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Immanuel Wallerstein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
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Immanuel Wallerstein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0

现代世界体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Immanuel Wallerstein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1

现代世界体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Immanuel Wallerstein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2

现代世界体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Immanuel Wallerstein

现代世界体系

第四卷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现代世界体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目录

-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
-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1730~1840年代](#)
-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
世界经济的起源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杰出教授，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等数十项学术职务。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和《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
世界经济的起源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ith A New Prologu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2011 ©Immanuel Wallerste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沛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朱云汉 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汝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汪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春声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罗志田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

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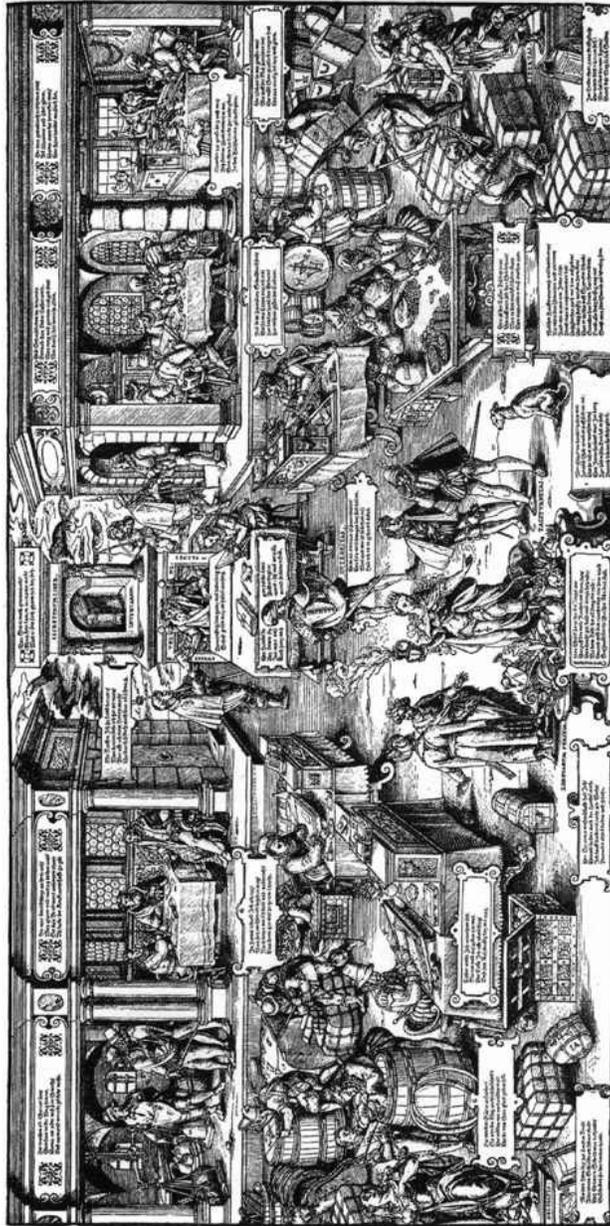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生于纽约。1954年和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58~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1976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1976年起，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1993~1995年任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1994~1998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2000年起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沃勒斯坦著述颇丰，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30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2011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4卷本。其他著作有：《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 1983*）；《世界经济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1984*）；《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9)；《知识的不确定性》
（*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2004）等。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
导论》（*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004）；《欧洲的普
适价值：权力的话语》（*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2006）。



卷首插图“贸易的寓言”

Jobst Amman (1539-1591) .

“贸易的寓言”，阿曼 (Jobst Amman) (1539~1591)，他生活在纽伦堡 (Nuremberg)。他是“小师傅” (Little Master) 之一。在底部细节图中描绘了纽伦堡

一个商人的大厅，它仍然是跨欧洲贸易的一个繁荣的中心。

2011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1]

《现代世界体系》是1974年出版的，实际是在1971~1972年写作的。在为其寻找出版商时，我费了一些周折。这本书是有关16世纪的历史，它研究的是一个当时还几乎不为人知的论题：一种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我拼写时有意加了一个连字符。该书的篇幅冗长，而且附有大量有实质内容的脚注。当它出版后，一位不太友好的评论者抱怨，脚注爬满了页面。最终，学术出版社（Academic Press）和它那时的学术顾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决定冒险一试，将它列入他们新出版的社会科学系列丛书。

它出版时受欢迎的程度令所有人，尤其是令出版商和作者感到意外。它受到《纽约时报》的“周日图书评论”专栏（在头版）和《纽约图书评论》的好评。1975年，它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最优秀学术出版物奖，当时这个奖项被称为“索罗金奖”（the Sorokin Award）。获得这个奖非常出乎意料，我甚至都未能出席颁奖大会。该书很快被翻译成多种其他文字。就一本学术专著而言，它的销售也非常之好。从任何标准来衡量，它都是成功的。

不过，它也很快就被证明是一本引发很大争议的书。尽管它获得很好的赞誉，但却同时也是被激烈指责的对象，这些指责来自许多不同的阵营。在最初出版的37年之后写作序言，我认为值得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这些批判从何而来？到今天，它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有效性？我自己现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批判的有效性？这些批判又是如何影响我以后几卷书的写作？

开始回应之前，我须说明一下这些批判背后的一个未曾言明的特定背景。从专业上说，我是一位社会学家。对许多人而言，这本书似乎是一部经济史方面的著作。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并不被认为会对写作16世纪的历史或对经济史学家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对来自大学其他学科的入侵者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当他们几乎完全依赖所谓的二手资料来写作的时候，就像我这样。进一步而言，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全球的空间关系，这被假定为地理学家的研究范畴。最后，在本书的早期爱好者当中有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群体：一些考古学家。因此，我似乎是在反对那时对各种学术研究做出分类的学科划分，而未落入在知识结构中通常被明确规定的框架。

首先应该介绍一下在写作本书时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本书的导言中，我解释了我是如何写作它的。当时我有一个糟糕的想法，即通过研究在16世纪“新兴的”国家是如何“发展”的，也许能更好地理解20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之所以是一个糟糕的想法，是因为它假设所有国家都将遵从相似的演进路线，有时被称为“发展”。不过，这种糟糕的想法也有意外收获。它使我能够解读16世纪的西欧，将我的注意力转向一些我未曾预料到的史实。

那时，在我的思想中主要是要反驳韦伯学派的社会学——不仅反驳韦伯本身，而且反驳1945年之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社会学对他提出的许多范畴的应用。韦伯论新教伦理的著作在1945年以后的时期被广泛解释为，某些类型的价值观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那时，通常的学术研究程序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考察这种价值观是否存在或将要存在。结果，就是构建了一种进步过程的编年时间顺序。哪个国家是最先进步的？哪个国家是接着实现进步的？哪个国家是现在将要实现进步的？作为一个衍生问题，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进步现在必须做什么？

我试图从几个方面对这种解释方法提出质疑。首先，我坚持认为，这种进程不能逐国地做出考察，而只能在一个较大的范畴内去考察。这个范畴，我称之为一种世界体系（“世界”一词并不是“全球”一词的同义语）——这里我用的是“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表述的那样。

其次，我提出，所涉及的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我提出，只有通过将各个国家置于它们彼此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财富积累方面成为领先者。

最后，我反对1945年之后韦伯学派所强调的主要对立关系，即现代同传统的对立关系。相反，我赞同像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所谓依附论者（dependistas）不断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和“现代”一样都是近代的产物，两者是一前一后出现的。因此，我们能够用弗兰克著名的说法谈论“低度发展的发展”。^[2]

我预想会受到1945年之后的韦伯学派的指责。但他们只是不接受我所论证的观点，一般还是会大体有礼貌地听取我的论证，尽管他们似乎认为我是在重提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相信后者已经被严肃的学者所抛弃或应该加以抛弃）。我认为，他们是对下述事实感到惊诧，即我是真的在埋头钻研16世纪的历史，而他们中许多人只是简单地依赖对韦伯命题的简单化总结（有时是曲解）来对20世纪的材料做出解释。进一步而言，正如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和我在此后不久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这种所谓的由现代化理论专家所做的比较分析，大多是将有关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当代数据同假设的（而不是通过经验研究获得的）有关美国（也或许是某个西欧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3]

尽管如此，但是最重要的攻击来自其他方面。有三种主要类型的批

判。我也将这些批判视为主要的批判。这些批判，反对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理由在于它同他们的分析方法不一致，而他们认为他们的方法明显更胜一筹。还存在一些我认为次要的批判。这些批判，是由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世界体系分析合法性的人提出的。他们反驳我所做的详细历史描述的根据是说我对某些重要经验资料的叙述或解释是错误的，或者说我忽视了某些重要的资料。还有第三种类型的批判，它们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他们试图通过去掉连字符和复数来修正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即坚持认为，在过去5000年一直只存在一种“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让我们依次地考察这每一种类型和亚类型的批判。

主要的批判

如果说1945年之后的韦伯学派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我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恰恰相反，是“新斯密主义者（neo-Smithian）”。^[4]就这里所言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指的是某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即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由苏联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由大多数托洛茨基派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在他们的政治发展战略上和他们对20世纪各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解释上，这些政党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别，但他们确实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前提。第一个是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性质，他们将它界定为本质上是在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商（主要是工业企业家）之间展开的。第二个是有关经济基础相对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而言具有首要性。第三个是有关在因果解释中内部因素（即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那些因素）相对外部因素（即在一个国家外部产生的那些因素）而言具有首要性。第四个是有关进步的必然性，即沿着一种由不同的所谓生产方式组成的序列做必然性的演进。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是，世界体系分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违背了所有这些前提。但这种指责，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分析的合理性。在提及《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时，这些批判者论证，我提出的是他们称之为“循环主义”的论证，而我应该根据在生产领域发生的现象来解释问题。那就是说，当我在讨论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时，我忽视用英格兰内部的阶级斗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赞成将之归因于某种被视为外部的因素，像美洲和西北欧之间贸易流动的特性。

当然，直接的问题是对于什么而言的内部性或外部性？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内部性一直被界定为一个国家政治边界内部的因素。“经济”是国家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阶级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正是国家能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的。这场争论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争论过程中，我提出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替代性观点。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一种我称之为“世界经济”的特定类型的世界体系。国家结构是在这种世界体系中存在的。

来自这个阵营对我提出批判的人非常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不过，在这些年中，他们在数量上变得越来越少。这与其说是同我著作的影响有关，不如说是由现代世界体系中不断变化的情势造成的。至迟到20世纪60年代，持有这种观点的政治运动受到构成1968年世界革命的各种力量的深刻挑战。由于一些强大运动的兴起，他们被迫转入防御地位，这些运动在分析社会现实时坚持强调性别、民族、种族和性的重要性。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做出的反击和一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他们同样被迫处于防御地位。作为结果，在今天仍然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所持传统分析方法的人，相对已经很少。

还有来自被我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最后一道防线的思想立场的批判。这些批判者来自被称为“多种生产方式互相联系”的思想流

派，在20世纪70年代曾非常有影响。^[5]在我看来，这个学派所做的是承认下述论点，即人们不可能仅仅在一个单一国家的限度内来分析社会现实。他们看到了在世界体系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尽管他们避免使用那种说法。从本质上看，他们所做的修正是提出，尽管一个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的，而另一个国家仍然是封建制的，但它们却以特定的和重要的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他们指出，两种生产方式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因此每种生产方式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影响。

我认为，这种折中方法既不令人信服，也没有给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能力增添任何重要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在流行了十年左右之后，这个学派已经销声匿迹。我想不出在今天还有谁在继续利用这种框架进行分析。

另一个对世界体系分析持非常敌视态度——几乎完全敌视——的学派是由传统的、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对他们而言，当他们确实愿意关注它时，往好里说是新闻写作，往坏里说是意识形态论述。总之，他们轻蔑地否定了世界体系分析。他们甚至不屑对它做出讨论，除了当他们被邀请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申请的匿名评委的时候。

他们蓄意的忽略掩盖了一种忧虑。这个学派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是危险的，正像他们将正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是危险的一样，尽管那是出于非常不同的理由。他们确实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岌岌可危的情势。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ell）最近正确地指出，我的书

实际上是从历史方面反驳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较优势规律”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最初在各种社会和经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多么的小，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平等程度被不断加剧，以致产生在今天被委婉地称为“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巨大差别。^[6]

由于李嘉图所揭示的规律实际已经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的和决

定性的前提，所以我的论点受到这个阵营如此负面地对待，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不过，由于世界体系分析在知识圈中获得的影响力，这个研究普遍性规律阵营中的一些人确实开始提出一些分析，意在从经验上反驳由我们提出的、被他们视为异端的假说。这些批判者特别渴望揭示，世界体系分析并未能解释在当代世界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也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比其他欠发达国家更能改善其境遇。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来自这个阵营的反对同样顽固，而且影响也许会更为持久。

还有第三种主要的批判。它来自自我视为新欣策主义（neo-Hintzian）的学派。奥托·欣策（Otto Hintze）是一位德国的政治史学家，他被认为在其著述中证明了政治领域相对于经济领域而言具有自主性。我遭到了两种主要的批判，[\[7\]](#)他们都特别援引欣策的观点作为论据。他们都指出，我错误地将政治和经济两个分析领域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领域，实际赋予了经济领域以首要性。

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对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仅仅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制度。尽管我试图在随后的几卷，尤其是第二卷，详细地说明这种将两个领域分割开来的错误，但这种批判已经表明它继续存在下去的能量。在今天仍有许多人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太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他们的意识中，这样说通常就是指它太过于“倾向马克思主义”。

总之，新欣策主义者对奥托·欣策的忠诚并不比新韦伯主义者对马克思·韦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卡尔·马克思，或斯密主义者对亚当·斯

密的忠诚程度更高。就奥托·欣策而言，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发表于1929年）中，他对他的观点做了这样的总结：

总而言之，战争年代和随后的十年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证明它可以完全脱离国家和政治。相反，它们证明，国家事务和资本主义事务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仅仅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或部分。^[8]

当然，这正是我在努力表述的观点。

最后有来自“文化”阵营的批判，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在分析文化阵营的兴起时，需要记住两件事。第一是传统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理论分析将现代生活分解为三个领域：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这反映在研究现代世界的三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上：关注于市场的经济学；关注于国家的政治学；关注于所有其他方面（有时被称为市民社会）的社会学。

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必然导致就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因果首要性问题展开争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普遍性规律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将因果首要性赋予经济领域。新欣策主义者含蓄地将它赋予政治领域。可以预期，也会有人将因果首要性赋予文化领域。

需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是1968年世界革命对理论争论的影响。对许多人而言，1968年所发生的是赋予经济因素以首要性阵营的最终失败（由此在思想上被否定）。在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对1945年以后世界的适用性所做的强有力批判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较早提到“意识形态的终结”。^[9]1968年以后，一个新的学派开始着手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批驳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要求做概念上的“解构”，宣称“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或“总体叙事”的终结（和无益性）。^[10]他们大体是在说主张经济因素具有决定作用的阵营，尤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忽略了话语在社会现实演进中的中心作用。

此时还有另外一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他们非常正确地指责后者忽略那些同性别、民族、种族和性相关的因素，而赋予阶级斗争和“革命”以首要性，其中革命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

我由于没有加入这个阵营而受到指责。^[11]当这个学派谴责宏大叙事时，他们往往把世界体系分析纳入到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同样的范畴之中，尽管事实上世界体系分析已经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做出过几乎相同的批判。我们拒绝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起泼掉。

这种文化主义批判的命运是同整个“文化研究”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阵营在逻辑一致性上存在着致命缺陷。一部分人主要关注于坚持文化的首要性地位，确实也是在维护知识分子特有的利益。但另一部分人却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即那些在以前的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群体。随着后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实际上也对宏大叙事感兴趣，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1968年之前时期所运用的宏大叙事，这个联盟走向解体。这个群体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由三个问题共同组成的对象：性别、种族和阶级；或阶级、性别和种族；或种族、性别和阶级。一旦这种新的三合一研究在大学中被普遍推广，一些主要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的人就会停止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指责，并开始寻求能够同后者达成一致的方法，或对它做出修正以使它能够更多地考虑到他们优先关注的对象。^[12]

自1974年以来的这个时期，这些主要的批判都已经提出。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批判提出者中的许多人已经销声匿迹，尽管还有一些人仍在重复着相同的批判。但这些主要的批判已经众所周知，已经变成有关世界体系分析讨论的背景知识，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仅仅是当代世界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竞争性范式。而目前正是那些次要的批判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次要的批判

次要的批判以三个不同的问题为中心：现代世界体系的空间边界、现代世界体系的时间边界，以及需要考察的制度变量。《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它试图确立的空间和时间边界，但相关的制度变量究竟包括哪些也许没有交代清楚。

让我们首先从空间边界开始谈起。本书的论点在于，存在着实际的边界，据此能够区分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内部和外部。我主张，在这些边界的内部，人们能够划分出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不过，第六章专门考察了在这些边界之外的地区，我称之为外部竞争场。我试图确定人们怎样才能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和外部竞争场之间做出区分。

基本的论点在于，人们能够区分出大宗物品的贸易和贵重物品的贸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基于不平等的交换。稍后，我试图进一步详细地论证这种区分。^[13]运用这种区分，我提出了特定的边界划分。在16世纪，波兰和匈牙利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不在该范围之内。巴西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印度次大陆在体系之外。

对这些经验论断有两种质疑。一种是提出，在大宗物品贸易和贵重物品贸易之间的区分要比我认为是更为模糊，因此这种区分不可能被用于确立体系的边界。另一种质疑非常不同于第一种。它提出，一些被断言在体系之外的地区事实上在从事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某些地区的大宗物品贸易，因此以我的区分标准为基础，它们应该被视为在体系的边界“之内”。

对我称之为主要批判的攻击，我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目前，我仍然拒绝承认这些对世界体系分析批判的合法性。但对有关空间边界的

批判，我从一开始就指出，我愿意仔细听取经验论证，当它们变得足够强有力时，我愿意对经验论点做出修正。汉斯·海因里希·诺尔特（Hans-Heinrich Nolte）长期以来一直论证，在16世纪，俄国像波兰一样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14]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论证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但他似乎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证。^[15]不过，在更晚的时候，法鲁克·塔巴克（Faruk Tabak）提出了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论证来说明，在16世纪，人们为什么应该将整个东部地中海地区（基本上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视为现代世界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6]

就大宗物品贸易和贵重物品贸易之间的区分，批判者做出各种尝试来反对这种区分的有效性。^[17]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种很难做出的区分。尽管强有力的批判促使我更细致地推敲我的观点，但我仍然认为我的基本观点是合理的。但无论如何，正如我稍后指出的，^[18]即使我必须承认说到底什么构成“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但在体系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外存在某些地区的观念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思想，尽管这些地区同体系存在着某种贸易关系。它为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开始时在范围上并不是全球性的，后来（在19世纪中期）如何变成全球性的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就空间边界做出理论和经验上的探讨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时间边界问题甚至更难解决。许多稍后做出次要批判的学者试图将现代世界体系开始的时间向前推到13世纪。^[19]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20]她试图在同欧亚大陆许多不同地区建立的贸易联系的背景下考察13世纪的欧洲，以对如何解释欧洲在16世纪的“兴起”提供一种稍稍不同的解释。

这种有关时间边界的争论大部分都聚焦到有关欧洲封建制度性质的争论上。我从根本上在两种封建制度之间做出了区分。我认为，“第一种”封建制度（中世纪欧洲的）是我们通常所意指的封建制度一词，“第

二种”封建制度是16世纪的，我并不认为它是指带有强制性的生产商品作物劳动的正确名称。我自己后来承认，第一卷中最薄弱的一章是第一章“序幕在中世纪拉开”。在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和资本主义的书中，我撰写了相当于对那一章做出修正的一章。[\[21\]](#)

在我看来，这里的基本问题在于，并没有哪种宏观的理论框架能够对欧洲封建制度的性质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制度通常被认为在1000~1500年间达到其鼎盛时期。一些分析家将它视为某种类型的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将现代世界体系开始的日期前推，以将这段时期包括在它的时间框架之内。其他学者则将它视为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制度，由此将资本主义开始的日期后推到被更广泛公认的现代世界开始的日期，即1800年前后。[\[22\]](#)

我自己的观点认为，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最好被界定为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帝国，它由罗马天主教会非常勉强地结合在一起。当然，正如我在本卷书中所表明的，我确实相信，在其内部存在着一些试图将它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力量，但未能获得成功。我视为是失败的尝试，其他一些人却视为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

我认为关键是要明白，创建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试图解释使这种世界经济成为可能的一些特殊条件。[\[23\]](#)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中，我试图解释这种脆弱的开端是如何在17世纪得到巩固的。我并不将17世纪视为一场“危机”，它导致向“封建制度”的某种回归，而是将它视为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我相信，正是这种巩固最终使体系的进一步扩张成为可能，无论是从强度看，还是从广度看，均是如此。

因此，尽管在面对这些次要的批判时我最终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让步，但我仍然坚信我对现代世界体系开始时期所做的空间和时间边界的界定基本上是正确的。

也许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度变量在第一卷中未能得到充分的阐明，我把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确定在何种意义上说在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现象在性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尽管工业还只是整个生产机构中一个小的组成部分，但我坚持认为人们不应过于集中关注农业。确实，雇佣劳动仍然只占劳动力获取报酬方式中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我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并不仅仅包括雇佣劳动。尽管如经典作家所界定的那样，资产阶级似乎还是一个相对小的集团；但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看到，贵族正在将自身转化为资产阶级。这就是我尝试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所做的全部修正所在。自1974年以来，我已就所有这些论题进行了广泛论述，就目前而言，我在《世界体系分析：导论》^[24]中对我的观点给出了简明的总结。

在1974年以后的时期，我被质疑忽略了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军事领域和环境领域。所有这些批判者都坚持认为，我的分析框架太过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我忽略对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研究的批判，我已经讨论过我的观点。这里只提示，我试图在第二卷中更清楚地阐明我对政治领域的理解，在第四卷，以及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25]中阐明我对文化领域的理解。

迈克尔·曼（Michael Man）和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都指责我忽略了军事领域，尤其是忽略了军事技术的重要性。^[26]我认为这种指责是非常不正确的。在本卷和随后几卷的各处，我谈到了军事技术和它的作用。但一般而言，我认为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他著名的论断“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所表述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人们就应该谨防在分析中赋予军事领域以太多的自主性。^[27]

最后，我被批判忽略了环境领域。^[28]最初我想说，我确实没有打算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我被贾森·摩尔（Jason Moore）所做的并未直言

的辩解所拯救，他通过仔细阅读第一卷，揭示了我已经将环境因素和它们在建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纳入到我的分析，而且指明它们对我的分析发挥着中心作用。^[29]事实上，我对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感到惊讶。

对我在第一卷忽略了各种制度变量的指责，最好的回答就是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所有方面的研究。我认为，通过阅读我的主要著作，一个理性的人将会看到我忠实于我的认识论前提的程度，即只有一种真正的整体主义分析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现实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重要知识。

对世界体系的修正派观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一个重要的学派，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被严重忽视了，这导致一种对世界的非常扭曲的认识。一些学者强调中华世界从15世纪到今天的持续存在。^[30]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和西欧之间所做的经济比较错得太过离谱。^[31]

不过，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则更进一步。他早期参与了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论建构。他本人写的著作论证了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6世纪。^[32]不过，到20世纪90年代，他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他自己写作和他同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合写的著述中^[33]提出了如下假设，即世界体系（唯一的世界体系）起源于大约5000年前。他坚持认为，能够运用世界体系分析的许多基本工具来对这种世界体系做出分析，诸如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同时存在的各种长波。

他不仅希望坚持这种单一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同时他还希望坚持，中国一直是（或几乎一直是）这种单一世界体系的中心。他认为，欧洲“兴起”的时间只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部分时间，并将它视

为是这种以中国为中心体系的暂时中断。他指出，我们中的那些论证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欧洲——不管是在16世纪还是更早——的人是犯了欧洲中心论的错误。这一指责的对象不仅包括费尔南·布罗代尔和我，而且包括马克思和韦伯。

他的主要著作《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获得了广泛的阅读和讨论。他在世界体系分析阵营中的三位同事——萨米尔·阿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我——都在《评论》（*Review*）杂志的一期特刊中写了长篇文章来批评该书。^[34]我自己提出的批评以三个问题为中心。第一，我认为，弗兰克的论点基本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论点相同。不像世界体系分析的其他著作，它才真正配得上“循环主义”的称号。

第二，我认为，他对西欧和中国在16到18世纪关系的经验分析主要是基于贵金属的流量，但正是运用弗兰克提供的数据能够证明他的分析是不正确的。进一步而言，我试图表明，弗兰克较早期的经验分析——我认为是基本正确的——证伪了他在新近研究中提出的论点。^[35]

不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的分析模式将资本主义从整个历史图景中排除了出去。我已经论证，16世纪标志着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弗兰克或任何其他人都绝不可能论证资本主义可以前推5000年。它取消了这个词的所有意义。弗兰克实际上也承认这一点，他指出，他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用的学术概念。

就这种世界历史的中国中心观而言，最后一个问题在于，弗兰克在整个分析中赋予印度一种模糊的作用，它似乎有时被包括在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有时又被排除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通过将他对印度近代史的分析置于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背景下，阿米亚·巴格奇（Amiya Bagchi）最近写的一本书揭示了这种模糊性。^[36]

这种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根本修正是否将在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尚不清楚。也许它将取决于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在未来几十年的演变。

结论

就我而言，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是一次伟大学术探险的开始。从那时起，它在许多方面就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中心所在。我目前已经完成了第四卷。正如我在那一卷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至少还有两卷待完成，甚至也许还有第七卷。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完成所有这些卷的写作工作。下述事实也许可以作为补救，即我已经写作了许多论文，它们包含了将在第五和第六卷书中所使用的材料。因此，我发表的有关1873~1968年和1945~20??年的研究成果都能够查阅到。但写作论文和建构一种系统的叙述是两回事。我希望能够完成后一种工作。

无论如何，我确信——我怎么可能不呢？——在克服19世纪社会科学狭隘的范式上，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一份详细的学术计划中所指出的那样，它既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新的范式（即使其他人认为它两者都是），而是“呼吁对一种范式展开争论”。^[37]在提出这种呼吁上，第一卷仍然是原创性的和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1] 2011年英文版序言和封底文字由吴英翻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 Andre Gunder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XVIII, 4, Sept. 1966, 17-31.

^[3] Terence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Review*, 1, 2, Fall 1977, 111-146. (Reprinted in T.K. Hopkins,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associates,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1982, 41-82].)

[4] Robert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 1977, 25-93. Maurice Zeitlin, *The Civil War in Chile, O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That Never We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8) .

[5] Harold Wolpe, *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See also Barry Hindess and Paul Hirst,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

[6] Stephen Mennell, “Sociology”, in W.H.McNeil et al., eds.,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Great Barrington, Massachusetts: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2005) , IV, 1746.

[7] Theda Skocpol,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XXII, 5, Mar. 1977, 1075-1090. (Reprinted in Theda Skocpol,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4, 55-71].) Aristide R. Zolberg,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 Missing Link”, *World Politics*, XXXIII, 2, Jan.1981, 253-281. (Reprinted in Aristide Zolberg, *How Many Exceptionalisms: Explorations in Comparative Macroanalysis*[Philadelphia: Temple Univ. Press, 2009, 132-157].)

[8] Otto Hintze,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elix Gilbert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5) , 452.

[9]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2000; first published in 1960) .

[10]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2000; first published in 1960) .

[11]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2000; first published in 1960) .

[12] Ramon Grosfoguel, special ed., special issue of *Review: Utopian Thinking*, XXV, 2, 2002. Walter D.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2000) ;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 Colonization*, 2nd edition, with a new afterword (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2006) . See also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1991) .

[13]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1840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9) .

[14] Hans-Heinrich Nolte, “The Position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Early Modern Times”, *Review*, VI, 1, Summer 1982, 25-84.

[15] Frederic C. Lane, “Chapter 8, Economic Growth in Wallerstein’s Social Systems, A review Article”, *Profits from Power: Readings in Protection Rent and Violence-Controlling Enterprises* (Albany: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1979) , 91-107.

[16] Faruk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 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8) .

[17] Jane Schneider, “Was There a Pre-Capitalist World-System? ”, *Peasant Studies*, VI, 1977, 20-29. (Reprinted in 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Thomas Hall, eds.,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recapitalist World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1, 45-66].) Thomas D. Hall, “Incorpo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 Toward a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LI, 3, June 1986, 390-402; *Social Change in the Southwest, 1350-1880* (Lawrence: Univ. of Kansas Press, 1989) .Christopher Chase-Dunn,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Economy*, 2nd revised edi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

[18] Terence Hopkins, Immanuel Wallerstein, Resat Kasaba, William G. Martin, and Peter D. Phillips, special eds., special issue of *Review: Incorporation into the World-Economy: How the World-System Expands*, X, Nos.5/6 (supplement) , Summer/Fall 1987.

[19] Fernand Braudel, *Out of Italy : 1450-1650* (Paris: Flammarion, 1991) ;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Vol. III of *Capitalism & Civilization*, 15th to 18th Centur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Verso, 2010; first published 1994) .Eric Mielants,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 Press, 2008) .See also Oliver Cox,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

[20] 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9)

[21]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West,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 T. Brook and G.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2, 10-56) .

[22] Perry Andersons,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New York: Verso, 1974) .Alex Dupuy and Paul Fitzgerald, “Review Essay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World-Systems

Perspective”, *Critique Sociology*, VII, No.113, 1977, 113-124. Steve J. Stern,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World-Syst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CIII, 4, Oct. 1988, 829-872. Immanuel Wallerstein, “AHR Forum: Comments on Stern’s Critical Test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CIII, 4, Oct. 1988, 873-885. Steve J. Stern, “Reply: ‘Ever More Solita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CIII, 4, Oct. 1988b, 886-897.

[23]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West,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24]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 Press, 2006) .

[25] 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1) .

[26]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B.Blackwell, 1988) .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2) .

[27] See also Giovanni Arrighi,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thinking the Non-Debates of the 1970s”, *Review*, XXI, 1, 1998, 113-129.

[28] Sing Chew, “For Nature: Deep Greening World-Systems Analysi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III, 3, 1997, 381-402. (Available at <http://jwsr.ucr.edu/archive/vol3/v3n3a2.php>.)

[29] Jason W. Moore, “‘The Modern World-System’ 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ory & Society*, XXXII, 3, June 2003, 307-377.

[30] Takeshi Hamashita,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 No.46, 1988, 7-25.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New York: Verso, 2007) .

[31]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2000) .

[32]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 *Mexico Agriculture, 1521-1630;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8; first published 1979) ;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first published 1978) .

[33] Andre Gunder,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Five Thousand Years of World System History”, *Review*, XIII, 2, Spring 1990, 155-250.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500 Years or 5000?* (Lanham, Maryland: Routledge, 1996) .

[34] *Review*, “ReOrientalism?” XXII, 3, 1999.

[35] Andre Gunder Frank, “Multilateral Merchandise Trade Imbalances and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2, Fall 1976, 407-438.

[36] Amiya Kumar Bagchi, *Perilous Passage: Mankind and the Global Ascendancy of Capital*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

[37]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Itinerary of World-System Analysis; or How to Resist Becoming a Theory”, in J. Berger and M. Zelditch, Jr., *New Direct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 358-376.

正是领主收入的危机终结了中世纪并开启了现代的时代之门。

——布洛赫

(MARC BLOCH)

实际工资等级（在欧洲）的崩溃构成了16世纪相对应价格的革命性上涨。这种运作是以工作更加辛劳、艰苦、贫穷和大多数人的沮丧为其全部代价的。当代人普遍的感觉是情况越来越糟了。

——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与斯普纳

(FRANK SPOONER)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马克思

(KARL MARX)

- [谢辞](#)
- [导言 论社会演变研究](#)
- [第一章 中世纪的先驱](#)
- [第二章 欧洲的新型劳动分工：约1450~1640年](#)
- [第三章 绝对君主制与国家主义](#)
- [第四章 从塞维利亚到阿姆斯特丹：帝国的失败](#)
- [第五章 强大的中心国家：阶级形成与国际商业](#)
- [第六章 欧洲的世界经济：边缘地区与外部竞争场](#)
- [第七章 理论的重述](#)
- [参考文献](#)
- [索引](#)

谢辞

要列举出在计划和写作一本书时所得到的想法和协助的直接来源——从著者、同事和学生那里——总是困难的，特别是在这样一本试图综合他人的经验性工作的书中更是如此。很大的危险是忽略。

就这卷书而言，两位写了多卷著作的作者最直接地激励了我决定最终所走的道路，他们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

每当我写完一份草稿，布罗代尔就仔细地阅读它，并在我需要恢复信心时给我鼓励。蒂利（Charles Tilly）也仔细地阅读了它，并借由提出中肯的问题，促使我解释清楚我的论证。在有关国家权力和“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一般作用方面特别是如此，还有它特有的对产物垄断现象的相反观点。我感谢多德（Douglas Dowd），他使我了解了莱恩（Frederic Lane），因为莱恩是非常值得了解的。

至于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我从我们二十年来在知识上的讨论和共同工作中获益良多。这种获益是无法用语言来概括的。

这本书是我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逗留的一年中写作的。无数的作者，为它唱过赞歌。除了绝佳的环境外，无条件的图书馆和秘书方面的协助，有各种学者可供随时请教，中心提供的这一切可使学者们为所欲为，不管是好是坏。但愿所有的人都如此明智。最后的定稿是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系的社会学奖金委员会的帮助下完成

的。



导言插图“查理五世洗劫罗马”

约1535年出版书中插图。London British Museum.

“查理五世（Charles V）洗劫罗马（Rome）。”一本论述“帝国的行动和预测.....”的书，约在1535年左右出版于斯特拉斯堡（Strass-bourg）其中的木刻插图。这幅木刻纪念了这个使教皇（Holy Father）在政治上依附于神圣罗马皇帝，并使查理成为意大利无可竞争的霸王的事件。

导言 论社会演变研究

变化是永恒的。无一事物恒变。这两个老生常谈都是“真理”。结构是生长在较长时期内固有的人类关系上的珊瑚礁，但结构本身也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演变研究作为全部社会科学的同义词的话，那么它的含义应限于对最持久的现象的演变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当然“持久”的定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点也有变化。

世界社会科学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若干大分界线。其中一个虽然只有少数社会科学家从事研究，但毕竟受到普遍的承认，它就是所谓的新石器革命或农业革命，另一个大分界线是现代世界的建立。

后者既是19世纪也是当今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毫无疑问，人们曾就“现代”的特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界线的划分标准）争论不休。非但如此，对这一变化过程的动力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人们似乎已经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世界曾发生一些重大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使今天的世界与昨天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那些反对突变进化论的人，也不否认这种结构上的差异。

如欲描述这种“差异”及其原因应以什么为单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今许多重大理论分歧概源于这一争论。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的大难题。因此，若要写一部旨在分析现代世界变化过程的著作，首先应交代作者概念探索的思想脉络。

起初，我的兴趣在于探索我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政治斗争的社会基础。我以为，通过理解这一斗争的形式，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可以为塑造那个社会作出贡献。结果我卷入了两大争论。一个是“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阶级斗争史？”换言之，阶级是社会和政治舞台上唯一重要的行动单位吗？或如韦伯（Weber Max）所云，阶级不仅只是存在，而且其相互作用足以说明政治进程的三位一体——阶级、阶层群体和政党——中的一员？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自己的偏见，但像在我之前的其他人一样，我也认为，很难说清这些词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我越来越认为，这是一个观念的而不是经验的问题。至少在我的头脑中，我觉得要解决这场争端，必须把诸问题放在更大的思想背景中来考察。

第二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与第一个密切相关，即在一个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存在或实际存在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假设这种一致性存在，它的展现或消失又实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说这一争论与第一个争论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只有当人们否认市民社会斗争的原发性时，这个问题才会产生。

当然，价值观念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且我对不厌其烦地进行有关价值的理论探讨感到不安，这种探讨似乎经常既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又有伤公众感情。但人或群体显然要以意识形态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而且，这一点似乎也很明显：只有当群体具有自我意识，即拥有共同语言和共同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时候，他们才变得更加团结，并因此更有政治作为。

我曾把进行经验考察的地区从我自己的社会转移到非洲，我寄予的希望是，通过揭示那些后来被我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所证实的各种理论，或者通过到遥远的地区去考察一下本来会忽略的问题，使自己的感觉敏锐起来。我寄望于前者，但实际收获却是后者。

我第一次去非洲是在殖民年代，因此我目睹了“殖民化”过程和随后

发生的主权国家独立的浪潮。作为一名白人，我也承受着人们对长期居住在非洲的欧洲人的殖民意识的强烈谴责。但作为一个民族运动的同情者，我也暗自分享年轻的非洲运动战士的激愤而乐观的情绪。不久我就发现，这两个群体不仅在政治问题上有分歧，而且已经到了具有截然不同的观念框架的地步。

总之，在深刻的对立中，被压迫者对时局的看法比较尖锐，因为为了暴露统治者的虚伪，公正地看待社会恰恰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不大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非洲的情况正是如此。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生活在“殖民局势”中，在这里，他们的社会行动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但身为行政官员、传教士、教师、商人的欧洲人的社会行动，都由一个法律与社会实体的种种强制性规范所决定。他们进而认为，政治机器是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均取决于种族。

非洲民族主义者决定改变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这种政治结构。关于这一点，我在别处已经述及，这里毋庸赘言。这里需要指出的只是，我借此了解到，作为抽象体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限于作为经验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中。有些人以“部落”之类的组织为单位，在分析其运作时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殖民形势下，“部落”的统治机构谈不上什么“最高权力”，它们受制于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法律（和习惯），这个实体就是殖民地，“部落”的统治机构只是这个实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这些人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由此我得到一个更加广义的结论：目前对社会组织所进行的研究总的来说都有缺陷，因为人们普遍忽略了这些组织及其成员活动于其间的法律和政治框架。

我曾试图揭示殖民形势的基本属性，并描述我视为属于其“自然的历史”的事物。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必须抓住世界体系固有特征中的某些要素。于是，我把自己的分析限定在19和20世纪欧洲海外殖民地的殖

民制度运作方式。掌握了这一固有特征，我以为便可以就下列问题做出大体得当的描述：殖民当局的强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反抗殖民当局的行为动机和形式；殖民政权维持统治并力图使其合法化的手段；能在这种框架内活动的种种势力的矛盾性；导致人们结为向殖民统治挑战的组织的原因；反殖民运动发展并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结构因素。在做这一切时，分析的单位都是执政当局法定的殖民区域。

我对这些在独立后成为“新国家”的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同样怀有兴趣。既然对殖民地的研究似乎以既存政治秩序的崩溃原因为中心，那么对独立后时代的研究似乎以相反的问题为中心，即合法的权威是如何建立的？民族统一体成员意识又是如何在公民中传播的？

但对上述后面那两个问题的研究遇到了困难。首先，研究独立后的亚非国家的政治似乎是一个追踪报刊标题的过程，因此必然缺乏历史的深度。再者，还有拉丁美洲这个棘手的问题。那里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似乎与亚非洲相类似，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把这三块大陆视为“第三世界”。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已有150年之久。它们的文化与欧洲传统比与亚非文化联系更密切。这项研究工作堪称举步维艰。

为了找到一个适当的分析单位，我转向那些“处于形式上已经独立但又无法称为民族整体时期的国家”。按照这种界定，迄今一切时期或几乎一切时期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拉丁美洲国家都包含在内。但是它显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地区。例如，它包括美国，至少内战前的美国。它肯定包括东欧，至少20世纪以前的东欧，甚至可能包括当今的东欧。它甚至还包括西欧和南欧，至少包括它们的早期。

按照这一逻辑，我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现代早期的欧洲。这使我首先遇到了这个过程的起点问题。这一过程因没有更好的定义，我暂时称之为现代化过程。非但如此，除了考虑这个过程的起点之外，我还要考虑它的终点，否则我就得把20世纪的英国和德国作为同样社会过程的例

证也包括进去，而这样做显然难于把握，因此终点必须加以考虑。

于是，我必须涉及发展脉络和颇为含糊的发展阶段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提出两个新的问题：划分阶段的标准和跨阶段单位的可比较性。

曾经有过多少个阶段？可能存在多少个阶段？工业化是转折点还是某种转折点的结果？就此意义而言，类似法国和俄国那样的革命，其“革命”一词的经验含义是什么？这些阶段是单向发展的，还是某个单位会发生“倒退”？我曾经在这些概念的泥淖中跋涉。

况且，走出这个泥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合理的评估手段。怎么能说17世纪的法国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20世纪的印度呢？外行人会认为这样的说法简直荒诞不经。他们真的错了吗？当然，我们可以重复教科书中的老生常谈，即强调科学抽象的价值，但在比较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毕竟是一重又一重。

运用这种“荒诞”的思想——对两个如此不同的单位进行比较——的方式之一是，允许有不同意见，同时再加上另一个变量，即特定时代的世界背景，亦即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所说的“世界时间”。这就是说，虽然17世纪法国的某些结构特征与20世纪的印度相同，但从世界背景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是迥异的。这样一来，概念就变得清晰了，但与此同时，评估也变得更加复杂。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某些社会经历了“诸阶段”，亦即经历了“自然的历史”，那么世界体系本身又如何？它没有“阶段”或至少“自然的历史”吗？如果它有的话，我们岂非在研究演变内部的演变？倘若如此，这种理论不是正在周转圆内变得头重脚轻吗？它不需要大大简化吗？

我认为的确如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彻底抛弃了以主权国家和那个含糊概念——民族社会——为分析单位的思想。我认为，这二者都不是社会体系，而人们只能在社会体系内谈社会变化，在这种结构中，唯一的社会体系是世界体系。

当然，这使问题大大简化了。我只用一类单位，而不是用诸多单位中的单位。因此我可以把主权国家的变化作为世界体系演变和交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但这同时也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在现代，我可能只有一个这种单位的实例。假如我是对的，假如正确的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假如主权国家应被视为这唯一的社会体系中的一种组织结构，与其他组织结构并存，那么我除了写一部世界体系史，还能做什么呢？

我无意于写这样一部历史，我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应具备的感性知识（就其性质而言，没有人可能具备这样的知识）。但可能存在关于这个独一无二的体系的规律吗？严格说来当然不可能存在。论述因果关系或或然性，应以一系列类似的现象或事例为基础，即使要把将来可能发生或极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在这一系列现象或事例中，最好也不要将来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强加在过去或现在已发生的事例网络里，而应把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从古至今的事例系列。

历史上只有过一个“现代世界”。也许将来某一天会在其他星球上发现类似的现象，或在这个星球上发现新的现代世界体系，但目前在这个星球上，现实很清楚，只有一个。这使我感到它与天文学的相似之处，后者旨在解释支配宇宙的规律，虽然（就我们所知）只有一个宇宙。

天文学家是怎么做的？我认为，他们的论证逻辑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他们先通过研究较小的物质实体总结出一些规律，即物理规律，然后运用这些规律，并论证这些规律适用于（也许除了个别例外）整个体系中的类似事物。第二，他们采用后证法。如果整个体系将在某个时间具有某种状态，它一般在其他时间已有过这种状态。

这两种方法都有些不可靠。正因为如此，在研究整个体系功能的宇宙学领域内，某些知名的天文学家持截然不同的假说。在解释现代世界体系问题上，情形也是这样，而且这种状态可能要持续一个时期。其实，研究世界体系运转的学生比研究宇宙运转的学生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因为他们掌握更多的经验证据。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牢记洛赫尔（T.J.G.Locher）的名言：“人们切不可把整体与全体混为一谈，整体固然大于各部分的集合，但它肯定也小于各部分的集合。”^[1]

我特别注意在某种抽象意义上来描述世界体系，即从世界体系结构的演变方面来描述它。当我提及某些特别事件时，只是因为它们作为某种机制的典型影响了这个体系，或标志着某种重要的机构或制度的变革中的转折点。

这种做法当遇到存在大量感性材料，而它们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矛盾的时候可做适当调整。所幸的是，目前在研究许多现代史问题时似乎都是这样处理的。

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努力把研究结果加以量化。根据大量的历史研究不厌其烦地加以叙述，这本身并不等于量化。那么量化统计的根据何在？人们怎么才能够依据有关这样一个体系运转的材料得出可靠的结论？20世纪社会科学的最大悲剧就在于面对这一困难，占相当大比例的社会科学家退下阵来。他们似乎认为，历史数据模糊武断，因此靠不住。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因而避而不用。而回避使用数据的最佳办法是在阐述问题时运用数据却又不表示出来。

这样，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可行性就决定着研究课题的选择，这种选择导致人们形成某种固定的观念，而人们又是按照这种观念去解释和处理数据的。这显然与科学的程序背道而驰。应根据形成概念的需要

决定研究手段，而不是反其道而行，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量化的程度仅仅应该反映在一定时间、凭借一定手段、就一定问题所能达到的最大精确性。量化程度越大越好，因为它有助于说明为了形成概念所必然遇到的问题。目前在分析世界体系方面，我们所能达到的量化程度仍是有限的，但我们将尽力而为，争取有所前进。

最后还有一个客观和杜撰的问题。我不认为存在非杜撰的社会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达到客观性。这首先是一个明确我们的词汇定义的问题。19世纪，在批判充斥于以前历史著作中的不实之词的过程中，人们告诉我们，最高的理想是原原本本地写历史。但社会现实是转瞬即逝的。此时的存在，彼时就会消失。历史只能按今天认为的那样去讲述，而不能按其本来面目来讲述，因为重构过去是今人今天的社会行动，因此反映今天的社会体系。

“真实”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特定时间内，一切都不具有连续性，一切都是当代的，包括过去的事情。今天的我们毫无例外地都是我们的生活背景的产物，都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个性和社会角色以及我们活动于其间的结构压力的产物。这并不是说没有选择的余地。事实完全相反。社会体系及其所有下属机构，包括现代世界的主权国家，都是无数社会群体活动的场所，这些群体互相交往、勾结，更多的是互相斗争。由于我们都属于多个群体，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选择应该首先效忠的对象。学者和科学家也不能逃脱这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在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非学术性的、纯政治性的角色上。

毫无疑问，做一个学者或科学家就意味在社会体系中充当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角色完全不同于各个群体的辩护士。我并不想贬低宣传的作用，它是必要的、应该的，只是学者或科学家不应该那样做。后者的作用是在他所设计的框架内，识别出他所研究的现象的现状，然后根据这种研究找出普遍原则，最后再具体运用这一原则。就这个意义而言，

一切研究领域都是与现实“相关的”。为了正确理解今天的社会动力，必须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概括只能建立在对最广泛的、跨时空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

当我说现象的“现状”时，我并不是说，比如一个考古学家，明明认为他所发现的物品属于某一个群体，但为了增进某个政府的政治权力，偏要说它属于另一个群体。我是说，考古专业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现实的职能，社会对这一科学分支的投资、它的研究方向、概括方式、它概述和交流成果的形式，都离不开社会。相反的看法只能是自我欺骗。在这里，客观就是诚实。

客观性是整个社会体系的职能。只要这个体系是有倾向性的，一些研究活动就会集中在个别群体的范围内，其结论就会向这些群体“倾斜”。客观性的要求决定着社会在这种研究活动中的投资分配，这样一来，研究工作就能以均衡的方式由分属于世界体系中各个主要群体的人来从事。根据这一定义，今天我们没有客观的社会科学。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个在近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世界体系研究非常不准确，因为不可能找到参照系。它非常不准确的另一个原因是，论述世界体系将产生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对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主要角色来讲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此一来，这个领域内的学者和科学家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就格外沉重，这种压力以对他们的活动加以相对严格控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学者们由于方法论的困境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

但唯因如此，这种研究才变得非常重要。一个人理智地参与其体系演变的能力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感受力。我们越是感觉到这一任务的艰巨，就越需要及时动手。当然，这样做不符合所有群体的利益，但我们应履行我们的义务，它源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正因为 we 期待着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世界，所以必须了解它实现的条件。为此需要先

剖析过去世界体系的性质和演变过程，进而指出其今后的发展趋势。这种知识就是力量。在我设计的框架中，它是对代表世界大多数受压迫人民利益的群体来说最有用的一种力量。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开始努力对影响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虽然本书只是一个序篇，但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也需要几卷的篇幅。

我把本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至少在起始阶段我是这样计划的。每一部分将与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主要时期相对应。第一卷描述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早期状况，当时还只是欧洲的世界体系，其大体年代是1450~1640年。第二卷描述这一体系的巩固，年代大约是1640~1815年。第三卷描述世界经济受到现代工业技术变革的影响如何转化为全球企业。这一扩展是如此突然和巨大，以至世界体系实际上不得不重建。这个时期大约是1815~1917年。第四卷描述从1917年至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怎样得到巩固的，这一巩固又怎样引起了个别紧张的“革命形势”。

当代许多社会科学在乔装为社会心理学之前，都变成了研究群体和机构的学问，但本书并不研究群体，而是研究社会体系。一旦以社会体系为研究对象，以前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法便变得毫无意义。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划分，都是基于对国家及其与社会秩序的职能部门和地方部门的关系的一种含混概念，若以机构为研究中心，这种划分还有一定意义，若以社会体系为研究中心，它则变得没有意义。我并不主张对社会体系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是主张建立一个特殊的学科。我希望本书的实质内容将有助于读者理解我这番话的含义和严肃性。



第一章插图“猎狐”

Master of the Housebook.Wolfegg (Schloss), Germany. (1475-1490)

“猎狐”，选自“中世纪家用手册”（Das Mittelalterliche Hausbuch），一位无名的德意志艺术家的墨水画，他活动于1475~1490年，以家庭手册大师而闻名。

[1] *Die Überwindung des europazentrischen Geschichtsbildes* (1954), 15, cited by G.Barraclough in H.P.R.Finberg, ed., *Approaches to History: A Symposium* (Univ.of Toronto Press, 1962), 94.

第一章 中世纪的先驱

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一个我们可称其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宣告形成。这不是一个帝国，尽管它占有大帝国一样的空间并具有某些帝国特征。它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是一种这个世界不会出现过的社会体系并具备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征。它与帝国、城市国家或民族国家不同，它是一个经济统一体，而不是政治统一体。事实上，在其范围内（这里很难说在其边界内），它包含一些帝国、城市国家和形成中的“民族国家”。说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因为它包括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大于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单位。它是“世界经济”，因为该体系内各部分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

相反的，帝国是一个政治单位。例如，艾森斯塔德（Shmuel Eisentadt）是这样为帝国下定义的：

“帝国”这个词通常用来指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它地域广阔，权力相对高度集中，以皇帝个人或中央政治机构为代表的中央自成一个政治实体。而且，帝国存在的基础虽然通常是传统的合法性，但他们往往鼓吹一种更广泛的、潜含统一性的政治和文化导向，这个导向一般在帝国的各个部分所追求的方向之外。^[1]

这种意义上的帝国在长达5000年之久的时间内是世界舞台的永恒特征。在任何历史时期，世界各地都持续存在过这样的帝国。帝国的集权政治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它的威力表现在它能借武力（以贡赋和税收的形式）和商业垄断保证使边缘地区的经济收入流向中央。它的弱点表现在这种政治结构所必需的官僚们往往借机中饱私

囊，尤其是当剥削压迫引起反抗从而增加军费开支的时候。^[2]政治帝国是初级的经济统治手段。现代世界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它能够通过减少过于臃肿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消耗”，来增加从低层到高层，从边缘到中央，从多数人到少数人手中的剩余物资流入量，这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一大社会成就。

我前面说过，世界经济是现代世界的发明创造，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历史上曾存在过世界经济，但它们总是变化为帝国的形式，如中国、波斯和罗马。现代世界经济若非现代资本主义手段和现代科学技术——我们知道，这两者是有某种联系的——使其可能在不建立统一的政治结构的情形下成长、壮大起来，它也会沿着那个方向发展，而且在某些地区似乎曾出现过这样的迹象。^[3]

资本主义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占有剩余物资的手段（至少最终更加有利可图）。帝国是一种征收贡赋的机构，按照莱恩（Frederic Lane）发人深省的说法，帝国“意味着税收，税收的目的是保护纳税人，但税收的数量超过防卫所需。”^[4]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政治力量用于保证垄断权（或尽可能地达到这一目的）。国家不再是一个直接经营的中央经济单位，而是在他人的经济活动中充当保障某些经商条件的工具。在这里，市场的作用（不是完全自由地发挥作用，但毕竟在起作用）刺激生产力的增长，并导致现代经济发展的一切伴生物的出现。世界经济就是指这些过程发生的舞台。

世界经济的规模似乎是有限的。弗雷德（Ferdinand Fried）认为：

若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罗马的“世界”经济空间限于最好的交通工具行驶40~60天的范围。……在我们今天（1939年），现代世界经济的空间也限于利用一般商业交易管道通行40~60天的范围。^[5]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补充说，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也大抵如此。^[6]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正是16世纪时这个60天范围的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和运转。^[7]但首先必须切记，欧洲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还有其他世界经济，^[8]但是只有欧洲踏上了使它得以超过其他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路程。这何以发生？如何发生？让我们先看一下在公元14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12世纪，东半球有一系列帝国和小世界，其中许多彼此相邻。那时的地中海是一个商业中心，拜占庭、意大利城市国家，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北非的部分地区在这里相聚。从印度洋到红海地区形成了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俄国的中亚大陆是第四个；波罗的海地区正在成为第五个，但西北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相当偏远的地区，那里的社会形式或组织属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封建性质。

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不属于封建性质。封建主义不等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西欧封建制是在一个帝国解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个解体实际上，甚或从法律上讲，并不彻底。^[9]罗马帝国的神话更为这个地区提供了某种文化上，甚至法律上的凝聚力。基督教适为一组社会行动发生于其间的参数。封建欧洲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世界体系。

认为在封建主义存在的地区存在两种经济——城市的市场经济和农村庄园的生存经济——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在20世纪，当涉及所谓不发达世界时，有人持此说并冠以“二元经济论”。但是，正如索纳（Daniel Thorner）所云：

如果我们认为农民经济绝对地以其生存为导向，而“资本家”这个词就意味着以市场为导向，我们肯定会把自己迷惑住。我们更应该从一开始就认为，农民经济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就有两种导向。^[10]

“多少个世纪以来”？究竟多少个？巴特（B.H.Slicher van Bath）在其有关欧洲农业史的大作中，把转折点定在公元1150年前后。但他并不认为在此之前西欧实行的是“生存农业”，他只是说，在公元500~1150

年间西欧奉行他所谓的“直接农业消费”制，也就是说，一种半自给自足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多数人自己生产粮食，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用以物易物交换的形式向非农业人口提供粮食。他认为，在1150年以后，西欧进入了“间接农业消费”阶段，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仍在其间的阶段。^[11]

因此，当我们说到西欧的封建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想象为一系列的经济小区，那里的人口和生产力在缓慢增长，那里的司法机构确保大量剩余物资进入拥有贵族身份并操纵法律机器的地主手中。由于剩余物资多为实物，所以除非把它们卖掉，否则无利可图。城市发展了起来，它哺育了工匠，他们购买剩余物资或用他们的产品与之相交换。商人阶层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有时可以获得独立身份的地主代理人，和向领主缴纳地租后仍有剩余到市场出售的中等农民；^[12]另一种是远方商人的驻地代办（驻地一般在北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后来则在汉萨同盟的诸城市里），这些人利用交通不便和地区间的巨大差价而积累资本，特别是当某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13]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它们为农民提供了可以避难和就业的场所，这些使庄园中人和人之间联系的某些条件开始变化。^[14]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不应被视为商业的对立物。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封建主义和商业发展可以并行不悖。卡恩（Claude Cahen）认为，如果说有些学者只在西欧以外的地区看到了这一现象的话，^[15]那他们可能是出于某种盲目观念，而对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同类现象视而不见，“既然我们注意到，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封建主义和商业可以齐头并进，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一点，重新考察西方本身的历史”。^[16]

但对有别于地方贸易的远途贸易来说，封建制度的维持能力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远途贸易是奢侈品贸易，而不是大宗商品贸易。它是一种利用差价的贸易，一种取决于殷实人家政治嗜好和经济能力的贸易。只

有在现代世界经济结构内生产取得发展的基础上，远途贸易才能部分地转化为大宗贸易，而大宗贸易反过来又促进生产的发展。正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云，到了那时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商业：

（至少）晚至马可·波罗（Marco Polo）时代，出门冒险的商人的生意还取决于权贵的脸色，……远途冒险者主要关心的不是商品的大宗出售，而是商品的稀奇和奢华，……商人们寻找乐善好施者，……如果他命运不济，他会遭到掠夺或课税，以至破产。但如果他是幸运儿，他与其说卖出了一个好价钱，不如说得到了一笔慷慨的施舍，……丝绸及许多其他物品的这种贸易形式更像是纳贡而不是贸易。^[17]

因此，商业活动的水平是有限的。主要的商业活动限于在狭小经济区域内经营食品和手工业制品。但无论如何，这种商业活动在缓慢增长，各个经济中心随之发展，新边区得到开发，新城市得以建立，人口也在增加。十字军为殖民掠夺提供了某种便利。但随后在14世纪的某个时期，这种发展停顿下来，耕地缩减，人口下降，在封建欧洲及其以外地区似乎出现了一场“危机”，其标志是战争、瘟疫和经济凋敝。这场“危机”是从哪里开始的？其结果如何？

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危机？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分歧并不在于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而在于解释其原因时的侧重点。佩罗伊（Edouard Perroy）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发展过程的最佳点和人口饱和的问题，“在农业和手工业技术还十分原始的条件下，人口密度过大”。^[18]由于缺乏更好的犁具和肥料，人们无力改变局势，于是出现食品匮乏，而这又导致疾病横行。但货币的提供量是稳定的，于是价格缓慢增长，使缴租人受到伤害。随后，缓慢恶化的局势在1335～1345年间由于百年战争的爆发而急剧恶化。这场战争使西欧的国家体系转向战时经济，这造成一个重大后果，即增加了对赋税的需要量。赋税使已经十分沉重的封建义务更甚一层，生产者简直无力承担，结果造成流通危机，这场危机又导致间接税和实物税的恢复。这样就开始了恶性循环过程：国税负担导致消费减少，消费减少引起生产和货币流通量的下降，于是造成流通困难，这种困境迫使王室靠借贷维持并最终耗

有限的王库，由此出现信用危机，于是囤积贵金属，从而破坏了国际贸易结构。价格迅速膨胀，生存愈加艰难，人口随之下降。土地所有者失去租地农民，工匠失去主顾，耕地转为牧场，因为后者需要较少的人力，但依然存在羊毛主顾的问题。工资上涨，这特别加重了中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他们转向国家，寻求遏制工资上涨的办法。“庄园生产的解体在1350年以后日趋严重，这是停滞中持续衰退的证明。”^[19]

从表面上看，停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后果，人们可能认为应该出现这样一种场景：人口减少导致高工资，在地租相对平稳的情况下，高工资会造成买方构成的变化，剩余物资便会有一部分从领主手中转移到农民那里，这将使囤积部分减少；而且，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人口减少应该造成供需两方面的同时减少；但是由于典型的生产者通常会以放弃不太肥沃的耕地的方式来减少生产，因此劳动生产率应该呈上升趋势，其结果是价格下跌；上述两种发展过程应该是促进而不是削弱商业。但不管怎么说，商业事实上“停滞了”。

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它以需求的稳定为前提，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托马斯（William L., Jr. Thomas）提醒我们注意，鉴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际贸易额，经营费用相当昂贵，贸易额的任何降低（由于人口数量下降）都会引起费用的提高，这将导致商业的进一步萎缩。他们将这一过程描述如下：

（以前的）商人认为，在远方城市派驻一个代理人，负责收集有关价格和商业机会的情报，借此减少经营费用，这种做法有利可图。但由于贸易额下降，这样做就不再有利。信息来源一枯竭，贸易额就进一步下降。因此，经济史学家甚至在这个农民和工人的实际工资肯定相对增加，因而人民的平均收入也随着提高的世界里，也看到了经济萧条（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经济活动总量的减少）的景象，就不足为奇了。^[20]

希尔顿（R.H. Hilton）同意佩罗伊对这些事件的看法，^[21]但他不同意后者把这一危机与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周期性危机相提并论的分析方

式，因为那样将夸大商品货币经济的困境对封建制度的影响。事实上，在封建制度下，现金流动因素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比起在资本主义社会要小得多。^[22]而且，他认为佩罗伊没有讨论自己所描述的这些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对希尔顿而言，这一后果是关键，那就是：极为严重的社会对立、“内乱的气候”，和以“反抗这种社会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农民起义。^[23]因此对希尔顿来说，这不是一时性的危机，不是往复循环中的一个点，而是千余年发展的最终结局，是一种制度的决定性危机。“像在中世纪一样，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由于社会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支出与社会生产资料的增长不同步，整个社会陷于瘫痪状态。”^[24]希尔顿同意佩罗伊的看法，认为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技术有限和肥料短缺。在这里，不能靠扩大畜牛的数量来增加肥料供给，因为气候限制了冬季养牛场的数量。“但是我们应该强调指出，这时缺乏对提高生产力来说至关重要的大规模的农业再投入”，^[25]这是因为受到封建社会结构固有分配制度的制约。

与佩罗伊的一时性危机观点相比，希尔顿对封建主义全面危机的强调，使我们更能看清这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因为在一种制度中，如果已经越过了生产的最佳点，并且经济压力正在导致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全面阶级战争，以及贵族内部的倾轧，那么唯一能把西欧从死亡和停滞中解脱出来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利益分享，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只有扩大土地面积和劳动人口资源才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这正是15、16世纪所发生的事情。

13到15世纪，农民暴动在西欧非常普遍，这一点似乎是无疑的。就英国来说，希尔顿认为农民暴动的直接原因是，“在13世纪，大多数世俗的或教会的大地主都扩大其领地的生产，以便到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结果）劳役增加，甚至加倍。”^[26]科斯明斯基（Eugen A.Kosminsky）也把这个时期视为“对英国农民剥削最严重的时期……。”^[27]在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农民起义：13至14世纪之交，先

后在意大利北部和沿海的佛兰德（Flanders）；1340年在丹麦，1351年在马略尔卡（Majorca）；1358年在法国的加斯科尼（Jacquerie）；在德国，远在1525年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前也出现了零星的起义。12至13世纪在弗里西亚（Frisia）；13世纪在瑞士，都曾经建立农民共和国。斯利克认为：“农民起义与经济衰退相伴随。”^[28]多布（Maurice Dobb）指出，当这种衰退到来时，受到沉重打击的并不是从来就食不果腹的最低的劳动者，而是“地位较高的温饱农民，这些人正在开发和改良新的土地，因此往往充当暴动的先锋。”^[29]

经济的突然衰落不只是造成农民的不满。与它相伴的是因为战争、饥馑和瘟疫引起的人口骤减，导致边区移民日减，有时甚至整个村庄消失。我们不应把村落荒芜只看作衰退的表征，因为至少还存在另两个造成荒芜的主要原因。其中之一是持久存在的原因，即战争无论什么时候降临，那个地区的人们都会背井离乡寻找安全的落脚点。^[30]第二个原因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那就是农业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圈地”（enclosures）或“占地”（engrossing of land）。在中世纪晚期，这个过程显然也在继续。^[31]以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要说明上述三个原因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些困难。

关于停止开荒和移民减少，有两点似乎是很清楚的。如赫雷纳（Karl Helleiner）所云：“这是一个对占有地规模的选择过程。在中世纪后期的土地抛荒中，小块地所占比例似乎高于大农场。”^[32]这也是一个选择地区的过程。无主荒地（Wüstungen）似乎不仅广泛存在于德国和中欧，^[33]也存在于英国，^[34]但在法国却远非如此严重。^[35]显然这与由于历史和土壤原因，法国比欧洲其他地区移民密度大、荒地开垦早有一定关系。

在这个对农产品的需求减少的时期，城市工资和工业品价格不断提高，这是人口减少引起的劳动力缺乏造成的。在地租下降（就价格普遍

上涨而地租固定而言)的同时,这种情况又导致农业劳动成本的增加。于是出现布洛赫所说的“贵族阶级的暂时贫困化”。^[36]像在一切困难时期一样,^[37]这时的土地所有者不但收益减少而且管理费用增加,这使他们开始考虑放弃直接管理。经济压力导致对农民剥削的加重,于是农民无心生产并最终大量逃亡。^[38]贵族恢复收入的一种方式另辟蹊径。追随王公,以图获利,这在通常情况下,对最富有的阶层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式。^[39]但它不足以抵消经济衰退的影响,因此也不能阻止领地的衰落。^[40]而且,由于它使贵族离开了住地,因此可能恰好削弱了人们对经营管理的兴趣。

那么大地产到哪里去了呢?它们被变卖或出租给一个愿意并且能够经营它们的重要群体,即殷实的农民,当时他们正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41]

但我们必须记住,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并非在各地都是相同的。西欧的领地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比较密集的人口需要较大的生产单位。在东欧,经济衰退同样导致边地荒芜,但是这里土地抛荒、人口流失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它既受到人口迁移也受到圈地的影响。^[42]再往东,在我们后面将讨论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波兰,人口密度更小,这里的领主从整体来看,占有的土地少于农民,因此“随着人口骤减,土地荒芜,他们把所有的荒地拼入了他们的地产”。^[43]这将在16世纪使他们获得怎样的利益?这将多么深刻地改变东欧的社会结构?这对于西欧的发展将是多么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14、15世纪的局内人无法意识到的。但在西欧的内地农业区,面积过大的领地让位于较小的占有地。这样,在同一个时期,西欧农田上的中等农民地位上升,西欧开始圈围不太适宜农耕的土地(这将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而东欧的财富向大地产集中(这终将导致这里成为农产品出口区)。

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来说,这种经济的“衰退”或“停滞”究竟

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取决于人们视野的广度。波斯坦（Michael Postan）认为15世纪比14世纪有所退步，^[44]当然这一倒退后来受到遏制。科斯明斯基则认为这是对封建主义的清算，因此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要步骤。^[45]事实是同样的，理论分析却不同。

在这一讨论中，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涉及政治方面的发展，尤其是中央集权国家官僚政治的缓慢兴起。在西方封建主义盛期，国家极为虚弱，地主、庄园主则势力强大。后来，贵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管怎样利用国家机器，最终还是帝王的软弱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便利。他们不仅本人享有更多不受控制、不纳赋税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较随意地支配农民和向农民收税。在这种拥有法律制度的中央权力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联系的社会里，暴力的作用格外显著，因为正如布洛赫所云：“由于习惯的作用，滥施权力的行为总是可以演变成先例，而先例又总是对的。”^[46]

因此，如果庄园主没有陷入终于发现非但难以抵抗中央权力而且需要利用强制性法令的困境，他们是绝不会欢迎加强中央机构的。而14、15世纪的经济困难和领主收入的减少恰恰使他们陷入这样一种困境。

与这种经济困难同时发生的还有战争技术的变化，长弓变成火枪火炮，骑兵战变为以步兵战为主，这种战争需要更多训练和纪律。这一切意味着战争的费用增加了，所需要人数也增多了，常备军优于临时拼凑的队伍这一点也变得更加清晰了。面对这种新的要求，封建领主个人和城市国家在财力和人力上都无能为力，尤其是在人口减少的时期。^[47]的确，这时这些地方性的国家也面临着维持秩序的艰巨任务，频繁的农民暴动表明了这一点。^[48]

但在15世纪，西欧一些内部秩序的伟大恢复者权力日增，他们是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西班牙阿拉冈（Aragon）的菲迪南（Ferdinand）和卡斯提尔（Castile）的伊莎贝拉（Isabella）。他们在执

行恢复秩序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所运用的主要手段，也如他们的不太成功的先辈一样，是财政手段，即经过艰苦的努力建立强大的官僚系统（政治的和军事的），它足以胜任征税的任务，因此可以为一个更加强大的科层结构提供财政保证。这个过程早在12和1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侵略——这曾使王公们精疲力竭、无暇他顾——的停止、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复苏和更多货币的流通，税收的基础得以奠定，这样便能够付给官员和士兵工资。^[49]不仅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情形如此，德意志各诸侯国也是这样。

税收肯定是一个关键问题。开始这个良性循环并非易事。^[50]在中世纪后期，有效税收系统面临的障碍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守旧性。赋税额事实上只能依据纯粹的产品数量，而纯粹的产品数量很低，正如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量都很小一样。核实赋税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既缺乏人力又没有高水平的数据保存手段。因此统治者不断寻求开辟赋税以外的新财源，这是并不奇怪的。他们的手段包括：没收财产、借款、卖官鬻爵、制造劣币。但这些手段只能暂时解决财政困难，从长远来看，会对国王的政治经济实力产生副作用。^[51]但过分强调困难的一面是错误的，令人难忘的是辉煌的成就。许多妥协方式可以被视为走成功之路的重要步骤。包税制（tax-farming）^[52]和高官厚禄制（the venality of office）^[53]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两种有效的妥协方式。而且，增加资金流入国王的数量，不仅因加强了国家的力量而伤害贵族的利益，而且也减少了贵族自己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在14、15世纪经济比较窘迫的年代，特别是对那些与新的科层组织缺少联系的人。正如杜比（Duby）所云：“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大部分收入仍落入领主之手，但不断增加的赋税已经极大地增加了国家代理人所瓜分的份额。”^[54]

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操纵铸币权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当战争造成的国家财政危机在14、15世纪因纳税乡村的低利率而变得更加严重的时候，国家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而由于人口减少意味着王公们主动

赐予那些重返荒地的人们以免税特权，国家就更需要开辟新财源。这样，控制铸币权就带来了许多便利。热尼科（Leopold Génicot）指出，对这时的币质不断下降的现象可以有三种解释。一个是减轻国家债务（尽管构成皇室领地大宗收入的固定收入也因之减少）；另一个是，在一个商业增长超过银币储量，社会动荡又促使人们囤积贵金属的时代，缺乏支付手段；第三个解释是，人们故意实行降低兑换率的政策，以便遏制通货收缩，打击囤币者，促进出口并借此复苏商业。不管取哪一种解释，币值下降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以这种方式减少了固定收入的实际价值”。^[55]固定收入的主要接受者是贵族阶级，因此相对于国家而言，他们就受到削弱。

国家？什么是国家（state）呢？在这时，国家就是君王（the prince）！有声望和尊严并渐渐与其子民相脱离的君王。^[56]而且，恰在这时，官僚体系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格和利益的独特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它是君王的主要盟友，^[57]但我们将看到，它是一个感情始终矛盾的盟友。国王们为了获得有助于他们制定税法的手段，还建立了各种代议机构，这些机构主要由贵族组成，国王试图利用这种机构来反对贵族，而贵族也试图利用这种机构来反对国王。^[58]

西欧的这种国家不是起源于16世纪，而是起源于13世纪。雷诺瓦德（Yves Renouard）曾探讨过当今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边界是如何在1212~1214年的一系列战争中初步确定的。^[59]正是在这些边界线而非其他边界线[比如包括普罗旺斯（Provence）和加泰隆尼亚（Catalonia）在内的地中海西方国家，或安茹王朝作为英国的一部分包括法国西部在内的大西洋国家]的基础上，后来形成了民族感情。先有边界，后有民族情绪，这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和在20世纪的非洲一样，确属实情。正是在这个时期，不仅边界划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有边界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这就是佩罗伊所说的西欧政治结构的“根本变化”。^[60]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欧洲变革的时间确定在12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简

言之，也就是在中世纪商业和农业的繁荣期。

为什么叫民族国家而不叫帝国？这里我们必须咬文嚼字。也许我们应该认为，13、14世纪的法国是民族国家，15、16世纪的法国是帝国，17世纪的法国又成为民族国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就是这样认为的，^[61]为什么如此翻来覆去？布罗代尔说：“15、16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契机，它对庞大的国家有利，而对‘厚重的国家（thick states）’不利。……事实上，对于庞大的政治结构来说，历史总是时而对它们有利，时而对它们不利。”^[62]哈通（Fritz Hartung）和穆斯纳（R.Mousnier）虽然认为若建立君主专制政体，需将其规模降至最低点（是否也应升至最高点？），但他们也知道，这种政体在小国并不成功。“毫无疑问，后者不能构成一个足以维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庞大的军事、经济单位。”^[63]这些不过是对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做出了一点提示。基尔南（V.G.Kiernan）下面一段廓清概念的话，也许对我们最有帮助：

没有一个王朝曾宣布要建立民族国家，历代君主都想无限地扩张……而王朝越强大，结果就越可能是一个松散（manqué）的帝国。它必须大到能够延续，并可以以邻邦为练兵场的地步，但又必须小得能服从一个中央的支配和自觉是一个整体。在封闭的欧洲西端，受到竞争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领土的过分扩张是不可能的。^[64]

当然，除非他们把帝国扩展到海外去。这些松散帝国的特点在于，从中将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是一个地域单位，其统治者谋求（有时谋求，时常谋求，但并非总是谋求）使它成为一个民族社会。其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如果我们记住，自16世纪以来，西欧的民族国家谋求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建立相对同一的民族社会，把帝国的冒险事业只作为建立民族社会的一种补充手段——也许是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那么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上面已经把14、15世纪西方封建主义的危机作为16世纪以后欧洲扩张和经济变革的背景或序幕加以讨论。到目前为止，这种讨论和

解释仅限于社会结构方面（生产组织、国家机构、各种社会群体的关系）。但是很多人感到，14世纪的“危机”和16世纪的“扩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物质环境因素引起的，比如气候、流行病、土质。这些观点不容忽视，这些因素应当给予考虑。在探讨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时，应给与这些因素适当的重视。

气候因素以乌特斯罗姆（Gustaf Utterström）最为看重，其观点概述如下：

感谢工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感谢技术进步，今天的人比前几个世纪的人较少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但我们是否经常注意到另一个因素，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气候——尤其是北欧的气候——极端温和的时代？在过去的1000年中……除了个例之外，人类事务的繁荣期总体说来多发生在严寒之间的温暖期。正是在这个温暖期，经济生活和人口数量取得最大进展。^[65]

为强调其观点，乌特斯罗姆提请我们注意，气候变化可以对早期的欧洲变革产生重大影响。他说：“中世纪的原始农业肯定比高技术的现代农业更依赖良好的气候。”^[66]

作为例证，乌特斯罗姆指出，14世纪至15世纪初的严冬，1460年至16世纪中叶的暖冬，17世纪下半叶的严冬，恰与经济的衰退、发展、衰退相对应。^[67]

把人口压力视为决定性因素并不能为这种经济发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人口如此增长的事实恰恰提出了一个迄今无人提出的问题：人口为什么增长？……在整个欧洲，人口都飞速增长。在北欧和中欧，这种现象发生在气候非常温和的时期。这并不是巧合，其间肯定有某种必然联系。^[68]

此外，乌特斯罗姆还把流行病视为一种可变的介入因素。他用酷暑来解释黑死病，因为酷热的夏天造成黑鼠的大量繁殖，黑鼠的增加又导致鼠虱的蔓延，而鼠虱是黑死病病毒的两种载体之一。^[69]

杜比（Georges Duby）承认，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假说。诚然，人们

用气候变化圆满解释了14世纪若干放弃农耕的现象[冰岛的谷物，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格陵兰的殖民，苏台德（Sudetenland）的放宽森林限制，英国葡萄栽培的终止，德国葡萄栽培的减少]，但是并非没有其他圆满的解释。特别重要的是，杜比提醒我们：“农业衰退和人口减少一样，始于14世纪以前。”^[70]这就是说，在所谓的气候变化之前。杜比认为气候因素和随之发生的流行病是一场雪上加霜的灾难，它在14世纪“给已经十分脆弱的人口结构以致命的打击”。^[71]在解释这种起伏现象方面一度盛行的气候变化决定论同样也受到赫莱恩（Hellein）、^[72]巴特^[73]和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74]的怀疑。

显然，既然存在气候变化，它势必对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影响。但同样明显的是，它对不同的系统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尽管现在仍有争议，但上面所说的严寒可能确实波及整个北半球，然而亚洲和北非的社会发展却与欧洲迥异。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转向下列持久性因素：一是在封建社会组织系统中，人们经济负担过重，另一个是，在整个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少数人过度消费。庞兹（Norman Pounds）提醒我们注意“中世纪农民即使在堪称正常的年景下其生活也是多么没有保障……”^[75]巴特为证明这种长期营养不良说，特别指出，唯有蛋白质生产区对这种瘟疫的抵抗力最强。^[76]

如果说无论如何首先是持续的剥削压榨和我们前面说过的由此导致的暴力反抗引起了经济衰落，然后气候因素又导致食物短缺和瘟疫，那么就很容易发现，社会因素和物质因素能够怎样地汇合在一起造成某种“失衡”。这种危机反过来又会因瘟疫蔓延为流行病而加剧。^[77]而且，虽然因为陆地面积不变，人越少就意味着食物越充足，但人口数量减少也意味着转向牧场，因而减少热量的生产。这样，人口衰减就也变为“流行病”。^[78]肖努（Pierre Chaunu）补充说：“地租减少，利润降低，贵族负担加重，这些势必造成土地投资削减，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79]多布认为，由此产生的地租折算现象非但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

那样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会使其负担加重，因而加剧危机。^[80]这样，即使把物质环境的可变因素考虑进去，也不能推翻我们前面的分析。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分析更加全面，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新的因素，有助于解释一种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中将不断出现的历史局面；同时也因为它进一步证明，持续的稳定和缓慢的变化可以造成一种足以改变社会结构的局面。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时期的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体。

上述分析可归纳如下：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既没有世界帝国，也没有世界经济，只有基督教“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封建的，也就是说，由相对自给自足的小经济单位组成。这种经济单位以这样一种剥削方式为基础：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相对直接地占有在庄园内部生产出来的少量剩余农产品。在欧洲内部，至少有两个较小的世界经济，其中中等规模的一个以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为中心，更小的一个以佛兰德和北德意志的城市国家为中心，但欧洲大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卷入这两个网络。

在约1150至1300年间，欧洲在封建生产模式内取得一定发展，这种发展同时表现在地理、商业和人口三个方面。在约1300至1450年间，欧洲又回复到发展以前的老样子，这仍然表现在地理、商业和人口三种水平上。

这种倒退引起了“危机”，它不仅表现于经济领域，也反映在政治方面（贵族的内部倾轧和农民暴动是两种主要体现）。它还体现在文化领域。中世纪的基督教大一统文化开始受到各种形式的广泛攻击，这种攻击后来被称为“现代”西方思想的开端。

对于这场危机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它本质上是经济循环发展的结果。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发展的最佳点既已过去，衰退便随之而来。第二种解释认为，它基本上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按照封建模式攫取剩余产品达一千年之久以后，达到了衰落的转折点。由于结构

上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可能因地力消耗有所下降）。而与此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消费数量和水平不断上升，剩余产品生产者的负担不断加重。榨取已达到了极限。第三种解释是强调气候因素。欧洲气候条件的变化在降低土地生产力的同时又助长了流行病的蔓延。

第一、三种解释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同样的周期性变化和气候变化也在其他时期发生在其他地区，但并未造成以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以长期发展趋势来解释这场危机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无法找到准确的统计数字来说明它是对这种社会变形的圆满解释。我相信，如果认为“封建主义”危机是长期发展、循环危机期和气候恶化的共同产物，那将是最令人满意的。

恰是这种共同作用的压力使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即将在欧洲产生并保存至今的是一种新型的剩余产品占有方式，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的基础不是以贡赋（像在世界帝国发生的那样）或封建地租（像在欧洲封建制度下发生的那样）的形式直接占有农业剩余，而是在更加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首先是农业，然后是工业），在国家机构的“人为”（即非市场性）帮助下，通过世界市场来占有剩余产品。国家机构从未彻底控制世界市场。

本书认为，有三件事是建立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其一是该世界地理范围的扩大，其二是在世界经济的不同地区针对不同的生产发展多种控制劳动力的手段，其三是在将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国家的地区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构。

第二和第三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第一个方面的成功。这样，欧洲的地理扩张在理论上就成为解决“封建危机”的关键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欧洲就完全可能陷于相对持久的无政府状态并进一步衰退。那么欧洲是怎样抓住这个拯救自己的机会的呢？答案是：不是欧洲而是葡萄牙

抓住了机会，至少应该说，是葡萄牙带了头。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葡萄牙的社会局势，看一下它为什么能在“危机”当中破门而出，从事海外冒险。为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记住，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欧洲的地理扩张早已开始了。刘易斯（Archibald Lewis）说：“从11世纪到13世纪中，西欧几乎是按古代的模式来开辟新疆域的。”^[81]他指的是西班牙从摩尔人（Moors）手中逐渐恢复失地，基督教欧洲在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撒丁尼亚（Sardinia）和科西嘉（Corsica）恢复了元气，诺曼人征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Sicily）。他还提到十字军首先把塞浦路斯（Cyprus）、巴勒斯坦（Palestine）和叙利亚（Syria），然后把克里特（Crete）和爱琴海诸岛（Aegean Islands）并入欧洲版图。在西北部，英国人向威尔士（Wales）、苏格兰和爱尔兰扩张。在东欧，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向波罗的海人和斯拉夫人的土地渗透，征服当地居民并令他们改宗基督教。“然而最重要的新疆域是内部的森林、沼泽、丛林、荒野和泥淖地。正是在这些不毛之地，欧洲的农民们在1000至1250年间定居下来，开荒种田。”^[82]随后，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扩张和兴旺景象因“危机”和衰退的到来而告结束。在政治方面，这意味着摩尔人在格拉那达（Granada）重整旗鼓，十字军被从利凡特（Levant）驱逐，拜占庭人（Byzantium）在1261年光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蒙古人征服俄罗斯平原。在欧洲内部则出现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的现象。

因此，这次伟大的冒险——大西洋扩张就是欧洲的第二次而不是第一次冲击，这一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势头更猛烈，技术基础更雄厚，心情更急切。然而为什么葡萄牙率先发起冲击？在1250年，甚至在1350年，还没有人意识到葡萄牙是这种角色的候选人。从20世纪回过头去看，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因为在现代甚或整个历史时期，我们从不把小国葡萄牙放在眼里。

我们将尝试从动机和可能性两个方面去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动机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存在的，尽管某种动机在葡萄牙反应得最强烈。探险家寻找的是什么？贵金属和香料，小学生的教科书都会这样告诉我们。这一点确实明白无误。

在中世纪，从金和银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用沃森（Andrew Watson）的话来说，“在货币方面，……这两个地区应被视为一体。”^[83]前者出产白银，后者出产黄金。作为长期价格失衡——其原因很复杂，我们无需在这里探讨——的结果，白银东流，最后大量积蓄在阿拉伯世界。白银出口不再能换来黄金进口。所以在1252年，佛罗伦萨（Florence）和热那亚（Genoa）铸造新的金币。动力就在那里。使这种动机转化为现实的一种现象是在13世纪穿越撒哈拉（Sahara）的黄金贸易的发展。^[84]沃森因此认为，在1250至1500年间，不能说西欧缺少黄金，因为这是供给日增的年代。但是尽管失衡状况有所好转，可是欧洲的贵金属还要经过拜占庭和阿拉伯流向印度和中国。沃斯顿颇为不解地谈到了“印度和中国从世界其他地区吸收贵金属的强大力量”。^[85]这样，欧洲对贵金属的需求量就仍然是很高的。在1350至1450年间，塞尔维亚（Serbia）和波斯尼亚（Bosnia）的银矿开始发展，^[86]在土耳其人于15世纪把这两个地区与欧洲的联系切断以前，它们一直是重要的贵金属产地。1460年初，银矿开采也突然在中欧兴起，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允许人们开发以前属于边区的矿山。据佩罗伊估计，从1460至1530年，中欧白银产量增长五倍。^[87]但是供给无论如何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取道海路寻找黄金（这样就可以避开北非的中间商，直接得到苏丹的黄金）无疑是葡萄牙早期航海家出海的一个目的。^[88]所以，当美洲的发现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比苏丹更丰富的黄金源泉，特别是提供了一个比中欧远为丰富的白银源泉的时候，经济后果将是巨大的。^[89]

欧洲人寻找贵金属固然是为了铸造在欧洲流通的货币，但更是为了

把它们输出到东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这又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为了香料和珠宝。谁需要这些东西？富人，用它们来炫耀其消费水平的富人。香料被制成春药，仿佛贵族没有香料便不能做爱。在这个时代，欧亚关系可以概括为交换挥霍的关系。贵金属流到东方用于装饰庙宇、宫殿和亚洲贵族的服装，而香料和珠宝流向西方。文化背景（也许不过是物质贫乏）决定了这种互补倾向。皮朗（Henri Pirenne）和后来的斯威奇（Paul Sweezy）认为，这种奢侈追求值得称道，因为它有利于欧洲商业的扩张。^[90]但我怀疑，交换挥霍的意识不管在欧洲上层阶级的思想中有多么强烈，它只能孕育诸如大西洋世界扩张之类的宏伟事业，却很难导致建立一种欧洲世界经济。

归根究底，生活必需品比奢侈品更能引起人们的经济冲动。为14、15世纪的西欧所必需的是食品（含有更多热量，营养价值配置更合理的食品）和燃料。向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的扩张，向西非、北非以及大洋彼岸的挺进，也和向东欧、俄罗斯草原以及中亚的扩张一样，带来了食品和燃料。它扩大了欧洲的消费品基地，因为它造成了一种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西欧以不平等的条件享用这些原料基地。这看起来很不相称。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早在13世纪已经始于佛兰德，至16世纪又传入英国的技术革新也增加了农业的产出。^[91]但是这种技术革新最容易发生在诸如中世纪佛兰德之类的人口稠密、工业发展的地区，而恰恰在这些地区人们改变土地经营方式，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粮、养牛和发展园艺业，结果这些地区“需要大量进口玉米（小麦）。只有这种复杂的工农业连锁系统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其优势。”^[92]因此，这一农业革新过程非但不妨碍扩张，而且反使扩张变得更加必要。

小麦是15、16世纪新型生产和新型贸易的中心。按照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正确说法。欧洲最初在北部森林和地中海平原找到了自己“内部的美洲”。^[93]但内部的美洲是不够的。于是开始向边陲扩张，首先来到了岛屿。戈丁诺（Vitorino Magalhaes-Godinho）提出了一

种现在仍有影响的假说：农业是葡萄牙向大西洋岛屿殖民的主要动机。塞洛（Joël Serrão）支持这一假说，他说，这些岛屿发展迅速，就“谷物、粮、染料和酒四部曲来说，……整体的倾向是单一生产，四种产品轮流受到偏爱。”^[94]这种新种植的小麦在14世纪初开始运往欧陆各地，最初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运到低地国家，^[95]15世纪远达葡萄牙，^[96]在14、15世纪又从地中海运到英国和低地国家。^[97]

食品的等级可以按其每一千大卡路里的成本来排列。贝内特（Bennett）发现，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如此排列出来的顺序都是完全相同的。面粉制品和淀粉质块根列在其8个等级的最下面，就是说，属于最基本、最廉价的生活必需品。^[98]但好的饮食并不能只吃谷。欧洲饮食最重要的一项补充品是糖，糖既可产生热量又可用于替代肉类。而且还可以用于酿酒[特别是朗姆酒（Rum）]。后来，它还被用于制作巧克力，这种技术是西班牙人从阿兹特克人（Aztecs）那里学来的，到17世纪，至少在西班牙，巧克力饮料已经非常受欢迎。^[99]

糖还是推动海岛殖民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受它生产形式的影响，奴隶制也如影相随。这首先发生在12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然后逐渐西移。^[100]随着向大西洋的扩张，奴隶制当然也会在那里继续存在下去。的确，里奇（Rich）认为葡萄牙的非洲奴隶出现于1000年左右，那时穆罕默德侵袭队在经商时需要使用奴隶。^[101]糖是一种非常有利可图和短缺的产品，它取代了小麦，但也耗尽了地力，^[102]以致造成需要开辟新地种植糖类作物（且不说种植糖类作物也耗尽了人力）。

在贝内特的分类表中，鱼和肉的地位较高。但人仍需要它们的蛋白质。戈丁诺（Godinho）认为早期葡萄牙人从事冒险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扩大捕鱼区。^[103]肉食显然没有粮食重要，而且在1400至1750年间，它的重要性明显持续下降^[104]：这证明了我们下面将会论及的一点，即欧洲工人为欧洲的经济的发展付出了一定代价。^[105]无论如何，食

肉的欲望是促进香料贸易的主要动力之一，这里所说的香料不是富人用于制作春药的亚洲香料，而是在西非极乐园（*Arnomum melegueta*）里种植的谷类植物，它们被用作胡椒的代用品，也被用来制作一种叫做姜汁健身酒的含香料葡萄酒。^[106]只有这种香料“才使麦片稀粥变得可以下咽。”^[107]

如果说是食品需求导致了欧洲的地理扩张，那么食品所带来的利益是始料未及的。整个世界的生态发生了变化，而且受突然出现的欧洲世界经济的社会组织的影响，这种变化以首先有利于欧洲的形式出现。^[108]除食品之外，另一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木材，用作燃料和造船（和建房）建材的木材。中世纪的林业技术肯定是非常低下的，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使西欧、意大利、西班牙像地中海岛屿一样逐渐沙化。橡树变得极为稀有。^[109]在16世纪，波罗的海地区已经开始大量向荷兰、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出口木材。

这有一种生活必需品应该提及，即服装。当然这时存在着奢侈品贸易，存在着对丝绸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古代与对珠宝和香料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但是欧洲工业发展中的第一个主要工业部门——成长中的纺织业绝不只是奢侈品交易，况且纺织业加工还需要一些物质材料：给棉纺织品或毛纺织品上色的染料和在浆洗丝绸制品时使用的树脂。^[110]

人们寻找金银是为了过上奢华的生活，为了欧洲的消费，更为了与亚洲通商。但对欧洲的经济扩张来说，金银也是必需品。为什么会这样？货币是一种支付手段，它可以用任何材料来制作，只要人们承认它。今天我们使用的支付手段几乎都不是用金银制作的。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在中世纪晚期已经开始这样做，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有时也被误称为“假想货币”。

但是，从金属币转为符号货币还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111]——即使今天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欧洲一直受着货币下降趋势

的困扰，以至布洛赫说这个问题“贯穿着货币史的始终。”^[112]但那时候从没有人认真地提出取消金银货币。

没有人提出这一点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参与政府机要的人认为，改变这种货币制度会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113]我们不应忘记，在中世纪后期，矿山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商品。^[114]但比个人利益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体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又是现实经济体系脆弱的反映。记账货币可能从未盛行起来，确实，无论多么富有的人都无法单独或共同控制它。既然它曾经夭折过，谁能担保整个这种货币经济不会再次夭折？但贵金属是一种安全保证。只要货币的这两个用途——价值标准和支付手段——没有过分分离，货币就总是作为商品而支付的。^[115]因此，货币必须使用贵金属制作。而且，没有贵金属，欧洲就会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整体信心，因为资本主义利润的基础是投资在先，而实现价值在后。这对于这个由于其他原因形成的非帝国世界经济体系而言，是更为（*a fortiori*）确实的。这种整体心理现象是这个时期社会结构的属性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把贵金属视为繁荣世界经济的基本条件。

探险的动机不仅可以在欧洲渴望获得的产品中寻找，也可以在欧洲各种群体的职业需要中发现。正如利弗莫尔（Livermore）提醒我们所注意的，恰是这个时期和稍晚一点的伊比利亚（Iberia）编年史作家首先指出，“在北非进行收复失地运动的思想，始于人们感到需要为那些在边境从事掠夺活动已达25年之久的人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去做。”^[116]

我们必须回到14、15世纪领主收入减少这个关键问题上来。波斯坦把英国贵族的反应行为称为“匪帮主义”（*gangsterism*），即用非法暴力手段恢复旧日的收入标准。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瑞典、丹麦和德国。这种暴力手段的表现之一必然是扩张。^[117]因为总的说来，只要封建贵族的土地收入减少，他们定会积极地去寻找新的可以带来收入的土地，借此使其实际收入恢复到符合其社会地位的水平。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只

有葡萄牙从事海外扩张，而其他欧洲国家没有这样做，那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其他国家的贵族比较幸运，他们的扩张可以比较轻松，可以离家乡较近，可以用马匹而不用舰只。但葡萄牙限于地理条件别无选择。

毫无疑问，按照传统观点，海外扩张是与商人及君主的利益连在一起的，前者寄望于在扩张后的贸易中赢利，后者谋求保证王室的荣耀和收入来源。但是伊比利亚人探险的原动力很可能首先来自贵族，特别是来自那些臭名远扬的“贵族子弟”。他们不是嫡长子，所以缺少土地。而且，只是在商业网开始发挥作用以后，比较谨慎的商人（他们不像社会地位濒于降级的贵族那样富有事业心）才变得热心起来。^[118]

扩张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吗？这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在地中海西部地区肯定存在人口过剩，他一再指出，许多国家先驱逐犹太人，后来又驱逐摩里斯科人（Moriscos）就是人口过剩的证明。^[119]但里奇又断然地对我们说：“把15、16世纪的扩张归因于人口过剩纯属无稽之谈。……人口的增加可能（仅只是可能）只是把人们推向战争或城市。”^[120]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那些奔赴城市（或战场）的人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呢？欧洲为它的人口——甚至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准备好了一个生存空间。不错，那是导致扩张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封建主义危机中，生存空间是农民反对贵族的力量的得以加强的一个因素，因此也是造成领主收入下降的一个因素。于是欧洲社会便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其中之一就是承认（至少是隐约地承认）自己人口过剩。因此需要扩大土地面积。^[121]但事实上，贵族（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以及他们将会得到的，都是更加驯服的劳动力。人口的多少不成为问题，影响上下层之间相互关系的是社会关系。

最后，海外扩张能用“十字军精神”，即宣传福音的必要性来解释吗？这也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确实，在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采取一种特别的军事形式，在那里，民族斗争长期以来披着宗教的外衣。确

实，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东南欧（及至维也纳的大门口）被土耳其穆斯林打得溃不成军的时代。大西洋的扩张完全有可能是对这些事件的一种心理反应，正如肖努所云，是一种“补偿现象，一种以攻为守的行为。”^[122]确实，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做出的许多决定，以及他们的某些多管闲事的行为，可以用基督教感情来解释。但我们似乎更应该把这种宗教热情视为一种理性化的感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它显然已变得比较内在，因而强烈、持久而易引起经济上的畸变。而且，热情过后就是玩世不恭的事例在历史上简直屡见不鲜。因此用信仰体系作为主要因素来说明这样一场大规模社会行动的起源和长期发展就不大妥当。

我们上述有关动机问题的全部论述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葡萄牙人为了什么？我们讲到的是欧洲的物质需要，贵族收入的总危机。当然从中我们可以引申出葡萄牙人通过大西洋扩张解决这一问题的特别有利条件，但这样做说服力仍显不够。所以我们必须从动机问题转向能力问题。为什么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葡萄牙人能一马当先？这在所有的地图上都能找到一个明显的答案。葡萄牙位于大西洋上，紧邻非洲。就在大西洋岛屿殖民和沿非洲西海岸探险而言，它显然最近便。而且，从大洋流向来看，特别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以从葡萄牙港口（以及西班牙西南部的那些港口）出海最为容易。^[123]

此外，葡萄牙人已经具备了长途贸易的丰富经验。在这方面，葡萄牙人无法与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相比，但晚近的研究表明，他们的经历堪与北欧的市民相比，因此是不容易忽视的。^[124]

第三个因素是资金是否充足。威尼斯人的劲敌热那亚人早就决定投资于伊比利亚的商业，并鼓励那里的商人从事海外扩张。^[125]到15世纪末，热那亚似乎更偏爱西班牙人，而不是葡萄牙人，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那时已经能够脱离热那亚人的资助和保护，独吞利润。弗林登（Verlinden）说意大利是“中世纪唯一真正的殖民国家”。^[126]在热那

亚人和比萨人（Pisans）首先出现在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的12世纪^[127]和他们最初到达葡萄牙的13世纪，^[128]意大利人都曾做出一定努力，把伊比利亚人拉进当时的国际贸易。但是既然到达了那里，意大利人就一定会在伊比利亚殖民中充当主要角色，因为他们来得这样早，以致“能够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要塞”。^[129]按照劳（Virginia Rau）的说法，在1317年，“里斯本城区和港口是热那亚商业的一大中心……”^[130]可以肯定，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葡萄牙商人已经开始抱怨“（意大利人）不正当地插手本国的批发贸易”，他们说：“这威胁到本国商人在这项贸易中的统治地位。”^[131]解决方法很简单，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古典式的，即意大利人通过联姻关系融合进来，并成为葡萄牙或马德拉（Madeira）的土地贵族。

在这种商品经济中，这有一个因素促使葡萄牙人比英、法等国的人民更具冒险性。说起来有一点讽刺意味，葡萄牙与那个日后将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地区关系甚小，相反地它与穆斯林控制的地中海地区倒联系密切。这样，相对来说，葡萄牙的经济就更加商品化，它的人民就更加市民化。^[132]

然而，造成葡萄牙人如此具有进攻性的还不只是地理环境和商业力量。国家机器的强大也是一个因素。在这方面，葡萄牙与其他西欧国家在整个15世纪都十分不同，后者只懂得内战，而前者懂得和平。^[133]国家的稳定十分重要。这不仅因为它为实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因为它鼓励贵族把他们的精力释放到国内战争或欧洲内部战争以外的地方去，而且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讲稳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实业；^[134]国家一稳定，它就会把力量投入到有利可图的商业冒险事业中去。就葡萄牙而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地理历史背景决定它必然把向大西洋扩张作为最明智的商业冒险选择。

为什么葡萄牙率先进行扩张？因为在欧洲国家中只有它最具备决心

和可能性。欧洲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来维持其经济的发展，补偿领主在危机中所失去的收入，并缓和封建主义危机所孕育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欧洲需要很多东西：金银、市场、蛋白质，储存蛋白质的手段、食品、木材、纺织业原料。而且它还需要更加驯服的劳动力。

但是我们不能把“欧洲”概念化。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在为那一系列目标而奋斗。真正的决定来自只考虑直接利益的诸群体。在葡萄牙，“发现业”似乎对很多群体都有利：国家、贵族、商业资产阶级（本地的和外来的），甚至城镇中的半无产阶级。

对这个国家——弹丸小国——来说，利益是明显的。扩张是增加收入、提高威望的最佳途径。而且葡萄牙可以说是当时欧洲唯一不受内战困扰的国家，它比西班牙、法国和英国都至少早一个世纪就实现了政治的基本稳定。

正是这种稳定鼓舞了贵族。葡萄牙贵族也同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经济十分窘困，但是他们没有遭受耗费资财的、无尽无休的战乱之苦（即使他们得胜，战争也会耗费他们钱财）。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内部殖民来恢复往日的经济地位，因为葡萄牙缺少土地。因此，他们赞同海外扩张。他们把长子以外的子弟送出去，充当远征中必需的领头人。

资产阶级的利益一度并不与贵族利益相矛盾。葡萄牙的资产阶级由于生活在欧洲最商业化的地区（因为涉足地中海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由于长期经受长途贸易的磨炼，已经为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做好了准备，所以他们也寻求突破葡萄牙狭小市场的桎梏。如果他们缺少资本，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热那亚人那里得到，后者为了对付自己的对手威尼斯人，随时准备资助葡萄牙人。本地资产阶级与外来资产阶级之间的潜在矛盾因为热那亚人自愿接受葡萄牙文化而渐趋弥合。

最后，探险及以后的商业形势也为那些在领主危机中因不堪日甚一

日的剥削而逃往城镇的半无产阶级提供了就业机会。外部的扩张再次使潜在的内乱危险降到了最低点。

如果说光具备决心和可能性还不够的话，那么葡萄牙还有幸占据从事这番事业的最佳地理位置，这不仅由于它朝南伸向大西洋，而且因为它地处有利于航行的洋流的汇合点。所以回过头去看，葡萄牙人铤而走险并不奇怪。

在我们开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以前，我们还必须正视最后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把欧洲推向了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因为我们要重点说明资本主义是怎样地只适合生长在世界经济框架内，而不适合生长在世界帝国框架里，所以我们必须简单地探讨一下为什么应该是这样。这里最好是拿欧洲和中国做一个比较。在13至16世纪，这两个地区的人口总数几乎是相等的。[\[135\]](#)正像肖努（Pieere Chaunu）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达·伽马（Vascoda Gama）都不是中国人……这一点颇为发人深省，因为据我们从历史文献中的了解，在15世纪末，远东作为一个堪与地中海地区相比拟的整体在任何方面都不逊于欧亚大陆的西端，至少表面看起来是如此。[\[136\]](#)

在任何方面都不逊色吗？这需要对双方技术的发展做一次历史的比较，在这方面，学者们见仁见智。怀特（Lynn White, Jr.）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进行扩张是因为早从9世纪起欧洲在农业技术方面就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他说：

从6世纪上半叶至9世纪末。北欧创造和引进了一系列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农业生产体系。就农民劳动而言，这一体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怀特指的是重犁、三圃制、敞地牧牛、现代鞍具、马蹄铁）……随着该体系中各种技术的精进和普及，人们生产出更多的食粮，人口随之增长。……各个北方农民所具备的新的生产能力使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够离开土地，前往城市，从事工商业。[\[137\]](#)

怀特还认为，在8世纪和11世纪，北欧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

也先后取得领先地位。如果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话，怀特把原因归之于蛮族入侵所带来的剧烈动荡。面对这一动荡，按照汤因比（Toynbee）的理论，西方给予积极的应战。[\[138\]](#)

但其他学者不同意对事实的这种估计。以军事技术为例，奇波拉（Carlo Cipolla）认为：

直到15世纪初，中国的枪支如果说不比西方的好，至少可能也同样优良。但在15世纪，欧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欧洲的大炮比亚洲制造的任何种类的火炮都有大得多的杀伤力。在16世纪的书本中，对欧洲军械的惊叹之辞随处可见。[\[139\]](#)

正在撰写有关中国科技史的划时代巨著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只是在1450年以后欧洲才取得对中国的工业和技术优势。[\[140\]](#)欧洲为什么能突飞猛进？李约瑟认为，原因不在于一时一事，而在于“有机的整体”，在于“一系列变化”。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中，从未发生过像西方文艺复兴或“科学革命”那样的巨变。我常常喜欢把中国的发展勾勒成一条缓缓升起的曲线，从2世纪到15世纪，它的水平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在这以后，随着发生伽利略革命（Galilean revolution），随着人们发现一系列科学发现的基本技术，西方开始了一场科学复兴，随后，欧洲的科技曲线几乎像指数曲线一样陡然上升，超过了各亚洲社会的水准……这种剧烈的动荡现在开始趋于缓和。[\[141\]](#)

一些学者认为，舵的发明在15世纪的欧洲起了关键作用。[\[142\]](#)但李约瑟指出，在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就已经有了舵，这种新发明大概是在12世纪从中国传到欧洲的。[\[143\]](#)

如果说李约瑟有关中国技术完备、中国技术水平在西方腾飞之前一直高于西方的描述是正确的话，那么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始于同一个时期，只是仅仅28年之后，中国又退缩回大陆，不再进行任何新的尝试。但是他们不乏成功。1405至1433年太监郑和率领的七次航行取得巨大成功。在七次航行中，他横跨印度洋，从爪哇（Java）经锡兰（Ceylon）到达东非，为中国宫廷带回珍贵的异域贡

品，中国宫廷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郑和1434年死后，航行便停止了。更有甚者，当1479年另一个太监汪直为发动对安南（Annam）地区的军事远征，想参阅郑和有关该地区的档案记录的时候，他被告知不得动用这些档案。郑和的记录被封存了起来，仿佛唯恐人们记住这个人物。^[144]

这些远征的动机和中止的原因都不甚清楚。儒家官吏可能一直反对这种行动。^[145]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另一方面，皇帝似乎支持这一事业，那么是不是还有发动远征的可能？张天策（T'ien-Tsê Chang）在下列事件中发现了更多的证据：15世纪初，始于8世纪的国家机构市舶司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负责征收关税（关税转归各省征收），而是专司贡品转运，这项业务在郑和时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张认为，这样做势必造成在某些地区放松关卡限制，那么中央为什么撒手不管了呢？张天策解释说：“皇帝难道不是有意这样做，以便鼓励对中国来说显然非常重要的对外贸易吗？”^[146]

既是如此“显然”，却又不继续加以鼓励，这是为什么？威利茨（William Willetts）认为，这与中国人的世界观有些关系。据说正因为他们总以老大自居，认为自身就代表整个世界，所以他们缺乏某种殖民使命感。^[147]此外，威利茨认为这种探险活动突然中止还有两个直接原因：“儒家官吏对太监的病态的嫉恨”^[148]和“海外事业所带来的国库空虚”。^[149]后一个理由似乎难以成立，因为国库支出可以用殖民事业带来的收入补足。至少对当时欧洲的国库来讲，情况是如此。

还有一些解释认为，某种政治考虑转移了中国当局最初对印度洋探险活动的兴趣。例如赫德森（Hudson）认为，1421年由于蒙古游牧蛮族的威胁日趋严重，中国的首都从南京北迁到北京。这个事件可能转移了帝国的注意力。^[150]博克塞（Boxer）则认为东部倭寇的威胁已使中国政府焦头烂额，因为日本的海盗不断偷袭中国沿海地区。^[151]梅林克-罗洛

夫茨（Meilink Roelofs）把中国撤出印度洋归因于穆斯林商人在这块水域的推进。[\[152\]](#)

即使上述说法都能成立，它们似乎仍不足以说明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内部没有一种动力使这些外部困难只成为小小的阻力，而不构成不可克服的障碍？果真如某些作者所云，中国就是不想扩张吗[\[153\]](#)？肖努认为，中国缺乏具有“扩张共识的群体”。[\[154\]](#)这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如果我们记得，葡萄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各个社会群体都对海外探险和扩张抱有兴趣，那么肖努的话就更加具有启发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中国和欧洲在哪些方面不同。

首先是农学方面的重大区别。我们说过，欧洲重肉食消费，而且随着14世纪“危机”的发生，这一倾向更加严重。在16至19世纪，人民大众的肉食消费水平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牧牛场减少而粮田增多。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口猛增，上层阶级的绝对数量也持续增加，因此用于畜牧业的土地面积可能没有变化。这与下层人民肉食消费水平相对下降并不矛盾，他们可以靠从边缘地区进口获得粮食，也可以利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有效地垦殖西欧的土地。

与此相反，这时的中国正在东南部发展稻米生产，寻求建立更巩固的农业基地。欧洲对牛的重视导致欧洲人在生产中更广泛地使用畜力。每亩稻田可生产出更多的热量，但稻米生产需要更大量的人力。

肖努（Chaunu）指出，这样，欧洲人对畜力的使用就意味着“在15世纪，欧洲人拥有了一种原动力，它比当时中国人拥有的原动力要高出大约四倍。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上，牲畜是第二受到钟爱的东西。”[\[155\]](#)

但对我们的问题来说，比这种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人与土地之间这种不同关系所具有的含义。正像肖努所说的：

欧洲人消耗空间。即使在15世纪初的人口最低点，欧洲仍缺少空间……但如果说欧洲缺少空间，则中国缺少人力……

西方的“起飞”（take-off）与中国稻米生产的起飞似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11至13世纪），但前者显然更具革命意义，因为它使繁荣的地中海地区让位于世界征服。

总而言之，15世纪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少能力，而是因为缺少动力。主要动力仍是对空间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常常存在于潜意识中。[\[156\]](#)

这样我们对中国为什么不想进行海外扩张的问题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解释了。事实上，中国也一直在扩张，但只是在内部扩张，即在其境内推广稻米生产。由于欧洲的畜牧业需要更大的空间，所以欧洲“内部的美洲”在15世纪已经不复存在。无论人还是社会都不会毫无目的地去从事艰苦的工作，而探险和殖民都是艰苦的工作。

最后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某种原因，15世纪的中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斯普伦克尔（Van der Sprenkel）所说的“反殖民倾向”，亦即人口从稻米生产区迁移出来。[\[157\]](#)这样诚然可以缓解“人口压力”——这是一个与社会定义密不可分的词——但也会削弱中国的工业潜力，同时又使中国无法以成为一个殖民帝国来作为补偿。因此，这次“起飞”就夭折了。

中国和欧洲还有第二个显著不同。中国像当时的土耳其伊斯兰世界一样，是一个大帝国。欧洲则不是。它是一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小帝国、民族国家和城市国家组成。从很多方面来讲，这种区别都是不容忽视的。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韦伯（Weber）有关帝国解体形式的理论。他认为，一个帝国的解体可以采取两种形式：西欧式的封建化和中国式的俸禄化（prebendalization），[\[158\]](#)而新兴的中央集权国家更有可能产生于封建制而不是俸禄制。他的观点如下：

西方领主和东方印度贵族一样，是在世袭国家中央权力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如西方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的解体，或印度哈里发政权（Caliphs）、土邦君主政权（Maharadja）和莫卧儿皇帝政权（Great Moguls）的解体。但在加洛林帝国，新的阶层在农村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自然经济在这里意味着低于东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在战时亲兵制基础上产生的誓忠封臣制，领主阶层与国王联合并充当自由人与国王之间的调停人。封建关系也出现在印度，但它不是贵族和领主阶层形成的关键。

在印度像在整个东方一样，领地产生于在更加官僚化的国家所实行的包税制（因为据说与中世纪早期欠发达的西方相比，东方的中央政权仍然强大得足以课税，东方的经济足够发达，货币的流通量足以保证用于纳税的余量）和伴随军事和征税功劳而来的禄田制。因此，东方的领地在本质上仍是“俸禄”，而没有变成“采邑”。这里的世袭国家没有封建化，但却俸禄化。西方堪与之相比的事物不是中世纪的采邑，而是在17世纪罗马教廷或法国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统治时期盛行的卖官鬻爵现象。……而且，为了说明东西方发展的这种不同，还必须考虑纯军事因素。在欧洲，从技术上讲，骑兵是封建制度下最强大的力量，而在印度，骑兵数量虽然不少，但其作用逊于步兵；后者在从亚历山大（Alexander）到莫卧儿皇帝（Moguls）的军队中一直占主导地位。[\[159\]](#)

韦伯的理论可归纳如下：技术因素（骑兵的重要性）加强了中间的武士阶层在帝国解体过程中对抗中央的力量。这样，新兴的社会形式就是封建制而不是俸禄制国家。在俸禄制国家里，中央权力要比在封建制国家里强大。而且，封建制经济没有俸禄制经济发达（但这里孰因孰果？韦伯没有交代清楚），简而言之，从地主的角度来看，封建化比较好，因为它使他们拥有更多权力（和更多收入？）。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俸禄制下的土地支配者阶层比封建制下的土地占有者阶层更能抑制真正的集权君主制的发展，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可以使自己登上唯一的封建关系阶梯的至高点（卡佩王朝的君主为实现这一目的奋斗了几个世纪），从而利用封建价值体系建立一种忠于他本人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一经建立起来，就能把个人因素掩盖起来，变成一种忠实于国家的制度，国王本人则是国家的化身。俸禄制比封建制更加真正具有契约性质，它不受这种神秘纽带的驱使（顺带说一句，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把18世纪法国的俸禄制视为一种倒退，而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次企图抑制这种倒退的行动）。

利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他的书中探讨了中国没有向海外扩张的原因，其结论与韦伯大同小异：

抽象地从理论上讲，作为社会学中“理想类型”的封建主义显然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但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前者推动了后者的发展。在中国，正因为缺乏封建限制，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才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比欧洲更大的障碍。中国是一个非封建性的官僚制社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成一统的社会，从理论上讲，它比封建社会更容易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形式，但唯因如此，它只是融合了资本主义的表面形式，却销蚀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潜力。既然如此，当我们看到在未来最小的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与中国截然相反的社会进程解放而不是扼杀了扩张力，我们还应该感到奇怪吗？在葡萄牙以及整个西欧，这都是一个从封建主义中游离出原始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封建主义逐渐腐朽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不同于非封建的中国官僚制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抑制了封建主义，也抑制了资本主义。[\[16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后面我们将不断遇到的理论：一个体系如果迅速接受了一种新的形式，那并不意味着将出现持久的变化，反而意味着变化的中止，而一开始采取抵制态度，则往往意味着日后的彻底改变。

封建化造成帝国结构的解体，而俸禄化却维系这一结构。在一种体制下，权力和收入在相对自治的地主中间分配，这些地主扎根于某一个地区，与固定的农民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种体制下，权力和收入在整个帝国的各阶层中间分配，这些阶层被有意识地切断同地方的联系，其成员来自各个地区，因此完全依附于中央。加强一个帝国的中央权力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只是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才刚刚起步。而只要中央政权像在明、清两代那样保持统一，在局部地区建立集权单位就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封建体系内建立集权单位虽然困难却是可能的。韦伯相当明确地道出个中原因：

东方世袭主义（patrimonialism）及其食禄制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典型的情况下，唯有军事征服或宗教革命才能动摇食禄者势力的坚实结构，才能建立新的权力分配体系，才能然后建立新的经济环境。任何内部的改革都会由于前面所说的障碍而夭折。现代欧洲像前面已经指出的，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例外，因为这里首先缺乏一个统一帝国所应具备的安定。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战国时代，恰恰是阻碍这个世界帝国实

现政治理性化的国家食禄阶层曾最积极地鼓吹理性化。但是后来这种动力消失了。正如市场竞争促使私人企业理性化一样，政权竞争促使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理性化，在西方和战国时期的中国都是如此。在私人经济中，行会组织化（cartellization）将侵蚀资本主义的灵魂：理性的精打细算；在国家中，权力的垄断将削弱对行政、财政和经济政策的理性管理。……西方除了具备上述特点之外，在那里还存在强大的独立势力。为了砸碎传统的镣铐，诸侯便与这些独立势力联合起来，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这些势力还能利用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挣脱世袭统治权的枷锁。[\[161\]](#)

在考察世界经济体系和帝国中中央或一个体系的至高点与边缘地区的关系时，还有一个因素需要加以考虑。帝国的责任是统治和保卫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帝国的全部注意力、精力和可以投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利润都投向了这里。例如日本倭寇问题及其对中国扩张的影响。总的说来，倭寇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还不如土耳其人对欧洲构成的威胁严重。但是当土耳其人从东面进攻时，欧洲没有皇帝号召葡萄牙人进行远征，葡萄牙人也没有从海外探险中掉转头来保卫维也纳，因为葡萄牙没有义务这样做，也没有一种机制驱使它这样做，这样做也不符合任何欧洲社会群体的利益。

扩张对欧洲皇帝也不会像对葡萄牙国王那样带来直接的利益。我们已经讨论过中国皇帝和中国官僚怎样把郑和的远征看成一件耗费资财的事情，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恰恰是欧洲扩张的动机之一。帝国与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不同，它不能被看作一个企业，因为帝国自我标榜为大一统。它不能靠损害别人的经济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因为它是唯一的经济（这肯定是中国人的认识，也可能是他们的信念）。经济一体化自然可以增加皇帝在经济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但是这意味着国家不追求企业利润，而只希望增加贡品。但是一旦中央政权衰落，贡赋形式本身就会带来经济上的自我毁灭，因为在这种形势下，“纳贡”可能是一种不利于帝国的伪装起来的贸易形式。[\[162\]](#)

军事技术也与帝国结构有一定关系。奇波拉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采用他们在葡萄牙人那里见到的先进的军事技术？他

的解释是：“朝廷对内贼的恐惧不弱于外敌，对国内起义的担忧不亚于外国入侵，因此他们极力限制武器知识的传播和能工巧匠的增生。”^[163]欧洲有许多主权国家，因此没有可能限制武器的扩散。在中国这显然是可能的。所以极权体制阻碍了技术进步，尽管从根本上讲，技术进步是维系极权的关键。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帝国结构的束缚性，这一次是束缚了技术的发展。

现在剩下的是最后一个疑问，那就是中国这时出现了王阳明学派鼓吹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认为它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原则相类似：属于“亚革命意识”，只是“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164]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不是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标志，并且是他们用以反对传统势力的武器吗？

按照穆斯纳（Roland Mousnier）的说法，事情似乎恰恰相反。他分析了明代中国的社会冲突，并得出结论：个人主义是观点如此“现代”的官僚集团——清朝儒教官吏用以反对宦官的武器，后者既是“实业性”的又是“封建的”，代表明代中国的“民族”进取力量。^[165]穆斯纳的观点如下：

在中国明代，在中产阶级出身，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大部分人为了升迁而自愿去势。他们因为受过教育而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个帝国事实上是由宦官统治的。

他们一旦谋得高就，就开始提携自己的亲属，借由封官赐田拉帮结派，最终成为帝国的实权派。所以宦官所起的重大作用似乎与资产阶级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王族和显贵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们也拉拢了一批中产阶级出身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并把他们安插在政府各部门。……（后面这些人）常常成为王阳明的门徒，他们运用他的训诫攻击当权的宦官。宦官是传统与权威的捍卫者朱熹的门生（这时进入权威机构的主要是宦官）。由于王族、显贵和宦官作为土地的支配者都有雄厚的实力，所以他们之间的争斗格外残酷。明代皇帝曾试图建立朋党封建制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种状态的牺牲者是农民。而国家付出的代价也无可限量。^[166]

当然，欧洲国家也付出了代价，但欧洲的代价有助于新兴的资产阶

级，有助于——像我们将看到的——最终靠变成资产阶级而自救的贵族。与此同时，欧洲的资产阶级也正在变成贵族。在中国明代，曾促使西方资产阶级最终夺权的意识形态恰恰不利于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可能是由于过早地掌握了部分权力？）扮演了捍卫传统和权威的角色。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有待说明的问题，但是事实至少告诉我们，不能过分简单地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兴起连在一起，那种盲目夸大新意识形态作用的议论也是大可怀疑的。

有关中国问题的结论可归纳如下。15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在人口、面积、技术水平（既包括农业也包括航海业）等基本方面似乎没有明显的不同。即使存在某些不同，它们也不足以说明这两个地区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走过的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二者价值体系的区别似乎也被过分夸大了，即使在这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它们也一样不是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因为正如我们试图说明的，同样的观念体系可以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服务，可以与方向截然相反的结构突变相结合。持价值观念优先论的学者，在极力批驳唯物论的同时，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更加教条地看待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尽管他们把因果顺序颠倒了过来），因此自己也犯了错误。

中国与欧洲的根本不同再次反映了长期趋势与比较直接的经济循环的结合。长期趋势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以及他们不同的解体方式和瓦解程度。罗马结构渐渐成为一种淡淡的记忆，它在中世纪主要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教会来体现的。而中国却保留了帝国的政治结构，尽管它受到了削弱。这是封建体系与建立在俸禄官僚制基础上的世界帝国的区别。由于这种区别，中国可以在经济的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受剥削的程度也很可能轻于欧洲农民。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晚些时候发生的两种不同的农学发展

趋向。欧洲倾向于养牛和植麦，中国则倾向于种植稻米，后者需要较小的空间但较多的人力，而前者需较少的人力但较大的空间，两种体制以不同的形式经受着长期的煎熬。欧洲比中国更需要地理扩张。在中国，即使某些群体发现扩张有利可图，他们也无法大显身手，因为在帝国结构内，重要决定都来自中央，而帝国中央首先关心的是暂时维持其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

因此，如果说就已经具备广泛的国家官僚机构、发达的货币经济以及可能存在的先进技术而言，中国表面上似乎处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地位的话，那么从实质上看它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它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帝国政治结构负担，受到自身价值体系“理性化”的拖累，这种价值体系使它无法利用（如果它想利用的话）启动变革的杠杆，而欧洲君主在神秘的欧洲封建忠诚观念中找到了这样的杠杆。

现在我们准备继续阐述我们的观点了。在1550年代，世界上只有欧洲具备了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条件。这种体系的基础是两个关键的体制，一个是“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另一个是某些地区的官僚制国家机构。我们将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考察这两个方面。然后我们将依次考察三个世界经济带，我们把它们称为半边缘带、中心带和边缘带。我们按这种顺序安排主要是因为这也是历史的先后顺序。这一点读者会在我们的阐述中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才可以比较抽象地概括我们的全部论点。我们把抽象概括放在最后而不是篇首主要是出于下列考虑：第一，我们相信，在经验材料基础上复原的事实真相将更有说服力；第二，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具备基本的洞察现实的能力，我们的理论的最后形成就应该在面对经验现实之后。



第二章插图 “黑人在金属矿被开采枯竭之后，必须去作制糖工作”

Theodore de Bry. (1575)

New York: the Rare Books Collection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黑人在金属矿被开采枯竭之后，必须去作制糖工作”。这幅关于在小西班牙（Hispaniola）一个糖厂的雕刻制于1595年，是一位佛兰德（Flemish）雕刻家布莱（Theodore de Bry）从事的一个名为《海外游历集》（*Collectiones Peregrinationum*）的系列中的一部分。以纪念西印度和东印度（West and East India）的“发现”。由纽约公共图书馆稀有书籍分部、阿斯特（Astor）、伦诺克斯（Lenox）和蒂尔登（Tilden）基金会允许复制。

关注微信公众号：窃蓝书房（ID:QLSF68）

[1] S.N.Eisenstadt, “Empires,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V, 41。

[2] 有关造成帝国衰落的这种内在矛盾的讨论，请见S.N.Eisenstadt, “The Causes of Disintegration and Fall of Empires: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es, ” *Diogenes*, No.34, Summer 1961, 82-107。

[3] 认识到这一点，是政治智慧的表现。这种智慧的第一个迹象是13世纪的威尼斯拒绝背上

拜占庭帝国这个政治包袱。阿伯雷特（Mario Abrate）指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建立了东拉丁帝国，这种政治体制把延续下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继续与西方保持联系上面。但海上强国威尼斯虽资助了这次十字军东侵并为其提供了海军装备，但它无意背上帝国政府这样一个政治包袱（丹多罗（Doge Enrico Dandolo）的确拒绝了出让给他的帝位），而只想——这几乎是出于本能——保证在这个新拉丁帝国统治的区域内垄断海上交通和市场。”“Creta, colonia veneziana nei secoli XIII-XV, ” *Economia e storia*, IV, 3, lugl.sett.1957, 251。

[4] Frederic C.Lane, “The Economic Meaning of War & Protection”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389.

[5] Ferdinand Fried, *Le tournant de l'économie mondiale* (1942), 引自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2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66), I, 339.

[6] 见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339-340.至于15世纪的欧洲，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认为需要使用更小的单位。他说：“在15世纪初，西方社会还缺乏组成民族性稳定国家的条件，它只能把意大利城市组成稳定的国家。由于国家小，所以距离的问题可以克服，这样一来，交通与交往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税收和维持中央政权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Renaissance Diplomac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5), 59.

[7] 不过马丁利又说“当16世纪的人说到‘世界’时……事实上，他通常指的是欧洲。就地理上的世界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是区域性的，它当然很原始，但毕竟是区域性的。” Michel Mollat, “Ya-t-il une économie de la Renaissance? ”, in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 (Paris: Lib.Philosophique J.Virn, 1958), 40.

[8] “在形成真正的世界经济之前（迄至20世纪仍未形成），人口聚集地往往在交通中心……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伴随着高密度的人口中心，它的四周是沙漠、海洋或处女地。欧洲和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 Pierre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du XIIIe au XV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No.26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9), 255.

[9] 布洛赫（Marc Bloch）曾迎头痛击这种非常糊涂的观念。他说：“事实很清楚，交易活动确定了相当于货币的物品或实物的价格，在没有更确切的证据以前，我们无法断定付方是否以货币支付……正如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尽管以国家的严重衰落为特征，但仍声称继承了传统并的确保留了昔日强国的某些残余一样，封建经济甚至在交换变得很稀少的时候，也没有失去经济的货币属性，其原则承继于以前的文明。”“Economie-nature ou économie-argent: un pseudo-dilemme, ”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I, 1939, 13-14.布洛赫进一步指出：“欧洲封建主义因而应被视为旧社会突然土崩瓦解的结果，若不是日耳曼人的猛烈入侵，它事实上是难以想象的。日耳曼人用武力把原本处于截然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结果使二者的发展都突然中断……。” *Feudal Society* (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61), 443.

关于“货币经济”问题另见波斯坦（M.M.Postan）的著作。他说：“根据英国的历史乃至中世纪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来看，把货币经济的兴起理解为货币的出现，从历史角度说来似乎没有意

义，因为在有文字的历史开始出现的时候，货币就在使用。所以货币经济的兴起不能用于解释后来的任何现象。”“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2, 1994, 127。

[10] Daniel Thorner, “L’économie paysan: concept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 *Annales E.S.C.*, XIX, 3, mai-juin 1964, 422.

[11] B.H.Slicher van Bat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D.500-1850* (New York: St.Martin’s, 1963), 24.作者指出，在1850年前后，间接农业生产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口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12] 比歇尔 (Karl Bücher) 提醒我们注意把“商人”这个词运用于中世纪所引起的混乱。他说：“近来有些研究德国城市起源的文章忽视了下列观点，即行商 (*Kaufmann*) 这个词的意义很广泛。按照他们的想象，中世纪末期在德意志帝国内存在着无数的城市，从科隆 (*Cologne*) 和奥格斯堡 (*Augsburg*) 到麦德巴赫 (*Medebach*) 和拉道夫泽尔 (*Radolfzell*)，到处都聚居着现代意义上的商人，即专门经商的阶层，人们一般还把他们称为批发商人。但所有经济史都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些人经营什么？他们如何买进货物？此外，所用的词汇本身也与这种结论相矛盾。专业商人在社会上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往往属于卖方，而不是买方。但中世纪时行商这个词源于购买 (*Kaufen*)。在奥托 (*Otto*) 三世时代有关990年至1000年多特蒙德市 (*Dortmund*) 的国家档案中的购买守则 (*emptores Trotmanniae*)，它的城市法据说与科隆和美因茨 (*Mainz*) 的城市法一样，对其他城市有样板作用。如果1075年的赖兴瑙 (*Reichenau*) 修道院院长可以大笔一挥，就把阿伦斯巴赫 (*Allensbach*) 的农民及其后代变为商人，那么这种商人与我们头脑中的专业商人是无论如何无法吻合的。商人专指市场上的出售者，不管他的商品是自己生产的还是主要靠购买得来的，这一事实是很明显的。尚未印刷出版的1420年法兰克福市 (*Frankfurt*) 议会征收所谓开市权 (*Marktrecht*) 的人头税的告示就是一个例证 (见 *Book No.3 of the Municipal Archives, Fol.80*)。在告示的开头，我们看到这项人头税由‘每一个在街头叫卖的商人缴纳，不管其商品是什么’，而后面又详细列举了这项人头税所涉及的种类繁多的‘商人’和‘商品’，其中包括：旧布商、面饼作坊主、食品摊贩、制绳匠、榛果商、推车叫卖鸡蛋和干酪的小贩、背筐叫卖家禽的摊贩、出售干酪等商品的异乡人、鞋匠、钱商、烤面包摊商、推车叫卖面包、鹅肉、干草、饲料、白菜的外乡人、在街上出售亚麻、大麻或纱制品的各种摊贩。我们发现城市小贩、工匠和农民一起混杂在这里。无数的档案材料明确地告诉我们，买主与卖主都被称为商人 (*Kaufleute*)。事实上，当我们讲到商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援引许多材料说明，它指的主要是买主。” *Industrial Evolution* (New York: Holt, 1901), 117-118, fn.23。

[13] 有“长途”贸易和纯地区性贸易，但不存在“中程” (*intermediate*) 贸易。奇波拉 (*Carlo Cipolla*) 对此的解释是：“广泛性与局限性的奇妙结合支配着舞台。从中国得到珍贵的丝绸或从远东得到贵重的皮毡在经济上是划算的，但从几英里之外得到较低廉的商品却不划算。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交通不可能发达，所以运费相对昂贵。特别是当不可能进行水路运输的时候，长途贩运的商品即使并非全部是贵重物品，但也主要是贵重物品。至于生活必需品，任何地方都

不得不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地区间的劳动分工必然主要由贵重物品和其他本地无法生产或不能轻易替代的物品决定。因此商业的基础只能是贵族的奢侈品消费。”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if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67), 57。

[14] 斯威奇 (Paul Sweezy) 说：“在整个西欧，城市的兴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不仅为逃离庄园的农奴提供了避风港，也改变了留在庄园中的农奴的地位。……正如低工资地区的工资必须提高一样，庄园主对可以迁居城市的农奴也必须做出让步。”“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2, Spring 1950, 145。请注意在斯威奇和多布 (Maurice Dobb) 之间的长期争论中，他们在很多方面存有歧见，但在这一点上，多布指出：“顺便说一句，我完全同意斯威奇的这一重要观点，即重要的并不是逃往城市本身，而是它构成的威胁（也许还伴随着一场不小的运动）足以使领主做出让步，从而严重削弱封建主义。”“Reply by Maurice Dobb, ”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2, Spr.1950, 160。

[15] “毋庸置疑，与封建主义极为类似的制度曾出现于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朝代，当时商业没有萎缩，而是在发展。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俄罗斯和波兰世界，那里的特点是，组织国际贸易货源的商人大多是外国人（汉萨同盟的商人Hanseatic merchants），而本地的土地所有者负责生产和集合商品，利润由双方分享。这种情况有利于领主阶层的兴起，因为他们借此可以获得支配农民的手段。”Claude Cahen, “Apropos de la discussion sur la féodalité, ” *La Pensée*, No.68, juil.- août 1956.95-96。

[16] Cahen, *ibid* .p.96.希伯特 (A.B.Hibbert) 同样认为：“现实和理论都说明，在中世纪早期，商业绝不是封建社会的溶化剂，相反地，它是那个社会的自然产物，封建统治者还特别支持它的发展……封建主义不能脱离商业而存在，……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封建主不得不为大量的家庭和公共机构提供生活必需品；第二，他们谋求从工商业中获取利润，其方式或者是亲自经营工商业，或者是通过对产品或生产者和销售者征收赋税来揩工商业的油。”*The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Town Patriciate*, ” *Past and Present*, No.3, Feb., 1953, 17。

希伯特进而论证了城市统治阶层的两个来源：

“两个过程影响了贵族阶级的形成，一个是城内旧有统治阶级的转化，另一个是商业和手工业暴发户的入围，后者常常是移民及其后代 (p.23)。”

“（这种解释）将有助于说明发财致富的小商贩和搬运工如何获得商业资本。最后它还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推断，新技术和新市场可能首先被新人所利用，他们为了发展而投靠原来有地位的富人，以致造成资本的使用方式渐渐翻新 (p.26)。”

[17] Owen Lattimore,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de Scienze Storiche, I: Metodologia-Problemi generali-Scienze ausiliare della storia* (Firenze, G.C.Sansoni, 1955), 124-125。

[18] Edouard Perroy.“A l’origine d’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 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 ” *Annales E.S.C.*, IV, 2, avr-juin 1949, 168.佩罗伊关于人口饱和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英国的

档案材料可资证明，据该材料记载，在中世纪，一个农业劳动日事实上意味着“从日出到中午”。见Slicher van Bath, *Agrarian History*, p.183.实际上，博瑟卢普（Ester Boserup）是从这一事实中得出如下结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工时的逐渐延长”。*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Growth*（Chicago, Illinois: Aldine, 1965），53。

[19] Perroy, *ibid.*, p.182。

[20] Douglass C.North & Robert Paul Thoma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I, 1, Apr.1970, 12-13, 斯利舍（Slicher）指出了类似的导致“停滞”的压力。他说：“尽管农耕面积缩小，生产要素减少——这肯定意味着谷物总量的严重下降——但谷物的价格并未像其他商品那样增长，它甚至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消费比生产倒退得更多。”“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préindustrielle en Europe occidentale,” *Afdeling Agrarische Geschiedenis Bijdragen*, No.12, 1965, 40。

“停滞”的严重程度也是一个问题。科斯明斯基（Eugen A.Kosminsky）怀疑，这种说法只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地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适用于法国。见“Peut-on considérer le XIVe et le XVe siècles comme l'époque de 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européenn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Milano: Istituto Edit.Cisalpino, 1957），I, 562-563。

[21] 波斯坦（Postan）的看法也与佩罗伊相近。见M.M.Postan, “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11, 3, 1950, 221-246。

[22] 布洛赫（Bloch）同意希尔顿的论点，他也警告我们，不要因高估现金流动的作用而夸大贵族收入减少的程度。确实，地租在一定程度上是固定的，银币贬值理应对租地农有利，只要租地农是以银币缴租。但是这里的前提未免过多了一点。布洛赫提醒我们，这时“金属货币严重短缺（以至在英国，一些农民因为无法获得缴租所需的银币，主动要求以实物支付）。”*Seigneurie française et manoir anglais*（Paris: Lib.Armand Colin, 1960），110。布洛赫说，这样的结果就是“限价较低，因为价格显然对收取固定地租的人有利”。

[23] R.H.Hilton, “Yeut-il une crise générale de la féodalité?” *Annales E.S.C.*, VI, 1.janv.-mars 1951, 25。

[24] *Ibid.*, p.27。

[25] *Ibid.*, p.28。

[26] R.H.Hilton, “Peasant Movements in England Before 1381”, in E.M.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 St.Martin's, 1966），II, 79.希尔顿指出，地租增加，对贫苦农民来说，可能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用冬季储备来充抵，但对富裕农民而言，结果是不同的。“最令他们恼火的是它有碍于积累，而不是饥饿的威胁（p.86）。”而且，旨在通过冻

结工资来降低开销的立法对大地主比对富裕农民还更有利，“既然没有劳动人手，大农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土地承租人就愿意以高价获得非如此便无法得到的劳动力。他的这种作法实际上也为领主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但领主不受经济法则的制约，因为他们掌握政治权力，这使他们具备了变通的可能。他们仍然保留着农奴，他们能够通过《劳工条例》（Justices of Labourers）和《治安条例》（Justices of Peace）等法令，来控制现有的工资劳动力的分配（p.88）。”

[27] Eugen A.Kosmimsky, “The Evolution of Feudal Rent in England from the XIth to the XVth Centuries,” *Past & Present*, No.7., April 1955, 32.他接着说：“封建剥削的加强开始榨干农民的血汗，同时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因为这摧毁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种长期的压倒一切的斗争……在1381年起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28] Slicher van Bath, A.A.G.B., No.12, p.190.他是这样来描述这一过程的：“当农民发现农产品价格低廉，而工业中不仅产品昂贵而工资亦高的时候，就感到不满起来，而政府或地主认为农民仍可忍受的某些附加税常使后者久蓄于衷的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

[29] Maurice, Dobb, *Papers on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1967), 11。

[30] 例如可参见Jean-Marie Pesez和Emmanuel Le Roy有关14~15世纪法国的讨论。“Le cas français: vue d’ensemble,”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 XIe-XVII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5), 155.他们还指出，有时附近的城市出于战略考虑也要求农民去寻找安全的避所（见p.156）。见Carlo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New York: Walker & Co., 1967a), 115。

[31] 见Georges Duby, “Démographie et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 XIe-XVII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5), 18-23。

[32] Kar Helleiner,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Eve of the Vita Revolution”,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Rich and C.H.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15.见Duby, *Villages désertés*, 14, 16; Pesez & Le Roy Ladurie, *Villages désertés*, 181-183。

[33] 见 Wilhelm Abel, *Die Wüstungen des Ausgehenden Mittelalters*, 2nd ed. (Stuttgart: Verlag, 1955), 5-12。

[34] 见Maurice W.Beresford, *The Lost Villages of England*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54).他认为人口减少（既包括整个村庄的荒芜，也包括村庄内部人口的减少）最严重的时期在1440至1520年间（见p.166）。他认为圈地是造成这一缓慢发展的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人口减少发生在那些随着耕地的减少已经存在大量牧场的村庄；……圈地和人口减少只是一个缓慢

发展过程的终点……（p.210）。”

[35] 佩塞茨（Pesez）和拉杜里（Le Roy Ladurie）认为，在东朗格多克（Languedoc），从1328年至今，约5%~7%的村庄变为荒地。如他们所说：“这些数字并非毫无意义，因为这些数字与艾贝尔（Abel）在德国统计的数字（40%）以及贝雷斯福德先生（Mr.Beresford）统计的数字相去甚远。” *Villages désertés*, p.129.这些统计数字的出入似乎更能说明农业重构问题，而不是人口下降问题。我们知道，在农业重构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比如，法国建立的大领地就比英国或德国少得多。当然，在14和15世纪也可能存在人口下降率的不同，但因这方面的根据主要是从村庄荒芜等现象中推导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把握。因此，我们不能以此为据，否则我们会陷入循环推理。

[36] Marc Bloch,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64), I, 122.

[37] Henri Lefebvre, “Une discussion historique: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observations,” *La Pensée*, No.65, janv.-févr.1956, 22.

[38] “这种加重压迫的后果，不只是榨干了为城堡下金蛋的鹅，而且引起濒临绝境的农奴非法逃离庄园的运动。……逃亡问题如此严重，对劳动力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尽管有契约和相互的许诺，人们还是竞相从邻近的领地上诱拐农奴。这种竞争造成一定的让步，竞争的存在也限制了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深。”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6), 46-47.

[39] “事实上，固定收入的减少，直接管理的削弱，修缮费的必要支出，所有这一切（在14和15世纪）极大地影响了所有领主的财政地位。各处的领主似乎都手头拮据，并积极地在外面寻找获利的机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经常走出家园，一闯天下。他们或投靠极需盟友的有权势的王公，或踏上政治交易和姻缘联盟的危险之途，总之，诸如此类的各种增加收入的方式使几乎所有的大贵族都安渡难关。” Georges Duby,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Columbia: Univ.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8), 330.

[40] “农村的工资由于城市手工业的竞争和纺织工人队伍在欧洲很多农村地区的渗透，而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相比之下，粮价显著下降，这就决定了所有农村特大地产的命运。的确，至少在法国和英国，在1380年以后似乎发生了领地消失和直接管理的庄园农业急剧衰落的现象。” Duby, *ibid.*, 311.

杜比（Duby）较早的一种说法更为慎重。他说：“结果似乎可能是这样，从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即使大地产的规模没有缩小，甚至有时还相反出现扩大的倾向，但至少它们变得松散了。”“Le grand domaine de la fin du moyen âge en France,” *Premièr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Stockholm, August 1960: *Contributions* (Paris: Mouton, 1960), 338.

[41] “货币地租的最终确立是在不利于收租人的形势下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强加在收

租人头上的，因为正是人口流动的发展迫使领主变得比较随和。” Kosminsky, *Past & Present*, No.7, p.33。

[42] 见Duby: “我们切勿以为14、15世纪在所有地区（重点号是笔者加的）发生的土地抛荒和人口重新在受到严格农业限制的固定村落里组合的现象都是经济不景气、农业衰落和人口骤减的迹象。相反，这种土地形式的变化只反映了农产品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危机阶段，这场危机持续了一至两个世纪，但就其发展和性质而言，它与13世纪法国亚富辖地发生的情形十分相似。于是，在日耳曼尼亚的西北部，领主把价值日增的林地圈围起来。他们在林地四周围以栏栅，将农民的猪群赶走并从此禁止周期性烧柴取暖。实行圈地的领主拥有权力，这使那些居住在林地，靠森林、畜牧和相关农业为生的家庭另寻出路。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结果林业居民（Waldbauer）就变成了在固定的土地上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居民（Ackermann）。” *Rural Economy*, p.309。

[43] *Ibid.*, p.315。

[44] “英国资本主义萌生的旺季是在百年战争的初期，当时皇室财政告急，新的税收制度开始尝试，人们投机羊毛业，意大利的财政亦趋紧张，新兴的纺织业在孕育，所有这一切导致一批新人的出现，其中包括军费支付者、投机商、羊毛业垄断者。但这批人既是新兴的也是短命的。他们的好运来得轻易，失去得也轻易。财政混乱和尝试征收巨额国税的时期随着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而告终结……”

英国商人阶层以所有商人都会采取的方式对商业的停滞作出反应。他们制定限制条例，阻止外人经商，谋求由圈内人分享现有的商业机会……常常被人们视为典型中世纪条例的那些条文，事实上出自于15世纪，它们标志着早期那些较自由、更具有投机性的商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M.M.Posta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2, May 1939, 165-166。

[45] “我们认为，并非人口减少，而是对庄园经济的清算和封建地租的折算与减轻，才造成了农民地位的改善和简单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后者为资本主义关系开辟了道路。人口的缓慢减少……只能加速或延缓……这种发展过程。” Eugen A. Kosminsky,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I, p.567。

[46] Marc Bloch: “The Rise of Dependent Cultivation and Seigniorial Institutions” in M.M.Postan, e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6), 269.

[47] “城市国家的对立面——充满希望富有人力的地方性国家，似乎更有承担现代战争费用的能力。它维持着雇佣军队，获得了建造大炮用的昂贵的材料，它会立即允许自己支付巨款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地方性国家的兴起在很长时期内曾一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I, p.8。

当然，我们绝不能擅自推测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把战争艺术的历史性转折确定在1494年。见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37), 30。“奥曼

认为，两个关键的‘倾向’（请注意这个词）是火药武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上述倾向的结果）陆战阵地的运用。后者使骑兵冲锋越来越不实用（p.33）。”的确，有的作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即使就16世纪而言，军事新技术的社会影响现在也被人们夸大了。例见H.M.Colvin, “Castles and Government in Tudor England,”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XIII, 1968, 226.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记住我们说的是一种趋势或倾向，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4世纪已经开始出现一种持续加深的影响。

[48] “在整个西欧和中欧，中世纪的最后两个世纪都是一个农村萧条、人口减少的时期……前期的庞大政治结构……似乎一时无法履行其维持治安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正是它存在的理由。”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p.117-118。

[49] “这样，从这时起，国家开始获得维持其最高权威的那一基本要素——财政源泉，其富有程度是任何个人或社团所无法比拟的。”Bloch, *Feudal Society*, p.422。

[50] 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曾把这里涉及的理论问题分离出来，他说：“官僚体制与税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官僚体制的效能取决于其税收系统的效能，而其税收系统的效能又取决于官僚机构的效能。这样，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只要官僚体制负担增加或征税能力削弱，结果都会造成分散权力的恶性循环。人们的确可以认为，世袭官僚体制的‘赋税危机’本质上相当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紧张局势往往是那些‘封建化’埋下的祸根转变为现实造成的，即官员‘滥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倾向；大土地所有者为获得免税特权和篡夺财权、政权而进行斗争；以及农民寻求保护躲避中央官僚机构的税收而必然具有的经济政治依附性’。这些‘离心’倾向既可以被看作造成不能维持有效的税收制度和中央统治的原因，也可以被看作它们的结果。”“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见于George K.Zollschan and Walter Hirsch, ed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1964), 254。阿丹特（Gabriel Ardant）对这一矛盾的分析更强调国家财政政策的选择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这是这种选择导致了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虽然事实上很难把二者分开。他说：“政府可以采取没收财产的手段，这种手段对那些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的政府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但这种手段带来的财富终究是有限的，并常常被浪费掉，不管我们这里说的是靠征服或侵吞教产所带来的财富，还是靠有计划地迫害某些社会集团所带来的财富。除了没收手段之外，还有两种解决方式可供当权者选择：第一种是封建的解决方式，它往往以存在庄园经济和官员以权谋私为前提，这种解决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造成国家事实上的肢解。与这种方式相对立的，我们可以说是借款和涨价的手段，这是一种财政应急措施，我们将看到，它也取决于经济结构。在这里，我们显然是极大程度地把国家借以改变该社会之社会组织政策抽象化了。”*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l'impôt* (Paris: S.E.P.E.N., 1956), I, 541 and ff。

[51] 例如阿丹特（Ardant）曾指出：“为了取得在不利的财政形势下看来必要的贷款，国家可能必须做出保证。这种保证是广义的，它意味着国家主权受到限制，因为某种特别的收入来源可能要转归外国贷款人控制，财政以至行政的某种监督权也会由贷款人或支持他们的国家来

行使，当然还会有其他表现形式（*Ibid.*, I, pp.549-550.）。”

[52] 韦伯（Max Weber）在对比西欧与印度时说：“在现代初期的西方国家也曾出现包税制和承包人显然握有财权的募兵承包制，但在诸多强大王国统治下的印度，那些中央机构却未像西方王公那样，把军权和财权逐渐收回到自己的手中。” *The Religion of India*（New York: Free Press, 1958），69。

[53] “高官厚禄制虽然绝非善举，但有（强化国家政权）的政治作用。这是行政中的‘雇佣军’制度，虽然它也受到同样严厉的指责……但它毕竟与日益强大的王权休戚与共，因此不再仅仅依赖封建贵族的军事力量。” F.Chabod, “Y-a-t-il un état de la Renaissance?” in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Paris: Lib.Philosophique J.Vrin, 1958），66。

[54] Duby, *Rural Economy*, p.331.

[55] Léopold Génicot, “Crisi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6），699.

[56] “理论家和活动家（例如黎塞留Lichelieu）都认为声望很重要，但与此同时，他们更重视‘尊严’，正是各种‘尊严’逐步造成王公与其子民的区别，把王公送上无人敢与之攀比的地位。” Chabod, *Actes*, p.72。

[57] “如果说王公的权力在增长，那么另一种权力也在日益扩大，这就是科层组织‘小头目’的权力。随之出现了一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集体精神，尽管在他们——既包括高级头目也包括一般成员——中间存在着个人冲突……
这个‘第四等级’是同期发展的王权的政治盟友（因此行政集权与政治专制同时发展），所以他们日益增长的权力事实上是我们应予重视的重要因素（*Ibid.*, pp.68-69, 72）。”

[58] 米勒（Edward Miller）曾简单讨论当今远为繁复的利益交织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是如何初露端倪的。见“Government and Economic policies and Public Finance, 900-150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8, 1970, 34-40。

[59] 见Yves Renouard, “1212~1216: Comment les traits durabl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moderne se sont définis au début du XIIIe siècle”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XXVIII, 1, janv-mars.1958, 5-21。

[60] “一个由无数小自治体——贵族领地组成，与拉丁基督教世界大体相合的大联合体让位于几个并列的、拥有广大领土的，并各具自己特点的大国，这些国家标志着现代欧洲国家的萌芽。” Edouard Perroy et al., *Le Moyen Age*, Vol.III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Pari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5），369~370。

[61] “事实上，车轮已经转了一周。16世纪初的形势对大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Ottomen

Empire) 有利。经济学家会说, 这种大国是最佳的政治单位。但随着这个世纪的发展, 由于某种我们无法恰当解释的原因, 这些庞然大物渐渐时运不济。这种危机是过渡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这些大国是虚弱了? 还是腐朽了? 不管怎么说, 在17世纪, 似乎只有中等国家生机勃勃。比如亨利四世统治时期绽放光彩的法国; 伊丽莎白时代好战而辉煌的小英格兰; 以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为中心组建起来的荷兰; 1555年至三十年战争前夕, 受到祥和气氛影响的德国——在那以后, 德国的整个身心陷入战争的泥潭。地中海地区的这种中等国家有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摄政权。前者再次赋有黄金, 后者以一个城市变为一个地方性国家。极尽奢华、美丽与智慧的威尼斯和菲迪南大公 (Grand - Duke Ferdinand) 统治下的托斯坎尼 (Tuscany) 亦属此类.....

换言之, 在1595~1621年的经济萧条期, 帝国比中等国家损失惨重。”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I, p.47。

[62] Ibid., II, p.10.

[63] Fr.Hartung & R.Mousnie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a monarchie absolue, ”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G.B.Sansoni, 1955), 47.

[64] V.G.Kieman, “State and N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 *Past & Present*, No.31, July 1965, 35~36.

[65] Gustaf Utterström,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 1955, 47.

[66] Ibid., p.5.

[67] Ibid., p.24.

[68] Ibid., p.39.

[69] 见Ibid., pp.14~15.但是赫雷纳 (Karl Helleiner) 援引罗登瓦尔特 (Ernst Rodenwaldt) 的著作说, 尽管现在人体上的虱子不像鼠虱那样在传播淋巴腺鼠疫方面起重要作用, 但在中世纪它可能是比鼠虱更厉害的传播媒体。这样乌特斯罗姆的假说就要大打折扣。见 Hellei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7。

[70] Duby, *Rural Economy*, p.307.

[71] Ibid., p.308.

[72] Hellei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26.

[73] “1200年以后, 西欧经济生活的周期性起伏似乎不可能是气候变化的结果。”Seicher van Bath, A.A.G.B., No.12, p.8。

[74] 在指出乌斯特罗姆的某些论据不属于气候造成之后，他又指出其在运用气象统计时犯的方法上的错误。他以为，乌斯特罗姆没有拿出足够长期的统计数字以支持他的结论。“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他要说明价格的长期持续增长，却只依据他想加以解释的曲线中的某些‘周转’点，而忽略，甚至也许根本不晓得该曲线的全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 (Paris: Plam-marion, 1967), 17。

[75] Norman J.G.Pounds, "Overpopulation in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II, 3, Spring 1970, 245。庞德尔谈到了“长期营养不良的状况”。布罗代尔持有相同观点：“（在原始农业经济中）收成的周期、品种和欠缺决定着全部物质生活，它们能严重侵蚀伤害树木的白质木层或人类的肌体。”
Civiliz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67), 32~33。

[76] “荷兰沿海地区的居民主要靠畜牧业和渔业为生，因此比务农的人食用更多畜产品和肉食，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14世纪不像其他欧洲人那样严重感染流行病。”Slicher van Bath, *A.A.G.B.*, No.12, pp.89~90。

[77] “这场瘟疫自（1347~1351年间）传入欧洲以后，一直延续了350年。它成为一种流行病，不仅对当时人口死亡率的波动，而且对人口死亡率的长期平均值，均产生深刻影响。”Hellei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5。

[78] 赫雷纳（Karl Helleiner）鼓吹这样一种看法：“（黑死病引起人口减少之后），下层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恰恰不利于人口的迅速恢复。这是一种推论，但某些事实可以证明这一论点。下层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将导致生活水准的提高，这意味着人们消费的食品从谷物部分地转为肉类。消费倾向的这一变化反映于肉产品和粮食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后者又势必加剧人口流动、土地抛荒的过程……其表现之一就是欧洲部分地区，人们放弃农业，经营畜牧业。然而，在一定的农业技术水平下，生产含一千卡路里的肉食所需要的土地比生产含一千卡路里的蔬菜要多出五、六倍以上。因此，每当人口减少，减轻了人口对土地压力的时候，都会因消费和生产的这种变化而使压力再次加重。这种假设有助于解释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事件，即中世纪晚期的饥馑与死亡惨剧并不逊于前几个世纪，虽然这时平均每人得自沃土的收获量显然比以前要高得多（*Ibid.*, pp.68~69）。”

[79] “14、15世纪的人口减少加剧，而不是缓解了空间短缺问题，所以它没有减轻始于13世纪的压力。相反，由于地租下降，利润减少和领主负担的加重，它会造成压力加剧，因为投向土地的资本将因转投他处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减。”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49。

[80] “但是还有大量事例说明，地租折算（*commutation*）非但没有减轻而且反倒加重封建负担。它只是直接摊派额外劳役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在主要是领主提倡采用这种方式的年代，它的这一性质表现得最明显。由于劳动力相对充足，所以可以以这种形式满足增加封建收入的愿望……。村庄的人口对耕地构成压力，这种压力使村民更加难以维持生计，于是雇佣劳动力贬值并相对充足，可能正是这一切诱使某些人采用折算制。”Dobb, *Studies*, pp.63~64。

[81] Archibald R.Lewis, "The Closing of the European Frontier," *Speculum*, XXXIII, 4, Oct.1958, 475.

[82] *Ibid.*, p.476.

[83] Andrew M.Waston, "Back to Gold - and Silv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 1, 1967, 1.

[84] "我们忘记了, 在古代和中世纪, 被今人视为很可怜的矿山, 那时被看作是一流的。从8世纪到美洲的发现, 西苏丹是西方世界的主要提供黄金基地。最初是加纳(Ghana)以西苏丹的名义把商品推销到地中海, 从而提高占有这一财源的国王的声望。"R.A.Mauny, "The Question of Ghana," *Africa*, XXIV, 3, July 1954, 209。

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认为, 正是北非对黄金的需要(为了把它卖给欧洲人), 而不是西苏丹对他们用黄金换来的盐的需要, 成为这次扩张的主要动因。见"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 l'or dans le Soudan occidental au moyen âge" *Annales E.S.C.*, XXV, 6, nov-déc.1970, 1630~1636。

[85] Wast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 p.34.参见洛佩兹(Lopez)和米斯基敏

(Miskimin)合写的著名文章。在那些文章中, 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 在1350~1500年间, 贵金属不断地从西北欧沿着意大利——利凡特——印度的走向输出。(英国)非农业人口的奢侈消费和在装修教堂方面的过分投资.....相对增加了对技工的需求, 使黑死病后已经出现的技工短缺现象愈加严重。结果, 技工的工资大幅度增长, 人们也开始转向北欧以外的地区去获得某些本地没有的奢侈品。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追求外国货, 实在也是经济形势使然。而且, 既然有限的劳动力已用于生产国内的奢侈品, 出口商品的生产就会因劳动力短缺而受到排斥, 于是北方经济潜在的出口利润随之减少.....。

"钱到哪里去了?的确, 北欧供给的贵金属大部分落入了罗马教廷, 但除了货币直接易手外, 商业渠道通过奢侈品消费似乎更容易导致同样的后果.....欧陆南北交通(始于汉萨同盟城市)的终点是米兰、热那亚和威尼斯.....南北欧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活跃的单向贸易, 其结果是北方的贵金属源源南流。

我们在14世纪至15世纪初的法国也发现人们越来越普遍地享用南方的奢侈品.....。法国和英国控诉意大利榨干了他们的贵金属, 殊不知意大利的贵金属也被利凡特榨干.....尽管从西北欧输入黄金, 尽管中欧的矿山也有一定的产出, 尽管塞内加尔(Senegal)提供了更多的贵金属, 但大量的事实表明, 黄金收支最多达到持平, 而在大部分时间是入不敷出。既然人们的黄金欲永无止境, 所以14、15世纪意大利与利凡特的贸易肯定造成更多的黄金从意大利流失。.....意大利奢侈品贸易的相对优势使它更加依赖利凡特, 从而增加了贵金属向那个方向的流失量.....。到14世纪末, 埃及的经济彻底衰退.....各种经济指标全面下降.....埃及的经济危机伴随着其货币体系的崩溃。金币、银币日益减少, 铜币成为国内流通和各种交易的主要币型。

在造成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埃及硬币短缺的无数因素中, 首要因素是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长期逆差。到13世纪, 努比亚(Nubia)的金矿几被采空, 以至采得黄金还不够开采费用。与西苏丹的活跃而有利可图的贸易使埃及在14世纪下半叶以前一直保持充足的黄金供应, 但在那以后, 这

一贸易萎缩，非洲的黄金流向欧洲……在埃及这个黄金源泉渐趋枯竭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外国商品和奢侈品的消费相应锐减的迹象，国家用于进口的支出也没有随之减少……

在15世纪，欧洲是埃及唯一维持贸易顺差的地区……15世纪初，埃及的财政完全依赖与欧洲的香料贸易……但在这种贸易的利润中，只有一部分留在这个国家。香料贸易是转手贸易。此外，由于埃及本身也要消费香料和其他从远东进口的商品，所以它也促进了（黄金向印度的）流动……

因此可以说，为了得到奢侈品，在从北欧启程南下的黄金中，至少大部分经过漫长的旅行，穿过意大利和埃及，最后落脚在储量已经吓人的黄金大国——印度。”“England to Egypt, 1350-1500; Long-term Trends and Long-distance Trade,” in M.A.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Press, 1970), 101~105, 109, 110, 114, 117, 123, 126~128。

[86] 见Desanka Kovacevic, “Dans la Serbie et la Bosnie médiévales: les mines d’or et d’argent,” *Annales E.S.C.*, XV, 2, mars-avr. 1960, 248~258。

[87] “从1460年起，以中欧为中心，采矿业突然兴起。在这个地区，技术日益科学化。由于钻井、排水、通风等技术的改进，萨克森（Saxony）、波希米亚（Bohemia）和匈牙利的矿井已经深达600英尺。水力的使用越来越普及，这使风箱增加了强度，钻头增加了力度，于是矿床从山脚移到了谷地。第一代10英尺高鼓风机炉的出现把旧式矿床的生产能力提高了3倍。在1460至1530年，中欧矿山开采量可能增加了5倍。”Perroy, *Le Moyen Age*, III, pp.559~562。

[88] 见V.M.Godinho, “Création et dynamisme économique du monde atlantique (1420-1670),” *Annales E.S.C.*, V, 1, janv-mars 1950, 33;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VIII (1) (Paris: S.E.V.P.E.N., 1959), 57。

[89] “对地中海地区来说，把非洲这个黄金源泉解脱出来的美洲，还扮演着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即替代了德国的银矿。”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433。

[90] “商业发展到哪里，哪里就会随之出现对新的消费品的追求。像通常会发生的一样，贵族希望极尽奢侈，或至少过上与他们的地位相称的舒适生活。”He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36), 81。

“如果我们考虑到战争夺去的主要是上层阶级的生命（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携带武器），我们就完全可以怀疑，这个寄生阶级的总人数是否真的相对增长……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日益严重的穷奢极欲……但是这种日益严重的穷奢极欲是一种能够用封建制的性质加以解释的趋势呢，还是反映了某些发生在封建制之外的东西呢？11世纪以后，商业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可以获得数量和品种都日益增多的商品。”Paul Sweezy,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p.139~140。

但是多布认为：“从土地所有者强制剥削剩余劳动转变为雇佣自由劳动力，其前提必须是存在廉价的待雇劳动力（即存在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成分）。我相信这一点在决定旧社会关系的存亡方面是比靠近市场远为重要的因素。”*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161。

希尔顿站在多布一边，他说：“经济的进步与抗租斗争及封建主义的政治稳定是连在一起的，这种进步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扣除必要消费部分所余总量的增加。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所谓国际丝绸、香料贸易的复苏，才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XVII, 4, Fall 1953, 347。

[91] 见 B.H.Slichervan Bath, “The Rise of Intensive Husbandry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J.S.Bromley & E.H.Kossman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London: Chatto, 1960), 130~153。

[92] *Ibid.*, p.137。

[93] “这些改良运动是为了满足15、16世纪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的需要。因急需向这些城市提供粮食，所以他们必须在周围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或者是开垦生地，或者是使用水利灌溉。”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62。

[94] Joel Serràs, “Le blés des îles atlantiques: Madère et Açores aux V^X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E.S.C.*, IX, 3, juil-sep.1954, 338。

[95] 见J.A.van Houtte, “L’approvisionnement des villes dans les Pays-Bas (Moyen Age et Temps Moderne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73-77。

[96] “在15世纪，葡萄牙对汉萨同盟的商人和布列塔尼人 (Bretons) 越来越开放，因为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小麦和木材，那时对这两种进口商品已经不可或缺。”Marian Malowist, “Les aspects sociaux de la première phase de l’expansion coloniale,” *African Bulletin*, 1, 1964, 12。

[97] 见Ruggiero Romano, “A propos du commerce de blé dans la Méditerranée des X^{IV}e et X^Ve siècles,” 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3), 149-161。

[98] 贝内特 (Bennett) 所列的8个等级是 (1) 面粉制品和淀粉质块根，包括羊角香蕉；(2) 植物脂肪和植物油；(3) 干豆 (蚕豆、豌豆和小扁豆)；(4) 食糖；(5) 奶和奶制品，可能还包括鱼；(6) 猪肉；(7) 牛肉、羊肉、山羊肉、水牛肉、禽肉和蛋类；(8) 蔬菜和水果。见M.K.Bennett, *The World’s Food* (New York: Harper, 1954), 127-128。“这张总分类表为什么应该存在？毫无疑问是因为它反映了这几种食品的生产成本与热卡含量之比 (p.128)。”

[99] 见G.B.Masefield, “Crops and Livestock,”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Rich and C.H.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295。

[100] 勒特雷尔 (Anthony Luttrell) 在描述1500年以前的情形时说：“自12世纪起，拉丁人

利用穆斯林和叙利亚、塞浦路斯（Cyprus）以及其他利凡特国家的其他奴隶来生产食糖，到1404年，当热那亚的达拉·帕多瓦（Giovanni Della Padua）从国王领取到准予在阿尔加维（Algarve）建立种植园的时候，热那亚人显然已经把食糖生产从西西里（Sicily）转移到葡萄牙南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热那亚人把这种想法、资本、粉碎和冲洗技术提供给亚速尔群岛（Azores）和马德拉群岛（Madeiras）的居民，也正是热那亚人把食糖从这些岛屿出口到远及佛兰德和君士坦丁堡那样的地方。他们还帮助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例如，诺里（Antonio de Noli）在15世纪60年代把几内亚人（Guineans）带到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Slavery and Slaving in the Portuguese Atlantic（to about 1500），”in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Africa*（mimeo, 1965），76。

[101] 见E.E.Rich, “Colonial Settlement and its Labour Problems,”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Rich and C.H.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308。

[102] 比如塞洛（Serrão）曾这样地说到马德拉群岛：“在大约1475年的时候，小麦的周期性生产结束了……食糖扼杀了小麦。”*Annales E.S.C.*, IX, p.340.塞洛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亚速尔群岛成为葡萄牙的小麦产地，主要用于弥补马德拉的不足。这种转作形式“存在于16世纪、17世纪，甚至18世纪。”*Ibid.*, p.341。

[103] 见Godinho, *Annales E.S.C.*, V, p.33。

[104] “人们现在普遍忽略了这样一点：在1750年的时候，人们的食品诚然以面包而不是肉类为主，但这是生活水平下降以后的情况，并不适用于中世纪。”Fernand Braudel and Frank C.Spooner,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1750,”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Rich and C.H.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414。

[105] “在1400~1750年间，欧洲是面包消费大户，一半以上的人口食素，……恰是这种‘低级’的饮食习惯使欧洲得以承受日益沉重的人口负担……面包消费越来越排斥肉食消费，直到19世纪中始终如此。”*Ibid.*, p.413.另见W.Abel, “Wandlungen des Fleischverbrauchs und der Fleischversorgung in Deutschland,” *Bericht über Landwirtschaft*, n.s., 22, 1938, 411~452, cited in Slicher van Bath, *Agrarian History*, p.204。

[106] “葡萄牙早期沿西非海岸所进行的探险活动只带来一种直接的收获，即极乐园的粮食……他们现在可以花费比穿越撒哈拉陆路更小的代价获得这些粮食。该海岸因这种贸易得名为‘粮食海岸’。但是这种作物不能在欧洲生长。”Masefiel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276。

[107]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54。

[108] 梅斯菲尔德（G.B.Masefield）指出了美洲与东半球的这种联系怎样改变了世界的农业布局。他说：“在这种联系建立以后出现的农作物与牲畜的配制，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许是地理大发现的最深远影响。没有美洲的农产品，欧洲后来便不能养活那么多的人口，旧大陆的热带地区也不能取得那样快的发展。如果没有欧洲的牲畜，尤其是如果在运输和耕作中不使用骡马，美洲大陆也不能取得那样高度的发展。”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276。

[109] 布罗代尔（Braudel）曾经提到在意大利各地出现的“木材荒”，“地中海地区的海军渐渐习惯于到越来越远的地区去寻找在他们本地森林中找不到的东西。在16世纪，满载板材和梁材的船只将北欧的木材运到塞维利亚（Seville）。” *La Méditerranée*, I, p.131。

莱恩（Frederic C.Lane）说：“当15世纪下半叶，橡树林濒危现象开始受到公开承认的时候，木材短缺似乎只在威尼斯特别严重。至少拉古萨人（Ragusans）和巴斯克人（Basques）有相当丰富的木材供应，所以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的竞争。但到16世纪末，似乎所有地中海国家都缺少橡木。”“Venet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21。

达比（Darby）认为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他说：“都铎王朝以后，英国的商船之所以能够增多，海军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有充足的橡木供应，橡木是建造船体的原材料。制造桅杆用的枞树，以及人造树脂、焦油沥青等‘海上储备’，都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The Clearing of the Woodland in Europe,” in William L.Thomas, Jr.,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56），200。

[110] 见Godinho, *Annales E.S.C.*, V, p.33。

[111] 金属货币向符号货币转化的关键因素是使硬币的商品价值低于（最好是大大低于）它的票面价值。但是奇波拉（Carlo Cipolla）指出，英国和美国的低值硬币分别是在1816年和1853年之后才达到这种水平的。见 *Money, Prices*, p.27。

[112] Marc Bloch, *Esquisse d'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Europe*（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4），50。

[113] 后期卡佩（Capetian，法国王朝）君主的咨议大臣即使并非全部，也大多数是商人，主要是意大利商人，他们一方面承揽长途贩运，一方面向国王或贵族放贷取息。他们还经常是铸币厂承包人和贵金属商贩（Bloch, *ibid.*, p, 52）。

[114] “在大多数情况下，铸币厂不由国家经营，而是承包给私人，后者使用其他人带给他们的贵金属来制造货币。这些铸币厂承包人主要是为个人利益打算，很少考虑公共利益。如果铸币厂由国王管理，他也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家，而不是一个国家首脑来行事。”Cipolla, *Money, Prices*, p.28。

[115] 布洛赫曾以15世纪法国度支部（Chamberdes Comptes）为例，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当他们把王室的一本账转到另一本去的时候，他们不是简单地以利弗（livres），苏

(sous) 和丹尼尔 (deniers) 等为单位把总数誊抄过去, 而是附上一纸兑换比率表, 用以说明在此期间这些货币单位的金属价值所发生的变化。他们写道: ‘登记前一本账时, 货币疲软, 当时的416利弗19苏……在货币坚挺的今天相当于319利弗19苏。’” *Esquisse d'une histoire*, p.49.

[116] H.V.Livermore, “Portuguese History”, in H.V.Livermore, eds., *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Press (Clarendon) 1953], 59.

戈丁诺 (Vitorino Magalhães-Godinho) 认为, 在葡萄牙, 1383~1385年激烈的社会斗争的结束与1415年葡萄牙人远征休达 (Ceuta) 有直接联系。见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9), 40.

[117] “历史学家认为, 14、15世纪的混战 (包括法国入侵意大利) 与贵族收入水平的下降有某种联系……难道15世纪开始的大规模扩张运动 (甚至可以说14世纪在大西洋岛屿殖民时就已经开始了) 不属于同类事件, 不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引起的吗? 作为同类事件, 我们还应该算上发生在东欧的扩张行为, 以及丹麦和德国贵族征服斯堪的纳维亚的企图。” Marian Malowist, “Un essai d'histoire comparée: les mouvements d'expansion en Europe au XV et XVI siècles, ” *Annales E.S.C .XVII*, 5, Sept-Oct.1962, 924.

[118] 马洛维斯特 (Malowist) 说: “似乎很清楚, 在葡萄牙殖民扩张的第一个阶段, ……贵族起主要作用……但随着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发展, 葡萄牙商人在海外贸易中所占的分量逐步增长。……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过程似乎也是如此。” *Africana Bulletin*, No.1, pp.32-34. 肖努 (Chaunu) 曾接引过戈丁诺 (Godinho) 的一段话, 用以说明类似的观点, 即葡萄牙的扩张可分为两类, “一面扩张主要是陆上的, 是由贵族以政治形式进行的, 例如占领休达或把收复失地运动扩大到摩洛哥; 另一类基本上是商业扩张, 主要由资产阶级沿非洲海岸进行。”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63. 像马洛维斯特一样, 肖努补充说, 对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过程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

威泰勒 (Luis Vitale) 似乎更重视资产阶级的作用。他说: “1381年, 葡萄牙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比法国革命早了四个世纪。里斯本 (Lisbon) 的商业资产阶级在与佛兰德通商的过程中联合在一起, 把封建贵族赶下了台。这场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 还不具备资产阶级胜利的条件, 但是资产阶级的兴起是明显的, 北大西洋的贸易、‘航海家亨利’ (Henry the Navigator) 的计划、最重要的是15世纪的大发现, 都反映了这一点。”“Latin America: Feudal or Capitalist?” in James Petras and Maurice Zeitlin, eds., *Latin America: Reform or Revolution?* (Greenwich, Connecticut: Fawcett, 1968), 34.

[119] “宗教既是这种迫害的原因, 也是它的口实。……后来在路易十四时代, 正如帕里塞特 (Georges Pariset) 很久以前所说的, 人口数量的对比也不利于法国的新教徒 (Protestants)。”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380.

[120] Rich,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302~303.

[121] 这种自我划定的边界在伊比利亚半岛肯定已有很长的历史。比什科 (Charles Julian Bishko) 说: “八个世纪以来, 对南部摩尔人发动的时缓时疾的进攻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斗争中

的一首‘伊利亚特（Iliad）’，而首先是中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再次殖民。”“The Castilian as Plainsman: The Medieval Ranching Frontier in La Manche and Extremadura, ”in Archibald R.Lewis and Thomas F.McCunn, eds., *The New World Looks at Its History* (Austin: Univ.of Texas Press, 1969), 47。

[122] Chaunu, *Séville*, VIII (1), p.60。

[123] “在整个北大西洋，如果要从冷水带向温水带航行，最理想的路线是沿着从里斯本北部到直布罗陀（Gibraltar）或从里斯本到摩洛哥北端的海岸航行。只有在这条线路上，你才能一开始就过到一股强劲的风，把你吹离海岸，送进公海，然后在夏至时分，信风最低点的时候，把你吹到大洋的中心。当你从秋天到初春返航的时候，又会有一股风吹着你战胜中纬度地区的逆流，安全返回。”Pierre Chaunu, *Séville* VIII (1), p.52。有关地图请见Charles R.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Knopf, 1969), 54~55。见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t capitalisme*, pp.310~312。

[124] “毫无疑问，伊比利亚国家的商业殖民活动在现代初期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他们的对外贸易已经在逐步的扩大。”Charles Verlinden, “Deux aspects de l’expansion commerciale du Portugal au moyen âge, ” *Revista Portuguesa de História*, IV, 1949, 170。另见Charles Verlinden, “The Rise of Spanish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1, 1940, 44~59。同样的观点还请见Michel Mollat, “L’economie européenne aux deux dernières siècles du Moyen Age, ”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Firenze: G.B.Sansoni, 1955) III, Storia del medioevo, 755。

António H.de Oliveira Marques在下文中详述了13、14世纪葡萄牙与佛兰德的贸易的性质：“Notas para a historia da feitoria portuguesa na Flandres no século XV,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 Medioevo (Milano: Dott.A.Giuffrèd., 1962), 437 ~476, 他指出, 1308年在布鲁日（Bruges）就已经存在葡萄牙“民族”，商品也是用葡萄牙船只运输的（见p.451）。见 Godinho, *L’economie portugaise*, p.37。

[125] 潘尼迦（K.M.Pannikar）指出，自13世纪以来，热那亚一直想控制西方与印度的贸易。“最后，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热那亚人得以打破威尼斯的垄断和穆斯林的封锁……”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3), 26~27, 帕尼卡尔这种关于威尼斯垄断权丧失的描述显然过分简单了，但他正确指出了热那亚人在这方面的长期追求。

[126] Charles Verlinden, “Italian Influence in Iberian Colonizatio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II, 2, May 1953, 199。

[127] Ibid., p.200。

[128] 见Virginia Rau, “A Family of Italian Merchants in Portugal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Lomellini,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ì* (Milano: Istituto Edit.Cisalpino, 1957), 718。

[129] Verlinde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205。另见Charles Verlinden, “La colonie italienne de Lisbonn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métropolitaine et coloniale portugaise,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Cisalpino, 1957), I, 615~628.

[130] Rau,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p.718。

[131] *Ibid.*, p.719。

[132] “在14世纪, 葡萄牙的国内市场已近饱和, 不再有发展的余地。可能是因为葡萄牙属于富庶的伊斯兰地域, 它才得以保持相当活跃的、高于西欧一般水平的商品交换活动, 在他们那里, 以钱易货占主导地位……这样, 背井离乡的农民初而奋起反抗领主日益残酷的压迫, 继则屈服于货币的购买力, 结果受沿岸大城市的吸引, 最后为这些商业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拓展做出了贡献。”J.-G.DaSilva, “L’autoconsommation au Portugal (XIVe-XXe siècles), ” *Annales E.S.C.*, XXIV, 2, mars-avr.1969, 252。

[133] “(葡萄牙打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整个15世纪, 葡萄牙是一个统一的王国, 完全没有内乱。法国正受着战争的困扰, 一方面百年战争已进入尾声阶段——1415年是进行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的年头, 也是(葡萄牙)占领休达(Ceuta)的年代——另一方面又在和勃艮第(Burgundy)作战。英国受到英法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困扰, 西班牙和意大利则因王朝战争和其他内部倾轧而四分五裂。”C.R.Boxer,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 (Johannesburg: Witswatersrand Univ.Press, 1961), 6。

[134] “在封建制度里, 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国王的私有财产, 就如同采邑是封臣的私有财产……国王及其封臣把其法庭的司法活动、其土地的开发、其军队的征服都视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后来, 这种封建精神和法律形式有很多被运用于海外扩张。”Frederic C.Lane, “*Force and Enterprise in the Creation of Oceanic Commerce*, ”in *Venice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401~402。

[135] 见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t capitalisme*, p.24。

[136] Chaunu, *Séville*, VIII (1), p.50。

[137] Lynn White, Jr., “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 ? ”in A.C.Crombie, 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277。

[138] “在一个社会里, 推动革新的首要因素是重视、鼓励革新。如果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整个中世纪, 我们似可发现, 西方之所以比较富于创造力,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拉丁基督教世界比东方(的拜占庭和伊斯兰教世界)受到了远为严重的冲击。从3世纪至10世纪, 蛮族对西方的冲击断断续续, 一浪接一浪……西方……是一个融化了的社会, 随时可以重新塑造。它特别开放, 欢迎并接受变化(*Ibid.*, p.282)。”

[139] Carlo Cipolla, *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London: Collins, 1965, 106~107。

[140] 见Joseph Needham, “Commentary on Lynn White, Jr., ‘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 in A.C.Crombie, 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a), p.32。

[141] Joseph Needham, “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Crombie, 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b), 139。

[142] 见Boies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Press, 1952), 269~270。

[143] 见Joseph Needham,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Vessel Control,” *Scientia*, XCVI, 99, May 1961, 165~167。当李约瑟(Needham)把这篇论文提交第五届国际海洋史讨论会的时候, 兰德斯(W.G.L.Landles)对此提出疑问, 后者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是欧洲人独立发明的。李约瑟承认他的怀疑有一定道理, 但是李说, 要想证明相反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见“Discus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de M.Needham,” in Joseph Needham, “Les contributions chinoises à l’art de gouverner les navires,” *Colloq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5e, Lisbonne, 1960 (Paris, 1966), 129~131。

[144] 见William Willetts, “The Maritime Adventures of the Great Eunuch Ho,” in Colin Jack-Hinton, ed., *Papers on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964), 38。

[145] “在1405年左右, 太监郑和率63只远洋航船驶离港口, 他到达了南海的许多地方……在此后30年间, 这样的远航进行了7次, 每次都带回大量有关地理和水路的信息, 同时也带回大量各个岛屿和印度的特产……我们不晓得这些远征的目的, 它可能是为了弥补陆路外贸萎缩所造成的损失, 也可能是为了增进帝国宫廷的荣耀, 甚至也许像官修正史所记载的那样, 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侄儿, 即他的前任(事实上, 他这时已经削发为僧, 出家隐居, 直到多年以后, 在下一个皇帝统治期间, 人们才把他找到)。不管怎么说, 它突然停止了, 正像它曾突然发生。停止的原因同样不明朗。不管这里是否涉及太监与儒教官僚之间的冲突, 结果是印度洋的商业留给了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4), 143~144。

[146] T’ien-Tsê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34), 30。

[147] “请问, 这些动用了几百条远航船只和成千上万人力的远征取得了什么实际结果? 答案很简单: 一无所获。明代的中国人不是帝国的建设者。他们的政治空谈家对殖民体制中的实力政策的恐怖性毫无认识, 他们没有使命感, 也不晓得什么叫‘狂飙运动’。从理论上讲, 天子

统治着整个世界，即天下，亦即‘苍天之下的一切’，天子的使者认为，只要在这些文明世界边缘上的莫名其妙的蛮族面前炫耀一番，向他们展示天子治下的太平盛世就足够了。”

Willetts, *Papers on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pp.30~31。

[148] Ibid., p.37。

[149] Ibid., p.38。

[150] 见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Arnold, 1931), 197。它是否也可能是人口北迁的结果呢？“地方史研究表明，（在明代）中国南方人口的流失（包括南京在内共1200万）恰与北方（900万）和西北部（300万）人口的增加相等。” Otto B.van der Sprenkel,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Ming China, ” *Bulletin of the SOAS*, XV, Part 2, 1953, 306。

[151] “当时的中国史学家把扬子江与珠江之间的沿海边防工程与北方为防备鞑靼人（Tartars）的入侵修建万里长城相比较。这里显然是太夸张了。但是为了抵御经常不断侵扰，必须耗费资财巩固海防，这对明代的财政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可能是促使中国放弃宏大的印度洋远征计划的原因之一（p.126）。”C.R.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7。

桑塞姆（George B.Sansom）在从日本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时，发现了与欧洲的相似之处。“毫无疑问，中国和朝鲜都曾遭受倭寇的掠夺，……问题一部分出在中国人身上，因为他们拒绝与外国通商，而日本当局却很愿意发展海上贸易。但是室町幕府（Bakufu, 日本中央政权）也有理由不采取极端手段镇压海盗。它完全不相信中国人的和平动机，并可能像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指望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一样，指望海盗头子在不同的条件下或充当强盗或充任舰长。而且，反海盗的行动取决于室町幕府对西部军阀的控制，但在1400年以前足利义满（Yoshimitsu）的权力还不是很巩固。” *A History of Japan : Vol.II.1334~161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Press, 1961), 177~178。

[152] “14世纪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群岛所起的作用是惊人的……但随着这个大洋的商业霸权转入穆斯林之手，中国的船只开始消失，这期间可能有一定联系……”M.A.Meilink-Roelofs, *A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Nijhoff, 1962), 25, 74。

[153] 见R.Servoise, “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Afrique au XVe siècle, ” *Le mois en Afrique*, No.6, juin 1966, 30~45。

[154]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35。

[155] Ibid., p.366。

[156] Ibid., pp.338~339。

[157] “一旦蒙古势力被摧垮，明代就针对南方的人口压力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Bulletin of*

the SOAS, XV, Van der Sprenkel, p.308。请注意，斯普伦克尔（Van der Sprenkel）与赫德森（Hudson）不同，他用蒙古威胁的减轻来解释重心的北移。

[158] 在为韦伯的《中国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一书制作的词汇表中，格思（Hans Gerth）写道：“食禄（Prebend）：官员从国家或教会地产以及其他公共收入中获得酬金的权利。韦伯把这种官员称为‘食禄者’。建立在食俸者基础上的政治社会制度被韦伯称作‘俸禄制’（Prebendalism）（p.305）。”伍尔夫（Eric Wolf）在《农民》（*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6）一书中又以农民的角度探讨了世袭（或封建）统治与食禄者统治的不同（pp.50~52）。

[159] Weber, *Religion of India*, pp.70~71。

[160] Joseph R. Levenson, ed.,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pansion of Asia*, 1300~1600（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7），131~132。

[161] Weber, *Religion of China*, pp.61~62。

[162]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曾描述过16世纪满洲与明代中国的纳贡关系：“在明朝衰落时期，向朝廷纳贡的‘任务’变成了占中国人便宜的手段。‘纳贡者’带着数以百计的随员结队而来，不仅全部费用由中国当局支付，而且这些人可借此提高政治地位。与此同时，这些人还携带着一些不属于贡品的货物到中国来出售，这也造成中国边境商人利润减少。”*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2nd edition（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Capitol Publishing Co.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124。这种自我毁灭的政治制度与葡萄牙及其他欧洲国家公开对海外蛮族实行的殖民主义适成对照。韦伯称后者为“掠夺性资本主义”，*Ibid.*, p.135。

[163] Cipalla, *Guns and Sails*, p.11。

[164]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 “Introduction,” 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0），24。他在该书“明代后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标题下，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在16世纪，一种带有明显现代特征的典型的个人主义思潮与更大的社会文化力量一道从王阳明学派内部的自由人文主义运动中产生出。这样，在现代人看来属于独裁主义思想体系、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就证明可以发挥类似西方个人主义兴起时，中世纪基督教所起到的那种作用（p.233）。”

[165] “1368年推翻元朝统治的起义和明朝的建立体现着中华民族对野蛮民族的反抗。”Roland Mousnier,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Vol. IV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4），520。

[166] *Ibid.*, pp.527~528。

第二章 欧洲的新型劳动分工：约1450～1640年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欧洲世界经济产生于16世纪。这种经济体系在早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征，即资本家并没有在世界面前自我炫耀。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由企业意识，也不是个人主义、科学、自然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这些世界观都是到了18、19世纪才趋于成熟。如果说当时流行着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国家干预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分国界的现象，其发展要以国家的强大为前提？这个问题不是能用一句话来回答的。但这也不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完全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决策要首先适合于世界经济舞台，政治决策要首先适合于较小的合法统治结构，即世界经济内部的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

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导向——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这种特性”——造成我们难以为决策者找到对应的群体，无法圆满而合理地说明决策所蕴含的群体利益。然而，由于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原则上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不能分开讨论的，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微妙的分析方法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尽量依序探讨这两个方面，但同时也暗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让读者在了解事情的全貌之后再作出判断。可以肯定，我们将一再有意无意地破坏自己定的这种依序叙述原则，但它至少是我们谋划构思的指导思想。如果有时我们把较大的体系视为资本主义的体现，把较小的体系视为国家干预主义（或用时髦的话来说，民族发展）的体现，那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具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国家只能在世界体系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我们也只能根据这一背景来理解国家。

社会阶级与集团组织（民族的与宗教的）的情形也是如此。它们也是在国家和世界体系的框架内进入社会。它们同时出现并常常互相对立。它们是该时代社会组织状态的反映。现代阶级体系是在16世纪开始形成的。

但是，16世纪指的是什么时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应当记住，历史世纪并不一定与历法世纪相吻合。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看法，这既因为它以坚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也因为似乎完全符合我所认为的事实。布罗代尔说：

有人在说到16世纪时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指的是一个世纪，还是前后跨着其他世纪，有人认为，即使它跨着几个世纪，也应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体。我以为这都是不妥的。我认为，正像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我的著名老师豪泽（Henri Hauser）所说的一样，‘我们的’世纪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大约从1450年到1550年，第二部分从1550年到1620或1640年。^[1]

如果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看，起止年代可能会各不相同，但就整个欧洲世界经济而言，我们认为1450~1640年的确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时间单位，因为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建立了起来，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这个体系“固然庞大但也是非常虚弱的”。^[2]

另外，这一欧洲世界经济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大陆未必与地理大陆相吻合。到16世纪末，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不仅包括西北欧和基督教地中海地区（包括伊比利亚），而且包括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它还包括美洲的一些地区：新西班牙、安的列斯（Antilles）、特拉法尔玛（Terraferma）、秘鲁（Peru）、智利（Chile）、巴西，或者说是包括这些地区中真正受西班牙和葡萄牙行政控制的那些部分。大西洋的一些岛屿，也许还有非洲沿岸的几块飞地，也可以包括在内，但是不包括印度洋地区。除了某一时期菲律宾的一部分之外，也不包括远东。不包括奥斯曼帝国。至于俄国，至多也只是短期包括其边缘地区，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但是仍有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把16世纪的欧洲看作两个以前相对分离的体系的组合——一个体系是以意大利北部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地中海地区，^[3]另一个是从佛兰德到汉萨同盟的北欧和西北欧商业网——外加两个附属部分：一个是易北河东（East Elbia）、波兰和东欧的其他一些地区，另一个是大西洋岛屿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

从纯空间的角度来讲，这个体系可谓相当广阔，据肖努统计，即使只把欧洲国家的海外正式殖民地考虑进去，在1535~1540年间，西班牙已经控制了西半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从那时起到1670~1680年间，欧洲人控制的面积从三百万平方公里增长到七百万平方公里（直到18世纪末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4]但是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肖努曾经讲到“人口剪刀运动”（Demographic Scissors Movement），在这一运动中，欧洲人口的增长“由于广大超欧洲地区的人口下降，而在全球范围内变得几乎毫无价值”。^[5]这样一来，欧洲世界经济中土地与劳动力之比就大为提高，这是欧洲在现代早期的危机时代得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但是扩张所带来的不只是土地与劳动力比例的改善，它还使大量积累原始资本成为可能，这些原始资本用于资助农业生产的合理化运动。16世纪的这一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长期的通货膨胀，即所谓的价格革命。这一独特的通货膨胀现象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的中心论题，我们将逐一考察争论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以便能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解释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欧洲世界经济所获得的独特劳动分工形式。

欧洲的价格起伏模式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虽然学者在时间方面有分歧，在原因方面更是各执一端，但都承认这一现象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把最近的两个有关粮食价格的统计放在一起，^[6]我们就会得到下面这张图表：

1160~1260年：迅速上涨

1260~1310（1330，1380）年：高居不下

1310（1330，1380）~1480年：逐渐下跌

1480~1620（1650）年：高价

1620（1650）~1734（1755）年：下滑

1734（1755）~1817年：上涨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缩小到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16世纪，我们将看到，尽管在上表中它处在高价阶段，但在这个世纪中间显然还出现过经济波动。肖努在卓有成效地研究了塞维利亚的交易所（Casa de Contratacion）——即跨大西洋贸易的主要仓库——的档案之后，揭示了下面这种活动周期。根据对商品量（商品总量和各种商品的数量）和价值的估算，肖努看到了下列四个时期：

1504~1550年：持续增长

1550~1562/3年：幅度较小的下滑

1562/3~1610年：膨胀

1610~1650年：下滑^[7]

商品量的估算不一定与价值的估算相一致。“流通指数与价格的浮动相近似，但比后者起伏大。特定的价格曲线要比商品流通曲线平缓一些。”^[8]肖努认为，他把1610年定为下滑点与亚尔萨斯（Elsas）把1627年定为德国物价的下滑点，和波斯特赫摩斯（Posthumus）把1637年定为低地国家物价的下滑点是一致的，都反映了欧洲的物价下滑趋势，只是在不同地区时间略有先后。这种下滑趋势，我们后面将会讨论。^[9]

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使我们认识到，世界经济还只是处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肖努指出，在15世纪，欧洲三个商业区（基督教地中海地区、西北欧、东欧）的价格水平各不相同，有的昂贵，有的低廉，有的居中。

世界经济建立的标志就是“（该世纪）初各地价格相去甚远，而最终消弭了价差”。^[10]虽然“最终”已是16世纪以后的事，但在16世纪已见“消弭”的端倪。如果说1500年基督教地中海地区与东欧的价差是6：1，那么到1600年则为4：1，^[11]到1750年只有2：1。塞姆索诺维支（Henryk Samsonowicz）说，16世纪初期以后，普鲁士的工资和价格与西欧“越来越接近，尽管两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12]“尽管”吗？不应该读作“因为”吗？

关于16世纪物价上涨的原因，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最初运用这一观点解释16世纪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价格，后来则把它更广泛地运用于西欧。他说：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在美洲金银进口量与安达卢西亚价格之间一直存在密切关系.....从1503-1505年间开始，直到1595年，贵金属的输入呈上升趋势，而从1503年到1597年，安达卢西亚的物价也持续上涨。物价的暴涨与金银进口量的激增也正好同期发生。贵金属进口与价格的这种联系在1600年以后继续存在，那时二者都呈下跌趋势。^[13]

在1960年以前，汉密尔顿的理论一直受到攻击，有的是事实方面的，有的是理论方面的。但他更加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自1500年以后，金银供给增加）的百分比可能远胜于物价上涨的幅度。与寻找价格革命的次要原因相比.....我们更需要解释为什么价格未能与贵金属储量的增加保持同步。由于越来越多的金银用于器皿、装饰、服饰和其他非货币目的，所以商品价格提高了，而金银本身则变得相对便宜，这就缓和了后来进口的金银的冲击力.....为扭转与东方的贸易逆差，西方花费了大量硬币.....生产租金转由货币支付，实物工资部分地换算为货币，以物易物现象的减少，这些也都抵消了金银供给量增加的影响。^[14]

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汉密尔顿运用的是费希尔（Fisher）的货币数量理论。按照这种理论 $PQ=MV$ ，而且汉密尔顿似乎还认为 V 和 Q 是不变化的恒量（ P 是价格； Q 是商品和劳务量； M 是货币量； V 是流通周转率）。批评者表示，他们怀疑汉密尔顿的这种观点，他们要求以事

实来验证。

汉玛斯特罗姆（Ingrid Hammarström）在一篇猛烈批评汉密尔顿的文章中写道，汉密尔顿颠倒了事物发展的顺序，正确的顺序应该是：经济的活跃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引起开采业的发展，开采业的发展带来贵金属供应量增多。对此，汉密尔顿反驳道：

显然，“莫名其妙的经济活动所引起的物价上涨”，通常不是助长而是阻碍贵金属的开采，因为贵金属的法定价格不变，而开采费用却增加了。而且，物价上涨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现有贵金属用于铸币的部分，因为随着贵金属用于非货币方面，铸币本身相对贬值。^[15]

但是，为什么法定价值必须是固定的？这只是一种政策，而且很难说对那些在扩张时代的贵金属流动中获利的人（包括西班牙国王）有利，因为当成本如此低廉、数量如此巨大的贵金属突然展现在眼前的时候，这一政策却不鼓励开采。正如汉玛斯特罗姆所云，问题的关键在于决定贵金属用途。他指出：

为什么西欧人舶来贵金属既不作为财宝珍藏，也不用来装饰圣殿（亚洲人和美洲土著居民都是这样使用黄金的），而是用作流通货币的重要补充，即用作一种支付手段？^[16]

布伦纳（Brenner）认为，英国的统计数字是以证实汉玛斯特罗姆的论点。布伦纳发现，产品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欧洲金属储备增加与否，而在于这一储备如何利用。”^[17]他指出，价格上涨先于美洲财富的抵达。^[18]布伦纳说，人们应该感觉到，费希尔等式中的所有因素这时都是可变的。他说：

总之，16世纪上半叶的物价上涨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货币流通量加大，周转率加速，另一个是在对农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的关头，其供应却相对减少……

周转率的加速则是下列因素造成的：工业发展和商业扩大；搞土地和合法市场投机的人突然增多；社会上大部分人从自给自足的农村转入通过市场（货币供给）取得食品的城镇。^[19]

因此，布伦纳认为，决定贵金属用途的就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全面兴起。

这种经济发展决定贵金属用途的理论意味着，即使商品的数量（Q）和周转率（V）不固定，那么至少也处于上限。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呢？从商品和劳务数量来说，它似乎难以成立。因为正像纳达尔（Jorge Nadal）提醒我们注意的，这种理论似乎认为人力、物力已得到充分利用。

只有当所生产的商品量不能再提高的时候，支出（相当于货币量乘以周转率）的增加才会转化为价格的成比例上涨。[\[20\]](#)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贵金属的增多不是直接导致物价上涨，而是由于提高了利用人力、物力的能力，而间接地引起物价上涨。例如米斯基敏（Miskimin）认为，“早期重商主义（mercantilist）者对贵金属流通的过分重视”在下列意义上是正确的：

贵金属的输入会启动人力和物力，并同时增加政府的资金储备，从而减少了战争消耗。

这样，我们就有了确定最充分利用贵金属的国家的根据，即

它们具有充分调动人力、物力以使贵金属的流入转变为真正的经济增长的能力，不管它们的这种能力是体制决定的，还是物质决定的。[\[21\]](#)

周转率受不受限制呢？鲁宾逊（W.C.Robinson）在与波斯坦（Chael Postan）争论时，曾提出金条流量能否解释14世纪衰退的问题。他认为，在信用机制尚属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周转率几乎就等于每个时期每块金币的实际周转……”因为13世纪因新币增多、周转率加速引起的膨胀就含有内在的制约因素：

最后，……货币供给量除每年略有增加外，基本上达到了它的上限，这样，周转率就不能再提高。这时，商业就受到制约，商人就被迫降价。早年的洋洋自得和高额

利润就变成郁郁寡欢和节衣缩食。人们开始储藏金币以防价格下降。简而言之，衰退也能自救。[\[22\]](#)

波斯坦在反驳时说，鲁宾逊认为货币供给量已达极限的说法事实上是错误的，因为新币继续进入流通领域。波斯坦还说，当时的信用机制也比鲁宾逊所说的要灵活，而商人的心理反应在当时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经济变量。[\[23\]](#)但是波斯坦基本上没有对有限论提出挑战。挑战是由米斯基敏（Miskimin）提出的，我认为他的挑战颇为有力：

在既定的信用机构发展水平上，金条一旦铸造成一定量的硬币，那么既定金条量的流通周转率就完全可能有一个物质上限。但是借缩小金条流通单位的体积而制造出来的劣币会从物质上和体制上提高金条流通周转率的上限。受内部移民、城市化、专业化等各种压力的影响，当从技术上讲，劣币使周转率所受到的限制放松了的时候，人们非常可能会利用这种新的自由，16世纪的许多欧洲劣币在周转之后，完全可能造成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其幅度相对于劣币本身水平而言，简直不成比例。[\[24\]](#)

于是我们可以重提这个事实，即导致16世纪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体系及其从结构上对某些类政治决策（如制造劣币）所形成的压力。并非一般的金条，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的金条才构成问题的关键。弗林登（Charles Verlinden）认为，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早期特有的垄断形式才最应为价格的持续上涨负责：

在我们解释周期性危机时，必须充分考虑投机的因素。“垄断”（Monopoly）非但未使物价稳定，反而会不时地使物价失去控制，当时某些奢侈品（酒）除外。它是这些灾难性物价波动的始作俑者，它无疑也间接地对这种特有的价格变化形式产生影响。在每一次几乎是人为的提价之后，物价都没有回落到危机前的水平。这样，垄断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长期的物价上涨。[\[25\]](#)

那么，输入金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不想探讨抽象的道德问题，我们只是问，金条输入有益于建立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吗？汉密尔顿当然会做出肯定的回答。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铸币材料的增加并不比其他种类货币量的自然增加更能对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影

响。显然，一切取决于如何利用新增加的货币。……就16世纪的西班牙来说，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新的财富用于贯彻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的政策……贵金属的输入延缓了劣币的出现。否则劣币会出现的早得多。所以，输入贵金属变成了战时通货膨胀的手段，随后通常开始一个穷困化和社会组织化过程，因此贵金属的输入也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因素。随之出现的物价暴涨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普通环节……

总而言之，流通媒介的膨胀的确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从结果来看，它使这一发展变得缓慢而不是加速。法国和英国的情况殊为不同，但这恰恰是因为这种影响在这里被更多地抵消了。……在我们说明英国工商业的一切持久性成就时，完全不必考虑贵金属过剩的因素……[\[26\]](#)

这种论点源于熊彼得的这样一种信念：“通货膨胀的影响——笔者并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感到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和理论问题被夸大了——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27\]](#)熊彼得似乎认为，只要实行理性的控制，就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有时无法预料的后果。对此我们不敢苟同。但他的长篇大论使我们充分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全球性影响比它对个别地区所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28\]](#)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食物供给。既然经济全面增长，为什么农产品供给下降？首先应该说明，严格地说来并没有下降。[\[29\]](#)只有当人们把诸如英国、西班牙之类的国家作为单位，而不是把欧洲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单位考察时，才会发现相对于日益增多的人口来说，食物供给量减少了。在那些工业发展的国家里，大部分土地必须改为牧场。[\[30\]](#)但是人依然在，只是这时他们越来越靠波罗的海的粮食为生。[\[31\]](#)由于明显的短缺，由于运输，由于中间人的盘剥，这种粮食的价格比本地产的粮食昂贵。

那么说，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并不是一件好事？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它为发展欧洲世界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它哺育了飞速的发展，保护了这个仍十分脆弱的体系，使其免遭大自然的袭击。莫里诺（Michel Morineau）指出，在中世纪的欧洲，物价的起伏与收成好坏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在16世纪，贵金属不是抬高了物价，而是使其避免跌

落。^[32]奇波拉（Carlo Cipolla）就曾对是否真正存在物价上涨表示怀疑。^[33]他相信，对16世纪的财政结构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物价上涨，而是利息率下降。他认为，在中世纪后期，利率约为4%~5%，1520至1570年间长到5.5%，然后突然下跌，在1570至1620年间，平均为2%，贵金属使货币变得不值钱。^[34]

这似乎表明，关键因素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如马克思所云，这个体系始于“16世纪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期”。^[35]一切变化都源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而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唯一的模式，因为一经它建立起来，其他“生产模式”的职能就只限于如何适应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政治社会格局。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至少在这个时期，“不只有一个资本主义，而是有若干欧洲资本主义，每一个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领域。”^[36]毫无疑问，正是若干资本主义的存在才使贵金属储量的增加变得重要，因为最初西北欧的金币周转率恰恰低于欧洲地中海地区。正如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所说的：“货币量理论只有在考虑进周转率因素和欧洲内部经济差异因素的情况下才有意义。”^[37]

这使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汉密尔顿论点的第二部分。不仅物价上涨，而且工资增长滞后。这种现象是否存在？其原因若何？在这些方面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38]汉密尔顿认为，在英国和法国，物价上涨，但由于制度僵化，工资和地租却没有同步增长。而在西班牙，情况并不是这样。^[39]因此在英法两国因有些人大发横财而造成一道鸿沟，这是16世纪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他说：

英法两国受价格革命的影响，物价和工资严重失衡，于是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大为减少，余下的这部分财富转入了其他瓜分者的腰包……地租也如工资一样落在物价的后面，因此地主并未从劳动者的损失中受益……这样，这笔横财就连同东印度贸易的利润一道为积累固定资本准备了条件，而且这种惊人的利润更对已有的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热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40]

这种认为地租落后于物价的观点受到非常猛烈的批评，主要批评者是柯立芝（Eric Kerridge）。他认为这种观点完全违背16世纪英国的现实。^[41]其他学者则认为它也不符合其他时期和地点的情况。^[42]到1960年，汉密尔顿收回了他有关地租的观点，但他强调指出，这并不影响其理论的力度。他说：

人们可以认为，在价格革命之初，工资相当于生产成本的3/5，……我认为在1500年，地租占英法国民收入的1/5。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出现了提高地租的倾向，但在个别情况下，也有为降低地租而修改租约的事情发生，两者相互抵消之后，在价格革命期间，地租与价格的增长同样迅速。国民收入的另1/5来自包括利息在内的利润。由于3/5的成本远远落后于飞涨的物价，……所以在16世纪的英法，利润肯定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一直持续了40~50年。在价格与工资出现巨大差异的时期——尽管这种差异在逐步缩小——利润率仍然很高，直到17世纪以来，这种高额利润局面才告结束。^[43]

汉密尔顿的工资滞后论还受到其他人的批评。^[44]一个重要的论点是由内夫（John Nef）提出的。他认为，有据可查的货币工资并不等于全部工资，因为还有实物工资，后者可能能够弥补货币工资与物价的差距。而且，小麦价格的上涨不是所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所能相比的。他说：

首先，迄今所统计的数字指数夸大了价格革命期间生活费用提高的幅度。第二，工人食品支出的增加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不由工人来承担，而由他们的雇主承担。第三，很多工人拥有小块土地，他们可以从这些土地上获得一些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可能要以相当多的货币工资用来购买食品以外的商品。^[45]

费尔普斯-布朗（Phelps-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以为，工资下降所造成的恶果事实上并不十分严重，因为粮价的增长速度高于手工业品，这样，日益重要的粮食制品的价格就不像粮食本身增长得那样快，而且手工生产技术的改进又会进一步降低这种粮食加工品的成本。^[46]但无论如何，晚近（1968年）的研究表明，根据比汉密尔顿更精确的统计，在16世纪的西欧，实际工资确有下降趋势，连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也承认这一点。^[47]

斯利克绘制的表一清晰地反映了实际工资的下降趋势。^[48]这是一个英国木匠的日工资，表中的数字是小麦的公斤数。

表一：英国木匠的实际工资 1721~1745=100

1251~1300 81.0

1300~1350 94.6

1351~1400 121.8

1401~1450 155.1

1451~1550 143.5

1501~1500 122.4

1551~1600 83.0

1601~1650 48.3

1651~1700 74.1

1701~1750 94.6

1751~1800 79.6

1801~1850 94.6

从上表中我们可发现三个事实。1850年英国木匠工资与1251年并无显著不同。工资最高点（155.1）在“漫长的”16世纪前夕，而最低点（48.3）在16世纪末。由此可见16世纪的工资下降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认知到，1601至1650年英国的工资在欧洲城市工资中并不是最低

的，这一下降趋势就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这种工资严重下降现象本身是三个结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则是16世纪尚未消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西奥卡（Pierluigi Ciocca）经过缜密的研究指出了这些结构在物价暴涨时期如何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并说明了各个结构因素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基本消失的原因。这三个因素是：货币假象和工资需求的间断性；习惯、契约或法律造成的工资固定；支付迟缓。西奥卡所说的货币假象，指的是除在突变时期之外，不能够准确地感觉到物价的缓慢上涨，而且即使感觉到它的增长也不能随时调整工资。再者，在16世纪，在习惯或契约失去作用的地方，国家经常进行干预，禁止提高工资。最后，在那个时期，许多工人一年才能领到一次工资，在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这意味着得到的钱已经贬值。在20世纪，货币假象的影响将随着商业同盟的组建、教育的普及、物价指数的出现，以及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逐渐适应而被抵消，工人的政治组织也使国家更难以限制工资，工资支付周期更是一项早已获得的权利。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工人们还不具备这种周旋能力。^[49]

由此可见，由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以世界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为基础，所以其结构中的某些因素造成工资滞后。不仅历史统计数字可以证实这一理论，而且两个历史例外现象也可以说明这一分析的合理性。这两个例外就是意大利中北部城市和佛兰德的城市。奇波拉认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相对于与之竞争的其他国家的工资水平来讲，意大利的劳动力价值似乎是太高了。”奇波拉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工人组织成功地迫使资方接受了与劳动生产率不相符合的高工资。”^[50]同样的，弗林登（Charles Verlinden）发现，在16世纪比利时的城市里，工资数总是紧随小麦制品价格而变化。^[51]为什么出现这两个例外现象？完全因为它们是“旧”商业中心，^[52]所以这里的工人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力量相对强大。于是，这些工人就能更有力地抵制资方的重利盘剥。此外，资本主义道德的“发展”已经部分地摧毁了旧结构。无论如何，正

是由于工人的“强大”和资本主义道德的进步使北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城市在16世纪作为工业中心衰弱下去，让位于脱颖而出的后来者，即荷兰和英国的城市，甚至还包括法国的城市。

这种认为某些工人（准确地说是那些最“发达”地区的工人）可以比其他工人更有效地避免工资下降的看法引起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长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的差异。^[53]维勒（Pierre Vilar）认为，这种差异只是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不同。^[54]但这是一种太简单的二分法。因为受到损害的不只是那些我们将看到的16世纪在拉丁美洲和东欧从事劳动的工人，同期西欧的大部分工资劳动者也蒙受了损失，即使这种损失也许——谁知道呢？——不像东欧工人那样严重（拉丁美洲工人的“损失”无法计算，因为此前他们完全不在这个经济体系内）。而且埃利奥特（Elliott）认为，在这一衰退时期，西班牙工人的地位更接近于东欧工人，而不是英国工人。^[55]

这样，如果我们编排一个顺序的话，那就是波兰工人收入最低，西班牙工人其次，威尼斯工人收入最高。英国工人完全可以归入威尼斯工人之类。他们代表正在变为中心地区的半边缘地区。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建议我们在考察这些国家的事件时注意，“（英国）工资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填满食品盘子的原因是厂房与农场之间的贸易条件发生了变化。”^[56]而这种变化了的贸易条件又对工资劳动者（无地者或不以土地收入为主者）的打击最为沉重。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估计，在16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这种工资劳动者的数量已占职业人口的1/3。正如他们所说的“（工资劳动者穷困的）反面是，农产品出售者和高地租土地出租者日渐富裕。”^[57]这就对汉密尔顿的观点——工资滞后是资本积累的直接原因——提出了质疑，并使我们转向这样一个事实：西欧的土地所有者是资本积累的主要中介。

但是，汉密尔顿的基本论点在经过凯恩斯（John Magnard Keynes）

补充后，至今仍为人们普遍接受。通货膨胀导致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一过程相当复杂，因为欧洲世界经济是多层次的。但无论如何，它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即政治上最软弱的地区被迫提供资金，然后其他人用这笔资金去投资。^[58]而地主则能够不断发现新的榨取农民血汗的办法。^[59]请记住，按照这种理论，不仅存在暴发横财的现象，而且通货膨胀鼓励投资。^[60]

这使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内夫（John Nef）的观点，他也不同意工资滞后理论。内夫宣称，法国的情况证明工资滞后理论不能成立，因为法国像英国一样也存在工资滞后问题，但法国的工业当时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61]内夫进而指出，这并不只是英法两国的比较。他认为，就工业发展而言，法国的状况与德国南部和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近似，英国的状况近似于荷兰、苏格兰、瑞典和列日（Liege）。这就是说，相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来讲，所有前者都发展缓慢，而所有后者都发展迅速。但法国的木材和劳动力比英国更廉价而不是更贵重。问题可能在于他们太廉价了。^[62]

但是，只有把英法两国在真空中加以比较，内夫的理论才能推翻汉密尔顿的假说：如果把这两个国家放在欧洲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进行比较，法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世界经济整体范围内，生产收入中付给工人的部分显著下降。只是下降率在各国不尽相同。对某地的投资阶级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从边缘地区的低工资劳动者身上获取利润，然后再从本地中等工资（相对于高工资而言）的劳动者身上获取利润。中等工资水平是最理想的，因为一方面，过高的工资水平（如威尼斯）会造成无利可图，另一方面，过低的工资（如法国）又会造成本地新工业市场的萎缩。在整个欧洲体系中，英国和荷兰最接近这种理想状态。但是，只有在世界经济的前提下，膨胀的利润才能被投入新兴的工业并且有利可图。

因此说，通货膨胀是很重要的。这既因为它起到强迫人们储蓄和积累资本的作用，也因为把它把这个系统内的利润进行了一次不平均的分配，使它们不成比例地集中于我们所说的正在形成当中的世界经济中心地区。这个中心地区已经与旧“发达”地区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相分离。

正如读者在我们讨论通货膨胀的影响时可能已经发现的，上述图景的另一面是在世界经济内出现劳动分工，这不只是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工，也是农业劳动内部的分工。随着劳动的专门化将出现不同的劳工控制形式和不同的分层模式，而这些又将对“国家”，即政治活动舞台，产生不同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试图解释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之类的国家）发起扩张，为什么在欧洲内部由葡萄牙带头，为什么这一扩张伴随着通货膨胀。我们还没有真正面对为什么这一扩张如此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世界经济的建立预示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以前在世界上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以相对强大的科层政治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没有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如果说原因在于技术水平，那么我们要问，哪一种体系促进了如此巨大的技术进步？（请记住，李约瑟有关西方这一技术飞跃的比喻。）琼斯（E.L.Jones）和伍尔夫（S.J.Woolf）认为，16世纪的真正特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实际收入的增长开辟了道路。他们认为：

一个不大令人愉快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先进、产量不俗的农业并不一定导致个人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更不必然推动工业化进程。古代精益求精的农业文明只提供了一个起点，无论在中东、罗马、中国，还是在中美洲，古代文明……都没有发展为工业经济。从技术上讲，他们的农业组织是无出其右的……他们的农业产量也同样不同凡响，但其社会的历史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生产往复循环的过程，无论在其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人民大众的实际收入都没有持久的提高……

实行灌溉农业的帝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国家机器力量强大。它以官僚制为基础，主要任务是抵御外敌和维护其在国内的地位。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官僚体制的目的是在一个高度自我平衡的国家里——不管它有多少人口——

长期维持一个庞大的农民社会。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63]

这两个作者认为，在这种体系内，生产总量的增加只导致“静态的发展”（static expansion），^[64]也就是说，只是向更多的人提供生活品，但在向各社会阶级分配物品时，仍按照过去的比例，仍采取过去那种绝对分配方式。

既已谈到16世纪世界经济的社会结构，我们不禁要问，对并非自我平衡的社会来说，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它的社会变形呢？毫无疑问，16世纪的官僚制并不具有与琼斯和伍尔夫所说的前几个世纪的科层制不同的动力。如果说结果不同，那肯定是因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形式与早期帝国不同，前者是在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压力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这种体系给统治阶级造成的各种困难及为人民大众提供的各种机会。

我们已经简单描述了促使欧洲进行扩张的诸种压力。扩张具有内在必然性。只要能够维持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因此具备分配所得物的办法），只要能够找到利用远方廉价劳动的办法（越走得远越追求廉价劳动，因为要考虑到运费因素），就能够成功地进行扩张。

扩张还导致发展不平衡，因此带来所得物分配的不均，结果出现了一种层内有层的多层制结构，在每一个层次内部都因分配严重不均而两极分化。具体地讲，在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中存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区别，在欧洲中心地区内有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在国家内部有地区间与阶层间的区别，在某地区内有城乡之间的区别，甚至在更小的地方单位内部也存在区别。^[65]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使这个体系保持稳定的基础，因为这种多层复合体使各层次的聚合和政治力量的不断重新组合成为可能。这既引起深层的动荡，从而为技术发展和政治变形准备了条件，也引起意识形态

的融合，而意识形态融合以后，各种反抗就变得可以容忍，不管反抗采取的是消极抵制、是武力，还是逃窜的方式。这种社会地位和社会分配多级化体系与生产活动的多重分配大体相合。一般来说，生育人的人哺育了粮食生产者，粮食生产者哺育了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者，其他原料生产者哺育了工业生产者（当然，随着工业的进步，这种生产活动阶梯变得更加繁复，因为在上述最后一项的内部出现更精细的分工）。

这时的世界经济含有各种类型的劳动者，其中包括奴隶，他们在粮厂工作，或者在开采业中从事地面上的简单劳动。还包括农奴，他们在大领地上种粮伐木。还有从事各种商品作物（包括粮食）生产的“租地”农民和从事某种农业生产的工资劳动者。上述这些人占欧洲世界经济总人口的90%~95%。还有新兴的自耕农阶级。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属于中间阶层——监工、自营工匠、少数技术工人——和人数不多的统治阶层。统治阶层的任务是监督大地产的运作、在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部门任职并在一定程度上寻欢作乐。这种人包括原来的贵族和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当然还包括基督教僧侣和国家官吏）。

只要略加思索就可以发现，无论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还是从种族成分的角度来看，这种职业分工都不是漫无规律的。在匆忙的起步过去以后，形势迅速发展，奴隶阶级变得完全由西半球的非洲人组成，“农奴”阶级分为两部分，主要部分存在于东欧，小部分为西半球的美洲印第安人。西南欧的农民主要是“封建”农民。挣工资的工人几乎全都是西欧人。自耕农的主要来源更加狭窄，主要来自西南欧。中间阶层最初遍及欧洲，后来分布在所有地区。统治阶层也遍及欧洲，但我相信，明眼人可以发现，西欧人占更大比重。

为什么在世界经济中同时存在不同的组织劳动形成——奴隶制、“封建制”、工资劳动制和个体经营制？因为每一种劳动控制形式都最适合各自特定的生产类型。为什么各种形式集中于世界经济的不同地

区——奴隶制和“封建制”在边缘地带；工资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在中心地区；我们将看到的分成制佃农在半边缘地带？因为劳动控制形式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和本地资产阶级生存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的前提就是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三个地带，而且它们的确有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确保那种孕育资本主义制度的剩余价值流动方式。

让我们回顾一下各种劳动控制形式，看一看它们与生产和生产力的关系。然后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些怎样影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我们从奴隶制开始。奴隶制在欧洲中世纪就存在，[\[66\]](#)但与之在16到18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相比，它在那时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其原因之一是，欧洲的军事力量以前十分虚弱。正如布洛赫所云：

经验证明，在各种动物的饲养当中，人是最难饲养的。若要在大规模的企业中划算地使用奴隶，必须在市场上有大量的廉价的人出售。你只能通过战争或袭击得到奴隶，因此一个社会的经济很难主要以被驯化人的劳动为基础，除非它与一个软弱可欺的社会为邻。[\[67\]](#)

这种低级的生产形式只有当市场广阔，大产量足以弥补低利润时才有利可图。这就是奴隶制得以在罗马帝国繁荣起来的原因，这也是奴隶制成为一种突出的资本主义制度，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早期前工业阶段的原因。[\[68\]](#)

然而，在需要技术的大企业里奴隶是没有用处的。不能指望奴隶有任何工作的主动性。一旦涉及技术，更经济的办法是利用其他劳动控制手段，因为否则低成本就会被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真正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是那些因不需要技术所以也不需要花费监督费的生产。主要在制糖业和后来的棉花种植业中，才有非技术工人聚在一起在严厉的监督下从事生产的现象。[\[69\]](#)

糖料作物的栽培最早始于地中海上的岛屿，后来移到大西洋上的岛

屿，然后跨过大西洋移到巴西和西印度。奴隶制跟随着制糖业迁移。^[70]随着迁移，奴隶阶级的种类构成也发生变化。^[71]但是为什么非洲人成了新的奴隶？因为种植园本地的劳动力资源已经耗尽，因为欧洲需要从赋有人口的地区获得劳动力，而欧洲又认为这个地区必须容易到达，并且靠近使用奴隶的地点。但是这个地区又必须在欧洲世界经济之外，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必为这些生产人力但人力又作为奴隶大量流失的地区所承受的经济后果而担忧。西非最符合这些条件。^[72]

其他劳动力源泉的枯竭是非常明显的。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上的单一栽培制既破坏土质又不利于人类的繁殖，因此破坏了这里的劳动力资源。岛民的土地遭到掠夺，很多人死去（如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关切斯〔Guanches〕），还有些人迫于压力远走他乡。^[73]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上的印第安人已经绝迹。新西班牙（墨西哥）的人口剧减，从1519年的1,100万下降到1650年前后的150万。^[74]巴西和秘鲁的人口下降幅度大约也是如此。^[75]造成这种人口锐减的直接原因似乎是两个，一个是疾病，一个是欧洲人畜养的家畜对印第安人的农耕所造成的破坏。^[76]但纯粹的人力损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采矿业中。这样，在相对早期阶段，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不再谋求以印第安人作为西半球的奴隶来源，而是完全依赖进口的非洲人作为种植园中的奴隶。当时运输奴隶的费用可能并不高于防范剩下的本地人口逃亡的费用，何况本地人正在大量死亡。

但奴隶制并不是到处都存在。在东欧就没有，那里实行的是“次生农奴制”（second serfdom）。在西欧也没有，那里实行的是新型“租金”制，而且工资劳动制渐渐兴起。甚至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很多地区的种植园里并没有实行奴隶制，而是实行所谓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为什么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未在所有的生产中实行奴隶制？可能由于非洲奴隶尽管数目巨大，但毕竟不是无限的。而且对本地奴隶实行监督的做法（因为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足够的奴隶，这成为

唯一合理的选择)也不划算,因为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暴动。在要求基层生产者具有比制糖工人更高技术的农业、畜牧业和采矿业当中,尤其是这样。所以对这些生产者必须采取稍微温和一些的劳动控制形式。^[77]

由于东欧的“次生农奴制”和西班牙美洲的委托监护制——请注意,它们是同期出现的事物——都被许多人称为“封建制”,所以就这些制度是否或在哪些方面可以与中世纪欧洲“典型”的封建制进行比较展开了大量无益的争论。这一争论基本上以这样一个问题为中心,即封建制的特征是所有权的等级关系(采邑分封以提供保护换取地租和服役),是庄园主对其农民的政治司法权,还是大领地的存在?所谓大领地指的是,农民至少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被迫”在领地上劳动,以换取最低限度的报酬(不管报酬形式是货币、实物还是为自己的消费或出售而使用土地的权利)。显然,封建制的特征完全可能是上述特点的综合。^[78]而且,不仅下属对上级的义务可以变化,而且隶属程度也可以变化,而多布又说:“前后两个变化并非总是同步进行……。”^[79]

以我们现在的观点看,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与16世纪东欧和西班牙美洲的“封建制”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土地所有者(领主)首先为地方经济而生产,他们因中央政权软弱而势力强大。他们经济剥削的强度以满足其家室的温饱和一定量的时尚奢侈品需求为限,并由(不断变化的)军事费用所决定。后者的土地所有者(领主)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生产。他们经济剥削的强度由市场的供求曲线所决定。他们拥有势力不是因为中央政权软弱,而是因为中央政权强大——至少相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中央政权是强大的。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将把这种形式的“农奴制”称为“强制性商业作物劳动制”(coerced cash-crop labor),尽管这种称谓并不准确而且十分蹩脚。

“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是这样一种农业劳动控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某种由国家推行的法律要求农民至少用一部分时间在大地产上劳

作，生产供应世界市场的产品。一般说来，这种地产通常被个人以国家的名义“占有”，但它不一定是世袭财产。国家本身可能直接拥有这种地产，只是通过个人占有之后就出现了转换劳动控制机制的倾向。^[80]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说，在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体系边缘地区农业生产中盛行的就是这种劳动控制形式。

斯达尔（Henri H.Stahl）曾清楚地说明易北河（Elbia）以东（更广义地讲，是东欧的）的“农奴制”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81]其他许多学者也承认，我们所说的“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而非封建经济的劳动控制形式。巴古（Sergio Bagú）在谈到西班牙美洲时，把它称为“殖民地资本主义”。^[82]布费尔蒂（Luigi Bulferetti）称17世纪的伦巴底（Lombardy）为“封建资本主义”。^[83]威泰勒（Luis Vitale）认为西班牙的大地产（latifundias）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84]伍尔夫（Eric Wolf）指出，“在其领地内实行家长式控制的”领主与“按照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其地产的领主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85]

这种形式在14世纪已经出现于威尼斯人支配下的克里特地区，^[86]到16世纪它遍布于欧洲世界经济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我们认为，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正如瓦萨里（Pietro Vaccari）所说的，不能把“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视为前封建奴役制的重建，^[87]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另一个是，这两种分属资本主义性质和封建性质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是并存的，而且也不能并存。世界经济只能取其中一种形式。只要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形式上仍与封建制类似的那些关系，就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原则加以改造。^[88]西班牙美洲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和东欧的所谓“次生封建制”都是如此。

西班牙美洲的委托监护制是国王直接建立的。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基督教化。它的主要作用是为矿山和养牛场提供劳力，同时养蚕制丝，

并为矿区和城里的工人以及委托监护者提供农产品。^[89]委托监护制最初是一种封建特权，即役使印第安人的权利。^[90]

当早期委托监护制的过分增长使劳动力供给告罄的时候——例如，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已经几乎死绝——1549年王室的一纸令状就把委托监护制的义务从提供劳动力改为缴纳贡赋，这样，一种类似奴隶制的制度就转变为我们所说的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正如佐瓦拉（Silvio Zavala）所云，委托监护制的新口号是“自由”，但在“自由”的背后隐藏着压迫。^[91]当“自由”造成劳动力供给大幅度下降以后，又有一个法令发布出来，它宣布建立强迫工资劳动制，这种制度在新西班牙叫“夸提奎尔”（cuatiguil），在秘鲁叫“米塔”（mita）。^[92]

结果，尽管西班牙美洲的委托监护（以及巴西的赠与制donatário）最初可能的确是作为封建赐予出现的，但它们立刻就由于法律的更动而转变为资本主义企业。^[93]“夸提奎尔”和“米塔”的出现正是为了克服封建制度的离心倾向，这个事实也证实了上述结论。^[94]

这里的土地所有者在积累资本、压迫农民的过程中不仅仅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他们还通常与印第安社会的世袭头领勾结在一起，后者使这些殖民统治者获得更大的压制权力。^[95]在很大程度上，头领的势力当然属于前殖民类型。^[96]如果我们看一下劳动者实际上是如何领取酬金的，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头领或卡西科（Caciques）怎样获得了利益。除加拉（Alvaro Jara）描述了1559年智利的分配制度。在那里，淘金的印第安人得到其产品的六分之一作为酬金。但是这种称为西斯莫（sesmo）的酬金并不发给印第安人个人，而是发给他们所从属的集体。^[97]可以想见，这种整体付酬制必然会导致分配的不平等。

“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在东欧的建立过程要比在西班牙美洲缓慢，因为在西班牙美洲，它是作为征服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在12、13世纪，东欧大部分地区[易比河东（East Elbia），波兰、波希米亚

（Bohemia）、西里西亚（Silesia）、匈牙利、立陶宛（Lithuania）]也和西欧及俄国一样，经历了向农民让步越来越多、封建劳役转变为纳钱义务的过程。^[98]这一过程在各处出现的理由是一样的：即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对农奴与领主之间的关系的影响。^[99]但是14、15世纪的经济衰退对东欧和西欧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西欧它导致封建制的危机。在东欧它则造成“庄园制反动”，^[100]以至到16世纪出现“次生农奴制”（Second Serfdom）和新的地主阶级。^[101]

为什么同一个现象（经济衰退）会引起这种截然相反的反应呢？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我们前面已经阐明的原因，这两个地区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单一体系——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两个互为补充的部分。在这个体系中，东欧扮演着为工业化的西欧生产原材料的角色，因此最终形成了一种马洛维斯特（Malowist）所说的“形同古代殖民地类型的经济”。^[102]波罗的海（Baltic）贸易的性质足以说明这一点。自15世纪以后，从东欧运往西欧的产品主要是原料（谷物、木材以及后来的羊毛），虽然早期的毛皮和蜂蜡的出口仍在继续。而从西欧流向东欧的货物则是纺织品（兼有高档和中档产品）、食盐、酒类和丝绸。到15世纪末，荷兰完全依赖波罗的海的粮食。没有东欧的木材、大麻、沥青和油脂，荷兰和英国的航海业也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小麦变成了东欧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它甚至出口到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和意大利。^[103]

可以肯定，这种殖民地商业类型以前曾存在于欧洲的商业关系中。例如威尼斯同其殖民地及其势力范围的关系，^[104]又如中世纪后期作为商业中心的加泰隆尼亚（Cataronia）。^[105]在13、14世纪，葡萄牙是佛兰德的原料产地，^[106]英国是汉萨同盟（Hanse）的原料产地。^[107]生产原料以便同较发达地区交换成品的现象，正如布罗代尔在谈到粮食问题时所说的，“是一种边际现象，经常发生（地理位置上的）变更。”而且，正像他所说的，“每一次的诱饵都是金钱。”^[108]16世纪的特点在

于，存在一个环绕着庞大世界经济体系的原料市场。斯利克认为，以低地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谷物市场只是到1544年才建立起来。^[109]

倘若我们认真对待布罗代尔“经常变更”（frequent revisions）的提法，我们就要问一下，一个地区何以被定义为边缘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区？在中世纪，甚至在中世纪晚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东欧注定要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很多作家曾强调指出，东西部的发展具有可比性。例如，贝茨（Reginald R. Betts）在谈到14世纪时曾说：“很奇怪（sic!），不仅英法的大土地所有者……而且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的土地所有者都愿意用硬币支付……”^[110]帕赫（Zs. P. Pach）也认为，晚至15世纪，“（匈牙利）农村的发展趋势与西欧国家基本相同……”^[111]

后来为什么出现了不同？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依据造成西欧飞速发展的地理和社会诸因素来回答。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人们也可以用东欧的特征做出部分解释。首先，城市弱小就是一个重要因素。^[112]这一区别在13世纪还不明显，但到16世纪已经十分显著，因为作为双方互补的结果，西欧城市愈来愈壮大，东欧城市越来越相对弱小。人们还可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3世纪末，西欧的土地已经更多地开垦出来，而东欧则有较多生地，^[113]而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在“新”地上较易获得发展。

但是我们还要问：造成东西欧之间一些细微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也许地理政治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中世纪晚期，土耳其人和蒙古-鞑靼人（Mongol-Tartar）的入侵造成了巨大损害，它导致人力的外流和各方面的衰落，最重要的是，它削弱了国王和大公们的相对权威。^[114]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原则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最初的微小区别逐渐扩大、定型并成为“传统”。但“传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现实的一个方面和基础，而绝不仅仅意味着已经过去的东西。弗兰克

（André Gunder Frank）在谈到现代世界时说：“经济发达与不发达是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暂时表现和必然结果。”^[115]但这个过程远比弗兰克所说的更为普遍。正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的“文明带来野蛮”。^[116]他在论及世界边陲地区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相互关系时说，要想正确认识他们的起源和关系就应该看到：

这两种不同的类型产生于一个原本统一的社会。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在尚可区分的情况下，我们把他们称为“先进”（变为以农业为主，游猎和采集为辅），或“落后”（仍以游猎和采集为主，以农业为辅）。^[117]

因此，如果一个地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由于以往的诸种因素，在一个关键因素方面取得了对另一地区的微弱优势，同时又存在一个机缘使这一微弱优势在决定社会行动方面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微弱优势就会变成巨大差距，而且这一优势将会在机缘过去以后继续维持。^[118]15、16世纪的欧洲就是如此。既然工商业世界的地理和人口范围已经大为扩展，那么欧洲的某些地区只要在谋取利润的活动中有所特长，他们就能够最大量地获取这一扩展所带来的利益。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用较少的时间、人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来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或者东欧变成西欧的“面包篮子”或者是相反。不管是哪一方，都是为了适应这种局面下的“形势要求”。微弱的优势决定了这二者中的胜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15世纪的微弱优势变成了17世纪的巨大差距和19世纪的悬殊差异。^[119]

当东欧决定采纳哪一种劳动控制形式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在劳动力相对短缺、荒地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只要提高产量，就有机会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存在世界市场）。^[120]这样，在16世纪的东欧和西班牙美洲经济体系中的部分地区，强制性商业粮生产制就变成被渴求的（因为可以获得利润）、必要的（就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言）和可能的（就所需要的工作类型而言）。奴隶制是不可行的，因为劳动力相对短缺。由于难以控制，本地奴隶总是短缺的，而长途贩运奴隶对像小麦生产那

样的需要大量照管、监督的生产部门来说又无利可图。总之，奴隶的费用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我们假设，对农民来说，与毫无尊严和表面自由权的奴隶制相比，他们更喜欢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那并不意味着，这种制度下的劳动者的物质条件必然优于奴隶。玛提涅兹（Fernando Guillén Martínez）曾经断言，在西班牙美洲，委托监护制下印第安人受到比奴隶更粗暴的对待，这主要是因为委托监护制的社会局势全无安全可言。^[121]除加拉（Alvaro Jara）在述及智利的情况时也认为，委托监护制下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最低点”。^[122]

所以，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阶段，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区存在两项主要的活动，一个是以生产黄金为目的的采矿业，另一个是以生产某种食品为主要目的的农业。在16世纪，西班牙美洲以前者为主，^[123]东欧则以后者为主。在这两个地区，技术水平都是劳动密集型，社会制度都是劳动剥削制。剩余产品完全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地区，满足那里的人们的需要。企业的直接利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中心地区诸群体、国际贸易群体和地方当局官员（诸如波兰贵族和西班牙美洲的官吏及委托监护者）中瓜分。人民大众被迫从事劳动，而这种劳动制度又为国家及其司法机构所规定、限定和推行。当有利可图时，仍然使用奴隶，但当这种靠极端严酷的法律来维持的制度变得得不偿失时，一种表面自由但实际上法律强迫的劳动制，就在生产商品粮的领地上推行开来。^[124]

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即西欧（包括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很多情况殊为不同。这里的人口密度比边缘地区大得多（即使在人口下降的14、15世纪），^[125]所以这里的农业就更加集约。^[126]此外，这里的部分耕地转化成了牧场。结果，这里的压迫就相对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更有技能的劳动者能够要求减轻法律压制，或者说，压迫通过

市场机制来体现，因此变得比较间接。另外，这里盛行畜牛业，所以人们总是想把喂牛的食品省下来，留给人来食用，在冬季尤其如此。庄园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127]但16世纪是肉食需求日增的时代，对肉食的需要是有弹性的，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加剧。^[128]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也需要更多的粮食，后果是一目了然的。有利可图的畜牛业需要采用不同的社会劳动组织，当由于各种原因，这种组织无法发展时，畜牧主义事实上就会衰落。^[129]这样，在欧洲范围内，它就成为一个劳动分工日趋扩大的问题。

在中心地区，城市繁荣，工业产生，商人变成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当然，在整个16世纪，大多数人仍然从事农业（这种情况在西南欧持续到19世纪，在南欧持续到20世纪），但无论如何，由于东欧和西班牙美洲在16世纪纳入欧洲世界经济，结果不仅带来了资本（通过劫掠的财物和带来高额利润的差价），而且使中心地区的一些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脱身出来，专门从事其他工作。中心地区的工作范围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大量与边缘地区的工作相似的残余（比如粮食生产）。但中心地区的趋势是多样性和专业化，而边缘地区的趋势是单一经营。

16世纪的扩张不只是地理的扩张，它也是经济的扩张，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增长，农业生产进步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代。它标志着欧洲与世界其他居民区经常性贸易的确立。^[130]到该世纪末，经济局势显然已经大为改善。^[131]

以上我们描述了初期边缘地区的生产和劳动控制形式，并直接或间接地拿它与中心地区相对比。事实上，中心地区的结构比我们所描述得要复杂，但在我们认真剖析这个复杂结构之前，我们应该考察一下第三个结构地带，即半边缘地区的农业生产，因为我们还没有详细说明半边缘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在经济的很多（但不是全部）方面，半边缘地区居于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这特别体现在经

济体制的复杂性方面、经济收益的程度（既包括平均水平，也包括限度）方面，尤其是劳动控制形式方面。

边缘地区（东欧和西班牙美洲）实行强制劳动制（奴隶制和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中心地区，像我们将看到的，自由劳动制日趋明显。半边缘地区（即以前的中心地区，但正在向边缘地区结构转化）则普遍实行一种中间形式，即分成租佃制。毫无疑问，分成租佃制也存在于其他地区，但这时它只在半边缘地区占主导地位。意大利的分益耕种制（*mezzadria*）和普罗旺斯（*Provence*）的分别清算制（*fâcherie*）自13世纪起开始存在，法国南部其他地区的土地收益分成制（*métayage*）自14世纪起开始存在。14、15世纪，随着庄园主的经济困难日益严重，领地越来越多地以这种形式出租，出租时一方领地往往分为几小块分别出租，每一块可以养活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村庄。杜比（*Duby*）指出，到15世纪中，“仍可以存在于西欧的大规模谷物生产产业消失了……他称这一现象为”农村生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132\]](#)

但是，变化为什么采取这种特殊形式？也就是说，如果必须变化，西欧的庄园主为什么不像东欧那样转而依靠国家强迫农民留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如果存在让步，让步为什么采取分成租佃的形式，而不是把土地转让给购地或缴纳固定地租的小农？需知，后者是西南欧的主要（当然不是唯一的）形式。

多布（*Dobb*）曾就东西欧庄园主对土地抛荒、人口减少局面的不同反应进行比较，认为西欧是“让步”，东欧是“重点强制”。反应不同的原因在于“农民反抗的程度”。[\[133\]](#)布兰查德（*Ian Blanchard*）也承认农民反抗程度是一个因素，只是他说得不这样直截了当。关键因素是劳动力资源。他认为，直到16世纪20年代，英国仍缺乏劳动力，立法者曾试图把劳动力固着在土地上，而土地所有者只要有可能就尽量不圈围土地。[\[134\]](#)布兰查德说，因此只要出现人口减少趋势，英国也会采取强制

手段。只是当人口增长时，农民才会真正地因要求土地而揭竿而起。

无论如何，农民反抗的程度不足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农民反抗在英国比在波兰剧烈？[\[135\]](#)（多布相信这一点吗？）为什么领主强大或弱小？为什么国王支持或反对贵族的权力？可能只有在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分工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至于造成这种分工的因素，我们认为有两点：一个是在分工刚出现时城市的相对实力，另一个是空地的面积。

所谓“空地”也可以用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来表示。如果有大量土地，那么人们即使生产手段相对低下，也可以获得温饱，因为他们可以广种薄收，可以役使奴隶或强制性商品粮生产者。集约农业需要劳动力，但为什么出现分成租佃制呢？虽然因为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地方，农业生产在粗放型与集约型之间。

如果我们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与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相比，他们可能更喜欢分成租佃制（sharecropping）。但事实上也不尽然，因为纯收入是很低的，虽然在繁荣时期它可能提高。债务压迫往往与法律压迫同样不堪忍受。对塔卡哈西（H.K.Takahashi）来说，为“高利贷地主”（usurious landowners）干活的土地分成收益者（métayers）是“半个农奴”。[\[136\]](#)布洛赫认为，法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为，农民在中世纪晚期已逐渐从庄园主手中解放出来，但他们的地位后来又倒退回去。他说：

如果——一个荒唐的假设——（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480年左右，它将在卡断贵族财源的同时，把土地几乎完全分给人数众多的小农。但是从1480到1789年，三个世纪过去了，其间大地产得以恢复。[\[137\]](#)

但为什么实行分成租佃制，而不实行承租制或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呢？那是因为，虽然从监督难度来讲，分成制更甚于商品粮劳动制，但分成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鼓励农民提高生产率，当然这要以在没有法律强制的情况下，农民愿意继续为庄园主工作为前提。[\[138\]](#)简言

之，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分成制可能比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更能带来利润。[\[139\]](#)

至于承租制（tenantry），按照这种逻辑分析，它无疑也比商品粮劳动制更有利可图。但这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租地契约和租地者的所得是在通货膨胀时签订的，至少就契约具有相对长期性而言是如此。当然，当市场衰落的时候，情形恰恰相反。这样，分成制就成为一种风险最小的形式。[\[140\]](#)于是，分成制在专门的农业区最可能实行，因为在那里，首先要考虑的不是经营成本，而是市场变化的风险。

但这恰恰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时刻。价格持续上扬，但极不稳定。因此分成制似乎是可取的。[\[141\]](#)在某些地区，农民十分幸运，他们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里的土地所有者若实行分成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他们宁肯直接收取固定地租。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切昂（Cheung）认为，关键问题在于自由地租佃制（Freehold Tenure），它存在于英国，但未在法国等地实行。[\[142\]](#)

法律因素本身不能决定一切，因为我们还必须说明法国北部与南部的差异。北部倾向于向承租制发展，而南部盛行分成制，但两地的法律基本相同。杜比认为，“两地的主要区别在于，北部农民相对富裕，而南部农民的经济状况则十分可悲，因为南方农业生产力未像北方那样随着技术改进而提高……”[\[143\]](#)

但是，如果这只是技术问题，我们就要退一步问，为什么在一个地区取得的技术进步却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相去不远的另一个地区所采用？布罗代尔以为，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土质与西北欧大不相同，前者土质比较差。[\[144\]](#)波尔什涅夫（Porchnev）则认为还应该考虑到卷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卷入的越深就越可能存在大地产（于是也就越不会实行分成制）。[\[145\]](#)

那么，我们不可以把分成制视为第二好的选择吗？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地主阶级既不能完全像英国地主那样以圈地和承租制为基础建立大地产，也不能完全像东欧地主那样以强制性商品粮劳动制为基础建立大地产，于是只好选择分成制的中间道路，[\[146\]](#)这是一种适用于半边缘地区的半资本主义形成。

如果说半边缘地区保持其半边缘地区的地位，而没有像边缘地区那样完全变成卫星国，那不仅是因为这里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大，而且因为这里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坏年景可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杜比指出，在城市商人数量大且势力较强的地区，很多地产落入这等市民之手，因为他们要防备饥荒，并谋求只有土地所有者才有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并不想务农。因此以分成的形式把土地租出去就成为合理。[\[147\]](#)但法尔盖罗（Falguerolles）认为，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大可怀疑，因为城市资产阶级总是谋求尽快从投资中捞取利润，结果在下一个世纪，这些土地变得荒无人烟。[\[148\]](#)

在这个“最发达”地区还有一个难题。我们前面提到过，城市工人有力量维持工资水平，因此使意大利北部的工业与西北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工人的这种力量也许也是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多的原因，因为他们利用行会（Guilds）组织限制农民进城谋职，而16世纪又是人口剧增的时代。其结果将是削弱农民讨价还价的能力。无论如何，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似乎给分成制带来了更大的可行性，从而使约曼农（yeoman farmer）无从产生，而后者在西北欧的经济发展中起到巨大作用。

现在让我们转向到1640年将处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地带的那些地区：英国、尼德兰，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法国北部。在这些地区，畜牧业与农业并存，其基础是自由或比较自由的劳动，其生产单位的规模也相对适中。可以说，西班牙最初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但后来偏离了方向，转变成半边缘地区。至于她这一经济角色变化的原因，我们将在下

一章详述。

在中世纪后期的危机时期，当人口减少造成农产品需求下降和城市工人工资上涨（因此城市工人便更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时，西欧的大领地趋于衰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它们不可能像在东欧那样转变为生产商品粮的地产，因为在普遍萧条的经济背景下没有国际市场。它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一方面，领地所有者可以把农奴的封建义务转为货币地租，[\[149\]](#)这将降低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但事实上它也造成土地控制权逐渐转移，也就是说，它使约曼小农的兴起成为可能。所谓约曼小农可以是交纳固定地租的佃农，也可能是地位更高的独立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一次付清了许多年的地租，从而买下了土地）。[\[150\]](#)地主的另一个选择是把他的土地变成牧场，从事养羊或养牛。在15世纪，羊毛价格和肉食品价格似乎没有因经济衰退而受到很大影响，另外，虽然当时劳动力因短缺而价格昂贵，但因畜牧业所用人手不多，所以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151\]](#)

这时，在英国和西班牙，畜牧业都有所发展。随着16世纪的经济扩张，粮食似乎比羊毛更有利可图，[\[152\]](#)但是未必比牛值钱，因为牛不仅提供肉食品，还提供牛脂、牛皮和日用品，而这一切的消费量都随着经济繁荣而增长。[\[153\]](#)关于16世纪的畜牧业，特别是家畜畜养业，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正在变成某些地区的专业。在这些地区，牛群越多对大地主越有利，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地区养牛业较不发达。因而农民的食肉量减少，而农民营养不足通常还意味着日产量的减少。[\[154\]](#)因此特别是在西班牙，人们对家畜畜养业高度重视。两种选择——把领地变为租地和把耕地变为牧场——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后者使耕地减少，而耕地减少又会导致地租提高。[\[155\]](#)而且，由于耕地变得更加缺乏，农业就势必更加向集约型发展，这意味劳动质量十分重要，因此进一步推动劳役向货币地租的转化。[\[156\]](#)

16世纪牧羊业的兴起在英国和西班牙导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但奇怪的是，圈地者不是大土地所有者，而是转型的、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157]当然，正是16世纪的经济复兴才使这些独立小农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由于——正如谚语所说的——“羊吃人”，牧羊业的兴起造成食物短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或者在英国更有效地从事农业生产（约曼），或者指望波罗的海的粮食（强制性商品粮生产）。^[158]

而且，日盛一日的圈地使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159]但是，西班牙的大牧羊主（mesta）过于顽固，以致小土地所有者难以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皇帝查理五世的政策也助长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西班牙不但没有利用农村的失业者发展工业，反而把他们赶往国外。

关于西欧农业发展问题和西欧没有走上东欧的发展道路——大地产和强制性商品粮劳动——的原因，我们必须多说几句。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在形成。斯威奇（Paul Sweezy）提出某种生态链的存在。他说：“在商业中心附近，（商业扩张）对封建经济起到极大的瓦解作用；而在远离商业中心的地区，其作用往往恰恰相反。”^[160]但波斯坦（Postan）认为这一公式过分简单，多布也有同感。^[161]斯威奇的论据是农民的选择余地，即逃往城市，“接近城市文明生活”的能力。^[162]他忽略了在东欧等许多边缘地区，农民也有选择的可能，他们可以到边区去，那里像城市一样具有吸引力。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民做出这一选择，16世纪才出现政府颁布法律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现象。

农民的不同选择固然起到一些作用，但地主的不同选择更加重要。地主走向何方才能获得最大、最直接的利润？一方面，他可以改换利用土地的方式（经营牧场，获得高额利润，或出租土地，收取货币地租。二者都意味着取消封建劳役）并用新获取的利润投资工商业或满足穷

奢极欲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可以通过加紧为市场生产商品粮而获取高额利润，并用新获得的利润投资商业（但不投资工业，也不用来满足穷奢极欲的需求）。^[163]前者在西北欧较为可取，而后者在东欧更为可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生产专业方面已经出现的微小区别意味着，最大限度地竭尽所能将会带来利润的最高点，至少人们认为是如此。^[164]因此英国当局鼓励圈围土地、兴建牧场和菜圃，而东欧国家当局鼓励建立大领地，种植小麦。

至于为什么西北欧实行契约劳动制而东欧实行强制劳动制，光指出土地用途的不同——牧场和耕地——是不够的。因为照那样说来，西班牙美洲也应该实行契约劳动制，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人口起着关键的作用。西欧进行选择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来满足土地所有者的需要。^[165]但在东欧和西班牙美洲，面对着已经存在的世界经济，相对于土地数量而言，可资利用的劳动力相对短缺。而且，在这种劳动力短缺的形势下，“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增长既可能导致劳役的减弱，也可能导致劳役的加剧。”^[166]事实上，在西班牙美洲，正是人口下降的现实引起了16世纪牛羊饲养业的普遍兴起。这里的牛羊饲养业用大企业的形式，由于劳动力短缺，强制下的劳动力构成这种企业主要成分。^[167]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货币租佃制的流行意味着什么。请记住，正像我们在上一章里讨论过的，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由于人口下降，封建义务向货币租的转换非常普遍。不要以为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封建义务可以表现为三种形式：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取舍的主动权常常在土地所有者的手中。^[168]由于这个原因，封建地租形式的变化并不重要。的确，塔卡哈西（Takahashi）甚至认为它只是一种副现象。^[169]但我认为，这一论断未免言过其实。即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适用于13世纪，但在16世纪，唯因超经济强制力不是迫使农业劳动力而是迫使土地所有者比他们所设想的走得更远，货币地租的流行显然具

有不同的含意。^[170]至少可以说“超经济强制力”正在推动着某些土地所有者。在扩张的时代，存在着对劳动力的争夺。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可以从他人处买来劳动力。最穷的土地所有者则除了满足于把其土地上佃农留住之外别无选择。正是中等的土地所有者才可以把旧式的封建关系保持得最长久。^[171]

在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的发展道路是相同的。两国都出现农奴的解放，货币租佃制的流行和与之相关的工资劳动的盛行。但在16世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英国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东欧朝“次生封建制”发展。法国南部走向分成制。在法国北部，演变似乎停顿下来。正如布洛赫所指出的：“（到16世纪）仍未能获得自由的乡村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于做到这一点。”^[172]

有人把上述现象归因于农奴自我解放能力有限。而布洛赫则认为，毋宁归因于领主把农奴转化为佃农的能力有限。^[173]布洛赫是根据英法两国历史的不同来解释这一重要区别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国的经济比英国发达，因为那里货币经济发展较早、较充分。而从政治方面来看，英国比法国“发达”，因为英国有相对强大的中央机构，这主要是由于，英国王权诞生于征服过程中，而法国国王是在真正封建割据的情况下，一步步地积累权力。让我们看一下这些论点的推理过程。

首先，法国比英国更靠近欧洲的商业、技术中心，所以法国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发展较早，那里封建义务转化为货币地租的过程也开始较早。^[174]但是因为英法两国几乎同时对庄园解体做出反应，所以在“漫长的”16世纪开始时，英国的庄园比法国更加完整。因此，按照布洛赫的想法，英国地主比法国地主更有条件利用新的大地产商业化机会。于是，英国走向工资劳动制，并把农奴解放进程继续下去，而法国被迫在逆境中尽力挖掘潜力，其地主只能靠恢复旧式的压制手段来增加收入。

第二个论点讨论的是早在12世纪国王与贵族的关系。那时英国已经

建立了强大的中央司法裁判权。但这一成就的另一面意味着，在庄园内部，领主虽然失去了对刑事犯罪的裁判权，但在土地租契方面，他却享有为所欲为的充分权力。14、15世纪，庄园法庭在解释习惯法时就降低了公簿持有权（copyhold）。当到15世纪末，王室法官终于可以干预这类问题时，他们发现，“习惯法”承认各种各样的地租。

但是在法国，中央不掌握刑事司法权，可是另一方面，法国庄园主也从未单独控制土地法。所以，世袭关系就难以如此轻易地被破坏。谁是真正的“所有者”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法律问题。到16世纪，有些法官自愿为佃户辩护，对这些法官，领主也无可奈何。因此，领主既然不能更改地租，他们就只好通过篡改法律文件或以“重新发现”为口实，扩大封建义务为手段来收回土地。^[175]久而久之，这一不同会变得非常重要。^[176]

如此看来，布洛赫似乎认为，由于英国的法律制度赋予地主更大的灵活性，所以英国的货币租佃制和工资劳动制继续发展，结果大牧场和正在变成乡绅的约曼农（yeoman farmer）都得以兴旺发达。这同时也迫使更多的农村劳力转入城市地区，形成工业化道路所不可缺少的无产者。而在法国，王权的强大反而造成领主阶层固守“封建”色彩相对浓厚、经济活力相对欠缺的土地占有形式，从而导致法国的落伍。

土地占有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会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有重大影响。类似东欧那样的地产管理制度需要大量人力进行监督。如果英国地主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担任许多新的管理职务，而这些职务又是新生的世界经济所必需的，如商业经理、最后派驻海外的职员等等。地产监督人员之所以减少，并不是因为地主要派他们去做别的事，而是因为“别的事”越来越多。租佃制于是成为一条出路。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描述。西北欧正处在把其土地一分为二，

分别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过程当中。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正在扩大的市场为畜产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177]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又为中心地区补充粮食供给。半边缘地区正在从工业（这一生产部门越来越限于中心地区）转向自给自足的农业。中心地区的农业专业化促进农村生产关系货币化，因为生产更富于技术性，而土地所有者又力图摆脱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负担。工资劳动和货币地租变成了劳动控制手段。在这种制度下，独立小农阶层得以兴起，而且凭借他们的农产品和与新兴手工业的联系变得日益强大。在人口增长和工资下降的形势下，诚如马克思所言，这些约曼农“靠剥夺他们的劳动力和他们的地主而致富”。^[178]他们声称必须保障国家的食品供应，^[179]从而（通过圈地）攫取了前者的土地，然后再以低工资雇用他们。与此同时，这些人还按照固定的地租从大领地所有者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不想夸大这个新兴的约曼阶层的实力，我们只是想揭示，他们已经变成一支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不乏成为“企业家”的各种刺激。他们正在寻求财富和更高的地位，成功之路则在于经济效益。在他们的背上没有传统富家大户的那些负担，他们也不必向上流社会成员那样撑持一个奢华的城市生活门面。^[180]

显然，农村经济任务的这一调整要极大地影响城市的面貌。城市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16世纪是人口全面增长的时代，是各地的城市规模都有所扩大，但相比之下，中心地区城市规模扩大更为显著的时代。我们知道，无论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事实来看，其结果都正如赫雷纳（Helleiner）所云，“在16世纪，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日趋严重。”^[181]在东欧，人们向边疆地区迁徙。在伊比利亚半岛，有些人出走美洲，有些人（初为犹太人，后来是摩尔人Moriscos）被驱赶到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在西欧，总的说来，人们向城市迁移，此外，流浪者也日益增多，一度成为“瘟疫”。^[182]背井离乡者中不仅有因土地被圈占而被迫出走的农村劳动者和在收获季节从山区来到川区的短工——布罗代尔所说的“真正的农村无产阶级”，^[183]还包括那些“因封建家丁组织衰

落或臃肿的王军（他们曾追随国王与封臣作战）解体而变得无事可做的浪民……”。[\[184\]](#)

这些四处流浪的人去向如何？显然，他们充实了新工业中无需技术的岗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迅速兴起的手工工场特别是英国的手工工场，把他们渐渐吸收进去”。[\[185\]](#)同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存在是造成地主愿意将封建劳役折算成租金的条件之一。[\[186\]](#)

但是，这种既扩充劳动力大军又不生产粮食的局面与另一个事实似乎是矛盾的。琼斯（Jones）和伍尔夫（Woolf）认为，工业发展的前提——历史上第一次需要这个前提的是16世纪的西北欧——是，除了生产率提高和市场扩大外，还要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有一个喘息机会，在此期间，收入而不是人口成倍地增长……”。[\[187\]](#)

但那些充斥于中心国家市镇或游荡在乡村的剩余人口命运如何呢？首先，他们中间死亡率一直很高。有些人因流浪而被绞死。[\[188\]](#)“饥荒经常发生，特别是在交通不便，运费昂贵，收成无保的情况下……”。[\[189\]](#)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认为，在分析这种经济时，“必须把这些‘年轻’的浪民考虑进去，由于贫病交加，他们的平均寿命非常短促……”。[\[190\]](#)

这可能就是布罗代尔所指出的那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的原因所在。他说：“若非不断出现移民浪潮，城市无产者队伍非但不会扩大，甚至难以维持其规模。”[\[191\]](#)这也有助于解释令布朗和霍普金斯感到困惑的那个问题，即尽管工人工资大幅度下降，却很少发生社会动乱。他们说：“其部分原因在于，虽然与（15世纪的）高工资相比，此时的工资水平大为降低，但工资劳动者仍可以维持生存……”。[\[192\]](#)

但西北欧工人工资水平下降后之所以能够维持生存是因为有下列前提条件：存在一个进口小麦的边缘地区；拥有维持流通的贵金属；听任

部分人口死去。死去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16世纪欧洲各城市工人阶级内部难道不可能已经存在某种种族上的尊卑贵贱之分吗？例如，泰米涅奇（Kazimierz Tyminiecki）曾明确指出，在16世纪的易北河以东地区（East Elbia）的某些城市中存在过这种现象，那里的德国工人把斯拉夫移民关在高等职业大门之外。^[193]目前有关现代早期欧洲工人阶级内部种族差异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我以为，泰米涅奇所描述的只不过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典型例证。分配不仅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诸城市间不平均，而且在城市内部的诸种族集团中也不平均。在这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样一个理论，即在每个层次内部还有不同的层次。

如果说在考察所谓城市工人时我们必须格外慎重，那么在考察上层阶级时我们也必须格外慎重。在中世纪欧洲，上层指的是被称为贵族的骑土地主。总的来说，他们是一个由相同职业的人构成的群体，他们的地位是否显赫基本上取决于其领地的规模和封臣的数量。显然，个人或家族的地位可能会上下浮动。在少数城市还出现了城市贵族，我们在上一章讲过，这造成定性方面的混乱。

但是16世纪的商人地主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呢？显然，无论从整体来看，还是从个体来看，这一点都不甚明了。在基于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世界经济形成以后，情况变得相当复杂。让我们依次考察一下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和“工业家”，然后看一下他们分布的地区和他们与地主阶级的联系。

从很多方面来说，16世纪赢得商业利润的手段只是城市在中世纪晚期在其内地所学会的惯用手段的发展。对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有一个控制自己市场的问题，这就是说，既要设法降低从农村购入的货物的消耗，又要把外来商人的作用降到最低点。^[194]两种手段被采纳；一方面，城市不仅谋求获得征收市场经营税的合法权力，而且谋求获得商业法规

（什么人可以经商、什么时间开市、出售什么商品）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城市设法避免农村不经过市镇而从事贸易。其结果就是多布所说的那种“城市殖民主义”。^[195]久而久之，各种商业制度就都变得只对市民或城市商人阶级有利，而对土地所有者和农民阶级不利。

这种利润尽管可观，但与长途贩运，特别是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贸易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据塞伊（Henri Sée）估计，早期殖民地的商业利润是很高的，“从几乎无异于海盗行径的交易中，利润常常超过200%至300%”。^[196]造成这种高利润率的原因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殖民地的“独家主顾”局面，也就是说，只有一个购买土地和劳动力的“主顾”。我们在前面讲过，无论在西班牙美洲还是在东欧，这种局面都是通过法律手段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出售原料的地区——西欧的竞争。缺乏竞争的原因又有两个，一个是技术水平停滞不前，另一个是商业链条的纵向性。

毋庸置疑，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交易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银行储蓄、兑换票据、经纪人、中央商业机构的分支等等纷纷出现。据肖努（Chaunu）估计，这些新技术可能使商业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的能力增长了“10倍”，因此他们“获得了足够的船只、人力和手段到附近地区去探险，然后开发利用新的空间”。^[197]但不管怎么说，全部这些商业革新若不辅以雄厚的资本和国家的某种支持，并不足以使远途商人进入世界市场。这样，能够进入世界市场的就不是很多，而那些已经进入的则不想改变既有的局面。^[198]

纵向联系更加重要。资本来源是有限的。请记住，国家机构甚至都靠大量借贷维持。例如，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葡萄牙甘蔗种植园的利润不仅流入直接参与的葡萄牙人手中，而且流入欧洲经济更“发达”国家的人之手，因为后者既提供了原始资本又提供了工业品销路。^[199]西北欧不仅能发展工业，而且他们的纵向商业联系还导致资金的依赖关系。如

果我们说在国家间存在债务用工制度的话，那也许并不过分，最初是中世纪晚期汉萨同盟的商人雇用挪威的渔民和出售毛皮的猎人，[\[200\]](#)后来则是里加（Riga）、雷维尔（Reval）和格但斯克（Gdansk）等城市的德国商人雇用东欧内陆地区的人们。这种手段存在于各地。土鲁斯（Toulouse）的商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热那亚商人（Genoa），以及在英国和西班牙经营羊毛贸易的部分商人都曾运用这一手段。这是一种什么手段？其实很简单：即预购产品，也就是说，先付款后发货。这就避免了市场上的公开出售。这样，转手出售的最佳时机也就不由生产者，而由商人决定。由于在发货时，生产者如果不是已经欠债的话，往往也把借的钱已经用光，因此他们往往希望把这种方式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在理论上，这种作法是非法的，所以只有那些有势力、有手段的商人，即“外商或便于与外国市场建立联系的商人”才能这样做。[\[201\]](#)这些商人因而便得以在价格革命中发财致富。马洛维斯特（Malowist）在谈到波兰的这种现象时，曾述及其纵向剥削网络和赚钱方式：

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当格但斯克（Gdansk）的商人对海上贸易逐渐失去兴趣时，他们开始对波兰各地的农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在16世纪末，时局对粮食出口十分有利，于是格但斯克的代理商便经常出没于波兰城乡套购粮食.....在17世纪，格但斯克的富商像里加（Riga）的商人一样，不但向小户乡绅，而且向波兰和立陶宛（Lithuania）的富裕贵族预付款项.....在广大的内陆地区，格但斯克贸易的这种极大繁荣可以用价格革命时代格但斯克商人财富的极大增长来解释.....格但斯克商人从荷兰人那里得到预付款.....而后者为了付款给格但斯克人有时又到安特卫普商人那里去收集钱。[\[202\]](#)

这种国际债务用工制使一些精干的国际商人得以绕过（并最终毁灭）东欧（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南欧）本地的商人阶级，直接与地主实业家（包括贵族）取得联系。这些地主实业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他们生产商品并在商品运抵第一个港口前一直占有它们。然后这些商品转入一些西欧（或意大利北部）商人之手，[\[203\]](#)而后者又与在少数几个城市中正在兴起的金融阶级联手经营。

如果说在欧洲世界经济中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大部分来自某些民族，那么工业家是否也如此呢？这两部分人的关系又如何呢？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工业，但它是分散的，小规模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奢侈品市场的需要。只是随着世界经济框架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才出现了工业实业家。[\[204\]](#)

准确地说，刺激工业化的因素不管是在经济扩张时期，还是在经济萎缩时期，都来自较大的农业专业化地区。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认为，在这些地区，纺织业的兴起与14、15世纪的农业危机密切相关。[\[205\]](#)瑟斯克（Joan Thirsk）指出，来自农村的刺激因素——必须为被赶出家园的农村劳动力找到其他职业——在16世纪的英国继续发挥作用。[\[206\]](#)

但在最“发达”地区，这种农村压力并没有起作用，因为工业大量出现于农村地区不只是由于农民寻求新的职业，而且也由于城市拒绝接受新的工业。在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的中世纪纺织业中心，许多人曾把资金投入奢侈品生产，当14、15世纪的货币危机和16世纪世界经济的建立分别使新市场变得必需和有利可图时，他们不能或不愿转向新市场。于是这些企业家把所谓边界置之度外。[\[207\]](#)在这类转移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个是佛兰德的资本家向英国迁移。我们必须记住，这时的工业基础薄弱、起伏不定。它们像一群寻找天堂的幽灵：“它们都很脆弱，却又同时在大片干草上点起熊熊大火。”[\[208\]](#)显然，昔日的发达中心不一定是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似乎证明了皮朗（henri Pirenne）的结论：资本主义企业家没有连续性。[\[209\]](#)

因此，我们在用词时必须格外慎重。当我们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社会变化时，我们不应像人们通常做的那样，把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分别视为“商人”和“地主”。在建立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漫长过程中，在这一体系的诸中心国家，某些商人和某些地主都因固守带有“封建”色彩的

生产方式而获得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仍然以某种制度或法律强迫农民把其绝大部分产品交给土地所有者（以徭役、封建地租等形式）。但也有些商人和地主都因采用新兴的工业生产方式而获得利益，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契约劳动。在16世纪，这种区别与大小之分十分接近。对大商人和大地产来说，旧的封建制度更为有利，对小商人和小地主（或中型的？正在兴起的？）来说，新的资本主义方式更为有利。但我们在使用这种大小划分法时必须格外慎重，而且应该知道，它只适用于这个历史时期。当然，从理论上讲，它很有道理。新的社会构成方式通常对那些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不如对那些壮志未酬的野心家更有吸引力。但从现实来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在这个新兴的“工业家”阶级当中，有的出身于约曼农（yeoman farmer），有的出身于重操旧业的商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都具有维勒（Vilar）所说的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面向大市场，薄利多销”；[\[210\]](#)部分利润来自工资浮动与物价浮动的的时间差；[\[211\]](#)部分利润来自意外的横财；部分利润低于利息率，部分利润偶得于货币贬值前的借贷。[\[212\]](#)但总之要有利润。而且，利润的积累不仅为这个阶级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对全部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这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刺激了原材料生产和人力的流动，又比如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大众需求提供了途径。但是除此之外，它还使许多为外向经济服务的工业得以出现，比如道路建设、防洪工程、港口建设等等。[\[213\]](#)

显然，16世纪也是一个纺织业中心发生转移的世纪。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纺织工业还是在“旧的”中心发展，比如意大利北部、德国南部、洛林（Lorraine）、法国统治下的孔泰（Comté）、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Netherlands）和英国西南部（但当时英国西南部只生产呢绒）。后来，新的中心兴起，主要是在英国和尼德兰北部，即如内夫（Nef）所云在那些“在16世纪初工业尚属落后”的国家。[\[214\]](#)

至此为止，本章探讨的主题是，在16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框架，即以资本主义方式为基础的欧洲世界经济。它的形成与生产劳动的分工有关，而要正确估价这一分工又必须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过去。工业区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而工业区之所以能够出现又是因为农业生产活动从封建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方式。并非所有这些资本主义“方式”都以“自由”劳动为基础，唯独在中心地区才是如此。但在“非自由”区也像在中心地区一样，地主和劳动力的生产动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在我们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应该不谈一下相反的观点。拉克洛（Ernesto Laclau）曾要求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具体论证一下有关16世纪的西班牙美洲已经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在拉克洛看来，这种观点既是错误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并不想纠缠于如何注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只想说，如果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拉克洛的看法是对的，但如果从实质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拉克洛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在根本问题上，拉克洛的主要观点是：弗兰克犯了概念上的错误，因为后者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追求市场利润，并防止利润落入直接生产者手中的生产，而把封建主义定义为封闭的自然经济。拉克洛认为弗兰克的定义忽略了“生产关系”（即劳动力是否“自由”），因此不仅可以把西班牙美洲纳入资本主义经济，甚至也可以把罗马大庄园

（latifundium）上的奴隶或欧洲中世纪教会地产上的农奴纳入进去，因为至少在后者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领主把从农奴身上搜刮来的一部分（重点号是我加的）用于出售。^[215]拉克洛继而论道，如果弗兰克的观点成立，“我们就要得出结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已经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216]他最后说，封建主义绝非不能与资本主义并存，西班牙美洲外部市场的扩大恰恰“加强和巩固了（封建主义）”。^[217]

其实，把问题搞混乱的恰恰是拉克洛。首先，在中世纪教会地产上

的农奴与16世纪西班牙美洲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下的奴隶、工人或波兰的“农奴”之间存在着三点不同：第一，一个是把“部分”剩余产品投入市场，一个是把“绝大部分剩余产品投入市场”；第二，一个是为地方市场生产，一个是为世界市场生产；第三，一个的统治阶级是把利润消费掉，一个的统治阶级为谋取最大利润把部分利润用于追加投资。至于拉克洛有关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推论，那是一种荒谬的诡辩。至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会加强封建主义的观点，应该说它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这时的“封建主义”属于新的种类。

问题在于，用于限定一种体系的“生产关系”是该体系的整体“生产关系”，而此时此刻的体系是欧洲世界经济。自由劳动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生产单位都使用自由劳动。自由劳动是在中心国家用于技术工作的一种劳动控制形式，而强制劳动在边缘地区用于技术性不太强的工作。二者的结合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一切劳动都是自由的，我们就到了社会主义阶段。

但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世界帝国的框架内兴起。它没有出现在罗马，就是这个道理。从政治方面来说，商人在形成中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所享有各种便利在任何单一国家的框架内都难以得到，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不得不应付多种势力和多重压力。^[218]我们说，资本主义产生于世界经济框架内的劳动分工，而不是产生于一个帝国，或一个民族国家，其秘密就在这里。在论及20世纪欠发达国家的状况时，贝里尔（K.Berrill）指出：“外来商品常常比本国商品还要价格低廉、供应充足，……国际间的专业化常常比一个国家内地区间的专业化实现得更早、更轻易。”^[219]在16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我们将在本文中说明其表现形式和个中原因。

总而言之，16世纪有哪些经济成就？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们呢？除了煤作为燃料开始在英国和法国北部利用之外，这不是一个技术跃进的

世纪。霍尔（A.Rupert Hall）认为，无论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农业方面，无论是从技术上讲还是从组织上讲，这时“均处于一系列变化的最后阶段”，而这些变化始于14世纪，即“危机”时期。但是他指出，“正是在16世纪，许多技术开始从欧洲文明的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传播。”^[220]

16世纪有四件大事。第一，欧洲向美洲扩张。这件事本身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但它是重要的。^[221]布罗代尔抓住了这一扩张的实质，他说：“新世界的金银使欧洲的生活超出其应有的水平，使欧洲的投资超出其储备。”^[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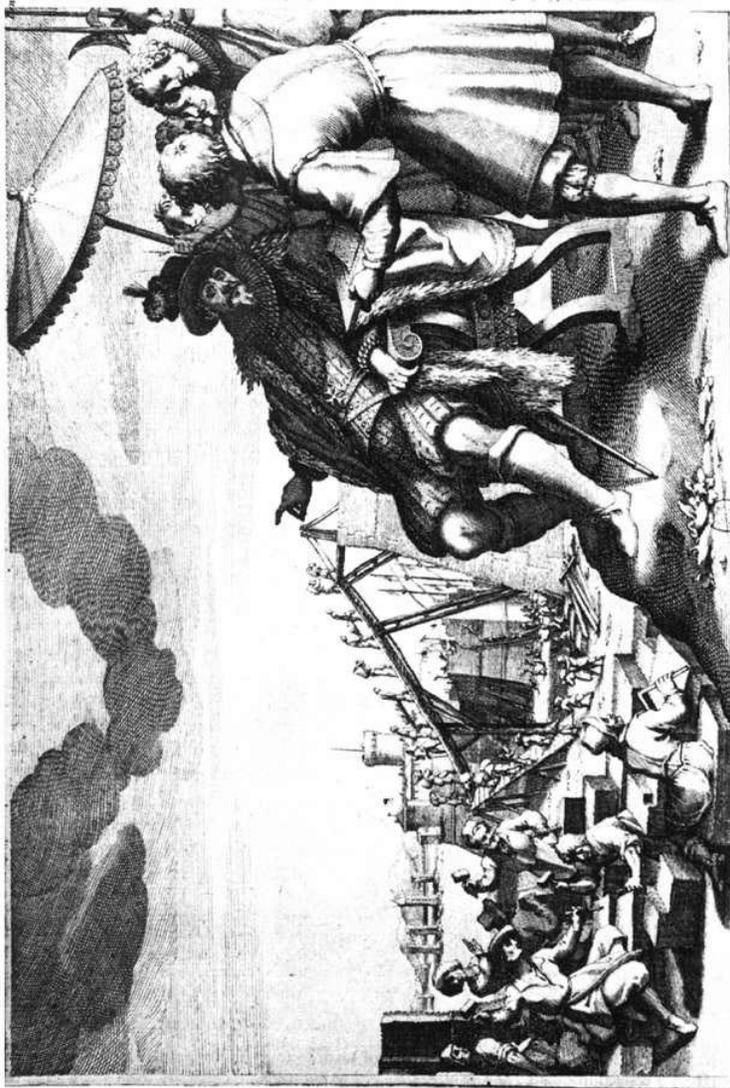
第二，受价格革命和工资增长滞后的影响，不仅投资超过储备，而且储备增加。不管贵金属的增多是否是生产发展的原因，也不论人口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是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果，金条本身“就是一种商品，而商业的全面发展又为16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种‘繁荣’既非儿戏也不是虚幻的货币假象”。^[223]

第三个重大变化是农村的劳动形式：边缘地区强制性商品粮生产制的兴起和中心地区约曼农的出现。塔卡哈西（Takahashi）说约曼农是埋葬封建主义的“第一推动力”，^[224]这可能言过其实，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约曼农，是否还会出现资本主义？而且，没有强制性商品粮生产制，似乎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

内瑞（Jean Néré）曾批评多布在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只强调了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充分供应。他认为必须把这个因素连同价格的持续变动一道来考虑。^[225]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则认为，切不可将暂时的浮动（价格革命）与结构变化混为一谈。^[226]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在16世纪，“资本主义纪元”^[227]开始了，而它采取的形式是世界经济。毫无疑问，“世界上首次出现的这个统一体是极为脆弱的”，^[228]这一点构成政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个统一体毕竟保存了下来，并在17、18世纪得以巩固。

16世纪欧洲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谁统治谁的问题不只有一种回答。人们有理由认为，低地国家通过格但斯克正在剥削波兰，更可以说西班牙在剥削它在美洲的领地。中心地带统治着边缘地区。但中心地带太大了。是热那亚的商人和银行家在利用西班牙呢，还是西班牙帝国主义者吞并了部分意大利？是佛罗伦萨支配里昂（Lyon），还是法国统治伦巴底（Lombardy）？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人们应该如何描述安特卫普（Antwerp），后来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与英国的真正联系？请注意，在上述所有示例中，我们都一方面谈的是商人城市国家，一方面谈的是更大一些的民族国家。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剖析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考察一下政治方面，看一下各个群体是如何利用国家机关去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的。这正是我们将转入的问题。



第三章插图 “大公爵加强了里窝那（Livorno）港口的防卫设施”

Jacques Callot. (1614-1620)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大公爵加强了里窝那（Livorno）港口的防卫设施”，卡洛特（Jacques Callot）雕刻的一个“麦地奇的斐迪南一世传”（The Life of Ferdinand of the Medicis）集中选出。斐迪南从1587~1609年是托斯坎尼（Tuscony）大公。这幅雕刻在1614~1620年间制作。

[1] Fernand Braudel, “Qu’est-ce que le XVIe siècle?” *Annales E.S.C.*, VIII, 1, janv.-mars.1953, 73. B.H.Slicher van Bath根据谷物价格划分出1450~1550和1550~1650两个时期,前者为“缓慢上涨期”,后者为“迅猛上涨期”。*Agrarian History*, p.113。

[2] Fernand Braudel, "European Expansion and Capitalism: 1450-1650" in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I, 3r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Press, 1961), 260.

[3] 有关基督教地中海地区的性质和范围请见Jaime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Press, 1961), 260。

[4] Chaunu, *Séville*, VIII (1), p.148.

[5] Pierre Chaunu, "Réflexions sur letournant des années 1630-1650," *Cahiers d'histoire*, XII, 3, 1967, 257.

[6] Eugen A.Kosmmsky, *Past & Present*, No.1, p.18; B.H.Slicher van Bath,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p.150.

[7] 见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592), VIII, (2): La Conjoncture (1504~1592) (Paris: S.E.V.P.E.N., 1959), 14~25。
纳达尔 (Jorge Nadal) 认为不能根据塞维利亚的营业额来确定西班牙的价格, 因为无法知道营业额中有多少只是运输费。他说: "最后, 我相信, 肖努因为把吨位变化曲线强加在价格变化曲线上, 而犯了与汉密尔顿 (Hamilton) 同样的错误, 后者把贵金属运输量强加在价格变化曲线上。在这两种情况下, 人们都是拿纯属西班牙的现象——消费品价格的浮动——与仅仅与该国经济有些许联系的现象 (产自国外的商品、寄销国外的银器) 作比较。" "La revolución de los precios españoles en el siglo XVI: estado actual de la cuestión,"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X, No.77, oct-dic.1959, 519~520, fn.55。

[8] Channu, *Séville*, VIII (2), p.19.

[9] "笼统地讲, 在1600年, 这种曲线变化开始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只是到了1650年, 它才发生在北方, 特别是低地国家, 当时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即将从那里支配世界舞台。" Braudel, in *Chapters*, I, p.263.

[10]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43.

[11] "在15世纪末, 这三个欧洲地区的物价之比是100:77:16, 到16世纪末, 比例变为100:76:25。差价缩小过程已经开始, 但只影响到欧洲边缘地带。在16世纪, 地中海地区与中欧始终保持着这样的距离 (Ibid., p.343)。"

但不管怎么说, 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差价也仍然很大。布罗代尔说: "这些古代经济区的自我封闭性越强, 当金钱不期然出现于舞台时, 它们的价值就越被高估。一个威尼斯人在1558年说, 撒丁尼亚 (Sardinia) 的生活费要比意大利低4~5倍, 当然这是指口袋里有钱的人而言。" *La Méditerranée*, I, p.352.

[12] Henryk Samsonowicz, "Salaires et services dans les finances citadines de la Prusse auXVe siècle et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550.

[13] Earl J.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Andalusian Prices, 1503~1660,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 1, Nov.1928, 34~35.关于这篇文章所有重要问题的参考书目请见Braudel and Spoo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605~615.

[14] Earl J.Hamilton, “The History of Prices Before 1750, 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Méthodologie, 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histoire des prix avant 1750*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156.

[15] *Ibid.*, p.157.

[16] Docent Ingrid Hammarström, “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me Swedish Evidence,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 1957, 131.

[17] Y.S.Brenner, “The Inflation of Prices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2, 1961, 231.

米斯基敏 (Miskimin) 在评论布伦纳 (Brenner) 的观点时说: “我更进一步认为, 人口分布及其与固定的土地供给的关系促使国家把输入的金银都保存起来, 因为人口对耕地的压力越大, 国库中就要有越多的部分用于国内农产品方面。”“Agenda for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1, March 1971, 179.

[18] Y.S.Brenn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p.229.

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也持同样观点。他说: “(如果说) 新世界的矿藏是一个因素的话。那是因为欧洲具备利用 (该矿产的) 手段。”*La Méditerranée*, II, p.27.但是洛佩兹和米斯基敏强调指出, 从1465年前后至宗教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这样1520年以后的迅速兴起就正好符合汉密尔顿的观点。“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3, 1962, 417.

[19] Brenn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p.238~339.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 (Spooner) 也同意周转率提高的观点。他们说: “与以前相比, 这种周转率的加速和生活费的增长是文艺复兴, 最好说是16世纪, 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但是存在程度的不同.....欧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使整个世界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 即使整个世界陷于激变的边缘。”“Les métaux monétaires et l’économie du XVle siècle, ”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 Scienze Storiche*,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Sansoni, 1955), 245~246.

[20] Nadal, *Hispania*, XIX.p.517.

[21] Miskim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p.183.

[22] W.C.Robinson, “Mone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 1959, 67.

[23] 见M.M.Postan, "No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 1959, 78~79。

[24] Miskim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p.177.

[25] Charles Verlinden et al., "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en Belgique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S.C.*, X, 2, avr.-juin, 1955, 198.

[26] Joseph A.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I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231-232.

[27] *Ibid.*, I, p.233, fn.1.

[28] 米斯基敏指出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参考思路：“当我们考察战火纷飞的16世纪的生产过程变化和工业结构时，很可能会问：数量增多但也许相对廉价的货币起了什么作用？当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满足私人资本的需要，而同时又不致引起私人企业间竞争、不会减消人们利润再投资的热情、不会造成一个食利者阶层的时候，私人企业资本积累变得相对容易了吗？较低的资本成本是否反过来又使荷兰造船业那样的企业储存更多的木材和原材料，或使英国鞣皮业那样的企业因得以在鞣皮坑里存放更多的皮革而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呢？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生产力都将得到提高。沿着这条思路，我们或许能够洞察英国和低地国家经济相对成功，法国和西班牙则相对失败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我们还能纠正对‘利润膨胀’这个词的误解，使它成为一个有用得多的分析工具。”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p.183。

[29] 有相对意义上的农产品供应不足吗？鲁宾逊（Robinson）认为，新开垦的土地肥沃而多产，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不一定是边地。见*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68.波斯坦反驳说，不管做怎样的解释，事实是新定居点往往在“贫瘠的土地”上。*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81。

[30] “可以引起（16世纪）粮价上涨的一个次要因素是（西欧）马匹的增多。工商业的巨大发展促进交通的发展，因此需要更大的拖运力，而这主要是由马承担的。马匹越多，对饲料的需要量就越大，而用于生产饲料的土地显然不能再种植供人食用的粮食。”Slicher van Bath, *Agrarian History*, p.195。

[31] 见Josef Petráň, “A propos de la formation des regions de la productivité spécialisée en Europe Centrale,” in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 Aix-en-Provence*, 1962, Vol. II,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 Mouton, 1965), 219~220。

常常有人认为，波罗的海的粮食影响不大，因为它在全部消费品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小。对于这种看法，人们提出了两点。第一，欧洲某些地区的粮食主要靠波罗的海供应。“（欧洲消费总量的）1.2%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足以使荷兰水手之辈富裕起来，足以决定里斯本等都城的命运。”Charles Tilly,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mimeo, 45)。见Pierre Jeannin, “Les comp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e-XVIIIe 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CCXXXI, janv.-mars 1964,

詹宁（Jeannin）援引斯科利尔斯（Scholeiers）的话说，在1562~1569年间，波罗的海的粮食占荷兰消费总量的23%。

第二，波罗的海的粮食对整个世界经济来说也至关重要。“粮食的国内运输与国际运输是分不开的。粮食之类的商品不能按照两地间的双向经济来理解。如果这一理论能成立，那么，波罗的海提供的粮食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影响不大。可是就此也可以推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相对微小的变化将会造成能得到波罗的海粮食的那些边远地区的较大变化。”Glamann, “European Trade, 1500~170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6, 1971, 44。

[32] “在16世纪，贵金属的到来导致这种金属的贬值，而不是货币的贬值。贵金属引起银价上涨，而没有引起实际价格的上涨。”

罗曼诺（Ruggiero Romano）指出，危机是否存在取决于我们是根据金银价格还是根据记账货币来看待价格上涨。“（有关16世纪物价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地把原来的记账货币折合为金属价格的结果。因此它们不是价格，而是金价和银价。准确地说，他们反映的不是货币史，而是‘金属’史……（至于有关15世纪是否存在衰退的争论），观点对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参与争论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勾画价格曲线。银价吗？那么15世纪存在‘危机’；记账货币吗？那么‘危机’不复存在。”“Tra XVIe X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3, sett.1962, 481~482。

[33] “（美洲的金条）扼制了在长时间经济衰退过程中价格的持续下跌。它们的作用是加剧或缓和总的趋势。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只能由其他趋势来解释，也只能通过其他趋势而存在，比如说投资趋势。这些是（变化的）真实反映。我们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认为它们只能起到次要作用。”Carlo M.Cipolla, “La pre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 ” *Annales E.S.C.*, X, 4, oct.~déc. 1955, 515.

[34] “1570~1620年，总的说来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年代，以至历史学家把它称为价格革命时期。所以如果有人把这个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间单位来考察，他就会对在通货膨胀时期，利率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下降产生一种视错觉。”Carlo M.Cipolla, “Note sulla storica del saggio d’interesse-Corso, dividendi, e sconto dei dividendi del Banco di S.Giorgio del secolo XVI, ”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 2, magg.1952, 266。

[35] Karl Marx,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I, ch.IV, 146.

[36] Braudel in Chapters, I, p.286.

[37] Braudel and Spoo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449.

[38] 西奥卡（Pierluigi Ciocca）在其两篇论述工资滞后理论的论文的结尾处写道，16世纪的工资滞后问题并不比通货膨胀的原因问题容易解决。见“L’ipotesi del ‘ritardo’ dei salari rispetto ai prezzi in periodi di inflazione: alcune considerazioni generali” *Bancaria*, XXV, 5, mais 1969, 583.

[39] 纳达尔（Jorge Nadal）认为汉密尔顿的观点不符合实际。他认为后者的计算方法有问题，因为后者研究英法两国时使用的是加权数字，而在研究西班牙时使用的是未加权数字。纳达尔指出，费尔普斯-布朗（Phelps-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使用唯一公布的，按同样方式加权的数字来比较泥瓦匠的工资，他们的结论就大不相同了。“这些数字异常清晰地表明，在整个16世纪，瓦伦西亚（Valencia）泥瓦匠的名义工资（西班牙唯一可折算的工资）的购买力像英法两国泥瓦匠一样，也持续大幅度下降。” *Hispania*, XIX, pp.523~524.

[40] Earl J.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Económica* IX, 27, Nov.1929, 355~356.

韦伯（P.Weber）补充说，在理论上区分一类财富和二类财富也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二者作为欧洲征服美洲的结果都迅速增长。“且不谈土地——这是最重要的财富——让我们看一下金银、森林产品、毛皮和龙涎香等一类财富……它们往往得到的快，只需要最少量的投资，也无需什么准备工作。而二类财富则含有需要长期等待的因素，投资也常常比较巨大，对远方缺乏耐心的投资者来说，简直难以忍受。一类财富刺激了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二类财富则使资本主义在18、19世纪继续发展。” *The Great Frontier*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1952), 181~182.

雷德利克（Fritz Redlich）提醒我们注意，尽管战争掠夺是暴富的古代形式，但在16世纪，在欧洲战争中获得战利品也是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De Praeda Militari: Looting and Booty, 1500-1815,” *Viert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No.39, 1956, 54~57.不同点在于，战利品只标志欧洲既有财富的重新分配，并不增加新的财富。

[41] 见Eric Kerridge, “The Movement in Rent, 1540~1640,” in E.M.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I, 208~226. 布兰查德（Ian Blanchard）也说：“现已出版的有关1485~1547年间，地租变化的文献多有含糊之处。这一点最清楚地体现在（瑟斯科Joan Thirsk编写的《英格兰和威尔斯农业史》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第4卷中），该书第204页写道，15世纪70年代以后，耕地地租明显增长，而在第690页又写道，16世纪以前，地租没有显著上升。这似乎是矛盾的。要搞清这一问题必须研究有关各个地产的资料，但这类资料相当缺乏。”“Population Change, Enclosures, and the Early Tudor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I, 3, Dec.1970, 443.

[42] Pierre Vilar, “Problems on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No.10, Nov.1956, 25.此外，纳达尔在谈到西班牙时也说：“对汉密尔顿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通货膨胀对西班牙大地主并非不利。” *Hispania*, XIX, p.256.

[43] Hamilton, *Int.Cong.*, I, 1960, p.160.

[44] 西奥卡（Ciocca）将其概述于 *Bancaria*, XXV, 4, apr.1969, 425~426 (footnote 13).

[45] John U.Nef, “Prices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64), 254.希尔顿对内夫（Nef）的反驳见“Prices and Progr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4, Fall 1952, 333~334.但是

西奥卡评论说：“希尔顿似乎认为，在这个商品化倾向日趋严重和无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时期，上述两个因素的重要性都相对减弱。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可取的，令人信服的。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仍需格外慎重。” *Bancaria*, XXV, p.428.

[46] 见E.H.Phelps-Brown and Sheila V.Hopkins, “Wage-Rates and Prices: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a*, XXIV, No.96.Nov.1957, 293.德卢莫 (Jean Delumeau) 在谈到罗马的价格时说：“更笼统地讲，在从1590至1629年的40年里，小麦的十年价格指数总是高于其他物品（如各种食品、酒、木柴、蜡烛）。只有1610~1619年的葡萄干的价格可能例外，但甚至这一例外也恰恰证明这种规律的存在，因为在16、17世纪之交，葡萄干价格之高异乎寻常。”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e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Boccard), II, 741~742.

[47] 费尔普斯-布朗 (Phelps-Brown) 和霍普金斯 (Hopkins) 在表二中证明，在16世纪的英国南部、法国、阿尔萨斯 (Alsace)、蒙斯特 (Munster)、奥格斯堡 (Augsburg)、瓦伦西亚 (Valencia) 和维也纳，实际工资均有所下降。“Builders Wage-rates, Prices and Population: Some Further Evidence,” *Economica*, XXVI, No.101, Feb.1959, 21.德卢莫和格兰达梅 (René Grandamy) 不敢肯定15~16世纪的生活水平是否真正下降，但他们指出，在15世纪和17、18世纪之间，小麦的实际价格增长4倍。“Remarques sur les prix salariaux des céréales et la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leur agricole en Europe du XVe and XVIe siècle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650.

[48] Slicher van Bath, *Agrarian History*, Table I, p.327.

[49] Ciocca, *Bancaria*, XXV, pp.578~579.

[50] Carlo Cipolla,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Italy,” in Brian Pullan, 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139, 140.见Brian pullan, “Wage-earners and the Venetian Economy, 1550~163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3, 1964, 407~426; Domenico Sella, “Les mouvements longs de l’industrie lainière à Venise aux XVIe et XVIIIe siècles,” *Annales E.S.C.*, XII, 1, janv-mars 1957, esp.40~45.塞拉 (Sella) 说威尼斯是一个“豪华”的城市。那里因“租金贵、工资高”而生活费昂贵。

[51] 见Verlinden et al., *Annales E.S.C.*, X, p.198范德维 (Herman van der Wee) 说：“这样，布拉邦 (Brabant) 的工资劳动者大众就未像16世纪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遭受到实际收入锐减的沉重打击。”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The Hague: Nijhoff, 1963), II, 386.

[52] 这使我们回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旧”的商业中心成为中心。这是一个与本章主旨完全无关的问题。斯鲁普 (Sylvia Thrupp) 对这个问题曾做过简明扼要的解释：“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是最吸引人的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并能很方便地从附近‘面包产地’进口食品，所

以这里人口密集。这不仅使相当多的农民可以在农闲之际从事乡村工业劳动，而且使这些地区可以把其大部分人口汇集到城市中去。”“Medieval Industry, 1000~1500, ”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6, 1971, 47.

[53]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国家间的区别。当然在国家内部还有社会群体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反映在我们有关地租、利润和工资水平的讨论中。然而，在工资劳动者阶层内部似乎没有这种区别。至少在英国，手工工匠和建筑工人之间没有工资收入的差别。“从黑死病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建筑工人和手工工匠工资水平的变化幅度总是适成比例。” E.H.Phelps-Brown and Sheila V.Hopkins, “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 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 ”in E.M.Carus-Wilson.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Martin’s, 1966), II, 189.

[54] “马克思曾意味深长地说：‘西欧伪装为工资工人的奴隶制以新世界纯粹的奴隶制为基础。’而我们在考察（价格和经济活动的‘长期波动’）时可能忽略了加紧剥削殖民地劳动者与加紧剥削欧洲劳动者之间的相互补充。” Vilar, *Past & Present*, No.10, p.34.

[55] “（汉密尔顿）那种认为在西班牙工资与价格保持同步的观点，迄今仍很难站得住脚。今后的研究将完全可能表明，在15世纪上半叶，卡斯提尔（Castilian）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这一下降，加上卡斯提尔的物价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现实，足以说明该世纪末卡斯提尔的特殊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与波兰等东欧国比与西欧国家更为接近，因为它们都出口原料，进口奢侈品。就卡斯提尔保存下来的工业而言，它们往往是满足少数富人需要，且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外国竞争的奢侈品工业。”J.H.Elliott, “The Decline of Spain, ”*Past & Present*, No.20, Nov.1961, 62.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的情况也是如此。见“Comments”of Jaime Vicens Vives made on the “Rapport de M.Malowist”in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II.Actes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1) 在这篇文章中，维森斯（Vicens）把波兰与加泰隆尼亚的“次生封建主义”作了比较。

[56] Phelps-Brown and Hopkins, *Economica*XXIV, p.298.

[57] *Ibid.*, p.299.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这一分析与多布观点非常近似。“人们很可能会问，既然大众消费水平下降，物价水平何以能够提高，这个时期的巨额利润（大抵相当于营业额乘以物价与货币工资间的微小差价）何以能成功地实现？换句话说，需求何以扩大？答案显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富人和殷实之家（即新资产阶级和王室以及正在兴起的乡间资本家和从大自耕农发展起来的农场主阶级）的消费造成了市场的扩大。这部分人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利润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在这个年代发展起来的工业中，许多都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殷实之家的奢侈消费的需要。此外，在造船业、建筑业、（很小规模的）机器和手工工具制造业、大炮和军械制造业等方面的投资也有扩大趋势，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也不容忽视，这指的是给这个地区带来大量金条的顺差贸易。”*Studies*, p.120.

布罗代尔（Braudel）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地主未必像汉密尔顿最初所说的那样受到物价上涨的损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价格革命……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并不是一样的。它减轻了农民的那

些用货币支付，并早在美洲发现之前就已固定下来的地租等负担。事实上，领主在农民占有地上的封建权利是很有限的，有时几乎等于零。但并非总是如此。特别是许多庄园主还收取实物地租，这些地租的价值是随市场而变化的……而且，无论是在地中海地区，还是在欧洲，土地分配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La Méditerranée*, II, p.51.

[58] “资本主义需要资本，不能想象还有比强制推行非常有利可图的价格—工资比率更有力的积累资金手段。” Earl J.Hamilt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p.338.凯恩斯 (J.M.Keynes) 说：“这种利润膨胀几乎总是导致财富分配的益发不平等，除非它的影响能够被直接实物税所抵消，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现代英国（1930年），并没有发生在其他时间和地点。” *A Treatise on Money* (London: McMillan, 1950), II, 162.

[59] “如果说这个土地所有者阶级在17世纪初统治着欧洲的话，那是因为它失去的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多。所以很多商人和富裕市民购买地产并不是疯狂的举动。”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479.

[60] “物价上涨促使人们抓紧时机投资。由于物价上涨造成实际利率下降，所以它鼓励人们对有望赚钱的项目借贷投资。简而言之，物价上涨和工资滞后导致了资本的产生，同时诱使人们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利用这种资本。” Hamilt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p.339.

[61] “对法国和对英国一样，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在价格革命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为何如此巨大，而是为何如此微小。” Nef,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p.242.

[62] “法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劳动者实际工资的持续下降虽然是促进兴办企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工业增长率的迅速提高。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可能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对某些工业品需求的增长，而在宗教战争期间，穷苦人民的悲惨境遇可能会妨碍而不是助长手工业者的发展 (Nef, *ibid.*, p.267.)。”

内夫的观点还得到费利克斯 (David Felix) 的支持。见 David Felix, “Profi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Historic Record and Contemporary Analog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XX, 3, Aug.1956.特别见 pp.443~451.

[63] E.L.Jones and S.J.Woolf, “The Historic Role of Agrarian Chan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ones and Woolf, eds.,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Methuen, 1969), I.

[64] *Ibid.*, p.2.

[65] 见 François Mauro,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aspects économ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6-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32), 285~286.

[66] 见 Charles Verlinden,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2 vol. (Brugge: De Tempel, 1955).

[67] Bloch,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p.247.另见Marc Bloch, “Medi-aeval ‘Inventions’,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180.

[68] 这种观点的经典论述见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London: Deutsch, 1964)。支持这一观点的近作为Sergio Bagú“La economí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 ”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 abr.1969, 53~61.

[69] 沃尔夫 (Eric Wolf) 指出, 在中美洲, 由于技术原因, 小规模采矿和甘蔗种植都是不经济的, 因此迅速让位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在采矿业中, 技术进步表现为1557年天井的引进, 通过天井, 在水银的辅助下, 可以从矿石中提炼出白银。但这种技术需要昂贵的机器, 尤其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深钻才利可图。大型碾磨或制糖厂 (ingenio) 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在靛青生产中, 类似的技术进步也导致类似的社会结果。见*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59), 177~180.

[70] “甘蔗生产传到马德拉群岛 (Madeira) 和加那利群岛 (Canaries) 后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 与已经存在的欧洲生产者进行激烈的竞争。美洲殖民地也进行这项生产以后, 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到1580年,西西里的这项工业已经气息奄奄.....西班牙的这项工业也不景气,意大利南部、马耳他 (Malta)、罗得岛 (Rhodes)、克里特 (Crete) 和塞浦路斯 (Cyprus) 的小规模中世纪制粮业也经历了同样的衰退过程, 并最终消失。

在马德拉和加那利的制糖业中都使用非洲奴隶.....奴隶的使用使这里的岛民可以以比欧洲糖业生产者更低的价格出售糖。但是后来马德拉和加那利又分别败给了巴西和西印度的竞争者.....。

在美洲热带地区, 糖的历史更加和奴隶史密不可分。在这个时期的所有热带出口作物中, 甘蔗最需要人力, 特别是在收获季节。由于甘蔗在收割以后必须在几小时内运到磨坊中去, 所以磨坊必须紧靠蔗田, 这就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种植园制度的要求。毫无疑问, 甘蔗应对热带农业的奴隶制负主要责任。” Masefiel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289~290.

以岛屿作踏脚石进行跨大西洋的移民, 这并不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现象。罗斯 (Rowse) 说北欧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那里的移民分为三步: 从欧洲大陆到不列颠; 从不列颠到爱尔兰; 从不列颠到北美。

“我们可以把北美的殖民视为1000年前跨大西洋移民的继续。1000年前, 在民族大迁徙

(Völkerwanderungen) 时代, 原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 到不列颠殖民.....。

不列颠岛和爱尔兰的联为一体为人们跨过大西洋向北美进发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一直为打开北美的门户而战斗.....历史学家们迄未注意到, 正是对爱尔兰南部的种植园和殖民活动最感兴趣的人——吉尔伯特 (Humphrey Gilbert)、雷利 (Walter Raleigh)、格伦维尔

(Richard Grenville) ——率先到弗吉尼亚 (Virginia) 的第一块殖民地殖民。爱尔兰宛如美洲的蓝本。”Rowse, “Tudor Expansio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History,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IV, 3, July 1957, 310, 315.

[71] “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欧洲人进入非洲以前已经兴盛了许多世纪, 所以在15世纪兴起的

这种大西洋贸易绝不只是发现非洲的偶然的副产品……最重要的变化——从主要为满足国内需要而从事肮脏贸易转变为专为种植园和殖民地市场而输送奴隶——早在发现美洲之前就开始了。总的说来，在15世纪，奴隶的肤色由白变黑，人们越来越视奴隶为可以买卖的物品而不是为某一个家庭或农场从事家务劳动或农业劳动的人。”Anthony Luttrell,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pp.78~79.

[72] 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奴隶往往来自外部。这一事实在弗林登（Charles Verlinden）有关14、15世纪克里特（Crete）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证明。克里特那时是威尼斯的殖民地，既是农产品贸易中心，又是一个货物集散地。由于最后一项属性，它成为奴隶贸易中枢，奴隶来自东南欧、俄国和西南亚的各个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这些奴隶或在克里特和其他威尼斯殖民地使用，或被转卖到埃及、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见“La Crête débouché et plaque tournante de la traite des esclaves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I: Medioevo (Milano: Dott.A.Giuffrè-Ed., 1962), 591~619.

[73] 见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p.144~145.

[74] 据库克（S.F.Cook）和辛普森（L.B.Simpson）统计，墨西哥的人口在1519年是1100万，此后持续下降，1540年约为650万，1565年约450万，1600年约250万。见*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bero-Americana: 31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10~16, 38, 43, 46.博拉（Woodrow Borah）又补充了1650年的数字，即150万。见*New Spain's Century of Depression*, Ibero-Americana: 35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3.

[75] “巴西土著居民的毁灭（与墨西哥）同样严重。耶稣会士安基塔（José de Anchieta）说：‘从20年前到现在（1583），这个地区（巴西）的人口损失似乎难以置信。’然后他举出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巴西人口下降的幅度与墨西哥基本相同。”Celso Furtad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70), 5, fn.2.至于秘鲁，加拉（Alvaro Jara）说：“若不是大量的人口储备可以使人口下降曲线维持一个时期，吃人的采矿业会难以为继。”“Estructuras de colonización y modalidades de tráfico en el Pacífico Sur Hispano-Americanas,” 见*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XIXe siècles*, VIIe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1965), 251.

[76] 见J.H.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3), 245~246.

[77] 见阿丹特（Gabriel Ardant）有关技术要求与劳动控制形式之间联系的论述。他在谈到法律限制逐渐消失时说：“这种让农奴自己安排劳动时间，并促使其产出更多的制度必然会引起一种酬金固定、更加自由的制度……领主们自己发现，用酬金来代替命令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l'impôt*, I, pp.46~47.另见*Ibid.*, pp.194.

[78] 见Rushton Coulbour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Press, 1956) ; Claude Cahen, “Au seuil de la troisième année: Réflexions sur l’usage du mot ‘feodalit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II, pt.1, April, 1960, 2~20; Dobb, *Studies*, pp.33~37; Levebvre, *La Pensée*, No.65; Henryk Lowmianski, “The Russian Peasantry, ” *Past & Present*, No.26, Nov.1963, 102~109; Joshua Praver and S.N.Eisenstadt, “Feudalism”,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V, 393~403; George Vernadsky, “Feudalism in Russia, ” *Speculum*, XIV, 3, July 1939, 300~323;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Totowa: Bedminster Press, 1968), I, 255~256.

[79] Dobb, *Studies*, p.66.

[80] 吉布森 (Charles Gibson) 曾描述了那些直属王权的委托监护制 (encomiendas) 如何在总督 (corregidores) 的管理下, 从我们所谓的强制性商品粮生产制发展为一种向农民课税的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 总督实际上变成了包税人。 *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Press, 1964), 82~97.

[81] “德国所发生的农奴制复苏并不是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也不是简单地重复易北河以东已经过时的中世纪形式。带来‘次生农奴制’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其影响为地方社会发展规定了新的法则。

首先, 必须保证谷物产量持续增长。为了做到这一点, 始于中世纪盛世的三区轮作制 (Dreifeldwirtschaft) 让位于容克 (Junkers) 从荷兰引进的更为现代的技术, 即圆圈式农庄 (Koppelwirtschaft)。容克用这种技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二, 农业生产目的不再是为自然经济下的消费者提供物品, 而是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提供商品。

结果, 对农民的这种封建榨取就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Henri H.Stahl, *Les anciennes communités villageoises roumaines-asservissement et pénétration capitaliste* (Bucarest: Ed.de l’Académie de la République Socialiste de Roumanie, 1969), 15.

[82] 见Bagù,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pp.34~35.42~53, 61.

[83] 见Luigi Bulferetti, “L’oro, la terra e la società: una interpretazione del nostro Seicento, ”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8th ser., IV, 1953, passim.

[84] Luis Vitale, “España antes y después de la conquista de America, ”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 abril 1969, 12.”

[85] Wolf, *Peasants*, p.54.

[86] “威尼斯对他们取得的采邑有充分的使用自由, 所以他们可以将采邑交换或分割, 只要接受方不是希腊人和犹太人。”Abrate, *Economia estoria*, IV, p.262.

[87] Pietro Vaccari, “I lavoratori della terra nell’ occidente e nell’oriente dell’-Europa nella età

moderna,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Cisalpino, 1957), II, 969.

[88] Henri Stahl, *Les anciennes communautés*: “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这样一个特征, 即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许多国家并存于一个文化舞台。国家总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一个‘历史纪元’的性质必然是由最先进的几个国家决定的。那些落后的国家必须服从这个‘时代’的法则。(p.17.)”

[89] “委托监护制用这些贡赋投资于各种企业: 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工业和商业。但是投资最集中的企业,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 最初是采矿业, 后来则是畜牧业。”José Miranda, *El tributo indigena en la Nueva España durante el siglo XVI* (Mexico: El Colegio de Mexico, 1957), 186.关于贡赋与丝绸生产的关系见第197~204页; 关于贡赋与非农业人口基本需求的关系见第204~223页。

[90] “按照法律原则, 委托监护制是使印第安人西班牙化的仁慈的代理机构。它的基本特征是, 官方把一群印第安人交由特许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管理。西班牙保护人叫做委托监护者, 他们有权让委身于他们的印第安人缴纳贡赋和服劳役。而印第安人虽然在委托监护制的特权的有效期内, 必须满足后者的贡赋和劳役需求, 但他们被认为是自由人, 因为他们不是被占有的财产。他们的自由性标志着委托监护制与奴隶制的区别。……委托监护制特许状不涉及地产、司法裁判权或领地权 (señorio)。”Gibson, *The Aztecs*, p.58.关于委托监护制下的司法裁判权和印第安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见J.M.Ots Capdequi, *El estado español en las Indias* (Me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41), 24~33.

[91] “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劳动量适中的自愿工资劳动制。但由于预感到印第安人不会自愿地服务, 所以又发布了一个命令, 它要求殖民当局把劳动力交给需要他们的殖民主。从一方面看来, 这个命令旨在防止有人滥用西班牙主人与印第安受委托监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强迫印第安人工作。但从另一方面看来, 这个命令的意义又在于, 如果自愿工作制因印第安人拒绝接受工作而无法实行, 国家便可以出面调解, 并通过强制劳动者去工作来维护公共利益。”Silvio Zavala, *New Viewpoints on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94.又见他的代表作*Le encomienda indiana*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Hisporicos, 1935).关于各种观点的介绍请见John F.Bannon, ed., *Indian Labor in the Spanish Indies: Was There Another Solution?* (Indianapolis, Indiana: Heath, 1966).关于智利的委托监护制, 加拉 (Alvaro Jara) 写道: “土著居民被迫在这样一种生产制度下工作, 即他必须为西班牙生产大大超过其日益减少的生活必需品价值的剩余价值。”*Gwerre et société au Chili: Essai de sociologie coloniale*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de l’-Amérique Latine, 1961), 46.

[92] Zavala, *New Viewpoints*, p.95.

[93] 这似乎是巴古 (Bagú) 的观点。见*Pensamiento critico*, No.27, pp.32~33.1549年西班牙王室宣布废除委托监护制奴役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巴西。在那里葡萄牙王室取消了世袭总督制 (Capitanias hereditarias), 将其改造为王室任命总督制 (Capitanias Coroa), 第一次这

样的行动恰恰也是在1549年采取的。见J.Capistrano de Abreu, *Capítulos de historia colonial* (1500-1800) (Rio de Janeiro: Ed.da Soc.Capistrano de Abreu, Typ.Leuzinger, 1928), 63~76.

[94] 威特勒 (Luis Vitale) 说: “在征服的第一年中, 委托监护者曾试图宣布独立。但西班牙王室唯恐出现一批最终将否认其权威的领主, 于是加强了统治, 以避免发生封建割据战争……委托监护者不是印第安人的主人, 也不能行使司法权, 因为‘印第安人不是委托监护者的农奴, 而是国王的臣民……’这样服役的委托监护制就被货币贡赋的委托监护制所取代……工资工人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突出标志, 他们形成了新的工人阶级。” *Latin America*, pp.37~38. 米兰达 (José Miranda) 说: “委托监护者首先是他那个时代的人, 他以发财致富为目标。对当时的人来说, 委托监护者是喜欢行动的人, 新世界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他那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人……他不像封建庄园主那样, 克制自己的欲望, 仅仅满足于享用贡赋和服务。他要把贡赋和劳役改变成为生财的基础……因此, 委托监护者把委托监护制劳动征集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放在首位, 那是唯一促使他狂热这求其目标——财富——的因素。”“La función económica del encomendero en los orígenes del régimen colonial, Nueva España (1525-1531), ” *Anales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II, 1941~1946, 423~424. 一个思想上和行为方式上的资本家, 但正如米兰达所指出的, 不是一个把商业资本投入企业的资本家 (见pp.431~444)。他的原始资本来自国家的赐予, 他后来的资本来自其利润。

[95] 马提涅兹 (Fernando Guillén Martínez) 甚至说: “事实上, 作为一种制度, 委托监护制和米塔 (派民伏制) (mita) 都只能存在于由于数量和惯性的关系尚保留印第安人部落制的地区。由于人们普遍认为, 在头领制与集体奴隶制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所以印第安人是以甘愿赴汤蹈火的精神去工作和献身的。但随着基督福音的传播和人种的混合, 部落解体, 个人主义兴起以后, 印第安人就不再容忍有组织的奴役制……” *Raíz y futuro de la revolución* (Bogotá: Ed.Tercer Mundo, 1963), 80. 关于“米塔”的定义和起源, 见Ots Capdequi *El estado español*, p.31~32.

[96] 事实上, 弗塔多 (Furtado) 认为, 在原有的地方统治阶级势力弱小的地区, “事实证明, 委托监护制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 于是委托监护者就采取一种更直接的奴隶制形式, 他们强迫人们在完全不同于他们所习惯的条件之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一制度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减少。”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pp.10~11.

[97] “1559年, 圣蒂兰塔莎蒂 (Tasa de Santillan) 法令规定, 金矿砂的1/6, 即西斯莫 (sesmo), 每年一次作为工资付给每个委托监护制的印第安人。从那时起, 这种分享制可能就真正获得了社会或社团工资的性质, 这种工资一次总付给每一个印第安人社团或村落。” Alvaro Jara, “Un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problemas del trabajo en Chile durante el período colonial,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2, May 1959, 240.

[98] 严格地说, 有些地区在中世纪根本没有实行封建制。这些地区只有“次生封建制”, 没

有原生封建制。斯培尔（Stahl）认为，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的情况就是如此。见*Les anciennes communautés*, pp.241~244.

[99] “东欧的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为利用这一资源所做的努力。在12、13世纪形成的诸国家，这时势均力敌，因此相互倾轧只能意味着两败俱伤。而德国又构成对波希米亚和波兰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王公和僧俗贵族被迫在开发自己的资源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但是这只有得到农民的合作才有可能。农民的义务一直没有固定下来，他们担心生产出剩余的财富也会遭到剥夺，所以对改进生产手段没有兴趣。但另一方面，领主已无力进一步敲诈农奴，因为后者随时可以逃跑。因此那些希望利用其财产获利的王公贵族就被迫鼓励其属民更紧张地劳动和引进新技术，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他们凭借引进德国乃至西方的习惯而达到了目的，因为作为这种引进的结果，农民的负担不仅固定下来，而且有所减轻。在13世纪早期的波希米亚和稍晚一点的波兰，劳役和实物地租已经折算为货币地租，这一转变反映了农业的发展和社会劳动分工的进步。” M.Malowis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Middle Ages, ” *Past & Present*, No.33, April 1966, 14~15. 见Jerome Blum, “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4, July 1957, 807~836.

[100] 收租人（Grundsherr）变成了直接生产者（Gutsherr）。有关讨论见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Press, 1966), Ch.I.有关斯洛文尼亚（Slovenia）的贵族如何通过扩大领地、提高地租、接管商业的手段战胜财政困难的讨论见Ferdo Gestrin, “Economie et société en Slovénie au XVIIe siècle, ” *Annales E.S.C.*, XVIII, 4,juil.-août 1962, 665.

[101] “（在15世纪以前）殖民时代的易北河以东地区（East Elbia）只有容克（Junkers），除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外，没有容克阶级。直到15、16世纪，才出现了一个紧密的贵族地主阶级。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野心，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意识和团结精神，荣辱与共，像种姓制度下的某个种姓一样自信和相投……从时间上讲，它的出现与英国和匈牙利乡绅的兴起、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地主贵族的兴起，以及波兰兹拉奇塔（Szlachta）贵族阶层的兴起大抵同时，与法国和德国西部的那个懒惰的、不参与经营而专靠食利为生的领主贵族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衰落也大抵同时。”Hans Rosenberg, “The Rise of the Junkers in Brandenburg-Prussia, 1410~1653,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X, 1, Oct.1943, 4.请注意，罗森伯格（Rosenberg）在这里把英国纳入东欧国家。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这样做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容易引起混乱。把东欧地主与英国乡绅相提并论的首创者之一是帕赫（Pach），他认为二者都“类似资产阶级”。见Zs.P.Pach, “Die Abbiegun der Ungarischen Agrarentwicklung von der Westeuropaischen, ”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155.

[102] M.Malowist, “Poland, Russia and Western Trad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 *Past & Present*, No.13, April 1958, 32.另见M.Malowist, “The Problem of th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 the Latter Middle Ag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IX, 1,

April 1966, 15~28. 霍斯佐斯基 (Stanislaw Hoszowski) 曾援引17世纪上半叶英国使节卡鲁爵士 (Sir George Carew) 的话说: “波兰变成了欧洲的粮食和造船材料库。”“The Polish Baltic Trade in the 15th-18th Centuries” in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Warsaw: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1960), 118.

[103] 见Malowist, *Past & Present*, No.13, pp.26~27.

[104] 有关殖民地用原料与宗主国交换成品的论述见Freddy 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Age* (Paris: Boccard, 1959), 304~305. 克里特 (Crete) 被称为“帝国的面包筐” (p.414)。至于帝国与外部国家的类似关系, 他写道: “帝国的小麦不够吃。”见pp. 327~328.

[105] 见Jaime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ch.17, esp.211~215.

[106] 见Oliveira Marques,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p.449.

[107] 见Phillipe Dollinger, *La Hanse (XIIe-XVIIe siècles)* (Paris: Montaigne, 1964), 76~80.

[108]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94.

[109] B.H.Slicher van Bath, *A.A.G.B.*No.12, p.28. 赫雷纳 (Karl Helleiner) 说: “到16世纪, 地区间的海上粮食贸易已有了很长的历史……但16世纪呈现出新的特点: 由于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 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易北河以东地区、波兰和爱沙尼亚 (Estonia) 剩余物资量大为增加, 永久性或一时性的粮食亏损区可以较以前更为大量和更为经常地从国外得到补充。到16世纪中叶, 每年经但泽 (Danzig) 港出口的粮食数量是1490~1492年间平均值的6~10倍。……这个时期又有两、三个重要的肉食基地向欧洲人敞开了大门: 从科德角 (Cape Cod) 到拉布拉多 (Labrador), 盛产鱼类的海岸产出更为大量的蛋白质; 匈牙利和瓦拉几亚 (Wallachian plain) 平原以及丹麦谷地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成为大牧牛场。这里的牛大量输入奥地利、德国和荷兰。” *Camb.Eco.Eur.*, IV, pp.77~78.

[110] Reginald R. Betts, “La société dans l’Europe centrale et dans l’Europe occidentale, ”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n.s.VII, 1948, 173.

[111] Zs.P.Pach, “The Development of Feudal Rent in Hungar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1, April 1966, 13.

[112] “西欧经济的兴起变成了引起东欧城市衰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Hartung and Mousni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p.46. “从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 波兰经济的特征是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领地经济逐渐蔓延。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并对这个国家的总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不利影响。” Hoszowski,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p.117.

[113] 见Doreen Warriner,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Agrarian Europe, ”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XXI, No.78, Dec.1953, 174~175.

[114] 贝茨认为, 这些入侵行动和“次生封建制”的出现堪与早些时候的入侵行动和“原生”封建制的建立同日而语。见Betts,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p.175.他详细论述了后期入侵对东欧统治者的影响, 见pp.175~180.沃里纳(Doreen Warriner)推测, “如果(欧洲的)商路没有在海外寻金热中(相对地讲从东欧)西移, 东欧可能会继续沿着与西欧相同的道路发展, 商业和城市的扩张也会成为封建社会经济的溶剂。或反过来说, 西欧15世纪的经济衰退也会转移到东欧(p.146.)。”

[115] André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9.弗兰克(Frank)继续说道: “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并不因它标志着一方在经济上比另一方更发达就仅仅是相对的, 就仅仅意味着数量上的不同。它也是相关的, 并有着本质性的意义, 因为每一方都因与另一方有着某种联系而存在, 而二者又有结构上的不同。但是, 发达与不发达又是同一的, 因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展过程的产物, 尽管辩证地来看, 二者是矛盾的。”

[116] Owen Lattimore, “La civilisation, mère de Barbarie?” *Annales E.S.C.*, XVII, 1, janv.-fevr.1962, 99.

[117] Owen Lettimore,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de Scienze Storichi*, I, p.110.弗里德(Morton Fried)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 他说: “从特定意义上来说, 大多数部落是一种派生现象, 因为它们完全可能是组织程度较高的社会从组织程度较低的社会中脱颖而出后带来的后果。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 那么部落主义就可以被视为对复杂的政治结构的一种反动, 而不能被看作是复杂政治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准备阶段。”On the Concept of “Tribe”and “Tribal Society”in June Helm, ed., *Essays on the Problem of Tribe*, Proceedings of 1967 Annual Spring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15.

[118] 事实上, 只要了解了微小区别的这一最终结果, 我们就可以了结有关质与量的无益纷争。我赞同戈登—沃克(P.C.Gordon-Walker)的说法。他认为: “质变与量变并没有真正的区别。如果历史学家探究数量和程度的变化, 他将发现‘质变’事实上只是量变的结果。这一法则既适用于经济组织的变化, 也适用于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质变不过是量变积累的某个阶段。”“Capitalism and Reforma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1, Nov.1939.4~5.

[119] 斯托雅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认为, 西欧与东南欧的差距也是这样拉大的。他说: “如果说在14世纪, 人们还看不到在巴尔干社会与西欧社会之间, 在导向方面有什么量的区别, 那么到1700年, 这一区别已经很明显, 到1800年, 这一区别更为加剧, 到1850年, 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Material Foundations of Pre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Balkans,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V, 3, Spr.1971, 232.

[120] 多玛尔(Evsey D.Domar)曾做过这样的假设: “(有关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农业结构

有三个因素：自由土地、自由农民、不工作的土地所有者。这三个因素中，每两个都可以同时存在，但三者不可同时并存。我们可能会在现实中发现诸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现象，但它必须依赖政治行为，即政府法令……”“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 1, March 1970, 21.

[121] “所谓等级制度，是指一个群体永久性地从属于另一个群体。（在西班牙美洲）这种制度形成以后并未得到法律的批准，只是偶尔获得承认。有关印第安人个人劳动的官方立法从未宣布在白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之间有任何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不平等……。

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只是悄悄地实行，而未见诸法律，所以由土地所有者及其盟友—官僚—构成的剥削阶级渐渐形成寡廉鲜耻、贪得无厌、残酷无情的性格，这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由国家维护贵族阶层经济特权的地区是闻所未闻的。

上述结论可由下面这一事实证明。在正式批准向新格拉那达（New Granada）输送黑奴，让他们在安蒂奥基亚（Antioquia）矿山劳动或在考卡河（Rio Cauca）地区及大西洋沿岸充当农业劳动力后，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并不像以前委派给的印第安人曾受到过的那样粗暴、无礼和野蛮。黑奴所有者的特权地位受到法律的保护，由于意识到奴隶制将持续存在，奴隶主遂具有一定真正的责任意识，而这正是占有印第安人的委托监护者所缺乏的。” Guillén, *Raíz y futuro*, p.81.

[122] Alvaro Jara, “Salario en una economía caracterizada por los relaciones de dependencia personal,”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608.

有关委托监护制的印第安人生活水平低下的证据也存在于出产靛青染料的危地马拉

（Guatemala）。1563年，西班牙国王批准了以前的监护法院（Audiencia）的决定，禁止雇用印第安人，理由是，那是“非常有害的工作”。史密斯（Robert S. Smith）指出，这一敕令并未生效。他说：

“1583年，殖民地官员发现，种植者找到了一种规避该法令的办法，他们不再把印第安人当作工资劳动者雇用，而是和他们订立合同，让他们背负肩扛，把沉重的靛青植物拖出种植园，而付给印第安人的酬金只相当于他们所应获得的十分之一……7年以后，检查官发现，‘很多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后代、自由的黑人，甚至奴隶’（即政府遣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劳动力）都破坏了这条法律，雇用印第安人来收割和拖运埃西奎里特（xiquilite，一种植物，为靛青染料的主要原料），而付给他们的工钱是微不足道的。”“Indigo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Colonial Guatemala,”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2, May 1959, 187.甚至奴隶也雇用印第安人，我们真是有了衡量标准！

[123] “西班牙征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占领和殖民的各个地区建立采矿经济……印第安人奉献给欧洲的主要是贵金属。殖民地的其他产品似乎只占不值一提的次要地位。” Alvaro Jara,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XIXe siècles*, pp.249~250.加拉（Jara）指出，在这方面，有关海上交通量的统计表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问题，“在1503至1660年间，除去1591至1600和1621至1630年外，似乎都适用于这样一个公式：矿产量越多，作为商业上的反映，海上交通量就越大（p.266）。”

[124] 韦伯把种植园经济和地产经济区别开来。地产经济是他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二者的主要区别似乎是劳动控制形式和典型产品。见*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79~92.种植园生产园艺业产品(按照韦伯的说法), 典型产品是甘蔗、烟草、咖啡和棉花。地产则用于畜牧或种植小麦, 或二者兼有。我不清楚这种区分是否有意义, 因为(这里所限定的)“地产”在东欧更近似于美洲的“种植园”, 而与英国等地的“地产”少有相似之处。

[125] 但是, 正像我们将论述到的, 随着半边缘化进程的发展, 南欧的人口密度日趋下降。维森斯(Jaime Vicens Vives)在评论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有关东欧此时发展状况的论文时, 曾与加泰隆尼亚(Catalonia)作比较。他说:“事实上, 作为专门研究一个完全不同于15世纪波兰的国家——加泰隆尼亚——的农民阶级演变的学者, 我们已经注意到, 如果说, 就我们所说的‘次生封建制’而言, 波兰和加泰隆尼亚如出一辙, 那么这种一致性不能用相同的原因来解释。马洛维斯特像其波兰先辈一样, (认为)15、16世纪开始新的封建化, 其原因主要是波兰在波罗的海地区贸易的发展和内部市场的扩大, 而内部市场的扩大又是城市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在加泰隆尼亚, 农民法律地位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地中海商业的萎缩, 另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减少。因此, 我们看到了殊途同归的结果。”Comments made on the“Rapport de M.Malowist, ”p.148.

我并不认为维森斯真正把握住了马洛维斯特的基本观点。除此之外, 我还认为维氏的观点有问题。在波兰和加泰隆尼亚, 导致农民地位变化的原因是相同的。只是他们的起点不同, 因为在14世纪, 加泰隆尼亚一直是欧洲相对发达的地区之一。加泰隆尼亚的人口减少和波兰的人口增加导致了两地人口密度几乎相等的结果, 因此在“漫长的”16世纪, 两地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没有显著差别。

同样的, 詹宁(Pierre Jeannin)指出, 在16世纪, 波罗的海的港口规模扩大, 活动频繁, 因此不应过高估计边缘地区城市衰落的程度。面对这一提醒, 我们也必须承认, 事实的确如此。见“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 des villes de la Baltique avec Anvers au XVIe siècle,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3, Sept.1956, 196.但是我们必须记住: (1) 国际贸易的增加当然会造成港口业务日趋频繁, 但政治和地方贸易的中心又如何呢? (2) 总人口的增加通常会导致城市规模的扩大, 但这种扩大是否与人口增加成比例呢? (3) 即使边缘地区城市人口有所增加, 但考虑到西欧城市化的程度, 我们也仍然可以说这些城市趋于衰落。

[126] 农业集约程度越强, 农民地位越高。见阿丹特(Ardant)有关什一税破坏生产力(*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l'impôt*, I, p.208)和固定的赋税或地租促进生产力发展(*Ibid*, I, pp.225~226.)的论述。

[127] 库拉(Witold Kula)从理论上剖析了这一矛盾。他说:“畜牧业的‘再生产’就是看管牛群。如果某种制度把这一任务主要交给农奴, 那对畜牧业来说是最不利的。牲畜只会给领主带来利益, 而对农民并无好处, 因此农民对牲畜漠不关心, 这是令所有庄园主忧虑不已的问题。在通常是因为少雨而造成的食物短缺的年月, 农民面临着喂养牲口还是喂养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的选择是可想而知的。最后, 由于牛生产能力低下, 庄园主必须畜养更多的牛, 而这又加剧了提供饲料的困难。” *Théorie économique du système féodal: pour un modèle de l'économie*

polonaise, 16e-18e siècles (Paris: Mouton, 1970), 31~32.这种看法并不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指出, 在1515~1530年间, 朗格多克 (Languedoc) 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Paris: S.E.V.P.E.N., 1966), I, 323.

[128] 见Kristof Glamann,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p.45~52.他说: “牛市场兴旺伴随着贵族的黄金时代 (p.50)。”

[129] 朗格多克 (Languedoc) 的情形就是如此。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说: “开垦荒地的行动造成牧场减少, 各种种植园 (橄榄树、栗子树等)、庭园和石土墙圈围起来的地限制了普通人使用敞地的权利。基于这些原因, 畜牧业发展到顶端之后走向衰落。这种传统农业不晓得种植饲料, 或只限于在园地上种植饲料, 所以不可能同时发展畜牧业和蔬菜生产。畜牧业和蔬菜生产是矛盾的, 因为二者都需要占用自由地, 而自由地日渐稀少。因为缺少西班牙等国家维护牧主利益的大牧羊主团 (Mesta), 牧牛业在正在从事扩张的传统国家很快变得难以发展。”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I, p.324

[130] 见J.H.Parry, “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Rich and C.H.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7th and 16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191.

[131] 请看1600年欧洲与1500年欧洲的这一对比: “首先, 主要生产部门农业不仅可以比1500年养活多得多的人口, 而且可以使他们吃得更好; 海外贸易和纺织业也比1500年有所提高, 采矿和冶金业的规模更远远超过1500年。”Mauro,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257.

[132] Duby, *Rural Economy*, p.325; 另见p.275.但在卡斯提尔 (Castile), 形势发展似乎不尽相同。“在14、15世纪, 卡斯提尔贵族的势力达于极盛, 以致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在卡斯提尔, 贵族不像在其他西方王国那样采取守势, 而是改朝换代, 接管王产, 使王权成为实现其野心的工具。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 卡斯提尔王室没有得到城市的有力支持。很多卡斯提尔城市站在贵族一边, 更多的城市甚至已沦为贵族的臣仆。”Vice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245.维森斯 (Vicens) 说, 这样, 在埃克斯塔马杜拉 (Extremadura) 和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 16世纪就是一个大领地 (Latifundia) 兴起的时代。这些贵族由于在14、15世纪得到大量土地封赠而一直虎视眈眈。见pp.247~248.

[133] 除了农民的反抗力量之外, 多布还考虑到两个因素。一个是“地方贵族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因为它将决定是否能够镇压农民的反抗和强行禁止农民离开庄园”。另一个是“王权为加强贵族权力, 或趁机削弱其对手——贵族的地位, 施加了怎样的影响……”*Studies*, pp.51~52.

[134] “(但是), 自16世纪20年代后期起, 以前对圈地一直保持沉默的租地农开始激烈谴责那些占有牧场的人, 从而阻止后者扩大占有地, 因为这时人口增长, 需要土地。这种愤怒情绪往往在立法机构中表现出来, 但是抗议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想服从法律, 而宁愿直接反抗圈地行为。”Blanchar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 p.440.

[135] 对于反抗的不同效果，布罗代尔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人口密度。他在把人口密度较低的中欧同人口密度较高的意大利（“村落城市”）以及莱茵河、缪斯河（Meuse）、巴黎盆地之间的广阔地带进行对比后指出：“既然在如许多的中欧和东欧国家里，村庄如此疏落，它不可能是决定农民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吗？面对庄园主，他们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他们缺乏大社会集团的那种并肩作战的精神。” *Civilization matérielle*, p.42

[136] H.K.Takahashi,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Sweezy Dobb controversy,” *Science and Society*, XVI, 4, Fall 1952, 324.

[137] 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54.

[138] 杜比（Duby）说：“分成制租（*Métayage*）给主人带来极大好处。它使他们有望从领地生产率的增长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中得到更多利润……即使领主的参与程度降至最低点，契约也确保他获得纯利中的绝大部分。（其数量可能多于承租制下他能得到的地租）。我们切不可忘记，分成制佃农（*Metayer*）还要从他们自己的那部分所得中留出种子和有时还要留出什一税。在当时农业产出通常很低的情况下，什一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无论如何，领主们十分清楚，这种制度对他们来说并不便利，因为收成好坏差距很大，这使他们必须密切监督生产。” *Rural Economy*, pp.275~276.

[139] 正如杜比所云，分成制租（*Métayage*）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好处在于，“农耕成本很低，而可出售产品所地来的利润……十分可观（*Ibid.*, p.280）。”

[140] 切昂（Steven N.S.Cheung）从理论上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说：“分成制合同中包括分成百分比、非土地投入与土地的比例、种植物种类等等。这些由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共同决定。但在固定地租制和工资制合同中，一方可根据市场价格决定另一方所使用的材料数量和种植物种类。因为在分成制度下，分成所得以实际产出为基础，所以土地所有者必须竭力保证丰产。因此分成制合同的签订和推行要比固定地租制和工资制复杂……。如果只考虑经营成本……那是绝不会选择分成制的。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分成制呢？……在固定地租制下，对（除埋头苦干之外，影响产量的其他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佃农即使不是全部承担，也要承担大部分；在工资制下，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大部分风险要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因此可以说分成租佃制是一种分担风险的制度……”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69），67~68.

[141] “大体上说，从16世纪开始，分成制在不均衡地广布于各处，甚至传播到迄今还对其十分陌生的地区之前，就已经遍行于法国，并至少在18世纪以前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由于物价浮动不定，人们找不到比它更稳妥的办法。意大利资产阶级，即机灵金融家，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后悔早些时候——比如在1376年的波洛尼亚（Bologna）没有通过法律要求这个主要城市的每一个市民签订这类合同。那里的市民已把土地出租给郊区的被压迫居民。法国土地所有者不久后也认识到这一点。” 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52.

[142] “在实行永久性租地制的情况下（这是自由持有制free-hold造成的结果），所谓自由持

有制是靠法律推行的终生租地制的地方，实行分成制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至难以为人们所接受，所以退佃成为防止分成租佃农怠工的有效手段。”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p.34.

[143] Duby, *Rural Economy*, p.327.

[144] 布罗代尔在比较这两个地区时说：“（地中海地区）很少能够避开种种威胁获得丰收。那里产量很低，而且由于只有少数地区拥有苗床，所以地中海人总是处于饥馑的边缘。”*Civilization matérielle*, I, p.223.

但是马德莱那（Aldo de Maddalena）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总而言之，除去特殊情况之外，人们必须承认（意大利）耕地的产出率是很低的。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地区土地低产的原因是气候恶劣，但是，若要历史地、公允地解释这一现象还应考虑下列诸方面的不足：技术手段、文化体系、农学理论、经营能力、资本源泉、行政和社会结构、政治和军事变迁。”“II mondo rurale ital-ianonel cinque e nel seicento,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2, giug.1964, 423.毫无疑问，人们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但不分主次的通盘考虑无助于得出一个明确的解释。然而，注释(52)所引的斯鲁普（Sylvia Thrupp）有关中世纪意大利北部土地肥沃的论述是值得注意的。

[145] 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指出，在这个时期，法国大地产没有取得像英国那样的发展。他说：“不管怎么说，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这种地产）只占极小的比例，在边缘省份更是如此，因为那里靠近海，所以利于发展商业。居埃纳（Guyenne）、朗格多克（Languedoc）、普罗旺斯（Provence）、圣东日（Sain-tonge）、波亚图（Poitou）、诺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any）等港口的有利地理位置促进了酒类和农产品的出口。这里的人们有时还走私小麦，甚至试图出口牲畜，特别是绵羊。简而言之，这里的贵族要尝一尝商业的禁果。”*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Paris: S.E.V.P.E.N., 1963），289.但要注意，波尔什涅夫把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也列在其中。对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里我们只需要说明，有时原因是多重的。

[146] 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成制是一种中间形式。他说：“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在这里，从一方面说，租地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从另一方面说，土地所有者在这里所得到的部分并不具有纯粹的地租形式。它可能实际上包含他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息和一个超额地租.....地租在这里已不再表现为一般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只使用本人劳动或者也使用别人劳动的租地人，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一部分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要求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也不只是根据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作为资本的贷放者，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Capital*, III, ch.XLVII, sect, V, p.803.

[147] “在环地中海的法国和意大利城市地区，市民曾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但（在14、15世纪人口下降的时期，）由于人们的迁离，土地荒芜，这里广泛实行分成制租（Métayage）这一事实说明，市民和农民为了耕种土地和生产粮食找到了一种合作的形式。”Duby, *Rural*

Economy, pp.356~357.

[148] “分成制在实行时表现出满足资产阶级所有者需要的资本主义本质。这些所有者的理想是从他们的土地上获得一份可以转化为货币的净收入。他们使其地产管理带有一种商业色彩。他们处心积虑将其在农业收成和粮食或牲畜的出售中的所得，连同贷款利息一道纳入他们的钱袋。与这些外在物质相比，利润是最主要的考虑。他们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农业本身并无兴趣。”G.E.de Falguerolles, “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agricole dans le Consulat de Lempaut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Annales du Midi*, LIII, 1941, 149.

[149] “农奴的解放与其说是得来的，毋宁说是买来的。” Marc Bloch, *Caracteres originaux*, I, p.111.

[150] “在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土地价格无异于资本主义地租……”Karl Marx, *Capital*, IV, ch.XLVII, sect.V, p.805.

[151] 见Slicher van Bath, A.A.G.B, No.12, 164~168.鲍登（Peter J.Bowden）说：“从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生产羊毛比生产粮食更有可能获得利润，牧业才发展起来，在英国中部尤其是如此……

随着毛纺品产量和出国量的增加，羊毛的价格上涨。以1541~1550年为例，本地生产的羊毛价格比1451~1460年几乎高一倍。在15世纪下半叶，粮食价格相对稳定，在价格普遍上涨的1520年以前，粮价没有明显的增长。” *The Wool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New York: Macmillan, 1962），4~5.

[152] “但到16世纪中叶，从粮食向羊毛转换的急迫性减弱。土地日渐稀少，劳动力却日渐增多。自16世纪20年代起一直上涨的粮价在物价普遍剧增的40年代又长了一倍。后来，在1557年，英国毛纺品的外国市场出现萎缩，羊毛价格随之停滞不动（Bowden, *ibid.*, p.5）。”拉姆赛（Peter Ramsey）说：“概而论之，在1550年以前，只要能够减少劳动力成本，（在英国）把耕地变为牧场就有利可图。以前一些评论家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1570年以后，把牧场变为耕地似乎更加有利可图，只要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不至于抵消卖粮的利润。” *Tudor Economic Problems*（London: Gollanc, 1968），25.

[153] 正如德卢莫（Delumeau）在谈到罗马时总说的：“对于一个人口和财富都在增长的城市，（乡村贵族）向其兜售肉食和奶酪似乎比兜售粮食更赚钱。结果，他们想方设法使限制他们经营畜牧业的一切政府努力都归于失败。贵族的贪婪和畜牧业日益增长的诱惑力伴随着贵族的各种反应——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罗马乡村。” Delumeau, *Vie économique*, II, pp.567, 569.

杜比（Georges Duby）把13世纪末期以来，法国畜牧业的发展与“从城市开始的对肉食、皮革和羊毛需求的增长”联在一起。反过来，随着养牛业（和酒类生产）地位的提高，“法国农村的商业化进程飞速发展……”“The French Countryside at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in Rondo Cameron,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Homewood, Illinois: Irwin, Inc., 1970），p.33.

[154] “（整个欧洲）对谷物和酒类需求量的普遍增加，使这个国家，特别是农民，肉食减少，而肉食是其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长期以来为肉商保留最后的牧场的村庄最后把所有牧场关闭。……

阿拉冈等地区因人口相对不足难以提高人均产量，于是这里的人们放弃了比较贫瘠的农场，发展出口业，工人也纷纷离开家乡……这样，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的消失就伴随着农民的贫困和地位下降，伴随着利润率的停滞，同时造成失业……” Jose'-Gentil da Silva, *En Espagne: déca-veloppement é-conomique, subsistence, déclin* (Paris: Mouton, 1965), 169~170.

[155] 见Dobb, *Studies*, p.58; 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I, 1.Apr.1970, 13.

[156] 见Dobb, *ibid.*, p.53.

[157] 克莱因 (Julius Klein) 说明了个中原因：“英国和卡斯提尔 (Castile) 的圈地运动……进行得如此同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两国的这一插曲都是在14世纪养羊业的刺激下开始的……在16世纪中叶，英国没收了修道院的地产，卡斯提尔王室则获得了军事集团的大量财产，这种地产的利用和财产的获得都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畜牧业的发展。后来，这两个王国的圈地显然都缓慢发展，但此时圈地不再是为了发展大规模的养羊业，在英国，它是为了租给小农——公簿持有农 (Copyholder)，在卡斯提尔它是为了圈养牲畜和农民务农。在这两个国家，高等法庭……都保护这一运动，而且圈占公地 (the common lands) 的企图都因渴望发展圈养绵羊业而变得炽烈。在两国的最终结果都是助长了小规模农业……在伊比利亚半岛，遏制圈地运动，并在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事实上成功地阻止了这一运动发展的因素是大规模的放养畜牧业。在中世纪和都铎早期的英国，反圈地势力绝大部分来自农业阶级。” *The Mesta: A Study in Spanish Economic History, 1273~183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Press, 1919), 314~315.

[158] “谷物出口贸易在13世纪末始于普鲁士 (Prussia) 和波兰，在14世纪为波罗的海国家所效法。谷物被海运到尼德兰 (Netherlands) 挪威北部和英国的部分缺粮区，如剑桥附近的沼泽地带和有大牧场的地区。” Slicher van Bath, A.A.G.B., No.12, 170.

[159] 瑟斯克 (Joan Thirsk) 在解释这些工业为什么只存在于部分地区时说：“共同的原因恐怕是这些：由人口众多的从事畜牧经济的小农组成的村社会，其主要成分常常是自由持有农 (freeholders) ……或享有几乎与自由持有农同样有利租地条件的习惯佃农 (customary tenants)。其基础可能是牛奶生产。在这些地区圈地通常较早，因此庄园组织和合作农业十分稀少或根本不存在。其基础也可能是大片公共牧场上的饲养业，在这些地区没有圈地的必要，而耕地又比较贫瘠，所以也不存在适于合作耕作的坚固的敞地结构。……由于这些共同原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时可以在这一切的背后发现某种规律。一些最适于放牧的土地直到该居民点历史上的晚期才开垦出来。在这里，直接圈地是可能的，独立农民组成的社团的兴起也是可能的，因为这些农民不以村庄而以家庭为合作生产单位。如果该土地适于畜养奶牛，那么

它也就有足够水源发展毛纺业。在自然条件较差的乡村，满目荒野沼泽，罕见良田美地，乡民遂不得不固守饲养绵羊的营生。公地吸引着无地的年轻人。饲养家畜不像种粮那样繁忙，这使他们有时间从事副业。”“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 in F.J.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1), 86~87.

[160] Sweezy,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141., 又见pp.146~147.瑟斯克 (Joan Thirsk) 在一定程度上对斯威奇的观点表示支持。她说：“但是在16世纪初，在这个王国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在康沃尔 (Cornwall)、德文 (Devon)、坎伯兰 (Cumberland)、威斯特摩兰 (Westmoreland) 和诺森伯兰 (Northumberland) 仍散布着许多村社，有些仍保留着部族的遗风，它们几乎仍完全与商业世界隔绝。另一方面，东盎格利亚 (East Angalia) 和肯特 (kent) 东部的一些产粮村深深卷入了大规模的食物贸易，而且他们只愿经营，全然不理会对部族、家族或庄园主的社会服务。在高原地区与低地地区 (如中西部) 之间，这种区别并不明显。”“The Farming Regions of England,”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15.对那些认为东盎格利亚不完全属于中心地区的人，我们必须提醒他们，重要的是它在16世纪的实际位置，而不是在20世纪的位置。在这方面，瑟斯克说：“在今天看来，东英吉利似乎远离从伦敦到北部的交通干线。但是在16世纪，其中心的河流、漫长的海岸线和为数不少的港口使它很容易与伦敦、英国东北部、苏格兰、尼德兰和波罗的海的市场建立联系。因此，那里的农业从很早起就服务于国内外市场。当时的生产专业化程度已经如此之高，以至到17世纪早期，即使在丰收的年代，很多很多地区仍远远做不到粮食自给…… (pp.40~41)。”

[161] “在英国距离大市场最远、比较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在西北部，劳役制最先消失，而比较进步的东南部却把它保留得最长久。” M.Postan, “The Chronology of Labour Servic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 XX, 1937, 171; Dobb,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161.

[162] Sweezy,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147.

[163] 这一点应该进一步说明一下。东欧的资本主义贵族地主当然是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詹宁 (Jeannin) 甚至说：“显然，虽然暂时或长期的府库空虚，限制了购买力，但力所能及的消费仍在增长，这一消费水平的提高是16世纪北欧 (即环波罗的海地区) 贵族生活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p.215.但请注意，詹宁毕竟提到府库空虚是一个限制因素。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经济扩张的时代，奢侈的绝对程度是增长的，但相对西欧的增长程度而言，我们可以说东欧的奢侈程度在下降。

[164] 诺斯 (Douglass C.North) 和托马斯 (Robert Paul Thomas) 指出：“这时的圈地发生在出产羊毛的牧场和适于生产商品粮的地区。前者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对羊毛的需要，后者是为了满足因城市地区扩大而引起的本地对食物的日益增加的需求。16世纪的圈地运动在英国高原地区最为盛行，因为那里圈地者的收益高于农耕区。这两个原因。第一，适于放牧的地区

比农耕区人口密度低；因此.....圈地时，征询意见面就相对缩小。第二点可能更为重要，即羊毛价格提高以后，每一个在公地上占有一块土地的人都想牧养更多的羊群，结果谁也不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土地。对于在公地上牧养另一羊群的个人来说，成本接近于零，但对于由这样做的人构成的社会来说，代价是很大的。因为那样公地上将放养过多的羊群，结果羊毛的实际出产量将会减少.....有力量圈占公地的人则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他把土地圈围起来，禁止他人使用。”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 p. 13.

[165] 多布把这种人力资源称为“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因素”。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p.161.

[166] Posta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XX, 192~193.

[167] 见François Chevalier, *Land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Mazico*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168] “货币地租的发展并非总是与劳役折算连在一起。在很多庄园里，货币租是作为实物租的折算形式而出现的。最后，货币租可以和劳役制及实物地租同时存在。最终，货币租的出现是出租一部分领地的结果。”Eugen A.Kosminsky, *Past & Present*, No.7, pp.16~17.波斯坦说：“本文含有这样一重意思：地租和劳役是一种互补关系，一种形式的增多在通常情况下伴随着另一种形式的减少。”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XX, p.191.

[169] “随着庄园制衰落而发生的封建地产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地租形式的变化：在英国，变为货币地租，在法国和德国，则是封建地租的性质发生变化。以前直接以工作形式奉献剩余劳动的农民，现在则以物的形式——产品或产品的货币价格——来奉献。所谓变化不过就是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封建地主都是凭借其所有权，利用‘超经济强制’（extra-economic coercion），在完全没有商品交换法则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地剥夺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尽管后者事实上占有生产资料——土地。”Takahashi, *Science and Society*, XVI.p.327.

[170] 韦伯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在庄园之外有各种力量把这一过程推向更彻底的形势变化。他说：“城市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力量.....加速了庄园的衰落或解体，因为庄园限制了他们自己的市场机会.....仅仅从佃农必须服劳役和交租这一点来看，庄园制就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因为它使农民无法把他们的全部劳动投入商品生产，也无法提高他们自身的购买力.....此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还有意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新兴资本主义分子对土地的渴求也使他们的利益与庄园制势不两立.....最后，国家的财政利益也起到一定作用，国家希望通过解散庄园而提高这个农业国国民的纳税能力。”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94.

[171] 多布说：“与大地产，特别是教会大地产相比，小地产的农奴劳动力数量.....往往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当一个地产所有者可以从另一个地产所有者那里引诱或掠夺走农奴的时候，小地产所有者是这一争夺中的失败者，并成为邻近豪门大户的牺牲品，因此他们最渴望法律的保护.....但有时.....这产生相反的结果。如果一个地产所能支配的农奴数量低于下限，该地产的领主只要认为这块领地还值得经营，就必然被迫主要依赖雇佣劳动，这样，他的每个农

奴必须向他提供的劳役数量问题对他来说就变得相对无关紧要，至少不像对比他富裕的邻里来得那样重要。如果雇佣劳动力不足，适合于他的选择也不是提高或扩大劳役（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不够的），而是放弃亲自经营领地，把它出租给有能力交租的佃农。” *Studies*, pp.59~60.

[172] 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17.

[173] “在易北河（Elbe）以东的德国和斯拉夫人国家，整个领主制都发生变化并让位于一种新的制度。封建义务不再有利可图。但是没有关系！乡绅（squires）本人变成了粮食的生产者和出售者，村民的土地重新集中到他们的手中……这种地产吞食或摧毁了旧式的土地占有关系。在英国，事情沿另一条路线发展。确实，那里乡绅所占有的地盘也呈增长趋势，农民和公社的土地也受到侵夺，但这里的乡绅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土地出租者，只是他的地租不再是可免的。此后，小块土地最多也只是按期限出租，租期更加通常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意志。续租手续十分简单，不过是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调整地租。这两个欧洲端点的特征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应为（13、14世纪封建）危机负责的永久性土地占有制宣告瓦解。这时在法国，如此大胆的改革是不可能的（Bloch, *ibid.*, I, 131~132）。”

[174] “英国的庄园递减过程比法国晚得多，它大约发生在13世纪末——14世纪末——15世纪末，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发生在11世纪末——12世纪末——13世纪初。这很自然，因为英国领地制建立较晚。” Marc Bloch, *Seigneurie française et manoir anglais*, p.114.

[175] 见Block,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132~139. 卢布林斯卡娅（A.D.Lublinskaya）在谈到这种观点时说：“我认为，布洛赫的这些解释是肤浅的。”但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出更好的解释。“Préface à l'édition russe des Caracte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Annales E.S.C.*, XIV, 1, janv.-mars 1959, 201.

在这方面，佩罗伊（Edouard Perroy）的观点比布洛赫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认为，在中世纪晚期，当英国的封建特征渐渐减弱之时，法国恰恰在国王的支持和倡导下加强她的封建制度。他的观点如下：在中世纪早期，法国是受封建割据影响最深重的国家。因此王权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权力（*primu inter pare*, 同等领主中的第一位），卡佩王朝（Capetian）为解决这个问题，扩大国王的领地，令其覆盖整个法国，使国王位于封建大金字塔的顶端。这样，自13世纪以后，国王鼓励把自主地变成采邑，以使这些地产服从国王的最高权威。见 Perroy, *Le Moyen Age*, pp.370~371.

[176] 我们必须提前指出这一点：“在英国，绝对主义的衰落对乡绅极为有利，因为这样，令人兴奋的‘圈地’运动就可以发展，技术手段就可以变更。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变更及其影响，无数佃农同时也倾家荡产。法国的情况既类似又不同，在那里，绝对君主的胜利限制了‘封建反动’的程度。” 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39.

[177] 有关成长中的伦敦食品市场如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逐步促进畜产品生产的描述参见 F.J.Fis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10,” in E. M.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New York: St.Martin's, 1965) pp.135~151.

[178] Marx, *Capital*, I, ch.XXXIX, p.744.

[179] “（在英国），新的工业主义的传播使公簿持有农的主张变得更加有力。他们认为，把小块农田改造成大牧场是解决这个国家的食品问题的唯一办法。” Klein, *The Masta*, p.344.

[180] 布洛赫指出，在16世纪的法国的确兴起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即“乡绅农民”（gentleman farmer）。他们是土地所有者，并亲自经营地产。“只要方法得当，主人亲自经营是最有利的。但前提是主人必须住在本地……可离开（巴黎）毕竟是一条失望的出路，而且，很多大土地所有者、贵族或资产阶级，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住在他们的领地上，且不说富人通常拥有大片土地，它们分布很广，因此他们根本无法亲自进行管理。”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49.

[181] Hellei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24.

[182] Braudel and Spoon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p.242.

[183]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67.“这里的农民饥病交加，穷困潦倒。他们属于某个主人并为主人而生产。这些纯朴的山民背井离乡初下山来往又受到地主及其管家的敲诈勒索。不管这些山民的法律地位如何，从很多方面来讲，他们都更像是在某块殖民正地上生活……平原属于领主。”

[184]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 1947), 51.

[185] *Ibid.*, 51~52.

[186] Dobb, *Studies*, p.55.多布补充说：“确实，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即只要（相对于雇佣劳动力的价格而言）生产水平并不高，那么雇佣劳动的效益就会低于强制性劳动，但使用雇佣劳动却仍然证明有利可图（p.56）。”他在注释中又说：“雇佣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并非必然高于农奴（农奴创造的剩余价值等于他为领主从事的生产活动），因为，尽管我们现在通常认为雇佣劳动正在取代领地农奴劳动，但事实上，它不是取代农奴劳动，而是作为一个剩余价值来源成为农奴劳动的补充。如果我们假定，领主是按照农奴在剩余劳动时间在其直领地上所创造的财富量来折算劳役的，那么只有当新的雇佣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高于其工资时，领主才会从这一折算中获得收益，因为那样，领主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就等于超过了折算前他从农奴处所获得的剩余价值。”

此外，正如布洛赫提醒我们注意的，“（对地主来说）徭役劳动并不是绝对可以随时征派的。通常是在特别的‘福利工程’中向这些劳动力提供食品。所以，只要食品价格高于劳动价值，这种劳动形式就不值得采用。以为工资水平可以低于工资劳动者食品开支的想法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我们必须记住，工作质量是极差的。……（而且），当应服劳役的农民无需履行这项义务时，那就意味着他赎买了这些义务，也就是说，他们付了钱。这样，我们必须依据当时的社会压力和食品开支状况在一栏里填上赎买价格，然后在另一栏里填上取代徭役的工资劳动日价

格，是否取消徭役制取决于一栏的总数是否高于另一栏。” *Seigneurie française*, pp.116~117.

[187] Jones and Woolf,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4.

[188] Marx, *German Ideology*, 51.

[189]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300.

[190] Braudel and Spoon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che*, IV, pp.241~242.

[191]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306.“这些不可或缺的移民并非穷困潦倒的平庸之辈。他们经常带来新技术，而新技术也像他们本人一样是城市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犹太人被迫出走是由于宗教原因，而不是因为穷困，他们在传播技术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 见Phelps-Brown and Hopkins, *Economica*, XXVI, p.294.当时城市各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可能与当今欧洲各阶层的差异并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对1559年马拉加（Malaga）3, 096户家庭（约合12, 000人）所做的研究中看出来。根据这项研究，社会分为下列几个阶层：

小康之家（未必富裕）（razon） 10%

小户人家（Peqnenŭ） 70%

贫民（Pobres） 20%

如果对20世纪的马拉加甚或巴黎做一番调查，其结果会与上表有明显的出入吗？上表引自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413.

[193] “在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即从卢萨提亚（Lusatia）穿过勃兰登堡（Branden-burg）直抵梅克伦堡（Mecklenburg）一带，亦即在尽管德国人（或德国化的王公）曾长期进行统治，但在农村里，斯拉夫人仍有很大势力的地区，人们可以发现，在此时，即14世纪以后，尤其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上半叶，在许多城市出现一种典型的禁止斯拉夫人加入手工业行会的现象。因此，除了种族歧视之外，我们还看到某种敌视斯拉夫人的‘社会性’因素。这一切是由于斯拉夫人争先恐后涌入城市所引起的。”Kazimierz Tyminiecki, “Le servage en Pologne et dans les pays limitrophes au moyen âge, ”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Rome* (Warszawa: 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Institut d’Histoire, 1955), 25.

[194]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从城市资产阶级的角度把经商的贵族视为“外来商”。雷德利克（Fritz Redich）分析道：“似乎曾经存在许多限制（商业贵族）的法规或法典，它们出现的时间相当晚，比如说1600年。……事实上，限制的范围似乎是除长子以外的其余子嗣的职业，而不是后代的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颁布限制贵族经营活动的法规是为了保护受到贵族竞争威胁的城市商人，因此并不意味着商人的活动有什么不正当。……总的来说，禁区限于批发业和手工业，对在农业、大工业……和海外贸易中存在的我们称之为实业的东西，限制并不多。”“European Arist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 2, Dec.1953, 83,

[195] Dobb, *Studies*, p.95.这样，一旦技术进步扩大了莱恩（Frederic Lane）所说的“天然垄断范围”，那么从“城市殖民主义”向“国家殖民主义”过渡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步骤。莱恩说：“在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地区，统治区域超过一个省就有诸多不便。相反，到了17世纪，如果一个政府的军事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征服一个民族国家的地步，该政府就难以维持对哪怕一个省的垄断权，因为它不能保证该省不受外来的侵略。这说明天然垄断力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竞争的时代，由于新的天然垄断范围与新技术相适应，所以国防费用也更加昂贵。在当今原子武器时代，天然垄断范围可能等于整个世界。”“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415~416, fn.4.

[196] Henri Sée,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Adelphi Co., 1928), 41.多布也持这样看法。他说“不仅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市场的成倍增长，而且由于随着雇佣劳动和货币地租的流行，货币经济逐渐渗透到农村，（英国的）国内市场才正在逐步扩大。但无论如何，还是对外贸易才为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而且正是在这个领域，财富的增长令人瞩目。”*Studies*, p.129.

列宁在论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也强调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V.I.Len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44.

正是由于考虑到世界贸易的这种主导地位，莫罗（François Mauro）才可以说：“在1500至1800年间，也就是说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西方文明的特色正是商业资本主义。”“Towards an ‘Intercontinental Model’: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Between 1500~18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 1961. 1~2.

[197]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p.311.

[198] “准确地说，正是由于市场发育不良——即生产者影响其产品交换的能力只限于本地——商业资本家才获得了黄金般的机会……只要这种原始状态持续下去，借机发财的机会就不会消失，因此十分自然地，商业资本家所制定的政策就不是改变这种状态，而是使之永恒。”Dobb, *Studies*, p.89.

[199] “（圣多姆São Tome）的甘蔗种植园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有密切联系，参与其间的最初是安特卫普（Antwerp）大公司，后来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大公司。在16世纪，由于圣多姆输出的糖浆与日俱增，在那些经济生活中心地区涌现出无数糖业加工厂。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在这个岛屿的食糖出口方面，葡萄牙人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加工过程并不是由经济脆弱的葡萄牙来经营的。经营食糖加工业是那些拥有雄厚资本和自由技术工人的经济繁荣的国家，即那些已经踏上发展之路的国家。”Marian Malowist, “Les débuts du système des plantations dans la période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Africana Bulletin*, No, 10, 1969, 29.

[200] “这是一种先付款后发货的购买制度。据说，凭借这种手段，在250年的时间里，汉萨同盟卑尔根（Bergen）商人把挪威北部的食鱼和毛皮贸易几乎全部揽在自己的手中。汉萨同盟的这些商人通过预付款使挪威北部的渔民直接依附于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得以把挪威市民长期拒于这种贸易之外。” Marian Malowist, “A Certain Trade Technique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the Fif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Warsaw: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1960), 103.

[201] *Ibid.*, p.104.

[202] *Ibid.*, p.114.

[203] 见Dobb, *Studies*, p.71.

[204]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行会手工业……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Frederick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3), 28.

[205] “恰恰在14和15世纪，在英国、低地国家、德国北部和意大利，我们发现农村纺织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参与其中的农民或者是为了城里的企业家生产，或者是为自己生产。我认为这一事实似乎说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温饱……事实上，就在佛兰德、布拉邦（Brabant）和托斯坎尼（Tuscany）等地的奢侈品生产，这时走向衰落的同时，在佛兰德本地、埃诺（Hainault）、荷兰、英国、德国南部和意大利部分地区，新型的纺织品生产已在小城镇和农村悄然兴起。这些纺织品质量不高，但价格较低廉，因此受到没落贵族和其他手头拮据的消费者的欢迎……在14、15世纪，不管在工业方面还是在长途贩运方面，日用品的作用都日趋比奢侈品重要。” M.Malowis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from the 15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2, 1959, 178.

马克思说：“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属于这种原始的历史形式的，从一方面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手工工场（还不是工厂）。手工工场产生在为出口、为国外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地方，因而是产生在大宗海陆贸易的基地、贸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佛兰德和荷兰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罗那等等。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除那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在这些地方，工场手工业找到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这也就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手工工场、造船业本身等等——除这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初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在乡村中，建立在没有行会等等的农村中。农村副业构成工场手工业的广阔基地，而城市工商业为了能够按照工厂方式生产则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构成工场手工业广阔基地的，还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如玻璃厂、铁工厂、锯

木厂等等，它们一开始就都要求劳动力的大量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产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集中，造纸厂等等也是一样。”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p. 116.

[206]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6世纪的人口增长、土地紧缺与约克郡谷地手工编织业的兴起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Thirsk, *Essay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88.

[207] “当这些工业资本家为了兜售廉价纺织品，而试图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生产这种纺织品时，他们发现他们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就把越来越多的活计交给农村工人。如果他们城市的行会或政府对这种做法也加以禁止，他们就把他们的工业转到其他国家。当时欧洲大陆的‘国家’并不是很大。” Robert L.Reynolds, *Europe Emerges* (Madison: Univ.of Wisconsin Press, 1967), 399.

[208]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399.

[209] “我认为，在我们所说的经济史的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资本家阶级。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特定时期的资本家群体都不是前一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每当经济组织发生变化时，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连续性。昔日的资本家似乎承认他们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因为这种形势有新的需求并呼唤新的手段。于是，他们退出竞争，变成贵族。如果他们后来仍发挥一定作用的话，那也是极为被动的。” Henri Pirenn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X, 3.Apr.1914, 494~495.

[210] Pierre Vilar, in *Actes du Colloque de la Renaissance*, p.50.

[211] 甚至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古尔德 (J.D.Gould) 也承认，在这个时期，“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严重下降”。见“The Price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 2, 1964, 265.多布也认为，“在14、15世纪，商业资本家的巨额利润是垄断的结果。他们致富的原因是限制广大生产者经商，而不是普遍降低生活标准。换句话说，新兴商业阶级暴富的原因不是生产者收入的绝对减少，而是相对减少。但是在16世纪下半叶（也可能是在17世纪，或17世纪上半叶），这种状况显然不复存在。” *Studies*, pp.119~120.

[212] 古尔德 (Gould) 特别强调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他说：“当今的人们普遍承认，在20世纪中期，物价上涨对工业利润的主要影响并不反映于工资上涨幅度落后于价格——事实上，基本不存在这种现象——而是反映于资本消耗程度落后于价格上涨。……在毛利润中，未分配部分贬值越来越严重，当最后不得不更换机器时，这种损失终归要补偿。但是如果机器或设施的寿命很长——都铎 (Tudor) 和斯图亚特 (Stuart) 时期的大部分固定资本都是如此，例如水车、晒盐田、熔炉等等——那么那个时代的毛利润率就会普遍增长。” *Ibid.*, p.264.

[213] 见Mauro,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298.

[214] Nef, *Conquest of Material World*, p.116.

[215] Ernesto Laclau (h), “Feudalism &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 *New Left Review*, No.67, May~June 1971, 25.

[216] *Ibid.*, p.30.

[217] *Ibid.*

[218]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认为, 工业主义的最初发展必须采取资本主义方式, 因为只有“那种制度才可以约束政治权力, 只有这种独立于政治结构的制度才能最有力地刺激经济发展。”*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101~102.按照帕森斯的看法, 其原因在于: “这种政治力量.....或被用于维护相对短命的‘地方势力’, 或轻易地落入传统的窠臼。这或许就是韦伯说政治力量‘在经济上往往产生非理性影响’的原因 (p.107)。”

这种分析似乎有理, 但与事实却有出入, 因为事实上, 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发展史上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帕森斯忽略了结构区别的一个根本因素, 即地理因素: 经济活动发生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内, 而政治领袖的权威——如果不是其权力的话——只限于比经济实业范围要小的某个地域。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使资本家获得了回旋的余地。

[219] K.Berrill,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3, 1960, 352.

[220] A.Rupert Hall,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Progress of Techniques, ”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Rich and C.H.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100.

[221] “所以, 大西洋彼岸新边区的开发带来了新的机会, 人们对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加充满信心。机会是存在的, 但同样存在着敢于并善于抓住机会的人.....美洲可能使欧洲的前进步伐加快了, 甚至可能如若没有美洲, 欧洲就不会有任何前进。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极端的看法, 我们似乎也应该记住布罗代尔教授的谆谆教诲: 美洲不是唯一的主导因素。”J.H.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70), 78.

[222] Braudel, in *Chapters*, p.268.

[223] Braudel and Spooner,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p.243.

[224] “这种第一推动力埋葬了封建生产方式和财产占有方式, 并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 这种推动力产生于小商品生产发展的过程当中 (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独立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并且是工业资本家与被剥夺了土地因此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在经济上两极分化的产物。我们相信, 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形式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特别是西欧

经济史的特征。”“On the‘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 140, 1955, 149~150.

[225] “多布先生……把‘劳动力资源的变化’视为打开经济史迷宫的钥匙；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但我们的作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其他因素，即价格的长期运动方式；……他没有考虑到两因素相结合的可能性。” Jean Neré,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 *Revue historique*, CCIII, janv.-mars 1950, 68.

[226] “每一次经济波动，即使在它具有决定性、破坏性或建设性的时候，都只是一个长期‘结构史’——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次偶然事件，‘结构史’本身当然比各次事件重要。” Braudel and Spoon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450.

[227] “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Marx, *Capital*, I, ch.XXVI, p.715.

[228] Braudel, in *Chapters*, p.285.

第三章 绝对君主制与国家主义

很明显，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同时，也兴起了西欧绝对君主制，但它是其原因还是其结果呢？这在两方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在一方面，如果不是由于商业的扩张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崛起，就很难有什么经济基础来支持开支如此庞大的官僚国家机构。^[1]但在另一方面，国家机构本身就是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经济支柱（不必说还是其政治庇护人）。如布罗代尔（Braudel）所言：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国家是那个世纪最大的企业经纪人。^[2]并且，他们是当时商人的主要主顾。^[3]

关于国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作用有几种不同的论点。第一是有关其程度，第二是它的经济影响，第三是有关它的阶级内容。第三个论点我们将在以后探讨。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虽然对于国家渗透进19世纪经济体系中的程度众说纷纭，但看来还是存在一个被较为广泛接受的想法，即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至少始于16世纪并延续到18世纪，国家始终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经济因素。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国家确实扮演了这一个角色的话，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必要且不受欢迎的角色。例如熊彼得（Schumpeter）坚信私人企业具有长期的高效率，而认为国家无论作为商品的购买者还是借贷的一方，对商业的发展都没有什么益处。他说，“如果认为没有宫廷的奢侈，就不会有从农民和市民阶级那里索取的相应产品和财富，这种想法是不可原谅的（错误）。”^[4]也许它是不可原谅的，但并不一定是错的。为什么不能认为，一个农民生产剩余产品只是为了交税，否则

他可能只会消费掉或者根本不生产它呢？熊彼得（Schumpeter）难道真的认为，16世纪的欧洲农民已经完全被导向商品市场了吗？

至于王室的开支对于信贷制度的创立至关重要这一论题，熊彼得（Schumpeter）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任何从信贷运行机制的发展中得到的好处必须要“与通过提高税收和其所需要的财政经费的方法所造成的全部破坏和经济活动的停滞加以平衡之后再估量。”^[5]这里含有大量违反事实的观点，而其可靠性却只能用这本书的作者自己的全部论证来估评。这里将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欧洲世界的中心地区内，强国的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他的第二个观点即认为给王室的贷款换得的是经济上的特权。但从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利益来看，它在经济上可能是最不健全的。^[6]无疑这个讲法是对的，但对我来讲，这似乎仅仅是资本主义本质事物中的一类，而不是它运行中偶然的扭曲。因而，它在事实上就为熊彼得（Schumpeter）的前一个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

我们前面已经考察了14和15世纪经济危机的各个方面，而正是这一危机导致国家官僚制度缓慢但却持续的发展。我们也谈到军事技术的进步，它使得中世纪骑士过时，因而也加强了控制大量步兵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君主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恢复秩序，这也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用热尼科（Génicot）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揭示权威崩溃的恶劣影响，使动荡时代为中央集权化提供了反面例证。^[7]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政治统治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用新生国家的离心现象来解释，这种观点也通常被用来解释20世纪新国家的形成。^[8]15世纪“秩序的恢复”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封建制度的危机”。对领主的经济压榨造成对农民剥削的加强，结果导致农民起义。它也导致贵族之间自相残杀战争。被削弱的贵族寻求国王的庇护，以免遭受更大动乱的威胁。国王坐收渔人之利，趁机扩大他们自己

相对于贵族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这就是他们为贵族提供庇护的价码。莱恩（Fredric C.Lane）称之为“庇护税”，而且他提醒我们这种“庇护税”比起工业技术或工业组织的优势，在当时来讲是商业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获得利润的来源。^[9]

当然，国王地位的上升不仅仅是一种机遇，而是连他自己也处于的那种压力之下的结果。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认为当政治统治者不能依靠通过他们自己的资产（如国王领地）或通过其他阶层所承担的不容置疑的义务使自己得以应付各种事务时，“官僚政治”就应运而生。^[10]但是，这些阶层所承担的义务真的从来就是不可置疑的吗？至于资财的可利用性，国王个人资产的不足，以致无法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个事实，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目标过于雄心勃勃而已。随后，我们必须探究一下导致统治者寻求实现更为野心勃勃的目标的压力。

刘易斯（Archibald Lewis）提出一种看法，他试图将此与土地的可利用性联系在一起：“当……君主将所有的自由土地分封完毕时，他就必须开始征税——以另一种形式收回他早年向臣民夸示的财富。”^[11]这种对国家税收的需要并没有直接导致“绝对君主制”，相反，君主不得不创建议会以得到贵族对其税收政策的支持，这种状况将会持续到“直到统治者感到已足够强大而无需这种支持的时候为止。”^[12]多布（Dobb）侧重点则不一样，他认为对国王的压力不是由于土地的缺乏，而是源自“劳动力的匮乏”。“国家机器的加强用于推进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13]

从这一分析中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如果说经济危机导致君主获得更大的权势的话，那么，16世纪的经济扩张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第一个16世纪是一个帝国争斗而不是强国争霸的时代，我们将在下一章论及此事。直到我们在稍后将要谈到的帝国的失败之时，强国才又再次崛起。而且确实只是到

了18世纪，历史学家们才会相信一个“绝对君主制时代”的存在。^[14]

然而事实上尽管变化不定，我们看到的是个现代国家权力的长期持续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似乎已要求并且为中央集权和对内部的控制的加强这一长期进程提供了便利，至少在中心国家是如此。

那么，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即国王们是如何使他们自己变得强大的呢？他们主要使用了四种机制：官僚制度化，垄断军队，建立合法性的统治体制和将其臣民同质化。我们下面将依次予以论述。

如果国王变得强大起来的话，那无疑是由于他们采用了新的机制，一群永久性的依赖于国王的官僚。^[15]当然在这方面，欧洲才刚刚赶上中国。因此，一个官僚国家机构本身不足以成为16世纪巨大变化的分界线，更无法解释这些变化。然而，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关键所在，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并确保今后的经济决策不通过国家机构就不再能轻易做出。这就意味着所有各阶层的精力不得不大部分转向对政治领域的征服。可以肯定，与当代欧洲相比，我们始终谈及的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官僚机构的时代。^[16]但是，如果与中世纪晚期相比，其规模和结构的差异则反映了一个质的变化。

那么，国王是如何得到这些人的呢？国王出钱收买了他们。国王的问题不是他没有代理人，王国里有许多行使行政和军事职能的官员。但从前，他们大都不依赖国王，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只执行国王的指令，而面临违背他们自己，他们的贵族领主及其家庭的利益的强大压力。国王将通常“具有现代起源”^[17]的人们变成付酬金的全日工作职员。而使这成为可能的主要制度就是逐渐为人所知的“官职买卖制”（venalty of office）。但是与建立在直接经济利益和普遍兵役制原则上的官僚制相反，这些形式无疑强调国王的有限权力和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国家收入转变成为这个购买的官僚制增加的俸禄。但是与它之前的封建制相反，买卖官职又使得国家制度的相对最高权威性成为可能。如哈通

（Hartung）和穆斯纳（Mousnier）所言：“无论里面看来如何，官职的买卖通常是最有利于绝对君主制的。”^[18]

国王做出了现实的政治抉择。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官僚制度，国家需要事先有资金的可靠来源，而不是靠官僚制度所带来的财富。斯沃特（Swart）认为，不同于后来的政府，16世纪的君主制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即“不用分让出他们收入的特定一部分作为获取利润的保证金就能发行借债”。^[19]他们陷入这样一个循环圈内：正是为了使这种可能性实现，他们必须首先创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官职买卖有个好处就是能立刻既得到收入（通过官职买卖）又得到政府官员。当然，这随后就与通过买卖获得官职的自私的官员共同群体的发展携手共进了。^[20]可以肯定，正如埃伦伯格（Richard Ehrenberg）所指出的那样，官职买卖造成一个“怪圈”，规模日益庞大的官僚制度吞噬国家税收并大举债务，这又导致国家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21]这一发展轨迹又将这一循环圈变成一个上升的螺旋形，在其中官僚制度十分有效地从广大人民那里榨取剩余价值，而这部分远远大于维持官僚制度的开支。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一些国家却失败了，而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他们各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这个上升的螺旋形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在中世纪晚期，国王获得了一时的优势，因为对贵族的经济剥夺使国王有了收入，这使他开始有钱购买下一个官僚制度，这反过来又使更多的征税和借贷成为可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这些地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以确保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的不均衡分配。国家发现征税和借贷变得更为容易，而这纯粹是对拥有货币的力量的未来取向有信心的一种反应。国家用这些增加的收入来加强他们的强制力量，而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人们也许应称之为“对国家潜在强制力量”的信心。

这使得国家债务的出现成为可能，这就是国家赤字预算。国家债务

在古代世界是没有的，在中世纪又由于中央政府的软弱和继承权的不确定，是不可能有的。只是到了16世纪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统治时期，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种经济现象。^[22]因为只有当国家能够强迫人们推延收还贷款或在适当时机拒绝偿还债务，而同时又强迫各阶层以硬通货或各种纸币形式的流通货币借钱给它时，国家债务才能存在。这样做的一部分动力就是要保证增加王室的收入。王室需要这笔钱来建立国家机器，并有足够的国家机构来保证获得这笔钱。这种运行制度还不是重商主义，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国家长远的税收基础，用沃尔夫（Martin Wolf）的话说，这不过是“财政主义”（fiscalism），^[23]即目的在于增加国家现时收入的政策。

现在应论及的是，与后来的国家相比，毕竟国家正规的财政机构的缺乏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所指出的那样，这是16世纪国家贫弱的“另一个标志”。^[24]国家作为财政的操纵者的弱点并没有贬损这一事实：即国家债务反映了国家作为经济实体不断增长的自身利益。而作为经济实体，国家已具备了追求其经济目标的特有能力。

一旦扣除用于征集税收的行政机构的开支，剩余资金投放的最重要部分恐怕就是创建一支常备军队。最初为了得到这些士兵，国家再次使用了购买方式。与可购买的官员相对应的就是“雇佣”（mercenary）兵。

然而，都是些什么人可以购买的呢？既然雇佣军是一种危险而且不定期付酬金的职业，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购买的。“它不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的职业，只有那些反应敏捷的人”才可以胜任。因而，它也就成为这样一种职业，其人员的征募带有很大的地区性和社会性，是新欧洲劳动力分工的重要部分。

西欧人口的增长造成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流浪者”（vagabondage）现象。“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在各地都有增长，他们对新国家还未完全确立的秩序是一个威胁。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收编到军队

中产生许多的后果。它可以给一些人以工作，并利用他们去镇压其他人。^[25]基尔南（Kiernan）指出，有多少雇佣军是来自西欧“不发达”地区：加斯科尼（Gascony）、皮卡迪（Picardy）、布列塔尼（Brittany）、威尔士（Wales）、科西嘉（Corsica）、撒丁尼亚（Sardinia）、达尔马提亚（Dalmatia）。“总之，在欧洲边缘地带的山区里的大量征募地区，居住着像凯尔特人（Celts）、巴斯克人（Basques）这些外族人。”^[26]而看来更重要的是主要来自瑞士的人。^[27]

基尔南（Kiernan）认为这种征募方式不仅直接有效地控制了16世纪的社会动荡；^[28]它还有第二个虽然微妙但同样重要的影响，如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出现：

正如尼泊尔（Nepal）和旁遮普（Panjab），这两个英国军队长期进行征募的地区与它们的邻居相比，雇佣兵的征募保持了政治上的停滞。而对瑞士来讲，附属于绝对君主制法国的三个世纪留下了后患。从雇佣兵出口许可证买卖中所获费用以及牺牲广大平民利益所换来的显贵集团权势的加强，都使得各州政治腐化……正如阿尔菲里（Alfieri）讥讽地评论的那样，这些山区的自由人堕落成僭主暴政的看家狗。如果农民战争早开始50年，如果瑞士在1524年依旧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力量的话，那么，欧洲历史可能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转折。^[29]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甚至不直接征募雇佣军。当时的机制不允许这样做。国家更多地是与谋利的“军事企业家”订立合同。雷德利克（Redlich）怀疑这是资本积累的最佳手段，因为如果他们的收入“特别高……而通常他们的开支是特别庞大的”。^[30]然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国家的建立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至少在短期内，“在一个长期缺乏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里，增加军事开支通常刺激其他部门的生产，这样在战争时代，剩余价值量就增加了”。^[31]但是，不只是商业和产业参与到军事企业中，这个体制是靠信贷建立的。因为不仅君主们要从银行家们手里借钱，军事企业家也这样做，他们的资本是由大商业银行家如福格家族（Fuggers）提供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

争”。^[32]

进一步说，雇佣军不仅为穷人提供就业和给予企业进行贸易的机会。军队必须要吃饭，通常与雇佣军相伴而生的粮食商人也成为战利品中间商。^[33]埃弗里特（Alan Everitt）认为军队供给是推动都铎（Tudor）王朝时期的英国农业生产地区专业化的一个主要动力。^[34]它甚至还刺激了出口贸易的发展。^[35]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家也意识到有责任确保他们日趋扩大的官僚体制有足够的粮食的话，这将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36]因此，资本主义的扩张也满足了国家的短期需要。

而随着文职官僚制度的建立，君主却又陷入困境。这些军事企业家是君主在追求强权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附属物，它也消耗了大量剩余价值。无疑，这些军事企业家比起贵族封臣是君主更为可靠的代理人，但最终他们还是主要是为自身的利益。令君主悲哀的是他因而失去了流动资金。^[37]然而，这种可能性再一次表明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中的直接作用。

说到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军队自己养活自己。因为他们使征收更多的税成为可能。由于税收的重负几乎完全落在人民身上，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身上，^[38]人民因此而恼怒，直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时，他们就揭竿而起，^[39]到时军队会赶去镇压，直到他们无能为力之时。最易于采用的起义形式，是由于很难阻止的匪帮，这当然在山区尤为容易。^[40]国家的警备力量除了在统治的中心地区外，在其他地区还太软弱，而这种匪帮活动经常在与新国家对抗的一些传统领主那里得到响应。^[41]

无疑，如德卢莫（Delumeau）指出的那样，匪帮活动通常是乡村反对城市的暴动。^[42]那么，当时农村都是些什么人以及在什么时候最重要呢？很显然，农民介入匪帮活动似乎与粮食匮乏时期有很大关系。^[43]当然，当发生粮食骚乱时，赤贫者肯定卷入其中。但是作为一

场运动，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赤贫者并没有构成匪盗活动的中心。更显然的是，在16世纪晚期，新兴的自耕农通过匪盗活动来表示对“再次封建化”和他们的国家被变成半边缘地区的抗议。^[44]在这些国家里，特别是像南意大利的地产管理人（Massari）这样的小企业家，比起较大的土地所有者更难抵御歉收年景，他们害怕这种突发的灾难使他们落入农村穷人的行列。因此，他们就采用匪盗这种方式来对付那些被他们视为直接敌人的大地产主。^[45]

参加匪盗活动的另一部分是贵族，那么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似乎正是那些被经济剧变榨干的人。我们在谈到雇佣兵问题时曾指出，人口的增长与促发圈地运动的各种力量一起造成了流浪者问题，雇佣兵制的兴起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雇佣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来控制另一部分人。雇佣军队加强了君主的力量。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仅通过建立足够强大的军队推行国王命令，而且还通过为较小的贵族创造任职机会的手段最终削弱了传统的贵族。^[46]当然，在许多地区，破落的骑士仍然还有另一种选择，他们可以参加国王的军队。进一步讲，在国王力量强大的地区，匪盗活动就难以存在。但是，在君主力量衰微的地区，当匪盗就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也就使选择其他职业变得更没有益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匪盗活动无疑是对强大国家的呼唤，而非只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反抗。它是一种反抗形式，在某种情况下，是王国境内存在的最大一支反抗力量。^[47]但它仍是现代国家结构中一种正常的反抗形式。

因此，将匪盗活动视为反对国家权威的传统的封建反抗形式将是大大错特错的。^[48]它是国家权威没有充分发展时，面对由经济和社会动荡所引起的混乱束手无策的结果。它也是国家在通货膨胀的时代，人口增长、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不愿意保证在分配上做到某种更多程度的平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匪盗活动是由国家自己造成的，它剥夺了部分贵族的传统特权（因而也就剥夺了其财富来源），还有生产产品以供

养新生官僚的农民。它还在这个国家里造成了财富的大量集中，这也就使得对财富的争夺变得更具诱惑力。因此，匪盗之患是混乱的象征，它是由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创立所导致的大规模经济再分配所引发的。

政治体制通常更为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达到局部的法制化。由于只考虑政府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就造成了对其合法性确立过程的分析有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人类历史上，假如许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得到大多数被剥削、被压迫和受到虐待的人民的认可，那才是令人怀疑的了。广大民众或许听天由命，或愤怒不安，或为他们暂时的好运而惊喜，或者蠢蠢欲动，随时准备铤而走险。然而，一个政府不管是否受到赞赏、敬慕、热爱或甚至支持，都趋向于长治久安。而这肯定是发生在16世纪欧洲的情况。

统治的合法性与老百姓无关，与官僚却有很大关系。政治稳定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周期性出现，即国家机构中的少数管理者能够使大多数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权要们确信其统治已形成，并且其职能建立在无论怎样的双方认可的价值之上，并使官员们相信它的存在，而且官员们的利益就在其中，其统治才能得以长治久安。当一个政府达到这种状况时，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合法政府”。

此外，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不断妥协的结果。在16世纪，作为使君主制这一新权威合法化的一种手段，产生了王权神授的思想。这种制度我们称之为“绝对君主制”。既然绝对君权是一种思想，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其所宣称的权力的空泛性。因此，弄清什么是他们的主张，并且其又是如何与现实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是很有用处的。

首先，“绝对”这个词究竟意味着绝对到什么程度？神在人世间没有代理人的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使着拒绝推行君主所宣示的意志的合法主张的作用，不全然是一种新意识。然而，它在这个时代比在这之前

或之后的时代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在知识界被接受。“绝对”一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用词不当。在理论上，绝对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正如哈通（Hartung）和穆斯纳（Mousnier）所指出的那样，它受到神法和自然法的限制。“他们认为‘绝对’一词不应解释为‘毫无限制’，而应该解释为‘不受监督控制的’（pas contrôlée）。君主制相对于过去分散的封建权力是绝对的。”“它并不意味着专制政治和暴政。”^[49]同样，马拉瓦尔（Maravall）说：“无论是在现代国家发展的最初和后来的阶段上，‘绝对君主制’都不意味着毫无限制的君主制。它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绝对。”^[50]其关键实用的要求就是君主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强制限制：“无法律限制”（*ab legibus solutus*）。

无论其主张如何，事实上君主们的权力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在许多方面，君主的权力比起一个20世纪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总统少得多，尽管后者受到许多制度上和道德上的限制。比如，20世纪的国家机构本身有一定程度的有机化能力，这大大缓解了日益加大的限制。为了理解一个“绝对”君主的真正权力，我们必须将其放入到那个时代和具体国家的政治现实背景中。只有当国家的大政方针发生争执，君主有了对国内其他力量占取优势的相应可能性时，君主在一定程度上才是绝对的。^[51]然而，即使是16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于实施对其疆界内军事力量有明显的掌握权或对财富资源有完全的控制权，^[52]更谈不上对他们的臣民的忠诚有最高的要求权。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国家的兴起和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的绝对君主制的出现，不应该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相混淆。世界体系中强国的创立是在这些强国和在其边缘地区内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前提。民族主义是对国家内部成员作为一个身份群体和公民的承认，只要它符合集体一致性所包含的要求。绝对君主制则是一种国家生存至上的主张。前者是由一种群众情绪所确定的，而后者则是与国家制度有直接利益的一个小群体的感情确定的。

无疑，一个跨时代的强盛国家的倡议者，会将培育民族感情作为实现他们目标的强大武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16世纪已经可以有所作为。^[53]但是，这种集体感情就它所存在的程度，对于国王个人而不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人民而言，常常首先是灵活运用的。^[54]绝对君主是一个“英雄式”人物，^[55]随着时间的推移，君主被神化的过程愈演愈烈。这是这样一个时代，精致的宫廷礼仪得到发展，君主才更好地得以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并且附带也能为宫廷贵族提供职位，从而也使他们受到严密的监督和限制。）

仅仅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重商主义的结构之中，民族主义才第一次真正得到资产阶级的提倡。^[56]但在16世纪，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家中还没有得到确定。相当多的人对开放型经济比对封闭型的经济更感兴趣。而对国家的决策人物而言，早熟的民族主义冒有将大小种族地域统一体强固化的危险。从早期来看，国家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反民族主义的，因为民族主义感情的范畴通常比君主国家的范围狭窄得多。^[57]只是到了晚得多的时期，（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才寻求创立“一体化”国家，^[58]在这样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将会同化边远地区。

16世纪时，一些国家在中央集权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至少，这一中央集权统治的合法性得到部分的承认。要列出这一过程发生的可能条件并不是件难事。任何时候，控制国家财源的大小官僚和各个群体都明白，借由说服和对君主施加影响的办法可以更好地从政治上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而不必通过其他行动的渠道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我们所能谈的只是一个相对具有效率的君主制度，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

“绝对”一词的使用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调子，而这正中国王的下怀。绝对主义一词是修辞上的强加手法，不是一个严肃的定义。我们如果不

强调权力集中到国王个人身上，单单只论及力量日益加强的国家，或更为“国家化”（stateness），这样或许更为明智。^[59]也许我们称这一思想为“国家主义”更为合适。国家主义要求赋予国家机器更多的权力。这一主张在16世纪意味着将权力集中到绝对君主手里。它是一种对权力的要求，这要求本身也成为获得权力欲望的一部分。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现在，任何人也没有也不该将它视为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描述。在一些国家，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即那些将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而它在其他地区却遭到失败，其原因我们将在后面阐明。

它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中央集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一样，这就是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将其所统辖的人民转变为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这里再次主要说的是个义上的官僚而不是广大民众。其中包括国王、国王手下的官僚和廷臣、农村的大小土地所有主和商人。16世纪，当中心地区的国家的这些阶层中正在转向更大的民族“同质性”时，边缘地区的国家却恰恰走向反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家机能对属于“少数族”群体的商人的态度。首先是犹太人，他们在整个中世纪的商贸活动中起了重大作用。有一点要注意，从社会和经济意义上讲，“在中世纪晚期犹太人的地位持续恶化。”^[60]另一方面，当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创立较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时，他们就开始驱逐犹太人：英国在1290年，法国在14世纪末，西班牙在1492年。但这一现象也发生在德国，如果谈不上是驱逐，犹太人作为商人群体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也被削弱了。是犹太人在公元800年到1200年，沿跨越北部大陆的商路从事大部分的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国际贸易，并且成为欧洲贸易的主力。^[61]这期间，在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内，他们的法律地位还较为有利。^[62]在13世纪和14世纪，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和经济上的作用普遍衰落。^[63]然而，到16世纪为止，我们只能谈及这一现象在地理上的不平衡：犹太人实际在西欧是很少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东欧和部分南欧地区却人数大增：也就是说

他们在中心地区人数不多，而在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不断增加。^[64]

尽管犹太人在东欧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在职业地位上也只许作为居工人阶级之上的商人，并且只是对他们而言，要取从企业家步入靠固定地租为生的阶层的传统途径是不可能的。^[65]同样，在北部意大利，由于城市国家经济力量衰落的结果，由于这些城市小国寡民的性质，其税收基础薄弱而无力保护那些生活在国境外的公民，^[66]这样犹太人的地位又开始有了一定改观，他们再一次主要扮演了商人的角色。^[67]对于统治者来讲，犹太人问题是“财政主义”面对新兴的“重商主义”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一方面，这些犹太商人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非犹太商人将他们视为竞争对手，土地所有者将他们视为放高利贷者。这两个阶层的人通常联合起来，迫使统治者减灭犹太人。经常像国王所处地位欲安排的那样，前一个考虑首先占了优势。^[68]当中心国家内的本地资产阶级逐渐变得强大时，他们就再也无法容忍犹太人，这导致了重大的立法进展。

犹太人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的众矢之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思想根源，任何人都可以基于宗教原因而提出反对犹太人在经济上作用的要求。西欧君主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对策就是驱逐犹太人，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阶层。这虽然在宗教上不那么易受攻击，但在本地的商人眼里，却是一个平等的竞争对手。例如，埃尔曼（P.Elman）就描述了当1290年英国君主最终被迫驱逐犹太人时，是如何欢迎意大利的放债者取代犹太人的位置。由于国王经常无力偿还贷款，实际上，意大利人的贷款与向犹太人征的税并无太大区别。^[69]到16世纪时，意大利人如果不说是在西班牙，^[70]至少在英国依然被排除在企业家阶层之外，^[71]而犹太人在波兰正在从企业家阶层中驱逐波兰人。^[72]这怎么会成为可能呢？

在西欧，不断增长与分化的农业基础与新兴工业一道加强了商业资

产阶级的力量，致使国王在政治上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就是他们作为纳税人、放债人和商业合伙人，如果不比外籍商人好多少的话，也已有同样的能力构成君主制的财政支柱。因此民族主义的反应就是自然的了。^[73]然而在东欧，这个问题则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君主软弱，商人无力，而农业商品作物生产者的力量却较强大。在16世纪的东欧，如同在农业生产商品化不断加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所有地区一样，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或者说一个商业资产阶级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一个货币经济的话，就一定存在着为复杂的货物交换提供流通渠道的人，以及鼓励货币使用的服务设施。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商人资产阶级究竟大部分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那它就成为国内政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是外族人的话，那他们的利益主要就与那些在发展中出现的集中地点，当时称为“大都会”（motropoles）中的人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犹太人在16世纪的东欧受到“欢迎”，是不是主要因为当地地主（也许还有西欧的商人）更愿意他们而不是本地的商人资产阶级成为必不可少的东欧当地商人呢？^[74]后者如果变得强大起来的话，将会拥有一个政治基础（而犹太人则完全不可能有），并且有可能寻求发展成为工业资产阶级。他们必将选择的这条道路将会减少民族经济的“开放性”，因而它将威胁东欧土地所有者兼商人的共同利益。而我们知道在现代初期，东欧曾经历一个本地资产阶级衰落的时期，^[75]“而在另一方面，在乡村中，犹太人作为地主的代理人和小村子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作用越来越大。”^[76]这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国家政治体系内的阶级联盟具有这样一种机能，无论统治阶层主要是由其利益是与世界市场主要产品的销售相关的那些人所控制，还是由那些其利益与商品交换和工业利润相关的人们所控制。

不单只是犹太人成为这些跨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盟的玩物，天主教国家的商人也通常是“新教徒”。16和17世纪整个欧洲思想争论的中心就是

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争论，它又与强大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纠缠交织在一起。16世纪出现再度农业化的那些欧洲地区同时也是反宗教改革运动成功的地区。而那些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却大多数仍是新教国家，这一状况并不是偶然的。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由于长期的思想妥协的结果，则处于“两者之间”。德国分化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但却孕育出一种一些团体拥护的反教会自由思想的传统。

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韦伯（M.Weber）的观点，认为新教神学比天主教神学与资本主义关系更为密切。无疑，任何人都能为这个观点提供佐证。另一方面，一般来说任何复杂的思想体系都可以被用来为任何特定的社会或政治目的服务。这个讲法看来是对的。确实，天主教神学理论证实它有能力适应其社会环境。以其思想的抽象性而言，没有理由说为什么人们不能写一本题目为“天主教伦理道德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可信的书。而加尔文（Calvin）神学可以看作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内涵。^[77]我正在论述的这一点是另一回事。通过历史发展中一系列偶发的思想，^[78]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强大民族国家结构中赞同商业资本主义扩张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与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取得共识。因此，当这些力量在波兰、西班牙，“意大利”或匈牙利消失的时候，新教主义通常也很快就衰落了。那些赞同扩大农业产品出口的社会力量同样也赞同对天主教教义加以重新确认。

人们必须考察一下宗教改革的发展。如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提到的那样：

教会长期以来一直是权力、庇护、财富的源泉，对于如法国和西班牙那样主要国家的统治者而言是如此。在16世纪早期就与罗马断绝关系的那些政府正是处于天主教文明的边缘，第二流国家的统治者不足以强大到与罗马教皇达成交易，如在英国、瑞典、丹麦、瑞士和苏格兰那样。^[79]

在这点上很清楚，北部欧洲存在一种与较为“先进”的基督教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实力相对峙的因素。^[80]然而如我们所知，到漫长的16世纪晚期，西北欧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区，东欧成为边缘地区，而南欧则迅速向边缘地区滑下去。

戈登-沃克（P.C.Gordon-Walker）试图将新教主义的发展——首先是路德（Luther），然后是加尔文（Calvin）——同价格革命的两个阶段联系在一起：1520~1540或1550年——不严重并只限于德国和尼德兰（中部欧洲银矿产地），1540年起的大约一个世纪（美洲银矿）。他认为这成对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与新兴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发展的结构性需要结合在一起：

由价格革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需要是原始积累，第二接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基本需要，即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阶级适应他们新的社会地位，而这又由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变得必不可少……

这两个阶段对欧洲各个地区至关重要。从1520~1540年起，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是西班牙（它从中世纪没有继承下来强大的中等阶级），^[81]和德国（它存在一个强大的带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从1545~1580年，西班牙和德国都衰落了。英格兰、尼德兰和法国及苏格兰部分地区取而代之。这些地区与那些宗教改革地区之间的对应性是惊人的；就像价格革命的第一阶段和路德时期（两者都发生在1520~1540年之间）以及价格革命的第二阶段和加尔文时期（两者都发生在1545~1580年）之间的对应性一样。^[82]

人们不必接受这所有的历史史实，而将其视为一个相关的假说。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谈到宗教改革的反对派在波兰的胜利时，我们也就有了进一步证据表明宗教与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查尔诺斯基（Stefan Czarnowski）认真分析了为什么波兰的宗教改革看来正取得一定进展时，却突然又转向天主教，而且为什么转变得如此迅速。他注意到领地贵族（noblesse territoriale）夺取被他称之为“阶级专制”的政治权力是与天主教发起猛攻同时发生的。他在分析中将传统贵族阶层、土地贵族和小贵族（petite）区别开来。他认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正是产生

于传统贵族阶层（以及资产阶级）之中。他看到传统贵族贪求得到教会土地，而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却发现，由于当地教区牧师得到仍然强大的天主教主教势力的支持，他们与他们的斗争变得更为艰难。既然在他们那里拥护新教没有什么好处，因而他们也就不这样做了。查尔诺斯基和其他人都指出在波兰，倒是封建领主支持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而国王和资产阶级却倾向于路德主义（Lutheranism）。^[83]这完全是对韦伯的（Weberian）论题的一个扭曲，但却使我们想起莫尔纳（Erik Molnar）的观点，他视之为君主与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层的联盟。查尔诺斯基进而提出“资产阶级”在这种状况下被分化了。城市中的“上层资产阶级”，特别是克拉科夫（Cracow）城（一个古老的贸易中心）的上层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结成联盟。这里，他所谈到的城市贵族是指那些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兴起才出现的银行家和商人阶级的一部分。”^[84]但是，波兰注定无法走英国的道路，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中资产阶级的一个活动中心。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的1557年的经济危机不仅摧毁了里昂（Lyon），安特卫普（Antwerp）和德国南部的金融家们，而且也葬送了克拉科夫的银行家们。

从那时起，传统贵族阶层和加尔文派的锐气被削弱了。……那些曾使先前的重商主义大为风光繁荣一时的商品：奥尔库什（Olkusz）的银，匈牙利的铜和工业产品不断贬值。货币连同农民所付的地租以惊人的速度贬值。同时，国际市场对波兰小麦、钾、燕麦皮、皮毛和有角野兽的需求却愈来愈大。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越来越不使用货币，而使用无偿的强迫农奴劳动将其生产出来，用其产品以易货贸易的方式换取所需，他们也就越成功地遏止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恰恰是中、小土地所有者（贵族）力所能及的。^[85]

查尔诺斯基所讲的并不意味着波兰没有资产阶级。克拉科夫的资产阶级也许被摧毁了，但意大利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和德国人取而代之。1557年时，一个国际性网络衰落了，与之相关的波兰资产阶级——贵族阶层随之衰败。这之后出现了另一个新阶层。与新贵族联系在一起的波兰人接受了波兰在世界经济中的新角色。他们让他们的孩子

接受耶稣会（Jesuits）的教育，以免受旧贵族阶层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说，波兰教会作为贵族的宗教代言人的角色结束了。”^[86]并且已经获胜的贵族现在可以将波兰的“民族”精神视为与天主教的虔诚完全合为一体了。

既然波兰确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区，它也就由此成为可靠的天主教国家。反宗教改革标志着新教徒们所认为的“社会倒退”（而不是“社会倒退”的原因）。但是他们虔诚的震惊激愤用错了地方。因为西北欧的社会进步正是由于东欧和南欧的“社会倒退”，当然还有对美洲的统治才成为可能。反宗教改革不仅针对新教主义，而且指向所有与文艺复兴有关的各种人文主义力量。16世纪威尼斯和罗马的紧张关系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一争执在1605年时达到高潮。当时威尼斯人限制教会某些权力的举动，导致威尼斯元老院（Senate）被罗马逐出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在意大利就是反文艺复兴运动。^[87]它在那里的胜利是北部意大利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半边缘地区的结果之一。

正是由于教会作为一个跨国家机构受到了一个同为跨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出现的威胁，后者在（中心地区）一些强大国家机器的创建中发现了它的政治力量。而恰恰是这一发展威胁到这些国家内的教会地位，教会才不遗余力地投入反对现代化的斗争中。但矛盾的是，正是由于他们在边缘国家中非常成功的努力，才确保了欧洲世界经济的长期胜利。1648年以后，围绕宗教改革进行斗争的激情最终衰退了，这也许不是由于双方都已精疲力竭而陷入僵局，更可能是由于欧洲地理划分使世界经济的潜在动力得以自然实现。至于新教伦理道德的作用，我同意威尔逊（C.H.Wilson）的观点：

如果新教理论及其道德伦理看来比起它们曾经作的那样难于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它也难于用以解释宗教改革时代的情况……经济事务上的领导权从地中海逐渐转移到北方，而当意大利城市衰落时，尼德兰人的城市却兴起了，但是新兴的北方经济无论是其商贸方式，还是其使用的工业技术，对一个15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或是一个佛罗伦萨的呢布商来说，都不含有什么不熟悉之处。^[88]

16世纪时，一些君主通过贿赂官僚阶层、雇佣军队、国王的神授权力及宗教的一体化（教随国定 *cuius regio*）等手段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另外一些君主却失败了。如我们所论述的那样，其成败是与这一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劳动分工所起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其作用的不同导致不同的阶级结构，而这又导致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这又向我们提出那个传统的问题，即国家相对于新资本主义时代的统治阶级的作用，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和商人有时不能简单方便地称之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因为有些贵族是资本家，而有些则不是。国家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什么人的代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第三势力？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还不存在一致的看法。维勒（**Pierre Vilar**）完善地阐述了这一基本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个特别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封建税收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即如何通过“司法”系统和其他方式在一个有闲贵族阶层和“商人—耕种者”组成的中间阶级，或那些将封建领地的税收转变为新型的资本投资的类似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换句话说，封建税收是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的。^[89]

一方面，封建贵族面临封建主义的“危机”，领地收入的减少以及其他各阶级（包括商业资产阶级、小农场主和农业雇工等）的联合进攻，那么，绝对君主制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看作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呢？其中有一个观点是塔卡哈西（**Takahashi**）提出来的，他认为“‘绝对君主制’只不过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以对付由于封建主义危机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发展（即导向农民的解放和独立）。”^[90]希尔（**Christopher Hill**）、^[91]基尔南（**V.C.Kiernan**）、^[92]莫尔纳（**Eric Molnar**）^[93]和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94]也都基本赞同这一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绝对君主政制是一种贵族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政体。但在这种政体之上，君主并不仅仅是贵族政治需要的简单延伸。例如，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认为：

因此，贵族阶层（在绝对君主制下）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一个必须考虑的主要因

素。它对王室的依附本质上更多的是妥协，而不是屈服。它更像一种选举——一种强制性选举，以确保国王成为贵族的领导者和执政工具。……这个原因（即贵族没有抵抗君主政权，甚至连消极抵抗都没有），在本质上是由于国王做他们所要求的事，将国家财富交由他们分配……是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个人作国家实际上的主人。[95]

布罗代尔（**Braudel**）同样坚持认为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是有限的。一方面，国王努力将贵族置于他的管制之下；但另一方面，国王又要保护其特权，以对抗公众的压力。[96]卢布林斯卡娅（**Lublinskaya**）所持的立场与布罗代尔很接近了。[97]赫斯特菲尔德（**Hurstfield**）强调君主们所处的窘境：“君主们发现没有贵族的支持难于进行统治，但与贵族共同统治同样很困难。”[98]

第三个观点，也许是最传统的观点，即是穆斯纳（**Roland Mousnier**）提出的。他将君主制视为一种自治的力量，往常与资产阶级联盟反对贵族，偶尔也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进行调停。[99]

那么，这两种见解即认为国家机器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与认为这属于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一场阶级斗争的性质，这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莫尔纳（**Molnar**）并不这样分析。首先，他使用更多的范畴，他谈及存在一个与君主明显对立的封建贵族，另外还存在一个“新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是君主潜在的同盟者。新贵族似乎包括那些小土地所有者和那些趋向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人们，但这一点还不完全清楚。他指出当绝对君主制向农民征收重税的时候，其财富是如何分配的就更不容易弄清楚了。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国家预算用来偿付给收税人、官僚机构的开支，国家贷款以及购买军事装备的费用，所有这些都使资产阶级大为受益。但另一方面，国家所有这些开销，即维持宫廷和军队的费用也是对新贵族的报偿。莫尔纳认为这是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所采取的一个策略。[100]恩格斯（**Engels**）同样指出了这一点，国家机器已开始发挥它的调节功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它的本来意愿相违背的，至少在“非常时期”是这样。[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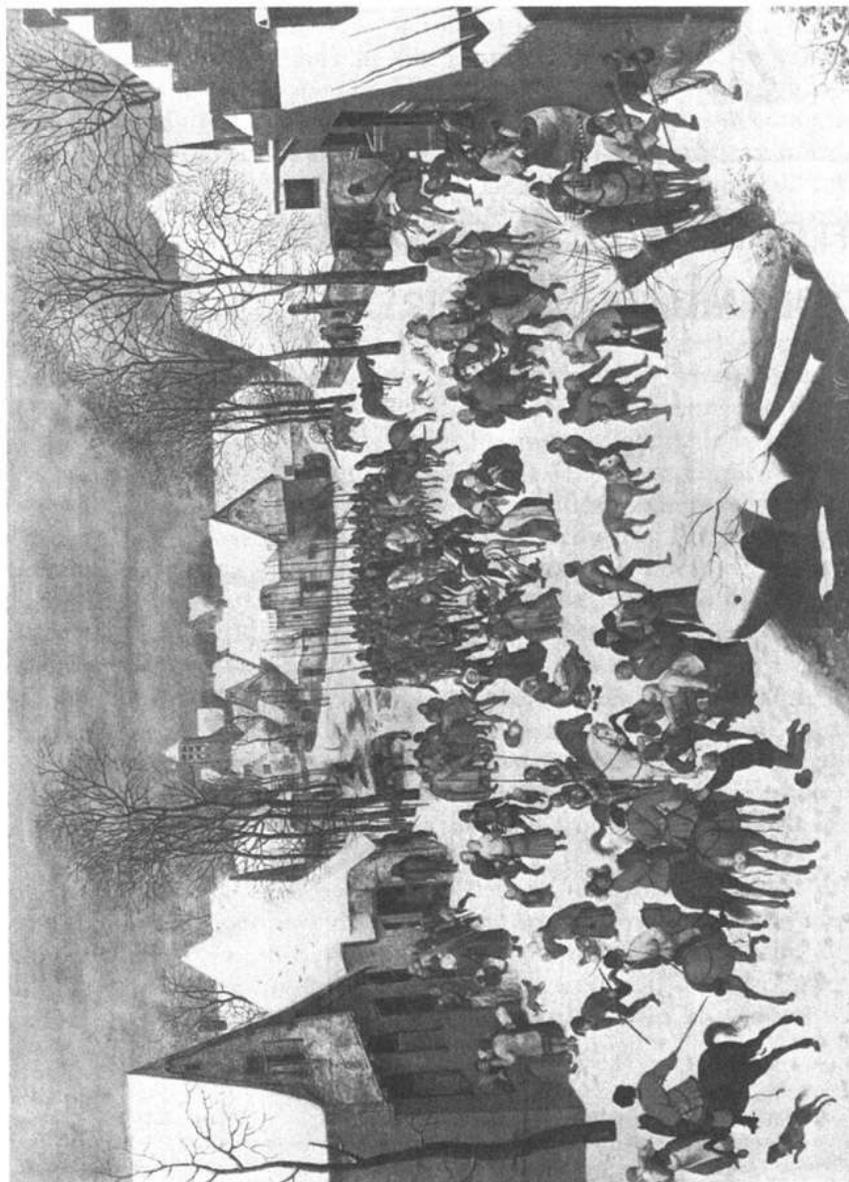
君主与贵族阶层关系的不明确源于新贵族阶层构成成分的含糊不清。无疑，随着时代的变迁，贵族的家庭成员已发生变化；所有有着贵族的社会中都存在不断流动这种现象。但16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不仅家庭，而且职业都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例如，我们假定西方封建制度中的贵族地位无法与企业家的职业相符，但在中世纪晚期的自治城市中，在相当程度上这可能已经是一个神话了。到16世纪，在整个欧洲，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这就根本不符合事实了。在欧洲各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易北河以东地区（East Elbia）、瑞典和英格兰，贵族成员已经变成企业家。^[102]像在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各个地方的贵族大多成功地消除了妨碍他扮演这一职业角色所存在的任何形式上的障碍。^[103]尽管在新教国家，教会眼看着它的土地被没收。但我们不应忘记，16世纪依然是教会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时代，尤其是在意大利。^[104]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成功的资产阶级又再不断成为土地所有主和贵族，而且三十年以后确实很难再将这两者截然区分开来。托尼（R.H.Tawney）把这视为不过在16世纪大为加速发展的一个正常进程。^[105]布罗代尔^[106]和波斯坦（Postan）^[107]都同意这一个观点，即那些非贵族阶层人们的地位不断从企业主转型为出租人，并且将其视为寻求长期安全的方法。然而，关键是他们意识到尽管职业不断流动，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力量并没有分崩离析。如布洛赫（Marc Bloch）所指出的那样，“封建领主的统治并没有被破坏。实际上它很快就吸取了更新的力量以新的姿态出现，而不是封建领主的财产在很大程度上易主。”^[108]正是造成这一稳定局面的绝对君主制，既允许个人身份和职业发生巨大变化，而没有同时或至少是及时破坏社会地位和报酬的传统等级划分。

那么，国家在支持商业资产阶级维护自身权利，并从中获利也保住了这些利益方面，是如何扮演关键角色的呢？这种联系肯定存在，然而是个程度和时机的问题。早期的相互支持发展到后来变成君主对商业资

产阶级令人窒息的控制。商人和国王相互支持的关系到17、18世纪发展成直接的对立，这不是偶然的。哈通（Hartung）和穆斯纳（Mousnier）发现在16世纪中就已存在这种紧张关系的征兆。^[109]诺斯（Douglass C.North）和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探求描绘出起到鼓励企业活动作用的各种司法和经济制度的兴起的大致轮廓，这些企业活动是建立在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而不是那些仅仅重新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商业类型。^[110]他们两人试图阐明这些条件，而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才能理解强调国家在体制上的作用的意义。他们认为与经济畸变一道，国家干预带来市场，因而也就带来了变革的可能性。这就使人们必须面对这种事实实际，即“使得政府实施其政策，即使遭到社会某一阶层人们的激烈反对，也在所不惜的强制性权力。”^[111]这个问题的阐述方式提请我们应将国家主义的作用视为一种用成本——利润分析为方式的资本主义。而对封建贵族来说，绝对君主制是维护其特权的最后一道防护壕，对于那些通过以国家机构作为商号，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效益来获取自己收入的人来说，国家机器有时特别有用，^[112]有时却又成为一个主要障碍。

到此为止，我们已列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两个主要构成因素。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上，在这个经济体系的不同地区（我们称之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分别被指派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了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采用了不同的劳动力控制模式，并且从这一体制的运作中获利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首先在国家体制中发生的政治变动，作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同角色的后果，就造成了不同的国家结构。中心地区的国家是集权化程度最高的。现在我们将整个16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回顾一下，这是一个某些地区变为这个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或中心地区的过程。因而，我们将力图有血有肉地论述，而不再冒抽象分析的风险。因此，我们将满怀希望地发展这整个过程的统一性。这些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其结构上的差异，注定其只能发生在可能变化的一定范围之内。



第四章插图“对无辜者的大屠杀”

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 (约1565年)

Vienna: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勃吕盖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的油画。它画于大约1565年，作为对西班牙人在尼德兰暴行的抗议。

^[1] “16世纪，国家越来越起着大规模征集和再分配收入的作用，它们通过税收、出卖官职、租金、没收、大量各种各样的国民产品来攫取财富。由于预算或多或少地同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而且预算还要与价格水平的涨跌同步，因此这种全方位的攫取财富十分有效。由此，国

家的兴盛是与经济发展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多少有点草率认为的那样，它并不是偶然的或一种破坏的力量。”布罗代尔（Braudel）《地中海》（*La Méditerranée I*），第1卷，第409页。

[2] “16世纪，国家越来越起着大规模征集和再分配收入的作用，它们通过税收、出卖官职、租金、没收、大量各种各样的国民产品来攫取财富。由于预算或多或少地同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而且预算还要与价格水平的涨跌同步，因此这种全方位的攫取财富十分有效。由此，国家的兴盛是与经济发展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多少有点草率认为的那样，它并不是偶然的或一种破坏的力量。”布罗代尔（Braudel）《地中海》（*La Méditerranée I*），第1卷，第409~410页。

[3] “没有获利颇丰的、从而使给国家贷款成为可能的商业，没有增加税收，没有皇家领地的剥削，没有战争与宫廷的开销，商业资本主义在16世纪上半期就绝不会有如此辉煌的繁荣。”哈通和穆斯纳（Hartung and Mousnier），*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第4期，第44页。

[4] 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商业循环》（*Business Cycle*），第1期，第236页。

[5] 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商业循环》（*Business Cycle*），第1期，第236页。

[6] 尽管经常许诺付极高的利息，但对宫廷贷款本身几乎不是一笔好买卖。不过恰恰是由于这些贷款无法偿付已成规矩，它们换来了在当时的各行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特权和让步……福格家族（Fuggers）上升到任何金融机构再也无法与之平起平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查理五世的窘境有关（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商业循环》（*Business Cycle*），第1卷，第236页。见注1）。

[7] 热尼科（Génicot），《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700页。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同样认为，中世纪晚期秩序的崩溃与16世纪贵族开始愿意“接受皇室的领导”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关系。他分析这种介入的变因在于集体社会心理的转变。“很难确定是哪些因素改变了有产阶级的行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较小的地主，和穷人一样遭受国内暴力之苦，他们也和穷人一样需要和平与安全。他们中的一些人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支持稳定的政府，从开始复兴的经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对15世纪末大多数革命的失败一直记忆犹新。”《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91页。

[8] 穆斯纳（Mousnier）在谈到16世纪的西欧时指出：“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之所以成为必然就在于各个民族（例如国家）的构成。它们是领地、省、地区（*Pays*）、城市、村社以及像骑士团这样的联合机构……官员组织、大学、行会……的并存。国王不得不强大到足以能够仲裁它们之间的冲突，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协调它们的行动。当然，它们的分歧也使国王有可能利用一方来反对另一方。”*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第97页。
是不得已吗？为什么这样？功能的解释几乎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不仅有可能没想出其他

的功能解释，而且，没能达到功能的需求不仅是一种可能的偶然现象，而且往往是十分貌似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坚持对“原因”作一判断。

[9] 见莱恩（Lane），《威尼斯与历史》（*Venice and History*）第421～422页。

[10] 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官僚社会的政治斗争”，《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9卷，第1期，1956年10月，第17页。

[11] 刘易斯（Archibald Lewis）《透镜》（*Speculum*），第33期，第483页。

[12] 刘易斯（Archibald Lewis）《透镜》（*Speculum*），第33期，第483页。见米勒（Edward Miller）：“尝试建立全面的直接税收是自13世纪以后形成的代表大会的主要影响之一，这一代表大会以保护人或代表的名义将各种纳税人联合在一起。”《方塔纳（Fontana）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14页。

[13] 多布（Dobb），《研究》（*Studies*），第24页。多布将“国家干预”和“自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政治组织方式进行了对比——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奇特的自由观。他用劳动力稀缺来解释二者的交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过量的无产阶级，当生产方式安全时，自由得以最大限度地发展兴盛，而一旦人们为工作而竞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收入的来源获利减少并变得不稳定时，合法的强制就会大受重视。”（第24～25页）。

[14] 见，例如，贝洛夫（Max Beloffs），《绝对主义时代，1660～1815》（纽约，哈普出版社，1962年）。

[15] “那么在16世纪现实的绝对主义与中世纪理论上的专制主义（这种绝对主义从未成为现实，或者只是暂时的，没有连续的、间断性的）之间有什么不同？”

“我们必须在国家新的内部结构组织中寻找答案，这就是公职人员、国王（或王公）的‘官员’——我们今天称之为‘官僚机构’——得以加强、扩充并掌握了权力，他们走到了公众生活的最前列，参与国家的日常活动，首先是介入了外交事务。”查博德（Chabod），《*Actes du Colloque*》第63～64页。

佩罗伊（Edouard Perroy）认为，法国早在13世纪就开始了这一进程：“法国国王私人机构（既有庄园性的，也有封建的）的进展导致了（中央）权力机构的发展……”

“〔在〕13世纪最后25年，王权已不再强大，在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其性质也开始发生转变。一个因素是专制主义思想、公共权力（主权）思想……另一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即国王自己人的压力，随着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书写应用的不断扩大，这些人的数量大增，一个新的阶层形成了，它成为权力、法律、钢笔的代理人……实际上，当时政府集体管理权力，已能够自行其是，开始使王室人员黯然失色……”《中世纪》（*Le Mogen Age*），第372～373页。

[16] “政治机器的庞大形象也许是错误的想象。将16世纪的政治机器与15世纪的政治机器相比，我们看到其规模的过分扩大。但这仍是相对的。如果人们考虑到当代以及庞大的为国家工作的文职人员，那么16世纪‘官员’的数量就少得令人可笑了。”布罗代尔，《地中海》，第2

卷，第37页。

[17] “政治机器的庞大形象也许是错误的想象。将16世纪的政治机器与15世纪的政治机器相比，我们看到其规模的过分扩大。但这仍是相对的。如果人们考虑到当代以及庞大的为国家工作的文职人员，那么16世纪‘官员’的数量就少得令人可笑了。”布罗代尔，《地中海》，第2卷，第29页。

[18] “就是这一切使西班牙国王们将各城市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就是这使得法国的路易十二世、法兰西斯一世、亨利二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世对王室及其附属机构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手段。……只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8年）之后，贪污腐败……才变得不能容忍……”哈通和穆斯纳（Hartung and Mousnier），*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第4卷，第48页。

[19] 斯沃特（K.W.Swart），《17世纪的官职买卖》（The Hague: Nijhoff, 1949年），第117页。

[20] “由于君主制下财政统治的加强，财政官员在国家中重要性也得以增强。随着贪污受贿的发展，财政官员成倍增加，联合组成了各种协会，这些协会从保证他们的进一步的利益出发，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范围。”佩奇斯（G.Pagés），“Essai sur l'évolution des institutions administratives en France du commencement du XVI^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n.s.*, 第1期, 1932年1~2月, 第26页。

[21] 由于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一些国王的过度负债是必然的。没有税收承包制或个人收入的抵押制，这是无法承受的。由此导致财政制度发生可怕的堕落，随着情况的发展，这一堕落势不可挡，从而造成了债务的不断积累。埃伦柏格（Richard Ehrenberg），《文艺复兴时代的资本与金融》，（纽约，哈科特出版社，1928年），第39页。

[22] 见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西欧国债的起源与增长”，《美国经济评论》，第37卷，第2期，1947年5月，第118~130页。如果我们谈的是目前现存的国家，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事实上，就大多数现代现象而言，都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城邦国家。贝克尔（Marvin B.Becker）曾分析过佛罗伦萨的公共债务从1303年“微不足道的数额”发展到1427年大约相当于全部佛罗伦萨人总财富这一过程。见《经济变革与正在出现的佛罗伦萨领土国家》，《文艺复兴研究》，第8期，1966年，第7~9页。

[23] 沃尔夫（Martin Wolfe），《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财政与经济政策》，《第三次经济史国际会议》，慕尼黑，1965年（巴黎，摩托出版社，1968年），第687~689页。见布罗代尔：“国家——至少是那些生存下来发展繁荣的，特别是能承受陆战和海战巨大开销的国家——从16世纪开始，并在本世纪复兴中更成功地控制、扭曲经济生活，使经济生活从属于一个限制的网络内，国家在它们的网络内操纵着经济生活。通过国家的要求和弱点，通过国家不稳定的目标来解释一切的确非常诱人。但历史从不一边倒，人们还可以用强有力的观点为这种主张辩护，即认为，在当时最现代化的，我们很容易认为是在大规模商业资本主义框架内运作的那部分经济生活，是与国家的财政兴衰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的刺激与搜寻下，经济已被国家的贪

得无厌和过重的公共开支所造成的必然的无效弄得逐步陷于瘫痪。这种贪得无厌和无效——作为历史的巨大力量——对16世纪的衰败起了作用。”“Le Pacte de recours au service du roi d’Espagne et de ses preteurs à la fin du LVie siècle, ”in *Studi in opere de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Cisalpino, 1957年) II, 1115。

[24] “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与广大的纳税人建立全面的联系，因此也就无法随心所欲地剥削纳税人；从而形成财政的，进而是金融的弱点。除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外，在16世纪后期，国家依然没有国库，也没有国家银行。”布罗代尔，《地中海》，第2卷，第39页。

[25] 雷德里克（Fritz Redlich）指出，有两种类型的佣兵。确切地讲有被赶出家园的人——用当时的话叫 *fahrendes Volk*，或流浪者。在瑞士和德国还有一种“扎根于家乡村社”的转为“固定的”人。这些人与紧急情况下召集起来的民兵十分相似。《德国的军工企业主及其工人》，第1卷，*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 1964年，第47期，第115~117页。

[26] 基尔南（V.G.Kiernan），《外国佣兵和专制君主制》《过去与现在》，第11期，1957年4月，第70页。

[27] “在法国（它的例子对欧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路易十一世创立了一种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的制度，在1474年，他征募了瑞士的辅助部队，安排他们驻扎在各地。从此，毗邻的瑞士对法国国王而言，就好比这以前威尔士与英国国王的关系。〔基尔南（V.G.Kiernan），《外国佣兵和专制君主制》《过去与现在》，第11期，1957年4月，第72页。〕”

拉斯科斯基（Otton Laskowski）认为瑞士佣兵之所以受欢迎在于他们的军事能力。见《16世纪的步兵战术与火力》，*Teki Historyczne*，第4卷，第2期，1950年，第106~115页。

由于当时法国步兵素质很低下，这支力量更是法国所需要的。奥曼（Sir Charles Oman）认为，其理由在于“除瑞士的常备军外，各国军队往往是不断地被匆忙召集起来，在危机结束后就被解散了。”《战争艺术史》，第45页。这使我们要问，为什么法国步兵同其他地方相比被更为频繁地解散？答案并不清楚，事实也不确切。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也只是又一次说明法国君主制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28] “欧洲政府因此严重依赖外国佣兵。他们特别适合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反叛的臣民，在16世纪盛行革命的时代，他们经常由于这一目的而被召集起来。‘我的瑞士人哪去了？’已是克劳狄乌斯（Claudius）和许多处境困难的君主的呼声……有钱人领导的反叛者也雇用他们自己的佣兵。……但总的来看，在这一争夺中，政府能够支出高于反叛者所出的价钱。”基尔南（Kiernan），《过去与现在》，第11期，第74~75页。

使用佣兵的第二种意义在于遏制社会的制度。使用佣兵限制了战争的破坏性，奥曼指出，如果拿不到钱，佣兵就会离开。这对军事战术有直接影响。不采取正面进攻，而是等待出击往往比强取军事优势更为成功。“看到敌方营地出现困难的征兆”时，军事指挥官往往是简单地等着时间的流逝，因为“再有几周的匮乏与瓦解就将使对手不攻自破。”奥曼（Oman），《战争艺术史》，第38页。

[29] 基尔南 (Kiernan), 《过去与现在》, 第11期, 第76页。

[30] 莱德里克 (Redlich),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第401页。

[31] 莱恩 (Frederic Lane) 认为这是哈巴卡克的观点。莱恩提出如下保留意见: “但这不是说从长远看, 在其他情况相同时, 一个唯有通过很高军事开支才能达到高水平资源利用的社会, 比起如果能够用较少的军事开支却达到同等水平的资源利用的社会, 该社会产出的剩余价值就较少。”《威尼斯与历史》, 第422页, 注脚第11。当然, 问题在于最后的“如果”。

[32] 见雷德里克 (Fritz Redlich), 《16世纪和17世纪的军工企业和借贷制度》, *kyklos*, 第10期, 1957年, 第186~188页。

[33] 见雷德里克 (Redlich),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 第39期, 第49~50页。

[34] 见埃弗里特 (Alan Everitt), 《农业生产市场》, 载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1500~1640年》第4卷, 瑟斯克编, (伦敦和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7年), 第521~522页。

[35] “英国农民在战时增加了生产或扩大了土地面积以满足都铎军队的需要, 当和平恢复后, 大量剩余产品随之出现, 农民们发现自己的负担加重了。他们战时的经验使他们想到了利用欧洲市场的权宜之计, 他们的剩余产品也就从英国士兵那里转到了法国或佛莱米的工匠手中 (见埃弗里特 (Alan Everitt), 《农业生产市场》, 载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1500~1640年》第4卷, 瑟斯克编, (伦敦和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7年), 第524页)。”

[36] “建立政府雇员的各个专业机构——着重在于包括常备军——使政府直接负担的吃饭人口数目成倍增加。”蒂利 (Charles Tilly), 《西欧的食品供应与公共秩序》, 第20页。同见第36~40页。

见戴维斯 (C.S.L.Davies): “前工业化时代政府面临的几个问题, 就像为野战部队提供足够的食品一样十分困难”, 《军队给养: 1509~1950年: 早期都铎政府的效力研究》, 《经济史评论》, 第2套, 第17卷, 第2期, 1964年, 第234页。

[37] “实际上, 战时贵族最坏的危险是军工企业主, 偶尔也包括工人可能会为了使自己得到报酬, 以牺牲其主人的政治目标作为代价。由于拒绝或推迟支付欠债 (通常伴随着军工企业及其最主要业务也面临危险), 战时贵族就会处于输掉这场由未获报酬的企业和工人为他而打的战争的危险中。”雷德里克 (Redlich),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第69页。

[38] 热尼科 (Génicot),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1卷 (1966年), 第700页。

[39] 布罗代尔认为, 16世纪前半期特别动荡, 随后从1550年到1600年则相当平静。他指出, “因此可能是……在菲利普二世时代, 国家的稳固说明了这种平静和民众谨慎的缘由。警察十分强硬……”《地中海》, 第2卷, 第80页。

[40] “因此，到16世纪末期，地中海山区到处有人，充满紧张气氛，各地发动了起义以获得解放。这场四处弥漫的战事与我们称之为盗匪活动（如果有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字眼）的那种隐蔽而无休止的社会冲突混合在一起，使我们难以识别。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在业平宁或其他山区，沿着广大的山区带，并在其中呼吸着大海送来的清新空气，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拥有了共同的命运。”（布罗代尔，布罗代尔认为，16世纪前半期特别动荡，随后从1550年到1600年则相当平静。他指出，“因此可能是……在菲利普二世时代，国家的稳固说明了这种平静和民众谨慎的缘由。警察十分强硬……”《地中海》，第2卷，第93页。）

[41] “在海上强盗的背后是城镇、城邦国家。在拦路抢劫的背后是支持冒险者的庄园主源源不断的援助。土匪们往往有一个可靠的庄园主当他们的首领或在背后支持他们……。”“我们不要过于简单化：土匪活动到处都有，而且多种多样，一些贵族也利用土匪，但往往是为了反对另一些贵族……因为土匪活动不只是与贵族中某种成分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它也是一种群众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运动。（“因此，到16世纪末期，地中海山区到处有人，充满紧张气氛，各地发动了起义以获得解放。这场四处弥漫的战事与我们称之为盗匪活动（如果有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字眼）的那种隐蔽而无休止的社会冲突混合在一起，使我们难以识别。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在业平宁或其他山区，沿着广大的山区带，并在其中呼吸着大海送来的清新空气，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拥有了共同的命运。”（布罗代尔，布罗代尔认为，16世纪前半期特别动荡，随后从1550年到1600年则相当平静。他指出，“因此可能是……在菲利普二世时代，国家的稳固说明了这种平静和民众谨慎的缘由。警察十分强硬……”《地中海》，第2卷，第88~90页）。”

[42] 德卢莫（Delumeau），*Vie économique*，第2卷，第547页。

[43] 德卢莫（Delumeau），*Vie économique*，第2卷，第543，546~547，608，625页。

[44] 维拉里（Rosario Villari）详细说明了农业变化对意大利南部的影响：“南部乡村没有受到伴随‘新教改革’扩展而来的农村暴动风波的影响，他们现在反对的是更沉重的重征封建土地税，反对当时教会的经济与财政改革势力。重要的一点是，参加运动的不只是劳苦劳动者，还有在农村的管理和社会凝聚方面起作用的各种集团。

他们是农村企业主，马萨里（地产管理人）（Massari），半资本家式的谷物生产组织者：农村中的这些力量在16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有利时期已能够营利，这部分是通过降低工资获利，也间接利用了贵族的财政危机和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有利条件。他们在当时是工资劳动者、小的或中等产业主、农村企业主。由于具备与富有资产阶级明显不同的特征，马萨里（地产管理人）（Massari）在王国初级生产和畜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Le origini*（1581~1647年），（Bari: Laterza, 1967年），第61页。

[45] 维拉里（Rosario Villari）详细说明了农业变化对意大利南部的影响：“南部乡村没有受到伴随‘新教改革’扩展而来的农村暴动风波的影响，他们现在反对的是更沉重的重征封建土地税，反对当时教会的经济与财政改革势力。重要的一点是，参加运动的不只是劳苦劳动者，还

有在农村的管理和社会凝聚方面起作用的各种集团。

他们是农村企业主，马萨里（地产管理人）（Massari），半资本家式的谷物生产组织者：农村中的这些力量在16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有利时期已能够营利，这部分是通过降低工资获利，也间接利用了贵族的财政危机和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有利条件。他们在当时是工资劳动者、小的或中等产业主、农村企业主。由于具备与富有资产阶级明显不同的特征，马萨里（地产管理人）（Massari）在王国初级生产和畜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Le origini*（1581~1647年），（Bari: Laterza, 1967年），第61~62页。

[46] 鲁施（Georg Rusche）和柯基海默（Otto Kirchheimer）概述了这一情形产生的后果，“佣兵的廉价供给使得骑士成为多余，并使他们失去了其收入一个重要部分。有些人遭受双倍的痛苦，特别是下层的骑士，因为土地贫瘠、农民越来越悲惨，以致不可能支付租金……这些世袭的、没有土地的骑士在他们的臣民进行小规模抢劫时就已转向拦路抢劫。主要的区别在于贫穷的农民不得不公开抢劫，骑士则以合法的战争或为穷苦大众向城市富商复仇的借口来掩盖他们的目的……。”《惩罚与社会结构》（纽约，拉塞尔和拉塞尔出版公司，1939年），第13页。

[47] 维拉里（Villari），*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第58页。

[48] “将（盗匪）现象与针对国家的封建反抗这一概念相联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16世纪末并不是一个国家特别反对男爵的时期；即使在罗马，教皇恢复被大土地所有者（feudatari）篡夺走的物品和权力的努力，在1581年随着篡夺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失败”（维拉里（Villari），*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第60页）。

[49] 哈通和穆斯纳（Hartung and Mousnier），*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第4期，第8页。

[50] 马拉瓦尔（José A.Maravall），《现代国家的起源》，*Cahiers d'histoire moderne*，第6卷，第4期，1961年，第800页。

[51] 莫尔纳（Erik Molnar）详细确定了这一定义：“绝对主义是国王在他所控制的军事官僚组织的支持下对全国行使基本的和有效的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权。这个定义包含一个基本的标准，即有效的权力，通常在发生对抗时，有效的权力将压倒敌对一方的企图，例如由国会或世袭官僚所制定的抱负。”“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e l'absolutisme, ”in *XI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Mé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Wie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ohne, 1965年），第155页。

[52] “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能清楚地说明16世纪王室权力的限度，政府常处于财政困境，无法从最有支付能力的人那里获得财富，只要政府试图挖掘适当的收入，就可能引发代价高昂的暴动。”鲍斯马（William J. Bouwsma），《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载于《西方文明选编》，第3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2卷，第233页。

[53] “在15世纪或者16世纪，都没有真正的民族传统，但存在集体的意识，国王能够将这种

意识转变为他们自己的目的，使国王对权力的控制得到承认，个人得以自由地组合起来。”马拉瓦尔（Maravall），*Cahiers d'histoire moderne*，第6期，第796页。

[54] “（我们应当）避免试图把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关于国家的思想）取向解释为一种集体民族团结的意识……

我们应当注意这一事实，16世纪逐步阐述国家思想的法理学家和思想家谈得更多的是帝王（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讲）而不是人民，是权力而不是集体。

由此我们应当回到出发点上：‘国家’并不存在于它本身。它首先是对新的权力形式——国王的公共权力的基本确认。”拉艾德（Georges de Lagarde）“*Réflexions sur la cristallisation de la notion d'Etat au XVIe siècle*，”in Enrico Castelli, ed. *Umanesimo e scienza politica*（Milano: Dott. Carlo Marzorati, 1951年），第247~248页。

[55] “古代的风尚表明，罗马法在16世纪具有了新的力量，它补充了古代关于‘英雄’、半神、法力无边者和行善人的思想，……英雄对于需要解救自己的人来说是楷模。”穆斯纳（Monsnier），*Les XVI etX VII siecles*，第96~97页。

[56] “与纯经济学相反，存在着一种非常易变的混合公式：‘市场是资产阶级首先认识民族主义的学校。’”维勒（Pierre Vilar），*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第1卷（巴黎：S.E.V.P.E.N.，1962年），第34页。

[57] “（西方国家）许多人，特别是首都和首都附近的人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国王的特殊臣民，具有今天称之为Staatsvolk（国民）那样的地位……努力把全部臣民置于其控制之下的国王可以让它们与中产阶级对抗，但他也能够希望通过扩张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主宰边远地区的省份，从侧面攻击他所在省的封建主义。”基尔南（Kiernan），《过去与现在》，第31期，第33页。

[58] “社会应当整合为一体，如果可能的话，一个国家中应当只有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在政治边界内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权决定应该做什么——这样的思想是新的，19世纪西方思想发展的结果。”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征服者与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的社会力量》（莱顿，布里尔出版公司，1965年），第二次修订版，第6页。

[59] 蒂利（Charles Tilly）用“正式的自治，同非政府组织的区别，中央集权和内部协调‘来衡量’国家形态”。由这一观点得出，“极端的国家形态既不能确保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保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权力。人们或许会猜想，国家形态的增强会自然加强政府对所属人口的流动资源的控制，增强政府将资源用于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目标的能力。”《欧洲国家形成史管见》，油印草稿，第9章；蒂利（Charles Tilly）编，《西欧国家的形成》（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18~19页。

[60] 巴伦（Salo W. Baron），《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第2版，第6卷：《公民或外国魔术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a），第192页。

[61] “13世纪末，由于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禁令，犹太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德国受到了削弱。从那时起，与东部的全部贸易就是沿着后来众所周知的渠道进行的：南部的意大利——地中海和北部的汉萨同盟。更早时期起过作用的穿越俄国和波兰的跨大陆路线退出了历史舞台。”布鲁茨库斯（J.Brutzkus），《同东欧的贸易，800~1200年》，《经济史评论》，第13期，1943年，第41页。

[62] 关于波兰，巴伦（Salo W.Baron）指出：“我们对〔11世纪和12世纪〕的犹太人生活知道得很少，但犹太人显然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所要遵守的法律限制也很少，如果有的话。”《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第2版，第3卷：《罗马和波斯的继承人》（费城：美国犹太人出版协会，1957年a），第219页。在西欧，封建制度往往对犹太人有利，使他们成为“有些类似基督徒贵族的新的王室仆从集团。”巴伦（Salo W.Baron），《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第2版，第4卷：《东方与西方的相会》（费城，美国犹太人出版协会，1957年b），第50页。在西班牙（见第36~43页）、加洛林王朝的法国（见第43~53页）、德国（见第64~75页）、英格兰和诺曼底（见第75~86页）情况确实如此。“尽管由于无政府状况的变化和教会对犹太人统治的加强，封建主义使得西欧犹太人的生活变得很麻烦。”但“教会的中央和省级机构继续坚持基本的信仰自由，通过强调国王的神权加强王室的权力，它们命令国王公正地统治，它们不懈地宣扬旨在为人口中最无防卫能力的集团（包括牧师和犹太人）确定‘神圣的休战’的主张，所有这一切大大增强了犹太人的安全（第53~54页）。”

[63] 在中世纪前期，犹太人作为“王室仆从”获益匪浅。在中世纪晚期，同样是这些国王，其权力更强大了，但犹太人的地位开始下降。巴伦（Baron）认为，“由于他们各自的王室主人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了更大的财政收益，他们没有利用其增强的权力更有效地保护他们的犹太‘奴隶’令人十分吃惊（第198页）。”巴伦（Baron）用“中世纪后期逐渐形成的新型民族主义（第99页）”来解释这一现象。此外，“中世纪社会世俗化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种族宗教的偏执（第200页）。”

[64] “〔在14世纪和15世纪……犹太人〕从一个国家被驱逐到另一个国家，他们大批地迁移到东欧和中欧的开放边界，在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立陶宛人的领土上建立了大量更加自成一体的村社。在众多的努力中，他们发现了自己对各个社会的作用：作为现金和借贷的提供者，对国家而言，他们成了现成的（往往是无依无靠的）征税对象，是国家最大的经济财产之一。”巴伦（Salo W.Baron），《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第2版，第7卷：《经济催化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b），第30~31页。德国是一个边际地区：“不过，在黑死病大灾难后，德国的犹太人大量死去或穷困潦倒，他们不得不越来越专注于放债。尽管放债的金融红利不断减少，但他们还是招致人们的强烈憎恨……那些通过税收在许多方面成为犹太银行家合伙人的特别统治者，现在越来越无力维持这种监护关系……16世纪初动荡的几十年中，情况变得更糟，社会动乱和宗教纷争成为内战和宗教战争爆发的基础（第151~153页）。”

[65] “波兰众多犹太人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对他们来说，原则上他们不能获得土地资产，不能得到社会晋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他们更多地参与资金投资活动（在工业和矿业

领域)。”马洛维斯特 (Marian Malowist), “L'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Pologne du XIVe au XVIIe siècle: traits généraux”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年) 第1期, 第601页。

[66] “但我们如何解释意大利城邦国家商业领先地位的这种衰落? 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可以归结为: 城市国家激烈的阶级斗争, 王室负债者无法偿还债务, 而陷于破产 [巴尔第佩鲁齐家族 (Bardi Peruzzi) 的破产], 没有可以保护其国外公民的大国; 也就是说, 根本的原因在于城市国家的特殊结构, 这种城市国家无法转变为一个拥用广阔领土的大国。”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Il Risorgimento* (Roma, Giulio Einaudi Ed, 1955年), 第9页。

[67] 只要北意大利共和国是世界银行业的中心, 犹太人就被有效地排挤在这些“伦巴德 (Lombards) 人的家园之外, 伦巴德人的金融财力甚至在欧洲其他地方也超过了他们自己的资产。然而, 13世纪发生金融危机, 导致大量各种大商号纷纷倒闭.....从而为犹太人提供了新的机会.....。”

“不久, 意大利公国对犹太人成为经济力量的补充来源表示欢迎。”巴伦 (Baron), 《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 第7卷, 第161, 163页。

“当1492年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犹太人遭到驱逐后, 意大利成了基督教欧洲唯一对难民开放的地方.....”罗思 (Cecil Roth), 《意大利犹太人史》(费城, 美国犹太人出版协会, 1946年), 第178~179页。

[68] “如果犹太人在 (西欧的) 某些地区没有被完全驱逐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各个政府的财政利益, 他们的财政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犹太人的放贷和对犹太人征收越来越高的赋税。”巴伦 (Baron), 《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 第7卷, 第197页。

见舍耐德曼 (J.Lee Shneidman) 对13世纪和14世纪阿拉冈的论述: “通常人们放贷时都希望钱能返还。但在向国家放贷时, 情况就不完全如此。国王确实经常偿还小笔借贷, 但通常的情况是通过再次借贷进行偿付, 或者向别的人再借一笔贷款来偿还向第一人的借款。犹太人借给国家的钱往往有去无回, 他只得通过税收方面的好处来弥补损失。由于这些好处成了进一步贷款的来源, 国王们便十分关心确保犹太人重新获得贷款附加好处的价值。”《阿拉冈—加泰隆尼亚帝国的兴盛, 1200~1350年》(纽约: 纽约大学出版社, 1970年), 第2卷, 第433页。

[69] 埃尔曼 (P.Eلمان), “1290年犹太人被驱逐的经济原因”, 《经济史评论》, 第7期, 1936年11月, 第151页。埃尔曼进而指出, 正是因为犹太人已被“榨干”了, 才让意大利人取代了他们的地位。

[70] “到那时候.....英国的海外商人已同英国城镇居民联合起来, 城市的仇外情绪发展成经济民族主义。在14世纪末, 英国布商试图打入波罗的海地区之举在汉萨同盟的城镇所受到的欢迎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 在英国的汉萨商人享有的优惠 (包括对布所征收的税比外籍居民缴付的还低) 总的来说就显得很不公平, 英国商人要求或在波罗的海地区享有互惠, 或者在英国取消汉萨同盟的特权.....在这同时, 意大利成了类似争议的中心..... (城镇居民转而) 反对使用正在成为通货的硬币。据说, 他们的金融和交换行为导致了金银的出口。他们贸易 (‘少量

的'奢侈品'的特点导致金银的不断流失。”米勒（Edward Miller），《政府的经济政策：法国和英国》，载于《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波斯坦（M.M.Postan）、里奇（Rich）和米勒（Edward Miller）编，《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政策》（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30～331页。

[71] 1492年是重要的时期。维森斯（Vicens）认为，在此之前，“就像西方其他国家一样，不存在城市资产阶级。这一空缺由基督教以外的一个社会阶级——犹太人填补了。”《西班牙经济史》，第248页。在此之后，热那亚人占据主导地位：“西班牙热那亚商人历史上的转折点是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同新大陆贸易关系的开辟。从那以后，热那亚人逐渐在西班牙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日益成为16世纪的世界强国。命运同时给了西班牙两个帝国：一个在旧世界，一个在新世界。西班牙对承担帝国的责任毫无准备，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点成了热那亚人前进的跳板。”派克（Ruth Pike），《塞维利亚的热那亚人与新世界的开创》，《经济史杂志》，第22卷，第3期，1962年9月，第348页。见肖努（Chaunu），《塞维利亚》，第8卷（1），第285～286页。

同见阿曼萨（Javier Ruiz Almansa）：“所有三个种族集团（基督徒、犹太人和摩尔人）都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排除他们会产生难以填补的真空，并会导致西班牙社会机制的真正动荡。热那亚和佛莱米（Flemish）的商人取代了以前犹太人所起的作用，但并没有全部代替。法国南部的手工业者填补了摩尔人留下的大部分空缺……”“Las ideas y las estadísticas de población en España en el siglo XVI”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sociología* I, 1947, cited by Juan Reglá, “La expulsión de las moriscos y sus consecuencias,”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II, No.52, 1953, 445.

[72] “〔在〕15世纪初突然进入现代的波兰，犹太人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从数量上看，几乎成了一个犹太民族和国家，所有这一切在17世纪的经济困难和无情的萧条冲击下荡然无存。……”布罗代尔，《地中海》，第2卷，第137页。

[73] “到13世纪和14世纪交替之际，大量意大利人的商社……控制着英国的羊毛出口，在一些年份则完全垄断了出口，全面控制着皇家海关。

处在这样的地位，意大利人终于被当地商人的联合组织取代，最后又被英国商品公司取而代之。……”

“到1361年，英国商品公司已实际垄断了对北欧的‘羊毛出口’……”

“这种垄断满足了……羊毛商人的需求，它也迎合了织布者不断增长的利益，因为垄断使国内与国外的羊毛价格形成很大差别。首先，垄断满足了国王的利益。对羊毛出口征收关税和提供补贴是国王提供的最可能的保障。与百年战争早期一个接一个破产的商社和企业联合体相比，一个享有贸易垄断的特许公司是更为安全的借贷来源……唯一遭受损失的是羊毛生产者；这也许一直是羊毛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波斯坦（M.M.Postan），《中世纪欧洲的贸易：北方》，载于《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波斯坦和里奇编，《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238页。

[74] 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做了转变。这是半边缘化的理想。犹太人被获许被迫作为基督教

的信徒。这使他们在资产阶级内部起着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当伊比利亚半岛的发展达到希望排挤本地资产阶级的程度，“资产阶级”与“新基督徒”的一致使后者成了易于迫害的目标。见雷瓦哈（I.S.Revah）“*L'hérésie marrane dans l'Europe catholique du 15e au 18e siècle*,” in Jacques Le Goff, *Hérésies et sociétés dans l'Europe préindustrielle, 11e-18e siècles*（巴黎：门图出版社，1968年），特别在第333页提到了葡萄牙。

[75] 见马洛维斯特（Malowist），《过去与现在》，第13期，格斯特林（Ferdo Gestrin），《编年史》，E.S.C.第17卷，（1962年）。

[76] 巴伦（Salo W. Baron），个人信件，1970年11月16日，见埃茨恩（D. Stanley Eitzen）：“由于犹太人〔在16世纪〕为贵族和王室做事，他们更加不受人们喜欢。他们充当王室的财政代理人，租赁和管理皇家领地和贵族的庄园，并常常充当收税人。”《两个少数民族：波兰的犹太人和菲律宾的华人》，《犹太人社会学杂志》，第10卷，第2期，1968年12月，第227页。

[77] 尽管如此，现在加尔文主义往往被公认为鼓励商人奋斗的宗教。从它最初的形式看，这一观点认为加尔文主义推崇进取精神，或至少是鼓励这样的信念；在商业方面的成功有可能被认作是上帝选民的一个标志。对加尔文主义的这一歪曲并非不可思议，而且还要看到，这不仅不是歪曲，且这一歪曲恰恰不被严格的加尔文派教徒所接受，因为它包含着试图揭示上帝继一般活动的有罪推断。一种可能更为普遍的对加尔文主义的歪曲则完全不同。它会使人从宿命论走向彻底的宿命论，基于在上帝意志面前个人努力无用这样的认识，以致对个人的作用表现出无动于衷和毫无兴趣的态度。几年前，由卡内基（Carnegie）公司任命的调查南非“贫穷白人”问题的专员激烈辩论说，“贫穷白人”缺乏进取心和自力更生精神的原因之一，不在于这种源于“错误的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这成了对那种广为人们接受的认为加尔文主义促进商业企业发展的观点所作的一种有趣的注释。“它确实强有力地表明，是感召力而不是教条决定了加尔文派教徒对经济机会和刺激的反应。”罗伯逊（H.M. Robertson），《16世纪欧洲经济发展》，《南非经济学杂志》，第18卷，第1期，1950年3月，第48页。

[78] 我并不想否认，运用加尔文派神学说明资本主义活动也许比用天主教神学容易些。不仅韦伯这样认为，连一些强烈批评他的人也这样认为。例如，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利用人们内心的动机，使社会压力更随意地影响个人行为的思想主张……在社会变革时期，在那些最易受影响的人那里尤其流行。基督教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也生活在旧标准逐渐被废除的时代，他的神学带着沉重的改革家色彩。他也十分强调内在的动机而不是外来的作用。……似乎有一种已确立的教会回复礼仪，而反对派强调内在因素的永久趋势。”《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费希尔（F.J. Fisher）编，《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经济与社会历史论文集》（伦敦，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34~35页。

我要指出一点，出于社会需要，可以用天主教而不必是新教为资本主义辩护。我顶多是同意希尔（Hill）的这一观点：“新教中不存在任何自动走向资本主义的东西，它的重要性在于破坏了天主教更刻板的机构和礼仪所造成的障碍〔第37页〕。”

[79] 希尔 (Christopher Hill), 《工业革命的改革, 1530~1780》, 《鹈鹕 (Pelican) 大不列颠经济史》, 第2卷 (伦敦: 企鹅丛书, 1967年), 第34页。

[80] 后来, 在16世纪20年代发生了大起义, 即路德 (Luther) 运动。这一反抗不是发生在欧洲旧的成熟经济内的反抗, 而是发生在北欧和中欧“不发达”“殖民”地区, “以长期重税、受挫与被剥削 (如他们所感受的) 来维持地中海和莱茵河的高文明。”特雷弗罗珀 (H.R.Trevor-Rope) 《宗教, 改革与社会变化》, 《欧洲16世纪和17世纪的巫术狂, 及其他文章》 (纽约: 哈珀, 1969年) 第32~33页。

[81] 见巴伦 (Baron), 《犹太人社会与宗教史》第12卷, 第18页。

[82] 戈登—沃克 (P.C.Gordon Walker), 《经济史评论》, 第8期, 1937年, 第14页。“路德时代的具体成果……在于破坏了天主教对中下层阶级的控制, 支持没收天主教的和封建的财产……”

“〔在第二阶段〕主要问题是阶级适应性……资产阶级从附属者变成统治者……工人阶级从松散、粗放的劳动转变为受纪律约束、固定的、有组织的工作……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个人主义掩盖社会的阶级结构, 这一阶级结构要比封建制度下更为明显……作为唯一的社会分化标准, 阶级结构既被个人精神行为承受的压力 (从外部) 所证明, 也被这种压力所掩盖; 正确的社会道德及其实行办法对上帝选民来说是现成的自我约束, 如果必要的话, 是对上帝摒弃者的强制约束……”

“〔随着〕阶级适应作为改革最高任务的逐渐完成, 新教徒只得服从其他更为重要的活动, 首先是让位给世俗国家和科学 (第16~17, 18页)。”

[83] 见查尔诺斯基 (Stefan Czarnowski), “La réaction catholique en Pologne á la fin du XVI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 *La Pologne au V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Société Polonaise d’Histoire, Varsovie: 1933), II, 300. 见格拉博斯基 (Thadée Grabowski): “路德教 (1530~1555年) 的主要支持者是教士、德裔资产阶级, 从当时的大学教育中心维登堡 (Wittenberg) 和科尼斯堡 (Königsberg) 返回的波兰学生。”

“贵族几乎没有参与。对他们来说, 路德教过于温和, 并且是支持……王权的…它的教义和君主思想未能迎合梦想建立古罗马式共和国的贵族们。” “La réforme religieuse en Occident et en Pologne” *La Pologne au 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Bruxelles, 1923 (华沙, 1924年), 第67~68页。

然而, 阿诺德 (Stanislaw Arnold) 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 “的确有一部分, 也仅仅是一部分权贵成了改革家, 尤其是加尔文派。但加尔文派吸引的主要是当时在国内特别在议会 (Diet) 掌权的中层贵族中的进步分子。” “Les idé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de la Renaissance en Pologne, ”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á Rome* (Warszawa: 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Institut d’Histoire, 1955) 第160页。阿诺德 (Arnold) 特别反驳了查尔诺斯基 (Czarnowski)。见第159页。

福克斯 (Fox) 和塔兹比尔 (Tazibir) 的看法与查尔诺斯基和格拉博斯基 (Grabowski) 比较一致。见福克斯 (P.Fox), 《波兰的改革》, 《剑桥波兰史》雷德韦 (W.F.Reddaway) 等人合

编, *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 (伦敦和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0年), 第329, 345~346页; 塔兹比尔 (J.Tazbir), 《贵族的联邦》, 吉斯托 (Aleksander Gieysztor) 等人编, 《波兰史》(华沙: 波兰科学出版社, 1968年) 第185~186页。

[84] 查尔诺斯基 (Czarnowski), 第301页。

[85] 查尔诺斯基 (Czarnowski), 第304页。

[86] 查尔诺斯基 (Czarnowski), 第308页。尤明斯基 (J.Umiński) 强调波兰新教中的非波兰成分: “路德教主要是吸引了居住在波兰城镇的德国后裔……所谓的反三位一体说很快取代了加尔文主义在贵族中的地位, 严格说来这种反三位一体说并不是波兰的。波兰的反三位一体说是由外国人组织和领导的。”《波兰的改革》, 《剑桥波兰史》, 第1卷, 第412页。

塔兹比尔 (Janusz Tazbir) 指出了宗教民族主义的国际意义: “天主教将波兰与新教的瑞典、东正教的俄国和穆罕默德的土耳其区别开了 (第228页)”与此相反, “罗马天主教会试图通过波兰不仅实现它自己的政治目标, 还要实现哈布斯堡王朝的目标 (第229页)。”

[87] 在路德教和加尔文主义新异端的背后隐藏着潜在的、更为危险的敌人。天主教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敌人的存在。罗马教廷从长远来看并不怎么关心压制新教 (一种过去的挑战), 而是更重视遏制当时不断发展的政治自主论, 在几乎所有的地方对日益联邦化和自主化的基督教会都加强了集权管理, 使那些肯定是僧侣之外的人都服从于教会机构的统治, 取消艺术和知识文化方面危险的自由, 恪守目标的合法性和有关现实的等级观念和哲学概念, 以支持对基督徒各种活动进行监督的要求。简言之, 就是阻止那种历史学家将其与文艺复兴时代相联系的发展进程。鲍斯马 (William J.Bouwsma), 《威尼斯与保卫共和国自由》(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8年), 第294页。

[88] 威尔逊 (C.H.Wilson), 《贸易, 社会与国家》,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4卷, 第4卷, 第490页。

[89] 维拉 (Vilar), 《过去与现在》, 第10期, 第33~34页。

[90] 塔卡哈西 (Takahashi), 《科学与社会》, 第16卷, 第334页。

[91] “绝对君主制是封建国家的一种形式”。希尔 (Christopher Hill),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科学与社会》, 第17卷, 第4期, 1953年秋季, 第350页。

[92] 《西方绝对君主制产生于某种特别的封建君主制》, 基尔南 (V.G.Kiernan), 《过去与现在》, 第31期, 第21页。

[93] “欧洲绝对君主制的所有形式都是服务于贵族和地主的利益, 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其他阶级的政治统治, 首先是对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的政治统治。”莫尔纳 (Erik Molnar),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第156页。

[94] “波尔什涅夫（Porchnev）试图说明官僚资产阶级恰恰起源于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在封建制度下，政治与经济的不可分性意味着每个贵族追求的特定利益不一定与他所在的阶级的整体利益一致。”“由此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困难：贵族国家的权力结构并不掌握在贵族的手中，任何一个特定贵族集团掌权都必然引发一场与庄园主阶级其他成员的公开斗争。”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第563页。

[95] 熊彼得（Joseph.A.Schumpeter），《帝国主义的社会学》，《社会阶级，帝国主义》（纽约：梅里第安丛书，1955年），第57～58页。

[96]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一样，贵族占据着最高地位，他们不愿放弃这一地位……在各地，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产物，作为刚刚产生的事物，必须与这些‘采邑所有者’、村庄、田地和道路的主人，以及广大农村人的卫士进行斗争。斗争意味着与他们妥协，分化他们，也保护他们，因为如果没有统治阶级的共同行动，是不可能在一个社会保持住权力的。现代国家运用了所掌握的这一武器；如果是进行破坏，所有的一切就得重新安排。而重建社会秩序就更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在16世纪任何人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布罗代尔，《地中海》，第2卷，第50页（转下页，包括第54页）。

[97] “就贵族的两个集团而言，绝对主义的政策旨在保卫他们的基本阶级利益，也就是他们的财产。绝对君主不会满足‘佩剑贵族’（noblesse d'épée）公开的反动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它会直接反对他们——但这与‘平等主义’相距甚远。”卢布林斯卡娅（A.D.Lublinskaya），《法国专制主义：关键的阶段，1620～1629年》，（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26页。

[98] 赫斯特菲尔德（J.Hurstfield），《西欧的社会结构、官职和政治》，《新剑桥现代史》，第3卷：沃纳姆（R.B.Wernham）编，《反改革与价格革命，1559～1610年》（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30页。他接着指出：“但在整个欧洲，贵族在社会中的作用天生就是自相矛盾的。作为贵族，他们有传统的野心，并互相对立，这往往不符合国王的和平利益。但作为世袭的当官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加强法律制度，而法制力量的扩大取决于对他们所拥有的自私权力进行遏制。”

[99] “绝对君主制产生于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对抗……”
“这种阶级斗争也许是专制君主制发展的主要因素。”穆斯纳（Mousnier），*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第97，99页。

[100] 莫尔纳（Molnar），*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IV，第163页。

[101]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但也有例外的时期，那

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注。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伦敦：劳伦斯·维沙特出版社，1940年），第195～196页。

[102] 科尔斯（Paul Coles）在论及15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商业中的贵族现象时说：“贵族正在预演他们将在16世纪欧洲商业活动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文艺复兴社会的危机：热那亚，1448～1507年》，《过去与现在》，第11期，1957年4月，第19页。

“（到15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匈牙利发展中的一种新的趋势，这在经济上可以归结为封建庄园主阶级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贸易，后来又参与这些商品（酒、牛和小麦）的生产。”帕克（Zs.P.Pach），“En Hongrie au XVIIe Siècle: l'activité commerciale des seigneurs et leur production marchande,” *Annales E.S.C.*, XXI, 6, nov-déc.1966, 第1213页。

“贵族参与农畜产品的出口贸易始于15世纪末，在后来又有所发展。这种参与成为与贵族直接开发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趣现象之一……促使16世纪（贵族充当布匹和奢侈品进口商）这一现象发展的因素是在贵族的压力下各大城市逐渐抑制了关税。”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I, 第587～588页。

“16世纪随着对城镇工业生产和贸易垄断的冲击，容克（Junker）企业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容克成了商人、走私贩和工业家，确实打破了城镇与乡村的传统平衡。”罗森伯格（Hans Rosenberg），《美国历史评论》，第XLIX期，第236页。

从16世纪晚期开始，大部分罗马农村控制在十来个地主的手中。他们被称作mercanti di campagna，即农村的商人。见德卢米莫（Delumeau），*Vieéconomique*，第2卷，第571页。

前面讨论过的军工企业家大多出身于贵族。如果不是的话，从事这种企业的活动也往往会被封为贵族。见雷德利克（Redlich），*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第47期，第411，427～428页。

同见奥林（Goran Ohlin），《瑞典贵族的企业活动》，《企业家历史探讨》，第6卷，第2期，1953年，第147～162页；斯通（Lawrence Stone），《商业中的贵族，1540～1640年》，《企业家历史探讨》，第10卷，第2期，1957年12月，第54～61页。

[103] “为了避免更多的困难，为了确立统一的规则，1622年公布了一项罗马教皇的训令，要求所有（军人）骑士团遵守圣地亚哥（Santiago）法令，大意是禁止（骑士团成员）从事商业活动的规定不适用于大企业主，而只适用于小店经营者或普通的放贷人……贸易显然是西班牙继续充当帝国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正常的财源是不能放弃的。”赖特（L.P.Wright），《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军人骑士团》，《过去与现在》，第43期，1969年5月，第66～67页。

[104] “在投资于土地的竞争中，教会和非营利的协会[它们大多受（教会）的影响]（gli enti morali）发现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它们比教会以外的人和‘私人团体’行动得更早。在16世纪末，他们控制了米兰（Milan）一半的地产，引起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和宗教后果。”保菲雷蒂（Bulferetti），*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第4卷，第21～22页。

[105] “从很早的时候起，成功的商人就通过投资不动产来换取尊严和社会的认可。贫穷的绅士通过商业投机来恢复其家族日渐减少的财产，在这些投机中，与商人家庭联姻如果不是最小的投机，也不是获利最少的。在16世纪初，上述两种趋势同时迅速发展，当时还鲜为人知，必须被解释为各种形式商业活动大发展的结果。来源于贸易的巨额收入的增长导致一种新的商人阶层的出现，甚至在寺院捐赠世俗化使得土地投机成为一代人的癖好以前，这些商人的企业已不局限于海港和享有特权的城镇，而是发展到购买土地不动产。”托尼（R.H.Tawney），《16世纪的农业问题》（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12年），第187页。

[106] “在16世纪，资产阶级与君主制联系在一起，并为国王服务，他们总是处于消失的边缘。这一阶级并不只有破产的危险。如果他十分富有，或者对商人生活的危险感到厌倦，他就会购买官职、地租、头衔或封地，使自己受贵族生活的诱导，享有贵族的声望和平静的懒散。为国王服务使他们很快被封为贵族；也是通过这一途径（并非不考虑别的途径），资产阶级消失了。”布罗代尔，《地中海》，第2卷，第68页。

[107] “隐退过食利者生活的癖好并不难理解。在海外积极从事贸易所承受物质风险并不总是致富机会能比得过的，随着外国市场的缩小，这种机会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能获得高利息资本可能仍然十分稀缺，……（这种过程）只是新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首先，一些人不是在仍然十分商业化的职业以外，而是在这些职业内部寻求并且获得了安全。他们通过较小的方式在组织完善并受到保护的市场进行交易来获得安全……大部分贸易控制在拥有中等资产的人手中。作为中等阶层，他们寻求安全，通过合作、联合，更经常的是在数量上获得这种安全。”波斯坦（M.M.Postan），载于《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218页。

[108] 布洛赫（Bloch），*Caractères originaux*，第1卷，第129页。

[109] “资本主义与专制君主制的联系并不总是有利于资本主义。无疑，从16世纪60年代起，影响全欧洲和国家统治的破产现象绝不是商业资本主义在这个大陆发展缓慢的不重要的因素。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缓慢发展从长远看，对绝对君主制是有利的。它妨碍了资产阶级的过快发展，有助于维持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相对平衡，这的确是西欧专制主义的特征之一。”哈通和穆斯纳（Hartung and Mousnier），*Relazioni dex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第4卷，第45页。

希尔（Christopher Hill）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垄断本身并不坏：它们是保护落后国家新工业的一种形式。最早的垄断关系到国家防卫——伊丽莎白皇家矿产公司旨在使国家在火炮制造方面不依赖外国的铜。在硝石、火药方面也有类似的垄断。当垄断被对资本主义发展怀有敌意的政府用于财政目的时，这种垄断很快就成为有害的了。17世纪建立的垄断，目的是为了销售……”《工业革命的变革》，第96页。

[110] “他们不仅提到了规模经济，也提到了通过外部因素‘内在化’（通过重组产权）、降低信息成本（通过经纪业）、减少风险成本（通过联合股份公司）来减少交易成本。”见诺思（Douglass C.North）和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经济史评论》，第23期，第5~7页。

[111] “他们不仅提到了规模经济，也提到了通过外部因素‘内在化’（通过重组产权）、降低

信息成本（通过经纪业）、减少风险成本（通过联合股份公司）来减少交易成本。”见诺思（Douglass C.North）和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经济史评论》，第23期，第8页。

[\[112\]](#) 库茨纳茨（Simon Kuznets）正确地指出了国家对企业有用处的关键因素：“当国家内部和人民中存在着冲突，这些冲突又常常直接和明显地影响到经济增长的主要选择时，主权国家的存在无疑意味着决策的可能性。”《作为经济增长研究单位的国家》，《经济史杂志》，第6卷，第1期，1951年冬季，第28页。

第四章 从塞维利亚到阿姆斯特丹：帝国的失败

形成中的欧洲世界经济是一件伟大的赠品，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总是试图控制它。帝国统治的路线是为该时代的人们所熟知的古典路线。不少人梦想着这种可能性。查理五世（Charles V）统治下的哈布斯堡家族（Hapsburgs）为把整个欧洲纳入其股掌之中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到1557年，这种尝试即已失败。这样，西班牙不仅不可挽回地失去其政治上的帝国地位，同时也失去了经济上的中心地位。许多城市渴望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塞维利亚（Seville）、里斯本（Lisbon）、安特卫普（Antwerp）、里昂（Lyon）、热那亚（Genoa）以及汉堡（Hamburg）这些城市，即使没有公然声称，也在做着这种美梦。但事实上却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个在1450年看起来还无多大希望的地方，到1600年已然捷足先登。现在我们看看帝国的失败，正是这种失败导致了西班牙的衰落，以及其全体同盟城市赞同阿姆斯特丹成功的反叛。

前述大约开始于1450年的经济震荡首先在那些过去的贸易中心，即所谓欧洲的脊梁——佛兰德（Flanders）、南德意志（Southern Germany）、北意大利（Northern Italy）；当然也包括作为地理大发现结果之一的西班牙，这些地区产生过昙花一现的繁荣。这些地方是如何准确地拼凑成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这一点的确引人注目。在这个扩张中，最新和最具意义的因素是16世纪及它的东印度贸易公司（Casa de Contratación delas Indias）为中心的大西洋沿岸的贸易，这种贸易如此重要以致“欧洲生活的一切方面乃至整个世界的的生活（某种程度上的世界），可以说都依赖于这种贸易。塞维利亚以及关于它的消

息.....会告诉我们世界的节奏。”^[1]

西班牙是怎样扮演上这么一个中心角色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在15世纪欧洲的海外扩张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毕竟是葡萄牙（Portugal），而不是西班牙。此外，在西班牙历史上，15世纪也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正如维森斯（Jaime Vicens Vives）所说“危机一同概括了15世纪的西班牙历史”。^[2]

危机是政治的（一段时间的起义和内部战争），也是经济的（整个欧洲价格下跌）。西班牙在经济危机方面的反应是发展它的羊毛工业，并且，由于低价的结果，获得了（已经萎缩了的）世界市场的相当可观的一部分。^[3]在西班牙，羊毛生产者集团，梅斯塔（大牧羊主）

（Mesta）的力量体现为，那些由潜在的卡斯提尔（Castilian）资产阶级分子试图让国王来用保护主义政策的努力在14和15世纪全都失败了。^[4]维森斯发现，甚至在斐迪南（Ferdinand）、伊莎贝拉（Isabella），这些被推测是工业活动的支持者的天主教君主的统治下，前面提到的工业要么“只生产奢侈品，要么仅拥有本地市场。”^[5]不像英国，西班牙并未努力发展重要的纺织工业。^[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英国踏上工业增长之途的，事实上完全有可能是那些掺和着晚期中世纪不景气的卡斯提尔人的竞争。但事实上，西班牙没有采取这条道路。

然而，如果西班牙的经济整个儿是如此的薄弱，我们又怎能解释它在16世纪前半期的经济中心地位？部分原因是这种薄弱由来已久，而非匆匆一现；部分原因是，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制度太强大。卡斯提尔在整个中世纪始终有一种明显的“民族的”任务。一方面，存在着再征服（Reconquista），即从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逐出摩尔人（Moors），这在穆斯林格拉纳达（Granada）没落之际达于顶点，还有是从西班牙驱逐犹太人，这两者都发生在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一年。另一方面，存在统一西班牙的基督教城邦的运动。这个运动

仅在阿拉冈（Aragon）保留独立的立法、城邦预算及社会法律制度之时达到高潮。

因为西班牙是建立在反摩尔人征服之上的，作为政治形式上的封建主义相对软弱。^[7]结果，正如马拉瓦尔（José Maravall）所说，“作为一种不是奠基于封建结构之上的社会政治秩序倒为‘国家’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空间”。^[8]一流的制度应使中心与边缘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络方便容易。^[9]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帮助梅斯塔（Mesta）创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市场体系。^[10]他们提供了一种独具灵活性的体制，尽管这种体制并未超越维护社会阶层、等级制度价值观的樊篱。^[11]他们强化官僚政治，使其成为“植根于全体居民的一个整体……”^[12]比如说，他们使天主教士们西班牙化。^[13]总之，他们创造了“卡斯提尔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实现的环境”。^[14]

如果金银涌入西班牙，如果卡斯提尔能翱翔在欧洲天空的中心，维勒（Pierre Vilar）说，“那既是原因也是结果”。^[15]然而确切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围绕金属品的经济地位其实有一系列的情况：地中海世界脆弱的银根基础，黄金供给者苏丹（Sudan）先前的中心地位，葡萄牙人对意大利各城市在北非中间地段扩张的压力，热那亚人在西班牙的地位以及热那亚人试图寻找非葡萄牙人所属的金银来源（只有西班牙处于这种替补地位）等等。

现在让我们追踪一下这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谈到在中世纪贸易中贵金属的地位，以及苏丹的黄金是怎样经由基督教的地中海世界抵达欧洲。在15世纪中叶，北非的地位突然大大下降。这种下降的程度似乎存在一些讨论。布罗代尔（Braudel）谈到过北非地位的崩溃。^[16]马洛维斯特（Malowist）承认下降但并不称它是灾难性的。^[17]突然的金银短缺加重了西班牙国家的财政负担，这种负担一直因不断提高的军事和宫廷支出而增加，以至于造成马拉维第（Maravedi）——记账货币价值的

下跌。^[18]

财政危机的严重性在于，它引起西班牙的热那亚人的不满，因为这些热那亚人既是西班牙的银行家，也是金银的购买者。我们已经谈论过热那亚人在西班牙商业中的地位。热那亚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卷入，而不仅仅是作为金融家的身份。^[19]然而为什么热那亚人不能获取经由葡萄牙而来的金银？或许葡萄牙作为新航线开辟的首要国家本身的力量就意味着它给热那亚人的条件不如西班牙供给的那么优惠。^[20]也许正因为它自身的强大导致其开拓精神的匮乏。开拓精神通常反之是那些近距离的财路已然被堵塞的人对中距离财路的探寻。财路畅通之际就是开拓精神受人冷落之时。葡萄牙已干得很漂亮，它的船队直下非洲海岸。它没有感受到西航的冒险所带来的压力。^[21]肖努（Chaunu）竭力说明在解释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发现时不能归因于运气正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不仅仅是把握出现的时机，而且要为自己创造时机”^[22]这么一个时代的转折时刻，西班牙最具条件。英国雇用意大利人卡波特（John Cabot），但他的第二次“英国的”探险却要求“西班牙式”的赞助。到17世纪法国和英国才成为海外探险的国家；直到18世纪他们才真正成功。^[23]

不管怎么样，16世纪的西班牙在美洲创立了一个其海上运输的成本所许可的那样庞大的帝国。^[24]这意味着横越大西洋的海上贸易发展速度闪电般地增长。1510年至1550年之间增加8倍，1550到1660年间又增加3倍。^[25]这种贸易的中心是塞维利亚的国家垄断，但这种垄断则在多方面成为西班牙主要的官僚主义结构。^[26]大西洋贸易的中心项目是黄金。首先，西班牙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印加人（Incas）开来加工、用于祭祀的黄金。^[27]这是一个财源。就在这个财源行将枯竭之时，西班牙人又成功地发现了怎样找到银矿的方法，这使他们得以有利可图地开来贮量丰富的白银，正是这一点，真正意味着大量的贵金属涌入欧洲。^[28]

伴随着贸易速度“闪电般增长”的同时是在欧洲引人注目的扩张。及至1519年，查理五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时，他在欧洲的辖区已经涵盖了如下各不相同、互不毗连的地区：西班牙（包括阿拉冈）、尼德兰、南德意志（包括奥地利）各部分，波希米亚（Bohemia）、匈牙利（Hungary）、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米兰（Milan）以及西班牙的地中海地区属地[那不勒斯（Naples）、西西里（Sicily）、撒丁尼亚（Sardinia）巴利阿里群岛（Balaerics）]。一时间，这个帝国在规模上竟与苏里曼（Suleiman）时代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恐怖伊凡（Ivan Terrible）之时的莫斯科帝国并驾齐驱，似乎将要吞噬欧洲的政治空间。新生的世界经济似将成为一种最高权力形式。查理五世试图将欧洲世界经济操于己手的做法并不孤独。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也有此野心，^[29]而且法国拥有国土宽广、地处中心之利。^[30]但是法国缺乏实现这种野心所必需的财源，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是查理五世而不是法兰西斯一世这一点，对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尽管如此，地处西班牙帝国“心脏部位”^[31]的法国，其强大足以使随后的50年成为两个庞然大物——哈布斯堡和瓦罗亚（Valois）之间不断角力的历史；这种斗争最终导致双方在1557年处于精疲力竭状态，迁延已久的欧洲霸主梦亦随之破灭。

法国与西班牙，这两个巨头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斗，主要战场在意大利半岛上。先是1494~1511年的法西战争，继之则是持续到1559年的哈布斯堡——瓦罗亚竞争（Hapsburg-Valois）。^[32]就帝国而言，围绕意大利争斗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北部意大利诸城在晚期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上一直是“最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活动中心。即使他们不再垄断远距离贸易，在积累的资金和经济方面仍然算是强大的；^[33]因而，一个理想的世界帝国必须抓住对他们的控制权。在支离破碎的意大利政治版图上，^[34]只有伦巴底（Lombardy）发展了一个控制中等面积领土的相对强大的城邦机构，^[35]但要作为政治意义上的生存还是明显太小一点。^[36]

事实上，我们正在谈到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域，“一个狭小的都市四边形的，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和谐，他们之间矛盾重重的竞争，每一个城市都有些微不同的分量……”。^[37]政治问题对这些城邦（正如对佛兰德那些城邦一样）来说，从事就是“将自己从封建干涉里〔解放出来〕，同时，〔预防〕那些新的君主制度要求的权力更加集中的政治控制所形成的新的威胁。”^[38]他们避开新君主们威胁的方式之一是“与一个帝国搭上关系”。^[39]所以，尽管卢扎托（Gino Luzzatto）将1530到1539年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描述成为意大利沦为“西班牙对这个半岛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40]而且科尔斯（Paul Coles）也说过类似的话，“16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明显的主题是法国和西班牙帝国主义对意大利的争夺”，^[41]这些城邦在多大程度上抵制这类“支配”仍然不太清楚。他们很有可能考虑到那是他们的最佳选择。我们应该记住这是一种世界经济，记住，经济活动的兴奋点及那些重要的经济组织的“族籍”与政治决策中心所关注的模式没有任何关系。在此种构架内，城邦与帝国结合主要是一种“利益的婚姻”。^[42]某种程度上这个比喻变成了现实。派克（Ruth Pike）指出，在塞维利亚的热那亚人数量增长的高峰发生在1503年至1530年之间，到该世纪中叶，这些热那亚人“广泛地控制了美洲的贸易，并对塞维利亚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43]然而，正如葡萄牙人曾经对先前的热那亚人冲击浪潮所作的反应，西班牙人用吸收的方式来融合他们：“随着16世纪热那亚人的归顺与同化日渐稳定，西班牙反而导致了自已的后裔不事商贸。”^[44]

除了控制四个主要的意大利城邦中的三个外（威尼斯在它的控制之外），查理五世的帝国还有两个另外的经济支柱：南德意志的商业银行（尤其是福格家族（Fuggers））和“第一个”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一大中心——安特卫普（Antwerp）。

位于阿尔卑斯山（Alps）另一边那些南德意志商业城市的情形与北意大利那些商业城市在实际上并无太大区别。比如，洛培兹

（R.S.Lopez）就提到：“在15世纪；那些发展速度最迅捷的地区位于南德意志和瑞士的城镇。”^[45]从1460年到大约1500或1510年，中欧的银矿开采速度增长极快，这为经济的增长进一步提供了资源。^[46]16世纪贸易的扩张似乎仅仅提高了德意志作为北意大利与佛兰德之间贸易渠道的地位。^[47]首先，甚至沿大西洋贸易没有增长，地中海贸易的相对衰落似乎也影响他们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当他们能从哈布斯堡帝国网络之内的大西洋贸易中获取利益时。^[48]

这是一个所有现代商业资产者——福格家族最春风得意的时代。他们力量的最高时期，查理五世时代，有时就被称作福格家族时代。福格家族为查理买下帝国皇位。^[49]他们是他帝国的财政精英，优秀的私人银行家。当代的编年史家，森德尔（Clemens Sender），说他们：

福格（Jakob Fugger）及他们的侄甥的名字闻名一切王国和领地；当然，也闻名于异教徒中。皇帝、国王、诸侯、贵族赋予他威名，教皇视他为亲爱的儿子拥抱他，红衣主教在他面前要起身。世界的商人们称他是启蒙者，异教徒们因他而惊讶。他是德意志的荣耀。^[50]

福格家族与查理相互依托，但也意味着同步升降。因为，福格家族的活动实际上“仅限于查理的帝国之内，而帝国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性……帝国被视作世界性的……”，^[51]“当查理和他的继承者们付不出钱时，福格家族也就断了财源。到17世纪中叶，福格家族因哈布斯堡王朝欠债所造成的损失总数不少于800万莱茵荷币（Rhenish gulden）。”^[52]

然而比北意大利或福格家族更为重要的是安特卫普，它“在16世纪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主角”。霍特（J.A.Van Houtte）考察过布鲁日（Bruges），14世纪一个“民族市场”中心（就佛兰德而言）与安特卫普之间的重大差异。16世纪的安特卫普乃是一个“国际市场”中心，它联结着经由南德意志的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之间，横贯欧洲大陆的贸易。^[53]安特卫普不仅仅协调哈布斯堡帝国的不少国际贸易，而且也是英国和葡

葡萄牙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关键。^[54]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它是英国不可缺少的一环。^[55]如果它能扮演这个角色，不管事实怎样，如英一意贸易在经哈布斯堡中转时，其运输成本更为低廉，也恰恰是因为它给那些帝国的商业中心有利可图的商人提供多种优惠。^[56]

另外，安特卫普在这时期成了欧洲最大的银钱市场，“主要是因短期信贷增加的要求，查理五世皇帝的世界政策引起的……”^[57]安特卫普不仅仅为帝国的证券交换服务；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城市本身也成了查理主要的贷款者。^[58]由于帝国没有可靠的税收基础，所以他们发现要想相对容易地获得现代类型的国家产业贷款是很困难的。一个16世纪的帝国由于其君主制的统治具有某种程度的信誉。^[59]这样，他不得不转向作为“公共财富中心”^[60]的那些城市以保证得到他的贷款。但是城市在信贷上也受限制，他们转而需要诸如福格这样一些大家族的保证，这正如朗彻（Lonchay）所描述：

城镇的信贷，正如地方的信贷接收者一样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金融家们在同意贷款给政府之前要求有偿付能力，最好是一些大银行家的担保。所以，在1555年，商人们以担保人的身份要求国家或是福格家族出具20万英镑贷款的保证书。匈牙利的马利亚（Maria）要求奥特尔（Ortel），该家族的管理人承认他，作为回报，以税收为他作保（收益间接税）（le produit des aides）。^[61]

这样，查理五世、卡斯提尔、安特卫普、福格家族全都搅进巨大的信贷网络及基于希望与乐观主义的利润诱惑之中。

从1530年代开始，增长的大西洋贸易给安特卫普一个新的扩张阶段。^[62]以南德意志商人为主的横贯欧洲大陆的贸易和西班牙人（含热那亚人）的大西洋贸易会合于也作银钱中心的安特卫普，这两个商业中心的联合创造了一种“狂热的资本繁荣”景象。^[63]这种繁荣有其自身的原动力，它主宰了哈布斯堡被公认的世界帝国的政治行政管理结构。帝国受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金融世家的困扰，一方面是由于正席卷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社会危机，同时也因企图鲸吞欧洲其余部分导致的冒险。这

样，帝国要么不得不破产，要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者证明是更为强大一些。让我们考察一下帝国操纵下的两个家族。

就政治意义而言，1450~1500年是德意志“诸侯国地位巩固”的时期，这是困难的任务，但也部分获得成功。巴拉克勒夫（Geoffrey Barraclough）写道：“诸侯们.....使德意志从根深蒂固的无政府状态中摆脱出来.....”^[64]不管怎么样，巩固很不完整。当宗教改革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开始侵犯这种新的繁荣之时，正如其他国家在这种时期所能做的一样，政治上的分野使它不可能控制骚乱。^[65]德意志“民族的”失败曾经被赋予种种解释。拿破仑曾经说过，是查理五世企图自己领导德意志新教诸侯联盟的失败。^[66]恩格斯也曾详细地讨论过，说它是路德（Luther）与中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理想的恐惧。^[67]托尼（Tawney）也将其与英国进行比较：在英国，农民（即自耕农，yeomen）在别的阶层中找到了有意义的联盟，并被认为其重要性“足以使他们成为那些关心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们忧虑的对象。”^[68]

是什么导致了社会危机？这种危机伴随着一种政治上的自我挫败性质，这与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所经受的完全臣属在结果上并无有大区分。或许有共同的原因，那就是缺乏一种甚至处于胚胎状态中的国家机器。16世纪早期的“德意志”是一幅分裂的“民族主义者”情绪多么强烈的极好图景，即使这种分裂情绪不是以一种行政管理实体的内部组织中滋长期而是超前出现。查理五世不能领导德意志新教主义者，因为他身陷帝国之中。在国家根本不存在之时，德意志政治家并不从民族利益的立场去重视农民（yeoman）的需求，不管他们之间的政治妥协会获得何种选民。人们宁愿进入政治竞技场，尽管在这里他们得到的可能是毁灭。这是一些公侯，既然他们小得不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便只好转向外面的恩人。结果便是步履踉跄乃至走向深渊。

最危机的时刻似乎一直是查理五世早期的统治年代。泰勒

（A.J.P.Taylor）认为有些戏剧性但并非那么重要：

查理五世的早年是曾经失去且将永不复返的哥特文化时期。作为创造一个民族的中产阶级的德意志时期在1521年永远失去了，至少持续数世纪之久。非常明显，到1525年，民族形成的时期已经过去，从那时开始了连绵不绝长达250多年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稳步迅速的发展.....^[69]

总之，骚乱一直以一种非常严重的形式持续到1555年奥格斯堡条约（Augsburg）的签订，条约对散乱的德国问题的解决，是基于“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基础之上的。即便这样，骚乱也未结束。在7世纪早期，德国成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的战场，经历了人口的减少与经济的衰退。

然而，德意志的骚乱不仅仅是一个查理五世的问题，而且这可能还不是最大的。这肯定不足以说明帝国何以崩溃的原因。它为何分崩离析？为何它最终实质上削弱了西班牙及西属拉丁美洲？而且末了西班牙为何会失其优势成为欧洲边缘地区的一部分？肖努（Pierre Chaunu）看到西属美洲经济重要性的上升，它对哈布斯堡帝国经济生活的中心地位，甚至在全欧，“不是查理五世国家分裂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70]艾略特（J.H.Elliott）和卡拉德（Ramón Carande）也持类似观点，查理五世的欧洲帝国主义对西班牙，尤其是对卡斯提尔来说，代价过于高昂。^[71]布罗代尔认为，甚至已经缩减的帝国（西班牙、尼德兰，没有中部欧洲）就其控制高水准的财政势头的能力而言，也是“太大了”，以至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些观点似乎都认为在入不敷出的通货膨胀之时，政治上的极端是一种财政负担，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72]西班牙是一个帝国，而在16世纪适合它的，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官僚政治未能充分发展，因为帝国的西班牙要求一个其资源、人力及财力所不及的更庞大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谓西班牙官僚政治“迟缓”的根本原因。^[73]

我们似乎不得不再次面对一种凌驾在世界帝国体系之上的世界经济

在结构上的优势。例如，科尼斯堡格（H.G.Koenigsberger）就描述了西班牙在开拓西西里殖民地的无能，将之归因于政治理论的缺乏。^[74]这在我看来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西班牙没有任何鼓励它在西西里建立贸易垄断的理论，因为，就官僚主义政治意义而言，它已然分得太散以致不可能合理地开拓它的帝国，它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维持在美洲的帝国，指挥在尼德兰的战争和统治西班牙之中。为了维护它在美洲的帝国，它不得不增设不断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保持对西班牙殖民者及他们在印第安贵族中的同盟者的控制。^[75]

西班牙帝国运转过吗？如果进行大幅度重构或许有这种可能，正如科尼斯堡格所说：“它最根本的缺陷是……税收基础的薄弱。卡斯提尔和白银供养并维持帝国；其余属地皆是程度不等的旁观者。”^[76]索尔德维拉（Ferran Soldevila）以文献证明了卡斯提尔人如何深思熟虑地从美洲贸易中排斥甚至像加泰隆尼亚（Calalonia）这样一个“亲密的”集团。^[77]然而即使它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也不可能获得绝对统治权，这正是我们的看法。如果加泰隆人（Catalans）与卡斯提尔人并为一体（他们没有），如果查理五世的帝国野心既没有耗干卡斯提尔，也没有将自己拖入帝国各部分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之中（这是些自我挫败的冲突），那么，西班牙倒的确有机会在欧洲的世界经济中成为一个中心国家。因而，西班牙的过分扩张注定要使查理五世及其后继者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1556年，帝国解体。查理五世退位。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查理五世的儿子接管了尼德兰。但是中部欧洲的领土则独立出去了。1557年，菲利普宣告破产。在西班牙—尼德兰土地上，当1559年菲利普进驻西班牙的政权重心又移到了西班牙。随即爆发了尼德兰革命（Netherlands Revolution），^[78]这场革命历经反复，大约80年之后，才以北部加尔文主义者独立联省（大致相当于当代的尼德兰）和南部天主教的所谓西班牙人的尼德兰（多少相当于当代的比利时）的分立而告结

束。但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是西班牙或哈布斯堡帝国的危机，它是欧洲世界经济演进的转折点。革命中最关键性的要素是1559年由西班牙和法国提出的卡托-坎布雷和约（Cateau-Cambrésis）的签订。为了理解和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首先看看另一个企图问鼎帝国宝座的野心家——法国的情况。

要说明在“第一个”16世纪中，西欧国家的窘境，法国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或许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带着相对强大的君主政治体制步出晚期中世纪。^[79]我们已经在前一章讨论了布洛赫（Bloch）对法国、英国及东欧，这些国家在16世纪时所有制状况差异的解释，这些解释基于对这些国家在中世纪晚期司法原动力的比较基础之上。正如我们所知，在英国的体制在14到16世纪为满足土地所有者的新要求，承认对所有权进行法律上的重新界定（确认）时，在法国这种界定却更为固定化的。布洛赫正确地表明这是16世纪法国“领地制权的颓废”，^[80]也确如库尔布恩（Rushton Coulbourn）所指出的，贵族阶层的政治力量导致一种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低能运转的经济结构。^[81]

在法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贵族与乡绅两个阶层相应的合并，这类事实有不少后果。让我们暂时来谈谈在世界体系中作为一种国家政策的内涵。米勒（Edward Miller）指出，贸易利益的政治力量在英国比在法国要大。结果，法国的贸易政策在晚期中世纪要开放得多。^[82]最后的结果就是，尽管拥有相对强大的官僚机构，16世纪早期的法国仍然比英国获得的“经济指挥权”要小，^[83]此种情形下的财政压力促使法国的君主们产生帝国野心，特别是因为哈布斯堡家族也有此野心。他们尝试过西班牙人进行过的海外扩张，但他们缺少国际资本的撑腰，这就是北部意大利人的资本。^[84]另一个选择就是在欧洲范围内，确切地说是针对北意大利进行了帝国主义的扩张。

法国拥有以里昂为中心的富有竞争性的国际财政与贸易网络。在中

世纪全盛时代，香槟（champagne）的集市曾是北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商人们下的汇聚地点。然而到13世纪晚期~14世纪早期，衰落降临。^[85]在15世纪，法国的君主们小心地培植里昂的成长，并鼓励它与该时代的大银行家——佛罗伦萨进行联系。^[86]16世纪早期，通过集中大量资本，里昂和安特卫普“在一定程度之内降低了个体金融家们的地位，（因而）以适中的比例积累大宗资本成为可能……”^[87]里昂并不像安特卫普那样是一个完全的国际中心，因为法国的君主们同时想使它成为“财政上的武库”。^[88]作为商业中心里昂也难以与安特卫普相比。总之，位居安特卫普之下。

然而，法国做过努力。哈布斯堡和瓦罗亚（Valois）这两个帝国同时衰败了。不仅是西班牙，法国也在1557年宣告破产。然而，即使在失败之后，哈布斯堡似乎也要夸耀他们过时的首要地位。这两个帝国在经济上的失败迅速导致军事冲突的平息和1559年的卡托-坎布雷条约的签订。该条约变更欧洲政治版图达一百年之久。这样，这些破产就不仅仅是财政上的重新调整。整个世界随即震荡起来。

震荡的不仅仅是一个特别的国家组织，亦不仅仅是查理五世面对哭泣的骑士们悲剧性的退位。震荡的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长达一百年之久；欧洲随即亦有新的繁荣。人们试图以过时的方式从中谋利。但是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高涨速度太快，以致不可能重建一个政治帝国来与这种经济景象相适应。如果同意的话，1557年标志着那种企图的失败和欧洲权力平衡的确立，这种权力平衡承认那些趋向形成民族的国家（让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拥有自己的地位，并得到仍然繁荣的世界经济的滋养。

危机是一种象征性的转折点。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第一个”16世纪的许多组织特征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告消失：1576年，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权力崩塌；1588年，无敌舰队（Armada）的失败；1598

年，维尔文和约（Peace of Vervins）及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的签订。因为决定体制的因素冰河般缓慢，体制重心的变迁就并非总是那么迅捷，这样，也就没有为这个变迁附注一个最合适的日期。

但是由于存在着变迁，这就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清楚这与欧洲世界经济相关的含意。让我们以托尼（R.H.Tawney）对“第一个”16世纪体制重心的描述开始：

在其经济组织中，国际贸易的机构达到一种不次于三个世纪之后所达到的效率状态。该时代以前最有效能的经济体制被西班牙与尼德兰的争斗、法国的宗教战争毁灭，大约有10至12个商业银行，他们的银钱市场就是欧洲贸易的财政权力中心，他们的意见和政策在决定财政状态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佛兰德（Flemish）、法国和意大利的城市里这种情形达到了顶点，而英国则是一个小学生；16世纪金融机构的实质是国际主义的，是每一个资产者随心所欲地从事任何交易，是一种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在主要的市场的运行上带有相互同情的迹象，在大规模资源的动员上具有以国际金融战略出发的效果。它的中心和象征是在安特卫普的交易所，以及它那颇有含意的献辞，“Adusum mercatorum cujusgue gentis ac linguae”（为各民族各语言的商人所享用），在那儿，正如圭查尔狄尼（Guicciardini）所说，能听到普天之下的每一种语言，用威尼斯人（Venetian）的话来说，在里昂的集市，形成了“整个意大利和西班牙、尼德兰的大部分金银交易基础”。^[89]

托尼说这种体制的崩溃是由于毁灭性的战争。事实的确如此，只不过这也太立竿见影了。在前一章里我们认为，较合理的原因是面对16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的冲击，它无能使帝国的体制运转起来，其结构之弊端甚多，即相当低水平的生产率，以及面对基于一种散乱的中等规模的企业经济扩张官僚体制的软弱性。

一种严重的瓶颈式的阻塞加重了帝国国家机构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并导致了帝国在该世纪中破产的通货膨胀。查理五世向一切国家及其商人寻求财政来源：那不勒斯（Naples）、西西里、米兰、安特卫普、卡斯提尔。^[90]这次争论的正式爆发是由豪泽（Henri Hauser）而起，他说，1559年欧洲的财政危机“可能阻碍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演进，并且推动了经济地理的变革。”^[91]他认为，开始于1557年的西班牙和法

国的战争显然削弱了国家可能违约的信贷声誉，这使得两个国家在1559年仓促签下了卡托-坎布雷和约。

扩张的哈布斯堡有一个极大的后果，就是它直接导致西班牙衰落的开始。^[92]危机导致了安特卫普与英国关系完全破裂，使得后者能够自由地与阿姆斯特丹发展新的富有成效的联盟。^[93]而在安特卫普内部，那种基于与西班牙轴心关系之上的繁荣也告结束。“1557年菲利普二世的破产带来了最终决定安特卫普命运的破裂。”^[94]

通观佛兰德，危机导致了加尔文主义者趋势的强化，尤其是在那些熟练技术工人中。1567年，西班牙派阿尔法（Alva）公爵去镇压新的社会政治骚乱，但该行动导致大批加尔文主义者商人和工匠成群结队地逃向新的国家，^[95]到1585年，佛兰德的工商业崩溃，“萧条延续了很多年”。^[96]掺和了基于这种灾难性后果之上的社会政治骚乱的尼德兰革命，在低地国家的北半部创造了一种灵活的政治机制，其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地位开始于16世纪晚期。^[97]

南德也不景气。卢扎托（Luzzatto）指出，“侵袭他们最严厉的风暴最初是债务问题，就是西班牙王室的破产，它整个地席卷了不仅仅是福格家族而且包括大部分南德意志商业银行家的私有财产。”^[98]随着经济的恶化，以前南德意志与北部意大利城市的商业伙伴开始相互侵蚀商贸领域，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情况。^[99]

这个灾难对德意志人来说有广泛的政治后果。巴拉克勒夫（Barraclough）所说的“为反抗帝国的衰败的新教徒主义的革命因素……，带有强烈的民族特征”正席卷德意志。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查理五世卷入他的帝国本身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将其政治资本投进德国的统一之中，对此，并不超过他对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重视。教随国定（*Cuius regio*）的妥协扶助了德国诸侯，削弱了德国资产阶级，粉碎了德国统一的希望达数世纪之久，德国大致分成路德教的北部与东北

部（后者在经济上至少属东欧边缘的部分）和较富裕一些的西南天主教地区（包括部分莱茵国家）。正如泰勒所说“两地的发展都是一种文艺复兴繁荣时代之后的退却，这几乎遍及全德……”^[100]甚至在相对富庶的西南地区，到17世纪手工业也趋于退却。^[101]泰勒也许夸张了16世纪早期德国的繁荣和经济领先地位，但他对新生的经济发展的戏剧性的衰落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102]

这样，查理从政治上对欧洲世界经济的统治就给西班牙、德国、佛兰德和北意大利诸城市以及那些与帝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商业银行带来了消极后果。帝国大厦的建立似乎是一件值得尝试的合理的事，甚至不乏这种可能。但它失败了。

我们已在相当的程度上谈到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史。为了把握西班牙的衰落对美洲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最好是在这里简单地描述一下帝国的内部情形。西班牙在加勒比海（Caribbean）及其沿岸地区（后来的墨西哥、危地马拉及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Chile）建立了殖民地。总体来看，这些殖民地构成不仅仅是欧洲，尤其是对西班牙经济上的补充。西班牙没有行政管理能力在美洲创立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所以，他们就利用帝国过去的权宜之策，将那些当地酋长或强盗首领吸收过来，作为国王和西班牙殖民者在那里的间接代理人。^[103]

西班牙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自己的殖民者。为了使他们保持政治上的忠诚，帝国给了许多经济上的特许。其中之一是阻挠印第安人从事畜牧业来限制他们的经济自主权，这种畜牧业使他们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富有竞争性。^[104]进一步说，不是印第安人从这个有利可图的活动中被驱赶了，而是活动的成功从经济上动摇了他们，因为在中美洲正如在英国一样，羊也吃人。^[105]尽管殖民者要依靠持续不断的西班牙的援助，他们并不对印第安人及非洲奴隶的反抗有太多的敌视，对英国和其他侵入他们的贸易领域或利润圈的人亦是如此。^[106]这样，虽然他

们与国王及其官僚机构偶尔也有不快，但始终未能形成一种自发的力量。此外，殖民者们，许多人出身微贱，也受益于殖民地作为出口经济这样的事实。^[107]

正如通常所发生的，在帝国的内部，准帝国主义者会增长起来——一种层层相叠的结构。我们可以谈一下墨西哥（指的是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殖民”秘鲁（Peru）的情况。墨西哥有多得多的人口。整个16、17世纪，那里的价格水平存在经久不息的波动。墨西哥向秘鲁出口生产产品、奢侈品和奴隶，以换取硬通货和水银。^[108]当菲律宾人

（Philippian）进入西班牙的贸易圈时，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就成了马尼拉与利马（Lima）之间的中介人，切断了西班牙与马尼拉的直接联系（Spanish Manilenos）。^[109]这类从墨西哥到秘鲁经由马尼拉的中间商品的再出口就变成了殖民地内部贸易的主流。^[110]西班牙王室做过不成功的尝试去破坏墨西哥的地位，因为它正在分享卡斯提尔的利益。“没有谁会持异议”，肖努（Chaunu）说，“16世纪的墨西哥之于秘鲁恰如一个宗主国之于它的殖民地。”^[111]

“第二个”16世纪的欧洲，掺和着经济矛盾的政治扩张的后果之一是大量的西班牙人涌向美洲。^[112]这就为那些需要工作的人提供了出路，而且为西班牙国家提供了直接的收入来源，因为在美洲的殖民官僚机构中的职位可以出售。^[113]另一方面，那些在美洲面临经济困境、靠土地活口的不断增加的西班牙人与在早期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印第安人口的灾难性的减少，这两者结合起来产生了美洲西班牙帝国的“萧条期”，^[114]结果是逐渐导致了以劳役偿债为基础的种植园体制的增长。^[115]但是种植园是一个比大农场更小的经济单位，^[116]是一个精明的殖民者相对自足的世界。^[117]西班牙自己也发现了正在发展的体制一方面在降低其经济收益，一方面在增加政治上的困难。当西班牙继续忍受帝国的政治代价时，别的欧洲国家要想从西属美洲获利却不难。^[118]

因此，在1557年之后的时代，西班牙不仅失去了帝国的中部欧洲地区，而且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后还失去了尼德兰。它也正在丧失残留在殖民地的利益。进一步说，北美作为西班牙如此重要的收入来源，占总量的10%之多，导致了西班牙减缓扩张的进程以便巩固其既得的利益。^[119]然而，减缓绝非权宜之策。

西班牙的没落一直是现代欧洲历史学的一个大课题之一。其原因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西班牙没有（或许是因为它不能够）建立促使西班牙的统治阶级能从欧洲世界经济形成中获利的国家机器，尽管在16世纪西班牙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占据位居中央的优势位置。这就意味着，“中心”地带并非就是那些所谓最“中央”的地方，无论就地理位置或是贸易运动而言。

在迈入16世纪之际，西班牙已然因经济机制上一些潜在的缺陷受苦。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流动的牧羊人相对有组织的力量对农民（Yeomanry）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阻碍，因为他们能够保留反对圈占耕地的特权。在英国，养羊业流动性相对较小，而且与允许不动产登记缓慢增长的圈地制度相处更为和谐。^[120]其次，缺少有意义的工业区，仅有的一些（卡斯提尔的布、丝）也在1590年的危机中破产。^[121]维森斯（Vicens）有些神秘意味地将它归咎于“卡斯提尔领会资本主义世界的失败”。^[122]不管怎么样，他关于危机后果的经济主义式的描述表明消费模式至少是帝国众多衰落因素之一：

恰恰是那些有钱人[旧贵族，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埃克斯塔马杜拉（Extremadura）的乡绅及退休的政府官员]通过建筑（教堂、宫殿和修道院）使货币僵化，通过艺术品使货币圣化。但没有谁屈尊动念从事工业，甚至简便的商业。^[123]

类似的投资模式走向也影响那些对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倾向的加泰隆（Catalan）市民。布罗代尔谈到他们从商业领域转向文化领域的投资正在增加。“这难道不是巴塞罗那经济戏剧的一个片断吗？巴塞罗

那的市民阶级开始将货币投放在土地上，而不再继续用它进行海外事业的冒险。”^[124]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该时代欧洲最重要的帝国中心的市民正将他们的海外投资转向谷物的增长上，而不是建筑他们的工业基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25]这里存在另一个困惑。许多学者有维勒（Vilar）类似的评价：“使西班牙寄生性富裕起来的那些金块银条……流入了那些购买力最大的国家。”^[126]维森斯也说：“的确，卡斯提尔在与欧洲其他国家争斗的紧急时刻依仗的是从来自美洲的金银。”^[127]

这里有一个因素可以肯定，那就是外国人长期处于关键性的地位：热那亚人、荷兰人、葡萄牙的犹太人、法国人。^[128]另外是查理五世不愿以“民族主义”角度考虑西班牙，也不愿在卡斯提尔的市民阶级受到一系列不利因素冲击之前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129]这些因素是价格上升，贵族的奢侈品消费以及通货膨胀和皇帝借贷造成的反保护主义后果，^[130]这一切都与泛欧洲的哈布斯堡帝国搅和在一起。这两个因素的后果，在西班牙内非西班牙人金融利益的优势地位和政府不愿（或许是不能）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导致了西班牙经济地位的逆转。^[131]

在不反对外国商人的同时，西班牙倒是走上了一条驱逐西班牙的非天主教徒的自我毁灭的道路。西班牙作为领导反对欧洲新教主义和地中海沿岸的伊斯兰主义的国际地位（曾经在1588年遭受了无敌舰队（Armada）的失败）必然导致在逻辑上一贯到底的国际主义政策。1492年驱逐犹太人，1502年、1525年驱赶摩尔人，在整个16世纪迫害马兰诺斯人（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Marranos）和“伊拉斯莫派”（Erasmians），西班牙在1609年驱赶了最后一个伪宗教少数民族，即所谓的摩里斯科（Moriscos）人。摩里斯科人约30万，大部分是农人，散居在巴伦西亚（Valencia）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132]摩里斯科人起义的“爆发”撕裂了西班牙人的内部社会组织。它部分标志着17世纪前10年经济后退的开始，同时也是西班牙国际形势恶化的起点。^[133]它是一个由西班牙带有市民阶级因素的人们发起的旨在反对大

领地主（Latifundias）土地贵族阶级的运动，其最后结果是要打破这个阶级与资本主义增长不相适应的垄断。^[134]但是土地贵族通过拒付由市民阶级提供的贷款捞回补偿以挽救自己，他们的行动得到政府的支持。^[135]维勒（Pierre Vilar）是这样概括其后果的：“这样，不仅没有伤害封建经济，反而重创了债权人自身：富有的自耕农（Labercurs riches）和市民阶级”。^[136]最后的后果带有双重性。一方面，“摩里斯科人的风暴打破了伊比利亚半岛一个多世纪的平衡。卡斯提尔受冲击后，就破坏了巴伦西亚和阿拉冈（Aragon）的依恃。”^[137]另一方面，它加深了已然严重的经济困难，促使西班牙寻求挽救其衰亡的短命的替罪羊。^[138]

同时，政府发现自己外债缠身，由于拒付债务可能出现预算危机（1557，1575，1596，1607，1627，1647），最后是，“不能预备更多的货币，就不能继续进行战争。”^[139]在国内，“查理五世不可思议的代价高昂的海外政策及其对支付这些政策的财政贷款的依赖”产生的结果，艾略特（J.H.Elliott）认为，不仅确立了“海外银行家对国家财富资源的控制，而且也保证了在卡斯提尔负担的正面冲击被那些至少能够承受它的阶级所承受。”^[140]西班牙的窘境早在1600年就被一个名叫冈萨雷斯（Martin Gonzalez de Cellorigo）的律师所预言：“所以，如果西班牙没有黄金或白银，那正是因为它有；其贫困的原因正是由于它的富有。”^[141]

伴随着没有能力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器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导致了广泛的强盗般的劫掠，对此，国家很难妥善处置。^[142]官僚机构的“迟缓”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重重困难造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僵化，“西班牙国王们的统治能以些微的变化和改革得以继续下去。”^[143]所以，尽管国家的收入在减少，国家仍能维持，甚至增加了寄生的宫廷官僚的奢侈品消费水平。

登峰造极的打击或许在人口数目的方面（如我们所说，当它发生的，即已作为各种内在因素开始起作用）。如果在“第一个”16世纪时西班牙的人口（或者说至少在卡斯提尔）不少且在增加，[\[144\]](#)那么到“第二个”16世纪这种情况即已不复存在，有种种原因：向美洲的移民，军事死亡，1599~1600年在安达卢西亚和卡斯提尔发生的饥馑与瘟疫，还有，如我们所知，1609年摩里斯科人起义的爆发。所以，并非因为西班牙比欧洲其他地区莫名其妙地缺少管理水平，[\[145\]](#)而是因为，如我们已提出的理由，国家机器建构的不足和不适当，[\[146\]](#)用艾略特（Elliott）的话说，“不利的环境太强大了”，而且西班牙证明“对长期收缩的现象有某种……过敏”，这是肖努（Chaunu）的话。[\[147\]](#)总之，西班牙没有成为欧洲首要的权力国家。相反，它注定要成为半边缘甚至边缘地区，直到20世纪，它才开始迟缓地回升。西班牙的衰落亦不是孤立的。它与那些与它升高曾经有联系的欧洲地区同时跌落下来：北部意大利、南部德国、安特卫普、克拉科夫（Cra-cow）、葡萄牙。总的来看，除葡萄牙以外，所有这些地方在本质上都是城市国家，他们既为哈布斯堡（与西班牙）帝国服务，也为世界经济服务。他们的繁荣并没有能在“第二个”16世纪的世界体系的重构中得以长期残存下去。

这个新的体系将史无前例地支配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其中心国家将相互交织在一种恒定的经济与军事的引力之中，向拓展边缘地区（正是拓展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特权挑战，并允许某些实体扮演一种特殊的、中间的角色，作为一种半边缘地区的权力。

中心国家自己也从哈布斯堡和瓦罗亚帝国的经济灾难中汲取财政教训。他们决意走出已经失控的财政迷宫。首先，他们寻求建立对进口的控制机构，这使他们能够保持一种有利的贸易平衡，这是一个在当时开始流行的概念。[\[148\]](#)但是国家并不仅仅关心贸易平衡。他们也关心恶劣的民族产品，尽管他们没有这样称，也关心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地位及对它的操纵。其结果是，正如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所指

出，到“第二个”16世纪末，“国家自身变成了信贷来源，而不是到目前为止仍在提供基金的银行。”^[149]

这样，就开始了一个转向内部的时期。总的来看，接下来的时期或许可以被认为，如沃纳姆（Wernham）所说，“是现代欧洲历史上最严峻和难挨的时期之一”，^[150]但是最初的矛盾反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国家之间暂时保持一种相对的平静——这基于一种产生了“争吵与仍易破裂的共存”的厌倦心理。^[151]

这种政治上的向内转变——即国家主义，也不必认为是一种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的本质有必然联系。回顾一下各国的人口是重要的。1600年法国估计有1600万人口，乃欧洲最大的国家，尽管众多诸侯国的德意志人加起来有2000万。西班牙和葡萄牙（1580年统一后）大约1000万，英国和威尔士（Wales）450万。人口密度差别极大。那些传统的工商业地区名列榜首：意大利每平方英里114人，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104人，法国88人，英国和威尔士78人，西班牙（和葡萄牙）另有44人。

绝对的人口数与密度则不准确。人口数意味着战争与工业的力量。它们也意味统治与吃饭的口数。正如我们以前的讨论中所提到，最理想的规模远远不太清楚。至于“第二个”16世纪，斯普纳（Frank C.Spooner）对人口扩大的经济利益表示怀疑。他谈到“减少的转变”。^[152]首先，在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西欧的经济活动处于一种相对轻松和恢复时期。”^[153]这是银通货膨胀时期，使德国的银矿竭尽开采；黄金增值，同时也刺激了欧洲的经济。^[154]白银通货膨胀的一个后果是，如托尼所注意到的，“到16世纪后半期，农业、工业和国外贸易都大大依赖信贷”。^[155]第二个后果是，对西方人来说，它明确地将经济重心从中部欧洲移到新的沿大西洋沿岸的贸易。斯普纳提到卡托-坎布雷和约，说它“并非结束了一个时期，而是开辟了未来”他说：“未来的

道路铺设在……横跨大西洋及世界的七个海洋区域。”^[156]

从经济上来看，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不是重心落在大西洋，而是向北部倾斜。佛里斯（Astrid Friis）讨论道，更确切地说，“在尼德兰和英国的特殊的海上贸易的扩张是与波罗的海地区货物尤其是谷物，进入欧洲其余的部分、进口的急速扩张相伴随的。”^[157]在她看来，金银、信贷及财政的危机并不是经济（及政治）变化的内因，而是它的结果。^[158]在此种情况下，银钱市场上紧张的直接原因是谷物的缺乏。^[159]其结果之一就是，大大地加强了阿姆斯特丹——其时已然处在波罗的海地区谷物市场的中枢，所以它就保留有比安特卫普和南部各省城市更多的偿债能力。

这样，我们就从塞维利亚步入了阿姆斯特丹。“第二个”16世纪的故事是阿姆斯特丹怎样孤立起哈布斯堡帝国的金钱，为世界经济编织一个平滑运转的网络。正是它使得英国和法国开始作为强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甚至具备强大的“民族经济”。

这些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世界经济第一个扩张阶段在该时期临近经济的结果。这是“大潮开始消退的时刻，似乎它的上升缺少克服障碍和阻力的必要能量”^[160]现在我们看看传统的人口与财政中心，低地国家与北意大利的反应。然后，在下一章我们将论述英国不仅仅作为欧洲第三个政权中心（还有法、西），而且也作为工业领域内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出现在历史舞台，同时讨论法国实现从帝国到国家主义转向的途径，它受从体制转换里获取足够利益的因素所制约。

该时期低地国家的重要性如何？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他给肖努（Chaunu）的论大西洋贸易的“大著作”（Magnum Opus）的序中提出——不，是肯定了——通过比较的来往于尼德兰范围内的贸易：

从经济史角度观察具有较大的深度；从世界与文化史角度看具有较大的广度：这种从北到南，从南到北的大量货物贸易之间有共同的地方，即有用而不珍贵……这类

沿海贸易，粮食的、物物交换式的，小宗贸易与短途运输——仅仅考虑到从美洲到欧洲的贸易，不计其数如贵金属对于恢复欧洲的经济与政治实体的作用，以欧洲强权的宏伟政策以至于加速和促进无数领域内社会制度：商人的致富及金融资产阶级增加，正如许许多多福格那样的家族达到了王公的水平；渐渐衰颓的贵族为保持其地位和荣耀只能靠剥削财富创造者的利益来攫取财富；身为欧洲长期霸主的哈布斯堡家族作为海外金银的主人：与这些伟大事件相比，这种地方性、主要由那些在朦胧的天空下拖着大腹便便的驳船所组成的家常便饭式的贸易（Trafic Casanier）到底有何重要性？[\[161\]](#)

事实究竟怎样？这是一个问题。即便费弗尔（Febvre）所列举的事实大体正确——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严重低估了北部贸易[\[162\]](#)——面对费弗尔的散文式的惊人华丽的辞藻我们也会犹豫。因为这种地方性的、家常便饭式的贸易为新兴工业和城镇居民提供了原材料和食物。[\[16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奠定和规定了新的欧洲劳动力的分布。毕竟，贵金属必须用于购买现实的货物，正如我们所知，对西班牙而言，贵金属的意义并不比各类等算它的账目更大。

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围绕低地国家贸易的经济中心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运转世界经济财政与商业中心所必需的新技术的特殊问题。它要求这样的技术，即使荷兰能够掌握从葡萄牙人手中接买过来的世界香料贸易，如同我们从“第一个”16世纪转移到“第二个”16世纪一样。[\[164\]](#)

就欧洲内部贸易而言，低地国家的重要性当然不是新鲜事情。正如宾多夫（S.T.Bindoff）提醒我们的，“从11到17世纪的尼德兰……是欧洲贸易枢纽之一……”[\[165\]](#)我们已经谈到了安特卫普在“第一个”16世纪的关键性的地位。[\[166\]](#)安特卫普在1559年衰落，[\[167\]](#)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其延续性并不明显。如我们所知，阿姆斯特丹填补了这个空缺，但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理解这个事实的一种方式是把它的失败看作是英国的失败，正如荷兰的成功一样，这个失败“延缓”了英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168\]](#)

这样，阿姆斯特丹的成功不仅在政治上同时在经济上也具有重要意

义。但是，什么政治结构使这个成功成为可能的呢？16世纪的最后50年不仅标志着阿姆斯特丹的兴起，而且还包括尼德兰革命，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界限如同其社会内容一样模糊不清（更确切地说是^{有争议}）。

首要的问题是，这是一场革命吗？如果是，那么是民族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还有，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何区别？我不想^{在革命的概念上}离题太远。我们也不打算为讨论这个问题而一定要进行这个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强调，在我看来，就尼德兰革命而不是现代任何别的“大革命”而言，这个问题并无太多歧异（可以肯定是不能再清楚了。）

历史文献在解释它时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有人认为革命本质上是“荷兰”民族——即北部尼德兰人，加尔文主义者为了自由与独立与西班牙政府进行斗争的历史，而后者则得到“比利时”（南部尼德兰人）的天主教徒的支持。另外有人认为它本质上是全体尼德兰民族勃艮第人（Burgundian）的反叛，得到了所有宗教团体的支持，成功地解放了半个民族。

在查理五世的时代，尼德兰的内部政治与欧洲其他地区并无明显区别，贵族们与他们的君主相处有一种矛盾心理，既害怕他的增长的政治与经济权力，又将他看作反对资产阶级和大众起义共同利益的保护人，还要向诸侯寻求资财援助自己的“非长房儿子”或是没落的子弟。斯米特（J.W.Smit）以非常切合实际的评论结束了对它的历史考察：

无论如何，如果我不把起义者视为一个集团，如果我们注意有大量的起义，则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这些起义代表各种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团体的种种利益和思想：有时各行其是，有时相互冲突，有时汇集成一个单独的运动。^[169]

从正在发展中的世界体系角度，我们必须问为何在“第二个”16世纪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当然，法国除外）的时代，单单在尼德兰发生了一场复杂的民族社会革命以及它为何取得那么大的成功，^[170]这

样，就最终与君主站在一边了。^[171]然而，我们突然发现了一种情景：“新兴城镇的那些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与绝望的、没有社会地位的匠人们合流，贵族们的兴盛与没落以及当地的扰乱，汇合成了一场总的革命。”^[172]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我认为革命爆发的关键不是工匠和城镇工人对社会的不满，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毫无疑问将成为革命的极大的受惠者：关键在于，大部分尼德兰贵族突然害怕君主不再是他们的代理人，他的政策将很快对他们的利益有决定性的威胁，而他们又没有说服他改变政策的政治可能性：因而既然他的竞技场（西班牙帝国）是如此之大，如果建立的话，他们也难于控制。^[173]总之，他们有一种“民族主义者”式的反抗反应。^[174]

让我们看看证据。那儿的贵族，正如别的贵族一样，债务正在增加。而且，皇帝正在截夺他们现有的收入来源。^[175]当菲利普二世接位时，他突然遇到对财政征收的抵制。^[176]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是曾试图这样做过——皇帝对财政高度的控制是与因物价上涨导致的贵族实际收入的降低分不开的。卡托坎布雷和约导致的破产与经济困难使得情形突然恶化。^[177]

然而，就在经济陷入绝望之际，菲利普二世在1559年获得罗马的允许建立新的主教管区。该行动是打算使政治和语言疆界合理化，增加主教管区的数目，并要求主教职业化（即只要求神学家而不是那些大贵族的儿子们担任主教）。而且，该计划要求馈赠给新的主教管区的基金主要取自某些过去及现在在财政上独立的大修道院，新的主教将在各种政治性的集会或场合取代旧的修道院长成大主教。毫无疑问，正如盖尔（Pieter Geyl）的精辟论述，它表明菲利普将是一个“勤勉的”国家缔造者。^[178]当然，“也无须怀疑，围绕这样一个加强国王权威的计划会掀起一场抗议的风暴，尤其是他的计划未获各方信任之时。”^[179]

另一方面，贵族试图将国家议会（Council of State）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贵族行政实体。”^[180] 菲利普拒绝了这种要求，作为要挟，他退出了西班牙的部队，留给尼德兰政府的只有当地贵族提供的和部分市区部队作为维持秩序的力量。如果有人将这幅图景与1560年代的衰落引起的下层阶级及中层资产阶级的不满^[181]和现在将近40年的教会势力的衰微结合起来，那么，一场起义就会成为可能：

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暴民攻击监狱——可恶的、压迫者的象征，并释放新教徒，信仰自由变成一个普遍的口号，要求成立自由的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成为反抗者政治纲领的中心。一时之间，这些口号竟成了一个民族或是各省区之间的统一的信念；它们是一些简单的原则，重要的是多数人的社会要求。^[182]

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卡托-坎布雷和约签订后不久的情况，该条约允许特伦特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恢复召开，这样，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将成为制度化。^[183] 从此以后，天主教徒与西班牙王权将空前地融为一体。

“革命”历经几个阶段：第一次起义（北方和南方）及其被镇压（1566~1572年）；第二次起义（更多的是“新教徒”）仅仅只有北部的荷兰和泽兰（Zeeland），以根特和约（Pacification of Ghent）缔结告终（1577~1576）；南部佛兰德一次激进的起义（1577~1579）；从1579年开始，该国一分为二（北部是联省，南部是亲王权者政权）；1598年有一次尝试性的统一；最后的休战是在1609年。

通观这一时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矛盾——在一开始错综复杂——随着新教徒的斗争，更确切地说是“新教化运动”的进行而逐渐呈现清晰形式。“新教化”的北方有着一个后来与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为了北方的民族独立的政权，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通过延续至17世纪的斗争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增长。开始之际，或许微不足道，即使是被冠以“帝国的失败”的西班牙也足以能够阻止它，^[184] 更何况有我们将会看到的，新的欧洲权力均衡。的确，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西班牙所受到的压

力，实际上西班牙的每一个政治转折点——从1557年到1648年的尼德兰关系——都以西班牙的财政危机为直接先导。[\[185\]](#)

尽管尼德兰革命是一场“民族主义者”运动，但其开始包含有宗教因素。当贵族在开始试图垄断与国王争吵的形式与性质时，加尔文主义者却把他们被指定的、被动的角色发展成为一种疯狂——这就是席卷国家南北的“偶像破坏运动”（*Breaking of the Images*）。盖尔描述当局“被吓呆了”，加尔文主义者领导者们自己也感到“吃惊和窘困”。[\[186\]](#)这是一种思想意识激情与革命掺和起来的宗教，使舍费尔（I.Shöffner）把“偶像破坏运动”比作巴士底狱的风暴和1917年彼得格勒（Petrograd）街头的暴乱。[\[187\]](#)

虽然这个阶段很快过去，作为一个革命团体的加尔文主义者的力量，依照科尼斯堡格（H.G Koenigsberger）的类比作为16世纪的雅各宾党人（Jacobins），意味着在别人跌倒路旁之时他们仍有耐力来用“人海恐怖”策略，所然能够“在战略性的时刻动员大众”。[\[188\]](#)在《根特和约》（*Pacification of Ghent*）中，当局试图解决因宗教分歧引起的冲突，他们仅仅是将在荷兰和泽兰（Zeeland）的改革派集中起来，并进一步验明其政治与宗教的身份，[\[189\]](#)这最终导致了在新教控制地区的“新教化”运动。1579年的分立使得两边都进一步巩固，也导致了漫长的宗教两极分化。[\[190\]](#)两边行政管理的实际界限是地理与军事因素的结果。南部的尼德兰地势开阔，在那里，西班牙骑兵可以纵横驰骋。北部地区密布水路和其他不利骑兵运动的障碍。简言之，它是一个理想的游击国家。[\[191\]](#)随着时间的推移，靠近北方的人成了新教徒，靠近南方的则成了天主教徒。

这样，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新教主义是社会变迁的特别因素这种说法不成立——民族主义不过就是资本主义而已。更确切地说，如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所言，“宗教是16世纪民族主义者的代名

词。”^[192]新教主义帮助统一了北部的尼德兰。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谈到了天主教主义是怎么样以及为何与波兰的民族主义情绪掺合在一起。在爱尔兰（Ireland）天主教也具备类似的功能。^[193]并非在任何地方，宗教都肯定与民族因素有关，如在法国的加尔文主义就证明不是这样。^[194]

将要发生的是，在各种利益冲突的大漩涡中，新的组织结构有可能被那些奇怪而不稳定的联盟所建立。人们试图控制这些联盟。科尼斯堡格（H.G.Koenigsberger）精辟地指出：

宗教是一种能够将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汇总起来的凝聚力，能给这些不同的阶层提供组织和宣传机器，正是它们创造了现代欧洲历史第一批真正的民族的和国际性的党派；这些党派不过是他们所属组成阶层的少数。此外，通过宗教，他们能召唤这些最低阶层和普通大众发泄他们贫困的愤怒和在野蛮屠杀、疯狂掠夺中生活无着的绝望。社会与经济的不满是一边力量补充的肥沃土壤，一般的平民暴政在加尔文主义者的根特（Ghent）和在天主教的巴黎都出现过。^[195]

那么，如果宗教能作为民族的黏合剂，它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形成国家机构的社会内容。斯密特（J.W.Smit）指出，尽管有些模糊，尼德兰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资产阶级掌权，尼德兰的分立及后来的国家疆界就是权衡敌对双方力量的尺度。^[196]

可以肯定，贵族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卷入了进去，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但是后来他们因社会激进主义潜流的出现而被从民族主义者的行列中吓跑了。^[197]但是，即使激进的社会运动在那些因经济的扩张及衰落所产生的城镇中的游民无产者中有足够的基础，如1577~1579年亨比泽（Janvan Hembyze）对根特城短暂的控制，^[198]那么，他们也会因失去追求民族利益的主旨和反对资产阶级而很快陷于孤立和走向自我毁灭，而且，可笑的是，从此后只能转向与国王结盟。^[199]

这样，逐渐地出现了城镇政府的联盟，他们很快抛弃了一切“民主

的”虚饰，但也从伤痕累累的旧的西班牙体制所产生的经济负担中摆脱出来。^[200]商人们为自己创立了一种松散的联盟，它没有大部分其他国家都拥有的行政机关。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软弱，但斯米特提醒我们他倾向那种观点，即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所获取的经济成就比欧洲任何君主政体都要高。荷兰的资产阶级把握一种恰到好处的改革程度以使它能够深化经济扩张，然而又能摆脱过分的权力集中。^[201]这样，如果没有众多背叛现存制度的贵族，尼德兰革命可能永远不会开始。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下层的激进主义潜流，这次革命可能就永远不会有第二次风暴。但是，最终成为新的社会秩序受益者的是那些拥有商行的资产阶级。

然而，为何是尼德兰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说过，“第二个”16世纪是一个收缩的转折时代，帝国理想的失败有利于寻求创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内，仍然有一个一切强权插手、矛盾百结的场所，这就是尼德兰。对尼德兰革命的一种解释是，它是当地的统治集团争取排斥外来政治干涉，摆脱西班牙、法国至少英国人对其自私的控制的结果。

另一种解释是，因为1559年以后，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相互均势不复存在，尼德兰便有了确认自己地位、摆脱西班牙这副枷锁的社会空隙。在1588年西班牙在无敌舰队（Armada）失败之后尤其如此。^[202]并非所有这些国家都赞同尼德兰的独立。西班牙不想失去它的部分统治权。法国，尽管它想削弱西班牙，但它自身因困扰于内部的宗教斗争而动荡不宁；英国想让西班牙退出但也不愿法国进去，所以，倾向于名义上由西班牙统治，实际上由尼德兰自治。^[203]然而，这种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西班牙霸权的衰落，正是问题的关键，它使联省的资产阶级们有可能左右逢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1596年，他们还在一个条约中与法国和英国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仅仅是在他们提出必须把他们看作是普通的一员之后不久之时。正如盖尔（Geyl）评论道：“法国和英国再

次相互猜忌之时，正是低地国家有利可图之日。”^[204]

尼德兰革命的意义并不是它树立了一个民族解放的楷模。尽管19世纪那些浪漫而又随意的历史编纂有可能作如是说，实际上荷兰不能作为意识形态流派变为现实的实例。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欧洲世界经济的影响。尼德兰革命产生了一种在那些艰难岁月里维系世界体系的力量，直到英国（还有法国）采取步骤最终作为加固它的准备之时。

让我们回顾一下阿姆斯特丹和北部尼德兰其他城市以前的经济历史。荷兰在波罗的海区的贸易中一直扮演上升地位。^[205]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站稳脚跟，到16世纪已有取代汉萨同盟城市（Hanseatic cities）的势头。在16世纪，他们在整个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呈上升趋势，在大约1560年达到控制该地区贸易总额中70%的程度。尽管革命期间对波罗的海贸易水平有些干扰，但荷兰到1630年时已然捞回了暂时衰落所造成的损失。^[206]

革命的结果不仅仅使佛兰德免于经济衰落，而且因不少佛兰德的（Flemish）资产阶级向北部移民总体上加强了北方。“如果荷兰和泽兰得以繁荣，佛兰德和布拉邦（Brabant）的勃勃生机对它的滋养是部分原因。”^[207]进一步说，联省在1579年宣布宗教宽容原则导致了1579年犹太人涌入的开始。“他们带来的财富和经营智慧补充了北部商业国家的繁荣，这样的移民被定义为欧洲的奇迹。”^[208]

尼德兰内部的斗争稍有缓和，荷兰即刻从仅仅是波罗的海贸易中心一跃成为世界贸易中心。^[209]再说，新的贸易增长并不意味削减被尼德兰人自己称为“贸易之母”的波罗的海贸易的重要性。毕竟，东欧供给荷兰城镇和海军需要的粮食和渔业、造船至关重要的原材料。^[210]造船业反过来又成为荷兰能在各地得以成功的关键。^[211]

这幅图景再次表明了经济优势的积累特点。因为荷兰拥有波罗的海

贸易优势，他们便成了大宗木材原料的集散地。因为他们是大宗木材市场，所以能够降低造船成本且富有技术革新精神。反过来，这又更有利于他们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的竞争。因为靠近波罗的海贸易的缘故，他们能够进一步扩大资本。^[212]在这样的基础上，阿姆斯特丹成了欧洲经济的三方中心：商业中心、造船中心和资本中心，以致“很难说哪一方面最重要，或是将其中之一与另外两者分开。”^[213]这个优势积累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扩张主义阶段达到顶峰，随后，这种领先地位开始因设备过时、劳动力代价相对高昂等不利因素受损。

关于荷兰的昌盛有另一种解释。布罗代尔提出一个问题，即在1588年之后，英国为何没有成为海上霸主，正如他们后来那样。他发现，尽管有政治上骚乱的不快，但荷兰与西班牙的经济纽带仍然存在。^[214]为何英国没有与西班牙的美洲宝地建立起同样的联系？英国还没有对西班牙构成太大的威胁，这类关系是有可能建立的。^[215]而且西班牙的强大仍然足以抵抗英国。帝国也许已然失败，但是要想控制欧洲世界经济仍然依赖于西班牙的殖民财富。荷兰尽管起义反抗西班牙，但毕竟是它的一个部分。在任何情况下，荷兰都不像法国和英国，对西班牙会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这样，荷兰受益于作为小国的本身。而且受益于作为一个“财政健全”国家的本身。^[216]它供给那些利用它的商人以最大限度的实惠。它的致富途径并非其他国家刚刚开始的重商主义政策^[217]——本质上着眼于长远利益，而不是商人和金融阶级所追求的最大限度、时间短促的眼前利益。它的途径是自由贸易。^[218]确切地说，这就是“第二个”16世纪当它成为海上霸主时的路线。当阿姆斯特丹仍在为获取商业上的一席之地而斗争时，它早已是政策上的保护主义者。^[219]

从欧洲世界经济总体这个角度看，随着扩张时代的结束，在众多的国家都致力于内部的政治与经济机制之时，荷兰的世界贸易成了推动机

器运转珍贵而又富有活力的润滑液。反过来说，不管怎么样，尼德兰政策的成功仰赖于这样一种事实：无论是英国或是法国都没有将他们的重商主义潮头推向一个临界点，即真正侵蚀那些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为荷兰商人运转的市场。^[220]这大概是因为荷兰通过与西班牙藕断丝连的联系得以控制一定的银钱市场相对强大的原故。^[221]

如果阿姆斯特丹接替了塞维利亚，如果北部尼德兰成了“第二个”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中心，那么，我们怎么描述北部意大利城市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描述看似扩展而非收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在这个时代的准确地位？我们要说的是，这种扩展是过眼烟云，它掩饰了在金光闪闪的外表下面一种没落的过程，到“第二个”16世纪，这些地区都降到了欧洲世界经济的半边缘地位。

阿姆斯特丹真正高潮始于1590年。1557和1590年之间的危机导致了尼德兰革命。在这段时间，尼德兰在世界商业中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下降。结果，热那亚承接了以前属于安特卫普的部分职能。^[222]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因安特卫普的衰落而不得不大受损失的英国（因为安特卫普的衰落阻止英国对美洲金银的获取），^[223]也从事对金钱的近距离军事袭击，这使得西班牙人的金银舰队改道热那亚。^[224]这样，热那亚的力量部分地因尼德兰的骚乱而复苏，部分地因为它全副身心投入经济活动^[225]和与西班牙的君主和商业体制延绵不绝的密切联系^[226]而加强。这些联系的起源我们已在前面讲过。

至于威尼斯，该地在“第一个”16世纪是地中海贸易衰落区（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征服，葡萄牙人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影响），“第二个”16世纪则出现贸易上的伟大复苏希望，尤其是在东部地中海。^[227]这种复苏已然在1540年开始，部分因葡萄牙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无能，^[228]部分归因于凌驾在葡萄牙人之上的威尼斯富有竞争性的优势，^[229]部分归因于葡萄牙人在欧洲的软弱，^[230]同时也与西班牙在

尼德兰的危机有关。^[231]

但是北部意大利的复苏未能延续下来。无论是它的农业还是工业基础都不稳固，不像北部尼德兰，尤其是英国那样；我们已经说过，到17世纪意大利已然衰落。

农业基础的薄弱是多方面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1580至1620年之间的人口增长。^[232]我们已经说过它的土地相对紧张。的确，在“第一个”16世纪期间，正如受益于衰落的贸易一样，出现了转向农业，尤其是小麦的投资。^[233]这在那些不允许从事城市商业的修道院系统尤其如此。这在1570和1630年之间，威尼斯^[234]附近的特拉法尔玛（Terraferma）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当地的投资者顺应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工业利润的降低。

尽管农产品增多，饥馑仍然存在。从社会制度角度来看，解释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因，它是偶然的，也是客观的：16世纪的最后10年雨量的突然增长、气候突然下降导致了沼泽地的增加，随之是疾病流行。^[235]后者特别严重，因为意大利由于内部殖民过程中土地开发的扩展已然受沼泽增加之苦。^[236]有人或许会认为一个有那么多金银通货的地方本应进口小麦。某种程度上似乎确是如此，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创造食物短缺而扩大饥馑的影响，^[237]但明显不能为工业生产维持一个农业基础。有人推测那些新的大的农业生产者（如像修道院）不愿转让其政治影响以扩大谷物进口。^[238]当然有成本因素在内。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太遥远，埃及和叙利亚的常常又不能利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也比较短缺，同时也因为与土耳其人的战争状态。^[239]

再说，他们进口谷物，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敲了竹杠，而且是经由他们的商业对手——荷兰之手进行的。阿姆斯特丹控制了波罗的海的谷物储备，并随心所欲地施舍。^[240]荷兰这种优于北部意大利的商业环境优势可因世界经济产生的连锁环节而转化成为某种更持久的东西。斯普纳

（Spooner）评论道，新的发达的信用技术——背书汇兑票（*Patto di ricorso*）（一种短期信用形式）以及公共银行——所有这一切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信用体系是国际性的，而且，随着北部意大利开始衰落，这类活动的地点毫不费劲地转移了。^[241]因为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热那亚的商业金融家为了拯救自己，也无须太多顾虑地理本位问题。

但是工业呢？难道北部意大利不是一个工业中心，尤其是威尼斯，不是一个充满新生活的地方？艾略特（J.H.Elliott）提到1560至1600年间新的投资，一个“富足的辉煌时刻”。^[242]然而富足为时不久。从1600年时欧洲发达的工业区之一，北意大利到1670年变成了一个郁闷的农业地区。我们已经暗示过，这种繁荣不太真实。塞拉（Domenico Sella）谈到16世纪晚期威尼斯的经济繁荣时说，它并不能“抹去其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比过去更加狭小的事实，相对地，它的经济也就更加脆弱。”^[243]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法国、英国主顾失去了，因为他们本国的纺织品工业增长。从此以后，市场或多或少限于北部意大利和德国。第二点是海上运输现在越来越多地是在非威尼斯人的船队掌握之中。正如奇波拉（Carlo Cipolla）所说：“该国整个的经济结构太取决于它的能力，即能不能提供向海外出售很大比例的加工成品和服务。”^[244]

太依赖产品的出售又意味着什么？原来，世界经济中心地区成功的秘密在于，以他们的成品交换边缘地区的原料。但是这幅简单的图景省略了两点因素：保持原材料低价进口的政治经济能力（我们已讨论过，尼德兰比北意大利更有可能）及在中心国家的市场上与其他中心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

这个故事相当简单，当荷兰人可能在英国向英国人低价出售产品时，与此相反，意大利人则有可能是高价出售，^[245]这显然不合时宜。^[246]意大利手工业行会使得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国家税收也相对

较高。意大利人为优质产品市场而生产，其他人则经营色彩明快、丰富的布料——不持久、质量相对较次，但是便宜。现代工业成功的秘密在其早期就显露出来了。当三十年战争搅扰德国市场时，同时也伴随着灾难：组织工业生产的衰落；资本投资的枯竭；为逃避行会劳动力的昂贵和税收者，工业向郊区（农村）转移。既然工业没有竞争性，他们也就逐渐趋于削弱乃至消失。^[247]

北部意大利至少应扮演北部尼德兰的地位吗？有可能，但可能已没有他们的位置，荷兰比威尼斯、米兰或是热那亚都更有资格、更适合充当此任。北部意大利也能步英、法的后尘，因为他们缺少政治上的统一。^[248]当黑死病在1630年袭击意大利时，^[249]食物压力倒是减轻了，但它也提高了工资水平。它已经无多少意义。这样，北部意大利就完成了从中心地区向半边缘地区的转变。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西班牙在这个时期也一直在发生同样的转变。毫无疑问，北部意大利的衰落从未达到像其他地中海地区那样的程度，比如南部意大利^[250]和西西里，^[251]但这也是前几个世纪的小小安慰。洛佩兹（R.S.Lopez）在详述1450年以来基督教的地中海地区所不应发生的一切时，悲哀地得出结论：“非常明显，地中海人的优势已不可能在如此多的灾难中幸存下来。”^[252]



第五章插图“两个乞丐在争斗”

Jacques Bellange. (1612-1617)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Rosenwald Collection.

“两个乞丐在争斗”。比拉格（Jacques Bellange）的蚀刻画。他从1602年到1616年是在南锡（Nancy）的洛林宫廷（Court of Lorraine）的官方画家，雕刻家和装饰家。这幅蚀刻画作于1612~1617年间。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国家艺术画廊，罗森沃德（Rosenwald）收藏品。

[1] Chaunu, *Séville*, VIII, (1) .p.14.

[2] Jaime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Spain*, 2nd ed.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 76.

[3] “没有14、15世纪的危机，没有卡斯提尔（Castilian）羊毛可能降价的吸引，没有众所周知英国羊毛出口的减缓，没有意大利城镇活跃的织布工业，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卡斯提尔的牧羊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布罗代尔（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I, p.84.

[4] “1348年在马德里加尔（Madrigal）召开的国会（Cortes）要求禁止外国织布进口、卡斯提尔羊毛出口的建议实际上表明了，15世纪的织布工业获得相当可观的发展。这个决定性的保护政策并没有被约翰二世接受，因为他对梅斯塔（大牧羊主）（Mesta）和那些从羊毛贸易中获利的人有坚定的干预态度，那些人包括：商人、羊毛收购者、掮客。之后是大地主开始了阻止卡斯提尔资产阶级发展的猛烈斗争。这是我们必须理解1462年托莱多（Toledo）国会协议的那种含意。当时亨利四世（Henry IV）将眼睛盯住梅斯塔（Mesta）出口比例中的1/3，这部分可被卡斯提尔的织布工业保留下来。如果在国内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意图，然后利用这笔财富去国外为贵族挣大钱的话，这个比例并不高。”Jaime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p.259~260.

[5] *Ibid.*, p.305.

[6] “卡斯提尔基本上是一个原料，羊毛的出口者而不是织布出口者，而且……天主教君主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鼓励梅斯塔（Mesta）大量畜养美利诺羊（merino）另一方面，羊毛制品业已繁荣起来的英国，其9/10的羊毛传统上是输向佛兰德（Flanders），随着养羊规模大幅度增长，14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与原料工业形成同步的政策。”José Larraz, *La época del mercantilismo en Castilla*（1500~1700）（madrid: Atlas, 1943），20.

[7] 瓦伊塔尔（Luis Vitale）列举了五点理由说明为什么封建主义在西班牙比别的西欧国家更软弱。它们综合了阿拉伯—穆斯林（Arab-Moslem）征服的影响，梅斯塔的地位以及早期资产阶级的地位。See *Latin America: Reform or Revolution?* pp.34~36.

[8] Maravall,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 p.791.没有必要谈论大地主经济地位的软弱。相反，维勒（Pierre Vilar）讨论了西班牙帝国“是封建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事实基础。“Le temps de Quichotte,” *Europe*, 34, No.121-122, janv.-férr, 1956, 8. 然而，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讨论了为什么像拉蒂芬丁（大领地制）（Latifundia）这种现象不能被考虑为“准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农业”。可参见维勒（Vilar）：“在西班牙……尤其是在卡斯提尔以一种再征服的方式从事征服：用封建的方式。土地的占有，强制性地奴役别人，搜刮金钱，这一切都不是为资本主义意义的‘投资’作准备。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倒可能这样做。从大约1480至1550年，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然而，因资金周转的关系，他们首先尝试的是港口、集市这类不稳定的资本主义。进一步说，‘生产力’——土地、人、技术发明的安排——都迅速与卡斯提尔平原上的报酬递减律相抵触。所以，在1550年之后，他们就感到投资收效甚微。一面耗费，一面输入，一面借贷收取利息。几乎没有生产什么。价格和工资上涨，寄生现象普遍，企业亏损。贫困接踵而至。”（*Ibid.*, pp.9~10.）

维勒（Vilar）的“港口和集市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似乎参考了马克思对商人资本的进步性的怀疑：“然而它的发展……不能自我促进和解释从一种生产模式向另一种生产模式过渡……相反，

在任何条件落后的地方，我们发现商人资本都居支配地位。” *Capital*, III, Ch.XX, p.327. Italics added.

[9] “正是‘货车运输’使卡斯提尔得以保证它同围绕它的半岛的边缘地区之间的联系，也是这种‘货车运输’常常使其与海洋脱离联系。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对卡斯提尔自身，如[加西特（Ortegay Gasset）]所说，‘使西班牙’……难道不是一个高效率的政府首先要求的交通状况的例子吗？卡斯提尔……因为这一切的原因，竟成了重心、西班牙的心脏。”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49.

[10] “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限制和调整梅斯塔（Mesta）羊群的 Portazgos（古代税收，由城镇征收通往市场途中的货物和牲畜的税）具有特别兴趣，原因在于将这个组织作为鼓励国内交往手段大大增加的重要性上。贸易的民族化，从地方、大的都市向民族市场的演进，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其深远的意义为半岛上这些开明的君主首先予以重视。” Klein, *The Mesta*, p.223.

[11] “所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政策的作用在于肯定和加强了卡斯提尔中的社会阶级制度，同时，也为那些在前统治时期没有希望获取特权地位的许多人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机遇。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教育，它甚至会导致形成一个皇家服务机构。另外就是财富，尤其是城镇的财富，它使富商家庭（包括犹太出身的家庭）与那些受人尊敬的贵族的联盟成为可能。” J.H.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New York: Mentor, 1966), 113~114.

[12] Maravall,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 p.805.

[13] “天主教国王们不希望在自己的王国内外国人担任教职，部分是因为保留他们的特权，同时也考虑到外国人对其王国内的事务知之甚少。” (Ibid, p.86.)

[14]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117. 艾略特（Elliott）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有关他们统治的消极性特征。 See pp.123~127.

[15] Vilar, . *Past & Present*, No, 10, p.32. 加拉（Alvaro Jara）补充说，西班牙能翱翔起来，是因为它征服拉丁美洲：“西班牙并没有从欧洲的网络中脱离出来，相反，它接受了来自后者的金融中心及与之有种种往来的经济必然性的影响及反馈。不论这是西班牙消费的需要（从总供给的意义上理解消费）或是君主制军事活动的要求，对印第安人的殖民构成了一个保护性的背景，没有它的帮助，要解释西班牙的优势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就不必说明西班牙征服美洲广泛的冲突（rasgos总貌）——其基础是私有企业——与大都市政府部门的需要之间共同利益的巧合，它鼓励一种征服形式，这种形式能够在既不需要冒险也不需要巨大开支的情况下积累大量的金银财富。” “Estructuras de colonización y modalidades del tráfico en el Pacífico surhispano-americano, ”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XIXe siècle*, VII Collog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1965), 251.

[16] “从15世纪最后的10年起，在北非城市中，苏丹（Sudanese）的黄金开始断流，至少数

量下降.....地中海周边竟然成了一个提供金银的重要地区.....所以，北非本地的繁荣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迅速坍塌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唯一的原因是：1460年，葡萄牙探险者接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1482年开始，圣豪尔赫达米纳（São Jorge da Mina）.....建立起来.....这开始了对撒哈拉（Saharan）经济运输线的真正‘占领’，一种方向上的转变。”Fernand Braudel, “Monnaies et civilisation: de l’or du Soudan a l’argent d’Amerique, ” *Annales E.S.C.*, I, I, janv.-mars 1946, 12~13.

[17] “在关注阿吉因（Arguin）的葡萄牙贸易各据点与圣豪尔赫达米纳（São Jorge da Mina, 1482~1484）在非洲黄金买卖的影响时有很多误解。我们必须承认，阿吉因（Arguin）的贸易界标某种程度上更改了苏丹黄金出口的方向，然而也没有损其人民的利益.....当欧洲人，这些新的金矿买主到达阿吉因（Arguin）之际，苏丹人和柏柏尔（Berber）游民已经在这个贸易中领先，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在贸易中的地位。这对传统的黄金购买者来说并不确切，那就是说，似乎马格里布人（Maghrebian）和埃及人将会感受到欧洲竞争者出现在西非海岸的影响.....。

在目前的研究阶段，我们倾向于认为苏丹人对马格里布人和埃及人的黄金出口或许在实际上减少了，但这种现象对阿拉伯世界并不是灾难。我们也怀疑瓦尔丹（Quardane）的金银流通的减少会是米纳（Mina）港贸易地点的变动引起，它位置很远.....

不管怎么样，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根据Tarikhes-Soudan一书，詹内（Djenné）仍然是撒哈拉以盐换金的交换中心。”Marian Malowist, “Le commerce d’or et d’esclaves au Soudan Occidental” *Africana Bulletin*, No.4, 1966a, 56~59.

[18] See Miguel Angel Ladero Quesada, “Les finances royales de Castille á La veilla des temps modernes, ” *Annales E.S.C.*XXV, mai-juin 1970, 784.

[19] 热那亚人和其他非西班牙人不仅仅在寻找贵金属和与西班牙的商业往来中，而且在加那利（Canary）群岛的初级产品的生产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See Manuela Marrero, “Los italianos en La fundución de Tenerife hispánico,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i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A.Giuffrè-Ed., 1962), 329~337.

[20] “它是热那亚人的一种光荣，如果是一种光荣的话，因为只有热那亚一直寻求反葡萄牙人的办法。”Braudel, *Annales E.S.C.*, I, p.14.

[21] “哥伦布（Columbus）在葡萄牙的失败可以从政府的地理知识及商业贸易的增加和进步那里得到解释，如果一个人是敏感的，尤其是考虑到那么遥远的距离，又有谁会愿意出钱，愿意相信那些依靠如此明显错误的假设的人呢。

加之葡萄牙已深深地投入到非洲探险的成功政策之中，投入到经由苏丹直达香料群岛的探寻中，不可能考虑哥伦布关于寻找另一条路线的希望渺茫的建议。”Chaunu, *Séville*, VIII (1), pp.89~90.

[22] *Ibid.*, p.235.

[23] “在一个人拒绝认识在16世纪早期和18世纪之间有一次技术革命之时，他就拒绝承认卡斯提尔的地位主要得益于其‘再征服’的先锋地位，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叉点，向北的贸易风向的风头，中部纬度地区至南纬地区逆流点（*contreflux*），而把一切归咎于机会，这是荒谬的；从帕洛斯（Palos）出发的热那亚海员对美洲的发现，而且，以同样的精神，安达卢西亚（Andalucia）的垄断，人们一旦忽略了风向，安达卢西亚在16世纪漫长而经验丰富的生活，南部伊比利亚人的努力，变成了荒唐的幻想造成的荒唐之果……”Chaunu, *Séville*, VIII（1），pp.236～237.

[24] “西班牙属美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达到了它的领土范围。对阿劳卡尼亚智利（Araucania Chile）征服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殖民地的美洲为了生存和发展，很快将自己纳入一个有效的海外商业体系基础之上。运输的成本需要大量丰富的产品。它宣告最初的美洲是唯一的能够很快生产这些财富的体制。”Pierre Chaunu,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Paris: Lib.Armand Colin, 1964），85～86.

[25] “这个扩张的第一阶段的动力多么令人惊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是一种结构上的突破。这种悬殊很容易解释：1504～1550年，这不是一个由虚无向存在过渡的时期吗？”Chaunu, *Séville*, VIII（2），p.51.

[26] “在海洋政策方面，西班牙国家不能摆脱控制局面的安达卢西亚人的影响，而是以全力保证一种对（塞维利亚）的垄断以严格的尊敬，在其他的冒险中，这种尊敬有利于它的控制效率。”Huguette and Pierre Chaunu, “Economie at Lantique, économie-monde（1504～1650）”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 1, juil.1953, 92.

[27] See Alvaro Jara, “La producción de metales preciosos en el Peru en el siglo XVI, ” *Boletin de La Universidad de Chile*, No.44, Nov.1963, 60. See the Table on p.63.

[28] “如果没有利用银矿财富的技术，整个欧洲的通货膨胀过程早就停止了，而且美洲的采矿也会进入一个停顿和衰落的阶段。”Alvaro Jara, “Econimia minera e historia económica hispano-americana, ” in *Tres ensayos sobre economia minera his-pano-americana*（Santiago, Chile: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e Historia Americana.1966），37.

[29] “（在16世纪）存在一个法国帝国主义。首先，法国拒绝承认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任何依附。（国王在其王国内是皇帝）。之后，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去意大利（1494），领导一次十字军，到达东方，在君士坦丁堡帝国内获得一些新的头衔。他进入那不勒斯（Naples），头戴金色的皇冠，手持权杖和象征皇权的小金球，每一个人都欢呼：最最至尊的皇帝。因此在德国有一种惊慌，他们认为他觊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这种法国帝国主义，它以一种试图统治意大利和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在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选举的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在哈布斯堡家族查理五世当权后，被防守性政策取代了。” *Mousnier Les XVe et XVIe Siècles*, pp.132～133.

弗拉索瓦（Michel Francois）也谈到过法兰西斯一世的双重遗产，一方面作为一个君主，其权威是那些政治哲学家（Légistes）和政府人员的努力工作造成的，另一方面作为查理七世（Charles

VII) 和路易十二 (Louis XII) 帝国的意大利事业的继承人, 他们“为法国君主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L'idée d'empire sous Charles-Quint, ”in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nx du C.N.R.S.*, Paris, 30 sept.-3 oct.1958 (Paris: Ed.du C.N.R.S., 1959), 25.

[30] 正如1500年的情形, 可以说: “英、西班牙以及勃艮第-奥地利 (Burgundy-Austria) 都在围绕最早、最大的欧洲权力运转, 法国.....法国最主要的优势是它的版图和中心地带的位置。对现代开端时代的西欧而言, 法国是心脏地带。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对称地排列在它的两翼, 这样, 法国就控制了内线。而且, 心脏地带也是人口稠密的王国。” Garrett Mattingly, *Renaissance Diplomacy*, pp.129, 131.

[31] 该说法来自16世纪西班牙人A.Pérez Lárt de gouverner.*Discours adressé à PhilippeII*, eited in Ruggiero Romano, “Lapace di Cateau-Cambrésis e léqui-librio europeo a metà del secolo XVI,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XI, 3, 1949, 527.

[32] 参看奥曼 (Oman), 《战争艺术史》, p.14, 他详述了大部分发生在意大利的军事斗争。

[33] 洛佩兹 (R.S.Lopez) 认为在1870年之后, 情况也与英国极其相似, 并补充说: “如果这一切意味着衰落的话, 那么, 无论是意大利人或是他们新的竞争者都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点。”“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The South”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M.M.Postan and E.E.Rich, eds.,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2), 351.范法尼 (Amintore Fanfani) 也注意到了中古晚期意大利的光荣及其在15、16世纪的衰落: “在中世纪, 意大利的好运与这样的事实相联系的, 半岛上众多的港口是到利凡特 (Levant) 的西部贸易和到西部的利凡特贸易的基地; 而且, 它还与这样的事实有关, 即与利凡特的商业联系具有殖民性质, 同时, 与西方的联系则是工业产品的出口者。意大利拥有海外殖民地, 而在阿尔卑斯山 (Alps) 之外却没有这一点并不完全确切。但是事实上, 或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享有纯粹的经济殖民的利益, 不是在表面上, 完全可以肯定, 而是实质性的好处, 所以, 相当的实惠.....”
“14世纪开始, 两件事开始干扰决定意大利人财富的形势.....随着土耳其人 (Turks) 的推进, 法国人、英国人的自我解放, 意大利经济的繁荣前景黯淡了, 尽管整个16世纪, 他们并没有完全退出。” *Storia del lavoro in Italia dalla fine del secolo XV agli inizi del XVIII* (Milano: Dott.A.Giuffré-Ed., 1959), 24~25.

[34] 为何意大利在政治上如此分裂与此分析无关。答案可能在于早期中世纪的政治发展之中, 同时掺和有些城市共和国在晚期中世纪相对的成功。一个典型的解释是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提出的: “教皇 (Popes) 与霍亨斯陶芬 (Hohenstaufen) 之间的斗争置意大利于一种与别的西方国家本质上不同的政治环境之中。同时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 封建制度是如此的完整, 以致在趋近结束时, 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统一的君主制, 同时在德国, 至少在外表上还维持一个帝国的统一体。意大利则完全没有这一切, 14世纪的皇帝,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不再被作为封建领主来接受和尊敬, 而是有可能成为已经存在的领袖和权力的支持者; 同

时，教皇制度及其附属的工具和同盟，强大到足以遮没存在于未来的民族统一的曙光，而不是强大到带来这种统一。两者之间则有大量的政治联合体……他们的存在取决于维持他们的权力。” *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4), 4.

参看弗格森 (Wallace Ferguson): “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城市必然与北部国家不一样，因为意大利过去的历史是如此不同，而且这种区别部分是两种纯粹的政治事实的结果：首先，从10至13世纪，意大利被并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其次，教皇统治的地域正好伸过半岛中间地区。”“Toward the Modern State,” in Wallace Ferguson, ed., *Renaissance Studies*, No.2 (London, Ontario: Univ. of Western Ontario, 1963), 147~148.

[35] “将伦巴底 (Lombardy) 从14、15世纪意大利其余部分分裂出去的是它的政治过渡……僭主位治 (Signoria) 是决定这时期伦巴底巨大的经济变化的基本的‘革新’……通过多种方式而不是一种，这时期伦巴底的经济政治已经明显地超越了公社共同体的政策，预示着英国的重商主义在处理教会及其土地时也是差不多如此。

在所谓的公共事业中，是他们鼓励工业和贸易的政策，他们在农业中的革新，他们的人口政策（对大家庭及遣返和移居伦巴底的人给予物质帮助），米兰公爵 (Milanese) 几乎以很多、几乎一切有意义的方式参与仍在出现的所谓重商主义国家。” Douglas F. Dowd, “The Economic Expansion of Lombardy, 1300-1500: A Study in political Stimuli to Economic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2. June 1961, 147, 160.

[36] 这种现象不只是在伦巴底，而更普遍。See Mousnier, *Le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93.

[37]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p.354.

[38] C.H. Wilso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492.

[39] 皮朗 (Henri Pirenne) 指出某些城市解放过程中的两个步骤：“实际上，一个城市共和国当它摆脱对直接的领主效忠之后，并没有享有绝对的独立。它仅仅逃避了伯爵或主教的权力，但又将自己置于更高级的封建主的直接的权力控制之下。德国的城市只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即它以紧邻的、非常直接的领主的权威去换取遥远的、虚弱的皇帝的权威。” *Early Democracies in the Low Countries* (New York: Norton, 1971), 183.

对强邦的形成所导致的结果是清楚的：“在法国、英国现代国家，在大贵族中找到其主要对手之际，在低地国家中，阻碍进步的则是城市。(p.187)。”

[40] Gino Luzzatto, *Storia economica del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Part I, L'età moderna* (Padova: CEDAM, 1955) 116. 他补充说：“威尼斯独自在意大利保持了独立，但它被更严重的土耳其人 (Turks) 的压力搞得不能动弹 (p.117)。”塞拉 (Domenico Sella) 也感到“威尼斯在震荡半岛其他城市的危机中找到了它自己的运气。” *Annales E.S.C.*, XII, p.36,

[41] Coles, *Past & Present*, No.11, 41.

[42] “16世纪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其中心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对意大利共和国来说，作为政治

独立表矢的经济补偿是必要的，特别是热那亚急于提出，它的市民急于补偿因利凡特（Levantine）贸易矛盾所造成的损失。这类补偿，西班牙通过它在新世界的所有权及后来的佛兰德，竟令人钦佩地予以提供。西班牙与意大利城邦在16世纪的关系史基本上是利益密切结合的历史，西班牙王权在政治上依靠意大利，意大利商人则在经济上依靠西班牙（Ibid., p.41）”参看他的注(57), pp.46~47.

[43] Ruth Pik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I, p.370.

[44] Ibid., p.351.

[45] Lopez,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 349.

[46] See John U.Net,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X, 4, Aug.1941, 575~591.关于在西班牙、葡萄牙新殖民世界中，南部德国人的地位与南部德国工业运转的联系，参看Jacob Streider,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Early European Capitalism,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 I, Nov.1929, 18.

[47] “通观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北部意大利和佛兰德是欧洲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两个主要地区，两者之间的接触对两者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那些非常笨重的货物外，陆路运输有很多优点……北部意大利与南部德国之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繁荣贸易在16世纪存在的时间也不长。” Parry,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185.

[48] 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谈到德国商人对他们的贸易方向在地理上改变的反应：“（他们）通过加强在古代就已有的与欧洲的这些交通中心（安特卫普和里斯本（Lisbon））的联系调整这种发展。1500年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新的商业加快了纽伦堡（Neremberg）和奥格斯堡（Augsburg）以及其他城市的国际贸易，而且它远远超出了他们以前依赖的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贸易的急剧衰落的补偿意义。” *Nure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 Wiley, 1966），148.帕里（Parry）正好也引过上文，似乎认为一个世纪以后才有“急剧衰落”。然而，两位作者都同意，至少到1550年，南部德国的商业是繁荣的。See also Streider,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4~15.

[49] See Richard 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 pp.74~79.

[50] Cited in *ibid.*, p.83.

[51]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8.

[52] 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 p.131.

[53] See J.A.van Houtte, Bruges et, Anvers: marchés “nationaux”ou “internationaux”du XIVE au XVle siècles, *Revue du Nord*, XXXIV, 1952, 89~108.（Herman van der Wee, 1963）：“安特卫普作为西欧商业中心的出现与纵贯中部德国的贸易的增长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The Hague: Nijhoff, 1963), II, 119, 他认为这发生在1493-1520年, 而且南部德国人最终取得了安特卫普在16世纪前半前的“商业鳌头”地位 (p.131) 见詹宁 (Pierre Jeannin): 《16世纪安特卫普的陆上商业获得了几乎不次于沿海商业的重要性》*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p.198. See 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 pp.112~113.

[54] “英国的布料贸易对安特卫普的繁荣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与安特卫普市场富有戏剧性的一致……葡萄牙人、南部德国人和英国人构成了安特卫普世界商业的三根支柱。”J.A.van Houtte, “Anver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expansion et apogée,” *Annales E.S.C.*, XVI, 2, mars-avr.1961, 258, 260.

参看维埃斯 (Philippe de Vries): “在16世纪的开端, 英国与……勃艮第 (Burgundian) 遗产的哈布斯堡国家组成了一个经济统一体, 安特卫普和佛兰德尔是金融和工业中心。”“L’animosité anglo-hollandaise au XVIIe siècle,” *Annales E.S.C.*, V, 1, janv.-mars 1950, 43.

另一方面, 帝国的竞争伤害了安特卫普与法国的经济关系。“相当自然, 安特卫普与里昂, 尤其是葡萄牙人香料出口的贸易遭受重创。”Vander Wee,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144.

[55] 克雷拜克斯 (Jan Craeybeckx) 是这样给主要贸易中心 (Staple) 下定义的: “无论谁, 只要他面对现实, 他将会很容易地同意, (主要贸易中心) 首先是一个市场。只有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市场能够担起主要贸易中心的职责, 并强迫商人们服从它的规则……优惠, 只有几个城市能够提供, 所以不是最重要的。任何拥有市场或主要贸易中心 (狭义上) 的城市, 足以加强其统治, 在法律上 (de jure) 或在事实上 (de facto) 或多或少, 该地区被称作一个主要贸易中心。”“Quelques grands marchés de vins français dans les anciens Pays-Bas, et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et au XVIe siècl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notion d’étap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819.

[56] See Wilfred Brulez, “Les routes commerciales d’Angleterre en Italie au XVI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I: Evo moderno (Milano: Dott.A, Giuffrè -Ed., 1962), 181~184.

[57] Van der Wee, *The Growth of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 362.他认为, 尽管在以后的年月里相对衰落, “安特卫普银钱市场甚至1550年代初仍是哈布斯堡的金融战略中心” (p.206.)。

在安特卫普、威尼斯、里昂、普莱桑斯 (Plaisance)、佛罗伦萨、塞维利亚以及鲁昂 (Rouen) 之间, 资本通过各种套汇渠道流入。See Jose-Gentil da Silva, “Trafics du Nord, marchés du ‘Mezzogiorno’ finances genouises: 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a conjoncture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Revue du Nord*, XLI, 1959, 140.

[58] See Fernand Braudel, “Les emprunts de Charles-Quint sur La Place d’Anvers,”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Paris, 30 sept.-3 oct., 1958 (Paris: Ed

du C.N.R.S., 1959), 197~198.

[59] “因为总的财富的发展，现今的国家几乎享有毫无限制的信贷。一个民族，一个具有生产力的民族，获利相当容易……”

“公众的提供、方便、迅速是现代国家获取贷款的特征。16世纪不一样。因为资本的稀少、分散，高额的资金只有在借贷者付出非常繁复的代价条件下才有可能。不了解国家财源也会导致对统治者的不信任。国家首脑与君主个人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愿意，可以在一个国王和作为一个国王的个人之间进行区别。”H.Lonchay, “Etude sur les emprunts des souverains belges au XVIe et au XVII e siècles, ”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Bulletins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et de La Classe des Beaux-Arts* (1907), 926, 928.

[60] Ibid., p.941.

[61] Ibid., p.943.

[62] “新的商业扩张对尼德兰非常有利。这不是巧合。西班牙——尼德兰的接触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王朝联盟，其后有尼德兰纺织工业对西班牙羊毛增加的需求作支撑。从三十年代开始，新大陆的贵金属开始在哈布斯堡世界的政治中扮演主导地位。既然他们的资金筹措主要以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为基础，这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刺激。在1539年，尼德兰的经济经由安特卫普与西班牙有如此强大的联系，以致莫兰（Van der Molen）写道，在由货币贬值引起的危机期间，‘如果从意大利或西班牙那里的指令来得慢些，大量的佛兰德的（Flemish）布商就会破产。’”Van der Wee,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European Market*, II, p.178.

[63] Ibid., p.317.

[64]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Oxford: Blackwell, 1962), 352.

[65] 安特卫普也在16世纪前半期极大的社会紧张关系中蒙受损失，那是查理五世的时代，尽管主要的抱怨来自城市的工人，他们受到1561年才克服的工资滞后之苦。See Charles Varlinden, “Cris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en Belgique á l’époque de Charles Quint, ” *Charles-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Paris, 30 Sept.-3 Oct (Paris: Ed du C.N.R.S., 1959), esp.p.183.然而，该时期安特卫普没有政治剧变多半是范农（Fanon）的假设，表明城市工人们不像农民们那样进行诉诸武力的自发的起义。See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 85~117.

[66] Cited by A.J.P.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Hamilton, 1945), 163.参看赫斯特菲尔德（Hurstfield）：“本是联合德国人反对教皇的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变成了德国人反对皇帝的改革。”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130.

[67] Friedrich Engles,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s* (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67), passim.

[68] Tawney, *Agrarian Problem*, p.347.

[69]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y History*, p.162.

[70]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Belgique”, 1555~1648, ” *Revue du Nord*, XL II, 1960, 269.他补充说：“对所谓的分离实质上是一种繁殖，我们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了吗？在由美洲引起的基本变化之前，尽管历史学家给人的印象是太注意欧洲，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到了1560年之后，菲利普二世（PhilipII）的国家比1540年之前的查理五世的帝国要大得不可计量？……”“一旦这一点被接受，1551~1559年的分离就被置于真实的考察角度之中了。查理五世没有考虑到他的儿子不能在欧洲继续他开始的事业。要将那么广大、数量那么多、越过海洋的国家统一起来达到一个世界性的规模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痛苦不堪、精疲力竭，对人们来说，它就像整个宇宙，而不是我们20世纪非常小的一颗行星……在美洲的刺激下，在conquista（征服）的末期，查理五世的帝国分裂，更确切地说，围绕其营养的轴心，构成了塞维利亚和加勒比海（Caribbean）之间的通道（pp.270~271）。”

[71] “查理五世的帝国主义，不像他儿子那样，基本上以欧洲为基础。在查理五世的欧洲版图之中，在统治的前半期，解帝国支出燃眉之急的是尼德兰和意大利。但随着它们逐渐被挤干，查理被迫在别的地方寻找收入来源……（1540之后）西班牙的财力——基本上是卡斯提尔——与低地国家比较起来重要性持续增长……”

“皇帝从阿拉冈（Aragon）王国那里榨取更大贡献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使他更加依靠卡斯提尔的财源，在那里，国会的权力要小得多，而且在国会牵制之外，有大量重要的财源。”Elliott, *Imperial Spain*, pp.197, 199.

“面对地狱一样永恒的赤字的折磨，查理五世知道，经济是他策划的仆人，但是他没有一个与他所缔造的西班牙霸权顶峰相适应、由他任意支配的政策。无论是他或是卡斯提尔人，几乎都看不见民族政策的微光。他的权力增强了，尽管不如他所渴望的那么大，如果他能够构想一个合适的政策；在帝国范围内如加蒂纳拉（Gattinara）曾推荐给他的，在现有的形势下，他能否实现它，是值得怀疑的，尽管有大量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财宝的输入，有迅速的海上运输，这些导致累赘的行为都是导致卡斯提尔贫困的复杂的原因。”Raman Carande, *Curl Vy sus banqueros: La vida economica en Castilla*（1516~1556），2a ed.carr.y aum（Madrid: Sociedad de Estuuios y Publicaciones, 1965），I, 140.

[72] “另一个动向能够在帝国见到，……卡斯提尔在欧洲的孤立，其繁荣最终会被帝国其他成员的“背叛”所毁，由于孤立，种种负担最终会落在它的身上。

人们能在美洲发现类似的现象，在那里，墨西哥（Mexico）和上秘鲁（Upper Peru）的采矿最终会由于越来越缺乏资金而停歇下来。好比刀刃，脱离主体就变得毫无用处；帝国的凝聚力也一样，随着经济从扩张向长期契约转移，统一的凝聚体和领地中的各部分便自生自长起来，卡斯提尔是一种情况，采矿的墨西哥和上秘鲁则是另一种情况。的确，当18世纪意大利和佛兰德（Flemish）边缘地区从卡斯提尔分离时，这刺激了后者经济的复苏，它卸掉了帝国凝聚体内的负担，这个凝聚体因无任何益处、徒自耗竭而不复存在……

对卡斯提尔而言，它向地中海地区的扩展，这是其在16世纪上半期的主动因素，到17世纪初逐

渐变得不利，因为要支付费用，要靠士兵和金钱维持，而且对这些士兵有稍更多的要求，他们便准备反叛（就像1640年的阿拉冈一样）。”Chaunu, *Séville*, VIII (1), pp.248~249.

[73] See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343.

[74] “既然西西里（Sicily）是一个既存的与其邻邦享有传统的商业关系的王国，西班牙政治家从来就没有像对待美洲殖民地那样对待它。由于帝国缺乏在欧洲发展的理论，因而西西里避免了西班牙加诸新大陆的殖民地身上的贸易垄断。由于没有经济资源的真正的协调，这样的贸易垄断可能是显示西班牙经济帝国主义的唯一途径。西西里不能从热那亚银行家的监护下解救自己，也不能从对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制造商的依赖中独立出来。但是它的市民至少能够卖掉他们大部分小麦和丝给那些能够供给他们成品的人。”H.G. Koenigsberger, *The Government of Sicily Under Philip II of Spain* (London: Staples Press, 1951), 143.

[75] “从1570年以后，非常明显，私人企业及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遏制西班牙及其同盟者的不可限量的贪婪，通过印第安酋长，他们取得贡物和劳力。为了高效率地保持、组织和操纵印第安人的公社，有必要使他们城市化、基督教化，并融入西欧经济的整体之中去。”Stanley J. and Barbara H.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0), 70.

[76] H.G. Koenigsberger, “The European Civil War,” in *The Hapsburgs and Europe, 1516~1660*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 Press, 1971), 257.

[77] See Ferran Soldevila, “Barcelona demana a l’Emperador Carles V l’autorització per a comerciar directament amb America (1522),”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o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638~641.

[78] 要看关于它的社会内容及其原因的评述，参看J.W. Smit, “The Nether Lands Revolution,” in Robert Forest and Jack P. Greene, eds.,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19~54. 该文含有一份好而简明的参考书目。

[79] “绝对君主制基础最好的地方是法国……实际上，自从1484年的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失败以后，无论个人或大众都没有可能导致反抗国王（的权威）的自由呼声。”Mousnier,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100.

参看赫克谢尔（Eli F. Heckscher）：“从地理上来说，（法国）早在16世纪的前半期就是一个联合的、坚实的王国，几乎拥有全部的领土主权。它的君主对国家或许北欧洲别的任何人都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它的政治家从较早时候就沿袭了一种自觉的经济政策，即其捐税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其组织上的封建形式的保留实际上只体现在河流及道路捐税上，peages (pedagia)，但另外，城市税则留下了——在这里正如在别的国家一样，或多或少的有自治市经济的遗迹。”*Mercantilism*, I, rev. ed.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1955), 78~79.

[80] 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07.

[81] “在15世纪，〔法国〕贵族表现了与英国贵族共同的趋势，即与roturiers〔平民〕融合，其数目与英国贵族亦差不多，但是在16世纪，政府处心积虑地寻求制止这种趋势的办法，并通过立法禁止贵族经商或从事其他赚钱活动而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麻烦在于，在法国，贵族建立了税务豁免制，而且，如果他们从事贸易，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免税身份，这样，国家就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新的收入……法国国王对贵族仍有相当的惧怕，不敢剥夺他们的免税权……”Rushton Coulbour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udalism,” Part Three of Rushton Coulbour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316.

[82] “〔路易十一的〕统治意图是使法国再次成为贸易枢纽，他深信集市和市场使国家致富，财富将会从繁荣的交通和国内的商品中自然产生……在法国，不管怎么样，政府的支持仅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立足于地方上的贸易，没有建立那种以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为基础的利益。”Miller,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pp.334~335.

[83] Ibid., p.338.斯特雷（Joseph Strayer）亦认为法国庞大的中央行政管理的程式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一致性，当然也不意味着有一个民族经济政策的可能：“对法国正如对英国而言，发展的两个基本领域是司法和财政。但是法国国王们不得不对此放慢脚步，比起英国来，他们的早期体制太简单、太不正规了……”

“法国在12、13世纪发起的一系列吞并给法国政府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一直足以维持一个小王国运转的相对简单的体制非常清楚有扩大与精炼的必要，以应付大幅度增加的地域和现在臣属于国王的人口。新的省份有其自己的惯例和习俗，常常比王国政府之下的惯例和习俗更复杂和特别……”

“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被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1180~1223）发现了，他是法国国家的真正奠基人。他允许每一个省保持各自的习俗和制度，但是从巴黎派人去充当重要的省区官职。这样，诺曼（Norman）的立法机关继续加强诺曼的法律，但是主要的官员却不是诺曼人而是从旧有的王室领地派去的王家代理人。各省的骄傲被安抚下去了，同时国王又对他的新领地保持有效的控制……”

“（比较起来，英国国家由于坚持习惯与法律的一致性，在融合那些有自己的政治传统的地区，比如威尔士的公国，爱尔兰的小王国时，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但是形成中的法国国家不得不为它的变通性付出沉重的代价。地方上的重要人物主要关心本地风俗和特权的保存；他们不信任中央政府正如中央政府不信任他们一样。在什么样的大的事情上，都不能在当地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擢用他们。实际上，法国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是，任何人不得在本省任职。”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p.49~51.

[84] “在15、16世纪，法国在全球失败两次……15世纪的失败，当时新大陆的发现者中没有法国人——或者是几乎没有。16世纪再次失败，当时法国……在寻找航线、岛屿、海岸的竞争中，在大西洋、非洲以及美洲的利益竞争中，法国都放弃了……”

“最重要的问题，甚至在百年战争之前，自从热那亚帆船（galleys）在地中海与北海之间进行成功的联络之后，一直是法国被排拒在横贯大陆的大贸易圈之外，被排拒在经济之外。香槟集市

仅仅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不考虑这种总的经济合作，我的意思是在15世纪没有威尼斯或热那亚的赞助，没有意大利人的合谋，没有北欧人（Nordic）的国际资本，人们怎能解释里斯本，解释休达（Ceuta）的占领，或是解释热那亚人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建立的根基，解释很久以后麦哲伦（Magellan）的航行？在伊比利亚人的好运之后，存在着14、15世纪的这种外因，存在着国际资本和塞维利亚、里斯本及以后的安特卫普之间的合谋，这些命运相关的城市，他们的连环圈上没有法国。所有这一切至关重要的……百年战争使任何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变糟，但它并没有产生已被贸易路线上的革命引发的一场危机。”Fernand Braudel, “La double faillite ‘coloniale’ de la Franc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 *Annales E.S.C.* IV, 4, oct.-déc.1949, 454.或许它不仅仅是缺乏外面支持。布罗代尔的结论是“殖民地的天职关系到整体的生活，国家全部的结构及其内部职能。16世纪的法国……并没有为此作准备。（ouverte aussi profondément）〔p.456〕。”

[85] 鲍蒂埃（Robert-Henri Bauthier）给了下列解释：“在我们看来，香槟集市（Champagne）衰落的原因与13世纪末、14世纪初西部经济的总转移有关系。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两个基本的领域：（1）意大利人的工业化；（2）贵金属引起的市场革命……”“既然香槟集市的主要目的对意大利人而言是法国和佛兰德人的布匹购买，那么他们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北部所有的服装业蒙受了同样的危机……”“国际经济在传统上依赖白银；13世纪末黄金开始起重要作用，两种贵金属对比率的突然变化完全打乱了那些贸易活动依赖外汇兑换和同类销售的公司之间的平衡。”“The Fairs of Champagn, ”in Cameron,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62~63.

[86] See *ibid.*, pp.193.

[87] *Ibid.*, pp, 333.

[88] *Ibid.*, pp.307.

[89] R.H.Tawney, “Introduction”to Thomas Wilson, *A Discourse Upon Usury* (London: Bell & Sons, 1925), 62.

[90] Braudel,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p, 199.

[91] Henri Hauser,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of 1559, ” *Journal of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II, 2, Feb.1930, 241.Fo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redit infcation, see pp.242~250.

[92] “但是如果我们忽略1560~1565年间开始的通货膨胀节奏的降低，就不可能认识到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最初时期潜在的危机状况。在1577年，国家就已经发生了第一次银行破产，这绝非偶然，菲利普的政策在1568年发生首次大的转变也非偶然。”Nadal, *Hispania*, XIX, p.513. 纳达尔（Nadal）指出，与汉密尔顿（Hamilton）断言的西班牙价格上升在该世纪末达于极点相反，资料表明1501~1550年间的增长（107%）比1551~1600年间（98%）要大。 See *ibid.*, pp.511~512.

[93] “1557年的危机已经灾难性地影响了安特卫普在公共财政领域中的地位基础。在以后的年代，衰落继续。在格雷瑟姆（Gresham）的努力下，英国国王已经完全从安特卫普在60年代对它的监护下摆脱出来……”

“当1569年英国——尼德兰禁运导致两国关系完全破裂时，英国感到已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从安特卫普的商业和财政影响中解脱出来。汉堡（Hamburg）接收了后者的商业遗产，伦敦接受了它的财政遗产。两者肯定具有辉煌的未来。这样，安特卫普就永远失去了其最初扩张的基础。”Van der Wee,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p.222, 238.

[94] Ibid., p.207.

[95] See *ibid.*, pp.232~236.见帕里（Parry）：“1576年‘西班牙人的狂怒’严重地伤害了安特卫普。帕尔玛（Parma）的国政以及该城在1585年的投降导致了许多经营公司的破产和转移，而且，成千上万的新教徒匠人被流放——大部分去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操纵的海上贸易移到了阿姆斯特丹。”*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169.

[96] Van der Wee,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 p.183.然而，最近两位学者断言安特卫普的衰落被夸张了，它相对的强大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See Jan Craeybeckx, “les industries d’exportation dans les villes flamandes au XVI^e siècle, particulièrement à Gand et à Bruges,”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oo moderno* (Milano: Dott.A.Giuffrè -Ed., 1962), 415.不管怎么样，克雷拜克斯（Craeybeckx）承认，1585之后安特卫普新的企业“当然未能防止国际商业的重心滑向阿姆斯特丹和伦敦（p.416）。”霍特（Jean A.van Houtte）甚至更偏激。他称这幅衰落的图景“被严重歪曲了”。“peclin et Survivance d’Auvers (1550~1700),”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A.Giuffrè-ed., 1962), 706.他指出，如果战时的阻碍伤害了安特卫普的海上贸易，它并没有影响它的陆上贸易。See *ibid.*, 720.他断言，通观整个17世纪，安特卫普的商人阶级仍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p.722）。”

[97] See *Verlinden in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维森斯Jaime Vicens Vives在随后的讨论中认为在加泰隆尼亚（Catalonia）情况亦如此。See *ibid.*, p.187.见斯密特（J.W.Smit）：“总而言之，我们对作为尼德兰革命先决条件的社会经济形势不能没有什么了解。”（*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43）。

[98] Luzzatto, *Storia economica*, p.151.

[99] See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150,

[100] Taylor,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20.

[101] 路德洛夫（R.Ludloff）这样描述德国的发展：“16世纪技术进步以及16世纪向资本主义组织靠近的决定性的进步，一种妨碍——部分归于领主封建权力增加的强征，以及在17世纪

向小规模生产方式的倒退。”“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16th~17th Century Germany, ” *Past & Present*, No.12, Nov.1957, 58.

[102] “德国这时是欧洲商业的生命线，它的城市远比别的城市繁荣。实际上，别国的民族君主制度对德国的商业霸权的抵制比对帝国的抵制要强得多……”
“每一个贸易共同体都会在世界市场上经历兴衰；但是在现代欧洲没有任何贸易共同体经历了德国中产阶级所经历的如此深刻、持久的灾难，而恰好是在他们的财政权力达于顶峰之际，而且他们的民族共同感（意识）充分形成——恰好在这个时刻，的确，他们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个主宰别人的政治力量，正如他们已然是中欧的经济主宰力量一样。”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pp.17~19.

[103] “在种种原生的社会，前哥伦布时代的至高权威的结束，一方面导致了传统的高居大众之上的首领（Caciques, Curacas）滥用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导致了这些首领与殖民者沆瀣一气，尤其是委托监护者。正如英国、法国、比利时（Belgium）等在19世纪的非洲和亚洲，16世纪美洲的西班牙对原生社会的古代土地的再划分进行了调整，转移了人口中心，声称只承认作为首领（或酋长）的一个等级，这个等级得由它任命（investie）和控制。这样，16世纪正如19世纪一样，殖民当局趋于达成一种妥协，但是首领，无论是传统的或是新产生的，最后仅仅是它征税的工具。”Charles Verlinden, “L'état et l'administration des communautés indigènes dans l'empire espagnole d'Amérique, ”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133.

[104] See Wolf, *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pp.182~183.

[105] See *ibid.*, pp.197~198.

[106] 见里奇（E.E.Rich）对奴隶贸易经济的描述：“依靠奴隶劳动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特征，奴隶劳动永远不会满足和廉价，因为在奴隶所有制中，劳动力是最容易消费的一个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私的、默许的船数量之多、之富有吸引力是不会令人惊讶的……总的来说，可以假设，当葡萄牙人到非洲海岸去寻找奴隶时，此类船只严重侵占了他们的财产利益，但是在把他们带到西班牙人的领地出售时，他们仅仅逃避形式上的禁止；葡萄牙是自由贸易的严重障碍，这一点并不比西班牙逊色。到这时，进行奴隶贸易的已经包含了16世纪的商人，一个有力的英国商人集团，他们看见了英国——西班牙建立贸易关系的可能性，条件是满足殖民者对奴隶的需要，满足西班牙政府对经济加强和控制的愿望，满足英国商人对必要的利润的愿望……霍金斯（John Hawkins）开始以奴隶与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希望他能在英国、西班牙之间建立一种固定的商业合作。”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325~326.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西班牙当局不愿接受霍金斯的似乎主要是针对葡萄牙商人的方案。难道可能是因为对国王和殖民者而言，英国人的闯入长远来看似乎是更危险的，国王将这个建议视为一个打开缺口的楔子？

[107] “从殖民存在（16世纪）的初期看，智利（Chile）拥有一种出口经济……相当典型地，智利开始是作为一个黄金出口者。但是矿藏……不丰富，为时不久……然而，在西班牙的

大陆殖民地中并不典型，即使在那时，也不像危地马拉（Guatemala），智利出口它自己的产品：从牲畜中提炼的动物脂肪。”André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29.

[108] See Woodrow Borah, *Early Colonial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Mexico and Peru, Ibero Americana*: 38 (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81~82, 86~88.

[109] See William C.Schurz, “Mexico, Peru, and the Manila Galleo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 4, Nov.1918, 391.

[110] See *ibid.*, pp.118~120, 124~127.

[111] Pierre Chaunu, “Pour u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mérique espagnole coloniale, ” *Revue historique*, LXXX, 216, oct.~déc. 1956, 218.

[112] 移民的规模由纳达尔（Jorge Nadal）在*La poblacion española (siglos XVI a XX)*（Barcelona: Ed.Ariel, 1966）一书中考察过，78~80。可以肯定人口过剩。“一个人口过剩的卡斯提尔的形象是与西班牙的庄严、宏大的形象不可分割的，”席尔瓦（José-Gentil da Silva）肯定了这一点。“Villages Castellans et types de production au XIVe siècle, ” *Annales E.S.C.*, XVIII, 4.juil-août 1963, 735.这样，移民与衰落有联系吗？或许，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

[113] “殖民地的官职占有.....给一切阶级的西班牙人提供了机会求职、致富，这一切都是狭隘的都市经济所不允许的。而且，扩大的殖民地行政管理名单也给西班牙君主提供了出售殖民地官职给那些急于当官的机会，这些人反过来又去找别的西班牙人给那些新任命的、即将赴任去统治印第安大众的行政官准备贷款。”Stein &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pp.71~72.斯沃特（Swart）强调西班牙殖民地贪污扩大的事实，法国则没有，这是这时期殖民负担的一个征兆。See Swart, *The Sale of Offices*, p.41.

[114] “所有有用的资料都接近这样的结论，通观大部分17世纪，在1576至1629年之后的最好的年代是白人居民能够很容易地提供足够的食物养活自己，仆人及其他的工人也直接依靠他们。除了劳动力供应外，或许代理经营在这时期发挥了作用；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前10年，牲畜数目莫名其妙的大减很难单独地归咎于畜养人的缺少；在持续的食物短缺和其他城市供应的匮乏中，劳动力供给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在采矿中，明显而又持续的劳动力短缺乃因印第安人口的减少.....”

“困扰新西班牙（New Spain）城市的经济困难.....几乎肯定与新大陆的西班牙主要殖民地类似的发展结伴而行.....西班牙经济机会的减少、生活状况的日趋恶化意味着大量西班牙人移居殖民地，在那里，经济条件可能一样糟糕，但通观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食物供应要比西班牙本土丰富。因为殖民社会的性质，这些移民对新西班牙劳动力的增加没有意义，但却增加了大量消耗食物的人口.....由于在时间上巧合，西班牙的经济与人口的危机和它的殖民地.....两者的消极面相互影响。”Borah, *New Spain*, pp.25~26, 29. See Alvara Jara on the *crisis of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Chile in Guerre et société en Chili: essai de sociologie coloniale*, pp.105~119.

[115] “有人会得出结论，庄园（*hacienda*）的兴起本质上是一种发展而不是一种斗争。大的庄园向前发展是与城市的规模及西班牙的人口这样的现实相呼应的，还与印第安人中的积累、现代早期西班牙社会的本质有关……无论在哪里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其发展中，国王或教会成了主要的发起者，有人会在一种更周密的考察中发现，有更深层的力量在起作用。国王的政策一直被认为毁灭了委托监护制，但是殖民地自然的发展，注定了地方制度的命运。一方面，从商业和矿业中产生的财富并不直接依靠委托监护制；另一方面，西班牙社会全面的发展产生一些新型的、有影响的家庭，他们开始开辟自己的庄园，暗中破坏墨守成规的委托监护制度。” James Lockhart, “Encomienda and Hacienda: The Evolution of the Great Estate in the Spanish Indie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X, 3, Aug.1969, 428.

[116] 斯坦（Stein）以自己的方式对庄园（*hacienda*）和种植园（*plantation*）进行了区别：“（*hacienda*是一种）规模较大、种植谷物或是畜养牲畜的庄园，其产品主要在本地的矿业中心或是大的城市如墨西哥和利马（Lima）消费。印第安人构成劳动力，他们具有依附、不稳定和被一种特别的工资劳动形成，即计日工资束缚的特性……不像庄园，种植园（*plantation*）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单位，对外，即欧洲人的消费生产大宗的出口商品。”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p.40.

[117] “到1590年代，西班牙人自己庄园的形成表面上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他们能够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他们的产品能够符合西班牙城市的食物要求。这并不是说，这些城市就完全脱离了对印第安人产品的依赖，而是通过自己拥有、被自己的邻近市民（*vecinos*）直接控制的农业场生产的食物在必要时分享一点利益。” Borah, *New Spain*, p.33.

参看霍盖特（Huguette）和肖努（Pierre Chaunu），他们论证，从西班牙出口至美洲的产品，从16世纪主要由那些殖民者生产的初级产品转移到了17世纪的加工成品，这些成品由意大利或是北欧生产，然后由西班牙海运至美洲。他们问：“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种主要的转移？事实是，随着西班牙殖民地的发展，他们越来越成为自然环境的主人。在别的人中也有一个例子：在太平洋岸，在秘鲁旱地的绿洲之中，成功地种植了葡萄，尽管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贵族受到自鸣得意的政府几分不切实际的柏拉图（*Platonic*）式的禁止。进一步的事实也不少，晚一辈生长在印第安人中的西班牙人，他们对当地的食物不再抱有他们父辈所感到的烹饪偏见，如从一个世界迁徙到另一个世界时发生的那样。最后，尤其因为运输在经济上的愚蠢，极高的成本，劣质产品，西班牙和美洲之间漫长距离不能运输的限制，当然新大陆的银矿回流不可能造成这样的愚蠢。当这些回流因大堆理由（矿源接近枯竭、采矿区人力的缺乏、水银合金必然增加的价格，尤其是16世纪价格革命产生的银购价的降低）而减少时，银就减少了向欧洲出口，而用于在美洲创造一种更加平衡、更加多样化的经济。”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 pp.99~100.

[118] “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统治的帝国主义奠基在西班牙——大西洋经济的基础上，这就是将美洲和定期从新大陆得到财力补充的卡斯提尔作为帝国的财源……”
“从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经济与美洲领地的经济开始脱节（与其说是一种补充，毋宁说是一种竞争），同时，荷兰和英国的侵入使两者之间的鸿沟扩大。这是关于西班牙正在变为欧洲世界经济半边缘部分的又一种说法。”

“弗兰克（Anarce Cunder Frank）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16世纪在智利积累起来的经济剩余价值

正花费在奢侈品上，被视为‘正在吸干智利的对外交换和国内资源’，这对西班牙并不利。”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33.

[119] “非常自然，为了保险，菲利普二世愿意停止进行进一步的征服，直到现存的各省住满勤劳的西班牙人和定居的印第安人，被有条不紊的、温顺服从的内部仆从管理着。首先，扩张泄气来自这样的认识，即印第安人作为王国收入的重要性的增长……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来自印第安人的收入接近整个收入的10%，并且在逐渐增加。就菲利普在欧洲的巨大债务和经济义务而言，越来越快地增加来自印第安人的收入不可避免地成为国王政策的主要目标；将西班牙人的资本、智慧和印第安人的劳力集中在银矿和其他增加收入的活动上，坚持发展现有的东西和有利可图的省份，而不是将精力消耗在遥远的、不可预知的新的入侵（*ontradas*）。”J.H.Parry,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510~511.

[120] “（16世纪西班牙的大城市）已渐渐在农业经济中注意到一个基本的真理，对卡斯提尔最大的不幸是，直到两个灾难性的世纪过去后才予以充分重视。这个真理是，农、牧生活能够结合起来，这两者毫无敌意，亦不相互排斥。”Klein, *The Mesta*, pp.327~328.

[121] “从16到17世纪，尼德兰、英国、法国从西班牙进口原材料：橄榄油、染料、羊毛，在交换中，西班牙则接受他们的产品，也有谷类。这样限定性的国际分工使西班牙得不到工业投资。只有小规模的手工业企业仍在为生存而竞争。”Da Silva, *En Espagne*, pp.177~178.

[122]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98.卡拉德（Ramon Carande）或许更中肯，他指出，通观16世纪，西班牙织布生产质量持续下降。See *Carlos V, I*, pp.191~192. See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193.

[123]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99.

[124]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63.

[125] 西班牙越来越注意适合庄园生产的农业产品。一个主要的例子是酒，它变成了“工资收入的农民、农村劳力的主要工作。”Da Silva, *En Espagne*, p.159.另外，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正被法国移民的涌入降低（p.113）。See Nadal, *La Población española*, pp.80~88.相反，作为一个生产行业的渔业正失去其在消费市场中的地位。英尼斯（H.A.Innis）清楚地讲明了它的含意：“西班牙渔业（在纽芬兰（Newfound-land））的衰落是西班牙市场向法、英、新英格兰渔业开放的一个副作用。它开始了英国在纽芬兰数世纪发展的贸易，这种贸易成了海员的摇篮，英国加工成品的消费地和吸取西班牙硬通货的途径。说16、17世纪不列颠帝国（British Empire）真正的柱石是与西班牙人的贸易并不过分。新教英国对鳕鱼的消费随着生活标准的变化而下降，但天主教的西班牙却提供了一个稳定而且需求不断增加的市场。纽芬兰（Newfoundland）渔民‘对教皇和10个先令’的祝酒也是所有优秀的不列颠帝国臣民应该参加的祝酒。”*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3rd ser., XXV, Section II, 1931, 167.

[126] Vilar, *Past & Present*, No, p.32. (fu.88) .

[127]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97.

[128] “这次危机的主要受益者是外国人——可恨的热那亚人[一个愤怒的加泰隆人 (Catalon) 称他们为‘白摩尔人’ (White Moors)]、葡萄牙的犹太人和信奉异端的荷兰人。外国银行家操纵了王室的财政；外国商人已牢牢地掌握了卡斯提尔的经济，而且他们的触须正伸向塞维利亚有利可图的美洲贸易。” John Elliott, *Past & Present*, No.20, p.69.

“对世俗事务深深的蔑视，西班牙全球基督化的理想，决定性地埋葬了卡斯提尔经济恢复的任何计划。热那亚银行家垄断了美洲矿产开发的利益。热那亚人装备工控制了舰队的提供。同时，意大利人、佛兰德人及法国商人通过麦迪纳平原 (Medina del Campo) 的集市控制了殖民地贸易和来自塞维利亚和加的斯 (Cádiz) 的投资。在根本没有反措施的情况下，君主制越来越陷入一种危险的财政混乱之中，它与远在比利牛斯山 (Pyrenees) 那边的资本主义机制相联系；这种联系最初是必不可少的，继之是毁灭性的，最后是毫无结果……我们没有发现在农村的投资，没有增加农业土壤的生产力，也没有组成开拓海洋世界的公司——甚至没有开拓奴隶贸易，它落入了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之手。”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p. 97~98.

卡拉德 (Romón Caranda) 清楚地说明，16世纪西班牙这种对外国银行家的依赖是驱逐犹太人的直接后果：“在16世纪之前，外国银行家并没有在卡斯提尔和阿拉冈 (Aragon) 出现，正如他们在英国、法国那样。在很长的时间内并非一直没有，通观13、14、15世纪，在这些王国内的外国商人……然而，我们的卡斯提尔和阿拉冈的国王们不需要外国银行家。有亚伯拉罕

(Abrahams)、以撒 (Isaacs)、撒母耳 (Samuels) 们已经足够。经济领域的犹太人，尤其在信贷领域，在整个中世纪，在该国之内都找不到能够取代他们的竞争者。对国王们来说，犹太人是财务掌管人和债主。” *El crédito de Castilla en el precio de la política imperial, discurso leído ant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Madrid, 1949), 24. See Klein, *The Mesta*, p.38.

[129]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196. This is also the thrust of Ramón Carande's Chapter entitled. "The mercantilist crossroads." *Carlos V*, I, ch.vii. 参见：“在追逐其目标时，查理五世自己承认，西班牙是他的家底。他给斐迪南 (Ferdinand) 写过这些话：‘因我的王国在西班牙，我只能维持自己；’但他并没有任何建立统一的西班牙的计划。正如从前一样，不同的地域有如此众多的利益互不相容的省份。尽管没有牵涉整个帝国，他们的共同利益还得依赖皇帝的决策，也不必接受民族市场中的必需的注意 (p.159)。”威泰勒 (Luis Vitale) 认为，西班牙的政策不是“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而是“贸易主义” (cambiaría)。 *Pensamiento Critico*, no.27, p.23. 的确，他认为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在于它采取保护政策的失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西班牙自己倒成了敌对的英国、法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p.24)。”

[130] See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p.192~193. 克莱因 (Klein) 指出那种途径，即皇帝的借贷取决于他排解西班牙内部矛盾的能力。在早期16世纪，曾经导致食物价格上涨的梅斯塔 (大牧羊主团) (Mesta) 的特权在国会 (Cortes) 中引起各种愿意鼓励更多的可耕农场发展的人反对：“查理本人在考虑整个牧羊的问题上有点难堪。首先，他提议，这非常自然，开发梅斯塔及其工业，正如其祖辈所为——这意味着毫无限制的牧养。他的这种政策也受这样的事实鼓励，

即在1525年他向他的信贷者——福格家族（Fuggers）包出了骑士团体成员（maestrazgos）最有价值的牧养地及军事骑士团的指挥权；必须承认，在这些土地上进行耕种所造成的任何意义上的侵蚀都可能引起来自银行家们令人难堪的质疑。另一方面，随着他的财政需求的增加，特别津贴或是帮助金（Servicios）不得不向国会申请。为了保证这些进项，他被迫许可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的公地进行圈占，他需要这些城市在国会中的选票.....”

“然而，查理在制定其决策时，没有从长远考虑，因为他的计划和野心并不属于那种耐心地等待整个新的工业发展的类型。他须马上用钱，西班牙王国内最值得开发的、可以利用的资源是由来已久、现在正在繁荣的畜牧业，那时的繁荣前所未有.....森林的保存和耕地两者都服从畜牧业的利益。” Klein, *The Mesta*, pp.327~328.如果这还不够的话，1590之后，银输入的衰落导致西班牙政府打算通过对残余的西班牙资产阶级实行灾难性的重税政策来补偿它的损失。See Elliott, *Past & Present*, no.20, p.71.

[131] “在我看来，菲利普二世似乎找到了自己在19世纪南美洲政府的位置，有丰富的产品、丰富的矿藏或是富有的种植园，但却放弃了相应的国际金融。政府动辄发怒，甚至出击，之后又被迫服从，交出资源、指挥权，得到‘理解’。”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464.

[132] See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pp.102~103. Vicens bare his figures on the work of Henri Lapeyre,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Paris: S.E.V.P.E.N., 1959) .

[133] 里格拉（Juan Reglá）指出，16世纪，摩里斯科人被认为是潜藏的“第五纵队”（Fifth colum），并且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推进的恐惧转嫁到了摩里斯科人身上。See “La cuestión morisca y la conyuntura internacional en tiempos de Felipe II, ”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III, 1953, 222~228.

[134] See Juan Reglá “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secuencias, ” *Hispania, revista aspaño la de historia*, XIII, No.51, 1953, 222.然而，克莱因（Klein）部分将它视为畜牧对农耕的防范：“可以说，它并非不像是梅斯塔（Mesta）利用它对君主的影响保证了1609年摩里斯科人的被驱逐。反对个体圈占牧场作为农业用的诉讼记录表明，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有多么惊人数目的摩里斯科人被告。尽管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莫里斯科人是小贩、行商和乞丐，但数量最多的是农人。他们的被逐.....毫无疑问是已知的西班牙农业史上最严重的损失。” *The Mesta*, p.338.参见纳达尔（Jorge Nadal）：“这种迫害的动机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摩尔人少数民族在意识形态上不相符合，但在经济上比经济矛盾日益增多的基督教少数民族更好一些；另一方面，穆斯林臣仆比他们的敌人更温顺一些，这有利于封建贵族的利益。” *La población espanola*, p.63.

[135] See Juan Reglá, *Hispania, revista espanol de historia*, XIII, no.52, 1953, 446.

[136] Vilar, *Europe*, 34, p.6.

[137] Chaunu, *Revue historique*, CCXXV, p.97. See Juan Reglá, “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nscuencias en la economia valenciana,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A.Giuffrè -Ed., 1962), 525~545.埃利奥特 (J.H.Elliott), 即使他在关于全面驱逐摩里斯科人对西班牙人有消极影响的问题上仍持有异议, 他也承认: “至少对巴伦西亚 (Valencia), 摩里斯科人的驱逐是一场经济灾难。”“The Spanish Peninsula, 1598-1648,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P.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1609-48/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70), 455.

[138] “当那些有用的摩里斯科人替罪羊没有了之后, 我们对……发生在17世纪西班牙退化过程中的目的转移到犹太人或被指为犹太人的人的程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吗?” Chaunu, *ibid.*, p.94.

[139] G.N.Clark,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Press (Clarendon), 1929), 42.

[140]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204.

[141] Cited by Vilar, *Europe*, 34, p.10.科尼斯堡格 (H.G.Koenigsberger) 用更现代的语言道出了同样的观点: “这样, 使外国人感到惊讶的是, 所有从秘鲁 (Pe-ru) 输入的银都不能使西班牙成为一个富国。美洲的金银支付了皇帝的军费, 使热那亚银行家发财, 但是用以投资生产克服国家经济后退的太少。随着查理五世的帝国越来越变成西班牙的帝国, 西班牙的经济弱点越来越成为它与西欧竞争者斗争的严重障碍。”“The Empire of Charles V in Europe,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R.Elton, 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8), 322~323.

[142] 席尔瓦 (Da Sliva) 将劫掠行为的兴起归因于这样的事实, “物价相当紧张以及市场使农民沦为当地封建主控制之下……” *En Espagne*, p.161.里格拉 (Juan Reglá) 认为它是法国危机的副产品之一: “进一步说, 法国危机使加斯科尼 (Gascony) 的移民狂涛涌入加泰隆尼亚 (Catalonia) 和阿拉冈 (Aragon), 这些人精力充沛地参与了盗匪活动。” *Hispania*, XIII, p.233.毫无疑问, 将它全推在加斯科尼人身上有点过分。但是塞莱马 (Enrique Serraima) 评论说, 因为胡格诺派 (Huguenots) 和当地山区盗匪“所造成的公害”使1582年比利牛斯 (Pyrenees) 的形势变得相当严重。“Hugonotes y bandidos en el Pirineo catalán, ”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IV, 1954, 211.

[143] V.G.Kiernan, *Past & Present*, No.31, p.37.

[144] “16世纪西班牙大帝国的成功主要得之于拥挤的卡斯提尔过剩人口的勇气与活力。16世纪西班牙人口数目付阙, 亦不可信, 但是一般可以肯定, 卡斯提尔的人口在该世纪增加了许多, 正如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 在1530年代, 它以最快的比例增长。”Elliott, *Past & Present*, No.20, p.57.

[145] See Elliott's arguments in *Imperial Spain*, pp.194~195.

[146] Ibid., p.195.

[147] Chaunu, *Séville*, VIII, (1), p.244.

[148] “16世纪50年末在战争的紧张关系下，各国财政的破产以及卡托-坎布雷（Cateau-Cambrésis）条约之后的和平，都使各国政府感到有积累战争金库的必要。”Lowrence Stone, “Elizabethan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 1949, 35.斯通（Stone）引用了新的法国指导准则：“Les chose desquelles les hommes se peuvent passe ne doibvent estre jugées nécessaires.”（人们能做到的事，就不要想它是否应当做。）

[149] Carl J.Friedrich, *The Age of the Baroque* (New York: Harper, 1952), 8.

[150] “Introductio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Wem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8), 1.

[151] “16世纪前半期如此大规模的争斗随着一个又一个的争斗者逐渐精疲力竭而沉寂下来。在东方，在基督徒与穆斯林土耳其人（Moslem Turks）之间的争斗慢慢冷却成为一种争吵和一触即发的和平共处。在中部，在神圣罗马帝国内，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Augsburg）确立了三方面的平衡，不稳定但总的看来能维持，在路德教（Lutheran）诸侯、天主教诸侯和哈布斯堡皇帝之间，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取决于帝国奥地利（Austrian）公爵地和波希米亚（Bohemia）境内的远东边界。在西方，1559年4月的卡托-坎布雷和约确认了法国君主与哈布斯堡的西班牙支系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他们长期以来的争吵只是暂时平息而不是结束。随着每一次这类争斗的平息，都留下了特定的政治体制，在1559年之后，每一种体制都以自己的方式逐渐与别的体制区别开来。”Ibid, p.2.

[152] “然而人口的变化并非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总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人成为不受社会和法律管束的流浪汉和土匪。他们也有就业要求，这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简言之，人口的增长意味着一系列优点，同时也伴随着负担与不便。可能.....在某些时候，人类生产与报酬递减律相随，这是一个退化的过程.....16世纪末的欧洲人口相对过剩，尤其是在西部国家，人口密度最大也最富庶。可能像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革命会挽救局面，但它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后。换句话说，生产水平有可能达不到要求的能力，与人口不相适应。实际上，供给并不随需求的增加而增加。”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34.

[153] Ibid., p.14.

[154] See *ibid.*, p.26.

[155] Tawney, *A Discourse Upon Usury*, p.86.

[156] Frank C.Spooner, “The Hapsburg-Valois Struggl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R.Elton, 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8), 358.

[157] Astrid Friis,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2.1953, 193. See also pp.209~213.

[158] 她尤其谈了一下豪泽 (Hauser) 关于1557至1559年危机的论文, 她肯定: "不幸的根源与其说在财政政策之中, 毋宁说是在流行的经济条件中发现的。我不赞同前者 (财政政策)。或许尼德兰——西班牙财政的崩溃不能在长期的运行中避免。但是可以肯定, 居民支付税款的能力及预付贷款的能力 (税务收入可以提前) 是尼德兰统治者财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各特 (W.R.Scott)在研究现代早期的不景气, 尤其是英国的不景气方面做出过大量努力, 他说在许多共同加深不景气的因素中, 歉收、瘟疫和因战争导致的商业中断是太明显了, 不可能被忽视。这三种因素在尼德兰恰恰可以追溯到致命的1557年。" *Ibid.*, p.195.

[159] See *ibid.*, pp.213~217.

[160] 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42.

[161] Lucien Febvre, "Préface" to Huguette & Pi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I: *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Paris: Lib.Armand Colim, 1955), XIII.

[162] 参看克雷里拜克斯 (Jan Craeybackx's) 对考尔纳特 (Emile Coornaert) 所著 *Les français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e à Anvers (fin du XVe-XVIe siècles)* 一书的评论, 他认为考尔纳特 (Coornaert) 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在旧大陆各地之间的运输规模远非如费弗尔 (Lucien Febvre) 在他给那本著作的第一卷的序言中描述的那么小, 这是一本由肖努 (H.P.Chaunu) 所著论 *Seville et l'Atlantique* 的杰出的著作。当我们认识到, 在西班牙和新大陆每年的运输量比来自米德尔堡 (Middlebourg) 的酒, 即使不是在价值上而至少在吨位数上大体差不离甚至超过时, 那么, 对此陈述必须予以修正。" "*Les français et Anver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S.C.*, XVII, 3, mai-juin 1962, 543.

[163] 参看克里斯坦森 (Aksel E.Christensen) 的描述: "波罗的海出口.....实际上除了谷物之外, 对于荷兰和西南欧的工业全是原材料及辅助性材料。在那些提供原料的船舶制造业中是最突出的.....麻是制绳的原材料, 制绳是造船和渔业 (渔网) 独特的辅助工业; 同时, 亚麻是别的辅助工业的基础, 如帆的制造。 (沥青、焦油及金属这些都为造船服务)" "的确, 波罗的海贸易是荷兰商业之'母'和'灵魂', 不仅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批量贸易, 而且是商业海运繁荣和增长的重要基础。" *Dutch Trade to the Baltic about 1600*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41), 365~366. See J.G.van Dillen, "Amsterdam's Ro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Politics and its Economic Background," in J.S.Bromley and E.H.Kossman ed.,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Groningen: Wolters, 1964), esp.pp.133~135.

[164] “一种新的世界经济……被缔造（在15世纪的下半叶），在这个经济里，里斯本和贸易公司（Casa de Contratación）控制了世界的香料贸易，并指挥到果阿（Goa）的集贸中心和泊在塔古斯河（Tagus）的香料船队。葡萄牙人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技术不足以担起这个生财的责任，而作为入侵者的荷兰人倒证明他们具有这种能力……在荷兰人控制之下的香料贸易形成了他们与波罗的海及西北欧贸易的价值不可估量的附属物。新的、扩大了香料贸易和东方的生产成为整个欧洲甚至横越大西洋贸易体制的一环。” E.E.Rich, “Preface,”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Rich and C.H.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XII, 又参见里奇（E.E.Rich）：“荷兰人，同时在没有发现必须积极参与向东或向西的航海与贸易的条件下获得了新大陆的贸易优势。他们的大半精力投入到与西班牙的宗教争论和长期斗争中。他们也能利用地理位置和商业上的聪敏使他们的国家、他们伟大的城市——安特卫普成为东方香料的集贸中心和美洲贵金属的交易所。北海（North Sea）的鲱鱼贸易也使他们能够与葡萄牙和地中海进行有益的商业交换；他们与波罗的海的木材、亚麻、焦油及皮毛贸易使他们对西欧别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Expansion as a Concern of All Europ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G.R.Potter, ed.,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7), 468.

[165] S.T.Bindoff, “Economic Change: The Greatness of Antwerp,”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R.Elton, 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8), 51.

[166] 与法国，后来与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的汉萨同盟（Hanseatic）贸易早在13世纪就已经过布鲁日（Bruges）了。到16世纪，再也不能无视安特卫普。总的来看，到这时，汉萨船只在大西洋贸易中更多是作为运输者，而不是作为商人而存在下来。See Pierre Jeannin, “Anvers et la Baltiqu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XXXVII, avr-juin 1955, 107~109. Jeannin认为“安特卫普的社会背景对汉萨传统及其制度有溶解作用（p.97）。”

[167] 并非每一个人都同意。斯莫拉（Frank J.Smolar, Jr.）认为其衰落在卡特（Charles H.Carter）的“Resiliency of Enterprise: Economic Cause and Recovery in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中被夸张了。Ed.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247~268.详细的讨论在251至252页，他的结论是：“内在的经济力量和广泛恢复的潜力是强大的；证据丰富，而且还有大量的证据有待挖掘”（p.253）。

[168] “英国成功地重新组建了它的商业，以致足以补偿安特卫普垮台后的粉碎性的打击。但是它失败了——的确它几乎未做尝试——继承伊利亚（Elijah）的衣钵。在安特卫普垮台和阿姆斯特丹兴起之间的唯一机会溜掉了。英国经济中的严峻时期表明，事实上它成功地从德国手中接过了采矿和工业技术的领导权。但它在商业和运输的霸权之争中输给了更有进取心、更有效率、组织得更好的荷兰人。说这种由于安特卫普垮台而出现取胜机会的失败延缓了英国跃居世界霸主之位至少一个世纪一点不过分。”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p.54.

[169] J.W.Smit,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Studies Regarding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in Bromley & Kossman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 28.

[170] ".....发生在(16世纪晚期的)政治发展,糅杂了经济的戏剧性的兴起,它由统治家族的商人阶层领导,在较大程度上说明了荷兰人在17世纪引人注目的地位。"P.J.Roorda, "The Ruling Classes in Holland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n Bromley &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I, 112~113.

[171] "贵族有寻求君主帮助反对普通的资产阶级或是与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君主的选择自由,那由于君主并非不愿意剥夺贵族的特权。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贵族似乎选择了君主。在为皇帝服务的过程中,更高的贵族迅速出现,同时,低级贵族对更低级别的管理部门或军队中的任职也感到满足。"J.W.Smit,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31.

[172] *Ibid.*, p.41.

[173] "因为实际上纯粹的贫苦阶级革命总是短命的,大的革命难道不应归因于那些兴旺的想成为革命者的阶级与那些被迫如此的贫苦阶级的联合?" Comments by Pirre Vilar in *Charles-Quint et son temps*, p.188.

[174] "在16世纪,几乎是只第一次,反对运动变成了民族规模,包括一切阶级或阶级成分,从世袭诸侯到无业匠人全都参加。"H.G.Koenigsberger,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Parties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4, Dec.1955, 336.

[175] "况且,中央政府和那些充满怨恨的律师正逐步吞食剩下的封建特权。在1520年,一个通告禁止征收新的什一税,试图取消存在不到40年的封建权利。在1531年,国王禁止贵族强征礼物或是从他们租户那里要求新的服务。因司法权的实行导致的收入的减少也提到过。"H.G.Koenigsberger, "Property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Hainault, 1474~157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X, 1, 1956, 14.

参见斯密特(Smit):"但是要确定这样的敌视是否主要因关心保存他们的经济根基或打算维护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激发的是困难的。更高层的贵族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其有关的经济地位,正如更低级的贵族(程度更轻)一样,似乎因引人注目的消费而一直在衰落。非常明显,经济压力仅仅是贵族的多种痛苦之一,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四面受敌的阶级构成了激发革命的主要因素。"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p.41~42.

[176] See Pieter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59~1609)*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32), 69~70.

[177] "如果低层贵族实际收入的减少事实上可以归因于高涨的价格,那么它或许不至于延续16世纪前3/4那么久,而是集中在大叛乱爆发之前的15或20年。1550年之后的年代,价格上升要比从前快得多。这样,即使有危机,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尖锐和突然的,它因1559年卡托-坎布

雷条约之后遣散bande s d'ordonnance, 即贵族的尼德兰骑兵而加剧。”Koenigsberg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p.14.

[178] “这是一个君王缔造国家的显著的例子, 也显示了菲利普 (Philip) 在构筑传统的大厦时是一个勤奋的工作者。”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71.

[179] Ibid., p.72.

[180] Smit,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47.

[181] See *ibid.*, pp.42~43.

[182] Ibid., p.48.

[183] “法国与西班牙的和平是特伦特 (Trentine) 天主教重新组合的政治基础。一种特别的超然存在, 不仅仅为某一个人, 而是面对基督教的一切。”Manuel Fernandez Alvarez, “La Paz de Cateau-Lambrésis,”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X, No.77, oct.-dic., 1959, 544.

[184] 科尼斯堡格 (Koenigsberger) 则替菲利普二世辩解: “菲利普二世几乎一直谴责派阿尔法 (Alva) 去尼德兰。但是这些判断难道不是广泛基于历史学家的事后判断? 一个强有力的16世纪的统治者当其面临高层贵族尽管是体制上的反对和一个革命的带有军事组织的宗教运动的双重反对时, 还会有什么行动呢? 在法国和苏格兰, 因为政府的软弱, 加尔文主义者建立了令人生畏的组织。叛乱必须扼杀在萌芽之际, 这是16世纪国家管理的正常现象。况且, 这个政策几乎成功。它之所以失败, 或许是因为行动太迟, 甚至在1567年才开始, 还有是阿尔法 (Alva) 没有指挥海军制服水上乞丐 (Water Beggars)。毫无疑问, 菲利普误会了局势的复杂性, 而且阿尔法证明了他的选择与目的不符。但这错误不像后来那么明显。因为阿尔法已带着相当的圆滑在战争中反对教皇保罗四世 (Paul IV)。然而……甚至阿尔法的残酷也没有引起那些受压迫者起义的自发发生; 1572年的起义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组织得更好的、无情的‘水上乞丐’以及与他们同样有较高组织水平的在荷兰和泽兰 (Zeeland) 城镇的‘第五纵队’的行动。”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341.

[185] 西班牙国内的发展与尼德兰革命时起时伏之间的联系被朗彻 (H.Lonchay) 简练地道出: “这些 (西班牙的财政) 危机不仅关系到安特卫普、伦敦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利益, 而且也影响到未被注意的 (比利时 (Belgium)) 的事务。1557年的危机说明了为什么菲利普二世急于与法国媾和, 尽管有圣昆廷 (Saint-Quentin) 和格拉夫林 (Gravelines) 的胜利。1575年的事使我们明白了西班牙人的狂怒和那些薪饷被克扣如此之久的外籍士兵的暴行。1596年的交易使低地国家提前易手给大公爵, 菲利普二世这样决定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在低地国家建立和平比采用暴力更容易些。1607至1608年的法令说明菲利普三世 (Philip III) 为何顺从地签订了使其自尊深受伤害的十二年停战协议。1647年的事肯定与菲利普四世 (Philip IV) 突然意识到联省的独立已成定局不无关系。这样, 比利时的命运与西班牙的命运联系起来。一个人通常在不知

道别国财政状况下是不能理解一国的政治史的。”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pp. 994~995.

[186] 盖尔 (Geyl) 补充说: “总之, 这的确是加尔文主义者的做法, 狂热、诚实、不受对艺术与美敬意的约束, 努力纯洁神的选民的土地, 使他们摆脱偶像的魔鬼的花朵, 并一举清算过去的一千年。这样的行为同时也不是不能得到理智的加尔文主义首领的认可。”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93.

[187] See I.Schöffer, “The Dutch Revolution Anatomized: Some Comme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II, 4, July 1961, 471.

[188] Ibid., p.343.

[189] See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 p.161.

[190] 盖尔 (Pieter Geyl) 认为: “对尼德兰分为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的真正解释恰恰与时下流行的意见相反。不是因为南方是天主教的, 起义的北部新教徒在这里失败而在北部却成功了: 它是因为河流使得起义以其作为屏障立足于北方, 同时, 西班牙恢复了那些从战略屏障来说坐落不对的省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形成了新教的北部共和国和天主教的南部尼德兰, 或是新教的荷兰和天主教的比利时这种双重制度。”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New York: Meridian, 1958), 209. See Henri Lapeyre, *Les monarchies européennes du XVI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39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188~189. 这样, 行政上的分离主义导致了宗教上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说, 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变成了资本主义者, 而是资本主义者变成了加尔主义者。特雷弗-罗珀 (H.R.Trevor-Poper) 谈到了这种情况: “如果 17 世纪中叶, 伟大的加尔文主义企业家们不具备加尔文主义者的虔诚, 甚至它假想的社会愿望, 那么他们目的何在? 如果我们注意地看看他们就肯定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事实。首先, 无论是什么样的加尔文主义者, 他们中的多数不是他们工作的国家本地人。不是荷兰人, 也不是苏格兰人, 不是日内瓦人 (Geneva) 也不是帕拉丁那特 (Palatinate) ——恰恰是这四个显著的加尔文主义团体——产生了他们自己的企业家。对那些团体中的当地人灌输必要的加尔文主义教义没有这样的效果。其次, 这些移民中的多数是尼德兰人……而且, 当我们进一步观察时, 我们会发现这些尼德兰人来自荷兰共和国中一个特别的阶级。甚至在那里, 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是移民。他们也有佛兰德人 (Flemings) ——即来自现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南部省份的移民——他们或是列日人 (Liégeois), 即来自列日 (Lege) 的天主教的王公——主教区。”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p.15~16.

[191] “比利时 (用一个现代概念) 基本上是一个‘骑兵国家’, 适合从根布罗尔斯 (Gemblours) 到滑铁卢 (Waterloo) 之间的开阔地上进行大规模战斗。‘欧洲的角力场’是一个可能输, 也可能赢的地方。荷兰 (又用一个现代概念) 就不是这样, 它的大部分地区被海湾、河流、水渠、沼泽分割得支离破碎, 以致在它的疆界内很难找到一个供大支军队整队排列的地方。” 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p.541.

[192] Cited in Christopher Hill, *Reforma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23. 在一封私人信

件中，希尔（Hill）谈到“纳米尔（Namier）对巴利奥（Balliol）学院的学生与他在1934年进行的几次晚上讨论中的一次作了评论，当时他正在牛津发表福特讲座讲演（Ford Lectures）。”参看查博德（F.Chabod）：“如果在16世纪的国家生活中有感情在起作用的话，他们本质上是宗教的而不是民族的或爱国的。就法国而言，这仅仅适合它的内部政治，因为外交政策早就是奉行意识形态无国界的原则。但就哈布斯堡而言，这难道不也适用在外交政策上吗？” *Actes du Colloque*, p.620.

[193] “爱尔兰的天主教，就像尼德兰的新教一样，通过与民族事业相结合汲取新的力量。虽然爱尔兰社会要比尼德兰社会小得多，它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具有荷兰反对西班牙斗争的许多共同的特点。两个社会中的斗争因一种宗教信仰而增强，宗教信仰又被一种民族共同感增强。在两个社会中，民族的领导者被国际宗教运动所接纳，为保证国际援助提供了新的机会。” J.H.Elliott, *Europe Divided, 1559~1598* (New York: Harper, 1968), 302.

[194] “在法国与尼德兰的政体之间存在一个……本质的差别，它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各自政治抗议的特点，（法国的）凯瑟琳（Catherine）本人是半个外国人，但她作为皇家政府的首领，这个政府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民族统一的象征。玛格丽特（Margaret），作为查理五世和一个佛兰德（Flemish）贵妇的女儿，血统上是一个尼德兰人；但她领导的王室政府却逐渐被视为外人。从长远观点来看，这证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因为它允许反对派出现——因为它从不能令人信服地出现在16世纪60年代的法国——作为民族传统反对外国革新的保护者。” Elliott, *ibid.*, p.126.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加尔文主义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不是革命的，而在这时期它在尼德兰和法国却是革命的，王室当局的区别再次显现出来：“从一开始，英国就因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的争吵倾注它大量的民族精神反对教皇……在英国，外国的影响在玛丽女王（Queen Mary）之后从来不成其为严重的问题，直到查理二世（Charles II）统治时才再次出现。但是在英国的形势中更重要的是1588年之后天主教君主的不存在，他们在法国和荷兰是起到了罗马反基督者不间断的提醒者的作用。” Leo F.Solt, “Revolutionary Calvinist Parties in England Under Elizabeth I and Charles I,” *Church History*, XXVII, 3, Sept., 1958.235.

[195] Koenigsberg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p. 350~351. 参见金顿（Robert M.Kingdon）论作为一个跨国运动的加尔文主义：“16世纪的起义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单独的民族史中的篇章；他们必须被考虑至少是国际革命宗教组织——加尔文教会的一个部分。” “Political Resistance of the Calvinists in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Church History*, XXVII, 3, Sept.1958, 233.

[196] “不管条件怎么样，我们最终必须使新的共和国变成第一个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它具有强烈的商业民族共同体特征。（解释矛盾的事实）的关键，我认为，存在于革命仅仅在尼德兰部分地区成功的事实中。我将为这样的观点辩护，即尼德兰革命在别的许多方面，的确是一场革新的、进步的、社会的革命。但是商业资产阶级……太软弱以致不能在尼德兰全境建立它的政府；它能够凭自己的形象仅仅在荷兰创立一个国家，在那里，处在发达阶段的市场经济被南部的资本、人力、技术壮大了，而且，在那里，它没有来自敌对的社会群体中的主

要反对派。”Smit,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pp.52~53.参看维特曼 (T.Wittman): “1566至1605年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构成了一个首尾一贯的进程, 而且完全符合资产阶级革命的尺度。城市和农民大众的反封建斗争构成了他们对西班牙人的压迫和天主教会的反抗; 而且这些大众运动恢复了等级会议 (Estates General) 中上层的领导地位, 尤其是在乌特勒支联盟 (Union of Utrecht) 成立之后, 尽管它有种种局限和矛盾, 毕竟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Quelques problèmes relatifs à la dictature révolutionnaire des grandes villes de Flandres, 1577~1579,*” *Studia historica*, no.40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960, 3~4.

[197] “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严重的社会革命威胁——从1566年的偶像破坏运动到根特 (Ghent) 加尔文主义者放肆的民主专政, 在16世纪70年代晚期——埃诺 (Hainault) 的贵族关闭了他们的等级并为维持现状联合起来, 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向西班牙的统治屈服。”H.G.Koenigsberg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p.15. “从长远看来, 即使是宗教也不能够使贵族与民主专政和解, 一派又一派与从前共同的敌人结盟。结果是, 到处是革命派的解体和群众运动的失败。”H.G.Koenigsberg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351.

[198] 参见维特曼 (Wittman): “这些社团……完全不受革命的左翼威胁; 他们反而是它的受益者, 而不是它的绊脚石。在佛兰德 (Flemish) 的大城市里激进主义存在的条件是: 贫困化和封建政体腐败导致的加速发展的社会分化, 在这种形势中, 迅速转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也不存在。平民大众来源于破产的师傅、短工、学徒、小商贩及有种种政治行为表现的流氓无产者阶层, 尽管这些政治行为在这个发展阶段仅仅是一种本能。” *Studia historica*, p.16.维特曼在注脚中补充说: “考虑到16世纪流氓无产者的大量增加……恩格斯 (Engels) 在《德国农民战争》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里作了中肯的评价……在分析中世纪的群众运动时,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因素做仔细的考察 (p.16)。”

斯密特 (Smit) 对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宗教倾向作了如下评论: “同时, 我们必须问自己, 对那些散布在大众中的宗教信仰是多么的漠不关心: 那些1566年的偶像反对者和1572年革命的失业者是怎样一个游动的、冷漠的一群, 与其说他们是那时新教或天主教的先锋队, 毋宁说是‘未来’的新生力量。对起义是加尔文主义特点或是纯政治的, 是现代的或是保守的这个问题的回答, 很大程度取决于对人口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的考察。”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 p.24.

[199] “没有什么地方的革命像根特 (Ghent) 的那么彻底。”Koenigsburg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344.也参看维特曼 (Wittman): “既不存在客观条件, 一个受自己的利益驱使的资产阶级, 也不存在主观条件, 针对亨比茨 (Hembyze) 及其支持者作出有效的对策。由于缺少这一切, 导致了激进主义进程, 在1583年, ‘法国风暴’后对自己的否定。亨比茨 (Hembyze) 整体说来已然削弱了奥兰治党人 (Orangists) 的权威, 将自己置身于根特反对奥兰治 (Orange) 的威廉 (William) 的力量前列, 并向西班牙寻求帮助。亨比茨的背叛没有引起道德上的争论——这与历史学家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它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在一切早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有可能发现。在英国, 在克伦威尔 (Cromwell) 护国政权期间, 一些平等派成员 (Levellers), 他们的党派一解散, 即与保皇主义者和西班牙人建立了关系, 恰

如亨比茨和道尔塔努斯（Dalthenus）所为。” *Studia historica*, p.36.

[200] “这样，共和国的显贵就不可能完全排拒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然而，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起义也引起从上至下的各种限制的消失。在16世纪前半期，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显贵反对那些声望不凡的野心家与他们城镇中的普通市民结盟。中央政府告诫摄政者们不要越城弄权。另一方面，在起义之后，城市地方长官实际上已完全独立。他们的统治无任何人干涉，几乎如脱缰的野马。”Roorda,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pp.114~115.

[201] Smit, *Precondition of Revolution*, p.52.

[202] See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p.217~219.

[203] On France, see G.N.Clark, “The Birth of the Dutch Republic, ”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46, 191. On England, See R.B.Wernham, “English Policy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 in Bromley and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 30~31.

[204] Geyl,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225.

[205] “在15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泽兰（Zeeland）和荷兰的渔业及造船业城镇在缓缓而又稳定地繁荣着，向东扩展他们的海岸贸易越来越远以致成为正好在那些普鲁士地区有强大经济力量的汉萨同盟（Hanse）最危险的竞争对手。”Carl Brinkmann, “The Hanseatic League: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 4, Aug.1930, 591.同时，荷兰大量侵蚀苏格兰的海外贸易，到1560年达到一半左右的吨位数。统计数字并不真正说明问题：“不管怎么样，数字甚至根据不同的贸易路线合计出来的运输船吨位数，对于估计苏格兰和低地国家之间贸易的真正意义都是有缺陷的，因为除了煤和盐之外，他们之间的贸易货物，例如（苏格兰）与挪威的贸易，比较起来价值相对较高。” S.G.E.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in its European Setting, 1550~1625*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60), 245.

[206] “对荷兰与波罗的海贸易船数字的分析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不是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也不是在1600年前后的年代新的远道路的伟大扩张影响到荷兰对波罗的海贸易控制呈持续下降状态。”Christensen, *Dutch Trade*, p.90. 约翰森（Oscar Albert Johnson）表明，挪威人利用1572年荷兰人反对西班牙人的起义开创了“与西班牙国王的属国直接的、定期的商业关系……”然而，在1621年《十二年休战协议》（Twelve Years Truce）结束之后，荷兰舰队有足够的实力攻击挪威人：“海盗及类似的截夺实际上完全毁掉了我们在地中海的航行。”“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la Norvège et l’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 *Revue historique*, 55e annee, fasc.1, sept~dec. 1930, 78.约翰森（Johnsen）承认，毁灭挪威的不仅仅是荷兰的海军力量，还有商业力量。See p.80. 正如詹宁（Pierre Jeannin）所说的：“人们可以讨论荷兰商业具体在什么时候赢得对汉萨同盟的胜利，但是在大约1600年，胜利是绝对的。”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pp. 193~194.

[207] Geyl,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239.

[208] 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31.布罗代尔（Braudel）走得更远：“随着1350至1450年的还俗运动将犹太商人推向意大利及其所庇护的经济，这样，在1600至1650年的危机中他们再次找到避难所，这次是北海地区（North Sea）。由于新教世界选择了他们而拯救了他们，反之，也由于他们的选择，拯救了新教世界。最终，正如桑巴特（Werner Sombart）评论的，热那亚就去美洲、印度或是中国的航海路线而言，其地位与汉堡（Hamberg）或是阿姆斯特丹相当。” *La Méditerranée*, II, p.151.

[209] “在1590至1600年短暂的时间里，荷兰……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贸易体制。虽然仍在襁褓之中，荷兰殖民的路线与利凡特地区（Levanting）的贸易……立刻建立起来。新的贸易主要是印度的贸易，立刻成为统治政权的利益中心，主要商人的利益中心，也成为当时整个共和国的利益中心。”Christensen, *Dutch Trade*, p.19.巴伯（Violet Barbour）认为，阿姆斯特丹崛起的迅速在当代人看来也是显著的：“外国人观察阿姆斯特丹向世界贸易的顶峰崛起，带着不无愤怒的惊讶。突然地，这座城市就出现在那儿。”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nn Arbor, Michigan: Ann Arbor Paperbacks, 1963），17. See Da Silva, *Revue du Nord*, XLI, p.143, Who dates the Dutch Supremacy very exactly between 1597 and 1598.

[210] Christensen, *Dutch Trade*, p.424.参看巴伯（Barbour）：“该城新财富的主要来源，正如它更早时期那些最一般的优势，似乎一直是谷物贸易和海运的提供，以及这类东西及别的重要货物的搬运、贮藏和上市。环境——饥荒、战争以及不断变更的战争技术，需要更多、更大的枪炮，海上冒险也要求更多、更大的枪炮以及装备更好的船只——这大大增加了阿姆斯特丹提供的货物和各种服务的需求。”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26.她也谈到了阿姆斯特丹在1592年之后的海上保险地位和1609年之后的武器及其他军需品提供的地位。（pp.35~42.）

[211] “因为阿姆斯特丹是主要的木材市场，这样荷兰的船舶制造比任何别的地方都要廉价。在英国人着眼于大的、军用商船时，大约在1595年，荷兰开始建造一种新型的称作‘飞船’（flyboat）的船只，这种船轻便、实用、狭长、快速，用于运输笨重的货物。飞船易驾驶，船员不多。低运费说明为什么别的海运民族很难与荷兰到波罗的海、挪威及莫斯科公国（Muscovy）的运输进行竞争。”J.G.van Dille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p.136. See Violet Barbour, “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 St.Martin’s, 1965），I, 227~253. 关于荷兰飞船的技术优点在帕里（J.H.Parry）的著作中有简要的描述。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3），p.83.希顿（Herbert Heaton）认为，荷兰造船业优势可以从财政和经济方面得到解释：“（1）以现金低价购买大量原材料……（2）在造船业中有标准化的设计、合成部件及制造方式……（3）制造者能够借到比他的外国竞争者利息低得多的钱。”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rev.ed.（New York: Harper, 1948），275.

[212] “谷物运输使阿姆斯特丹的商业海运得以运转，较少大批量装载使商品运输的廉价成为可能……直到1666年，据估计，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中还有3/4的流动资本从事波罗的海贸

易。” Barbour,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27.

[213] Barbour, *ibid.*, p.18.塞欧斯 (André-E.Sayous) 谈到阿姆斯特丹作为财政中心地位的优势：“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改进了它的技术：这样，使那些资本主义团体进行海上贸易和获取现代形式的信贷变得更加容易。海上保险完善了，这归功于许多人参加分担风险、更加准确地确定固定比率；……至于信贷，即使方式没有改进，给商品信贷的数量却增加了；兑换证不仅仅用于一个又一个地方的支付，而且实际上是早先的信用状；然而它仍然不能作为后来市场需要的套汇来用。”“Le rôle d’Amsterdam dans l’histoire du capitalisme commercial et financier, ” *Revue historique*, CCXXXIII, 2, oct.-déc.1938, 263. See also pp.276~277. 在塞欧斯 (Sayous) 看来，阿姆斯特丹兴起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是“新的集资和投机形式 (p.279)。”

[214] “仅仅只有一种解释似乎有道理：荷兰，由于它靠近天主教低地国家的位置以及它坚持敲开西班牙的大门，比 (英国) 保留了与 (伊比利亚) 半岛更多的联系以及与美洲金银的联系，没有它，它的商业很难存活……在西班牙与荷兰之间有金钱联系，这种联系因1609至1621年的和平而加强，作为17世纪中叶西班牙完全的幸福而中断，恰好在那个时刻——是纯粹的巧合？——即荷兰开始不妙之时。”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572~573.

巴伯 (Barbour) 将重点放在阿姆斯特丹对谷物的控制上：“有可能，阿姆斯特丹作为金银市场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与西班牙的战争交易，这样，在1595年以及随后直到1630年的年代里，西班牙被迫认可贵金属出口以作为谷物进口的回报。”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49. 而且我们再次发现了积累的优势：“但是从加的斯 (Cadiz) 至荷兰输银的直接豁免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也有间接的豁免权，这主要从那些亦分享卸在加的斯的金银的国家获得——豁免商品购买服务的支付，被投机的可能性所吸引；或仅仅是追求安全和处置的自由。(pp.50~51)。”

[215] See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209.

[216] Friedrich, *The Age of the Baroque*, p.8.

[217] 正如拉雷兹 [José Larraz (1943)] 所说，如果有一种荷兰人的重商主义，那它“应是一种自由的重商主义。” *La época del mercantilismo*, p.186.

[218] “荷兰人赞成在世界各地进行尽可能开放的贸易，英国人则偏爱一种时时限制的贸易，尤其是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而且在外国与英国之间也实行这种政策。”Robert Reynolds, *Europe Emerges*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442. 参看巴伯 (Barbour)：“出口货币金属的自由，在17世纪别处极为罕见，有利于稳定阿姆斯特丹的兑换比率，这样，也鼓励了作为可转让的信贷工具的票据的流通，它的贴现与出售成为该城一桩红火的生意。”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53.

[219] “阿姆斯特丹作为西欧商品交换给人印象深刻的地位的一个基本条件似乎是由贸易保护方针提供的，在15世纪下半叶，它的海上政策亦如此。与此相适应，所有从波罗的海来的身为阿姆斯特丹公民的船长都被要求为该城服务。这同样适用于阿姆斯特丹与一个非阿姆斯特丹公民船长共有一条船的情况。这条规则，是萌芽时期的航海法，旨在反对吕贝克 (Lübeck) 和

反对从波罗的海到佛兰德，尤其是到布鲁日（Bruges）的直接交通运输。”Glamann, *Fou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35.

[220] “大宗的购买、自由的信贷以及廉价的运输综合起来使阿姆斯特丹的价格与原产地通行的价格保持在一个水平上。1606年一个下议院的议员强调，荷兰人能够在尼德兰向英国人出售布料并进行再出口，这样，比英国贸易公司的售价更便宜。”Barbour,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p.95.

[221] 例如，参看巴伯（Barbour）论荷兰的对外投资及其力量：“（在17世纪）大部分寻求信贷购买的外国货物，或是短期贷款，都着眼于阿姆斯特丹的私人资本……”
“在北部国王之间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荷兰人的资本就像荷兰人的船只一样，为双方而战……”
“英国和法国给外国资本主义提供的处女地要比北部国家少，因为他们自己的中产阶级商业和工业态度富有活力和竞争精神，并为他们各自的货物寻找富有进取精神的帮助。但是在两个国家，荷兰人的资本都起作用。”Ibid., pp.105, 111, 119. See Braudel in footnote 229 above.

[222] “在1557年至1627年，热那亚银行家的世纪，在庄严的资本主义宏声中，在福格家族（Fuggers）的短暂世纪时代与阿姆斯特丹混杂的资本主义时代之间生存……非常清楚，热那亚人的财富不是被1557年的魔杖，在西班牙国家破产之后一挥而就的，也没有在1627年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在第五次或第六次西班牙破产之际……热那亚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国际金融枢纽地位。”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p.454~455.

参看艾略特（Elliott）：“热那亚银行家与福格（Fuggers）家族一道成为查理五世的贷款人，在1557年王室破产之后，在福格家族的影响衰落之际，热那亚人的影响却因此而增加。”*Europe Divided*, pp.59~60.

还见斯普纳（Spooner）：“在大约1570年之后，热那亚人的全盛时期开始了，在他们接替了福格家族的势力时便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福格家族从前卓越的金融地位已随1530年之后德国银矿繁花的枯萎而衰落。”*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27.

威尼斯也在这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金融角色：“在16世纪漫长的经济扩张中，威尼斯已经变成了国际货币交换流通的决定性的中继点。……1587年之后，威尼斯即有了存款银行，Banco della Piazza di Rialto.根据1593年的法令，参议院（Senate）规定，兑换货币应分类办理报关手续。结果，国际交易中的大量证券就这样产生了。实际上，共和国有双重金融体制：（the moneta corrente and the moneta di banco）流通货币和银行货币。”Frank C.Spooner, “Venice and the Levant: An Aspect of Monetary History (1610~1614),”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s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646~647.

[223] “菲利普二世与伊丽莎白之间的协约政策是有可能的，只要女王和英国商人被许可借用他们在安特卫普的交易，参加美洲的金矿（Pactole）开采。然而，恰恰是该决议使均衡受到了1566年危机的危害，还受1567年阿尔法（Alva）公爵进入尼德兰威胁性的登陆的危害……从那以后，在广阔的大西洋水域一切事情都发生了变化。”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438.

[224] “在金融领域，……安特卫普从1658年开始失去其中心地位，这时英国的伊丽莎白没收在普利茅斯（Plymouth）避难的西班牙舰队上的金银……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不再安全，从此，热那亚银行家决定改变贵金属运行路线，使它们通过热那亚和贝桑松

（Besancon）的集市。这样，后者在接近16世纪末之际变成了西欧领导银行业的地方和继续从新大陆流入的白银的集散中心。

因此，从银行业角度看，继承安特卫普的不是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直到1640年才变成贵金属的世界中心……”Raymond de Roover. “Anvers comme marché monétaire au XVII^e siècle, ”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XXI, 4, 1953, 1044~1045.

参见布罗代尔：“从1580年开始，真正的白金属集散中心远远不是西班牙自身，而那些意大利的大城市。他们依恃这种地位牟取巨额利益，他们向利凡特（Levant）出口一些来得便宜而又获利丰厚的东西，即部分西班牙过剩的银币。” *La Méditerranée*, I, pp.450~451.

[225] “我认为没有重申这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即热那亚是一个不受任何非商业势力侵扰的银钱市场。例如，那儿不存在教会对金融活动的压力。”Corlo M.Cipolla,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 p.256.

[226] 朗彻（Lonchay）论证，意大利银行家要求西班牙国王的利率是16%~20%。科尼斯堡格（H.G.Koenigsburger）说：“热那亚比任何别的城邦都更把它的宝押在西班牙君主身上……只要秘鲁到塞维利亚的白银输入不断，热那亚的富豪们就会发财。”“Western Europe and the Power of Spa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1968), 257.

[227] “由于种种不同力量的作用，到16世纪中叶，利凡特（Levant）的市场充盈着东方的商品，威尼斯也恢复了它从前的商业繁荣。但是在该世纪的前半期一直很萧条。”Vitorino Magalhães-Godinho, “Le repli vénitien et égyptien et la route du cap, 1496~1533.”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Vol. II*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3), 300. See Frederic C.Lane, “The Mediterranean Spice Trade: Its Revival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581~590, and his earlier article, “Venet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Venice and History*, 13~24; see also E.E.Rich.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esp.p.447.

[228] “可能，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作为与阿拉伯联系的中介，通过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高的价格，使自己得以维持，葡萄牙人或许由于在亚洲采用极其低价的购买而做得过分……地中海与东方的商业由于一点没有失去作为中介地位的利益，只能被武力阻止，这种压力监督它的出发地点。葡萄牙人利用几次机会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但是他们僵化的监视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之后自己放松了这根绷得太紧的弦。”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459~496.

[229] “在16世纪初期，由于葡萄牙与印度的直接贸易经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打开，地中海地区西班牙人的贸易度过了严重的危机……然而，葡萄牙人的垄断是短命的。尽管他们身在海上，也令人望而生畏，葡萄牙人不能指望用几只从散得很广的基地行动的战船永久

地压制滋养埃及、土耳其帝国还有欧洲顾客的繁荣的商业……印度洋上的西班牙贸易——或是更大的部分——很快重新进入其过去的航道，与之相伴随的是利用威尼斯船只的地中海贸易的恢复。在价格与质量的直接竞争中，优势绝不可能完全属于葡萄牙人的海洋贸易一边，好望角路线的成本和风险很大，且在继续增加。葡萄牙人也没有什么有利可图的货物外运。他们用贵金属购买香料，向国内运输的收益不得不包括向外航行的成本……香料的质量也有区别，葡萄牙人的香料容易‘在长距离航海中变质，失去香味。’J.H.Parry,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164~165.

[230] 参看宾多夫 (S.T.Bindoff) 论葡萄牙人皇家工厂在1549年不再作为一个永久性机构而维持所产生的影响。“不论采取这一步的理由是什么，也不管它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p.68.

[231] See J.B.Harrison,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Outside Europe, II: Asia and Africa.”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Wernham, ed.,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8), 533~534.

[232] 例如，奇波拉 (Carlo M.Cipolla) 评论道，在1580年与1610至1620年间的米兰 (Milan)，“人口数量有确切的增长。” *Mouvements monétaires dans l’Etat de milan (1580~1700)*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2), 31.在罗曼诺 (Ruggiero Romano) 看来，佛罗伦萨亦有类似的增长，而从1619至1620年开始下降。“A Florence au XVIe siècle: industries textiles et conjomture,” *Annales E.S.C.*, VII, 7.oct-déc.1952, 508~512.

[233] “小麦，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在整个（16世纪的经济活动中）农业产量中占压倒优势。农业是地中海的主要产业，尽管小麦仅仅代表农业收入的一个部分。”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385.

[234] “〔这种转移〕的主要理由一定是威尼斯人希望从陆路取利……早期的刺激或许来自大的修道院通过土地开垦获利的事例，这已经是15世纪的事情……”“向土地活动转变的关键性时期似乎是在1570年至1630年之间，这时期威尼斯人的土地增加了35%。”S.J.Woolf, “Venice and the Terraferma: Problems of the Change from Commercial to Landed Activities,” in Brian Pullan, 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en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194~195.参见鲍斯马 (Bouwsma): “总的来看，意大利的教会土地所有在反宗教改革期间一直在扩展，特别的环境又使这一趋势在威尼斯境内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加深了一步。教会组织利用他们积累的特别的资本，带着热情参与了该时代的开垦工程。” *Venice and the Defenses*, p.343.

[235] 布罗代尔 (Braudel) 以这样评价来给他的关于雨量与衰落之间的关系的描述下结论：“饥饿的整个社会性戏剧，在这个世纪最末几年引人注目，在这种气候变化，且变化相当微妙的情況之后或许有其真正的根源。这个假设是在很不谨慎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是又不得不提出它。” *La Méditerranée*, I, p.248.

[236] “谁都不会注意不到16世纪到处都是（疟疾）成灾的情景。或许是因为在那时，人们从事他们的老对手——低地的开发。整个16世纪，甚至15世纪，都在寻找新的土地。如果不去潮湿而又荒芜的平原，人们又能去哪里寻找呢？但是没有什么比害虫出没的荒地开垦更伤人的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四处的内部开垦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在意大利尤其如此。如果后者错过征服远方广地的机会，游离在那个伟大的运动之外，更多的理由，难道不是因为他忙于征服全部的国内的土地？这些土地能够被技术开垦，从洪水淹没的平原到大山之巅都可利用。”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59. See P.J.Jones, “Per La storia agraria italiana nel medio evo: lineamenti e problem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2, giugno, 1964, 307~308.

[237] “如果没有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提供购买大量谷物的财力，地中海地区的食物情形有可能要严重得多。这样，气候变化成了帮助在全欧扩散贵金属影响的因素之一。15世纪中叶以来的商业和造船业的扩展肯定也有利于缓和歉收的影响。然而，气候的变化使地中海国家在与大西洋与北海国家的相处中受到极大的削弱。”Utterström,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p.44.

[238] “从前，正如在1591年食物危机之后，地中海人的生活基本上依赖自己的农产品。没有什么事情可与阿姆斯特丹那样的低地国家的发展相比，更没法与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将在自由贸易的英国、在广阔得多的范围内所发生的相比。都市世界并没有给别的任何人向他们提供食物的任务。”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p.387. 然而，谷物的进口的确增加了。事实上是布罗代尔和罗曼诺（Romano）一道指出了小麦在里沃那（Leghorn）的扩张中的地位：“里窝那（Leghorn）的兴起难道与其作为小麦的出口港的地位的增长没有联系吗？1591年的大饥荒及北方小麦的流入……我们相信，标志着主要的转折点。”Fernand Braudel and Ruggiero Romano, *Navires et marchandise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1547~1611)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1), 22.

[239] 利凡特（Levant）作为谷物来源被截断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在帕里（J.H.Parry）关于15世纪的形势的描述中提到过：“在西部，人口较稠密，生产力较低，情形就更加困难。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拉古萨（Ragusa）、那不勒斯以及西班牙东海岸的城市——这些城市多数都位于开始生产酒、油或是羊毛的国家——他们全都是通过海路进口食物的国家，既然当地的供给不足，或是不可靠，既然地方的陆路运输成本太贵。西方主要的食物来源是阿普利亚（Apulia）和西西里（Sicily），这两地在政治上受阿拉冈的统治者控制，他们是定期的进口者；但总的说来，西部地中海谷物几乎不能自给自足，而且这些进口城市也往往求助于利凡特（Levant）廉价而丰富的谷物。威尼斯尤其依赖东部的谷物；它的爱琴海（Aegean）殖民地是一个有用的供给来源，共和国也定期从埃及进口谷物。这样，在东部地中海就存在一个特别、复杂、非常必要、富于弹性的海运谷物贸易网络。威尼斯、热那亚、拉古萨（Ragusan）的船只较大，专门设计来运送他们笨重的货物，通常不运别的东西。”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p.53.

[240] “在地中海地区条件不一样：因为经常有来自阿尔及利亚（Algerian）海盗威胁的危险，大而装备武器的船在那个地区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怎么样，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控制了地中海的部分贸易，这是由于它囤积了大量的谷物。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前半期的不少年代正好

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谷物短缺期，而阿姆斯特丹的仓库里却堆放着丰富的波兰（Polish）和东普鲁士（East Prussian）的裸麦和小麦，这样，荷兰商人能够谋取暴利。” Van Dille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p.136. See Parry,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pp.158~159. 帕里进一步考虑了地中海谷物短缺的原因：“16世纪70年代大量土耳其——西班牙人的敌对行动，以及威尼斯与西班牙的结盟也打乱了正常的谷物贸易，同时增加了海军、陆军以及各地驻军的食物需求（p.159）。”

[241] “另一方面，信贷的广度与贸易网络与商人们在遍及全欧的港口、市场、集市的联合有密切联系。热那亚商业金融家们的活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那些创立于意大利并参与了西班牙大西洋伟大冒险、其代理人遍布大陆的欧洲传统的中心地区，是影响到国际经济重心从南欧向北欧与大西洋转移的渠道。这样，他们就为荷兰辉煌的成功做好了铺垫。” 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31.

[242] “一时间，当欧洲其余国家将它们的注意力与资源更多地投入到海上贸易时，威尼斯却选择了正好相反的方向。1560年以后威尼斯的舰队开始衰落……但是这种海上撤退恰好与威尼斯的资本从航海转向陆地的大转移一致。在这里，它不是用于贸易，而是用于获取土地和建立能够成功地与北意大利和尼德兰的纺织工业进行竞争的纺织业，这两地皆遭欧洲战争之祸。这个政策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丰富的回报。在这个世纪的余下年代……（威尼斯）置身壮丽的辉煌之中，似乎从前的光辉日子又奇迹般地回来了。” Elliott, *Europe Divided*, pp.58~59.

[243] Domenico Sell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Venetian Trade,” in Brian Pullan, 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90.

[244] Carlo M. Cipolla, “The Decline of Italy: The case of a Fully Matured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2, 1952, 180~181. 这不只对于威尼斯对于米兰（Milan）也是真实的。 See Cipolla, *Mouvements monétaires*, pp. 33~34. 威尼斯衰落的详情在有关1620至1720年这个时期的论文集中有极好的详细说明。 *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Atti del Convegno* (27 giugno~2 luglio 1957) (Venezia-Roma: Istituto per la Collaborazione Culturale, 1961) .

[245] 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对关于意大利人价格波动讨论的可靠性持一点保留看法。 See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19. 萨普利（Barry Supple）对奇波拉（Cipolla）的假设给了一些肯定的证据。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9), 159~160. 也参看罗曼诺（Ruggiero Romano）关于威尼斯船业的衰落，尤其在1570年之后衰落的解释：“（关于造船的贷款政策）不能平衡威尼斯军库所承受的高价，这个价格和其他地方，尤其是和北欧的海军舰船的造价比起来要高。” “La marine marchande vénitienne au XVIe siècle,” in M. Mollat et al. eds.,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aritime en Europe,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 Actes du I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1962), 46.

[246] “北部纺织业的成功归功于两个因素：他们的成本低、质量高，与对款式要求反应及时的威尼斯产品比较起来，或许看起来不那么堂皇。” Sella, *Annales E.S.C.*, XII, pp.39.人们应该记得，16世纪的质量工作意味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业化的工作。在一个工厂工作与供给大众需要的产品同时与大宗生产相联系，优秀的工匠是为特别的市场而存在的时代，要求一种趋常的想象去认识前工业化时代的确存在的对立面。那时，工厂即聚在一个地方受直接监督的工人的集合体，仅用在那些极为罕见的情况，或是质量非常重要，如像某些奢侈品生产的地方，或是为安全的理由精确度要求较高的地方，或是有别的问题需要实行大规模管理的地方。例如，在16世纪的威尼斯，绳索的生产就是这样的情况，在那儿市议会担忧“我们的船舰以及相应的海员和资本的安全。”而且，市议会根本不信任利用个体劳动的企业。议会的声明被莱恩 (Frederic Lane) 在《15、16世纪的绳索与麻贸易》一文中引用过，见《威尼斯与历史》，(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270.

[247] “当一个国家处境不妙时，意大利在17世纪初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些力量或早或迟，或是自发的，或是被诱发的，会汇聚起来进行调整。调整不平衡的必要步骤有种种：新型产品的开发，新的市场的寻求，不鼓励某些类型的消费品生产，缓和国内价格水平和世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开发新型产品和开拓新的市场，大体说来，它就能维持它的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准。否则，很自然，它必须默认生活水准，最有可能是它的就业水平会戏剧性的降低。” Cipoll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pp.186~187.

霍布斯鲍姆 (E.J.Hobsbawm) 怀疑北部意大利是否还有可能有别的作为：“意大利的衰落……说明了寄生在封建土壤上的‘资本主义’的软弱性。这样，16世纪的意大利人或许控制了最庞大的资本集团，但却明珠投暗，蒙上恶名，他们使资本滞留在建筑业，在价格革命期间随便借给外国人（价格革命很自然有利于债务人），或是使它们从制造业活动转向各种形式的固定投资。……然而意大利投资者一直注意到太大的教堂伤害经营，所以行动谨慎。数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最高的利润并不是在技术进步甚或在生产中获得……如果他们非生产性地花掉了大量资本，仅仅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区域’的有限范围之内没有更多的空间进行任何规模的积极投资……16世纪晚期总的繁荣……依靠私人承包商的大的专制君主突然增加的需求，以及大贵族们前所未有的奢侈，延缓了不幸的日子。” *Crisis in Europe*, pp.18~19.

[248] 范方尼 (Amintore Fanfani) 使之成为最早虽然不是仅有的对衰落的解释：“在意大利，除了在农业中寻求避难，没有别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未能成功地减缓颓势，因为缺少三种东西：（1）缺少一个统一的市场或强大的统一趋势；（2）意大利未参与欧洲人海洋性扩张的伟大运动；（3）缺少一个重要的经济方案以满足意大利经济的真正需要。” *Storia del lavoro*, p.48.

[249] 灾难的严重性也表现在对人口的影响上：“1630和1657年的瘟疫勾销了1580至1629和1631至1655年的成果，并使意大利的人口回到大约1100万的水平。”Carlo M.Cipolla, “Four Centuries of Italian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D.V.Glass & D.E.C.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rnold, 1965), 573.

[250] “土地的出售以及（随后的封建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意大利半岛到处发生，从皮埃蒙特（Piedmont）……到西西里。……” Bulferitti,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IV, p.21, fn.30. 维拉里（Villari）描述了南部意大利他所谓的“封建土地商业化”的过程。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p.164. 由政府推行的这类土地的出售有利于那些封为贵族的新的群体的兴起。“这是一个复杂的扩张运动和封建领地的加强，对此，上层资产阶级给予过有力的推动，而且，它恰好与对传统贵族的经济和社会富有生气的断言一致（p.192）。”一个后果是“城市的封建化（p.168）”，它强烈而无效地抗拒着。城市的生活作风变化了：“封建扩张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奢侈品及非生产性物品的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发展处在新的阶段，在省区城市中心建设宫殿、教堂、别墅以及花园等等（pp.193~194）。”

[251] “由于严重的工业化水平不足，大部分银行和信贷被外国人控制，出口贸易的利益滋润了热那亚、威尼斯、加泰隆（Catalan）商人，及一种将封建经济与现代信贷体制的弊端混为一体的农业体制，西西里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地方，而且从未赶上过北部意大利在晚期中世纪得到过的领先地位。” Koenigsburger, *The Government of Sicily*, p.82.

[252] Lopez,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353. 布罗代尔写到过1620年代初，整个地中海地区“经济的衰落”。“L'économie de la Méditerranée au XVII siècle, ” *Les Cahiers de Tunisie*, IV, 14, Le trimestre, 1954, 195. 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谈到过“从1620开始折磨意大利人、卡斯提尔人以及西班牙属美洲这种衰落的魔怪。” *Paysans*, p.636.

第五章 强大的中心国家：阶级形成与国际商业

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恒久的主题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跷跷板式的起伏。我不谈论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游戏，尽管它当然存在，只是谈谈体制方面的这种游戏。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那些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机构适合在国际舞台上运转，同时也能感觉地方的利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另一些时候，社会活动家们则注重本地方的直接效益，注重国边界的稳定，对与之无关的事件则相对淡漠。当然，这些仅仅是“趋向”而已，而且并非所有的活动家们都崇奉这些主要的趋向。对于这些活动家来说，也没有类似的义务。

我应该强调一下，我是在谈论组织上而不是结构上的趋向。问题在于世界经济是否更加完整或是不完整，前景是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财产权受到更多或是更少的注意。这些结构方面的可变性加强了组织上的选择权，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长期而不是暂时的。组织上的选择权是政治方面的选择，是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所做出的决定。

在“第二个”16世纪，在“卡托-坎布雷”和约之后，经济平衡开始摇摆起来。西北欧变成了欧洲经济的心脏地带。现在正是考察究竟是什么给了法国和英国如此重要力量的时候。既然在这幅图景中工业部门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让我们看看何种类型的工业转换会出现，以及英国看上去是如何大大地受惠于它的。

“第二个”16世纪工业转换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它的技术革新（尽管有一些），也不是它的社会组织。工厂和大宗产品从根本上说仍是未为

人知的。欧洲世界经济的工业产品的综合水平增长多少亦不清楚。塞拉（Domenico Sella）提示我们尽管有漫长的16世纪的经济的发展，但是“1700年的欧洲工业部门与其中世纪的前驱相比要比19世纪的继承者相似得多。”^[1]

关键的变化在工业地理的分布方面。到1550年，在许多欧洲地区仍然有一些工业活动的中心地区。“欧洲经济的脊背……从佛兰德直到托斯卡尼（Tuscany），”^[2]但各地仍然有一些工业。从大约1550年起，工业活动开始集中在欧洲“西北”的某些国家，而在其他欧洲国家衰落。非常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衰落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查理五世的帝国版图。^[3]

随着工业在某些地区戏剧性的衰落，欧洲的其余地区似乎分成两大类。内夫（John Nef）一方面区分了北部意大利、法国、瑞士的不同，另一方面亦区分了欧洲“北部”（英国、荷兰共和国、瑞典、丹麦和苏格兰）的不一样。照内夫（Nef）的说法：

（前者）在手工与奢侈品工业方面有明显增长，在艺术与工艺品方面有明显的进步，但重工业产量不多，结果，在产品的量上没有显著的变化；（后者）由于重工业扩大，相应地，产品的量度达到空前水平。^[4]

塞拉（Sella）绘制的地理区画线稍有不同。他将佛兰德、南部德国至北部意大利画入衰落区内，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他这样做有充足的理由。他没有提到瑞士。他宁可比较瑞典和法国，两者有一定成就；也宁可比较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在这里“成就卓著”；^[5]在以上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了“一个宽阔的工业活动范围”。^[6]

然而不管怎样，两位学者都认可英国的伟大增长。当我们回顾许多关于相对欧洲大陆来说，英国就像“殖民地”的描述时就更令人吃惊了，^[7]而且内夫坚持认为迟至1547年，“与多数大陆国家，包括法国在内比较起来，英国在工业方面仍是死水一潭。”然而，因为英国的工业

扩张，尤其是1575至1620年之间工业增长；“两国的地位开始逆转……”^[8]

我们看到了晚期中世纪历史构图的一个重要变迁以及英国出口贸易的最终目标。它最初是作为原材料的供应者——谷类、羊毛以及少量的金属品和皮革。到14世纪，这些物品的出口相对衰落，谷类是完全衰落了，布料成为英国主要出口物。

谷类（特别是小麦）从14世纪以后地位日减。这部分归咎于东欧开始出口谷物，吸引了大部分国际市场。这本来有助于抑制英国产量过分扩张的任何趋势。^[9]然而，如我们也知道的，英国的封建领地趋于解体，通常认为是由于人口数下降，导致价格（尤其是谷物类）下跌，生活费增多。可以肯定，15和16世纪伦敦市场的增长导致一种新的对小麦的需求，^[10]但是那时，英国的封建占有制已然解体，谷类部分由海外进口提供。^[11]爱尔兰和挪威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虽然英国仍然是大陆的“殖民地”。^[12]这也是威尔士（Wales）从法律上并入不列颠王国的时期，它给英国提供了一个内部的殖民地，在这段时期重点发展牲畜饲养。^[13]

羊毛出口贸易在14世纪“不可逆转地衰落”，^[14]因为西班牙人的竞争，纺织品出口的增加及英国织布工业自身对羊毛的吸收。尤其是羊毛出口税被国家作为一笔财政进项，“对新生的英国纺织工业是起一种关税保护作用。”^[15]到1614年，羊毛出口正式被禁止，在这时期，英国试图调整爱尔兰的羊毛贸易，将爱尔兰变成一个羊毛出口者而不是布料输出者，这种输出反对英国而不是其他地方或国家。^[16]

英国的纺织工业对浮现的世界经济来说有两个特征尤为重要。在英国，乡村工业越来越多，这使得英国探索广阔的出口市场。

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里提到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的理

论，在英国，正如在欧洲的其余部分，14、15世纪的萧条引起农业收入的急剧减少，导致了提供收入的纺织工业的诞生。从资本家的角度看，乡村工业也有避免支付由城市行会抬高的高工资的优点，^[17]并且可以利用水力转动漂洗机。^[18]这些乡村工业生产的纺织品“质量不是最好……但廉价，所以能卖到那些没落的贵族和其他并不富有的顾客手中。”^[19]英国这种乡村工业的扩展远远补偿了城市中心的任何衰落。^[20]但是在经济收缩阶段，内部市场太小，以致不能维持工业。“自此以后，工业不得不寻求海外市场。这种情况……从14世纪下半期起在英国和荷兰没有失败过。”^[21]

这样，纺织品成了英国出口贸易的中心，这是一个自13世纪以来谷类出口一直居较大地位的大转变，也就是波斯坦（Postan）所说的“早熟的重商主义”的来由。^[22]其中一个方面是挤出海外商人，尤其是意大利商人，该过程到15世纪完成。^[23]不敢肯定进行得是否顺利。^[24]挤掉汉萨商人更困难，但那也在16世纪得以完成。^[25]

布料贸易给英国产生极大的困难。在众多的市场上出售的需要意味着英国将因竞争受到更多的损失和遭到更大的政治困难，这是相对受到保护的羊毛贸易而言。^[26]事实上，由于以上原因，布料工业在15世纪一再倒退。

波斯坦和宾多夫（Bindoff）将这些退步看作是新的海外贸易者商业组织——伦敦商人冒险家同业公会（Fellowship of Merchant Adventurers）产生的主要原因。该组织正式产生于1486年并垄断了与安特卫普的联系。^[27]但是英国人在市场幅度上遭受的损失，在数量上补了回来。进一步说，他们被迫合理化和讲求效率，如宾多夫所说，既然“新的形势意味着不仅仅是对布料的需求，尤其是对那些外国买主感兴趣的产品的需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的布料在特定时间里供给海外市场。”^[28]而且，英国这一方比尼德兰那一方更团结一

些（尼德兰受城市内部间相互的竞争所干扰），因此，商业冒险家协会可以“准确地避免相互冲撞”，^[29]这就处于一种有利的贸易地位。

关于英国的贸易地位还有有利的一面。它的税收压力比起那些旧的商业中心（佛兰德、北意大利）要小，而且，它的技术组织最先进因而也更经济，这样，就使其早在“第一个”16世纪就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30]在“第二个”16世纪的开端也是如此，英国有繁盛的出口贸易，其2/3的产品进入安特卫普，剩下的1/3进入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它与法国的纯赤字贸易被与哈布斯堡地域内的金银贸易所产生的有利的平衡掩盖了。在伊丽莎白时代（Elizabethan era）之初，英国的海外贸易已然受到高度称赞。^[31]

随着“第二个”16世纪的开始，英国既有政治优势亦有经济优势。可以说，英国内部异常统一，而且时间相对较早。^[32]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为它回顾理由，我们在前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讨论过，可以注意一下两种主要的解释：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形式据说已然为强大的君主制度所用，^[33]海岛英国的自然地理在集中君主权力方面比大陆更少障碍。^[34]

既有以上解释，让我们看看都铎（Tudor）的君主们是用什么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自然的”机遇，这也可以解释英国在“第二个”16世纪追求暂时性工业利益的能力。

一个因素是埃尔顿（G.R.Elton）所谓的发生在1530至1542年之间的亨利（Henrician）或都铎政府革命。这是在“最激进的现代人”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天才指挥下进行的。埃尔顿认为这是一个确实发生变革的时期，一个现代君主国产生的时期：“都铎时代的国家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新的民族的君主国，在看到君主制的表象时，实际上应注意它的民族特征。”^[35]政府革命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利益要求的更多协调的伴随物。如果英国在世界经济的网络中保持一贯的统一，它的经济就不再会被切割和分散。^[36]

埃尔顿看到一系列体制的程序——一种新的管理财政的模式，一个在国务秘书指挥下的管理权的集中，作为协调组织的枢密院，王室的合理化——每一个方面都与重组一个“更具体、专门的官僚机构”^[37]的努力有关。埃尔顿的研究引起种种永无休止的争论之一是，历史学家们认为，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在何种程度上，“差异”构成了质的飞跃。^[38]

亨利宗教改革（Henrician Reformation）是新的还是陈旧的？行政变化的确是一场革命，抑或仅仅是14到17世纪持续不断的行程上前进了一步？在我看来，希尔（Christopher Hill）对发生的一切有一种敏锐的适度的把握：

通观整个中世纪，都有“跷跷板”式的力量此起彼伏：当国王软弱或是无足轻重时，“官僚”政府在诸侯控制之下；当他强大时，“王室”政府在国王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在16世纪这个循环被打破了。“宫廷以外”的部门仍在国王控制之下……^[39]

这与国家行政管理力量的加强是同期的。正如希尔告诫说，这是“1066年以来英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海外领地的时期（爱尔兰例外）。”^[40]这样行政才能可以全力集中在内部。结果是一帆风顺而且非常重要的。

英国能够发展成一个作为文化与经济联合体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城市。^[41]而且在没有一支常备军的情况下，在大陆上战火燃烧之际，英国能够维持内部和平，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工业增长。^[42]为何英国摆脱了大陆上的宗教战争，正如沃纳姆（R.B.Wernham）所说，在“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的时期，“不列颠诸岛内部的不稳（主要是由英国的继承权不稳引起）使他们……成为西欧竞争中危险的地区和焦点。”^[43]这种残酷的较量及法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相对疲惫（我们已经提到），还有1559年在作为安立甘（Anglican）教的英国^[44]颁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的大胆，这“使得在西欧出现第三个权力大国，并最终在一系列权力平衡中取代哈布斯堡和瓦罗西亚这两个孪生帝国成为可

能。”^[45]

相对的内部和平，不设常备军意味着税收的降低，也无需靠出售官职而膨胀的官僚机构。^[46]中央权力的扩展是通过更有效力的官僚机构而不是通过扩大官僚机构（负担更重）。这也由于君主本人的经济地位、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使其成为可能。^[47]但是在一种相对孤立和统一的，其力量在于新的工业发展之上的民族经济中，作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国王的利益何在呢？无疑，国王的利益是模棱两可的，既然作为土地所有者，国王当然尽力从他的土地上扩大他的收入，作为国王他又必须寻求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扩大他的收入。^[48]王室试图解决难题的方法是试图减弱他作为一个地主的角色。但是君主不得不找到另一个收入来源。末了，在1610年，国王向国会提出“大契约”（Great Contract）——封建权力与年津贴的交换。^[49]因为在年津贴的数量上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这个提议失败了。因为皇家租金量正在减少，这个失败导致了该时代政治上的紧张。

内部的不稳与内部的和平，一次行政管理的革命，而牵涉到的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官僚机构，一个民族的市场网络和作为大土地领主的国王——这种奇妙的结合，导致了艾尔默（G.E.Aylmer）所说的“早期斯图亚特（Stuart）的英国‘统治的程度很广’，同时统治机构又极弱小的那种看似矛盾而又不言而喻的状态。”^[50]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其实正是英国相对成功的秘密。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转到现代英国历史学的中心议题：在英国革命前一世纪，上层阶级的本质以及争论不休的“乡绅”的地位。

综览这些争论的文献，赫克斯特（J.H.Hexter）所谓的“乡绅风暴”^[51]引起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争论轰动，其中每一次都有漂亮的反驳论据相互无休止交锋，要想认识这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争论，与其说是要集中毋宁说更需将它们拆开：一个是关于“第二个”16世纪英国历史的实

质性的讨论，另一个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关于斗争的根本路线的讨论。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要求在讨论中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人身份的转换非常迅速上，这种转换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单纯、简单的球赛式的错觉。

如果争论难于澄清，这是因为事情本身复杂的缘故。让我们从观察土地所有制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开始吧。

斯普纳（Frand C.Spooner）认为大约1540年到1560年间，震动欧洲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就英国而言尤其严重……”^[52]毫无疑问，这是导致官方宣布改革的因素之一，它使没收修道院和其他教会财产成为可能。国王然后出售了这类土地的大部分，一方面提供了现成的收入，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强化的手段。购买者是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谓的“拥有既得利益的新教徒。”^[53]这个政策戏剧性地扩大了在市场上可利用的土地的数量，它加速了整个资本主义运转模式的扩展过程，而且，在那段时间，可以说没有别的欧洲国家（可能除北部尼德兰）有这种经历。^[54]曾经出售的土地再度被出售（常常重复若干次）。以后的75年该将如何？这似乎是争论的关键之一。

对托尼（R.H.Tawney）在其最初的论文里提出的两个论点争论似乎相对较小。一个论点是“活跃的土地市场趋势是，总的来看，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目，同时也减少了那些巨富的数目。”^[55]然而要注意，并没有一定说是关于谁，贵族或是“乡绅”拥有这些中等财产。^[56]托尼的第二个论点是这种土地转移导致了“农业进一步商业化”。^[57]在此不作过多讨论。

但是那些拥有土地的社会阶层都有哪些？争论激烈。它远非一个语义学问题，但语义学有作用，因为每个人都给予贵族、乡绅（上层乡绅（upper gentry）、下层乡绅（lower gentry）、纯乡绅（mere gentry）、绅士（gentlemen））以及约曼（yeoman）以各种含意。学者们对此争论激烈并非偶然，因为总的来看，这时期的英国历史不仅是经济变迁的

时刻，个人社会流动的时刻，也是范畴概念变化的时期。不仅我们不敢肯定如何称呼那些含意复杂的社会集团，即使同时代的人也不能。^[58]然而指出一定时代概念的可变性并非意味着这些概念无用。应鼓励学者们怀疑的胆量。

为了理出线索，我们必须从下列概念序列开始。让我们有效地考察一下贵族、乡绅及约曼。但在我们这样做时，必须记住“经济的变化正在促使更多有事业心的人（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不管如何称呼他们）来用新的庄园管理方法……如果他们的农场适应新的商业环境，他们会获取更多。如果他们竟然保守到固守旧的一套方法，无疑会失去更多。”^[59]似乎相当清楚，各社会等级之间没有全面的相互关联，以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斯通把贵族们在大庄园上“无能的管理”和“日益明显的浪费”描绘成一幅罪恶的图案，“以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从一条细缝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裂口。”^[60]另外，贵族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诉讼及公共服务设施的费用，“因为都铎王朝的运转依靠的是一个无薪俸的官僚体系。”^[61]但他们增加收入的努力却徒劳无益：为了让现金尽快回手，他们出卖长期租借权；他们负债累累；他们依赖国家的恩惠，直到政府不能或是不愿再给为止。这一切都无用：

贵族经济资源消耗的过程……几乎不间断地延续整个伊丽莎白时代……到1603年，都铎社会整个的等级结构似乎濒临解体的边缘。^[62]

然而，也是同一作者，几年以后，对同样属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却大唱赞歌：

这时期贵族承担着没有别的阶级，无论是乡绅或是商人能够或是愿意匹敌的职责……这时期贵族的重要性应归功于他们愿意鼓励和以财力支援新的冒险，这些活动被视为冒险，所以未能保证得到更多的小心谨慎的社会团体的支持。既然大规模的采矿和冶金工业在都铎时期仍是新事物，他们便起了开拓作用；既然海外贸易和探险是新事物，他们便一再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63]

在他们的领地（庄园）里，似乎也不缺乏最初的开拓者：

（那些）旧的贵族显示了惊人的敏捷.....在自己的领地上发展新的资源.....1558至1642年间，相对乡绅而言的贵族的衰落肯定不能归咎任何最初企业者的缺乏。[\[64\]](#)

很难将斯通所描述的两个画面调和起来，既然史东关于贵族财政危机幅度的统计数字一直是招致攻击的主题，既然他部分而不是全部放弃他的说法。[\[65\]](#)我们也可看看特雷弗-罗珀（H.R.Trevor-Roper）是怎么说的：

如果“2/3以上的英国贵族在1600年不是生活在中上水平而是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我们怎么能够解释这样的事实：他们不仅仅从这种接近破产的状态中恢复，而且在以后60年更加深重的危机中存在下去？在那些年月，他们的奢侈并没有减少.....他们是怎么维持的呢？[\[66\]](#)

特雷弗-罗珀的解释是，贵族的困境“尽管是事实，但决非如斯通先生所夸张和想象的那么严重”，他们附着于土地，1600年后地价上涨，为维持财产，他们“做得比詹姆斯国王（King James），甚至任何国王所能做都要多”。[\[67\]](#)不管怎么样，斯通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尽管他把它从1620年算起，他说：

甚至最无能的土地阶层成员都能从17世纪普通租金的大规模上涨中获利，这样，价格稳定就削弱了那些低效率的庄园管理的重要性。[\[68\]](#)

至于赫克斯特（J.H.Hexter），他一方面攻击斯通和托尼，另一方面也攻击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他说：

大约1580年代，土地市场开始繁荣，这种兴旺似乎可以延续至下半个世纪.....土地价格的总增长对于那些拥有土地并借以牟利的人来说，当然是相当的有利可图，这就是托尼和特雷弗-罗珀所归属的在经济上无能的土地阶层的那部分。[\[69\]](#)

然而，撇开含混不清的日期不论，赫克斯特在这个概念上所采取的立场与斯通和特雷弗-罗珀并没有什么差异。现在，让我们转向希尔所提出的第四个观点。这在多方面与其他观点不一样，对这个问题他说：

所以，对一部分贵族而言，宗教改革导致了经济损失，尽管并非整个阶级。我们

应该小心，不要把这个过程中（土地转移）的任何事都视为“反封建的”。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修道院）的解散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加强，既然土地成倍地增加……教会财产（转移到君主手中的）很快被分割……这样，在短短的过程中，宗教改革加强了世俗土地统治阶级的地位，尽管对某些成员的既有权力有所削弱。^[70]

如果对初看似乎争论不多的贵族不做一些讨论，我们又怎能在争论焦点之源的乡绅上统一呢？乡绅当然是一个含混得多的概念。库珀（Cooper）清楚地谈到一些困难：

贵族是一个由享有一定法律地位的个人组成的群体，这种法律上的地位……属于每一个大家庭的唯一的男性成员。这样，贵族的长子之外的儿子及他们的后代将会在托尼教授的分类中作为乡绅而出现。大的土地所有者只要力所能及，对他们的儿子在现金或是土地方面比通常想象的要慷慨……这样的慷慨肯定会影响财产的分配……（那些）乡绅不仅仅从下面（像贵族们一样）得到补给，也从上面得到补给……进一步说，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群体是不和谐的：贵族被法律地位严格限制，而同时乡绅则没有任何限制。这是一个按财产的分类，某种程度上又是按生活模式来分类……尽管贵族爵位在1603年后可以被出售，然而晋升至贵族阶层从来不以简单的财产标志和生活风格来决定。^[71]

那么，谁是乡绅？乡绅不是贵族，更不是约曼（yeoman），定义后者就像定义乡绅一样困难。而且，我们发现，包含在“乡绅”之中不仅仅是贵族的儿子们，也有诸如骑士、小地主、地方绅士等等杂色类属。这表明什么将会发生。在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中衍生着大量的名目，诸如法定的社会等级、职责、特权以及荣誉等等。等级经常在变化，当然家庭延续性亦不稳，与之相关的收入也不一样。资本主义农业的扩张在由新的“土地所有者”构成的分层中反映出来（新的土地所有者肯定将会因持有土地的规模而出现再分配）。乡绅作为一个包括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的概念而出现。其他的概念没有消失。但是“乡绅”是一个组合标签，它缓慢地吸收和抹去其他的概念。在伊丽莎白时代，除了“乡绅”之外至少仍然还有“贵族”和“约曼”。在20世纪，仅仅只有“农夫”（Farmers）。如果我们要使乡绅这个概念具体化，如同给它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以特定含意或是给特定的社会现实下定义一样，将会无从着手。关于“乡绅”，整个说来，它不仅仅是形成中的阶级，而且是一个形成中的概念。它是

旧瓶中的新酒。在我看来，费希尔（F.J.Fisher）似乎说得不错：“16、17世纪新的经济变化的后果不是增加了新型的人，而是给现存类型的人以新的机会，并以新的精神去激发他们。”^[72]

相比之下，希尔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的形成中增加了混乱：

我们必须从“乡绅”不是一个纯经济阶级这样一个事实出发。他们是一个社会、法律的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是不统一的。1640年以前通货膨胀时代是一个大的分水岭，所有的共同体都发生了经济分散。一些约曼形成为上流社会的绅士，其余的则正在消失。一些贵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其余的濒临破产。如果我们视之为一个阶级，那么讨论“乡绅”的“兴起”或“衰落”并不困难。因为一些家族的情形是这样，另一些家族的情形则是另一个样。^[73]

然而在我看来，经验主义的社会现实的描述没什么差错，试图建立理论模式却有可能忽略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关键性地方。“乡绅的标志”，康沃尔（Julian Cornwall）说，“是土地的所有权”。^[74]乡绅这一概念将涵盖所有在生产方式上关系相同的一批人：为市场而生产的非法定的土地所有者。这个过程清晰性被人们仍然看重旧的法律等级的社会身份特权这个事实弄混乱了，^[75]但它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冲击，这是16世纪及以后的时代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主题。在一个经济阶级内，有些人比别人更富有，在市场上比别人更成功。收入的差异并不证明一个团体不是一个阶级。

那么，这一点会给关于乡绅的传统的讨论以什么启示呢？托尼的基本观点是，乡绅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活习惯的团体，比起那些挥霍的贵族和无信的投机商在通货膨胀的年月更有生存能力。“与那些图谋他们自己从未看见的财产的冒险家比较起来，地方上的乡绅属定居的人口，他们面临的纯粹是些掳掠者。”^[76]他们高于其法国同道的优势在于“人数不多、具有英国家庭制度的冷酷所决定的韧性，那种冷酷要求牺牲个性以服从制度。”^[77]他们在政治上比被“整个割断了与农村的根基”^[78]的荷兰同道更加强大，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角色将并非货真价实的

贵族品味与当地的、大众的基本权利混杂在一起，以其老练的现实主义态度按部就班地打出每一张王牌，而且从不后悔。”^[79]这样，他们成为皮朗（Pirenne）所讨论的精英延续不断的缩影，这种延续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本质。^[80]结果是“政治体制不与经济现实协调”，它无情地导致了由“新兴的”的乡绅领导，由于“非个人的力量太强大（对于议会和统治者而言）”^[81]引起的英国革命。

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诘难的基础，众所周知，除了向托尼（Tawney）的统计数据、程序编制挑战外，^[82]还认为政治舞台的基本模式是大错特错的：

我已经说过，是官职而不是土地是许多无疑是“新兴”家庭的基础。现在我将进一步来谈。在贵族与乡绅之间没有“新”、“旧”地主之间的差别，我的意思是，在都铎和斯图亚特土地社会中有意义的差别，是在“宫廷”与“农村”之间，在官职占有者和纯粹是大土地主之间.....

从事修道院的财产国有化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官员们发了财！很自然，最好的地价会落入他们及他们的地方代理人之手，在政府拥有官职的乡绅之手.....

但那些没有如此地位的纯粹的乡绅们又怎样呢？随着每一次馈赠的到来，价值越大，离他们也就越远。^[83]

这样，英国内战（Civil War）至少部分被看作是“负担过重的”纯粹的“乡绅”反抗新兴王权（Renaissance court）的起义。

赫克斯特（J.H.Hexter）最终坚持“有第三个英国地主集团”。^[84]他说看一眼议会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对就知道，他们并非是从托尼所谓的“有权而又富有野心的乡村中等阶级”中选拔而来，因他们是“富有的农村乡绅”（这与托尼的说法确有不同吗？）；他们也不是特雷弗-罗珀所谓的“愤怒的、压迫深重的土包子”，因为他们是一群“受过不寻常教育的人”（这与特雷弗的说法不一致吗？）^[85]

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接受赫克斯特充满自信的断言，就会在事实

上被引入一个乡绅的社会地位非常清晰的图景。他在其评论中谈到：“我们仍然有托尼探索的问题……在这特定的历史转折点，农村为何能在最高权力之下的社会阶层中找到领导地位？为何是在乡绅之中而不是在贵族之中？”^[86]赫克斯特的答案中心点是，乡绅政治力量的兴起与国王增长的军事权力与守土大臣军权的同时衰落有关。“结果，都铎时代的乡绅比起他们在兰开斯特（Lancaster）和约克（york）时代的先辈们拥有大得多的行动独立性……”^[87]这一点很多人已然注意到。谁还会经谈到过别的方面？正如斯通（Stone）中肯地评论：“赫克斯特先生关于乡绅政治权力的兴起的解释总的来说是太表面化了：贵族失去了军事控制。这是当然的；但是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88]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种种中心点上（正如托尼和特雷弗-罗珀所讨论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扩充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89]赫克斯特随后就开始反对“中产阶级的神话”。但是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在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挑战，尽管他引证了那么多现代经济史，他也不是一个“无意识”（uncousious）的马克思主义者。^[90]事实上，他自己的分析在现实中与托尼和特雷弗-罗珀的分析相去不甚太远。都铎人（Tudors），他说，不是一个先定的中产阶级，除了“一个极小的都铎商业银行家内部小圈子”，一伙“与王权搅和在一起的资本主义者”。^[91]

都铎政策实际上是非常连贯的：

既得利益通常相当敏感。在企业形式形成过程中，它既创新也护旧……墨守陈规或放任自流都不是都铎的政策，而是引导它，如他们所说，使一些规则符合良好的秩序。^[92]

而且，赫克斯特附带还说，“都铎人认为中产阶级是共同福利仰给之源”。^[93]

但恰恰是斯通强调，总的来说，都铎统治者一定程度上实行经济控

制，赞助一小批企业家，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且极其重视国家军事力量的加强，^[94]这也是特雷弗-罗珀认为的乡绅反对这个仰给之源的本质。

最后，赫克斯特说，情况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仅仅出现在16世纪，因为它一直都存在着，也不是“16世纪的土地所有者期待城镇商人领头和鼓励”^[95]去从事资本主义的农业。事实的确如此。但是，我们该回到来源于种种社会背景的、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图景上去。^[96]

这一点为何有点奇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它发生在整个欧洲世界经济之中。^[97]毫无疑问，在“乡绅”内部，不同的群体有种种政治要求。例如，摩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特雷弗-罗珀的“没落的乡绅”的政治上的反抗就有一个看法，总的说来，它在表面上与托尼“新兴”的乡绅的政治反抗是一致的。他引用托尼的话：“大量乡绅流动或是走下坡路。要发现些应时而变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其财富的贵族土地主是容易的。”^[98]然后摩尔谈到那些“流动”（stragnated）的人：

这些“狂人和牢骚者”也许为克伦威尔（Cromwell）和清教革命（Puritan Revolution）提供了部分激进因素，尽管这种刺激有其主要的远非社会表象的原因。这样，在商业和部分工业的冲击下，英国社会正在解体，它正在以一种方式下滑，即放任那些偶露面的共同的社会力量所产生的激进主义的不满……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旧的秩序的崩坏，部分由于沿习已久的经济潮流而失落的社会力量浮出社会表层，并大量从事毁灭旧体制（ancien régime）的激烈而又“肮脏的活动”，为新的体制的建立扫清道路。在英国，这类主要的下流的活动正是将查理一世（Charles I）送上断头台的象征性行动。^[99]

赫克斯特在谈到有三种类型的土地贵族——“兴起”、“衰落”以及其他时或许是对的。而且，政治上的反抗使前两者比第三类相互联系更多，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在解释早期斯图亚特时代的政治时，这些细节是至关重要的。^[100]在评估社会变迁趋向时，勿将乡绅的兴起视为一种经济力量，也不要视为一种政治力量，而是一个社会团体，这一点相当重要。

在时常进行纯属空洞无力的抽象概括时，专注于细节也会模糊现实的变迁。斯通在对该时期英国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作了如此详细的分析后指出，这种分析来自对英国社会两个重要的方面的认识：

首先是社会分化为贫富两个极端：上等阶级数量相对较多，收入增加；贫困者数目亦增加，实际收入下降。其次，在上层阶级中有更多的平等：先是大的乡绅们的财富与权力相对旧贵族来说得到了增加；其次是贸易及其他种种职业的成员在财产、数目及社会地位方面相对土地贵族都增加了。^[101]

在强调它对“第二个”16世纪的政治影响时，赫斯特菲尔德（J.Hurstfield）有类似的看法：

在英国，旧的贵族从未变成一个等级，土地乡绅从未成为次等贵族。因而，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相互之间比他们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样，在危机时代，他们相互之间比起与王权来，就有多得多的共同者。^[102]

斯通和赫斯特菲尔德俩人都在这里都论证一个关键之点：一个新的阶级种类出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贵族与乡绅之间“往昔的”区别正在失去它的意义。正如扎戈林（Perez Zagorin）对形势的概括，在英国，在漫长的16世纪中总的趋势，“是给人.....在农业、贸易和工业方面的投资一个位置.....从支配社会生活。”^[103]而且这几乎联合了那些靠牺牲农民利益获利的所有阶级。^[104]英国的情形是拉铁摩尔（Lattimore）概括的一个极好的图解：“在任何渐进的变化的社会中，拥有优势总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紧紧把握旧体制残存下来的精髓，同时也能抓住新体制提供的精髓，并适时进行灵活的变通.....”^[105]

如果“乡绅”在成为一个阶级时，简单地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的代名词，那么，约曼（yeoman）又是什么呢？约曼如同乡绅，是一个早已存在的社会法律概念，其内涵在16世纪不断变化。坎贝尔（Mildred Campbell）在她讨论英国约曼的书中，考证了该词的各种用法及其与诸如农人（farmer）、绅士（gentleman）、完全地产拥有者（freeholder）、农民（husbandman）以及劳动者（laborer）等等概念的

关系，并尖刻地评论：“人们在最初可以说一切都无所谓，就像没有差别那么简单。”^[106]她的结论是：

就与社会结构中其他集团的关系来看，约曼的地位具有相当明确的特点。他们是一个真正的农村的中产阶级，其领头关心土地和农业，是“生活适度”、顺服英国的一群，正如他被说成是“中等人”……处境在乡绅与农民之间。^[107]

为了评价这个团体的地位，我们必须回到前面章节里讨论的一个问题，即英国农业中的所有制的演化。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时，有一个锐利的看法，这在注释他的观点时常常被人忽略：

当租金采取货币形式时，支付租金的农民和土地主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通过契约固定的关系——在世界市场、商业、制造业达到相对高的水平时，这是一种进步——对资本主义者来说，也不可避免地要使这种形式出现。后者迄今已然不仅仅限于农村，并超越农村跨入城市需要的资本主义农业，使之成为资本主义运转模式——它可以制造纯粹商业性的产品，作为一种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这种形式在那些统治世界市场的国家在由封建向资本主义产品模式的过渡时期变成了一个总的规则。^[108]

马克思的观点的中肯之处在于，显而易见，土地所有制中的转移过程并非是英国独一无二的现象。但是随着英国（及荷兰共和国）在“第二个”16世纪（甚至更多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日益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该过程在这些地区越走越远、越来越快，恰恰因为他们为中心国家。为了从世界经济的中央贸易与金融地位中获利，有效地利用资源是非常关键的。在英国，向完全可让渡的土地制度的转向使土地阶级受惠，正如在波兰（甚至在南部法国）限制这种转向使土地阶级受惠一样。

为了使土地可以被充分让渡，如同为了商品生产而毫不顾及农业一样，人们不仅取消各种封建占有制，也不得不取消农民式的农场主，因为农民可能固着于土地，从事那些边际类型的生产活动而无视高额的近期利益。事实上这种消除是怎样完成的呢？

哈巴库克（H. John Habakuk）指出有三种剥夺农民财产的方式：将

他们从租地上赶走并吞并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放弃终生租佃权只给予有限的租期；削减农民的共有地权利。他认为在“第二个”16世纪只有那些租期有限，或是终生租佃或无权重续契约的承租人属于这类剥夺形式，他估计加起来大约占农民总数的35%左右。[\[109\]](#)至于土地的出售，情况是很复杂的：

在这个时期.....有某些贵族（封建诸侯）购买农民的土地；也有一些农民积累相当数量的财产上升到乡绅行列。在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农民财产的减少。但是也有些农民当这些领地被公开拍卖时，购得大块领地，或是获得公簿持有租佃权（copyhold lease）。此类交易的详细结果尚不清楚。但是总的来看，对农民而言，得多失少是有可能的；反过来说，贵族一方面剥夺农民，另一方面，农民也通过啃噬领主的土地获取财物。[\[110\]](#)

随之而来的就是英国农业的完全的资本主义化。在16世纪，约曼仍然有其扮演的角色。这时期农业日益商品化给那些小土地主提供的不仅仅是“危险”，还有“机会”。坎贝尔以一种浪漫感触，将约曼夸张为英雄：

老谋深算的土地主及其渴望土地的邻人都曾经打算从人们的不幸中牟利。尽管价格总体来看呈稳定上升之势，但有时候仍有毫无先兆、前景难测的波动，别的种种灾难更使得这时期风雨飘摇。不能控制的瘟疫是一种永恒的恐惧感。因火灾而遭损失是家常便饭的事，而且实际上不知道有任何类型的保险。一个人或许会因如此多雨的日子而稳获拯救，也有可能陷入债务.....

但是在要么下沉要么泅渡的情况下，除非重负过甚，他通常会尽力泅渡.....尽管有前述种种不测，在英国土地持有的历史中，那些拥有工业和丰富企业的平民正前所未有地获得他们的机会。那些能够经受暴风的人能够在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市场中找到使他们付出更大努力的牟利的机会。然而欲壑难填。[\[111\]](#)

即使约曼不是修道院解散的直接受惠者，他也可以从中分得一份好处。[\[112\]](#)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时所进行的圈地有两种类型：大的领地圈作牧场，合并小块土地以便更有效率地耕作。正是在后者这个过程中约曼

扮演了主角。这个角色至关重要是因为它有关系到增加食物提供的重要的社会后果。它不会招致牧场圈占所遇到的政治性的反对。^[113]部分改善来自别的增加劳动效率的因素。瑟斯克（Thirsk）将它归因于：

与大量施肥相伴的更深入的轮作的运用；改善各种谷物品种的运用；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开垦荒地和改换牧场占耕地总面积给人印象深刻的增加……可耕地的大量施肥，当然，由于豢养大量牲畜变得可能，这又引起肉类、羊毛及其他畜业产品供给量的增加，牧畜比重的大量提高由于一系列原因成为可能：牧场和因施肥而导致的牧草的改善，因通过在西部农村给草地浇水及其他地方种植野蚕豆，春天牧养得以增加；夏季牧养通过利用泥塘及沿海沼泽而得以增加。这样，耕地与畜牧管理的改善携手并进，相互帮助，使各个地区更加专门化，更加相互依赖。^[114]

威尔士在这时期英国劳动力分布中的地位推动了农业改进的进程。因为一件事，即英国强加的法律形式，特别是对长子继承权方面的过分要求，导致了土地占有权制度的极大的不稳定性。在威尔士，这有利于大的领地的产生。“在整个威尔士都在进行地产的重建和家族财产的分配。”^[115]这在那些“英格兰化的低地地区”尤其如此，它表明“财产所有的明显的不平等……”^[116]我怀疑土地贵族中英国人比例大得多。在威尔士，因圈地而导致的农业改进的程度比在英国更大一些。到那时为止，威尔士仍然受“接受性的技术”之苦。^[117]然而，这意味着移居英格兰的人口的更大的变动，在英格兰，极有可能成为缺乏意识的无产阶级，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充当佣兵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出路。

坎贝尔说，这是一个“土地饥渴”的时代。^[118]“在土地渴望者中，没有谁会比约曼更贪婪。”^[119]这已经被1570年至1640年，即“伟大的重建”时期英国农村的住房建筑清楚地表明。根据霍斯金斯（W.G.Hoskins）的看法，“略富的农民、约曼以及小乡绅在中世纪几乎有共同的社会根源。”^[120]然而，斯通引用相同的事实，作为“乡绅兴起”^[121]的又一个证据，再次表明我们正在使用的名称的变通性。这些约曼难道不是那些已是资本主义农场主的乡绅的另一个说法吗？

如果我们知道事实上（在两种）圈地的过程中谁受损失，这便会更加清楚。随着圈地的进行——无论是牧羊人的大规模圈地或是地位逐渐改善的约曼小规模圈地——从前依土地为生或是靠土地养活的人都被迫离开它，其余的人则降为无地的农村劳动者，他们为工资而工作。^[122]这一直被认为是产生剩余劳动的中心因素，它也是“英国生活商业化”^[123]的关键因素。这个转移过程发生在1540年至1640年之间。在经济榨取的过程中，少数人获利，但更多的人则是破产。^[124]的确，将农民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或许是贫困化的又一方式。萨文（Alexander Savine）在其讨论都铎英国时封建农奴（Villeinage）残余的文章里评论了这种矛盾现象，即“对于16世纪的农奴来说，在他获得自由之时，其对领主的个人依附反而变得最为繁重。”^[125]要解释这种矛盾现象是很简单的。解放不是无条件的，它是通过赎买的。实际上，赎价肯定较高，因为萨文评论道：

解放农奴被认为是封建主的一项通常的收入来源……最后的农奴的解放是一种补偿性的政策。在16世纪，事情作得是如此公开，以致伊丽莎白时代的廷臣们可以从君主那里得到一种特别的恩惠，那就是在王室庄园上解放一定数量的农奴家庭；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因农奴解放所得到的补偿而恢复他们的财产。^[126]

农奴不再在领地上为领主作周日服务。^[127]更确切地说，“农奴的人身依附变成了敲诈他们的纯粹的托词。”^[128]这样，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许多人成为了无地的贫民。

我们在各类农民的实际消失中找到这种贫困化的进一步证据。一方面，一些农民“上升为约曼，而且约曼与农民的差异正变得模糊。”^[129]另一方面，那些更贫困的农民则正变得比许多本是村民的农村劳动者的情况更糟糕，需要从事部分时间的工资劳动以敷支出。^[130]被间歇雇用的农民难道没有想过成为定期的受雇者？

在任何情况下，这两类农民都是那些易受圈地和侵占公共权益伤害的人。尤其是对公共权益的侵占容易导致人们背井离乡、四处迁

徙。[\[131\]](#)埃弗里特（Everitt）指出，在农民——约曼与“无地、被从别处驱赶来的农人和流浪汉”之间日益增加的区别尤其在更多的、新近定居下来的农村森林地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132\]](#)而且，“这后一种人，由于他们半漂泊的身份，大部分被补充进由于商业化农场的需求而日益增加的季节性工人的大军。”[\[133\]](#)

这样，就产生了乞讨和流浪者这两个极为严峻的政治问题，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征。[\[134\]](#)艾德洛特（Frank Aydelott）认为可以三个各不相同的因素来综合解释伊丽莎白时代的流浪汉高潮：圈地是肯定的，并且是最重要的因素；都铎的和平及过去由贵族拥有的大量封建家臣的遣散；还有是修道院的解散及他们作为账济分配者地位的消失。艾德洛特关于这些流浪者的观点与当时的统治者的观点不会相去太远，也是将这些流浪者视为社会问题：

他们远非一个软弱无能或是没有危害的阶级，16世纪的流浪汉们代表中世纪英国的基础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他们中许多人有较好的出身，但是在现代英国的经济方案中找不到有用的位子。他们有策划犯罪与冒险并将它付诸实行的头脑。他们的队伍中包括政治、宗教、社会的反叛者和鼓动家。因而，他们就像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瘟疫一样危险。流浪者构成的威胁足以使从亨利七世开始的法律制订者花很大的心思给予补救，一方面制定法规并准备付诸实施，直到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直到通过1572、1597、1601年令人称赞的济贫法从立法上解决问题。[\[135\]](#)

令人称赞吗？或许，艾德洛特想要我们称赞的部分即使从最简单的意义而言都不是无疑问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些法律有助于理解国家机器正在扮演的角色。首先，让我们解释一下“社会福利”立法，这在以前的欧洲尚不知道，在这时却出现在许多地点和场合。进一步说，它甚至不是一件同时出现的新鲜事件，而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文化扩散活动。[\[136\]](#)其次，这样的立法与经济转移的关系并不明确。可以肯定，它是对由经济变迁引起的社会危机的一种反应，一种转移政治反叛的方式。[\[137\]](#)但是它的经

济含意并没有直接向资产阶级倾斜。这是一种政治稳定的方式，其作用是如同抑制工人一样甚至更为抑制雇主的对象。^[138]这种16世纪君主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施展进行约束的经济政策，与18世纪在一些大而明确的圈地过程中国家实施干预的行为形成明显的对照。^[139]

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常被设想为“失败了”，因为他们政策的最终结果是英国革命。然而，或许英国革命应被理解为都铎—斯图亚特君主们“成功”的尺度，因为他们将暴乱推迟了如此之久。让我们看看16世纪的英国农民在重压下的反应。许多人选择流浪。另一种可能是农民起义，可以肯定确有起义。但必须注意，在英国，这时的起义比从前要少，比法国或欧洲大陆上别的地方要少。

每一个类似的对比都值得观察。希尔顿（R.H.Hilton）认为16世纪的圈地具有一种“前历史”（pre-history）性质。离开土地的过程可追溯到13世纪。当然有人口减少的现象，但希尔顿感到贫困是乡村人口大批出走的基本原因。^[140]随之是“漫长的”16世纪的通货膨胀。在东欧，无论在什么地方，土地主们都强迫劳动者回到土地上，因为扩大的专供销售的农产品（cashcrop）需要这样做。英国则走上一条养羊（需要较少的劳动力）和增加可耕地产品的效率之路（劳动力需求亦相对较少）。这非直接掌握农场财产，大的土地主寻找承租人，而且比起“农民”来，宁愿要“资本主义农场主”作为承租人。^[141]既然这会给农村地区带来诸多损害，为何农民们不起来反抗他们不堪忍受的一切？希尔顿认为，他们太软弱，不能抵抗。^[142]戴维斯（C.S.L.Davies）在他的观察中进一步证实，相对而言，农民抵抗在“第一个”16世纪要比“第二个”16世纪多，反之，如果条件恶劣足以解释农民的反抗，那么，对抗肯定发生过。仅仅是在1590年之后，租金上涨的幅度才超过价格上涨。戴维斯对此作了两方面说明，一方面，种种租金概念相对较新，因而在“第一个”16世纪令人厌恶，而到“第二个”16世纪，农民们则习惯了这些概念。^[143]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一些，就是“约曼”并非消极地受圈地影响。^[144]

让我们回到同一时期英国与法国的“约曼”的命运的比较问题上。对此，戴维斯注意到，是税收的负担直接导致了对中央政权的反叛，这个负担在英国要比在法国轻，因为政府规模较小，贪污受贿相对较少，敲诈勒索相对较轻，同时，该地区制度的相对软弱也使国家机器的重要性下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反叛的焦点。[\[145\]](#)

最后，让我们比较一下16世纪与18世纪的英国农民起义。托尼指出，这是一种“16世纪中期……流行”与“200年以后相对罕见”之间的比较，尽管相同的潜在的原因，圈地仍然存在。[\[146\]](#)托尼认为，16世纪的农民骚动“标志着从15世纪的封建起义向一种基于地方上各个阶级联合反对中央政府的转移，这些阶级也因经济利益的差异而相互摩擦。”[\[147\]](#)

那么，我们在谈什么呢？16世纪，尤其是1540年至1640年之间是资本主义农业阶级（较富有的成员叫“乡绅”，不富裕的叫“约曼”）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英国土地合并的社会化过程，总的来看，就是这个阶级增加收入的过程，包括里面不富裕的那部分成员，同时也带动了无产阶级形成的开始，他们中的多数仍然没有定居在城镇，而是“流浪汉”，他们是拥有维持生计的小块土地的季节性雇佣劳动者，城镇里的游民无产者。

政府机关不是一个紧凑有力的独立力量，而是两种矛盾势力——那部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传统地位较高的人和那些新兴的力量之间冲突的战场，这些新的力量（不论就其传统地位的背景或是现在相对的富有）极力推动经济生活的全面商业化。

在这两种势力寻求并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政府的帮助时，都没有把握能从政府机构的大力加强上占便宜。主要因为双方都害怕对方控制政府官员。“社会福利”政策有利于维护现存秩序的利益，却干涉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它减缓了新旧转移的势头，因而有利于尚在发挥作用的各力量。

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恰恰使其有可能玩弄这种平衡游戏。它避免了因两大军事强国——西班牙和法国的争斗所造成的太多的外部干扰。它亦不受帝国义务的妨碍。^[148]所以，它可以自由地从事它的经济专业化（economic-specialization），尤其它可以得到东欧原料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与荷兰共和国的商业联盟；荷兰人也想得到军事强国的庇护，这是它保持世界贸易机体运转所“付出的代价”。英国的国家机器恰好强大到足以摒除致命的外部影响，但仍然软弱，不足以剔除“因循守旧者”或是新产生的官僚主义寄生虫，以至于两者都不能完全吞掉最富生产性的阶级的剩余物。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地位：相对的政治孤立兼有世界经济的经济优势；内部各种势力的相对平衡，这能使它极大限度地保持国内和平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专横的国家机器的错误。

那么，有人或许会问，英国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可以说，我们正在试图证明，在这个时代英国“成功”的证据是英国革命发生的时间——不早也不晚——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力量产生时显而易见的胜利，尽管他们曾被设想为“失败”和“保守”。为了正确评论英国革命这个时机的选择问题，我们看看三个相关的现象：该时代的政治联盟、移民模式及所谓的早期斯图亚特时代的商业危机。这使我们能够谈论有关英国革命背景的“真实情况”。

特雷弗-罗珀坚持认为，最中心的矛盾在宫廷与农村之间。如果这是他的关键性的论点，那么，他占了上风，因为这种说法可能出现的诘难者——例如斯通（Stone）和希尔（Hill）——已然对此作了让步。然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宫廷玩弄什么样的政治游戏，这些游戏与正在进行的社会与经济过渡有何关系，以及它对英国在欧洲世界的地位的原因与结果的影响。

政府机构、宫廷既是戏剧的主角，也是不同力量之间的调停处、沟

通者。这是一切所谓绝对君主们的本色。他们平衡各种势力；他们是权力的代理人，他们达成种种妥协。但是他们希望的结果之一是强化自身，实现真正的绝对统治，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精神抱负。由于地位与目的不明确，宫廷对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处于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王权要讨好“资产阶级”（*bourgeoise*），他们是土地资产者、富有的农场主、各种专业人员（律师、牧师以及开业医生）和富商的混合体。^[149]“由于被封建起义的恐惧所缠绕”，^[150]如托尼所说，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在他们中间寻求同盟。但是宫廷，归根究底，是被贵族所控制的，在他们——旧贵族、新授贵族头衔和更为看重这种头衔的人，以及其余为国王服务梦想成为贵族的人中间，国王是头号贵族——宫廷不愿意破坏这种自己居于顶端的等级地位制度。它也不可能破坏它。它珍视这种制度，强化之，完善它，并为之付出代价。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王权光华夺目，名闻欧洲。

出于对货币与政治同盟者的需要，宫廷进一步趋近商业和自身的商业化。出于对政治稳定与自身尊严的需要，又使其对新的阶级咄咄逼人的成功感到忧虑。在一定程度上，宫廷是有能力的，它试图缓慢地刹住资本主义过度的飞速进程，同时加强国家制度的权威性。都铎英国在这一点上与瓦罗亚（*Valois*）家族的法国和哈布斯堡的西班牙并无不同。不同的是16世纪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地位。它使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相对强大，并更有能力在其内部吸收大量旧贵族的成分。

许多作者谈到，大约在1590~1600之间，在英国的政治中有一个危机时刻。托尼写道：

在权力的基础是经济的信条上，少数统治者没有早期都铎的君主们那么无情。他们扩大王室领地，保护种地的农民，这是新君主政体（*New Monarchy*）的两点基本政策。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晚期，前一政策已然支离破碎，后一政策总是令大土地主不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的反抗。^[151]

王权决策的重心一直向资本主义农场主倾斜，抑制贵族。^[152]后者

为了生存，也变得越来越像“兴起的乡绅”，这样，在农民眼里，他们越来越像雇主。[\[153\]](#) 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关系逐渐松弛，在民族矛盾中，后者对地方权力人物的号召不再轻易响应。[\[154\]](#) 王家官僚机构本身正变得不合时宜和“多余”，正如特雷弗-罗珀所说，这个过程有其自然的界限。[\[155\]](#) 斯通和特雷弗-罗珀都同意，到1590年，浮滥的经费渐被减缩。欧洲的和平（1598~1618年）为所有国家减轻了开支。[\[156\]](#) 在英国，因詹姆士一世的爵位出售增加了收入，[\[157\]](#) 危机因而得以避免。危机虽然避免，但因王室的“双重政策”（dual-stranded），浪费增加。[\[158\]](#)

正如托尼原来所想，一个世纪的都铎统治也许并没有引起贵族土地所有权的急剧衰落。最终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皇家领地被部分分给非贵族的资本主义农场主。[\[159\]](#) 都铎统治的受益人无疑是那些能够掌握新经济的贵族和非贵族。[\[160\]](#) 都铎的把戏使他们的形势岌岌可危。但是，“漫长的”16世纪正接近它的终端。而它的矛盾的紧张将被早期斯图亚特感受到。这正是特雷弗-罗珀所谈的论点：

甚至在1590年代，甚至一个廉洁、有效得多的官僚机构也仅仅是靠和平拯救的：如果没有16世纪漫长的繁荣和17世纪救命的和平，那么，如此残暴的政体（早期斯图亚特和这时期其他的欧洲君主）又怎能维持？

事实上在1620年代，这两者都没有。1618年，布拉格（Prague）的一次政治危机将欧洲的权力国家置于动荡之中……同时欧洲经济……遭到一次大萧条，即1620年的普遍的“贸易衰落”（decay of trade）的突然打击。[\[161\]](#)

所以，我们再次回到世界体系的作用上。英国对所谓的“17世纪的危机”的反应与其他国家有点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带着如此强大的力量进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原因。这种力量的一个方面是它的农业高度的商业化，这是一个我们一直在描述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它的“工业化”。

内夫（John Nef）认为，英国在1540~1640年间从事了一次“早期工业革命”，比较起来，法国就没有。[\[162\]](#) 他断言在英国有三个方面的发

展。大量以前在欧陆上闻名而英国没有的工业被介绍进来（造纸和火药厂、火炮铸造、明矾和绿矾工厂、糖的冶炼、硝石和铜制品生产）。新的技术从欧洲大陆上引进，尤其是采矿和冶金方面的技术。最后，英国人自己积极致力于技术改进，尤其是以煤代替木材方面。^[163]内夫进一步认为“对技术发明创造方面的资本投资，正前所未有的转向以质量为目的的产品生产。”^[164]不管怎么样，当有人问内夫英国为何由这种工业“死水”状态突然转向相对进步的状态时，内夫主要从地理方面解释。大的国内市场，一个工业集中的先决条件得以具备，主要因为“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仅次于荷兰的岛国位置和良港之利，这使其拥有廉价的水上运输工具。”^[165]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但是既然地理条件在更早的年代亦是如此，对这种突然爆发的原因我们仍不能肯定。

似乎清楚的只是这种突然的爆发在工业技术方面，在工业化的程度方面以及相对而言在人口的增长方面。泰勒（K.W.Taylor）在观察英国人口在都铎统治时期翻倍时，提出两个方面的解释：国内和平和世界贸易的新布局，后者改变了英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从此以后，人口不再完全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就像一株盆景植物，在窗台上自由地伸展，然后，移到露天的园地，英国的经济长出了新的树叶和枝条。”^[166]泰勒的地理方面的解释，因为谈到英国的位置与世界经济相关，这与内夫的国内地理条件有利论不一样，它论述了恰恰发生在16世纪的变化，因而更令人信服。进一步讲，如果我们记得波罗的海新的重要性，同时也记得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这种说法就更为有力。然而，这种说法本身仍然不足以解释与法国的差异，或许我们将不得不在法国内部寻找因素，这些因素使其没有获得英国人在新的地理区划中所占的那么多的便宜。

让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英国的人口加倍是有选择性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增长，而且关系到优质的外来移民和有益的出境流动。一方面，有广为人知的欧陆匠人的流入——佛兰德

（Flemish）的织工，德国的冶金学家等等——这些人的到来通常被归咎于大陆宗教战争的烽起。但是，如果他们去英国，正如克拉克（G.N.Clark）所言，是因为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本及经营才能够获取酬劳更为丰厚的地方。”^[167]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记得，伊丽莎白时代的最后时刻正是经济及社会紧张之时——宫廷过于庞大的开支、伴随圈地的人口增长及由此涌现的流浪大军。正如费希尔（F.J.Fisher）提醒我们的，当时人们就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是一个人口压力正逐渐使许多人沦为贫困因而也可能使按人数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的国家。”^[168]

在一国之内，处理过剩的人口问题有两种方式：将他们从城市中疏散出去（即从地理上分开他们），或是集体向国外疏散。在都铎—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两者都尝试过。一方面济贫法，即布罗代尔（Braudel）所说的“反对穷人的法律”，^[169]将他们赶到农村地区，过一种边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正好在此时，英国开始考虑海外殖民——首先从大约1590年向爱尔兰殖民，然后向北非和西印度群岛。就对外移民而言，吸引移民的是它的社会流动。^[170]马洛维斯特（Malowist）建议我们对开始于16世纪末的欧洲第二次扩张浪潮做出解释——包括英国、荷兰，甚至法国的扩张——不仅仅是我们常常引证的商业因素，而且也是甩掉人口过剩包袱的需要。他评论，有许多人将人口数目的膨胀视为经济发展的刺激，但是，他提醒我们，有一种最令人接受的想法。“困难的经济形势和某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形势似乎能创造一种有利于对外移民甚至对外冒险的条件。”^[171]让我们再以这种观点考察一下那些“早熟的、人口过剩的”^[172]国家。像英国一样，法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将它的人口输往西班牙（取代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人Moriscos），以后又输往美洲“诸岛”，并在迫害新教徒时屠杀了許多人。^[173]到18世纪末，可以肯定，法国的人口再次趋于平衡。^[174]但比起英国来，它达到这一步要困难得多。而且，这仅仅是国内战争的代价——战争加强了某些不利的势力，也赶走了某些有利的势力——有利与不利是从工业化观点的角度来

看。英国在发展中的这些附带的好处在162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的后果中变得更加清楚。然后，在我们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看看法国在卡托-坎布雷条约签订之后到危机爆发之间都发生了什么。

在斯普纳（Frank C.Spooner）看来，“1550～1560年的10年是决定性的（对法国而言）。”^[175]这时期黄金突然明显的短缺，使法国的注意力转向对非洲的探险，并导致了西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它标志着巴黎作为一个金融中心（里昂到1580年已完全衰落）的兴起。^[176]而且，这时期还有内部宗教战争的爆发，法国将在这世纪余下的时间被这些战争所纠缠。这种双重的（沿海地区及巴黎）与宗教战争并非没有联系。

通货膨胀影响了贵族的收入，尤其是那些靠固定租金生活的准贵族的收入。但是，由于内战造成的破坏，农民并没有获利，尽管按照常规设想，通货膨胀会使他们受益。一个主要的后果是国家机器大大增加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发生在这时的农业税收的大幅度增加，也因为那些愿意在经济上生存下去的贵族，他们通过将自己与宫廷联系在一起寻求金融上的庇护。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法国在寻求重新转向新的欧洲世界时面临一个主要的难题。它非驴非马，帝国不复存在，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它仍有活力，一半靠陆上运输，一半靠海上运输。它的国家机器一方面过于强大，一方面过于软弱。

在两种领域内，可以相当清楚地见到这种选择的模棱两可性。一个是贸易领域，另一个是政治和宗教领域。贸易领域的真实情况并不与政治疆域纠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是当然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总是事实），但是，法国尤为引人注目，如果将其在经济上的强大对手，英国与北部尼德兰与之进行比较时尤为明显。考尔纳特（Emile Coornaert）是这样描述16世纪开始的情形的：

在从巴黎和卢瓦尔（Loire）的弯曲地段到地中海地区里，法国是那些仍受意大利人操纵的经济区域的一个部分，这些意大利人是整个西欧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各类事务

的主人和商业技术的拥有者。幸亏由于他们，该地区就组织与工作模式而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法国，其端点同时又是国家在该地区的出海口的是里昂，它联系南部和大陆的中部，并相当活跃地与大陆西北部进行联系。后者包括法国的北部、波南特（Ponant）的法国沿海一带、低地国家、英国及构成帝国另一区域的莱茵（Rhenish）边缘，其端点是安特卫普，它控制了与北欧及大部分与德国的接触。从技术角度而言，该地区正在接近南欧地带的水平。^[177]

这种经济上的分裂意味着，就拥有“民族”经济而言，法国不如英国，在这一点上它与西班牙要接近得多。而西班牙的问题是，西班牙是更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个部分，至少在查理五世统治之时，西班牙没有真正控制该帝国；法国的的问题是，在1557年之后，它至少被三个不同的方向所吸引。国家的政治心脏——大体上指的东北部，包括首都——被欧洲大陆的大片陆地所吸引，这些地区的经济在“第一个”16世纪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与安特卫普相联系，甚至在它衰落之后。^[178]法国的西北部和西部被新的欧洲世界经济及它的大西洋与波罗的海贸易所吸引。^[179]法国的南部正在发展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分益耕种体制（*métayage*），这部分是基督教地中海地区致力的初级生产，和产品的对外出口及资本主义农业的总体运动。

在豪泽（Henri Hauser）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和方向合起来就达到了一种“巧妙的状态，（法国）既忽视它的邻居，同时他们又不能没有它。”^[180]他甚至希望把此种状态称作“独裁”（*autarchy*）。在我看来，情况似乎相当不一样，法国正好是各种经济离心势力的总和。为了反对这种分化，国家机器的操纵者们对国家机器本身进行了极大的加强，创造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以致无论从当代人或是历史角度来看，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统治下的法国，都堪称绝对君主制之典范。

法国经济困境最根本的根源之一在于欧洲世界经济技术基础的变化。为了评估它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首先解析一下一些前工业化时代有关欧洲海上和陆路运输成本的相互矛盾的材料。一方面，有一些常见

的、表面上非常明确的论述，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陆路运输仍然相当昂贵，那些拥有最好的海运贸易之利的民族，经济增长速度最快。”^[181]格拉曼（Krist of Glamann）认为，因经济交往而产生的范围扩大的理论尤其适用于海上贸易。的确，他说，“国际贸易（经由水路）在很多情况下比内陆贸易更为廉价和容易。”^[182]另一方面，布鲁勒兹（Wilfrid Brulez）指出：

在16世纪，……陆路运输拥有其本来的地位。这个事实对低地国家与意大利之间的贸易来说是无可争辩的：尽管他们有安特卫普，一个第一流的海上运输出口，甚至于像一个世界中心，然而，低地国家与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商业关系是经由陆路进行的。两国之间也有海上船只往来，但其重要性微乎其微。^[183]

情况到17世纪似乎变得相当不一样了。发生了什么呢？非常简单。似乎在这个时期尽管在陆路和水上运输方面技术都有进步，但是改进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出现了“对于笨重庞大的货物来说，水上运输在一切情况下（除了运输活牲口）是最经济便宜的。”^[184]以前提到的荷兰弗鲁特（三桅快船）（Fluyt）的发展或许在此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反过来说，在16世纪，对于轻便而价值昂贵的产品以及贵金属来说，陆路仍然是廉价、有效、安全的运输工具。^[185]

这一点对法国有何意义？我们说过，“第一个”16世纪的政治是围绕西班牙和法国试图将欧洲世界经济转化为世界帝国的念头而转动的。尽管有大西洋的探险，这些企图主要瞄准的是陆路。的确，这或许是对他们失败的一种附加的解释。“第二个”16世纪的政治转向在一个非帝国性的世界经济的网络内，为了获取政治经济利益所需要的共同的民族国家的产生上。这些企图的焦点又主要集中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海路上（外部及内部两方面）。北部尼德兰和英国的天然的地理优势对他们帮助极大。法国的政治关系紧张，常常分不清谁是陆路派，谁是海路派。^[186]法国一方面与英国，另一方面与联省之间关键的差别在于，在英国和联省转向海路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体及民族已经是一些互不矛盾的抉

择，然而，对法国而言，因为地理方面的原因，这些抉择之间有矛盾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第一个有力的暗示来自从1560年法兰西斯二世（Francis II）之死开始，到1598年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宣布休止一直折磨法国的宗教冲突和内战。

我们要在这里简单地考察一下某些阶级和宗教战争在地理方面的共同性。只要法国将其注意力转向与哈布斯堡帝国作斗争，以及依靠里昂来与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竞争，宗教宽容是有可能的。^[187]在卡托-坎布雷条约之后，国际金融对宗教宽容的需要消失了。同时，里昂的繁华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它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降低，同时也因为它是宗教战争的主要战场。^[188]这些战争同时产生了许多完全不同的力量，他们的政治观点常常与他们本来的动机脱节，而且通常发生在旷日持久的政治骚乱的高潮之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理清一些线索。赫斯特菲尔德（Hurstfield）在《新编剑桥近代史》中对内战的起源是这样论述的：

这时期的法国，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化成一场持久的流血战争。当然，众所周知，法国的内战源于世俗的因素并不少于宗教的因素……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运动在16世纪中期首先吸引了商人和工匠；它的早期的殉难者——就像在玛丽统治英国（Marian England）时期的殉难者一样——来自身份最卑下的集团。但是，到1562年内战开始时，贵族包括高级的以及地方上的，已经参加进来并在实际上取得了领导权。当时的法国人就认识到区分运动两翼的重要性，将一部分说成是“宗教的胡格诺派”（Huguenotes of religion），另一部分说成是“国家的胡格诺派”（Huguenotes of State）。后者远非意味着宗教方面的分歧。他们表达了地方上的显赫家族对身居巴黎权位的贵族长期以来的敌视；对国王及其同盟者——天主教会的恨；并且，尤其是对吉斯家族（Guises）的敌视，该家族与教会打得最为火热，最为强烈地反对那些外省的，常常是趋于没落的家族的目标和利益。[表达“外省贵族”（provincial nobility）的传统用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争议：它的大部分成员在英国被认为不属于贵族，而是属于骑士及乡绅家族。^[189]]

这样，赫斯特菲尔德就勾勒了一幅法国的画面，这个画面与特雷弗-

罗珀勾勒的英国画面极其相近，这是一个不包括宫廷在内的整个国家的画面。而这样的画面引起了对英国那些相近的概念认识不清——贵族（或是乡绅）、“兴起”或是“衰落”？国家在实际上代表谁的利益？

让我们看看科尼斯堡格（Koenigsberger）在《剑桥史》同一卷里紧接着赫斯菲尔德所勾勒的画面：

在1557年银行破产之后，亨利二世（Henry II）从他不幸的臣民身上榨取了700万非凡的税收。不管怎么说，这已经达到极限。在诺曼底（Normandy）和朗格多克（Languedoc）有农民的起义。贵族虽然免税，为了忠于国王，支付在圣昆廷（St. Quentin, 1557年）灾难之后贵族俘虏们所需求的大笔赎金，也花掉了收入，或是抵押，或是卖掉了他们的财产……

在城镇，小手工艺人和商贩遭到沉重的税收和如像1557年的农业歉收所导致的农村购买力周期性的崩溃的打击。雇工看见食物价格的上涨要比工资增加快得多，并且发现，行会日渐增加的影响及其规定的严格堵死了多数人晋身师傅之路……

在1559年之后，贵族大量参加运动，尤其是在南部……

仅仅是在（1573）年，胡格诺组织达到全盛阶段，蔓延在从多斐内（Deuphiné）经普罗旺斯（Provence）和朗格多克到贝亚恩（Béarn）和基恩（Guienne）的广阔地带。如同在尼德兰一样，成功的革命趋向于地方主义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地方上反对多管闲事的中央政府的情绪相吻合，同时也有可能是因军事形势的需要。^[190]

对此作出反应的是天主教的地方同盟的兴起，也强调他们的地区身份和（传统的）地方自治的要求。巴黎的地方主义者站在天主教同盟一边。^[191]进一步说，两大营垒都与外部势力相联系，胡格诺派与英国和德国的新教诸侯有联系，天主教徒则与罗马和西班牙、萨瓦（Savoy）的统治者有联系。“这样，这时期的一切革命运动都与民族疆界之外的权力及其利益联系起来。”^[192]

国王亨利三世（Henry III），试图仲裁这场斗争，最终目的是打击和疏远两派。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寻求使冲突降级的非常漂亮的一招，因为如果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他认识到有来自他的继承人——纳瓦尔（Navarre）的亨利（亨利四世），一个身为新教徒的王位觊觎者的威

胁。后来亨利四世果然口出名言：“Paris vaut une messe”（巴黎值得作弥撒）。注意，是巴黎，而不是法国，而且说的是纳瓦尔的亨利。

亨利四世动摇了他的阵营，既然他的本意与他的大众基础的要求不一样，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相当容易的。贵族们基本上都从冲突中退了出来，变成了天主教徒。这拔掉了宗教冲突的导火索，而且，也削弱了政治性反抗的力量。^[193]它也挫败了下层阶级，他们转化成了愤怒然而相对无效的扎克雷起义（Jacqueries）。^[194]最终，胡格诺派的地盘反而比以前更加坚固了。他们失掉了北部和东部的势力，然而在南部却大为加强。^[195]

非常明显，地区性是潜在的紧张关系之一。一方面，诺曼底和布列塔尼（Brittany）正逐渐脱身；另一方面，整个南部的分离主义者也是如此，自从13世纪失败以后，该地一直潜藏着分离主义势力。脱身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强大的民族经济的产生有利于限制而不是扩大地方显贵牟利的机会：那些西部沿海的资产阶级试图利用金钱开拓大西洋——波罗的海贸易，而不愿建立国家官僚机构和政府军队；南部的土地资本家寻求一个自由的国际市场。中央的大员们并不倾向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在本质上行中庸之道：首先加强政府，再考虑商业的可能性。

如同在英国一样，法国的君主制度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愿意创造一种能够在新的世界经济中进行成功竞争、以新的社会力量为基础的民族经济，同时自身又位居等级制度的顶端，其特权的基础则是保守的社会力量。不想做出草率的选择，国王——在法国正如在英国一样——感觉沉湎于贵族的雅好之中要比扮演新事物的先驱者角色愉快得多。然而，不同的是，在英国，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无论在农村或是城镇，都感到他们能够从更为强大的民族经济中获取养分。但是，法国也有商人阶层，他们感觉正被遥远的巴黎出卖，而且，南部的资本主义农业与领地内乡村工业正在增长的英国土地主相比，他们的结构和需要更接近像

波兰（只需要开放的经济）这样的边缘国家的土地主。在英国，国王有点利用反对者去抑制反对者的意图，既然国王的“民族的”姿态寓于这些反对者的“眼前”利益之中。法国国王则不能这样做，而且，他不得不用更为严厉的手段去统辖整个国家：因为16世纪后半期的内战，17世纪的前半期便出现了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主义。

然而代价是沉重的。可以肯定，宗教战争促进了绝对主义的兴起。正如穆斯尼尔（Mousnier）所说：“不像在英国，法国的贸易、工业以及资产阶级的发展都被延迟了（freiné）。”^[196]代价并没有全部偿还。路易十三（Louis XIII）及黎塞留（Richelieu）时代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不管怎么样，为了估计这个代价，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总的世界经济形势上。

“漫长的”16世纪现在就要结束。并且，大多数历史学家这样说，出现了危机。一种危机或是多种危机？因为在1590年代有一次经济衰退，在1620年代出现了一次更大的衰退，而被一些人视为致命一击的发生在大约1650年。我们不想在时间的争论上停留太久——无论是理想的日期是1622或1640，或1650年。斯普纳（Spooner）坚持认为，谈到漫长的16世纪这个“终端和分水岭”时，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这个转折点“覆盖了相当广阔的时间周期。”^[197]因种种理由，我们选择1640年作为最后的日期，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保证不会越过此界。然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事实上无任何例外，历史学家都接受这个意见，即大约在这个时间的某个地方存在某种类型的关键性的转折点。^[198]

它由什么构成的？首先，是价格运转，是曾经支撑了欧洲世界经济扩张的物价飞涨的结束。这种价格潮头并非突然逆转的。这一点对理解这个时期及世界经济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总的来说，逆转在南部比在北部发生更早，西部比东部早，在沿海比内陆要早。^[199]前后的断层不仅仅是几年时间。

在无敌舰队（Armada）失败后不久，麻烦就在西班牙开始了。贸易仍然时起时落。肖努（Chaunu）的资料表明，1608年是西班牙大西洋贸易的顶点。然后就是持续到1622年的平稳期，肖努认为是这时期暂时的和平具有经济特质的裨益创造了它，随后是明确的衰落。然后，无敌舰队的军事政治的失败仅仅是刺破了一个气球，这个气球是被西班牙繁荣的资源基础的耗竭吹胀的。西班牙对美洲的开发具有种种破坏作用，近似于一种野蛮的猎取和搜括，只不过采用的是发达的技术。^[200]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耗尽了土地和人力。进一步说，西班牙不仅仅耗尽了印第安人的劳动力，正如我们知道的，它也用别的方式耗尽了它自己的劳力。^[201]

一个重要的后果是贵金属进口的下跌。例如，在1641~1650年间，从美洲进口到塞维利亚的贵金属每年平均是1591~1600年进口的39%，主要是白银，黄金只占8%。贵金属产量的下降是“无情的边缘地区价值递减律和利润下降的后果。”^[202]然而，既然贸易没有突然减少——实际上它仍然在扩大——货币贬值就不可避免。

这是第一次，一个不平衡的民族发展的单一的世界经济的存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差异。西北欧国家货币贬值的程度比起南部、中部及东欧的国家要轻微得多。^[203]这些当然就是贵金属价格。贝莱尔（René Baehrel）有一个精彩的附论，他证明，贵金属价值的变化与物价的变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人们主要依据后者来做现实的经济决策。^[204]不管怎么样，他在一本书里深入地讨论了17、18世纪的经济是有意义的。卢布林斯卡亚（A.D.Lublinskaya）有一个看法，从16世纪与17世纪的分别恰在于这个事实，在1615年之后，第一次有一个“独立的价格运动，而不依靠金、银的流入量。”^[205]她断言，这个事实确立了“价格革命”的结束。罗曼诺（Ruggiero Romano）坚持认为，在1619~1622年发生了价值贬值的突然加重：“事态是严重的……”^[206]在1619年有如此富足的货币以致利率降至1.2%，“在整个1522~1625年间，绝

对是最低的利率比率。”[\[207\]](#)

从总的不景气情况看，只有荷兰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到什么程度，我们将会看到）英国得以幸免。[\[208\]](#)罗曼诺坚持认为，荷兰不仅得以幸免，而且1590~1670年间或多或少是荷兰农业扩张的一个时期。[\[209\]](#)

为什么西北欧相对远离厄运狂风的侵袭？肖努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解释。16世纪，因为贵金属到来的滞后，西北欧价格的上涨远非西班牙那么迅猛。然而，西北欧通过走私总是获得部分贵金属。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私的贵金属比例在上升。因此，走私贵金属所引起的物价上升的冲击力在总的冲击力比例中处于上升之时，西班牙的价格正开始下跌。“北欧的价格由于非常不易受不景气因素的影响，这样，就有可能接近西班牙的价格水平。”[\[210\]](#)这似乎扯得太远了，因为它立足于绝对意义上不重要的衰落的与走私贵金属的相对提供相对立的似是而非之论，根据斯普纳提供的数据，这就可能与事实不符。

詹宁（Pierre Jeannin）对西北欧抵制不利因素正如它源于从这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的分析似乎更中肯一些。[\[211\]](#)他引证其地理位置（临大西洋，处于东北部谷物、森林产区及需要进口它们的国家中间的十字路口上）；引证工业能力（植根于过去，像荷兰、英国的纺织；或是由于国际经济的扩展而释放经济潜能，如像瑞典的铁）。进一步讲，北部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扩展意味着人口的持续增长，而这时正是地中海地区人口数下降之时。肖努（Pierre Chaunu）估计，在1620到1650年间，帝国的人口从2,000万降至700万，意大利的人口从1600到1650年降至200万。相对而言，英国（还有法国）避免了人口的下降。[\[212\]](#)

由于地理政治现象，就意味着西班牙人的大西洋时代的结束，欧洲人的大西洋时代的确立。[\[213\]](#)随着荷兰人对巴西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攻击，在1624年重新开启了给予西班牙经济以毁灭性打击的战争，当时葡萄牙隶属西班牙王室。[\[214\]](#)至于亚洲的贸易尤其是胡椒，在1590到1600

年，荷兰人和英国人打破了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垄断，导致了香料价格的暴跌。^[215]人们能良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展现了一个重商主义前景，这个前景使他们感到“世界繁荣总体而言是持续前进的，商业政策的目标……对每一个别的民族而言，是保证尽最大的可能性去分享这个繁荣。”^[216]

但是事实上这种繁荣并不是持续的。一方面，有人认为，16世纪的结束意味着全欧“利润的惨跌、租金飞涨、经济停顿。”^[217]但此人肯定比较片面。罗曼诺（Romano）坚持认为，16世纪“正如12、13世纪一样，是一个广阔的农业利润的世纪。”^[218]它是小康农业利润的衰落期，这种衰落将说明17世纪晚期及18世纪奠基在前所未有的强制与廉价农业劳力基础之上，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地位增长的原因。罗曼诺的评论是中肯的：

如此宏大景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一方称作“faillite”（破产），“trahison de la bourgeoisie”（资产阶级的背叛），另一方面称为“réaction seigneuriale”（领主制的反动），仔细察看，似乎不是两种分开的、截然不同的类型，而是一个整体：几乎是相同的人，或者至少是背叛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首先是他们的资产阶级职能）的家族的后代，进入réaction seigneuriale（领主制反动）的体制，在论述意大利的情况时，我将它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再版”（refeudalization）。^[219]

但是，正如罗曼诺所观察的，荷兰及仅次于荷兰的英国再度成为例外。但是，我们不想超越我们的故事本身。仔细地看看英国和法国是怎样处理“漫长的”16世纪临近的灾变，对理解后来的时代至关重要。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是围绕英、法对最高权力的竞争进行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关键性的牌是在1600~1640年间打出的。

当克拉克（G.N.Clark）试图解释英国在“第二个”16世纪工业的“明显”进步时，他认为，根源在于国际商业。他在分析这时期的英国国际商业时，发现在这时期的结束与开始之间有三个主要的差别：（1）虽然英国国际贸易绝对地扩展了，但是在有关国内提供消费的需要的工业

方面却衰落了；（2）尽管阿姆斯特丹继承安特卫普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枢纽，英国对尼德兰的关系还是从一种依附和补充状态转化成了竞争对手；（3）尽管英国在欧洲内部的对外贸易日渐多样化，英国还是与俄罗斯、利凡特（Levant）、印度洋地区及美洲开始了有系统的贸易。[\[220\]](#)

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之前，不管怎么样，这些变化的出现还没有到引人注目的程度。正如克拉克所暗示的，他们也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平稳的方式。因为这些变化打翻了都铎统治者们殚精竭虑所创造的精致的社会与政治平衡，而且展示的是赤裸裸的令人争斗的利益，这将撕裂英国的政治体制。让我们依次谈谈这些变化。

毫无疑问，在国民产品总数中国际贸易部分的比例的衰落是事实，这可被解释为英国长期的经济健康的标志。但是这一点忽略了英国国内工业化的最初的进程使英国的社会结构更多而不是更少依靠变化莫测的世界市场。萨普尔（Barry Supple）指出，不像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时期，固定资本在工业经济中扮演次要角色，所以，民族经济中的波动不是因超常的能量引起，也非由于资本的产品工业的波动而加剧。比起后来，信贷里的波动也是一个更次要的因素。所以，国内市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收获波动的一个作用（由气候变化导致）和“海外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国内活动变更的策略方面的决定因素。”[\[221\]](#)而且，恰好因为英国工业的发展，这些变化在政治方面是非常迫切的：

布料生产由于太先进而停止发展，主要成为占绝对优势的农业人口的一项副业。这样，总体来看，对政府和国家共同体而言，纺织工业的存在意味着在一个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任何财产的阶级中，长期存在着痛苦与混乱爆发的威胁。这种情形促使伊丽莎白时代济贫法的出现，并造就了数代鼓励工业增长的谨慎的政治家。[\[222\]](#)

那么，英国会做什么去保证经济，也是政治的稳定呢？萨普尔提出一个答案：仍然是进一步地收缩。费希尔（F.J.Fisher）注意到“培根（Bacon）回顾伊丽莎白的统治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这时期英国一直

危险地依赖外国的谷物……”^[223]很大程度上，这是北意大利所实行的一条非工业化道路。另一个答案或许是向外扩展，并借由获得别的供给资源来克服供给压力，借由控制新的市场来克服需求的压力。^[224]这是北部的尼德兰人所实行的道路。这一个又一个的答案事关英国社会结构的决定性的选择。这一切恰恰是都铎统治者竭尽全力回避的决策。结果走的是折中道路。斯通（Lawrence Stone）对伊丽莎白时代海外贸易量的考察使他得出结论，“伊丽莎白统治时著名的贸易扩展好像是一个虚构的神话。”^[225]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英国到1600年之时将自己从荷兰的经济监护中解放的程度，可以肯定，我们会发现，英国商业资产阶级对英国内地贸易增加控制的过程一直或多或少被诸如先是在1552年，决定性的是在1598年对汉萨（Hanseatic）的特权的取消这类行动完成了。^[226]这有利于像“商人冒险家”（Merchant Adventurers）这样封闭的垄断集团。^[227]这类组织的利益主要来自不稳定的折中平衡。

在斯图亚特时代，当别的商人获得了法律权力向荷兰在纺织制成品工业的角色挑战时——所谓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科克因计划）^[228]——他们失败了。在萨普尔看来，这种失败证明了：

由荷兰人染色与梳理英国纺织半成品所形成的国际劳动分工，并不是一种靠人为的合伙关系所维系的专断现象。相反地，到17世纪早期，它反映了经济现实对英国可能只在她危险时才稍动摇的反抗。^[229]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迟疑主张对外扩张或许并非不明智的。^[230]所以，都铎统治者们将内部的社会矛盾一直推延到他们从外人那里得到帮助加强了国家机器的政治自主之时，以使英国有力量容忍爆炸性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调整。

最终，伊丽莎白时代海外的多样化活动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肯定，在这时期，英国的船只回到了波罗的海，并开始向地中海、俄罗斯和非洲航行。而且，这是第一批特许公司组建的时代。但是我们

必须当心不要夸大。一方面，比起英国来，东欧仍然与法国和西班牙（经阿姆斯特丹）有更加密切的联系，^[231]而且，另一方面，在伊丽莎白时期，对英国来说，与法国和反叛的荷兰诸省的贸易仍然是最主要的。^[232]

英国商业景象的现实既是都铎君主们政策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他们仍采取骑墙姿态。^[233]1590~1640年的国际经济危机使这种姿态日渐变得不可能，这样，君主制度的政治稳定性及其所庇护的专制权日渐变得虚弱。稳定并不总是每个人的“至善”（Summum bonum）。对某些人而言，它是“令人厌倦的”。^[234]到1640年，那些试图实现商业扩张可能性的跃跃欲试的商人们在议会推出的种种自由贸易法案中找到了知音。最直接的促进或许来自与西班牙的和好，如同和好惯常的作用那样，它打开变化的贸易前景，一方面可排除某些贸易方面的阻塞，同时也可以说，意味着从前繁荣的私掠船队的失业。^[235]

对下一个10年来说，英国的织布工业看上去比较光明，它在1614年达到了出口顶峰。但是用萨普尔（Supple）的话来说，也将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宜人的晚秋。”^[236]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经济萧条，它“造成了海外市场对过去的布匹的长久的限制，”^[237]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突然的滑坡？实际上它并不是如此的猝不及防，而是如欣顿（R.W.K.Hinton）所说，“一种已然一直不景气形势的加速的恶化。”^[238]发生的事是，相对于英国而言，大陆通货的贬值产生了一种更加不利的贸易条件，它使“（英国的）布料价格过高而失去了（他们在北部、中部欧洲的）市场。”^[239]这导致了贵金属的外流，这种外流由于1621年和1622年农业的歉收需要外国谷物而加剧。^[240]贵金属戏剧性的流失“对一种简单地依靠一种固定的金属货币的供给的经济，意义非同小可。”^[241]

古尔德（J.D.Gould）认为英国现在是在为1550~1600年间“争夺特

权”中，国际价格优势的浪费付出代价。结果，既然价格优势已然逆转，“英国就不得不背负一个刻板及代价高昂的经济，不宜对付一个已在低成本、适应性强且先进的基础上复苏起来的竞争者（荷兰）。”^[242]荷兰人现在能够打入英国自身的进口贸易，^[243]而且英国对德国和东欧的纺织品出口也受荷兰人和地方上的竞争者所冲击。^[244]

商人们与政府都惊恐起来。商人们的反应是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如像限制非英国人向英国进口商品的权力，强制性地采用英国船只，向波罗的海谷物再输出的自由，这可以扩大织布贸易并为谷物的需要带来通货。^[245]政府则有相当不同的看法。首先，在议会里呼声较高的农业利益政策正因谷物进口的禁止得以推行，因为农业需要价格保护。^[246]其次，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为了预防暴乱和骚动，为了维持经济上的稳定与权力，如何将它的需要与减轻地方匮乏调和起来，与商业恢复调和起来。”^[247]为了第一个方面，政府试图采取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办法，即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如同在今天一样，此种办法绝非易事。^[248]与其提供新的保护，政府还不如转向放松垄断，看看这是否会使商业和工业复兴。^[249]但是他们不可能在此路上走得太远，因为特许公司的设置对政府有太多的好处。它保证私营公用事业的官僚机构的忠诚，它们行使领事或海关职能，通过贷款和税收是一个收入的来源，甚至代替海军在国际性的商业中起保护作用。^[250]“专利产品及其垄断，将自私的目的包裹在迂腐的陈腔滥调之中，是斯图亚特政府机构总体组织中的一个部分。”^[251]如果政府坚决地转向反垄断主义，事实上也仅仅是在议会的压力之下，“那是些对外输出港和较小乡绅们的吵吵嚷嚷的代理人。”^[252]

英国也没有上帝保佑的运气。1623~1624年，贸易的复苏又因1625年的瘟疫以及歉收遭受打击。与西班牙战争的恢复，正如我们已经看见，对西班牙损害极大，对英国也没有好处。对谷物的新的需求导致了支付危机趋于另一种平衡。^[253]这样，英国工业的保守的内心就发现“衰

落、煞费苦心的调适以及漫无边际的弊端是那么无穷无尽。”^[254]政府干涉不解决问题；它只是通过制造“商业信心的危机”^[255]来恶化形势。

非常明显，对英国纺织工业而言，要降低成本绝非易事。部分原因是，对国王来说，商人们与国家机构牵涉太深，以致不能强迫企业家们去经营一个亏损的工厂。^[256]肯定也因为工人们相对强大，足以打消任何削减工资的念头。^[257]所以唯一的办法除了非工业化外，是通过发展新的工业来对付那些既得利益者。事实上，英国正是在这里，在所谓的“新布匹”（new draperies）^[258]中找到了商业上的生机。“新布匹”作为一个出口项目走红之引人注目恰如“老旧布匹”（old draperies）之衰落。^[259]

对高价格的困境有第二个解决办法：英国发展一种再出口贸易。正是英国这方面的商业政策，组成了17世纪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殖民扩张和英/荷之争。两种趋势在内战（Civil war）之后明朗化，但是内战之前已露端倪。^[260]

新的产品要求新的市场。总的来看，为英国提供最重要的新的竞争场所是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261]这是一个相对不受过去英国的垄断限制的地区。^[262]尤其是西班牙市场具有吸引力，因为“国内的通货膨胀和殖民地的购买力。”^[263]英国这只鹫鹰开始吞食西班牙帝国这具腐尸。在意大利工业的衰落之际，英国的出口部分地填充了差额。^[264]

至于殖民化，我们必须记住，对英国（法、荷）来说，很长时间没有从事直接殖民的必要。卡托-坎布雷和约毫无疑问部分作为帝国扩张疲惫的结果，包含了令人吃惊的条款：“本初子午线的西部和北回归线的南部.....双方的暴力行为将不被视为触犯条约。”^[265]这个概念广为人知，“界外无和平”在1598年于弗尔文斯（Vervins）又得以重新肯定。可以肯定，它意味着建立新的殖民地的自由，也意味着劫掠的自由。而且长达50年的劫掠其收益远远超出殖民地的收益。^[266]比较起来，建立殖

民地似乎是一种前景未卜的冒险。可以设想，西班牙人已然捷足先登，而且“甚至狡诈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尤其是女王本身——都感觉到在欧洲大陆上已然没有左右逢源的希望。”^[267]再说，英国已有爱尔兰作为对外移民的一个出口。^[268]

这种态度在1600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以詹姆斯一世（James I）名义的英国两个王位的联合加强了与苏格兰的联系。爱尔兰的殖民地化对英国和苏格兰都有一种新的严重性。^[269]爱尔兰与不列颠的劳动力分布已然并为一体。为了供给英国木材，它的森林已经伐光。^[270]在未来的100年，它变成了一个受英国人控制的以铁为主的工业基地。^[271]而且，英国将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帕里（Parry）将变化归因于西班牙声望的衰落，归因于对原材料——廉价的食物，尤其是鱼的寻求，^[272]归因于战略物资的提供（木材、麻、沥青），它们的波罗的海来源有可能在战争期间被截断。进一步说，它们将成为新的产品市场和出口贫民的地方。^[273]这一切无疑是事实，如果不是考虑到西班牙的军事力量，这一切的实现或许会提前一个世纪。西北欧三个强国对殖民的新的抢夺难道还不是他们竞争的信号吗？在西班牙衰落之时，它难道不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行为？

这类国际经济灾变的影响加深了英国的政治危机。我认为札戈林（Perez Zagorin）相当准确地抓住了冲突的本质：

英国革命的起源不应在阶级斗争中寻找——因为内战中双方的领导集团都包括同一个经济阶级中的许多人，他们的发展随时代的推进而稳步发展。而应该去英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中寻找。^[274]

而且，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残杀不仅仅被国际经济领域内的突发性事变促成，还因英国政治体制的两大危险的提早解除而成为可能，正如斯通断言：“来自贫困或是西班牙人威胁的钟声消失了……”^[275]

关于内战的开始有两点稍显愚蠢的讨论。一是它可不可以避免。对

于托尼“君主制的没落是因都铎统治者为了保有它而采取的措施而加速”^[276]的论断，特雷弗-罗珀断言，主要的问题是超支的行政管理，这本来应被议会改革完善的。“因为君主制本身当然不构成障碍，说这样的政策没有革命就不可能推行是荒唐的。”^[277]

我们简要地看看特雷弗-罗珀回顾性地推荐给长期国会的改革在法国的结果。但是说“必然”是在玩弄一种无意义的游戏。如果一种原因不一样，结果当然也会不一样，除了“一种”，为什么不是两种或是三种原因呢？事实是内战的确已经发生，学者们的任务是解释它。

另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关于自由或是宗教的信奉是否是分裂英国的“真实的”原因。赫克斯特（Hexter）先生坚持认为它们是，令人惊讶的是，在争论中竟有他的许多伙伴及论敌同意[欣顿、斯通、波卡克（Pocock）、希尔、罗珀支持他本人和托尼]。他欢迎他们去他的“辉格党”（Whiggish）公司。^[278]波卡克（J.G.A.Pocock）至少有些生气，坚持认为他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新辉格”成员。^[279]但这是一个愚蠢的争论，因为内战的主角们当然会用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就政治自由和宗教问题表达不少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当然对此作了解释。而且，内战的结局当然会有一个统治英国政治生活的正常的制度。

要仔细分析一种政治和社会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共同点从来没有太多的意义，除非将这种分析植根在当时盛行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样才能理解这些关系中意识形态的真实内涵。讨论的确是围绕这些关系的全貌展开的，是围绕他们的本来面目或是某些特定方面的变化展开的。

如同所有的社会剧变一样，英国内战是一场复杂的冲突。其中最主要的冲突是在两类人之间进行的。一类是那些强调君主制地位的人，他们希望维持一种特权以及尊重特权的正在没落的制度，^[280]他们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超出了别的任何考虑，他们在世界经济的强制性的选择面前显得有些麻木不仁。另一类人是那些将农业商业化视为至高无上的人，

他们欢迎社会模式中的一些变化，几乎看不见宫廷浪费有什么美德，他们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

让我们转向法国，在那儿情况是相同的，但最重要的不是相同。比滕（Davis Bitton）谈到1560~1640年是“一个从晚期中世纪的法国贵族向旧政体（Old Régime）的法国贵族过渡的至关重要的阶段。”^[281]在英国也是如此。但是法国发生了不同的过渡。在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和穆斯纳（Roland Mousnier）的大论战中——我们将马上谈到——波尔什涅夫认为这时代法国发生的是“买官鬻爵没有导致权力的‘资产阶级化’，而是资产阶级的‘封建化’。”^[282]对此，穆斯纳的回答是：“没有诸如‘封建绝对主义’秩序之类的事，只有某种与反封建秩序斗争相关的封建绝对主义趋向。残余的封建秩序会使绝对主义瘫痪。”^[283]尽管我认为争论部分属于语义学范围，在一些方面波尔什涅夫有道理，但也有可能是穆斯纳更接近真相，如果人们用他的理由去解释英国，用波尔什涅夫的观点去解释法国。就是说，以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公式，一个人也能断言，在英国，贵族借着将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暂时损失，来得到长远的利益；同时，在法国，贵族以强迫资产阶级放弃其特定的职能来获得短期利益，失去长远利益，某种程度上，这是法国经济停顿的原因。为何这样，我们将讨论，本质上是两者相对世界经济职能的不同。

但是首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在何种程度上，这对法国社会体制是一种公正的描述。因为我们已经勾勒过1600年的法国国家比英国更强大。这就意味着官僚机构“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在社会等级制度里往上爬的一个主要途径，”^[284]在英国更是如此。反过来，这种金钱的效力导致法国资产阶级对君主制产生更大的兴趣。^[285]这也使穆斯纳认为在这时期的法国存在着一个相对开放的阶级。^[286]但是穆斯纳本人认为要往上爬非常困难。他指出，对于贫民而言，要达到*mãître des requêtes*（行政法院审查官）的地位，需要四代人的努力。^[287]我认为，事实上波尔

什涅夫更深刻地看到了阶级地位的本质。比那些阶级感情随具体的地位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阶层有更多的等级之间的流动情况是不多的。最具意义的这样的阶层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官僚——noblesse de robe（穿袍贵族）。

当一个与原来的村庄仍保持联系的工人失去其工厂里的工作时，他会再次变成一个农民。同样，当人们试图收回官员们的财产和特权，即剥夺他们作为特权贵族的地位时，这些官员自然在实际上又回到了资产阶级的地位……那些受马札林（Mazarin）的决策消极影响的官员感觉自己是资产阶级，在投石党运动（Fronde）的开端，他们的态度简直就像整个资产阶级的态度一样。^[288]

恰恰是因为在法国获取正式的贵族地位的相对容易度（在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也是这样，但没有这么多）导致了16世纪法国贵族所抱怨的“贵族地位的模糊”，这种情形引起他们“对光荣的特权强烈而又执著的关注，”^[289]而且也导致他们大力强调行为的严格准则和 dérogance（丧失贵族资格行为）的理论。^[290]

将绝对君主制视为一种与资产阶级结盟反对贵族的传统说法总是会碰到这样意外的事实，即所谓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典型的绝对君主制政体也是一个重新肯定封建领地之特权的最好的例证。布洛赫（Mark Bloch）是这样解决这种矛盾现象的，他认为，这两种现象中封建领主特权的恢复是更为主要的一面，而且，没有绝对君主制，这种趋势也将势不可挡。换句话说，人们可以说是“绝对君主制的胜利限制了‘封建回潮’的程度。”^[291]

卢布林斯卡亚（A.D.Lublinskaya）基本同意如此勾勒“第二个”16世纪的法国画面。^[292]1559年之后，法国的外国银行家衰落，一方面因为意大利和德国的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宗教战争。这些战争给法国商业资产阶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差距。为了获取财力，所以，法国政府创立了一种包税制度。包税商们甚至完全渗进了国家财政机构。“包税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它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政府依靠包税人建立一种强制性

的贷款体制，将这些主要的包税者变成政府的信贷者。”^[293]这样，“金融家”与国家之间的亲密联系如此亲密，以至于他们自己的生存依赖于国家的强大，就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仍然强大到需要向他们贷款的政府。”^[294]尽管君主政体不向贵族征税的说法不符事实，^[295]这完全是因那些贪官使这种情况变得非常困难，卢布林斯卡亚仍断言，税收改革必然会导致重新购买官职的昂贵的现金支出。^[296]增加国家债务的任何事都会加强这类官员的地位。尤其是“对财政官员们非常有利的战争。”^[297]

这里的部分理由可以直接从英国那里看出，在英国，在伊丽莎白和早期斯图亚特时代，“财政封建主义”或是由商人联合组织（辛迪加）负责的包税岁入成了一件平常事，^[298]没有宗教战争可以解释，也没有紧随其后的贪官阶层的大规模增加。进一步说，谋取税款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是行政管理改革的结果。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战争支出的紧急状态和需要在国家和纳税者中间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削减财政中间人。^[299]

然而，没什么根据。对此进行最主要的攻击来自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对“行贿是资产阶级政治最高权力的一种形式”^[300]这种说法发出了颇有分量的攻击，他将这种理论归属于佩奇斯（Pegès），然后是穆斯纳（Mousnier）。波尔什涅夫试图证明，17世纪的法国“在其主要特征方面，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这由封建生产关系占绝对优势和封建经济形式所决定。”^[301]

波尔什涅夫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形式是存在的，但是资产阶级“参加封建国家的政权是有限的，其行动不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阶级。”^[302]资产阶级为了受贿、贪财和过一种贵族式的生活而寻求各种官衔。再说，他们被引诱放弃了真正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为了经济上的便宜，他们将钱用作信贷资本，而不是用作工业和农业资本。^[303]

因此，当农民起义在1623~1648年间发生时（我们将很快谈到），资产阶级左右摇摆。一方面，他们也不满高额税收；另一方面，他们与贵族有共同的利益因而害怕平民。一些人起而反抗；一些人逃离国家；另一些人则以购买官职和将钱置于信贷运转的方式来与国家达成妥协。^[304]

如果有人问英国和荷兰是怎样产生一种“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ée*）的贵族阶层，而法国却没有，答案是“在法国，封建主义有一种完善的、传统生命力，这阻止任何贵族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形成。”^[305]不是因法国更落后，而是“法国经济性质的特殊性使那种阶级组合不可能，这种组合导致了英国模式的、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306]波尔什涅夫看法的清晰性在这种关键性的比较中显得站不住脚，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不可解释的完善性、无法界定的特殊性以及“不彻底革命”这类模糊的概念。

正是在这一点上，维范迪（*Corrado Vivanti*）支持波尔什涅夫，完全同意波尔什涅夫对穆斯纳关于“投石党”（*Fronde*）在法国史中是一种孤立的因素的论点的反驳，他认为波尔什涅夫没有跟随自己观点的逻辑坚持到底，而是陷入了斥责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泥潭。他们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为足以强大和自立”到有进一步作为的社会集团。^[307]维范迪采取一种提问的方式作出这样的假设：

因为16世纪的[法国]经济没有成功地创造那种资本积累，那么，在何种程度上，17世纪的“封建反动”或是“复辟”以及全然的“资产阶级的背叛”可以说是奠基于一种人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即相似的危机状态中找到的不同的方式？^[308]

那就是说，列举的“那些最终阻止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从事独立行动的客观障碍”^[309]是毫无疑问的常识吗？即使法国达不到英国具有的发展水平，它也不会降到像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半边缘国家的地位。甚至南部法国，虽然滑到了交谷租种的道路，在

经济上并没有退步到紧邻的地中海地区的程度。拉杜里（Le Roy Ladurie）坚持认为，人们可以不像谈论北部意大利和卡斯提尔那样谈论南部法国（以及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经济状况“停止不前，备受限制，正在改善和缓缓发展，但仍然没有翻过身来……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戏剧还没有落幕，但是农业生产僵化而缺乏弹性；没有倒退（décroissance），但是缺乏明显的增长。”^[310]南部法国可能最终会改变，但至少比别的地区晚50年。

戈德曼（Lucien Goldman）对绝对君主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理论作了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正好相反，基本的同盟是君主与贵族之间，然而，经过创造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君主保证了侧翼的安全。然而，不管怎么样，戈德曼认为，恰好是借由维护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而不是伪贵族者，君主制才到17世纪初期引进官职税改革（Paulette）。^[311]实际上通过对官职设立税收制度——官职税（Paulette），使得官职可用金钱买得，既维护了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性质，^[312]又使其依靠君主制度。^[313]

戈德曼的论说中心点在于区分二类国家官员：一类是老的，由显贵和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组成，他们是最高法院（Cours souverains）和各地区法院（Parlements）的成员；一类是新的，他们是特派员（Commissaire）和行政法院法官（Conseillers d'Etat），还有的担任总督（intendants）和行政法院审查官（maîtres de requêtes）。戈德曼看见“在17世纪的前半期，尤其是从1620至1650年”后者将取代前者。^[314]戈德曼分析了这个新体制的动力源于君主制“在1598年亨利四世登上宝座之后重新获取社会基础”的企图，^[315]这种基础在宗教战争中已经失落。

既然官员们在宗教战争中对君主制帮助极大，他们便期待他们的权力和重要性将会上升而不是下降，他们因官职税（Paulette）^[316]和特派

员（Commissaires）的兴起而极感不快。官员与特派员

（Commissaires）的关系日渐紧张。大约在1637~1638年达到极点。戈德曼将在官员中兴起的詹森教徒（Jansenism）与此联系起来，这种意识形态主张“世界从本质上说来是虚无的，只有在孤独与退隐中才能获救。”^[317]

在戈德曼对君主制的勾画与波尔什涅夫接近时，他对资产阶级的勾画与穆斯纳更接近，后者声称“对将17世纪说成是一个‘封建的’时代的说法极为反感，既然这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已然深深地扎根和渗透国家的时代”^[318]——是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城镇。专利权并非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突破口。而是“它在这个阶段一个发展条件。”^[319]但是穆斯纳对官员与贵族已然同化的说法极为愤慨。他以一种真正的贵族式的炫耀进行反击。

一个官员的某些重要的方面在司法上接近一个贵族。一个贵族，而不是一个绅士或一个领主（unféodal）。波尔什涅夫从未做过区分。我们难道会将威尼斯贵族、那些大商人称为封建团体？在法国，公众坚持进行区分。一个因官职而被封为贵族的官员，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人们悲痛这样的事实，即那些真正的绅士式的贵族不为国家所用，而公共官职竟然成了那些被戏谑地称为“笔墨绅士”（gentlemen of pen and ink）的人们的特权。资产阶级不论是官员或是特派员（Commissaire），就算他位居百合花徽（fleur de lys）上，身穿显贵紫袍，就算他头顶骑士、男爵封号，身为议院议长或是皇家议事会成员，他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320]

穆斯纳由否定他或是佩奇斯曾经认为资产阶级控制了君主制的观点得出结论。“在重建国家时，正是君主制降服了所有的阶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君主制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帮助……”^[321]

注意到在这场争论中大量的问题已经搅和在一起非常重要。一个是体制的本质；另一个是阶级之间关系的本质；第三个是君主制的地位。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解释了，考虑到这时期的农业生产（向市场方向转化的现金收成，即使是基于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劳动之上），我们为何相信“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是混乱的，无助于分析。坚持法国在这时期

最早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管怎么样，并不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运用了物质性的政治权力。显然没有。在东欧，贵族们是资本主义农场主，而那些土生土长的商业资产阶级则正趋于死亡。它也不意味着在这个世界经济中，法国君主扮演的是反对别国的角色。萨尔蒙（J.H.M.Salmon）评论道，“就像围绕英国的乡绅与贵族进行讨论一样，这场讨论（对17世纪早期的法国）关系到早期现代社会与政府的特征。”[\[322\]](#)精辟！

穆斯纳或许比波尔什涅夫更正确地将君主制视为这样一种体制，即它远非清楚地对形势起支配作用，而是竭力争取维护它在政治上的卓越性，即使在法国亦是如此。但波尔什涅夫比穆斯纳更正确地看到法国明显不同于英国的一个发展方面是旧贵族的法国在政治上的相对成功，法国旧贵族的眼前利益并没有使法国具有从世界经济的劳力分配中最大限度地获利的长远能力。

现在让我们转向“漫长的”16世纪临近的“危机”，并准确地看看它给法国的政治领域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从1600~1610年法国价格下跌这个事实开始，事实上，它在经济意义上深受法国及其资产阶级的欢迎。[\[323\]](#)甚至波尔什涅夫也承认，没有必要讨论工业资本家在法国不具有重要地位。他承认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其道路上继续发展，但是步履稍缓。”[\[324\]](#)

问题主要在对外贸易中，对外贸易对于民族经济的重要性在前面我们讨论英国对商业危机的反应时曾经讨论过。尽管1600~1610间的法国补偿了因宗教战争所造成的损失，然而，1610年之后，又一次大衰落出现在法国，这一次主要因荷兰人、一定程度上英国人竞争的结果。使荷兰人、甚至英国人能够在这时期操纵法国价格的，在订立分配世界市场的契约时，是积累起来的工业资本的优势，而且50~60年之前的技术是关键性的：

就所有重要的指数而言，法国落在了它的竞争者之后。法国工厂中的劳动力处于较低的水平，技术工人的短缺不允许企业家设立一种适当的工资水平等级。国家补贴在那时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偶尔的、零星的，而且数量较小，这样，资金积累规模较小；法国被排拒在直接的殖民掠夺之外，而这些殖民掠夺滋养了荷兰和西班牙的野蛮积累，也滋养了英国的工业。

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法国工业品的相对昂贵。结果，法国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不能在国内市场上与荷兰和英国人进行成功的竞争。被迫以别的方式进行投资……法国的造船业和航海，因而法国的海上贸易也落后于英国人和荷兰人，在技术上和经济上……

因为这一切，法国的资产阶级的确非常关心增加保护，而法国政府亦尽力在这方面满足他们的需要。[\[325\]](#)

这样，这种情况就使法国在一种中间层次上进入世界经济。在法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西班牙和德国的市场时，英国人和荷兰人也能开拓法国和西班牙的市场。[\[326\]](#)

法国的国家机器与英国和联合省比较起来相对的强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会在对付这种困境时发挥较好的作用。如果当时的法国君主们毫无保留致力于工业的发展和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毫无疑问，法国很有可能会超过另外两个国家实际上并非过于雄厚的优势。他们的对外入侵并非总是会使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商业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实际上，内夫（Nef）没有将英国成功的秘密归因于王室意图的差异上，而是归因于这种事实：即法国在干涉资产阶级企业时具有较高的效率。[\[327\]](#)当此同时内夫认为：英国在这时期相对游离于欧洲战争之外意味着在英国比法国较少强调“皇家当局服从的习惯”。[\[328\]](#)得到那些免税贵族支持的法国君主们的征税能力不仅意味着大众的负担更重，而且资产阶级的负担也更重。

最后，我们不能忽略在世界经济中如1610年时已有的地位与未来的地位之间的联系。法国人在国内市场上与荷兰人和英国人进行竞争中的困难，促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产品的生产上，这些产品他们有历

史优势，比其他欧洲国家有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奢侈品；尤其是丝织产品方面。^[329]但是，面向广阔市场的廉价产品将在长时期的积累中为工业发展打下基础。

三十年战争给法国造成极大的压力。随着军费的膨胀、军队的扩充，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亦随之扩大；两者互为因果。征税程度一方面直接由国家决定，另一方面是在事实上依靠军队在农村的掠夺（*de facto*）。^[330]我们已经提到过战争对波罗的海地区谷物价格的影响，因而也是整个食物价格的影响。这一切又因流行于1628~1633年之间，尤其是1630~1631年的大瘟疫大大地加重了。或是歉收导致了疾病的扩散，或是疾病导致了谷物的短缺，这两者同时发生，极为严重地打击了法国。^[331]

在做出这个分析后，便很容易理解在这时期的法国农民起义是那样的广泛，不仅是国家对起义农民的强制性的税收，而且由于那些贵族们的经济压榨，他们也很难从农民那里得到租金和其他收入。^[332]毫无疑问，这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同一地区的贵族和农民同时对君主制不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效忠的意识和相互的责任〔封建主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于”^[333]17世纪早期的法国，但是对此夸大是一个错误，正如某些人试图所为。可以肯定，不仅仅是今天的分析家，而且包括当时的农民也能看出，宗教战争之后，封建领主正如萨尔蒙（Salmon）所说，“不论是旧贵族或是新贵族，再不是农民苦难的伙伴，而是它的部分原因。”^[334]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毕竟恰恰是贵族的政治行为。^[335]同时，法国不完全的工业化也使这种不满从农村向城市扩散，这两个地区是由那些增加的人数联系起来的，这类人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来回流动，生存空间太小以致无法承受危机的加重。^[336]

芒德鲁（Robert Mandrou）对这个争论有贡献，他要求我们将1623

~1648年中，大众的起义置放在整个法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起义在更早和更晚些时候都发生过。他提醒我们，各种税收“应被视为极为恶化的经济形势的标志，而不应简单地视为农民起义唯一的或是最直接的原因。”^[337]芒德鲁极力主张我们回到一条最高成效的途径上去。他要求我们：

注意局部，注意地图上的位置：西部（诺曼底圭因（Guyenne））、中部（马尔凯（Marché）贝里（Berry）、布邦内斯（Bourbonnais））是最易受到那些麻烦的连锁反应影响和刺激的地区。在面对“漫长的16世纪”中出现的灾变，这些省份大规模参与的后果中，我们难道看不见：1620~1680年的衰落导致了这些地方比那些更具大陆性的更不发达（fruste）的地区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不景气吗？但是，这些17世纪动乱的农村和城市地区难道不也是那些在从前的世纪宗教战争时战况激烈的省份？^[338]

这的确是一条珍贵的线索，也与我们整个的假设非常接近，而且，穆斯纳和波尔什涅夫也同意。穆斯纳说：

每种对起义的研究都不能与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分离。为什么农村的起义主要发生在西部、中部和西南部？难道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在那里的发展程度对城市进行归类，考察一下它与起义中的某些常数是否有关？^[339]

波尔什涅夫指出，1623~1648年的起义已经在16世纪的三个序列中发出了先声。前面两个序列是1520~1550年，与宗教改革有联系，1570~1590年；在这期间，大众的运动“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宣称自己是同志的天主教同盟身上。”然后是从1590~1600年，是最后一次浪潮，它现在已经变成了非宗教形式。^[340]的确，波尔什涅夫进一步证明，对宗教战争普遍的厌恶导致了权威的世俗化，它反过来说明了在17世纪早期极需重新肯定国家权威的原因。^[341]

波尔什涅夫的这个论断，在宗教运动的含意及其在早期现代欧洲的渊源，以及他们与维护民族统一体及与此相反的宗教离心力量的关系上，再次引发了一些疑问。我们早已谈论过科尼斯堡格

（Koénigsberger）将胡格诺派视为法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观点。^[342]在理

性思维的王国范围之内可以肯定，胡格诺派很有可能在法国的南部和西部得到了加强，这类似于加尔文主义者在尼德兰的北部得到加强一样，它也有可能导致发生在尼德兰那样的分立。在当时，这肯定是一种忧虑。^[343]在这样一种观察框架中，就不会对胡格诺派有时会向天主教的西班牙寻求帮助感到惊讶。然而，胡格诺教派的肃清只是在部分地区，这就为法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留下了隐患。^[344]穆斯纳指出，官职的可以购买在1620年之后起到了收买加尔文主义骨干的作用。^[345]

地方主义比宗教分裂更严重，在南部法国已是胡格诺堡垒的奥西塔尼亚（老西部）（Occitania of Old）脱离过程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埃斯皮优克斯（Henri Espieux）说宗教改革找到了它的堡垒“一是在奥西塔尼亚，一是在6世纪时古代罗马高卢（Gaul）地区的边缘，当此同时，天主教基本上是在北方……”^[346]但是，他解释说，当纳瓦尔的亨利成了“对奥西塔尼亚人的目标不利的国王，‘继而’又单独妥协时，奥西塔尼亚对同盟（league（ligeuse））同情起来——这是留下的寻求其差别的唯一方式……”^[347]最终，埃斯皮优克斯认为，奥西塔尼亚人以同样的“非国教主义者精神”接受了詹森教派（Jansenism），“这是一桩对维持他们的反叛态度（humeur frondeuse）有利的事。”^[348]埃斯皮优克斯将这种反叛视为奥西塔尼亚人抵制法国统一的方式，它曾在16世纪向奥西塔尼亚征税；反抗因奥西塔尼亚承受的财政负担得以发生和加强，这种负担因在“第二个16世纪”马赛（Marseilles）和波尔多（Bordeaux）的经济衰落变得更加令人讨厌，衰落不仅仅与巴黎有关；而且与巴塞罗那（Barceona）和热那亚有关——这一切使奥西塔尼亚成为最底层的垫脚石。^[349]

波尔什涅夫关于1639年诺曼底起义的描述记载了类似的主体。如他所追溯的历史；14、15世纪诺曼底的农民承担比法国任何地方的农民都要沉重的封建负担。因为这个事实，也因为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的破坏，农民逃亡，产生了严重的劳力短缺，这就导致了建立在

对农民有利的条件之上的长久的地租相对急速的衰落。价格革命以及法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崛起，使农民受挫——租金更高、地方更小，部分回到自然经济，简言之，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350]一时间，当英国的约曼（yeoman）正从可耕地的圈占中获取利益时，他的诺曼兄弟正在遭受损失。至于资产阶级，波尔什涅夫谈到不同的两个部分：地方行政官与地方利益联系在一起，参与起义；金融家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因而倾向于扶植地方贵族。^[351]起义可以看作是对中央的政治的不满，中央政府正在剥夺诺曼的农民业主（和当地资产阶级）参与新的世界经济的利益。

在西部，如像在奥西塔尼亚，君主制被视为正在追求法国的“民族的”前途，这会导致经济上的退步。凭借传统，外省正在要求更大而不是更小的经济进步。^[352]继1639年诺曼底起义之后，布列塔尼（Bretagne）、朗格多克（Languedoc）以及普瓦图（Poitou），这些省相继起义绝非偶然。^[353]它也不是偶然的，诺曼底起义的直接背景是君主不愿减轻1632~1633年瘟疫之后，身处经济困难中的诺曼底的税收负担，因为“陛下沉重的支出负担使他不可能缓解他的人民，即使他愿意。”^[354]他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正在把钱花在为法国创立一个民族统一体上。

设想一下——一种伟大的历史游戏——法国本是一个外形不同的地理整体，只包括法国的北部和西部，以鲁昂（Rouen）作为首都。设想一下，奥西塔尼亚自13世纪起，一直就是一个分离出去的国家。如果知道中央政权的民族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彼此并不矛盾，法国就不会是这样一副支离破碎的模样吗？如果像英国那样——通过创立工业基础而响应形成中的世界经济，法国在表面上就不是如此软弱吗？或许。

但是，这样一个法国并不存在。存在的法国如我们所说，非驴非马，被宗教——地区性的冲突搞得四分五裂。在16世纪的欧洲试图建立

单一的宗教国家就像在20世纪的非洲建立一党制国家那样不容易，为了同样的理由，都需要与分裂势力作斗争，但是代价是沉重的。对法国而言，主要以这样的条件——“领主制反动”（*réaction seigneuriale*）及资产阶级的“封建化”（*féodulisation*）与贵族达成妥协。17世纪避免了内战的，只有“投石党运动”（*Fronde*）。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789年，在另一个时代，为另一个目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太晚了些。在17世纪，当权的资产阶级、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自知不能提供过多的奢侈品以此追求其狭隘的利益，既然它这样做会威胁国家的统一，因而也会威胁它这个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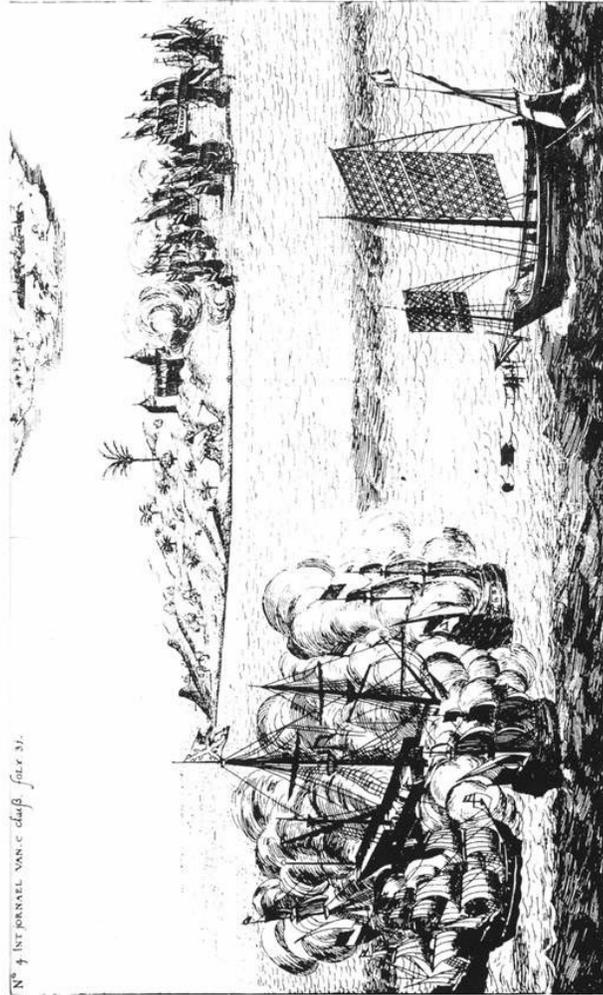
英国、法国君主的不同地位（是地位不是目的）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对此进行观察的一个方式是，将政治斗争限定为，该时代的君主试图侵蚀所有非国家集团的特权，正如库珀（*Cooper*）所看到的，他们在反对城镇阶级（当然包括部分资产阶级）方面要比反对土地阶级更加成功。^[355]布罗代尔（*Braudel*）谈到过城镇被君主“控制”或是“约束”住了。^[356]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阶级正在利用国家去帮助他们避免经济扩张激流的冲击。这样看来，投石党人（*Frondeurs*）虽然他们暂时失利，最终却胜利了，反之，英国的贵族虽然有所谓的复辟（*Restoration*），但最终也失败了。最后，布罗代尔认为，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是伦敦的霸权，“在1688年和平革命之后；它将英国按自己的要求（*à sa guise*）建构起来。”^[357]

在资产阶级的要求和贵族要求的摇摆之中，英、法两国的君主都更趋近贵族的要求。不同之处在于，在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强大的中央政府联系在一起，而在法国，某种程度上，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边缘地区联系在一起。这种差别是在欧洲世界经济的网络中地理条件不同的结果。

一个结果是，为了从根本上控制桀骜不驯的资产阶级，法国君主一

方面加强自己，同时售以官职收买资产阶级，这就渐渐地转移了他们对工业投资的兴趣。在英国，为了生存的贵族不得不寻找与资产阶级不太公平的融合途径。法国，正好相反，这种紧迫感落在了为了生存的资产阶级身上。在法国和英国，中央政府都赢得了民族统一的胜利，但是在英国，这意味着民族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而在法国，对资产阶级而言，这是一种退步。

英国内战最终在它可能发生的时刻发生了。在以后的150年间，土地阶级的复兴在各地声势浩大，甚至在英国亦是如此。但是，资产阶级至少赢得了公民权（*droit de cité*）。而且，土地阶级的贵族色彩越来越淡，乡绅味越来越浓，最终成为地道的资产阶级人物（*bons bourgeois*）在法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太弱小，以致不能产生一个克伦威尔。直到1789年，他们才发现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并不矛盾，正如国家这时的发现一样。但是，到这个时候，世界经济体系已然形成，对法国而言，要在这个体系内充任主角已经太迟了。



第六章插图“（荷兰）舰队驶离莫桑比克（**Mozambique**），在果阿（**Coa**）附近俘获一艘（葡萄牙人的）大型帆船”

一本（出版于1651年的）杂志插图。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荷兰）舰队从莫桑比克（**Mozambique**）出发，并在果阿（**Goa**）附近捕获了一艘（葡萄牙的）大帆船，”摘自“波米兰的克莱松（**Corneilis Claezoon of Purmerent**）的东印度航海观察日志（**Uournal of Observation of an East Indian Voyage**），他是万丹（**Bantam**）船的舵手，为联合公司（**United Company**）的巨头作航行服务，”1651年出版。

[1] Domenico Sella, "European Industries, 1500~170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5, 1970.5.罗曼诺 (Ruggiero Romano) 断言, 16世纪几乎没有“真正的工业”, 只有“必要的纺织产品、冶矿业以及航海船舶制造业。所有别的生产性活动本质上都建立在个体手工劳动基础之上。” *Revista Norica Italiana*, LXXIV, p.500.

[2] Sella,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5, p.64.

[3] “产品明显下降, 工业企业规模缩小, 工业重要性相对降低……在欧洲大部分地区, 帝国与西班牙人的领地内, 包括弗朗什-孔泰 (Franche-Comté) 和南部尼德兰——所有的版图曾经在名义上都属查理五世统治……” John U. Net, *War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orton, 1963) 6.内夫 (Nef) 对前哈布斯堡帝国的各部分都在6~7页上给出衰落日期。

[4] *Ibid.*, p.6.

[5] Sella,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5, p.65.

[6] *Ibid.*, p.66. See Heato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pp.314~319.赫克谢尔 (Eli F. Heckscher) 在他所谓的“中世纪经济的成熟期”, 即1520与1600年之间, 勾勒了一幅瑞典 (Sweden) 的图画, 倾向于肯定塞拉 (Sella) 所说的: “16世纪瑞典经济的显著之点, 不是在程度上有一个变化, 而是变化来得太迟。在该时期, 瑞典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水平。正如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离群索居一样, 该国仍然在向后看, 而不是向前看。政府所做的努力是如此微不足道, 以致无论是统治者或是纳税者都没有被自然经济的继续存在所妨碍。既然政府在海外没有实质性的付出, 它就没有通过出口获取外国通货的需要。人们的生活方式普遍没有变化, 以致除了盐以外, 进口贸易几乎无人问津。”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4), 77~78. 莫罗 (Francois Mauro) 坚持注意关键性的工业现象以解释英国和荷兰的领先地位: “是……采矿和冶金工业在商业革命中起作用, 类似于钢铁工业在当代第三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商业阶级相伴的是工业主义者阶级的出现。英国和荷兰的伟大财富是两者都有: 相互帮助, 一个供应机器, 另一个为工人大众供应消费品。安特卫普—列日 (Liege) —洪德斯库特 (Hondschoote): 即是比利时人成功的三角区。伦敦—纽卡斯尔 (Newcastle), 那是伊丽莎白统治之下英国前工业革命的轴心。”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pp.298~299.

[7] Posta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233.然而, 在别的地方, 波斯坦 (Postan) 在看待中世纪英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时, 很不愿意将之视为像20世纪, 随着殖民统治者的被驱逐, 殖民主义者的技术与资本输入循环。他认为, 不同点在于英国的增长是逐渐的, 它的原因最初在人口扩张和其他国内因素中发现, 或许综合了一点借贷和外国投资。他进一步说, 当民族经济的盈亏大致持平时, 意大利人的统治是相当次要和相对不重要的。的确, 完全有可能, 意大利人的影响最深的地方不是他们的直接投资, 也不是他们的高技术的传导, 而在于他们帮助国王调整国家的经济生活。从前从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土地劳动者阶级榨取大量财富

的皇家税收和皇家财政流入了商人、金融家、军队承包商及战争牟利者之手。这样，一部分本来应被囤积起来的国家财富得以被商业和工业利用。”“Ital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 4, Fall 1951, 345.

[8] Jonh U.Nef.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 (Ithaca: Great Seal Books, 1957), 1.

[9] “通观早期中世纪，尤其是13世纪，英国是一个食物包括谷物的出口者。以后，另一个更重要的谷物来源出现了。作为在易北河（Elbe）那边斯拉夫土地的德意志殖民化的结果，巨大的新的农业资源被开发了，并且，从13世纪来以后，东部德国和波兰的裸麦开始涌入西部。到14世纪初，波罗的海谷物开始为佛兰德（Flemish）提供食物，而且到这时，英国谷物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市场上出现。”Posta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121.

参看迈尔斯（A.R.Myers）：“直到16世纪，英国的出口，除了布以外，大部分由原料构成——金属、小麦和别的粮食、羊毛以及皮革——到14世纪，英国的这些出口品，尤其是小麦，面临东部德意志新的殖民地日益增加的强有力的竞争。” *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Volume IV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2) .57.

[10] See F.J.Fisher,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I, pp.197~207.

[11] See M.M.Posta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of England and the Hanse (1400 to 1475)” in Eileen E.Power and M.M.Postan, 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esp.139~141.参见格拉斯（N.S.B.Gras）：“在都铎（Tudor）时期，有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伦敦打破了早期不依赖外国谷物的状况……伦敦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需求，这反过来又导致发展有组织的进口贸易……当认识到16世纪谷物出口总的来说是增加时，这一切就更有趣了。”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Press, 1915), 101~102. See Marian Malowist, “Histoire Sociale: époque contemporain” in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I.Rapports*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0), 310.

但是参看迪伦（Van Dillen）：“（在17世纪）英国是自给自足的，但在尼德兰却不是。这就是为何最初出口的谷物命中注定主要是给尼德兰的。”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p.134. See also Alan Everitt in *Agrarian History*, IV, pp.524~527.

[12] G.N.Clark, *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 (London: Oxford Univ.Press, 1946), 27~28.但是挪威也向苏格兰、丹麦和尼德兰出口初级产品，这减少了它对英国的依赖性。 See Lythe, *The Economic of Scotland*, p.147.

[13] “都铎时期通过平定在威尔士边区（Marches）的骚乱，威尔士（Wales）行政管理的变化有利于牲口贸易的发展。”Carolime Skeel, “The Cattle Trade Between Wales and England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the Ser., IX, 1926, 138.

[14] Eileen E.Power, "The Wool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Eileen E.Power and M.M.Postan, eds., *Studies in the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39.

[15] Myers, *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 p.132.

[16] See P.J.Bowden, *The Wood Trade in Tudor & Stuart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1962), pp.203~212.

[17] See Posta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244. See Ramsey,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p.101.

[18] "12世纪晚期, 由于水力代替了以前一直用手或脚的人力, 漂洗机得到了广泛而快速的应用。以流水推动漂流机在科茨沃德 (Cotswold)、奔宁山区 (Pennines) 以及湖区 (Lake District) 发现, 到14世纪开始, 织布工业已然移到这些地区。绒布, 尤其是在东盎格利亚 (Anglia) 制造的绒布, 不需要漂洗, 所以不是太依赖水力, 但甚至绒布制造业也因城市手工业价严的政策而转向村庄, 他们保持产品价格的企图加速了他们的衰微, 因为无组织的村庄织布工人愿意拿低工资.....这样,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织布工业的发展主要得力于这种技术和组织的进步, 而不是 (像有时断言的那样) 爱德华三世 (Edward III) 对佛莱米 (Flemish) 织工定居英国的邀请。" Myers,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 p.56.

[19] M.Malowi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p.178.

[20] "13世纪织布工业在其一向繁荣的城市中心的衰落就像在同一时期它在农村地区扩展一样明显, 但是迄今为止吸引历史学家注意的是城市这一边, 他们据此错误地推断织布工业总的衰落。" E.M.Carus-Wilson,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 1941, 59. 参见米勒 (Edward Miller): " (英国纺织工业的) 产品在被许多学者视为经济萎缩期的14世纪快速增长。" "The Fortunes of the English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1, Aug., 1965, 39~60.

[21] Malowist, *Economic History*, p.179. 参看波斯坦 (Postan): "只要英国的出口以羊毛为主, 对英国商人而言, 就没有必要远离故土去寻找市场和顾客。羊毛是一种工业原材料。它的主顾是外国的织布制造者; 而且仅有的织布业中心不仅高度集中, 而且近在咫尺, 主要在低地国家。另一方面, 加工好的布料必须出售给潜在的主顾, 主要在潜在的消费中心, 换句话说, 出售给欧洲大陆及大陆以外的男人和女人们。"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245.

[22] Postan, in Power and Postan, 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103; cf. Clark, *Wealth of England*, pp.39~40.

[23] See Alwyn A.Ruddock, *Italian Merchants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 (Southampton, University College, 1951), passim.

[24] See Jacques Heers, "Les Génois en Angleterre: La crise de 1458~1466," i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ì* (Milano: Istituto Edit.Cisalpino, 1957) .II, 812, 824.

[25] See Postan,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101.

[26] “15世纪羊毛与织布贸易之间显著的区别是由每一种商品都要出售这一条件决定的。除了意大利人的装运外，羊毛被英国人在加来（Calais），一个英国人拥有、被政府公开保护的商业中心卖给大陆上的买者。相比之下，外国人在大陆上出售的织布与英国人一样广泛，市场遍布从欧洲西海岸、普鲁士到意大利。这种展开和不设防的市场区域比起在加来的集中的、受保护的羊毛市场及其与意大利人的其他辅助性的贸易更易受到打扰。英国人更大的织布市场是波罗的海地区，尤其是普鲁士、波兰、低地国家及下莱茵（Lower Rhine）地区，最后是法国北部和吉恩（Guienne）。在1448~1476年期间，不仅吉恩人（Guienne）输给了英国，而且，由于政治上的纠纷，波罗的海及低地国家的市场亦动荡不宁。所以，在估计织布贸易衰落的原因时应注意三个市场地区的状况。”H.L.Gray, “English Foreign Trade from 1446 to 1482” in Eileen E.Power & M.M.Postan, 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25.

[27] “到15世纪中期，英国的织布商被所有较远的出口点所排拒。斯堪的纳维亚市场在该世纪初即已失去。与普鲁士的联系，以及通过普鲁士与整个中部及东部欧洲的联系最终也由于英国—汉萨同盟（Anglo-Hanseatic）之间在30和50年代连续的争斗而中止。英国贸易在尼德兰的集中，英国的半成品布料加工业的专门化，公司及商人冒险家协会的兴起——所有这一切中世纪末期英国贸易熟悉的特征都可追溯到百年战争结束后中古英帝国的崩溃那里去。”

Post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942, 3. See also Postan in Power & Postan, 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p.153.

“但是毫无疑问是英国人把持了这个时期安特卫普‘各民族商人（na-tions）’中的地方价格，而且对安特卫普作为英国织布‘商城’的选择仅仅次于香料贸易中心的建立，这就是为什么全欧的商人们麇集此地的原因。在面对阻挠的情况下，英国的织布贸易通过斗争在15世纪的尼德兰获得贸易中心地位。这种可得到丰厚报偿的固执是一种由必须而产生的勇气。他们如不在欧洲海岸立足就是一种失败。正是这种勇气驱使那么多的英国商人去尼德兰碰运气。关于那种认为英国与安特卫普织布贸易的兴起就像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 Company）的兴起那样，总体来看，不是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是收缩的观点争论很多。”S.T.Bindoff,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pp.53~54.

[28] S.T.Bindoff, *Tudor England*, Vol.V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0), 20.

[29] Bindoff,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p.54.

[30] “就国际贸易或国际交易而言，装、卸、运输、法律程序和税收加起来的费用仅仅是成本费用的小一部分。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事实。这种西部的商业在15世纪，比实行一种远要沉重得多的税收政策的热那亚要更为有利。在任何情况下一定的商业技术（运输或相应的操作）

其进步之快的程度足以允许相对的低价。无论是像英国织布那样昂贵的货物或像明矾这样廉价的产品，成本都不高：一种更为现代的经济的标志.....”

“信贷条件也非常重要。在伦敦，无须繁琐的手续，也无须或多或少的秘密关系即可轻易得到贷款。”Heers,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p.832.

[31] “英国的海外贸易.....由单一的产品交换构成，织布——对于该时代而言，的确是大规模工业化的结果，酿成一场伟大的农业革命和整个内在经济模式的变迁——反过来，英国的大量商品连同满足文明而又爱好奢侈的中上层阶级需要的各种工业成品，皆受此种风气影响不能生产。英国为北欧农民提供了服装，反过来，吸引了大量欧洲技术设计的产品，主要由欧洲的海运商人从东部和南部输入。贸易的平衡完全取决于欧洲操纵、运输及购买英国无限量供应的织布的能力。” Lawrence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p.32.

[32] See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p. 44~45.赫克谢尔（Eli F.Heckscher）谈到，英国早在12世纪后半期亨利二世（Henry II）统治时就有了统一的币制，而法国则在1262年才有。Mercantilism, I, p.119.

[33] 例如，布洛赫（Marc Bloch）说过：“〔威廉（William）的征服〕恰好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即整个西方的经济及知识状况处于开始赞同反对分裂斗争的过渡时期。这种由于成功的战争产生的君主制度几乎从一开始就有意义，它似乎在早期就能支配全体受教育的成员和官僚机构.....虽然〔不应读为因为？〕在某些方面国家并非完全封建化，但是封建主义最终会增加国王的威望。在这个每一片土地能出租的国家，国王名义上是一切领主的领主。没有什么地方实行井井有条的军事采邑制。” *Feudal Society*, pp.429~430.

[34] 例如，赫克谢尔（Heckscher）说：“〔在中世纪难于产生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两个主要因素之一是当时的交通工具，尤其是陆路交通工具状况，在原始的技术条件下，它比内陆水路或是沿海的交通有更大的困难，当时尚未产生交通的伟大发明。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由于有显而易见的漫长的海岸线（就其陆地区域而言），就比大陆国家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政治上的统一，而在这些大陆国家中，又没有哪一个比德国更加糟糕了。” *Mercantilism*, I, p.36.see Clark, *The Wealth of England*, pp.4~5, 44~45.

[35] G.R.Eiton,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3) .4.

[36] “英国的不同地区（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同的城市）在.....14和15世纪有其不同的经济史，就像19世纪欧洲不同民族的经济史千差万别一样.....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的出现本身就能起到强的协调作用。” Dobb, *Studies*, p.21.

[37] Elton, *Tudor Revolution*, p.415.埃尔顿也认为“基本的改变是从教会或国王家务服务训练的官僚转为在大臣家中训练官僚，以便此后受雇为国家服务的变化（p.308）。”

[38] See Penry Williams and G.L.Harriss,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Past & Present*,

25, July 1963, 3~58; G.R.Elton, "The Tudor Revolution: A Reply," *Past & Present*, 29, Dec.1964, 26~49; G.L.Harriss and Penry Williams,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Past & Present*, 31, July 1965, 87~96; G.R.Elton,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Past & Present*, 32, Dec.1965, 103~109.

[39]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28.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比埃尔顿(Elton)那些有点极端的说法更有道理一些。埃尔顿说:"1530年代的改革,政府的官僚化,在取得那种标志现代政府的连续性方面是成功的,它甚至在内战时期阻止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 *Tudor Revolution* .p.417.

[40] Hill, *ibid.*, p.25.

[41] "16世纪,英国的城镇已开始并为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这并不与大陆国家同步.....伦敦有意义的扩张,以及它作为一个凝聚力量增长的地位,可以追溯到改革之后的时代.....由于法律、社会秩序、内部政策的设立,在威尔士和北方私人战争的结束,特权区(franchise)的消除以及缓慢的交通的改善,来自城市的商人逐渐打破了地方联合体的特权。同时,在财力上得到伦敦支持的新教牧师致力于将王国愚昧的角落带入为首都所接受的对宗教的真正理解之中。"Hill, *ibid.*, pp.25~27.

赫克谢尔(Heckscher)也强调与大陆相比伦敦的例外地位:"建立一个统一的捐税制度在任何国家相对说来都不如在英国那么容易,主要有两点因素。首先,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英国的君主制是统一的和连贯的,其次,是其海上运输至为重要,这使得它的陆路和水路比起像德国和法国那样在地理上是密集的板块的国家来远非那么重要....."

"英国占据了独一无二的有利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陆路、河道税的非重要性,也能够发展一种民族的海关税制,完全不依靠市政税制,并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关税既不被大量的免税人所减少,也没有被正式承包....."

"况且,它具有这样的特点,不仅掌握在政府之手,而且在外国和国内贸易之间显示了一种早熟的特质。" *Mercautillism*pp.46.51.52. See Gino Luzzatto, *L'età moderna* (Padova: CEDAM), p.14.

萨普利(Barry Supple)更为保守地阐述了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就生产和大多数消费品而言,我们还不能提到民族市场。但是地区的专业化和贸易已足以发展到产生一种会对商业性的骚扰极为敏感的平衡。" *Commercial Crisis* .p.3.关于伦敦市场刺激民族发展的增长,参看两篇文章。F.J.Fis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 in Carus-Wilson, ed., I, 135~51; "The Development of London as a Centr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in Carus-Wilson, ed., II, 197~207.

[42] "在由中世纪向现代过渡之际,与西欧及中欧的部分国家,包括西南德国相比,英国人在文化上相对落后;无论这种过渡时代是从15世纪末或是从更早的时候起,也不论这种比较是针对工业的、物质的文明或是非物质概念的知识成就及生活艺术方面。但是在接下来的世纪,这个英国共同体已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以致到它的末期,他们已与(或许值得怀疑)他们的大陆邻居比肩而立了。这种不列颠成就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两者都归因于岛国领土上高度的进

步，尽管大陆上的迟滞在17世纪比16世纪更显而易见.....”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拥有不同的优势，就企业而论，别的基督教世界正陷入毁灭性的战争，这对英国工业团体的发展是幸运的，而对可能成为他们的工业和商业上的对手们却是一种灾难。”Thorstein Veble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igan Ann Arbor Paperbacks, 1966), 92, 98.

[43] R.B.Wernham, “The British Question 1559~1569”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209.

[44] See *ibid.*, 212.

[45] *Ibid.*, 233.

[46] 参看赫斯特菲尔德 (Hurstfield) 对欧洲，包括英国的通论：“那么16世纪欧洲政府发现他们自己与承担的职责相比，资源相对薄弱.....〔他们〕面临一种形势，即中等阶级不能，也不可能分担民族政府主要的负担。但是如果中等阶级自身互不合作，那么君主们与中等阶级的关系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一系列广泛的企图.....遍及欧洲的巧立名目的税收；视现存的商业和工业化过程作为国库收入的来源。它们必然会导致经济畸形。而且，它的规模很大。最好的现象是官职的广泛出售。”J.Hurstfield,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139~140.

但是参看希尔 (Christopher Hill) 对英国的评论：“都铎的和平，以及在英国一支坚强的军队的不存在，意味着税收比起大陆的标准来相对要轻.....税收数目不多反过来成了未能建立法国那样相对强大的官僚机构失败的原因。”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01.

[47] “恢复王室权力的基本事实是王室财富的恢复，为了在王国中成为最有权力的人，国王必须是最富有的。事实上，这在15世纪末，意味着他不得不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Elton, *Tudor Revolution*, p.25.

[48] “专制主义时期是由修道院的解散开始的，它从经济上使统治阶级重新浮起，并通过资助新的家族补充新生力量。在此之前，土地主一直试图通过圈地和提高租金重建他们的经济权力，但是这种措施激起农民的不满，必然使得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政治上致力于加强土地主的经济和社会权力。然而，这却导致了绝对君主陷入了两难境地，它从未解决，并因此倒台。如果它给土地主以自由，它会面临可能推翻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如果它限制土地主，保护农民，它就会面临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可能威胁君主的反抗。” Brian Manning, “The Nobles, the People, and the Constitution,” *Past & Present*, 9, Apr.1956, 48.

[49] See Gordon Batho “Land Lords in England.A.The Crown,” in the *Arg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 ed., IV: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273.

[50] G.E.Aylmer, *The King is Serva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Press, 1961), 7.

[51] J.H.Hexter,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udor England,"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3), 117~162.

[52] Spooner, *New Co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15.斯通 (Lawrence Stone) 说: "从1540年起存在一个大起大落的繁荣、暴跌循环期, 直到1553年以财政崩溃告结束。" "State Control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1, 1947, 106.

[53] Christopher Hill, "Som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Henrician Revolution" in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Schockon Books, 1958), 44.布洛赫肯定"修道院的解散 (1536~1539) 加速了阶级的融合。国王奉送或是出售的部分最多。所有的阶级、贵族、乡绅 (他们中的很多人作为管理人为僧侣服务或是耕种自己的土地), (伦敦的商人团体) 都是受益者。" *Seigneurie francaise*, p.122.

[54] See Clark, *Wealth of England*, pp.64~65.斯通认为, 另外, 家族的突发事件导致了贵族出售相当多的土地。Se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abr.ed. (London: Oxford Univ.Press, 1967) 76~88.

[55] R.H.Tawney, "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 in E.M.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Martin's, 1965), I, 202.

[56] 这是批评托尼 (Tawney) 最严厉的论点, 库柏 (J.P.Cooper) 认为, 许多贵族拥有中等规模的庄园, 许多俗人 (Laymen) 有10个以上的庄园。See "The Counting of Mano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ser., VIII., 1958, 381~383.

[57]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189.

[58] "一个人不能在没有误解的情况下, 认为现代社会的开始有其严格的'阶级'概念, 尤其是当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划分的三段论法来定义阶级概念时。在某些时候, 工资劳动者可能反对他的师傅, 然后, 他们也可能反过来与雇主联合反对商业资本或是政府的压迫。有时农民会揭竿而起, 同时也有可能反对国王削弱他们的领主的权力的政策, 也反对贵族增加封建税收的企图。总的看来, 农村的水平而言, 农民从未成功地建立一个团结的整体; 相反, 人们常会发现城市居民是他们的压迫者。每一个人都属于几个社会团体: 他的家庭、他的行会 (corps de metier)、他的城镇或是乡村, 他的郡——16世纪被称为'乡村' (Country) ——现代意义上的农村, 以及他的经济阶级。毫无疑问, 大多数人常常认为自己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联合体中的一员。一个人宁愿说'诺福克' (Norfolk) 的织布工人而不愿笼统地说织布工人或是诺福克人。个人给自己定义的社会成员或是忠诚的概念, 很简单, 取决于其时的社会环境。要想知道什么是一个人的'原则性'的忠诚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不仅仅是因为资料难于评价, 也因为这类抉择极少从理论上而是根据相对的特定的环境做出的。" C.S.L.Davies, "Les révoltes populaires en Angleterre (1500~1700)" *Annales E.S.C.* 24, I,

jam-fevr.1969, 59~60.戴维斯（Davies）谈到的社会隶属的自我指派的模式和复杂性当然是事实，但纯属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模式。马克思同样精确地考虑到这一点。然而戴维斯的看法在提醒我们注意在这时期许多阶级成员是地区的而不是民族的，这一点上是有用的。

[59]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p.195.

[60] Lawrence Stone, “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1 & 2, 1948, 3~4.

[61] *Ibid.*, p.15.

[62] *Ibid.*, pp.37~38.参看托尼：“综合性的材料几乎还没有收集到一起；但谈论许多贵族家庭——尽管不是单一的——在百年战争之前的两代中所遭遇的财政危机或许不是一种夸张。”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p.181.

[63] Lawrence Stone, “The Nobility in Business, 1540~1640”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X, 2.Dec.1957, 61.

[64] *Ibid.*, p.60.

[65] See H.R.Trevor-Roper,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An Anatomy Anatomiz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I, 3, 1951, 279~298.并回答说：“但是特雷弗-罗珀先生在指责我夸大了1950年代危机长时期的严重性方面，可能是正确的。” Lawrence Stone,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A Restate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1, 2, &3, 1951~52, 311.在结尾部分斯通说：“〔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否定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处于全面的经济衰落似乎与证据有矛盾……〔p.320〕。” See also Cooper, *Encounter*, XI, p.388, Lawrence Stone, “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1, July 1958, 73, J.H.Hexter, “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2, Aug., 1958, 176.

[66] Trevor-Rop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pp.292~291.

[67] *Ibid.*, 291~292.P.J.鲍登（P.J.Bowden）对为什么衰落比某些假设的不那么严重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管怎么样，土地阶级也未必会遭受实际收入的损失。那种预定的假设，即地租是土地主唯一的收入来源，事实上并不真实。16、17世纪的土地主有种种收入。大多数土地贵族或许直接经营农业以维持家庭的支出，如果不是为了市场……

（cont.）”

“除了租金收入及直接的农业经营外，……对于绝大多数土地主，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木材。”“Agricultural Prices, Farm Profits and Rents”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 ed., IV: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675, 677.鲍登（Bowden）断言，因为有些租金是固定的，有些不是，实际的结果有两方面：“租金在范围两者之间（被放宽了）；”以及“贫瘠与肥沃土质的差别（被缩小了）。”

[68]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94.

[69] J. H. Hexter, “The Storm Over the Gentry” in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3), 133. 如果一个人要相信赫克斯特 (Hexter), 那么对此争论可能有两方面——托尼和特雷弗-罗珀——但是他, 赫克斯特, 有正确的观察, 两方争论者都是反对他自己的“辉格式解释” (Whig interpretation) 的“伪马克思主义者” (pseudo-maxians)。然而更为奇怪的是, 如果细心观察, 就会发现赫克斯特的论证事实上分成了三类——一个是亲托尼的 (“糟糕”的是与希尔一致), 第二个是亲特雷弗-罗珀的, 第三个与两者皆异。完全不能肯定这三者谁的分量最重。进一步说, 正如引证所表明的, 赫克斯特有时发明了一些非真实的不同。

[70] Hill,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pp.36~37.

[71] Coop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p.381. 赫克斯特也愿意区别有爵位贵族 (peerage) 和贵族阶层 (aristocracy), 将有爵位贵族 (peers) 更年轻的儿子们也算作“贵族阶层” (aristocrats) 而不是“乡绅”。*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127.

[72] F.J.Fisher,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Dark Age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a*, N.S., XXIV, 93, 1957, 17. 费希尔 (Fisher) 也提醒我们, 不管怎样, 分类的传统含意仍然不是社会重要地位的被剥夺 (bereff): “如果土地本身不足以成为通向社会天堂的护照, 绅士们也无能为力。乍一看, 16、17世纪的等级制度似乎并不对那些新兴者有利。如我所理解的, 至少在其最表面的现象, 这种体制基本上是生物学上的。它基于一条彩带之上; 尽管有关的颜色是血液的而不是皮肤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太取决于自己的物质, 而是取决于在他之前已然被区分的先辈的地位。先辈越遥远, 他那通过伊丽莎白时代的静脉的血液就越少, 他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地位就越高。16世纪最为动人的故事之一, 我认为, 是柏立 (Burleigh) 勋爵奋斗的故事——按任何标准看都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为了证明或许从不存在过的威尔士 (Wales) 的王侯血统, 即使存在, 或许也很难与他本地山头上那些羊群区别开来 (pp.13~14)。”

[73] Christopher Hill,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ivil War” in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8), 8.

[74] Julian Cornwall, “The Early Tudor Gent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ser., XVII, 3, 1965, 470. 他补充说: “他们事实上是土地所有者阶级, 远远胜过有爵位贵族 (peerage), 后者在该时期几乎没有了。”

[75] 托尼也偶尔讨论乡绅, 或许讨论更多的是那些地方上的乡绅, 他们“拥有不是根据法律确认而是通常评估的地位……”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174.

[76] *Ibid.*, p.197.

[77] *Ibid.*, p.174.

[78] Ibid., p.175.这种对荷兰形势的估计与一篇最近的博士论文有矛盾, 这篇论文简要的结论已经发表, 它认为, 该时代荷兰经济每一片农民土地都是重要的, 正如英国人心目中的农村土地一样。See Jan de Vries, “The Role of the Rural Se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7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1, Mar.1971, 266~268.

[79]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175.

[80] “皮朗 (Pirenne) 教授在一篇众所周知的论文里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者都会得到补充, 不是从前一时代的人, 而是从那些出身低微、靠奋斗拓展的个人, 这些人形成新的富豪; 他们重又变成尊贵的寄生虫, 因而被新一代取代。这种后浪逐前浪的变化在土地阶级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在哈林顿 (Harrington) 写道的之前三代就是这样的例子。”R.H.Tawney, “Harrington’s Interpretation of His Age, ”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41, 218.

[81] Ibid., p.207.

[82] See H.R.Trevor-Roper, “The Gentry, 154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ement 1, 1953, 4~24.对于这场辩论这部分继续的情况, see R.H.Tawney, “Postscript” in E.M.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Martin’s, 1965), I, 206~214; Coop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pp.377~81;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p.124~129; Hill, “Recent Interpretations”p.9.

[83] Trevor-Rop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p.26, 27, 30.

[84]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131.

[85] Ibid., pp.135~136.从不因想象而糊涂, 但讨厌统计数字的赫克斯特, 在另一点上谈到早期斯图亚特 (Stuart) 的英国: “因当时显贵们的无能而出现的真空中源源不断涌入农村乡绅——不是托尼教授所说的冒险的、顽强的小乡绅, 也不是特雷弗-罗珀所言的陈腐的、跳蚤般的小乡绅——而是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坐在詹姆斯一世 (James I) 和查理一世 (Charles I) 的议会中的骑士和绅士们 (p.48)。”参看库柏 (Cooper) 对赫克斯特对统计数字态度的评论: “最后, 与赫克斯特教授所言不同, 我相信如果对第一个例子中的报导和租赁及统计不多的庄园作更仔细的研究, 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的矛盾形式。对斯通先生, 我应公正地补充一点, 既然他首先切入该主题, 他肯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它。我想斯通先生与我至少能在继续这类研究的必要性上达成共识, 而不是像赫克斯特所言, 抛开它们。”“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3, Sept.1958, 74.

[86]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142.

[87] Ibid., p.147.

[88] Lawrence Stone, *Encounter*, p.74.

[89] “如果我们不再毫无保留地接受托尼教授的观点，即乡绅在1540至1640年之间的兴起是以贵族的牺牲作代价的，或是在庄园的管理上詹姆斯一世（James I）时的贵族明显有别于伊丽莎白的人，那么，就无可否认在某些家族中土地阶级的兴起，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将已经改善的地位归功于官职、贸易而不是土地的收益。”Gordon Batho, “Land-Lords in England.B.Noblemen, Gentlemen and Yeoman”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285, 但是巴索（Batho）补充说：“在抬高某些家庭在社会等级中拥有官职和政治影响的重要性时，不管怎么样，不应夸张。在大宗的收入被极少数幸运者所享用时，大多数家庭及政治的职位收入不多，并且不允许除了薪俸之外有大量收入，甚至在斯图亚特时代（p.289）。”

[90] J.H.Hexter, “A New Framework for Social History” in *the Reappraisals*, p.14.

[91] J.H.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p.103, 105.

[92] *Ibid.*, p.109.

[93] *Ibid.*, p.110.

[94] “16世纪的前半期是一个在经济控制中进行大量实验的时期，但是在商业自由方面没有明显增加的证据……”

“可靠而非繁荣，是都铎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

“但是都铎政府的自相矛盾及可能是整个体制崩溃的最后的最后的原因，可以进一步在与之相关的家长式统治的方案和社会公正中找到，而且，保守主义已成为满足有计划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机会主义的战争财政日趋增多的需要的祭品。历届都铎政府都是那些社会变迁和那些被设想提供了大量援助的新的资产阶级坚定理论上的反对者。”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pp.109, 111, 115.

[95]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p.91, cf.also pp.83~84.

[96] 它可能是这样的情形，正如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说：“在通货膨胀的时代，似乎是农民、约曼（Yeomen）、小土地主首先发展了那种必然成功的资产阶级品质——节俭、勤奋，敏于寻找市场，有节制的消费及利润的再投资。那些维持传统消费标准的贵族和大乡绅则相对较慢地自我适应，并继续花费那部分他们的地租已不能提供的金额。这样的人为了经济上生存下去越来越依靠王室。”*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p. 65~66.但它至多是一个程度问题。

[97] 参看帕赫（Zs.S.Pach）关于匈牙利（Hungary）和英国特定的比较：“〔作为商人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原本的现象，如果我们将匈牙利与这时期英国的发展比较一下，在那里，类似的过程正在发生。我们正在考虑‘新贵族’即那些基本上以租金形式接受他们应得的封建收入的英国‘乡绅’。他们从事羊毛、小麦及其他物品的出售，并剥夺农民和自耕农的财产，使他们受

自己资产阶级特征的直接剥削。” *Annales E.S.C.*, XXI, p.1230.

[98]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186.

[99]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16.

[100] 在这一点上, 希尔绝对正确: “我们应该停止对乡绅的概括。”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p.27.

[101] Lawrence Stone,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Past & Present*, 33, April 1966, 28~29.

[102] Hurstfield,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148.

[103] Perez Zagori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3, Sept.1959, 388.他补充说: “根据现实利益而形成的阶级正持续不断地得到补充, 而且自然包括形形色色的因素诸如地位、财富及收入来源之类。但是尽管有这么一些及别的区别, 它的成员都是同类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阶级; 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资本的占有, 这些资本以盈利和进一步积累为目的 (p.389)。”

[104] “1500及1700年之间, 伟大的土地转移活动的结束的结果就像一切土地区域内穿越社会边界的网球运动, 有时一个土地所有者可以携地越界, 有时则在越界中将所有权易手。在这个过程中, 赢家是大土地所有者和乡绅, 输家则是制度拥有者——国王和教会, 农民或许粗略的得失比例相等。”

“16世纪土地所有者的结构对正在对农业生产增长的市场需求的压力有反应, 它伴随着一种趋势, 即偏离维持生活的农业, 趋向商业性的农业, 这时农民的构成产生了影响。它不仅使许多庄园主最大限度地行使他们的法律权力, 而且也给那些幸运的、有事业心的约曼以成功的机会。但是这种结构也对富有竞争性的等级世界的压力有反应, 和驱使新生的商业财富在土地中寻找安全。地位需要在消费中, 而不是在大量的家臣和随从的团体中寻求新的保护, 这是对农民地位压力的另一个根源。”F.M.L.Thompson,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England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ed., XIX, 3, 1966, 515.

[105]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123.

[106] 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Press, 1942), 25.

[107] *Ibid.*, p.61.

[108] Karl Marx, *Capital*, III, Chap.XLVII, Sect.IV, p.799.*Italics added.*他补充说: “这种农业中独立和起主导作用的资本的出现并不是突然的和大规模的, 而是逐渐地, 尤其是在生产

部门。首先，它不包含一般的农业，而是像牲畜饲养，尤其是养羊业这样的生产分支，它的主要产品、羊毛，在最初阶段提供了较工业兴起时期生产价值超出的市场价值，这在以后也没有持平。16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p.801）。”

[109] See H. John Habakkuk, “La disparition du paysan anglais,” *Annales E.S.C.*, XX, 4, juil-août 1965, 652~654. 托尼指出它的合法性：“如果经济原因造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农业体制，那么，使一些人有利可图的法律原因当然也存在……任何传统的自耕农都从事过相当规模的养羊农业，而且，要找出为什么低廉的羊毛需要纺织工业发展的经济理由并不容易，织布工业本不应被农民支持，在他们的农舍里，布是被纺织而成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这样的事实，即大量的小开垦者的土地占有权使他们被过高的罚金随意榨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公簿一旦到期，他们便被驱逐。他们的不幸在于，15世纪以来法庭提供给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的保护不及现存的庄园制加强的限度……他们仍然带着农奴（villein）的标记生活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自耕农被中世纪法律权利的残余束缚着，没有享有中世纪习惯法的实际安全，倒是感受到了现代商业主义痛苦，一切全能的现代国家唯独容忍了它，而不予保护。” *Agrarian Problems*, p.406~408. [注意托尼提到“大量的小自耕农。”然而，他没有像哈巴库克（Habakkuk）那么仔细地考察这个经验主义的问题。] 所有权制的含混不清是城镇中律师阶层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更多的土地变得可以让渡，个人确切的权利更需被限定。对于小自耕农来说，无论是谁强制性出售他的土地或是在他的土地上做他不愿意的事，他都可以雇用律师控告这种非法的侵权以保护自己。

“除了私人商人以及他们的管家、仆人之外，一个规模不大但强有力的职业精华团体出现在16世纪。每一个规模不等的地方城镇都有其公证团体、律师及掮客；北安普敦（Northampton）或梅德斯通（Maidstone）这种规模的自治市或许有半打这样的人，他们常常自命‘绅士’，出身小土地主家庭……” Everitt, *Agrarian History*, IV, p.555.

[110] Habakkuk, *Annales E.S.C.*, XX, p.657.

[111] Campbell, *English Yeomen*, p.68~69. 伍尔夫（Eric Wolf）对农民转向增加市场生产的分析更加固执：“这样，农民多年的问题在于平衡外部世界的要求与农民家室生活的需要。然而在遇到这个根本的问题时，农民可能会采取以下两种相反的战略，第一是增加生产，第二是削减消费。”

“如果一个农民采取第一个策略，他必须提高自己土地上的劳动量，以便提高生产和增加产量以进入市场。他这样的能力大部分取决于他动员生产因素的容易程度——土地、劳力、资本（无论是存款、现金或是贷款）——当然，还有整体的市场情况……”

“首先，（这个策略）在传统的农民租金方面的扣押权削弱时变得可能——当传统的领主吸吮租金的权力结构遭削弱时，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其次，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现象，即对农民而言，要摆脱加在他身上与他的身份相联系的习惯消费是可能的。如果他能拒绝将他的余钱花在习惯的支出上，他就利用这部分资金促进他的经济发展。二者殊途同归。随着超经济权力结构的削弱，许多传统的社会联系也失去了它们特别的约束力。农民共同体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会看到那些富裕农民的兴起，这些农民将他们比较不幸的同伙抛在一边，步入由退却的超级权力拥有者留下的权力真空。在他们兴起的过程中，常常践踏传统的社会关系——他们常常

不惜损害邻人，利用新近得到的权力使自己致富。这样的人是16世纪英国新兴的约曼，中国的富裕农民以及俄国革命前的‘富农’（Kulaki）或‘拳头’（Fists）。” *Peasants*, p.15~16.

[112] “在解散后的最初年代，或许几乎没有约曼能从修道院的土地解散中得益；因为这部分财产最先是作为礼物进入大土地主之手，或是作为薪俸，或是通过购买得到。但是它大部分落入投机商手中，经过在市场上不断分割，到16世纪晚期它才进入小的购买者之手。” Campbell, *English Yeoman*, pp.70~71.

尤因斯（Joyce Youings）警告勿作夸大的评论：“大量修道院的土地被最初的土地接受者重新卖掉，其中有一部分多次易手，但是市场并非如此活跃，投机亦非那么普遍，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并非所有这类土地所有权的易手都是清楚的出售。合伙人之间被转让的部分财产被忽略了，但部分‘再出售’财产清楚、简单地被代理人转让给了他们的委托人。” “Landlords in England C.The Church,”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 ed., IV: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349~350.他进一步指出：“对大多数非宗教群众，无论是乡绅或约曼，更快的获利是租用而不是购买修道院的土地（p.348）。”

[113] “但是通常约曼是一些在同时代的人，更主要是在后世的作者中相对不挨辱骂的土地蚕食者。小规模的地圈地通常是指望靠种地获利而不是转换成牧场的事实，也有利于他们摆脱堆积在那些促使人口减少过程的人身上那么多的责骂。” Campbell, *English Yeomen*, p.91.

[114] Joan Thirsk, “Farming Techniques,” in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 ~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199. Italics added.然而，在英格兰，正如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一样，不能肯定有太大的地区专门化。至少巴凯茨赫（E.J.Buckatzsch）在他的税收估计的研究中表明“英国财富的地理划分模式……从13世纪末到17世纪末没有本质的变化，（反之）在18世纪才有根本的变化。”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 1086~184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2, 1950, 195.

[115] Frank Emery, “The Farming Regions of Wale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 ed., IV: 1500 ~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124.

[116] Ibid., p.152.

[117] T.Jones Pierce, “Landlords in Wales.A.The Nobility & Gentry,”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ed., IV: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380.

[118] Campbell, *English Yeomen*, p.65.

[119] Ibid., p.72.

[120] W.G.Hoskins, "The Rebuilding of Rural England, 1570~1640." *Past & Present*, No.4, Nov.1953, 30.

[121] Stone, *Past & Present*, No.33, p.26.

[122] 意思是压榨有一种方式：“概括起来：小农实际的数目在都铎英国很难确定。在那些圈地的郡，他们的财产易被剥夺，这是16世纪的开端和末期密德兰地区（Midland）的真相。在那些不鼓励圈地的地方，他们要承受高额的租税、专横的罚金以及对普通人牧养的权利的践踏.....不安全非常普遍，而且构成（正如当时人承认的）农业英国的脊梁的公簿持有者只能得到都铎政府部分和间歇的保护。” Ramsey,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p.36.

[123]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16世纪的农业变化可以被认为是英国生活商业化的长足进步。纺织工业的增长与畜养农业有密切关系，是羊毛织品的出口，‘贸易的奇迹’引人注目地将英国带入世界经济，而且动机不仅仅是寻求市场的早期探险，还有发展新的大农场、殖民地、帝国.....相当数量的家庭从土地上离开，即使不是启动，也是加速了中世纪工资问题的转移，这个问题在现代在于劳动力的过剩，而在当时则在于劳动力的匮乏。” Tawney, *Agrarian Problems*, p.3, See Joan Thirsk, “Enclosing & Engrossing,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 ed., IV: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210, Bowden, *Agrarian History*, IV, p.598.

[124] “少数农场工人拥有相对较多的东西或是普通的权利，能够受益于该时代新的商业开放，在一、二代人中打开出路，进入约曼阶层。然而，中、下阶层的小屋农则正在失去他们最简单的财产，沦为无地的无产者。” Alan Everitt, “Social Mo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 *Past & Present*, 33, Apr.1966, 157.

[125] Alexander Savine, “Bondmen Under the Tudors,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s., XVII, 1903, 268.

[126] *Ibid.*, p.270~271.

[127] See *ibid.*, p.275.

[128] *Ibid.*, p.276.

[129] Batho, *Agrarian History*, IV, p.303.

[130] “在那些为自己的产业工作，并通过季节性的工资工作增加收入的情况较好的劳动者，与那些产业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须靠偶尔的工资工作去扩大财源的贫穷农民之间有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前者的雇佣逐渐规律化，而后者则是间歇的、不定期的。” Everitt, “Farm Labourer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Joan Thirsk, ed., IV: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7), 397.

[131] See *ibid.*, p.409.

[132] 林区的吸引力之一是可以从事副业（forest & woodland crafts; spinning & weaving of flax, hemp or wool）See Everitt, *Agrarian History*, IV, pp. 425~429; Thirsk, *Agrarian History*, IV, pp.109~110.

[133] Everitt, *Past & Present*, No.33, p.58.

[134] “英国的乞讨和流浪汉并非开始于16世纪……尽管有丰富的证据表明在16世纪流氓和流浪汉在人口中的比例数目比这之前和以后都要大……”Frank Aydelotte, *Elizabethan Rogues and Vagabonds*, Volume I of *Oxford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Press (Clarendon), 1913], 3.
“违法乱纪的流浪汉和胆小怕事的乞丐帮，这一切为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学者们所熟悉，在（*idill lymmaris and harlottis falsie calling thame selffis egiptiamis*）‘假称自己是吉卜赛人的懒惰嗜好和娼妓中’有他们的同类，这些人漫游苏格兰，勒索食物和钱财、偷窃、恐吓，将惊恐带到偏远的农场和小村庄（Clachans）。”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29.

[135] Aydelotte, *Elizabethan Rogues and Vagabonds*, p.17.

[136] See Robert M.Kingdom, “Social Welfare in Calvin’s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I, 1, Feb.1971, 50~51.

[137] “多数16世纪的反圈地立法与饥饿年代同步而出，匮乏的抱怨能在1536、1548至1549和1596年的起义中听见。”Edwin F.Gay, “The Midland Revolt and the Inquisitions of Depopulation of 1607,”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s., XVIII, 1904, 213, fn.2.

[138] 克拉克（G.N.Clark）在描述都铎的经济法典，包括工匠法（或学徒法）、关税率、鼓励造船法、反圈地法案、济贫法时，这样说：“新的立法接受甚至扩大了货币经济：它推进了贸易的限制，或是以实物支付工资。但是这些法令总的倾向是保守的：它们支持首先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然后是更简单的手工业，限制进入有更多社会标准的职业和那些被认为不太适宜的地方……”

“这样，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就支持稳定现存的阶级结构、工业布局，以及通过授予特权和给契约签订的机动性和自由设置障碍限制劳动力供给的流动。但它不是简单的教条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它调停或是有利于相矛盾的利益者之间达成妥协。” *Wealth of England*, pp.84, 86.

[139] “英国在未经大的伤害的情况下经受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仅仅是因为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利用王权减缓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直到它变得能为大众接受——利用中央政权解除过度的牺牲，并试图对其变迁过程予以疏导以减缓灾难。”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38.

[140] “财产落入贵族之手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口自然更代的失败……贫困——不是土地的匮乏而是设备与余钱的匮乏——或许是一个因素（在财产的放弃中），它与趋向城镇或农村

工业的发展并非不相容。”Rodney H.Hilton, “A Study in the Pre-History of English Enclos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Cisalpino, 1957), I, 678~679.

[141] “领地可以出租给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主，这些农场主从土地的产品中获取最大部分的收入，而不是从自己的财产中。对于土地贵族来说，这种方式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可取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比农民有较大的资本基础，他不会像农民那样被诱惑对自己的农场给予极大的关注，而忽略他从土地主那儿租来的土地。所以人们清楚为什么土地主宁愿以有限的租期给予少数资本主义农场主，而不愿租给大量的农民。” Habakkuk, *Annales E.S.C.*, XX, p.650.

[142] “13、14世纪英国的农民公社一直具有强大的抵抗力，甚至成功地抵抗了土地贵族对他们境况的攻击。如果他们允许在15、16世纪自己被剥夺那是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已经毁掉了在过去一直是他们的力量的内聚力。” Hilto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p.685.

[143] See C.S.L.Davies, *Annales E.S.C.*, XXIV, p.35.

[144] 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与那些不得不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完全不相符合，这与那些不得不从工业或农业工作中获取额外收入以补给财力的小佃主也不相符。后者在这时期损失惨重。”Ibid., pp.36~37.

[145] See *ibid.*, pp.54~55. See Tawney, *Agrarian Problems*, pp.340~342.

[146] *Ibid.*, p.321.

[147] *Ibid.*, p.322.

[148] “标志着英国中世纪的结束的是收缩而不是扩张：放弃征服法国的梦想，尤其具有意义的是，在爱尔兰由英国人控制的英语及文明区域显著的缩小。盖尔语（Gaeldom）再次像湖水一样浸入城镇——都柏林（Dublin）、沃德福德（Waterford）、科克（Cork）、高尔韦（Galway），这些盎格鲁—爱尔兰人（Anglo-Irish）的最后堡垒。在15世纪早期，随着格兰道尔（Owen Glendower）的起义，威尔士获得了暂时的不完全的独立；尽管遭到失败和镇压，威尔士仍心怀怨恨，拒绝融合。康沃尔（Cornwall）或是苏格兰边区（Scottish Borders）的合并也非任何实际的进步，在这些地方，他们知道不是国王而是一个珀西（Percy）家族的人进入国家结构。”A.L.Rowse, “Tudor Expansio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History,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IV, 3, July 1957, 312.

[149] See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176.

[150] Tawne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211.

[151] *Ibid.*, p.216. See Tawne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p.176~177.

[152] See Ston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124, 133.

[153] See Tawney, *Agrarian Problems*, 191~192.托尼的结论是：“最辉煌的年代开始于伊丽莎白白的曙光开始照耀社会的贫穷与悲惨之时……农民所知道的就是他的地产管理人更苛刻了（p.193）。”

[154] See *ibid.*, p.229.

[155] “繁荣的经济能带来很多异常和弊病。它甚至会带来——假如繁荣继续——令人无法置信的浪费、虚饰，文艺复兴时期寄生的宫廷和教会。假如它继续繁荣——但会繁荣多久？到1590年，裂隙开始出现。”H.R.Trevor-Roper,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1969a), 68~69.

[156] See *Ibid.*, p.69.

[157] See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p.39.

[158] 当伊丽莎白寻求16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的对策时，贵族们自身也受到了威胁。See Ston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124, 133.然而并不准备消除“只有贵族才能提供的支柱”（Tawne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212），王室扩大了新的奢华。See Trevor-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69.

[159] See R.W.K.Hiton, “Letter to the Editor,” *Encounter*, XI, 1, July 1958, 74~75.

[160] *Ibid.*, p.73~74.即使这是事实，如库柏（J.P.Cooper）所说，“仍然没有好的证据说明贵族总的土地财产（在1642年比1559年）更少。”（*Encounter*, XI, p.74）似乎土地向那些倾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贵族手中转移。

[161] Trevor-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70.

[162] See John U.Nef, “A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France and England form 1540 to 1640,” in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64), 144~212.但是参见鲍登（Bowden）对这个假设的保留意见：in *Agrarian History*, IV, pp.608~609.对内夫（Nef）的论点更为同情的评估来自一份法国的资料，可以发现在Gaston Zeller, “Industry in France Before Colbert,” in Rondo Cameron,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Inc., 1970) p.128~139.

[163] 纽卡斯尔（Newcastle）煤的产品从1563至1564年年产的30,000吨增加到1658至1659年的年产500,000吨。See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elle*, p.281.

[164] John U.Nef,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40,” in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64), 136.

[165] Ibid., p.142.再参见内夫（Nef）：“英国将其逐渐加强的经济独立和力量主要归因于沿海、陆路、河道贸易出色的扩张。这种扩张因大不列颠岛内自然资源和富有活力的开发而成为可能，它是如此富有矿藏和优质土壤，拥有良好的港湾，以致成本相对低廉的水路商品运输可直达不列颠的每一港口。” *War and Human Progress*, p.111.

[166] K.W.Taylor, “Some Aspects of Population History,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XVI, Aug.1950, 308.

[167] Clark, *Wealth of England*, p.51. See Edward Taube, “German Craftsmen in England During the Tudor Period,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IV, 14, Feb.1939, 167~168. 佛兰德（Flemish）对移民“在一些平凡事物上改变英国人生活模式”的种种方式的描述可以在默里（John J.Murray）的“佛兰德低地国家对16、17世纪英国的文化影响”一文中发现。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4, July 1957, 853ff.这也是威尔士移民涌入英国的第一个高峰期。 See Bindoff, *Tudor England*, p.24.

[168] Fisher, *Economica* XXIV, p.16.

[169]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p.56, 克拉克（G.N.Clark）提到：“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到来那一年，国王就试图阻止伦敦的扩张，先是通过议会法案（Acts of Parliament），然后是宣告、委员会及司法程序。” *Wealth of England*, p.94.

[170] See Stone, *Past Present*, No.33, pp.32~33.

[171] Malowist, *Annales E.S.C.*, XVII, p.929.

[172]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p.37.卢布林斯卡亚（Lublinskaya）提到，这一点早在1615年即被蒙塔莱田（Montchretien）证明过。 See *French Absolutism*, p.132.

[173] 注意，戈贝尔（Pierre Goubert）认为，尽管有宗教战争，法国人口在16世纪还是稳步增长。“Recent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French Population Between 1500 and 1700, ” in D.V.Glass and D.E.C.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rnold, 1965), 465.

[174] 1628 ~ 1633年的大瘟疫无疑对此有帮助。 See J.Meuvret, “Demographic Crisis in France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V.Glass and D.E.C.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rnold, 1965), 509.瘟疫也在德国和意大利肆虐。

[175] Frank C.Spooner, “A la cote de Guinee sous pavillon francais (1559~1561).”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Milano: Istituto Edit.Cisalpino, 1957), II, 1001.

[176] See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I, 449, See Emile Coornaert, “Les échanges de la France avec l’Allemagne et les pays du Nord au XV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 3, 1959, 244.

[177] Coornaert,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 p.242.

[178] “安特卫普在1550年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持续有力地吸引法国人，可以从法国的经济分裂（Morcellement）得到解释，法国这个国家的工业设备仍然相当缺乏。”Jan Craeybeckx, “Les français et Anver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S.C.*, XVII, 3, mai-juin 1962, 548.的确，内夫（Nef）提到了这种增长的不足：“英国工业增长速度的50年（1550至1600）在法国是一个倒退的时期……”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1964a, p.146.

[179] See J.H. Parry,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Outside Europe, I. America,”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 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530. H.A. 英尼斯（H.A. Innis）提到：“在16世纪的前半期，在新大陆的渔业舰队主要属于法国……” *The Cod Fisherie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40), 49. 海峡和比斯开湾（Biscay）的港口都包含在里面。这种贸易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他们能够提供“过剩的干渔产品给英国市场。”
詹宁（Jeannin）也提到：“在法国对波罗的海的海上远征中，最初的角色……肯定是迪耶普（Dieppe）的角色……在16世纪横渡海峡船只主要来自诺曼底（Normandy），在诺曼人中，迪耶普（Dieppe）人占主导地位。”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p.329. 与苏格兰广阔的法国贸易有两个部分：诺曼底贸易中的创造品及服务业出口，还有比斯开湾（Biscay）贸易中盐和酒的出口。See 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p.172~182. 前者极像低地国家在该时代与苏格兰的贸易。“两者（北部法国和低地国家）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植物产品，两者都有相对高的工业技术水平，两者都是远地异国产品的集散地（p.174~175）。”

[180] Haus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V, p.260.

[181] K. Berrill,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II, 3, p.357.

[182] Glamann,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7.

[183] Wilfrid Brulez, *Studi in onore di Aminfore Fanfani*, IV, p.125. 布鲁勒兹（Brulez）进一步补充说，这时期多数英—意贸易通过陆地的原因似乎相同：“可以肯定，纺织品是英—意贸易的中心，从不用海路，除了次要的产品，在该世纪都是陆路运输（p.126）。”

[184] Glamann,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31.

[185] See Jacques Heers, “Rivalité ou collaboration de la terre de l’eau? Position générale des problèmes,”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XIX^e siècles, VII^e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1965), 47~50.

[186] 参看罗斯（A.L. Rowse）关于16世纪中叶法国政府是如何未能帮助海洋派的讨论：“在16世纪50年代，法国的闯入者们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逐渐活跃。但是到1556年停战之时，法国接受了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关于禁止贸易的要求，除非有他本人的特许证——我们

猜想，这并非易事。法国的海上船长们拒绝接受它，但他们也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与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形成对照：英国作为新教国家的这一事实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它使我们放手大干，不像法国那样受到重重阻碍。到卡托-坎布雷条约（1559年）签订时，为了天主教联盟的利益，亨利二世放弃南美洲所有的法国企业……法国由于可怜（还有正统保守的）的瓦罗亚（Valois）所造成的损失！火炬传到海军上将——胡格诺首领科里尼（Coligny）之手，这是法国利益务实和有远见的代表者。” *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New York: Macmillan, 1959），7~8.罗斯（Rowse）的新教激情无疑要打折扣。但是关于法国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争斗的记述及其对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所造成的后果，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关于新教，正如我们谈到它在波兰的衰落时讨论的，那些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在民族国家的冲击中的受益者易于与新教徒求得共同点，这就表明与帝国的权力和哈布斯堡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对立，后者在卡托坎布雷条约后与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运动的联系尤其紧密。

[187] “在1552年，为了支付‘德国之旅’（German journey）的花费，国奥王更确切地说是图尔农（Touuron）不仅仅求助于意大利人，也向两个奥格斯堡人（Augsburgers），赞梅斯特（Zangmeister）兄弟求助，还向乌尔姆（Ulm）的威克曼（Georg Weikman）求助，三人皆在里昂（Lyon）立业。国王将这些反帝国主义金融的代理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并为他们保密。”Henri Hauser, *Journal of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II, p.247.

[188] “在法国，圣昆廷（St.Quentin）危机之后几乎接着就是宗教战争的爆发。这样，由于地理位置，里昂无遮无拦。它被天主教派和胡格诺派轮番占领、包围、洗劫，由于第一线中的萨瓦公爵（Duke of Savoy），它被法国所有的敌人威胁，首先是萨瓦公爵（Duke of Savoy）。”Hauser, *ibid.*, p.255.

[189] Hurstfield,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131.

[190] H.G.Koenigsberger, “Western Europe and the Power of Spain,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B.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8），281~282, 290.Italics added.注意科尼斯堡格（Koenigsburger）谈到行会逐渐增加的影响。内夫（John V.Nef）作了如下比较：“但是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行会制度开始在英国解体，恰恰在这时，它在法国则正在加强和扩展。”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p.25.

[191] See Koenigsberg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302~303.

[192] *Ibid.*, p.292.

[193] “宗教是一种能够将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凝聚起来的力量，并给他们提供能够在现代欧洲历史上形成最初的民族和国际团体的组织和宣传机构；因为这些团体在其各自的阶级构成中从不占多数，通过宗教，他们能吸引最下层的阶级和暴民在疯狂的劫掠和野蛮的屠杀中发泄他们贫困的愤怒和无业的绝望。” Koenigsberg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306~307.

[194] “当这些团体失去了革命的动力和关于他们的社会目标的鼓吹时，他们便很快失去了下层阶级的支持。灾难因同盟之间的战争而起，法国农民深重的苦难产生了大量的农民运动，这些农民运动的矛头指向封建领主和他们的租金，指向教会和他们的什一税（tithes），指自税吏及他们的人头税（taille）；但是他们并不顾及宗教或政治团体。这些扎克雷（jacqueries）起义在1594~1595年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民起义’（Croquants）运动中的达到高潮。他们和那些以打败他们为唯一目的而结集起来的领主同盟展开了猛烈的战斗。17世纪许多类似的起义给农村社会和法国的税制笼上了阴影。但是直到1789年革命，他们才具有政治影响。” Ibid., p.307. 扎克雷起义的原因在拉杜里（Le Roy Ladurie）看来不难解，他认为他所描述的1550至1590年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底层农民所遭受的“双倍贫穷”：“一方面加深了小土地所有者的痛苦，他们的数目由于土地的划分而增加，没有补偿土地份额缩小的实际的收入；一方面因实际工资的下跌加深了工资劳动者的痛苦。” *Paysans du Languedoc*, I, p.317.

[195] See Koenigsberg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31.

[196] Mousnier,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103.宗教战争的消极性的经济影响是累积起来的影响，因为正如罗伯逊（H.M.Robertson）所论，“在那些经济状况发生不景气的地方，国家作为现存体制的保护者但同时也是威胁者的角色变得普遍起来。”在德国，当局的多重性意味着收缩市场，放任行会的再现和都市垄断。“在法国，行会的权力到该世纪末，也被认为由于1581年和1597年的条例而得到相当的加强。”“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 1, 1950, 46.

[197] Frank C.Spooner, “The European Economy 1609~1650,”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P.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70), 69.

[198] 或许贝歇尔（René Baehrel）是例外，他与众不同，确定1594到1689年是一个价格阶段，在此期间，1628至1655年显然是一个中间期。See *Une croissance: La Basse Provence rurale (fin XVIe siècle-1789)* (Paris: S.E.V.P.E.N., 1961), 50~57.

[199] See Pierre Chaunu, “Le renversement de la tendance majeure des prix et des activités au XVII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vo moderno* (Milano: Dott A.Giuffrè-Ed., 1962), 231.

[200] “16世纪整个美洲都被认为是一个掠夺财宝的巨大地域（Champ de ceuillette）。对其进行搜罗，或是简单地将数世纪劳动积累起来的潜在财富转入商业流通；或是挖掘靠近运输线的土壤中的矿藏，而这只有依靠一定的中介，依靠印第安人的铺路才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如同富人不费心保持贮藏物品，毫不关心保留他们，那种毁灭性的使用方式，使他们最初的作用不复存在。如此一来，使得可耕地在40年中枯竭，所有地表土壤在70年中遭到破坏。为此，17世纪的大种植园不得不完全利用进口的劳动力。” Chaunn, *ibid.*, pp.1422~1423.

[201] See *ibid.*, pp. 1423~1425.

[202] Spooner,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p.79.

[203] 斯普纳 (Spooner) 在前引书中作了透彻的说明。表二 (p.86) 和图一 (p.87)。英国、荷兰是贬值最有力的抵抗者, 波兰、热那亚和西班牙则最软弱。法国仅比西班牙略好一点。

[204] See Baehrel, *Une Croissance*, pp.2~20; also René Baehrel, “Economie et histoire à propos des prix, ”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3) I, 287~310.贝歇尔 (Baehrel) 这样结束这篇文章: “布洛赫 (Marc Bloch) 劝告, 注意‘社会屏幕’。我们也必须谈论‘经济屏幕’? 费弗尔 (Lucien Febvre) 曾经告诉我们, 路德 (Luther) 对赎罪券的反对是因为它们提供的是不真实的保证。我们能谈论太多贵金属的价格吗?” (p.310)

[205]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15.

[206] Roman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 p.522.

[207] *Ibid.*, p.525.罗曼诺 (Romano) 利用奇波拉 (Cipolla) 的数字, “Note sulle storia del saggio d’intereses, ”表III。我相信罗曼诺用了奇波拉错误的数字。它应该是1.4%。

[208] See Ruggiero Romano, “Encore la crise de 1619~1622.” *Annales E.S.C.*, XIX, 1, janv.-fevr.1964, 33.

[209] See Roman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p.516.格拉曼 (Glamann) 曾经不经意地指出它为何最终结束了。他谈到波罗的海的谷物地位在1650之后欧洲的衰落中的意义, 因为南部、西部欧洲谷物的自足, 荷兰的经济从此衰落。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42.这反过来可以从人口的减少得到部分解释 (或许), 主要从产品的增加和可耕地的扩展来解释, 因为南欧是它的边缘地区的一部分。进一步讲, 在1650至1750年欧洲世界经济的收缩中, 英国发现回到部分国际谷物贸易以维持它较高的贸易平衡是有利可图的, 在以前更有利可图的年代它就忽略了边缘地区。

[210] Chaunu, *Séville*, VIII (2bis), p.90.

[211] “西北欧所享受的‘繁荣’并不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馈赠的恩赐; 它有其内因, 其中, 一份扼要的财产清单很快就将结构和结合之间的因素辨别清楚。”Pierre Jeannin, “Les compt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e-XVIIe siècles), ” *Revue historique*, CCXXXI, avr.-juin 1964, p.325.

[212] See Pierre Chaunu, “Réflexions sur le tournant des années 1630~1650”, *Cahiers d’histoire*, XII, 3, 1967, 259~260.

[213] See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52.

[214] See Chaunu, *Séville*, VII (2bit), 1535~1537 *for the impact on the Spanish economy*.

[215] See H.Kellenbenz, "Autour de 1600: le commerce de poivre des Fuggers et le marché internationale de poivre," *Annales E.S.C.*, XI, 1, janv-mars 1956, esp.23, 27.

[216] Glamann,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5.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如此荒谬吗? 罗伯逊(H.M.Robertson)的观点是:“在19世纪,或许有一种将经济进步的代价估计得极低甚至忽略的趋势;在现在,或许有一种对它进行夸张的方面。在16世纪,这些代价是如此高昂而立竿见影,以致某人或某国的所得就是别人别国的所失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这里活动规模越大,那里就业就越少;恰如一句荷兰谚语所说:一个人的生计就是另一个人的死亡(De één man zijn brood is de ander zijn dood)。”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 p.46.

[217] Chaunu, *Cahiers d'histoire*, XII, p.264.

[218] Romano, *Annales E.S.C.*, XIX, p.33. Italics added.

[219] Romano, *Rivista Sforica italiana*, LXXIV, pp.511~512.对荷兰来说是一个例外, See p.512, 对英国来说,更是一个有限的例外, See pp.517, 519.

[220] See Clark, *Wealth of England*, pp.103~107.

[221]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9.

[222] Supple, *ibid.*, 6~7, See Astrid Friis,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and the Cloth Trade* (Copenhagen: Levin & Munksgaard, 1927), 22.

[223] F.J.Fisher, "Tawney's Century," in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1), 4~5.

[224] 费希尔(Fisher)是这样勾勒这种压力的:“在初级生产中,扩张的障碍主要在供给领域,主要因当时的技术限制而产生.....”

“在16、17世纪,正如在中世纪一样,人们寻求土地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也为饮料、燃料以及像木材、羊毛、兽皮、牛脂之类这样一些基本的工业原料.....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和人口数的增长就使土地趋于紧张,在以后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里,它们将调节支出平衡.....”

“在第二产业中,比较起来,扩展的障碍似乎在需求而不是在供给领域.....在大多数工业中,生产的主要因素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不定期雇佣的、收入微薄的劳动者和小屋农是一些贫困的主顾。” *Ibid.*, pp.3, 4, 6.

[225]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p.50.

[226] “1598年这件事似乎是英国由边缘向新的贸易体制中心转移的征兆。”W.E.Minchinton, “Introduction, ”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9), 3. “正在转移……”但仍然没有达到——这是关键之点!

[227] See Rich,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pp.461~462.

[228] 标准的叙述可以在Friis,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p.22.

[229]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p.49~50.

[230] 斯通本人承认：“两个大的消费市场对英国经济的新模式意义非同寻常，需要扩大的生产是国家的军需和贫困阶级的基本生活必需品。”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p.51.

[231] See R.W.K.Hinton,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9), ix-x.

[232] See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p.51.

[233] “稳定取决于对资本主义增长的限制，这是绝对君主制的经济政策……（同时），绝对君主制的军事和战略要求又导致它在一定程度上扶植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Manning, *Past & Present*, No.9, p.49.

[234] “到16世纪末，对于更早一代如此富有吸引力的稳定已经令人厌烦；随着贸易扩张条件形成，反对这种扩张的情绪也缓和了；对这些因限制大萧条而产生的既得利益者的拔除成为17世纪的主要任务之一。”Fisher, in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172.

[235] See Friis,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pp.149~150.

[236]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29.

[237] *Ibid.*, p.52.

[238] Hinton, *The Eastland Trade*, p.20.参见萨普利（Supple）：“因为它仍然记忆犹新，即萧条的全面影响仅仅可以从有关来自科克因（Cockagne）计划的损害，竞争性的工业的增长，大陆战争引起的干扰以及英国商人一直存在的广泛的困难中得到解释。这一切意味着，如再有任何麻烦事发生，经济将再次经历另一个极其低落的时期，这对所谓的‘大萧条’是永久的历史性的挑战。” *Commercial Crisis*, p.64.

[239] Supple, *ibid.*, p.80.

[240] See *ibid.*, pp.89~96.

[241] *Ibid.*, p.162.

[242] J.D.Gould, "The Trade Depression of the Early 162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1, 1954, 87.

[243] See Hinton, *Eastland Trade*, pp.18~19.也参看他特定的经验主义研究的论述：“1611到1618年是我们唯一的年代，这时，英国和联省战火熄灭，所以他们的船队和商人在这方面的竞争是平等的。显然，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中，荷兰很快建立了绝对的商业上的优势，毫无疑问，主要是通过他们臭名昭彰的低货运价格。1615年是我们所知波士顿（Boston）港（Lincs林肯）文献记录中的第一个年头……我们发现在1615至1618年间所有从联省进口的干货（即不包括酒）的价值比从别的地方进口的干货的价值总和还要多，当然，每隔一段时间又有倒退的情形也是事实。与此类似的是，每年从联省到波士顿的船只比各地去的总和还要多，只有1628年是一个例外，这一年贸易量极少……这些事实给当代解释1620年的萧条染上一层色彩，似乎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荷兰的贸易中心对英国进口贸易的影响。”“Dutch Eutrepót Trade at Boston, Lincs., 160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3, Apr, 1957, 470.

[244] Hinton, *Eastland Trade*, p.45.

[245] See *ibid.*, pp.28, 31~32.

[246] See *ibid.*, p.29.

[247]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64.

[248] “试图找到一些成功程度不等的方法劝说商人们购买他们宣称在国外出售无利可图的织品，（枢密院（Privy Council））发现自己身陷争论不休的麻烦中。”*Ibid.*, p.237.

[249] See *ibid.*, pp.68~69.

[250] See *ibid.*, pp.242~243.

[251] *Ibid.*, p.227.

[252] *Ibid.*, p.71.

[253] See *ibid.*, pp.99~102.参见史蒂芬（W.B.Stephens）：“更不预见的是文献证据表明，后20年是许多输出港真正的危机年代，而前20年的后退是有限而短暂的，并伴随着某种繁荣。”“The Cloth Exports of the Provincial Ports, 160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 2, Aug.1969.241.

[254]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p.119.

[255] *Ibid.*, p.125.

[256] “从一开始，政府就被赋予一项毫无希望的任务。如果法律上的要求被强制实行，那

么成本将会提高到如此程度，乃至批发业都可能停止。如果生产方式中的一种变化是经济萧条的结果，如同常有的情况那样，那么，它就不是后者试图限制前者的答案。列举的当时的工业技术可能有这样一些情况，因为它的腐败，英国织品正失去海外市场。但也有更多的事例表明，因果关系正好是颠倒的。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伪劣产品仅仅是有限的和毫无希望的削减成本的形式，那么英国问题的答案可能存在于别的方面。”Ibid., p.147.

[257] “技术不熟练的劳动力是廉价的和丰富的，低质量的产品的制造成本较低。这在那些典型的普遍贫困的地区尤其如此，还有些地区的纺织品生产仅仅是劳动者们从事的副业。并不期待创造所有的生活费的雇用劳动力一般比全日雇佣要廉价一些。这就是斯密（Adam Smith）解释粗糙的织品相对精美的织品要便宜的历史理由。17世纪早期，东欧的经济条件比较接近这种情形，这意味着该地区明显适合生产廉价织品，如果市场对产品质量要求不高。”Ibid., p.140.

[258] “织品是多种多样的。似乎有这些：（a）羊毛织品：暖和、厚重；绒面呢主要是毛毯类，采用卷曲的短纤维；将乱纱梳理好，将洗好和在湿润状态下打平的羊毛缝得较宽大，使它更温暖、不透明和耐久，式样单调，适合寒冷的气候；（b）“较新类型”织品（基本上仍是羊毛）：较窄小和廉价；包括克瑟手织粗呢等，较早输往新的南部市场；（c）精纺织品：用精梳、长纤维羊毛纺出的纱；依靠经纱和纬纱的强度；比粗布轻，每码用毛较少；不宽大，很适合温和的地中海气候；（d）“新的布料”或“新原料”：与精纺品基本不同；最轻，有各种式样；偶尔比较宽大；有时用丝、亚麻或是棉作纬纱；包括斜纹花布（bayes）、（sayes）、哗叽（serges）、（perpetuanas）、（stammetts）、（tammies）、（rashes）、麻纱布（fustians）以及许多别的品种。”See Bowden, *Wool Trade*, pp.41~43; Friis, *Alderman Cockagne's Project*, p.2: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5; D.C.Coleman, “An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The New Drape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 3, Dec.1969, 418~423.

[259] 这种兴起的原因被鲍登（P.J.Bowden）归因于技术上的而不是商业上的因素。他认为“就羊毛的精细和纤维的长度而言，牧场比湿度重要得多。羊得到的营养越多，它就长得越大。羊毛纤维不例外，像这种动物的任何别的一部分一样，长度和体积都与饲养有关。为养羊而圈地使得生活容易了，对农人和他的羊都是这样。正如厄恩利（Ernle）勋爵所说，‘随着圈地增多，羊饲养得更好，羊毛在重量和长度上增加了，虽然它在质量上有失精美。’这样，整个16、17世纪，精而短的羊毛在英国的供给逐渐减少，长而粗的羊毛在增多。”“*Wool Supply and the Woolen Indust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1, 1956, 45~46.萨普利（Supple）回答道，鲍登（Bowden）“未能考虑大陆工业的扩张，以此必须考虑到劣质产品；也未考虑欧洲羊毛供应的显著，这是大陆工业化的基础。进一步讲，最强烈的竞争不是直接在高质量产品的市场，而是在相对粗糙的纺织品市场——大概已经泛滥到国外生产的次品正在替代英国传统的宽面呢的程度。这是市场和丰富的供给品中的一系列激进的变化，不仅仅是英国工业的一种恶化，其对旧的布匹商具有如此不幸的反响。” *Commercial Crisis*, p.143.

[260] See F.J.Fisher, “London’s Export Trad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I, 2, 1950, 159~161.

[261] “内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中，英国经济增长的力量在它和地中海地区的关系中表现得最清楚。在这个时期，英国工业解决了技术问题，这一直阻碍着它，其羊毛产品充斥了东、西部地中海市场，随之将土耳其和意大利降到工业原料供给者的地位。”Ralph Davis, “England and the Mediterranean, 1570~1670,” in F.J.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1.), 117.

[262] See Fish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p.336.参见鲍登 (Bowden): “(过去的羊毛织品) 最适合北部、中部和东部欧洲地区穿, 在此同时 (新的羊毛织品) 则极适合暖和而非热带的地中海地区穿。英国的幸运在于, 它拥有长纤维羊毛的准垄断权。……”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p.57.现在垄断是在没有竞争的意义上的垄断, 而不是在法律限制的意义上的垄断。到17世纪中叶, 长纤维的羊毛在爱尔兰多起来, 到该世纪末, 它在荷兰、泽兰 (Zeeland) 和佛兰德 (Flanders) 也有一定的数量。(Seep.53.fn.3.)

[263] Fish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p.155.

[264] See Charles Wilson,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2, 1960, 212.

[265] Cited in Rich,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p.467.

[266] “(新大陆的西班牙人) 殖民者——渴望奴隶和一切产品, 并用大量硬通货来换取, 然后还要对付那种贪得无厌而又无能的垄断的法律限制——这就提供了一个完备的非法经营者市场, 进入它得冒相当大的风险。” Parry,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p.516~517.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是最早认识到海上私掠在英国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性的人之一。他指责前一辈史学家忽略了金银的这个主要的来源: “这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的特点, 例如, 《剑桥现代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在论述伊丽莎白时代的形成及其伟大之可能时就没有提及这些经济因素。” *Treatise on Money*, II, p.156.fn.1. 韦布 (Webb) 提出了该过程, “打劫的意外之财曾经被抹去了。”这就是: “不是像西班牙人所为从它的产地去掠取金、银, 而是在西班牙得到它后通过抢劫去索取……” *The Great Frontier*, p.196.

[267] Parry,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524.

[268] See *ibid.*, p.526.即使在爱尔兰, 英国的态度这时也放松了。爱尔兰与西班牙进行广泛的贸易, 即使英国不高兴或是多疑, 他们也没有试图压制这种贸易。“至少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此事比往后的英国要大度得多。爱尔兰的天主教臣民们在经济上也非无能之辈。” Cyril Falls, *Elizabeth's Irish Wars* (London: Mettuen, 1950), 20.

[269] See Lyth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pp.63~70.在此相应, 苏格兰人这时试图在新斯科舍 (Nova Scotia) 殖民的意图失败了, 因为“在1603年后, 苏格兰不再有独立的外交政策, 也没有获得英国完全的好感, 在新斯科舍 (Nova Scotia), 它与法国利益冲突, 这是另一个支持它的野心的民族 (p.75)”

[270] 在1600年，爱尔兰的林地占其整个面积的1/8。到1700年，实际上全都消失了。通过出售木材，现利唾手可得。木材用于制革、造船、桶板和管道的制造及铁的冶炼。也用于家庭（建筑材料、燃料）。除了经济动机外，还有减少沼泽和树林的考虑，在沼泽和树林里，爱尔兰抵抗者很难被英国的骑兵追上。See Eileen McCracken, “The Woodlands of Ireland circa 1600”,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XI, 44, Sept.1959, 273, 287, 289.

[271] “总的来说有这样的假设，在爱尔兰，英国控制的铁工业的兴起正好与英国的燃料短缺同步。现在似乎是困扰英国工业的主要困难是燃料的成本更甚于燃料的短缺……”
“到16世纪末，燃料和劳动力是推动英国工厂运转的成本中最昂贵的项目……同一时期在爱尔兰则要廉价得多……”Ibid., p.295.

[272] “在1550~1600年间，英国人已然开始在北美的渔业中取代西班牙人。还在1580年之后当丹麦（Denmark）开始加强在冰岛（Icelandic）水域捕鱼的特许费制时更是如此。到该世纪末，英国开始在阿瓦龙（Avalon）半岛上创业。直到1600~1650年，不管怎么样，英国才在纽芬兰（Newfoundland）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站稳脚跟并抢占了西班牙人的市场。”See Innis, *The Cod Fisheries*, pp.30~81.

[273] See Parry,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p.527.

[274] Zagor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pp. 391~2392.该观点与托尼（Tawney）原先提出的观点极相近：“它主要是不同类型经济之间的斗争，这些不同类型更多地与地区特征而不是与社会分野相联系。”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p.186.

[275] Sto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p.120.可以肯定，只有在这样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我们才能找到这幅奇特的画面，即特许公司转而反对他们的恩主——政府。参看阿什顿（Robert Ashton）的解释：“回避这个结论是困难的，即许多公司在发展中达到一个阶段，这就是他们视政府的大量支援为理所当然，更关心那些仍未完全满足的目的，而不是实际上已经获得的东西。此种心态，这种对特许权的显而易见的践踏，在特权所有者眼中简直就是一种极不相称的傲慢。”“Charles I and the City”in Fisher, ed., 151.如果社会结构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真正攻击，很难想象这些特许公司会如此纵容自己。

[276] Tawne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 212.

[277] Trevor - 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pp.86~87.

[278] Hexter, *Encounter*, XI, p.76.

[279] J.G.A.Pocock, “Letter to the Editor, ” *Encounter*, XI, 41., 1958, 70.

[280] See Ston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349~351.

[281] Bitto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Press,

1969), 1.

[282] Boris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Paris: S.E.V.P.E.N., 1963), 577.

[283] Roland Mousnier, ed., *lettres et mémoires adressés au chancelier Séguier* (1633~1649), Vol.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82~83.

[284] Roland Mousnier,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Henri IV et Louis XIII*. (Rouen: Ed.Mangardln.d., ca.1945, 58.) See also pp.518~532.

[285] See G.Pagès, “La venalité des offices dans l’ancienne France” *Revue historique*, CLXIX, 3, 1932, 493~494.

[286] “即使仍然有阶级等级之间的距离，甚至有阶级斗争，也没有清晰的阶级划分。相互交往由于相互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细小差别的关系而发生。” Mousnier, *Vénalité*, p.532.

[287] See Mousnier, *Lettres et mémoires*, I, pp.168~169.

[288]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578.

[289] Bitto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p.100.

[290] See *ibid.*, pp.70~76.

[291] Bloch, *Caractères originaux*, I, p.139.

[292] “绝对君主制政策的主线是趋于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向，资产阶级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保护法国疆域以外和内部的经济利益。”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330.

[293] *Ibid.*, p.240.

[294] *Ibid.*, p.271.

[295] “想象贵族能够从路易十三（Louis XIII）和摄政府（Regency）所加诸国家的财政压力中得到完全保护，总的来说是不确切的。”“A propos des rapport entre la noblesse et la monarchie absolu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CCXXXI, avr.-juin 1964, 342.

[296] See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226.维范梯（Corrado Vivanti）补充说，这种转移无论从政治上还是财政上对政府都是危险的，既然它可能“引起反对绝对君主政体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的完全的联合。”“Lerivolte popolari in Francia prima della Fronde e la crisis del secolo XVII,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4, dic.1964, 966.

[297] Lublinkaya, *French Absolutism*, p.271.

[298] See J.Hurstfield, "The Profits of Fiscal Feudalism, 1541~1602,"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I, 1955, 53~61; Robert Ashton, "Revenue Farming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3, 1956, 310~322.

[299] See Hurstfie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p.60.

[300]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39.

[301] Ibid., p.43.

[302] Ibid., p.545.

[303] See *ibid.*, pp.545~561.

[304] See *ibid.*, pp.282~285, 446.

[305] Ibid., p.580.

[306] Ibid., pp.580~581.

[307] Corrado Vivant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p.966.

[308] Ibid., p.965.

[309] Ibid., p.965.

[310] Le Roy Ladurie, *Paysans*, pp.636~637.

[311] Paulette（官职税）是根据构想它的金融家波莱（Paulet）的名字命名的。在1604年（官职税）的法令之前，官职可以相互出售，但不能传给后代，因为如果一个官员在辞职之后不到40天就死了，那么这笔交易就无效。1604年法令使官职传诸子嗣成为可能，假如该官员每年年初缴纳相当于该官职价值1/60的税（the paulette）。See Swart, *The Sale of Offices*, pp.9~10.

[312] “有限君主政体的政府依靠官员（officiers）和最高法院（Cours souverains），这样，就先定了国王与第三等级之间有密切的了解。绝对君主制政府依靠枢密院（Conseils）和总督（Intendants），这样，就先定了不同阶级之间，一方面是贵族之间，另一方面是官员与第三等级之间力量的平衡。于是，绝对君主制的发展就涉及……王权与贵族之间联盟的政策。这存在着一种冒险，即当国王与第三等级结盟时，贵族也会像资产阶级那样进入政府机关。所以，王权首先不得明白，这个机关要凌驾在一切社会阶级之上，其次，保证官职中中等阶级的绝对优势。”Lucien Goldmann, *The Hidden God*（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4），127~128. Ergo, the paulette.

[313] See *ibid.*, p.120.

[314] *Ibid.*, p.141.

[315] *Ibid.*, p.106.

[316] 这首先令人感到沮丧。在他们失去从前的权力希望和影响时，他们看见官职税（*paulette*）有利的一面。

[317] *Ibid.*, p.120.

[318] Roland Mousnier, “Recherches sur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avant la Frond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 1958, 107.

[319] *Ibid.*, p.108.

[320] *Ibid.*, p.110. 维范梯（Corrado Vivanti）回答穆斯纳（Mousnier）：“另外，当穆斯纳试图表明此类术语的滥用的极端后果时，问道：‘我们会称威尼斯贵族、那些大商人为一个封建团体吗？’就像那句从脑子里蹦出来的著名诗句一样：‘你身为撒丁尼亚（Sardinia）的国王，却也是比萨（Pisa）的资产阶级。’（*Voche ve siete in Sardegnaled in Pisa cittadini*,）实际上，一个人起码会回答，威尼斯贵族也参与了接管东部（属于拜占庭（Byzantine），后来是奥斯曼（Ottoman）帝国）和特拉法尔玛（Terraferma）的封建领地。”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p.969.

[321] Mousnier,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 p.110.

[322] J.H.M.Salmon, “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Past & Present*, No.37, July 1967, 43. 普雷斯特维奇（Minna Prestwick）在评论波尔什涅夫（Porchnev）和芒德鲁（Robert Mandrou）的书中几乎用了同样的语言：“这样，开始是关于17世纪法国兴起的本质的争论就转化成为关于政府的结构和特性的辩论……”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CCCXX, July 1966, 572.

[323] “低价并没有损害工业。例如，在法国，17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是一个制造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繁荣期，也是一个国债减少、预算平衡等等的时期。商人和产业主的利润增加了，在这些年代，他们成功地变成了相当富有的人。”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13.

[324]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560.

[325]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p.144~145. 泽勒（Zeller）指出，在16世纪繁荣的整个王家制造业（*manufacture royale*）体例，尤其是在亨利四世（Henry IV）统治之下，是建立在一种防止贵金属外流的愿望基础上的。这样，为了避免进口奢侈品，国王鼓励创建奢侈品工业。其结果在早期17世纪的收缩中是严重的。“紧缩通货对法国经济特别困难。法国出口的产品并不提供明显的利润赚头。它的出口主要基于

法国和西班牙价格的差异上。从贵金属流入减缓之日起，这种差异就萎缩了。”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紧缩通货时期，在联省和英国这些国家则有明显的经济合理化意图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着试图利用资金的积累以充足的资金在市场上赢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相比之下，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Louis XIV）的法国制造业努力为什么仅仅是一系列旨在限制进口、发展奢侈品工业或多或少的成功就容易理解了。尽管如此，德马雷（Desmarets）注意到，国家总的来说仍处于资金短缺的状况，但是柯尔伯（Colbert）早在1670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向国王承认了农民和那些‘从地方上索钱’的税务官们所经历的‘重大困难’，并推断，在‘公共商业’中情况甚至更糟。” Jean Meuvret, “Monetary Circulation and the Economic Utilization of Money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France” in Rondo Cameron,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Inc., 1970), 148~149.

[326] See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328.

[327] “但是（法国和英国）之间极大的不同不在于（工业）法的本质，在于它的实施。在法国，官员们在实施法律时是如此强有力，以致工匠们有时甚至会因他们的热情而杀死他们。在英国，官员们是那么松懈，乃至工人们有时不得不通过罢工以提醒他们的职责……多数规则都是属于干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进步的那一类……”Nef,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p.56.

[328] Ibid., p.98.

[329] See Sella,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p.26.

[330] 波尔什涅夫（Porchnev）和穆斯纳（Mousnier）都同意。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458~463. see Roland Mousnier, *Peasant Upris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Harper, 1970), 306~311.

“战争，恰好与经济萧条的漫长年岁同步，对（西部和北部欧洲）国家的财政资源和管理机构提出要求，迫使他们的政府一方面提高管理能力，同时增加税收。但是当这两种政策在逻辑必然相互补充时，又表明在政治上它们是不相容的。作为扩大王室权力的官僚机构完全不存在，或是即使它存在，也是缺乏效力和控制能力的。财政压力越大，中央政府主动与特权阶级合作和对企业的求助就越多……”

“在理论上，法国的君主政体是绝对的。它的立法、行政权及其几乎完全自由的税收权总的来说被全国所接受。然而，在实践中，君主制是有限的，因为那些实际上触及不到的阶级、企业、个人的豁免，以及对那些庞大、异质的王室官员团体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正如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战争时期的生产要求更高的集权，而战争又使这一点更难于实现。” H.G.

Koenigsberger, *The Hapsburgs and Europe* pp.279~280.

[331] See J.Meuvret,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p.511~512. “法国的税收负担从1623年的4, 300万镑增加到1640年的8, 000万镑。然而，小麦的价格开始在1638~1640年间有明显的下降。这种国库财政上的增加与经济上的倒退的现象说明了结束黎塞留（Richelieu）政府的大起义的原因。” Ardant, *Impôt*, II, p.754.

[332] 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119.

[333] Elizabeth S.Teall, "The Seigneur of Renaissance France,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VII, 2, June 1965, 150.

[334] Salmon, *Past & Present*, No.37, p.43.

[335] “法国仍然给贫困的农民残留一块土地，它们受土地出租贵族支配。它仍然残存一个贫穷的、未经很好开发、依靠传统的经济方式过活的农村。在宗教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期里开始的趋势并不成熟。反之，它们在英国则有一个直接的发展。”Firedrich Lutge, “Economic Change: Agriculture,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 G.B.Elton, 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8) , p.47.

[336] 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268~275.波尔什涅夫从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借用了“平民”(plebeians)这个概念去描述这些市民。他说：“平民还没有构成无产阶级前身，而是一些乌合之众，它们植根于封建社会不同的团体，逐渐地，融汇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联合体(p.269)。”

[337] Robert Mandrou,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XVIIe siècle, ” *Annales E.S.C.*, XIV, 4, oct.-déc.1959, 760.

[338] Ibid., p.761.

[339] Mousnier,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 p.112.

[340] “到16世纪末，由于确信宗教改革的旗帜无用，天主教是在保卫自己的利益，普通的群众在经历了种种政治上、宗教忏悔上的幻灭后，拒绝给自己的阶级斗争披上任何宗教外衣。在16世纪末，当法国普通大众用简明、坦率的阶级术语宣告法国封建阶级应尽快‘结束自相残杀的宗教战争’并忘掉争吵，重新团结在亨利四世(Henry IV)的君主制下时，部分理由正是这样。”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47.see also pp.280~281.

[341] See *ibid.*, pp.572~573.

[342] See Koenigsberg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pp.338~340.

[343] See 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p.166.

[344] 杜比(Georges Duby)和芒德鲁(Robert Mandrou)谈到了“正在捍卫王国统一的天主教徒。”*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Vol.I: Le Moyen Age et le XVIe siècle* (Paris: Lib.Armand Colin, 1958), 341.参见塔皮(Victor-L.Tapié)“摄政时期(Regency)和路易十三(Louis XIII)统治初年的法国.....是一个牺牲品.....法国的几个省仍是地域争执的对象.....”“在那时，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强大富庶到足以在自身周围筑起一道屏护和平和经济发展的盾牌，但是一个坚定的政府能够保护领土独立，并允许它的自然资源有自己结出硕果的可能性。黎塞

留（Richelieu）的优点在于看到了这一点，路易十三（Louis XIII）的优点则是明白他的大臣们必须好好服务于他。” *La France de Louis XIII et de Richelieu*（Paris: Flammarion, 1952），524～526.

[345] See Mousnier, *Venalité*, pp.601～602.

[346] Henri Espeix. *Histoire de l'Occitanie*（Nimes: Le Centre Culturel Occitan.Collection cap-e-cap, 1970），155.

[347] Ibid., p.159.

[348] Ibid., p.161.

[349] See *ibid.*, pp.146～154.

[350] 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p.402～403, 418～419.

[351] See *ibid.*, p.578.

[352] 法弗尔（Jeanne Favret）在“Le traditionalisme par excès de modernité”中描述了一个20世纪这种现象的例子。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III, 1, 1967, 71～93.

[353] See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p.470.

[354] *Ibid.*, p.425.

[355] J.P.Cooper, “General Introduction,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P.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70）15.

[356]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p.399.

[357] *Ibid.*, p.396.

第六章 欧洲的世界经济：边缘地区与外部竞争场

一个实体的范围，从政治的词汇来定义是较易于确定的。如果我们要知道中国在1600年所包括的领土，我们需要查阅一些档案，它们就会告诉我们那时在法律上宣称的权利。当然，总会有一些边缘地区，那里的主权为两个敌对的国家机构所争夺，或是那里帝国的权力在事实上几乎觉察不到其存在，可以使我们把这种权利看作是法律上的假定。但是这些标准差不多是直截了当的：将在某种程度上名义的权威（不管其有多大）和有效的权威（不管其有多小）结合起来考虑，一般而言就会得到我们所需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种社会体系的范围，它不能用政治意义来确定，像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世界经济”就是如此。谈到在16世纪存在一种欧洲的世界经济，我们所指的范围是比全球要小的。但是要小多少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欧洲”进行贸易的世界任何部分都包括进去。在1600年葡萄牙人与中非洲的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王国和日本都进行贸易，而很明显难于认为莫诺莫塔帕或日本是那时欧洲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我们却认为巴西（Brazil）（至少是巴西的沿海地区）和亚速尔（Azores）群岛是欧洲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还有在西欧和波斯之间穿越俄罗斯的过境贸易。^[1]而我们认为波斯当然是处于世界经济之外的，甚至俄罗斯也是如此。俄罗斯在此之外，而波兰却在此之内。匈牙利在此之内，而奥斯曼（Ottoman）帝国却在此之外。这种区分是以什么根据来确定的呢？

这不是一个简单地有关贸易量或贸易成分的问题。弗塔多（Celso

Furtado) 认为:

除了金银, 在殖民化的头一个世纪中, 美洲人生产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能在欧洲市场上出售。不像东印度群岛人 (East Indies), 那里生产的物品每一磅都有很高价值, 如香料、丝和薄棉布, 美洲人却生产不出任何能够作为获利贸易来源的东西。^[2]

然而, 美洲人在此之内, 东印度群岛人却在此之外, 至少我们是如此坚信的。

我们应把这种区分看作是一种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和它的外部竞争场的区别。一个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在地理上是其延伸部分, 其产品主要是低级货物 (也就是说, 货物的劳务所获报酬较低), 但它是劳务分工整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其中包括的商品对日常所需是不可少的。一个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由其他世界体系各部分组成, 使这种世界经济与其他世界体系有了某些贸易关系, 主要是以贵重物品的交换为基础, 有时这被称为“富人贸易”。我们将首先通过分析俄罗斯和东欧各个部分, 印度洋地区和西班牙属美洲在16世纪的不同, 以力图把这种区别展现出来。

初看俄罗斯和东欧似乎是非常类似的。它们都有经营商品粮生产、并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大领地兴起的历史。确实如布罗代尔 (Braudel) 指出的, 在奥斯曼帝国那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3]在这两个地区, 对农民的强制首先是国家当局采取措施的结果。在这两个地区, 地主阶级看来都在那个时代变得很强大, 而市民阶层却削弱了。再者, 这两个地区看来都受到价格革命的影响, 并且与具有合理的精确性的总变量是相符合的。但是更准确的观察就会展现出一些区别。^[4]

我们在论述俄罗斯与西欧的关系和东欧与西欧的关系的不同, 将从以下三个主要题目出发: (a) 贸易性质上的不同。(b) 国家机器的力量与作用的不同和 (c) 作为以上两点的结果, 其当地城市市民阶层的力量与作用的不同。

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学大家克鲁契夫斯基（V.O.Kluchevsky），将他的俄罗斯史建构在这个前提之上，即“俄罗斯历史的主要基本因素一直是移民和拓殖，并且……所有其他因素一直是或多或少密不可分地与此联系的”。^[5]在我们述及的范围内这是正确的，这是16世纪的一个现象，当时的俄罗斯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一个经济成长的新时代……”^[6]一般认为，1552年对伏尔加河（Volga）间的喀山（Kazan）汗国的征服，和紧接之后于1556年对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征服是一个转折点。^[7]在接着的一个世纪中俄罗斯向南拓殖了森林草原地带，沿着顿河（Don）到达亚速海（Azov Sea），并沿着伏尔加河到达里海（Caspian）。俄罗斯也向横跨西伯利亚（Siberia）沿途的一大部分地区推进。在同时，乌克兰人（Ukrainians）（当时在波兰统治之下）沿着第聂伯河（Dnieper）推进，所有这些地区在1654年都成为俄罗斯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向南和向东的扩张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重要的是要指出，这种扩张方向是由于环绕着俄罗斯的地区各个政权力量的作用。像瓦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提请我们注意的，这是“在俄罗斯人在西方被阻止和击退时开始向东朝西伯利亚推进的真正时刻。”^[8]

因此，在俄罗斯这种情况下，西方贸易者面对的是一个比波兰、波希米亚（Bohemia）或梅克伦堡（Mecklenburg）远为广大的国家。也是一个本身有着明显的帝国结构的国家。然而波兰的外部贸易几乎完全是与西欧的，俄罗斯却既与西方也与东方贸易。正如布卢姆（Jerome Blum）说的：“东方贸易对俄罗斯可能比它与西方的商业更重要。”^[9]

不只是东方贸易在数量上更大，而且它的性质和数量使其有形成一种世界经济的倾向，或者像一些作者以略有不同的理论框架所说的，形成了一种国家市场。曼科夫（A.G.Mankov）指出，粮食生产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概念：“在谷物变为商品之前，在封建社会内部是谈不上商品关系的有效发展的——这表明了农业和手工业

（*métiers*）之间某种水平的分化。”^[10]因此让我们检验一下小麦生产扩大的现象，这在15和16世纪的波兰和俄罗斯是已知的，波兰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已在16世纪并入欧洲的世界经济，它的小麦既为其市场出售，也为其市场种植。像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所说的：“这个世纪末具有压倒性的特征明显的是这个事实；波兰的小麦被吸收到欧洲的价格的总流之中。”^[11]这对波兰和欧洲其他地区是关键性的，因为波兰那时变成了“谷物的最大出口者。”^[12]

波兰小麦出口经济的兴起，正如我们看到的，意味着用强制劳动生产商品粮的大领地的兴起。这也意味着贵族政治力量的兴起，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去除贸易障碍方面与西欧的商人相一致。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波兰维持了一种开放经济。^[13]波兰贵族的繁荣是如何依赖于这种开放贸易，从1626~1629年间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封锁维斯杜拉河（*Vistula*）造成的经济困难可以清楚地证明。他企图以此“切断波兰的神经”。^[14]“经过波罗的海（*Baltic*）港口的谷物出口（在波兰）被迅速实行了，其比例足以支配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15]这个事实被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用以解释波兰17世纪衰退的毁灭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波兰各地依其地方经济出口取向的程度而各有不同。^[16]

这可以用小麦的价值在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总产品中只占相当小的比例来反驳，但是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对此回答说：“不是商品出口的数量（事实上不很大）应当成为学者只予注意的目标，而是在商业中间人和土地所有者剥削农奴劳动所分配的利润率。”^[17]霍斯佐斯基（*Stanislan Hoszowski*）指出，在16世纪的全面物价上涨中，不只是波兰的物价在西欧与中欧之前就开始上涨，并且在美洲的财富对物价造成冲击之前就如此，^[18]而在波兰内部，“土地所有者从（物价上涨）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和市民却只因此遭受了损失。”^[19]这种对农民经济榨取的反应是经常性的农民反抗斗争。^[20]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当时在俄罗斯小麦生产的作用。让我们从曼科夫（Mankov）对16世纪俄罗斯的论断说起：“可以说在那时只有一个国内谷物市场。”^[21]也就是说，虽然几乎没有小麦出口，但“在16世纪已存在着地方市场间的一种联系，有时彼此之间是非常遥远的。”^[22]因而资本主义农业在那时就以类似的形式，一方面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出现了。但是当前者为扩大的西欧市场生产时，在俄罗斯“领主们为扩大的国内市场生产。”^[23]确实在16世纪，“将粮食装船运出国外需要沙皇的特许。”^[24]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专业化只以小规模在俄罗斯的世界经济中有所反应。俄罗斯世界经济的中心是出口制成品（金属器物、纺织品、皮货、武器和盔甲），以换回奢侈品、棉布、马匹和绵羊。^[25]此外，他们把西方的制成品再向东方出口，“虽然这种活动在16世纪显然不是非常重要的。”^[26]俄罗斯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的集中地的愉快效应：“毛皮、盐、兽皮和其他物品从殖民地流入旧有地区，创造了新的财富，并刺激了商业和工业活动。”^[27]

但是俄罗斯与西方的贸易又如何呢？它和波兰与西方的贸易不相似吗？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以18、19世纪的现象去推断16世纪，因为那时一个分立的俄罗斯世界经济确实已经消失，俄罗斯已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又一个边缘地区。^[28]

确实一眼看去，在16世纪发生的情况是，“在与西方的贸易中，俄罗斯用原料和半成品交换制成品。”^[29]俄罗斯出口用作军舰补给品的各种原料（亚麻、大麻、油脂、蜡）和毛皮，进口奢侈品和金属物品（包括军火）。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来，这种贸易似乎都不是很重要的。对西欧来说，直到17世纪前不能说俄罗斯重要到“粮食与森林产品的供应库”的地步。^[30]威兰（T.S.Willan）认为对英国这个16世纪与俄罗斯贸易最多的西方国家来说，俄罗斯的主要价值是“作为海军重要物资的一个来源。”但是他又说：

有点难于说这种贸易对俄罗斯人是否有同等的价值。他们出口到英国的海军补给品所换回的，多半是这个公司所宣称送给俄罗斯的武器和军火，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31]

“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将回头讨论这个见解。阿特曼（A.Attman）认为重要的进口不是金属物品，而是以银条或工艺品形式的银。他提出在教堂、修道院、宫殿中银的非常积聚和对银条的重要发现来证实这个假设。^[32]如果记得主要出口是毛皮，“那时尊严和财富的穿着”，^[33]所谓“富人贸易”的一种，我们就可以认为，16世纪俄罗斯—西方贸易的主要部分是贵重物品的交换，一种消费而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所以在紧缩时是不重要的，因而对经济体系的作用不是主要的。这并不是说它是不重要的。中间人靠它获利。无疑国家从此也得到了一些关税收入。无疑它也加强了社会声望积聚的体系。而关键是，如果发生了相当于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在1626年封锁维斯杜拉河同样的封锁，对俄罗斯内部经济的影响会远比在波兰要小。

我们一直用波兰作为欧洲的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一个国家的例证（作为外部竞争场的一个对立面）。但波兰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边缘地区的其他国家，会有什么不同吗？回答是会有一些，但看来是不重要的。

例如，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农奴”的“强迫劳动”不总是完全用强制劳役（*corveé*）的形式，有时是用“强制工资活动”的形式。^[34]瓦尔加（Josef Válka）指出这种中间形式的劳役在波希米亚是与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导向一个内部市场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35]帕特拉内（Josef Petraň）同样指出，在中欧如波希米亚、西里西亚（Silesia）、萨克森（Saxony）、奥地利各种较小的领地上，大地产兴起的趋向较弱，他认为我们能够看到专业化的产生不只是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而且发生在农业本身的内部，但“很自然这其中的专业化不会是完全的。”^[36]马洛维斯特（Malowist）指出，在丹麦农业的专业化与在东欧相似，因为在16世纪

期间，丹麦和霍尔斯坦（Holstein）贵族“发展出了一种以农奴劳动和以农业和乳产品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它也以他们农奴的产品为基础，因为农奴从事商业的机会被限制到最低程度。”^[37]但是他说这种贵族掠夺的社会进程“能够最清楚地波兰、勃兰登堡（Brandenburg）、波美拉尼亚（Pomerania）、梅克伦堡（Mecklenburg）和立沃尼亚（Livonia）看到，在丹麦就显得微弱得多了。”^[38]

由于这些例证我们可以说，它们显示出在16世纪，欧洲的劳动分工结构已经变得更复杂了。然而，对于波希米亚这个为欧洲的世界经济其余部分所包围的小国，低出口率的意义与俄罗斯这个在欧洲世界经济边缘的大帝国相似的低出口率相比，必然是十分不同的。波希米亚政治行动的自由毕竟要少得多，因而它的经济依赖性毕竟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分析者必须把绝对值看作最小因素而把比例看为最大因素的事例。^[39]波希米西倘使贸易被切断，将比俄罗斯难以适应。因而它的经济活动必须更有意识地在欧洲世界经济需求的框架内发展。

让我们回到威兰（Willan）有关1550和1560年代的评论。我们的解释至此应是很明白的，在边缘地区和竞争场之间的界限是可变的，不论从分析者确定它的困难性还是它的易于变动的意义上都是如此。一种观察此期间的俄罗斯历史的方法，是看它在欧洲曾尝试将其包括在世界经济之内时的反应。这个尝试在那时失败了，因为欧洲的技术和经济还不够强大。在以后的时代里它最终成功了。雷诺兹（Robert L.Reynolds）以某种民族优越感提到了这个进程：

在我们能述及的范围中，是英国人开辟了一条通路并引发了俄罗斯人的扩张……英格兰开辟了（北方）通路（在1553年）给予俄罗斯一个巨大的毛皮市场，它刺激了边疆的哥萨克人（Cossacks）和施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s）用他们的资本和经营才能尽可能快地向东方和北方推进。每年他们占据了毛皮贸易的新地域，完全像法国和英国的毛皮商人和以后的美国人，越来越远地推进到北美洲的西部。用这个巨大的毛皮市场，开辟了从西欧购买精美纺织品、金属器物和其他东西的可能性。^[40]

英国人闯入俄罗斯人的世界，是与俄罗斯内部政治发展相协调的吗？对这幅图景我们必须翻转过来，看看俄罗斯对“带入欧洲”作何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如何将俄罗斯与东欧进一步区分开来。马洛维斯特（Malowist）指出，在俄罗斯中部种植的粮食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北部与东北部和西伯利亚出售。^[41]因而俄罗斯小麦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拓殖和征服”它本身很富庶的北方和东北领土，这些领土又“供应了无数的财富，首先是沙皇们的财库，然后就是商人们的财产。”^[42]

要评价俄罗斯国家的作用，我们要简要说明我们在前一章所论述的西欧中心国家中国家的作用，再来考察东欧边缘国家中国家的作用，以两者与俄罗斯国家的作用进行比较。我们将绝对君主制描述为这样一种结构，其国王和他的臣仆靠着一个世袭的和购买的官僚阶层和雇用常备军的帮助上升到政治上的首要地位。一方面国王寻求城市商业市民阶层中有势力的部分的援助，他们供给国王金钱和对于有离心倾向的旧贵族某种政治上的制衡。另一方面，国王是传统社会阶层体系的顶峰，并最终是贵族反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体系侵蚀作用的保护者。

因而对这两个社会阶层旧贵族和商业市民阶级而言，绝对君主制对每一方都是较小的祸害，它力量的发展建立在他们都没有其他选择的基础上。它创造了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实体的可能性，以从整个欧洲世界经济的剩余产品中得到不成比例的份额，为这两个阶层很好地服务。在16世纪，我们至多可以说是国家“财政主义”（fiscalism）或“早熟的重商主义”。从大约1650年起，西方国家实行全面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图进一步加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16世纪在西欧是一个国家力量兴起的时期，而在东欧是一个国家力量衰败的时代，这既是东欧经济地位的原因也是其后果。这是社会变化累积影响的又一个例证。当波兰的土地贵族通过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作用变得强大时，本地的市民阶层则变得衰弱了。国家征税的基础消亡

了，这意味着国王不能供给维持一支足够的军队。^[43]这样大地主需要确保能保护自己，但是这必然造成了私残的条件。^[44]这些私人军队中有一些在数量上与王权的军队相等。^[45]国王变为由选举产生，中央立法机关议会（Seym）开始把它的许多权力转交给地方会议（diets）。

从这时起，国家机器分解就加速进行了。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揭示出这一步如何导致下一步的：

从1613年起有关税收的决定权作为一种常规转到地方会议了。财政系统的权力分散导致一种情况，一些地区必须比其他地区交纳更多的税。当地方会议被赋予投票决定甚至有关国家防务的税收时（1640年），混乱进一步加剧了。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国库资金的衰竭，最终使供养军队完全变为不可能。

士兵由于军饷被拖欠，组织了军事同盟或联合蹂躏国家，构成了政治动乱的危险中心。^[46]

在西欧，王室财产的增长是靠牺牲教会财产得到的，甚至在天主教（Catholic）的西班牙，但在波兰不是这样。在宗教改革的第一次冲击中，一些教区的教会土地被新教（Protestant）的乡绅没收，但甚至在那时主要教会财产的大部分未被触动。此后反宗教改革因我们已阐明的原因获胜。然而因为国家十分衰弱，王室财产也减少了。^[47]

类似的进程也发生在东欧的其他地方。今天大多数人把普鲁士（Prussia）国家与两个现象联系在一起：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容克（Junker）贵族阶级。在16世纪严格地说，在后来构成普鲁士的那个地区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容克贵族阶级。但这也是一个国家变得更弱而不是更强的世纪。

首先，大地产体系是以极小的小屋农保有地和强制劳役（corvée）^[48]为基础的，它于那时在易北河（Elbia）以东发展，被称为庄园主地产（Gutsherrschaft），取代了被称为领主地产（Gutswirtschaft）的旧封建形式，正如这个名字所表示的，在权力的内

部体系上与旧的形式有极明显的不同。在这个新体系中，像吕特格（Friedrich Lütge）所说的，“这种地产有些像国家内的小政治单位：它的居民只间接是本国君主的属民。”^[49]其次，像在波兰那样，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家族用他们的王室领地甚至以前教会的土地^[50]作为借债的担保，这是一个持续地削弱其力量的进程。这些由王权采取的极端（in extremis）措施，非常有利于容克贵族阶级。^[51]

在德意志（Germany）君主权力的衰退进程在16世纪一道继续着，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了三十年战争时达到最低点，泰勒（A.J.P.Taylor）认为这是一个“与其说是德意志衰弱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的和平。虽然和平是外国列强“强加”的，没有它们的干预事情会更糟。“在1648年的唯一选择不是外国的干涉少一些而是多一些——继续这场战争会直到将德意志的大部分实际上在瑞典、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s）之间瓜分掉。”^[52]

瑞典的地位值得简要地注意一下，因为瑞典的国家机器的演化接近于西欧而不是其边缘地区的模式，虽然当时它在经济上是很落后的。它的强大不是因为其商业和工业强大，虽然铁产量从1540年起就稳步上升。^[53]看来矛盾的倒是由于它农业的落后，它的贵族希望靠其他土地上的获利立足，因为他们缺乏靠自己土地获得地位的能力。或者至少如马洛维斯特（Malowist）所论述的：

这值得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瑞典控制波罗的海的某些方面。事实上，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扩张开始时是小规模的，但在15世纪就能察觉了。并且瑞典在15和16世纪是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国家，不只是与西欧比较，甚至与德意志东部或波兰相比也是如此……因而应当说，就瑞典商人的地位而言是不能用来解释瑞典对邻国的侵略的，因为这些商人从瑞典的征服中只得到微不足道的利益，甚至有时还要反对征服政策，认为它不过是不断增加税收的一个缘由。

相反地，强烈支持扩张的群体是贵族阶层。贵族当时不能够用牺牲农民阶层来增加他们相当少的收入，因为农民阶层是强大而组织良好的。对于大领主和贵族而言，正是征服和统治被征服领土带来了新收入的重要来源。^[54]

而我们若要问为什么农民阶层如此强大，可能不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即瑞典在那时只有着“一种几乎不能供应自己需要的农业，”因而它直接财富的唯一真正来源就是“某种靠它邻居的衰弱的寄生生活，是贵族权力巨大增长的结果。”^[55]

瑞典作为一个适中的反常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有着弱小的市民阶层的边缘国家，它是一个贵族政治权力随着16世纪经济扩张而增长的竞争场。但是小麦的增长由于那时气候逆转被遏止，特别对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国家造成了不利影响。^[56]因而贵族需要征服，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强大而不是衰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强大的国家，他们就能在17和18世纪用重商主义作为工业进步的楫杆，因而避免了波兰的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俄罗斯。俄罗斯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一部分这个说法的一个关键根据，就是在俄罗斯绝对君主制的成长具有与其在西欧的发展在某方面本质相同之处，而与东欧有着明显的不同。

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16世纪商品粮生产强制劳动的兴起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直接与被称为（军事）“领地制”（pomestia）的军事采地的创设相联系，它被用来酬劳沙皇的支持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与西班牙属美洲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s）有一些类似之处，然而这种强制劳动制度不能够立即实行，因为土地首先要从旧贵族（the boyars）和修道院那里征用。也没有任何相当于部族酋长（cacique）的中间人，除非将俄罗斯东正教（Orthodox）教士在某些地区所起的类似作用也算进去。确切地说，“农奴制”的法律强制是在农民债务的增长进程使“再封建化”的过程进行到最后时才实施的。克鲁契夫斯基（V.O.Kluchevsky）描述了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

地主的借贷产生了这样的关系，在其中领主的农民必须二者择一，或者作个有着明确偿还期的破产农民，或者作个没有明确偿还期的奴隶（就是用自己劳动的形式偿

还债务)。而这种限制不是用警察拘留在居住地……而只是在国家总的民法之下，由于债务工人对个人（也就是对土地所有者）的一种隶属关系。因而到16世纪末，农民的移居权没有法律的取缔就自行消失了。

农民自己在为一小块土地和一笔贷款与土地所有者做交易时，永久放弃了（通过佃户契约）曾经拥有的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有终止他承担的契约义务的权利。^[57]

但是当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在16世纪中期的军事成功，将今日俄罗斯欧洲部分东南部的大片无主土地并入后，自愿的农奴化在俄罗斯就不够用了。为阻止农民人口跑到那些新土地上，致使军事“领地制”（pomestia）的持有者失去劳力，引起政府失去纳税者，“采取了对农民迁移自由的限制措施。”^[58]如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出的：“农奴化的进程不靠国家权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敞开面对着在南方和东方如同俄罗斯大平原那样的巨大空间的国家中，其他方法怎么能行呢？”^[59]国家机器的积极作用因此很紧密地与俄罗斯卷入征服战争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

当然在西班牙也是这样。但是西班牙由于金银、意大利的借贷人和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的联系，与欧洲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保持了下來。俄罗斯则寻求创立它自己的世界经济。然而俄罗斯国家创立的最初过程与西班牙有某些相似之处。西班牙的创建是“光复运动”（reconquista）的结果，它的领土是基督教十字军从由北非洲来的穆斯林征服者那里夺回的。俄罗斯的创立是一个推翻“鞑靼（Tartar）奴役”的过程，是基督教十字军从中亚细亚来的穆斯林（或伊斯兰化的）侵略者那里再征服的领土构成的。莫斯科公国（Muscovy）的作用类似于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共同斗争的激情（élan）极大地帮助了莫斯科公国的胜利。^[60]

作为得到传统旧贵族（boyars）帮助的代价的一部分，在这场再征服中，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必须承认他们根据在早期历史上的阶层秩序所宣称的永久性首要地位。^[61]这种制度被称为“任官等

级”（mestnichestvo），是变革进程中创立的那些重要传统之一。为了平衡贵族的这种新力量，伊凡三世（IvanIII）在15世纪晚期创立了一种非完全私有采邑的新制度，称为军事“领地制”（pomestia），它作为回报军事服役的俸禄赐予。“领地制”由征服的边疆土地，从修道院和游荡的旧贵族（boyars）处没收的土地，也从自由农民处夺来的土地中创设。^[62]

但是因为没有宗教改革，教会能够进行抵抗，所以存在着两种土地租佃制，军事“领地制”和被称为“世袭领地”（votchina）的旧庄园制度，这给了修道院一个很大的机会，使“世袭领地”（votchina）的拥有者开始把他们的土地出售或捐赠给教会（特别在1550年之后），以换取终身的租佃权。确实这有着宗教上的缘由，但关键的因素看来是社会与政治方面的。^[63]

正是创立了军事“领地制”这种租佃的新形式，它不是以传统的相互封建义务为基础，通常位于边疆地区，再加上领土扩张和因此而来的现成可用的土地这个事实，导致政府于整个16世纪一直在推行加强农民劳动与居住束缚的强制性的措施，始于1497年的法典（Code），到1649年的大会法典（Assembly Code）达于顶峰。^[64]没有这样的限制，农民将会拒绝服劳役。教会的政治力量意味着国家不能阻止土地从赋税体制中流失。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增加剩下土地的赋税，进一步压榨农民。^[65]再加上因为农民在修道院土地上被给予较优惠的条件，增加的赋税就更进一步起到了促使农民移居的作用。

这就是“50年代与60年代”问题的背景。“恐怖者”伊凡四世（Ivan IV, the Terrible）从1547年到1584年的统治期间，是俄罗斯历史的关键时期，因为伊凡一心一意专注于固定内部社会结构以达到增强国家权威的目标，这种结构的俄罗斯在此后几个世纪为人所熟知，这也是企图建立俄罗斯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中的自身地位。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暂时

在后一个目的上取得了成功。或者换一种说法，他把门口的狼赶走了足够长的时间，确实使俄罗斯在以后被吸收进世界经济时，它是作为一个半边缘国家（像17、18世纪的西班牙）而不是一个边缘国家（像波兰）进入的。

在俄罗斯内部，沙皇增加国家权力的主要武器是创设一个世袭性的国家机器（像在西欧那样），在俄罗斯它要比在法国更多地与土地权利的再分配联系在一起。一个关键性的改革是废除地方当局的“食邑”（Kormlenie）制度，即一种以承包赋税作为薪俸的制度，而用一部分付给现金部分赐予土地的官僚体制来代替它。^[66]这个改革不只创立了一个中央官僚体制；同时也创立了它的赋税基础。^[67]与此一同创设了地方政府机构，它紧紧掌握在地方乡绅的手中，他们的兴起受惠于沙皇权威的扩张，并是其一部分。^[68]正是在那时（1556年）军事服役牢固地与军事“领地制”（pomestia）的持有联系在一起，使得沙皇确保有一支相对忠诚的常备军。^[69]军事“领地制”的发展和由此增加的监督这个制度经营的复杂性，导致在莫斯科为军事“领地制”创设了一个中央土地部门。

与此同时，伊凡四世在外部推行的扩张政策不只是在南方（那是在克里米亚，the Crimea）的边疆土地，而且向着西方的波罗的海（Baltic）地区，所谓立沃尼亚（Livonian）战争拖延了25年（1558年～1583年）。它的目标是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波罗的海强国。它是一场漫长的实质上无结果的战争。^[70]假若它有更多成果，俄罗斯就会在那时被明确地吸收到欧洲世界体系之中。

可以理解为什么向西方扩张激发了沙皇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能力。不像东欧各国的统治者，沙皇处于直接从贸易扩张中获利的地位，因为已有了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波兰是贵族操纵着从出口贸易的垄断性控制中获益。在俄罗斯则是沙皇，他为自己和他宠信的人保留这些权

利。^[71]因此对外贸易的沙皇对利益不只是作为关税收入的来源，而且是作为农民以物代钱交给他的非常大量货物的销路。正如城市为中世纪封建领主服务那样，伊凡四世寻求使全欧洲为其服务。因为这个计划是庞大的，他发现得到商业市民阶级（包括外国和本地的）的合作来买卖商品是方便有利的。当波兰的贵族除去波兰的商业中间人，借以避免为他们的货物付某些税时，就使国家丧失了财政收入，波兰的市民阶级也衰落了。当地主就是君主时，任何税收的减免只不过是记账上的事情。因此在俄罗斯，相对于独立的企业家而言，管理货物转运的人——商号的成员，在财政上没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是以这种身份起家的，让他们仍保持下去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在俄罗斯像在西欧那样，本地的商业市民阶级存在下来了，国家机器也同时加强了。^[72]假若沙皇伊凡四世成功了，不能肯定俄罗斯商人的处境会如同他们预想的那么好。我们永远不能知道会如何，因为当立沃尼亚（Livonian）战争以表面上的停战结束时，所有这些事中最真正实现的，是在俄罗斯引发了一场国内社会和经济危机。

在那时本身包含不稳定性的政治竞争场中，一个国家在国际领域缺少持续的成功，会导致国内展开利益斗争，常常使国家经受分裂的危险。为了抵消这种内部的动乱，伊凡四世诉诸强大的警察手段——臭名昭著的“禁卫军”（Oprichnina），因此他得到了“恐怖者”的称号。它主要包括创立一支特别的宫廷卫队，靠其帮助沙皇用激烈手段清除他的敌人，特别是在贵族当中。武器有两种：处死和没收财产，后者使沙皇能够重新分配土地给那些他希望对自己保持忠诚的人们。

在结束有政变（*coup d'état*）的危险状况方面，它在政治上是成功。但从许多人的观点看来，它招致了相反的结果。例如布卢姆（Blum）就说：

禁卫军（Oprichnina）的恐怖，与不成功的漫长的立沃尼亚（Livonian）战争的持

续消耗着国家资源加在一起，搅乱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没收大土地集合与它们的分支，将其并入“领地制”，搅乱了这个国家经济作为根基的农业体系，阻碍了技术发展，减少了产量，制造了领主与农民之间新的紧张状态。^[73]

布卢姆也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加上瘟疫，庄稼歉收和侵略引起的农民大批逃亡。^[74]在1575年到1590年之间，剧烈而突然的物价上涨反映并突出了这些事件。曼科夫（A.G.Mankov）在他研究16世纪俄罗斯物价波动的基础上，乐于得出更进一步的认识，“把1580年到1590年的危机看作国家经济的综合性危机，”^[75]这是一个他确信苏联历史著作也普遍持有的观点。

瓦尔纳茨基（Vernadsky）以类似的语气论证立沃尼亚战争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俄罗斯除了继续在克里米亚（Crimean）边疆继续作战别无选择，因为选择了在立沃尼亚作战，俄罗斯就选择了两面作战这种有着灾难性后果的政策。^[76]在我看来，这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即俄罗斯在立沃尼亚可能同样也是别无选择的。瓦尔纳茨基将立沃尼亚战争看作是一场失败，在其中俄罗斯人“有幸能在1583年8月5日与瑞典达成了休战协议，尽管其条件是非常不利的。”^[77]也许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俄罗斯没有被拖入欧洲的世界经济中。它的市民阶级和君主，至少在当时避免了他们在波兰的同类人物的命运。

这完全不足为奇。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分析了16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模式，认为在其中哈布斯堡家族——天主教会（Habsburg-Catholic）有创立一个单一帝国体系的目标，而其反对者们则企图促成一道东方国家屏障的建立——瑞典、波兰（后来的波兰—立陶宛Poland-Lithuania）和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主要是针对东欧，”但它也成为“一道与欧洲其余地区隔离的屏障，它孤立了变得更强大的俄罗斯。”^[78]

当天主教再度得到在波兰的地盘时，波兰—立陶宛国家却成为西班

牙的盟国。当伊凡四世之后的年代里，当俄罗斯国家被内部纷争所分裂，在所谓“混乱时代”（Time of Troubles）（1610年~1613年）达于极点时，波兰在哈布斯堡家族和另有动机的瑞典的秘密支持下，进行了“肢解和征服俄罗斯的尝试，”^[79]这个尝试失败了。还有，瓦尔纳茨基（Vernadsky）相信，英国在那时也有兴趣建立“一种对全部或部分俄罗斯的保护权。”^[80]无疑，造成失败的主要因素是存在着“三十年战争”的尖锐对立分野，它一直使俄罗斯的直接敌人们转向更为迫切的事务。

但是俄罗斯正在越来越接近于被欧洲吸收。伊凡四世的“灾难性”政策延缓了它。看一下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ky）叙述在“漫长的”16世纪的末尾发生了什么吧：

我们看到英国与荷兰帮助（沙皇）米哈伊尔（Michael）（1613~45）与其敌人波兰与瑞典和解，其原因是莫斯科公国是英、荷一个有价值的市场，也是到东方一条方便的道路——到波斯，甚至到印度。再者，我们看到法国国王建议与米哈伊尔缔结同盟，以符合法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在那里它在与英国和荷兰竞争……沙皇米哈伊尔的帝国比沙皇伊凡四世和提奥多尔（Theodor）（1584~98）的帝国要弱，但在欧洲却远不那么孤立。^[81]

“但”这个词不是应说成“因此”吗？伊凡（Ivan）所追求的是创立一个俄罗斯帝国，而不是欧洲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也是后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目标。

俄罗斯与东欧间第三个重大的不同，正如我们已指出的，是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商业趋向和国家机器不同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在俄罗斯城市和本地市民阶级在“漫长”的16世纪存在了下来，而在东欧市民阶级则大部分却没有。而土地，虽然在东欧大部分以同样的大地产形式发展起来，在俄罗斯却落入有时被称为“乡绅”，有时被称为“小贵族”（我们已看到这种区分是多么不得要领）的“新人”手中。这些人不是出身于旧贵族（boyar）阶级，而是来自两个群体——“宫廷贵族”（dvoriane）（一种宫廷贵族）和所谓“旧贵族（boyars）之子”，他们在较早的时代

是较小的和偏远地区的贵族。那些存在下来的“旧贵族”大部分是“沙皇的非王室亲戚”。^[82]因此，特别是在“混乱时代”（Trouble Time）之后，当沙皇米哈伊尔能够完成伊凡四世政策的必然结果时，一个新的巨头阶级出现了。^[83]最终拿到了旧贵族一切正式的附有权利。“任官等级”（Mestnichestvo）在1682年废除了。军事“领地制”事实上可以由出售和继承转让，于是与“世袭领地”（Votchini）的区分便破除了。1649年的《法典》（Code of Laws）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两种财产形式的区别，^[84]在1731年这种财产形式在法律上合并了。^[85]

“新人”的兴起当然在各地都出现了——如我们在西欧确实见到的那样，在东欧许多情况也是这样。但布卢姆（Blum）抓住了要点：

俄罗斯经验.....在一个重要方面与东欧其余地区不同（而类似于在西欧的情况）。在其余东欧地区小贵族的得势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君主权力的衰弱。在俄罗斯乡绅的兴起有赖于沙皇权力的增长。它是新绝对君主制风筝的尾巴。^[86]

最后，在东欧与俄罗斯之间的明显差别在城市地区是清楚的。城镇在东欧进一步衰落了。本地城市市民阶级和本地民族工业也进一步衰落了。这确实是一个相对而言的问题。俄罗斯与西欧比较可以被认为是相对衰落了，如果不是绝对的话。而这种衰落在东欧也不是完全性的。而有证据似乎表明，在东欧与俄罗斯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别。

这种区别在“第一个”16世纪可能一直是较小的。^[87]但是当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多地从事直接贸易，他们在东欧公然进行“反城市活动。”^[88]随着在波兰“小国王们”和易北河（Elbia）以东“庄园主”（Gutsherrschaft）的兴起，作为地主的君主认为没有直接的需要使他对市民表示同情。^[89]当城镇衰落时贵族变得更强大了。^[90]在俄罗斯，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ky）能够谈到“在16和17世纪，俄罗斯城镇和城镇工业格外缓慢而艰难的增长，”^[91]但至少是增长而不是衰落。布卢姆更为确定这一点。他说：

（在16世纪）的经济生活中交换的新重要性表现在城市作为工业和商业的中心重新出现，并作为在俄罗斯和外国农产品及其他货物的市场。旧的市镇复兴了，新的建立了，一些农村定居点[像诺夫哥罗德（Novgorod）土地登记簿所显示的]开始抛弃农业转向贸易和工业。^[92]

与市镇力量俱增的是本地商业市民阶级的力量。地方贵族不只从地方商人那里夺去了出口贸易，“把他们贬低到代理人的角色”，^[93]并且与外国市民阶级分享进口贸易。^[94]一个国家的本地市民阶级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外国市民阶级。德意志商人在易北河以东的经济中找不到地盘，在波兰却大受欢迎，并在政治上恰当地表示感谢。^[95]确实可以推测，后来德意志市民阶级恢复权力是否是由于这个事实，即他们在像波兰和斯洛文尼亚（Slovenia）这样的地方存在了下来。相反在俄罗斯，虽然本地商人卷入来自大土地持有者，包括修道院，特别是沙皇本人最大的竞争，然而他们生存了下来。^[96]一个有利因素是主要的商人被称为“客商”（gosti），被允许充当沙皇商业和财政代理人，和商人本身利益代理人的双重角色。^[97]最终他们能够摆脱他们与沙皇的联系，甚至变为其有力的竞争者。而终于，“私人企业在事实上的确获得了俄罗斯向太平洋扩张的一大部分成果，虽然很少得到国家的支持，反而要与国家竞争。”^[98]

至于手工艺工业，看来在各地都衰弱了，大部分是因为没有关税屏障，使得西欧工业更多更经济的产品在销量上胜过本地产品。^[99]在某种程度上本地工业存在下来，例如捷克（Czechia）的花边，它被看作是为商人在他们所住地区之外服务的农舍工业。^[100]虽然如此，因为它促进了农业的多样化，并为波希米亚（Bohemia）后来的工业发展准备了途径，它还是有所不同的。^[101]但在俄罗斯，因为它有它自己的世界经济，有些积累的资本投入了工业发展。^[102]甚至在欧洲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出口工业纺织业的情况中，人们会认为俄罗斯工业在竞争中垮掉，而地方工业却保有了大部分大批量市场，甚至一部分优质品市场。^[103]

我们能够对为什么奥斯曼（Ottoman）帝国不是欧洲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作类似的分析。^[104]我们的注意力看来应当更多地转向葡萄牙的印度洋贸易和它与西班牙的大西洋贸易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首先摒弃土耳其人（Turks）在葡萄牙的印度洋贸易兴起中的作用的神话。绝非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导致了地中海东部对西欧的封锁，因而促使葡萄牙寻求到亚洲的好望角（Cape）航路，现在普遍承认，葡萄牙的海外探险实际上早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地中海东部香料贸易的衰落实际上也早于葡萄牙进入该项贸易。确实，莱比尔（A.H.Lybyer）正确地将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Levant）的“衰落”归因于不是对现代技术的文化上的抵制，而是由于贸易的结构性转变，使其不能包含在扩张中的欧洲世界经济之中。

（土耳其人）不是有意阻碍这些道路的积极行动者，这大部分不是由于他们臭名昭著的漠不关心与保守主义，若是这毕竟总体来说增加了东方交通的困难的话。他们也没有使新航路的发现成为必需的。相反，他们由于新的和更好的航路蒙受了损失。假若没有绕过非洲的航路，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Levant）从1500年的整个历史就会非常不同。首先马木鲁克（Mameluke）苏丹（Sudan）们就会发现，他们没被中断的贸易足以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使他们能够成功地抵抗土耳其人在1516年的进攻。但假若土耳其人征服了埃及，而东方贸易的主流仍然涌穿其中，他们必然或者会远比实际上控制这些道路的时间早得多地被赶走，或者使自己适应这种穿越他们领地的巨大而增长着的贸易。在后一种情况中，他们会被迫采用现代的方式，并加上他们使领地统一的奇妙才能，用类似的计划组织他们的贸易……贸易路线的改换实现了，但不是由于土耳其人，但是却由于他们的无所作为而使他们受到了损失。^[105]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研究了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内部导致15世纪探险和16世纪海外贸易与建立帝国的力量情结的解释，引人注意的是，考虑到伊比利亚人（Iberian）扩张的经济动力是多么大地面向大西洋地区（西半球，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还有西非洲）而不是亚洲，尽管探险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始于寻找到东印度群岛（Indies）的航路。例如，当戈丁诺（Vitorino Magalhães-Godinho）列举了一长串支配葡萄牙扩张早期阶段的因素（从缺少黄金，粮食短缺，到对生产糖的

土地和奴隶，捕鱼海域的需要），没有提到胡椒、香料、药材、丝绸、瓷器或宝石，简而言之，即所有葡萄牙人将在16世纪实际上从亚洲进口的物品。^[106]但是到15世纪的后25年时，葡萄牙人对香料贸易的兴趣被唤醒了。^[107]而且寻找约翰王（Prester John）在国王约翰二世（John II）的心目中与这种兴趣开始联系起来。“因为（约翰的）这个王国将会为他用来作为到印度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从那里葡萄牙的船长们可以带回那些至今由威尼斯（Venice）散布的那些财富。”^[108]并且西非洲的黄金加上亚洲的胡椒和香料事实上到1506年构成葡萄牙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加上此后亚洲贸易比例的增长，就构成了“帝国经济的支柱”。^[109]

达伽马（Vasco da Gama）来到，看到和征服到的地方，比恺撒（Julius Caesar）要多得多和快得多。这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在很短的一些年中，葡萄牙的船只完全主宰了印度洋的大规模贸易。这个事业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这么快地建立起来的？

后一个问题回答起来要相对容易些：备有火炮的船只的技术优势，在大西洋沿岸欧洲地区在前两个世纪就发展起来了，对其关键性的技术发明，即在船的实际船身上而不是在船甲板上面开炮口，在1501年实现了。^[110]是这种技术上的优势足以解释葡萄牙人的成功呢，还是我们必须另外加上这种为桑塞姆（George B.Sansom）所坚持的意见，即葡萄牙人“用一种决心获得成功的精神来到亚洲，它比亚洲各民族进行抵抗的意志更坚强。”^[111]呢？或许，虽然我倾向于认为文化特质像共同心理的精神这一类，是非常特有的社会结构集合的产物，不会比它们的基础维持得更为长久的多。

无论如何，约从1509年起，当葡萄牙人在第乌（Diu）打败埃及（Egyptian）舰队时，葡萄牙海军在印度洋保持了“无可争议的霸权”。^[112]加上在16世纪中[但在马六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只是到

1570年]，葡萄牙商人们将不只是出现在那里，而且出现在中国海（China Sea），在非洲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在南大西洋（Atlantic），在纽芬兰（Newfound-land），当然也出现在欧洲。“因此，一个葡萄牙人的经济出现在每个地方。”^[113]

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控制系统基本上是很简单的：一支有两个分遣队的舰队[一个封锁红海（Red Sea），另一个在印度西海岸巡逻]，一位在果阿（Goa）的总督和七个在其边缘地区的堡垒。^[114]为着商业的目的，他们维持着一系列商站（feitoria），并建立了三个大的中间市场：马六甲（Malacca），卡利卡特（Calicut）和霍尔姆兹（Ormuz），及一个在亚丁（Aden）的辅助站。^[115]它们中最大的是马六甲，它成为一个巨大的仓库货栈和集散地，它所处的位置几乎是势在必然的，因为季风迫使航船由东而来者在那里卸货。^[116]这种结构是由葡萄牙在这种背景中的主角地位发展而来的，阿尔布奎基（Affonso Albuquerque）努力建构它，以作为对这个事业的军事困境的一种解决办法。^[117]

从整体上说这种贸易掌握在国家手中，^[118]而当葡萄牙的作用在16世纪后期开始减弱时，私人方面完全从减少的贸易中撤了出来，因为危险性增加了。^[119]

在少数小的地区，葡萄牙人实行直接的统治。在几个地区像交趾（Cochin）或锡兰（Ceylon），当地统治者处于葡萄牙的“保护”之下。但是在大多数地方，葡萄牙没有号称进行政治统治，而是“在流通和贸易上与他们所了解到的国家中的法律、惯例和习俗遵从一致。”^[120]如拉什（Donald F.Lach）所说，欧洲人在那时“主要对那些有着有效的统一与中央政府，有助于提供利于贸易稳定状态，及传播基督福音的有利环境的国家有兴趣。”^[121]

要弄清为什么我们不把印度洋贸易地区看作欧洲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尽管在事实上它完全被一个欧洲强国所控制，就必须继续注意这种

控制对有关亚洲国家的意义，它对于欧洲的意义，及如何将其与那些在伊比利亚（Iberian）人统治下南北美洲的部分相比较。

看来几乎无疑的是，葡萄牙首先在印度洋，其后在中国海迅速取得优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如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所说的“海上贸易的真空”，它在当时在两个地区存在：“亚洲的巨大贸易——其中与欧洲的长途贸易只是很小一部分，它向第一个到来者开放，葡萄牙人来到并获取了它。而当这种真空持续到欧洲压倒了葡萄牙人或亚洲抵抗了他们之前，是由他们来独占的。”^[122]这个真空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因为它是理解葡萄牙人没有创造这个贸易这种情况的中心。他们获取一个先已存在的贸易网，在那时掌握在印度洋的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古吉拉特（Gujeratis）人]和中国海的倭寇（Wako）海盗手中。^[123]驱逐首先及时到来的穆斯林商人，“靠的是野蛮的武力而非和平的竞争。”^[124]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和海军上的优势。^[125]

从亚洲到里斯本（Lisbon）的大宗进口是胡椒，或胡椒和香料。在15世纪末葡萄牙获胜之前，欧洲已经大约消费了亚洲产品的1/4；^[126]并且，为了满足欧洲增长的需求，亚洲的生产量在这个世纪进程中增长了一倍；^[127]作为交换，亚洲从欧洲主要得到的是银锭和金锭。^[128]银大部分来自南北美洲和日本，^[129]金似乎首先来自西非洲，^[130]其次来自东南非洲、苏门答腊（Sumatra）和中国。^[131]

欧洲囤积金银的热情是众所周知的，因而这种在形式上支付的不平衡能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确实是奇怪的。但是如果欧洲需要亚洲的供给，看来这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与亚洲那时不是欧洲世界经济一部分这个基本想法相符合的，因为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通常为亚洲各国所建立的框架和条件所规定。除了那些生活在少数殖民据点的人们，欧洲人在那里都只是被容忍而已。”^[132]尽管欧洲有着军事优势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军事优势只是一种

海军优势。^[133]

从亚洲人的观点看，这些葡萄牙商人在一个重要方面与那些此前历史上的商人不同。这些购买者“不是商人——私人企业家，而是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从一个外国的名义，作为其商人与国家的代表行动。”^[134]这意味着贸易关系（确实其价格）是由国际法所承认的条约来规定。但是国家必须与国家打交道。而这需要使葡萄牙人有一段时间使他们习惯于他们遇到的高水平的国家尊严。^[135]最初，葡萄牙人乐于用掠夺带来巨额的利润，但是在短短10年后，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政策。^[136]他们转而变为亚洲内部贸易的仲裁人和中介，他们用以此得到的利润投资于好望角（Cape）航路贸易，把香料和金银都带到葡萄牙。像戈丁诺（Godinho）说的，这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个“超乎它的可能性的（过分的démésurée）的事业。”^[137]他们牺牲了金银（和更多的东西）来得到香料，但是他们没有达到一种“集中的亚洲间贸易”，这是一种“在亚洲全然新奇的事物。”^[138]将它翻译为欧洲世界经济用语，葡萄牙作为中间人的角色意味着“欧洲进口的一大部分得自船运和商业服务的无形出口。”^[139]亚洲间贸易对于葡萄牙卷入亚洲的经济成效的重要程度，为这个事实显示出来，只是在75年之后的1578年，第一艘直达的快船（一个笔直的“跑马场”，une carrière de droiture）才从里斯本（Lisbon）到达马六甲（Malacca）。^[140]

因而对亚洲而言，葡萄牙商人意味着两件事：亚洲商人必须与一个作为商人代理者的国家打交道，亚洲间的贸易要符合经济原则。而范吕尔（J.C.van Leur）不认为这些加起来足以证明其可称之为社会变化：

葡萄牙殖民政权.....没有把一种独特的新经济因素引入南部亚洲的商业.....葡萄牙政权只是给现有的航运和贸易结构引入了一个非密集型的出口。下一个时期[荷兰人（Dutch）的时期]才及时组织了对外贸易和对外航运的新体系，它创生了有效的殖民关系，它也在欧洲创造了新的经济形式——这大概不是直接的结果，而是这种体系所支持的一种平行发展.....

贸易在国际间的亚洲特性保留了下来，而东方国家的政治独立实际上未被欧洲的影响所侵犯。大的亚洲间贸易航路保持着它充分的重要性。^[141]

文献倾向于支持范吕尔（van Leur）的评价。^[142]葡萄牙人到来并发现了一个繁荣的世界经济。他们把它组织得更好一点，并带回国内一些货物作为他们努力的回报。经济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的上层结构一样，大部分保持未被触动。主要的变化发生在胡椒生产上，这是唯一“出现大规模生产”的香料。^[143]但种胡椒的技术是如此简单，它只需要很少的劳动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扩大生产，因为胡椒有一个重要的特质：“一旦种下去就不需要照看它。”^[144]所以，葡萄牙控制下的一个世纪对亚洲大多数人意味着，是葡萄牙人而不是阿拉伯人获得了利润。印度史学家潘尼迦（K.M.Pannikar）的说法总结了这种见解：

对印度统治者还是他们的商人而言，把他们的货物卖给葡萄牙人或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葡萄牙人具有他们能够卖给印度统治者所需的武器装备的优势。就有关的印度商人而言，不久他们就努力获得了一种许可制度，通过它他们能在没有阿拉伯商人竞争的情况下进行贸易，在这种意义上，葡萄牙的垄断可以说帮助他们。^[145]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事实上，“葡萄牙国王们的事业……把保护、运输和货物转运的垄断结合在一起，”^[146]博克塞（Charles Boxer）能够将葡萄牙的海上霸权称为一种“本身脆弱的上层结构。”^[147]亚洲或甚至印度洋的边缘地区，在16世纪没有变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亚洲是欧洲贸易的一个外部竞争场，确实是基于某些不平等的条件。这就是说，靠武力强加的垄断因素介入了市场的运作。用肖努（Chaunu）的话来说，有着一场葡萄牙的“制海权征服”（Conquista）。^[148]但是亚洲的内部生活虽有这种接触却基本保持未变。确实难于证明，亚洲的农业生产是欧洲劳动分工在当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葡萄牙亚洲贸易对欧洲的影响，就能找到进一步的证据。欧洲在16世纪没有征服亚洲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它的军事优势

只是在海上。[\[149\]](#)在陆地上它面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的攻击仍在退却，[\[150\]](#)这种军事均势只是在工业革命时才改变。[\[151\]](#)

亚洲那时供给欧洲的是奢侈品。现在奢侈品是重要的而不应加以蔑视，但它们比起食品（粮食、牲畜、鱼、糖）处于第二位，需要人力来生产它们。它们比起金银也处于第二位，不是指贮藏的金银，而是作为货币的金银（虽然只有魔法使金银能用作货币，这个魔法是由于如果需要，它最终可以用作一种商品的可能性。）与食品甚至金银相比较，一个世界经济能够相对容易地转换奢侈品的供应。

胡椒已可以证明不完全是一种奢侈品，甚至香料也不是，因为它们对保存食物是重要的，还可以作为药品。[\[152\]](#)这又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要保存的食物大部分是肉类，不完全是一种奢侈品，但也不完全属于那些维持生命的食物，药品也是如此。[\[153\]](#)当然如肖努（Chaunu）所论证的，随着欧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世界力量均衡的改变，胡椒变得更不是一种奢侈品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于它是在多大程度上如此：

（胡椒）是什么时候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传统上显示有几个转折点（jalons）。其中第一个是在12与13世纪东方和西方在地中海的接触，即是在十字军（Crusades）的时代。要说出实际情况有两个因素必须予以考虑。胡椒消费的增长必然一定与14、15世纪肉类消费的增加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被清楚证实的现象。然而包括遥远的和昂贵的产品的消费类型更为持久得多的发展，在我看来与从12和13世纪以来的权力状况的转换是不可分的。在13（世纪）的状况下香料的获得构成了一种奢侈品。为了得到它们需要发展力量。它使得西方基督教世界慢慢地发展其潜力，（慢慢地揭示其能力 *le lent décollément de ses moyens*）。这种力量使得西方产生具有一个又一个各种对味蕾和神经系统的刺激，这是拉丁基督教世界比起东方文明来不那么敏感产生的。[\[154\]](#)

无论如何，在这种程度上胡椒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半必需品，正是西非洲的几内亚胡椒（Malagnette）而不是亚洲的产品，在数量上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在价格上的话。[\[155\]](#)

当然对葡萄牙而言，亚洲的贸易有利可图是没有问题的。这毕竟是

其目的所在。戈丁诺（Godinho）用了25页来估算它。一个也许是特别的例子就足够了。阿尔布奎基（Albuquerque）在1512年估算商品的获利价值为葡萄牙送出货币的8倍。^[156]因而易于看到，为什么胡椒是“（16和17世纪）最著名的投机商品，吸引着那个时代最大的商人和资本家们的注意力。”^[157]胡椒的可分性和耐久性如同其带来的利润一样，“使它成为投机的一个极好目标。”^[158]

这种投机不只是属于那些作为个人企业家的资本家们。突出的是葡萄牙国家寻求“使用军事力量来增加国家财富，”莱恩（Frederic Lane）对此作了系统论述。^[159]我们下面将考虑一下这种政策的代价。但是在这里插入一段莱恩（Lane）对这种集体“投机活动”的估计是恰当的：

在50年或100年这个长时期内，一种更和平的政策能助长东方贸易一个更大的发展，可以使国家更富有。虽然征服印度在一段时间内增长了葡萄牙的国家收入，后来却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因此它不能为使用武力增加国家的繁荣提供一个清楚的成功范例。^[160]

但葡萄牙能够推行一种“更和平的政策”吗？这是令人怀疑的，部分正如莱恩（Lane）自己指出的，是因为在1500年在葡萄牙存在的资本和劳力的性质。^[161]

然而，对获利可能性的讨论使得我们清楚了在外部竞争场经商获利的局限。这种利润就当时所说到和做到的都是属于掠夺而来。而掠夺是从长远看于己不利的，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框架中进行剥削才能加强自己。

如果我们对在亚洲的伊比利亚人（Iberia）和在南北美洲的伊比利亚人试图作系统的比较研究，可能这一点就会更清楚了。首先应当讲一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关系。教皇的圣谕“共存中间线”（Inter Coetera）在1493年6月的第二个文本中划了一道著名的界线，妄自将非欧洲人世界分配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照管，以达到传布基督教的目的。^[162]在大西洋

地区，它就意味着承认葡萄牙对巴西（Brazil）和大西洋上不属加勒比海（non-Caribbean）岛屿的主权，而西班牙则统治大部分大陆。亚洲则妄自“分配”给葡萄牙。但是麦哲伦（Magellan）说服了查理五世（Charles V）重新解释这幅地图，在16世纪估算经度是件困难的事，他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在1520年对菲律宾（Philippines）宣称其占领权，[\[163\]](#)但直到1564年占领才成为事实。确实，只是当葡萄牙作为胡椒供应的来源的地位因威尼斯（Venice）作用的复兴而开始动摇时，西班牙才派出它的远征队去菲律宾寻找胡椒，并到达中国。[\[164\]](#)

于是我们面对的就是在南北美洲西班牙起着大部分作用，葡萄牙则占据了一角，在亚洲葡萄牙起着大部分作用，西班牙则占据了一角。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地区伊比利亚人（Iberian）的政策是多么大致相似。因为在16世纪，伊比利亚（Iberia）在南北美洲建立的是殖民地，但在亚洲建立的是贸易商栈。[\[165\]](#)

我们已经写到了西班牙在南北美洲的政策和葡萄牙在亚洲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各自都寻求把它统治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但认识到它的错误后，两国都去使自己适应那个地区的需要。葡萄牙人企图在巴西把他们的卷入限于安排一个货物集散地，但在1530年被迫将其殖民地化，以作为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166\]](#)与此类似，西班牙人企图在菲律宾运用委托监护（encomienda）制度，但国际商业不够支付维持它的代价，他们就改用了葡萄牙的模式。“马尼拉（Manila）于是就固定于从事以新西班牙（New Spain）运来的银直接交换中国的制成品。”[\[167\]](#)

这两种不同政策的原因看来正如我们已经暗示的，是两重性的。一方面，美洲殖民化的获酬报在某种意义上要更大。另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殖民的困难要大得多。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南北美洲成为欧洲16世纪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而亚洲仍是一个外部竞争场。

我们说的酬报并不意味着短期的利润，虽然即使当时南北美洲看来比亚洲可获利要多大约50%。^[168]但是长期利润要依机运而定。亚洲贸易是进口贸易，特别是那些绕过地中海东部沿岸（Levant）的部分。确实，西班牙最终放弃马尼拉大型帆船队（Manila Galleon）的原因之一，的确是国内对其造成金银外流的反对。^[169]当然正如我们已指出的，这不是没有一些例外。例如看来印度的柚木森林在某种程度上并入了欧洲世界经济，作为在果阿（Goa）造船所造船的木材供应地。^[170]

但这比起从新世界（New World）所获的金银、木材、皮革和糖看来是次要的，这些产品在这一个世纪中从收集技术发展为一种使用廉价劳力在欧洲人监督之下稳定的生产形式，^[171]因而改变了有关地区的社会结构，将它们并入欧洲世界经济之中。^[172]

只是当欧洲别无选择，不能在它自己的世界经济体制内得到一种产品时，才以较高代价去外部的竞争场中获得它。以丝为例，博拉（Woodrow Borah）描述了在16世纪晚期，墨西哥（Mexican）生丝生产的失败原因。^[173]正如肖努（Chaunu）指出的，正是那时，我们才有了“大帆船队（Galleon）贸易的高峰，中国的丝大量、突然而短暂地到达东印度群岛（Indies）的市场上。”^[174]当然，当西班牙人再没有美洲的银提供给中国人，他们就不能再买丝，马尼拉大帆船队贸易也就约在1640年停止了。^[175]

作为一条总规律，一种世界经济的地理界限是一个对抗均势的问题。在中心地区力量的驱动力可能导致扩张主义的压力（如我们所知，15世纪在欧洲发生的那样）。这个体系向外扩张直到它达到失大于得的地点。一个因素当然是距离，一个与技术状况有关的变量。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60天世界的概念。有许多估算时间的方法。比较一下肖努（Chaunu）所描述的从伊比利亚（Iberia）到南北美洲的时间和从伊比利亚到亚洲的时间，对于前一点，他说“出发的旅程是一个月，返回是

六个星期，往返旅行包括装货和卸货，在两个冬季停航期之间要做的一切事，要以一年为周期。”^[176]对于后一点他则说：

最长的距离——我们可以说就是塞维利亚（Seville）在1565的情形——马尼拉轴心——15和16世纪的长期变化所产生的世界是一个5年世界。这就是说，5年是从西班牙到菲律宾作一次往返旅行所需的平均时间。^[177]

这种差别明显是很大的。

但是距离的阻力还与已建立的政权的抵抗结合在一起。南北美洲是易于征服。甚至像阿兹特克（Aztecs）和印加（Incas）这样有组织的国家，也抵抗不了欧洲的军队。亚洲完全是另一回事。无论葡萄牙还是它在17世纪的后继者，都不能运用武器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征服。因为缺乏这种手段，他们不能建立像在南北美洲和欧洲东部那种体系，在那里，一小股力量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剩余产品剥削。与这相反，它需要大量军队（葡萄牙人对付他们的海上对手）以达到获取较少量的剩余产品的目的（因为当地统治者能够坚持要大得多的百分比）。了解此事的一个方法是估计选择使用武力的有利可图性。莱恩（Frederic Lane）于是将其概念化：

我胆敢于提出一个假说，（殖民地）的事业使用武力掠夺和阻止对手的贸易（例如葡萄牙人在亚洲），在总的方面引起了利润的减少，但是许多使用武力形成保护（而不是破坏或夺取它的首都和瓦解它的劳动力）的事业，包括许多强迫劳动（例如葡萄牙人在巴西）制，享受到利润增加的好处。^[178]

在边缘地区和在外部的竞争场把握自己是两种不同的技巧。只有在边缘地区经济上更强大的群体能同样靠文化上的统治巩固它的地位。葡萄牙人远比西班牙人更懂得这一点。西班牙人比葡萄牙人把基督教皈依事业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葡萄牙人在16世纪亚洲基督教徒—穆斯林的大碰撞中更意识到他们力量的限度。肖努（Chaunu）指出，西班牙人把很大力量投入到阻止穆斯林对菲律宾的渗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但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这种对伊斯兰教深怀的敌意，这种缺乏与摩鹿

加群岛（Moluccas）穆斯林小王公做交易的能力，这难道不是要比葡萄牙人的敌意远为真实得多的解释，说明为什么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不能获得香料贸易的成功吗？”^[179]这可以与葡萄牙人在刚果（Kongo）的决定作比较。在那里他们首先进行传教、殖民甚至商品化作物农业，但后来他们认识到代价过高，退而将其作为一个货物集散地（entrepôt），在那里他们首先寻求的是奴隶和象牙。^[180]

在亚洲，印度洋的葡萄牙控制权及其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随着“漫长”的16世纪的发展，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挑战——来自阿拉伯人连同威尼斯[老的地中海东部沿岸（Levant）航路]，来自欧洲西北部升起的新星（英格兰和荷兰），和来自亚洲复兴的本地力量。

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论述了在“第二个”16世纪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复兴。因而，让我们在此只是简略回顾一下这件事。隔断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需要代价高昂的封锁。事情的中心是“葡萄牙不足以富有到能维持这个巨大的网络，它的堡垒，它花费昂贵的分遣舰队，它的官吏。”^[181]到1530年代，土耳其人（Turks）再度能够在波斯湾（Persian Gulf）登陆，从这时起葡萄牙的贸易份额下降了。^[182]到1560年，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出口到欧洲的香料如同15世纪晚期一样多，^[183]虽然确实在所占比例上比以前要小。而且葡萄牙人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降低他们的价格来与威尼斯人（Venetian）竞争。^[184]当然我们只是谈到胡椒贸易，因为药材贸易似乎没有这样为葡萄牙所垄断。^[185]确实葡萄牙的衰落可以由这个事实来衡量，最终于1580年之后，他们寻求在威尼斯的贸易中获得一份给自己。^[186]葡萄牙的衰落因而是很确实的。戈丁诺（Godinho）警告我们不要走另一个极端，将威尼斯的上升看作一幅乐观的图景。^[187]这个观点我们已有机会论述过了。因为威尼斯不能拿到所有葡萄牙所失去的东西。

一个更有力的竞争是来自欧洲西北部。我们不会忘记当西班牙和法

国的国王都在1557年宣告破产，葡萄牙国王就在1560年加以仿效，我们将不评论荷兰和英国兴起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香料贸易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事实上有两种香料贸易，通常称为“亚洲包卖贸易”和“欧洲包卖贸易”。这就是说，把香料从亚洲带到里斯本（Lisbon）或威尼斯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有利可图，把同样的香料再出售给他们最终的欧洲消费者也有利可图，这些消费者主要要到欧洲北部去找。[\[188\]](#)

葡萄牙人没有在欧洲出售胡椒的网络，特别是在安特卫普（Antwerp）衰落以后。他们与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肖努（Chaunu）谈到1585年的葡萄牙：

西班牙国王从1580年起统治着里斯本，但由于切断了与北方的关系，提供了不在欧洲的贸易机会。意大利不够强大（nést pas du taille），在西班牙没有人会寄希望于它。他必须以德意志（German）资本主义的一切力量替代安特卫普，这就是韦尔塞家族（Welsers）和福格家族（Fuggers）。

难道还能比这说得更清楚吗？欧洲的贸易最终比亚洲贸易取得了优先地位。[\[189\]](#)

但是韦尔塞家族（Welsers）和福格家族（Fuggers）也同样不够强大到足以对抗英国人和荷兰人（Dutch）。[\[190\]](#)荷兰的兴起事实上是对威尼斯的最后一击，因为阿姆斯特丹“比（里斯本）更有效地折断了旧地中海商业的脖子。”[\[191\]](#)

荷兰人（和英国人）不只在欧洲具有优势。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优势有着分外的财富收益。他们能够不仅从贸易，还从掠夺葡萄牙船只获取利润。[\[192\]](#)尽管如此，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没有在亚洲的总背景上纳入新的因素。他们继续扮演葡萄牙人那种中间经纪人的角色。[\[193\]](#)

这就使我们要看看在亚洲到底发生了什么。当葡萄牙人垮台时，亚洲统治者恢复了某种控制。例如，从1570年起在马六甲海峡，爪哇人（Javanese）至少在荷兰人于1596年闯入之前获取了香料贸易。有一段

时间葡萄牙人因他们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运货贸易的新垄断作为补偿。^[194]但是当日本人开始克服其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时，他们就不再需要葡萄牙人。起初明朝皇帝（Ming Emperors）因为愤恨倭寇（Wako）海盗，禁止日本人贸易。一旦倭寇受到控制，直接贸易就再度成为可能。此外，此时荷兰人和英国人来到这个场所，对西班牙（及葡萄牙）绝非好消息。日本人对耶稣会士（Jesuits）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是日本有可能与世界隔离的时候了，特别是因为本地的手工业者正在削减对中国丝的需求。^[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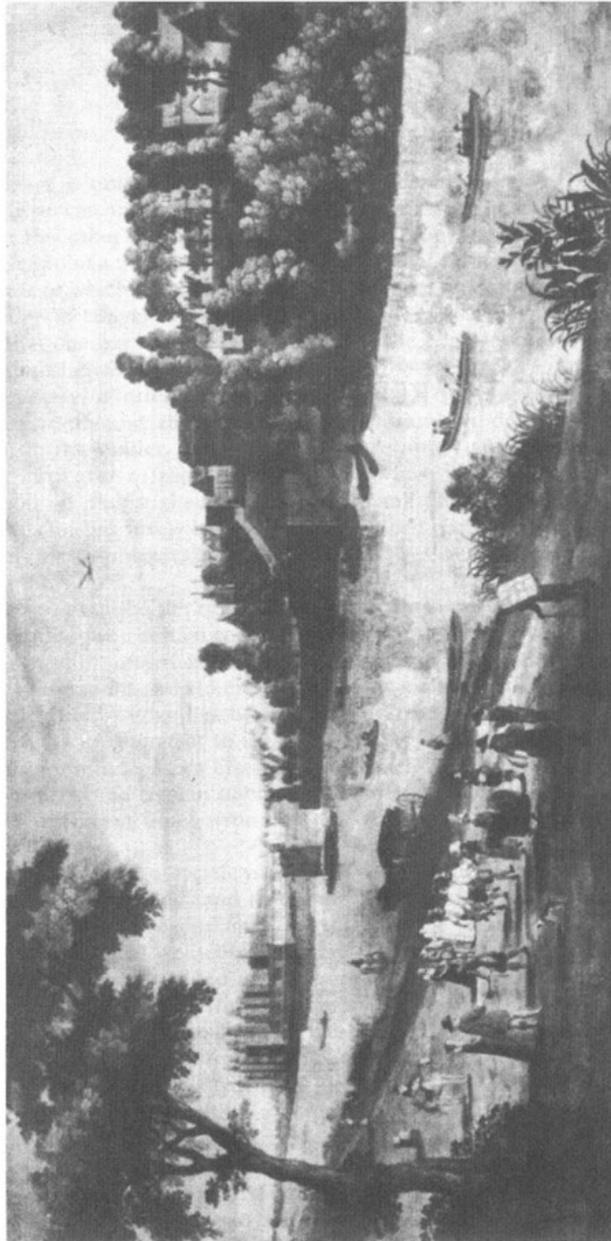
可能日本的隔离这种事态是由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过于积极引起的，如博克塞（C.R.Boxer）所认为的。^[196]人们必须认真地看待博克塞（Boxer）提出的这个说法，他广博的知识和历史的判断力博得了尊重。然而，他几乎没有提出具体的经验性证据来支持他的判断。为什么他们在内部力量进一步增强，与任何世界经济联系薄弱的情况下，非要采取隔离政策呢？

葡萄牙公民自己吸取了货物集散地繁荣衰落的教训。他们开始自己切断与母国的关系，并调整自己以适应在亚洲生存。他们在经济关系上大部分成为欧洲血统的亚洲人，虽然在政治关系上并不如此之甚，而在文化关系上无疑绝非如此。哈里森（J.B.Harrison）描述了印度小邦（Estado da India）在16世纪进程中日益增强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自治，这是一个与葡萄牙人在亚洲间贸易中重要性的增长相伴随的过程。^[197]随着葡萄牙人在国内和在印度之间利益日益增加的冲突，

葡萄牙人嵌入了东方世界，作为“已成家者”（Casados，在字义上指那些维持一个家庭的人）定居在各个地方，他们使自己与地方或地区的利益相适应，投入地方或区间的经营交易中去。^[198]

当西班牙于1580年合并了葡萄牙时，这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过程。当地的葡萄牙人不希望卡斯提尔人（Castilians）打进他们的市场，西班牙

国王也没有力量强迫他们。[\[199\]](#)但这意味着伊比利亚人（Iberian）一个世纪的卷入没有把亚洲纳入一个边缘地区的行列，而是将其推开得更远了。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欧洲才强大得足以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吞并。



第七章插图 “里奇蒙的宫殿”

David Vinckenboons的油画作品。（1600-1625）

Cambridge: Fitzwilliam Museum.

“里奇蒙的宫殿”（Richmond Palace），或“里奇蒙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Richmond），一幅17世纪前25年中的油画，文肯彭斯（David Vinkenboons）（1578～1629）所作。他是一位佛兰德的（Flemish）艺术家，他移民到英格兰，在詹姆斯一世（James I）和查理一世（Charles I）时代受王家委托绘画。

[1] 对于这种贸易的一个总结，请看克伦本兹（H.Kellenbenz）：《欧洲贸易的陆上交通，江河与海上航运》（Landverkehr, Fluss-und See schiffahrt im Europaischen Handel），见《15～16世纪世界大规模海上贸易，海洋史国际委员会第七次讨论会》（*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 le monde, XVe-XIXe siècles, VII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巴黎，1965年（Parisi S.E.V.P.E.N）132～137页。

[2] 弗塔多《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Celsu Furtad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3] 如果历史学家们说到西方在16到18世纪之间有“再封建化”，……一个类似于在土耳其（Turkey）发生的现象……布希—赞特纳（Busch-Zantner）开拓性的著作指出……这些自营地（tschifitliks）从他的观点看来，是在产粮地区出现并作为改良过程的一部分而创建的。巴坎（Ömar Lutfi Burkan）和他的学生们……考察到现代财产的这种增长对苏丹们（sultans）和巴夏们（pashas）有利，我们知道他们已专心于粮食的“繁荣景气”……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出售小麦给西方购买者的权利而禁止“人民”这样做。我们能够推测这种改变的程度。土耳其像西欧一样，在一个价格“革命”和农业革命的时代生存下来了，作为其结果，那里像其他地方一样人口增长了。“布罗代尔”（Braudel）《地中海》（*La Méditerranée*）第1卷，357页。

[4] 我们见解的实质艾略特（J.H.Elliott）提到过。他承认，“在欧洲边疆地区（就是东部欧洲）生活的几个特点在俄罗斯的土壤上发现了。”由此他谈到这个事实，在这两个地区在那时都发现了用强制劳动为市场生产高品粮的大领地生产。尽管如此，艾略特说：“莫斯科公国（Muscovy）的农奴社会仍保持着一个它自己的世界，威胁它的邻居，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在增长，但在经济上仍与欧洲世界无关。在另一方面，波兰，西里西亚（Silesia），勃兰登堡（Brandenbury）和普鲁士（Prussia）无可挽回地被拉入西欧生活圈……”《欧洲被分裂》（*Europe Divided*）47页。见瓦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从地理政治学上说，俄罗斯的背景不是欧洲的而是欧亚大陆（Eurasian）的。中世纪的俄罗斯不那么属于东欧，而更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封建主义在俄罗斯》（*Feudalism in Russia*）《镜刊》（*Speculum*）14卷，306页。

[5] 克鲁契夫斯基（V.O.Kluchevsky）：《俄罗斯史》（*A History of Russia*），第1卷，（London, Dent, 1911）2页。

[6] 布卢姆（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1) 120页。他说：“这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这个国家面积和人口的增加。俄罗斯像西欧的大西洋沿岸国家，在16世纪从事于殖民扩张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蒙古人(Mongol)权力的崩溃，在莫斯科(Moscow)领导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在莫斯科公国边界之外巨大的欧亚大陆土地上，似乎能够获得无限领土的机会。”

[7] “对喀山(Kazan)的征服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胜利和重要的政治成就。从宗教的观点看，它被理解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瓦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莫斯科公国的沙皇制，1547~1682年》(The Tsardom of Muscorg, 1547~1682)《俄罗斯史》第5卷(Vol V of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69)第一部分(Part I)，58页。

“喀山(Kazan)的陷落突然扫清了斯拉夫人(Slavs)向东方前进的障碍。”波特尔(Roger Portal)，《斯拉夫人》(*Les Slav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5) 110页。

[8] 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Tsardon*)，V, I, 175页。

[9]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resant*)，128页。见费克纳(M.V.Fechner)《俄罗斯国家在16世纪对东方地区的贸易》(*Torgovlga russkogo gosudarstva so stranani voctoka UXVI veke*)，这为摩拉(M.Mollat)等人引用来说俄罗斯与东方通过河流和商队的贸易比它与西方贸易“要重要得多”(“总是估计过分了”)，《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告》(*Relazioni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II)第3卷，780页。摩拉(Mollat)等人自己不愿采取有关著作中“没有数字”的立场。

[10] 曼科夫(A.G.Mankov)：《俄罗斯国家在十六世纪的价格变动》(*Le monuement des prix l'etat russeau XVIe siècle*) (Paris: S.E.V.P.E.N, 1957) 28页。

[11]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Braudel and Spooner)《剑桥欧洲经济史》(*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4卷，398页。

[12] 霍斯佐斯基(Stanislaw Hoszowski)：《中欧在价格革命中：16和17世纪》(*L'Europe centrale dans larévolution des prix: XVIe et XVIIe Siècles*)《年鉴》(*Annales E.S.C .XVI.3*) 14卷3期，1961年3月至6月，446页。

[13] “然而贵族的经济政策在著名的1565年政令法令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它禁止波兰商人出口波兰产品和进口外国货物，并从官方鼓励外国商人进入波兰。确实这个法律一直无效。尽管如此，它是那个时候波兰贵族政治经济政策倾向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表述，并且我们相信，这也是其他波罗的海(Baltic)国家贵族的倾向，除了瑞典之外。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时代这些贵族对待资产阶级工商业态度的特征是一种独特的(suigeneris)反重商主义。”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15和16世纪东部地方贵族操纵政治问题讨论》(über die Frage des Handels-politik des Adels in den Ostseelandern im 15, und 16, Jahrhundert)《汉萨历史文稿》(*Hansische Geschichts blatter*)，75Jh., 1957, 39页。

[14] 波兰各物的出口立即被禁止。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完全理解这个措施对波兰贵族的重要性。他对加博（Bethlen Gabor）的使节说：“占领这条河（维斯杜拉河），就关上了德意志和所有波罗的海地区交往的大门，砍断了支持波兰的神经。”[Occupato hoc flumine (the Vistula), pracluso etiam portu Dantiscano et omni maris Baltici aditu prohibito, ipse iam nervus reigerendea Poloniae in cibus est.]他是正确的。停止出口小麦使得国内的价格下落，影响到贵族和农民这些波兰的主要纳税者。在国家花费增加以支付召集军队的需要时，提高赋税变得更困难。只是由于国王和他的仆从的努力波兰才能参战整整三年，尽管有财政的困难，这场战争是需要如此之大的努力的。沙尔平斯基：《16和17世纪的波罗的海问题》（Le problème baltiqu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历史科学国际会议，斯德哥尔摩，1960年，报告，第四部分，现代史》（*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41页。

[15] 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波兰的经济退化》（La régression économique en Pologne）《波兰历史年鉴》第七期，1962（*Acta ploniae historica, VII, 1962*）40页。

[16] 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波兰的经济退化》（La régression économique en Pologne）《波兰历史年鉴》第七期，1962（*Acta ploniae historica, VII, 1962*），47~48页。

[17] 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三十年战争时期西欧和东欧的政治报告》（Les rapports politiqu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et de l'Europe Orientale à l'époque de la Guerre des Trente Ans）《十一届历史科学国际会议，斯德哥尔摩1960年，报告第四部分，现代史》（*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137页。

[18] 见霍斯佐斯基（Hoszowski）《年鉴》（*Annales E.S.C.XVI*）16卷，446页。

[19] 见霍斯佐斯基（Hoszowski）《年鉴》（*Annales E.S.C.XVI*）16卷，453页。

[20] 见帕斯库（S.Pascu），马夫罗丁（V.V.Mavrodin），鲍里斯，波尔什涅夫（Boris Porchnev）和安特列娃（I.G.Anteleva）《中欧和东南欧15到20世纪的农民运动》（*Mouvements paysans dans le centre et le Sud-est de l'Europe du XV^e au XX^e siècles*）《十二届历史科学国际会议，报告第四部分：方法论和当代史》（*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Mé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Wei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ohne, 1965*）21~35页。

[21] 曼科夫（Mankov）《价格变动》（*Le mouvement des prix*）28页。

[22] 曼科夫（Mankov）《价格变动》（*Le mouvement des prix*），38页。见38~43页的讨论。

[23]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easant*）205页。

[24] 布卢姆 (Blum), 《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8页。

[25] 见布卢姆 (Blum), 《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8~129页。见希尔顿 (K.H.Hilton) 和史密斯 (R.E.F.Smith): “应当注意, 偶然地, 广泛系列货物在16世纪与伊朗、土耳其、诺盖帐汗 (NagaiHorde) 和乌兹别克 (Uzbek) 汗国的地区贸易中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而俄罗斯有时被看作是当时一种半殖民地式的西方原材料供应者, 对于东方俄罗斯既是制成品, 也是原材料的供应者。”史密斯 (R.E.F.Smith) 《俄罗斯农民的农奴化》 (*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an Peasantny*) 一书的引言。(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8) 27页。

[26] 布卢姆 (Blum) 《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9页。

[27] 布卢姆 (Blum) 《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2页。

[28] “从伊凡大帝 (Ivan the Great) 的时代即15世纪末, 我们能容易地追溯俄罗斯与西欧联系的增长……在这个方面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的统治没有带来突然的改变。但这仍是确实的, 外来人心中的印象 (无疑在他们国内的人也如此) 是俄罗斯从此后非常不同了。”巴拉克勒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变革世界中的历史》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Blackrell, 1957) 192~193页。

[29] 布卢姆 (Blum), 《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28页。

[30] 马洛维斯特 (Malowist) 《经济史评论》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80页。

[31] 威兰 (T.S.Willan) 《16世纪下半叶英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 (*Trade Betwee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英国历史评论》63卷, 247号, 1945年7月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III No.247, July, 1945) 320页。

[32] 引自摩拉等人 (Mollat et al) 《第十届历史科学国际大会报告, 第三部分》 (*Relazioni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 Science Storiche*, III) 782页。

[33] 帕里 (Parry)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167页。

[34] (在16世纪捷克 (Czech) 的领主) 事实上不只利用强迫劳役 (corvée), 也利用工资劳动和强迫工资劳动……因此存在着工资劳动。但它是一种用封建关系重压下的工资劳动形式: “在领主领地上的工资劳动不过成为农奴的又一个义务。”瓦尔加 (Josef Válka) 《捷克领地制在16世纪的经济结构》 (*La structure économique de la seigneurie tchèque au XVIe siècle*) 《第二届国际经济史会议, 第二部分, 中世纪和现代》 (*Deuxie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II.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i Mouton, 1963) 214~215页。
“工资劳动与强迫劳役 (Corvée) 合并在一起, 尽管有这一切, 但总是在封建政权之下并受其束

缚。因此，16世纪匈牙利（Hungarian）农业的新倾向是以领主领地靠侵吞农民所有地扩张为特征的，并以领主领地的市场化生产，和使用工资劳动的形成成为特征。”帕克（Zs.S.Pach）《年鉴》21卷（*Annales, E.S.C .XXI*）1229页。

[35] 见瓦尔加（Valka）：《经济史第二届国际会议，第二部分》（*Deuxie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II*）212~213页。

[36] 帕特拉内（Josef Petráň）《经济史第二届国际会议，第二部分》（*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que II*）222页。

[37] 马洛维斯特：《经济史评论》第12卷（*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0页。

[38] 马洛维斯特：《经济史评论》第12卷（*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8页。斜体字附言。

[39] 见例如马洛维斯特（Malowist）：“外国制造品的巨大重要性没以同样的方式如在波罗的海（Baltic）国家那样阻碍俄罗斯工业的发展，因为这个国家有巨大的面积，即使这样，首先，俄罗斯的工业几乎没有发展。”《经济史评论》第12卷（*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9页。

[40] 雷诺兹（Reynolds），《欧洲的出现》（*Europe Emerges*），450，453页。

[41] 见马洛维斯特（Malowist）《过去与现在》13期（*Past & Present, No.13*）.35~36页。

[42] 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189页。

[43] （波兰）在16世纪缺乏的不是活跃的精神，这方面有许多证据，缺乏的是大规模和活跃的货币经济。如果说波兰国家是如此从根本上是脆弱的，并且国王的存在“更多的是镇压而不是行使权力”，这个解释可以在“共和国”（Republic）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中发现，也可以从不可能积累大量的银货源以拥有一支现代化军队中得到说明。布罗代尔（Braudel），*La Méditerranée*，第1卷，184页。

[44] 宫廷改革（原文如此！）的愿望使得贵族院议员寻求进一步削弱行政当局。王家特权的逐步受限制加上大贵族特权的的增长，特别是东乡边疆的大贵族，他们有在其掌握中的自己的军事力量，大量财富，和许多依附的地方乡绅作为其随从。因此，个别的大贵族拥有一切临朝君主被拒绝拥有的东西——充足的财政资源，强大的军队和政治党派的支持……在17世纪开始时，个别大贵族家族已经进行相互间的私战，毁灭了这个国家并吞没了它的资源。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波兰史》（*History of Poland*），209页。

[45] 宫廷改革（原文如此！）的愿望使得贵族院议员寻求进一步削弱行政当局。王家特权的逐步受限制加上大贵族特权的的增长，特别是东乡边疆的大贵族，他们有在其掌握中的自己的军事力量，大量财富，和许多依附的地方乡绅作为其随从。因此，个别的大贵族拥有一切临朝

君主被拒绝拥有的东西——充足的财政资源，强大的军队和政治党派的支持……在17世纪开始时，个别大贵族家族已经进行相互间的私战，毁灭了这个国家并吞没了它的资源。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波兰史》（*History of Poland*），224页。

[46] 宫廷改革（原文如此！）的愿望使得贵族院议员寻求进一步削弱行政当局。王家特权的逐步受限制加上大贵族特权的的增长，特别是东乡边疆的大贵族，他们有在其掌握中的自己的军事力量，大量财富，和许多依附的地方乡绅作为其随从。因此，个别的大贵族拥有一切临朝君主被拒绝拥有的东西——充足的财政资源，强大的军队和政治党派的支持……在17世纪开始时，个别大贵族家族已经进行相互间的私战，毁灭了这个国家并吞没了它的资源。塔兹比尔（Janusz Tazbir）《波兰史》（*History of Poland*），225页。

[47] “与教会，特别是修道院地产形成明显对照的是，王室财产在现代时期继续萎缩。亚历山大（Alexander）国王的法令（1504年）限制了王室给予、出售或抵押王室领地的权利，但是长期缺乏货币迫使他的继承者西格斯蒙德一世（Sigismund I）（1506~1548年）继续他哥哥的政策，虽然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实行。王室领地是城镇的主要安全保障。在西欧货币大部分是由商人和银行家借出的，债权人使用接管王家财政作为担保——关税或税收。但在波兰，贵族债权人和一些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一样，利用大部分机会获取王室领地。”马查克（Antoni Maczak）：（从16世纪到18世纪波兰土地财产的社会分配）（*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Poland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第三届经济史国际会议》（*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Parisi Mouton, 1968 I）第1卷，456~457页。

[48] “庄园主地产（Gutsherrschaft）包括逐渐消失的旧庄园租佃地和创建的大量小屋持有地……”赫雷纳（Helleiner）《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26页。

[49] 吕特格（Lütge），《新剑桥现代史》第2卷（*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36页。西蒙斯基（J.Siemenski）用类似的语言说到波兰：“在短期内（在16世纪）大地产变成了小国，由其领主和骑士统治，他们决定向农民阶层的征税（以劳役和运用专贵权的形成）和农民自治政府的范围。”《15和16世纪的宪政状况》（*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剑桥波兰史》第1卷（*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雷德韦（W.F.Reddaway）等人编辑，《从起源到苏比斯基（到1696年）》[*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50）427页。

[50] 甚至没收教会土地也没有帮助，除非这个地区的经济性强大到足够提供一个充分的赋税基础：“恰如在英国那样，[在易北河（Elbia）以东]解散修道院没有使得统治者独立于等级会议（the Estates）给予的信任投票。君主增长的货币需求和迅速上涨的价格迫使他们把许多修道院地产出售或抵押给贵族。……因此，与广泛持有的观点相反，君主们的权力没有为宗教改革所加强，而是继续衰落。”卡斯坦（F.L.Carsten）：《普鲁士的起源》（*Origin of Prussia*）（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endon, 1954），166页。

[51] “债务的偿付是以土地的方式，特别是领地，明显地对价格革命时代的借贷者最为有利。流行的借贷制度通过以王家地产为抵押，并将其经营权转交给借贷者作为担保而创立，它以契约和货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偿还借贷为基础。从地主的观点看，对‘公营’借贷的需求开辟了一个机会，通过在土地上进行投机性投资的手段，使资本以格外高的速度增值。借款者收到的现金通常远远低于抵押的物品的实际资本价值。这个利润额趋于加大，因为土地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扬。因而借贷者得到过高和有伸缩性的经济租金作为偿付。而当将其作为担保而拥有时，能够以更有效地利用和无情的剥削使其进一步增值。只有严重的财政失调的持续和资本市场的受限制特点，它造成了市镇经济衰落的后果，使市镇更多地受到大土地所有者和高级政府官员影响的控制，迫使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s）一再地求助依赖于这种方法。”罗森堡（Rosenberg）《美国历史评论》第一部分，49卷（*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art I, XLIX, ）22页。

君主权力有利于土地贵族的同样衰落，可以在西班牙人的那不勒斯（Naples）王国见到。因而给予出现的经济作用和政治结构之间紧密联系以进一步的证据。在那里地主转向了粮食生产，特别是在17世纪初。他们维护和增加了他们的议会特权，特别是有效地削减了西班牙总督的权力范围，用他们自己人置于高级职位来维持对官僚阶层的控制，只将较小的职位留给人贿赂，并保持了对国家军事组织的绝对最高权威。见维拉里（Villari），《反西班牙人的反抗斗争》（*La rivolta antispagnola*）3~5页、14页、17页、24~25页、28页。

[52] 泰勒（Taylor），《德国史教程》（*Course of German History*），23页。

[53] 斯普纳（Frank C.Spooner）《新剑桥现代史》第4卷（*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97页。

[54] 马洛维斯特（Malowist）《年鉴》18卷（*Annales E.S.C .XVII*），926页。

[55] 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Economic History Review*XII）189页。

[56] 因此看来北欧（Nordic）国家的情况必须认为是特殊的：“一种太严酷的冬季寒冷对耕作粮食极为有害，一连串严寒的冬天会有严重的后果，而它在法国却实际上无害，甚至是有益的。”拉杜里（Le Roy Ladurie）《气候史》（*Histoire du climat*）281页。

[57] 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hy）《俄罗斯史》第2卷（*A History of Russia*II）233页，241页。

[58] 肖夫特尔（Marc Szeftel）《俄罗斯史中封建主义情况》（*Aspects of Feudalism in Russian History*），库尔布恩（Rushton Coulbourn）编：《历史上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 New verst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6），176页。

[59] 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评论文：从9到19世纪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Review Article: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经济史

杂志》第二十四卷，第1号1964年3月（*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V, 1, Mar, 1964）56页。

[60] “这是莫斯科（Moscow）从15世纪中叶起吞并罗斯（Rus）时突然浮现的新现象。首先地方团体开始公开转向莫斯科，不管是出于他们自愿还是出于他们为自己政府的要求，这使得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统一这个国家获得了一种不同的特征和更快速的进度。这就是说，它不再是一种掠夺活动或私人谈判，而变成一种民族的，宗教的运动。”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hy）《俄罗斯史》第2卷（*A History of Russia, II*），8页。

[61] “这是莫斯科（Moscow）从15世纪中叶起吞并罗斯（Rus）时突然浮现的新现象。首先地方团体开始公开转向莫斯科，不管是出于他们自愿还是出于他们为自己政府的要求，这使得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统一这个国家获得了一种不同的特征和更快速的进度。这就是说，它不再是一种掠夺活动或私人谈判，而变成一种民族的，宗教的运动。”克鲁契夫斯基（Kluchevshy）《俄罗斯史》第2卷（*A History of Russia, II*），第2卷，44页。

[62] 这种转变所需要的不只是缩减世袭的领地（Votchina），还有暂时拥有的土地（pomestye）的出现，它是以拥有者单方面对国家执行服务为依据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大量面积的以前“黑色”（也就是自由的）农民的土地被国家再分配给它的仆人。这个突出的政治发展在一个扩张中的国家的结构和它增长的需求中，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节约。格申克龙（Alesander Gerschenkron），《俄罗斯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经济史杂志》第12卷，第2号，1952年春（*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2, Spring, 1952*）131页。对这个制度的财政根源，参见阿丹特（Ardant）：《捐税》第2卷（*Impôt, II*）1089~1097页。

[63] “修道院获取土地在16世纪后期的政治经济危机中达到了顶峰。许多世袭领地持有者（votchinniks），为防止由于经济灾难或王家没收失去他们的土地，把他们的财产给予修道院，换取对他们捐赠的全部或部分土地，或是修道院拥有的一些其他土地的终生租佃权。于是以前的财产所有者能够在修道院保护下平安地度过一生，享有他们财产的收入，避免在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统治时期包围着世袭领地持有者（votchinnik）阶级的危险。”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easant*），191~192页。

[64] “修道院获取土地在16世纪后期的政治经济危机中达到了顶峰。许多世袭领地持有者（votchinniks），为防止由于经济灾难或王家没收失去他们的土地，把他们的财产给予修道院，换取对他们捐赠的全部或部分土地，或是修道院拥有的一些其他土地的终生租佃权。于是以前的财产所有者能够在修道院保护下平安地度过一生，享有他们财产的收入，避免在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统治时期包围着世袭领地持有者（votchinnik）阶级的危险。”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easant*），247~268页。希尔顿（Hilton）和史密斯（Smith）把其开始时间定为从1460年起〔见《农奴化》（*Enserfment*），18~19页，42~46页，73~75页〕，但同意它在1649年变得明确了。（见25页，141~152页）。

[65] “在修道院的世袭领地（votchini）问题和农民阶层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二重性之事。一方面，事实上从国家财政的财务中，宫廷和服役土地中形成了修道院的世袭领地

(votchini)，而所有防止这些土地流失到修道院，并将其复归于国库和服役地的尝试，证明都是徒劳的，这迫使政府以农民的劳动（通过增加税收）以抵偿它在修道院所有权上受到的损失，而在另一方面，事实是修道院的租赁土地对国库和服役地产财政生产的可能性构成持久的威胁（由于前者便易的租赁条件诱使农民阶层离开后者），迫使政府试图减轻对农民移居权利强加限制造成的灾难。”克鲁切夫斯基（Kluckevshy），《俄罗斯史》第2卷（*A History of Russia* II）197页。有关农民阶层的总的情况，参见布卢姆（Blum）的《领主与农民》1（*Lord and Peasant*）219~246页。

[66] “在修道院的世袭领地（votchini）问题和农民阶层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二重性之事。一方面，事实上从国家财政的财务中，宫廷和服役土地中形成了修道院的世袭领地（votchini），而所有防止这些土地流失到修道院，并将其复归于国库和服役地的尝试，证明都是徒劳的，这迫使政府以农民的劳动（通过增加税收）以抵偿它在修道院所有权上受到的损失，而在另一方面，事实是修道院的租赁土地对国库和服役地产财政生产的可能性构成持久的威胁（由于前者便易的租赁条件诱使农民阶层离开后者），迫使政府试图减轻对农民移居权利强加限制造成的灾难。”克鲁切夫斯基（Kluckevshy），《俄罗斯史》第2卷（*A History of Russia* II）197页。有关农民阶层的总的情况，参见布卢姆（Blum）的《领主与农民》1（*Lord and Peasant*），142-143页。“食邑”（Kormlenie）这个词在史密斯（R.E.F.Smith）在《俄罗斯农民的农奴化》（*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Press, 1968）中被翻译为“生计”（living），156页。

[67] 正是在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的统治下，俄罗斯第一次由国家建立了直接税制度。见米勒（A.Miller），《16、17世纪莫斯科公国国家财政机构述评》（*Considerations sur l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de l'état moscovite au XVIe et XVIIe siècles.*）《社会学国际杂志》第12卷，7~8号，1932年6~8月，1932年（*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XI, 7~8, juil-août, 1932）374~378页。米勒（Miller）清楚地揭示出这与取消“食邑”（Kormlenie）的联系：“因为这些人口不再必须给‘食邑贵族’（Kormlenshchiki）交付租赋，替代的是此后为中央政府获益而收取的一系列赋税。1378页。”

[68]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度》第1卷（*Tsardom*, I）84~85页。

[69]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度》第1卷（*Tsardom*, I），85~86页。

[70]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度》第1卷（*Tsardom*, I），87~174页。

[71] “沙皇伊凡四世（Ivan IV）从外国人的观点看被认为是欧洲最富有的封建领主之一……非常有利可图的王家贸易垄断为外国贸易，完全依赖沙皇本人和他的仆从的庄园经济。”拉什琴柯，（Peter.I.Lyashchenko）《到1917年革命的俄罗斯民族经济史》（*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9）213~214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伊凡四世（Ivan IV）首先似乎对与英国商业联系的发展如此赞助。确实，鲁比曼科（Inna Lubimenko）证明他比伊丽莎白（Elizabeth）对其需要得多，而是英国的冷漠致使伊凡（Ivan）作出强烈反应。见《彼得大帝之前英国与俄罗斯的商业和政治关系》（*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politiques de L'Angleterre avec la Russie avant Pierre le Grand, Paris: Libi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33) 40~53页。

[72] “因此很清楚，海上贸易不只对俄罗斯的资本积累有利，并且加强了那些利益在于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的强大的力量……（增长着大量和富有的商人）的利益在于国内的自由贸易和海外的商业扩张，因为这种扩张能够使（他们）通过立陶宛（Lithuania）和波罗的海与西方接触，并打开了西伯利亚（Siberia），可能还有中东和远东财富的大门。”马洛维斯（Malowist），《过去与现在》第13期（*Past & Present*, No.13）38~39页。

[73]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easant*）146~147页。布卢姆也说道，“在1570年代和1580年代生产的灾难性下降。”布卢姆《16世纪俄罗斯的价格》（*Price in Rus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经济史杂志》第16卷，第2号，1956年6月（*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 2, June, 1956），196页。见拉什琴柯（Lyashchenko）：“从大规模的，封建的，自足经济的旧形式转变为农奴劳作的领地制（*pomestye*）的新形式，根植于最大限度剥削劳动力的驱动力，这不能不在16世纪的莫斯科国家整个民族经济中产生一个长期的普遍衰落……”

“通过他们的免税权，世袭领地（*votchini*）有着如此之多的特权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使他们能够容易地聚集起大量的劳动力，将农民逐步农奴化……普通的服役领地（*pomestye*）经济不能由农奴（*kholop*）〔维兰（*villein*）——见史密斯（*Smith*），162页〕劳动操作，很少有服役领地拥有农奴，更不用说其贫乏的品质了，这特别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但是它也不能把它的生产建立在完全在经济上依靠农民劳动的基础上，因为服役领地

（*pomestye*）经济的力量通常不是很大的。服役领地劳动组织的需要只有通过超经济强制得到，用将劳工奴隶化把劳动力‘束缚’在服役领地上，不只是通过债务、货款、劳役期等等，也通过‘认可’服役地主（*pomeshchik*）对农民实行强制劳动的‘权利’……”

“农民阶层的毁灭和服役地主（*pomeshchik*）方面增长着的经济压力，迫使农民减少他们的可耕地（已经‘在16世纪中叶达到95%以上’它衰落到‘在中央省……为31.6%，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省只有6.9%’这是在1580年代），并从农奴化地区逃到‘自由’土地以寻求挽救，结果是衰落的不只是服役领地本身，还有与其联系的农民经济，这在16世纪期间变得明显了。”《俄罗斯的民族经济》（*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191~193页。

[74] 见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easant*），158~159页。

[75] 曼科夫（Mankov），《价格波动》（*Lemouvement des prix*），126页。法文本中说是1570~1580年，但是从上下文看似显示出一个印刷错误，因此我予以改正。

[76]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第1卷（*Tsardom*, I）94~95页。

[77] 见瓦尔纳茨基（Vernadsky）；《沙皇制》第1卷（*Tsardom*, I），156页。他又说：“由于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立沃尼亚（Livonian）战争的结束，在俄罗斯人民这方面需要忍受许多艰苦和牺牲，与禁卫军（*oprichnina*）造成的后果一道，使俄罗斯陷入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78] 波尔什涅夫 (Porchnev),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60年, 第4卷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960, IV) 140页。

[79] 波尔什涅夫 (Porchnev),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60年, 第4卷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960, IV), 142页。

[80] 瓦尔纳茨基 (Vernadsky) 《沙皇制》第1卷 (*Tsardom*, I), 291页。

[81] 克鲁契夫斯基 (Kluchevsky), 《俄罗斯史》第3卷 (*A History of Russia*, III) 128页, 斜体字附文。

[82] “17世纪的大贵族主要是新人物。在这个世纪中叶23个为沙皇服务的最富有的商人, 只有9个是旧王公家族的后裔。其余的是沙皇非王室的亲戚, 他们的家族出自莫斯科旧贵族 (boyar) 和其他无头衔的服务阶级的成员, 包括来自小乡绅的人。”布卢姆 (Blum), 《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212页。见马洛维斯特 (Malowist), 《经济史评论》第12卷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89页, 卢布林斯卡亚 (Lublinskaya), 《法国绝对君主制》 (*French Absolutism*), 60页。

[83] “但作为一个阶级, 乡绅分享了绝对君主制的胜利。作为沙皇们在反对大贵族斗争中的王家工具, 在混乱时代 (Time of Troubles) (17世纪的头几年) 国家复兴的领袖, 和米哈伊尔 (Michael) (沙皇) 的选举者 (1613年), 他们得到的酬报是代替了世袭贵族 (Kniazhata) 和旧贵族 (boyars) 作为统治阶级。旧贵族的成员使用他们保留的部分权力徒劳地与占据国家最高职位的乡绅的这种征服斗争。他们试图坚持当时已无希望且过时的‘任官等级’ (mestnichestvo) 制度, 但是系谱学的主张不再能抵抗沙皇的意志。任命和擢升由王权作出命令, 且是经常基于功绩, 可能更经常是按偏爱的根据, 而不是按其血统。最后在1682年, 已长期废弃的任官等级 (mestnichestvo) 制度被取消了。”布卢姆 (Blum), 《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51页。

[84] 见瓦尔纳茨基 (Vernadsky), 《沙皇制度》第1卷, 394~411页。

[85] 见瓦尔纳茨基 (Vernadsky), 《镜刊》第14卷 (*Speculum*) XIV, 321~322页。

[86] 布卢姆 (Blum), 《领主与农民》 (*Lord and Peasant*), 151页。注意布卢姆偶尔不严谨地使用“乡绅” (gentry) 这个词作为“小贵族”的同义语的。见塔兹比尔 (Tazbir) 论波兰乡绅与君主制的关系: “这在1537年引起了‘母鸡战争’ (Hen’s War), 乡绅们公开表示反抗, 聚集在利沃夫 (Lwo’w) 附近准备一场武装征讨, 迫使国王、王后博纳 (Bona) 和他们周围的大贵族接受妥协。乡绅们成功的根源也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巩固。这是使用农奴工作的地产发展的结果, 它增长的幅度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 将他们从他们持有的土地上迁走, 给予他们较小的或产量较少的地块而得来的。”《波兰史》 (*History of Poland*), 176页。

[87] 例如塔兹比尔 (Tazbir), 论述波兰说“城镇的经济繁荣不能被议会 (Seym) 的法律所妨碍, 这些法律免除了乡绅购买的所有货物和他们地产上那些产品的捐税。同样的法律在其他

国家对城镇人民的处境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这在那时的波兰也存在，许多市民与乡绅混合的公司生意做得很好。1565年的法律禁止人民的粮食贸易，并禁止波兰商人出售波兰货物到海外和进口外国货物到波兰，将大城镇置于相当优越的地位，因为他们由此成为这种贸易仅有的媒介。外国商人只允许在那里展示他们的货物。然而，1565年的法律从未发生效力，禁止市民购买土地的禁令由议会（Sejm）颁布了几次，也没有能阻止城镇的发展。相反地，它有利于从商业而来的资本投资到制造业中。”《波兰史》（*History of Poland*），177~178页。

但是他也同样注意到：“在16世纪末波兰的城镇开始感受到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庄园农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一种不同的城镇在16世纪末出现，建立在大贵族的领地土地上……这些市镇是属于地方领主的财产，自然归他们用于增加剥削。贵族阶层的最高权力的产生也在其他城市中心可以感受到……乡绅的政治霸权和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农场经济的扩张，对波兰城镇和手工业的不利影响只是在较晚年代变得明显，但是一场经济危机的头一批征兆在17世纪前半期已经表现出来了。（226~227页）。”

[88] “（这种）城市的衰落由于德意志东部（East German），立沃尼亚（Livonian），波兰和波希米亚（Bohemian）贵族推行的反城市政策大大加速了……他们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打破城市对国内外贸易的垄断。他们也决心终止城市接受逃亡农民的活动……”布卢姆（Jerome Blum），《美国历史评论》第62卷，834页。

[89] 宗教改革有另一个后果〔在易北河以东（east Elbia）〕：“在普鲁士（Prussia）之外，统治者变成了大领地的所有者，因此他们作为地主的利益此后与那些贵族相一致，而与城镇的人在商业事务上相对立。”卡斯坦（Carsten），《普鲁士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russia*）166页。

[90] “最重要的是，长期持续的衰落和对东部城镇的压抑消除了对贵族阶层兴起的一切抵抗……”
“这种压抑和城镇的衰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世纪的社会平衡，开辟了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道路。在普鲁士，同样的结果靠在1466年把所有重要城镇放弃给波兰〔除了柯尼斯堡（Konigsberg）〕而达到了。”宗教改革有另一个后果〔在易北河以东（east Elbia）〕：“在普鲁士（Prussia）之外，统治者变成了大领地的所有者，因此他们作为地主的利益此后与那些贵族相一致，而与城镇的人在商业事务上相对立。”卡斯坦（Carsten），《普鲁士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russia*），116，147页。

[91] 克鲁契夫斯基（Kluchesky），《俄罗斯史》第2卷（*A History of Russia, II*）145页。

[92] 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easant*），23页。

[93] 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6页。见卡斯坦（Carsten）：“直到16世纪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谷物出口掌握在城镇手中，它们的市民从这种贸易中大量受益。当贵族对生产在市场出售的谷物更感兴趣时，就开始侵入城市企业的领域。（170页）。”

见格斯特里（Ferdo Gestrin）：“斯洛文尼亚的（Slovenian）资产阶级以相反的意义卷入了可能

是他们希望得到的总进程。比非农业生产它更多地保留与商业的联系，特别是过境贸易，但是他们在这个竞争场中被农民和领主的双重竞争所击败。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16）世纪……他们从未停止慢慢地衰落下去，尽管在他们的境况中有一些一时的改善。”《16世纪斯洛文尼亚的经济与社会》（*Economic et socièté en Slovénie au XVIe siècle*）《年鉴》第17卷（*Annales E.S.C.XVII*）687页。

见霍斯佐斯基（Hoszowski）：“〔波兰的乡绅〕不只要他们土地上产品的收入，也要他们产品的贸易而得到的收入。因为这个理由他们通过适当的议会（Seym）立法来设法确保维斯杜拉河（Vistula）上的通行自由（及它的支流），还有农业和林业产品由他们自己的领有地出口到国外的免税自由，以及从国外进口的所有用于他们自己的地产和农场的货物免于必须付税的自由。在实际活动中，封建阶级扩展了这种关税特权，不付由于他们出口粮食、牲畜和其他农场产品而应付的关税，而这是在村庄或农村市场上从农民那里买来的。他们也带着一些外国商品沿着维斯杜拉河（Vistula）不付关税进入国内，然后把这些商品出售给生活在他们地产上的人们。用这种方法，乡绅们把农产品，木材和林业产品的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把市民从这种贸易驱赶出去，严重地毁掉了城镇商人从进口货物中获利的机会。”《波兰在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中》（*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127页。

[94] “波罗的海（Baltic）国家贵族的经济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城镇的衰落。这个政策包括加强食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给予外国贸易以强有力的支持以利于制品出口。这个行动的方针是打算确保外国货物的丰富和压低它们的价格。”马洛维斯特（Malowist）《经济史评论》第12卷（*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188页。马洛维斯特称这种政策为“反重商主义”。

“波兰出口贸易的主要特征是在有关整个国家的范围内为乡绅所控制……而从国外进口大部分掌握在外国商人手里。”霍斯佐斯基，（Hoszowski）《波兰在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上》（*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eess*）129页。

“对于商业资产阶级和城市繁荣来说，在农村地区比竞争更可怕的是外国资本（从意大利和南部意志）的到来。”格斯特里（Gestrin）《年鉴》第17卷（*Aunales.E.S.C .XVII*）680页。

[95] “格但斯克（Gdańsk）的城镇居民很清楚经济优越性源于与波兰的政治联合，因此，尽管在格但斯克的贵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大多数中是德意志人血统和使用德语，却有着强烈的亲波兰倾向……〔格但斯克的人民〕渴望维持他们与波兰的联合，这是他们繁荣的来源。”霍斯佐斯基（Hoszowski）：《波兰在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上》（*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141页。

[96] “不像在西欧，那里贸易主要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职业，俄罗斯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从事商业……沙皇本人像他古代的祖先基辅（Kiev）的王公，是全帝国唯一最重要的生意人……沙皇们不限于经销他们自己领地的产品，他们维持着对许多物品的垄断……有时沙皇通过他的商业代理人和官员，垄断一种商品的全部产品，提高它的价格，然后迫使商人购买。”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easant*），129页。

[97] “除了为他们自己获利进行贸易之外，客商（gosti）还是沙皇的商务代理人，从国内最

成功的商人中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个职责。他们也被给予收取某些税的责任，被要求交付由政府规定的一定数目。作为对这些职责的酬报他们被给予一种类似于服役贵族的地位。在商人中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s）是最有名的。来自农民出身，他们在14世纪后半期在盐贸易上开始兴起。随时间推移他们把活动扩展到其他工商企业。他们成为北方殖民区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对西伯利亚财富的商业剥削上起着主导作用。”“不像在西欧，那里贸易主要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职业，俄罗斯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从事商业.....沙皇本人像他古代的祖先基辅（Kiev）的王公，是全帝国唯一最重要的生意人.....沙皇们不限于经销他们自己领地的产品，他们维持着对许多物品的垄断.....有时沙皇通过他的商业代理人和官员，垄断一种商品的全部产品，提高它的价格，然后迫使商人购买。”布卢姆（Blum）：《领主与农民》（*Lord and Peasant*），130~131页。

[98] 福斯特（Foust），《经济史杂志》21卷（*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475页。

[99] “这些与尼德兰（Netherlands）活跃的商业关系，还有与其他西方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商业关系，使我们顺便注意到，例如如果波兰贵族的财富与出口小麦到荷兰（Holland）有密切联系，相反地西方商品的自由进口，以较高的质量（特别是荷兰和英国的呢布）和较低的价格出售，促使了民族工业的毁灭。由这同样的途径，荷兰（Dutch）舰队越来越大的垄断倾向逐步导致了波罗的海域镇舰队的毁灭，包括格但斯克（Gdańsk），波兰的主要港口.....”“从他在波罗的海的特权经济地位获得了大量利润，尼德兰、英国，和不久以前的法国对欧洲这个部分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严重关注。首先，这些国家希望保持他们的贸易不受战争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注意到在斗争中（在1617，1629，1635年）进行调停的新努力.....”沙尔平斯基（Czulpinski），《历史科学第十一届国际大会报告，第四部分》（*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37页。

[100] “从16世纪后半期起，在以纽伦堡（Nuremberg）和其他城市的德意志商栈为一方，捷克（Czech）的花边公司为另一方之间就开始缔结集体契约，其中包括这些公司做出的保证，运交规定质量水平特定数量的花边，价格由契约确定。”“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看来是这种情况，由公司集体交货给商栈这种形式，在那时的新情况下，不再能确保充足数量或货品供海外出口。人们必须发展生产和商业的新形式，这就是被称为批发制度（Verlagssystem），它的起始在16世纪就可以发现，但是它的充分发展只是发生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克里马（Klima）和马库里克（J.Macurek），《中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问题（16到18世纪）》（*La question de la transition du féodalisme am capitalisme en Europe centrale 《16e-18e siècles》*）《历史科学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1960年，报告，第四部分；现代史》（*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rire moderne*）（Göteborg, Almquist & Wiksell, 1960）87页。

[101] 一个特有的特征区分开来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捷克大地产。在那里人们也看到粮食生产和初级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同时，他们继续加工农业产品，例如从粮食生产啤酒和其他初级工业产品。特别是酿造业给予了捷克的大地产，作为与相邻的德意志、波兰和北部匈牙利

(Hungary) (也就是斯洛伐克Slovakia) 大地产的区别, 它特有的特点……捷克农业生产另一个杰出的特点是特别在16世纪与相邻国家比较, 发展了池塘养鱼业……此外, 封建大地产在捷克土地上企图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在16和17世纪, 他们特别卷入了探寻金属矿、采矿业和产铁业。“从16世纪后半期起, 在以纽伦堡(Nuremberg) 和其他城市的德意志商栈为一方, 捷克(Czech) 的花边公司为另一方之间就开始缔结集体契约, 其中包括这些公司做出的保证, 运交规定质量水平特定数量的花边, 价格由契约确定。”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看来是这种情况, 由公司集体交货给商栈这种形式, 在那时的新情况下, 不再能确保充足数量或货品供海外出口。人们必须发展生产和商业的新形式, 这就是被称为批发制度(Verlagssystem), 它的起始在16世纪就可以发现, 但是它的充分发展只是发生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克里马(Klima) 和马库里克(J.Macurek), 《中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问题(16到18世纪)》(La question de la transition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en Europe centrale 《16e-18e siècles》) 《历史科学国际大会, 斯德哥尔摩, 1960年, 报告, 第四部分: 现代史》(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rie moderne) (Göteborg, Almquist & Wiksell, 1960), 99~100页。

[102] 在本国商人阶级手中资本积累的情况, 因而在俄罗斯要比在波兰有利得多, 一个优势甚至要更大, 因为俄罗斯贵族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经历了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危机, 没有很多参与大规模的贸易。

“还有, 看来当地积累的资本用于生产性目的比起波兰程度要大得多。它的投资加速了俄罗斯经济落后地区和北部与东南部边疆殖民化的步伐。它确实有助于增加对国家的内部需求和它的对外贸易至关重要产品的数量。而且, 商人们重点投资于某些工业, 例如盐矿业和乌拉尔(Urals) 的铁工业, 这对俄罗斯军队的装备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对国家人口整体而言至关重要的商品数量因而也增长了, 甚至大量农民也被卷入商品经济网中。”马洛维斯特(Malowist), 《过去与现在》第13期(Past & Present, No.13), 39页。

[103]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在羊毛丝呢中, 麻棉毛织品和长袍(svitka) 绒布在16世纪是最常见的, 这为外国访问者巴尔贝里尼(Barberini) 提供的证据所证实。他带着一种傲慢强调, 俄罗斯人不知道制造毛呢, 是从海外进口的。他告诉我们: “在俄罗斯乡间, 所有地方都同样, 他们制造普通的布供下层阶级使用, 主要是农村的人们。这些是麻、棉毛织品, 他们区分为较好的, 中等的和较差质量的几种, 在农村市场上出售。”

“第二类远不那么重要, 其中包括质量好的毛呢, 由人口中较高的阶级和沙皇宫廷使用。这主要是进口毛呢; 来自佛莱米(Flemish) (从布鲁日(Bruges)、伊普雷(Ypres)、布拉邦(Brabant)) 后来是英国。但是这一类也包括在俄罗斯制造的毛呢。特别是诺夫哥罗德(Novgorod), 以其高质量的毛呢闻名。”曼科夫(Mankov), 《价格变动》(Le mouven ent desprix), 102页。

[104] 讨论16世纪奥斯曼(Ottoman) 帝国与欧洲关系的两篇文章是刘易斯(Bernard Lewis) 《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某些反映》(Some Reflections of the Decline of Ottoman Empire) 《伊斯兰教研究》第11卷, 1958 (Studia is Lamica XI, 1958) 111~127页和巴坎(Ömer Lütfi Barkan) 的《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所见的伊斯坦堡》(La Méditerranée' de Fernand Braudel vue

d'Istamboul) 《年鉴》第9卷第2号, 1954年4月6日 (*Annales E.S.C.IX .2, avrjuin, 1954*), 189~200页。

布伦纳 (Otto Brunner) 的评论“在基于政治权力的紧密联系方面, 拜占庭 (Byzantium) 的长途商业和奢侈品贸易无疑比西欧 (类型) 更为接近俄罗斯类型 (的经济) 得多。”《欧洲与俄罗斯的市场阶层》 (*Europäisches und Russisches Bürgertum*) 《社会经济史季刊》第11卷1号, 1953年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I, 1, 1953*) 15页。

[105] 莱比尔 (A.H.Lybyer): 《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东方贸易之路》 (*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Reutes of Oriental Trade*) 《英国历史评论》第120卷, 1915年10月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 Oct, 1915*) 588页。

[106] 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40~41页。对于一件事, 即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 (Levant) 得到很好的香科供应 (见537页), 戈丁诺怀疑在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有着比短暂和浪漫的兴趣更多的想法: “亨利 (Henry) 或他那时的其他葡萄牙人确实把他们的活动指向这些 (在东方) 有着奇异事物的国家吗? 看来很难说如此; 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在那时会有兴趣企图改变对其有利的香料之路呢?” (548页)

[107] 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40~41页。对于一件事, 即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 (Levant) 得到很好的香科供应 (见537页), 戈丁诺怀疑在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有着比短暂和浪漫的兴趣更多的想法: “亨利 (Henry) 或他那时的其他葡萄牙人确实把他们的活动指向这些 (在东方) 有着奇异事物的国家吗? 看来很难说如此; 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在那时会有兴趣企图改变对其有利的香料之路呢?”, 43页, 550~551页。

[108] 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40~41页。对于一件事, 即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 (Levant) 得到很好的香科供应 (见537页), 戈丁诺怀疑在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有着比短暂和浪漫的兴趣更多的想法: “亨利 (Henry) 或他那时的其他葡萄牙人确实把他们的活动指向这些 (在东方) 有着奇异事物的国家吗? 看来很难说如此; 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在那时会有兴趣企图改变对其有利的香料之路呢?”, 551页。

[109] 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e*) 40~41页。对于一件事, 即欧洲似乎通过地中海东部 (Levant) 得到很好的香科供应 (见537页), 戈丁诺怀疑在那时葡萄牙人对香料有着比短暂和浪漫的兴趣更多的想法: “亨利 (Henry) 或他那时的其他葡萄牙人确实把他们的活动指向这些 (在东方) 有着奇异事物的国家吗? 看来很难说如此; 为什么葡萄牙商业在那时会有兴趣企图改变对其有利的香料之路呢?”, 831页。见830页上的图表。

[110] (开凿炮门) 有着很大重要性。它使较大的船只有大量增加其大炮的可能性。把炮装在主甲板上, 不只使其可能装置得多得多, 也使得使用大得多的炮、而又不危及船的稳定性成为可能.....

“当大西洋沿岸欧洲地区的航行船只到达 (印度洋), 几乎没有什么能抵抗他们。当1513年阿尔

布奎基（Albuquerque）骄傲地写给国王的信说，‘谣言说我们来到时，所有（当地的）船只都消失了，甚至鸟儿也不再掠过海面，’它不是夸张的文章。在他们初次来到印度海面后15年内，葡萄牙人完全摧毁了阿拉伯人的海军力量，国王能够有理由自称为‘埃塞俄比亚（Ethiopia）、阿拉伯（Arabia）、波斯（Persia）和印度的征服、航海与商业之主。’”奇波拉（Carlo M.Cipola），《大炮与航海》（*Guns and Sails*）82，137页。

对这个时代葡萄牙船只的详细描述，见莫罗（Francois Mauro），《16和17世纪葡萄牙在大西洋的船只类型和海军建设》（*Types de navires et constructions navales dans L’Atlantique portugais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现代与当代史杂志》第4卷，1959年7月~8月（*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 juil.-août 1959）185~193页。

[111] 这被博克塞（Boxer）赞同地引用，他提出了怀疑技术解释是否充分的理由：“但这种垄断不像它表现得那样如此包括一切。除了葡萄牙从来没有拥有足够的战船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强制实行它之外，腐化的殖民地官员很容易贿赂，并且当地的船只经常为葡萄牙商人（或以他们的名义）运货。”《葡萄牙人在东方，1500~1800年》（*The Portuguese in the East, 1500~1800*）在利弗莫尔（Livermore）编辑的《葡萄牙和巴西，一个介绍》（*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Press, Clarendon, 1953），193页。

[112]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18页。

[113]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19页。

[114]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71页。

[115]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91，595页。

[116]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94页。

[117] “当有着相等的海上力量的欧洲竞争者们向葡萄牙人的权利挑战时，保卫巨大的已往赢得的贸易需要有严密的组织，这些驻防要塞需要军队来抵抗欧洲人的攻击，并在缺乏海军支持时能坚持下去。葡萄牙的回答是由他们的总督（Governor）阿尔布奎基（Affonso Albuquerque）以论文的形式精密计划的，他发展出建立一系列独立堡垒的计划，并为了通过果阿（Goa）的货物集散地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沟通贸易，对欧洲通过唯一的港口里斯本（Lisbon）在欧洲贸易，他将防卫系统集中在波斯湾（Persian Gulf）和亚丁湾（Gulf of Aden）易受攻击的地区，他建设发展混血人口来解决人力问题。”里奇（Rich）《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204~205页。

[118] “由国家进行的最大规模海外商业是葡萄牙的印度人的贸易，还有在非洲海岸的中介港口——一种完全开辟了新领域的贸易。从最早期直到1577年，这种殖民地贸易一直进行，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这种贸易的法律制度被保持了下来，它完全为君主的利益进行，由他自己承担风险，用他自己的船，发给私家商人印度贸易的许可证只是例外的情况，虽然在非洲贸易中更为往常一些。”赫克谢尔（Heckscher），《重商主义》第1卷（*Mercantilism*, I），341页。

[119] “然而，从16世纪末起，不幸落到了好望角（Cape）航路上，它的交通大幅度衰落了。现在英国人和荷兰人带着大量货船的胡椒，和其他香料和药材到欧洲，这就是为什么从1597年开始，贸易回到国家掌握的根本原因。私人企业家不再敢于冒险组成公司来‘收获’退回货品（‘*laferme de trazida*’）……荷兰人在进行早期避免不了的战争，以图从贸易和接获葡萄牙船只中获利；他们的船往返旅行不怕攻击，而葡萄牙人不是如此。因而私人企业家不希望投入他们的资本，一共只有少量资本投入。大多数资本是国家投资的，不足以组成一个公司。”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696~697页。

[120] “然而，从16世纪末起，不幸落到了好望角（Cape）航路上，它的交通大幅度衰落了。现在英国人和荷兰人带着大量货船的胡椒，和其他香料和药材到欧洲，这就是为什么从1597年开始，贸易回到国家掌握的根本原因。私人企业家不再敢于冒险组成公司来‘收获’退回货品（‘*laferme de trazida*’）……荷兰人在进行早期避免不了的战争，以图从贸易和接获葡萄牙船只中获利；他们的船往返旅行不怕攻击，而葡萄牙人不是如此。因而私人企业家不希望投入他们的资本，一共只有少量资本投入。大多数资本是国家投资的，不足以组成一个公司。”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656页。

[121] 拉什（Donald F.Lach）《欧洲成长中的亚洲》第1卷《发现的世纪》（*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Chicago Illinois Univ.of Chicago Press, 1965）第2本（Book II），827~828页。

[122] 特雷弗-罗珀（H.R.Trevor-Roper）《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s*），120页。

[123] 关于在印度洋上驱逐穆斯林（Moslems），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uese*）630页。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45~48页。关于葡萄牙人取代倭寇（Wako）海盗，见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s*）》120页，它依次根据博克塞（Boxer），《日本的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和桑塞姆（Sansom），《日本史》第2卷（*A History of Japan, II*），208页。

[124] 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Poutuguese Seaborne Empire*），46页。

[125] “对于葡萄牙人幸运的是，当他们出现在亚洲海面时，埃及（Egypt）、波斯（Persia）和维贾亚纳加尔（Vijayanagar）各帝国在印度洋没有武装船只，如果它们确实拥有任何船只，而中国船只由皇帝诏令官方限制其沿着中国海岸航行的话。”博克塞（Boxer），利弗莫尔（Livermore），《葡萄牙和巴西》（*Portugal and Brazil*）189~190页。

[126] 见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96页。

[127] 见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81~582页。博克塞 (Boxer), 《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59页。

[128] “胡椒是从东方进口的主要商品, 而银锭是向‘黄金果阿’ (Golden Goa) 的主要出口……在16世纪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中, 马拉巴尔 (Malabar) 的胡椒商人拒绝接受除黄金之外的任何东西作为付款……”博克塞 (Boxer) 《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52页, 60页。

应当提到, 肖努 (Chaunu) 认为这种贸易对欧洲是个好交易: “购买了120, 000到150, 000吨香料, 却几乎没有什么货品交换。只有150吨黄金, 主要是从弱小的非洲社会掠夺而来的, 香料的数量难于统计, 但是绝不能与留在那里作为补货的相当于6000吨的银相比。”《新世界的征服与剥削 (16世纪)》 [“*Conquête et exploitation des nouveaux mondes*” (XVIe siècle)], 《历史动态集刊》26号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26 bi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9) 323页。

[129] “与美洲的贸易使得欧洲能发展它的亚洲贸易。因为若没有新世界的银的话, 香料、胡椒、丝绸、宝石、后来的中国瓷器, 所有这些珍贵的奢侈品西方是不能得到的。”肖努 (Chaunu), 《塞维利亚》第1卷 (*Séville, I*) 13~14页。

“与西方的贸易在开辟墨西哥—秘鲁 (Mexican-Peruvian) 的银砂后的时期达到一个转折点, 因为它们的出产很大一部分流入中国, 以交换丝绸、瓷器和茶。”韦伯 (Max Weber) 《中国的宗教》 (*Religion of China*) 5页。韦伯指出在那时中国银与金的比价贬值, 从1368年的4:1到1574年的8:1, 1635年的10:1和1737年的20:1。

“次于中国与葡萄牙进行贸易的主要国家是日本。澳门 (Macao) [在16世纪] 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这个国家的金银出口。”张 (Chang), 《中国—葡萄牙贸易》 (*Sino-Portuguese Trade*), 117页。是葡萄牙人的能力控制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 给予她用于在东南亚和印度贸易的金银。

“金银产量的突然增加, 特别是在16世纪之后银的增加, 与对外贸易的新发展有紧密联系。”

“葡萄牙船只与日本贸易的发展和由此增长的利润, 事实上是用日本的银交换中国的生丝和其他商品构成的中介贸易的结果。”

“这是丰臣秀吉 (Hideyoshi) 特许贸易以确保在第三国获得中国商品的主要目的。因为明朝的政策禁止外国船只登陆大陆, 特别是日本船只。日本对外贸易享受到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贵金属生产达到了它最繁荣的顶峰。”科巴塔 (A.Kobata), 《16和17世纪日本金银的生产和使用》 (*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Japan*) 《经济史评论》第二系列, 第18卷, 2号, 1965年10月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2.Oct.1965) 245~246页。

[130] 见肖努 (Chaunu), 《征服》 (*Conquête*) 316页。

[131] 见博克塞 (Boxer), 《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60页。

[132] 拉什 (Lach), 《欧洲成长时期的亚洲》第1卷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 I*) 第Xii页。见布罗代尔 (Braudel): “在16世纪和以后的世纪里, 在生产香料、药材和丝绸的广大土地上, 因此流通着宝贵的金币特别是银币 [在地中海地区铸造]大发现可能使道路和价格变得颠倒混乱; 但它们不能改变基本的事实 [支付上的赤字]” 《地中海》第1卷 (*La Méditerranée*) 422页。

[133] “虽然欧洲人沿着海路到亚洲旅行似乎是容易的, 他们深入到主要大陆国家是不经常和困难的。并且在16世纪, 他们从未处于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印度或中国的帝国统治者的地位, 亚洲大陆大的政治文化中心绝没有受到他们武力的威胁。”拉什 (Lach), 《欧洲成长时期的亚洲》第1卷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 I*) 第Xii页。

[134] 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619页。

[135] 见达伽马 (Vasco da Gama) 在第一次遇到卡利卡特 (Calicut) 国王时失礼的奇妙故事, 载戈丁诺 (Godinho), 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588~590页。

[136] 见达伽马 (Vasco da Gama) 在第一次遇到卡利卡特 (Calicut) 国王时失礼的奇妙故事, 载戈丁诺 (Godinho), 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627~629页。

[137] 见达伽马 (Vasco da Gama) 在第一次遇到卡利卡特 (Calicut) 国王时失礼的奇妙故事, 载戈丁诺 (Godinho), 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630~631页。

[138] 迈林克-罗洛夫茨 (Meilink-Roelofs), 《亚洲贸易》 (*Asian Trade*), 119页。

[139] 奇波拉 (Cipolla), 《大炮与航海》 (*Guns and Sails*), 136页。

[140] 见戈丁诺 (Godinho), 《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655页。

[141] 范吕尔 (J.C.Van Leur) 《贸易与社会》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Hoeve Ltd 1955) 118~119页, 165页。甚至迈林克-罗洛夫茨 (Meilink-Roelofs), 他在总的方面对范吕尔的分析有保留, 也看到主要的变化只是在17世纪才发生: “现在的研究其目的只是显示早在17世纪前半期.....欧洲的优势地位就开始表现出来——就算可承认它——这并不是在任何地方, 任何方面都如此。” 《亚洲贸易》 (*Asian Trade*) 10~11页。

[142] “如果葡萄牙人不组成公司并超越千年之久的经验, 如果他们不能大大加强已经存在

的事物，葡萄牙人就不能在十五年中成功地控制印度洋的一半贸易。他们的道路分成一种新的阶层系统；他们转向最重要的贸易趋势。但是从根本上，他们没有能动千年之久的交往和交换。葡萄牙人的革命是迅速的，因为它局限于最高点。”肖努（Chaunu），《征服》

（*Conquête*），177页。

“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出现很少被感受到，除了在少数地方的少数个人之外……可能若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末放弃了他们印度帝国，他们留下的痕迹比希腊人（Greeks）、塞西亚人（Scythians）和帕提亚人（Parthians）还要少，——可能有些钱币，有些在集市语言中残缺不全的词汇，有些萎缩的混血人社团，有些外国武士和教士的流行传说。”桑塞姆（George B.Sansom）《西方世界与日本》（*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New York Knopf, 1950）87页。

“马六甲（Malacca）做为贸易的中枢连结点，甚至在它被葡萄牙人夺取后，继续进行长期建立的商业活动。”拉什（Lach）：《欧洲成长时期的亚洲》第2卷（*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Book II*），829页。

“只是由于其海岸葡萄牙人才支持住自己的地位，甚至那时他们的地位也是不稳固的。在陆地战争中，他们的优越装备用处很少，在事实上比当地武器更不适于在热带地方作战。此外，欧洲人对抗的是数量上大大超过他们的本地人，他们熟悉农村和习惯于当地气候。因此在整个16世纪期间葡萄牙的影响仍限于海岸定居地周围的小块地区。”迈林克-罗洛夫茨（Meilink-Roelofs），《亚洲贸易》（*Asian Trade*），124页。

[143]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77页。

[144]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78页。

[145] 潘尼迦（K.M.Pannikar），《亚洲和西方的统治》（*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53页。

[146] 莱恩（Frederic C.Lane），《威尼斯和历史》（*Venice and History*）426~427页。

[147] 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57页。

[148] 肖努（Chaunu），《征服》（*Conquête*）205页。见博克塞（Boxer）：“旧的葡萄牙殖民帝国本质上是一个海上霸权，一个航海和商业帝国，不管是主要与东方的香料，非洲西部的奴隶，或是与巴西的糖，烟草和黄金有关。然而它是一个以军事和教会模式造就的海上帝国。”《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种族关系，1415-1825年》（*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415-1825*）[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Press（Clarendon），1963]2页。

[149] “欧洲人的相对优势是在海上。在陆地上，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是非常易受攻击的……欧洲人直到1840年代还不能生产能作战的可移动野战炮……”
“欧洲人总体的感觉是，任何将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亚洲内地的尝试没有成功的机会……”

“晚至1689年，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势力才完全通过印度的陆地发展。”奇波拉（Cipolla）《大炮与航海》（*Guns and Sails*），138，141，145页。

[150] “当欧洲大胆地向海外扩张，并侵略性地将她的支配势力强加给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大陆时，在她的东部边疆在精神上却在土耳其军队的压力下退却。”“欧洲人的相对优势是在海上。在陆地上，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是非常易受攻击的……欧洲人直到1840年代还不能生产能作战的可移动野战炮……”

“欧洲人总体的感觉是，任何将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亚洲内地的尝试没有成功的机会……”

“晚至1689年，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势力才完全通过印度的陆地发展。”奇波拉（Cipolla）《大炮与航海》（*Guns and Sails*），140页。

[151] “欧洲人有效地征服或控制巨大的内陆，后来就成为工业革命的副产品之一。”“当欧洲大胆地向海外扩张，并侵略性地将她的支配势力强加给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大陆时，在她的东部边疆在精神上却在土耳其军队的压力下退却。”“欧洲人的相对优势是在海上。在陆地上，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是非常易受攻击的……欧洲人直到1840年代还不能生产能作战的可移动野战炮……”

“欧洲人总体的感觉是，任何将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亚洲内地的尝试没有成功的机会……”

“晚至1689年，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势力才完全通过印度的陆地发展。”奇波拉（Cipolla）《大炮与航海》（*Guns and Sails*），146页。

[152] “今天我们发现很难想象在16世纪香料的重要性……并且，当全然不知道糖时，当既没有电冰箱也没有冬季牲畜饲料用以供应除了香料调制或盐腌肉之外的任何食物时，当几乎没有蔬菜增加维生素和多种食物用餐时，当香料和其他东方药材构成了主要的药物（*materin medica*）时，它们在欧洲商业中有着确实重要的地位。”罗伯逊（Robertson）《南非经济期刊》第18卷（*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42页。然而如我们看到的，说糖在那时完全不为人所知是不真实的。蔗糖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上广泛生长，并被引入巴西，后来又引入加勒比海地区（Caribbean）。

[153] 然而应当牢记这种阶层制度的重要性。胡椒相对而言比香料更重要。肖努（Chaunu）观察到：“在16世纪贸易中胡椒不被视为是一种香料，胡椒是宫廷和肉类保存的卫士，此外没有香料或药材在这词上有狭义的声望。”《征服》（*Conquête*），200页。

[154] 然而应当牢记这种阶层制度的重要性。胡椒相对而言比香料更重要。肖努（Chaunu）观察到：“在16世纪贸易中胡椒不被视为是一种香料，胡椒是宫廷和肉类保存的卫士，此外没有香料或药材在这词上有狭义的声望。”《征服》（*Conquête*），316~317页。

[155] “非洲的香料贸易对于葡萄牙而言，显示出其交易量明显地高于除胡椒和姜之外的任何亚洲香料，并经常比它们加在一起的总量还大。单独看来，几内亚胡椒（*malaguette*）几乎总是超过姜的交易量。当然，白豆蔻荚的价格是衡量东方香料价格唯一的可比量，在1506年3月，每百公斤（*guintal*）白豆蔻荚价格为8克鲁赛多（*cruzados*），而胡椒为22克鲁赛多、肉桂为32和33克鲁赛多，姜为18到19克鲁赛多。尽管几内亚胡椒的价格低，它的总价值通常等于，有时

大于其他香料各自的总价值，胡椒和姜除外：因为百公斤白豆蔻荚为8克鲁赛多（cruzados）时，如1506年，1511年2000公斤的价值等于价格为32克鲁赛多的5000公斤肉桂或价格为19克鲁赛多的8400公斤的姜。”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47页。西非洲产品植物学上的描述和地理分布见539~542页。

[156] 这个估计可以在同上书683~709页见到。例子在699页。

[157] 格拉曼（Glamann），《欧洲贸易》（*European Trade*），52页。

[158] 格拉曼（Glamann），《欧洲贸易》（*European Trade*），53页。

[159] 莱恩（Frederic C.Lane），《国民财富和保护价格》（*National Wealth and Protection Costs*），载《威尼斯和历史》（*Venice and History*）（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376页。

[160] 莱恩（Frederic C.Lane），《国民财富和保护价格》（*National Wealth and Protection Costs*），载《威尼斯和历史》（*Venice and History*）（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381页。

[161] “葡萄牙人那时所表现的对于其他民族的优势的活动，不是精明的贸易，而是在航海和战争中大胆的冒险。由于葡萄牙人军事和宗教的传统与其阶级结构，因在印度推行的传教政策所良好地刺激起来的活力所得到的财富，比葡萄牙人通过较少的战争手段所得到的更多。一个威尼斯人（Venetian）在1500年似乎相信，葡萄牙人通过更和平的政策就能得到的更多，因为如果葡萄牙的统治阶级有着类似于1500年的威尼斯人的特色的话，就会是这种情况。在那时许多威尼斯贵族已变为投入和平的贸易和经营乡村地产。他们不再像三、四百年前威胁拜占庭（Byzantium）时那样，作商人或海上袭击者同样胜任。”莱恩（Frederic C.Lane），《国民财富和保护价格》（*National Wealth and Protection Costs*），载《威尼斯和历史》（*Venice and History*）（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395~396页。

[162] 这个故事因为外交密谋是复杂的。见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大洋的海军上将》（*Admiral of the Ocean Sea*）（Boston: Little Brown, 1942）367~374页；肖努（Chaunu），《征服》（*Conquête*）251~254页。

[163] 见肖努（Pierre Chaunu），《马尼拉的大帆船队》（*Le galion de Manille*）《年鉴》第6卷4号，1951年10月~12月（*Annales E.S.C.* VI4, oct-déc, 1951）449页。

[164] 见肖努（Pierre Chaunu），《马尼拉的大帆船队》（*Le galion de Manille*）《年鉴》第6卷4号，1951年10月~12月（*Annales E.S.C.* VI4, oct-déc, 1951），450~451页。

[165] 西班牙最初的打算是在南北美洲建立贸易据点而不是殖民地，只是由于缺乏容许这样一种关系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得西班牙开始殖民化。阿兹纳尔（Luis Aznar）描述这种发展说：“既不是未发掘的黄金矿床，不是奴隶贸易，也不是人头税.....赚到了相当于哥伦布

(Columbus) 在15世纪前三次远航的花费和付给第一批定居者薪金的钱。在小西班牙 (Hispaniola) 遭到不幸的新闻很快传播开来, 并导致了宫廷圈子中的不信任.....”
“ [宫廷改变了它的政策, 并因此] 以这种方式, 将以封建性事业起步的东西在16世纪初变为一种政府的组织系统, 作为在现代的头两个世纪的过程中殖民化国家中所建立的系统的原型。”《对印第安人立法的最初阶段》 (*Las etapas iniciales de la legislacion sobre indios*) 《美洲笔记》第7卷, 五号, 1948年9月~10月 (*Cuadernos americanos*, VII, 5, sept-oct.1948), 177~178页。

[166] “在16世纪前半期葡萄牙人认为发现巴西 (1500年) 是件次等重要的事。事实上, 努力加强对现在的巴西的海岸的控制, 大约在现在的港口桑托斯 (Santos) 和累西非 (Recife) 之间, 是一种大部分是自然而然采取的行动, 以防止法国和英国从它们所建立竞争海岸地出口巴西产颜料的树木, 以用于低地国家和英国的毛呢制造业, 只是由于害怕竞争导致在这个世纪后半期维持了占领并建立了一种种植园经济。”S.J.斯坦 (Stanley J.Stein) 和B.H.斯坦 (Barbara.H.Stein) 《拉丁美洲的殖民遗产》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22页。肖努 (Chaunu), 《征服》 (*Conquête*), 222页。

见葡萄牙对巴西态度的分析: “缺乏能够易于惊奇的财富, 减少了葡萄牙在较早年代对巴西的兴趣, 特别是当她与东印度 (East Indies) 的贸易那时正处于高峰, 为了吸引私人资本到她的美洲殖民地, 葡萄牙王室把它分为十二个可继承的捐赠领地 (donatários), 它们可以接管许多王家特权。除了在引进蔗糖种植的地区外缺乏任何经济基础, 导致了这个实验的垮台。王室不得不担负起直接责任, 花费费用来保卫长期只有很少经济价值的巨大领土。虽然形式上以葡萄牙封建机构为模式, 可继承捐赠领地制度应当看作是在王室引导下, 吸引私人资本完成商业扩张的努力, 可以与16世纪后半期在英国和荷兰建立的贸易公司相比。”弗塔多 (Celso Frutado), 《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9~10页, 注脚2。

[167] 哈里森 (Harrison), 《新剑桥现代史》第3卷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554页。

[168] “尽管如此, 我们对16世纪有一个度量等级.....如果里斯本 (Lisbon) 和远东的值为1, 巴西的值在0.5和1之间, 塞维利亚 (Seville) 的值为1.5。在17世纪初, 塞维利亚的值或多或少为里斯本的1.5倍。”肖努 (Chaunu), 《征服》 (*Conquête*), 209页。
然而这对于这种贸易对整个欧洲的重要性而言没有说明什么。“衡量塞维利亚和里斯本的份额是困难的, 这是这种垄断的份额, 伊比利亚 (Iberian) 半岛西南角的份额, 因为这种垄断比起支持它的欧洲世界更易于衡量。对有关估价由塞维利亚控制的美洲贸易和里斯本控制的亚洲贸易的重要性方面, 衡量其程度的可能性之不同, 不是由于衡量垄断本身的某些不可能性, 而是更多得多地由于我们目前不可能衡量其余的部分 (也就是不属于垄断的部分)”哈里森 (Harrison), 《新剑桥现代史》第3卷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273页。

[169] “马尼拉 (Manila) 大帆船队最大的敌人无疑是西班牙政府本身。在塞维利亚 (Seville) 的商人们的抱怨很容易传到国王的枢密院 (Council of the King) 中, 在他们和宫廷的金银通货主义信奉者的眼里, 大帆船贸易是所有与远东的贸易中最坏的: 它的赤字要由出口

贵金属来补偿。”肖努（Chauna），《年鉴》第4卷（*Annales E.S.C.VI*）458页。

反对这种金银流失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流失逐渐地甚至不经过里斯本和塞维利亚：“通过好望角（Cape）航路，（银）里亚尔铸币（*reales*）流往整个东方地区。正是靠着它们，中国贸易——瓷器、生丝和丝织品、黄金——胜过了其他贸易，导致经常来往的日本，这个丝绸的市场和银的来源的出口。一方面是中国对白银深深的渴求，西班牙属美洲的发展是另一方，共同建立了从阿卡普尔科（Acapulco）到马尼拉的直通航路，这引起了果阿（Goa）和里斯本的敌意，使他们都接近了同样受到其伤害的塞维利亚。”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833页。

西班牙的立场与英国的立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7世纪早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同样处于由于它的贸易带来了银的流失的攻击之下，许多人认为它对那时贸易的萧条负有责任。“对这种攻击通常的回答是，因为公司向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的再出口在价值上超过了送往东印度群岛的金银，这整个问题与这个国家整体上的支付平衡是不可分的。”乔杜里，《东印度公司与17世纪早期的金银出口》（*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xport of Treasur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经济史评论》第16卷，第1号，1963年8月（*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 1, Aug 1963）25页。公司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欧洲”丧失了金银，而英国没有。是西班牙没有能力把她自己置于欧洲地区间贸易的联结点上，如英国当时那样，这造成了不同之处。

[170] 见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56~57页，也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673页。

[171] 见肖努（Chaunu），《征服》（*Conquête*）290~296页，300~311页。

[172] 见博克塞（Boxer）对糖在巴西社会结构中的冲击作用的描述。《葡萄牙海上帝国》（*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84~105页。对矿业经营，见加拉（Alvaro Jara）：“毫无问题，在南北美洲的许多地区，矿业是有着重新组织甚至破坏人们在前殖民时代所具有的结构巨大力量。当地人口新的集中是由创建矿业中心产生的——我们想到的不只是玻托西（Potosi），还有许多其他银、金和水银生产中心——可能是第一次创造了这种社会现象：那些流动的被剥夺了产业的群众，被夺去了一切东西，没有未来或任何对明天的安全保证，集中在伪城市地带，在那里城市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没有那样的重要意义，即至少在城市生活的范围内可能使他们比以前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加拉（Jara），《西班牙属美洲矿业经济的三次实验》（*Tres ensayos sobre economia minera hispano-americano*），28页。

[173] 博拉（Woodrow Borah）指出，发展产丝业最初是因为它“由搬运夫或骡子成捆地容易地搬运，可望其运输费用低廉，在殖民地有肯定的市场，或是在西班牙，还有大量的利润。”《产丝业在殖民地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20号。（*Silk-raising in Colonial Mexico, Ibero-Americana*, 20）（Berkeley: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43）15页。博拉（Borah）提供了这种衰落的三个解释，在印第安人（Indians）中的衰落是因为受虐待，荷重的征税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导致他们退出和毁坏桑树林，利润的丧失是因为从菲律宾（Philippines）向世界市场的补充供应。见他对于衰落的这些原因的长篇讨论，在85~101页。

[174] 肖努 (Chaunu), 《年鉴》第6卷 (*Annales, E.S.C.VI*) 462页, (注脚1), 虽然博拉 (Borah) 似乎在一点上指出, 菲律宾贸易的兴起是墨西哥产丝业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另一点上他论证这种逆转是真实的, 由此支持了肖努: “形成对照的是, 菲律宾贸易的发展与墨西哥产丝业的衰落在时间上相合, 中国丝的大规模进口于1579年开始, 而大约在这个时候国内的产丝业开始衰落。”博拉 (Borah), 《产丝业》 (*Silk-raising*), 90页。

[175] 见肖努 (Chaunu), 《年鉴》第6卷, (*Annales, E.S.C.IV*) 460~461页。

[176] 肖努 (Chaunu), 《征服》 (*Conquête*), 290页。

[177] 肖努 (Chaunu), 《征服》 (*Conquête*), 277页, 一个关于距离—时间的长篇讨论可以在277~290页找到。

[178] 莱恩 (Lane), 《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28页。

[179] 肖努 (Chaunu), 《年鉴》第6卷 (*Annales, E.S.C.VI*), 455页, (注脚2)。

[180] 马尔卡里多 (Alfredo Margarido) 提到: “‘异教的’刚果 (Congo) 拒绝天主教 (Catholicism) 给其打上印记, 并对殖民地经济的迫切需要 (贩卖人口经济 *économie de traite*) 进行抵抗。葡萄牙人不得不摧毁这个王国, 为了创造必不可少的剩余价值, 在那里需要推行他们在南美洲的殖民化政策。”《刚果的古代王国》 (*L'ancien royaume du Congo* 《年鉴》第25卷, 6号, 1970年2月12日) (*Annales E.S.C.XXV nov-déc, 1970*), 1725页。博克塞 (Boxer) 也说道, 他称之为“有希望的实验”, 在1543年国王阿丰索一世 (Dom Affonso I) 死后垮台了, “部分是因为葡萄牙在亚洲和南美洲增长的承诺, 但主要是由于奴隶贸易的扩散和加强。”《种族关系》 (*Race Relations*) 20页。也是博克塞, 《葡萄牙海上帝国》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s*) 97~103页。巴兰迪尔 (Georges Balandier), 《刚果王国的日常生活》 (*Daily Life in the Kingdom of the Kongo*) (New York, Pantheon, 1968)。

[181] 布罗代尔 (Braudel) 《地中海》第1卷 (*La Méditerranée I*), 496页。另一个因素是在这种高利润贸易中的腐败: “在1500年之后的几十年中, 葡萄牙人在红海 (Red Sea) 贸易的道路上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迫使在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的香料价格涨到15世纪的水平之上。后来葡萄牙官员在印度变得如此无能或是易于腐化, 他们不再在经过红海和波斯湾的贸易道路上设置花费很大的障碍。”莱恩 (Frederic C.Lane) 《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33页。

[182] 见莱比尔 (Lybyer), 《英国历史评论》第30卷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XX*) 586页。

[183] 莱恩 (Lane), 《威尼斯和历史》 (*Venice and History*), 31页。

[184] 戈丁诺 (Godinho) 引用一位16世纪威尼斯商人费德里切 (Cesare de Fedrici) 的话说: “运去里斯本的胡椒不像经过美加 (Mecca) 海峡 (或许是红海) 运来的那样好, 因为葡萄

牙国王的使节在许多年以前，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与交趾（科钦）（Cochin）的国王订立了契约，确定了胡椒的价格，结果是这种价格既不能涨也不能落。由于这个价格是很低的使得农民非常不愿意地交付胡椒，造成其品质是不成熟和肮脏的。因为阿拉伯（Arab）商人所支付的价格较高，他所得到的胡椒和更好的对待。”《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638~639页。

戈丁诺（Godinho）主张在好望角（Cape）航路上的损失不是葡萄牙衰落的一个解释：“总之，在136年的过程中，这种损失总计起来在外出航行中少于11%，在回归航行中少于15%。在1558年，当草拟一份香料贸易的预算时，包括有一项每年在五只船中损失一只于归程之中

（20%）。这个计算是很有余地的。意大利人萨塞蒂（Sassetti），他熟悉地中海，并有着被迫回到他前一年离开的港口的经验，从交趾（科钦）（Cochin）写信说，从里斯本去印度比从巴塞罗那（Barcelona）到热那亚（Genoa）相对而言的危险性要小。（671页）”

可以如乔辛瑙-诺加里特（Guy Chaussinaud-Nogaret）那样，在评论戈丁诺（Godinho）的书时问道，为什么葡萄牙人在那时从未像后来的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发展起大的私人公司，这样就可以用更有效的商业手段超过他们的欧洲竞争者（在1628年建立这样一个公司的企图失败了。）

“为什么葡萄牙看来是处于一个发现了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的伟大运动的前哨，却在17世纪初发现其不能遵行北方（欧洲）（那时已存在的）模式？部分的答案难道不是在于里斯本在国际资本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如劳（Virginia Rau）所称的‘世界性投资交易’（agiotage）？

这将我们带回到这个问题，谁是香料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明显地不是掌握这种垄断的国家：‘胡椒国王’看着他的财富被所需投资的巨嘴吞没了。”《黄金，胡椒，葡萄牙与世界经济》（*L'or, Le poivre, le Portugal et L'économie mondiale*）《年鉴》第25卷，6号，1970年11~12月

（*Annales, E.S.C, XXV, 6, nov.-déc.1970*）1595页。见对这个评论的观点。弗塔多

（Furtado）的观点，已写在注脚(170)中。

葡萄牙人建立这种私人公司的一个尝试完全是由国家发起的。于1628年建立，在1633年解散了。见席尔瓦（Da Silva），《论西班牙》（*En Espagne*），140~141页。

[185]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96~616页。他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行动，甚至在他们最为有效的时候，“也没有对药材供应造成冲击（616页）。”

[186]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96~616页。他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行动，甚至在他们最为有效的时候，“也没有对药材供应造成冲击（616页）。”，771页。因为土耳其人（Turks）禁止西班牙国王的臣民（在1580年以后包括葡萄牙人）在他们的领地中贸易。葡萄牙商人冒充法国人、英国人或威尼斯人的姓名。

[187]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596~616页。他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行动，甚至在他们最为有效的时候，“也没有对药材供应造成冲击（616页）。”，714页。戈丁诺（Godinho）也说到最初威尼斯人

（Venetian）的困难是在1502年：“这个危机不是由葡萄牙人的航行引起的，因为它发生在这之前……这就是说东印度（Indies）航路的建立和所进行的反对红海（Red Sea）商业的行动，是

用以对准一个有着极为敏感的伤口的躯体的，这比危机爆发的原因更为持久，将其转变为持久的衰退 [729] 页。”

[188] 见克伦本茨 (H.Kellenbenz)，《年鉴》第11卷 (*Annales E.S.C .XI*)，8页。

[189] 肖努 (Chaunu)，《征服》 (*Conquête*)，358页。

[190] “汉堡 (Hamburg) 只享受了短暂的在国际香料贸易中的领先地位。1590年代表殖民地贸易扩张中有很大的重要性。荷兰人和英国人成功地寻求到了扩大他们在世界香料市场中的参与的目的。”克伦本茨 (Kellenbenz)，《年鉴》第11卷 (*Annales, E.S.C .XI*)，23页。荷兰人在欧洲的网络也被用来在那时涉足巴西的糖贸易：“巴西是欧洲消费的糖的主要来源。大多数糖与奴隶在巴西与葡萄牙之间，或西部非洲与巴西之间的贸易，仍掌握在葡萄牙商人和承包商手中，他们中许多人是犹太人 (Jewish) 血统；但是糖从葡萄牙向欧洲其余地区出口却在荷兰人掌握之中，而荷兰船长也与巴西的港口经常从事秘密贸易。当地的葡萄牙人纵容这种贸易，并抵抗西班牙官僚机构防止它的企图。在葡萄牙的商人们将他们的名义出借给荷兰商业企业，以委托制为根据，而在这个时期荷兰的贸易在伊比利亚 (Iberian) 的港口是官方所禁止的。”帕里 (Parry)，《发现的时代》 (*Age of Reconnaissance*)，277页。

[191] 肖努 (Chaunu)，《塞维利亚》第1卷 (*Séville, I*) 13页。

[192] 见戈丁诺 (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696~697页。但是戈丁诺对这真正因素的重要性如何提出了慎重的警告，至少从一个葡萄牙人的角度而言。见671页。

荷兰人和英国人也在那时开始移入南北美洲。当西班牙于1595年在伊比利亚 (Iberian) 半岛开始了对荷兰船只的封锁时，荷兰人遭受了严重的盐短缺，这是一种伊比利亚的出口产品。克伦本茨 (Hermann Kellenbenz) 强调了上述事实，那盐“对 (荷兰的) 鲑鱼加工业是很重要的……”《1600年前后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西班牙，北尼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地区》 (*Spanien, die nördlichen Niedervlande und die Skandinavisch-baltische Raum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d Politik um 1600*)，《社会经济史季刊》第41卷，4号，1954年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di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 4, 1954*)，293页。

荷兰人发现在南美洲的加勒比 (Caribbean) 海岸阿拉亚 (Arya) 半岛的盐可以利用。他们开始对其进行开发，并用运回的船只附带进行走私和抢掠。这个后果对西班牙是严重的？“对西班牙本身，首先它意味着她对盐的限制性政策 (对北尼德兰‘叛乱者’的政治压力) 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她失去了以前通过把半岛的盐卖到荷兰所得到的现付批发价格和税收。现在荷兰人免费免税得到了美洲的盐，它们估计一年价值一百万弗罗林 (florin)。”《西班牙属美洲历史评论》第28卷，2号，1948年5月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VII, 2, May 1948*)，181页。

西班牙人试图驱逐荷兰人，并一时间成功地这样做了，但只是在付出配备一支大舰队，和于1609年的休战 (Truce) 后对荷兰重新开放伊比利亚半岛的代价之后。从某方面来说挽回这种破坏为时已晚。“对西班牙而言，荷兰人大规模闯入加勒比海，与他们在远东、西非洲、巴西、圭

亚那（Guiana）和半岛本身施加重大的航海—商业压力同时发生，是又一个使得伊比利亚人（Iberian）保卫他们的热带殖民世界复杂化的因素……西班牙暂时在加勒比海地区，并在某个花园内在其他地区修补上了她的筑笆，但这付出了多大代价！被荷兰人突然逼得在殖民地世界这里那里到处防守的这个时期，她为了保护其要害的热带地带耗尽了自身的力量，没有剩余精力维护她对在其帝国边缘仍未占领地区的独享权利。只有看到这种关系才能够理解，例如，为什么英国能够建立和保持弗吉尼亚（Virginia），她在美洲第一个微小的前哨站，而没有受到来自西班牙人（Spaniards）方面的干涉，他们在加勒比海和佛罗里达（Florida）有着稳固的基础。”斯鲁伊特（Sluiter），《西班牙属美洲历史评论》第28卷（*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VII），195～196页。

[193] 见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814～817页。

[194] 见博克塞（Boxer），《葡萄牙海上帝国》（*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65页。

[195] 见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s*），120～123页。

[196] “但是对于在16和17世纪好战的基督教（Christicity）的引入，成长和强有力的镇压，似乎有可能德川时代（Tokugawa）的日本不应退回到孤立主义的外壳中。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在这个时期的海外扩张不会终究失败。日本人不管是和平地或是用其他方式，会在17世纪开始时在菲律宾（Philippines）、印度支那（Indo-China）和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部分地方定居；他们就有一切可能能够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果实中分享一份，比他们确实做到的要早几十年。”博克塞（Boxer），《日本的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第vii页。讨论“假如”的分析总是困难的。但在我看来，人们可以完全不同地解释后来的结果。人们难道不能论证，只是因为日本如此有效地在那时进入它的外壳中，它才能在19世纪以足够强大的形态，抵抗住在世界体系中只扮演边缘的角色，因而迅速地工业化。与博克塞类似的对于这种隔绝政策的动机的观点，由本所荣次郎（Eijiro Honjo）表达说：“随着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在日本的传播而带来的祸害，使得德川（Tokugawa）幕府采取了隔绝政策……”《明治复兴之前日本海外发展的事实和思想》（*Facts and Ideas of Japan's Oversea Development Prior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京都大学经济评论》第17卷，1号，1942年1月（*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XVII, 1, Jan 1942），1页。

[197] 见哈里森（Harrison），《新剑桥现代史》第3卷（*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538～543页。戈丁诺（Godinho）谈到，摩鹿加（Moluccas）总督区在1570年左右它“实际上是独立的”。《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812页。

[198] 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783页。

[199] “在澳门（Macao）受到恐慌打击的葡萄牙居民的第一个步骤（当他们在1582年得知葡萄牙与西班牙1580年的合并时）是将这个殖民地置于西班牙总督的势力范围之外。因为如果在

澳门的葡萄牙人降为西班牙普通臣民的地位，如果澳门港在那时如西班牙人所希望的那样向他们开启，葡萄牙人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就会立刻完结，他们的损失将会是无可弥补的。”张（Chang），《中国—葡萄牙贸易》（*Sino-Portuguese Trade*），100页。

达成了妥协。澳门的葡萄牙人被许可有半独立的地位，宣誓对西班牙王室效忠，但悬挂葡萄牙旗帜，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个二品官的地位。张（Chang）清楚西班牙人接受这个妥协的动机：“卡斯提尔（Castiliom）的国王.....害怕干涉澳门的内部事务会导致反抗甚至公开叛乱，只好勉强同意它名义上的效忠。”戈丁诺（Godinho），《葡萄牙帝国的经济》（*L'économie de l'empire potugais*），101页。

第七章 理论的重述

创立理论不是一种与经验资料分析相分离的活动。分析只能靠以理论范型或见解的方式做出。另一方面，事件或过程的分析必须包括以可变事物的特有确定价值的一整套系列作为出发点，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能解释最后结果是怎样得到的。为了清晰地表达历史的解释，情况往往是，人们必须假定或是避开对可变事物的形式上相互关系作出说明。

因此，在作结论时更为简短抽象地对资料再做一次考察，通常是合乎情理的。无疑这对读者有用处。但是对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在尽力使分析有一定的精确性时，在错综复杂的细节中却会易于将其忽略掉。上述处理的经验性资料当然是都很复杂的——确实远比可能描述的复杂得多。因此，我打算回顾一下我在这本书中的论证。

为了叙述一个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最初的活动，我必须论证一个世界体系的确定概念。一个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有着它的边界、结构、组成成员群体、合法的规则和一致性。它的生命是由冲突的力量用其牵制力聚合在一起的，而当每个群体不停地寻求为其利益重组它时，就会将其分裂瓦解。它有着一个有机体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生命期，在其中它的特点在某些方面有变化，而其他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能够以他的机能的内部逻辑发展判定它的结构在不同时代是强还是弱。

以我的观点而言，成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在于这个事实，它包含的生命力大部分是自立自足的，它发展的动力大部分源于内部。读者可能感到，使用“大部分”这个词是一种学术上故意模棱两可的做法。我承

认我不能说得更明确。可能没有人会能够把一个基于违反事实的假说明确化：假如这个体系因为不管什么原因，会与一切外部力量隔绝（这从来没真正发生过），这种明确化就意味着这个体系会持续以实际上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再有，当然要把它变为严格可使用的标准实际上是困难的。尽管如此，这点是重要的，并对这本书经验研究的许多部分是关键的。可能我们应当认为自足是一种理论上的绝对化，一种社会真空，很少见到，人为创造更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虽如此，这仍是一条社会真实的渐近线，其间距离虽是可以设法加以衡量的。

使用这样一种标准，所需要辩论明白的是，大多数通常被描述为社会体系的实体——“部分”（tribes）、社团、民族国家——事实上不是完全的体系。确实正相反，我们所论证的唯一真正社会体系，在一方面是那些相对小的、高度自主的生存经济，而且是不属于某些常规的纳贡体系的一部分者，另一方面是世界体系。这后一类确实与前一类有区别，因为它们相对要大，也就是说按通常的说法它们是“世界”。但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由这个事实确定的，即它们作为一个经济——物质实体是自立自足的，这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和它们内部包含的一个多重文化。

这进一步证明，至今只存在两种这样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其中有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大部分地区，但却减弱了它有效控制的程度；另一种体系中则不存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所有的，或真正统治所有的空间。为了方便起见和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用“世界经济”这个名词来描述后者。

最后，我们论述了在现代之前，世界经济是高度不稳定的结构，它倾向于转变为帝国或是瓦解。现代世界体系的特点在于，一种世界经济存在了500年，还没有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帝国——一个在于其力量之奥妙的特点。

这个特点在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政治方面。资本主

义能够一直繁荣，正是因为世界经济在其领域内有着不是一个而是一种多重政治体系。

我在这里不是要论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古典理论，即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国家在经济事务中实行不干涉政策的体系。完全相反！资本主义是以不断地吸收政治实体的经济损失，而将经济上的所得分配于“私人”手中为基础的。我所论证的不过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基于这个事实，经济因素在一个大于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的竞争场所中起作用。这给了资本家们一种以结构为基础的策略自由。这使得世界体系的持续经济扩张成为可能，虽然它的酬报的分配是很不均衡的。只有另一种世界体系能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和改变分配体系，并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作决定的水平重新统一起来。这构成了世界体系的第三种可能形式，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这不是一种现在存在的形式，而这在16世纪并非更为遥不可及。

为什么在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会产生，并抗拒了将其改变为一个帝国的尝试，其历史原因最终要进行解释。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它们。然而应当注意，一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大小是与技术状况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在它的疆界内运输和交通的可能性。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现象，并不是总向好的方面转变，所以一个世界经济的疆界总是流动变化的。

我们将一个世界体系定义为一个有着广泛劳动分工的体系。这种分工不只是功能性的——即是职业性的——而是地理上的。这就是说，经济任务的分布范围不是平均地分配在整个世界体系之中。确实这部分是社会生态学因素造成的结果。但是大部分是劳动社会组织的作用，它扩大和合法化了这个体系中某些群体剥削其他人劳动的能力，也就是能得到剩余物的更大份额。

在一个帝国中，政治结构倾向于将文化与职业联系在一起，而在一个

个世界经济中政治结构则倾向于将文化与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其原因在于，在一个世界经济中，用于群体的政治压力的首先着重点在当地（民族的）国家结构上。文化同质化倾向于为关键群体的利益服务。并且这种压力对创造文化——民族同一体起到了增强作用。

这是世界经济先进地区特有的情况——我们称之为中心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一个强大国家机器的创造随之而生成一种民族文化，这是一种通常称之为统合的现象，即作为一种保护了世界体系内兴起的不均衡现象的机制，又作为一种维持这种不均衡现象的意识形态掩护和辩护口实。

于是世界经济便划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我不将其称为边缘“国家”，是因为边缘地区的一个特点是本地国家是很弱的，其弱的程度从根本不存在（也就是殖民地状况）到只有低度的自治（也就是新殖民地状况）。

在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力量、文化的完整性等一系列层面上，在中心与边缘之间还有半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中有一些是一个既定世界经济较早形态时的中心地区，一些会是边缘地区的后来上升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扩展着的世界经济中变化的地理政治学的变化结果。

然而，半边缘地区不是一种统计学上划分点的技巧，也不是一个剩下来的类别。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必需的结构因素。这些地区起着类似于中间商群体在一个帝国起的作用，当然随着情况不同是不一样的（*mutatis matandis*）。它们是生存技巧的集合点，这在政治上通常是不得人心的。这些中间地区（像一个帝国内的中间群体）部分倾向于主要位于边缘地区的群体的政治压力，这些群体可能在其他方面是针对中心国家的。这种群体在它们国家机器的内部并通过其起作用。在另一方面，主要处于半边缘地区的势力位于中心国家的政治竞争场之外，并且很难达到寻求在政治上联合的目的，若是它们在同一政治竞争场中，

就会有途径这样发展的。

一个世界经济的分工包括有一种职业任务上的等级制度，在其中需要高水平技艺和较大资本额的任务保留给较高等级的地区，因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本质上是对积累的资本的酬报，这也包括人的资本，它们要比“未训练”的劳动力得到更高比例的酬报。这些职业技艺在地理上的分配不均造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强烈倾向。市场经济的力量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些情况。世界经济缺乏一个中央政治机制使它很难对报酬的分配不当有着加以制衡的力量。

因而，一个世界经济的进程倾向于使其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扩大经济和社会差距。一个会掩蔽这个事实的因素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带来了技术进步，使得扩展世界经济的疆界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的特定区域可能会改变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角色，尽管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其不同部分的报酬差别在同时进一步加大。为了清楚地考察这个很重要的现象，我们要强调一个既定的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之间的区别。一个世纪里的外部竞争场经常在下一个世纪变成边缘或半边缘地区。而中心国家可以变为半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也可以变为边缘地区。

当中心国家的优势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不停扩展时，在中心地区内的各个国家的能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总是追逐野兔的猎犬才能成为头等的猎犬。确实，可能已是由于在这种体系中，在结构上不可能避免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从统治某个时期的特定国家这个意义上的最杰出者发生流动变化，这样的国家总是或早或晚被另一个国家所取代。

我们已强调了现代世界经济是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排除用“封建主义”来称呼在世界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形式。此外虽然不在这一卷中进

行讨论，由于同样的原因，在以后几卷中我们将以极大的审慎对待这种主张，即20世纪在世界经济的框架内存在着社会主义的民族经济（与此对立的主张是社会主义运动控制着世界经济内某些国家机器。）

如果世界体系是唯一真正的社会体系（与真正孤立的生存经济不同），就必然随之具有阶级和阶层群体的出现、结合和政治作用作为这个世界体系的因素，因而必须予以重视。并且必然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分析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群体时，不只要看其自我意识的状况，还要看其自我确定的地理范围。

阶级总是潜在存在的（*an sich*，就其本质而言是自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成为阶级意识（*für sich*，自为的），也就是在政治—经济竞争场中作为一个群体起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文化实体。这种自我意识是斗争形势造成的一个机能。但是对于开展斗争的上层阶层，因而公开其意识总是一种不得已的事（*faute de mieux*）。在这头一种意义上阶级界限不是划得明显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更类似于一种要加以维持的特权。

因为在斗争形势中，许多派别由于组成联盟的作用而倾向于并为两个，从这个定义上说不可能有三个或更多（有意识）的阶级。明显地能够有多种职业利益群体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在社会结构内起作用。但是这种群体实际上是阶层群体的一个变种，事实上通常与其他种类的阶层群体，如那些由种族、语言或宗教标准划分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叠。

说到不可能有三个或更多的阶级，并不是说总是有两个阶级。可能一个也没有，虽然这是少见和过渡性的。可能有一个，这是最常有的。可能有两个，这是最具爆炸性的。

我们说可能只有一个阶级，这和我们说过的阶级实际上只存在于斗争形势中，斗争会将其分为两面，在这里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一场斗

争可以成为一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阶级设想自身是普遍性的阶级，所有其他的都是阶层。这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事实上普遍存在的形势。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the bourgeoisie）已经被称为一个普遍性的阶级，追求组织达到其目的的政治生活来反对其两个对手。在一方面，有那些为维护传统等级区分说话的人，他们不顾这些等级已经失去了与经济功能原本有的关联这个事实。这类因素宁愿把社会结构确定为一种非阶级结构。为了对抗这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就变成为一个有自身意识的阶级。

但是资产阶级有另一个对手：工人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工人一旦成为一个有自身意识的阶级，这在16世纪虽不是很经常的，这就会使他们把形势明朗化为一种两极阶级形势。在这种环境中，资产阶级发现自己深陷于一种战术上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维持着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由于这个事实他们煽起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由此冒着削弱他们自己政治地位的危险。在另一种程度上，为了应付这个问题，他们不谈他们的阶级意识，他们就冒着把其地位削弱到相当于传统的高阶层的佃户的危险。

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体形成的过程，即将自身看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阶级，从所有社会等级中吸收它的成员，这在我们讨论都铎王朝时的英国（Tudor England）乡绅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出现，或尼德兰

（Netherland）北部自治市公民（burghers）的兴起时，会加以论述。他们支持自己宣称是一个普遍性阶级的一个方法是靠民族感情的发展，这给予他们的宣称一层文化上的外衣。

激进派的暴动使资产阶级深深陷入了困境，也就是说，害怕在它的两拨对手之间结成联盟，并采取主张乡土主义的形式，这在我们讨论法国在“第二个”16世纪时曾论述过。那里的资产阶级选择了暂时的退却。他们可能实际上别无选择。但是这种退却会有它的长期后果，它出现在

法国大革命后期的社会激进主义中（尽管是暂时），并使法国在经济发展中长期落在英国后面。

我们这里的例子是变得有意识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在民族国家疆界内的意识。这明显不是唯一的选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自身意识的世界阶级。而有许多群体向这样一个目标推进。在另一方面，在边缘地区有许多资本主义农民派别。

在查理五世（Charles V）的全盛时期，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南部德意志、北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有许多群体，把他们的希望系于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s）的帝国雄心上[一些群体谨慎地把部分希望同样系于瓦罗亚（Valois）王朝]。如果这些群体仍是个社会阶层，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意识的阶级，它们则正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随着帝国的失败，欧洲的资产阶级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未来系于中心国家。而这些人由于他们种族—宗教的亲密关系的性质，能够转而把民族国家作为他们政治斗争的竞争场，他们也这样做了。

至于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农民，他们会高兴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国际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乐于为了加入“世界”文化牺牲本地文化的根。但是要构成一个国际性阶级，他们需要中心国家资本主义阶层的合作，而这并没有实现。于是逐渐地这些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农民变成了腐朽而势利的西班牙属美洲的庄园主（Chacenderos）或欧洲东部后几个世纪的贵族，从潜在的国际阶级意识后退到本地阶层的结合——这对西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很适合的。

特定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对于阶层群体的形成造成了一种持续的压力。当地方统治阶层受到较低阶层任何萌发的阶级意识的威胁时，强调本地文化对于加强本地的内部斗争，创造一种取代本地团结以对抗外部的手段起了很大作用。并且，如果这些本地统治阶层感到自己受到

世界体系中较高阶层的压迫时，他们加倍地激发了对创造一个本地同一体的追求。

明显地，构建一个同一体不能没有沉厚的气氛。它要建立在它能寻求到的方式上，如语言、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很明显，语言和宗教的同质性和感情（更何况对个别生活方式的热爱）是社会的创造物，而不能将其看作传统不变事物的简单继续。它们是在一个充满阵痛的时代，在困难中形成的社会创造物。

16世纪就是这样一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充满阵痛的时代。这当然是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规模宗教内战的时期。这是一个国际性宗教“党派”的时代。但是最后当尘埃落定，所有这些宗教劫乱的结果是，在国际性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框架内，以各个政治实体相对的宗教同一性形式确定下来。

我们在讨论各种特有的发展时，会试图指出，为什么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各种形式会最终成为中心国家的宗教（除了法国，而这又是因为什么），而天主教（Catholicism）则成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宗教。我们对各种神学的教条是否对此有很大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虽然它们可能为这个任务提供了便利。更确切地说，这些神学的教条当在实际中向着与它们最初概念相反的方向演化时，反映着并为维持在世界体系中各个地区中的作用服务。

经常听说查理五世（Charles V）由于企图保持在宗教分裂中作一个仲裁者而不是主角的地位，失去了创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基督教新教国家的大好机会。但是这种批评忽视了这个事实，查理五世寻求创建的是一个世界帝国，而不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中心国家。帝国的兴盛要靠多种宗教来反映多重的作用，而它们极少集中在特定的政治疆域之内。在国际的异质多样性中有着民族的同质性，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常规状态。

至少这是在最开始时的常规状态。中心国家因为它们复杂的内部劳动分工，反映了这个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模式。在16世纪，英格兰已经向着变为不列颠（Britain）的方向前进，它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在有着相对异质多样性的国家中具有地区的同质性。

宗教不一定是主要阶层群体的明确文化特点。语言在16世纪确实开始起到了这种作用，它的重要性随着这个世纪的过去而增加了。但是，在一个世界经济中作用的专业化方面，宗教的增强作用要优于语言的增强作用。它较少干涉世界经济内部进行交往的进程，它也较少使自己参与（只是较少而已）孤立主义者的封锁，这是因为世界性宗教基本上是以普世主义为主题的。

16世纪的欧洲世界经济倾向于大体上是个一个阶级的体系。它是从经济扩张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益的能动力量。特别是在中心地区，他们倾向于具有阶级意识，也就是在政治竞争场中作为一个首先由在经济中的共同作用确定的群体起作用。这种共同作用从20世纪的角度看来，事实上确定得很宽。它包括农民、商人和工业家这些人。各个企业家经常在无论其中哪一个活动中来回转换，或是将其合并在一起。这些人之间的关键区别，不管他们的职业如何，主要是看一些人趋向于从世界市场中得到利益，其他人则没有这种趋向。

这些“其他人”以他们的阶层特权进行抵抗——那些传统的贵族，那些由封建制度产生的小农，那些由行会垄断产生的人都成为过时的了。在文化相似性的掩盖之下，他们能够结成奇特的联盟。这些奇特的联盟能够采取非常实际主义的方式，迫使政治中心考虑他们。在我们讨论法国时指出过这样的例子。或者，它们可以采取一种政治上消极的方式，这很适合世界体系中统治力量的需要。

这幅图画细节是以阶层团体多种形式的甲冑、它们的力量和主音调充填的。但是大背景是以阶级形成的过程构成的。就此而言，16世纪

不是决定性的。资本家形成了一个阶级，生存下来并取得了公民权（droit de cite），但还没有在政治竞争场中获胜。

国家机器的演变准确地反映了这种不确定状况。强大的国家为某些群体的利益服务而伤害其他人的利益。然而从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来看，如果有着众多的政治实体（就是说这个体系不是一个世界帝国），那就不会有所有这些实体同等强大的情况。因为如果是那样，它们就处于阻碍位于其他国家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作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劳动的世界性分工被阻止，世界经济的衰落最终导致世界体系的瓦解。

但是也不能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中，资本家阶层就没有机构保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财产权利，保证各种垄断，和把损失分担到较多的人口中等等。

于是世界经济就发展出了一个模式，其中中心地区的国家机构相对强大，边缘地区的国家机构则相对弱小。哪个地区起哪种作用在许多方面是偶然性的。必然的情况是在某些地区国家机器要比其他地区强大得多。

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指其力量相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国家，包括其他中心国家强大，相对于国家疆域内地方政治单位强大。实际上，我们是指一种在事实上与在法理上同样的统治权。我们也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内的任何特定社会群体强大。明显地，这类群体在它们能够带给国家的压力程度上是有变化的。也很明显，这些群体的某种联合控制着国家。这并非说国家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但国家并非只是现存力量的简单媒体，若这是因为这些力量中有许多是处于一个以上的国家内，或是因为其包括的范围与国家疆域的联系很少就好了。

因而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一个部分自治的实体，其意义是，它有一个它可以利用的行动余地，在其中反映了多种利益的妥协，即使这种余地的界限是由原生力量的某些群体的存在所确定的。成为一个部分自治的实体，就必然有一群人，他们的直接利益是由这样一个实体提供的，即国家的管理者们和一个国家官僚阶层。

这样的群体出现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之中，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两个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上最强大的群体：是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层和旧的贵族等级在两难之间的最好选择。

对于前者，以“绝对君主制”为其形式的强大国家是首要的顾客，是对抗地方上和国际上匪徒的保卫者，是社会合法性的一个模式，是防止在其他地方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障碍的先发制人保护措施。对于后者，强大的国家代表对同样强大的资本家阶层的一个刹车器，一个阶层习俗的支持者，秩序的维护者，奢华的促进者。

无疑，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发现国家机器是对财富的一个沉重的消耗负担，还是一个好管闲事的非生产官僚阶层。但是他们有什么选择呢？尽管如此他们总是不安分的，而世界体系的现实政治，就是由这两个群体努力使它们自己与对它们而言是国家机器的负面影响相隔离的反复斗争而构成的。

一个国家机器包括一个倾斜的机制。在某一点上力量创造出更大的力量。赋税收入使国家能够有更大规模、更有效的文职官僚和军队，这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税收——这是一个以螺旋形持续的过程。这种倾斜机制也向另一个方向起作用——弱小导致更加弱小。在这两个倾斜点之间就是建立国家的治术所在。就是在这个竞争场中各个管理者群体的技巧产生了差别。而正是因为这两种倾斜机制，在世界体系中某些点上一个小的差距就能够迅速变成大的差距。

在那些国家机器弱小的国家里，国家管理者不能起到协调复杂的工业—商业—农业机制的作用。他们只不过成为其他人中间的一拨地主，对全体人没有什么可以宣称的合法权威。

这些人便被称为传统统治者。政治斗争经常以传统对变革的方式命名。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和意识形态上的术语。这在事实上可以看作一个总的社会学法则，在任何特定的一个时间上，被认为是传统的事物有着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晚近的起源，主要代表着受到衰落的社会地位威胁的某些群体的保守本能。确实，似乎没有什么像“传统”那样，当需要指出它时就出现和发展得那么快。

在一个阶级的体系中，“传统的”是“其他人”与这个具有阶级意识的群体进行斗争的名义。如果他们能够用使其广泛合法的办法把他们的价值护卫起来，甚至更好地将其纳入立法的界限之内，由此他们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法变革了这个体系。

传统主义者可以在一些国家中获胜，但是如果世界经济生存下来，他们必然在其他地区或多或少遭受损失。进一步说，在一个地区的所得是在另外地区所失的对应之物。

这不完全是个总和为零的竞赛，但要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所有的因素都同时向一个既定方向改变其价值，那也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体系是建立在其中具有多重价值的各体系之上，它反映着在世界劳动分工中各群体和地区特有的功能。

我们在这里没有穷尽与一个世界经济中各种机制有关的理论问题。我们只是谈那些世界经济在创建时的早期要论述的问题。也就指16世纪的欧洲。许多在较晚阶段出现的其他问题，将在经验上和理论上于后面几卷中处理。

在16世纪，欧洲像一匹狂奔的野马。某些群体企图建立一个以特有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在中心地区创建作为这个体系政治经济担保者的民族国家，和得到不只能付出利益，还能付出维持这个体系的费用的工人，这是不容易的。做到了这些是欧洲的光荣，因为没有16世纪的冲击，现代世界就不会诞生，虽然它充满着残酷，但它诞生总比没有诞生要好。

它诞生的不易也是欧洲的光荣，特别是其不易是因为那些付出短期代价的人们，对其不公平毕竟发生了引人注意的呼喊。在波兰、英国、巴西、墨西哥，农民和工人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暴乱。正如托尼（R.H.Tawney）对16世纪英国的农业骚乱所说的：“这些运动是血与肉，高尚和勇敢精神的考验与证明……它的人民没有忘记如何反抗，是这个国家的一件幸事。”^[1]

现代世界的标志是它获暴利者的梦想和被压迫者对这种专断的反抗。剥削和拒受剥削作为不可避免之事，恰恰构成现代持续的二律背反现象，它们共同处于一个辩证过程之中，到20世纪还远没有达到其顶点。

^[1] 托尼，《农业问题》（Tawney, *Agrarian Problems*），第340页。

参考文献

Abel, Wilhelm, *Die Wiistungen des Ausgehenden Mittelalters*, 2d ed. Stuttgart: Fisher Verlag, 1955.

Abrate, Mario, "Creta, colonia veneziana nei secoli XIII-XV, " *Economia e storia*, IV, 3, lugl.-sett., 1957, 251-277.

Actes du Colloque de la Renaissance. Paris: Lib. Philosophique J. Vrin, 1958.

Ardant, Gabriel, *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l'impôt*, 2 vol. Paris: S.E.V.P.E.N., 1965.

Arnold, Stanislaw, "Les idées politiques et sociaules de la Renaissance en Pologne, "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Rome*. Warszawa: 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Institut d'Histoire, 1955, 147-165.

Ashton, Robert, "Revenue Farming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VIII, 3, 1956, 310-322.

Ashton, Robert, "Charles I and the City, "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1, 138-163.

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Atti del Convegno (27 giugno-2 luglio 1957) . Venezia-Roma: Istituto per la Collaborazione Culturale, 1961.

Aydelotte, Frank, *Elizabethan Rogues and Vagabonds*, Vol. I of Oxford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 1913.

Aylmer, G. E., *The King's Serva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1.

Aznar, Luis, "Las etapas iniciales de la legislación sobre indios, " *Cuadernos americanos*, VII, 5, sept.-oct., 1948, 164-187.

Baehrel, René, "Economie et histoire à propos des prix" 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3, I, 287-310.

Baehrel, René, *Une croissance: la Basse-Provence rurale (fin XVIe siècle-1789)* . Paris: S.E.V.P.E.N., 1961.

Bagú, Sergio, "La economí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 " *Pensamiento crítico*, No. 27, abril 1969, 30-65.

Balandier, Georges, *Daily Life in the Kingdom of the Kongo*. New York: Pantheon, 1968.

Bannon, John F., ed., *Indian Labor in the Spanish Indies: Was There Another Solution?* Boston, Massachusetts: D.C. Heath, 1966.

Barbour, Violet, "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I, 227-253.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1930.)

Barbour, Violet,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n Arbor, Michigan: Ann Arbor Paperbacks, 1963.

Barkan, Ömer Lutfi, "La 'Méditerranée' de Fernand Braudel vue d'Istamboul, " *Annales E.S.C.*, IX, 2, avr.-juin 1954, 189-200.

Barley, M. W., "Rural Housing in England,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696-766.

Baron, Salo W.,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2nd ed" III: *Heirs of Rome and Persi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7.

Baron, Salo W.,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2nd ed., IV: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7.

Baron, Salo W.,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2nd ed., XI: *Citizen or Alien Conjur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7.

Baron, Salo W.,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2nd ed., XII: *Economic Cataly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7.

Barracrough, Geoffrey,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Blackwell, 1957.

Barraclough, Geoffrey,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Oxford: Blackwell, 1962.

Barraclough, Geoffrey, "Universal History, " in H. P. R. Finberg, ed. *Approaches to History: A Symposium*.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62, 83-109.

Batho, Gordon, "Landlords in England, A: The Crown,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256-276.

Batho, Gordon, "Landlords in England, B: Noblemen, Gentlemen, and Yeomen,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276-306.

Bauthier, Robert Henri, "The Fairs of Champagne, " in Rondo E. Cameron,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1970, 42-63.

Becker, Marvin B.,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Emerging Florentine Territorial State, "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XIII*, 1966, 7-39.

Beloff, Max, *The Age of Absolutism, 1660-1815*. New York: Harper, 1962.

Bennett, M. K., *The World's Food*. New York: Harper, 1954.

Beresford, Maurice W., *The Lost Villages of England*.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54.

Berrill, K.,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3, 1960, 350-359.

Betts, Reginald R., "La société dans l'Europe centrale et dans l'Europe occidentale, "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n.s., VII, 1948, 167-183.

Bindoff, S. T., *Tudor England*, Vol. V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0.

Bindoff, S. T., "Economic Change: The Greatness of Antwerp,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 R. Elton, 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50-69.

Bishko, Charles Julian, "The Castilian as Plainsman: The Medieval Ranching Frontier in La Mancha and Extremadura, " in Archibald R. Lewis and Thomas F. McGann, eds., *The New World Looks at Its History*. Austin: Univ. of Texas Press, 1967, 47-69.

Bitton, Davis,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 Press, 1969.

Blanchard, Ian, "Population Change, Enclosures, and the Early Tudor Econom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I, 3, Dec. 1970, 427-445.

Bloch, Marc, "Medieval 'Inventions'"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169-185. (Translated from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No. 36, Nov. 1935.)

Bloch, Marc, "Economie-nature ou économie-argent: un pseudo-dilemme, "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I, 1939, 7-16.

Bloch, Marc, *Esquisse d'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Europe*, Cahiers des Annales, 9,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4.

Bloch, Marc, *Seigneurie française et manoir anglai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0.

Bloch, Marc, *Feudal Society*.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1.

Bloch, Marc,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2 vol.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4.

Bloch, Marc, "The Rise of Dependent Cultivation and Seigniorial Institutions, "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M. M. Postan, ed.,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235-290.

Blum, Jerome, "Prices in Rus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 2, June 1956, 182-199.

Blum, Jerome, "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4, July 1957, 807-836.

Blum, Jerome,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1.

Borah, Woodrow, *Silk-raising in Colonial Mexico*, Ibero-Americana: 20.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Borah, Woodrow, *New Spain's Century of Depression*, Ibero-Americana: 35.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Borah, Woodrow, *Early Colonial Trade Between Mexico and Peru*, Ibero-Americana: 38.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Boserup, Ester,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Illinois: Aldine, 1965.

Bouwsma, William J.,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 in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r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1, I, 199-244.

Bouwsma, William J., *Venice and the Defenses of Republican Libert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Bowden, P. J., "Wool Supply and the Woollen Indust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X, 1, 1956, 44-58.

Bowden, P.J., *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Bowden, P. J., "Agricultural Prices, Farm Profits, and Rents,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593-695.

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Boxer, C. R., "The Portuguese in the East, 1500-1800, " in H. V. Livermore, ed., *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 1953, 185-247.

Boxer, C. R.,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 Johannesburg: Witswaters-rand Univ. Press, 1961.

Boxer, C. R., *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415-1825*.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 1963.

Boxer, C. 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Knopf, 1969.

Braudel, Fernand, "Monnaies et civilization: de Tor du Soudan à l'argent d'Amérique, " *Annales E.S.C.*, I, 1, janv.-mars 1946, 9-22.

Braudel, Fernand, "La double faillite 'coloniale' de la Franc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 *Annales E.S.C.*, IV, 4, oct.-déc. 1949, 451-456.

Braudel, Fernand, "Qu'est-ce que le XVIe siècle? , " *Annales E.S.C.*, VIII, 1, janv.-mars 1953, .69-73.

Braudel, Fernand, "L'économie de la Méditerranée au XVIIe siècle, " *Les Cahiers de Tunisie*, IV, 14, 2e trimestre 1956, 175-196.

Braudel, Fernand, "Le pacte de ricorsa au service du roi d'Espagne et de ses prêteur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 i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I, 1115-1125.

Braudel, Fernand, "Les emprunts de Charles-Quint sur la Place d'Anvers, "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Paris, 30 sept-3 oct" 1958. Paris: Ed. du C.N.R.S., 1959,

191-201.

Braudel, Fernand, "European Expansion and Capitalism: 1450-1650" in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r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1, I, 245-288.

Braudel, Fernand,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2e éd. revue et augmentée, 2 vol.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6.

Braudel, Fernand,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Vol. I.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7.

Braudel, Fernand, and Romano, Ruggiero,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1547-1611)*.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1.

Braudel, Fernand, and Spooner, Frank C., "Les métaux monétaires et l'économie du XVIe siècle," 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G. B. Sansoni, 1955, 233-264.

Braudel, Fernand, and Spooner, Frank C.,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374-486.

Brenner, Y. S., "The Inflation of Prices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2, 1961, 225-239.

Brinkmann, Carl, "The Hanseatic League: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 4, Aug. 1930, 585-602.

Brulez, Wilfrid, "Les routes commerciales d'Angleterre en Italie au XVIe siècle, "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vo moderno*. Milano: Dott. A. Giuffre-Ed. 1962, 121-184.

Brunner, Otto, "Europäisches und Rüssisches Bürgertum,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 1, 1953, 1-27.

Brutzkus, J.,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800-120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I, 1943, 31-41.

Bücher, Karl, *Industrial Evolution*. New York: Holt, 1901.

Buckatzsch, E. J.,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 1086-1843,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I, 2, 1950, 180-202.

Bulferetti, Luigi, "L'oro, la terra e la società: una interpretazione del nostro Seicento, "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8th ser., IV, 1953, 5-66.

Burckhardt, Jacob,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4.

Cahen, Claude, "A propos de la discussion sur la féodalité, " *La Pensée*, No. 68, juil.-août 1956, 94-96.

Cahen, Claude, "Au seuil de la troisième année: Reflexions sur l'usage du mot 'féodalité,'"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II, Pt. 1, Apr. 1960, 2-20.

Campbell, Mildred, *The English Yeome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42.

Capistrano de Abreu, J., *Capítulos de história colonial (1500-1800)*. Rio de Janeiro, Ed. da Soc. Capistrano de Abreu, Typ. Leuzinger, 1928.

Carande, Ramón, *El crédito de Castilla en el precio de la política imperial*, discurso leído ant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Madrid, 1949.

Carande, Ramón, *Carlos V y sus banqueros: La vida económica en Castilla (1516-1556)*, 2a. ed corr. y aum., 2 vol. Madrid: Sociedad de Estudios y Publicaciones, 1965.

Carsten, F. L., *The Origins of Prussia*.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1954.

Carus-Wilson, E. M.,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 1941, 39-60.

Chabod, F., "Y a-t-il un état de la Renaissance?" in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 Paris: Lib. Philosophique J. Vrin, 1958, 57-74.

Chang, T'ien-Tsê,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34.

Chaudhuri, K. 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xport of Treasur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1, Aug. 1963, 23-38.

Chaunu, Pierre, "Le galion de Manille, " *Annales E.S.C.*, VI, 4, oct.-déc.1951, 447-462.

Chaunu, Huguette & Pierre, "Économie atlantique, économie-monde (1504-1650) , "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 1, juil. 1953, 91-104.

Chaunu, Huguette & Pierre,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 I: 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5.

Chaunu, Pierre, "Pour u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mérique espagnole coloniale, " *Revue historique*, LXXX, 216, oct.-déc. 1956, 209-218.

Chaunu, Pierre,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 VIII (1) : Les structures géographiques*. Paris: S.E.V.P.E.N., 1959.

Chaunu, Pierre,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 VIII (2) : La conjoncture (1504-1592) .* Paris: S.E.V.P.E.N., 1959.

Chaunu, Pierre,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 VIII (2 bis) : La conjoncture (1593-1650) .* Paris: S.E.V.P.E.N., 1959.

Chaunu, Pierre, "Séville et la 'Belgique', 1555-1648, " *Revue du Nord*, XLII, 1960, 259-292.

Chaunu, Pierre, "Minorités et conjoncture: l'expulsion des Morèssques en 1609, " *Revue historique*, CCXXV, 1, janv.-mars 1961,

81-98.

Chaunu, Pierre, "Le renversement de la tendance majeure des prix et des activités au XVIIe siècle,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vo modem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219-255.

Chaunu, Pierre,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4.

Chaunu, Pierre, "Réflexions sur le tournant des années 1630-1650, " *Cahiers d'histoire*, XII, 3, 1967, 249-268.

Chaunu, Pierre, *L'expansion européenne du XIe au XV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26.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9.

Chaunu, Pierre, *Conquête et exploitation des nouveaux mondes (XVI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26 bi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9.

Chaussinand-Nogaret, Guy, "L'or, le poivre, le Portugal et l'économie mondiale, " *Annales E.S.C.*, XXV, 6, nov.-déc. 1970, 1591-1596.

Cheung, Steven N. S.,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9.

Chevalier, François, *Land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Mexico*.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Christensen, Aksel E., *Dutch Trade to the Baltic about 1600*.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41.

Ciocca, Pierluigi, “L’ipotesi del ‘ritardo’ dei salari rispetto ai prezzi in periodi di inflazione: alcune considerazioni generali, ” *Bancaria*, XXV, 4, apr. 1969, 423-437; 5, maio 1969, 572-583.

Cipolla, Carlo M., *Mouvements monétaires dans l’Etat de Milan (1580-1700)* .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2.

Cipolla, Carlo M., “Note sulla storia del saggio d’interesse-Corso, dividendi, e sconto dei dividendi del Banco de S. Giorgio nel secolo XVI, ”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 2, magg.1952, 255-274.

Cipolla, Carlo M., “La pré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 ’” *Annales E.S.C.*, X, 4, oct.-déc.1955, 513-516.

Cipolla, Carlo M., “Four Centuries of Italian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D. V. Glass & D.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rnold, 1965, 570-587.

Cipolla, Carlo M., *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London: Collins, 1965.

Cipolla, Carlo M.,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New York: Walker & Co., 1967.

Cipolla, Carlo M.,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if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Gordian Press, Inc., 1967.

Cipolla, Carlo M.,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Italy, ” in Brian Pullan 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126-145.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Decline of Italy: The Case of a Fully-Matured Econom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952.)

Clark, G. 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 1929.

Clark, G. N., “The Birth of the Dutch Republic, ”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46, 189-217.

Clark, G. N., *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46.

Coleman, D. C., “An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the ‘New Draper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 3, Dec. 1969, 417-429.

Coles, Paul, “The Crisis of Renaissance Society: Genoa, 1448-1507, ” *Past & Present*, No. 11, April 1957, 17-47.

Colvin, H. M., “Castles and Government in Tudor England,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XIII, No. 327, Apr.1968, 225-234.

Cook, Sherburne F.and Simpson, Lesley Boyd,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bero-Americana: 31.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Cooper, J. P., “The Counting of Manor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3, 1956, 376-389.

Cooper, J. P., “Letter to the Editor, ” *Encounter*, XI, 3, Sept. 1958.

Cooper, J. P., "General Introduction,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P. 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1-66.

Coornaert, Emile, "La genèse du système capitaliste: grande capitalisme et économie traditionnelle au XVIe siècl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III, 1936, 127-139.

Coornaert, Emile, "Les échanges de la France avec l'Allemagne et les pays du Nord au XV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 3, 1959, 407-427.

Coulbourn, Rushto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6.

Coulbourn, Rusht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udalism, " Part III of Rushton Coulbour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6, 183-395.

Craeybeckx, Jan, "Quelques grands marchés de vins français dans les anciens Pays-Bas et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et au XVIe siècl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notion d'étape,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I, 849-882.

Craeybeckx, Jan, "Les français et Anvers au XVIe siècle, " *Annales E.S.C.*, XVII, 3, mai-juin 1962, 542-554.

Craeybeckx, Jan, "Les industries d'exportation dans les villes flamandes au XVIIe siècle, particulièrement à Gand et à Bruges,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vo moderno*. Milano: Dott. A. Giuffrè-

Ed., 1962, 411-468.

Cromwell, Julian, "The Early Tudor Gent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 3 1965, 456-471.

Czalpinski, Wladyslaw, "Le problème baltiqu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25-47.

Czarnowski, Stefan, "La réaction catholique en Pologn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 *La Pologne au V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Varsovie: Société Polonaise d'Histoire, 1933, II, 287-310.

Darby, H. C., "The Clearing of the Woodland in Europe, "in William L. Thomas, Jr.,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6, 183-216.

da Silva, José-Gentil, "Trafics du Nord, marchés du 'Mezzogiorno, ' finances génoises: 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a conjonctur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 *Revue du Nord*, XLI, 1959, 129-152.

da Silva, José-Gentil, "Villages castillans et types de production au XVIe siècle, " *Annales E.S.C.*, XVIII, 4, juil.-août 1963, 729-744.

da Silva, José-Gentil, *En Espagn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subsistence, déclin*. Paris: Mouton, 1965.

da Silva, José-Gentil, "L'autoconsommation au Portugal (XIVe-

XXe siècles) , ” *Annales E.S.C.*, XXIV, 2, mars-avr. 1969, 250-288.

Davies, C. S. L., “Provisions for Armies, 1509-50: A Study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Early Tudor Government,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 2, 1964, 234-248.

Davies, C. S. L., “Les révoques populaires en Angleterre (1500-1700) , ” *Annales E.S.C.*, XXIV, 1, janv.-févr.1969, 24-60.

Davis, Ralph, “England and the Mediterranean, 1570-1670,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1, 117-137.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Introduction, ” to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0, 1-27.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 ” in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0, 145-247.

de Falguerolles, G. E., “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agricole dans le Consulat de Lempaut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Annales du Midi*, LIII, 1941, 142-168.

de Lagarde, Georges, “Réflexions sur la cristallisation de la notion d'Etat au XVIe siècle, ” in Enrico Castelli, ed., *Umanesimo e scienza politica*. Milano: Dott. Carlo Marzonti, 1951, 247-256.

Delumeau, Jean,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2 vol. Paris: Boccard, 1957.

de Maddalena, Aldo, "Il mondo rurale italiano nel cinque e nel seicento,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2, giug. 1964, 349-426.

de Oliveira Marques, António H., "Notas para a história da feitoria portuguesa na Flandres no século XV,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 *Medioev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437-476.

de Roover, Raymond, "Anvers comme marché monétaire au XVIe siècle, " *Revue bei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XXI, 4, 1953, 1003-1047.

de Vries, Jan, "The Role of the Rural Se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10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1, Mar. 1971, 266-268.

de Vries, Philip, "L'animosité anglo-hollandaise au XVIIe siècle, " *Annales E.S.C.*, V, 1, janv.-mars 1950, 42-47.

Deyon, Pierre, "A propos des rapports entre la noblesse et la monarchie absolu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CCXXXI, avr.-juin 1964, 341-356.

Dobb, Mauric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6.

Dobb, Maurice, "Reply, "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2, Spring 1950, 157-167.

Dobb, Maurice, *Papers on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 1967.

Dollinger, Philippe, *La Hanse (XIIIe-XVIIe siècles)*. Paris: Montaigne, 1964.

Domar, Evsey D.,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 1, Mar. 1970, 18-32.

Dowd, Douglas F., "The Economic Expansion of Lombardy, 1300-1500: A Study in Political Stimuli to Economic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2, June 1961, 143-160.

Duby, Georges, "Le grand domaine de la fin du âoyen âge en France," *Premièr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Stockholm, August 1960: *Contributions*. Paris: Mouton, 1960, 333-342.

Duby, Georges, "The French Countryside at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in Rondo E. Cameron,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Inc., 1970, 33-41. (Translated from *Bolletino dell'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vo*, No. 74, 1962.)

Duby, Georges, "Démographie et villages désertés,"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 XIe-XVII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5, 13-24.

Duby, Georges,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Columbia: 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8.

Duby, Georges, and Mandrou, Robert,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I: *Le Moyen Age et le XVIe siècl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8.

Duby, Georges, and Mandrou, Robert,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II: *XVIIe-XXe siècl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8.

Eberhard, Wolfram,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2nd ed. Leiden: Brill, 1965.

Edler, Florence, "Th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Measures of Charles V on the Commerce of Antwerp, 1539-42, " *Revue bei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VI, 3-4, juil.-déc.1937, 665-673.

Ehrenberg, Richard, *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Harcourt, 1928.

Eisenstadt, S. N., "Political Struggle in Bureaucratic Societies, " *World Politics*, IX, 1, Oct.1956, 15-36.

Eisenstadt, S. N., "The Causes of Disintegration and Fall of Empires: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es, " *Diogenes*, No. 34, Summer 1961, 82-107.

Eisenstadt, S. N., "Empires,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V, 41-49.

Eitzen, Stanley D., "Two Minorities: The Jews of Poland and the Chinese of the Philippines, " *Jew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X, 2, Dec. 1968, 221-240.

Elliott, J. H., "The Decline of Spain, " *Past & Present*, No. 20, Nov.1961, 52-75.

Elliott, J. H.,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New York: Mentor, 1966.

Elliott, J. H., *Europe Divided, 1559-1598*. New York: Harper, 1968.

Elliott, J. H.,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Elliott, J. H., "The Spanish Peninsula, 1598-1648,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 P. 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435-473.

Elman, P., "The Economic Causes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in 129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1, Nov. 1936, 145-154.

Elton, G. R.,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3.

Elton, G. R., "The Tudor Revolution: A Reply, " *Past & Present*, No. 29, Dec. 1964, 26-49.

Elton, G. R.,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 *Past & Present*, No. 32, Dec. 1965, 103-109.

Emery, Frank, "The Farming Regions of Wales,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113-160.

Engels, Frederick,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Engels, Fre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40.

Engels, Frederick,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s*.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7.

Espeix, Henri, *Histoire de l'Occitanie*. Nîmes: Le Centre Culturel Occitan, Collection Cap-e-Cap, 1970.

Everitt, Alan, "Social Mo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 *Past & Present*, No. 33, Apr. 1966, 56-73.

Everitt, Alan, "Farm Labourers,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396-465.

Everitt, Alan,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466-592.

Falls, Cyril, *Elizabeth's Irish Wars*. London, Methuen, 1950.

Fanfani, Amintore, *Storia del lavoro in Italia della fine del secolo XV agli inizi del XVIII*. Milano: Dott. A. Giuffre-Ed., 1959.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

Favret, Jeanne, "Le traditionalisme par excès de modernité,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III, 1, 1967, 71-93.

Febvre, Lucien, "Préface" to Huguette &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5, I.ix-xv.

Felix, David, "Profi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Historic Record and Contemporary Analogies,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XX, 3, Aug. 1956, 441-463.

Ferguson, Wallace, "Toward the Modern State, " in Wallace Ferguson, ed., *Renaissance Studies*, No. 2. London, Ont.: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1963, 137-153. (Originally in *The Renaissance: A Symposium*, 1953.)

Fernández Alvarez, Manuel, "La Paz de Cateau-Cambresis, "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X, No. 77, oct.-dic. 1959, 530-544.

Fisher, F. J.,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I, 135-151.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935.)

Fisher, F. J., "The Development of London as a Centr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6, II, 197-207. (Originall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 XXX, 1948.)

Fisher, F. J., "London's Export Trad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I, 2, 1950, 151-161.

Fisher, F. J.,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Dark Age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 ” *Economica*, n.s., XXIV, 93, 1957, 2-18.

Fisher, F. J., “Tawney’s Century, ”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New York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1, 1-14.

Fourastié, Jean, and Gradamy, René, “Remarques sur les prix salariaux des céréales et la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leur agricole en Europe du XVe et XVIe siècles,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647-656.

Foust, C. M., “Russian Expansion to the East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4, Dec.1961, 469-482.

Fox, P., “The Reformation in Poland, ”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I: W. F. Reddaway et al., eds., *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 .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0, 322-347.

François, Michel, “L’idée d’empire sous Charles-Quint, ”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30 sept.-3 oct. 1958. Paris: Ed. du C.N.R.S., 1959, 23-35.

Frank, André Gunder,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Fried, Morton, “On the Concept of ‘Tribe’and ‘Tribal Society, ’” in

June Helm, ed., *Essays on the Problem of Tribe*, Proceedings of 1967 Annual Spring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3-20.

Friedrich, Carl J., *The Age of the Baroque*. New York: Harper, 1952.

Friis, Astrid,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and the Cloth Trade*. Copenhagen: Levin and Munksgaard, 1927.

Friis, Astrid,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2, 1953, 193-241.

Furtado, Cels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Gay, Edwin F., "The Midland Revolt and the Inquisitions of Depopulation of 1607,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s., XVIII, 1904, 195-244.

Génicot, Leopold, "Crisi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M. M. Postan, ed.,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6, 660-741.

Gerschenkron, Alexande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2, Spr. 1952, 146-154.

Gerschenkron, Alexander, "Review article: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V, 1, Mar. 1964, 53-59.

Gerth, Hans, "Glossary" in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298-308.

Gestrin, Ferdo, "Economie et société en Sloveie au XVIe siècle, " *Annales E.S.C.*, XVII, 4, juil.-août, 1962, 663-690.

Geyl, Pieter,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59-1609)*.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32.

Geyl, Pieter,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New York: Meridian, 1958.

Gibson, Charles, *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 Press, 1964.

Glamann, Kristof, "European Trade, 1500-1700, "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6, 1971.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Création et dynamisme économique du monde atlantique (1420-1670) , " *Annales E.S.C.*, V, 1, janv.-mars 1950, 32-36.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Le repli vénitien et égyptien et la route du Cap, 1496-1533, " *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3, II.283-300.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9.

Goldmann, Lucien, *The Hidden Go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4.

Gordon-Walker, P. C., "Capitalism and the Reforma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1, Nov. 1937, 1-19.

Goubert, Pierre, "Recent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French Population between 1500 and 1700, " in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rnold, 1965, 457-473.

Gould, J. D., "The Trade Depression of the Early 1620'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1, 1954, 81-90.

Gould, J. D., "The Price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 2, 1964, 249-266.

Grabowski, Thadée, "La réforme religieuse en Occident et en Pologne, " *La Pologne au 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Bruxelles, 1923. Warsaw: 1924, 67-72.

Gramsci, Antonio, *Il Risorgimento*. Roma: Giulio Einaudi, 1955.

Gras, N. S. B.,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m Mark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15.

Gray, H. L., "English Foreign Trade from 1446 to 1482, " in Eileen E. Power and M. M. Postan, 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1-38.

Griffiths, Gordon,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Netherlands,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I, 4, July 1960, 452-472.

Guillén Martínez, Fernando, *Raíz y futuro de la revolución*. Bogotá: Ed. Tercer Mundo, 1963.1

Habakkuk, H. John, "La disparition du paysan anglais, " *Annales E.S.C.*, XX, 4, juil.-août 1965, 649-663.

Hall, A. Rupert,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Progress of Techniques, "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96-154.

Hamilton, Earl J., "American Treasure and Andalusian Prices, 1503-1660,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 1, Nov. 1928, 1-35.

Hamilton, Earl J.,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Economica*, IX, 27, Nov. 1929, 338-357.

Hamilton, Earl J.,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National Debt in Western Europ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XVII, 2, May 1947, 118-130.

Hamilton, Earl J., "Prices and Progress: Prices as a Factor in Business Growth,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Fall 1952, 325-349.

Hamilton, Earl J., "The History of Prices Before 1750, " 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 *Méthodologie, 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histoire des prix avant 1750*.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144-164.

Hammarström, Ingrid, "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me Swedish Evidence,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 1957, 118-154.

Harrison, J. B.,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Outside Europe, II: Asia and Africa,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532-558.

Harriss, G. L., and Williams, Penry,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 *Past & Present*, No. 31, July 1965, 87-96.

Hartung, Fr., and Mousnier, 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a monarchie absolue, " 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G. B. Sansoni, 1955, 1-55.

Hauser, Henri,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of 1559, " *Journal of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II, 2, Feb. 1930, 241-255.

Hauser, Henri,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V, 3, Oct. 1933, 257-272.

Heaton, Herbert,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rev. ed. New York: Harper, 1948.

Heckscher, Eli F.,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4.

Heckscher, Eli F., *Mercantilism*, 2 vol., rev.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55.

Heers, Jacques, "Les Génois en Angleterre: la crise de 1458-1466,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I, 809-832.

Heers, Jacques, "Rivalité ou collaboration de la terre et de l'eau? Position générale des problèmes, " in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XIXe siècles*, Vile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1965, 13-63.

Helleiner, Karl,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Eve of the Vital Revolution,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1-95.

Hexter, J. H., "Letter to the Editor, " *Encounter*, XI, 2, Aug., 1958.

Hexter, J. H.,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udor England, "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3, 71-116.

Hexter, J. H., "A New Framework for Social History, "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3, 14-25.

Hexter, J. H., "Storm Over the Gentry, "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3, 117-162. (Originally appeared in *Encounter*, X, 5, May 1968.)

Hibbert, A. B., "The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Town Patriciate, " *Past & Present*, No. 3, Feb. 1953, 15-27.

Hill, Christopher,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 *Science and Society*, XVII, 4, Fall 1953, 348-351.

Hill, Christopher,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ivil War, " in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8, 3-31.

Hill, Christopher, "Som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Henrician Revolution, " in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8, 32-49.

Hill, Christopher,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0, 15-39.

Hill, Christopher, *Reforma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530-1780*, Vol. II of *The Pe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7.

Hilton, R. H., "Peasant Movements in England before 1381,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6, II, 73-90.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1949.)

Hilton, R. H., "Y eut-il une crise générale de la féodalité? " *Annales E.S.C.*, VI, 1, janv.-mars 1951, 23-30.

Hilton, R. H.,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 *Science and Society*, XVII, 4, Fall 1953, 340-348.

Hilton, R. H., "A Study in the Pre-History of English Enclos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ò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673-685.

Hilton, R. H. and Smith, R. E. F., “Introduction” to R. E. F. Smith, *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1-27.

Hinton, R. W. K., “Dutch Entrepôt Trade at Boston, Lincs., 1600-4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X, 3, Apr., 1957, 467-471.

Hinton, R. W. K., “Letter to the Editor, ” *Encounter*, XI, 1, July 1958.

Hinton, R. W. K.,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9.

Hobsbawm, E. J.,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5-58.

Honjo, Eijiro, “Facts and Ideas of Japan’s Over-sea Development Prior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 ”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XVII, 1, Jan. 1942, 1-13.

Hoskins, W. G., “The Rebuilding of Rural England, 1570-1640, ” *Past & Present*, No. 4, Nov. 1953, 44-57.

Hoszowski, Stanislaw, “The Polish Baltic Trade in the 15th-18th Centuries, ”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Warsaw: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1960, 117-154.

Hoszowski, Stanislaw, "L'Europe centrale dans la révolution des pri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Annales E.S.C.*, XVI, 3, mai-juin 1961, 441-456.

Hudson, G. F.,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Arnold, 1931.

Hurstfield, J., "The Profits of Fiscal Feudalism, 1541-1602,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1, 1955, 53-61.

Hurstfield, J., "Social Structure, Office-Holding and Politics, Chiefly in Western Europe,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126-148.

Innis, Harold 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panish Fishery in Newfoundland, "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3rd ser., XXV, Section II, 1931, 51-70.

Innis, Harold A., *The Cod Fisheries: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40.

Jara, Alvaro, "Un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problemas del trabajo en Chile durante el periodo colonial,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2, 1959, 239-244.

Jara, Alvaro, *Guerre et société au Chili: essai de sociologie coloniale*.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de l'Amérique Latine, 1961.

Jara, Alvaro, "La producción de metales preciosos en el Perú en el

siglo XVI, ” *Boletín de la Universidad de Chile*, No. 44, nov. 1963, 58-64.

Jara, Alvaro, “Estructuras de colonización y modalidades del tráfico en el Pacífico sur hispano-americano, ”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XIXe siècles*, VIIe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1965, 247-275.

Jara, Alvaro, “Economía minera e historia economica hispanoamericana, ” in *Tres ensayos sobre economía minera hispanoamericana*. Santiago de Chile: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e Historia Americana, 1966, 15-54.

Jara, Alvaro, “Salario en una economía caracterizada por las relaciones de dependencia personal,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601-615.

Jeannin, Pierre, “Anvers et la Baltique au XVIe siècle, ” *Revue du Nord*, XXXVII, avr.-juin 1955, 93-113.

Jeannin, Pierre, “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des villes de la Baltique avec Anvers au XVIe siècle,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3, Sept. 1956, 193-217; 4, Dez. 1956, 323-355.

Jeannin, Pierre, “Les comptes du Sund com 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XVIIIe siècles) , ” *Revue historique*, CCXXXI, janv.-mars 1964, 55-102; avr.-juin 1964, 307-340.

Johnsen, Oscar Albert,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la Norvège

et l'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 *Revue historique*, 55e Année, CLXV, 1, sept.-déc. 1930, 77-82.

Jones, E. L., and Woolf, S. J., "The Historic Role of Agrarian Chang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 L. Jones and S. J. Woolf, eds.,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Methuen, 1969, 1-21.

Jones, P. J., "Per la storia agraria italiana nel medio evo: lineamenti e problemi,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2, giugno 1964, 287-348.

Kellenbenz, Herman, "Spanien, die nördlichen Niederlande und die Skandinavisch-baltische Raum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d Politik um 1600,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 4, 1954, 289-332.

Kellenbenz, Herman, "Autour de 1600: le commerce de poivre des Fuggers et le marché internationale de poivre, " *Annales E.S.C.*, XI, 1, janv.-mars 1956, 1-28.

Kellenbenz, Herman, "Landverkehr, Fluss-und Seeschiffahrt im Europäischen Handel (Spätmittelalter-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 " in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XIXe siècles*, VIIe Colloqu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1965, 65-174.

Kerridge, Eric, "The Movement in Rent, 1540-1640,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6, II, 208-226.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 1953.)

Keynes, J. M., *A Treatise on Money*, 2 vol. New York: Macmillan, 1950.

Kiernan, V. G., "Foreign Mercenaries and Absolute Monarchy, " *Past & Present*, No. 11, Apr. 1957, 66-83.

Kiernan, V. G., "State and Nation in Western Europe, " *Past & Present*, No. 31, July 1965, 20-38.

Kingdon, Robert M., "The Political Resistance of the Calvinists in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 *Church History*, XXVII, 3, Sept. 1958, 220-233.

Kingdon, Robert M., "Social Welfare in Calvin's Europ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I, 1, Feb. 1971, 50-69.

Klein, Julius, *The Mesta: A Study in Spanish Economic History, 1273-183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19.

Klíma, A., and Macůrek, J., "La question de la transition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en Europe centrale (16e- 18e siècles) , "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84-105.

Kluchevsky, V. O., *A History of Russia*, 5 vol. London: J. M. Dent, 1911.

Kobata, A., "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Japa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2, Oct. 1965, 245-266.

Koenigsberger, H. G., *The Government of Sicily Under Philip II of Spain*. London: Staples Press, 1951.

Koenigsberger, H. G., "The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Parties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VII, 4, Dec. 1955, 335-351.

Koenigsberger, H. G., "Property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Hainault, 1474-1573) ,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X, 1, 1956, 1-15.

Koenigsberger, H. G., "The Empire of Charles V in Europe,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 R. Elton, 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301-333.

Koenigsberger, H. G., "Western Europe and the Power of Spain,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234-318.

Koenigsberger, H. G., "The European Civil War, " in *The Habsburgs and Europe, 1516-1660*.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 Press, 1971, 219-285. (Originally in H. R. Trevor-Roper, ed., *The Age of Expansion*.)

Kosminsky, Eugen A. "The Evolution of Feudal Rent in England from the XIth to the XVth Centuries, " *Past & Present*, No. 7, Apr. 1955, 12-36.

Kosminsky, Eugen A., "Peut-on considérer le XIVE et le XVE siècles

comme l'époque de la décadence de l'économie européenne?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551-569.

Kovacevic, Desanka, “Dans la Serbie et la Bosnie médiévales: les mines d'or et d'argent, ” *Annales E.S.C.*, XV, 2, mars-avr. 1960, 248-258.

Kula, Witold, *Théorie économique du système féodal: pour un modèle de l'économie polonaise, 16e-18e siècles*. Paris: Mouton, 1970.

Kuznets, Simon, “The State as the Unit of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 1, Winter 1951, 25-41.

Lach, Donal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2 books.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5.

Laclau (h) , Ernesto,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 *New Left Review*, No. 67, May-June 1971, 19-38.

Ladero Quesada, Miguel Angel, “Les finances royales de Castille à la veille des temps modernes, ” *Annales E.S.C.*, XXV, 3, mai-juin 1970, 775-788.

Lane, Frederic C., “The Rope Factory and Hemp Trade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269-284.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V, 1932.)

Lane, Frederic C., “Venet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3-24. (Originall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VIII, 1937.)

Lane, Frederic C., "The Mediterranean Spice Trade: Its Revival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25-34. (Originall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 1940.)

Lane, Frederic C., "National Wealth and Protection Costs, "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373-382. (Originally in Jesse Clarkson and Thomas C. Cochran, eds., *War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1941.)

Lane, Frederic C., "The Economic Meaning of War and Protection, "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383-398. (Originally in *Soci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VII, 1942.)

Lane, Frederic C., "Force and Enterprise in the Creation of Oceanic Commerce, "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399-411.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X, 1950.)

Lane, Frederic C.,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 " in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412-428.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II, 1958.)

Lapeyre, Henri,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Paris: S.E.V.P.E.N., 1959.

Lapeyre, Henri, *Les monarchies européennes du XVI^e siècle*,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39.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Larraz, José, *La época del mercantilismo en Castilla (1500-1700)*.
Madrid: Atlas, 1943.

Laskowski, Otton, "Infantry Tactics and Firing Power in the XVI
Century, " *Teki Historyczne*, IV, 2, 1950, 106-115.

Laslett, Peter, *The World We Have Lost*. New York: Scribner's,
1965.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2nd edition.
Irvington-on-Hudson: Capitol Publishing Co., and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Lattimore, Owen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 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di Scienze Storiche*, I: *Metodologia-Problemi generali-Scienze
ausiliare della storia*. Firenze: G. C. Sansoni, 1955, 103-138.

Lattimore, Owen, "La civilisation, mère de Barbarie? , " *Annales
E.S.C.*, XVII, 1, janv.-févr. 1962, 95-108.

Lefebvre, Henri, "Une discussion historique: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observations, " *La Pensée*, No. 65, janv.-févr. 1956, 22-25.

Lenin, V. I.,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Les paysans du Languedoc*, 2 vol.
Paris: S.E.V.P.E.N., 1966.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 Paris: Flammarion, 1967.

Levenson, Joseph R., ed.,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pansion of Asia, 1300-1600*.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7.

Lewis, Archibald R., "The Closing of the European Frontier, " *Speculum*, XXXIII, 4, Oct.1958, 475-483.

Lewis, Bernar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 " *Studia islamica*, IX, 1958, 111-127.

Livermore, H. V., "Portuguese History, " in H. V. Livermore, ed., *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larendon) , 1953, 48-81.

Lockhart, James, "Encomienda and Hacienda: The Evplution of the Great Estate in the Spanish Indie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X, 3, Aug. 1969, 411-429.

Lockwood, Davi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 in George K. Zollschan and Walter Hirsch, ed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1964, 244-257.

Lonchay, H., "Etude sur les emprunts des souverains beiges au XVIe et XVIIe siecles, "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Bulletins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et de la Classe des Beaux-Arts*, 1907, 923-1013.

Lopez, R. S.,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the South,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M. M. Postan and E. E. Rich, eds.,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2, 257-354.

Lopez, R. S., and Miskimin, H. A.,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3, 1962, 408-426.

Lopez, R. S., Miskimin, H. A., and Udovitch, Abraham, "England to Egypt, 1350-1500: Long-term Trends and Long-distance Trade, " in M. 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70, 93-128.

Lowmianski, Henryk, "The Russian Peasantry, " *Past & Present*, No. 26, Nov. 1963, 102-109.

Lubimenko, Inna,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politiques de l'Angleterre avec la Russie avant Pierre le Grand*. Paris: Lib.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33.

Lublinskaya, A. D., "Preface a l'édition russe d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 *Annales E.S.C.*, XIV, 1, janv.-mars 1959, 91-105.

Lublinskaya, A. D., *French Absolutism: The Crucial Phase, 1620-162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Ludloff, 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16th-17th Century Germany, " *Past & Present*, No. 12, Nov. 1957, 58-75.

Lütge, Friedrich, "Economic Change: Agriculture,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 R. Elton, 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23-50.

Luttrell, Anthony, "Slavery and Slaving in the Portuguese Atlantic (to about 1500) , " in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Africa* (mimeo, 1965) , 61-79.

Luzzatto, Gino, *Storia economica del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Part I, *L'età moderna*. Padova: CEDAM, 1955.

Lyashchenko, Peter I.,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Lybyer, A. H., "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Routes of Oriental Trade,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XX, Oct. 1915, 577-588.

Lythe, S. G. 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in Its European Setting, 1550-1625*.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60.

Maçzak, Antoni,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Poland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Paris: Mouton, 1968. I, 455-469.

Malowist, Marian, "Histoire sociale: époque contemporaine, "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I: Rapport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0, 305-322.

Malowist, Marian, "L'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Pologne du XIVE au XVIIe siècle: traits généraux,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ì*,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571-603.

Malowist, Marian, "Über die Frage des Handelspolitik des Adels in den Ostseeländern im 15. und 16. Jahrhundert, "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75 Jh., 1957, 29-47.

Malowist, Marian, "Poland, Russia and Western Trad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 *Past & Present*, No. 13, Apr. 1958, 26-39.

Malowist, Maria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from the 15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2, 1959, 177-189.

Malowist, Marian, "A Certain Trade Technique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the Fif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Warsaw: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1960, 103-116.

Malowist, Marian, "Un essai d'histoire comparée: les mouvements d'expansion en Europe au XVe et XVIe siècles, " *Annales E.S.C.*, XVII, 5, sept.-oct. 1962, 923-929.

Malowist, Marian, "Les aspects sociaux de la première phase de l'expansion coloniale, " *Africana Bulletin*, No. 1, 1964, 11-40.

Malowist, Marian, "Le commerce d'or et d'esclaves au Soudan Occidental, " *Africana Bulletin*, No. 4, 1966, 49-72.

Malowist, Marian, "The Problem of th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 the Latter Middle Ag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1, Apr. 1966, 15-28.

Malowist, Maria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Middle Ages, " *Past & Present*, No. 33, Apr. 1966, 3-15.

Malowist, Marian, "Les debuts du système des plantations dans la période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 *Africana Bulletin*, No. 10, 1969, 9-30.

Malowist, Marian,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 l'or dans le Soudan occidental au Moyen Age, " *Annales E.S.C.*, XXV, 6, nov.-déc. 1970, 1630-1636.

Mandrou, Robert,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XVIIe siècle, " *Annales E.S.C.*, XIV, 4, oct.-dec. 1959, 756-765.

Mankov, A. G., *Le mouvement des prix dans l'état russe au XVIe siècle*. Paris: S.E.V.P.E.N., 1957.

Manning, Brian, "The Nobles, the People, and the Constitution, " *Past & Present*, No. 9, Apr. 1956, 42-64.

Maravall, José A.,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 4, 1961, 789-808.

Margarido, Alfredo, "L'ancien royaume du Congo, " *Annales E.S.C.*, XXV, 6, nov.-déc. 1970, 1718-1726.

Marrero, Manuela, "Los italianos en la fundación de Tenerife hispánico,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329-337.

Marx, Karl,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 1947.

Marx, Karl, *Capital*, 3 vo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Masefield, G. B., "Crops and Livestock,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276-301.

Mattingly, Garrett, *Renaissance Diplomacy*. London: Jonathon Cape, 1955.

Mauny, R. A., "The Question of Ghana, " *Africa*, XXIV, 3, July 1954, 200-213.

Mauro, François, "Types de navires et constructions navales dans l'Atlantique portugais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 juil.-août 1959, 185-193.

Mauro, François, "Toward an 'Intercontinental Model':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Between 1500-180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 1961, 1-17.

Mauro, François,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aspects économiques*, Collection Nouvelle Clio 32.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6.

McCracken, Eileen, "The Woodlands of Ireland circa 1600, "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XI, 44, Sept. 1959, 271-296.

Meilink-Roelofs, M. A.,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Nijhoff, 1962.

Meuvret, Jean, "Monetary Circulation and the Economic Utilization of Money in 16th- and 17th-Century France, " in Rondo E. Cameron,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Inc., 1970, 140-149. (Translated from *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 1947.)

Meuvret, Jean, "Demographic Crisis in France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rnold, 1965, 507-522.

Miller, A.,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de l'état moscovit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XL, 7-8, juil.-août 1932, 369-421.

Miller, Edward,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Governments: France and England,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M. M. Postan, E. E. Rich and Edward Miller, eds.,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3, 290-340.

Miller, Edward, "The Fortunes of the English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Thir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1, Aug. 1965, 39-60.

Miller, Edward, "Government Economic Policies and Public Finance, 900-1500, "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8, 1970.

Minchinton, W. E., "Introduction, "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9, 1-57.

Miranda, José, "La función económica del encomendero en los orígenes del régimen colonial, Nueva España (1525-1531) , " *Anales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II, 1941-1946, 421-462.

Miranda, José, *El tributo indígena en la Nueva España durante el siglo XVI*.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57.

Miskimin, H. A., "Agenda for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 1, Mar. 1971, 172-183.

Mollat, Michel, "Y a-t-il une économie de la Renaissance? " in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 Paris: Lib. Philosophique J. Vrin, 1958, 37-54.

Mollat, Michel, Johansen, Paul M., Postan, M. M., Saponi, Armando, and Verlinden, Charles, "L'économie européenne aux derniers siècles du Moyen-Age, "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II: *Storia del medioevo*. Firenze: G. B. Sansoni, 1955, 655-811.

Molnar, Erik, "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e l'absolutisme, " in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Mé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Wie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öhne, 1965, 155-169.

Moore, Jr.,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Morineau, Michel, "D'Amsterdam à Séville: de quelle réalité l'histoire des prix est-elle le miroir? ", *Annales E.S.C.*, XXIII, 1, janv.-fevr. 1968, 178-205.

Morison, Samuel Eliot,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2.

Mousnier, Roland,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Henri IV et Louis XIII*. Rouen: Ed. Maugard, n.d., ca. 1945.

Mousnier, Roland,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Vol. IV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4.

Mousnier, Roland, "Recherches sur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avant la Frond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 1958, 81-113.

Mousnier, Roland, ed., *Lettres et mémoires adressées au Chancelier Séguier (1633-1649)*, 2 vo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Mousnier, Roland, *Peasant Uprising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Harper, 1970.

Mundy, John H., and Riesenbergh, Peter, *The Medieval Town*. Princeton, New Jersey: Van Nostrand, 1958.

Murray, John J.,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Flemish Low Countries o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4, July 1957, 837-854.

Myers, A. R., *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Vol. IV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2.

Nadal, Jorge, “La revolución de los precios españoles en el siglo XVI: estado actual de la cuestión, ”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X, 77, oct.-dic. 1959, 503-529.

Nadal, Jorge, *La población española: siglos XVI a XX*. Colección de ciencia económica, VII. Barcelona: Ed. Ariel, 1966.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4.

Needham, Joseph, “Les contributions chinoises à l’art de gouverner les navires, ”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5e, Lisbonne, 1960 (Paris, 1966) with discussion, 113-134.

Needham, Joseph,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Vessel Control, ” *Scientia*, XCVI, 98, April 1961, 123-128; 99, May 1961, 163-168.

Needham, Joseph, “Commentary” on Lynn White, Jr., “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 ” in A. C. Crombie, 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Needham, Joseph, “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 ” in A. C. Crombie, 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117-153.

Nef, John U.,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X, 4, Aug. 1941, 575-591.

Nef, John U.,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 Ithaca: Great Seal Books, 1957. (Originally in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XV, 1940.)

Nef, John U., *War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orton, 1963.

Nef, John U.,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40, " in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4, 121-143.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934.)

Nef, John U., "A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1540 to 1640, " in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4, 144-212.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V, 1936.)

Nef, John U., "Prices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 " in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4, 240-267.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1937.)

Nef, John U., "Industrial Europe at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c. 1515-c. 1540, " in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4, 67-117.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X, 1941.)

Néré, Jean,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 *Revue historique*, CCIII, janv.-mars 1950, 64-69.

North, Douglas C., and Thomas, Robert Paul,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I, 1, Apr. 1970, 1-17.

Ohlin, Gor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the Swedish Aristocracy,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 2, Dec. 1953, 147-162.

Oman, Sir Charles,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37.

Ots Capdequi, J. M., *El estado español en las Indias*. Me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41.

Pach, Zs. P., "Die Abbiegung der Ungarischen Agrarentwicklung von den Westeuropäischen, "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Stockholm, 1960. *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154-156.

Pach, Zs. P., "The Development of Feudal Rent in Hungar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1, Apr. 1966, 1-14.

Pach, Zs. P., "En Hongrie au XVIe siècle: l'activité commerciale des seigneurs et leur production marchande, " *Annales E.S.C.*, XXI, 6, nov.-déc. 1966, 1212-1231.

Pagès, G., "Essai sur l'évolution des institutions administratives en France du commencement du XVI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n.s., No. 1, janv.-févr. 1932, 8-57; No. 2, mars-avr. 1932, 113-151.

Pagès, G.,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dans l'ancienne France, " *Revue*

historique, CLXIX, 3, 1932, 477-495.

Pannikar, K. M.,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3.

Parry, J. H.,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3.

Parry, J. H., "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155-219.

Parry, J. H., "Colonial Developmen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Outside Europe, I. America,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507-532.

Parsons, Talcott,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Pascu, S., Mavrodin, V. V., Porchnev, Boris, and Anteleva, I. G., "Mouvements paysans dans le centre et le Sudest de l'Europe du XVe au XXe siècles, "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Mé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Wie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öhne, 1965, 21-35.

Penrose, Boies,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2.

Perroy, Edouard, "A l'origine d'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 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 " *Annales E.S.C.*, IV, 2, avr.-juin 1949, 167-182.

Perroy, Edouard, *et al.*, *Le Moyen Age*, Vol. III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5.

Pesez, Jean-Marie, and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Le cas français: vue d'ensemble, "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 XI^e—XVII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5, 127-252.

Petráň, Josef, "A propos de la formation des régions de la productivité spécialisée en Europe Centrale, " in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Aix-en-Provence, 1962, II: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 Mouton, 1965, 217-222.

Phelps-Brown, E. H., and Hopkins, Sheila V., "Wage-Rates and Prices: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Economica*, XXIV, No. 96, Nov. 1957, 289-306.

Phelps-Brown, E. H., and Hopkins, Sheila V., "Builders' Wage-Rates, Prices, and Population: Some Further Evidence, " *Economica*, XXVI, No. 101, Feb. 1959, 18-38.

Phelps-Brown, E. H., and Hopkins, Sheila V., "Seven Centuries of Building Wages,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6, II, 168-178. (Originally in *Economica*, XXII, 1955.)

Phelps-Brown, E. H., and Hopkins, Sheila V., "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 of Consumables, 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6, II, 179-196. (*Originally in Economica*, XXIII, 1956.)

Pierce, T. Jones, "Landlords in Wales, A.: The Nobility and Gentry,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357-381.

Pike, Ruth, "The Genoese in Sevil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ew World,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I, 3, Sept. 1962, 348-378.

Pirenne, Henri, "The Stag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apitalism,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X, 3, Apr. 1914, 494-515.

Pirenne, Henri,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6.

Pirenne, Henri, *Early Democracies in the Low Countries*. New York: Norton, 1971.

Pocock, J. G. A., "Letter to the Editor, " *Encounter*, XI, 4, Oct. 1958.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Porchnev, Boris, "Les rapports politiqu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et de l'Europe Orientale à l'époque de la Guerre des Trente Ans, "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136-163.

Porchnev, Boris,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Paris: S.E.V.P.E.N., 1963.

Portal, Roger, *Les Slav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5.

Postan, M. M., "The Chronology of Labour Services,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 XX, 1937, 169-193.

Postan, M. M., "The Fif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2, May 1939, 160-167.

Postan, M. M., "Som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 & 2, 1942, 1-12.

Postan, M. M., "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I, 1-12.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1944.)

Postan, M. M., "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3, 1950, 221-246.

Postan, M. M., "Ital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 4, Fall 1951, 339-346.

Postan, M. M.,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The North,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M. M. Postan and E. E. Rich, eds.,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2, 119-256.

Postan, M. M., "Note" (on article by W. C. Robins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 1959, 77-82.

Postan, M. M.,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of England and the Hanse (1400 to 1475) , " in Eileen E. Power and M. M. Postan, 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91-153.

Pounds, Norman J. G., "Overpopulation in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II, 3, Spring 1970, 225-247.

Power, Eileen E., "The Wool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in Eileen E. Power and M. M. Postan, eds.,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6, 39-90.

Praver, Joshua, and Eisenstadt, S. N., "Feudalism, "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V, 393-403.

Prestwick, Minna, review of Boris Porchnev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CCXX, July 1966, 565-572.

Pullan, Brian, "Wage-earners and the Venetian Economy, 1500-163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3, 1964, 407-26.

Quinn, D. B. "Ireland and Sixteenth-Century European Expansion, " in T. Desmond Williams, ed.,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Bowes & Bowes, 1958, 20-32.

Ramsey, Peter,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London: Gollancz,

1968.

Rau, Virginia, "A Family of Italian Merchants in Portugal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Lomellini,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715-726.

Redlich, Fritz, "European Arist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 2, Dec. 1953, 78-91.

Redlich, Fritz, "De Praeda Militari: Looting and Booty, 1500-1815,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ement No. 39, 1956.

Redlich, Fritz, "Military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redit System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 *Kyklos*, X, 1957, 186-193.

Redlich, Fritz,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 Vol. I,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uppl. No. 47, 1964.

Reglá, Juan, "La cuestión morisca y la conyuntura internacional en tiempos de Felipe II, "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III, 1953, 219-234.

Regiá, Juan, "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nsecuencias, " *Hispania, revista española de historia*, XIII, No. 51, 1953, 215-267; No. 52, 1953, 402-479.

Regiá, Juan, "La expulsión de los moriscos y sus consecuencias en la economía valenciana,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i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525-545.

Renouard, Yves, "1212-1216: Comment les traits durabl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moderne se sont définis au début du XIIIe siècle, "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XXVIII, 1, janv.-mars 1958, 5-21.

Revah, I. S., "L'hérésie marrane dans l'Europe Catholique du 15e au 18e siècle, " in Jacques LeGoff, *Hérésies et sociétés dans l' Europe pré-industrielle, 11e-18e siècles*. Paris: Mouton, 1968, 327-337.

Reynolds, Robert L., *Europe Emerges*.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Rich, E. E., "Expansion as a Concern of All Europe,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G. R. Potter, ed.,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7, 445-469.

Rich, E. E., "Colonial Settlement and its Labour Problems,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302-373.

Rich, E. E., "Preface,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xi-xxxii.

Robertson, H. M.,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VIII, 1, Mar. 1950, 36-53.

Robinson, W. C., "Mone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 1959, 65-76.

Romano, Ruggiero, "La pace di Cateau-Cambrésis e l'equilibrio europeo a metà del secolo XVI,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I, 3, sett. 1949, 526-550.

Romano, Ruggiero, "A Florence au XVIIe siècle: industries textiles et conjoncture, " *Annales E.S.C.*, VII, 7, oct.-déc. 1952, 508-512.

Romano, Ruggiero, "A propos du commerce de blé dans la Méditerranée des XIVe et XVe siècles, " 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3, II, 149-161.

Romano, Ruggiero, "La marine marchande vénitienne au XVIe siècle, " in M. Mollat *et al.*, eds.,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aritime en Europe,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 Actes du I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1962, 33-55.

Romano, Ruggiero, "Tra XVI e X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3, sett. 1962, 480-531.

Romano, Ruggiero, "Encore la crise de 1619-22, " *Annales E.S.C.*, XIX, 1, janv.-févr. 1964, 31-37.

Roorda, D. J., "The Ruling Classes in Hol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J. S. Bromley and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I, 109-132.

Rosenberg, Hans, "The Rise of the Junkers in Brandenburg-Prussia, 1410-1653,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art I, XLIX, 1, Oct. 1943, 1-22; Part II, XLIX, 2, Jan. 1944, 228-242.

Rosenberg, Hans,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66.

Roth, Cecil,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6.

Rowse, A. L., "Tudor Expansio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History, "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IV, 4, July 1957, 309-316.

Rowse, A. L., *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59.

Ruddock, Alwyn A., *Italian Merchants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 Southampton: University College, 1951.

Ruiz Almansa, Javier, "Las ideas y las estadísticas de población en España en el siglo XVI, "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sociología*, I, 1947, 89-107.

Rusche, Georg, and Kirchheimer, Otto,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39.

Salmon, J. H. M., "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 *Past & Present*, No. 37, July 1967, 21-43.

Samsonowicz, Henryk, "Salaires et services dans les finances citadines de la Prusse au XVe siècle et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533-551.

Sansom, George B.,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Knopf, 1950.

Sansom, George B. A., *A History of Japan: II: 1334-161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Savine, Alexander, "Bondmen under the Tudors,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s., XVII, 1903, 235-289.

Sayous, André-E., "Le rôle d'Amsterdam dans l'histoire du capitalisme commercial et financier, " *Revue historique*, CLXXXIII, 2, oct.-déc. 1938, 242-280.

Schöffler, I., "The Dutch Revolution Anatomized: Some Comments,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II, 4, July 1961, 470-477.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2 vol.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1943.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 in Social Classes, Imperiali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Schurz, Walter L., "Mexico, Peru, and the Manila Galleo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 4, Nov. 1918, 389-402.

Sée, Henri,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Adelphi Co., 1928.

Sella, Domenico, "Les mouvements longs de l'industrie lainière à Venis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Annales E.S.C.*, XII, 1, janv.-mars 1957, 29-45.

Sella, Domenico,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Venetian Trade, " in Brian Pullan, 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88-105.

Sella, Domenico, "European Industries, 1500-1700, "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5, 1970.

Serraïma Cirici, Enrique, "Hugonotes y bandidos en el Pirineo Catalán, "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IV, 1954, 207-223.

Serrão, Joël, "Le blé des îles atlantiques: Madère et Açore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 *Annales E.S.C.*, IX, 3, juil.-sept. 1954, 337-341.

Servoise, 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Afrique au XV^e siècle, " *Le mois en Afrique*, No.6, juin 1966, 30-45.

Shneidman, J. Lee, *The Rise of the Aragonese-Catalan Empire, 1200-1350*, 2 vol. New York: N.Y. Univ. Press, 1970.

Sieminski, J., "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I: W. F. Reddaway et al., eds., *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0, 416-440.

Skeel, Caroline, "The Cattle Trade between Wales and England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 IX, 1926, 135-158.

Slicher van Bath, B. H., "The Rise of Intensive Husbandry in the Low Countries, " in J. S. Bromley and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London: Chatto, 1960, I, 130-153.

Slicher van Bath, B. 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D. 50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1963.

Slicher van Bath, B. H., "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pré-industrielle en Europe occidentale, " *Afdeling Agrarische Geschiedenis Bijdragen*, No. 12, 1965, 3-46.

Sluiter, Engel, "Dutch-Spanish Rivalry in the Caribbean Area, 1594-1609,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VIII, 2, May 1948, 165-196.

Smit, J. W.,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Studies Regarding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 in J. S. Bromley and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 11-28.

Smit, J. W., "The Netherlands Revolution, " in Robert Forster and Jack P. Greene, eds.,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19-54.

Smith, R. E. F., *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Smith, Robert S., "Indigo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Colonial Guatemal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2, May 1959, 181-211.

Smolar, Jr., Frank J., "Resiliency of Enterprise: Economic Causes and Recovery in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Charles H. Carter, ed.: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247-268.

Soldevila, Ferran, "Barcelona demana à l'emperador Carles V l'autorització per a comerciar directament amb America (1522) ,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e-Ed., 1962, 633-641.

Solt, Leo F., "Revolutionary Calvinist Parties in England Under Elizabeth I and Charles I, " *Church History*, XXVII, 3, Sept. 1958, 234-239.

Spooner, Frank C., "A la côte de Guinée sous pavilion français (1559-1561) ,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I, 1001-1008.

Spooner, Frank C., "The Habsburg-Valois Struggle,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G. R. Elton, ed.,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8, 334-358.

Spooner, Frank C., "Venice and the Levant: An Aspect of Monetary History (1600-1614) , "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e-Ed., 1962, 643-667.

Spooner, Frank C., "The Economy of Europe, 1559-1609,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14-93.

Spooner, Frank C., "The European Economy, 1609-50,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 P. 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67-103.

Stahl, Henri H., *Les anciennes communautés villageoises roumaines-asseruissement et pénétration capitaliste*. Bucarest: Ed. de l'Académie de la République Socialiste de Roumanie, 1969.

Stein, Stanley J. and Barbara H.,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0.

Stephens, W. B., "The Cloth Exports of the Provincial Ports, 1600-164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 2, Aug. 1969, 228-243.

Stoianovich, Traian,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Pre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Balkans,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V, 3, Spring 1971, 205-262.

Stone, Lawrence, "State Control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 1, 1947, 103-120.

Stone, Lawrence, "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1 & 2, 1948, 1-53.

Stone, Lawrence, "Elizabethan Overseas Trad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 1949, 30-58.

Stone, Lawrence,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A Restatement,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1, 2, & 3, 1951-52, 302-321.

Stone, Lawrence, "The Nobility in Business, 1540-1640,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X, 2, Dec. 1957, 54-61.

Stone, Lawrence, "Letter to the Editor, " *Encounter*, XI, 1, July 1958.

Stone, Lawrence,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 *Past & Present*, No. 33, Apr. 1966, 16-55.

Stone, Lawrenc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abr. ed.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7.

Strauss, Gerald,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iley, 1966.

Strayer, Joseph,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0.

Streider, Jacob,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Early European Capitalism,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 1, Nov. 1929, 1-19.

Supple, Barry,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9.

Swart, K. W., *The Sale of Offic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Hague: Nijhoff, 1949.

Sweezy, Paul,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 *Science and Society*, XIV, 2, Spring 1950, 134-157.

Szeftel, Marc, "Aspects of Feudalism in Russian History, " in Rushton Colbour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6, 167-182.

Takahashi, H. K.,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Sweezy-Dobb Controversy, " *Science and Society*, XVI, 4, Fall 1952, 313-345.

Takahashi, H. K., "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 *In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 140, 1955, 143-151.

Tapié, Victor-L., *La France de Louis XIII et de Richelieu*. Paris: Flammarion, 1952.

Taube, Edward, "German Craftsmen in England During the Tudor Period,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IV, 14, Feb. 1939, 167-178.

Tawney, R. H.,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Longmans, 1912.

Tawney, R. H., "Introduction" to Thomas Wilson, *A Discourse Upon Usury*. London: Bell & Sons, 1925, 1-172.

Tawney, R. H., "Harrington's Interpretation of His Age, "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41, 199-223.

Tawney, R. H., "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I, 173-206.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 1941.)

Tawney, R. H., "Postscript,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I, 206-214.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1954.)

Taylor, A. J. P.,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Hamilton, 1945.

Taylor, K. W., "Some Aspects of Population History,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XVI, Aug. 1950, 301-313.

Tazbir, Janusz,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Gentry, " in Aleksander Gieysztor *et al.*, *History of Poland*. Warszawa: PWN-Polish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68, 169-271.

Teall, Elizabeth S., "The Seigneur of Renaissance France,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VII, 2, June 1965, 131-150.

Thiriet, Freddy,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Age*, Bibliothèque des Ecoles Française d'Athènes et de Rome, fasc. 183. Paris: Boccard, 1959.

Thirsk, Joan,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 "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1, 70-88.

Thirsk, Joan, "Enclosing and Engrossing,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200-255.

Thirsk, Joan, "The Farming Regions of England,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1-112.

Thirsk Joan, "Farming Techniques,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161-199.

Thompson, F. M. L.,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England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3, Dec. 1966, 505-517.

Thorner, Daniel, "L'économie paysanne: concept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 *Annales E.S.C.*, XIX, 3, mai-juin 1964, 417-432.

Thrupp, Sylvia, "Medieval Industry, 1000-1500, "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6, 1971.

Tilly, Charles,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 mimeo, forthcoming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Building of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Tilly, Charle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 mimeo., forthcoming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Building of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Topolski, Jerzy, "La régression économique en Pologne,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VII, 1962, 28-49.

Trevor-Roper, H.R.,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An Anatomy Anatomize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I, 3, 1951, 279-298.

Trevor-Roper, H. R., "The Gentry, 1540-164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ement 1, 1953.

Trevor-Roper, H..R., "Letter to the Editor, " *Encounter*, XI, 1, July 1958.

Trevor-Roper, H. R., "England's Moderniser: Thomas Cromwell, " in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Harper, 1966, 74-78.

Trevor-Roper, H. R., "The Jesuits in Japan, " in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Harper, 1966, 119-124.

Trevor-Roper, H. R.,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1969, 46-89.

Trevor-Roper, H. R.,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 in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1.969, 1-45.

(Previously published as part of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Tymieniecki, Kazimierz, "Le servage en Pologne et dans les pays limitrophes au moyen âge, "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Rome*. Warszawa: 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Institut d'Histoire, 1955, 5-28.

Ullman, Joan Connelly, "Translator's footnotes, " in Jaime Vicens Vives,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Spain*, 2nd ed.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Umiriski, J.,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Poland, "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I: W. F. Reddaway et al., eds., *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to 1696)* .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0, 394-415.

Utterström, Gustaf,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 1955, 3-47.

Vaccari, Pietro, "I lavatori della terra nell'occidente e nell'oriente dell'Europa nella età moderna,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ì*.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I, 969-978.

Válka, Josef, "La structure économique de la seigneurie tchèque au XVIe siècle, "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II: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 Mouton, 1965, 211-215.

van der Sprenkel, Otto B.,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Ming China, " *Bulletin of the SOAS*, XV, Part 2, 1953, 289-326.

van der Wee, Herman,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3 vol. The Hague: Nijhoff, 1963.

van Dillen, J. G., "Amsterdam's Ro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Politics and its Economic Background, " in J. S. Bromley and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I, 133-147.

van Houtte, J. A., "Bruges et Anvers: marchés 'nationaux' ou 'internationaux' du XIVe au XVIe siècles, " *Revue du Nord*, XXXIV, 1952, 89-108.

van Houtte, J. A., "Anver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expansion et apogée, " *Annales E.S.C.*, XVI, 2, mars-avr. 1961, 248-278.

van Houtte, J. A., "Déclin et survivance d'Anvers (1550-1700) ,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m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703-726.

van Houtte, J. A., "L'approvisionnement des villes dans les Pays-Bas (Moyen Age et Temps Modernes) ,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73-77.

van Leur, J. C.,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van Hoeve, Ltd., 1955.

Veblen, Thorstei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igan: Ann Arbor Paperbacks, 1966.

Verlinden, Charles, "The Rise of Spanish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1, 1940, 44-59.

Verlinden, Charles, "Deux aspects de l'expansion commerciale du Portugal au moyen âge, " *Revista portuguesa de história*, IV, 1949, 169-209.

Verlinden, Charles, "Italian Influence in Iberian Colonizatio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II, 2, May 1953, 199-211.

Verlinden, Charles,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2 vol. Brugge: De Tempel, 1955.

Verlinden, Charles, "La colonie italienne de Lisbonn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métropolitaine et coloniale portugaise,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ì*.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I, 615-628.

Verlinden, Charles, "Cris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en Belgique à l'époque de Charles Quint, " in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Paris, 30 sept.-3 oct.1958. Paris: Ed. du C.N.R.S., 1959, 177-190.

Verlinden, Charles, "L'état et l'administration des communautés indigènes dans l'empire espagnol d'Amériqu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 Göteborg: Almqvist & Wiksell, 1960, 133-134.

Verlinden, Charles, "La Crète, débouché et plaque tournante de la traite des esclaves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I: *Medioev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593-669.

Verlinden, Charles, et al, "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en Belgique au XVI^e siècle, " *Annales E.S.C.*, X, 2, avr.-juin 1955, 173-198.

Vernadsky, George, "Feudalism in Russia, " *Speculum*, XIV, 3, July 1939, 300-323.

Vernadsky, George, *The Tsardom of Muscovy, 1547-1682*, Vol. V of *A History of Russia*, 2 part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69.

Vicens Vives, Jaime, "Discussion" of Charles Verlinden, "Cris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en Belgique à l'époque de Charles-Quint, " in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30 sept.-3 oct. 1958. Paris: Ed. du C.N.R.S., 1959.

Vicens Vives, Jaim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9.

Vicens Vives, Jaime,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Spain*, 2nd ed.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Vilar, Pierre, "Le temps de Quichotte, " *Europe*, 34, Nos. 121-122, janv.-fevr. 1956, 3-16.

Vilar, Pierre, "Problems on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m, " *Past & Present*, No. 10, Nov. 1956, 15-38.

Vilar, Pierre, *La Catalogue dans l'Espagne moderne*, 3 vol. Paris: S.E.V.P.E.N., 1962.

Villari, Rosario, *La rivolta antispagnola a Napoli: le origini (1585-1647)*. Bari: Laterza, 1967.

Vitale, Luis, "Latin America: Feudal or Capitalist? , " in James Petras and Maurice Zeitlin, eds., *Latin America: Reform or Revolution?*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8, 32-43.

Vitale, Luis, "España antes y después de la conquista de America, " *Pensamiento crítico*, No. 27, abril 1969, 3-28.

Vivante, Corrado, "Le rivolte popolari in Francia prima della Fronde e la crisi del secolo XVII,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4, die. 1964, 957-981.

Warriner, Doreen,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Agrarian Europe, "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XXI, No. 78, Dec. 1953, 168-186.

Watson, Andrew M., "Back to Gold-and Silve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 1, 1967; 1-34.

Webb, Walter Prescott, *The Great Frontier*.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1952.

Weber, Max,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Weber, Max,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Weber, Max, *The Religion of Ind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Totowa, New Jersey: Bedminster Press, 1968.

Wernham, R. B., "English Policy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 in S. Bromley and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Groningen: Wolters, 1964, I, 29-40.

Wernham, R. B., "The British Question, 1559-69,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209-233.

Wernham, R. B., "Introduction,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R. B. Wernham,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1-13.

White, Jr., Lynn, "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 , " in A. C. Crombie, ed., *Scientif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272-291.

Willan, T. S., "Trade Between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III, No. 247, July 1948, 307-321.

Willetts, William, "The Maritime Adventures of the Great Eunuch Ho, " in Colin Jack-Hinton, ed., *Papers on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964, 25-42.

Williams, Eric, *Capitalism and Slavery*. London: Deutsch, 1964.

Williams, Penry, and Harriss, G. L., "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 " *Past & Present*, No. 25, July 1963, 3-58.

Wilson, C. H.,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I, 2, 1960, 209-221.

Wilson, C. H., "Trade,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487-575.

Wittman, T., "Quelques problèmes relatifs à la dictature révolutionnaire des grandes villes de Flandres, 1577-1579, " *Studia histor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No. 40, 1960.

Wolf, Eric, *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9.

Wolf, Eric,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6.

Wolfe, Martin, "Fiscal and Economic Policy in Renaissance France,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1968, 687-689.

Woolf, S. J., "Venice and the Terraferma: Problems of the Change from Commercial to Landed Activities, " in Brian Pullan, 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175-203.

Wright, L. P., "The Military Order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Spanish Society, " *Past & Present*, No. 43, May 1969, 34-70.

Youngs, Joyce, "Landlords in England, C: The Church, "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Joan Thirsk, ed., 1500-164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7, 306-356.

Zagorin, Perez,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3, Sept. 1959, 376-401.

Zavala, Silvio, *La encomienda indiana*.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1935.

Zavala, Silvio, *New Viewpoints on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3.

Zeller, Gaston, “Industry in France Before Colbert, ” in Rondo E. Cameron,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Inc., 1970, 128-139. (Translated from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VIII, 1950.)

索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系原著页码，检索时请查阅本书正文页边码）

A

Abel, Wilhelm, 艾贝尔 25, 44

Abbeys, 参见Monasteries大修道院

Ab legibus solutus, 无法律限制 144

Abrate, Mario, 阿伯雷特 16, 92

Absolute monarchy, 参见State, absolutism绝对君主制

Acapulco, 阿卡普尔科 337

Act of Supremacy, 至尊法案 234, 另见Anglican Church

Aden, 亚丁 327

Gulf of, 亚丁湾 327

Aegean Islands, 爱琴海诸岛 38, 218

Affonso I, Dom, King of the Kongo, 阿方索一世, 刚果国王 339

Africa, 非洲 4-6, 32, 49, 87-90, 183, 187-188, 262, 276, 296, 325, 329, 332-333

coast of, 西非海岸, 参见Africa, West East, 东非 54, 327-329

North (or northern), 北非 17, 39, 41-42, 46, 168, 314

southeast, 东南非, 参见Africa, East West, 西非 42, 44, 47,

49, 68, 168-169, 188, 326-328, 332-334, 341-342

Agincourt, 阿金库尔 50

Agriculture, 农业 34, 98, 100, 102, 107, 109, 126-127, 198, 216-217, 219, 304, 307, 312, 320, 324

arable production, 可耕地 22, 27, 35, 101, 106-110, 112, 116, 191, 193-194, 250, 255, 272, 295, 318

capitalist, 资本家 42, 86, 89, 92, 111, 119, 133, 142, 147, 149, 153, 157, 159-160, 167, 187, 192, 221, 236-237, 240, 243-244, 246, 248, 255-256, 260, 260, 264, 269, 273, 283, 286, 302, 305, 339, 另见Coerced labor, Farmer, Laborers, Slavery cash-crops, 商业作物, 参见Agriculture, capitalist

enclosures, 农业圈地 25, 102, 106, 109-110, 112, 115-117, 142, 191, 193-194, 234, 249-251, 253-256, 279, 295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耕种区扩张 24, 26, 31, 37-38, 42, 47, 51, 57, 102, 117, 141, 217, 另见Europe, expansion of

extensive, 疏耕农业 104

fertilizers, use of, 肥料使用 250

horticulture, 园艺 42, 100, 112

improvements in, 农业改进 250-251

innovation in, 农业革新 42, 52, 95

intensive, 密集农业 101, 104, 109

irrigated, 灌溉 43, 85

land consolidation, 土地合并 256

land-markets, 土地市场 236, 239, 246, 248-249

pasturage, 畜牧 22, 27, 35-36, 42, 92, 101-102, 108-110, 112, 115-116, 142, 191, 193-194, 249-250, 252, 255, 279, 另见 Livestock Meat

re-agrarianization, 重新分配地 152

retraction of cultivated areas, 耕地收缩 21, 25, 34, 37

rotation systems, 轮栽制 53, 91, 250

subsistence, 少有剩余的农场经营 17-18, 58, 72, 91, 226, 246, 295, 311

Albuquerque, Affonso, 阿尔布奎基 327, 334

Alcoholic drinks, 含酒精饮料 43, 另见 Beer, Hippocras, Rum, Wine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科克因计划 275, 277, 另见 England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58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340

Alfieri, Count Vittorio, 140 阿尔菲里

Algarve, 阿尔加维 43

Algiers, Regency of, 阿尔及尔 32, 218

Alienable land, 可转不良的土地, 参见Tenure, allodial

Allensbach, 阿伦斯巴赫 19

Allodial tenure, 自主佃农, 参见Tenure, allodial

Alps, 阿尔卑斯 142, 171, 173

Alsace, 阿尔萨斯 79

Alum, 明矾 231, 260

Alva, Duke of, 阿尔法 186, 205, 215

Ambergris, 龙涎香 78

America (the Americas), 美洲 41, 44, 68, 87, 90, 117, 128, 150, 153, 156, 173, 179-180, 183, 187, 190-192, 201, 211, 215, 217, 264, 270, 274, 301, 305, 326, 329, 332, 336-338, 342

American Indians, 美国印第安人, 参见Amerindians

discovery of, 发现美洲 169, 183

Hispanic, 西属美洲 47, 82, 90-94, 99-100, 102-103, 112, 120, 126, 129, 168, 170, 178, 189-190, 194, 221, 280, 302, 313, 353, 另见America, Iberian; Antilles; Chile; Colombia; Cuba; Guatemala; Hispaniola; Mexico; Peru

Iberian, 伊比利亚 328, 335, 另见 America, Hispanic; Brazil
“internal Americas”, 美洲内, 参见 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Latin, 拉丁美洲 5-6

Meso-, 中美洲 85

Middle, 中美洲 88, 188

North, 北美洲 35, 88, 261, 281, 308

South, 南美洲 194, 266, 339, 342

Amer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 87, 89, 92-94, 99-100, 188-191,
270-271, 338

chiefs (caciques), 酋长 94, 180, 187-188, 313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32, 70, 121, 129, 180, 185-186,
199, 201, 205, 211-215, 217-218, 274, 276, 341, 另见 Holland;
Netherlands, northern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70-71, 103, 169-170, 183, 190, 192,
194, 196

Angevin monarchy, 安茹王朝 32

Anglican Church, 安立甘教 234, 另见 Christianity, Protestantism

Anglo-Irish, 257 盎格鲁-爱尔兰人

Animals, domestic, 动物 90

Annam, 安南 54

Anteleva, I.G., 安特列娃 305

Anticlericalism, 反教权主义 152

Antilles, 安的利斯 68, 88, 93, 261-262, 266

Anti-mercantilism, 反重商主义 304, 323, 另见Open economy

Antiquoía, 安蒂奥基亚 99

Antiquity, vogue of, 古代时尚 145

Anti-Trinitarianism, 反三位一体论 155

Antwerp, 安特卫普 122-122, 129, 155, 173-177, 183-186, 196, 199, 201, 205, 214-215, 226, 230-231, 263-265, 274, 341, 另见Flanders

Apennines, 亚平宁 142

Apulia, 阿普利亚 218

Arbia (Araby), 阿拉伯半岛 327, 336

Arabs, 阿拉伯 39, 194, 216, 327-328, 332, 339-340, 另见Islam

Aragon, 阿拉冈 29, 109, 150, 166, 170, 179, 184, 193-196, 218, 另见Catalonia

Araucanian Indians, 阿劳干印第安人 170, 另见Amerindians

Araya, 阿拉亚 342

Ardant, Gabriel, 阿丹特 90, 101, 292, 314

Arguin, 阿吉因 168

Aristocracy, 贵族 41, 62, 95, 100, 103, 111, 119, 134, 146-147, 154-155, 157-159, 162, 190, 192-194, 200, 203, 205, 236-240, 242, 245, 258, 284, 286, 288-290, 295, 297, 309, 311-312, 314, 317, 320, 322, 354-355, 另见Landlords, Peers, Sgniors debts, 债务 195, 237, 另见Seigniors, seigniorial income

decline in feudal, 封建贵族, 参见Seigniors

Armada, 参见Spain, Spanish Armada无敌舰队

Armaments, 军备 29, 212, 305, 331, 另见Army; Artillery; Industries, military equipment and ordnance; Munitions

Armenians, 亚美尼亚人 155

Army, (standing), 军队 29, 139-141, 233-234, 269, 292, 309-310, 316, 324, 356, 另见Artillery; Cavalry; Industries, military

equipment and ordnance; Infantry; War

contractors to, 承包商 227, 244, 另见Merchants

mercenaries, 雇佣军 29, 30, 139-143, 157, 250, 309, 另见Capitalism, en-trepreneurs, military

private armies, 私人军队 310 victualling, 供给食物 141, 218, 另

见Army, contractors to

Arnold, Stanislaw, 阿诺德 154-155

Art objects, 艺术品 192, 306

Artificers, Statute of, 发明家, 参见 Engl-and, Statute ofArtificers

Artillery, 炮兵队 29, 53, 332, 另见 Armaments, Army, Cannons

Artisans (artisanal enterprises), 工匠 18, 20-22, 26, 40, 61, 81, 86, 110, 119, 123, 141, 150-151, 185-186, 191, 203, 208, 220, 225-226, 251, 261, 267-268, 290-291, 304, 321, 323

Ashton, Robert, 阿什顿 282

Asia, 亚洲 5-6, 35, 45, 53, 187, 325-326, 328-336, 338-339, 341-344

Central, 中亚 17, 42, 314

southern, 南亚 331, 另见Ceylon, India

southeast, 东南亚 329

southwest, 西南亚, 参见Levant

Assimilation, 同化作用 146

Aston, Trevor, 阿斯顿 219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303

Atlantic 大西洋

islands, 大西洋群岛 42-43, 47, 49, 68, 88-89, 333, 335

oceanic currents, 大西洋潮流 49, 52, 169

south, 南大西洋 327

Atlantic (world), 大西洋世界 42, 44, 48-49, 51-52, 99, 128, 169, 183, 215, 217, 261, 272, 303, 326, 335, 另见Trade, Atlantic; World-economy

Atlantic economy, 大西洋经济, 参见Trade, Atlantic

Attman, A., 阿特曼 306

Augsburg, 奥格斯堡 19, 79, 174, 266

Treaty of, 奥格斯堡和约 178, 197

Austria, 奥地利 96, 170-171, 197, 307, 另见Germany, southern

Austrian Netherlands, 奥地利尼德兰, 参见Netherlands, Southern

Austrian Succession, War of the, 奥地利继承权战争 137

Avalon Peninsula, 阿瓦龙半岛 281

Aydelotte, Frank, 艾德洛特 253-254

Aylmer, G.E., 艾尔默 235

Aznar, Luis, 阿兹纳 334

Azov Sea, 亚速海 303

Azores, 亚速尔（群岛） 43-44, 301

Aztecs, 阿兹特克人 43, 338

B

Bacon, Sir Francis, 培根 275

Baehrel, René, 贝歇尔 271

Bagú, Sergio, 巴古 88, 92-93

Bahía, 泛神教信徒 89

Bakufu, 室町幕府, 参见Japan

Balae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38, 170

Balandier, Georges, 巴兰迪尔 339

Balliol College, Oxford, 巴利奥学院 207

Baltic (region), 波罗的海 42, 45, 68, 75-76, 101, 110-111, 150, 180, 212-214, 217-218, 227, 230, 261, 271, 276-277, 281, 292, 304, 308, 312, 316-317, 322-324

Balts, 波罗的海地区居民 38

Banco della Pizza di Rialto, 存款银行 214, 另见Banking, deposit

Bandes d'ordonnances, 203, 另见Cavalry

Banditry, 盗匪之行径 61, 141-143, 196, 198, 355, 另见Piracy

Bankers, 银行家, 参见Financiers

Banking, 银行业务 107, 122, 148-150, 155, 169, 184, 218, 221, 另见Financiers; Merchant-Bankers; Money; State, banks

deposit, 存款 121, 214

Bankruptcy, 破产, 参见State, bankruptcy

Bannon, John F., 班农 93

Barberini, Raffaello, 巴尔贝里尼 325

Barbour, Violet, 巴伯 211-214

Barcelona, 巴塞罗那 123, 192, 295, 340

Bardi Peruzzi, 巴迪 148

Barkan, Ömer Lutfi, 巴肯 302, 325

Barley, M.W., 巴莱 251

Baron, Salo W., 巴伦 147-149, 153

Barons, 男爵, 参见Peers

Barraclough, Geoffrey, 巴拉克勒夫 8, 177, 186, 306

Barrel-stave making, 制桶, 参见Industries, wood products

Basques, 巴斯克人 45, 139

Bastille, storming of, 巴士底监禁 206

Batho, Gordon, 巴索 235, 243, 251-252

Bauthier, Robert-Henri, 鲍蒂埃 183

Béarn, 贝亚恩 267

Becker, Marvin B., 贝克 138

Beer, 啤酒 324

Belgium, 比利时, 参见Netherlands, southern

Beloff, Max, 贝洛夫 136

Bennett, M.K., 贝内特 43-44

Berbers, 柏柏尔人 168

Beresford, Maurice W., 贝瑞斯福德 25

Bergen, 卑尔根 121

Berrill, K., 贝瑞尔 127, 265

Berry, 贝里 293

Besançon, 贝桑松 215

Betts, Reginald R., 贝茨 97

Bills of exchange, 交换货币, 参见Money, Bills of exchange

Bindoff, S.T., 宾多夫 201, 216, 230, 261

Biscay, Bayof, 比斯开(湾) 264

Bishko, Charles Julian, 比许科 48

Bitton, Davis, 比滕 283, 285

Black Death, 黑死病 34-36, 40, 148

Blacks, 黑暗 99-100, 另见Africa

Blanchard, Ian, 布兰查德 78, 103-104

Bloch, Marc, 布洛赫 17, 23, 26, 28-29, 45-46, 87, 104, 108, 114-117, 161, 180, 231, 236, 271, 285

Blum, Jerome, 布鲁姆 95, 303, 305-306, 315, 317-318, 320-322

Bohemia, 波希米亚 41, 94-95, 170, 197, 303, 307-308, 321, 324, 另见Czehia

Bologna, 波隆那 105

Bona, Queen of Poland, 波娜, 波兰皇后 321

Bond-labor, 禁锢劳工, 参见Serfs

Booty, 战利品, 参见Plunder

Borah, Woodrow, 博拉 89, 188-190, 337-338

Bordeaux, 波尔多 295

Bboserup, Ester, 博瑟阿波 21

Bosnia, 波斯尼亚 40

Boston (Lincs.), 波士顿 227

Bourbonnais, 布邦内斯 293

Bourgeoisie, 中产阶级 47-48, 61-62, 82, 105, 107, 113, 119, 123-124, 133, 142, 146, 150-151, 154-155, 157-160, 165-167, 186, 192-195, 202-204, 206, 208-211, 221, 244, 258, 264, 269, 284-291, 296-297, 302, 312, 317, 319, 323, 334, 351-353, 355, 另见Burghers; Capitalism, entrepreneurs; Farmers, capitalist; Financiers; Gentry; Industrialists; Merchants; Classes, middle; Patriciate; Trade betrayal of, 中产阶级反叛273, 287

embourgeoisement of power, 权力的资产阶级化 283

feudalization of, 封建制度 283, 296

foreign, 外国中产阶级 20, 51-52, 119, 149, 151, 192-195, 221, 285, 304, 321-323

indigenous, 本地的中产阶级 50-52, 87, 107, 122, 149, 151, 182, 289, 302, 309, 317, 320-324

manufacturing, 制造业的中产阶级, 参见Industrialists petty, 128, 208

Bouwsma, William J., 鲍斯马 145, 156, 217

Bowden, P.J., 鲍登 108, 228, 239, 260, 279-280

Boxer, C.R., 博克塞 49-50, 55, 327, 329, 332, 337, 339, 342-

Boyars, 旧贵族 (俄) 313-314, 318, 320, 另见Seigniors

Brabant, 布拉邦 81, 123, 211, 325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27, 119, 302, 307, 322

Brass, 黄铜 260

Braudel, Fernand, 布罗代尔 16-17, 29, 32, 35, 41-42, 44-45, 47-49, 52, 67-68, 70-72, 77, 83, 89, 96-97, 104, 106, 117-118, 124, 128-129, 133, 136, 138-139, 141, 150, 158, 160, 165, 167-169, 172, 176, 179, 183, 185, 192, 194, 198, 211-217, 221, 260-262, 296, 302, 304, 309, 330, 340

Brazil, 巴西 68, 88-89, 93, 272, 301, 332-333, 335-336, 339, 341-342, 357, 另见America, Iberian

Bread, 面包 44, 另见Cereals

Breaking of the Images, 圣像破坏运动 205-206, 另见Revolution, Netherlands

Brenner, Y.S., 布伦纳 72

Brigandage, 劫匪, 参见Banditry

Brinton, Crane, 布尔顿 206

Brittany, 布列塔尼 43, 106, 139, 180, 268, 295

Broadcloth, 宽布, 参见Textiles, woollens

Brokers, 经纪人, 参见Financiers

Bromley, J.S., 布鲁姆林 42, 200, 202

Bruges, 布鲁日 49, 175, 201, 213, 325, 另见Flanders

Brulez, Wilfrid, 布鲁勒兹 175, 265

Brunner, Otto, 布鲁诺 325

Brutzkus, J., 布鲁茨库斯 147

Bücher, Karl, 比歇尔 19

Buckatzsch, E.J., 布卡契 250

Building materials, 建筑材料, 参见Wood

Bulferetti, Luigi, 布费尔蒂 92, 221, 160

Bullion, 金银条块 39-41, 45-46, 51, 71-77, 100, 118, 168-170, 176, 183, 187-188, 192, 195, 197-200, 213, 215-217, 231, 265, 271-272, 277-278, 280, 290-291, 305-306, 314, 329-330, 333, 336-337, 另见Gold, Money, Silver

dehoarding, 73

drain of, 金银流失 40, 337

hoarding, 22, 31, 73, 330, 333

Burckhardt, Jacob, 布克哈特 172

Bureaucratic politics, 官僚政治 135

Bureaucracy, 官僚制度, 参见State, bureaucracy

Bureaucratization, 官僚制度化, 参见State, bureaucracy

Burgesses, 市民, 参见Burghers

Burghers, 自治市公民 107, 311, 321-322, 352, 另见

Bourgeoisie, Towns, Patriciate

Burgundy勃艮第（若与“低地国家”有关, 请参见Low Countries; 若与“法国省份”有关, 则请见下文）, 50

Burleigh, William Cecil, Lord, 布尔莱 241

Busch-Zantner, R., 布什赞特纳 302

Byzantium, 拜占庭 16-17, 20, 39, 53, 289, 325, 334

C

Caciques, 部族酋长, 参见Amerindians, Chiefs

Cabot, John, 卡波特 169

Cadiz, 加地斯 193, 213

Caesar, Julius, 西泽 326

Cahen, Claude, 卡恩 20, 90

Calais, 加来港 230

Calicut, 卡利卡特 327, 330

Caliphs, 哈里发 58

Calvin, John, 加尔文, 参见Calvinism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152-156, 185-186, 202, 205-209, 267, 297, 另见Christianity, Huguenots, Protestantism

Cameron, Rondo E., 卡梅伦 109, 183

Campbell, Mildred, 坎贝尔 246, 248-251

Canary Islands, 加那利群岛 88-89, 169

Cane-farming, 甘蔗农业, 参见Sugar

Cannons, 加农炮 28, 53, 161, 260, 326, 另见Armaments;

Artillery; Indust-ries, military equipment and ordnance

Cape Cod, 科德角 96

Cape of Good Hope, (Cape route), 好望角 216, 325, 328, 330, 337, 340

Cape Verde Islands, 佛得角群岛 43

Capetian monarchy, 卡佩王朝 46, 58, 115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6-18, 23, 28-29, 46, 51-52, 59-60, 62-63, 67-68, 74-75, 77-78, 81, 87-88, 92-93, 98, 102, 110, 113, 120-124, 126-129, 133-134, 136, 138, 140-141, 149, 151-155, 157, 161-162, 168, 177, 180, 184, 188, 191-194, 207, 214, 220, 228, 232, 236, 242-244, 247, 252, 254, 256-259, 264, 276, 286, 288-290, 293, 295, 309, 340, 348, 350, 354-355, 另见
Agriculture, capitalist; Bourgeoisie; Companies; Indu-stries; Money; Trade; World-economy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rimitive), 资本积累 69, 75, 77, 83-84, 91, 153, 217, 249, 287, 290-291, 317, 324, 350

availability of capital, 可用资本 106, 121, 191, 323

“booty capitalism, ”资本市场, 参见Plunder capital market, 参见
Money, financial centers

capitalist agriculture, 资本农业, 参见Agriculture, capitalist

“colonial capitalism, ”殖民地资本主义 92

entrepreneurs, 企业家 46, 50-51, 60-61, 106, 116, 119, 123-124, 135, 148, 159-161, 196, 201, 206, 238, 244, 249, 290, 316, 328, 330, 334, 354, 另见Bourgeoisie military, 军事140-141, 160, 另见Army, mercenaries

“feudal capitalism, ”封建资本主义 92

investments, 资本主义发明 23, 36, 49, 78, 83-84, 92, 107, 126, 128, 148, 157, 160, 191-193, 195, 214, 217-218, 220, 227, 260, 297, 311, 321, 328, 342

merchants' capital, 商业资本 167

monopolies, 资本主义独占 15-16, 74, 150, 160-161, 169, 180, 230, 269, 273, 275, 278, 280, 288, 311, 316, 324, 327-328, 332, 336, 340, 342-343, 355, 另见State, monopoly

Capitalist, 资本家, 参见Bourgeoisie

landed, 拥有土地的, 参见Farmers, capitalist

Capitation, 资本, 参见Taxes, capitation

Captaincies (capitanias), 地主, 参见Estates, donatário

Carande, Ramon, 卡拉德 178-179, 191, 193

Carew, Sr George, 卡鲁爵士 96

Caribbean, 加勒比 178, 187, 333, 342, 另见 Antilles, Colombia, Guatemala, Mexico

Carolingian Empire, 加洛林帝国, 参见Empire, Carolingian

Carpenters, 木匠, 参见Workers

Carsten, F.L., 卡尔斯坦 311, 322

Carter, Charles H., 卡特 201

Carus-Wilson, E.M., 卡卢斯-威尔森 24, 78, 81, 116, 212, 229, 233, 236, 242, 276

Casa de Contratación de las Indias, 印度贸易公司 69, 165, 200

Casados, 已成家者 343

Cash-crops, 商业农产品, 参见Agriculture, capitalist

Caspian Sea, 里海 303

Castelli, Enrico, 卡斯提利 145

Castes, 种姓制度 99, 245, 另见Status-groups

Castile, 卡斯提尔 29, 82, 103, 109, 165-168, 176, 179-180, 185, 189, 191, 193-196, 221, 287, 314, 343-344, 另见Spain

Catalonia, 加泰隆尼亚 32, 49, 82, 96, 101, 180, 186, 192, 196, 221, 287

Cateau-Cambresis, Treaty of, 卡托坎布雷和约 181, 184-185, 197-198, 203-204, 225, 234, 262-263, 266, 280

Catherine, Queen of France, 凯瑟琳 207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教会 30, 32, 53, 113, 142, 148, 151-156, 160, 172, 181, 186, 190, 192, 197, 202, 204-209, 213, 217, 236, 246, 259, 266-268, 281, 294, 309-310, 319, 333, 339, 343, 353-354, 另见Christianity

Council of Trent, 特伦特会议 204

Counter-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151-152, 156, 204, 217, 266, 310, 353

divine truce, 神圣休战 148

Jesuits, 耶稣会士 89, 155, 342

Papacy, 罗马教皇职位 40, 143, 153, 155-156, 160, 172, 174, 177, 192, 203, 207, 268, 335, 另见Rome

Catholic League, 天主教联盟 268, 294-295, 另见France, Wars of Religion

Catholic Monarchs, 天主教君主, 参见Ferdinand and Isabella

Cattle, 家畜 23, 53, 56, 63, 90, 96, 100-102, 108-109, 159, 188, 228, 264, 322, 333, 另见Livestock

cattle-raising, 家畜蓄养 109, 247, 另见Agriculture, pasturage

ranches, 农场 92, 187

Cavalry, 骑兵 28-29, 58, 206, 281, 另见Army

Celts, 凯尔特人 139, 257

Cereals, 谷类 22-23, 26-27, 34, 36, 43-44, 56, 68, 75-76, 79, 86, 90-91, 96, 101-103, 107, 109-111, 116, 141-142, 191-192, 198, 211-213, 217-218, 227, 229, 250, 264, 271, 277-278, 292, 302-306, 311, 318, 321, 324, 333, 另见Bread, Food, Rye, Wheat shortage of, 谷物短缺, 参见Food, shortage of

Ceuta, 休达 46-47, 50, 183

Ceylon, 锡兰 54, 328

Chabod, F., 查博 30-31, 136, 207

Champagne, 香槟 183

Chang, T'ien-Tsê, 张天策 54-55, 329, 343-344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查理一世 (英王) 243, 245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 查理二世 (英王) 207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 查理五世 (神圣罗马皇帝) 110, 134, 165, 170-171, 173-174, 176-181, 184-187, 192, 195, 202-203, 214, 226, 263, 335, 352-353

Charles VII, King of France, 查理七世 171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查理八世 170

Chartered companies, 特许公司, 参见Companies, Chartered

Chaudhuri, K.N., 乔杜里 337, 342

Chaunu, Pierre, 肖努 36, 44, 47-49, 52, 56-57, 68-70, 121,

165, 169-170, 178-179, 189-190, 194-196, 199-200, 270, 272-273, 329, 331-333, 335-339, 341

Chaunu, Huguette, 肖努 170, 190, 200

Chaussinaud-Nogaret, Guy, 乔西诺·诺加里特 340

Cheese, 奶酪, 参见Dairy products

Cheng Ho, 郑和 54-55, 60

Chestnuts, 栗子 102

Cheung, Steven N.S., 切昂 105

Chevalier, Francois, 谢瓦利埃 112

Chile, 智利 68, 93-94, 100, 170, 187-190

China, 中国 16-17, 19, 39, 52-57, 59-63, 84-85, 136, 189, 211, 249, 301, 329-330, 335-336, 338, 342, 另见Orient

Bureau of Trading Junks, 市舶司 54

Confucian mandarins, 儒家官吏 54-55, 61-62, 另见State, bureaucracy

China Sea, 中国海 327-329

Chocolate, 巧克力 43

Christensen, Aksel E., 克利斯腾森 200, 211-212

Christianity, 基督教 36-38, 48, 142, 147, 150, 158, 166, 194-195, 197, 234, 303, 314, 339, 343, 另见Anglican Church; Calvinism; Catholic Church; Eur-ope, Christian; Protest-anism;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Christianization, 基督教化, 参见 Christ-ianity, evangelization

clergy, 僧侣 86, 148, 154, 167, 203-204, 233, 258, 268, 313, 331, 另见Catholic Church Papacy

evangelization, 传福音 48, 92, 94, 180, 192, 328, 334-335, 339, 343

Latin, 拉丁文, 参见Catholic Church

new Christians, 参见Marranos

Western, 参见 Catholic Church

Chu Hi, 朱熹 62

Church, 教会, 参见Catholic Church (若与俄罗斯有关, 则请参见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Churches, 教堂192, 306

Cinnamon, 肉桂 344

Ciocca, Pierluigi, 西奥卡 77,

Ciocca, Pierluigi, 西奥卡 77, 79-80

Cipolla, Carlo M., 奇波拉 19, 45-46, 53, 61, 76-77, 81, 198, 215-216, 219, 221, 271, 327, 330, 332, 342

Cities, 城市, 参见Towns

Citizenship, 公民 145, 148, 另见Status-group

City-states, 城市国家, 参见State, city-states; Towns

Civilization (barbarism之相对词), 文明 98

“Civilization, ”a, 文明 18, 36

Clandestine trade, 秘密交易, 参见Contraband

Clark, G.N., 克拉克 195, 228-229, 231, 236, 254, 261, 274

Classes, 阶级 3, 67, 84, 86, 118, 133, 151, 162, 203, 236-237, 241, 246, 251, 254, 256, 258, 266, 268, 274, 282, 284, 289, 334, 351, 354, 356

class-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351-354, 356

classformation, 256 阶级形成

class-struggle, 阶级斗争 3, 24, 46, 148, 158, 282, 284, 294, 351

gentry, international, 乡绅 352

landed, 地主, 参见Seigniors lower (lowest), 下层阶级 204, 325, 353, 另见Poor, the; Workers

middle, 中产阶级 153, 177-178, 187, 204, 231, 234-246, 323, 另见 Bourgeoisie

ruling, 统治阶级, 参见Classes, upper

universal, 普遍阶级 352

upper, 上层阶级 231, 234-235, 245, 282, 309, 351, 353, 另见
Aristo-cracy, No-bility, Peers

wretched, 不幸, 参见Poor, the

Clearings, 土地开垦, 参见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Climatic changes, 气候转变 33-35, 106, 217, 274, 312

Closed economy, 封闭经济, 参见State, mercantilism

Cloth, 布, 参见Textiles

Clothier, 布商 156, 261

Clothing, 布匹, 参见Textiles

Coal, 煤 127, 260, 另见Fuel

Cochin, 交趾 328, 340

Coerced labor, 强制劳动 100, 103, 112, 127, 另见Slavery cash-
crop, 商品谷物82, 86-87, 90-95, 97, 99-101, 103-106, 110, 113,
126, 128, 155, 289, 302, 304-305, 307, 313-314, 318, 321, 350,
另见Agriculture, capita-list; Estates; Farmers, capitalist

forced wage-labor, 强制薪资劳工 93-94, 307

Coffee, 咖啡 100

Coins, 钱币, 参见 Copper coins, or Money, according to context

Colbert, Jean-Baptiste, 柯尔伯 290

Coleman, D.C., 科尔曼 279

Coles, Paul, 科尔斯 159, 173

Coligny, Gaspard de, Admiral of France, 科里尼 266

Cologne, 科隆 19

Colombia, 哥伦比亚 68, 99, 187

Colonial pattern, 殖民地模式, 参见 Colonies, economic

Colonial situation, 殖民地状态, 参见 Colonies

Colonial vocation, 殖民地的职业, 参见 Colonies

Colonies, (overseas), 殖民地(海外) 4-5, 34, 43, 49-50, 57, 61, 89, 93, 120, 171, 180, 183, 187-188, 192, 227, 233, 252, 261, 272, 280, 282, 290, 302-303, 308, 323-324, 330-331, 335-337, 339, 342, 349

economic, 殖民地经济 96, 120, 227-228, 305, 339

internal, 内部殖民 228

internal colonization, 内部殖民地化, 参见 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semi-colonial trade, 半殖民地贸易, 参见 Colonies, economic

settlers, 殖民地居民 187-188, 190, 280

trade, 殖民地贸易, 参见Trade, colonial“urban colonialism”, 参见Towns, “urban colonialism”

Colonization, 殖民地化, 参见Colonies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伦布 52, 169, 335

Colvin, H.M., 科尔文 29

Commerce, 贸易, 参见Trade

Commercial Crisis, 商业危机, 参见Trade, recession of

Commercial crops, 商业作物, 参见Agri-culture, capitalist

Commercial houses, 商行, 参见Merch-ants, merchant houses

Commissaires, 特派员 288-289

Commoners (Peers or Seigniors之相对词), 平民 182, 284

Communities, 小区 348

Commutation, 交换, 参见Feudalism, feudal dues, commutation of

Compagnie du Corail, 珊瑚公司 336, 另见Companies

Companies, 公司 278, 328, 336, 340, 另见Merchants, merchant houses

chartered, 特许状 150, 276, 282

joint-stock, 股份公司 161

Comptoirs, 商行, 参见Trading-posts

Confiscation, 充公, 参见State, confiscation

Confucianism, 孔教 61

Congo, 刚果, 参见Kongo

Conseillers d'Etat, 行政法院法 288-289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炫耀财富 41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39, 43, 123, 170, 215

Contado, 国家, 参见Country

Contraband, 非法交易 160, 188, 272, 341

Contraction, 紧缩, 参见Agriculture, retraction of cultivated areas;
Population, decline of; Trade, recession of

“Contracts, ”契约, 参见Trade, “contracts”

Cook, M.A., 库克 40

Cook, Sherburne F., 库克 89

Cooper, J.P., 库珀 195, 236, 238-240, 243, 259, 270, 296

Coornaert, Emile, 考尔纳特 175, 200, 262-263

Copper, 铜 155, 161

Copper coins, 铜币 40, 45, 336, 另见Bullion

Copperas, 绿矾 260

Copyholder, 公簿持有农 251, 另见Tenure, copyhold

Coral, 珊瑚 336

Core-states, 核心国家 38, 63, 82, 84, 86, 97, 100, 102, 107, 116-118, 124, 126-129, 134, 136, 147-148, 153, 156, 162, 181, 191, 196, 219, 221, 247, 349-350, 352-355, 357, 另见World-economy

Cork, 软木 257

Corn, 谷物, 参见Wheat

Cornwall, 康沃尔 110-111, 257

Corporations, 公司, 参见Guilds

Corsairs, 海盗, 参见Pirates

Corsica, 科西嘉 38, 139

Cortes, 议会, 参见 Spain, Cortes

Cossacks, 哥萨克人 308

Cotswolds, 长毛绵羊 (科茨沃尔德) 229

Corvée-labor, 无偿劳工, 参见Feudalism, feudal dues, labor services

Cottagers, 佃农 251-252, 275, 另见Husbandmen; Laborers, rural

Cotton, 棉 45, 88, 100, 另见Industries, textile; Textiles, cotton

Coulbourn, Rushton, 库尔布恩 90, 181-182, 313

Council of Trent, 特伦特会议, 参见Catholic Church, Council of Trent

Counter-Renaissance, 反文艺复兴 156

Counter-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参见Catholic Church, Counter-Reformation

Country (Town or Court之相对词), 乡村 86, 105, 109, 119-120, 123, 142, 242, 257, 267, 292

Cours souverains, members of, 最高法院成员 288

Courtiers, 廷臣, 参见Aristocracy

Cracow, 克拉科夫 155, 196

Craeybeckx, Jan, 克雷拜克斯 175, 186, 200, 264

Crafts, 手工艺者, 参见Artisans

Credit, 信贷, 参见Money, credit

Crete, 克里特 38, 88-89, 92

Crimea, 克里米亚 316, 318

Crisis of seventeenth century, 十七世纪危机 260

Crombie, A.C., 克伦比 53

Cromwell, Julian, 克伦威尔 241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 209, 245, 297

Cromwell, Thomas, 克伦威尔 232

Croquants, 农民起义运动 movement of, 268

Crown, the, 王位, 参见State

Crusades, 十字军 21, 38-39, 333, 另见 Christianity, evangelization

Cuatequil, 夸提奎尔, 参见Coerced labor, forced wage-labor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教随国定 157, 178, 186, 353, 另见 Augsburg, Treaty of; State, homogenization

Cultivated areas, 屯垦区, 参见Agriculture

Cumberland, 坎伯兰 111

Curia, 中世纪法庭, 参见Catholic Church, Papacy

Cyprus, 塞浦路斯 38, 43, 88

Czalpinski, Wladyslaw, 萨平斯基 304, 324

Czarnowski, Stefan, 查尔诺斯基 154-155

Czechia, 捷克 97, 307, 323, 另见Bohemia, Moravia

D

Da Gama, Vasco, 达伽马 52, 326, 330

Dairy products, 乳制品 108-110, 307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139

Dalthenus, Petrus, 达瑟努斯 209

Da Noli, Antonio, 达诺里 43

Danzig, 但泽, 参见Gdąnsk

Darby, H.C., 达比 45

Da Silva, Jose-Gentil, 席尔瓦 50, 109, 176, 189, 191-192, 196, 211, 340

Dauphine, 太子妃 267

Davies, C.S.L., 戴维 141, 237, 255

Davis, Ralph, 戴维斯 280

De Anchieta, José, 德安谢塔 89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狄百瑞 61

Debasement of coinage, 币值贬低, 参见Money, debasement

Debt peonage, 债务劳役制 190 international, 121-122

Decay of trade, 贸易衰退, 参见Trade, recession of

De Falguerolles, G.E., 德法尔古罗勒 107, 264

De Fedrici, Cesare, 费德利奇 340

Deforestation, 45, 另见Wood, famine采伐森林

Delumeau, Jean, 德卢莫 79, 109, 142, 160

De Maddalena, Aldo, 马德莲娜 106 (capitalist)

Denmark, 丹麦 24, 47, 96, 153, 180, 226, 228, 281, 307

Depreciation, 贬值 125

Depression, 不景气, 参见Trade, recession of Dérogeance, 丧失贵族资格的行为 285, 另见Aristocracy, France

De Roover, Raymond, 路佛 215

Desmarets de Saint-Sorlin, Jean, 德马雷 291

Devon, 得文 111

De Vries, Jan, 德弗利斯 241

De Vries, Philippe, 德弗利斯 175

Deyon, Pierre, 狄昂 285

Diet, 地方会议, 参见Poland, seyn

Disease, 疾病, 参见Epidemics

Diú, 第乌 327

Divine right of kings, 君权, 参见State, absolutism

Divine truce, 神的休战, 参见Catholic Church, divine truce

Dnieper, 第聂伯河 303

Dobb, Maurice, 多布 20, 24-26, 36, 41-42, 82, 90-91, 103-104, 109, 111-113, 117, 120-122, 125, 128, 135, 232

Dollinger, Philippe, 多林格 96

Domar, Evsey D., 多马 99

Don, 顿何 303

Dowd, Douglas F., 多德 172

Drake, Sr Francís, 德雷克 56

Druge, 药材 326, 328, 330, 333, 340

Dry goods, 干货 277

Dual economy, 双重经济 18

Dublin, 都柏林 257

Duby, 杜比Georges, 25-27, 30-31, 34, 103, 105-106, 109, 294

Dutch, 荷兰, 参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Dvoriane, 宫廷贵族 320, 另见Nobility, lesser

Dyes (dyestuffs) , 染料 43, 45, 191

Dyewood, Brazillian, 产颜料的树 335, 另见Wood

E

East, the, 东方, 参见Orient

East Anglia, 东盎格利亚 111, 229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332, 337, 另见Companies, chartered; England

East Indies, 东印度群岛, 参见Indies, East

Eastern Hemisphere, 东半球 17, 44

Eberhard, Wolfram, 埃伯哈德 6, 146

Economic regression, 经济侵略, 参见Trade, recession of

Economies of scale, 经济规模 161

Edler, Florence, 艾德勒 180

Edward III, 爱德华三世King of England, 229

Egypt, 埃及 40, 89, 168, 215, 218, 325, 327, 329, 336

Ehrenberg, Richard, 埃伦伯格 137, 174-175, 183

Eisenstadt, S.N., 艾森斯塔德 15, 90, 135

Elbia, East, 易北河以东, 参见Germany, East Elbia

Elizabeth, Queen of England, 伊丽莎白, 英国女皇 32, 56, 207,

215, 226, 240, 253, 258-259, 261, 266, 274, 281, 286, 316

Elizabethan era, 伊丽莎白时期 126, 231, 233, 237-238, 240, 243, 251-254, 274-276, 281

Elizabethan Mines Royal, 伊丽莎白皇家矿场 161

Elliott, J.H., 艾略特 82, 128, 167, 178-179, 190-196, 207, 214, 218-219, 302

Elman, P., 艾尔曼 149-150

Elsas, M.J., 艾尔萨斯 70

Elton, G.R., 埃尔顿 195, 198, 201, 232-234, 293

Emery, Frank, 艾莫利 250

Emigration, 移民, 参见Migration

Empire 帝国

British, 大英帝国, 参见Great Britain

Carolingian, 加洛林王朝的 58, 147

Eastern, 东方帝国, 参见Byzantium

failure of, 帝国的失败 136, 165-221

Hapsburg, 哈布斯堡帝国 75, 150, 155, 165, 169, 171, 174-175, 177-178, 180-182, 193-194, 196-197, 199-200, 203, 207, 226, 234, 258, 266, 272, 312, 314, 319, 352

Holy Roman, 19, 170-172, 197

imperial economy, 帝国经济 326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165, 167, 170-171, 173, 179-180

manqué, 受挫的 33

Moscovite, 莫斯科公国, 参见Russia

Ottoman, 奥斯曼帝国 32, 57, 68, 155, 170, 194, 215, 218, 280, 289, 301-302, 319, 325, 332, 另见Levant, Turks political overextension of, 政治的过度扩张179, 189

subimperialism, 次帝国主义 188-189

within world-economy世界经济内 33, 57, 67, 252, 326, 332

world-, 世界帝国 16-17, 32, 34, 38, 52, 57, 60-62, 85, 127, 170 - 171, 173, 179, 184-185, 187, 263, 303, 308, 319, 348-349, 353-354

Employment, 雇佣 123, 141, 198, 253, 278, 另见Artisans; Coerced Laborers, Rural; Sharecropping; Slavery; Workers

full, 完全雇佣 73, 140

self-, 自己雇佣 87

unemployment, 非雇佣 110, 207, 276, 279

Enclosures, 圈地, 参见Agriculture, enclosures

Encomienda, 委托监护制, 参见Estates, encomienda

Engels, Frederick, 恩格斯 123, 159, 177, 209, 293

England, 英格兰 23-26, 29, 32, 34, 38, 40, 43, 45-46, 51, 75, 77-84, 95-97, 100, 104-117, 120, 123-127, 129, 141, 147, 149-150, 153, 155, 159, 165-166, 169, 171-172, 175, 180, 182, 184-185, 187-188, 191-193, 198-199, 201, 207, 209-210, 213-217, 219-220, 225-263, 265-269, 271-284, 286, 289-291, 295-297, 308, 316, 319, 323-325, 328, 335-337, 339-342, 352, 354, 357

Civil War, 内战 235, 237, 242, 245, 254, 257, 280, 282, 297

east, 东英格兰 260

Long Parliament, 长期议会 282, 另见England, Parliament

north (north-east), 北英 111, 233

Parliament, 议会 236, 242-243, 261, 278, 282, 另见
Parliamentary bodies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232, 278, 另见State, bureaucracy

Protectorate of Cromwell, 克伦威尔护国公时期 209

Southern (and southwest), 南英 79, 125, 260

Statute of Artificers, 254

English Channel, 英吉利海峡 215, 264

English Company of Staple, 英国土产公司 150

Engrossing, 占地, 参见Agriculture, enclosures

Entradas, 191, 另见Colonies; Europe, expansion of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参见Capitalism, entrepreneurs

Epidemics, 传染病 21, 25, 33-35, 81, 118, 196, 199, 221, 248, 262, 278, 296, 318, 另见Black Death

Erasmians, 伊拉斯莫派 194

Ernle, Lord, (R.E.Prothero) 厄尔 279

Espieux, Henri, 埃斯皮优克斯 294-295

Esquires, 乡绅, 参见Squires

Estado da India, 印度水邦 343, 另见Goa, India

Estates, 三级会议, 另见Parliamentary bodies (capitalist), 43, 97, 100-102, 106, 121, 151, 190, 194, 237, 243, 252, 270, 302, 304, 307, 310-311, 320-321, 324, 336, 另见Manors, Tschiftliks

encomienda, 委托监护制度 90-94, 99-100, 126, 190, 313, 336

hacienda, 农场 190, 353

latifundia, 大领地 92, 103, 162, 194

Estates-General, 等级会议, 参见 France; Netherlands, northern

Estonia, 爱沙尼亚 96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327

Ethnic groups, 同文同种的民族 67, 88, 118-119, 146-148, 另见
State, homogenization; Status-groups

Eunuchs, 宦官 54, 61-62

Eurasia, 欧亚大陆 52, 302-303

Europe, 欧洲 4-6, 17, 31-32, 34, 36, 38-39, 41, 44, 47-49,
51-52, 54, 56-57, 60-63, 70, 76-78, 81, 83-91, 97-98, 102, 107,
109, 114, 122, 128, 133, 136, 139-141, 143-144, 147-148, 155-
157, 162, 168, 170, 175, 177-178, 183-185, 187, 190-194, 196-
198, 200-201, 207, 209, 211, 214, 216, 219, 226-227, 230, 234-
236, 244, 247, 257-259, 263-265, 268, 270, 272-274, 292, 296,
301, 303-309, 313-317, 319, 324-330, 332-333, 336-337, 340, 343-
344, 349, 352, 357

central, 中欧 25, 27, 34, 40-41, 68, 104, 153, 173, 179,
181, 191, 198, 230, 233, 263, 271, 277, 280, 305, 336

cockpit of, 欧洲古战场 206, 另见Netherlands, southern

dorsalspine of, 欧洲的背脊, 参见Europe, old developed areas

east-central, 中东欧, 参见Europe, eastern

eastern, 东欧 6, 27, 38, 42, 47, 68, 70, 82, 87, 90-92, 94-
97, 99-100, 102-104, 106, 108, 110-113, 115, 117, 120-122, 147-
149, 151, 153, 156, 181, 186, 211, 227, 230-231, 255-256, 270-
271, 276, 280, 289, 302-324, 338, 353

expansion of, 欧洲的扩张 33, 38, 44, 46-49, 51-52, 54, 56, 59, 63, 84-85, 98, 165, 182, 191, 221, 262, 265, 325-326, 332, 另见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invasions of, 欧洲的侵略 39, 53, 97

northern, 北欧 33-34, 40, 43, 52-53, 70, 150, 156, 190, 220, 226, 231, 263-270, 277, 280, 341

northwest, 西北欧 17, 38, 40, 68, 70, 77, 87, 102-103, 106-107, 111, 116, 118, 121, 153, 156, 226, 263, 271-272, 281, 339, 341

southeastern, 东南欧 48, 89, 99

southern, 南欧 6, 77, 87, 101-102, 106, 122, 148, 153, 156, 231, 263, 270-272, 292

southwestern, 西南欧 200

western, 西欧 6, 18, 20-21, 24, 27, 30, 32-33, 35, 42, 45, 50, 56, 59, 63, 75, 79, 82, 87, 90, 94-95, 97, 99-100, 103, 108, 110, 112, 117, 120, 122, 134, 139, 147-149, 151, 158, 166, 171, 175, 180, 195, 198, 201, 215, 230, 233-234, 263, 270, 292, 301-306, 308-310, 312-313, 315, 317, 320-321, 323, 325, 353, 另见West, the

Everitt, Alan, 埃弗里特 141, 228, 248, 252-253

Eversley, D.E.C., 埃弗利 221, 262

Expansion, 参见 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Europe, expansion of; Population, expansion of; Trade, expansion of

Export economies, 出口经济 188, 另见Colonies, economic;
Periphery

External arena, 外部竞争场 89, 301, 307-308, 332, 334, 336-
337, 339, 350

External economies, 外部经济 125

Extremadura, 埃克斯塔马杜拉 103, 192

F

Fabrics, 纤维, 参见Textiles

Fâcherie, 分成清算制, 参见Sharecropping

Fairs, 事务 167, 182-184, 193, 215, 218, 另见Trade

Falls, Cyril, 佛尔斯 281

Famines, 饥荒, 参见 Food, shortage of

Fanfani, Amintore, 范法尼 171, 221

Fanon, Frantz, 法农 177

Far East, 远东, 参见Orient

Farmers, 农夫 141, 24, 258-259, 354, 另见 Gentry, Landlords, Peasants

capitalist, 122, 246, 251, 255, 258-259, 289, 352-353, 另见 Agriculture, capitalist

yeomen, 自耕农 83, 86-87, 107-108, 110, 115-116, 125, 128, 142, 157, 177-178, 191, 195, 237, 240-241, 244, 246, 248-249, 251-253, 255-256, 295, 另见Husbandmen, Gentry

Feitoria, 商站, 参见Tradingposts

Ferdinand and Isabella, King and Queen of Spain, 菲迪南和伊莎贝

拉 29, 166-167, 193

Feudal order, 封建主义, 参见Feudalism

Feudalism, 17-18, 20, 23-24, 28-30, 35-38, 42, 51, 57-59, 61-63, 90-94, 101, 110, 113, 124, 126, 128, 136-137, 146-147, 157, 159, 166-167, 172, 181, 195, 203, 220-221, 231, 247, 252, 283, 286, 288, 293, 303, 307, 309, 315-318, 335-336, 354, 另见 Manor, Seigniors, Serfs

crisis of, 封建主义危机 21, 23, 33, 37-38, 48, 51-52, 56, 114, 127, 135, 157

feudal-absolutist order, 封建秩序 283

feudal lords, 封建领主, 参见Seigniors

feudal'rents, 封建地租, 参见Feudalism, feudal dues

feudalization of bourgeoisie, 中产阶级封建制度, 参见Bourgeoisie, feuda-lization of

Feudatori, 土地所有者, 参见Seigniors

Field entrenchments, 土地防御工事 29

Financiers, 金融業者 28, 105, 121, 129, 180, 183, 192-195, 200, 214, 227, 285, 295, 310-311, 314, 另见Banking; Bourgeoisie; Merchants, merchant-bank-ers; Money

Finberg, H.P.R., 芬伯格 8

Fish, 鱼 43-44, 281, 333, 另见Food

Fish-breeding (in ponds), 养殖渔业 (池塘) 324

Fisher, F.J., 费舍尔 110, 116, 152, 227, 233, 240, 261, 275, 280, 282

Fir, 枞树 45, 另见Wood

Firearms, 枪炮, 参见Armaments

Firewood, 柴薪, 参见Fuel

Fiscalism, 参见State, 财政主义fiscalism

Fisher, Irving, 费舍尔 71-72

Fisheries, 渔场 35, 96, 192, 200, 212, 281, 326, 336

Fishermen, 渔夫 121, 192

Fishing fleets, 渔港 264

Flanders, 佛兰德 24, 42-43, 47, 49, 68, 81, 96, 123-124, 141, 150, 165-166, 173-175, 177, 179, 183-187, 193, 204, 206, 208, 211, 213, 225, 227, 229-230, 261, 325, 另见Europe, old developed areas; Low Countries; Netherlands, southern

Flax, 亚麻 200-201, 253, 306

Fleet, 舰队, 参见Navy

Florence, 佛罗伦萨 39, 129, 138, 156, 172, 176, 180, 183,

216, 218

Florida, 佛罗里达 342

Fluyt, 三桅小商船 212, 265, 另见 Industries, shipbuilding;
War, naval technology; Transport, maritime

Flyboat, 飞船, 参见Fluyt

Fodder, 秣草, 参见Forage

Food, 粮食 21, 42-44, 51, 53, 75, 86, 100, 118, 141, 199-
200, 227, 249, 267, 281, 292, 322, 333, 另见Cereals, Fish,
Meat, Staples calories, 卡路里42-43, 56

fats, 脂肪 35, 43

processed food products, 食品加工产品 79

proteins, 蛋白质 35, 44, 51, 96

shortage of, 粮食短缺 21, 25, 35-36, 76, 101, 107, 110, 118,
142-143, 189, 199, 212, 217-218, 267, 292, 318, 326

Forage, 牛马饲料 23, 75, 101-102

Foust, C.M., 佛斯特 320, 323

Force, (natural) monopoly of, 自然地武力独占, 参见State,
force

Forced wage-labor, 强制薪资劳工, 参见Coerced labor, forced
wage-labor

Forest areas, 森林区, 参见Woodlands

Forest crafts, 木业工会 253

Forest products, 森林产品 78, 另见Wood

Forster, Robert, 佛斯特 181

Fourastié, Jean, 佛瑞斯蒂 79

Fox, P., 福克斯 155

Franche-Comté, 弗朗什-孔泰 125, 170, 226

France, 法兰西 6, 23-26, 29, 32, 40, 46-47, 51, 75, 77-79, 81, 83-84, 95, 97, 99, 105-107, 109, 113-115, 126, 129, 136-141, 147, 152-153, 169-173, 181-184, 187, 189, 191-193, 196-199, 201, 205, 207, 210, 213-214, 219-220, 225-227, 231, 233-234, 241, 254, 256-258, 260-269, 271-273, 276, 280-297, 308, 312, 316, 324, 335-336, 340-341, 352

central, 法国中部 268, 293

Estates-General, 等级会议 181

French Fury, 法国愤怒 209, 另见Revolution, Netherlands

Fronde, 投石党 284, 287, 296

manufactures royales, 皇家工厂 290

northern (northeast), 北法 106, 108, 113, 127, 230, 263-264, 268, 294, 296

southern, 南法 70, 89, 103, 106-107, 113, 150, 247, 264, 267-268, 287, 294, 另见Languedoc, Occitania, Provence

southwest, 西南法 293

Wars of Religion, 宗教战争 184, 210, 261-263, 266-269, 285, 288, 292-294

Western (northwest), 西方 32, 262-264, 269, 293-294, 296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弗朗西斯一世 137-138, 170-171

Francis II, King of France, 弗朗西斯二世 266

François, Michel, 弗朗索瓦 171

Frank, André Gunder, 弗兰克 98, 126, 188, 190

Frankfurt, 法兰克福 19

Free labor, 自由劳工, 参见Workers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参见Trade, free

Freeholder, 完全地产拥有者 246, 251, 另见 Farmers, yeomen

Fried, Fercünand, 弗雷德 16

Fried, Morton, 弗雷德 98

Friedrich, Carl J., 弗雷德里希 197, 213

Friis, Astrid, 弗里斯 198, 274-276, 279

Frisia, 弗里西亚 24

Fronde, 投石党, 参见France, Fronde

Frontiers, 边界 21, 38, 46, 98, 111, 117, 128, 148, 308, 314-316, 324

internal, 内部边界, 参见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Fuel, 燃料 42, 45, 127, 281, 另见Coal, Wood

Fuggers, 福格家族 134, 140, 173-176, 186, 193, 200, 214, 341, 另见Merchants, merchant houses

Fulling mills, 229, 织布工业, 另见Industries, textile

Furs, 毛皮 96, 201, 306, 308

Furtado, Celso, 富尔塔多 89, 94, 301, 336, 340

G

Gabor, Bethlen, 加博 304

Galway, 高尔韦 257

Galileo, 伽利略 53

Garden products, see Agriculture, horticulture

Gascony, 加斯科尼 139, 196

Gaul, (Roman), 高卢 294

Gay, Edwin F., 盖伊 254

Gdańsk, 格但斯克 96, 121-122, 129, 180, 323-324

Gemblours, 赌徒 206

Geneva, 日内瓦 206

Génicot, Léopold, 热尼科 31, 134, 141

Genoa, 热那亚 39-40, 43, 49-50, 52, 121, 129, 150, 165, 168-169, 172-173, 177, 180, 183, 192, 195, 211, 214-215, 218, 220-221, 231, 271, 295, 340

Gentlemen, 绅士 236, 240, 244, 246, 251, 289, 另见Gentry of pen and lak, 笔墨绅士, 参见State, bureaucracy

Gentry, 乡绅 95, 115, 151, 154, 182, 192, 235-246, 248, 251, 256, 258, 267, 278, 289, 297, 310, 316, 320-323, 352, 另见Farmers, capitalist; Farmers, yeomen; Landlords

stormover, 乡绅的政治反抗 235-248

Geographical expansion, 地理扩展, 参见Europe, expansion of; Europe, expansion of; Russia, expansion of

Germanies, the, 德意志诸邦, 参见Germany

Germany, 德国 6, 24-25, 32, 34, 38, 47, 70, 91, 95-96, 99, 118-119, 121, 139, 147-148, 152-155, 170, 172, 174, 177-178, 186-187, 198, 201, 214, 219-220, 227, 231, 233, 261-263, 266, 268-269, 277, 285, 291, 311-312, 323-234, 341, 353

east, 东德, 参见Germany, East Elbia

East Elbia, 东易北河 68, 91, 94-96, 114, 118, 159, 227, 311-312, 321-323

German Empire, 德意志帝国, 参见Empire, Holy Roman

northeast, 东北部, 参见Germany, East Elbia

northern, 北部 37, 另见Hanse, the

northwestern, 西北部 27

principalities of, 德意志公国 29, 198

southern (south), 南部 83, 123, 125, 155, 165, 170, 173-

175, 177, 186, 196, 226, 233, 323, 352, 另见Europe, old
developed areas; Trade, transcontinental

southwest, 西南 186

west (western), 西德 95, 233

Gerschenkron, Alexander, 格申克龙 313-314

Gerth, Hans, 葛思 57

Gestrin, Ferdo, 盖斯特林 95, 322-323

Geyl, Pieter, 盖尔 203-206, 210-211

Ghana, 加纳 39

Ghent, 根特 208-209, 另见Pacification of Ghent根特

Gibraltar, 直布罗陀 49

Gibson, Charles, 吉布森 91, 93

Gieysztor, Aleksander, 吉斯特 155

Gilbert, Humphrey, 吉尔伯特 88

Ginger, 333-334 另见Spices

Glamann, Kristof, 格拉曼 76, 101, 213, 265, 271, 334, 336

Glass, D. V., 格拉斯 221, 262

Glendower, Owen, 格兰道尔 257

GNP, 国民生产毛额, 参见Stat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oa, 果亚 200, 327, 329, 337

Godinho, Vitorino Magalhaes, 戈丁诺 41-42, 44-47, 49, 215, 327-331, 334, 337, 340-343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 178

Gold, 黄金 39-41, 70-72, 76, 78, 94, 128, 150, 168-169, 180, 183, 188, 195, 198, 200, 262, 271, 281, 301, 326, 329-330, 332, 335, 337, 另见Bullion

Goldmann, Lucien, 哥德曼 287-288

González de Cellorigo, Martin, 冈萨雷斯 195

Gordon-Walker, P.C., 戈登沃克 98, 153-154

Gosti, 客商 323, 另见Merchants

Goubert, Pierre, 古伯尔 262

Gould, J.D., 古尔德 125, 277

Grabowski, Thadée, 戈拉鲍斯基 154

Grain, 谷物, 参见Cereals

Grain Coast, 谷物海岸, 参见Africa, West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148

Granada, 格拉那达 39

Grandamy, René, 格兰达米 79

Gras, N.S.B., 葛拉斯 228

Gravelines, 格拉夫林 205

Gray, H.L., 格雷 230

Grease, 油脂 306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6, 88, 140, 192, 233-234, 260, 281, 354, 另见 England, Scotland, Wales

Great Contract, 大契约 235, 另见 England

Great Rebuilding, the, 251, 另见 industries, construction

Great Wall, 长城 55

Greeks, 希腊 92, 331

Greene, Jack P., 181

Greenland, 格陵兰 34

Grenville, Richard, 格伦维尔 88

Gresham, Sir Thomas, 格雷瑟姆 185

Griffiths, Gordon, 格里夫斯 206

Guanches, 关切斯 89

Guatemala, 危地马拉 100, 187-188

Guerilla country, 206

Guiana, 圭亚那 342

Guienne (Guyenne), 基恩 106, 230, 267, 293

Guilds, 行会 123-124, 134, 208, 220, 228, 237, 267, 269, 324, 另见Workers, organizations

restrictions, 107, 229

Guillén Martinez, Ferdinand, 吉兰 94, 99

Guinea, Gulf of, 几内亚 43, 168

Guicciardini, Francesco, 圭查尔狄尼 184

Gujeratis, 古吉拉特人 328

Gum, 树脂 45

Gunpowder, 火药, 参见Munitions

Gustavus Adolphus, King of Sweden, 阿道尔夫, 瑞典国王 304, 307

Gutsherrschaft, 庄园主 95, 311, 321, 另见Estate, (capitalist)

Gutswirtschaft, 领主地产 311, 另见Manor

H

Habakkuk, H.John, 哈巴库克 140, 247-248, 255

Hainault, 埃诺 123, 208

Hall, A. Rupert, 霍尔 127-128

Hamburg, 汉堡 165, 175, 185, 211, 341

Hamilton, Earl J., 汉密尔顿 70-72, 74, 77-79, 82-84, 185

Hammarström, Ingrid, 哈马斯特罗姆 71-72

Handun, 罗姆手枪 28, 另见Armaments

Handicrafts, 手工业者, 参见Artisans

Hanse, the, 汉萨 19-20, 40, 43, 68, 96, 121, 147, 150, 183, 201, 211, 229-230, 275

Hapsburg dynasty (empire), 哈布斯堡王朝, 参见Empire, Hapsburg

Harrington, James, 哈林顿 242

Harrison, J.B., 哈里逊 216, 336, 343

Harriss, G.L., 哈里斯 232

Hartung, Fr., 哈通 32-33, 96, 133, 137, 144, 161

Harvests, bad, 坏的收成, 参见Food, shortage of

Hauser, Henri, 豪泽 68, 185, 199, 264, 266

Hawkins, John, 霍金斯 188

Heaton, Herbert, 希顿 212, 226

Heckscher, Eli F., 赫克谢尔 181, 226, 231, 233, 328

Heers, Jacques, 希尔 229, 231, 265

Helleiner, Karl, 赫雷纳 25, 34-36, 96, 117, 311

Helm, June, 赫尔姆 98

Hemp, 亨普 200, 253, 281, 306

Henrician administrative revolution, 亨利行政革命, 参见State, bureaucracy, administrative revolution

Henry 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二世 (英国国王) 231

Henry II, King of France, 亨利二世 (法国国王) 137, 266-267

Henry III, King of France, 亨利三世 268

Henry IV, King of Castile, 亨利四世 (卡斯提尔国王) 166

Henry IV, King of France, 亨利四世 32, 137, 268, 288, 290-291, 294

Henry V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七世 29, 253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八世 207, 242

Henry of Navarre, 参见Henry IV, King of France

Hens War, 母鸡战争 327

Hero, prince as, 英雄式君主 145-146

Herring, 希林 201, 342, 另见Fish

Hexter, J.H., 赫克斯特 235, 238-240, 242-245, 282-283

Hibbert, A.B., 希伯特 20

Highway robberies, 公路强盗, 参见Banditry

Hill, Christopher, 希尔 152-153, 157, 161, 207, 232-234, 236, 239, 241-242, 244-245, 257, 283

Hilton, R.H., 希尔顿 23-24, 42, 255, 305, 315

Hinton, R.W.K., 欣顿 259, 276-277, 283

Hippocras, 希波克拉斯 44

Hirsch, Walter, 赫希 29-30

Hispania, 西班牙, 参见Spain

Hispaniola, 小西班牙 335, 另见Antilles

Hobsbawm, E.J., 霍布斯鲍姆 219-220

Hohenstaufen dynasty, 霍亨斯陶芬王朝 172, 另见Empire, Holy

Roman

Hohenzollern dynasty, 霍亨索伦王朝 311

Holland荷兰（若非涉及国家，则请参考 Netherlands, northern），
180, 204-206, 211, 213, 280

Holstein, 霍尔斯坦 307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请参见 Empire Holy Roman

Hondschoote, 洪德斯库特 226

Honjo, Eijiro, 所荣次郎 343

Hopkins, Sheila V., 霍普金斯 77, 79, 81-82, 118

Horned beasts, 有角兽 155

Horticulture, 园艺, 参见 Agriculture, horticulture

Horsemen, 骑兵, 参见 Cavalry

Horses, 马匹 45, 47, 75, 305, 另见 Livestock

Hoskins, W.G., 霍斯金斯 251

Hoszowski, Stanislaw, 霍斯佐斯基 96-97, 304-305, 322-323

Housing, 供给住宅 251

Hudson, G.F., 赫德森 55, 57

Huguenots, 胡格诺派 196, 266-268, 294, 另见 Calvinism

Humanism, 人文主义 156

Hundred Years War, 百年战争 21, 28, 50, 150, 183, 230, 295, 另见War

Hungary, 匈牙利 41, 94-97, 148, 153, 155, 159, 170, 244, 301, 307

northern, 北匈, 参见Slovakia

Hunting and gathering, 狩猎及采集 98

Hurstfield, J., 赫斯特菲尔德 158, 234, 245-246, 266-268

Husbandmen, 农民 246, 251, 253, 另见Cottagers; Farmers, yeomen

Hydraulic power, 水力 41

I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 45-50, 68, 96, 117, 121, 151, 166-167, 169, 180, 183, 195, 210, 213, 231, 326, 335, 338, 341-342, 344, 另见 Portugal, Spain

Iceland, 冰岛 34, 281

Ideology, 意识形态 4, 67, 86, 144-145, 147, 283, 288, 356

Ile de France, 法兰西岛, 参见Paris

Immigration, 移民, 参见Migration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参见Empire, imperialism

Incas, 印加 170, 338

India, 印度 6, 30, 39-40, 49, 58, 211, 216, 319, 326-327, 329-330, 334, 337, 340, 343, 另见 Orient; Trade, Indian

Maharadjaor Great Moguls, 大莫卧儿大君 58

western coast of, 印度西岸 327

Indian Ocean (areas), 印度洋 54-55, 68, 274, 302, 327-329, 331-332, 337, 341

Indians (与“西部”有关者), 印第安人, 参考Amerindians

Indies, 东印度群岛 326, 336, 338, 另见Orient East, 东印度30,

337, 342, 另见Orient

West, 西印度, 参见Antilles

Indigo, 靛青 100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61-62, 67, 154

Indo-China, 印度支那 343

Indonesian archipelago, 印度尼西亚群岛 56, 343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20, 198, 332, 343

“first, ” 102, 226-227, 231, 260, 274, 另见England

Industrialism, 工业主义, 参见Industries

Industrialists, 工业家 119, 122-125, 151, 160, 180, 226, 290, 354, 另见Bour-geoisie, Industries, Manufactured goods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参见Industries

Industries, 工业 10, 24, 53, 75, 85-86, 92, 98, 102, 110-111, 116-118, 121-123, 126-127, 149, 155, 160, 171, 183, 186, 188, 190-192, 198, 200-201, 217-220, 225, 234, 246-247, 260, 264-265, 269, 274, 278-279, 286, 291, 293, 296-297, 305, 312, 321-322, 324, 另见Manu-factured goods

brewery, 啤酒厂 324

construction, 工业建筑 83, 192, 251, 另见Wood

cottage, 农舍 269, 324

deindustrialization, 非工业化 275, 279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工业的地理分配 225-226

glassworks, 玻璃工业 123

iron, 铁工业 281, 312, 324, 另见Iron; Industries, metallurgical

luxury, 奢侈品工业 82, 122-124, 166, 226, 290-292

machinery, 机械工业 83

metallurgical, 冶金工业 102, 123, 226, 238, 260, 281

military equipment and ordnance, 军事装备枪炮工业 83, 161, 260, 另见Armaments, Army, Munitions

mining, 矿业 40-41, 86, 88, 90, 92, 99-100, 102, 153, 173, 179, 187-188, 190-192, 194, 198, 201, 214, 225-226, 238, 260, 270, 324, 329, 335, 337, 另见Gold, Salt, Silver

putting-out system, 生产系统 324

rural, 乡村的 124, 220, 228-229, 324

shipbuilding, 造船工业 45, 75, 83, 192, 200, 212, 219-220, 225, 254, 281, 290, 另见Navy; Transport, maritime; Wood

silk, 丝工业 191, 另见Silk

steel, 226 钢铁工业

tanning, 制革工业 75, 281, 另见Leather, leather goods
textile (cloth), 纺织工业26, 28, 45, 102, 110, 123, 125, 150,
166, 176, 191, 219-220, 228-231, 248, 252, 274, 276-280, 335,
另见Textiles

wood products, 木材生产 123, 260, 281

Infantry, 步兵团 28, 134, 139, 另见Army

Inflation, 通货膨胀, 参见Prices, rise of

Intendants, 总督 288

Inter Coetera, 共存中间线 335

Interest rates, 利率, 参见Money, interest rates

Interlopers, 私商, 参见Trade, interlopers

Internal colonization, 国内殖民, 参见Colonies, internal colonization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184, 225

Internecline warfare among nobility, 贵族间的毁灭性战争, 参见
Seigniors, internecline warfare

Investments, 投资, 参见Capitalism, investments

Iran, 伊朗, 参见Persia

Ireland, 爱尔兰 38, 88, 182, 207, 228, 233, 257, 261, 281

Iron, 铁 99, 272, 另见Industries, iron

Islam, 伊斯兰 20, 43-44, 48-49, 53, 56, 142, 150, 155, 158, 194-195, 197, 303, 314, 328-329, 339, 另见Mediterranean, Islamic; Moors; Mori-scoss; Moslem world

Italy, (northern), 意大利 17, 19, 24, 28, 37, 40, 45-47, 50, 68, 70, 81, 96, 99, 103-107, 122-123, 125, 129, 138-139, 147-150, 153, 155-156, 159-160, 165, 168-175, 177, 179, 183-184, 186-187, 190, 193, 196, 214-221, 226-227, 229-230, 262-263, 265, 275, 280, 287, 314, 323, 340-341, 352, 另见Europe, old developed areas; Florence; Genoa; Lom-bardy; Milan; Venice

central, 意大利中部 81

decline of, 意大利的衰微 216-221, 285

southern, 南意 38, 88, 142, 221

Ivan III (the Great), Tsar of Russia, 伊凡三世 (伟大伊凡), 俄国沙皇 306, 314

Ivan IV (the Terrible), Tsar of Russia, 伊凡四世 (恐怖伊凡), 俄国沙皇 170, 315-317, 319-320

Ivory, 象牙 339

J

Jack-Hinton, Colin, 杰克-欣顿 54

Jacobean era, 詹姆斯时期 243, 另见James I

Jacobins, 詹姆斯宾党人 206

Jacqueries, 扎克雷起义 24, 268, 另见Peasants, rebellions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詹姆斯一世 238, 243, 259, 281

Jansenism, 约翰逊教徒 288, 295, 另见Catholic Church

Japan, 日本 55-56, 60, 301, 329, 337, 342-343

Jara, Alvaro, 加拉 89, 93-94, 99-100, 168, 170, 189, 337

Java, 爪哇 54, 342

Jeannin, Pierre, 詹宁 76, 101, 111, 175, 201, 211, 264, 272

Jesuits, 耶稣会士, 参见Catholic Church, Jesuits

Jewels, 珠宝 41, 45

Jews, 犹太人 92, 118, 147-151, 167, 193, 195, 211, 341

expulsion of, 驱逐犹太人 47, 117, 147, 149, 166, 193-194

Portuguese, 葡萄牙的犹太人 192, 另见Jews, Sephardic; Marranos

Sephardic, 犹太后裔的 211, 另见Marranos

John II, King of Aragon, 约翰二世, 阿拉冈国王 166

John II, King of Portugal, 约翰二世, 葡萄牙国王 326

Johnsen, Oscar Albert, 约翰逊 211

Joint-stock companies, 合股公司, 参见Companies, joint-stock

Jones, E.L., 琼斯 85, 118

Jones, P.J., 琼斯 217

Journeymen, 旅人 267

Junkers, 普鲁士年轻贵族 (容克) 91, 95, 160, 310-311, 另见
Aristocracy; Farmers, capitalist; Seigniors

Junks, 中国大帆船, 参见Transport, maritime

K

Kazan, 喀山 303

Kellenbenz, Herman, 克伦本茨 273, 301, 341, 342

Kent, 肯特 111

Kerridge, Eric, 柯立芝 78

Keynes, J.M., 凯恩斯 83, 280-281

Kholop labor, 农奴, 参见Coerced labor, cash-crop

Kiernan, V.G., 基尔南 33, 139-140, 146, 157, 196

Kiev, 基辅 323

King, Gregory, 金 251

King, the, 国王, 参见State

Kingdon, Robert M., 金顿 208, 254

Kinglets, 小国之王 321, 另见Aristocracy

King's household, 王室, 参见State, bureaucracy

Kirchheimer, Otto, 克什海默 143

Klein, Julius, 克莱因 109, 116, 167, 191, 193-194

Klíma, A., 克里马 324

Kluchevsky, V.O., 克鲁契夫斯基 302-303, 313-315, 319, 322

Kniazhata, 贵族 320, 另见Aristocracy

Knights, 骑士 240, 243, 267, 289

Kobata, A., 科巴塔 329

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154, 322

Koenigsberger, H.G., 柯尼希斯贝格 179-180, 195, 203, 206-209, 215, 221, 267-268, 292, 294

Kongo, 刚果 339

Korea, 朝鲜 55

Kormlenie system, 食邑制度 316, 另见Taxes, tax-farming

Kosminsky, E., 科斯明斯基 23-24, 27-28, 69, 112

Kossman, E.H., 科斯曼 42, 200, 202

Kovacevic, Desanka, 科夫塞维奇 40

Kula, Witold, 库拉 101

Kulaki, 富农 249, 另见peasants

Kuznets, Simon, 库兹奈特 162

L

Labor, 劳动

division of, 劳动分工, 另见Capitalism, World-economy European or international, 欧洲或国际劳工 63, 67-129, 139, 157, 162, 200, 276, 290, 302, 307, 332, 349, 335-357

national, 国际劳工 281, 354

shortage of, 劳工短缺 26, 135, 295

Labor control, modes of, 劳动控制 38, 84, 87, 90, 92, 99-100, 102-103, 116, 127, 162, 另见Coerced labor; Farmers, tenant, Laborers; Sharecropping; Slavery

Labor force, 劳动力, 参见Workers

Laborers, (common), 劳动者(一般) 251, 268, 275, 307

migratory, 迁徙 117

rural, 乡村的 86, 91, 93, 99, 113, 117, 120, 142, 157, 192, 194, 246, 251-253, 另见 Coerced labor, Cottagers, Farmers, Husbandmen, Peasants

seasonal wage-workers, 季节佣工 256

urban, 市区劳工, 参见Workers

Labrador, 拉布拉多 96

Lace, 花边 324

Lach, Donald F., 拉什 328, 330-331

Laclau (h), Ernesto, 拉克洛 126

Ladero Quesada, Miguel Angel, 奎塞达 169

Lake district (England), 湖区 229

Lancaster, House of, 兰开斯特家族 243

Land/labor ratio, 土地劳力比 69, 104, 107, 112

Landlords, 地主 18, 58-59, 62, 78, 83, 93, 95, 99, 101, 107, 115, 122, 124, 157, 234-235, 238-242, 244, 246-248, 255, 258, 302, 305, 313, 321, 356, 另见Farmers, capitalist; Gentry; Seigniors

Landowners, 地主, 参见Seigniors; Landlords

Lane, Frederic C., 莱恩 16, 45, 51, 120, 135, 140, 215, 220, 332, 334, 339-340

Language, 语言 353-354

Languedoc, 朗格多克 101-102, 106, 267, 295, 另见France, southern

Lapeyre, Henri, 拉培瑞 194, 206

Larraz, José, 拉瑞兹 166, 213

Laskowski, Otton, 拉斯考斯基 139

Laslett, Peter, 拉斯莱特 251

Latifundia, 大地产、大庄园, 参见Estates, latifundia

Latimer, Hugh, Bishop of Worcester, 拉蒂默 251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参见America, Latin

Latins, 拉丁文 43, 另见italy, (northern)

Lattimore, Owen, 拉铁摩尔 21, 61, 98, 246

Lawyers, 律师 248, 258, 另见Professions, members of

Lease, 租佃, 参见Tenure

Leaseholder, 佃租人, 参见Farme, tenant

Leather, 皮毛 108-109, 227, 281, 337, 另见Industries, tanning;
leather goods

Leather goods, 皮毛货 305

Lefebvre, Henri, 勒费弗尔 26, 90

Leghorn, 里窝那 217

Legitimacy, 法制, 参见State, legitimacy

Lenin, V.I., 列宁 120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拉杜里 25, 35, 101-102, 221,

268, 287, 312

Levant, 利凡特 19, 39-40, 43, 85, 89, 171, 173, 215, 218, 274, 317, 325-326, 336, 339, 另见Empire, Ot-toman;
Mediterranean, eastern; Orient; Trade, Levantine Levellers, 平等主义者209

Levenson, Joseph R., 利文森 59

Lewis, Archibald R., 刘易斯 38, 48, 135

Lewis, Bernard, 刘易斯 325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35, 144, 243

Liège, 列日 83, 206, 226

Lima, 利马 189-190

Liquidity crisis, 动产危机, 参见Money, liquidity crisis

Lisbon, 里斯本 47, 49-50, 76, 165, 174, 183, 200, 327, 331, 336-337, 340-341

Lithuania, 立陶宛 94, 122, 148, 317, 319

Livermore, H.V., 利弗莫尔 46, 327, 329

Livestock, 家畜 44-45, 106-109, 159, 188-189, 另见
Agriculture, pasturage; Cattle; Dairy products; Horses; Meat;
Mules; Sheep

Livonia, 利沃尼亚 307, 321

Livonian War, 利沃尼亚战争 316-319

Locher, T.J.G., 洛赫尔 8

Lockhart, James, 洛克哈特 190

Lockwood, David, 洛克伍德 29-30

Loire, 卢瓦尔 263

Lombardy, 伦巴底 92, 129, 149, 173

Lonchay, H., 朗彻 176, 205, 215

London, 伦敦 111, 116, 205, 226-227, 231, 233, 236, 261, 296

Long bow, 长弓 28

Lopez, R.S., 洛佩兹 40, 72, 171, 173, 221

Lords, 领主, 参见Seigniors, Aristocracy

Lorraine, 洛林 125

Louis X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一世 29, 139, 182

Louis XI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二世 137, 171

Louis XII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三世 137, 269, 294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世 47, 264, 285, 291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43, 70, 75, 96, 123, 129, 170-172,

175-176, 179-181, 184, 186, 198-205, 285, 210, 213, 215-217,
229-230, 263-265, 267, 335, 352

Lubimenko, Inna, 卢比曼科 316

Lublinskaya, A.D., 卢布林斯卡亚 115, 158, 174, 262, 271-
272, 285, 290-291, 294, 320

Ludloff, R., 鲁德路夫 187

Lübeck, 吕贝克 213

Lütge, Friedrich, 吕特格 293, 311

Lumpenproletariat, 流氓无产阶级 139, 208-209, 250, 256, 293

Luther, Martin, 路德, 参见Lutheranism

Lutheranism, 路德教派 153-156, 177, 186, 197, 271, 另见
Christianity, Pro-testantism

Luttrell, Anthony, 勒特雷尔 43-44, 89

Luxury goods, 奢侈品 305-306, 329, 333, 另见Trade, luxury;
Industries, luxury

Luzzatto, Gino, 卢札托 172-173, 186, 233

Lwow, 利沃夫 327

Lyahchenko, Peter I., 拉什琴柯 316, 318

Lybyer, A.H., 里拜尔 325, 340

Lyon, 里昂 129, 155, 165, 175-176, 183-184, 262-263, 266

Lythe, S.G.E., 里斯 228, 253, 264, 281

M

Macao, 澳门 329, 343

McCracken, Eileen, 281

McGann, Thomas F., 48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利 145

Macurek, J., 麦丘里克 324

Maçzak, Antoni, 马查克 310

Madeira, 马德拉 43-44, 50, 88

Madrigal, 马德里加尔 166

Maestrazgos, 骑士团成员 193, 另见Agriculture, pasturage

Magellan, Ferdinand, 麦哲伦 183, 335

Magistrates, 长官, 参见Notables

Magnates, 大地主 243, 309, 320-321, 另见Aristocracy

Maidstone, 梅德斯通 248

Maina, 马伊纳 19

Maître des requêtes, 行政法院审查官 284, 288

Majorca, 马略尔卡 24

Malacca, 马六甲海峡 327, 311

Straits of, 327, 339, 342

Malaga, 马拉加 118

Malaguettes, 44, 333-334, 另见Pepper

Malaria, 疟疾 217

Malowist, Marian, 马洛维斯特 39, 43, 47, 95-96, 101, 121-123, 148, 151, 160, 168, 180, 228-229, 262, 306-308, 312, 317, 320, 322, 324

Malta, 马耳他 88

Mameluke sultans, 马木鲁克 325

Manchu dynasty, 清朝 59

Manchuria, 东北（中国） 61

Mandrou, Robert, 芒德鲁 289, 293-294

Manila, 马尼拉 189, 336, 338

Manila Galleon, 马尼拉大帆船 336-338

Mankov, A.G., 曼科夫 303-305, 318, 325

Manning, Brian, 曼宁 235-276

Manors, 领主 20, 26-27, 58, 103, 108, 112, 114, 116, 120, 227-228, 236, 238, 252, 255, 311

manorial economy (system), 领主经济, 参见Feudalism

manorial reaction, 参见Seigniors, seign-iorial reaction

tenants, 农奴, 参见Serfs

Manufactured goods, 手工制品 305-306, 308, 322

Manumission, 解放, 参见Serfs, liberat-ion of

Maravedi, 马拉维第 169, 参见Money, money of account (记账货币)

Maravall, José A., 马拉维尔 144-145, 166-167

Marché, 马尔凯 293

Margaret of Austria, 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 玛格丽特 207

Maria of Hungary, 匈牙利的马利亚 176

Marian era (England), 航海时期 267

Marine insurance, 海上保险 212, 另见Transport, maritime

Market-economy, 市场经济, 参见Money money-economy

Markets, 市场, 参见Trade

Marranos, 中世纪被迫改教的犹太人 151, 194, 另见Jews,

Sephardic

Marrero, Manuela, 马列罗 169

Marseilles, 马赛 295, 336

Marx, Karl, 马克思 77, 82, 106-108, 116-118, 123, 126, 129, 167, 237, 247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26, 135, 209 236-237, 239, 241, 243, 283

Mary, Queen of Scots, 玛丽（苏格兰女王） 207

Masefield, G.B., 梅斯菲尔德 43-45, 88

Massari, 地产管理人 142, 另见Farmers, yeomen

Mattingly, Garrett, 马丁利 17, 171

Mauro, François, 莫罗 86, 102, 120, 125, 226, 327

Mavrodin, V.V., 马夫罗丁 305

Mazarin, Jules, Cardinal, 马札林 284

Meat, 肉类 36, 43-44, 56, 101, 108-109, 250, 333, 另见
Food, Livestock

Mecca, Straits of, （Red Sea）, 麦加 340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119, 303, 307

Medebach, 麦德巴赫 19

Medical practitioners, 医药从业者 258, 另见Professions, members of

Medicine, 医药 333

Medina del Campo, 麦地那坎波 193

Mediterranean (region), 地中海(地区) 32, 39, 43, 52, 57, 83, 89, 129, 142, 147, 156, 168-170, 179, 183, 194, 201, 211, 216-218, 221, 263, 272, 276, 279-280, 287, 330, 333, 336, 另见Africa, north, Europe, sou-thern; Levant; Trade, Mediterranean

Christian, 基督教 68, 70, 100, 153, 168, 221, 264, 另见Christianity

eastern, 东方 43, 215, 218, 280, 325, 339, 另见Levant

Islamic, 伊斯兰 50-51, 另见Islam, Moslem world

island, 地中海岛屿 42, 45, 88-89, 333

western, 西方 47, 218, 280

Meilink-Roelofs, M. A., 迈林克-罗洛夫茨 55-56, 330-331

Mercanti di campagna, 160, 另见Merchants

Mercantile marine, 商船, 参见Transport, Maritime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参见State, mercantilism

Mercenary armies, 佣兵军队, 参见Army, mercenari es

Merchant Adventurers of London, Fellow-ship of, 伦敦商人冒险家
同业公会 230, 275, 另见Companies

Merchants, 商人 19, 28, 46-47, 50, 56, 100, 102, 119-122,
124-156, 129, 133, 141, 147-151, 156-157, 160-161, 167, 174-
176, 182-183, 186, 188, 193-194, 200, 205, 209, 211, 213-215,
221, 226-227, 229-230, 233, 236, 244-245, 248, 251, 258, 267,
275-276, 285, 289-290, 296-297, 303-305, 309-310, 312, 317,
321, 323, 327-330, 332, 334, 337, 340-341, 349, 354, 另见
Bourgeoisie, Trade

capital, 资本, 参见Capitalism, merch-ants'capital

foreign, 外来的, 参见Bourgeoisie, foreign

indigenous, 本地的, 参见Bourgeoisie, foreign indigenous

merchant-bankers, 商业银行员 46, 186, 218, 243, 310, 另见
Financiers

merchant (-banking) houses, 商行 121, 134, 173, 176, 184,
187, 193, 197, 324, 352

shopkeepers, 店员 267

Mercury, 水银 80, 170, 188, 190, 337

Mesta, 大牧羊主 102, 110, 165-167, 193-194, 另见Sheep,
sheep-farming

Mestizos, 梅斯蒂索 87, 94, 100

Mestnichestvo, 任官等级 314, 320

Metal (s), 金属 200, 227, 324, 另见Brass; Copper;
Industries, metallurgie-cal; Iron; Metal wares

Metal wares, 金属器皿 305-306, 308

Metallurgists, 冶金师 261, 另见Industries, metallurgical

Métayage, 土地分成收益者, 参见Sharecropping

Meuse, 缪斯 104

Meuvret, Jean, 穆夫雷 262, 291-292

Mexico, 墨西哥 68, 89, 93, 179, 187-189, 329, 336-338, 357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190

Mezzadria, 分益耕种制, 参见Sharecropping

Michael, Tsar of Russia, 米哈伊尔, 俄国沙皇 319-320

Midlands, 密德兰 111, 251

Middle East, 中东, 参见Levant

Migration, 移民 109, 117-119, 189, 191, 196, 206, 253, 261,
281, 302, 314

Milan, 米兰 40, 160, 170, 172, 185, 216, 219-220

Military expenditure, 军事经费, 参见War, economic aspects of

Military orders, 军事秩序 109, 134, 160, 193

Miller, A., 米勒 316

Miller, Edward, 米勒 31, 135, 150, 182, 229

Minchinton, W.E., 明钦顿 275

Ming dynasty, 明朝 55, 59, 61-62, 329, 342

Mining, 采矿业, 参见Industries, mining

Minority groups, 小众 147, 另见State, homogenization

Mints, 造币厂 46, 另见Bullion; State, finances

mint farmers, 46

Miranda, José, 米兰达 93-94

Miskimin, H.A., 米斯基敏 40, 72-75

Mita, 米塔, 参见Coerced labor, forced wage-labor

Mollat, Michel, 莫拉特 17, 49, 220, 303, 306

Molnar, Erik, 穆尔纳 145, 155, 157-159

Moluccas, 摩鹿加群岛 339, 343, 另见Indonesian archipelago

Monasteries, 修道院 192, 216-217, 306, 310, 314-315, 323, 另
见 Catholic Church,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issolution of (confiscation of), 分裂 109, 160, 204, 234, 236, 239, 242, 249, 253, 311, 314-315

Money, 货币金钱 155, 231, 333, 另见 Banking, Bullion, Financiers

balance of payments, 支出平衡 40, 278, 330

bills of exchange, 交换货币 121, 214-215, 218

circulation of, (velocity of), 流通 22, 29-30, 41, 58, 72-74, 77

credit, 信贷 30, 74, 140, 148, 175-176, 185, 193, 195, 197-198, 212, 214, 218, 221, 231, 249, 274, 286, 311, 另见 Banking, Financiers

debasement, 贬值 30-31, 45, 74-75

devaluation, 贬值 271, 另见 Money, debasement

financial centers, 金融中心 175-177, 183, 199, 212, 214-215, 262, 266

illusions, 幻影 80

imaginary, 想象, 参见 Money, money of account

interest (rates), 利润 75-78, 125, 134, 160, 215, 271

liquidity crisis, 动产危机 21-23

manipulation of, 操纵 31

metallic, 全民的 45, 另见Bullion, Copper coins, Gold, Silver

money-economy, 货币经济 18, 63, 120, 309, 311, 318

money-market, 货币市场, 参见Money, financial centers

moneyof account, 计账货币 45-46, 76, 169

quantity theory of, 计量经济 71-74, 77

volume of 30, 72-75, 另见Bullion

Mongols, 蒙古人 17, 39, 55, 61, 97, 303

Monoculture, 单一耕作 43, 102, 另见Agriculture

Monomotapa, 莫诺莫塔帕 301, 另见Africa, East

Monopolies, 大都会, 参见Capitalism, monopolies

Moore, Barrington, Jr., 摩尔 244-245

Moors, 摩尔人 38-39, 48, 195, 另见Islam Reconquista, Spain

Moravia, 摩拉维亚 95, 另见Czechia

Morea, the, 摩里亚 88

Morineau, Michel, 莫里诺 76

Morison, Samuel Eliot, 莫里森 335

Morocco, 摩洛哥 32, 47, 49

Moslems, 穆斯林人, 参见Islam

Mousnier, Roland, 穆斯尼尔 32-33, 61-62, 97, 133-134, 137, 144, 158, 161, 181, 269, 283-284, 286-289, 292-294

Mulattoes, 黑白混血儿 87, 100

Mules, 骡 45, 另见Livestock

Munitions, 军需品 161, 260, 306, 另见 Armaments; Army;
Industries, military equipment and ordnance

Munster, 蒙斯特 79

Murray, John J., 穆瑞 261

Muscovy, province or duchy of (也可参见Russia), 莫斯科公国
303, 314, 318

Muslins, 细薄棉布 301, 另见Textiles, cloth

Myers, A.R., 迈尔斯 227-228

N

Nadal Jorge, 纳达尔 69, 73, 77-78, 185, 189, 192, 195

Nagai Horde, 诺盖帐汗 305

Namier, Sir Lewis, 纳米尔 207

Nanking, 南京 55

Nantes, Edict of, 南特敕令 184, 266

Naples, 那不勒斯 170, 185, 218, 311

Napoleon, 拿破仑 177

Nation-states, 民族国家, 参见State, nation-states

National debt, 国债, 参见State, debts

National economy, 国际经济, 参见Trade, national markets

National society, 国际社会 7, 33, 232, 357

Nationalism, 国家主义 4-5, 61, 67, 145-146, 148, 156, 178, 186, 192, 197, 203, 205, 207-210, 225, 314, 352, 另见Religion, religious nationalism

Naturale conomy, 自然经济, 参见Agriculture, subsistence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67

Navy, 海军 45, 211, 278, 306, 327, 329-331, 另见Industries, shipbuilding; War

Near East, 近东, 参见Levant

Needham, Joseph, 李约瑟 53-54, 85

Nef, John U., 内夫 79, 83-84, 125, 174, 226-227, 260-261, 264, 267, 291

Negros, 黑人, 参见Blacks

Nepal, 尼泊尔 140

Netherlands 尼德兰 (如果涉及北尼德兰与南尼德兰, 可参见Low Countries; 若仅指北部, 则可参见Netherlands, northern)

Austrian, 澳洲, 参见netherlads, southern

northern, 北尼德兰 32, 35, 45, 75, 81, 83-84, 91, 96, 107, 110-111, 122-123, 125, 153, 156, 181, 184, 190-192, 200-202, 204-214, 216, 218-220, 226, 228-229, 236, 241, 247, 256, 260, 262-263, 265-266, 271-277, 280, 286, 290-291, 294, 319, 323-324, 328, 331, 336, 339-342, 352

southern, 南尼德兰 83, 125, 152, 181, 187, 199, 202, 205-206, 226

Spanish, 西班牙, 参见Netherlands, southern

Netherlands Revolution, 尼德兰革命, 参见Revolution, Netherlands

New draperies, 新布料, 参见Textiles, new draperies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192, 281

Newfoundland, 纽芬兰 192, 281, 327

New Granada, 新格拉纳达, 参见Colombia

New Monarchy, 新君主政体, 参见Tudor monarchy

New Spain, 新西班牙, 参见Mexico

New World, 新世界, 参见America

Newcastle, 纽加塞尔 226, 260

Nobiles minores, 小贵族, 参见Nobility, lesser

Nobility, 贵族, 参见peers (for early modern period) ;
Seigniors (for medieval period) ; 另见Aristocracy

embourgeoisement of, 资产阶级化 286

higher, 高等贵族, 参见Aristocracy

younger sons of, 旧贵族之子 202, 239-240

Noblesse 贵族

de robe, 穿袍贵族 58, 284, 288, 292, 296, 另见State,
bureaucracy

territoriale, 参见Aristocracy

Nordic 北欧

Norfolk, 诺福克 237

Normandy, 诺曼底 38, 106, 147, 182, 264, 267-268, 293, 295

North, the, 北方, 参见England, north

North, Douglass C., 诺思 22, 109, 112, 161

North Sea, 北海 183, 201, 211, 217

Northampton, 北安普敦 248

Northern Hemisphere, 北半球 35

Norway, 挪威 110, 121, 211-212, 228

Notables, local, 本地显贵 269, 288, 295, 另见Bourgeoisie;
Farmers, capitalist; Peers; Seigniors

Notaries, 公证人 248, 另见 Professions, members of Nova Scotia,
新斯科金281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318, 322, 325

Nubia, 努比亚 40

Nuremberg, 纽伦堡 174, 324

O

Oak, 橡木 45, 另见Wood

Oak bark, 橡木材 155

Occitania, 奥西塔尼亚 32, 294-296, 另见France, southern

Offices, 官僚, 参见State, bureaucracy

Officers, 官员 284-285, 288-289

Ohlin, Goran, 欧林 160

Oil, (olive), 油 191, 218

Olives, 橄榄 102

Olkusz, 奥尔库什 155

Oman, Sir Charles, 欧曼 29, 139-140, 171, 206

Open economy, 开放经济 146, 151, 269, 304

Opium, 鸦片 336

Oprichnina, 禁卫军 317-319, 另见Ivan IV

Order, 秩序, 参见State, order, internal

Orient, 东方 41, 52, 68, 170, 200, 215-216, 303, 305, 317, 326, 331-334, 336, 342, 另见China, India, Indies, Levant

Ormuz, 霍尔姆兹 327

Ortegay Gasset, Jose, 奥尔特加·加塞特 67

Ortel, 奥特尔 176

Ots Capdequi, J.M., 欧兹 93-94

Oxen, 牛, 参见Gattle

P

Pach, Zs. P., 帕赫 95, 97, 159, 244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323

Pacification of Ghent, 根特和约 204, 206, 另见Revolution,
Netherlands

Pagès, G., 佩吉斯 137, 284, 286, 289

Palaces, 宫殿 192, 306

Palestine, 巴勒斯坦 38

Panjab, 旁遮普 140

Pannilar, K.M., 潘尼迦 49, 332

Papacy, 教皇权, 参见Catholic Church, Papacy

Paper mills, 纸厂, 参见Industries, wood products

Paris, 巴黎 27, 118, 182, 208, 262-263, 267-268

Pariset, Georges, 派瑞西 47

Parisian Basin, 巴黎盆地 104

Parliament, members of, 议会成员 288-289

Parliamentary bodies, 议会团体 31, 135, 311

Parma, Duke of, 帕尔玛公爵 185

Parry, J.H., 帕里 90, 102, 174, 185, 187, 191, 212, 216, 218, 264, 280-281, 306, 341

Parsons, Talcott, 帕森斯 127

Parthians, 帕提亚人 331

Party, transnational, 超越国界的政党派, 参见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Pascu, S., 巴斯古 305

Pastoralism, 田园风味, 参见Agriculture, pasturage

Patriciate, 贵族阶级 20, 86, 140, 155, 209, 289, 323, 另见Bourgeoisie, Towns

Patrimonialism, 世袭主义 29, 58-60, 92, 115, 309, 315, 另见State, bureaucracy

Patto di ricorso, 背书汇兑票 218, 另见Money, credit

Paul IV, Pope, 教皇保罗四世 205

Paulet, Charles, 波莱 287

Paulette, 官职税 287-288

Pauperization, double, 双重贫困化 268

Paupers, 贫民, 参见Poor, the

Payments, balance of, 支出平衡, 参见Money, balance of payments

Pearl river, 珍珠河 55

Peasants, 农民 19, 22-25, 27-28, 30, 35-36, 48, 53, 59, 63, 83, 90-91, 94-95, 99, 101, 104-107, 109, 111, 113, 117, 120, 123-124, 128, 133, 135, 142-143, 155, 159, 177, 192, 194-195, 208, 227, 231, 236-237, 244, 246-249, 252-255, 259, 262, 268, 284, 292-293, 295, 302, 304, 311-315, 318, 322, 324, 357, 另见 Cottagers; Farmers; Husbandmen; Laborers, rural

Peasant economy, 农民经济 18

Peasant rebellions (resistance), 农民叛乱 23-24, 29, 35, 37, 50, 86, 103-104, 135, 141-142, 234-235, 254-256, 267, 286, 292-293, 295, 305, 357, 另见Peasants' War, Slavery, slave rebellions

Peasants' War, 农民战争 24, 140, 177

Pedological conditions, 参见Soil conditions

Peking, 北京 55

Pepper, 胡椒 44, 273, 326, 328-329, 331-336, 340, 另见 Malaguette, Spices Percy family, Earls of Northumberland, 帕西家族, 诺森伯兰伯爵257

Pérez, Antonio, 佩雷兹 171

Periphery, 边缘 60, 63, 70, 82, 84, 86, 97, 100-103, 107, 111, 116, 118, 127-129, 145, 147-148, 153, 156, 162, 186, 196-197, 219, 269, 272, 301, 306-309, 312, 315, 336, 339, 343, 349-

350, 352-353, 355, 另见World-economy

Perroy, Edouard, 佩罗伊 21-24, 32, 41, 115, 136

Persia, 波斯 16, 301, 305, 319, 327, 329

Persian gulf, 波斯湾 327, 340

Peru, 秘鲁 68, 89, 93, 179, 187-188, 190, 195, 215, 329

Pesez, Jean-Marie, 佩塞茨 25

Peter the Great, Tsar of Russia, 彼得大帝 306, 320

Petrograd, 彼得格勒 206

Phelps-Brown, G. H., 费尔普斯-布朗 77, 79, 81-82, 118

Philip II, King of Spain, 菲利普二世, 西班牙国王 141, 178, 181, 185, 190-191, 194-195, 203-205, 215, 266

Philip III, King of Spain, 菲利普三世, 西班牙国王 205

Philip IV, King of Spain, 菲利普四世, 西班牙国王 205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菲利普奥古斯都, 法国国王 182

Philippines, 菲律宾 68, 189, 335-336, 338, 343

Picardy, 皮卡迪 139

Piedmont, 皮埃蒙特 221

Pierce, T.Jones, 皮尔斯 250

Pike, Ruth, 帕克 150, 173

Pipe-making, 参见Industries, metallurgical

Piracy, 海盜 55 -56, 142, 211, 218, 276, 280, 334, 另见
Banditry; Trade, interlopers

Pirnne, Henri, 皮朗 41, 124, 172, 242

Pisa, 比萨 49, 289

Plague, 瘟疫, 参见 Black Death, Epidemics

Plaisance, 普莱桑斯 176

Plantations, 大规模农场, 参见Estates

Plebeians, 平民 208, 286, 293, 另见 Bourgeoisie, petty;
Lumpenproletariat; Workers

Plows, 犁 21, 53, 250

Plunder, 战利品 21, 61, 78, 102, 141, 213, 227, 280, 290,
330, 335-336, 339, 341

Plymouth, 普利茅斯 215

Pocock, J.G.A., 波卡克 283

Poitou, 普瓦图 106, 295

Poland, 波兰 20, 27, 68, 82, 94-97, 100-101, 104, 110, 122,
126, 129, 147-148, 150, 153-156, 180, 207, 218, 230, 247, 266,

271, 301-307, 310-313, 315-317, 319, 321-324, 354, 357

local diets, 310

Seym, 154, 310, 321-322, 另见Parliamentary bodies tatute of King Alexander, 310

Polanyi, Karl, 波拉尼 254

Police, 警察, 参见State, order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307

Pomestia, 领地制, 参见Estates, pomestia

Ponant, 波南特, 参见France, western

Poor, the, 贫者 118, 134, 141-142, 203, 207, 245, 276, 281-282, 另见Classes, lower

Poor laws, 济贫法 254, 256, 261, 274

Population, 人口 62

decline of (depopulation), 人口缩减 21, 25-29, 31, 34, 36-37, 69, 89, 101, 103-104, 107-108, 112, 178, 196, 227, 255, 272, 338

density, 人口密度 21, 26-27, 100, 104, 109, 112, 198

expansion of, 人口扩张 21, 24, 29, 34, 36, 37, 42, 48, 53, 56, 68, 98, 101-102, 104, 107, 116-118, 123, 128, 139, 142-143, 196, 198, 216, 227, 260-262, 302

overpopulation (pressure, saturation), 人口膨胀 21, 34, 47-48, 57, 189, 196, 198, 261-262

Porchney, Boris, 波尔什涅夫 106, 157, 283-284, 286-290, 292-295, 305, 319

Portal, Roger, 波托尔 303

Portugal, 葡萄牙 38-39, 41-44, 47-52, 54, 56, 59-61, 68, 84, 90, 93, 96, 121, 149, 151, 165, 168-169, 173-175, 188, 192-193, 196, 198, 200-201, 215-216, 272-273, 301, 325-344

Postan, M.M., 波斯坦 18, 23, 27, 28, 46, 74-75, 111-112, 150, 160-161, 171, 227-230

Potosi, 波托西 337

Potter, G.R., 波特 201

Pounds, Norman J.G., 庞兹 35

Power, Eileen E., 鲍尔 228-230

Prague, 布拉格 259

Prawer, Joshua, 普劳尔 90

Prebendalism, 俸禄化 57, 60, 63, 314, 316

Preciosities, 参见Trade, luxu-ry

Precious metals, 贵金属, 参见Bullion

Precious stones, 宝石 326, 329

Prester John, 普雷斯特约翰 326

Prestwick Minna, 289

Preussische Schlagwirtschaft, 普雷斯特维克·明纳, 参见
Agriculture, rotation systems

Prices, 价格 24, 230

Price Revolution, 价格革命, 参见Prices, rise of

rise of, 价格上涨 21-22, 26, 30, 68-80, 82-84, 105, 128-129,
143, 153-154, 179, 190, 193, 198, 203, 217, 220, 241, 255,
262, 264, 270, 272, 295, 302, 305, 311, 318

Primogeniture, 长子继承制, 参见Tenure, primogeniture

Prince, the 君王（如果是州邑之首领, 可参见State; 若是王国王
子, 则可参见Aristocracy）

Private enterprise, 私有企业, 参见Capitalism

Privateers, 参见Piracy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参见England, Privy Council

Productivity, 22, 24, 35, 38, 42, 53, 75, 85, 90, 101-102,
105- 106, 117-118, 161, 193, 249, 272, 334

Professions, 专业

members of 专业成员 245, 258, 另见 Lawyers, Notaries,
Scriveners

Profits, 利益 23, 31, 34, 47, 60, 73, 75-76, 78, 81, 84,
94, 99, 100-102, 107, 109, 111, 120, 122, 125-126, 135, 169,
188, 213, 216-217, 244, 248-249, 271, 273, 281, 286, 290-291,
305, 312, 328-330, 334, 336-338, 341, 354, 357

windfall, 77-78, 83, 125, 170, 281

Protection rent, 保护租 16, 90, 135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参见 State, mercantilism

Proteins, 蛋白质, 参见 Food, proteins

Protesantism, 新教主义 47, 151-156, 160, 177-178, 185, 192,
194, 204, 206-207, 209, 211, 233, 236, 262, 266, 268, 310,
353, 另见 Christianity

Provence, 普罗旺斯 32, 103, 106, 267, 295, 另见 France,
southern

Prussia, 普鲁士 70, 110, 230, 302, 310, 322, 另见 Germany,
East Elbia

East, 东普鲁士 218

Pullan, Brian, 普兰 81, 216-217, 219

Pyrenees, 比利牛斯 142, 193, 196

Q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金钱的量化理论, 参见Money, quantity theory of

Quicksilver, 金银 336

R

Radolfzell, 拉道夫泽尔 19

Ragusa, 拉古萨 45, 218

Raisins, 葡萄干 79

Ramsey, Peter, 拉姆塞 108, 228, 251

Rau, Virginia, 劳 49-50, 340

Recife, 勒西菲 335

Reclamation of waste, 荒地开垦, 参见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Reconquista, 光复运动 46-47, 166-167, 169, 314, 另见 Christianity, evangelization; Moors; Spain

Red Sea, 红海 17, 327

Reddaway, W. F., 雷德韦 155, 311

Reddaways of Devon, 德文的雷德威家族 251

Redlich, Fritz, 雷德里克 78, 119, 140-141, 160

Re-exports, 再出口, 参见Trade, re-exports

Reformation, (宗教) 改革 142, 151, 153-154, 156, 177, 236,

239, 294, 310-311, 314, 322, 353, 另见 Catholic Church, Counter-Reformation

Reformed party, 改革派 206, 另见 Calvinism; Revolution
Netherlands

Reglá, Juan, 雷格拉 150, 194-196

Reichenau, 赖兴瑙 19

Religion, 宗教 47, 67, 206-208, 263, 268, 282, 294, 353-354, 另见 Christianity, Jews, Islam

conversions, forced, 宗教协议 151

religious enthusiasm, 宗教狂热 48, 另见 Crusades; Christianity, evangelization

religious nationalism, 宗教国家化 155

religious polarization, 宗教分裂 206

religious toleration, (lack of), 宗教容忍的缺乏 148-149, 194-195, 204, 211, 266

religious uniformity, 宗教同一化, 参见 State, homogenization

theology, 神学 152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53, 72, 83, 120, 126, 138, 156, 172, 187, 258-259, 另见 Counter-Renaissance

Renouard, Yves, 雷诺阿德 32

Rents, 租金 22-23, 36, 78, 81, 90, 94-95, 106-108, 114, 117, 124, 133, 155, 234-235, 239, 247, 249, 264, 268, 273, 295, 311, 另见Feudalism, feudal dues

capitalist ground rent, 资本家地租 247

fixed, 固定租金 23, 26, 31, 101, 103, 105, 108, 114, 116, 262

money, 租金 27, 108-109, 112-113, 116, 120, 另见Farmers, tenant

rack-renting, 244, 25 1

rentiers, 出租人 21, 75, 95, 114, 148, 160-161, 293, 另见Landlords, Seigniors

rent struggle, 租金斗争 42, 另见Classes, class-struggle variable, 多种255

Restoration, 复辟 296

Revah, I.S., 雷瓦哈 151

Reval, 雷维尔 121

Revolution, 革命 6, 201-203, 282

bourgeois, 中产阶级革命, 参见Revol-ution, social

English, 英国革命, 参见England, Civil War

French, 法国大革命 6, 59, 139, 206, 268, 352

national, 国家革命 202, 294

Netherlands, 尼德兰革命 181, 186, 201-211, 214

Puritan, 清教革命, 参见England, Civil War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parties), 革命运动 205, 207-208, 268, 294, 353

Russian, 俄国革命 6

semi-, 亚革命 286

social, 社会革命 47, 202, 208-209, 352

Reynolds, Robert L., 雷诺德 124, 213, 308

Rhine, 莱茵 104

country, 莱茵地区 186, 230, 263, 另见Germany, west

Rhodes, 罗德斯 88

Rice, 米 56-57, 63, 另见Food

Rich, E.E., 里奇 25, 44, 48, 102, 128, 150, 171, 188, 201, 215, 275, 280, 327

Richelieu, Armand de Wignerod, Cardinal, 黎塞留 269, 292

Riga, 里加 121-122

Rio Cauca, 考卡河 99

Risk-minimization (risk-sharing) , 危机减少化 105

Robertson, H. M., 罗伯森 269, 273, 333

Robinson, W.C., 罗宾逊 73-75

Rodenwaldt, Ernst, 罗登瓦尔特 34

Roman law, 罗马法 145

Roman republic, 罗马共和 154

Romano, Ruggiero, 罗曼诺 43, 76, 171, 216 -217, 219, 271, 273

Rome 罗马

ancient empire of, 古罗马帝国 16-17, 23, 63, 85, 88, 126-127

Church, 罗马教堂, 参见Catholic Church, Papacy

cityof, 罗马城 79, 109, 143, 160, 另见Italy, cen-tral

Roorda, D.J., 罗达 202, 209

Rope-making, 制绳业 200, 220

Rosenberg, Hans, 罗森伯格 95, 160, 311

Roth, Cecil, 罗斯 149

Roturiers, 平民, 参见Commoners

Rouen, 鲁昂 176, 296

Rowse, A.L., 罗斯 88, 257, 266

Royal borrowing (debt, loans), 皇家借贷, 参见State, debt

Royal finance, 皇家财政, 参见State, finance

Rudder, 舵 54

Ruddock, Alwyn A., 鲁多克 229

Rugs, 皮毡 19

Ruiz Almansa, Javier, 阿曼萨 150

Rum, 朗姆酒 43

Rus, 俄国 314, 另见Russia

Russia, 俄罗斯 17, 20, 39, 42, 68, 89, 94, 147, 155, 170, 212, 249, 274, 276, 301-325

Assembly Code of 1649年, 大会法典, 315, 320

Code of, 1497, 1497年法典 315

expansion of, 俄罗斯扩张 302-303, 308, 315-316, 323

great Russian plain, 大俄罗斯计划 314

northern, 北俄 323-324

southeast (European), 东南俄 313-314, 316, 324

“Time of Troubles, ”混乱年代 319-320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 155, 313-314, 另见
Christianity

Rye, 裸麦 218, 226, 另见Cereals

S

Saffron, 番红花 336

Sahara, 撒哈拉 39

Sail, 航行 200

St.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152

Saint-Quentin, 圣昆廷 205, 266-267

Salmon, J.H.M., 萨尔蒙 289, 292

Salt, 盐 96, 226, 264, 306, 323-324, 333, 342

Salt pans, 盐场 125

Salt peter, 硝酸肥料 161, 260

Samsonowicz, Henryk, 山姆森诺维兹 70

Sansom, George B., 桑塞姆 55-56, 326-327, 329

Santos, 桑托斯 335

São Jorge da Mina, 圣豪尔赫达米纳 168

São Tome, 圣多美 121

Sardinia, 撒丁尼亚 38, 70, 139, 170, 289

Savine, Alexander, 萨文 252

Savoy, Duke of, 萨伏依公爵 266

Sawmills, 锯木厂, 参见Industries, wood products

Saxony, 萨克森 41, 307

Sayous, André E., 塞欧斯 212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34, 38, 227, 230, 312

Scholliers, E., 斯科利尔斯 76

Schumpeter, Joseph A., 熊彼得 74-75, 133-134, 157-158, 309

Schurz, Walter L., 舒兹 189

Science, 科学 53-54, 67

Scotland, 苏格兰 38, 83, 111, 153, 205-206, 228, 253, 264,
281

Scottish borders, 苏格兰边界 257

Scott, W.R., 斯考特 199

Scriveners, 公证人 248, 参见Professions, members of

Scythians, 西徐亚人 331

Sea raiders, 海盗, 参见Piracy

Securities exchange, 证券交易会, 参见Money, financial centers

Security, search for physical, 安全 25, 另见State, order, internal

Sée, Henri, 塞 120

Seigniors, 封建领主 18, 20, 22, 24, 26-32, 36, 46-48, 50-51, 78, 83, 86, 90-91, 93-95, 97, 101, 103-104, 110-111, 113-115, 117, 119-120, 122, 124, 134-136, 139, 141-143, 147, 149, 151, 157-161, 167, 181, 187, 185-196, 200, 202, 204, 208-209, 227, 236, 239-240, 243-244, 246, 248-249, 253, 259, 262-263, 267-268, 283, 287-290, 292-293, 296-297, 304-305, 307, 309-313, 316-318, 322-324, 334, 353, 355, 另见Aristocracy, Landlords Statute of King Alexander, 310

seigniorial income, decline in, 领主收入 23, 26, 36, 46-48, 51, 135, 138, 152, 157, 203, 237

seigniorial reaction, 领主制反动 95, 109, 115, 142, 273, 285, 287, 296, 302, 313

seigniorial revenues, 领主岁收, 参见Feudalism, feudaldues

Seignior, 领主的, 参见Manor

Sella, Domenico, 塞拉 81, 173, 219-220, 225-226, 292

Semiperiphery, 半边缘 63, 82, 84, 101-103, 107-108, 116, 142, 148, 151, 153, 156, 162, 178, 190, 196-197, 221, 287, 315, 349-350, 353, 另见World-economy

Semiproletariat, 半无产阶级, 参见Workers

Sender, Clemens, 森德尔 174

Senegal, 塞内加尔 40

Serbia, 塞尔维亚 40

Serfs, 农奴 20, 24, 113, 117, 126, 252, 311

liberation of, 农奴解放 36, 108, 113-114, 252

“second serfdom, ”次生农奴制, 参见Coerced labor, cash-crop

“semi-serfs, ”半农奴, 参见Sharecropping

Serraima Cirici, Enrique, 塞莱马 196

Serrão, Joël, 塞洛 43-44

Sesmo, 西斯莫 94

Settlers, 参见Colonies, settlers

Seville, 塞维利亚 45, 69, 165, 170, 173, 176, 178, 183, 192-193, 199, 214-215, 336-338, 另见Spain, Andalusia

Seym, 中央立法机关议会, 参见Poland, Seym

Sharecropping, 分成租佃制 103-107, 113, 264, 287

Sheep, 羊 106, 108-110, 112, 165, 188, 279, 305, 另见Livestock

sheep-farming, 牧场 109-110, 247-248, 另见Agriculture, pasturage; Mesta

shepherders, 牧羊人 191, 251, 另见Farmers

Shipbuilding, 造船业, 参见Industries, shipbuilding

Ships (shipping), 船, 参见Transport, maritime

Shneidman, J.Lee, 舍耐德曼 150

Shöffer, I., 舍费尔 206

Shortage of foodstuffs, 粮食短缺, 参见Foods, shortage of

Siberia, 西伯利亚 303, 308, 317, 323

Sicily, 西西里 38, 43, 88, 149, 170, 179-180, 185, 218, 221

Siemanski, J., 西蒙斯基 311

Sigismund I, King of Poland, 西格斯蒙德 310

Silesia, 西里西亚 94, 302, 307

Silk 丝

raw, 生丝 92, 329-330, 337-338

textiles, 丝织品, 参见Textiles, silk

Silver, 白银 23, 31, 39-41, 70-72, 76, 78, 128, 150, 153, 155, 170, 173, 180, 183, 187, 190-191, 193, 195, 198, 200, 213, 215, 271, 281, 301, 306, 309, 329-330, 336-338, 342, 另见
Bullion

amalgam, 汞合金 88, 170, 190

Simpson, Leslie Boyd, 辛普森 89

Sixty-day world, 六十天世界 16-17, 338

Skeel, Caroline, 史基尔 228

Skilled labor, 技术劳工, 参见Workers

Skins, 肤色 155, 275

Slavery, 奴隶 43-44, 86-90, 94, 99-100, 103-104, 121, 126, 187, 280, 326, 332, 339, 341, 另见Coerced labor

debt, 债 313

slave rebellions, 奴隶反叛 188

slave-trade, 贩奴, 参见Trade, slave-trade

Slavs, 斯拉夫人 38, 114, 119, 148, 227

Slicher van Bath, B.H., 斯里舍·范·巴特 18, 21-24, 35, 42, 44, 69, 75, 79-80, 96, 108, 110

Slovakia, 斯洛伐克 324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95, 322-323

Sluiter, Engel, 斯鲁伊特 342

Smit, J.W., 斯密特 181, 186, 202-204, 208-209

Smith, Adam, 史密斯 279

Smith, R.E.F., 史密斯 305, 315-316, 318

Smith, Robert S., 史密斯 100

Smolar, Frank J., Jr., 斯莫勒 201

Social struggle, 社会斗争, 参见Classes, class-struggle

Social system, 社会制度 7, 11, 15

Social welfare (legislation), 社会福利, 参见Poor laws

Socialism, 社会主义 348, 351

Soldevila, Ferran, 索尔德维拉 180

Soldiers, common, 一般士兵 251, 310

Solt, Leo F., 索特 207

Sombart, Werner, 桑巴特 211

“Sons of boyars, ”贵族之子 320, 另见Nobility, lesser

Sound, the, 桑德海峡 180, 200, 264, 另见Baltic

South Africa, 南非 152

Sovereign state, 主权国家, 参见State, nation-states

Spain, 西班牙 29, 32, 38, 43, 45, 47-51, 68-71, 74-75, 77-78, 82, 84, 88-90, 92-93, 100, 102, 108-110, 122-123, 129,

137, 147, 149, 151, 153, 160, 165-174, 177-182, 184-186, 198-207, 209-211, 213-216, 218, 228, 234, 245, 262-263, 270-273, 276, 278, 280-282, 287, 290-291, 294, 310-311, 314-315, 319, 325-326, 335-344, 另见Castile

Cortes, 议会 166, 179, 193, 另见Parliamentary bodies

decline of, 西班牙的衰微 165, 187, 191-196, 281-282

Hispanic America, 西属美洲, 参见America, Hispanic America

Spanish Armada, 西班牙舰队 194, 210, 261, 270

Spanish Empire, 西班牙帝国, 参见Empire, Hapsburg

Spanish Fury, 西班牙的愤怒 185, 205, 另见Revolution, Netherlands

Spanish Netherlands, 西属尼德兰, 参见Netherlands, southern

Specie, 钱币, 参见Bullion

Spice Islands, 香料群岛 169

Spices, 香料 39, 41-42, 44-45, 175, 201, 216, 230, 273, 301, 326, 328-334, 340, 另见Pepper; Trade, spice

Spooner, Frank C., 斯普内 44, 71, 77, 117-118, 128-129, 198-199, 211, 214-215, 218, 235, 262, 270-272, 304, 312

Squatters, 侵占公地者 253

Squires, 乡绅 240-241, 243, 311

Stuatsvolk, 国民 146, 另见Ethnic groups

Stagnation, 不景气 22, 24

Stahl, Henri H., 斯达尔 91-92

Standing army, 驻军, 参见Army

Staple (emporium), 主要贸易中心 175, 212, 另见Trading-posts

Staple (fiber), 人造纤维, 参见Wool

Staples (products), 主要物产 42-43, 51, 111, 190, 230, 另见Agriculture, capitalist

State, 国家 31, 46-47, 50-51, 59-60, 63, 80, 82, 84, 91-93, 99-100, 103-104, 109, 114-115, 117, 121, 133-151, 117, 121, 133-151, 154-155, 157-158, 161-162, 165-167, 173, 176, 178, 180, 182, 185-190, 193-197, 199, 202-209, 214, 227-228, 231-236, 239, 242-243, 246, 252, 254, 256, 258, 261, 263-264, 266-267, 269, 278, 282-297, 302, 307-311, 313-317, 319-323, 328, 330, 334-336, 338-344, 348, 356

absolutism, 绝对主义 31-33, 115, 133-162, 178, 234, 257, 264, 269, 276, 283, 285, 287-288, 292, 309, 313, 320-321, 355

aristocratic (*état nobiliaire*), 贵族国家157

bankruptcy, 破产 148, 161, 181, 183-186, 197, 203, 214, 267, 341, 另见State, debts, repudiation of banks, 国家银行139, 另见Banking

bureaucracy (civil) , 国家官僚 15, 21, 28-31, 38, 54, 58-60, 62-63, 85-86, 93, 100, 133-134, 136-139, 141, 143-145, 147, 157, 159, 167-168, 179-180, 182, 185, 187-189, 191-192, 196-197, 202, 231-235, 237, 242-243, 254, 256-257, 259, 263, 269, 278, 280, 284-285, 289, 291-292, 309-311, 314, 316-317, 320, 340-341, 351, 354-356, 另见China, Confucian mandarins

administrative revolution, 行政革命 232-236

hereditary, 世袭官僚 145, 158

military, 军事, 参见Army

sale of offices (venality) , 卖官 30, 58, 133, 137-139, 157, 189, 234, 240, 256, 259, 285-287, 294, 297, 309, 311

capital city, 首都城市 233

centralization of, 国家集权统一, 参见State, strengthening of

city-states, 城市国家 15-17, 29, 57, 67, 129, 138, 142, 148, 165, 168, 171-173, 196, 198, 214

confiscation, 充公 30, 133, 315, 317

court ceremonial, 法庭仪式 146

customs (tariffs) , 关税 54-55, 228, 233, 254, 278, 307, 310, 317, 322-323

debts, 国债 22, 30-31, 46, 133-134, 137-141, 159, 176, 191, 193, 199, 214, 278, 285, 290, 311

repudiation of, 拒付国债 195

domains, royal, 王室领地 31, 135, 151, 182, 234-235, 259, 310-311, 322

finances (budget), 国家财政 28, 31, 60, 62, 133, 159, 168, 182, 191, 195-196, 203, 227, 285, 290, 317, 另见 Mints; State, debts; State, customs; Taxes

financial collapse, 财务崩溃, 参见State, bankruptcy

fiscalism, 财政主义 137-138, 149, 182, 309, 另见State, finances

force, (monopoly of), 武力 120, 136, 339, 另见Army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生产毛额 (G.N.P) 197, 274, 334

homogenization, 同质化 33, 92, 136, 147, 157, 296, 349, 353

integration of, 国家整合 146

judiciary, 司法 114-115, 182

legitimacy, 合法性 137, 143-144, 146, 356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146, 149, 166, 172, 193-194, 213-214, 229, 273, 277-278, 290, 309, 313

military power, 军事力量, 参见Army

monopoly, 国家专利 170, 316

nation-states, 民族国家 9, 15, 29, 32-33, 57, 67, 86, 120,

127, 129, 134, 142, 148, 184, 197, 263, 266, 348, 352

order, internal, 国际秩序 28, 134-135, 141-142

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 261

revenues, 国家岁收, 参见State, finances

state-machinery, 国家机器, 参见State bureaucracy

statism, 国家主义 67, 133-162, 197

strengthening of (strong), 官僚强化 30, 38, 50, 58, 67, 114, 134, 136, 140, 145-146, 151, 153, 156, 162, 172, 181-182, 196, 199, 209, 231, 234, 258, 263-264, 269, 285, 294, 297, 302, 310, 312, 314-317, 353-355

tax base, 税基 148-149, 176, 180, 199, 309, 311, 316

weakening of, 国家的削弱 17, 60, 97, 197, 309-311, 317

Static expansion, 国家的扩张 85

Statism, 国家主义, 参见State, statism

Status-groups, 阶层群众 3, 145, 351, 354, 另见Castes, Ethnic groups

formation, 形成 353

solidarities, 353, 另见Nationalism

Stein, Stanley J. & Barbara H., 斯坦 180, 189-190, 336

Stephens, W.B., 史蒂芬 278

Stock-farming, 畜牧业, 参见Agriculture, pasturage

Stock-feed, winter, 冬季畜牧 333

Stoianovich, Traian, 斯托亚诺维奇 99

Stone, Lawrence, 斯通 160, 197, 201, 231, 235, 237-239, 243-246, 251, 257-259, 261, 275-276, 282-283

Stratification, 阶层, 参见Classes

Strauss, Gerald, 斯特劳斯 174, 186

Strayer, Joseph, 斯特雷耶 134, 182, 231

Stroganovs,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 308, 323

Stuart monarchy, 斯图亚特王朝 125, 235, 242-243, 245, 251, 254, 257, 261, 275-276, 284, 286

Stuffs, 毛织物, 参见Textiles, new draperies

Subsistence economy, 实质经济, 参见Agriculture, subsistence

Sudan, (Western), 苏丹(西部) 39-41, 168-169

Sudetenland, 苏台德 34

Sugar, 糖 43-44, 86, 88, 90, 100, 121, 326, 332-333, 336-337, 341

grinding mill (or ingenio) , 磨坊 88

refineries, 炼糖厂 121, 260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伟大的苏里曼 170

Sumatra, 苏门答腊 329

Supple, Barry, 萨普勒 219, 233, 274-279

Surplus, 剩余 15-16, 18-19, 22, 36-38, 42, 58, 87, 93, 95, 100, 107, 113, 117, 120-121, 126, 133, 138, 140-141, 247, 257, 306, 338-339, 349

Swart, K.W., 斯沃特 137, 189, 287

Sweden, 瑞典 47, 83, 153, 155, 159, 226, 272, 304, 312, 319

Sweezy, Paul, 斯威奇 20, 41, 110-111

Switzerland, 瑞士 24, 139-140, 153, 226

Syria, 叙利亚 38, 43, 218

Szeftel, Marc, 肖夫特尔 313

Szlachta, 小贵族 (波兰) , 参见Gentry

T

Tagus, 塔古斯 200

Takahashi, H.K., 塔卡哈西 104, 113, 128, 157

Tallow, 牛羊脂肪 108, 188, 275

Tapié, Victor-L., 泰皮 294

Tar, 焦油 45, 200-201

Tartars, 鞑鞑 55, 97

Tartar yoke, 鞑鞑奴役 314

Taube, Edward, 陶伯 261

Tawney, R.H., 托尼 160, 177, 184-185, 198, 236-237, 239-243, 245, 252, 256, 258-259, 282-283, 357

Taxes, 税 15, 22, 24, 28-31, 58, 83, 91, 101, 120, 133, 135, 137-138, 141, 148-151, 159, 176, 182, 193, 220, 227-228, 230-231, 234, 250, 255, 264, 267, 278, 285-287, 291-293, 295, 304, 310-312, 315-318, 321, 323, 356, 另见State, finances

capitation, 人头税 335

in kind, 实物税 22

tax base, 税基, 参见State, tax base

tax-farming, 包税制 30, 58, 91, 137, 263, 285, 291, 316

tithes, 什一税 268

Taylor, A.J.P., 泰勒 177-178, 186-187, 312

Taylor, K.W., 泰勒 260-261

Tazbir, Janusz, 塔兹比尔 155, 310, 321

Tea, 茶 329

Teak, 柚木 337, 另见Wood

Teall, Elizabeth S., 蒂尔 292

Tenanciers, 佃农, 参见Farmers, tenant

Tenant farmers, 承租农, 参见Farmers, tenant

Tenure (system), 承租制 181, 247-248, 250, 另见Estates:
Gutsherrschaft; Guts-wirtschaft; Manors; votchini

allodial, 自主承租制 105, 110, 115, 241, 247, 314

copyhold, 公簿承租制 109, 115-116, 191, 248

cottage holdings, 310-311

freehold, 自由地租佃制, 参见Tenure, allodial

life, 佃农生活 247-248, 315

limited term, 限期承租制 248, 295

perpetual leases, 永久租期 105-106, 114, 295

primogeniture, 长子继承权 250

villein, 农奴 248, 另见Feudalism, fiefs

Terraces, 梯形地 102

Terraferma, 特拉法尔玛 Americas, 68, 另见Colombia

Italy, 216, 289, 另见Venice

Territorial state, 领地国家, 参见State, nation-states

Teutonic Knights, 条顿骑士 95, 另见Military orders

Textiles, 纺织业 45, 51, 100, 108, 125, 150, 159, 175, 183, 214, 220, 225, 227-231, 237, 272, 277-280, 305, 324-325, 336, 另见Industries, textile

coarse (inexpensive), 粗糙的 (不贵的) 96, 124, 220, 279, 325

cotton, 棉 305

fine (luxury), 精美的 (奢华的) 96, 220, 279, 308, 323, 325

new draperies, 新织物 279

old draperies, 旧织物 277, 279

semi-manufactured, 半工业 276, 另见Industries, textile silk, 丝 19, 21, 42, 45, 96, 180, 292, 301, 326, 329, 337-338, 342, 另

见Industries, silk

woolens, 羊毛 252, 279, 324, 335

worsteds, 毛纱 229, 279-280

Thalassocracy, 海权 332, 另见Navy

Theodor, Tsar of Russia, 提奥多尔俄国沙皇 318

Theology, 神学, 参见Religion, theology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5, 226

Thirsk, Joan, 瑟斯克 78, 110-111, 123, 141, 235, 239, 243, 249-250, 252-253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32, 140, 178, 220, 292, 311, 319, 324, 另见War

Thomas, Robert paul, 托马斯 22, 109, 112, 161

Thomas, William L., Jr., 托马斯 22, 45

Thompson, F.M.L., 汤普森 246

Thorner, Daniel, 索纳 18

Thrupp, Sylvia, 瑟拉普 81, 106

Tilly, Charles, 蒂利 76, 141, 146

Timber, 木材, 参见Wood

“Time of Troubles, ”混乱时代, 参见Russia, “Time of Troubles”

Tithes, 什一税, 参见Taxes, tithes

Tobacco, 烟草 100, 332

Tokugawa shgunate, 德川家康 343

Toledo, 托莱多 166

Topolski, Jerzy, 托波尔斯基 304-305

Toulouse, 土鲁斯 121

Tournon, François de, Cardinal, 图尔农 266

Towns, 城镇 18-21, 26, 48, 50-53, 72, 74, 81, 86, 92, 97, 101-104, 107, 109, 111, 113, 116-120, 122-124, 129, 142, 150, 155, 159-160, 165, 172, 175-176, 180-181, 184, 187, 190-191, 193, 200, 203-204, 208-210, 212, 217, 221, 228-230, 232-233, 237, 248, 255, 269, 293, 296, 302, 309-311, 317, 320 - 322, 另见
Burghers; Patriciate; State, city-states“urban colonialism, ” 120

Toynbee, Arnold J., 汤因比 53

Trade, (world), 贸易 15-16, 19, 22, 40, 45, 50, 52-55, 61, 75, 77, 83, 91-92, 96, 99, 101-102, 106, 111, 114, 119-124, 126-127, 135, 147, 159-161, 170, 173, 175, 182-186, 188, 190, 192, 198, 201, 211, 214, 216, 219, 227, 231, 246-247, 252, 256, 263, 269, 274-276, 278, 290, 292, 303, 312, 316-317, 320, 322, 324-326, 328-329, 331, 334, 336, 338, 340, 354, 另见
Bourgeoisie, Fairs, Merchants

American, 美洲贸易, 参见Trade, Atlantic

Asian, 亚洲贸易 272, 325-326, 329, 334, 另见Trade, Indian Ocean

Atlantic, 大西洋贸易 69, 170, 174, 176-177, 180, 190, 192, 194-195, 198-201, 264, 269-270, 290, 325, 329

balance of, 贸易平衡, 参见Trade, terms of

Baltic, 波罗的海贸易 17, 96, 101, 175, 198-201, 210-213, 264, 269

bulk, 散装货 20-21, 96, 199, 265

China, 中国贸易 342, 另见Trade, Asian

colonial, 殖民地贸易 120, 193, 211, 328

commercial centers, 贸易商业中心 212, 214

commercial revolution, 贸易商业革命 226

“contracts” (of Asia, of Europe), 贸易契约 341

East Indian, 东印度, 参见Trade, Indian Ocean

Eastern, 东方贸易, 参见Trade, Asian

expansion of, 贸易扩张 20, 29, 31, 34, 37, 41, 47, 69, 73-74, 76, 98, 110, 133, 135, 142, 165, 170, 173, 179, 185, 199, 208, 214, 244, 262, 270, 276, 312, 354

free, 自由贸易 188, 213-214, 217, 269

Hispano-American, 西班牙—美洲, 参见Trade, Atlantic

Indian (Ocean), 印度(洋) 17, 56, 78, 211, 216, 325-326, 328, 336

intercolonial, 国内殖民化 189

interlopers, 私商 190, 200, 266, 280, 另见Piracy

intra-Asian, 穿越亚洲 330-331, 343, 另见Trade, Indian Ocean

intra-European, 欧洲内 201

invisible exports, 隐形出口 330

Levantine, 利凡特地区 211

long-distance, 长途贸易 19, 21, 46, 51, 121, 171, 325, 328

luxury, 奢侈品贸易 19-21, 40-42, 45, 74, 159, 188, 190, 193, 196, 302, 306, 325, 另见Luxury goods

Mediterranean, 地中海贸易 17, 101, 174-175, 216, 218

“mother trade, ” 200, 211, 另见Trade, Baltic

national markets, 国家市场 167, 175, 193, 199, 227, 234-235, 263, 269, 290, 303, 351

oriental, 东方贸易, 参见Trade, Asian

recession of, 贸易衰退 22, 24-25, 28, 34, 37, 165-166, 178-179, 189, 196, 199, 208, 217, 229, 257, 259, 262, 271, 273, 277, 287, 290-292, 304

Red Sea, 红海 340-341

re-exports, 再出口 189, 277, 280, 305, 337

slave-trade, 奴隶贸易 89, 188, 193, 335, 339

spice, 香料 44, 200, 325, 339-342, 另见Trade, “contracts”

terms of, 贸易观点 16, 197, 277

trans-Alpine, 穿越亚平宁山 174

Trans-continental, 穿越大陆 147, 175, 177, 183

trans-Saharan, 穿越撒哈拉 39, 44, 168, 另见Sudan

transit, 322

war, 贸易战争 213, 另见War, economic aspects of

Trade unions, 贸易联盟, 参见Workers, organizations

Trading-posts, 贸易站 327, 335, 另见Staple

Traditional, the, 传统 98, 356

Transactions costs, 交易花费 22, 105, 161

Transport, 运输 76

costs of, 运输费用 19, 86, 90, 118, 169-170, 190, 212, 214, 218, 231, 265, 277, 337

land, 土地运输 45, 75, 218, 263, 265-266

maritime, 海上的 19, 45, 47, 54-55, 76, 96, 100, 121, 169, 200-201, 214, 219, 231, 233, 260, 263, 265-266, 277, 324, 327-328, 330-331, 337, 342, 另见Fluyt; Industries, shipbuilding

shipping centers, 海上航运中心 212

truck, 货车 167, 另见Transport, land

Treasure, 金银珍宝, 参见Bullion

Trevor-Roper, H.R., 特雷弗-罗珀 153, 206, 232, 238, 244, 247, 259, 267, 282-283, 328-329, 342

Tribes, 部落 348

Tribute, 贡赋 15-16, 21, 37, 54-55, 60-61, 92-93

Truce of 1609, 1609年停战, 参见Truce of Twelve Years

Truce of Twelve Years, 12年停战 205, 211, 342, 另见
Revolution, Netherlands

Tschiftliks, 自营地 302, 另见Estates

Tudor monarchy, 都铎王朝 45, 125, 141, 228, 232, 234, 237-238, 242-244, 251-254, 258-259, 261, 274-276, 282, 352

Tunisia, 突尼西亚 336

Turco-Muslim world, 土耳其—伊斯兰世界, 参见Empire, Ottoman

Turkey, 土耳其, 参见Empire, Ottoman

Turks, 土耳其人 40, 48, 60, 97, 171, 197, 218, 325, 332,
339-340

Tuscany, 托斯坎尼 32, 123, 226

Tyminiecki, Kazimierz, 泰米尼基 118-119

U

Udovitch, Abraham, 乌多维奇 40

Ukraine, 乌克兰 303

Ulman, Joan Connelly, 乌尔曼 194

Ulm, 乌尔姆 266

Umiński, J., 乌明斯基 155

Unemployment, 失业, 参见Employment, unemployment

Unentailed land, 自主地, 参见Tenure alodial

United Provinces, 联合省, 参见Nether-lands, norther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6, 45

University, 大学 134, 154

Unskilled labor, 非技术劳工, 参见Workers

Urals, 乌拉尔 324

Urban centers, 市中心, 参见Towns

Utrecht, Union of, 乌特勒支联盟, 参见Netherlands, northern

Utterström, Gustaf, 乌特斯特罗姆 33-34, 217

Uzbek khanates, 乌兹别克汗国 305

V

- Vaccari, Pietro, 瓦萨里 92
- Vagabondage, 流浪者 117-118, 139, 143, 198, 251, 253-254, 256
- Valencia, 巴伦西亚 77, 79, 194-195
- Válka, Josef, 瓦尔加 307
- Valois monarchy, 瓦罗亚王朝 171, 183, 197, 234, 258, 266, 352, 另见France
- Van der Molen, Pieter, 范德·莫伦 176
- Van Dillen, J.G., 范·狄伦 200, 218, 228
- Van der Sprenkel, Otto B., 斯普伦克尔 55, 57
- Van der Wee, Herman, 范·德维 81, 175-177, 185-186
- Van Hembyze, Jan, 范汉比斯 208-209
- Van Houtte, J.A., 范胡特 43, 175, 186
- Van Leur, J.C., 范鲁尔 331
- Veblen, Thorstein, 维布伦 234
-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循环速率, 参见Money, circulation of

Venality of office, 官职买卖制, 参见State, bureaucracy, sale of offices (venality)

Venice, 威尼斯 16, 32, 40, 49, 52, 70, 81-82, 87, 89, 92, 96, 156, 172-173, 176, 180, 183-184, 214-221, 289, 326, 334-336, 339-341

Verlinden, Charles, 弗林登 49-50, 74, 81, 87, 89, 177, 186, 188

Vernadsky, George, 瓦尔纳茨基 90, 302-303, 316, 318-320

Vervins, Treaty of, 维尔文和约 184, 280

Vicens Vives, Jaime, 维森斯 68, 82, 96, 101, 103, 150, 165-166, 186, 191-194

Vienna, 维也纳 48, 60, 79

Vijayanagar, 维贾亚纳加尔 329

Vilar, Pierre, 维勒 78, 82, 125, 146, 167-168, 192, 195, 202

Villari, Rosario, 维拉里 142-143, 221, 311

Villeins, 维兰 (即农奴), 参见Serfs

Virginia, 弗吉尼亚 88, 342

Vistula, 维斯杜拉河 304, 307, 322

Vitale, Luis, 威泰勒 47, 92-93, 166, 193

Viticulture, 参见Wine

Vivanti, Corrado, 维范迪 285, 287, 289

Volga, 伏尔加河 303

Votchina, 世袭领地, 参见Manors, votchini

W

Wages, 工资 24, 26, 40, 80-81, 108, 116, 220, 251, 255,
290

decline in, 工资削减 116, 118, 268, 279, 另见Wages, wage-lag

fixed, 固定工资 105

in kind, 实物工资 79, 254

money-wages, 金钱工资 79, 100

rising, 工资提升 20, 22, 26

wage-fixing, 工资固定 80

wage-lag, 工资滞后 77-84, 125, 128, 142

wage-workers, 资薪工人, 参见Laborers

Wakopirates, 倭寇 55, 60, 328-329, 342

Wales, 威尔士 38, 116, 139, 182, 198, 228, 233, 241, 250,
257, 261

Wallachia, 瓦拉几亚 94, 96

Wang Yang-ming, 王阳明 61-62

War, 战争 21, 25, 28-29, 47-48, 50, 78, 138, 140-142, 185,

196, 198, 212, 214, 218-219, 278, 281, 285, 291, 312, 324, 331, 334

civil wars, 内战 148, 另见England, Civil War; Fronde

economic aspects of, 战争的经济方面 21, 75, 91, 133, 140, 195, 227, 292, 另见Trade, war

military tactics, 军事策略 140, 281, 另见Army

military technology, 军事技术 28, 53, 61, 134, 212, 另见Army

naval technology, 海军技术 62, 212, 326, 另见Navy

religious wars, 148, 234, 286, 353, 另见France, Wars of Religion

strategic supplies, 战术支持 281, 另见Navy, naval supplies

War of the Roses, 玫瑰战争 50

Warriner, Doreen, 华勒纳 97

Water Beggars, 水上乞丐 205, 另见Revolution, Netherlands

Waterford, 沃特福德 257

Waterloo, 滑铁卢 206

Water power, 水力 228-229

Water-wheels, 水车 125

Watson, Andrew M., 沃森 39-40

Wax, 腊 79, 96, 306

Weapons, 武器, 参见Armaments

Weavers, 织工 229, 另见Colthiers

Webb, Walter Prescott, 韦布 78, 281

Weber, Max, 韦伯 30, 57-61, 91, 100, 113, 127, 152, 154, 329

Weikman, Georg, 威克曼 266

Welsers, 韦尔塞家族 341, 另见Merchants, merchant-houses

Weltanschauung, 共同世界观 4, 67

Wernham, R.B., 沃纳姆 158, 197-198, 215-216, 234, 264, 267

West, the, 西方 37, 52-53, 58, 60, 85, 146, 157, 159, 231, 302-303, 329, 333, 另见Europe, western

West Indies, 西印度, 参见Antilles

Western Hemisphere, 西半球, 参见America

Westmoreland, 威斯特摩兰 111

Westphalia, Peace of, 威斯特伐利亚 311

Wheat, 小麦 42, 44, 63, 79, 96, 99-100, 106, 109-110, 112, 114, 155, 159, 180, 200, 216-218, 227, 244, 264, 304-305, 308, 312, 322-323, 另见Cereals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辉格 283

White, Lynn, Jr., 怀特 52-53

Willan, T.S., 威兰 306, 308

Willetts, William, 威利茨 54-55

William the Conqueror, 征服者威廉 231

William (the Silent) of Nassau, prince of Orange, (奥兰治的) 威廉 209

Williams, Eric, 威廉 88

Williams, Penry, 威廉 232

Wilson, C. H., 威尔逊 25, 44, 102, 128, 156, 172, 201, 280

Wilson, Thomas, 威尔逊 184

Wine, 酒 34, 43, 74, 79, 96, 106, 109, 159, 192, 200, 218, 264, 277

Wine-grapes, 酿酒的葡萄 190

Wittenberg, 维登堡 154

Wittman, T., 魏特曼 208-209

Wolf, Eric, 沃尔夫 58, 88, 92, 188, 249

Wolfe, Martin, 沃尔夫 138

Wood, 木材 43-45, 51, 75, 79, 83, 86, 96, 180, 191, 212, 227, 239, 260, 275, 281, 306, 322, 337, 另见Forest products; Fuels; Industries,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shipbuilding; Industries, wood products; Woodlands famine, 饥荒45, 另见Deforestation

Woodlands, 林地 27, 38, 45, 193, 253, 281

Wool, 羊毛 22, 28, 45, 96, 108-109, 112, 121, 125, 150, 165, 176, 201, 218, 228-230, 244, 247-248, 250, 253, 275, 279-280

Woolf, S.J., 伍尔夫 85, 118, 216

Workers, (urban wage-), 工人 22, 26, 42, 44, 51-52, 77, 79-82, 84, 86-87, 90, 103-104, 108, 112-119, 124, 126-128, 135, 148, 154, 177, 185, 203, 208, 229, 237, 256, 279, 281, 284, 290, 352, 357, 另见Laborers, rural

organizations, 工人组织 80-81

World-economy, (European), 世界经济 (欧洲) 10, 15-17, 20, 34, 37-38, 42, 44, 46, 50, 52, 57, 60, 63, 67-69, 74-77, 81, 83-87, 91-92, 95, 97, 100-102, 104, 106-107, 110, 112, 115-116, 119, 122-124, 126-127, 129, 133, 136, 138, 140-141, 143, 147, 153, 155-157, 162, 165, 170, 173, 175, 179-181, 184, 187, 190-191, 196-197, 199-200, 210, 213-214, 218-219, 225, 228, 232, 244, 247, 256-257, 261, 264-266, 269-274, 283-284, 289-

291, 285-297, 301-306, 308, 313-315, 319, 324-325, 328, 330-333, 335-338, 343, 348-350, 353-357, 另见Capitalism; Corestates; Labor, division of; Periphery; Semiperiphery

World-empire, 世界帝国, 参见Empire, world-empire

World-government, 世界政府 348

World-system, (modern), 世界体系 7-8, 10, 15, 18, 67, 102, 115, 129, 133, 145, 149, 162, 182, 196, 201-202, 210, 260, 302, 316, 343, 347, 349, 353, 355-356

World time, 世界时间 6

World view, 世界观, 参见Weltanschauung

Wright, L.P., 莱特 160

Wüstungen, 无主荒地 25-27, 36, 39, 103, 253, 另见Agriculture, retraction of cultivated areas

X

Xiqilite, 靛青染料 100

Y

Yangtz eriver, 扬子江 55

Yeomen, 农民（约曼），参见Farmers, yeomen

York, House of, 约克家族 243

Yorkshire, 约克郡 123

Yoshimitsu, 足利义满 56

Youngs, Joyce, 尤因斯 249

Ypres, 伊普雷 325

Yuan dynasty, 元朝 61

Z

Zagorin, Perez, 札戈林 246, 282

Zangmeister brothers, 赞梅斯特 266

Zavala, Silvio, 佐瓦拉 93

Zeeland, 泽兰 204-206, 211, 280

Zeitlin, Maurice, 柴特林 47

Zeller, Gaston, 齐勒 260, 290

Zollschan, George K., 索尔斯坎 29-30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书目

-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 35.00
元
-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饥饿与公共行为》 35.00
元
- 阿玛蒂亚·森
《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 48.00元
- 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
《生活质量》 68.00
元
-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59.00
元
- 曼纽尔·卡斯特

元	《认同的力量》（第二版）	59.00
	曼纽尔·卡斯特	
元	《千年终结》	45.00
	孙伟平 选编	
元	《罗蒂文选》	53.00
	涂纪亮 编	
元	《皮尔斯文选》	49.00
	涂纪亮 编	
元	《杜威文选》	49.00
	万俊人 陈亚军 编	
元	《詹姆斯文选》	59.00
	李国山 编	
元	《刘易斯文选》	45.0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	49.00
元		
费尔南·布罗代尔		
	《地中海考古》	49.00
元		
山口重克		
	《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	35.00元
莱斯特·M.萨拉蒙等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59.00
元		
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		
	《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	49.00
元		
詹姆斯·M.布坎南/罗杰·D.康格尔顿		
	《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	39.00
元		
詹姆斯·S.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	125.00
元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	
元	《发展经济学》（第三版）	59.00
	理安·艾斯勒	
元	《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	39.00
	理安·艾斯勒	
元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49.00
	理安·艾斯勒	
元	《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	68.00
	安东尼·吉登斯	
元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39.00
	露丝·本尼迪克特	
元	《文化模式》	29.00
	涂纪亮 编	
	《莫里斯文选》	58.00

元

杜丽燕 余灵灵 编

《布里奇曼文选》

49.00

元

李真 编

《普特南文选》

69.00

元

丁东红 编

《米德文选》

68.00

元

约翰·H.杰克逊

《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

59.00

元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哲学家》

98.00

元

H.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35.00

元

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

元	《社会学之思》（第二版）	29.00
	汤姆·R.伯恩斯等	
元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	59.00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元	《理论与实践》	49.00
	马克斯·韦伯	
元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	45.00
	克里斯托弗·戴尔	
元	《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	49.00
	吉尔贝·李斯特	
元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59.00
	佩里·安德森	
元	《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59.00

尤尔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59.00
元		
何伟亚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69.00
元		
唐纳德·萨松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		
（上、下册）		
189.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98.00
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98.00
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98.00
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元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

98.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美）沃勒斯坦（Wallerstein, I.）著；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97-4929-6

I.①现... II.①沃... ②郭... III.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
IV.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068号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著者/（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者/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校者/郭方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责任编辑/赵怀英 段其刚 刘娟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曹艳浏 陈晓永

项目统筹/祝得彬 责任印制/岳阳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本卷印张/34.5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本卷字数/617千字

印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929-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1282号

定价/489.00元 (四卷本)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
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值20周年社庆之际，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其二是问题意识；其三是开放意识。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的基本理念。



《现代世界体系》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颇具影响力的多卷本著作，对全球史进行了重新阐释，将现代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确定为从16世纪到20世纪。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覆盖延长的16世纪，讲述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创立的历史。在新增的2011年版序言中，沃勒斯坦梳理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写作背景，并对“世界体系”理论迄今遭遇的主要学术批判做了系统的回应。

“这是一部非同凡响的著作。作者提出了一种理论，并用它来解释欧洲公共事件的结构和进程，以及欧洲在16世纪进行的海外扩张活动。这部著作正在产生的影响力令人艳羡。”

——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McNeill)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所涉及的并不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某个或某些学科，而是对所有这些学科的整合，因此是将所有这些领域置于一个新的认识层面上。这是一部人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著作，我们必须学习它、援引它、同它进行争辩，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总之，这是一部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著作。”

——埃里克·沃尔夫 (Eric R. Wolf)

“这部力作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并揭示出在它们似乎彼此矛盾的表象背后所隐含的意义。这是一项非常令人钦佩的成就。”

——杰特鲁德·伦泽尔 (Gertrud Lenzer)

“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伟大成就。……在解释欧洲-世界层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它所提供的解释是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最具说服力和最值得赞同的。”

——琼·瑟斯克 (Joan Thirk)



ISBN 978-7-5097-4111-5

定价：98.00元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吴必康

钟伟云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
1600~1750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杰出教授，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等数十项学术职务。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和《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吴必康

钟伟云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
1600~1750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With A New Prologu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2011 ©Immanuel Wallerste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沛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朱云汉 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汝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汪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春声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罗志田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

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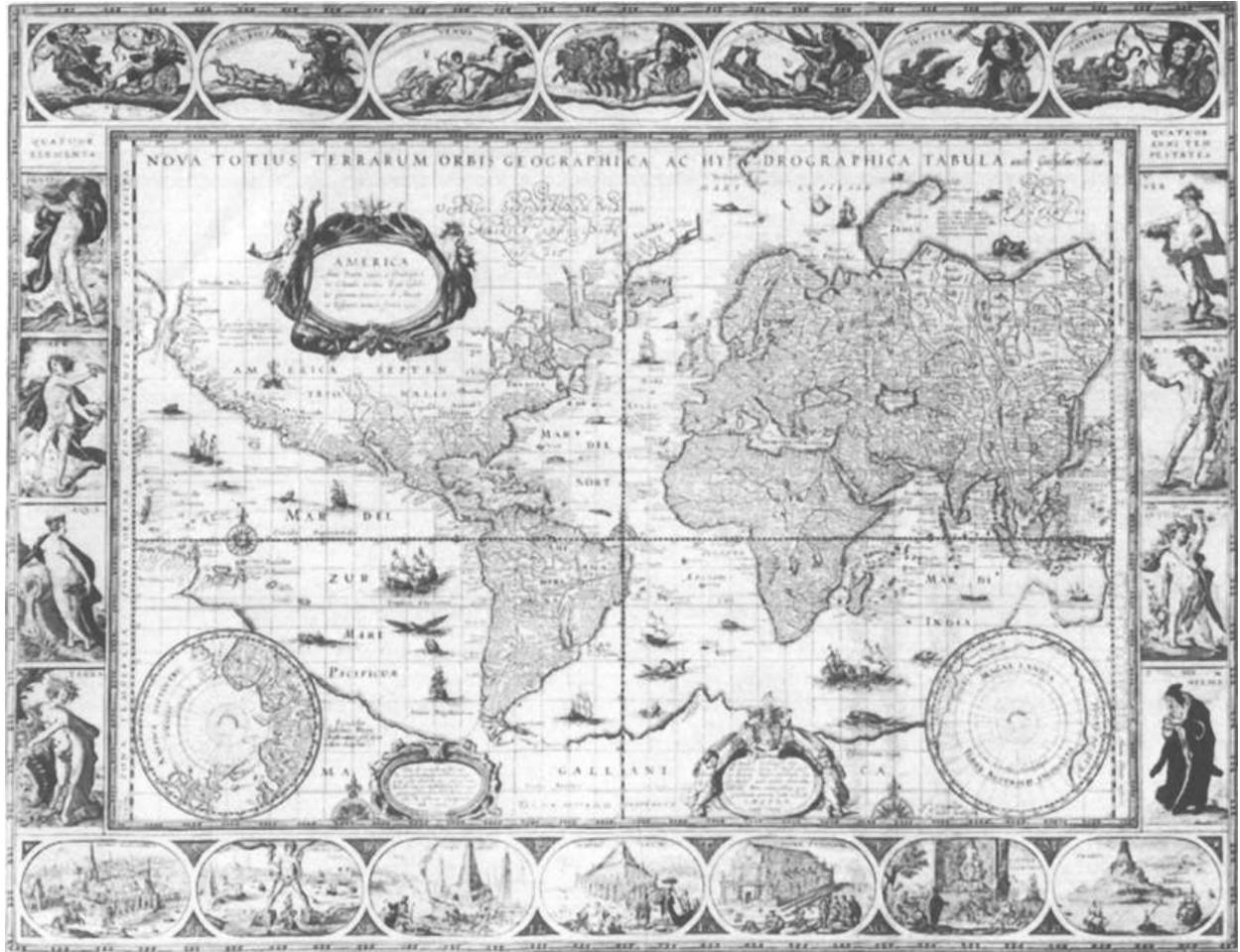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生于纽约。1954年和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58~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1976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1976年起，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1993~1995年任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1994~1998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2000年起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沃勒斯坦著述颇丰，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30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2011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4卷本。其他著作有：

《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 1983）；《世界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1984）；《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9）；《知识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2004）等。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004）；《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2006）。



卷首插图“世界地图”

布拉约（Joan Blaeu）。（1638）

芝加哥（Chicago）：艾耶尔（Edward E.Ayer）收藏品，
纽伯里（Newberry）图书馆。

“世界地图”，布拉约（Joan Blaeu）制，1638年，选自《大地图册》（Atlas Major）。布拉约和他的父亲威廉（Willam）是他们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制图家。他们的地图为所有与印度群岛（Indies）从事贸易

的荷兰船只所需要。地图册在17世纪已取代单张地图成为主要的制图形式。在1670年，布拉约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权威制图者。

2011年英文版第二卷序言^[1]

本卷探讨的问题首先是怎样描述17世纪欧洲发生的现象。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有关17世纪“危机”的大讨论过于强调这一时期的封建性质。大多数学者将这一时期解释为欧洲的“重新封建化”。本卷试图辩驳对17世纪特征的这些总结，再次重申，欧洲的世界经济在延长的16世纪就已经确定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在许多方面，这第二卷是整套书至关重要的一卷。因为，它论证了对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观点和界定的合理性。

许多读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是最难理解的部分。因此，更多地从理论方面来重新阐释这种论点，以揭示我为什么相信我们所称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封建制度本质上不同于现代早期所谓的再版封建制度，也许是有益的。

本卷提出的第二个新的和重要的论题是霸权问题。这里，同样有许多人甚至那些对世界体系分析所做的总体研究持同情态度的人，也错误理解了我们的有关霸权概念的论点。因此，更准确地重新阐释霸权概念到底意指什么，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它在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如何运转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或许同样是有益的。

欧洲在**1450~1750**年时期是一种世界经济吗？

我们提出的学术问题是，人们能否论证在1450~1750年时期存在一种欧洲的世界经济，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实际上，这又是由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构成的：欧洲（或它的某些部分）在这一时期是否

构成一种单一的经济体，它拥有单一的“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axial division of labor）；这个经济体能否被描述为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的论证是从一个前提开始，它既是概念性的又是经验性的。这个前提是指存在着被称为“趋势” [logistics，这是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所使用的术语] 的现象，它在法语文献中经常被称为“长期趋势”（trends séculaires）。它们可能是时间非常长的周期，由通胀的A阶段和通缩的B阶段构成。在欧洲经济史学家有关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欧洲文献中，这些趋势的存在似乎被广泛——但不是普遍——认为是想当然的。从经验方面看，文献中被最经常提到的阶段划分如下：^[2]

	中世纪晚期	现代早期
A 阶段	1000 (1100) -1250	1250 (1300) -1450
B 阶段	1450-1600 (1650)	1600 (1650) -1700 (1750)

我将这些趋势和它们的阶段划分视为前提性的知识。

从本质上看，我们论点的逻辑如下：在中世纪的趋势和现代早期的趋势之间存在某些基本相似的地方，这使我们能够将它们视为可以划分成A和B两个阶段的趋势。不过，对这两个时期做仔细比较能够揭示它们之间存在某些重要的本质区别。以致人们能够从这些区别中推断出，欧洲在后一时期存在着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而在前一时期不存在这种分工。

从最低标准看，一种趋势的基本模式将包括人口、经济活动和价格三个方面的扩张和收缩。我们假设它们将表现出长期稳定的上升和下降，并且这三项指标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确定这种趋势时，我们不考虑短期的波动。但就这三种现象中哪一种是决定扩张和收缩的首要因素，存在巨大争论。我认为，这种争论大体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这些现象依次又是由各种变量组成的复合体。价格并不构成

一种简单的总体系列。在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最重要的价格系列被认为是小麦的价格。不过，它并不仅仅是小麦价格在绝对量上的升降，而且包括相对于其他谷物价格的升降，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谷物价格相对于畜牧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升降。还有我们称之为租金和工资的价格。其中工资——即实际工资——价格同其他价格系列成反比关系。

经济活动概念也是由许多变量组成，诸如商业交易量、总产量、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收益率和货币存量。这些变量同社会结构的各种变量存在着紧密的相关联系，后者诸如农业经营模式、土地占有模式、城市化的程度和行会的影响力等。

有关这些趋势的最基本观点认为，在这些变量的周期性运动中存在一种非常系统的相关关系，它们中的大多数彼此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也有一些变量同大多数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一般而言，在由经济史学家提出的大多数分析中，并不存在对“政治”和“文化”变量是如何同这种分析框架建立联系的总体思考，即对它们是否存在某种系统的相关关系的总体思考。我相信，这种忽略是错误的。因为我认为，如果不考察在社会行为各领域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话，我们不可能理解整个体系是如何运转的。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1000/1100～1450年

我们提及要用“封建体系”来描述这一时期的特征。但我对“体系”一词持怀疑态度，因为封建时期的欧洲既不是一种世界经济，也不是一种世界帝国。作为一种“体系”，它至多能被描述为短命的加洛林

（Carolingian）世界帝国解体后的残余。也许最好称它为一种“文明”，意思是指它是一系列小的体系（或劳动分工），由于一种共同的宗教组织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由于共同使用拉丁语而联系在一起。

封建时期欧洲的地理格局是由无数个庄园组织构成，每个庄园都是同周围地区形成的某种小的劳动分工的中心，这些庄园分别被嵌入多样的、松散的和更大的政治组织之中。许多这些地方性区域同时也被卷入长距离的贸易网络之中。但难道能够说这些地方性区域就是某种更大的经济体、某种单一性的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吗？很少有人会如此主张。

然而，这些独立存在的区域似乎能够以同样的节奏做出反应，以致我们能够提及一种趋势的存在。几乎是在欧洲各地，人口在11和12世纪开始增加。欧洲的农业生产也开始扩张，这既是因为有更多的人从事生产、也是因为对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需求。每个地方性区域/乡村都在开垦它周边的荒地（森林、湿地、沼泽），我们能够推断出，这些地块整体上看肯定要比他们以前耕作的土地更贫瘠。这种扩张不仅发生在每个地方性区域的周边地区，而且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的边界地区：十字军东征，在伊比利亚半岛开始的收复失地运动，从穆斯林统治者手里收复地中海西部的岛屿，“德意志人”向“东方”的殖民，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北的扩张，英格兰人向西和向北占领凯尔特人的土地。

因为对谷物的需求高涨，所以种植谷物变得有利可图，由此不仅“荒地”被开垦，而且牧场也转为耕地，低产谷物的种植转为高产谷物的种植（主要是小麦，其次是黑麦）。投资土壤改良与改进技术变得有利可图，因此产出增加（尽管新开垦土地的质量在下降）。

在总体扩张和价格上涨的背景下，那些向地主支付货币地租的土地占有制度越加令地主感到不满。固定地租的提高滞后于价格的上涨。因此，地主试图缩短租期，甚至最好是将货币地租转为劳役地租（农奴制），以此来保证劳动力的供应，满足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劳动力总是能够被有利可图地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极小的生产单位也能够获得盈余，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作为谷物生产者“进入”市场。这大大增加了经

济行为者的数量，并使生产“分散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的确，实行农奴制的一个根由正是这种生产的分散化。

经济的一般性扩张也包括——而且是相关关系——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品和金属器皿制造）的扩张和它的生产集中于城市地区（减少了交易成本）。工业生产集中于城市，使势力强大的行会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总体而言，经济活动越来越专业化，地方性劳动分工也发展起来。

尽管地方性劳动分工能够为某种长距离的“奢侈品”贸易创造条件，但似乎并不存在更多的中距离范围内的劳动分工。高运输成本阻碍了它的形成。总之，地方性区域一般而言并不依赖或依靠这种“地区性”（即中距离）的供应来源。

封建文明的政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地方性政治，其中地主/领主试图用政治统治来加强他对地方的经济统治，甚至当地主是教徒时也是如此，恰如许多人的所为那样。国王、公爵和伯爵是掌握主要权力的地主/领主，他们直接拥有土地所有权，从中获取收入；其次是军事首领，他们领导着来自其效忠的贵族/其他地主提供的军队。在经济扩张时期，所有地主都会强化他们对农民的政治控制，首先是通过实施和扩大农奴制，并且通过扩大他们家臣的数量。在地主于地方上增加对直接生产者权力的同时，更高级别的统治者（国王、公爵、伯爵）的权力要比地方贵族增加的更大一些。统治者“家庭”的规模在扩大，小的官僚机构开始出现。欧洲的“对外”扩张是这些统治者的行为，这使他们依次又变得更加强大。不过，也不应夸大其辞。并不存在真正的强国，因为贵族抵制国家的控制（例如通过1215年在英格兰制定的大宪章）。但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一些“国家”。

从文化方面看，这是一个全盛时期。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同时也具有文化上的自信。欧洲的“对外”扩张导致新的文化思潮被

吸纳进来，不过它们已经很好地被主流世界观同化了。阿奎那（Aquinas）的《神学大全》（the Summa Theologica）正是这样一部集大成的著作。

人口的全面增加、工业的城市化以及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扩张，意味着城市的数量和面积增加。这使得一个小规模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第一批大学也被创建起来。

大约在1250~1300年，扩张结束，一个长时期的萧条开始。从根本上看，现在一直在增长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下降。“向外开拓”的边疆被别的国家收复。对外征服的十字军战士被驱逐，拜占庭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摩尔人收复格拉纳达（至少是暂时地），蒙古人从亚洲大草原入侵欧洲。

人口下降，最明显的是由于黑死病的流行。不是将新的土地投入耕作，而是将已经耕作的一些土地抛荒，同样是这些土地在两个世纪之前还在使用。耕地面积之所以减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口减少（疫病、饥荒、地方性战争），部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有则是因为地主对土地的圈占和集中经营。

价格上涨的趋势被逆转。租金下降。小麦价格下降。土地利用从谷物生产转向了畜牧生产或葡萄种植（取决于当地的气候），这既是因为谷物需求量下降，也是因为谷物生产需要较多的劳动力。“高贵”的谷物生产让位于“比较低贱”的作物的生产；后者对技术和土壤肥力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因此产出也低。

领主租金减少的压力由于人口的减少进一步复杂化，后者增加了直接生产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作为结果，农奴制走向衰落，最终完全消亡。另一方面，地主试图通过占用和圈占更多的土地来补偿他们收入的下降。这导致了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新集中。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致

使地主的经济地位受到削弱，他们拥有的劳动力规模太小。但富裕农场主阶层的力量却得到加强，他们家族的成员众多，并且已经连续几代占有他们耕种的土地。资本也从投资于土地转移到其他领域。

当然，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在下降。实际工资增加。在寻求减少生产成本的过程中，工业生产倾向于转移到农村地区，主要是为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尤其是因为交易数量在不断下降，所以将交易成本保持在低水平被置于优先地位）。

从政治方面看，结果是地主/领主在地方上对直接生产者的权威在下降。统治者的权威也同样地在下降。“国家”开始分裂，统治者失去了对地主/贵族的控制。作为“领主收入危机”的结果，同此前向边界以外地区的暴力入侵相反，“欧洲”内部的暴力斗争大大增加。爆发了许多农民的反抗斗争，他们利用了政治权威下降的机会。为了寻求增加收入，统治者和贵族之间彼此进行着更广泛和更激烈的斗争。上层阶级这种彼此之间的流血斗争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同直接生产者斗争时的力量。

从文化上看，这是一个质疑权威、反抗传统、动荡混乱的时代。教皇的中央权威被削弱。许多新的基督教运动——强调平等主义和准异端的运动——传播开来。居“中心”地位的文化无法维持其地位。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独立。

通过对这种总体趋势的概括，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它的对称性。各种经济变量先是上升，然后下降。社会结构首先沿着一个方向发生变化，而后沿着相反的方向变化。政治的等级结构（地主高于直接生产者，统治者高于一般贵族）先是变得越来越强，而后变得越来越弱。居中心地位的文化先是巩固了自身的地位，而后受到广泛质疑。此外，这种对称性不仅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封建文明，而且适用于各个地方性区域。从整体上看，“欧洲”的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好像每个地方性区域都在复制一种普遍模式似的。封建时代的欧洲似乎

成为了涂尔干所描述的机械团结的典型。

现代早期的欧洲：1450～1750年

现代早期的欧洲在演进趋势上发生的根本变化在于，其变化模式失去了很多对称性，既包括在A阶段和B阶段之间的对称性、也包括在不同地理区域上的对称性。尽管同样是在扩张之后伴随着收缩，但每个阶段的变化模式变得更为复杂。在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同样存在着相关关系，但这里的模式也更为复杂。说模式更为复杂不是说不可能予以分辨，而是要理解它，就必须引入空间模式分析或中心区-边缘区这对矛盾。

进一步而言，在B阶段的性质上存在着某种差别。在中世纪的变化趋势中，B阶段的标志性特征是人口、经济活动和价格的下降；而在现代早期，正如从整个欧洲来衡量一样，B阶段并不是一种下降，而是一种停滞或在增长率上的放缓。这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能够看得非常清楚。1450～1600年，人口变化曲线是大幅度上升，而到了1600～1750年，曲线变得平坦起来。并不存在类似黑死病的疫病爆发。再进一步讲，存在地理区域上的多样性变化。在西北欧，人口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下降，但在中欧有下降的趋势（主要是30年战争的结果），在东欧和南欧则是一种平坦的曲线。

在土地的利用上同样存在拓展趋势，这不仅表现在欧洲的内部，而且在对外部边疆的开拓上也是如此。A阶段是大探险的时期，在这个阶段美洲的部分地区被纳入到欧洲的生产版图。作为对照，B阶段标志着将更多的地区纳入欧洲版图的进程放缓，但不是丧失已占的领土。

如果我们考察土地利用模式的话，确实在A阶段同样有土地向耕地的转化，在B阶段则是耕地转为其他用途。但从细节看，在现代早期所发生的非常不同于在中世纪晚期的情况。在土地利用模式的转变上，西

北欧转向一种农耕/畜牧生产相互补充的模式（在A阶段，是农耕和畜牧的轮作，在B阶段，甚至是更集约地实施轮作）。从整个欧洲看，中心区这种由轮作带来的产品缺口可以由在边缘区维持农耕生产或畜牧养殖的专业化，并由它们将相关产品广泛出口到西北欧的中心城市来补偿。因此，这包括在各个地区创立较大的生产单位——在西北欧是通过更广泛地圈地和/或重新确立“封建”权力来重建大的生产单位，在边缘区则是建立庄园和种植园。

一方面，欧洲各地商品价格的差别在大幅度减小。在中世纪晚期，至少有三个价格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在1500~1800年之间，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别从6:1降到了2:1。但另一方面，在欧洲的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商业交往，这些交往是由在劳动力价格上存在的显著差异造成的。因此，尽管商品价格差别在缩小，但财富上的差异开始增加。正如在中世纪那样，A阶段是一个专业化程度不断增长的时期，而B阶段则是专业化程度下降的时期，但能够对这种变化程度做出衡量的单位已经发生变化。在中世纪晚期，我们谈论的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理区域内实现的专业化；而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我们谈论的则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区域内实现的专业化。

类似的情况也在工业中发生。A阶段是工业生产集中在城市中进行的时期，而B阶段则是工业生产更多地在农村中进行的时期〔即被描述为“原工业化时期”（proto-industrialization）〕。在中世纪晚期，工业确实存在某种程度向原来的中心地区集中的趋势，但相比现代早期欧洲工业集中于西北欧的程度要小得多。进一步而言，在现代早期的B阶段，由于在边缘区重新出现了工业生产在农村进行的趋势，专业化程度有所下降，但这主要是在附加值最低的纺织品的生产上。而那些利润较高、附加值较高的纺织品生产，却仍然主要在中心区进行。

这种地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模式同样也在对劳动力控制的模式中出

现。中世纪晚期的发展趋势是几乎在各地，A阶段基本都是实行农奴制，B阶段则是这种制度的瓦解；而现代早期的发展趋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地理区域上的多样性。在拥有更专业化农业生产的中心区，并没有向农奴制的倒退，而是转向一种由地主、租佃农场主和作为转租租户的直接生产者“三者组合”的模式。随着自耕农的“消失”，这种情况在B阶段甚至变得更为突出。绝大多数农业生产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

在边缘区，拥有大量被迫种植商品作物的劳动力的大规模生产单位出现——在东欧是在庄园中劳动的农奴；在泛加勒比海地区是在种植园劳动的奴隶、一度曾是契约劳工；在美国的矿场一直是强迫土著人劳动的模式。这种生产很大部分是为市场进行的——在A阶段是销售到中心区；在B阶段，当中心区市场对它们“关闭”时，是销售到“本地”市场。这些生产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当边缘区大庄园的赢利率在B阶段下降时，庄园所有者通过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来补偿损失。应该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对劳动力的压力是在不断增加的，劳动时间从中世纪的“日出到正午”模式转变为现代早期的“全日制”模式，而在边缘区的B阶段劳动时间事实上是被进一步延长的。

进一步而言，当专业化从地区内部层面转向欧洲层面时，就有可能产生两类以上的地区。事实上，第三类地区——半边缘区——已经出现，它有自身独特的模式——盛行分成制，在世界经济的贸易模式中发挥一种中间区的作用，将中心区和边缘区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从长期看）国家结构和工资水平都处于中心区和边缘区模式的中间位置。

在经济格局上，现代早期的发展趋势同中世纪相比还有最后一个重大区别。布罗代尔所说的、由国家支持的、在多个部门实施垄断的企业——活动范围跨越了政治边界——作为主要的经济运行组织在现代早期

出现，成为进行资本积累的主要机构。

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非常不同于封建文明的政治。国家成为政治组织的主要单位，而不是由一个庄园作为它的中心的地方单位。国家开始采取其现代形式。首要的问题是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既包括民事的，也包括军事的，以使统治者不再主要依赖其个人持有的土地获得收入，而是代之以依赖税收。作为从一种统治者的家庭实施统治的封建制度向那种韦伯所描述的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度转变的组成部分，现代早期欧洲的各个国家发明一种中间人制度。其中，官僚部分独立于企业家，“分享”国家的收入。这些就是官员的贪污和包税制度。作为过渡机制，它们被证明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这些国家被置于一种新的制度——国家间体系——之中，而且受它的制约。国家间体系是从16世纪开始悄然存在的，只是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而在1648年被正式承认。在理论上，所有在体系内的国家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的和平等的。但事实上，存在一种国家权力的等级制，它往往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着相关关系。国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与一种国家间体系的形成相结合，大大改变了在发展趋势中每个阶段对权力分配的影响。

在中世纪的发展趋势中，在A阶段，领主对直接生产者的权力和统治者对贵族的权力是增加的，而在B阶段则是下降的。在现代早期的发展趋势中，在中心区（实行绝对君主制）统治者对贵族的权力是增加的，但在边缘区这种权力是在不断下降的（例如波兰议会的权力获得了巨大增加），而在半边缘区国家的情势则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就领主和依附农的关系而言，情况稍微有些不同。尽管在边缘区领主的权力明显是增加的，尤其是在B阶段；但在中心区，权力差别不是那么大，统治者试图获得对臣民的直接政治控制权，以及获得他们所缴纳款项的更大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努力削弱领主对直接生产者的政

治权力。在A阶段这是一个稳定推进的过程，但在B阶段它的推进速度放缓。尽管如此，人们也许可以论证，就一般而言，领主/依附农的关系是在沿着领主权不断减少的方向演进的，这个过程直到19世纪才最终完成，那时全体公民都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地方权贵居间控制。不过，这并不适用于边缘区，甚至直到今天也不适用。

另一种政治差别也应该予以关注。很明显，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带来的是资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加。同样的，这在整个欧洲的世界经济中绝非是均衡分布的。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集中于中心区，在边缘区则实际上几乎被清除殆尽（至少是对本地产生的资产阶级而言）。进一步而言，作为结果，每个地区的国家政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最后，简单地说，在文化领域，同样的空间差别应该予以关注。尽管封建时代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文化的同质性（至少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实体——教会——来看是如此）；但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却产生了主要宗教教派的对立，在这个时期它同基本的经济对立存在高度的——尽管不是完全的——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似乎并非偶然。

现代早期的发展趋势确实是重复着同样过程。当然，存在着体系的某种发展过程——空间上的扩展和将新的地区纳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反复发生的去垄断化过程和发现新技术并以此作为确立新垄断的基础，城市化、无产阶级化和政治上吸纳新的统治阶级成员的稳定推进，这些似乎改变了它们的形态，但事实上并未改变基本的、在空间上的非对称性，即未改变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

因此，在两种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匀称和不匀称；本地多样性的劳动分工和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劳动分工；上升到下降的A/B阶段和断断续续增长的（或齿轮似推进的）A/B阶段。这就是涂尔干所讲的机械式团结和有机团结之间的区别。的确，主要的争论涉及从

延长的16世纪开始时欧洲内部（接着是在地理范围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相对较小的差别到20世纪形成非常悬殊的差别，其变化程度到底有多大。一些人论证，这只是部分地真实，量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这种观点似乎很难被坚持。不过，另一些人论证，它只是在19世纪，或甚至只是在20世纪才是真实的。当然，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论断，因为极化程度一直是在稳定地增加。但将某种结构存在的时间只确定为从它最完全成熟的阶段开始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从此它将开始走下坡路。在存在的初期，它就有权要求人们承认其存在。

世界经济中的霸权概念

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个重要观念是，认为在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和世界帝国。世界帝国被界定为一种结构，它有一种单一的整体性的政治结构和单一的整体性的劳动分工。汉朝时期的中国和罗马帝国是世界帝国的两个好例子。霸权概念则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国家间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特征。

一个霸权国家非常不同于一个世界帝国。一种世界经济的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个拥有官僚机构的帝国，而是一个由所谓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间体系。一个霸权国家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强国，甚至并不简单地是国家间体系中最强大的那个国家，而是那个明显比其他强国（这里是强，而不是弱）更强的国家。这描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但绝非是连续发生的情势。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些时期，此时在世界经济的国家间体系中存在一个霸权国家；同时也存在另外一些时期，那时并不存在霸权国家，而是多个强国处于一种“力量平衡”状态。

说存在一个霸权国家，意思是指什么呢？它意指，一个国家能够将它的一揽子规则强加给国家间体系，并由此以它认为的明智方式创建一种世界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势下，霸权国家会给予属于它的或受它保护的企业以某种特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由“市场”赋予的，而是通过政

治压力获得的。

我认为，将霸权不是视为一种结构，而是视为一种时间上的过程是有益的。进一步讲，我认为它并非是只有两个发展阶段（兴起和衰落）的过程，而是类似于熊彼特所描述的康德拉基耶夫周期，有四个发展阶段。如果人们从存在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国家开始描述，那么，第一阶段发生于刚起步的时期。这是已有的霸权国家缓慢走向衰落的阶段，这段时间会出现两个强国竞争霸权地位。在此之后的阶段，是前霸权国家走向衰落的最终时段。我将这第二个阶段视为在世界体系中存在某种“力量平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两个竞争霸权的国家展开斗争，以攫取在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第三个阶段，争霸斗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致现有的秩序被破坏，在霸权竞争者之间展开一场“三十年战争”。第四个阶段是最终一个竞争者赢得胜利，由此能够确立它的一种真正霸权，自然将延续到这个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开始缓慢衰落。

迄今为止，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史中已存在过三个霸权国家。荷兰共和国是17世纪中期——短暂地从1648年到17世纪60年代——的霸权国家。英国是在19世纪的一个稍微比较长的时间——从1815年~1848年，也许时间更长一些——的霸权国家。美国是在20世纪中期——从1945年到1967/1973年——的霸权国家。

在荷兰的霸权衰落后，两个竞争霸权的国家是英格兰和法国。在英国的霸权衰落后，两个竞争霸权的强国是美国和德国。在美国的霸权衰落后，两个竞争霸权的强国是新兴的东北亚国家组织（日本-韩国-中国）和仍只是部分得到稳定发展的欧盟。

霸权国家缓慢但必然的衰落

霸权国家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它们不可能永远维持其对世界地缘政治权力的准垄断地位。它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最终会破坏

它们的经济优势。同时，在追求维持其政治-军事权力时，最终也会破坏它们的政治-军事权力。

霸权国家在与其盟国关系上的模糊性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霸权国家试图限制其盟国的经济实力，以维持自身的“特殊”优势。另一方面，霸权国家需要市场，它也需要盟国足够强大，以帮助它迫使经济“敌人”别无选择。所有这些要求都必然导致盟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他强国相比，霸权国家在生产率上的优势地位将消失或至少是大大减弱。

因此，霸权必然会损害自身的地位，首先是在经济方面——这种衰落直接是由盟国经济实力增强引致的。在这个时期，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必须利用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策略来维持其在经济上的特殊优势。它最初能够这样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当“敌人”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具威胁的时候。特殊优势地位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霸权国家必须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是正确的。这种强调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确性的做法不仅是它衰落的证据，而且会对它的吸引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进一步讲，作为维持它确立的世界秩序的努力，霸权国家开始更多地投资于军事。它发现，它不时地需要实际利用其军事力量。使用军队是代价高昂的，会使资金从经济投资领域转移出去。

确实，在这一时期，霸权国家仍然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但在真正的霸权时期，它很少需要利用军事力量，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它具有军事优势，而且是压倒性的。在衰落时期，它开始需要利用它。然而即使它赢得了军事斗争，但利用军事力量本身就损害了它的长期有效性，意味着其他国家敢于从军事上挑战霸权国家。一个国家敢于这样做，就会导致另一个国家也敢于这样做。

均势状态

当两个竞争霸权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和越来越自信时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存在某些模式。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例子中，一个竞争国家主要是以陆地为基础，而另一个国家主要以海洋为基础（或在今天以海/空为基础）。在头两个霸权周期中，以陆地为基础的强国试图通过将世界经济变为世界帝国来获得统治地位。拿破仑试图征服整个欧洲，希特勒试图征服全世界。而作为回应，以海洋为基础的强国并不试图变为一个帝国，而是要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为此，以海洋为基础的强国要建立大的联盟，首先是同以前的霸权国家结盟——英格兰同联省共和国，美国同英国。依此类推，我们也许期望，假定的东北亚国家组织也许会寻求同美国结盟。在过去的两个例子中，失去霸权地位的国家都变成新崛起的海洋（或海/空）强国的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

新崛起的以海洋为基础的强国开始往往并不拥有强大的陆军，只是在稍后的阶段才建设。在早期阶段，不拥有这样的陆军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它节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被投资于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使它能够在关键的竞争中，而成为在为世界市场生产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在以前的两个例子中，生产上的优势导致商业上的优势，后者又顺次导致在金融上的优势。正是在新崛起的强国拥有所有这三方面优势的时间段上，同真正的霸权阶段相对应。荷兰霸权的这种发展序列将在本卷予以讨论。正如对荷兰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英国的情况那样，同样真实的是衰落也在重复同样的变化过程——处于衰落中的霸权国家首先丧失在生产方面的优势，接着丧失在商业方面的优势，但能最长时间地保持在金融方面的优势。

衰落的过程对霸权国家而言并不是灾难性的。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仍然是最强的国家，能够获得作为霸权国家所能获得的所有声望。一般而言，它仍然是非常富裕的国家，即使相比从前已不那么富裕。在其国民财富中仍然有很多盈余，这使它的居民能够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衰落最初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间有试图对其他国家，也对自己否认其衰落的各种努力。但衰落终究会到来。

这个衰落的时期并不是以前霸权国家的实力被大大削弱的时期。恰恰相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看均是如此（但在经济方面不再如此），但它已不再是霸权国家。即它开始从霸权的“特殊”优势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少。这个缓慢但稳定的衰落时期可以被视为一种世界秩序——以前的秩序——缓慢但稳定地瓦解的时期。

正是在这个“均势”时期，衰落中的霸权国家开始投资于新崛起的强国的经济活动，而后者是作为一个次要的盟友同它结盟的。由此，它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在金融领域中的优势，并为它的剩余资本找到一个收益好的投资渠道。

世界体系中的无序状态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以前的霸权国家已经表现出无力维系已有的秩序。两个竞争霸权的强国变得越来越活跃，他们试图通过建立适当的地缘政治联盟，以及通过创建新的领先产品的生产基地（在此基础上他们能够创建强大的具有垄断地位的生产部门），以确保其优势地位。对两个竞争者而言，“均势”似乎开始变得无法接受。由此，秩序最终被瓦解。

“三十年战争”

最终就是秩序完全丧失的阶段、“世界大战”阶段，或如我愿意称之为的“三十年战争”阶段。最初的三十年战争是从1618年到1648年，从中

产生了作为霸权国家的联省共和国。第二次是1782年到1815年的革命/拿破仑战争时期，从中产生了作为霸权国家的英国。第三次是1914年到1945年时期，从中产生了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

在这三场“三十年战争”中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模式。每场战争都将那时世界经济相对发展好的地区卷入战争状态，都对这些地区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生命造成巨大破坏。不过，这些“世界大战”不是连续发生的，它们是间歇地进行的。

每场“三十年战争”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是模糊的。荷兰同天主教国家结成联盟。英国同欧洲的大多数专制国家结成联盟。美国同苏联结成联盟。在每场“三十年战争”期间，所看重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是为击败其他竞争者。在每个史例中，最终的霸权国家都会在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一支强大的陆军，到战争结束时，这支战胜竞争对手的陆军已经变成赢得军事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在每个例子中，以前的竞争者最终被打败，失去了它的竞争力（至少暂时地），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当然也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

最后，在每个例子中，赢得霸权地位的胜利者大体能够在战争期间免遭物质上的破坏。免遭战争破坏和在战时发展经济基础设施，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大战结束时，霸权国家已经拥有相对于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它能够比所有其他国家的生产者——不仅包括边缘区的生产者，而且包括以前的或未来的中心区的生产者——最有效地生产出那个时代最能赢利的产品。

真正的霸权

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真正霸权的开始，这是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或第一个阶段。对战争的厌倦、对秩序解体的厌倦、对政治动荡的厌倦，世界欢迎或似乎欢迎当前霸权国家的“领导”。霸权国家提供一种对

世界的设计。荷兰提供的是宗教宽容 [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 (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尊重国家主权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和开放海洋 (mare liberum)。英国提供的设计包括在欧洲建立以立宪议会制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家、赋予“危险阶级”以政治权利、金本位制度和结束奴隶制。美国提供的是多党选举制度、人权、(温和的) 非殖民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这些设计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并不必然付诸实施。正如1663年乔治·唐宁爵士 (Sir George Downing) 在谈及荷兰的设计时所指出的：“英国的海是开放之海，而非洲和东印度的海岸 (即荷兰占有优势的地方) 则是封闭之海”。^[3]霸权国家从来就不允许意识形态干预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尽管如此，但这些设计构成了霸权国家宣称它的霸权地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这种设计无疑在它能够维持世界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真正的霸权时期，霸权国家既建构了一个反对它对世界设计的“敌人”，又建构了一个同盟网络，对它而言，这具有根本重要性。与其说建构一个同盟网络是为了同敌人做斗争，不如说建构一个敌人是为了控制盟国。霸权国家试图确保盟国的直接经济利益屈从于霸权国家的经济利益，由此创造出一些“额外”的好处，那也是霸权国家追求的目标和回报。

荷兰同英格兰建立了新教联盟以反对法国。英国在1815年以后时期同法国达成友好谅解，以反对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个专制国家。美国创建北约 (与《日美安保条约》) 以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在每个例子中，盟国在经济上都受到联盟的制约，至少是直到霸权国家的衰落时期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到那时仍受到制约)。

霸权国家提供的领导不仅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是在文化方面的，不仅是在艺术方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结构方面的。这适用于荷兰，它在很长时期中为那些被自己国家驱逐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聚集

地。英国，接着是美国，是如何塑造某种知识结构的，将在第四卷中用更多的篇幅去讨论。这种对文化领域的控制，以及对金融领域的控制，是霸权优势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它最终也会失去这种控制。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运转中，霸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霸权周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决定性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霸权国家的兴起和衰落阻止了世界经济转变为世界帝国——后者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是定期出现的。霸权机制使现代世界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经济，它产生、繁荣和扩张，并将整个地球包括在内。没有这种机制，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并由此改造着整个世界。

[1] 2011年英文版序言等由吴英翻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 此表疑有误，似需改为

	A 阶段	B 阶段
中世纪晚期	1000 (1100) -1250	1250 (1300) -1450
现代早期	1450-1600 (1650)	1600 (1650) -1700 (1750)

[3] Cited in Pieter Geyl, *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ol.2, 1648-1715 (London: Ernest Benn, 1964), 85.

- [谢辞](#)
- [导言 有17世纪危机吗？](#)
- [第一章 B阶段](#)
- [第二章 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
- [第三章 中心地区中的斗争——第一阶段：1651~1689年](#)
- [第四章 缓慢增长时代中的边缘地带](#)
- [第五章 十字路口上的半边缘地区](#)
- [第六章 中心地区中的斗争——第二阶段：1689~1763年](#)
- [参考文献](#)
- [索引](#)

谢辞

下列人读了草稿的一章或几章，并给予我有益的详细评论和（或者）异议。安德森（Perry Anderson），阿斯特罗姆（Sven-Erik Åström），布斯奎特（Nicole Bousquet），布鲁奇（Stuart Bruchey），马达莱那（Aldo de Maddalena），皮涅多（Fernández de Pinedo），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戈德弗兰克（Walter Goldfrank），霍普金斯（Terence K. Hop-kins），凯伦本茨（Hermann Kellenbenz），科斯曼（E.H. Kossmann），库拉（Witold Kula）（和同事），梅迪克（Hans Medick），奥登（Birgitta Odén）和威尔逊（C.H. Wilson）。我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

下列几章的先前文稿曾在其他地方发表：序言和第一章，以法语发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年鉴》（*Annales E.S.C.*）（1979）；第二章，在艾马尔（Maunce Aymard）编辑的《荷兰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Capitalisme hollandais et capitalisme mondiale*）（1980）；第四章部分，在《加勒比地区国际关系年鉴》（*Caribbe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78）。

导言 有**17**世纪危机吗？



导言插图 “阿姆斯特丹的老交易所”

约布博克海德（Adriaensz Job Berckheyde）。（17世纪晚期）

法兰克福（Frankfurt）：艺术研究院大厅（Stadelsches Kanstinstitut）。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老交易所，”博克海德（Adriaensz Job Berckheyde）作，他是一位来自哈莱姆（Haarlem）的艺术家。这种情景在1747年由波尔尼茨（Charles Louis Pollnitz）描绘说：

我在看这个广场，在那里商人为他们的贸易事务从中午聚集到一点半。这个广场比它的宽度要长，被一个大的敞开的回廊或走廊围绕着，由石柱加以支撑，它在有雨时可作为遮蔽。这个地方被称为“交易所”，在那里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商人，他们的服饰和语言的多样如这个地方的美丽那样使人欢娱。总而言之，没有比目睹那些被称为经纪人的那些人忙忙碌碌更有趣了。他们是被大商人雇佣来买卖交易汇票或是整理他们的其他事务，看到他们在这个广场从一头到另一头来回奔跑，人们会认为他们是疯子。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学家们有关欧洲价格的著作，^[1]其倾向与当时流行的经济循环理论（倾向于认为大约经250年有一个起落）相一致，这种循环理论由西米安（François Simiand）详述其分为两个阶段（A和B），^[2]这流传给我们对早期现代欧洲史一个总括，至今看来仍为多数人所接受：即在16世纪有一个扩张（阶段A），而17世纪有一个收缩、萧条或“危机”（阶段B），划定这些阶段的年代，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即使我们只将讨论限于经济事务）的性质，各地区的不同，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涨落的后果与原因，是众多辩论的论题；但这个总括一直未变。

在1953年，莫斯尼尔（Roland Mousnier）写了一大部有关这两个世纪的著作（此后有了四次修订版），他在论17世纪这一部分（将其范围定为1598到1715年这个时期）时，以一种戏剧性的颤抖语调开头：

17世纪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全部、他所有的活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还有所有有关他生存的一切，在他的生命力、感觉和意志的最深层次上。这场危机可以说是持续性的，但是有着剧烈的上升与下降。^[3]

在写了这些一年之后，霍布斯鲍姆（F.J.Hobsbawm）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发动了一场重要的学术辩论。论题是“欧洲经济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总危机’，这是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总过渡的最后阶段。”^[4]

同样的论题在艾贝尔（Wilhelm Abel）和范巴特（B.H.Slicher van Bath）论欧洲农业的主要调查研究中看到，艾贝尔说：“欧洲价格的主导趋势，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是下降。”^[5]确实，范·巴特在使用危机（**crisis**）这个词时是迟疑的，他确认1650年到1750年间这个时期“更确切地是一场非常漫长的萧条”；^[6]但这么说有很大差别吗？无论如何，他没有不同意艾贝尔的断言，即这个时期代表一种“总趋势的逆转”。^[7]如果我们使用更为谨慎的语言，还能进一步扩大这种学术上的一致。维拉尔（Pierre M.Vilar）谈到“17世纪相对的倒退（*recul*）”，^[8]而肖努（Pierre Chaunu）断言阶段A和B之间的不同不是“增长〔相对于〕衰退（*décroissance*）”而是“增长〔相对于〕较少的增长”。^[9]博利尔（René Baehrel）是最不愿意不管为什么就将其看作危机的，他甚至他也接受了在1690年到1730年这段非常有限的时期危机的概念。^[10]由于用语变得越来越淡薄和时期定得越来越短，我们可能想看看到底还留下多少余地。舍费尔（Ivo Schöffler）在他论这个时期的文章中，是以一种怀疑的语调开头的。

有时看来17世纪似乎是插在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没有它自己的特色。一边是文艺复兴（*Renascence*）和宗教改革，另

一边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Revolution），而对于这个夹在中间的世纪，我们只留下诸如“过渡”和“变化”这类模糊的术语。^[11]

可能这只是因为，如穆夫里（Jean Meuvret）在1944年论述的，对于价格明显上升的两个高潮之间的这个时期，“我们了解得要少得多。”^[12]那么我们就应当拒绝找出这个时期的特征，让它沉没在模糊有时是混乱的资料的错综复杂之中吗？或者我们应当如舍费尔（Schöffner）说的那样：“可能是囿于传统而不是由于我们更好的判断，但我们只不过是必须给予17世纪一个它自己的地位。我们的想象力需要它。”^[13]

如果在专有名词的小题大做的后面没有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将这种决定看作文字风格上的奇想。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否有像经济的“长期趋势”这样的东西存在，^[14]而如果有，它们与政治和文化是如何相关联的。如果存在长期趋向，是否如英贝尔特（Gaston Imbert）论证的那样，每一对相连的阶段（从中世纪到现在）反映着一种不同的经济？^[15]或是否如巴特（Slicher van Bath）所论证的，它们都属于从约1150年直到1850年这一个“间接农业消费”长时期的一部分？^[16]或者是在其中某个地方有关键性的断裂？如果有关键性的断裂，我们就面对又一个问题，即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对于这最后一个问题有几种熟悉的见解。一个是根本的突变，重要的断裂是随18世纪末工业革命发生的。对奇波拉（Carlo Cipolla）而言，这个“事件”和公元前八千年代的农业革命都代表了“历史进程连续性中深刻的断裂”。^[17]科尔曼（D.C.Coleman）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说在欧洲从1500到1750年的经济发展中，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变化：“透彻地观察一下，1500~1750年的技术整体上显示出的更多是停滞而不是进步。”^[18]类似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个学派得出了同

样的结论，来看待任何断裂的分期，如巴利巴尔（Balibar）所坚信的，1500年到1750年这段时期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1750年之后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时期。^[19]以与巴利巴尔相同的精神，克拉克（G.N.Clark）将晚期中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与19世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这第一个阶段的界限被清楚地标明为“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柏克（Sir Edmund Burke），从哥伦布（Columbus）到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从福格家族（Fuggers）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衰落，从乔托（Giotto）到泰波罗（Tiepolo）。它止于离亚当·斯密（Adam Smith），瓦特（James Watt），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拿破仑（Napoleon），欧文（Robert Owen）不远的地方。”^[20]

对于另一个思想流派，这种断裂不涉及工业革命，而涉及欧洲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创建和资本主义的出现——或多或少发生在漫长的16世纪。例如西米安（Simiand）将16世纪看做是长期浪潮时期的开端。^[21]斯威奇（Paul Sweezy）抨击以巴利巴尔（Balibar）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真正的制造业时期”（从约1500到1750年）和“现代工业时期”不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而是资本主义的两个阶段。”^[22]因此这个断裂来自16世纪。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实质上持有同样观点，虽然他将这个时期扩展得更广：

事实上很清楚，从经济观点看，13世纪到17世纪或多或少构成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它对一种经济上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进行了有力的挑战（*Meten cause*）。^[23]

第三个群体提供的断裂点，在以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一方，和以漫长的16世纪为标志的另一方的时期之间。他们建议以17世纪中作为现代的转折点。霍布斯鲍姆（Hobsbawn）看来属于这个阵营，而肖努（Pierre Chaunu）在其称为“古典欧洲”的综合论题中实质上也持

有这种观点。在他这本书的引言中，他特别反对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他们没能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知识分子起源”可以在斯宾诺莎（Spinoza）那里发现，并忘记了16世纪的“数量和空间上的扩张”不是真正深刻的变化，而只是“12世纪开始的一场革命的最终结果”。肖努认为“最重要的质的变化发生在17世纪。”它们之中首先是“世界的数学化”。^[24]作为人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者在每个问题上都有站在每一方者的证据，这第三种可能的断裂点的一个提倡者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祖科夫（E.M.Zhukov），他在1960年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世界历史学家大会上断言：

中世纪时代的传统上和空间上的界限，苏联历史科学的观点是在17世纪中期。这是因为封建主义在那时开始在经济上失去活力，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25]

于是这一个断裂有了三个年代：1500年、1650年和1800年左右；三个（或者更多）历史理论：1800年强调工业化是关键的变化；1650年强调的或者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列颠和尼德兰）出现的时间，或者是认为关键的“现代”思想，即笛卡尔（Descartes）、莱布尼茨（Leibnitz）、斯宾诺莎、牛顿（Newton）和洛克（Locke）的出现；1500年强调的是区别于其他形成经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创建。随之就是要回答人们提出的疑问，“有17世纪危机吗？”，这是个人们对于现代世界有关前提密切相关的问题。危机这个名词不应当贬值为循环变化（cyclical shift）的简单同义语。它应当保留给有着戏剧性压力的时代，它不只是一个连接点，而应当是表示出长时段（*Longue durée*）结构中的一个转折点。

因而危机应当表现的是那些非常的历史时刻，在其中一个社会体系内的补偿机制，在如此众多重要的社会行为者的观点看来是确实过于无效，重大的经济重构就开始出现了（而不只是在这个体系内利益的重新

分配），这从后来的角度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一个公认的危机不是确实不可避免的，但另一种选择是旧体系的崩溃，以致使得许多（大多数？）社会行为者认为这要比发生的一场结构革命造成更大的伤害和无法接受。如果这是我们所认为的危机含义，那么“有17世纪危机吗？”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知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实际意味着：世界历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的？这个回答需要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体系、一种生产模式，并确实也是一种文明。当我们选择我们所定的年代时，我们就要选择我所评判类似与不同的标准。

这种工作的论证是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它起源于漫长的16世纪的欧洲，包括一种特有的再分配或纳贡式生产形式的转变，就是从封建的欧洲 [布罗代尔 (Braudel) 的“经济旧政体” (ancien régime)] 转变为在本质上不同的社会体系。从那个时候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着 (a) 在地理上扩张到覆盖全球；(b) 表现出一种扩张和收缩的循环模式 [西米安 (Simiand) 的阶段A和B]，还有经济角色的地理位置的转换 (霸权的兴起和衰落，特定中心地区、边缘和半边缘地带的起落变动)，和 (c) 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包括技术进步、工业化、无产阶级化，和对这个体系本身有组织的政治抵抗——一个今天仍在进行的转变。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17世纪可以看作从大约1600年到1750年这一个时期，首先是扩张和收缩循环模式的一个例证。从世界体系的整个地理范围而言，大约在1500年创立的疆界直到1750年后没有重大的改变。对于正在进行的长期变化过程，在从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观察不到显著的质的飞跃。因此我们要论证，对于漫长的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本质上的连续性而言，有着一个大的不同，即扩张 (A) 和收缩 (B)，增长和较少的增长。对于这种总括实际情况的方式，我们应当如何提供证据呢？以一个标准而言这个回答是十分简单的。我们会试图表明扩张

和收缩在经验资料上的不同，证明这种循环模式为什么发生，以阶级形式、政治斗争和文化感知在经济好转时勾画出其后果。从这种经验资料式的描述，我们会更清楚地力图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变革理论的一部分。

我们要论证的是，虽然世界经济的疆界在从15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基本上保留着相同的状况，有关资源的配置、经济角色、工资雇佣和工业企业的财富、贫穷及其场所，在1450年（或1500年）到1650年与1600年到1750年（年代上的重叠是有其考虑的）这两个时期之间有着不同。证明这种主张是不容易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需要建构几个全新系列的经济指数，这在本质上是困难的，从客观条件讲也许是不可能的。我们也许需要一系列间隔为25年连续性的断代图表，以显示出奢侈品和必需品贸易的规模、价值和方向，还有1500~1650年间和1600~1750年间的“累积”图表。也许如果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这类地图将会显示出欧洲贸易在其一边是东欧，另一边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属巴尔干的疆界内，在其基督教地中海沿岸与伊斯兰教地中海沿岸间的疆界内，包括的主要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贸易。而这些疆域应当包括南北美洲，而非洲和亚洲则排除在外。

首先，这些图表显示出，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除了包括了加勒比海（Caribbean）地区外，就外部疆界而言，1500到1650年间和1600到1750年间的模式没有重要的不同。在另一方面，在这两个时期的欧洲世界经济疆界之内，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模式而言，我们确实发现某些重要的变化。工业的场所和集中地不同了（或至少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还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贸易方式上，不同地带工资雇佣者的百分比上，挣工资者的实际工资上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机器变得更强和更弱，农业、工业生产和人口的增加率也变化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也有些改变，而最重要的是，每个地区对世界剩余价值占有的相对程度变化了。

甚至在指明预期的变化方向之前，说明我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对于读者而言就会明白这种理论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是很缺乏的，往好里讲也是局部的和零星的。特别缺乏的是有关世界经济的全面资料，而这种资料才能够对有关的论述进行检验。如果要梦想对社会结构的可变性作出固定的论述，情况甚至要更糟。我们要找出阶级形成的变化模式，和在民族国家疆界的确定方面，在1500到1650年和1600到1750年这两个时期之间有什么改变，特别是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局限于特定国家的疆域内来对待，这方面资料甚至就更稀少了。从这点出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分析分散的资料，勾画出看来或多或少是可靠的、总括性的解释模式，以包容这些资料，表明一种理论观点，并对我们经验资料上的空白和理论上的未解之谜获得某些见解。我们正是以这种精神来考察意味着17世纪的“危机”、“相对倒退”或“较少增长”的历史文献的。

[1] 见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的文章所附的书目。（1967，605~615）

[2] 见西米安（Simiand）（1932，6）。

[3] 莫斯尼尔（Mousnier）（1967，161）。

[4]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5，5）。

[5] 艾贝尔（Abel），（1973，221）。艾贝尔的调查研究的德文第一版发表于1935年，修正与扩充的第二版发表于1966年。艾贝尔说明“总的框架是保持着”，但是“14~15世纪和16~17世纪的萧条被解释为滞缓，并尽可能多地再细划分”（1973，6）。也许，艾贝尔相信两个萧条之间有一个好转。

[6]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 a，206）。两种更近的调查研究[奇波拉（Cipolla），1974，12；戴维斯（Davis）1973 b，108]同样勉强地使用危机这个词，虽然奇波拉又说：“任何一种简单化说到底总有一点真理。”

[7] 这个用语出现在第二部分第五章（Part II ChV）的标题上。（Abel，1973，206）。肖努（Pierre Chaunu）使用了类似的用语“价格和活动主要趋势的逆转”，在论17世纪一篇文章的标题上。

[8] 维拉尔（Vliar，1974，46）他确定的时期开始于1598到1630年之间，结束于1680到1725年之间。

[9] 肖努 (Chaunu, 1962b, 224)。这趋于接近西米安 (Simiand) 对阶段B的原始描述。“不是阶段A所发生的情况的逆转, 而是……一个缓慢的增长或停滞, 和不再有上升的连续性” (1932 b, 649)。

[10] 博利尔 (Baehrel, 1961, 29) 如同肖努 (Chaunu), 特别提到阶段B不一定必然是衰退, 可以只是一种低速增长 (1961, 51)。其他人同意说这个时期是特别严厉的。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将其确定为: “这个 (17) 世纪最后的20或30年” (1973, 431)。雅卡尔 (Jacquart) 将其定为1680到1710年 (1978a, 385)。莫莱诺 (Morineau) 却发现“大量确实的迹象 (*de bon allant*)”是在1660到1700年之间 (1978f, 523)。

[11] 舍费尔 (Schöffler, 1966, 82)。模糊的用语总可以当做历史学家戏剧性的华丽辞藻而被换掉。“这是一种历史学家对于变化的情感的叙述性评论, 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在这时或那时都会被归类为‘转折时代’”萨普勒 (Supple), 1959, 135)。

[12] 穆夫里 (Meuvret, 1944, 110)。见麦克劳德 (Murdo MacLeod) 论西班牙属中美洲的书显出的类似抱怨: “17世纪在某些时候以前的特征是‘拉丁美洲被遗忘的世纪’” (1973, xi) ——辛普森 (Leslie Boyd Simpson) 一篇文章题为“墨西哥的被遗忘的世纪” (1953) 可供参考。波利森斯基 (J.V.Polišenský) 以相同的语气, 观察到“社会的、经济的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们首先关心的是‘更有革命性的’16世纪和18世纪, 对17世纪所给予的注意很少” (1971, 2)。鲍斯马 (William Bouwsma) 将17世纪称之为“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 是一个在两个过分开发地区之间的未开发边疆地带” (1970, 1)。

[13] 舍费尔 (Schöffler, 1966, 83)。

[14] 克鲁泽 (Francois Crouzet) 在1971年谈到“像西米安的A和B阶段那样的僵化概念” (1971, 147), 一个类似的抨击这次是来自左派, 是波斯代尔维内 (Gilles Postel Vinay) 所作的: “A和B阶段…被证明是不考虑由分析地租所引起的真正问题的一个保险办法” (1974, 78)

[15] 英贝尔特 (G.Imbert)。在他论长期波动的书中 (1959), 指明了四个长期趋势, 每个与一种经济形式相对应:
1250年——中世纪经济1507/1510年——重商主义经济1733/1743年——资本主义经济1896年——计划经济

[16]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3a, Pt.III)

[17] 奇波拉 (Cipolla, 1964, 31)

[18] 科尔曼 (Coleman, 1959, 506)。这是一篇评述《技术史》 (*History of Technology*) 第三卷的文章。在其中科尔曼为他的见解提供了一个证据。也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7) 对1300~1320年和1720~1730年之间“静止的历史”的论述。

[19]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采用了这种分期法。但是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自觉地在—个“过渡时期”和—个某种生产方式占优势或“统治地位”的时期之间作了理论上的区分（1968，217~226）。

—场马克思主义内部讨论这个分期问题的辩论在1940~1941年的《劳动月刊》（*Labour Monthly*）清晰地表现出来。这场辩论是围绕着希尔（Christopher Hill）—篇论述英国革命的早期著作展开的。菲尔德（Peter Field）批评希尔将1640年之前的英格兰估计为“仍然本质上是封建的”。菲尔德认为马克思讲得很清楚，16世纪的英格兰是“明确资产阶级化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并且，“马克思是正确的；16世纪的社会是—个资产阶级社会。”确实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中最突出的资本家——可以与比利时的利奥波德（Leopold）相比”[菲尔德（Field），1940 a，558]。道格拉斯·加曼（Douglas Garman）答辩说菲尔德“误把蛋当作了鸡”；而且如果资产阶级革命在1640年之前已经发生了，“人们就要问是在什么时候？”[加曼（Garman，1940，652）]。菲尔德回答说加曼先生“忘记了这个概念和诞生不是同一事物”并且它“始于玫瑰战争（War of Roses）——封建主义者的大规模自杀行为，资产阶级利用其牢固地扎下了根——（而且）经过农民起义、没收教会土地、求恩迎礼（Pilgrimage of Grace），（和）北方伯爵们的起事，资产阶级社会逐步形成了”[菲尔德（Field），1940b，654~655]。因此，托尔（Dona Torr）为权力为—种十分明确的阶段理论辩护。她说菲尔德的错误是断定社会是直接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因而“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发展至为重要的小商品生产的中间阶段。”她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形式”只存在于工业革命之时，在英国庄园经济于14世纪“崩溃”的四百年之后[托尔（Torr），1941，90]。多布（Maurice Dobb）在写到与托尔同样的论题时，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在—方面，他不同意托尔将资本主义时期定于工业革命。如果人们这样做，他认为“那怎么能将17世纪的斗争看作—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都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兴起的一个半世纪之前？”进一步，他说要论证“都铎（Tudor）和斯图亚特（Stuart）时代的英国是—个与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对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是在回避这个论题。”多布的解决办法是论证在那时，“生产关系可以说已经改变，即使生产力仍保留其中世纪的形式。”因此将16世纪的英国描述为“其生产方式已经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是正确的。[多布（Dobb，1941，92）]。虽然多布的公式避免了托尔的公式易于导致落入的粗陋陷阱，但追根究底与她的思想没有真正的差别，如多布自己后来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希尔（C.Hill）在几年后发表了一篇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革命的观点的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是—个包括有“封建国家被在其内部成长的中产阶级所推翻，和—个新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创立起来。”希尔列举的例子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德国宗教改革（“资产阶级精神对旧秩序的第一次猛攻”）；尼德兰起义（“第一次国家规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1640年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失败的1848年德国革命；1905年和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1948，135）这篇文章集中在政治活动和政权上，绕过了对经济的直接描述，因而没能认真对待菲尔德（Field）提出的观点。

[20] 克拉克（G.N.Clark，1960，10~11）

[21] 西米安（Simiand，1932a，3）

[22] 斯威奇（Sweezy，1972 a，129）

[23] 布罗代尔 (Braudel, 1974, 6)

[24] 肖努 (Chaunu, 1960 a, 20~21)

[25] 祖科夫 (Zhukov, 1960, 85)。祖科夫特别提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法国大革命定为转折点，并说俄国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第一章 **B**阶段

NE POUR LA PEINE

Rouille matin de Campagne

Bien des gens de Campagne
Toujours payés

LA VACHE
Chacun a part à son travail
son maître, son lait et manger

LE COCHON
Il est méprisé et nécessaire

LA POULE
sa journée est d'un petit prix
l'acquiescent
qui ne nourrit rien ni rien



第一章插图“村民”

吉拉尔（Nicolas Guérard）作。（17世纪晚期）

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

“村民”（L’homme du Village），吉拉尔（Nicolas Guérard）（1648~1719）作，一位在巴黎有声望的印刷业主，他将村民看作“生来是为受苦的”。

就巴特（Slicher van Bath）而言，从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代起，欧洲农业扩张和收缩时期的基本辨别特征是谷物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和工资是上升还是下降。这是一个谷物贸易的条件是有利还是不利的的问题。他认为在1600年（或165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是收缩的，这意味着谷物贸易处于不利条件。^[1]它对于强调收缩的这个定义是重要的，因为巴特相信，小麦价格的相对下跌比其绝对下跌要重要得多。^[2]与贸易条件的改变一道发生的（这时要避免一切因果关系的暗示）是格拉曼（K.Glamann）称之为在1650年左右“东西方粮食大贸易”的转折点，明显的发生原因是“南欧和西欧（似乎）已经变得在粮食上更为自足”。^[3]这种自足是由于“17世纪下半期西欧食品生产的增加，与人口总的停滞在时间上一致”。^[4]这或许造成了过剩。然而格拉曼（Glamann）也注意到，在这同时“欧洲的胡椒供应过多了。”^[5]

但是当时代的问题或许是食物太少时，又怎样能说明供应过多的现象呢？舍费尔（Schöffner）谈到在欧洲存在着“长期的、有时是潜伏着的结构性现象”，“从14世纪的灾祸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主要是“一方面是食物生产和食物供售之间持续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是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其结果是“一种营养不良是地方病，饥荒经常流行的形势”。^[6]塞拉（Domenico Sella）发现，早期现代时期的安于幸福是依靠“食物供给是否能与人口增长并进”。^[7]其他人谈到生产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很清

楚地，我们面对的反常情况只能以对事物发生顺序更清楚的概念来解答。但我们首先看看其他事件中发生了什么。

17世纪据记载农业上有了一些变化：土地开垦的进度至少是放慢，或许停止了，也可能是倒退了。不像16和18世纪“创造了土地”[用肖努（Chaunu）恰当的想象]，17世纪特别是1650年之后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但这是一种“没有成就”的巩固。^[8]加上土地面积扩张的停止，谷物的平均出产率在整个欧洲于1600年到1699年期间下降了。大麦和燕麦下降的程度要比小麦和裸麦大，在中欧、北欧和东欧比在西欧下降得更厉害。^[9]马德莱纳（De Maddalena）称这种出产率的下降为“一个显著的现象”。^[10]另一个主要的农艺变化是所种庄稼的选择：首先，将种谷物的土地改作在较寒冷的地区用来放牧，在较温暖的地区用来造酒；^[11]第二，将种谷物改为增加种植需要集约劳动的饲料庄稼和蔬菜的生产，以及经济作物（亚麻、大麻、蛇麻草、油菜、草、大青）；^[12]第三，从高价格的谷物（裸麦和小麦）改种低价格的谷物（大麦、燕麦和荞麦），^[13]并减少购买生产谷物所需的肥料（腐殖土和石灰泥）。^[14]

与纯粹农艺上的改变一道，农业生产社会组织上的许多变化也发生了。马德莱纳（De Maddalena）论及17世纪普遍的“农民阶级地位的恶化”，^[15]在此期间“土地所有者借口‘紧急和迫切的需要’（urgens etvimprovisa necessitas）一直在没收以前属于农民的农地”。^[16]他也提到“没收——最好称之为霸占——1/3的公社财产[因而被称为‘挑选’（trriage）]”，这影响到农民减少了他所有权利放牧和拾柴的土地的面积。^[17]巴特（Slicher van Bath）同意农村人口大部分人遭受到比城镇人口更多的苦难，但是在以小农和茅舍农为一方，劳工和家仆为另一方之间作了区别；前两类要比这两类挣工资者“相对更糟一些”。^[18]穆夫里（Meuvret）对此作出了一个很明白的解释：

对于每一个抱怨因为小麦价格获利甚少的耕地所有者/佃

农（农夫laborureur）而言，有多少工人（manoeuvriers）或手工艺人却高兴为他们有很少机会必须购买东西时，付出的价钱较低。^[19]

总的来说，巴特（Slicher van Bath）认为，随着租佃（Fermages）和特别是小佃农（Petits fermiers）数量的减少，农民地产主和佃农（fermierpropriétaires）处于不利的财务状况。^[20]与这两种减少平行发展的事实是总的来说农业经营单位（exploitation agricole）的面积变大了。^[21]然而尽管经营单位更大，劳动力更贵，农业设备的改进在17世纪比16世纪要少，虽然在乳酪生产的工具上有更多的发明，如搅乳器的改进。^[22]

工业像农业一样，看来在17世纪也丧失了它的“加速力量”，虽然发生得晚一些。^[23]不清楚从总的欧洲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塞拉（Sella）认为这种波动相对较小，因为当人口在16世纪扩张时，实际工资下降了，因而事情“根本上没有变化”；当每人平均收入在1650年后上升时，增长的个人需求却“可能一直抵消了部分下降的人口数量”。^[24]霍布斯鲍姆（Hobsbawm）坦率地谈到这样一类分析的不确定性：“生产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25]

我们似乎和道的是工业的位置有变化。巴特（Slicher van Bath）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农业收缩时期——中世纪末和17世纪——乡村工业出现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纺织工业”。^[26]这种情况的发生被认为是因为失业的乡村劳动力对工业而言是便宜和有吸引力的。因为这类工业至少在18世纪中叶之前，是建立在低比例的固定资本之上的，罗曼诺（Romano）认为，“因此，清偿营业成本，收回投资是非常容易的”，^[27]这在纺织工业也许是确实的，但是这种论证难于应用到那时两到三类其他主要工业（根据罗曼诺自己所列举的）——矿业开采和造船。^[28]纺织生产向乡村地区的转移与独有的重要新工业——酿酒，烧

酒和制麦粉的工业结合在一起，而这些都是从事谷物加工的行业。^[29]

明显地，下降的谷物价格相应提高了实际工资。“在17世纪下半期，……当食物价格趋于下降……工资等级保持原状或没有以同样幅度下降。”^[30]这当然是与在漫长的16世纪发生的情况相反。^[31]如果造成这种结果部分是由于工资的相对“黏着”，但更多是因为“整个欧洲从1625～1750年都有明显的劳动力短缺”。^[32]倘若是这样，我们又怎样与这样一个事实调和起来，即17世纪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高的就业不足的失业率？如格拉曼（Glamann）所说的：

挣工资劳动者可能对实际工资的某些增加感到高兴。然而前提是他被雇用，而这在以混乱的经济状况为特征的如此一个时代是不能肯定的。17世纪的许多经济问题作家，不管怎样都是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社会上流行着大规模的就业不足的基础上。^[33]

任何价格的讨论（不管是谷物还是工资劳动力）在这个时期都特别为票面价格与以金银衡量的价格的关系所困惑。^[34]普通的看法如莫斯尼尔（Mousnier）所说的，“在许多国家衰落要比表面看来得严重，如果不只是根据以货币账目计算的票面价格，而是以相应的贵金属重量来计称的价格来衡量的话。”^[35]因此，如果我们根据贵金属价格，如维拉尔（Vilar）所说的，有“一个确定的事实：在国际上以银来衡量，价格在1600年左右下跌，在1680年达到第一个最低点。”^[36]贵金属价格的下跌相对于贵金属流通量的下跌是稳定的。

帕克（Geoffrey Parker）总结了这整体的形势：

持平而论似乎确实可以认为，欧洲贵金属的净储存在1500年到1580年间缓慢增长，在1580年到1620年间迅速增加，可能从1620年代起下降，当时欧洲的银矿枯竭了，由美洲运来的银

急剧下降，这种情况直到1700年之后巴西的黄金运到为止。

欧洲所使用的货币数量的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是无疑的。欧洲在1700年的贸易很清楚不能够以1500年那种小规模货币来源进行。然而仍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它够用吗？欧洲货币储存的净增长是否充裕到足以相抵对支付手段迅速增长的需求？有几种指标说明其不能，特别是在1600年之后。^[37]

不只有着货币储存的短缺，还有相应的信贷短缺，这至少从1630年到1680年延续了半个世纪，正如斯普纳（Spooner）指出的，可用总数量的“银、铜、金、信贷（算在一起）几乎不敷用，造成了一种艰难而低水准的货币经济生活，这是世界物质生活总停滞的反应和结果。”^[38]这解释了伪造货币“这种17世纪普遍性瘟疫”^[39]的浪潮。价格的这种变化对于全球贸易的规模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欧洲工业生产的情况完全没有全面的资料可以适用。

摩洛哥（Frédéric Mauro）称之为跨大陆贸易关系的概念，将世界分为五个大陆：欧洲、非洲、温带（temperate）美洲、热带（tropical）美洲和亚洲。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不完全适用于地理上的类型，因为非洲和亚洲处于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而南北美洲是其边缘，还因为摩洛哥将欧洲的中心和边缘地区置于同一类别中，因而丧失了关键性的资料根据。^[40]尽管如此，考察一下他在表1（table 1）中的估计是有用的；我为了清楚起见改动了它的排列。假若表中的这种比较是正确的话，我们注意到由欧洲进出的贸易和世界范围的贸易是沿平行方向移动的，而在17世纪，两者都显示出相对于较早和较晚的时期有一个停滞的中间期。

表1-1 五个地区和世界范围的跨大陆往来贸易的程度与上一世纪关系的比较*

地区	世纪		
	16	17	18
欧洲	上升	不变	上升
非洲	不变	上升	上升
温带美洲	(近于零)	上升	上升
热带美洲	上升	不变	不变
亚洲	上升	下降	下降
世界范围	上升	不变	上升

注：采自摩洛哥 (Mauro) 1961a。

转而考察另一个重要的变量人口，我们发现人口学家们的估计倾向于在一个狭窄的局限中变化。莱因哈特 (Reinhard) 和阿曼高特 (Armengaud) 认为17世纪的特点是“停滞……如果不是……略有下降 (*recul*)”，但不是一场‘灾祸〔危机〕’，就如14世纪发生的那一类”；^[41]而罗杰·莫尔斯神父 (Fr. Roger Mols) 说：“尽管可怕的危机造成了破坏，17世纪似乎也在人口上经历了稍许的增长。”^[42]少许下降，少许增长——简而言之，是一种持平。

从这种对欧洲经济总模式的考察，即对1600年到1750年 (B时期) 和1450年或1500年到1650年这个时期 (A时期) 的比较，并确实再与1750年之后时期来比较，就显现出一幅经济停滞的图景，一个暂停、忧虑和转变的时代；但它是一场具有从1300年到1450年那场“封建主义危机”那种意义的“危机”吗？^[43]看来不是，因为虽然“它的主要征兆是相同的”，1650年至1750年的“萧条比起中世纪晚期严重的经济衰落来属于远为缓和的一类”。^[44]如果这是确实的，这就必须加以解释，而我们提供的解释是1600年至1750年间的收缩不像1300年到1450年间那样，不是一场危机，因为困难关头已经过去，危险时期已经渡过，封建主义危机本质上已解决了。17世纪的收缩是一件发生在正形成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内的事。正是这个体系将会经历的许多世界范围的收缩和萧条的

第一次，但是这个体系在世界经济之内已经对政治上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足以进行保护，这些阶层的精力大致上（*grosso modo*）和共同转而去不去破坏这个体系，而是改为去寻找使其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手段，也许特别在一个经济收缩的时期更是如此。

资本主义阶层在17世纪是个混合体，还谈不上有一致的阶级构成，肯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有自我意识的阶级，确定它的统治权利，像他们获利那样获得政权；但是他们完全有能力面对大的机遇谋取利益，如同詹宁（Jeannin）谈到的但泽（Danzig）商人，在解释了他们在1600年前后必须做出的一些很复杂的盘算后，他们的“计算方式显示出，这些商人懂得获利的技巧。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贸易，可以使人们确实将它们描述为在其最具体的意义上对‘贸易费用’的一种理解。”^[45]由变换的贸易费用所产生的获利考虑导致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经济行为的主要解释。如维拉尔（Vilar）所认为的，我们所应更多注意的不是价格的上升和下降，而是价格“运动的不一致性”。^[46]

这些不一致性包括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它们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所能产生的利润，还在于它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托波尔斯基（Topolski）说这种收缩不是“一种停滞意义上的或间歇性的总经济危机，或是经济活动减弱所引起的萧条”；它是一个以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内“增长着的不平衡”^[47]为标志的时期。增长着的不平衡不是相对于收缩的某种东西；在一个收缩的时期不平衡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关键机制之一，一个使得资本集中和增加积累的因素。维拉尔（Vilar）的解释是好的：“在每一个总危机中，不同的国家反应是不同的，因而发展也是不平等的，最终造就了历史。”^[48]

让我们转论塞拉（Sella）称之为“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的戏剧性转变”，^[49]但不是用学究气失望的传统模式来使我们要“避免概括化”，^[50]而是让我们牢记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于精确性的

警语：“因为没有单一的结合点：我们必须想到一系列重合的历史在同时发展着。”^[51]主要的地理区分是一件普遍接受的事情，虽然对于细节有着许多学术上的烦琐争论。霍布斯鲍姆（Hobsbawm）关于“总危机”的讨论提到“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的相对免疫性”；^[52]这里他指的是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英格兰。然而在另一场讨论中，他将“欧洲经济”划分为四个地带，其中三个据说在某种意义上在经济上衰落了。（没有试图将它们彼此作相对排列）。这些地带是“中世纪在经济上‘旧有发展’地带——‘地中海和西南德意志’、‘海外殖民地’、‘波罗的海地区内地’”，和“新的‘发展’地区。”在这第四个地带有“更复杂的”经济情况，我们看到不只有荷兰和英格兰，还有法国。^[53]

罗曼诺（Romano）的地理学的分层更清楚：

在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危机基本上已经施放出了影响；在法国它没有释放出能量，但是它确实播下了以后会结出果实的种子；在欧洲其余地区，它只不过意味着退化。意大利无疑包括在欧洲这最后一部分之内，贴上了退化的标签。^[54]

奇波拉（Cipolla）对罗曼诺的地理学加上了一些细微差异：“17世纪对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是个黑色世纪，对法国至少是灰色的。但是对于荷兰是个黄金时代，对于英格兰如果不是金色的，也至少算得上是银色的。”^[55]托波尔斯基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画出这幅分层地图，区分开存有巨大活力的地带（英格兰和联合省），较不迅速发展的地带 [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以及波希米亚（Bohemia）和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除去波兰]，还有停滞或萧条地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波兰）。^[56]作为一个群体，地理的分级看来是一致的，虽然在细节上是有变化的。

让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时间上的分类，这里混乱更大了；收缩的时期在各国间是不同的，在票面和和银价格上也有着不同；甚至在特定国家

和特定货品的价格上，分析家们看来也不一致。在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对价格资料的述评中，他们的论题是简单的：“16世纪末如同在16世纪初一样难于探索。”^[57]对于金银价格，他们发现上升的长期趋势“在南欧在1590年到1600年之间，在北欧在1620年到1630年之间，也许甚至到1650年”有一个逆转。但是对于票面价格他们在三个连续的波动中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模式：一个在1620年代左右在德意志；一个在世纪中叶左右在锡耶那（Siena）、埃克塞特（Exeter）、拉古萨（Ragusa）、那不勒斯（Naples）、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但泽（Danzig）和巴黎这些不同的城市中，一个在1678年在卡斯提尔（Castile），它“非常不同一般。”他们说：“票面价格只是在英格兰的情况中精确地遵循银价，在荷兰的情况中紧密相关。”注意我们这一对国家怎样又出现了。在所有其他国家中都有一个差距，从十年到卡斯提尔（Castile）高达四分之三世纪。“连续的通货膨胀……是在这各个国家中一直接续的票面价格上升。”^[58]

这里我们有着一条精确的线索可以追寻。当世界经济中有着收缩时，通货膨胀能够作为相对衰退的模式之一吗？人们能够说票面价格通货膨胀的程度，特别是与金银价格相比来衡量，是相对衰落的尺度吗？当我们评述各种分期时（对此定下的标准通常是不明确的）；这个问题是应当记住的。根据范·巴特（Slichervan Bath）所说，萧条于1600年左右在西班牙开始，在意大利和中欧部分地区是在1619年，在法国和德意志部分地区是在1630年，在英格兰和联合省是在1650年。在中欧于1640年到1680年间，联合省于1720年到1740年间情况最坏。在英国和法国它于1730年结束，在德意志是1750年，在联合省是1755年。“经济上更高度发达的地方如英国和荷兰能够抵抗得更长久。农产品生产者——在17世纪这些人是在波罗的海地带的谷物生产地区——几乎毫无抵抗能力。”^[59]

维拉尔（Vilar）利用白银价格发现了两个主要模式——一个在西班牙

牙和葡萄牙，它们的衰退开始得较早（在1600年到1610年之间），也结束得较早（在1680年到1690之间），另一个在北欧，它开始在1650年到1660年之间，持续到1730年到1735年之间。法国在这种分类中以一个分裂国家出现，其中法国南部（Midi）“以马赛（Marseilles）与地中海相连接，离西班牙比博韦（Beauvaisis）还近。”^[60]肖努（Chaunu）发现了同样的两个类型。一个“地中海地区和西班牙属美洲的早熟趋向，和一个迟缓的属于北方和波罗的海的，它相当奇怪地与巴西和印度洋联系在一起。”^[61]

然而艾贝尔（Abel）选取了一种有些不同的集合，以谷物25年的平均折银价格为基点，对此他总结为总的来看，“在17世纪下半期和18世纪上半期”是一种下降趋势。^[62]他说这对于英国、西班牙属尼德兰、法国、北部意大利、联合省、丹麦和波兰是真实的，但德意志和奥地利不是这样，它们的“价格曲线从17世纪最后25年起是上升的。”^[63]事实上，仔细观察艾贝尔的图表，就会显示出一幅远为复杂的图像，其中突出的有两个事实。首先，最大的价格差距可以看出发生在1650年，当时波兰显著地高而德意志显著地低。第二，波兰显示出在这段时期内最大幅的价格变化，从1650年比起任何地方价格为最高到1725年比起任何地方价格为最低。德意志价格偏差在这个范围中要小得多。波兰这种显著的摆动在寻求一种解释的总框架中不应当被忽视；但是现在让我们先讨论德意志，因为在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衰退”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论著涌现。

拉布（Theodore Rabb）在评述1962年的有关论著时，描述了两个思想学派，“灾难性战争”学派和“较早衰退”学派（他们将三十年战争看作只是最后一击）。^[64]吕特格（Friedrich Lütge）是前一个学派的一个好例子。对他来说，德意志的经济在1560年和1620年之间是繁荣的。他参与了海外贸易，制造业是大规模和有利可图的。在1620年后便不再是如此了。因此他得出结论，三十年战争是关键的可变性干预。^[65]对此巴

特（Slicher van Bath）的答辩是典型的“三十年战争不能对此负责，因为德意志的衰退在16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开始了。”^[66]许多人企图解决这场争辩。例如卡尔斯坦（Carsten）对战前衰退的论点投以怀疑的目光：

甚至如果德意志城镇的大多数在1618年之前已经衰落的说法能成立，这也不一定必然引起普遍衰落，因为经济活动可能已从城镇转向乡村。确实在东北德意志是这种情况，在那里16世纪是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期，是谷物出口增长和谷物价格迅速上升的时期。^[67]

因而城镇的衰落不一定要看作负面的经济征兆。当然不是！它是边缘化的一个征兆。^[68]卡尔斯坦（Carsten）发现，除此之外，1608年之前这个时期在上巴伐利亚（Upper Bavaria），一个他密切考察的地区，是“一个缓慢地发展繁荣的时期。”因此他谨慎地劝告说，要有“更详细的调查和研究才行。”^[69]当卡尔斯坦（Carsten）靠坚持我们共同的无知来调和时，拉布（Rabb）靠坚持我们共同的知识来调和，它“显示出在德意志内部（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绝对的繁荣和衰落经常是并存的。”他也以一个谨慎的语调得出结论：

衰落地区的事实是属于一个无疑的少数……这不可能得出结论，1618年之前的斗争比差异更糟。……从最好的方面说，三十年战争开始了以前不曾存在的总体衰落；往最坏方面说，它以灾难取代了繁荣。^[70]

第三种不同的论点是卡曼（Kamen）的。他承认“毕竟无疑的事实是，战争对于大多数讲德语的地方是一场灾难”，但是他认为“这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因为没有“一个称作德意志的单一经济或政治单位”，并且“区分战前和战时的衰落通常是不现实的。”^[71]

所有这些民族“经济的”衡量标准都没有直接考虑到三十年战争本身

的政治后果和在整个欧洲普遍经济收缩的征兆的程度。一个将这场战争放在整个欧洲错综关系中观察的主要尝试是由波里森斯基（J.V.Polišensky）作出的，他说这场战争是可以被

看作两种文明之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榜样。从人文主义（Humanism）遗产源出的一个概念的冲击，一个染上了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的色彩，以联合省尼德兰为其模式，另一个是天主教人文主义者，遵循西班牙的榜样，于是就成为政治战线和权力联盟各有发展的分离点。^[72]

这场全欧洲战争就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y）持有这种观点，虽然带有某种谨慎的语调：

这场斗争普遍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17世纪早期欧洲的现状，如果不是属于一个经济统一体，至少属于一个交易框架和一个世界市场的第一批参与者，它的重心是在波罗的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整个地区。^[73]

对于他的核心论证“无可争论的”是瓦因什泰因（Vajnshtejn）的论点，即“三十年战争属于密切与荷兰人的革命和从西班牙那里获得解放的故事联系一起的”，波里森斯基又说：“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一个国内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怎么能够变为它在整个欧洲仇敌的一个可怕妖怪。”^[74]对他而言，不只是“荷兰因素”对这场斗争的普遍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最重要的结果是荷兰人在整个欧洲取得了胜利。他注意到当荷兰人占了优势时战争就正好结束了：

在1645年荷兰的舰队第一次控制了桑德海峡（the Sound）和波罗的海的贸易通道。荷兰省的商人贵族和阿姆斯特丹市就能看出没有理由继续一场与西班牙的战争，使法国成为唯一的

胜利者.....

分别缔结的和平〔联合省与西班牙在1648年1月〕立刻成为共和国对西班牙和荷兰对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和尼德兰其余部分的一场胜利。它同样可以看作阿姆斯特丹对所有其他荷兰伙伴的完全胜利，而战争的结束确保了同样的城市寡头制的特权，这是奥兰治的莫里斯（Maurice of Orange）在三十年之前予以贬低了的。^[75]

一个有关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荷兰独立战争。尼德兰革命早在1566年就开始了，直到1621年为止并没有蔓延为整个欧洲的大火——这是波里森斯基称为“战争的荷兰时期”（从1621年到1625年）的开始。^[76]它对罗曼诺（Romano）所说的1619年到1622年危机有什么作用呢？^[77]它比看起来所引起的作用要更大。因为遍及欧洲的经济收缩是以这些年的尖锐危机为征兆的，^[78]这意味着政治控制的赌注增高了；对于参战者而言军事破坏的代价似乎要低于在一个收缩时期衰弱的商业地位的潜在损失。在这个意义上，联合省下赌注并且赢了。特别是因为许多战争的代价，从破坏这方面来说事实上是德意志要记住还有波希米亚（Bohemia）所付出的。^[79]因而卡门（Kamen）认为有关德意志的争论是“虚假的”是正确的。这个问题不是德意志如果不受到三十年战争的干扰会不会衰落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体上没有意义的假设式考虑。它的干扰是世界经济中趋势逆转的一个反应。因此这场战争就成为经济角色重新配置和经济差异强化产生的形成程式之一。

总结这各种研究与综述，我们就得到如下的图景。在1600年到1650年左右的年代（如在1300年到1350年左右的年代那样），一个经济扩张的时期似乎结束了。主要用价格为出发点描述这种扩张，这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价格史学家的研讨是不错的，但是他们被完全误导了，因为价格确切而言是相对的。一种价格只有在一个既定市场的所有同期价格

体系的关系之中才具重要性。价格从来不会普遍上升或下降；一些价格上升了，因而就意味着其他的下降了。扩张的结束不只关系到票面价格难于把握的度量标准；它们关系到实在的物质产品。首先的并或许是核心的扩张是在谷物的生产上，包括每亩产出量和用于谷物生产的总亩数。后一种扩张靠土地开垦（bonification），也靠将用做牧场和造酒的土地改用种植谷物来达到。发生这些种扩张，当然是因为贸易条件对于谷物要比起其他产品更有利可图。

此外，至少还有四个其他真正领域的扩张：（a）人口，其升降在这个时代不可能与食物供应情况长期脱节；（b）城镇“工业”，它的进步和落后相对与货币化相关联，创造了高比例的工资雇佣，因而从不会大大脱离于相对低或至少是下降着的实际工资；（c）多种形式（金银、纸币、信贷）的货币供应；（d）乡村和城镇能有赚头的企业家的数量。所有这些有关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扩张的标准，而它们在这个经济的许多剖面中全都是不一致的。在一个政治单位的疆界中衡量它们，比起在全球性经济市场的各疆界中来衡量，由此只能得出一幅片面的图景，其中的经济意义就不可理解了；而政治后果于是也变得模糊不清，除非从更大的整体来考虑。

在大约1300年到1350年和1600年到1650年这些扩张因为大部分类似的原因终止了。然而不同之处是巨大的，这就是对于扩张终止的系统反应。从数量方面，我们能十分容易地看出这种差别。从1300年到1450年这个时期，与前面的上升大概比较起来，从各方面衡量都是一个衰落，而从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衡量起来呈现一种稳定化。从1450年到1750年的曲线看起来像一个台阶，而不像1150年到1450年的曲线如一个山峰。但这只是结构上不同的外壳。从1300年到1450年的萧条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危机，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危机，而1600年到1750年的危机，用舍费尔（Schöffner）的用语说，导致了“一个凝结化和有机化的时期”；^[80]它以肖努（Chaunu）称为“容易的增长之终结和滋生的困难之

开始”^[81]为标志。凝结化和滋生的困难与什么有关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是唯一看来真正的回答。

让我们注意一下在1600年到1750年之间收缩的某些系统的结构性特点。首先，过分强调这个事实是困难的，这个时期经历了国家机构的强化。至少是在中心国家和兴起的半边缘国家，以作为抗衡这种收缩的一种方法，与1300年到1450年之间的收缩相比较，在这另一方面，却恰恰导致了土地贵族中间残酷的互相残杀战争，一个封建欧洲真正的众神末日（Götterdämmerung）。17世纪并非没有经历战争和破坏，而是完全相反，但是它们没有统治阶层大规模流血的同样特征。战争的模式改变了，广泛使用了佣兵，而最重要的，17世纪的斗争是在国家之间而不是贵族之间，这样就能为某些人经济力量的增长起作用。正如艾略特（Elliott）在他所谓的危机的讨论中所说的：“16和17世纪确实在欧洲生活的结构上经历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发生在这个贵族君主制国家的弹性结构之内。”^[82]弹性确切地说就是在形成的危机中保持收缩。

第二，在一些地方有着持续的经济活动，从停止生意到活动看来是繁荣的信号。我略过最明显的例子：荷兰的黄金时代，德意志从17世纪后期的好转，英国农艺学的持续进步，简而言之，“在整个阴暗和困难的17世纪，微小进步无限性的积累。”^[83]这种较不经常观察到的现象包括土地开垦从未真正减少这个事实，如罗曼诺（Romano）提醒我们的：

土地开垦（bonifiche）？在17世纪仍在继续，它只是没有用货币来支付，而是用法定劳务（corvées）、劳役、滥行征税（Soprusi）等等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说：“农业生产不像其他行业，在17世纪几乎没有缩减。”^[84]

不使我们惊奇的是，对17世纪的许多企业家而言，看来“对于投资缺乏安全感和生产的销路”；^[85]这毕竟是收缩的意义之一。当肖努

（Chaunu）将17世纪描述为一个“获利减少但.....胜利的地租凯旋”的时期，[\[86\]](#)这样他就误导了我们。他事实上描述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中趋向农业投资的转变。

霍布斯鲍姆（Hobsbawm）发现了资本主义史上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我们面对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即资本主义只能在一个已经在本质上是资产主义的经济中发展，因为对任何不是这样的情况，资本主义力量将倾向于使自身适应于占优势地位的经济与社会，因此就不是具有充分革命性的。[\[87\]](#)

但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只能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确切地说是发生了什么？——中产生吗？这确实是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延续和巩固的方式是不能在1300年到1450年间做到的（确切说是因为1150年到1300年间的扩张还没有打破欧洲封建结构的桎梏）；由于这个原因，17世纪能够准备好在经济上、政治上、知识上和社会方面给予所谓工业革命以激励的途径。[\[88\]](#)

我们必定不要忽略社会习俗的革命，例如，在晚期中世纪没有相应的从16到18世纪制欲主义的性道德的持续发展，所有这些强加给家庭结构的道德习俗是为了使其适应一个资本主义世界。肖努（Chaunu）像通常那样，有些以他的理想主义想象来驾驭自己；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偏离他的论证标准：

17世纪从社会习俗方面而言，是一个伟大的，也许是唯一革命的世纪，以对传统文明的态度而言，这全然是个破坏传统的世纪；自相矛盾的是，它为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的革命造成了一个先决条件。[\[89\]](#)

我们还要问，这个自相矛盾之处在哪里？确实我们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工业革命是否在17世纪已经进行了。威尔逊（Charles Wilson）敢于以足够的勇气论证这点：

在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和17世纪的荷兰的经济发展之间，有没有绝对的区别？大多数历史学家可能会说有。但是我们能如此确信吗？……荷兰的造船业本身以当时的条件而言是一个基础工业，作为运输工程学的水平属于19世纪。[\[90\]](#)

让我们不要忘记，从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继续并进一步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过程；如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所展示的，在三个欧洲的基本价格地带价格差别的持续分化。

[最高和最低价格] 之间的差距从18世纪早期明显地接近，显示出整个欧洲的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开始趋同……通过过度的剥削……价格差别，商业资本主义对价格拉平做出了贡献，创建了交流的渠道，并必然造成利益的转化，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更有利可图的条件。[\[91\]](#)

这就是要点。有一个从16世纪到18世纪进行的资本主义过程，使得工业的促进动力成为可能，其中价格的拉平是一个根本因素。

一个关键的差别保留下来了，对我而言似乎是，在从1450年到1750年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被创造出来，其他的历史可能性逐步被消除的时期，与从1150年到1450年这个可能说是做出了类似努力但终归失败，因为封建经济的政治凝聚力还没有因为内部矛盾而崩解的时期之间的差别。这种关键的区别也可以在整体经济内部的收入分配类型上发现。

艾贝尔（Wilhelm Abel）在他论述前工业化德意志的民众贫穷的书中，其主要观点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中所论证的工人的状况随着工业化而恶化是完全错误的。据艾贝尔所引用的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的著作，“（在德意志）贫穷最严重的恰好是在那些没有工业的地区。”^[92]艾贝尔说，事实上，民众贫穷要早于工业化，要回溯到16世纪：

在实际工资上最严重的下降是发生在16世纪。后来，实际工资在德意志在30年战争之后不久上升，在其他地方是在18世纪初。尽管如此，这些工资……并不比16世纪后半期高多少（并比15世纪的工资低得很多）。贫困时代（*The Age of Pauperism*）（1791~1850）以一个重新下降结束了这一系列过程，但是在早期工业化的英国下降是最少的。^[93]

艾贝尔（Abel）书中的观点是要论证工业革命意味着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上升。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论及的范围之内，虽然他自己对1791年到1850年这个时期的讨论表示出，这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可能不是这样。对我们现在的讨论切题的是他在从1450年到1800年这个时期较低阶层的收入有一个全面下降的论证。这个论证在其他著作中得到了确认。明钦顿（Minchinton）冒着一点把欧洲的“需求结构”概括化的危险，将15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看作“在1750年要比1500年更受益于变富。”他又说：“贫富之间的差距变大了。”^[94]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通过考察价格资料得出类似的结论：

从15世纪后期一直到18世纪初，欧洲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做一个缜密的分析会是有趣的，如果对这个时期之前的14和15世纪的状况这样做有可能的话。一般而言那个时期的状况要好一些。这个时期构成了劳动者的一个黄金时代，正如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处于我们提到的一连串发生的暴烈动乱之前吗？^[95]

在一个我从巴特（Slicher van Bath）的资料构建的图表中，英国木匠从1251年到1850年的实际工资，^[96]从1251年到1450年显示出持续的上升，在这个时期上升了一倍，在此之后或多或少持续下降，到最后回到了最初的起始点（除了在1601年到1650年这个时期格外的低）。要解释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再考察所谓的封建主义危机。安德森（Perry Anderson）已经正确地论及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活力的充分理解是近十年来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这个危机不是建立在失败而是成功之上。是建立在（封建制度）所表现的显著的全面经济和社会进步之上。”^[97]而到13世纪，在经过三个到四个世纪的持续扩张后，这个制度本身处于危机之中。

我在前面已解释了^[98]为什么我相信这是由于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气候上的变化和封建结构基本矛盾长期恶化相结合造成的结果。安德森（Anderson）随后相当详细地对这种历史结合的分析，将着重点放在这个事实上，即“农村垦殖的基本动力带动了整个封建经济向前发展了三个世纪，最终在地域和社会结构上超越了其目标的限度。”^[99]在强调可以被称为这个体系的社会——经济衰竭时，安德森批评了多布（Dobb）和柯斯明斯基（Kosminsky）所进行的解释是“在经验上有问题和在理论上过于简化的”，他们认为危机是由“贵族剥削的直线增加”造成的，因为它“似乎不适应这个时代地租关系的总趋势。”^[100]

这里的混乱值得花一些时间去解决。一些经验上的证据以支持这个直线增加剥削的假说事实上在安德森（Anderson）自己的书中就可以找到，其中他提到，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农民持有土地的平均面积“从大约9世纪的100英亩左右下降到13世纪的20或30英亩。”^[101]他也提到小贵族和职业的中间人的地位在大贵族和农民之间，“（在社会和经济重要性上）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趋向于稳步上升。”^[102]也许，这必然意味着经济盈余增长的百分比落到非生产性工人的手中，因而存在着贵族剥削的直线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社会经济衰竭和增长着的剥削的结合

（前者不是部分地导致了后者，作为一种平衡上层阶层成员个人收入的方式吗？），这促成了（正如我提到的，由于其他因素也增强了）领地收入的著名危机，这是由“城镇和农业价格关系扩大的剪刀差”^[103]所造成的。

这个“剪刀差”的后果之一是正好在经济下降时期发生的地租关系的普遍改变。安德森（Anderson）说：

远非封建生产模式的总危机使在农村的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它由于其状况改善和对他们的解放而告结束。它在事实上被证明是西方农奴制瓦解的转折点。^[104]

这里关于经济“剪刀差”的印象，接着就是领主制的反动，接着是相对成功的农民抵抗，以农奴制的瓦解告结束。“靠劳役耕种的领主自劳地在法、英格兰、西部德意志、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在1450年已经不合时宜了。”^[105]我对这个次序的看法有些不同。社会经济危机削弱了贵族，以致使农民在1250年到1450年或1500年间稳步地增加了他们在剩余产品中的份额。这在整个欧洲西部和东部都是确实的。^[106]这是较低阶层向着收入相对平均的趋向发展的生活水准的提高，而不是由于上层阶层呈现出真正危机和被迫面对的困境。

没有剧烈的社会变化是没有摆脱危机的出路的。这条出路正如我前面所论证的，就是创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一个占据剩余产品的新形式。^[107]用资本主义模式取代封建模式是领主制的反动构成的结果之一，它是统治阶层保存他们的集体特权的一个巨大政治社会努力，即使他们必须接受经济的根本性重组和所有对熟悉的社会阶层构成形式造成的威胁。很清楚，有一些家庭会由于这种改变而失败；但是许多家庭并没有。^[108]此外和最重要的是，社会形成阶层的原则不只是保存下来了；它还得到了加强。

不是发现了欧洲较低阶层的生活水准从1500年到至早1800年在下降，尽管事实上这个时期既包括扩张（阶段A）和收缩（阶段B）吗？不是证明了这种战略是多么成功，如果这可以称之为经济转变吗？应当注意的是，收入下降的经验性论证不是由资本主义的一个批判者，而是由一位创造恩格斯（Engels）的艾贝尔（Abel）做出的。艾贝尔错误地相信，这种下降在1800年之后停止，只说明他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没能够将他在1800年以后的计算放到正确的分析单位之内，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外部疆界正好在那时已经扩张了。

我们现在转回到我们对1600年到1750年之间收缩的解释上。将1450年到1750年作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一个长期“过渡”来分析，因为我们这样就会越来越减少“纯粹”的封建主义时期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时期，早晚要达到根本没有，只剩下了过渡。足够公平的——所有的只是过渡，但是无论何时我们把一部分扩张为一个普遍的属性，我们就只是在专门术语上掉换论题。我们仍然要知道，是什么时候、如何，和为什么社会结构的主要改变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描述给这些体系赋予它们的总是不真实的。常常易于发现“非资本主义的”行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所有欧洲在1650年到1750年，也在1850年到1950年有着特定的种种例证。这类“非资本主义的”商号公司和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行为，“资本主义的”商号公司，或（所有这些中最不适当的用法）“资本主义的”国家混合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这既不是反常的也不是过渡性的。这种混合是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实质，它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如何历史性地影响了已共存于社会空间的各个文明。

我已讲过，资本主义表现着封建主义危机的一种解决方式；但解决方式是选择的结果，即靠克服了因任何既定解决方式都处于损失地位的个人或群体的抵抗而形成了多数人集团，因为受损失者是为数众多并多种多样的，就结成了奇怪的同盟，并且这个过程是冗长和不清晰。其

他“解决方式”可能尝试过。查理五世（Charles V）企图重建一个统一的君主国，但他没有成功。^[109]较低的阶层可能想趁1600年到1750年周期性衰退之机对这个体系进行破坏，借此获得对当时多得多的绝对剩余产品的大规模再分配，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现在的国家机制有了力量。靠着以复杂的方式与反对力量调和，它们只是在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层增进利益的范围内，终于生存和繁荣下来。对于安德森（Anderson）而言，“绝对君主制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的一种重新部署和重新进攻的机构，是用来钳制农民群众回到他们传统的社会地位中去的——不愿并且对抗农民从普遍的劳役折算中获得的好处。”^[110]

如果去掉封建的这个形容词，我可以接受安德森的整个观点。对我而言，这重新部署确切地与以资本主义统治代替封建统治相关。不管其公开的专门术语是什么。甚至安德森本人也承认，有一个“绝对君主制明显的自我矛盾”；他提到当绝对君主制是保护“贵族的财产和特权的”，它“能够同时确保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家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解释这种自相矛盾，安德森求助于这个事实，即在“机器工业”时期之前（也就是在约1800年之前），“商人和制造业资本”不需要“大众”市场，因而能够避免“与封建农业秩序激进的决裂。”^[111]这是确实的；然而，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范围内，这在20世纪仍是确实的。也就是说，大众市场的“需求”仍然没有包含整个世界人口。

由上述可见，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不是所有绝对君主制国家都是强国，而不是所有的强国都实行绝对君主制。关键因素是国家是如何强大的，而不是政府的形式是多么绝对君主制的。当然我们必须解释这种形式，我们将提到，在17世纪最强的国家中，谁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居第一位，英国居第二位，法国居第三位。英国革命使英国国家强大，而路易十四（Louis XIV）的主张“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是国家相对衰弱的一个征兆。

17世纪的收缩不是这个体系的危机，恰好相反，这是它的一个巩固时期。舍费尔（Schöffner）在论及在16世纪晚期西班牙属美洲白银进口衰落的一面时，抓住了这个要旨。他论证说，结果是在17世纪，“普遍而言平均价格保持在同一水准”，而这是“经济的一个稳定因素，而经济一直被一切太过高的通货膨胀所破坏。”^[112]

漫长的16世纪不只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它是一个结构上革命的时代，并非不重要，这是大规模的人群愿意接受新的和激进的思想的时代。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思想有着一种令人陶醉的性质，使他们冒着失去控制的危险。17世纪呈现为一个平静和冷静下来的时期。古典主义（Classicism）像绝对君主制那样，不是一种对现实的描述，而是一种计划——一种恢复上层阶层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的计划，较好的一面是吸收了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产生所表现的根本社会变化。鲍斯马（William Bouwsma）将17世纪实质上文化冲击的特征总结为

系统化的心理状态在所有地方的恢复，它建立在对人的知识的一种正面估计之上的，它与以脱离宗教的世俗化运动为基础的观点非常不同，它坚持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与宇宙普遍原则的一个中央核心，由此也就与抽象的真理相关联。^[113]

在政治上和文化上，17世纪表现出对形式和结构的稳定性的一种追求，这是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时刻相伴随的。没有这样一个时期，下一个质的改进就是不可能的。这使得17世纪不是一个“危机”，而是前进步伐所需的变化，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最大利益人们进一步增加利润的一个基本因素。^[114]因为从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对欧洲的世界经济的巩固是如此重要，因而值得对为什么如此作一个仔细的分析。我们就能够了解，资本主义阶层运用什么样的重商主义来应付世界经济中周期性发生的收缩时期。

[1]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5a, 38) 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说：“这决不意味着排除经济生活中其他方面的繁荣，如酿酒业、蒸馏酒业、纺织和烟草工业在这个时期的兴旺” (1977, 53)。

[2] “最重要的是谷物和畜产品之间价格比的变化，如黄油、奶酪和羊毛在一个长时期的情况。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小麦价格和经济作物如亚麻、油菜籽、烟草等之间的关系，还有小麦和油之间，小麦和工业材料如纺织物和砖之间，最近还有小麦价格和地租之间的关系”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5b, 144]。关于这种联系，见安德森 (Anderson) 对杜比 (Duby) 不愿意指出中世纪晚期的经济是处于危机之中的驳斥。杜比 (Duby) 在一些地区看到经济发展某种连续性的迹象，而安德森 (Anderson) 评论说：“这就混淆了危机和衰退的概念” (1974b, 197)。

[3] 格拉曼 (Glamann) (1974, 464)。

[4] 格拉曼 (Glamann) (1974, 465)。也见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3a, 208)。关于随后谷物生产的全面衰落，见雅卡尔 (Jacquart) (1978a, 352, 360)，雅卡尔指出 (P378) 一个生产的全面衰落只能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生产费用的改变，收获水平的改变，和产品市场价值的改变。他排除了第一个原因，认为在这个时期是难以置信的，这就剩下两种其他解释。他认为较低的产出是首要的解释。然而，巴特 (Slicher van Bath) 的论证反对将气候作为产出下降的有根据解释。“如果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其他方面都差不多 (*ceteris paribus*)，在这个时期的粮食价格应当显示出上升趋势。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却显示出下降趋势。这暗示着必然发生了影响需求的巨大变化” (1977, 63)。

[5] 格拉曼 (Glamann) (1974, 485)。

[6] 舍费尔 (Schöffner) (1966, 90)。

[7] 塞拉 (Sella) (1974, 366)。

[8] 肖努 (Chaunu)。也见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3b, 18)。被遗弃的村庄在17世纪不只在战争破坏的地区如波希米亚 (Bohemia)、德意志诸邦、波兰和勃艮第 (Burgundy) 可以发现，也在主要战场之外的意大利的坎帕尼亚 (Campagna) 和托斯坎尼 (Tuscany) 和西班牙的萨拉曼卡 (Salamanca) 发现。见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77, 68)。

[9] 见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3b, 17)；也见雅卡尔 (Jacquart) (1978a, 363~368)。

[10] 马德莱那 (De Maddalena) (1974a, 343)，巴特 (Slicher van Bath) 认为在产出率和谷物价格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增长的施肥需要购买肥料，导致更高的产量。但这只有在谷物生产有利可图时才能做到。” (1962a, 32)。很明显他不相信有利可图，因为他也认为“施肥数量或质量的下降可能造成了1600年到1750年间谷物产出率的轻微下降，这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我们都有证据。” (1977, 95)。

[11] 见罗曼诺（1962，512~513）。也见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2a，33~34），他提供了这个在1650年到1750年之间从耕作土地转作牧场的地区的名单：卡斯提尔（Castille）、什未林（Schwerin）、福拉尔堡（Vorarlberg）、阿尔高（Allgau）、布雷根茨瓦尔德（Bregenzerwald）、贝当豪（Pays d’Enhaut）、埃蒙塔尔（Emmenthal）、萨瓦（Savoie）、汝拉（Jura）、格吕叶埃（Gruyères）、贝德尔维（Pays d’Hervè），布尔戈涅（Bourgogne）、蒂埃阿什（Thiérarche）、贝道日（Pays d’Augè）、贝辛（Bessin）、科唐坦（Cotentin）、密德兰（Midlands）、爱尔兰（Ireland）。在1630年到1771年之间新的葡萄园地区是朗德（Les Landes）、佩里高尔（Pèrigord）、塞特（Sete）、蒙彼利埃（Montpellèr）、阿尔萨斯（Alsace）、加泰隆尼亚（Catalonia）、沃州（Vaud）、豪尔维尔（Hallwil）、苏黎世州（Canton of Zurich）。

[12]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3，39）。他引证了摩泽尔（Moselle）、哈尔茨（Harz）、爱尔福特（Erfurt）和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

[13]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9）

[14]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15，39）

[15] 马德莱那（De Maddalena）（1974a，288）；参见雅卡尔（J.Jacquart）（1978a，346，1978b，427~428，1978c，462）。

[16] 马德莱那（De Maddaleua）（1974a，292）；参见雅卡尔（Jacquart）（1978b，391~392）。

[17] 马德莱那（De Maddaleua）（1974a，294）。

[18] 巴特（Slicher van Bath），这些名词在德语中是“小农”（*klein bauern*）、“小屋农”（*käther*）和“无地农”（*häusler*）。相对于“雇工”（*knechte*）和“女仆”（*magde*）。雅卡尔（Jacquart）也类似地强调“中层农民”的相对衰落。他将其定义为那些“拥有或利用一小块家庭地产的人们”，他认为他们在危机中“无产阶级化”了（1978c，466）。

[19] 穆夫里（Meuvret）（1944，116）。

[20]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8）。

[21]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37~38）。

[22]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a，15，34，39）。

[23] 罗曼诺（Romano）（1962，520）。后来在重述这篇文章的要点时，罗曼诺说：“首要和最重要的是，（在农业上）决定性的崩溃在16世纪末到来，商业和工业的崩溃到来得较晚，在那些年短暂的危机之后这个意义上说，它开始于1619~1622年。商业和‘工业’的危机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危机。”（1974，196）。

[24] 塞拉 (Sella) (1974, 366~367)。

[25]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1965, 9)。

[26]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5a, 37), 他列举了下列地区: 爱尔兰、苏格兰、曼恩 (Maine) (法国)、佛兰德尔 (Flanders)、特文特 (Twente)、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蒙斯特 (Münster) 周围地区、萨克森 (Saxony) 和西里西亚 (Silesia)。

[27] 罗曼诺 (Romano) (1962, 520)。

[28] 罗曼诺 (Romano) (1962, 500)。

[29]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5a, 39)。

[30] 塞拉 (Sella) (1974, 366)。也见维戈 (Vigo) (1974, 390)。

[31] 见我在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 77~84) 中的讨论。

[32] 艾贝尔 (Abel) (1973, 225)。

[33] 格拉曼 (Glamann) (1974, 431) 见莱昂 (Léon) 类似的观察: “对于17世纪, 实际工资的上升被农业危机所阻碍, 它发动了对谷物价格突然性的和猛烈的冲击。决定性地增加了生活费用, 还有剧烈的工业萧条, 它造成了长期和严重的失业。因而对于工人阶级的更大部分而言, 是一场非常的灾难” (1970c, 674)。

[34] 见我的简要讨论,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 271)。

[35] 莫斯尼尔 (Mousnier) (1967, 167)。对使用金银作为度量的论证是由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有说服力地做出的。他引用了博利尔 (René Baehrel) (1961) 提出的尖锐问题: “不可能存在一个单一正确的货币价值度量标准, 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应当是一克 (gram) 银呢?” 对此拉杜里回答说: “这是正确的。但更有理由 (*a fortiori*) 说, 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应当是都尔锂 (*Livre touvnois*) 呢? 它添加补充金属的相对量使钱的价值不稳定.....我批评以银作为米 (meter) 的标准, 由于宇宙的某种相对性, 我难道就要以橡皮作为米的标准, 同样是相对的, 却加上令人烦恼的弹性吗?” (1964, 83)。

[36] 维拉尔 (Vilar) (1974, 246); 但是维拉尔又说: “除了在法国外, 对1683年到1689年和1701年到1710年之间曲线的上升是不可忽视的。”

[37] 帕克 (Parker) (1974a, 529~530) 斜体字是后加的。

[38] 斯普纳 (Spooner) (1956, 8)。

[39] 斯普纳 (Spooner) (1956, 35~36)。

[40] 见摩洛 (Mauro) (1961a, 特别是16~17), 对他将欧洲作为一个单一类别对待的批评, 可以在马塔 (Mata) 和瓦莱里奥 (Valerio) 的文中找到 (1987, 特别是118~120)。

[41] 莱因哈特 (Reinhard) 和阿曼高特 (Armengaud) (1961, 114)。

[42] 莫尔斯 (Mols) (1974, 39); 沃莱斯 (J.de Vries) 以1600年为100, 计算出1700年的指数为106 (而1750年为123)。但是他的计算去掉了东部欧洲, 这部分必然会进一步降低这个指数 (1976, 5, 图表I)。

[43] 见我的讨论,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 第I章)。

[44]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3a, 206)。

[45] 詹宁 (Jeannin), (1974, 495)。

[46] 维拉尔 (Vilar) (1961, 114)。

[47] 托波尔斯基 (Topolski) (1974a, 140)。戴维斯 (Ralph Davis) 讲的完全是同一件事: “比普遍的经济衰退要引人注目得多的是发展途径出现歧义的方式。” (1973b, 108)。比较托波尔斯基对罗曼诺 (Ruggiero Romano) 所用的“停滞”这个词予以驳斥: “17世纪是什么?在众多的定义之中, 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减少为单一的一个: 它是一个‘经济停滞’的世纪。这只是一印象, 但是我坚定地确信, 在这种轻易地论证后面只有一个支持论据: 价格史.....但这是一个好的标准吗? 我不相信。” (1962, 481~482)。

[48] 维拉尔 (Vilar) (1974, 52)。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莫里诺 (Morineau) 驳斥对于17世纪有一个阶段B这整个概念的企图。他说: “增长的停顿? 这是这册 (集体) 作品选用的标题。它充满了假定和许多模糊的概念。它假想定会严守罗斯托式 (Rostowian) 的增长, 无论对16世纪的乐观景象还是17世纪统一的悲观景象.....如果一个人是荷兰人或英国人, 而不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 欧洲在1598年之后在地理上的兴起似乎是十分清楚的。这是一个重新分牌的问题。” (1978g, 575)。然而, 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想象中不是始终悲观的, 如果他认为一个B阶段包含的恰恰是重新分牌, 如果他持有与罗斯托式 (Rostowian) 增长理论相反的观点, 他就会较少受到这种反对势力的影响。

[49] 塞拉 (Sella) (1974, 390)。

[50] 马德莱那 (De Maddalena) (1974a, 274)。

[51] 布罗代尔 (Braudel) (1973, II, 892)。这些过程的重叠在我看来似乎解释了肖努 (Pierre Chaunu) 的确信: “这种衰落通常不是发生在一个运动, 而是两个、三个、四个阶段中。阶段是那些周期性危机.....这些危机的年代在欧洲各地或多或少是相同的, 前后相差两三年。但是相对的重要性和这些危机的意义在这个和那个地方各不相同。” (1962b, 231)

[52]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1965, 13)。

[53]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1958, 63)。

[54] 罗曼诺 (Romano) (1974, 194)。

[55] 奇波拉 (Cipolla) (1974, 12)。舍费尔 (Schöffner) 谈到荷兰历史学家不愿意为欧洲普遍危机的概念的讨论做出贡献。“这个总危机怎么能使它适合于荷兰的黄金时代呢？” (1966, 86)。

[56] 如格雷梅克 (Geremek) 所报告的 (1963)。

[57] 布罗代尔 (Braudel) 和斯普纳 (Spooner) (1967, 404)。

[58] 布罗代尔 (Braudel) 和斯普纳 (Spooner) (1967, 405)。

[59]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5b, 136)。在波罗的海地带一个类似的萧条的时期由马查克 (Maczak) 和萨姆索诺维茨 (Samsonowicz) 发现 (1962, 82)。他们将时间定为1620年代到1760年代。

[60] 维拉尔 (Vilar) (1974, 303)。于是维拉尔企图使博利尔 (Baehrel) (1961) 其他不和谐一致的论证适应于与法国人有关的总理论。

[61] 肖努 (Chaunu) (1962b, 251~252)。

[62] 艾贝尔 (Abel) (1973, 221)。

[63] 艾贝尔 (Abel) (1973, 222, 223, 表No.37)。

[64] 拉布 (Rabb) (1962b, 40)。

[65] 见吕特格 (Lütge) (1958, 26~28)。

[66]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3b, 18)；见艾贝尔 (Abel) (1967, 261) 的同样论证。

[67] 卡尔斯坦 (Carsten) (1956, 241)。

[68] 对卡尔斯坦 (Carsten) 自己而言这是熟知的，虽然他没有用这种语言。他谈到“土地贵族的兴起和与外国商人的直接贸易，扼杀了许多较小的城镇。” (1956, 241)。

[69] 卡尔斯坦 (Carsten) (1956, 241)。

[70] 拉布 (Rabb) (1962b, 51)。

[71] 卡曼 (Kamen) (1968, 44, 45, 48)。

[72] 波里森斯基 (Polišenský) (1971, 9)。帕克 (Parker) 类似地建议类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76a, 72); 但是要注意, 波里森斯基正好在下一句话警告不要误解: “如果过于简单地相信, 这场战争是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士为一方, ‘旧政体’和封建贵族的代表为另一方的忠实, 那就是愚蠢的。”

[73] 波里森斯基 (Polišenský) (1971, 258)。接下去讲的就是“战争起到了加速某些社会经济变化的催化剂的作用, 这些变化在战争爆发之前已在进行了。”(259页) 它不是一个转折点。“三十年战争强化了已经存在的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它没有改变商业路线的基本方向或商业收缩的强度。”罗施 (Hroch) 也分析了三十年战争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停滞”之间的矛盾的结果。这必然是商品生产为一个“欧洲范围的市场”发展的结果 (1965, 542)。然而, 他将这场斗争看作是“在封建阶级内部的。”(541页)。

[74] 波里森斯基 (Polišenský) (1971, 264)。

[75] 波里森斯基 (Polišenský) (1971, 236~237)。

[76] 这是波里森斯基 (Polišenský) 著作第五章的标题 (1971)。

[77] 见罗曼诺 (Romano) (1962)。

[78] 见我的讨论,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 269~273)。

[79] “波希米亚 (Bohemia) 的〔经济〕悲剧的程度是清楚的。”波里森斯基 (Polišenský) (1971, 294)。这对于瑞士也是确实的; 见卡曼 (Kamen) 的讨论 (1968, 60)。

[80] 舍费尔 (Schöffner) (1966, 106)。

[81] 肖努 (Chaunu) (1967, 263)。

[82] 艾略特 (Elliott) (1969, 55)。

[83] 肖努 (Chaunu) (1967, 265)。

[84] 罗曼诺 (Romano) (1962, 512)。里面的引语见布费尔蒂 (Bulferetti) (1953, 44, 777)。

[85] 明钦顿 (Minchinton) (1974, 100)。

[86] 肖努 (Chaunu) (1967, 264)。斯普纳 (Spooner) 指出, 土地只是那时商业财富的出路之一。他还列出三十年战争、国家、大公司和新技术 (1970, 100~103)。

[87]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1960, 104)。

[88] 这个时期相对于较早时期的成就被肖努 (Chaunu) 抓住了: “用从13世纪起进行了最大

改良的一系列工具，16世纪的欧洲人撒出了第一张全球经济图。自相矛盾之处不在这里。不如说是从1550年到1750年，古典的欧洲做到了维持这个奇迹。这是在18世纪中叶的交通运输革命之前。”（1966a，277~278）。

[89] 肖努（Chaunu）（1966a，209）。

[90] 威尔逊（Wilson）（1973，331）。

[91] 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1967，395）。阿基利斯（Achilles）谈到阿姆斯特丹的小麦价格成为“全欧洲的标准。”（1950，52）。

[92] 艾贝尔（Abel）（1972，7）。

[93] 艾贝尔（Abel）（1972，63）。他用（用来做面包）小麦公斤（Kilogram）来制表，显示在英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维也纳和莱比锡（Leipzig）一个石匠的实际工资。

[94] 明钦顿（Minchinton）（1974，168）。

[95] 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1967，429）。也见托特堡（Teuteberg）所讲的“素食化”，即欧洲在中世纪末期到1800年之间这个时期（无关饮食增加了）（1975，64~65）。

[96]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80，表I）。拉杜里（Le Roy Ladurie）报告说鲍拉尔（M.Baulart）揭示出，巴黎工人的薪金在15到18世纪中的最高点是从1440年到1498年（1973，434）。范范尼（Fanfani）相信，意大利的实际工资在16世纪下降350%（1959，345）。

[97] 安德森（Anderson）（1974b，182）。

[98]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1~37）。

[99] 安德森（Anderson）（1974b，197）。对于他这场危机不完全是农业上的：“在同时，城镇经济现在碰到了它发展上的某种关键障碍.....一个普遍的货币短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银行业和商业。”安德森将这种短缺解释为是由于采矿的“技术障碍”（1974b，199）。

[100] 安德森（Anderson）（1974b，198）。我冒着将自己落入这个阵营的危险，在我将自己与希尔顿（Hilton）关于这个假设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的范围内。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3~24）。

[101] 安德森（Anderson）（1974b，185）。他认为在私人交往中这可能是由于遗产的分割而不是剥削的加强。

[102] 安德森（Anderson）（1974b，185）。他认为这应当是全球生产量增加的结果，又不

是由于剥削的加强。但是见赫利希（Herlihy）对13世纪皮斯托亚（Pistoia）农村仔细的经验研究。在反驳马尔萨斯主义者（Malthusian）对14世纪人口下降的解释时，他指出在13世纪，农民“支撑着巨额水平的地租”；他们出售他们土地的永久租佃权给投资者以筹集资本，而在1250年之后，“由于货币的贬值和小麦价格的迅速上升，永久地租的价值也突然飞涨，在1280年代达到高峰。”此外，“皮斯托亚的农村支付着相当于城市六倍高的赋税”（1965，238，240，242）。

[103] 安德森（Anderson）（1974b，200~209）。他对这个后果的经验性描述显得简明扼要和可佩服的清晰。

[104] 安德森（Anderson）（1974b，204）。

[105] 安德森（Anderson）（1974b，209）。

[106] 虽然安德森（Anderson）两本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是东欧和西欧方向不同的道路，甚至他也承认，“（封建主义的危机）的相对影响，在某些方向也许‘在东欧比在西欧’甚至更大。”当然，他对这两个地区危机的原因所进行的论证是不同的（1974b，246~248）。但是它的真实性是相同的，对农民阶层有利的后果也是相同的。

[107]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37~38）。

[108] 安德森（Anderson）本人指出，减少危险或减慢精英转换速度的方法之一，是他称之为“法律制度”（vincolismo），即在17世纪晚期引入的各种司法伎俩，在18世纪将大规模地产保持在家庭中，以“对抗分割的压力和资本主义市场的不可捉摸情形。”（1974a，56）

[109]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165~181）也见耶茨（Yates）（1975）。

[110] 安德森（Anderson），他提供了相同论证的另一个公式：“绝对主义国家的统治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代封建贵族的统治”（1974a，42）。

[111] 安德森（Anderson）（1974a，40）。

[112] 舍费尔（Schöffner）（1966，97）。

[113] 鲍斯马（Bouwsma）（1970，10）。鲍斯马解释了这种对“宇宙系统理性化”的关心，是由于“这个时代的物质状况；是由于这个世纪长期的萧条，它的社会纷乱、战争和革命”（94页）。

[114] 拉布（Rabb）谈到在1610年到1660年间所建立的知识体系的“巨大范围和巨大的图景”[培根（Bacon）、笛卡尔（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霍布斯（Hobbes）]，他认为这正好是对危机的一个反应。“当这种渴望在欧洲文化中表示它的中心地位时，如1660年代起那样，人们就可以再度说，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这场‘危机’已经被抛诸脑后了”（1975，58~59）。

第二章 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



第二章插图“乌坦波盖尔特（Jan Uytenbogaert）总收款人”

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1639）作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里克斯博物馆
（Rijksmuseum）。

“乌坦波盖尔特（Jan Uytenbogaert）总收款人”，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作。这幅1637年的蚀刻画，以“秤量黄金者”的名称更为通行。其风格是一种富裕者的庄严几乎是神圣。可以和16世纪艺术家的钱币交易者的肖像相比较，他们将其描绘成有着尖鼻子和冷峻的脸的人。

“在北方有一个现象，像卢本斯（Rubens）……是不可想象的。”

——盖尔（Pieter Geyl）^[1]

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在1600年左右牢固地位于欧洲西北部，也就是在荷兰（Holland）和泽兰（Zeeland）；在伦敦、在伦敦周围各郡（the Home Counties）、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还有法国的北部和西部。^[2]这些中心地区的所在处政治单位，在面积、形式和政体上是相当不同的，它们在随后一个半世纪经历了重大变化，但是在经济上这些地带的相似之处要多于不同。正如前一章所考察的，1600年到1750年是一个巩固时期，在其间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放慢了。这在整体上是确实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特定标志是，整体中心趋势是其组成部分鲜明的不同倾向的合成物。随着速度放慢和巩固化，强行推行了困难的经济决策，由此政治的（和文化的）缠结也被培育出来。这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比在17世纪的中心国家中更确实的了。在其中这些国家的企业家阶层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生存有着尖锐的竞争，一些人必然被淘汰，以留下足够的利润给其他人。

历史书将16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称为重商主义时代。我不打算考察赋予这个名词的多重意义或是组成它“实质”的各个定义。^[3]有关重商主义的辩论大部分是有关论证的真值被17世纪的理论家提出的。明显地，他们的论题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实际，而在某些方面是依据实际而设计行动的。这对所有理论家都是确实的。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论题是这个时代的国家的实际活动，不管在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如何。这些活动在那个时代不是唯一的，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的几乎每个时刻，某些国家都曾加以利用，虽然在意识形态的理由上有所变化。在对17世纪重商主义的解释的巨大混乱中，这个概念的两个方面完全为每一个人同意。重商主义包括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策，和围绕着对商品周转，不管是以金银运动为形式，还是对创立贸易平衡（双边或多边的）的关心为考虑重心。有关“利润和权力”的真正关系的事实是什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中和今天的分析家中所争论的问题。

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弱者反对强者，和竞争者相互对抗的国家政策，只不过是接受一种正统观念。在这本书中可能有些不同的是，认为重商主义竞争的成功，首先是由于生产率的作用，和所有重商主义国家政策的中期目标是在生产领域的整体效率。这个故事必须从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开始，因为在17世纪至少部分时期，这个“从冰川时代留下的沙子和泥堆”^[4]上草率建成和看来缺乏效率的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主。联合省（或者我们应称之为荷兰）是在查理五世（Charles V）这一方企图将世界经济纳入世界帝国失败后，第一个这样的霸权。霸权是一种少有的情况，至今只有荷兰，大不列颠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曾经拥有霸权，每一个只在相对短的时期内享有这种地位。荷兰是最难置信的，因为在它的时代，它是所有军事巨人中最弱的一个。

霸权包含比中心地位更多的东西。它可以定义为一种形势，在其中某个中心国家产品的生产如此有效率，以致在整体上在其他中心国家也

是有竞争力的，因而这个中心国家就是一个最大限度自由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受惠者。明显地，要取得生产质量高的优势，这样一个国家必须足够强大，以阻止或尽量缩小为生产因素自由流动设立的内部和外部政治壁垒，并且为保持其优势，曾经受庇护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发现，鼓励某些知识和文化冲击，运动和意识形态是有好处的。与霸权随之而来的问题，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就是它是短暂的。当一个国家一成为真正的霸权，它就开始衰落了；因为一个国家不再是霸权的，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力量（至少不是在长时间光阴逝去之前），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得到了力量。位于顶峰就必然意味着未来不是你的，不管现在有多少，但无论如何它是甜美的。这种霸权的类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在农业—工业生产效率上的显著优势导致世界贸易中商业供销领域的统治地位，加上由作为大部分世界贸易集散中心和由对“无形物”——运输、交通和保险业的控制而增加的相关利润。商业领先地位导致了必然会对银行业财政份额的控制（兑换、储蓄和信贷）和投资（直接的和有价证券）。

这些优越性是具有连续性的，但是它所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同样的，优越性的丧失看来也是以同样的顺序发生的（从生产到商业再到金融），也基本上是连续性的。接着可能终有只是一个短时期，一个特定的中心强权能够同时表现出在生产、商业和金融上对所有其他强权居于优势。这个瞬间的高峰我们称之为霸权。对于荷兰或联合省而言，这个瞬间可能是在1625年到1675年之间。荷兰人的生产效率首先是在历史上食品生产最古老的形式上达到的，这就是渠集业，这里指的是鱼类集散，特别是（但不只是）腌鲱鱼，这个“荷兰人的金矿”。^[5]这种效率的起源可以在1400年左右鲱鱼横帆船（haring buis或buss）的发明中找到，^[6]这是一种长宽比很高的渔船，它提供了“更大的机动性，更耐风浪和更大速度，而对载货空间没有大的损失。”^[7]这种鲱鱼横帆船两个大的优点是它的设计使得用大拖网捕鲱鱼成为可能，这是于1516年在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tland）的霍恩（Hoorn）首先提到的，^[8]并且它宽

阔的甲板使得在船上进行腌晒成为可能。腌晒并即去除内脏和加盐腌鱼的新技术也就确保了储存，这种技术在13世纪就发展起来了。^[9]这种“工厂船”^[10]的创造使得船能够远离荷兰海岸待上6到8个星期，鲱鱼横帆船把它们载货转给抱买者（ventjagers），快船则带着产品回到海岸。^[11]

荷兰人不只控制着北海的捕鲱鱼业，即所谓的“大渔业”（Grand Fishery），^[12]他们还控制着冰岛（Iceland）的捕鳕鱼业，还有斯匹茨卑尔根（Spitzbergen）群岛的捕鲸业。^[13]鲸在事实上不是用作食品，而是一种工业产品。鲸提供“鲸油”，用于肥皂和灯油，而鲸骨用于服装。^[14]捕鱼加工业不但对这类进一步程序是重要的，而且对这之前的程序如制网，造成了一种“在欧洲唯一的‘情况，在人口相当的比例上’都卷入了渔业或至少有关。”^[15]在17世纪，对于英国人“令人恼恨”^[16]的是荷兰人能够在英国海岸外捕鱼，并在英国港口有竞争力地出售鱼，并且因于这种优越性，在波罗的海建立了他们的“本国贸易”。英国人在那时非常了解这一点。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在1661年7月8日写信给克拉伦登（Clarendon）说：“（荷兰人的）鲱鱼贸易是盐贸易的缘由，而鲱鱼和盐的贸易是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垄断波罗的海贸易的缘由，因为他们有这些庞大的货物装上他们的船去那里。”^[17]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确实是对荷兰造船业的效率有益的因素之一。荷兰人有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螺旋性效果的幸福环境之中：循环地增强着优势。

尽管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如此说，鳕鱼业不能解释这一切。荷兰人在农业，这个当时最基本的生产企业中显示了同样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不论就其后果的广度，^[18]还是其效果的深度而言都是如此，因为尼德兰（Netherlands）在地质上一点也不适于谷物生长^[19]或是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农业。然而这个弱点通过两种方式转化为力量。首先，这个国家抽水创造土地的工程（填海造低地），导致了风车的发明和工程科学的繁荣，因此在许多方面荷兰成为“木制机械

时代的中心。”^[20]填海造地可追溯到1250年，但是最盛期是1600到1625年间，那时有一个突然的数量上的飞跃；这种高水平大部分从1625年到1675年维持了下来。^[21]因而马维尔（Andrew Marvell）在“荷兰的特点”（Character of Holland）中谬误地嘲笑道：“因而在被淹的人中的规则是他应当排水。”困难的自然环境的第二个后果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必要性推动荷兰人进行集约农业，首先是在1300年左右，那时较早的艰苦时代和低的价格导致了富于创造力，后来在1620年到1750年，集约农业一个更大的扩展发生了。^[22]

因为土壤对于耕作农业特别地不利，^[23]增加产量能够最易于通过改种如亚麻、大麻、蛇麻草、园艺、果树栽培，和很重要的染料产品等工业原料作物来达到，由此在16和17世纪，荷兰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种植者，几乎无人可与之竞争。”^[24]与园艺和农耕一起有着可观增加的是畜养业。^[25]使得工业原料作物如此集中成为可能的部分原因是大量进口粮食，这不是一件小事。德弗里斯（De Vries）估计在17世纪中期，荷兰、乌得勒支（Utrecht）、弗里斯兰（Friesland）和格罗宁根（Groningen）等省半数的居民靠粮食进口供养。^[26]有益的因素是农业技术的改进——休耕地的消失，^[27]与之相关的饲料作物耕作、苗畦和成行种植，简单而便宜的工具的使用，通过大量施肥和仔细的多的劳动投入小面积而获得高产量。^[28]牧草种植和系统化的施肥也使更多的牲畜和更高的奶产量成为可能。^[29]所有这类集约化农业即使增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可能，也为其所促进。“到17世纪中期，大多数城市有特准的人收集（工业）垃圾（例如灰烬）并出售远送给农民。”^[30]无怪乎罗曼诺（Romano）称约从1590年到1670年这段时期为“荷兰农业世纪”，以与欧洲农业的16世纪做比较。^[31]当荷兰人变得更为有效率时，欧洲其余地区大部分在农业技术上相对停滞时，这个差距变得更大了。

联合省不只是这个时代领先的农业生产者，它在同时也是工业产品领先的生产者。有如此之多的笔墨花费在解释荷兰为什么没有工业化

上，以致我们易于忽略它已这样做了这个事实。威尔森（Charles Wilson）由于其相信这点，在他大部头论尼德兰的著作中一直坚持这个观点。^[32]工业进步首先在纺织业上显示出来，即传统上领先的部门。尼德兰北部在1560年代开始从向北涌来的逃亡者获得好处，这是由尼德兰革命导致的结果。纺织品生产集中在莱登（Leiden），^[33]那里“新布商”[贝斯呢（bays）、塞斯呢（says）、骆驼绒（camelot）、绒面斜纹呢（fustians）]开始了他们使英格兰变得著名的事业。在一百多年的时期内，工业生产一直汹涌前进，在1660年代达到高峰。（一种以1584年为100的指数，相比之下1664年为545，1795年为108）。^[34]生产不只是在数量上扩展了，并且直到1660年代，莱登（Leiden）的主要工业纺织品竞争者，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新布商”，“不得不进行一场艰难的战斗。”^[35]阿斯特罗姆（Åström）认为荷兰的力量来源于17世纪波罗的海贸易，将纺织业生产的效率作为他的第一个解释，将他们英国呢布（和欧洲南部的盐）的中间商作为第二个解释^[36]——第一个是生产的优势，第二个是商业的优势，它跟随着第一个优势并为其所促进。

这种优势明显地在科克因计划（Alolerman Cockayne's Project）的历史中表现出来。英国希望借此转变英国未经染色梳理的呢布送到荷兰加工完成的情况。在1614年詹姆斯一世（James I）禁止出口“原白色的”呢布，而荷兰人以禁止进口成品货物作为报复，对此詹姆斯一世以再次禁止出口羊毛作为反击。这正如萨普勒（Supple）所说是一场“巨人的赌博”，^[37]一方会堕入无底深渊。在三年多时间中，英国的出口下降到原先的1/3，这个计划在1617年完蛋了。这个赌注一直是很高的。威尔森（Wilson）计算在染色程序中增值了47%，而这是在荷兰完成的。^[38]英国不能赢得这场赌博的原因很清楚，因为我们已经提到荷兰在那时在染料生产因而在染料价格上享有的巨大优势。因而在17世纪前半期，英国与联合省在呢布贸易上的竞争，如同在渔业上一样，反映了“徒劳无功的重商主义愿望。”^[39]

现代早期的第二个大工业是造船业，这方面联合省的领先地位是众所周知的。^[40]这个事业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清楚的分析对它很重要，荷兰的造船工业是“属于现代规模的，有着标准化、重复性方式的强烈趋向。”^[41]它是高度机械化的，并且使用许多省力的技术——风力锯木厂、供锯、木堆和滑车的动力送料机，搬适重木材的大起重机的，——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产量。^[42]这个工业—商业复合体的联系是明显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系列附属工业——制造场、烘饼干作坊、船蜡烛业、航海用具、航海图制造业，^[43]造船业本身需要大量木材。据估计一艘战舰需要200棵生长一个世纪的橡树，因而这种木材不是很容易劈开的；200棵橡树在当时需要50英亩（acres）树林。^[44]这种木材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波罗的海地区，荷兰人垄断这个贸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纺织业生产的效率，后来当然主因变成是造船业上的效率。而这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荷兰人能够控制世界贸易的原因。此外，因为造船之外的其他荷兰工业是“完全依赖”由水路运来的供应，船只“必然应视为生产的一个真正因素。”^[45]因而，造船业是生产手段的生产。

纺织业和造船业不是仅有的重要工业。荷兰是至少在1660年之前煤矿业的一个主要中心。^[46]蒸馏酒业在1600年后不久开始有一个“强有力的繁荣”，并延续了一个世纪。其他工业是造纸工业、锯木厂、书籍业、制砖业和石灰业，约在1500年扩展，到18世纪依然“相当地繁荣”；陶器业、烟草业和烟斗制造业；出口导向的很大规模的制革业在17世纪特别突出；酿酒业在17世纪到来时达到高峰；油脂和肥皂生产，它们最繁荣是在17世纪中期；当然还有化学工业，它的首要作用是提供染料；^[47]并且人们必然不能忽略军火工业。受到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和三十年战争的促进，政府鼓励进口战争物资，这类工业就稳步扩张了。在16世纪末存在着大规模的出口贸易，在1600年，生产结构从手工业行会向制造业和外放加工制转变。^[48]

不是在1575年到1675年这一百年间，联合省在每个工业领域都具有

优先地位或没有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如果可以确信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所说的，尼德兰是“第一个达到自立型增长的国家。”^[49]这首先是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显示出有这样一种连贯的、有凝聚力的和整体性的农业—工业生产结合，而这是在尽管进行了80年的独立战争的经济困难中形成的。^[50]没有比英国人更为仔细地观察17世纪荷兰的情景了。在1673年，英国大使坦普勒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出版了他的《联合省考察》（*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其中他说道：

我相信，贸易的真正起源和基础是大量人群聚集在小范围的土地内，那里所有生活必需品就都是稀缺的；所有有财产的人都趋于极度节俭；但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被迫勤勉劳动。大多数人精力充沛地投入劳动；那些不能供应的东西由某种发明和创造力来弥补。这些习惯首先是由需要养成的，而及时成长为一个国家的常规。^[51]

威廉爵士希望英国人能尽可能像所说的这样就好了。

对这种活力的确证可以在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数字中找到。众所周知有一批主要的移民，特别是手工艺人和市民，在16世纪晚期从南部来到北部尼德兰，首先是从安特卫普（Antwerp）^[52]来到阿姆斯特丹和莱登（Leiden）。^[53]在1622年，联合省60%的人口是城镇居民，其中有3/4是在一万人口以上的城镇中。^[54]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增长到4倍——从1600年的5万人增加到1650年的20万人，^[55]它作为一个真正的“熔炉”，将佛兰德人（Flemings）、瓦隆人（Walloons）、德意志人（Germans）、葡萄牙人和德意志犹太人（Jews）、法国的胡格诺教徒（Huguenots）变为“真正的荷兰人”。^[56]大多数作家集中于移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考察特别但不只是在莱登（Leiden），大量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许多被雇用

的工人是妇女和儿童。正如詹宁（Jeanin）恰如其分地说的：“这种压力和斗争含有一种现代的回响。”^[57]当然是如此，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可以说在16世纪晚期，北部尼德兰坚定地走上了发展生产效率的道路，使得联合省在1600年左右发展为欧洲世界经济主要的（虽然当然不是唯一的）生产中心。在农业方面，它将需要高技艺的产品专业化，产生了高额利润，^[58]在工业方面，荷兰在纺织业和造船业处于权威的领先地位，这是那个时代两项主要工业，在其他工业方面荷兰也起到了一个主要的，有时是占统治地位的作用。在这种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联合省能够建立它的商业网，并树立它作为“世界货栈”^[59]的地位。对此我们要转论到某些更为熟知的话题上。

荷兰人的船只在17世纪控制了世界的运输贸易。它从1500年到1700年增长了10倍，在1670年，荷兰人拥有的船只吨位是英国人的3倍，比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德意志诸地的吨位的总和还多。荷兰人建造的船只的百分比甚至更大。荷兰的船运业事实上只是在17世纪后半期才达到鼎盛期，荷兰人利用英国内战的时机建立了“在世界运输贸易中无可争议的霸权。”当荷兰人船只运输所有的荷兰纺织品时，英国船只除了垄断专卖商和特许公司外，不得不与荷兰船只分运英国纺织品，确实只有较少的份额。^[60]晚至1728年，笛福（Daniel Defoe）仍把荷兰人说成是：“世界的运输者、贸易的中间商、欧洲的经纪人和代理人。”^[61]在17世纪荷兰人给人如此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分布在每个地方”^[62]——到了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地中海、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还依然掌握着波罗的海地区（Eastland）的贸易，他们扩大他们在欧洲西北部的贸易的份额，并掌握了到这个大陆内陆的河流贸易。

东印度贸易的经历当然就是东印度贸易公司（Vereenigde Oost-Endisehe Compagnie VOC）的经历。它是一个资本主义贸易公司的榜样，部分是投机性企业，部分是长期投资，部分是殖民地开拓者。^[63]它在阿姆斯特丹有着审慎的指导者“十七位绅士”（De Heeren

Zeventien），在巴达维亚（Batavia）有牢固实行控制的殖民地总督，其中第一个人是柯恩（Jan Pietszoon Co-en）。^[64]用某些方法荷兰人偶然获得了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当安特卫普在1585年落到西班牙人手中，欧洲的香料市场转到了阿姆斯特丹。但是因为西班牙在1580年合并了葡萄牙，而里斯本（Lisbon）是欧洲香料的输入港，荷兰人要设法绕开西班牙人。^[65]于是豪特曼（Corneliusde Houtman）在1592年被派到东印度群岛执行使命，在1598年第一支贸易船队航入，到1602年国务会议（States-General）给予东印度贸易公司（VOC）特许状，部分是为控制荷兰人中的毁灭性竞争，部分是为较少的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部分是为了创造一个反对西班牙的经济和政治武器，部分只是为了得到比欧洲那时所有的更多香料。^[66]

事实上这是个控制海运香料贸易的好机会；经过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陆路贸易最重要的封锁，不是像通常说的发生在1450年到1500年；而是发生在1590年到1630年。^[67]因而机会是很大的，荷兰人抓住了它。印度洋上主要的航运通道从北半部（红海和波斯湾）转到了南半部〔好望角（Cape）路线〕。荷兰人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做的技术。像帕里（Parry）指出的，“横帆战胜了大三角帆，贸易风战胜了季风”；^[68]但是一旦荷兰人一进入这场贸易，他们就遇到有着一个外部竞争场的贸易这个基本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奢侈品贸易，利润很高并且竞争激烈；但因为它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贸易，市场本来就是小的，充满这个市场的是一个严重的可能性——腹背受敌（Scylla and Charybdis）。^[69]只有两个途径来摆脱这个困境。或者以将东印度群岛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边缘地带并入来转变贸易的性质，或者求助于在世界性帝国之间传统方式的长途贸易实行“行政性”贸易。走哪一条途径事实上是柯恩（Coen）和“十七绅士”（De Heeren Zeventien）之间进行争论的主题。柯恩这位“在亚洲一种强硬方针的斗士”，^[70]推行第一种选择方案，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上司们则主张第二种。

柯恩（Coen）说将东印度群岛边缘化需要在两重意义上的边缘化：建立政治控制以压服相对强大的亚洲国家并重新组织生产体系；并出口一个白人定居者阶级，这两者都有助于管理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为欧洲出口除金银外的其他商品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初始市场。他说这样一种政策与行政性贸易是相矛盾的，需要以市场法则来运作。这里讨论的术语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被错误认为是自由贸易与垄断之争；^[71]但是事实上柯恩不反对东印度贸易公司（VOC）在市场中实行垄断，（确实对野蛮的力量时常给予深思熟虑的帮助），而“十七位绅士”（De Heeren Zeventien）也不是不了解在如此大的距离上限制使用他们的行政性贸易权利的能力局限。^[72]这是一个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家什么在短期内最合算的问题——是剥削的利润还是投机的利润。在短期内，那些主张投机的人占了上风；^[73]但是长期看来，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74]生产剥削的利润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领先的唯一巩固的基础。那些中心国家（不只是尼德兰，还有不列颠和法国）在18世纪开始将印度洋竞争场边缘化，在1750年之后确实站稳了脚跟。^[75]

东印度贸易公司（VOC）在17世纪的政策，是否如马塞尔曼（Masselman）所认为的“目光短浅”？^[76]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必须考察其他选择。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多的剥削利润，特别是在一个世界经济相对全面停滞的时代？回答是确实有——在波罗的海沿岸（Eastland）的贸易，在欧洲西北部本地、在南北美洲，所有这些都更就近方便。为什么还要为东印度群岛所困扰呢？人们会奇怪东印度贸易公司（VOC）整体上长达一个世纪的收支亏损是否掩饰了其收入内部转移的巨额程序，并把资本从小投资者集中到联合省内部的大投资者手中。^[77]如果是这样，东印度贸易公司可以说起到了某种股票交易所的作用，对于那些如“十七位绅士”（De Heeren Zeventien）自身的有着获得消息优越性的人是很有用的，但是关于它的历史，至少直至18世纪来临，更恰当地说是属于这段历程的财政而不是其商业和供销方面。然而，东印度贸易公司的历程很好地说明了在一个地区的统治如何与在另

一个地区的统治联系起来。

东印度群岛贸易可能是17世纪荷兰商业扩张中最富戏剧性甚至特殊的一支，但它不是最重要的，也不能以其解释荷兰人的霸权。当荷兰贸易者出现在印度洋时，他们首先经常在地中海往来。转折点看来是在荷兰——西班牙1609年的休战协定后不久。^[78]然而，应当将贸易的两个地区区分开来。首先是在总体上与基督教地中海地区，特别是与意大利北部的贸易，在那里是一个供应长期需要的粮食的问题，但是这时由于意大利的坏收成、流行病和在政治上与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切断了关系而变得更为短缺，而同时，意大利北部工业被呢布出口到这个以前纺织品出口的地区所削弱，威尼斯的船运被取代了。^[79]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英国人、法国人和汉萨同盟人（Hanseates）都与荷兰人一道为地中海贸易竞争；但是荷兰人带着最大的份额前来，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船只设计和商业组织的技术问题”上有优势。^[80]这给了他们以双重优势，既能运粮食（和其他产品）从欧洲北部到地中海，又能确保粮食在波罗的海沿岸（Eastland）贸易中的首要地位。

在取得与北部意大利贸易的较大部分之后，“荷兰人在那里获取了大部分（商业的第二个领域，也就是）‘富人贸易’，并且伴随他们商业的是像他们的效率一样无情的暴力行动。”^[81]一个接着另一个，因为在地中海“富人贸易”的商业并不是新东西。本质上，荷兰人在夺取威尼斯与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贸易的传统角色。在这个时代，地中海东邻地区打算从欧洲西北部比从东印度群岛进口更多的真正货物（像有别于金银的奢侈品），但是他们也许比印度洋地区在1600至1750年期间出口更多的奢侈品，印度洋地区那里随着时间推移，增长出口茶叶、咖啡、印花布和其他最终成为原料而不是奢侈品的货物。地中海东部地区还仍然是外部竞争场的一部分吗？这很难说；向边缘地位的转变正在开始，虽然可能要等到18世纪晚期才能完全变为现实。

大西洋贸易——对于西半球和西非洲两个附加补充地区——使我们转向荷兰人商业网的中心地区。许多方面使得两个荷兰的大公司，即东印度贸易公司（VOC）和“晚得多并且不那么成功”的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有着不同。^[82]首先，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不同的。东印度贸易公司（VOC）被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所控制——他们是阿米尼斯派教徒（Remonstrants）和和平党人。^[83]但是西印度公司基本上是他们的对手努力的成果——如奥兰治党人（Orangists）、加尔文教徒（Calvinists）、泽兰人（Zeelanders），南部尼德兰移民再定居在北方者这些“党派”——他们是蛾摩拉人（Gomarian），进行殖民和好战者。^[84]当它在1621年6月3日建立时，休战协定（Truce）结束刚几个星期，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也进入了这个公司，一个“传教—殖民公司”的想法变成了一个“私掠船机构”，^[85]不同利益之间的斗争在西印度公司内部发生了。大部分是在经济上较薄弱的泽兰人（Zeelanders）（他们依靠公司在私掠上的垄断）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他们希望切断私掠与任何荷兰企业家的关系）之间。^[86]

西印度公司就是这样一个“贸易和宗教上争斗的混合体”，我们所知的后果是“一个乱成一团近乎破产的凄凉故事。”^[87]无疑是这样的；但是有理由认为这种政治努力事实上奠定了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贸易一根中心支柱的基础，即所谓三角贸易，它给欧洲提供棉花、糖和烟草，所有这些当然是使用非洲人奴隶劳动种植的，还有欧洲用于获得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和茶叶的白银。^[88]荷兰人是这种结构的先行者，如果利益大部分归于英国人和法国人，这首先是因为起始的“社会投资”是沉重的和耗费时间的，从账目观点看，由荷兰人花费了负担，而利润却正好在荷兰人的霸权在1670年代结束后才能获得，落到了后来生产上更为有效率的英国人（和某种程度上法国人）的手中了。

在西印度公司于1621年建立后所发生的事，简而言之，就是荷兰人寻求在下一个1/4世纪在大西洋扩张。他们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征服了巴西东部，将其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夺去，并第二次试图夺取西非洲的艾米纳（Elmina），其后是安哥拉（Angola）的卢安达（Luanda）。然而在第一次英荷战争（Anglo-Dutch War）（1652至1654年）中，葡萄牙人（当时从西班牙人统治下再次解放出来）再度夺回巴西；而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荷兰人失去了新阿姆斯特丹和一些西非洲的堡垒。在相当于荷兰世界性霸权的这个短时期究竟实现了什么呢？首先，荷兰人将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逼入困境，提供了“海上屏障”，^[89]在其后英国人（加上苏格兰人）和法国人建立了移民殖民地。其次，在南北美洲开始的在巴西的糖业种植，在荷兰人被驱逐后，转移到巴巴多斯（Barbados），第一个大的英国加勒比地区种植业殖民地。第三，荷兰人从事第一次重要的奴隶贸易，以替糖类种植业提供人力，当他们丧失种植园时，就企图保持奴隶贸易者的领域，但是到1675年，荷兰的首要地位终结了，将这个地位让给了英国人新建立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90]

荷兰人的大西洋时代无疑对欧洲的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它对荷兰人有多大贡献呢？确实不像波罗的海贸易那么多，它在16世纪就已经成为“母贸易”，当时荷兰的船只运输了其总量的60%。在17世纪至少到1660年，荷兰人继续维持着同样的统治地位，^[91]尽管英国人做出重大努力来打进他们的市场。这里是荷兰人商业霸权的证明。在一个关键的竞争场，那里英国人、荷兰人、确实甚至还有法国人（不用说还有北方的国家）都以为控制船运是重要和有利可图的，荷兰人单独夺到了最大的一份。^[92]仔细观察一下正在出现的世界经济的停滞对英国—荷兰在波罗的海竞争的影响，萨普勒（Supple）和欣顿（Hinton）都以两个相同的因素解释荷兰的优势：便宜的船运和控制了为出口用的白银的充分供应。^[93]莫莱诺（Morineau）将他们的优势归于还有他们愿意比“东地公司”（Eastland Company）买更多的粮食。^[94]可能他们以完全构成倾销的如此之低的价格出售鱼类的能力也起到了作用。^[95]

拥有供出口的白银是一个优越性，它是通过造船业和纺织业的生产效率获得的，这使得有可能从西班牙人和其他人那里得到白银。为什么拥有白银在波罗的海贸易中是一种优势？这是因为经济紧缩加上三十年战争造成了英国人称为“钱币过滥”[德意志人称为“货币伪造时代”（Kipper und Wipperzeit）]，它影响到小钱币对白银的贬值。瑞克斯元（rixdollar）——一种可流通银币，它的银含量保持稳定，在1600年值37个格罗辛（groschen，德意志币），到1630年就值90格罗辛。它最大的上扬从四五到七五发生在1618年到1621年之间。这些变化是由于格罗辛银含量的降低，而根据它对于瑞克斯元的价值来显示这种变化。^[96]问题是为什么这对荷兰人的影响与对英国人的影响不同。假若是两者那时都能用白银衡量以较低价格得到波罗的海地区的产品，但是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现钱”供出口，但荷兰人有英国人却没有。还有，当在贸易上普遍存在萧条时，进口较便宜要比出口较便宜受的影响较小。

对于英国人而言根本的问题是荷兰商人能够在英国比英国商人更便宜地出售波罗的海的货物，^[97]在英国的波罗的海地区（Eastland）商人认为解决办法最好是得到许可将波罗的海谷物再出口到地中海地区，如像荷兰人做得那样；但是他们遇到了英国小麦商人强烈反对的麻烦，这些英国商人成功地维持了出口禁令，只要谷物价格高于一个相当低的数字。因为害怕英国谷物不能充分在国际上竞争。^[98]结果，英国人不能在地中海地区赚到白银，以用来在波罗的海的便宜价格上取得优势，这就转而使他们不能得到赚到更多白银的产品等好处。在波罗的海的货币贬值因而对荷兰人比对英国人更为有利，从他们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和由此掌握地中海贸易的方面说都是如此；而它也使得荷兰人开始“在英国本土侵占英国商人的贸易。”^[99]

这幅图景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内陆河流贸易，它在尼德兰起义前是属于安特卫普（Antwerp）。当荷兰人关闭了斯凯尔特河（River Scheldt）

时，这种贸易转到阿姆斯特丹，在此之后有两种方法使它可以再度转回到安特卫普：将联合省扩张到包括安特卫普，或是通过和平和自由的贸易，第一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斯密特（Smit）怀疑，尽管联合省宣称的目标 [和奥兰治党人（Orangists）和喀尔文教徒（Calvinists）的真实计划] 是如此，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努力：“荷兰不要收复南方的省份，这样随之而来的是贸易流回解放的安特卫普的危险。”^[100]当和平终于在1648年来到时，将禁止性关税实施于经过斯凯尔特河口到安特卫普的任何贸易就写进了条约。^[101]如此之多的政治成果在总体上而言是市场贸易重要性的成就，可以认为到1648年阿姆斯特丹在反对安特卫普的复兴方面已感到安全了，但是有一种对生产而言是关键性的货物还没有机会能拿到：泥煤。原来为安特卫普和布拉邦（Brabant）市场开掘的泥煤，在1570年代之后再度转向荷兰本地的艾（IJ）与马斯（Maas）河之间地区。使用泥煤是荷兰城市工业有效率的一个关键所在，并且它“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与煤炭对19世纪欧洲的影响相比较。”^[102]还有，河流贸易将城市的肥料运到其他方向，有助于实现“荷兰谷物农业独有的高产量。”^[103]

从1580年代起，在改进的运河系统上经常性的交通服务网络将荷兰的各城市，以及其他省份和布拉邦（Brabant）的内地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以荷兰为中心。从1632年开始，更进一步的技术进步随着第一条拖船河（trekvaart）的建造发生了，这是一种有着为客船备有纤道的直运河，它需要大量资本。^[104]荷兰的造船者发明了能够用大快艇在河流和湖上分发和收集货物的船。^[105]这形成了欧洲最有效率的国内运输网络，它在1660年代达到了交通高峰。如果我们将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较远的贸易路线——东印度群岛、地中海东部（Levant），甚至基督教地中海和大西洋贸易——确实是重要的，但它们是第二位的。对于荷兰人在欧洲世界经济中于1620年代（也许在1590年代已经如此）到1660年代的商业霸权的关键，“仍然是北欧和西欧之间的古老贸易”；^[106]而荷兰人能够取得商业霸主地位的原因与他们农业

——工业的效率有关。这主要通过船运费、保险费和一般性经常开支转化为商业效率。

为什么荷兰的船运费如此便宜？最大的因素是船只建造费的低廉，帕里（Parry）列举了六条价格优势：荷兰造船者的技艺，使用材料较经济，节省劳力的设备，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大规模购买材料，用荷兰船只便宜地运输建造材料。其结果是生产的总价格晚至17世纪中期，比他们最接近的竞争者英国要便宜40%—50%。^[107]在这些优势中，前三个可以看作是荷兰人的技术优势，后三个则是在前三个基础之上的累积性优势。除了在建造上更为经济外，荷兰的船只按需要船员较少的方式建造的——通常是18个人，而不是其他国家船所需的26至30个人。^[108]这使荷兰人能较好地供给船员食物，可能比其他国家的运货者更好；^[109]他们由此自然因为较低的工资总开销得到较高的生产率。这种较高的生产率在港口和在海上一样可见。荷兰船只“较优的坚固性和速度”，是与其设计有同样作用的“经常性维修”有关的。^[110]进一步说，荷兰的船只“更清洁、更便宜与更安全”^[111]这个事实有着螺旋上升式的效果；便宜的船运导致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由此又带来便宜的木材，再带来便宜的造船费用，又使得船运更为便宜。更清洁、更便宜、更安全的船只也意味着总船运量的增加，它使得保险费用更低成为可能——部分是与其比例相关，部分是一种更有效的财政结构的结果，^[112]对此我们将做简短的讨论。较低的保险费用也是累积的；它们导致更低的船运费，它又导致在规模和交易技术上的发展，这又反过来导致更低的保险费用。

如果“（荷兰）贸易的基础是船运。”^[113]那么最大的利润是通过市场和大宗产品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贸易中心取得的。^[114]这个成功是由于荷兰形式的商业组织的优越性。哈克谢尔（Heckscher）说17世纪尼德兰的“最大独特之处”是比起其他国家来，具有“以更少和更简单的商业组织谋生……的能力”。^[115]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在合股

制度中储金的联营，[\[116\]](#)这当然不是荷兰人首创的；但是他们将其扩展到包括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商业贵族阶层，还有大量较小的商人。[\[117\]](#)第二，它意味着创造了一种保护股制度，它大量减少了商人的风险，特别因为它是**有组织的垄断**，并且它减少了贸易中心市场不稳定的供给（和价格）的依赖，而使商人在出售时能够得到投机性的利润。[\[118\]](#)第三，它意味着一个**委托代理人网络**，它为生产者寻找顾客，通过寄卖得到货物，接受购买者给生产者付汇票的委托。[\[119\]](#)这样荷兰人的中心市场贸易随着荷兰的船运发展起来，它本身是荷兰工业效率的自然结果。[\[120\]](#)我们再一次看到这种螺旋形的效果：荷兰中心市场贸易的力量“趋于毁灭”[\[121\]](#)英国的船运。当然，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创造了大量稳定的就业机会，[\[122\]](#)这特别在17世纪维持了荷兰产品的国内需求。

我们已论证了在世界经济中荷兰优势的过程次序是生产性、销售性和金融性的。如果这个结果的第一部分是有争议的，第二部分则是公认的明智之举；但是它通常表现得有些可耻的味道，高贵的、苦行的（商业）企业家转变成为卑鄙的、爱好奢侈的、靠吃利息为生者，本身就背叛了天国（Zion）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足以解释荷兰为什么被逐出伊甸园（Garden of Eden）。近年来一直有着健全的反应反对这种谬论，但我希望能更进一步论述。转向金融不是衰落，更不是崩溃的迹象；它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力量的象征，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可以看作是“17世纪的华尔街（Wall Street）。”[\[123\]](#)这种力量的来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过程中三个步骤的结果：第一步，世界经济中生产和商业的实力创造了充足的公共财政基础。第二步，充足公共财政与世界范围的商业网结合，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支付体系和货币市场的中心，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滞缓因而货币不稳定的情形下。第三步，生产和商业的实力与对国际货币市场的控制相结合，使得荷兰资本通过汇款输出，能让荷兰人靠着比他们自己创造得多得多的生产剩余价值生活，一直到他们自己主要做出生产贡献的时代之后很久。

在一个世界经济的扩张已经放慢时，事实是联合省“总是有解决办法”，^[124]并且在17世纪“短缺的阴暗的延续”中是主要的例外。^[125]这是普遍的经济霸权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在海上船运和保险上的商业优势中产生的结果本身就足以创造使收支平衡的剩余价值；^[126]而这也是其原因，因为财政充裕的声誉使荷兰政府能够更便宜地借贷，^[127]因为荷兰国家信用的优良说明其在“军事成功上所起的重要作用。”^[128]并因为由此可能吸引充足的金融流向这个安全的储蓄地点，使得联合省能够有高价值的通货。这最后一个优越性意味着联合省能够用流入的金融来平衡现金收支中的赤字。^[129]然而充足的财政只是资本主义总信用水平的一个前提，它需要金融交易的有效率流通。充足的财政使得大规模低利率的信贷交易可以进行，并使得由每笔金融交易的低收入组成的总的高收入中获利成为可能。

在1609年这个休战年（The Year of the Truce），阿姆斯特丹维塞尔银行（De Wisselbank van Amsterdam）建立了；它很快变为欧洲储蓄和交易的大中心，因为它“提供了在17世纪银行业历史纪录上少有的安全和方便。”在这个世纪中，存款从不到100万弗罗林（florin）上升到超过1600万弗罗林，^[130]它成为资本拥有者担心他们财富的安全者的一个隐蔽之处。^[131]一旦储蓄了足够的金银和货币，阿姆斯特丹就掌握了“可以说是欧洲的国际支付体系的钥匙。”^[132]有着大量通货在它的钱柜中，阿姆斯特丹因而发展了一种汇票制度，使多边的结算得以扩展。这当然需要时间来发展信用和流通；但是到1660年，阿姆斯特丹终于作为多边支付体系的中心扮演了无可争议的角色，并至少一直保持到1710年。^[133]关于对金银出口的限制，联合省在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中是一个重大的例外：金银流出联合省完全能像其流入一样容易，这正是为什么如此多的金银流入的原因，^[134]而当然这种政策只是在金银确实流入时才是可能的。这种现象正如许多其他现象那样，在形式上是螺旋形的，每个行动都有助于使下一个行动更为可行，直到最终达到一个高峰。

储蓄与交易方面的殷实可靠使信贷关系成为可行，这在1683年维塞尔银行（Wisselbank）就开始进行了。首先对存款者有“预支”，后来，“承兑贷款”交易不再与阿姆斯特丹的贸易中心的货栈相联系，而主要与遥远的中心进行信贷交易。^[135]荷兰人发展信贷是以“非常稳定”的特别储备为基础的，因为“用船运贵金属偿还汇票的费用，用任何所需货币来衡量都大为减少”，^[136]因为维塞尔银行（Wisselbank）正是这种贵金属的贮藏所。最后，荷兰通货的稳定性使它的贸易货币（negotiepenningen），包括银币和金币，是那种因“品质保险”而成为世界贸易中乐于接受的钱币，甚至在西班牙的八王宫（Reales de ocho）中。^[137]金融流入必然造成和维持了低利率，它又吸引进一步的金融流入。荷兰的利率在17世纪过程中下降了一半还多，迫使英国、法国甚至瑞典的利率也下降，但是这些国家从未下降到足够有效竞争的低水平。^[138]低利率使我们转向投资这个另一个金融利润来源的话题。作为欧洲主要的货币市场和主要的商业贸易中心，阿姆斯特丹能够大规模地降低寻求、商谈和实施借贷资本的费用，因而总的而言鼓励了投资。^[139]作为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社会，联合省也能够出口它的各种技术，这是确保金融流入的又一个方面。^[140]

在国内外投资的扩展对荷兰资本家有利可图，并有助于国家的收支平衡；但是它是否有助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呢？这是近年来带有重商主义味道的一场奇特辩论，认为荷兰人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投资置于联合省之外，特别是在英国。这忽视了这个事实，投资者关心的是得到最大的利润而不是支持国家。^[141]我们将在讨论英国金融业的兴起时再谈。目前让我们满足于凡·迪伦（Van Dillen）提请注意的，资本的创造“对于共和国（the Republic）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只需要想一下通过津贴手段获得的联盟就行了”，^[142]这是一种国家投资加强私人党派的形式。确实，不直接考察国家的作用，我们就不能了解荷兰霸权的完整情况。联合省在17世纪似乎在重商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是重大的例外。从这个事实许多人得出奇怪的推论，荷兰的国家是

软弱的。在我看来恰恰相反的一面是真实的：在17世纪，荷兰人的国家是欧洲唯一有足够的内部和外部力量，能使它对重商主义政策的需要减到最低程度。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本质，再考察一下联合省那些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在历史的较早时期阿姆斯特丹当然一直遵循强有力的保护主义路线，^[143]在这方面的实行程度在城镇中甚至在17世纪也没有完全消失。^[144]并且，有许多人对在联邦范围内缺乏保护主义表示反对。在这个世纪进程中，农业—工业领域丧失了它们的优势并求助于关税，但只取得有限的成功。^[145]也没有在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斗争中由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设置关税壁垒。^[146]国家的作用在保护之外的其他事情上是清楚的：它为私人企业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一旦在尼德兰有了一个自治政府，“渔业就成为政府最迫切关心之事。”^[147]为了控制其品质，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在1575年将5个渔业港口的代表召集到一起，通过一系列法令在1580年到1582年创建了一个社团性组织控制鲱鱼加工业。^[148]更重要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的创建，这在很重要的程度上是对殖民地货物的自由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况和随之而来发生的倾销的一种反应。斯托尔斯（Stols）认为它们的关键重要性是“国家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干预”和这两个公司的创建“几乎可以称之为国家化的‘先声’（avant le lettre）”，一种寻求将以前的国际贸易联合在一个国家的垄断之下的方式。^[149]

荷兰国家保卫它的企业家的利益，并且在这样做时几乎不担心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荷兰人霸权的意识形态是海上自由（mare liberum），在格劳秀斯（Grotius）于1609年那个休战年出版的书中最强有力地表达出来。然而，如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在1663年11月20日怨恨地写给克拉伦登爵爷（Lord Clarendon）的信中说的：“这就是在不列颠治海是公海（mare liberum），而在非洲沿岸和东印度群岛是领海（mare clausum）。”^[150]所有这些没有什么可惊奇的。^[151]联

合省是统治者，而“自由主义很适合统治者的经济”；^[152]但无论什么时候自由主义若与保持统治地位的可能性相矛盾，总有办法不让其延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荷兰国家的“自由”分权结构可以被看作一个强有力而不是软弱的表征。分权的结构并不总是强有力的征兆。在像波兰这样的边缘地带，地方议会和骑士的兴起是边缘化的标志。然而在霸权国家，这样一种结构是相对于其他中心国家更强有力的征兆，其他国家正是需要增加它们政府的中央集权化，以企图战胜这个霸权国家的经济优势。

联合省的结构究竟是什么？详情从1579年的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时代到1795年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的创立使非集权化国家崩溃的时代在变化；但每个动荡变化的实质没有很大变化。在1576年，七个州（或省）——格尔德兰（Gelderland）、荷兰（Holland）、泽兰（Zeeland）、乌得勒支（Utrecht）、弗里斯兰（Friesland）、上艾塞尔（Overijssel）和格罗宁根（Groningen）——已经同意派出代表组成一个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每个州在其中有一票投票权，决定必须是全体一致的。还有一个称为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的相当缺乏权力的执行机关。关键的军事组织舰队处于五个分别的海军军团（Admiralty Colleges）的日常指挥之下。最重要的州荷兰，本身有着一个累赘的政府结构，它的中央立法机关——荷兰议会（States of Holland），由各城镇的十八个代表和整个贵族的一个代表组成。在联合省没有君主。最接近其地位的是省行政长官（Stadholder）——一个省的官员。奥兰治（Orange）各亲王通常同时是各省（但不是全部）的行政长官，当然两个所谓“无行政长官时期”除外。很难去努力发明这么一个看来不像能有效工作，或确实能够工作的机构。

事实上它确实工作得很好，虽然不是没有冲突和动乱。[在个人程度上，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事件可以与1672年在海牙（Hague）私刑处死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t）相比，这一年在荷兰历史上被称

为“灾难之年”。] 而且，如果我们将联合省的内部纷争与英国和法国相比较，任何明理的分析家都能看到，尼德兰比其他两个国家的动乱要少；统治阶层的内部决定使社会造成分裂要少得多；下等阶层也不那么具有反叛性。要对此作出解释，我们首先要注意，政府的正式结构掩饰着（只是略微地）另一个真正的结构。在财政上，荷兰支付几乎占60%的政府开支，而阿姆斯特丹占其中一半。荷兰州的首席省行政长官是国家辩护人（Land's Advocate），这个官职后来改名为国务会议长（Council Pensionary），被外国人称为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这个官员就成为联合省整体真正的国务总理，在“无行政长官时期”如总统一样行使职权。^[153]

这个官员的权力是源于这种事实，包括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和荷兰议会都在海牙（Hague）的同一座建筑^[154]中开会，从这种非常规的惯例即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年复一年地留在等级会议中，从荷兰是所有荷兰人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从阿姆斯特丹对粮食进口的控制而以其养活将近一半的人口而得到的。^[155]如果在17世纪初对阿姆斯特丹的突出地位还有什么怀疑，那在1650至1672年的第一个“无行政长官时期”就完全消失了，那时荷兰的权势成为“将这个国家黏合在一起的水泥”，而外交政策“是以从属于贸易利益制定的”^[156]适应于一个霸权国家。阿姆斯特丹担负了花费，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她“感到有权发号施令。”^[157]为什么人们还要操心将国家中央集权化，如果没有它也能得到所要的东西呢？被雷尼尔（Renier）还有威尔逊（Wilson）称为“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独裁”^[158]无疑偶尔会受到它内部对手的竞争——反阿米尼斯教派（Contra-Remonstrants）与阿米尼斯教派（Remonstrants），奥兰治派（Orangists）与劳维斯坦（Loevesteiners）派，还有它可能被“贵族化”的缓慢过程逐渐腐蚀，^[159]虽然统治阶层的利益从来没有受到社会上更为保守的贵族的真正威胁。正如考斯曼（Kossmann）正确地发现的：“奥兰治（Orange）亲王们很少愿意并从未能取代荷兰的富豪政治。”^[160]

这个阶层也从未受到向下层的真正威胁；它的成员为社会和平付出了代价。荷兰的社会福利，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的社会福利，引起了外国访问者的“无条件的羡慕”，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些钱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没收的罗马天主教会的财产。^[161]不管怎样，尽管其他国家在17和18世纪也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却“为穷人提供如此充足的东西。”^[162]我们应当揭去面纱来看看荷兰福利国家的社会现实。荷兰资本主义的全部利润“很少造福于人民中的大多数。”实际工资最多在开始时有少许上升，在整个世纪一直下降；^[163]国家的繁荣与“许多工人群众更为贫穷”携手并进，阿姆斯特丹的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肮脏的旧房屋、地窖和地下室中。”^[164]

然而这怎么可能会有相对的社会和平呢？一个主要因素是对一些人而言，下降的实际收入为社会福利支出所平衡，它比中心国家的其他地方要高。^[165]第二个因素是阿姆斯特丹因其救济金的声誉，使其成为“邻近国家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的北极星。”这个秘密在后来的时代被纽约（New York）再度发现。一旦“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这种信念得其发展，^[166]工人们就从各地移居——恰足以使这个光明之城的工人阶级居民的劳动状况恶化，使那些人用一些多余的面包屑养活他们，使每个移民专注于发扬个人可能的长处上。所有这些需要权力、繁荣和少量的慷慨施与，和一点（souppgon）社会流动性——简而言之即一个霸权国家的典型社会政策。

国内的力量与国外力量是平行发展的。在17世纪前半期荷兰的舰队统治着海洋，到了使一支舰队统治海洋成为可能的程度。^[167]西班牙当然曾经是先前的居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荷兰人帮助英国人在1588年结束了西班牙人的“无敌地位”，而到1600年，西班牙的海军力量仍然还比荷兰的和英国的合起来要强。^[168]一连串的海军胜利改变了这点。在前面提到的在加勒比海的“海上屏幕”，在1634年拉起来了，当时荷兰人夺取了库拉索（CuraCao）。在1645年荷兰的舰队第一次控制了桑德（The

Sound) 海峡。^[169]这正如海权大理论家马汉上将 (Admiral Mahan) 所写的, “联合省靠他们的财富和舰队赢得了尊重和权力。”^[170]这种权力确实在1651年到1678年间这个时期, 在荷兰霸权的高峰受到挑战, 到18世纪来临时的战争时期, 荷兰比起法国和英国成为一个二等军事强国。但这正是荷兰经济霸权的后果。在17世纪中期到达这样一个转折点, 当积累的经济优势看来到了无法削减的程度, 以致英国和法国决定“荷兰必须将其用武力逐出竞争场。”^[171]当然在事实上, 甚至用纯粹的经济手段, 霸权也不能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延续下来; 但是不能因为对这种羁绊激怒而责怪英国人和法国人。我们认为, 国家是荷兰资产阶级用以巩固其经济霸权的重要工具, 这种霸权他们最初是在生产领域赢得的, 再扩展到商业和金融中去。竞争的中心国家和半边缘势力的国家, 在以后破坏这个霸权的过程中同样是重要工具。

文化领域中又是什么样呢? 难道没有思想、价值观、科学、艺术、宗教、语言、爱好和特色的地位吗? 当然有, 因为文化是人们将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追求披上外衣以表达它们, 隐蔽它们, 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它们, 并将其保存在记忆中的方式。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最内部的自我和我们最外部的自我, 我们的个人和集体个性。怎么会没有霸权的文化表现呢? 这种表现不一定是在所有方面的文化控制。中心国家通常控制着边缘地区, 灌输给人们以一种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低劣的意识; 但是一个霸权国家不能够与其他中心国家所做的相同。至多在后者而言, 一个霸权国家的文化能够起一种榜样的作用, ^[172]特别是技术上的榜样; 但是各种文化正是抵抗霸权出现的竞争场, 在那里人们求助于已有“文明”的历史价值来对抗市场上的一时优越性。这在今天是确实的, 在17世纪也同样确实。

在另一方面, 霸权国家确实在文化上处于卓越地位, 对它们的批评通常由酸葡萄心理产生的。首先, 他们有着物质需求和物质手段进行科学化的生产, 这种生产能力被引入了艺术。第二, 自由主义的政治培育

了文化爆炸，所有这些更有甚之，因为产生的开放政策经常导致从其他地方来的文化个性。第三，财富养成了奢侈，它寄生在文化外来品上，以至它损坏了财富本身的物质基础。明显地，应用科学是荷兰关心的重点。以前几世纪的技术优势正是荷兰农业工业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确实在17世纪，荷兰人忙于出口这种技术，我们已经提到这种转化是金融流入的一个来源。它当然也是文化影响的一个信号。在整个欧洲人世界，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普鲁士、波兰都有“荷兰村”（Hollandries），即住着进行筑堤和排水工作的荷兰移民的村庄。^[173]当他们出口其农业技艺时，——寻求降低造价，特别是改进航海技术。^[174]

在描述英国君主们如何在1669年到1750年之间鼓励有技术的工匠移民英国时，克拉克（Clark）说了一个理由，荷兰人到来是因为他们面对国内贵族的严重竞争，比起在像英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较容易的机会”更为不利。因为在17世纪的情况是“不管雇佣的行业如何微贱，如果它需要技艺，……我们发现荷兰人在其中就不会惊奇。”^[175]我们要想到这点，就不会惊奇在苏格兰有“特别帮派”。^[176]商业联系为宗教上的密切关系所加强，还有几代苏格兰人（Scotsmen）到尼德兰受大学教育的结果。这是18世纪晚期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关系上的另一个联系，它本身是不列颠工业浪潮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进步不是知识自由的附属物；但这确实是培育它的一个模式，而这是一个适合于霸权国家的模式。然而一个有疑问的矛盾是，知识上的自由主义总有它危险的一面，大多数特别是在国内方面。它的逻辑可能并不尊重统治阶层中派别间的政治妥协；它的口号可能鼓励低下阶层的反叛。因而霸权国家的方式是鼓励自由文化又加以控制，用竖立一块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动的石屏来指出其界限（特别是在国内），以便为占优势的统治者的利益保持政治经济优势，不被旋风所卷走。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对联合省意味着什么。在一方面，荷兰是“哲学

家的天堂”^[177]——包括笛卡尔（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和洛克（Locke），17世纪思想的三位大师。笛卡尔发现在荷兰有一种宁静和安定，这是他在法国记不起有的。斯宾诺莎被犹太移民教会（Jodenbreestraat）开除教籍驱逐出西班牙籍犹太人居住区，到了较为友好的荷兰市民居住区。洛克由于惹怒了詹姆斯二世（James II）而来寻求避难，直到一位荷兰人坐上英国王位的较为愉快的时代。当然，有许多受到更多迫害的知识分子，如夸美纽斯（Comenius）、儒里奥（Jurieu）和拜尔（Bayle），他们感谢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Rotterdam）的存在。^[178]它是一块法国胡格诺教徒（Huguenots）确信可以逃亡的土地；但是荷兰人是自由地欢迎胡格诺教徒和詹森教徒（Jansenists）、清教徒（Puritans），英国保王党人（Royalists）和辉格党人（Whigs）；甚至波兰的索兹尼教徒（Socinians）。所有这些人都是荷兰的商业公理的受益者：“禁止得尽可能少，接受任何地方输入的东西。”^[179]这种态度不只是表现了高等文化的荷兰人无缘无故的鉴赏；它是个好生意，对包括其中的每个人都如此。一方面，荷兰用它的“高薪水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吸引知识分子”^[180]——人才外流不是新近的发明。^[181]另一方面，欧洲世界经济中多个国家对立，自由地在荷兰印刷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182]意味着执政们（Regents）“懂得经济优势是来自出售书籍和小册子”；^[183]于是一些人“天赐的表达选择媒介”^[184]成为另一些人的商业利润。

然而这种事还有另一面。在1592年，正当联合省转变为世界强国地位开始时，第一次阿米尼斯（Arminian）争论爆发了。在新教主义神学盛行的日子里，当一切都是恩典和一切都是拯救时，阿米尼斯（Jacobus Arminius）要抓住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神学中最棘手的一支即预定论的推理谬误^[185]和心理学，确定堕落的信条。阿米尼斯驳斥恩典就是拯救的观点，即他的主要对手戈马尔（Francois Gomar）信奉的观点。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恩典是拯救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拯救的必须手段。这在20世纪人们的偏见中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区别，但它导致了17世

纪荷兰的一场最大神学辩论，在基督教欧洲可能也是这样。^[186]尽管阿米尼斯教派看来首先在荷兰的政治和经济圈子中有强有力的支持，但在短期内他们在这场辩论中失败，当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Synod of Dordrecht）在1619年举行时，反阿米尼斯派（戈马尔派）（Contra-Remonstrants, Gomarians）赢得了反对阿米尼斯派（Remonstrants, Arminions）的胜利，将后者驱逐出这个国家。当然，从长期看阿米尼斯派没有真正失败。这就是整个事件。

争论到底是什么呢？据荷兰历史学家雷尼埃（G.J.Renier）说，阿米尼斯派的公式意味着个人能够抵受或失去恩典，因而“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一部分为阿米尼斯派（Remonstrants）保存下来了。他们是人文主义的真正儿女。”也许如此，但是谁支持人文主义呢？^[187]阿米尼斯派明显是社会上的少数，但却是有力的，因为他们的政治基础是商人—贵族社会联系的产物。^[188]在另一边是正统的清教徒传道者（Predikants）吸引着朴素的家庭，在宗教宗议上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鼓动着城镇中的群众，并得到摩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和奥兰治派（Orangists）阵营的支持。^[189]戈马尔派（Gomarians）指控阿米尼斯派对天主教教义（Catholicism）持温和态度，这也许带给阿米尼斯派某些天主教徒心照不宣的支持；但是天主教徒是被镇压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190]在政治力量方面提供不了什么。

这种社会群体在两个阵营中的位置是粗略的但非不正确的。它对于这场辩论的意义能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看看为什么这场辩论转向反对阿米尼斯派。第二次阿米尼斯派辩论开始于1602年，在1608年达到高峰。第二次辩论比第一次要小题大做得多。虽然主要人物和神学题目都是一样的。改变了的是政治形势。1609年的休战（Truce）成为当时继续战争派和休战派讨论的题目。头一派包括奥兰治党人（Orangists），他们希望进一步加强英雄的行政长官的权力并取得光荣；新教的改宗者也仍希望合并南部尼德兰和根除天主教；一些商人他

们从海上私掠中抽取利润；民众阶层中一部分人为机会和对外国人的仇视所吸引，休战派由荷兰的国家辩护人（Land's Advocate）奥尔登巴恩威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领导，他为所有看到霸权的可能性的人讲话。他们的观点在这个世纪晚些时候由巴瑞尔（William Bareel）所总结，他在1654年12月18日写给奥尔登巴恩威尔特（Oldenbarnevelt）的精神继承人维特（Jacob de witt）说：“对我而言，对主权共和国最好不过的箴言和希望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和一切地方的和平，因为我们的贸易伸展到一切地方。”^[191]

在1608年10月30日，当关于休战的政治辩论达到其“激烈的顶峰”^[192]时，阿米尼斯（Arminius）发表了他的“观点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这两种辩论不可分解地纠缠在一起。奥尔登巴恩威尔特（Oldenbarnevelt）得到了他要的休战，但戈马尔（Gomars）在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Synod of Dordrecht）上得手。前者是为后者付出的代价吗？如博克塞（Boxer）所认为，这的确是如此，摄政阶级能够将加尔文教派的狂热者控制住，而不要“为虔诚而牺牲利益。”因为他们对宗教容忍的态度是“在本质上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193]把一些阿米尼斯教徒及时扔给狼群看来并非不合理的代价。——如果不是奥尔登巴恩威尔特（他在1619年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的同一年被处死），至少对他的阶级的其他人是如此。^[194]这种特别戏剧化的情节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熟知的戏剧脚本。文化容忍有它的界限，特别是在国内的界限。它不能允许播下颠覆的种子。它甚至不能允许造成统治阶层中根本的分裂。笛卡尔（Descartes）和洛克（Locke）受到欢迎，但是格劳秀斯（Grotius）被终身监禁。对斯宾诺莎（Spinoza）的主要著作下了禁令，他是位国内流亡者，虽然允许他居住和写作。当他去世时，他的葬礼伴随着“六辆马车和大量富裕的人。”^[195]不只是自由主义还要有自由。

在1618年一个威尼斯人（Venetian）将阿姆斯特丹看作是“威尼斯早

期的翻版。”^[196]到1672年这个时代过去了。霸权地位的果实“衰败了”，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痛苦，因为直到顶峰过去很长时间之前很少被觉察。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我们还可以争论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在那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像荷兰人一样将荷兰看作主要角色，至少到1763年，如果不是到法国大革命的话，做一个荷兰市民在物质上是非常满足的，无疑在精神上也是如此。衰落只能分析为上升，利润效率框架内其他人的上升。进一步继续我们关于霸权局限性的讨论，就必须从迄今以荷兰为中心的介绍，转到对联合省、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对应发展和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讨论。

这种形势开始在世纪中改变。三十年战争结束了；八十年战争也结束了。联合省最终开始感受到经济收缩的压力，这在其他国家已感受了30到50年了。英国内战结束了——还没有清算，但是结束了。在法国长达一世纪之久的激烈国内斗争正趋于结束。改革教派和反改革教派之间，“清教徒”和“初始自由派”（或“容忍派”）观点之间的基督教徒的战斗，被公开容忍和大部分私人化了。各个国家又喘了一口气，公共行政能够开始成为统治者集中关心的事情。^[197]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卡托-坎布雷（Cateau-Cambrésis）条约之后一个分裂主要是在国家之内的时代转向欧洲战争和政治，到了一个分裂再度主要在国家之间的时代。这后一个时期从1651年开始，即第一次英国—荷兰战争开始的时候，到1763年七年战争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分裂的区分是武断和模糊的；但无论如何，它可能对强调一个时代的主调是有用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事情，并在许多的伪装之下曲折地出现。这个时期若导致直到一个霸权国家实现统治，似乎有利于国内形成一种模式，让那些在市场上追求阶级优势的人企图消灭从较早时代遗留下的国内政治束缚。而在霸权衰落的时期似乎有利于形成一种国家间模式，让那些在市场上追求阶级优势的人企图消灭从较早时代遗留下的国家之间的政治束

缚。[\[198\]](#)

在17世纪中，很明显英国和法国都有兴趣用武力消除荷兰的一些经济优势并自己取而代之。因为市场的优势从一方转到另一方不是那么轮廓分明，而荷兰人仍是相当强有力的，并且因为如普鲁士（Prussia）、瑞典（Sweden）和奥地利（Austria）这些半边缘国家的兴起，它们从一个缺乏军事优势的国家寻求利润，用了一百多年局势才得以明朗化。到1763年英国排挤了法国（及荷兰）的情况明朗了，不列颠能够向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推进。到1763年普鲁士在半边缘竞争中成功地向排头前进也变清楚了，它决定了将来中欧的政治进程，边缘地带重新改组的收缩也完成了，世界经济准备好开始进一步的地理和经济扩张。

[\[1\]](#) 盖尔（Geyl）（1961，37~38）。

[\[2\]](#) 琼斯（J.R.Jones）指出了这些在不列颠和联合省之间的特别地带以供比较（见1966，40）。

[\[3\]](#) 对这场辩论的一个很好的概览见科尔曼（Coleman）（1969）。然而，我不能同意科尔曼的观点，即虽然重商主义是“历史编纂学中”作为一个政策标签“难以界定的东西”；它作为对经济理论的一种描述是有用的（1957，24）。我想正好相反的是真实的，即理论是模糊多变的，因为它们具有辩护性，而处于一定地位的国家倾向采取的政策，我们称之为重商主义的。

[\[4\]](#) 维恩（Van Veen）（1950，11）。对尼德兰的地质状况在它为人类干预的结果而改变前简明的描述，见舍费尔（Schöffner）（1973，9~13）。

[\[5\]](#) 见威尔逊（Wilson）（1941，3）。安德鲁斯（Andrews）将这种说法追溯到等级会议在1624年7月19日的一个公告（1915，541）。塞默因斯（Meynert Semeyns）在1639年写道：“荷兰人捕到了更多的鲱鱼，并将其预制得比其他国家想要的都好；上帝通过鲱鱼这个工具，使荷兰成为整个欧洲的交易与产品市场。鲱鱼业使荷兰的贸易运转，荷兰的贸易又使世界在运动。”（Corte beschryvinge over de Haring vischerye in Hollanat）。引自博让（Beaujon），（1884，60~61）。法国分析家卢阿扎克（Luzac）在1778年写道，捕鱼业是“（荷兰）商业的摇篮”（I，19）。

[\[6\]](#) 见詹森（P.H.H.Jansen）（1978，13）。昂格尔（R.W.Unger）更为精确地指出了这种船首次出现的时间，是于1415年在霍恩（Hoorn）（1978，30）。

[7] 昂格尔 (Unger) (1918, 30)。在开始这个比例是2.5:1, 到1570年是4.5:1。“显著地比甚至最先进的帆船还大。”但是这种比例有技术上的局限:“拉网不能太大。”

[8] 见昂格尔 (Unger) (1978, 29~30)。

[9] 见舍费尔 (Schöffner) (1973, 72~73)。腐坏发生在24到48小时之内。见米歇尔 (Michell) (1977, 142)。

[10] 米歇尔 (Michell) (1977, 148)。他注意到这种船是“一种只在最近才重新进入捕鱼业的。”在船上有三种工人:清理工 (去除内脏), 腌制工 (加盐) 和打鱼工。

[11] 见帕里 (Parry) (1967, 172)。

[12] 他们就能够利用三个捕鲱鱼季节:一个在6月和7月, 在奥克尼群岛 (Orkneys) 周围、设得兰群岛 (Shetlands), 和苏格兰 (Scotland) 北部; 一个在8月, 从苏格兰的邓巴 (Dunbar) 到约克那 (Yorkshire); 一个在9月到11月, 在亚茅斯 (Yarmouth) 岸处。见米歇尔 (Michell), (1977, 139)。鲱鱼以“穷人的牛排”而闻名。在荷兰和西弗里斯兰 (West Friesland) “季节中的第一批鲱鱼用马车奔运入内地, 彼此竞赛争取首先达到市场。” (Michell, 1977, 180)。

[13] 见帕里 (Parry) (1967, 167~173)。

[14] 米歇尔 (Michell) 指出这一点并说:“捕鲸业的过程因而更多反映着欧洲的工业史而不是人口史。英国人在其重商主义霸权的高峰时设想达到鲸产品的自给自足 (更不用说剩余了), 而荷兰人尽管经济总的衰落了, 还维持着他们的地位, 这是有趣的。” (1977, 171)。

[15] 米歇尔 (Michell) (1977, 180)。

[16] 威尔逊 (Wilson) (1968, 64)。对此的反应, 如坎宁安 (Cunningham) 在1887年提到的, 是“有意识地效仿荷兰人”这些话被作为他的《英国工业和商业的成长》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第一版第五卷 (Book V) 第二章的标题。 (Clark, 1960, 15)。

[17] 引自威尔逊 (Wilson) (1957a, 3)。

[18] “我们怎么能忽视荷兰农业的显著发展和低地国家在17世纪经济图景中的突出地位之间的关系呢?” [马德莱那 (De Moddalena), (1974a, 313)。确实怎么能呢?]

[19] 见琼斯 (E.L.Jones) (1967, 147)。

[20] 维恩 (Van Veen) (1950, 145)。

[21] 见维恩 (Van Veen) 的图表 (1950, 65)。巴特 (Slicher Van Bath) 考察了农业价格

和填造低地之间的正相关联系。“很明显突出的，是1664年之后填造低地的伟大时期结束了，就在这同时谷物的价格就开始下降，总的经济形势恶化了。”（1977，69；也见70，图表4）。

[22] 见戴维斯（Davis）（1973b，112~113），巴特（Slicher van Bath），和威尔逊（Wilson）（1977a，23~24）。对巴特，这种集约强化“对于在相对低粮价的时期对于增长着和稠密的人口，谋生是必需的。”但是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做这么多呢？戴维斯提出的论证是，英国和法国比不上荷兰先进，是因为荷兰在13与14世纪的改进到15和16世纪才传播给他们，欧洲在其扩张主义阶段，因而不那么愿意接受集约强化技术，特别是因为在1450年到1650年之间农民们在控制已耕土地和良好牧场的最高点，并且是最不打算革新的阶级。他认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7世纪不和荷兰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23] 土地是不适合的，除了“一些有利的地区，那里土地位置相对高并且干燥，如荷兰的沙丘海岸，马斯河（Maas）以南岛屿的一部分，弗里斯兰（Friesland）的海岸黏土”[德弗里斯（J.de Vries），（1974，71）]。

[24] 吉布斯（Gibbs）（1957，693）。

[25] 德弗里斯（1974，136~144）。

[26] 德弗里斯（1974，172）。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最大限度利润的问题。“一个试探性的结论可以提出来，即贸易的增长使粮食价格便宜，而粮食在北部尼德兰只能以高代价生产。如果是这样，这个地区的经济以相对低的粮食价格的方式节省了大量的钱，这就给予粮食以当时在任何经济中具有的重要性，将资金可以用于其他目的。”（182页）。也见德维（Van der Wee），他认为在1500年到1670年间尼德兰北部生产力的上升倾向“主要是明显专门化的结果：粮食全部（en masse）从波罗的海进口，这样海岸地区就能集中生产奶产品、园艺和经济作物，供给增长的城镇中迅速增加的富裕人口”（1978，15）。一个对波罗的海粮食贸易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的观点是由格拉曼（Glamann）提出的，他反驳的根据是内地贸易，并以莱茵河（Rhine）、佛兰德（Flanders）、法国北部和英国加以说明。（原文如此！1977，231~232）。

[27]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55，181）。

[28] 巴特（1960，132，147~148，1955，176~178）。

[29] 德弗里斯（1974，142~144）。

[30] 德弗里斯（1974，150）。

[31] 罗曼诺（Romano）（1962，519）。

[32] 见例如威尔逊（Wilson）的总结性论述：“有时（荷兰共和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经济，没能设法转轨到工业社会阶段。……就17世纪的情况而言是夸张其词……大量技

术……合理地集中在经济上高度有利可图的加工业，即原料或半制成品的完工或精制，这刺激了货物在货栈和市场的流通。”（1968，30）。

当代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彻（J.J.Becher），利奥波德一世皇帝（Emperor Leopold I）在维也纳（Vienna）的经济顾问，提倡鼓励制造业，他在1673年写道：“荷兰人生产丝，它却不在这个国家出产；他们从外国人那里买亚麻和大麻，生产花边和美丽的细麻布再出口；他们生产皮革的原料来自外国，再供出口”，*Politischer Discours*，第二版，法兰克福（Frankfurt），1673，173页，引自克里马（Klima），（1965，97）。

[33] 莱登（Leiden）在1350年后是供出口的纺织品的一个重要生产地。见詹森（Jansen）（1978，11）。詹森认为荷兰的工业在1350年到1400年这个时期有一个关键的增长；由于较少受到黑死病的冲击，受人口减少的影响较小，荷兰“能够更好地与其人口被大批毁灭和时常有敌意的行会组织的周围地区竞争”（第7页）。

[34] 费伯（Faber）及其他地方（1974，7）。

[35] 威尔逊（Wilson）（1965，55）。格拉曼（Glamann）更多地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看待这种形势：“对1620年至1700年这个时期略一观察，显示出当毛纺业在英国衰落而毛织业在繁荣，而莱登（Leiden）确实正好相反。莱登的毛纺业以拉肯斯呢（Lakens）闻名，在与英国产品的竞争中处于良好地位，而英国人在毛织业中领先”（1974，505），然而要注意，威尔逊说的大约是1570年到1670年。当休战（Truce）在1621年结束，切断了作为纺织品出口市场的西班牙控制领土，伊斯雷尔（Israel）将这看作荷兰便宜、轻薄的呢绒业的一个明显挫折。“莱登（Leiden）设法用扩大旧式呢绒业的生产来补偿它的损失，著名的拉肯斯呢（Lakens）更为适合于欧洲北部市场，但虽然在莱登生产的纺织品的总价值在1621年到1648年间无疑增加了，（旧式呢绒比新式呢绒昂贵），从生产呢绒的数量和所需劳动力的角度看，莱登事实上衰落了”（1977，61）。据戴雍（Deyon）说，这种他将时期定为1650年之后的变化，是蒂尔堡（Tillburg）、韦尔维埃（Verviers）和布瓦勒迪克（Bois-le-Duc）竞争的结果，与莱登因生活高消费和工资的高水准而处于劣势有关。莱登……放弃了最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并）再度投入奢侈品生产，粗呢布、混合山羊和骆驼毛的驼绒（Camelots）（1978d，267）。

[36] 阿斯特罗姆（Åström）（1963，61）。列举的第三个因素是“殖民地产品”。

[37] 萨普勒（Supple）（1959，34）。

[38] 威尔逊（Wilson）（1965，71）。威尔逊说总的看来，“最大的利润盈余”来自“染色和梳理呢布的精致技术，（必然）提供了控制市场的关键”（1968，29）。

[39] 威尔逊（Wilson）（1957a，40）。

[40] 见克伦本茨（Kellenbenz）（1957a，40）。

[41] 威尔逊（Wilson）（1973，329），也见米歇尔（Michell）：“荷兰人真正的成就不是建造大船，而是在他们的产品中达到相适应的质量”（1977，152）。

[42] 见昂格尔（Unger）和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5，618）。

[43] 见克莱弗恩（Van Klaveren），（1969a，183）。

[44] 见奈什（Naish），（1957，493）；也见塞拉（Sella），（1974，392~394）；巴伯（Barbour）将荷兰造船比英国的造价低归因于这个事实，即英国人不能更便宜地进口木材和其他材料——在造船业中原料的价格是劳动力价格的8倍。荷兰人的优势是“便宜的购买，低价的船运费，和低关税”（1954，238）。

[45] 威尔逊（Wilson）（1977a，39）。

[46] 阿姆斯特丹在1661年有60个炼矿厂。大多数法国和英国殖民地的矿在这里提炼，直到1660年英国的航海法案，和柯尔伯（Colbert）实行类似的限制时为止。见梅斯菲尔德（Masefields），（1967，293）。

[47] 见费伯（Faber）及其他地方（1974，4~10）。戴雍（Deyon）（1978d，289）；萨普勒（Supple）（1977，429）。关于书籍生产，见哈扎尔（Hazard）（1964，112），他指出晚至1699年，10个主要的书籍印刷中心有5个在荷兰，只在阿姆斯特丹就有400个印书商。

[48] 见克莱因（Klein）（1966，195~197），和巴伯（Barbour）（1963，35~41）。

[49] 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1973，145）。谈到20世纪的环境，海默（Stephen Hymer）和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说：“我们的观点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主要转换不是闲暇和懒惰被工作取代，而是家庭生产的落后方式向以专门化和交换为基础的先进方式的转换”（1969，503）。这难道不是对那时在联合省发生的事的很好总结吗？

[50] 帕克（Parker）试图评估荷兰起义的正面和负面经济影响，结论是从整体上，它带来的损失大于收获，虽然不是很多（1974b，11~15）。威尔逊（Wilson）站在另一方面说：“在四十年战争之后，尼德兰北部基本的经济力量从来没有比在1609年休战时更大”（1968，22）。这两种估价不一定必然矛盾，如果将威尔逊的论述作为对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估价的话。

[51] 伦敦，1673年。178页。引自弗尼斯（Furniss）（1957，102）。

[52] 见霍特（Van Houtte）对安特卫普（Antwerp）衰落阶段的分析（1962，707~712）。

[53] 见莫尔斯（Mols）准备的引人注目的地图（1974，63），也见詹宁（Jeannin）（1969，71）。

[54] 见赫雷那（Helleiner）（1967，46）。

[55] 考斯曼（Kossmann）（1970，366）。

[56] 弗林登（Verlinden）（1964，329）。在荷兰在对威斯特伐里亚（Westphalia）低阶层

寻求他们的运气的人们的吸引力方面，见比尤廷（Beutin），（1939，131~132），关于整个德意志西北部，见库斯克（Kuske）（1956，255）。

[57] 詹宁（Jeannin）（1969，75）。我们甚至看到作为这种斗争的反应的类似于20世纪的城市规划。在1585年到1622年之间，建设了阿姆斯特丹的三条大运河——赫伦格拉希特（Heerengracht）、凯瑟格拉希特（Keisergracht）和普林森格拉希特（Prinsengracht）。随后，有污染的工业——酿酒业、金属制造业、染料业、玻璃制造业、炼矿业，——在城市中心被禁止。“它们被限制在城市外的一个工人区，在西部的约尔达安（Jordaan），投机家为移民建造了低矮的小屋，在那里执政们（Regents）的社会安全机构（Prévoyance，储金互济会）设置了几个慈善机构。这是系统地划分地区的第一个例子，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色彩。”戴雍（Deyon）（1978e，299）。

[58] 甚至在粮食这种相对次要的农业产品中，在17世纪有着从大麦向小麦的转换，“一种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的庄稼”德弗里斯（J.de Vries）（1974，148）。

[59] 这个时代的这种说法见于克拉克（Clark）（1960，14）。

[60] 这引语出自利普森（Lipson）（1956，III iii）。也见利普森（1956，III，10~11）。帕里（Parry）（1967，176，210）。格拉曼（Glamann）（1974，452）和明钦顿（Minchinton）（1974，164）。鲍曼（Bowman），说在1650年，在世界运货贸易的2000只船中，荷兰船只数量在1500—1600只（1936，338）。

[61] 引自《英国商业中的一人》（*A M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第192页。引自威尔逊（Wilson），（1941，4）。

[62] 库尔纳尔特（Coornaert）（1967，244）。

[63] 对于东印度公司（VOC）的法律结构的描述，见拉布（Rabe）（1962，351~366）。

[64] 尽管桑巴特（Werner Sombart）声称如此；并且名字、外表类似，库恩（Coen）不是科恩（Cohen），他不是犹太人。对于考察为什么库恩（Coen）的父亲把其家族的姓氏由退斯特（Van Twisk）改为库恩（Coen），见马塞尔曼（Masselman）（1963，229~230）。

[65] 他们不只要绕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跨过里斯本（Lisbon）也跨过印度，以到达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贸易来源地。见帕里（Parry）（1967，195）。

[66] 见马塞尔曼（Masselman）（1963各处，特别是62~66和141~179）。莫里诺（Morineau）强调这个事实，即在欧洲由于香料缺乏而造成高价格（1978c，133）。

[67] 见邓肯（Duncan）（1975，512）；也见格拉曼（Glamann）（1974，477），他提到：“如此有说服力的是‘大西洋’胡椒对‘地中海’胡椒的胜利，以至它再出口到地中海东部（Levant）。”关于更早时期，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15~216，325）的讨论。

[68] 帕里 (Parry) (1967, 199)。

[69] 格拉曼 (Glamann) (1974, 483) 使用了这个暗喻, 他强调欧洲对香料的有限需求。里奇 (Rich) 注意到这个并行问题中两相关联的另一方面: “香料贸易要以这个事实为条件, 香料群岛 (Spice Islands) 除了火器枪炮外, 对欧洲产品需求甚少, ……荷兰人在这里遇到的是他们的皮毛商人在北美洲遇到的同样问题。一旦他们直接的需要得到满足, 岛民们对贸易就毫无兴趣” (1967, 368)。梅林克—勒罗夫兹 (Meilink-Roelofs) 的说法类似: “在亚洲对欧洲产品几乎没有什么需要” (1968, 66)。

[70] 莫里诺 (Morineau) (1978e, 170)。

[71] 见马塞尔曼 (Masselman) (1963, 433~442) 决非不典型的讨论。

[72] 库恩 (Coen) 在写给“十七位绅士” (De Heeren Zeventin) 的一封信中说: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势力给予人以更好的权力, 并在将武力加诸权力上。”引自博克塞 (Boxer), (1965, 98~99)。确实, 根据盖尔 (Geyl) 的评价, 东印度公司 (VOC) 是“在印度洋世界中用刀剑的权力” (1961, 188)。关于说到“十七位绅士” (De Heeren Zeventin), 博克塞说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有三类贸易: 他们有着领土控制权的地区 (数量很少); 他们有垄断性契约的地区; “自由贸易”地区。这最后一类如博克塞所评论的, “常常是近于最重要的” (1965, 94)。帕里 (Parry) 说除了“长距离贸易”外, 荷兰人面对着中国人、马来人、阿拉伯人, 和非荷兰的欧洲贸易商的积极竞争 (1967, 197)。英国人能够与荷兰人在东印度 (Indies) 贸易中竞争而不能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竞争的一个理由之一, 正是必须利用“富人”贸易与“大宗”贸易的对立。造船的费用与大宗贸易关系更大, 因为这个原因, 英国人在那时作为“丧失的贸易”而勾销了它们。在东印度群岛 (和在地中海), 货物运载倾向于按价值比例而言体积和重量较小, 并且武装船只要比速度和效率更重要。荷兰在这个领域的相对优势较小。[巴伯 (Barbour), 1954, 230~231]。确实, 昂格尔 (R.W.Unger) 谈到英国人“在危险的贸易中有着相对优势”——并不只是在远东——因为他们使用“坚固并有良好武装的商船” (1978, 110)。在地中海, 私掠的获利之道是如此之多, 以致它在17世纪早期是一个“巨大的……工业, 部分是大规模并由富商井然有序地组织起来的。”戴维斯 (Davis) (1964, 127)。当1618年, 海盗船队比所有地中海国家的舰队合起来还要强大。

[73] 如格拉曼 (Glamann) 提到的, “胡椒的可分性与它的耐久性结合起来……使它成为投机的极好物品。它能够保存很长时间; 有例子得知胡椒放在仓库中30年以上, 这当然会影响到质量, 但是这能够用混入新鲜胡椒改进” (1974, 475)。然而, 克莱因 (Klein) 论证说更为普遍地是, “荷兰人实际贸易在17世纪的成功部分是由于富商熟练的投机, 用他们贮藏的货物操纵市场” (1970, 33)。

[74] 见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

[75] 库尔纳尔特 (Coornaert) 提到欧洲人在17世纪不愿意创建“大陆体制”。只是在这个时期到末尾和在18世纪中“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帝国才开始形成” (1967, 265)。类似地, 舍费尔

(Schöffner)谈到这个事实,“本地人口最初几乎没有为这个公司的影响所触及。”舍费尔说,直到19世纪,荷兰人的存在对海岸人民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商人和行政官员取代了阿拉伯人和中国的商人(1975,75)。这当然基本上类似于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描述的葡萄牙人在16世纪亚洲的角色(1974,第6章)。见帕赫(Pach),他得出同样的观点。(1973,60~61)。确实,在1680年之后有限地使用荷兰的“咖啡卫士”负责管理外国地区的本地人种植者,但类目使用是有限的。见里奇(Rich)(1967,370)。加阿斯特拉(Gaastra)注意到随着金银流出的增加,在18世纪贸易类型的转换,但作为进口的纺织品、茶和殖民地产品也有转换(1976,18~19)。看来矛盾的是,是荷兰在亚洲内部贸易中作用的衰落解释了金银外流的增加。这事实上是边缘化的一个信号,正如金银流出的增加是需要将其用作货币而不是奢侈装饰品的结果。

[76] 马塞尔曼(Masselmann)(1963,460)。这论证了垄断包括某种扼杀贸易的掠夺:“两种以前繁荣的主要来源,香料的种植和自由船运被剥夺了,这些中世纪的著名公国,德那地(Ternate)、蒂多雷(Tidore)、马特詹(Matjan),和巴詹(Batjan),降低到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准。这就是欧洲企业家中有决心的集团有着有价值产品者引诱的贪欲而带来的惩罚。……到17世纪末,本地人变得如此穷困,以致他们不再买得起(印花布)而自己来织。”(461页)。

[77] 马塞尔曼(Masselman)注意到香料以两倍半到三倍于它们的原价值出售,平均每年付出的股息在17世纪是18.7%。尽管这样,九十年之后,公司负债为400万基尔德(guilder)。马塞尔曼说这“揭示了这个事实,即维持垄断的费用吸收了全部而不是一部分毛利。”(1963,466)。从公司的共同观点看这是确实的,但这对于公司的大投资者确实如此吗?在莫里诺(Morineau)(1975)一篇关于所谓与遥远国家收支平衡不利的贸易的吸引人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等于二”,即商人们只是在回程中将价格加倍,因而金银流出的数量不像看来那样。它事实上表现得是欧洲收入的内部交换。

[78] 帕里(Parry)(1967,189),和伊斯雷尔(Israel)(1977,37)。罗曼诺(Romano)将这个转折点的时期定为1611至1612年,他注意到为相关的事务,叙利亚(Syria)、巴勒斯坦(Palestine)和埃及(Egypt)于1611年首次设立了一个领事馆(Consul)(1962,489~491)。帕里(Parry)将1612年看作荷兰贸易由于荷兰人确保了他们与土耳其人(Turks)的协定的结果,而“充分合法化”的时机。罗曼诺(Romano)注意到到1612年船运吨数要比东印度公司(VOC)的多。

[79] 见拉普(Rapp)(1975)。也见帕里(Parry)(1967,188)。他提到在1593年到达里窝那(来亨,Leghorn)的219只船中有73只运载粮食。如果要问意大利北部用什么交换它的进口货,答案是前一时期所积累的资本。因而粮食进口在那时对于威尼斯比阿姆斯特丹有着根本不同的重要意义。对于阿姆斯特丹它意味着不要浪费精力生产粮食,当时生产纺织品、船只和其他形式的农业更为有利可图,因而可获得不平等交易的好处。对于威尼斯它意味着为经常性消费大量吃掉资本,一个很好的可以应用的“衰落”定义。

[80] 帕里(Parry)(1967,189)和戴维斯(Davis)(1967,188)。拉普(Rapp)在讨论

荷兰（和英国）在地中海取代威尼斯的成功时，指出北方强国在商业活动中没有引进什么可以解释其成功的新东西。他们必须提供的是在工业生产上的竞争优势，用它可以将“衰落”强加给威尼斯（见1975，499~501）。

[81] 帕里（Parry）（1967，189）。

[82] 威尔逊（Wilson）（1968，206）。他讨论了东印度公司（VOC）和西印度公司之间的不同（第十二章，206~229）。

[83] 人们但是应记得，虽然阿姆斯特丹的政策是“在传统上热爱和平的.....但当生意利益受到威胁时，如在1645年、1657年和1668年，或是当共和国的存在（和其贸易）濒于危险时，如在1672年，这个强有力的城市不再处于被动，而是倡导一种强有力带侵略性的政策”[弗兰肯（Franken），1968，6~7]。

[84] 见肖努（Chaunu），（1959，1200~1202）。戈斯林加（Goslinga）说它“被看作加尔文教派（Calvinism）和反阿米尼斯教派（Contra Remonstrantism）的坚强堡垒”，在1629年阿姆斯特丹市政会（City Council）抱怨北方人为布拉邦人（Brabanders）的利益做出了牺牲，也就是指南方来的逃亡者（1971，287）。

[85] 戈斯林加（Goslinga）（1971，39）。

[86] 见旺辛克（Wansink）（1971，146）和戈斯林加（Goslinga）（1971，109）。

[87] 威尔逊（Wilson）（1968，210）。琼斯（J.R.Jones）将荷兰西印度公司称为“一个侵略性的半海盗式团体”，并认为它的态度对三次英荷战争负有很大责任（1968，44~45）。荷兰历史学家也强调它的政治性质。霍博金（Van Hoboken）说：“最终（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命运，它的兴起和衰落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因素所决定（1960，42）。戈斯林加（Goslinga）强调这只是两个公司在寻求利润的方法上的差别。在东方收获由贸易来寻求，必要时辅以武力，而在西方利润来自私掠”（1971，91）。

[88] 斯普纳（Spooner）得出的观点是荷兰人在东印度胜过英国人的优势之一，是他们控制了白银（它更为需要这个事实，而英国人只能提供黄金）（1956，68）。

[89] 帕里（Parry）（1967，204）。斯吕特（Sluiter）（1948）实质上得出同样的论点。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342，n.197）对其背景的讨论。

[90] 见埃默（Emmer）和里奇（Rich）（1967，333）。

[91] 见昂格尔（Unger）（1959，206）。确实相对的控制从1600年到1660年增加了。而利润相应地从100%增长到200~300%。见博古卡（Bogucka）（1973，439）。

[92] 当英国船只运载英国货时，荷兰船只装载着从西班牙往北到波罗的海之间所有西方国家的货物。见东斯多夫斯（Dunsdorfs）（1947，20）。

[93] 萨普勒 (Supple) (1959, 83) 和欣顿 (Hinton) (1959, 19)。欣顿加上第三个因素, 荷兰人“精明的活动”这可能起了某些作用, 但也不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 英国人利用荷兰人的成功使自己的经营合理化。

[94] 莫里诺 (Morineau) (1978d, 144~145)。“粮食在数量上显然表现出是荷兰人与波罗的海贸易唯一最重要的商品” [费伯 (Faber), 1966, 115]。

[95] 见米歇尔 (Michell) (1977, 177)。

[96] 见欣顿 (Hinton) (1959, 14~16)。

[97] 见萨普勒 (Supple) (1959, 86)。威尔逊 (Wilson) 说, 货币伪造时代 (Kipper und Wipperzeit) 给英国商人带来的只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由荷兰人竞争引起的 (1965, 55)。

[98] 见欣顿 (Hinton) (1959, 29~30)。

[99] 欣顿 (Hinton) (1959, 9~10)。

[100] 史密特 (Smit) (1968, 21)。

[101] 见舍费尔 (Schöffner) (1973, 89)。他观察到“这将留给佛兰德人 (Flanders) 对北方无尽的怨恨。”也见博克塞 (Boxer) (1965, 92)。斯凯尔特河 (Scheldt)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一直关闭。对于许多关于它的谈判, 见休伯特 (Hubert) (1909, 641~646)。这种限制最终在1795年5月16日由海牙条约 (Treaty of the Hague) 所取消。

[102] 德弗里斯 (De Vries) (1974, 204) 和库斯克 (Kuske) (1956, 232~233)。策乌 (de Zeeuw) 指出, 泥煤的利用是一个地质上的巧合, 在这里泥煤是“在非常接近, 部分甚至正好在整个地下水水位之下”, 这是由“在全新世升起的海平面”所造成的 (1978, 5)。泥煤给了荷兰人“便宜的燃料”, 用它来“经营以热加工为基础的工业”, 他们因而“能够生产易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货物” (23页)。荷兰人世界竞争力的衰落直接与后来的事件有关。首先, 竞争场由于易于进入的地带用完的结果变得更为昂贵, 被迫用更深的疏浚获得更远的地区, 或是靠延伸可以到达的运河。第二, 运输因为港口和河流变窄而更为困难。(见25页)。

[103] 威尔逊 (Wilson) (1977a, 24)。

[104] 见德弗里斯 (De Vries) (1974, 202~209) 和 (1978)。

[105] 昂格尔 (Unger) (1978, 52)。

[106] 威尔逊 (Wilson) (1957a, 2)。

[107] 见帕里 (Parry) (1967, 211)。

[108] 威尔逊 (Wilson) (1941, 6)。

[109] 莫里诺 (Morineau) 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法国南部的船上的水手吃得同样好 (1970b, 118), 关于在17世纪荷兰船运上提供的高卡路里 (caloric) 消费的讨论, 见莫里诺 (1970a, 114)。尽管如此, 博克塞 (Boxer) 得出了荷兰船员的低工资是解释低船费的一个因素的观点 (1965, 66~67)。

[110] 昂格尔 (Unger) (1978, 4, 也见p.183, n.7)。

[111] 威尔逊 (Wilson) (1957a, 42)。

[112] 至少可以说, 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 “保险业比其他地方处理得不那么非专业性”。[巴伯 (Barbour), 1929, 580]。巴伯报告说英国船只在17世纪在荷兰通常得到了它们的保险费。“尽管保险费率通常比在伦敦应用的要高。” (p.581)。它在表面上是令人困惑的。如果巴伯在经验上说是正确的, 必然名义上的费率和实际费率是不同的, 这可以用荷兰商业组织较高的效率来解释, 它在总体上是一个重要的可变量, 如我们就会看到的那样。无论如何, 巴伯后来写到荷兰海上保险业对一般欧洲人的吸引力 (见1963, 33~35)。

[113] 威尔逊 (Wilson) (1967, 518)。

[114] 威尔逊 (Wilson) (1941, 10)。诺思 (North) 和托马斯 (Thomas) 宣称是如此, 因为“市场或是交易这领域.....在那时是生产率能够发现有大的收获的领域” (1973, 135)。

[115] 哈克谢尔 (Heckscher) (1935, I, 352)。

[116] 对塞拉 (Sella) 而言, 是这些合股船运公司 (reederij), “使得荷兰的商业船队在1500年到1700年间壮观的十倍增长成为可能。” (1974, 411)。

[117] 格拉曼 (Glamann) 说到“普通商人”“大规模”参与了“17世纪荷兰的商业扩张”; 特别列举了他们在谷物、盐、鲱鱼、木材, 和砖贸易中的作用 (1974, 519)。尤其是造船工业特别在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里适合于小投资者。斯卡梅尔 (Scammell) 谈到英国时说: “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随着对土地竞争的激化, 与在荷兰发生的类似, 一只船, 或者不过是一只小艇, 可能是下层低微的人拥有的那种资本的唯一出路” (1972, 404)。

[118] 克莱因 (Klein) 相信这种制度于17世纪“实际上为荷兰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他认为这种垄断活动的推行——“同业的或各制造环节业的价格协定, 国内或国外垄断的特许权”——这使得创建本质上是保险股的“冒险企业”成为可能; 因为否则“成功的商人 (将会是) 掠夺利润的竞争者的公开打击对象” (1966, 188~189)。这些垄断是有效的。格拉曼 (Glamann) 注意到粮食“确实不夸张地说, 在17和18世纪, 荷兰大城市著名的谷物交易 (确定着) 欧洲的粮食价格” (1974, 457)。对于列日 (Liège) 的价格在1630年到1738年间如何依赖阿姆斯特丹的价格的证据, 见卢维特 (Ruwet) (1957, 101)。

[119] 在18世纪，委托制变为一种由代理人（agent）支付相似价格（低估价）的3/4，但为其预先支付收取中等的利息，直至货物售出。威尔逊（Wilson）认为这是一个“滑坡”。当代理人从完全的委托生意转向船运和搬运业，提供承兑信贷，他们就从银行业转向投机和冒险。“当委托贸易变得越来越间接，不可靠和欺诈的因素就变强了。”（1941，12）。

[120] 当戴维斯（Davis）提到17和18世纪的尼德兰时说：“确实，区分商业和工业资本是困难的。”（1973b，232），但是如萨普勒（Supple）注意到的，“对于商业企业家而言，投资或经营制造业完全是一种正常和预期的活动。”（1977，424）。

[121] 这个说法来自欣顿（Hinton），他将荷兰的货物中心贸易看作“形成17世纪英国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单一因素”（1959，10~11）。

[122] 格拉曼（Glamann）谈到粮食贸易的传布像“一个池塘中的波纹”。不仅是粮食的装载和卸货，而且保护股制度导致仓库的建立，它们中有约3/4专门用于粮食贮存。由此需要经常翻动粮食“以防止生芽和自燃”，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1974，461）。布里格斯（Briggs）指出在船运和仓储需要之间，阿姆斯特丹在1610年开始了一个“引人注目和野心勃勃的中心扩张规划，……将居住区扩大4倍”（1957，294）。

[123] 库伯特（Coubert）（1970c，27）。

[124] 卡尔斯坦（Carsten）（1961，13）。将与法国的预算相比较，在1610年到法国大革命之间只在1662年到1671年这10年有盈余。见帕克（Parker）（1974a，575）。

[125] 霍默（Homer）（1963，98）。

[126] 见维拉尔（Vilar）（1974，249）。

[127] 见帕克（Parker）（1974a，573）。有一个国家“在一般时期”仍过得更好，这里指的是热那亚（Genoa）。

[128] 霍默（Homer）（1963，124）。在其他事情中，如霍默所指出的“靠好的信用，可以雇用德意志佣兵来保卫国土。”（125页）。

[129] 这是格兰瑟姆（Grantham）试验性的论证（1975，65）。凡·德维（Van der Wee）提供了另一个动机：“荷兰共和国（有意高估）银的价值，以便在17世纪供给阿姆斯特丹加上白合金的贵金属，以应付出口到波罗的海和远东的迫切需要”（1977，297）。

[130] 巴伯（Barbour）（1963，44~45）。

[131] 巴伯（Barbour）（1963，46），他注意到在这个世纪两次英国政治危机中，个人把资金转移到尼德兰。卡斯提罗（Castillo）类似地注意到1649年四只船到达阿姆斯特丹的“奇怪事件”，带着未铸造的多于300万杜卡特（Ducat）的原料。[条状或圆状的金银（en barrasy piñas）]。他说这些可能是西班牙犹太人（Marranos）遣还的货币财产，因为西班牙在1648年

破产了。“资本主义当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是知道怎样不必顾及意识形态和国界的”（1964，314）。德·鲁弗（De Roover）说，“在16世纪后半期，阿姆斯特丹取代热那亚（Genoa）成为世界贵金属市场”（1974b，227）。

[132] 格拉曼（Glamann）（1974，540）。

[133] 帕克（1974a，550~551）。他的图表显示出在1700年前后阿姆斯特丹作为这样一个交易中心对伦敦的明显优势。维拉尔认为（Vilar）这种情况保持到1763年（1974，257）。也见霍默（Homer）（1963，174）和格拉曼（Glamann）（1977，261）。这种信任和潮流的普遍性可以由这个事实说明，阿姆斯特丹直到1763年是唯一的金融中心，在那里商人们能开出和接受从俄罗斯来的支票。见诺珀斯（Knoppers）（1977a，13~14）。

[134] 见戴雍（Deyon）（1963，38）。也见维拉尔（Vilar）：“对于荷兰人，贵金属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商品，它们的‘出口—进口’是有利可图的”（1974，251）。莫里诺（Morineau）指出，然而一旦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实际上需要出口的金银很少，至少对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是如此。例如波罗的海，作为与东印度群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Levant）这样的外部竞争场的区别。“分析到底，这确实是联合省经济的经济上的（相对于金融上的）功能，在国内和国外都如此，这是我们必须回头想到的”（1972，4）。

[135] 见迪伦（Van Dillen）（1974b，179~185）。和克莱因（Klein）（1970，39~40）。也见巴伯（Barbour）（1963，53），他说：“自由出口造币金属，这在17世纪其他地方是少见的，有助于稳定阿姆斯特丹的兑换率，鼓励汇票作为信贷的流通票据周转，它们的贴现和出售成为这个城市活跃的生意。”阿姆斯特丹的集中性汇票交易不只总的便利了贸易；它对于银行业操作也证明是高度有利可图的。博古卡（Bogucka）指出，由荷兰银行家用汇票大量转移给革但斯克（Gdańsk）商人的“不只是转移资金的一种手段，还引起了投机的独立操作，被称为套汇，这.....在17世纪前半期，在几个星期赚得6.5%到8%的利润，有时是10%到12%的资本投资。在这时，荷兰本身的利息率只不过3%~4%。”

[136] 德维（Van der Wee）（1977，342）。

[137] 德维（Van der Wee）（1977，340）。

[138] 见克莱因（Klein）（1970，38）和霍默（Homer）（1963，137，179，）。霍默比较了17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荷兰、英国和法国三种贷款的利率、人口年金、抵押、其他长期债务、短期商业贷款，和短期储蓄。在六种比较之中的五种，所知道荷兰的利率是最低的，有一种英国略微低过荷兰。林格罗斯（Ringrose）认为低利率的根源是来自“流动资本大量集中于低地国家的军事用途”的1566年到1648年这个时期（1973，291）。

[139] 见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1973，139，142）和里德（Reed，1973，182~185）。见克莱因（Klein）（1969，14）论保险股的投资。巴伯（Barbour）（1963，104~129）对荷兰在海外的贷款和投资有一个考察。论18世纪对欧洲国家以增长的债务形式的投资，

见威尔逊（Wilson）（1977a, 27）。货币流向“首先是到英国，那里荷兰投资者的决定大的足以让每位财政部第一大臣都列入重要考虑之内。”

[140] 早在1628年，沃尔姆伊登（Cornelius Vermuyden）就与查理一世（Charles I）讨论一项协议，给哈特菲尔德沟渠（Hatfield Chase）排水。见坎宁安（Cunningham）（1897, 209~210）。狄更斯（Dickens）谈到17世纪荷兰人在英国的技术殖民化（1976, 8）。也见威尔逊（Wilson）论排水、船只建造和农业技术的技术出口（1968, 77~91）。对于土地排水和开垦，见哈里斯（I.E.Harris）的文章。只是到17世纪末，“排干（英国）沼泽……再不是尼德兰的特权”（1957, 322）。

[141] 马克思（Marx）在描述作为丧失商业霸权的后果的18世纪荷兰海外投资时说：“它的祖国开始处于它付出的资本获得最好利润的地方的地位”（1969, 93）。

[142] 迪伦（Van Dillen）（1974a, 207）。

[143] 见格拉曼（Glamann）（1974, 457）。

[144] “城镇保护和资助工业。造船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造船业设备的建设是资助的一种形式。造船木工行会的规程包括了许多其他的形式。”昂格尔（Unger）（1978, 114）。

[145] 无论如何这些势力必须得到安抚。在1681年，一个经济困难的关头，在阿姆斯特丹的粮商和泽兰（Zeeland）的农业生产者之间达成了一项妥协。前者得到了出口（和再出口）关税的取消，而后者得到了进口关税的增加。见詹宁（Jeannin）（1969, 74），他告诉我迪伦（Van Dillen）的两篇荷兰文文章（1917年和1923年）包括有这场争论和政治妥协的详情。也注意到“在整个17和18世纪造船业原材料如绳索和桅杆的出口，有时是非法的”昂格尔（Unger, 1978, 115）。

[146] 见戴雍（Deyon, 1969, 38）。

[147] 博戎（Beaujon）（1884, 30）。

[148] 米歇尔（Michell）（1977, 148）。

[149] 斯托尔斯（Stols）（1976, 39）。

[150] 引自：盖尔（Geyl）（1964, II, 85）。见梅林克罗克洛夫兹（Meilink-Roclofsz）（1968, 71）。也见戈斯林加（Goslinga）对加勒比海地区的论述：“荷兰殖民帝国建于17世纪前半期，开始于桅杆上的一把扫帚，也就是海上自由的原则。一旦海上被肃清，无论怎样说——一旦西班牙人的海上力量不再是荷兰人的真正威胁——后者就丧失了对由他们最好的哲学家阐明的高度原则的兴趣，甚至并非不情愿地接受了伊比利亚人（Iberian）的领海（mare clausum）理论（相对于英国人而言）”（1971, XIV）。

[151] 哈克谢尔（Heckscher）还是感到惊奇。“现在出现了这种矛盾的形势，即尼德兰虽然

是所有重商主义者的理想典型，在同时比起大多数其他国家较少受到重商主义倾向的影响。唯一的解释是尼德兰被理想化了”（1935, I, 359）。如果戴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遮眼罩，拒绝从相互关系而不是属性的特征上去考虑，这当然是人们能想象的唯一解释。比较一下哈克谢尔和施莫勒（Schmoller）的观点：“荷兰人在为宗教自由和从西班牙人羁绊下解放进行的英勇斗争中表现了自己，当以一种‘公平的眼光’来考察如一个世纪之久的征服东印度殖民地的战争，和同样长时间的劫掠攻击西班牙人和西班牙—美洲贸易的运银船队时，这些为我们这个时代天真的自由贸易者因为他们早期的低关税如此赞美的荷兰人，从一开始就以世界熟知的垄断方式成为最严格、最好战的垄断主义者。”（1897, 65）。

[152] 戴雍（Deyon）（1969, 40）。格拉曼（Glamann）称自由主义为国家的一种“消极态度”，并说“因为作为政府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在经济过程中从来不是中立的”，很清楚“这种消极态度对于和阿姆斯特丹贸易中心的成长相协调而言，确切地说是一种正确的态度”（1977, 273~274）。

[153] 见考斯曼（Kossmann）（1975, 362~365）。霍博金（Van Hoboken）（1969, 46），伯克（Burke）（1974, 44）。和万辛克（Wansink）（1971）。“矛盾的是荷兰强烈地支持联邦政府，但它意味着在实际上荷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复杂的半中央集权方式统治这个共和国。”舍费尔（Schöffner）（1973, 92）。

[154] 对于东印度公司（VOC）的法律结构的描述，见拉布（Rabe）（1962, 351~366）。

[155] “在这个国家粮食短缺的年代里，阿姆斯特丹的权力是巨大的。”例如在1628年至1630年。凡·迪伦（Van Dillen）（1964, 145）。

[156] 弗兰肯（Franken）（1968, 24）。也见伯克（Burke）（1974, 42~43），卡特（Carter）（1975a, 1）和里默斯马（Riemersma）（1950, 39）。对于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决定政策能力的局限，见罗恩（Rowen）（1974）。

[157] 博克塞（Boxer）（1965, 90）。阿姆斯特丹的调子对她非常有利。阿尔伯（Albers）注意到在1650年之后，“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越来越集中在阿姆斯特丹，直到最终这个城市垄断了它们”（1977, 86）。

[158] 雷尼埃（Renier）（1944, 16~24）。和威尔逊（Wilson）（1968, 47）。博克塞（Boxer）特别指出在这点上同意雷尼尔（1965, 11）。

[159] 见鲁尔达（Roorda）（1964, 119和1967, 196~197）中的讨论。迪那克（Van Dijk）和鲁尔达警告不要夸大这种现象。“直到18世纪末，没有持续的贵族化阻止了所有社会流动性的问题”（1976, 101~102）。

[160] 考斯曼（Kossmann）（1970, 365）。哈利（Haley）类似地注意到虽然奥兰治党人（Organist）与“财阀政治”的斗争吸引了从低等阶级城市力量而来的支持，有着“一切造成内战和社会革命的因素。”奥兰治党人最终后退了。“他们自己最终凭借的是贵族和现存社会秩序的

捍卫者”（1972，83）。

[161] 博克塞（Boxer）（1965，55）。

[162] 威尔逊（Wilson）（1968，53）。

[163] 克莱因（Klein）（1969，9）；也见德弗里斯（J.de Vries）（1978，303）。

[164] 博克塞（Boxer）（1965，54~55）。

[165] 见克莱因（Klein）（1969，9）。

[166] 博克塞（Boxer）（1965，58）。

[167] 在一次私下讨论中，已故的罗坎（Stein Rokkan）告诉我欧洲世界经济有能力抵抗向一个世界帝国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建立在海的周围而不是陆地上，而海洋本来比一个大块陆地更易于征服，对于这个有趣的观点，我这时完全要为它负责。关于这个问题，见安德森（P.Anderson）对英国所做选择的评价：“虽然每单位造价较高，舰队的建造和维持的总费用远低于一支常备军……而在下几个世纪中的投资收益却要高得多”（1974a，135）。

[168] 见库珀（Cooper）（1970，227）。到1659年，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西班牙的舰队比联合省的舰队和英国的舰队都要弱（而不久之后比法国的舰队也要弱）。

[169] 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236）。

[170] 马汉（Mahan）（1889，97）。弗兰肯（Franken）进一步论证这是发展力量的唯一途径：“也可以肯定，财政储备没有多到足以为一支军队付款，而从长期看这却是积极的大陆政策所必需的，此外还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保卫海岸和漫长的贸易航道。”（1968，6）。而且绝不能忘记荷兰军队。在1609至1621年的休战期间，“增加的财富使荷兰人能够拥有除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外，还有欧洲唯一一支在力量上可与西班牙遥相比较的常备军”[伊斯雷尔（Israel），1977，38]。这是摩里斯的（Maurician）的改革的结果，包括更好地使用人力，较小的战术单位，围攻战的革新。罗伯茨（Roberts）指出这些改革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荷兰的军队要有好的报酬，首先是要准时支付……第二个条件是一种有效的训练和操练制度。”对于当代人来说，荷兰的改革“似乎改变了战争艺术”（1958，185，187）。

[171] 安德鲁斯（Andrews）（1915，542）。

[172] “然而谨慎的绅士执政者们也许看到了这个事实，联合省到1621年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鲜明模式，由于它的真实存在成为整个欧洲千万有思想的人的理想典型。”波里森斯基（Polišenský）（1971，162）。

[173] 见凡·维恩（Van Veen）的地图（1956，56）。

[174] 威尔逊 (Wilson) 指出, 这个任务需要技术上许多部门同时的成就, 将“数学家、雕刻家、印刷者、制地图者、仪器制造者、磨透镜者中的天才”召集到一起 (1968, 92)。

[175] 克拉克 (Clark) (1960, 16)。格拉曼 (Glamann) 注意到像诺里奇 (Norwich) 和科尔切斯特 (Colchester) 这样的城镇, 居民有1/3到1/2是以新呢布为专业, 是属于“尼德兰血统的” (1977, 253)。这确实是真实的, 如威尔逊 (Wilson) 所认为的, “经济的革新总是短命的, 致命之处在于容易仿效” (1968, 30); 但问题是由谁做出了革新。

[176] 威尔逊 (Wilson) (1968, 178)。

[177] 威尔逊 (Wilson) (1968, 165~177)。

[178] 朱里约 (Jurieu) 和拜尔 (Bayle) 以不同方式对他们的流亡做出反应。见拉布普斯 (Labrousse) (1967)。

[179] 詹宁 (Jeannin) (1969, 103)。

[180] 詹宁 (Jeannin) (1969, 102)。

[181] “荷兰共和国的半放任主义 (Semi-Laissezfaire) (和它的自由移民政策) 带给这个新‘国家’在制造业、商业和金融技艺必不可缺的发展, 一个个人商务关系网络和资本与船只的大量增加..... 没有它们荷兰人的进步就会慢得多和小得多”威尔逊 (Wilson) (1977a, 18)。

[182] 比尤廷 (Beutin) 说它是18世纪欧洲唯一有着“相对出版自由”的地方 (1939, 110)。

[183] 哈利 (Haley) (1972, 124)。

[184] 威尔逊 (Wilson) (1968, 163)。如维拉尔 (Vilar) 所说: “自由的精神表现了这个时代荷兰在商业事务上的优越性” (1974, 251)。这会使我们要绕一段长路去论证荷兰艺术的卓越时期, 作风上的“中产阶级式”和“中立主义”和流行状况的关系。牢记住这种形势愚蠢的一面就全面了, 威尔逊 (Wilson) 强调说: “保持 (艺术) 专业前进的是需求的坚实持久性, 而不是对高报酬的任何期望” (1968, 124)。

[185] 这个用语是肖努 (Chaunu) 发现的。见他对“多德雷赫特 (Dordrecht), 这个世纪最大的事件”的讨论 (1966a, 470~474)。这是就“在荷兰本身发生的所有事件中” (tout vase jouer en Hollande) 而言的。

[186] 就我看来, 至少就17世纪而言, 肖努 (Chaunu) 所说的是十分正确的, 这场辩论要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更有根本性意义。阿米尼斯派 (Arminian) 与戈马尔派 (Gomarian) 的辩论: 如肖努提醒我们的, 是与天主教会内部莫利那派 (Molinist) 和詹森派 (Jansenist) 的争论是相似的。他将阿米尼斯教派称为“19世纪自由派开端的祖先”也是正确的 (1962a, 119)。

[187] 雷尼埃 (Renier) (1944, 46)。见盖尔 (Pieter Geyl) 对科斯特 (Samuel Coster)，一位阿米尼斯派和阿姆斯特丹文学人物的描述：“通过一个比喻——这个世界是一匹邪恶的马，由权力骑着，用法律的鞭子和宗教的缰绳驾驭着，将缰绳交到一个世俗骑手的手中，教会和这匹马将会脱缰而逃——科斯特发展了纯粹的阿米尼斯教派 (Remonstrant) 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这是一个引起全欧洲有教养的人兴趣的理论。他们害怕无理性的群众和其在到处煽起的过度宗教激情，促使世俗政府官员提出拥有绝对权力的要求，在其他地方即是君主，在这里即是国家” (1961, 70)。

[188] 虽然这里说的是指最初争论时的情况，但这种社会分裂在整个世纪中一直持续下来。詹宁 (Jeannin) 说：“在阿姆斯特丹，在1672年有抱怨说阿米尼斯派 (Arminians) ——一个成为政治性多于宗教性的名词——在政府官员中占大多数，虽然他们代表的在人口中只占不到5%” (1969, 111)。但是这些抱怨有多严重呢？鲁尔达 (Roorda) 注意到在荷兰霸权时期达成了一种妥协，加上教士在慢慢地“贵族化”。“教会暴露在世界中并为这个世界的权力所同化……执政者们也变得更为教会化……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最激烈斗争 (到1672年) 成为过去的事情” (1672, 201)。

[189] 肖努 (Chaunu) 对社会分裂做了这种描述：“一种社会对立：荷兰的执政者 (Regents) 们在一方，组成阿米尼斯 (Arminian) 党，东部的土地贵族、中产阶级、新近到达的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另一方是戈马尔 (Gomarian) 党的骨干。戈马尔党人是除荷兰外的六个省，特别是新近征服的农业省份。戈马尔党人也是1590年疆界之外的新近皈依者。阿米尼斯党人是荷兰海岸城市中的资产阶级，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荷兰在沙丘后面那部分之外的更新来的新教徒” (1966a, 128~129)。

[190] 鲁尔达 (Roorda) (1967, 264)。雷尼埃 (Renier) 认为尽管外表上“漠不关心”，天主教是秘密表示同情的 (1944, 49)。考斯曼 (E.H.Kossmann) 在一次私下交往中，说他怀疑天主教徒在17世纪早期是否能说是社会下层，因为许多贵族仍然是天主教徒。

[191] 引自弗兰肯 (Franken) (1968, 5)。

[192] 班斯 (Bangs) (1970, 481)，他的文章是对神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极好的分析。也见盖尔 (Geyl) (1961, 13~14)。

[193] 博克塞 (Boxer) (1965, 131)。

[194] 哈利 (Haley) 同意：“(执政者们) (Regents) 倾向于容忍的观点，极端恶成为只是一个不容忍的教会的世俗武器。但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为有利于和平和谐而平息争论” (1972, 104)。相反地如鲁尔达 (Roorda) 所指出的，奥兰治 (Orange) 的省行政长官 (Stadholder) 真正打算为普通人提供保护，以反对“贵族的恶行”的程度是有限的，“省行政长官的行动只有很少能达到奥兰治党人下层中产阶级的期望” (1967, 189)。“休战”党也开始在那时在休战中发现机运较少了。在1621年菲利普三世 (Philip III) 为延长休战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天主教徒的礼拜自由，开放斯凯尔特 (Scheldt) 河，撤离东印度和西印

度群岛（East and West Indies）。奥兰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商人发现他们的利益再度协调一致了。[见盖尔（Geyl），1961，84]。也许西班牙人二十六年多战争赢得的是一个天主教的南部尼德兰，但是荷兰人的经济利益占了优势。[见帕克（Parker）1972，263]。因而从长远看来，荷兰新教牧师（predikants）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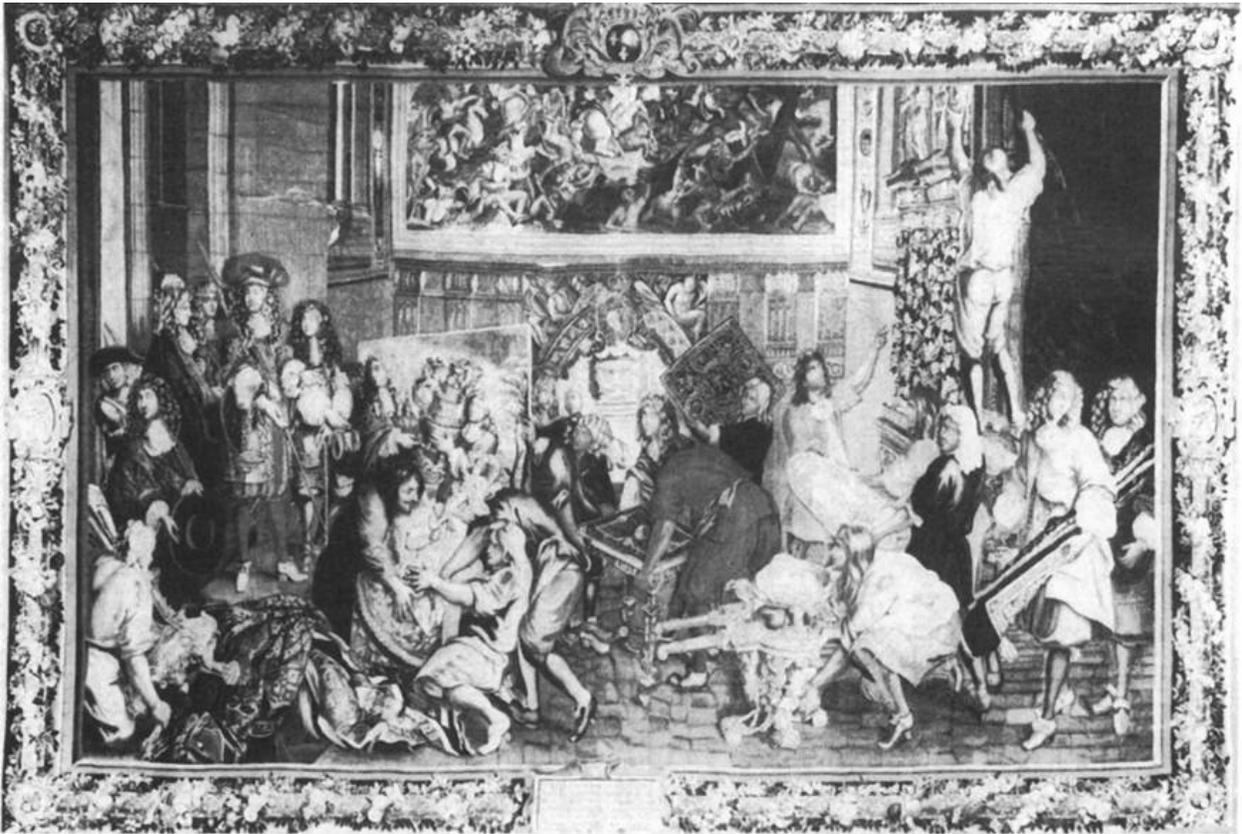
[195] 哈利（Haley）（1972，128）。

[196] 维斯康提（Visconti）（1958，301）。

[197] 巴克（Barker）将他的现代行政史开始于1660年“有些武断但也有一些道理”（1966，I）。

[198] 安德森（Anderson）的评论是类似的：“因为如果说17世纪是在贵族政治统治总体体系中在阶级和国家之间关系上混乱而无秩序的正午，比较之下18世纪就是他们平静和好的金色黄昏”（1974a，55）。

第三章 中心地区中的斗争——第一阶段：1651～1689年



第三章插图“路易十四（Louis XIV）访问高布林（Gobelins）工厂”

根据勒布伦（Charles Le Brun）。（1660年代）绘画所作的高布林织毯

凡尔赛（Versailles）：凡尔赛宫国家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u Château de Versailles）。

“路易十四（Louis XIV）访问高布林（Gobelins）工厂”，一幅根据勒布伦（Charles Lebrun），国王的首席画家，绘画总监，高布林织毯工厂的指导，绘画制作的高布林织毯。这幅织毯是为纪念1677年路易十四的一次访问。他由年轻的当甘公爵（Duke d’Enghein）和孔德王子（Prince of Condé）陪同。柯尔伯（Colbert）在他后面。

“贸易处于危急之中就是最后的防线：你要么起而保护，要么就灭亡。”

——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1]

1691年，荷兰的霸权地位首次受到真正的挑战。为何到这时才受到真正挑战？这绝不是因为在此之前英国和法国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它们内部问题成堆，自顾无暇，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动作，以打破荷兰的霸权。”^[2]

165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是欧洲人口增长的倒退时期。人口增长的曲线呈下降或持平之势，直到该世纪末，这曲线才再次开始上升。^[3]无疑，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十年战争的破坏，生态压力导致一些地方物品短缺（并因此而发生流行病），以及从整个世界经济来看谷物生产过剩导致世界谷物价格下跌。^[4]当然，各地区有所不同，这一点不能忽视。17世纪初期，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主要是欧洲的旧脊背地区（从佛兰德到北意大利）以及欧洲世界经济的新中心地区（联合省、英国东部以及法国的西部和东北部）。^[5]三十年战争、八十年战争及17世纪初期流行病的主要影响，是旧脊背地区及以前人口密度居中的西班牙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了。^[6]

相比之下，新中心地区国家的人口就几乎没有下降。1650~1680年联合省的情况不甚清楚，但此后人口大致是稳定的，大约在1750年之后

人口增长曲线就呈上升之势了。^[7]法国北部“没有发生大的灾难”。^[8]英国的情况被认为是“不清楚的”、^[9]“迄今所知甚少”，但这一时期该地区人口可能有过“缓慢的”增长。^[10]

由于中心地位和对人口下降的抑制这种联击，“乐观的”人口理论在17世纪风靡一时就不难理解了；同样，人丁兴旺意味着国力强盛，人口稀少必然代表“民穷国弱”这种理念也很容易理解。^[11]中心国家所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自己的国力，超越他国。激发托马斯·曼（Thomas Mun）爵士撰写《英国从海外贸易中得到的财富》^[12]这部重商主义古典著作的，正是1622年大萧条。重商主义在英国却非新鲜事物。格兰普（Grampp）将重商主义追溯至1500年，^[13]昂温（Unwin）则描绘了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声势浩大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14]但当困难时期降临英国和法国的时候，两国就采取了“更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策。^[15]不过，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事实证明科克因（Alderman Cockayne）方案是不成熟的。17世纪中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重商主义政策有可能取得成功？重商主义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16]

1651年英国《航海条例》是中心地区尖锐斗争的导火线。是什么因素导致该条例的产生？1648年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和西班牙最终承认荷兰独立的年份。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宣告成立；1651年联合省开始了最高行政长官位缺时期。在欧洲宗教大斗争方面，改良派和反改良派多少划定了各自势力范围（法国胡格诺教徒被逐事件除外）。欧洲从此有了和平。不过也还有战争——或者是长期的“冷战”，有时也引发零星的战斗，从而加剧了中心国家的“刻毒的贸易对立”。^[17]欧洲大陆一系列战争的终结于英国并无益处。相反，英国的海运业本来因英国的中立国地位而受益良多，而“和平的到来意味着又回到荷兰的仓储贸易中”。^[18]此外，1632年以后，由于海上航行缺乏安全保障的缘故，西班牙贩奴主义者（asientistas）雇用英国船只将他们的金条、银条运送到佛兰德。这给英国带来了极其重要的边际利益，因为双方协议规定，2/3的金条和银

条必须在多佛尔卸下，在伦敦的造币场（mint）铸成货币，再运往佛兰德。这就给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这笔收入对查理一世（Charles I）以及后来的长期国会都是非常有用的。^[19]

在荷兰方面，战争结束后，荷兰和丹麦旋即于1650年签订了“补偿条约”，允许荷兰人在松德（the Sound tolls）海峡以每年固定的数额对自己的船只征收税收，从而节省了金钱和“并非不重要的”时间。^[20]1652年4月7日，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在扼守往来东印度群岛航线的好望角建立了第一个荷兰前哨阵地。总体上看，荷兰的繁荣正在攀上新的高峰：相比之下，“英国的形势却每下愈况”。^[21]1649年谷物价格达到17世纪的至高点。法国此时禁止英国物品进入法国。商人们不管是在国内（税收）还是在海外（由于缺少外交使团和沿海地区把注意力集中于海军）都在为内战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以新教徒为主的共和政权势必打破历史的、相互交织的新教爱国主义方式。^[22]实际上，李希泰姆（Lichthiem）认为克伦威尔在英国海外扩张史上作出了“决定性的突破”。正如他把清教徒“民族化”一样，^[23]他将外交政策世俗化，使之不受宗教支配。

由于荷兰实际上仍处于霸主地位，所以要加强英国的商业只有两种方法：用国家的力量帮助本国商人，或者用国家的力量抑制外国商人。1621年的英国由于害怕采取后一种方法会惹怒荷兰，便以规范公司的形式选择前一种方法。^[24]这种方法很合公司的心意，但并不符合整个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1651年，英国采取了直截了当的行动反对荷兰，对其进入英国的物品实施限制。这一行动虽然受到规范公司的反对，^[25]但却是符合“整个经济大踏步向前进”这一原则的。^[26]1651年“航海条例”规定，进入英国的物品必须用英国船只或生产国船只（称为第一港口国）运送。制定这一条例的真实用意是要“打击荷兰的运输生意和创储贸易”。^[27]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航海条例”是有关商人游说的结果，而施莫勒（Schmoller）则认为，该法是国家建设的一个方

面。^[28]我们不必从亚当·斯密和施莫勒两种理解中做出选择，因为在当时符合商人（一些商人）和生产者利益的，是国力强盛不仅能帮助他们垄断波罗的海贸易，而且有助于他们独占即将扩大而且终将更为重要的跨大西洋贸易。^[29]

因此英荷双方在战场上比一高低便不可避免。即使英国人认为自己处于防御地位，但还是对荷兰人构成巨大挑衅。1651年初，荷兰一口回绝了英国提出的一项条约，英荷关系迅速恶化。^[30]不过战争在1652年爆发后，荷兰很快处于被动地位，主要是因为其海军力量不堪一击，软弱得令人咋舌。^[31]一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又引发另一场战争。英国的“沙文主义者”在等待着“对荷兰的另一次毁灭性打击”。^[32]几年后，他们久待的时机终于到来。这一次是英国公开的侵略。如果说“克伦威尔（Cromwell）想打击荷兰，保卫自己，那么可以说查理二世（Charles II）想把自己变成荷兰人的君主”。^[33]然而到查理二世时代，荷兰海军已吸取了往日的教训，装备已大为改善，而英国却士气低落（原因是行政管理上的无能和伦敦的瘟疫）。所以局势处于僵持状态，双方相安无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1667年的“布列达（Breda）和约”是荷兰人的胜利，或者至少是个妥协。荷兰用它的“沉重包袱”——新阿姆斯特丹换得了苏里南和东印度群岛的普洛兰（Pulo-Run），^[34]英国同意将联合省的自然腹地——即其港口所能供应到的地区——的产品（如在荷兰加工或分类的亚麻布）视为荷兰产品。由于这些物品是荷兰向英国出口的大宗物品，因此便抵消了“航海条例”的一些限制。^[35]不过，在威尔逊看来，布列达和约是“英荷关系的真正转折点”，卡特（Carter）也认为它是“荷兰共和国的繁荣衰落的开始”。^[36]很明显，在表层政治之下，必定发生着某种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肯定比英国取得新阿姆斯特丹及由此弥补了在英国重商主义限制区内荷兰走私的一大漏洞所得到的利益要大得多。^[37]这就是在英国人对荷兰人的痛恨背后，伴随着“对荷兰的经济本

领情不自禁的羡慕”^[38]以及“对模仿他们的渴望”^[39]，英国农业—工业方面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最终将使在布列达的让步变得无足轻重，从而使荷兰变成英国的小伙伴，难道不是这样吗？

无疑，法国加入战争就是以上这一变化的结果，战争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一转变。1667年法国入侵西班牙所属的荷兰，这是导致匆匆签署布列达和约的“关键事件”，^[40]并迅速促使英国、联合省和瑞典（当时是欧洲第四大军事强国）建立三国同盟。路易十四被迫让步，荷兰“自吹是欧洲的仲裁者（1668年确有一点这样的迹象），一下子降服了五位君主”。难怪路易十四成了“荷兰迷”。^[41]

1672年事情发展到了高潮。荷兰人发现自己腹背受敌，分别同英国、法国进行战争。第三次英荷（海上）战争，尽管英国在象征性的敬礼问题上遂了意愿，赢得胜利，^[42]但相对来说这场战争不甚了了，没有什么结果。相比之下，法国在陆上发动的攻势就大获全胜，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在1672年这个“灾难之年”，荷兰国土几乎全部被法国所占。在随后发生的政治混乱中，维特（Johan de Witt）被杀，荷兰共和国寿终正寝。然而，法国功败垂成。（所以其他荷兰人称1672年为“奇迹之年”）法国不仅没有夺占荷兰的贸易网络，而且最终于1678年结束这场漫长且没有结果的战争的“内伊梅根（Nijmegen）条约”还要求法国取消1664年开始实行的关税。^[43]

1672年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从1651年到那个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把荷兰人视为主要对手，而现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却互相攻讦，把矛头直指对方，荷兰经济力量尽管依然强大，却突然成了一个次要因素。^[44]在某种意义上，战争的代价正在直线上升。虽然整个现代早期制造武器的技术都大同小异，但骑兵^[45]的作用及荷兰人擅长的围攻战术的作用已大为降低。^[46]17世纪末，勃艮第（Burgundian）公国被瓜分，在人口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波及军队。联合省尽管很富有，但

它“太小，无法长期肩负军事和海防的沉重负担”。^[47]英国由于“掌握了更多的资源”。^[48]其海军最后超过了荷兰。理所当然法国也是如此，但法国人主要把他们的资源用于陆上，而不是海上，所以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军事投资收益就不那么多了。^[49]

英国和法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其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重大变化。在讨论1650年至1750年中心大国农业—工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特别是英国（不列颠）和法国的比较效益时，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几乎所有研究工作都是在国家范围内做的。这类著作常常也有关于各国比较的论述，但这些论述大多代表某种成见而不是严肃的探索。各国学者包括法国学者，在理解19世纪的差别时，往往把这些差别追溯至更早的时期，因而他们煞费苦心，解释他们仍无法从经验上加以论证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之间农业—工业效率的实际差别比我们所假定的要小得多。出于政治目的，1763年时出现的细微差别被夸大成了一个世纪后的重大差别：一个世纪后，这些差别在经济上已经制度化了。我们在此欲加以论述的，是上述论断的前半部分。

要做比较，一个基本问题是比什么。法兰西这个政治单位在面积和人口上大约是英格兰的4倍（人口密度大致相同）。如果我们加进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大不列颠作为一个比较单位，则法国的面积不到大不列颠的两倍，人口的差别比也降低了一些。仅仅代表一个统一关税区的“法兰西五大免税区”，其面积就大致相当于大不列颠。我们没有关于这些不同政治单位的清晰可辨的统计资料，即使有，我们也可能因选取资料的角度不同而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在评估军事前景和说明政府政策可能影响到经济生活的领域时，外部边界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即便如此，在三个中心地区大国中，每一个中央政府均受到其宪法结构的（更不用说其国内政治了）不同形式的抑制。

雅卡尔（J.Jacquart）认为，在17世纪，农业是法国“最重要的财富

来源”。^[50]难道英国不也是这样吗？在经济停滞时期，英国部分可耕地被用于放牧，而在法国则被用作种植酿酒用的葡萄。这等于又回归到了16世纪经济扩张以前的土地使用方法。两国对土地的不同反应主要是气候和土壤的功能问题。古伯特（Goubert）在比较17世纪法国、英国、荷兰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地区农业时，把法国农业描绘成一幅黑暗的图景，但在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眼中，法国农业的扩展（至少是北部最宜于耕作的地区）几乎和英国农业的扩展一样，开始于同一时期——1690年。英伯特（Imbert）则从第三者的角度论证说，法国谷物生产只是略微改善了，但葡萄酒生产则有较大改善。^[51]

从1650年到1750年间，所有三个中心国家都发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谷物价格下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也下跌了，不过下跌的幅度并不总是一样的。^[52]这三个国家对谷物价格下跌所做的反应是转向其他产业，或通过提高效率、进行结构改革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保持利润水平。荷兰人在农业多样化方面始终走在了前列。其他国家现在要模仿他们。^[53]在福塞尔（Fussell）看来，英国“最重要的新鲜事物”是开始在轮休的耕地上种植芜菁和苜蓿；对琼斯（Jones）来说，“最关键的革新在于饲料的供应”。威尔逊（Wilson）强调开垦（assarting）——“从旧的废地和石南丛生的荒地获得新土地的过程”——的作用；而哈巴库克（Habakkuk）则认为，起作用的倒不在于新技术的使用，更重要的在于“现有的最优良技术的传播”。^[54]不管以上四种观点哪一种正确。我们可从中注意到两个主要的事实。一系列“革新”本质上使耕种以前低产或完成荒芜的土地成为可能；^[55]这是对谷物市场疲软的一个直接反应，因为为了维持利润水平，农场主必须在相对疲软的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56]要么就转产其他产品。

关于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改善，已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加以论述，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德弗里斯（De Vries）提醒我们，至少在17世纪，英国农业的改善“主要是帮助了英国农业提高到荷兰和北意大利早

已达到的水平，而不是把荷兰和意大利远远抛在后边”。^[57]罗尔（Roehl）一反学者们的模棱两可，^[58]以大胆的口吻说：

其他地方现代农业技术的产生和法国一样早。尤其是巴黎以西直到英吉利海峡和巴黎以北直到佛兰德这两个地区。在农业结构及气候方面和英国最适宜农耕的地区十分相似。所以，“农业革命”虽然并不是在英国和法国同时发生，但却发生在相同类型的农业地区并在很长时间内局限于这些地区，这一点也不奇怪。^[59]

关于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知道什么？巴特（Slicher van Bath）用他自己的标准把英国、荷兰和法国都列为C阶段（谷物的平均产出率在6.3～7.0之间）。他把这两个国家这一阶段的起止年代定在1500年和1699年，法国则定在1500年和1820年。开始年代是相同的，但结束年代却不同。他认为1750年以后，英国和荷兰进入了他自己所称的D阶段（平均产出率在10.0以上），他究竟认为在1700年到1750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从得知。^[60]霍金斯（Hoskins）认为，从1680年到18世纪末之间英国的农业产出没有明显的提高，里格利（Wrigley）则估计1650年到1750年间人均产量增长了10%，而费希尔（Fisher）则说，在查理二世统治的后期，即大约在1680年前后，“从土地上源源产出的产品如此之多，以致给人们带来了过剩的恐惧。”^[61]至于苏格兰，农业（种植和放牧）的商业化是“17世纪一个最突出的特点”。^[62]如果用产出率和每公顷产量来衡量。^[63]15世纪到1840年法国谷物的生产率没有变化，但以工作日和工作年来衡量，则发生了变化，工作日和工作年都变长了。^[64]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谷物生产，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农业改良的关键是畜牧业和农耕业的结合”。^[65]这是新的草本植物——干草、紫苜蓿、三叶草——所允许的。这正是英国人从荷兰人那里

学到的，^[66]也使得劳动力可以代替土地，不用流动放牧就可得到高效率的畜牧业。^[67]当这一切正在英国发生的时候，法国的葡萄酒生产也正经历着类似的繁荣。肖努（Chaunu）以某种调侃的口吻评论说：在17世纪，西方“在通往人间天堂”的路上开始赶上东方。^[68]

如果把1650年到1750年欧洲的世界经济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就可看出谷物生产的地区发生了重大转移，从边缘地区转移到了中心地区。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论述东欧边缘地区所发生的变化时再详加讨论，但由于法国南半部实际上属于半边缘地区甚至是边缘地区，因此在那里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虽然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北部作为中心地区都大大增加了它们在世界谷物生产中的比重，但就英国情况而言，其新的剩余出口到了国外；^[69]而就法国北部而言，其新的剩余只是“出口”到国内其他地区。^[70]或许这就是描述所发生的事的最好方式了。如果就广义而言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后来17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差别就不在于农业生产率水平的不同，而在于农业生产组织的不同。如果我们欲对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土地使用的发展情况做一明晰的比较，我们就必须记住，英法两国主要的土地使用方式各有两种。但只有一种是共同的，那就是生产谷物。英国的第二种土地使用方法是畜牧业，和法国的第二种方法——葡萄酒生产——比起来，英国的这种土地使用方法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规模经济；而且畜牧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这一简单的经济事实比用法律、传统、观念、前阶级结构或假设的“封建”继承权更能清楚地说明土地使用方式的发展的差异。

在英国和法国，由于法律哲学、政治学和市场变动等因素的相互交织，使和土地的关系成了名副其实的万花筒。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就主要的收入来源而言，我们可以分辨出四种类型：地主（常常是大地主），他们一般是贵族，从生产者那里收取租金收入；殷实的生产

者，也就是经常称之为“佃农”（tenants）的人，控制着中等规模或大规模的土地，并雇用劳工、不殷实的生产者，他们有小块土地，有些人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常常需要寻找别的工作以补充收入；还有无地（或几乎无地）的劳工。通常，像小农（peasants）和自耕农（yeomen farmers）这类十分含糊的用词主要指第二类，有时也指第三类。当著作者们提到英国的自耕农（yeomen farmers）的消失和法国小农（peasants）的存在时，所指的看来是第三类。那么，17世纪英国和法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就可把这一问题弄得最清楚。

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之一是大地产的缓慢但持续不断的生长，这是一个日益集中化的过程。^[71]一个主要方法是圈占公地，这一时期公地似乎没有大幅度减少。^[72]在困难时期，要创造这样的地产需要金钱和精力。通过出卖途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转移到非贵族手中，不过在法国，由于非贵族用来购买土地的金钱可以允许他们购买贵族头衔（法国贵族比英国贵族可得到多得多的便利），因此这一现象不那么引人注目。在这些大地产中，有些是由一小块一小块土地积聚而成的，所以某些所有权的集中只是“细水长流的集中”。^[73]从定义上说，这种细水长流的集中可能造成日益增多的地主外在现象。此外，随着谷物价格的下跌，直接经营农场越来越无利可图，而出租土地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74]这种状况的持续发展把越来越多的地主吸引到大都市去生活。不管他们是去做朝臣还是去金融市场弄潮，他们的身体都越来越远离农业生产，这是事实。^[75]

要维持大生产，地产主就必须是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对这类天才有发挥其才干的充足空间，但家族必须寻找方法保护自己免受特定继承人平庸无能之害。在英国，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司法形式——严格定居。^[76]这对于维护大地产是很有用的，降低利率也是如此，它使得举债更加可行，严格定居所包含的对借贷的限制更加强了这种作用。^[77]

在法国，家庭继承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地产强制性分割。但法国地产主和英国地产主一样狡猾多端，钻法律的空子，利用可以传给继承人的指定年金制（rentes constituées），避开不能传给继承人的地产年金制（rentes foncières）。他们乐于接受低利率，而不愿把资本用于创造永久世袭的财产。捐官鬻爵成了这类投资的主要形式。^[78]

第二和第三种类型——即殷实的生产者和不殷实的生产者——很难加以分清，这是因为，虽然一些人是地产主，但大部分人是佃农，而且一些合法的佃农事实上就是土地的所有者；^[79]地产主—佃农之间的差别与经济力量、社会或政治观念并没有必然的关系。除了大地主这一阶层外，在经济困难时期，做一个佃农比做一个地产主可能还更好些。^[80]这两种类型的发展应该看作是一个两阶段的过程。17世纪前半叶，地租不断上涨，税收也已开始上升，但是种植小麦所得到的利润却日益下降。^[81]这就给小的谷物生产者造成了巨大压力。许多独立的生产者不得不放弃其独立地位。^[82]小佃农也是如此。^[83]

其结果似乎是，在其后的停滞时期，一个种植谷物的殷实佃农阶层踩着不殷实佃农（不管是土地拥有者还是不拥有土地的佃农）的肩膀而发达起来了。英国^[84]和法国北部^[85]都是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制奶业——这些地区的其他主要农业生产活动——也是如此。^[86]殷实佃农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具有资本主义结构的大地主的增加；这种具有资本主义结构的大地主需要中间人来管理直接生产者（无论直接生产者是劳工还是次佃农）。^[87]这类中间人并不容易找到，在谷物价格低落时期，中间人便可要挟地主给予更优惠的条件：可能是减少实际地租，^[88]或者可能是地主承担改良的费用。^[89]

人们广泛认为，1660年至1750年间，小农、自耕农或“自己耕种的土地所有者”在英国日渐消失了；但这类农民在法国是否生存了下来？我们一直认为在法国北部，就广义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和英国一

样)；但对于法国南部，答案则是肯定的。关于法国有何证据？我们不妨从词的定义开始。与自耕农 (yeomen farmer) 最相近的法文词汇是 *laboureur* (农夫)，它蕴含的意思并不是土地的租佃关系，而是资本物品。古伯特说，*laboureur*“习惯上是指 (法国东北部和北部) 某个拥有著名的北方大 *charrue* (犁) 农具的人”。^[90] 这个时候，*charrue* 已经不同于 *araire* (摆杆步犁) 了，不过在英语里，两者都称为犁 (plow)。^[91] 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国，*charrue* 是一件比 *araire* 重得多的农具，犁土时能犁得更深，装有更多的铁犁片，因而需要马或牛来牵引。所以，*laboureur* 是“相当大的土地所有者或控制者 (*exploitant*)，他由于他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及他所雇佣的人的数量而高踞村民之上”。

带着 *araire* 而不是 *charrue* 往南走，我们就看不见 *laboureur* 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称为分成制佃农 (*métayers*) 和小屋农 (*closiers*)^[92] 的更弱小的农民。迪帕卡尔 (*Dupâquier*) 和雅卡尔估计，1685年至1689年间，法国北部的韦克辛 (*V'éxin-francais*) 地区 *petits laboureur* (称为 *haricotier* 或 *sossons*) 在人口中的比例为9.9%到3.0%之间，而比他们更富裕一些的 *fermiers laboureur* 只占10.2%到8.4%。相比之下，我们发现在生产葡萄酒的地方，“小农经营明显居于支配地位”，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北部大规模耕作地区的5倍。^[93] 由于这些 *petits laboueurs* (小农夫) 受到排挤，许多人跨过了界线，沦为 *manoeuvriers* (劳工)。拉杜里 (*Le Roy Laduri*) 认为，即使是针对16世纪，我们亦不应夸大这一区别，因为真正的界线在这两种人和 *gros fermier* (大佃农) 之间。^[94] 我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英国也是这种情形。不过，在停滞时期，虽然社会上和政治上这一界线在英国变得更突出了，但在不种植谷物的法国农村，这一界线还不那么明显。

那么，应如何看待布伦纳 (*Brenner*) 所提出的论点呢？布伦纳认为，“正是由于法国小土地所有者占绝对优势，才导致农业的长期落后” (提出这种观点的并不只他一人)。我们对下面两种假设均已提出

了怀疑：小土地所有者的绝对优势地位（法国北部并不是这种情形）和法国农业比英国相对落后（法国北部可能是这种情形，至少是在1750年以前）。布伦纳说，在英国由于“地主可以吞并、扩大、圈占土地，形成大农庄，然后把大农庄出租给有能力进行资本投资的资本主义式的佃农”，农业的进步是有可能的。^[95]

雅卡尔描述了“第二个”16世纪老家族开始出卖它们的土地时，法国北部所发生的变化。他说^[96]：

要紧的是新土地控制者（*maitres de sol*）的所作所为。由于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脑袋仍残留着某些他们的商人祖先的谋利思想，即使想忘也忘不掉。他们明白庄主收入中的储备部的关键作用，集中的大地产的益处和森林地、草地所带来的更大收益。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形成一条涉及取得土地、改良土地和开发土地的完整的政策（*mise en valeur*）。

当此同时，雅卡尔还注意到，15至20公顷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中等农场也发展起来了。这是典型的温和的资产阶级的投资，“既易于生存又有利有图。”大地产和中等规模地产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被剥夺土地所有权的缓慢过程”，它导致了“农村大众的真正贫困化”。难道这和英国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吗？

布伦纳承认，法国地主或许也有“积聚”和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多地产的愿望，只不过他们没有这种能力罢了！如果说英国法律允许地主“把地租提高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水平，从而把小佃农驱逐出土地”的话，那么则可以说法国的地主“为了聚敛到完整的大地产，不得不买下无数的小农拥有的土地”。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对只是初具资本主义雏形的法国地主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但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一块一块购买地产远非令人难以置信，它是英国和法国土地集中的主要方法。事实上，布伦纳在说下列这句话时也含糊地承认了这一点。

他说：“在整个现代初期，许多农民实际上被迫陷于债务缠身的境地，最终被迫出卖他们的地产。”^[97]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谁来购买这些地产呢？布伦纳得出结论说，在17世纪末期，法国“约40%~50%的耕地仍掌握在农民手中”，但在英国，“这一比例不超过25%~30%。”可是，法国北部的比例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观点是，在土地结构和农业生产率方面，英国和法国北部在1650年到1750年这一时期的差别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个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地方大同小异。为了在停滞时期维持利润水平，两个都正在扩大其在世界谷物生产中的份额。这使它们能够部分地赶上荷兰的天然优势。至于工业部门，17世纪英国和法国政府都十分关心保护工业。利普森（Lipson）认为，英国的保护工业是和航海条例、谷物法并列的英国重商主义三大支柱之一。他说：“重商主义时代”就是“创业的时代”。^[98]而在法国，虽然早在黎塞留（Richelieu）时期保护主义干预已不可小视，但“柯尔伯主义”（Colbertism）是该世纪的一个主要特征。^[99]

工业保护（或许我们应该说工业促进）的努力主要集中于纺织业。我们先看看工业保护的后果，然后再分析其原因。法国纺织业主要集中于靠近北部的地区，法国南部（Midi）也有一些纺织业。^[100]17世纪，里昂（Lyon）的传统丝绸工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发展”。^[101]羊毛纺织和棉纺织则景况不佳，它们在1625年至1635年间达到了顶峰，接着便开始衰落了，再后来在柯尔伯时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徘徊之中”，^[102]最后又有所回升，1680年至1705年间又恢复了原状 [是不是柯尔伯（Colbert）采取措施的结果？] ^[103]这一恢复原状的过程也是工业“乡村化”的重要过程。^[104]英国的纺织业危机开始得更早些，随着新兴的布和服装业的兴起，英国渡过危机也早一些。1660年到1700年间，布匹生产增多了，出口翻了一番，布匹产品的花色也大大增加了。^[105]英国的纺织业生产也乡村化了，或许“比欧洲大陆更早、速度更快”。^[106]

和英国甚至和法国相比，荷兰纺织业在17世纪后半叶出现了麻烦。原因之一是荷兰的纺织业集中在城镇，劳动力昂贵。^[107]所以荷兰在毛纺织业的各个领域都衰落了，只有驼绒（camelots）和羊毛纺织例外。在驼绒（camelots）和羊毛纺织方面，荷兰人仍保持了优先取得所需原料的便利条件：西班牙的羊毛和土耳其的用于驼绒（camelots）的原料；荷兰人还保持了用靛蓝和胭脂进行印染的技术优势。驼绒（camelots）和羊毛织品是高价值、高质量的产品，但它们的市场狭小。这种方向上的转变是“总体脆弱形势”的结果，^[108]因此17世纪后半叶荷兰资本从工业投资转移到利润更高的商业领域也就不难理解了。^[109]

其他工业部门则变化不大。不过，在荷兰造船业下降的时候，^[110]英国造船业却“在1670年前后相当迅速地”发展起来。^[111]人们必须首先注意到的是，就世界经济整体而言，需求是最攸关的。即使在需求正在增长的产业部门，需求的增长也赶不上联合省及其重商主义对手——英国和法国——农业、工业的努力。英国和法国所主要关注的，是为其工人找到就业门路，而联合省所主要关心的则是保持这些就业。^[112]佩尔斯（Pares）说，重商主义只要能创造就业，他对“所雇佣的劳工的效率是不太关心的”。^[113]

中心大国彼此转嫁失业的斗争是停滞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惯常现象。1660年至1763年间，这一斗争甚至变得更加尖锐，因为英国和法国都面临着“年复一年的贫困问题”，这一问题影响所及，达到两国人口的1/4到一半，不仅影响了靠救济为生的人，而且影响了大量（而且越来越多）不能充分就业的工人。威尔逊（Wilson）说，英国有“一支工人大军，他们部分或完全依靠巨大的但不稳定的出口制造业为生”。^[114]或许不那么强调出口的法国也是如此。这样，问题就在于有什么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所希望的就业？在这里，关于工资问题的论争十分激烈，众说纷纭。一方面，有人说荷兰的一个弱处就在于高工

资，高工资“在抑制购买力总体滑坡方面具有独特作用，[\[115\]](#)正如其他地方所经历过的一样”。荷兰之所以出现高工资，其原因可能是工业集中在城市，以及工人的工团主义力量强大，导致政府采取社会福利政策。这又是高税收的一个原因。高工资和高税收使荷兰产品缺乏竞争力，因而是荷兰相对衰落的原因。

然而，英国和法国的工资水平实际上也一直在上升。不少人提出了有关法国农业和工业这方面的暗示。[\[116\]](#)另一方面，为了弄清楚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劳动生产率和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的比例的情况。希尔（Hill）说，17世纪“英国人的懒惰是挂在外国人嘴边的口头禅”。[\[117\]](#)要比较的话，大概还是和荷兰比。利普森告诉我们，在不那么景气的时期，工匠们常常被迫领取一部分价值被过高估计的实物工资，或者工资以打欠条的形式被拖欠，工人然后打折扣卖掉欠条，换回现金。[\[118\]](#)后一种现象尤其有趣，因为它意味着工资上涨虽然是雇佣者的真正代价，但得益的不是工人，而是一些小银行家。

我们再来看一看衰退时期重商主义的中心大国为争夺中心大国的霸权地位而斗争的相互矛盾的需求。一方面，中心大国要力图使自己产品的成本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为它们的产品找到市场。成本竞争的压力在劳动纪律方面对工人构成了压力。弗尼斯（Furniss）在有关“劳动责任”（据说和“就业权利”是相互关联的）思想的范畴内描述了劳动纪律这一概念在英国出现的过程。[\[119\]](#)汤普森（Thompson）谈到17世纪广为流行的24小时连续工作的现象，“直到牛顿时期，这一现象.....遍布整个世界”。[\[120\]](#)内夫（Nef）注意到，同一时期，早期工业主义使苏格兰煤矿工人和制盐工人“沦落到奴隶一般的地位”。[\[121\]](#)我们习惯于把自由工资劳动者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中心国家），以致“奴隶制”这个词听起来已十分刺耳，甚至使人感到惊讶。法国皇家工场的情形亦是如此，那里的工人完全被禁锢在他们的工作场所里，不过他们可以领取相对较高的工资。

下面我们把这种论点和有关高工资的争论做一比较。和大多数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大多数重商主义者赞成以低工资作为加强成本竞争的一种方法；但大多数有头脑的重商主义者却不赞成这种观点。1668年，柴尔德（Josiah Child）在他的新著《论贸易》（*Discourse on Trade*）一书中论述道，荷兰的优势在于：“不管何时，哪国只要工资高，就是那个国家富裕的一个明证；不管哪里，只要工资低，就是那里贫穷的证明。”^[122]由此可看出，柴尔德早在300年前就提出了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提出的观点。^[123]虽然柴尔德没有说服任何人，但他的观点是结构压力的一个反应。

在世界经济停滞时期，劳动纪律和工资的增加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的结合，增加了就业（不论其真正的单位生产率如何），也就是：劳动纪律（甚至包括接近奴隶地位）作为增加生产的方法（难道这不是苏格兰煤矿和巴黎挂毯编织的真正动机吗？），而增加工资则作为吸引熟练工人（织毯工人也是如此）、扩大国内市场并因此扩大需求的方法。在增加需求方面，把增加的“工资”收入转移到小银行家手中而不是工人手中这种制度与工人真正得到较好收入的制度或许可以收到同样效果。不过，过早、幅度过大地增加劳动力成本（不论得益的是谁）会危及和荷兰的竞争；所以必须达到某种平衡。

现在我们可以评估一下17世纪后半叶英国和法国为促进农业、工业而做出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自由史学派所做的经典比较，是走向私有制未来大工业的辉格党英国和跌入奢侈工业泥潭、官僚主义和柯尔伯的法国之间的比较。在人们看来，其结果是英国走向了自由主义、国会掌权和进步；而法国则加强了贵族统治、“封建主义”和浪费，一句话，旧政体（*ancien regime*）。关于这一时期，论述十分丰富，观点举不胜举，其中的现代权威性叙述要算是哈克谢尔（*Heckscher*）所说的：

英国不仅没有像法国那样控制在国家手中的奢侈工业设

施，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数众多、规模庞大、拥有各种特权的私人皇家工厂（manufactures royale）.....在英国也是不存在的.....

差别十分重要。这样，如果像从前那样，技术上的变化主要在于手工技术的改善、兴趣的培养和工艺可塑性的话，换句话说，如果变化是在皇室、宫廷、贵族和富有的生产者用来决定生产的技术领域内发生的话，那么法国很有可能成为阿尔卑斯山以北一个工业上领先的国家。但事情恰恰相反。“工业主义”或“资本主义”所指的是为大规模的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而奢侈工业却完全是附属性的。所以领导地位转移到英国手中。[\[124\]](#)

针对哈克谢尔（Heckscher）的解释，我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事实是否正确？例如，莱昂（Pierre Léon）虽然同意柯尔伯促进了某些奢侈工业这种说法，但他对其准确性提出了怀疑。

实际上，主要的推动力是朝向大工业：羊毛和亚麻纺织 [埃尔伯夫（Elbeuf）、色当（Sedan）、朗格多克（Languedoc）]、军火工业的基础——钢铁业 [范伦西叶尼（Valenciennes）、康布雷（Cambrai）] 和造纸业。由于他的努力建立了400项基金，包括300项纺织业基金。无疑（柯尔伯）并没有创造一个“工业基础”，因为工业基础几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他确实努力加强了这一基础，并使之集中化.....无疑，皇家工场.....首先奠定了.....未来工厂的“雏形”。[\[125\]](#)

谈到柯尔伯主义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窒息性影响，我们不应该忘记，像买官鬻爵和雇佣兵一样，柯尔伯主义也是向19世纪迈出前进的一步，而不是后退的一步。柯尔伯主义源自黎塞留，内夫（Nef）认为，柯尔

伯主义的两个积极影响必须给予肯定：

首先，在这个体制下，经济冒险比黎塞留时期得到更多的自由……第二，商业管理体制……实际上朝着给商人政治承认——地位——迈出了一步。埃昂（Eon）（柯尔伯主义时期著作影响很大的一位传教士）认为，商人极其需要这种地位。[\[126\]](#)

如果说17世纪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行动的差别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大，那么，为什么古伯特（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会谈“柯尔伯主义的全盘失败”？[\[127\]](#)为什么有人认为柯尔伯主义的关税政策的主要影响只是“暂时拖住”英国织布业的上升势头？[\[128\]](#)如果像戴雍（Deyon）所说的那样，是当时的环境不利的话，[\[129\]](#)那么对法国和英国都是同样不利的。威尔逊暗示，法国还不够重商主义，法国人的重商主义不像英国的重商主义，它“相对来说内在不连贯，没有成为一体，即使在柯尔伯主义时期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法国没有“扩大商业资本和以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城市轴心为代表的政府影响这两个因素的结合。”[\[130\]](#)这一论断使我们看到了利益集团是怎样在两个重商主义中心国家的框架内追求他们的商业目标的——要牢记，法国国土是英国的4倍，其国境内还有大部分不属于中心地区的地区。[\[131\]](#)

为了对两者做一适当比较，我们必须从总体评价开始，考察一下商业和金融领域。人们广泛认为，1660年到1700年这段时间是英国的“商业革命”时期，[\[132\]](#)这一时期英国率先成了“世界的仓库”。[\[133\]](#)关于这一时期，人们经常强调的是英国人相对于荷兰人所取得的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这是《航海条例》成功方面的一个反应。[\[134\]](#)但法国的情形如何？根据克鲁泽（Crouzet）说“法国没有发生17世纪（特别是1660年后）英国所发生的对外贸易快速而且持续的增长”；[\[135\]](#)不过，德鲁莫（Delumeau）在考察1590年到1690年这整个时期时，描绘了一幅完全不

同的画面：法国的外贸得到了明显的加强，“进步……是缓慢的、不平衡的，有时甚至倒退，但却是决定性的。”^[136]李希特（Richtet）赞同这一论点，他认为，发生“绝对增长”地区范围所至，“远及沿海以外的地方”，使得纺织业生产者和其他业主“在1680年到1690年达到即使在上世纪最好的年代他们也无法想象的水平”。^[137]

法国公司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真有其原因的话）？与英国及荷兰资本主义者相比，法国资本主义者更不愿进行投资，原因又是什么？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法国人的性格及其劣根性所致”，^[138]或者因为法国商人的后代放弃从商。^[139]对这些解释，笔者不敢苟同。如果这些解释比别的可疑的解释更真实的话，那么法国人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不管怎样，我们还得对所说的后代的先辈们的投资方式作一说明。或许分门别类地考察一下世界贸易会使我们茅塞顿开。

我们从英国航运的总吨位和价值（按地区分类）开始，其数字见表2（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找到法国相关的数字）。

表3-1 1700年英国的海外航运业

分类	吨位	价值（百万英镑）	每千吨价值（镑）
东印度群岛	5 000	0.9	.180
地中海	} 71 000	1.5	} .046
西班牙和葡萄牙		1.7	
西印度群岛	43 000	1.3	.030
北美	33 000	0.7	.021
北欧	218 000	0.9	.004
欧洲附近地区	224 000	5.1	.023
总计	594 000	12.1	

注：此表系根据威尔逊（1965，162）表重编；威尔逊的数字源自戴维斯（Ralph Davis）的数字。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三个事实。欧洲近邻地区（大都是其他核心国家）占了总吨位的1/3强和几乎一半的价值。波罗的海贸易又占了1/3，但就价值而言微乎其微，这对船主来说是好事，但对商人就不那么重要了。东印度群岛在总吨位和总价值上都不多，但该地区每吨的单位价值却是最高（相比之下波罗的海的单位价值是最低的），而每吨的高价值意味着每艘船的高利润率。就亚洲贸易而言，这些事实表明，虽然亚洲贸易对东印度公司来说非常重要，但就世界经济整体来说，还并不十分重要。这或许说明了东印度公司抵制对其实行贸易赤字，违反重商主义原则的攻击的能力。^[140]这类贸易造成的损害实际上是有限的。同样，东印度公司希望英国政府“在亚洲为自己筑起一道樊篱”。^[141]

进口正在上升：1700年进口了86.1万匹白布（其中2/3为重新出口），而1600年只有24万匹；^[142]但欧洲产品对亚洲的出口市场仍十分有限，以至“进货一旦过多，就会造成需求锐减、价格下跌”。^[143]那时候，需求是重商主义大国所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东印度贸易无法提供解决办法。实际上，为了使这一贸易变得“有利可图”，必须把印度加以“边缘化”，但是在1750年后贸易上升以前，英国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值得的，法国人更是如此。实际上，英国开始对印度进行政治征服，使其在经济上边缘化正是在1750年之后。^[144]地中海贸易在各个方面——贸易数量的重要性、^[145]英法对抗的决定性作用^[146]——都处于中间地位，地中海地区也是边缘地区而不是外部竞争场。^[147]

当我们谈到英荷斗争以及英国在牺牲荷兰的基础上的兴起时，我们想到的主要是两件事：荷兰占有重要地位的英国国内市场及荷兰的“贸易之母”——波罗的海航运业。如果我们强调船只的旗帜，就可能忽视所运输的物品的实质；在17世纪，运输物资的实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漫长的16世纪，波罗的海贸易主要是由西运的谷物（格但斯克在这方面地位至关重要）和东运的纺织品构成。17世纪的停滞造成波罗的海贸易的终结，到该世纪中期，“波罗的海地区完完全全解体了。”^[148]谷物出

口的衰落是世界谷物价格崩溃及由此造成的波兰和易北河以东（East Elbia）谷物生产地区退出国际市场的结果。反过来，这又造成这些谷物生产地区布匹市场的衰落，因为这些地区硬通货不如从前那样多了〔记住Kipper-und Wipperzeit（伪币泛滥）〕，也因为东欧的地方手工业生产重新出现了，地主以此来补偿他们的谷物市场崩溃带来的损失。^[149]

较之荷兰和当地生产的纺织产品，英国纺织产品的边际效应并没有大到足以在需求已经减少、“大幅度降价又不可能的”波罗的海生存的程度。^[150]东地公司（Eastland Company）正是由于其进口印染的布匹和成衣，从而创造了就业，才得到皇家的至关重要的支持。^[151]但当该公司把重点从出口转向进口后，特别是在英国日益转向转口贸易和仓储业的时候，其特权地位便丧失了。但进口什么？传统的谷物进口已经崩溃了。由于谷物贸易的原因——世界经济的停滞——导致三个中心大国间尖锐的商业斗争，而且他们的斗争常常演变成战争（特别是海战），因此一种波罗的海所能提供的双重需求便产生了：海军军需品和钢铁。

当然，长期以来海军军需品一直从波罗的海进口，但“在1650年以前供应一直不成问题”。^[152]现在，由于造船业的扩大、住房建设的发展（特别是伦敦大火之后）和以前的建设耗尽英国的木材供应（到该世纪末，也耗尽了爱尔兰的木材供应）等三个原因，供应的短缺“已达到……一场全国危机的程度”。^[153]这里我们碰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一个关键性的差别。由于法国国土面积比英国大得多，其木材供应量也大得多，直至柯尔伯时期，看来在这方面法国遥遥领先于英国。^[154]确实，法国木材对造船业来说质地不高，因而遭受损失，而北欧产的桅杆却是上乘的；但法国毕竟有自己的木材。法国的的问题是，桅杆质量的差别是否到了值得花额外的时间、金钱和政治——军事资源去从别处取得木材的程度。答案大概看来是否定的。^[155]英国人本也不想选择这样做，他们从别处弄木材只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他们在波罗的海做了巨大努力，在北美的努力亦比法国人大。

法国木材自给程度较大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副作用。它把波罗的海贸易在地理上向东推移了许多，从格但斯克（Gdańsk）到了柯尼斯堡（Königsberg），再到里加（Riga），再到纳尔瓦（Narva），最后开始把俄国和芬兰〔通过斯德哥尔摩港和维堡（Viborg）港〕也包括在内了。^[156]第二个也是更深远的影响是，它推动了英国开发自己的煤炭资源。最近一个保守的估计认为，该世纪煤炭生产总量增加了大约60%，拿1650年的最低点和1680年的最高点比，则上升了370%。^[157]用煤炭取代树木作取暖和烹调火源首先是由詹姆斯一世（James I）推广开来的，但由于英荷战争导致的进口中断则是其真正动因。后来，生产者开始寻找使用煤的途径。1738年，一位法国观察家写道，煤是“英国制造业的灵魂”。^[158]

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除海军物资外，另一种新的进口物资便是铁。17世纪中期，铁的进口仅占英国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总额的2%，到该世纪末上升至28%。^[159]提起铁，人们便想到瑞典，而且铁是工业产品，是铁矿石冶炼的结晶。为何这时瑞典在冶铁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大家肯定记得，在18世纪末以前，木炭是冶炼铁的主要能源。由于铁矿石和燃料的运输费用昂贵，所以最理想的环境是一个地方同时出产这两种原料。（实际上，铁矿石比木材更普遍、更丰富。）瑞典则恰恰两者兼具，且铁矿石质量高，木炭产量大。^[160]英国和法国也在进行重大的冶铁活动——法国的规模可能更大些，主要是因为“和英国相比法国不那么缺乏燃料”。其结果，英国为了弥补自己冶铁生产之不足，成了瑞典铁的主要进口者，而法国则“既不进口亦不出口”。^[161]也就是说，法国生产的铁可以自给自足，因而不“需要”进行波罗的海贸易。在瑞典作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半边缘国家的兴起过程中，铁起了主要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加论述。眼下我们要强调的是，英国和法国国土面积、资源的差别究竟对它们的外贸方式造成什么影响。两国的制造业都处在发展过程中，因而对铁的需求日益增加；^[162]而对铁的需求的增加，反过来对燃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英国之所以转向以煤作燃

料，并比法国更早^[163]进口铁，其原因与其说是工业化水平的差异，毋宁说是生态环境的不同。

英国和法国最鲜明、最重要的差别，或许体现在大西洋贸易上。英国的跨大西洋贸易规模远比法国大得多。此外，这一时期英国在西半球开辟了定居殖民地，而法国的定居殖民地的发展却相对缓慢，也不那么成功。这两个不同现象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到1700年，英国是“在大西洋占有最大份额”的国家。^[164]其原因何在？前面我们讨论过荷兰人是如何支配欧洲贸易的；对他们来说，顺着优势发展下去比去开辟新的、困难的市场更有意义。然而，法国人为何不与英国人一样，转向大西洋贸易？换句话说，为什么英国人比法国人干得好（特别是在1660年到1700年）？原因看来是清楚的。在18世纪，西半球建立了28块殖民地，其中3块是荷兰人的，8块是法国人的，17块是英国人的；1700年英国在殖民地有35~40万臣民（包括奴隶），而法国只有7万；在欣欣向荣的加勒比海诸殖民地中，英国人的数量是法国人的两倍。^[165]在人口数量或生产的产品方面，法属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都无法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相比。1600至1700年间，英国率先在欧洲发展了殖民地产品的转口贸易，这是一项崭新的、规模巨大的、获利甚丰的仓储贸易。^[166]实际上，航海条例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英国运输船只成功地垄断了和其殖民地的贸易；还必须补充一点，英国船只在西属美洲的走私活动也普遍取得成功。^[167]

法国人当然也和英国人一样，从事大西洋烟草和蔗糖贸易，只不过数量上较英国少，而且法国国内市场吸收了大部分进口的物资，余下转口的已不多。和英国相比，法国在美洲的生产者——殖民地、契约劳工、奴隶——更少，所以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就较少。^[168]法国的生产者为何较少，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知道，两国对宗教异端集团向外移民问题上，态度有所不同。实际上英国鼓励此类移民，或者至少不加阻止；而路易十四却禁止胡格诺教徒到美洲定居，称他“还没有把

他的天主教王国整治得井井有条，因而不能把殖民地交给异教徒”。[\[169\]](#)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对两国差别的通常解释中——英国为宪政统治，相对自由；而法国则是绝对主义和专制统治。不过，这里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在1687至1688年间；即废除南特（Nantes）敕令后不久，法国国王威胁要将“逃出”国界（主要是向其他欧洲国家）时抓到的胡格诺教徒驱逐到密西西比（Mississippi）、加拿大、马提尼克（Martinique）或者南北美洲的其他地方。至少在斯科维尔（Scoville）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威胁，因为“与被终生用锁链链起来服苦役的可能性相比，胡格诺教徒和改变信仰者更加害怕跨越大西洋的航行”。[\[170\]](#)从这些事实来看，宗教因素似乎不是阻碍法国人派出更多移民的因素。或许那是因为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热衷于移民到殖民地。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移居殖民地的兴趣？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美洲殖民地有两个用途：第一，殖民地是所谓热带产品——蔗糖、棉花、烟草——的产地。这些物产生长所需的气候条件欧洲大部分地区是不存在的。大加勒比地区（包括巴西和北美南部）生态上正好适宜，英国、法国都为此目的到这个地区开辟殖民地。在这方面，虽然英国或许比法国更成功，但两国差别相对较小。殖民地的第二种并且显著不同的功能是作为制造业产品和转口贸易的市场。热带殖民地由于使用强迫劳工，以便降低产品成本，因而购买力不强。要发挥这一功能需要欧洲移民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从而带来足够大的集体收入。

英国发展了此类殖民地，而法国却没有。是不是由于法国不那么需要市场，或者它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市场？我们又一次碰到了国土面积这个因素。莫非法国不是可以把自己的产品更多地在国内销售吗？[\[171\]](#)英国需要欧洲这个市场（长期以来通过联合省），[\[172\]](#)亦需要在北美开辟殖民地。[\[173\]](#)当然什么事情都是相对而言。英国和法国面临着世界范围的衰退这一同样的问题，因而都做出了重商主义的反应，先是把矛头

指向联合省，继而把矛头直指对方；但英国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推动了对外贸的集中化。这是一个互相作用的过程：英国人由于需要贸易，结果导致对船只的需求，继而导致对海军物资的需求，接着又造成对用来购买海军物资的产品的需求，最后得有殖民地的购买者来购买日益扩展的制造业的产品。数量甚至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发展了三角贸易，而法国却没有。由于船只较多，因此更加关心单程运输和船只利用不足的问题，三角贸易作为解决办法便应运而生。^[174]这又进一步巩固了移民殖民地的效用。其结果，英国大西洋贸易规模越大，其转口贸易规模就越大，而转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导致在英国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反重商主义的压力集团。^[175]这或许就是18世纪有不同的发展的原因。

人们常常认为，英国经济进步的另一个主要推动力是不存在税收关卡和国内运输系统改善（搬走了河堤，加固了堤坝，挖深了河床，建起了水闸，并凿运河缩短了距离）这两者的结合。^[176]虽然法国的税收关卡所带来的成本增加是相对有限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税收关卡只适用于五大包税区以外的地区。但莱昂（Léon）和柯利尔（Carrière）认为，总的来说法国的运输费用还是昂贵的。他们迷惑不解地说：“关于这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我们很难再加以深入论述。”^[177]

以这种方式看问题难道不也合适吗？英国国内的运输费用和法国北部关税区内部运输费用比较起来，差别也许没有大到哪里去。由于从英国往外运输靠海运，而从法国北部关税区往外运输至少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靠陆运，又由于这时海运比陆运便宜得多，因此，英国国内市场狭小就成了一个优势。^[178]或许关键是法国在经济上比英国好。推动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不那么迫切。在漫长的衰退时期，两国外贸的发展也许没有真正的差别，但却使英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为利用18世纪中期新的经济扩张做了更好的准备。^[179]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和法国是怎样解决给生产和

贸易的流动提供资金这一问题的？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下列三个互相盘根错节的问题：这一时期造币用的条金条银在贸易中的地位（大概是重商主义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一时期条金条银是否可以得到及其流动情况；公共资金对整个系统的运作的的影响。帕克（Geoffery Parker）认为，1500至1730年间，发生了一场“金融革命”；这场革命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序曲，它对私人金融来说，意味着两件事情：信贷机构集中于大中心城市，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支付国际体系的形成”。^[180]在“形成”——一个表述过程的名词——这个词含糊的意义背后，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支付多边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什么时候支付多边化发展到了足够普遍，以致商人、政府都依靠它来结算？

威尔逊（Charles Wilson）和哈克谢尔（Eli Heckscher）那场著名的交锋是这场辩论的一个系统反应。他们的交锋开始于威尔逊对哈克谢尔（Heckscher）斥责重商主义逻辑（实际上他有权这样认为）的不满。威尔逊认为，由于从双边支付体制到多边支付体制这一转变只是发生在18世纪，因此17世纪重商主义者对能否得到金属货币的关注属正常现象。^[181]哈克谢尔（Heckscher）回答说，“多边贸易和套汇早在中世纪就已存在——或许比这更早”，多边贸易所赖以实现的手段是一个“次要问题”。^[182]条金条银的流动只是实现多边结算的一个手段；同时还存在着汇票的流动；如果没有汇票的“广泛使用”，多边贸易就“无法进行”。威尔逊则反诘道：当然存在过一些多边贸易和某种程度汇票的使用，但贸易量所依赖的是条金条银与硬币的“联系”（特别是在波罗的海）；而且，没有条金条银贸易或许早已“回复到双边状态中”。^[183]

普莱斯（Jacob Price）对这一争论做了评论，他指责双方的“历史观念含糊不清”，把整个重商主义时期看成是静止不动的。他说，汇票源于中世纪，并不单单地出于安全和支付简单化的原因，“而且是用来弥补通货的相对缺乏”。他认为，从16世纪中期到1660年，世界白银供应空前繁荣，使贸易得以扩展，但1660年后，白银供应减少，这导致汇票

使用的增加和商品流动的扩展，以“平衡贸易”。^[184]这样，普赖斯对威尔逊和哈克谢尔（Heckscher）各打50大板，认为对于17世纪前半期，威尔逊是正确的；后半期，哈克谢尔（Heckscher）则是正确的。在普赖斯看来，观点的不同可以从条金条银的数量得到解释。斯珀林（Sperling）步普赖斯之后尘，认为1660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存在着一个阿姆斯特丹—伦敦国际清算中心，这个中心“职能已经扩大，以满足日益增长着的世界贸易体系”，^[185]并因此促进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布利兹（Rudolph Blitz）加入了这场辩论，他补充了一个有益的提示，认为条金条银既是货币，也是商品：

如果一个国家不产别的，只产黄金，并把黄金出口到其他国家换取消费品和资本物品，那么，把这些黄金出口视为“黄金商品出口”比视之为弥补逆差的一个措施更富有意义。^[186]

这一论断完全正确，因此，为什么17世纪金银在某些渠道的流动比其他渠道多这个问题就和在哪里流动这个问题同样重要了。考察一下各个贸易区，我们便可发现，威尔逊——哈克谢尔（Heckscher）原先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波罗的海贸易，威尔逊认为，“西班牙为换取荷兰商品而抵押在阿姆斯特丹的美洲白银都消失在波罗的海这个无底洞里了。”^[187]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会看到波罗的海贸易作为一个整体并不需要白银出口。欣顿（Hinton）认为，在1660年前后，英国有三种贸易需要出口白银，即东印度、土耳其和挪威，而“东方贸易并不一定需要出口白银”。^[188]阿斯特罗姆（Åström）在评论威尔逊关于波罗的海的论述时说，银币确实出口到挪威和俄国，但对贸易额大的地区如东方国家和瑞典本身，则根本不出口或数量极少。^[189]此外，斯珀林坚持认为，有“大量证据”证明在波罗的海贸易中使用了汇票；赫洛奇（Hroch）和格拉曼（Glamann）也暗示，波罗的海贸易赤字可以通过陆上东—西方贸易中西方的顺差来弥补。^[190]那么，金银究竟向何处流动？看来是向挪威和俄国流动，或许还有土耳其，但最重要的是东印度

和另一个地方——荷兰流动。东印度和荷兰这是令人奇怪的一对！金银的这两个方向的流动其形式和目的都是大相径庭的。

戴尔斯（Dales）认为，威尔逊是正确的，但他指得不是波罗的海贸易；他说威尔逊的论断正确之处主要是关于欧洲和“东方”的贸易。^[191]乔杜里（Chaudhuri）的著作似乎认为1600至1750年间金银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流向印度。但这意味着什么？关于17世纪初，乔杜里说：

由于东印度公司成了亚洲市场的本地商人，因此可以认为财富的出口实质上多半是资本出口，当这些资本投入到公司在亚洲的工厂时，可产生高额利润，这些利润至少可以供欧洲购买部分商品。^[192]

不过，其后的进口说明，一些物品（主要是香料）在亚洲可以很便宜地买到，而在欧洲却卖得很贵。就通货而言，乔杜里发现“贵金属流动的根源……在于金银作为商品的价值在两个大陆存在着巨大的差别”。^[193]但为何会有差别？

当乔杜里论述1660至1720年这段时间时，^[194]他暗示东印度贸易“亦正在形成着多边贸易的特征”。不过他引述的数据显示金银的出口没有大幅度减少——实际上恰恰相反。他认为，总体上说财宝依旧占年出口总值的70~90%，这说明“17世纪和18世纪初，欧洲和东印度贸易的基本经济因素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至于荷兰，数字显示从1672至1695年间，它接收了从英国出口的金银和硬币总量的70%~90%；^[195]1699至1719年间它依然接收英国“财宝流动的最大部分”。^[196]另一个必须注意的细节是，条金条银包括金和银，两者的运动显然不是等同的，它们之间存在一定比率；但是否有规律可循？吕提（Herbert Lüthy）暗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条金条银都是从欧洲以外的地方流到欧洲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欧洲然后把这些大都来自美洲的白银重新出口到亚洲，“几乎全都是单本位制白银”。^[197]然而，黄金在欧洲世界经济中扮

演着不同角色。它“流入欧洲后便留在那里了，主要是作为欧洲国家大规模商业清算与支付的一种手段”。[\[198\]](#)

现在，让我们回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的贸易与某一特定世界体系和其外部地区之间贸易的差别上来。在这一问题上，世界体系指的是欧洲世界经济，外部地区指得主要是东印度群岛，还有挪威、俄国，或许还有土耳其。为促进体系内的贸易，就需要通货（就欧洲世界经济而言，日常使用的通货是银和铜，辅以黄金）。显然，纸币（汇票）也具有这种用途。我们可以想象，这类贸易本质上是多边的，而且主要是通过纸币进行，时不时辅之以在国际金融中心（17世纪的金融中心是阿姆斯特丹）的黄金交割来结算。如果是两个经济地区的交易，每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是外部竞争场，因而就不使用“通货”。这种交易相对来讲是双边的，使用量小价高的商品来进行——在这方面，欧洲的银起初被用来交换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后来被用来交换印花布。带到亚洲（和俄国）的硬币或条金条银大都被用作“储藏或珠宝”；[\[199\]](#)在很长时间里“贸易平衡”（如果绝不把白银看作商品的话）总是不平衡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双边的。这两个事实恰好证明，东印度群岛对欧洲世界经济来说，依然是外部竞争场。另一方面，西欧和东方（及瑞典）的贸易大都是多边进行的，并使用汇票，这一事实说明这两个地区是同一经济体系的不同部分。

生产金和银这种商品使美洲成了欧洲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其生产的这种商品对欧洲世界经济十分重要，重要到被用作货币的程度。如果美洲的条金条银全部流到了亚洲，那么美洲或许成了另外一个外部竞争场，而欧洲或许仅仅会成为三个地区——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轴心，用运到美洲的物品换得亚洲的奢侈品。但美洲对交换其条金条银并无兴趣，也不去开采它。所以，欧洲人先是攫取了印加帝国的黄金，然后开采波托西（Potosi）和墨西哥的银矿，并到处寻找新矿区（其中巴西的金矿后来变得最为重要）。他们派遣定居居民去从政治上控制美洲

这些地区，监督经济活动，还引进了劳工。一句话，他们把美洲合并进他们的世界经济中去了，因为他们需要坚挺的通货基础来为正在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服务，其次还要利用剩余的通货来与亚洲进行贸易。当英国人于1663年废除了对向波罗的海出口条金条银的刑罚时，[\[200\]](#)难道这不正是因为波罗的海地区被平平安安地融合进多边支付体系中了吗？

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重商主义者对条金条银流动的关心？是的，确实有这样的证据，因为条金条银作为通货的流动是霸权国家确保其特殊优势的机制之一。英国重商主义者在担心条金条银的流动的同时（在较小程度上法国重商主义者也是如此），不也是在担心通货流向荷兰和商品通过荷兰流动吗？[\[201\]](#)如果白银向东印度群岛的流动真正成了一个问题的话，那么为何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一流动？欧洲世界经济内部的条金条银流动不仅依赖于金融清算机制，而且依赖于对商品生产和总供给的控制。正是在这方面，17世纪的贵金属缺乏的问题便摆在了我们面前。

有人认为，17世纪世界白银生产下降了，黄金生产停滞不前，而西班牙从美洲进口的条金条银突然大幅度下跌。[\[202\]](#)莫里诺（Morineau）在其对西班牙条金条银流动的重新评论中，对公认的事实表示了怀疑，尤其是对从以下这些事实得到的解释提出了疑问：

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能从总体和普遍化危机的角度来想象17世纪，尤其不能从金银饥荒——不论是美洲原产地还是运到欧洲——的角度想象17世纪。真正的问题与此不同。[\[203\]](#)

莫里诺并不想否认运到西班牙的条金条银的数量下降了，虽然他相信平常使用的数字是被夸大了的；但对这是长期趋势的结果这一说法，他表示怀疑。他认为，那是由于一系列偶发因素造成的结果，而且他尤其对欧洲世界经济的经济衰退（他承认存在过这种危机）可以从条金条银供应的变化得到解释这种说法提出了怀疑。

两个问题都值得加以探讨。为何条金条银的进口下跌了？显然，这一定是要么供应方、要么需求方的下降的缘故。最通常的解释是供应方的下跌。过去可以轻而易举得到条金条银的渠道由于过度掠夺而枯竭了，现在开采贵金属成本增加，发现新的渠道又需要时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一特定技术水平情况下，16世纪的扩张已经用尽了这一关键资源，结果导致资本短缺，进而造成萧条。对于这一点，莫里诺的回答是，大约在1620年，“当运抵的金和银日渐稀少的时候”，是人“和自然因素.....的结合造成了这一趋势”。^[204]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以人为主“伴随着自然因素”的问题，而不是相反。

条金条银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有其价格；总体价格的上涨——16世纪金融史上的主要特征——常常意味着条金条银价格的下跌。但条金条银作为货币只是实际交换的一种媒体。^[205]那时条金条银的进口之所以下跌，是由于“德雷克（Drake）效应”——莫里诺称之为“现代达摩克拉斯之剑”。^[206]如果武装掠夺船拦截护送船的数量相对地少的话，就会产生莫里诺所说的“更加微妙、更加有效、更加有害的”效应：会导致耽搁，并最终导致破产。除了16世纪的“德雷克效应”外，还有17世纪中期消灭了大船队（*Carrera*）的“布莱克（Blake）效应”。^[207]

然而，这些武装劫掠只会提高条金条银的成本。如果对条金条银的需求还是和以前一样大的话，那么为何没有把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为什么不派更多的船只去运送条金条银？忽视经济萎缩的现实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这主要并不是由条金条银供应下降造成的，而是由于对这些供应的需求减少造成的。在17世纪初期，供应下降对霸权国家很有好处，因为荷兰依靠其生产和商业上的优势，可以大量吸收现有的条金条银。^[208]当供应真正变得短缺的时候，条金条银就成了投机性投资机制的基础。到该世纪中期，荷兰商人已经把英国客户支付给他们的条金条银留在伦敦，开始以5%至7%的利率借贷出去，因而创造了“一种到一定时候将以其‘稳定’方式减轻资本压力的”机制。^[209]

迄今为止我们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来接近我们的主题：17世纪后半叶条金条银的供应状况及其对英法斗争的影响。由于条金条银的生产率比其他商品的生产率低，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贵金属就越来越缺乏。当短缺开始感觉得出来的时候，便产生了寻找金银的新热潮。^[210]吕提（Lüthy）怀疑法国这一时期的短缺是否真正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严重的程度，他注意到，在和平的年代，法国有相当大的贸易顺差。他说，考虑到法国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货币兑换的场所，其对硬币的饥渴不同于荷兰和英国，这种饥渴“不是任何可以使条金条银流动起来的机构和其他流通、储蓄或——并非最不重要的——囤积的财富所能缓解的”。^[211]

和平常一样，这种解释只会使我们退后一步。银行体系很早以前就在欧洲旧脊背地区发展起来了。17世纪，荷兰的银行体系也发展起来了，这是它的霸权地位的必然结果。为什么在17世纪末期英国比法国更有能力顺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我无法做出直截了当的回答，但我可以提供两种看法。首先，在欧洲世界经济内部，当时（现在仍然是）三种金属货币的社会用途大致如下：黄金用于国际清算和国家事务（亦用作储藏），白银用于大规模的国内商业，铜用于家庭和小商之需。如前所述，由于法国产品大部分在法国市场销售，而英国（和荷兰）产品则更多地在国外市场销售，因此两个竞争对手走到了“实际上的单本位制”——法国为银而英国则是金。^[212]

第一种看法与铜币的作用或者铜币的大量增长——“该世纪的梦魇”^[213]——有关。斯普纳（Spooner）认为，金的流通（相对于其储藏）与银的流通及信贷之间存在着一种逆反关系。后两者在世界经济中是携手并进的；^[214]但这两者是不是国民方针的两种选择？在整个17世纪，法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避免Livre tournois（图尔城铸造的一种钱币）的贬值，^[215]但只是在柯尔伯时代才取得有限的成功。^[216]我们是否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说明国土面积如何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因素？

法国由于其经济上内向但政治上外向，因而倾向于白银；除了在它试图改变政治—经济倾向之时（柯尔伯时代），法国无法减轻白银短缺时铜的增多而带来的痛苦。英国则经济上外向（它不得不这样）但政治上内向，因而倾向于黄金；它对国际黄金银行网是开放的，并可以使用纸币而不使用铜。

那么，哪个国家是“强国”？这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难道路易十四不是君主制的化身吗？难道法国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是由于国家和贵族共同窒息资本主义企业所造成的吗？不过，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在我们论述的这个时代之初，即1651年，联合省属于“强国”。到这个时代结束时，即1689年，英国和法国都比联合省“强大”，而且英法两国不相上下。18世纪，英国超过了法国，比法国更强大；导致1789年大革命的，是由于法国本身的软弱，而不是由于其强大。不过，这一论点涉及一国强大指得究竟是什么。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里，业主—生产者均希望国家代表他们履行两种重要功能。他们希望国家通过限制或扩大市场的“自由”来帮助他们取得或保持在市场上的优势，不管这是国家积极还是消极的干预，但代价必须低于干预所增加的利润。这是一个业主相对于另一个业主的利益。此外，业主—生产者还希望国家帮助他们取得他们所无法取得的更大比例的剩余，同样亦不管国家的作用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但代价同样亦必须低于国家干预所产生的利润。因此，对业主—生产者来说，强国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亦不一定需要有最专制的决策程序。事情常常恰恰相反。

毋庸置疑，一国之强大与该国业主—生产者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是相关的；但为了避免这些论断成为毫无意义的重复之辞，我们就得有衡量所谓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尺度。这里我们提出五种可能的尺度：国家政策能够直接帮助业主—生产者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程度（重商主

义)；国家可以影响别国的竞争能力的程度(军事力量)；国家可以动用其资源来完成这些竞争性和军事任务(而其代价又不至于完全吞掉利润)的程度(公共财政)；国家可以创造一个能迅速进行战术决策的政府的程度(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政治规则反应业主—生产者之间利益平衡的程度，以便一个有效的“霸权集团”[借用葛兰西(Gramscian)的术语]构成国家的稳定基础。上述最后一个因素，即阶级斗争政治，是其他因素的关键所在。

所有这些尺度均为政治尺度而非经济尺度，因为它们不是生产效率的尺度。当然，政治及经济尺度最终还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生产效率使一国强盛成为可能；反过来，国力强盛又通过超市场手段进一步加强生产效率。生产效率非常高的国家与生产效率一般的国家相比，其国家积极干预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就较后者小。由于生产效率与国家机器干预世界市场的能力是互为关联的，因此生产效率最低下的国家就谈不上“强大”。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当然也包括国内市场)与该国内部业主—生产者的经济地位之间呈一种曲线关系。在国力一般的国家里，国家最为“积极”。对强大这个词的修饰(“l'Etat, c'est moi”，朕即国家)常常成了现实的代用语。

根据辉格党人对历史的理解，现代包括弱小国家漫长的历史探索，这一探索被认为是和人类自由的进步同步进行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从这种角度看待英国革命的，他们赞成神秘化。^[217]相反，我认为，现代国家的历史是创造足够强大结构的漫长探索，以便在世界经济中保护一类业主—生产者的利益，反对另一类业主—生产者的利益。

军事力量是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一些荷兰历史学家由于1580至1640年间荷兰缺乏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机器，因而把这一时期荷兰权力扩张视为“奇迹”。普卢姆(Plum)严厉批判了这些历史学家，他非常正确地指出：

奇迹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国家和城市之间存在尖锐对立，以及独裁权力及特权的经常阻碍，荷兰人还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并主要用税收支付其费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加尔文主义寡头统治集团的贡献实现的，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和一个民族国家的命运具有强烈和持久感情。[\[218\]](#)

只有当人们把专制主义视为通向国力强盛的最理想道路而不是最后手段时，这才是奇迹。要是存在一个具有自觉意识和自信心的资产阶级，他们就可能同意进行必要的集体调整；而在其他地方则需要一个强大的君主来强制实施这种调整。由于后一种模式不具有风险，因此强大君主可能受到错误引导，试图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里重新创造“世袭君主制”。布克哈特（Burckhardt）之所以指责路易十四和后来的拿破仑，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的愚蠢行为——模仿查理五世（Charles V）。[\[219\]](#)这是一个由软弱演生的荒唐行为。

我们论述的三个中心国家是如何和为何由于17世纪经济困难而尔虞我诈的，以及一旦英国和法国把它们精力转到加强其军事机器时，英国是如何在海上、法国是如何在陆上击败联合省的。荷兰人在两个问题上吃了大亏。他们是在卫护一种既得优势而不是寻求一种优势，这至少对执政阶层的大部分人来说，进行军事准备的代价常比不进行军事准备的潜在损失更加可怕。[\[220\]](#)这是既要富裕又要政策保险的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在军事上，人们甚至被迫原地跑步。更糟糕的是，这一特定时期是军队单位规模巨大扩大的时期。[\[221\]](#)向这些扩大的军队提供后勤服务，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军队数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生产手段的增长”。[\[222\]](#)在荷兰人的意志正在衰退之际，联合省与英国、法国的竞争变得更迫切。

我们在前面论述了促使法国面向大陆、英国和荷兰面向海洋的一系

列因素，除此之外，法国纯粹的地理优势也印证了这一军事倾向，特别是因为整个欧洲军队的绝对数量正在增长。这一纯粹的军事考虑也说明了英荷牺牲法国而握手言和是不可避免的。^[223]1672年的震荡似乎使荷兰人认为，法国是其主要敌人；^[224]而1688年威廉三世（William III）登上英国王位最终使阿姆斯特丹商人与他们在英国的年轻伙伴重归于好。^[225]

尽管法国表面上军事力量强大，塔皮（Tapie）认为，法国在1679年就已达到了极点；^[226]布尔德（Bourde）在批判路易十四把目光放在南部的大陆轴心而不关心北方的海洋轴心时，谈到由此产生的“路易十四的失败”。^[227]这样，如果我们要解释清楚法国的最终^[228]失败的话，就得寻找非军事因素——重商主义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古怪行为。

莫斯尼尔（Mousnier）说，从亨利四世时代到路易十四时代，柯尔伯主义始终是法国政策的一个特征，该政策的目的“首先是政治性的”。^[229]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莫斯尼尔大概把巩固国家本身看成是目的了，看成是任何君主都可以追求的。但实际上君主们能否成功？法国国王们显然没有。实际上，王位复辟时期的英国和柯尔伯时代的法国都在自觉地、积极地支持它们的生产阶级，反对外国竞争者；建立它们的商船队；并在国家与业主—生产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上制订出可行的分配比例。莱昂和柯利尔（Carrière）注意到了柯尔伯时期大船数量的增加，但他们认为我们不应把全部功劳归于柯尔伯，因为这实际上是“战争的重要性”所导致的结果。^[230]德鲁莫（Delumeau）注意到了柯尔伯时期经济形势的普遍改善，但他说，这与其归功于柯尔伯，不如归功于击败投石党人（Fronde）所带来的“政治稳定”。^[231]总之，以上这些著作者是在向我们暗示，小集团精心设计的政策并非关键因素，我们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压力。笔者对此表示赞同；而且我们亦可把这一分析用于英国；英国的一系列战争促进了其造船业，1660年后也经历过没有政治动乱的平静时期。

威尔逊以隐喻的方式暗示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点差别：“在英国‘重商主义’与柯尔伯主义及其衍生物之间，所有的差别就是一套特制衣服与一套现成衣服之间的差别。”^[232]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一隐喻应用于公共财政体制和总体行政时情况如何。17世纪“战争的制度化”^[233]意味着中心大国公共支出的大幅度增加。荷兰共和国最终因此而不堪重负。但英国和法国情况如何？增加的支出得有某种来源渠道，而这个来源必定是有产阶级。其原因很简单，到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早已对工人生产的产品征收了很高的税收，因此对工人的任何公共税收的增加，实际上就意味着有产阶级利润的减少，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无法从他们的土地上得到同样的地租，或者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因此付出更高的工资。^[234]

国家的问题是一个双重问题：筹措资金和有效地消费这些资金。有效地消费并不等于实实在在地消费，而是指消费得要有生产效率；用它作为一个尺度，衡量国家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所得到的增加利润是否超过这类国家支出用于资产阶级的间接消费。英国和法国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在王位复辟时期的英国和柯尔伯时期的法国，它们的应付能力是否有很大差别，还不甚清楚。

筹措资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速度要快，这就意味着要从某处借贷。举债仍是联合省的一个优势，它“享有健康的公共信誉……因为政府是主要的投资者”。^[235]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也在寻求方法应付借贷之需。

费弗尔（Febvre）在谈到柯尔伯时，称他是位“要为国王寻找金子的炼金术士。是位一旦开始寻找，就决不罢休的人”。^[236]但柯尔伯觉得，国家早已以税款包收的形式借贷太多。为了增加总收入，他降低了包税商的作用（结果这将农民的大部分税收转到国家手中），同时严格控制国家“非生产性”开支（这减少了重新分配给同一有产阶级的税

款），以便把这些钱花在重商主义事业上。^[237]

柯尔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他大概将国王的收入增加了一倍。^[238]路易十四的国家可能是那时唯一一个可以支撑重大军事行动而又不招致严重困难的国家。^[239]不过，就其清晰度与透明度来说，可以说柯尔伯的衣服是现成的：更直接地征税和平衡预算（即更直接地重新分配），他的方法是不受欢迎的，只适合于费资巨大的大陆军事扩张。这种方法是不能持久的。

英国的衣服则是特制的，创造了长远的公共借贷新机制：税收不那么明显了，但从长远角度看有产阶级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因而这种方法受到的抵制较小，并在18世纪为国家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些收入又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有效消费。与联合省和法国相比，虽然英国迟至王位复辟时期它的公共借贷方式仍“相对落后”，^[240]但王位复辟时期为1689年后所谓金融革命打下了基础。1665年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的一系列试验——呼吁私人小投资者直接借钱给政府——虽然只维持到1672年，但这些试验为财政部作为一个财政控制部门支配财政开创了一个重要先例，也为日后提供了手段。^[241]

法国的更直截了当的方法（也许可以这样说）扩展到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但有效的行政管理亦不一定意味着专制的行政管理。斯沃特（Swart）认为，荷兰政府缺乏效率，是一个“过时的、带着中世纪味道的混杂物”，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斯密特（Smit）对此持完全反对态度（笔者亦是如此）：^[242]“在17世纪，使荷兰政府比别的中央集权化君主政府更有效率的，正是其非中央集权化。”其实，从荷兰市镇市民的“贵族化”倾向就可看出行政管理效率下降的迹象；一些拥护“贵族化”的人因此而为荷兰共和国提出了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同时抱怨执政阶层对海外贸易失去兴趣的声音也出现了。^[243]

法国加强国家力量的道路是众所周知的：中央集权和统一性。其

实，这条道路被人们认为是一条古典的道路。当然，中央集权化并不仅仅包括设立中央行政机构（这个任务在以前的时代已经完成了），而且包括创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直接的权力网络，即地方行政长官（*intendants*）制度。这种新的地方行政管理方式是“真正的专制主义革命”。^[244]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但柯尔伯只在五大包税区实施了统一关税。哈克谢尔（Heckscher）认为，这“证明柯尔伯从未打算实行全国关税统一”。^[245]这一评论过于苛刻。我认为，穆夫里（Meuvret）的说法更公平，他说：“这样说大概更好些：柯尔伯只是位兢兢业业、坚忍不拔的行政长官，而不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独创精神的改革家。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观念都不允许进行激进的变革。”^[246]为了进一步认识柯尔伯为使国家官僚化而进行的艰苦战斗，我们只需看一看海员（*gens de mer*）和海军军官集团抵制柯尔伯设立和平时期可以为商船队服务的海军预备队的打算的情况就够了。^[247]在同一时期，即从17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尽管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激烈冲突，政府的核心既得到了加强，又提高了效率，”^[248]只不过没有那么多喧嚣，因而反对意见也少得多。

英国和法国同时寻求建立强大的国家，为何他们的方式如此明显不同？为何英国所走的道路更富有成果？我们可以从两国阶级结构的细微差别中找到答案。不过，我们必须从英法两国的共同点开始。两国都是该时代欧洲世界经济中欣欣向荣的工业生产和农业中心。两国的封建贵族均大都转化为资本主义式的农场主，并在非农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国的非贵族资本主义企业家亦在农业、商业、工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这些非贵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经济成功，他们迟早会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由于法国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界线画得比英国低，所以技术上居于中上社会地位的人在法国可以成为贵族的（*noblesse de robe*，穿袍贵族），在英国则为平民（绅士）；但两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实际上是相当的。由于法国历来比英国弱小（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英国国土面积，还因为由此产生的经济向心力），因

此*noblesse de robe*（穿袍贵族）被吸收进政治结构中，成了国家官员；而绅士则大部分成了地方官员。不过，在两种情况下，他们的新角色都代表了对政府真正的（虽然有限）政治参与。

此外，从16世纪至18世纪，或许直至19世纪，两国社会的上层均发生了一场根本的政治冲突。这场斗争是在那些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律结构意义上具有高社会地位的人与那些或多或少成功的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的关键是，在该时代的任何时候，每一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同时既具备传统地位又取得高度的经济成功，因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认为自己是贵族或是资本家。如果再考虑到通过“贵族化”手段把经济成功转化为社会地位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就会产生模棱两可。不过，那个时代的人肯定比后来时代回顾这些斗争的学者能更好地驾驭这些模棱两可，理解这些斗争的现实。[\[249\]](#)

笔者再重复一次，综上所述，从1500年到1800年这一整个时期，英国和法国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别。托尼（Tawney）说了句著名的俏皮话：“资产阶级革命，当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问题是两边都有资产阶级。”[\[250\]](#)但这是1688至1689年光荣革命的实情，就像是1640年革命的实情一样；投石党运动也是如此，甚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这就使这些革命失去了其“革命”特征。因此，我们必须摒弃认为资产阶级和贵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这一非历史观念，特别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与贵族是两个在很大程度上互相重叠的社会集团，它们依人们的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角度来定义统治阶级而具有某种不同的面貌。使用不同的定义便会产生不同结果。社会与政治斗争确实存在，但它们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事情。[\[251\]](#)

在强调英国和法国的相似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两国的具体差别。必须对这些差别加以分析，以便弄清19世纪两国为什么走上不同的道路，因为使得英国在1763年后在经济效率和经济地位上大大领先于其

对手的，正是早些时候的细小差别。

在一本论述政治稳定概念的著作里，拉布（Theodore Rabb）把1500年以后现代初期欧洲政治描绘成一幅极不稳定的图画，国王和贵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平衡”直到17世纪中期是“不稳定的”，“从那以后的一百年里，一系列问题才不再使社会两极分化”。拉布说，虽然该世纪中期以后还有“余震”，但没有谁“对哪个政治结构……持根本的疑问态度。那是十分重要的变化”。^[252]对政治现实的这种描述是否合乎理性？如果合乎理性的话，那么它对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斗争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注意到拉布论述的年代与长期经济趋势大致相关，乍看起来似乎是古典的韦伯式（Weberian）的关联：扩展和政治不稳定，停滞和政治稳定。

假如我们更清楚地界定我们所谈论的是何种稳定及什么时代，我并不认为拉布的观点是谬误。我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16世纪的经济扩张使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清晰的社会阶级出现了，这个阶级和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只要保持高速扩张，这种形势就无需加以进一步澄清。一旦可以看到经济扩张的极限时，决定谁有权控制国家机器的斗争就变得尖锐起来。不过，持续的经济困难迫使两个派别达成事实上的妥协，以免政治斗争失去控制，避免较低阶层（城市的和农村的）不仅仅生机勃勃地，而且独立地和直接地开始表露自己。正如拉布暗示的，这以后是一段相对稳定时期，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得到控制，或在制度上得到抑制。

在此我无意分析17世纪中期英国和法国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不过想简述一下斗争结束时情况如何。两国的君主均受到挑战，在英国更加激烈。但在最后，法国的投石党（Fronde）运动受到镇压，英国的君主制得以恢复。确实，两国议会的地位存在重大的宪制上的差别，英国议会得以扩大，法国议会却被废除。在英国，“国王的行政专制”被“议会的

无限的立法权力”所取代。^[253]但社会妥协的内容是什么？关于英国革命的结果我们可以找到完全不同的总结性论述。这里略举两例。斯通（Stone）说：“1660年革命结束时的英国与1640年革命开始时的英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254]希尔（Hill）说：“1660年旧国家并没有恢复，恢复的只是其外表。”^[255]

依笔者之见，两种总结均失之偏颇。1660年和1640年之间确实有差别，但我认为事情和大多数观点相反，要紧的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公开的社会冲突结束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取得了*droit de cite*（公民权），但这一阶级的领导权仍旧安安稳稳地掌握在旧家族手中。新形成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符合前保皇党人（Cavalier）和圆颅党（Round-head）人之类的利益，因而成了社会妥协的基础。“没有什么比王位复辟时期的政府委员会和贸易商会的追求更具有典型意义的了，在这些委员会与商会里，王公贵族与商人勾肩搭背，密谋策划，指望互相得利”，^[256]这是一种妥协，偿还被没收的土地这一问题被掩盖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了，因而这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这是查理二世（Charles II）捧给议会的一个烫手山芋，议会又把它捧给了一个委员会，但在最后，这一问题通过私下安排解决了。^[257]

斯通（Lawrence Stone）暗示，在前工业时代，大概除了1540至1640年这一期间外，英国“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流动社会”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258]难道1660年的妥协不是止住、稳定住16世纪扰人不安的好动症、将事情就地冻结住的一种共识吗？^[259]难道1660年英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不是统治阶层中间下面这样一种共识吗？将来不再需要内部的社会变革，英国国家（不管是国王还是国会都相差无几）将在牺牲世界经济的其他国家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发展。^[260]1680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不是证实了这一点吗？^[261]17世纪80年代不是有一些集团出于一系列鸡毛蒜皮的原因而威胁要重新提出王位复辟时期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吗？这些集团后来被镇压下去。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辉格党人把英国革命看作是对“封建主义”的伟大胜利，那么可以说光荣革命是自由辉格党人最喜欢的时刻。正如特里维廉（Trevelyan）所说^[262]：“用革命方式解决问题的基调是法律下个人宗教及政治的自由。历史上所有革命中最保守的也是最自由主义的。”有人认为革命是贵族的革命，特里维廉是否受过这种观点影响？并非如此；他说：“革命是由整个国家、由所有阶级联合掀起的。”这是另外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在一个依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经济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地主是乡村地区自然的、为众人所接受的领导者。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当必须临时组织力量抵抗政府时，像托利党（Tories）的丹比（Danby）和西摩（Seymour）、辉格党（Whigs）人的德文郡（Devonshire）和什鲁斯伯里伯爵（Shrewsbury）这样的乡绅和贵族们便走在前头。

在所有阶级联盟的言辞的背后，存在着“乡村地区自然的、为众人所接受的领导者”这一现实。确实，“专制”国王被永远消灭了；但正如平卡姆（Pinkham）所说，这一点的根本意义在于：

迄今为止国王可随意用来他所乐意的任何一个集团（有时甚至是普通百姓，这一点不要见怪）利益服务的皇家权力，现在已转移到土地贵族手中，他们能够控制议会。^[263]

土地贵族的这一胜利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政治妥协将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很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它使贵族和乡绅可以加入商人和金融家的行列，在攫取欧洲世界经济财富的竞争中超过他们的法国对手。

法国在何种方式上与此不同？这又是法国独特的地理的缘故。英国（英格兰）有其边际地区，更有一个大不列颠。这些位于一个中心国家

之内的边缘地区害怕两种趋向：英格兰一大不列颠国家的逐渐强大（这对它们形成政治威胁）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胜利（这在经济上对它们构成威胁）。在大不列颠，上述两种威胁是等同的，因此，边缘地区对英国革命更加敌视就不奇怪了；^[264]同样，在革命的十年里英国完成了统一也不足为奇。^[265]法国的情形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得那样，与此大相径庭。^[266]在法国，中央集权化势力和资本主义企业势力没有像英国那样在地理上等同起来，中心的势力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抵抗（虽然并不一定协调一致）：经济上边缘地区的抵抗和经济上属于核心，但政治上属于边缘的地区的抵抗。这使得统治阶层内部斗争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从宗教战争到投石党运动），政治上亦更加不明朗。

由于两派看来正在达成妥协（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王位复辟时期紧张关系缓和了，而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即路易十四的柯尔伯时代，却有过一段强加的休战时期。休战依赖于君主遏止那些下大赌注的势力（或者说比他们的英国同行更愿意、更有能力玩危险游戏的势力）的政治能力。法国的政治结构反映了这一点：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边境地区在司法上（及经济上）均处于“中心”之外。那时候这些地区不仅没有和其他地区结成关税同盟，因而得不到好处（虽然加入关税同盟也有不利之处），而且它们的税收负担也重得多。^[267]那些不具贵族身份的资产阶级只是单个地^[268]而不是集体取得贵族身份，这使得他们常常感到不安，因而骨子里桀骜不驯。^[269]

矛盾完全出于胡格诺教徒问题。南特敕令大概是解决统治阶层内部分裂的一个步骤。为什么在1685年敕令被废除？对于这一问题，在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中找不到真正令人满意的答案。胡格诺教徒并不特别反对君主制。^[270]为什么国王对他们如此敌视？吕提（Lüthy）认为这是法国针对早年内战遭受的羞辱而为“维护国家形象”而采取的行动。^[271]罗伯特（Robert）认为这是国王等待已久的一个行动，这个时机终于在体面的内伊梅根（Nijmegen）和平之后来到了：“这一外交政策的巨大胜

利.....使国王相信：从此以后他可以为所欲为”。^[272]拉杜里（Ladurie）则认为这是把教会拉拢到国王这一边的一种方法。“公平交换（*donnant donnant*）。教区牧师们在神圣联盟和投石党运动时期是如此好斗，尽管出现詹森主义者（Janseinst）的争吵，他们后来成了新秩序的支柱”。^[273]这些解释没有一种足以令人信服。或许这就像在棋盘上无目的地对弈，期望减少了棋子便可改善自己的地位。在棋盘上，如果一次交换棋子吃并不明显有利，那么就离死棋接近了一步。国王想方设法加强国家力量。这在英国更加困难。废除南特敕令虽然于事无补，但也并无害处。

关于我们对17世纪中期英法两国稳定所做的一般解释，还有一条重要证据。英国的稳定比法国更有效，但两国都存在过稳定，这一点毋庸置疑。稳定是统治阶层内部妥协的结果。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看到低级阶层态度的转变，因为统治阶级的分裂给他们提供了空间，而统治阶级的妥协则加深了他们的政治边缘化。对于后一点，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证据。农民暴动发生的频率降低了，暴动本身也变得温和了。^[274]由于这个时期大概是经济困难时期，因此答案似乎是在于暴动存在政治困难，而不是缺乏暴动的动机。

在以前，农民在暴动中可以依附于统治阶层的某一集团，到17世纪末，这样做已不可能了。^[275]这一伟大的妥协对农民和城市工人来说是多么痛苦！1837年一位宪章主义者（Chartist）在回顾英国革命时说：“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它一点好处也没有。”^[276]确实，出现了难以镇压下去的骚乱，特别是在城市，^[277]然而一旦资产阶级间达成了妥协，他们便转而镇压这些骚乱。正是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和危险阶级这两个概念开始联系起来，“贫穷与犯罪”开始在“统治阶级的头脑中”挂起钩来。^[278]

如果愿意，你可以重复关于商业和专制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旧格言，

因为商人会“使Rol Soleil（太阳王）黯然失色”。^[279]但熊彼得（Schumpeter）的补充更切中要害：“（封建）桎梏一方面阻碍（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保护（资产阶级）。”^[280]这在英法两国都是如此，^[281]但由于我们前面勾画的各种原因，英国的政策稍微成功一些。

^[1] 引自普卢姆（Plumb）（1950，71）。

^[2] 盖尔（Geyl）（1961，161）。他说：“黎塞留或许有他烦恼的时候，但他一生都致力于使胡格诺教徒和贵族们温驯听话，团结法国各派力量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致使他没有什么行动自由。”

^[3] 参见肖努（Chaunu）的图表，该表列有各地区的曲线（1961a，181）。

^[4] 宾特兰（Pentland）的说法令人信服。他认为，一般的因果顺序是从经济机会到人口增长而不是相反；但这一因果顺序适用于一个长期的上升曲线的开始。在其他时候，“人口增长本身，并在缺少其他支持的情况下会导致贫困和停顿”（1972，179）。举例来说，在论述18世纪英国人口增长时，他把通常的分析方法完全颠倒了过来，认为人口增长“在18世纪上半叶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粮食过于丰富，造成农业萧条；后半世纪人口开始增长，其原因之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农村居民更为繁荣”（1972，180）。亦参见伍德（Van der Woude）（1972），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设。

^[5] 肖努关于1620年人口密度的图表使这种情况一目了然（1966a，图23）。

^[6] 参见莱因哈特（Reinhard）和阿曼高特（Armengaud）（1961，141~142；144-146），他们讨论了日耳曼的“灾难”（包括捷克）以及17世纪南欧“缓慢但持久的衰落”。此外正如肖努所指出的，饥饿造成人口流动增多，从而加速了流行疾病的传播。“每一次食品短缺实际上都再次创造了征服美洲的条件”（1966a，233）

^[7] 参见伍德（Van de Woude）和门廷克（Mentink）（1966，1189）。

^[8] 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a，360）。

^[9]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5b，145）。

^[10] 莱因哈特（Reinhard）和阿曼高特（Armengaud）（1961，147）；但伦敦的人口却直线增长，从1600年的20万人增至1650年的40万、1700年的57.5万人。而巴黎人口只从1600年的40万人增至1700年的50万人。参见里格利（Wrigley）（1967，44）。

^[11] 见哈钦森（Hutchinson），1967，94。他讨论了这些思想及其起源和传播；他还注意到了与此同时兴起的“政治算术”——现代人口学的始祖。关于中心地位和人口密度的联系！有一

点常识必须指出 [正如哈巴库克 (Habakkuk) 所指出的], “在19世纪以前, 我们关于人口运动的知识部分地是从经济现象——即工资、价格和房租情况——推断出来的, 人口的运动都可以从这些因素中得到说明 (1965, 148~149)。”

[12] 这本小册子写于何时, 一度被认为是无法确定的, 因为成书很久之后才公开发行; 但现在看来很可能是16世纪20年代的作品 [参见古尔德 (Gould), 1955a, b; 萨普勒 (Supple), 1954]。

[13] 格兰普 (Grampp) (1952, 465)。

[14] 昂温 (Unwin) (1904, 172~195)。这一运动遭到广泛的反对。其缘由是围绕1604年英国国会关于自由贸易的辩论而在英国展开的一场生动活泼的争论。参见拉布 (Rabb) (1964和1968), 阿什顿 (Ashton) (1967和1969) 及克罗夫特 (Croft) (1975)。

[15] 戴雍 (Deyon) (1969, 31)。欣顿 (Hinton) 提醒我们, 虽然主张重商主义的人“不相信‘进步’思想; 但他们相反的思想——退化思想——亦同样是强有力的行动刺激” (1955, 286)。

[16] 参见戴雍 (Deyon) (1967, 43)。他说: “在1650~1750年的困难时期, 需求和价格的疲软加剧了竞争, 这时候生产者的繁荣就意味着采取了严厉的关税保护政策, 以及政府能够抵制住外国外交和商人的压力。”

[17] 弗兰肯 (Franken) (1968, 8) 将这一现代术语用于荷英关系。威尔逊也强调了这种刻毒: “英国人乘西班牙霸权威胁的衰落和法国霸权兴起之前的间隙, 向荷兰人展开了短暂但刻毒的斗争” (1965, 41)

[18] 泰勒 (H.Taylor) (1972, 260)。他说: “1648年以后的危机和1651年航海条例公布这两件同时发生的事件看来有紧密的联系, 不可能纯粹是偶然性的。”

[19] 参见开普勒 (Kepler) (1972); 亦参见泰勒 (H.Taylor) 有关论述, 他认为英国这种作为向佛兰德的西班牙人的供货者的地位是17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贸易的“新动力源” (1972, 240)。

[20] 欣顿 (Hinton) (1959, 85)。

[21] 琼斯 (J.R.Jones) (1966, 21)。

[22] 参见希尔 (C.Hill) (1961, 42)。亦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61, 405)。他认为, 克伦威尔并没有用新教观点来支配英国的贸易, 他对波罗的海的政策“即使受到宗教考虑的影响, 也是从严格的世俗观点出发的”。

[23] 黎塞泰姆 (Lichtheim) (1974, 24)

[24] 参见欣顿 (Hinton) (1959, 63)

[25] 参见欣顿 (Hinton) (1959, 165), 亦参见阿代利 (M.P.Ashley) (1934, 19~20, 163) 关于英国商人集团各种观点的论述。

[26] 威尔逊 (Wilson) (1965, 184)。

[27] 哈珀 (Harper) (1939b, 49)。英国这一新动作的一个边际效果表明了这一意图。1597年, 荷兰等级会议 (Dutch Estates-General) 通过了新章程, 赞成“葡萄牙国民在这些土地上定居”。这里指的是新教徒和 (间接地) 有专长的犹太人。其动机是要吸引犹太人的资金。巴伦 (Baron) 认为, “奥兰治亲王 (Prince Orange) 和他的下属大大地高估了犹太人的资金” (1973, 20; 3~73)。1651年航海条例通过后不久, 克伦威尔就重新准许犹太人进入问题 [从1290年爱德华一世 (Edward I) 起英国就一直排斥犹太人] 与阿姆斯特丹的西班牙及葡萄牙犹太人进行谈判, 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从犹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 重新准许进入英国意味着“可以绕过航海条例中打击荷兰商业的意图”。而在克伦威尔看来, 重新准许犹太人进入是“扩张海外贸易的大政方针中的一个小小的因素: 准许犹太人定居伦敦就可以加强英国在和荷兰的商业较量中的地位” [恩德尔曼 (Endelman), 1979, 15, 17]。

[28] 参见法奈尔 (Farnell) (1964, 439~440) 关于这两种理解的论述。

[29] 戴维斯 (Davis) (1962, 297)。

[30] 参见盖尔 (Geyl) (1964, 25, 28)。欣顿 (Hinton) 指出, 荷兰人实际上需要的是经济联盟, 因为这对他们有利; 而英国人却宁可要对他们有利的政治联盟 (1959, 88)。因此人们可以看到有关人士从这两种决然相反的立场出发, 从讨论联盟迅速转移到“相互宣泄敌对情绪” [德弗里斯 (De Vries) 1950, 46]。引发双方进行政治讨论的, 是一项要求考虑英荷东印度公司合并的建议。此事发生在1610年至1618年之间, 但是英国人认为荷兰人的要求太过分, 因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参见德米尼 (Dermigny) (1970b, 453)。

[31] 马汉 (Mahan) 海军上将的解释是, “荷兰政府反对支出, 不主张扩军备战, 沉湎于很久以前那次对下三流的西班牙海军的轻而易举的胜利, 心甘情愿地眼看着自己的舰队沦为了一支武装商船队。在克伦威尔时代, 情况陷入最糟糕的境地” (1889, 126)。最近一些学术观点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威尔逊 (Wilson) 认为, “在三十年战争的长期陆上战争期间, 荷兰海军相对受到忽视” (1975a, 65)。威尔逊对这次战争有简要的叙述 (1968, 190~194), 他的结论是, “战争无疑暴露了荷兰经济的致命弱点, 因为它是在正常的经济效率、和平与商业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32] 威尔逊 (Wilson) (1968, 194)。

[33] 欣顿 (Hinton) (1959, 145)。哈利 (Haley) 认为, 三次英荷战争“在荷兰人中都是不受欢迎的”。他说, “头两次战争的爆发是因为贪婪的英国商业利益集团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迫使英国政府发起武力进攻, 以打击荷兰的商业和海军力量” (1972, 177)。一系列事

证实了这一观点：“第一次战争于1652年爆发时，布莱克（Blake）海军上将的三道手令之一便是摧毁停泊在苏格兰海面上的荷兰渔船队”[米歇尔（Michell），1977，179]。

[34] 参见卡特（Carter）（1975a，6）。

[35] 参见威尔逊（Wilson）（1941，6）。

[36] 威尔逊（1951a，154）；亦参见法尼（Farnie）（1962，206）和卡特（1975a，6）。

[37] 参见威尔逊（1968，213~214）；亦参见威廉森（1929，252）。

[38] 这就是威尔逊对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英国商业制度的“设计师”——所持的观点（1965，168）。

[39] 欣顿（Hinton）（1959，106）。

[40] 琼斯（J.R.Jones）（1966，75）。

[41] 古伯特（Goubert）（1970b，112）；亦参见琼斯（1966，60~61）。关于荷兰“维持现状的努力”，参见弗兰肯（Franken）（1968，7）。

[42] 有一段时间，英国一直要求在海上的其他国家船只向英国船只敬礼。1672年，英国又一次强有力地重申了这一复一年的要求。琼斯（J.R.Jones）评论说，对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汉萨人和法国人来说，“这等于是一个当代所称的海上君主同盟”，有人认为英国的这一要求和法国在陆上的要求是相似的（1968，48）。

[43] 参见威尔逊（Wilson）（1969，202~204）。

[44] 在此之前，路易十四一直把英国看成是“一个亲法国的弱小国家”。古伯特（Goubert）认为，这个判断“在1661年是可行的，不幸的是路易十四说此话时是在1670年”（1970a，72~73）。鲁尔（Rule）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路易十四“低估了英国的力量”。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英荷战争最后会“使法国政治家迷惑不解的部分原因”（1969，59）。至于英国，视野的改变是政治争论的一个话题。希尔（C.Hill）说，在1674年，只是“辉格党人和资本家把法国视为英国在世界贸易和世界霸权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1969，163）。托利党人（Tories）优柔寡断。英国只是在1689年后才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作为中心大国的地位。霍恩（Horn）认为，在那之前，英国以大国的身份在欧洲大陆的出现“常常是不情愿的、为时不长的和不起作用的”（1967，2）。笔者对“不情愿的”这个形容词不敢苟同，但后两个形容词看来名副其实。霍恩提供了基本的证据，证明英国人只是在1689年后才不再接受补贴，而荷兰人和法国人早就不接受补贴了。

[45] 参见霍尔（A.K.Hall）（1957a，347，349）。虽然武器制造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革，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了“军队组织上的巨大改进，以及军队规模的巨大扩大”。关于军队结构的变革（相对于它们的武器），参见芬纳（Finer）（1975，99~102）。关于在多大程度上发生

军事革命，有人提出了保留意见，参见帕克（Parker）（1976b）。霍尔认为骑兵作用的下降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巴尼特（Barnett）指出，在1660年到1714年间，有两项发明——刺刀（bayonet）和燧发枪——使步兵的威力大大增强。

[46] 从拿骚的摩里斯（Maurice）亲王时代起，荷兰就以其围攻战术而颇负盛名。使用这种战术，荷兰人可以自由施展其工程技术、挖地道和反地道、发射学和爆炸等方面的天才（威尔逊，1968，100）。

[47] 威尔逊（Wilson）（1970，125）。

[48] 费歇尔（Fischer）和伦格林（Lundgreen）（1975，541）。

[49] 在古伯特（Gorbert）看来，1672年是路易十四“统治的重大转折点”，由于法荷战争，卢瓦（Louvois）战胜了柯尔伯，财政上的稳定不复存在。“到1673年，国王的钱财已花费殆尽，柯尔伯构筑的大厦开始土崩瓦解”（1970a，140）。无疑，马汉（Mahan）海军上将也是这样想的：“在所有强国中，只有法国才能做出自由选择（陆上和海洋）。1672年，法国确凿无疑地选择了陆上扩张。为何1715年时法国景况悲凉、国力衰竭，而英国却形势喜人、繁荣兴旺？为什么英国强加的和平条件法国乖乖地接受了？其原因显然是两国在财富和声望上的差别。”马汉引述了坎贝尔（Campbell）关于英国在海上战争和贸易上的成功的论述《海军上将传》：“这些是我们的海军力量增长以及使用海军力量的方式所带来的果实。”马汉评论说：“这就无需再说更多了”（1889，226~227，229）。

[50] 雅卡尔（Jacquart）（1973，172）。

[51] 参见古伯特（Goubert）（1970f，150），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a，416）和英伯特（J.Imbert）（1965，339）。

[52] 关于联合省，参见伍德（Van der Woude）（1975，240）；关于英国，参见瑟斯克（Thirsk）（1970g，149）。关于法国，参见古伯特（Goubert）（1970g，334，338~340）。

[53] “17世纪初期，英国就开始认识到，在社会组织的许多方面，荷兰人比他们先进得多。当时流传的一些小册子就已开始指出了英国人应该加以模仿的一些荷兰做法，或者英国人应该去较量一番的一些荷兰成果” [克拉克（Clark），1960，14]。

[54] 参见福塞尔（Fussell）（1959，613~614），琼斯（E.L.Jones）（1967，7），威尔逊（Wilson）（1965，33）和哈巴库克（Habakkuk）（1965d，328）。“在英国……大约从1630年起，新饲料作物就和农业生产融合在一起了，产生了混合农耕制度” [琼斯（Jones）和沃尔夫（Woolf），1969，7]。

[55] 参见钱伯斯（Chambers，1960，21）和达比（Darby）（1973，330~344）。

[56] 参见琼斯（Jones）（1965，14），他说的下列一段话（p.1）与他的观点是自相矛盾

的。他说，在1660年到1750年间，“（英国农业）技术的变化与其农产品市场相当有限的扩大是极不成比例的。”那么什么是合适的比例？什么时候？当市场扩大时，保持现有技术而不是花钱去进行革新常常是最有利可图的。

[57] 德弗里斯（De Vries）（1975，82）。

[58] 例如，拉杜里（Le Roy Ladurie）谈到了英国人将佛兰德人（Flemish）用于小农场的技术加以改造，以适应大规模农业。他说，法国在索姆河（Somme）和卢瓦尔河（Loire）之间的旷野所进行的类似努力只是部分地成功了，而且时间相当晚（1975a，416~417）。

[59] 罗尔（Roehl）（1976，262）。他进一步论述说：“新的作物品种——尤其是从北美引进的——被纳入农业轮作中，如西红柿、玉米、甜菜、苜蓿和其他绿叶作物。它们同时兼收了‘清洁土地’和土壤休闲的功效，使土地不再需要休耕；还可从中得到喂牛的饲料并扩大可耕地。”罗尔（Roehl）援引了布洛克（Bloch）的论述作为辅证（1966，213~219），但也注意到了莫里诺（Morineau）（1968）提出的与此相反的观点。

[60]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b，16）

[61] 霍金斯（Hoskins）（1968，27），里格利（Wrightley）（1967，57）和费希尔（F.J.Fisher）（1961，4）。

[62] 斯穆特（Smout）和芬顿（Fenton）（1965，78），但是他们认为，由于“中央政府的软弱统治”和价格下跌造成的收益下降（p.56~87），所以在1650年时革新（用石灰对酸性土壤做碱性处理）和垦殖的步伐放慢了。这与英国所发生的事情不同，不同的原由大致可作如下解释：虽然政治上苏格兰位于中心大国范围之内（实际上1707年之前只是部分地在核心大国之内），但从经济角度而言，它则是边缘的一部分，所以在研究衰退的影响时，我们可以看到，苏格生产者和波兰生产者之间的相似性比苏格兰生产者和英国（英格兰）生产者之间的相似性大得多。

[63] 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68，326），拉杜里（Le Roy Ladurie）进一步阐述道，“在小自耕农的世界里”，这是确凿无疑的。

[64] 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66，83）。不过，他指的仅是朗格多克。

[65] 威尔逊（Wilson）（1965，143）。

[66] 参见福塞尔（Fussell）（1968，33~34）。

[67] 参见穆夫里（Meuvret）（1968，17）。

[68] 肖努（Chaunu）（1699a，310）。

[69] 谷物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开始于1700年。巴尔罗克（Bairoch）由此推论出，这个过程或

许开始于“1/4个世纪以前”（1973，459）。这一年代与政府政策开始改变的年代相吻合。

《1673年法》引进了谷物奖励制度——不仅允许出口，而且也鼓励出口，参见利普森（Lipson）（1956，ixx-ixxi，451~452）。联合省也很可能增加了其在世界谷物生产中的比重，但由于其起点较低，因此不那么引人注目。参见弗兰肯（Franken）对琼斯（Jones）的反诘，后者认为，在价格不景气的情况下增加谷物生产是“英国人所独有的特点”（1967，159）。詹森（Jansen）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说林堡（Limburg）和其他地方的情形也是如此。弗兰肯把这一谷物生产的增长归因于城镇的压力，并认为谷物生产增长导致了地力衰竭（1971，165）；但问题是，为什么谷物没有从更远的地方输进（特别是考虑到生态因素的时候）所以，必须把利润问题列入解释之中。

[70] 根据雅卡尔（Jacquart）（1974，181~182），“17世纪法国生产的农产品绝大部分都用于国内消费或就地加工。”虽然也出口其他一些农产品，但“除非丰收之年，谷物贸易一般是禁止的。”例如，正当英国开始实施谷物奖励制度的时候，Conseil de Roi（枢密院）却在一项项地颁布禁止出口的法令——1675到1683年间发布的这类法令多达30多项。厄谢尔（Usher）在他对谷物贸易的经典论述中，对这问题有不同的评价（1913，273，294）。他说：“柯尔伯在处理谷物贸易问题上的一个独创之处”是自由贸易。他还认为柯尔伯遵循了“不足时禁止，充裕时许可”的原则。厄谢尔（Usher）指出，这里涉及两方面的自由：出口和跨省贸易。那么，在1675年到1683年跨省贸易相对自由的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一点上，或许大家应该注意到，直到1680年，巴瑟—普罗旺斯（Basse Provence）和朗格多克（Languedoc）两地的谷物生产一直处在扩张阶段。对这一现象有不同的解释，但其后果是：它弥补了其他地区的不足。肖努认为，非中心地区谷物生产持续扩展这一“异常现象”说明了“先前未耕作土地（L'incult）的重要性”，它“意味着比其他地区后达到的极限”（1963b，354）。亦参见古伯特（Goubert）（1970c，49~54），拉杜里（Le Roy Ladurie）认为，1655年到1675年间，朗格多克（Languedoc）谷物生产只发生了“短暂的繁荣”（1974a，149）。当然，英国也“向国内”出口，特别是向伦敦地区〔参见埃弗里特（Everitt），1968，64〕。关键是把对外贸易的限制看作是促进生产的措施——这一点是莫里诺（Morineau）所强调的。就地域而言，联合省、英国和法国都处于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国家越小，外贸在其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71] 参见汤普森（F.M.L.Thompson）（1966，512），古伯特（Goubert）（1970e，102），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b，1412）和雅卡尔（Jacquart）（1968，66）。雅卡尔强调指出，法国大地产的增长只发生在卢瓦尔谷地以北的地区。

[72] 霍金斯（Hoskins）提到，在19世纪，英国的“大量空地不知不觉地被圈占了”（1955，220）。亦参见达比（Darby）（1973，321）。在17世纪的法国，大平原正被封建领主所占用，以致对小农来说拥有一小块草地就是“上帝的恩惠”了〔古伯特（Goubert），1970e，102〕。布洛赫（Bloch）写道，到1700年，法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发生了广泛的圈地现象（1930，332）。

[73] 穆夫里（Meuvret）（1960，346）。塔皮（Tapié）说，在17世纪的法国，许多大封建领主“已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其产业分散，由管家或佃农管理”（1959，138）。

[74] 罗巴克 (Roebuck) (1973, 15)。不过,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认为, 1665年以后, “出租土地者的境况恶化了” (1977, 107)。

[75] 在法国可广泛看到这一现象, 但同样的现象英国也有所发生。参见罗巴克 (Roebuck) (1973, 11~14)。雇用擅长于地产管理的专职官员更是拉大了地主和农业生产的距离。参见明盖 (Mingay) (1963, 59)。

[76] 严格定居是从法律上限制地产继承人出卖或抵押其地产的方式的机制。参见哈巴库克 (Habakkuk) (1967b, 2~3)。这一制度迫使新富裕起来的家族从较小绅士、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那里购买土地, 这样有利于土地的进一步集中。参见明盖 (Mingay) (1968, 28)。

[77] 参见明盖 (Mingay) (1960, 376~376) 和哈巴库克 (Habakkuk) (1960, 160~165)。

[78] 吉赛 (Giesey) (1975) 详细论述了这一十分复杂的体制。古伯特 (Goubert) 认为, 17世纪法国 (指定年金制, *rentes constituées*) 的利率和其他收入来源比起来实际上并不低 (参见1970g, 343~345)。

[79] 穆夫里 (Meuvret) 认为, 征收年贡地 (*censive*) ——类似英国公簿的一种永久土地使用权——是“名副其实的财产”, 其持有者可以“出租、交换、出售或分与他人”, 只要他向封建领主缴纳一定贡赋就可以了。这种贡赋“构成了一种税收体制” (1960, 343)。不过, 古伯特 (Goubert) 指出, 为体现所有权的这种税收可能是非常高的 (1970f, 130)。凯里奇 (Kerridge) 在论述英国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 如果就土地而不是就法律而言, 终生公簿持有者就是自由持有农 (1969, 60)。

[80] 例如, 明盖 (Mingay) 相当正确地指出,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所用的自耕农 (*yeoman*) 这个词“只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自耕农是一种农民, 其地位高于农夫 (*husbandmen*), 低于较大的农场主 (*larger farmer*), 但他可能是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或是承租人 (1963, 88)。巴特 (Slicher van Bath) 认为, 一般来说, 做一个地产主并不总是优越于他人的标志。“在人口稠密、土壤肥沃的地区, 佃农经营起来可能比贫瘠地区的地产主经营起来更有利可图。土地所有权远远不等于财富” (1977, 109)。

[81] 对法国来说, 1660年似乎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停滞和灾难”时期的结束——雅卡尔 (Jacquart) 在一本论述1560年到1660年法国农村的书中, 以此作为其中一章的标题。不过, 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认为, 直到1675年, 地租一直是呈上升之势的 (1973, 430)。

[82] 世纪中以后, “以前一直为自己的小账本、几亩地 (*arpents*) 和相对独立的地位而洋洋自得的独立小农, 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失败。在大规模耕作 (*grande culture*) 的地区, 这种独立小农的土地被合并到某些大型租佃单位 (*quelque grosse ferme*) 中去。如果他能租回他原先的土地就算是幸运的了” [雅卡尔 (Jacquart), 1975, 264]。亦参见迪帕卡尔 (Dupâquier)

(1973, 171) 和拉布鲁斯 (C.E.Labrousse) (1970, 703)。

[83] 劳伦斯 (Lawrence)、斯通 (Stone) 说：“17世纪初期，地租增长的速度比价格增长的速度快，利润从佃农那里流回到地主手中” (1972, 68)。他主要所指的必定是小佃农，因为他说道，这一事实说明了后来地主、殷实的佃农和无地劳工之间的三角关系。哈巴库克 (Habakkuk) 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资本的总规模是解释小农衰落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一特定时期，富裕的地主“总是有足够的 (资本) 储备，随时可用来购买附近农民出售的物品” (1965a, 660)。哈巴库克很恰当地把1660~1740年这一时期同1540~1640年这一时期区分开来，认为1540~1640年这一时期有更多的大地产被变卖。至于17世纪英国由于对资本的需求而造成的小地主衰落，参见瑟斯克 (Thirsk) (1970, 157)。雅卡尔 (Jacquart) 谈到了1675年后小生产者——laboureur (独立的) 和农民fermier (佃农)——的纷纷破产。在另一个地方，他提到了1680~1700年间法国北部“为数众多的商人—小生产者 (laboueurs) 王朝”的消失 (1978c, 467)。

[84] 明盖 (Mingay) 提到了1660~1750年间自己耕种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戏剧性的”衰落 (1968, 14~15, 31)。明盖还说，在这一时期，一批殷实的乡绅——介于自己耕种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地产主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设法支撑了下来” (1960, 375)。拉夫洛夫斯基 (Lavrovsky) 认为自己耕种的小土地所有者的衰落“始于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18世纪” (1960, 354)。

[85] 迪帕卡尔 (Dupâquier) 认为，乡村一级的强大社会集团由大佃农 (gros fermiers)、中等的“土地所有者” (grands laboueurs) 和商人组成 (1973, 169)。17世纪初期，苏利 (Sully) 公爵常常提到，“农耕 (labourage) 和畜牧业是法国吮吸的两个乳房” [转引自拉瑞兹 (Larraz), 1943, 201]。穆夫里 (Meuvret) 提到了1660年后“生产谷物的富裕农村”发生的一系列生存危机的严重后果 (1971b, 122)。

[86] 福塞尔 (Fussell) 描述了17世纪西欧各地“租让制奶业”的现象。

[87] 参见穆夫里 (Meuvret) 关于承租包税人 (fermiers generaux) 和土地出租人 (amodiateurs) 地位的论述 (1960, 347~349)。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论述道，全法国租让土地中39% (但法国北部有多少?) 是“大地产” (1975a, 421)。

[88] 在不景气时期，地主免除拖欠的地租，并重新负担土地税，以争取合适的佃户。参见琼斯 (E.L.Jones) (1965, 8)。

[89] 参见明盖 (Mingay) (1960, 378~379)。改良的原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佃农和控制着中等规模土地的人。[参见哈巴库克 (Habakkuk), 1965d, 327和明盖 (Mingay), 1963, 166]；但在这一时期，地主可能被迫承担大部分费用。

[90] 古伯特 (Goubert) (1973, 135)。

[91] 例如，参见康塞兹 (Quencez) (1968, 118~119)，他在这部技术词典中把

charrue（法语）翻译成“犁（plow）”，而把araire译成“扶犁、原始的犁”。其他语言类似的词汇也出现同样的困难，如德语（pflug和hakenpflug），意大利语（aratro或aratro di leggio），西班牙语（arado de labor profunda和arado或arado primitivo）及荷兰语（ploeg和primitieve ploeg）。豪泽康特（Haudricourt）和德拉马尔（Delamarre）（1955），用他们整本书506页的篇幅解释了从东方到西方、从远古到现代charrue和araire的差别，还解释了由于语言的误差和错误译法而造成的误解。

[92] 古伯特（Goubert）（1973，135~136）。

[93] 迪帕卡尔（Dupâquier）和雅卡尔（Jacquart）（1973，17）。他们给haricotier（作小宗交易者）下的定义是“拥有一匹劣马的laboureur（自耕农）”，sosson则是“只拥有一群马或牛的农民”。雅卡尔估计，法国农民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其所拥有的财产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他还认为，在整个17世纪，中等规模的地产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这里所说的中等规模是在至少30公顷以上（1966，22~26）。

杜兰（G.Durand）认为，南方的葡萄种植园及其拥有者一样，是“工作极其艰辛而贫穷的地方”，利润大都流入商人腰包或通过税收流到国家官僚手中（1977，133）。

[94] 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b，1405~1407）。

[95] 布伦纳（Brenner）（1976，43，63）。克鲁特（Crook）和帕克（Parker）对此提出了怀疑。他们说：“农民远远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实际上，由于他们采用了新的方法或新作物，或只是向地主证明一心一意致力于放牧能带来利润，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1978，39）。

[96] 雅卡尔（1975，273~275）。

[97] 布伦纳（1975，72~73）。不论从何种角度说，英国地主一般都是通过购买获取土地。参见阿什顿（Ashton）（1969，36）。克鲁特和帕克说：“在布伦纳教授忽略英国农民的贡献、极力否认他们的独立性的同时，他也夸大了法国农民的独立性”（1978，41）。雅卡尔（Jacquart）也说，欧洲大陆的大地产主攫取农民土地的方式与英国同出一辙（参见1978b，409）。

[98] 利普森（Lipson）（1956，II，lxxxix，cxlx）。至于专利保护——17世纪英国政府的中心政策——的重要性，各方意见不一。诺思（North）认为，它“非常重要”（1973，228），起到了鼓励革新的作用。克拉克（Clark）则认为，说它鼓励了许多发明者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许多发明者得不到应得的报酬（1936，152）。

[99] 自从兰斯（Reims）、亚眠（Amiens）和博韦（Beauvaisis）的布匹生产崩溃以后，1644年6月15日对荷兰和英国进口的布匹的关税增加了一倍 [参见戴雍（Deyon），1969，77，1966，54]。

[100] 参见莱昂（Léon）（1970b，236）书上关于1703~1705年的地图。

[101] 戴雍 (Deyon) (1966, 60)。

[102] 古伯特 (Goubert) (1970g, 336)。

[103] “(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 1680至1705年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为18世纪上半叶的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 实际上推动了18世纪上半叶的发展”(Deyon, 1963, 955)。

[104] 参见戴雍 (Deyon) (1963, 952) 和克伦本茨 (Kellenbenz) (1965, 389~390)。

[105] 参见威尔逊 (Wilson) (1965, 185)。

[106] 戴雍 (Deyon) (1872, 31) 持这种观点; 但克伦本茨 (Kellenbenz) 的考察 (1965) 似乎得不出同样的结论。

[107] 参见格拉曼 (Glamann) (1974, 506) 和威尔逊 (Wilson) (1977a, 26~27)。

[108] 威尔逊 (1960a, 221)。

[109] 参见斯密特 (Smit), 1975, 62)。

[110] 欣顿 (Hinton) (1959, 101)。

[111] 参见罗曼诺 (Romano) (1962, 519)。他把荷兰造船业的下降定在1671至1701年。亦参见费伯 (Faber) 编 (1965, 108)。昂格尔 (Unger) 注意到, 荷兰在船舶设计方面的主导地位到17世纪30年代就已经下降了, 到70年代则已丧失了, 到18世纪, 荷兰造船厂已大大减少或消失了。昂格尔提出了一系列原因: 法国的保护主义, 战争导致荷兰税收负担和公共债务的加重; 国内市场的萎缩; 海盗业的衰落; 船舶寿命的延长 (参见1978, 109~110)。

[112] 谈到17世纪初期的英国, 萨普勒 (Supple) 说: “就政府来说, 不稳定的最关键因素是年复一年的失业问题”(1959, 234)。谈到18世纪初期, 乔治 (D.George) 说: “有人认为失业问题是一种现代病。这是错误的”(1953, 53)。

[113] 佩尔斯 (Pares) (1937, 120)。弗尼斯 (Fumiss) 说, 对贸易联系的评价不仅从其 对贸易平衡的贡献的角度看, 而且从“该项贸易可以向本地劳工提供的就业”角度看 (1957, 52)。

[114] 威尔逊 (Wilson) (1969a, 125)。

[115] 德弗里斯 (De Vries) (1974, 183)。罗梅因 (Romein) 估计1690年荷兰的工资水平比英国高16% [转引自威商逊 (Wilson), 1969b, 118]。

[116] 雅卡尔 (Jacquart) 提到, 投石党运动以后的时期, 由于缺乏农业工人而导致农村劳工的工资上涨 (1973, 178); 亦参见古伯特 (Goubert) (1970d, 64)。至于1665年至1688年间的工业, 尽管出现了衰退, 但“城市和农村的工资水平 (计件和计时) 看来是稳定的” (古伯

特, 1970g, 348)。这实际上是相对上升了。还参见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70, 37u)。莱昂 (Léon) 指出, 1660年到1750年间, “各种行会气势迫人”, 导致城市工资水平升高和工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农村地区, 因为农村地区劳动力“十分丰富, 而且温驯听话, 习惯于低工资” (1970b, 251)。

[117] 希尔 (C.Hill) (1969, 98)。

[118] 利普森 (Lipson) (1956, III, 278)。

[119] 参见弗尼斯 (Furniss) (1957, 76~78)。法国也存在同样的压力。参见圣-莱昂 (Martin Saint Léon) (1976, 13, 501~504)。

[120] 汤普森 (E.P.Thompson) (1967, 57), 他注意到 (P.64) 同一时期英国钟表制造业的兴起。

[121] 内夫 (Nef) (1968, 233)。达克姆 (Duckham) 在谈到“矿工奴隶制”时说: “实际上没有哪部法典允许‘奴役’矿工。然而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社会历史上, 绝大多数矿主都认为他们的矿工是最完全意义上的契约劳工, 而且认为所有矿工乐于都接受这种地位” (1970, 243)。不过, 这无法阻止矿工时不时地举行罢工。罢工是可能的, 因为“缺乏熟练的采煤工人” [休斯 (Hughes), 1952, 253]。

鲁舍 (Rusche) 和克什海默 (Kirchheimer) 注意到, 就在这一时期的荷兰、英国和法国, 我们可以看到教养院的兴起。教养院主要是作为“以特别低的成本 (由于其廉价劳动力) 生产商品的工场” (1939, 50: 亦参见24~52)。此外, 这一时期, 苦力犯这种司法惩罚形式也发明了——这是“获得用于自由劳工所无法完成的任务 (即使经济条件处在最糟糕的时期) 的劳工的最普遍的方法” (P.56~58)。

[122] 转引自威尔逊 (Wilson) (1969a, 122)。亦参见哈克谢尔 (Heckscher) (1935, II, 169), 利普森 (Lipson) (1956, III, 273~274), 科茨 (Coats) (1958, 35, 46) 和怀尔斯 (Wiles) (1968, 115, 118)。

[123] 伊曼纽尔 (Immanuel) (1972)。

[124] 哈克谢尔 (Heckscher) (1935, I, 22)。

[125] 莱昂 (Léon) (1970a, 113)。此外, 1660年至1789年间国家对工业的投资每年仅为200万法郎, “实际上这是一个可笑的数字”, 因为工业带来的财政收入高达1亿法郎 (莱昂, 1970b, 225)。

[126] 内夫 (Nef) (1969, 215)。

[127] 古伯特 (Goubert) (1970g, 354~356)。他提醒我们, 在“内伊梅根条约”里, 柯尔伯在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压力下, 被迫在他的高关税政策上做出让步。穆夫里 (Meuvret) 认为,

公司的失败比关税及对外国运输船只征收的每吨50苏的富凯（Fouquet）税 [相当于法国的航海条例的失败重要得多（1971a, 32）]。亦参见戴雍（Deyon）（1966, 55）。

[128] 普里斯特利（Priestly）（1951, 47）。

[129] 柯尔伯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戴雍（Deyon），1963, 95, 1]。

[130] 威尔逊（Wilson）（1965, 65）。

[131] 一方面，有人说法国在某种角度上来说太大了，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荷兰面临相反的问题。“如果尼德兰的所有领土都统一起来了，英国后来所登上的经济进步新台阶荷兰就会更早登上。比利时的铁和煤、阿登（Ardennes）的至关重要的水力都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但荷兰两者都缺乏” [普卢姆（Plumb），1965, XXV]。

[132] 参见戴维斯（Davis）（1954, 161, 163）。不过他注意到，“贸易顺畅的一段时期是从1677年走出萧条到1688年革命这一时期。”

[133] 威尔逊（Wilson）（1965, xii）不过，克莱因（Klein）说，“到1670年前后，阿姆斯特丹的谷物市场已无足轻重，不成其为世界中心贸易市场了”（1966, 208~209）。

[134] 哈珀（Harper）认为，此条例“在抑制荷兰作为第三方运输者方面有实际影响”（1939b, 300）。阿斯特罗姆（Åström）说，1633年至1685年波罗的海贸易的变化是“巨大的”（1960, 7），虽然荷兰的失常就是波罗的海沿岸和英国船主的得。弗兰肯（Franken）引述了1684年阿姆斯特丹城市长老（City Fathers）的话，呼吁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由于自己有谷物和工业制成品，所以其商业本钱比阿姆斯特丹多，”相比之下，阿姆斯特丹的贸易是“人为的”（1968, 10）。

[135] 克鲁泽（Crouzet）（1972, 62）。

[136] 德鲁莫（Delumeau）（1966, 105）。

[137] 李希特（Richet）（1972, 205）。

[138] 穆夫里（Meuvret）（1971a, 33）。

[139] 库尔舍（Kulischer）（1931, 16~17）。

[140] 参见托马斯（P.J.Thomas）对17世纪东印度贸易的“苛刻的”论述（1963, 6）。至于利润，参见格拉曼（Glamann），他说，“荷兰的亚洲贸易所得利润，与其在欧洲通过航运和商业所得利润相比是不算多的”（1958, 11）；亦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78e, 175）。

[141] 贝塞特（Bassett）（1968, 85）。

[142] 威尔逊 (Wilson) (1965, 170)。当时亚洲的布匹由于其轻柔、美观和质高而具有很高的价值。托马斯 (Thomas) 提醒我们：1727年的海事地图说：“印度和中国可以用其产品为整个世界提供衣着” (1963, 31)。

[143] 乔杜里 (Chaudhuri) (1968, 486)。他补充说，至于1700年，“欧洲产品的贸易条件似乎恶化了。”

[144] 穆克吉 (Mukherjee) 把这一变化的年代定在18世纪40年代，那时由于莫卧儿帝国的解体，英法对立就可以采取“严肃竞争”的形式，“目的在于控制印度，以牺牲他人的代价为一家公司取得绝对‘贸易’优先权” (1974, 110)。

[145] 戴维斯 (Davis) 在他对英国贸易的分析中论述了边缘化这一问题 (1961, 125, 137)。就意大利而言，他说，到1700年，它已成为“用其农产品来交换英国工业制成品的另一个国家。”他描述地中海东部贸易是“用英国工业制成品交换外国原料”的贸易，并说，“实际上该贸易可归结为用布匹交换丝绸的贸易。”我同意关于意大利的评论，但对地中海东部 (Levant) 的判断持保留态度。伊萨维 (Issawi) (1974) 也描述了1600年到1914年间奥斯曼 (Ottoman) 帝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贸易的过程；但至于何时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尚不清楚。他似乎认为18世纪是个转折点。

[146] 拉普 (Rapp) 说，17世纪英国的兴起“靠的是征服了南方市场，更确切地说，靠的是摆脱了地中海地区工业和贸易的对手” (1975, 522~523)。笔者认为，尽管17世纪初期与基督教的地中海的贸易的扩大可给英国 (和联合省) 带来直接好处，拉普的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夸大其辞。事实是，1660年后，地中海贸易虽在绝对数量上继续扩大，但在总体贸易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小了。如法国，16世纪后期它和地中海东部 (Levant) 的贸易占其全部外贸的一半，到18世纪80年代，只占1/20。英国的下降甚至更快：从17世纪中期的顶峰的10%降至18世纪末的1%。而且，作为原棉的产地和纺织品的销售市场，黎凡特的重要性已让位于其他新的原产地和市场。参见伊萨维 (Issawi) (1974, 114~115)。

[147] 帕里 (Parry) 说，18世纪将在后来产生“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英国人的地中海” (1967, 191)。莱昂 (Léon) 和柯利尔 (Carrière) 说，从1661年到1789年这一期间，地中海贸易占法国贸易总额的30% (1970, 194)。伊萨维 (Issawi) 说，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占了奥斯曼 (Ottoman) 帝国贸易的50~60% (1974, 114)。法国还在和柏柏尔 (Barbané) (大致指的是突尼西亚) (Tunisia) 贸易中占支配地位 [莱昂 (Léon) 和柯利尔, 1970, 193]。

[148]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63, 29)。

[149]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补充了另外一个因素，认为波罗的海地区购买布匹 (而不是丝绸和丝绒) 的社会集团是小贵族、小绅士、传教士、官员和自治市的市民，他们的需求依旧不变。“所以，造成布匹消费巨大波动的只是一个穿衣集团：军队。战争准备促进了需求，军队遣散则抑制了需求” (1963, 71)。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北方的平静”是布匹购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这一理由能否成立，我表示怀疑。首先，我并不认为非军事需求是固定不变的。阿斯特罗姆（Åström）自己也注意到那时英国的布匹出口危机主要有三方面因素：“荷兰的竞争，欧洲东部和北部布匹生产者的增加和波兰市场购买力的下降”（1963，69）。第二和第三个因素恰恰包含了非军事需求的不稳定性。第一个因素涉及三十年战争，但不涉及军事需求，而是涉及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战争，1623年到1649年间荷兰船只从波罗的海的“英国贸易中消失了”[欣顿（Hinton），1959，37]。

[150] 欣顿（Hinton）（1959，45）。

[151] 参见欣顿（Hinton）（1959，59）。

[152] 欣顿（Hinton）（1959，99）。

[153] 威尔逊（Wilson）（1965，80）。达比（Darby）说，到“1660年王位复辟时，森林面积已大大减少了”（1975，328）。造成的一个政策结果是，海军部受到了震惊，和皇家学会进行了协商。1664年，伊夫林（John Evelyn）撰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土地贵族多植树。他的劝告得到广泛的赞同，并最终收到了效果，国内供应增加了。很清楚“这些年里种植的树木及时成材，在18世纪的战争时期支持了英国的海军”[达比（Darby），1973，329]。

[154] 参见班福德（Bamford）（1956，206~207）。

[155] “法国企业家之所以不愿拿他们的资本和船只冒险去经营北方航运（他们常常批评这种航运），其原因是他们现实地认识到他们的能力有限和与可怕的荷兰人竞争十分危险”[班福德（Bamford），1954，219]。班福德暗示，除了成本高外，法国人不愿到北方获取桅杆的另一个原因是害怕“在战时依靠它们会造成严重的战略无能”（1956，113）。这一时期法国在波罗的海的贸易只占其总贸易的7% [参见莱昂（Léon）和柯利尔，1970，194]。关于法国在北美的行动，班福德说：“用于桅杆的树木在加拿大非常丰富而且便宜，但要开发这些树木需要雇用当地劳工，而当地劳工的工资又出奇的高”（1956，120）。

（和英国人需要相比，）法国人最初不愿到北美去寻找木材资源的原因是要加强国内木材业。看清这一点十分重要。班福德注意到，1731年法国全面停止从北美进口桅杆的一个理由是北美桅杆质量低下。但他又认为，桅杆之所以质量低下，是因为这些桅杆是在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 River）附近而不是在更远方砍伐的，而且在装船之前在场地上存放了两年左右。“假如法国人不是停止进口，而是扩大他们在加拿大的采伐活动，那么结果肯定会像后来对英国那样，法国人可以从中得到莫大益处”（1956，127~128）。

[156] 参见阿斯特罗姆（Åström）（1963，41~44）。这不仅对寻求木材来说是真实的，而且对寻求亚麻、大麻、树脂、柏油、钾碱等来说也是如此。

[157] 兰顿（Langton）（1972，51），他暗示，与内夫（Nef）15倍增加的估计相比，这一数字是保守的。所以他认为“没有发生彻底的‘革命’”。要达到他所谓的革命所需数量谈何容易！

[158] 引自明钦顿（Minchinton）（1974，151）。关于英国木材短缺和采煤的兴起，参见威

尔逊（Wilson）（1965，80~85），他补充了一句颇具特色的评论：“煤成功地取代树木作为燃料以及煤产量的增长不应看作是用来解释英国纺织业以外所有工业发展的两种前提机制（*deux ex machina*）。”不过，他又说：“这大概是17世纪初最有利于经济扩展的因素。”

[159] 阿斯特罗姆（Åström）（1963，32）。

[160] 哈克谢尔（Heckscher）（1932，139）。他说：“（瑞典）的优越之处不仅在于其（铁矿石的）质量，更重要的在于其（木炭的）数量。”

[161] 莱昂（Léon）强调了18世纪法国生铁日益短缺。他宣称，早在1685年，法国就进口850万磅生铁（1787年为4200万磅），主要是从德国、俄国、西班牙特别是从英国和瑞典进口的。他谈到了18世纪“对毁林的威胁和燃料成本日益上升”的越来越多的抱怨，并提到1731年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省农民举行的反对冶金者的暴动，因为冶金者毁坏森林（1970b，231~232）。

[162] 弗林（Flinn）攻击了认为1660至1760年英国冶铁业是停滞工业的陈旧观点。他认为相反，进口的增加反映了国内和殖民地日益增长的需求（1958，145）。巴尔罗克（Bairoch）证明，1660年至1760年不列颠国内钢铁产量没有增减，而进口却增长了130%。他认为主要用途是在农业（1966，8~10）。

[163] 法国的相应膨胀最近迫使它于1735年前后进入“煤的时代”[莱昂（Léon），1970b，232]。

[164] 戴维斯（K.G.Davies）（1974，314）。

[165] 戴维斯（1974，45，80，85）。当然，殖民地的块数取决于如何来界定“块”这个单位。戴维斯列出了一张清单并提供了证明。

[166] 参见戴维斯（Davies）（1954，131）和威尔逊（1965，161）。

[167] 帕里（Parry）（1967，206）。

[168] 英国人“更充分地使用契约劳工”。1700年，有25万英国人移居北美，而法国只有2万[戴维斯（Davies），1974，80，96]。柯廷（Curtin）的估计表明，英国殖民地的奴隶数量较别国殖民地多，尤其是在1700年之前（1969，表3）。

[169] 德休（Dehio）（1962，89）。胡格诺教徒并不一定渴望移居他处，正如德休所说，他们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也只能面临同样专制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方式”。

[170] 斯科维尔（Scoville）（1960，103）。

[171] “无疑就数量而言，（法国）国内贸易大大超过其对外贸易量”[莱昂（Léon）和柯利尔（Carrière），1970，165]。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贸易港口把方向转向内地——莫里诺称马赛（Marseille）港“北方化”，“与地中海脱钩”。他解释说，在17世纪初期，马赛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扩展”，这次扩展比16世纪的扩展还要辉煌（1970b, 163, 169）。人们不禁要问这怎么可能，因为马赛刚刚失去了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这一贸易被荷兰人占领，并在随后将之改道了。莫里诺的回答是：马赛成了一个进口皮革特别是生丝的地方，并供应里昂（Lyon）的丝织产品，而里昂当时正在占领以前由北意大利人占据的法国市场。这是些什么市场？是宫廷的奢侈品市场，尽管总体经济衰退，但这个市场长盛不衰。这一市场有三种源泉：现有需求的重新定向，封建领主收入的增加以及税收增加所造成的廷臣收入的增加。“这样便促进了可与武器贸易和皮革贸易相媲美的奢侈品贸易，因为17世纪是一个穿靴子的世纪，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马赛把它发展的原动力注入法国的内部资源中去了。这样它便可躲过金融危机的影响”（1970, 168~169）。

[172] 尽管英国“（在17世纪）规模庞大的殖民冒险，贸易（依旧）主要是跨欧洲贸易”[萨普勒（Supple），1959, 7]。不过，当和殖民地的贸易上升的时候，和荷兰的贸易却下降了[威尔逊（Wilson），1965, 271~272]。

[173] 参见费希尔（F.J.Fisher）（1950, 156）。詹宁（Jeannin）认为，在1650至1750年这一时期，西欧制造业有两个主要的市场，一是北美殖民地，另一个是西欧各国内部（1964, 338~339）。我们可再次看到，由于法国比英国大，有更大的需求，因而不那么需要北美市场。

[174] 参见戴维斯（Davies）（1956, 71）。

[175] 参见威尔逊（Wilson）（1967, 513）。

[176] 参见阿什顿（Ashton）（1969, 72~74）。

[177] 参见莱昂（Léon）和卡里埃（Carrière）（1970, 178）。

[178] 参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以前的论述（1974, 264~266）。

[179] 我们不要忘记，在漫长的衰退时期，即使是英国，外贸也无足轻重。例如，里德（Reed）认为：“不论商人来自哪个国家，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是总贸易量。虽然（英国）的外贸（在17世纪）增加了，但其水平还比国内贸易低，也没有证据显示外贸增长更快。所以国内商业极有可能占据支配地位”（1973, 1984）。这一论点得到广泛赞同。不过，法国的贸易总量是否低于英国贸易总量（特别是考虑到法国国土大得多），仍有待考察。因此，我们也许不想考察全国贸易量，而是考察某一市场的贸易量。当然，巴黎不像伦敦那样集行政和经济职能于一身，这也是由于法国的面积及其所造成的地理结构所致。不少学者已对1650至1750年间伦敦作为一个城市和市场的成长过程有广泛的论述[参见里格利（Wrightley），1967, 63]；伦敦的贸易成本比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的贸易成本低一些，这或许是事实。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认为，1500至1700年间，技术上的变化微不足道，从生产率提高上的得益不多，因此得益的唯一可信的来源是“利用市场代价的减少”（1973, 150）。如果他们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这就解释了英国相对于法国的优势。

[180] 帕克 (Parker) (1974a, 532)。

[181] 威尔逊 (Wilson) (1949)。

[182] 哈克谢尔 (Heckscher) (1950, 221~222)。

[183] 威尔逊 (Wilson) (1951, 232)。他坚持认为,这一争论具有现实意义:“我希望,认为使用贵金属作为国际支付媒体是一种多边结算方式这种共识会缩小争论的领域。不过它没有完全解决这一争论。我总是认为,对于重商主义时代正常的国际贸易与支付方式,存在着一个观念上的差别。在我看来,哈克谢尔 (Heckscher) 教授似乎暗示条金条银的作用过小,汇票的作用过大。事实是否像他暗示的那样,托马斯·曼时代的世界与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时代的世界如此相似? 国际贸易的资金问题是否是一个与历史无关的问题? 我不这样认为。条金条银流动的规模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条金条银的‘点滴流动’存在着天壤之别” (1951, 233)。

[184] 普莱斯 (Price) (1961a, 273~274)。

[185] 斯珀林 (Sperling) (1962, 468)。

[186] 布利兹 (Blitz) (1967, 41)。

[187] 威尔逊 (Wilson) (1949, 154)。在这一点上,萨普勒 (Supple) 赞成威尔逊,反对哈克谢尔 (Heckscher) (1959, 86)。他引述了1641年罗伯茨 (Lewes Roberts) 撰写了一本题为商人商业地图书中一段话:“东方的人民素以金银稀少而著称,他们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他们丰富的商品,特别是用作日常食品的商品。” (1951, 176)

[188] 欣顿 (Hinton) (1959, 115)。

[189] 参见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63, 82)。说到瑞典,哈克谢尔 (Heckscher) 也坚持认为,“退一步讲,找不到白银向 (瑞典) 流动的蛛丝马迹” (1950, 225)。但在谈到和俄罗斯的贸易时,阿特曼 (Attman) 说:“至少直至17世纪中叶,每个国家都不得不用贵金属来支付其贸易逆差” (1973, 160)。

[190] 斯珀林 (Sperling) (1962, 461)。流到波罗的海地区的白银一部分被地中海东部 (Levant) 的波兰人用来购买“东方的奢侈品”了 (Maczak, 1976b, 5; 亦参见1974, 507)。还参见罗赫 (Hroch) (1971, 26) 和格拉曼 (Clamann) (1977, 262)。

[191] 戴尔斯 (Dales) (1955, 142~143)。

[192] 乔杜里 (Chaudhuri) (1963, 26) 和辛格 (Singh) (1977, 第7章)。关于从西班牙向菲律宾的流动,参见肖努 (Chaunu) (1960b, 268~268); 关于从荷兰到东印度群岛的流动,参见舍费佛尔 (Schöffner) (1966) 和范德维 (Van de Wee) (1977, 310)。雷乔杜里 (Raychaudhuri) 总结了荷兰对科罗曼德尔 (Coromandel) 的进口 (原文如此):“主要的进口物品,除了金银和硬币外,其他本质上是奢侈品” (1962, 197)。不过,就荷兰而言,由于其

有能力经营印度、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跨亚洲海上贸易，因而“使得（她）可以减少西方允许流到东方以平衡支付的金银硬币数量。所以，直至1668年，日本的白银使荷兰省却了部分西班牙比塞塔（piasters），因此和英国竞争对手相比，荷兰人具有一定优势”戴雍（Deyon）（1978b, 229）。

[193] 乔杜里（Chaudhuri）（1963, 27）。

[194] 乔杜里（Chaudhuri）（1968, 484, 495）。

[195] 参见阿斯特罗姆（Åström）（1963, 82）。

[196] 乔杜里（Chaudhuri）（1968, 496）。

[197] 吕提（Lüthy）（1961, 34）。他说：“几乎全部是单一本位的白银并不等于全部。”乔杜里（Chaudhuri）注意到，1662至1680年间，东印度贸易吸收了东南部印度所渴望的黄金，那时东南部印度处在贸易的最前线，但“在1676年，由于某些至今仍令人费解的原因，印度金银市场以白银来衡量的金价突然崩溃了”（1698, 488）。吕兹马丁（Ruiz Martin）注意到了“从1609年……直至18世纪”欧洲金融市场上白银较之黄金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部分原因是东方对白银的需求。“例如，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与阿尔及利亚人（Algerians）、波斯人（Persians）的外交接触中，经常听到实施治外法权的唯一条件：用卡斯提尔（Castilian）的里亚尔（reales）（银币）付钱”（1970, 56）。不过，斯珀林（Sperling）在谈到大约从1680至1703年的“白银危机”时说，为何黄金没有取代白银运往东印度群岛？“白银之所以向东流动，并不是在任何终极意义上贸易要依靠它，而是因为它有利可图。第二……本来可以使用黄金，但利润可能要少些，因为欧洲人的贸易条件可能恶化”（1962, 466~467）。他注意到那时西班牙所属美洲白银和黄金的比率是17：1，欧洲是15：1，印度是12：1，日本是9：1。但如果这些不同比率不是从使用条金条银的不同估价中产生的话，何以产生？

[198] 吕提（Lüthy）（1961, 35）。当然，欧洲内部也使用白银，但只是作为市场交换用，而不是用作清算。吕提（Lüthy）补充了下面这段具有有启发意义的语言注脚：“如果在法语中白银（argent）成了用来表达货币的名称的话，那么硬币就被译为金币（point-or）。”[Lüthy把英语的“硬币”（specie-point）用在法语中了]。

[199] 斯珀林（Sperling）（1962, 450）。

[200] 参见威尔逊（Wilson）（1967, 509）。

[201] 萨普勒（Supple）认为，政府的真正问题是条金条银流动的变化的迅速重新调整，也就是清算上的困难。“在这方面，‘重商主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更常常以防卫机制的面貌出现，而不是以侵略性的、错误的和自相残杀的面貌出现。出于对丧失的钱财的数量和质量的担心，各国当局都十分希望在金钱外流产生年复一年的经济失调之前，控制金钱外流”（1959, 194）。

[202] 参见维拉尔（Vilar）（1974，237~244）书中总结性的论述。

[203] 莫里诺（Morineau）（1969a，346~347；亦参见1978b，80~85）。

[204] 莫里诺（Morineau）（1969a，311）。例如，在解释16世纪最后20年运抵西班牙的条金条银的“增长”时，莫里诺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国王从美洲运回更多的条金条银（大概是从什么地方开采的，但本来不会越过大西洋运到西班牙），及他大幅度减少从印第安人和美洲西班牙人那里运来的条金条银（1969a，334）。但是印第安人让出条金条银并没有得到报偿，而定居的西班牙人大概想把这些条金条银用来在西班牙购物，所以不管怎样条金条银总会越过大西洋。戴雍（Deyon）和莫里诺持同样的怀疑态度：“没有谁想否认意外发现的作用，但对于欧洲命运会埋葬于美洲矿山深处这样一种理解，我们怎能不表示怀疑呢？”（1967，84）。

[205] 博利尔（Rene Baehrel）运用这一时期的历史统计资料论述道，条金条银或货币是一个“次要现象”（1953，309）。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条金条银是一种像小麦或纺织品一样的商品，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商品之间的贸易条件。

[206] 莫里诺（Morineau）（1969a，331~332）。他补充说，德雷克（Drake）效应是“保险公司的圣饼”。关于德雷克效应，亦参见帕里（Parry）（1961，127）和林奇（Lynch）（1969，190）。

[207] 莫里诺（Morineau）（1969a，346）。这里指的是英国的布莱克（Blake）海军上将，1656年他率舰在加的斯（Cádiz）近海袭击了八艘西班牙大帆船，击沉两艘，俘虏两艘。

[208] 维拉尔（Vilar）说：“可以肯定到该世纪中期，荷兰共和国的资本至少已经和欧洲其余国家的资本总和相等了。”

[209] 威尔逊（Wilson）（1949，160）。斯通（Stone）注意到了1620至1650年间伦敦的利率从10%跌至了5%，并说这一跌幅与除荷兰以外欧洲其他地方是相同的。“这一利率的急剧下跌既是游资增加和利用游资的机构（如联合股份公司、储蓄银行及掮客和金银首饰商）发展的原因，又是其结果”（1972，69）。如果真是荷兰拥有的条金条银导致了利率的下跌的话，那么全球游资的减少实际上不是更能说明这一点吗（尽管银行信贷、游资还是增加了）？

[210] 首先，大家必须记住，商品总体价格低廉的时候也就是贵金属购买力高的时候，所以这是寻找贵金属的刺激因素。[维拉尔（Vilar），1974，247]。

[211] 吕提（Lüthy）（1959，95）。他怀疑条金条银缺乏这个概念是否正确，并暗示可能是缺乏流通。他指出在那时，世界resserrement（萎缩）既意味着囤积货币，又意味着缺乏货币。

[212] 吕提（Lüthy）（1959，97）。这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维拉尔（Vilar）指出，在18世纪上半期，“英国发现自己和巴西、葡萄牙之间的货币流通是以黄金为基础的；而法国的对外关系则与西班牙及加勒比为中心，而且结算是以白银为基础的。”（1974，324）

[213] 维拉尔 (Vilar) (1974, 287)。

[214] 参见斯普纳 (Spooner) (1956, 3~4)。

[215] 参见皮勒盖特 (Pillorget) (1966, 129)。

[216] 参见吕提 (Lüthy) (1959, 98)。

[217] 阿什顿 (Ashton) 指责希尔 (Christopher Hill) 说：“在他看来（就像在辉格党人看来一样），17世纪实际上是现代自由主义出现的伟大的英雄时代” (1965, 581)。

[218] 普卢姆 (Plumb) (1965, xxii)。琼斯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1640年之间，“和荷兰相比之下”英国的软弱无能“是很关键的” (1968, 41)。

[219] 博克哈德 (Burckhardt) (1965, 144~145, 152~153, 180)。他说：“对路易十四来说，权力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保护权力财富的一种方法。”

[220] 威尔逊 (Wilson) 用国防费用来解释荷兰的高税收。在谈到独立以后的时期时，他说：“依靠自己的防卫力量而进行战斗常常比效忠于无力相助的封建领主更好。这样做费用还低些” (1968, 235)。斯密特 (Smit) 注意到，17世纪最后20年战争代价的上升“超过了该国税收和人口的承受力。”为了继续进行这种竞争，荷兰人可能被迫“在这个税率已是最高的国家里……大幅度增加税收” (1975, 62)。

[221] 芬纳 (Finer) 说：“不论哪国，急剧增加发生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 (1975, 101)。

[222] 佩吉斯 (Perjés) (1970, 3)。格拉曼 (Glamann) 指出，在17世纪末，英国海军在海上服役的人数为2万，“这一数字与布里斯托尔 (Bristol) 及诺里奇 (Norwich) 等城市当时的人口相当” (1977, 200)。

[223] 卡斯韦尔 (Carswell) 认为，在1685年，英国和荷兰军队是在力量上“相对来说不相上下”，双方在战时都依靠一种“特别的组织能力”，但法国却拥有“大规模的职业军队” (1969, 20)。

[224] 参见卡特 (Carter) (1975a, 24)。

[225] 关于至1683年阿姆斯特丹商人的抵抗及1688年他们观念的变化，参见史密特 (Smit) (1968, 33)。关于导致英国支配的英荷伙伴关系和两国“敌对共存现象”，参见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1960, 112)，关于路易十四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英国已成为其“主要对手”这一事实，参见博尔德 (Bourde) (1960, 54)。

[226] 塔皮 (Tapie) (1960, 12)。

[227] 博尔德 (Bourde) (1960, 63)。

[228] 参见霍布斯鲍姆 (Hobsbawm)。他说：“17世纪末期法国最突出的事情不是柯尔伯主义，而是其相对的失败；不是君主制的改革，而是与其海上对手经济上竞争的失败，以及被这些对手所击败（尽管有丰富得多的资源），和最后在军事上的失败（1960, 111）。”

[229] 莫斯尼尔 (Mousnier) (1967, 269)。

[230] 莱昂 (Léon) 和柯利尔 (Carrière) (1970, 190)。

[231] 德鲁莫 (Delumeau) (1996, 94)。

[232] 威尔逊 (Wilson) (1965, 57)。欣顿 (Hinton) 在谈到英国商业体制的灵活性本质时，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参见威尔逊 (1959, 71~83)，并比较哈珀 (Harper) (1939b) 关于在理解从航海条例中行政决策地位的重要性的论述。

[233] 这一用语是明钦顿 (Minchinton) (1974, 111) 提出的。亦参见帕克 (Parker) (1974a, 561)。

[234] 可以看出公共财政和私人利润之间关系的这一现实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例如，马德莱那 (De Maddalena) 指出，在法国和德国西部，新的资产阶级地主聚敛财产是通过“迂回方式进行的，因为吞并农民的农场意味着承担与之相伴随的税收义务” (1974a, 293)。这也是为何雅卡尔 (Jacquart) 称国家是“17世纪的真正牟利者”的原因 (1978b, 406)。

[235] 帕克 (Parker) (1974a, 572)。

[236] 费弗尔 (Febvre) (1933, 270)。

[237] 关于柯尔伯对 *traitants* (包税商) 的敌视，参见马尔森 (Marsin) (1970, 269)。不过，吕提 (Lüthy) 注意到，*fermiers* (包税人) 和 *traitants* (包税商) 是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他们可以增加国家的岁入 (1959, 109)。重商主义事业并不仅仅限于工业区域，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4b, 16)。德瑟尔 (Dessert) 和朱尔内 (Journet) (1975)，描述了他们所称的“柯尔伯游说集团”，这个集团由1663至1687年间占据 *La Ferme générale* (大总包税区) 的金融家组成；他们从土地上掠取税收，用于他们的工业企业和进出口业务。在这个意义上，柯尔伯主义代表了资源从低水平的、非生产性的 *traitants* (包税商) 和 *fermier* (包税人) 转移到高水平的、生产性的个人中。

[238] 参见鲁尔 (Rule) (1669, 32) 和古伯特 (Goubert) (1970f, 123)。

[239] “柯尔伯的工作干得很出色。虽然法国人是付出了很高的费用，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付得起” [古伯特 (Goubert), 1970f, 124]。

[240] 阿什利 (H.P.Ashley) (1934, 970)。

[241] 参见罗斯维尔 (Roseveare) (1969, 61; 1976)。

[242] 斯马特 (Smart) (1975, 45) 和史密特 (Smit) (1975, 63)。

[243] 参见罗尔达 (Roorda) (1964, 126~127)。关于荷兰共和国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 参见考斯曼 (Kossmann) (1976, 13~17) 和鲍斯马 (Bouwsma) (1970, 9)。

[244] 巴克 (E.Barker) (1966, 7)。

[245] 哈克谢尔 (Heckscher) (1935, 104)。

[246] 穆夫里 (Meuvret) (1971a, 29)。此外, 把这与英国进行不对等的比较是荒唐的, 英国的统一关税区只比五大包税区略大一些。正如克鲁泽 (Crouzet) 所说, 英国的统一“不应估计过高” (1972, 78)。

[247] 参见阿谢尔 (Asher) (1960, 48)。至于柯尔伯的海军需求体制——这一体制比新闻出版体制公平得多——为什么会以失败而告终, 他的解释是绝对君主制不够强大 (参见第91~95)。

[248] 普卢姆 (Plumb) (1967, 13)。

[249] 例如, 哈林顿 (James Harrington) 在《大洋共和国》 (*Commonwealth of Oceana*, 1656) 一书中说: “贵族, 就其形式……我亦应理解成绅士, 就像法国人对No-blesse (贵族) 的理解一样” [转引自威尔逊 (Wilson), 1965, 109]。要说后来没有学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公平的。例如, 哈巴库克 (Habakkuk) 说英国的贵族加上绅士是一个“单一的、虽然不是非常同一的社会阶级” (1967, 2)。亦参见拉布鲁斯 (Labrousse) 的论述, 他宣称, 有产阶级 [La classe propriétaire, 包括贵族中nonannual (无年金)、非农民阶层]、教士和经营良好 (bonne) 的资产阶级“混淆了三个社会等级。这并没有否认他们的存在。在这里, 阶级和等级并不矛盾” (1970, 474)。

[250] 转引自希尔 (Hill) (1975a, 281)。

[251] “英国有地阶层的真正划分不在于新老有地家族之间, 而在于那些地产和利益极其有限, 感觉不合时宜和自己不满受到忽视的地产主与那些更勤劳或幸福、在经济扩展与社会运动中找到优势的地产主之间。”明盖 (Mingay, 1963, 107)。

[252] 拉布 (Rabb) (1975, 71)。

[253] 巴克 (Barker) (1966, 31)。1688年又出现这种情况。虽然看来这是国会对君主的胜利, 但实际上却意味着18世纪“行政权力的扩大, 这……成功地实现了斯图亚特 (Stuarts) 王朝常常试图实现但从未成功的对立法机构的降服” (普卢姆, 1967, 65)。

[254] 斯通 (Stone) (1972, 49)。与此相似, 萨戈林 (Zagorin) 说: “没有发生重大的社

会变革”（1959，400）。

[255] 希尔（Hill）（1969，135）。除了无可否认的政治结构的变革外，希尔提到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和政府放弃控制圈地的努力。他说：“就贸易、殖民和外交政策而言，英国中世纪的结束是在1650~1651年，那时共和政府可以自由地把目光向外看”（第155页）。在希尔看来，中世纪就像一个水龙头，旋转程度不同，水流就不一样：“就工业和国内贸易而言，……中世纪结束于1640年，那时中央政府丧失了其授予垄断权和控制穷人救济机构的权力”（第169页）。“就财政金融而言，英国的中世纪结束于1643年，那时两种新的税收——营业税和土地税产生了”（第180页）。

[256] 威尔逊（Wilson）（1975a，153）。

[257] 参见瑟斯克（Thirsk）（1954）。

[258] 斯通（Stone）（1966，5）。

[259] 1660年后，“竖起了反对社会流动性的樊篱，这些樊篱具有反对革命的特征”[瑟斯克（Thirsk），1976，xx]。

[260] 萨普勒（Supple）说：“使英国的地位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地位的市场环境的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行动的功能问题。”不过，他补充说，此种国家行动不是直接的。萨普勒列举的一系列行动中首先是17世纪内战以后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1973，314~316）。

[261] “（1688年）革命表明有产阶级最终是团结一致的”[希尔（Hill），1961a.276]。

[262] 特里维廉（Trevelyan）（1963，45）。

[263] 平卡姆（Pinkham）（1963，85）。亦参见琼斯（Jones）（1972，15），他说：“不过，詹姆斯（James）用城市中产阶级来代替有地阶级的企图应该使历史学家在把革命彻底描绘成资产阶级革命前犹豫一番。严格地讲，事情恰恰相反。”

[264] 参见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他说：“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国王已开始呼吁旧保皇阶级、教区僧侣、具有忍耐精神的‘官方’贵族和绅士——他父亲的联盟就是依靠这些人的支持……但当情况表明这些集团不够强大时，他便在两个国家都退回到凯尔特的边缘。他成了反对英国种植园主的‘老爱尔兰人’和反对定居的低地人的苏格兰高地人”（1967，710）。与高地人的联系后来以詹姆斯主义（Jacobitism）的形式存在了下来。

[265] 希尔（Hill）（1969，137）。

[266] 参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93~297）。

[267] 参见皮勒盖特（Pillorget）（1975，879）。当然这些地区在经济上也常常遭受损失。关于这如何影响了巴斯克（Basque）乡村，参见戈伊亨奈什（Goyhenetche）（1975，5~

32)。

[268] 从研究路易十四对其官僚人员政策一系列著作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不管我们研究的是国务大臣、军官还是司法人员都可清楚地看出，富裕和能干的人大都被招募进官僚机构中，并以个人地位的提升作为报偿。参见布鲁彻（Bluche）（1959，18~22），考维西埃（Corvisier）（1959，45~46）和古伯特（Goubert）（1959，73）。

[269]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依旧……不满。他们满怀热情地渴望得到的权力，可以说他们得到了，同时又没有得到。如果说自柯尔伯以来，大部分大臣们的祖先或多或少都出身于资产阶级，但一旦当这些大臣们坐在政府办公楼里，他们便对他们的出身断然否认，而千方百计把自己同贵族联系起来”（莱昂，1970d，643）。

[270] 参见亚当斯（Adams）（1974），的论述。这种观点是如此典型，以至一些现代新教徒认为废除南特敕令是把法国新教主义从保皇主义和遵奉国教中解救出来，迫使其在废除敕令后恢复其“原先特征”[列奥纳德（Léonard），1940，11]。

[271] 吕提（Lüthy）（1959，12）。

[272] 罗伯特（Robert）（1967，47）。

[273] 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1，21）。他把英国同法国作了清晰的比较：“英国君主属于新式君主，他于（1688年）和前反对派达成了和平：就像路易十四和以前支持神圣联盟（Ligue）及投石党人（Fronde）的教士达成和平一样”（1975c，36）

[274] 参见雅卡尔（Jacquart）（1975，344~345；1978c，492），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4c，8~9）和戴维斯（Davies）（1973，125~127）。

[275] 关于1661年后普罗旺斯（Provence）“名门显贵的温驯”，参见皮勒盖特（Pillorget）（1975，863~866）。亦参见巴斯奎（Basquet）编（1972，79），他说：“（这一温驯）或许是君主政府在团结工作方面取得成功的最好证明。”

[276] 引自希尔（Hill）（1975b，204）。希尔赞同地说：“人民大众究竟从革命中得到什么？是税收、劫掠、征兵，而不是稳定的公簿持有、废除头衔或保护小工匠免受其雇主之剥削。”琼斯（Jones）也说，小人物以及为革命舍生赴死的战士“反过来并不是革命的受益者”（1972，16）。1688至1689年英国乡村小绅士的情形便是这样，就像尼德兰起义后加尔文主义战斗分子、靠海为生的穷人、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情形一样。

[277] 参见莱昂（Léon）（1970e，684）。

[278] 莱昂（Léon）（1970e，686）。

[279] 格拉斯比（Grassby）（1960，38）。法国贵族远不是不能相容的。正如萨普勒（Supple）所指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向17和18世纪的联合股份企业捐献资本和财

物”（1977，450）。

[280] 熊彼得（Schumpeter）（1943，135）。

[281] 萨普勒（Supple）援引英法两国的例子说：“贵族的企业.....在矿业和重工业领域最为活跃”（1977，499）。关于法国制造业中贵族的地位，亦参见戴雍（Deyon）（1978d，277）

第四章 缓慢增长时代中的边缘地带



第四章插图“摩根（Morgan）入侵普林西比港（Puerto del Principe）”

埃斯克姆林（John Esquemelin）。（1678）

纽约公共图书馆稀有书籍部分。

阿斯特（Astor），伦诺克斯（Lenox）和蒂尔登（Tilden）基金会。

“摩根（Morgan）入侵普林西比港（Puerto del Principe）”，埃斯奎姆林（John Esquemelin）作，于1678年在《美洲海盗》（De Americaensche zee-roover's）发表，在1684年的《美洲海盗》（Bucaniers of America）再版。不能确定埃斯奎姆林是法国人，佛兰德人（Flemish）或是荷兰人。埃斯奎姆林作为理发师-外科医生为这些海盗服务了六年。他的书一直是关于海盗信息的主要来源，它的描述为那时的国家档案所证实。

世界经济的各个扩张时期，可以相对容易地予以概述。生产全面发展，而且在大多数地方都是如此。就业广泛，人口增长。繁荣成为该时期的征象。在名义价格的稳步上涨之中，大多数人们的实际工资收入可能在事实上下降却又不那么明显可见。确有相当大的社会躁动，但是，这是一种由乐观主义，甚至是由大胆鲁莽所滋生促成的社会躁动。个人的流动看起来是蔚然成风之事。进步发展似乎是上帝恩赐的礼物。

衰降时期却是大为复杂。首先，它们的曲折不平更是明显可见得多。有倒退、有停滞、有收缩，还有诸种坏年头——但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之坏。全面考虑世界经济的总体生产，并对其所有价值或人均数量予以某种计算，这一总体生产可能依然保持着稳定；不过，这可能是下面情况的结果：一些地区的生产量或生产率或是这两者得以增加，然而在其他地区却是下降，从而相互平衡。就业者们的实际工资收入可能增加，但是，失业者们所占的比例也可能上升。

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中有一种尤为黯淡的情况，这也许是在意料之中的事。这些地区在政治竞争场上处于极为软弱的地位。可想而知，处于中心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生产和就业水平，将会以牺牲边缘地区为其代价。可是，边缘地区并没有完全退出世界经济，其中有许多原因。首先，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骨干分子们希望保留在世界经济之内，他们为此而进行斗争。其次，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骨干们必须关切整个世界经济最终的周期循环上升趋势，他们为此需要边缘地区的人口和土地中所体现的自然地域和能源。第三，处于核心地区的国家甚至在经济下降趋势之时，也不断需要边缘地区的某些产品——部分地是因为这些产品从生态方面来看无法由其他地方提供，部分地也是因为边缘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耗费要更加低于中心地区。

所有之中最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衰降是活动的减退，而不是停止。这从经济角度来说表现为一系列不利于追求利润的阻碍，如果你愿意说的话，也就是将资本主义绵羊从山羊群中剔除出去。强壮者不仅幸存下来，而且经常兴旺发达。因此，世界经济中的一次衰降所引发的结果既有退化也有进化；既有经济活动的货币化中表面的衰退，也有新企业的出现；既有废弃也有重建或重新安置，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专门作用既有衰退也有深化。我们评估这一显而易见的相反现象必须从头开始。是什么引起世界经济诸趋势的长期性反动变化？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包括市场机制。由于市场受到政治调节和文化缓滞和偏好的影响，市场不是自由的——远不是自由的。然而，如果没有市场的反应，无论是什么样的反应，就很难于谈论资本主义制度了。

我们都知道：市场对供应与需求的诸种变化做出反应。诚然，这些都不是一些神秘不可思议的力量，以不可预测的诸种方式汇集于市场。供应和需求决定于相互关系并且是惯例性彼此决定；但是，如果彼此差异悬殊太大，时间太长，市场必然会予以注意。扩张时期趋向于超长时间地创造出大于需求的供应，其原因是非常简单的：供应决定于只是单

个的企业家们（对于他们来说，在扩张时期增加生产意味着谋取利润的良好前景），然而，需求是集体性地予以决定（通过安排收入分配的政治机器）。或迟或早，在一定的现存世界范围分配情况下，相对于不断扩大的生产将会出现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有两种事情可以消除这种差异悬殊：一是可以使生产的扩张倒退逆转，使之停止，或者最少使它减缓；二是可以重新安排收入的分配以便增加世界需求，最终许可形成一轮新的扩张。

这两种情况在实际中都发生了，而且也是以此次序发生的。先是生产停滞，后来接着就有了一种关于收入的政治再分配。这是衰降时代的社会侧面景象，但是必须立即加以说明。较之其他地方，旧边缘地区中的生产停滞要更多一些，而在中心地区和半边缘地区（或者至少在这些地区的若干地方），其收入的政治再分配却要多于边缘地区。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正好就是17世纪长期衰降时期的情况，介于1600年/1650年至1750年之间这个时期的情况。这一模式还有另外一个基于缺乏有效需求之上的说明之处。我们已经确定这个衰降时期起始于1600年至1650年之间。这种贯穿于本书之中的模棱两可的解释，并不是一种由于缺乏足够知识的模糊解释，而是对从扩张到衰降这一转变的正常方式的表述。正常情况下，有这么一个较长阶段：扩张仍在持续进行，而衰降却已经开始，因而这是两个时代之交发展情况的一个部分。

我们已经讨论过长期趋势中的这种特定的逆反，它看起来是由三个连续的商业冲击波构成：一个是在1590年代，一个是在1620年代，最后一个是在1650年代。^[1]这是与欧洲的世界经济相同的时期，当时，欧洲的世界经济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在波罗的海地区有货币的兴起，在西班牙有铜币的通货膨胀，在美洲有贵金属生产的突然衰落。这也是发生各种各样的人口灾难的时候，这些灾难由战争、流行病和饥荒所引起。它们的合并并不是偶然而成的。突然面临一个不利的市场之时，边缘地区的出口农作物的生产者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从他的观点来看，有

两种反应具有意义。他可以扩大他的出口数量和/或者降低他的生产成本，用以保持他的净收入。这两种办法或其中任何一种办法在短期之内，对个别企业生产者来说都是经常有效的；但是，它们在中期范围内却会恶化一个特定地区中边缘地区生产者的集体状况。在一个其需求已是很紧张的市场上，扩大出口农作物的生产只会更多地增加总体产量。如果降低成本的办法是以加剧对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的掠夺开发而实现的话（这在边缘地区极为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则会耗尽未来生产的潜力。

我们将要表明这就正是在16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边缘地区所发生的情况。1590年代和1620年代的疲软市场导致了生产量的增大和/或者资源开发速率的增加。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到了1650年代，这种最初策略的结果就迫使边缘地区生产者转向唯一的合理反应：部分地退出供给市场的生产——至少是他们于16世纪在世界经济中数占有一席之地的一部分。^[2]让我们先从东欧边缘地区谈起吧。17世纪时，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生产率以及出口总值和数量都下降了，其中最为显著的（并非唯一的）是波兰的谷物和匈牙利的畜类。价格的变动情况最令人熟悉，因为它正处于农业价格的下跌之时，一次17世纪经济萧条的基本形象就是由此而来。波兰小麦价格于1615年至1620年下跌后，有过一次短暂的上升，接踵而来的是17世纪中期“急剧下跌和长期的价格不景气。”^[3]匈牙利畜类价格从17世纪开始就逐渐下跌，只是“在1620年代另外一次短暂的景气繁荣后才完全停止下跌。”^[4]至17世纪中期，在维也纳的匈牙利畜类价格已是“大幅度”跌落了。^[5]对于捷克的农业来说也是如此，1650年之后的一百年是“停滞不前的世纪”。^[6]

不仅出口产品价格绝对下降，而且它们也可能处于相对下降，即贸易条件对边缘地区出口者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利了”。^[7]同时，却有“奢侈品进口量的迅速增加”，尤其是在17世纪的第二个25年之中^[8]——这是边缘地区乡绅地主们的一种最后的放纵。这种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的

综合情况（至少是在过渡时期）导致了贸易平衡中的一次戏剧性转变。举例来说，波兰的波罗的海贸易盈余从1565年至1585年的52%降到1625年至1646年的8%，然后是在17世纪后期出现贸易逆差。^[9]马查克（Maczak）认为波兰的这种消极性贸易平衡产生于“1620年代致命的十年之中。”^[10]波兰经济企业所得到的保护是很微弱的，无力抵御价格膨胀所带来的货币不稳定的消极影响，进而恶化了这一贸易平衡的逆变。荷兰商人要求格但斯克（Gdańsk）的商人在接受硬通货杜卡特（ducats）和塔勒（thalers）的同时，也接受劳温塔勒（leowenthaler）这样的软通货作为他们的购物付款。当然，这种软通货币本来是可以为政治权威当局所禁止。但是，格但斯克的商人们自己就大力反对任何保护性措施，他们“担心对外贸易中出现严重紊乱”，^[11]也不认为这种保护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把荷兰人强加给他们的这一负担“转嫁给中产阶级、贵族和农民。”^[12]

关于东欧谷物的产量比率，其测算标准一直很广泛的，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在17世纪中其产量比率肯定有下降。下降多少则是有所争议之事。较为乐观者认为东欧谷物产量在西北欧谷物产量上升之时只不过是滞步不前而已。不那么乐观者则认为有重大的下降。^[13]关于小麦产量下降的普遍解释是：“地主们对商品生产的支配控制，这些地主利用强迫劳力至最大程度。”帕赫（Pach）也以相同的解释去说明匈牙利畜类出口的下降。^[14]但是，为什么这种支配控制竟会导致产量比率的下降？有两种理由可供解释。一是对强迫劳役有不断增加的迫切需要，“导致许多农民不再保有耕畜而是交给佃农们”；由于农民们的农场生产比率普遍高于贵族们的农场，整个产量也就下降了。^[15]二是生产的增加背离土地轮耕轮种的主要原则，^[16]过度的如此耕作耗竭尽土地肥力。凭借着对人力和土地的耗竭，维持了50年至60年的总体生产水平，但是，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方法。尽管有所有这些增加生产和降低成本的努力，出口总量的下降还是反映出竭泽而渔的后果。16世纪末期，格但斯克每年船运出口小麦10万拉斯特（lasts），而在17世纪只有

3万拉斯特，在18世纪开始之初的年份中只剩下1万拉斯特了。^[17]艾贝尔（Abel）认为1620年是其下降转折点，^[18]但是，詹宁（Jeannin）指出桑德（the Sound）海峡的纪录表明1649年或1650年是“创纪录之年，超过了1618年”，并建议我们考虑将1650年视作转折点，而不是1620年。^[19]

畜类出口的情况与此相同。在匈牙利，1550年至1600年是“黄金时代”，^[20]此后就是衰落了。随着“三十年战争”的开始，放牧畜群已成为危险之事，波兰对西里西亚，萨克森和莱茵河地区的畜类贸易“失去了其重要意义”。^[21]丹麦的畜类出口同样如此，成为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同一画面的一部分。^[22]帕赫（Pach）认为畜类贸易的下降远比小麦贸易的下降更严重，因此，匈牙利所遭受的损失要更甚于波兰，因为小麦是贩卖给“正在兴起的现代国际贸易的大西洋中心地区”，畜类却是贩卖给德国南部城镇，而这些城镇本身都“已成为国际贸易路线发生变更的牺牲品”。^[23]16世纪中，铜曾经是东欧的第三项主要出口产品，也在162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衰落。^[24]在此每一案例中——小麦、畜类和铜——其解释原因都在于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在小麦这一案例中，南欧和西欧的谷类生产曾有过增加，尽管只是一个“不大的增加”，费伯（Faber）也认为这就足以说明解释17世纪后半期“荷兰谷物贸易的灾难性衰退”了。^[25]至于畜类贸易，正是“需求的下降压低了价格”。^[26]在铜的贸易情况中，主要因素是“瑞典铜充斥市场”。^[27]

在每一情况中，出口形势都由于战争和国内破坏（但不是由于它们引发）而更趋恶化了，尤其是瑞典入侵波兰（1655年至1660年），匈牙利在百年之中断续不绝的战争，从“十五年战争”（1591年至1606年）开始一直到拉科西（Rokokzi）的独立战争（1703年至1711年），以及丹麦与瑞典之间的战争（1643年至1645年）。^[28]但是，战争的破坏包括总供应的削减，都不是对它们本身的解释。如齐曼尼（Vera Zimanyi）向我们提示的：“16世纪的整个欧洲都知道战争的破坏性决不会小，但

在那个时代战争却刺激了生产，创造有利的联系局面等等，而结果是价格上升。”^[29]那么，从16世纪以来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欧洲的世界经济从一种总供应少于需求的形势转向了相反的形势。在前一种形势中，破坏趋向于使需求更为急切，而在后一形势中，破坏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借口去削减总生产。

这样一种全面削减是如何分配的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决定了，或更确切地说是改组了边缘地区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在东欧，强迫性的经济作物劳工（即所谓的第二种农奴制）作为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产业的一种控制劳工的机制，已在16世纪传播开来。我们现在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对农奴的需求在17世纪日渐缩减的出口市场中，竟然会有更深入的增长。我们必须首先着手这一事实：16世纪中，经济作物的生产的效率在庄园主领地和农民的小块土地上是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上。^[30]然而，17世纪的一个突出之处是在整个东欧都有可观的土地集中，即：总耕地面积和为市场而生产的作物都是更多地集中于庄园主之手，只是较少地集中于农民之手。波兰、^[31]捷克^[32]和立沃尼亚（Livonia）^[33]都有如此情况。的确，就波兰来说，马查克（Maczak）特意将17、18世纪与16世纪作了对照比较，他指出：“为数不多的繁荣一时的自耕农民……作为地主们贪婪之下的直接牺牲品……完全彻底地消失了。”^[34]

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所发生之事。总耕地面积的扩大曾是16世纪中为响应有利的市场而出现的现象，此时却停止了，甚至部分地倒退了；但是，在耕种的土地面积中，庄园主的直接专用地所占的份额却不断增大。这就是说，在16世纪东欧已有两个方面迎接了扩大市场生产的挑战：一是占有强迫劳力的巨头阔佬的大领地农耕，二是富裕农民的农耕的某些发展。“然而，至17世纪初，战斗结束了，胜利的‘庄园主们’依赖于使用强迫的农奴劳力。”^[35]

大面积领地具有凌驾于农民的农场，实际上还有凌驾于中等面积领地之上的多种优势。农作物收成的不可预计性有利于大面积单位，因为他们有一种内部保险，能以他们控制下的土地的多样性抗御坏收成。^[36]除了有供求平衡中供应一面的优势外，还有需求一面的优势。在此方面，他们直接通往市场，他们能够无需中介就可以自行将货物运往港口这一事实，就是“一种很重大的经济特权”，库拉（Kula）认为这是造成土地集中过程的“部分负责原因”。^[37]随着时势更艰难，这些优势也变得更为巨大，表格3引人注目，对此予以清晰表示。在此表格中，库拉核算了此时波兰三个不同社会集团的贸易地位（他们卖出和买进产品的购买力）。人们固然不可过分解释这些不可靠的资料数据，^[38]但运用两个不同的指标年代，1550年和1600年，使一些尝试性的意见看法成为可能。最大的扩张时期即1550年至1600年，既对巨头阔佬们有利，也对农民有利，看来，对此两者皆有利却以牺牲贵族为代价。一旦坏年头降临，农民就立即感到它的沉重压力。而贵族和巨头阔佬却顺畅无碍。从1660年的指数入手来看，很清楚的是，贵族有一段时间（但只是一段时间内）相对的要比巨头阔佬显得更好一些；同样很清楚的是，用1550年的指数来看，在绝对意义方面，巨头阔佬总是领先于贵族。

表3 波兰三个社会集团贸易地位的变动

	1550	1600	1650	1700	1750
巨头	100	276	385	333	855
贵族	100	80	144	152	145
农民	100	205	169	118	51
巨头		100	139	121	310
贵族		100	180	190	181
农民		100	82	58	25

注：此表经允许从库拉的著作（1970，94）中复印而来。

为什么竟会出现如此情况？但愿我可以提示出一种非常简单的运行

机制。在时势艰难之时，生产者为最大程度增加销售可有两种办法：降低成本和消除竞争者。巨头（和贵族）以增加强迫劳工对抗工资收入劳工的办法去寻求成本的降低。^[39]此法不仅降低了平均成本还增加了总生产量，是一种产生于压低市场价格之中，用于弥补损失的次要手段；^[40]庄园主为了确保其庄园土地上的生产增长有市场出路，便会出资买下农民甚至贵族的产权，^[41]农民和贵族中许多人愿意出售因为他们事实上沦于破产。即使庄园主不把这些新土地投入生产，他们至少也会使之不去生产可与自己原有土地进行竞争的产品。这种看来颇有道理的土地投资过程，即使并未企图立刻就从出口作物中赚钱，16世纪初期的金融危机也无疑会鼓动这么做，这一危机将巨头们投入一场“心理学上可以理解的竞争，以囤积货物作为保险去抵御货币市场上的不安全。”^[42]货物包括土地，看来其储藏价值要比金钱更为安全，如果他们的“储存”要准备存放一个较长时间的话。

关于那些被要求置于竞争之外的土地，会发生什么事呢？无疑，它们体现了“转向维持生存的生产潮流”，^[43]如果你愿意说的话，这是退化，但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否定。它们正好体现了对市场状况的一种明智调整，是资本主义企业家（巨头和贵族们）在一个疲软市场中求取利润最佳化（或将损失减少至最低程度）的一种方法——全面减少存货和完全缓滞生产。面对世界经济的波动变化，农民可能无法做出扩大或缩减其努力的反应，但是，农民并非资本主义式企业家，而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的劳力投入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企业家对世界经济做出反应的一种机能作用。^[44]

倒退并不意味资本主义生产的放弃，相对于向中心国家出口产品的衰落，地区性市场的幸存，甚至兴盛成为其表现。施皮茨（Špiesz）指出：早在16世纪，中欧各地就为各地区市场进行生产，这也解释了它们不同于向西欧出口的东欧地区的各个方面。他将中欧——波希米亚（Bohemia）、摩拉维亚（Moravia）斯洛伐克（Slovakia）、下西里西

亚（Silesia）、下卢萨蒂亚（Lusatia）、奥地利〔不包括蒂罗尔（Tyrol）〕、萨克森（Saxony）、图林吉亚（Thuringia）和西匈牙利——的生产关系称作“领地经济”（Wirtschaftsherrschaft）以相对于第二次农奴制。甚至在那些国家，17世纪农民所处的状况也恶化了。^[45]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17世纪中，波兰的一些市场中心，它们先前服务于横贯大陆的贸易，如克拉科夫（Cracow）和波兹南（Poznań），却不再发挥这种作用了，其原因是“三十年战争”和“瑞典战争”的综合影响；但是，它们直至17世纪后期依然是作为地区市场中心而繁荣兴旺。^[46]土地集中的增多与扩大对强迫劳役时间的榨取是齐头并进的。显然，如果庄园主的专有土地越大，他所需要的强迫劳役也就越多；如果农民的土地越少，他也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强迫劳役——这就是说，他大概依然耕种足以养活他自己，^[47]但不再会为经济作物生产而耕种他自己的大部分土地。我们已提到在17世纪的波兰、^[48]东易北河（Elbia）地区、^[49]匈牙利、^[50]波希米亚、^[51]罗马尼亚^[52]和丹麦、^[53]强迫劳役的数量增加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生产关系。如果说17世纪中强迫劳役的增加是合理的，为什么在16世纪中就达不到同样的高水平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需要时间。另一个答案可能是强迫劳役的高比率在市场衰落之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合理的，但一种中度比率对于市场扩张之时是更为适当的，因为存在有一种高比率的消极方面。达到某一程度界点之后，强迫劳役就耗竭下去并降低生产效率。鲁辛斯基（Rusiński）问道：“是在什么时刻强迫劳役开始表现出经济上的倒退特征的？……最新研究使我们可以极为精确地确定这个时刻。”他说，这一时刻对波兰中部而言是介于1580年至1620年之间，对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而言是此后稍晚一点。^[54]这一看法使我们直接回到我们所说的转变时期（1600年至1650年）。我们大概可以恢复以下情形：16世纪时，强迫劳役在经济上是具有生产效率的。它包括了农民本来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市场强劲都会投入的相同劳动，但是，庄园主以强迫劳役为手段从农民那里将部分剩余归

为已有。随着时日变得艰难，庄园主对农民劳动时间的需求增加了。在此时刻，农民开始付出他本来根本就不会扩大的劳动。在长时期之内，这种过量产出将会耗竭农民的劳动潜力并且是反生产效率的；但是，它在中期时间内会确保由于世界市场疲软所产生的大多数损失由农民承担，而不是由庄园主来承担。

很自然，农民对此情形是不会感到高兴的。“地产越大，专有地和农民的小土地（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之间的反差也就越大。”^[55]其结果是农民的逃亡和故意破坏。我们就此碰上了另外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同时出现了强迫劳役和工资劳动的增加。这一矛盾并不难于解决，如果我们还记得事实上有三种方式使东欧的庄园主与农村劳动力联系起来，这三种方式是：强迫劳役、工资和免役税（quit-rent）14和15世纪东欧的主要准则正是这种对立于强迫劳役和工资的免役税。在16世纪，世界经济的扩张导致曾取代免役税的强迫劳役的重建和扩大。实际上，在那些最接近出口港的地区，比如说西普鲁士、北部的“大波兰”和库亚维（Kujawy），农民们能够较好地抵制16世纪强迫劳役的建立，并且维持着免役税制为自己保留住更多的市场利润。^[56]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靠近港口，因而能使自己相对容易地以竞争成本处置他们自己的产品。然而，在17世纪，在市场更为困难的条件下，东欧残剩的租佃农抵御庄园主压力的能力就瓦解了，免役税已开始消失，甚至更进一步——即现时为强迫劳役和工资劳动所取代。

从农村劳动者的观点来看，工资劳动并不见得就必然比强迫劳役制要更为可取。实际上，在庄园专有地，工资劳动者大多数不是雇佣仆人就是打散工者，而且后者“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更为依附的地位上”^[57]要比负有强迫劳役的农奴还不如。^[58]农奴不仅比散工者有更多的安全感（从他们不能被打发走的意义上来说），而且有更多的实际收入和更有身份。看来似乎会令人奇怪的是，他们还有更多的选择。事实是：尽管他们身上有法律约束，由于公共权威当局的虚弱，“那些身受其庄园主

强加太多税赋的农奴，总是能够更换他们的庄园主。”^[59]庄园主与农民之间的这种冲突，实际上已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此冲突中，农民并非完全被剥夺了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即使这是艰难时代。庄园主—资产阶级因而不得不寻找除依靠法律手段单纯压低实际工资之外的其他方法，以求榨取利润盈余。他在逻辑上必然转向工业生产，以使农民不仅成为他的雇员，也变为他的消费者。

如果17世纪中的农民贫困化了，那么，他们能够购买什么东西呢？至16世纪终结之时，现存的城市工业正在死去，因为“大多数人口的贫困已是普遍之事了。”^[60]那么，庄园主能够生产什么东西使农民买得起呢？偶尔的简单纺织品、一些玻璃和金属的用品，以及歉收年头中的谷物。无论如何，看来有工匠们由城镇向大地产庄园流动，工匠们在这些大地产庄园的制造业中工作。^[61]最成功的产业无疑就是生产那些越变越穷的穷人们永远宠爱的产品——酒精。我们把杜松子酒与18世纪后期英格兰的新兴城市工厂相联系，把威士忌与19世纪边疆地区流离失所的穷困人口相联系。波兰的伏特加和啤酒以及匈牙利的葡萄酒对17世纪的贫困农民也同样如此。此种极重要的风俗被称之为“Propinatio”，即“请君痛饮”，这意味着庄园主在事实上垄断了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62]1650至1750年这个时期中，“请君痛饮”已经常是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63]

土地集中的最终结果、免役税制的进一步衰亡，加上“请君痛饮”都意味着：尽管世界市场疲软对他们出口农作物不利，尽管有战争的破坏，东欧的上层阶级仍以合理姿态设法渡过了这个时期。无疑，他们也许不如阿姆斯特丹的统治阶级或法国北部庄园主那样兴盛，但是，东欧边缘地区的岁入所遭受的严重削减损失首先全都落在了下层阶级身上。^[64]城市工匠和较为富裕的农民陷入破产，而贫穷农民则是更加贫穷了。随着社会分化更趋极端化，一些人们的地位上升了。这些人是宫廷的常客，而宫廷与其说是国王的宫廷，如在法国，还不如说是许多庄

园权势人物的宫廷。^[65]这被称为“再度封建化”，但是，马卡凯（Makkai）恰当地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使用不当的名称，他说，应当称作“贵族的膨胀”。^[66]

前一章中，我们描绘了英、法两国新资本家和旧贵族之间达成的社会妥协，这两个阶级的部分一致远多于当时评论或以后各时代的评论所能承认的；不过，他们的部分一致并不是完美的，因而在世界经济的扩张时代有许多摩擦冲突之处。冲突在转变时期变得更为尖锐，这个转折时期是最后的膨胀时期，与世界性扩张的平缓并肩发展；但在1650年至1750年这一时期，衰降时代的现实和重商主义迫使这两个部分一致的阶层相互妥协，具体表现在17世纪末期的新宪法安排（广义上运用这一表述）之中了。在东欧边缘地区，是否有任何类似之事发生呢？在中心地区有两个因素是边缘地区所没有的。第一个是：对于中心地区的那些阶层来说，资本主义利润的前景就总体而言要相对好些，肯定缓解了达成相互让步所产生的苦痛，还是值得这么做的。第二个是：在中心地区，上层阶级如果不是个别地，也是集体地从强化国家机器中获得好处；不过，国家机器反过来也会作为一种制度化控制手段遏止上层阶级的内部冲突。

边缘地区既没有这些经济补偿，也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波兰，君主制日趋衰微。匈牙利则被分裂为三个部分，其中两部分处于外国统治之下，最后，三个部分将全部沦亡。捷克国土也同样处于外国统治之下。实际上，除了我们随后将要讨论的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个特例之外，17世纪是本土国家权威进一步崩溃的世纪。波兰国家是唯一对其全部民族领土拥有本土主权的国家，也在实际上被称为“共和国”（*Rzeczpospolita*），该词源于拉丁语“*Respublica*”，而它通常是作为“绅士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Gentry*）而提及的。然而，外国经常干预国王的挑选，因为国王是经选举产生的；因而经常是某个别人而不是土生土长的波兰人被挑选出来当上国王。17世纪匈牙利的三位领袖

人物 [贝特兰 (Gábor Bethlen)、锡林尼 (Zrinyi) 和拉科齐二世 (Ferenc Raköczy II)] 寻求“创建一个强大到足以承受欧洲形势变化压力的匈牙利国家”^[67]并且努力创立一支强大军队，以此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去获得税收。^[68]他们失败了，因为匈牙利的贵族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联合反对，他们在1711年匈牙利独立战争失败后达成了一项相互便利的持久安排。“在匈牙利，贵族的税收豁免权被延续到下一个世纪，铜贸易落入了荷兰人之手，同时，哈布斯堡王朝国家将中间人所获的利润投资于奥地利矿业的现代化之中。^[69]”

在中心地区国家，新兴的阶层无论是绅士或是长袍贵族，都可以指望国家机器对旧贵族的权利主张予以某些约束，尤其是约束那些在市场中表现不佳者。但是，在东欧，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些阶层想替代强大国家的“绅士共和国”，这是仅占人口5%至10%的上层阶层之内平等法律和道义的压力所带来的强加之物，尽管在事实上这个上层集团之内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也相当显著，^[70]并且由于时势的经济困难而加重了。^[71]在波兰，中等绅士阶层为了反抗巨头们或立法纠正中的胡作非为，争取法庭正义的种种努力都属徒劳。巨头们贿赂法庭并随时随刻在法庭不听其摆布时就打碎它们。^[72]在匈牙利，“绅士阶层”尝试了一次战争却失败了。在波兰，他们重新塑造了萨尔马提亚 (Sarmatians) 人神话——这个神话原本是说波兰—立陶宛王国不同种族的人口都是源于一个共同的斯拉夫民族祖先，即萨尔马提亚人——使之变成一个关于进行征服的贵族阶层即统治阶级的奠基者的神话。^[73]这样，“绅士阶层，也唯有他们才是波兰民族，将其他据说不是正宗出身的其他社会阶层排斥在民族社会之外。^[74]绅士阶层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卫士和仇外者，将此论积极地推向极端方面，^[75]并且无疑犯有“自大狂^[76]和“病态神话狂。^[77]但是，如果人们没有进行一次“光荣革命”的可能性，就只好凑合着运用“萨尔马提亚主义”，即使它意味着“文化的停滞和创造性智识活动的萎缩”。^[78]

就在世界经济衰降时期引导核心地区沿着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上层阶级内部达成宪法妥协的道路前进之时，并且有减少下层阶级叛乱可能性的结果之时，东欧国家的虚弱则意味它们即无法寻求到重商主义策略的好处，也无法确保上层阶级内部的任何妥协。这就导致这些边缘地区走向阶级冲突的尖锐化^[79]、地方主义的增长和国家意识的衰减、^[80]在内部寻找替罪羔羊，^[81]以及农民的激动狂躁。^[82]经必要修正，我们将看到南欧和美洲的旧边缘地区中确有相同情况。对基督教地中海进行一番迅速审视，就会看出相同模式流行于一个以“商业停滞”^[83]为其特征的17世纪。主要出口品的价格下跌了。在西班牙，小麦价格在1585年之后下跌，并在整个17世纪中一直滞步不前，葡萄酒、大米和油类价格也是如此。^[84]在西西里，丝绸出口如同小麦和葡萄酒的出口那样在1640年之后衰落了；但是，艾马德（Aymard）注意到人口的持续增长增加了“内部”消费量，从而弥补了出口的减少。^[85]然而，这也许意味着人均谷物产量正在下降，这是我们在东欧已经碰到的一种现象。

对此作何解释呢？坎奇拉（Cancilo）谈到了1573年至1653年之间西西里的“殖民化的密集工作”。^[86]达席尔瓦（da Silva）报告说：1609至1610年的西班牙有一位苦恼的作家注意到陋习横行，三年轮作制废弃，因而生产者“正在耗尽地力”。^[87]达席尔瓦说这种情形从1570年至1630年导致寻求新的领地，这些新领地随后又同样被耗竭。这种土地的“贫瘠化”格外沉重地打击了小生产者，^[88]并导致进一步的土地集中。在这一耗尽地力的过程导致无力出口的同时，土地集中应运而生，并导致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货币化”，因为“农民和村民们无力依靠自己的土地谋生，这就扩大了内部市场”。^[89]我们注意到世界贸易衰落之时东欧的地区市场同样扩大了。人口统计随之而来。西班牙人口下降了——因为有16世纪最后年月中的瘟疫和驱逐摩里斯科（Moriscos）人。从1609年至1638年，瓦伦西亚港市（Valencia）的人口减少了35%，但是，这一“剧烈的人口危机”还只是尾随人口停滞不前之后发生，并非在此之前。^[90]

关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人口下降了。据艾马德（Aymard）之说，西西里岛只是经历了人口增长（并非下降）的“减缓”；但他又说西西里的数字隐去了“清楚的地方区别”；该岛被分成两半了，其北部、东北部和中部停滞不前，而且食物不再能够自给自足。^[91]不知除此外是否就没有别的某种隐蔽的人口衰落了。弗林登（Verlinden）报告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奴隶制的影响于15和16世纪达到顶点后在17世纪中衰落，因为非洲奴隶贸易（他们先前是由葡萄牙人进口到地中海）转向了美洲。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奴隶的供应也大为减少了。^[92]这是不是意味着总人口的下降，其他统计数据也许无法反映其差错呢？据说经济的“无可置疑的收缩”说明了那不勒斯国家中从阿奎拉（Aquila）到萨莱诺（Salerno）的地方制造业的兴起；^[93]然而，这不仅对那不勒斯来说是真实的，对全意大利和朗格多克（Languedoc）来说也是真实之事。布罗代尔（Braudel）问道：难道这就是“对贸易不足的不安和广泛反应吗”？^[94]小农业生产者是衰退时期的真正受害者，压榨他们的结果导致了尖锐的阶级冲突。塞雷尼（Emilio Sereni）在谈到1647年至1648年的那不勒斯农民起义时写道：正是“新贵族们在商业上的贪婪激化了农村人口对封建压迫和胡作非为的反抗。”他又说：“我们不提‘重新封建化’，而是会恰当地谈论采邑封地的商业化。”^[95]经济衰退、对土地和劳力的压力的增大、集中化、土地和劳力的进一步商业化——事实上全部都在南欧和东欧齐头并进。

让我们现在转向西班牙属美洲，那里的“17世纪的不景气”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大的争议课题。让我们先从种植庄园的兴起入手，将它视为世界经济中这一边缘地区的关键性农业体制。怎样才能确定和理解种植庄园呢？关于16世纪中的土地结构是该说成是“封建性的”^[96]还是“资本主义性的”，我们已碰到过一次争论了。如摩洛（Frederic Mauro）那样有可能认为：在西班牙属美洲16和18世纪至少“增加了投机家、商人、矿业主、城市资产阶级……甚至于皇家官僚的重要性”，而17和19世纪却代表了“家长制社会”的胜利。^[97]从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和封建

主义均可视作竞争趋势，与世界经济的漫长的A周期和B周期联系在一起。因此，关键性的辩论不在于16世纪，而是在于17世纪。自给自足的“非资本主义性的”种植庄园的胜利，是谢瓦利埃（Francois Chevalier）的著作中的基本主题，据说，这一胜利是世界经济收缩的结果：

17世纪最初数十年中，白银的繁荣崩溃了，它的消逝又窒息着几乎尚是初生的资本主义的最初激动。土地变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最大的地产都是自给自足的。大炼糖厂、大农场、种植园和农场附属的冶金厂几乎提供了它们自己的全部需要之物.....我们常有机会回忆起中世纪..... [种植园主们] 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贵族阶层；一些人成功地取得了贵族封号。Marquese del Valle（庄园诸侯）的国家，最终不过是勃艮第大公国的黯淡复制品。[\[98\]](#)

17世纪墨西哥种植庄园的另一面，由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作了极有力的说明：

在17世纪的墨西哥，大庄园的成长并非是由经济紧缩的不景气诱发而变成人们所称的封建种植庄园，与其相反，这种种植庄园此时的成长和繁荣，在拉丁美洲的一切其他时代和地方都是一样的，因为国家经济和实际的世界经济的其他方面事变都使大庄园有厚利可图。[\[99\]](#)

如果我们更深入细致地分析若干这些历史过程，将会使我们有能力评价这些相互矛盾的诸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确定衰降时期的时间。林奇（Lynch）说：墨西哥白银生产的顶点是在1590年代，“此后，繁荣便完结了。”[\[100\]](#)然而，关于普遍的东印度群岛贸易，他接受了肖努（Chaunu）的观点：1593年至1622年之间发生了一次纯粹的“主流的倒退”以及1623年至1650年之间发生了大萧条。[\[101\]](#)麦克劳德（McLeod）

接着谈到了中美洲并把大约介于1576年至1635年之间的时期称之为“转折的半个世纪”，确定大萧条的时间发生在1635年至1720年^[102]的某个时间中。伯斯（Berthe）把墨西哥农业的深重危机确定在1630年至1680年之间。^[103]最后，梅拉法（Mellafe）在泛泛谈到西班牙属美洲和特别论及智利之时，认为“真正的危机始于1650年之后”，又补充说“1595年喀他基那（Cartagena）港的陷落，是此后将延续两个世纪之久残酷而又富于破坏的斗争的第一个警告。”^[104]

通常，关于确定时间的学术性吹毛求疵之争反映了实际事物的复杂性，其中，衰降看来是起始于上升周期结束之前。看来相当清楚的是西班牙美洲有一个周期循环相重叠（或称过渡转折）的时期，或许最早开始于1570年代，但更为合理的是始于1590年代，并在1630年至165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结束了。我们应当期盼在此时期内发现的是：主要部门中的利润危机以及大业主和投资家们为了弥补损失做出的不情愿的努力和采取的短期行为，这实际上使长期形势更为恶化。而这正是所发生之事。白银，16世纪西班牙美洲的主要出口品，在1590年至1630年之间开始停滞不前，此后数字就表现出急剧和突然的衰落。此处的官方统计数字可能会使人误入迷途，因为有增长的隐秘贸易；不过，来自矿业地区的说明证据表示了的确存在有“一个真实的生产下降”。^[105]这为什么竟然会发生呢？一种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劳力短缺所引起的。然而，尽管总人口下降和劳工成本略有上升，矿业主们看来还是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劳力。在墨西哥，他们常用工资劳力，而在波托西（Potosi），他们只需简单地从偏远之地征召强迫劳工即可。关键之处在于即使在劳工足以供应之时生产依然下降，如戴维斯（Davis）所说：“实际上，在17世纪，波托西的许多矿业经营都接受印第安人货币贡金代替他们应有的‘米达’（mita）或称强迫劳工，宁愿要这种确定收入也不要矿业可能带来任何利润。”^[106]

那么是缺乏汞吗？很清楚，1630年代至1660年代是有这么一种短

缺。贝克韦尔（Bakewell）称汞供应的困难是“[白银]生产诸种波动变化中唯一的最大决定因素”；但是，戴维斯并不认为这些困难是“决定性的”。^[107]问题在于为什么1660年代比1630年代有更多的汞可供应。一定是在1660年代为获取汞而做的必要之事肯定有利可图，而在1630年就不会获利。让我们重新回忆起尽管在那个时代金银块的供应是价格形成中的一个主要因素，“金和银也有它们的价格”和“货币在大体上，尤其是在金银本位制中，不过像任何其他之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108]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赞同前述之言并解释说生产下降是价格膨胀的长期结果：

那么，即使成本也保持固定不变，白银的固定价格就不意味报酬下降吗？说到通货膨胀中货物与服务的价格上涨，换言之就是在说货币的价值或价格在下跌。由于银价固定，矿业主在他们的矿场中进行生产就不是金钱吗？复杂之处是他们既面对成本上升也面临利润率下降——对任何一位资本家来说，这些理由就足以使他削减产量并投资于某些其他生意，如果可能的话。^[109]

作为主要经济部分的贵金属出口下降，接着就影响了其他的“出口作物”。关于中美洲的靛青染料的生产，麦克劳德（McLeod）认为17世纪的航运技术状况使得运过大西洋的初级产品利润率摇摆不定。“靛青在有利时候可以靠金银的差价幸存，而在艰难时候就因离欧洲太远无法表现出稳定一贯的利润。”^[110]靛青的这一情况也可以更广泛地应用。^[111]

出口价格的下跌立即使两个强大的集团蒙受损失。它们是控制生产企业的西班牙人和向这些西班牙人征税的国家。16世纪后半期的税率已经显著上升；^[112]但是，经济困难对西班牙及其帝国的打击恰好碰上了一个重大军事活动的时期（先是尼德兰的叛乱，继之又是“三十年战

争”）。面对岁入下降和开支增长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西班牙国家从17世纪开始之时就求助于“无节制地铸造维农铜币（Vellon）”，^[113]当这也不敷使用之时，它就努力对其帝国“从骨头里榨油”。^[114]因此，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国家不仅增加税赋还力求使征税更为灵验有效。^[115]这实际上是自取失败。1620年，菲利普三世没收了私运银块的1/8（让他们用维农铜币或特权来换回）。他极自信地直接剥夺了商人们的资本；但是，商人们随之就变得根本不愿把他们的银块运回来了（这无疑是削减白银生产的又一个因素）。结果，王室取自海捐费（即支付护航费用的按价税收）的收入下降了。为了维持住舰队，君主只得更加提高海捐费的税率，如林奇（Lynch）所说的这是“鼓励欺诈”，并使君主变成“依赖美洲贸易和殖民地的寄生虫”。君主还向西班牙人授予更多的“种种奖赏”（mercedos），以作为弥补之计。这是一种螺旋式发展。“掠夺和寄生使欺诈与走私变成一种生活方式”^[116]——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欺诈与走私更加速了西班牙的半边缘地区化。

一些克里奥尔人（Creoles，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和混血儿等——译注）因经济的困难备受痛楚，因而转向求取公职作为解脱，^[117]使国家的官僚机构的寄生之状成倍增长，同时，其他一些人实际上正在良好地适应世界市场的沉浮变迁。银块的出产以及至此时的主要出口作物都下降了；而谷物的生产却上升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困惑。由于美洲谷物（与东欧谷物不同的是）并没有成为向核心地区出口的边缘地区产品，就经常会认为这种生产是非资本主义性的。巴赞（Bazant）却说正好相反：“[小麦]的大规模生产无疑是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并运用了资本。”他提醒我们注意尽管小麦并不是供食用玉米饼的苦力的消费品，“仍然存在有一个可观的市场：城市中的白人人口。”^[118]此外，这种生产还要求有以磨坊、牲畜和劳工食物等形式的大量资本。

也许可以争辩说这对小麦生产是可信的，而对玉米生产就不是真实的了。然而就在这一点，商业化也是极为重要的：

工人们（印第安人、黑白混血儿、黑人和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以及推动机械的骡马，这整个在矿场中使用的劳动力全都依靠玉米为生。从16世纪末期开始，为了服务于他们，在矿场周围形成了一个特别专为供应他们的农牧业种植庄园地带。^[119]

这并不是暗示说这些种植庄园就不受经济的影响；矿场地的坏年头也导致“困难岁月，有时还是衰退”，^[120]并且由于新竞争庄园的创立而经常恶化加剧。然而，这也表明市场有地区限量，而且超越世界经济紧缩中的这种限量就无利可图。^[121]这无疑就是关于种植庄园和糖业庄园之间不同结构的经典描述的共同起源，种植庄园供应小规模市场，糖业庄园则是供应大规模市场。^[122]在地区限量之内，种植庄园的生产颇为有利可图。如果愿意的话，人们也许会称此为自给自足，但对我而言，看来更显得可能的是如贝克韦尔（Bakewell）所说的：它是“这样一种结果：在新世界追求创造一种多样化的，且依当代说法，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用这种经济为了中美洲的利益而开发中美洲的丰富资产。”^[123]由此产生的利益未能影响被称作中美洲的这样一个抽象实体，而是的确影响了一个具体的社会集团：中美洲的地主。

然而，如在东欧那样，世界经济的衰退在总体上要求强化使用基本资源（土地和劳力），用以维持利润水平。在整个西班牙属美洲，印第安人人口急剧减少，现在已是人尽皆知之事了，^[124]流行疾病的作用已明白无疑。^[125]对于西班牙人地主而言，印第安人人口的如此减少既创造了机遇也制造了困境。印第安人生产者由于死亡和从土地上被逐而产生的减少与西班牙人及其混血儿人口在城镇和矿业地区的增长，给种植庄园主创造了地区市场和高价格。另一方面，这些庄园主又需要劳力。正是在此我们找到了谁应当是资本积累者的斗争的关键所在。事实是：世界范围中资本积累的衰退意味着西班牙属美洲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为了争夺业已减小了的经济利益，处于同西班牙本土的资本主义部门的

激烈竞争之中。我们已经提到西班牙君主为了从美洲汲取盈余而增加了税收。从新西班牙的观点来看（新西班牙是往昔美洲最具有活力的地区），最沉重的伤害莫过于西班牙君主企图减少墨西哥同秘鲁和菲律宾的直接联系。无疑，走私活动甚为广泛，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西班牙君主的政策也对墨西哥城产生了“严重的有害影响”。^[126]

利润争夺不仅表现为控制贸易路线之争，也表现为控制劳工之争。“分配”（*Repartimiento*）制度（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者根据官方法令分配印第安人劳工的制度——译注）从16世纪中期起就一直有效。从大农业生产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却是相当令人沮丧的。当它等同于强迫雇用劳力时，劳工们却是暂时性的并定期送回去维持他们的传统生产活动。^[127]西班牙官僚机构，尤其是“总务”（*Corregidores*）（西班牙小镇之警察首长：旧时地方长官），策划这种劳工供应，坚决支持修道士，修道士们赞成将它当作一种手段用以保护印第安人免受西班牙人贪婪掠夺之害。这些“保护者”的利益显而易见，如伊斯雷尔（*Israel*）对墨西哥的这种利益解释说：

地方长官（*Corregidores*）们.....经常敛聚大量财富。靠的是他们所采取的各种敲诈勒索手段，包括以极低价格强行购买印第安人的作物，以便在城市中出售获取高额利润，买卖中漫天要价、强买强卖、向西班牙人收取好处费、挖空心思利用印第安劳工制度.....因此，印第安人实际上是支撑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一是西班牙居住者的经济，二是印第安人区内主要是为了地方长官、修道士和印第安人等级制的利益的经济。^[128]

这种压迫在印第安人身上的双重负担，肯定就是他们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之一；此外，这也肯定对政治制度制造了一种难以应付的紧张压力，只要一旦产生了经济动荡。^[129]

1632年，西班牙君主终于决定在新西班牙的矿场之外停止使用强迫

雇用劳役。由于持续不停的紧张压力，它只是加速了西班牙地主（现在是农场主*hacendados*）逐渐发展出一种策略，用于吸引称作*gananes*（挣小费者）和*laborios*（劳工）的永久性劳工。起初，地方长官们的办法是豁免这些永久性劳工的无偿劳役，其实际意味是地方长官们为了削弱作为一个阶层的克里奥尔人，强迫印第安人离开一个克里奥尔人转移到他人的控制之下。当西班牙君主试图完全废除强迫劳役时，印第安人完全无工可做的可能性增大了；在这一点，大农业生产者求助于创造出一种债务劳役制作为在其土地上保有劳力的办法。^[130]土地的变更易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控制；^[131]因此，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的领地变成了种植庄园（*hacienda*），^[132]强迫劳工变成了债务劳工。在以时间单位计算的报酬方面，这些工人的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善。劳力短缺使工人有一些讨价还价的力量了；^[133]但是，难道他没有为这一较高水平的报酬支付他被迫付出并增加了的全部时间吗？实际上就没有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他的生命可能缩短吗？他们在这里，如在东欧那样，就没有耗费劳动力资本以维持生产水平吗？

结果可能是这样的：16世纪之末农产品的高价格和短缺供应导致土地变更易主和生产加速。举例说，谢瓦利埃（Chevalier）就谈到了牧牛业主愿意“甚至冒着耗尽其畜群的风险去牺牲许多牲畜的程度”。^[134]矿业主、市民、官吏——简言之，那些组成农产品地区市场的人们——力图控制生产者的获利水平，其办法是运用价格控制机制，如*alhóndiga*（谷物商行），即市政储备谷仓以固定价格出售，不过，印第安人的产品不在此例。^[135]较小的西班牙农业生产者由于遭受挤压而趋向于破产，如混血儿生产者那样，他们之中许多人“被降到了当雇农谋生的悲惨境地。”^[136]相反的是，大农业生产者变得更大，就趁价格下跌之时进行扩张。如此一种看似邪恶的逻辑由莫内尔（Mörner）予以透彻说明：

当丰收太甚之时，由于市场有限和价格暴跌，种植庄园不

得不削减它们的产量。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还要费力去扩张呢？因为经由剥夺周围邻居的地产，这些种植庄园就能消灭生产竞争或逼迫迄今为止仍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沦为庄园产品的消费者。[\[137\]](#)

那些所谓的自给自足的大种植庄园正是能够微妙调整市场力量的一种机制。它能够在利润变化运行中缩减或扩大生产，能加快或减缓资源的利用，因而能长期维持住农业生产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而且，种植庄园也是新的纺织业的生产之地。它的出现类似于后来数世纪中将闻名的替代进口，世界范围紧缩的出名产物。贝克韦尔（Bakewell）认为：“贸易大概下降了，在很大部分的意义上，是因为新西班牙不再需要从欧洲进口了。”[\[138\]](#)他得出的结论是：“新西班牙的经济在17世纪初期远未受损害，反变得更健壮了。”[\[139\]](#)但是，这是对情形的错误理解。并没有一种如新西班牙经济那样的事情可以与西班牙的经济相比拟。西班牙属美洲的一些企业家将其投资主要是投向了纺织业生产，因为有市场的变动情况（西班牙和混血儿人口的增加，白银出口的衰落，以及种植庄园制的劳力规模经济），从而损害了西班牙纺织业生产者的出口潜力。

世界性紧缩并不意味资本主义活动的衰落。实际上，它可能标志着地方性资产阶级企业的力量增强。[\[140\]](#)此外，关键之处不在于有什么纺织生产总体的衰落，而是在于这一生产正在转往农村地区。种植庄园和印第安人村落以及“大部分精致布匹是在工场作坊之中生产”。[\[141\]](#)纺织业也不是唯一处于发展中的工业。17世纪之初，铜和铁工业就已扩大，以供建造“大教堂及其文艺复兴式的门窗格栅”。[\[142\]](#)西班牙属美洲的主要出口品（尤其是白银）在世界市场上遭受衰落之苦时，这些老边缘地区的生产者就将其注意力转向其他的生财之道。他们将其生产活动集中在不断增长的地区市场上，从横越大西洋的贸易角度来看，这代表了一种相对的收缩；但是，它几乎不可能被描述为绝对主权的兴起。同时在

核心地区国家，高度的需求为糖的出口（以及较小程度上烟草的出口）创造了不断扩大的市场。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中新边缘地区的逐渐发展，它们是加勒比海诸岛及其扩延部分和英属北美的南部大陆殖民地。我们必须完成的描述所要转向的就是这一过程。

直到17世纪之初，大多数加勒比海岛屿并不处在欧洲的控制之下。西班牙人占据了主要的大岛屿，特立尼达（Trinidad）和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古巴、牙买加、小西班牙（Hispaniola）、波多黎各（Puerto Rico）]。他们有一些畜牧业，种植一些食品作物以及一点烟草和糖类作物；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只是控制通往他们在美洲的主要地区的贸易路线。突然，在1604年至1640年之间，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侵入加勒比海地区并占据了全部的小岛屿。从1625年至1654年，荷兰人控制了部分的巴西。1655年，英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牙买加。1629年，一些法国海盗在小西班牙岛之外的托尔图加（Tortuga）岛登陆，而到了1659年，他们完全控制了小西班牙岛，他们很快就向今日所称的海地（Haiti）这个大岛屿的西半部进展（不过，法国的主权直到1697年才获得正式承认）。然后，从1650年代直至1763年，是殖民地分割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期。西北欧的列强为什么突然蜂拥入侵这个扩大了了的加勒比海地区？为什么这一入侵实质上不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领地就决不罢休？17世纪的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在1660年代和1670年代，为什么会是海盗群聚之地，成为那个时代的“野蛮西部”，会比美洲的其余地方的“零散居住地要有更远为诱人、激动、暴富的前景和连绵不绝的毁灭呢？”^[143]

肖努（Pierre Chaunu）曾说：介于1619年至1623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在一个无法精确定义的日子”，西班牙发展道路的本质中出现了一个变化。官僚的严峻刻板取代了曾是16世纪发展道路成功特色的灵活机制。“从17世纪后半期起，瓜达尔基维尔（Guadalquivir）的大西洋已变成了只是数个大西洋中的一个而已”。^[144]肖努所确定的时间晚于那个时

代某些人确定的时间。1619年，德蒙卡达（Sancho De Moncada），托利多（Toledo）大学的一位圣经教授兼西班牙的重商主义思想家，断言（无疑带有某些夸张）说西印度群岛的商业9/10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他们拥有西印度群岛，而陛下您只有头衔而已。”^[145]他的话将被证明是基本正确的。在17世纪这个重商主义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未能成为，也无力成为重商主义国家，它们因此沦为半边缘地区国家，成为中心地区各强国在边缘地区的利益输送带。作为半边缘地区的发展过程，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较多谈到，而作为边缘地区的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就必须论及。

在一个全面紧缩的时代，它们的经济活动的某些竞争场地也必须紧缩。为了在经济活动中将紧缩降至最低程度，核心地区的各强国彼此激烈竞争，其中部分是寻求先发制人地控制边缘地区。它们既进行殖民活动，又寻求防止别人的殖民活动，这就导致了激烈的殖民战争，而且它们力图使世界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可控制地区并使之超越于不容易控制地区之上（如美洲之对于东欧和南欧）。此外，它们在事实证明，立即夺取较软弱的殖民国家的殖民地领土代价过于高昂而不可取时，如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庞大帝国，就寻求去侵蚀这些较软弱的殖民国家。^[146]因此，随着世界性紧缩的开始，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全都转向加勒比海地区以求先行占有它。他们先是打入那些容易得手的地带，然后，通过夺取贸易的手段，在仍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的地区取得他们原可以直接的殖民统治获得的经济利益。走私就是17世纪如此作为的主要手段。

欲理解走私活动如何进行，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海盗的社会起源。16世纪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群岛上漫游着牛群。其中一些是野生的牛群，一些是由印第安人控制的牛群，但是，随着16世纪的岁月推移，西班牙人也放牧了一些牛群。我们已经描述过西班牙美洲的人口变迁：印第安人人口持续下降，与之相伴的却是克里奥尔人黑白混血儿和欧印混

血儿人口的持续增长。17世纪矿业地区的紧缩，引起了城市地区中较贫穷的克里奥尔人和社会地位居中的黑白混血儿与欧印混血儿人口所获机遇的减少。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搬迁到农村地区。一些人在不断增加的种植庄园和牧场中就职。其他人却没有。中等阶层中那些失业的成员所遇到的风险是“卑贱化”，即降到只是粮食作物劳作者的身份地位上。然而，在边疆环境中，他们确实还有其他选择。他们变成了野生动物的牛仔，为了生存需要什么就滥杀什么。他们的队伍开始由逃亡船员扩充起来。荷兰船长们开始同他们进行牛皮贸易，而这一贸易增加了更多的捕杀。“显然，这一行当是非常浪费的。”^[147]最终，从居民人口的观点来看，“这种浪费太过分了。”^[148]

大约在1640年，西班牙当局开始肃清这些岛屿上和中美洲海岸地区的海盗。^[149]西班牙人一个肃清之策就是自己杀戮这些牛群以便阻难牛仔们。而英国人为了阻难西班牙人也加入了这一游戏。至此，牛群至少是从这些岛屿上实际消灭了，绝望的海盗只好再横行于海上。然而，若不是在库拉索（Curaçao）岛的荷兰人，在圣多明各（St.Dominigue）（小西班牙岛）的法国人，特别是在牙买加的英国人“为他们的掠夺物提供了可靠的销赃管道”，^[150]这些海盗们原本是绝难幸存下来的。牙买加是关键之地。正是在克伦威尔（Cromwell）统治之下，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牙买加岛，又是在英国王政复辟之时，该岛变成了海盗们的一个相当的基地，以致他们中的一个人，亨利·摩根（Henry Morgan）将擢升为总督并封为骑士。只是到了“光荣革命”之时，海盗才完全销声匿迹。克伦威尔的目的是要打破西班牙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垄断。他先是试图使用外交手段，然而并不奏效，于是就求助于劫掠。斯特朗（Strong）写道：“克伦威尔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之人，他属于雷利（Raleigh）、吉尔伯特（Gilbert）和哈克路特（Hakluyt）等人一类。整个西印度群岛远征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式的。”^[151]这种政策并非只是克伦威尔的政策，它对于牙买加的前途来说还是一种“国家海盗风险事业”，且从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沿袭下来经久不息。^[152]理论上，根据1670年英

国——西班牙条约，海盗是违法之事，但在实际中，至少直到1685年，海盗行径劲头十足地继续进行。实际上直至1692年地震摧毁了罗伊尔（Royal）港的巨大海盗据点，海盗行径才由1697年的赖斯韦克（Rijswijk）条约予以最终的截止。在牙买加，该岛是作为一个生产糖类的殖民地还是应该作为劫掠和走私的基地之间出现了矛盾，且在日趋增长；但在中心地区国家，将海盗行径作为一种原始积累方法的需要却在日渐减少。

走私贸易模式是由16世纪末期的荷兰人首创的，是一种非常讲求实际的事情。同西班牙的多次战争切断了荷兰通往伊比利亚半岛的航运，因而也就切断了对于鲱鱼工业必不可少的盐供应。荷兰转而从委内瑞拉的产盐地私购。这一应急之举，由于世界价格基本结构的原因，变成了长久政策。荷兰联合省较之于西班牙，是一个大有效率的农业生产者。“塞维利亚（Seville）——（西班牙地名——译注）的垄断无法以合理价格（向西班牙美洲）供应足够的货物。”^[153]而荷兰人却可以做到。走私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联结了中心地区国家的商人和他们没有直接控制的边缘国家的生产者。^[154]西班牙和中心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每下愈况了，在战争期间更是糟糕透顶，新建立的殖民地“部分注定要用作私掠基地”，佩尔斯（Pares）注意到这是对他们的历史记载年表的一个部分解释。^[155]它也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的殖民地最终要多于法国殖民地的原因，因为法国经常与西班牙联盟反对英国。

牙买加代表了走私体系的顶点，变成了加勒比海地区走私贸易中心，走私贸易成了“英国人不愿停止之事……而西班牙人又不可能阻止之事。”^[156]起初，海盗的存在有助于这一过程。他们毕竟不是真正的海盗，因为他们只抢劫西班牙人，并且经常是得到他们自己的政府授权去这么干的。^[157]但是，糖作物种植在牙买加变得更为重要了，而且西班牙于1670年最终放弃了他们长期坚持的排外性居住权利的要求，此时，英国人逐渐认为海盗是有害无益之事，特别是由于海盗数量增多，更趋

绝望，且为日渐扩大的大农场将贫穷白人逐出牙买加土地。^[158] 海盗不再是人们所需要的了。洪都拉斯的生产者很乐意直接与牙买加商人做生意，这些商人“消除了将货物走私进入中美洲的许多风险。”^[159]

海盗们干过劫掠之事。^[160] 现在，英国人和法国人打算满足于不合法贸易，因为这包括了盈余利润的同样转让，但同时又保障了持久生产，这正是海盗们的劫掠没有办到的事情。一旦海盗们的基地被关闭，“西班牙种植园主就有可能在这个岛上和海岸地区重新开始繁荣发达。”^[161] 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有可能直接与西班牙谈判“合法的”奴隶贸易。^[162] 西班牙属美洲的走私不过只是全局中较小的部分。较大部分是蔗糖，它长期以来就一直是边缘地区的基本产品之一。由于土地耗竭不断发生，蔗糖生产逐步向西推进，^[163] 16世纪后期达到巴西（在较少程度上达到墨西哥），17世纪移到了加勒比海群岛。与小麦、畜类和白银不同，蔗糖并未被卷进1600年左右世界经济供应过剩问题中，这一问题引起了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出口的基本性紧缩。蔗糖更像是波罗的海地区木材的持续“增长”。它的长久问题是生态耗竭和必须找到处女地以供开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高利润。^[164]

由于中心地区国家创造出新的食物口味，对糖的绝对需要在17世纪不断增长。中世纪之时，主要是蜂蜜和未发酵的葡萄汁满足欧洲对甜食的需要，此两物都是天然甜物。现在，发现了新的饮料，创造了新的甜点，都要放糖使之美味可口。^[165] 约在1580年，蔗糖生产从大西洋诸岛广泛地移向巴西。^[166] 就在长期性衰降的迹象出现在西班牙美洲之时，巴西看起来却有一种向上趋势。肖努解释说“这一缓慢的转折点”是约在1630年至1650年出现在巴西，而不是在1580年时期，与西班牙美洲不同，巴西“仍然受益于朝气蓬勃时期的轻松发展。”^[167] 这在我看来却是捏造的。要是以先前讨论过的快速的生态耗竭与世界需求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一发展，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蔗糖作为世界经济产品受制于长期性涨跌要少于小麦和白银，不是更容易一些吗？那么，肖努所看到的1630

年至1650年的衰降就将正是生产率下降再次不请自来的因素了。[\[168\]](#)

正是荷兰从巴西的出口达到顶峰之时以及1645年的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叛乱导致荷兰人被逐出巴西之前，将蔗糖作物引入巴巴多斯（Barbados）的就是荷兰企业家。为什么呢？邓恩（Dunn）对此问题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欧洲人对糖的渴求据信“大到足以有理由将巴巴多斯添加给巴西以扩大糖的供应。”第二，“正在英国的海外贸易受挫于国内的内战之时”，荷兰人能够从经纪人服务中获利。[\[169\]](#)或许是这样。但是，同样可能的是荷兰人深知蔗糖庄园对土地的耗竭之害。[\[170\]](#)荷兰人寻求最佳条件的事实，清楚地清现在对巴巴多斯而不是对其他岛屿的选择上。一般来说，较之加勒比海其他岛屿，巴巴多斯的气候更佳，土地更肥沃，其地理位置也更安全免于受劫掠。[\[171\]](#)事实上，这些考虑也可适用于所有早期的蔗糖岛屿（巴巴多斯在其中不过是最突出的），如谢里登（Sheridan）曾经指出的[\[172\]](#)：

在建立庄园方面，小岛屿最初要比大岛屿更受青睐。从交通、防卫、离北欧距离较短的角度来看，顺风的岛屿要比逆风的岛屿更容易防守，海岸线比率高于陆地也使大多数庄园直接靠近海上航船。

谢里登（Sheridan）又补充说，还有更多的风力供风车磨坊之用，有不那么使人疲弱的气候，而且奴隶暴动和逃亡的可能性也较小一些。[\[173\]](#)

在蔗糖生产到达牙买加这个非常之大的岛屿之时，至少对英国来说，领土扩张的过程就停下来了，因为牙买加提供了大量的土地面积，而且英国糖业利益集团担心“甘蔗种植面积的任何扩大都会使生产饱和从而使价格下跌。”[\[174\]](#)在此意义上，没有进行更多的扩张正是重商主义新近获得力量的表现。法国人在取得多米尼加（Domingue）之后的态度也如出一辙。[\[175\]](#)以西班牙的损失为代价的扩张再也不是必要的了，

因为英、法统治下的蔗糖种植面积足够供应下一个世纪。但是，在加勒比海区发生的三次英法战争（1666年至1667年、1689年至1697年以及1702年至1713年）之时，英、法两国相互破坏对方的财产仍然是它们的重大目的。如果说这种相互破坏在1713年之后消失了，那也是因为世界需求量至此时已扩大到足以满足这两国正繁荣的蔗糖工业。“蔗糖种植业主终于发现了理想的福境”。^[176]

某种意义上，烟草总是糖业的穷亲戚，既是早创者也是早败者。之所以说它是早创者是因为它是创始人的作物，在一年之内就生长起来且又几乎不要求什么特殊设备。但它是“土壤的杀手”，^[177]更甚于蔗糖。烟草每25年左右就必须易地而种，因此唯一真正可行的是在大面积岛屿上或在像弗吉尼亚（Virginia）和马里兰（Maryland）那样有内地可扩展的土地上种植它。^[178]此外，烟草的世界市场和利润率都小于蔗糖。它“并不像蔗糖那样适宜于成为使人发财之物，……蔗糖可在十年之内赚钱致富。”^[179]它像蔗糖那样也曾被认为有医疗之用。但是蔗糖在17世纪初期就不再是药物而是变成了大宗货品，直到一个世纪，或许是两个世纪之后，烟草才变成大宗货物。为什么竟会有如此之变，尚不完全清楚，不过，却有两个明显事实：蔗糖具有营养价值而烟草却没有，以及不断扩大的食糖消费有助于咖啡、茶和可可的消费的扩大。^[180]

此外，与蔗糖不同的是，自从烟草可在非热带气候条件下种植，它也就成为欧洲许多地区的一种农业选择。蔗糖生产唯有在地中海岛屿才是可能的，而且早已“贯穿”了这些地方。因此，尽管烟草引起土壤的迅速耗竭，其世界供应超过了世界需求，烟生产的过剩经常甚于蔗糖生产。欧洲各国政府抓住烟草这项奢侈品作为容易征税之物，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垄断向农场征税，这种政策烟草的情形更为复杂了。肯定并非处处都是如此。荷兰联合省是适宜的主要世界烟草市场，就没有对烟草征税，^[181]而且尤其是在谷物歉收年份中，其内地的烟草生产繁荣起来。^[182]大多数国家除了对烟草征税和控制外，还企图禁止本国生产。

英、法两国尤为如此，财政控制是最为可能的动机。“向伦敦或拉罗舍尔（La Rochelle）进口的烟草征收海关税，要比向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或加斯科尼（Gascony）种植的某种产品征收货物税更为容易。”^[183]

起初，国家征税打击了美洲的烟草工业。其主要结果是“抬高了价格和限制了市场”^[184]自从征收海关税扶助了欧洲的国内生产，从而恶化了西半球生产中“经常扰人的经济问题”：“劳工和运输的成本”，^[185]其结果就是如此了。不过，到了18世纪初期，一些连接起来的因素扭转了整个局面。首先，对欧洲烟草生产的国家抑制逐渐放松了。第二，在西半球的生产者之中，切萨皮克（Chesapeake）河谷的英国殖民地证明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优良作物。第三，英国人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就是发展他们的热带货物的再出口，其中包括了烟草。因此，英国人逐渐认为烟草主要是商业税收的一个来源，而不再是财政岁收的一个来源。^[186]与此同时，法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使烟草税变成了“国家岁入的一个主要分支。”^[187]1720年之后，在政府的鼓励之下，法国变成了从英国再出口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产烟草的最大买主，一举购买其总产量的1/4，也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最终说明了烟草业的繁荣景气和生产集中化与商业化的增大。^[188]

17世纪最后几年中，或许是在1693年至1695年，巴西“发现”了黄金。^[189]这就是一次黄金出口景气的启端，官方数字显示从1699年的725公斤增加到顶峰年份1712年的1450公斤。博克塞（Boxer）估计说这不过只是实际出口量的1/10至1/3，其余部分都走私出口了。^[190]巴西黄金为什么恰在此时被“发现”？维拉尔（Vilar）注意到巴西“黄金时期”的起始与1689年至1713年战争引发的英国通货膨胀相偶合；他极为中肯地认为这些黄金“发现”并不是解释英国商业扩张和通货膨胀的原因，与之相反，而是这种扩张、新矿开采的需要或顺利解释了这个“黄金时期”的出现。^[191]走私贸易几乎是公开进行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种观点，走私贸易

系统性地组织起来，完全绕过了葡萄牙经济而将巴西的黄金带到了英国。

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巴西黄金都由皇家海军舰船和法尔默思（Falmouth）至里斯本的定期邮船带进英国。军舰和邮船都免受葡萄牙海关和其他一切官吏的检查。很自然，里斯本的商人们，无论是英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都喜爱以此手段将他们的黄金汇寄到英国，因为葡萄牙自从中世纪以来就一直严禁香料和金银条的出口。[\[192\]](#)

上述之事表明1600年至1750年之间的长期紧缩并没有包括边缘地区简单的衰退。所发生之事是一些原来的边缘地区活动（特别是谷物生产和畜牧业）从边缘地区重新转往中心地区（因而迫使东欧和西班牙美洲的生产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转向地区市场），再加上创造了一个新的边缘地区，它部分地是直接移民开发并且仅仅只是专门生产中心地区国家所不能生产的产品。这个新的边缘地区就是扩延了的加勒比海地区，从巴西的西北部伸向马里兰，它的三项主要产品是糖、烟草和黄金。三个中心地区国家：荷兰联合省、英国和法国，分享了这里的经济利益——荷兰人直至1650年前分享了较多利益，英国人在此后，特别是在1690年之后，分享了较多的利益。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新边缘地区中阶级形成的过程，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边缘地区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人和种植业主”的典型结合。17世纪，在东欧和欧洲极南部（西西里再加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南部）以及西班牙美洲这些“老”边缘地区中，普遍出现了退化，工业的作用得到恢复，市场发展方向是地区性的。从总资本集中在一个集团手中的百分比，或他们的活动的利润率，或他们的政治势力（包括地方性和世界性的）来评判，看来很清楚的是商人阶级的重要性下降了，相比之下，生产企业家即种植业主的重要性更大。许多长距离

贸易的消失，必定沉重地打击了商人集团，在他们与作为地主的经济作物生产者力量抗争方面尤为如此。（种植业主对商人的）整个国际性的债务劳役制必定衰落了，而（农民对地主的）地方性债务劳役制却扩大了。[\[193\]](#)

但是，在扩延了的加勒比海的“新”边缘地区，其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就没有“商业资本主义的”显赫地位吗？关于17和18世纪中英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资本投资和流动，佩尔斯（Richard Pares）做了详细的分析，值得从他的结论入手对所发生之事作一小心的观察：

因此，可以说，正是种植业主本人为他自己的奴役支付代价。种植庄园的利润就是填喂庄园本身负债的源泉。在此意义上，亚当·斯密是错误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并非全都是来自母国；最初时期的首批贷款不过只是发挥了启动作用，此后，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就是由它自己的利润创造出来，而且，其中许多财富又在英国纳税人的某些支持下永久流往英国了。[\[194\]](#)

这种制度是怎样工作运行的呢？让我们先明了我所在讨论的不是加勒比海地区劳力的开发利用对英国的资本积累做出了多少贡献；问题是：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是怎样影响了他们之间剩余价值分配的方式和剩余价值最终是怎样从边缘地区流进核心地区。

从17世纪之末直至整个18世纪，糖业“利益”移到英国。然而，邓恩（Dunn）跳跃了一步。他注意到：尽管加勒比海蔗糖种植园主是“大规模的企业家”和“农场主与制造业者的结合体”，[\[195\]](#)至17世纪之末时，“业主在外所有制正在变成一个重大问题。”[\[196\]](#)起初的通常模式是：种植园主作为移民来到一个地区，他们在此以有限的资本和小块地产开始创业。他们从诸如伦敦和迪耶普（Dieppe）这样的欧洲港口城市中的商人那里获取所需投资。商人不是去取得无抵押贷款，而是与一位

小种植园主合伙。这位种植园主得到他本人及其契约仆人的旅费，加上工具和最初给养的费用。商人以此投资并获得实物回报利润。这种制度不同于那种“种植园主”在其中只是“代理人”的直接所有制度，而是极为有利于商人，商人“依靠使种植园主在此生意的繁荣中享有一份诚实利益的合伙，部分地得到保护免受代理人的不忠实之害——一切殖民地企业中的首要风险。”[\[197\]](#)

然而，一旦种植园开始在岛上建立，集中过程就随之发生，因为大规模生产者面对激烈的世界竞争所作出反应力更大了。随着种植园的规模扩大，种植园主具有了比他的商人合伙者更大的重要性。这可见于关于“航海条令”的冲突之中。重商主义立法保护的是制造业者和再出口商人，对边缘地区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难得有什么用处。17世纪中期，相对于其他地区，英属加勒比海的蔗糖生产显得强大，而英国的国内消费又相对较小，英属西印度的小种植园主们通过北美洲、荷兰和法属西印度的商人，甚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商人向欧洲大陆出售，以此尽力防范英格兰商人。至18世纪，货运路线完全改变了。蔗糖生产扩大到其他地方，由于保护主义使英国国内市场价格上涨了，由于人口增多和生活水平提高，也使英国的需求增大了。于是，正是非英属地区的种植园主寻求经过英属西印度的商人出口他们的货物。此举削弱了英国种植园主的地位，加强了伦敦商人的地位。[\[198\]](#)

我们因此必须区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加勒比海种植园主相比于相对意义上的大商人要显得弱小。作为集中化的结果，种植园主逐渐壮大起来并取得了这些岛屿上的政治权力。[\[199\]](#)更为重要的是，代理制发展起来了；种植园主不再是商人的“代理人”，反而是商人变成了种植园主的“代理人”。代理制着手排除（对抗英国大代理商的）岛上的小商人。[\[200\]](#)这有减少各岛屿之间私下交易的附带好处。至1707年，西印度群岛的利益阶层强大到足以在苏格兰创造出一个“强迫”市场，又以1732年的“蜜糖法令”为手段，在爱尔兰和英属北美创造出同样的市

场。^[201]通过加勒比海种植园主与英国商人建立直接的关系，代理制排除了中间商，将蔗糖初级市场从加勒比海移到欧洲。有两个因素创造了使代理制得以出现的条件，它们首先出现在与巴巴多斯蔗糖生产的联系之中：种植园主经过集中化不断增强的力量和价格不断下跌对他们的压力，因为他们需要更大的利润占有比例以维持同样的收入水平。^[202]代理制扩大到其他岛上，而且至1690年代时，也运用到烟草生产之中了。^[203]它把企业投资从商人那里转移到种植园主。“种植园主将他的产品运往欧洲由他的代理商代理出售，也是这同一位代理商又是通过委托根据种植园主的订货购买庄园的需用品。”^[204]代理制并不是普遍的，仅为英国蔗糖种植园所用，不为法国种植园主所用。在弗吉尼亚烟草这个例子中，转向代理制的变化只是短暂的，种植园主们在1730年代改变了他们先前曾使用过的这种安排形式。我们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代理制只出现在英属岛屿上，而不出现在法属岛屿上？为什么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会改变主意？我们怎样解释利润地点的转移？

在谈到为什么代理制只为英国人而不为法国人所用的这个问题时，佩尔斯（Pares）首先注意到戴维斯（Davis）的解释：代理制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大种植园主不得不为他们的奴隶付账。代理人在伦敦可以用汇票支付这些款项，并通过食糖代销迅速收回代付款。代理制由此创造了为大种植园主——企业家所用的信贷。不过，佩尔斯说，由于法国大种植园主也需要奴隶信贷，又没有创造出代理制，就有另外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在英属岛屿上，业主不在制的出现要比法属岛屿更早更广泛。^[205]但是，业主不在制表明了什么呢？它的发生是因为成功的企业家正在从他们的好运气中获取利润，是他们的企业的力量证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工头，而是变为金融经理；也因为他们积累资本所达到的规模，他们可以专门从事这后一项任务（也因此就便将更多的个人时间用于消费他们所获的利润）。业主不在制（和随之而来的代理制）之所以出现在英属岛屿上而未出现在法属岛屿上，之所以更多地与蔗糖而不是与烟草相联系，完全都是因为英属地区和蔗糖有更高的利润可

图。 [206]

关于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为什么改变主意的问题，也由此得到部分解答，烟草种植园主无法轻松地变为不在业主，因为出现了法国的独家垄断买主。法国市场采购者寻求大宗供应者，而苏格兰西海岸的公司担当了这一角色。尽管苏格兰的公司将货物运往法国港口的距离决不会更长，他们却有胜过英国商人集团的优势：进入弗吉尼亚的关系和更低的劳工成本（这是因为格拉斯哥的半边缘地区地位所致）。苏格兰的公司拥有可供应的大规模市场，向切萨皮克（Chesapeake）河谷派出代理商，绕开了在伦敦有代理人的大种植园主，找到卑小的小农场主并提供用实物偿还的信贷。 [207]因此，力量平衡在此例中又回到了交易中的买主一方。最后，欲要回答企业家风险和利润的地点转移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债务的含意。由于糖价下跌是这一转移的突然变化之一，佩尔斯认为“企业家的地位并不是种植园主从商人手中夺取的那种骄傲又有利可图的地位，而只是一种由商人将他逼入其中的卑贱和无报偿的地位。”然而，这一角色明显不是卑贱和无报偿的，因为佩尔斯本人就指明：“在外蔗糖种植园主以及东印度富豪者们，都是他们那个时代中最惹人瞩目的富人。” [208]

让我们将此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一起考虑，这就是18世纪中英国种植园主不断增长的债务，尤其是所欠英国商人的债务不断增加。这是否代表了一种此时不利于种植园主而有利于商人的转变呢？也许是的，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一金融安排的方法。这种向代理商欠债的结构，唯有在食糖工业繁荣之时才是有效用的。然而，很清楚的是种植园的不在业主正在开始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几乎每一笔大债务……开始都是一笔往来债务或账目，结果变成一笔抵押借款……最后……许多西印度地产证明不值它们的抵押之数。” [209]我们知道蔗糖（和烟草）是自我耗竭性的。在有商人帮助的创业第一阶段之后，在有土地集中和种植园主对实现利润的控制的第二阶段之后，有没有一个第三阶段：假定其衰落不

可避免，种植庄园为无力使资本在同样水平上增值的不在业主所榨尽耗竭？诚然，这些业主和他们的代理商一起分享了这些超额利润；但是，如此一种安排并不是前工业时代中商人统治的一个实例，而是利润形式，紧随在最大生产能力和相对有效率之后那个时期中的利润形式。[\[210\]](#)

我们现在必须转而讨论这个问题的另外一半：使生产效率提高的劳力供应。实际上，蔗糖和奴隶制“情同手足”是不言而喻之事。[\[211\]](#)然而，事实是：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甘蔗和烟草的最初尝试几乎总是使用契约劳工而不是奴隶。只是到了17世纪之末，奴隶才成为这些岛屿上独特的劳动力，也只是在18世纪初期，对于北美洲南部大陆殖民地而言，这才可以说有如此之事。[\[212\]](#)这两种身份之间的法律差别程度是一场学者的唇枪舌剑之争，有的学者如戴维斯（Ralph Davis）等人强调说契约劳役是临时性的奴隶制，[\[213\]](#)有些学者如K.G.戴维斯（Davis）等则提醒我们说契约劳役只是短暂的奴隶制。[\[214\]](#)真实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们各自的长期性成本利弊是什么呢？这可以容易地从早期加勒比海企业家宁愿使用契约劳工而不愿使用奴隶的原因中看出来。第一个和也许是决定性的原因是资本支出要少很多。那时，一名契约仆人的预付款用以旅费是5至10镑，而一名非洲奴隶却要花费去20至25镑。[\[215\]](#)即使奴隶随后的衣食费用更少，即使契约劳工的还债期限仅仅只有三四年，还是存在一个创始资本清偿的问题。

当然，非得有现成的供应才行。谁在实际上会作为一名契约劳工前往西班牙属美洲呢？一般而言，这些人相当年轻，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工资劳动者或较贫穷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不是被逼落魄到如此地步的，吸引他们前往严酷的陌生之地和承受明知的艰难工作的，是在完成服役后获得一块土地并由此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有时候，据说他们比非洲奴隶有更多的技艺；但是，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经历，这种说法令人可疑。的确，人们可以为了反对某事而夸大其词。训练一名有效率

的工作者常常需要数年时间，而在契约劳工刚刚“取得某种技艺”^[216]之时，他们就要离开他们的雇主。在另外一个方面，非洲奴隶在受完训练后仍会留下来。当我们说寻求“更固定和更可靠的劳动力”是解释巴巴多斯决定使用奴隶劳力的原因时，这不就是争论之处吗？^[217]

是什么改变了更喜爱使用契约劳工的诸因素平衡？首先，这种安排所依托的“未占用的肥沃土地”已经耗尽，^[218]因为有归因于土壤耗竭的土地退化和不断增大的土地集中。因此，蔗糖种植庄园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要早于烟草种植庄园和北美大陆南部。^[219]如果一位契约劳工无法指望获得他的酬报，他为什么要在种植庄园里遭受苦役之罪呢？在劳力供应下降而需求却同时上升之日，肯定就是采用奴隶制之时。甚至就在它并不是“经营蔗糖种植庄园的最廉价和最有效率的方式之时……由于白人奴仆不再被吸引而来，它也就成了唯一的可行之路。”^[220]使用奴隶作为替代经常是与繁荣时期相联系，这绝非偶然之事。^[221]其原因是：以奴隶取代欧洲契约劳工作为劳动力，相对而言，是简便易行的。但是，奴隶为什么是非洲人？为什么不把印第安人用作奴隶？为什么印第安人（和欧印混血儿）的债务苦役制未在扩延的加勒比海地区应用，就像在西班牙属美洲那样盛行呢？

事实上，印第安人在开始之时被用作奴隶，但是，据广泛的报告说，他们“被俘虏后很快就死去”，^[222]表明“无法适应蔗糖厂的生活条件。”^[223]在智利的矿场中，印第安人起初也被用作奴隶，^[224]但在1589年后就由非洲奴隶取代了他们，梅拉法（Mellafe）说这就是“使智利的西班牙人殖民地幸存下来的基本因素之一。”^[225]在未使用印第安人劳力而使用非洲奴隶的地区印第安人大多曾是狩猎者和采集者（如在小安的列斯）或者其农业尚未发展出明确的阶级结构（如在大安的列斯）。正是这些人们“不适应”有纪律的劳动和“死去”。^[226]然而，在生产力的再分配方式存在的地区，印第安人人口就出现阶级分化，下层阶级已在生产出按等级制占有的剩余产品。因此，这些人可以相对成功地被强迫继续

进行这一过程，但是采取代表欧洲剥削者的修改形式，特别是他们先前的统治者如果予以合作的话——因而有了印第安劳役制、米达制和债务苦役的最终演化，尤其是在新西班牙、危地马拉以及秘鲁。^[227]

如果非洲奴隶只是在印第安人无法被强逼充当这样或那样形式的强迫劳工之地取代印第安人，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奴隶制只是一种权宜之策；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使用强迫的经济作物劳工所费较少——无论是在农业、采矿或是工业之中——少于使用奴隶的花费。^[228]那些只是为他们的部分劳作收取“工资”的劳工，如强迫的经济作物劳工，其花费是怎样少于那些只得取实物报酬且又并非慷慨报酬的劳工呢？如果这只是雇主一方初始支出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延时的分期付款；但是，也正是强迫的经济作物劳工在雇主控制之外的土地上以食品作物的形式生产出他们的部分“工资”，却没有算在雇主的劳工成本之内。如果使用奴隶，其经常性劳工成本的总量就要高于使用强迫的经济作物劳工。^[229]

因此，正是在扩延的加勒比海地区，这个于1600年至1750年期间的新边缘地区，无产阶级劳工被组织起来的基本形式是奴隶制而非工资劳动者、承租者或强迫的经济作物劳工。^[230]在那个时代的特定政治条件下，奴隶制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生产者来说是最适宜的，这些资产阶级生产者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塑造了这个地区中的基本生产关系。

^[1] 参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69~271）。

^[2] 在维赞斯基（Wyczański）（1967年版）的书中，有关于波兰的这种一系列情况的良好描述。古尔德（Gould）就其前半部分指出：“农民对价格下跌的反应不是削减生产，而是扩大生产，旨在努力维持总收入在通常可接受的水平上，此种反应有许多历史后果。”（1962，332）。

^[3] 参见维赞斯基（Wyczański）（1967，68~69）。

^[4] 参见帕赫（Pach）（1970b，254）。

^[5] 参见齐曼尼（Zimányi）（1973，327）。

[6] 参见马特耶克 (Matejek) (1968, 210)。

[7] 参见托波尔斯基 (Topolski) (1971, 62)。见表格31, 库拉 (Kula) 关于人口中不同阶层的贸易的说明。库拉对托波尔斯基的评论可见于他的著作中 (1970, 164~165, 注释(164))。甚至库拉也接受1650年至1700年这一细分时期的普遍假设。

[8] 参见博古卡 (Bogucka) (1972, 1)。

[9] 参见马查克和博古卡 (Maczak and Bogucka), 引自帕赫之书 (Pach) (1970b, 258), 另外参见马查克 (1970, 139, 表格16)。

[10] 参见马查克 (Maczak) (1975, 3)。

[11] 参见博古卡 (Bogucka) (1972, 4)。地方货币兑换者也反对此种措施, 因为他们也分享了国际投机者的利润。(第5页)。

[12] 参见博古卡 (Bogucka) (1972, 13)。

[13] 参见祖特科维茨 (Zytkowicz) (1971, 71)。他认为在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波希米亚普遍存在“乡村耕作产量低的情况”, 但是在1655年至1750年期间, 并不是特别低于1500年至1655年时期。巴特 (Slicher van Bath) 认为17世纪东欧有“停滞或者甚至是一次衰落”(见Slicher van Bath, 1969, 175~176)。他表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俄国, 一共在1600年至1649年期间和1650年至1699年期间下降了4.3%至3.9%。马查克 (Maczak) 对祖特科维茨 (Zytkowicz) 关于16世纪的低数字表示怀疑 (马查克, 1976b, 23), 他还认为确有一次下降“已是可见于17世纪前半期”(参见Maczak, 1968, 77)。维赞斯基 (Wyczański) (1960, 589) 表明在一个领域中 [科尔茨赞 (Korczyn)] 有下降, 从1569年的4.8%降至1615年的4.1%, 1660年的4.4%, 1765年的3.2%。托波尔斯基 (Topolski) (1974a, 131) 谈到了一次全面衰落, 从16世纪末的大约5%降至18世纪末的大约3%~4%。施茨捷尔斯基 (Szczygielski) (1967, 86~87) 的用语最为强烈, 他说波兰的产量在15和16世纪时的欧洲位居最高之巅, 却在17和18世纪处于最低之列。

[14] 参见帕赫 (Pach) (1970b, 262)。

[15] 参见马查克 (Maczak) (1968, 77), 他说: “农场的萎缩引起市场盈余的紧缩几乎是无可置疑之事”(第78页)。

[16] 参见施茨捷尔斯基 (Szczygielski) (1967, 94), 他说对于林地的结果亦是如此: “不顾后果的开发在17世纪时产生了林地的荒漠”(第97页)。

[17] 参见莱斯诺达尔斯基 (Lesnodarski) (1963, 24)。

[18] 参见艾贝尔 (Abel) (1973, 251, 表45)。另外参见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77, 87), 他说出口额最高时是1617年。

[19] 参见詹宁 (Jeannin) (1964, 320, 322)。贸易过程的另一端证实了此事。斯穆特 (Smout) 和芬顿 (Fenton) 在考察苏格兰进口的波罗的海小麦时发现在17世纪中叶时, 有一个“明确无误的”中断——即这种进口的急剧衰落——他们对此的解释是: “英国和爱尔兰的供应者部分取代了波罗的海的供应者。”事实上, 他们还说在1675年至1685年之间, 苏格兰谷物“甚至被输往波罗的海地区。”斯穆特和芬顿 (Smout & Fenton) (1965, 76)。

[20] 参见马卡凯 (Makkai) (1971, 483)。再参见普利克勒 (Prickler) (1971, 143~144)。维泽 (Wiese) (1974, 454) 也用该词描述“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的欧洲大体上的畜类贸易。

[21] 参见马查克 (Maczak) (1972, 679)。他提到了“牲畜的灾难性下降, 包括挽畜 (大多是牛和马)”, 从1549年每100公顷农民土地有大约77头牲畜降到1630年的53头, 以及此后持续的下降趋势。(1976b, 23)。

[22] 艾贝尔 (Abel) 谈到了17世纪丹麦畜类出口的“减弱” (Abel, 1973, 249)。再参见格拉曼 (Glamann) (1977, 236~237)。

[23] 参见帕赫 (Pach) (1968, 316)。维泽 (Wiese) 的观察有所证实了帕赫之言。维泽发现在德国的1640年至1820年间, 肉类价格总是不如黑麦价格那么有利 [参见维泽 (Wiese), 1966, 105]。匈牙利和波兰的牲畜送往德国南部诸城市, 丹麦的牲畜大多却送往荷兰。[参见格拉曼 (Glamann), 1977, 216, 233]。

[24] 参见帕赫 (Pach) (1970b, 257)。

[25] 参见费伯 (Faber) (1966, 131)。托波尔斯基 (Topolski) (1974c, 435) 解释说: 生产力的衰落以及因此而来的“准相对”有利条件 (quasi-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衰落, 导致了17世纪波兰谷物出口的衰落。我们认为是相反的关系——其他地方小麦生产的增长间接地引起了波兰生产力的衰落。

[26] 参见齐曼尼 (Zimányi) (1973, 330)。

[27] 参见克伦本茨 (Kellenbenz) (1974, 262) 和弗拉索维茨 (Vlachovic) (1971, 626)。还有日本铜和智利铜的竞争。参见帕赫 (Pach) (1970b, 257)。

[28] 关于瑞典之入侵波兰的影响, 参见巴拉洛夫斯基等人的著作 (Baranowski et al) (1966, 79) 和基耶茨托罗瓦 (Gieysztorowa) (1958) 关于匈牙利, 参见马凯 (Makkà) (1971, 493~494) 和瓦尔康尼耶 (Várkonyi) (1970, 272); 关于丹麦, 参见约尔根森 (Jorgenson) (1963, 309)。

[29] 参见齐曼尼 (Zimányi) (1973, 309)。

[30] 参见祖特科维茨 (Zytkowicz) (1968, 118), 他以此作为他的比较研究的暂时结

果。他比较了17世纪马索维亚（Masovia）的领地和农民农庄的生产率。“总之，这种（庄园）制度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生产了更多的食物，而是因为它使地主阶级能够增加收入。”然而，柯日利（Kirilly）（1965，621）研究了匈牙利的谷物生产，注意到在18世纪前半期有一次“转变”：“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庄园小麦此后的特色就是更高的产量比率。”

[31] 参见托波尔斯基（Topolski）（1967，114），他说在17世纪中期的战争破坏之后，保留地上的生产最终能够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农民的小块土地仅只能恢复到原有生产的60%至65%。他说在格涅兹诺（Gniezno）这一个地区中，保留地的土地总面积相当于16世纪初之时农民土地面积的13%，该世纪中期时的16%，之末时的20%，至18世纪的25%（1970，90）。鲁辛斯基（Rusiński）（1972，112~113）谈到了“农民单位的平均面积的减小”，尤其是在中部和南部地区，这一减小过程始于16世纪，又在17世纪时加剧，并导致了贫穷化。鲁特科斯基（Rutkowski）（1927b，119~120）认为17世纪中期由于战争的缘故是一个转折点：“大农户（Laboueurs）的农场为小农户所取代而消失了……或者说取而代之的是由小屋农（closiers）由贫农（chatupnicy）以及散工/租户所耕种的小块土地。”他提到了“农村人口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和“农业生产的绝对集中。”尽管后来的波兰历史学家辩驳了鲁辛斯基关于“战争缘故”的因果解释，但他们并未辩驳此种观察。参见基耶罗夫斯基在其书中引用的各种研究（Gierowski）（1965，244）。

[32] 参见施皮茨（Śpiesz）（1969，43~44），他将捷克的此种情况确定在1620年，但是又说在摩拉维亚，地主土地与农民土地的比率大致维持未变。洛姆（Lom）（1971，9~10）注意到了1650年至1750年波希米亚“土地集中”的增大和庄园比率的上升。梅依德里兹卡（Mejdricka）（1971，394）说：“使用强迫劳工的大领地的巨大扩张，见于17世纪下半期。”

[33] 尽管东斯多夫斯（Dunsdorfs）（1950，115）将此看作是18和19世纪特别确实之事，“人们还是可以表明17世纪时庄园保留地规模的增大”。

[34] 参见马查克（Maczak）（1972，673）。德沃尔查什克（Dworzaczek）（1977，159）报告说在此同一时期权贵巨头们逐渐扩大了小贵族们的领地；而在16世纪，鲁辛斯基（Rusiński）提到了“土地集中于更富裕的农民之手的趋势，他们从贫穷邻人手中购买土地。”（参见鲁辛斯基，1972，104）。再参见马洛维斯特（Malowist）（1972，203~204）关于富裕农民的作用的论述。

[35] 参见帕赫（Pach）（1976b，261）。在波兰的几个地区中，永久租佃地（emphyteusis）得以幸存下来。祖特科维茨（Zytkowicz）（1974，251）解说了这样一个地区靠近老普鲁士的埃尔布拉格镇（Elblag），认为这种例外之事是可能的，因为“有极贴近发达的市场，剩余产品可以比较容易地处置，以及通往市场的廉价运输。”

[36] 参见库拉（Kula）（1961，138）和祖特科维茨（Zytkowicz）（1968，109）。

[37] 参见库拉（Kula）（1970，91）。

[38] 库拉解释了他确定出这些数字的方法，也承认“这些结果无疑是夸大了的。”（1970，94）。

[39] 但是，相反之事当然也是确实的。歉收之时，价格高昂，大量需求强迫劳工。马查克（Maczak）说：“我怀疑至少在某些地产中地主惯于在歉年中压迫其佃户会更厉害，即使他们也会挽救即将困死者。……（根据对1550年至1695年一块地产的研究）此种情况出现歉年价格高涨之时，公爵领地管家从其佃户榨取相对更多的谷物”（马查克，1975，16）。就不会有曲线的关系吗？价格高昂之时，需要更多的强迫劳工，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力；而且农民不会被工资打动，因为他们更喜欢为高价市场生产自己的货物。价格相对低落之时，也需要更多的强迫劳工，因为需要更多的非工资劳力。价格取中时，也有对强迫劳工的最低需求。这些关于需求强迫劳工的多种理由，会解释为什么它作为一种技巧经过周期性的高涨和低落而延续下来。

[40] 库拉（1970，35）说：“投资于（物质和劳力）的决策不是来自市场条件的改善……而是恰好相反，来自其恶化，这一事实并无荒谬之处。”他还说这是非资本主义行为；但是，在20世纪，在停滞时期，多国公司有时就不会遵循同样的策略吗？

[41] 甚至在贵族们未被逼迫向权贵巨头们直接出售之时，普遍的缺乏现金“使权贵巨头们转向地主阶级的银行家，给予他们额外的优势，这是一位银行家对他的顾客们经常享有的优势。”马查克（Maczak）（1968，88）。

[42] 参见博古卡（Bogucka）（1975，147），他提到了囤积珠宝、豪华餐具、贵金属和成色纯的硬币；但是其用心动机无异于保有土地，此即防范剧烈的通货膨胀，此两者都证明了她的结论：“这种囤积……无疑对国家经济有不良后果，因为它使大量资本冻结多年。”（第148页）

[43] 参见帕赫（Pach）（1962，234）。

[44] 因为农民被认为不会对世界市场做出反应，库拉（Kual）（1970，27）争辩说：“资本主义的会计方式不适用于这种‘企业’。”与之相似，阿基利斯（Achilles）（1959，51~52）怀疑农业生产对16和17世纪的价格会有反应。此两者都未区分身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大地主和农民/半无产阶级。

[45] 参见施皮茨（Śpiesz）（1969，61）。梅依德里卡（Mejdricka）（1971，401）有相同看法，即：波希米亚在其市场的地理范围方面有别于波兰和北德意志：“在捷克，农产品和原料的市场紧系于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系于与邻国的交易。”

[46] 克拉科夫（Cracow）作为一个地区性市场要比作为一个横贯大陆的市场“证明是更为长期可靠的。”参见马利克奇（Malecki）（1970，119，以及1971，151）。“在17世纪后半期……波兹南贸易有新的生机，然而只是完全作为一个地区性市场。”[参见格里兹（Grycz），1967，55；再参见1971，119]。

[47] 马查克（Maczak）提醒我们注意“波兰尽管贫穷，还是向她的居民们提供了重要的好

处。与其他早期现代国家比较，波兰没有普遍的饥荒。”（1972，678）。马卡凯（Makkai）（1974，207）说：“东欧农民的营养佳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工资工人，但是劣于已获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正在兴起的西欧国家中的工人。”关于后一类国家，他确定为英国和荷兰联合省。至于法国，由于他仅只引用了罗伊（Le Roy），他之所言对法国南部可能是对的，但是法国北部可能不属“正在兴起的西欧国家”之列。在此书的术语中，他的观点是认为半边缘地区中农村工人的生活劣于边缘地区，大概是因为边缘地区农村工人对维持生活的小块土地保有更大的控制。

[48] 参见马查克（Maczak）（1972，677）和鲁特科夫斯基（Rutkowski）（1927b，122）。赞塔拉（Zientara）（1971，284）报告说农民强迫劳工在17世纪被引入大规模铁矿开采。鲁特科夫斯基（Rutkowski）（1927a，89）说：18世纪的税款不如16世纪时那么高。另一方面，他可能弄错了度量衡。库拉（Kula）（1962，279）指出：增加农民税赋的办法之一是加大农民交纳税赋的小麦的度量衡。16世纪时在克拉科夫每一蒲式耳是26.26公升，而在18世纪则是43.7公升；在华沙16世纪是52.5公升，而在19世纪是64公升。波兰贵族证明他们自己是操纵资本主义机制的老手。他们认识到重新确定度量衡有利于作为收租者而不是出售者的自己。所以，他们又安排了“批发量衡拉斯特（Laszt），专门用于出口，然而用于征收税赋的零售量衡——蒲式耳——却在不断增大。日后之事不过就拉斯特比蒲式耳越来越小而已。”应当指出此种行径也是在一个价格下跌的市场上维持利润水平的一种方法。

[49] 参见吕特格（Lütge）（1963，123~127）。

[50] 参见马卡凯（Makkai）（1963，41），他说在小麦生产中大多确实如此，“因为畜牧业和种葡萄酿酒业中的强迫劳工出于技术性原因无法充当在小麦生产中那样的角色。”然而，17世纪时匈牙利谷物生产增加了，可能是因为它适宜于强迫劳工。参见柯日利和基斯（Kirilly and Kiss）（1968，1235）。

[51] 马洛维斯特（Malowist）（1974，344）断言在波希米亚强化了强迫劳役，“主要发生在哈布斯堡王朝于1621年赢得白山之战胜利和波希米亚在‘三十年战争’中受劫之后。”再参见克里马（Klima）（1957，87），卡尔克（Kavke）（1964，58）和赖特（Wright）（1966，14）。

[52] 参见斯特凡尼斯库等人（Stefanescu, et, al）（1962，56）。他们确定强取硬逼之增加是在17世纪后期。

[53] 参见尼尔森（Nielsen）（1933，153）和汤尼森（Tonneson）（1971，I，304；II，719~720）。汤尼森坚持认为“把丹麦看作是东方类型的一个例子”是恰当的。关于挪威有一个问题，然后是丹麦。大多数挪威农民在17世纪后期时获得自由。参见约翰逊（Johnsen）（1939，392~393）。汤尼森（1971，I，311）以此事实解释说：“在一个贵族软弱的国家中，重要之事（对丹麦君主而言）是要保持人口中农民大众的效忠，用以保卫国家防范邻国瑞典。”但是，如果就是如此，那么同样的逻辑也应当在波兰的乌克兰地区盛行起来。波兰人应当会去保持乌克兰农民的效忠用以防范俄罗斯的奉承讨好；如我们所知，这完全不是他们的态度。很可能正是

在挪威缺乏出口农作物和对他们的早期尊重，解释了挪威人和乌克兰人的不同态度。

[54] 参见鲁辛斯基（Rusiński）（1960，40~41）。

[55] 参见鲁辛斯基（1960，420）。

[56] 参见鲁辛斯基（1972，112）。

[57] 鲁特科夫斯基（Rutkowski）（1926，473）说，在17世纪中期，工资劳工开始和强迫劳工一起，要比先前在庄园保留地上发挥出一种重要的作用。库拉（Kula）（1970，152）表示赞同：在1650年后，“农民人口的流动在战争的强化之下，增加了工资劳工的供应。”

[58] 参见鲁特科夫斯基（Rutkowski）（1926，503）。

[59] 参见鲁特科夫斯基（1926，486）他说：“此时的公共权力无力引进绝对的和无频繁例外‘附属土地农奴（adscriptus glebae）’”（第485页）。库拉（Kula）也谈到了“农民的广泛逃亡和贵族对此现象无能为力。”（库拉，1961，145）。

[60] 参见马洛维斯特（Malowist）（1972，215）。

[61] “封闭的货物和货币的流通确保了垄断地主的丰厚利润。为了供应自己和他的农民，地主在自己的地产上建立了手工匠的作坊。”[马查克（Maczak）1972，672]。罗斯特沃罗夫斯基（Rostworowski）（1968，307）指出大地产实际上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王侯国家：“一个权贵巨头拥有自己的运输工具和代理商，将一大片农业地区的进出口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此地区之内没有自由主义，却有一个强制和垄断的体系……这些就是导致在大地产上建立制造业的条件。”莫伦达（Molenda）（1976，169）报告说：铅矿的控制权在17世纪中从克拉科夫的商人手中转移到权贵巨头手中，他们由于有税赋特权能够以更低成本融化铅。它由于更容易得到强迫劳工也能如此吗？

[62] 关于波兰，参见施茨捷尔斯基（Szczygielski）（1967，97）和库拉（Kula）（1970，102~103）。关于匈牙利参见帕赫（Pach）（1962，262~263）和马卡凯（Makkai）（1963，41）。

[63] 参见祖特科维茨（Zytkowicz）（1972，149），以及巴特（Slicher van Bath）（1977，116）。拉斯科维茨（Leskiewicz）（1960，414，表3）表明在波兰皇家领地上，来自酒类收入的比例从1661年的0.4%增至1764年的37.5%，而来自农产品的收入比例从59.6%降至38.2%。

[64] 罗斯特沃罗夫斯基（Rostworowski）（1968，291）在写到18世纪中期形势时说：“波兰的权贵巨头被认为是欧洲最富有的个人，仅次于英国贵族。”这部分是因为萨克森—波兰联合王国宫廷中有现成的领薪闲职，而在17世纪这是不太可能的。他们从衣裳褴褛变成腰缠万贯也是不可能的。

[65] 马洛维斯特（Malowist）（1976，15）谈到了住在领主贵族和教会贵族的宫廷中的年

轻贵族，他们在17世纪前半期时是“贵族的各种财产的管理者，特别是在大领主募集的私人军队中充任军官。”马查克（Maczak）认为特雷弗—罗珀（Trevor-Poper）“关于皇家宫廷铺张豪奢的评论也可用于波兰权贵巨头的宫廷。”（1975，33，注释(16)）。这无疑解释了鲁特科夫斯基（Rutkowski）的如下观察：17和18世纪中住在王国各最重要的城镇中的贵族人数“大为增加”。（1927b，153）。

[66] 参见马卡凯（Makkai）（1974，198）。马查克（Maczak）（1975，10）也同样说道：这并不代表是“中世纪方式的延续……上层地主阶级的新老成员……现在需要比以往更多的贵族侍臣。”科瓦茨基（Kowecki）（1972，6）指出了与法国贵族相比较，波兰和匈牙利的（以及西班牙的）贵族规模庞大。他列出了以下数字：波兰，8%至10%（波兰种族的16%）；匈牙利，5%（多于中产阶级）；法国，0.7%（如果包括教士则为1%）。

[67] 参见瓦尔康尼耶（Várkonyi）（1970，279）。

[68] 瓦尔康尼耶（Várkonyi）（1970，281）引用了泽林尼耶（Zrinyi）的话：“没有军队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军饷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就没有军饷。”（*Neque quies gentium sine armis, neque arma sine stipendis, neque sei pendia sine tribueis haberi queunt*）（1970，271）。

[69] 实际上，自从南德意志的资本家们被逐走之后，荷兰人和其他人对此贸易叫价竞争有整整一个世纪。瓦尔康尼耶（Várkonyi）（1970，275）描述了17世纪时早期的西欧“旅游者”四处旅行勘察地形，称他们的作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侦察员”。

[70] 参见瓦尔康尼耶（Várkonyi）（1970，299）。这种外来入侵，即我们今日所称的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现象。马查克（Maczak）（1976b，12）描绘了波兰的相类似现象。波兰出口贸易的中心当然是在格但斯克，它享有相当大的自治地位；而且相对于国王来说，“格但斯克的合作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权贵巨头的的作用。”瓦迪斯瓦夫四世（Władysław IV）在“瑞典战争”（1626年至1629年）之后的“热情欢呼声”中掌握权力 [塔兹比尔（Tazbir），1968a，235]，他寻求强化皇家权威。马查克（Maczak）描述说：“正在瑞典人和波兰人在斯图姆斯多夫（Stuhmsdorf）签订了1635年的条约之后，波兰国王就试图获取一部分格但斯克的海关税收并有所成功。丹麦武夫们阻止这位国王继续表现为强大者，格但斯克城的海关主权仍然未受触动。”（马查克，1976b，14）。

[71] 鲁特科夫斯基（Rutkowski）（1926，498~499）描述了上层贵族（即封建领主或权贵巨头）、中层贵族和下层贵族彼此之间的差异。后者没有农奴，他们耕种自有土地，实际上是农民，其收入相当于富裕农民。下层贵族中甚至有一个分支，称作免役租（quit-rent）贵族，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向领主租佃土地。

[72] “权贵巨头和绅士之间陈旧的差异，总是潜在的，却在农业繁荣和社会平等的岁月里被遗忘了，而在17世纪中又重新复活，大地产在立陶宛和乌克兰兴起，不仅超出了这些大地产主的地位，而且包纳了一大批小地主，小地主们乐意为权贵巨头们效劳，并且帮助他们摧毁以平等为基础的旧结构。” [博斯韦尔（Boswell），1967，159]。换言之，贵族的膨胀联系到前述

的追随者现象，成倍地增加了依附于权贵巨头的下层贵族，由此威胁了向权贵巨头要求平等的中层贵族和老下层贵族。

据称匈牙利也有相似情况。在1711年的索特马尔（Peace of Szatmár）和约之时，大约有二、三百名权贵巨头和25000名绅士，每个人都属于议会中的一个家族。“这是权贵巨头们的全盛时期。以往还不曾有过一个匈牙利寡头统治享有如此的机遇，与其说是（在重新分配结束后）获取财富，不如说是保有财富。……（权贵巨头们的大地产中）很大一部分处在从土耳其手中夺回的地区，也是没有奴役负担的地区。这些土地的拥有者可以将它们当作‘基督的’土地，豁免去对一切国家的任何义务。他们的生产成本因而极低，低到足以使他们赚取到的资本投资有时可以带来10倍的回报。”[麦卡特尼（Macartney），1967，129]。

[73] 参见塔兹比尔（Tazbir）（1968b，259）。

[74] 参见塔兹比尔（1968b，264）。关于立陶宛和卢坦尼亚（Ruthenia）的权贵巨头们使自己的语言和宗教“波兰化”的必要性，参见克斯顿（Kersten）（1977，125~126）。

[75] 17世纪中，德波勒茨基神父（Fr.Wojciech Debolecki）宣称：“波兰人是亚当和夏娃的直系后裔，因而，他认为他们是最古老的民族，命中注定要统治世界。”[塔兹比尔（tazbir），1966，20]。

[76] 参见塔兹比尔（Tazbir）（1968b，265）。

[77] 参见安德森（P.Anderson）（1974a，292）。

[78] 参见罗斯特沃罗夫斯基（Rostworowski）（1968，302）。华沙在1658年为瑞典征服，经受了物质和文化的破坏，此后，作为一个“萨尔马提亚（Sarmatia）”城市重建并且“东方化”了——它的中产阶级被毁灭了。[参见托姆凯维茨（Tomkiewicz），1967]。罗斯特沃罗夫斯基对华沙是非常刻薄的：“这个都城的腐朽堕落尤其对文化生活是有害的。萨克森时代的华沙不仅没有完成作为文化艺术赞助人的作用，而且从未是一个社会生活的中心……波兰变成了一个大省，文化生活懒懒散散地流于狭隘的地方圈子中。”1733年，奥古斯都三世（August III）将萨克森和波兰联合王国的宫廷迁往德累斯顿，什么都未留下。“直至那时，尽管君主的权力有种种限制，君主仍是国家政治结构的拱顶石，皇家宫廷仍是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奥古斯都二世雄心勃勃的计划瓦解之后，波兰—萨克森联合王国就剥夺了波兰的这种要素。”罗斯特沃罗夫斯基（Rostworowski，1968，275）。

[79] “（17世纪波兰的）货币问题的重要后果之一是……各种集团之间阶级仇恨和对抗的反复发作，演变成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一种无情斗争。”[博古卡（Bogucka），1975，152]。再参见巴特（1977，122）所言：“这是整个中欧和东欧频繁发生农民战争和叛乱的时期。”

[80] 参见塔兹比尔（Tazbir）（1966，14~15，20）所言：“17世纪中，民族（nation）的概念——作为一个种族单位——在此背景下的延伸是由于以萨尔马提亚（Sarmatia）神话为基础的贵族民族的极端主观概念所造成的。……反对宗教改革的胜利在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里西亚）

所采取的形式，不仅有几乎只许使用拉丁语，而且实行为教会所青睐的德国化。……

Sarmataia（萨尔马提亚）民族概念的胜利有利于波兰各地方富有特色的诸种地区主义复苏。17世纪中，马索维亚（Masovia）再次发现了它的独特性。”

然而，罗斯特沃罗夫斯基（Rostworowski）（1968，297）却争辩说：“尽管它的中央政府局部麻痹，甚至于萎缩，地方独特性并未被发展进入国家联邦。农民大众和市民之中一种深远的区别依然盛行于这个多民族国家，但是，‘绅士国家’却在它的表面上变得越来越相似。使卢坦尼亚贵族波兰化的过程完成（于1697年，卢坦尼亚在司法纪录上被废除）。波兰的、立陶宛的和卢坦尼亚（Luthenia）绅士们由于密切的家庭关系而交接在一起，汇合成一个兄弟贵族大家庭。”然而，问题却在于权贵巨头鼓励波兰民族感及反对地方独特性所达到的程度。

[81] 16世纪扩张时期中整体迁入东欧的犹太人，却轻而易举地变成了17世纪衰退时期中的替罪羔羊，证实了他们延绵不断的功过是非。魏因里布（Weinryb）认为：“这些犹太人中有一大批定居在（波兰的）乌克兰……时在16和17世纪……其中很多人发挥的经济作用是充任旅店乃至村庄或整个城镇的租借人，以及充任贵族或王室领地的征税人。租赁频繁行使一些权力，包括对人口的各种部分使用司法审判。这些活动和权力使犹太人扮演了波兰地主角色，以致他们在对‘卑贱的’乌克兰人[汉诺威（Hanover）的编年史家如此称呼他们]的关系中经常成为事实上的领主。这样，犹太人与波兰贵族联系在一起了。”（1973，185）。魏因里布（Weinryb）还列举了在与瑞典的诸次战争中失败后的推诿罪过、没收财产[尤其是在克拉科夫（Cracow）（1973，190~191）]。安德森（Anderson）注意到在波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种族分层状态，是由作为地主的波兰（或同化了的立陶宛）贵族和非波兰人的农奴构成的。这些农奴在宗教上信奉东正教，使用白俄罗斯语或卢坦尼亚（Ruthenia）语。而且，如我们刚从魏因里布（Weinryb）处所见的，犹太人充作贵族和农奴两者之间的中间人。安德森提醒我们说：这是一种“殖民地”状态；（1974a，285），而且还应当加上：在困难时期中，殖民状态易于导致各种族集团之间的冲突。

[82] 塔兹比尔（Tazbir）谈到了劳役天数增加后农民的反应。“农民以大规模逃亡作为回答，拒绝工作，在国家的某些地区甚至以武装抵抗作为回答。除了1651年的农民叛乱外，还应当提到在皇家地产中的诸多起义，如在克拉科夫的西南部（1669年至1672年），在波德黑尔（Podhale），在库尔皮耶（Kurpie）地区（位于普鲁士公国边境），以及在波德拉塞（Podlasie）的苏拉兹（Suraz）地产上。”（1968b，258~259）。此外，在乌克兰还有连续不断的“哥萨克人问题”。参见塔兹比尔（Tazbir）（1968a，237~241）。在匈牙利，有一个反对外部力量的“民族主义”斗争，匈牙利的绅士—资产阶推动绝望中的农民投入战斗。从1704年至1706年，拉科历（Rákoczi）在反对贵族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以解放和武装农奴来获取力量。[瓦尔康尼耶（Várkonyi）1970，292]。可以充分想象出农民不会太快地放下手中的武器。

[83] 参见布罗代尔（Braudel）（1956，196）。

[84] 关于巴伦西亚（Valencia）参见卡斯蒂略（Castillo）（1969，251~252）；关于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卡斯提尔（Castile），参见庞索特（Ponsot）（1969，105）。威特曼

(Wittman) (1965) 将西班牙的农业衰落比作匈牙利的农业衰落。

[85] 参见艾马德 (Aymard) (1971b, 440)。

[86] 参见坎斯拉 (Cancilo) (1969, 25)。

[87] 参见达席尔瓦 (Da Silva) (1764b, 244)。

[88] 参见达席尔瓦 (1964b, 248)。

[89] 参见达席尔瓦 (1964b, 250)。

[90] 参见卡斯提罗 (Castillo) (1969, 242, 247, 273)。人口下降也反映出抑制性变动, 结束了来自法国南部的移民潮流。参见纳德达尔和吉拉特 (Nadal and Giralt) (1960, 83~84, 198)。

[91] 参见艾马德 (Aymard) (1968, 222和1971b, 427)。关于那不勒斯, 参见佩特科恩 (Petraccone) (1974, 40~41, 51)。

[92] 参见弗林登 (Verlinden) (1963, 37)。

(Larquie) (1970, 55) 报告说在17世纪后半期的西班牙南部的奴隶制有相似的衰落, 以及奴隶制到18世纪时的消失。他解释说: “这是经济虚弱局面的结果。最终, 商业潮流变得紊乱不堪, 还有西班牙的经济困难影响了消费社会; 逐步逐步地, 他们减少了对奢侈的渴望。”尽管他提到奴隶是一种奢侈物品, 他注意到他们之中许多人是“王室奴隶”, 用于港口维护、阿尔马登 (Almadén) 的矿场和大帆船上 (见第67页)。这很难说是一种奢侈用途。在收缩时期和一个太旧的边缘地区, 奴隶与强迫劳工相比是一种昂贵的劳动形式, 难道不会更是这样吗? (此事随后将在有关加勒比海奴隶制的内容中予以讨论)。

[93] 参见艾马德 (Aymard) (1971a, 11)。

[94] 参见布罗代尔 (Braudel) (1956, 194)。

[95] 参见塞雷尼 (Sereni) (1961, 195)。此时在意大利南部总之没有“再度封建化”。“重新封建化”在此如在东欧那样, 意味着在对地方上地主贵族的关系中 (西班牙) 国家的衰落。参见维拉里 (Villari) (1962, 260, 以及1963和1965); 再参见维范蒂 (Vivanti) (1974, 422)。

[96] 弗林登 (Charles Verlinden) (1971, 347) 的解释是: 不仅在西班牙属美洲, 而且在巴西、法属加拿大和荷属加勒比海都引进了“封建的”土地使用权制度, 因为“缺乏中心大都市的资源”, 它“并不希望承担起初始风险”。他认为形势的变化仅依据白人居住地。因此, 在西班牙属美洲, 尽管“理论上”废除了封建制, “只要这些居住地不足以使国家增加税收去改变公共权威当局的各个方面, 庄园统治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第348页)。

[97] 参见摩洛 (Mauro) (1974, 249), 他详细说明了“长期局势对一个封闭经济”如西班牙属美洲“可能具有的唯一影响是使之更加封闭……或更为开放”(第 245页)。由于他所说的“唯一”在事实上就是一切事情, 人们也许会奇怪为什么摩洛会使用这个词。值得注意的倒是他所说的17世纪的另一个特性: 由于食糖生产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大体上偏袒(关于巴西)关于西班牙美洲的‘资本主义的’论点, 我们就公开倾向于‘封建主义的’论点了”(第245页)。他运用这一特性解释18世纪后期的政治差异时说: 人们预计“封建主义的”西班牙属美洲(像法国那样)会比“资本主义的”巴西(它像英国)有更为暴烈的政治动乱。参见第251页。摩洛将此特性应用于租佃制度: “(在巴西)对分成制(sesmaria)并不是一项农民使用权; 它是由封赠制(donatario)对着眼于出口农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做的一个让步……并未企图照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领地或者甚至是17世纪墨西哥种植庄园那样的模式, 去创立一个封闭性的经济。”(1971, 388)。“甚至”这个词在原文中并未加重点号, 却意味着摩洛认为在加洛林王朝领地和西班牙种植庄园之间有某种区别。

[98] 参见谢瓦利埃(Chevalier)(1970, 309, 311, 313)。注意谢瓦利埃提及最大地产时近似抒情散文的说法。于是, 次大的地产是什么呢? 他们怎样取得食物? 还要注意到这个事实: 种植庄园可能在自给自足之时, 也能生产出可供在某地出售的剩余之物。那么, 对如此获得的利润做些什么呢?

[99] 参见弗兰克(Frank)(1979a, 38)。参见皮尔(Piel)(1975, 147~148)对谢瓦利埃和弗兰克之争的简要评论。贝克韦尔分析了墨西哥经济景象中银矿的作用, 实质上是站在弗兰克一边: “17世纪新西班牙的经济在许多方面, 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贝克韦尔(Bakewell), 1971, 225]。

[100] 参见林奇(Lynch)(1969, II, 204)。贝克韦尔(Bakewell)(1971, 117, n.4)批评了有关谢瓦利埃(Chevalier)的类似的时间确定, 他说谢瓦利埃“将银矿的衰落时间提前了20年是太早了, 说成是在17世纪头10年中。”

[101] 参见林奇(Lynch, 1969, II, 184), 他说: “1592年至1622年形成了扩张和收缩之间的一个平稳时期, 肯定是一个很平稳的时期, 有着持续的繁荣迹象, 但同样也有徘徊犹豫的明显迹象, 表现出对先前趋势的逆动。”(第185页)。他称新西班牙是“1620年代至1650年代大西洋经济中的病夫”(第189页)。再参见肖努(Chaunu)(1959, VIII, 书中各处)。肖努认为: “绝对和大西洋—塞维尔(Seville)(形势)一致的”一次衰落可以同时菲律宾找到, 那儿在“1630年至1640年中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点”(1906b, 246, 250)。

[102] 参见麦克劳德(MacLeod)(1973, 208), 他说到了1655年至1670年货币危机达到高峰, 当时, 铸币的成色降低、无力支付和重新估值“损害了出口, 摧毁了内部贸易, 甚至削弱了对统治阶层的安全信任感。”(第286页)。

[103] 参见伯斯(Berthe)(1966, 103)。此说符合谢瓦利埃(Chevalier)的见解: 大约是从1630年至1640年, 墨西哥白银生产中第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了(1970, 4)。

[104] 参见梅拉法 (Mellafe) (1959, 207~208)。

[105] 参见贝克韦尔 (1976, 224) 和戴维斯 (Davis) (1973b, 158)。戴维斯称证据是“充足的”。

[106]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b, 159)。

[107] 参见贝克韦尔 (Bakewell) (1971, 188) 和戴维斯 (Davis) (1973b, 159)。兰 (M.F.Lang) (1968, 632) 也将缺乏水银看作是首要原因。

[108] 参见罗曼诺 (Romano) (1970, 131, 140)。再参见翁诺第 (Onody) (1971, 236, n.2)，他对巴西黄金做出了同样看法，并且引用了巴西财政部的一份19世纪文件，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将当前形势下和帝国之内我国的货币，看作是名副其实的商品种类，是我们的沿岸商业或沿海航行权的一部分。”

[109] 参见弗兰克 (Frank) (1979a, 54)。戴维斯 (Davis) 也赞同说：“总体而言，上涨的成本却是被吸纳了。白银采矿受到限制，因为白银的购买力价值下降……（白银的固定价格加上进口货物价格的上涨）使白银的购买价格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不值得以不变价格或上涨的实际价格去生产白银了。”当然，我们于是可以问为什么白银的价格被阻止上升，罗曼诺 (Romano) (1972, 140) 在此提供了答案：“美洲的矿山削减了它们的生产，原因相当简单，因为欧洲的经济生活处在停滞阶段，并不需求白银，或者至少是削减了对白银的需求。”世界需求的减少（或者说在实际上是世界性生产过剩）和利润率的减少，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生产下降的两种解释都是相同的。

[110] 参见麦克劳德 (McLeod) (1973, 382)。尽管劳力需求少，尽管不要求有最好的土地，17世纪时靛青染料的生产仍然停滞不前（参见第202页）。

[111] 参见洛培兹 (López) (1974) 关于17世纪时巴拉圭茶的价格下跌的讨论，巴拉圭茶是巴拉圭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唯一联系。

[112] 拉瑞兹 (José Larraz) (1943, 79) 的图表显示：1504年至1596年之间的物价指数稳步上涨，增加了3倍；两项主要税赋（货包道税）(alcabala)（百万）(millones) 的指数，起初更为缓慢地上浮，然后在1575年大幅度超过物价指数，在1596年时达到537点。

[113] 参见汉密尔顿 (E.J.Hamilton) (1947, 12)。莫里诺 (Morineau) (1978d, 158) 认为我们应质询威尔逊的 (Charles Willson) “不合时宜的问题”。西班牙的高税率“在16世纪时会是一种令人生疑的优势力量的勒索……并不是它在17世纪时的悲惨和衰败的原因吗？”

[114] 参见林奇 (Lynch) (1969, II, 165)。

[115] 参见伊斯雷尔 (Israel) (1974a, 40)。他说：我们不应当认为高税率水平是西班牙属美洲的“经济表现的标志”，而是应当看作是“西班牙（对其殖民地）施加压力的标志”。西班牙

牙征税的需要从其他方面也影响了经济生产。1630年后墨西哥矿场极为缺少水银，是西班牙王国政府的一项决定所产生的结果。这项决定削减了一半的船运。布雷丁和クロス（Brading and Cross）（1972，574）说，这项皇家决定“之所以被采纳，大概（是因为秘鲁的）总督辖区支付五中抽一税，而墨西哥却只是支付十中抽一税。”

[116] 参见林奇（Lynch）（1969，II，165~167）。

[117] 参见麦克劳德（McLeod）（1973，311），他论及阻止许多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地位身份下降”的“唯一的实际办法”是担任公职。

[118] 参见巴赞（Bazant）（1950，90），他补充说：“总产量中有一部分是供出口。”

[119] 参见弗洛里斯卡洛（Florescano）（1969，150）。再参见贝克韦尔（Bakewell）所言：“在向拉卡特卡斯（Lacatecas）供应谷物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可能是其网络的广大……拉卡特卡斯的白银装上骡车，运往四面八方，用以支付谷物款，南至普埃布拉（Puebla），北至萨尔蒂略（Saltillo）。”（1971，64）。这一关于墨西哥的描述，有林奇（Lynch）（1969，II，217）关于秘鲁的描述与之相称：“种植庄园的产品，食糖、酒和棉花的最大市场是上秘鲁矿场居住地。整个秘鲁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波托西（Potosí）而工作，并从它的财富中谋利。”更多的证据可见于1687年的秘鲁地震。它导致了智利的一次“小麦热潮”，智利的生产者更改了畜和葡萄种植 [罗曼诺（Romano），1969，280；再参见卡马格那尼（Carmagnani），1973，31~42，265~366]。

[120] 参见弗洛里斯卡洛（Florescano）（1969，183）。

[121] “（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中，种植庄园成功地满足了地区性消费需要。然而，一旦达到这一水平并在种植庄园发挥出最大生产能力之前，市场的地区结构、巨大的地理距离、糟糕的道路、高昂的货运成本、王国政府的商业政策都使之不可能超越地区限制出口它的剩余产品。种植庄园于是被迫，如不是削减生产的话，至少也是去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生产水平上。”（弗洛里斯卡洛，1969，184）。

[122] 参见沃尔夫和明茨（Wolf and Mintz）（1957，380）。

[123] 参见贝克韦尔（Bakewell）（1971，235）；再参见莫内尔（Mörner）（1973，191）。林奇（Lynch）（1969，II，139）甚至走得更远，称此为“西班牙属美洲的第一次解放”。他说：“将美洲贸易的巨大萧条归之于殖民地经济的崩溃，是一种诱人的说法。但是，这是变化的后果，而不是崩溃的结果。如果殖民地再也不能如以往那样支撑贸易，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将国内的资本用于公共和私人的投资中。”皮尔（Piel）（1975，151）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反驳那些认为金银流通量很低是以削减横渡大西洋的船运的数字为基础的学者 [参见罗曼诺（Romano），1970]，他说：“如果横渡大洋的货币流通减缓下来，这是矿业生产收缩的象征吗？或者更确切地说金银中有不断增多的部分是留在当地吗？”

[124] 例如，参见库克和博拉（Cook and Borah）（1971）。菲律宾人口有一种相似的，但

不那么严重的减少。参见费伦（Phelan）（1959，154）和肖努（Chaunu）（1960b，74，表1）。

[125] 关于天花病，参见クロス比（Crosby）（1967）。安第斯山脉地区似乎脱逃了16世纪中美洲的死亡率数字，却在17世纪后期未能逃脱。参见多宾斯（Dobyns）（1963，514）。关于智利，参见梅拉法（Mellafe）（1959，226），关于中美洲，参见麦克劳德（McLeod）（1973，204~205）。

[126] 参见伊斯雷尔（Isreal）（1974a，39），他指出：“在1630年代和1640年代的墨西哥，有许多愤怒的抗议。”兰（Lang）认为很明显的是：“王国政府不情愿从万卡维利卡（Huancavelica），向（墨西哥银矿）定期供应水银的首要动机，是想要限制新西班牙和秘鲁之间的贸易。”（1968，639）。

[127] 参见由西莫（Enrique Semo）（1973，222）给*repartimiento*（分配制）一词所下的定义，他承认该词是由20世纪分析家们创造出来的，并非必然就是当时人们的用法：“我们认为‘分配制’（*repartimiento*）是西班牙人的经济企业中一种定量配给的和轮换的工作制度，它的影响所及既有处于这种制度之下在‘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中的印第安人，也有不处于这种制度下的印第安人；它给拥有者阶级带来的好处远大于享有‘委托监护制’的好处。对此必须加上这个事实，即：与‘委托监护制’中的印第安人不同，作为对为王国政府效劳的奖赏和接受者认为如此使用他们的方便之策，‘分配制’更频繁地是批准用于明确界定的经济目的，并且禁止将印第安人用于其他目的。在此新制度之下，由总督最后确定优先重点次序……优先次序将白银生产置于‘委托监护者’（*encomiendos*）的需要之中。”（1973，222）。

[128] 参见伊斯雷尔（Isreal）（1974a，47）。与麦克劳德（McLeod）笔下描述的中美洲情形相比较：“1630年至1690年的这个时期，是附加税大增之时，在此时期中，政府小官吏们经常是克里奥人，强迫印第安人以膨胀价格购买并不需要的物品，或者强迫他们生产物品，不给报酬或只给极少一点报酬。”（1973，384）。

[129] 关于1620年至1664年在控制稀少的劳动力的冲突中，墨西哥统治阶层内的摩擦不和，伊斯雷尔（Isreal）的全篇文章给予了清楚说明。

[130] 参见萨维拉（Zavala）（1966，尤其是79页），戈丁诺（Godinho）（1948），以及谢瓦利埃（Chevalier）所言：“劳役偿债缓慢地——也是不可更改地——渗入越来越多的种植庄园。至17世纪之末或18世纪之初，将苦力（*gananes*）或印第安仆人（*naborios*）看作是地产上的财产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了”（1970，285）。再参见费伦（Phelan）（1959，191）所言：“通过劳役偿债将印第安人束缚于种植园中，要比其他劳工形式有数种好处。黑人奴隶需花大笔资本投资，‘分配制’（*repartimiento*）劳工由于每周轮换和可供使用的印第安人数目减少，因而缺乏工作效率。矿业主们起初将工资和额外奖赏劳工为自己开采一些矿石的办法结合起来，想以此保留住劳工。这在墨西哥称为‘供养制’（*pep-ena*），在秘鲁称为‘加倍制’（*dobla*）。然而，单个的印第安人无法加工自己额外开采出的银矿石，只好低价售给矿业主。在一些情况中，付薪工作变成了实际上的实物付酬工作。总之，矿业主逐渐使用债务方法保留住劳工。”参见罗曼

诺 (Romano) (1970, 132~133) 和贝克韦尔 (Bakewell) (1971, 125~126)。戴维斯 (Davis) (1973b, 167) 分析说：“由于在16世纪末左右，人口达到最低水平，债务奴役制是雇主对自由市场上劳工的力量所做出的反应。”

[131] “获取苦力 (*gananes*) 和雇农的最佳方法是从印第安人城镇夺取土地……。大庄园得以发展及其资源利用缺乏效率的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对重要的辅助资源—土地实行垄断化（不过，这点大多未为人们注意）；此外，缺乏利用资源的效率是从社会角度而言，并非是从私人垄断角度而言”（弗兰克，1979a, 70~71）。再参见麦克劳德 (McLeod) (1973, 221) 关于1580年至1590年时期的论述：“（在中美洲的）西班牙人首次采用了 *tierras baldias*（荒地制）和 *realengas*（国家土地制），它们曾为死去的或‘集合的’印第安人所摒弃。此刻，对印第安人土地的首次猛烈入侵开始了。”

[132] 洛克哈特 (Lockhart) (1969, 419, 425~426) 很有说服力地表明了以下各点：无论法律的分隔是什么，从“委托监护制”到种植庄园的社会学连贯性都是巨大的；“委托监护制 (*encomienda*) 和后来的庄园制 (*hacienda*) 都是如出一辙”；种植庄园夸大了的自给自足，“很难区别于一家商贸企业的多种经营或一体化”；最重要的是，劳工的生活依然如旧：“村民们先是在庄园 (*estancias*)，后是在种植庄园劳作，先是须尽‘委托监护制’义务，然后是遵从‘分配制’，最后是服从单独的安排，但是，还是同样的人们干着同样的事情。”再参见基思

(R.G.Keith) (1971, 411) 和皮尔 (Piel) (1975, 161, 238)。
种植庄园的法律基础是1591年西班牙王国政府的两项特许敕令，其中宣布它对全部没有法律所有权的土地拥有权利。此举逼迫地主们支付一笔费用去取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因为这些土地被宣布为荒地或弃地。参见巴尼特 (E.M.Barnett) (1973, 89, 90)，以及利拉和穆罗 (Lira and Muro) (1976, 143)。至1713年时，王国政府极为渴盼资金，愿意出售荒弃土地，甚至出售给印第安人，只要他们有钱。参见皮尔 (Piel) (1975, 191)。

[133] 参见麦克劳德 (McLeod)，他谈到了“一些下层阶级的成员的状况得到了勉强改善。” (1973, 227)。

[134] 参见谢瓦利埃 (Chevalier) (1970, 107)。

[135] 参见贝克韦尔 (Bakewell) (1971, 75) 然而，他注意到：“谷物市场的调节价格的功效是无从知道的事情” (第66页)。再参见格思里 (Guthrie) (1939, 105) 和谢瓦利埃 (Chevalier) (1970, 62~65)。

[136] 参见麦克劳德 (McLeod) (1973, 153)。当然，是有抵抗的。奥斯本 (Osborn) (1973) 观察到：此时，墨西哥印第安人对土地占用的抵抗能力来自团体组织的力量。

[137] 见莫内尔 (Mörner) (1973, 192)。

[138] 参见贝克韦尔 (Bakewell) (1971, 234)。

[139] 见贝克韦尔 (Bakewell) (1971, 230)。费伦 (Phelan) 基本上也做出了相同的看

法：“关于印第安人劳力的短缺，博拉的论点无可争议，但是，正是这种劳力短缺可能对17世纪的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要多于它对经济停滞的作用。我认为‘萧条’（depression）这个词用于这整个时期是一个引人误入歧途的术语。”（1970，213）。

[140] “如果大规模地产在秘鲁的出现，在年代上巧合于货币经济和非农业企业（开矿、制造业和商业）的衰落，我们将如何解释17世纪中兴起的秘鲁的作坊工场？它的生产量将超过……那个时代的西班牙，甚至于我们将如何解释西班牙—秘鲁的商人资产阶级惊人的兴起？这个阶级创立了利马执政政府的审判法庭，能够以此在1613年迫使西班牙王国政府同意让其分享秘鲁与西班牙之间商业的殖民垄断专卖权。”[皮尔（Piel），1975，150]。关于与塞维利亚（Seville）的经济精英相对立的新西班牙的经济精英及其“不断增长的自由”，请见博耶（Boyer）（1977，457及书中各处）。关于在墨西哥与西班牙王国政府相对立的当地的放贷者（aviadores）或旅行商，他们能够强迫债务人在交税之前先向他们偿还债务，参见贝克韦尔（Bakewell）（1976，219）。

[141] 参见波尔（Pohl）（1969，448）。然而，戴维斯（Davis）却强调说：“墨西哥大量生产更为廉价但质量很差的产品，而高级的羊毛织物、亚麻布和金属用品仍然是来自欧洲。”（1970b，161~162）。

[142] 见巴格洛（Bargallo）（1955，251）。

[143] 参见邓恩（Dunn）（1972，9~10）。

[144] 参见肖努（Chaunu）（1959，1539）。

[145] 引于拉腊兹（Larraz）（1943，90）。

[146] 博克塞（Charles Boxer）（1961，49）对17世纪前七十年荷兰与葡萄牙的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作了如下的概括：“虽有过于简单化的危险，仍可以说这场长期的殖民战争采取的形式是为亚洲的香料贸易而战，为西非洲的奴隶贸易而战，为巴西的食糖贸易而战。同样可以说，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是荷兰在亚洲获胜，在西非不分胜负，而葡萄牙人在巴西获胜。”可以这么说吗？在政治控制方面可以这么说，但是，在经济控制方面，这不是荷兰人（后由英国取而代之）在所有这三个地区的胜利吗？这个胜利采取不同的形式，取决于它是在外部竞争场（亚洲），还是在边缘地区（巴西），西非洲是一个此时正在从外部竞争场缓慢变为边缘地区的地区。差异在于葡萄牙人在生产过程中坚持的程度，博克塞本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暗示：“葡萄牙人连同他们所有的毛病，作为殖民者已在巴西深深扎根；因此，仅凭一次海军或陆军的战败，或者甚至一系列战败，通常都无法将他们驱走”（1961，54）。

[147] 参见麦克劳德（McLeod）（1973，212）。

[148] 参见佩尔斯（Pares）（1960，20）。

[149] 产生、“烤肉者”（boucaniers）这个名词是因为他们将肉块在铁架或铁盘上熏烤之后

出售，以印第安语“烤肉”（*boucan*）称呼闻名。参见德斯钱伯斯（Deschamps）（1973，40）。并非此时之前无人知晓海盗。相反，正是“在1650年左右，西印度群岛的海盗行径”与此后的“全盛时期”相比，或多或少是偶尔之举 [哈林（Haring），1964，249]。

[150] 参见戴维斯（Davis）（1973b，169）。在17世纪早期，荷兰海盗“在追逐西班牙船只中是最为大胆放肆的……最为固执不舍的……‘荷兰佬’这个名称变成了‘海盗’的同义语。” [彼得森（Petersen），1975，250]。

[151] 参见史壮（Strong）（1899，233）。他补充说：“查理二世的顾问们理解克伦威尔的征服与殖民的计划有多么大的深远意义，也了解他攻击西印度群岛的真实动机。1656年1月，‘A.B’代表查理致信给西班牙国王时，强调了这个事实：克伦威尔旨在使西印度群岛殖民化，并且以他的舰队切断西班牙的贸易。实际上，从其他理由来看，这整个计划没有意义。护国公克伦威尔假定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花费甚大之后，竟只会满足于几平方英里的领地，很难说不是荒唐之事。”

[152] 参见佩尔斯（Pares）（1960，3）。

[153] 参见朗格（J.Lang）（1975，55）。哈林说（Haring）（1947，314~315）：作为一个后果，“西班牙商人经常变成了实际上的中间商、委托代理商，经常用他们的西班牙姓名逃避法律。”最终，这意味着“西班牙与美洲的贸易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一架被动的机器，用以将欧洲其他地方而来的货物供应纳入皇家控制范围之内。”

[154] 这正是超越出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实际行为。荷兰人以同样的方式与挪威的丹麦“殖民地”联系起来。伦德（Lunde）（1963，38~39）说：“走私总的来看是哥本哈根统治当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整个挪威都有大规模的走私活动绝对是人人皆晓之事。总督委员会抱怨说荷兰人是走私职业的行家高手。该委员会写道：只要有海关税，挪威商人就必须走私；唯一的补救之策是降低海关税。这正是他们欲求之事，但是，效果甚微，走私活动依然照旧进行……商人们自己就声言：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就得完蛋……走私活动是哥本哈根控制经济体系和操纵商业政策的直接结果。”

[155] 参见佩尔斯（Pares）（1960，12）。

[156] 参见克里斯托洛（Christelow）（1942，312）。谢里登（Sheridan）（1969，24）的估计清楚地表明了非法贸易的原因：“在大约1763年之前，不列颠的非正式帝国贸易的价值大概不会亚于帝国的正式贸易。”他将经过牙买加的非法贸易和经过加的斯（Cadiz）与葡萄牙的间接贸易，引证为不列颠的非正式帝国的两个主要部分。人们还不应当忘记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无执照经营的贸易。“它的位置远离利马的西班牙权力中心和西印度群岛，接近在巴西的葡萄牙人，这使有效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利益，这个港口实际上关闭了，因此，以这种手段确保为西班牙否定的利益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 [哈林（Haring），1947，329]。

[157] 参见德斯钱伯斯 (Deschamps) (1933, 44~45)。哈林 (Haring) (1964, 249) 提醒我们说, 这种认可可以是“真实的或自称的。”

[158] 参见弗洛伊德 (Floyd) (1967, 26~28)。再参见法尼 (Farnie) (1962, 209) 所言: “食糖将牧场经营挤到了二流角色的地位, 结束了加勒比海历史上的‘海盗’阶段。”

[159] 参见麦克劳德 (Macleod) (1973, 367~368)。

[160]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b, 169)。实际上, 有两种形式的劫掠。一种是抢劫载有财宝的舰队。另一种是掠夺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沿岸的西班牙人城镇。前一种劫掠中从未真有海盗参加, 唯有海军分舰队, 此后仅有三次, 1628年系由荷兰人所为, 1656年和1657年系由英国人所为。参见哈林 (Haring) (1964, 235~247)。然而, 劫掠西班牙人的城镇却是海盗们的专业。1655年至1671年之间, 有18个城镇被毁; 而且, 正是这种劫掠形式决定性地改变了横越大西洋的贸易模式。“正是以这种手段加上非法经营的贸易, 才耗竭了西班牙与美洲的贸易源泉, 并非是由于摧毁西班牙的白银舰队所致。”[哈林 (Haring), 1964, 250]。最终, 如格拉曼 (Glamann) 所言: “海盗经济…… (并不) 特别富于增长……。武夫们无论是否挂有飞扬的黑色旗, 都是无助于贸易和繁荣的, 与满载的谷物船和装载煤、砖、酒桶、盐桶和干鱼的沿岸船只相比都黯然失色了。”格拉曼 (Glamann) (1977, 191)。

[161]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b, 169)。再参见邓恩 (Dunn) (1972, 22) 所言: 在17世纪之末, 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心照不宣地同意让西班牙这个, ‘美洲病夫’保留其散乱的地盘的其余部分, 不发达的加勒比海帝国。事实上, 英、法两国都认为与西班牙殖民者做生意要比抢劫他们更为有利可图, 从1680年起, 它们尽力镇压海盗。”实际上, 1678年的内伊梅根 (Nijmegen) 条约之后, 荷兰不再是“加勒比海中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了。”[戈斯林加 (Goslinga), 1971, 482]。邓恩 (Dunn) (1972, 162) 认为在此政策转变之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至少是对英国而言, 他说: “光荣革命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是那些从此与王国政府维持了紧密关系”的糖业种植园主的一个胜利, 他们不再如王政复辟时期那样坐吃山空了。

[162] 参见内特尔斯 (Nettels) (1931b, 17~19) 关于这一政策变化的讨论。

[163] 参见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 88, 尤其是注解70)。

[164] 谢瓦利埃 (Chevalier) 在讲到墨西哥时说: “地产所有者们非常急于用甘蔗取代小麦, 只要气候许可……, 被认为是主要商品的小麦受制于 (政府的) 最高价格限制和诸种要求, 经常使生产者只有少量薄利可图; 而在另一方面, 食糖是在开放市场上出售的奢侈产品, 由于需求不断增大而使价格高昂。”(1970, 74)。
为什么墨西哥没有变成一个主要的食糖生产者呢? 伯斯 (Berthe) (1966, 103) 发现解答在于政治上所维持的劳工成本差别: “(食糖厂) 长期得不到‘分配制’ (repartimiento) 的好处, 加之为了小麦种植庄园的利益, 甚至于不能独自使用印第安人的付酬劳工, 只得最大量地使用既虚弱又代价高昂的奴隶劳动力。”另一方面, 巴蒂 (Batie) (1976, 13) 强调指出: 与烟草和棉花生产相比较, 食糖生产的困难是要求有“大量的资本支出、大量的劳动力和制炼生产过程中的

复杂知识”。

[165] “17世纪中，食用甜点和甜饮料更加蔚然成风了” [福布斯 (Forbes)，1957，7]。再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b，168) 和佩尔斯 (Pares) (1960，23)。

[166] 博克塞 (Boxer) 称1580年至1680年是巴西的“食糖世纪” (1952，388)。

[167] 参见肖努 (Chaunu) (1961，193~194)。摩洛 (Mauro) (1960，233) 对17世纪时巴西食糖的“特殊情况”所作的解释是：由于食糖的用途从一种药物变为一种食物，需求量扩大了。

[168] 参见卡斯特罗 (de Castro) (1976)。佩尔斯 (Pares) 谈到后来一段时间中，18世纪西印度群岛上的食糖生产时说道：“土地耗竭对甘蔗种植的影响明显可见。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生产出同样数量的糖，每十年就要增加奴隶劳动力，或者说，何处的耕作精细先进或产量增加，那仅仅是付出了大量的额外劳动力的代价才实现的。” (1960，41) 梅斯菲尔德 (Masefield) 谈到了食糖工业的“跷跷板或运气来自对土地肥力的反复消耗” (1967，291)。巴蒂 (Batie) 认为在巴西的情况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与荷兰人的战争 (1630年至1641年) “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甘蔗种植园地产 (1976，15)。

[169] 参见邓恩 (Dunn) (1972，65~66)。谢里登 (Sheriden) 认为在1636年，英国烟草种植业者遇到了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使他们寻求别的出路。1637年，荷兰人带来了甘蔗以及技术、资本和黑奴 (1969，11)。另一方面，弗塔多 (Furtado) (1963，25) 认为：“有可能的是，那些对加勒比海经济具有影响的变化的发生，本来会是大为缓慢的，但是在17世纪前半期之末时有一个外部事件发生了——荷兰入侵者终于被从巴西北部赶走。”

[170] 伊德尔 (Edel) (1969，42) 将此变化归因于这个事实：由于土地肥沃，巴巴多斯的成本低于在巴西的成本。因此，“对荷兰资本家而言，尽管他们在伯南布哥 (Pernambuco) 有现存的利益，将巴巴多斯看作是一个新投资场所仍是合理之举，即使荷兰对巴西东北部的控制是不牢靠的。”巴蒂 (Batie) (1976，21) 补充了正在逝去的局面中一个因素。1645年的伯南布哥发生叛乱后，荷兰西印度公司认为叛乱是短命的，命令自己在黄金海岸的代理商继续送来奴隶。当奴隶抵达，就被送往小安地列斯群岛“以宽厚的信贷条件”出售。诸岛之中，巴巴多斯最靠近累西腓 (Recife)。

[171] 关于气候和土壤，参见邓恩 (Dunn) (1972，26~30)。关于安全，参见佩尔斯 (Pares) 所言：“巴巴多斯出奇的平静发展 (自从建立以来甚至一天都未有过改主易帜之事) 归之于这个事实：位于群岛的诸主要岛屿以东数英里，不在西班牙人和加勒比人的往来路途上” (1960，10)。巴蒂 (Batie) (1976，15) 说：因为糖业需要大笔投资，安全是重要之事。“入侵威胁特别令富裕的投资者焦虑不安，甚至在来自海上的最短暂袭击中，他们也必定会损失奴隶和装备。”

[172] 参见谢里登 (Sheriden) (1969，19)。巴西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国内提供了逃亡奴

隶团体可以幸存下去的地域，尤其是在巴伊亚（Bahia）的凯鲁（Cairu）和卡马莫（Camamu）。参见施瓦茨（Schwartz）（1970）。

[173] 参见邓恩（Dunn）（1972，21）。再参见戴维斯（Davis）所言：“1655年占领牙买加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其特点是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利益得到了巩固而不是扩张。”（1952b，89）

[174] 参见邓恩（Dunn）（1972，21）。

[175] 参见邓恩（Dunn）（1972，23）。如果这些战争中的相互破坏未能阻止食糖工业的增长率（需求持续增长的一个迹象），那么，对生产的社会组织确有影响。“在英属诸岛上，（从1689年至1713年的长期）战争无疑损害了农民而有益于大种植园主。”[邓恩（Dunn），1972，147]。再参见谢里登（Sheriden）（1965，299，表3），他论述了1670年至1754年在牙买加不断扩大的土地集中。

[176] 参见佩尔斯（Pares）（1960，20）。

[177] 令人好奇的是，佩尔斯（Pares）（1960，41）将此不利之事说成是一种长处：“（糖和烟草的）种植园主都受害于土壤的耗竭。烟草殖民地受害最少，因为一个地力耗竭的庄园的主人可以很容易取得处女地——充其量有200英里之远——而且能够将他的奴隶迁往此处……甘蔗种植园主却较少能够自助。这些岛中有很多都是小岛。”但是，此说是本末倒置。为什么甘蔗在更小的岛上取代了烟草，又退往较大的岛屿和切萨皮克河谷（Chesapeake）？至1660年时，在较小的岛上从烟草转向食糖的这种变化确定无误了。参见佩尔斯（Pares）（1960，22）和法内伊（Farnie）（1962，210）。尽管在1645年至1680年之间食糖价格暴跌，情况依然如此。参见佩尔斯（Pares）（1960，40）。如他所言：“甘蔗种植庄园不那么容易变为烟草种植庄园——在已种植的田地里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和更多的机械。由于这些原因，甘蔗种植庄园主经常只好原地不动。”（1960，41）。

[178] 参见兰德（Land）（1964，647）。

[179] 关于在此时期烟草最初是如何被认为是物理疗法，参见奥梯兹（Ortiz）（1947，242～245）。关于对食糖的喜好之扩大，内夫（Nef）（1968，77）解释说：“16世纪和17世纪初，欧洲人培养出对食糖的喜好，是此前文明人中从未有过的。对此的部分解释是北方经济文明的增大。北方的水果蔬菜不如地中海土壤上种植的水果蔬菜那样多汁。要使它们美味可口就得使之变甜。”

[180] 在欧洲，对烟草不征收进口税的唯一的另外一个主要地区是西班牙尼德兰。参见格雷和维科夫（Gray and Wykoff）（1940，4）。

[181] 在欧洲，对烟草不征收进口税的唯一的另外一个主要地区是西班牙尼德兰。参见格雷和维科夫（Gray and Wykoff）（1940，4）。

[182] 参见罗辛（Roessingh）（1976，500）所言：“长期而言，烟草种植的兴起可能被解释为在大约从1650年至1750年左右出现的长期农业衰退的一种伴随物。内地烟草和谷类的价格比率变得有利于烟草，对此经济变化，种植者的反应是增加烟草面积。”

[183] 参见佩尔斯（Pares）（1960，26）。然而，摧毁欧洲的烟草生产不是那样轻而易举。比尔（Beer）（1912，145）注意到：“1620年发布了第一个禁止英国烟草的禁令……又花费了70年时光以或多或少的持久努力和得力措施去根除这一产业。”在英国种植烟草并无生态障碍。瑟斯克（Thirsk）（1974，89）称英国的农业条件“完全适合”，并且指出它的时间并不妨碍重要粮食作物的栽培。

[184] 参见格雷和维科夫（Gray, Wyckoff）（1940，4）；但是，布林（Breen）（1973，13）将“弗吉尼亚的变化……归之于1684年之后烟草价格的上涨。”

[185] 参见戴维斯（Davis）（1974，144）。

[186] 1723年，沃尔波尔（Walpole）免去了烟草税以此鼓励烟草的再出口（而且以此消除了荷兰和德国烟草的价格优势）。参见普莱斯（J. M. Price）（1964，504~505）。

[187] 参见普莱斯（Price）（1964，504）所言：“1700年时，英国国王从烟草所获之税收大约是法国国王所获之两倍；至1760年代时，法国国王所获的烟草税收大约是英国国王所获之四倍。”（第503页）。

[188] 普莱斯（J.M.Price）将此直接联系到“法国独家买主的压力。”（1964，506）。

[189] 参见博克塞（Boxer）（1969b，35）。

[190] 参见博克塞（Boxer）（1969b，59）。

[191] 参见维拉尔（Vilar）（1974，279）。此事可能还有另外一面。博克塞（Boxer）（1969b，26）指出：“在17世纪最后25年中，随着食糖价格的下跌，许多里斯本商人坚持要用现金为奴隶付款，拒收实物付款（食糖或烟草），而且，结果硬币的出口在巴西产生了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这将意味巴西和英国有“发现”黄金的刺激。

[192] 博克塞（Boxer）（1969a，460）。

[193] 关于16世纪国际性债务劳工的讨论，参见沃勒斯坦（Wallerstain）（1974，121~122）。

[194] 参见佩尔斯（Pares）（1960，50）。

[195] 参见邓恩（Dunn）（1972，194）。制造作用包括有用于甘蔗榨汁的磨坊，将甘蔗汁蒸干成糖晶的煮房，用于烘干糖和排干糖浆的加工房，用于将糖浆制成糖酒的酿酒坊，以及贮藏桶装食糖的库房（参见第189~190页）。

[196] 参见邓恩 (Dunn) (1972, 200)。

[197] 参见佩尔斯 (Pares) (1960, 5)。

[198] 参见谢里登 (Sheriden) (1957, 63~66)。

[199] “至18世纪初期时，富有的种植园主们在岛上的大多数立法机构中掌握了多数席位。” [谢里登 (Sheriden), 1957, 67]。

[200] “常住的商人们作为一个阶级，在殖民地的许多地方开始失去活力，甚至于消失，不过，他们仍幸存在牙买加的金斯顿 (Kingston) (它与西班牙帝国有紧密联系)、巴巴多斯的布里奇顿 (Bridgetown) (此处有大笔的奴隶生意) 以及马提尼克岛 (地方长官在此以其他岛屿的贸易养肥了自己。在其他地方，他们的重要性也大为衰落。商人们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大多只是代理商，出售北美洲产品收取佣金而已。)” [佩尔斯 (Pares), 1960, 33]。

[201] “种植园主们抬高糖价的努力大获成功，以致 (在1753年) 买主们被迫寻求议会的帮助。”谢里登 (Sheriden) 以此作为1730年代后期至1763年这个“超额利润”时期的主要原因解释 (1957, 81, 88)。

[202] 参见戴维斯 (K.G.Davis) (1952b, 101, 103~104)，他说：“精耕细作和高度资本化的大种植园所生产的糖的出售办法，是代理商制的起源。”

[203] 参见戴维斯 (J.M.Davis) (1954, 506)。

[204] 参见佩尔斯 (Pares) (1960, 33)。

[205] 参见戴维斯 (K.G.Davis) (1952b) 和佩尔斯 (1960, 33~34)。佩尔斯 (Pares) 还补充说：“但是，对此解释有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在外种植园主和几乎每一个常住种植园主 (在英属岛屿上) 都自行负责委托他的蔗糖家园。”我不明白这一反对意见的分量何在。一旦竖立起榜样，小庄园主们立即群起效尤，找到愿意代理其生意的伦敦代理商。

[206] 兰德 (Land) (1965, 64) 指出：切萨皮克 (Chesapeake) 烟草并没有提供出西印度群岛食糖那样的滚滚财源。“结果是切萨皮克的种植园主们未能衣锦还乡，炫耀财富。他们的利润首先是来自烟草生产，这需要有足够能力，其次来自办企业，此中有更多的酬报。”换言之，他们无力去“专业化”；他们只好仍作监工。沃德 (Ward) (1978, 208) 却对18世纪时英属和法属岛屿的获利有重要差异这一点表示怀疑。

[207] 普莱斯 (J.M.Price) 说：“如果一位 (格拉斯哥的) 商人想要更多的烟草，他只能扩大给种植园主的信用贷款，收获季节时才会得到额外的烟草。因此，苏格兰和其他商人为自己的烟草供应所作的信用贷款，要比价格机制远为有效。在苏格兰人的背后是法国买主” (1964, 509)。

[208] 参见佩尔斯 (Pares) (35, 38)。

[209] 参见佩尔斯 (Pares) (48~49)。

[210] 因此, 谢里登 (Sheriden) 说: “很清楚, 一群伦敦商人和在外种植园主控制着牙买加的种植园经济, 大家族的命运与商业金融结盟, 要比与热带农业远为紧密” (1965, 309~310)。他的此番话对随后的时期而言是正确的; 但是, 他没有考虑到这个随后阶段是因为有更早时期的生产竞争效率才成为可能之事。

[211] 参见梅斯菲尔德 (Masefield) (1967, 290)。

[212]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b, 134)。然而, 布林 (Breen) (1973, 14) 却认为弗吉尼亚的转折点是1680年, 当时, “英国诸公司已有能力从非洲直接将黑奴用船运到美洲大陆各殖民地”。他还指出: 1682年, 英国颁布了关于招收契约奴仆的新条令, 规定所有合同必须有一名英国地方官的签名, 14岁以下儿童必须有父母许可。

[213]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b, 130)。

[214] 参见戴维斯 (K.G.Davis) (1974, 107)。

[215] 参见佩尔斯 (Pares) (1960, 19)。再参见费伦 (Phelon) 所言: “黑奴花费大笔资本投入” (1959, 191)。

[216] 参见佩尔斯 (Pares) (1960, 19)。

[217] 参见邓恩 (Dunn) (1972, 72)。德比恩 (Debien) (1942, 74) 引用契约劳工是“一种流动人口”的事实解释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变化。

[218]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b, 131)。契约劳工在法属加拿大, 而不是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得以幸存下来, 其原因正在于土地未分发这一事实。参见德米格尼 (Dermigny) (1950, 236)。

[219] 佩尔斯 (Pares) 在一点上认为烟草是“自由人的一种作物”, 因为它要求有“灵巧精细的判断”, 因而也就“无法如此轻易地托付给机械行事的奴隶”; 但是, 他又承认说: “弗吉尼亚的经历表明烟草也可以在奴隶种植园种植。” (1960, 21)。

[220]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b, 133)。艾伦 (Allen) 注意到: 在1667年“仆役阴谋”至1682年的诸次烟草暴动之间, 弗吉尼亚共有10次民众和仆役叛乱或叛乱阴谋, 其中决定性的一次是1676年4月的“培根 (Bacon) 叛乱”。他认为种植园主们认识到有必要采取给予白人劳工不同地位的办法去分裂工人阶级。从此, “1685年之后转向非洲劳工的变化是很急剧的。” (1975, 49)。梅纳德 (Menard) (1978, 24) 指出: “从1670年代后期起, 契约劳工的价格开始上涨。”奴隶需求量的增大在1700年左右导致了更高的价格。为了降低价格, 然后就“在整个货运量中增加妇幼奴隶的比率。” [盖伦森 (Galenson), 1979, 247]。

[221] 参见邓恩 (Dunn) (1972, 59) 关于1640年至1660年之间糖业繁荣的影响的论述。

关于1680年至1700年之间烟草繁荣的影响，见法内伊所述（Farnie）（1962，208）。柯廷（Curtin）（1971，253）认为：在欧洲劳工供应的下降和对劳工的需求上升之中，还有第三个因素：抗病力的不同。非洲人有“巨大优势，产生于一种疾病环境，那里既有热带疾病又有许多非洲和欧洲共有的疾病。”他认为在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劳工和非洲劳工的死亡率之比是3：1。而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这一比率是4：1，考虑到我们如果设想“维持（奴隶和契约奴仆的）费用大致相等，那么无论怎么说奴隶也值得上欧洲劳工的3倍价钱”（1968，207）。

[222] 参见博克塞（Boxer）（1952，223）。

[223] 参见维安纳（Viana）（1940，11）。当然，在实际上，非洲人也表现出同样的“无力”，并且也死亡。施瓦茨（Schwartz）（1970，316）提醒我们注意以下之事：“关于1570年至1670年的糖业繁荣时期中的奴隶状况，用巴西人的形容词描述，就是如地狱一般可怕”；收获季节时一天只睡4个小时是常见事情；而且，“关于管理奴隶的流行理论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压榨出尽可能多的劳动”。

[224] 参见罗曼诺（Romano）（1970，133）。

[225] 参见梅拉法（Mellafe）（1959，252~253）。

[226] 杜普伊（Dupuy）谈到伊斯帕尼奥岛（小西班牙）（Hispaniola）的情形时说道：“阿拉瓦克人（Arawak）的社会构成和生产组织的特点并不是一个阶级剥削和征服另一个阶级。阿拉瓦克社会的生产关系特点是明显突出的使用价值和完全没有价值交换，换言之，没有商品生产……因此，宁愿饿死在深山之中也要好于死在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奴役之下。”杜普伊（Dupuy）（1976，22）。

[227] 参见罗曼诺（Romano）（1970，130）。布雷丁和クロス（Brading & Cross）（1972，557）指出：在秘鲁的矿场中的强迫劳动要比在墨西哥的矿场中存留更久，印第安人口在墨西哥出现了灾难性的减少。结果，至18世纪时，墨西哥的矿工逐渐得到相对而言的高工资，而且是从梅斯蒂索印欧混血种人、穆拉托黑白混血种人和有文化适应的印第安人中招募。“这种多样化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是，令人感到诱惑的是认为诸此原因在于这两处印第安人完全相异的发展和定居人口的主要地域的不同。”（1972，557）。贝克韦尔（Bakewell）（1976，217）宣称早在17世纪中，“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主要关系就已是……一个是雇主，一个是雇工”。相比之下，塞斯佩迪斯（Céspedes）（1947，39）却谈到了“秘鲁的土著人口驯良听话”。

[228] 奥伯良（Oberem）（1967，767~770）将Conciertos（协作者）定义为“准奴隶”，因为他们可以被“买下来”。他将使用“准奴隶”或“负债工人”的花费与在厄瓜多尔使用非洲奴隶的花费作了比较，就此准确地道出此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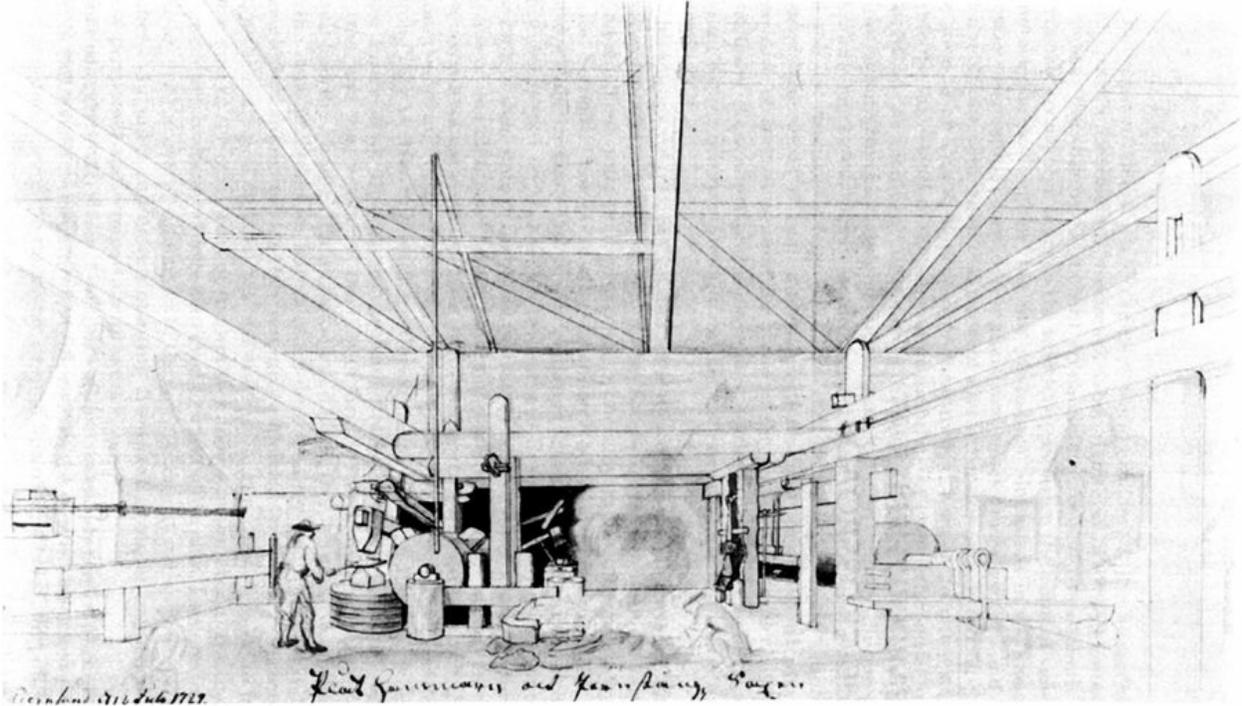
[229]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不能赞同霍尔（D.Hall）的看法，他认为奴隶是“资本装备”，而且说人们因此不能将奴隶劳动的成本与自由劳力的成本作比较，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件代替劳

动和资本成本的事情。霍尔（Hall）（1962，309）。如果说它仅止于此，如兰德（Land）事实上所说的，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主使用奴隶本来就会是不合理之事。兰德说：在17和18世纪，他们对通过增加奴隶劳动而不是依靠技术改进来扩大生产，有一种“坚定不移的偏爱”，从而“阻碍技术变革”（1969，75，79）。与此见解相同的是巴尼特（W.Barnett）（1965，167）关于对英属西印度群岛上甘蔗种植园观察：“没有迹象表明.....实行了规模经济。”

然而，这未解释这种偏爱本身，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的”和经济的不合理性。这一分析失败是我的印象。在一个意义上，所有劳动成本都是资本成本。它总是一个关于机械（死劳动）和活劳动理想结合的选择。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奴隶劳动（作为对工资劳动、强迫的经济作物劳动和额外的机械的一个选择替代），才是最适宜的和政治上是可能的。当我们想起奴隶能够在许多地方作为销售者参加货币经济并积聚资本时，问题的答案就更为复杂化了。如施瓦茨（Schwartz）所问（1974，628~629）：巴西奴隶怎样才能支付他们自己的解放呢？明茨（Mintz）（1964，251）指出：在牙买加“至18世纪初期时，奴隶们在市场上积极地买卖他们自己的产品”（1964，251）。

[\[230\]](#) 基本形式并不就是唯一形式。施瓦茨（Schwartz）关于巴西糖业地区中的甘蔗农（cavadores de cana）的论文整个精锐之处在于：他们的租赁安排甚至于所有权，都是大地主们剥削劳动的一种选择形式，其运用之法根据经济状况而异。“在经济扩张时期，使用甘蔗种植工人.....是一种方法，用于降低资本成本，也可能提供对可生利（engenho）财产的精细管理”（1973，193~194）。

第五章 十字路口上的半边缘地区



第五章插图 “一幅瑞典炼铁工人的画”

克隆斯塔特（Carl Johan Cronstedt）作。（1729）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瑞典博物馆（Tekniska Museet）。

“一幅瑞典炼铁工人的画”，克隆斯塔特（Carl Johan Cronstadt）（1709~1779）作，他学习机械力学和几何学作为建筑的基础，成为他那时著名的瑞典建筑师。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经久不变的要素就是等级式的（和广为

分布的)劳动分工。然而,另一个历久不变的要素是这个世界体系中经济活动和由此而来的特定地理区域的不断变动的界定。从国家机器的观点来看,各个界定场所、地区和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中经常性(但不是连续性)的交替变动,可以看作(实际上也是极经常地看作)是国家实体的一种向上和向下的“运动”,是一种可在国际体系框架内与其他国家相比测量的运动。20世纪中,人们谈论的是国家的“发展”。17世纪中,人们谈论的是王国的“财富”,但是,17世纪的人们要比今日的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测量是序数而非基数,至少是在现代世界体系的限制因素之内。地位的交替变动尤其发生在全面衰降或停滞之时;对于那些处于等级式统一体中间位置(半边缘地区)的国家来说,运动主要是受国家行动的作用影响。半边缘地区国家是通常上下沉浮的国家。

这听起来好像是自发随意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明智的国家政策与发生的事物有很大关系。但是,必须立即加上两点防止误解的说明。首先,国家政策并不是原动力而只是干预过程。第二,并不是一切国家都可以运用任何为其喜好的政策并指望取得好结果。许多国家也许会试图这么做,但是在世界劳动分工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地将其他国家地位等级做出了重大改变。这是因为一个国家非常成功地消除了其他国家的机运和选择。17世纪中,有许多半边缘地区失利衰落——西班牙、葡萄牙和欧洲的旧后背地带[从佛兰德(Flanders)经过德国西部和南部至意大利北部];但是,也有几个地区得势壮大:显著的有瑞典、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英属北美的“北方”殖民地(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殖民地)。前一系列国家经历了许多与我们曾描述过的边缘地区相同的发展过程,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们保留了不同这些边缘地区的重要结构差异。后一系列国家只是刚刚开始斗争以争取成为这个时代中的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一部分。对于这样的国家实体来说,甚至于开始走上这条道路就是一个成就,更不必说它们能够利用世界经济的总体困难谋取自己的利益,免受更远离核心地区之苦,而这种远离之苦正是大多数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所遭受的。

在这一方面，西班牙的“衰落”是17世纪中最壮观的现象——甚至对那个时代的人们也是清晰可见的。如我们先前所见到的，其原因深藏于西班牙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中，其相应的虚弱在16世纪时已达到颇为可观的程度了。^[1]西班牙的军事力量和充足的金银财富部分地掩盖这些虚弱；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倒退撕去了西班牙外表上的掩饰，将其虚弱暴露给西班牙人自己和世界。如果我们希望定一个确切年代，或许菲利普二世第二次破产的1596年会像其他时间一样管用。这次破产的“意义要超出北方卡斯提尔（Castile）的卓越财政状况的告终；它也意味着菲利普二世的帝国之梦的结束。”^[2]17世纪西班牙传统的编史景象显现的是一种经济颓废衰败的景象。在汉密尔顿伯爵（Earl J.Hamilton）看来，这一景象描述是夸张之语，但是，他又说，17世纪是“西班牙经济史上的最衰败不振时期之一。”^[3]关于这个时期中西班牙的农业生产，我们知道些什么呢？不如说是知之甚少。^[4]17世纪变成了这样一个时期：“田地荒芜，无人灌溉、畜禽稀少。”^[5]17世纪前30年之时，当时已有许多人讨论土地使用过度问题，每年耕作取代了三年轮耕制，结果是土地的耗竭。粗粮——小米、高粱和大麦——以及玉米用来取代小麦，^[6]这使我们想起了边缘地区的发展。酒类生产的扩大牺牲了谷类，如在法国南部，而且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人们开始用酒类换取小麦。^[7]

与作物更换同时而来的是出口数量下降。大体上，“作为一个原料出口国，西班牙（在17世纪中）的表现并不令人印象深刻。”^[8]然而，西班牙在16世纪时却不是一个边缘国家，并不限于出口原料。它曾是一个制造业中心，因而它在这一部门中的衰落甚至更为惊人。西班牙在纺织工业中的衰落最为严重。托莱多（Toledo）曾是西班牙的丝绸和亚麻生产中心，却在1600年至1620年的20年间实际上消失了。^[9]塞哥维亚（Segovia）和昆卡（Cuenca）也是如此命运。衰落的并不仅仅是纺织工业，冶金业和造船业也衰落了。这三个行业是现代欧洲早期的“发展工业”，西班牙却在其中“不仅失去了她的出口市场，也失去了她的一个

很大部分的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她失去的市场让给了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10]因此，在这个停滞的时代，西班牙不仅蒙受了边缘地区农业退化之害，也蒙受了工业退化之害。后果是双重性的：一方面，西班牙内部的两极分化和地区间冲突增大；另一方面，西班牙不得不为谋生存而耗去她的殖民地遗产。

16世纪中，西班牙就已经表现出在卡斯提尔（Castile）与西班牙其他地区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一切事情都使卡斯提尔拥有不断增长和压倒一切的支配优势。”^[11]普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西班牙深深卷入“三十年战争”所付出的花费，使税赋不断增加。诚然，卡斯提尔也如西班牙其余地区一样承担了税赋重担，甚至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如韦斯（Jaime Vicens Vives）所指出的，卡斯提尔享有“巨大的补偿……：剥削美洲大陆，和西班牙的心脏中文化和政治的首要权力”。^[12]这一差距很可能仍在扩大。总之，加泰隆尼亚（Catalonia）和葡萄牙这两个边缘地区，直到17世纪开始时还维持了与卡斯提尔的相对的经济平等均势，此时却已深深感到了卡斯提尔的新的经济压力。^[13]因此，以奥利瓦雷斯（Olivares）为代表的政府想要获取更多金钱时，“加泰隆人（Catalons）自然而然地怀着不信任之情，使自己坚守在斐迪南（Ferdinand）的自治立法的堡垒后面”。^[14]这么做的还不止于加泰隆人（Catalons）。1628年在波尔图（Oporto）和1629年在圣塔伦（Santarem）发生的抗税暴动，以及1632年在巴斯克地区发生的“盐税叛乱”，其主要原因都是征收新税——“人民已被压榨至极忍无可忍了。”^[15]加泰隆尼亚的特殊之处倒不是老百姓的怨恨“突然剧烈地爆发”，^[16]而是老百姓的怨恨会合了“资产阶级的幻想破灭”和“加泰隆尼亚统治阶级”的矛盾心理。^[17]这些会合起来的不满源泉就是加泰隆人的叛变能够持续如此之久和具有如此威胁性的原因。^[18]

正好就在欧洲的世界经济从扩张和膨胀时代重新转向停滞时代的时刻，葡萄牙正式变成了西班牙的一部分——伊比利亚联盟，或葡萄牙人

后来常说的“六十年监禁”。王位继承的一次中断，加上1578年葡萄牙人在阿尔卡萨—埃尔—凯此尔（Alcazar-el-kebir）为摩洛哥人击溃的军事失败，使西班牙国王率领军队进入葡萄牙，并于1580年登上葡萄牙王位。反抗是虚弱无力的，因为这个联盟对葡萄牙人还是有一些明显好处的。其中之一是废除了半岛上的边境海关，使葡萄牙人能够免税获取西班牙小麦。^[19]其二是这个联盟使葡萄牙资产阶级进入西班牙帝国，这个帝国在1580年时“如日中天，强烈地吸引着葡萄牙人的积极性，他们已习惯熟悉了不同文化和奇特的贸易方法，急切要求扩张他们在一切地方的市场，深知这样一种联盟提供给他们巨大可能机会。”^[20]从西班牙人的观点来看，这个联盟在卡斯提尔政府身负的财政压力日趋增大之时，有进入新的金融网络的经济好处。葡萄牙的银行家们现在也能进入卡斯提尔的金融同业组织了——1606年之后才是正式加入，此前则是非正式加入。

葡萄牙人得到奥利瓦雷斯（Olivares）的恩宠，因为他正在设法解决君主的财政问题。葡萄牙银行家们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有联系，可能正在使用荷兰人的资金。^[21]（他们实际上几乎全都是“卑劣下贱者”，即犹太皈依者。^[22]）而且，他们是商人—银行家，^[23]对他们来说，进入西班牙就是进入西班牙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德拉普拉塔（Rio de la Plata）、泰拉菲马（Terraferma）、安的列斯群岛。^[24]此外，葡萄牙人可以在西班牙舰队保护之下从繁荣的巴西蔗糖殖民地获取利润。^{[25][26]}因此，葡萄牙人部分地通过这个联盟的好处来保护自己，免受17世纪的首次寒风侵袭；但是，这种好处无法持久。一方面，西班牙人开始对葡萄牙人能如此获益进行反击，^[27]轻而易举地采用了反犹太人的仇外主义作为掩饰。^[28]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也逐渐感到愁苦不堪了，因为西班牙人越来越无力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保护了。葡萄牙人认为荷兰对巴西的占领部分地归因于持久的荷兰—西班牙冲突。^[29]总之，葡萄牙—大西洋贸易数在1600年至1630年之间远胜于塞维尔—大西洋贸易，开始下降了。^[30]至1638年，西非洲的海上黄金贸易又落入英

国和荷兰之手，加重了在巴西的这些困难。^[31]

葡萄牙人于1640年揭竿起义，与加泰隆人的起义同时，却没有后者的内部阶级分裂，这一点“使〔葡萄牙资产阶级〕更容易接受从与西班牙的联盟到独立的转变。”^[32]葡萄牙宣布独立，并走上与英国结盟之路。它在17世纪开始之时将自己的亚洲贸易帝国丢失给荷兰，博克塞（Boxer）说，这是因为荷兰“所具有的实际力量和潜在力量都远远超过穷困枯竭的葡萄牙王国”。^[33]如我们所知，它曾经从与西班牙的联盟中得到一些补偿；然而，欧洲的世界经济之衰降所产生的压力正在使这些补偿化为乌有。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重大问题在于：就经济而言，葡萄牙就不是西班牙好时光的伙伴吗？”^[34]正值西班牙忍痛舍去一点物质利润之时，它同时受损于殖民地的元气大伤。首先，美洲与西班牙的交通出现大衰退，肖努（Chaunu）将此确定为1622年至1680年。^[35]第二，走私贸易发展起来，先是荷兰人^[36]走私，继之以英国人和法国人，以至成为欧洲美洲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37]走私贸易经过17世纪逐渐成为这样一个事实了；核心国家与西班牙美洲的直接关系“通过走私路线提供了后者的基本必需品中的最大部分。”^[38]

因此，在17世纪的核心国家与西班牙的殖民地之间，西班牙至多只是充当了一个相当被动的转送带。西班牙从核心地区国家进口纺织品和纽芬兰（Newfoundland）干鱼，供国内消费，在未完全为走私贸易甩开时，也供给它的殖民地。西班牙所支付的款项部分是产自半岛的原料、产自殖民地的染料，最重要的则是美洲金银块——“旧西班牙贸易中的精华诱物。”^[39]在财政十分拮据之时进行的不断战争——与荷兰联合省、法国、加泰隆尼亚、葡萄牙的各次战争——导致了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1650年之后尤为严重。这又导致1680年代中“卡斯提尔的行政和经济的全面崩溃。”^[40]在此形势下，西班牙君主几乎无力抗拒核心地区强国对美洲的侵蚀和劫掠，甚至无力阻止西北欧的工业产品不断扩大向西班牙本身的出口销售。^[41]兰伯特（Rambert）概括如下：“17世纪之

末，西班牙占有世界经济中的一席特殊之地：它是一个庞大而实际上又未开发的市场，所有贪婪的欧洲列强都扑向它……（西班牙依靠更发达的国家）勉强为生。”^[42]

葡萄牙或多或少面临着相同的形势。从王政复辟时期的英国纺织业的眼光来看，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巨大的海外市场，尽管英国商人还只能通过中间商与南美洲进行贸易。”^[43]实际上，1642年、1654年和1661年的一系列英葡条约已使英国在巴西的插足要多于在西班牙美洲。^[44]英国插足于葡萄牙的三角贸易（使之变成四角贸易了）使葡萄牙“越来越被推向边缘。”^[45]约在1650年开始在欧洲普遍出现，尤其在葡萄牙出现的短暂经济景气，于1670年就告终了。^[46]葡萄牙做出了一个勇敢努力以求摆脱这种中间人和传送带的地位，即采取17世纪的万用妙药：重商主义，从1675年至1690年，弗龙泰拉（Fronteira）侯爵，埃里塞拉（Ericeira）公爵和诸位国务大臣们公开宣布这一重商主义政策。葡萄牙人有意认为这是模仿柯尔伯（Corbert）的政策。他们引进法国技工以帮助建立工业，与英国和法国的工业进行竞争，^[47]并且创立了一个非洲奴隶贸易商业公司，试图捞取西班牙的生意。他们一度使其货币正常价值上升20%，期望汲取金银块，尤其是从西班牙。^[48]

也正是作为1670年代这场危机的一个结果，葡萄牙重新努力在巴西寻找金银，^[49]不过，一直到了1693年至1695年，它才在实际上发现了大量黄金。^[50]此外，这场危机还促成寻求新的出口市场，也正是在此时候开始了马德拉白葡萄酒的一个广大出口市场。英国人发现“马德拉（Madeira）酒是可供运往热带气候地区并保存的最佳酒类。”^[51]实际上，英国人是如此重视它，以至于在1663年的航海条例中规定：从马德拉岛和亚速尔（Azores）群岛进口的葡萄酒是三项不受大宗货物限制要求的例外货物之一，这种限制要求欧洲货物必须经由英国才能运往英属美洲殖民地。^[52]英属西印度群岛和新英格兰迅速变为这些葡萄酒^[53]的重要市场，葡萄酒在葡萄牙的重要性也不断增大了。^[54]埃里塞拉死于

1690年，两年之后，葡萄牙的重商主义政策就崩溃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戈丁诺（Godinho）作了三个解释^[55]：第一，1690年的普遍经济危机（它曾提高了糖和烟草的全面价格）和葡萄牙人利用荷兰的暂时困境而获的好处都结束了；第二，出售给英属美洲的酒类持续增加，而且其进一步增加是由于这一事态：作为英法战争的一个结果，英国禁止进口法国酒因而转向葡萄牙进口作为替补；^[56]第三，巴西的淘金热潮开始了。^[57]

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是为了对付严重的商业危机；^[58]但是，反对重商主义的力量已是根深蒂固，一旦气氛稍微再次有利于他们的利益，就不可能阻止他们在政治上卷土重来。^[59]1703年和1713年，葡萄牙放心签订了梅休恩条约，用戈丁诺（Godinho）的话来说，这条约“实质上肯定了一个事实上的形势”，^[60]这一形势创于1692年，源于17世纪的一切发展变化。这些条约是李嘉图（Ricardo）的关于国际劳动分工福音理论的榜样，并没有创造英国特权，却重新创造了密藏于1642年、1654年和1661年诸条约中的那些特权。^[61]葡萄牙酒上的英国盖布就要变为辉格党商业政策的光辉标志。^[62]

如果说埃里塞拉时期（1675年至1690年）的重商主义，是葡萄牙人抗拒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世界经济中与日俱增的从属地位的一个短暂时刻，那么，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可能看作是西班牙人进行同样的，但也一样失败了的抗拒企图。17世纪中，西班牙国家已虚弱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从1697年赖斯韦克（Rijswijk）和约开始，法国、奥地利和荷兰联合省合谋瓜分西班牙帝国。至1720年，西班牙和法国命运与共，联手对抗全欧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次年签订了梅休恩（Methuen）条约的葡萄牙。^[63]在英国人看来，法国人长期以来从西班牙获取的利益份额太大，而且，一名波旁王朝的王位继承人将威胁进一步减少英国的利益份额——在美洲还不至于有如此威胁，因为英国在美洲已经战胜了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本土和地中海。^[64]英、法之间的战争远远超出了对西

班牙本身，而且彼此力图摧毁对方的贸易网络，尤其是掠捕对方商船。^[65]莱格瑞尔（Arsene Legrelle）认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历史，并不是西班牙的内部历史。”^[66]法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西班牙盟国的主要目的不是去促进法国的利益，而是想摆脱自己深陷其中的经济困境。^[67]

加泰隆尼亚的叛乱也必须如此同样看待。1760年之后，加泰隆尼亚出现了一次缓慢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税赋的重担减少了……而且经济衰竭也小于”卡斯提尔。^[68]这一不大不小的繁荣基础是它的商业中间商作用。一个重商主义的和集权的西班牙不会去帮助“这个正在发展中……又梦想‘自由贸易’和变成另一个荷兰的阶级。”^[69]此外，“法国作为一个强权，就是敌人，^[70]”它曾夺取了1659年比利牛斯（Pyrenees）条约中的加泰隆尼亚的领土。因此，加泰隆人运动——它是统治集团的一个运动，不是如1640年中那样的人民叛乱——“投靠英国—奥地利‘联盟’，以求重新夺得与法国结盟的伊比利亚半岛。”^[71]这一次，它较少是一个想独立于西班牙的分离主义运动，更多的是一个希望保存加泰隆人的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运动，阻止怀有重商主义观念的集团在西班牙掌权。^[72]在此，重商主义观念是一种进步的和善于务实处事的观念。^[73]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西班牙被迫放弃它在半岛之外的领土。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不得不同英国签订贩卖奴隶条约，承认英国享有先前由法国据有的权利：将奴隶运往西班牙西印度群岛（每年至少4800人）；还有先前法国贩卖奴隶条约所没有的两个特点：英国在里约德拉普拉塔（Rio de la Plata）建立一个殖民居住地和每年一艘500吨英国“获准之船”被允许前往西班牙属美洲进行广泛贸易。^[74]结束这场战争的多种条约是“反路易十六联盟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胜利。”^[75]但特别是英国的一个胜利。^[76]

然而，在西班牙内部的加泰隆人却被他们的盟友抛弃了，菲利普五世继续在西班牙实行中央集权化。阿拉冈（Aragon）和加泰隆尼亚失去

了由“新普兰塔（Neura Planta）（计划）1716年宣布的各种特权和制度”。^[77]巴伦西亚（Valencia）的诸特权早在1707年就被撤销了。^[78]唯有那瓦尔（Navarre）和巴斯克（Basque）地区因保持了对菲利普的效忠得以保全了他们的诸种特权，并因此以“豁免省”而著称。^[79]在整个的国际解决办法和贩卖奴隶条约的范围之内，西班牙无法实现其意图的目的。^[80]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规定西班牙不得变更关税使之不利于英国。而且，兑换维农铜币（Vellon）的白银税率固定在1700年查理二世统治结束时所通行的比率上。这就“有效地预防了真实的保护性关税。”^[81]

无疑，如索利斯（Romero de Solis）所强调说明的，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胜利“是中产阶级和下属贵族反对教会和庄园贵族的胜利。”^[82]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菲利普五世将力图“在乌得勒支条约允许的限制范围之内”结束西班牙的半边缘地区地位。^[83]但是，卡曼（Kamen）认为：“在乌得勒支失去了意大利和尼德兰的负担之后，这个国家可以致力于内部恢复和在外重获活力。”^[84]这是真实的吗？无疑，波旁王朝这么努力尝试了。但是，卡曼本人又说，用于启动这一努力的信用回到了查理二世手中，而且，1680年同时，葡萄牙也正在做出它的努力尝试。“菲利普五世的西班牙实质上差不多是一个近百年来以货币混乱不堪闻名的国家。”^[85]很清楚，无论波旁王朝的努力的效果是什么，西班牙在实质上不可能变更它在18世纪中的经济角色了；实际上，在世界经济于1750年后重新出现扩张的时期，西班牙失去了它的美洲帝国。人们是否不应该将波旁王朝所取得的成就与可能会取得的成就（如果乌得勒支没有以贩卖奴隶条约结束，也没有破坏削弱西班牙追求重商主义政策的能力）作比较？菲利普五世也许会被相信能制止西班牙的世界经济地位的进一步衰落，至少是暂时予以制止；但是，几乎不可能说他扭转了这一衰落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西班牙在发展工业基础中取得任何成就，都以损害法国而不是英国为代价。^[86]

关键问题在于贩卖奴隶（Asiento）条约。奴隶贸易对英国人有厚利可图。此外，贩卖奴隶条约使这一合法贸易有可能“当作一道屏幕以遮掩向西班牙殖民地输入违禁商品”。^[87]在南海公司的主持之下，这种非法贸易至1730年代已变得非常巨大。^[88]“走私贸易成为南海公司经营活动每一阶段中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89]它成为1740年代詹金（Jenkin's）割耳之战的一个主要原因。^[90]走私贸易主要是从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91]它成功地大幅度减少了经由加的斯的贸易。^[92]凡英国人在英国与西班牙美洲直接贸易中未能获取的好处，^[93]他们都从经由加的斯（Cadiz）的间接贸易中得到了，在此贸易中，西班牙最终要用它的美洲金银弥补它对英国的支付亏空。^[94]与西班牙的金银损失相对应的是西班牙国家预算不平衡的长年不断增大，这一不平衡正是源自波旁王朝的集权化，它使王室开支从1701年至1745年中增加了3倍之多。^[95]法国在西班牙和世界上抗击英国的努力，使西班牙有一些小小的喘息之地，但是，“七年战争”于1763年结束之时，“法国作为美洲殖民地格局中一个要素实际上被排除了，但西班牙被留下来单独面对未来20年中的英国威胁。”^[96]从1600年至1750或1763年这一漫长时间内，西班牙证明它自己无力阻遏逐渐明显为人所知的西班牙“衰落”之势。

除了他们与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的合法与非法的繁荣贸易之外，英国人与葡萄牙和巴西的合法和非法贸易甚至要更为巨大。^[97]梅休恩（Methuen）条约的诸种影响立竿见影。十年之间，葡萄牙从英国的进口增加了一倍余，而它的出口只增加了40%。这一条约消灭了它的“未成年的”纺织工业。^[98]与之相应的是葡萄牙的葡萄酒类生产在1670年至1710年之间增长了5倍，“汲取了大多数的葡萄牙现有资本，更为重要的是汲取了越来越多的葡萄牙劳力。”^[99]对英国来说，进口葡萄牙酒类的好处要超于法国酒类之上，因为葡萄牙酒类虽然价格更贵，但不必像在法国购买时须支付金银，原因在于英国向葡萄牙出口纺织品。^[100]这可能使英国消费者破费更多钱财，但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却是更好。这

种酒类贸易在实际上对葡萄牙并非是很有利的。除了它对制造业的消极影响之外，这种酒类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为英国利益集团所控制并由它们获取其中大多数利润”^[101]因此，在1760年，法国外交大臣舒瓦瑟尔（Duc de Choiseul）不无理由地说葡萄牙“必须被看作是一个英国殖民地。”^[102]

从价值方面看，酒类出口远远少于纺织品进口，情况依然如此。对英国的贸易亏空平衡迟至1700年尚可说是微不足道，但随后每年增加100万英镑左右。^[103]葡萄牙可以庆幸的只是它至少还是一个半边缘地区国家。它有自己的殖民地巴西，而且还是一个富裕殖民地。^[104]正是巴西的黄金使葡萄牙能够从1710年之后至18世纪中期平衡它与英国的贸易。^[105]葡萄牙历史学家马丁斯（Oliveira Martins）于1908年尖刻地指出：“巴西的黄金只不过从葡萄牙转手运到英国，用以支付英国供养我们的面粉和纺织品。我们的工业只是歌剧和祈祷而已。”^[106]而在另一方面，英国得到了非常需要的金银，以使它的货币供应适应它在世界经济的总体生产和贸易中不断增长的份额。^[107]而且，英国由此不仅垄断了这个合法的黄金贸易，也垄断了金银走私贸易。^[108]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塞（Charles Boxer）在此中发现了葡萄牙的一个可供安慰之处：“葡萄牙从其海外领地得到的一个好处是，凭借这些领地及获取的资源，它逃脱了苏格兰和加泰隆尼亚所遭受的命运。”^[109]从20世纪的眼光来看，葡萄牙在17和18世纪中依靠巴西本来会是更富裕而不是更贫穷。苏格兰和加泰隆尼亚有复杂的情况，它们后来的工业发展不在此处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它们并没有一个巴西足以使与英国的不平等交易（这对某些葡萄才人集团有利可图）得以发生，而又不招致国内的政治动荡，这种情况也许不会有损于这两个世纪。为之付出代价的正是巴西的直接生产者，但是，在葡萄牙寻求结构性变化的内部压力此时较少。

16世纪，伊比利亚各国曾是光辉的殖民开拓者和金银的控制者，如果它们在17世纪如此可悲地衰落到只是充当西北欧制造业者的输送皮带

的地步，那么，曾在15和16世纪是伟大的工业中心的那些地区又将是如何呢？欧洲的后背脊骨——意大利北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的）尼德兰南部也衰落了，而且是戏剧般的衰落，但是，是以一种不同方式走向衰落。它们没有殖民地，因而也没有金银资源或热带原料去购买进口货物，赖以生存的唯有它们自己的工农业，以及长期积聚培育起来的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专长。

它们求取生存的关键是分发加工包销制（*putting-out system*, *verlagssystem*）。以下的特色基本上确定了这种体系。实际生产者在自己的住所以自己的设备进行工作。他使用他自己的工具。他或者是拥有几个学徒的师傅，或是自己单独地工作，或是在小家族集团中工作。他从一位商人企业家那里接受必要的原材料用以完成他的加工生产任务，后者则有权以固定价格“收购”加工产品并负责将产品运往市场。如果生产者是单独工作或在小家族集团中工作，他通常只是部分时间工作，并将此生产活动与一些其他经济角色结合起来。这种体系的经营经常导致生产者长期向商人企业家负债，这种情况类似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中盛行的债务奴役。

分发加工包销制在中世纪时就已经闻名于世了，但是，它在16世纪才得以首次广泛传播开来，并且主要是在那时的城市工业之中。^[110]这种体系经常与纺织工业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在几乎一切工业生产中都被得到运用。^[111]17世纪的停滞时期中，这种体系要比在16世纪有甚至更多的传播运用，但有一个重要的改变之处。在欧洲各处，加工包销工业都纷纷迁往乡村地区。其中主要动机是增加商人企业家的利润收入。布罗代尔（*Braudel*）告诉我们：“无论在何处，只要引进了加工包销体系，它就是于行会的一个打击。”^[112]然而只要生产过程仍留在城镇中，行会就处于能够在此体系之内予以反击的政治地位上，在好年头时尤为如此，其手段是通过合同调节商人企业家与工匠生产者之间的关系。^[113]

一旦工业设置在乡村地区，商人企业家就逃离了行会，^[114]摆脱了行会工匠，代之以农民，他们“是廉价的多的劳动力。”^[115]处于乡村还可以确保劳动力在地理上的分散，减少了工人组织的风险却又同时仍由少数几个大商人企业家集中控制分配。^[116]克伦本茨（Kellenbenz）强调说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体系绝不是静态的，^[117]而是仍对经济形势的演变做出反应。它的演进方式之一是使工人对商人企业家的持久依赖日益扩大。^[118]特别是在半边缘地区国家，这种体系的另一个特点应当予以注意。它经常是掌握在外国商人企业家手中。握有霸权的荷兰人无处不在：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城邦国家；在勃兰登堡、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在莱茵河地区和北意大利。但是在这些地区，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其中许多地方安营扎寨。17世纪时，如意大利人那样的老企业集团发挥一种业已削减但仍很可观的作用。“少数”外国集团却也繁荣发达起来了：如在德意志诸国、北美洲、瑞典、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集团；遍布各地的犹太人；一些重要的德意志地区中的门诺派（Mennonites）教徒。^[119]

就像官职买卖和使用雇佣军队标志着国家雇佣的官僚制度化的启端那样，加工包销制标志着同样方式的无产阶级化的开始。在加工包销制下，直接生产者形式上拥有生产资料，但在实际上变成了商人企业家的一名雇员，商人企业家无须为了确保他的最大效率而在工作地点直接监督，就可以控制他的实际收入并占有他的剩余价值。^[120]（以此类推，国家官僚制度的情形亦是如此）。半边缘地区国家加工包销工业这一事实，正是使它们自己在此时区别于边缘地区的标志。半边缘地区加工包销工业趋向于部分地处在外来集团控制之下，因而难以拥有保护主义立法保障的这一事实，又是使它们自己在此时区别于核心地区的标志。加工包销体系就是孟德尔的那个众所周知的术语“原始工业化

（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描述之物，^[121]不过，我并不认为把这种工业化看作是“原始的”（proto，意味着它并不是真实事物）会有什么用处。相较于工厂制度，加工包销制效率较为低落，但在事实上更能剥削

利用劳动力，^[122]因此，它对一个相对停滞的时代来说是合乎理想的。

17世纪中，欧洲的后背脊骨地区的旧工业全都经历了一次衰落。这在意大利北部尤其具有戏剧性，但在实际上是德国各地和尼德兰南部的实情。罗曼诺（Romano）以一种惨淡的眼光看待意大利北部的情形，将其概括为四个趋势：一、城市人口的衰落（并非是所有城市）；二、传统中心地区（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以及那不勒斯）的工业生产的衰落，特别是在更廉价的纺织品生产之中；三、经销行业的衰落；四、价格下跌、流通货币减少，但是工资却相当稳定不动（导致失业，因而又导致贫民和流浪者数量增多）。因此，罗曼诺称城市经济在1620年至1740年之间处于“一种极端萧条状况中”。此外，他还提到了“意大利农业经济的普遍退化。”^[123]他认为意大利无疑是17世纪中生活在“衰退阴影”之下的大多数人的一部分（不过，不同于英国、荷兰联合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法国的人们）。^[124]在罗曼诺看来，意大利因而错过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复兴机遇”，如它在14世纪曾有过的那次机遇那样，因为它的“整个统治阶级愿意顶住”危机，并且“熬过了漫长的黑夜”，虽被削弱却依然无损。^[125]普罗卡西（Procacci）抨击了关于这种错过了机遇的一厢情愿的说法；^[126]塞拉（Sella）也抨击了这种经验主义描述，认为它言过其实了。塞拉相信至17世纪之末，意大利北部的工业“远非贫瘠不堪”，其制造业产品在出口贸易中仍有“一席可观之地”。^[127]此外，他认为农村〔至少是在伦巴底（Lombardy）〕的情况还要更好一些——17世纪的发展经历是面对逆境磨难所做出的卓越非凡的坚忍、适应和恢复力。^[128]

在关于德国西部和南部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混合评价。早在19世纪，施莫勒（Schmoller）强调说该地区从1600年至1750年“无条件地依赖于”荷兰。^[129]本廷引用的一份1770年的资料表明此时的法兰克福“只不过是一个大仓库，由荷兰人控制。”^[130]安德森（Anderson）提到了一种“受挫折的莱茵河经济”，^[131]是荷兰人控制了它的出海口的结

果。库斯克（Kuske）认为从16世纪之末开始在莱茵河地区出现了一个“消极迟钝的时代”，^[132]而利贝尔（Liebel）则描绘出17世纪诸次战争对斯瓦比亚（Swabia）的帝国城市——奥斯格堡（Augsburg）、乌尔姆（Ulm）和纽伦堡（Nuremberg）——所带来的“摧毁性影响。”^[133]基许（Kisch）甚至谈到了“相邻的荷兰所发挥的活跃影响”，^[134]认为可以由此解释为什么莱茵河地区能够“逃脱”17世纪中沉重打击了德国大多数地区的“不景气萧条”。^[135]

当我们转而讨论尼德兰南部时，我们发现同样的争论。我们看到有皮朗（Pirenne）的传统观点——经济衰落，产生于斯凯尔特河（Scheldt）的被关闭和西班牙人与奥地利人都无力施行保护主义措施。^[136]斯托尔斯（Stols）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观点，认为佛兰德人（Flemings）即便是在17世纪中与西班牙人继续保持了联系，也未能像荷兰人那样获益，因为西班牙人怀疑他们可能有亲荷兰情绪。^[137]在另一方面，布鲁勒兹（Brulez）坚持认为17世纪中安特卫普的情况“不是我们今日所认为的那么坏”。^[138]他就此解释说安特卫普仍继续发挥了作为一个商业贸易交往之地的作用，人们在此做出关于欧洲贸易和商业买卖的决定，法兰德斯商人凭借他们久已取得的商业联系从中获利。^[139]

因此，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关于此时这些地区的实际经济结构我们知道些什么。在意大利北部的中心地区，城市工业的衰落的确是清楚无误的。转折点应当是1619年还是1636年，尚属有争议之事。^[140]无论怎么说，米兰的呢绒生产从1619年有六、七十家企业年产15000匹定呢布，降至1640年只有15家企业年产3000匹呢布，1682年只有5家企业，至1709年只剩下1家企业年产100匹呢布。^[141]布费尔蒂（Bulferetti）将此衰落归因于17世纪中的法国重商主义，认为是它对伦巴底（Lombardy）和托斯坎尼（Tuscany）的制造业和手工业活动给予了“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也抱怨工人抵制了技术革新。^[142]马德莱那（De Maddalena）还补充说事实上，1706年米兰合并于奥地利帝国可以看作

是“长期下坡路趋势”最后的“扩大”。^[143]伦巴底已从西班牙控制下摆脱出来，也“被降到了绝境之地”。^[144]热那亚的毛纺工业^[145]以及威尼斯的各工业部门也是如此。^[146]利贝尔（Liebel）说在符腾堡（Württemberg），“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最有中产阶级气息的地方”，出现了手工业的衰落，特别是在毛纺和亚麻织布中。^[147]

至于瑞士人，他们看来把非做不可的事情装扮成一种善行，而且把他们与法国的特殊联系化作半边缘地区化的一种机制。这种特殊联系的起源始于16世纪中瑞士人提供雇佣军队的角色，瑞士政府常用佣兵来讨价还价以换取法国的关税豁免。因此，法国市场变成了“瑞士工业的主要兴奋剂。”^[148]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尽管有此特殊联系的保障，瑞士人还是开创了他们典型的中立立场，这使他们“从德国市场上撵走了法国”^[149]并且以此为基础发展一门出口工业。^[150]然而，在1678年法国合并了弗朗什孔泰（Francé-Comte）地区时，瑞士奶制品工业对这个地区进口盐的依赖加强了瑞士对法国的政治依赖性。^[151]瑞士既然接受了法国的政治保护和经济上的反重商主义，^[152]又成功地发展了自己的钟表制造和奶制品工业，至18世纪之末，瑞士已成为“欧洲大陆上最为工业化的国家。”^[153]

如前文讨论中所表明的，不可能认为欧洲的后背脊骨地区的工业在17世纪中消失了。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工业，特别是毛纺织和棉纺织工业移到了乡村地区。据说，在一切地方都是如此：在威尼斯、热那亚、亚琛（Aachen）、佛兰德、苏黎世（Zurich），以及17世纪后期甚至在荷兰。^[154]在每一实例中，降低高工资成本（它产生于城市行会的强大势力）都被当作一个重要动机。在另一方面，奢侈的丝绸工业继续在城市中繁荣发达，城市里的丝绸工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工厂。^[155]在此时期，另一个得以扩大的城市奢侈“工业”是艺术品的生产和出口。^[156]在乡村地区，我们发现就在相同时间和地方有一种恶化对农民的剥削和创立加工包销工业的发展趋势。17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有对公共土地的侵

占。^[157]贝尔特拉米（Beltrami）认为在泰拉菲马（Terraferma）地区的贵族财产“从此具有真正的大领地庄园的特点。”^[158]1633年，威尼斯的元老院明确禁止农民移往他乡异地，甚至农民不带走其牲畜和生产工具也不许迁移。博雷利（Borelli）就此问道：“人们怎么才不认为……农奴制以更为现代的形式重新复活了呢？”^[159]

整个17世纪中，由于地主对农民的权力在意大利北部得到加强（这是“下降的”半边缘地区化的一个结果），由于国家的权力在易北河以东地区（Elbia）得到强化（这是“上升的”半边缘地区化的一个结果），这两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变得更为相近了，以至于至18世纪初期时，皮埃蒙特（Piedmont）和勃兰登堡—普鲁士，未来的意大利和德国的形成单位，表现出若干显著的相似之处。^[160]相似的发展看来也出现在尼德兰南部〔和列日（Liege）〕，在这里，大地主的权力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得以增强，而农民却失去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佃农地位变到了交租人（sharecropper）的地位上。^[161]关于德国南部和西部的文献资料经常强调的是农民保有对土地的控制权的程度；^[162]然而，不应当忽视这些地区农村结构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德国学者们创造了一个新词：经济统治（*Wirtschaftsherrschaft*），用以表示介于传统的地主统治（*Grundherrschaft*）和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庄园主统治（*Gutsherrschaft*）之间的新型结构。^[163]如早先曾提及的，“经济统治”是流行于中欧更多的半边缘地区的一种制度。

一个地理地区内的衰落，通常意味着该地区的资本持有者开始转移其投资场所，因此，地理范围内的集体性衰落并不意味个人或家庭的衰落。资本转移有两种形式——一是转移到具有更好经济前景的地理地区，经常采取有形转移的形式，二是在同一地区内转移到利润更高的生产单位，经常是由于剥削率更高的缘故。在17世纪停滞时期，一个地区之内的资本转移采取投资于土地的形式。欧洲后背脊地区中的资本家此时从事于这两种转移活动。银行业经营活动逐渐从诸如热那亚这样的中

心迁移到了阿姆斯特丹，^[164]而且工业艺人也移民国外——佛兰德人移往英国，德国人移往荷兰，威尼斯人移往里昂，诸如此类等等。拉普（Rapp）颇为正确地坚持认为这些工业艺人并不是去追求更高的报酬，因为他们毕竟是从高工资地区向外迁移。这种迁移运动反映了小资本家的一种“企业人才大出走”，他们冒险移居国外在“获取巨大利润”。^[165]

关于此时的资本从工业转移到土地，已有研究并且大多集中于意大利北部地区，或许这是因为此种转移最富于戏剧性地发生于此地。布费尔蒂称此转移为“土地上的安全投资”，^[166]但是，这给人以一种错误印象，我是这么认为的。伍尔夫提醒我们注意皮埃蒙特的证据“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时期中新旧地主“地产管理的有效方法”。^[167]塞雷尼（Sereni）谈到了意大利农业改良的“相对的持续性”，并表明它从16世纪延续到18世纪，“农业中有一种商业性发展，（17世纪的）经济萧条也未能大到足以打断它的程度。”^[168]很清楚，在羊毛工业处境不妙之时，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农业对于一位企业家来说是一个明智的投资之地。意大利北部的食物供应具有更大的自给自足性，加之在其他未占用土地上种植“稻米的发展”，^[169]成为世界性大宗食物生产过剩的一部分，正是这一生产过剩导致了17世纪中东欧地区谷物出口的急剧衰落。

意大利北部的资本还找到了保护自己的其他途径。其一是*Commenda*（或*Commandite*）的兴起，它是有限责任合伙制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在托斯坎尼（Tuscany）的丝绸产业中兴起，席尔瓦（De Silva）认为我们应当将它视为“资本的一种集中化形式。”^[170]其二是包税制（*appalti di gabelle*）的兴起，它与国家贷款相联系。^[171]在一些人们看来，17和18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国债的增大，充当了“使资金源源不断地从生产活动中外流的排水管道。”^[172]或许是的，但是，资金流入谁的手中？首先流入了那些发放这些贷款的企业家手中——于是，衰落是集体的，个别的资本家却幸存下来（甚至兴旺发达）。

现在，让我们转向那些发现17世纪长期停滞是一个机遇时刻而不是衰落的非中心地区（noncore areas）。其中，瑞典位居榜首。瑞典是一个较为次要的国家，1599年西格蒙特（Sigismund）被废黜和查理（Charles）（后称查理九世）当上摄政王之时，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落后状态。然而到了1697年和查理十二世登位之时，瑞典已变为欧洲的一个巨大的军事强国和相对来说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如此一种转变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世纪后期，斯德哥尔摩不过被列为汉萨商业同盟的一个城镇，而且一般而言，至17世纪时，瑞典“所据有的地位几乎就是一个德国殖民地。”^[173]尽管这种情况在瓦萨（Gustav Vasa）（1523至1560年）统治时开始发生变化，但迟至1612年仍有要求将德国人从市政官职上排除出去的政治呼声。^[174]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行会从未在瑞典深深扎根。它们是“从德国传进来的异乡之物”，就其存在的范围而言，也只是局限于斯德哥尔摩。^[175]

约在17世纪中期某时，贸易量开始增加。德国的垄断被打破，荷兰和苏格兰的贸易得以进入。外国纺织品的进口扩大了。^[176]瑞典的出口也增长了，尤其是以矿产品为重要出口产品。^[177]边缘地区化的过程看来在发生，然而结局却是不同于东欧。^[178]众所周知，在瑞典农民在法律上是非常强大的。等级（Estates, stand）这个术语是16世纪中叶在埃里克（Erik）十四世统治时期首次进入瑞典普通用语，^[179]议会（parliament, riksdag）这个术语也是如此。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才在1617年由议会枢密委员会最终确定了关于这两个议院的安排，瑞典带着独特的四个等级出现了，这第四个等级就是农民，其定义是拥有自己的农场的那些人们。^[180]我在前文中将此奇特之处解释为瑞典农业经济虚弱的结果，归因于土壤和气候的原因，这意味着贵族们认为：在欧洲的世界经济的16世纪扩张中使土地关系“（再次）封建化”，相对来说几乎无利可图。^[181]结果，贵族利益并没有如东欧大地主们反对其统治者那样去直接反对瓦萨王朝建立国家的中央集权化。^[182]

17世纪，经济衰降的最初迹象出现时就打击了欧洲，此时，像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1611至1632年在位）这样的强有力人物就能利用危机进一步强化瑞典国家政权，并发动一场经济变革。他调动瑞典的人力、物力去进行“三十年战争”。他增加税赋并使之以硬币支付。他创立了包税制。他从普鲁士挤榨出金钱（即所谓的普鲁士特许证或港口费）。他还创立了皇家专卖权，在盐和谷物贸易中失败了，却在铜和铁的贸易中或多或少成功了。简言之，如罗伯茨（Michael Roberts）所概括的：

瑞典在瓦萨（Gustav Vasa）统治之下原有的边缘性和原始不开化的地位……现在都永远地抛弃掉了；在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统治下，瑞典的经济利益完全变为欧洲性的了，他在经济事务中的政策符合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模式。[\[183\]](#)

在许多方面，其秘密就是铜。“铜是穷人的黄金”，[\[184\]](#)而最需要铜的那个穷人就正是那个富人西班牙，它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16世纪的白银资源。卡斯提尔为了保持住哈布斯堡王朝在尼德兰的统治所造成的财政紧张，使勒尔马（Lerma）公爵（他又使菲利普三世的政府）下令于1599年铸造纯铜的维农（Vellon）货币。由此开始了西班牙的巨大的通货膨胀，源于这一事实：“对于一个连年破产的政府来说，这种以钱赚钱的诱惑实在是强大了。”[\[185\]](#)17世纪中，维农币发行时断时续，不断贬值，直至1686年通货膨胀被遏制住才告罢休。[\[186\]](#)

西班牙是这种铜币贬值的主要牺牲者，又因而是扩大世界铜需求量的主要促进者，[\[187\]](#)尽管如此，它并非是唯一的牺牲者。1621至1623年，是德国的通货膨胀时代，而且在1607至1621年，有大量的法国铜币铸造。[\[188\]](#)1625年，瑞典本身也进入铜—银本位制。[\[189\]](#)此外，货币并非是铜在那时的唯一用途。在荷兰生产水壶和黄铜器具也需要它；而且

自15世纪中叶以来，它还被用于铸造铜炮。铜炮的运用在1600年达到高潮，^[190]随后才在17世纪中让位给铁炮。16世纪时，铜的主要来源地曾是蒂罗尔（Tyrol）、上匈牙利和图林吉亚（Thuringia）。无论这些来源地的衰落是因为耗竭还是因为受到瑞典产量的影响，^[191]瑞典都迅速地成为欧洲的首要生产者，铜矿开采也成为瑞典的主要经济活动。^[192]

在此首次的巨大跃进中——它始于阿道夫统治之时，在克里斯汀娜（Christina）女王时奥克森谢尔纳（Alex Oxenstierna）的治理之下继续发展——与荷兰的联系至为重要。我们可以谈论瑞典的经济发展大部分（至少至1660年）是在“荷兰的支持下”取得的，就像德弗里斯（De Vries）所说的那样；^[193]但是，这里有一点儿分歧。特罗伊厄（Treue）更为谨慎地表述这一现象：“在世界历史方面非常富有趣味的是……瑞典在其生存斗争和成为一个伟大强国的复杂岁月里，有荷兰和汉堡的国际商人和企业家站在它的一边。”^[194]正是阿姆斯特丹（还有汉堡）购买瑞典的铜，既是为了铸币而再出口，也是为了“供应尼德兰各城镇中许多用铜的工业”。^[195]我们看到在阿道夫统治之下外国投资（主要是荷兰和佛兰德人）的开始，以及瑞典采矿和冶炼工业中有大量外国管理工作者直接参与。^[196]大量的荷兰资本涌入，其条件是“以铜作为有效的偿付”。^[197]偿还国际债务的那种令人熟悉的模式正在占上风。

1619年，阿道夫创建了瑞典贸易公司以求控制瑞典铜的市场销售，旨在力图消灭这种外国威胁。^[198]这位国王寻求使结构变化与更大的短期收入的财政利益结合起来。最初的特许状授予该公司以垄断专卖权，其条件是三年之中在瑞典建立炼铜厂和铜器工厂。该公司欢迎外国资本，实际上，它也成功地吸引了外国投资。该公司试图离间汉堡和阿姆斯特丹两个市场以便从中渔利，但是，世界铜市场突然下跌，至1627年，该公司就解体了。这可能是荷兰资本家操纵的结果吗？我们确实知道特利普（Trip）公司作为瑞典铜业的一个主要投资者，也同VOC（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系，于1624年从日本订购了铜。1626年和1627年，

特利普（Trip）公司收购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日本铜。我们还知道1627年后特利普（Trip）公司又给予瑞典人以新的贷款，还是以铜作为偿付，并由此重新创立了阿姆斯特丹铜市场。[\[199\]](#)

这一旨在使瑞典摆脱荷兰人去赢取经济独立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但也不会使我们过度相信，如果我们还记得科克因（Alderman Cockayne）的计划的的话，那是一个相类似的英国人的失败，大约发生于同一时间（1614年至1617年）。我们所正在讨论的毕竟是荷兰人的霸权时代。关于阿道夫，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倒不是他无力胜过荷兰企业家，而是他成功地建起瑞典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所达到的程度——这两大力量并肩发展，如诺德曼（Nordmann）所说的，瑞典在17世纪中已是“一个手持刀枪的国家，以战争为生，并将战争当作其国家工业。”[\[200\]](#)阿道夫是他那个时代中首要的军事革新家。他采纳了荷兰将军摩里士的组织方法，加以改进，创造出一种欧洲军队模式一直沿用到法国大革命之时。他强调要重视训练和纪律，他所做的战术改革向所有军队重新强调要重视进攻行动。或许，他最为重要的革新在于他的军队是由武装农民组成的。“它的先进性”，诺德曼（Nordmann）认为，“正在于它是一支国家军队，而不是一支佣兵军队。”[\[201\]](#)

我们不要忘记，佣兵是16世纪的重大进步。阿道夫不能一下全部摆脱佣兵，但是他降低他们的作用。他能够利用瑞典封建传统的薄弱，也能利用中世纪重装甲骑兵从未在瑞典被采用，这部分是出于地形的考虑，部分是因为农民的力量（这部分地也是国土条件的结果）。

在这里，早期的德国军事传统要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得到更多的坚持；胆敢攻进瑞典森林之地的入侵者都会受到人民大众的武装队的迎击，主要是采取徒步和三五成群的战斗，如果地面开阔，他们就以大量的非正规集群进行战斗。[\[202\]](#)

这种征募来的军队以地方团队为基础，地方团队偏爱工匠和青年农

民，而且与当时的其他军队不同，拒绝招收“卑贱者”。有一个分配各家各户纳税款收入的分权系统，负责向这支军队定期支付薪饷。建立了中央服装兵站。武器和弹药一律统一标准化，以及极为重视炮兵。

阿道夫建立了军火工业，以便瑞典能够自给自足。^[203]他的军事组织具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将其很大一部分开支费用转嫁到瑞典国外。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德国特许证，作用在于筹资用以资助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军事行动。该特许证由阿尔特马克

（Altmark）停战协定授权颁发，是波兰和瑞典于1629年签订此项停战协定。这些特许证允许瑞典在勃兰登堡和库尔兰（Courland）的港口征收捐税，以及在最有价值的格但斯克港征税。其收益颇巨，相当于瑞典有案可稽的战争费用的大约20%。这些特权于1635年结束之时，又在斯图姆斯多夫（Stuhmsdorf）条约中重新规定有权在立沃尼亚（Livonia）征税。^[204]实质上，瑞典正在从由东欧转往西北欧的剩余价值中获取一份，并将此用来为它自己创立一个半边缘地区的地位。

这支军队是这个正在兴起中的半边缘地区国家的重要工具，但是，其报偿却是在工业化之中——而且铜并不足用。17世纪中，铜作为瑞典矿业和工业生产的中心让位给铁，铁取代铜作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不仅用于炮兵，^[205]也用于家庭器具。^[206]然而，从瑞典的利益角度来看，铜与铁之间的差异在于瑞典拥有当时世界铜矿中一个不相称的份额，而铁矿却是广泛分布于欧洲。作为一个铁生产国参加竞争，瑞典无法指望拥有对铁矿的垄断，也无法指望独有的生产技术。然而，瑞典非常有效地进行了竞争，利用了一点儿资源幸运并将此幸运变为一种社会经济优势。这个幸运就是瑞典的铁矿含铁量“具有非同寻常的高纯度”，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一点造成了很大的差异，使瑞典具有一种“极为强大的边缘地位”。^[207]瑞典在生产中“重视质量”，^[208]正是17和18世纪中瑞典铁的主要销售要点。

瑞典的铁矿开采可上溯至12世纪。即使在那时，瑞典铸铁的优良质量就已闻名于欧洲了。^[209]16世纪前期，低价的铸铁出口给德国经锤炼制成高价的条铁，首先为此感到恼怒的正是瓦萨（Gustav Vasa）。为了结束这种资源外流，他引进了德国技师并建立了瑞典的锻造厂。不过，继续生产出来的铸铁仍多于条铁。直到1600至1650年之间，铸铁占产量的2/3，此后的比例才彼此产量平均。一门炼钢工业开始兴起。从生产铸铁转而锻造条铁需要大量投资，国王提供了其中许多资本。继之，这种投资又要求扩大矿山以及对拥有大量矿藏的遥远地区实施相应的殖民化，如对韦姆兰（Varmland）这样的地区。^[210]至此时，瑞典铁业有吸引荷兰企业家的足够重要性了。1580年代，维伊克（Willem van Wijck）就已取得了在厄普兰（Uppland）的皇家矿山的租借权，并享有铜专卖权中的一份利益。在阿道夫统治下，国家放弃了自己的直接管理，而且随着军火工业的兴起，外国资本也变得更有兴趣了。17世纪初期，一个名叫吉尔（Louis de Gerr）的荷兰人发挥了一种极重要的作用。^[211]虽然该工业的控制权在国家和外国企业家之间反复易手，这一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共存现象而不是相互冲突。

诺德曼（Nordmann）谈及铁业生产的起飞和“第一次工业革命”。^[212]国家鼓励铁业生产，也是首要的铁消费者，用铁制品作军事装备。传统的小制铁业者的作用得以保留——此即鼓励铁矿开采和生产生铁——尽管同时拥有大型铁工厂的外国企业家“得到了精制生产的垄断权以及得到廉价原料和半成品的保障”。^[213]在这些大型铁工厂中，劳动力主要是从瑞典的边缘地区招募来的人们——芬兰人和谷物歉收的瑞典地区的农民——以及逃避兵役者和逃犯。简言之，向外国企业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214]保留给小制铁业者的作用并没有构成瑞典企业家的幸存空间，大为相反的是，这些小制铁业者通过加工包销制负债于外国的商人，由此降到了半无产阶级的地位。瑞典的铁业发展经历了类似于欧洲纺织业的一般发展经历：

外国进口商将预付款交给斯德哥尔摩和哥特堡（Göteborg）的出口商，出口商又依次向铁器制造商提供信用贷款，铁器制造商作为这一连锁网的最后一个环节又将预付款交给工人。……所有各方都受缚于他们的债权人，……工人通常以商品的形式从制造商的商店里提取他们的贷款。这是几乎不可能避免之事，因为这种工作通常都处于国家中的封闭隔绝之地。[\[215\]](#)

也许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这些已经予以描述的铜铁生产的情景，是否就是值得夸耀之事，因为这情景中的主题却是外国控制。然而，有两件事必须记在心中。首先，让我们说不同于波兰的是，瑞典的17世纪是新出口工业得以发展的时代。这是除了焦油和其他航海用品出口（更类似于波兰谷物和木材出口[\[216\]](#)）之外的新增事物。第二、瑞典可以封这些外国企业家为贵族，从而最终使这些工业“国有化”。[\[217\]](#)关键要素在于有意识地使用国家机器。实际上，瑞典国家拥有17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中的三个近似的垄断产品：铜、优质铁和焦油。瑞典的国家机器起初是使自己与霸权联系起来，随后又在相互敌对的核心地区国家之间纵横捭阖从中渔利，追求一种当时类似于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218\]](#)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瑞典是那个时代中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它运用此三种准垄断之物去为自己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无此地位，政治和军事的扩张将不会实现。”[\[219\]](#)政治和军事的扩张继之又使之有可能发展转化工业（transformation industries）。阿道夫已奠定了瑞典军事力量的基础，使其后人能够统治安德森所称的“东方之锤”，[\[220\]](#)至少是直至瑞典达到其力量极限之时——1721年，它承认在“伟大的北方之战”中未能获胜。只要荷兰仍是一个霸权强国，瑞典就诸事顺利。[\[221\]](#)1658年的罗斯凯尔德（Roskilde）条约使瑞典从丹麦手中取得了斯堪尼亚（Scania），斯堪尼亚不仅是“波罗的海的钥匙”，凭借它还可以控制桑德海峡（the Sound, Öresund），它在一个世纪之后却变成了瑞典的谷物丰产之地。[\[222\]](#)至该世纪中期，瑞典已取得了爱沙尼

亚（Estonia）、立沃尼亚（Livornia）、因格里亚（Ingria）和凯克斯霍姆（Kexholm），使这一东波罗的海地区变成了“瑞典—芬兰母国的殖民地”；^[223]它还取得了布莱梅费尔登（Bremen-Verden）、波莫恩（Pommern）、哈兰德（Halland）和远西的耶姆特兰（Jämtland）。简言之，唯一可以描述瑞典的波罗的海政策的说法就是称之为“有意识的经济帝国主义”。^[224]与此政治和商业扩张齐头并进的，是波罗的海中瑞典商业船运^[225]和海军舰队船运^[226]的崛起，其规模和重要性都增大了。

创立一个相对而言是强大而又运转有效的瑞典国家机器，取决于控制住贵族势力。由于瑞典此时的阶级结构，也由于瑞典在世界劳动分工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角色，控制贵族势力是有可能办到的。分隔的（*aysöndring*）的王室财产和国家税收与贵族关系的政策早在16世纪即已开始，又在17世纪上半叶加速执行。这一政策“包括了国家财政中相当广泛的历史现象。”^[227]它包括由阿道夫创始的包税之法，也包括以出售和赠与换取军政效劳的方式，将王室领地和自有农的土地上的税收都转让给贵族。^[228]这些办法为君王迅速获取流动资产，也扩大了瑞典经济中的货币化区域；但是，君王所获之利的代价却是上层贵族的政治经济权力的不断增大。这种权力作为法律写进了1626年的“贵族注册法”（后于1644年再次确认），该法将贵族等级的选举权限定给126个注册的贵族家族，由此排斥了贫穷的小贵族。这个“高等贵族以瑞典标准来看是极为富有的，而且可能正变得更加富有——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对于君王都是如此。”^[229]

然而，农民也很强大，而且已经组织起来成为1617年议会枢密委员会（*riksdagsordning*）中的一个等级。实际上有三种农民：王室领地农（*kronobönder*）、贵族领地农（*frälsebönder*）和纳税农即自有农（*skattebönder*）。自有农所纳之税赋大约相当于王室领地农所交之租赋，但是他们自然拥有更安全可靠的法律地位。贵族领地农豁免了国家

税赋，只向贵族纳税，所纳之数约为前两种农民的一半，但是，他们的地位极为不安全可靠。他们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逐走，受制于领主的司法权威，而且每年须有30天为贵族服役。^[230]此外，建立农民等级之时，贵族领地农也被拒之门外。^[231]大体上，尽管这三种农民地位的经济酬报看来几乎没有全面性的差异，但是，人们普遍感到贵族领地农的租地权缺乏保障是“一个很大的不利之处。”^[232]“分离政策”（avsöndring）具有使一些原先的王室领地农变作贵族领地农的效用；这在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法律上，也正是发生在许多自有农身上之事。^[233]数字是戏剧性的。至1654年，贵族所控制的土地已从21.4%增加到63%。^[234]农民起而反对。至1634年，农民等级担心农民正在变为农奴（servitus），“叫喊着要削夺贵族的特权。”一位农民代言人在1650年说：“他们知道在其他国家平民百姓都是奴隶；他们担忧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命运，然而，他们却是生而自由的人民。”^[235]

出售税赋收入以求筹集国家岁入的问题在于：此举饮鸩止渴，解决了一年的预算危机，代价却是使来年的预算危机更加恶化。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瑞典的重商主义努力中包括了用于经常扩张所耗费的沉重军事开支，^[236]而瑞典这个国家却是自然资源贫乏（而且正在耗尽），人口不众（17世纪中叶时约有100万瑞典人和50万芬兰人及其他人）。这就导致了国家财政的“紧张状况”，且贯穿于整个17世纪。^[237]为1655年波兰战争筹款的需要，突然产生了第一次所谓的“归还

（*reduktion*）”，或称将贵族控制下的土地交还给君王。^[238]1655年的“归还”相对而言是较小的一次。在所谓不可转让地区中原先属于王室的土地也被收回了，而且，自从1632年以来“赠送”的其他土地中，确有1/3也被奉还回去。自1604年以来不顾诺尔科平（Norrköping）城的议会关于土地赠送只能依据“封建”条件的三令五申，并以绝对占有形式放弃的土地也依据如此“封建”条件重新划分。虽然1655年的“归还”既不是大规模的，也未得到积极有力的推行，^[239]然而却是一个启端，伴随着贵族人口的增长对贵族施加的压力，逼迫他们去从政府官职中寻求更多

的收入。^[240]

我们已经提到过普鲁士特许证在寻求税源中的作用。它们于1635年完结，又于1637至1679年之间由法国补贴所代替。这些补贴是如此重要，以致阿斯特罗姆（Åström）将此时期的瑞典称之为“实际上是法国的一个卫星属国”，而瑞典军队是“法国在中欧和东欧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直接工具。”不过，法国补助的金额总数少于普鲁士特许证中的总数；无疑，如阿斯特罗姆所观察到的：“宁愿波罗的海贸易受惩罚也不愿依赖法国的补助”，^[241]但是它们聊胜于无。当然，法国人的波罗的海贸易极小，^[242]非常乐意使瑞典成为荷兰和英国的一个潜在商业对手。这种对法国补助的依赖也有“助于高等贵族的利益，这些贵族耗费来自这些补助的收入和来自抵押或出售王室土地的税赋，以此维持他们”穷奢无极的贵族生活方式。实际上，在17世纪中后期——从1632年阿道夫至1670年后期查理十一世（Charles XI）有效掌权之间的大部分时间内，高等贵族们身为国家政务院成员购买王室土地，然后将收入供自己消费。^[243]

“大归还”于1680年到来，从经济角度来解释它似乎也不困难。全面停滞时期中国家开销的增长，^[244]国家岁入流向贵族的增多，^[245]以及法国补助的完结，^[246]共同造成了王室的一场财政危机，接着又由一项政治决策予以解决。君王远比高等贵族拥有更多盟友的事实使此决策成为可能之事。这一决策是连续两个“归还”法令。1680年，议会决议交还所谓的“诺尔科平（Norrköping）决议地产”，即依据“封建”条件从君王手中所据有的地产〔那些价值不足600银达勒（*daler*）的地产除外，因此，更小的贵族们的资产得到豁免〕。1682年，议会又进而赞同中世纪的土地法不仅授权国王可以创立采邑封地，也可以有权取消它们；这在实际上授予国王全权委托使他可以随意处置“归还”之事了。^[247]看来几乎毋庸置疑的是许多土地在事实上转交给了君王，君王变得富裕多了，其所获正是贵族之所失。^[248]此外，其中大量土地后来又由查理十二世

出售给文职官员、中产阶级以及贵族——但是附有这种土地必须变成纳税土地之类的条件。[\[249\]](#)

另一方面，人们不可夸大贵族的衰落。因为在“归还”之前的时期中，除了贵族领地的比例因夺取王室土地和自有农土地而稳步增大之外，还发生有另一个变化。在贵族领地范畴之中，还有一个亚范畴（subcategory）：最高等贵族领地，它是指采邑主的家园农庄，及其相对于由贵族领地农耕种的零散土地的附近土地。尽管后一种土地还须向君主履行一些较小的义务，而前一种土地却是没有任何义务。在实行“归还”政策之前的一个世纪中，最高等贵族领地作为整个贵族领地中的一部分不断增加，这就是说贵族不断集中土地。[\[250\]](#)当“归还”政策实施时，贵族有权利选择归还何种土地。大体上，他们选择归还零散土地而保留下采邑土地，因而仍然以牺牲贵族领地农为代价继续扩大他们的土地集中。[\[251\]](#)

不过，国家从土地“归还”中所获之益仍多于大体上增加了的收入。尤其是它通过1682年修订“派款制度”为筹集军费奠定下一个更牢靠的基础。全国的农庄此时被分成三、四类，从中收取的税款用于支付士兵的军饷，而且士兵可以驻扎在这些农庄的村舍中。军官们则被安置在“归还”中从贵族手中没收充公的土地上。较大的农庄必须供养一名骑兵；沿海农庄必须供养水兵。一个“替代”征兵的制度的意义在于士兵、骑兵和水兵不再从拥有土地的农民中征募，而是从无财产的农业劳动力中征募，这些人“自幼便习惯于服从教俗官长”；军官们则在此时成为“君王的领薪仆从，除军务外不从事其他职业。”[\[252\]](#)这种更为明达合理的制度是因为“归还”政策才成其可能；此前，君王没有足够的农庄去构成这种制度所需的基础。[\[253\]](#)

在国家机器于17世纪中不断强化的程度方面，瑞典国家在非核心地区（noncore areas）中名列前茅。它创建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它抑

制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并将他们引导向为国服务。^[254]它建立了一个具有一些重要意义的制铁工业和一支可观的商船队。它阻止英国，至少是不能立即，接收衰落中的荷兰联合省在波罗的海的诸种特权。^[255]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更不必提及波兰和匈牙利，瑞典国家是很强大的——在许多方面几乎是和法国国家一样强大，尽管还是远逊色于英国国家或荷兰联合省国家。事实上，从英、荷两国的观点来看，17世纪中两个强大的扩张主义军事国家正是瑞典和法国。不过，正在瑞典的力量如日中天之时，它却暴露出来是“一个泥足巨人”。^[256]

以欧洲标准来衡量，瑞典人口甚寡，因而其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小规模。如卢德维斯特（Lundkvist）所表述的：瑞典帝国的资源“不足以长期支撑它的地位。”^[257]在经济上，瑞典跃上了正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衰落下去的地位——介于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中间人地位。瑞典不仅从它在波罗的海所处的战略位置中谋利，也从17世纪中东欧边缘地带深化了的虚弱状态中谋利。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从一个波兰人的角度观察，认为瑞典是一条寄生虫：

17世纪中，瑞典既得益于其邻国的工业落后，也得益于邻国政府的软弱（这是贵族权势巨大增长的一个结果）。最终是瑞典像寄生虫那样寄生在其邻国虚弱之上，而且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虚弱，瑞典才在波罗的海地区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达一百年之久。但是，瑞典随后又不得不让位于俄国。^[258]

而且在俄国之后，又加上了普鲁士。

1696年至1697年中，在“北方战争”开始之前，芬兰已深受饥荒之害并损失了大约1/3的人口。然而，芬兰国家却没有强大到足以阻止斯堪尼亚（Scania）市民将粮食运出王国之外。^[259]此外，瑞典作为中间人的角色不仅首次受到核心地区强国的打击，也受到俄国——商品流通链

环的另一终端——的打击。在整个17世纪试图将俄国纳入世界经济的努力中，[\[260\]](#)英国、荷兰联合省和瑞典充其量也只是取得有限的成功。1695年，沙皇彼得一世（Peter I，即彼得大帝）取得了俄国的统治权力，随之开始了他的伟大的改革运动和“西方化”，其中包括他对西欧的访问（他在西欧主要是学习造船），于1703年建立圣彼得堡城（使之成为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港口），以及他对瑞典发出的挑战。从整个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彼得的努力也许可认为是企图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但是，俄国是作为一个半边缘地区而不是一个边缘地区（波兰曾是如此）去参与其中。欲要实现这一目标，打破瑞典的中介作用就成为关键之举，虽然仅此一举明显不够。瑞典也如彼得一样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瑞典沿东波罗的海地区所进行的征服，有足够理由认为是它的强国地位需建立设防堡垒，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捍卫”。[\[261\]](#)

波兰—萨克森国王奥古斯都二世（Augustus II）发起了对立沃尼亚（Livonia）的进攻，由此开始了1700年爆发的“北方战争”。彼得参战。为了寻求利用这个机会击破俄国人，瑞典抵制了停战企图，[\[262\]](#)但是，它又决没有强大到足以击败俄国军队。彼得运用了焦土撤退政策，这种焦土政策命中注定是俄国防御入侵的经典之作；最终，在1709年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后勤问题加上冬天的降温导致了瑞典人的灾难。[\[263\]](#)诺德曼（Nordmann）认为：查理十二世的政治帝国主义政策“破坏了”由查理十一世（Charles XI）所建立的“平衡”。[\[264\]](#)这平衡是什么？查理十二世的帝国政策所带来的内部耗费太大，无法为瑞典人民所接受；早一个世纪中，查理五世（Charles V）在卡斯提尔（Castile）所破坏的也正是这一同样的平衡。“派款制度”曾创造了“税源与开销项目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265\]](#)而就在此法或多或少平衡了国家预算之时，要在场长期战争中，尤其是没有外国资助和兵员的情势下，去维持住这种制度是一件困难之事。”在“北方战争”中，8万军队“有大部分不得不从帝国心脏中征集”；而且，一旦俄国人真正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瑞典除了放弃游戏别无选择。”[\[266\]](#)

去辩论继续进行战争是不是查理十二世一方的错误判断会有什么意义吗？这是否就是招致灾难的过分自信？很难说，因为瑞典几乎没有选择余地。^[267]在一定意义上，瑞典的恐吓就是它的力量；但是，一旦它的恐吓面临摊牌，它的地位就被“革命”了。^[268]1721年，瑞典丢失了立沃尼亚、爱沙尼亚、因格里亚（Ingria）和卡累利阿（Karelia）——东波罗的海地区的绝大部分——它们落入俄国手中。瑞典还将它在德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普鲁士。瑞典因而损失了土地、人口、国家税收和对它的“面包篮”的控制^[269]——而最重大的损失则是它失去了在波罗的海的垄断地位。^[270]由于瑞典巨人的力量在于它是一个准垄断

（quasimonopoly）国家，这次“德意志—斯拉夫攻势”成功地使瑞典降为二流强国。^[271]瑞典内部的结局更是戏剧性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专制主义让位给议会自由。1718年至1772年这段时期在瑞典以“自由时代”著称。^[272]1680年至1682年所达成的重要妥协包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由新、旧贵族及中产阶级组成的政治经济结合体，“自由时代”圆满完成了这一妥协，其方式正好是英国1688年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和沃尔波尔时代圆满完成英国革命的另一方式。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在18世纪中，英国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霸权强国，而瑞典却遭受失败，未能变为一个企望最终取得中心国家地位的强大的半边缘地区国家，因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因此，英国在一个事实上的一党统治下享有稳定，瑞典却公开表现出极精巧的两党杂耍把戏中的中产阶级内部争吵。

在“自由时代”最初的岁月中，瑞典的关键性难题是国家的破产。霍恩（Arvid Horn）伯爵所领导的政府致力于和平^[273]和“温和的重商主义”。^[274]1738年出现了一个“高帽党”（Hats），主张强烈的重商主义并推翻了霍恩（Horn），但是该党在实质上仍继续推行同样的政策。^[275]“高帽党”执掌政权直至1765年，才在英国取得世界性胜利之时由其反对派“无沿帽党”（Caps）取而代之。“高帽党”的政策是亲法国的，主张重商主义和通货膨胀，他们代表了大出口业、制铁业和纺织业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瑞典人穿瑞典衣”。“无沿帽党”的政策是亲英国

的，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通货膨胀；他们代表了进口业、小商人和工业家的利益，将自己表现为无特权社会阶层的激进党。^[276]但是，在此游戏后面的真实选择会是安德森（Anderson）所称的“腐败的贵族议会制度”吗？^[277]或许并不比波旁王朝西班牙好多少。“北方战争”对瑞典来说就如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对于西班牙：是旨在突破世界经济强力给它的结构性限制的一个尝试。两国的努力都未成功，但是，此举也许阻止了发生更恶劣的事情。

只要英、法两国争斗谁胜谁负尚未完全分晓，这就是说直至1763年，瑞典（就像西班牙那样）仍可以施展其策略进行斡旋，并且得到一个大于其力所能及的角色。^[278]由于法国在最后阶段的抵抗，瑞典的算账时刻延后了，而在1763年至1815年这段时期，此时，英国开始算总账了。瑞典如其经济能力许可那般地强大。将瑞典比于丹麦就可以看出其国家机器的力量几乎与国王原来的权力并无什么牵涉。丹麦是一个专制主义比瑞典更早、更悠远，但也远为虚弱的国家，反映出丹麦的边缘经济角色，相形之下，瑞典的政策就使瑞典能够扮演半边缘地区角色。丹麦经常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星座”，^[279]无法适用于现代欧洲早期时一切劳动分工的普通模式。在第四章中，我们表明我们认为丹麦是边缘地区的一个部分，边缘地区主要是出口低工资成本商品，就丹麦而言是出口谷物和畜类。不过，与17世纪大多数其他边缘地区不同，丹麦于1660年创立了一个专制的君主制度。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一政治变化并不足以使丹麦像瑞典和勃兰登堡—普鲁士那样，迅速进入半边缘地区国家之列，还必须解释为什么竟会发生这种变化。

丹麦的经济结构是怎样一方面与东欧的相比较，另一方面又与瑞典的相比较？彼得逊（Petersen）强调丹麦对东欧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因为丹麦既出口谷物也出口畜类，这意味丹麦在困难时期有更大的灵活性。^[280]这一点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第一阶段的欧洲衰退（1600年至1650年）对丹麦的影响小于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实际上，对于丹麦

在世界市场上的利润来说，1630年代和1640年代初期却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夏天”。^[281]丹麦贵族的极端封闭再加上豁免税赋使他们能够在此时期稳步加快土地的集中。^[282]然而，国王本人就是一个特大地主，^[283]这一点再加上他有能力在“三十年战争”中增加桑德海峡税（the Sound Dues），就保障了国王有可观的国家收入。^[284]瑞典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农业不是主要收入来源，主要生产和出口的产品是矿物，如我们已知，矿物是瑞典工业发展的基础。此外，瑞典农业的生态缺陷也强化了农民的社会力量，并且妨碍了任何类似于庄园经济的发展。

在乡村的社会结构方面，丹麦也是极端对立的。丹麦农业的组织包括大领地庄园和四周的农民农庄。农民农庄不仅要向领地庄园交租赋，还要服劳役。这些服役集团即周日工作农民在数量上不断增多，至17世纪中期时已占全部农民的40%：“徭役不仅用于农田耕作，也用于货物运输、建筑、手工劳动，甚至用于港口的货物装卸。”^[285]在同一时期，丹麦商人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德国与荷兰的商人正将丹麦人逐出出口贸易，特别是在从1630至1645年的“印第安人的夏天”。^[286]在1645年“克里斯蒂安诺贝尔（Christianopol）和约”中，瑞典人（与荷兰人携手）强迫减少桑德海峡税，以致王室的税收与从前相比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残渣”。^[287]因此，“三十年战争”的好时光逝去时，^[288]丹麦变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边缘地区国家：它的领地庄园是出口导向型的并广泛使用徭役；它的商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它的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虚弱不堪 [最富裕的土地豁免了税赋；而“桑德（the Sound）税”又微不足道了]。

丹麦君王于1657年对瑞典宣战，旨在夺回失去了的战略—经济优势，当时，瑞典正忙于其他战争。丹麦指望荷兰人给予援助，却落空了。1658年签订的罗斯凯尔德（Roskilde）条约结束了对瑞典的战争，也加速了丹麦的政治危机。丹麦不得不将斯堪尼亚（Scania），哈兰德（Halland）和布胡斯伦（Bohuslän）诸省割让给瑞典，这就是说割让了

桑德海峡的整个右岸地区和临近海峡两岸的通道。^[289]然而，就在同年稍晚，瑞典的查理十世重新开战，企图将整个丹麦并入瑞典，他却很快就面对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反对，他们共同加入了所谓的“海牙协议”（1959年5月11日），这三个中心地区强国在此协议中将和平强加给交战国，并否决了“封闭波罗的海不许非沿岸国舰队入内”。^[290]丹麦得以死里逃生是因为这些核心地区强国打算抑制瑞典。这些强国因此感兴趣的是确保丹麦有税收来源，以便能维持一支足以发挥这种地缘政治作用的军队，而这种作用已明显不再是1657年至1660年时期的那种情况了。

此外，丹麦的国债债台高垒，1660年已在400万皇家达勒（rigsdaler）以上，其中38%的债权属于外国，此中又有1/4属于尼德兰国会，1/4属于荷兰议会，其余则属于汉堡和卢卑克（Lübeck）的商会。因此，荷兰国家和外国私人债主的重大直接利益在于使丹麦国家有能力解脱极为困难的财政窘境，就如约根逊（Jørgensen）所言：

在1660年的宪法动乱和紧随其后的时期中，丹麦的债主们所发挥的准确作用难于确定……但是，在短期之内它一定是对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丹麦的破产原本会是北欧商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极不愿意看到的结局……由于让债主们托管王室土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实际解决办法。^[291]

这就是看起来很难于解释的，突然引入丹麦的专制主义的背景。专制主义意味着什么？它意味君主制已成为世袭的和“无上的”。它意味行政改革——包括建立一个枢密院和对地方官僚机构有更多的直接控制。它意味贵族的封闭性的完结，而且意味增加税赋。简言之，它意味一个既有能力发挥某种作用偿还其外债，又能抑制瑞典扩张的国家。

不过，它会意味着基本经济结构的变更吗？在任何有意义的程度上都不会。贵族依然享有免税权，不过，他们现在被要求从自由农民处征

税用以援助国家。此时，国王可以将他自有的土地出售给新近移居来的德国贵族，这些人立刻就竭力仿效旧贵族创立出口寻向的领地庄园结构。此时，单一经营（是谷物而不是畜类）受到重视，由此减少了丹麦与东欧之间经济结构先前就不大的差异。^[292]三十年之中，贵族拥有的土地数量增加了——其牺牲代价是王室和自由农民。^[293]在另外一方面，农民的经济和法律的地位恶化了，最糟时是1733年的一项敕令规定农民不得离开土地。^[294]对于国家而言，它肯定比以前要有更多的购买力；^[295]但是，就在瑞典强化其本土军队之时，丹麦却放弃了本土军队转而依赖佣军。^[296]在重商主义立法方面做出了一些微弱的努力，^[297]但是丹麦国家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装饰门面，依靠外国利益支撑。丹麦的经济角色依然如故并无改变。实际上，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丹麦在1650至1750年这百年之间更多地变成了一个边缘地区。

尽管有一个外表上的专制君主制度，丹麦仍然是一个边缘地区并不令人真正感到惊奇。远为令人大感惊奇的却是勃兰登堡这个微不足道的边缘地区，竟在18世纪时能够首次变为一个半边缘地区强国——普鲁士，^[298]而且从此后又超过更有可能性的候选国家——北方的瑞典和南方的萨克森与奥地利——并最终将它们甩在身后。对此并没有合理的解释，除非人们考虑以下因素：（1）在作为表示经济力量的国际制度（interstate system）之内有持续连贯的相互作用，以及（2）一些特殊地区能够在历史上的特定时刻发挥经济作用的有效范围（不过，是有限的范围）。从中心地区强国的视角来看，普鲁士得以发展的关键在于拥有一个主要的半边缘地区强国在中欧活动的余地。当瑞典畏缩之时，普鲁士就趁隙而入。我们必须考察的问题正是“如何”和“为什么”。但是，我们将无法理解其中活动变化过程，除非我们预先认识到在同一地区的两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取得普鲁士那样的成功业绩。

17世纪中，在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方面，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地区经历了波兰和东欧的其他地区所经历过的大多相同变化过程。这里是庄园

经济和庄园主统治的地区，相对立于德国西部和南部的地主统治（和/或经济统治）。^[299]大地产于16世纪在易北河以东发展起来，经历了独买独占（经常是强迫买下）土地和将农民逐出土地的过程。^[300]这一过程于“三十年战争”后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301]大为加速进行。徭役增加了，从每周平均二至三天增至六天。^[302]由于土地从农民处落入贵族领主手中，就变成了豁免税赋的土地，这就意味着留下的农民“越发成为沉重负担”。^[303]在哈布斯堡王朝土地上，有着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类似的发展，但是，奥地利本身依然是一个地主统治地区。^[304]如果将易北河以东地区与东欧的其他边缘地区相比较，其农民所受的压迫是相同的，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是更糟糕。^[305]

那么，18世纪的普鲁士是怎样产生的？有一种看法认为尽管易北河以东的农民所受之压迫甚于波兰农民，但其土地集中程度却少于波兰。它更多的是庄园主统治而不是庄园经济。吕特格（Lütge）提醒我们注意克纳普（G.N.Knapp）的警句：“庄园主并不是在经济上变得更富有，而是变得更有权势。”吕特格（Lütge）得出结论：这正是诸侯王公的权势（Fürstenmacht）得以兴起的源泉。^[306]易北河以东地区与其他边缘地区（包括大部分欧洲）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缺乏真正的土地集中，大多数地产只具中等规模，以及因此而来的没有一个“大巨头阶层”。^[307]这意味着与之相对立的潜在的中央权威，容克（Junkers）地主阶级夺取政治统治权的经济能力要逊于17世纪欧洲边缘地区的其他地主们。这一弱点是普鲁士得以兴起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很难说是一个充足条件。不过，它结合了一个有利的地缘政治机遇。

“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前，勃兰登堡选侯“几乎并不比一个超级容克地主强多少”，^[308]处于一块分散且无防卫的土地上，没有丰富的资源或巨大的商业财富，却有“一些在欧洲都是最顽强独立的城镇和最不驯服的贵族。^[309]”“三十年战争”中，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家族的权势

低落至极与它的巨大机遇（部分是由于纯粹的幸运）一度同时而至。^[310]这幸运是勃兰登堡选侯继承了一些旁系土地：1609年的克利夫斯（Cleves）公国（它是位于莱茵河北端并靠近荷兰联合省的一个地区）；1625年的普鲁士（它在波罗的海边，邻近波兰并处于波兰的宗主权治下）；1637年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因此，勃兰登堡发现自己置身于主要战区中的两个：莱茵河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勃兰登堡已获得了为各种欧洲国家“垂涎”的“重大战略”地区，而且“不费自己的一枪一弹”就唾手得之，而在当时它是无力动武的。^[311]此外，各大强国还允许勃兰登堡保有这些令人垂涎的土地。1637年勃兰登堡宣称领有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它还处在瑞典的占领之下，由于法国在威斯特伐里亚（Westphalia）和约中予以支持被承认为是勃兰登堡领地的一部分。^[312]勃兰登堡就以这种方式成为力量均势的首批获益者之一。正是为了抑制瑞典，其他国家才支持勃兰登堡的扩张。也正是为了防范瑞典国王毁掉这一幸运局面，勃兰登堡大选侯威廉才考虑创建一个官僚制度和一支军队用以维持这块扩张了的领土。^[313]

此时，容克地主们也许尚未在经济上强大到足以创建小型军队，尽管他们的波兰同类者能够如此这么做。然而，勃兰登堡选侯也未能有足够力量，正在设法收取税赋去建立一支有足够威力强迫容克地主交纳税赋的军队。^[314]1653年的“大休战”是达成一项坦率妥协的第一步，在此妥协中，大选侯实际上通过国家官僚机器给予容克地主阶级他们全部的地产上收入（记住，并非都是全部）并加上新收入，以此换取有权力去沉重压榨农民和市民。他因而获准建立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用以对外捍卫国家，而且最终是让我的继任者在国内执行一项工业发展政策。（没有容克地主阶级打算或能够阻止它）。如此一种妥协原本应该适合其他地方的王公们——波兰国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王公。但是，为什么唯有勃兰登堡才使它行之有效？让我们审视发生之事。至1653年，主要的税赋是所谓的（军事）捐助，是一种土地税。贵族被豁免此税。在乡村地区，由其他贵族指定的一位贵族负

责从农民处征收地方税，用以缴纳该地区的税赋总额。以此方式得来的国家收入数额相当少。

1650年，勃兰登堡选侯召开等级会议，指望可以说服与会者让他仿效荷兰，去征收货物税（即对商品所征收的一种间接税），无人可以豁免此税。然而，一个中心地区国家如荷兰联合省可以办到之事，对一个边缘地区国家来说却在政治上行不通，即使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既明智又有雄心也不可能。贵族们拒绝投票赞成征收货物税。不过，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应当建立一支军队的需要依然是清楚无误的。于是双方达成了1653年的“休战”，作为一项临时解决办法。选侯在6年中得到额外的50万塔勒（thaler）国税款，但不得征收货物税；而且，他还向容克地主做出让步：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行农奴化。最重要的条款是做出农民为农奴的法律规定，除非农民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会几乎不记得1653年“休战”。它本来也就会是17世纪又一个边缘国家中又一个贵族的胜利而已。但是，1653年的“休战”却是大选侯的“楔形尖刃”，^[315]在后来的1655年至1660年的“北方战争”中显露身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讨论了这场战争，当时，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军事作用如日中天。瑞典击败了波兰和丹麦，阻止了俄国的扩张，又取得了斯堪尼亚，因而也取得了桑德海峡一侧。

勃兰登堡是在何处巧妙适应了这些事件？直至1657年，勃兰登堡还与瑞典并肩反对波兰，此后就在荷兰的鼓励之下反目成仇。从此，它阻挠瑞典吞并波兰，或至少是阻挠吞并波兰沿海地区，而且为自己取得了普鲁士的全部主权。这样，勃兰登堡以限制瑞典的权势力量而效劳于荷兰（以及英国）。勃兰登堡是当时唯一能够这么做的国家，因为它有一支由1653年的“休战”所征之税赋创建的军队。在勃兰登堡内部，大选侯可以将这一地缘政治上的成功化作他的直接优势，这就是为什么认为国家权力得以增大的转折点是“北方战争”而不是1653年“休战”的原因。^[316]去审视大选侯后来的一系列政治举动——各种地区的各种等级

会议、各种各样的命令、粉碎1674年科尼斯堡（Königsberg）的市民反叛——都不如去审视1688年大选侯的统治结束时，正是在“光荣革命”和“九年战争”前夕之时所发生的变化。^[317]

大选侯将枢密院重新组织为一个中央行政机构，又创建了财政、军事和司法三个官僚部门用以执行中央的决策。^[318]这些官僚部门职能广泛，但是其规模在18世纪之中却是“令人惊讶地微小”。^[319]与1640年的100万塔勒（thaler）相比，国家岁入已增至1688年的330万塔勒，^[320]大都用于维持一支领饷的志愿军队，其中部分是外国人。1653年的常备军只有4000人，1688年已增至3万人。^[321]不过，这些官僚部门的权威却止于容克地主的地产大门之外，在容克地产之内的最高统治权属于由容克地主们选举出来的“郡县委员”。^[322]但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却有一个对付地产拥有者的手段，而且是波兰、奥地利、丹麦和瑞典的统治者所没有的手段，这就是几乎没有大规模地产的事实。这一点，再加上时势艰难、^[323]大规模战争破坏，^[324]以及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的贫乏，^[325]就意味着“为普鲁士国王工作是满足物质野心的最佳之道……这就是在17和18世纪条件之下最快和最佳的致富或增加财富的捷径之一。”^[326]由于没有大地产主，这不仅是“最快和最佳的”捷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可行之路。

从此，容克地主们既在自己的地产上勤奋经营，^[327]又期望强化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国家官僚机器用以作为他们的一条必要的就业出路。^[328]这又使国家有可能创建现代官僚机器，并且不必大量运用代价昂贵的官职购买的中介形式。^[329]它既允许保留贵族的某些封闭性^[330]（法国无法这么做），又同时依旧维持了一个节俭和有效率的国家机器。在扩大贵族对农民的“封建”权利和将贵族纳入国家官僚机器中这两个方面，勃兰登堡—普鲁士做到了这一时期中任何欧洲国家所能做到之事。不过，因为容克地产只是中等规模又相比之下较为贫穷，所以国家构架^[331]逐步变得更加强大——首先是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后来又是作

为活跃在世界经济中的力量——以至到18世纪初期时，普鲁士成为一个半边缘地区国家。

当然，在若干方面，奥地利处于好得多的地位上去发挥普鲁士正在寻求发挥的作用。它在17世纪开始之时已是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哈布斯堡王朝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化身，至17世纪中期时已使奥地利、捷克和大部分匈牙利重新皈依天主教。1620年的“白山之战”后，哈布斯堡王朝粉碎了波希米亚国家（Bohemia），并“使它降到了一个行省的地位上”。^[332]剧变动乱使波希米亚贵族从一个独立的地主阶级变为宫廷贵族，并且消灭了本地的中产阶级。^[333]此外，哈布斯堡王朝还能够像勃兰登堡—普鲁士那样，招募一个不听命于贵族的军官团。^[334]不过，哈布斯堡王朝绝不可能使其领地变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国家并使之能在国际系统之内充分运行工作。唯有一个相对而言是同族的国家构架，才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繁荣兴旺起来。^[335]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遭受的困境之苦，也正是他们的先辈查理五世曾广泛面临的困境磨难。

土耳其军事力量是哈布斯堡领地上实现一个这样国家结合体的主要障碍。17世纪是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斗争的世纪，这一斗争的高潮是1683年的“土耳其之年”，当时，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地抵抗了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336]就在哈布斯堡王朝显现胜利之时，其胜利付出了一个代价：在此时期对匈牙利贵族所做出的让步。匈牙利贵族手中总是有一张土耳其牌可打，并且要求在哈布斯堡王朝国土上享有自治权利。^[337]土耳其威胁及其直接的经济含意，加上它对国家构架的诸种间接影响后果，使哈布斯堡王朝无力为其国库筹集足够资金而大受其苦，^[338]“或许（在17世纪）比任何其他君主都更深受其害”，使他们“明显地捉襟见肘”。^[339]至查理六世统治时（1711至1740年），奥地利在其国家岁入的基础上只能维持一支相当于法国军队一半兵力的军队，实际上只是略大于普鲁士军队而已。^[340]因而，奥地利尽管有两倍于普鲁士的军队和远远多于普鲁士的财富和人口，却在重商主义努力的实效方面并未取得比

普鲁士更多的实绩。

人们应当已在心中明了中心地区强国（如法国和英国）的重商主义与半边缘地区强国的重商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特罗伊厄（Treue）指出：

虽然〔重商主义〕在各大强权之间基本上相当于侵略和扩张的经济政策，它在德国却是坚持自己权利的防卫性目标；更多的是抓紧市场而不是强行征服市场；更多的是排斥别人的，特别是其西面邻国的控制而不是渴望去控制别人。^[341]

从“三十年战争”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的这整个历史时期，是整个德国，实际上也是整个中欧的重商主义时代。^[342]哈布斯堡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可以追溯至1660年左右。^[343]霍亨索伦家族从大选侯之时起，就一直以重商主义政策为政府的核心工作。^[344]真正的问题是这些重商主义政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另一方面，在从1650至1750年的百年之中，国家鼓励制造业的结果在根本上就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345]这可能是真实的。实际上，克拉韦伦（von Klaveren）认为落后国家中的重商主义是“伪重商主义”，其真正目的是“地方权贵人物的发财致富”，而且“无人真正指望重商主义获得成功。”^[346]更不必说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使半边缘地区国家与边缘地区国家之间的差异可以不屑一顾，半边缘地区国家至少还可说是伪重商主义的，而边缘地区国家甚至伪重商主义都不是。

同样清楚的是半边缘地区国家的重商主义在这个经济衰降的漫长时期中，为大约1750年之后的扩张时期中制造业活动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基础。^[347]因此，应当仔细观察18世纪前半期正在发生之事，此时，瑞典已在竞争中被击倒，普鲁士和奥地利正在事实上争夺中欧的霸权以求最大限度利用欧洲下一次扩张的好处。1711年，查理六世登上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座；1713年，威廉一世登上了普鲁士的王座。1713年至1714

年，随着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和拉施塔特（Rastatt）条约的签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宣告结束。奥地利取得了西班牙（现为奥地利的）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尼亚（1720年与萨伏依用西西里交换了得来）。1718年，奥地利又根据帕萨罗维茨（Passarowitz）和约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塞尔维亚（Serbia）、巴纳特（Banat）和小瓦拉几亚（Lesser Wallachia），还根据1699年的卡罗维茨（Carlowitz）和约早已取得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为了从巴尔干贸易的新可能性中谋利，奥地利重建了维也纳东方贸易公司（前一个该公司于1683年倒闭）。1719年，查理六世终于能够宣布的里雅斯特（Trieste）港和阜姆港（Fiume）为自由港，这一主张早在1675年就首次提出了。^[348]

在奥地利“对海洋的渴望”中，1719年是一个转折之年。奥地利现在有通道通往大西洋〔在奥斯坦德（Ostend）〕和地中海（在的里雅斯特）。它可以大胆与威尼斯和汉堡一争高下了。^[349]看起来它至少是一个大国了。^[350]它突然又发现自己与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同时发生争执”^[351]——因为这些国家全都感觉到奥地利新的商业雄心所造成的威胁了。确切地说，普鲁士也在此时实力大增出现于世了。根据1719年的斯德哥尔摩和约，普鲁士取得了瑞典在德国的最后领地。它现在的军事力量已比瑞典更为强大，至腓特烈大帝统治时，将继承“欧洲军事猛士”之称，而这一声誉原来由瑞典享有并保持至查理十二世逝去之时。^[352]直到1713年，普鲁士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353]其资源仍是“微不足道”。^[354]然而，至18世纪中期时，奥地利仍被限定为二流的世界强国，并且直到1918年仍是如此。而普鲁士却走上了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之途。使之成为可能的正是普鲁士的特殊的内部构架，我们对此已经予以评论；^[355]但是，如果不考虑英、法两国之间敌对的过程（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就无法解释普鲁士—奥地利之争为何会趋向有利于普鲁士。

巴拉克勒夫（Barraclough）认为这两个对手此时都“企图将对方一笔勾销”。^[356]此举并非易行之事。普鲁士一直打算勾销奥地利，并取得西里西亚作为报偿。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战略上，西里西亚都是极有价值的。自10世纪以来，争夺它的纷争不休，而在17和18世纪，它又是勃兰登堡外交政策最为专心用力之处。^[357]西里西亚是“东部的真正工业地区……奥地利世袭领地中的‘明珠’”。^[358]诚然，西里西亚的亚麻布是由英国、荷兰和汉堡的商人销往市场，因而西里西亚也可说是表现出“殖民渗透的一种典型模式”。^[359]然而，生产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以一种购销制形式在乡村中发展起来，乡村商人然后将产品卖给注重统一质量标准的大商人。^[360]在许多例子中，庄园地产上有制造业，地主是企业家，农奴为赚取工资而工作。^[361]这些工业活动的广泛性大概能解释这个事实：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波希米亚领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之中，西里西亚以“它的农奴—领主法令相对温和”而著称。^[362]1748年，普鲁士取得了西里西亚以作为它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奖品，因而也就取得了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最为繁荣和工业化的省份”。^[363]

这是对奥地利的一个“沉重出奇的打击”，不仅因为西里西亚的工业产量，也因为它是哈布斯堡王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商业中介”。^[364]这一损失的影响也波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因为这两地的纺织者直至1742年一直是将其产品销售给西里西亚商人。如果这种交易得以继续进行，就如和约所允诺的那样，那么，这些已成定规的交易就不得不“在经济上仰赖普鲁士的兴致所至了”。^[365]奥地利被迫重新皈依。普鲁士取得西里西亚因而是一个重大事件，大大有助于19世纪工业化。^[366]此举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创建了一支普鲁士军队和一个普鲁士国家，加之有英国和荷兰想抑制瑞典的需要，于是就挫败了奥地利；然而，普鲁士军队和国家之所以能够创建，又是因为普鲁士土地贵族的软弱（与其他边缘地区国家比较而言）。正是一个世纪中这一系列机遇才使得勃兰登堡这个非常无足轻重的边缘地区，于1750年有可能成为欧

洲的一个半边缘地区强国，拥有改变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最大潜力。

这个时代中创造出的最后一个半边缘地区，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是由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殖民地组成的不列颠属北美洲。它们的殖民化仅仅始于1620年（或许可以说的例外是新阿姆斯特丹，它是荷兰的世界网络中一个战略性的商业前哨基地），这些北美地区在1660年之前甚至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367]的确，新泽西（New Jersey）、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和特拉华（Delaware）只是由英国人在英国王政复辟时期才得以殖民开发。^[368]1660年是北美洲的历史转折点，因为该年也是英国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殖民地利益（要服从）国家福祉”^[369]这一重商主义学说的贯彻执行。1660年代中各种各样的“航海条令”规定最重要的殖民地产品——糖、烟草和染料等等——为“列举”产品，因而必须由英国船只装运，只能售给英国买主，从而大大影响了西印度群岛和切萨皮克（Chesapeake）湾的生产者。起初，这些航海法令对北方的殖民地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影响，部分是因为这些法令极少得到执行，部分是因为这些北方殖民地并不出产许多“列举”产品。^[370]实际上，在下列意义上才可以说航海法令的影响是积极的，即在“英国航运可以满足殖民地的全部需要之前”，航海法令将荷兰人逐出北美洲从而刺激了这些殖民地的造船业。^[371]

这些殖民地在17世纪中几乎不生产什么可用于贩卖给英国的产品，而且对于英国货物来说又是一个太小的市场。但是，它们参加转口贸易的竞争，因而看起来又几乎是英国的一个义务。如果说英国抓住这些殖民地不放，那也是部分地因为担心法国会占有它们，是抢先保有之举。^[372]斯图亚特王朝撤销特许状，取得了对这些难对付的和幼稚的殖民地的大部分实际控制权，建立了（1684年）新英格兰领地。若不是新英格兰对斯图亚特王朝政策的抵制正巧碰上英国在“光荣革命”中达到高潮的内乱，“结束了，至少也是推迟了对殖民地的威胁”，^[373]那么，这

些殖民地本来也会可以顺利地边缘地区化了。因此，正是由于为洛德（Eleanor Lord）所称的“对这些殖民地漫不经心的忽视”，但不如说是英国重商主义宏图规划难以执行的内在困难更为妥帖，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殖民地的商人们才得以至1700年时能够不仅作为造船业主，也作为中间商“取得重大进展”。^[374]

这些商人加入了所谓的“三角贸易”。“三角贸易”中有许多事实上的不同部分。在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中，西印度群岛的蜜糖运往北方殖民地，北美殖民地的糖酒和小饰物品运往非洲，而非洲奴隶又运往西印度群岛。在与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中，粮食和木材从北方殖民地运往西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的糖和烟草运往英国，而英国的工业品运往北方殖民地（或者是在英国售出的北方殖民地的航船）。在第三个也是较小的南欧和英国的三角贸易中，北方殖民地的小麦、^[375]鱼和木材运往南欧，南欧的酒、盐和水果运往英国，而英国的工业品又售往北方殖民地。关于这些著名的三角贸易，有两件事必须予以强调。它们在很大部分的意义上是分析出来的构想。它们更多的是反映商品的流向而不是航船的往来。北方殖民地的航船集中于西印度群岛的穿梭往返运输，少有横越大西洋赴英国的航行，而赴非洲的航行更是极少。^[376]

第二，英国人迫使北方殖民地维持一种不利的直接贸易平衡，这意味着如果北方殖民地想要获取制造业品，就不得不设法取得硬币。由于三角贸易无法获取必要的金银，它们不得不要么就去扩充自己的制造业（并且因此减少从英国的进口），要么就去寻找出一种大宗产品。^[377]面对这两种选择何去何从，是18世纪前半期北方殖民地与英国的政治斗争核心内容。17世纪时，北美殖民者就作为造船业主、船运业者，以及西印度群岛和欧洲的粮食供应者，逐渐成为英国生产者的竞争对手。按重商主义学说的看法，他们“更多地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笔资产”，因而也就是“价值最少的英国领地。”^[378]1689年之后，英国有意识

地努力^[379]改变这种情况，鼓励发展一种新的大宗产品（船用品），扼杀工业生产萌芽，旨在使殖民地扩大为英国制造业的市场。^[380]怎样才能在一个特殊地区“创造”出一个市场？使其人民参加世界经济的生产。如果缺乏有足够高水平收入的如此人民，那么就去鼓励“殖民拓居”。正是这后一种办法为英国人所采取，使他们大为不同于法国人、荷兰人，甚至不同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381]

1713至1739年之间，实际上有一股尤为重要的移民潮，特别是流向中部大西洋各州。由于英格兰人不愿意大量移民出走，英国此时就向非英格兰人开放不列颠属北美洲以求实现移民目的，前来的移民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以及所谓的荷兰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和瑞士人）。^[382]英国希望这些新移民会从事新的大宗产品（船用品）的生产。此举不仅会在经济上有利于英国，也会在军事上有利于英国。船用品长期以来就是英国殖民贸易中的一项“严重缺乏之物”，^[383]弥补这一缺项一直是18世纪英国政策的“固定目标”。^[384]1689年爆发的“九年战争”使这一缺项更为急迫逼人。英国所需之船用品的生产和运送几乎都掌握在瑞典人手中。瑞典人表面中立，骨子里却是亲近法国的，而这正是“令人不安的经常原因所在”。^[385]明显可见的替代来源就是北美殖民地（以及爱尔兰）。1696年，英国设立了贸易殖民局，其首要关切事务之一就是使英国解除对瑞典的依赖。他们为此试图建立一种垄断权，但是碰上了众多抵制。^[386]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次使这一问题尖锐突出，斯德哥尔摩柏油公司作为垄断者的形成则使形势复杂化了。这就导致了1705年的“船用品法令”，其中决定依靠奖励之法诱导北美殖民地的生产。^[387]使英国摆脱对瑞典的依赖明显不是“船用品法令”的唯一动机。内特尔斯（Nettles）列举出三个理由说明创建北美殖民地市场是一个重要目标，甚至是首要动机。第一、尽管对瑞典的依赖实际上仅限于沥青柏油，“船用品法令”仍奖励生产树脂、松油、大麻和船用木材——它们全都可以从一些

国家中获取。第二、海军官员看来是对此种依赖最为漠不关心之人，这使人们怀疑短缺的真实性。他们不断地反对从北美殖民地获取沥青柏油，因为其质量太差。[然而，内特尔斯提醒我们说，贸易局的官员指责海军官员与东土（Eastland）商人有利益勾结]。第三、贸易局对从卡罗来纳（Carolina）获取沥青柏油也不感兴趣，即使其质量优于北美殖民地的产品（当然啦，卡罗来纳已在生产大宗产品了）。

内特尔斯（Nettles）进而认为船用品计划最坚定的支持者正是那些与北美殖民地贸易的英国商人。^[388]在任何情况中，北美殖民者对生产木材的兴趣总是大于生产沥青柏油，^[389]然而，木材不是运往英国，而是用于本地的造船工业。^[390]事实是发展造船工业之利于开发英国商品的市场，至少是与成功实行船用品计划之可能收效是旗鼓相当大致相同。这可能就是下述之事的根本原因：在航海法令之下，“为了最实际的目的”，北美殖民者的船只从未被排斥在英国船只所享有的特权之外。^[391]因此，在北美殖民地建造船只具有了经济意义，虽然所费工资很高，但是，木材成本之低廉足以弥补工资费用。^[392]这一相对优势由于1675年至1775年期间美洲殖民地航运效率的逐步提高，而得到强化。^[393]结果是至1775年时，在英国注册的英国拥有之航船中有1/3是在北美殖民地建造的——这成为“殖民地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源泉”。^[394]

至于造船业之外的其他制造工业，英国人实际上试图予以阻止，但是采取了一种杂乱无章的方式。1699年，他们颁布了“呢绒法令”，禁止超越出殖民地以外的出口装运。1732年，他们颁布了有着类似限制的“哈特（Hat，制帽）法令”。1733年的“蜜糖法令”又试图限制糖酒的生产。1750年的“冶铁法令”禁止兴建新的工厂。^[395]所有这些法令在很大程度上都未得到执行。^[396]首先，英国人对荷兰、德国和法国的竞争的忧虑，要远甚于对殖民地制造业的担心。^[397]再者，如布鲁奇（Bruchey）所说的：“缺乏熟练技工和资本的不足与优先的分配去向”是北美殖民地的“天然”阻碍。^[398]无论天然与否，这一因素的确有助

于英国不用力执行这些法令，至少直到1763年前的时代是如此。我们怎样才能概括出北美殖民地的经历呢？它们还有第三种幸运。它们缺乏自然资源，但是，它们却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世界工商业强国的殖民地，有着足够远的地理距离去将它们的一个主要资源——木材用于造船工业，使之成为在经济上有厚利可图之事。造船工业只是一个启端，却是一个极重要的启端。由此创造出的条件在形势变化了的18世纪下半叶导致了“美国革命”，以及19世纪中一个主要工业强国的兴起。

主宰1600年至1750年这一时期的力量是英国和法国，它们先是努力去摧毁荷兰的霸权，然后是去继承这个最高地位。在此相对停滞（即相对于16世纪明显的经济扩张而言）的漫长时期中，边缘地区深深受害于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加剧了的盘夺剥削，以及本地区剥削阶级利益之减少（减少系与核心地区国家相似阶级相比较之意）。半边缘地区国家的经历更是远为复杂。核心地区国家企图使它们成为联系边缘地区的中介，剩余利润的传送带。它们大都成功了；但是，在中心国家相互争斗激烈的地方，某些地区可以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先是瑞典，后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就是属于此例，在一个较小等级上不列颠属北美的北方殖民地也是如此。

[1] 参见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 第五章各处), 有关于16世纪西班牙结构的讨论。有关17世纪西班牙思想家们对他们的“衰落” (*decadencia*) 的自身概念, 参见艾略特 (Elliott) (1977)。

[2] 参见艾略特 (1966, 283)。马丁 (Ruiz Martin) (1970, 43) 确定1586年至1680年或1690年是“堕落的世纪”。但是, 有时候要拿更多的事件和另外50年去说服现实中的参与者。“1643年5月19日, 西班牙步兵部队在罗克鲁瓦 (Rocroi) 的失败看来标志着西班牙权力长期依赖的军事体系的崩溃。这个国家此时缺乏能够利用新国际局势所需的军队和领袖。”(第345页) 斯特拉德林 (Strading) (1979, 182) 认为, 不到1668年, “由于正式承认葡萄牙的独立, 落到耻辱至极的地步。菲利普二世的世界帝国不复存在了。”德泽特 (G.Desdevises de Dezert) (1927, 354) 这么说: 至17世纪之末时, “西班牙的军事力量仅仅只是一种往事记忆而已。”再参见汉密尔顿的著述 (E.J.Hamilton) (1943, 192)。

[3] 参见汉密尔顿。同样的, 达席尔瓦 (José Gentil da Silva) (1965, 175~179) 也认为有一个“衰落”, 不过, 这也许是“太简单的”一种表述。最近有两篇论文持异议, 向此传统看法提出挑战。卡曼 (Kamen) (1978, 35, 41) 认为17世纪不是一次衰落, 因为西班牙从15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下垂的”, 因而“很难理解如此一个不发达国家在变得富裕之前就会‘衰落了’。”斯特拉德林 (Strading) (1979, 167, 171) 认为: “西班牙的权力和权力体系 (维持) 到了1660年代之中”, 至少至那时, “没有敌人或敌人的联盟强大到足以组织起来实施……致命的打击。”他在此重复了豪泽 (Henri Hauser) 为“西班牙的优势”所确定的年代: 1560年至1660年。

[4] 参见艾略特 (Elliott)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写于1961年, 韦斯尔 (Weisser) (1973, 615) 予以引用和随声附和。

[5] 参见汉密尔顿 (Hamilton) (1935, 111)。为塞哥维亚所发展起来的生产曲线“倾向于证实……关于17世纪是‘堕落’或‘停滞’的世纪的诸种解说。”[安尼斯与利弗莱 (Anes and Le Flem), 1965, 16]。

[6] 参见达席尔瓦 (da Sliva) (1965, 156~158); 再参见安尼斯与利弗莱 (Anes, Le Flem) (1965, 18~19), 他们论述了黑麦和燕麦生产以及由于耗竭了腐殖肥料引起的土地过分使用。他们还指出种植黑麦所需劳动力较少。

[7] 参见达席尔瓦 (Da Sliva) (1965, 158~160)。

[8] 参见林奇 (Lynch) (1969, 153)。

[9] 参见韦斯 (Weisse) (1973, 614~615, 637~640), 他希望对此做出解释, 但不是按照汉密尔顿 (Hamilton) 关于“外部因素 (换言之是财富)”的说法, 而是按照“卡斯提尔的内部经济状况”这么一种说法去做出解释。然而, 他所说的三个内部因素却是: 一、“生活资料生产与工业生产的竞争需求之间缺乏平衡”, 起始于大约1575年, 其解释是: “牧羊王国牧羊

（Mesta）因放牧人的减少和北方贸易的断绝，迫使托莱多（Toledo）更加依赖采矿者（tierra）的工业力量”；二、“外国商品的出现……以低于当地产品的价格大批量出售”；三、马德里的成长吸引了托莱多的人口，它的人口减少是“君王的帝国野心所导致的结果。”韦斯尔（Weisser）还将市人口的衰落归因于驱逐摩里斯科人（Moriscos）（第632页），沃登（Warden）（1864，261）也引证了这个因素，用以解释亚麻制造业的近乎于绝灭：从1550年的50家工厂减至1665年的13家。

[10] 参见林奇（Lynch）（1969，152，以及149~151）。

[11] 参见艾略特（Elliott）（1963，11）。“中世纪的分歧——这没有予以足够的强调吗？——并没有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减弱下去，而是在数百年中变得更受重视。”[维拉尔（Vilar），1962b，I，191]。

[12] 参见比韦斯（Vicens Vives）（1970，107）。

[13] “尽管（在1637年）公爵（Conde Duque）伯爵奥利瓦雷斯（Olivares）成功地压榨出卡斯提尔更多的金钱，他也像其他一切人那样深知必然会有一天卡斯提尔将会被榨干，无钱可取。这意味着：必须使武装联盟（Union of Arms）有效力，而且，特别是要使半岛上两个据称是最富有的国家加泰隆尼亚和葡萄牙，以其推测的资源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奥利瓦雷斯（Olivares）[即杜基（Conde Duque）]认为这两个国家与王国的其余部分危险地“分离”了[艾略特（Elliott），1966，333，着重号系本人所加]。

[14] 参见比韦斯（Vicens Vives）（1970，107）。再参见维拉尔（Pierre Vilar）（1962b，I，627）所说的：“处于巨大的财政困境中的中央政府，双眼紧紧盯住加泰隆尼亚的资源，这正是当地政府强烈反对征税，力图保住的东西。”

[15] 皮涅多（Emiliano Fernández de Pinedo）（1974，76）引用了波尔什涅夫（Porchnev）关于法国的此言：认为此言恰好适用于此时的维兹卡亚（Vizcaya）（1974，70）。

[16] 参见艾略特（Elliott）（1963，463），他认为人民的这些怨愤是“小农和无地者对富农和贵族的仇恨；是农村失业者的苦难；是盗匪分子渴望对镇压者实施复仇；是城市反对乡村的宿仇旧怨，是贫穷市民反对都市寡头的仇恨。”（第462~463页）。

[17] 参见艾略特（Elliott）（1963，127，465）。

[18] “战争将给这个公国带来最坏的诸种邪恶，卡斯提尔从1600年以来就一直遭受这些邪恶之苦：巨大的公共开支、通货膨胀、生产瘫痪、瘟疫肆行而人口减少，最后，作为国际斗争的一个结局，加泰隆尼亚的部分土地丧失了，包括非常富裕的鲁西荣（Roussillon）平原”比拉尔（1962，I，633）。受苦最深重者是那些独立小农。参见维拉尔（Vilar，1962b，I，633）。请再次注意与边缘地区国家相类似的这种情况。当然，这激化了叛乱，而且使之具有“社会色彩，威胁着要迫使贵族服从暴民统治”艾略特（Elliott）（1966，349）。由于这种原因，加泰隆尼亚的团结统一瓦解了，至1652年，加泰隆尼亚人又被关进了葡萄牙的羊栏之中。

[19] 马奎斯 (A.H.de Oliveira Marques) (1976, I, 30) 称废除海关税一事是“长期以来梦寐以求之举, 特别是葡萄牙人如此渴盼着。”

[20] 参见马奎斯 (Marques) (1976, I, 308)。葡萄牙人大获其利。伊斯雷尔 (Isreal) 估计: 至1640年时, 他们占新西班牙人口的6%, 而且在西班牙印度群岛各处均有相似的人群。他谈到了“确有大量的人们从葡萄牙出走……反映出人口从葡萄牙的乡村和小城镇流走, 葡萄牙企业家则逃出萧条的葡萄牙、正在衰落的西班牙和受打击的意大利” (1974b, 32)。

[21] 参见卡斯提罗的论述 (Castillo) (1964, 特别是第311~314页)。

[22] 在伊比利亚的其他非卡斯提尔的地区也确实如此: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边缘地带 (葡萄牙、加泰隆尼亚的沿海地区、巴伦西亚) ……资产阶级的身份地位与‘改宗者’ (converso) 的身份地位之间有很大的相互融通关系” [肖努 (Chaunu), 1963a, 82]。摩洛 (Mauro) (1970, 34) 持相同观点: “17世纪中, 葡萄牙并不是拥有资产阶级和新基督教徒的唯一国家。但是, 使葡萄牙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正在于这两种身份地位有事实上的混淆。”

[23] 参见摩洛 (Mauro) (1961c, 20) 有关这些商人银行家的描述之言: “在他们之间并无可供区别的专业根据。是批发、半批发还是零售? 他们什么生意都做。是远距离贸易、全国性贸易还是地方性贸易? 他们或多或少地参与每一种贸易。是商品贸易, 还是货币贸易? 他们不分彼此都做。”

[24] 参见休格特和肖努 (Hugutte and Pierre Chaunu) (1954, 53)。雷瓦赫 (Revah) (1959~1960, 37; 参见第48页注释4) 指出: “葡萄牙这个名词本身已和‘新基督徒’, 而且经常和‘隐密的犹太人’等词是同义的。”然而, 伊斯雷尔 (Isreal) 谨慎地区分犹太教徒 (Judaizants), 实际上已被同化了的新基督徒 (*cristaos novos*), 以及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集团“改宗者” (conversos), “他们不是犹太教化者, 但是他们的犹太气质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涯经历” (1974b, 24和各处, 19~32)。

[25] 摩洛 (Mauro) 提醒我们“不要将葡萄牙人的命运与趋向16世纪之末的西班牙帝国混淆起来, 因为巴西及其巨大的糖业发展是一个差异, 而且不是一个小差异。” (1959, 183)

[26] 参见休格特 (Hugutte), 和肖努 (Pierre Chaunu) (1954, 52)。

[27] 见艾略特 (J.Elliott) (1958, 68) 在“17世纪革命”中所提到的意见。迪斯尼 (Disney) (1977, 252) 在解释为什么葡萄牙企业家不愿意投资于葡萄牙东印度公司时, 提出了一个因素: “一些葡萄牙人认为它是马德里的一个阴险企图, 旨在巧取1580年由菲利普二世授给葡萄牙的行政独立。”

[28] 参见休格特和肖努 (Hugutte, Pierre Chaunu) (1954, 54), 他们注意到犹太人成了攻击对象, 谈到“这些南特敕令, 有人在A阶段协调它们以便在B阶段去撤销。”再参见肖努 (Chaunu) (1963d)。这些新基督徒中的一些人径直迁往汉堡, 他们在汉堡的18世纪商业扩张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参见克伦本茨 (Kellenbenz) (1958)。

[29] 博克塞 (Boxer) (1961, 52) 认为这次占领是“1640年为什么 (葡萄牙人) 反叛西班牙君王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他注意到：“他们曾希望一旦葡萄牙及其‘征服地’ (canquisas) 断绝与西班牙的联系，荷兰人就会停止对葡萄牙‘征服地’的侵略，但是他们失望了，事与愿违……。”

[30] 参见肖努 (Chaunu) (1961, 1194)。摩洛 (Mauro) (1960, 513) 谈到了到1670年时葡萄牙大西洋经济的“辉煌壮观”；但是，肖努更为慎重：“塞维尔 (Seville) 在17世纪之初时倒转了长期趋势，与之相比，巴西的大西洋经济是由诸种幻影和细微差异构成的。”他还谈到了“在1630年后期，也可能是在1650年的一个姗姗迟来的转折点：一次增长的减退而不是崩溃。”葡萄牙人的反叛未能解释至少是至1670年时巴西的恢复能力吗？相反，如艾略特 (Elliott) 所言 (1966, 351)：“葡萄牙的救星”是这种恢复，它“有助于刺激外国 (尤其是英国) 有兴趣于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幸存。”

[31] 参见戈丁诺 (Godinho) (1950a, 34)

[32] 参见艾略特 (Elliott) (1963, 543)。

[33] 参见博克塞 (Boxer) (1961, 53)。

[34] 参见布罗代尔 (Braudel) (1956, 196)。

[35] 参见肖努 (Chaunu) (1959, VIII, 二版, 1568)。再参见海默 (Helmer) (1967, 405)：“从1630年开始，在印第安送货人 (carg adoras de Indias) 中有大量的破产。”肖努 (Chaunu) 先声明：“我不打算去裁定这个微妙的因果关系问题”，指明这个时期与维农铜币 (Vellon) 的通货膨胀有相互关联，并且就此评论说：“或许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吗？然而却是一个使人不安的巧合。” (1959, VIII, 2 bis, 1568~1569)。

[36] 的确，比韦斯 (Jaime Vicens Vives) (1970, 106) 回顾了那个时代的西班牙政府：“奥利瓦雷斯 (Olivaries) 虽然没有使自己卷入麻烦的欧洲冲突中 (法国与荷兰正全力以待他)，本来应当治愈荷兰人在加勒比海打击帝国留下的首批创伤，使其美洲殖民地做好战争准备。相反，他在安达卢西亚 (Audalusia) 搜集来的黄金，本来要用于执行明智的政策，却被他挪用来支付‘三十年战争’的军事行动。其结果是西班牙美洲的前途毁灭于欧洲。”

[37] 维格诺斯 (Vignols) (1925, 240) 指出：横渡大西洋的走私贸易虽然其频繁程度因时而异，却总是大于欧洲之内的走私贸易，大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之内的走私贸易。

[38] 参见拉瑞兹 (Larraz) (1943, 98)。西班牙的贪官污吏和殖民者鼓励帮助了走私贸易。参见潘塔勒奥 (Pantaleão) (1946, 127~129, 235~236)。

[39] 参见麦克拉伦 (McLachlan) (1940, 13)；再参见克里斯特罗 (Christelow) (1941, 516)。

[40] 参见艾略特 (Elliott) (1966, 360), 他说卡斯提尔的崩溃“伴随着有文化智识生活的瘫痪”(第361页)。再参见拉瑞兹 (Larraz) (1943, 96)。卡曼 (Kamen) 描述1677年至1686年的危机时, 称维农 (Vellon) 硬币的通货膨胀“差不多就是大祸了”(1964, 75)。对这些困难进一步思考的看法是: 盗匪活动, 特别是在瓦伦西亚, “在整个17世纪中日益频繁, 有增无减”(卡曼Kamen) (1974, 654)。

[41] 德鲁莫 (Delumeau) (1966, 100) 认为这种贸易是“法国的天祐”。潘塔勒奥 (Pantaleão) (1946, 272) “整个英帝国都有兴趣于对西班牙帝国的商业贸易。”

[42] 参见兰伯特 (Rambert) (1959, 269)。

[43] 参见弗朗西斯 (Francis) (1966, 187)。

[44] 参见潘塔勒奥 (Pantaleão) (1946, 15)。此外, 1661年条约登记了布拉干萨 (Bragunca) 的凯瑟琳 (Catherine) 与查理二世的婚约, 将孟买 (Bombay) 和丹吉尔 (Tangiers) 作为凯瑟琳的嫁妆割让给英国。博克塞 (1961, 52) 对此解释说: 葡萄牙“寻求与英国结盟的保护”以求对付荷兰人。

[45] 参见赛德里 (Sideri) (1970, 21)。

[46] 摩洛 (Mauro) 确定的时间是1680年 (1975, 9); 但是在此, 他看来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参见维拉尔 (Vilar) (1974, 280), 他谈到了1670年至1703年的一次危机; 戈丁诺 (V.M.Godinho) (1974, 266; 以及1950b, 186) 谈到的危机是从1670年至1690年; 而赛德里 (Sideri) (1970, 26) 认为“困难的经济形势”是在1670年。白银进口的一次衰降, 加之葡萄牙殖民地的食糖和烟草不断被排斥出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市场, 这个危机在实际上大为加剧了。此外, 荷兰人在几内亚海湾与葡萄牙人的竞争引起了奴隶价格的上涨; 安哥拉方面的供应的部分衰竭又使之复杂化了。所有这些在1670年时开始发生, 使葡萄牙难于在原有贸易结构中发挥作用。这正是我们今日所称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参见戈丁诺 (Godinho) (1950b, 184~185)。

[47] 一个后果就是: 在1670年至1680年时期, 法国成为葡萄牙的首要贸易伙伴。摩洛 (Mauro) (191b) 在试图解释为什么后来不再是如此的原因时, 强调了在世界市场上法国与葡萄牙的产品的竞争程度。但是, 这究竟是英国与葡萄牙的关系更新的结果, 还是原因呢?

[48] 参见戈丁诺 (Godinho) (1950b, 186~187)。他们的这些政策并非是不成功的。例如, 戈丁诺指出了货币状况: “1688年, 已是不可能安排收支了; 1689年, 硬币在里斯本正常流通了。由此有了成功的运行操作。”

[49] 参见戈丁诺 (Godinho) (1950b, 191), 以及维拉尔 (Vilar) (1974, 280~281)。

[50] 参见赛德里 (Sideri) (1970, 40)。

[51] 参见弗朗西斯 (Francis) (1972, 64); 以及西尔伯特 (Silbert) (1954, 413~419)。

[52] 参见安德鲁斯 (Andrews) (1929, I, 275); 以及比尔 (Beer) (1912, I, 78~79)。

[53] 参见邓肯 (T.Bentley Duncan) (1972, 46), 他特别提到: “考虑到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的人口甚少, 马德拉 (Madeira) 葡萄牙酒贸易在美洲是一项重要的生意, 即使以一般的欧洲标准来看只是中等的。” (1972, 48)。但是, 他也注意到对美洲的葡萄酒贸易“完全掌握在丰沙尔 (Funchal) 的英国商人手中, 他们用来自出售英国纺织品和其他进口商品 [咸鱼、腌鲑鱼、英国工业品、亚速尔 (Azores) 小麦等] 的收益, 去购买葡萄酒货物” (50~51)。

[54] 戈丁诺 (Godinho) 认为葡萄酒生产的增加“直接与美洲市场的扩大相关。” (1953, 79)。

[55] 戈丁诺 (Godinho) (1950b, 188~190)。

[56] 博克塞 (Boxer) (1958, 34) 也说: 在“威廉 (William) 国王之战”中, 对葡萄牙的葡萄酒需求大增, 由此减少了葡萄牙所遇到的“不利的贸易平衡”, 而且“使以本国制造的产品替代进口的英国布制品不那么急切了”。英国人实际上并非是只喜爱葡萄牙酒而不喜欢法国酒。赛德里 (Sideri) (1970, 64) 有说明数据。1683年, 英国禁止法国酒。这一年, 英国只从法国进口了65加仑酒, 而从葡萄牙进口了16772加仑酒。1686年, 禁令撤销, 英国只从葡萄牙进口了289加仑, 却从法国进口了12750加仑。

[57] 卡多佐 (Cardozo) (1946, 146) 指出: 淘金热的一个效应就是“非法引进巴西的外国产品增加了”, 而巴西是“能给葡萄牙带来一切利润的唯一市场”。

[58] “我个人认为这个鼓励制造业的政策, 也可能由这一危机做出充分解释” [戈丁诺 (Godinho), 1953, 76]。最后, 戈丁诺还说, 重商主义时期不是别的什么, 而是处于食糖、烟草、盐的时期和巴西的黄金、葡萄酒与马德拉酒的时期之间的一个旋转盘 (1950b, 190)。

[59] “‘工业家们’让位给葡萄园种植主了” [戈丁诺 (Godinho), 1950b, 189]。对此, 后来的评论予以确认: “在后来的岁月中, 甚至葡萄牙人也同意认为是英国人发展了上杜罗 (Douro) 河的葡萄园, 而且认为在他们到来之前, 那里什么都不生长, 除了金雀花和荆豆丛” [弗朗西斯 (Francis), 1972, 109]。

[60] 参见戈丁诺 (Godinho) (1950b, 188)。

[61] 参见梅西多 (Macedo) (1963b, 53); 赛德里 (Sideri) (1970, 42)。

[62] “主张与葡萄牙而不是与法国进行贸易的辉格党, 在1713年为此投票反对托利党, 并且长期执政。在他们执政初期, 英国与葡萄牙的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弗朗西斯

(Francis), 1966, 185]。

在一封私人信函中，皮涅多 (Fernández de Pinedo) 向我指出：从1650年开始，荷兰人和英国人不希望他们满载纺织品、咸鱼和小麦的船只开往西班牙后空船而归，他们鼓励发展加泰隆尼亚的白兰地酒生产和马拉加 (Malaga) 沿岸的葡萄干和杏仁生产。他将此称为是“一项白银梅休恩 (Methuen) 条约”，特别是因为贸易赤字以美洲的金银予以平衡。

[63] 参见卡曼 (Kamen) (1969, 1~5)。

[64] 参见坦普利尔 (Temperley, 1940, IXX)；参见麦克拉伦 (McLachlan) (1940, 30) 所言：英国商人反对1698年和1700年的分割条约，因为他们感到如果签订这些条约，地中海就“会成为一个法国的湖泊”。克拉克 (Clark) (1928, 262) 赞同此见：“如果法国人获得成功，荷兰和英国这两个突出的海上强国必定会失去它们的许多贸易。”

[65] 法国人最终将在这场公海上的战斗中败北。“英国人不仅成功地制止了法国私掠船的威胁，还在战争这一勾当中充作侵略者干得很出色” [克拉克 (Clark), 1928, 264]。

[66] 参见莱格瑞尔 (Arsène Legrelle) (巴黎, 1888~1892) 所著的《法国外交与西班牙王位继承》，第三卷，第332页，卡曼 (Kamen) 引用此语 (1969, 9)。

[67] 卡曼 (Kamen) 评论说：“要促进法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就必须保持低关税，禁止与 (英国和荷兰) 敌国进行商业贸易。令法国人烦恼的是他们发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威胁着要减小他们正式享受的贸易特权的价值” (1969, 127)。法国人依然在西班牙享受特权。正是这些特权激怒了英国人；法国人对打进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更感兴趣。然而，“尽管法国有海军优势，尽管有贩奴专卖权，尽管有经过圣马洛 (Saint Malo) 进行的大量非法贸易，这整个问题对法国来说却是以失败告终。路易十四从未设法打破加的斯对西印度群岛的垄断。” [卡曼 (Kamen), 1969, 155]。

参见兰伯特 (Rambert) 所言：“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可能经常记住他们的出身血统，从一开始，他们就表现出是百分之百的西班牙人。” (1959, 272)。

[68] 参见艾略特 (Elliott) (1966, 365)。维拉尔 (Vilar) 认为这不止于是缓慢的复苏。他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统治时期 (1665年至1700年) 是加泰隆尼亚的好时光，……对富裕农民、商人和各种各样的生意人来说，……17世纪的最后30年是一个繁荣时代。……1700年至1715年的危机之前从未有过如1640年王位继承时那样对君王的严重攻击” (1962a, 101)。

[69] 参见维拉尔 (Vilar) (1962a, 104)。

[70] 参见维拉尔 (Vilar) (1962a, 103)。

[71] 参见维拉尔 (Vilar) (1962b, I, 672)。有一段时间，加泰隆人的运动是非常成功的。如卡曼 (Kamen) 所注意到的，这段时间与1640年危机时不同，“我们观察到卡斯提尔人的军队没有驻扎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而是葡萄牙人和加泰隆人的军队驻扎在马德里” (1969, 248)。

[72] 参见维拉尔（Vilar）（1962b, I, 678）。

[73] 肖努（Chaunu）抓住了经济选择中的文化含意：“菲利普五世（Philp V）的西班牙打算开放，但是只能如此缓慢地去办……开放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法国、对北方……开放。查理二世统治末期，聚集在王后周围的德国人诺堡的玛丽安妮（Marie-Anne de Neubourg）党派，无疑是受意大利艺术影响，是昔日的聚会。”（1963c, 468~469）。关于西班牙波旁王族作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的文化“现代化者”，请参阅比韦斯（Vicens Vives）（1970, 116~120）。

[74] 参见皮特（Pitt）（1970, 475~476）。

[75] 参见维恩达尔（Veenendaal）（1970, 444）。正是在此意义上，维拉尔（Vilar）认为乌得勒支（Utrecht）是一个转折点。它完成了“旧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的毁灭，结束了法国的霸权，宣告了英国在海上和殖民世界中初现的优势，除了其他以外，以占领直布罗陀为其标志。”（1962a, 12）。

[76] 克拉克（Clark）（1928, 279）指出：尽管英国人与荷兰人已经结盟，“和约的一般本质……却是英国人为了自己与荷兰商业竞争，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确立了自己的有利地位。”再参见沃德（Ward）所言：“荷兰联合省在联盟领土上牢固地设立一道屏障，用以对付法国的任何再度侵略。但是，除此之外，尽管荷兰人继续从和约中获取了一些商业好处，他们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地位却离开了他们，永远离去了，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抵抗，就落入了曾是其敌手的那个强国手中；……而且，他们的商业优势也同样终结了”（1908, 438）。

[77] 参见艾略特（Elliott）（1966, 370~371）。比韦斯（Vicens Vives）尖刻地说道：“加泰隆人逆历史潮流而战，如此的代价通常是非常高昂的”（1970, 111）

[78] 参见卡曼（Kamen）（1974, 687）。

[79] 参见比韦斯（Vicens Vives）（1970, 114）。

[80] 比韦斯（Vicens Vives）认为：“地区特权的奥秘只由用中央集权化的神秘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取代……而在此事业中，波旁王朝及其合作者（像他们的前人那样）将会失败。”（1970, 113）。

[81] 参见汉密尔顿（Hamilton）（1935, 116）。

[82] 参见索利斯（Romero de Solis）（1973, 54），他谈到了“新的中产阶级、农业资本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第66页），以及菲利普五世的党徒作为“土地贵族的中层部分正处在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使自己变成农业资本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它的代理人物——国家资产阶级”（第67页，注释108）。然而，奥梯兹（Dominguez Ortiz）（1955, 301）说：“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虽然反对一切旨在削弱中央主权的企图，但只要剥夺了他们最后的政治意义（这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末年已近于荡然无存），就同这些庄园领主达成交易。”卡曼（Kamen）表示赞

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虽然大公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但是他们的衰落在西班牙社会历史上只有次要的意义。如同在以往各个统治时期那样，贵族的特权和地产依然牢不可破。”（1969，115）

[83] 关于这些努力，参见汉密尔顿（Hamilton）（1943，206）；以及拉福斯（La Force）（1964，337~338）。

[84] 参见卡曼（Kamen）（1969，391~392）。

[85] 参见卡曼（Kamen）（1969，34）。

[86] 参见兰伯特（Rambert）所言：“他们的海关政策总是很谨慎的，（在18世纪中）将会一点一点地成功地升高关税壁垒，在此保护之下，民族工业能够成长起来，国家也能部分地摆脱外国的控制。长期以来在竞争中独占鳌头的法国，将会成为这种逐渐变化的主要牺牲者。”（1957，270）。

[87] 参见尼尔逊（Nelson）（1945，55）。

[88] 尼尔逊（V.L.Nelson）引用了1730年至1739年之间550万磅的数值，并且说：它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成为对西班牙重商主义的真正威胁。”（1945，64）。

[89] 参见布朗（Brown）（1928，179）。尼尔逊（Nelson）（1945）指出说南海公司利用一切手段从事非法贸易：秘密手段（这是可行的，尽管在其董事会中有西班牙政府派的一名董事，大多数信息交往却没有经过董事会）；贿赂西班牙官吏；对奴隶贸易视而不见；以及使用武力，由英国士兵提供保护〔见尼尔逊（Nelson），1945，56~60〕。

[90] 参见尼尔逊（Nelson）（1945，55）。

[91] 参见克里斯特洛（Christelow）（1941，532）和尼尔逊（Nelson）（1945，57）。

[92] 参见戈丁诺（Godinho）（1948，552）。

[93] 关于交易产品的清单，参见尼尔逊（Nelson）（1945，61）和戈丁诺（Godinho）（1948，553）。

[94] 戈丁诺（Godinho）注意到此时西班牙属美洲的金银这时流出，如果不像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那么那么多。“尽管如此在欧洲的货币生活中有着很大重要性。”（1948，553）。也见费希尔（Fisher）（1971，4~5）。与西班牙属美洲合法和不合法的贸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两个不同群体的英国人有益。西班牙国家试图用他们合法贸易的对话者控制非法贸易，但不是很成功。见戈丁诺（Godinho）（1948，552）。

[95] 见汉密尔顿（Hamilton）（1949，316）。

[96] 布朗 (V.L.Brown) (1928, 187)。也见克里斯特洛 (Christelow) (1941, 519~520)。作为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763年。

[97] 在1700年到1750年, 葡萄牙是英国出口的第三大消费者, 次于联合省和德意志各邦, 英国船只在里斯本在总数几乎从未不在总量的50%, 以下见麦斯威尔 (Maxwell) (1968, 612)

[98] 参见赛德里 (Sideri) (1970, 44~46)。梅西多 (Macedo) (1963a) 认为英国尽管有便利之处, 其他外国制造业者的竞争仍然迫使英国的价格下降, 并且打破了垄断; 但是, 赛德里 (Sideri) 对此予以否认, 指出梅西多 (Macedo) 的自相矛盾之处: “荷兰的或者法国的纺织品不可能抵消英国的优势, 因为它们不享有英国商人背后的销售网络和已经确立起来的势力影响” [梅西多 (Macedo), 第51页; 在赛德里 (Sideri) 书中引用, 第46页]。费希尔 (Fisher) 声称: 英国纺织品商人之所以享有超出法国、荷兰以及德国竞争对手的优势, 是因为他们“更多地专门从事于……中低价格范围内的精纺毛织品和纺织品, 而且可以享有更廉价的……船运” (1971, 36~37)。更详细地阅读费希尔 (Fisher) 的论著, 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循环, 因为更廉价的船运意味着更大的贸易量, 出售纺织品意味着购买葡萄酒, “而且, 在葡萄牙的英国商人控制了运往英国的葡萄酒的购买和船运。” (第36页)。

[99] 参见赛德里 (Sideri) (1970, 46)。

[100] 参见赛德里 (Sideri) (1970, 41, 48), 他在第41页上写道: 英国对法国的逆平衡是在于白银, 但是又在第48页说是在于黄金。

[101] 参见赛德里 (Sideri) (1970, 46)。

[102] 引于克里斯特洛 (Christelow) (1946, 27)。杨 (G.Young) 于1917年著述时也同样观察到: “杜罗 (Douro) 港区变成了英国殖民地的一个物质供应地”, 见其所著的《新旧葡萄牙》(牛津, 1917, 185)。

[103] 参见赛德里 (Sideri) (1970, 45)。

[104] 博克塞 (Boxer) 断言: 在18世纪, “无可置疑, 巴西在大多数方面比其母国更繁荣” (1969b, 323)。

[105] 参见弗朗西斯 (Francis) (1972, 179~180)。

[106] 参见马丁斯 (Oliveira Martins) 所著的《葡萄牙》史一书 (伦敦, 1908), 第二卷第149页至151页, 引用于赛德里 (Sideri) (1970, 67)。

[107] 参见赛德里 (Sideri) (1970, 49)。莫里诺 (Morineau) (1918h, 44, 47) 想要调和这一判断: 虽然巴西的黄金对英国向葡萄牙的出口具有一种“有限然而确切的影响”, 它却既不是“必不可少的”也不是“不可取代的”; 大体上, 在18世纪英国的经济增长方面, “巴西黄

金……既不是增长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最有力的因素”。然而，这却是骑马持矛大战风车之论。金银是必要的，而且在此关头正是从巴西才取得事实上的大多数金银。

[108] 弗朗西斯（Francis）指出：“荷兰人和汉堡人也需要贵金属，却没有（英国人那样的）便利条件，只好从伦敦转手获取他们的（走私金银中）一个份额”（1966，217）。

[109] 参见博克塞（Boxer）（1961，90）

[110] 参见布罗代尔（Braudel）（1972，I，430~432）。

[111] 关于例证，参见弗里德里希（Friedrichs）（1975，32~33）所言：“至16世纪初期在纽伦堡（Nuremberg）已被引入金属工业的许多部门和亚麻、绒织品、钱包、手套、刷子、纸张书籍等制造业中。17世纪后期在纽伦堡甚至组织铅笔生产也以此为基础。”克伦本茨（Kellenbenz）（1977a，469）所见相同并且补充说：“在黑色及有色金属矿的采掘业中，购买水泵、熔炉和其他必不可少的技术装备经常使小工场作坊负债累累，需要有商人的帮助。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产品的定期买主是一个明显可见的潜在信贷来源之时。”

[112] 参见布罗代尔（Braudel）（1972，I，431）。关于根特和布鲁日两地，卡雷拜克斯（Careybeckx）（1962，427）观察到：“在17世纪，‘行会’联系变得更为松散，特别是在17世纪后半期。工人即‘师傅’或‘熟练工人’知道他的命运掌握在商人的手中，唯有他才能确保将其产品出售。”

[113] 参见弗里德里希（Friedrichs）（1975，33），他指出：“行会在此种关系证明是有害于其成员时，就会结束这种安排。”

[114] 参见克伦本茨（Kellenbenz）（1965，II，420）。

[115] 参见克伦本茨（Kellenbenz）（1977a，V，470）。塞拉（Sella）认为至少是从威尼斯向农村地区的转移，要更多地归因于行会成员的工作缺乏效率而不是他们的高工资，但是，这在我看来都是同一回事。参见塞拉（Sella）（1968，122~123）。在农村地区，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渴盼扮演此种角色。琼斯（E.L.Jones）（1975，339，341）指出：特别是在那些“沙地贫瘠、土地难耕”的低地地区和某些“高地地区”，可以看到这种乡舍外加工工业（putting-out）。他暗示说，正是这些地区“无力以内部农业资源供养其人口”的事实，致使他们以此方式寻求补充收入。门德尔斯（Mendels）以同样的语调指出：“有证据表明……成为织工的农民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而且就留在那里了”（1972，242）。克里特（Peter Kriedte，et al）（1977，68）认为：“由于缺乏可耕地，（来自农业的收入越少），小制造业主轻视农业转而重视工业的倾向就越大。”克里马和麦克里克（Klima and Macurek）（1960，90）指出：在捷克，乡村制造业的工人来自“乡下穷人”。参见瑟斯克（Thirsk，1961）关于手工业与某些类型的农业团体的联系的论述。

[116] 参见库里舍（Kulischer）（1931，11）。

[117] 参见克伦本茨（Kellenbenz）（1965，II，427及书中各处）。

[118] 参见弗里德里希（Friedrichs）（1975，33）。布费尔蒂等和康斯坦丁尼（Bulferetti and Constantini）（1966，73）指出：“经过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商业资本和独立工匠之间长久的对抗在热那亚变化了，……变成了各个工匠集团一致屈从于商人企业家的指挥。”克里特指出：甚至在“购买制”（Kaufsystem）中 [此处不同于“中间商制”（Verlagssystem），工作不是以佣金来完成的]，也有由于信用贷款的协调作用而出现“一个经济依赖的启端”，此外，尽管生产者有外表上的独立性，仍然存在“经过贸易的剥削”（见克里特等人的著作，1977，202~203）。更不必说在“中间商制”中亦是如此，在此，商人企业家“自始至终决定着是否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产量”。（第214页）。

[119] 参见特罗伊厄（Treue）（1957，41~42）所作的概述。关于在德国的犹太人，参见特罗伊厄（Treue）（1955，398~399）；关于在意大利的盎格鲁—荷兰人，参见范范尼（Fanfani）（1959，57~58，128）；关于在波希米亚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参见克里马（Klima）（1959）和米卡（Mika）（1978，234~235）；关于中欧的“中间商制”与出口贸易之间的联系，参见克里马和麦克里克（Klima and Macurek）（1960，96）以及克里特（Kriedte）等人的著述中克里特的文章（1977，64）。

[120] 参见桑巴特（Sombart）（1900，1138~1140）。甚至于那些并未顺从商人企业家的家庭工业生产者，在市场的作用下也被降到了一种事实上的类似地位上，如梅迪克（Hans Medick）（1976，296）所强调指出的：“无论家庭工业的织布工、编织者、制钉者或制镰刀者本人作为买主和卖主是否进入市场，以及是否以‘购买制’如此工作，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商业资本。”“外加工制”对商人企业家来说当然要比“购买制”更为有利可图，因为在后一制度下生产者保留下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虽然“中间商制”在管理控制方面不能与工厂制度相比较，它仍然优于“购买制”，并且由此增大了生产效率，其利润大多落入商人企业家之手。尽管在“中间商制”之下，一个直接生产者的计件工作收入要少于“购买制”之下的收入，但是，他的年度收入由于有更可靠持久的雇用而更多。参见克里德特（Kridte）等人的著述中（1977，215~216）施吕勃姆（Schlumbohm）的文章。

[121] 参见门德尔斯（Mendels）（1972）。参见克里特（Kridte）等人的著述中（1977，13~35）有关这个概念的历史学根源的讨论，他们认为：在决定世界市场的既定地区的最终经济作用方面，“原始工业化”具有“战略重要性”（第30~31页，注释52）。克里马和麦克里克（Klima and Macurek，1960，IV，96~97）认为制造业此即“外加工制”，“在从行会制度经由制造业转向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逐渐过渡中是一块达到目的的跳板”。关于制造业和工厂制度为什么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渐进过程中的联系环节而不是一场深刻决裂中的彼岸，他们的解释是：制造业“深化了劳动分工”而且“将大量的无技能和低技能的工人带入生产中”。迈斯卡（Myška）（1979，44~49以及各处）在讨论捷克的集中化的铁制造业时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再参见雷德利希（Redlich）（1955，93~97）。

[122] 梅迪克（Medick）（1976，299）对其如何运行做出了非常出色的解释，并且概括

说：“家庭经济生产的逻辑发展变得有效了，首先是因为贫穷的无地劳动者倾向于求助手工品生产中的‘自我开发’，如果这对确保通常的家庭生存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必要的话。”这就给商人企业家造成了一种“差别利润”，既“超越了可以从行会制度的生产社会关系中所取得的利润，也超越了可以从制造业的相似的工资劳动关系中所获的利润”。梅迪克（Medick）尤其感兴趣的是“家庭经济和商人资本的共生关系”。他认为“传统家庭自然经济的行为规范与规则”在促成资本主义的起源发生方面比新伦理更为重要（我倒是宁愿说资本主义的成长发展）（1976，300）。

[123] 参见罗曼诺（Romano）（1974，188~189）。

[124] 参见罗曼诺（1971，201）。

[125] 参见罗曼诺（1974，195）。

[126] 参见普罗卡西（Procacci）（1975，28），他称此思想是“太简单和太激进”。博雷利（Borelli）（1974，27~28）给予了一个良好的例证去说明它为什么并不仅仅只是一件意愿之事。他指明威尼斯为了挽救它的丝绸工业而在1588年禁止出口生丝，因为这种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导致价格下跌，而且鼓励了走私出口。至1694年，威尼斯的生丝有2/3私下偷运出口了。这还不足以宣布重商主义政策。还必须在政治上强大到足以实行这样的政策。在此例中，重商主义措施所提供的竞争余地，尚不足以克服威尼斯非常之高的生产成本障碍。

[127] 参见塞拉（Sella）（1964，244）。拉普（Rapp）对此经验形势的保留意见有所不同。他也认为威尼斯从出口定向型工业转向了国内服务业。他将此变化看作是一个旨在维持就业和繁荣水平的努力，多少有些成功 [参见拉普（Rapp），1975，523~524]。

[128] 参见塞拉（Sella）（1975，12）。事实上，恢复力的一种形式是增加了城市与近郊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如在威尼斯和特拉费马（Terraferma）。见马里诺所言（Marino）（1978，100）：“特拉费马（Terraferma）的生产所承受的更多财政负担、农业投资和地区市场使威尼斯及其内地成为一个有机整体.....（17世纪）危机的最重要后果本身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一体化的地区性经济和一个协调的经济政策。”

[129] 施莫勒（Schmoller）（1897，74）。德弗里斯（De Vries）（1976，97）提出了一个关于这种依赖性的良好例子。在1650年前的时期中，哈勒姆（Haarlem）的呢布商还依赖内地的女织工们，但是，到1650年时，这种工作任务在地理上向外转移到了威斯特伐里亚（Westphalia）（以及南尼德兰）的家户之中。“现在，哈勒姆（Haarlem）成为布业代理商的一个网络中心地，代理商们将亚麻布送到此处漂白和最后出售。”

[130] 参见法兰克福和莱比锡所出版的《荷兰的商店》一书（Frankfurt and Leipzig 1770，251~252），引用于比尤廷（Beutin）的著作中（1939，120）。比尤廷引用了“弗里德里希（Friedrichs）一览表”证明此见，他本人对此“并无怀疑之处”。

[131] 参见安德森（Anderson）（1974a，249）。

[132] 参见库斯克 (Kuske) (1922, 189)。

[133] 参见利贝尔 (Liebel) (1965a, 287)。16世纪中, 这些城镇当然已经开始了一个长期衰落。

[134] 参见基许 (Kisch) (1968, 3)。

[135] 参见基许 (Kisch) (1959, 555)。

[136] 参见皮朗 (Pirenne) (1920, V, 65~69, 129~130, 193~201)。当然有一个重商主义的插曲, 其本身就是富有教义的。所谓的“比利时的柯尔伯 (Col-bert)”, 布罗奇温 (Jean de Brouchaven)、贝格雅克 (Bergeyck) 伯爵于1698年设法说服巴伐利亚 (Bavaria) 选侯伊曼努尔 (Maximilien Emmanuel) 兼西班牙尼德兰的总督, 劝说他去设立关税, 创建“东方公司”在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 筹划内部航线的改进, 甚至在1699年劝说他去禁止羊毛的出口和外国纺织的进口。但是, 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报复, 连同各省之间的猜忌, 使马克西米连后退了 (第64~69页)。

就在菲利普五世登基后不久, 马克西米连失势, 他的军队也为法国军队所取代, 此时, 贝格雅克 (Bergeyck) 伯爵再次被授权去推行他的柯尔伯 (Calbert) 式的改革。这就是所谓的“旧制度 (Régime anjouin)” (第94~105页)。1706年在拉米伊战役 (Ramillies) 中, 马尔博罗 (Marlborough) 击败了法军, 此时, 英、荷两国的联合占领取代了法国占领。关税立刻被废除, 政府的集权化终止了。皮朗 (Pirenne) 注意到: “改革曾企图使国家挣脱出在17世纪末所陷入的呆滞状况, 却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无人予以注意。曾经反对贝格雅克 (Bergeyck) 伯爵改革计划的地方独立主义, 现在都效劳于英国—荷兰当局的协商会议的利益。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各省自行其是, 只顾各自的眼前利益。英国与荷兰袖手旁观, 任其放任自流。它们知道一旦和平降临, 就无法保留住比利时, 因而最好的办法是: 将它交给 (奥地利的) 查理三世, 一个其国家的政治经济处于虚弱无力和死水状态的国王。” (第114页)。再参见哈斯钦 (Hasquin) (1971, 125~126)。甚至卡雷拜克斯 (Careybeckx) 也坚持认为在此时期中, 南尼德兰的生产并不比英国与荷兰竞争对手逊色, 他解释说从欧洲普遍的衰落局面来看, 17世纪后期的危机“在南尼德兰显得尤为严重, 因为他们面对邻国更为狂热的保护主义, 极为缺乏重新做出反应的手段” (1962, 465)。凡·德维 (Van der Wee) (1978, 14, 17) 认为南尼德兰在17世纪的复兴实际上伴随着“明显的非城市化 (de-urbanisation)”和“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的倒退”。

[137] 在1648年之前尤为如此。斯托尔斯 (Stols) 引用了一位来自布鲁日的耶稣会会士在1617年所说的话, 此人在谈及西班牙美洲时说: “从此, 由于有荷兰叛徒, 通往印度之路对佛兰德人显得更加困难起来” [引于斯托尔斯 (Stols), 1976, 40]。

[138] 参见布鲁勒兹 (Brulez) (1967, 89)。卡雷拜克斯 (Careybeckx) 也持有相同见解 (1962, 413~418), 然而, 他又承认“经济的重心滑向乡村” (第419页)。还有向列日 (Liege) 的滑动。参见克伦本茨 (Kellenbenz) (1965, II, 393) 所言: “据说, 西班牙尼德兰的不幸正是列日 (Liege) 的幸运。”再参见詹宁 (Jeannin) (1969, 70)。

[139] 参见布鲁勒兹 (Brulez) (1967, 94~99) 和卡雷拜克斯 (Careybeckx) (1962, 416)。这种看法得到了贝顿斯的支持, 贝顿斯 (Beatens) 讨论了佛兰德人的私掠巡航活动, 这在直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17世纪中是一种颇为繁荣的事情。贝顿斯谈到了它对安特卫普的商人集团的消极作用, 利用荷兰船队进行他们的广泛贸易, 这表明了佛兰德人绕过对其经济的合法限制的主要渠道 [见贝顿斯 (Beatens), 1976, 74]。

[140] 穆夫里 (Meuvret), (1953, 216) 认为这是在1636年; 奇波拉 (Cipolla) (1958, I, 392) 认为这是在1619年。

[141] 参见奇波拉 (Cipolla) (1958, I, 392, 394)。

[142] 参见布费尔蒂 (Bulferetti) (1953, 53)。

[143] 参见马德莱那 (De Maddalena) (1974b, 77)。“米兰的经济无可否认地进入了一个停滞的阶段”(第79页)。

[144] 参见凯齐 (Caizzi) (1968, 6)。

[145] 参见布费尔蒂和康斯坦丁尼 (Bulferetti and Constantini) (1966, 35)。

[146] 拉普 (Rapp) 断言说: 17世纪后半期时, 出口部门的全部就业职位减少到了1539年的绝对水平, “就在工业的突然兴盛开始之前”(1976, 104)。他又补充说: “威尼斯港并没有由于17世纪的诸种经济困境而崩溃, 但是, 它的特点却从世界贸易的支轴变成了一个地区性的服务港口”(第105页)。莱恩 (Lane) (1973, 417) 指出威尼斯再也无力将对手的船队阻拦在亚得里亚海之外或者说无力阻止竞争港口的兴起。

[147] 参见利贝尔 (Liebel) (1965a, 295, 300)。

[148] 伯金 (Bürgin) (1969, 220) 说: 至17世纪之末时, 瑞士以钟表制造“作为世界中心出现于世”(第227页)。

[149] 参见伯金 (Bürgin) (1969, 221)。

[150] “在17和18世纪中非常重要的”转口贸易和“持续发展的出口贸易的政治基础, 是国家的政治中立” [博德默 (Bodmer), 1951, 574]。此外, 由于它的中立, 瑞士吸引了流亡的企业家 (第598页)。

[151] “忠实于柯尔伯 (Colbert) 主义的原则的法国政府, 将新近赢得的弗朗什孔泰省 (Franché-Comte) 的矿产财富用于为它们的强权政治服务, 而且, 只向那些顺从其意志的地方以优惠条件提供盐” [博德默 (Bodmer), 1951, 576]。

[152] “在17世纪看来与此同样荒谬的是: 正是缺乏一项明确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 帮助这一特殊地方实现了积极的收支平衡” [博德默 (Bodmer), 1951, 575]。不过, 反重商主义并

不排除国家贷款给企业家，而且，例如日内瓦的各行会就反对不设立关税 [参见皮乌兹 (Piuz)，1970a，9]。

[153] 博德默 (Bodmer) (1951，598) 说瑞士“不仅大量出口工业产品，而且也出口包括奶酪和牛肉在内的一些山地经济产品”。

[154] 参见拉普 (Rapp) 关于威尼斯的论述 (1976，159)；布费尔蒂 (Bulferetti) 和康斯坦丁尼 (Constantini) 关于日内瓦的论述 (1966，48~50)；基许 (Kisch) 关于亚琛 (Aachen) 的论述；门德尔斯 (Mendels) 关于佛兰德的论述 (1975，203)；以及弗里斯 (De Vries) 关于苏黎世的论述 (1976，97)。在荷兰，纺织业从哈勒姆 (Haarlem) 和莱顿 (Legden) 扩大到特文特 (Twente) 和北布拉邦 (Brabant)。德尔夫特 (Delft) 的陶器业扩大至弗里斯兰 (Friesland)。饼干制造业越过了荷兰的北方边界。沃德 (Van der Woude) (1975，239) 称此为“(荷兰) 工商业的乡村化”。

[155] “虽然制毛业衰落了，丝织业却兴起了” [博雷利 (Borelli)，1974，25]。再参见布费尔蒂 (Bulferetti) 和康斯坦丁尼 (Constantini) (1966，70) 以及拉普 (Rapp) (1976，105~106)。皮乌兹 (Piuz) 谈到了日内瓦丝织业中“城市中间商制 (Verlagssystem)”的兴起 (1970a，5)。基许 (Kisch) (1968，28) 指出在18世纪早期的克雷费尔德 (Krefeld) 有从一个从亚麻转向丝绸的变化。然而，卢扎托 (Gino Luzzatto) 坚持认为所有这些，甚至于包括丝绸都发展不顺利，因为法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其他地方都损害了销售 [参见卢扎托 (Gino Luzzatto)，1974，161~162]。关于作为工厂的丝织坊，参见庞尼 (Poni) (1976，490~496)。

[156] 参见哈斯科尔 (Haskell) (1959，48)。艺术品出口的另一面是旅游者的进入。17世纪时，威尼斯可能是第一个现代旅游中心 [见德弗里斯 (De Vries)，1976，27]。

[157] 参见罗曼诺 (Romano) (1962，510~513)，博雷利 (Borelli) (1974，20) 以及塞雷尼 (Sereni) (1961，207)。与此同时发展的是在1600年至1750年期间，交租佃农制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继续扩大 [参见塞雷尼 (Sereni)，1961，205]。

[158] 引用于罗曼诺 (Romano) (1968，733)。

[159] 参见博雷利 (1974，15)。

[160] 伍尔夫 (Stuart Woolf) (1964，283) 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相似之处：“在此两国，统治者阿马托二世 (Vittorio Amadeo II)、伊曼努尔二世 (Carlo Emanuele II) ——大选侯，腓特烈·威廉一世 (Frederick William I) 有意将其改革活动用来对付被认为是创立集权专制君主制度主要障碍的贵族；新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贵族的财税特权受到攻击；但是，在此两例中，贵族仍然保留了财税豁免权的实质部分，而且，他们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实际上也未受触动。”

[161] 关于地主的权势的增长，参见詹宁 (Jeannin) (1969，69)；关于在列日兴起的交租佃农，参见卢维特 (Ruwet) (1957，69)。

[162] 例如，可参见韦斯（Weis）（1970），他比较了德国西部（莱茵地区除外）和法国的情况。法国农民只拥有35%的土地，易北河以西的德国农民拥有90%的土地，因此，法国农民的“经济、社会、法律和心理方面的状况……在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时更是大为不利……尽管法国的土壤更肥沃，农业技术有全面进步”（第14页）。再参见布拉斯柴克（Blaschke）（1955，116）关于萨克森的论述。

[163] 参见吕特格（Lütge）（1963 and 1965，685）。霍夫曼（Alfred Hoffmann）（1952，98）创造了“领地经济统治（Wirtschaftsherrschaft）”这个概念，并且明确认为它是介于老式“领地租金统治（Rentenherrschaft）”与17和18世纪中新发展起来的“庄园主统治（Gutswirtschaft）”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他给“领地经济统治（Wirtschaftsherrschaft）”所下的定义是：“在此形式中，如先前一样，绝大多数的可耕地仍是分散给单个的和独立的农民农场。然而，农民农场利用纳税的更大集中化和更多地为领主服务，比以往更紧密地彼此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经济团体。这种团体不仅包罗纯粹的农民农业经济活动，也包罗一系列手工业活动，并且与某个面向出口市场的商家有密切联系。”霍夫曼认为：从“领地租金统治”转向更现代和更资本主义的“经济农场统治”变化，“导致地主经济（grundherrlichen）的财产谋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第166～167页）。

巴克（T.M.Barker）（1974，27）说：“领地经济统治（Wirtschaftsherrschaft）意味着一个集中化与合理化管理的‘农场庄园’……它将领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与许多技术结合起来，用于从农夫的私有劳动中谋取利润。”马卡凯（Makkai）（1975，230）暗示说关键特色在于：地主“利用他的独占权利（酒店、磨坊、屠宰场等等）以及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以求增加他的收入。”马卡凯（Makkai）认为将此看作是第三种经济制度是“站不住脚的”说法（第231页）。在强调领主的商业活动的这一程度上，他是正确的，而且可以引证霍夫曼（Alfred Hoffmann）本人所写的一篇关于作为企业家的地主（Grundherr）一整篇论文（1958）。但是，在领地经济统治（Wirtschaftsherrschaft）是“合理化管理”这个意义上，它有别于传统的地主经济（Grundwirtschaft）。不过，也许说所有的“地主经济领地都在此时间”向经济农场统治方向发展会妥当些。

[164] 至1620年代时，热那亚曾充当西班牙的银行家，关于它的这一陈旧的金融作用的衰落，参见德维（Van der Wee）（1977，333，375）。热那亚通过投资国家债券先是在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诸国，后是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萨克森等成为欧洲的银行家，关于它的这一新的金融角色，参见德米尼（Dermigny）（1974，549）。德米尼说热那亚的金融投资是如此滑稽，以致“人们只要稍稍夸大词语，就可以谈成是寄生方式，即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562页）。

[165] 参见拉普（Rapp）（1976，37）。范范尼（Fanfani）（1959，130～131）也注意到17世纪中意大利纯粹向外移民。

[166] 参见布费尔蒂（Bulferetti）（1953，47）。

[167] 参见伍尔夫（Woolf）（1964，283）。

[168] 参见塞雷尼 (Sereni) (1961, 188, 210)。维拉尼 (Villani) (1968, 124) 说到了同样之事：“17世纪中，（意大利农业部门）并无倒退，但是却有连续发展。”

[169] 塞雷尼 (Sereni) (1961, 187) 认为大米是“促成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一种决定性推进力量”。再参见格拉曼 (Glamann) (1977, 201)，他认为在伊比利亚半岛引进玉米是一种类似的现象。

[170] 参见达席尔瓦 (da Sliva) (1964a, 485)，以及第490~491；卡莫纳 (Carmona) (1964, 106~107)。

[171] 参见罗曼诺 (Romano) (1968, 735)。

[172] 参见文图拉 (Ventura) (1968, 719)。

[173] 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20)。

[174] 参见罗伯茨 (1958, II, 21)。

[175] 参见罗伯茨 (1958, II, 21)。

[176] 希登布兰德 (Karl-Gustav Hidebrand) (1954, 101) 说：进口宽布优于国内产品的主要之处不是经久耐用或雅致漂亮，而是“质量相对稳定一致”这个事实。

[177] 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139~142)。

[178] 本人在此拙作第一卷 (1974) 中讨论了“倾斜重商主义”，鲁斯 (Hans-Edvard Roos) (1976, 65, n.35) 提及这一讨论时说：“这并不符合瑞典的情况。尽管16世纪后半期时国家财政的特点是大笔赤字，这并未导致一种‘盘旋下降’及产生国家更虚弱和处于边缘地位的结果。与之相反，此文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在此困境中找出了新的道路，最终形成民族国家的一次扩张和国家经济的诸种新形式。”

[179] 该词是“外来语，如许多其他词汇一样来自德国，用以形容任何这种人：他拥有共同的特权和责任，对社会和社会的共同功能有共同的权利要求” [罗伯茨 (Roberts), 1953, I, 285]。

[180] 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48)。

[181] 参见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 312~313)。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1974a, 179) 也做出了同样的见解，认为“农业中的商业化指数在欧洲大陆各处都可能是最低的。”

[182] 实际上，安德森 (Anderson) (1974a, 173) 认为“瓦萨改革 [(Vasa) 1527年至1542年，瓦萨 (Gustav Vasa) 在顺应宗教改革的旗号下没收教会财产] 无疑在欧洲任何王朝所

实现的这种经济行动之中是最为成功的”。安德森详细列举了该君主国的经济获得物和政府集权化的诸种措施。他得出结论说：这些措施却是“没有引起贵族的对抗，在瓦萨统治时期，贵族表明了同统治政权的基本团结一致”（第174页）。

[183] 罗伯茨（Roberts）（1958，II，120）全面描绘了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治下的经济变革（见该书第二章各处）。事实上，在1580年代就有了更早的各种垄断权，维伊克（Willem Van Wijck）在其中发挥了一种重要作用；然而，它们未能持续长久。

[184] 参见格拉曼（Glamann）（1977，242）。关于17世纪时铜在（金和银之后的）各种金属中所占的主要地位，参见克伦本茨（Kellenbenz）（1977b，290）。

[185] 参见艾略特（Elliott）（1966，300）。这次始于16世纪而在17世纪臻于极点的通货膨胀的后果之一，就是急剧的内部资本集中 [参见吕兹马丁（Ruiz Mar-tin），1970，60]。

[186] 参见艾略特（Elliott）（1966，300，329，344，352~353，361，365）。只是在1693年才结束在卡斯提尔铸造维农货币（Vellon）。

[187] 例如，安德森（Anderson）（1974a，183）认为：“正是在1599年的贬值中由勒尔马（Lerma）公爵发行新的铜质维农，使国际需求大涨，纷纷要求增加位于法伦（Falun）的科帕尔伯格（Kopparberg）的产量。”正是在1599年，“瑞典政府的货币政策有了变化”，这肯定不是偶然之事；那一年中开始“大量发行纯铜的维农货币，导致1600年后铜价的一次突然上涨” [罗伯茨（Roberts），1958，II，33]。

[188] 参见德维（Van der Wee）（1977，299）。

[189] 哈克谢尔（Heckscher）（1954，88~89）认为这一点既提高了铜价又减少了对进口白银的需要。

[190] 参见格拉曼（Glamann）（1977，243）。

[191] 格拉曼（Glamann）认为在16世纪后半期中欧的采矿业的产量一直在下降（1977，188）。罗伯茨（Roberts）认为使匈牙利矿场关闭和图林根的矿场瘫痪的正是“三十年战争”（1958，II，90）。克伦本茨（Kellenbenz）反对这两种解说，认为匈牙利的生产和德国中部铜市场的衰落归因于“瑞典铜的充斥饱和”（1974，262，以及1977b，340）。

[192] 参见罗伯茨（Roberts）（1958，II，90）。哈克谢尔（Heckscher）说：“瑞典的政治扩张和经济发展之间最有力的联系环节是铜业”（1954，85）。它最终将受到日本铜的挑战。1623年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首次出现了日本铜，但是，1650年之前这种竞争是否有重大意义却是争论之事。有关这种辩论，参见罗伯茨（Roberts）（1958，II，97，n.3）；再参见诺德曼（Nordmann）（1964，474~475）。

[193] 参见德弗里斯（De Vries）（1976，21）。

[194] 参见特罗伊厄 (Treue) (1957, 28)。见波利森斯基 (Polišenský) (1971, 175) 所言：“哥特堡 (Göteborg) 和其他城镇只是瑞典土地上的荷兰前哨基地，尽管它的铜和钢变成了由特利普 (Trips) 和吉尔 (de Geer) 这样的家族所代表的荷兰—瑞典联合企业控制下的商品。”又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122) 所言：“1619年之后新哥特堡 (Göteborg) 的兴起发展，是这个正在变化的方向 (转向西面) 的显著标志。由于哥特堡的贸易都在波罗的海之外，它的最重要的市场是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船长们为了可以自由地与西班牙贸易，而且不顾国家的禁令，居住在哥特堡，就像他们居住在汉堡那样。”

[195] 参见格拉曼 (Glamann) (1977, 244)。

[196] 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28)。

[197] 参见格拉曼 (Glamann) (1977, 245)。

[198] 这一时机的选择令人迷惑。该公司成立于1619年7月24日。1619年是商业危机严重之年，也是荷兰的政治危机之年。4月23日，多德雷赫特 (Dordrecht) 的宗教会议正式谴责了阿米尼斯派 (Arminius) 的五点 (Sereni, Remonstrantium)，随后又在5月13日，奥尔登巴那维特 (Olden-barnevelt) 被处死。阿道夫 (Gustavus Adolphus) 有意试图抓住那些参与波罗的海贸易最多的董事们在政治上软弱的危急时刻吗？这些董事倾向于加入阿米尼斯 (Arminius) 阵营，一个有普遍化的商业危机混合其中的软弱之处。

[199] 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92~98) 和格拉曼 (Glamann) (1977, 245~246) 的有关讨论。

[200] 参见诺德曼 (Nordmann) (1972, 133)。

[201] 参见诺德曼 (Nordmann) (1972, 133)。瑞典军队因而是第一支不抢劫的现代军队 [见赫顿 (Hutton), 1968, 524]。

[202] 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189)。瑞士是维持了这个步兵传统的另一个国家。

[203] 这一描述基于罗伯茨 (Roberts) 书中所称的“陆军”一章，再参见另一章“海军” [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第三和第四章]。由于有这些成就，难怪瑞典军队成为克伦威尔、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 (Sergent-Roi, 士兵国王) 和彼得大帝仿效的一个榜样了。 [见诺德曼 (Nordmann), 1972, 147]。

[204] 参见鲍曼 (Bowmann) (1936, 343~344) 和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73, 92~94)。在1630至1635年的特许证时期，战争费用已戏剧性地增加了。1630年前，战争每年花费瑞典人的50万皇家达勒 (vixdaler)，此后是2000万至3000万。詹宁 (Jeanning) 说：“(开支) 猛增的基本前提条件是以战养战” (1969, 324)。他引证了阿道夫 (Gustavus Adolphus) 在1628年所言：“如果我们不能说以战养战，我就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成功地完成未竟之业。”关

键问题在于：普鲁士特许证是否能够使瑞典人承担起独自增长的战费，或者阿尔特马克（Altmark）条约和随之而来的普鲁士特许证是否使他们有可能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而增加战费吗？罗伯茨（Roberts）分析了瑞典的偿付能力（这是未用出售官职而取得的一项成就，相比之下，法国无力这么办到），他评论说：“对此困难（瑞典纳税基础的薄弱）的一个可能解答在于这种反论：通过对瑞典的牺牲者所称的侵略，也许可以找到安全和偿付能力。战争也许可能用来维持战争，也可能带来其他的丰富酬报：适合瑞典需要的是一个战争经济，而不是一个和平经济。”而且，后来在“它的军队不再能威胁其邻国之时，它的资源不足就变得日趋明显了”（1973a, 12, 14）。

[205] “1644年，瑞典企业家吉尔（Louis de Geer）（他实际上是一个在瑞典居住和投资的荷兰人）宣布说：能够以铜炮的1/3的价格为军舰提供铁炮……随后数十年中，甚至从技术角度来看，铁炮已改进到可与老式大炮比美的程度，在各个地方得到广泛使用了” [格拉曼（Glamann），1977, 243]。

[206] “可以察觉到有一种从铜制用具转向铁制用具的变化。其中部分原因是铁制品价格的下跌，但也是因为铁制炊具更容易清洗，也不会使食品败味” [格拉曼（Glamann），1977, 203]。

[207] 参见塞缪尔森（Samuelsson）（1968, 28）。

[208] 参见塞缪尔森（Samuelsson）（1968, 30）以及关于瑞典铁矿技术的讨论（第30~31）。

[209] 参见罗伯茨（Roberts）（1958, II, 29）。

[210] 罗伯茨（Roberts）引证了查理九世（1599年至1611年在位）对韦姆兰（Varmland）的殖民化，认为它是（瑞典历史学家）盖耶尔（Eric Gustav Geijer）的名言至理的一个著名例证，此言是：“铁开发了国家”（1958, II, 36）；罗伯茨（Roberts）还讨论了铁工业中的国家干预的历史（第29~31页，第35~36页）。

[211] 在此处以及注解(205)，吉尔（de Geer）被认为是一个荷兰人，因为在瑞典他就是这么被认为的。但是，吉尔（de Geer）家族显示了资本的流动。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机遇原因，列日的吉尔家族只是在16世纪末时将其“总部”迁往阿姆斯特丹 [参见耶诺克斯（Yernaux），1939, 101, 120~124]。再参见中欧和北意大利的“外加工”工业中荷兰投资的有关论述（第195页）。卡曼（Kamen）（1972, 92~99）声称这些投资者是佛兰德人（Flemish）和瓦隆（Walloons）人或者是比利时人，亦即是来自南尼德兰——和列日（Liège）吗？这在16世纪后半期是真实的，他正是从这一时期得出他的特有的看法；但是，在尼德兰叛乱之中，这些佛兰德人中有许多人定居在荷兰，随后又在别处投资。在这些别处国家中，在17世纪，他们被认为是荷兰人，而且，还不仅仅只是“当时的英国人”是这么认为，卡曼（Kamen）（1972, 95）将“该词的使用……”归之于这些英国人，还认为该词掩盖了这一事实：他们是佛兰德人。词语的用法更经常的是揭示了而不是掩盖了社会现实。

[212] 参见诺德曼 (Nordmann) (1972, 137)。

[213] 参见塞缪尔森 (Samuelsson) (1968, 31)。

[214] 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37~38)。在一封给我的私人函件中, 奥登 (Birgitta Odén) 写道: 她对此感到怀疑, 因为, 除了烧炭之外, “劳动力是高度技术性的, 而且按等级制组织起来了”。

[215] 参见哈克谢尔 (Heckscher) (1954, 99)。蒙克特勒 (Munktell) (1934) 的一项研究表明: 工人既从事开矿也在他们的小屋中从事第一阶段的冶炼, 制铁商主要是向他们提供木柴。在弗林特 (John Flint) 的帮助之下, 我接触到了这一研究。在下发制 (Utarbetningsträtt) 的名义之下, “外加工制”也在铜的生产中广泛使用。参见鲁斯 (Roos) (1976, 59) 和贝瑟斯 (Boëthius) (1958, 148~149)。

[216] 参见塞缪尔森 (Samuelsson) (1968, 28~29)。17世纪中, 谷物出口减至近乎于零。参见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73, 67表格5)。由于挪威的竞争和政府不许出口橡木的一项禁令 (瑞典自己的海军需要橡木), 木材出口也减少了。参见塞缪尔森 (Samuelsson) (1968, 29)。

[217] 塞缪尔森 (Samuelsson) 说: “17世纪争夺‘国家的’商业海运的斗争 (更不必提起瑞典为国内工商业所做出的其他努力了) 可以比作是一个已获取政治自治的前殖民地的渴盼, 要求摆脱经济桎梏。也许, 甚至可以更大胆地制订出相类似之事……。正如某些新近出现的非洲国家关心要留住前殖民官吏, 以求其帮助去管理经济和公共行政那样, 17世纪的瑞典也是如此关切, 劝说从前的金融家和来自国外的商人变成瑞典臣民, 旨在以‘容纳’他们而使其资本和才能‘瑞典化’” (1968, 41)。

[218] 参见戴雍 (Deyon) (1969, 36~37)。然而, 他也表明与英、法两国不同, 瑞典“与荷兰联合省的经济关系太密切”, 以致无法有一个紧凑连贯的经济政策 (第22页)。

[219] 参见塞缪尔森 (Samuelsson) (1968, 29)。实际上, 塞缪尔森称此三项垄断为一种“商业霸权”, 但是在我看来只是夸口而已。

[220] 参见安德森 (Anderson) (1974a, 98), 他将17世纪中瑞典对付东欧的军事作用, 比作16世纪中西班牙在西欧的军事作用。他将瑞典作为一个强国的时代确定为1630年至1720年。罗伯茨 (Roberts) 将此时代确定为1621年阿道夫 (Gustavus Adolphus) 占领里加至1721年签订尼斯泰德 (Nystad) 和约, “正好一个世纪” (1973a, 1)。

[221] 罗伯茨 (Roberts) 将瑞典相对成功的发展过程确定为直至1670年代为止——正好是我们所确定的荷兰霸权告终之时。这就理所当然地解释了为什么“瑞典完全不适合于任何一种关于‘17世纪危机’的解释概论” [罗伯茨 (Roberts), 1962, 53]。

[222] 参见塞缪尔森 (Samuelsson) (1968, 75)。

[223] 参见阿斯特罗姆（Åström）（1973，68）。如他所言：帝国结构层次化了：“它们的贵族作为一个骑士般组织起来的团体，其思维方式和语言都是德国的。在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地，在大宗贸易的里加（Riga），在停滞的勒维尔（Reval）和繁荣的纳尔瓦（Narva）……的市民也是如此。大大小小的总督们，连同他们的小宫廷和来自瑞典和芬兰的官吏及仆人，代表瑞典君王管理着各个公爵领地；瑞典和芬兰的驻军构成了他们的统治权威的基础。爱沙尼亚（Estonia）和立沃尼亚（Livonia）的贵族居住在他的领地上，四周是农奴化的农民，农民的语言却不是主人的语言，而是另一种语言。”从这些东波罗的海地区的观点来看，17世纪是一场反对外国资本侵犯的长期斗争，虽然不大成功。见斯姆（Arnold Soom）（1962，458）所言：“无疑，缺乏资本（在此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为了成功地与荷兰人竞争，就需要非常大量的资本。”

[224] 见罗伯茨（Roberts）（1973a，4），他也认为旨在实现“金融形势长期稳定”的企图失败了，但是，“对瑞典本身而言，帝国的经济重要性是确切无疑了”（第4，5，6页）。卢德维斯特（Lundkvist）（1973，4）也认为瑞典在其波罗的海帝国中所抱有的“商业壮志”是失败之举，例外的只是控制里加所获的好处以及获取其内地种植的亚麻和大麻。“里加的贸易统计表明了17世纪后期中一种明确无误的上升趋势；以及城市的重要性稳步增大”。东斯多夫斯（Dunsdorfs）（1947，2）说：对波罗的海之外的贸易点来说，在17世纪中仅有三个重要港口：格但斯克（但泽）（Gdańsk, Danzig）、柯尼斯堡（Königberg）和里加。詹希（Jensch）（1930，88）表明前往里加港的船只有增多——从1600年至1609年的96艘增至1650年至1657年的263艘，其中，荷兰船从65艘增至221艘。

[225] 至该世纪后半期时，每年的船只数目从大约40艘增至300艘左右，见东斯多夫斯（Dunsdorfs）（1947，16）。

[226] 见詹宁（Jeannin）（1969，95）。

[227] 见阿格伦（Ågren）（1973a，9）。

[228] 见卡尔（Carr）（1964，20~21）。

[229] 罗伯茨（Roberts）（1958，II，1958，59；以及第57~60页的讨论）。再参见塞缪尔森（Samuelsson）（1968，53~54）。

[230] 罗伯茨（Roberts）（1958，II，1958，50~52）。见汤尼森（Kåre D. Tonneson）（1971，307）所言：“正是在贵族的佃户中，人们发现大多数农民都受强迫劳役支配。17世纪中，建立了大规模的农业庄园，以贵族城堡为其中心，这一时期的城堡建筑新颖辉煌，随之，强迫劳役推广开来而且变得更为难于负担。”汤尼森注意到这些是有地区性差异的：在北方，这种庄园寥寥无几，无疑是因为要有利可图地种植一种经济作物更为困难，而且还高度集中在斯德哥尔摩以西地区和斯堪尼亚及荷兰的前丹麦诸省。

[231] 参见卡尔森（Carlsson）（1972，575）。

[232] 参见达尔格林 (Dahlgren) (1973a, 109)。

[233] 参见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55~56)。

[234] 哈顿 (Hatton) (1974, 4, n.2)。汤尼森 (Tonnesson) (1971, 308) 说：贵族土地从1560年的15%增加到1655年的60%。贾蒂卡拉 (Jutikkala) (1975, 159~160) 说：从1600年至世纪中期，瑞典的增长从1/4升至2/3，芬兰则是从5%升至50%。

[235] 罗伯茨 (Roberts) (1958, II, 153)。罗伯茨从威特洛克 (Wittrock) (1927) 的书中引用了一位农民代言人的这段声明。

[236] “17世纪中的瑞典帝国只要继续扩张，就可以继续存在” (达尔格林 Dahlgren) (1973b, 175)。

[237]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73, 58; 以及65~75)。

[238] 达尔格林 (Dahlgren) 认为这次战争仅仅只是直接的借口而已：“甚至在1654年登位之前，查理十世在事实上就已经计划了一次归还 (*reduktion*)，并且认为此乃必需之举，无论瑞典是否处在战争之中” (1973b, 178)。

[239] 参见阿格伦 (Ågren) (1973b, 240~241) 和达尔格林 (Dahlgren) (1973a, 120)。

[240] 参见阿格伦 (Ågren) (1973a, 27; 1973b, 237~241)。这一挤榨在1680年的“归还” (*reduktion*) 之后变得更为严厉。见达尔格林 (Dahlgren) (1973a, 126~131)。

[241]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73, 94) 提到说：瑞典有时也从荷兰、英国、西班牙和一些德意志邦国获得少量的补助金，但是，“并无什么重要意义”。大体上，瑞典试图通过它在纳尔瓦、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的海关港口，沟通与波兰和俄国的西欧贸易。见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63, 50)。

[242] 参见班福德 (Bamford) (1954)。

[243] 参见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73, 73, 86~87)。正是芬兰农民比瑞典农民更多地支付了这种贵族掠夺的代价。芬兰以及凯克斯霍姆 (Kexholm) 构成了“希望之乡”，因为波士尼亚 (Bothnia) 海湾沿岸和拉多加 (Ladoga) 湖为出口高等贵族院的大庄园产品“提供了良好的交通便利条件”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73, 87]。当要提供兵员时，芬兰所做的贡献也多于其份额。“说芬兰骑兵在‘伟大时代’之初类似于哥萨克骑兵，可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或者是一种怪僻的夸口之言。但是，其中也有道理”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73, 64]。

[244] 诺德曼 (Nordmann) 提醒我们注意欧洲价格的普遍下跌；在瑞典，价格下跌“较晚” (1650年后)， “但是，是可以感觉到的” (1971, 454)。下跌在英国和荷兰联合省曾是较晚的，在此同样的意义上说在瑞典下跌也是较晚的。参见詹宁 (Jeannin) (1969, 95)。价格

下跌对国家岁入的影响由于一个事实而恶化了，这个事实是：（1672年）一次缓和的价格开始上升后不久，瑞典参加了（1675年）法国—荷兰战争。罗森（Rosén）（1961，529）说：“路易十四世以不付补贴金的威胁，逼迫瑞典进攻勃兰登堡——荷兰联合省的一个盟友，而在1675年6月，瑞典军队在费尔伯林（Fehrbellin）遭受一次失败。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瑞典被拖进了大国之争……费尔伯林（Fehrbellin）之战虽然是一次不重要的武装冲突，却打破了瑞典军队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所享有的力量光环。”见罗伯茨（Koberts）所言：“至1679年……30年前曾使欧洲不寒而栗的力量已落到了令人耻辱的地步……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的后人变成了法国的附庸：法国与荷兰的外交官争论瑞典领土的命运处置时的口吻，和他们讨论西班牙领地时一模一样，当作战利品或交换物品。”[罗伯茨（Roberts），1967，230]。罗森（Rosén）又说：“恰如1657年至1660年的战争促成了在丹麦和挪威建立专制主义那样，1675年至1679年的战争也导致了瑞典的专制主义”（1961，531）。再参见奥斯塔鲁德（Østerud）（1976，8）所言：“约在1680年，作为对严重的财政和军事危机的回应，瑞典建立了专制君主制度。”

[245] 达尔格林（Dahlgren）认为，与欧洲其他地方的贵族相比，瑞典贵族在经济方面明显高出一筹：“在其他欧洲国家中，甚至在丹麦这样紧邻瑞典的国家中，土地贵族都在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这已成常见之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就瑞典贵族而言，在1680年之前的时期中没有任何这种危机的迹象。有一件事看来可以表明他们的明智作为，这就是他们之中有非常之多的人，不仅限于那些高等贵族之人，利用了各种机会投资于各式各样的商业冒险活动，或是投资于航运或是贸易公司……直到1680年之后，瑞典贵族才碰上了一次危机，危机到来时，它已是政治决策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因素的结果了。”[达尔格林（Dahlgren），1973a，124~125]。

不应当忘记，“分隔政策”（*Avsöndring*）特别有利于高等贵族[即相对于“地方派”（*Lögadel*）的所谓“宫廷派”（*Högadel*）]，而且，直到1680年，贵族为了收入而日益依赖国家服役，这大多是“地方派”（*Lögadel*）之所为。关于“归还”（*reduktion*）的一个解释是：后者发现自己的薪金在1675年至1679年的战争中未得到支付，因而希望增加国家收入确保自己的进项，办法是没收“宫廷派”（*Högadel*）的土地。参见阿格伦（Ågren）书中（1976，56~58，79~80）关于罗森（Rosén）和赫斯勒（Hessler）的理论的有关讨论。关于贵族中的这种分裂的讨论，阿斯特罗姆（Åström）补充了一个种族方面的考虑见解。他指出：克里斯蒂娜（Christina）女王和查理十一世将许多德裔波罗的人提升为“宫廷派”（*Högadel*），另一方面，支持“归还”的“狂热者”却是“来自芬兰的人——如克吕兹（Creutz）、弗莱明（Fleming）或伍尔德（Wrede）；或是来自瑞典中部只是新近才提高社会等级的那些家族”（1973，77）。在芬兰内部，支持“归还”的“斗士们”也是那些“最不得意的”男爵们，他们住在波士尼亚（*Bothnia*）海湾和拉多加湖地区（第87页）。利维（Liiv）对爱沙尼亚的研究倾向于证实阿斯特罗姆（Åström）的见解。在利夫兰（*Livland*）贵族失去其土地的5/6，在埃斯特兰（*Estland*）则失去了2/5，在沙阿雷马（*Saaremaa*）则失去了近1/3。参见利维（Liiv）（1935，35）。

[246] 1678年至1679年间的内伊梅根（*Nijmegen*）和约结束了法—荷战争。“路易十四没有做出任何真实的协商，就代表瑞典同敌国媾和了。……路易十四未同查理十一世协商一事遭到怨恨。法国还违背1672年同盟，背信弃义毁约：除非瑞典在通行税方面得到某些让步，否则不

与荷兰联合省媾和，此外，在此与荷兰的和约中还有一项如此不利的贸易协定，以至于查理十一世拒绝认可”[罗森（Rosén），1961，530]。哈顿（Hatton）认为“归还”主要是“一个大体上成功的企图，旨在解决‘和平的问题’，使瑞典摆脱这些结盟和补助金条约，因为它们限制瑞典在欧洲事务中的选择自由，阻碍了‘平衡政策’”（1968a，74）。

[247] 见阿格伦（Ågren）（1973b，243）。

[248] 见阿格伦（Ågren）（1973b，257）。此外，这种土地转让对农业生产率有间接影响，如哈克谢尔（Heckscher）所指出的：“贵族们被剥夺了大量的地产后，就变成了绅士农场主而不是收租者……他们较之从前……更有生产效率了”（1954，128）。

[249] 参见阿斯普维勒（Aspvall）（1966，3~4）。

[250] 参见奥斯塔鲁德（Østerud）（1976，13~14）。

[251] 参见罗森（Rosén）（1961，534），奥斯塔鲁德（Østerud）（1976，14）和达尔格林（Dahlgren）（1973a，125）。“国王的一些主要侍从利用由于实行‘归还’引起的地价下跌，为他们自己谋取了大量地产”，这一事实更加纵容了土地的集中[达尔格林（Dahlgren），1973a，125]。阿格伦（Ågren）赞同贵族挽救了庄园，但是，关于国王的主要侍从据称是捞取了地产一说，他却认为：“关于地价下跌的断言——这对整个争论是一个重要之点——不过是假想而已，未被证实”（1973b，256）。

有关新、旧两种贵族相对实力的学术争论，不可等闲视之。特别是因为“在1680年代和1690年代有异常之多的贵族册封”[卡尔森（Carlsson），1972，580]。这个重要因素是增加了大地主和非继承官僚的共生性。1700年，25%的高级文官系贵族出身，44%封为贵族。1700年至1721年的“伟大的北方战争”中，查理十二世册封了许多军官（经常是外国贵族家族）为瑞典贵族[卡尔森（Carlsson），1972，586]；战后，许多文职侍从不是被授予单独的政治权利，而是被封为贵族（第610页）。同时，在国家机构中为旧贵族保留了大量官职，这使得旧贵族在战争中依然效忠国王，尽管有“归还”政策。参见哈顿（Hatton）（1974，4）。整个事情都将这些新、旧上层阶级放置于国家机器领导集团的控制之下。国家的相对力量反应在大约1700年时的这种阶级结构的两极分化中；贵族与平民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界线”。“贵族既是官员又是地主，而平民只能任官员（教士、文官、陆海军军官），或只能是地主（农民），或只能是商人或工匠”[卡尔森（Carlsson），1972，608]。19世纪的瑞典历史学的观点认为国王试图以“归还”政策从贵族压迫之下拯救农民，关于对此观点的怀疑，参见阿格伦（Ågren），（1973b，244，257~263）。另一方面，罗伯茨（Roberts）（1967，249）却对此种观点表示信任：“农民的自由将不会再受到威胁了。”

[252] 参见阿伯格（Aberg）（1972，272）。这一制度的普遍性颇得人心。1675年至1679年的战争期间，“大多数农民特别厌恶征兵，因为贵族的侍从和佃农经常得到豁免”[见斯托伊（Stoye），1970b，770]。

[253] 参见达尔格林（Dahlgren）（1973a，129）。阿格伦（Ågren）指出这种合理性已超出

军队：“严格而论，用专项支取（indelningsverk）这样一个词语去形容一个纯军事组织，未免太狭隘了；该词在广义上意味着每一项开支都联系到一个确定的税源，以便该组织既可以申请军用开支也可申请民用开支”（1973b，248n）。

[254] “从此，委员会的成员将是大臣——国王或等级会议的仆从——但是，由于他们的貂皮帽、长丝绒袍、庄重的口才、面目的镇定和传统的元老尊严，他们再也不是查理十一世的少数派时期那种模样了” [罗伯茨（Roberts），1967，242~243]。

[255] 17世纪中，英国的谷物需求减少，木材需求增加，因此，它的贸易也就日益从波兰转向瑞典，因为波兰木材价格太高昂。见费多罗维茨（Fedorowicz）（1976）。1655年至1656年的波兰—瑞典战争后的这一转变是戏剧性的 [见费多罗维茨（Fedorowicz），1967，337，fig.1]，但是，瑞典却避免了曾是波兰的下场命运的边缘地区化。“（英国人）抱怨不休的一个主要之处就是不许外国代理商（在瑞典国内）自由行动和贸易” [阿斯特罗姆（Åström），1962，101]。瑞典有能力决定贸易条件，使英国大为失望，以至于如我们将要见到的，用力去颠覆它，在18世纪之初，企图在英属北美建立一个与之竞争对抗的海军用品供应地，但不太成功。

[256] 参见塞缪尔森（Samuelsson）（1968，13）。

[257] 参见卢德维斯特（Lundkvist）（1973，57）。

[258] 参见马洛维斯特（Maltowist）（1959，189）和哈顿（1970，648~650）。

[259] 参见贾蒂卡拉（Jutikkla）（1955，48，63）。

[260] 克伦本茨（Kellenbenz）认为17世纪俄国已经并入17世纪的世界经济之中。见克伦本茨（Kellenbenz）（1973）。关于苏联学者对17世纪的见解，参见沙利普宁（Cherepnin）（1964，特别是第18~22页）。阿斯特罗姆（Åström）认为俄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中的转折点，只是出现在“18世纪中期，当时，英国进口的铁、亚麻、大麻、沥青和焦油以及钾碱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俄国的港口”（1962，113）。

[261] 见哈顿（Hatton）（1970，648）。这很难说是一种经济上的不合理见解——如欧伯格（öberg）所指出的：“因此可以说的，瑞典的商业政策沿着这些垄断路线的形成，有着确定真实的正当理由。瑞典作为一个国家，其资本并不雄厚，以自己的人民所拥有的手段是无法为了俄国市场而去与荷兰和英国这样的富国竞争。然而，如果瑞典能够以军事或政治的手段取得一种垄断地位，就可能从俄国市场中获取一份丰厚的金融利润” [欧伯格（öberg），1955，61]。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在1690年代的战争中追求一项共同的波罗的海政策”的原因 [阿斯特罗姆（Åström），1962，45]。

[262] “海上诸强国急于结束这场战争，以便利用瑞典军队投入它们与法国的急迫斗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于1700年向彼得和查理提出调停。此后数年中又多次提出，一直为俄国沙皇所接受，也一直为瑞典国王所拒绝，这位国王因胜利而得意，受到一种念头的鼓励：向

攻击他的那些国家进行正当的报复” [安德森 (Anderson), 1970, 734]。

[263] 参见钱德勒 (Chandler) (1970, 754)。

[264] 参见诺德曼 (Nordmann) (1972, 147)。

[265] 参见卢德维斯特 (Lundkvist) (1973, 26)。

[266] 参见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73, 100)。

[267] “甚至从1721年以来 [尼斯塔特 (Nystad) 和约签订之年, 该条约正式结束了战争], 就一直在争论瑞典失去其非凡的帝国的原因。这是在幸运年头中拒绝和平的查理十二世的过错吗?正相反, 可以认为保持大国地位的唯一希望在查理十二世时破灭了” [哈顿 (Hatton), 1970, 679]。

[268] “波尔塔瓦 (Poltava) 使查理十二世从一位征服者变成了一个亡命者, 使整个形势彻底改观了.....它极大地增加了彼得在西欧的影响, 还赋予他唯有军事胜利才可获得的威望。俄国驻维也纳的大臣乌比奇 (Urbich) 于1709年8月在致莱布尼兹 (Leibnitz) 的信中写道: ‘现在人们就像从前惧怕瑞典那样惧怕沙皇了。’莱布尼茨这位哲学家表示赞同: 人们都在说沙皇对整个欧洲都将是令人可畏的, 而且说他将是有些像北方的土耳其人” [安德森 (Anderson), 1970, 735] 注意此语“比做土耳其”, 它像俄国一样, 是处在欧洲的世界经济之外地区的一个世界帝国, 而且在17世纪中受到一体化和边缘地区化的威胁。

[269] 实际上, “直至1721年并入俄国之前, 立沃尼亚 (Livonia) 并未真正变为一个‘瑞典的面包篮子’ [塞缪尔森 (Samuelsson), 1968, 76]。1721年, 条约特意允许瑞典从它先前的诸省免税进口谷物, 每年最高值为五万卢布”。见卢德维斯特 (Lundkvist) (1973, 56)。

[270] “1720年之后, 越来越多的产品——铁、焦油和沥青, 以前几乎完全是瑞典的垄断之物——可以直接从俄国获取了”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62, 106]。

[271] 诺德曼 (Nordmann) (1971, 455)。

[272] 1718年, 查理十二世死去, 没有留下继承人, 而且正是在这个复杂的王位继承问题的过程中, “一个反对专制主义党派由有势力的地主、军官和行政官员组成的松散集团.....取得了胜利”, 1719年5月在乌里卡 (Ulrika) 加冕之前, 强加给她一份宣言书“去签署和保持由等级会议制定的一部宪法” [哈顿 (Hatton), 1966, 351]。乌里卡 (Ulrika) 否认它, 因而被逼退位, 她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克一世 (Frederick I) 签署了1720年宪法, 实际上创立了立宪君主制, 由最终向国会负责的内阁实行统治 [见哈顿 (Hatton), 1966, 352~355]。

[273] 塞缪尔森 (Samuelsson) 将无沿帽党 (Horn) 的努力比作是“解决大破产”, 如同“大约同时的”路易十四之下的红衣主教弗勒里 (Fleury) 的作为 (1968, 14)。哈顿 (Hatton) 指出: 在无沿帽党 (Horn) 在委员会中权势极盛的年代, “看起来好像是代表土地贵族、高级官吏

和高级教士利益的寡头委员会再度统治了瑞典”（1966，352）。

[274] 哈顿（Hatton）（1966，357）。

[275] 他们自我标榜为高帽党人（Hats）是一种“军事头饰的暗示”，以此表明对无沿帽党人（Horn）缺乏军事支撑力量的批评。他们称呼对手是“睡帽党（Nightcaps）”或“无边帽党（Caps）”，暗示这些人是“沉睡的懦夫，戴着睡帽的老头”[哈顿（Hatton），1966，356]。

[276] 参见塞缪尔森（Samuelsson）（1968，107，119~120）；伊格利（Eagly）（1969，748，752；1971，13~14，18~20）；霍夫德（Hovde）（1948，23~25）。

[277] 参见安德森（Anderson）（1974a，190）。

[278] “高帽党”和“无沿帽党”之间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争论。哈顿（Hatton）说“1720年代.....的严格的重商主义的范例，是1724年的‘产品标示法’，它仿效英国的航海条例，沉重打击了波罗的海中的英国和荷兰的航运”。哈顿（Hatton）说，严格的重商主义的另一个范例，是1738年后由“高帽党”复活的1726年进口法令，“高帽党”正在要“加强支持瑞典的工业，伴之以一种更为强烈的保护，反对外国的竞争。”哈顿（Hatton）又说：“回顾起来可以清晰易见地看到：唯有来自瑞典和芬兰牢固的出口业的利润，特别是来自瑞典铁的利润，才能允许‘高帽党’如此长期地以新兴制造业去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的诸种实验，但是，在1762年至1763年的危机之前（危机部分产生于瑞典参加了‘三十年战争’，部分产生于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无沿帽党’并没有对‘高帽党’经济政策的理论提出什么强烈的抗议反对，尽管他们不断地要求执政党温和一些。同样，这两党在农业政策也有某些程度的协同一致之处”[哈顿（Hatton），1966，357]。

这一重商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正在悄悄溜走，不仅是因为英国对抗法国的力量日渐增大，也因为俄国作为铁制品出口者稳步加强了竞争力。18世纪之初，瑞典的生产占世界产量的75%至90%，而在1760年代降至大约1/3，当时，俄国的产量超过了瑞典。大约在1730年至1745年的不景气状况中，瑞典的销售额下降了，因此，瑞典人限制产量以求维持住价格。塞缪尔森（Samuelsson）并不认为此乃愚蠢之举，而是看作“将必做之举装成善行”（1968，89）。再参见哈克谢尔（Heckscher）（1932，134~135）；贝瑟斯（Boëthius）（1958，151~152）；希登布兰德（Hildebrand）（1958，13）。

[279] 奥斯塔鲁德（Østerud）（1976，24），他所说的“独特的星辰‘包括有’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其社会基础是半奴隶般的农民和占优势的城镇。”

[280] 见彼得森（Petersen）（1967，20~21，以及1968，1249）。

[281] 彼得森（Petersen）（1967，30）。当然，如在一切这种情况中那样，一个竞争者的不幸就是另一个未受不幸打击的竞争者的大好时机。彼得森（Petersen）注意到：在“安全规则”方面，“丹麦相对地处于普遍的战争景气中的有利地位上。”他说：“1617年至1623年德国和波兰的商业与货币危机，以及1630年代中期以前，瑞典的波罗的海政治都向丹麦农业提供了难

得的良机；瑞典的战争行动和限制性的谷物贸易政策……又一次迫使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中的谷物价格上涨，因而使荷兰生产者赚回了超常的边际利润。”

[282] 参见彼得森（Petersen）（1967，6~7）和奥斯塔鲁德（Østerud）（1976，19）。

[283] 在非领主（nondomain）土地中，有56%属于君主。见彼得森（Petersen）（1968，1238）。

[284] 参见希尔（Hill）（1926，102~152）和罗伯茨（Roberts）（1970，402~403）。

[285] 参见贾蒂卡拉（Jutikkala）（1975，164）。这总是取决于一个所看到的百分比的哪一面。彼得森清楚地看到60%，希望强调说丹麦农业的基础是“地主经济”（Grundherrschaft）（1967，23；1968，1251~1252）。彼得森的确注意到：在封锁资产阶级的流动性的程度方面，丹麦贵族与瑞典（以及英国和法国）的贵族是“大相径庭”的（1968，1237）。

[286] 参见乔根森（Jørgensen）（1963，78，107），格拉曼（Glamann）（1977，240）和彼得森（Petersen）（1970，84）。

[287] 雷德韦（Reddaway）（1906，573）。奥斯塔鲁德（Østerud）谈到了“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1978，15）。

[288] 1650年代，瘟疫打击了丹麦，具有巨大的人口后果。见彼得森（Petersen）（1967，31）和乔根森（Jørgensen）（1963，79）。

[289] 罗斯凯尔德（Roskilde）条约还将挪威的特伦黑姆（Trondheim）区和波罗的海中的波恩霍尔姆岛交给瑞典；但是，在1660年的哥本哈根条约中，它们又被交还给丹麦。见罗森（Rosén），1961，552；希尔（Hill）（1926，184）；以及达比和富拉德（Darby and Fullard）（1970，36）书中的地图。

[290] 参见雷德韦（Reddaway）（1906，588）；希尔（Hill）（1926，174~175）。1658年10月29日由于荷兰舰队在桑德海峡参加瑞典舰队作战，瑞典的攻击获胜，尽管这是一次战术平局战斗，瑞典人却在战略胜利中进入哥本哈根。希尔（Hill）指出这支海军舰队由威特（de Witt）指挥，“正是那位在1645年迫使桑德（the Sound）海峡向（丹麦的）克里斯蒂娜四世（Christian IV）关闭的同一个海军上将”（1926，170）。在此较早阶段，瑞典在荷兰的支持之下，取得了布罗姆斯布罗（Brömsebro）条约中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清楚地标志丹麦从北方首要大国的地位上衰败下来”[雷德韦（Reddaway），1906，572]。该条约再次确认了瑞典不交桑德海峡通行税的悠久豁免权，更重要的是将此特权扩大到瑞典在东波罗的海和德国的新省份。

[291] 参见乔根森（Jørgensen）（1963，97~98）。同时，1660年农业不景气中的价格下跌，“在社会、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是丹麦贵族的一个全面性的灾难”[汉森（Hansen），1972，10]。这使贵族们更加无力抵抗新的专制措施。

[292] 罗森 (Rosén) (1961, 523~526)。关于单一经营的趋势, 参见詹森 (Jensen) (1937, 41~42)。

[293] 罗森 (Rosén) (1961, 536) 和贾蒂卡拉 (Jutikkala) (1975, 160)。

[294] 参见詹森 (Jensen) (1937, 45)、罗森 (Rosén) (1961, 526), 英霍夫 (Imhof) (1974, 书中各处) 以及芒克 (Munck) (1977, 书中各处)。

[295] 乔根森 (Jørgensen) (1963, 96)。

[296] 参见罗森 (Rosén) (1961, 538)。

[297] 参见肯特 (Kent) (1973, 6~8)。

[298] 国家名称的演变反映这一过程。柏林周围的勃兰登堡的选侯, 在15和16世纪给他的领地又添增了几块不连接的领土, 在17世纪增添更多。由于这些领地就有了额外的头衔。例如, 他分别是波美拉尼亚 (Pomerania)、马格德堡 (Magdeburg) 和克利夫斯 (Cleves) 的公爵。他是哈尔伯施塔特 (Halberstadt) 和明登 (Minden) 两地的亲王。他又是马克 (Mark) 和拉文斯堡 (Ravensberg) 的伯爵。1618年, 他成为普鲁士公爵, 但这只是意味着东普鲁士, 直到1657年至1660年前在波兰宗主统治下仍是这样。1701年, 他就在普鲁士被提名为国王, 然而只是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 他取得了西普鲁士之时, 他才被称为普鲁士的国王。虽然在国际外交中, 迟至1794年这个国家仍以“普鲁士”闻知, 一般的国家法律名称 (Allgemeines Landrecht) “普鲁士国家”。只是在1807年, 正在拿破仑战争动乱中, 这个演变进程才明朗化, 普鲁士成为整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名称, 当然, 后来它才成为德国。应当看到, 只是在1804年, “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才成为了“奥地利帝国”。参见罗森堡 (Rosenberg) (1958, 27~28); 达比和富拉德 (Darby & Fullard) (1970, 138~144, 146)。

[299] “庄园主统治” (Gutsherrschaft) 作为一个相对于“地主统治” (Grundherrschaft) 的名词, 其准确定义是一件笔讼颇多之事。一个可能的英语近似词也许是相对于manor领地经济的 demense (自营地) (Gut)。三种定义都可以。欣茨 (Otto Hintze) 说: “‘庄园主统治’ (Gutsherrschaft) 的主要特点是地主本人亲耕其田, 在远方市场出售产品, 以此收入谋生, 并且使用农奴, 农奴也因此受束缚在土地上。庄园 (Gutsbezirk) 是一个司法行政单位 (庄园区), 地主拥有管束农民的政治权力和审判权力……‘地主统治’ (Grundherrschaft) 的主要特点是: 地主本人不耕其田, 生活依靠从他的农民处收来的现金和实物。这种制度下的农民由于受地主的经济控制较少, 因而要比处在‘庄园主统治’ (Gutsherrschaft) 制度下的农民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欣茨 (Otto Hintze), (1975a, 39)。见布劳恩 (Joachim Freiherr von Braun), 《德国东部农业史》, (1960, 10), 他说: “庄园主经济 (Gutswirtschaft) 是一个大型农业企业, 因而也是一个基于管理积极性之上的独立机体。因此, 它可以作为一个充分面向市场的生产而操作运行, 无须顾忌法律和间接的义务。”见吕特格 (Friedrich Lütge) (《德国东部农业史》, 1960, 83), 他说: “‘庄园主经济’ (Gutswirtschaft) 是一种经济现象 (行为存在)。”‘庄园’ (Guts) 属于一位地主, 他经营它是

依靠雇佣和分配无家族关系的劳工去做工。地主统治（Grundherrschaft）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出租地主统治’（Rentengrund-herrschaft），地主在其中只为他自己保留了一小块土地，主要依靠租金等生活。另一种是‘经营地主统治’（Wirtschaftgrundherrschaft）……其中，在一个‘地主属地’（Grundherrlichen）框架之内 [即：在一个与‘地主统治’（Grundherrschaft）相应的法律体系之内]，保留了一个更大的‘庄园主经济’（Gutswirtschaft）‘自营经济’（Eigenwirtschaft）， [此即：在地主的直接控制之下的一个demense（自营地）]”。必须记住：“统治”（herrschaft）是指政治—法律结构，“经济”（wirtschaft）是指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有可能像在下萨克森那样去“混合”诸种形式，在下萨克森盛行“地主统治”和“庄园主经济”。见布劳恩（Joachim Freiherr von Braun）与吕特格（Friedrich Lütge）之间的讨论（《德国东部农业史》，1960，84~85）。在此，我们将不再评论“庄园主经济”是否仅仅只是封建制的又一种变体或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这个问题已在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书中（1974）已有长篇讨论。我们只想指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份刊物《历史学期刊》上，有关于这一特定问题的长期争论。1953年，尼特韦斯（Johannes Nichtweiss）认为由于“庄园主经济”包括了大规模的面向市场的生产，它就有别于封建经济。他还指出说：“在封建封臣经济（Fronwirtschaft）的情况之中，很典型的是农民被束缚于农民的土地上，而不是地主的土地上（如在‘庄园主经济’中的情况那样）” [尼特韦斯（Johannes Nichtweiss），1953，705]。对此的回答见库泽恩斯基（Jürgen Kuczynski）（1954）。随后有一系列的论文，见尼特韦斯（1954），哈曼（Manfred Hamann）（1954），海茨（Gerhard Heitz）（1955），尼特韦斯（1956），贝尔克（Willi Boelcke）（1956），海茨（1957），以及尼特韦斯（1957）。如尼特韦斯所指出的：在此问题上，库泽恩斯基的见解与吕特格（Lütge）相似（1957，805）。泰勒（Taylor）（1946，29）的见解也相似于尼特韦斯，他将容克地主庄园比作“美洲大草原上的大型资本主义农场”。

[300] 参见卡尔斯坦（Carsten）（1947，145，157）；库恩（Kuhn）（《德国东部农业史》，1960，40~41）；吕特格（Lütge）（1963，101~102），巴特（Slicher van Bath）（1977，111~112）。“庄园主经济”明显地联系到“营地”或空地（见施莱辛格（Schlesinger）《德国东部农业史》，1960，48）；但是，这个联系是什么呢？沃尔夫（Siegmond Wolf）认为“农民安置”（Bauernlegen）导致“营地”，后者又使创立“庄园主经济”成为可能。见沃尔夫（Wolf）（1957，323~324）。然而，伯贺德（Berthold）（1964，16，19）却认为农民的逃亡是对加重剥削的一种反应。

[301] 参见特洛伊厄（Treue）（1955，413）；巴拉克勒夫（Barraclough）（1962，394）；哈尼什（Harnisch）（1968，130~131）；巴特（Slicher van Bath）（1977，111）。

[302] 参见库里舍（Kulischer）（1932，12）。

[303] 参见卡尔斯坦（Carsten）（1954，198）。

[304] 参见塔皮（Tapié）（1971，123~124）。的确，哈布斯堡王朝停止了将免税权授予给领主的（domincal）（Seigniorial）土地，它在至1654年时已占用了乡村（公共）土地（见塔

皮，1971，120）。

[305] 举例说，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就有强迫勤务（Gesindezwangdienst）的额外惯例，要求农奴的孩子必须在领主家中做家仆一至四年。见库里舍（Kulischer）（1932，14）；巴特（Slicher van Bath）（1977，115）。鲁特科夫斯基（Rutkowski）（1926，496）指出：强迫勤务中有如此恶劣待遇，以致使农奴“宁愿坐十年牢狱也不愿去做两年家仆”，尽管这种服务是有工薪报酬的（当然是很少的工薪）。鲁特科夫斯基认为易北河以东的农民所承受的所有义务（服役和纳税）要大于波兰农民的义务。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也存在有这种强迫勤务。见施皮茨（Špiesz）（1969，53）。

[306] 吕特格（Lütge）（1963，117）。引用的克纳普（Knapp）说的这段话是来自《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农民解放》一文，重载于《地主统治和骑士庄园（Rittergut）》（1897，I，34）。再参见戈利兹（Gorlitz）（1956，86）他谈到17和18世纪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社会变革时说：“农民不再只是贵族的奴仆；作为一个等级，贵族与王侯的宫廷并立，都是王侯的仆从。贵族不再划定有社会活动的场所。它倒是变成了社会的一个功能作用部分。”这符合特科夫斯基（Rutkowski）关于易北河以东农民境况的解说。他认为至18世纪时，工业的兴起和保护农民使得获取农业人力变成困难之事。因此，强迫勤务的状况更为恶化，因为只有更多地剥削受其控制的农民，地主才可以在经济上生存下来。见鲁特科夫斯基（1926，497）。施皮茨（1969，23）认为与东欧其他地区相比，易北河以东庄园所使用的强迫劳役较少，尽管有法律允许可能，而且，庄园劳作更多地依靠“或是强迫或是自愿受雇的家庭劳动力，他们是为钱而劳作”。

[307] 见安德森（Anderson）（1974，262）。此外，“三十年战争”进一步削弱了相对力量，“肯定标志着许多德国庄园的命运中一个决定性变化（变得更糟糕）”（卡尔斯坦（Carsten），1959，437）。

[308] 罗森堡（Rosenberg）（1958，31）。

[309] 霍华德（Howard）（1976，67）。再参见卡尔斯坦（Carsten）所言：“德国历史上的奇迹之一正是在17世纪后期，在一个不利的基础上突然兴起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勃兰登堡当时看起来注定要重蹈波兰或梅克伦堡的覆辙。”

[310] 卡尔斯坦（Carsten）（1954，179），他说这次战争是“幸运的环境形势”（1950，177）。

[311] 参见卡尔斯坦（Carsten）（1950，178）。克利夫斯（Cleves）以及附近的马克和拉文斯堡（Ravensberg）更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就是有大量工业的地区了。

[312] “霍亨索伦家族在‘三十年战争’中成为继哈布斯堡王朝之后最重要的德国统治家族”[卡尔斯坦（Carsten），1969，544]；但是波美拉尼亚却归于瑞典了。

[313] 安德森（Anderson）特意强调了瑞典作为“东方之锤”的角色，它促成了“对迫在眉睫的瑞典威胁的一个直接回答”：普鲁士专制主义（1974a，198~199）。

[314] 梅林 (Franz Mehring) (1975, 47) 简洁明了地表述说：“如果选侯弗雷德里克……要想在‘三十年战争’之后仍然是一位王侯，那么，他很明显地需要一支军队。但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容克地主的支持，他甚至无法保有一个连的军队，更不必说用军队去反对容克地主了。”

[315] 见卡尔斯坦 (Carsten) (1950, 188)。

[316] 卡尔斯坦 (Carsten) 说：“有迹象表明……腓特烈·威廉看来不太可能在此时刻有一个计划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或与等级会议对抗。使他走上此途的却是大势所迫，其中最重要的是外国事务对国内发展的冲击” [卡尔斯坦 (Carsten), 1954, 189]。

[317] 对此政治历史的详细解说，可见于卡尔斯坦 (Carsten) (1954, 111)。

[318] 参见多沃德 (Dorward) (1953, 17)；布劳恩 (Braun) (1975, 134~140)。欣茨认为 (Otto Hintze) 认为“在法国旧制度的行政机构的创造过程和普鲁士行政委员的出现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旧法国的行政体系和旧普鲁士的战争与领土部中，(外省的) 行政长官都有相同地位” (1975b, 275)。

[319] 见多恩 (Dorn) (1932, 261)，“整个王国中有不多于14000名的各类官吏。正当旧法国因官吏太多而民怨载道之时，普鲁士却是官吏不足。普鲁士国王无力雇用多余的官吏。”多恩 (Dorn) 在此所说的是18世纪时已经扩充了的官僚机构。大选侯时代的情况正是如此。同样，巴拉克勒夫 (Barraclough) 也提到了18世纪，注意到：“节俭、严格控制开支和精心管理正是普鲁士政府的标志，才产生了这种结果” (1962, 400)。

[320] 见芬纳 (Finer) (1975, 140)。关于收税，参见雷切尔 (Rachel) (1911, 507~508)，罗森堡 (Rosenberg) (1958, 49~50) 以及布劳恩 (1975, 271~273)。卡尔斯坦 (Carsten) 认为城市的货物税的效果已是如此失衡，以至于“成为城镇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1954, 198)。

[321] 见芬纳 (Finer) (1975, 139)。弗雷德里克一世 (1713年至1740年在位) 将常备军增至8万人 (半数是外国人)，并且使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在欧洲无与伦比” [巴克 (Barker), 1966, 42]。

[322] 参见克雷格 (Craig) (1955, 16) 和布劳恩 (Braun) (1975, 273)。

[323] “17世纪后期的严寒般的经济气候，再次激励地主阶级聚集到王权政治大本营中，这个王权此时正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土上蒸蒸日上” [安德森 (Anderson), 1974a, 243]。

[324] “首先，(在北方战争中) 普鲁士由于纪律败坏的乱军、外国入侵和烧杀掳掠而备受摧残破坏，惨不忍睹”。卡尔斯坦 (Carsten) (1954, 208)。当然，勃兰登堡和克利夫斯 (Cleves)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已经横遭破坏了。

[325] 梅林（Mehring）谈到了“在马克（Mark）和波美拉尼亚的沙质土的继承地”，并且指出对容克地主来说“每一个新公司就如同一个新庄园那么美好，使他们甚至无须欺诈”就可以每年赚取几千塔勒（thaler）的收入（1975，54）。

[326] 参见罗森堡（Rosenberg）（1958，102）。梅林（Mehring）注意到：大选侯所建立的军队是如何解决由于“三十年战争”产生的流浪游民无产者问题以及以“骑木马的骑士”著称的贫穷贵族问题，两者分别变为士兵和军官（1975，48~49）。再参见克雷格（Craig）（1955，11）。罗森堡（Rosenberg）指出：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1688年至1733年），由于将法国新教徒和德国平民招纳为军官，使军队提拔贫穷贵族的作用受到阻断，但是，腓特烈·威廉一世这位“士兵国王”统治时，又将此作用恢复起来，威廉一世“颇有条理地压制了政治不满，减缓了恐惧，又使贵族‘预备军’加入职业文官贵族中，重获一种有保障的荣耀社会地位，从而使大多数容克地主顺从独裁的中央权力的发展”（1958，50~60）。

[327] 泰勒（Taylor）称讲求效率和勤奋工作“是18世纪容克地主的美德，而德国市民却没有同样程度的品行”（1946，29）。安德森（Anderson）做出了类似见解：“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是处于一个小国之中的甚为严密紧凑的社会阶级，有着粗犷的乡村办事传统”（1974a，263）。此外，庄园中的勤奋工作非常适合军队的需要。“迅速增长的消费阶层、军需、上涨的生产成本和贸易利润都左右着小麦贸易。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小麦贸易政策、军需供应、庄园经济和军队改革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联系。”[特罗伊厄（Treue），1955，243]。

[328] “特别是在个人招募的地区，根深蒂固的旧军官和暴发骤贵的‘行政委员’之间并无牢固界线可分。从一开始，那些融合于新的行政机构中的一些人就是来自烦躁不安的国家军队的军官队伍中”[罗森堡（Rosenberg），1958，56]。

[329] 参见罗森堡（Rosenberg）（1958，79，83）。考虑到容克地主的经济状况，不会有许多金钱用去买官职。

[330] 封闭性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不能变为地主。特罗伊厄（Treue）注意到：“在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勃兰登堡、波希米亚、下萨克森和威斯特伐里亚，军伍中的许多校官和将官变得如企业家那样富裕，购买负债贵族的土地，成为地主阶级的成员”（1955，414）。

[331] 罗森堡（Rosenberg）指出：在“投石党运动”（Fronde）后的法国，高等贵族实际上被排斥在国家机器之外达两代人之久，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随着天主教胜利地反对宗教改革之举，兴起了一整个新的阶层；但是，在普鲁士，反对君主权威的贵族抵抗“却没有激发出有组织的叛乱和血腥内战。三位伟大的霍亨索伦君主从未过于严惩容克地主”（1958，44）。关于与法国的比较，参见卡尔斯坦（Carsten）（1954，273）。在普鲁士，弗雷德里克一世在安排管理上又别出心裁，一方面使军队变成贵族的一个紧编密织的团体，另一方面又向平民敞开心职官僚机构（创造了‘在1920年代普鲁士国家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堡垒之前，普鲁士政府雇用中无与伦比的进步机会’）[罗森堡（Rosenberg），1958，67，70]。这两个集团互相制约，却又都有原因感激国家。

[332] 参见卡尔克（Karke）（1964，59）。

[333] 卡尔克（Karke）（1964，55，57）肯定地说，贵族的地位有所恢复。赖特（Wright）谈到了贵族地位“从1627年的最低点升至1740年的最高点了”（1966，25）。1740年后是特蕾莎（Maria Theresa）女王和新的中央集权化。然而，不可夸大。赖特（Wright）本人告诉我们说：“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中，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开支增大，征税需求变得更加巨大和更坚决，农奴的纳税负担也就变得更为沉重。在农奴开始不堪税赋重压之时，国家对农奴作为税入生产者发生兴趣，也开始采取有利于农奴的措施干预其事，制止可能毁灭农奴的地主”（1966，21）。因此，1679年发生波希米亚的农民起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680年的“强迫劳役特许权”，限制强迫劳役最多不得超过每周3天。波利森斯基（Polišenský）（1978，200）认为1680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外，在1717年和1738年，还有两次“强迫劳役特许权”之事。这种模式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做法实际上并无二致。参见施皮茨（Špiesz）（1969，33～34）；希普尔（von Hippel）（1971，293～295）；巴特（Slicher van Bath）（1977，117）。

[334] 参见卡恩（Kann）（1973，9）和巴克（Barker）（1978）。

[335] 相比之下，勃兰登堡已将起初非常复杂的异族杂处的人口 [见特罗伊厄（Treue），1955，355] 在现代历史之初时变成了一个种族同类的王国。参见卡尔斯坦（Carsten）（1941，75和1947，147）。

[336] 参见巴克（T.M.Barker）所作的详细叙述（1967）。

[337] 安德森（Anderson）称匈牙利是“军事皇权国家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且“亲近土耳其军事力量……对于将集权化的奥地利专制主义扩大至匈牙利，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客观障碍”（1974a，314～315）。

[338] 参见伯伦格（Bérenger）（1973，657），他的一篇论文详叙了对公债的必然依赖。他表明说这些借贷款确实可供利用，因此，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皇帝的财政状况“并非如一般推测所说的那样令人绝望，也不是如皇帝本人喜欢声称的那般糟糕至极”（第669页）。但是，依赖私人金融家的长期后果不利于增强国家机器。应当看到诸次土耳其战争对农业经济（以及由此推测对纳税基础）有一种积极影响，就此而论，以至于对供养军队成为必需之举。博格（Bog）（1971）认为这些战争是德国各地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得以复苏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三十年战争”却无此同样作用，因为有战争破坏。但是，在这些土耳其战争中就没有对农业经济的破坏影响吗？见巴克（Barker）（1967，282～284）。

[339] 见旺格曼（Wangermann）（1973，12），他将哈布斯堡君主不利地比作是法国君主。他们的领地面积大致相同，但是“远为重要的是同种族性、紧密结合、固定税赋收入和经商企业谋利的便利条件。”在奥地利，强迫劳工的净产品是辉煌壮丽的巴洛克式建筑，我们或许对此要感激不尽。见索尔纳（Zollner）（1970，279～280）。

[340] 参见旺格曼（Wangermann）（1973，14）。

[341] 参见特罗伊厄 (Treue) (1974, 106~107)。关于重商主义绝非完全是防御性的证据, 见多沃德有关德国为什么向犹太人显示新的宽容的讨论。他谈到了“德国的王公们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招揽犹太人, 去帮助他们从‘三十年战争’留下的商业废墟中恢复元气”(1971, 212)。怎样让犹太人愿意帮助在多沃德 (Dorwart) 的叙述中有清楚的表白, 多沃德 (Dorwart) 叙述1650年大选侯允许犹太人从波兰重回勃兰登堡的决定时说: “有瑞典人将奥得 (Oder) 河口掌握在手中, 重开与波兰的直接贸易就使犹太商人有了用武之地”(1971, 122)。有种观点认为在法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 重商主义是“自然”之物, 关于此种观点, 参见克鲁格 (Kruger) (1958, 65)。他认为德国历史学家自从施莫勒 (Schmoller) 时代以来所鼓吹的“社会王国”, 是“霍亨索伦王朝传奇神话”, 他的观点就是对此传奇神话的抨击的一部分 (1958, 13)。

[342] 参见吕特格 (Lütge) (1966, 321~322); 博格 (Bog) (1961, 134~135, 139); 克里马和麦克里克 (Klima, Macurek) (1960, 98)。

[343] 参见特里梅 (Tremel) (1961, 176); 克里马 (Klima) (1965, 107), 和索尔纳 (Zollner) (1970, 283)。

[344] 参见布劳恩 (von Braun) (1959, 611~614) 和基许 (Kisch) (1968, 4)。

[345] 参见库勒舍 (Kulischer) (1931, 13)。

[346] 参见克莱弗恩 (Van Klaveren) (1969b, 149~150)。戴雍 (Deyon) 指出“重商主义计划是普遍常见的”, 但是“经常只是冲动而已, 纸上谈兵, 全无实效”(1978a, 208)。

[347] 参见克里马 (Klima) (1965, 119)。库勒舍 (Kulischer) 问道在18世纪中叶之后, “如果不是在此前的时代, 即柯尔伯 (Colbert) 时代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工业在法国、普鲁士、奥地利、莱茵地区和俄国的迅速兴起是否能够实现”(1931, 13~14)。

[348] 参见哈辛格 (Hassinger) (1942, 36~37)。

[349] 参见卡尔顿斯泰勒 (Kaltenstadler) (1969, 489~498, 以及1972)。通向海洋的道路又接着说明了在此时期毛呢品工业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迅速发展。见费罗伊登伯格 (Freudenberger) (1960b, 389~393)。

[350] 史托伊 (Stoye) (1970a, 598) 赞许地引用了雷迪什 (Reddich) 论述1700年至1740年的奥地利的一本著作的书名: 《一个大国的发展》。

[351] 参见麦卡尼 (Macartney) (1966, 397)。

[352] 参见塞缪尔森 (Samuelsson) (1968, 69)。

[353] 见布拉福德 (Braford) (1966, 293): “在普鲁士可以真正地算做欧洲的一个独立强国之前, 必须克服种种严重的困难, 这些困难产生于它的各省的地理位置、低落的经济发展和

缺乏人力。”

[354] 泰勒 (Taylor) (1946, 27) 又补充以下的话：“没有工业地区，没有重要城市，没有出海口，土地瘦瘠贫产，贵族贫穷无知，文化生活在实际上也就不会存在。”

[355] 此时在国家结构方面，普鲁士优于奥地利，这种优越性由贝伦 (Behrens) 和罗森堡 (Rosenberg) 予以清楚描述。贝伦 (Behrens) (1977, 551) 说：“1740年特蕾莎 (Maria Theresa) 女王登位时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上，并无什么阻碍一个中央政府，只是留下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只是在1748年后才开始存在，此后也只是存在于所谓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国世袭土地上。”普鲁士的行政统一也只是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即三十年之前 (1977, 557)。然而，“在旧王朝统治下的基本发展方向中，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倾向与欧洲其他专制政体协和一致。或许，它的最显著特点是这个事实……过于热心的领袖们将许多政治革新、行政改革和财政措施运用至极” [罗森堡 (Rosenberg), 1958, 23]。

[356] 参见巴拉克勒夫 (Barraclough) (1962, 386)。

[357] 参见莱斯泽恩斯基 (Leszczyński) (1970, 104)。

[358] 见特里梅 (Tremel) (1961, 177)，“西里西亚的亚麻品在荷兰、英国、波兰和俄国找到了出口市场。荷兰商人为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而需要它。西里西亚头纱 (由亚麻或类似亚麻的棉花所制的轻薄的妇女头饰) 出口到非洲、库拉索 (Curaçao) 岛和印度尼西亚。西里西亚羊毛在羊毛市场上举足轻重”。关于为什么西里西亚是“明珠”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都城布雷斯劳 (Breslau) 在与东部的土地转让中具有关键作用，它在其中逐渐拥有了一种垄断权 [沃兰斯基 (Wolański), 1971, 126]，再参见赫洛齐 (Hroch) (1971, 22)。

[359] 参见基许 (Kisch) (1959, 544)。利贝尔 (Liebel) (1965b, 210~216) 讨论了18世纪中以牺牲荷兰为代价，哈布斯堡王朝所取得的重要作用。

[360] 参见克里马 (Klíma) (1959, 37~38)。

[361] 参见奥宾 (Aubin) (1942, 169) 和克里马 (Klíma) (1957, 92)。

[362] 参见赖特 (Wright) (1966, 20)。尽管温和，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中还是有数次农民起义造反；而被军事力量镇压。见基许 (Kisch) (1959, 549)，再参考米契尔捷维茨 (Michalkjewicz) (1958) 和达比 (1971, 121)。

[363] 安德森 (Anderson, 1974a, 317)。再参见布劳恩 (von Braun) (1959, 614~616) 关于夺取西里西亚对普鲁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364] 参见弗路登伯格 (Freudenberger) (1960b, 384)。

[365] 参见弗路登伯格 (Freudenberger) (1960a, 351)。

[366] 参见库拉 (Kula) (1965, 221)。

[367] 见克雷文 (Craven) 笔下描述的1660年时的新英格兰：“经济……基本上依赖农业，……典型的新英格兰城镇是农作村庄……但是在波士顿之外，现在有一个可能有3千人的城镇，谋生农作对所有其他活动是如此重要，以致有时可以看到牧师在田地里干活” [克雷文 (Craven), 1968, 18]。

[368] 参见克雷文 (Craven) (1968, 68~103) 关于“复辟时期殖民地”的论述，殖民地包括两个卡罗来纳 (Carolinas) 和纽约，于1664年夺自荷兰人手中。

[369] 参见贝林 (Bailyn) (1955, 112~113)。Institutionalization (国家机构化) 是一个关键词。克伦威尔也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但是，“英裔殖民者已企图利用内战这个机会去充作一种独立手段，而且，共和国也已容忍了许多要求意图，只要不是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 (英国政府对付殖民地的) 驯服完成时期，与其说是克伦威尔共和党人之时，还不如说是复辟后的斯图亚特君主统治时期。” [里奇 (Rich), 1961, 330~331]。

[370] 克雷文 (Craven) 又说他们“未受不利影响之害” (1968, 39)。内特尔斯 (Nettels) 说在1685年至1720年之间，新英格兰和纽约“在向英国出口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障碍” (1933, 326)。贝林 (Bailyn) 说在1673年有一条规定，要求向新英格兰商人征收双重税赋——货物到港结关和入港税——但是，英国商人只交一种税。这条规定被抗议为“严重的歧视” (1955, 151)。卡曼 (Kammen) 讨论了1670年代后期新英格兰人所具有的他们是“与伦敦其他竞争集团相分离的一种特殊利益”的意识思想启端 (1970, 37)。

[371] 内特尔斯 (Nettels) (1952, 109; 1931b, 9~10)。

[372] 参见比尔的讨论 (Beer) (1912, I, 51~53)。

[373] 参见巴罗 (Barrow) (1967, 34~35)；贝林 (Bailyn) (1953, 386) 和克雷文 (Craven) (1968, 246)。

[374] Lord (1898, 1057)。

[375]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声称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中，“唯有 (欧洲的) 大土地所有者才能足够廉价地生产谷物，以同宾夕法尼亚的谷物进行竞争” (1963a, 220)。

[376] 沃尔顿 (Walton) (1968b, 365~367)。原因是经济的。商人与他的代理人之间的熟悉关系大为减少了风险，导致航线的专业化。三角航线上的航船水手在港口就得到工薪，而单线往返的水手却不是 [沃尔顿 (Walton), 1968b, 386~389]。奥斯特兰德 (Ostrander) 进一步研究，怀疑这个构思是有效的，因为这些船只实际上并未航行。他将此概念归之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需要 [奥斯特兰德 (Ostrander), 1973, 642]。

[377] 洛德 (Lord) (1898, 124~125)。

[378] 巴罗 (Barrow) (1967, 8)。内特尔斯 (Nettels) 认为如此一种分析忽视了从北方殖民地流向英国的“无形利润”——硬币和金银的流动、海盗掠夺品、求取政府官职的“购买”，甚至于为英国买主造船；但是，无形利润正是这样的，而且，由此也许不能够根本改变英国对北方殖民地的价值的看法了。(1933, 344~347)。

[379] 然而，无论怎样意识到增加北方殖民地对英国的价值的努力，无疑的是：有关他们对扩大的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态度，英国人在此例中是又一个忽视。弗兰克 (Frank, 1979b, 60) 认为这种忽视产生于“土地和气候的不佳，以及……没有矿产”，也是这些殖民地的幸运，因为这种忽视允许它们与热带和亚热带殖民地相比，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巴罗 (Barrow) 从另外一种角度讨论了“‘有益忽视’的政策”。他指出至少在18世纪，“要使（英属北美的）殖民者保持满意，就要求有一个绥靖政策，而不是强压政策。结果，沃尔波尔 (Walpole) 及其继任者的指导原则变成了任其自流，因此，沃尔波尔 (Walpole) 在殖民行政管理方面的政治格言是：‘*Quieta non movere*’（不要打草惊蛇）” (1967, 116, 134)。

[380] 参见内特尔斯 (Nettels) (1931a, 233)。关于确定年代，内特尔斯提到了比尔 (Beer) 的观点：1745年之后，北方殖民地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市场。内特尔斯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早在17世纪之末时就已是如此有价值的市场了 (1931a, 230~231)。坎曼 (Kammen) 认为是1713年，此后，“英国认为所有的殖民资源（包括北方殖民地的资源）都是重要的，有助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 (1970, 46)。布鲁奇 (Bruchey) (1966, 8) 认为这发生在“更晚后的殖民时期。”科尔曼 (Coleman) 所定的时间最早。他说：“1650年之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表现出最令人惊奇的需求增长，正在欧洲贸易不景气且竞争激化之时，为英国工业开辟了一个排他性的市场” [科尔曼 (Coleman), 1977, 197~198]。或许我们在此所说之事（始于1690年代）将要变成现实（在18世纪中叶）。法尼 (Farnie) 为整个美洲殖民地所确定的时间表明：作为英国货物的一个市场，这些殖民地所占比例从1701年至1705年的大约10%上升到1766年至1770年的23%，作为英国的进口来源，从19%上升到34%。美洲大陆殖民地（包括南、北）的作用在1726年至1730年首次超过了西印度群岛。法尼 (Farnie) 表明英国对外贸易的这种“美洲化”——他从施洛特 (Schlote) 那里借用该词——导致了一种“最终的过分依赖”，这就解释了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经济困境 (1962, 214)。此见令我吃惊，深为怀疑——的确，作为重商主义思想的这种看法走到极端了。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看法是说英国无力不让北方殖民地成为一个半边缘地区，而且到了这样的程度：英国创造了自己未来的一些困难。但是，如果不是从此处这样，也会从别处如此。

[381] 参见内特尔斯 (Nettels) (1933, 322)。

[382] 汉森 (Hansen) (1945, 50)。

[383] 参见麦克拉伦 (McLachlan) (1940, 4)。

[384] Åström (1962, 15)。

[385]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62, 20)。1699年至1700年, 英国的进口品中包括了来自北欧的各种物品——大麻纤维、亚麻、沥青、焦油、铁、钾碱——其中有48%主要产于瑞典; 26.4%来自俄国; 24.1%来自东方国家; 只有1.5%来自丹麦和挪威。然而, 俄国货物经由纳尔瓦转运, 此地却在瑞典人手中, 东方国家货物经由里加, 也在瑞典人手中 [参见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62, 99]。

[386] 有三重抵抗。北方殖民地中的商人受到反对。海军的主要关心是得到最佳又最廉价的海军用品, 也受到抵制。英国公众舆论也怀疑垄断。见洛德 (Lord) (1898, 38~39)。

[387] 参见洛德 (Lord) (1898, 56) 和内特尔斯 (Nettels) (1931a, 247)。

[388] 参见内特尔斯 (Nettels) (1931a, 255~264)。里斯 (Rees) (1929, 586) 提供了一件证据表明有一种考虑要摆脱对瑞典的依赖。他报告说: 尽管长期以来, 英国的制铁业者一直反对北美的铁和金属器具, 当铁的价格在1717年飞涨上去, 因为与瑞典的关系趋于紧张之时, 人们“反对去寻找新的供应来源, 将铁条和生铁包括在货物清单之中, 在海军军需部门的带头之下鼓励在殖民地生产这些货物”。然而, 这条法律却并未执行, 因为瑞典的国王查理十二世去世了, 随后, 英国与瑞典的关系得到改善。

[389] 内特尔斯说 (Nettels) 说: 他们并没有生产“人们最需要的这些商品” (1931a, 269; 再参见1952, 112)。然而, 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认为瑞典的焦油和沥青的垄断在1728年左右就宣告结束了, 而且对此解释说这是靠北方殖民地的生产增加了 (1962, 111, 1973, 101)。

[390] 参见洛德 (Lord) (1898, 101~103) 有关殖民者逃避限制法律的持久能力的论述。

[391] 哈珀 (Harper) (1939a, 9)。

[392]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4, 193)。

[393] 参见沃尔顿 (Walton) (1967和1968a), 其中有关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各种因素的一个讨论。

[394] 迪克森 (Dickerson) (1951,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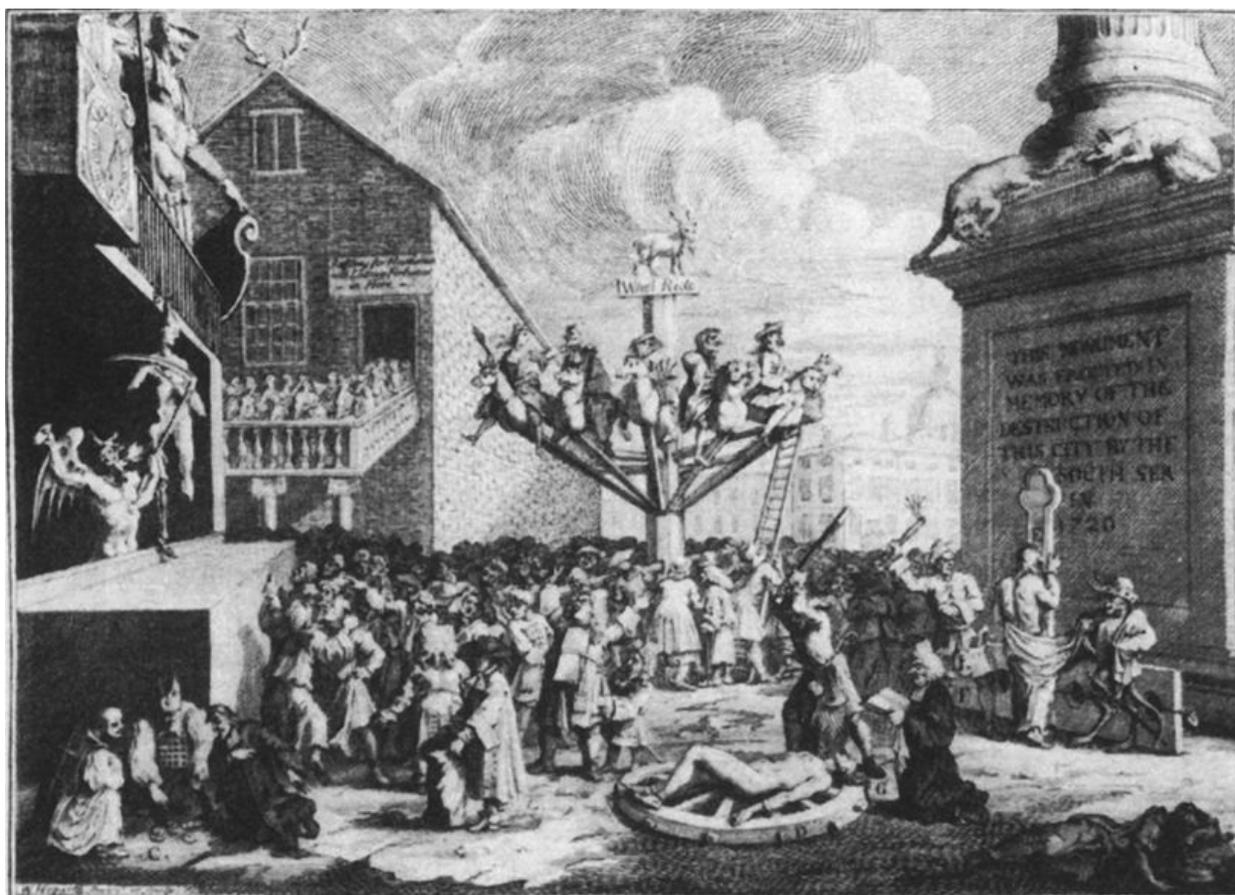
[395] 参见布鲁奇 (Bruchey) (1966, 9) 和奥斯特兰德 (Ostrander) (1956, 77~79)。“蜜糖法令”引发了最多的抗议。“蜜糖和兰姆酒 (rum)在殖民地经济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哈珀, 1942, 11)。该项法令的首要目的看来是旨在帮助西印度群岛的生产者。

[396] 参见迪克森 (Dickerson) (1951, 46~47), 他指出说: 充其量, 对制帽业有所影响。见奥斯特兰德 (Ostrander) (1956, 77) 关于蜜糖法令的论述。

[397] 见哈珀 (Harper) (1942, 6~8)。

[398] 见布鲁奇 (Bruchey) (1965, 69)。

第六章 中心地区中的斗争——第二阶段：1689～ 1763年



第六章插图“南海计划”

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721）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
（不列颠博物馆信托会准许复制）。

“南海计划”，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一幅作于1721年的雕刻和蚀刻画。市政厅（Guildhall）、伦敦纪念塔和圣保罗（St. Paul's）教堂可以在图上辨认出来。一个旋转的幸运之轮，由南海计划的指导者转动这些乘客，其中包括认捐者们、一位妓女和一位教士。一个魔鬼切碎了教士下赌注的幸运之神（Fortune）的身体。整个景象代表的正如荷加斯在雕刻下描述的，私利和邪恶战胜了荣誉和诚实。

若不界定社会现象的时间与空间，就无法分析它们。我们已确定了空间范围概念以作为本书分析的中轴。但是，历史学家们有许多分歧之见的的时间和划分时期的长久问题又是什么呢？我们已肯定本书中赋有意义的时间单位大致是从1600至1750年。在此期间之中，欧洲的世界经济总体上经历了总生产的一个漫长的相对停滞时期。（停滞相应地表现在世界价格的通货紧缩之中和总人口增长、物质扩充以及交易速率的相对稳定之中。）为了证实这一肯定，我们在此全书中选择出我们所握有的证据资料。^[1]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把对中心地区的敌对竞争的讨论细分为两个阶段：1651至1689年，以及1689至1763年。这样的年代划分并不完全与我们前述的1600至1750年时期相符合。不幸，真实的世界并不是由适合一切意图的明晰刻画的界线所构成。虽然1651至1689年和1689至1763年这两个时期反映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它们所侧重的却是这些变化的政治结果。

在第一阶段中（1651至1689年），如我们已经讨论的那样，英国和法国成功地向荷兰的霸权发起了挑战，这两国至1672年时已感觉到荷兰国家不再是先前无可置疑的巨人了。我认为至1689年时甚至荷兰人也同意此说。因此，威廉（William）和玛丽（Mary）登上英国王位看来是一个合理的转折点。^[2]选定下此后的1689至1763年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界定了连续未断的英国与法国的敌对时代。人们也许会认为在所

谓“第二次百年战争”之后的1763年是英国确定胜利的时刻，尽管法国人至1815年才承认其失败。^[3]英国将要在与法国的斗争中获胜这一点，在1689年之前绝不是明朗之事。法国拥有的人口4倍于英国，并有一支比英军远为庞大的军队。法国的自然资源丰富，还有极佳的港口和海军基地。此外，法国的工业生产正在增长，然而“英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却在内战之后缓慢下来”。^[4]因此，如威尔逊（Charles Wilson）所说：“自1689年以后，（英国）面对一个远比西班牙或荷兰更为可怕的敌对强国（法国）。”^[5]此说并非没有道理。两国敌对看来是一连串几乎无休止的战争，征战所夺皆是欧洲的土地、盟国和市场，以及边缘地区和外部竞争场地区（美洲、西非、印度）中的供应品（奴隶、热带和亚热带产品如糖、皮毛和船用品）。^[6]

1689年，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威廉三世国王。^[7]始于1688年11月的法-荷战争，也就因此变为法-英战争了。^[8]对英国而言，这标志着恢复了“克伦威尔时代的外交政策”。^[9]此举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光荣革命”的政治安排，在沃尔波尔（Walpole）和辉格党的统治时代，这种政治安排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反对法国的斗争中，英国的军用需求远大于以往所获之数。这就要求有议会的准许，最终是担保向公众举债。1689年的政治安排结束了君主和议会之间的敌对关系，使它们的必要合作成为可能之事。1689年英国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将会始终贯穿整个18世纪的问题，就是主要军事战略重点应是放在陆上还是应放在海上。两个思想流派即“海洋派”和“大陆派（或称陆军派）”就此发生争论。两派在战略分析之中的争论在于：战时派遣陆军进入欧洲大陆作战究竟是增强英国的事业目标（因为此举将会支援盟国使之不致失败），还是会削弱它（因为英国陆军基本而言太弱小不足以战胜法国陆军，但是，英国海军却比法国海军胜出一筹）。

在战略之争的背后是经济争论。由于“海洋派”认为战争主要是争夺

新市场和排斥竞争者的斗争，因而主张战争应在海上和边缘地区进行。他们认为陆地战事导致太高的税赋并且由此间接地损害商业。“大陆派”争辩说：除非英国参加欧洲的陆地战事，否则法国就会置其他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于它的控制之下，因而也就能够将英国斥之于大陆关税体系之外。^[10]经济之争也反映在社会政治争论之中。辉格党是“光荣革命”的创造者的继承人，它的信条之一曾是“不要常备军”。不过，至1694年时，辉格党停止叫喊这一口号，并在实际上变成了急剧扩充陆军的主角（陆军兵员从1689年的一万人增至1711年的至少七万人）。^[11]如普卢姆（Plumb）所言：“这是一个真奇怪的辉格党！……从1694年起，辉格党在宪法原则上变得极为保守了……他们企图夺取政府机器并管理它……他们认为如果得到国王的全力恩庇，就能使政府既为国家利益又为他们的私利而工作。”^[12]

辉格党议会没有明确授权之事，他们至少就会设法弥补。陆军和海军略耍花招就开始在英-法战争中回避议会所设限制。陆军扣留军饷并转移款项，却向议会呈报亏空赤字，迫使议会予以拨款填补；海军购买货物、服务和补给品很快债台高筑，也使议会面对既成事实。罗斯维尔（Roseveare）有点不那么坦率地谈及这种制度：“议会虽说本当宽容这些做法，可它竟然真的就这么做了。”^[13]这种制度之所以早就被接受下来是得助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变化。1689年之后，辉格党力量所代表的联盟中有大地主、正在增加的官僚以及商人阶级，他们反对“乡村党”；而这个“乡村党”是由小乡绅组成，对征税、常备军和一个“腐败政府”抱有敌意。在扩充的军队中，军官是贿赂就任的。能有钱买下军官职位的人大多是辉格党诸家族的子弟们。因此，“正是那些控制着议会的相同家族派人出任军官并指挥”这支军队。^[14]

然而，英国建立一支庞大军队还不是关键之处。关键要点在于“九年战争”中（即英国的“国家苦难”中）^[15]陆军和海军中都发生了质的变化。^[16]当然，海军的这种变化要大于陆军，因为欧洲的政治家们现在

感到与陆地不同的是（在陆地上力量均势是可能之事）“海洋却是单一的”。^[17]我们将要发现，海洋变成英国的海洋。不过在1689年时，法国海军与英国和荷兰的海军是旗鼓相当。而且，法国海军还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充。柯尔伯（Colbert）在此前的20年之中创造了“完全是空前之举”。^[18]他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建立了一连串的海军基地（在大西洋的主要基地是布勒斯特，在地中海则是土伦）。他把法国海军分成两支分驻这两个区域。^[19]此外，此时的法国海军在技术装备上要比英国和荷兰的海军更为先进。法国军舰更大、火炮更重、而且重量较轻、航速更快，也更灵活。法国建造了一种先进的新舰，双桅炮舰，是一种适合于炮轰沿海城市和西塞的小型舰。它已在1682年攻击阿尔及尔时为法王路易十四立下功劳。

尽管英国海军在斯图亚特王朝受到忽视以及荷兰海军已老化过时，^[20]但是在1694年至关重要的“巴弗勒尔（Barfleur）战役”中，法国舰队发现自己处于数量劣势（44艘法国军舰面对99艘英、荷联合舰队）和炮火劣势（法军3240门大炮对英、荷舰队的6756门大炮），^[21]以及机动灵活上的劣势。^[22]用海军少将马汉（Mahan）的尖刻之语来说，就是法国海军“像烈焰中的一片树叶被席卷而去了”。^[23]此战是一个转折点，不仅对于这场战争，而且对于下一个世纪中的战争都是如此：“制海权在一次打击中就落入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手中。”^[24]有人奇怪为什么西姆考克斯（Symcox）会认为1693年的农业危机和法国海外贸易的萎缩导致法国国家的一次财政危机，使法国不可能“维持某种近于与同盟国对抗的均势”。^[25]它的部分舰队被迫搁置以节省下钱财用于陆军。这就点出了与英国的“海洋派”和“大陆派”之争相同的问题。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此世界经济全面停滞时期，都无力承受立刻在各条战线上全面进行军备的费用负担。必须做出选择。很自然，英国侧重海军，而法国则偏重陆军。

法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既庞杂无章又相对缺乏内部团结，在此情形

下看来几乎无可选择，^[26]甚至即使制海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直是“赖以积聚财富的交易链中一个中心环节”。^[27]无论对此次巨大的海军事战败做出何种解释，它都使法国的海军策略从“舰队作战”的战略转向了“海盗式作战”战略了——摧毁敌人舰队和夺取制海权不再是首要目标了；现在的重点是捕获和摧垮敌人的商人、困扰敌人的商业，为此目的可以兼用海军舰队和海盗船只。如此策略在1694年前还闻所未闻，现在却成了主要的行动方式。^[28]克拉克（Clark）说：“在一场海上战争中，摧毁商业是弱者手中很自然的武器”。^[29]是的，这是一种很自然就会运用的武器，但它却只是一种二流武器，因为很难于协调由单个个人指挥的各船只的行动。西姆考克斯（Symcox）称法国的全部努力“都不过是有保留的成功”，并指出这种方式中潜在的矛盾：“如果政府无钱当家，也就不能做主”。^[30]英、荷两国却可以玩此游戏。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的海峡群岛上的海盗们大肆行劫，“引起法国的严重惊恐，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对法国的港口贸易予以痛创”。^[31]

1697年的赖斯韦克（Rijswijk）和约结束了“九年战争”，但只是一个暂歇而已。它之所以重要大都是因为它标志着法国自黎塞留（Richelieu）以来“首次采取的倒退步骤”。^[32]法国被迫承认威廉三世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还被迫承认安妮（Anne）女王为它的王位继承人。威廉三世的首要战争目的就是取得此种承认。此外，法国自从内伊梅根（Nijmegen）和平条约以来所获取的所有土地都要归还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阿尔萨斯（Alsatian）的“重新合并”在此例外]。法国因而交出其全部边境上的地区——佛兰德（Flanders）、卢森堡、洛林（Lorraine）、莱茵地区（Rhineland）、比内罗洛（Pinerolo）和加泰隆尼亚的部分或全部。^[33]在较小的海外领地调整中，法国将奥尔巴尼要塞（Port Albany）交还给哈得逊湾公司，又重新取得本地治里（Pondicherry）和新斯科舍（Nova Scotia）——恢复了战前原状。荷兰人也得到了他们想要之物：与法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商业条约，恢复1664年时的法国关税，以及法国承认所谓的“尼德兰屏障”。

在荷兰联合省和法国之间设立一道军事屏障的概念，已是由来已久之事。或许早在1635年，它就起始于这一思想：南尼德兰（西班牙属尼德兰）应当被用作一个缓冲国。1678年的内伊梅根（Nijmegen）和约却将南尼德兰的16个要塞割让给法国，尽管允许荷军的小分队部署在其邻近地区。至1684年时，法国人已夺取了卢森堡，形成荷兰人在一项停战条约中被迫接受的局面。“九年战争”的结局改变了这一切；在赖斯韦克（Rijswijk）和约中，设立一道屏障的观念有了新的明确形式，荷兰人有权利在一连串由法国人归还的要塞中驻军。^[34]“九年战争”确立了欧洲强国的新组合阵容。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Westphalia）条约之后诸国之间的权势斗争，本质上是英、法、荷之间的三边斗争。但是由于各种影响和意图，三边斗争此时化为双边斗争，荷兰或多或少从1648年后成了英国的一个长久盟友，实际上成了一个小伙计。

琼斯（Jones）确定荷兰“放弃大国地位”^[35]的时间发生于1689年5月，当时，威廉三世使荷兰舰队从属于英国人。荷兰并非没有恼怒于这种新角色——荷兰与英国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合股经营”。^[36]一方面，荷兰人不想看到他们与英国人的结盟妨碍他们与法国的贸易关系，特别是他们有利可图的波罗的海贸易“依赖于法国货物的持续供应”。^[37]整个18世纪中，荷兰人不断声言中立国家（他们就常是）的海上商业不应当受到干涉。他们的口号是“自由之船、自由之货”。然而，英国人坚持说有权力搜查中立国的船只，法国人更是声言有权力没收向敌方运送货物的中立国船只。^[38]对于荷兰人来说，战争乃是不合其需要的最后手段。1702年时，这场战争作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继续进行，坚持催促英国人为和平做出安排的人正是荷兰人，只要他们可以保留“尼德兰屏障”。^[39]最终，英国人愿意支持荷兰争取这一屏障的努力（尽管此举对他们有商业危险），用作必要交换条件换取荷兰保证同意英国新教的王位继承，一个英国（和苏格兰）政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40]

正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中途，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高潮并且得以解决。由于1688年的解决办法，法国实际上失去了干涉英国内部政治的能力；又由于1707年的所谓“议会的合并”，^[41]法国失去干涉苏格兰内政的同样能力。1707年最后安排中的政治谈判和手腕是复杂之事，^[42]但是，真实内容是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强国之争怎样造成对苏格兰的压力，导致了“议会的合并”。对苏格兰（以及其他边缘地区）来说，整个17世纪后半期一直是一个漫长的“危机和衰落交相强化经济停滞”的时期。^[43]苏格兰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英格兰；但是，英格兰的主要贸易伙伴却很难说是苏格兰，而且，随着经济停滞的延长，苏格兰越发更加依赖英格兰了。^[44]像其他人那样，苏格兰人也试图采取重商主义抵制措施。1681年，约克公爵作为国王在苏格兰的代表召集各种商人与他和由他在枢密院中创立的贸易委员会进行商讨，其内容是有关苏格兰（与英格兰、挪威、法国和波罗的海）的对外贸易模式，内地贸易、航运，以及苏格兰想有一块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愿望。于是，苏格兰的等级会议颁布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此后不久，成立“新米尔斯（New Mills）布业公司”，使等级会议在同年颁布了“鼓励贸易法”。此法的保护使该公司生意兴旺——直至“合并条约”之时。^[45]

1695年，等级会议颁布了一项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公司贸易法令，据此法令创建了“苏格兰公司”。该公司代表了联合起来的三种利益：寻求加入非洲贸易的爱丁堡商人，希望在一块新的加勒比殖民地为其亚麻产品找到市场的格拉斯哥商人；以及急于防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某些伦敦商人。^[46]这家新公司〔后来以“达连（Darrien）公司”知名〕的创立，或许与加强导致“1707年合并法令”的诸种压力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这使人清楚看到“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危及了整个〔英格兰商业〕体系”。^[47]“老王位觊觎者”的詹姆斯党威胁依然真实存在。^[48]而且，处于危急中的并不仅有苏格兰，还有爱尔兰。^[49]因此，英格兰的长远利益在于加紧实现合并。

在苏格兰方面，虽然各种看法大相径庭，“达连（Darien）公司”计划到头来是一个惨败结局。“苏格兰公司”打算在达连海峡（位于今日巴拿马）的地峡（Isthmus）建立一个世界贸易的大货物集散中心。它将不止于只是非法经营者的避难港。该公司旨在开辟一条横越大陆的路线〔由一个将要取名为喀里多尼亚（Caledonia）的殖民地予以保护〕，用以取代好望角路线（预兆着巴拿马运河）。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因为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商人们都不愿投入必要的资本，而且在1698至1700年所进行的实际远征都瓦解了。^[50]林曼（Lenman）认为这些苏格兰人过于好高骛远：

苏格兰没有力量保护一个垄断性贸易或殖民地的帝国，无力对抗那些敌对的欧洲列强，它们全都掠夺成性而且极为庞大。在殖民领域中对苏格兰唯一有价值的目标是别国的殖民地居民。同这些居民做买卖交易是可行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足以弥补其非法性的边际风险〔即西班牙对达连（Darien）海峡有合法所有权这一事实〕。格拉斯哥在17世纪后期之所以兴旺起来，是部分地因为与英帝国有着活跃的非法贸易。只要将在达连（Darien）抛弃掉的资本中一小部分用于向半独立的美洲殖民地的可靠走私，就会有殷实的红利可得。^[51]

我们又一次看到，停滞时期中的重商主义是唯有足够强大者才可以成功应用的武器。

或许确实是如赖利（Riley）所言：1707年的合并是“直接归因于英格兰政治而非苏格兰政治”；^[52]但是，若无苏格兰的实质性默许，英格兰人不可能这么做。那么这种默许从何而来呢？很大一部分苏格兰贵族给予了强大支持，他们或是圣公会（Episcopalians）成员，或是“光荣革命”的参与者和反詹姆斯党者，或是在英格兰拥有土地利益而又受到1705年英格兰“排外法令”（Alien Act）威胁的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苏

格兰集团是城镇商人。笛福（Daniel Defoe）曾领导过一场由英国政府设计的小册子宣传运动，旨在劝说这些城镇商人相信英格兰现在是，将来也会是苏格兰的主要出口市场，以及通往繁荣之路就是加强向英格兰出口苏格兰的畜类和亚麻制品（而且还可能有谷物、羊毛和盐），因为平衡对英格兰的贸易将会是有利之事。1704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安全法令”，规定在安妮（Anne）女王去世后结束自动合并的君主制。英格兰议会针锋相对，通过了“排外法令”，规定除非苏格兰人取消其法令，否则他们的全部出口品都将被逐出英格兰。^[53]历史从未验证英格兰的这一决心。^[54]

如同可以预计的那样，苏格兰城镇内部出现分歧，分歧的一派是在英格兰贸易中有重大贸易利益者和在英格兰及其殖民地之外有大宗贸易者；另一派自然是感到英格兰竞争威胁的手工业行会。斯穆特

（Smout）要求我们注意在地主们中，尤其是贵族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实际上是参与出口贸易的“买卖人”。如我们多次所见，划分贵族和中产阶级的界限要比我们通常所想的更为模糊不清了。在此时的苏格兰亦是如此。“有一种巧合：一方面是对很大一部分贵族来说，与英格兰的贸易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有70%的贵族被发现在表决中投票支持合并，这种巧合非常醒目而不可忽视。”^[55]“合并法令”中的经济条款规定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何人得利呢？该法令包括两项有利于苏格兰的经济规定。第一、英格兰议会破财出资购买“苏格兰公司”的股份并加上利息，对于那些受到先前因投资“达连（Darien）计划”失利之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爱丁堡，此举显然有助于它们的商业复兴。

第二、所谓的殖民地贸易首次合法地向苏格兰人开放，此举又特别有利于格拉斯哥和苏格兰西部克莱德（Clyde）河地区的商人们。此外，也可能是合并的一个副产品，议会在1727年设立了一个渔业和制造业托管局，它促进了苏格兰亚麻工业的扩展。^[56]所有这些究竟是苏格兰的苦酒还是机遇呢？在此问题上迄今仍有激烈争论。无论怎么说都是

合并了，大不列颠的新国家继续去赢得西班牙王位战争。这场战争当然是为谁将统治西班牙而战，但是在根本上更多的是为西班牙帝国的商业落入谁手而战。1701年，西班牙国王将西班牙美洲的贩奴垄断权交给“法属几内亚公司”，该公司股份持有者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和法国的大资本家。而在先前，这一垄断权为一家葡萄牙公司所拥有。正是这一行动要比任何其他之事都更多地激怒了英国和荷兰的商人，导致战争再度进行。^[57]

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将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交给了波旁王朝，却将贩奴垄断权交给了英国人。^[58]“南海公司”取得了每年向西班牙美洲贩运4800名奴隶的三十年贩卖权。此外，该公司还可以每年派出一艘船载货500吨向西班牙美洲出售。至于荷兰人，奥地利的皇帝也许已得到了西班牙尼德兰，而荷兰人则得到了他们的屏障之地。根据乌得勒支条约，荷兰军队可驻防在由法国交还给奥地利王朝的一切地区：那慕尔（Namur）、图尔内（Tournay）、梅嫩（Menin）、菲尔纳（Furnes）、瓦尔纳通（Warneton）、伊普雷（Ypres）、克诺克（Knoque）、登德尔蒙顿（Dendermonde）（荷兰驻军费用的60%将由奥地利人支付）。这种安排不仅给荷兰人以安全保障，而且“还作为一种掩护使荷兰人渗入南尼德兰市场”。^[59]每一个海上强国都分享了一份它们的西班牙馅饼。西班牙就此供它们渔利了。在随后25年的相对和平之中，获胜的英国并不确信和平有利于它的利益——普卢姆（Plumb）就此指出：

从1713年至1739年是和平的；但这和平对许多人而言是在每下愈况，这和平成了法国对英国的欺骗，法国在友谊的外衣遮掩下逐步为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增强其海上力量和工业力量。商界中很多舆论在狂喊求战。^[60]

战争竟然到来了。这就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一方是普鲁士并与

法国结盟，另一方是奥地利，它最终也与英国和荷兰结盟。战争于1748年结束，签订了沙佩尔（Aix-la-Chapelle）条约，“其结局非常近似于恢复到战前原状”。^[61]不过，这场无结果的战争却是很有利于英国的商业战争。坦普尔利（Temperley）甚至如此认为：“在英国所进行的诸次战争中，这是第一次绝对以贸易利益为主的战争，是仅为贸易平衡而非均势平衡所进行的战争。”^[62]这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尽管是盟友，仍为南尼德兰（此时的奥地利尼德兰）一事争吵不休。奥地利人已厌烦为“尼德兰屏障”付款，也厌烦自己的贸易在屏障区、英国及尼德兰不被允许扩大。实际上，英国人还正在威胁要撤销西里西亚（此时仍是奥地利的）亚麻产品所依赖的屏护，西里西亚亚麻产品依靠它通过英国才被允许在西印度群岛出售。佛兰德商人则对自己与荷兰商人竞争所受的政治限制厌烦了。^[63]

至于西班牙，它对自己的殖民地中英国非法贸易泛滥成患也大为不满——“这是西班牙人对英国船只满腔怒火的真实秘密所在”，^[64]而英国政府却小心提防西班牙与法国的波旁王朝同盟积极复活。^[65]另一方面，“南海公司”既精心又有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成为英国内部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66]受惠于侵略政策的并不止于“南海公司”一家，不列颠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业主们也发现战争结束了1730年代中严重的糖业不景气。^[67]而且，英国的海事保险业诸公司“也为在海上被英国海军俘获的法国船只承担保险”。^[68]实际上，商业利益对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如此之重要，以至在整个战争时期实行护航制度，护航安全成为护航舰只的“首要考虑之事”。^[69]尽管此时在陆地上法军和普军在数量上超过了英军和奥军，^[70]英国海军却是两倍于法国海军。西班牙海军和法国海军联合之力可在规模上相等于英国海军，但是，如将荷兰舰队加给英国舰队，英、荷舰队就在数量上有略胜一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还有联合指挥。尽管法国自1713年以来一直抓紧重建海上力量，战争还是再次确定了英国的制海权。法国在此战争中损失了它的半数战舰和一千多艘商船。“法国的海上力量一蹶不振了”。^[71]

和平又是昙花一现。战争于1754年在美洲和于1756年在欧洲重新爆发。英、法在美洲的商业冲突（“犬牙交错几乎难以分清，但仍然是确切的”^[72]）化成了“七年战争”的激烈斗争。荷兰人企图保持中立，但迫于英国压力限制了对法国的贸易。^[73]西班牙人被诱加盟法国以求最终废除英国的特权，^[74]但是，此举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好处。1763年的巴黎条约标志着英国在与法国的一百年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在欧洲，等待着法国的是一个可与西班牙状况相比的漫长的黯淡时期。”^[75]为了最终继承荷兰在17世纪中叶的霸权，英国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并获胜了。这是作为全世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在英国国家的支持下取得胜利。能够对此胜利做出解释的唯一途径，就是分析英国国家是如何在政治上能够创造和扩大英国企业家压倒其法国竞争对手的社会经济优势差距。

让我们首先从人口统计考察着手。难题在于这是一个争论激烈之处，争论所及不仅有人口变迁之原因，还有需要解释的资料数据。有些人认为1600至1750年之间的法国人口增长缓慢，^[76]甚至有人认为“实际上处于静止状态”；^[77]其他人却争辩说在此时期的法国人口增长了50%。^[78]有一种看来是一致的意见认为法国人口在1500至1750年之间或多或少地保持了稳定状态，^[79]人口数字是英格兰的三倍多，是大不列颠的两倍多。有人认为法国人口在1700年处于低点，在1700至1750年之间略有增长。^[80]有人认为英国人口在1700至1750年的所有各年中都是“低得反常”。^[81]考虑到在1693至1694年法国像大部分欧洲那样（与英国不同），遭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饥荒，^[82]又于1709至1710年遭受另一次饥荒，^[83]关于法国在1700至1750年之间人口增长的推测就更是令人吃惊了。此外在1720年，马赛经历了最后一次欧洲大瘟疫。^[84]然而，至1740年时，英、法两国以及实际上大部分欧洲的人口数字都相当确定地向上增长了。^[85]

赫夫顿（Hufton）认为整个食物供应是决定性的变数：“一般来

说，忍饥挨饿的人口不可能再繁殖；而营养不足的人口再增殖却不困难。”^[86]整个食物供应的增长从何而来？它不是气候变化的结果，至少不是完全依靠气候的结果。由于从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的整个时期以小冰河期而著称，1750年左右不可能有任何重大改善发生。^[87]更有可能的是英国和法国北部与东南部的农业生产体系的发展，成为整个局面中的关键因素。一些人们高度评价马铃薯，认为18世纪的人口增长是“根据（马铃薯的）播散面积和消费量”而变化的。^[88]另外一些人们认为马铃薯不过只是普遍较好的饮食中的一个因素而已。茶叶取代了烈酒，大米和极为重要的食糖消费不断增加，后来又是水果、果酱和甜点心有助于食品丰富起来，在冬季里尤其是如此。^[89]我们已经描述了农业改良的社会背景，这就是依靠压榨不景气的生产者扩大土地集中。^[90]作为早在1750年之前就已开始的一种重要方法，^[91]圈占土地之所以能够实现部分是依靠立法，部分是依靠土地占有者的效率和利润。^[92]大地主们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效率呢？首先是农业工具的改良，主要是因为铁器取代了木制工具。^[93]此外，那些欲想变为大农场主的家畜饲养者发现青草饲料特别有用处。^[94]

然而，对逐步集中趋势的局面最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谷物价格的长期低落。^[95]在从1600至1750年的整个时期中，几乎没有几个谷物丰产年份。^[96]据说，价格低落的不幸却在实际上是英国的幸事，因为它导致了农业革新。^[97]人们会奇怪为什么在此时期欧洲各处都是谷物价格低廉之时，农业革新只是在或主要是在英国竟然是真实之事。引人注目的正是在18世纪前期谷物价格处于最低廉时，英国成为欧洲的主要谷物出口国。最为明显的解释是英国政府于1688年实施的“谷物补贴金法令”，此项法令旨在鼓励谷物出口，^[98]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广泛有利的”^[99]条件。几乎无可置疑，补贴金导致了英国谷物生产的增加，而且，它造成国内市场上有比其他情况下更为充裕的谷物供应，可能确实加深了国内谷物价格的不景气。^[100]其明显可见的意图就是要帮助英国农业企业家们增加他们的利润率。

英国谷物供应得以增加，其市场又在何方呢？出路在于酿酒，城镇劳工又是酒类产品的市场，他们的实际工资在一个长期停滞时期中增加了。^[101]例如，吉尔伯伊（Gilboy）特别提到伦敦所增加的实际工资，可以说都为“杜松子酒流行病”所耗尽。^[102]在荷兰亦是如此，它增加进口英国谷物，特别是麦芽和大麦，供荷兰酿酒者之用。^[103]英国的补助金促成对荷兰的出口日趋增大，^[104]荷兰人又接着鼓励了英国更多地生产，因为荷兰的谷物价格在1700至1720年期间上涨了。^[105]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将波罗的海生产者排挤出荷兰市场，^[106]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市场推销上击败他们。这并不仅仅只是因为英国的运输成本更低（有过此种情况，但毕竟是先前之事），也是因为运往国外的谷物的实际价值中有大约16.5%是补助金。^[107]一份作于1768年的伦敦小册子就此解释说：“我们与波兰人竞争，争做荷兰人的农夫……同时，我们又同样让我们的爱尔兰兄弟去与丹麦人竞争，争做荷兰人的牧牛人。”^[108]在此出口兴旺时期整个英国的小麦价格不断保持均匀一致，这就表明此项补助金全面发挥效用，其影响之力波及英国农业生产的一切地区。^[109]

英国国家寻求为它的企业家们夺取荷兰谷物市场，既是作为对其他谋取利润机遇的一个增补（正是在如此谋利机遇不易取得之时），也是通过连锁效应谋取利润的一种方法。例如，英国排挤掉波罗的海生产者的结果，也就是英国在谷物运输贸易中取代了荷兰人。^[110]当然，其他人也想这么干。实际上，从1650至1700年的半个世纪中，南尼德兰和法国扩大了它们对荷兰的出口，荷兰人也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生产。^[111]但是，英国补助金以廉价出售谷物使这些生产者在1700至1750年时期内走向衰落。^[112]英国通过利用世界谷物市场保障了自己的地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并且有助于在全欧洲恢复1700至1750年之间的田地（ager）超过了丛林（saltus）。^[113]然而，由于整个世界经济依然疲软，这又很快导致了1730至1750年之间的谷物生产过剩和又一次农业不景气。^[114]在1750年之后普遍的世界状况好转之中，英国减少它作为世界谷物生产者的作用，转向更大的工业生产专业化。^[115]

我们已经讨论了法国的状况，它与英国的差异要小于我们的想象。在考察1690年以后发生的变化时，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法国没有设立补助金。法国可能并不需要它们，因为法国要比英国远为庞大。1688至1713年的诸次战争切断了法国先前曾有过的谷物进口，由此“创造了一种有利于法国南部谷物生产的形势”。^[116]此外，战争在西班牙造成破坏并因而切断了西班牙的畜类和酒类产品市场，而封锁则切断了英国和荷兰的亚麻籽市场，因此，法国南部明显地重新生产小麦。^[117]从此时期直至18世纪中期，有土地的逐步集中，南部——比利牛斯山地区变成了“一个单一生产谷物供在地中海出口的地带”。^[118]与此同时，由于交通运输革命（南方运河于1680年开通，新道路于1725年开始建筑），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农业得以繁荣；得以改善的交通运输还使小麦产品有可能在运抵马赛时的价格低廉到足以在地中海市场上有竞争力。^[119]因此，法国谷物生产之增加类似于英国谷物生产之增加，在乡村社会结构和对世界经济的意义方面都有相同的影响。这就是说，核心地区在全面停滞时代又重操赚钱的“边缘”之业了。

从前述之事来看，为什么会有如此一种普遍的历史印象：英国在大约从1650至1750年有一场农业革命而法国却没有？要对此问题作答，我们考察在非农业的工业部门中所发生的情况。1700年之后的英国冶金和纺织生产表明了“一种普遍复苏趋势，但还不是明显增长。”^[120]直至1750年，制造业的价格趋势仍是“和缓下跌”，而“实际工资和市场需求缓慢增加”。^[121]这种增长了的需求首先就是出口需求，特别是殖民地的需求，这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讨论过的是英国在英属北美诸北方州中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它还体现了作为这一时期中农业财富增长之结果的国内需求。^[122]在首先从自己的需求增长中获利的人们中就有大地主们。1700至1750年之间，通常很低的地租得到了补偿，补偿来自地产利润不断增多的来源：出售木材，出租土地供采煤及其他采矿以及采石、铁工厂和石灰窑之用。^[123]

冶金工业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生产的扩大，^[124]与法国的连年战争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125]战争产生了对军需金属的需求，使进口更为困难（至少是在战时），由于造船业扩大耗尽了木材。国内需求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建筑业，刺激了铅制品生产；然而，铅的价格仍然很低，也许表明产量的实际增大对于缓慢增加的需求是太快了。^[126]古尔德（Gould）作了这样的猜测：1600至1750年之间食品价格低廉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降低了纺织品生产的成本。^[127]在此，如在小麦出口的情况中那样，生产扩大的关键因素又是政府在世界市场上的干预行动。英国政府提出了今日所称的“进口替代”政策。^[128]早在1675年，议会就讨论了英国织布业者面临的印度贸易所带来的竞争，于是就向白布征收若干关税。

1690年代那场特别的经济危机导致了1696至1700年的所谓“白布争端”，结果是1700年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从波斯、印度和中国进口印花布。尽管有东印度公司的反对，有那些在英国市场上出售或加工印度货物的人的反对，还是这么做了。然而，此举并未起到帮助毛纺制造业者的作用，因为白布可在英国印染。1719年织布工暴乱（失业所致）导致了1720年的“节俭法令”，禁止使用和穿戴印花布（有少数例外）。当然，其实施效果是有限的。由于平纹细布仍可进口，许多白布也就鱼目混珠得以进口，而上光印花棉布就走私进口。1735年的“曼彻斯特法令”改弦更张，特意从“节俭法令”中剔除了在大不列颠制造的亚麻和棉毛印染品，实际上最终给予棉和亚麻纺织品合法权利了，只要它们是在英国制造的。^[129]这些立法的整个作用因而是：在英国“鼓励了白布替代品的制造”。^[130]

然而，棉纺织时代尚未到来，因为直至1773年时所谓的英国棉实际上只是一种纤维，棉网的棉纬线或经线在其中与亚麻经线或纬线混合编织。^[131]亚麻大多仍靠进口，主要是从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进口。^[132]18世纪时，德国亚麻逐渐让位给爱尔兰和苏格兰亚麻，这又是

起始于1660年的政府政策的结果，此后，政府政策逐步更趋严厉。^[133]1707年之后，苏格兰成为大不列颠的一部分。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的基本影响是英格兰毛纺织品取代了苏格兰毛纺织品（那些最粗劣种类除外）；但是作为回报，苏格兰亚麻制品被允许在英格兰畅销。^[134]这对苏格兰的地主-企业家有多大好处一直是久为争论之事。^[135]爱尔兰的情形更是于一个单方面有利。利默里克（Limerick）条约结束了“威廉战争（1689至1691年）”，并规定英国君主的权威对其殖民地对爱尔兰都是相同的。^[136]这对爱尔兰的生产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王政复辟时期已有措施压制爱尔兰工业，禁止同美洲殖民地的最直接贸易关系。^[137]1666年的“牲畜大法令”将爱尔兰产品排斥在英国市场之外，迫使其集中向英国出口羊毛。^[138]

在“光荣革命”之后的时期中，英国人走得更远。他们以1699年的“爱尔兰毛纺品法令”摧毁了爱尔兰毛纺工业。^[139]此项法令迫使爱尔兰转向由工资极微薄的乡舍工业（Cottage Industries）进行的亚麻品生产。^[140]詹姆斯（James）声称这对爱尔兰来说并不太坏，因为他们在18世纪中被允许像苏格兰那样向英格兰和英国殖民地出口货物，西印度群岛成为爱尔兰供应的主要市场。^[141]然而，此中遗漏了这个事实：这种出口贸易的主要受惠者却是在爱尔兰的英国大地主。希尔的评论看来更合理：“使英国获得世界霸权的海上体系，又使爱尔兰成为继黑奴之后的一个重大牺牲者。”^[142]我们随之看到这样一种模式：在1650至1750年期间（特别是在1689年之后），英国政府积极采用重商主义措施去扩大英国在世界冶金和纺织生产中的份额。^[143]英格兰包揽了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但是，苏格兰和爱尔兰只被允许分享亚麻生产。^[144]问题仍然是：英国工业生产中这种无可置疑的增长与法国的情况相比较又是如何呢？

英贝尔特（Imbert）说：在旧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法国工业资本无疑取得了进展，但小于英国资本所取得的进展。^[145]法国起初独领

风骚，门德尔斯认为在1700至1750年时期，法国仍是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强国。^[146]莱昂（Léon）指出：尽管在18世纪中法国制造的出口产品的百分比维持未变，但是其绝对数量增加了四倍，他还说这种出口导向工业是技术最先进的部门。^[147]内夫认为1640至1740年之间，法国生产规模的增长速度要快于1540至1640年时期，而英国的增长速度由于内战出现缓滞，只是在1750年代才重新增长。因此，他又认为这两种经济增长速度趋同了。^[148]计量数据不足，学者们又各执己见，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小心从事。或许，最好是对王政复辟后时期的英国生产和柯尔伯后时期的法国生产进行比较。坎宁安（Cunningham）在1892年就此比较说：

在（1689至1776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国）在谷物的进出口方面执行了一项非常醒目的政策（即补助金制度）。……这一咄咄逼人的政策之举带有重大利益，因为它看来已经引起了农业改良中的巨大进步，这进步发生时仍维持了这一政策。……这看来是对英国还很新鲜又称之为重商主义体系的计划中之一部分。法国扶持工业，荷兰扶持航运。英国却走了一条促进农业发展的路线。此举在18世纪中证明是英国繁荣发达的柱石。^[149]

有两个问题令人思索。将这一时期英、法两国政策之间的差异视作为重视农业轻视工业的差异，这样的认识正确吗？这能解释英国后来更大的繁荣吗？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所作的一项新近研究考察了18世纪英、法两国的工农业贸易，倾向于证实康宁汉的概括结论。他发现在法国，工业价格相比于农业价格是高昂的，而英国正好是相反的。^[150]为什么竟然会如此？或许，这是因为两国就是想要如此；如果它们确实这么做了，那么，它还会同长期的世界经济停滞背景下的两国规模有关系吗？无论是英国的国内市场，还是法国“五大包税区”（Five Great Farms）的国内市场，其规模都不足以支撑实现工业机械化的重大努力。对英国而言，这意味着征服国外市场；对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实

现国家的经济统一。[\[151\]](#)

在此时期世界需求疲软，英国欲要进入，乃至最终控制主要的外国市场，一个更可靠的办法就是出口谷物而不是工业品。英国政府因此重视谷物补贴金，不过也未排除其他策略。法国的情况颇为不同。法国工业的一个很大部分是在大西洋区（*ponant*），该地区处在“五大包税区”之外，且与美洲有极密切的商业往来。大西洋区的企业家们发现，在法国其他地方销售他们的货物要比在荷兰销售更为困难。为了维持与荷兰的商业关系，他们开始放弃诸如炼制精糖这样的工业，向荷兰出售未精炼的粗糖以换取印染花布和铁器。[\[152\]](#)这就开始使大西洋区处于与荷兰相对的一种地位上，也就是类似于葡萄牙相对英国所处的地位。

柯尔伯（*Colbert*）的政策并未成功地“吸收”“大西洋区”，但是在其他地区恢复了“大西洋区”正在放弃的工业，从而拯救了法国免于重蹈葡萄牙的覆辙。在17世纪之初，“大西洋区”是富裕之乡，布匹和亚麻制品的产地；由于有了柯尔伯（*Colbert*），这种情况就开始转变，东北部地区（处在“五大包税区”之内）和朗格多克（*Languedoc*）地区都兴起了工业。[\[153\]](#)从1700至1750年之间，55%的毛纺工业在东北部地区，28%在南方地区，西部地区却降到了4%。[\[154\]](#)法国对工业的重视是对一种急切需求的反应，在长期之内它是成功的。在拿破仑战争中终于全面实施柯尔伯（*Colbert*）的政策之时，使这些政策能够贯彻执行的工业基础已经保存下来了。“自由放任、自由通行”最初就是指废除重商主义的法国内部的诸多障碍。[\[155\]](#)

1700至1750年，大不列颠对农业出口予以更大的重视，可以用来解释它在随后百年中的经济胜利吗？[\[156\]](#)或许可以，但仅仅只是间接的。正是对国外贸易的重视（此时正好大都是谷物贸易）促成了英国重视海军和殖民地，这又继而使英国能够在与法国的长期斗争中获得军事胜利。就在法国国家费尽心思克服其内部障碍之时，英国国家技高一筹挫

败了它。这种胜利远非是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是国家强大的胜利，然而，国家强大的力量又是必然的结果。结合对荷兰共和国——原来的霸权强国——的生产力量的考察，可以极佳地理解英、法两国的生产力量。整个17世纪中，相对于英、法两国，荷兰的生产成本费用增大，至1700年时其中差异明显可见。^[157]成本费用上涨产生于霸权通常具有的两个特点：税赋增加^[158]和工资水平提高，^[159]尤其是后者损害了劳力密集型部门（在此处情况中系指纺织业、造船业和酿酒业）。^[160]荷兰产品到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程度，荷兰资本主义仍可以依靠对外投资的收入维持下去。因此，荷兰的衰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英国和法国而言的衰落。^[161]

英、法两国生产模式中的缓慢转变（以及荷兰持续的相对衰落，更不必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促成了新的商业模式，或者说至少是一些先前趋势的强化。在1660至1700年之间，英国成为殖民地产品转送出口的一个主要贸易中心；但是，情形依旧，世界经济中的海运商业还是“欧洲的一统天下”，还是由荷兰人掌握大多数海运商业。然而，经济扩张的发展方向，尤其在1700年之后，明显向西移至新的殖民贸易；而在此方面，英国正在寻求成功地取代荷兰。^[162]1689至1713年的英—法战争时期，标志着英国出现了关于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之利弊的公开争论。一方认为1696年的英国航海法令和贸易部的建立，标志着政府在贸易过程中的管理达到了一个新的严重程度，^[163]另一方却是提出了更自由的贸易和修改重商主义政策的要求。^[164]双方都无足够之力取胜，正好反映出这个事实：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日趋强大却又依然离霸权甚远。^[165]

18世纪前半叶，在西移的贸易中居首位的是食糖，^[166]其次是制糖的奴隶。^[167]在1700年时，英国明显控制了食糖的世界商贸，但是至1750年时又大多落入法国之手。^[168]对此变化可能做出的最佳解释，是比较牙买加的生产 and 法国控制下的生产，前者成本费用增大，因为其沿

海地带的土地耗竭了，后者却是相对的是新生产地区。^[169]这意味着法国的竞争取胜了英国吗？不是，如比拉尔所指出的：虽然法国的对外贸易在18世纪中“美洲化”了，英国的对外贸易却“全球化”了。^[170]英国在食糖中的损失由别处予以弥补——首先就是奴隶贸易。在17世纪争夺非洲奴隶贸易的斗争中，荷兰人一开始就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171]他们在当时也适合这一角色。西班牙殖民地是最重要的奴隶市场，因此有了争夺贩奴垄断权的竞争，贩奴垄断权作为一项定规在1662年恢复。^[172]

在英国，皇家非洲公司自1663年开始拥有奴隶贸易专卖权。^[173]起初，利润甚低，因为世界糖业不景气，但是，1689年的战争使之改观。^[174]这家英国公司拥有在英国殖民地出售奴隶的专卖权，还享有“航海法令”的豁免权，可以在英国的加勒比海港口向西班牙买主出售奴隶（西班牙港口不向英国奴隶贩子开放），这些西班牙买主用西班牙船将买下的奴隶带走。这种买卖使该公司受到英国种植园主的抨击，他们认为西班牙人的购买抬高了奴隶价格，增强了西班牙人的竞争力。^[175]他们呼吁实行奴隶自由贸易，事实上，该公司的专卖权也于1698年结束，尽管该公司声称说非洲奴隶贸易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事业。^[176]经营奴隶贸易的利润如同经营糖业的利润一样，看来是合法事业，需要英国政府予以保卫。英国政府取悦这两种利润的唯一办法就是“为了向西班牙美洲供应奴隶取得一份另外的合同”，^[177]这就是奴隶贸易专卖权，如我们所见，于1713年获取了。

英国种植园主得到了他们的奴隶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奴隶贩子得到了他们的西班牙市场。种植园主们认为这一妥协偏袒了奴隶贩子。^[178]此外，牙买加岛上那些因牙买加是奴隶贩卖中心而获利受益的人们，现在全都悲叹“南海公司”直接进入了西班牙港口。^[179]奴隶贸易专卖权也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在美洲的非法贸易，法国人被迫退回到与西班牙属美洲的一种较早期也不太赚钱的贸易方式：由在西班牙的商人托销货物，这些商人再出口至西班牙的边远地区。^[180]相比之下，英国人

却有打开西班牙贸易的三种不同方式。他们像法国人那样经由西班牙之手进行贸易；但是，他们也利用“南海公司”每年派出的船只做交易；以及通过经由牙买加的非非法但半受保护的贸易。^[181]西班牙商船队正在消亡，^[182]而且到了它求取生存的程度，而英国人现在从以船抵押贷款的无形条款中获利了。^[183]

17世纪之初，法国在地中海商业中发挥了比英国更大的作用〔马森（Masson）称之为压倒优势作用〕。^[184]在整个17世纪中，英国的参与作用稳步增大，^[185]但在1689至1713年的战争时期衰落了。另一方面，法国外交颇为成功。1690年，法国与阿尔及尔签订了一项条约，排除了北非海盗对法国商业的攻击，这些海盗们仍在同时威胁着其他欧洲强国的贸易。^[186]法国还取得了在埃及的特权地位〔法国人曾失去这种地位，当时，路易十四于1697年签订赖斯韦克（Rijswijk）条约并未与他的土耳其盟友磋商〕。^[187]总之，法国在地中海东部的贸易明显高涨。^[188]其基本原因看来是法国纺织品的优良质量，或者说至少是比英国此时向地中海东部提供的中等纺织品要高一筹。^[189]法国的这种贸易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为马赛所垄断，^[190]马赛因而也变成了地中海东部和北非的各种产品的再出口中心之地。^[191]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外部竞争场（external arena），^[192]因此，它的贸易在法国（和西欧）的整个商业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变得更大了，而是变得更小。^[193]

在17世纪后期，亚洲与欧洲的贸易中有一种缓慢的转变，开始从胡椒和香料转向其他的奢侈品：印度纺织品，中国、孟加拉和波斯的丝绸，中国艺术品（漆器和瓷器等），^[194]以及茶叶和咖啡，这两者起初也属奢侈品。^[195]这种不断发展的贸易其本身并未使印度洋地区边缘化。比如说，纺织业生产的增长并未“伴随有制造技术中任何重大变革”，^[196]或者也就因而没有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重大变革。然而，欧洲列强正在开始使自己处于可以强迫变革的地位上。1674年，“英属东印度

公司”与马哈拉特（Mahrattas）人结盟；1684年，他们又在孟买筑堡设防，结束了“不设防商站”的政策。苏瑟兰（Sutherland）说这是“一个巨楔之利刃”。^[197]欧洲利益的这种增长导致了欧洲诸国之间的竞争激化。1746年法国人攻占了英国人占据的马德拉斯（Madras）之后，这种竞争采取了战争形式。此后，尽管欧洲出现短暂的和平局面，暗中的冲突却连绵不断；^[198]只是至1763年巴黎和约之后英国的霸权最终确立起来，这竞争才告结束。

然而，尽管欧洲在亚洲贸易中的利益不断增大，^[199]亚洲仍是一个外部竞争场。从1600至1750年，中心地区国家全都一步一步地变成世界广大地域之内的殖民强国或半殖民强国。它们对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都持积极态度，因为它们能够在北美洲通过移民殖民地扩大它们的市
场，^[200]能够在西印度群岛取得有厚利可图的食糖供应。但是，它们对印度洋地区、非洲海岸地区以及伊斯兰地中海却是极为勉强的态度。甚至在这些地区，有时出现强加的欧洲的直接政治权威，通常也只是预先阻止某个竞争对手的占有。交换的产品对欧洲而言逐渐地变得不再是奢侈之物。然而，直到18世纪中期出现世界经济的高涨发展之时，才会有真正的边缘地区化开始进行，而且即使在此时，边缘地区化也只是首先发生在最有经济前景的地区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201]人们正是在波罗的海和白海的贸易中，最为敏锐地认识到可以说是意味荷兰商业霸权完结的东西，1689年之后的时期中，世界经济中的这一霸权结束了。荷兰的地位在别处也衰落了，如在加勒比海、大西洋和一般而言在亚洲的贸易中。^[202]但是，北方贸易是荷兰的根本贸易所在，也正是在此，英、法两国的竞争给予荷兰以最大的损害。

如同对印度的贸易那样，对俄国的贸易日益密切但也未使俄国边缘地区化。^[203]诸如谷物、大麻和钾碱这样的大宗贸易在此时因为其不定期而与众不同。唯有在欧洲市场上粮价特别高昂之时，西欧才会从阿尔汉格尔（Archangel）进口谷物；但是，诸如蜂蜡、鱼子酱和皮毛这样的

奢侈物品，“在运输成本费用少于售价时”，就会定期运来。^[204]诚然，荷兰人在俄国贸易中保有一席之地，^[205]但是在1700年之后，英国人缓慢地取代了荷兰人，^[206]特别是成为桅杆木材的进口者。^[207]英国人还开始控制瑞典铁的进口。^[208]法国此时增加了它在北方的贸易，虽然少于英国，但又一次以牺牲荷兰为代价。^[209]威尔逊（Wilson）说荷兰对欧洲商业和运输“的实际垄断直至1730年左右仍完好无损”，^[210]只是在1740年之后，才有了对荷兰的贸易中心地位发起的严重攻击。^[211]

威尔逊（Wilson）所言或许是对的，但是，有两个事实也许会使我们认为这种实际垄断在更早一些时候终结。第一，在17世纪时，英国货物大批运往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并且是委托出售；但是至18世纪时，情形逆转了：伦敦成了贸易中心，荷兰的亚麻品在英国也只能委托代销了。^[212]第二，有证据表明18世纪中感觉敏锐的英国人民不再认为荷兰是霸权强国；依我们来看，他们倒是很恰当地认为法国是一个比荷兰更严重的竞争对手。^[213]当然，在金融领域中荷兰人仍执牛耳。甚至在此领域中，英、法两国的地位也最终发生惊人的变化。始于1689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对英、法两国都提出了巨大的财政问题，尤其是对法国。^[214]作为“大陆”强国，法国不得不为了维持它的雇佣军队和在欧洲的外交而提供无止境的资金。法国国家寻求满足这些不断增加的费用的办法，^[215]就是在1690至1725年之间实行一系列的贬值。^[216]这些贬值在短期和若干方面有助于国家，^[217]但中期的代价却是高昂的，^[218]因为名义价格上涨掩盖了实际上的周期性危机、普遍的生产下降和税赋的增加。^[219]

英国能够较好地消除这些战争的财政压力，部分是因为它的纯军事费用较少，也部分因为它的金银储备情况更有利。17世纪后期，全欧洲都遭受了一次白银危机。英国也不例外，而且在1690年代对出口实行部分禁止，与东印度和波罗的海的贸易被允许例外。^[220]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法国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在法国市场出售，并要求用国内商业货币

（白银），而英国（因为其规模）主要面向出口市场，要用国际清算货币（黄金），所以，英国走向实行实际上的金本位制，法国则实行银本位制。^[221]这种情况又为金银贸易的连环本质所强化：法国经由西班牙从墨西哥取得白银，英国经由葡萄牙垄断了来自巴西的黄金。^[222]英国利用从1689至1714年的战争时期去确保它的黄金供应。^[223]因此，白银危机对英国的影响要小于对法国的影响。法国调整处理它那负担太重的白银储备，从而削弱了它的国家结构，就在此时，英国通过对日益增长的黄金储备加以商业控制，从而增强了它的国家结构。

无疑，金银的重要性不是它自身内在的，而是其他商品价格疲软的反映；^[224]在这样一个时代，控制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却是核心大国彼此斗争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可变因数。英、法两国都力求使本国财政有一个更健全的基础。两国都发展专门组织、增大税赋、多发行纸币以及增加公债。^[225]然而，1689至1714年的战争导致法国公共财政于1715年陷入“无法忍受的混乱”，^[226]却使英国财政有相对的偿付能力。差别何在？范·德维（Van der wee）认为法国重商主义“在路易十四的‘伟大政治’时期太多地服务于军事扩张政策”，而英国的重商主义“是系统地服务于经济扩张。”^[227]他因而比较了军事扩张（绝对是国家资金的非生产性用途）与经济扩张（更可奖励的）。这是一种标准的观点，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差异。

我们已经讨论过英、法两国不同的地理条件，这种差异迫使法国进行代价昂贵的陆地经济扩张——首先就是法国本身有效的经济统一。法国作为一个陆地强国的相对成功，不应由与英国的比较来衡量，而是应由与奥地利的比较来衡量。“在18世纪开始之时，奥地利王朝拥有的领土和法国一样广大，其人口也几乎是一样稠密，但是它的税赋收入却要少五倍。”^[228]

并非只有法国才有支出大于收入，而是英国和法国都是如此，这在

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中是可能的，只要有信心支撑。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现实。成功带来成功，失败导致再失败。如我们所知，法国国家利用货币贬值作为一种借方筹资机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国家发展出一种征收未来税赋的举债形式。1690年代后期，商业银行家们开始出售打折扣的债券，这些债券的基础却是国家财政部对未来税赋收入的指望。随着这种办法的扩大，现实情况是商业银行家在事实上依靠不可靠的战时政府的许诺，而在发行一种信用货币。1709年，这座信用大厦倒塌了。国家授权延期偿还应付给商业银行家的款项。如吕提（Lüthy）所说的：“实际上是国家在给它自己延期还债。”^[229]

同时，包税（*affermage*）成为筹集皇家税收的一种主要机制。它提供了从柯尔伯（Colbert）时代至法国大革命全部皇家税收的一半。^[230]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包税是一种花费昂贵的办法。莱昂（Léon）说：金融家们是高价的中商集团，在“一个虚弱的发达国家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国家中，直接向公众举债“如果不是可能的，那看来也是困难的”。^[231]在英国，同一时期的发展大为不同。的确，在较早时国家筹措资金有同样的困难。克拉潘（Clapham）提到了“斯图亚特王朝后期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232]但是在1689至1714年的诸次战争时期，这正是威廉与玛丽随后又是安妮女王的统治时期，英国人采取了决定性步骤去创立一种长期性公共举借的制度，也就因而是公债制度，它使国家以相对低廉的代价就有了一个更安全可靠的基础。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创立。此外，这一时期中还建立了一个经过重组的“联合东印度公司”和一个新建立的南海公司”。这三家公司向国家提供长期贷款以换取它们的特权。^[233]它们的贷款“在从短期债务向统一国债发展的转变中……发挥了一种极重要的作用。”^[234]

的确，这些贷款是一笔好买卖交易。对政府当局来说，这些贷款虽要偿还但可以不断举借；对于股东们来说，利息率诱人而且股票可以不断增值。它仍需有可靠的信心支撑。卡特（Carter）说：在威廉和玛丽

掌权之后，金融界感到可以信任政府。^[235]投资者是谁？除了城市居民（甚至还有一些乡村居民），卡特提到了外国人：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犹太人，以及法国新教徒。^[236]根据更深入的调查，看来相当清楚的是：英国国债赖以寄托的重要信心是荷兰银行家及其金融盟友的信任，包括那些组成称之为法国新教徒国际的人们。^[237]为什么紧接着在撤销“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之后法国新教徒情愿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投资于银行，^[238]以及为什么在历次反法战争中与英国结盟的荷兰人会有相同之感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在荷兰投资呢？英国人在1689年之后可能是冒了入不敷出的风险去举债，而且也可能确如威尔逊（Charles Wilson）所说的：“英国利用借自荷兰黄金时代的得益，对帝国前途进行赌博，而且赌博成功了，”^[239]但是，荷兰人不得不心甘情愿地借钱给英国。

如果说荷兰银行业对18世纪的英国国债表现出一种“特别强烈的”兴趣，^[240]其中必有某种原因。我认为这原因较少与英国有关，而是更多地与荷兰有关。^[241]我们首先考察两个事实。18世纪中，英国国债大多为外国人所拥有，^[242]而且在1689年之后，英国逐渐成为“备受阿姆斯特丹资本青睐的投资场所。”^[243]17世纪英、法两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最终效果就是要消除荷兰在生产领域中的优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消除它的商业优势。荷兰的工资成本上涨了。荷兰的技术领先地位消失了，国家税率之高异乎寻常，部分原因是债务还本付息的费用高昂。^[244]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力量曾引起一个后果：低利率，现在看来要维持这低利率却要依靠“日渐衰弱下去的商业趋势，这趋势又证明了资金外流的合理性。”^[245]荷兰联合省的利率从17世纪早期的6.25%跌到了18世纪中期的2.5%，在此情况下，英格兰银行提供的6%的利率（以及5%的年金和殖民抵押品）对荷兰投资者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246]

简言之，没有更实在的选择了。促使荷兰人把自己的钱投资于英国的原因既不是“封建责任”心态（feudal business mentality），也不是缺乏

爱国主义精神。“比较成本费用，比较资本回报，以及财政政策全都有助于荷兰人在国内外投资于食利股票，而不是工业。”^[247]桑巴特（Sombart）将此种变化作为证据分析说：中产阶级总是“堕落颓废”，但是荷兰自由派史学家克莱因（A.N.Klein）对他这种“可争议的”说法提出异议，赞同马克思的解释，即每一个资本家都是热衷于政府维持价格或资本自我扩张的狂热迷。他认为这一形象描述完全适用于荷兰的情况：

17世纪的荷兰商人及其在18世纪的食利者后裔适合这一概念，只要我们认识到后者的经济前景曾被限定于非常缺少诱人之处金融投资中。如果有一位狂热迷要比另一位更快更有效率地实现了目标，即也许只是因为他有更大的可能性，肯定不是因为他有更大的决心。^[248]

荷兰的这种金融变化既非突然之举，亦不是完全彻底之事。相反地，它是一个渐进过程。荷兰的银行仍是其他人可以存入金银的可靠保存之地，^[249]而且在18世纪中硬币铸造的比率持续升高。^[250]

直至1763年之前，欧洲对阿姆斯特丹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信心尚未动摇；^[251]但是在18世纪之初时，荷兰人已将他们的钱财投向酬报最丰之地，这就是英国。这是“一种直截了当的生意安排”，^[252]在此之中，给予荷兰投资者的高额回报帮助英国国家减少了它借债的成本费用。最后，英国可以如法国那样在国内就能筹集他们的资金，但是，荷兰投资“使英国能够在极少打乱其经济的情况下进行战争。”^[253]在一个原来的霸权强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强国之间达成的这种共同安排，给前者提供了体面的退休金，给后者提供了极重要的推动力去与对手竞争。后来，这种模式再度重现，这就是在1873至1945年的时期中，英国扮演了当年的荷兰角色，而美国扮演了当年的英国角色。

在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之后，法国做出了一次强有力的努力去

毁灭英国在世界金融中初生的优势。哈辛（Harsin）论及了法国的问
题：“直至1715年，法国金融体系中最严重的缺陷是缺少公众信
誉”。^[254]约翰劳（John Law）的“私营”银行^[255]就是旨在弥补这一缺
陷。他的企图是创建一个将是国家收入接受者的银行，以此重新建立法
国国家的信誉。在此基础上，该银行将发行可以兑换黄金的有效货币。
其长期目的是确保货币稳定、增加流通货币、降低利率、改善与外国货
币的兑换汇率，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减少国家开销（公债和由居中的
官僚阶层不断耗去的国家收入）。所有这些都将可能实现大规模进行海
上和殖民地扩张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约翰劳主要提出了两件
事：多发行纸币和财政改革。^[256]这看来是企图完成柯尔伯（Colbert）
的未竟事业，是想象中的一次大跃进，似乎可能恢复法国在与英国的斗
争的明显领先地位。这一计划完全失败。在取得了最初的资本之后，约
翰劳的银行创办了“西方公司”（Compagnie d'Occident）去开发密西西比
河流域（路易斯安那），并拥有国家授予的垄断权。这家银行着手合并
其他一些贸易公司 [塞内加尔（Compagnie du Sénégal）公司、东印度
（Compagnie Indes Orientales）公司和中国公司]，并在1719年创建
了“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同时，约翰劳的银行接手公债的支付，不由税收款项予以偿还。约
翰劳还寻求重新组织税收制度使之合理化，但是，股票和纸币的通货膨
胀所引起的巨大的投机狂热使这一计划化为泡影。突然之间出现了一场
信心危机。紧缩股票的企图适得其反，这个制度在所谓的“密西西比泡
泡”中崩溃。为什么？戴雍（Deyon）和雅卡尔（Jacquart）认为尽管“此
项计划的规模”令人“景仰”，约翰劳本人却没有“即使是最出色的战略的
成功也要依赖的实施艺术和耐心掌握时间。”^[257]哈辛（Harsin）认为约
翰劳所建立的体系是“坚定的，但是也许是早熟的”，之所以失败是因
为“他的创意失之轻率、他的建议失之仓促行事，而不是因为它们缺少
逻辑以及他的敌人联手反对。”^[258]在韦伯（Max Weber）看来，约翰劳
的失败却是不可避免的，仅仅只是因为“不论是路易斯安那的，还是中

国的，或是东印度的诸种贸易都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去支付即使是他的资本中一小部分的利息。[\[259\]](#)”

如果我们看一看英国在同时发生的投机一事，或许我们就可以理解约翰劳的失败了。英国的这场投机导致了称作“南海泡泡”的类似危机。

（当然，投机行为并非仅限于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荷兰联合省、汉堡和意大利北部，银行家和投资者都在积极地煽动投机）。[\[260\]](#)约翰劳的“体系”中包括了连在一起的三个国家垄断企业：一家货币发行银行（皇家银行），一家贸易公司（印度公司）和一个集中化的间接税收系统（税务总署）。1719年10月，约翰劳提出偿还15亿元法郎国债的剩余部分，对股票的需求远远超出预计，在法国和英国都是如此。英国人于是照葫芦画瓢仿效此项计划，利用了已存在的“南海公司”。[\[261\]](#)在英国也同样是出现对股票的需求超出预计之数。在此两例中，举足轻重的要素是单个的政府的债权人不是被强迫而是被引诱去购买股票。[\[262\]](#)然而，在法国如此引诱处在压力下之后，游戏规则却被改变了，银行纸币价值被减少了50%。如汉密尔顿（Hamilton）所言：

由于约翰劳和摄政者都庄重地反复许诺说银行纸币的价值决不会改变，恐慌压倒了一切。既然王国政府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最后一击，就一笔勾销了银行纸币的一半面值，持有者们就力图抢在第二击之前将它们花光或投资出手。[\[263\]](#)

“大崩溃”从巴黎波及伦敦。无疑，此事“生动鲜明地展示了新金融大厦的脆弱”，但是同样无疑地表明了“新金融技术的恢复之力”。[\[264\]](#)英、法两国此后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金融稳定时期直至法国大革命。[\[265\]](#)在此意义上，坏事变成了好事。然而，法国试图利用约翰劳的体系去克服英、法两国之间在金融力量中不断扩大的差距，此举却适得其反。英国先前创立的中央银行幸免于“南海泡泡”之灾，但是法国的相似机构却导致了“密西西比泡泡”，而且与之同归于尽。“约翰劳的统治

是极短命的，震撼了一切却一无所获。”^[266]在英国，议会支撑了破产的南海公司；此举“挽救了面子”，因而也挽救了英国的信誉。^[267]这样的事情在法国政治中是不可能的。约翰劳的体系的直接消极影响被夸大了，^[268]它也有甚至是积极的影响。^[269]真正的消极影响是未能成功的失败，也未能重振旗鼓。

随着18世纪的岁月推移，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金融中心地位提高了，而法国却降低了，^[270]因为法国不如英国那么强大。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英国是如何变得比法国更为强大？有些人衡量一国之力量的尺度是个人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保护，免受政府的专横决定或公共官僚机构之害。对他们而言，这个问题也许显得可笑。但是，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见解：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那些统治者可以使其意志胜过国内外其他人的意志。根据这一标准，我们认为英国至18世纪之初期时已明显比法国胜出一筹。真正强大的国家极少需要显示它的铁拳。坦普尔利（Temperley）指出：如果说沃尔波尔（Walpole）时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和平时代”，那是因为有着昔日的勇猛之功：“1703年与葡萄牙签订的梅休恩（Methuen）条约和1713年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的商业条款，都为人普遍看作是对英国贸易的让步，只有凭借武力或武力威胁方可强取。”^[271]仅有武力尚不足用，还须有管理之功效。普卢姆（Plumb）说：“1714年时的英国，很可能享有欧洲最有效率的政府机器。”^[272]

我们的见解是：在18世纪晚期英、法两国奏效的社会妥协，与现在有时所言的相去不远；在此两国中，它们都在1689至1763年的英法战争中产生了相对的内部稳定。18世纪是“欧洲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和解时代”，^[273]这一和解的基础是地主阶级的收入得到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法国的情形是公认如此，那么英国就不是商业资本的胜利之乡吗？此事实无疑，但是，这与地主收入竟无牵涉吗？^[274]除了与个人的作为相重复之处外，还有历届政府以我们已叙述的诸种方式支持商业的、工业的

和金融的企业；不过，它们同时也允许地主阶级分享一份厚利。法国的情形又是公认如此。免交税赋的贵族们以及贪利的长袍贵族对我们心目中的旧王朝可谓举足轻重，[\[275\]](#)但是，这在英国竟是未闻之事吗？就在这个“贵族垄断了土地”的“大地产时代”，[\[276\]](#)沃尔波尔（Walpole）执政时的稳定产生了何种影响呢？汤普森（Thompson）尖刻地说：

1720年代英国政治生活有“香蕉共和国”（译注）的病质中的某些弊害，每一个政客凭借裙带关系，诱之以利和贿赂，在其身旁聚集了一帮忠实的附庸者。目的是要奖赏他们，授予某种职位以便从中渔利公帑：军费、教会、税赋……。大乡绅、投机家和政客们均是巨富之人，其收入之高耸入云犹如安第斯（Andes）山之巍峨于百姓贫困的遍地雨林之上。[\[277\]](#)（译注：香蕉共和国系指由外国资本控制，只有单一经济作物的拉丁美洲小国）。

与情形相差无几的法国相比，英国的这种“国家如同匪盗的情况”[\[278\]](#)在土地财富的影响后果方面竟会有什么明显不同之处吗？我们必须言归正传：是什么使英国国家比法国更为强大？最简单的答案很可能是：英国人在1689至1714年的战争中以其军事能力抑制法国的结果，这与其说是因为荷兰人给予了军事援助（这并非不重要），还不如说是因为荷兰人对英国国家的投资给予了金融财政援助。荷兰利益所树立起来的信心使创建英格兰银行成可能之事，也使英格兰银行有可能在“南海泡泡”之灾中幸存。最重要的是最终有可能在沃尔波尔（Walpole）的一党国家中解决英国国家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这一分裂始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之时，又以一种不同形式延续为1689至1715年之间尖锐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之争。[\[279\]](#)英国国家逐渐强大以及英国企业家继续征服经济世界，并不是因为英国比法国更民主，[\[280\]](#)而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更不民主。在突然之间，气氛从一种政治暴力变成了一种政治稳定。[\[281\]](#)

上层阶级的政治和解曾是英国在18世纪得以稳定的要素，但在法国只是部分地实现。恰如在英国，英国上层阶级中的新部分已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了“公民权”（*droit de cité*），也就不再是反对力量了，[\[282\]](#)法国类似的集团——长袍贵族——也是如此这般。[\[283\]](#)但是与英国不同，行政部门从未处于国家的完全控制之下。“（专制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依旧宽深非凡”。[\[284\]](#)为了便于解释法国上层阶级的和解之所以未完成，先让我们回顾法国胡格诺教徒（Huguenots）和撤销“南特敕令”的问题。16世纪时，法国有半数之多的贵族特别是中小贵族，曾支持“胡格诺党”。这一令人好奇的结果是因为较小的贵族们身受国王官吏的压迫，转而给予“他们手下的农民以一种相对的和自我矛盾的宽容”。1598年的政治妥协变成1629年的君王胜利之时，其社会后果是巨大的：“胡格诺党的失败成为这些贵族所有失败的启端”。[\[285\]](#)1599年之后，尤其是1630年之后，贵族慢慢地放弃了新教信仰；这就是使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成为可能之事的原因。[\[286\]](#)

随着“南特敕令”之撤销，就有主要是城市市民胡格诺教徒的离散，[\[287\]](#)但这部分人只占法国胡格诺党的10%而已。许多其他人改变信仰了。[\[288\]](#)留下了什么呢？

王室的严酷因而摧毁了胡格诺教主义——集中化的、根深蒂固的、教士的和中产阶级的胡格诺教——它曾在17世纪时遮掩过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胡格诺教。后者在不幸逆境中重建起来。起初并无牧师，随后是纯朴的俗人、布道者，……。幸亏有了曾是16世纪改革教会的主要力量的贵族和农民。当“南特敕令”撤销，逼迫他们再度寻找一种抵抗手段时，他们首先的本能反应就是叛乱。[\[289\]](#)

这个重建的胡格诺教教会的重要特色是：“教派自治主义、联邦主义的、议会主义的和平等主义的”。[\[290\]](#)平等主义的又是造反叛乱的！法

国国家面临中产阶级——较穷的贵族和较富的农民——的一场潜在的阶级起义，这是极为严重之事。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是因为在16世纪中形成的历史窘困：这个国家的规模太大，经济太离异，无法迅速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结构。

可能造成动乱的诸种因素不得不予以抚慰和钳制，也这么做到了，部分地是靠1720年后减少农民的税赋，^[291]部分地是靠乡村地区推行小学教育，以此作为反对宗教改革的胜利者实行文化上潜移默化的手段。^[292]然而，减少税赋只是扩大英、法两国力量对比之间已在扩大的差距。^[293]教育和宗教的潜移默化作用虽然可能已控制住18世纪乡村法国中的“激进主义”和“犯罪行为”，^[294]但是明显不足以根除较大的农场主在政治上的被排斥感。这种集团在英国称之为乡绅，至少是称为小乡绅。不在政治上吸收这个集团，国家就不能真正强大。^[295]法国的内部斗争并非与英、荷同盟的建立毫无关系。在17世纪中叶时，荷兰将在18世纪宁愿与英国结盟而不愿与法国结盟一事绝不是明显可见的。英国人是荷兰的商业大敌，荷兰人反而与法国有许多联系。事实上，如我们所见的，他们正在着手使“大西洋区”（Ponant）变成一个像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正在变成的经济转送带地区。

然而，法国自身的困境迫使法国成为一个以陆地为主的军事扩张主义大国，镇压它的新教徒。对荷兰资本持有者而言，无论他们是共和派还是保皇派，与英国交往肯定要比同法国交往少有风险。法国威胁要吞并荷兰人，扼杀他们。英国人却使两国资产阶级缓慢渗透融合。奥兰治（Orange）王室登上英国王座只不过证实了荷兰人更喜欢英国。由此，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力量导致力量，虚弱导致虚弱。16世纪中创立国家结构的困难分裂了法国，由此恶化，并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一体化的不完全。16世纪时的英国是一个坚实的国家。内战的混乱迫使重建一个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之后，英国得以能够吸收合并它周边的凯尔特人（Celtic，意指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等——译注）。它也能

够吸引足够的荷兰资本，用以在18世纪创立一个稳定的沃尔波尔（Walpole）的一党国家。正是英国国家相对实力的这种逐步增强——不是1600至1750年之间英、法两国生产是如何组织或它们的价值体系中的重大差异——才解释了英国有能力在1750至1815年期间将法国远远抛在身后。

在此全书之中，我们一直强调英、法两国生产中的相同之处。至于技术和知识的革新，这取决于你读谁写的历史书。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无疑开始满布于荷兰和英国；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哈扎尔（Paul Hazard）精辟地表明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宰法国，不是在法国大革命，甚至也不是在百科全书派之时，而是在1680至1715年。^[296]如拉布鲁斯（Labrousse）所言：“（在法国）18世纪思索着的中产阶级。”^[297]并非唯有法国是如此。尽管往时世界的意识形态表面上依然统治着整个欧洲的世界经济，越来越多的集团开始乃至最终采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行动方式追求他们的利益，捍卫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命运。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论说的核心内容。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均未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实际作为已经正在形成社会行动上重大的紧张压力。

^[1] 当然，关于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时期划分是一件争论不休之事。肖努一方面认为“从1580至1760年”在欧洲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并无重大变更”（Pirre Chaunu）（1966a, 242），然而他又说：“正是在1680至1690年之间我们必须确定为18世纪长时期扩张阶段在马尼拉（Manila）、美洲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开端。然后是一个上升趋势，先于欧洲大陆久被延误的好转趋势之前四、五十年左右。”（1966b, 213）古伯特和维拉尔（Pirre Goubert）（1970g, 333）；（Pirre Vilar）（1962b, I, 708）都确定上升趋势始于1733年；但是维拉尔（Vilar）声称：“在经济方面，18世纪开始了所谓的大热潮，在1733年广为人知，但只是在1760年之后才迅速发展，持续至1817年”（1962a, 11）。同样的，拉布鲁斯（Labrousse）（1970, 388）认为1726至1763年是一个缓慢上升趋势，但是“热潮”只是在此之后才到来。

^[2] 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1688年革命也是英国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绝不亚于其政治史和宪法史上的转折意义。就在詹姆斯王逃走之前一个星期，皇家非洲公司依然如旧发布委任授权抓捕那些侵犯1672年特许状的无执照经营者。该公司以未经记录在案的決定，就

放弃了以强制性措施实施其专卖权的要求。后来的议会法令正式确立了自由贸易；但是，真正的变化是随着詹姆斯二世倒台才得以发生”（Christopher Hill）（1961a, 262）。哈克谢尔（Heckscher），（1935, I, 262~263）也以1688年为分界点，作为（自由派的）英国和〔柯尔伯特（Colbert）的〕法国之间的重大的歧义点。但是，我已表明了我为如此解说的怀疑。

[3] 参见谢里登（Sheridan）（1969, 13）和西利（Seeley）（1971, 64）。布罗代尔（Braudel）曾将英国对法国的胜利确定为“早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之时”但是，他又说英国只是“在1815年才获胜”（1977, 102）。

[4] 参见内夫（Nef）（1968, 149）。再参见古伯特（Goubert）（1970b, 21），他说：“旧王朝统治的特色是数字的力量、人口的优势。”科特勒（Fred Cottrell）（1955, 69~70）从另一方面争辩说英国有“能量”优势：“正是在英国，航船产生了它所能的充分革命。英国作为一个岛国拥有一些大于欧陆强国的优势。英国的主要防卫不是运用陆军，而是运用航船实现的，其本身就是（能量的）盈余—生产者。用于防范入侵的这种必要盈余要小于其邻国为此所要求的，以便能量可用于生产更多的转换之处而又不危及国家的生存。欧洲大陆国家的陆军却是不断地耗去它们的能量盈余。”

[5] 参见威尔逊（Wilson）（1965, 282）。

[6] 参见安德鲁斯（Andrews）（1915, 546）。

[7] 有时确定为1688年。出现异差的原因是由于英国直至1752年仍使用儒略（Julian）历。因此1689年的新年始于3月25日。威廉于1月7日成为“执政者”，2月23日又与玛丽共同接受了王冠和“权利宣言”。从此，“光荣革命”既是在1688年，又是在1689年。参见默里（Murray）（1961, 162）和德比尔（de Beer）（206~208）。

[8] 在理论上，这是片面的。尽管威廉作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于1689年5月17日对法国宣战，法国却从未对英国宣战；路易十四直至1697年和赖斯韦克（Rijswijk）条约时仍一直承认詹姆斯二世是合法国王。参见克拉克（Clark）（1970, 226, 注释2）。

[9] 参见希尔（C.Hill）（1961a, 257）。

[10] 参见费伊勒（Fayle）（1923, 285）所作的讨论，他指出：“大陆派”因而预见到了1762年舒瓦瑟尔（Duc Choiseul）向西班牙人提出的建议以及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

[11] 参见普卢姆（Plumb）（1967, 120, 134）。

[12] 参见普卢姆（Plumb）（1967, 135）。

[13] 参见罗斯韦尔（Roseveare）（1969, 93）。再参见巴尼特（Barnett）（1974, 166），他谈到了在乔治国王统治时的英国每年更新“卫兵和驻军”：“和平时期中这种军事力量为人臆测出的临时基础得到小心谨慎的珍护。每年的兵事法案都向顽固的议员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要求

减少或摧毁他们所憎恶的‘常备军’。直到1755年公布了持久的军队名单，‘这支军队’才获得了正式承认。”

[14] 参见芬纳（Finer）（1975，123~124）。再参见巴尼特（Barnett）（1974，148），他说：“托利党是‘海洋派’，辉格党是‘大陆派’。”

[15] 此语引自琼斯（Jones）（1966，85）。

[16] 格拉汉（Graham）（1948，95）如此说：“直至18世纪，英国海军极少在欧洲范围之外游弋……疾病和大风几乎就是最凶恶的敌人。……然而至17世纪末时，海军工程建筑和航海技术的改进，以及卫生医疗方法的进步，都使舰船能够在海上航行更长时间，离开母港航行更远距离。”

[17] 参见格拉汉（Graham）（1958，VIII）：“在更强大的舰队控制住海上交通时，它就会要求逐步握有独一无二的垄断权。”

[18] 参见西姆考克斯（Symcox）（1974，1）。

[19] 参见西姆考克斯（Symcox）（1974，43，49）。

[20] 参见西姆考克斯（Symcox）（1974，37~40），然而，卡特（Carter）（1975a，24~25）却争辩说：“奥兰治（Orange）的威廉于1686年取得又一个巨大的好处，作为他和他国内反对派之间关系较佳的结果。这就是重建荷兰海军的手段，即通过决定为此目的征收一些荷兰海关税，向君主支付收益款，这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至1688年，共和国的海军力量因而得以相对强大起来。”

[21] 参见厄曼（Ehrman）（1953，395）。

[22] 西姆考克斯（Symcox）（1974，56，60~61，64，67）指出：虽然在此次和先前的战事中，主要的海军战术一直是战舰之间“炮火猛轰竞赛”，“海军大炮射击不准确令人吃惊”；他说海军战斗因而是“一种笨拙和协调甚差之事”。在此情形下，胜利取决于“所占的优势位置和风向。”

[23] 参见马汉（Mahan）（1889，225）。

[24] 参见厄曼（Ehrman）（1953，398）。布罗姆利和瑞安（Bromley & Ryan）（1970，790）指出：“荷兰人曾在1689年争夺英国人的联合舰队指挥权，已被严格压制到在1714年得有8艘军舰为乔治一世国王护航。”

[25] 参见西姆考克斯（Symcox）（1974，14）。

[26] 常见的一种解释是关于1683年至1717年期间法国的经济停滞，此次停滞大概是因为取消“南特敕令”之后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向外移民所引起的。如斯科维尔（Scoville）（1960，218

~219) 所言：这是牵强附会因果式（Post hoc propter hoc）的谬误推论的好例子。当然，撤销“南特敕令”是“于事无补的”，但是，大多数胡格诺教徒事实上作为皈依者留下来。实际上，“宗教迫害并未削弱减少他们的精力，反而是加强了他们的决心意志”。斯科维尔（Scoville）提供的这种证据遍及工业、贸易、造船业和农业各个领域。关于此时期中的法国经济危机再请参见莱昂（Léon）（1956，152）。

[27] 参见马汉（Mahan）（1889，226），他认为正是由于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繁荣商业的结合使“英国超越所有其他国家之上取得海上权力”。（第225页）。

[28] 参见西姆考克斯（Symcox）（1974，5~6，187~220）。

[29] 参见克拉克（Clark）（1960，123~124）。再参见西姆考克斯（Symcox）（1974，68~69）。克拉克接着说：“拥有更为强大的舰队的一方能够封锁海洋，阻止敌方的商业，但是，它自己的商业航运也会引来行动迅速的海盗船的袭击，这些海盗船逃脱了舰队的监视。一个国家的商业数量越大，也就越多地招致这种袭击。由于这些原因，法国的武装私掠船大为增多。”

[30] 参见西姆考克斯（Symcox）（1974，222~223）。

[31] 参见布罗姆利（Bromley）（1950，465）。

[32] 参见马丁（Henri Martin）的《法国史》第二卷第167页（波士顿，1865年版），转引自摩根（Morgan）（1968，174）。摩根观察到：“赖斯韦克（Ryswick）条约标志着路易十四时代的终结的启端，种下了毁灭他的种子，而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使之发育成熟。”（第195页）。哈札尔（Hazard）（1964，84）这么评说此项条约：“这位伟大的君王的自尊心该是感到多么屈辱啊！”

[33] 布罗姆利（Bromley）（1970，26）说：路易十四保留阿尔萨斯（Alsace）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就在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关系一如既往处在他的谋算中心位置时，保住了他的王国的战略钥匙。”

[34] 参见卡特（Carter）（1975a，25~26）。

[35] 参见琼斯（J.R.Jones）（1972，329）。

[36] 参见潘宁（Stork-Penning）（1967，113）。

[37] 参见琼斯（J.R.Jones）（1966，93）。

[38] 参见克拉克（Clark）（1923，4~6，121）。

[39] 参见潘宁（Stork-Penning）（1967，113~114）。如威尔逊（Wilson）（1968，165）所言：荷兰人的态度是“经验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和有保留的消极态度”。

[40] 参见卡特（Carter）（1975a, 30~31）。

[41] 默里（Murray）指出：“议会合并”扩大了1603年的“王室合并”，对此事的常规描述“也许是写得很好的历史，但它却是令人怀疑的法律”。他认为正确的法律表述是这样的：“每一个王国的王位之继承仍继续是取决于该王国之法律。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继承法律不同，（不过，是稍有差异），而且也有适当的偶然之事发生，两个王室可以再次分开，各自遵循自己的王位继承……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室之偶合延续（克伦威尔的干预除外）至1707年‘合并条约’生效之时。直至今时之前，‘王室的合并’只是暂时的联合而非永久的联合。在1707年‘合并条款’所创立的是一种根本上不可分解的王室合并。”（Murray）（1961, 162）。正是1707年的合并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变为大不列颠。特里弗—罗珀（Trevor-Roper）（1964, 79）指出：事实上，1652年的合并要比1707年的合并更紧密，但是，它未能持久。

[42] 关于更详尽的政治史，参见布劳恩（Brown）（1914）。

[43] 参见斯穆特（Smout）（1963, 256），再参见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1964, 78）。

[44] 参见斯穆特（1963, 29, 238）。

[45] 参见英什（Insh）（1952, 32~37, 51~55）。“但是，此时阻碍英格兰布业制造者竞争的贸易障碍是由合并条约所推翻，苏格兰公司逐渐衰落了。1713年2月16日，他们在爱丁堡储存布匹的大厦出售了。一个月后又出售了机器和存货。”

[46] 参见英什（Insh）（1952, 69~71）。基思（Keith）（1909, 54）指出：1695的法令“引起了（英格兰的）某种恐慌。人们担心……苏格兰人会逐步越来越多地侵蚀美洲贸易，他们在此贸易中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非法份额。”再参见汉密尔顿（Hamilton）（1963, 249），他谈到了17世纪后半期格拉斯哥在大西洋贸易中“迅速增长的重要性”。的确，斯穆特（Smout）解释了格拉斯哥商人反对“合并”的确切原因：“正因为格拉斯哥已经在（海外贸易中）取得进展，也就感到没有合并一举可能会更好些。”（Smout）（1960, 211~212）。

[47] 参见基思（T.Keith）（1909, 60）。英什（Insh）说：“1706年秋季，欧洲事态的压力再次对英格兰-苏格兰关系施加最大影响。”（1952, 80）。英格兰的盟友荷兰和奥地利，正在为控制南尼德兰一事争吵，南尼德兰新近才从法国夺来。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刚击败了彼得大帝，征服了波兰，占领了萨克森，正在威胁波希米亚；路易十四正力图劝说他向南攻击奥地利。“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形势都是朦胧不清的，最重要之事是不要有一个既愤怒又可能独立的苏格兰，这样一个苏格兰将为詹姆斯党阴谋提供又一个威胁手段，成为法国—詹姆斯党联合作战的基地。”（1952, 81）

[48] “老王位觊觎者”爱德华（James Francis Edward）谢瓦利埃（Chevalier de St.Georges）是站在法国方面的一位积极战士。他对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位都提出了要求。无疑，他愿只接受苏格兰王位，如果他能够得到的话。琼斯（Jones）（1954, 73）认为：“正是因为詹姆斯党在

苏格兰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才使得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成为急切之事，……成为最重大无比之事……1704年苏格兰议会的一项法令规定安妮女王在苏格兰的继承人应当是苏格兰王族中人，但不是她在英格兰的同一继承人。……如果只有合并一举能够消除（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继承王位）的可能性，那么就必须有合并，而且迅速合并。”

[49] 詹姆斯党的事业在爱尔兰甚至要比在苏格兰更得人心。在苏格兰，“詹姆斯二世和七世的宗教信仰是一件招致人怨之事，但是，爱尔兰人先天地就喜爱他，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参见皮特里（Petrie），1958，100]。英格兰人颇费力气地才镇压了1689年至1691年王室流放者在爱尔兰的远征[参见皮特里（Petrie），1958，100~135]。英格兰人依然赢得了胜利，这不是一个微小胜利。“利默里克（Limerick）条约标志着‘老爱尔兰’的终结，完全就像阿波马托克斯（Appotomax）条约意味着‘旧南方’的终结那样如出一辙。”[参见詹姆斯（James），1973，17]。

随之而来的惩治法律，不许天主教徒任公职和占有土地是如此“使人麻木”，以致在1715年和1745年詹姆斯党两度掀起叛乱时，爱尔兰人并未揭竿而起予以响应。皮特里（Petrie）观察到：“在其余两个王国中尚未有如此恶意报复‘光荣革命’反对者之事，而且在（投降条款的）利默里克（Limerick）之叛卖后，爱尔兰人之希望以武力成功抗拒征服者，就犹如更近些时的犹太人之希望推翻与之无异的希特勒暴政。”（1958，133）。关于“惩治法律”，参见詹姆斯（James）（1973，22~25）的叙述。直至1713年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时，有八九个爱尔兰团队参加法国军队作战，有鉴于此事实，英格兰人一定是很担心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任何成功，都会使爱尔兰问题重新爆发。

[50] 参见英什（Insh）（1952，74~77），他说：“远征地峡（Isthmus）和达连（Darien）海峡的损失与烦恼，导致人们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和进入英格兰的殖民地市场，这是促使苏格兰人接受1707年合并条件的最强劲的刺激。”（第50页）。但是，林曼（Lenman）否认进入英格兰殖民地的重要性。[参见林曼（Lenman），1977，55]。此外，1696年和1699在苏格兰出现重大生存危机，也就是詹姆斯党所称的“威廉国王的七个坏年头”的一部分。[参见林曼（Lenman），1977，45~52]。

[51] 参见林曼（Lenman）（1977，51）。再参见斯穆特（Smout）（1963，252）。“如果有足够的勇气、经验、金钱、人力和海上力量，一个大强国也许也想象去努力实现[达连（Darien）]计划。苏格兰人只拥有勇气，其他一切都令人悲惨地缺乏，包括缺乏自知之明。”斯穆特（Smout）进而言之：达连（Darien）计划的失败还只是1690年代的四个灾难之一。其他三个具有消极影响的灾难是英法战争、四年饥荒和严酷的关税之战的损害波及在各地的贸易：英格兰、荷兰联合省、南尼德兰、法国、北美洲和挪威。（参见第224~253页）。

[52] 参见赖利（Riley）（1969，498）。卡斯泰尔斯（Carstairs）的说法却不同。他认为从长期观点来看，要求实现合并的压力来自英格兰方面，但是从短期观点来看，“经济利益解释了为什么苏格兰人长达数世纪以武力抵制的合并，竟最终又为他们所接受下来的似乎有理的原因。”[参见卡斯泰尔斯（Carstairs）（1955，65）。斯穆特（Smout）区分了英格兰的政治原因和苏格兰的经济原因。][参见斯穆特（Smout），1964b，462]。

[53] 参见哈里斯 (Harris) (1963, 68~70)。

[54] 林曼 (Lenman) 与我的怀疑之见相合：“静观危机，看看英格兰在它深深陷入与欧洲的重大冲突之时，究竟是否会愚蠢到冒险在其北方边境发动战争，这需要有更坚强的意志，苏格兰领导集团却没有。” (1977, 57)。

[55] 参见斯穆特 (Smout) (1963, 273)。

[56] 参见英什 (Insh) (1952, 84~89) 和林曼 (Lenman) (1977, 58~60)。卡斯泰尔斯 (Carstairs) 怀疑这些好处的直接性。他认为只是在1750年之后才扩大了对英属和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他说：合并并未说明亚麻生产得以扩大的原因，因为直至该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的主要进口大多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亚麻产品，它们以“退税”的方法经英格兰销往美洲。只是在1742年之后，随着一项补贴金制度的创立，苏格兰的亚麻出口贸易才开始扩大 [参见卡斯泰尔斯 (Carstairs), 1955, 69~70]。林曼 (Lenman) (1977, 66) 将此分歧分开，他同意卡斯泰尔斯 (Carstairs) 关于苏格兰人起初并未从合并中获取什么好处的看法，但是，他认为1727年是一个转折点，“表明在此特殊的夏天中最初几只燕子的飞来。”

[57] “法国人的计划从未像路易十四接受西班牙查理二世的遗嘱的直接后果那样威胁着英国与荷兰，……西班牙帝国的巨大市场会变成法国商人的私家猎场吗？” [戴雍 (Deyon), 1978b, 235]。古伯特 (Goubert) (1970a, 237~238) 注意到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反应是多么迅速：“签订贩奴专卖条约之后只有几天，就有了‘海牙大同盟’。在海牙，皇帝和海上强国有力地紧合在一起，给路易十四两个月时间达成妥协让步。如果不行，那将将进行战争，其目的是破坏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使尼德兰向法国关闭，取得在意大利和地中海的控制权，使盟国进入西班牙殖民地，同时又将法国贸易阻止在外。”

[58] 关于这些条约的详细内容参见沃德 (A.W.Ward) (1908, 440~450)。

[59] 参见卡特 (Carter) (1975a, 26)。

[60] 参见普卢姆 (Plumb) (1966, 29)。他说：“在很多18世纪英国人看来，战争是……大好时机，可用来使邻国落难贫穷，劫掠世界上的财富，羞辱那些处于教皇驭下、吃食物而又软弱无力，穿着木头鞋的奴隶，即法国人。” (参见第14页)。再参见苏德兰 (Sutherland) (1956, 56~57)。

[61] 参见汤普逊 (Thompson) (1966, 436)。

[62] 坦珀利 (Temperley) (1909b, 1997) 西利 (Seeley) 同意这些观点：“在我看来，英国在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她立刻变得商业化和好战” (1971, 88)。

[63] 参见迪克森 (Dickson) (1973, 83, 107) 所言：“奥地利与英—荷的谈判立场 (在1739年) 之不相容已是明显可见。英国人与荷兰人希望保有奥地利的尼德兰，使之成为一个经济殖民地，其部分防务由荷兰驻军负责，但奥地利人支付荷兰驻军的费用，这一立场实现于

1715年的‘关卡条约’……在经济方面，（在1746年）英国想保留在1746年前的关税好处以及与尼德兰的贸易平衡，尼德兰被认为依赖它们。英国以冷淡的失望回答佛兰德（Flemish）人希望在英国享有较低关税或直接进入东印度贸易的要求。”

[64] 参见坦普尔利（Temperley）（1909b, 204）。参见布朗（Brown）“非法贸易在南海公司经营活动的每一阶段中都是不可少的一个部分。”（1928, 179）。再参见纳尔逊（Nelson）（1945, 55）。

[65] 坦普尔利（Temperley）（1909b, 198）注意到，在整个18世纪，西班牙“时常是一个袖手旁观者，更曾经是英国的劲敌，绝不是朋友。”然而，1739年时的英国政府观点是：“将西班牙驱入法国人的怀抱，就是毁灭英国支配新世界的前景。”

[66] 仍请参见坦珀尔（Temperley）（1909b, 222）：“对文献资料的一项研究并未证实如下普遍的看法：英国希望保留无执照经营者和私人所进行的非法贸易，这种贸易很受政府部门的重视。他们的不足之处留给了南海公司——它以金融关系建立了与政府的密切交往，并在1739年支持沃尔波尔（Walpole）竞选用以回报他在1720年拯救该公司的恩典。”

[67] 参见戴维斯（K.G.Davies）：“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美洲战争除外）英、法之间的大西洋诸次战争对英国种植园主是利大于弊，不过应承认有不少例外。”（1960, 109）。戴维斯（Davies）就此挑出了1739至1748年以及1689年至1713年的战争。

[68] 参见瓦伊纳（Viner）（1969, 84）：“议会在旷日持久的辩论之后，拒绝承认此种行径是非法行为。”

[69] 参见费伊勒（Fayle）（1923, 288）。然而，法国人走得更远，“而且将护航严格限于防卫作用……更令人惊讶的是……法国战舰实际上被出租给商人……根据安全送到的货物价值收取一定百分比的费用。”

[70] 见利奥纳德（Léonard）（1958, 192）列举出1740年的如下数字：法国，16万人；普鲁士，84000人；奥地利，17000人；英国，59000人 [包括汉诺威（Hanover）王朝士兵]。

[71] 参见里奇蒙（Richmond）（1928, 173）。

[72] 参见安德鲁斯（Andrews）（1915, 780）。

[73] 参见卡特（Carter）（1963, 820~821）。

[74] 参见克里斯特洛（Christelow）（1946, 24, 29）。然而，这正是西班牙人一方的错误。“西班牙不明智地加入了‘七年战争’，使英国人在冲突结束时不仅巩固了它在前几年中的获益，还在西班牙殖民地的财富上开拓了新的收入来源。” [参见布朗（Brown），1928, 186]。

[75] 参见德休（Dehio）（1962, 117）。

[76] 参见达比 (Darby) (1973, 304)。

[77] 参见塔克尔 (Tucker) (1963, 214)。

[78] 参见威尔逊 (Wilson) (1977b, 116)。

[79] 参见古伯特 (Goubert) (1965, 473)。

[80] 参见古伯特 (Goubert) (1965, 473); 亨利 (Henry) (1965, 455); 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53, 22)。

[81] 参见塔克尔 (Tucker) (1963, 214)。

[82] 参见弗林 (Flinn) (1974, 301): “在西欧可能再也不会有1690年代那样如此广泛和严重的饥荒了。”弗林注意到英国是一个例外。然而在法国, “大多数的人口……处在饥饿的威胁之下, 备受饥饿煎熬, 或实际上死于饥饿” [古伯特 (Goubert), 1970a, 216]。彭特兰 (Pentland) (1972, 174) 对英国另一番复杂的解释。1690年至1710年是农业的高价格时代 (大概是因为饥荒遍及欧洲), 英国此时有一个高人口增长率。因为这种情况, 也因为在此时期年轻人甚少 (归因于先前的低人口增长率), 农庄就业机会导致了早婚和高出生率, 这又接着导致了机会的减少和1705年至1710年之后的衰降趋势。随着1720年后的价格下跌, 死亡率上升了, 这解释了1720年代的大流行瘟疫—“十年之间条件恶化的逻辑结果, 产生于农业产量相对地供过于求, 并非供应不足和相伴而来的人力过剩 (并非缺乏)。”

[83] 参见古伯特 (Goubert) (1970d, 60) 和雅卡尔 (Jacquart) (1975, 187)。

[84] 参见兰伯特 (Rambert) (1954, 606~617)。莱因哈特 (Reinhard) 和阿曼高特 (Armengaud) 认为最后一次大瘟疫是在1668年, 此后瘟疫“极少” (1961, 131); 但是他们提到在1694年的西班牙有过一次 (1964, 143)。尽管有过马赛的瘟疫, 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a, 364) 提到在1730年至1737年之间法国人口大增长。

[85] 德普雷兹 (Deprez) (1965, 626) 称1740年是“欧洲人口史上的伟大转折点”。“通常的解释是结束了瘟疫和饥荒。”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a, 388) 和赫雷那 (Helleiner) (1967, 95) 他们提到了没有灾难。

[86] 参见赫夫顿 (Hufton) (1974, 15)。

[87] 参见雅卡尔 (Jacquart) (1975, 187)。但是, 古伯特 (参见1970d, 63) 归因于较好的气候结束了法国的饥荒, 气候变得更温暖, 雨水较少了。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却强调了普遍湿润多雨但并不寒冷的气候的重要因素, 至少在法国是如此 (参见Le Roy Ladurie) (1967, 281)。莱因哈特 (Reinhard) 和阿曼高特 (Armengaud) (1961, 115) 也如此认为。

[88] 参见范登布罗克 (Vandenbrocke) (1971, 38)。争论是: 与谷物比较, 马铃薯使人平均卡路里热量的食品供应增加1倍多。虽然每公担马铃薯的卡路里含量只及谷物的1/5左右,

产量却高出10倍。“而且，马铃薯是夏季作物，较少依赖天气。谷物种植总是要冒风险，因为太多依靠气候条件。”然而，萨拉曼（Salaman）（1949，455~456）认为直至18世纪最后25年，马铃薯才成为英国穷人普遍的食品，尽管此前两个世纪中食用马铃薯已逐渐推广。他说，直至1775年左右马铃薯还主要是用作牲畜饲料：“在马铃薯可以成为穷人的部分食品之前，它必然应当先证明它值得作为猪食。”

[89] 参见希尔（Hill）（1969，256）。

[90] 参见科尔曼（Coleman）（1977，125），明盖（Mingay）（1963，81~82），拉夫洛夫斯基（Lavrovsky）（1960，343~355）。明盖注意到1660年至1750年之间小地主们有一次重大衰落（1968，31）。

[91] 参见霍尔德尼斯（Holderness）（1976，52）：“从1750年来看，很明显，英格兰的很大一部分已被圈占了。”

[92] “甚至在那些18世纪中仍保留了敞田制的村庄中，也有主张田地面积更大块数减少的强烈倾向。[明盖（Mingay），1962，480]。这看来已发生在英国，尽管马铃薯的高产量已使人们有可能依靠很小的地块就可以谋生。”这也许意味着谷物生产是财政方面的一个重要变量因素。

[93] 谁能有钱购买呢？大概是那些已有更高的总体收入的人们。[贝尔罗克（Bairoch），1966，16] 以一种可能是间接的方式说：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购买新工具的可能性。

[94] “没有芜菁的帮助，在冬、春两季饲养牲畜就大成问题”[参见厄恩利（Ernle），1912，176]。至1720年时闻名于英国的不止于芜菁，还有三叶草、驴喜豆、车轴草（三叶植物）、红色剪秋罗和黑麦草。

[95] “所发生之事是小农场主在丰年中只生产一小部分市场盈余，却在歉年中失去了货币收入。但是，小农场主的所失正是大农场主的所得，大农场主从小麦生产者的退出竞争中大发意外横财。”[古尔德（Gould），1962，321]。

[96] 参见厄恩利（Ernle）（1912，168~169），古尔德（Gould）（1962，323），哈特韦尔（Hartwell）（1969，25）。

[97] 参见约翰（John）（1969，171），威尔逊（Wilson）（1965，245），霍尔德尼斯（Holderness）（1976，74~75）。

[98] 参见阿什顿（R.Ashton）（1969，49~50）。

[99] 参见明盖（Mingay）（1960，337）。1700年至1750年之间，在英国的出口中，谷物从3.7%增加到了19.6%。参见阿什顿（Ashton）（1960，12）。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a，211）宣称在1690年至1720年之间，“农业品和非农业产品之间加权平均价格比率”短

时倒退有利于农业，在1620年至1740年大范围内是不利的。

[100] 参见古尔德（Gould）（1962，331~332）。

[101] “1660年至1760年之间（英国实际工资中）的改善是颇大的，但不是惊人的……至1750年时情况明显好于1600年。1670年后价格膨胀率更低、1750年前人口增长的缓慢下降、农业剩余品（尤其是食品）的积聚，以及特别是在劳力密集行业中经济活动的复苏，都促成1750年之前实际工资的增加。”[霍尔德尼斯（Holderness），1976，204]。

即使实际工资增加了，失业就没有增加吗？是的，失业增加了，但是，它至少由这些时期中其他就业予以部分弥补。工人变成了走私贩和拦路强盗。妇女去纺织。捕渔业增长了（这是穷人的最后谋生手段之一），男人们更愿意接受海上小船中的艰苦生活。巡回推销员的人数增多。甚至建筑业也显得繁荣起来，几乎是与出口的繁荣成反比例变化[参见阿什顿（T.S.Ashton），1959，138]。尽管在此时期实际工资增加，城市生活的质量几乎没有使工人们离开小酒店。“肮脏和疾病就在优雅和奢侈中蔓延滋长。在乔治一世统治之时以及乔治二世的早期统治中，伦敦是一个散发臭味、泥泞不堪和污物四溅的都市，遍地都是贫民窟。”[参见普卢姆（Plumb），1966，17]。

[102] 参见吉尔伯伊（Gilboy）（1930，613）。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实际工资的增多导致杜松子酒生产的扩大，这又要求增加谷物的供应。如果谷物供应太多，更多地销售杜松子酒就能解除困境。参见钱伯斯（Chambers）（1957，44）所述之言：“‘杜松子酒时代’不止于是沉醉迷糊的伦敦平民那种难以言状的迷茫失态……连年丰收增大了谷物供应，而一连串的流行病又减少了本该消费这供应的人们。1739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开始，谷物出口下降，部分关闭了谷物的一条出路……，伦敦的种族自杀又使中部农场主遭受产量丰裕之害；他们为之叫苦不迭的生产过剩部分地由杜松子酒的超量消费予以解决。”然而，中部农场主却为短期谷物消费的中期成本付出了代价。伦敦的酿酒工业发展出用废料饲养猪牛的办法，而且推广应用。18世纪伦敦人消费的肉类和牛奶越来越多地取自伦敦城郊地区之内的猪和奶牛，伦敦四周各郡农场主们所遭受的激烈竞争之苦来自“现在所称的以系统方式进行的‘资本主义’肉类生产。”[马赛厄斯（Mathias），1952，254]。

[103] 参见奥姆洛德（Ormrod）（1975，39~40）。大量出口可有补助金。大麦可谓“火爆”，鼓励了其出口超过其他谷物。在荷兰的“杜松子酒时代”也是如此。参见约翰（John）（1976，53）。

[104] “或许荷兰人易于依附（英国谷物的）进口，但是其他人也许也会依附廉价的或受补贴的谷物，就像依赖不受补贴的谷物那样。”[德弗里斯（De Vries）（1975，55）]。荷兰并非唯一的出口市场。葡萄牙人是又一个重要的二级市场。参见费希尔（Fisher）（1971，64）。

[105] 参见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a，212）。如果价格从1720年至1740年再次下跌，这不会是对英国增加生产的部分反应吗？

[106] 关于大不列颠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年均谷物出口，约翰有令人吃惊的数据。从1650年至1699年，波罗的海地区出口了约合 $10 \frac{1}{2}$ 夸脱（quarter）58800拉斯特（last）[每拉斯特约合 $10 \frac{1}{2}$ 夸脱（quarter）]，英国出口了2500百拉斯特；在1700年至1749年之间，波罗的海地区出口降至3100拉斯特，英国升至42000拉斯特。两者的总量从58300百拉斯特增至73000拉斯特[参见约翰（John），1976，56表格6]。再参见利普森（Lipson）（1956，II，460），詹宁（Jeannin）（1964，332）和奥姆洛德（Ormrod）（1975，38）。

[107] 参见约翰（John）（1976，59）。

[108] 《关于对出口谷物、麦芽和面粉予以补贴金对这个王国的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之思考》，伦敦，1768年版，第61至62页，注脚，引用于约翰（John）的书中（1976，56）。

[109] “不必教条主义地迎合一个既复杂又不明了的领域，……我们趋向于认为至少是在小麦的情况下，市场的自主性可以被严重地夸大。”[参见格兰奇和艾略特（Granger and Elliott），1967，262]。

[110] 参见奥姆洛德（Ormrod）（1975，40）。

[111] 参见德弗里斯（De Vries）（1974，171）。

[112] 参见艾贝尔（Abel），（1973，265），他指出英国出口在1711年至1740年之间向法国和德国生产者封闭了世界市场。詹森（Jansen）（1971，255）指出在1680年至1740年时期中，南林堡（South Limburg）的农业生产者面临价格下跌，缩减了普通谷物，转而生产“高价的小麦”（以及种植燕麦）“以求弥补谷物价格下跌的损失。”

[113] 参见肖努（Chaunu）（1966a，242）。Ager（农地）是在其上进行劳作的地表，相对于Saltus（荒林地），即覆盖着自然植物的土地。

[114] 参见明盖（Mingay）（324，336）。

[115] 参见阿什顿（T.S.Ashton）（1960，50）关于18世纪后半期的论述：“在一个人口增长迅速和英国正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的时代中，由出口盈余变为进口盈余是一种几乎难免的变化。”

[116] 参见巴特（Slicher van Bath）（1977，75）。

[117] 参见恩加伯特（Enjalbert）（1950，116）和布罗代尔（Braudel）（1951，71）。

[118] 参见费雷歇（Frêche）（1974，835）。

[119] 参见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a，397~400）。

[120] 参见克伦本茨（Kellenbenz）（1977a, 547），他说：“仍然有太多的障碍，尤其是在冶金业中，尽管经济变化趋势有利于铁和森林都很丰富的俄国。”参见伊斯特（East）（1951, 512）：“有了煤和铁，将要在地图上留下它们痕迹的那些大规模发展就有望于19世纪了。”

[121] 参见科尔曼（Coleman）（1977, 151），他说1650年至1750年时期“是英国工业的投资和进取的时代，虽无下个世纪中那些宏伟壮观的变化，但是其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发生奠定了更有力和更灵活的基础。”

[122] 参见威尔逊（Wilson）（1977a, 8）。

[123] 参见明盖（Mingay）（1960, 373）。

[124] 贝尔罗克（Bairoch）（1966）对此颇有分析研究，包括铁在工具中的应用以及使用工具数量的增多。他还强调了马的使用的增多和给马钉上铁蹄的新方法。他认为在此方面的关键时期对英国而言是1720年至1760年，对法国而言是1760年至1790年，甚至是1790年至1820年。另外参见钱伯斯（Chambers）（1957, 36），他认为17和18世纪的英国农业对工业做出了三个贡献：为船、铁和煤矿工业提供了资本和领导人物；消费工业的产品；促进了交通运输变革，特别是收费公路。

[125] 约翰（John）（1955, 330, 333）认为这些因素“促成加快寻求使用煤去冶炼的方法”，这又导致了1688年至1698年之间发明反射炉。他还提醒我们注意“在1714年至1763年之间，海军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克伦本茨（Kellenbenz）（1974, 206~207）指出：一旦在冶铁中用煤取代木炭，铁生产和稠密人口之间的互不相容就消失了，他断言这就解释了该项生产从瑞典引人注目地转移到英国的原因。

[126] 参见伯特（Burt）（1969, 266）。

[127] 参见古尔德（Gould）（1962, 320）。相比之下，他拒绝一切旨在辨明收成波动对经济活动状况有直接即时意义的企图，认为这么做太“冒险”了；他指出了这些波动可以引出的相反效用。威尔逊对古尔德的此说不那么肯定：“但是，在王政复辟至18世纪后期工业化之间的岁月中，制造业的扩散增大究竟有多少应归功于必需品一般价格水平的平衡甚至于下降呢？这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128] 参见奥姆洛德（Ormrod, 1975, 40）。1678年的“大禁令”，主要旨在对付法国，它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 [参见阿什利（Ashley），1897, 338]。

[129] 参见托马斯（P.J.Thomas）（1963, 68, 101, 125, 139, 150, 163~164）。尽管如此，呢绒仍是18世纪英国的主要制造业 [迪安（Deane），1957, 207] 而且还经历了从1700年至1740/1750年的“突出增长”时期（第221页）。

[130] 参见斯梅尔色（Smelser）（1959, 53）。哈克谢尔（Heckscher）（1935, I, 145~174）认为英、法两国重商主义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鼓励进口替代。他觉得有必要再加上一

个“或许是最重要”之处：英国并未真正地严格执行进口禁令，法国却是这么做了。我们有此证据吗？或者这只是自由派（反法的）偏见？

[131] 参见沃登（Warden）（1864，373）。

[132] 对亚麻进口的依赖程度是一件有争议之事。哈特（Harte）（1973，107）认为：“有可能的是……英格兰本土生产的和用于自己消费的亚麻制品要多于从苏格兰和爱尔兰进口之数的总和。”有可能，但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进口之数要多于当地生产的产品，而且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亚麻发挥出一种正在增大的作用。

[133] 参见哈特（Harte）（1973，76）和戴维斯（Davis）（1962，287~288）。“在1690年后的一个世纪中，向大部分亚麻制品征收的税赋约有两次增加了一倍。”[哈特（Harte），1973，78]。哈特认为法国亚麻制品是由于直接竞争原因受到打击，而德国、佛兰德（Flemish）和荷兰的亚麻制品是由于“纯粹的财政原因受到打击。”（第97页）。无疑，但是又如他本人所承认的：“国家财政的急切窘况和增加税收支付战费的不断需要的副作用，几乎和对法国人征收的惩罚性税收是一样巨大。”

[134] 参见古尔温（Gulvin）（1971），汉密尔顿（H.Hamilton）（1963，255），杜里（Durie）（1973，47）。坎贝尔（Campbell）（1964，477）断言：“有足够的经济理由认为1707年的合并，在其他发展适时发生之时，确保了苏格兰经济（将专注于）这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由于英格兰的兼并，苏格兰产品的市场得到保证。”

[135] 斯穆特（Smout）（1964a，234）坚持这种结合的看法，他指出：“老派的简单化看法”认为工业革命是资产阶级压倒贵族的胜利，而苏格兰却给这种老式看法扔来一个“冷嘲热讽的乱麻团”。“18世纪的苏格兰地主与中产阶级并肩奋力发展出一种有活力的新型经济……——而且当他们获得成功之时，它却变成了一个法兰根斯坦（Frankenstein）（意喻自己创造出来却又无法控制之物或作法自毙——译注），反而瓦解了他们的特权和领导权。”

[136] 参见詹姆斯（James）（1973，277）。他认为爱尔兰要比北美殖民地更像一个殖民地，因为“爱尔兰政府所依赖的是征服，而且无法轻易地逃脱它的军事胎记（第290页）”。库伦（Cullen）（1968，2，46）称爱尔兰在英国体制中的角色在17世纪时就已经“在某些方面是殖民地角色”，他还谈到爱尔兰在18世纪“日益依赖英格兰”。

[137] 参见詹姆斯（James）（1973，191~192）。

[138] 参见库伦（Cullen）（1968，53）。

[139] 参见基尔尼（Kearny）（1959）。库伦（Cullen）认为与“畜类法令”和各种“航海法令”相比，“呢绒法令”的后果不那么严重，但更加臭名昭著，仅仅因为它与前种法令不同的是：前两种法令是调节英国贸易的英国法令，而“呢绒法令”却是关于爱尔兰出口的立法，“是英国议会妄称为爱尔兰立法的一个臭名远扬的例证。”[库伦（Cullen），1967，2]。

[140] 参见克伦本茨 (Kellenbenz) (1965, 385~386), 吉尔 (Gill) (1925, 31) 和沃登 (Warden) (1864, 393)。

[141] “爱尔兰人不再是向英国商人出售畜类, 而是现在出售牛肉、猪肉和黄油给全世界的消费者。” [詹姆斯 (James), 1963, 576]。再参见詹姆斯 (James) (1973, 190~217)。库伦 (Cullen) (1977, 171) 却指出了“航海法令”的一个重要的消极副作用: “由于缺乏直接的殖民地贸易和再出口贸易, 减少了要求建立复杂的金融结构的需要。”

[142] 参见希尔 (Hill) (1969, 164)。

[143] 戴维斯 (Ralph Davis) 认为1690年代是英格兰开始实行保护的年代, “至1722年, 工业保护已明显出现和可见了”, 并在此后的50年中扩大了 (Ralph Davis) (1966, 306, 313, 317)。

[144] 即使如此, 1740年至1790年时期也是英国亚麻生产的“一个突出的扩张时期。” [哈特 (Harte), 1973, 107]。然而, 杜里 (Durie) (1973, 37) 指出: 在这一点上, 英格兰亚麻在出口市场上并不是苏格兰亚麻的竞争对手。

[145] 参见英伯特 (J.Imbert) (1965, 385)。

[146] 参见门德尔斯 (Mendels) (1972, 258~259)。参见马尔科维奇 (Markovitch) (1968b, 579)。然而, 莱昂 (Léon, 1970e, 528) 认为法国落后于英国的一个方面是总生产的百分比, 即在工业中——18世纪中是1/5对1/4。此外, 哈克谢尔 (Heckscher) (1935, I, 202~203) 是英国反对法国的一位坚决支持者, 也承认英国的优势不是数量的, 而是“技术的”。为什么不是数量的优势? 因为“在英国, 工业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几乎尚未孵化出来, 各种革新尚是潜在的, 而不是实际的”。

[147] 参见莱昂 (Léon) (1970b, 229~230)。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70, 704) 说: “在竞赛中, 18世纪时已经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轻而易举地就击败了陈旧的封建部分和它的传统收入。”

[148] 内夫 (Nef) (1968, 149)。克鲁泽 (Crouzet) (1966, 268) 赞同1700年至1750年这个时期, 但是发现英、法两国情况从1750年至1800年是颠倒的。

[149] 参见坎宁安 (Cunningham) (1892, II, 371~372)。

[150] 参见马尔科维奇 (Markovitch) (1968b, 578)。

[151] 参见罗勒 (Richard Roehl): “在英国, 国内市场太小, 内部产生的需求总量水平不足, 都不足以同时产生和维持工业革命。法国却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对工业革命的需要来说是足够的, 法国并不需要大量依赖世界市场去补充需求总量。英国被迫要以国际需求作为一种替代用以补充, 要是英国要自立的话, 其太小而不能维持推动工业化的增大动力的国

内市场。”

[152] 参见布尔（Boulle）（1975，73）。荷兰人又接着以奴隶贸易帮助了南特的商人 [参见布尔（Boulle），1972，76~80]。伦珀斯（Huetz C.de Lempis）（1975，614）注意到波尔多（Bordeaux）的商人有同样的现象。“波尔多的经济生活可能从未有如此之多地依赖荷兰人。”莫里诺（Morineau）（1969a，326）谈到法国的巴斯克（Basque），尤其是巴荣纳（Bayonne），为荷兰人对西班牙的贸易扮演了一个合法和非法中转站的重要角色。

[153] 参见莱昂（Léon）（1970c，525~526）和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4a，155）。当然，像大西洋区（Ponant）那样，朗格多克（Languedoc）也处在“五大包税区”之外，但是，它的主要出口市场是地中海，在地中海，法国由于地理原因能够更好地与英国和荷兰进行竞争。克里埃（Carrière）（1974，169）谈到了1689年之后朗格多克和马赛之间的共生现象。

[154] 参见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1968b，556）。

[155] 参见博谢尔（Bosher）（1964，66~69）。

[156] 英国最终的财富必须结合普鲁姆对18世纪之初状况的评价来理解，他说：“1714年的英国是个小城镇之国，人口稀疏；英国人民的财富无法与法国或荷兰相比。” [普鲁姆（Plumb），1966，28]。

[157] 参见威尔逊（Wilson）（1968，236），他说“大约在1700年，英国人开始抱怨荷兰商品的成本和质量。”罗辛（Roessingh）（1976，501~502）确定1720年是荷兰烟草制造业相对于英国烟草业的衰落之年。博克塞（Boxer）（1964，149）说至1730年代时英国的造船木工已在向荷兰人教授改进的技术了。克里埃（Carrière）（1974，172）断言1700年时法国南部的生产之上升，正是荷兰人（以及英国人）在地中海之衰落之时（1974，172）。

[158] 参见巴克豪森（Barkhausen）（1974，246），另外参见威尔逊（Wilson）（1969b，120），他提供的资料表明在此时期荷兰人所缴纳的税赋大约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3倍之多。

[159] 参见斯沃特（Swart）（1975，47）和德弗里斯（J.de Vries），1975，56），他说：“共和国中的大规模慈善救济所提供的最低救济也高于许多雇主愿意为某些工作所支付的工资额，使失业和劳力短缺同时存在。”

[160] 见考斯曼（Kossmann）（1975a，53）。这又混合了环境灾难——船蛆和水污染，船蛆摧毁了堤坝的桩基，水污染迫使布匹精整工进口新鲜水用于染织。参见诺伯斯（Knoppers）（1975b），卡特（Car ter）（1975a，67）和维恩（Van Veen）（1950，73）。1731年之后，荷兰人投资建造石头防卫堤，但花费高昂。

[161] 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65，170）和克莱因（Klein）（1970，33）。哈札尔（Hazard）（1964，96）生动地描述了情形：“荷兰是繁荣的，荷兰也是强大的。如果它在商业

领域中有一个英国对手；如果它在1688年后开始看起来像大船旁边的一条小船；如果它逐渐失去那种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海上和殖民地强国的战斗不息和冒险精神，仍不能设想改变了的环境会使它落入穷困。它是富裕的，而且正在坐享其成。”

[162] 参见威尔逊（Wilson）（1975b，27~28）。“整个18世纪中期英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活力因素……就是殖民贸易。” [戴维斯（Davis），1962，290]。

[163] 参见克拉克（Clark）（1923，135~137），安德鲁斯（Andrews）（1929，285），奥格（Ogg）（1970，261）和霍夫登（Hoffenden）（1970，490~491）。

[164] 参见彻里（Cherry）（1953，119）。

[165] 英国政府意见的政治立场犹豫不决，无疑反映了经济现实的摇摆不定。“很有可能，在18世纪前半期（世界贸易）中大多数相当温和的进步，都发生在前20或25年之中，这种运动随后受阻20年左右，接着是远为更强劲和多面的扩张浪潮，始于1740年代，又在随后数十年中聚集起不断增大的冲劲。” [迪安和科尔（Deane and Cole），1962，61]。

[166] 费拉杰那尔斯（Moreno Friginals）（1978，I，22）称糖是“最主要的世界性基本产品，此即：国际商业交往总价值中位居顶端的商品。”

[167] “对欧洲和美洲而言，奴隶贸易的重要性不在于非同寻常的盈利——这可能是虚构的——而是在于加勒比海热带经济离不开它的支持。” [戴维斯（Davis），1973b，137]。

[168] “在1701年至1725年之间，（法国的）进步是如此之快……以致法国人不仅供应法国自身，而且在大陆市场上以低价销售排斥英国人，尤其是在汉堡、佛兰德、荷兰和西班牙，而在直布罗陀海峡，（法国人）与葡萄牙人以巴西糖供应地中海东部诸地” [安德鲁斯（Andrews），1915，550]。英国的食糖再出口逐渐衰落了，由1698年至1700年占全部再出口的37.5%，降到了1732年至1737年的4.2%。 [参见谢里登（Sheridan），1957，64]。同时，它是“法国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 [布尔（Boulle），1972，71]。再参见费拉杰那尔斯（Moreno Friginals）（1978，I，27），莱昂（Léon）和克里埃（Carrière）（1970，197）。

[169] 费拉杰那尔斯（Moreno Friginals）将这些“经济的和技术的”因素的转折点确定为1730年左右（1978，I，32~34），这相合于安德鲁斯（Andrews）所说的英国政策中的里程碑转折点：1731年，这一年中，关于禁止非英国糖输进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法案未获通过 [安德鲁斯（Andrews），1915，772]。梅（May）（1930，163）悲叹1673年至1757年法国保护主义在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的缓慢崩溃，可能是食糖力量的信号。

[170] 参见维拉尔（Vilar）（1974，323）。然而在绝对方面，法国贸易正在扩张。罗曼诺（Romano）（1957，II，1278）谈到在18世纪时——战争时期除外——“法国商业生活中实际的和结构的良好状况”。

[171] 参见戴维斯（Davies）（1957，2）。其他的竞争对手是葡萄牙、法国、英国、瑞

典、丹麦、勃兰登堡和苏格兰。

[172] 参见戴维斯 (Davies) (1957, 13)。

[173] 这一垄断专卖权属于“皇家非洲探险公司”，该公司于1672年为“皇家非洲公司”继承取代。[参见邓恩 (Dunn), 1972, 20]。

[174] 参见戴维斯 (Davies) (1957, 335~343)。

[175] 参见帕里 (Parry) (1961, 175)。

[176] 参见韦德尔 (Waddell) (1960, 9)。

[177] 参见帕里 (Parry) (1961, 176)。

[178] 参见里奇 (Rich) (1967, 356)，他引用了波斯特勒瑟威特 (Malachi Postlethwayte) 关于乌得勒支 (Utrecht) 条约中贩奴专卖条款的评论：“很少有一项条约被弄成这样对国家几乎无利可言。”应当记住的是种植园主们得到他们所要之物——废除这种垄断专卖——时在1698年，而奴隶贩子们却在1713年得到了贩奴专卖。在此之间的时期，牙买加进口的奴隶增加了3倍，总人口增加了1倍。“于是在乌得勒支 (Utrecht) 和约结束了法国的战争之时，牙买加终于成为一个典型的匀称的蔗糖社会，完全处于大种植园主的支配之下。”[邓恩 (Dunn), 1972, 165]。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捍卫他们的强有力地位。

[179] 贩奴专卖“干涉了 (牙买加) 视为是自己特权的一种贸易。”[唐南 (Donnan), 1930, 442]。唐南引用了1731年的一本伦敦书籍，书名是《在美洲的英国种植园对这个王国的重要性》，引文是：“直至1716年，牙买加岛兴旺繁荣，贸易频繁，其价值仍如以往一样巨大；而且，他们在此贸易中雇用了1200至1500人，这有时是既是一支巨大的防卫力量，又是由于许多人在那儿花钱成为他们的一笔增值进项之利。实际上，这些人中大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居民，不是在那儿结婚，就是在那里出生。但是在1716年，贩奴专卖一事来到了西印度群岛时，那项贸易对牙买加岛已具有了巨大利益，他们从中可获利25%至30%。每月都有进款，大致上一年可收进3000至4000块金币，进项虽未被完全摧毁，然而却受到影响，变得非常微不足道，而且又由此影响变得不仅是非常微不足道而且更加危险不稳定，以至于人们现在认为由于有了贩奴公司和私营者，现在雇用的人尚不足以往的一半。其恶劣影响对牙买加岛的作用是明白显见的。”

除了有益于在牙买加合法从事奴隶贸易的人外，贩奴专卖还干涉了私掠船的利润：“因为私掠者以捕猎西班牙船为生，他们惶恐地看到牙买加人和西班牙人之间受保护的和半合法的奴隶贸易得到发展。”[内特尔斯 (Nettels), 1931b, 6]。他们因而与种植园主合力反对“贩奴专卖派”。私掠者的不满产生严重后果，如佩尔斯所言 (Pares) (1963, 17)：“众所周知，私掠者中的失业在‘威廉国王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引起了几乎是世界性的海盗之风。而且，在乌得勒支 (Utrecht) 和约之后，在美洲的英国海员和西班牙海员被要求忘却两次长期战争的传统和一个世纪之久的冲突和掳掠。实际上，出乎意料的事情却是：并非是他们还应当持

续一段时间去干习以为常的敌对和劫掠，而是应当最终根除它们。”

[180] 参见彭森（Penson）（1929，345）。无论怎么说，法国人在非法贸易中干得不算出色。参见佩尔斯所言（Pares）（1960，132）：“或许，法国人在走私贸易中相比之下的失败，其最好的解释是猜测荷兰人和英国人以廉价出售击败了他们……。与其说是贪图超额利润，还不如说是高额的通常开支费用阻碍着法国竞争者。法国航运看来不如英国，不那么廉价，而且，如果……它在此贸易中有更多的武装和人员，有利于英国人的差别一定得到了强化，尤其是英国人有时得救于护航，免受海岸警卫队（Guarda-Costas）的抗衡之风险。”法国航运的高成本开支在整个18世纪中都是一个压制因素。诺伯斯（Knoppers）（1977b，1）注意到在1785年，“法国商人与法国海军签订了一份供应木材的合同，商人们成立了一个新公司：法国北方公司。但是，民族国家的考虑并未克服掉这个事实：外国航运者提出了低得多的运价。法国海军于1786年取消了与该公司所订的合同，赏给了荷兰航运者。”

[181] 参见费希尔（Fisher）（1963，219）。

[182] 参见哈林（Haring）（1947，335~347）。

[183] 参见约翰（John）（1953，154）。依然有些人认为商业好处被夸大了。麦拉克伦（McLachlan）（1940，28）走得如此之远以致称其为是一个欺骗妄想。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就难以理解西班牙人为什么会如此之久地受困于英国南海公司的获益。参见希德纳（Hildner）（1938，322~323）。

[184] 马森（Masson）（1967a，522）。

[185] 参见瑟诺沃德努（Cernovodeanu）（1967，457）。

[186] 参见博诺（Bono）（1964，51~61）。法国人还在1687年与黎波里签订了一项条约。

[187] 参见帕里斯（Paris）（1957，91）。法国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往来维持到以后一个世纪。

[188] 斯托亚诺维奇（Stoianovich）（1974，80）谈到了“从1680年至1720年，英国商业在阿勒颇（Aleppo）的崩溃。”马森（Masson）（1967b，367）称之为是“一个最出人意料之外的转变，甚至法国人也为此吃惊。”

[189] 参见斯托亚诺维奇（Stoianovich）（1974，86，100）；马森（Masson）（1967b，370）和帕里斯（Paris）（1957，100）。

[190] 参见帕里斯（Paris）（1957，12~15，30~36）。

[191] 参见帕里斯（Paris）（1957，5~6）。

[192] 内格夫 (Neguev) (1975, 11) 确定该地区纳入世界经济的时间只是从18世纪末开始。帕里斯 (Paris) (1957, 80) 指出在此之前“欧洲商人严重依赖土耳其帝国政府, 因而也就依赖于后者与它们的君王的关系”。

[193] 在17世纪开始时, 地中海东部地区贸易占法国对外贸易的50%, 至1789年时只是5%了。至1750年时, 该贸易远远落在与美洲和西班牙的贸易之下, 不过大约和与荷兰的贸易相等 [参见马森 (Masson), 1967b, 429]。

[194] 参见博克塞 (Boxer) (1965, 199), 维拉尔 (Vilar) (1974, 345) 和格拉曼 (Glamann) (1974, 447ff)。维拉尔谈到了直至大约1765年前的单方面商业 (见第345、354页)。

[195] 参见博克塞 (Boxer) (1965, 174~178) 和格拉曼 (Glamann) (1958, 14)。随着这些物品在欧洲流行起来, 也就开始更廉价地仿制它们: 有17世纪中期的德尔福特 (Delft) 陶器, 1709年的梅森 (Meissen) 瓷器, 以及18世纪英国的印花布。茶叶和咖啡当然无法在欧洲种植, 但是茶叶热潮始于1734年, 咖啡还要更晚。

[196] 参见博克塞 (Boxer) (1965, 197)。数量的增多却有一种推动力。它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积极鼓励, 该公司又为此于1696年和1699年在议会中受到英国毛纺和丝绸制造业主的猛烈抨击 [参见托马斯 (Thomas), 1963, 39]。勒依奥特 (Leuilliot) (1970, 260) 指出这种推动力的诸种后果: “如果说欧洲引进印度棉布和细布在起初之时激起了保护主义反应——1686年在法国, 1700年在威尼斯和佛兰德, 1701年在英国, 普鲁士大约在同时, 都禁止进口, 此外, 英国在1721年还禁止了印花布——那么, 它也刺激了棉纺织工业, 还在新世界殖民化的影响之下与非洲奴隶贸易联系起来。英国、德国、尼德兰和法国都或多或少兴起了对印度产品的仿制。”

[197] 参见苏瑟兰 (Sutherland) (1952, 3)。

[198] 参见苏瑟兰 (Sutherland) (1952, 48)。

[199] 在我看来, 莱昂所言在1650年至1750年时期, “欧洲大规模商业的兴趣转移到亚洲”的看法似乎言过其实了 [莱昂 (Léon), 1970a, 128]。

[200] 然而, 我愿意将北美洲的皮毛贸易地区, 大部是加拿大, 置于外部竞争场之内。劳森 (Lawson) (1943, 2) 称皮毛是一种“奢侈需求”。再参见格兰德 (Glenday) (1975, 特别是24~33)。戴维斯 (Davis) (1974, 168) 说它开始之时是一种奢侈品, 但是海狸帽子使皮毛民主化了, 即使皮毛进入了中产阶级可接受的价格范围之内。他说1600年时的这种“涓涓细流”变成了1650年的“奔流河川”, 及至1700年已是“洪水泛滥”了 (第174页)。里奇 (Rich) (1966, 26) 认为是在1696年生产过剩了。我们仍须记住18世纪时科贝特 (Cobbett) 在英国议会中的评论。他指出为了保住一项价值5万镑的贸易, 却花费了80万镑军费去与法国进行战争: “假设整个皮毛贸易沉入海底, 于英国又何害之有?” [引自英尼斯 (Innis), 1943,

XX]。

[201] “在真实的意义上，印度洋的欧洲经济只是在1750年之后才变成殖民经济……。我们以此所指的是它向欧洲再出口企业利润的时刻。” [肖努 (Chaunu), 1966b, 893]。博克塞 (Boxer) (1965, 194) 说：“必须强调指出：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和18世纪）成为爪哇、锡兰和香料群岛上的地方性权力，它一直是亚洲社会边缘上的一个外来异物，甚至在它直接管理的地区也是如此。”

[202] 关于英国与荷兰在从亚洲进口纺织品上的敌对竞争，格拉曼 (Glamann) (1977, 251) 说在1700年之后“英国贸易设法超过了荷兰对手。”

[203] 肖努 (Chaunu) (1966a, 639) 将此关键性的转变确定在18世纪，他认为此后的俄国才成为欧洲政治的一部分。

[204] 参见奥伯格 (Öhberg) (1955, 131~133)。大部分在阿干折附近地区生产的物品——柏油、沥青和皮革——以及专卖物品牛脂也都是定期航船运送。

[205] 实际上，诺伯斯 (Knoppers) (1977b, 12) 认为1716、1717至1740年代早期是一个发展高峰点，此后就是急剧衰落。

[206] 参见阿斯特罗姆 (Åström) (1963, 188, 196~198)。

[207] 参见班福德 (Bamford) (1956, 141) 和昂格尔 (Unger) (1959)，他也指出铁的进口增大了。

[208] 参见伯奇 (Birch) (1955)。

[209] 莫里诺 (Morineau) (1965, 206) 说法国对北方的出口在1742年与荷兰出口相等了。然而，詹宁 (Jeannin) (1975, 71) 指出：“法国的直接商业在18世纪中的扩张，部分得益于荷兰人的中间商作用的减小。但是，如果汉堡或多或少取代了阿姆斯特丹，这种变化在法国商人眼中还是如此有重大作用吗？”

[210] 参见威尔逊 (Wilson) (1954, 254)。

[211] 参见威尔逊 (Wilson) (1941, 137)。

[212] 奥姆洛德 (Ormrod) (1975, 72) 指出：“这意味着荷兰商人实际上支付了税项，承担了全部风险，其资本被困住直到亚麻实际售出。英国商人赚取了2%的佣金却没有承担任何风险，而且他的资本是自由的，可投资于更有利可图之处。”

[213] 参见安德鲁斯 (Andrews) (1915, 545~546, n.18)：“1713年，威瑟斯 (John Withers) 发现有必要去写一封‘从一个公民致一位乡绅’的信，题目是《更好的朋友是荷兰人而不是法国人》。他在信中反驳如下的流行看法：荷兰人是‘我们的贸易之敌，暗中破坏我们的商

业；以及如果这些英国佬一旦被粉碎，全世界的贸易就是我们的。’……他努力表明实际上法国人才是英国的大敌，荷兰人则是英国的朋友。从此事实可以推测出关于荷兰竞争的实际情况的当时舆论意见。”

在诸次英、法战争中，荷兰人在可能的程度上退而求取中立，由此可见他像承认失去了商业优势及其对付的方式。诸种解释令人好奇地感到有内在矛盾之处。参见卡特（Alice Carter）和霍恩（David Horn）。卡特（Alice Carter）（1963，818）认为荷兰在18世纪中的中立，“部分地归因于宪法形式和一个实际上不可能做出迅速决定的政治制度，但是，中立却良好地服务于它的利益”。霍恩（David Horn）（1967，24，88）认为：“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之后，荷兰联合省作为一个大强国的突然消失不能归结于经济力量的失败，而是必须归之于意志的瘫痪……。不干预、中立把戏和谋略如果使荷兰人两边都不讨好，至少也有助于拖延最后的算账之时。”此两位作者提供了纯粹的政治解释（宪法形式和意志瘫痪），最后还是承认中立政策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荷兰产品的比较成本不断增长，在此形势下，荷兰人以削减“保护成本”来保持他们的竞争力。

[214] 古伯特（Pierre Goubert）（1970a，205）注意到在这些战争的第一次战争中：“有9年之久，在4条主要战线和许多遥远战区，要供养和装备20万大军和两支舰队，几乎是对抗整个欧洲、阿姆斯特丹银行和不久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其金钱之花费是力所不及的。”

[215] 我们今日所称的贬值，意指纸币（计算货币）的价值相比于金属货币减少了，这在现代早期被看作是“货币的欢叫”，意指金属货币相比于计算货币此时要更加值钱，因为在此时期中硬币兑其他种类货币的比率在实质上是有利于硬币。关于法国，参见吕提（Lüthy）（1959，99）；关于英国，参见阿什顿（Ashton）（1959，106）。

[216] 参见吕提（Lüthy）（1959，114~120）。

[217] 吕提（Lüthy）（1959，101）提到对国家有三种好处：来自铸造新硬币的税收；减少国家负债；增加了手中控制的硬币数量，因为国家在实际上每次收入的硬币多于交还出去的硬币。[贝斯尼尔（Besnier），1961，83]补充了第四个好处的事实：法国国家将重大贬值混合于不断的小价值重估之中，其效果是对硬币持有者施加压力使之将硬币借给国家：“例如在1703年，夏米拉特（Chamillart）宣布了一系列改值，因而使食利者接受将他们的债券以低利率兑换，因为他们受到以硬币偿还的威胁，硬币价值的减少是失去货币资格的前兆，已迫在眉睫。”

[218] 每一次贬值都导致“金属货币的失血造成对法国的损害”。[吕提（Lüthy），1959，118]。吕特伊认为“法国财政部为拒不付账的错觉最终付出高昂代价。”（第120页）。布罗代尔和斯普纳（Braudel and Spooner）（1967，382）回顾了自1750年之后的时期并且断言：“在1750年的整个欧洲，回想起来，贬值在三个庞大的政治体系中看来尤为严重，它们是波兰、土耳其和法国。”至19世纪时，波兰不复存在了，土耳其是“欧洲病夫”——那么法国呢？贬值还是有其另外一面。它在长期之内削弱了庄园贵族。“计算货币的每一次削弱都是走向逐渐演变的一步，侵蚀乃至最终消灭了留传下来的支付款项。”吕提（Lüthy）（1959，10）。

[219] 参见雅卡尔（Jacquart）（1975，211），以及里希特（Richet）（1968，762）对1690年至1720年法国经济状况的怀疑评论。他怀疑这是柯尔伯（Colbert）收缩时期（1660年至1690年）的一个良好转折点。以计算货币来看，谷物价格急剧上升，酒类和橄榄油的价格也是如此；但是以金属币含量来看，它们仍是低价格。“这是一种‘名义上的’上升，由货币贬值人为引起的，是贫困的信号而不是繁荣的象征。”

[220] 参见威尔逊（Wilson）（1951，240~241）。这些例外由斯珀林（Sperling）（1962，62）从利润方面做出解释说：“白银之所以向东方流去并不是因为贸易在任何极限意义上依赖它，而是因为它是赚钱的事。”原因是世界各地的金与银之间的兑换比率存在差价：白银与黄金的比率在西班牙美洲是17：1；在欧洲是15：1；在印度是12：1；在日本是9：1。布里兹（Blitz）（1967，53）也认为有相类似的比率：在西班牙是16：1；在英国是15：1；在东方是10或9：1。

[221] 默顿斯（Mertens）（1944，56）发现了17世纪英国金本位制在白银极为短缺时的起源；由于同样的逻辑也可用于法国，怎样才能如此？

[222] 参见布维尔（Bouvier）（1970，308~309）。

[223] 参见维拉尔（Vilar）（1974，278~279）。再参见威尔逊（Wilson）（1941，8）：“1703年的英国—葡萄牙条约……的效应在于使黄金从巴西改为流向伦敦”，也就是说使之由原来流向阿姆斯特丹改为流向伦敦。1713年时巴西货物的60%是黄金 [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78h，32]。18世纪时巴西出口了约800吨纯金 [莫里诺（Morineau），1978h，24]。

[224] 维拉尔（Vilar）（1974，247）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各种商品价格非常低落的时期意味着贵金属购买力旺盛时期，因而由此刺激了对它们的勘探。”另一方面，这种好处随着经济复苏而消散，如莫里诺（Morineau）所注意到的：“在1730年达到其顶点时，（黄金的）商业意义在接近19世纪时独自减小了。仅举一例，一公斤黄金在1740年的里斯本‘价值’大约7200公斤糖，在1778年却是不到3900公斤，在1796年不足1950公斤。有谁会相信黄金和食糖之间竟是黄金出现最大的价格崩溃？”（1978h，40）。

[225] 参见莫斯尼尔（Mousnier）（1951，1~8），他却是坚持认为英、法两国之间的差异要大于相同之处；然而，他提出来的论证少于意识形态争论。英国“更多的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第8页）“1713年的法国政府本质上是独裁的，有极权主义倾向，英国却有一个富豪政府，有自由主义倾向。”（第13~14页）。

[226] 参见德维（Van der Wee）（1977，378）。

[227] 参见德维（Van der Wee）（1977，391~392）。

[228] 参见阿登特（Ardant）（575，200）。

[229] 参见吕提 (Lüthy) (1959, 112), 比较德维 (1977, 378) 和哈辛 (Harsin) (1970, 272~273)。

[230] 参见杜兰 (Durand) (1976, 21)。

[231] 参见莱昂 (Léon) (1970b, 623), 他说在1685年至1715年时期, “金融‘统治’在法国是绝对的。”在此时期, 我们以“金融家” (financiers) 指“包税者” (traitants), 他们既是皇家官僚, 又是借款给国家的银行家, 他们从盈余中捞取多少仍受限制。“这些人们看起来无所不能, 在强权面前仍是虚弱和依从的, 无疑受到它们的‘控制’, 却也‘控制’它们。” (莱昂, 1970d, 624)。随着18世纪岁月推移, “包税人” (traitants), 让位给包税区包税人 (*fermiers ~généraux*), 这些包税区包税人的经营方式更为稳定, 较少是投机性的。他们不可能大发横财, 但在18世纪中能够刮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参见莱昂 (Léon) (1970, 628~630) 和杜兰 (Durand) (1976, 13~16)。

[232] 参见克拉潘 (Clapham) (1944, 25)。

[233] 参见克拉潘 (Clapham) (1944, 1~2) 和德维 (Van der Wee) (1977, 352, 387)。

[234] 参见德维 (Van der Wee) (1977, 388)。戴雍和雅卡尔 (Deyon and Jacquart) (1978, 500) 提供了这个经验主义的指示, 表明英国国家筹资新方式优于法国的制度。“ (1688年至1713年) 的诸次战争迫使英国采取的筹资努力与法国是相似的, 两国的债务也以相似的比率增多, 两国的税赋, 特别是间接税也以相似比率增加。然而在签订乌得勒支 (Utrecht) 条约之时, 法国的国债大约是英国的五、六倍之多。”

[235] 参见卡特 (Carter) (1955, 21)。再参见罗斯维尔 (Roseveare) (1969, 69): “伦敦城长期以来感到焦虑的事情就是向政府借出大笔贷款, 议会革命排除了这焦虑。以国王和女王为首的金融界 (在1694年) 毫不犹豫地认购了120万镑用于合资所需的资本。”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乐观。反对派的土地利益者中有些人认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一个独立于议会之外的收入来源。参见鲁比尼 (Rubini) (1970, 697~701)。

[236] 参见卡特 (Carter) (1955, 22, 30, 39~41, 以及1959)。

[237] 参见蒙特 (Monter) (1969, 298) 关于瑞士在英国投资的论述, 瑞士投资是仅次于荷兰的最重要的外国投资。他说: “如果说瑞士投资者基本上是日内瓦人, 如果日内瓦人又大多是法国胡格诺教徒 (而且如果英国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在18世纪初期又大多是法国胡格诺教徒), 那么, 需要发现和确定的真实主题就是18世纪初伦敦交易所中‘法国胡格诺教徒国际’的活动。”蒙特 (Monter) 指出在英国的柏林和汉堡的投资者“几乎也是法国胡格诺教徒”。关于法国胡格诺教徒国际, 另参见布维尔 (Bouvier) (1970, 312)。马尔斯 (Marrès) (1966, 152~153) 指出: 法国新教徒向外移居创造了“朗格多克 (Languedoc) 地区工业产品的商业与用户网络。他们那些留在朗格多克 (Languedoc) 的兄弟们, 虽已被剥夺了公职, 却接管了一些最兴

旺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再参见吕提（Lüthy）（1959，424）。

[238] 后来，在路易十四死后，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又回来在法国投资，特别是在法国的外部商业中投资。[参见布维尔（Bouvier），1970，312~313]。“荷兰君主和他的顾问擅长处理财政和金融事务，特别是长期性的政府借贷，而且与荷兰银行界联系在一起。在他们到之后发生了金融革命肯定不止于只是巧合。”[布兰（Braun），1975，292]。

[239] 参见威尔逊（Wilson）（1949，61）。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极重要机构获得成功的证据之一在于这个事实：尽管它的钞票在法律上是直到1833年才成为合法货币，但在事实上，“早在18世纪之初，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就已经在债务清算中广泛为人接受了。”[霍斯菲尔德（Horsefield），1977，131]。

[240] 参见德维（Van der Wee）（1977，389）。

[241] “看来，除去几年的战争时期以外，荷兰资本发现投资于英国公债较少是因为英国需要资本，更多的是因为在国内缺乏投资机会。”[约翰（John），1953，158]。

[242] 参见威尔逊（Wilson）（1941，72~73）。特别是荷兰人持有3/7的公债[威尔逊（Wilson），1941，78，190]。但是，卡特（Carter）（1953a，159）认为此说的依据是“极为令人怀疑的”。她从分类账得到的印象是荷兰人只占有1/8至1/6的利息（第161页）。不过，她承认就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前，荷兰人在英国公债中的投资已是“有相当可观的利息，相对于总数而言。”[威尔逊（Wilson），1953b，338]。

[243] 参见巴伯（Barbour）（1963，125）。

[244] 克莱因（Klein）（1969，19）指出：在荷兰人指望得到霸权的17世纪，荷兰联合省的公债增长最快。他们努力去保持低税率，部分是因为反抗西班牙的战争的思想动机之一就是反叛征税；但是，开销花费最终还是必须有人补上。“这样，也许可以说，16世纪的荷兰的自由是以后人的代价买下的。”

[245] 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74，775）和卡特（1971，131~135）。

[246] 参见威尔逊（Wilson）（1954，263~264）。

[247] 威尔逊（Wilson）（1960b，439）。

[248] 参见克莱因（Klein）（1970，34）。这种故意的决定可见于这个事实：18世纪中，荷兰人首先进行投资托拉斯的金融革新，这种思想直到1870年代才传到英国，当时的英国正在达到荷兰联合省于1689年所达到的阶段[参见克莱因（Klein），1969，12]。

[249] 参见迪伦（Van Dillen）（1926，199~200）。

[250] 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72，4）。

[251] 威尔逊 (Wilson) (1954, 264~265)。

[252] 卡特 (Carter) (1953b, 323)。

[253] 约翰 (John) (1955, 343)。

[254] 哈辛 (Harsin) (1970, 276)。

[255] 各种各样的利益反对劳 (John Law) 的银行建议, 因此, 这个银行“只好以一家私营银行的外表伪装自己以便得到批准。”哈辛 (Harsin) (1970, 277~278)。关于劳 (Law) 试图建立法国银行, 参见汉密尔顿 (Hamilton) (1969, 140~149)。他称劳在1702年呈交的最初计划是“我所见到那个时期中任何国家建立国家银行的最出色计划之一。”(第143页)。这家银行私营性质伪装由此事实表明: 1718年12月4日, 它终于正式成为皇家银行, “所有公开出售的股票均已由政府秘密买下了。”[汉密尔顿 (E.J.Hamilton), 1969, 145]。

[256] 关于劳 (Law) 的意图的这段描述引自哈辛 (Harsin) (1970, 29)。卡斯韦尔 (Carswell) (1960, 78~79) 说: “发行一种国家纸币, 它可一致为人接受, 因为国家的权威是它的后盾, 并且由一个地方机构网络加以控制, 这一思想就是劳用于增加世界财富的计划的核​​心内容。他是如此深信这种货币将比金属硬币更受欢迎, 以至于在他的最初计划模式中他认为有必要限定纸币应享有对金银的溢价, 规定每百元债券不得要求以110元的黄金去偿付。”

[257] 参见戴雍和雅卡尔 (Deyon and Jacquart) (1978, 502)。

[258] 哈辛 (Harsin) (1970, 280)。

[259] 韦伯 (Weber) (1950, 288) 就“南海泡泡”做出了同样的解释: “在此, 破产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南海贸易不足以支付所收款项的利息。”(第289页)

[260] 参见阿克曼 (Åkerman) (1957, II, 1, 254~255); 哈辛 (Harsin) (1970, 294); 金德尔伯格 (Kindelberger) (1978, 120~122)。阿什顿 (Ashton) (1959, 120) 加上了丹麦、西班牙和葡萄牙。关于日内瓦, 参见塞约斯 (Say-ous) (1937)。阿克曼 (Åkerman) 称1720年的危机是“首次国际危机”(第225页)。韦伯 (Weber) 称这两个泡泡事件是“首次巨大的投机性危机”, 将它们区别于16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大狂热 (1950, 286)。帕克 (Parker) (1974a, 582) 使用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用语: “现代的第一次金融危机。”

[261] 1711年, 南海公司首次偿还短期债务是很成功的。“这一明智之举使英国从1713年的乌得勒支 (Utrecht) 和约中成为其信誉实际未受损的国家, 甚至即使它债台高筑”[帕克 (Parker), 1974a, 581]。弗林 (Flinn) (1960) 对此成功更感怀疑。但是, 希尔 (B.W.Hill, 1971, 411) 认为它是一个政治上的极重要行动, 甚至比其经济上的重要意义还要更突出: “托利党的议会被说服去维护国债, 而辉格党的伦敦城则恢复它作为国家债权人的角色。这些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未来都是重要的发展; 在政治上是因为他们消除了政府更迭 (1710年时有过一次辉格党政府改为托利党政府之事) 会引起公共信贷崩溃的担忧, 在经济上是因

为：自从（英格兰银行）革命以来由‘金融利益’发展起来的组织形式得到了承认，甚至得到由一位代表伦敦城最大的批评者地主乡绅的大臣保护。”

[262] 参见帕克（Parker）（1974a, 583）。

[263] 汉密尔顿（E.J.Hamilton）（1969, 147）。

[264] 帕克（Parker）（1974a, 586）。

[265] 关于英国，参见维拉尔（Vilar）（1974, 285）关于法国，参见吕提（Lüthy）（1961, 31）和布维尔（Bouvier）（1970, 307）。

[266] 吕提（Lüthy）（1959, 414）

[267] 哈辛（Harsin）（1970, 279）。普卢姆（Plumb）关于政府行动的评论更为强烈。他说沃尔波尔（Walpole）“拯救了宫廷”（1950, 59）——以此在两年之后当上了首相。

[268] 参见波依森（Poisson）（1974, 266）。

[269] 英伯特（Imbert）（1965, 354）谈到了“1718年至1721年对法国经济的鞭笞”是有益的。汉密尔顿（E.J.Hamilton）（1969, 147~148）注意到它使法国摆脱了商业危机，但是这并非“无代价的”。

[270] 关于里昂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在1720年之后的衰落，参见吕提（Lüthy）（1959, 55）。

[271] 参见坦普尔利（Temperley）（1909a, 40, 49）。保守主义挟力而来。“沃尔波尔（Walpole）的政策极为简单——避免战争、鼓励贸易、减少税赋，至于其他就是维持现状——没有革新。如他所正确地说道：‘我不是圣人、不是斯巴达人、也不是改革者’。”[普卢姆（Plumb），1966, 78~79]。

[272] 参见普卢姆（Plumb）（1967, 13）。效率比数字更重要。但是，要注意到在英国不可忽视数字。“1689年至1715年政府雇员人数的增长要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此前的时期都快”，[普卢姆（Plumb），1967, 112]——直至19世纪。参见艾尔默（Aylmer）（1974, 24）：“在政府的单纯增长方面，关键时期……看来是1642年至1652年以及1689年至1697年（也可能有1702年至1713年）。”贝格尔（Berger）对1689年之后法国行政效率推测的增长做出了评估，将其与普卢姆（Plumb）的描述相比较对照：“研究了据说由于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巨大的行政进步，以及1693年的饥荒（和法国政府如何处理）之后，使人没有留下印象。”（1978, 120）。

[273] 参见安德森（P.Anderson）（1974a, 232）。

[274] 关于英国和土地财富，参见哈巴库克（Habakkuk）（1967b, 9），他说：“没有理由

怀疑1715年之后百年中的形势会比1640年至1715年更有利于地主们的收入。”再参见普卢姆（Plumb）（1967，8）：“地主绅士们日益融合进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贸易、投机和冒险对他们终于再也不是陌生之事了。”关于法国和商业资本，参见麦克马纳斯（McManners）（1967，26）所言：“金钱是理解18世纪法国社会的关键所在。凭借背后的金钱力量，富豪财阀正在渗入贵族之中。”再参见格瑞斯比（Grassby）（1960），关于回避降低身份之概念的若干方法及由此使得贵族与商人之间严格的隔阂障碍无法维持，而这正是有意培植的。

[275] 泰勒（Taylor）（1964，488）称此为“宫廷资本主义”：“贵族、金融家、银行家和职业投机者使政府卷入令人置疑的经营业务，并且运用他们的势力获得官方决策，去抬高或压低物价，或使投机者摆脱不利的未来承诺。”

[276] 参见明盖（Mingay）（1963，15，26）。

[277] 参见汤普森（E.P.Thompson）（1975，197~198）。

[278] 此语系汤普森之言（E.P.Thompson，1975，294）。

[279] 荷兰人在英国政治中发挥的金融作用当然是通过伦敦城的中介。苏瑟兰（Southerland）（1952，18~23）认为伦敦城的支持是沃尔波尔（Walpole）执政体系的四大基础之一，既是直接的，又是经由东印度公司联系的。

[280] 普卢姆（Plumb）（1969，115~116）颇有说服力地认为：1715年标志着驯服了英国自1640年以来所知的普遍冲动。“自有农在17世纪英国变成了一种政治动物。……至18世纪中期时，许多与生俱来的权利已失去了。”普卢姆又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一党政府、立法机构处于牢牢的行政控制之下，以及那些融集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人们共有的认同感”造成了1715年之后英国的稳定（Plumb，1967，XVIII）。

[281] “从诺曼人以来，在统治阶级中有一种搞阴谋诡计和造反作乱的传统。至1685年时，政治暴力是英国人的天生权利。”[普卢姆（Plumb），1967，19，重点号系本人所加]。“政治稳定到来之时，经常是在一个社会中相当迅速地发生，其突然犹如水之结冰。”（第XVII页）。希尔（Christopher Hill）（1969，119，213）有相似之语，但是他确定这个转折点是1688年而不是1715年：“英国以其政治暴力在欧洲臭名远扬。……1688年之后，英国政治的英雄时代结束了。先前50年的暴力动荡继之以相对的平静。”

[282] “[沃尔波尔（Walpole）和小集团]将辉格党原则与激进主义分离开。……这个党融合了贵族、大金融和行政政府的利益，这是由沃尔波尔（Walpole）予以扩大以便包容大部分地主乡绅的一个过程。”[普卢姆（Plumb），1967，187]。

[283] 福特（Franklin Ford）（1953，59）观察到在1614年的等级会议的聚会中，高等长袍贵族（high noblesse de robe）仍然算在平民之中，“关于1715年高等长袍贵族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在法律上对此再无任何怀疑之处了。”他又接着说：实际上，“高等长袍贵族在1715年确保了其贵族身份地位，恢复了其政治权利，是贵族中最有势力的力量。”（1953，188）。

并非所有那些形式上仍是资产阶级的人们都受到这种所谓的封建反动的消极影响。巴伯指出：虽然“中等”资产阶级的晋身之路不通，“大”资产阶级却运用他们的财富“免受不少这种影响。”（Elinor Barber）（1955，143）。

[284] 参见布罗姆利（Bromley）（1957，135），他说：“从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政府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经常受到干扰，从未完成。”（第137页）。

[285] 肖努（Chaunu）（1965b，26~27）。

[286] “如果仔细考虑，（大元帅）蒂雷纳（Turenne）（于1688年）的改宗皈依比撤销南特敕令更为重要。没有他的改宗皈依，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敕令就会是不可想象之事。要是他们不屈不挠，国王也就不可能抑制住他的半数绅士们。一个半世纪之后，拉法耶特（La Fayette）、拉罗什福科尔德—林考尔（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和90名其他自由派贵族要比米拉波（Mirabeau）的演说更多地确保了1789年6月23日第三等级的成功。”〔肖努（Chaunu），1965b，27〕。

[287] 1680年至1720年之间，约有20万名法国胡格诺教徒离开了，大多前往英国、荷兰联合省、日内瓦和德意志诸邦〔参见斯科维尔（Scoville），1952，409~410〕。

[288] 参见斯科维尔（Scoville）（1960，3~5，118）。一些改变信仰者实际上是伪装者，是“新改宗犹太人”〔参见莱奥纳尔（Léonard），1948，177~178〕。

[289] 参见莱奥纳尔（Léonard）（1948，178）。因而有了卡米扎尔（Camisards）战争，有了安东尼法庭（Antoine）和1715年在塞文河谷（Basses-Cévennes）的背教者（the Desert）宗教会议。

[290] 参见伦纳德（1948，179）。

[291] 参见拉杜里（1995，35~37）。

[292] 参见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a，528）。比较于17世纪，18世纪是“农民教育的伟大时代”（1975a，538）。

[293] 参见穆斯尼尔（Mousnier）（1951，18）关于1690年至1715年时期海关税、货物税、邮件和印花的比较数字。法国来自“包税联盟”（Fermes-Unies）的收入，从1690年的大约7000万图尔内利弗尔（Livrestournois）降至1715年的4700万，而英国的收入从1700年的2050万图尔内利弗尔升至1713年的5950万。随着18世纪时间推移，这一差距逐渐变得更为糟糕了。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Mathias and O'Brien）（1976）在仔细考察了整个世纪中的纳税负担比较之后说：“在法国，纳税负担少于英国。”（第634页）；他俩指出：纳税负担超过英国的唯一国家是荷兰联合省，“它的内部市场高度结合程度甚至超过英国。”（第640页）。

[294] 参见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a，550，552）。

[295] 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比较了18世纪中乡村英国和乡村法国在封建制之下的政治联盟：英国庄园主和富裕农场主之相对于法国穷人和中等农民，甚至富裕农场主 (1975a, 584~585)。

[296] “没有比此更大的对照比较和更突然的转变。……在一个时代，法国人民几乎一致地像波舒哀 (Bossuet) 那般思考。在这个时代之后，……又像伏尔泰 (Voltaire) 那般思考。没有通常的犹豫摇摆，这就是一场革命。” [哈扎尔 (Hazard), 1964, 7]

[297] 参见拉布鲁斯 (C.E.Labrousse) (1970, 716)。

参考文献

Aalbers, J., "Holland's Financial Problems (1713-1733) and the Wars against Louis XIV," in A. C. Duke & C. A. Tamse,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VI: *War and Socie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79-93.

Abel, Wilhelm, *Die Drei Epochen der deutschen Agrargeschichte*, 2nd ed., Schriftenreihe für Ländliche Sozialfragen, XXXVII. Hannover: Verlag M. & H. Schaper, 1964.

Abel, Wilhel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vom frühen Mittelalter bis zum 19. Jahrhundert*, 2nd rev. ed. Stuttgart: Verlag Eugen Ulmer, 1967.

Abel, Wilhelm, *Massenarmut und Hungerkrisen in vorindustriellen Deutschlan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2.

Abel, Wilhelm, *Crises agraires en Europe (XIIIe-XVe siècle)*, traduit de la 2ème édition allemande,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Flammarion, 1973.

Aberg, Alf, "The Swedish Army, from Lutzen to Narva," in M.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265-287.

Achilles, Walter, "Getreidepreise und Getreidehandelsbeziehungen europäischer Raum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VII, 1, 1959, 32-55.

Adams, Geoffrey,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The Philosophic View of the Huguenots in the Age of Louis X V , " *Historical Reflections*, I , 1, June 1974, 59-79.

Ågren, Kurt, "Breadwinners and Dependents: An Economic Crisis in the Swedish Aristocracy during the 1600's? " in K. Ågren *et al.*, *Aristocrats, Farmers, Proletarians*, Studia Historica Uppsaliensia X LVII.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 1973, 9-27. (a)

Ågren, Kurt, "The *reduktion*, " in M.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237-264. (b)

Ågren, Kurt, "Rise and Decline of an Aristocracy, "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I , 1-2, 1976, 55-80.

Åkerman, Johan, *Structure et cycles économiques*,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57.

Allen, Theodore, "'...They Would Have Destroyed Me': Slavery and the Origins of Racism, " *Radical America*, IX, 3, May-June 1975, 41-64.

Anderson, M. S., "Russia Under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Changed Relations of East and West,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716-740.

Anderson, Perry,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a)

Anderson, Perry,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b)

Andrews, Charles M., "Anglo-French Commercial Rivalry, 1700-1750: The Western Phas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art I : X X , 3, Apr. 1915, 539-556; Part II : X X , 4, July 1915, 761-780.

Andrews, Charles M., "The Acts of Trade, " in J. Holland Rose *et al.*,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I , 268-299.

Anes Alvarez, Gonzalo, & le Flem, Jean-Paul, "Las crisis del siglo X VII: Producción agrícola, precios e ingresos en tierras de Segovia, " *Moneda y Credito*, No. 93, junio 1965, 3-55.

Appleby, Andrew B., "Agrarian Capitalism or Seigneurial Reaction? The Northwest of England, 1500-1700,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X , 3, June 1975, 574-594.

Ardant, Gabriel,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5, 164-242.

Ariès, Philippe, "Nationalisme d'hier et nationalisme d'aujourd'hui, " *La table ronde*, No. 147, mars 1960, 46-51.

Asher, Eugene L., *The Resistance to the Maritime Classes: The*

Survival of Feudalism in the France of Colbert.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Ashley, M. P.,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Policy under the Cromwellian Protectorate.*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34.

Ashley, W. J., "The Tory Origin of Free Trade Policy,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I, 4, July 1897, 335-371.

Ashton, Robert, "Cavaliers and Capitalists, " *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V, 1961, 149-175.

Ashton, Robert, "Puritanism and Progres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3, Apr. 1965, 579-587.

Ashton, Robert, "The Parliamentary Agitation for Free Trade in the Opening Years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 *Past and Present*, No. 38, 1967, 40-55.

Ashton, Robert, "Jacobean Free Trade Again, " *Past and Present*, No. 43, 1969, 151-157.

Ashton, T. S.,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England, 17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Ashton, T. S., "Introduction" to 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 *English Overseas Trade Statistics, 1697-180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1-14.

Ashton, T. 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18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69, reprinted with minor corrections.

Aspvall, G., "The Sale of Crown Land in Sweden: The Introductory Epoch, 1701-1723, " *Economy and History*, IX, 1966, 3-28.

Åström, Sven-Erik,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and the Baltic Trade, 1660-1700,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1, 1960, 3-18.

Åström, Sven-Erik, *From Stockholm to St. Petersburg*, Studia Historica, II. Helsinki: Finnish Historical Society, 1962.

Åström, Sven-Erik, "From Cloth to Iron: The Anglo-Baltic Trade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 Part I : "The Growth,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Trade, " *Commentationes Humanum Litterarum*, X X III, 1, 1963, 1-260.

Åström, Sven-Erik, "From Cloth to Iron: The Anglo-Baltic Trade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 Part II : "The Customs Accounts as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rade, " *Commentationes Humanum Litterarum*, X X X VII, 3, 1965, 1-86.

Åström, Sven-Erik, "The Swedish Economy and Sweden's Role as a Great Power, 1632-1697, " in M.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58-101.

Attman, Artur, *The Russian and Polish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500-1650*. Public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History of Gothenburg University, No. 26, Göteborg, 1973.

Aubin, Hermann, "Die Anfänge der grossen schlesischen

Leinweberei und -handlung,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 X X V , 2, 1942, 105-178.

Aylmer, Gerald E., “Office-holding, Wealth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England, c. 1580-c. 1720, ” paper at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Prato, 30 apr. 1974.

Aymard, Maurice, “Commerce et production de la soie sicilienne, aux X VIe- X VIIe siècles, ”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L X X VII, 1965, 609-640.

Aymard, Maurice, *Venise, Raguse et le commerce du blé pend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 VIe siècle*. Paris: S. E. V. P. E. N., 1966.

Aymard, Maurice, “Une croissance sélective: la population sicilienne au X VIIe siècle, ” *Mélanges de la Casa de Velázquez*, IV , 1968, 203-227.

Aymard, Maurice, “Production, commerce et consommation des draps de laine, ” *Revue Historique*, No. 499, juil.-sept. 1971, 5-12. (a)

Aymard, Maurice, “In Sicilia: Sviluppo demografico e sue differenziazione geografiche, 1500-1800, ” *Quaderni storici*, No. 17, magg.-agosto 1971, 417-446.

Aymard, Maurice, “Economie rurale, économie marchande, ” in *Commerce de gros, commerce de détail dans les pays méditerranéens (X VIe- X IXe siècles)* , Actes des Journées d’Etudes Bendor, 25-26 avr. 1975. Univ. de Nice: Centre de la Méditerrané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76, 131-144.

Baehrel, René, “Economie et histoire à propos des prix, ” in *E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3, I , 287-310.

Baehrel, René, “Histoire statistique et prix italiens, *Annales E. S. C.*, IX, 2, avr.-juin 1954, 213-226.

Baehrel, René, *Une croissance: La Basse-Provence rurale (fin du X^{VI}e siècle—1789)* . Paris: S. E. V. P. E. N., 1961.

Baetens, R., “The Organization and Effects of Flemish Privateer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e*, IX, 1976, 48-75.

Bailyn, Bernard, “Communications and Trade: The Atlant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I, 4, Fall 1953, 378-387.

Bailyn, Bernard,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5.

Bairoch, Paul, “Le rôle de l’agriculture dans la création de la sidérurgie modern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LIV, 1, 1966, 5-23.

Bairoch, Paul, “Le rôle du secteur tertiaire dans l’atténuation d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No. 1, 1968, 31-49.

Bairoch, Paul,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ollins, 1973, 452-506.

Baker, Dennis, "The Marketing of Cor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rth-East Kent, "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 VIII, 2, 1970, 126-150.

Baker, Norman,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Gover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 in A. Whiteman, J. S. Bromley, & P. G. M. Dickson, eds., *Statesmen, Scholars and Mercha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202-219.

Bakewell, P. J., *Silver Mining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Mexico: Zacatecas, 1546-17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Bakewell, P. J., "Zacatecas: An Economic and Social Outline of a Silver Mining District, 1547-1700, " in Ida Altman & James Lockhart, eds., *Provinces of Early Mexico*. Los Angeles: UCLA Latin American Center Publication, 1976, 199-229.

Balibar, Etienne, "Sur les concepts fondamentaux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 in Louis Althusser & Etienne Balibar, *Lire Le Capital*, nouv éd. entièrement refondue. Paris: Maspéro, 1968, II , 79-226.

Bamford, Paul Walden, "French Shipping in Northern European Trade, 1660-1789,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X VI, 3, Sept. 1954, 207-219.

Bamford, Paul Walden, *Forests and French Sea Power, 1660-1789*.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56.

Bamford, Paul Walden, "Entrepreneurship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IX, 4, Apr. 1957, 204-213.

Bangs, Carl, "Dutch Theology, Trade and War: 1590-1610, " *Church History*, X X X IX, 4, Dec. 1970, 470-482.

Baranowski, B. *et al.*, *Histoire de l'économie rurale en Pologne jusqu'à 1864*. Wrocław: Zakład Narodowy Imienia Ossolinskich, Wydawnictwo Poskiej Akademii Nauk, 1966.

Barber, Elinor G., *The Bourgeoisie in 18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5.

Barbour, Violet, "Marine Risks and Insuran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 , 1929, 561-596.

Barbour, Violet, "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 London: Edw. Arnold, 1954, 227-253.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 2, 1930.)

Barbour, Violet,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Paperbacks, 1963.

Bargalló, Modesto, *La minería y la metallúrgica en la América Española durante la época colonial*. Me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55.

Barker, Ernest,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in Western Europe, 1660-1930*.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66.

Barker, Thomas M., *Double Eagle and Crescent*. Albany: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1967.

Barker, Thomas M., "Military Entrepreneurship and Absolutism: Habsburg Models, "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IV, 1, 1974, 19-42.

Barker, Thomas M., "Armed Service and Nobility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General Aspects and Habsburg Particulars, "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IV, 3, May 1978, 449-500.

Barkhausen, Max, "Government Control and Free Enterprise in Western Germany and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Peter Earle, ed.,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212-273. (Translated from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58.)

Barnett, Correlli, *Britain and Her Army, 1509-1970*. London: Pelican, 1974.

Baron, Salo W.,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XV, Late Middle Ages and Era of European Expansion (1200-1650) : Resettlement and Explo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3.

Barraclough, Geoffrey,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

Barral, Pierre, "Note historique sur l'emploi du terme 'paysan', "

Etudes rurales, No. 21, avr.-juin 1966, 72-80.

Barrett, Elinore M., “*Enconiendas, Mercedes, and Haciendas in the Tierra Caliente of Michoacán,* ”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von Staat,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Lateinamerikas*, X , 1973, 71-111.

Barrett, Ward, “Caribbean Sugar Production Standard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in J. Parker, ed., *Merchants and Scholar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xploration and Trade*.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65, 145-170.

Barrow, Thomas C., *Trade and Empire: The British Customs Service in Colonial America, 1660-177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67.

Bassett, D. K., “Early English Trade and Settlement in Asia, 1602-1690, ” in J. S. Bromley and E. H. Kossman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n Europe and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68, 83-109.

Batie, Robert Carlyle, “Why Sugar? Economic Cycles and the Changing of Staples in the English and French Antilles, 1624-54, ” *Journal of Caribbean History*, VIII, 1, Nov. 1976, 3-41.

Baynes, John, *The Jacobite Rising of 1715*. London: Cassell, 1970.

Bazant, Jan, “Feudalismo y capitalismo en la historia económica de México, ” *Trimestre económico*, X VII, 1, enero-marzo 1950, 84-98.

Bazant, Jan, “Evolu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of Puebla: 1544-1845,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II, 1, Oct. 1964, 56-69.

Beaujon, A., *History of the Dutch Sea Fisheries: Their Progress, Decline and Revival*. London: William Clowes & Sons, 1884.

Beer, George Louis,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60-1754*, Part I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1660-1668*,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12.

Behrens, Bett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49-620.

Beiguelman, Paula, "A destruição do escravismo capitalista, " *Revista da História*, X X IV, 69, 1967, 149-160.

Bérenger, Jean, "Public Loans and Austrian Polic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 3, Winter 1973, 657-669.

Berengo, Marimo, & Diaz, Furio, "Noblesse et administration dans l'Italie de la Renaissance: la formation de la bureaucratie moderne, " paper at X 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Moscow, Apr. 16-23, 1970.

Berger, Patrice, "French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mine of 1693, "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VIII, 1, Jan. 1978, 101-127.

Bergier, Jean-François, "Il X VI secolo segnò l'inizio di una nuova concezione dei salari, " *Revista storica italiana*, L X X VIII, 2, 1966, 431-438.

Bernard, Léon, "French Society and Popular Uprisings under Louis XIV,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III, 4, Fall 1964, 454-474.

Berthe, Jean-Pierre, "Xochimancas: Les travaux et les jours dans une hacienda sucrière de Nouvelle-Espagne au XVIIe siècle, "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von Staat,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Lateinamerikas*, III, 1966, 88-117.

Berthold, Rudolf, "Wachstumprobleme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Nutzfläche in Spätfeudalismus (zirka 1500 bis 1800) , "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II -III, 1964, 5-23.

Besnier, R., *Histoire des faits économiques: La fin de la croissance et les prodromes d'une révolution économique en Europe au XVIIe siècle*. Cours de Doctorat, 1960-1961. Paris: Les Cours de Droit, polyc., 1961.

Beutin, Ludwig, "Nordwestdeutschland und die Niederlande seit de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 X II, 2, 1939, 105-147.

Birch, Alan, "Foreign Observers of the British Iron Industr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 1, 1955, 23-33.

Blanchard, Marcel, "Le sel de France en Savo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X, 47, sept. 1937, 417-428.

Blaschke, Karlheinz, "Das Bauernlegen in Sachsen,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 L II, 2, 1955, 97-116.

Blitz, Rudolph C., "Mercantilist Policies and the Pattern of World Trade, 1500-175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II, 1, Mar. 1967, 39-55.

Bloch, Marc, "La lutte pour d'individualisme agraire dans la France du X VIIIe siècl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II , 7, juil. 1930, 329-383; II , 8, oct. 1930, 511-556.

Bloch, Marc, *French R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Bluche, François, "L'origine sociale des Secrétaires d'État de Louis X IV (1661-1715) , X VIIe siècle, Nos. 42-43, 1^{er} trimestre 1959, 8-22.

Bodmer, Walter, "Tendenz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der eidgenössischen Orte in Zeitalter des Merkantilismus, "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I , 4, 1951, 562-598.

Boelcke, Willi, "Zur Geschichte der Gutscherrschaft und der zweiten Leibeigenschaft in der Oberlausitz,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V, 6, 1956, 1223-1232.

Boëthius, B., "Swedish Iron and Steel, 1600-1955,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 2, 1958, 144-175.

Bog, Ingomar, *Der Reichsmerkantilismus*.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59.

Bog, Ingomar, "Der Merkantilismus in Deutschland, " *Jahrbuch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 X X III, 2, Mai 1961, 125-145.

Bog, Ingomar, "Türkenkrieg und Agrarwirtschaft, " in O. Pickl, her.,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Grazer Forschungen zur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I. Graz: 1971, 13-26.

Bogucka, Maria, "Merchants' Profits in Gdansk Foreign Trad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23, 1971, 73-90.

Bogucka, Maria, "Le marché monétaire de Gdańsk et les problèmes de crédit public au cours de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 VIIe siècle, " Quarta settimana di studio,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Prato, 20 apr. 1972.

Bogucka, Maria, "Amsterdam and the Baltic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 3, Aug. 1973, 433-447.

Bogucka, Maria, "The Monetary Crisis of the X VIIIth Century and it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in Poland,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I, 1, Spring 1975, 137-152.

Boissonade, P., *Le socialisme d'état: L'industrie et les classes industrielles pendant les deux premières siècles de l'ère moderne (1453-1661)* . Paris: Lib.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7.

Bonney, Richard J., "The French Civil War, 1649-53, "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VIII, 1, Jan. 1978, 71-100.

Bono, Salvatore, *I corsari barbareschi*. Torino: Ed. Rai, 1964.

Borelli, Giorgio, *Un patriazato della terraferma veneta tra X VII e X VIII secol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74.

Bosher, J. F., *The Single Duty Project: A Study of the Movement for a French Customs Un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4.

Boswell, A. Bruce, "Poland, " in A.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Torchbooks) , 1967, 154-171.

Boulle, Pierre H., "Slave Trad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in Eighteenth-Century Nantes,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IX, 214, 1^{er} trimestre 1972, 70-112.

Boulle, Pierre H., "Failed Transition, 'Lombardy and France: General Comments,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72-74.

Bourde, André-J., "Louis X IV et l'Angleterre, " *X VIIe siècle*, Nos. 46-47, 1^{er}-2^e trimestres 1960, 54-83.

Bouvier, Jean, "Vers le capitalisme bancaire: l'expansion du crédit après Law,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a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a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301-321.

Bouwsma, William J., "The Secularization of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aper delivered at X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Moscow, Aug. 16-23, 1970. Moscow: Nauka, 1970.

Bowman, Francis, J., “Dutch Diplomacy and the Baltic Grain Trade, 1600-1660,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 , 4, 1936, 337-348.

Boxer, C. R., *Salvador de Sá and the Struggle for Brazil and Angol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2.

Boxer, C. R., “Vicissitudes of the Anglo-Portuguese Alliance, 1600-1700, ”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 (Univ. de Lisboa) , ser. 3, 1958, 15-46.

Boxer, C. R.,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 Johannesburg: Witswatersrand Univ. Press, 1961. (Reprinted b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Boxer, C. R., “Sedentary Workers and Seafaring Folk in the Dutch Republic,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 Groningen: J. B. Wolters, 1964, 148-168.

Boxer, C. 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New York: Knopf, 1965.

Boxer, C. R., “Brazilian Gold and British Trader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X, 3, Aug. 1969, 454-472. (a)

Boxer, C. R., *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1750*.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b)

Boxer, C. 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Knopf, 1969. (c)

Boyer, Richard, "Mexico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ition of Colonial Societ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VII, 3, Aug. 1977, 455-478.

Brading, D. A. & Cross, Harry E., "Colonial Silver Mining: Mexico and Peru,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I, 2, Nov. 1972, 545-579.

Braudel, Fernand,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XV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VI, 1, janv.-mars 1951, 65-71.

Braudel, Fernand, "L'économie de la Méditerranée au XVII^e siècle, " *Les Cahiers de Tunisie*, IV, No. 14, 2^e trimestre 1956, 175-197.

Braudel, Fernand, "L'histoire des civilisations: le passé explique le présent, " in *Ecrits sur l'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1969, 255-314. (Originally chap. V, in *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XX, "Le Monde en devenir [Histoire, évolution, prospective], " 1959.)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Braudel, Fernand, "Discorso inaugurale, " in *La Lana come materia prima*, Atti della 'Prima Settimana di Studio' (18-24 aprile 1969) . Firenze: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 Datini", Prato, 1974, 5-8.

Braudel, Fernand,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7.

Braudel, Fern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and the 'Longue Durée', " in H. L. Wesseling, ed., *Expansion and Reaction: Essays on European Expansion and Reaction in Asia and Africa*. Leiden: Leiden Univ. Press, 1978, 1-27.

Braudel, Fernand, Jeannin, Pierre, Meuvret, Jean, & Romano, Ruggiero, "Le déclin de Venise au X^{VII}e siècle, " *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n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Atti del Convegno 27 giugno-2 luglio 1957. Venezia-Roma: Istituto per la Collaborazione Culturale, 1961, 23-86.

Braudel, Fernand & Spooner, Frank,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374-480.

Braun, Rudolf, "Taxation,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tate-Building: Great Britain and Braudenburg-Prussia, "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5, 243-327.

Braure, Maurice, "Quelques aspects d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au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du Midi*, L X V , 21, janv. 1953, 67-89.

Breen, T. H., "A Changing Labor Force and Race Relations in Virginia, 1660-1710,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II, 1, Fall 1973, 3-25.

Brenner, Robert, "The Social Basis of English Commercial Expansion, 1550-165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II, 1, Mar. 1972, 361-384.

Brenner, Robert, "England, Eastern Europe, and France: Socio-Historical versus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General Conclusions,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68-71.

Brenner, Robert,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 *Past and Present*, No. 70, Feb. 1976, 30-75.

Briggs, Martin S., "Building Construction,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500-c 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245-268.

Bromley, J. S., "The Channel Island Privateers in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 *La Société Guernésiaise*, Report and Transactions for the Year 1949, X IV, 4, 1950, 444-478.

Bromley, J. S., "The Decline of Absolute Monarchy (1638-1774) , " in J. M. Wallace-Hadrill & John McManners, eds., *Franc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London: Methuen, 1957, 134-160.

Bromley, J. S., "The French Privateering War, 1702-1713, " in H. E. Bell & R. L. Ollard, eds., *Historical Essays 1600-1750 presented to David Ogg*.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4, 203-231.

Bromley, J. S., "Introduction,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36.

Bromley, J. S. & Ryan, A. N., "Armies and Navies: (3) Navies,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790-833.

Brown, P. Hume, *The Legislative Union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4.

Brown, Vera Lee, "Contraband Trade as a Factor in the Decline of Spain's Empire in Americ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III, 2, May 1928, 178-189.

Bruchey, Stuart,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Bruchey, Stuart, ed., *The Colonial Merchant.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Bruford, W. H., "The Organisation and Rise of Prussia,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 J. O. Lindsay, ed., *The Old Regime, 1713-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292-317.

Brulez, W., "Anvers de 1585 à 1650,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IV, 1, 1967, 75-99.

Bulferetti, Luigi, "L'oro, la terra e la società: una interpretazione del nostro Seicento, "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8th ser., IV, 1953, 5-

66.

Bulferetti, Luigi & Constantini, Claudio, *Industria e commercio in Liguria nell'età del Risorgimento (1700-1860)*. Milano: 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 1966.

Burckhardt, Jacob, *Fragments historiques*. Geneve: Lib. Droz. 1965.

Bürgin, Alfred, "The Growth of the Swiss National Economy, " in Hugh G. T. Aitken, ed., *The State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9, 213-236.

Burke, Peter, *Venice and Amsterdam: A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lites*. London: Temple Smith, 1974.

Burt, Roger, "Lead Produc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700-177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II, 2, Aug. 1969, 249-267.

Busquet, Raoul, Bourrilly, V.-L., & Agulhon, M., *Histoire de la Provenc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2.

Caizzi, Bruno. *Industria, commercio e banca in Lombardia nel X VIII secolo*. Milano: 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 1968.

Campbell, R. H., "Anglo-Scottish Union of 1717: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 VI, 3, Apr. 1964, 468-477.

Cancilo, Orazio, "I dazi sull'esportazione dei cereali e il commercio dei grani nel Regno di Sicilia, " *Nuovi quaderni del meridione*, No. 28, ott.-dic. 1969, 1-36.

Cardozo, Manoel, "The Brazilian Gold Rush, " *The Americas*, III, 2, Oct. 1946, 137-160.

Carlsson, Ste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wedish Estates, 1700-1865,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 , 3, Winter 1972, 574-624.

Carmagnani, Marcello, *Les mécanismes de la vie économique dans une société coloniale: Le Chili (1680-1830)* . Paris: S. E. V. P. E. N., 1973.

Carmona, Maurice, "Aspects du capitalisme toscan au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I, 2, avr.-juin 1964, 81-108.

Carr, Raymond, "Two Swedish Financiers: Louis de Geer and Joel Gripenstierna, " in H. E. Bell & R. L. Ollard, eds., *Historical Essays 1600-1750 presented to David Ogg*.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4, 18-34.

Carrière, Charles, "La draperie languedocienn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I} siècl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conjoncture levantine) , " in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structures sociales; Hommage à Ernest Labrouss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4, 157-172.

Carstairs, A. M., "Som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Union of Parliaments, "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II , 1, Feb. 1955, 64-72.

Carsten, F. L., "Slaves in North-Eastern German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 1, 1941, 61-76.

Carsten, F. L., "The Origins of the Junkers,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No. 243, Apr. 1947, 145-178.

Carsten, F. L., "The Great Elector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Hohenzollern Despotism,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V, No. 255, Apr. 1950, 175-202.

Carsten, F. L., *The Origins of Prus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Carsten, F. L., "Was There an Economic Decline in Germany Before the 30 Years War?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VI, No. 279, Apr. 1956, 240-247.

Carsten, F. L., *Princes and Parlia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Carsten, F. L., "Introduction: The Age of Louis XIV, "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 F. L. Carsten, ed.,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8-8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8.

Carsten, F. L., "The Rise of Brandenburg, "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 F. L. Carsten, ed.,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8-8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543-558.

Carswell, John, *The South Sea Bubb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60.

Carswell, John, *The Descent on England*. New York: John Day, 1969.

Carter, Alice C., "The Dutch and the English Public Debt in 1777, " *Economica*, n. s., X X, No. 78, May, 1953, 159-161. (a)

Carter, Alice C., "Dutch Foreign Investment, 1738-1800, " *Economica*, n. s., X X, Nov., 1953, 322-340. (b)

Carter, Alice C., "The Huguenot Contribution to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unded Debt, 1694-1714, " *Proceedings of the Huguenot Society of London*, X IX, 3, 1955, 21-41.

Carter, Alice C., "Financial Activities of the Huguenots in London and Amsterdam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 *Proceedings of the Huguenot Society of London*, X IX, 6, 1959, 313-333.

Carter, Alice C., "Note on A Note on Yardstick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3, Apr. 1960, 440-444.

Carter, Alice C., "The Dutch as Neutrals in the Seven Years War, "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XII, 3, July 1963, 818-834.

Carter, Alice C., "Britain as a European Power from her Glorious Revolu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n Europe and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68, 110-137.

Carter, Alice C.,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 Years War*. Coral Gables, Fla., : Univ. of Miami Press, 1971.

Carter, Alice C., ed., "Survey of Recent Dutch Historiography,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VI, 1973, 175-200.

Carter, Alice C., *Neutrality or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Dutch Foreign Policy, 1667-1795*. London: Edw. Arnold, 1975. (a)

Carter, Alice C., *Getting,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Early Modern Times*. Assen, Netherlands: Van Gorcum & Comp B. V., 1975. (b)

Castillo, Alvaro, "Dans la monarchie espagnole du X^{VII}e siècle: Les banquiers portugais et le circuit d'Amsterdam, " *Annales E. S. C.*, X^{IX}, 2, mars-avr. 1964, 311-316.

Castillo, Alvaro, "La coyuntura de la economía valencian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 *Anuario de historia económica y social*, II, 2, enero-dic. 1969, 239-288.

Cavignac, Jean, "Carrières et carriers du Bourgeois au X^{VIII}e siècle, " in *Carrières, mines et métallurgie de 1610 à nos jours*, Actes du 98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Saint-Etienne, 1973, Section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5, 205-226.

Cernovodeanu, Paul,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English Trad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 " *Revue des études du sud-est européen*, V, 3-4, 1967, 447-460.

Cernovodeanu, Paul, *England's Trade Policy in the Levant, 1660-1714*. Bibliotheca Historica Romaniae, Economic History Section Studies, 41 (2). Buchares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Academy of the Socialist Rep. of Romania, 1972.

Céspedes del Castillo, Guillermo, *Lima y Buenos Aires. Repercusiones económicas y políticas de la creación del Virreinato de La*

Plata. Publicaciones de la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X X IV. Sevilla, 1947.

Chambers, J. D., "The Vale of Trent, 1670-180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ements*, No.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ambers, J. D., "Industrialization as a Factor in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700-1900, "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Aug. 1960.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0, 205-215.

Chambers, J. D., "The Rural Domestic Indust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to the Factory Syste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idland Counties of England, "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Aix-en-Provence, 1968, II :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5, 429-455.

Chandler, David G., "Armies and Navies, I : The Act of War on Land,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741-762.

Chaudhuri, K. 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xport of Treasur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 VI, 1, Aug. 1963, 23-38.

Chaudhuri, K. N., "Treasure and Trade Balances: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Export Trade, 1660-172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XI, 3, Dec. 1968, 480-502.

Chaunu, Huguette & Pierre, "Autour de 1640: politiques et

économies atlantiques, ” *Annales E. S. C.*, IX, 1, janv.-mars 1954, 44-54.

Chaunu, Pierre,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VIII (2bis) : *La conjoncture (1593-1650)* . Paris: S. E. V. P. E. N., 1959.

Chaunu, Pierre, “Les échanges entre l’Amérique espagnole et les anciens mondes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Information historique*, No. 5, nov.-déc. 1960, 207-216. (a)

Chaunu, Pierre,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 Paris: S. E. V. P. E. N., 1960. (b)

Chaunu, Pierre, “Brésil et l’Atlantique au X^{V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VII}, 6, nov.-déc. 1961, 1176-1207.

Chaunu, Pierre, “Jansénisme et frontière de catholicité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A propos du Jansénisme lorrain, ” *Revue historique*, 86^e année, CC X X VII, 1, fasc. 461, 1^{er} trimestre 1962, 115-138. (a)

Chaunu, Pierre, “Le renversement de la tendance majeure des prix et des activités au X^{VII}e siècle,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Evo modern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219-255. (b)

Chaunu, Pierre, “Manille et Macão, face à la conjoncture d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Annales E.S.C.*, X^{VII}, 3, mai-juin 1962, 555-580. (c)

Chaunu, Pierre, “Las Casas et la première crise structurelle de la colonisation espagnole (1515-1523) , ” *Revue historique*, 87^e année, CC X X IX, 1, fasc. 465, 1^{er} trimestre 1963, 59-102. (a)

Chaunu, Pierre, "Le X^{VII}e siècle. Problèmes de conjoncture. Conjoncture globale et conjonctures rurales françaises, " in *Mélang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en hommage au professeur Antony Babel à l'occasion de son soixante-quinzième anniversaire*. Genève: La Tribune, 1963, I, 337-355. (b)

Chanu, Pierre, "Notes sur l'Espagne de Philippe V (1700-1746) ,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XL I, 4, 1963, 448-470. (c)

Chaunu, Pierre, "Les 'Cristãos Novos' et l'effondrement de l'empire portugais dans l'Océan Indien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4e ser., II (CXII), fasc. 1-2, janv.-juin 1963, 188-190. (d)

Chaunu, Pierre,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64. (a)

Chaunu, Pierre, "La population de l'Amérique indienne, " *Revue historique*, CCXXII, 1, juil.-sept. 1964, 111-118. (b)

Chaunu, Pierre, "Les crises au X^{VII}e siècle de l'Europe reformée, " *Revue historique*, CCXXXIII, 1, janv.-mars 1965, 23-60. (a)

Chaunu, Pierre, "Une histoire religieuse sérielle: A propos du diocèse de La Rochelle (1648-1724) et sur quelques exemples normands,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II, 1965, 5-34. (b)

Chaunu, Pierre, *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classique*. Paris: Arthaud, 1966. (a)

Chaunu, Pierre, "Le rythme trentenaire de l'expansion européenne, " *Annales E. S. C.*, X XI, 4, juil.-août 1966, 886-893. (b)

Chaunu, Pierre, "Reflexions sur le tournant des années 1630-1650, " *Cahiers d'histoire*, XII, 3, 1967, 249-268. (a)

Chaunu, Pierre, "A partir du Languedoc, De la peste noire à Malthus. Cinq siècles d'histoire sérielle, " *Revue historique*, CC X X X VII, 2, fasc. 482, avr.-juin 1967, 359-380. (b)

Checkland, S. G., "Finance for the West Indies, 1780-181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 3, 1958, 461-469.

Cherepnin, L. V., "Russian Seventeenth-Century Baltic Trade in Soviet Historiography, "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LIII, No. 100, Dec. 1964, 1-22.

Cherry, George 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Free-Trade Movement in Parliament, 1689-1702,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X V, 2, June 1953, 103-119.

Chevalier, François, "Pour l'histoire du travail en Nouvelle Espagne: Une oeuvre fondamentale, " *Annales E. S. C.*, III, 4, oct.-déc. 1948, 484-487.

Chevalier, François, *Land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Mexico*.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Christelow, Allen, "French Interest in the Spanish Empire during the Ministry of the Duc de Choiseul, 1759-1771,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I, 4, Nov. 1941, 515-537.

Christelow, Allen, "Contraband Trade between Jamaica and the Spanish Main, and the Free Port Act of 1766,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II, 2, May 1942, 309-343.

Christelow, Allen,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Anglo-Spanish War of 1762,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VIII, 1, Mar. 1946, 22-36.

Cipolla, Carlo M., "Aspetti e problemi nell'economia milanese e lombarda nei secoli X VI e XVII, " in *Storia di Milano*, XI. *Il declino spagnolo (1630-1706)*, 1st ed. Milano: Fond. Treccani degli Alfieri per la Storia di Milano, 1958, 377-399.

Cipolla, Carlo 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rev. ed.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4.

Cipolla, Carlo M., *Guns, Sails and Empires*. New York: Pantheon, 1966.

Cipolla, Carlo M., "Introduction" to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asgow: Collins, 1974, 7-13.

Clapham, (Sir) John, "The Growth of an Agrarian Proletariat, 1688-1832: A Statistical Note, "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I , 1, 1923, 92-95.

Clapham, Sir John, *The Bank of England*, I : 1694-17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Clark, G. N., *The Dutch Alliance & the War Against French Trade, 1688-1697*. Univ. of Manchester Historical Series No. 42, Manchester,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 1923.

Clark, G. N., "War, Trade and Trade War, 1701-13,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 2, Jan. 1928, 262-280.

Clark, G. N., "Early Capitalism and Inven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 2, Apr. 1936, 143-156.

Clark, G. 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Clark, G. N., "The Nine Years War, 1688-1697,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3-253.

Coats, A. W., "Changing Attitudes to Labou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1, Aug. 1958, 35-51.

Cohen, Jacob, "The Element of Lottery in British Government Bonds, 1684-1919, " *Economica*, n. s., X X , No. 79, Aug. 1953, 237-246.

Coleman, D. C., "Labour in the English Econom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3, Apr. 1956, 280-295.

Coleman, D. C., "Eli Heckscher and the Idea of Mercantilism,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 1, 1957, 3-25.

Coleman, D. C.,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History, 1500-17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I, 3, 1959, 506-514.

Coleman, D. C.,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Coleman, D. C.,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7.

Cook, Sherburne F., & Borah, Woodrow, *Essays in Population History, I : Mexico and the Caribbea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Cooper, J. P., "Sea Power, "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 P. 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6-238.

Coornaert, E. L. J., "European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he New World: the Chartered Companies, " in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20-274.

Corvisier, André, "Les généraux de Louis X IV et leur origine sociale, " *X VIIe siècle*, Nos. 42-43, 1^{er} trimestre 1959, 23-53.

Cottrell, Fred, *Energy and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55.

Craeybeckx, Jan, "Les industries d'exportation dans les villes flamandes au X VIIe siècle, particulièrement à Gand et à Bruges,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V : Evo moderno*. Milano: Dott. A. Giuffrè-

Ed., 1962, 411-468.

Craig, Gordon A.,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Craven, Wesley Frank, *The Colonies in Transition, 1660-1713*.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Croft, Pauline, "Free Trade 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1605-6,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II, 1, Feb. 1975, 17-27.

Croot, Patricia & Parker, David,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Past and Present*, No. 78, Feb. 1968, 37-47.

Crosby, Alfred W., "Conquistador y Pestilencia: The First New World Pandemic and the Fall of the Great Indian Empire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LVII, 3, Aug. 1967, 321-337.

Crouzet, François,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 VIII siècle. Essai d'analyse comparée de deux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 *Annales E. S. C.*, X XI, 2, mars-avr. 1966, 254-291.

Crouzet, Françoi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I, 1, Mar. 1971, 135-152.

Crouzet, François,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Marc Ferro, ed., *Social Historians in Contemporary Fra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59-86. (Translated from *Annales E. S. C.*, 1966.)

Cullen, L. M.,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vis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Irish Economic History,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X VII, 1967, 1-22.

Cullen, L. M., *Anglo-Irish Trade, 1660-1800*.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68.

Cullen, L. M., “Merchant Communities Overseas, the Navigation Acts and Irish and Scottish Responses, ” in L. M. Cullen & T. C. Smout, eds., *Comparative Aspects of Scottish and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600-1900*.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 1977, 165-176.

Cunningham, W.,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 2 v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2.

Cunningham, W., *Alien Immigrants to England*.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7.

Curtin, Philip D., “Epidemiology and the Slave Trade,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L X X X III, 2, June 1968, 190-216.

Curtin, Philip 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Curtin, Philip 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600-1800, ” in J. F. A. Ajayi &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s, 1971, I , 240-268.

Dahlgren, Stellan, “Estates and Classes, ” in M.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102-131. (a)

Dahlgren, Stellan, "Charles X and the Constitution, " in M.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174-202. (b)

Dales, J. H., "The Discoveries and Mercantilism: An Essay in History and Theory,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X XI, 2, May 1955, 141-153.

Darby, H. C., "The Age of the Improver: 1600-1800, " in H. C. Darby, ed., *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302-388.

Darby, H. C. & Fullard, Harold, eds., *Atlas*, Vol. X IV of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da Silva, José-Gentil, "Au X VIIe siècle: la stratégie du capital florentin, " *Annales E. S. C.*, X IX, 3, mai-juin 1964, 480-491. (a)

da Silva, José-Gentil, "Degradazione economica e ristagno secolare. Linee di sviluppo dell'economia spagnola dopo il secolo X VI, " *Studi storici*, V, 2, 1964, 241-261. (b)

da Silva, José-Gentil, *En Espagn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subsistance, déclin*.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5.

da Silva, José-Gentil, "Les sociétés commerciales, la fructification du capital et la dynamique sociale, X VI- X VIIIe siècles, " *Anuario de historia economica y social*, II, 2, enero-dic. 1969, 117-190.

Davies, C. S. L., "Peasant Revolt in France and England: A Comparison, "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 XI, 2, 1973, 122-134.

Davies, K. G., "Joint-Stock Investment in the Later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3, 1952, 283-301.

(a)

Davies, K. G., "The Origin of the Commission System in the West India Trade,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II, 1952, 89-107. (b)

Davies, K. G.,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57.

Davies, K. G., "Empire and Capital,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I, 1, Aug. 1960, 105-110.

Davies, K. G., *The North Atlantic Worl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74.

Davis, Ralph, "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0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2, Dec. 1954, 150-166.

Davis, Ralp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Economy of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X, 1, Aug. 1956, 59-73.

Davis, Ralph, "Earnings of Capital in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1670-173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II, 3, 1957, 409-425.

Davis, Ralph, "England and the Mediterranean, 1570-1670, "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7-137.

Davis, Ralph,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1774,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 2, Dec. 1962, 285-303.

Davis, Ralph, "The Rise of Protection in England, 1669-1786,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X, 2, Aug. 1966, 306-317.

Davis, Ralph, review of Pierre Jeannin, *L'Europe du Nord-Ouest et du Nord aux X VII et X VIII siècle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69)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X III, 2, Aug. 1970, 387-388.

Davis, Ralph, *English Overseas Trade, 1500-1700,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73. (a)

Davis, Ralph,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3. (b)

Davis, Ralph,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and Anglo-Dutch Rival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H. M. S. O.,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1975.

Deane, Phyllis, "The Output of the British Woollen Indust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II, 2, 1957, 207-223.

Deane, Phyllis & Cole, W. A.,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de Beer, E. S., "The English Revolution,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93-222.

Debien, Gabriel, *Le peuplement des Antilles françaises au X^{VII}e siècle: Les engagés partis de La Rochelle (1683-1715)*, *Notes d'histoire coloniale*, II.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1942.

de Castro, Antonio Barros, "The Hands and Feet of the Planter: The Dynamics of Colonial Slavery," unpubl. ms., c. 1976.

Dechêne, Louise, *Habitants et marchands de Montréal au X^{VII}e siècle*. Paris, Plon, 1974.

Dehio, Ludwig, *The Precarious Balance*. New York: Vintage, 1962.

Delille, Gerard, review of M. Morineau, *Les faux semblants d'un démarrage économique* i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 3, Winter 1972, 809-812.

Delumeau, Jean, "Le commerce extérieur français au X^{VII}e siècle," *X^{VII}e siècle*, No. 70-71, 1966, 81-105.

de Maddalena, Aldo, "Rural Europe, 1500-1750,"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asgow: Collins, 1974, 273-353.

(a)

de Maddalena, Aldo, *Prezzi e mercedi a Milano dal 1701 al 1860*. Milano: Banco Commerciale Italiano, 1974. (b)

Dent, Julian, "An Aspect of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Collapse of the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1653-61),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2, Aug. 1967, 241-256.

Deprez, P., “Th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of Fland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D. V. Glass &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 Arnold, 1965, 608-630.

Dermigny, Louis, “Saint-Domingue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 *Revue historique*, No. 204, oct.-déc. 1950, 234-239.

Dermigny, Louis, “Circuits de l’argent et milieux d’affaires au X VI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78e année, No. 212, oct.-déc. 1954, 239-277.

Dermigny, Louis, “Le fonctionnement des Compagnies des Indes, I : L’organisation et le rôle des Compagnies, ” in M. Mollat, réd.,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Paris: S. E. V. P. E. N., 1970, 443-451. (a)

Dermigny, Louis, “Le fonctionnement des Compagnies des Indes, II . East India Company et Compagnie des Indes, ” in M. Mollat, réd.,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Paris: S. E. V. P. E. N., 1970, 453-466. (b)

Dermigny, Louis, “Gênes et le capitalisme financier,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L II, 4, 1974, 547-567.

de Roover, Raymond, *L’évolution de la lettre de change, X IVe-X VIIIe siècl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3.

de Roover, Raymond, “What is Dry Exchange?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Mercantilism, ” in Julius Kirshner, ed., *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Selected Studies of Raymond de Roover*.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4, 183-199. (a)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L II , 3, 1944, 250-266.)

de Roover, Raymond, “New Interpret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Banking, ” *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4, 200-238. (b)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I , 1954, 38-76.)

Deschamps, Hubert, *Pirates et flibustiers*, “Que sais-je? , ” No. 554.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3.

Desdevises du Désert, G., “Les institutions de l’Espagne, ” *Revue hispanique*, L X X , 1927, 1-556.

Dessert, Daniel & Journet, Jean-Louis, “Le lobby Colbert: Un royaume, ou une affaire de famille? , ” *Annales E. S. C.*, X X X , 6, nov.-déc. 1975, 1303-1336.

Devine, T. M., “Colonial Commerce and the Scottish Economy, c. 1730-1815, ” in L. M. Cullen & T. C. Smout, eds., *Comparative Aspects of Scottish and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600-1900*.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 1977, 177-190.

de Vries, Jan, “On the Modernity of the Dutch Republic,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III, 1, Mar. 1973, 191-202.

de Vries, Jan, *The Dutch Rural Economy in the Golden Age, 1500-*

1700.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74.

de Vries, Jan, "Holland: Commentary,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55-57.

de Vries, Jan,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de Vries, Jan, "Barges and Capitalism: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 the Dutch Economy, 1632-1839, " *A. A. G. Bijdragen*, No. 21, 1978, 33-398.

de Vries, Philip, "L'animosité anglo-hollandaise au X^{V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V, 1, janv.-mars 1950, 42-47.

Deyon, Pierre, "Variations de la production textil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sources et premiers résultats, " *Annales E. S. C.*, X^{VIII}, 5, sept.-oct. 1963, 939-955.

Deyon, Pierre, "A propos des rapports entr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et la monarchie absolu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CC^{XI}, 2, fasc. 470, avr.-juin 1964, 341-356.

Deyon, Pierre, "La production manufacturière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et ses problèmes, " *X^{VII}e siècle*, Nos. 70-71, 1966, 47-63.

Deyon, Pierre, *Amiens, capitale provincial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7.

Deyon, Pierre, *Le mercantilisme*, Questions d'histoire, 11. Paris: Flammarion, 1969.

Deyon, Pierre, "La concurrence internationale des manufactures lainières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X X VII, 1, janv.-févr. 1972, 20-32.

Deyon, Pierre, "Théorie et pratique de mercantilisme,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197-218. (a)

Deyon, Pierre, "Compétitions commerciales et coloniales,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219-247. (b)

Deyon, Pierre, "Le rôle animateur des marchands,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263-289. (c)

Deyon, Pierre, "La production manufacturière,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263-289. (d)

Deyon, Pierre, "Les sociétés urbaines,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291-316. (e)

Deyon, Pierre & Jacquart, Jean, "L'Europe: gagnants et perdants,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497-519.

de Zeeuw, J. W., "Peat and the Dutch Golden Age: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Energy Attainability, " *A. A. G. Bijdragen*, No. 21, 1978, 3-31.

Dickens, A. G., "Preface, " *The Anglo-Dutch Contribution to the Civilization of Early Modern Society*. London &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 Press, 1976, 8-10.

Dickerson, Oliver M., *The Navigation Ac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1.

Dickson, P. G. M.,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 Macmillan, 1967.

Dickson, P. G. M., "English Commercial Negotiations with Austria, 1737-1752, " in A. Whiteman, J. S. Bromley, & P. G. M. Dickson, eds., *Statesmen, Scholars and Mercha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81-112.

Disney, A. R., "The First Portuguese India Company, 1628-33,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2, May 1977, 242-258.

Dobb, Maurice H., "The English Revolution, II, " *Labour*

Monthly, X X III, 2, Feb. 1941, 92-93.

Dobb, Maurice H.,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6.

Dobb, Maurice H., "A Reply, " in Rodney Hilton, ed.,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57-67. (Originally in *Science and Society*, Spring 1958.)

Dobyns, Henry F., "An Outline of Andean Epidemic History to 1720, "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X X X VII, 6, Nov.-Dec. 1963, 493-515.

Dominguez Ortiz, Antonio, *La sociedad española en el siglo X VII*, Monografias historico-sociales, I . Madrid: Instituto Balmes de Sociologia, Depto. de Historia Social, 1955.

Dominguez Ortiz, Antonio, *The Golden Age of Spain, 1516-1659*.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Donnan, Elizabeth,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 1711-1718,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 , 3, May 1930, 419-450.

Dorn, Walter L.,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X L VI, 3, Sept. 1931, 403-423; X L VII, 1, Mar. 1932, 75-94; X L VII, 2, June 1932, 259-273.

Dorwart, Reinhold A.,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of Frederick William I of Prus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3.

Dorwart, Reinhold A., *The Prussian Welfare State before 174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71.

Duckham, Baron F.,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Coal Industry, I : 1700-1815*.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1970.

Duncan, T. Bentley, *Atlantic Islands: Madeira, the Azores and the Cape Verd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2.

Duncan, T. Bentley, "Neils Steensgaard and the Europe-Asia Trade of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VII, 3, Sept. 1975, 512-518.

Dunn, Richard S., *Sugar and Slaves*.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2.

Dunsdorfs, Edgars,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Baltic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Contributions of Baltic University, No. 40, Pinneberg, 1947.

Dunsdorfs, Edgars, *Der grosse schwedische Kataster in Livland, 1681-1710*,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s Handlingar, del 72. Stockholm: Wahlstrom & Widstrand, 1950.

Dupâquier, J. (& Jacquart, J.) , "Les rapports sociaux dans les campagnes françaises au X VIIe siècle: quelques exemples, " in D. Roche, réd., *Ordres et classes*, Colloque d'histoire sociale, Saint-Cloud, 24-25 mai 1967.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3, 167-179.

Dupuy, Alex, "Spanish Colonialism and the Origin of Underdevelopment in Haiti, "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III, 2,

Spring 1976, 5-29.

Durand, Georges, "Vin, vigne et vigneron en Lyonnais et Beaujolais (XVIe-XVIIIe siècles), " *Cahiers d'histoire*, XII, 2, 1977, 123-133.

Durand, Yves, *Finance et mécénat: Les fermiers généraux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 Hachette, 1976.

Durie, Alastair J., "The Markets for Scottish Linen, 1730-1775, "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LII, Nos. 153-154, 1973, 30-49.

Dworzaczek, Włodzimierz, "La mobilité sociale de la noblesse polonais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36, 1977, 147-161.

Eagly, Robert V., "Monetary Policy and Politics in Mid-Eighteenth Century Swede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X, 4, Dec. 1969, 739-757.

Eagly, Robert V., "Monetary Policy and Politics in Mid-Eighteenth Century Sweden: A Repl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 3, Sept. 1970, 655-656.

Eagly, Robert V., "Introductory Essay, " to *The Swedish Bullionist Controversy: P. N. Christiernin's Lectures on the High Price of Foreign Exchange in Sweden (1761)*.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Amer. Philosophical Soc., 1971, 1-37.

East, W. G.,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H. C. Darby,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 D. 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465-528.

Edel, Matthew, "The Brazilian Sugar Cyc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Rise of West Indian Competition, " *Caribbean Studies*, IX, 1, Apr. 1969, 24-44.

Ehrman, John, *The Navy in the War of William III, 1689-16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Elliott, J. H., *The Revolt of the Catal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Elliott, J. H.,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6.

Elliott, J. H., "Revolution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 1969, 35-56.

Elliott, J. H., "Self-Perception and Declin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Spain, " *Past and Present*, No. 74, Feb. 1977, 41-61.

Emmanuel, Arghiri, *Unequal Ex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Emmer, Pieter C., "The History of the Dutch Slave Trade: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II, 3, Sept. 1972, 728-747.

Endelman, Todd M., *The Jews of Georgian England, 1714-1830*.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Jewish Publ. Soc. of America, 1979.

Endrei, Walter G., "English Kersey in Eastern Europ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ungary, ” *Textile History*, V , 1974, 90-99.

Enjalbert, Henry, “Le commerce de Bordeaux et la vie économique dans le Bassin Aquitaine au X VIIe siècle, ” *Annales du Midi*, LXII, 9, janv. 1950, 21-35.

Ernie, Lord (Prothero, Rowland E.) ,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2.

Everitt, Alan, “The Food Market of the English Town, 1660-1760,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I , Munich, 1956.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8, 57-71.

Eversley, D. C. E., “Demography and Economics: A Summary Report,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Demography and Economy*.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2, 15-35.

Faber, J. A., “Cattle-Plague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Mededelingen van de Landbouwschool te Wageningen*, LXII, 11, 1962, 1-7.

Faber, J. A., “The Decline of the Baltic Grain Trad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 , 1966, 108-131.

Faber, J. A., Diedericks, H. A., & Hart, S.,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l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500-1800, ” paper prepared for V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Economic History, Copenhagen, 1974, 21 p., mimeographed. Published in Dutch in *A. A. G. Bijdragen*, No. 18, 1973, 251-271.

Faber, J. A., Roessingh, H. K., Slicher Van Bath, B. H., Van der Woude, A. M., & Van Xanten, H. J., "Population Changes &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Netherlands, A Historical Survey, " *A. A. G. Bijdragen*, No. 12, 1965, 47-114.

Fairlie, Susan, "Dyestuff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I, 3, Apr. 1965, 488-510.

Fanfani, Amintore, *Storia del lavoro in Italia dalla fine del secolo X V agli inizi del X VIII*. 2a ed. accresc. ed illus., Vol. III of A. Fanfani, ed., *Storia del lavoro in Italia*.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59.

Farnell, J. E., "The Navigation Act of 1651, the First Dutch War, and the London Merchant Communit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 3, Apr. 1964, 439-454.

Farnie, D. A., "The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Atlantic, 1607-1783,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 V, 2, Dec. 1962, 205-218.

Fayle, C. Ernest, "The Deflection of Strategy by Commer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L X VIII, 1923, 281-290.

Febvre, Lucien, "De l'histoire-tableau: Essais de critique constructiv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 No. 21, 31 mai 1933, 267-281.

Fedorowicz, Jan K., "Anglo-Polish Commercial Rel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2, Fall 1976, 359-378.

Fernández de Pinedo, Emiliano, *Crecimiento económico y transformaciones sociales del país vasco (1100-1850)*. Madrid, Siglo XXI de España, 1974.

F [ield], P [eter], "England's Revolution, " review of Christopher Hill, e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in *Labour Monthly*, X XII, 10, Oct. 1940, 558-559. (a)

F [ield], P [eter],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II. A Rejoinder, " *Labour Monthly*, X XII, 12, Dec. 1940, 653-655. (b)

Finer, Samuel E., "State 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5, 84-163.

Fischer, Wolfram & Lundgreen, Peter,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f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5, 456-561.

Fisher, F. J., "London's Export Trad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III, 2, 1950, 151-161.

Fisher, F. J., "Tawney's Century, "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1, 1-14.

Fisher, Sir Godfrey, *Barbary Legend: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75-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Fisher, H. E. S., "Anglo-Portuguese Trade, 1700-177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 VI, 2, 1963, 219-233.

Fisher, H. E. S., *The Portugal Trade: A Study of Anglo-Portuguese Commerce, 1700-1770*. London: Methuen, 1971.

Flinn, M. W.,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Iron Industry, 1660-176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I, 1, Aug. 1958, 144-153.

Flinn, M. W., "Sir Ambrose Crowley and the South Sea Scheme of 1711,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1, Mar. 1960, 51-66.

Flinn, M. 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700-1760: A Com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I, 1, Mar. 1966, 93-98.

Flinn, M. W., "The Stabilisation of Mortality in Pre-industrial Western Europe,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I, 2, Fall 1974, 285-318.

Florescano, Enrique, *Precios del maiz y crisis agrícolas en México (1708-1810)* .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69.

Floyd, Troy S., *The Anglo-Spanish Struggle for Mosquita*. Albuquerque: Univ. of New Mexico Press, 1967.

Forbes, R. J., "Food and Drink,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1-26.

Ford, Franklin L., *Robe and Sword: The Regrouping of the French'*

Aristocracy After Louis X IV,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Vol. X X IV.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3.

Forster, Robert, "Obstacles to Agricultural Growth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V , 6, Oct. 1970, 1600-1615.

Forster, Robert & Litchfield, R. Burr, "Four Nobilities of the Old Regime (review article) ,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II, 3, Apr. 1965, 324-332.

Fourastié, Jean & Grandamy, René, "Remarques sur les prix salariaux des céréales et la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leur agricole en Europe du X V e et X VI e siècles,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I , Munich, 1965.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8, 647-656.

Francis, A. D., *The Methuens and Portugal, 1691-170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Francis, A. D., *The Wine Trade*. Edinburgh: T. & A. Constable, 1972.

Frank, André Gunder, *Mexican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of Mode of Production, 1521-16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 (a)

Frank, André Gunder,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b)

Franken, M. A. M., "The General Tendencies and Structural Aspects of the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of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II, 1968, 1-42.

Frèche, Georges, *Toulouse et la région, Midi-Pyrénées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vers 1670-1789*. Mayenne: Ed. Cujas, 1974.

Freudenberger, Herman, “Industrialization in Bohemia and Morav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X IX, 4, Jan. 1960, 347-356. (a)

Freudenberger, Herman, “The Woolen-Goods Industry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3, Sept. 1960, 383-406. (b)

Friedrichs, Christopher R., “Capitalism, Mobility and Class Form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German City, ” *Past and Present*, No. 69, Nov. 1975, 24-49.

Furniss, Edgar S.,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u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Kelley & Millman, 1957. (Original publication, Boston, 1920.)

Furtado, Cels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Fussell, G. E., “Low Countries: Influence on English Farming,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IV, No. 293, Oct. 1959, 611-622.

Fussell, G. E., “Dairy Farming, 1600-1900,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I : *Production et productivité agricoles*.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8, 31-36.

Gaastra, F., Summary of paper delivered at Nederlands Historisch Genootschap, 24-25 Oct. 1975, title translated a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he Growth of the Concern; Money for Goods; A Structural Change in Dutch-Asian Trading Relations, " in *Newslette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Expansion, I , 3, 1976, 18-19.

Galen son, David, "The Slave Trade to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73-1724,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II, 2, May 1979, 241-249.

Galloway, J. H., "Northeast Brazil, 1700-50: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Re-examined, "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I , 1, Jan. 1975, 21-38.

Garman, Douglas,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I, A Reply to P. F." *Labour Monthly*, X XII, 12, Dec. 1940, 651-653.

Gately, Michael O., Moote, A. Lloyd, & Wills, John E., Jr., "Seventeenth-Century Peasant 'Furies': Some Problem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 *Past and Present*, No. 51, May 1971, 63-80.

George, C. H.,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Bourgeoisie, 1500-1750, " *Science and Society*, X X X V , 4, Winter 1971, 385-414.

George, Dorothy, *England in Transition*. London: Penguin, 1953, published with additions.

Georgelin, J., "Ordres et classes à Venise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 in D. Roche, éd., *Ordres et classes*, Colloque d'histoire sociale, Saint-Cloud, 24-25 mai 1967.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3, 193-197.

Geremek, Bronisław, review of Jerzy Topolski, *O tak zwanym kryzysie gospodarczym w. w Europie* (Sur la prétendu crise économique du X^{VII}e siècle en Europe), *Kwartalnik Historyczny*, L X IX, 2, 1962, 364-379, in *Annales E. S. C.*, X VIII, 6, nov.-déc. 1963, 1206-1207.

Geremek, Bronisław, “La popolazione marginale tra il medioevo e l'era moderna, ” *Studi storici*, IX, 3-4, lugl.-dic. 1968, 623-640.

Geyl, Pieter, *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rt One: 1609-1648. London: Ernest Benn, 1961.

Geyl, Pieter, *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rt Two: 1648-1715. London: Ernest Benn, 1964.

Gibbs, F. W., “Invention in Chemical Industries,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676-708.

Gierowski, Józef, “Les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 Pologn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au cours de 1945-1965, ” in *La Pologne au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Vienne*. Warszawa: PWN, 1965, 229-263.

Gieseey, Ralph E., “National Stability and Hereditary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 paper delivered at X^{I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an Francisco, Aug. 22-29, 1975, 19 pp.

Gieysztorowa, Irena, “Guerre et régression en Masovie aux X^{VI} et

XVII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XIII, 4, oct.-déc. 1958, 651-668.

Gilboy, Elizabeth Waterman, “Wage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 1930, 603-629.

Gill, Conrad, *The Rise of the Irish Linen Indust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5.

Glamann, Kristof,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 Denmark: Danish Science Press, 1958.

Glamann, Kristof, “European Trade 1500-1750, ”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asgow: Collins, 1974, 427-526.

Glamann, Kristof,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rade,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185-289.

Glass, D. V., “Two Papers on Gregory King, ” in D. V. Glass &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 Arnold, 1965, 159-220.

Glenday, Daniel G., “French Mercantilism and the Atlantic Colonies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New France) , 1494-1672, ” unpubl. M. A.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January 1975.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Le commerce anglais et l’Amérique espagnole au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III, 4, oct.-déc. 1948,

551-554.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Création et dynamisme économique du monde atlantique (1420-1670) , ” *Annales E. S. C.*, V , 1, janv.-mars 1950, 32-36. (a)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Le Portugal, les flottes du sucre et les flottes de l’or (1670-1770) , ” *Annales E. S. C.*, V , 2, avr.-juin 1950, 184-197. (b)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Portugal, as frotas do açúcar e as frotas do ouro 1670-1770, ” *Revista de história*, X V , 1953, 69-88.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L’émigration portugaise du X V siècle à nos jours: Histoire d’une constante structurale, ” in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structures sociales*, Hommage à Ernest Labrouss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4.

Gongora, Mario, “Vagabondage et société pastorale en Amérique latine (spécialement au Chili central) , ” *Annales E. S. C.*, X XI , 1, janv.-févr. 1966, 159-177.

Goodwin, Albert,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 : Grands thèmes*. Wie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öhne, 1975, 356-368.

Gorlitz, Walter, *Die Junker: Adel und Bauer in deutschen Osten*. Glücksburg/Ostsee: Verlag von C. A. Starke, 1956.

Goslinga, Cornelis Ch., *The Dutch in the Caribbean and on the Wild*

Coast, 1580-1680. Gainesville, Florida: Univ. of Florida Press, 1971.

Goubert, Pierre, “Les officiers royaux des Présidiaux, Bailliages et Election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X^{VII}e siècle, ” *X^{VII}e siècle*, Nos. 42-43, 1^{er} trimestre 1959, 54-75.

Goubert, Pierre,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2 vols. Paris: S. E. V. P. E. N., 1960.

Goubert, Pierre, “Recent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French Population Between 1500 and 1700, ” in D. V. Glass &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 Arnold, 1965, 457-473.

Goubert, Pierre, *Louis X^{IV} and Twenty Million Frenchmen*. New York: Pantheon, 1970. (a) Goubert, Pierre, “La force du nombre,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9-21. (b)

Goubert, Pierre, “Le régime démographique français au temps de Louis X^{IV},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23-54. (c)

Goubert, Pierre, “Révolution démographique au X^{VIII}e siècle? ,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55-84. (d)

Goubert, Pierre, “Les cadres de la vie rurale,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a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a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87-118. (e)

Goubert, Pierre, “Le paysan et la terre: seigneurie, tenure, exploitation,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a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a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119-158. (f)

Goubert, Pierre, “Le tragique X^{VII}e siècle,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a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a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329-365. (g)

Goubert, Pierre, “Remarques sur le vocabulaire social de l’Ancien Régime, ” in D. Roche, red., *Ordres et classes*, Colloque d’histoire sociale, Saint-Cloud, 24-25 mai 1967.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3, 135-140.

Goubert, Pierre, “Sociétés rurales françaises du X^{VIII} siècle: vingt paysanneries contrastées, quelques problèmes, ” in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structures sociales*, Hommage à Ernest Labrouss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4.

Gould, J. D., "The Trade Depression of the Early 1620'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1, Aug. 1954, 81-90.

Gould, J. D., "The Date of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 2, 1955, 160-161. (a)

Gould, J. D., "The Trade Crisis of the Early 1620's and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 2, 1955, 121-133. (b)

Gould, J. D.,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II, 3, Sept. 1962, 313-333.

Goyhenetche, Manex,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au pays basque*. Bayonne, France: Ed. E. L. K. A. R., 1975.

Graham, Gerald S., "The Naval Defense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1739-1763,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th ser., X X X, 1948, 95-110.

Graham, Gerald S., *Empire of the North Atlantic: The Maritime Struggle for North America*, 2nd ed.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58.

Grampp, W. D., "The Liberal Elements in English Mercantilism,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 X VI, 4, Nov. 1952, 465-501.

Granger, C. W. J. & Elliott, C. M., "A Fresh Look at Wheat Prices and Marke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2, Aug. 1967, 257-265.

Grantham, G., in "Holland: Participant's Discussion,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64-66.

Grassby, R. B., "Social Status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 under Louis X IV,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I, 1, 1960, 19-38.

Gray, Stanley & Wyckoff, V. J.,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II, 1, July 1940, 1-26.

Grycz, Marian, "Handelsbeziehungen der Stadt Poznan bis Ende des X VII Jahrhunderts, " *Studia Historiae Economicae*, II, 1967, 43-55.

Grycz, Marian, "Die Rolle der Stadt Poznań im Innen- und Aussenhandel bis Ende des X VII Jahrhunderts, " in Ingomar Bog, her.,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450-1650*. Köln-Wien: Böhlau Verlag, 1971, 105-119.

Guerrero B., Andres, "La hacienda précapitaliste en Amérique latine, " *Etudes rurales*, No. 62, avr.-juin 1976, 5-38.

Gulvin, G., "The Union and the Scottish Woollen Industry, "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L, Nos. 149-150, 1971, 121-137.

Guthrie, Chester L., "Colonial Economy, Trade, Industry and Labo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Mexico City, " *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No. 7, dic. 1939, 103-134.

Habakkuk, H. John, "The English Land Marke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0, 154-173.

Habbakkuk, H. John, "La disparition du paysan anglais, " *Annales E. S. C.*, X X, 4, juil.-août 1965, 649-663. (a)

Habakkuk, H. Joh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 in D. V. Glass &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 Arnold, 1965, 147-158. (b)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58.)

Habakkuk, H. John, "Land-owners and the Civil Wa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II, 1, Aug. 1965, 130-151. (c)

Habakkuk, H. John, "Economic Functions of English Landowner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in Hugh G. J. Aitken, ed., *Explorations 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65, 327-340. (d) (Originally in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3.)

Habakkuk, H. John, "England, " in Albert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Torchbooks), 1967, 1-21.

Haley, K. H. D., "The Anglo-Dutch Rapprochement of 1677,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III, 1958, 614-648.

Haley, K. H. D.,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2.

Haley, K. H. D., "Holland: Commentary,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58-60.

Hall, A. Rupert, "Military Technology,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347-376.

(a)

Hall, A. Rupert, "The Rise of the West,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709-721.

(b)

Hall, A. Rupert,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Progress of Techniques, " in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96-154.

Hall, Douglas, "Slaves and Slavery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XI, 4, Dec. 1962, 305-318.

Hamann, Manfred, "Archivfunde zur Geschichte der zweiten Leibeigenschaft,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I, 3, 1954, 476-480.

Hamilton, Earl J., "The Mercantilism of Gerónimo de Uztariz: A Reexamination, " in Norman E. Hines, ed.,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35, 111-129.

Hamilton, Earl J., "Prices and Wages in Southern France under John Law's System, " *Economic History*, III, 12, Feb. 1937, 441-461.

Hamilton, Earl J., "Money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Spain under the First Bourbon, 1701-1746,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V , 3, Sept. 1943, 192-206.

Hamilton, Earl J., *War and Prices in Spain, 1651-18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47.

Hamilton, Earl J., "The Role of Monopoly in the Overseas Expansion and Colonial Trade of Europe before 1800,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X X X VIII, 2, May 1948, 33-53.

Hamilton, Earl J., "Plans for a National Bank in Spain, 1701-83,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VII, 4, Aug. 1949, 315-336.

Hamilton, Earl J., "The History of Prices before 1750, " 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 : *Methodologie, 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histoire des prix avant 1750*. Göteborg, Sweden: Almqvist & Wiksell, 1960, 144-164.

Hamilton, Earl 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rance at the Time of John Law, "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 , 1, Spring 1969, 123-149.

Hamilton, Earl J., "The Role of War in Modern Infla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VII, 1, Mar. 1977, 13-19.

Hamilton, Henr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Hansen, Marcus Lee, *The Atlantic Migration, 1607-186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45.

Hansen, S. A., "Changes in the Wealth and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nish Aristocracy, 1470-1720,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V: J. E. C. Eversley, ed., *Demography and History*.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2, 91-122.

Harkness, D. A. E., "The Opposition to the 8th and 9th Articles of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Utrecht, "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X XI, No. 83, Apr. 1924, 219-226.

Haring, Clarence Henry,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47.

Haring, Clarence Henry,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 in the Time of the Hapsburgs*.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Peter Smith, 1964. (Original publication, 1918.)

Harlow, Vincent T., *A History of Barbados, 1625-168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Harnisch, Helmut, *Die Herrschaft Boitzenburg: Untersuchungen zur Entwicklung der sozialökonomischen Struktur ländlicher Gebiete in der Mark Brandenburg vom 14. bis zum 19. Jahrhundert*. Weimar: Hermann Böhlau Nachfolger, 1968.

Harper, Lawrence A., “The Effect of the Navigation Acts on the Thirteen Colonies, ” in Richard B. Morris, ed.,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39, 3-39. (a)

Harper, Lawrence A.,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39. (b)

Harper, Lawrence A., “Mercanti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III, 1, Mar. 1942, 1-15.

Harris, L. E., “Land Drainage and Reclamation,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300-323.

Harris, R. W.,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689-1793: A Balanced Constitution and New Horizons*. London: Blandford Press, 1963.

Harsin, Paul, “La finance et l'état jusqu'au système de Law,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267-299.

Harte, N. B., “The Rise of Protection and the English Linen Trade, 1690-1790, ” in N. B. Harte & K. G. Ponting, eds., *Textile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73, 74-112.

Hartwell, Richard M.,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X, 1, Mar. 1969, 13-31.

Haskell, Francis, "The Market for Italian Art in the 17th Century, " *Past and Present*, No. 15, Apr. 1959, 48-59.

Hasquin, Hervé, *Une mutation: Le "Pays de Charleroi"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Bruxelles: Ed.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1971.

Hassinger, Herbert, "Die erste Wiener orientalische Handelskompanie, 1667-1683,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 X X V, 1, 1942, 1-53.

Hatton, Ragnhild M., "Scandinavia and the Baltic,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 J. O. Lindsay, ed.,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39-364.

Hatton, Ragnhild M., "Gratific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glo-French Rivalry in Sweden During the Nine Years War, " in R. Hatton & J. S. Bromley, eds., *William III and Louis X IV, Essays 1680-1720, by and for M. A. Thomson*.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68, 68-94. (a)

Hatton, Ragnhild M., *Charles XII of Swede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8. (b)

Hatton, Ragnhild M., "Charles XII and the Great Northern War,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648-680.

Hatton, Ragnhild M. *Charles XII*. London: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74.

Haudricourt, André G. & Delamarre, Mariel Jean-Brunhes, *L'homme et la charrue à travers le monde*. Paris: Gallimard, 1955, 3rd ed.

Hauser, H., "Réflexions sur l'histoire des banques à l'époque moderne de la fin du X V e siècle à la fin du X VIII e siècl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er} année, No. 3, 15 juil. 1929, 335-351.

Havinden, M. A.,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Open-Field Oxfordshire, " in E. L. Jones, ed.,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50-1815*. London: Methuen, 1967, 66-79. (Originally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1961.)

Hazard, Paul, *The European Mind, 1680-1715*. London: Penguin, 1964.

Heaton, Herbert, "Heckscher on Mercantilism,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V, 3, June 1937, 370-393.

Heckscher, Eli F., "Un grand chapitre de l'histoire du fer: le monopole suédois,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V, 14, 31 mars 1932, 127-139; 15, 31 mai 1932, 225-241.

Heckscher, Eli F., *Mercantilism*, 2 vol.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1935.

Heckscher, Eli F., "Mercantilism,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1, Nov. 1936, 44-54.

Heckscher, Eli F., "Multilateralism, Baltic Trade, and the Mercantilist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III, 2, 1950, 219-

228.

Heckscher, Eli F.,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4.

Heitz, Gerhard, review of Johannes Nichtweiss, *Das Bauernlegen in Mecklenburg*,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I, 4, 1955, 643-649.

Heitz, Gerhard, "Zur Diskussion über Gutsherrschaft und Bauernlegen in Mecklenburg,"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 2, 1957, 278-296.

Helleiner, Karl F.,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Eve of the Vital Revolution," in E. G.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95.

Helmer, Marie, "Economie et société au X^{VII}e siècle: Un Cargador de India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von Staat,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Lateinamerikas*, IV, 1967, 399-409.

Henry, Louis, "The Population of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D. V. Glass &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 Arnold, 1965, 434-456.

Herlihy, David, "Population, Plague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Pistoia, 1201-143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2, Aug. 1965, 225-244.

Hildebrand, Karl-Gustaf, "Salt and Cloth in Swedish Economic History,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 2, 1954, 74-102.

Hildebrand, Karl-Gustaf, "Foreign Markets for Swedish Iron in the 18th Century,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 1, 1958, 3-52.

Hildner, Ernest G., Jr., "The Role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 in the Diplomacy Leading to the War of Jenkins'Ear, 1729-1739,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VIII, 3, Aug. 1938, 322-341.

Hill, B. W.,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the 'Loss of the City', 1710-1711,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V, 3, Aug. 1971, 395-413.

Hill, Charles E., *The Danish Sound Dues and the Command of the Baltic*.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 Press, 1926.

Hill, Christopher,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terpreted by Marx and Engels, " *Science and Society*, XII, 1, Winter 1948, 130-156.

Hill, Christopher, "Land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 *Science and Society*, X III, 1, Winter 1948-1949, 22-49.

Hill, Christopher,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New York: W. W. Norton, 1961. (a)

Hill, Christopher,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15-39. (b)

Hill, Christopher, *1530-1780,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Vol. 2 of *The Pe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Baltimore: Penguin, 1969, published with revisions.

Hill, Christopher, "Conclusion, " 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75, 278-284. (a)

Hill, Christopher, "The Many-Headed Monster, " 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75, 181-204. (b) (Originally in C. H. Carter, ed.,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Garrett Mattingly* New York, 1965.)

Hilton, R. H., "Capitalism. What's in a Name? , " *Past and Present*, No. 1, 1952, 32-43.

Hinton, R. W. K., "The Mercantile System in the Time of Thomas Mu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3, Apr. 1955, 277-290.

Hinton, R. W. K.,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Hintze, Otto, "The Hohenzollern and the Nobility, " in *Historical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5, 33-63. (a) (Translated from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14.)

Hintze, Otto, "The Commissary and His Significance in General Administrative History: A Comparative Study, " in *Historical Essays*.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5, 267-301. (b)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9.)

Hobsbawm, E. J., "Seven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s, " a discussion with others in *Past and Present*, No. 13, Apr. 1958, 63-72.

Hobsbawm, E. J.,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 *Science and Society*, X X IV, 2, Spring 1960, 97-112.

Hobsbawm, E. J.,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5-58. (Originally in *Past and Present*, 1954.)

Hoffenden, Philip S., "France and England in North America, 1689-1713,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80-508.

Hoffman, Alfre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Landes Oberösterreich, I : Werden, Wachsen, Reifen von der Frühzeit bis zum Jahre 1848*. Salzburg: Otto Müller Verlag, & Linz: Verlag F. Winter'sche Buchlandlung H. Fürstelberger, 1952.

Hoffman, Alfred, "Die Grundherrschaft als Unternehmen, "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VI, 2, 1958, 123-131.

Holderness, B. A., *Pre-Industrial England: Economy and Society, 1500-1750*.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76.

Homer, Sidney, *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 Press, 1963.

Horn, David Bayne,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Horner, John, *The Linen Trade of Europe during the Spinning Wheel Period*. Belfast: McCaw, Stevenson & Orr, 1920.

Horsefield, J. Keith, "The Beginnings of Paper Money in England,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I, 1, Spring 1977, 117-132.

Hoskins, W. G., "English Agricultur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Roma 4-11 settembre 1955, *Relazioni*,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G. C. Sansoni-Ed., 1955, 205-226.

Hoskins, W. G., "Harvest Fluctuations and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1620-1759, "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 VI, 1, 1968, 15-31.

Hovde, B. J.,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1720-1865*, I :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 Press, 1948.

Howard, Michael,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6.

Hroch, Miroslav, "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und die europäischen Handelsbeziehungen, "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Ernst-Moritz-Arndt-Universität Greifswald*, XII, 5/6, 1963, 533-543.

Hroch, Miroslav, "Die Rolle des zentraleuropäischen Handels im Ausgleich der Handelsbilanz Zwischen Ost- und Westeuropa, 1550-1650, " in Ingomar Bog, her.,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450-1650. Köln-Wein: Böhlau Verlag, 1971, 1-27.

Hubert, Eugene, "Joseph II , " i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 W. Ward *et al.*, eds., VI: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626-656.

Huetz de Lemps, Christian, *Géographie du commerce de Bordeaux à la fin du règne de Louis X IV*.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5.

Hufton, Olwen H., *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Hughes, Edward, *North Country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North-East, 1700-1750*.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52.

Hutchison, E. P., *The Population Debate*.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1967.

Hymer, Stephen & Resnick, Stephen, "A Model of an Agrarian Economy with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X, 3, Sept. 1969, 493-506.

Imbert, Gaston, *D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Kondratieff*. Aix-en-Provence: La Pensée Universitaire, 1959.

Imbert, Jea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s origines à 1789)* , Collection Thémi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65.

Imhof, Arthur E., "Der Arbeitszwang für das landwirtschaftliche Dientsvolk in den nordischen Ländern im 18. Jahrhundert, "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X XII, 1, 1974, 59-74.

Innis, H. A., "Preface" to M. G. Lawson, *Fur: A Study in English Mercantilism, 1700-1775*.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43, vii-x x.

Insh, George Pratt, *The Scottish Jacobite Movement: A Study in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London: Moray Press, 1952.

Israel, J. I., "Mexico and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63, May 1974, 33-57. (a)

Israel, J. I., "The Portuguese in Seventeenth-Century Mexico,"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von Staat,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Lateinamerikas*, XI, 1974, 12-32. (b)

Israel, J. I., "A Conflict of Empires: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618-1648," *Past and Present*, No. 76, Aug. 1977, 34-74.

Issawi, Charles,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1600-1914. Some Observations and Many Questions," in Kemal H. Karpat, ed., *The Ottoman State and It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1974, 107-117.

Jacquart, Jean, "La production agricole dans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 *X^{VII}e siècle*, Nos. 70-71, 1966, 21-46.

Jacquart, Jean, "La productivité agricole dans la France due Nord du X^{VI}e et X^{VII}e siècle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I. *Production et productivité agricole*. Paris & LaHaye: Mouton, 1968, 65-74.

Jacquart, Jean (& Dupâquier, J.), "Les rapports sociaux dans les

campagnes françaises au X VII^e siècle: quelques exemples, ” in D. Roche, éd., *Ordres et classes*, Colloque d’histoire sociale, Saint-Cloud, 24-25 mai 1967.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3, 167-179.

Jacquart, Jean, “French Agri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Peter Earle, ed.,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Translated from *X VII siècle*, 1966.)

Jacquart, Jean, “Immobilisme et catastrophes, ” in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éd., *L’age classique des paysans de 1340 à 1789*, Vol. II of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Paris: Seuil, 1975, 185-353.

Jacquart, Jean, “Les inerties terriennes,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345-388. (a)

Jacquart, Jean, “L’offensive des dominants,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389-430. (b)

Jacquart, Jean, “Des sociétés en crise,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455-494. (c)

Jago, Charles, “The Influence of Deb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rown and Aristocrac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astil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 2, May 1973, 218-236.

James, Francis Godwin, "Irish Colonial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 X, 4, Oct. 1963, 574-582.

James, Francis Godwin, *Ireland in the Empire, 1688-177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73.

Jansen, H. P. H., "Holland's Advance,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e*, X, 1978, 1-19.

Jansen, J. C. G. M., "Agrarian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in South Limburg in the Years 1650-1850,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V, 1971, 243-270.

Jeannin, Pierre, "Les compt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e-XVIIIe siècles) , " *Revue historique*, 88e année, No. 231, 1er partie, janv.-mars 1964, 55-102; 2e partie, avr.-juin 1964, 307-340.

Jeannin, Pierre, *L'Europe du Nord-Ouest et du Nord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Nouvelle Clio 34.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69.

Jeannin, Pierre, "Preis-, Kosten- und Gewinnunterschiede im Handel mit Ostseegetriebe (1550-1650) , " in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Strukturen im saekularen Wandel*, II : Ingomar Bog *et al.*, her., *Die vorindustrielle Zeit: Ausseragrarisches Probleme*. Hannover: Verlag M. & H. Schaper, 1974, 494-518.

Jeannin, Pierre, "Les marché du Nord dans le commerce français au X VIIIe siècle, " in Pierre Léon, réd., *Aires et structures du commerce français au X VIIIe siècle*, Colloque national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Historiens Economistes, Paris, CNRS, 4-6 oct. 1973. Lyon: Centr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1975, 47-73.

Jensch, Georg, "Der Handel Rigas im 17. Jahrhundert, " *Mitteilungen aus der livländischen Geschichte*, X X IV, 2, 1930.

Jensen, Einar, *Danish Agricultur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penhagen: J. H. Schultz Forlag, 1937.

John, A. H., "Insurance Investment and the Land on Money Market of the 18th Century, " *Economica*, n. s., X X, No. 78, May 1953, 137-158.

John, A. H., "War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700-1763,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VII, 3, Apr. 1955, 329-344.

John, A. H.,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 1, Mar. 1965, 19-34.

John, A. H., "Aspects of English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W. E. Minchinton, ed.,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9, 164-183. (Originally in *Economica*, 1961.)

John, A. H., "English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 Grain Exports, 1660-1765, " in D. C. Coleman & A. H. John, eds., *Trade,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6, 45-67.

Johnsen, Oscar Albert, *Norweg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 1939.

Jones, E. L.,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60-1750: Agricultural Chang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 , 1, Mar. 1965, 1-18.

Jones, E. L., "Editor's Introduction, " in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50-1815*. London: Methuen, 1967, 1-48.

Jones, E. L., "Afterword, " in William N. Parker & Eric L. Jones, eds., *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 Essays in Agrarian Economic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5, 327-360.

Jones, E. L. & Woolf, S. J.,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London: Methuen, 1969.

Jones, George Hilton, *The Main Stream of Jacobit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4.

Jones, Sir Harold Spencer, "The Calendar,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558-581.

Jones, J. R.,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Edw. Arnold, 1966.

Jones, J. R., "English Attitudes to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n Europe and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68, 37-55.

Jones, J. R., *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2.

Jørgensen, Johan, "Denmark's Relations with Lubeck and Hambur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2, 1963, 73-116.

Joslin, D. M., "London Private Bankers, 1720-178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2, 1954, 167-186.

Judges, A. V., "The Idea of a Mercantile State, " in D. C. Coleman, *ed.*,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35-60. (Originall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39.)

Jutikkala, Eino, "The Great Finnish Famine in 1696-97,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 1955, 48-63.

Jutikkala, Eino, "Large Scale Farming in Scandinav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X III, 2, 1975, 159-166.

Kaltenstadler, Wilhelm, "Der österreichisch Seehandel über Triest im 18. Jahrhundert,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V, 4, März 1969, 481-500; LVI, 1, Juni 1969, 1-104.

Kaltenstadler, Wilhelm,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n Recent German Historiograph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 1, Spring 1972, 193-218.

Kamen, Henry, "The Decline of Castile: The Last Crisi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I, 1, Aug. 1964, 63-76.

Kamen, Henr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 *Past and Present*, No. 39, Apr. 1968, 44-61.

Kamen, Henry, *The War of Succession in Spain, 1700-1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69.

Kamen, Henry, *The Iron Century: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550-1660*. New York: Praeger, 1972.

Kamen, Henry, "Public Authority and Popular Crime: Banditry in Valencia, 1660-1714,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I, 3, Winter 1974, 654-687.

Kamen, Henry, "The Decline of Spain: A Historical Myth? , " *Past and Present*, No. 81, Nov. 1978, 24-50.

Kammen, Michael, *Empire and Intere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and the Politics of Mercantilism*.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J. B. Lippincott, 1970.

Kann, Robert A., "Aristo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bsburg Empire, "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II, 1, 1973, 1-13.

Kavke, František, "Die habsburger und der böhmische Staat bis zu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 *Historica*, VIII, 1964, 35-64.

Kearney, H. F.,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English Mercantilism, 1695-170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3, Apr. 1959, 484-496.

Kearney, H. F., "Puritanism, Capitalism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 *Past and Present*, No. 28, July 1964, 81-101.

Keith, Robert G., "Encomienda, Hacienda and Corregimiento in

Spanish America: A Structural Analysi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I , 3, Aug. 1971, 431-446.

Keith, Theodora, “The Economic Causes for the Scottish Union,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 X IV , No. 93, Jan. 1909, 44-60.

Kellenbenz, Hermann,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Ihr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vom Ende des 16. bis zum Beginn des 18. Jahrhundert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e 40.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58.

Kellenbenz, Hermann, “Händliches Gewerbe und bäuerliches Unternehmertum in Westeuropa von Spätmittelalter bis ins X VIII. Jahrhundert, ”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Aix-en-Provence, 1962. II :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5, 377-427.

Kellenbenz, Hermann, “Les industries rurales en Occident de la fin du Moyen Age au X 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L X III, 5, sept.-oct. 1963, 833-882.

Kellenbenz, Hermann,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Archangel Route (from the late 16th to the late 18th centur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 , 3, Winter 1973, 541-581.

Kellenbenz, Hermann,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00-1700, "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History of Europe*, II :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asgow: Collins, 1974, 177-272.

Kellenbenz, Hermann,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6.

Kellenbenz, Herman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462-548. (a)

Kellenbenz, Hermann, "Europaisches Kupfer, Ende 15. bis Mitte 17. Jahrhundert. Ergebnisse eines Kolloquiums, " in H. Kellenbenz, her., *Schwerpunkte der Kupferproduktion und des Kupferhandels in Europa, 1500-1650*. Köln-Wien: Böhlau Verlag, 1977, 290-351. (b)

Kemp, Tom,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Retardation of French Economic Growth, " *Kyklos*, XV , 2, 1962, 325-350.

Kent, H. S. K., "The Anglo-Norwegian Timber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1, Aug. 1955, 62-74.

Kent, H. S. K., *War and Trade in Northern Se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Kepler, J. S., "Fiscal Aspects of the English Carrying Trade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Wa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 , 2, May 1972, 261-283.

Kerridge, Eric, *Agrarian Problem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Ltd., 1969.

Kerridge, Eric, *The Farmers of Old England*.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1973.

Kersten, Adam, "Les magnats—élite de la société nobiliaire,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36, 1977, 119-133.

Kindleberger, Charles P., "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V, 3, Winter 1975, 613-654.

Kindleberger, Charles P.,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Kirchner, Walther, "Emigration: Some Eighteenth Century Considerations,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 3, Apr. 1963, 346-356.

Kirilly, Zs., "Examen au point de vue de rendement de la production du blé des serfs, " in Mme. Zs. Kirilly *et al.*, "Production et productivité agricoles en Hongrie à l'époque du féodalisme tardif, (1550-1850),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publiées à l'occasion du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par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Historiens Hongroi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65, 615-622.

Kirilly, Zs. & Kiss, I. N., "Production de céréales et exploitations paysannes: En Hongri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X X III, 6, nov.-déc. 1968, 1211-1236.

Kisch, Herbert, "The Textile Industries in Silesia and the Rhine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in Industrializa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IX, 4, Dec. 1959, 541-564.

Kisch, Herbert, "Growth Deterrents of a Medieval Heritage: The Aachen-area Woolen Trades before 179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V, 4, Dec. 1964, 517-537.

Kisch, Herbert, *Prussian Mercanti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Krefeld Silk Industry: Variations upon an Eighteenth-Century Them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LVIII, Pt. 7, 1968.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Amer. Phil. Soc., 1968.

Kiss, Istvan, "Die Rolle der Magnaten-Gutswirtschaft im Grosshandel Ungarns im 17. Jahrhundert, " in Ingomar Bog, r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450-1650*. Köln-Wien: Böhlau Verlag, 1971, 450-482.

Klein, Peter W., "The Trip Family in the 17th Century: A Study of the Behavior of the Entrepreneur on the Dutch Staple Market,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 , 1966, 187-211.

Klein, Peter W.,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the Economic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 *Annales cisalpines d'histoire sociale*, I , 1, 1969, 7-19.

Klein, Peter W., "Stagnation économique et emploi du capital dans la Hollande des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 *Revue du Nord*, LII, No. 204, janv.-mars 1970, 33-41.

Klíma, Arnoš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Bohemia, 1648-1781, " *Past and Present*, No. 11, Apr. 1957, 87-99.

Klíma, Arnošt, "English Merchant Capital in Bohem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 Aug. 1959, 34-48.

Klíma, Arnošt, "Mercantilism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ohemian Lands, " *Historica*, XI, 1965, 95-119.

Klíma, Arnošt & Macůrek, J., "La question de la transition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en Europe centrale (16^e-18^e siècles) , "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IV: *Histoire moderne*. Göteborg, Sweden: Almqvist & Wiksell, 1960, 84-105.

Knoppers, Jake,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Dutch Shipping from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paper presented to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Edmonton, June 7, 1975. (a)

Knoppers, Jake, "Discussion, " in F. Krantz & P.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65. (b)

Knoppers, Jake, "Patterns in Dutch Trade with Russia from the Nine Years' War to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Netherlandic Studies, Univ. of New Brunswick, Fredericton, 28-29 May 1977. (a)

Knoppers, Jake, "Ships and Shipping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Europe, "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Univ. of New Brunswick, Fredericton, 2-6 June 1977. (b)

Koeningsberger, H. G., "English Merchants in Naples and Sicil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II, No. 244, July 1947, 304-326.

Kossmann, E. H., "Discussion of H. R. Trevor-Roper: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ast and Present*, No. 18, Nov. 1960, 8-11.

Kossmann, E. H., "The Low Countries,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 P. 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59-384.

Kossmann, E. H., "Some Meditations on Dutch Eighteenth-Century Decline,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49-54. (a)

Kossmann, E. H., "Some Late 17th-Century Dutch Writings on Raison d'Etat, " in R. Schnur, her., *Staatsräso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eines politischen Begriff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5, 497-504.

(b)

Kossmann, E. H., "The Singularity of Absolutism, " in R. Hatton, ed., *Louis X IV and Absolutis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1976, 3-17.

Kowecki, Jerzy,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structure sociale en Pologne au X VIIIe siècle: La noblesse et la bourgeoisie,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26, 1972, 5-30.

Kriedte, Peter, Medick, Hans, & Schlumbohm, Jürgen, *Industrialisierung vo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7.

Kruger, Horst, *Zur Geschichte der Manufakturen und der Manufakturarbeiter in Preussen*, Vol. III **of Schrittenreihe des Institut für allgemeine Geschichte an der Humboldt Universität Berlin**, ed. by **Gerhard Schilfert. Berlin: Rütten & Loening, 1958.**

Kuczynski, Jürgen, "Zum Aufsatz von Johannes Nichtweiss über die zweite Leibeigenschaft,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I , 3, 1954, 467-471.

Kula, Witold, "L'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ologne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4, 1961, 133-146.

Kula, Witold, "La métrologi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des classes: Exemple de la Pologne au X VIIIe siècle,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273-288.

Kula, Witold, "Gli studi sulla formazione del capitalismo in Polonia, " in A. Caracciolo, red., *Problemi storici della*

industrializzazione e dello sviluppo. Urbino, Italy: Argalia Ed., 1965, VI, 205-228.

Kula, Witold, *Theorie économique du système féodal*.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0.

Kulischer (Koulischer), Joseph, "La grande industri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France, Allemagne, Russi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II, 9, janv. 1931, 11-46.

Kulischer, Joseph, "Liebeigenschaft in Russland und die Agrarverfassung Preussens in 18. Jahrhundert: Eine vergleichende Studie, "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3rd ser., L X X XII, 1, 1932, 1-62.

Kuske, Bruno, "Gewerbe, Handel und Verkehr, " in H. Aubin *et al.*, her., *Geschichte des Rheinlandes von der ältesten Zeit bis zur Gegenwart*, II: *Kulturgeschichte*. Essen: G. D. Baedeker, Verlagsbuchhandlung, 1922, 149-248.

Kuske, Bruno,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Verflechtung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n Niederlanden bis zum 18. Jahrhundert, " in *Köln, Der Rhein und das Reich*. Köln-Graz: Böhlau-Verlag, 1956, 200-256. (Originally in *Deutsches Archiv für Landes-und Volksforschung*, 1937.)

Labrousse, C.-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 Dalloz, 1932, 2 vol.

Labrousse, C.-E., "La révolution démographique du premier tiers du X^{VIII}e siècle, " *Bulletin semestriel, Association pour l'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ssociation Marc Bloch, Toulouse, séance du 17 mai 1953, 21-23.

Labrousse, C.-E., "Les 'bons prix' agricoles du X VIII^e siècle,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3, 67-416.

Labrousse, Elisabeth, "Le refuge hollandais: Bayle et Jurieu, " X VII^e siècle No. 76-77, 1967, 75-93.

La Force, J. Clayburn, "Royal Textile Factories in Spain, 1700-180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V, 3, Sept. 1964, 337-363.

Land, Aubrey C., "Economic Base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Northern Chesapeak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 4, Dec. 1965, 639-654.

Land, Aubrey C., "The Tobacco Staple and the Planter's Problems: Technology, Labor and Crops, " *Agricultural History*, X LIII, 1, Jan. 1969, 69-81.

Lane, Frederic C., "Oceanic Expansion: Force and Enterprise in the Creation of Oceanic Commerc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Supplement, 1950, 19-39.

Lane, Frederic C.,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3.

Lang, James, *Conquest and Commerce: Spain and England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Lang, M. F., "New Spain's Mining Depression and the Supply of Quicksilver from Peru,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III, 4, Nov. 1968, 632-641.

Langton, John, "Coal Output in South-West Lancashire, 1590-1799,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V, 1, Feb. 1972, 28-54.

Larquié, Cl., "Les esclaves de Madrid à l'époque de la décadence (1650-1700) , " *Revue historique*, CCXLIV, 1, juil.-sept. 1970, 41-74.

Larraz, José, *La época del mercantilismo en Castilla (1500-1700)* . 2nd ed. Madrid: Atlas, 1943.

Laslett, Peter, "John Locke, the Great Recoinag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oard of Trade: 1695-1698,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XIV, 3, July 1957, 370-402.

Lavrovsky, V. M., "Expropriation of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IX, 2, Aug. 1957, 271-282.

Lavrosky, V. M., "The Great Estate in England from the 16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August 1960,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0, 353-365.

Lawson, Murray G., *Fur: A Study in English Mercantilism, 1700-1775*. Univ. of Toronto Studies, History and Economics Series, Vol. IX.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43.

Lenman, Bruc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Scotland, 1660-1976*.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7.

Léon, Pierre, "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u règne de Louis XIV (1685-1715) ," *Information historique*. X VIII, 4, sept.-oct. 1956, 127-137.

Léon, Pierre, "Points de vue sur le monde ouvrier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 .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8, 181-185.

Léon, Pierre,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préindustrielles, II : 1650-1780: Les origines d'une 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0. (a)

Léon, Pierre, "La réponse de l'industrie,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217-266. (b)

Léon, Pierre, "L'élan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499-528. (c)

Léon, Pierre, "Les nouvelles élites,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601-649. (d)

Léon, Pierre, "Morcellement et émergence du monde ouvrier,"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651-689. (e)

Léon, Pierre, "Structures du commerce extérieur et évolution industrielle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in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structures sociales. Hommage à Ernest Labrouss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4.

Leon, Pierre & Carrière, Charles, "L'appel des marchés,"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 Ernest Labrousse et al.,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70, 161-215.

Léonard, Emile-G., "Economie et religion. Les protestants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II, 1, janv. 1940, 5-20.

Léonard, Emile-G., "Le protestantisme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CC, 2, oct.-dec. 1948, 153-179.

Léonard, Emile-G., *L'Armée et ses problèm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 Plon, 1958.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Climat et récolt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X V , 3, mai-juin 1960, 434-465.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Histoire du Languedoc*.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62.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rurale (X VIe- X VIIIe siècles) , ” *Etudes rurales*, No. 13-14, avr.-sept., 1964, 79-95.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 Paris: Flammarion, 1967.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Les rendements du blé en Languedoc,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I . *Production et productivité agricol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8, 75-84.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L’amenorrhée de famine (X VIIe- X Xe siècles) , ” *Annales E. S. C.*, X X IV , 6, nov.-dec. 1969, 1589-1601.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Les insurgés de l’impôt, ” *Le Nouvel Observateur*, 28 juin 1971, 26-28.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Sur quelques types de revenus réels (16^e-18^e siècles) , ”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Bloomington, 1968.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3, 419-435.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A Long Agrarian Cycle: Languedoc, 1500-1700, ” in Peter Earle, ed.,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a) (Translated from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1969.)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Pour un modèle de l'économie rural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 *Cahiers d'histoire*, X IV, 1, 1974, 5-27.

(b)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Révoltes et contestations rurales en France de 1675 à 1788, " *Annales E. S. C.*, X X IX, 1, janv.-févr. 1974, 6-22. (c)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De la crise ultime à la vraie croissance, " in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éd., *L'âge classique des paysans de 1340 à 1789*, Vol. II of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Paris: Seuil, 1975, 359-591. (a)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Un 'modele septentrional': Les campagnes parisiennes (XVI^e-XVI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X X X, 6, nov.-dec. 1975, 1397-1413. (b)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Un cas de méthodologie dans l'histoire rurale: Les grandes monographies des révoltes et des contestations rurales en France de 1675 à 1788, " in *Metodología de la historia moderna: economía y demografía*, Actas de las I Jornadas de Metodología Aplicada de las Ciencias Históricas, Univ. de Santiago de Compostala. Segovia: Artes Graficas Galicia, III, 1975, 33-50. (c)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Motionless History, " *Social Science History*, I, 2, Winter 1977, 115-136. (Translated from *Annales E. S. C.*, 1974.)

Leśkiewicz, Janina, "Sur le niveau et les composantes du revenu

foncier en Pologne du X^{VI}e siècle au X^{VIII}e siècle, ”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August, 1960, *Contributions*.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0, 409-414.

Leśnodorski, Bogusław, “Les Partages de la Pologne. Analyse des causes et essai d’une théorie,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8, 1963, 7-30.

Leszczyński, Józef, “La Silésie dans la politique européenne au X^{VI}e- X^{VIII}e siècles,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22, 1970, 90-107.

Leuilliot, Paul, “Influence du commerce oriental sur l’économie occidentale, ” in M. Mollat, réd.,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Paris: S. E. V. P. E. N., 1970, 611-627.

Lichtheim, George, *Imperialism*. London: Penguin, 1974.

Liebel, Helen P., “The Bourgeoisie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1500-1789: A Rising Class?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 2, 1965, 283-307. (a)

Liebel, Helen P., “Laissez-faire vs. Mercantilism: The Rise of Hamburg and the Hamburg Bourgeoisie vs. Frederick the Great in the Crisis of 1763,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 II, 2, 1965, 206-238. (b)

Liiv, Otto,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s estnischen Gebietes am Ausgang des X^{VII} Jahrhunderts, ” I. *Verhandlungen der Gelehrten Estnischen Gesellschaft*, X X VII, 1935, 1-336.

Lipson, Ephrai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Vols. II -

III: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6th ed.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56.

Lira, Andrés & Muro, Luis, "El siglo de la integración, " in Centro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Historia General de Mexico*, II. Mexico: El Colegio de Mexico, 1976, 83-181.

Litchfield, R. Burr, "Les investissements commerciaux des patriciens florentins au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 X IV, 3, mai-juin 1969, 685-721.

Lockhart, James, "Encomienda and Hacienda: The Evolution of the Great Estate in the Spanish Indie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I X, 3, Aug. 1969, 411-429.

Lom, František, "Die Arbeitsproduktivität in der Geschichte der tschechoslowakischen Landwirtschaft, "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X I X, 1, Apr. 1971, 1-25.

López, Adalberto, "The Economics of Yerba Mate in Seventeenth-Century South America, " *Agricultural History*, X L V I I I, 4, Oct. 1974, 493-509.

Lord, Eleanor Louisa, *Industrial Experiment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X V I I,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 1898.

Lunde, Johs., *Handelshuset bak "Garman & Worse": Jacob Kielland & Son*.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1963.

Lundkvist, Sven, "The Experience of Empire: Sweden as a Great

Power, ” in M.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20-57.

Lütge, Friedrich, “Strukturelle und konjunkturelle Wandlungen i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r Ausbruch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 in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 Sitzungsberichte*, No. 5, 1958.

Lütge, Friedri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graruerfassung vom frühen Mittelalter bis zu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Verlag Eugen Ulmer, 1963.

Lütge, Friedrich, “Grundherrschaft und Gutsherrschaft, ” *Handwörterbuch des Sozial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5, IV, 682-688.

Lütge, Friedrich,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3rd enlarged and improved ed.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66.

Lüthy, Herbert,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I : Dispersion et regroupement (1685-1730)* . Paris: S. E. V. P. E. N., 1959.

Lüthy, Herbert,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II : De la Banque aux Finances (1730-1794)* . Paris: S. E. V. P. E. N., 1961.

Luzac, Elie, *La richesse de la Hollande*. London: aux dépens de la Compagnie, 1778, 2 vol.

Luzzatto, Gino, *Per una storia economica d'Italia*, 2nd ed. Bari, Italy: Ed. Laterza, 1974.

Lynch, John,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 II : Spain and America: 1598-170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9.

Macartney, C. A., "The Habsburg Dominions,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 J. O. Lindsay, ed., *The Old Regime, 1713-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91-415.

Macartney, C. A., "Hungary, " in A.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Torchbooks) , 1967, 118-135.

Macedo, Jorge Borges de, "O Tratado de Methuen, " *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de Portugal*, II , edited by Joël Serrão. Lisboa: 1963. (a)

Macedo, Jorge Borges de, *Problemas de Historia da Industria Portuguesa no Século XVIII*. Lisboa: Assoc. Industrial Portuguesa, Estudos de Economia Aplicada, 1963. (b)

Macera, Pablo, "Feudalismo colonial americano: el caso de las haciendas peruanas, " *Acta Historica* (Acta Universitatis Szegediensis de Attila Josef Nominatae) , X X X V , 1971, 3-43.

MacLeod, Murdo J., *Spanish Central America: A Socioeconomic History, 1520-1720*.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Mączak, Antoni, "Export of Grain and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the Years 1550-1650,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18, 1968, 75-98.

Mączak, Antoni, "The Balance of Polish Sea Trade with the West, 1565-1646,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2, 1970, 107-142.

Mączak, Antoni,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 in Poland: Internal and Foreign Markets,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 3, Winter 1972, 671-680.

Mączak, Antoni, review of A. Attman, *The Russian and Polish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500-1650*, i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I, 2, Fall 1974, 505-508.

Mączak, Antoni, "Money and Society in Poland-Lithuania of the 16th-17th Centuries, " *Settima Settimana di Studio*,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15 apr. 1975.

Mączak, Antoni, "Money and Society in Poland and Lithuania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1, Spring 1976, 69-104. (a)

Mączak, Antoni, "State Revenues and National Income: Poland in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Ottava Settimana di Studio*,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Prato, 8 magg. 1976. (b)

Mączak, Antoni & Samsonowicz, Henry K., "La zone baltique; l'un des éléments du marché européen,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11, 1965, 71-99.

Mahan, A. T.,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00-1783*.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1889.

Makkai, László, "Die Hauptzüge der wirtschaftlichsozialen Entwicklung Ungarns im 15-17. Jh." in *Studia Historica*, No. 53.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63, 27-46.

Makkai, László, "Der Ungarische Viehhandel, 1550-1650, " in Ingomar Bog, her.,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450-1650*. Köln-Wien: Böhlau Verlag, 1971, 483-506.

Makkai, László, "La structure et la productivité de l'économie agraire de la Hongrie au milieu du X VIIe siècle, " in S. Herbst *et al.*, eds., *Spoleczenstwo Gospodarha Kultura*. Studia ofiarowane Marianowi Małowistowi w czterdziestolecie pracy naukowej. Warszawa: PWN, 1974, 197-209.

Makkai, László, "Neo-Serfdom: Its Origin and Nature in East Central Europe, " *Slavic Review*, X X X IV, 2, June 1975, 225-238.

Małecki, Jan M., "Le rôle de Cracovie dans l'économie polonaise aux X VIe,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21, 1970, 108-122.

Małecki, Jan M., "Die Wandlungen im Krakauer und polnischen Handel zur Zeit der Türkenkriege des 16. und 17. Jahrhunderts, " in O. Pickl, her.,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Grazer Forschungen zur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I. Graz: 1971, 145-151.

Małowist, Maria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from the 15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2, 1959, 177-189.

Małowist, Marian, "L'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Pologne du X^{IV}e au X^{VII}e siècle, " in *Croissance et regression en Europe, X^{IV}e- X^{VII}e siècles*, Cahiers des Annales, 34.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2, 191-215.

Małowist, Marian, "Problems of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Central-Eastern Europ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I, 2, Fall 1974, 319-357.

Małowist, Marian,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déclin des états de l'Europe de l'est au X^{VI}e jusqu'au X^{VIII}e siècle, " paper delivered at Seminar of Fernand Braudel, Paris, 4 mars 1976.

Mandrou, Robert, "Le baroque européen: mentalité pathétique et révolution sociale, " *Annales E. S. C.*, X V, 5, sept.-oct. 1960, 898-914.

Mandrou, Robert, "L'agriculture hors du développement capitaliste: Le cas des Fugger, " *Studi storici*, IX, 3/4, lugl.-dic. 1968, 784-793.

Marino, John A., "La crisi di Venezia e la New Economic History, " *Studi storici*, X IX, 1, genn.-marzo 1978, 79-107.

Markovitch, Tihomir J., "L'industri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l'industrie lainière à la fin du regne de Louis XI V et sous la Régence, "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Cahiers de l'I. S. E. A., II, 8, août 1968, 1517-1697. (a)

Markovitch, Tihomir J., "L'industrie lainière française au début d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 LVI, 4, 1968, 550-579. (b)

Marques, A. H. de Oliveira, *History of Portugal*,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6.

Marrès, P., "Le Languedoc méditerranéen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Annales de l'Institut d'Etudes Occitanes*, 4^e ser., No. 2, aut. 1966, 151-156.

Martin Saint-Léon, Etienne, *Histoire des corporations de métiers*. Genève: Slatkine-Megariotis Reprints, 1976. (Originally published, Paris, 1922) .

Marx, Karl,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 1969.

Masefield, G. B., "Crops and Livestock,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75-301.

Masselman, George, "Dutch Colonial Polic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I, 4, Dec. 1961, 455-468.

Masselman, George, *The Cradle of Colonialism*.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63.

Masson, Paul, *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e Levant au X^{VII}e siècle*.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7. (a) (Originally published, Paris, 1911) .

Masson, Paul, *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e Levant au X^{VIII}e siècle*.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7. (b) (Originally

published, Paris 1896.)

Mata, Eugénia & Valério, Nuno, “Alguns dados e notas sobre o comércio europeu e mundial nos finais do século X VII, ” *Revista de história económica e social*, No. 2, julho-dez. de 1978, 105-122.

Matejek, František, “La production agricole dans les pays tchécoslovaques à partir du X VIe siècle jusqu’à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 *Trois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Munich, 1965, II.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8, 205-219.

Mathias, Peter, “Agriculture and the Brewing and Distilling Industr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V , 2, Aug. 1952, 249-257.

Mathias, Peter & O’Brien, Patrick, “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15-1810.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ncidence of Taxes Collec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 3, Winter 1976, 601-650.

Mathiex, Jean, “Trafic et prix de l’homme en Méditerranée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IX, 2, avr.-juin 1954, 157-164.

Mauro, Frédéric, “Pour une théorie du capitalisme commercial,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 II , 2, 1955, 117-131.

Mauro, Frédéric, “Sur la ‘crise’ du X V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 IV , 1, janv.-mars 1959, 181-185.

Mauro, Frédéric, *Le Portugal et l’Atlantique au X VIIe siècle (1570-*

1670) . *Etude économique*. Paris: S. E. V. P. E. N., 1960.

Mauro, Frédéric, “Toward an ‘Intercontinental Model’: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between 1500 and 180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V, 1 1961, 1-17. (a)

Mauro, Frédéric, “L’empire portugais et le commerce franco-portugais au milieu du X VIIIe siècle, ” *Actas do Congresso Internacional de Historia dos Descobrimentos*, V. Lisboa: 1961, 1-16. (b)

Mauro, Frédéric, “Marchands et marchands-banquiers portugais au X VIIe siècle, ” *Revista portuguesa de história*, IX, 1961, 5-20. (c)

Mauro, Frédéric, “La bourgeoisie portugaise au X VIIe siècle, ” in *Etudes économiques sur l’expansion portugaise (1500-1900)* . Paris: Fund. Calouste Gulbenkian, 1970, 15-35. (Originally in *Le X VIIe siècle*, 1958.)

Mauro, Frédéric, “Existence et persistance d’un régime féodal ou seigneurial au Brésil, ” in *L’abolition de la “féodali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 N. R. S., Toulouse 12-16 nov. 1968. Paris: Ed. du C. N. R. S., I , 1971, 385-391.

Mauro, Frédéric,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et structure sociale en Amérique latine depuis l’époque coloniale, ” in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structures sociales*. Hommage à Ernest Labrouss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4, 237-251.

Mauro, Frédéric, “Le rôle de la monnaie dans les décollages manqués de l’économie portugaise du X V e au X VIIIe siècles.” Paper presented at VII Settimana di Studio, Prato, 17 apr. 1975.

Maxwell, Kenneth, "Pombal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Luso-Brazilian Econom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III, 4, Nov. 1968, 608-631.

May, Louis-Philipp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Martinique (1635-1763)* . Paris: Les Presses Modernes, 1930.

McLachlan, Jean O., *Trade and Peace with Old Spain, 1667-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

McManners, J., "France, " in Albert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Torchbooks) , 1967, 22-42.

McNeill, William H., *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4.

Medick, Hans, "The Proto-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 The Structural Funct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sant Society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Social History*, No. 3, Oct. 1976, 291-315.

Mehring, Franz, *Absolutism and Revolution in Germany, 1525-1848*. London: New Park Publ., 197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2, 1897, 1910.)

Meilink-Roelofs, M. A. P., "Aspects of Dutch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n Europe and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68, 56-82.

Mejdricka, Kveta, “L’état du régime féodal à la veille de son abolition et les conditions de sa suppression en Bohême, ” in *L’abolition de la “féodali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 N. R. S., Toulouse 12-16 nov. 1968. Paris: Ed. du C. N. R. S., I , 1971, 393-409.

Mellafe, Rolando, *La introducción de la esclavitud negra en Chile: tráfico y nitas*. Estudios de Historia Económica Americana: Trabajo y Salario en el Periodo Colonial, II . Santiago: Univ. de Chile, 1959.

Menard, Russell R., “Secular Trends in the Chesapeake Tobacco Industry, ” *Working Papers from the Regional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I , 3, 1978, 1-34.

Menashe, Louis, “Historians Define the Baroque: Notes on a Problem of Art and Social History,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II, 3, Apr. 1965, 333-342.

Mendels, Franklin F.,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II, 1, Mar. 1972, 241-261.

Mendels, Franklin F., “Agriculture and Peasant Industry in Eighteenth-Century Flanders, ” in William N. Parker & Eric L. Jones, eds., *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5. 170-204.

Merrington, John,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 in Rodney Hilton, ed.,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170-195. (Originally in

New Left Review, 1975.)

Mertens, Jacques E., *La naissanc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étalon-or, 1692-1922*, Univ. de Louvain, Collection de l'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No. 131. Louvain: Ed. Em. Warny, 1944.

Meuvret, Jean, "Les mouvements des prix de 1661 à 1715 et leurs répercussions, "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L X X X V , 5-6, mai-juin 1944, 109-119.

Meuvret, Jean,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t utilisation économique de la monnaie dans la France du X VIe et du X VIIe siècles, " *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 , 1947, 15-18.

Meuvret, Jean, "La géographie des prix des céréales et les anciennes économies européennes: Prix méditerranéens, prix continentaux, prix atlantiques à la fin du X VIIe siècle, " *Revista de economia*, IV , 2, 1951, 63-69.

Meuvret, Jean, "Conjoncture et crise au X VIIe siècle: L'exemple des prix milanais, " *Annales E. S. C.*, VII, 2, avr.-juin 1953, 215-219.

Meuvret, Jean, "L'agriculture en Europe au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Roma, 4-11 sett. 1955, *Relazioni*,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G. C. Sansoni-Ed., 1955, 139-168.

Meuvret, Jean, "Circuits d'échange et travail rural dans la France du 2VIIe siècle,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II , 1957, 1127-1142.

Meuvret, Jean, “Domaines ou ensembles territoriaux? , ”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August 1960.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0, 343-352.

Meuvret, Jean, “Production et productivité agricoles,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I : *Production et productivités agricoles*.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8, 11-22.

Meuvret, Jean, “La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 V : des temps difficiles, ” in *E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1, 17-37. (a) (Originally in *La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 IV*, 1965.)

Meuvret, Jean, “Les oscillations des prix de céréales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en Angleterre et dans les pays du bassin parisien, ” in *E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1, 113-124. (b) (Originally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69.)

Michalkjewicz, Stanislas, “Einige Episoden der Geschichte der schleisischen Bauernkämpfer, im 17. und 18, Jh., ” in Eva Maleczyńska, her.,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Schlesiens*. Berlin: Rütten & Loening, 1958, 356-400.

Michell, A. R., “The European Fisherie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4-184.

Míka, Alois, “O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Czech Towns in the Period

of Late Feudalism, ” *Economic History*, II , publish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VII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in Edinburgh, 1978. Prague: Institute of Czechoslovak and World History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78, 225-256.

Mims, Stewart L., *Colbert’s West India Policy*.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 Press, 1912.

Minchinton, Walter, “Patterns and Structure of Demand 1500-1750, ”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asgow: Collins, 1974, 82-176.

Mingay, G. E., “The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1730-17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3, 1956, 323-338.

Mingay, G. E., “The Large E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August 1960.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0, 367-383.

Mingay, G. E., “The Size of Farm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V, 3, Apr. 1962, 469-488.

Mingay, G. E.,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

Mingay, G. E., “The Land Tax Assessments and the Small Landowne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I, 2, Dec. 1964, 381-388.

Mingay, G. E., *Enclosure and the Small Farmer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68.

Mintz, Sidney W., "Currency Problems in Eighteenth Century Jamaica and Gresham's Law, " in Robert A. Manners, ed., *Process and Pattern in Culture*. Chicago, Illinois: Aldine, 1964, 248-265.

Mintz, Sidney W. & Wolf, Eric R., "Haciendas and Plantations in Middle America and the Antilles, "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I, 3, Sept. 1957, 380-412.

Molenda, Danuta, "Investments in Ore Mining in Poland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1, Spring 1976, 151-169.

Mollat, Michel, réd.,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Actes du Huit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Beyrouth, 5-10 sept. 1966. Paris: S. E. V. P. E. N., 1970.

Molnar, Erik, "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e l'absolutisme, " XII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Methodologie et histoire contemporaine*. Wien: Verlag Ferdinand Berge & Söhne, 1965, 155-169.

Mols, Roger, S. J., "Population in Europe 1500-1700, "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asgow: Collins, 1974, 15-82.

Monter, E. William, "Swiss Investment in England, 1697-1720, "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 la banque*, II, 1969, 285-298.

Moreno Fragnals, Manuel, *El Ingenio*, 3 vol. La Habana: Ed. de Ciencias Sociales, 1978.

Morgan, W. T.,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Negotiations at Ryswick, " in Ian R. Christie, ed., *Essays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68, 172-195. (Originall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read 14 May 1931.)

Morineau, Michel, "Le balance du commerce franco-néerlandais et le resserrement économique des Provinces-Unies au X VIIIe siècle, "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X X X , 4, 1965, 170-233.

Morineau, Michel, "Y a-t-il eu une révolution agricole en France au X VIIIe siècle? , " *Revue historique*, CC X X X IX , 1, avr.-juin 1968, 299-326.

Morineau, Michel, "Gazettes hollandais et trésors américains, " *Anuario de historia económica y social*, II , 2, enero-dic. 1969, 289-361.
(a)

Morineau, Michel, "Histoire sans frontières: prix et 'révolution agricole', " *Annales E. S. C.*, X X IV , 2, mars-avr. 1969, 403-423.
(b)

Morineau, Michel, "En Hollande au X VIIe siècle, " in Jean-Jacques Hémardinquier, réd., *Pour une histoire de l'alimentation*, Cahiers des Annales, 28.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0, 107-114. (a)
(Originally in *Annales E. S. C.*, 1963.)

Morineau, Michel, "Post-scriptum. De la Hollande à la France, " in Jean-Jacques Hémardinquier, réd., *Pour une histoire de l'alimentation*,

Cahiers des Annales, 28.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0, 115-125.

(b)

Morineau, Michel, "Flottes de commerce et trafics français en Méditerranée au X^{VII}e siècle (jusqu'en 1669) ," *X^{VII}e siècle*, No. 86-87, 1970, 135-171. (c)

Morineau, Michel, "Bayonne et Saint-Jean-de-Lux, relais du commerce néerlandais vers l'Espagne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 *Actes du Quatre-Vingt-Quatorzièm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Pau 1969, II , Section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1, 309-330.

Morineau, Michel, "Quelques remarques touchant le financement de l'économie des Provinces-Unie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 paper at Cuarta Settimana di Studio,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Prato, 16 apr. 1972.

Morineau, Michel,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abondance monétaire aux Provinces-Unies, " *Annales E. S. C.*, X^{XIX}, 3, mai-juin 1974, 767-776.

Morineau, Michel, "Quelques recherches relatives à la balance du commerce extérieur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ou cette fois un égale deux, " in Pierre Léon, réd., *Aires et structures du commerce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Colloque National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Historiens Economistes, Paris, C. N. R. S., 4-6 oct. 1973. Lyon: Centr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Region Lyonnaise, 1975, 1-45.

Morineau, Michel, "La terre,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r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11-39. (a)

Morineau, Michel, “Le siècle,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r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63-106. (b)

Morineau, Michel, “Un siècle après la conquête: Les empires ibériques,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r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109-138. (c)

Morineau, Michel, “Les mancenilliers de l’Europe,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r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139-162. (d)

Morineau, Michel, “La ‘substitution’ aux Indes Orientales,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r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163-176. (e)

Morineau, Michel, “Jeune Amérique et vieille Afrique,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r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521-546. (f)

Morineau, Michel, "Le challenge Europe-Asie, " in Pierre Deyon & Jean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40*, Vol. II of Pierre Léon, éd.,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sociale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8, 547-579. (g)

Morineau, Michel, "Or brésilien et gazettes hollandaises,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X V , 1, janv.-mars, 1978, 3-60. (h)

Mörner, Magnus, "The Spanish American Hacienda: 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and Debat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II, 2, May 1973, 183-216.

Mousnier, Roland, "L'évolution des finances publiques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pendant les guerres de la Ligue d'Augsbourg et de la Succession d'Espagne, " *Revue historique*, X L I V , No. 205, janv.-mars 1951, 1-23.

Mousnier, Roland, *Les X V I e et X V I I e siècles*, 5^e ed., revue, corrigée et augmentée, Vol. IV of Maurice Crouzet, éd.,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67.

Mukherjee, Ramkrishn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Munck, Thoma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sition of Peasant Freeholders in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Denmark,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X V , 1, 1977, 37-61.

Munktel, Henrik, *Bergsmans-och Bruksförlag intill 1748 års Förlags-Förordning*. Uppsala, Sweden: Almqvist & Wiksells, 1934.

Murray, R. K., "The Anglo-Scottish Union, " *Scots Law Times*, Nov. 4, 1961, 161-164.

Myska, Milan, "Pre-Industrial Iron-Making in the Czech Lands, " *Past and Present*, No. 82, Feb. 1979, 44-72.

Nadal, J. & Giralt, E., *La population catalane de 1553 à 1717*. Paris: S. E. V. P. E. N., 1960.

Naish, G. P. B., "Ships and Shipbuilding,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471-500.

Nef, John U., *War and Human Progress: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s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Nef, John U., "Impact of War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 Bloomington, 1968.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3, 237-243.

Neguev, S., "Le Proche-Orient précapitaliste, " *Khamsin*, No. 2, 1975, 7-14.

Nelson, George H., "Contraband Trade under the Asiento, 1730-1739,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I , 1, Oct. 1945, 55-67.

Neto, Paulo Elpídio de Menezes, "Patrimonialisme rural et structure de domination au Brésil, à l'époque coloniale, " *Revista de ciências sociais*, IV, 1, 1973, 93-107.

Nettels, Curtis P., "The Manace of Colonial Manufacturing, " *New*

England Quarterly, IV, 2, Apr. 1931, 230-269. (a)

Nettels, Curtis P., "England and the Spanish American Trade, 1670-1775,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III, 1, Mar. 1931, 1-32. (b)

Nettels, Curtis P., "England's Trade with New England and New York, 1685-1720, " *Publications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X XVIII, Feb. 1933, 322-350.

Nettels, Curtis P., "British Mercantilism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2, Spring 1952, 105-114.

Nichtweiss, Johannes, "Zur Frage des zweiten Leibeigenschaft und des sogenannten preussischen Weges der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der Landwirtschaft Ostdeutschlands,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 5, 1953, 687-717.

Nichtweiss, Johannes, "Antwort an Jurgen Kuczynski,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I, 3, 1954, 471-476.

Nichtweiss, Johannes, "Zu strittigen Fragen der sogenannten zweiten Leibeigenschaft in Mitteleuropa: Zusammenfassung eines Artikels von Benedykt Zientara,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V, 4, 1956, 750-754.

Nichtweiss, Johannes, "Einige Bemerkungen zum Artikel von G. Heitz 'Zur Diskussion über Gutscherrschaft und Bauernlegen in Mecklenburg', "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V, 4, 1957, 804-817.

Nielsen, Axel, *Dän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Jena: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33.

Nordmann, Claude J., "Monnaies et finances suédoises au X^{VII}e siècle, " *Revue du Nord*, XLVI, No. 183, oct-déc. 1964, 469-488.

Nordmann, Claude J., *Grandeur et liberté de la Suède (1660-1792)*. Paris: Béatrice-Nauwelaerts, 1971.

Nordmann, Claude J., "L'armée suédoise au X^{VII}e siècle, " *Revue du nord*, LIV, No. 213, avr.-juin 1972, 133-147.

North, Douglass C.,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 Bloomington 1968.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3, 223-231.

North, Douglas C. & Thomas, Robert Paul,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Oberem, U., "Zur Geschichte des Lateinamerikanischen Landarbeiters: Conciertos und Huasipungueros in Ecuador, " *Anthropos*, LXII, 5/6, 1967, 759-788.

Ochmański, Jerzy,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sociale et la lutte de classes des paysans dans les domaines royaux (*Ekonomie*) de Kobryń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VI}-ième et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ième siècle, " *Roczniki dziejó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XIX, 1957, 89-90.

O'Farrell, Patrick, *Ireland's English Question*. New York: Schocken, 1971.

Ogg, David, "The Emergence of Great Britain as a World Power,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54-283.

Öhberg, Arne, "Russia and the World Marke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2, 1955, 123-162.

Ónody, Oliver, "Quelques aspects historiques de l'économie de l'or brésilien, "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 la banque*, IV, 1971, 173-316.

Ormrod, David, "Dutch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ecline and British Growth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36-43.

Ortiz, Fernando,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New York: Knopf, 1947.

Osborn, Wayne S., "Indian Land Retention in Colonial Metztitlá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II, 2, May 1973, 217-238.

Østerud, Øyvind, "Configurations of Scandinavian Absolutism: The 17th Centu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paper given at the ISSC/MSH Symposium on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tate in Europe, 16th-18th Centuries, " Bellagio, Oct. 14-16, 1976.

Østerud, Øyvind, “Agrarian Structures, Urban Network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Cases of Early Modern Scandinavia, ” paper at IX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Uppsala, August 14-19, 1978.

Ostrander, Gilman M., “The Colonial Molasses Trade, ” *Agricultural History*, X X X , 2, Apr. 1956, 77-84.

Ostrander, Gilman M., “The Making of the Triangular Trade Myth,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X X X , 4, Oct. 1973, 635-644.

Pach, Zsigmond Pál,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r Gutswirtschaft in Ungarn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X VII. Jahrhunderts, ” in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Aix-en-Provence, 1962.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5, 222-235.

Pach, Zsigmond Pal, “The Shift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outes in the 15th-17th Centuries, ” *Acta Histor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 IV , 1968, 287-321.

Pach, Zsigmond Pál, “Diminishing Share of East-Central Europe in the 17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Trade, ” *Acta Histor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 VI , 1970, 289-306. (a)

Pach, Zsigmond Pál, “The Role of East-Central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 ” in *Etudes historiques 1970. I* ,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70, 217-264. (b)

Pach, Zsigmond Pál, “Favourable and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Capitalist Growth: The Shif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outes in the 15th to 17th Centuries, ” in F. C. Lane, ed.,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 Bloomington, 1968.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3, 53-68.

Palmer, R. R., "Questions de féodalité aux Etats-Unis, " in *L'abolition de la "féodali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 N. R. S., Toulouse 12-16 nov. 1968. Paris: Ed. du C. N. R. S., I , 1971, 348-356.

Pantaleão, Olga, *A penetração comercial da Inglaterra na América Espankola de 1713 a 1783*. São Paulo: n. p., 1946.

Pares, Richard, "The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mpir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2, May 1937, 119-144.

Pares, Richard, *Yankees and Creoles: The Trade between North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56.

Pares, Richard, *Merchants and Plante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ement No.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ares, Richard, *War and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1739-63*. London: Frank Cass, 1963. (Original publication, 1936.)

Paris, Robert,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V : De 1600 à 1789, Le Levant*, gen. ed., Gaston Rambert. Paris: Lib. Plon, 1957.

Parker, Geoffrey,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arker, Geoffrey,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inance in Europe, "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History of Europe. II :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asgow: Collins, 1974, 527-594. (a)

Parker, Geoffrey, "War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Economic Costs of the Dutch Revolt, " paper at Sesta Settimana di Studio,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Prato, 3 magg. 1974. (b)

Parker, Geoffrey, "Why Did the Dutch Revolt Last Eighty Years? ,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X X VI, 1976, 53-72. (a)

Parker, Geoffrey,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A Myth? ,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L VIII, 2, June 1976, 195-214. (b)

Parry, J. 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Hegemony: 1415-1715*. New York: Harper & Row (Torchbooks) , 1961.

Parry, J. H., "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 " in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55-219.

Patterson, R., "Spinning and Weaving,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e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151-180.

Penson, Lillian M., "The West Indies and the Spanish American Trade, 1713-1748, " in J. Holland Rose *et al.*,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330-345.

Pentland, H. C., "Population and Labour Growth in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V: J. E. C. Eversley, ed., *Demography and History*.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2, 157-189.

Perjés, G., "Army Provisioning, Logistics 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 *Acta Histor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 VI, 1-2, 1970, 1-52.

Perrot, Jean-Claude, *Genèse d'une ville moderne: Caen au X VIIIe siècle*. Lille: Service de reproduction des thèses, Univ. de Lille III, 2 vol. 1974.

Petersen, E. Ladewig, *The Crisis of the Danish Nobility, 1580-1660*. Odense, Denmark: Odense Univ. Press, 1967.

Petersen, E. Ladewig, "La crise de noblesse danoise entre 1580 et 1660, " *Annales E. S. C.*, X X III, 6, nov.-déc. 1968, 1237-1261.

Petersen, E. Ladewig, "The Danish Cattle Trade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VIII, 1, 1970, 69-85.

Peterson, Mendel, *The Funnel of Gold*. Boston: Little-Brown, 1975.

Petraccone, Claudia, *Napoli dal 1500 all'800: problemi di storia demografica e sociale*. Napoli: Guida Ed., 1974.

Petrie, Sir Charles, *The Jacobite Movement*, 3rd ed., revised one volume.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8.

Phelan, John L., "Free Versus Compulsory Labor.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 1540-1648,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 , 2, 1959, 189-201.

Phelan, John L., *The 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panish Aims and Filipino Responses, 1565-1700*.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Phelan, John L., review of John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 II : *Spain and America, 1598-1700*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I , 2, Nov. 1970, 211-213.

Piel, Jean, *Capitalisme agraire au Pérou. I : Originalité de la société agraire péruvienne au X IXe siècle*. Paris: Ed. Anthropos, 1975.

Pillorget, René, "Les problèmes monétaires français de 1602 à 1689, " *X VIIe siècle*, No. 70-71, 1966, 107-130.

Pillorget, René, *Les mouvements insurrectionnels de Provence entre 1596 et 1715*. Paris: Ed. A. Pedone, 1975.

Pinkham, Lucille, "William of Orange: Prime Mover of the Revolution, " in Gerald M. Straka, ed., *The Revolution of 1688: Whig Triumph or Palace Revolution?* Boston: D. C. Heath, 1963, 77-85.
(Originally in *William III and the Respectable Revolution*, 1954.)

Pirenne, Henri, *Histoire de Belgique*, Vols. IV , V . Bruxelles: Henri Lamertin, Libr.-Ed., 1920.

Pitt, H. G., "The Pacification of Utrecht,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46-479.

Piuz, Anne-Marie, "Politique économique à Geneve et doctrine mercantiliste (vers 1690-1740) ," paper delivered at 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nomic History, Leningrad, 10-14 Aug. 1970. (a)

Piuz, Anne-Marie, "Alimentation populaire et sous-alimentation au X VIIe siècle: Le cas de Genève et sa région, " in Jean-Jacques Hémardinquier, éd., *Pour une histoire de l'alimentation*.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0, 129-145. (Originally in *Revue suisse d'histoire*, 1968.)

Plumb, J. H.,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15)* , Vol. 7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Penguin, 1950.

Plumb, J. H., "Introduction, " to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New York: Knopf, 1965, x iii- x x vi.

Plumb, J. H., *The First Four Georges*. Glasgow: Fontana Collins, 1966.

Plumb, J. H.,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England, 1675-1725*. Boston: ,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1967.

Plumb, J. H., "The Growth of the Electorate in England from 1600 to 1715, " *Past and Present*, No. 45, Nov. 1969, 90-116.

Pohl, Hans, "Das Textilgewerbe in Hispanoamerika während der Kolonialzeit,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VI, 4, Dez. 1969, 438-477.

Poisson, Jean-Paul, "Introduction à une étude quantitative des effets socio-économiques du système de Law, "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115^e année, No. 3, 3^e trimestre 1974, 260-280.

Poitrineau, Abel, "L'alimentation populaire en Auvergne au X VIII^e siècle, " in Jean-Jacques Hémandinquier, éd., *Pour une histoire de l'alimentation*.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70, 146-193. (Originally in *Annales E. S. C.*, 1962.)

Polišenský, J. V., "The Thirty Years' War, " *Past and Present*, No. 6, Nov. 1954, 31-43.

Polišenský, J. V.,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Crises and Revolutions of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 *Past and Present*, No. 39, Apr. 1968, 34-43.

Polišenský, J. V., *The Thirty Years' War*.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olisensky, J. V.,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618-16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8.

Poni, Carlo, "All'origine del sistema di fabbrica: tecnologia e organizzazione produttiva dei mulini da seta n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sec. X VII-X VIII) ,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 X X X VIII, 3, 1976, 444-497.

Ponsot, Pierre, "En Andalousie occidentale: Les fluctuations de la production du blé sous l'Ancien Régime, " *Etudes rurales*, No. 34, avr.-juin 1969, 97-112.

Postel-Vinay, Gilles, *La rente foncière dans le capitalisme agricole*.

Paris: Maspéro, 1974.

Price, Derek J., "The Manufacture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from c1500-c1700,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620-647.

Price, Jacob M., "The Rise of Glasgow in the Chesapeake Tobacco Trade, 1707-1775,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I, 2, Apr. 1954, 179-199.

Price, Jacob M., "Multilateralism and/or Bilateralism: The Settlement of British Trade Balances with 'The North', c170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V, 2, 1961, 254-274. (a)

Price, Jacob M., "The Tobacco Adventure to Russia: Enterpri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Quest for a Northern Market for English Colonial Tobacco, 1676-1722, "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 s., L I, 1, Mar. 1961. (b)

Price, Jacob M.,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hesapeake and the European Market, 1697-1775,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V, 4, Dec. 1964, 496-511.

Prickler, Harald, "Das Volumen des westlichen ungarischen Aussenhandels vorn 16. Jahrhundert bis 1700, " in O. Pickl, her.,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Grazer Forschungen zur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I. Graz: 1971, 131-144.

Priestley, Margaret, "Anglo-French Trade and the 'Unfavorable Balance' Controversy, 1600-168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1, 1951, 37-52.

Procacci, Giulio, "Italy: Commentary",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27-28.

Quencez, G., *Vocabularum geographicum*. Bruxelles: Presses Académiques Européennes, 1968.

Rabb, Theodore K., "Puritanism and the Rise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England, " review article,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I, 1, 1962, 46-67. (a)

Rabb, Theodore K., "The Effect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on the German Economy,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IV, 1, Mar. 1962, 40-51. (b)

Rabb, Theodore K., "Sir Edwin Sandys and the Parliament of 1604,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X, 3, Apr. 1964, 646-670.

Rabb, Theodore K., "Free Trade and the Gentry in the Parliament of 1604, " *Past and Present*, No. 40' 1968, 165-173.

Rabb, Theodore K., *The Struggle for St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5.

Rabe, Hannah, "Aktienkapital und Handelsinvestitionen im Überseehandel des 17. Jahrhunderts,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X, 3, 1962, 320-368.

Rachel, Hugo, *Die Handels-, Zoll-und Akzisepolitik Brandenburg-Preussens bis 1713*. Acta Borussica. Die einzelnen gebilde des verwaltung. Handels-, Zoll-und Akzisepolitik, I , Berlin: P. Parey, 1911.

Rambert, Gaston, “De 1660 à 1789, ” in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IV: *De 1599 à 1789*, gen. ed., Gaston Rambert. Paris: Lib. Plon, 1954, 193-683.

Rambert, Gaston, “Préface” to Robert Paris,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V : *De 1660 à 1789, Le Levant*. Paris: Lib. Plon, 1957, i -vi.

Rambert, Gaston, “La France et la politique de l’Espagne, au X VII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 oct.-déc. 1959, 269-288.

Rapp, Richard Tilden, “The Unmak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Hegemony: International Trade Rivalry and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V , 3, Sept. 1975, 499-525.

Rapp, Richard Tilden, *Industry and Economic Decline in Seventeenth-Century Ven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76.

Raychaudhuri, Tapan, *Jan Company in Coromandel, 1605-1690. A Study in the Interrelations of European Commerce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s*, Verhandelingen van het 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 38.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62.

Reddaway, W. F., “The Scandinavian North, ” in A. W. Ward et al., eds.,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The Thirty Years’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6, 560-591.

Redlich, Fritz,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L X X V , 1955, 59-106.

Redlich, Fritz, "Contributions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2, 1959, 247-254.

Reed, Clyde G., "Transactions Costs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Seventeenth-Century Western Europ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III, 1, Mar. 1973, 177-190.

Rees, J. F., "The Phases of Britis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a*, V , No. 14, June 1925, 130-150.

Rees, J. F., "Mercantilism and the Colonies, " in J. Holland Rose *et al.*,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561-602.

Reinhard, Marcel R. & Armengaud, Armand,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Paris: Ed. Montchrestien, 1961.

Renier, G. J., *The Dutch Na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1944.

Revah, I. S., "Les marranes, "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3^e ser., I (C X VIII) , 1959-1960, 29-77.

Rieh, E. E., "The First Earl of Shaftsbury's Colonial Policy,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VII, 1957, 47-70.

Rieh, E. E.,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 : F. L. Carsten, ed.,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8-8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330-368.

Rich, E. E., *Montreal and the Fur Trade*. Montreal: McGill Univ. Press, 1966.

Rich, E. E., "Colonial Settlement and Its Labour Problems, " in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308-373.

Richet, Denis, "Croissance et blocages en France du X V e au X VIII 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 X III, 4, juil.-août 1968, 759-787.

Richet, Denis,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Setbacks in Franc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Marc Ferro, ed., *Social Historians in Contemporary Fra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180-211. (Translated from *Annales E. S. C.*, 1968.)

Richmond, Vice-Admiral Sir H., *National Policy and Naval Strength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28.

Riemersma, Jelle C., "Government Influence on Company Organization in Holland and England (1550-1650) ,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X , 1950, 31-39.

Riley, P. W. J., "The Union of 1707 as an Episode in English Politics,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X IV, No. 332, July 1969, 498-527.

Ringrose, D. R.,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Comments on the

North-Thomas Theo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 2, May 1973, 285-292.

Robert, Daniel, “Louis XI V et les protestants, ” *X VIIe siècle*, No. 76-77, 1967, 39-52.

Roberts, Michael, *Gustavus Adolphus*, 2 vol.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53, 1958.

Roberts, Michael, “Cromwell and the Baltic,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VI, No. 300, July 1961, 402-446.

Roberts, Michael, “Queen Christina and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ast and Present*, No. 22, July 1962, 36-59.

Roberts, Michael, “Charles XI, ” in *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226-268. (Originally in *History*, 1965.)

Roberts, Michael, “Sweden and the Baltic, 1611-54,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 P. 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9/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85-410.

Roberts, Michael, “Introduction, ” in M.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1-19.
(a)

Roberts, Michael, “The Swedish Church, ” in M.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132-173. (b)

Roebuck, P., "Absentee Landownership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A Neglected Factor in English Agrarian History, "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 XI, 1, 1973, 1-17.

Roehl, Richard,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A Reconsideration,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III, 3, July 1976, 233-281.

Roessingh, H. K., "Inland Tobacco: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a Cash Crop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the Netherlands, " *A. A. G. Bijdragen*, No. 20, 1976, 498-503.

Romano, Ruggiero, "Documenti e prime considerazioni intorno alla 'Balance du commerce' della Francia dal 1716 al 1780,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i*, II. Milano: Istituto Edit. Cisalpino, 1957, 1265-1300.

Romano, Ruggiero, "Une économie coloniale: le Chili au X 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 V, 2, mars-avr. 1960, 259-285.

Romano, Ruggiero, "Tra X VI e X 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 X X IV, 3, 1962, 480-531.

Romano, Ruggiero, "L'Italia nella crisi del secolo X VII, " *Studi storici*, IX, 3-4, lugl.-dic. 1968, 723-741.

Romano, Ruggiero, "Sens et limites de l' 'industrie' minière en Amérique espagnole du X VIe au X VIIIe siècle, "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LIX, 1970, 129-143.

Romano, Ruggiero, "L'Italia nella crisi del secolo X VII, " in *Tra due crisi: L'Italia del Rinascimento*. Torino: Piccola Bibl. Einaudi, 1971,

186-206. (Originally in *Studi storici*, 1968.)

Romano, Ruggiero, "Italy in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Peter Earle, ed.,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185-198. (Translated from *Studi storici*, 1968.)

Romero de Solís, Pedro, *La población española en los siglos X VIII y XI X*. Madrid: Siglo X XI de España, 1973.

Roorda, D. J., "The Ruling Classes in Hol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Groningen: J. B. Wolters, 1964, 109-132.

Roorda, D. J., "Party and Faction,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I, 1967, 188-221.

Roos, Hans-Edvard, "Origin of Swedish Capitalism, " *Economy and History*, XI X, 1, 1976, 49-65.

Rosén, Jerker, "Scandinavia and the Baltic,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 F. L. Carsten, ed.,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8-8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519-42.

Rosenberg, Hans,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58.

Roseveare, Henry, *The Treasury: The Evolution of a British Instit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9.

Roseveare, Henry, "Government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Market in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 Ottava VIII. Settimana di Studio,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Prato, 8 magg. 1976.

Rostworowski, Emanuel, "The Crisis of Sovereignty (1697-1763) , " in A. Gieysztor *et al.*, *History of Poland*. Warszawa: PWN, 1968, 313-337.

Rowen, Herbert H., "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 The *Coup d'Etat* of 1650 in Holland, "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IV, 2, Oct. 1974, 99-117.

Rubini, Dennis, "Politics and the Battle for the Banks, 1688-1697,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X V, No. 337, Oct. 1970, 693-714.

Ruiz Martin, Felipe, "La banca en España hasta 1782, " in F. Ruiz Martín *et al.*, *El banco de España: Una historia económica*. Madrid: Banco de España, 1970, 1-196.

Rule, John C., "Louis X IV, Roi-Bureaucrate, " in John C. Rule, ed., *Louis X IV and the Craft of Kingship*.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1969, 3-101.

Rusche, G.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39.

Rusiński, Władysław, "Hauptprobleme der Fronwirtschaft im 16. bis 18, Jhd. in Polen und den Nachbarländern, "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August 1960. *Contributions*.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0, 415-423.

Rusinski, Władysław, "Strukturwandlungen der bäuerlichen Bevölkerung Polens im 16.-18. Jahrhundert, " *Studia Historiae Oeconomicae*, VII, 1972, 99-119.

Rusiński, Władysław, "Über die Entwicklungsetappen der Fronwirtschaft in Mittel-und Osteuropa, " *Studia Historiae Oeconomicae*, IX, 1974, 27-45.

Rutkowski, Jan, "Le régime agraire en Pologne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XIV, 4, 1926, 473-505; XV, 1, 1927, 66-103. (a)

Rutkowski, Ja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ologne avant les partages*. Paris: H. Champion, 1927. (b)

Ruwet, Joseph, "Prix, production et bénéfices agricoles. Le pays de Liège au XVIIIe siècle, " *Cahiers d'histoire des prix*, II, 1957, 69-108.

Saalfeld, Diedrich, *Bauernwirtschaft und Gutsbetrieb in der vorindustriellen Zeit*.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60.

Sagnac, Philippe, "Le crédit de l'Etat et les banquiers à la fin du XVIIe et au commencement d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No. 4-5, juin-juil. 1908, 257-272.

Salaman, Redcliffe N., *The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9.

Salin, Edgar, "European Entrepreneurship,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4, Fall 1952, 366-377.

Salmon, J. H. M., "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 *Past and Present*, No. 37, July 1967, 21-43.

Samuelsson, Kurt, *From Great Power to Welfare State*.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1968.

Sandberg, Lars S., "Monetary Policy and Politics in Mid-Eighteenth Century Sweden: A Com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 3, Sept. 1970, 653-654.

Sayous, André-E., "L'affaire de Law et les Gènevois, " *Zeitschrift für schweizerische Geschichte*, X VII, 3, 1937, 310-340.

Scammell, G. V., "Shipowning in the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 *Historical Journal*, X V , 3, 1972, 385-407.

Scelle, Georges, "The Slave-Trade in the Spanish Colonies of America: the Assiento,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IV , 3, July 1910, 612-661.

Schmoller, Gustav,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ew York: MacMillan, 1897. (Reprinted Augustus M. Kelley Publ., 1967) .

Schöffler, Ivo, "Did Holland's Golden Age Coincide With a Period of Crisis?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 , 1966, 82-107.

Schöffler, Ivo,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2nd rev. ed.

Amsterdam: Allert de Lange bv, 1973.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1943.

Schwartz, Stuart B., "The Mocambo: Slave Resistance in Colonial Bahia,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III, 4, Summer 1970, 313-333.

Schwartz, Stuart B., "Free Labor in a Slave Economy: The *Lavradores de Cana* of Colonial Bahia, " in Dauril Alden, ed., *Colonial Roots of Modern Brazil*.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47-197.

Schwartz, Stuart B., "The Manumission of Slaves in Colonial Brazil: Bahia, 1684-1745,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VII, 4, Nov. 1974, 603-635.

Scoville, Warren C., "The Huguenots an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 4, Aug. 1952, 294-311; LX, 5, Oct. 1952, 392-411.

Scoville, Warren C., *The Per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 1680-1720*.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Sée, Henri, "Remarques sur le caractère de l'industrie rurale en France et les causes de son extension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CXLII, 1, janv.-févr. 1923, 47-53.

Seeley, J. A.,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ed. by John Gross. Chicago, Illinoi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83.)

Sella, Domenic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Venetian Woollen Industry, " in Brian Pullan, 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8, 106-126.

Sella, Domenico,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 A Reappraisal,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 3, Spring-Summer 1969, 235-253.

Sella, Domenico, "European Industries, 1500-1700, " in C. M. Cipolla, ed.,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I, Glasgow: Collins, 1974, 354-412.

Sella, Domenico, "The Two Faces of the Lombard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11-15.

Semo, Enrique, *Historia del capitalismo en México: Los orígenes/1521-1763*. Mexico City: Ed. Era, 1973.

Sereni, Emilio, *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 Bari, Italy: Laterza, 1961.

Sheridan, Richard B., "The Molasses Act and the Market Strategy of the British Sugar Planter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I, 1, 1957, 62-83.

Sheridan, Richard B., "The Wealth of Jama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II, 2, Aug. 1965, 292-311.

Sheridan, Richard B., "The Wealth of Jama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Rejoinde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n, X XI, 1, Apr. 1968, 46-61.

Sheridan, Richard B., "The Plant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625-1775, " *Caribbean Studies*, IX, 3, Oct. 1969, 5-25.

Sideri, S., *Trade and Power: Informal Colonialism in Anglo-Portuguese Relations*. Rotterdam: Rotterdam Univ. Press, 1970.

Silbert, Albert, "Un carrefour de l'Atlantique: Madère (1640-1820) , " *Economias e Finanças*, ser. 2, X XII, 1954, 389-443.

Simiand, François, *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ue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 Paris: Lib. Felix Alcan, 1932. (a)

Simiand, François, *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e mouvement général des prix du 16e au 19e siècle*. Paris: Ed. Domat-Montchrestien, 1932. (b)

Simpson, Leslie Boyd, "Mexico's Forgotten Century,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 XII, 2, May 1953, 113-121.

Singh, O. P., *Surat and its Trad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Delhi: Univ. of Delhi, 1977.

Skazkine, S., "Sur la genèse du capitalisme dans l'agriculture de

l'Europe occidentale, ”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No. 37, *Le féodalisme*, mai-juin 1963, 191-202.

Slicher van Bath, B. H., “Agriculture in the Low Countries (ca. 1600-1800)”,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Roma, 4-11 settembre 1955. *Relazioni,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G. C. Sansoni-Ed., 1955, 169-203.

Slicher van Bath, B. H., “The Rise of Intensive Husbandry in the Low Countries,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0, 130-153.

Slicher van Bath, B. 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 D. 500-1850*. London: Edw. Arnold, 1963. (a)

Slicher van Bath, B. H., “Yield Ratios, 810-1820, ” *A.A.G. Bijdragen*, No. 10, 1963. (b)

Slicher van Bath, B. H., “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préindustrielle en Europe occidentale: Une orientation et un programme, ” *A. A. G. Bijdragen*, No. 12, 1965, 3-46. (a)

Slicher van Bath, B. H., “Die europäische Agrarverhältnisse im 17. und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 *A. A. G. Bijdragen*, No. 13, 1965, 134-148. (b)

Slicher van Bath, B. H., “Eighteenth-Century Agriculture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I, 1, Jan. 1969, 169-179.

Slicher van Bath, B. H., “Agriculture in the Vital Revolution,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2-132.

Sluiter, Engel, "Dutch-Spanish Rivalry in the Caribbean Area, 1594-1609,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VIII, 2, May 1948, 165-196.

Smelser, Neil J.,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9.

Smit, J. W., "The Netherlands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n Europe and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68, 13-36.

Smit, J. W., "Holland: Commentary,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W.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61-63.

Smith, C. T.,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 London: Longmans, 1967.

Smout, T. C., "The Development and Enterprise of Glasgow, 1556-1707, "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II, 3, 1960, 194-212.

Smout, T. C., *Scottish Trade on the Eve of the Union, 1660-1707*.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63.

Smout, T. C., "Scottish Landowners and Economic Growth, 1650-

1850, ”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I, 1, Feb. 1964, 218-234. (a)

Smout, T. C., “The Anglo-Scottish Union of 1707. I :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3, Apr. 1964, 455-467. (b)

Smout, T. C. & Alexander Fenton, “Scottish Agriculture Before the Improvers—An Exploration, ”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III, 2, 1965, 73-93.

Sombart, Werner, “Hausindustrie, ”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 1900, IV, 1138-1169.

Soom, Arnold, “Der Kampf der baltischen Städte gegen das Fremdkapital im 17. Jahrhundert,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X, 4, 1962, 433-458.

Spengler, Joseph, J., “Mercantilist and Physiocratic Growth Theory, ” in Bert F. Hoselitz, ed.,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3-64.

Sperling, J.,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Mechanis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XIV, 3, 1962, 446-468.

Spiesz, Anton, “Czechoslovakia’s Place in the Agrarian Development of Middle and East Europe of Modern Times, ” *Studia Historica Slovaca*, VI, 1969, 7-62.

Spooner, Frank C., *L'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 1493-168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56.

Spooner, Frank C., "The European Economy, 1609-50,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V: J. P. Cooper, ed.,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67-103.

Stark, Werner, "Die 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se der gutsherrlichen Bauern Böhmens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 *Jahrbu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IV**, 4, Juli 1952, 270-92; 5, Sept. 1952, 348-374.

Steensgaard, Niel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aper delivered at 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Moscow, Aug. 16-23, 1970.

Stefanescu, St., Mioc, D. & Chirca, H., "L'évolution de la rente féodale en travail en Valachie et en Moldavie aux XIV^e-XVIII^e siècles, " *Revue roumaine d'histoire*, I, 1, 1962, 39-60.

Stoianovich, Traian, "Pour un modèle du commerce du Levant: Economie concurrentielle et économie de bazar, 1500-1800, "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tudes du Sud-Est Européen*, XII, 2, 1974, 61-120.

Stols, E., "The Southern Netherland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Dutch East and West India Companies,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X, 1976, 30-47

Stone, Lawrence,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 *Past*

and Present, No. 33, Apr. 1966, 16-55.

Stone, Lawrence, "Literacy &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 1969, 69-139.

Stone, Lawrenc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Stork-Penning, J. G., "The Ordeal of the States—Some Remarks on Dutch Politics During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 *Acta Historiae Neelandica*, II, 1967, 107-141.

Stoye, J. W., "The Austrian Habsburgs,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572-607. (a)

Stoye, J. W., "Armies and Navies. 2. Soldiers and Civilians,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762-790. (b)

Stradling, R. A., "Seventeenth Century Spain: Decline or Survival? , "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IX, 2, Apr. 1979, 157-194.

Strong, Frank, "The Causes of Cromwell's West Indian Expedi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V, 2, Jan. 1899, 228-245.

Supple, Barry E., "Thoman Mun and the Commercial Crisis, 1623, "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X X VII, No. 75, May 1954, 91-94.

Supple, Barry E., "Currency and Commerc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2, 1957, 239-255.

Supple, Barry E.,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4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Supple, Barry E., "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Glasgow: Collins, 1973, 301-357.

Supple, Barry E.,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94-461.

Sutherland, Lucy 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Eighteenth Century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Sutherland, Lucy S. "The City of London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s, " in Richard Pares & A. J. P. Taylor, eds.,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Lewis Namier*. London: Macmillan, 1956, 49-74.

Swart, K. W., "Holland's Bourgeoisie and the Retarde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44-48.

Sweezy, Paul, "Karl Marx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7-146. (a) (Originally in Robert V. Eagly, ed., *Events*,

Ideology and Economic Theory, 1968.)

Sweezy, Paul, "Marx and the Proletariat, " in *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47-165.

(b) (Originally in *Monthly Review*, 1967.)

Symcox, Geoffrey, *The Crisis of the French Sea Power 1688-1697. From the Guerre d'Escadre to the Guerre de Cours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Szczygielski, Wojciech, "Le rendement de la production agricole en Pologne du X^{VI}e au X^{VII}e siècle sur le fond européen, " *Ergon*, V, supplement to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ej*, X^{IV}, 4, 1966, 745-803.

Szczygielski, Wojciech, "Die ökonomische Aktivität des polnischen Adels im 16.-18. Jahrhundert, " *Studia Historiae Economicae*, II, 1967, 83-101.

Takahashi, H. K.,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Sweezy-Dobb Controversy, " *Science and Society*, X^{VI}, 4, Fall 1952, 313-345.

Tapié, Victor-Lucien, "Les officiers seigneuriaux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X^{VII}e siècle, " *X^{VII}e siècle*, Nos. 42-43, 1^{er} trimestre 1959, 118-140.

Tapié, Victor-Lucien, "Quelques aspects généraux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ouis X^{IV}, " *X^{VII}e siècle*, Nos. 46-47, 1^{er}-2^e trimestres 1960, 1-28.

Tapié, Victor-Luci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New York: Praeger, 1971.

Tawney, R. H.,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review of M. H.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3, 1950, 307-316.

Taylor, A. J. P.,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46.

Taylor, George V., "Types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I X, No. 312, July 1964, 478-497.

Taylor, Harland, "Trade, Neutrality and the 'English Road', 1630-1648,"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 2, May 1972, 236-260.

Tazbir, Janusz, "Recherches sur la conscience nationale en Pologne au X VIe siècle,"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14, 1966, 5-22.

Tazbir, Janusz, "The Commonwealth at the Turning Point (1586-1648)," in A. Gieysztor *et al.*, *History of Poland*. Warszawa: PWN, 1968, 208-241. (a)

Tazbir, Janusz,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Years of Crisis (1648-1696)," in A. Gieysztor *et al.*, *History of Poland*. Warszawa: PWN, 1968, 242-312. (b)

Temperley, Harold W. V., "The Age of Walpole and the Pelhams,"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40-89. (a)

Temperley, Harold W. V., "The Causes of the War of Jenkins' Ear, 1739,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rd ser., III, 1909, 197-236. (b) (Reprinted in Ian R. Christie, ed., *Essays in Modern History*, 1968.)

Temperley, Harold W. V., "Foreword" to Jean O. McLachlan, *Trade and Peace with Old Spain, 1667-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 ix-x i .

Teuteberg, H. J.,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and Industrialization, " in Elborg & Robert Forster, eds., *European Diet from Pre-Industrial to Modern Times*. New York: Harper & Row (Torchbooks) , 1975, 61-109.

Thirsk, Joan, "The Restoration Land Settlement,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X VI, 4, Dec. 1954, 315-328.

Thirsk, Joan,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 "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70-88.

Thirsk, Joan, "Sevemeenth-Century Agri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 VIII, 1970, Supplement: Joan Thirsk, ed., *Land, Church and People*, 148-177.

Thirsk, Joan, "New Crops and Their Diffusion: Tobacco-grow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 in C. W. Chalklin & M. A. Havinden, eds., *Rural Change and Urban Growth. 1500-1800*. London: Longmans, 1974, 76-103.

Thirsk, Joan, *The Restoration*. London: Longmans, 1976.

Thomas, P. J., *Mercantilism and the East India Trade*. London: Frank Cass, 1963.

Thomas, Robert Paul, "The Sugar Colonies of the Old Empire: Profit or Loss for Great Britain? ,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I, 1, Apr. 1968, 30-45.

Thompson, E. P.,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 *Past and Present*, No. 38, Dec. 1967, 56-97.

Thompson, E. P.,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Act*. New York: Pantheon, 1975.

Thompson, F. M. L.,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X, 3, Dec. 1966, 505-517.

Thomson, Mark A.,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 J. O. Lindsay, ed.,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416-439.

Tilly, Charle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5, 3-83.

Tomkiewicz, Władysław, "Varsovie au X VIIe siècle,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15, 1967, 39-64.

Tonnesson, Kåre D., “Les pays scandinaves, ” in *L’abolition de la “féodali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 N. R. S., Toulouse 12-16 nov. 1968. Paris: Ed. du C. N. R. S., I , 1971, 303-313 (plus Discussion, II , 719-721) .

Topolska, Maria Barbara, “Peculiarities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Eastern White Russia in the Sixteenth-Eighteenth Centuries, ” *Studia Historiae Oeconomicae*, VI, 1971, 37-49.

Topolski, Jerzy, “Les tendances de l’évolution agraire de l’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aux X VIe- X VIIIe siècles, ” *Rivista di storia dell’agricoltura*, VII, 2, giug. 1967, 107-119.

Topolski, Jerzy, “L’économie rurale dans les biens de l’archévêché de Gniezno depuis le 16e jusqu’au 18e siècle, ”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No. 63-64, 2e et 3e trimestre, 1970, 86-98.

Topolski, Jerzy, “La reféodalisation dans l’économie des grands domaines en 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X VIe- X VIIIe ss.) , ” *Studia Historiae Oeconomicae*, VI, 1971, 51-63.

Topolski, Jerzy, “Economic Decline in Poland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 in Peter M. Earle, ed.,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127-142. (a) (Translated from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1962.)

Topolski, Jerzy, “The Manorial Serf Econom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 *Agricultural History*, XLVIII, 3, July 1974, 341-352. (b)

Topolski, Jerzy, “Commerce des denrées agricoles et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e la zone baltiqu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X X IX, 2, mars-avr. 1974, 425-436. (c)

Torr, Dona, “The English Revolution, I , ” *Labour Monthly*, X X III, 2, Feb. 1941, 90-92.

Tremel, Ferdinand,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 zwischen 1620 und 1740, ” *Österreich in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1961, V , 166-181.

Treue, Wilhelm,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vom 16. bis zum 18. Jahrhundert, ” in Bruno Gebhardt, her.,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I :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zum Ende des Absolutismus*, 8th rev. ed. Stuttgart: Union Verlag, 1955, 366-436.

Treue, Wilhelm, “Das Verhältnis von Fürst, Staat und Unternehmer in der Zeit des Merkantilismus,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 L IV, 1, 1957, 26-56.

Treue, Wilhelm,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und Technik in Deutschland von 16. bis zu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4.

Trevelyan, George Macauley, “The Revolution as a Movement for Democratic Unification, ” in Gerald M. Straka, ed., *The Revolution of 1688: Whig Triumph or Palace Revolution?* Boston: D. C. Heath, 1963, 43-49. (Originally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 1938.)

Trevor-Roper, Hugh R.,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 ” *Past and Present*, No. 16, Nov. 1959, 31-66.

Trevor-Roper, Hugh R., “Scotland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 ” in

H. E. Bell & R. L. Ollard, eds., *Historical Essays 1600-1750 presented to David Ogg*.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4, 78-130.

Trevor-Roper, Hugh R., "The Union of Britain in the 17th Century, " in *Homenaje a Jaime Vicens Vives*. Barcelon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1967, II, 703-715.

Tucker, G. S. L., "English Pre-Industrial Population Trend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2, Dec. 1963, 205-218.

Unger, Richard W., *Dutch Shipbuilding Before 1800*. Assen/Amsterdam: Van Gorcum, 1978.

Unger, W. S., "Trade Through the Sou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2, Dec. 1959, 206-221.

Unwin, Georg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4.

Usher. Abbott Payson, *The History of the Grain Trade in France, 1400-1710*.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Vol. IX.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 Press, 1913.

Usher, Abbott Payson, "The Growth of English Shipping, 1572-1922,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LII, 3, May 1928, 465-478.

Usher, Abbott Payson, "Machines and Mechanisms,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500-c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324-346.

Utterström, Gustav, "An Outline of Some Population Changes in Sweden ca. 1660-1750 and a Discussion of Some Current Issues, " in D. V. Glass &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 Arnold, 1965, 536-548.

Vandenbroeke, Chr., "Cultiv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otato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V, 1971, 15-39.

Van der Wee, H., "Introduction—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Low Countries as Revealed by the Tithe and Rent Statistics, 1250-1800, " in H. van der Wee & E. van Cauwenberghe, eds., *Productivity of Land and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250-1800)*. Leuven: Leuven Univ. Press, 1978, 1-23.

Van der Woude, A. M., "Discussion, " in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V: J. E. C. Eversley, ed., *Demography and History*.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2, 232-234.

Van der Woude, A. M., "The A. A. G. Bijdragen and the Study of Dutch Rural Histor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V, 1, Spring 1975, 215-241.

Van der Woude, A. M. & Mentink, G. J., "La population de Rotterdam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 *Population*, X XI, 6, Nov.-Dec. 1966, 1165-1190.

Van Dijk, H. & Roorda, D. J., "Social Mobility under the Regents of the Republic, " *Acta Histriae Neerlandica*, IX, 1976, 76-102.

Van Dillen, J. G., “Stukken betreffende den Amsterdamschen graanhandel omstreeks het jaar 1681, ”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III, 1917, 70-106.

Van Dillen, J. G., “Eenige stukken aangaande den Amsterdamschen graanhandel in de tweede helfte der zeventiende eeuw, ”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IX, 1923, 221-230.

Van Dillen, J. G., “Amsterdam, marché mondial des métaux précieux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51^e année, CL II, 2, juil.-aôut 1926, 194-201.

Van Dillen, J. G., “Amsterdam’s Ro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Politics and its Economic Background,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I. Groningen: J. B. Wolters, 1964, 133-147.

Van Dillen, J.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rade in the Netherlands, 1650-1750, ” in Peter Earle, ed.,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199-211. (a) (Translated from *Van rijkdom en regen ten: handboek tot de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 tijdens de republiek*, 1970.)

Van Dillen, J. G., “La banque de changes et les banquiers privés à Amsterdam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Mouton, V, 1974, 177-185.
(b)

Van Hoboken, W. J., “Th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its Rise and Decline,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0, 41-61.

Van Houtte, Jean A., “Déclin et survivance d’Anvers (1550-1700) ,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Evi moderno e contemporane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2, 703-726.

Van Klaveren, Jacob, *General Economia History, 100-1760*. München: Gerhard Kieckens, 1969. (a)

Van Klaveren, Jacob, “Fiscalism, Mercantilism and Corruption, ” in D. C. Coleman, ed.,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140-161. (b) (Translated from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0.)

Van Veen, Joh., *Dredge, Drain, Reclai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0.

Várkonyi, Ágnes R., “Historical Personality, Crisis and Progress in 17th Century Hungary, ” *Etudes historiques, 1970*, publiées à l’occasion du VI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par la Commission National des Historiens Hongroi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70, 295-299.

Veenendaal, A. J.,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in Europe,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 J. S. Bromley, ed.,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10-445.

Ventura, Angelo, “Considerazioni sull’agricoltura veneta e sulla accumulazione originaria del capitale nei secoli X VI e X VII, ” *Studi*

storici, IX, 3-4, lugl.-dic. 1968, 674-722.

Verlinden, Charles, "Schiavitù ed economia nel mezzogiorno agli inizi dell'età moderna, " *Annali del mezzogiorno*, III, 1963, 11-38.

Verlinden, Charles, "Amsterdam, " in Amintore Fanfani, red., *Città mercanti doctrine nell'economia europea dal IV al XVIII secolo*. Milano: Dott. A. Giuffrè-Ed., 1964, 321-340.

Verlinden, Charles, "Les conditions de l'introduction et de l'abolition du régime féodal dans les deux Amériques, " in *L'abolition de la "féodali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 N. R. S., Toulouse 12-16 nov. 1968. Paris: Ed. du C. N. R. S., I, 1971, 341-348.

Verlinden, Charles, "Dal Mediterraneo all'Atlantico, " in *Contributi per la storia economica*. Prato: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 Datini", 1975, 27-51.

Viana, Luis Filho, "O trabalho do engen ho e a reacção do Indio— Estabelecimento de escravatura africans, " in *Congresso do Mundo Portugues*, X, Lisboa: Publicações Lisboa, 1940, 11-29.

Vicens Vives, Jaime,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Spain*, 2nd ed.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Vignols, Léon, "L'ancien concept monopole et la contrebande universelle, I. Le 'commerce interlope' français, à la mer du sud, aux débuts du XVIIIe siècle, type de ce contrebande. Et textes inédits sur ce sujet,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XIII, 3, 1925, 239-299.

Vigo, Giovanni, "Real Wage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Italy:

Building Workers' Wages (14th to 18th Century) ,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I, 2, Fall 1974, 378-399.

Vilar, Pierre M., “Problems of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m, ” *Past and Present*, No. 10, Nov. 1956, 15-38.

Vilar, Pierre M., “Remarque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 *Annales E. S. C.*, X VI, 1, janv.-févr. 1961, 110-115.

Vilar, Pierre M., *Le “Manuel de la Companya Nova” de Gibraltar, 1709-1723*, Affaires et Gens d’Affaires, X X VI. Paris: S. E. V. P. E. N., 1962. (a)

Vilar, Pierre M., *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 3 vol. Paris: S. E. V. P. E. N., 1962. (b)

Vilar, Pierre M., *Or et monnaie dans l’histoire, 1450-1920*. Paris: Flammarion, 1974.

Villani, Pasquale, *Feudalità, riforme, capitalismo agrario*. Bari: Ed. Laterza, 1968.

Villani, Pasquale, “Note sullo sviluppo economico-sociale del Regno di Napoli nel settecento, ” *Rassegna economica*, X X X VI, 1, 1972, 29-55.

Villari, Rosario, “Baronaggio e finanza a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rivoluzione del 1647-48, ” *Studi storici*, III, 2, apr.-giug. 1962, 259-306.

Villari, Rosario, “Note sulla rifeudalizzazione del Regno di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rivoluzione di Masaniello, *Studi storici*, IV, 4, ott.-dic. 1963, 637-668; VI, 2, apr.-giug. 1965, 295-328. Continued as “Cogiura aristocratica e rivoluzione popolare, ” *Studi storici*, VII, 1, genn.-marzo 1967, 37-112.

Villari, Rosario, “Rivolte e coscienza rivoluzionaria nel secolo X VII, ” *Studi storici*, XII, 2, apr.-giug. 1971, 235-264.

Viner, Jacob, “Power versu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in D. C. Coleman, ed.,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61-91.
(Originally in *World Politics*, 1948.)

Visconti, Alessandro, *L'Italia nell'epoca della controriforma dal 1576 al 1773*, Vol. VI of *Storia d'Italia*. Milano: Arnoldo Mondadori Ed., 1958.

Vivanti, Corrado, “La storia politica e sociale: Dall'avvento delle signorie all'Italia spagnola, ” in R. Romano & C. Vivanti, coordinators, *Storia d'Italia*, II, Part 1, 277-427. Torino: Einaudi, 1974.

Vlachovič, Jozef, “Produktion und Handel mit ungarischen Kupfer im 16. und im ersten Viertel des 17. Jahrhunderts, ” in Ingomar Bog, her.,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450-1650*. Köln-Wien: Böhlau Verlag, 1971, 600-627.

von Braun, Joachim Freiherr, “Die ostdeutsche Wirtschaft in ihrer vorindustriellen Entwicklung, ” in Göttinger Arbeitskreis, *Das östliche Deutschland: Ein Handbuch*. Würzburg: Holzner Verlag, 1959, 603-639.

von Hippel, W., “Le régime féodal en Allemagne au X VIIIe siècle et

sa dissolution, ” in *L’abolition de la “féodali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 N. R. S., Toulouse 12-16 nov. 1968. Paris: Ed. du C. N. R. S., I , 1971, 289-301.

Waddell, David A. G., “Queen Anne’s Government and the Slave Trade, ” *Caribbean Quarterly*, VI, 1, 1960, 7-10.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Walton, Gary M.,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American Colonial Shipping, 1675-177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1, Apr. 1967, 67-78.

Walton, Gary M., “A Measure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olonial Shipping,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2, Aug. 1968, 268-282. (a)

Walton, Gary M., “New Evidence on Colonial *Commerc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III, 3, Sept. 1968, 363-389. (b)

Walzer, Michael, “Puritanism as a Revolutionary Ideology, ” *History and Theory*, III, 1964, 75-90.

Wangermann, Ernst, *The Austrian Achievement, 1700-180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Jovanovich, 1973.

Wansink, N., “Holland and Six Allies: The Republic of the Seven United Provinces, ” in J. S. Bromley & E. H. Kossman,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V: *Metropolis, Dominion and Province*. The Hague: Nijhoff, 1971, 133-155.

Ward, A. W.,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2) The Peace of Utrecht and the Supplementary Pacifications, " i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 The Age of Louis X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437-459.

Ward, J. R., "The Profitability of Sugar Planting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650-1834,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I, 2, May 1978, 197-209.

Warden, Alexander J., *The Linen Trade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64. (Reprinted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68.)

Wätjen, Hermann, "Zür Statistik der Höllandischen Heringsfischerei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X VI, 1910, 129-185.

Weber, Max,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50.

Weinryb, Bernard D., *The Jews of Poland.*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Jewish Publ. Society of America, 1973.

Weis, Eberhard, "Ergebnisse eines Vergleichs der grundherrschaftlichen Strukturen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vorn 13. bis Zum Ausgang des 18. Jahrhundert,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VII, 1, 1970, 1-14.

Weise, Heinz, "Der Rinderhandel in nordwesteuropäischen Küstengebeit vom 15. bis zum Beginn des 19. Jahrhunderts, " in H. Wiese & J. Böltz, *Rinderhandel und Rinderhaltung im nordwesteuropäischen*

Küstengebiet vom 15. bis zu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66, 1-129.

Wiese, Heinz, "Die Fleischversorgung der nordwesteuropäischen Grossstädt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interterritorialen Rinderhandels,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4, V , 453-458.

Weisser, Michael, "The Decline of Toledo Revisited: The Case of Toledo,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 , 3, Winter 1973, 614-640.

Westergaard, Waldemar, *The Danish West Indies under Company Rule (1671-1754)* .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Wiles, Richard C., "The Theory of Wages in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m,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I, 1, Apr. 1968, 113-126.

Williamson, J. A., "The Colonies after the Restoration, 1660-1713, "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 . J. Holland Rose et al., eds., *The Old Empir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17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239-267.

Wilson, Charles Henry,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1.

Wilson, Charles Henry, "Treasure and Trade Balances: The Mercantilist Problem,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 2, 1949, 152-161.

Wilson, Charles Henry, "Treasure and Trade Balances: Further Evidenc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2, 1951, 231-242.

Wilson, Charles Henry,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Netherlands,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 London: Edw. Arnold, 1954, 254-269. (Originall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9.)

Wilson, Charles Henry, *Profit and Power: A Study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War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57. (a)

Wilson, Charles Henry, "The Growth of Overseas Commerce and European Manufacture,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 J. O. Lindsay, ed., *The Old Regime, 1713-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27-49. (b)

Wilson, Charles Henry,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I, 2, Dec. 1960, 209-221. (a)

Wilson, Charles Henry, "Dutch Investment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A Note on Yardstick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3, Apr. 1960, 434-439. (b)

Wilson, Charles Henry,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London: Longmans, 1965.

Wilson, Charles Henry, "Trade, Society and the State, " in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87-575.

Wilson, Charles Henry,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8.

Wilson, Charles Henry, "The Other Face of Mercantilism, " in D. C. Coleman, ed.,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118-139. (a) (Originall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59.)

Wilson, Charles Henry, "Tax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Empires, an Unfashionable Theme, "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114-127. (b) (Originally in *Bijdragen en Mededelingen van het Historisch Genootschap*, 1963.)

Wilson, Charles Henry,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Wilson, Charles Henry, "Transport as a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 , 2, Fall 1973, 320-337.

Wilson, Charles Henry,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E. E. Rich &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41. (a)

Wilson, Charles Henry, "The British Isles, " in Charles Wilson & Geoffrey Parker, e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Vol. I : *Western Europ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 115-154. (b)

Wittman, T., "Apuntes sobre los métodos de investigación de la decadencia castellana (siglos X VI- X VII) , " in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publiées à l'occasion du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par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Historiens Hongrois, I .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65, 243-250.

Wolański, Marian, *Związki handlowe Śląska z Rzeczpospolitą w X VII Wieku*. Wydawnictwa Wrocławskiego Towarzystwa Naukowego, No. 77, 1961. Germany summary, pp. 303-39: "Die Handelbeziehungen Schlesiens mit dem Königreich Polen im X VII. Jahrhunder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tadt Wrocław."

Wolański, Marian, "Schlesiens Stellung im Osthandel vorn 15. bis zum 17. Jahrhundert, " in Ingomar Bog, her.,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450-1650*. Köln-Wien: Böhlau Verlag, 1971, 120-138.

Wolf, Siegmund A., "Das Entstehen von Wüstungen durch Bauernlegen, "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V , 2, 1957, 319-324.

Wolfe, Martin, "French Views on Wealth and Tax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Old Regim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I, 4, Dec. 1966, 466-483.

Woolf, Stuart J.,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Nobilit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Example of Piedmont,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I, 2, Dec. 1964, 267-283.

Woolf, Stuart J., "The Aristocracy in Transition: A Continental Comparis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II, 3, Dec. 1970, 520-531.

Wright, William E., *Serf, Seigneur and Sovereign: Agrarian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Bohemia*.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66.

Wrigley, E. A., "Family Limitation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X, 1, Apr. 1966, 82-109.

Wrigley, E. A., "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650-1750, " *Past and Present*, No. 37, July 1967, 44-70.

Wyczański, Andrzej, "Le niveau de la récolte des céréales en Pologne du X VI^e au X VIII^e siècle, "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August 1960. *Contributions*.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0, 585-590.

Wyczański, Andrzej, "La campagne polonaise dans le cadre des transformations du marché des X VI^e- X VII^e siècles. L'économie de la Starostie de Korczyn, 1500-1600, " *Studia Historiae Oeconomicae*, II , 1967, 57-81.

Wyrobisz, Andrzej, "Mining in Medieval and Modern Poland,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 3, Winter 1976, 757-762.

Yates, Frances A., *Astraea: 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Yernaux, Jean, *La métallurgie liégeoise et son expansion au X^{VIII}e siècle*. Liege: Georges Thone, 1939.

Zagorin, Perez,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 X , 3, Sept. 1959, 376-401.

Závala, Silvio, "The Evolving Labor System, " in John Francis Bannon, ed., *Indian Labor in the Spanish Indies*. Boston: D. C. Heath, 1966, 76-81. (Originally in *New Viewpoints on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1943.)

Zhukov, E. M., "The Periodization of World History, " 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tockholm, 1960, *Rapports*, I : *Methodologie, histoire des prix avant 1750*. Göteborg, Sweden: Almqvist & Wiksell, 1960, 74-88.

Zientara, Benedykt, "Eisenproduktion und Eisenhandel in Polen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in Ingomar Bog, her.,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450-1650*. Köln-Wien: Böhlau Verlag, 1971, 270-285.

Zimaányi, Vera, "Mouvements des prix hongrois et l'évolution européenne (X^{VI}e-X^{VIII}e s.) , " *Acta Histor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I X , 1973, 305-333.

Zollner, Erich,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4th ed.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70.

Żytkowicz, Leonid, "An Investigation in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Masovi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18, 1968, 99-118.

Żytkowicz, Leonid, "Grain Yields in Poland, Bohemia, Hungary, and Slovakia in the 16th to 18th Centuries,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No. 24, 1971, 51-72.

Żytkowicz, Leonid, "The Peasant's Farm and the Landlord's Farm in Poland from the 16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 1, 1972, 135-154.

Żytkowicz, Leonid, review of A. Piatkowski, *Agricultural Estates Belonging to the Town of Elblag in the XVIIth and XVIIIth Centuries*, i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I, 1, Spring 1974, 249-251.

"'Failed Transitions': Concluding Participants' Discussions,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81-84.

"Holland: Participants' Discussion, " in Frederick Krantz & Paul M. Hohenberg, eds., *Failed Transitions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Renaissance Italy and Seventeenth-Century Holland*.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75, 64-66.

L'abolition de la "féodali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II : *Discussion des rapport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 N. R. S., Toulouse, 12-16 nov. 1968. Paris: Editions du C. N. R. S., 1971.

"Seventeenth-Century Revolutions, " a discussion, *Past and Present*, No. 13, 1958, 63-72.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Population Change in Relation to the Economy,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IV: *Demography and History*.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2, 227-235.

Zur Ostdeutschen Agrargeschichte: Ein Kolloquium, Vol. XVI of *Ostdeutsche Beiträge: Aus dem Göttinger Arbeitskreis*. Würzburg: Holzner-Verlag, 1960.

索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系原著页码, 检索时请查阅本书正文页边码)

A

Aachen, 亚琛200

Abel, Wilhelm, 艾贝尔3, 16, 22, 28, 31, 132-133, 262

Absentee ownership, 不在地主168, 170-171

Absenteeism, 不在位地主制86

Absolutism, 绝对主义see State, ab-solutism

Achilles, Walter, 阿基利斯28, 137

Act of Union, 联盟法案see Great Britain, Union of
Parliaments (of1707)

Adams, Geoffrey, 亚当斯124

Administrative unification, 单一管理see State, strength of

Admiralty colleges, 海军大学62,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199

Adscriptus glebae, 农奴see Serfs

Affermage, 包税see Tax-farming

Africa, 非洲9, 17-18, 46, 51, 146, 171-174, 210, 235, 237, 238, 270

coast of, 非洲海岸see Africa, West

East, 东非49

North (or northern), 北非172, 272, see also
Mediterranean (region)

Age of Liberty, 自由时代220

Ager, 农地see Land, cultivated

Ågren, Kurt, 阿格伦212, 215

Agriculture, 农业3, 5, 9, 13-16, 27, 29, 39-42, 46, 50, 54, 59, 81-87, 89, 92, 94, 98, 101, 116, 119, 123, 132, 145, 147-149, 152, 155, 164, 174, 180-181, 193-194, 196-198, 201-202, 204, 221-222, 227, 234, 236, 249, 259-262, 267-268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农业革命5, 83, 263

agronomy, 农艺学14, 25, 46

arable production, 适合耕种的产品14, 41, 84, 194, 201

capitalist, 资本家14, 48, 83, 119, 134, 147, 151, 167, 190, 202, 204, 212, 226, 232, see also Coerced labor; Farmers;

Laborers; Slavery

cash-crops, 商品作物see Agriculture, capitalist

commercialization, 商品化see Agriculture, capitalist

consolidation, 合并, 巩固 141, 155, 164, 168, 171-172, 216, 225-227, 259, 262

contraction of cultivated areas, 耕种区收缩13-15, 135

crop rotations, 谷物轮作82-83, 133, 146, 180

enclosures, 围绕86, 88-89, 121, 259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耕地扩张13, 15, 25, 29, 82, 135, 260, 263

fertilizers, 肥料14, 41, 44, 54, 180

fodder (forage), 粮草41, 83, 259, see also Grasses

fruit culture, 水果耕种41

horticulture, 园艺41

industrial crops, 工业的作物13, 41

innovation in, 农业开发15, 39-42, 83, 259-260

mixed farming, 混合农业82

monoculture, 单一耕作224, 262

pasturage, 畜牧14-15, 25, 41, 86, 152, 166

subsistence, 少有剩余的农场经营137, 146, 181, 236

tropical, 热带农业103, 171

yields, 农场13-14, 25, 41, 75, 83, 90

Agro-industrial production complex, 农工业综合生产44, 66, 79

Agullhon, M., 阿古隆125

Aix-la-Chapelle, Treaty of (1748), 亚琛和约256, 272

Akerman, Johan, 阿克曼282

Albany, Fort, 奥尔巴尼要塞250

Albers, J., 阿尔伯63

Alcabala, 阿卡巴拉150

Alcazar-el-Kebir, 阿尔卡萨尔182

Alcoholic beverages, 酒精浓度141, 259, see also Beer; Brandy;
Distillers; Gin; Port; Rum; Taverns; Whiskey; Wine

Alderman Cockayne Project 艾德曼科卡因计划, 43, 76, 206

Aleppo, 阿勒坡272

Algeria, 阿尔及利亚108

Algiers, 阿尔及尔248, 272

Alhóndiga, 谷物商行155

Allen, Theodore, 艾伦173

Allgau, 阿尔高14

Allgemeines Landrecht, 国家法律名称225

Almadén, 阿尔曼登146

Alps, 阿尔卑斯94, 200

Alsace, 阿尔萨斯14, 250

Altmark, Truce of (1629), 阿尔特马克条约207-208

America (the Americas), 美洲9, 17, 49-50, 52, 101-103, 108-110, 130, 145-146, 150-153, 157-158, 160, 165, 172, 181, 184-188, 190, 238-240, 245-246, 252-253, 256-257, 267, 270-271

American Indians, see Amerindians美洲印第安人

Central, 中美洲4, 148, 150, 152-154, 158-159, 161

Hispanic (Spanish), 西属美洲21, 33, 61, 102, 108, 147, 149, 151-152, 155-156, 158, 160-162, 166-167, 173, 184-185, 189, 191, 198, 255, 271, 276, see also America, Iberian

Iberian, 伊比利亚4, 148, see also America, Hispanic; Brazil

Latin, 拉丁美洲see America, Iberian

Middle, 中美洲see America, Central

North, 北美洲17-18, 47, 83, 97, 100, 103, 157, 168-169, 179, 191, 195, 218, 236-241, 253, 255, 263, 273, see also Middle Atlantic colonies; New England新英格兰

southern colonies, 南方殖民地169, 171-172, 253, 255

temperate America, 温带美洲see America, North

tropicalAmerica, 热带美洲17-18, see also America, Hispanic; America, Iberian; Brazil; Caribbean

Amer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110, 151-155, 158, 162, 173-174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大革命see Revolution, American

Amiens, 亚眠90-91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2, 6, 21, 24, 28, 43-47, 50-51, 53-60, 63-64, 67-70, 78, 96, 106, 108, 115, 141, 183, 202, 205-206, 209, 222

Bankof, 阿姆斯特丹银行see Wis-selband van Amsterdam, De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113

Ancien Régime, 旧政体6, 8, 23, 94, 229, 246, 266, 285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145

Anderson, M.S., 安德森211, 219

Anderson, Perry, 安德森13, 29-32, 64, 71, 144-145, 197, 204-205, 211, 221, 227-228, 230, 232, 235, 284

Andes (region), 安第斯153, 285

Andrews, Charles M., 安德鲁斯39, 65, 186, 246, 257, 269-270, 275

Anes Alvarez, Gonzalo, 安尼斯阿尔瓦雷斯180

Anglo-Dutch wars, 英荷战争51-52, 70, 78-80, 100

Anglo-French wars, 英法战争187, 245, 247, 253, 275, 284

Anglo-Portuguese Treaties, 英葡战争185, 277

Anglo-Spanish Treaty (1670), 英西条约159

Angola, 安哥拉52, 186

Animals, 动物see Livestock

Anne (of England), 安妮(英国女王) 250, 252, 254, 278

Antilles, 安得列斯see Caribbean

Antwerp, 安特卫普45-46, 53-54, 198

Appalti di gabelle, 包税制203, see also State, finances

Aquila, 阿奎拉147

Aragon, 阿拉冈189

Araire, 扶犁88

Arawak, 阿赖韦克173

Archangel, 阿尔汉格尔274

Ardant, Gabriel, 阿丹特277

Ardennes, 阿登95

Aristocracy, 贵族22, 26, 32, 56, 63, 69, 71, 86, 94, 103, 112, 119, 122-125, 132, 138-139, 141-143, 145, 148, 182, 204, 211, 214-216, 220, 224, 230-231, 253-254, 265, 285-286, see also Classes, upper; Junkers; Landlords; Nobility; Seigniors
“aristocratization, ”贵族化63, 68, 119

Armaments, 兵力80, 95, 103, 207-209, 248, 263, see also Army; Navy; War

Armengaud, André, 阿曼高特18, 75-76, 258-259

Arminius, Jacobus (Arminians), 阿米尼乌斯51, 67-69, 206

Army, 军队64, 80, 114-115, 117, 141-142, 150, 158, 163, 180, 198, 203, 207, 209, 211, 213-214, 216-217, 219-220, 223, 227-236, 239, 246-249, 253, 268, 274, 276-277, 285, 288, see also Navy; War

commissions, 委任247

contractors, 包商80, 150, see also Merchants

mercenaries, 佣兵26, 57, 95, 195, 199, 207, 224, 275

private armies, 私人军队195, 207

victualling, 粮食储备231

Art objects, 艺术品65, 67, 200

Artisans, 15, 45, 93, 98, 125, 141, 196-196, 199, 201, 207, 216, 254

Asher, Eugene L., 阿谢尔119

Ashley, M.P., 阿什利78, 118, 264

Ashton, Robert, 阿什顿76, 114, 260

Ashton, T.S., 阿什顿90, 104, 260, 262, 276, 282

Asia, 亚洲9, 17-18, 47-49, 97, 107-109, 158, 184, 273

Asiento, 贩奴77, 161, 188-191, 270-271

Aspvall, G., 亚斯普维尔215

Åström, Sven-Erik, 阿斯特罗姆42-43, 96, 98-101, 106, 108, 208, 211, 213-215, 217-220, 239-240, 274

Atlantic (world), 亚特兰大23, 51-52, 102, 110, 133, 150, 162, 184, 237, 248, see also Trade, Atlantic; World-economy

Attman, Artur, 阿特曼106

Aubin, Hermann, 奥宾235

Auge, 奥日14

Augsburg, 奥格斯堡197

Augustus II (of Poland), 奥古斯都二世219

Austria, 奥地利22, 71, 138, 143, 188, 198, 225-226, 228, 230-236, 252, 255-257, 277

Austrian Succession, War of, 奥地利继承战争235, 256, 260, 280

Hereditary Lands, 继承土地225-226

Autarky, 经济独立政策156

Aviadores, 放贷者156

Avsöndring, 分离政策212-213, 215

Aylmer, Gerald E., 艾尔莫284

Aymard, Maurice, 艾马德145-147

Azores, 亚速尔群岛186

B

Bacon, Sir Francis, 培根34

Bacon's Rebellion (1676), 培根反叛173

Baehrel, René, 博利尔4, 16, 21, 111

Bahia, 巴伊亚163

Bailyn, Bernard, 贝林236-237

Bairoch, Paul, 巴尔罗克84, 263

Bakewell, P.J., 贝克韦尔148-149, 152, 155-156, 174

Balibar, Etienne, 巴利巴尔5-6

Balkans, Turkish, 巴尔干土耳其8, 234

Baltic (region), 波罗的海20-23, 40-41, 43, 52, 77, 80, 96, 99-101, 107, 109, 130, 133, 162, 194, 206, 211-212, 217-223, 227, 229, 261, see also Trade, Baltic

Bamford, Paul Walden, 班福德99-100, 214, 274

Banana republic, 蔑指中美洲的一些共和国285

Banat, 巴纳特234

Banditry, 强盗 182, 260, see also Piracy, State, state banditry

Banking, 金融29, 36, 38, 55-58, 112, 132, 137, 171, 180, 183, 266, 275-276, 278-281, 283, see also Financiers; Loans; Merchants; Money

private, 183, 223, 281-282

state, 57, 202, 281, 283

Bankruptcy, 崩溃see State, finances

Banque Royale, 皇家银行283, see also Banking, state

Barbary, 巴巴利98

Baranowski, B., 贝拉诺斯基134

Barbados, 巴巴多斯52, 162, 169, 172, 191

Barber, Elinor G., 巴伯286

Barbour, Violet, 巴伯43-44, 48, 280

Barcelona, 巴塞罗那189

Bareel, William, 巴瑞尔69

Barfleur, Battle of (1694), 巴弗勒尔战役248

Bargatló, Modesto, 巴格罗156

Barker, Ernest, 巴克70, 118, 121, 130

Barker, T.M., 巴克201, 232

Barkhausen, Max, 巴克豪森268

Barley, 大麦14, 46, 180, 261

Barnett, Correlli, 巴尼特80, 247-248

Baron, Salo W., 巴伦78

Barraclough, Geoffrey, 巴拉克勒夫226, 230, 235

Barrier Treaty (1715), 贝瑞尔条约256

Barrow, Thomas C., 巴洛237-238

Basque country, 巴斯克地区124, 182, 189, 268

Basses-Cévennes, 塞文河谷287

Bassett, D.K., 贝塞特97

Batavia, 巴达维亚46

Batavian Republic, 巴达维亚共和国62

Batie, Robert Carlyle, 贝蒂162

Batjan, 巴蒂49

Bauernlegen, 农民安置226

Baulart, M., 鲍拉特29

Bavaria, 巴伐利亚23

Bayle, Pierre, 贝尔67

Bayonne, 贝亚恩268

Bazant, Jan, 巴赞特151

Beaujon, A., 布杨39, 61

Beauvaisis, 博韦21, 90

Beef, 牛肉see Meat

Beer, 啤酒141, 165, 260, see also Malt

Beer, George-Louis, 比尔186, 237-238

Behrens, Betty, 贝伦235

Belgium, 比利时see Netherlands, southern

Belorussia, 白俄罗斯145

Beltrami, Daniele, 贝尔特拉米200

Bengal, 孟加拉273

Berckheyde, Adiaensz Job, 贝瑞克海德2

Bérenger, Jean, 贝伦格232

Berger, Patrice, 柏格284

Berlin, 柏林225, 279

Berthe, Jean-Pierre, 伯特149, 162

Besnier, R., 贝斯尼尔276

Bessin, 贝辛14

Bethlen, Gabor, 贝特兰142

Beutin, Ludwig, 比尤廷45, 67, 197

Biala Gora, 拜亚拉哥拉see White Mountain, Battle of (1620)

Birch, Alan, 伯屈274

Black Death, 黑死病（瘟疫） see Epidemics

Blacks, 黑人 see Negroes

Blake, Admiral Robert, 布莱克79, 111

Blaschke, Karlheinz, 布拉斯柴克201

Blitz, Rudolph, 布利兹106, 276

Bloch, Marc, 布洛赫83, 86

Bluche, Francois, 布鲁许124

Bodmer, Walter, 博德默199-200

Boelcki, Willi, 波尔基226

Boethius, B., 波修斯210, 221

Bog, Ingomar, 波格232

Bogucka, Maria, 博古卡52, 59, 131-132, 137, 144

Bohemia, 波希米亚14, 20, 24, 132, 135, 138-139, 195, 226, 231-232, 234-236, 252, see also Czechia; Czecho-slovakia

Bohuslän, 布胡斯兰223

Bombay, 孟买185, 273

Bonification of land, 土地开垦 see Land, land reclamation

Bono, Salvatore, 波诺272

Borah, Woodrow, 博拉153, 156

Bordeaux, 波尔多268

Borelli, Giorgio, 博雷利197, 200

Bornholm (island), 博恩霍姆223

Bosher, J.F., 268

Bossuet, Jacques Bénigne, 波苏维特289

Boston, 波士顿236, 250

Boswell, A.Bruce, 波士维尔143

Bothnia, Gulf of, 波斯尼亚214-215

Boucaniers, 烤肉者159, see also Piracy

Boulle, Pierre H., 布勒267-268, 270

Bounties, 255, 261-262, 267, see also Great Britain, Corn Bounty Act

Bourbons, Spanish, 波旁王朝188-191, 221, 228, 256

Bourde, André-J., 布尔德115

Bourgeoisie, 中产阶级5, 19, 23, 30, 34, 45, 65, 68, 77, 89, 96, 112, 114, 116-117, 119-121, 124-125, 129, 132, 140, 142-145, 147, 150, 153, 156, 161, 167, 175, 182-184, 189-190, 193, 199, 202-203, 206, 215, 220, 222, 226, 231, 233, 254,

258, 273, 277, 280, 286-289, see also Burghers; Capitalism;
Farmers, capita-list; Financiers; Gentry; Industrialists; Merchants

bourgeois revolution, 中产阶级革命5-6, 20, 24, 63, 87, 120,
123, 138

commercial, 商业see Merchants

foreign, 外国的22, 143

manufacturing, 制造see Industrialists

Bourgogne, 布尔戈涅see Burgundy

Bourilly, V.-L., 布瑞利125

Bouvier, Jean, 布维尔276, 279, 283

Bouwsma, William, 鲍斯马4, 33, 118

Bowman, Francis L., 鲍曼46, 208

Boxer, C.R., 博克塞48, 63-64, 69, 158, 162, 166, 173, 184-
185, 187, 192-193, 268, 273-274

Boyer, Richard, 波义耳156

Brabant, 布拉邦51, 54, 200, see also Netherlands, southern

Brading, D.A., 布莱丁151, 174

Brandenburg (-Prussia), 勃兰登堡see Prussia

Brandy, 白兰地187

Braudel, Fernand, 布罗代尔3, 6, 8, 2-21, 28-29, 145, 147, 184, 194, 246, 262, 276

Braun, Rudolf, 布劳恩229-230, 279

Brazil, 巴西17, 22, 51-52, 103, 147, 150, 157-158, 160-163, 166-167, 173-175, 183-187, 191, 193, 270, 276-277, see also America, Iberian

Bread, 面包28, see also Cereals

Breda, Treaty of (1667), 布列达条约79

Breen, T.H., 布尔165, 171

Bregenzerwald, 布伦根茨瓦尔德14

Bremen-Verden, 布里梅-费尔登211

Brenner, Robert, 布伦纳89-90

Breslau, 布雷斯劳235

Brewers, 酿造者260-261, 269

Brick, 砖13, 56

Bridgetown, 布里奇顿169

Bristol, 布里斯托115

Britain, 不列颠see Great Britain

Broad cloth, 宽布 see Textiles, woollen

Bromley, J.S, 布罗姆利249-250, 286

Brömsebro, Treaty of (1657), 布鲁姆斯布罗条约223

Bronze, 青铜156, 205, 208

Brown, Vera Lee, 布朗191, 251, 257

Bruchey, Stuart, 布鲁奇238, 241

Bruford, W., H., 布鲁福234

Bruges, 布鲁格194, 198

Brulez, W., 布鲁勒兹198

Buccaneers, 海盗see Piracy

Buckwheat, 荞麦14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160, 183, 191

Buffer stocks, 股票56, see also Trade

Bulferetti, Luigi, 布尔费蒂26, 195, 199-200, 202

Bullion, 金银条块16-17, 25, 37, 48-50, 58, 76, 103, 106-112, 149-152, 180, 184-187, 191-193, 238, 276-277, 281, see also Gold; Mints; Money; Prices, bullion; Silver

Burckhardt, Jacob, 博克哈德114

Burghers, 自治市镇之公民45, 67, 70, 99, 145, 211, 218, 230, 254, 287, see also Bourgeoisie; Patricians; Towns

Burghers revolt (1674), 自治市民叛乱229

Bürgin, Alfred, 伯根199

Burgundy, 勃艮第14, 80, 148

Burke, Sr Edmund, 柏克6

Burke, Peter, 柏克62-63

Burt, Roger, 柏特263

Busquet, Raoul, 布斯奎125

Buss, 戏吻39

C

Cádiz (Cadix) 加的斯111, 160, 188, 191

Cairú, 凯鲁163

Caizzi, Bruno, 凯西199

Caledonia, 喀里多尼亚 (古苏格兰) 253

Calico, 白布108, 264, 273

Calories, 卡路里55, 259, see also Food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51, 53, 67, 69, 114, 125, see also
Christianity

Camamú, 卡马莫163

Cambrai, 康布雷95

Camelots, 驼绒91

Camisard, 卡米札尔287

Campagna, 平原14

Campbell, R.H., 坎贝尔81, 265

Canada, 加拿大100, 102, 147, 172, 273

Canals, 运河see Transport, canals

Cancilo, Orazio, 坎奇拉146

Cane, 蔗糖see Sugar

Cape of Good Hope (Cape route), 好望角47, 77, 253

Capital, 资本的16, 19, 30, 32, 49-50, 54, 56, 60, 67, 85-88, 91, 95, 100, 107, 111, 125, 137, 152-155, 163-164, 167-168, 170-172, 174-175, 193, 202-203, 205-206, 209, 211, 218, 241, 253, 263, 266, 275, 280, 282, 285, 288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3, 5-9, 19, 23, 26-28, 31-33, 37-38, 45-51, 57, 59-60, 63, 65, 85, 93-94, 108-109, 116-117, 122, 130, 137-138, 143, 147-148, 156, 201-202, 255, 266, 269, 277-

278, 280, 289, see also Agriculture, capitalist; Bourgeoisie;
Companies; Industries; Money; Trade; World-economy

capitalist agriculture, 资本家农业see Agriculture, capitalist

entrepreneurs, 资本主义企业家25-26, 37, 48-49, 51, 56-57,
78, 86, 93, 100, 119, 130-131, 137, 147, 156, 162, 167-172,
183, 194-195, 199-203, 206, 208-210, 231, 235, 249, 258, 260-
261, 265, 267, 274, 286, see also Bour-geoisie; Financiers; Gentry;
Indust-rialists; Merchants; Planters

merchant capital, 商业资本5, 28, 32, 56, 76, 78, 123, 167,
193-195

monopolies, 专利46, 49, 51, 56, 121, 141, 154, 165, 201,
203-204, 209-211, 218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封建主义转变3, 5, 7, 31-32

Capitalists, 资本家see Bourgeoisie

landed, see Farmers, capitalist

Caps (political party), 无边帽党220-221

Cardozo, Manuel, 卡多佐187

Carelia, 卡尔利亚219

Caribbean, 加勒比地区9, 46, 52, 61, 64, 69, 97, 103, 107,
112, 146-148, 157-175, 183-184, 186, 188, 236-241, 255-257,
265, 267, 270-271, 273-274

Carlo Emanuele II (of Savoy), 卡罗伊曼纽尔二世201

Carlowitz, Treaty of (1699), 卡洛维兹条约234

Carlsson, Sten, 卡尔森213, 216

Carmagnani, Marcello, 卡马格那尼152

Carmona, Maurice, 卡莫纳203

Carolinas, 卡罗林那236, 240

Carolingianera, 加洛林时代13, 147

Carr, Rayrnond, 卡尔212

Carrera, 船队157, see also Trade, Atlantic

Carrière, Charles, 柯利尔98, 100, 103-104, 116, 268, 270

Carstairs, A.M., 卡斯泰尔254-255

Carsten, F.L., 卡尔斯坦22-23, 57, 226-232

Carswell, John, 卡斯韦尔115, 282

Cartagena, 喀他基那149

Carter, Alice C., 卡特63, 79, 115, 250-251, 255, 257, 275, 279-281

Castile, 卡斯提尔14, 21, 108, 145, 180-183, 185, 188-189, 204-205, 219

Castillo, Alvaro, 卡斯蒂罗58, 145-146, 183

Catalonia, 加泰隆尼亚14, 181-185, 187-189, 193, 250

Catalan Movement, 加泰隆运动189

Revolt of the Catalans, 加泰隆反叛182, 188

Cateau-Cambrésis, Treaty of (1559), 卡托-坎布雷条约70

Catherine (of Braganca), 凯瑟琳185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教堂5, 63, 68-69, 102, 124, 145, 190, 204, 231, 253, 285, see also Christianity; Counter Reformation

Cattle, 牲畜83, 131-134, 139, 152, 157-158, 161, 221-22, 224, 254, 261-262, 265, see also Livestock

Cavalry, 骑兵队see Army

Caviar, 鱼子酱274

Cédulas, 南美发出的公文155

Celtic (areas), 凯尔特 (地区) 123, 288

Cens, 年贡see Rents, quit-rents

Cereals, 谷物13-14, 16, 21-22, 25, 40-41, 46, 50, 53, 60, 63, 75, 82-84, 87, 89-90, 98-99, 131-132, 134, 139, 141, 146, 151-152, 165-166, 180, 202, 210, 217, 219, 222, 224, 237, 259-260, 262, 267, 274, see also Barley; Bread; Buckwheat; Food; Millet; Oats; Rye; Sorghum; Wheat shortage of, 谷物短缺see Food,

shortage of

Cernovodeanu, Paul, 瑟诺沃德努272

Cespedes del Castillo, Guillermo, 174

Ceylon, 锡兰274

Chatupnicy, 小农 135, see also Farmers, small

Chambers, J.D., 钱伯斯82, 260, 263

Chamillart, Michelde, 夏米拉特276

Chandler, David G., 钱德勒219

Channel, the, 海峡83

Channel Islands, 海峡群岛249

Charcoal, 木炭101

Charity, 慈善捐款45

Charles I (of England), 查理一世 (英) 59, 77

Charles II (of England), 查理二世 (英) 79, 83, 122, 159, 185

Charles II (of Spain), 查理二世 (西班牙) 185, 188-190, 255

Charles III (of Austria), 查理三世 (澳) 198

Charles V (of Spain), 查理五世 (西班牙) 32, 38, 114, 232

Charles VI (of Austria), 查理六世 (澳) 232, 234

Charles IX (of Sweden), 查理九世 (澳) 203, 209

Charles X (of Sweden), 查理十世 (瑞典) 213, 223

Charles XI (of Sweden), 查理十一世 (瑞典) 214-215, 217

Charles XII (of Sweden), 查理十二世 (瑞典) 203, 215-217, 219-220, 234, 240, 252

Charrue, 犁88

Chartered companies, 宪章公司see Companies

Chartists, 宪章主义者125

Chaudhuri, K.N., 乔杜里97, 107-108

Chaunu, Huguette, 肖努107, 183-184, 262

Chaunu, Pierre, 肖努3-4, 6-7, 14, 20-22, 25, 27, 51, 67-68, 75, 84-85, 148, 152, 157, 162, 183, 189, 245, 274, 286-287

Cheese, 奶酪see Dairy products

Cherepnin, L.V., 沙利普宁218

Cherry, George L., 彻里269

Chesapeake Valley, 切萨皮克谷164-165, 170, 236

Chevalier, François, 谢瓦利埃148-149, 154-155, 162

Child, Josiah, 蔡尔德93-94

Chile, 134, 149, 152-153, 173

China, 中国97, 107, 264, 273, see also Orient

Chinoiserie, 中国人273

Chintz, 印花棉布264

Choiseul, Etienne-François, Ducde, 舒瓦瑟尔192, 247

Christelow, Allen, 克里斯特罗160, 185, 191-192, 257

Christian IV (of Denmark), 克里斯琴四世223

Christianity, 基督教70, 144, see also Calvinism; Catholic Church; Mediter-ranean, Christian; Protestantism

clergy, 僧侣68-69, 99, 120, 124, 142, 216, 244, 287

Christianopel, Peace of (1645), 克里斯蒂安诺贝尔和约223

Christina (of Sweden), 克里斯汀娜205, 215

Cipolla, Carlo M., 奇波拉3, 5, 20, 199

Cities, 城市see Towns

Civil servants, 公仆see State, bureaucracy

Civilizations, 文明化7, 23, 27, 32, 65, 210

Clapham, Sir John, 克拉潘278

Clarendon, Earl of (Edward Hyde), 克拉伦登40, 61

Clark, G.N., 克拉克5-6, 40, 46, 66, 90, 188-189, 246, 249, 251, 269

Classes, 阶级8-9, 19, 31, 71, 114, 117, 119-123, 144, 167, 169, 173, 188, 201, 212, 222, 231, 247, 262

class-struggle, 阶级斗争70, 84, 113, 120, 140, 144, 147, 189, 287

lower, working, 下层阶级, 劳动业16, 28-29, 31-32, 45, 63-64, 68, 125, 144, 155, 173, see also Poor: Workers

middle, manufacturing, mercantile, 中间阶级, 手工制造业6, 32, 63, 67-68, 123, 172, 190, 265, 287, see also Bourgeoisie; Merchants; State, bureaucracy peasant, 农民see Peasantryupper, ruling, landowning, 上层阶级, 统治阶级, 地主阶级19, 25, 30-31, 33, 70, 120, 122, 125, 129, 142, 144, 154, 182, 189, 197, 216-217, 231, 285, 286, 288, see also Aristocracy; Junkets; Nobility; Seigniors

Classicism, 古典主义33

Climate, 气候13, 29, 82, 163-164, 186, 204, 230, 238, 248, 258

Clock-making, 钟表制造93, 199-200

Closed economy, 封闭经济see Mercantilism

Closiers, 小屋农88, 135, see also Farmers, small

Cloth, 布see Textiles

Clothiers, 织布者197, 207, 236, 260, see also Weavers

Clover, 苜蓿83-84, 259

Clyde (river), 克莱德(河) 255

Coal, 煤54, 93, 95, 100, 263 smelting, 炼煤148, 263

Coats, A.W., 寇兹94

Cobbett, William, 柯伯特274

Cochineal, 洋红91

Cocoa, 可可164

Coen, Jan Pieterszoon, 柯恩46-47

Coerced labor, 强制劳工103, 132, 135, 146, 149, 153-155, 174, see also Coryée-labor; Slavery cash-crop, 商品作物134, 138, 174-175

Coffee, 咖啡50, 164, 273

“Coffee-sergeants”, 下级军官49

Coinage, 铸币see Money

Colbeft, Jean Baptiste, 柯尔伯44, 81, 84, 91, 94-95, 112, 116-119, 123-124, 186, 198-199, 245, 248, 266, 268, 278, 282

Colchester, 科尔切斯特66

Cole, W.A., 柯尔269

Coleman, D.C., 科尔曼5, 37, 238, 259, 263

Coleseed, 油菜籽13

Colonies, 殖民地20, 46-47, 51-52, 101-103, 146, 151-152, 156-158, 160, 164-165, 167-170, 173, 181, 183-186, 189, 191, 193, 203, 209-210, 235-241, 247, 253-255, 257, 263, 265-266, 268-270, 273, 280, 282

colonial products, 殖民地产品43, 61, 103, 236, 241

settlers, 48, 52, 101, 103-104, 109, 154, 159, 193, 239, 273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伦布6

Comenius, John Amos, 柯米尼厄斯67

Commenda, 有限责任合伙制203

Commerce, 商业see Trade

Commercial crops, 经济作物see A-griculture, capitalist

Commerical primacy, 商业首位see Trade, commercial primacy

Commission agents, 委任员56, 169-170, 275, see also Merchants

Commonwealth of the Gentry, 绅士共和国142-144

Compagnie de Chine, 中国公司282

Compagnie des Indes, 印度公司282-283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东印度公司282

Compagnie du Sénégal, 塞内加尔公司282

Companies, 公司27, 32, 46, 50-57, 78, 95-96, 98, 107, 111, 125, 137, 171, 201, 206, 215, 237, 255, 278, see also Companies by title; Partnership system; Stocks

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s into Africa, 皇家非洲冒险公司270

Company of Scotland, 苏格兰公司252-254

Condé, Prince of, 孔德王子74

Conseil du Roi, 枢密院84, see also France

Constantini, Claudio, 君士坦丁尼195, 199-200

Contadini, 农民see Peasantry

Continental Blockade, 大陆封锁247

Continental (or Military) school of thought, 大陆思想学派246-247, 249

Contraband, 非法交易79, 102, 151, 153, 158, 160-161, 166, 184-185, 191, 193, 197, 253, 256-257, 260, 271

Contraction, economic, 经济合约see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Cook, Sherburne, F., 库克153

Cooper, J.P., 库柏64

Coornaert, E.L.J., 46, 48

Copenhagen, 哥本哈根160, 223

Copper, 铜17, 108, 112, 133-134, 204-206, 209-210

copper coins, 铜币108, 112, 130, 205, see also Money,
metallic; Vellon

Copyholders, 不动产所有者86-87, 125

Core (states), 核心国家8-9, 17, 26-27, 32, 37-39, 48, 61,
65, 75-76, 81-84, 93, 95-96, 116, 123, 129-130, 137, 142-144,
151, 156, 158, 160, 162, 166-168, 179, 185, 196, 211, 217-218,
223, 225, 228, 233, 241, 262, 273, 277

core rivalries, 核心竞争76, 92-93, 98, 181, 184, 241, 245-
246, 250-251, 253, 274

Corn, 谷物see Wheat

Corn Laws, 谷物法90

Coromandel, 科罗曼德尔107

Corregidores, 小镇首长153-154

Corsair fleets, 地方长官see Piracy

Corvée-labor, 法定劳务132, 135-136, 138-141, 212, 222-223, 226-227, 232, see also Coerced labor, cash crop

Corvisier, André, 考维西埃124

Cossacks, 哥萨克人145, 214

Cost of living, 生活开销16, 268, 270

Coster, Samuel, 科斯特68

Cotentin, 科唐坦14

Cottagers, 乡舍15, 216, see also Labor-ers; Peasantry

Cotton, 棉花51, 91, 98, 103, 152, 162, 200, 264, 266-267, 273

Cottrell, Fred, 科特勒246

Council Pensionary, 62,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Counter-Reformation, 反改革76, 145, 231, 287, see also Catholic Church

Country (as contrasted with Town or Court), 乡村16, 22, 30, 87, 92, 122-123, 132, 138, 158, 182-183, 194, 197-198, 200-201, 222, 228, 231

Courland, 库尔兰207

Court, Antoine, 康特287

Courtiers, 廷臣see Aristocracy

Cowboys, 牛仔159

Cows, 牛see Livestock

Cracow, 克拉科夫138, 141, 145

Craeybeckx, Jan, 克雷别克194, 198

Craig, Gorden A., 克雷格230

Craven, Wesley Frank, 克雷芬236

Credit, 信贷see Money, credit

Creoles, 克里奥尔人151, 154, 158

Creutz, Count Philip, 克鲁兹215

“Crisis”, 危机3-4, 7, 9, 13 15-16, 18-20, 24-26, 29-31, 33-34, 87, 110, 137, 149, 166, 185-188, 197, 204, 206, 215, 221-222, 249, 251, 253-254, 264, 276, 285, 284, see also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77-79, 159, 207, 236, 246, 251

Cronstadt, Carl Johan, 克伦斯塔德170

Croot, Patricia, 克鲁特89-90

Croosby, Alfred W., クロス比153

Cross, Harry E., 克罗斯151, 174

Crouzet, Francois, 克鲁泽4, 96, 266

Crown, 王位see State

Crying-up of money, see Money, devalu-ation Cuba, 古巴157

Cuenca, 昆卡181

Cullen, L.M., 库伦265

Cultivators, 耕作者see Farmers

Culture, 文化65, 67, 181, 234, 289

Cunningham, W., 坎宁安40, 59, 266-267

Curacao, 库拉索64, 159, 235

Curing (salting), 腌制39

Curtin, Philip D., 柯廷102, 173

Cycles, economic, 经济循环3-8, 18-21, 33-34, 37, 53, 71, 120, 149

A-phases, A阶段3-4, 8, 18, 20, 25, 29, 31, 100, 104, 120-121, 129-130, 136, 139-140, 142, 148-149, 156, 162, 166, 173, 182-183, 211, 233, 241, 245, 262, 269, 276-277

B-phases, B阶段3-4, 8, 12, 17-26, 30-34, 40, 49-50, 52, 57, 76, 82, 87, 89-90, 92-94, 96, 98-99, 103-104, 110-111, 120, 129-

133, 137, 139, 142, 144-150, 152, 155-156, 158, 162, 165-166, 179, 182, 184, 194, 196, 198-199, 202-204, 214, 224, 229, 233, 241, 244, 249, 251, 253, 257, 258, 260, 262, 267, 270, 276, see also “Crisis”

Cyprus, 塞浦路斯49

Czechia, 捷克75, 139, 231, see also Bohemia;

Czechoslovakia; Moravia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拉伐克131, 138, 142, 194, 196, see also Bohemia; Czechia,

Moravia; Slovakia

D

Dahlgren, Stellan, 达尔格伦213, 215-217

Dairy products, 乳制品13, 41, 88, 199-200, 261, 265

Dales, J.H., 戴尔斯107

Danby, Earl of (Thomas Osborne Leeds), 丹比122

Danzig, 但泽see Gdańkk

Darby H.C., 达比82, 99, 223, 225, 258

Darien, Isthmus of, 达连253

Darien Company, 达连公司252-253

da Silva, José Gentil, 达席尔瓦146, 180, 203

Davies, C.S.L., 戴维斯125

Davies, K.G., 戴维斯101-102, 163, 165, 169-170, 240, 257,
273

Davis, Ralph, 戴卫斯3, 19, 41, 48, 50, 78, 96, 98, 102,
104, 149-150, 154, 156, 159, 161-162, 172, 265, 266

Deane, Phyllis, 狄恩265, 269

Debien, Gabriel, 狄比安172

Debolecki, Fr.Wojciech, 狄博列基144

Debt papers, 债券see State, finances

Debt peonage, 劳役偿债制度155, 167, 174, 194, 206, see also
Gananés; Naboros

Decadence, century of (decadencia), 衰微的世纪180

de Castro, Antonio Barros, 卡斯特罗162

Declaration of Rights (1689), 权利宣言246

de Dezert, G., 迪色180

Defoe, Daniel, 笛福46, 254

de Geer, Louis, 吉尔206, 208-209

Dehio, Ludwig, 德休102, 257

Delamarre, Mariel Jean Brunhes, 德拉美尔88

Delft potteries, 德尔夫特陶业200, 273

Delumeau, Jean, 德鲁莫96, 116, 185

De Maddalena, Aldo, 马德莱那14-15, 20, 40, 116, 199

Demesne, 封建土地30, 216, 222-226

Democracy, 民主286

Demography, 人口see Population

De Moncada, Sancho, 蒙卡达157

Dendermonde, 登德尔蒙顿255

Denmark, 丹麦22, 66, 77, 133, 138-139, 143, 160, 211, 213-215, 221-224, 229-230, 239, 261, 270, 282

Depression, economic, see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萧条

Depression of 1662 萧条1622, 76, 148

Deprez, p., 德普瑞兹258

Dermigny, Louis, 德米尼78, 172

Derogation, 减损285

Descartes, Rene, 笛卡儿7, 34, 66, 70

Deschamps, Hubert, 德斯钱伯斯159, 161

Dessert, Daniel, 德瑟尔117

Desserts, 沙漠259

Devonshire, William Cavendish, Duke of, 德文郡122

De Vries, Jan, 德弗里斯18, 41, 46, 63, 78, 92, 200, 261-262, 268

De Vries, Philip, 德弗里斯78, 83, 197, 205

de Witt, Jacob, 德维69, 80, 223

De Witt, Johan, 德维62

Deyon, Pierre, 戴雍42, 44-45, 58, 60, 76, 90-91, 95, 107, 110, 125, 233, 255, 278, 282

Dickerson, Oliver M., 狄克森241

Diplomacy, 外交214, 272, 275

“Disastrous War” school, 造成灾祸的战争派22

Distillers, 蒸馏器168, 261, see also Alcoholic beverages

Dobb, Maurice, 多布5-6, 30

Dobla, 加占制154

Dobyns, Henry F., 多比恩153

Dominquez Ortiz, Antonio, 多明奎兹190

Donnan, Elisabeth, 多南271

Dordrecht, Synod of, 多德瑞奇67-68, 206

Dorn, Waltr L., 多恩230

Dorsal spine of Europe, 欧洲的脊柱112, 179, 193, 196, 200, 202

Dorwart, Reinhold A., 多沃德229, 233

Douro, 杜罗河187

Dover, 多佛 77

Downing, Sir George, 唐宁爵士40, 61, 79, 118

Drake, Sir Francis, 德雷克III

Dresden, 德恩斯顿144

Drobna szlachta, 多罗布南（小贵族）143, see also Nobility, lesser

Droit de seigneurage, 领主权see State, finances

Duby, Georges, 杜比13

Duckham, Baron F., 杜克汉93

Dunbar, 邓巴尔39

Duncan, T.Bentley, 邓肯47, 186

Dunn, Richard S., 杜恩161, 163-164, 168, 172-173, 270-271

Dunsdorfs, Edgars, 东斯多夫52, 135, 211-212

Dupaquier, J., 迪帕卡尔87-89

Dupuy, Alex, 杜普伊173

Durand, Georges, 杜兰89

Durand, Yves, 杜兰278

Durie, Alastair J., 杜利265-266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荷兰东印度公司46-51, 61, 78, 206, 274“Dutch Gold Mine”, see Herring 荷兰金矿

Dutch Republic, see Netherlands (northern) 荷兰共和

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 see Netherlands, revolution 荷兰独立战争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荷兰西印度公司50-51, 163

Dworzaczek, Wodzimierz, 德沃尔查什克135

Dyes, 染料41, 43-44, 91, 185, 269, see also Cochineal; Coleseed; Indigo; Madder; Pastels; Rapeseed

Dyewoods, 染料树236

E

Eagly, Robert V., 伊格利221

“Earlier decline” school, 早期禁制派22

East, W.G., 伊斯特263

East Anglia, 东盎格利亚37, 42

East Country, 106, 239

East Elbia, see Germany, east 易北河以东

Eastland Company, 东土公司52, 99, 240

Ecuador, 厄瓜多尔174

Edel, Matthew, 伊德尔163

Edict of Nantes, 南特敕令124, 183

Revocation of, 102, 124, 249, 279, 286, 287

Edinburgh, 爱丁堡525, 254

Education, 教育66, 287-288

Edward I (of England), 爱德华一世78

Egypt, 埃及49

Ehrman, John, 厄曼248-249

Eighty Years' War, see Netherlands, revolution八十年战争

Elbe, 易北河201

Elbeuf, 埃尔伯夫95

Elblag, 埃伯列格135

El Dorado, 传说中的黄金山164

Elizabeth (of England), 伊丽莎白5, 159

Elliott, C.M., 261艾略特

Elliott, J.H., 艾略特26, 180-185, 188-189, 205

Elmina, 艾米纳52

Emmanuel, Arghiri, 伊曼纽尔94

Emmenthal, 埃蒙塔尔14

Emmer, Pieter C., 埃默52

Empire, 帝国48, 151, 184-185, 188

Austrian, 奥地利帝国190, 199, 225, 255

Hapsburg, 哈布斯堡帝国75, 139, 142-143, 145, 190, 204, 225-226, 228, 231, 234, 236

Holy Roman, 神圣罗马帝国199

Mughal, 莫卧儿帝国98

Ottoman, 奥斯曼8, 49, 91, 98, 106-108, 144, 146, 219, 232, 234, 272, 276, see also Balkans, Turkish

world-empire, 世界帝国38, 47, 64, 180, 219, see also State, universal monarchy

Employment, 职业16, 56, 66, 86, 92, 94, 99, 129, 159, 196, 199, 258, 264, 269, 280, see also Workers

Encomienda, 委托监护制155

Encyclopedists, 百科全书编纂者289

Endelman, Todd M., 恩德尔曼78

Engag'es, see Laborers, indentured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6, 28, 31

Enghein, Ducd', 恩盖因74

Engineering, 引擎40, 80

England, 英格兰see Great Britain, England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see Great Britain, England, East India Company

Engravers, 雕刻师66

Engrossment, 全神贯注226

Enjalbert, Henry, 恩艾伯特262

Enlightenment, 启蒙4, 66

Entrepreneurs, 企业家see Capitalism, entre-preneurs

Eon, Chevalierd', 埃昂95

Epidemics, 疾疫42, 50, 75, 130, 146, 153, 173, 187, 223, 248, 258, 260

Episcopalians, 圣公会254, see also Prote-stantism

Erfrt, 爱尔福特14

Ericeira, Countof, 埃里基拉186-187

Erik XIV (of Sweden), 艾里克十四世203

Ernle, Lord, 恩尼爵士259-260

Esquemelin, John, 埃斯克姆林128

Estancia, 牧场148, 155

Estates, 地产85-89, 138-144, 147-158, 161-164, 167-175, 202, 211-217, 220, 225-231, 235, 263, 285

intermediaries, 中介者88

owners, 地主86-87, 162, 202, see also Landlords

Swedish, see Sweden, Estates瑞典, 参见等级会议

Estland, 东地215

Estonia, 爱沙尼亚132, 211, 215, 219

Ethnic groups, 同文同种之群族142, 144-145, 232

Europe, 欧洲3, 5-8, 13-14, 16-20, 23-24, 26-31, 34, 39-42, 46-49, 51, 54, 60, 65, 67-68, 70, 75, 82, 91, 96, 101-103, 107-110, 112, 115, 120, 122, 132, 134, 142, 150, 152, 155-157, 160, 162-163, 165, 168-169, 173-174, 179, 181, 184, 186, 188-189, 191, 194, 196, 198, 200, 203-204, 207-208, 210, 214-215, 217, 221, 227, 230-231, 234, 236-238, 245-248, 257-258, 260, 262, 269, 272-276, 281, 284, 286, see also Mediterranean (region)

central, 中欧14, 20-21, 71, 130, 144, 195, 201, 205, 209, 214, 225, 233-234

eastern, 东欧8, 13-14, 18, 20, 31, 84, 98-99, 131-135, 138, 140-147, 151-152, 155, 158, 166-167, 202-204, 208, 211, 214, 217, 222, 224-227, 235

expansion of, 欧洲扩张75, 145, 234

northern, 北欧14, 21-22, 37, 42, 50, 97, 99-100, 163, 208, 224, 239

northwest, 西北欧37, 49-50, 132, 157, 185, 193, 207

southern, 南欧13, 21, 43, 75, 133, 145, 147, 158, 167, 237

western, 西欧13-14, 30-31, 88, 103, 109, 133, 138, 211, 218-219, 233, 258, 273-274

Evelyn, John, 埃弗林99

Everitt, Alan, 埃弗里特85

Exchange, see Trade Old, 交换2

Exempt Provinces, 免役辖区190

Exeter, 埃克塞特21

Expansion, 扩张see 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Cycles, economic, Aphases; Population, expansion of

Exploitation, 经营30, 167, 196, 200, 241

External arena, 外部竞争场17, 47, 50, 272

F

Faber, J.A., 费伯42, 44, 52, 91, 133-134

Factory System, 工厂系统196

Falmouth, 法尔默思166

Family, 家族27, 31, 86, 89, 120, 193, 196, 202, 206, 215,
227

Famines, 饥荒see Food, foodshortages

Fanfani, Amintore, 范法尼29

Far East, 远东see Orient

Farmers, 农人15, 41, 82, 87, 131, 164, 216, 222, 259-261,

288, see also Gentry; Landlords; Peasantry capitalist, 资本家86, 88-90, 168, see also Agriculture, capitalist; Junkers

gentlemen, 绅士86, 215

small, 小资本家15, 83, 86-89, 134-135, 155, 170, 259

tenant, 15, 85-90, 136, 140, 145, 175, 201, 212, 217, 222

yeoman, 约曼15, 85-89, 92, 134-135, 141, 143, 182, 188, 213, 216, 286-287

Farms, 农场see Agriculture

Five Great, 五大包税区see France, Five Great Farms

Farnell, J.E., 法内尔78

Farnie, D.A., 法尼79, 161, 164, 173, 238-239

Fayle, Ernest C., 费伊勒247, 257

Febvre, Lucien, 法弗瑞117

Fedorowicz, Jan K., 费多罗维茨217

Fehrbellin, Battle of (1675), 弗尔贝林战役214

Fenton, Alexander, 芬顿83

Feodalite, 封建制289, see also Classes, upper

Ferdinand (of Spain), 菲迪南182

Fermages, 租佃fermiers, see Farmers, tenants

Fernandez de Pinedo, Emiliano, 费南德兹182, 187

Fertilizers, 肥料see Agriculture, fertilizers

Feudalism, 封建主义3, 5-8, 24-32, 85, 94, 119, 121, 125, 134, 147-148, 204, 207, 213-215, 226-227, 231, 264, 286

crisis of, 封建主义危机18, 25, 29-37, 147

feudal dues, 封建税276

Field, Peter, 费尔德5-6

Fifteen Years' War, 十五年战争134

Financial Revolution, see Revolution, finan-cial经济革命

Financiers, 财政家38-39, 49, 67, 123, 210, 232, 278-279, 282, 285, see also Banking; Money; Traitants

Finer, Samuel E., 芬纳80, 115, 230, 248

Finland, 芬兰100, 209, 211, 213-215, 218

Fischer, Wolfram, 费歇尔81

Fish, 鱼39-40, 52, 161, 185-187, 237, see also Food

Fisher, F.J., 费舍尔83, 103

Fisher, H.E.S., 费舍尔191-192, 261, 272

Fisheries, 鱼货39, 43, 61, 79

Fishermen, 渔夫39

Fishing boats, 渔船see. Transport, mari-time

Fiume, 阜姆港234

Flanders, 佛兰德16, 41, 45, 75, 77, 83, 179, 198, 200, 206, 209, 215, 250, 256, 265, 270, 273, see also Netherlands, southern

Flax, 亚麻13-14, 41-42, 100, 211, 218, 239

Fleming, Klas, 弗莱明215

Fleury, Andre Hereule, Cardinal, 弗勒利220

Finn, M.W., 芬101, 258, 283

Flint, John, 弗林特210

Florence, 佛罗伦萨196

Florescano, Enrique, 弗洛里斯卡诺152

Flour, 面粉192, 261

Floyd, Troy S., 弗洛伊德161

Fodder, 秣草see Agriculture, fodder (forage)

Fontainebleau, 枫丹白露287

Food, 粮食13, 16, 25, 39, 75, 146, 148, 151, 157, 159, 165, 172, 174, 202, 263, see also Cereals; Fish; Meat; staples

shortage of, 粮食短缺13, 50, 75, 130, 138, 146, 218, 253, 258-259, 284

Forage crops, see Agriculture, fodder (forage) 饲料庄稼

Forbes, R.J., 福布斯162

Forced wage-labor, 强制薪资劳工 see Coerced labor, forced wage-labor

Ford, Franklin, 福特286

Fouquet, Nicolas, 富凯95

Fralsebonder, 212-213, 216, see also Peasantry 贵族领地农

France, 法国17, 20-22, 24, 31, 33, 39, 41, 46, 48, 50-52, 59-60, 62, 64-67, 70-71, 75-77, 79-82, 84-89, 91-105, 109, 111-113, 115-121, 123-125, 138, 141-142, 147, 157-161, 164-170, 181-182, 184-191, 193, 195, 197-201, 206, 208, 211, 214-215, 219-223, 228-235, 237, 239, 241, 245-248, 250-253, 256-258, 261-264, 266-270, 272-273, 276-277, 279-289

eastern, 东方的75, 88

Five Great Farms, 五大包税区81, 104, 118, 267-268

French Canada, see Canada 法属加拿大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6-7, 70, 120, 207, 266, 278, 283, 288

northern, 北方37, 41, 84, 87-90, 138, 141, 259

Royal Manufactures, 皇家手工业94-95, 117

southeast, 东南方259

southern, 南方84, 88, 138, 180, 262, 268

Treasury, 金库276

Franche-Comte, 弗朗什孔泰101, 199

Francis, A.D., 弗兰西斯186-187, 192-193

Frank, Andre Gunder, 法兰克148, 150, 154, 238

Franken, M.A.M., 弗兰肯51, 63-64, 69, 77, 79, 84, 96

Frankfurt, 法兰克福42, 197

Freche, Georges, 弗瑞许262

Frederick I (of Prussia), 弗雷德里克一世220, 230

Frederick II (of prussia), the Great, 弗雷德里克二世234

Frederick William (of Brandenburg), the Great Elector, 大选候
201, 207, 227-231, 234-235

Freeholders, 自主地产拥有者86-87, 213, 216, 286, see also

Farmers, yeoman

Freudenberger, Hermann, 弗路登伯格234, 236

Friedrichs, Christopher R., 弗里德里希194-195

Friesland, 弗里斯兰39, 41, 62, 200

Fronde, 投石党92, 116, 120-121, 123-124, 231

Fronteira, Marques of, 弗龙泰拉186

Fronwirtschaft, 封建封臣经济255, see also Feudalism

Fruits, 水果237, 259

Fullard, Harold, 福勒223, 225

Funchal, 丰沙尔186

Furniss, Edgar S., 弗尼斯45, 92-93

Furs, 皮货189, 246, 274

Furtado, Celso, 弗塔多163

G

Gaastra, F., 加斯特拉49

Galenson, David, 加伦森173

Garman, Douglas, 加门5

Gascony, 加斯科尼165

Gathering, 收集业39

Gdansk, 格但斯克19, 21, 59, 98, 100, 132-133, 143, 207,
211

Geijer, Eric Gustav, 盖杰209

Geneva, 日内瓦200, 279, 282, 287

Genoa, 热那亚57-58, 195, 199-200, 202

Gentry, 绅士86, 99, 119-120, 123, 125, 132, 143-145, 246,
283, 285-286, 288, see also Farmers, capitalist

George I (of England), 乔治一世247, 249, 260

George, Dorothy, 乔治92

Geremek, Bronisaw, 格雷梅克20

Germany (the Germanies), 德国6, 14, 20-24, 26, 28, 45-46,
53, 79, 101, 133, 166, 189, 191, 193, 195-196, 198, 201-205,
207, 209-210, 215, 219-220, 222, 224-225, 227-228, 230, 232,
234, 239, 241, 255, 262, 264, 273, 287

east (east Elbia), 东德 (易北河以东) 22, 98, 138, 201, 225-
227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德意志民主共和226

northern, 北德138

northwest, 45西北德

Southern, 143, 179, 193, 197, 201, 225南德

southwest, 西南德20

western, 西德31, 116, 179, 193, 197, 201, 225

Geyl, Pieter, 盖尔37, 38, 68-69, 75-78

Ghent, 根特194

Gierowski, Jozef, 吉洛斯基135

Giesey, Ralph E., 吉赛86

Gieysztorowa, Irena, 基耶茨托罗瓦134

Gilbert, Sir Humphrey, 吉尔伯159

Gilboy, Elizabeth Waterman, 吉尔伯伊260

Gin, 141, 杜松子酒260-261

Gin Age, 杜松子酒时代260-261

Giotto, 乔托6

Gippers, 骗子39

Giralt, E., 吉拉特146

Glamann, Kristof, 格拉曼13, 16, 41-42, 46-48, 56, 58, 60, 66, 91, 97, 107, 115, 133, 161, 202, 204-206, 208, 223, 273-274

Glass, 玻璃141

Glenday, Daniel G., 格兰代273

Gloucestershire, 格洛斯特郡165

Gniezno, 格涅兹诺135

Gobelins Tapestries, 高布尔织挂毛毡74, 94

Godinho, Vitorino Magalhaes, 戈丁诺154, 184, 186-187, 191

Gold, 黄金17, 20, 51, 58-59, 64, 106-112, 117, 149-150, 166-167, 184, 186-187, 192-193, 204, 276-277, 281-282, see also Bullion; Money, metallic

goldstandard, 黄金标准276

Gold Coast, 黄金海岸163

Gomar, Francois (Gomarians), 戈马尔51, 63, 67-68

Gorlitz, Walter, 戈立芝227

Goslinga, Cornelis C., 科斯林加51, 61

Goteboirg, 哥特堡206, 210, 214

Gothenburg, see Goteborg哥腾堡

Goubert, Pierre, 古伯57, 79-82, 85-87, 91-92

Gould, J.D., 古尔德76, 131, 260, 262, 264

Goyhenetche, Manex, 戈伊亨奈什124

Graham, Gerald S., 格拉汉248

Grain, see Cereals谷物

Grampp, W.D., 葛兰普76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113

Granger, C.W., 葛兰治261

Grantham, G., 格拉汉58

Grassby, R.B., 格瑞斯比125, 285

Grasses, 牧草14, 41, 83-84, 259, see also Clover; Hay;
Lucerne; Nonsuch; Rye-Grass; Sain-foin; Trefoil

Gray, Stanley, 格雷165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7, 37-38, 48, 53, 77, 95, 103-104,
118, 160, 167, 220, 238, 241, 255-258, 260-261, 264, 270-271,
279, 281, 284, 287

Corn Bounty Act, 260, see also Bounties

England, 英国5-6, 19-22, 28-29, 31, 33, 39-43, 45-46, 48,
50-52, 55-56, 59-60, 62, 64-66, 70-71, 76-82, 84-85, 87-102, 104-
109, 111-125, 133, 141-142, 147, 157, 159-161, 163-168, 170-
171, 181, 184-193, 195-196, 198, 202, 211, 214, 217-218, 221-
223, 229, 233-241, 245-249, 251-254, 256-260, 262-267, 269, 271-

272, 275-281, 284-288

Alien Act of 1705, 1705异族法令254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275, 278-280, 283, 285

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经济和农业部239-240, 269

Charter of 1672, 1672年宪章, 245

Civil War, 内战5-6, 33, 46, 70, 246, 266

Committee of Trade, 贸易委员会525

Commonwealth, 共和76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78, 97, 252, 262, 273, 278, 286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96, 120, 123, 144, 159, 161, 220, 229, 237, 245-247, 253-254, 265

House of Orange, 奥兰治家族288

Long Parliament, 长期议会77

Mint, 铸币厂77, see also Mints

National Debt, 国债279

Navigation Acts, 航海条例44, 76-79, 90, 95-96, 102, 116, 168, 186, 221, 236-237, 240, 265-266, 269-270

Privy Council, 私人议会252

Scotland, 苏格兰16, 39, 52, 66, 79, 81, 83, 93-94, 123, 168-170, 193, 203, 239, 251-255, 264-266, 270

Act for a Company Tradeing to Affricaand the Indies, 公司贸易法案
252

Act of Security, 安全法案254

Board of Trustees for Fisheries and Manufac-
tures, 渔业及制造业信托部255

Estates, 地产252

Highlands, 高地123

Lowlands, 低地123

Union of Parliaments (of1707), 议会联盟251-252, 254-255, 265

Union of the Crowns (of 1603), 王室联盟251

Wales, 威尔士81

Great Cattle Act (of 1666), 牛只法令265“Great Crash”, 大撞击
283

Great Northern War, 大北方战争211, 216, 218-219, 221

Great Recess (of 1653), 大休业期228

Groningen, 格罗宁根41, 62

Grotius, Hugo, 格劳秀斯61, 70

Grundwirtschaft, grundherrschaft, 地主统治201, 222, 225-226

Gruyères, 格吕叶埃14

Grycz, Marian, 格黑兹138

Guadalquivir, 瓜达尔基维尔157

Guatemala, 174危地马拉

Guérard, Nicolas, 12吉拉德

Guilds, 行会42, 44, 92, 194, 196, 200, 203, 254

Guinea, Gulf of, 几内亚湾186

Gulvin, G., 265古尔文

Guns, see Armaments枪只

Gustav Vasa (of Sweden), 瓦萨203-204, 208

Gustavus Adolphus (of Sweden), 阿道夫204-209, 211-212, 214

Gutswirtschaft, gutsherrschaft, 园主统治135, 201, 222, 225-226

H

Haarlem, 哈伦2, 197, 200

Habakkuk, H.John, 哈巴库克76, 82, 86-88, 120, 285

Hacienda, 农场主147-148, 152-156, 158, 162, see also Estates

Hague, the, 海牙62, 255

Concert of, 海牙会议223

Treaty of (1795), 海牙条约54

Haiti, see Hispaniola海地

Hakluyt, Richard, 哈克洛特-加龙省159

Halberstadt, 哈布斯塔德225

Haley, K.H.D., 哈利63, 67, 69-70, 79

Hall, A.Rupert, 霍尔80

Hall, Douglas, 霍尔174

Halland, 哈兰德211, 213, 223

Hallwil, 豪尔维尔14

Hamann, Manfred, 哈曼226

Hamburg, 汉堡183, 193, 206, 233-235, 253, 275, 279, 282

Hamilton, Earl J., 汉密尔顿151, 180, 190-191, 283-284

Hamilton, Henry, 汉密尔顿252, 265

Hanover, 汉诺威145, 257

Hanseates, 汉萨50, 203

Hansen, Marcus Lee, 汉森239

Hansen, S.A., 汉森224

Hapsburgs, see Empire, Hapsburg哈布斯堡

Hardware, 金属件267

Haring, Clarence Henry, 哈林159-161, 272

Haringbuis, see Buss鲱鱼横帆船

Harrington, James, 哈林顿119

Harnisch, Helmut, 哈尼什226

Harper, Lawrence, A., 哈珀78, 96, 116, 240-241

Harris, L.E., 哈里斯59

Harris, P.W., 哈里斯254

Harsin, Paul, 哈辛278, 281-283

Harte, N.B., 哈特264-266

Hartwell, Richard M., 哈特韦尔260

Harz, 哈尔茨山脉14

Haskell, Francis, 哈斯凯尔200

Hasquin, Hervé, 哈斯钦198

Hassinger, Herbert, 哈辛格234

Hastings, Warren, 黑斯廷斯6

Hat Act (of 1732), 制帽法令241

Hats (political party), 制帽党220-221

Hatton, Ragnhild M., 哈顿213, 215, 218-220

Haudricourt, André G., 豪泽康特88

Hauser, Henri, 豪泽180

Hay, 秣草84

Hazard, Paul, 哈札尔44, 269, 288

Heckscher, Eli F., 哈克谢尔56, 61, 94, 101, 105-106, 118, 205, 210, 215, 245, 264, 266

Heeren Zeventien, De, 46-49, see also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Heerengracht, 45, see also Transport, canals

Hegemony, 霸权38, 61-63, 65-66, 69-71, 77, 93, 109, 111-113, 195, 220, 268-269, 280-281

Dutch, 49, 51-552, 57, 60-61, 63-65, 68-71, 75, 195, 206,

211, 241, 245, 258, 268, 274-275

English, 71, 266

French, 70-71, 75, 77, 189

Spanish, 77

Heitz, Gerhard, 海兹226

Helleiner, Karl F., 海连娜45, 258

Helmer, Marie, 海默184

Hemp, 汉普14, 41-42, 100, 211, 218, 239-240, 274

Henry IV (of France), 亨利四世115

Henry, Louis, 亨利258

Herlihy, David, 赫利30

Herring, 黑林39-40, 56, 60, 160, 186

Hessler, C.A., 赫斯勒215

Hildebrand, Bruno, 希尔德布兰德28

Hildebrand, Karl-Gustaf, 希尔德布兰德203, 221

Hildner, Ernest G., Jr., 希德纳272

Hill, B.W., 希尔266, 283

Hill, Charles E., 希尔77, 93, 121, 222

Hill, Christopher, 希尔5-6, 80, 114, 123, 125, 245-246, 259

Hilton, R.H., 希尔顿30

Hinton, R.W.K., 欣顿52, 76-79, 91, 99, 106, 116

Hintze, Otto, 欣茨225, 229

Hispaniola, 小西班牙157, 159, 173

Hitler, Adolph, 希特勒253

Hobbes, Thomas, 霍布斯34

Hobsbawm, E.J., 霍布斯鲍姆3, 6, 15, 20, 27, 115

Hoffenden, Philip S., 霍芬德269

Hoffmann, Alfred, 霍夫曼201

Hogadel, 宫廷派215, see also Nobility, upper

Hogarth, William, 霍加斯244

Hohenzollerns, 霍亨索伦家族225, 227-228, 230-231, 233

Holderness, B.A., 霍尔德尼斯259-260

Holland, 荷兰20-21, 24, 26-27, 37-43, 45-46, 50, 63, 65, 67-68, 70, 75, 78-80, 82, 90, 93, 96, 98, 103, 107, 109, 111-112, 133, 184, 189, 197, 200, 202, 205-506, 209, 214, 223, 234-235,

248, 252, 261, 267, 269-270, 273, 279, 282,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States of, 尼德兰, 荷兰联合省62

Hollandries, 66, see also Poldering

Home Counties, 家园37

Homer, Sidney, 荷马57-59

Honduras, Gulf of, 洪都拉斯湾161

Honey, 蜂蜜162

Hoorn, 霍恩39

Hops, 酒花14, 41

Horn, Arvid, Count, 霍恩220

Horn, David Bayne, 霍恩80, 220, 275

Horsefield, J.Keith, 霍斯菲尔德279

Horses, 马88, 152, 263

Hoskins, W.G., 霍金斯83

Households, 王室人员197, 207-208

Houtman, Cornelius de, 47

Hovde, B.J., 霍夫德221

Howard, Michael, 霍华227

Hroch, Miroslav, 赫洛奇24, 107, 235

Huancavelica, 万卡维利卡153

Hubert, Eugène, 胡伯特54

Hudson Bay Company, 哈得逊海湾公司250

Huetz, Christian de Lemps, 休易茨268

Hufton, Oliver H., 赫夫顿258

Huguenots, 胡格诺派45, 67, 75-76, 102, 124, 195, 220, 230, 249, 279, 287-288

international, 279

Humanism, 人文主义23, 33, 68

Humus, see Agriculture, fertilizers

Hundred Years' War, second, 百年战争, 第二次245, 275

Hungary, 匈牙利131-134, 138-139, 141-145, 205, 217, 226, 231-234

Husbandry, 农夫82, 84, 87, 89, 201

Hutchinson, E.P., 哈钦森76

Hymér, Stephen, 海默44

I

Iberia, 伊比利亚61, 160, 183, 193, 202, see also Spain;
Portugal

Iberian Union, 伊比利亚联盟182

Ice age, little, 冰河时期（小）259

Iceland, 冰岛39

Imbert, Gaston, 英伯特5, 82, 266

Imbert, Jean, 英伯特284

Imhof, Arthur E., 英霍夫224

Immigration, see Migration移民

Incas, 印加109

Income, 收入15, 28-31, 49, 57, 64, 85, 94, 103, 117, 130-131, 140-141, 148, 169, 194-196, 201, 222, 228, 259, 278, 284-285

Incorporation, see World-economy

Indelningsuerk, 专项支取216-219, see also State, finances

India, 印度47, 97-98, 106-108, 198, 246, 264, 274, 276

Indian corn, see Maize

Indian ocean (areas), 印度洋22, 47-50, 274

Indians (if referring to Western Hemisphere), see Amerindians印第安人

Indies, 东印度群岛

East, 46-47, 49-51, 54, 61, 69, 77, 79, 96-97, 107-109, 148, 157, 171, 188, 245, 256, 276

West, see Caribbean

Indigo, 靛青91, 150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47, 235, 274

Industrial crops, see Agriculture, industrial crops工业作物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5-6, 27-28, 96, 105-106, 209, 265, 267

Industrialism, 工业主义7, 28, 94-95, 101, 190, 197, 207, 221, 227-228, 233-236, 256, 285

Industrialists, 工业家187, see also Capitalism, entrepreneurs

Industries, 工业8-9, 13, 15-17, 27-28, 39-46, 50, 90, 92, 94-95, 117, 119, 121, 125, 140-141, 174, 181, 186, 191, 193, 196, 200, 202-203, 207-208, 210, 217, 228, 246, 260, 262-263, 265-267, 279-280

copper, 铜205-208

depression, see Cycles, economic, B-phases不景气

mining, 矿业80, 93-94, 101, 110, 125, 138, 143, 148-150, 152, 154-158, 173-174, 194, 205-206, 208-210, 222, 238, 263

protoindustrialization, 原始工业化196

putting-out system, 加工包销制44, 193-196, 200, 209-210

rural, 16, 91-92, 156, 194

shipbuilding, 造船16, 27, 40, 43-44, 46, 48, 54-55, 59-60, 91, 99-100, 116, 181, 215, 218, 236, 238, 240-241, 249, 263, 269

textile, 13, 16, 42-43, 46, 95, 181, 193-194, 199, 234, 252, 255, 263, 273

urban, 都市的25, 54, 92, 140-141, 194, 196, 199

Infantry, see Army

Inflation, 膨胀see Prices, rise of

Ingria, 因格里亚211, 219

Inheritance, 继承30, 86

Innis, H.A., 英尼斯274

Insh, George Pratt, 英什252-253, 255

Instrument Makers, 工具制造者66

Insurance, 保险38, 55, 57, 257

Intendants, 地方行政长官制度

Interest rates, 利率see Money, interest

Investments, 投资56, 60, 86, 89, 91, 95-96, 111, 118, 137, 144, 152, 154, 163-164, 168-169, 172, 197, 202, 206, 209, 215, 253, 263, 269, 279-285

Involution, 卷入20, 129, 137, 166-167, 181, 196, 197, see also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Ireland, 爱尔兰14, 16, 99, 123, 133, 168-169, 239, 252-253, 261, 264-266

Irish Woollen Act of 1699, 爱尔兰羊毛法令265

Iron, 铁99-101, 138, 156, 196, 204-205, 208-210, 217-218, 220-221, 239-240, 259, 263, 274

Iron Act of 1750, 1750钢铁法案241

Islam, 伊斯兰146, 274, see also Mediterranean, Islamic; Moriscos

Israel, J.I., 伊斯雷尔42, 49, 183

Issawi, Charles, 伊萨维98

Italy, 意大利14, 20-21, 29, 50, 98, 147, 183, 189-190, 195-197, 200-201, 255

northern, 北方22, 31, 50, 75, 83, 103, 193, 195-197, 199-200, 202-203, 209, 282

southern, 南方146-147, 167

J

Jacobitism, 詹姆斯党123, 252-254

Jacquart, Jean, 雅卡尔4, 13-15, 81-82, 84, 87-90, 92, 117, 125, 258-259, 276, 278, 282

Jamaica, 牙买加157, 159-164, 169, 171, 174, 191, 270-272

James I (of England), 詹姆斯一世

James II (of England), 詹姆斯二世43, 76, 100

James VII (of Scotland), 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

Jams, 果酱259

Jämtland, 耶姆特兰211

Jansen, H.P.H., 詹森39, 42, 84

Jansen, J.C.G.M., 詹森262

Jansenists, 詹森主义者67, 124

Japan, 日本107-108, 134, 205-206, 276

Java, 爪哇274

Jeannin, Pierre, 詹宁19, 45, 67-68, 103, 132, 198, 201, 208, 212, 214, 261, 274

Jenkin's Ear, War of, 詹金割耳之战191

Jensch, Georg, 詹许212

Jensen, Einar, 强森

Jesuits, 耶稣会士198

Jewelry, 珠宝109, 137

Jews, 犹太人46, 78, 145, 183, 195, 233, 253

German, 德裔犹太人45

Sephardic, 西班牙籍犹太人67, 78

Jodenbreestraat, 约登布利斯特拉特67, see also Amsterdam

John, A.H., 约翰260-261, 263, 272, 280-281

Johnsen, Oscar Albert, 约翰森139

Jones, E.L., 琼斯40, 82, 84, 194

Jones, J.R., 琼斯37, 51, 77, 79-80, 82, 114, 123, 125, 248, 250-251

Jordaan, the, 约旦45, see also Amsterdam

Jorgensen, Johan, 约根森134, 223-224

Journet, Jean-Louis, 朱尔内117

Journeyman, 熟练的工人see Artisans

Judaizantes, 犹太教徒183

Julian calendar, 儒略历246

Junkers, 年轻贵族（容克）226-231, see also Aristocracy;
Classes, upper; Farmers, capitalist; Landowners; Seigniors

Junto, 秘密结社286, see also Whigs

Jura, 汝拉14

Jurieu, Pierre, 朱里尤67

Jurisprudence, 法理学85

Jutikkala, Eino, 贾蒂卡拉213, 218, 222, 224

K

Kaltenstadler, Wilhelm 卡坦斯塔德勒234

Kamen, Henry, 卡曼23-24, 180, 185, 188-190, 209, 237-238

Kann, Robert A., 卡恩232

Kätner, 卡特纳15, see also Farmers, small

Kaufsystem, 购买制195-196, 235

Kavke, František, 卡夫喀139, 231

Kearny, H.F., 基尔尼265

Keith, Robert G., 凯思155

Keith, Theodora, 凯思252

Kellenbenz, Hermann, 克伦本茨43, 91, 134, 183, 194-195, 198, 204-205, 218, 263, 265

Kent, H.S.K., 肯特224

Kepler, V.S., 克卜勒77

Kerridge, Eric, 柯立芝87

Kexholm, 凯克斯霍姆211, 214

Kindleberger, Charles P., 金德伯格43, 282

King William's War 威廉国王战争187, 265, 271

Kingston, 金斯顿169

Kirchheimer, Otto, 克什海默93

Kirilly, Zs., 柯日利134, 139

Kisch, Herbert, 基许197-198, 200, 235

Kiss, Istvan, 基思139

Klein, Peter W., 克莱因44, 48, 56, 59, 63-64, 96, 269, 280

Klima, Arnošt, 克里马42, 139, 194-196, 233, 235

Knapp, G.N., 克纳普227

Knechte, 雇工, 15, see also Laborers (common)

Knoppers, Jake, 克诺伯58, 272, 274

Knoque, 克诺克255

Komornicy, 135, see also Laborers (common)

Königsberg, 科尼斯堡100, 211, 229

Kopparberg, 科帕尔伯格

Korczyn, 科尔茨赞132

Kosminsky, Eugen A., 科斯明斯基30

Kossmann, E.H., 科斯曼45, 62-63, 68, 118, 269

Kowecki, Jerzy, 科维基142

Krefeld, 克雷非德200

Kriedte, Peter, 克里特194-196

Kronobönder, 王室领地农212, see also Peasantry

Kruger, Horst, 克鲁格233

Kuczynski, Jürgen, 库钦斯基226

Kuhn, Walter, 库恩226

Kujawy, 库亚维140

Kula, Witold, 库拉131-135, 137-138, 140, 236

Kulischer, Joseph, 库里舍96, 196, 226

Kurland, 库尔兰195

Kurpie (region), 库尔皮145

Kuske, Bruno, 45, 库斯克197

L

Labor, 劳工14, 16, 29, 45, 84, 91-94, 100, 109, 129, 134, 149, 152, 156, 162, 165, 167, 171, 193-194, 196, 210, 222, 227, 260, 269, see also Workers

division of, 劳动分工8-9, 20, 37, 42, 179, 187, 196, 199, 212, 221, 241, see also Capitalism; Core; Periphery; Semiperiphery; World-economy

laborforce, 劳动力see Workers modes of control, 控制形式153-154, see also Coerced labor; Farmers, tenant; Laborers; Slavery

Laborers (common), 8-9, 15-16, 25, 45, 85, 88, 92, 139-140, 153-154, 172, 196, 217

indentured, 契约劳工87, 102, 132, 168, 171-173

urban, 都市劳工see Workers

Laboueurs, 劳动者15, 87-89, see also Farmers, yeoman

Labrousse, Elisabeth, 拉布鲁斯67, 120, 266, 289

Lace花边42

Lacquer, 273

Ladoga, Lake, 拉多加湖214-215

La Fayette, 拉法耶特287

Land, 土地14, 27, 30, 41, 45, 56-57, 64, 82, 85, 90, 135-136, 138, 146, 148, 152, 154-156, 164, 170, 194, 200-202, 212-216, 219, 222, 224, 226, 228, 238, 246, 248, 254, 259, 262, 285

cultivated, 可耕地90, 262

land reclamation, 土地重划14, 25-26

uncultivated, 处女地85

Landlords (landowners), 地主14, 31, 85-90, 99, 116, 119, 123, 132, 135-137, 141-142, 145, 147, 153-155, 167-168, 175, 200-202, 204, 215-216, 220, 222, 225-227, 230-231, 235, 237, 247, 253-254, 259, 263, 265-266, 279, 284, 285, see also Aristocracy; Estates, owners, Farm-ers, capitalist; Gentry; Nobility; Seigniors

Land's Advocate of Holland, 荷兰的土地开发62, 69,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Lane, Frederic C., 莱恩199

Lang, M.F., 朗格149, 153, 160

Langton, John, 兰顿100

Languedoc, 朗格多克84-85, 95, 147, 262, 268, 279

Larquié, Cl., 拉尔基146

Larraz, José, 拉瑞兹87, 150, 158, 185

Latifundia, 地产141, 143-144, 148, 154, 200, see also Estates

Latvia, 拉脱维亚132

Lavrovsky, V.M., 拉夫洛夫斯基87, 259

Law, John, 约翰劳281-284

Lead, 领导141, 263

Lease, 佃农see Tenure

Leather, 皮革42, 103, 274

Le Brun, Charles, 布伦74

Le Flem, Jean-Paul, 弗莱姆180

Leghorn, 来亨50

Legrelle, Arsène, 莱格瑞尔188

Leibbeigen, 农奴229, see also Serfs

Leibnitz., G.W., 莱布尼茨7, 219

Leiden, 莱登45, 45

Leipzig, 莱比锡28, 197

Lenman, Bruce, 林曼253-255

Lensgrinders, 磨镜片者66

Léon, Pierre, 莱昂16, 91-92, 94-95, 98, 100-101, 103-104, 116, 124-125, 249, 266, 268, 270, 273, 278

Léonard, Emile-G., 列奥纳德124, 257, 287

Leopold I (of Austria), 利奥波德一世232

Leopold I (of Belgium), 利奥波德一世5

Leopold I (Holy Roman Emperor), 利奥波德一世42

Lerina, Duke of (Francisco Cómezde Sandovaly Rojas), 勒尔马公爵204-205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拉杜里4-5, 16, 29, 76, 82, 84-85, 87-89, 117, 124-125, 138, 258-259, 262, 268, 287-288

Leskiewicz, Janina, 列斯基维茨141, 235

Les Landes, 兰德斯14

Lesnodarski, Bogustaw, 莱斯诺达斯基133

Leuilliot, Paul, 勒依奥特273

Levant, 地中海东部47, 50, 54, 58, 98, 107, 235, 270, 272,
see also Mediterranean (region)

Liberalism, see State, liberalism自由主义

Lichtheim, George, 李希泰姆77

Liebel, Helen P., 利贝尔197, 199, 235

Lima, 利马156, 160

Limburg, 林堡84

South, 南林堡262

Limekilns, 263

Limerick, Treaty of (1691), 利默里克条约253, 265

Linen, 亚麻42, 95, 156, 181, 199, 235, 252, 254-255, 265-
266, 268, 275

Linseed, 亚麻仁262

Lipson, Ephraim, 利普生46, 84, 90, 93-94, 261

Lira, Andrés, 里拉155

Lisbon, 里斯本47, 166, 186, 189, 191, 277

List, Friedrich, 里斯特197

Lithuania, 立陶宛143-145

Livestock, 家畜13, 41, 82, 85, 132, 151, 159, 180, 200, 259, 261, see also Agriculture, pasturage; Cattle; Dairy products; Meat

Livonia, 立沃尼亚134, 208, 211, 219

Loans, 贷款59, 200, 206, 232, 278-279, see also Banking; Financiers; Money

Locke, John, 洛克7, 66-67, 70

Lockhart, James, 洛克哈特155

Logadel, 地方派215, see also Nobility, lesser

Loire (river), 卢瓦尔河83

Loire Valley, 卢瓦尔河谷85

Lom, Frantisek, 洛姆135

Lombardy, 伦巴底197, 199

London, 伦敦37, 45, 58, 76, 78-79, 95, 104-106, 111, 165, 168, 170-171, 193, 237, 252, 260-261, 271, 275, 277, 283, 286

Long Parliament, see Great Britain, England, Long Parliament长期

议会

López., Adalberto, 洛佩兹150

Lord, Eleanor Louisa, 237-240

Lorraine, 洛林250

Louis XIV (of France), 路易十四世33, 74, 79-81, 102, 112, 114-117, 123-124, 188-189, 214-215, 246, 248, 250, 252, 255, 272, 277, 279

Louisiana, 刘易斯安那102, 282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14, 20, 40,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Luanda, 卢安达52

Lübeck, 卢卑克223

Lumpenproletariat, 缺乏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230

Lunde, Johs., 伦德160

Lundgreen, Peter, 伦格林81

Lundkvist, Sven, 卢尔德维斯特211, 217, 219

Lusatia, 卢萨蒂亚138

Lütge, Friedrich, 吕特格22, 38, 201, 225-227, 233

Lüthy, Herbert, 吕提108, 111-112, 117, 124, 276, 278-279, 283-284

Luxembourg, 卢森堡250

Luxury goods, 奢侈品42, 49-50, 65, 94, 107, 131, 146, 162, 165, 200, 273-274, see also Trade, luxury

Luzac, Elie, 卢萨克39

Luzzatto, Gino, 卢札托200

Lynch, John, 林奇111, 151, 181

Lyon, 里昂91, 103, 202, 284

M

Maas (river) 马斯河41, 54

Macartney, C.A., 麦卡特尼144, 234

Macedo, Jorge Borges de, 麦西度187, 192

Machiavelli, Nicolo, 马基雅维利6

MacLachlan, Jean O., 麦克拉伦185, 188, 239, 272

MacLeod, Murde J., 麦克劳德4, 148-151, 153-155, 159, 161

Macurek, J., 麦丘里克194-196, 233

Maczak, Antoni, 马查克21, 107, 132-133, 135-138, 141-143

Madder, 疯狂者14

Madeira, 马得拉186-187

Madras, 马德拉斯273

Madrid, 马德里156, 181, 183, 189

Madrid, Treaty of (1750), 马德里条约272

Magde, 女仆15, see also Ladorers (common)

Magnates, 大地主30, 135-137, 141, 143-144, 227-228, see also
Aristocracy; Landlords; Seigniors

Mahan, Admiral Alfred T., 马汉64, 78, 81, 248-249

Maine (France), 曼恩16

Maize, 梅兹83, 151-152, 180, 202

Makkai, László, 133, 138-139, 141-142, 201, 马卡凯

Malecki, Jan M., 马利克奇138

Málaga coast 马拉加海岸187

Malowist, Marian, 马洛维斯特135, 139-141, 218

Malt, 黑麦261, see also Beer

Manchester Act of 1735, 1735年曼彻斯特法令264

Manila, 马尼拉245

Manoeuvriers, 工人15, 89, see also Laborers

Manorialeconomy, 采邑经济5

Manufactures, 制造22, 42, 44, 67, 78, 92-96, 98, 100-101, 103-104, 147, 156, 167, 181, 185-187, 193, 196, 199, 233, 237-238, 249, 262, 264, 266, 273

Manumission, see Slavery, manumission

Mare clausum, mare liberum, 领海公海61

Maria Theresa (of Austria), 特蕾莎231, 235

Marie-Anne de Neubourg (of Spain), 玛莉·安189

Marino, John A., 马里诺197

Maritime school of thought, 思想的海上学校246-247, 249

Mark, 记号225, 228, 230

Market, 市场

capitalist, see World-economy资本家

market economy, see Money, money-economy市场经济

world, see Trade (world) 世界市场

Markovitch, Tihomir J., 马可维奇266-268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 of, 马尔博罗198

Marques, A.H.de Oliveira, 马奎斯182-183

Marqueses del Valle, 马奎斯148

Marranos, 马拉诺斯58, 78, 183, 287, see also Jews Sephardic

Marseilles, 马赛21, 103, 258, 262, 268, 272

Marshall, Alfred, 马歇尔105

Martin, Henri, 马丁108, 250

Martinique, 马提尼克102, 169, 270

Martins, J.P.Oliveira, 马丁192

Martin Saint-Léon, Etienne, 93

Marvell, Andrew, 马维尔40

Marx, Karl, 马克思5-6, 60, 280

Marxism, 马克思主义5-7, 114, 122

Maryland, 马里兰164, 166-167

Masefield, G.B., 梅斯菲尔德44, 162, 171

Mason, 梅森28

Masovia, 马索维亚134, 145

Masselman, George, 马赛曼46-49

Masson, Paul, 梅森272-273

Mata, Eugénia, 梅塔17

Matejek, Frantisek, 马特耶克131

Mateship, 同志之谊168

Mathematicians, 数学家66

Mathias, Peter, 马西厄斯261, 287

Matjan, 马特耶49

Maurice of Nassau (Orange), 拿骚24, 64, 68, 80, 207

Mauro, Frédéric, 摩洛17-18, 162, 183-184, 186

Maximilien Emmanuel (of Bavaria), 马克西米连198

Maxwell, Kenneth, 马克斯韦尔191

May, L.P., 梅270

McManners, J., 麦克马纳斯285

Meat, 肉类133, 159, 200, 261, 265, see also Food; Livestock shortage of, 29

Mecklenburg, 麦克伦堡226-227, 231

Medick, Hans, 麦迪克195-196

Mediterranean (region), 地中海地区20-21, 23, 46, 48-50, 53,

64, 97-98, 103, 146, 165, 188, 248, 255, 262, 268, see also Africa, north; Europe, southern; Levant; Trade, Mediterranean

Christian, 基督教9, 50, 54, 98, 145, see also Christianity

Islamic, 9, 274, see aksi Uskan

Mehring, Franz, 梅森228-230

Meilink-Roelofsz, M.A.P., 默林克47, 61

Meissen, 梅森273

Mejdricka, Kveta, 梅依德里卡135, 138

Mellafe, Rolando, 梅拉费149, 153, 173

Menard, Russell R., 曼纳德173

Mendels, Franklin F., 门德尔斯194, 196, 200, 266

Menin, 梅嫩255

Mennonites, 门诺派教徒195

Mentink, G.J., 门廷克75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5, 37-40, 43, 58, 60-61, 67, 69, 75, 77, 79, 90-92, 95, 97, 103, 105-106, 109, 113, 115-117, 122, 141-142, 144, 147, 157-158, 160, 164-166, 168, 186-191, 196-200, 203-204, 211, 213, 220-221, 224, 232-233, 236-239, 247-248, 250-253, 256, 264-269, 273, 275, 277, 280, 285, 287

Merchant Capitalism, 重商资本主义see Capitalism, merchant capital

Merchants商业19, 24, 27, 45, 48-49, 51, 53, 60, 87, 89, 95-96, 115, 147, 151, 156, 160-161, 166-171, 183, 188, 193-194, 198, 202, 206, 210-211, 216, 222-224, 233, 235-238, 240, 247, 249, 252, 254-256, 268, 272, 275, 280, 285, see also Bourgeoisie; Trade (world)

Mercury, 水银149, 151

Mertens, Jacques E., 默顿斯276

Mesta, 梅斯塔181

Mestizo, 梅斯蒂索152-153, 155-156, 158, 173-174

Metals, 金属17, 58, 105, 110, 130, 181, 204, 266, 282, see also Copper; Iron

Metalwares, 金属器皿141, 205-206

Métayers, 分成制租田者88, see also Sha-Sharecropping

Methuen, Treaty of (1703), 梅休恩条约187-188, 191, 284

Meuvret, Jean, 穆夫里4, 15, 84, 86-88, 95-96, 118, 199

Mexico, see New Spain墨西哥

Mexico City, 墨西哥湾153

Mexico Gulf of, 墨西哥湾161

Mezzadria, 梅萨德里亚200, see also Sha-recropping

Michalkjewicz, Stanislas, 米契尔捷维茨235

Michell, A.R., 米歇尔39-40, 43, 52

Middle Ages, 中世纪6, 13, 15, 18, 20, 27, 29, 49, 105-106, 121, 148, 162, 166, 194, 203, 207

Middle Atlantic colonies, 中大西洋殖民地179, 237, 239

Midi, 法国南部21, 91

Midi-Pyrénées, 南法-比利牛斯262

Midlands, 密德兰14

Migration, 迁移45, 51, 64, 66-67, 102, 158, 183, 202, 239, 249, 279

Mika, Alois, 米卡195

Milan, 米兰196, 199, 234

Milk, see Dairy products牛奶

Millet, 粟180

Millones, 150, see also State, finances

Minas Geraes, 米纳斯吉瑞斯191

Minchinton, Walter, 明钦顿26, 29, 46, 100, 116

Minden, 明登225

Miners, 矿工93

Mingay, G.E., 明盖86-88, 120, 259-260, 262-263, 285

Mints, 铸币厂276, 281, see also Bullion; Great Britain, England, Mint; State, finances

Mintz, Sidney W., 明兹152, 174

Mirabeau, Comtede (Honoré Gabriel Riqueti), 米拉波287

Miississippi, 密西西比102

Mississippi Bubble, 密西西比泡沫282-283

Mississippi Valley, see Louisiana密西西比河谷

Mita, 米达制149, 174

Mode of production, see Production, mode of生产模式

Molasses, 糖蜜168, 237, 241

Molasses Act of 1732, 1732年糖法案169, 241

Molenda, Danuta, 莫伦达141

Mols, Fr.Roger, 穆尔斯18, 45

Moluccas, 摩鹿加274

Money, 货币, 金钱16-17, 25-27, 29-30, 49, 57, 59, 63, 81,

88, 92, 106, 109, 111-112, 116-1117, 132, 137, 149-150, 152, 168, 185-186, 190-191, 193, 196, 202-206, 215, 222, 231-233, 238, 249, 253, 271, 276, 279-282, 285; see also Banking; Bullion; Copper, copper coins; Financiers; Gold; Silver; Vellon bills of exchange, 交换货币58-59, 105-109, 170

credit, 信贷17, 25, 38, 57, 59, 81, 86, 105, 112, 170, 194-195, 203, 210, 278, 283

devaluation, 贬值53, 205, 275-276, 278

financial centers, 金融中心57, 86, 94, 171, 180, 183, 193, 202, 281

hoarding, 贮藏106, 112, 137

interest, 利益59, 86, 111, 276, 279-281

metallic, 金属的58-59, 105, 275-276, 281-282, see also Bullion; Copper, copper coins; Gold; Silver; Vellon

money-economy, 金钱经济70-71, 94, 129, 156, 174

money-market, see Money, financial centers 金钱市场

money of account, 会计16-17, 275-276, 283

paper, 纸币25, 275, 277, 282

“Rising of the Moneys”, 币值提升130

stability, 稳定性57, 130, 132, 281

Mmontpellier, 蒙彼利埃14

Monter, E.William, 蒙特279

Morality (mores), 道德27

Moravia, 摩拉维亚135, 138, 226, 231, 234-236, see also
Czechia; Czechos-lovakia

Moreno Fragnals, Manuel, 摩利诺270

Morgan, Henry, 摩根159

Morgan, W.T., 摩根250

Morineau, Michel, 莫里诺4, 19, 47, 49, 52, 58, 83-85, 97,
103, 110-111, 151, 193, 268-269, 274, 277, 280-281

Moriscos, 摩里斯科人146, 181

Mörner, Magnus, 莫内尔152, 155

Morocco, 摩洛哥182

Moselle (river), 莫赛尔河14

Moslems, see Islam穆斯林

Mousnier, Roland, 莫斯尼尔3, 16, 116, 277, 287

Mughal Empire, see Empire, Mughal莫卧儿帝国

Mukherjee, Ramkrishna, 穆克吉98

Mulattoes, 穆拉托152-153, 155-156, 158, 173-174

Mun, Sir Thomas, 孟75, 105

Munck, Thomas, 孟克224

Munktell, Henrik, 蒙克泰尔210

Munster, 蒙斯特16

Muro, Luis, 穆洛155

Murray, R.K., 默里246, 251

Muslin, 穆斯林364, 273

Myska, Milan, 迈斯卡196

N

Naborios, 印第安仆人154, see also Debt peonage

Nadal, J., 那达尔146

Naish, G.P.B., 内许43

Namur, 那慕尔255

Nantes, 南特102, 268, 279

Naples, 那不勒斯21, 146-147, 196, 234

Napoleon, 拿破仑6, 114, 225, 233, 268

Narva, 纳尔瓦100, 211, 214, 239

National economy, see Trade, national markets 国家经济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144, 203, 210, 272

economic, see Mercantilism 民族主义经济

Naval stores, 军舰补给品99-100, 104, 210, 217, 238-239, 246,
see also Hemp; Pitch; Resin; Tar; Turpentine

Naval Stores Act of 1705, 1705年军舰补给法令239-240

Navarre, 那瓦尔189

Navigation Acts, see Great Britain, England, Navigation Acts 海军条
例

Navy, 海军52, 64, 78, 80, 99, 114-115, 118-119, 158, 161,
183, 188, 207, 210, 212, 216, 239-240, 246-249, 257, 263, 268,
272, see also Army; Navy

Nef, John U., 内夫93, 95, 100, 164, 246, 266

Negotiepenningen, 58, see also Money

Negroes, 黑人152, 154, 163, 172, 266

Neguev, S., 内格夫272

Nelson, George H., 尼尔逊191, 256

Netherlands (northern), 荷兰(北方)7, 19-24, 33, 37-57, 59-

67, 70-71, 75-79, 82-84, 90-94, 96, 98, 101-103, 106, 111-118, 132, 134, 138, 143, 157-160, 162-163, 165-168, 181, 183-191, 193, 195-198, 200, 203-207, 211-212, 214-215, 217-218, 221-223, 227-229, 235-237, 239, 241, 246, 249-251, 253, 255-257, 261-262, 265, 267-271, 273, 275, 279-282, 285-288, see also Batavian Republic; Holland; Low Countries; Trade, Dutch; Zeeland Netherlands Barrier, 尼德兰障碍250-251, 255-256

Revolt of the, 荷兰反叛6, 25, 42, 44, 53, 70, 75, 125, 150, 209

southern, 南荷22, 45, 51, 54, 69, 79, 95, 165, 193, 196-198, 201, 209, 234, 250, 252-253, 255-256, 261, see also Brabant; Flanders

states-General, 等级会议39, 47, 60, 78, 96, 206, 223, 286

War of Independence, 独立战争see Netherlands, Revolt of the

Nettels, Curtis P., 内特尔斯161, 237-240, 271

Neutrality, 中立250, 275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51-52, 79, 236, see also New York

New Christians, see Marranos新基督徒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179, 186, 236-237

New Jersey, 新泽西236

New Mills Cloth Manufactory, 新密尔斯布厂252

New Spain, 新西班牙4, 109, 147-149, 151, 153-156, 161-162, 174, 183, 276

New World, see America新世界

New York, 纽约64, 236-237, see also New Amsterdam

Newton, Isaac, 牛顿7

Nichtweiss, Johannes, 尼希特韦思226

Nielsen, Axel, 尼尔逊139

Nijmegen, Treaty of (1678), 80, 95, 124, 161, 215内伊梅根条约

Nine Year's War, 九年战争229, 239, 248, 250

Nobility, 贵族31-32, 68, 75, 85-86, 119-120, 122, 124, 134, 136-137, 140-145, 182, 200-201, 210-218, 220, 222, 224, 226-229, 231-232, 234, 236, 254, 284-287, see also Aristocraey; Classes, upper; Landlords, Seigniors

lesser, 低阶贵族30, 99, 135, 143, 190, 212, 230, 287

middle, 中等贵族143

quit-rent, 还债141, 143

upper, 上层143, 190, 212

Nobility Matriculation Law (1626), 贵族注册法212

Noblesse de robe, 穿袍贵族119, 143, 285-286

Nomadism, 游牧生活84

Nordmann, Claude J., 诺德曼205, 207, 209, 214, 219-220

Normans, 诺曼人286

Norrkøpping, Diet of, 诺尔科平213, 215

North, Douglass C., 诺思44, 59, 90, 105

North Sea, 北海39, 195

Norway, 挪威106-108, 139, 160, 211, 214, 239, 252-253

Norwich, 诺里奇66, 115

Nova Scotia, 新斯科夏250

Nueva Planta, 新普兰塔189

Nuremberg, 纽伦堡194, 197

Nystad, Peace of (1721), 尼斯泰兹和约211, 219

O

Oak, 橡木210, see also Wood

Oats, 燕麦14, 180

Oberem, U., 欧布伦174

O'Brien, Patrick, 奥布莱恩287

Odén Birgitta, 奥登210

Oder, 奥得233

Ogg, David, 欧格269

Öhberg, Arne, 欧伯格218, 274

Old South, see America, North, southern colonies老南方

Olivares, Gaspar de Guzman, Count of Olivares, Duke of Sanlúcar de Barrameda, 奥利瓦雷斯181-184

Olive oil, 橄榄油276

Onody, Oliver, 奥诺狄150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211

Open door policies, see State, liberalism门户开放政策

Oporto, 奥波托182

Orangists, 奥兰治人51, 53, 62-63, 68-69, 78,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Orient, 东方48, 84, 107-108, see also China, Japan

Orkneys, 奥克尼39

Ormrod, David, 奥姆洛德261, 264, 275

Ortiz, Fernando, 欧帝兹164, 190

Osborn, Wayne S., 奥斯本155

Ostend, 奥斯坦德234

Osterud, Oyvind, 奥斯塔鲁德215-216, 221-223

Ostrander, Gilman M., 奥斯特兰德238, 241

Ottoman Empire, see Empire, Ottoman 奥斯曼帝国

Owen, Robert, 欧文6

Oxenstierna, Axel, 奥克森谢尔纳205

P

Pach, Zsigmond Pál, 帕赫49, 131-135, 137, 141

Panama, 巴拿马253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253

Pantaleão, Olga, 潘塔里奥185

Paraguay, 巴拉圭150

Pares, Richard, 佩尔斯92, 159-160, 162-165, 167-172, 271

Paris, 巴黎12, 21, 29, 76, 83, 86, 104-105, 272, 283

Paris, Treaty of (1763), 巴黎和约257, 273

Parker, David, 帕克89-90

Parker, Geoffrey, 帕克17, 23, 44, 58, 69, 80, 105, 116-117, 282-283

Parry, J.H., 帕里39, 46-47, 49-50, 52, 111, 270-271

Partnership system, 合伙制度56, see also Companies

Passarowitz, Peace of (1717), 帕萨罗维茨 (和约) 234

Pastels, 青色染料14

Pastoralism, 田园风味83

Pasturage, 放牧see Agriculture, pasturage

Patriarchal society, 家长制社会147

Patricians, 贵族 68, see also Burghers

Pauperism, 贫穷see Poor

Payments, 报酬

balance of, 57-58, 60, 92, 97, 106, 109, 111, 132, 186-187, 192, 200, 254, 256, see also Money; State, finances

system of, 58, 105, see also World-economy

Peasantry, 农人12, 14-15, 30-32, 41, 84-90, 117, 124, 132-

141, 143, 145-146, 155, 164, 167, 182, 194, 200-202, 203-204, 207, 209, 211-214, 216-217, 221-222, 225-229, 231, 286-288, see also Cottagers; Farmers; Laborers

desertions of, 遗弃140, 145, 226

Estate of the Peasantry, 农民等级会议see Sweden, Estates

expropriationof, 90, 226

peasant revolts, 农民反叛5, 30, 101, 125, 139, 144-145, 147, 232, 235

upper, see Farmers, yeoman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236-237

Penson, Lillian M., 彭森271

Pentland, H.C., 宾特兰75, 258

Pepena, 供养制154

Pepper, 胡椒13, 47-48, 273, see also Spices

Périgord, 佩里高尔14

Periphery (peripheralization), 边缘8-9, 17, 22, 47-50, 65, 83-84, 97-98, 109, 123, 129-132, 134, 138, 141-142, 144-147, 151, 156, 158, 160-162, 166-169, 175, 179-182, 185, 196, 203-204, 209, 217-219, 221, 223-229, 233, 236-237, 241, 246-247, 251, 262, 273-274

Pernambuco, 伯南布哥州163

Persia, 波斯108, 264, 273

Persian Gulf, 波斯湾47

Peru, 秘鲁87, 151-156, 174

Peter the Great (Peter I of Russia), 彼得大帝207, 218-209, 252

Peterson, E.Ladewig, 彼德森159

Peterson, Mendel, 彼德森222-223

Phelan, John L., 费伦153-154, 156, 172

Philip II (of Spain), 菲利普二世180, 183

Philip III (of Spain), 菲利普三世69, 151, 204

Philip V (of Spain), 菲利普五世189-190, 198

Philippines, 菲律宾107, 148, 153

Piedmont, 皮埃蒙特201-202

Piel, Jean, 皮尔148, 152, 155-156

Pigs, see Livestock猪

Pilgrimage of Grace, 求恩巡礼5

Pillorget, René, 皮勒盖特112, 124-125

Pinkham, Lucille, 平卡姆123

Piracy, 海上抢劫48, 51, 69, 91, 111, 128, 157-161, 163, 188, 198, 238, 249, 271-272, see also Banditry

Pirenne, Henri, 皮朗198

Pistoia, 皮斯托亚30

Pitch, 沥青100, 218, 220, 239-240, 274

Pitt, William, (the Elder), 庇特75

Piuz, Anne-Marie, 皮乌兹200

Planned economy, 计划经济5

Plantations, 148, 152, 161, 163, 167-168, 172-173, 271, see also Estates

Planters, 种植园主161, 164, 167-171, 173-174, 257, 270-271

Plow, 犁88

Plumb.J.H., 普卢姆75, 96, 114, 119, 121, 247, 256, 260, 268, 283-286

Plunder, 抢劫161

Plutocracy, 财阀政治63, 277, 285

Pohl, Hans, 波尔156

Poisson, Jean-Paul, 波以森284

Poland, 波兰14, 20, 22, 61, 66, 83, 98-99, 107, 131-136, 138-139, 141-145, 207, 210, 214, 216, 219, 222, 225-230, 233, 235, 252, 261, 276

Poldering, 波德林40, see also Hollandries

Polisensky, J.V., 波里森斯基4, 23-24, 64, 206, 232

Polish War of 1655, 1655年波兰战争213, 217

Politicians, 政客130, 285, see also State

Pollnitz, Charles Louis, 波尼兹2

Poltava, 波尔塔瓦219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211, 225-228, 230-231

Pommern, 波莫恩see Pomerania

Ponant, 大西洋区see France, western

Pondicherry, 本地治理250

Poni, Carlo, 波尼200

Ponsot, Pierre, 彭萨特145

Poor, 贫民8, 28-29, 49, 63, 84, 89, 92, 94, 125, 135, 140-141, 161, 194, 196, 204, 259, 276, 285, see also Classes, lower

Poor Laws, 济贫法92, 121

Population, 人口13-15, 18, 30, 33, 39-41, 45, 48, 63, 68, 75-76, 80-81, 88, 92, 102, 106, 115, 130-131, 140-141, 143-144, 146, 151-153, 158, 168, 172, 194, 207, 213, 219, 228, 232-233, 246, 258, 260, 268, 271

decline of (depopulation), 人口缩减15, 18, 25, 30, 42, 75-76, 130, 146, 149, 153-154, 181-182, 196, see also Epidemics

expansion of, 人口膨胀9, 15, 18, 25, 41, 75-76, 129, 145, 245, 258-259, 262, 277

Porcelain, 瓷器273

Porchnev, Boris, 波尔什涅夫182

Port, 港口187

Port-Royal皇家港159

Portugal, 葡萄牙19-21, 45-47, 49, 52, 78, 97, 112, 146, 157, 160, 167, 179-182, 184-191, 193, 217, 235, 239, 255, 261, 268-270, 276, 282, 284, 288, see also Iberia

Portuguese East India Company, 葡萄牙东印度公司183

Postlethwayte, Matachi, 波斯特尔思韦特271

Postel-Vinay, Gilles, 波斯特尔维内4

Potash, 波塔许100, 218, 239, 274

Potatoes, 马铃薯83, 259

Potosi, 波托西149, 152

Poverty, 贫穷see Poor

Poznań, 波兹南138

Precious metals, 贵金属see Bullion

Predikants, 荷兰新教教会之牧师68-69, 287, see also Christianity, clergy

Price, Jacob M., 普莱斯105-106, 166, 169-170

Prices, 价格3, 14-16, 19, 21, 25, 28-30, 33, 56, 76, 83, 110, 131, 133-134, 136-137, 150, 155, 160, 166, 168-169, 193, 205, 216, 262-263, 267, 272, 285

agricultural, 农业30, 40, 56, 75, 77, 82, 87-88, 131, 154-155, 164-165, 222, 224, 258-260, 262, 276

bullion, 16-17, 21-22, see also Bullion

decline of, 价格缩减3, 13, 16, 19, 21-22, 40-41, 86, 88, 97-98, 131, 138, 145, 155, 169-170, 193, 196-197, 214, 220, 234, 245, 260-261, 264, 277

nominal, 形式价格16, 21, 25, 276

rise of, 价格提升4, 13, 19, 21-22, 30, 33, 47, 75, 110, 129-132, 134, 137, 142, 150, 154, 165-166, 173, 182, 184, 186-187,

205, 214, 220, 260-261, 270, 274, 276

silver-gold ration, 金银比率13, 17

Prickler, Harald, 普里克勒133

Priestly, Margaret, 普里斯特利95

Printers, 印刷工44, 66

Printmaking, 印制12

Prisons, 囚徒93, 226

Procaei, Giulio, 普罗卡西197

Producers, agricultural, 生产者see Farmers; Peasants

Production, 生产5, 13, 24, 30, 38-39, 42, 44, 56, 86, 92, 119, 140, 155, 173, 194-196, 238, 259, 273-274

forces of, 强制生产6, 24

mode of, 生产模式5-8, 29, 32, 54, 115, 173, 195-196, see also Capitalism; Feudalism

relations of, 生产关系6, 24, 146, 175, 196, 226, 273

Profits, 利润19, 26, 38, 41-43, 46-49, 51-52, 56-57, 63, 67, 69-70, 87, 89-90, 97, 108, 113, 116, 129-130, 132, 137-138, 140-142, 148-150, 152-157, 161-164, 167, 169, 171, 179, 184, 187, 191-194, 196, 198, 201-202, 204, 211, 218, 221-222, 255, 259-261, 263, 270-272, 274, 276, 279

Proletarianization, 无产阶级化8, 15, 135

Proletariat, 劳动阶级see Workers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see Mercantilism

Protestant ethic, 新教伦理57

Protestantism, 新教主义23, 68-69, 77, 124, 249, 251, 254, 286-287, see also Christianity; Reformation

Provence, 普罗旺斯125

Prussia, 普鲁士66, 71, 135, 152, 179, 195, 201, 204, 214, 217, 219, 222, 225-236, 241, 256-257, 270, 273

Ducal, 公爵的145

East, 东普鲁士225

Prussian licences, 普鲁士执照207-208, 214

West, 西普鲁士140, 225

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务see State, bureaucracy

Pueblo, 普埃布罗152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157

Puritans, 清教徒67, 70, 77

Putting-out system, 加工包销制see Industries, putting-out system

Pyrenees, Treaty of (1659), 比利牛斯条约189

Q

Quarrying, 采石263

Quencez, G., 康塞兹88

Quicksilver, 水银see Mercury

R

Rabb, Theodore K., 拉布22-23, 34, 120-121

Rabe, Hannah, 拉伯46

Rachel, Hugo, 雷切尔230

Ragusa, 拉古萨21

Rákoczi, Ferenc, II (of Hungary), 弗兰茨·拉科齐二世134,
142, 145

Raleigh, Sir Walter, 雷利爵士159

Rambert, Gaston, 兰伯特185, 188, 190, 258

Ramillies, 拉米伊198

Ranches, 大农场158

Rapeseed, 油菜粒14

Rapp, Richard Tilden, 拉普50, 97, 197, 199-200, 202

Rastatt, Treaty of (1714), 拉施塔特条约234

Ravensburg, 拉文斯堡225, 228

Raychoudhuri, Tapan, 雷乔杜里107

Renles de ocho, 八里亚尔银币59, 108, see also Money

Recession, 萧条see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Recife, 勒西菲163

Red Sea, 红海47

Reddaway, W.E., 雷达威223

Reddich, O., 雷地希234

Redlich, Fritz, 雷德利希196

Reduktion, 归还213-217

Reed, Clyde G., 里德59, 104

Rees, J.F., 里斯240

Reformation, 复兴4, 6, 33, 76, 287, see also Protestantism

Refugees, 难民42, 199

Regents (of Amsterdam), 摄政45, 65, 67-68, 115

Régime anjouin, 旧政体198

Regionalism, 区域主义144-145, 181

Reims, 兰斯90

Reinhard, Marcel R., 莱茵哈德18, 75-76, 258-259

Religion, 65-68, 76, 102, 123, 145, 252, 288, 宗教see also
Christianity; Islam; Jews

Rembrandt van Rijn, 伦勃朗36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4, 156

Renier, G.J., 雷尼尔62-63, 68

Rentes constituées, 指定年金制86

Rentes foncières, 地产年金制86

Rentier, 出租者57, 215, 276, 280

Rents, 租金4, 13, 27, 30, 76, 85, 87-88, 90, 116, 138,
212, 222, 225, 263

Repartimiento, 分配153-155, 162, 174

Republicans, 共和主义者69, 288

Resin, 雷辛240

Resnick, Stephen, 瑞斯尼克44

Revah, I.S., 雷瓦183

Revolts, 反叛119-120, 122, 125, 173, 182, 263, 280, see also Peasantry, peasant revolts; Revolution; Slavery, slaverebellions

Revolution, 革命

agricultural, 农业革命see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美国革命241, 257

bourgeois, 中产阶级革命see Bour-geoisie, bourgeoisrevolution

Dutch revolution, 荷兰革命see Netherlands, Revolt of the

English, 英国革命see Great

Britain, England, Civil War

financial, 经济革命105, 118

French, 法国革命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see Great Britain, England, Glorious Revolution

industrial, 工业革命se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volution of 1688, 1688革命see Great Britain, England, Glorious Revolution

Russian, 俄国革命see Russia, Rus-sian Revolution

Rhine (river), 莱茵河41, 133, 227

Rhineland, 莱茵兰195, 197-198, 201, 227, 233, 250

Ricardo, David, 李嘉图187

Rice, 米145, 202, 259

Rich, E.E., 里奇47, 49, 52, 236, 271, 274

Richelieu, Cardinal Armand, 黎塞留75, 90, 95, 250

Richet Denis, 李希特96, 276

Richmond, Vice-Admiral Sir H., 里奇蒙257

Riemersma, Jelle C., 里默斯马63

Riga, 里加100, 211-212

Rijswijk, Peace of (1697), 赖斯韦克和约188, 246, 250, 272

Riley, P.W.J., 赖里253-254

Ringrose, D.R., 林格罗斯59

Rio de la Plata, 里约德拉普拉塔183, 189

Roberts, Lewes, 罗伯茨106

Roberts, Michael, 罗伯茨64-65, 77, 203-217, 222

Roehl, Richard, 罗尔83, 267

Roessingh, H.K., 罗辛165, 268

Rokkan, Stein, 罗坎64

Romano, Ruggiero, 罗曼诺14-16, 19-20, 24, 26, 40, 42, 49, 91, 150, 152, 154, 173-174, 196-197, 200, 203, 270

Romerode Solis, Pedro, 索利斯190

Romein, Jan S., 罗曼92

Roorda, D.J., 罗尔达63, 68-69, 118

Roos, Hans-Edvard, 罗斯203, 210

Rosén, Jerker, 罗森214-216, 223-224

Rosenberg, Hans, 罗森堡225, 227, 230-231, 235

Roseveare, Henry, 罗斯维尔118, 247, 279

Roskilde, Treaty of (1658), 罗斯凯尔德条约211, 223

Rostow, W.W., 罗斯托19

Rostworowski, Emanuel, 罗斯特沃罗夫斯基141, 144-145

Rothschilds, 罗斯柴尔德6

Rotterdam, 鹿特丹67, 275

Roussillon, 鲁西荣平原182

Royal African Company (R.A.C.), 皇家非洲公司52, 245

Royal Bank, 皇家银行281

Royalists, 67, 288, 保王党see also Great Britain

Rubens, Peter Paul, 鲁本斯37

Rubini, Dennis, 卢比尼279

Ruiz Martin, Felipe, 吕兹马丁180, 205

Rule, John C., 鲁尔80, 117

Rum, 朗姆酒168, 237, 241

Rusche, G., 鲁许93

Rusiński, Wladyslaw, 鲁辛斯基135, 140

Russia, 俄罗斯7-8, 58, 100-101, 106-109, 132, 139, 195, 214, 218-220, 229, 233, 235, 239, 263, 274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大革命6

Ruthenia, 卢塞尼亚144-145

Rutkowski, Jan, 鲁特科斯基135, 138, 140, 143 226-227

Ruwet, Joseph, 鲁维特56, 201

Rye, 裸麦14, 180

Rye-grass, 牧草259

S

Saaremaa, 沙阿雷马215

Sainfoin, 圣伏因259

St.Dominique, 圣多米尼克159, 164

St.Lawrence (river), 圣劳伦斯100

Saint-Léon, Martin, 圣里昂93

Saint-Malo, 圣马罗188

St.Paul's Church, 圣保罗教堂244

St.Petersburg, 圣彼得堡218

Salaman, Redciffe N., 撒拉曼259

Salamanca, 萨拉曼卡14

Salerno, 萨莱诺147

Salt, 盐39-40, 43, 56, 93, 160-161, 187, 199, 204, 254

“Salt Mutiny” (1632), 182

Saltillo, 萨尔蒂略152

Saltus, 丛林see Land, cultivated

Samsonowicz, Henryk, 萨姆索诺维茨21

Samuelsson, Kurt, 萨缪尔森208-209, 211-212, 217, 219-221,
234

Sardinia, 撒丁尼亚234

Sarmatians, 萨尔马提亚144-145

Säteri, 萨特里216

Savoy, 萨伏依14, 234

Saxony, 萨克森16, 133, 138, 141, 144, 201, 219, 225, 252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see Baltic (region)

Scania, 斯堪尼亚211, 213, 218, 223, 229

Scheldt (river), 斯凯尔特河53-54, 69, 198

Schlesinger, Walter, 施莱辛格226

Schlote, Werner, 许洛特-加龙省239

Schlumbohm, Jürgen, 施吕勃姆196

Schmoller, Gustav, 施莫勒61, 78, 197, 233

Schöffner, Ivo, 舍费尔4, 13, 20, 25, 33, 38-39, 48, 62, 107

Schumpeter, Joseph A., 熊彼得125

Schwartz, Stuart B., 施瓦茨163, 173-175

Schwerin, 施沃林14

Scotland, 苏格兰see Great Britain, Scotland

Scoville, Warren C., 斯科维尔102, 249, 287

Securities, 安全278

Sedan, 色当95

Seeley, J.A., 西利246, 256

Segovia, 塞哥维亚180-181

Seigniors, 领主23, 86, 117, 134-135, 137-141, 143, 147, 190, 226, 276, 280, see also Aristocracy; Classes, upper; Junker; Landowners; Nobility

seigniorial dues, 领主税86, 138, 140

seigniorial reaction, 领主反动30-31

seigniorial revenue, 领主岁收89, 103, 140, 212

Sella, Domenico, 塞拉13, 15-16, 20, 43, 56, 194, 196-197

Semeyns, Meynert, 西米恩39

Semiperiphery, 半边缘8-9, 26, 65, 84, 101, 129-130, 138, 151, 158, 170, 179, 190, 192, 195-196, 199, 201, 208, 218, 221-222, 225, 231, 233, 236, 239, 241

Semo, Enrique, 西莫153

Serbia, 塞比亚234

Sereni, Emilio, 塞雷尼147, 200

Serfs, 农奴134, 140, 143, 145, 147, 154, 200, 225-226,

229, 231-232, 235

collier serfdom, 煤矿工93

emancipation, 农奴解放30, 145

“second serfdom”, 二次农奴制see Coercedlabor, cash-crop

Servants, 仆人15, 102, 140, 168, 173, see also Laborers

Settlers, see Colonies, settlers安置民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70, 191, 221, 257

Seymour, Charles, Duke of Somerset, 西摩122

Sharecropping, 200-201, see also Meta-yers, Mezzadria分成租制

Sheridan, Richard B., 谢里登160, 163-164, 168-169, 171, 246,
270

Shetlands, 设得兰39

Shipbuilding, see Industries, shipbuilding造船业

Shipping, see Transport, maritime航运

Shipwrights, 造船者55, 238, 268

Shrewsbury, Charles Talbot, Duke of, 什鲁斯伯里公爵122

Scily, 西西里145-146, 167, 234

Sick man of Europe, see Empire, Ottoman欧洲的病人

Sideri, S., 赛德里186, 192-193

Siena, 西恩那21

Silbert, Albert, 西尔伯特186

Silesia, 西里西亚16, 133, 138-139, 145, 226, 234-236, 256

Silk, 丝42, 91, 98-99, 103, 145, 181, 197, 200, 203, 273

mills, 磨坊91, 197, 200

Silver, 白银16-17, 20-22, 33, 51-52, 59, 61, 106-112, 148-154, 156, 161-162, 186, 190, 192, 204-205, 215, 276-277, 282, see also Bullion; Money, metallic; Prices, bullion

Simiand, Francois, 西米安3-4, 6, 8

Sixty Years' Captivity, 六十年囚禁182

Skattebonder, 自有农212, see also Free-holders

Slavery, 奴隶51, 93-94, 102, 146, 154, 162, 164, 167, 169-170, 172-175, 189, 213, 237, 246, 255-256, 266, 270, see also Coerced labor

manumission, 奴隶解放174

slave rebellions, 奴隶反叛163, 173

slave-trade, 贩奴see Trade, slave-trade

Slicher van Bath, B.H., 斯里舍·范·巴特3, 5, 13-16, 18, 21-22,

29, 40-41, 76, 83, 132-133, 141, 144, 226, 232, 237, 260-262

Slovakia, 斯洛伐克132, 138, see al-so Czechoslovakia

Sluiter, Engel, 斯鲁易特52

Slums, 贫民窟260

Smelser, Neil J., 斯梅尔瑟264

Smit, J.W., 斯密特53, 91, 115

Smith, Adam, 亚当·斯密6, 78, 87, 167

Smout, T.C., 斯穆特83, 251-253, 265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231

Social groups, 社会团体69, 152, 231

Social security, see Charity社会安全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结构9, 25, 29, 32, 182, 201, 247

Social struggle, 社会斗争see Struggles, social

Social system, 社会系统6-8, 32, 64

Social welfare legislation, see Poor Laws社会福利制度

Soil conditions, 土壤状况41, 75, 84, 133, 146, 150, 161-165,
180, 201, 207, 222, 230

Solon, 梭伦236

Sombart, Werner, 桑巴特46, 195, 280

Somme (river), 索姆河83

Soom, Arnold, 速姆211

Sossons, 88-89, see also Farmers, small拥有一群牛或马的农民

Sound, the, 松德海峡24, 64, 77, 211, 222-223, 229

South Sea Bubble, 南海泡沫282-283, 285

South Sea Company, 南海公司191, 255-257, 271-272, 278, 283

Spain, 西班牙14, 19-21, 23-24, 31, 42, 46-47, 49, 52-53, 58, 61, 64, 69, 75-77, 91, 97, 101, 106-107, 110, 130, 142, 145-147, 153, 156-158, 160-161, 164, 167, 169, 179-187, 189-191, 198-199, 202, 204-206, 211, 214, 217, 221, 234-235, 239, 246-247, 253, 255-257, 262, 268-273, 276, 280, 282, 288, see also Iberia

Hispanic America, see America, Hispan-ic西属美洲

southern, 南西班牙146

Spanish Bourbons, 西班牙波旁see Bour-bons, Spanish

Spannish Netherlands, 西属荷兰see Neth-

erlands, southern

Spanish Succession, War of, 西班牙继承战争188-190, 198, 219, 221, 234, 239, 249, 251, 271

Speculators, speculation, 投机者45-46, 48, 132, 147, 278, 282, 285

Spelt, 一种小麦262

Sperling, J., 斯珀林106-109, 276

Spice Islands, 香料群岛47

Spices, 香料47, 49, 51, 107-108, 273, see also Pepper

Spiesz, Anton, 施皮茨135, 137-138, 226-227, 232

Spinoza, Benedict, 斯宾诺莎6-7, 34, 66-67, 70

Spitzbergen, 斯皮茨柏根39

Spooner, Frank C., 斯普纳3, 17, 21, 27-29, 51, 112, 276

Squirearchy, 乡绅87, 137, 143, see also Gentry

Stadholder, 荷兰一省之行政长官62-63, 69, 76,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标准28-31, 168

Staples, 土产50, 56, 61, 96, 164, 186, 202, 206, 238, 240, 275

Starvation, 饥饿see Food, shortage of

State, 国家6, 9, 20, 25, 27, 32-33, 37-39, 44, 62-63, 65, 67-68, 70, 77-78, 95, 103, 108, 111, 113, 115, 117-118, 121-

122, 124-125, 142-145, 150-151, 179, 182, 184, 188, 191, 198-199, 201, 203-204, 209-210, 216, 224-225, 228-232, 235-236, 245, 247, 249, 258, 261, 263, 275, 277-278, 281-284, 286-287

absolutism, 绝对主义32-33, 68, 102, 114, 118-119, 121, 124-125, 190, 201, 214-215, 220-221, 224-225, 228, 232, 286

aristocratic, 贵族26

banks, see Banking, state 银行

bureaucracy, 官僚体系9, 32, 38, 89, 113-114, 118-120, 124, 143, 153, 155, 157, 179, 183, 195-196, 210-221, 223-224, 228-232, 235, 247, 279, 281, 284, 288, see also Tax-farming

sale of offices, 卖官鬻爵86, 95, 142, 151, 195, 208, 231

“capitalist”, 资本家7, 32, 60

feudal, 封建6, 119, 122

finances, 财政30, 54, 57, 77, 86-89, 91-92, 103, 105, 113-118, 121, 137, 141-142, 147, 150-151, 153-154, 156, 165-166, 180-182, 184, 188, 191, 202-205, 207-208, 212-220, 223-224, 226, 228-232, 237, 246, 249, 265, 268, 276-283, 285-287

interstate system, 国内体系70-71, 179, 225, 232

liberalism, 自由主义61, 65-66, 68, 70, 94, 114, 141, 245, 268, 277

mercantilism, see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monopolies, 独占203-204, 283

state banditry, 国家劫掠285

state-machinery, see State, bureaucracy国家机器

strength of, 国家强化9, 26, 32-33, 38, 76, 112-114, 116-119, 123, 142-144, 188, 190, 203-204, 212, 217-218, 220-221, 227, 268227-278, 284-288

taxation, 税制see State, finances universal monarchy, 普遍专利
32, see also, Empire, world-empire States-General, see Netherlands

States-General等级会议

Steel, 钢铁95, 206, 209

Stefanescu, S, 史蒂芬尼斯库139

Stewards, 斯图亚特86

Stock-exchange, 股票交易49, 57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7, 100, 203, 210, 212, 214

Treaty of (1719), 234

Stockholm Tar Company, 斯德哥尔摩焦油公司239

Stocks, 股票282-283, see also Companie

Stoianovich, Traian, 斯托亚诺维奇272

Stols, E., 斯托尔斯61, 198

Stone, Lawrence, 斯通87, 111, 122

Stork-Penning, J.G., 斯托克-潘宁251

Stoye, J.W., 斯托伊234

Strading, R.A., 斯特拉德林180

Straits, 海峡270

Strasbourg, 史特拉斯堡28, 250

Stratification, modes of, 21, 62-63, 66, 68-69, 119-125, 131, 141, 143-145, 172-173, 241, 286, 288

Strict settlement, 严限移民86

Strikes, 罢工93

Strong, Frank, 斯特朗159

Struggles, 斗争—社会斗争3, 8, 32, 76, 145, 238

social, 121, see also Classes, 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

Stuarts, 斯图亚特121, 236-237, 248, 278, 285, see also Great Britain

Stuhmsdorf, Treaty of斯图姆斯多夫条约（1635）, 143, 208

Sublime Porte, 土耳其政府see Empire, Ottoman

Sugar, 糖44, 51-52, 102-103, 152, 157, 160-175, 183, 186-187, 236, 246, 257, 259, 267, 270-271, 274, 277

beets, 甜菜83

mills, 磨坊173

refineries, 精制厂147-148, 267

Sully, Duke of, 苏利87

Supple, Barry E., 萨普勒4, 43-44, 52, 92, 103, 106, 109, 122, 125

Surinam, 苏里南79

Surplus, 剩余9, 30-32, 39, 139-140, 148, 152-153, 161, 173, 246, 259-260, 262, 278, 285

Surplus-value, 剩余价值167-168, 195, 208, 241

Sutherland, Lucy S., 萨瑟兰256, 273, 286

Swabia, 斯瓦比亚197

Swart, K.W., 史沃特118, 268

Sweden, 瑞典58-59, 71, 79, 100, 106, 108, 134, 138, 143-145, 178-179, 203-206, 208-215, 217-225, 228-230, 233-234, 236, 239-241, 263, 270, 274, see also Baltic (region)

Estates (Stand), 203, 212-213

Swedish Trading Company, 瑞士贸易公司206

Sweezy, Paul, 斯威奇6

Switzerland, 瑞士24, 195, 199-200, 207, 239, 279

Symcox, Geoffrey, 西姆考克斯248-250

Synod of the Desert, 沙漠宗教会议287

Syria, 叙利亚49

Szatmar, Peace of 萨特马和约（1711），143

Szczygielski, Wojciech, 施茨捷尔斯基132-133, 141

T

Tallow, 牛羊脂274

Tangiers, 丹吉尔185

Tapie, 塔皮Victor-Lucien, 86, 115, 226, 235

Tar, 焦油100, 210, 218, 220, 239-240, 274

Taverns, 酒店260, see also Alcoholic beverages

Tawney, 托尼R.H., 120

Taxes, 税赋see State, finances

Tax-farming, 包税86, 117, 165, 204, 212, 278, see also State, Bureaucracy

Taylor, 泰勒A.J.P., 226-230, 234

Taylor, 泰勒George V., 285

Taylor, 泰勒Harland, 77

Tazbir, Janusz, 塔兹比尔144-145

Tea, 茶49-51, 164, 259, 273

Technology, 技术8, 27, 42-47, 54, 59, 65-66, 105, 150, 163, 174, 199, 208, 248, 280, 288

Temperley, Harold W.V., 坦普尔利188, 256-257, 284

Temple, Sir William, 坦普尔45

Tenant佃农Farmers, see Farmers, tenant

Tenure, allodial, 自主佃农86, 88-89, 121, 147, 263, 213

Ternate, 三个一组的49

Terraferma, 泰拉菲马183, 197, 200

Teuteberg, H.J., 图特伯格29

Textiles, 纤维13 16, 39, 42-43, 46, 49-50, 53, 90-91, 95-100, 111, 141, 181, 185-187, 192, 196, 198, 200, 203, 210, 220, 264, 266, 268-269, 272-274, 279, see also Calico; Camelots; Chintz; Cotton; Industries, textile; Lakens; Linen; Muslin; Obrajes; Trade, textiles; Wool

new draperies, 新织物42, 66, 91

woollen, 羊毛织品95, 156, 192, 198, 200, 234, 264

Thierarche, 蒂埃阿什14

Thirsk, Joan, 瑟斯克82, 87, 122, 165, 194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22-24, 28, 44, 53, 70, 75-76, 78, 99, 115, 133, 138-139, 150, 181, 184, 199, 204-205, 207, 214, 222-228, 230, 232-233, 235

Thomas, 托马斯P.J., 97, 105, 264

Thomas, 托马斯bert Paul, 44, 59, 273

Thompson, 汤普森E.P., 93, 285

Thompson, 汤普森F.M.L., 85

Thuringia, 图林吉亚138, 205

Tiepolo, Giovanni Battista, 泰波罗6

Tierras baldias, 采矿者154

Timber, see Wood木材

Titolipubblici, see State, Finances

Tobacco, 烟草13, 51, 102-103, 157, 162-167, 169-174, 186-187, 236-237, 268

Toledo, 托莱多157, 181

Tomkiewicz, Wadysaw, 汤姆基维兹144

Tonnesson, Kare D., 汤尼森139, 212-213

Tools, 工具27, 200, 263

Topolski, Jerzy, 托波尔斯基19-20, 131-132, 134-135

Tories, 托利党人80, 122, 248, 283, 285, see also Great Britain, England

Torr, 托尔Dona, 5-6

Tortuga, 托尔图加157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277

Toulon, 土伦248

Tourists, 观光客143, 200

Tournay, 图尔内255

Towns, 城市21-22, 30, 41, 45, 51, 68, 91-92, 104, 114-115, 121, 123, 125, 133, 140-141, 144-145, 151, 154-155, 182-183, 194, 196-198, 200, 203, 206, 211, 221, 227, 230, 234, 236, 248, 268, 279

Trade (world) 贸易 (世界), 6, 8, 15, 17-18, 22, 25, 29, 37-41, 44-54, 57, 59, 61, 63-64, 66-67, 75, 80, 85, 91-92, 96-99, 101, 104-108, 117, 121, 125, 133, 138, 147-149, 151, 153,

156, 158, 160, 163-165, 167, 171, 181, 183, 185-189, 191, 193, 195, 199, 202-203, 206, 210, 222, 234, 237-240, 246-247, 249-252, 256, 261-263, 267, 269-270, 272, 274-275, 284-285, see also Bourgeoisie; Merchants; world-economy

“administered”, 47-48

Africa, 非洲46, 186, 238, 252, 273-274

Arab, 阿拉伯48-49

Asian, 亚洲see Trade, Indian Ocean

Atlantic, 大西洋贸易46, 50, 78, 101-102, 104, 133, 148, 151-152, 156, 161, 184, 198, 238, 252, 274, 282, see also Carrera;

Trade, triangular

Baltic, 波罗的海贸易24, 0, 42, 46, 48-50, 52-53, 55, 58, 63, 77, 96-98, 105-107, 132, 206, 214, 217, 240, 250, 252, 274, 276

bullion, 金银条块贸易76, 105, 278

Caribbean, 加勒比海see Trade, Atlantic

cattle, 牛131, 133, 155, 157, 265-266

China, 中国48-49, 273, 282

copper, 铜143, 204

Dutch, 荷兰39, 41, 48-50, 53, 55, 56-57, 66, 69, 78, 134,

189, 200, 203, 267

Eastland, 东土see Trade, Baltic entrepot, 54-57, 59, 77-78, 102, 197, 211, 253, 275

external arena, 外部竞争场85, 98, 103, 108-109, 158, 219, 246, 267, 269, 273

free, 自由贸易38, 48, 53, 61, 84, 188, 220, 245, 253, 269, 271

fur, 47, 273-274

grain, 谷类13, 41, 134, 204, 211, 222, 261-262, 268, see also Cereals

herring, 鲱鱼40

Indian Ocean, 印度洋46, 48-49, 97, 107, 269, 273-274, 282

inland, 内地252, 276

interregional, 地区间84, 103, 138, 146, 183, 197, 212

intra-Asian, 跨亚洲贸易49

intra-European, 跨欧洲贸易137-138, 188, 214, 238, 273

Levant, 利凡特107, 273, see also Trade, Medi terranean

luxury, 奢侈品8, 47-48, 50, 103, 107, 131, see also Luxury goods

Mediterranean, 地中海区贸易46, 50, 53, 63, 98, 262, 272, see also Trade, Levant

monopolies, 专利61, 63, 156, 159-160, 193, 206, 219-220, 235, 239-240, 245, 252-253, 255, 270-272, 274-276, 282 “Mother trade”, see Trade, Baltic

national markets, 国际市场183

plan tation, 大规模农场254

re-exports, 再出口60, 102, 104, 165-166, 206, 266, 269

Russian, 俄罗斯106, 274

salt, 盐40, 237

slave, 奴隶52, 102, 146, 158, 161, 166, 186, 191, 255, 268, 271, 273

spice, 香料47, 59, 103, 158, 273

sugar, 糖103, 158, 166, 270

terms贸易项目of, 9, 13, 19, 25, 37, 49, 97, 111, 131, 136, 193, 217, 267

textile, 织品42-43, 111, 192, 235

timber, 木材44

trade war, 贸易战争see War, economic aspects of trading companies, see Companies

transcontinental, 横贯大陆的183, 199, 214

triangular, 三角51, 104, 185, 237-238, see also Trade, Atlantic

White Sea, 白海274

wine, 酒193, 237

Trading-posts, 贸易站273

“Train oil”, 鲸39

Traitants, 包税商278, see also Financiers

Transport, 转运27, 38, 102, 104, 136, 141, 163, 165, 193, 261, 263, 274-275

canals, 转运运河45, 54, 262

land, 转运地104

maritime, 滨海转运39-40, 44, 46, 49-50, 53, 56-57, 66, 96-97, 100, 104, 116, 118-119, 132, 150, 152, 160, 193, 210, 212, 217, 221, 236, 238, 250, 252, 257, 272, see also Buss, Ventjagers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234

Treasury, 资金59, 118, see also Great Britain, England

Trefoil, 三叶草259

Tremel, Ferdinand, 特瑞梅尔233, 235

Treue, Wilhelm, 特罗伊厄195, 205-206, 226, 231, 233

Trevelyan, George Macauley, 特里维廉122

Trevor-Roper, Hugh R., 特雷弗-罗珀123, 141, 251

Tribute, 贡金149

Triage, 挑选15

Trieste, 的里雅斯特234

Trinidad, 特立尼达157

Trinkets, 小饰物237

Trip, Elias, 特利普206

Triple Alliance, 三国同盟79

Tripoli, 的黎波里272

Trondheim, 特伦海姆223

Tropical economy, 热带经济238, 246

Truce of 1609, 1609年休战45, 58, 64, 69, see also Netherlands,
Revolt of the

Tucker, G.S.L., 塔克258

Tulips, 郁金香282

Tunisia, 突尼西亚98

Turenne, Henri Vicomte de, Marshal-General, 图伦尼287

Turkey, see, Empire, Ottoman土耳其

Turpentine, 松脂240

Turnips, 突尼斯82, 259

Tuscany, 托斯坎尼14, 199, 203

Twente, 特文特16, 200

Tyrol, 蒂罗尔138, 205

U

Ukraine, 乌克兰139, 143, 145, 219

Ulm, 乌尔姆197

Ulster, 阿尔斯特239

Unequal exchange, 不平等交换50

Unger, Richard W., 昂格尔39, 43, 48, 60, 91

Unger, W, S., 昂格尔52, 274

Union of Arms, 武装联盟181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联合东印度公司see Great Britain,
England, East India Company

United Provinces, 联合省 see Netherlands (norther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38, 281

Untertan, 农奴227, see also Serfs

Unwin, George, 昂温76

Urban industry, 都市工业see Industries, urban

Urban phenomena, 都市现象see Towns

Urbich, Johann Christian, 乌尔比希219

Utarbetningstratt, 下发制210, see also In-dustries, putting-out system

Utrecht, 乌得勒支41, 189-190, 234, 246, 250, 253, 255, 271, 275, 278, 281, 283-284

Utrecht, Union of (1579), 62,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乌得勒支联盟

V

Vagrants, 流浪者196

Vajnshtejn, O.L., 瓦因什泰因24

Valencia, 巴伦西亚145-146, 183, 185, 189

Valenciennes, 范伦西叶尼95

Valerio, Nuno, 瓦莱里奥17

Vandenbroecke, Chr., 范登布洛克259

Van der Wee, H., 范德维41, 58-59, 198, 202, 205, 277-279

Van Dijk, H., 范狄克63

Van Dillen, J.G., 范迪伦58-59, 60, 63, 281

Van Hoboken, W.J., 范霍伯肯51, 62

Van Houtte, Jean A., 范胡特45

Van Klaveren, Jacob, 范克列维伦43, 233

Van Oldenbarnevelt, Johan, 范奥登巴尼维尔特69

Van Riebeeck, Jan, 范里别克77

Van Veen, Joh., 范维38, 40, 66, 269

Van Wijck, Willem, 范韦克204, 206, 209

Varkomyi.Agnes R., 瓦尔康尼耶134, 142-143, 145

Varmland, 韦姆兰209

Vassal, see Feudalism家臣

Vaud, 沃州14

Veenendaal, A.J., 维农达尔189

Vegetables, 蔬菜14

Vellon, 维农铜币151, 185, 190, 204-205, see also Copper, copper coins; Money, metallic

Venality of office, see State, bureaucracy, sale of offices 买卖官职

Venezuela, 委内瑞拉160

Venice, 威尼斯50, 70, 194, 196-197, 199, 200, 202, 234, 273

Ventjagers, 包买者39

Ventura, Angelo, 文突拉203

Verlagssystem, see Industries, putting-out system 城市中间商制度

Verlinden, Charles, 韦林登45, 146-147

Vermuyden, Cornelius, 韦尔穆登59

Verviers, 韦维尔42

Viana, Luis Fiho. 维亚纳173

Viborg, 维堡100

Vicens Vives, Jaime, 维韦斯181-182, 184, 189-190

Vienna, 维也纳28, 42, 131, 219, 232

Vignols, Leon, 维格诺185

Vigo, Giovanni 维戈16

Vilar, Pierre 维拉尔M., 4, 17, 19, 21, 57-58, 67, 111-112,

166, 181-182, 186, 188-189, 270, 277, 283

Villani, Pasquale, 维拉尼202

Villari, Rosario, 维拉里147

Viner, Jacob, 维纳257

Virginia, 弗吉尼亚164-166, 169-174

Visconti, Alessandro, 维斯康提70

Vittorio Amadeo II (of Savoy), 维多利奥201

Vivanti, Corrado, 维凡提147

Vizcaya, 182, see also Basque country 维兹卡亚

Vlachovic, Jozef, 弗拉索维茨134

VOC, s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Vodka, 伏特加 141

Voltaire, Francois-Marie Arouetde, 伏尔泰289

von Braun, Joachim Freiherr, 布劳恩225-226, 233, 235

Voralberg, 福拉尔堡14

W

Waddell, David A.G., 韦德尔271

Wages, 薪资13, 54, 67, 76, 92, 100, 137, 202, 205, 209
decline in, 薪资减少15, 25, 28-29, 63, 93, 129, 146, 196
real, 实际薪资9, 15, 16, 25, 28-29, 63, 129, 140, 260, 262
rise in, 薪资提升16, 28-29, 42, 63, 92-94, 116, 200, 240,
260, 268, 280
stickiness of, 16
wages in kind, 93, 154, 166, 168, 170, 174, 225
wage-workers, see Laborers 薪资劳工
Wallachia, 瓦拉西亚234
Wallerstein, Immanuel, 沃勒斯坦16, 18, 24, 29-32, 47-49,
52, 104, 123, 161, 167, 180, 204, 226
Walloons, 瓦隆45, 209, see also Bra-bant; Flanders
Walpole, Horace, 沃尔波尔166, 220, 238, 246, 257, 283, 285-
286
Walton, Gary M., 沃尔顿238, 240
Wangermann, Ernst, 旺格曼232
War, 战争3, 14, 22-16, 33, 44, 65, 69, 78-80, 91, 99-100,
111, 116, 121, 123, 130, 134-135, 138, 140-141, 143, 145, 158,
162, 164, 182, 184, 188, 189-191, 207, 213-219, 222-223, 227,
230, 232, 246-247, 250-251, 254-257, 262-263, 269-273, 275-276,

278, 280-281, 284-285, see also Armaments

civil wars, 内战5, 63, 77, 124, 144, 163, 213, 236, 288, see also Great Britain, England, Civil War

cold war, 冷战76

economic aspects of, 战争的经济观点24, 77, 80, 115, 158, 166, 181, 185, 207, 208, 230, 247

military tactics, 军事策略150

war materials, 战时物资44

warships, 战舰43, 99, 166

War of the Roses, 玫瑰战争5

Ward, A.W., 沃德170, 189, 255

Ward, J.r., 沃德170

Warden, Alexander J., 沃登181, 264-265

Warneton, 瓦尔纳通255

Watt, James, 瓦特6

Wax, 腊274

Weapons, see Armaments武器

Weavers, 织工194, 197, 199, 236, 264, see also Clothiers

Weaver's riots (1719), 织工暴动264

Weaving, 纺织49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120, 282

Weis, Eberhard, 韦思201

Weisser, Michael, 韦斯尔180-181

West, the, see Europe, western西方

West India Company, se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西印度公司

Western Hemisphere, 西半球see America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95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16, 45, 197, 231

Peace of (1648), 228, 250威斯特伐利亚和平

Whales, 鲸39

Wheat, 小麦13, 15, 22, 28, 30, 40, 46, 52, 56, 77, 87, 111, 131-134, 138-139, 145, 151-152, 161-162, 180, 182, 186-187, 231, 237, 254, 261-262, 267

Whigs, 辉格党人67, 80, 94, 114, 122, 187, 246-248, 283, 285-286, see also Great Britain

Whiskey, 威士忌141

White Mountain, Battle of白山战役（1620），139, 231

White Sea, 白海274

Wiese, Heinz, 维泽133

Wiles, Richard C., 韦尔斯94

William II (of Orange), Stad-holder, 威廉二世24, 61, 246, 248

William III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威廉三世115, 246, 250

Williamson, J.A., 威廉森79

Wilson, Charles Henry, 威尔逊27, 39-46, 50-51, 56, 63, 66-67, 78-80, 82, 84, 91-92, 94-97, 99-100, 102-107, 109, 111, 115-116, 119, 122, 151, 246, 251, 258, 260, 263-264, 268, 274-277, 279-281

Windmills, 风车磨坊40, 163

Wine (growing), 酒13-14, 25, 82, 84-85, 139, 141, 145, 152, 161, 187, 18, 262, 276

Wittman, T., 魏特曼145

Wittrock, G., 威特罗克213

Withers, John, 威瑟斯275

Wadysaw IV (of Poland), 瓦迪索夫四世143

Wolanski, Marian, 沃兰斯基235

Wolf, Siegmund A., 沃尔夫152, 226

Wood, 木材15, 40, 43, 99-100, 133, 162, 210, 237, 240-241, 259, 263, 272, 274

Wool, 羊毛13, 42-43, 91, 199-200, 202, 235, 254, 264-266, 268, 273, see also Textiles

Woolf, Stuart J., 伍尔夫82, 201-202

Woollens Act of 1699, 1699年羊毛法令241

Workers, (wage-), 工人16, 28-29, 45, 63-64, 92-94, 114, 116, 138-140, 149, 151-152, 154-156, 162, 167, 172, 174-175, 182, 193-195, 199, 202, 210, 235, 260, 289, see also Classes, lower; Laborers skilled, 技术工人66, 93-94, 194, 241

World-economy, 世界经济7-9, 17-19, 21, 23, 25-29, 31, 34, 45-49, 52, 54, 57, 64-65, 67, 70-71, 75, 82, 84, 90-92, 96-97, 99, 101, 103-104, 108-110, 112-114, 119, 122-123, 129-131, 134-135, 137, 139-143, 147-148, 150, 152, 156-158, 167-168, 175, 179-180, 182, 185, 188, 190, 193, 196, 199, 204, 208, 210, 218-219, 221, 231-232, 234, 236, 239-240, 244, 249, 251, 260, 262, 267, 269, 272, 274, 280, 284, 289, see also Capitalism; Core; Labor, division of; Payments, system of; Peri-phery; Semiperiphery

World-empire, see Empire, worldempire世界帝国

World marker, see Trade (world) 世界市场

World-system (modern), 世界体系7-8, 19, 25, 29, 31-33, 69, 218

Wrede, Karl Theodor, Prince, 215

Wright, William E., 赖特231, 235

Wrigley, E.A., 里格利76, 83.104

Wurttemberg, 符腾堡199

Wyckoff, V.J., 维科夫165

Wyczanski, Andrzej, 维赞斯基131

Y

Yarmouth, 雅茅斯39

Yates, Frances A., 叶芝32

Year of Disaster, 79,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灾难之年

Year of the Miracle, 奇迹之年80,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Yeomen, see Farmers, yeoman 自耕农

Yernaux, Jean, 耶诺克斯209

Yorkshire, 约克郡39

Young, G., 杨193

York, Frederick, Duke of, 约克公爵251

Ypres, 伊普雷255

Z

Zacatecas, 札卡特卡152, 174

Zagorin, Perez, 萨戈林121

Zavala, Silvio, 萨维拉154

Zeeland, 37, 51, 62, see also Nether-lands (northern) 泽兰

Zhukov, E.M., 祖科夫7

Zientara, Benedykt, 锡安塔拉138

Zimanyi, Vera, 齐曼尼131, 134

Zollner, Erich, 索尔那232-233

Zones, economic, see Labor, division of经济区

Zrinyi, Miklos, 锡林尼142-143

Zurich, 苏黎世14, 200

Zytkowicz, Leonid, 祖特科维茨132, 134-135, 141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书目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 35.00元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饥饿与公共行为》 35.00元

阿玛蒂亚·森

《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 48.00元

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

《生活质量》 68.00元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59.00元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第二版） 59.00元

曼纽尔·卡斯特

《千年终结》 45.00元

孙伟平 选编

《罗蒂文选》 53.00元

涂纪亮 编

《皮尔斯文选》 49.00元

涂纪亮 编

《杜威文选》 49.00元

万俊人 陈亚军 编

《詹姆斯文选》 59.00元

李国山 编

《刘易斯文选》 45.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 49.00元

费尔南·布罗代尔

《地中海考古》 49.00元

山口重克

《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 35.00元

莱斯特·M.萨拉蒙等

-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59.00元
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
- 《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 49.00元
詹姆斯·M.布坎南/罗杰·D.康格尔顿
- 《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 39.00元
詹姆斯·S.科尔曼
-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 125.00元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
- 《发展经济学》（第三版） 59.00元
理安·艾斯勒
- 《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 39.00元
理安·艾斯勒
-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49.00元
理安·艾斯勒
- 《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
68.00元
安东尼·吉登斯
-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39.00元

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29.00元

涂纪亮 编

《莫里斯文选》 58.00元

杜丽燕 余灵灵 编

《布里奇曼文选》 49.00元

李真 编

《普特南文选》 69.00元

丁东红 编

《米德文选》 68.00元

约翰·H.杰克逊

《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 59.00

元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哲学家》 98.00元

H.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35.00元

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

《社会学之思》（第二版） 29.00元

汤姆·R.伯恩斯等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 59.00元

尤尔根·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 49.00元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
45.00元

克里斯托弗·戴尔

《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
49.00元

吉尔贝·李斯特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59.00元

佩里·安德森

《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59.00元

尤尔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59.00元

何伟亚

元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69.00

唐纳德·萨松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下
册） 189.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98.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98.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98.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 9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美）沃勒斯坦（Wallerstein, I.）著；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97-4929-6

I.①现... II.①沃... ②郭... III.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
IV.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068号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

著者/（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者/郭方 吴必康 钟伟云

校者/郭方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赵怀英 段其刚

（010）59367004 责任校对/陈晓永 高利娟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岳阳

项目统筹/祝得彬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本卷印张/31.75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本卷字数/579千字

印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929-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1282号

定价/489.00元（四卷本）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值20周年社庆之际，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其二是问题意识；其三是开放意识。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的基本理念。



《现代世界体系》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颇具影响力的多卷本著作，对全球史进行了重新阐释，将现代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确定为从16世纪到20世纪。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是整套书中至关重要的一卷，它反驳了把17世纪“危机”视为欧洲的“重新封建化”的观点，论证了对作为一种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观点和界定的合理性。另外，本卷还提出另一个新的重要论题，即霸权问题。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运转中，霸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霸权机制使现代世界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经济。

“一部才华横溢的和令人振奋的著作。……沃勒斯坦能够在不同的分析层面做非常熟练的转换，并将它们天衣无缝地整合在一起，令人震惊和钦佩。”

——亨利·卡门 (Henry Kamen)

“在这个学科划分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沃勒斯坦所做的综合性研究既是充满抱负的、又是谨慎细致的，他将赢得所有那些试图解决这一时期各种棘手问题的学者的尊重。……本卷书充满了睿智的和富于启发性的论述。”

——查尔斯·威尔逊 (Charles Wilson)

“不管沃勒斯坦第二卷书的销量有多少，他的努力都赢得了尊重，并且证明了他所从事的研究的正当性。”

——W.W. 罗斯托 (W. W. Rostow)



ISBN 978-7-5097-4105-5

定价：98.00元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夏继果

顾宁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
第二时期：1730 ~1840年代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 -1840s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杰出教授，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等数十项学术职务。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和《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夏继果

顾宁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
第二时期：1730 ~1840年代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 -1840s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s-1840s

With A New Prologu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2011 © Immanuel Wallerste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沛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朱云汉 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汝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汪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春声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罗志田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

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生于纽约。1954年和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58~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1976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1976年起，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1993~1995年任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1994~1998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2000年起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沃勒斯坦著述颇丰，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30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2011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4卷本。其他著作有：

《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 1983）；《世界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1984）；《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9）；《知识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2004）等。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004）；《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2006）。

ENCYCLOPÉDIE,
O 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Mis en ordre & publié par M. *DIDEROT*,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 des Belles-Lettres de Prusse; & quant à la PARTIE MATHÉMATIQUE, par M. *D'ALEMBERT*,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Paris, de celle de Prusse, &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Londres.

*Tantum series juncturaque pollet,
Tantum de medio sumptis accedit honoris!* HORAT.

TOME PREMIER.



A PARIS,

Chez { *BRIASSON*, rue Saint Jacques, à la Science.
DAVID l'aîné, rue Saint Jacques, à la Plume d'Or.
LE BRETON, Imprimeur ordinaire du Roy, rue de la Harpe.
DURAND, rue Saint Jacques, à Saint Landry, & au Griffon.

M. D C C. L I.

AVEC APPROBATION ET PRIVILEGE DU ROY.

卷首插图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头版的封面（1751）

巴黎：国家图书馆。

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是启蒙运动（Lightenment）完美的知识体现，并且对许多人而言长期以来象征着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理性主义的胜利。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的协助下写了数学部分，它原在1751年到1780年间出版，对开本35卷，其中21卷是正文，12卷容纳插图，2卷包容图表，由蒙松（P.Mouchon）制作。

2011年英文版第三卷序言^[1]

在我对173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对许多分析家、也许是大多数分析家而言，这个时期代表了现代阶段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现代性产生。读过前三卷的人都知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认为，重大的转折时期是在“延长的16世纪”。

第二个有争议的问题涉及将我称之为“外部竞争场”（external arena）组成部分的地域“纳入”（incorporation）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的概念。这是假设在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全球的其他部分之间能够做出区分，尤其是在1500~1750年这个时期。它还进一步假设，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部地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边缘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

第三个问题是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的周期性变化过程的概念和它们在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些周期性变化过程在法语中被称为“经济形势”（conjuncture）[在其他拉丁语言，以及日耳曼和斯拉夫语言中性质相同；这种用法的主要例外是英语，在英语中“conjuncture”（有场合的意思——译者注）一词的意思非常不同于“conjuncture”]。主要的经济周期通常被称为康德拉基耶夫长波——这是本卷中使用的概念，但它是否真的存在常常遭到不同的争议。

这里对所有这三个概念——这个时期并不存在一个转折点、外部地区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的性质——重新做

一番阐述也许是有益的，因为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对我的论证存在相当多的误解。

一 重大的转折点

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喜欢指定一些转折点。它是一种工具，非常有助于阐明他们正在努力讲述的历史。它成为他们对于所研究的直接对象做出分析的基本架构。对转折点的选择，构成了一种我们在其中做研究的基本框架。因此，选择不同的转折点能够完全改变分析的逻辑。被认定的“转折点”既可能有助于阐明问题，同样也容易诱使研究者误入歧途。

如果人们浏览一下过去两个世纪中历史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这些文献中存在一种很强的偏好，即认为构成过去500年（或5000年）的重大转折点的正是173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不管学者们使用的是“现代性”、“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还是使用的是“西方对世界的统治”的分析框架，大多数人——或至少是在过去大约50年间的大多数人——都将它真正开始的时间追溯到了这个时期，但这期间对将这一时期确定为“重大的转折时期”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本卷内容整个是否定将这一时期作为重大转折时期的观点，而主张将“延长的十六世纪”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阶段，后者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前三卷都是在论证这种观点。请允许我扼要地重复一下我的论点。我们已经论证，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的根本要素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或为市场生产，或在工厂中进行生产，这通常会引起很大的争议。首先所有这些现象都有着长期的历史根源，都能够许多不同种类的体制中发现。而在我看来，界定资本主义体制的关键要素在于，它是建立在促使资本做无限积累的动力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价值观使然，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要求。这意味着在

体制内存在某些机制，它们能够在中间时段对那些按照其逻辑行事的人给予回报，对那些坚持按照其他逻辑行事的人给予（物质上的）惩罚。

我们已经论证，为了维持这样一种体制，有几种因素是必需的。必须存在一种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以至在那些利润较低和竞争力较强的生活必需品（即边缘区生产的产品）同那些利润较高和处于准垄断地位的产品（即核心区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换。为了使企业家能够在这种体制中获得成功，还必须存在一种国家间的体系，它由拥有不同影响力（实力）的、自诩拥有主导权的国家构成。同时还必须存在一种周期性机制，使那些新的处于准垄断地位的盈利性企业能够不断产生。结果就是体系中处于特权地位的中心区在地理位置上发生着一种非常缓慢的但却是定期的转移。

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确实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发生了，它最初主要是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欧洲国家、部分在美洲国家发生。用布罗代尔的术语来表述，它是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但根据它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会不断扩张它作为一个体系的边界。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扩张将在本卷予以研究。我们试图说明这段历史，描述这种扩张将哪些新的地区纳入到体系之中，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屈从于这种扩张。

针对这种论点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反对意见。一种是断言，在全球各种类型的交往（贸易、交通、文化、征服）中存在一个渐进的扩张过程。这被视为一个历经几千年的过程，其中既不是延长的16世纪，也不是19世纪之交作为一个如此明显的阶段，以至它能够构成一个转折点。最近有关中国在欧亚大陆的贸易格局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的观点是这种论点的一种变体。当观点以这种方式提出时，作为一种概念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或者，人们可以认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失去土地的产业工人的出现

——他们彼此间进行着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但在这一时期只是在一些国家（也许只是在英格兰）中出现。这使得该时期成为“转折时期”。这样一来，国家间体系与核心区-边缘区变换的存在就完全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了。这种论点要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要么是以“韦伯学派”的语言提出的。这两种观点都从根本上否认存在一种世界体系及其制约方式的观念。

二 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

在第一卷中，我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外部竞争场和边缘地区之间做出区分。尽管部分外部竞争场存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贸易和其他形式的互动，但我已论证，这种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因此对双方经济的运行都不具有实质意义。结果，这种贸易是相对平等的，每一方都在用他认为是低价值的物品去交换他认为是高价值的物品。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贸易是一种双赢的贸易。

我们提出，边缘区的产品是以一种不平等交换的形式同核心区的产品进行交换的，其中存在着剩余价值从边缘区向核心区复杂的但却是真实的转移。这种交换是必需品的交换，每一方都需要这些产品来维持自身的生存。这种贸易如果被中断，不可能不对一方或双方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过，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产品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我们也讨论了实施这种“保护主义”的政治背景。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过程会反复导致下述情势的出现，即为了维持边缘区生产产品的低成本，有必要不断地将新的地区纳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也就是说将它们“纳入”到劳动分工之中。

当然，纳入过程也许会遭到抵制。不过，能够论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技术发展——这本身就是内在于那种体系的一个过程——会导致世界经济中的诸强国不断强化它们的军事力量，这是相比外部竞争场各

组成部分的军事力量而言的。因此，例如在16世纪全欧洲的军事力量也许都不足以“征服”印度，但到18世纪晚期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最后，在任何特定时间，扩张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那个时间点上能够将多少新的地区整合进体系的函数。它同样也是在世界经济使用武力将某些地区纳入到体系的过程中这些地区的遥远程度，以及由此将它们纳入体系时的困难程度的函数。因此，我在本卷中论证，我们目前称之为印度的地区是在这一时期被纳入到体系中的，但这并不适用于中国，它将在稍后的时间被纳入到体系之中。

我们接着论证了纳入体系之中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在一天或甚至十年之内发生的，而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生的。不过，通过比较四个不同的地区——俄国、印度、奥斯曼帝国和西非，我们试图揭示，“边缘化”是如何变成一个同质化过程的。就是说，尽管在这个过程开始时，这四个地区彼此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世界体系施加的诸种压力发挥作用使它们在特征上变得更为相似。例如，这些压力在一些地区削弱了国家结构，而在其他地区强化了国家结构，使它们按照现代世界体系的设计最适当地履行其角色作用。

就这种区分而言，存在两种形式的反对意见。一种是主张纳入过程是一个更为渐进的过程，有着多个发展阶段。我非常愿意考虑这种对我论点的修正，将更多经验研究的成果吸纳到我的论证之中。

另一种是质疑我在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所做的区分。这种观点宣称，通常被视为奢侈品的实际上是必需品，至少是作为显示威望的物品。他们进一步论证，对奢侈品的界定是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不同的民族对它的界定是不同的。

我同意这是一种很难做出的区分。但奢侈品概念是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事实恰恰是我自己论点的组成部分。尽管孔雀翎也许对某些群体而言

似乎是必需品，但我认为很难承认它是像谷物那样满足人类基本消费需求类型的必需品。进一步而言，谷物是大宗产品，而钻石在运输中只占有非常小的空间。对我而言，这似乎已经造成很大的实际差别。

因此，我坚持认为，彼此不同的两个地区进行的“平等”交换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等”交换，构成一种决定性的理论上的区分。由于它的运行模式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种高度两极分化的体制。这是它最大的缺陷，长期看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缺陷。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非常不同于在延长的16世纪之前存在的各种体制。忽视这一基本事实对分析是非常不利的。

三 康德拉基耶夫周期

康德拉基耶夫周期是以尼古拉·康德拉基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位俄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了这种周期的存在。他事实上并不是第一位发现这种周期的学者。他对这种周期如何发挥作用和它们什么时候首次出现的描述，不再被广泛公认。但被最广泛使用的对这种周期的命名，仍然是用他的名字。我自己对这种周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认识，源自我对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商是如何从他们的企业中赚取利润，由此能够积累资本的认识。

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体制，其中追求无限资本积累是它存在的理由。而要积累资本，生产商就必须从他们的经营中获得利润。不过，要想获得真正可观的利润只有当生产商能够以大大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时才是可能的。在完全竞争的情势下，赚取可观利润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完全竞争的权威界定是指一种拥有三个特征的情势——有大量的卖主、有大量的买主、能够普遍获得有关价格的信息。如果这三个特征都具备（这很少会发生），那么明智的买主都会从一个卖主到另一个卖主去问价，直到他找到一个愿意以高于生产成本一便士的价格——如果确实不低于生产成本的话——出售产品的卖主。

要获得可观的利润就需要确立对世界经济权力的某种垄断，或至少是准垄断。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垄断，那么卖方就能够制定任何的价格，只要不超出需求弹性所允许的范围即可。在任何世界经济显著扩张的时期，人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领先”产品，生产它们的企业拥有相对垄断的地位。正是从这些产品的生产中能够赚取巨额利润，并积累大量资本。同这些领先产品有着前向和后向联系的产品生产，是世界经济实现全面扩张的基础所在。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A阶段。

资本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所有垄断都是自我消除的。这是因为存在一个新的生产者都能够进入的世界市场，不管从政治上对一种特定的垄断实施了多么好的保护。当然，进入世界市场并非易事，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但其他生产者迟早会克服障碍，并由此进入市场。作为结果，竞争的程度会加剧。当竞争加剧时，价格就会下降，正如资本主义信徒一直宣扬的那样。不过，同时利润也会下降。当领先产品的利润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时，世界经济就会停止扩张，进入停滞时期。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B阶段。从经验上看，A阶段和B阶段加起来往往是50到60年，但确切的时间长度是变化的。当然，在B阶段的某个时间段之后，又能够产生新的垄断，一个新的A阶段又会重新开始。

因此，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A阶段和B阶段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推断出，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的开始，它们从逻辑上就应该是它运作的组成部分。根据我这套书的论点，这意味着它们应该从延长的16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确实，经济史学家经常指出，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这种趋势，这能够在本卷和其他卷中记录这些论述出处的参考书查到。当然，这些经济史学家并不称它们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但我们能够发现它们作为一种有规律的现象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之中。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该体系的地理边界就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界。

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指出了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这种周期，尽管这是一种非常有争议的论点。如果这种论点能够成立的话，它将为那些希望将现代世界体系的开始时间追溯到比延长的16世纪更早的人提供某种支持。

[\[1\]](#) 2011年英文版序言等由吴英翻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谢辞](#)
- [第一章 工业与资产阶级](#)
- [第二章 中心地区的斗争——第三阶段：1763~1815年](#)
- [第三章 巨大的新地带并入世界经济：1750~1850年](#)
- [第四章 南北美洲定居者的非殖民化：1763~1833年](#)
- [参考文献](#)
- [索引](#)

谢辞

许多同事愿意对这本书的一章或几章作批判性的阅读。虽然他们中许多人对一些主要见解有异议，他们每个人都给我许多帮助，指出错误或就重点问题争论。我感谢他们每个人有价值的帮助，并在所有那些我婉谢了他们的良好建议的事情上，要说明并非他们的责任：安德森（Perry Anderson），巴塔查尔雅（Sabyasachi Bhattacharya），卡梅伦（Rondo Cameron），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霍普金斯（Terence K.Hopkins），伊萨维（Charles Issawi），卡萨巴（Resat Kasaba），诺尔特（Hans-Heinrich Nolte），奥布莱恩（Patrick K.O'Brien），帕拉特（Madhavan K.Palat），夸塔尔特（Donald Quataert），鲁德（George Rude）和蒂利（Charles Tilly）。

第二章的部分曾发表于《论点》，第十一期（*Thesis XI*）（1986）。第三章的一个较早的文稿曾发表在《历史的研究》（*Studies in History*）（1988）。

第一章 工业与资产阶级



第一章插图 “空气唧筒的实验”

德比的赖特（Joseph Wright）。（1768）

伦敦：国家艺廊。

虽然德比（Derby）的赖特（Joseph Wright）（1734～

1797) 是以一个肖像画家开始他的职业，但他最著名的绘画却表现了他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他参加了“月光学会”（Lunar society），一群有知识的工业家和科学家在有充足的月光时举行的聚会，沿着黑暗的乡村道路前进，靠月光或人工照明来照亮并启发他们的内在思考景象。这个家庭在从事“空气唧筒的实验”（1768年），它强调了科学概念和发现的平等态度，这从那些在实验室外的人如妇女和儿童也能在场上而表现出来。

故事越说越长。

——柯立芝（Eric T.Kerridge）^[1]

我们习惯于围绕着以基本公理为形式的中心概念来组织我们的知识。工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兴起就是两个这样的概念，这是由19世纪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为解释现代世界而留传给我们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历史的质变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那时在大不列颠的“第一次”^[2]工业革命和在法国的“典型”^[3]资产阶级革命都发生了。无疑对这种公认的看法一直有人提出挑战，对其细节也不断有模棱两端的说法。尽管如此，这两场革命的印象却一直深深固着于民众文化和学术思想之中。^[4]这些概念事实上是我们通常在现代历史事实那满是迷雾和汹涌波涛的海洋中航行的指南针。实际上，如我将指出的，这两个指南针不过只是一个而已。

“革命”这个用语对我们而言的含义是突然的、戏剧性的和广泛的变化。它强调的是非连续性。无疑这是大多数使用“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人所要表示的意思。^[5]科尔曼（Coleman）谈到一场“比较而言是突然和暴烈的变化开创了工业化社会”，^[6]而兰德斯（Landes）谈到一场“比起从发明轮子以来的任何事都远为彻底地与过去的决裂。”^[7]霍布斯鲍姆（Hobsbawm）也类似地强调说：“如果说突然的、实质的和根本性的发生于1780年代左右的转变不是一场革命，那么这个词就没有通常说的意

义了。”^[8]

什么是这场革命所包含的内容呢？汤因比（Toynbee）（我们由他那里得到对工业革命这概念的经典分析），在1884年写道，发现它的“本质”是在于“用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节制。”^[9]哈特韦尔（Hartwell）在80年后所写的，对这个“本质特征”的定义则略有不同：“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率，以较以前是革命性的速度持续增加。”^[10]

这两个重点——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解放（或社会革命）和增长率（或经济革命）——的确并非不能并存的。确实，传统论证的核心一直是前者导致了后者。但是近年来增长率一直是注意的焦点，一个接着一个因素被找出来用以解释这个问题。这也不足为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一直包含着将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最根本的共同任务，这种意识的不断升华，这种发展的定义是以国家的经济增长为标准的，与此相应实际上的“公理是……通向富裕之路在于走工业革命的途径。”^[11]

这两个“本质上”的因素——增长和自由——仍是很不明确的。每个都必须以更特定的概念来解释。增长似乎在概念上与“将机械原理应用——到制造业上，”^[12]也就是法国人经常说的“机械论”；^[13]而机械化“革命”通常被认为是“熊彼得（Schumpeter）的术语意识中的一串革新。”^[14]

机械化的分析将生产力的发展置于主要地位。在另一方面，“自由”（或社会革命）的增进则将生产关系放在首位；谁会生产什么，谁会为谁工作和在什么条件下。两个现象是这部分讨论的中心：工厂（机器集中的场所）和无产阶级或工资劳动者（工厂的雇员）。现在工厂据说：“在18世纪最后1/3时期起源于英格兰。”^[15]对许多权威而言，是工厂和一切意味着劳动力组织方式的事物，被认为在工作组织上最关键的革新所需要的是工资劳动力。霍布斯鲍姆（Hobsbawm）强调说工业革命“不单是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且是因为或通过经济和社会转变而造成

的增长加速。”^[16]这种转变最重要的表现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兴起，它本身就是“农村社会结构物一个总体转变”^[17]的结果。

然而有关工业革命的许多讨论，采纳了机械化过程和“解放”/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两个设定，而集中于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这些过程“首次”发生在大不列颠，又是什么使不列颠“起飞”了？起飞实际上是一个恰当反映工业革命基本模式的比喻，尽管罗斯托（Rostow）详细的假说分期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尖锐争辩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回答绝不是相互排斥的，虽然各个权威都强调以一个既定因素为中心（其他权威则必然就此争辩）。将这些因素按时间的直接次序列举出来并加以把握，就是需求的增长（据说这使得机械化和无产阶级化有利可图），资本的可供利用（这又使机械化成为可能），人口的增长（这使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一场农业“革命”（这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和土地保有权形式的预先发展（这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最后也是总结的是，最难确定是人们心灵中的应有态度（它确保有企业家会利用这个革命性过程在其许多关键时期所提供的一切机会，这样累积的效果就是“革命性的”）。显然，这种对以上各因素的时间次序排列是有一点抽象，而各个权威也认为有不同的次序。

以需求作为革新的解释，是一个老的理论（“需要是发明之母”），兰德斯（Landes）以它作为分析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需求对生产模式的压力在不列颠使新技术不能兴起。”^[18]但是哪些方面有需求呢？有两个可能的方面：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对于出口的论证集中于这个事实：在18世纪后半期出口的增长和加速度“显著地大于”国内工业的增长加速度。^[19]埃弗斯利（Eversley）认为并非如此，他说在1770~1779年这个“关键时期”，“毫无疑问”出口的比重下降了，但尽管如此，在工业化方面“显而易见地加速了”，这加强了论点，即“为大宗生产的货品消费的大规模国内市场”对工业化是最重要的。^[20]霍布斯鲍姆（Hobsbawm）提出了不可避免的折中观点——对外贸易和大规模的国

内市场都是必要的，还要加上“第三个通常被忽视的因素：政府。”^[21]

有一些人则对需求的大规模增长表示怀疑。他们将重点放在“有关过程的供给而不是需求上。”^[22]对有些人而言，资本的供给问题显得很大。汉密尔顿（Hamilton）在1942年用18世纪后半期“利润的膨胀”来解释工业革命的“革命性”特点，这是由工资滞后，即价格上涨和工资上涨之间的差距造成的。^[23]这个旧的论据曾被汉密尔顿以前用来解释16世纪的经济扩张。^[24]阿什顿（Ashton）发现他对工业革命解释的核心在于“相对便宜的资本，”^[25]这来自利率的降低。一个世代之后，在回顾了论及资本构成这个题目的文献后，克鲁兹（Crouzet）采取了以更为适度的态度立论：资本的“相对”充足“是一个”可以承认的因素，但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必然的，而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历史事实。^[26]

但是一定数量的资本是否更为重要呢？有着数量增多之势的持怀疑的评论家们认为，“早期工业化对资本的需求是不多的。”^[27]面对这些论证，资本重要性的支持者们后退到更确定的，因而更难以证实的阵地上。“是资本的流动……而不是积累对最终分析更有价值。”^[28]这个话题的一个改变提法，是认为与此相关的不是资本积累的“相对数量”（就是指“相对于国家收入”的数量）的变化，而是“资本积累内容”的变化，也就是投资“从资本积累的传统型向现代形式”的转变。^[29]对资本流动的强调直接导致对信贷机构的关心。标准的观点是大不列颠在用于工业的信贷机构在数量上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30]当然这种观点假定资本投资仅局限在国界之内。然而吕提（Lüthy）相信，在18世纪中期，西欧和中欧已经组成了一个以“易于进行银行交易和资本流动”为特征的“交换带”，并谈到对于这种流动实际上没有障碍。^[31]

另一派权威将人口变化置于突出地位。人口增长被认为既为工业产品提供了需求，也为生产它们提供了劳动力。不列颠“空前的人口增长”^[32]据说因为它长期地维持并伴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特别显著。^[33]普

卢姆（Plumb）加上了解释，即关键的因素是“中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父母有更多的儿童生存下来，因为“没有受到充分教育和技术背景的下层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展，工业革命将是不可能的。”^[34]

然而这就出现了两个难题：确实是有一场人口革命和实际上是什么引起了人口的增长（这当然就涉及经济变化是其原因为还是结果）？这个人口革命真实性的问题，既然又引出两个问题：这些变化比起这之前和之后相关状况是否是“革命性”的，和英国（或大不列颠）的模式比起法国和其他地方是否有重大的不同？划出一条对数曲线图，一些权威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18世纪晚期这一段有什么独特之处。^[35]确实，人口增长率在18世纪后半期要比前半期高，但是有论证说前半期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后半期。如塔克尔（Tucker）认为，在英国这个例子中，“整个18世纪的人口增长从整体而言，比我们根据较早的长期趋势可预期的延续多不了多少。”^[36]莫里诺（Morineau）对法国情况得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18世纪末的人口增长不是革命性的，而应当更谨慎地认为是“一种更新、恢复和复原。”^[37]而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做出了法国情况转好的完全相反论证。法国的人口模式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的出生率在死亡率下降之前或同时就开始下降）。“但是在19世纪发展的环境中较慢的人口增长使平均（per capita）收入更易于增加，在市场交易中给法国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38]

然而即使人口增长（这是无疑的）不被认为是革命的，即使这对英国并不一定是个特例，这个“核心问题”^[39]仍然存在，即人口增长是经济与社会变化的结果还是其原因。正如哈巴库克（Habakkuk）提出的，“工业革命是否创造了它自己的劳动力？”^[40]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一下是死亡率的下降还是生育率的上升与人口增长有关的辩论。对于大多数分析家而言，似乎无疑地死亡率的下降是主要解释，因为理由很简单，“当两者都高时，要增加人口，减低死亡率要比增加生育率容易得多”。^[41]当然当两者都低时，相反而言也是确实的。

为什么死亡率会下降呢？因为高的死亡率“主要可以归因于传染性疾病的高度传播，”^[42]这就对死亡率的下降有了三种逻辑上可能的解释：医疗的改进（免疫力或治疗），对感染抵抗力的增强（环境的改进），或是细菌和病毒毒性的降低。这最后一个解释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几种疾病的死亡率同时减少的话（这似乎常是如此），因为不能相信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引起疾病的）生物的特点发生了偶然变化。”^[43]这留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辩论：是由于变好的医疗条件还是变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好的医疗条件长期以来一直是有利的解释。它仍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给予死亡率下降最可信的解释是“在18世纪引进和使用种痘来防止天花。”^[44]这个论点经过仔细和有说服力的论证，显示出医疗对死亡率的影响直到20世纪前都是相当不重要的，因而很难用来解释18世纪的变化。^[45]由此推断，我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进”并未导致人口的扩张。^[46]

由里格利（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所写的里程碑式的英国人口史认为生育的作用是一个主要推动力。他们认为生育率的提高是由于不婚者百分比的降低。这与食品利用范围增加的模式联系起来，这是导致建立家庭可能性增加的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他们的资料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时期（1539~1813年），在其中他们发现，除了一个短期间隔（1640~1709年），生育、死亡和婚姻都在增长，但生育一直多于死亡。由此他们似乎论证了英国人口史的一个长时期模式。他们也希望论证在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晚期之间的某处，英国打破了“预防性阻碍周期”，和人口数量与食品价格之间的关系。^[47]

除了里格利（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在逻辑上的矛盾之处（一个解释性的长期模式相对于一个解释性的模式破裂间的矛盾），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即他们强调以结婚率增加（还有或是结婚率的降低）作为经济“起飞”的解释如何与哈伊纳尔（Hajnal）直接相反的论证相调和。哈伊纳尔论证说，唯一只有一种西欧的（注意：不只是英

国的) 婚姻模式存在于18世纪前半期, 它由较晚的结婚年龄和高比例的未婚者组成。哈伊纳尔(Hajnal)发现低生育率的模式(延续到20世纪)对经济发展起了“刺激了资源的彻底转化而不是用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的作用。^[48]

最后一个人口因素, 讨论得较少却也许是具有很大重要性的是, 人口的增加从欧洲的农村边缘地带转向城市和工业化地区。但这当然是增加雇佣机会和改进交通条件的结果。^[49]

近年来注意力越来越被吸引到由作为序幕的农业部分变化转到工业部分的决定性变化上。(这种强调对于当代的边缘国家有着含蓄的政策指导性, 这与增长着的利害关系不是没有联系的, 并经常被明显地提出。)除了工业和人口革命外, 我们现在必须对农业革命做出定位和解释。这就引出一个大的论题。首先我们必须记住, 甚至对于大不列颠而言, 甚至在整个19世纪前半期, “农业是占首位的……工业。”^[50]因此, 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这个认识如果有任何意义, 特别是指着一场农业革命的话, 必须有某个地方, 在某种实际存在物的总体上有着生产量的增加。我们立刻就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是每公顷耕地的出产量(这又可以意味着每单位播种量的产量, 每单位投入劳力的产量, 或是平均产量)还是总出产量。似乎无疑地总耕作物产量在欧洲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言, 从18到19世纪这一百年中是上升的。^[51]然而如果有部分劳动力从耕作生产转向其他种类的生产(特别是到工业), 就证明了既有每单位播种量产量的增加也有每单位投入劳力产量的增加(加上耕种面积的扩大)。^[52]进一步说, 如果有总体生活水准的改进, 就证明了必然有平均产量的增加。然而这没有必然的道理, 为什么平均产量的增加必须伴随着每单位播种量或每单位投入劳力产量的增加, 而后两者是世界经济扩张时期的明显因素。

也许出产量的增加是通过农业工具机械化产生的? 而似乎在犁上使

用铁件（和给马上马蹄铁）有一些增加，^[53]在19世纪之前很难说有农业的重要机械化。^[54]这种进步主要是通过使用种植秣草更集约地耕种土壤得到的。^[55]有两个主要的方式，即轮种制〔那时称为“诺福克”（Norfolk）方式〕，和改种制（即牧场经营）。两种变化都不需要休耕，用块根作物（萝卜、马铃薯）清除野草，用牧草（苜蓿、红豆草、裸麦草）肥沃土壤。^[56]由此形成的连续性收成使得牲畜在冬天有食物，并用粪肥作为土壤的附加肥料。

这哪一种方式都不是新的，但是18世纪晚期是使它们达到大规模推行的时期。无疑在英格兰这些方式造成了很大进步，有疑问的是这是否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巴特（Slicher van Bath）谈到“从三步轮作制……向转换耕作的普遍程度”在西欧于1750年之后是对于较高的小麦价格的反应。^[57]尽管如此，在使用秣草作物的非法的传布中，新的东西是它使这种增加耕作物产量的转变不像以前那样以牺牲牧场为代价。^[58]

甚至这种进步，如果从平均产出量分析也受到莫里诺（Morineau）的质疑。他认为产出量的重要增加只发生在19世纪中期。^[59]他认为18世纪晚期的农业“进步”，只不过如从前那样服从于“贫穷的逻辑”。他认为作物革新趋向于和生活水准的危机性下降一致。这些衰落阶段伴随着食物短缺，而作物的革新“对维持他们有贡献。”^[60]而莫里诺的分析集中于法国的资料，他接受英国比法国有某些优势的论点。但他甚至怀疑英国在1835年之前“生产率有实质性的增长。”

西方经济的起飞不是植根于一场农业革命。这不就是说后一个概念，即使就英国的情况也不适用，这样一种睡梦中的前进，在第一场严霜中就会被吓醒吗？^[61]

甚至如果说耕作上的变化可以说没有造成平均产出量立刻戏剧性的增加，是不是土地上生产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工业化过程的本质因素，既因为它们造成了工业劳动可利用的人力（通过每个投入劳动力更高的产

出率使得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成为可能，或通过更大的总产量使人口得以扩张），或是因为它们是最导致每单位播种量更高产出量的技术革新的前提条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简而言之，圈地不就是这整个过程的关键因素吗？

在圈地这个题目下要讨论的是三个分离的、并非不可避免地联系着的过程。一个是取消“敞田”（open fields），这种制度在收获和播种季节之间将耕作生产的个人单位转变为公共的放牧地。第二个是废除“公共权利”，即在庄园主收割过的土地上或“荒地”（即从耕作生产的观点而言的“荒地”）上平等使用敞田的权利。这两种变化减少或取消了有着较少或没有财产的人供养牲畜的能力。第三个变化是分散财产的集合，达到规模经济的必要性使结束敞田制和公共权利成为可能。

圈地也许使得混合耕作制更有利可图，既由于增加了单位的面积，也由于保护了那些种植秣草作物的人防备自由牧马者。^[62]地主们的首要目标是“从圈地和集合而便进行的技术改进中得到地租的增加。”^[63]然而，事实上圈地是否达到了增加产量的目的是不那么明显的。钱伯斯（Chambers）和明盖（Mingay）主张圈地是提高生产量的“最必需的手段”，然而也承认18世纪英国的证据充其量而言也是“间接而不足的”。^[64]奥布莱恩（O'Brien）甚至更表示怀疑。“再不能那么轻易地推断”在1750年到1815年间的大规模圈地“对生产量实际上有任何重要的作用。”^[65]

圈地当然在1750年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加速了它们的步伐和明显性的是不列颠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新作用。^[66]这种政治的干预说明了这种“大规模”发展的原因。并且，若认为只有不列颠在进行圈地则是错误的。布洛赫（Bloch）的仔细分析显示出，在法国发生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大量圈地，并且也在1730年之后加速进行了。^[67]事实上，布洛赫称之为“农业个人主义”的相对扩张在18世纪是全欧洲范围的现象。^[68]

如果这场运动的成功在大不列颠比在大陆上更大，这种不同是明显地在于在不列颠国家机器的力量为大地主们提供的武器在法国不那么有效，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或以后。^[69]

单纯的围圈（围栏）土地，对于既有的分散小块土地的历史遗产是不够的。如圈地那样，将地产集合，小农（无论土地所有者还是佃农）的持续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能于18世纪在不列颠和法国都加速了。^[70]不管土地的集合在事实上是否显著地增加了生产量，这也是一个假定而不是证明。^[71]

最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的社会重组导致了土地上雇佣人力的消失，他们不断成为城市和工业可利用的人力。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农业革命据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前提条件。例如多布（Dobb）认为，英格兰在18世纪晚期的圈地“将小屋农大军从公地边缘他们最后的微薄地产上……驱逐出去……这与工业扩张的新时期相一致。”^[72]这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一直是许多政治的目标，既由于这个过程有多大程度上是暴力和镇压性的问题，^[73]也由于驱逐的规模究竟有多大。^[74]这后一种论证是两重性的。一方面，据说新的耕作制需要“较多而不是较少的劳动力。”^[75]另一方面，因为看来在农业中家庭数所占的百分比无疑是减少了，而在工业中的人数增加了，^[76]据认为是人口的增长解释了城市劳动人口增加的来源。^[77]当然这两种论证——强迫驱逐和人口膨胀——绝不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对这两个假说都与不列颠例外学说相冲突，却很少有人考察。如果是人口增长导致了城市劳动力的扩张，18世纪的大不列颠在这其中有什么特殊优势呢？而如果强迫驱逐解释了大不列颠，我们如何解释在大陆工业中没有劳力短缺的证据？^[78]这正像法国人喜欢说的，两件事就是一件。既是由于在不列颠与在大陆上有着不同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就要用一个或一系列大不列颠特有的因素来解释，也是由于这个过程是更为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密切地观察这结果是如何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将这个论证向后推一

步，论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同样的情况也是真实的。我们发现自己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面对两个问题：这种现象发生到什么程度；在它所及范围内，大不列颠又如何有所不同？

我们已经提到莫里诺对18世纪法国农业革命这个论题的尖锐质疑。柯立芝（Kerridge）对有关英国农业公认的认识进行了同样激烈的责难，他认为农业革命在那里发生要早得多，是在16和17世纪，并且“由于其确实相当低的比例，18和19世纪的农业进步相对于工业和交通革命而言，在重要性上相对地就落到次要的地位。”^[79]然而奇怪的是，明盖（Mingay）（他是柯立芝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在他的反驳中，用将其包括在一场从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进行的“一个在技术和制度上逐渐变化的长期接续过程”的农业革命中，作为其一个部分。^[80]这个论点在很大程度上贬损了将一场“革命”更局限于一定时间的论点。

多弗林（Dovring）对于将18世纪的西欧作为一个整体表示了类似的怀疑。他也发现在农业上没有什么变化“有类似于工业革命的规模和速度之处。”但是，他对于为什么我们相信在不列颠有一样农业革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他认为在那里确实发生的变化比起在欧洲大陆上的变化得到了“更好的宣扬”，“这再加上工业和农业革命诱人的类似之处，可能导致我们如同夸大其产生的独创性那样夸大了其深度。”^[81]

若不列颠的人口和农业的独特性作为工业革命的解釋也遭到怀疑的话，还有一种有某种分量的解释可以提出，即不列颠的文化，或是其中某些可以解释存在着更多的企业精神的因素。让我们不去用某种民族特性有哪些空泛领域的循环推理来论证，而依据其看来更规范化的表达方式考察。一个更为自由的国家结构的存在源自历史和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冲击的结果。

如果可以称之为正統的观点是这样，在大不列颠的工业革命“是在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82]或是更强调说，“没有任何帮

助。”^[83]有一些人不那么绝对化，他们愿意承认政府在建立“市场环境”本身上的作用，即通过创造如政治稳定、行政统一、普通法，和对商务利益的同情态度等这类前提条件。例如萨普勒（Supple）总结说：“国家确实在工业革命的先驱阶段起到了重要的，尽管是间接的作用。”他又说：“然而事实仍然是这种作用是间接的。”^[84]

如果更密切地考察不列颠国家在18世纪被认为的自由主义，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相比后，会得出两个论点：不列颠国家管制得较少；并且征税也较少。然而，议会在土地围圈方面的主要作用却很难用作国家不干预经济的例证。确实明显的是，在农业方面，不列颠国家擅长于调节社会生产关系。可以说这种调节的目标是除去习惯束缚的桎梏，但很清楚其中所包括的不单是对市场交易的法律许可的一种简单行为。在去除行会的市场束缚作用上也同样确是如此。这再一次显示国家的干预是至关重要的。确实，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另一种普遍性学说，即“于1750年后在中央政府最强有力的地方，行会和公司是最软弱的。”^[85]然而这又是说，这是一种看来其目标在于使市场自由化的调节。

但是还有更直接的干预，在世界市场上要比在国内市场更甚。甚至在典型的较新较自由的工业中，如大不列颠的棉制品生产中，保护主义所起的作用也不小，芒图（Mantoux）对此问题的论断是十分肯定的。^[86]此外，认为政府的调节作用只限于保护是错误的。因为当保护变得不那么需要时，在国内介入生产过程就变为一种越来越多的实际情况。伯布纳（Berbner）甚至怀疑在不列颠是否有过真正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的时候：“当国家在19世纪前半期对商业放手时，它同时将工业和其随之而来的东西抓在手中。”^[87]

最后一点，在大不列颠，并非是国家没有作为工业企业的财政来源之一这种情况。无疑钱没有直接来自国家银行，正如普雷斯奈尔

（Pressnell）指出的，“大量的国家货币使私人银行家的资金膨胀，并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充分的滋养。”

如果不列颠国家不如人们通常相信的或认为的是一个不干涉典范，我们对不列颠有相对精简的官僚结构和因此较轻的税务负担，因而作为不列颠的优点，特别是又相对于法国而言的这种观点，又能说些什么呢？^[88]这个曾被每本教科书视为神圣的真理，近来在海峡两岸都处于猛烈攻击之下——在大不列颠有马赛厄斯（Mathias）和奥布莱恩（O'Brien），在法国有莫里诺（Morineau）。在两方面，对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的财政和预算资料进行仔细考察，导致他们推翻了传统的假说。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发现不列颠的税收负担在整个18世纪期间“比法国人上升得更为迅速”，虽然到1796年代“还不是那么显著”。但是在此之后，不列颠人的税收负担就远超过了过去。

因此，在不列颠于1775年之后工业增长、城市化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增加……是在税收的实际负担急剧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过程。这种负担的增长速度比在法国要快得多。^[89]

莫里诺的比较使用了与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所根据的有所不同的法国资料，将这种矛盾定位在比1790年更早期的时期。在对这两个国家在1725年到1790年的情况进行比较时，他发现不列颠的税收进款无论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上都增加得更快，因此

联合王国的臣民比最信仰基督的国王（Most Christian King）的臣民从18世纪的最初25年起要付更多的税：17.6利弗图尔内（Livres Tournois），核算后相对于法国人交纳8.1利弗图尔内（比率为2.17：1），到这个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之前更变本加厉了；40利弗图尔内相对于法国人交纳17利弗图尔内（比率为2.7：1）。^[90]

这种对已被认可的真理的戏剧性颠覆还不止于此。传统上人们认为不列颠的税收负担在18世纪不只是没有法国人那么重，而且更为公平。这种论点是法国财政中直接税的比重更大，而直接税向来就不那么公平，因为它较少以累进率计税。在法国的情况下特别被认为是如此，因为人头税（*taille*），对于贵族、教士甚至一些资产阶级都是免除的。但是正如莫里诺（*Morineau*）所指出的，人头税的财政作用不是其核心，确实它在18世纪减少了，在1788年只提供所有税收的15%。^[91]而不列颠的间接税几乎不是累进的，它们主要落在“消费与需求者而不是储蓄和投资者身上。”^[92]

从这里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对莫里诺（*Morineau*）来说，就是在大不列颠和法国都不存在公平，而更重要的是，两种税收模式（对此他主要以历史可能性的方式来解释）有着“几乎相同的效率水准，在与征税财源的关系上只有细节上的不同（*Mutatismulandis*）。”^[93]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愿意再进一步并“提出这种可能性”，即不论以直接税或间接税的方式，法国的税收“经考察可能判定”比起不列颠“不是更为落后的。”^[94]

如果是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这种误解是由何而来呢？对这个问题的主要回答是由于在大不列颠没有正式的免税权，这“较少引起愤慨，”而事实上直接税“当转变为地租的一个成分时‘隐形地’存在下来。”^[95]这是将这种误解作为历史性起源进行分析。但是可能它源于历史编纂学，特别若是我们注意到多弗林（*Dovring*）提请注意的在农业上的类似误解的话。

我们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原因”这个问题上绕了很大的圈子，而没有论及这个待解释的术语。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一下这个难于对付的东西本身的性质。工业革命是什么？回答当然是，一系列发明导致了在棉纺织业中一种新工业的繁荣，首先是在英格兰。这种工业是以新的或

经过改进的机器为基础，在工厂中组织起来的。同时或在此后不久，在制铁工业中有着类似的扩展和机械化。对于使这个过程的不同之处，据说是它“开创了一个累进的，自我维持的变化过程。”^[96]与这后一个概念有关的问题不只是难于运用，并且在确定时期上也是有争论的。例如，这本著作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这种累进的、自我维持的变化表现为不停地追求积累的形式，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16世纪发生以来的主导动力。我们已特地讨论了17世纪的长期停滞，这远离这种累进过程的一个中断，而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因而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可能归因于这些发明的社会重视。这个时代的发明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以前已长期存在的资本—劳动力比例。一些发明是节约劳动力的，但许多其他的发明是节约资本的。甚至在这个时期的最末尾出现的铁路，当资本密集时，对于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经济是节约资本的。因为改进的交通使工业家们可以减少存货，以“特殊的方式”降低他们的资本—产出比例。^[97]这似乎就是迪恩（Deane）在她坚信1750~1850年这个时期在生产中有着“资本的扩散”而不是“资本的深入”时所表达的意义。^[98]

是什么使这种资本扩散，“在总产量中获利”成为可能呢？兰德斯（Landes）有一个答案：“投入的质量”，这就是“新技术的较高生产率 and 企业家与工人两者更优越的技艺和知识。”^[99]无疑这是真实的，但是在世界经济的一个扩张阶段其主导工业恰恰是高利润的工业，这总是真实的，因为较高的生产率转变为较低的费用，使得对“技艺和知识”一时的市场垄断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就成为是否有什么东西对有关这个时期而言是非常特殊的。

那时有没有一种科学和技术上的突破？科学史家很少相信这个特定时期是属于某种转折点。17世纪和20世纪比起1750~1850年这个时期似乎是这种评价的更佳候选者。此外，历史编纂学上对工业革命中科学与

技术相关作用的辩论，看来一直强有力地归于偏向技术这一方。[\[100\]](#)

这时期必然有着技术上的突破。实际发明的目录是熟知的：从塔尔（Jethro Tull）发明于1731年的播种机到1786年的打谷机；从凯（Kay）发明于1733年的飞梭到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在1765年发明的珍妮（Jenny）纺纱机，阿克赖特（Arkwright）于1769年发明的水力装置，克朗普顿（Crompton）在1779年发明的纺织骡机，最后罗伯茨（Roberts）于1825年发明了完全自动的纺织骡机；从达比（Darby）于1709年发明焦炭熔炼生铁法到科特（Cort）于1775年发明精炼铁法；可能最重要的是瓦特（Watt）于1775年发明的蒸汽发动机。[\[101\]](#)这一系列发明为不列颠特殊论提供了理论的核心。这些机器是在英格兰而不是在法国或其他地方发明的。[\[102\]](#)它们说明了在棉纺织业和制铁业上不列颠为何在世界市场上获胜。

首先讲讲棉纺织业的故事。直至18世纪晚期，纺织业首先用的是羊毛，其次是亚麻。棉纺织业是机械化的，但是从总产量来看它们在总体上只占一个相当小的百分比。此外，一大部分供给欧洲市场的棉纺织品是在印度生产的。确实，这后一个事实为棉纺织业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大的刺激动力。“机器——只有它能够有效地与印度纺织工人竞争”，布罗代尔（Braudel）是这样说的。[\[103\]](#)对于新的棉纺织技术而言，首先是要节约劳动力。[\[104\]](#)

因为是毛纺织业而不是棉纺织业是18世纪早期西欧的主要工业，并且因为18世纪在1770年代之前是毛纺织业一个重要的扩张时期，[\[105\]](#)这就要问（经常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技术发明没有首先在毛纺织业中发生。

对于这个谜提供了各种解释。一个传统的解释是棉（相对于羊毛和亚麻）纺织业在脱离行会监督方面有更大的自由。[\[106\]](#)但是如兰德斯（Landes）所说：“这种论证经不起详细审查”，[\[107\]](#)因为羊毛业在英格

兰是自由的，而棉业也不是如此之新的行业。兰德斯（Landes）提供了两种其他的解释替代：棉业易于机械化，[\[108\]](#)而棉货市场更具伸缩性。但是易于机械化的说法与技术一次突破性发展的理论的本质相抵触，[\[109\]](#)并忽视了在18世纪早期在羊毛纺织技术上事实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并确实发生在法国这一事实。[\[110\]](#)

市场弹性理论引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特别是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英国新呢布业（羊毛）在16世纪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它的市场具有弹性。[\[111\]](#)市场弹性通常是指在更低价格上会有新主顾的潜在市场。但是如果这种概念扩展到以政治上消灭竞争者以获得新市场的能力，可以说棉纺织业在那时比毛纺织业更具有“弹性”，即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只是不列颠还有所有西欧的生产者都是如此。因为在羊毛业中他们相互竞争，而几乎可以肯定发明能够并将会被迅速仿效。在棉业中，却是西欧（集合起来）与印度竞争，[\[112\]](#)并最终在政治上能够保证这些发明不会扩散到那里。

发明的另一个大竞争场是制铁业。制铁业当然如纺织业一样是欧洲世界经济的传统工业之一。铁的主要应用到那时一直是铁器，包括用于家用和武器。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制铁业消费另外两个市场变得重要了：机械和交通。这三个市场每一个据说都依次在不列颠的经济扩张中起了一种作用。戴维斯（Davis）将北美洲殖民地在18世纪前75年对铁器增长与需求作为追求规模经济压力产生的原因，而规模经济一旦达到，就能降低成本并由此必然“进一步刺激需求。”[\[113\]](#)贝尔洛克（Bairoch）认为使用铁制品的增长这种情况首先是在农业中，此后是在纺织机械中，它是进一步的需求。[\[114\]](#)当然，是1830年代的铁路提供了钢铁工业真正扩张的基础；使其轻度为19世纪世界经济的主导工业。铁路的发展必然与煤与铁矿开采的大规模扩张相联系，这使得对交通进行大笔资本投资成为值得，[\[115\]](#)首先是运河，[\[116\]](#)然后是铁路。

因此，煤作为能源生产的基本燃料的兴起是与钢铁工业的扩张和它的技术进步交织在一起的。煤也完全不是新东西，然而是在18世纪它成为作为燃料的树木的主要替代品。原因很简单，欧洲的森林一直由于前几个世纪的工业生产（和家庭取暖）而不断地耗尽，到1750年，缺乏树木已经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瓶颈。”^[117]英格兰的木材长期缺乏一直很严重，在16世纪就已经鼓励用煤，同样也长期关心煤业，^[118]因为需要一种新技术将高成本工业变为低成本工业。对煤“有效率的”利用和用蒸汽发动机转化能量就是这种解决办法。^[119]

兰德斯（Landes）十分正确地说，“使用（煤和蒸汽）还是一种可替代的能源，是一种成本和便利上的考虑。”^[120]在寻找尽管达比（Darby）在1709年发明了焦炭熔炼的方法，却为什么在英格兰有半个世纪没有被其他人采用的解释时，海德（Hyde）所提出的解释是纯粹和简单地由于“成本”。^[121]这对于为什么煤业技术于18世纪没有在法国得到类似的发展这个问题提供了某些线索。兰德斯（Landes）似乎认为不列颠的选择是“一种较深刻的理性的表征”而法国“执迷不悟地排斥煤——甚至当有力的金钱刺激去转用较便宜的燃料时也是如此。”^[122]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却认为这是一个对“较昂贵的加工方式生产较差的铁”的“适当反应”，只要法国人没有遭遇到不列颠面临的严重树木短缺，这种转用就没有什么合理性。^[123]

在这幅两项大工业扩张——棉业和铁业——的图景中，一个从属但却重要的争辩是这两项之中哪一项是“关键性”的。在这两项工业和我们的技术之间在结构上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在棉纺织业中的发明在性质上是机械方面的，实质上是节约劳力的。在制铁业中的发明大部分是化学方面的，它们改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而没有马上减少劳动力的使用。^[124]纺织业技术的变化导致外包加工制的结束和工厂生产的使用，但是工厂从16世纪以来一直是制铁工业的生产方式。^[125]

这些不同与我们认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革命性”有关系。不列颠棉纺织工业的兴起主要包括两项变化。首先，它意味着在当时世界的首要工业中劳动组织（生产关系）的一个主要改变。其次，它从整体上明显地与世界市场的结构相关联。原材料完全是进口的，而产品“绝大多数销售到海外”。正因如此，控制世界市场是关键性的，霍布斯鲍姆（Hobsbawm）得出结构说只有给一个“先驱国家工业化”的空间，这就是大不列颠。^[126]棉纺织业正好是关键性的，因为它们重组了这个世界经济。然而，利利（Lilley）对赋予棉纺织业的这种重要性表示怀疑。他从预测的角度论证说：人们可以“想象”没有棉纺织业的持续发展，但是“没有钢铁业的扩张那将是不可想象的。”^[127]这场辩论表现了一直使用的工业革命的概念在方式上的易变性（或模糊性）。

一个关键的例子是这个老生常谈的理论，即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不列颠的工业革命是革命性的，在于它标志着在工业中创造了以工厂作为劳动组织的体制。但是在一方面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一直有工厂（从将由一位雇主付酬的许多工人的人身集中于一个场所的意义上）。^[128]在另一方面，在当时使用工厂制度的程度很容易被夸大，甚至在不列颠。^[129]

当然，在纺织业中有着生产地点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让我们回忆一下，这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16世纪，只是在17世纪又转变回去。）那时在人力配置上是否有真正的转变就更可疑了。虽然以前乡村工人将他的部分时间用于农业，部分用于纺织生产，现在则更大程度的专业化了。但是由不列颠工人贡献给农业和工业的这个“全球时代”，可能最初大致还保留原状。^[130]因为还有，这些早期工厂“不一定有高得多的效率，”^[131]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这种转变还是发生了，特别因为企业家丧失了外加工制的大优点，即事实上这些工人不只是“便宜”，而且还是“可以任意处置的”，^[132]兰德斯（Landes）本人给了我们一个关键性的解释。在一个“长期扩张市场”的时代，企业家们主要关心的不是省掉

他的工人而是扩大他的生产量，至少是大规模地生产，并阻止“工人侵吞物品的倾向。”特别是因为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偷窃所得的好处更大。”^[133]

我们现在必须面对有关“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心论断：这只存在于大不列颠，而不存在于法国（或其他地方）。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被世界学术界广泛接受为一个基本的公认真理。芒图（Paul Mantoux）对不列颠的工业革命发表了一部挽歌，而塞伊（Henri Sée）写道，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的末期，在法国的“机械设备”是“零星的”并“处于初始阶段”，“只在一少部分工业中……（开始）转用”，^[134]这都是与大不列颠比较而言的。

不列颠较高的经济增长在传统上一直不是要证明而是供解释的论题。肯普（Kemp）的解释说法是原型性质的。在一个广阔的阵线上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视一种（不列颠人所有的）才能而定”，而法国人甚至在19世纪继续遭受“历史遗留”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对他们的“盘踞”。^[135]然而近来，许多学者开始对不列颠优越性这个公认的真理表示怀疑。他们以提出另一种真理开始：“法国在17和18世纪是世界上第一工业强国。”^[136]此外，还论证说在法国工业产品超过农业产品要早于大不列颠。^[137]如果人们能够使用如“起飞”这样的概念，这种理论继续论证说，它在法国发生于“接近18世纪中叶”或“最晚在约1799年”，但是更可能在较早的时期。^[138]这个论证的整个途径为大量资料的积累所支持，它们直接与所辩论的这个关键时期有关。^[139]从这些资料中奥布莱恩（O'Brien）和凯德尔（Keyder）道出放弃法国“相对落后”这整个概念的看法，并得出结论说不如认为“在法国工业化发生在一个不同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传统中。”^[140]

有两条路径可以挑战在大不列颠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一条途径正如我们刚看到的，认为在那时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区别是小的，

或者说至少小于需要运用这个概念的程度。但是第二条途径就引出了到底有没有一场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有的看法认为在较早时就有工业革命——在13世纪^[141]或在16世纪。^[142]还有相反的看法认为真正的革命性变化出现得较晚，在19世纪中期，或甚至在20世纪。^[143]这些看法中最极端的是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1550~1750年这个时期和1850年之后，但正好不是在1750~1850年这个时期。^[144]

这种有较早和较晚的工业革命的看法很容易混合为有一场更长的工业革命的看法。在1929年，比尔斯（Beals）在考察了这些文献后，就已经认为这种向后和向前的扩展已经消除了赋予这场工业革命的“剧变性特点”。^[145]希顿（Heaton）合乎逻辑的苛刻评论看来是中肯的：“一个持续了150年的革命，还要有至少150年的准备时间，看来最好是需要一个新的标签。”^[146]

“原工业化”这个概念作为对希顿（Heaton）指责的一种过迟的回答，几乎完全是为此而设的。为“在正式的现代工业化之前和作准备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市场导向，以乡村工业为主”的阶段——创造一个新名词，门德尔斯（Mandals）以此保持一个界定更狭窄和限定时代的工业革命的特殊性，而同时又接受对这个过程渐进性的强调。^[147]他甚至能够证明使用这个概念通过将其简化为语义学上的争吵，能够解决不列颠工业优于法国的辩论。^[148]因此他不能够回答加登（Garden）的质问：“变化的活力是工业部门力量的一种影响呢，还是由于在18世纪它结构上的脆弱？”^[149]

对这种渐进主义的理论还有其他方式的反应。一种是兰德斯（Landes）提出的，他说这是肤浅描述和老术语的一种人工产物。^[150]第二种是霍布斯鲍姆（Hobsbawm）提出的，他在较长的，更为渐进的过程中挑出来一个“胜利”时期。^[151]第三种是熊彼得（Schumpeter）提出的，他说在这里革命和进化理论都是正确的，（如同通常那样），因

为它只是一种微观对应宏观角度看法的问题。[152]

还有一种看法是追问，所有这些是否可以总结出对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启发性价值应提出怀疑。内夫（Nef）采取了一种强烈否定的立场：

在经济史上很少有这样一个概念造成更大的误导，它将我们现代文明的所有重要问题以及在1760年到1832年间在英格兰发生的代表的经济变化联系起来。很少有这样一个概念建立在如此不安全的基础上，它发现误解现代工业化世界的关键是在英国经济史的那72年中。[153]

我同意内夫（Nef）的观点，“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和它几乎不可避免的相关物，大不列颠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完全的误导。不用考虑那些修补工作——如在时间上扩展它，使它成为一个两阶段的过程，将缓慢的量的积累和质的突破区分开来等——会拯救它。因为它开始于这个前提，即在我们需要为一个星座在一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中的关系定位时，它在解释不列颠的“优越性”时是将一个星座的特性作为绝对性的。是世界经济使时代得到发展，而不是它其中的一个从属单位。

问题不是为什么大不列颠领先于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对于其程度，要看人们对“领先”的估量），而是为什么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以在这个时代（这里我们讲的是1730~1840年这个时期）任何一个特定时间那样的方式发展，还有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造成了最大利润的经济活动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在特定的国家疆界之内（和为什么更多的资本积累在那里），而不是在其他的国家疆界内。

布里阿瓦尼（Briavoigne）在1839年比我们现在所论的更为简捷地提到在进行的是什么：

劳动领域变得更大了，生产手段（*exécution*）在这个多样化和简单化的过程中天天有所增加。人口因死亡率的减少而持续增加。在地下的财富被开采得更多且更加丰富，人们生产得更多也消费得更多，并变得更富有。所有这些变化构成了工业革命。[\[154\]](#)

如果你要问布里阿瓦尼用什么说明这个革命，他用三个关键发明来解释它：火药武器、罗盘和印刷机。[\[155\]](#)我们于是在时间上被引回到前一个时代，正是几世纪前创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被认为可列入在时间范围上大致相同的一个事件时期。这一点经常被提到，而“革命时代”这种表达方式有时被用来称呼这个时期。时间上的联系在事实上为概念上的联系所加强，这一点不常被讨论到。确实，许多专家将“工业革命”这个术语看作是由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变化与迅速的工业变化间“一种很自然的联系”[\[156\]](#)产生的。但是反过来也是真实的。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是由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得出来和构成的。

法国大革命是这个现代世界所有政治激情的体现，可能甚至比它唯一真正可匹敌的一个象征性事件——俄国革命更彻底。这也许是现代史上的一个论题，有关它占了如此之多的历史论著，以致到了有人可以作历史编纂学的时候了。我们将在此集中讨论看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整个辩论中心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吗？[\[157\]](#)

索布尔成为法国大革命社会诠释的主要发言人，他为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释者饶勒斯（*Jaurès*）的主张辩护，他认为饶勒斯是这个学派的奠基者，“大革命只不过是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演变使资产阶级成为权力和经济的女主人而出现的后果。”索布尔说，在饶勒斯之后有马迪厄（*Mathiez*）和勒费弗尔（*Lefebvre*），此后有索布尔和吕德（*Rudé*）。

至此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诠释通过一个长达一世纪的进展一点一点完善起来。由于它不断地借助于渊博的研究.....批判的精神，它对理论上思考的探求，它对大革命的全球性视野，它独有的价值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性。

这种大革命的全球性视野本身就是现代史全球性视野的一部分，在其中

法国大革命只是历史总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它在尼德兰、英格兰和美利坚革命之后，有助于带给资产阶级（或与之结合者）权力，并带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解放。[\[158\]](#)

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诠释在根基里隐藏着对历史的一种辉格派（Whig）解释，同样的诠释产生了在英格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概念，这可以在勒费弗尔（Lefebvre）在他写给1789年150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对他思想的综述中看到：

《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仍然是.....整个革命的体现.....美国和法国，如在它们之前的英国那样，以类似的方式对思想的趋势做出贡献。它们的成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兴起，并构成了一种共同意识形态，西方文明的进化由此获得新生。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我们西方由基督教所塑造，但也是古代（Antiquity）思想的后裔的意识形态，它集中了它的力量，克服了成千的障碍，以实现人类个人的解放。[\[159\]](#)

因此如果我们以某些更详细的内容说明这种社会诠释的理论，可能是最有用的。[\[160\]](#)从这个角度有三个基本的主张。这个革命是一场反对封建秩序和控制它的贵族阶层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向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那些人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新秩序转变的关键阶段。资产阶级能够

在这个革命中取得成功，只是因求助于民众阶级的支持，然而民众阶级往好处说只是其次要的受惠者，往坏处说则是其牺牲品。此外，这种理论认为这三个论点不只总结了（法国的）历史现实，而且它们也是有关这个始于1789年，终于1799年的特有事件时期的论述。[\[161\]](#)这个事件时期是“革命性的”，是在于它以一种突然的，本质上的社会转变为特征，而并非社会发展中长期前进系列中的一个片断而已。

我们被告知，“在18世纪末”，“法国社会的结构仍然本质上是贵族性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在革命中做到了“摧毁领主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特权秩序。”[\[162\]](#)索布尔（Soboul）对法国社会的评估奇怪地与兰德斯（Landes）的接近。尽管他们都认为不列颠和法国之间的不同在18世纪继续存在，而兰德斯则认为这继续到19世纪（可能甚至到20世纪前半期）：

这些势力（贵族的傲慢自大，资产阶级的渴望，文学和艺术意见的压力）的影响（在法国）形成的普遍氛围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反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用的中世纪概念，它属于一个静止的而不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这种概念从来没有丧失其生命力。[\[163\]](#)

在18世纪的法国，一个不只是“封建的”而且是据说正经历一场“贵族的反动”的法国，资产阶级发现其自身处于深深的挫折之中，特别是在投资于制造业的情况中，因为那些“对资本主义最基本的自由：拥有劳动力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和买卖的自由”强加的限制。几乎不用说，这些自由被认为对英国人而言是可以广泛利用的，他们利用这些自由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于是这个阶段就被认为可以定位作资产阶级自身“革命阶段的入口。”[\[164\]](#)

法国资产阶级有幸在1789年推动了它，采取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两条可能道路中）马克思（Marx）所认为的“真正革命化道

路”^[165]的那一条。如果人们问为什么资产阶级采取这条道路，索布尔（Soboul）会将其归因于“贵族阶层的顽固”（它拒绝做出让步）和“农民群众的残忍”（1789~1793年反封建的农民起义（*Jacqueries*）），但决非因为资产阶级“不打算毁灭贵族阶层。”^[166]索布尔（Soboul）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同样是这些原因，为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也采取了同样的“真正革命化道路。”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否那些采取另一条道路，即“普鲁士（*Prussian*）道路”的国家，就得归类为较不顽固的贵族阶层或较不残忍的农民们。

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个解释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索布尔十分传统地认为英国革命比起法国革命“还不那么激进”，法国革命是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富戏剧性的”，它确实是“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167]这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是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说的“巨大的矛盾”，即“在纸面上”（也就是根据这个解释模式），法国“理想地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应该跑在它的竞争者前头。而事实上，它的经济发展却“慢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不列颠差距最大。霍布斯鲍姆有一个解释：“法国大革命……借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之手夺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借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之手给予的。”^[168]然而，如果雅各宾（*Jacobins*）党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par excellence*）代表，用他们的行动创造了一个“小农和中农土地所有者、小手工艺人和店主的牢固（经济上倒退的）堡垒”，它“将（农业和小企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减慢为一种爬行，”^[169]人们就要问，在什么意义上这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如果说是资产阶级的，又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一场革命呢？^[170]

于是我们就触及到这个问题最微妙的部分，民众力量的作用究竟如何。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警句“贵族开始了这场革命；平民完成了它，”^[171]现在被承认为真理。那么资产阶级是从哪里参与进来的呢？也许两者的混合；于1789年在民众力量（促进）的支持下从贵族阶

层那里夺来了领导权，[\[172\]](#)但又通过热月政变（Thermidor），击败共和国三年（Year III）的民众起义，镇压平等派密谋（Conspiracy of the Equals），并最后〔可能也是通过雾月18日的政变（18th Brumaire）〕阻止了民众的力量。[\[173\]](#)

这幅阶级力量的图画是资产阶级到处进行政治控制的图画。吉伦特派（Girondins）、雅各宾派（Jacobins）、“丹东派”（Dantonists）或“宽容派”（Indulgents）、罗伯斯庇尔派（Robespierrists）、埃贝尔派（Hébertistes）、无套裤党（sansculottes）都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对于无套裤汉这种情况，则是小资产阶级店主和手艺人领导的力量联盟）。这些政治派别表现了革命好斗精神增长的程度，并在一定有限的程度上降低了资产阶级的身份。[\[174\]](#)

起到了如此积极作用的群众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确实是这样的；这不只是对于无套裤汉是真实的，甚至对于农民阶层，在人们认为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范畴之内，如较富裕的农民领导下也是如此。[\[175\]](#)在一方面，这些小生产者（城市的和乡村的）据说是革命的先锋并且是“不妥协地反封建的，”[\[176\]](#)（我推想就是说不像其他资产阶级分子那样倾向于妥协）。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这个小资产阶级群体做出了让步，而这种让步证明是如此持久，可以用来解释霍布斯鲍姆的矛盾：19世纪法国工业发展的缓慢步伐和由此而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全球的失败。

这个经典模式使许多人不安，部分是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和用法，部分是因为在其直率论述的外表后面缺乏理论上的严密性，部分是因为它被认为与某些经验上的事实不符合。无论如何，从1950年代以来，它在所有方面遭受了大量的攻击：来自大西洋（Atlantic）理论的提出者〔戈德肖（Godechot）、帕尔默（Palmer）〕，来自对归功于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者〔科班（Cobban）、孚雷

（Furet）]，还有来自那些一直对18世纪法国的传统描述，特别是贵族阶层在经济功能中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的人们。

大西洋理论的要点是，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即“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的大革命运动。”这个更大的整体，包括引人注目的美国革命，但还有各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海地（Haiti）革命，还有18世纪晚期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革命。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与这些其他革命“具有相同性质”，只是“无比地更为激烈。”^[177]从做出了这个断言来看，大西洋理论的主张者不像有时想的那样是对传统解释做出了太大的修正。^[178]西方的这个独特革命被大西洋派（Atlanticist）定义为一场“自由的”或“资产阶级的”革命，^[179]一场“民主”革命，在革命中“民主派”与“贵族派”进行斗争。^[180]此外，大西洋派将雅各宾（Jacobin）阶段传统式地解释为“使革命革命化”，^[181]然而这是一场“在最开始就是激进”的革命。^[182]雅各宾激进主义至少部分被解释为“阶级斗争”。^[183]

若是大西洋理论利用了社会解释的关键前提——即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统治的革命，而这是一种必须的转变模式，雅各宾派（Jacobins）体现了它最激进的形式——为什么索布尔对其进行激烈的诅咒，并指责它“掏空了（法国大革命）的所有特有内容，”^[184]特别是既然大西洋学派为大革命提供了一幅赞同性的图景呢？回答似乎是很明显的：大西洋派的解释“断绝”了法国与俄国革命的关系，将一个视为自然的，另一个视为反动的（趋于“落后”），一个是18世纪“西方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另一个是20世纪“非西方革命”的一部分。^[185]因此，大西洋学派的结果是更为含蓄地重新解释了俄国革命而不是法国革命。

这种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当然与对那些接受“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人心目中所想的相差不远。但是这些人进一步找到要害之处。据说“一切都源自科班（Cobban），”^[186]而更有理由认为它源自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基本观念，即“革命的作用不是推翻而是加

速。”^[187]这其中关键的做法是坚持考察法国大革命这个事件时期本身之外的更长时段，向后和向前扩展到16至19世纪，包含着由于资本主义的“多重长期”发展造成的“缓慢但却是革命性的变化。^[188]孚雷（Furet）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根据坚持社会解释者的前提依据，他们应当欢迎而不是抵制这种从时间角度上的重新定位。”如果谁坚持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概念化方式，谁就必须以比法国大革命本身那些年代无限大的一个时期作为研究对象。”^[189]

反对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人们中心理论是，到18世纪法国在任何有意义的方面不再是一个封建国家。科班引用了那时的一篇法律论文，认为领主权只是“财产的一种奇怪形式。”它接着认为力求增加领主税构成了封建的或贵族的“反动”最大部分，“其商业性远远大于封建性”。^[190]

这个论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主张许多领主，甚至大部分领主，在经济领域所起的作用是资产阶级的，而要“几乎可以扩展专用术语”将贵族定义为“成功的资产者。”^[191]他反对将外省法国贵族描绘为“懒惰的、消极的、贫穷的和虚假的”传统图画，而认为更应当被看作多数通常是“积极的、机敏的和富足的土地所有者，”^[192]他们在农业中的改进作用一直“太经常被忽视”，相比较而言英国贵族的作用“有时被夸大了”。^[193]因而有着“是资本家的贵族”，这些人可以在贵族的“最高阶层”中找到。^[194]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领主的资本负债表，就会看到封建税相对于资本主义利润，在总收入中“严格地说（strictó sense）通常（只）占一小部分，甚至很小的一部分”。^[195]这确实正如布洛赫（Bloch）很早所论证的，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展在经济上使“封建”特权重新得到确认：

在一个越来越多地被以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统治的世界中，最初与一些小的错综复杂的村庄社会的头目相配的特权，

一点一点地多了以前预想不到的价值。[196]

贵族的这种资本主义活动也不局限于农业。古伯特（Goubert）认为贵族中“很大一个比例”在18世纪对制造业有很大的兴趣。于是“很早他们自己就从事未来会发展的经济活动，并准备了它的‘起飞’。”[197]

这个理论的第二部分是坚持认为“贵族的反动”是贴错了标签。观察家们称之为“反动”的首先反映了“出租人（bailleurs）相对于承租人（preneurs）”市场地位的改进。[198]还有，这不是落后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测量和制图方法的改进使领主们能够从“一种管理技术的某种完善中”[199]获益。远不是一种贵族的“封闭性”，问题是在于它“对于这个等级的凝聚力而言开放得太大了，（然而）对于这个世纪的繁荣而言却太狭窄了。”[200]并且这还不是一个法国资产阶级遭受大挫折的时期，18世纪法国历史的适当题目是“第三等级的兴起。”[201]

人们可以听到社会解释的辩护者的回答。这些在“旧政体”（Ancient Régime）中“兴起”的资产阶级人物寻求尽可能迅速地将他们自己“贵族化”，他们的理想是过贵族式的生活（Vivre noblement）。只是在1789年之后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才出现，即准备以再投资维持资产阶级生活的人。[人们几乎要被诱导去重弹老调，即被一种新教（Protestant）伦理所感召的人]。

对于这种反驳有着三种回答。首先，贵族式生活（Vivre noblement）并不是必然与继续进行利润导向的商业活动不能共存。[202]第二，其暗示的比较群体——不列颠的资产阶级（甚至不列颠的工业家们），同样也有贵族式生活的理想。[203]第三，这种模式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并没有改变。[204]

如果确实是“在那时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不可能辨别出一条根本的分界线，”[205]那么用什么来解释法国大革命，毕竟在1789年确实发生

了一些事情？这种理论至此去除了以阶级敌对作为解释，因为社会各类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经济作用被认为一直是高度一致的。^[206]托克维尔也以政治权利上并无不同作为解释——“不管（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而在特权上的区别——“〔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中〕的资产阶级中（也）是巨大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剩下的区别是过着“分别的（社会）生活。”^[207]尽管如此，托克维尔却得出结论，大革命是旧制度各个特有方面的“自然，确实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此不可避免而又如此全然不可预料。”大革命是通过18世纪法国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激情”并到一起发生的，即“对不平等不可抑制的仇恨”和“作为自由人生活的渴望”。^[208]

在法国近来的托克维尔党人（Tocquevillians）继续坚持这种解释模式，将个别事物^[209]的一种模糊混杂和对价值变化的强调结合起来。^[210]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作了一个主要的改变。大革命不再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它现在成为一个“偶然事件”，是三个革命〔即国民公会（Assembly）的、巴黎与城镇的、农村的〕相重叠在同一时期的巧合结果；是“民众的干预改变了这场革命的节奏。”^[211]这种在强调重点方面的转变在分析上是重要的，并且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托克维尔所寻求的是说服保守力量接受大革命，他说在实际上不像他们想得那么坏，而他的继承者们则寻求说服自由知识分子们，所有这些在大革命中都不是优点〔要（Si）吉伦特派（Girondins），不要（no）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正如孚雷（Furet）自己所说的：“将近200年来，大革命的历史从来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叙述，因而就有了大致同一性质的论述。”^[212]

由于否认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孚雷（Furet）和李希特（Richet）希望改用一场“自由革命”来为之定性。他们说这是一场早于1789年开始的革命。他们十分清楚，对他们而言什么是有关法国革命最重大的知识问题。

让我们斗胆问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的结果使得这场自由革命在短时期内失败，这场革命在18世纪发动（*enfantée*），最终却要在几十年之后由法国资产阶级来完成吗？[\[213\]](#)

1792年8月10日对他们而言是从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开始大“偏离”（*déravage*）[\[214\]](#)的日子，在“恐怖时期”（*Terror*）达到了其极点，这是在跨越了1750年到1850年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巨大推进力量”中“短暂的插曲和逆流”。

似乎是群众的爱国热情毁灭了自由主义。[\[215\]](#)孚雷（*Furet*）和李希特（*Richet*）指责索布尔（*Soboul*）将共和国二年（*Year II*）分析为1871年或1917年的“天使报喜节”。[\[216\]](#)但是他们的分析不同样是20世纪历史的某种解释吗？无论如何，从他们对这个时期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而言完全是索布尔式（*Sobouliau*）的——即在共和国二年之后，资产阶级重新发现了它的真实目标，“经济上的自由，财产上的个人主义，有限制的选举权。”[\[217\]](#)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对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批判就失去了某些力量。确实，孚雷的“自由”革命所定的时期比起索布尔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些不同，也更长一些。它比较不具有政治性，也许有更多的“文化性”。并且这两种分析在有关共和国二年的解释上有着深刻的分歧。这再次隐含着对俄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同的。但是这些修正派和社会解释派对这个历史转折点对法国意味着什么，比起所有那些鼓吹者要人们相信的而言，不是那么完全对立的。

由于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到许多尝试企图找出调和这两种分析的模式。这些尝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寻求将看来正确的对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的批判结合起来，而不去结合从这种批判会得出的政治含义。

罗宾接受了孚雷的批判，即如果要分析生产方式的一种改变，就必须作有关一个长时期的分析。一场社会革命不能够转变“生产力发展的

节奏，它只能促使这样一场转变成为可能。”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工业革命使得劳动力的容纳前提条件从形式上转变为真实的成为可能，而这种工业革命“明显地是在社会革命之后。”[\[218\]](#)

此外，确实在18世纪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作用上的区别已变得相对小了。两者都是“混合的阶级”，[\[219\]](#)而大多数领主正在将他们自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地主。一旦人们确信法国走的既不是英国道路也不是“普鲁士道路”，而是代表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而法国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典型阶段中在法国大革命的之前和之后持续了几个世纪，[\[220\]](#)这在调和长时期的视角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上就不再困难了。[\[221\]](#)

还有调和这两者的第二种模式。扎波里（Zapperi）认为，将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和贵族之间的争端说成只是竞争的精英之间的一场争端是正确的。但这两者对扎波里而言都是前资本主义的精英。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法国仍然处于它历史上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将一个城市商人阶层与土地贵族的“粗鄙争论”看作一场阶级斗争需要一种“想象力的烈性药剂”。资产阶级不配拥有归功于他们的“革命道路”的优点，他们是用扩展他们在市民社会中“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作用”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将法国大革命定性为社会革命为的是表现所类比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落后性，因为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创造出那么一种形势，使工人阶级完全可以脱离靠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生活。索布尔派（Soboulian）的说明（Scenario）对于扎波里（Zapperi）而言也成了一个神话，不过人们更多地是被西哀耶斯教士（Abbé Siéyès）而不是马克思耍弄了，虽然马克思上了“商人偏见”的当。[\[222\]](#)

还有第三种观点，既接受了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批判，又不必赞同自由主义。它将资产阶级受到其他群体支持的基础去掉，即不认为其他群体的行动与其有因果逻辑上的关系，因而可以说是确定了这个

事件时期的真正历史意义。盖兰（Guérin）在1946年就已经相当有力地提出了这种主张。法国大革命有一种“双重的特征”，它既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又是“一场内部结构的持久革命”，它“孕育了一场萌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223\]](#)

盖兰使得索布尔和孚雷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们都不同意对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作用的这种理解，这隐含着对20世纪历史的见解。对索布尔而言，盖兰错误地将无产阶级的先锋当作大部分是“保卫他们在传统经济中地位的后卫。”此外索布尔说，无套裤汉与资产阶级“在重大的事件上，如对贵族的仇恨，和取得胜利的意愿上”联合了起来。[\[224\]](#)

对于孚雷和李希特（Richet）而言，无套裤汉也大部分是沉溺于“卢梭派”（Rousseauian）的追忆中的后卫力量，在寻求一个过去黄金时代的后卫力量，在寻求一个过去黄金时代的“反动”乌托邦（Utopias）。如果说在共和国二年，无套裤汉与政府争吵起来，这是他们的核心分子的做法，“一种下层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从货摊和商店中冒起出来的，”他们嫉妒那些在大革命中得到职位的人。这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管是萌芽的还是其他，它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一件互相竞争的队伍之间的敌对事件。”[\[225\]](#)

现在很清楚，盖兰是如何用与罗宾（Robin）和扎波里（Zapperi）的论述相反的方式的批判，来回避索布尔—孚雷的争吵的。后者同意孚雷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如索布尔所想的那样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因为充分的社会革命或者是完全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然而盖兰同意索布尔认为共和国二年不是“侧滑”（dérapage）的看法，因为雅各宾派（Jacobins）与吉伦特派（Girondins）没有真正的分歧。然而这不是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最高点，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对群众进行政治欺骗的最高点。[\[226\]](#)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可能体现了“侧滑”，但对盖兰来说他也不是英雄。无套裤汉和巴贝夫派

（Babouvism）在他的论述中甚至比起索布尔，还有科布（Cobb）和吕德（Rudé）的论述来更是中心议题。[\[227\]](#)

盖兰（Guérin）的立场强调了萌芽中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并就此贬低了将法国大革命能够定义为主要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件的程度。以类似的方式，其他人强调农民阶层的作用，农民不只是一场与资产阶级革命并行的附加革命中的一组演员，而是给法国大革命留下最强的印记的人们，使它可以被定义为“现代第一场成功的农民革命。”[\[228\]](#)并论证说农民是唯一一个其所得没有被1815年的复辟夺走的群体。

这种强调一直被用来批判索布尔[\[229\]](#)和批判孚雷。[\[230\]](#)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观点从某个角度看到的结果，是将法国大革命看作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拉杜里（Le Roy Ladurie）问道，是否将旧政体（Ancien Régime）的最后年代中被称为“革命的反领主主义”当作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反动”更好些，若事实是它反对的是圈地者、灌溉者、现代化者这些农民反抗的人，而在缺少进行这种改进的地主的地方，像是在布列塔尼（Brittany），在没有资本主义“深入渗透”的地方，农民们是消极的。[\[231\]](#)以类似的方式，胡内克（Hunecke）小心翼翼地在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的兴起和面包价格控制的结束中找到了“群众的革命心态”的解释，它采取了反对自由贸易和市场法则的“防卫性反弹”的形式。[\[232\]](#)

领主——农民间斗争的中心 [以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传统而论] 地位最后使得斯考波尔（Skocpol）也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它不能与英国革命作比较。它不如说是“旧政体国家结构中集中的矛盾”的表现。它“比起是（无论如何）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言”更多地或更加是一场“官僚的群众组合和国家强力推进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适合作比较的是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但是它因而就不是一场自由革命的一部分，因为法国大革命中农民起义

的政治结果是一个“更中央集权和官僚化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自由——议会制的政权。”[\[233\]](#)

那么与这整个理论有关的是什么呢？很明显，法国大革命的确发生了，并且对法国和全世界以种种不同的和持续性后果的方式作为一个纪念碑式的“事件”。它无疑以索雷尔（Sorelian）的观念来说是一个“神话”，到今天它仍保留着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在法国抓住这个神话来利用它作为驱动力。

克列孟梭（Clemenceau）在1897年说：“革命是一个政治集团。”对于科班（Cobban）而言，这是在所有法国大革命特有的神话之后的“真正的论证”，就是总有一些事、一件事，是“你能够赞成或是反对的。”[\[234\]](#)勒费弗尔（Lefebvre）十分正确地反驳说：

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的召集是一个“好消息”，它宣告了新社会的诞生，遵循正义以使生活更美好；在共和二年，同样的神话鼓舞了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它已生存在我们的传统中，并如一在1789年和1793年那样，它是革命性的。[\[235\]](#)

正是因为这个神话是如此强有力，科班不是以19世纪反对者那种方式指责大革命是一种罪恶，而是寻求借由攻击它的可信度来贬低这个神话，甚至像维多托（Vidotto）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经典模式的捍卫者也承认曾经被相当的“说服”过。然而正如维多托（Vidotto）所说的，像一些这个概念的捍卫者所作的，用扩大定义来回答这些批判，会导致“术语上的模糊”并使得这整个解释不可理解。因此他发现经典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概念对那些在马克思主义轨道上运行的人们而言是“一项不能抛弃的遗产，并且不只是对他们如此。”[\[236\]](#)

但是对那些希望欢呼这个“好消息”的人，这是不可抛弃的遗产吗？

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是服务于对20世纪的评价的。但是，也许我们对20世纪的某些困惑不正是由于我们所对18世纪的错误解释吗？如果是这样，使模式永恒化是因为它们代表一个“不能抛弃的遗产”，是在维护一种曾经（但可能不再是如此）对集体凝聚力有用处的感情形式的利益方面，保护着战略上的错误。我不相信我们企图保留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想象。但是我也不相信我们企图创造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自由革命是为了将俄国革命玷污为一场极权主义革命。没有一种分类法——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或是自由的——能将事实上发生了什么陈述得很好。

孚雷说：“大革命体现了这个政治幻象，它将客观现实（lesubi）转化为主观意识（enconscient）。”他提醒我们马克思认为热月政变（Thermidor）表现了“现实社会的复仇。”^[237]他由此得出了反意志论的结论。但是由于坚持要在长时期的社会变化（及资产阶级其真正概念的质变），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决裂这两个脉络中再分析法国大革命，他比他所相信的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我有时试图将孚雷归类为一个隐秘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而由于索布尔对共和二年的赞美，和将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这些概念具体化为社会类别，我将他看作是保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双重代理人。由于以类别本身的流动性为根据而拒绝接受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经典解释的“修正派们”使得考察阶级分化过程在实际上如何运行成为可能——借由长期的、曲折的、持久的重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它的作用，但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战鼓敲响了！）

马克思犯了一个主要的错误。他有些太过于斯密派（Smithian）（竞争是资本主义的规范，垄断是一种变态），又有一些过于熊彼得式（Schumpeterian）了（企业家是进步的支持者）。许多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持有这些偏见，但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又演变了。然而，一旦人们将这些假设倒转过来，就会运用一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

框架进行分析，力求使人们对16世纪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历史做出与马克思本人所得出的一般而言是非常不同的理解。

但确实我听到了开放，法国大革命讲的是反封建的语言。农奴制最终被取消了；行会最终被禁止了；贵族和教士最终不再是特权阶层。是的，所有这些或多或少是真实的。确实是这种情况，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中，在一个“等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甚至上层资产阶级（Haut-bourgeois）中最富有的人，只要他们没有被封为贵族，就会遭受社会的鄙视和物质上的歧视。只购买贵族地位是不够的。在1781年，塞居尔法令（Loi Ségur）使得要成为一个军队军官必须是第四代的贵族。不管是否这只是佩剑贵族一种过时的势力派头，不久就被取消或忽视了，我们尚无从知道。尽管如此，它使第三等级的上层和新近受封为穿袍贵族的人同样强烈地被触怒。

于是法国大革命到来了。在一些年中，在街道上人们确实被拉住并被批判性地问道：“你是属于第三等级的吗？”回答最好说是的。跟着这个困难时刻的是热月（Thermidor）、拿破仑（Napoleon）和复辟，事情又回到某种正常状态。上层资产阶级（Haut-bourgeois）再次寻求得到贵族头衔，至少一直到1870年是这样。在这之后，他们继续寻求正式社会阶层的标志，正如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出现以来成功的资产阶级所作的那样。

那么，如果反封建主义不是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问题，为什么那时的语言是反封建主义的？布罗代尔（Braudel）有一个极好的回答：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至少是部分因为资本主义的语言还没有找到把握一个新的和惊人的形势的用语，使法国农民转回到熟悉的反封建主义的旧语言？[\[238\]](#)

但如果这是对农民阶层的解答，我们又怎样解释第三等级的著名人

物也趋于使用同样的语言？一种解答是这些“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喧闹争吵是一种巨大的分散注意力的消遣，对分散注意力的消遣这个词的两个意义上而言的：玩笑和游戏，和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在这里指的是农民和无套裤汉。[\[239\]](#)

是的，当然一些事在1789年确实改变了，在1791~1793年甚至变得更多。如安德森（Anderson）曾说过的：“西方的整个意识形态世界改观了。”[\[240\]](#)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发生起已有了很长时间。这是这几卷书的整个理论。国家结构的转变只是已经进行了两个世纪的一个过程的继续。从这方面而言托克维尔（Tocqueville）是正确的。因而法国大革命既非基础经济也非基础政治转变的标志。法国大革命从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而言，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终于赶上了经济基础的时刻。这是这个过渡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也不是它发生的时刻。

大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位置，他们相信的是利润，而不是自由的意识形态。“前程向有才能的人开放”（*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普遍的真理，绝对性的命题，在狭义上是所有意识形态中的首要题旨。它们是手段，随心所欲的信条，但决不表示无论什么时候它们若干扰了资本最大程度的积累，还会被认真遵行。尽管如此，这种意识形态也反映了资本主义进程在结构上的终点，上层阶级的最终资产阶级化，在那里一切优越性都源自在经济结构中现有（*Current*）的地位而不是过去的地位。而且这种作为手段的意识形态本身是这个进程在结构上所呈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原来作为屏幕的东西变成一种过时的束缚。

法国大革命另外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意义。这就在于它宣告了未来。法国大革命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第一次反体系的革命——在小部分上成功了，在大部分上失败了。但是这个“神话”所体现的不是一个资

产阶级的神话，而是一个反资产阶级的神话。

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和工业革命的概念那样最终服务于同样的功能。后者的目的是解释为什么大不列颠在这个特定时期掳获了不成比例数量的世界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于它的主要竞争者法国而言。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的是同样的现象，但使用的是法国而不是不列颠的资料。它告诉我们为什么法国失败了。法国比大不列颠晚了一个多世纪才有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被假定是一场“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我们没有意思要否认这点，即在1730~1840年代的这个时期，大不列颠（或更精确地说，以大不列颠为他们的领土基地的资产阶级）在主要的竞争上比法国占了上风。我们现在将寻求解释这是怎样发生的，而不求助于这两个互相联结的错误概念，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

[1] 柯立芝（Kerridge, 1969, 468）。

[2] 例如见很多其他作者中的马赛厄斯（Mathias, 1969）和迪恩（Deane, 1979）。

[3] 普兰查斯（Powlantzas, 1971, I, 187）。

[4] 查理和蒂利（Charles and Richard Tilly）将其说明得很好：“相信这场工业革命的信念在我们中间是如此广泛和执著，以致我们可以称它为主要的教条和欧洲经济史学家既得的利益。”（1971, 186）。

[5] 最初使用这个名词的要追溯到贝赞森（Bezanson, 1922, 345~346），在1798年对法国大革命作的一个比较，一种从那时以来一直是无所不包的比较。威廉斯（Williams）认为，使用它表明一种社会新秩序的创立而不只是技术的改革，应当追溯到1830年代的拉马丁（Lamartine, 1975, 138）。此后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有布朗基（Adolphe Blanqui），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马克思（Karl Marx）[芒图（Mantoux），1928, 25, 注脚1]。希顿（Heaton）认为汤因比（Arnold Toynbee）从马克思那里拿过了这个术语并将它“放进了学术界的传播中”（1972, 3）。我们应当注意到当时人似乎很少觉察到这个现象。安德森（M.S.Anderson, 1979, 192）观察到，在“那时最好的书”中——查默（George Chalmer）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从最早时期到当代的国内经济的历史考察》（*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the Earlies to the Present Times），1812年在爱丁堡（Edinburgh）出版，有着许多关于贸易、人口和公共财政的讨论，但是“工业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6] 科尔曼（Coleman, 1956, 20）。在回答：“工业革命”这个术语的用法时，他认为太不严格了。普卢姆（Plumb）有力地回答说：“在1760年到1790年之间，如水晶般清楚的是（在不列颠）有着两个世界，旧的和新的……这种改变过程不可能是渐进的——与以前过去的几个世纪比较，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农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是既猛烈又带有革命性的”（1950, 77）。

[7] 兰德斯（Landes, 1960, 42）。

[8] 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62, 46）。

[9] 汤因比（Toynbee, 1956, 58）。强调社会或社会学上的改变是“革命”的中心，在1844年已经由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提出来：“在表面上看来英格兰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革命——而还在（18）世纪中期起英格兰就经历了一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的激变，一场有着论其后果的充分有效而言是更为深远意义的激变，因此它更可能在实际上达到它的目标，相比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意志的哲学革命而言这都是如此……社会革命是唯一真实的革命，政治和哲学革命必然会引导到这上面。”（1971, 9）。

[10] 哈特韦尔（1967a, 8）。坎纳丁（Cannadine, 1984）观察到工业革命有四种不同的和接续的解释：作为负面的社会后果（1880~1920年），作为周期的上下波动（1920~1950年），作为经济的增长（1950~1970年），作为增长的极限（1970年~ ）。

[11] 迪恩（Deane, 1979, 1）。

[12] 休斯（Hughes, 1968, 253）。也见多布（Dobb, 1946, 258）和兰德斯（Landes, 1969, 41）。兰德斯将其详述为三种改进：机器取代了人工技艺，非动物动力取代了动物动力，矿物取代了植物和动物物质作为原料。奇波拉（Cipolla）称其为机器取代生物的动力“转换”（1961, 529）。

[13] 见巴洛特（Ballot, 1923）。将机器主义（machinisme）翻译为机械主义（mechanism）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概念的用法。

[14] 迪恩（Deane, 1979, 106）。为了寻求说明他的不列颠的工业化是“独一的”理论的正确性，马赛厄斯（Mathias）认为，说它是“独一的”“是在便宜的煤，便宜的铁，机器制造，动力和矿物燃料的技术，工程技艺作为关键的母体控制着一个单一的国家经济的程度上而言。”并且他又说这也在于它是“第一个，因此是独一的”的意义上（1979a, 19）。参见罗斯托（Rostow, 1971, 33）对这种结合的类型论证。

这种结合的理论被里格利（Wrigley）用来推向逻辑上的极端。为了寻求指责“现代化”（或“理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业化”（或“持续经济增长”）这种思想，里格利（Wrigley）以因为荷兰在18世纪比英国更“现代”，应该第一个工业化这种例子，坚持认为一系列技术革新是“特有

的，当地的环境的产物”，他将其称之为一种“幸福的巧合”。接着他说“要解释的不仅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要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早，还有为什么它毕竟发生了”。他将这种想法总结为“这很可能比方说像一个人，有1/50的机会赢得一大笔赌博，而仍然毕竟赢得了它”（1972，247，259）。这在逻辑上类似于哈特韦尔（Hartwell）的理论，工业革命必须看作是“由于其本身条件的非连续性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兴起所留下的后果”（1970b，10）。

[15] 芒图（Mantoux，1928，25）他说：“工厂制度的鲜明特点是机器的使用”（38页）也见汤因比（Toynbee，1956，63）。

[16]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8，34）。此外，这种转变从开始就被看作一场“危机”。圣西门（Saint-Simon）在他1821年出版的《工业体系》中对国王的呼吁中写道：“陛下，事件的进行继续加剧着这场危机，在危机中社会认识到了它自身，不只是在法国，并且在西欧各民族构成的整个大族群都是如此。”引自费弗尔（Febvre，1962，514）。

[17] 萨维尔（Saville，1969，251）。这个理论又一次认为大不列颠是独一的：“除了不列颠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之前农民阶层就完全消灭了，并且在 不列颠早期工业化的许多特征之中，没有比在乡村迅速增长着的无产阶级的出现更引人注目的了”（250页）。

[18] 兰德斯（Landes，1969，77）。也见普卢姆（Plumb，1982，284）。“毕竟，这种新的工业方法始于消费工业——纺织业，制陶业，博尔顿（Boulton）和瓦特（Watt）的纽扣、鞋扣和别针。”迪恩（Deane）以类似的语气论证说：“只有当潜在的市场足够大，需求有足够的伸缩性时，才有正常的理由使产量有重大的增加，让企业家中的多数人与他们的传统技术决裂……没有证据能认为……生产者中的大多数人在1815年并不比在1750年更多地准备革新”（1979，131）。迪恩和科尔（Cole）在需求来源上却摇摆不定。在他们的著作1962年的第一版中，将其定位于对外贸易中，他们在第二版的前言中写道：“假如我们今天再写这本书，我们会试图将我们的立足点建立在有所不同的根据上，例如突出的是有关18世纪增长中对外贸易的作用”（1967，XV）。

[19] 怀特海（Whitehead，1964，74）。克鲁兹（Crouzet）称18世纪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大西洋阶段”，确认这点，是因为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与南北美洲的贸易是“整个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1964，568）。布勒（Boulle）所添加的一个需求重点通常没有被包括进去。他注意到在奴隶贸易中为买奴隶用以支付的合适货物变得十分标准化。“在工业革命开始所有的需求因素于是通常就被认定了——市场的重要性，商品的标准化，为按计划进行手工生产给予的红利——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非洲发现。”（1975，312）。

[20] 埃弗斯利（Eversley，1967，248，211）；也见贝尔洛克（Bairoch，1973b，571）。埃弗斯利将自己置于罗斯托（Rostow）的传统中，认为在1770~1780年这个时期，在国内市场据说是有利的情况下，是“正好在起飞”（1780年代）进入持续增长之前的关键“热身准备”时期（209页）。然而罗斯托（Rostow）驳斥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有关18世纪法国经济增长的论证时，依据的是法国的对外贸易不足以使其起飞：“在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教授和

他（罗斯托）之间的分歧是一个简单问题。在估计法国的演化时，罗斯托（Rostow）教授说他认定……只有一个为国内市场的现代纺织工业的发展，没有足够的规模效果来作为持续增长的基础。因为纺织业要起到这种功能，对外贸易给予的助长力也是必需的。这是一个武断的判断，导致他否认19世纪早期在法国和德意志的棉花工业能作为起飞中的主导部分起作用。”[黑格（Hague），1963，359]。

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的同事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将这个论证倒转过来，怀疑18世纪晚期英国棉花工业的增长，他承认这是“特别的”，但能否是“推动不列颠工业机器进入工业革命轨道的中心枢轴”，因为在1770年棉花业只占不列颠纺织生产的5%，所有纺织业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0%，而羊毛业相当于不列颠工业生产的1/3，并在法国也同等重要（1976a，645）。卡梅伦（Cameron）使用这些有关棉花业的同样百分比数字与霍布斯鲍姆（Hobsbawm）的主张对质（1968，40），即对“任何人说工业革命就要说到棉花业”加以反驳：“就这种叙述是正确的程度而言，它也显示了这个术语（工业革命）的不适当和虚夸”（1985，4）。

[21]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8，42）。

[22] 莫凯尔（Mokyr，1977，1005）。对于莫凯尔的批评和对吉尔博（Elizabeth Gilboy）以嗜好的改变作为扩大需求的基础的论证的辩护，见本-沙哈尔（Ben Schachar）（1984）。另一位供应方面的理论家是戴维斯（Davis），他认为推动力正是在于“棉花工业的技术改变”（1979，10）。关于将技术发明作为工业革命唯一的，充足的解释的论证，见加斯基（Gaski，1982）；关于尖刻的批判，见吉尔里（Geary，1984）。

[23] 汉密尔顿（Hamilton，1953，336）。兰德斯（Landes，1969，74）抨击汉密尔顿的根据是在那个时期在欧洲大陆上利润通货膨胀率也同样高，而只有不列颠有工业革命。也见费利克斯（Felix，1956）。

[24]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77~84）。

[25] 阿什顿（Ashton，1948，11）。

[26] 克鲁兹（Crouzet，1972a，68）“不列颠在18世纪财富的证据是压倒性的”（140页）克鲁兹也同意在这个时期有着“极端高的净利润”[1972b，195，参见波拉德（Pollard）1972a，127~129]。

[27] 哈特韦尔（Hartwell，1976b，67）。查普曼（Chapman）也使用“适度的”这个词（1970，252）。波拉德（Pollard）说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一直“经常被夸大了”（1972a，143）。也见贝尔洛克（Bairoch）论包括在内的低资本成本（1974，54~65）。

[28] 兰德斯（Landes，1969，78）。他似乎感到这种攻击会首先伤害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s）。他说：“对原始积累的先入为主之见是如此之多。”

[29] 迪恩（Deane，1973b，358~359）。在这意味着从投资土地到投资工业的一种转变而言，克鲁兹（Crouzet）的谨慎是有益的：“地主们将潜用的权力用于投资交通改进以确保他们

地产的安全。”但是关于工业，人们被说服维持波斯坦（Postan）的观点，即“英格兰乡村的财富中‘少得惊人’，在新的工业中寻找出路”（1972a, 56）。可参考的是波斯坦（Postan, 1972）认为“除了商人和金融家的内部圈子外，投资的习惯只是在19世纪有所增长”（175页）。克鲁兹（Crouzet）也提到，“在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初，农业、交通和建筑比起投资于不列颠工业吸收了多得多的资本”（1972b, 163）。

[30] 见吉利（Gille）：“（信贷的便利性）在大陆上要低得多，可能是因为较大的银行……从政府财政中得到了他们利润的较大比例部分”（1973, 260）。然而查普曼（Chapman）不相信英国棉花工业的资本都可以利用银行。“所有的迹象是在合股银行出现和承兑商号的同时扩展之前（在1830年代），对北方制造业有组织的支持是微弱的”（1979, 66）。

[31] 吕提（Lüthy, 1961, 25）。莫里诺（Morineau）类似地说明了18世纪欧洲的投资模式：“资本主义不关心未开发领域”（1965, 233）。

[32] 迪恩和科尔（Deane & Cole, 1967, 5）。

[33] 见迪恩（Deane, 1979, 21）。哈巴库克（Habakkuk）观察到：“（在英国人口）的增长开始于1740年代并没有逆转，不只是没有逆转，它还加速了”（1971, 26）。

[34] 普鲁姆（Plumb, 1950, 78）。克劳斯（Krause）提供了这个恢复信心的假说的伴随论证，即“较穷的群体”可能有着最低的生殖率，而不像当代边缘地区国家中他们生殖率是最高的情况。他承认这种断言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根据上的”，但是他认为假如西方穷人 unlimited 家庭的规模，就会接近趋于似乎是马尔萨斯牧师（Pastor Malthus）的好心警告：“很难看到西方如何能避免今天在印度看到的贫穷”（1969, 108）。因而从理论上，我们推知经验上的资料。

[35] 见麦基翁（Mc Keown）：“因为（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人口的）现代上升是唯一的（从其规模、连续性和持久性而言），试图单独解释它的初始阶段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1976, 6）。对于加登（Garden）而言，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人口学模式是属于“一种非常慢的进展而不是一场革命”，真正的革命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1978d, 151, 154）。

[36] 塔克（Tucker）（1963, 215）。

[37] 莫里诺（Morineau, 1971, 323）。

[38]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 Saul, 1973, 314）。

[39] 德雷克（Drake, 1969, 2）。

[40] 哈巴库克（Habakkuk, 1958, 500）。哈巴库克自己的回答是“对18世纪晚期农业产量增加最有道理的解释是，它是对人口增长的回应，而不是这种增长发生的起因”（1971, 33）。

[41] 麦基翁和布朗（Mc Keown & Brown）（1969, 53）。

[42] 麦基翁和布朗 (Me Keown & Brown) (1969, 53)。

[43] 麦基翁 (Mc Keown), (1976, 16)。

[44] 拉兹扎尔 (Razzell; 1969, 134)。关键的论证是因为英国的中层和上层也显示了他们生活期望的上升,“依据食品供应增加作的解释是不适当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拉兹扎尔 (Razzell) (1974, 13) 使他的论点更有普遍性:“是个人卫生的改进而不是公共保健的变化对1801年到1841年之间死亡率的减少有因果关系。”

也见阿曼高特 (Armengaud, 1973, 38~43)。然而他相信这个因素要与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导致人口吃得较好,对疾病更有抵抗力合并考虑。

[45] 由疾病引起疾病的分析可从麦基翁 (Me Keown, 1976, 91~109) 处找到。他承认可靠的资料只有1838年以后的才可利用,但是认为如果这个资料显示出“免疫力和治疗方法在(1838年的大不列颠)之后一百年对死亡率的趋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似乎可以得出推论,它们完全不会对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起到重大作用”(104页)。

[46] 麦基翁和雷科德 (Me Keown and Record, 1962, 122)。也见贝尔洛克 (Bairoch, 1974, 30)。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386~390) 和波斯特 (Post, 1976, 35)。

[47] 关于这个分期,见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 (Wrigley & Schofield, 1981, 162), 关于人口学模式的变化,见478页。在245页,他们似乎将变化的时间更精确地定为1751年,他们说在此之后就有着明确的“出生率控制着增长率本身的变化。”

戈德斯通 (Goldstone) 寻求对这个论点作一点变动,他认为虽然在16世纪那些结婚的人数的增加引起了出生率的增加,在1700~1850年这个时期,首先是因为结婚年龄的降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英格兰,工业化和食品市场的增长发生在农业领域已经很大程度无产阶级化的背景之中,并且已变得越来越是这样”(1986, 28)。另一种强调出生率增加的论证得自推测的爱尔兰 (Irish) 在1780年代早婚的例子,这是由于较早和更广泛地“安置”年青的乡村青年成年人,由于逐步从放牧向农耕的转变。见康内尔 (Connell, 1969, 32~33)。这种向农耕的转变当然是世界经济扩张本身的后果,如康内尔 (Connell) 本人承认的:“到(1780年代),因为英格兰本身人口的增长,她不再是谷物出口者,并且不再那么嫉妒地看待在爱尔兰的谷物生产。”德雷克 (Drake) 却对这个以爱尔兰 (Irish) 的情况作的整个婚姻年龄论证表示怀疑,因为这可能颠倒了男性和女性结婚年龄的关系。他更归功于马铃薯种植的传播 (1963, 313)。康内尔

(Connell) 确实没有排除这种解释;如果我们“不保险的统计”错误,并且人口的增加开始于1750或1760年代。“它可能正好紧随着一种马铃薯饮食的普遍化”(1969, 38)。即使爱尔兰在18世纪早期确实以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为特点,麦基翁 (Mc Keown) 和布朗 (Brown) 也怀疑人口上升能够用较低的结婚年龄来解释。他们指出,如果一个年龄较大的丈夫在晚婚的时代娶一个较年轻的妻子,早婚时间的影响(对男性)可能就较小。此外他们指出所宣称的最大区别是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但是高死亡率随着家庭的规模而增加,有着一种相抵消的影响 (1969, 62)。并且克劳斯 (Krause) 说,在另一方面,“甚至晚婚也能导致格外高的出生率”(1960, 108)。

[48] 哈伊纳尔 (Hajnal, 1965, 132)。

[49] 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依据从奥弗涅 (Auvergne) 和比利牛斯 (Pyrenees) 山区在18世纪向巴黎 (Paris) 和其他北部城市的移民得出这个观点的 (1975, 407), 并且康内尔 (Connell) 认为有同样的爱尔兰 (Irish) 移民到英格兰 (1950, 66)。

[50] 迪恩 (Deane, 1979, 246)。

[51] 例如,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认为这整个时期构成了“一个农业繁荣的时代”, (1963, 221), 是依据整体上的价格水平 (除了1817年之后的相对跌落) 来解释农耕地区的扩张和新方法的。

[52] 例如见贝尔洛克 (Bairoch, 1974, 83), 他将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看作不只是“工业化发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这些进程开始时必然需要的东西。瓦赞斯基 (Wyczański) 和托波尔斯基 (Topolski) 却特别否认增加农业生产率是解放劳动力到工业中所必需的, 指出在农村“大量的劳动力潜在地保留下来” (1974, 22)。

[53] 最有力的例证是由贝尔洛克 (Bairoch) 做出的 (1973a, 490~491), 他论证了这些将铁用在数量增加的使用的犁上 (是土地清垦和减少休耕地的扩展造成的) 的情况说明铁的整体需求的重大增加。

[54] 奥布莱恩 (O'Brien) 断言, 在总体上, “在农业上的机械化进行得比工业上的机械化要慢得多, 因为农业操作比工业程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更加分离” (1977, 171)。迪恩 (Deane) 说, 甚至在英格兰, “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以说明到18世纪末, 农业资本在数量上或比例上有实质上的增加; 并且甚至那时这种扩张与这个时期农业收入增长的关系看来一直是相当小的” (1972, 103)。确实, 迪恩 (Deane) 将此归之于直到19世纪中期农业机械技术的限制这个事实, 大多数新技术“只适合于松软的沙土地”, 它还不可能“为黏土和沼泽排水” (1979, 41)。钱伯斯 (Chambers) 和明盖 (Mingay) 也贬低机械发明的作用, 并指出塔尔 (Jethro Tull) 有名的播种机使连续耕作成为可能, 虽然“在1733年……有记载, 在此之前也有了一段很长的历史, 但在进入19世纪一段时间之前没有被普遍用来播种谷物” (1966, 2)。

[55] 见蒂默 (Timmer): “豆科作物不只直接增加了土壤的肥力, 而且养活了更大的牲畜群, 它们产生了更多、更丰富的肥料” (1969, 382~383)。然而,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提醒我们: “更为集约的耕作不必然意味着更高的产出量” (1963, 245), 但是他在这里的意思是每单位播种量的产出量, 而仍可能通过减少休耕地增大每公顷耕地的产出量。依据每播种单位的产出量, 通过大量施肥也可能得到较高的产量, 但是这要事先大量从外面带进来, 因而一般来说是太昂贵了。

[56] 这些方式间的不同是另一种耕作法只能用在松软的土壤上。在粘硬 (但仍排水良好) 的土地上, 必须避免根部断裂和保持牧草生根 (在牧场上)。在湿冷的黏土上, 哪一种体系都不能施行, 直到19世纪中期便宜的地下排水方式发展起来时, 见钱伯斯和明盖 (Chambers &

Mingay, 1966, 54~62), 和迪恩 (Deane, 1979, 38~42)。

[57]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3, 247~250)。“诺福克 (Norfolk) 方式以不同的形式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为各个欧洲国家开明的土地所有者所遵循” (251 页)。

[58] 钱伯斯 (Chambers) 和明盖 (Mingay) 说这种新的耕作打破了中世纪农业的“牧草缺乏导致土壤贫瘠的恶性循环” (1966, 6)。

[59] 见莫里诺 (Morineau, 1971, 68~87)。他赞同鲁伊特 (Ruwet) 的观点, 每播种单位量产出量的一个决定性前提条件是化学肥料的发展 (69 页, 注脚 129)。然而, 对鲁伊特 (Ruwet) 人均产出量从 17 世纪中期由于播种数量的增加而上升 (假定由于休耕地的减少是使其成为可能的首要原因) 表示怀疑。类似的对诺福克 (Norfolk) 方式中每个投入劳动力产出量的增加的怀疑可以在蒂默 (Timmer, 1969, 392) 处找到, 他却发现每播种单位量产出量的某些增加。

[60] 莫里诺 (Morineau, 1971, 70~71, 也见 1974b, 355)。当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描述了洛尔马林 (Lourmarin) 农业生产的多样化 (不再只是小麦,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 一半的土地用作葡萄园、果园、种桑树、花园和灌溉草场), 他解释说: “在那里这是一场真正适合于法国南部 (Midi) 状况的农业革命” (1975, 402)。莫里诺批评这种特别的惊叹, 指责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诱人的推理”建立在靠不住的数量基础上, 它“解释、推测, 并且是无意中的循环推理” (1978, 383)。拉杜里以同样方式予以回应。他说莫里诺的著作是“似是而非和有才气的”, 但毕竟是错误的: “我不认为谁能够否认 18 世纪的农业进步” (1978, 32)。所有这些如我们将看到的, 都围绕着进步意味着什么。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倾向于不平等减少的观点, 而莫里诺认为它们是增加了。

[61] 莫里诺 (Morineau, 1971, 76, 85)。

[62] 关于单位规模的增加, 见钱伯斯和明盖 (Chambers & Mingay, 1966, 61)。但是耶林 (Yelling) 说: “对于大规模农业有利或不利的环境与圈地的地区分布不一致 (1977, 97)”。关于自由围圈问题, 见富塞尔 (Fussell, 1958, 17)。

[63] 多弗林 (Dovring, 1966, 628)。

[64] 钱伯斯和明盖 (Chambers & Mingay, 1966, 34, 37)。

[65] 奥布莱恩 (O'Brien, 1977, 170)。对此所给予的某些证据是迪恩 (Deane) 和科尔 (Cole) 的估计, “看来在 18 世纪不列颠农业平均产出量大约增加了 25%, 而这个进展整个是在 1750 年之前达到的” (1967, 75)。他们甚至在一个注脚中说“看来农业生产率确实可能在这个世纪的第三个 25 年中下降了, 并在此后又恢复了。”

[66] 见芒图 (Mantoux, 1928, 170~172)。琼斯 (E.L.Jones) 认为围圈土地的历史比普遍公认的要更为渐进, 因为没有考虑到由协议达成的圈地。“由 18 世纪后半期以议会围圈土地为表

现的明显迅速上扬，并没有压倒一切地排除其他证据所包含的东西，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被扫平了”（1974b，94）。耶林（Yelling）类似地认为大量的公共土地独占发生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他否认希望用较早的时期取代1760年以后时期作为“与中世纪的过去决裂的决定性和革命性时代。”他不过是论证说“它不像是如启示录中曾发生的那样”（1977，111）。

[67] “在大量的省份中——香槟（Champagne）、皮卡迪（Picardy）、洛林（Lorraine）和三个主教区（Three Bishoprics）、布尔戈涅（Bourgogne）和布雷斯（Brésse）、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贝里（Berry）、奥弗涅（Auvergne）、图鲁兹（Toulousaine）、贝亚恩（Bearn）——开始于16和17世纪，特别是从约1730年，采取了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如每当有旱灾、霜冻灾或水灾时，开放田地的使用权，在草场上共同放牧（Lavaine Pâturage sur les prés）。在草再次生长出之前，这种使用权如果不是总被取消的话，至少也在下一年被限制。”[布洛赫（Bloch），1930，341]。也见332页各种类型的围圈土地逐渐在各个地区建立的讨论。

[68] “这个运动是普遍的，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到处被宣扬的教条和或多或少清楚感觉到的需要。那些耕种土地的人们中间感受着这些最强有力的影响。”[布洛赫（Bloch），1930，511]。

[69] “面对土地围圈，（不列颠的）村庄没有选择；议会已做出了决定，它只得服从。在法国，强有力的农民租佃法律似乎不能容忍这样的苛刻作法”[布洛赫（Bloch），1930，534]。

[70] 关于英国自耕农阶层的消失，见沃迪（Wordie，1974，604），和钱伯斯（Chambers）与明盖（Mingay）（1966），他们观察到：“（合并）的倾向受到围圈土地的鼓动，但绝不是依靠于它。”192页。关于法国，见劳伦特（Laurent，1976a，660）和沃维勒（Vovelle，1980，60~61），他们估计在夏尔特尔（Chartres）的土地持有者们的“中间类别”有明显的衰落。让我们讲清楚我们这里谈的是这类土地持有者的消失，他们的规模足以维持他们的家庭，但不是更大。但是，对有关法国情况的保留看法，见穆夫里（Meuvret，1971d，196）。多弗林（Dovring）对于土地合并的压力是这样解释的：“在牛拉重犁的方式下，带状耕作法可能有某些技术优势，因为带状的长度比一块紧凑的田地更重要。（这点不应过分强调，因为带形事实上不总是长到牛拉犁的需要的长度，带轮重犁甚至在可耕地占主要地位地区也是常使用的。）但是这种新铁犁用一两匹马来拉，这种犁相信在比旧的开放田制中的带状地要宽，而不那么长的合并地块中会工作得更好；而新的轮种制也被认为在合并的地产上更容易应用……比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并不小的是这个事实，即18世纪经历了在欧洲的农民村庄人口增加的一个上升浪潮时期，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带来越来越剧烈的土地分裂”（1966，627）。

[71] 耶林（Yelling）在对大不列颠的圈地历史作了最仔细的研究之后，作结论说：“面积缩小和便于农作的变化是围圈土地的主要好处之一，它的支持者最有信心确认的好处之一，也是它的批评者最少攻击的。对于所有这些，要展示出它们所达成的所有结果是不容易的……（问题）是没办法看到任何优点怎样转译成如生产率改进那类的具体经济学术语”（1977，144）。在谈到这点时，耶林（Yelling）列举了改进的假定可能性，并要我们不要低估它，“因为发现足够的证据确定（假定的优点）的（效果）是困难的”（145页）。奥布莱恩（O'Brien）采取了另

一种方式。若是大不列颠长久以来发展出不同的土地租佃形式，比起许多大陆上的国家的情况在其协议上不那么“有封建性”，就论证它们通过鼓励投资和发明促进了生产率。“但是，从推理而言（*apriori*），没有理由期望不列颠的地主—佃户模式比农民所有权必然会产生明显要高的投资率，或比起普鲁士（Prussian）式的封建主义，或甚至比起某些形式的收益分成制（*métayage*）来是如此”（1977，168）。他认为如果不列颠有一种优势，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较早大规模增长的地理极限，这样“农业资本积累的少量增加……都能产生十分显著的产量增值”（169页）。他将最强调的方面放在每英亩种地较早的牲畜比例上。

[72] 多布（Dobb，1946，239）

[73] 例如，塔特（Tate）争辩说：“18世纪圈地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行得小心谨慎，并且它引起的有组织抗议规模相对小”（1945，137）。当塔特（Tate）后来以长达一本书的形式发表了他的论证，一位评论家理查森（Richardson）恰当地形容他如同“一位几乎是压制着愤怒在读L.L.和B.哈蒙德（Hammond）的《农村劳工》（*The Village Labourer*）”（1967，187）。

[74] 经典的论证见克拉潘（Clapham），他断言在1685年到1831年之间劳动者家庭与企业家家庭的比例从1.74：1增加到2.5：1。“增加看来是小的，这篇（论文）不是一个证明；但是对任何更大的增加毕竟没有证据。”（1925，95）。拉佐尼克（Lazonik）认为克拉潘（Clapham）的计算方式低估了这个变化（1974，37~38）。

遵循克拉潘（Clapham）的思路的我们发现还有钱伯斯（Chambers）：“圈地运动有着进一步减少而不是毁灭剩下的英国农民阶层的效果。……拥有小屋的人口看来在圈地之后实际上增加了”（1973，335，338）。

[75] 迪恩（Deane，1979，45）。见钱伯斯（Chambers）：“对于任何熟悉芜菁农作的多样性和耗费时间的过程——仔细地事先调配土壤成分、播种、挑选间苗、挖洞眼、收拣、切碎、喂养牲畜——的人，它能够被认为是任何形式的节省劳力的想法会使其吃惊”（1957，37）。也见明盖（Mingay，1977，50）。塞缪尔（Samuel）给予这个论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农业中，便宜的劳动力不是发明而是经济增长的支点。由农业革命开创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巨大增加，还有他们辛苦劳动的强化”（1977，23）。

[76] 马赛厄斯（Mathias）通过对金（King）在1688年，梅西（Massie）在1760年，柯尔库洪（Colquhonn）在1803年收集的资料进行比较显示了这点。见马赛厄斯（Mathias，179d，189，表9.3），它显示了从1760年到1803年之间清楚的变化。

[77] 见钱伯斯（Chamber，1953，各处）。

[78] 例如见勒费弗尔（Lefebvre）论法国北部：“北方（North）的大工业会招募乡村的劳工[短工（*manoeuvriers*）]。并这样解决农村的问题”（1972，54）。确实，哈夫顿（Hufton）的推理导致我们认为这种优点与法国联系在一起。谈到以西欧作为一个整体的在18世纪社会的两极分化，他说大不列颠在乡村地区有着最好的“整体社会平衡”，因为存在着“一个巩固的中层农民群体。”他认为法国代表了相反的极端。农村人口的60%（而在某些地区是90%）“不足以维

持生活”（1980，30）。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些农村穷人不是一个城市无产阶级明显的候补者呢？

[79] 柯立芝（Kerridge, 1969, 474）。关于16和17世纪在英格兰“无比的成就”，见柯立芝（Kerridge, 1967, 348, 和各处）。也见奥布莱恩（O'Brien）：“看来从1750年到1850年不列颠在农业上的成就没有什么是特别超常的”（1977, 173）。柯立芝用带有抱怨莫里诺（Morineau）的语气说：“现今……从1750年到1850年间英国农业革命的神话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证明一个神话是错误的并不等于消灭它”（469页）。

[80] 明盖（Mingay, 1969, 481）。

[81] 多弗林（Dovring, 1969, 182）。

[82] 迪恩（Deane, 1979, 2）。

[83] 克鲁兹（Crouzet, 1972b, 162）。

[84] 萨普利（Supple, 1973, 316）。

[85]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 Saul, 1973, 36）。

[86] 见芒图（Mantoux, 1928, 262~263）。半个世纪以后，凯恩（Cain）和霍普金斯（Hopkins）得出了同样的论点（1980, 473）。

[87] 布雷布纳（Brebner, 1966a, 252）。也见阿什顿（Ashton）：“真实的事情是在所有时代在工业和贸易中某些竞争手段都存在；而在所有时代都有人寻求压制和控制竞争的焦点”（1924, 185）。

确实同样的，迪恩（Phyllis Deane）写到了工业革命的“自发性”，但仍然注意到：“事实是当工业化进行时，国家的干预比以前曾经有的在经济中更为深入和有效……哲学激进派的真正目标……转向不只是从政府得到自由，而是要从无效率的政府获得自由，并且效率意味着在经济体系中有效率和有目的干预，以对抗无效率无目标的干预”（1979, 251~252）。

[88] 最近有一篇文章将所有这种观点的论证收集在一起，见哈特曼（Hartmann, 1978）。

[89]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Mathias & O'Brien, 1976, 606~607）。关于英国从1660年到1815年征税水平的进一步证据，见奥布莱恩（O'Brien, 1988）。赖利（Riley）扩展了马赛厄斯/奥布莱恩（Mathias/O'Brien）的论证，断言法国财政的脆弱“可以归因于没有能……对于经济中财富的大量增长部分征税”。他更进一步断言，在1735年到1780年，法国和平时期的税收负担不但没能增加到“以产出量为标准相符合的程度”，而甚至还下降了（1987, 211, 236）。

[90] 莫里诺（Morineau, 1980, 320）。也见帕尔默（Palmer, 1959I, 155）提供的1785年类似的数字，显示出不列颠的税率高于法国，相当于一倍半。

[91] 见莫里诺 (Morineau, 1980b, 321)。他也认为：“在英格兰没有人敢于确信，土地税 (Land Tax) 确实是由土地所有者支付的，而分析到底不是由实际生产者支付的；即由农业工人和佃户。有着许多清楚的实例” (322页)。

马赛厄斯 (Mathias) 和奥布莱恩 (O'Brien) 的论证有所不同，但得出同样的结论。“无疑不列颠的直接税总的来说是‘进步的’，无疑的是为什么在总的公共财政中它构成的比例是如此之小” (1976, 614)。

[92]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 (Mathias & O'Brien, 1976, 616)，他们随即提到：“关于在18世纪英格兰的需求结构鼓励了工业的更快增长的论证 (特别是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中等收入’的重要性的理论) 必须将包括间接税在内的这些重要转变考虑进去” (621页)。马赛厄斯 (Mathias) 在较早出版的一本书中，总结不列颠的税收是“非常退步的”，因为事实上2/3的财政是由大众需求的商品而抽取的间接税得来的 (1969, 40)。

[93] 莫里诺 (Morineau, 1980b, 322~323)。

[94]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 (Mathias & O'Brien, 1976, 633)。

[95]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 (Mathias & O'Brien, 1976, 636)。古伯特 (Goubert) 对18世纪晚期法国人的自我感觉作了类似的解释：“国王和王家权力的花费一直被夸大了；它们在亨利四世 (Henry IV) 统治下比在路易十四 (Louis XIV) 统治下大得多，在路易十四 (Louis XIV) 统治下比在路易十六 (Louis XVI) 统治下大得多。”但是这些后者的花费遭遇了不那么友好的舆论压力 [另一种政治舆论 (une autre publicité)] (1973, 139)。

[96] 兰德斯 (Landes, 1969, 81)，他认为：“创造工业革命需要一个联姻。一方面，它需要不只能代替手工劳动并能促进工厂生产集中化的机器……另一方面，它需要生产广泛的有伸缩性需求的商品 (如棉纺织品) 的大工业，于是 (1) 制造过程的任何一部分的机械化都会给其他部分造成严重的压力，(2) 这种工业改进的影响会波及整个经济。”

[97] 米尔沃德和索尔 (Milward & Saul, 1973, 173)。

[98] 她又说：“至少要到……铁路时代。”迪恩 (Deane) 将资本的扩散定义为资源的供给使得“人口的增加、市场的扩大，或新的和潜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成为可能，相对于“资本深入，即采用更为资本密集的生产技术。” (1973b, 364)。

[99] 兰德斯 (Landes, 1969, 80)。

[100] 见马赛厄斯 (Mathias)：“(关键的技术封锁) 是在工程学而不是科学方面” (1976b, 33)。还有，“由事后回顾 (ex post facto) 的结果而不是其努力判断科学贡献的效果，会大大减少它们的重要性” (1979c, 58)；也见吉利斯皮 (Gillespie, 1972)。马森 (Musson) 对科学作了后卫性辩护，他坚持说“应用科学起了比普遍承认的重要得多的作用” (1972, 59)。兰德斯 (Landes) 典型地应用技术变革更大的重要性当作一根棍子打击法国人。“这并非偶然，在热动力学方面，法国人将他们的努力专注于将技术简化为数学的一般法

则”，而有企业心的英国人继续“在工程实践和革新上领先于世界”（1969，104）。

[101] 为了让读者不要为提到的年代弄得混乱，我在比较了一系列的技术和基本文献时发现，关于这个和那个发明的年代有许多矛盾之处。问题在于这个事实，即在发明的年代，第一次使用的年代和获专利的年代之间经常有着不同。此外，当一个特定的机器有着几种连续略有不同的形式时，不同的作者也会将不同的形式称为一项发明。就讨论的目的，如果列举略有不同年代并没有多大关系。

[102]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在发明的数量和重要性上。见麦克洛伊（Mc Cloy）：“法国她如果落后于不列颠的话——我不愿意想到她是如此——确实落后得也不太远”（1952，4）。这本书在每一个领域论证了这点，包括纺织业和蒸汽发动机。作者经常提到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动荡是如何打断了这个过程。有时发明者去流亡，有时政府的兴趣和注意力被分散。也见布里阿万尼（Briavoine）论法国对不列颠在机械过程中优势的反应：他们“立刻抓住留给他们的东西来平衡这种优势：他们转向化学”（1839，194）。

[103] 布罗代尔（Braudel，1984，572）。这位比利时（Belgian）分析家布里阿万尼（Briavoine）在他写于1839年的一本著名的书中，将欧洲对印度棉制品市场的征服看作是工业革命的主要“政治”后果，他使用了一个惯用语：“欧洲几世纪以来依靠印度的最有价值的产品和那些大量的消费品：薄棉布、印花布（indiennes）、紫花布、开司米斜纹呢。每年欧洲进口大量的制成品，对此她只能付给金银钱币，而它们被永远隐没在没有机会送回我们这里的地方。这就是欧洲贫穷的原因。”

“印度有着不昂贵而有技艺的劳动力的优势。由于制造模式发生了改变，事情的状况不再是过去那样了，贸易的差额因而对我们有利了。印度的工人不能与我们的蒸汽发动机和织机竞争——在大多数纺织品方面，欧洲在世界市场中已经排挤掉了印度制造商（fabricants）几个世纪来独占的市场。英格兰能够买进印度的棉花和羊毛，然后送回去制成的布。如果后者保持原状，她将送还欧洲所有从那里收取的货币。这种明显的后果有希望增加我们大陆的财富”（1839，202～203）。他是多么正确啊！布里阿万尼（Briavoine）从他的探究中进而（记住他是在1839年写的）警告这个政治后果有着另外一面。“但是在这些政治后果中，有一个是可怕的，政治家从现在开始就必须预见到。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组织的劳动，使得人身不再如一个奴隶，留给其发展智力的自由。如果不抓紧给他们提供充实的教育作为引导，其中就存在着动荡鼓动的长久来源，从中终有一天会出现新的政治骚乱。经验教给我们，工人们群聚在一起能成为暴动的因素，而大多数工业危机将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这个观点值得予以严重关注。”

[104] 关于在改进质量方面新机器有什么意义，见曼（Mann，1958，279），关于它们如何节省劳力，见迪恩（Deane，1979，88～90）。

[105] 迪恩（Deane）指出在英格兰，毛纺织业的实际产量在1700年到1770年之间增加了2又1/2倍，在头四个十年每十年增长率为85%，而在1741～1770年这个时期增长率为13～14%（1957，220）。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描述了18世纪法国羊毛工业达145%的“全面增长”，他说这接近于迪恩（Deane）和科尔（Cole）对同一时期推测的增长率

150%（1967）。“法国的毛纺织工业因而在18世纪并不落后于英国工业。在这两个例子中，毛纺织工业看来都达到了整体上年平均（整齐均衡的）1%的增长率”（1976a, 647~648）。（如果这些统计在整体上不是前后一致，这并非我所为。）

[106] 见霍夫曼（Hoffmann, 1958, 43）。

[107] 兰德斯（Landes, 1969, 82）。

[108] “（棉花）是一种植物纤维，强韧并在特点上相对一致，而羊毛是有机物、多变的，在其品质上有着微妙的多样性”，兰德斯 [（Landes），1969, 83] 。

[109] 见利利（Lilley）：“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除了用滚轴拉长这一个真正新的想法之外，棉纺业的发明直到约1800年基本是将几世纪来熟悉的纺轮各部分以新的组合联结在一起的问题。这些‘容易的’发明造成了一种观念，即它们不需要特别的资历或训练。它们能够由有充分的热情和商业洞察力的任何聪明人制造”（1973, 194）。利利（Lilley）认为它们没有打破什么技术障碍，并不是扩张的前提条件，而是“更为迅速的扩张创造的新的激励和机会的结果”（195页）。也见查普曼（Chapman）：“在细微地对早期棉纺工业进行的考察越长久，它的再生周期的早期阶段看来是越不具有革命性”（1970, 253）。

[110] 见帕特森（Patterson, 1957, 165~166）。此外，革新不是增加竞争力的唯一方法。转移生产场所是第二种也是十分标准的方法。此外，戴维斯（Davis）注意到这正是毛纺织和亚麻工业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的，它们“能够转移到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北部的低工资地区而在一段时期内降低成本”（1973, 307）。

[111]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 279~280）。

[112] 霍夫曼（Hoffmann）将不列颠议会反对印度棉布的行动作为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以解释这些革新，另一种是（如以前提到的）从行会控制下获得自由（1958, 43）。

[113] 戴维斯（Davis, 1973, 303）。

[114] 见贝尔洛克（Bairoch, 1974, 85~97）。芒图（Mantoux）论证了制铁与机械之间总的关系。早期大部分是木制的机器“不规律地运行并迅速磨损。”然而瓦特（Watt）的发动机需要威尔金森（Wilkinson）的金属汽缸的“完全准确的造型”（1928, 316）。

[115] 赖利（Wrigley）简洁地总结了为什么这样的理由：“（矿物原料的）生产是点状的；（植物和动物原料的生产）是面状的……前者意味着沿着少量的交通路线有大的载重量，而后者意味着相反的情况”（1967, 101）。

[116] 在大不列颠的运河大多数建造于1758年到1802年之间这种情况，其“首要目的是运煤”（迪恩Deane, 1979, 79）；参见盖尔（Gauer）和其他各处：“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在沃斯利（Worsley）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之间的早期联系使煤的价格在后

一个城镇降低了一半”（1975～417）。

[117] 肖努（Chaunu, 1966, 600）。

[118] 见内夫（Nef, 1957, 78～81）。

[119] 见福布斯（Forbes）：“缺乏木炭和水力的限制是对18世纪制铁工业的经济威胁。作了许多劳力来打破迫种木材和水的暴政”（1958, 161）。对技术问题和它们在历史上的解决办法的一个清楚说明可见兰德斯（Landes, 1969, 88～100）。也见利利（Lilley, 1973, 197～202）。

[120] 兰德斯（Landes, 1969, 99）。

[121] “直到世纪中期左右，使用木炭要比焦炭进行熔炼要便宜，所以铁器商避免用焦炭熔炼并继续使用较旧的技术是有道理的。用焦炭制造铸铁的成本在这个世纪上半期大大下降了，而木炭炼铸铁的成本在1750年代急遽上升，给予焦炭熔炼以明显的成本优势”[海德（Hyde），1973, 398]。那么如果人们奇怪为什么达比家族（Darbys）使用它，海德（Hyde）认为他们使用它“尽管这种新方法成本较高是因为他们从焦炭铸铁的一种新的副产品——薄壁铸件中得到高于平均的财源”。并且这种铸件技术“是一种保护得很好的工业秘密”（406～407页）。

[122] 兰德斯（Landes, 1969, 54）。在1786年，兰道夫主教（Bishop of Landoff）沃森（Richard Watson），在贵族院（House of Lords）有关伊登条约（Eden Treaty）的辩论中对法国人不那么苛刻。他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他们的森林消失之前，去开始寻找地下的燃料”《英格兰议会史》（*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J*, XXVI, 1816, 545）。

[123]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 Saul, 1973, 173）。奇怪的是，兰德斯（Landes）在他书中后面的观点中，说的完全是同样的事：“甚至自然的慷慨也有损害，因为木材的相对丰富看来也鼓励了传统技术的保持”（1969, 126）。

[124] 见芒图（Mantoux, 1928, 304）。

[125] 见迪恩（Deane, 1979, 103）。

[126] 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68, 48～49）。

[127] 利利（Lilley, 1973, 203）。兰德斯（Landes）正确地认为，对于18世纪晚期的分析，这可能是年代上的错误，给予制铁工业“比应有的以更多的注意……不论在雇佣的人数上、资本的投资上、产量的价值上、增长率上，这个时期的制铁业都不能与棉业相比”（1969, 88～89）。

[128] 例子是很多的。它们的早期广泛应用最著名的例子是在意大利的丝织工业。庞尼（Carlo Poni）对这个题目作了许多研究。

弗罗伊登贝格（Freudenberg）和雷德里希（Redlich）倾向于称这些建筑物为“原始工厂”或“集中控制的联合车间”。“包含有对生产增加控制，但不一定增加劳动的分工”（1964，394）。对18世纪晚期棉纺业工业的早期工厂重大不同的程度，却是一个没有充分研究的题目。

[129] “向工厂生产发展不像通常一直认为的那样具有普遍性” [伯吉尔（Bergier），1973，421]。也见克鲁兹（Crouzet）：“在19世纪初大不列颠工业最广泛的组织形式是外包工，商业资本主义和家内劳动的结合；正是以这种形式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得以发展”（1958，74）。也见塞缪尔（Samuel）论不列颠的棉花工业：“现在有可能将新的生产模式等同于工厂制度……资本主义的增长植根于小规模企业的深层土壤之中”（1977，8）。在强调他相信的是“机械化的缓慢进步”时（47页），塞缪尔（Samuel）观察到：“在制造业中如同在农业和矿业中那样，（在19世纪早期的不列颠）资本主义企业大量的是在手工技术而不是蒸汽动力技术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45页）。

[130] 见贝尔洛克（Bairoch，1974，108）。

[131] 奥布莱恩和凯德尔（O'Brien & Keyder，1978，168）。

[132] 兰德斯（Landes，1969，119）。兰德斯让我们参阅希尔施曼（Hirschman，1957）为什么在理论上会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希尔施曼（Hirschman）因为写到了世界经济20世纪的边缘地带，提醒我们外加工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劳动组织的一个主要特点。

[133] 兰德斯（Landes，1969，57）。

[134] 塞伊（Sée，1923a，191；198）。但在这同一年，巴洛特（Ballot）论“机械化”的书在他死后出版了。在前言中，豪泽（Henri Hauser）写道，“机器在1789年之前的法国，比人们通常相信的传播得广泛得多”（1923，VIII）。

[135] 肯普 [Kemp，1962，328~329；参见卡梅伦（Cameron），1958，11；克兰兹伯格（Kranzberg）1969，211；亨德森（Henderson）1972，75]。

[136] 马尔科维奇（1976b，475），他认为法国不只是“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下在工业力量上优于英格兰”（1974，122），而且“甚至在19世纪开始时”还是如此（1966c，317）。然而见莱昂（Léon），他的系统说明更为谨慎：“（在法国1730~1830年这段时期）显示出它本身尽管在技术上有持续劣势，一切事物越来越为工业化浪潮的控制，而经济增长如果说不是大规模的，至少也是真实的和非常重要的” [1960，173；参见加登（Garden），1978c，36]。最后，见威尔逊（Wilson）对1500~1800年这整个时期的总结性观点，即“英格兰偏离正常的欧洲模式没有曾经认为的那么大”（1977，151）。

[137] 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说它于法国发生在“1789年之前”，但在大不列颠只是发生在1811年到1821年之间（1965，XIV）。然而他承认不列颠在19世纪在物质生产的增长方面占优势，“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上”（cxxxv页）。

[138] 马尔切夫斯基 (Marczewski, 1961a, 93~94)。马尔科维奇 (Markovitch) 说很难谈得上“起飞”，因为法国从18世纪中期到现在的整个工业史一直是“几乎不间断的长期经济增长” (1966c, 119)。米尔沃德 (Milward) 和索尔 (Saul) 将法国“工业革命”的时期定为发生在1770年到1815年，虽然他们说如果人们使用起飞的标准，一场起飞直到19世纪中期才发生 (1973, 254~255)。

[139] 例如见马尔切夫斯基 (Marczewski, 1961b)。其中的各图表显示了在法国从1701年到1844年 (除了短时期外) 有着稳定的增长率，在农业和工业上均可表述出来，并且这种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以棉花工业的大量发展为主导的密集和大规模的工业化。

[140] 奥布莱恩与凯德尔 (O'Brien & Keyder, 1978, 21)。说明它的另一种方法是说有关英格兰的霸权问题是“误解的”和“无法回答的”，因为对英格兰在18世纪是否是“不证自明地优越”这个问题，回答只能是“一个响亮的‘不’”。这种优越性的推论只是得自英格兰的“最终霸权” [克拉夫特 (Craft) 1977, 434, 438~439]。克拉夫特 (Craft) 认为“‘为什么英格兰是第一个？’这个问题应当与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区分开来？” (431页)。米尔沃德 (Milward) 和索尔 (Saul) 类似地要求从“为什么是不列颠？”这个问题改换为一个“说欧洲角度”的问题 (1973, 30~38)；也见布罗代尔 (Braudel)，他说我们能在大陆上发现“或多或少接近英国模式的例子”，并希望将农业和工业革命看作“一个欧洲的现象” (1982, 282)。

[141] 见卡勒斯-威尔逊 (Carus-Wilson, 1954)，艾贝尔 (Abel, 1973, 51, n.1) 写道，将13和14世纪早期描述为欧洲的第一个工业化时期是首先由施默勒尔 (Schmoller) 或菲利皮 (F. Philippi) 做出的，他在1909年出版了《德意志的第一次工业化》 (*Die erste Industrialisierung Deutschlands*)。

[142] 见内夫 (Nef, 1954)。而卡勒斯-威尔逊 (Carus-Wilson) 认为在13世纪有一场工业革命 (即漂布厂)，她，作了18世纪晚期工厂依据其重要性作的任何比较。与此相对照，内夫 (Nef) 在夸耀大不列颠1540~1640年这个时期时，认为它的“变化速度显著的程度几乎不小于”那个后来的时期 (88页)。但是见迪恩 (Deane) 的回答，即无论如何“在工业发展的绝对规模上”这两个时期之间有着不同，还有在它的“组织和技术上的变化”的“更广泛”影响方面 (1973a, 166)。

[143] 例如，加登 (Garden) 警告说“人们不应该.....草率地对18世纪和工业革命感到吃惊，不列颠的真实情况是它本身是守旧的和有限的，在整个18世纪传统形式在任何地方都有残留——确实甚至在发展” (1978a, 14)。也见威廉森 (Williamson)，他说在1820年代之前，不列颠的增长“至多是适度的” (1984, 688)。

[144] 道马斯 (Daumas) 称1550~1750年这段时期在技术上是“根本性转变”的时期之一 (1965, V)。他称在1750年到1850年间有一场技术革命的想法是在我们对技术史的理解中的“主要错误之一” (1963, 291)。他于是承认这个时期的成就是在他在的专门知识之外的经济社会性组织方面，以试图拯救1750~1850年这个时期的论点。见道马斯 (Daumas, 1965, XII)

和道马斯与加伦格 (Daumas & Garanger, 1965, 751)。

类似地, 利利 (Lilley) 主张: “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大约到1800年——大部分以使用中世纪技术和将这些技术扩展到它们的极限为基础的” (1973, 190)。也见布罗代尔

(Braudel): “如果说有一个作为工业革命的关键性解释之一的因素已失去根据, 那就是技术” (1984, 566)。

[145] “传统的叙述……对重大发明的出现说得太多了。”比尔斯 (Beales) 说, 较稳妥的解释将这些发明者看作“这个时期希望的代言人 (而不是) 它们的创始者”, 工业革命的概念的内容失去了“戏剧性的性质……它获得了广泛性和对人类的重大意义” (1929, 127~128)。也见哈特韦尔 (Hartwell), 对他而言, 工业革命不需要“解释”, 因为它是“一个最不显眼的过程的最高点, 一个长时期缓慢经济增长的结果” (1967b, 78); 还有迪恩 (Deane) 和哈巴库克 (Habakkuk), 对他们而言“第一次起飞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渐进性” [1963, 82, 参见哈特韦尔 (Hartwell), 1870b]。

[146] 希顿 (Heaton, 1932, 5)。

[147] 门德尔斯 (Mendels, 1972, 241), 他对转变到“现代、工厂或机器工业化”的第二阶段的解释是由于这个事实, 原始工业化造成资本积累于商人企业家手中, 并具有了工厂工业化的必须技艺, 并创造了导致增加地理专业的农业货物市场。

伯杰龙 (Bergeron) 唤起了对“重建”原工业化概念“专业”的注意, 即“强调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时期之间的生产和劳动组织的连续性甚于断裂” (1978a, 8)。

[148] 门德尔斯 (Mendels) 指出, 马尔科维奇 (Markovitch) 对有关法国工业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相对落后的标准意见的修正 [如同克鲁兹 (Crouzet) 的类似观点], 依靠的是包括了他将工业和“最广泛可能意义上的手工业, 甚至包括为家庭消费的家庭工业劳动”手工业归类在一起。他得出结论说: “人们对法国经济发展的解释这样就能戏剧性地改变, 取决于其给予‘前工业的工业’的地位” (1972, 259)。詹宁 (Jeannin) 在他对原工业化的批评性注释中, 评论了一种更新近的说法, 即克里特 (Kriedte) 的和其他各人的 (etal) (1977), 他们认为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是“乍看有一点夸张, 结合了非特殊的因素, 并且因为过于特指薄弱的工业而显得过于狭隘” (1980, 64)。

[149] 加登 (Garden, 1978a, 14), 他称这为“根本性的问题”。

[150] “人们切不要将表面现象错当作现实……如专门资料所描述的, 1851年的不列颠经济可能看来与1800年没有不同。但是这些数字只是描述了社会的表面——甚至使用不变的专门术语门类据以确定没有变化。在表层的下面, 生命器官改变了, 而且虽然它们按比重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不管从人数还是财富上来衡量——是它们决定了整个体系的新陈代谢” [兰德斯 (Landes), 1969, 122]。但是这就使我们无法确定如何辨明“生命器官”和“新陈代谢”, 更重要的是, 1800~1850年间的不同是否比这之前任何50年的期间要重大得多。

[151] 1789~1848这些年标志着“不是作为”工业本身的胜利, 而是资本主义工业的胜利, 不

是普遍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而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自由平等，……它们不是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和社会的这些因素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胜利……不是它们在前几个世纪通过逐渐的挖掘采矿式的手段取得的进步，而是它们攻占堡垒的决定性胜利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1962，17，19]。霍布斯鲍姆的时期几乎难于挤进马克思的分期法。马克思所写的决定性胜利时刻是相当晚的，甚至对于大不列颠：“工业资本的完全统治在谷物税废除 (1846年) 之前没有被英国的商人资本和资金利润所承认等等” (1967，327，n.)。

[152] “一场革命从来不能从它自身来理解，也就是不能不考虑导致其出现的发展过程；它是个总括而不是起始……这是个微观与宏观观点之间的不同；在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矛盾，正如在为某些原因要求给森林一个轮廓线，在某些情况下它是非连续性的，而为了其他目的它又是平滑的” [熊彼得 (Schumpeter)，1938，227]。

[153] 内夫 (Nef，1943，1)。麦克伊夫迪 (Mc Evedy) 走得更远，他说工业革命这个概念“事实上——不是说其作为一个历史学理论的成就——造成了许多实际上的害处” (1972，5~6)。卡梅伦 (Cameron，1982；1985) 类似地一直遵循这个理论“工业革命”这个术语是一个“用法不当的词汇。”

熊彼得 (Schumpeter) 做出了同样重要的指责：“作者赞同现代经济史学家对这个术语‘工业革命’所表示的不悦。它不只是过时的并且还是误导的，或甚至在原则上是虚假的，如果它打算表达这个意思，它所指明的是一个独一的或一系列的事件，它或它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或社会秩序，或者意思是它与以前的发展没有联系，突然于18世纪的最后20年或30年出现在世界上……我们将这个特有的工业革命和至少两件在它之前的类似事件，及至少多于两件随后的事件放在同等位置” (1930，253)。他将1787~1842年认为是一个康德拉节夫 (Kondratieff) 周期，并且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长期波动不是这类中的头一个” (252页)。科尔曼 (Coleman) 对熊彼得 (Schumpeter) 的回答是，重申工业革命这个术语对18世纪晚期的大不列颠应当保留，它“在历史的长焦距中，比较而言是突然和剧烈的改变，它使工业化社会得以诞生” (1966，350)。

[154] 布里阿万尼 (Briavoine，1839，185~186)。

[155] 布里阿万尼 (Briavoine，1839，188)。

[156] 贝赞森 (Bezanson，1922，343)。

[157] 施密特 (Schmitt，1976)，在关于法国大革命从1945年以来文献他所作的历史学编纂评介中，将这个问题列为六个问题之一，但是其他五个问题在我看来都是这个问题的具体化。其他五个问题是法国大革命——神话还是现实？“大西洋革命”问题；有没有一场“封建反动”？在1789年有一个还是三个革命？雅各宾 (Jacobin) 专政——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高点吗？

[158] 索布尔 (Soboul，1974，41~42，44)。

[159] 勒费弗尔 (Lefebvre，1939，239~240)。

[160] 可能会有反对意见，认为我们会太过于依赖索布尔（Soboul）（或更概括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的这种社会解释，还有勒费弗尔（Lefebvre）的观点 [不用说还有马迪厄（Mathiez）的了] 在几个方面是不同的。但是因为正如费罗（Ferro）提到过的“（历史在法国）（如同法国的历史那样）是内战的首要场所之一”（1981，32），这可能是正确的，正如格伦农（Grenon）和罗宾（Robin）如下的看来正确的评估：“奇怪的是，1789年仍然还是在法国右派和左派的基本分界线，大革命作为一个神话仍然能激起情感。这是因为在写作历史时，法国大革命经典解释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两种概念一直总是随意相互重叠。经典解释不是别的，就是对大革命的进步解释”（1916，6）。

[161] 索布尔（Soboul）在他的简史中以1799年为最终年代（1977a）。确实人们能够选择其他最终年代，比如说1793年，或1792年，或1815年。人们也能够选择其他开始年代，比如说1787年或1763年。这样做是要改变解释。然而，选择1789~1799年这个时期不一定在所有方面同意索布尔（Soboul）。艾格隆（Agulhon）正是选择这个时期，用以论证1830年标志着“革命”的重新开始，他认为这是一场“自由主义”革命，而1800~1830年代表了“以两种连续形式”的反革命——即拿破仑（Napoleon）的独裁统治和权威主义的、教会权力的君主制（1980，15）。

[162] 索布尔（Soboul，1977a，1，3）。旧秩序必须称为“封建主义，因为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 [索布尔（Soboul），1976a，3]。确实如果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就是大革命的否定一面比肯定一面更重要。谈到18世纪的“贵族反动”，索布尔（Soboul）说：“从这个角度看，大革命可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确实是反贵族和反封建的”（1970b，250）。

[163] 兰德斯（Landes，1949，57）。

[164] 吕德（Rudé，1967，33）。

[165] 马克思（Marx，1967，I，334）。正是靠这条道路“生产者变成了商人和资本家，‘而不是靠’商人建立对生产的直接统治”这条道路。

[166] 索布尔（Soboul，1976d，16；1977b，38）。明显地，君主制度比贵族更有远见。它企图通过创造一个“商业贵族阶层”和“使商人贵族化”来解决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中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但是这个经验是一个“失败”，并显示出“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的状况下”这两个群体“不可能真正的融合” [索布尔（Soboul），1970b，279，282]。

[167] 索布尔（Soboul，1977a，160~161，168）。

[168]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212~213），他这样解释他的格言：“法国经济的资本主义部分是建立在农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坚固基础之上的。没有土地的自由劳动者只是缓慢地流入城市，使别的地方进步的工业家发财的标准化便宜货物缺乏一个足够大的和扩张着的市场。充足的资本储存下来了，但为什么要将它投资到家庭工业中去呢？”霍布斯鲍姆

（Hobsbawm）让我们参考（381页，注19）这个理论的“权威论述”（Locus classicus）；勒费弗尔（Lefebvre）1932年的文章〔见勒费弗尔（Lefebvre），1963〕。

索布尔（Soboul）在回答霍布斯鲍姆（Hobsbawm）这个矛盾论题时，认为农民革命是“不完全的”。假如农民阶层中的激进派获胜，就会有“一种有利于小生产者的土地财产重物”，这后来就会造成“集中化”而没有矛盾问题了（1977b，42~43）。波朗查斯（Poulantzas）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回答霍布斯鲍姆（Hobsbawm）的矛盾论题。这个“矛盾”显示出这个革命的国家“不是一个在这个时刻和在这个危机关头在政治上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家，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受到阻碍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家。正是在这个时刻，它在事实上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居支配地位的国家，而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正确地看到的。这个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1973，176）。

[169]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93）。

[170] 我们当然可以回答，它较少是一场在狭隘意义上的经济领域的革命，更多是一场在价值领域的革命。“大革命在法国的主要结果是结束了贵族社会……大革命后法国的社会在它的结构和价值上是资产阶级的。它是一个暴发户的社会；即靠白手起家成功的人的社会”〔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218，220〕。如果如此，泰勒（George V.Taylor）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计划到的后果。“思想上的革命国家体现在《人权宣言》中，而1789~1791年的法令是从1781年开始的危机的产物——不是原因”（1972，501）。泰勒（Taylor）的理论是基于他对《三级会议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的研读。

[171] 引自勒费弗尔（Lefebvre，1932，40）。

[172] “在1789年没有三个革命而只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和自由的，得到民众（特别是农民）支持的革命。大革命在1792年没有‘失控’（*dérage*），而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维持第三等级凝聚力的决心再由于和人民群众的联盟，没有他们的支持1789年所获得的就会永远遭受半途而废的危险”〔索布尔（Soboul），1974，56〕。

[173] 索布尔（Soboul）断言，法国大革命两次在“农民和群众”的革命中“超越了它的资产阶级界限”——在共和国二年和在“平等的密谋”（*Conspiracy of the Equals*）中（1977a，168）。

[174] “革命的先锋不是商业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面的真正力量是直接小生产者群众”〔索布尔（Soboul），1977a，154~155〕。也见卡普洛（Kaplou）：“正像一场革命没有资产阶级控制它的运行是不可思议的那样，无套裤汉（*Sanculottes*）的形成没有手工业师傅的参加也是不可能的。无套裤汉作为一个实体不是旧政权下的劳动者穷人的同义语。他们不如说是临时性的形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于大革命进行中政权崩溃所生长出来的主要是政治上的一种形式”（1972，163）。

[175] “资产阶级革命通过1793年7月17日最终废除一切封建权利的法律，解放了直接生产者，小商业生产者从此独立了”〔索布尔（Soboul），1976d，15〕。

[176] 索布尔 (Soboul, 1977a, 168)。

[177] 戈德肖 (Godechot, 1965, 114)。

[178] 这不足为奇，当人们记得戈德肖 (Jacques Godechot) 这位大西洋理论的首要提倡者，是马迪厄 (Mathiez) 和勒费弗尔 (Lefebvre) 的一位门徒，据我所知，他从未否认这个传承。关于勒费弗尔 (Lefebvre)，他说：“他的著作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中占据着一个首要 (capitale) 地位” (1965, 257)。关于戈德肖 (Godechot) 和马迪厄 (Mathiez) 的密切关系，见戈德肖 (1959)。另一位大西洋派帕尔默 (Palmer)，将勒费弗尔 (Lefebvre) 的著作译为英文。

[179] 戈德肖 (Godechot, 1965, 2)。

[180] 帕尔默 (Palmer, 1959, 各处，但特别是13~20)。

[181] 帕尔默 (Palmer, 1964, 35~65)，他将这种革命化归因于“民众的和国际上的革命主义的灌输” (44页)。

[182] 帕尔默 (Palmer, 1959, 446)。如果美利坚人的革命的革命性不如法国人，这是因为“ (美利坚) 不知道封建主义，.....在法国和在欧洲，.....达到同样的革命理想的努力在进展中会遇到因革命会被剥夺和受威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反抗” [戈德肖和帕尔默 (Godechot & Palmer) 1955, 227, 229]。

[183] 戈德肖和帕尔默 (Godechot & Palmer, 1955, 229)。阶级联盟的概念也在此处：“农民像‘资产阶级’式第三等级的上层那样，将贵族看作敌人。这种利益的趋同.....是使1789年法国大革命成为可能的条件” [帕尔默 (Palmer), 1971, 60]。

[184] 索布尔 (Soboul, 1974, 44)。

[185] 帕尔默 (Palmer, 1959, 13)。索布尔 (Soboul) 特别求助于大西洋理论是“冷战”的结果这种指控，指出它出现在1950年代中期 (1974, 43)。这个断言不是没有道理。戈德肖 (Godechot) 和帕尔默 (Palmer) 的长篇的联合通讯运交给195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它围绕着这个问题：有没有可以称之为大西洋文明的东西？作者们的同情看来明显地赞同肯定性的回答。他们以忧伤的调子结束：“美国这个前殖民地，相信会比欧洲看来更多地在现实上或可能性上为一个‘大西洋文明’做些事情” (1955, 239)。

[186] 马佐里克 (Mazaucic, 1975, 167, n53)。也见施密特 (Schmitt) “‘科班’ (Cobban) 的名字在这场争论中几乎成为一个法定词汇 (敏感词汇) (Reizwort)” (1976, 50)。

[187] 这不是一个从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书中的引语，而是蒂利 (Tilly) 对其立场的非常适宜的总结 (1968, 160)。托克维尔自己所说的是：“没有警告，没有过渡，没有良心上的不安就突如其来，大革命影响到无论如何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是缓慢而来的话” (1955,

20)。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以类似的语气说：“事实上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并不使其成为一个必然的事件。或至少难于证明是这样……它是一个社会发生被激怒情况时的行为表达方式……法国大革命在农村地带是这个世纪扩张的直接结果，甚至或者特别是当它们遭受到178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它表现了决裂，并同时也是连续性”（1975，591）。

[188] 李希特 (Richet, 1969, 22)。李希特在别的地方论证在法国公法遵循着同样的发展历程，这样来企图驳斥掉索布尔 (Soboul) 和其他人的关键之一，即一场革命对于改变阻碍资本主义力量兴起的法律上层结构是很重要的。李希特 (Richet) 说，不如说“大革命爆发在一个立法现代化过程正处于进行中的国家 (1973, 36)。乔尔金 (Choulin) 类似地认为，大企业成长的阻碍来自行会的限制这个问题一直被大大夸张了，因为乡村工业的很大重要性限制了行会制度 [在旧政体 (Ancien Régime) 下的影响]” (1922, 198~199)。

[189] 孚雷 (Furet, 1978, 158)。

[190] 科班 (Cobban, 1963, 155~156)。也见罗伯茨 (Roberts)：“大多数封建制度被八月 (1789年) 的法令废除，是掩盖现金交易的直率现实的法律虚构” (1978, 28)。

[191] 乔森诺-诺加里 (Chaussinaud-Nogaret, 1975, 265)，他继续说：“商业资本主义在其大部分现代方面，是更多地掌握在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的” (274页)。比恩 (Bien) 谈到这种情况的另一面，即“在1789年，很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贵族” (1974, 531)。

[192] 福斯特 (Forster, 1961, 33)。

[193] 福斯特 (Forster, 1957, 241)。此外，“个人地产经营不只是一位乡绅 (gentilhomme campagnard) 确保好收入的最好方式，这也被认为是他的专业，并且相反对于零售贸易和纯粹的商业投机，它完全是受尊敬的贵族的事业” (241页)。

[194] 泰勒 (Taylor, 1967, 489)，他因而断言资产阶级这个用语是“不适当和误导的”如果我们用资产阶级这个用语来指一个“在生产关系中起到资本家作用的非贵族群体” (490页) 的话。他由此得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这些结论：即“我们没有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解释，第三等级上层对绝对君主制的攻击”和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有着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不是一场有着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 (490~491页)。泰勒 (Taylor) 得到了由凯恩 (Cain) 和霍普金斯 (Hopkins) 近来企图重新解释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的人对这种论证路线的间接支持，他们引进了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乡绅资本主义”的概念，并论证这个时期：“我们的目的不是否认不列颠的工业化这件事是无可辩驳的，而是认为非工业的，但也是资本主义的活动，在工业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要比经济史和帝国史中承认的标准解释要重要得多” (1986, 503~504)。然而，沃维勒 (Vovelle) 发现泰勒 (Taylor)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推论超出了他对“非资本主义财富”所作的“有用的评论”许可的限度。“将旧政体 (Ancien Régime) 的旧式资产阶级列入一个有充分组织的精英行列之中，就如同拔苗助长一样”。 (1980, 136~137)。

[195] 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430)，他将封建特权看作如所有的政治权力那样，

是一个“金钱利润的间接来源”。对于大地产，“作为一种资产主义事业”，法国国家同样像那种“甜爹爹”那样为其服务，就像为柯尔伯尔时的（Colberian）的制造商那样（431页）。

[196] 布洛赫（Bloch, 1930, 517）。如布洛赫所指出的，有时这是一个重新解释封建特权的问题，但有时只是一个运用它们的问题。摩尔（Moore）称这为“用封建方法向商业和资本主义活动的一种渗透”（1966, 63）。

[197] 古伯特（Goubert, 1969, 234；也见181~182）。这在事实上类似于琼斯（Jones）对英国地主的描述，他说他们“兑现了他们领土上（在18世纪）的工业潜力”（1967, 48）。

[198] 拉杜里（Le Roy Ladurie, 1975, 435），他继续说：“这是真实的——在其中掺入了主观因素——即出租人要花一些时间去理解市场已变得有利于财产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了解到利益趋势所在，出租人就会再次加快速度（*met les bowchées doubles*）；他就会以更大的精力全力以赴，助行情（*conjuncture*）一臂之力并压迫承租人（*fermiers*），出租人以前由于疏忽而宽待了他们。”

[199] 古伯特（Goubert, 1974, 381）。

[200] 孚雷（Furet, 1978, 145）。孚雷进一步指出，这种封锁不是针对由平民成为贵族的，而是在佩剑的“小”贵族和“大的”但是暴发户的宫廷贵族所构成的统治阶级之间。他认为是这些“小”贵族在支持1781年法令，即塞居尔法（*Loi Ségur*）（140页）。戈德肖（Godechot），他的分析又一次接近于经典解释，对贵族在18世纪看来要垄断政府职位的企图，以这个事实来解释，即贵族发现难于“靠他们的财产收入生活，由于物价从1730年以来持续增长”（1965, 145）。

多伊尔（Doyle）从另一方面怀疑有什么职位的垄断化：“从社会角度看，在法国大多数机构看来随着这个世纪发展更广而不是更多在它们的招募中变得具有独占性”（1972, 121）。格鲁德（Gruder）对王室总督的研究倾向于肯定这个论证。通过比较路易十四（*Louix XIV*）朝代与路易十五和十六（*Louis XV and XVI*）朝代总督的社会出身，格鲁德（Gruder）发现，远非是有着贵族垄断的增加，如果说有什么的话，“相反的倒是真实的”（1968, 206）。当然，在18世纪封为贵族的平民们不是“从贫穷者变为富人的，通往上层的路不是从底层开始的”（173页）。对格鲁德（Gruder）而言这个统治阶级的适当特征是“一个体现了财阀政治的贵族阶层”（180页）。

[201] 科班（Cobban, 1963, 262）。

[202] 这是布勒（Boulle）关于南特（Nantes）的奴隶贸易商在被封为贵族后仍从事商业的论证（1972, 89）。

[203] 见克鲁兹（Crouzet）：“我们决不要.....过分强调这些早期不列颠工业家的节俭。一旦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和确保了他们的财富，他们差不多总是有些松懈，收回他们更多的钱并采取一种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他们中一些人购买地产和建筑自己的大宅邸”（1972b, 189）。也见琼斯（Jones）：“18世纪英国的城市企业家以购买和修饰地产来寻求他们最终的安全堤

岸”（1967，48）。

[204] 科班（Cobban）观察到“新富人”（nouveauxriches）取代了“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中有文化的上层资产阶级”。他鄙视地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如果我们用这个术语指贪污贿赂的军官、律师、自由职业者、专利者，和一些大部分将他们的钱投资于土地和公债（rentes）的金融家和商人，在贪污贿赂的官员不再可利用之后随之而来……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言他们是旧式贵族（noblesse）的继承人，而如果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他们的目标是作过贵族式生活的资产阶级（bourgeois vivant noblement）”（1963，251，264~265）。当然，这种对社会解释的否定必然会起到有利于如兰德斯（Landes）这类论证的作用。但是这无疑没有什么会对科班（Cobban）造成困扰。

[205] 卢卡斯（Lucas，1973，91）：“旧政体（Ancien Régime）后期的中产阶级没有显示出与贵族有重大的功能上的不同，在接受的价值观上没有重大的分歧，最重要的是没有属于一个阶级的其经济和社会特征与贵族正相反的意识。”

[206] 像帕尔默（Palmer）所说：“这是大革命的难解之谜之一，即贵族和非贵族之间的阶级仇恨或敌对直到1787年其迹象是如此之妙，在1788年又是那么多”（1959，457）。

[207] 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3，361~362）。

[208] 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5，1，203，207~208）。

[209] 见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3，19~27）。当安德森（Anderson）谈到由阿图塞（Althusser）所草拟的有关俄国革命类似的大杂录，这样一种杂录是“单纯的经验多元论”将许多事件和趋势归拢在一起，但是却没能建立“它们重要的有关科学分类和相互联系”（1980，77）。

[210] 见李希特（Richet）：“1789年的大革命是这些精英们通过一个长期过程达到一个双重自觉悟（prise de conscience）造成的。首先，是对于政治秩序他们的自主意识，他们随后就需要限制这种权力。一种被所有人分享的意识，在其中贵族起到了发起者和教育者的作用，但这扩大到包括财富、财产和才能。这就是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然而这块公有地将很快放弃给统治群体同质性的专有地域。（1969，23）。于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最终解释又重新出现了。”

在这里应当指出一个与科班（Cobban）的歧异之处。科班对大革命从整体上更抱有敌意。“18世纪末确实可以说经历了从一个人主义向社会的集体主义观点的部分转变……大革命结束了个人主义时代并开始了民族主义时代……所有这些可以看作不是完成而是破坏了启蒙运动”（1968a，25）。

[211] 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5，102，参见孚雷（Furet），1963，472）。将民众革命的作用称为从长时期结构演化的角度而言所“次要事件”，并不明显地意味着它们是不重要的，因为我们也祈求“还原革命事实本身为‘事件’（event），它在历史非连续性中的创造性作

用” [孚雷和李希特 (Furet & Richet), 1973, 8]。尽管如此, 我们现在已远离了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的词汇“不可避免”, 这被孚雷 (Furet) 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两个主要的不可靠前提之一, “事件的必然性”, ——另一个是“时代的断裂” (1978, 36)。

[212] 孚雷 (Furet, 1978, 18~19)。

[213] 孚雷和李希特 (Furet & Richet, 1973, 126)。

[214] 孚雷和李希特 (Furet & Richet, 1973, 10)。在孚雷和李希特著作的英文译本中, 标题为“Le dérapage de la révolution (革命的失控)”这一章被称为“The revolution blown off course (革命偏航)。”这是个有理由 (或许过于像航海用语了) 的翻译, 但有着将一个名词变为动词的不便之处, 因而造成了后面在谈及“dérapage” (侧滑) 这个概念时用英文表达的困难。伊戈涅特 (Higonnet) 在后面两页中用“deviation (出轨)”和“slide (滑落)”的不同译法就是一个例子, (1981, 4~5)。因而我愿意在英文中保留这个法文术语, 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孚雷 (Furet) 和李希特 (Richet) 整个分析中的核心术语。

[215] “面对一位被怀疑叛国的国王, 面对拒绝作战的将军们, 面对布里索派 (Bris-sotins) 在权力和反对派之间的犹豫不决, 有一种坚定的民众反应被释放出来并至少找到了它的名称——爱国主义……它是第二次革命……”
“革命的爱国主义成为 (在1792年8月10日) 一种宗教。它已经有了它的殉道者。它在军事挫败后将很快有它的宗教裁判所 (Inquisition) 和它的火刑柱” [孚雷和李希特 (Furet & Richet), 1973, 129, 157]。

[216] 孚雷和李希特 (Furet & Richet, 1973, 204)。

[217] 孚雷和李希特 (Furet & Richet, 1973, 258)。

[218] 罗宾 (Robin, 1970, 52)。

[219] 格雷农和罗宾 (Grenon & Robin, 1976, 28)。

[220] 罗宾 (Robin, 1973, 41~43)。对罗宾一个全面的举出证据反驳可以在索布尔 (Soboul) 编辑的一本书中找到。斯莱德泽夫斯基 (Guibert-Sledziewski) 认为罗宾 (Robin) 将这个问题论述为存在着两个可供选择的过渡横式——通过封建势力的崩溃或是通过它们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并且说这个公式消除了“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方向; 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的问题。”真正的选择不如是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倾向的反动性恢复”或者是“在革命的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努力之中”之间 (1977, 48~50)。后者遇过大革命发生, 这就使法国避免了重蹈普鲁士 (Prussian) 覆辙 (66~75页)。[这种论证类似于摩尔 (Moore) 的, 1966, 各处]。

最后, 斯莱德泽夫斯基 (Guibert-Sledziewski) 指责罗宾 (Robin) 滑到了与李希特 (Richet) 没有什么不同的立场: “(罗宾的) 愿望是使得”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 过渡成为一个问题, 导致她将这种过渡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 一个不会有89~94年的夸耀性表现

的阶段，但它会表示敌对的生产方式之间决定性的冲突的必然性与剧烈的变动一样大。因而这种革命的“现象”，正如它的称呼所表示的，就只是一个证明，一个这种巨大冲突的变化；而这是什么样的变化啊！它实现了李希特（Denis Richet）称之为新生资本主义“缓慢但却是革命性的质变……但在我们看来任何对过渡的疑问必然会导致一种对革命的疑问”[吉伯特-斯莱德泽夫斯基（Guibert-Sledziewski），1977，68]。

[221] 这两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曼弗雷德（Manfred）和多布（Dobb）所认可。曼弗雷德（Manfred）：“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约16世纪的法国。通过缓慢而逐渐地在封建社会内部前进，它在18世纪的后1/3世纪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成熟。新的生产力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秩序间的矛盾导致了一个更尖锐斗争的时期。这些矛盾于是就在所有地方爆发了”（1961，5）。多布（Dobb）：“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登场在时间上不是同时发生的……这需要有一个解释，一个能够包括一个以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最早出现起……到工业革命……（在英格兰这相隔有几个世纪）一个长时期的解释。”“工业革命需要一个总体形势的成熟……它需要一个复杂和延续发展的长期进程，并最终有着可预见的结果……谈到某些数量的相关因素，然而这不意味着它有幸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它是‘偶然的事件’”（1961，458~460）。

[222] 扎波里（Zapperi）（1974，13~15，83~86，91~92）。

[223] 盖兰（Guérin，1968，1，17，23，27和各处）。

[224] 索布尔（Soboul，1958a，10，1025）。卡普洛（Kaplow）以这种论证回应索布尔的反驳：“（劳动者）男人们，不能够忍受抑制住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没有——也不能——将其置于更大的关系背景之中。我认为他们不能够从较远的角度思考……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导致他们进入了文化贫穷的死胡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开始破坏了造成这个文化贫穷的心理上社会性的核心，使得向现存秩序挑战是可能的，即使说不是合法的这样一种思想流行”（1972，170）。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而言是奇怪的论证；它的意思似乎是无产阶级只能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榜样和帮助中获得的虚假意识中产生。

[225] 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23，206，212~213）。

[226] 见盖兰（Guérin）：“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是大革命中所有人物里最得人心的。他还没有揭示出他真正的形象。‘温和主义’赤裸的手臂（bras nus）还没有立刻抓住他（in flagrant delicto）”（1968，I，411）。伊格涅特（Higonnet）采取类似的观点，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即雅各宾派（Jacobin）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几个联合起来的阶级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物质目标”，并首先是“革命资产阶级”的这种看法相对立，他认为雅各宾派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而非雅各宾派的世界观，若是有的话，是一种‘虚假意识’的进一步形式……在一个星期之内‘完全’破坏了封建领主制度后，立宪会议（Co-stitüents）开始努力尽可能多地将封建义务收入抱归到资产阶级财产名义之下。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和‘老实人’（honnêtes gens）开始分道扬镳。由于不能够完全接受这个情况，革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雅各宾派（Jacobins），被迫走进了许多死胡同（1980，46~48）。

[227] 盖兰 (Guérin) 在1968年承认, 索布尔 (Soboul) 和吕德 (Rudé) “已经大量修正了他们的罗伯斯庇尔派 (Robespierriest) 教条主义, 并更打算承认, 砍掉了巴黎 (公社) 市府, 破坏了民主的基础构成了对大革命的致命一击” (1968, II, 524)。至于科布 (Cobb), 他采纳了大部分“我对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和罗伯斯庇尔派的批判”但是他“很少使自己在逻辑上连贯” (534页)。老派如何, 索布尔 (Soboul) 和科布 (Cobb) 虽然“在他们对我的著作的批判是不公平的, 他们却暗地肯定和完成了它” (358页)。

见伊格涅特 (Higonnet) 论巴贝夫派 (Babouvism) 的作用: “很清楚, 巴贝夫派的重要性依靠人们赋予社会主义和阶级战争在世界历史性事件的地位。如果法国大革命被看作是‘自在之物’ (Ding an sich), 巴贝夫 (Babef) 就不会被认为有多重要。如果将它看作是人民与资本主义对抗的第一个行动, 巴贝夫派就占有很大分量” (1979, 780)。

[228] 米尔沃德和索尔 (Milward & Saul, 1973, 252); 参见摩尔 (Moore) 一种更克制的说法: “因而将农民阶层作为大革命的决定者是公平的, 虽然不是它主要的推动力量” (1966, 77)。

[229] 见麦克里尔 (Mackrell): “马克思主义者将大革命看作既推翻了封建主义又给法国带来资本主义的观点, 很难适用于其他事实, 还有如农民在推翻‘封建主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73, 174)。

[230] 见胡内克 (Hunecke), 他攻击“修正派”历史学家科班 (Cobban)、孚雷和李希特 (Furet & Richet) 的依据是农民革命“更多的是宣示将来而不是追忆过去” (1978, 315)。戈迪埃 (Gauthier) 要将农民看作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了一种“进步”作用。“农民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而是反对对领主有利的一种资本主义形式” (1977, 128)。

[231] 拉杜里 (Le Ray Ladurie, 1975, 568, 575)。对于驳斥农民们是具有某些“倒退性”和强调他们的反资产阶级作用的观点的近来文献的一个评论, 见亨特 (David Hunt, 1984)。

[232] 胡内克 (Hunecke, 1978, 319)。“在贫穷农民的革命的核心是两个要求, 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反封建的; 他们要求拥有土地耕种和恢复在公共土地上的权利” (集体惯例, Usi Collectivi)。农民反叛“不只反对那些 [封建] 特权, 但也 (可能主要是) 反对那些‘革命的资产阶级’” (313~315页)。类似地摩尔 (Moore) 看到: “大革命后面激进的冲击是以无套裤汉 (sans-culottes) 和农民阶层的部分为基础, 是明显而强烈地反资本主义的” (1966, 69)。科班 (Cobban) 也将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一场不是赞成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 (1964, 172)。然而在这种说法中, 胜利的不仅是农民, 足有“大大小小的保守的, 有财产的, 拥有土地的阶级” (170页)。事实上据说这是使“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在法国的经济发展之前的特点之一” (140页)。

[233] 斯科奇波尔 (Scocopl, 1979, 29, 41, 181)。“社会革命——如它们改变了阶级关系、社会价值, 和社会制度那样大地改变了国家结构” (29页)。一个奇怪的论证: 社会革命主要不是由社会的改变而是由作为主要的政治机构的国家的改变来确定的。那么什么是政治革命呢? 而如果不是社会革命改变了阶级关系、社会的价值和社会制度, 这是因为后者只是逐渐地

改变，从来没有采用“革命的”方式吗？那么也许对“社会革命”的真正概念需要作重新检验。

[234] 科班（Cobban, 1968d, 108）。

[235] 勒费弗尔（Lefebvre, 1956, 345）。孚雷（Furet）对这种分析满怀轻蔑，因为它受到信仰的影响：“不难揭示出，[勒费弗尔（Lefebvre），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正如在他的综合说法中那样，有的……只不过是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uches）或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信念”（1978, 22）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论证。

[236] 维多托（Vidotto, 1979, 51）。

[237] 孚雷（Furet, 1978, 43, 84）。但是谁是“真正的社会”？巴伯（Barber）提到“资产阶级中受损失最大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中那些人，他们的目的在于法律、政治、军事，或教会等职业……很难制定法律使大金融家或主要知识分子不再存在”（1955, 143）。

[238] 布罗代尔（Braudel, 1982, 297）。

[239] 见诺加里（Chaussinand-Nogaret）：“只有当民众力量入场面的时刻，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名人们所希望的革命已无事可做，出现了将会最终加宽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一个错误。因为现在面临一个逃避惩罚的问题，并且到头来任何策略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由于受到的威胁与贵族一样多，他们打出了主要的王牌，令人愤慨的美德喜剧：它与人民一起呼喊，在威胁会将他们消灭的这场风暴中用‘贵族阶层’来顶替……而在革命后的社会中，这两个阶层已调和了他们的分歧，再度分享权力”（1975, 277）。

[240] 安德森（Anderson, 1980, 36）。他实际上说这个转变是由两个革命造成的——法国的和美利坚的。也见亨特（Lynn Hunt），他说法国大革命“最具决定性的结果”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发明”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1984, 12, 15）。类似地，休厄尔（Sewell）谈到“革命本身的思想”是法国大革命“没有预期到的”产物之一（1985, 81）。

第二章 中心地区的斗争——第三阶段：1763～ 1815年



第二章插图“危险中的铅球布丁：或——国家美食家在享用小点心”

吉尔雷（James Gillray）的印刷画。（1805）

伦敦：不列颠美术馆、印刷和绘画部。

（由不列颠美术馆信托部同意复制）

英国的印刷业主，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7～1815），就当代政治题材生产了约1500幅讽刺印刷画。庇特（Pitt）和拿破仑（Napoleon）是他爱好描绘的两个人物。在这幅雕版漫画中，“危险中的铅球布丁：或——国家美食家在享用小点心”，发表于1805年2月26日，由汉弗瑞（H.Humphrey）画。庇特用一个三尖叉在大西洋上将地球上不列颠以西从北极到赤道切下来，得到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拿破仑用他的剑作为一把刀，切下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即除了瑞典和俄罗斯以外的欧洲。一个副标题写道：“‘大地球本身’，和所有由之而来的一切” [《暴风雨》《*Tempest*》第四幕，第一场]，“对于满足这种不知餍足的胃口而言是太小了……”。

1763年的巴黎条约（the Treaty of Paris）使大不列颠处于有利的地位，去达到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企图达到的目标——使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各项水准决定性地远远超过法国。^[1]但是，这一目标直到1815年才达到，而且也非一帆风顺。

谋求霸权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持续、公开斗争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新扩张这一形势之下。新扩张本身又是这一世界经济在17世纪的长期停滞期间调整的结果（对此，我在第二卷中分析过了）。这一新扩张创造了拉布鲁斯（Labrousse）所称的“繁荣的伟大世纪……从18世纪30年代到1820年前不久。”^[2]拉布鲁斯主要谈及的是法国，但这一描述也适合于大不列颠，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整体意义上的世界经济。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固然，人们肯定总是要问，繁荣是对谁而言呢？不但如此，一个长期的向上趋势的概念并不排除在这一向上趋势中存在周期的阶段，实际上也存在。但在这一长时期中，我们仍然可以谈及“增长中的生产、价格和总收入的持续运动。”^[3]

莫里诺（Morineau）指责他认为对于价格增长的流行的“海市蜃楼般的”解释。他更倾向于不把它视为一个长期的现象，而是由歉收导致的一系列短期的价格增长，它们互相之间有一“惯性”相连接，阻碍每次较高价格（高价）（cherté）突发之后的价格下降，“因此，它有一种渐增的效果。”^[4]但是，这一观点不否定这一趋势；它是解释这一趋势的一种特殊风格。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必须从所谓的旧政体危机（crises d'Ancien Régime）开始谈起，由于它，这一时期被称为“最后”的历史运动——对欧洲来说，并且，可能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说。旧政体危机——正像拉布鲁斯经典地描述的——是一短期的农业收成现象。它的效力依赖于谷物作为食物的主要成分的中心地位及市场价格对于地方供应的变化的迅速反应、面包对于人民大众的生存至关重要、运输缓慢而又昂贵。对大生产者来说，食物短缺意味着价格的突然上涨，并由此时常导致利润的戏剧性增加，即使他们的贮存减少了。但是，对大量的小生产者来说，同样的形势所带来的不是利润而是灾难。这乍看起来好像自相矛盾。原因在于，小生产者的收成分为多个部分（当然，并不均等）：一部分留作来年的种子，一部分是农产品杂税，一部分（有时）是实物地租，一部分维持生计，还有一部分在市场上出售。每当歉收时，正是这一部分大量或全部消失（可能还有一部分用于维持生计的口粮）。因此，出售价格也许是高昂的，但在歉收的情况下，小生产者时常无以出卖。也许会更糟，他自己必须购买以求糊口，而且是在价格高昂时购买。^[5]

当然，对其他小消费者来说，高昂价格同样是灾难性的。他们的花费突然膨胀恰逢失业增加之时，因为相当大比例的有薪金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全日的农业工作，恰恰由于同样歉收，对这种工作的需求减少了。不但如此，由于歉收，纺织业生产者的短期需求下降，因此，他们倾向于在此同时减缓生产，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失业率。^[6]

正如莫里诺的观点，这简直不是什么繁荣。但是，它也不是18世纪的新事物。短期的收成危机总是在以这种方式起作用，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由大量小农（不管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从事生产的农业领域，所生产的大部分为民众所需的物品，还有物品运输的很高费用都受到影响。不太常见的是在丰收的年份价格中仍有一些令人不快的成分。正常情况下，歉收的年份给大地主（和商人）带来的好处本应被丰收的年份给小农带来的好处所补偿。但事实上，随着1730年以后农业价格的上升，“地租”也同样上升。这是小生产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7]

这何以来解释呢？是连年的恶劣天气所致吗？^[8]我们时常倾向于求助这类“迷人的”解释——维拉尔（Vilar）如此称之。但是，正像他提醒我们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到达点，在社会舞台”（即收入与支出的分配点），而不是“在出发点，由于气候。”^[9]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难道“社会舞台”与上一个世纪相比已如此地变化，以至于它创造了一个不同于早些时候的经济外形吗？

在旧政体危机的这一讨论中，被忽略的论点之一是拉布鲁斯本人在早些时候注意到的那一点：尽管短期的价格上涨有骤发的效果，特别是与降低的生产相连，但是，长期的价格上涨则有相反的意义，“与今天同样的意义”。^[10]因为这导致生产的长期增长。这种增长还不得不满足不同的市场运转方式，一方面是地方市场（主要是小生产者的势力范围，虽然并非全是他们的），另一方面是地区性或世界经济范围的市场（主要是大生产者的势力范围）。旧政体危机是地方市场的现象。满足于更大、更远的市场的生产是“正统的”资本主义现象，其运转按照这一简单的原则：较高价格反映了世界经济中的一些尚未满足的有效需求，因此，对愿意扩大生产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潜在的长期利润。在这一更大的舞台上，气候只起次要作用，甚至在农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倒不如说是资本积累的一般速度。

我们以前论证过，^[11]在17世纪的长时间停滞中，中心地区国家的对策是努力把资本主义利润的所有主要来源集中在它们的边界内，世界市场指导着谷物生产、新的冶金业和纺织业、新的运输基本设施和大西洋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在这点上，它们或多或少地成功了。不仅如此，在中心地区内部的斗争中，最初表现最好的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被英国和法国的竞争慢慢破坏了根基。在英国和法国之间，斗争则相对平缓，到18世纪初，还不能说任何一方在世界经济中比另一方更强大。中心地区内生产过程的缓慢调整导致了这些国家的每一国家中收入的一些再分配。它缓慢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可以谈及一些增加的“国内”需求和世界经济边界的进一步扩张的尝试性开始。总之，我们认为是1750年后的时期的伴随物的变化过程（中心地区内农业和工业的技术变化、地理扩张、增加的需求）在这一世纪的早些时候已经出现了，虽然速度慢一些。^[12]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经济扩张，出现了生产的新的地理划分（专门化）和中心地区的日益机械化（“工业革命”）。

从中心地区国家的角度看，漫长的17世纪的主要成就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垄断即将拥有的利润的能力。主要缺陷是有限的总体需求，其表现之一是人口增长的停滞。边际性小生产者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被排除，加上收入的有限再分配（主要在中心地带），为新的扩张时代奠定了基础。这一时代在一些地方开始于18世纪前半期，在后半期达到一高水平，告终于那个有利可图的动乱时期，即1792~1815年的法英战争。

传统观点认为，与经济扩张（它的表现和结果）互相关联的是人口的膨胀。并且，人们好像普遍认为，大约从1740年开始，有一次人口膨胀，持续或花了10年时间。^[13]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简单陈述了为什么从社会经济转变的角度来解释人口统计数的增长好像是合理的，不论这一增长是由于死亡率的降低（在这时，在这一点上，较好的卫生习惯和更多的食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较好的药物），还是由于增大的繁殖

力。被大多现时学者放在第一位的是繁殖力的解释。弗林（Flinn）是代表人物，他认为，虽然死亡率仍然主要“在上帝管辖下”，而繁殖力则“完全在男人（原文如此！）管辖下”^[14]可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妇女的结婚年龄。^[15]除了降低的结婚年龄这一事实之外，一些分析家又加上了——推断的、不妥当的事实，即避孕（用未射精中止法）率（猜测的）下降。人们认为这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已经发生了，农民以此作为艰难岁月的对策。^[16]

实际上，由于前一世纪的人口下降，幸存者吃得更好，“实际工资”水平也因此缓慢上升。最终，这一节制“心理”引起了自我毁灭。因此，当有“连年丰收”之时^[17]——好像1715~1750年这一时期也的确这样（这本身部分地是改善的技术的结果吗？），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种连年丰收能启动我们注意到的繁殖力的增长。

如果说在这一世纪开始时英国的生产能力更强一些，关于英国的（著作）同时也强调一个缺陷。这一缺陷恰恰由这一优势所致，发生在这一世纪第二个25年的某个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农业萧条”，丰收导致的价格下降的范例。^[18]然而，有两点应当注意。第一，这时的价格变化好像并没有中断农业产出的增长，不论是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还是从平均资本的角度。^[19]第二点无疑部分地是第一点的解释，这就是公认的现象，在1730和1740年代，有一地租下降的趋势（加上更经常的欠租），还有“地主向佃农的各种让步”。^[20]地租下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这时期可以被认为“农业工人的黄金时代”。^[21]

因此，从大约1620年一直持续到大约1750年的遍及欧洲的谷物的低价这一现象，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有了一次最深刻的体现，特别是在那时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英国。但是，这一长期的价格下降本身有助于创造新需求的来源（要求更好地分配收入），这又给人口学上的恢复以动力。它还鼓励中心地区的农业资本家寻找利润的新来源。首先，他们

加紧努力，把经济作物的生产集中在他们手中，降低直接生产者的分担量。其次，他们通过工业革新占领利润的新来源，这又导致了世界市场上冲突的加剧。每一方面都需要依次说明。

在差别很大的语言中，关于18世纪的农业状况，一般以法国和大不列颠为例来描述。在法国，据说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特征是“领主的反动”，而这又被说成是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的因素之一（关键因素吗？）。在大不列颠，据说大约从1750年开始，发生了（新的）大规模圈地浪潮，这又被说成是解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因素之一（关键因素吗？）。但是，难道“领主的反动”和“圈地浪潮”如此不同吗？我认为不是。

18世纪，中心地区国家发生了努力增加地租收入，扩大对土地和生产的控制的现象。我认为，这最初是大农业土地所有者对下降的利润的适中的反应（类似于17世纪初东欧领主的反应）。随着人口增长，这一途径本身成为大量利润的来源。这就是说，本来曾过量的供应后来变为不足，粮食价格上涨——最初缓慢，后来加速。这发生在欧洲世界经济的每个地方，特别是在大约1750年之后。^[22]

对于供应短缺，一个自然的对策通常是尝试靠技术革新来增加生产。并且，的确像艾贝尔（Abel）所指出的，1750年后，“农业如此突然地变成有教养的人们的兴趣的中心，以至于甚至当代人都感到吃惊。”^[23]但事实是，虽然尝试发展新的生产技术——持续耕作，新作物轮种，混合耕种，^[24]其结果却远不如那一“十分迷人的”^[25]名词——“农业革命”的含义那样惹人注目。要说产量或生产率没有任何增长明显有悖于事实。但事实很可能是这样，人口增加超过了食物供应的增加，其速度仅足以为可观的利润奠定基础，不需要用传统的“马尔萨斯式”控制来干涉。可以相信，这将导致劳动阶层的实际收入的下降，并且有相当多的事实可资证明。

法国的所谓领主的反动是怎么回事呢？它通常被定义为有两个中心因素：重新强制实行已不再采用或已减少采用的庄园费和庄园特权；同样这些领主和（或）其他地方大地主占用公地。尽管从法律角度来说，第一项措施属于源自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因此，它也许可以证明“再封建化”这个分析式的标签是有道理的），但是，第二项措施直接与这一同样的法律体系相冲突。^[26]因此，即使从表面来看，断定领主的反动代表了封建政制的最后喘息的观点面临着根本性的矛盾。不仅如此，正像福斯特（Forster）所提醒的，“反动”实际上被“太狭隘地理解了”。^[27]它发生在正在扩大中的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对此，它是一个“全面的”反应，这同时包括现代的地产管理（比如，账目清单、调查、改善的监督）、贮存、投机、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拥护重农论者的价格理论。总之，这包括了我们希望企业家所能做到的一切。

这一“反动”的根本在于地租。不能把地租与庄园费混为一谈。后者虽然在这时期也增加了，但在整个收入的增长中，它只占很小的比例。拉杜里（Le Roy Ladurie）对于法国区域性分析的总结说明了，从1730年代与1780年代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最大的实际增加在于严格意义上的地租：在收缩的价格下，用所有农业价格的加权指数来计算，是51%。最接近此数的其他增长是用货币支付的农产品杂税（35%）。从贷款利息中获得的收入也显著上升，尽管利率有大的下降。增长的农业收入的最弱的来源在于各种税收、以实物交纳的农产品杂税和各种庄园费——虽然其中每一项也有小的增加。^[28]

在农业收入显著增长的这一长达60年的时期中，谁是受益者呢？从上涨的价格水平这一角度来看，^[29]答案是简单的。胜利者是那些“控制着可销售的剩余产品”的人，失败者是那些“即使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被迫成为购买者”的人。^[30]但是，除了有80%的好处是源自增长的价格外，还有20%的好处源自“勒索辅助性的剩余价值”。^[31]正是这20%反映了内部社会结构的转化。

在等级制的顶端，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多半是贵族。但实际上，整个17和18世纪法国的特点是，那些富裕到足以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人从平民身份到贵族身份的相对“容易的转化”。^[32]并且，特别是在这一时期，从实际收入的角度来说，正是大土地所有者这一身份最为重要。^[33]

尽管从直接的词义上说，封建义务的作用有限，然而，通过出租（包捐税）（*affermage*）这一间接途径，它们可以被转化成资本主义利润。因为不仅中央政府有赋税包收人，领主也“出租”他们的封建义务。这就是说，每个领主将与一个更大的包税人（*farmiers*）签订合同，包税人每年支付预定数量的钱财，而这些又由包税人从直接生产者那里以实物的形式征集。因此，实际上正是这些包税人在市场上出售这样征集来的产品。在价格上涨的时代，这意味着价格的任何上涨都“有益于包税人”。^[34]

地主直接地和间接地得到了增加的地租。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扩大他们领地的规模。^[35]主要方式有两种。第一，尝试废除收获后在庄园土地上共同放牧的权利（公共牧场）（*vaine pâture*），以及这一权利在邻近土地上的扩展——共同畜牧权（*the droit de parcours*）。这一权利本来是允许在收获后的庄园土地上共同放畜牧，像在休耕地和荒地上一样；^[36]第二，尝试分割公地（市镇的财产）（*Communaux*）并允许圈地。

在这些尝试中——它们在法国的历史与在英国至少一样长，^[37]法国大土地所有者在1750年以后的时期明显不如他们的英国同行成功。法国较弱的国家机器和英国政治上较弱的农民在两个国家导致了十分不同的政治结果。但是，其反面也是正确的：就地租可以被提高到的程度而言，英国地主在1750年以后的时期不如他们的法国同行成功。英国佃农在契约有效时期方面的牢固“权利”阻止了佃农的快速更换，这一状况在

法国可谓“天方夜谭”。^[38]

如果人们要问这是何故，有一个解释可能是这样——恰好与一般的解释相反。这是两方面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一方面是法国资本主义价值（企业家财产转让的精神）的较快传布，以及它的反面，英国传统价值（租用土地的人的既得权利）的较为持久；另一方面是法国国家强制改变的能力较弱（与不列颠相比）。正如福斯特所指出，在法国，从事谷物生产的大租佃农试图得到使用权的安全、更长的租期和减少保证金的行动，被认为是“对契约自由的不正当干涉”。^[39]

关于英国圈地的总体描述要清楚一些。1750年以后，圈地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主要不是通过私人契约，而是通过议会法令（即通过国家）来实现的。无疑地，我们今天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长达三个世纪的趋势的顶峰。^[40]我们今天还认识到，敞地和分散的条田这一长期存在的先前的制度，并非完全基于非理性的愚蠢的持久性。^[41]尽管如此，在18世纪后期，圈地仍有一个异乎寻常的突发，主要发生在那些不像早先被圈占的土地那样投入这一过程的土地之上。^[42]我们不得不解释的正是这一突发状况。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正像达尔曼（Dahlman）所辩明的，如果圈地一直主要是技术革新的结果，我们所见的此前的圈地现象本应比实际发生的要少。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从“渐渐发展的变化因素”的角度的解释。他提供给我们一个：“市场的规模和相对价格的影响”，要求与敞地制不相容的一定程度的“专门化”。^[43]如果要问为何需要议会干涉，迪恩（Deane）有一个最合理的回答：“猜想私人圈地的过程慢于1760年之前的时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食物价格高昂的时候，抗拒剥夺的动机是强烈的。”^[44]

由于高价的刺激，农业生产的确发展了——即使与人口增长的速度可能不太吻合。但是，虽然如此，农业生产可能仍被认为是18世纪的一个“笨重又缓慢”的部门。最终“飞速发展”^[45]的部门是工业和商业。在18

世纪初，英国和法国（东北部地区、朗格多克）（the Northeast, Languedoc）的工业，还有奥属尼德兰（比利时）（Belgium）和瑞士的工业，有一个“大致平等”的发展——按农业与工业的国内比例（大概2：1）来说。^[46]它们都是出口国，但它们工业产品的大宗仍在它们的边界内销售。因此，这些工业都倾向于鼓励保护主义政策。^[47]工业生产的开始增产与谷物生产平行，法国早于英国，法国大概在1715年左右，^[48]英国则一般在1740年。^[49]无论如何，很明显，全球扩张——像人们所预料的——是一个渐增的过程。哈特韦尔（Hartwell）认为：

由于丰收的促进，1750年后的普遍经济扩张历久不衰……因此，1750年后在广泛领域——农业、工业、贸易和交通——的投资，为1770年代和1780年代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技术突破在关键性工业中创造了获取利润的机会，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企业马上有了反应，产量迅速提高。^[50]

然而，在哈特韦尔看来，正像在许多人看来一样，这只是英国情况的描述。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这一“连锁反应”只是一个英国现象，并且，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一程度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现象是真实的：1790年以后，英国的生产消费下降的足够快速，以至于英国生产者能够“成功地侵入欧洲主要市场”？哈巴库克

（Habakkuk）等人认为，这时期的大多发明“更合理的说法是由于日益增加的需求的压力”，^[51]而不是由于偶然的机遇，或工业价格的变化，或熊彼得主义的革新者（Schumpeterian innovators）的观点。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需求在法国没有同样的结果呢？

此外，经济扩张不仅意味着生产的增加，还意味着增加的贸易。1715年后，英国和法国都扩张了它们的对外贸易，但并非在所有市场上都达到同样的程度。克鲁兹（Crouzet）指出，英国人“总的说来在欧洲市场上不成功，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保护性关税和法国的竞争”。^[52]只是

到大约1785年，随着证明是英国进入这一市场的手段的新发明的出现，这一形势才发生改变。但相反地，在整个18世纪，英国人有一个远大于法国人的殖民地市场，并且，他们能够——不像法国人那样——广泛渗入其他殖民国家的市场。^[53]

由于美洲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作用，英国人在殖民地贸易中的优势变得更为重要。^[54]不仅如此，恰恰是这一提供有弹性收入产品的殖民地贸易，使得英国在1750年代以后（还有在以后由1785年起的棉花之前产品大涨价）的扩张时期能够在欧洲扩大贸易。^[55]虽然如此，总的说来，在1780年代之前，英国出口的增长并非“十分迅速”。^[56]因此，正是这一最后的突发将需要说明。

类似地，经过更仔细的研究也许会发现，英国与法国的令人满意的“国内市场”差别要小于它的鼓吹者一般所断言的那样。这里有两个争论的问题。第一，英国生产者在他们的边界——政治边界、免税边界、低廉的运输花费边界——内，有一个明显大于法国的“总有效需求”吗？第二，对任何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来说，国内市场——不论如何定义——是明显强于“国外”市场（即横越“边界”之外的市场）的有力促进因素吗？

就政治边界——大概是用以限定国家政策的直接效力范围——而言，我们知道，法国远大于英格兰，甚至是大不列颠（联合法令之后的统一体），虽然如果加上帝国，法国“国内”市场与大不列颠“国内”市场的比率下降。

就免税的疆界而言，在主要的国内价格考虑因素的范围内（这是可怀疑的），^[57]英格兰的面积约相当于五大包税区（Five Great Farms）。

就低廉的运输边界而言，在18世纪，两个国家的内部状况都有了改

善，但无可怀疑，英国优于法国（但在多大程度上？）。^[58]无论如何，国内运输设施的改善也服务于“对外”贸易，使它远不再是一种港口到港口的事务。

因此，问题在于，一个地方的总购买力是否大于另一地方。在这一点上，应该区分开中等阶层的规模与繁荣程度与较低阶层的手头现金的购买力水平。后者虽然单个人来说微不足道，但由于在人口中所占的数量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前面关于1650~1750年这一时期的发展的讨论中，^[59]我们区别了大地主、富裕（中等水平）生产者、不富裕的（小）生产者与无地工人。关于两个中等阶层（我们已指出，就所有权而言，它们相互间没有区别），我们看到，在那一时期，富裕（中等水平）阶层以牺牲不富裕（小）生产者为代价富裕起来，在英国和北部法国都是如此。事实上，这可能降低了总体购买力，因为小生产者收入的下降超出了富裕阶层收入的增加，这一转变使得前者中的许多人去从事农工业和农村工资劳动。近年来，这一现象被贴上了原工业化的标签，其研究成为时尚。^[60]

在那一长期停滞的时期，小生产者已被动摇了根基。同样，在经济扩张的1730、1740和1750年代及其后时期的集中、侵占和高地租中，受打击最重的正是那些在前一时期中相对较为富裕的人。对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圈地，钱伯斯（Chambers）是这样总结的，“受‘吞并’的不是那种最小的所有者，而是那种中等所有者，即那些支付4先令以上但少于10镑地租中间类型的人。他们被吞没了。”^[61]这一时期，法国地租的增加超出了生产和生产率的发展，使得许多农民——他们此前没这样做过——“寻找第二职业（职业）（*métier*），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土地每年应交纳的地租……无可怀疑，在这种情况下，额外工作仅能用于维持他们先前的生活水平，以免继续下降。”^[62]

这是一幅昏暗的图景，它好像与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这一观点相冲突。但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工资收入这一图景，它影响着农村和城市地区。无可怀疑，在1750~1815年这一时期，实际工资下降了，虽然下降程度如何还有争论。^[63]霍布斯鲍姆与哈特韦尔（Hobsbawm-Hartwell）等人之间的著名论战（留在后面讨论）——关于工业革命提高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实际收入——主要涉及的是1815年以后的时期。如果1750~1815年间国内需求扩大了，完全可能，这不仅是增长的平均收入而造成，同时也由于增长的人口。^[64]

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同样的情况也很可能存在。因上，虽然科尔（Cole）谈到不列颠的贸易在18世纪晚期“空前的扩张”是在对外贸易中，不管什么情况，不如说是由于其他情况而发生的，但他还敏锐地指出，这一增长的大部分是由于“在北美市场的销售的迅速增加”，他还提到英国此时侵入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对萧条的市场”的能力。^[65]

因此，当巴黎条约结束七年战争时，英国经济行为的水平决非明显不同于法国。的确明显存在的是每一方在商业上都有不同的优势。大不列颠在与法国竞争欧洲大陆上削弱了，但它以在“海外”的相应地位的改善来补偿这一衰落。敏锐的荷兰作家塞里奥尼的阿卡里亚斯（Acarias de Sérionne）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778年的著作中，分析了英国人面临的困难：由于国内价格和工资上升，其生产变得昂贵，不能在大陆上与法国（和荷兰）竞争。这一困难促使英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成功”，并且，当然也促进了技术革新——它很快重新创造出了不列颠在欧洲的竞争力。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一“成功”必须仔细分析，就像布罗代尔（Braudel）坚持认为的：

英国说来如何把贸易推进到这些外部边缘，是很容易看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胜利是靠暴力来取得的。比如，1757年在印度，1762年在加拿大，或在非洲海岸，英国把竞争对手推

到了一边……它高昂的国内价格迫使它……从低花费的国家……寻找原料供应。[\[66\]](#)

舒瓦瑟尔（Choiseul）在七年战争中想设法阻止的正是这一点，阻止英国建立“在公海上的专横势力”。[\[67\]](#)

大不列颠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没有取得全然的胜利就半途而废。[\[68\]](#)皮特（Pitt）像舒瓦瑟尔那样清醒地看到，世界贸易的争夺在那时至关重要，但是，在1760年乔治二世（George II）死后，皮特被撤职。皮特和他的朋友痛惜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和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回归法国，以及纽芬兰（Newfoundland）附近的大浅滩（the Grand Banks）上的捕鱼权回归法国。在关于条约的争论中，皮特在伦敦城（the City）商人的支持下，大声疾呼：

大臣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最根本的原则，如果不仅就海上和商业势力而言，法国是首要可怕的手。[\[69\]](#)

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竞争斗争中的适当角色的人，此时在英国归于失败，就像他们不久以后在法国的结局一样：

好像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但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缺少政治权力。失败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政府的制度和办法。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黎明来临了。[\[70\]](#)

然而，如果说法国的海外经济基地还没有被摧毁——像皮特和他的朋友所希望的，英国至少得到了一些关键的战略地带——加拿大、多米尼加（Dominica）、圣文森特（St.Vincent）、米诺卡岛（Minorca）、塞内加尔海岸（the Senegal Coast）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孟加拉（Bengal）。法国马上求助于欧洲外交中的势力均衡这一手段，以改善

处境。^[71]1768年吞并科西嘉岛（Corsica）有助于调整在地中海的形势。^[72]但这并不足以抵消法国经济在两个关键领域所受的损害，这一损害将成为法国毁灭的根源。

首先，七年战争中断了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商业和工业混合体的飞速发展。这一混合体是三角贸易、奴隶贸易和棉花制造业的纽带，我们知道它在英国运行良好。在巴黎条约前的20年，处于“现代经济发展”“最前沿”的是法国的港口城市，如，南特（Nantes）。^[73]然而，这场战争是“灾难性的”，封锁影响了“成长最快的部门”，并且，战争结束时出现了“一种更为谨慎的精神”。因此，这场战争标志着经济的“一个转折点”。^[74]

第二，正是战争从根本上“扰乱”了国家财政，永久地中断了收入与开支间的平衡。因此，国家走上了靠未来的收入过活的危险道路，而这只能通过进一步向债权人让步而得到。^[75]对法国国家来说——就像类似情况下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最终起了通货膨胀的作用。

在七年战争后的时期，世界贸易普遍减缓。直到1792左右，世界经济才完全走出这种康德拉提夫B时期（Kondratieff-B period）。^[76]然而，在抓住这一情况好转的机会中处于最有利位置的将是大不列颠，而不是法国，这在1780年代将显现出来。我们现在将着眼于造成抓住这一机会的工农业发展。然而，记住这一点将是有益的：在与法国长期争夺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的较量中，英国所获得的政治战略优势对于这一经济高涨是多么重要。关于其重要性，哈巴库克有精辟的表述：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在1780年代的出口加速是技术革新的结果。但至少是在棉花纺织业中，这些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事实的结果：在先前的几十年中，英国已与迅速扩大的市场联系起来。大陆的纺织工业满足需求的增长远为缓慢的市场，有鉴于此，它们无需面对改善其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同样

需要。^[77]

好像正是在1760年代的这个时候，法国精英们——知识分子、官僚、农学家、实业家和政治家——开始表达这一感觉，即他们不知怎么地“落后于”大不列颠了，并想设法寻求“迎头赶上”的方法。根据我们今天的知识来判断，这样一种印象也许被夸大了，但这并没有抹去它在那时对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在农业中，这意味着三个主要的社会政治尝试：土地清理、“自由的”谷物价格和农艺的改进。

土地清理采取两种形式：分割公地和废除集体使用权 [特别是强制性公共牧场 (*vaine pâture*)]。由于法国国家法律的薄弱，这一改革尝试不得不逐省进行。虽然有这一复杂性，1769到1781年间，省级法令还是接连批准分割公地，1766到1777年间则是批准结束公共牧场。王权以各种方式予以支持。财政的需要刺激开垦荒地，这又进一步鼓励了土地侵占。布洛赫 (Bloch) 称这一尝试“规模宏大”，指出这部分地是故意模仿英国的议会程序。然而，正如他所评论的，改革者遇到了“意外的困难”，一股“胆怯和泄气的浪潮”使它夭折了。^[78]这些改革的失败现在没有争议。^[79]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归咎于对传统的一种纯粹崇拜吗？无可怀疑，改革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它反映了维持某些“封建”特权（比如打猎区）的愿望，但是，反抗的主要来源明显是一个受到威胁的物质利益。

公地的分割受到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普遍支持，他们通过挑选权 (*the droit de triage*) 可以得到这些土地的1/3。无地工人或那些有很小一块土地的人也能够在这一分割中得到一些好处，但这只有在所得份额与现存财产规模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一般说来，正是耕地者 (*Laboueurs*) 倾向于最强烈地反对，因为他们在耕地上的所得不能补偿他们在放牧权上的所失，并且，最贫穷的人们所得到的土地——尽管很小——足以使他们离开耕地者的劳动力市场。因此，法国的耕地者像

英国的自耕农一样被引向了无产阶级化。的确，在谈及18世纪的法国——不是英国——时，拉杜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化取代了墓地。”^[80]

然而，在禁止集体权利（公共牧场，共同放牧权）（*vaine pâture, droit de parcours*）的问题上，政治组合就不同了。无论如何，无地工人或土地极少的人从此得不到任何好处，废除这些权力意味着他将失去他仅有的几头牲畜的牧场。^[81]耕地者，特别是有肥沃土地的人，是现行调整中的“互惠主义”的受害者。但现在，正是他们从圈地中获取好处。^[82]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大土地所有者则意见不一。只要是在属于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单位散布的地方，这些集体权力对他们来说像对那些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一样有用，如果不是更为有用。但如果他们的土地集中起来，他们就失去了公共牧场的好处。^[83]

但是，对情况的这一描述不同于我们对英国的可能的描述吗？是的，在一个根本的方面不同：在法国，土地单位的分散程度远大于英国。^[84]就像我们看到的，这能够影响大土地所有者的态度。但是，法国土地所有者为什么不像英国圈地法令中司空见惯的举动那样，靠立法敕令这一简单的办法来重新组合土地呢？布洛赫提供了答案：

自然在一个极大部分的土地持有权（租佃）全然没有得到永久所有权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束缚（重新组合）在法国是可以接受的吗？这些经济学家，行政官员甚至没有正视这种可能性。^[85]

事实再一次表明，相对于财产权不那么根深蒂固的大不列颠来说，法国管理现存财产权的严格规定是法国的“不利”。它使得法国能够更好地反抗侵占行为。

当我们转向谷物价格的开放的情况时，我们发现另一个讽刺。首先试图贯彻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甚至在它出版之前——的国家是法国而不是英国。正是在1763年5月的“宣言”（Declaration）和1764年7月的“敕令”（Edict）中，法国政策打破了粮食供应传统，并实行“谷物自由主义”。“宣言”创造了整个法国境内的自由流通，而“敕令”则允许谷物和面粉的自由出口。^[86]这些法令在相当程度上是对1763年的“屈辱的……伤风败俗的、破坏性的”失败的反应。它们构成了“一个惊动社会的事件”，标志着与一个长久传统的“断然决裂”。但是，它的持续并不长久。它结束于1770年经济问题的突然出现，并颁布法令再一次禁止进口，其颁布时间恰巧在7月14日。^[87]

如果实行谷物自由主义的目的是降低价格、平衡地区间价格或减少年度差别，那么，在它的短期历史中，它没有明显地实现这些目的。拉布鲁斯把它的“微弱影响”归因于由交通“困难”所导致的客观经济局限。^[88]但这一观点的先决条件是我们把重农论的主张作为政治解释。然而，卡普兰（Kaplan）提醒我们，虽然这一措施由于其“激进主义”而让人吃惊，但它得到了十分“传统、保守”的土地所有者的支持，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自由主义思想，而是谷物贸易的直接利润。^[89]谷物自由主义的执行是在1763~1770年间，而拉布鲁斯认为，正是在这些年，出租土地不利于所有者而有利于佃农。这是全然的巧合吗？谷物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通过扩大总销售量来维持利润水平的手段。在1770~1789年这一时期，直接生产者的利润下降，同时，地租却正在上升，这样，谷物自由主义变得不再那么必要。在杜尔哥（Turgot）统治时的1774年，谷物自由主义的短暂再现遭到了大众的强烈反抗——面粉之战（the guerre des farines），^[90]而没有得到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必要政治支持。1776年，杜尔哥甚至试图把谷物的自由贸易扩大到巴黎，而这在以前是被免除的。杜尔哥失去了职位。

但是，这一领域改革的失败是封建势力强大的标志吗？如果听取拉布鲁斯对“幸福的土地贵族阶级”——其首要收入，即地租收入“正在上升，猛烈地上升”——的论述，就不会这样考虑了。

土地上的资本主义不只是扮演社会上的有影响的受保护者的角色。它也进攻，也推进，其速度空前，在它面前，农民的利润大大下降了。^[91]

因此，无怪乎我们重新对土地所有权和投资感兴趣。^[92]

法国的谷物自由的实际情形（与合法性相对应）与英国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呢？正如莫里诺所提醒的，由于“缺少统计数字”，我们不能真正地确信比较的谷物出口数字。但无论如何，有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供应过剩的省〔比如，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Brittany and Languedoc）〕正在船运商品到供应不足的省，^[93]因此，只看对外贸易数字不能作为比较的恰当依据。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事实——正如他所说——这一问题就不会被“恰当地摆对位置”。

如果我们回到改革的第三个舞台，即经济的改进，头奖通常要颁给大不列颠。实际上，通过研究18世纪英国对法国农学家的影响，鲍德（Bourde）得出的结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学的后果是很少的，而且，这一影响“与其说是经济史的事实，还不如说是思想史的事实”^[94]不过，有三点还需要指出。第一，英国农学的发展虽然是真实的，但没有达到通常认为的“革命”的水平（就像已经指出的）。^[95]第二，英国土壤比法国更适合新饲料作物。^[96]第三，英国的新耕作制没有增加每个工人的产出，而只是增加了每个土地单位的产出。^[97]

因此，对于1763~1789年间法国农业中的重农主义改革尝试的失败，人们可以有各种解释方式。法国与英国之间的真正区别被夸大了。就真正的区别而言，法国土地所有者/大包税人阶层的犹豫反映了尽可能创造直接利润的可能性的理性考虑。与英国的较低阶层相比较，法国的较低阶层在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进一步扩大的某些方面中更为成功。可能所有上述三点主张都是正确的。

在工业舞台上，情景又如何呢？在那里也同样，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即法国人正落在后面。这是那时的人们的观点，也是此后的分析家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如何呢？英国棉纺织业是这一分析的中心问题。首先我们应记住，在18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法国的棉纺织业不仅大于英国，而且，在1732~1766年间，法国的棉纺织业规模翻了一番。1700年的保护主义反印度法规刺激英国的微弱工业开始成长，但其成长“只是在七年战争后的1760年代中期才加速了”。^[98]许多作者将注意到，只是从1780年代开始，英国才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99]

我们还应当记住，从17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欧洲的小型乡村工业蓬勃兴起，它们赖以建立的资本积累水平从低级到中级不等。^[100]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提醒我们，到1780年为止，欧洲“最为工业化的景观”仍然不是在英国，而是在“里尔（Lille）、鲁昂（Rouen）、巴塞罗那（Barcelona）、苏黎世（Zurich）、巴塞尔（Basel）和日内瓦（Geneva）附近的乡村地区。”^[101]并且，在总结了现今大量的关于所谓原工业化的论著之后，蒂利（Tilly）指出，从1650年一直到1850年，“庞大企业和巨额资本很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对衰落。”^[102]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通常所称的工业革命实际上应当理解为领先工业的再城市化和再集中，同时还有扩大规模的尝试。因此，从定义上说，只有一个或两个地区能够成为这一尝试的所在地。对法国和英国来说，生死攸关的是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引导这一对抗行动。恰好由于世界经济的新扩张，这一对抗行动的好处将是巨大的。

英国开始这一过程是否先于法国，我们仍然远非肯定。^[103]至于工业的规模，在18世纪，是法国，而不是英国有更多的“大规模企业”。^[104]虽然如此，事实仍然是这样，在1780~1840年期间，英国能够以任何国家为代价，最为直接的是以法国为代价，成为世界经济的较大

规模、相对更机械化、相对高利润^[105]的工业部门的中心地区。^[106]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看来很明显，在178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生产的相对效率突然提高了。这是著名的“新发明浪潮”的结果，这一浪潮在英国大于在法国。^[107]如果愿意，人们可以把这归因于更大的“创造力”。^[108]但另一个肯定有助于此的因素是这一事实：此时，英国人有进入市场的优势。^[109]这适逢“发展极从法国向西班牙的转化这一相当经典的现象，可能由于某些拥有陈旧设备的省（如，布列塔尼）的全面成熟而变得复杂”。^[110]

关于市场，还有另外一个需考虑的问题。对于英国国内市场的作用，历史学家们已给予了很多注意。但这在两个方面总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在一个销路有如此大的部分依赖对外贸易（并如此地依赖外国进口，且形成联系，以出卖什么东西作回报）的工业中，为什么国内市场是技术进步的原因呢？难道法国国内市场不大或更大吗？至于英国生产率为什么恰在这时有这一飞跃，莱昂（Léon）的回答在我看来合理得多。“人们能不能设想，（法国）国内市场的收缩会承受得住用它的一切力量去对抗对外贸易发展的任何深刻改变”。^[111]这就是说，恰恰由于国内的利润水平很高，在海外要有竞争力的压力减弱了。这就是为什么1786年条约——我们很快会提及它——如此重要的原因。

尽管“降低的花费和可以扩大的市场”无可怀疑“在技术发展的（进一步）加速中具有战略重要性”，^[112]但是，英国还有一个根本的优势——乐于积极干预市场的国家机器。除了再引用芒图（Mantoux）早先的，但经常被遗忘的分析外，我不能对此有更好的说明：

没有比说英国棉花制造业在外国竞争面前没有得到人为保护就成长起来更不准确的说法了……不论从哪里进口印花棉布都被禁止。没有其他任何保护措施会更完全，因为它给制造者

从国内市场的真正垄断……并且，不仅国内市场留给他们，而且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获取海外市场。补助金给每一匹出口的白布或平纹细布 [乔治三世21年40号法案（1781年）和乔治三世23年21号法案（1783年）制定了严厉措施阻止（新机器）出口到外国……如果棉纺织业的历史能为自由贸易（laissez-faire）理论提供论据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这些论据肯定不会在其早期发现。] [\[113\]](#)

虽然如此，即使考虑到所有这些，英国的优势也并非那样之大。正如莱维-勒布瓦耶（Lévy-Leboyer）所指出，“英国人不能指望太长时期地保持其技术和财政优势。”然而他们做到了，并超出了人们认为是合理的限度。在多大程度上应当从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莱维-勒布瓦耶愿意“从这一角度”称它为“一个民族灾难”[\[114\]](#)——来寻找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呢？

如果我们着眼于导致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有一个广泛一致的观点是，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的召开开始了直接的行动过程，而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是一种“君主制危机”的结果。对于这一危机，勒费弗尔（Lefebvre）有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

政府危机可以追溯到美国战争（the American War）。英国殖民地的反叛可以被认为法国大革命的首要的直接原因，一方面由于它号召人权而在法国引起了大骚动，另一方面由于路易十六（Louis XVI）为支持它而陷入财政危机。[\[115\]](#)

这一解释导致了两个直接的问题：它对大不列颠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思想影响呢？英国国家的财政又如何呢？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1763年这一转折点。当时，法国察觉了自己“落后于”英国。从根本上说，那时讨论的解决办法有两个：增强法国国家力量——从财政、社会（与地理的或阶级的离心势力相对）、军事——或从经济上“开放”国家。两者都被

视为“改革”运动。其中一个计划是利用国家财力支持企业家以增强法国的经济地位，另一个计划是利用国家财力迫使法国企业家变得更有“竞争力”以增强法国地位。在上一个世纪，这种全国性争论已变得司空见惯。它是保护主义干涉者与“自由主义”干涉者间的争论。1763年以后，法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其结果一塌糊涂，并成为政治性爆发——实际上发生了——的主要潜在力量。

摇摆开始于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他

渴望这一最后结局：在世界上重新确立法国的势力，进行对英国的复仇战争。但他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手段，在法国国内恢复王家权威，改革王家财政。没有这些，所有其他改革都将是徒劳。[\[116\]](#)

弗尔热纳（Vergennes）继续这一政策。他在1774年到1786年任外交大臣。一系列控制法国财政的人也同样，他们是，杜尔哥（Turgot, 1774~1776），内克（Necker, 1776~1781），弗勒里（Fleury, 1781~1783），卡洛纳（Calonne, 1783~1787）。每个人都竭力解决同样的问题，每人都采用了不得人心的解决办法（各不相同），每人都没能增强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经济地位。如果绝对君主制能更绝对的话，它本来是能够战胜危机的。但是，1715年到1789年的所有财政改革计划都“由于最高法院（parliaments）的反对而完全失败”。[\[117\]](#)

政府财政始终是核心问题。如果说世界经济的长期扩张导致了拥有土地的生产者的资本得以稳定地积累——主要通过地租这一手段，那么，这一资本集中不仅只是导致了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且降低了国家作为再分配中心的地位。虽然国家岁入——作为全国性产出的一部分——在17世纪稳定增加，并至少延续到1715年，但从1730年开始，它走了下坡路。[\[118\]](#)由于总包税公司（Company of General Farms）的制度，形势恶化了。它在18世纪（至少到1774年）是征税的

首要结构，这大大便宜了征税人。^[119]“王权失去了独立于（这一公司）的地位。”内克尔可能降低了这一公司的作用，但是，“要摧毁它所需要的完全应当是一场革命”。^[120]

然而，正是美国战争把一个稳定的趋势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在国家岁入下降的时代大大增加了国家开支。^[121]美国战争应该有利于法国，在许多方面也的确如此。毕竟，它标志着那一殖民地区脱离大不列颠，那里是它的最重要出口场所。事实上这一战争也的确挫伤了英国，引起了对外贸易的“突然中断”^[122]和对外贸易总额的下降。对法国来说，它是一场“复仇战争”，^[123]其意识形态上的实质被忽略了。

虽然大不列颠输掉了美国战争，但法国所得的好处也证明是虚幻的。追溯这一事件，吕提（Lüthy）谴责这一“不自然的联盟”，它源自舒瓦瑟尔（Choiseul）在新大陆复仇的观念，并指出，和平刚刚取得，“美国人和英国人发现自己又在私下交涉，以结束他们间的家内争吵，给那些作为不速之客的外国人（拉丁人和教皇主义者）以背后一击。”^[124]这一现象为什么发生呢？在20世纪的所谓非殖民化之后，发生了前殖民者与前被殖民者之间恢复商业联系的类似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从解释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中可以看出，鉴于现存的商业、社会和文化网络，前被殖民者恢复他们的传统联系（以稍微改变的形式）比把这一关系转移到其他中心地区国家要简单得多。^[125]

的确，一位敏锐的法国分析家，布瓦西埃的唐居伊（Tanguy de la Boissière），在反省了1775年以来的法—美商业关系后，到1796年就能这样写道：

大不列颠虽然失去了殖民地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没有失掉什么，因为她马上得到了它的使用权。现在，她享用着庞大的商业所带来的好处，而不需行政管理的花费——像过去那样……因此，很明显地，英国从1774年的脱离中不但没有损

失，反而有所得。[\[126\]](#)

这一分析在英国也并非不为人所知。它无可怀疑地支持了伯克（Burke）反对乔治三世的政策和观点。后者认为，这一“灾难”是“与1689年大革命（Great Revolution）所建立起的传统的分界线”。[\[127\]](#)伯克并非孤身一人。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一个“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典型的”企业家，也反对战争。“当美国获得独立时”，他“庆幸自己的运气，和祝佑诺思勋爵（Lord North）。”[\[128\]](#)

然而，英国之所以能从非殖民化中获取好处，主要是由于1763年以后英国在世界商业中已取得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英属北美为殖民地变成了负担，不会相应地带来足够的好处，即使那时并非所有英国官员马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后看来（但仅仅是事后看来吗？），很明显地，“从商业上来说，殖民地的脱离的结果几乎是有利于母国的”。[\[129\]](#)

法国本以为美国战争会“敲响英国盛世的丧钟”，结果却导致了“法国大革命”。[\[130\]](#)由于这一战争，法国的国家债务加倍增加。[\[131\]](#)不出五年，王权已变得“不再能让人放心地给予信贷”。[\[132\]](#)1788年，国债利息已达预算的50%。[\[133\]](#)国家正走向“破产”。[\[134\]](#)

但是，在1780年代，英国国家的处境如此地优于法国吗？1782年，英国的国债利息在政府岁入中所占的比例甚至大于法国——甚至是1788年的法国，且不说1782年的法国。两国间的差别不在1783年和平条约之时，而是在“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之中。[\[135\]](#)

英法间的悬殊差别出现得很突然。首先，英国提高了额外岁入，因此明显降低了国债利息。[\[136\]](#)但这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特别是由于1780年代荷兰投资的逐渐撤回导致英国人出现了进一步的问题。[\[137\]](#)这就是说，他们的债务不能再延期了。可是，我们知道，在1783年到1790年或

者到1793年间，法国债务持续暴涨，而英国债务却在相当程度上偿清。^[138]对此，戴维斯（Davis）的解释是由于“在普拉西战役（Plassey）之后的几十年中对印度的掠夺”。这种掠夺即使不是工业中的资金投入的主要成分，也可以被认为“为从荷兰人和其他人那里买回国债提供了基金”。^[139]我们再一次看到，英国优势来自于它在1763年后获取的地位。1780年代，英国工业获得发展，“在（法—英重新）开战前夕的1792年的真正繁荣中”达到高潮。^[140]当我们把英国这兴旺的十年与法国悲惨的“革命前”相比较时，我们必须把这种比较放在十分不同的国家财政状况这一背景之下。这一财政的差别本来可能只是“暂时的麻烦”^[141]——如果它没有导致一次大爆发并因而最终成为造成法—英悬殊的重要因素。^[142]

因此，1763年以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积累起来的优势在1780年代得以增强，到1815年取得决定性地位。法国政府企图“赶上”英国，这成为导致1780年代的大爆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暴涨的国家债务只能用两种办法解决，其一是节省开支，其二是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岁入。法国政府选择了间接增加岁入的道路。

1776年，路易十六（Louis XVI）在杜尔哥的一个备忘录的页缘写到：“人们对杜尔哥先生满腹怨言。对喜欢追求新奇的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英格兰更英国化的法国。”^[143]路易十六好像犹豫不决。内克则试图转向另一道路，即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提高国家的所得份额。他失败了。对于那些愿意“开放”法国，以吸收“新鲜”的清风（他们的反对者认为是狂风）并投入竞争的人来说，1780年代将再一次提供机会。一方面，那些从垄断地租中获利甚丰的人——特别是在1780年代，可以被认为已经“奋力脱离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分支”。^[144]另一方面，王权正在试图应付挫折（没有能力改革国内财政系统），因而转向了开放边界（进而增加关税收入）的解决办法，以此作为岁入的来源。因此，我们可以说，王权已在帮助他们脱离。这样，王权招致了资产阶级阶层的另

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担心在英国占主导的世界经济中法国会最终“半边缘化”。

新政策的第一个标志是1784年8月30日的法令，它开放法国殖民地，实行自由的对外贸易。这是企图鼓励刚独立的北美国家与法属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的贸易。但这一招的结果却是至少像有益于法国一样有益于英国。^[145]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港口大商人已在强烈抗议。^[146]政府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垄断公司已被无处不在的走私贸易破坏。因此，1784年法令认可了并试图利用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147]正是这一逻辑导致1786年致命的伊登条约（Eden Treaty）。布罗代尔认为它“证明了”，而非招致了法国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的失败。^[148]但是，是不得不如此显眼地表明失败吗？无论如何，它难道不是唯一可行的手段吗？

是什么导致法国不仅签订1786年的英—法商约（Anglo French Commercial Treaty），而且还带头要求它呢？^[149]看来很明显，法国是企图一箭双雕。一方面是通过能够向先前的走私贸易（的确也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这一贸易）^[150]征税来解决法国国家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是通过市场压力造成的强制性革新来解决法国生产的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151]从法国的角度看，还有一个非常因素刺激法国采取主动。这就是，1778年以后的时期，农业价格大幅度下降，^[152]使得大土地所有者更加抗拒把剩余产品从他们手中转移到国家的任何手段。在人们看来，增加关税收入这条道路肯定更具吸引力。

英法商约涉及与英国的一个交易。更自由的贸易意味着（残酷地）更多的英国棉布（和陶器、羊毛、金属器具）出现在法国市场，以抵偿更多的法国酒（和其他农产品，还有丝绸、亚麻布、玻璃制品）在英国市场。但多到什么程度呢？答案依赖于经济预测。毋庸置疑，法国谈判者低估了英国制造品的冲击力^[153]而高估了它们补偿法国工厂主的任何

损失的能力。^[154]但最糟的是，他们好像欢迎法国的新的半边缘角色。夏普泰尔（Chaptal）在1802年给拿破仑（Napoleon）的备忘录中，谈到了这一条约，认为法国指望着“他的农业的优势和繁荣”，他还说，英国土地上的产品“没有任何是特别或罕见的”。^[155]虽然如此，就像人们所认为的，雷恩瓦尔（Rayneval）好像乐于进行任何让步，“只要能够降低（法国）农产品的税收”。^[156]的确，1786年刚好在条约签订之前，雷恩瓦尔写信给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阿德马尔（M.Adhemar）：

毋庸置疑，我们正输往英国的主要是我们土地上的产品，以换回英国产品。但我过去始终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者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

雷恩瓦尔并没有就此停止。1786年5月21日，在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上，为了进一步论证条约的正当，他争辩说：

假设结局与我们预测的不同，是寻求几个钢铁制造商的繁荣，还是寻求王国的繁荣呢？是增加制造商的人数，还是增加农业生产者的人数呢？假设英国金属器具充斥了我们的市场，难道我们不能把它们再卖到西班牙或其他地方吗？^[157]

就是这样，雷恩瓦尔心安理得地期待着法国将扮演世界经济的传送带角色的可能性，两个世纪以来，这一角色一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光荣使命。难怪皮特在议会争论中能够这样为条约辩护：“正是从工业品制造国与幸而有着奇特（原文如此！）生产的国家间的协议的自然本性而言，好处肯定最终是有利于前者。”^[158]

对于恰处于旧政体（Ancien Régime）时期经济增长最高峰的法国国家来说，这是别无选择的战略吗？^[159]引人注目的是，1785年到1793年间，在与法国谈判的同时，不列颠正试图与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英格兰、普鲁士、两西西里和荷兰进行商约谈判。议会还讨论与瑞

典、土耳其和奥属尼德兰的谈判。因此，卡马森侯爵（Marquis of Carmarthen）于1786年能够谈及“目前的商约狂热”。其他谈判都没有任何结果。“[与法条约]的成功是无与伦比的”。^[160]法国政府的压力无可怀疑是巨大的——政府财政状况、酒贸易危机，^[161]但做出这一决定的压力也同样巨大，不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实际上的压力。看来，法国国家是在改革的幌子之下，选择一种部分的非工业化，这将有利于某些农业企业家，但损害了制造业阶级的利益。这些“改革”好像类似于20世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向面临支付平衡问题的负债政府所鼓吹的那些东西。

因此，可以理解，英国对这一条约的反对虽然真实存在，但也容易克服。皮特从商业利益着眼维护这一条约。福克斯（Fox）反对它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法国是大不列颠的天然敌人”。^[162]无论如何，英国人有各种正当的、直接的经济原因支持这一条约。他们像法国人一样，试图寻找国家岁入的新来源，因而要把走私贸易合法化，进而使得法—英交易处于应纳税范围。^[163]他们担心在以下地方的市场被法国占领的可能性：北美（由于战后条约）、西班牙（由于王族协定）

（Family Accord）、葡萄牙（它刚给法国以最惠国地位）。因此，他们欢迎在法国本土的市场。^[164]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竞争的焦点在于棉花。他们不仅对自己在法国市场销售商品的能力充满信心，^[165]而且还关切着维持从英国殖民地以外的地方得到棉花进口的通道，那里目前提供着他们所需棉花的不足30%。^[166]从那一视角来看，庸俗的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

这一条约对法国的经济后果几乎马上被感受到了，特别是（正如一个1788年的法国政府备忘录所表明的）在与“精美布匹”相对应“普通布匹”——各种用于“人民”而非“富人”消费的——方面。^[167]条约导致了大量进口商品涌入，造成了来自英国的棉纺织品（还有其他制品）的“真正泛滥”。^[168]这是一场“经济革命”，^[169]“法国工业史的转折点”之

一。^[170]阿诺德（A.M.Arnould）于1791年写到，英国商品“充斥着”法国市场。^[171]但是，不出五年，法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影响几乎马上成为政治讨论的话题。从那以后，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觉，因为经济衰落开始于1786年，甚至是1785年，在条约的真正生效日期1787年7月1日——之前。^[172]在我看来，这一观点失之偏颇。客观上说，这一影响可能在1787年后最为剧烈，但能部分地解释1786年的困难的一个因素可能是条约的预先讨论。无论如何，正是感觉，而非事实决定着政治反应。^[173]

当然，法国制造商和其他人认识到，英国布匹在法国市场畅销是因为其售价低于法国布匹。^[174]英国的这一优势由更显著的机械化所致，它反过来又能瓦解法国的经济。但具体情况怎样，速度又如何呢？1789年出版的一本法国百科全书写到：

我们刚为英国签订了一个商约，它可能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但它已经剥夺了王国内500,000工人的生计，破坏了10,000家商业店铺。^[175]

与此同时，法国人察觉英国政府是在帮助一个倾销过程。^[176]他们担心那些将“难以摆脱”的后果，比如，无业熟练工人的移居国外。^[177]到1789年革命前三级会议的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时，这一条约已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甚至在“受影响不太直接”的省的陈情书（cahiers）中也有怨言。^[178]“大众普遍的愿望是完全废除这一条约。”^[179]

在1911年的著作中，穆尔洛（Mourlot）提到了那时许多人的感受。条约把法国变成了英国的一个“经济省”；它是“对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的一种新的废除”。^[180]从政治上说，影响是显著的。制造业部门感到被国家机器抛弃了——恰在他们认为他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肯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国王的随从们乐于接受法国在自由放任主

义幌子和竞争善行之下的半边缘化。毋庸置疑，在某种程度上，“竞赛已经输掉了…… [并且]，英国已控制了世界范围的经济”。^[181]但是，条约好像是使这一状况不可逆转的法令——这一观点将导致一场强烈的抵抗运动——特别是鉴于英国的目前状况如此良好。

条约对英国有直接、“明显的好处”。国家岁入提高，出口机会扩大，贸易平衡“陡然转向”有利于英国。^[182]但还有更多的好处。通过开放法国市场，伊登条约给英国制造商提供了大量经济实惠，这使得英国人能够在美国（大概还有其他地方）降低价格。早在1789年，一个英国领事（Consul）就提到，这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明显中断了费城（Philadelphia）的棉纺织业的发展”。^[183]

本来指望，法国在棉纺织品上所受的损失将由在酒上所得的好处得到一些补偿。事实并非如此。英国人购买法国酒的数量虽然增加了，但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多。^[184]伊登条约导致的“危机”大概又导致了法国国内市场的衰落。因此，虽然酿酒业表现为条约中的开放贸易政策的自然的^[185]和事实上的^[186]支持者，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善。1777年以来，酒价格一直在下降，事实上，在1786年降到了最低点，这一低水平持续到1791年。1788年和1789年，谷物价格急剧上升，这导致了葡萄园主人岁入的减少——由购买力下降40%而造成。^[187]他们又联合抵抗什一税和庄园费以求自救。难怪，制造业部门这一“可怕的”危机，加上谷物和面包高昂的价格，“将引起大革命”。^[188]

怎样“解释”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复杂“事件”呢？不论把法国大革命限定为1789年7月14日所发生的事情，还是把它限定为1789年（或1787年）到1793年（或1799年，或1815年）间所发生的事情，这都无关紧要。不管这一事件的时间范围如何，对一个事件的解释从另一个事件的角度来看就不会很令人满意了。两个事件构成一因果联系。它们的联系也许是合理的，但自然还有其他“事件”相干涉，而问题通常直接出自这

些其他事件对于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如何。决不会有人能正当地排除没有发生的其他因果联系，认为它们没有发生的同样可能性。宣称一种后果是一种因果联系，几乎全然是一种以果为因的牵强论证。

然而，用长时段的观点（*Longue durée*）来解释一个“事件”同样不能让人满意。长期发展的观点解释大规模的、长期的结构变化，但不可能说明这类变化的发生只有通过特定事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争论就在这一最终不得要领的水平上。一个重大事件是一个机缘（*conjuncture*）（这一词的英语意思是“一个结合点”）的结果，或者说是形势（*conjonctures*）（法语意思是中等长度的循环阶段）的结果。这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为伟大主要是由于其结果而不是其起因。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无可怀疑是现代世界的“重大事件”。

两个“客观”形势已被广泛用于“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经济形势^[189]和国家机器的形势，特别是国家财政的日益亏空。从前面已经谈到的可以看出，这些形势的确明显存在，事实上也的确起了重大作用。然而，如果这两个形势是历史的全部，完全可能会出现各种类型的法国大革命。^[190]但倘若如此，我会很难相信它能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中的如此核心的事件。

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地位是法—英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核心地位的结果。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法国意识到在这一斗争中面临的失败，是这一觉醒的结果。^[191]并且，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对世界体系有如此的影响，正由于它发生在争夺霸权已经失败的国家。许多人本来指望法国大革命将使英国的胜利浪潮逆流，但事实上正相反，我们可以说，它在保证英国的持久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也正由于这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论的失败，法国革命党人实际上达到了他们的长远的意识形态目的。

因此，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考察将主要从其结果的角度，而不

是从人们所认为的它的起因的角度。首先，在两个关键的领域——农民生产的结构和国家在与工业生产的关系中的作用——早期革命政府的真实经济政策是什么？

很久以前，布洛赫（Marc Bloch）提出了一个观点。从它的着重强调可以看出，这一观念反对法国大革命代表着大规模农业领地的衰落这一简单化的概念。

人人都知道，在1789年到1792年间，领主体制如何被打得粉碎，同时打碎的还有已成为其标志的君主体制。

无论新型领主如何愿意视自己为手下农民的头领，实际上，他又一次初步变成了大规模经营者，就像许多普通中产阶级的类似状况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设想——这当然是荒唐的——法国大革命在1480年左右爆发，我们将发现，摆脱了领主捐税的土地几乎无一例外地重新分配给了许多小占有者。但是，在1480年到1789年间的三个世纪中，大地产复兴了。当然，像在英国和东德（Eastern Germany）一样，它并没有覆盖所有土地。大片土地——总量可能超过了大地产所覆盖的土地数量——仍然是归农民所有。但这一胜利是巨大的，虽然其彻底性各地有明显不同。法国大革命对大地产也不会有太大触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法国农村土地状况是：不是小地主的土地——像有时所说的那样，而是大地主和小地主的土地并存，其比例各省之间有很大区别。这一状况应由它在15到18世纪之间的演变来解释。[\[192\]](#)

那么，我们何以有这一印象——由于法国大革命，农民生产的作用实际上增大了——呢？一个原因是，的确有一些影响庄园主的“传统”权力的法律条文。在1789年8月4日那个著名的晚上，国民议会（the National Assembly）的确正式废除了“封建政策”，包括什一税和某些

（还不是全部）领主权。[193]然而，剩余的领主权将依次被废除，1793年7月17日也没给以保障。不仅如此，1791年9月28日正式通过的农村法典（Rural Code）的确还批准圈占公地。1792年8月28日的法律的确还批准分割公地。教士的土地被国有化，并最终被出卖。

虽然如此，所有这些并没有像看上去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革命者政府不论是废除公共牧场还是公共牧权，都没超过刚过去的旧制度下的十年的农业改革家。[事实上，公共牧场直到1889年才被废除，即使那时，其废除也要得到地方同意。[194]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之后，它才被无条件地废除。] 允许分割公地的法令也于1797年中止。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农民的那种“所得”主要是那些拥有一定量财产的农民的所得，即那些中等富裕的耕地者（laboueurs）。并且，这种所得通常不是以小佃农、小分成制佃农和无地工人为代价。[195]固然，各种改革在法国创造了管理秩序。[196]但是，正像布尔金（Bourgin）带有几分尖刻地指出的，“它是一种超乎想象地协调一致的管理……为它服务的立法出乎预料地保守”。[197]

勒弗费尔把我们学究气的错觉——认为大革命时的农业改革是激进的——归咎于农民反抗的“猛烈”和“顽固”性，以及8月4日晚上导致的那一涉及废除封建权利的“骚动”。他认为，其立法不是激进的改革，只不过是一个“妥协”。但他的确还说，我们不能如此地轻视它。因为，如果说它减缓了经济发展，但它比英国农业变革“导致了更少的痛苦，因此也更人道”。[198]这是评述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式，但我感到有点太唯意志论。这一“妥协”——我们将会看到——是那些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有所得的人们与那些有所失的人们之间的残酷阶级斗争的结果。[199]这一结果的“人道”是由反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而造成的。[200]

如果我们转向国家在促进工业生产中的作用，我们将会看到，在这

一舞台上，法国大革命的成就至少像在农业改革的舞台上一样重要——甚至还超过。夏普泰尔在1819年的著作中，借由回溯到1789年为止的英、法工业生产形势的比较，发现，从市场的地理范围、出售商品的数量和较低的价格这些方面来看，英国有明显的优势。他从许多方面来解释英国为何能取得优势地位。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执行的一种制度：只允许它自己的工厂的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通过禁止或关税手段——两者效果一样——阻止外国生产者的产品”。^[201]

恢复保护主义明显的是相当一部分发动革命并（或）由于革命而掌权的人所直接关切的问题之一。“无疑地，在（制宪）会议（Constituency Assembly）的成员和整个国家中，（1786年英—法商业）条约是不得人心的。”^[202]1793年，这一条约被国民议会（the Convention）正式抛弃。

这决不会与影响工业生产的其他主要经济决策相矛盾。这就是废除国内关税，因而，它最终实现了柯尔伯（Colbert）的梦想。^[203]由于这一条例（还有废除行会），大革命得到了赫克谢尔（Heckscher）的称赞，他赞颂它的“否定性结果”——摧毁旧制度下的工业立法这一“非理性怪物”。赫克谢尔称此为“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204]原则上，索布尔（Soboul）应当同意这一观点，因为他视大革命为资产阶级自由放任主义的胜利。然而，他的确也评论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关税、排斥法（the Exclusif）、1793年的航海条例〕：“制宪会议的资产阶级，由于面临外国竞争的危险，在他们的商业自由放任政策上妥协了。”他称这是“1789年的人们的现实主义的又一证据”。^[205]但这为什么是一个“妥协”呢？只有假设资本家——从定义上说——赞成自由贸易、国家的作用微不足道，这才是一个“妥协”。^[206]

对许多人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整体目标是扩大——而非缩小——国家的作用。然而，是谁想这样做并且为什么这样做呢？卢梭

（Rousseau）实际上已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区分了普遍愿望和所有人的愿望，即共同利益与特殊愿望的总和相对应。^[207]处于国家间的体系之中的现代国家正是这一无休止的紧张局势的战场。加强国家的力量明显意味着降低（不是消除）特殊愿望战胜一些更普遍的愿望的能力。这些普遍愿望试图最大可能地发挥国家及其公民受益人（citizen-beneficiaries）（这一概念的范畴小于所有公民的范畴）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与其他国家的公民受惠者相比较而言。这样，国家能够变成这样一个机构，通过它，一个特定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或胜了个别有产者的特殊利益。固然，这是一个持续的较量。但它有时也变得很剧烈。只要一个或更多的其他国家将要有大的飞跃——在与该国家的相对地位方面，这一较量就容易变得剧烈，并会因此导致一些运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正是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的进退两难状况。^[208]

正如吕提所指出的，在旧政体下的法律“混乱”中，“没有不需要保卫自己特权的……地位稳定的团体”，18世纪的所有王家行政管理也是同样，不论是新柯尔伯主义者、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重农论者，他们都“不得不成为革命者，否则就会陷入困境”。所有“进步的”趋势都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开明专制”。^[209]从国家的行政管理结构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Napoleon）正提供了那一开明专制。慎重的保守主义者托克维尔（Tocqueville）后来正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此而痛惜。^[210]

虽然如此，事实却是，没有真正的普通愿望，只有以特殊愿望的几分稳定的政治集中为基础的国家愿望或舆论。法国这一“稳定”的破坏（即大革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特权阶层内部的损耗和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的冲突。今天看来，这些都已成常识。如果像这样平淡地表述，也几乎没有人会不同意。正是围绕着试图给这两个斗争加上概念化术语，关于法国大革命（以及通过大革命而进行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根本政治斗争）的历史编纂学之战进行着。

在这一争论中，几乎人人都用“阶级”这一术语来评述那些政治人物——贵族、资产阶级、无套裤汉、农民，有时还有无产阶级。这一术语深置在已渐渐使真正的斗争变得模糊的那一系列政治规约中。因此，我概述一下我对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三点争论的看法：（1）在这一时期，“贵族”与“资产阶级”实际上的关系如何？（2）在法国大革命中，“大众力量”（城市的和农村的）的实际作用和目的是什么？（3）谁是雅各宾派（the Jacobins）？

贵族和资产阶级是旧政体下的两个明确的社会法学范畴。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争议的是他们是否是不同阶级（class）的成员。关于法国或其他地方的这些团体在16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以来的经济作用，这些种类的社会学范畴是否能告诉我们很多呢——如果能告诉什么的话？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我对此是多么的怀疑。如果它们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这些范畴的成员作为实际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趋向于大量交集，那么，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胜利（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它）就既不是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前提，也不是其相关物，也不是其结果，而只不过是宪法和法国国家的根本政策问题上展开的“精英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或者，如果愿意，可称之为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的体现。

这一观点能得到拥护吗？如果我们争辩说法国大革命是作为上层阶级的内部争吵开始的，我们不会激怒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或勒费弗尔或任何其他后来的评论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本人对此就有精辟的说明：“因此，正是在法国，审判员、贵族、教士和富人给革命最初的推动，人民只是到后来才出现在舞台。”^[211]英国作为“楷模”，其中有一点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引人注目，让人称羨，并因此推进了法国顺利走上了“革命”之路，它就是英国贵族（aristocracy）的政治和经济力量。^[212]这的确是这幕大战的更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之一。毕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贵族”如此地保留着最大的作用并且在现代

时期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其中一个国家恰是大不列颠——如此众多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象征性的心脏地带。

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对法国大革命的所谓的社会解释（视大革命为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近年来遭到了大量系统性的攻击。有人认为，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业，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封建贵族的利益相对），在社会结构上需要大革命。通过阅读社会解释本身对佃农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对上述观点的怀疑。马迪厄（Mathiez）在他的代表作的开篇就承认，1789年的形势是，绝对君主制的实际权力有限，领主已失去了对国家的一切公共权力，农奴制实际上已经消失，封建地租已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现象，而资产阶级“虽然受到社团政治的束缚，但无论如何，他们所受到的反对要小于我们所一直认为的”，因为，虽然还有各种约束力，但“在整个（18）世纪，商业和工业已成长起来”。^[213]倘若如此，对革命的社会结构需要又表现在何处呢？^[214]

勒费弗尔分析研究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人权宣言》为什么没有强调财产权呢？他的解释是，对起草人来说，这好像没有必要，“因为这一权利旧政制并无非议。相反，18世纪的大臣和行政官员们谈起财产时总是充满敬重，而且以全然的资产阶级口吻”。^[215]并且，正是沃弗尔（Vovelle）和罗奇（Roche）令人信服地指出，在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这一名词，虽然指的是平民，但它“特指那些不积极主动的人们”。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不但还没有使得这伙人成功，相反却“给这一社会阶级以致命的打击”。^[216]

摩尔（Barrington Moore）称所有这些观点为“不足挂齿的吹毛求疵”。他的理由是：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土地贵族的政治权力的毁灭构成了法国现代化进程中作用最为显著的步骤”。^[217]果真如此吗？恰恰相反，这绝非什么吹毛求疵。有两个理由。实际上，如果法国大革命继续被解释为主要是一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

反封建的革命，那么，我们真正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搞清它为什么没能实现更重大的经济转变。霍布斯鲍姆（Hobsbawm）为这一“自相矛盾”大伤脑筋，并把它从根本上归咎于农民。^[218]但是，这当然只会引我们发问：难道一场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依赖于政治上软弱的农民吗？并且，如果这一“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没能”达到资产阶级的目的，那么，这一概念的效用何在呢？

这又把我们引到这为什么不是吹毛求疵的第二个原因。过于强调资产阶级反封建秩序的斗争的中心地位，已导致了对人民大众的反叛的歪曲认识，当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将民众阶级的反抗视为一种非常次要的事情时，这种认识甚至（如果不是特别地）存在于热衷于社会解释的人们之中，而他们大多自认为是人民大众的拥护者。虽然学者们近来投入了惊人的精力去研究无套裤汉和农民，但是，这种状况仍然存在。^[219]

这样，我们必须转向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即这些“大众力量”的作用和目的。这些大众力量是马迪厄所称的“第四等级”的人们、自然，他们大多在农村。所有关于资产阶级与这些大众力量联盟的讨论都无法解释一个基本的事实。对此马迪厄指出：

有产的资产阶级突然惊觉第四等级的可怕面目。它不能允许贵族的财产被剥夺。因为它为自己担心。这是由于，它控制着贵族土地的大部分，并从村民那里得到庄园地租。^[220]

好像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个联盟，而是人民大众的独立行动。对此，资本家阶层（不管是在这场政治肉搏战的哪一方）的对策是不同程度的暴行或恐慌。

让我们从“农民革命”开始讲起。这一名词实际上是指“处于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地位”——甚至对索布尔（Soboul）来说——的一系列斗争。^[221]如果把这些斗争视为延续整个18世纪的不发展的冲突的一部

分，只不过是1789~1793年的暴风骤雨中达到高潮，^[222]那么，把这种农民骚动理解为反抗“资本主义攻势”看来是合理的。这种“资本主义攻势”——圣雅各布（Saint-Jacob）的用语^[223]——是指，在许多地区（特别是法国的东北部、东部和中部偏东地区）企图摧毁或缩减法国农民的“集体权利”，并且时常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农民以“防御行动”进行回击。^[224]

三级会议的召集是在几十年的这种防御行动之后。此外，我们知道，它的召集还发生在特别严重的粮荒之时。农村穷人的极度痛苦与他们对自身的“集体权利”的担心（稍微富裕些的农民也有这种担心）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在这一反抗“资本主义攻势”的斗争中，富裕农民和农村穷人时常并不像当时的资产阶级或后来的学者那样惯于区别，“贵族”和“资产阶级”。^[225]对农村劳动者来说，贵族和资产阶级都是“特权阶级”的一部分。^[226]

如果农民反叛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决定性暴力因素”，^[227]我们就需要解释什么致使这些反叛具有如此的爆炸性。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反抗无产阶级化的长期过程与近期的但十分强烈的食物需要的结合。^[228]不只是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对此有错误认识。同样，大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认识到，对人民大众来说，大革命“不仅是为了得到人的政治权利，也是为了生计”。^[229]

观察大恐怖（Great Fear）中的一连串事件，可以发现这些大众情感的力量。在农村地区，1788~1789年的“日趋混乱”促使“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免遭‘第四等级’侵害”。如果说7月14日动摇了这一联盟，那么，“在随后的困境中，它在外省的重新出现比我们所知的更为频繁”。^[230]7月14日以后，当大恐怖遍布法国农村的广大地区之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谴责“贵族的阴谋”，而外省的贵族也谴责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详细生动的描写中，勒费弗

尔打消了双方的疑虑。明确的说是，7月14日之后，农民开始落实他们的要求，停止交纳什物税和庄园费，恢复他们已丧失的集体权力。“农业人口承担起了自己的事业。”^[231]大恐怖使此锅沸腾，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它在8月4日夜晚的准备工作产生作用”。^[232]所谓的1789年8月4日废除封建制度并非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计划。它是暴动的农民强加于他们的。国民议会企图尽力限制这一制度转变的实现。^[233]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况将在以后四年中重复出现：只是在人民大众的直接压力下，政府和立法机关才采取“激进”措施，并且总是在某种意义上试图限制它。^[234]像索布尔和其他许多人那样，人们可以把这解释为农民和无套裤汉迫使胆怯的资产阶级去追求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果。^[235]在我看来，认为农民和无套裤汉是在追求他们自己的革命更直截了当、更显而易见。这一革命的对手是他们语言中的“特权阶级”，即矿山中的资本家阶层。^[236]1789~1793年间，这一反抗力量增大而非减弱了，这是由于，消灭作为农村地租接受者的“贵族”和教会的结果常常只不过是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农村劳动者与农村剩余价值的受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237]

从这一角度来看，如何解释旺代（the Vendée）保皇党的叛乱和朱安（chouannerie）保皇派叛乱这一著名的争论难题就不那么困难了。甚至马佐里克（Mazauric）——他的解释接近于索布尔——也断言，它们“首先是反资产阶级的”。^[238]布瓦（Paul Bois）把这些反叛的关键起因归为参与者的被骗，即法国大革命没给农村耕作者带来实际利益。“按照这种或那种地契，他被迫继续交租。”^[239]蒂利不仅在农民状况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40]而且发现，反革命势力在制造业工人中也有牢固的基础。^[241]因此，为什么不明白易懂地将旺代保皇党的叛乱视为广大法国农民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一部分呢？

在城市地区，情况一般说来并没有很大区别。巴黎最为明显。在那

里，无套裤汉，即那些被压迫但并不穷困的工人，可以说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特别是耕地者）的城市对等人物。正像农民为反抗“特权阶级”（模糊地包括着贵族和资产阶级）而战一样，城市工人也为反抗“达官贵人”（aristocracy）而斗争。“达官贵人”一词不仅指贵族（noblemen），而且还指

富人和游手好闲之人，大地主和资本家，投机商，吉伦特派（Gerondins），克扣工人工资的人，那些头披长发、涂脂抹粉的人，那些与还没宣誓效忠共和国的教士交往密切的人，那些持有各种类型的温和政治观点的人，甚至还有那些只不过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242]

既然包括了这样一些人，就难怪无套裤汉与革命政府之间闹矛盾的时间至少像合作的时间一样长了。无套裤汉最为气愤的是指券（assignat）贬值^[243]和粮食价格上涨，这两者导致了政府与他们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和”。^[244]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满足他们的最高限价的要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如索布尔所说——“被迫的和强制的”。^[245]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像索布尔那样，谈论什么“无套裤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呢？^[246]费赫尔（Feher）的观点远较此恰当，他称巴黎人的直接民主为“现代早期反资本家的政治愿望的最明显的例证。”^[247]对于颁行禁止工人在工作中建立组织法（Loi Le Chapelier），并在热月（Thermidor）前夕痛斥工人的示威和罢工为“犯罪的伎俩”的政府，还能指望人们采取其他的态度吗？^[248]

一个枝节问题时常干扰关于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讨论，即无套裤汉可能不是无产阶级的性质。关于这一本质上的政治术语所指的职业类型，大多数分析家好像意见一致。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249]包括小店主、小商人、手艺人、帮工、工人、流浪汉和城市穷人。^[250]然而，他们的“核心份子”^[251]是工匠。有薪金的工人只是少

数，是“其他许多成份中的一种”。^[252]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人，索布尔也企图否认他们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地位，而称他们为“传统类型的工资劳动者”，^[253]其意思可能是，他们在小工场而不是在大工厂工作。

无可怀疑，从叙述的角度来说，这都是正确的。然而，隐含在这一叙述中的东西与真正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运动——其参与者有各种类型——可能有着明显差异。果真如此吗？后来所发生的大多工人运动难道不是这样吗？它们的力量和骨干来自一部分“经济境遇较好”一些的劳动人口，不论这部分人是技术上独立的工匠还是薪金更高的熟练的（和/或专业的）工资劳动者。对于除枷锁外真正无可丧失的人的寻找使我们接近了法国大革命时的贫民（indigents），接近今天的各种所谓的次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非熟练（时常是迁移来的）工人、收入仅敷支出的人、不断失业的人。如果我们要争辩——像素布尔那样，由于城市大众听从工匠领导（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总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他们“正在丧失”真正的“阶级精神”，^[254]那么，对于20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劳动阶级的阶级精神，我们又如何评价呢？

在作结论之前，我们再探讨一下最后一个争论：雅各宾派的性质和作用。这一问题的讨论比其他讨论具有更浓的当代政治的含意。对这一争论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雅各宾派”动不动就成为在苏联（U.S.S.R.）和其他地方当权的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者（Third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的代名词。这一几乎不加掩饰的代号式研究，使得对雅各宾派的实际作用的不偏不倚的分析变得十分困难。然而，看来有一种基本上的立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超越了另一方的阵线。或是雅各宾派（Jacobins）代表着某种与以前的掌权者——不只是旧政体（Ancien Régime）还是吉伦特派（Girondins）——根本上不同的东西，或是他们只是同一统治群体中一个更大的变异。相信这些不同的人们的阵营是索布尔和孚雷的大联盟，这是在其他观点上尖锐对立的代表人物。还包括费赫尔。其他阵营较小，但也包括这种完全不同的人物，如托克维尔

（Tocqueville），盖兰（Guérin）和伊戈涅特（Higonnet）。

马迪厄（Mathiez）相当明确地陈述了热衷于社会解释的人们的立场：

在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冲突是根深蒂固的，几乎达到了阶级冲突的地步……

6月2日（1793年）……超出了是一场政治革命。无套裤汉所推翻的不只是一个党派，而几乎是一个社会阶级。在贵族少数派与王权一起倒台后，现在又轮到大资产阶级了……从制宪议会开始，罗伯斯庇尔成为工匠和小业主阶级的最受欢迎的革命者，深得他们的信赖。他是无套裤汉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特别是在马拉（Marat）死后。[\[255\]](#)

然而，孚雷和李希特（Richet）却把大革命的转折点更多地划在1792年8月10日〔巴黎革命公社（Revolutionary Commune of Paris）的设立〕而不是1793年6月2日（吉伦特派代表被抓）。[\[256\]](#)他们还认为，转折点与政治价值，而不是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更为密切：

1792年8月10日之后，战争和巴黎民众的压力把大革命拖出了18世纪智慧和财富所追求的宏伟道路……在饶勒斯（Jaurès）如此深刻理解的大革命之外，还有一个米什莱（Michelet）本能地感受到的革命：充满痛苦与愤怒的下层人们的革命。为了与他们达成妥协，不得已，山岳派的政治家们屈服于他们的各种要求：征兵、控制物价和恐怖。但是，他们保留了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东西：权力。[\[257\]](#)

可见，在马迪厄看来，雅各宾时期是十分积极的，而在孚雷和李希特看来则是十分消极的。但除此之外，他们实际上一致认为，它与大革

命的“第一阶段”有重大区别，并且，雅各宾派与人民大众从根本上说是同一阵营的。

费赫尔提供了在同一视点上的一个稍微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他看来，雅各宾派的确在政治上代表着无套裤汉和其他人民大众。然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作为激进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而是作为“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份子。^[258]但是，在费赫尔看来，就像孚雷和李希特的看法一样，雅各宾的经历是消极的。对后者来说，它是消极的是由于它偏离（*derapage*）了启蒙运动已接受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议会式道路，即英国道路。与他的相比较，费赫尔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认识到这一现象背后的启蒙思想的整个传统：恰恰主张抵制英国的资本主义“解决办法”。^[259]如果在费赫尔看来雅各宾时期是消极的，那是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不应当仅仅是反资本主义的，并且，恐怖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260]

托克维尔从没有明确讨论这一问题，但是，他总体上强调连续性就排斥着关于大革命中途有一根本转折点的任何见解。要求平等和自由的冲突的感情在旧制度下已经存在，以后的斗争只不过是其延续，时起时落。“尽管大革命也许是激进的，但它所带来的变化要小于人们一般设想的”。大革命只不过十分快速地实现了“在任何情况下注定要发生——即使速度慢一些——的事情”。^[261]

在许多方面，盖兰（Guérin）是社会解释学派的正统成员。他认为，立法会议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并且正如吕德（Rudé）所说，“即使在雅各宾民主炉火纯青之时”，^[262]仍是资产阶级的。除此之外，在盖兰看来，即使那时，也不是什么“民主”，而是“资产阶级专政”，^[263]抵抗第二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罗伯斯庇尔不是这第二个革命的代理人，而是其最聪明的反对者。他“幻想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向‘靠力气讨论者（*bras nus*）’让步，但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屈

服”。[\[264\]](#)

伊戈涅特研究这些问题的立场（在客观上，如果不是主观上）更接近于科班-孚雷（Cobban-Furet）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的否定，而非更接近于社会解释，但他得出的结论仍然并非全然不同于盖兰。因为伊戈涅特视1792~1793年为“机会主义的反贵族主义”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大恐怖是一个战略时段……目的是把“人民”拖入资产阶级革命事业。他认为：事实上，（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对贵族的迫害是“机会主义的、策略的和煽动性的”，因为它本质上服务于使大众的不满偏离开他们的真正目的，即：贵族、官员（officiers）和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致力于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265\]](#)

对于雅各宾派，我们将作何结论呢？从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任何角度来看，我认为好像都很明显：托克维尔所主张的连续性决定着法国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平衡表。因此，关于雅各宾派、盖兰和伊戈涅特比其他人更正确一些。在我看来，把罗伯斯庇尔变成列宁的原形（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列宁）明显解释错了他的角色，正像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看法一样。而且，在我看来，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经不起这一事实的考验：像在西欧其他地方一样，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实现远早于1789年。

那么，法国大革命是什么呢？是无事空忙吗？肯定不是。法国大革命有三个内容，三个十分不同的内容。但这三者又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第一，它是形形色色的当权的资产阶级阶层的相对自觉的行动：以英国向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的飞跃为楷模，强制推行急需的法国国家的改革。以此为目的，它在拿破仑时期继续，并且，虽然改革完成了，但阻止英国霸权的目的没有达到。事实上，法国革命的进程增强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英国的领导地位。

第二，大革命造成了公共秩序崩溃的态势，足以引起现代世界体系

的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反制度（即反资本主义）运动，即法国“人民大众”的运动。作为这样一个运动，它当然失败了。但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运动，它已成为所有后来的反制度运动的精神支柱。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恰恰由于它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第三，大革命为整体上的现代世界体系提供了必要的冲击，以便把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最终纳入经济和政治现实的轨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最初几个世纪主要生存在“封建”意识形态的外衣之下。这既非异常也非意外。这种停滞是正常的，在结构上也是必需的。但它不能永久持续下去，而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它只是“西方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关键的一部分）——则标志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最后崩溃。知识分子——伯克（Burke）和梅斯特尔（Maistre）——的反抗可资证明。因为，只有在“保守”思想从根本上受到怀疑并且不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时候，人们才公开保护它。而在1789年之前，这情况还没有发生。^[266]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变化，也激励了許多人。但是，它并不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资产主义的时代的开始，而标志着它的完全成熟。

搞清了这些之后，我们现在回到在1792年到1815年这最后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中法—英争夺世界体系的霸权的斗争。这是一个通常在文献中被看作为康德拉基耶夫（Kondratieff）周期中经济扩张的A阶段。在对1790年到1810年间法国羊毛工业的研究中，沙萨涅（Serge Chassagne）告诫我们，这是一个“显露长期存在的弱点”的时期，同时又是“加速不可避免的革命”的时期。因此，他说，我们不要夸大这一革命时期的意外特征，并把它们与意义更为深远的“结构转化”混为一谈，由此谋求“抬高或贬低大革命”。^[267]虽然如此，但大革命难道仅仅是一个意外因素吗——甚至从狭义的经济内涵上说？迄今为止，我们的论据还使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在相当程度上，它的爆发恰恰是对世界经济中正在发生的结构转化做出的反应，并且，正如沙萨涅本人所指出，通过其

动力，将“加速”这一演变。^[268]如果不是这样，这些演变是否“不可避免”我们将永远不会搞清。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些演变的确发生了。

在法/英敌对的这一时期，与前面两个时期不同的关键性政策因素是双方国家政府实质上的自动卷入——它们处于敌对的双方，卷入了所发生的每次“革命性”斗争。严格说来，这一区别并非开始于1789年，而且开始于旧政体下的1770年代。^[269]正像我们所知道的，大不列颠最终在军事上称霸于全球。因此，的确可以这么说，“在普通有利的机遇（conjoncture）下，大不列颠在政治上，有时在军事上，创造了自己的机遇。”^[270]正是这些政治、军事胜利决定性地拉大了经济差距——在农业、工业、贸易和财政上。

在农业上，关键的区别是，在法国，农民在大革命中所表现出的政治力量减缓了（甚至中止了）所有权的集中过程。^[271]而与此同时，战争时期实际上加速了大不列颠的所有权集中。^[272]这样就增大了差距，并且，从耕地的产出上说，为英国创造了19世纪的长期的优势。^[273]

在工业上也同样，战争好像对至关重要的纺织业生产有明显影响。一方面，最近对于英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的资料的大多数校订表明，人们以前好像夸大了开始于18世纪80年代的“惊人加速”，^[274]取而代之的应当是谈论人们收入和总体生产率的“稳定加速”。^[275]不仅如此，以前人们的印象是，这一加速对于大规模工业^[276]和蒸汽动力^[277]起了主要作用，好像也过分强调了这一时期。最后，查普曼（Chapman）认为，这一区分——英国是“大量生产”的，法国是“时髦的、有设计意识的”——“在1790年以后找不到证据”。^[278]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到1815年，英国的棉纺织业已有“无可怀疑的增强的经济优势”，超过了整个大陆，特别是超过了法国。^[279]这是怎么回事呢？盖尔（Gayer）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推断英国的扩张“如果在和平时期本来不会那么快”。^[280]这也许是正确的，虽然战争

明显增加了棉纺织品与亚麻纺织品和毛纺织品相比的比例——由于在战时环境下，前者的原料供应更易得到。^[281]事实好像是这样，与其说英国的扩张与从前相比如此地加快了，还不如说法国的工业化步伐“明显放慢了”。^[282]

对时局的仔细研究可以确切地告诉我们在法国发生了什么，并且，推而广之，在法国控制下的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发生了什么。革命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可以再分为1790年到1800年的低潮时期，1800年到1810年的相对高潮时期和1810年到1815年的新低潮时期。^[283]第一个时期是大革命强加给自己的中断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英国强加的中断时期。在它们之间，拿破仑的英雄行为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英法间的另外一个区别应当到棉纺织中去找。在这一时期，英国正在或多或少地消灭纺织业中的厂外分发制度，纺织业行为也在城市化。但法国正相反，在这一时期，法国纺织业的确确正在创立厂外分发结构，它将延续到1860年。沙萨涅称这为“工业化的双重进程”，它把18世纪90年代的劳动分为“集中的相当资本主义化的”机械化的靠水力的纺的过程和在乡村的织的活动。^[284]

如果要问这种现象为什么要发生，施米特（Schmidt）提供了一条线索并恰恰与大革命的影响有关。施米特牢记，法国人所关心的事情之一是赶上大不列颠在机械化纺线上的新发展，因此，他指出，为了快速又廉价地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利用现存的厂房。在这一点上，教会财产的国有化是一笔意外的财富。革命政府免费或廉价地把相当数量的女修道院、教会学校和修道院转给制造商，以便安装纺线机器。^[285]然而，这种财产只能是随见随没收，而它们在农村地区最为常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厂外分发制度是“社会秩序的极好的保障”，^[286]它本身就是大革命中法国劳动阶级的反制度暴乱的对抗手段。

无可怀疑，对农业和工业有最大影响的因素是战争对国际贸易——

此时主要的发展部门——的影响。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英国“附加的工业产品”几乎有60%出口到国外。^[287]而正是在这时，曾在旧政体的最后几十年的法国经济发展中起过主要作用的法国出口贸易蒙受了“灾难性衰落”。^[288]原因有三。第一是由于大革命，^[289]第二是由于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的丧失，^[290]第三是由于拿破仑战役（Napoleonic wars）。

事实看来很明显了，正是战争使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品有“惊人的改变”，^[291]同时也“束缚了法国”，^[292]这样就为英国创造了“在世界市场中的永久的贸易优势”。^[293]当然，拿破仑曾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实际上，正是在他开始掌权的那个月（共和八年雾月），法国政府的一个国内备忘录就评论说：“英国的现状完全由于其贸易和信贷，如果其中之一被撼动，她就会毁灭，就会失败。”^[294]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拿破仑尽了最大努力，他却永远不能使对外贸易达到它在1789年的水平。^[295]

当然，拿破仑的政策实际上并非开始于拿破仑。这些政策开始于1791年恢复保护主义，在1793年的法国航海条例中得以延续，1798年又禁止运送英国商品的中立船只到达法国，只不过是在组织大陆封锁（Continental Blockade）的1806~1807年的柏林（Berlin）和米兰（Milan）法令中达到高潮。^[296]

封锁本身好像主要是针对英国棉纺织生产，也的确给它造成了“危害”，因为“由于过速发展而导致生产过量”。^[297]这一封锁特别地发生在拿破仑正经历第一次贸易危机的1799~1802年。^[298]封锁是一“严重的”危害，因为大不列颠的确是“脆弱的”。^[299]拿破仑企图在许多方面影响英国贸易：关闭制造品在欧洲的销路、封锁原材料进口、损害英国的财政信誉（通过造成支付的逆差，导致贵金属枯竭，进而导致纸币信誉的破坏）。^[300]

这些目的中唯一部分地实现的是关闭在欧洲的销路。^[301]由于拿破

仑的权力——用海军上将马汉（Captain Mahan）的尖刻的散文语言说——“遇到海洋时就像某些男巫的权力那样立刻中止了”，[\[302\]](#)阻止大不列颠原料进口的希望遂化为泡影。至于英国的财政信誉，它仍然是良好的。这是由于与大陆的财政联系实际上从没中断，[\[303\]](#)更不用说这一事实了：作为资金转移的避难所，英国是贵金属流入的稳定接受者，先是来自大革命，后是来自拿破仑的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304\]](#)英国的国家财政处于平衡，最初是由从扩大的对外贸易中获得的收入，[\[305\]](#)当战争花费猛增时，则通过借钱[\[306\]](#)和向农业部门强加不相称地抬高的税收负担，以此保护工业和贸易。[\[307\]](#)

虽然拿破仑是在用国家的权力来鼓励，事实上是津贴工业，[\[308\]](#)但英国人也同样积极地资助他们的工业，[\[309\]](#)并且在阻止法国的和大陆的工业获取原材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310\]](#)克劳泽特坚持认为，从经济意义上说，大陆封锁并非“没有实效”。它的确严重影响着英国的经济行为，但由于根本上的政治和军事原因，拿破仑不能把这一政策坚持到实现其目的。[\[311\]](#)一方面，在帝国内，法国人遭到了政治的、民族主义的抵抗。[\[312\]](#)另一方面，在这一有利的气氛下，英国通过大量的对外援助来买得同盟者。[\[313\]](#)在这一反压力下，拿破仑实际上早在1810年就开始在经济舞台上退却了。那时，他通过特许状，把法国港口重新向殖民地产品开放。通过这一手段，他的确把走私者的利润盈余吸引到国库，但这只会加剧欧洲的政治抵抗，因为它意味着以其他欧洲人为代价的隐蔽与英国的经济联系。这又增加了一个促进即将发生的同盟分裂的因素。[\[314\]](#)

这么说来，难道革命政府和拿破仑试图破坏大不列颠胜过法国的增长中的相对优势的努力是一极大的失败吗？也许不是全然的失败。克劳泽特认为，“到1800年，中欧受到了畜牧化的威胁，在19世纪则受到了印度命运的威胁。”[\[315\]](#)这一威胁没能成为现实。虽然如此，1815年的英国已比17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316\]](#)这一进步恰恰由于大革命和拿破

仑时代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

然而，还有一个因素应考虑在内，这就是法国和大不列颠的国家水平上的阶级斗争的进程。在法国，我们已经列举了在革命年代发生的城市大众的反制度暴动。我们知道，作为政治运动，不论忿激派（Enrages），或扎克卢派（Jacquesroutains）还是巴贝夫派（Babouvistes）都失败了，而且是决定性地失败了。^[317]人民大众迫使革命政府答应计划中的社会政策改革从没正式颁布。虽然如此，雅各宾的社会救济（bienfaisance）理想——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享受社会帮助的权利——却留下了“不容忽视的”政治遗产，^[318]这一遗产在拿破仑时代也感受到了。

拿破仑保留了大革命所实行的一切合法的改革，事实上还把它们编进了法典。^[319]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给工资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安全和权力。他们在拿破仑时期的状况并没改善，或许更糟了。^[320]但是，虽然如此，人民大众的经济状况在拿破仑时期大大改观了。拿破仑时代的特色是“工资的增长”。物质状况的这一改善是“无可怀疑的”，它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1817年的经济滑坡后，农民和城市工人追忆帝国为“一种黄金时代”。^[321]无可怀疑，这一机遇（conjoncture）给拿破仑帮了大忙。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的自愿的支持。在这里，比较一下法国和大列颠在同样一个机遇下的气氛是恰当的。

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可以被广义地称为英国政治派系的左翼的大量同情。在雅各宾阶段，虽然更温和的支持者开始背离，但仍有一忠实的团体，即所谓的英国雅各宾派，他们的政见实际上比雅各宾派的政见更接近于无套裤汉。他们的力量来自工匠阶级，他们坚持“彻底地反抗”王权、贵族、国家和税收。^[322]但战争一爆发，这些民间社团的成员就渐渐在政治上被“孤立”出更为主流的辉格（whig）团体。^[323]

虽然如此，政府仍发现他们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担心“任何形式的

民间自我行为”，因为它好像不仅威胁着传统权威，而且威胁着“政治经济的新思想”。^[324]结果是残酷的并且相当有效的镇压，以至于1790年代的英国激进分子“认为他们正在经历一恐怖时代”，^[325]其中包括中止人身保护权。

就控制劳工而言，在这一时期有两个最有意义的新政策：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补贴制度”（Speenhamland allowance system）和1799年的反合并法令（Anti-Combination）。斯品汉姆兰放松了古老的1662年的“安置法”（Act of Settlement）。关于这项法令的作用，罗杰斯（Thorold Rogers）断言，它已“并吞劳动者到他居住的济贫区，并把他变成农奴”。^[326]修订的济贫法（Poor Law）制度实际上提供就生活花费而言的最低工资（通过政府补贴），外加一家庭补贴制度。

关于斯品汉姆兰制度，有三个问题应该搞清。它对工人有好处吗？它对雇主（主要是农业劳工的雇主）有好处吗？它为什么被制定？鉴于它意味着即使遇上坏年景，工人也“可以靠它来避免马上挨饿”，^[327]因此显然对工人有些好处。它对雇主更有好处吗？通过补助事实上“标准以下的工资”，其结果是，在1795年到1824年间，它“压低了农业工资”。然而，布劳格（Blaug）主张，给雇主的这些补助金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地方税制度来支付的，两者之间“联系”紧密。^[328]

目的何在呢？它实际上所做的是通过在一个仍然相当农业化的国家推广未充分就业来阻止失业。^[329]如果要问为什么这样做，其目的好像明显地、间接地是政治性的，即“对人民起义的恐惧”，^[330]它是作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法国大革命的幽灵。在这方面，斯品汉姆兰制度成功了。^[331]然而，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它与反合并联结在一起，“但如果没有它，斯品汉姆兰制度本来会起到增加工资的作用的，而不是像实际上发生的那样降低了工资”。^[332]普鲁姆（Plumb）指出，反合并法同时做了两件事情：它不愿食物花费增加，压低了工资，但它也使得政

府能够“根除颠覆性宣传的一块最肥沃的土壤”。^[333]

因此，最后结果是，针对人民大众的政策在不列颠比在法国更苛刻，这可能是由于反制度暴动在法国——虽然被镇压——更有成效。在这方面，一个证据是在战争时期两个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和食物供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国工人感受到拿破仑时代是实际工资增长的时期，而英国在这一时期却经历了工资的下降。^[334]

当这种状况遇上食物匮乏的年景——比如1809~1811年——时，艰难的生活导致了严重的骚动，它在某些方面可以与革命前的法国所发生的骚乱相比，只不过它表现的不是反政府情绪，而是反雇主、反机器情绪，即卢德主义（Luddism）。^[335]然而，其最后结果不是，或者说还不是革命的高潮。^[336]在战争时期，尽管英国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但他们被控制住了，这部分是借由政府的镇压，部分是无可怀疑地（就像经常所宣称的那样）通过卫理公会派（Methodism^[337]），但同时也部分是通过把民族主义（反法）情绪拉入谋求政治稳定的轨道。^[338]英国统治阶级所需做的只是开始给他们的较低阶层一点小恩小惠。但这不得等待新的霸权时代的来临（并且，甚至那时，它的到来也是缓慢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英国终于真正称霸于世界体系。通过获取一系列沿海基地，英国巩固了自己的世界权力。加上英国已占领的地方，这意味着英国现在战略性地环绕了全球。1783年到1816年间，英国在大西洋（Atlantic Ocean）地区夺取了圣卢西亚（St.Lucia）、特立尼达（Trinidad）、多巴哥岛（Tobago）、巴瑟斯特（Bathurst）、塞拉利昂（Sierra Leone）、亚松森（Ascension）、圣赫勒拿（St.Helena）、库哈的特里斯坦岛（Tristan da Cunha）、戈夫岛（Gough Island）；在印度洋（Indian Ocean）夺取了殖民地角（Cape Colony）、毛里求斯（Mauritius）、塞舌尔群岛（the Seychelles）、拉克代夫群岛（Laccadive Islands）、马尔代夫群岛（Maldiv Islands）、锡兰

（Ceylon）、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槟榔屿（Penang）；在澳大利亚（Australasia）夺取了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新西兰（New Zealand）、麦夸里群岛（Macquarie Islands）、坎贝尔群岛（Campbell Islands）、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豪勋爵岛（Lord Howe Island）、查塔姆岛（Chatham Island）；在地中海夺取了马耳他（Malta）和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339]

不仅如此，在战争的过程中，英国已做到了结束荷兰昔日称霸的最后一个遗迹——她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角色。^[340]通过控制商业和金融，英国现在开始赢得大量不显眼的存款，包括海上商人、商业代办的所得、海外专家和殖民官员的汇款、投资的利润。它们足以补偿持续的，甚至扩大的贸易亏空——在英国出口贸易规模庞大的情况下仍存在的亏空。因此，英国能够维持持续的支付顺差。^[341]虽然她仍然维持极度的保护主义壁垒，^[342]但她已开始扮演作为“工业欧洲的教员”的新角色。^[343]

在这一时期，法国落后于英国工业这一舆论已成为认可的事实。19世纪30年代，一位法国实业家用英国工业有更强的专业化来解释英国的优势，这意味着英国能够更快、更廉价地生产。^[344]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夏普泰尔（Chaptal）当时的解释强调法国的低工资是机械化的障碍因素。^[345]然而，这一解释好像是可疑的，因为近来的资料表明，那时美国工业中的工人“达到了比他们的英国同行更高水平的生产率”。^[346]如果我们记住这一事实，它就更令人怀疑了：关于法国比英国工资率低的资料并不一定是对“收入的平均水平”的陈述——鉴于不同的家庭收入结构，“因此”，也不是“关于这两个国家的福利情况”的陈述。^[347]

英国在战争中的最后飞跃和法国的失败的明确结果之一是两个国家中相当不同的人口统计结构的出现。拉杜里有几分戏剧性地称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为“人口统计的伊斯兰世界”，^[348]意思是由于大革命，计划生

育在乡村广为流行。莱茵哈德（Reinhard）则更冷静地指出，法国的模式只不过是后来将在各地出现的结构“原型”。^[349]然而，麦克尼尔（McNeill）的看法却相当不同，他视拿破仑战争为“缓和”18世纪的“人口迅速增长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局势”的一个途径。^[350]

难道我们不能视1815年以后的人口统计结构为对经济和政治现实的适应吗？英国人已经得到了在世界市场中的头把交椅，需要扩大劳工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优势。为此，他们采取了如下手段：鼓励高自然增长率，移民入境，鼓励提高工薪的与非工薪的劳工的比例的办法。^[351]法国由于不能像英国那样靠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一般的商业服务的收入来养活扩大的劳工队伍，因此满足于通过“控制生育”来维持每个人头的相应的国内生产。^[352]假若是这样，这不应用人口的缓慢增长来解释缓慢的机械化，^[353]而应当相反。如果事实是这样，法国人有这种认识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在滑铁卢（Waterloo）之后的一个世纪，成功的重商主义，而非工厂制度……在英国的优势中占有中心地位。”^[354]

我们正是应当根据这一点来理解长期以来关于英国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的争论。实际上，这一争论主要围绕着1815年前后到1840年间发生了什么。阿什顿（Ashton）发起了1945以后的争论，他断言，鉴于价格的下降和英国进口的增加，“很难相信在这一所得中没有工人的份”。霍布斯鲍姆针锋相对地指出，鉴于死亡率和失业的增长，零散的证据“支持一个悲观的而非玫瑰色的观点”。哈特韦尔（Hartwell）也指出，改善“在战争期间缓慢发生了，1815年以后速度加快，1840年以后则变得迅速”。霍布斯鲍姆反驳说，虽然国家收入有改善，但是，有更公平的分配吗？泰勒（Taylor）继续了这一观点，指出，“劳动阶级的发展落后于整个国家的发展”。^[355]

调和转述的这些现行的经济主义的研究结果好像并不困难。许多材

料看来是难于辩驳的。物价大大降低了，虽然由于谷物法（Corn Laws），粮食价格的下降小于本应下降的幅度。^[356]受雇于工资劳动的人们的实际工资稍微提高了。但是，农业劳工的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失业工人和城镇半被雇用的工人也不一定如此。这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虽然他们的实际工资提高了，但工资劳动者和他的家庭的工作比从前延长了，强度也更大了。这就是说，在每个小时的实际工资不增加的情况下，每年的实际工资可以增加。最后，很明显，虽然物价下降，但棉纺织工业（还有其他工业部门）的利润却“良好地维持着”。同样很明显，这其中一个是实业家“享受着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357]物质上说，英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人所享用的这块馅饼的比例稍微增大了。但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这与这一断言恰好一致：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阶级所享用的这同一块馅饼的比例降低了。

我们应当记住，正是在这时，世界经济中正在发生着一个双向运动。新的区域被大量卷入世界经济，这些新边缘地区正在遭受着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然而，西欧广大地区（特别是法国、比利时、西部“德国”和瑞士）和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北部各州却正在紧随大不列颠之后，走向“工业化”，并且将能够在19世纪中期成为（重新成为）强大的中心地区。与此同时，它们的劳动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可能也为他们赢得了实际生产生活水平的小的提高。

这两个发展都将是后面详细分析的内容。但是，按照惯例，这里需要有一些初步的评语，以结束法英比较。在1815~1840年这一时期，法国能够特别地使它的纺织工业“现代化”，并因此“摆脱”它与英国相比较的“落后局面”。^[358]但是，要密切注意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供应于什么市场。在生产场所乡村化——正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同时，法国致力于高级纺织品生产的专门化。^[359]关键原因之一是市场的规模。由于被剥夺了世界，法国不得不重建，以供应法国需要，而通过调整结构和工业重新布置可以做到这一点。^[360]因此，虽然这是边缘地区非工业

化的时期，但在欧洲，这一“恶魔——并非不著名——则没有那么可怕”，这是因为那些国家仍强大到足以进行积极干涉，以抵抗这一威胁。^[361]但是，英国不需要欧洲的非工业化不也是事实吗？答案可能正好相反。鉴于边缘区市场的扩大，英国将需要紧随其后的工业化国家作为第二个层次，以弥补随着她的技术新发展将留下的空隙。或许它将至少在50年以内起作用。

然而，我们必须暂时以1830年（或1832年）这一政治转折点来结束这段历史。在法国，1830年7月“大于一场骚乱，但肯定小于一场革命”。^[362]在许多方面，它之于法国大革命的作用正如英国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之于英国革命（English Revolution）的作用。它代表着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妥协，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妥协结束了此前的革命的极端暴力所引起的思想冲突的酷烈性。它保证了统治上层的内部冲突从此以后将以“正常的”（如果不总是宪法的）政治形式进行。通过这些，它实际上把工人从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概念依赖中解放了出来。工人们“拣起了大革命的语言，并加以改造，以适合他们自己的目标”。^[363]

1830年的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在大不列颠马上有了回声，并导致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364]实际上，那里1832年的暴力反抗“只是在第11个小时才被避免”。^[365]这样，1832年的改革法案结果成为1688～1689年革命的一种思想结局，实业家也加入了这一政治运动，他们以前被排除“不是由于他们的财产是工业性的，而是由于这一财产微不足道”。^[366]它在术语上解放了工人阶级。现在，英国工人能够开始谈论他们长久以来所从事的有阶级意识的活动。

[1] “1762年，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注定了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失败，就像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Peace of Pyrenees）注定了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的失败一样” [德希奥（Dehio），1962，117]。

[2] 拉布鲁斯（Labrousse）（1954，VII）。在较早的一部著作中，拉布鲁斯表述得甚至更精确。他谈到了“人们所说的法国在1733年到1817年之间的长期的繁荣”（1944，XI）。类似地，莱昂（Léon）（1966，20）谈到了摄政时期（Re-gency）的结束（1723年）到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的开始（19世纪30年代）之间的100个“决定性”年代。

[3] 索布尔（Soboul）（1976a，4）。奥布莱恩（P.K.O’ Brien）说：“我们没有关于增长的生产的真正资料；我们只有价格资料”（私人书信）。拉布鲁斯（Labrousse）在他的关于价格的经典性著作中提供了法国的价格指数，1733年为100，1789年为192，1816年为254，还有欧洲的与此类似的价格指数，分别为100，177，269。他认为，从300年前的那次运动以来，价格的这一上涨“在广度上……是无与伦比的” [拉布鲁斯（Labrousse），1933，143~144]。塞伊（Sée）认为它是“16世纪的著名上涨的翻版”（1933，VIII）。并且参见吕提（Lüthy）（1961，12）。据艾贝尔（Abel）（1973，269~270）计算，1740年到1810年，法国的小麦价格上涨了163%，英格兰上涨了250%，而总体上的欧洲价格至少涨了一倍，这样，法国就成为一个相对低通货膨胀的国家。迪恩（Deane）和科尔（Cole）（1967，14）谈到了大不列颠的“价格水准上涨的趋势”，认为它“开始于这一世纪中叶稍前”，但他们把“强烈的通货骚动”这一描述留给了1790年代。

[4] 莫里诺（Morineau）（1978，386）。

[5] 参见达尼埃尔（Danière）（1958a，318~319）。然而，兰德斯（Landes）主张（1958a，335），收成对商业行为的这一作用局限于“极端”（即饥荒）形势下。

[6] 在拉布鲁斯（Labrousse）的著作和其他地方，对于这一现象有许多描述。最简明的陈述可能在拉布鲁斯，1945，IV-V。

[7] 当然，这是拉布鲁斯（Labrousse）著作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经验主义的发现。特别是参见拉布鲁斯，1933，II，379，399，444。

[8] “法国农业的真正危机，在路易十五（Louis XV）统治结束时，在整个路易十六（Louis XVI）统治时期偶尔地，[是]变糟的气候环境导致的危机” [莫里诺（Morineau），1971，67；并且参见1969a，419]。同时也参考下面关于“好天气”的问题。

[9] 维拉尔（Vilar）（1974，40）。

[10] 拉布鲁斯（Labrousse）（1944，XVI）。

[11] 参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80，特别是259~275）。

[12] “对18世纪中叶以前的技术变革予以轻描淡写，相反地，对于那一世纪后半期的新技术予以浓妆艳抹，这一习惯已有很长的历史” [琼斯 (Jones)，1970，49]。

[13] 迪恩 (Deane) 说，英国的日期一般在1740年代，并且即使在1780年代以前这一增长是“适度的”，但事实仍然是：“好像是开始于1740年代的增长并没有倒转” (1979，214)。钱伯斯 (Chambers) 说，英国“人口统计的革命”的日期一般在1750~1800年，并且即使塔克 (Tucker) (1963) 的这一说法——这是对1720~1740年的“低增长率”的补偿——是正确的，“随之而来的对人口统计和经济形势的侧面影响也是深远的” (1972，122)。类似地，里格利 (Wrigley) 和斯科菲尔德 (Schofield) 的图表 (1981，207) 显示，从1750年起有一突然上升 (但开始于1740年，见210~211页)。至于法国，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的总体观点 (1975，364~365) 是：“1717年后，情况开始好转 (重新开始) (reprise)，很快就有一个突然上升 [突飞猛进 (essor)]！”他称1737~1745年是“一个暂停，暂时的停滞”，此后，增长“在1745~1750年间重新开始”，并很快“冲破了最高限度”。图坦 (Toutain) 说，“早在大约1720年，[法国] 人口就在增长” (1963，17)。然而，正像赫伦纳 (Helleiner) (1965，86) 提醒我们的，这并非“无与伦比”的，只不过可以与以前的人口膨胀相比。里格利 (Wrigley) 和斯科菲尔德 (Schofield) 有同样的观点 (1981，211) 正像莫里诺 (Morineau) 一样。后者还怀疑“18世纪的人口统计增长达到了已被认定的水平” (1971，85)。弗林 (Flinn) (1981，76) 显示了类似的怀疑，他强调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整个时期与“大多欧洲国家的增长率实质上大于以前”的19世纪的对比。

[14] 弗林 (Flinn) (1981，18)。

[15] 参见弗林 (Flinn) (1981，21)，李 (Lee) 和斯科菲尔德 (Schofield) (1981，27)。然而，里格利 (Wrigley) 和斯科菲尔德 (Schofield) (1981，247~248) 指出，虽然这在英国是真实的，但在其他某些国家——如瑞典——死亡率的下降起了主要作用。法国被认为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例子。哈巴库克 (Habakkuk) (1953，133) 也说，“在原工业化社会”最大的可变因素将来自结婚年龄和因此而对出生率的影响。

[16] 见里格利 (Wrigley) (1969，181)。以科里顿 (Colyton) 和肖努 (Chaunu) 关于诺曼底 (Normandy) 所作的论证为基础的论断。肖努总结了一场讨论，即新奥古斯丁派 (New-Augustinism) 赞成一种禁欲的马尔萨斯主义 (Malthu-sianism)，即将射精中断法视为一种“较小的罪恶”。除此之外，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69，1600) 提醒我们，在残酷的饥荒 (17世纪有许多) 与暂时的绝育之间有生物上的联系。“好像是生物体压制了自身的再生功能，并且，如果代价是牺牲生命功能，这就成了一个奢侈品。”

[17] 迪恩 (Deane) (1979，49)。关于法国的著作并没有直接承认这一点，但他的确谈到了饥荒的结束。参见穆夫里 (Meuvret) (1971e，275)。

[18] 像通常那样，这个日期有许多争论。明盖 (Mingay) (1956，324) 把它定在1730~1750年，但特别地到1745年。钱伯斯 (Chambers) 谈到了1720~1750年 (1972，143)，利特尔 (Little) (1976，5) 则提到了“第二个25年”，但同时也提到了1730年代和1740年代。然而，奥

布莱恩 (P.K.O'Brien) 说：“农业价格没有下降，在1740年代以前，有的只是稳定。约翰 (John) 的观点没有资料依据” (私人书信)。

[19] 克拉夫茨 (N.F.R.Crafts) (1981, 3) 断言：“农业……明显不是一个衰落的部门。事实上，在这一世纪的第二个25年，增大的需求给它有限的供应造成的压力已提高了农业价格——相对工业价格而言。”类似地，科尔 (Cole) (1981, 48) 主张：“新的估算无可怀疑地为琼斯 (John Jones) 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量的证据……在18世纪早期的总体上的经济增长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是主要的因素。”然而，关于这一时期之于“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伊波利托 (Ippolito) 有保留意见 (1975, 311)。

[20] 明盖 (Mingay) (1956, 324)。

[21] 利特尔 (Little) (1976, 18~19)。

[22] 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9, 173~174) 称1755年为“价格比率的转折点”。他特别提到，欧洲的小麦平均价格在1760~1790年比在1721~1745年高出30%~40%，并“在大约1660年以来的非同寻常的长期恒定价格之后”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除外) 导致了一个危险的增加。奥布莱恩 (1977) 把上升的日期定为从1745年开始。

[23] 艾贝尔 (Abel) (1973, 281)。博尔德 (Bourde) (1967, III, 1571) 把法国农学手册“大量出现”的第一个时期定在1750~1770年。

[24] 尤其参见迪恩 (Deane) (1979, 38)。

[25] 哈夫顿 (Hufton) (1980, 23)。以前已经引证过了，在这一问题上，首要的争论者是柯立芝 (Kerridge) (1967) 和莫里诺 (Morineau) (1971)。古瓦 (Goy) 和黑德-柯尼希 (Head-König) 的修订压低了图坦 (Toutain) 对18世纪法国农业生产率的估算 (1969, 263)；同时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395)。奥布莱恩 (O'Brien) (1977, 175) 没有发现英国在1745~1820年期间的“推动社会变化的能力”“如此这般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提醒我们，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发明报酬递减律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的时期。类似地，特纳 (Turner) 指出，发生的这种生产率的变化在1770年以前所起的作用如此巨大，它因此使得人口统计的上升成为可能，而不是对这一上升的反应。他主张，“按更大的产出计算，[英国的] 生产率从大约1770年或者更早开始，直到1830年以后始终处于稳定，而这是在人口统计的革命时候” (1982, 506)。

[26] 不能推断，所有封建权利的再声明都是法律上的。塞伊 (Henri Sée) (1908, 181~184) 早就清楚地说明，这一再声明在多大程度上招致了法律上的滥用。

[27] 福斯特 (Forster) (1963, 684)。

[28] 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434~437)。迈耶 (Meyer) (1966, II, 1248) 甚至在布列塔尼 (Brittany) 这样的封建特权的堡垒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实际上，确

切地说，领主权利（seigniorial rights）不论如何之大，它们在贵族的岁入中仍然只占相当小的比例。‘封建’制的重要性更多是在于非寻常的‘税收’（额外收入：土地转让和出卖，再买回）（casuels: Lods et ventes, rachats）和采邑上的什一税的高额代价，最重要的是，在于它给土地的特有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专横的社会权力。”

[29] 参见拉布鲁斯（Labrousse）（1933, II, 361~362）的总结。

[30] 哈夫顿（Hufton）（1980, 26, 28）。

[31] 这一用语和比例的估算是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 434）中的。

[32] 古德温（Goodwin）（1965a, 358）。同时参见格鲁德（Gruder）（1968, 226, 228）：“这看来是可能的……在 [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资产阶级，特别是富有的大资产阶级，并没有被与位于他们之上的人们切断关系，也没有被与职业的和社会的发迹切断联系。……社会地位并非不可改变，出身不再注定前途。如果有成功所需要的手段——能力和金钱，[资产阶级] 可以在被认可的道路发迹。并且，他也想成为贵族。”
18世纪英国的状况如此地不同吗？富裕的平民变成了议会议员，从那里，他可以期待被封爵。“到1784年，下院普遍被认为是通往上院的升至高层之路” [纳米尔（Namier），1957, 14]。

[33] “（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势力的增长大于领主贵族——在（领主权利）方面；大于教会——在（什一税）方面；大于国家——在（税收）方面。” [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 584]。

[34] 阿伯德姆（Aberdam）（1975, 75）。不仅如此，由于包税人（fermier）能够再包给别人，这人又可以再包出，因此，“包税人”是一个大范畴。

[35] 这还没有说明他土地的质量。正像莱昂（Léon）（1966, 18）针对东南部法国所指出的，大土地所有者有“最好的种植谷物的土地，特别是最好的葡萄园和牧场，这些是最可观的利润的所在地”。

虽然，我们应时刻牢记布洛赫（Marc Bloch）关于领主阶级的打算的慎重话语（1930, 513）：“……谈论领主阶级——设想他们是一个集团——的农业政策将是十分武断的；这会鉴于它的利益而认为它行动一致，认为他观点成熟……，认为他有阶级意识……而实际上他还没有那一水平。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某些总体的趋向。”

[36] 博尔德（Bourde）（1967, I, 538, 注1）指出，包含到邻近教区放牧牲畜的互相权力的共同牧畜权（droit de parcours），其首要特征是，它是“公共牧场（vaine pâture）的场所的扩大——通过（两个教区）间的互相同意”。关于它在“判例汇编”（Répertoire de jurisprudence）中的法律定义，参见塞伊（Sée）（1913, 265）的引用。

[37] 参见布洛赫（Bloch）（1930）。

[38] 福斯特 (Forster) (1970, 1610)。“不太成功”并不意味着地租没有增加。但是,英国地主更多地采用圈地作为增加他们的地租总额的方法。参见明盖 (Mingay) (1960, 377)。同时参见帕克 (Parker) (1955), 他愿意强调地租增长的渐进性, 强调它不具备构成人们时常断言的大变动现象的水平。

当然, 法国官僚机构的权力正在增加, 但没有达到大不列颠的水平。虽然法国国家不能够 (不像英国国家) 进行大量圈地, 但它的强大足以收回以前证明领主征收义务税为正当的许多功能。通过这样“破坏”领主作为封建义务税的征收者的功能的“稳定性”, 它有助于把领地投入“交易” [鲁特 (Root), 1985, 680~681]。

[39] 福斯特 (Forster) (1970, 1614)。

[40] 柯立芝 (Kerridge) (1967, 24) 在诋毁它的特异性方面走得最远。“总体来看, 可以这样大致估计, 1700年, 东部 (East) 和西部 (West) 只剩下1/4土地需要圈占。议会圈地的极端重要性这一古老传说应当被扫进垃圾堆。”

[41] 这一制度比人们从前所认为的有更大的“适应性”, 允许更多的“发展”, 并且, 遭受了更多的“增长中的分化和兼并”。参见耶林 (Yelling) (1977, 146)。达尔曼 (Dahlman) 坚定地认为, 只要生产主要为满足附近市场, 这一制度就有经济合理性。他提醒我们 (1980, 178), 车轮是一个重大发明, 但它不是用于雪地运输。“敞地制的采用, 是为了解决在外部极少发生变化并因此相当稳定的条件下, 利用同样的资源生产两种不同的产品 [农耕的和畜牧的] 这一难题。”

[42] 早期圈地发生在“那些最不适于耕作农业的地带” [耶林 (Yelling), 1977, 58], 因此, 在这地方, 要想使生产达到一既定水平, 就需要更大的技术和组织努力。

[43] 达尔曼 (Dahlman) (1980, 154)。“一旦专门化变得有利可图, 更大量的产出成为可能, 圈地的耕作方式就被采纳了” (178页)。科恩 (Cohen) 和韦茨曼 (Weitzman) (1975, 321) 虽然遭到了达尔曼的批判, 但从根本上说, 他们提供了类似的解释: “圈地运动的主要动力在于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获取利润。”他们视这一现象为“与中世纪价值观念的决裂” (304页), 大致开始于这时, 但这与早期圈地的有力证据形成对立。琼斯 (E.L.Jones) (1981, 84) 的解释也朝同一个方向: “圈地的主要动力可能是外部的—— [18] 世纪中叶以后农业产品价格的相当快速的提高……生产效率的进步容易被夸大。”最后, 艾贝尔 (Abel) (1973, 283~284) 同意这一观点, 指出: “当时人一致认为, 圈地异乎寻常地增加的直接动力是谷物价格的提高……法国的情况与此相同。”

[44] 迪恩 (Deane) (1979, 44); 同时参见希尔 (Hill) (1967, 269)。

[45] 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70, 698)。

[46] 哈夫顿 (Hufton) (1980, 31)。

[47] 例如, 可参见阿什顿 (Ashton) (1924, 104) 关于18世纪早期英国铁工业的论

述：“以这种方式在国内市场出售的英国铁与外国产品竞争。鉴于铁的需求……极度无弹性，这一竞争被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因此，难怪苦不堪言的英国铁工业老板是十足的保护主义者。”铁供需的非弹性将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而改变。

[48] 马尔切夫斯基 (Marczewski) 谈到了1715年以后的增长 (1963, 137)，福林 (Fohlen) 则谈到了1715~1720年以后的增长 (1973, 12)。莱昂 (Léon) (1954, 200) 关于多菲内 (Douphiné) 则提到了1732年，它接近于拉布鲁斯给法国经济扩张的重新开始所定的1733年这一一般性断限。

[49] 迪恩 (Deane) 和科尔 (Cole) [1967, 58; 还有迪恩 (Deane), 1973a, 170] 已成为断限英国“工业革命”从1740年代开始的领头的鼓吹者。他们已遭到了批评。批评者认为，1740~1780年的工业发展是相当微弱的，他们愿意强调——像罗斯托 (Rostow) 那样，1780年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起程”的时期。参见怀特海 (Whitehead) (1964, 73)。

[50] 哈特韦尔 (Hartwell) (1968, 11~12)。

[51] 哈巴库克 (Habakkuk) (1955, 150)。

[52] 克鲁兹 (Crouzet) (1967b, 147)。戴维斯 (Davis) 的资料 (1979, 21, Table10) 表明，1699~1701年到1784~1786年间，英国向北欧和西北欧出口羊毛商品的总额持续下降。此后又开始回升，而这发生在总体上的毛织品出口增加的大环境之下。同时参见布特尔 (Butel) (1978c, 112~113) 关于德国和北欧是法国对外贸易的“重心”的论述。迪恩 (Deane) 和科尔 (Cole) (1967, 86) 特别指出，在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有明显的转移。在世纪之初，4/5出口到欧洲，而在世纪末，则只有1/5。原因很简单——“[英国的] 欧洲竞争者的保护性市场”。相反，英国在北美，西印度和爱尔兰的贸易则“形成了本质上的封闭体系，竞争者被严格地排除在外”。

[53] 参见戴维斯 (Davis) (1973, 306)。英属北美市场特别重要，这是鉴于：1700年到美国革命 (American Revolution) 开始时的1775年，那里的人口增长了10倍，那些殖民地盛行高工资。参见布特尔 (Butel) (1978a, 64)。爱尔兰是英国更重要的一个市场，类似于英属北美。参见戴维斯 (Davis) (1969, 107)。

[54] 米尔沃德 (Milward) 和索尔 (Saul) (1973, 104) 主张：[1713年的乌特勒支条约 (Treaty of Utrecht) 之后]，“欧洲与其他大陆间的贸易扩张空前重要，这一贸易的发展大大快于欧洲范围内的贸易。”

[55] 参见迪恩 (Deane) (1979, 55)

[56] 克鲁兹 (Crouzet) (1980, 50)。不能确切知道的一个因素是走私将对此有什么帮助。科尔 (Cole) (1969, 141~142) 主张，“英国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两个分支在18世纪倾向于向相反的方向运行”，因此，允许走私将降低市价摆动的记录。他估计，走私商品占总额的1/4或1/5。穆伊 (Mui) 和穆伊 (Mui) (1975) 对科尔的资料提出异议。无论如

何，我们没有与法国的比较。

[57] 布罗代尔 (Braudel) (1984, 347) 从他的图像得出结论, “到17世纪末, 法国实际上正在走向拥有一个紧密交织的网络, 这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一个民族市场。”类似地, 蒂利 (Louise Tilly) 发现, “早在17世纪末, 法国就有一个 [谷物的] 民族市场的倾向” (1971, 43)。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8, 389) 认为, 法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是18世纪农业扩张的主要因素 (1975, 398)。然而, 莫里诺 (Morineau) (1978, 379) 告诫我们, (鉴于“艰难的、花费巨大的长途运输”), 价格的划一与其说预示着统一的市场, 还不如说预示着“交易的封锁, 即他们的居民创造的地方供应来源的经济保护区”。同时参见博舍 (Bosher) (1965, 577~578)。

[58] 就运河而言, 英国开凿得更多, 因此每人或每公里的可航行水域远远领先于法国。然而, 法国运河更代表着工程技术的成就, 特别是朗格多克 (Languedoc) 运河, 它“为工业发展的下一个时期发生的欧洲运河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打下了技术基础” [斯肯普顿 (Skempton), 1957, 468]。关于英国的著作从运输时间的缩短等因素造成的贮存花费的节约和盗窃的减少这一角度来强调运输的“革命”。参见迪恩 (Deane) (1979, 85~86); 同时参见吉拉德 (Girard) (1966, 216~217) 和巴格韦尔 (Bagwell) (1974, 25, 43, 55)。肯努 (Leta Connoux) (1909, 282~283) 在反观法国的水路运输后指出, 节约被夸大了, 运输和抢劫中的损失在分析家的计算中时常被低估了。运河和河流好于陆路; 吉拉德 (Girard) (1966, 223) 认为水运费用下降了1/2到3/4。然而, 阿尔贝洛 (Arbellot) (1973) 特别强调18世纪法国陆路的极大改善。关于法国各地的运输革命, 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397)。

[59]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80, 85~90)。

[60] 参见蒂利 (Tilly) (1983, 126~128) 关于1650年后整个西欧农村地区非农业劳动的增长这一现象的总结。这一增长到如此的程度, 以至于“18世纪欧洲乡村的重要地区充满了非农民, 充满了制造业的嘈杂”。

[61] 钱伯斯 (Chambers) (1940, 119)。他坚决主张 (123页), “最小的所有者”实际上增加了。他以“这一事实”作为证据: “那些以前被认为没有义务交土地税的公地居住者 (squatters) 和茅舍农 (Cottages) 现在第一次加入了此行列。”

[62] 莫里诺 (Morineau) (198, 385); 同时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584)。

[63] 参见吉尔博 (Gilboy) (1930, 612~631; 1975, 7, 16~17), 塔克 (Tucker) (1975, 32), 迪恩 (Deane) (1979, 31), 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33, II, 491, 600, 610) 和莫里诺 (Morineau) (1978, 377)。

[64] 实际上, 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44, XVIII) 正是这一观点: “如果说实际工资

[在18世纪下降了]，那么，工资劳动者的数量增加了，并且，随着总体上的生产资本的[扩大]，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增多了。”

[65] 科尔 (Cole) (1973, 341~342)；参较明钦顿 (Minchinton) (1969, 16~17)。“平衡的”观点——它既是国内的，也是国外的需求——已变得相当流行。参见兰德斯 (Landes) (1969, 54)、科尔 (Cole) (1981, 45) 和克拉夫茨 (Crafts) (1981, 14)。然而，问题不再是法国和英国与边缘地区的对比，而是互相之间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造成的？

[66] 布罗代尔 (1984, 575~578)，他引证了塞里奥尼 (Accarias de Sérionne)；同时参见弗兰克 (Frank) (1978, 214~218)。迪恩 (Deane) (1979, 10) 在比较177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生活水准时，直接地验证了塞里奥尼的分析。“好像无可怀疑，普通英国人令人羡慕地富于他的法国同行。”不能在欧洲大陆竞争是英国拥有的这一国内市场优势的消极面。

[67] 转引自迈耶 (Meyer) (1979a, 211)。迈耶说，法国的政策是努力实现公海在战争期间的中立。但是，中立目标本身就是军事虚弱的标志。

[68] “巴黎和约确立了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西班牙除外——的地位…… [然而]，英国超出法国的殖民和海上优势……还 [不是] 不可战胜” [安德森 (Anderson)，1965, 252]。

[69] 转引自普鲁姆 (Plumb) (1956, 104)；同时参见巴尔 (Barr) (1949, 195)。如果人们不理解皮特和伦敦城商人的观点怎么可能没占上风，人们必须牢记，有其他利益在起作用。琼斯 (Jones) (1980, 222) 评论说：“英国商人和在西印度的英王特许领主对于吞并在加勒比海的占领地不感兴趣，因为结局将是保护性外国市场上的竞争的增加；马提尼克岛 (Martinique) 和瓜德罗普岛 (Guadeloupe) 能够削低英国殖民地指令的价格而与他们抢生意，古巴 (Cuba) 潜在地成为一个甚至更有力的大规模生产者。”

[70] 普鲁姆 (Plumb) (1950, 115)。

[71] 参见麦克尼尔 (McNeill) (1982, 157)；安德森 (Anderson) (1965, 254ff.)。但是，法国的外交地位已由于1763年的失败而大大削弱了。“在欧洲宫廷的庆典场合，英国外交代表的被邀和款待都优于法国——七年战争的结果，这一行为有时会引发异常的屈辱感” [比米斯 (Bemis)，1935, 9]。

[72] 参见拉姆齐 (Ramsey) (1939, 183)。当舒瓦瑟尔 (Choiseul) 宁愿冒着重新开战的危险而不愿割让福克兰群岛 (Falklands) (马尔维纳斯群岛) (Malouines) 给英国——因为这一群岛控制着进入麦哲伦 (Straits of Magellan) 和合恩角 (Cape Horn) 的通道——时，他于1770年被驱逐了。参见吉耶姆 (Guillerm) (1981, 11, 451)。

[73] 布尔 (Boulle) (1972, 109)，他主张 (93页)：“由于奴隶贸易，廉价和大宗——现代工业两个发动机——在南特可以得到。奴隶贸易的寡头政治集团积累的资本也是同样。”

[74] 布尔 (Boulle) (1972, 103, 106, 108, 111)。达代尔 (Dardel) (1963, 52) 转述了鲁昂 (Rouen) 的同样的经济逆转, 但把1769年作为转折的日期。伯杰龙 (Bergeron) (1978e, 349) 说, 这一观点——法国的海上经济对以工匠和农民为支柱的真正法国来说是边际的——是“简单化者”的观点, 他坚持认为两者之间在18世纪后期有“多样的、生机勃勃的结构联系”。但也正由于这种联系, 大西洋法国遭到的破坏会在其他地方有惨重的反响。

[75] 莫里诺 (Morineau) (1980b, 298)。吕提 (Lüthy) 称七年战争对法国财政的作用为“18世纪的1914年”。转引自伯杰龙 (Bergeron) (1978b, 121)。同时参见普莱斯 (Price) (1973, I, 365), 他视七年战争为“18世纪法国财政史的转折点”。

[76] 七年战争本身已成为此前的世界贸易扩张的原动力, 因为海外军队的后勤工作本身就成为增加出口的重要原因。这一后果有些被带到了和平年代。戴维斯 (Davis) (1969, 114) 不知道“[1763年以后]的时期[英国]扩大的向美洲出口在多大程度上根源于在殖民地维持的规模远大于战前卫成军的需求”。

无论如何, 仅有这一遗留下来的后果是不够的。商业有所下滑, 虽然关于这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 [科尔 (Cole), 1981, 39~43; 克拉夫茨 (Crafts), 1981, 16; 克鲁兹 (Crouzet), 1980, 50~51; 费舍 (Fisher), 1969, 160; 弗兰克 (Frank), 1978, 170~171] 还是仅仅开始于1770年 [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44, XXIII; 戴维斯 (Davis), 1979, 31~32] 还有一些争论。

[77] 哈巴库克 (Habakkuk) (1965, 44)。同时参见科尔 (Cole) (1981, 41), 他设想, 如果英国是封闭型经济,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不是在成为工业国的道路上快跑 (1800年), 而是还没有开始这一征程。”

[78] 布洛赫 (Bloch) (1952, I, 226)。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 (1930, 381) 中, 布洛赫强调了同一主题: “胆怯明显是旧政体 (Ancien Régime) 的最后几年的农业政策的权威的注脚。”关于农民抵抗是“困难”之一, 参见戈蒂埃 (Gauthier) (1977, 59~60)。

[79] 参见萨顿 (Sutton) (1977, 256): “对照荒地总面积, 对照法国总体的农业生产, 额外的300~350, 000公顷只能标志着政府的土地清理政策的十分有限的成功。”同时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582), 他说, 在18世纪法国, 不像在英国和普鲁士 (Prussia) 那样, 农民的小块土地 (小块土地) (Lopin) 只是“边沿地受到侵害”。然而塞伊 (Sée) (1923b, 49; 参较1908, 1913) 的叙述则表明, 尽管政府干预减缓了, 但领主的兼并“却是越靠近大革命的年代越加严重”。

[80] 拉杜里 (1975, 440; 同时参见415~416); 并且参见布洛赫 (Bloch) (1952, I, 229~235)。

[81] 即使公地没有被分割, 这也是正确的, 因为正如布洛赫 (Bloch) (1930, 523) 特别指出的, “几乎在任何地方, 公地都不能满足需求。”同时参见穆夫里 (Meuvret) (1971b, 179) 关于肥沃土地上的互惠的令人怀疑的好处的论述。因此, “在他们的一致抵抗中, [劳工

(laborers) 善于耍政治手腕的人 (manoeuvriers)] 在各地构成了农村反抗运动的突击队” [布洛赫 (Bloch), 1952, I, 228] ; 同时参见塞伊 (Sée) (1923b, 76) 。

[82] 参见布洛赫 (Bloch) (1930, 531) 和穆夫里 (Meuvret) (1971b, 179) 。

[83] 参见布洛赫 (Bloch) (1952, I, 230) 。他特别提到, 大土地所有者特别强有力地维护公共牧畜 (droit de parcours) 。他谈到了弗朗什孔泰 (Franche Comté), 在那里, 他们无礼地得到了在公地和休耕地上牧养几乎没有限制的牲畜的权利。他这样评论: “这些农田反而变得更有利可图, 因为经济的转型保证了牲畜的饲养者有贵重的产品, 与此同时, 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敞开了大门。”

穆夫里 (Meuvret) (1971, 195~196) 则坚持认为, 应该区分在休耕地上的和在耕地上的公共牧场 (vaine pâture), 因为实际上, 休耕地是用于放牧绵羊, 耕地则是放牧有角牲畜。鉴于大土地所有者有大片的羊群和有利可图的羊毛, 废除休耕地上的公共牧场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84] 参见穆夫里 (Meuvret) (1971d, 196) 。

[85] 布洛赫 (Bloch) (1952, I, 236) 。

[86] 卡普兰 (Kaplan) (1976, I, 93) 列举了当时一个著名的布雷顿 (Breton) 的治安法庭法官, 此人用明显类似于先锋派的语言说, “敕令” (Edict) 标志着法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

[87] 卡普兰 (Kaplan) (1976, I, 145, 163) 。

[88] 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33, 122, 124) 。

[89] 卡普兰 (Kpalan) (1976, II, 687) 。谷物自由主义也得到了国王的顾问们的支持, 他们认为, 它将导致价格上升, 因此会带来更高的税收。然而, 这“证明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哈夫顿 (Hufton), 1983, 319] 。

[90] “面对重农主义者杜尔哥 (Turgot) 所希望的由供需调整的疯狂的谷物价格, 大量普通工人 (熟练操作工人) (manoeuvriers), 特别是工匠, 以‘大众的道义上的经济’的名义要求公平价格” [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388]] 。赖利 (Riley) 认为谷物自由主义 (和削减的和平时期税收) 是“促进经济扩张的试验”, 这一试验证明是“铤而走险的” (1987, 237) 。

[91] 拉布鲁斯 (1944, XXXV) 。同时参见圣-雅各布 (Saint-Jacob) 对同一时期的勃艮第 (Burgundy) 的描述 (1960, 428, 569) 。他讲述了包税人 (fermier) ——领主的反动的发起人——的日益增长的作用。“从那一点上说, 在农民看来, 领主权在于包税人。”然而, 非贵族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这一成功出现将破坏领主权的根基。“成为采邑上的傲慢企业家的包税人以毁坏采邑的声誉而结束。”

[92] 参见博尔德 (Bourde) (1967, III, 1609) 。

[93] 莫里诺 (Morineau) [1971, 325~326; 参较勒费弗尔 (Lefebvre), 1939, 115~116]。

[94] 实际上, 博尔德 (Bourde) (1953, 217~218) 排除了把“封建主义”作为这一现象的解释, 论据是, 法国农学的落后持续到19世纪。因此, 他提出了一个轻视“法国农民的传统思想”而重视“法国特有的地理环境”的解释。

[95] 伯杰龙 (Bergeron) (1978c, 226~227) 提醒我们: “最后, 如果说有一个‘农业革命’, 它是英国的吗? 在18世纪, 英国只不过是克服了与佛兰德 (Flanders) 和荷兰相比较的在这一领域的落后局面。”不仅如此, 肯定地说, 1760年后, 法国也在北部地区进行了许多同样的革新。参见巴斯 (Slicher van Bath) (1963, 279~280)。

[96] 参见奥布莱恩 (O'Brien) 和凯德 (Keyder) (1979, 1293~1294), 他们也主张, 法国更大的人口稠密度导致了把更多的土地用于谷物生产和精耕细作农业。

[97] 参见蒂默 (Timmer) (1969, 392)。他主张: “[英国的] 农业革命显然没有为工业的劳动大军提供剩余劳动力。但它的确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食物, 增多的农业和工业劳动力正是来自这里” (384~385页)。

[98] 戴维斯 (Davis) (1973, 311); 参较罗斯托 (Rostow) (1971, 54) 关于从1697到1831年英国棉花—羊毛进口的数字。

[99] 参见内夫 (Nef) (1943, 5): “从大约1735年到1785年, 大不列颠工业变革的速度并不比法国快……18世纪经济史的明显特征是: 大不列颠与大陆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这一发展的方向两个方面都如此。”内夫还主张 (1968, 971), 在1735~1785年这一时期, 法国总体上的生产, 特别是铁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英国。同时参见沃兹沃思 (Wadsworth) 和曼 (Mann) (1931, 193), 贝尔洛克 (Bairoch) (1974, 24), 奥布莱恩 (O'Brien) 和凯德 (Keyder) (1978, 57~60), 科尔 (Cole) (1981, 36) 和克拉夫茨 (Crafts) (1981, 5)。

科尔 (Cole) 和迪恩 (Deane) (1960, 11) 断言, “在大革命爆发时 (并且可能在此前的整整一个世纪), [法国的] 平均生产率落后于 [英国]。但是, [他们还说], 按现代标准看, 这一差距并不大。”不仅如此, 他们还认为法国处于建立在“强烈的科学传统”基础之上的“优势地位。”参较马赛厄斯 (Mathias) (1979, 54~55)。同时参见莱昂 (Léon) (1974, 407), 他将18世纪的法国说成是被“更新的强有力而积极的力量”所扭转。他断言“工业进步, 工业增长的现实不再需要在这样一个国家来证明了, 它在这两个领域失忠于将其置于欧洲国家一流地位的使命。”

[100] 参见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80, 193~200)。

[101] 米尔沃德 (Milward) 和索尔 (Saul) (1973, 94)。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和基耶 (Quilliet) (1981, 375) 关于他们所称的法国的“上层斗争模式 (Oberkampf

model) ”的论述。

[102] 蒂利 (1983, 130)。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厂外分发制度部分地合并到了新工厂制度”。一个“纺织业企业家可以被称为一个服务站……染色工和修整工也许为属于商人的呢绒而劳作；精纺羊毛的梳理工或纺线工也许取来羊毛而送回精梳毛或毛线。因此，厂外分发制度显示了明显的适应能力，磨坊主人而不是家内手艺人‘绑腿’” [希顿 (Heaton), 1972, 86]。

[103] 勒尔 (Roehl) 的观点相反，甚至宣称这一较早开始正是它的劣势。马尔切夫斯基 (Marczewski) [转引自加登 (Garden), 1978a, 16] 把所有转型工业都算在内，断言，1780~1790年，工业占法国生产的总价值的42.6%。关于对近来论述法国经济发展的修正派著作的评论，参见卡梅伦 (Cameron) 和弗里德曼 (Freedeman) (1983)。关于早期作家与修正派之间的中间观点，参见克拉夫茨 (Crafts) (1984)。关于对勒尔 (Roehl) 的批评和他的答复，参见洛克 (Locke) (1981) 和勒尔 (1981)。

[104] 然而，“在18世纪，吉尔 (Gille) 所称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不是产生在占法国工业机构的60%到65%的纺织工业中，而是在采矿、冶金工业，运河开凿和化工工业中” [乔治 (George)、泰勒 (Taylor), 1964, 493]。

[105] 1810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第四版为这一事实而得意：“东印度 (East India) 棉花已经被纺成了一磅价值五基尼的纱线；当被织成平纹细布并被孩子们装饰到刺绣架上时，其价值则扩张到了15镑；收入是原材料花费的5, 900%” [阿农 (Annon), 1810, 695]。

[106] “在1770年几乎是无足轻重的棉纺织品出口，在19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已经占英国产品总出口额的近一半。棉纺织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的转变实质上在1800年已经完成，用了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戴维斯 (Davis), 1979, 14]。同时参见克鲁兹 (Crouzet) (1980, 92) 关于1782年到1802年间英国出口方式的明显转化的论述。

[107] 这一历史已经被多次谈论。参见兰德斯 (Landes) 的总结性评论 (1969, 84~88)。克朗普顿 (Crompton) 的骡机——莱维-勒希瓦耶 (Lévy-Leboyer) (1964, 7) 断言它是决定性的——开始于1779年。关于英国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参见霍夫曼 (Hoffmann) (1955, 32)，内夫 (Nef) (1968, 967)，克劳泽特 (Crouzet) (1980, 65) 和克拉夫茨 (Crafts) (1981, 8)。

之所以说在英国“较大”，是因为这一说法——法国在这一时期没有创新——有悖事实。巴洛 (Ballot) (1923, 22) 称1780~1792年为法国工业中的“革新活动”的时期，其中包括机械劳动在棉纺织业中的最终渗入。

[108] 这是莱维-勒布瓦耶 (Lévy-Leboyer) (1964, 24) 的用语。

[109] “在某种程度上，两个国家都依赖于在非洲和美洲的 [棉纺织品] 市场，而在这里，

1720年后的历史发展历程有利于英国工业——以法国为代价”[沃兹沃思 (Wadsworth) 和曼 (Mann), 1931, 208]。“英国18世纪的大规模殖民地和海上扩张提供了大于法国的销售棉布的殖民地市场, 而正是在棉纺织业中发生了主要的机械更新”[米尔沃德 (Milward) 和索尔 (Saul), 1973, 97]。因此, 18世纪80年代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一方面是历史地得到的进入某些市场的优势, 这“给了她在主要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的成果”[凯恩 (Cain) 和霍普金斯 (Hopkins), 1980, 474]; 另一方面是贸易地区有利的市场环境——它“在1780年之前只是缓慢地成长”[贝里尔 (Berrill), 1960, 358]。美国战争 (American War) 的结束 (实际上是1781年) 在英国对外贸易的“大飞跃”中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珀金 (Perkin), 1969, 100]。关于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的殖民地商业中面临的困难, 参见克拉克 (Clark) (1981, 139) 和斯坦 (Stein) (1983, 116~117)。

[110] 莫里诺 (Morineau) (1978, 411~412)。

[111] 莱昂 (Léon) (1974, 421)。

[112] 迪恩 (Deane) 和科尔 (Cole) (1967, 35)。

[113] 芒图 (Mantoux) (1928, 262~264)。参见汤普森 (Thompson) (1978a); 同时参见杰里米 (Jeremy) (1977, 2~5), 他特别指出, 大不列颠最全面地立法禁止技术出口的时期是18世纪80年代到1824年。

[114] 莱维-勒布瓦耶 (Lévy-Leboyer) (1964, 25, 29)。皮尤 (Pugh) (1939, 312) 赞同这一观点, 他视卡隆 (Calonne) 在1783~1787年的“新政 (New Deal)”是发展法国的资本主义的举措。“大革命中断了 [卡隆的] 事业, 并使英国的工业发展能够取得如此长足的进步, 以致于法国永远不能赶上。”

[115]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39, 24)。

[116] 科班 (Cobban) (1963, 91)。

[117] 科班 (Cobban) (1968c, 74)。类似地, 罗宾 (Robin) (1973, 53) 谈到了“审判员 (法官) (magistrature) 在阻挠一切可能性, 一切妥协的努力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像贝伦斯 (Behrens) (1967, 177) 提醒我们的, “直到18世纪80年代末, 为改革而进行的斗争还从没在第三等级 (或其中任何一部分) 与贵族之间进行。”

[118] 参见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和基耶 (Quilliet) (1981, 387~388)。当然, 绝对地说, 国家岁入正在增加 [参见普莱斯 (Price), 1973, I, 375, 表IV], 但还少于国家生产或政府开支。

[119] 在18世纪, 40%的政府岁入来自总包税区 (General Farms)。但这一数字没有告诉事实的全部。“延误盛行于各地。考虑到 (财政) 制度的松散, 许多人专门的恶意, 运输的实际困难……和习惯上的散漫行为造成的整体上的复杂性, 延误几乎是结构上的” [古贝尔

(Goubert), 1973, 147]。

[120] 肖辛南-诺加雷 (Chaussinand-Nogaret) (1970, 266)。“大恐怖 (Terror) 使真相大白。1794年5月8日, 在被补或被囚的36名普通包税人中, 28人被处决。剥夺他们的动产是已成为王家财政的同义语的一个公司的最后一次财政投机——有利于共和国——的机会。”这些财政官同时兼有“资产阶级”和“贵族”两种身份。他们的成长“是资产阶级的成长,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 办事果断, 时常是有知识的, 推行‘重商主义’ (La marchandise) ……这些财政官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寡头集团, 关于它, 人们不能说清它的建立依赖于运气还是继承” (肖辛南-诺加雷, 1970, 270)。“靠金钱起家的这些家族势力, 很快掩盖了他们的出身和他们的地位提高的环境……财政渗入到贵族, 贵族关注财政, 正像财务官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 [索布尔 (Soboul), 1970b, 228]。利益的这一融合依赖于资本的共同积累。正像博舍 (Bosher) (1970, 309) 特别指出的, “国民议会的大多数人不喜欢这一财政制度正是因为它被控制在营利的资本家——他们用了这个词——手中, 在这一方面, 债务在他们看来是一腐败制度的最有害的性能。”

[121] 关于政府开支与正常岁入之间的增大的差额, 参见盖里 (Guéry) (1978)。在莫里诺 (Morineau) (1980b, 318) 看来, 不是单独一次战争, 而是一系列战争造成了这一困境。“正像人们可能会猜测的, 最有力的影响源自每个阶段的敌对之后的债务的累加。”甚至莫里诺也承认 (311页), 正是随着1781年内克 (Necker) 辞职, “法国财政进入了一个极度难堪的时期……由于债务利息 (利息的开支) (Charge des intérêts) 的增加, (外债) 从内部吞食了正常岁入 (法国的制度区分正常的和特别的岁入)。”在美国战争期间, 正像在此前的法英战争期间一样, 法国人不需要在欧洲维持大规模陆军。考虑到这一点, 这种财政状况就更令人注目了。参见安德森 (Anderson) (1965, 266)。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斯科波尔 (Skocpol) 的主张 (1979, 64) ——正是“压制不住的好战热情把18世纪的波旁王朝拖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我看来失之偏颇。我认为, 这一“喜好”在法国并不强于英国, 可能更弱一些。“谁不会理解……杜尔哥似的人”在听说美国战争爆发时的“担心”呢? [莫里诺 (Morineau), 1980b, 309]。至于内克, 格兰奇 (Grange) (1957, 29) 特别提到, 正是“他所痛恨的美国战争使他不能实现他的大多设想”。让我们记住, 正是皮特对巴黎和约满腹怨言。

[122] 马赛厄斯 (Mathias) (1969, 44)。迪恩和科尔 (1967, 47), 他们认为美国战争是一“灾难性插曲”, 否则, 18世纪40年代以后将是英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阿什顿 (Ashton) 也提到了1775年的“灾难” (1948, 148)。

[123] 迈耶 (Meyer) (1979a, 187)。

[124] 吕提 (Lüthy) (1961, 592)。关于法国人的希望——一个扩大的北美贸易——的破灭, 参见戈德肖 (Godechot) (1980d, 410): 其结果“不是给双方国家带来繁荣的与合众国的活跃的贸易 (1778~1789年), 而是一个停滞的, 甚至更糟, 单一方向的贸易, 它从法国带走现金, 而不能为她取回任何利润。”

[125] 一个典型的例证可以在合众国的海船桅杆出口这一问题上找到。班福德（Bamford）（1952，33~34）对这一现象大惑不解：1776~1786年，法国为什么没能大量进口这种桅杆，而使法国海军丧失了“一个庞大的森林资源。而长久以来，英国一直依赖于这一资源，而且是自由地提取，没有受到法国人的阻挠。”他的答案是：“许多法国海军官员对于美洲森林资源的无知和保守主义”，加上美洲商人不负责任的一些例子，更坚定了法国人的偏见。

[126] 布瓦西埃（Tanguy de la Boissière）（1796，19）。

[127] 普鲁姆（Plumb）（1950，135）。

[128] 普鲁姆（Plumb）（1956，129）。

[129] 德希奥（Dehio）（1962，122）。不仅法国被这一发展所欺骗。在荷兰，反省长的两个团体——摄政者派（Regents）（自由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爱国者派（Patriots）（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相信英国在美洲的失败会给英国商业以致命一击，他们国家的利益从此以后将与法国联系在一起……（然而），荷兰与合众国间的贸易在1783年后并没像商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意义重大，因为美洲港口与英国恢复了联系”[戈德肖（Godechot），1965，108~109]。在经济上，由于美国战事，法国在北欧也有所失（像英国一样，但谁失得更多？），这是因为，法英海上争夺造成了一个商业空缺，它部分地由这些国家的“中立商业”补上了。参见迈耶（Meyer）（1979a，213~214）。

[130] 科班（Cobban）（1963，122）。

[131] 参见莫里诺（1980b，312~313），他认为债务达到了10亿到13德里佛尔。在美国战争期间，终身年金（rentes viagères）的出卖不问购买者的年龄，可谓孤注一掷。这在财政危机的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尚有待争论。赖利（Riley）（1973，742）认为它是“昂贵的”；哈里斯（Harris）（1976，256）说，“这些贷款是灾难性的这一说法还有待证明。”但是，终身年金（rentes viagères）恰恰不是“贷款”——不像世袭年金（rentes perpétuelles）那样。参见泰勒（Taylor）（1961，959~960）。

不仅如此，国家贷款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投机性利润”，从日内瓦、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热那亚吸收资本。其结果是，到1786年，“价格和信贷恶性暴涨”。这使人们担心国家会没有偿债能力，并威胁着“法国商业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更不用说对外金融中心了”。这与大革命的联系可以从这一事实清楚地看到：1789年，国民议会（Nation Assembly）对于这些国家债务做出了三个明确保证。并且，“努力通过教会财产收回归国有这一办法恢复政府的偿债能力的正是塔列朗（Talleyrand）这个主教和投机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只不过推进了灾难性日子。最终，指券（assignats）和1793年的国民公会（Convention）“摧毁了投机性富豪阶级”[泰勒（Tayler），1961，956~957]。

[132] 罗伯茨（Roberts）（1978，8）。

[133] 参见拉杜里（Le Roy Ladurie）和基耶（Quilliet）（1981，386）。

[134]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79～80）。

[135] 莫里诺（Morineau）（1980b，329）。它也不是法国的收税官（financiers）制度与英国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经营方式间的区别，这一区别“有点被夸大了”（332页）。两者都是作为各自政府的“货币温床”（货币产生地）（Viviers d'argent）（332页）来使用。

[136] 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80b，326）。这不像紧随七年战争后的时期。参见沃德（Ward）（1965，549～550）。但在那一较早时期，大不列颠有（超出法国的）另外一个优势，即它与英属北美的顺差贸易，它使得英国在七年战争期间“仍然有偿债能力”[安德鲁斯（Andrews），1924，109]。法国情况如何呢？“没有预见到的庞大战争耗费”导致了两个政策决定，这两者结合起来，造成了国家财政的根本性混乱。一方面，法国于1755到1756年决定“用信贷而不是用税收来支付战争”。这从本质上说是由于来自最高法院（parlements）反抗增加税收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法国于1764年——不像1714年那样——决定“维持债务的……神经”，宁可敞开谷物价格和降低税收。我们再一次特别指出，这是太过火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Laissez faire）。第一个决定促进了债务显著上升，而第二个决定则“保证了债务可以自由地对政体、经济和财政施加其影响”[赖利（Riley），1986，160，230～231]。

[137] 关于荷兰持有股份在18世纪英国的重要性，参见伊格利（Eagly）和史密斯（Smith）（1976，210～211）；同时参见沃勒斯坦（Wallerstern）（1980，279～280）。关于其遣返回国，参见马赛厄斯（Mathias）（1969，4）和戴维斯（Davis）（1979，54～55）。

[138] 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80b，324～325）。

[139] 戴维斯（Davis）（1979，55）。

[140] 克鲁兹（Crouzet）（1965，73）。

[141] 1786年10月25日，在巴黎的一个机敏的英国外交官，黑尔斯（Daniel Hailes）发给了在伦敦的卡马森勋爵（Lord Carmarthen）这样一份形势分析：“按照内克先生（M. Necker）的计算，由于十分奇特的意外，英国和法国的公共债务在战争结束时几乎是同样的数额。把一切因素考虑在内，法国像英国一样，是战争的十足的受害者，并且，她没有什么东西来安慰自己，只有看到美国政治上脱离其母国而产生的一种徒然的满足感，没有给她自己增加任何的商业优势；这也是由于她明显没有能力像英国那样完好地、廉价地或信用时间长地提供美国头等急需的东西。这样，在为自己得到合众国的贸易的希望（如果说她确有任何希望）化为泡影后，人们本来指望她能吧眼光转向国内，审视一下自己的国内环境，并且，在发现自己给自己招致的与她的敌人所遭受的相同的灾祸后，她本应采取一些有效的举措以紧缩开支，采用唯一能治愈她的创伤，使她从中解脱的良药——节约。大不列颠在这方面已树立了榜样，这使得法国采取上述措施成为双倍的急需；两个国家都已习惯，并且也是合理地，用敌手的优势和财力来衡量自己的急需和不幸。但是，此时的法国好像完全没有看到那一政策；勋爵阁下可能已经察觉，在我的通信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于那些最有可能与人们所希望的背道而驰的财政行为。”

“虽然我总是绝对相信，由杜尔哥先生（Mons Turgot）和内克先生（Mons. Necker）提出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开始的在这一领域的制度改革对这一王朝的政府来说既不适用，也不可行，并且，虽然位于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强大阶级明显需要用国家的部分岁入来扶持，然而（如果我能被允许这一表达方式），明智地管理贪污受贿，减少腐败和偏袒，以防像如今这样把大多的荣誉和报酬集于一人，这种方式能提供如此巨大的财富，以至于它也许能构成好的财政管理超出坏的财政管理的唯一根本的、可行的优势。因此，勋爵阁下，你正是必须从宫廷（Court）来寻找现今不幸的祸根” [布朗宁（Browning），1909，144~145]。

[142] 莫里诺（Morineau）（1980b，334）。

[143] 转引自奥斯勒（Osler）（1978，680）的第7623条。

[144] 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422）。

[145] 卡隆（Calonne）与他的殖民地大臣、发布这一命令的卡斯特里（Castries）在殖民地应当向所有外国人还是只向北美开放的这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卡斯特里取得了胜利，他主张，实际上，通过最惠国条件，对北美人的让步意味着对任何人的让步。因此，卡隆采取措施，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和给鳕鱼出口以补助金的办法来补偿鳕鱼渔夫。参见皮尤（Pugh）（1939，294~295）；同时参见哈巴卡克（Habakkuk）（1965，39）。

布瓦西埃（Tanguy de La Boissière）在1796年的著作（22页）中，认为这一命令是在未来的与北美的商业联系中看不到希望的结果。“在凡尔赛（Versailles）的内阁……相信，给美国人再多也不过分。”唐居伊（5页）赞同地引用了阿诺德（Arnould）（1991，I，233）中的原文：“与法国相比，美国人得到了一个基本的支付平衡，他们以此来挫败英国工业。这就是说那时是商业的顶峰，对此的企求使法国牺牲了几亿 [里佛尔（Livre）] 和几代人。”在阿诺德看来，这一法令没有得到报偿有两方面的原因：法国商品质量低劣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北美市场）的积极竞争（参见235页）。甚至荷兰人也乞求路易十六（Louis XVI）废除这一法令，认为正是英国人从中获利，受损失的不仅有法国人，还有他们荷兰人。参见莫里诺（Morineau）（1965，225）。

[146] 参见戈德肖（Godechot）（1980a，81）。

[147] 参见哈巴库克（Habakkuk）（1965，39）。

[148] 布罗代尔（Braudel）（1984，379）。

[149] 法国的首席谈判员韦尔热纳（Vergennes）和雷恩瓦尔（Rayneval），“企图采取白里安式（à la Briand）的‘清理’政策解除隔离邻近两国人民的分歧。从财政的角度看，这更是一个形势严峻的时刻；重新开战也许会招致国内的崩溃。急需一个长期的和平以恢复王权和民族经济……有一点是肯定的，谈判是法国执意坚持的结果” [卡恩（Cahen），1939，258]。实际上，法国的最初打算遭到了小皮特（Pitt）的极度猜疑，甚至在法国人显示是带来礼物的时候，他还在怀疑 [科班（Cobban），1963，III]。如果说英国人同意谈判，那无可怀疑是因为双方

政府“都受现实性的考虑的影响——由于双方都急需增加岁入”[亨德森 (Henderson), 1957, 105]。除此之外, 法国还施加压力迫使英国人谈判: 1785年7月17日颁布法令, 恢复禁止英国制造品; 积极与荷兰谈判, 以签订一个新的商业条约。参见杜马 (Dumas) (1904, 30~35)。他们还威胁, 准备废除 (杜马, 1904, 36) 1716年的乌特勒支条约 (Treaty of Vtrecht): 它是一个同一天签订的涉及航海和贸易的和平条约。参见埃尔曼 (Ehrman) (1962, 30, 注4)。记住这一点是有用的: 1716年, 英国议会否决了这一条约的8和9两个条款。这两个条款本来是要广泛地开放两国之间的贸易的。英国之所以否决是因为在那时, 法国工业“仍然在英国实业家中引起了如此的恐惧, 以致于他们感到没有能力支撑与它的竞争” (杜马, 1904, 3)。布里亚瓦尼 (Bri-avoine) 于1839年 (193页) 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因此, 没有了“有利的”第八和第九条款, 法国人也反对“不利的”第五条款 (英国船只可以进入法国港口)。参见德雷恩瓦在给卡隆的敦促开始谈判的备忘录 (1784, 2066) 中的抱怨。

[150] 内穆尔 (Dupont de Nemours) 通常被赞誉为这一条约和更自由贸易在知识界的首要鼓动者。他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他在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长的一份备忘录中主张 (1786, 36的副页), 应支持一个受控制的、互惠的英法间的贸易, 以之取代走私贸易。由于两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压制, 这一走私贸易已经剥夺了两个国家“从各自接收被提供的商品中应得的回报”, 即关税。在两年后的辩护性小册子中, 他又回到了这一主题, 抱怨已经支持了走私贸易的“我们国家的关税”, 认为这一条约已经“把以前用作支持非法贸易的保险金的资金.....转移到了有利于国家的轨道” (内穆尔, 1788, 49, 72)。同时参见阿尼松-杜普龙 (Anisson-Dupéron) (1847, 16)。

法国人内穆尔的分析十分接近于英国外交官黑尔斯 (Daniel Hailes) 的分析: “在大不列颠, 国王陛下的大臣们, 以其非凡的智慧、警觉和执著, 已最终找到了把长期没能兑现的岁入付诸实施的途径.....”“因此, 法国政府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把禁止进口英国制造品的法律付诸实施也是可能的。从那一意义上说, 无论如何, 他们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条约的赢家。”“但是, 我认为我敢斗胆使勋爵阁下相信, 法国之所以渴望达成贸易和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性不亚于前者的原因。我的意思是, 通过增加岁入来立刻解救王家金库 (Trésor Royal)。可以设想, 一旦条约生效, 随着各种英国商业的突然涌入, 国家从合法关税中的收入将是巨大的。”[写于1786年10月25日的给卡马森勋爵 (Lord Carmarthen) 的急件, 引自布朗宁 (Browning), 1909, 149~150]。

[151] 斯图姆 (Stourm) (1885, 31) 在解释内穆尔、韦尔热纳和其他人的动机时, 指出, 条约不是在这条道路上的唯一的举措。“在对英国竞争造成的后果进行了英勇的补救之后, 在最初几年又采取了为了同一目的的一系列措施: 从英国应征店铺领班 (本间主任) (Chefs d'atelier), 给发明家以允诺, 不但给各种机器制造人提供便利条件, 而且, 国家花钱一件件地进口外国机器, 支持与殖民地的贸易, 突袭般地禁止英国工人回国, 使他们 (在法国) 待到合同期限, 给愿意在法国定居的外国制造商 (厂主) (fabricants) 以特别优惠条件等等。”勒费弗尔 (Lefebvre) (1932, 14) 认为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好主意.....经由突然向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工业 (勒费弗尔的武断的主张) 开放边界, 将招致一个残酷的打击。”兰德斯 (Landes) (1969, 139) 赞同这一观点。1786年的伊登条约“把法国市场向英国棉织品开放, 使得现代化

变成了一个生存问题。”

[152] 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44, 417) 认为下降了45%~50%。“1760年以来获得的发展就这样丧失了。”

[153] 提到这一点会让人感到吃惊：到伊登 (Eden) 被皮特任命为英方首席谈判员的时候，也只有那时，韦尔热纳 (Vergennes) 才写信给在伦敦的法方代办 (Chargé d'affaires) 德巴泰勒米先生 (M.de Barthélémey)，询问英国政府是否给出口以奖金这类初级的信息。参见塞居尔-杜佩龙 (Ségur-Dupeyron) (1873, 386~387)。雷恩瓦 (Rayneval) 也同样无知。参见杜马 (Dumas) (1904, 27)。他俩本应从霍尔克 (Holker) 那里获取资料。霍尔克是英国血统，但已成为法国制造业的监察长。1785年12月29日，他提醒雷恩瓦尔，英国人“能够以比我们便宜30%的价格为法国提供各种棉布。”[转引自博耶特 (Boyetet), 1789, 86~87] 但是，在伊登到达巴黎前几天，霍尔克去世。据说，曼彻斯特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不仅由于德雷恩瓦尔少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顾问，也由于他们希望他本人的在鲁昂的棉纺织工厂将随着他的去世一起倒闭。参见比滕瓦尔 (His de Butenval) (1869, 65, 70)。

[154] 1788年，内穆尔 (Dupont de Nemours) 给诺曼底商会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ormandy) 写了一封公开信，回答他们对伊登条约 (Eden) 的抱怨。在这封信中 (1788, 8)，他说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政府扶植法国工业。“我当面告诉内阁大臣 (Minister)，写信给他，苦口婆心地一再敦促他；他不得不努力使他认为必须允许的竞争变得可以承受，甚至有利可图。他也认识到这一必要性…… (然而)，名人议会 (Assembly of Notables) 的怀疑，以及内阁 (Ministry) 的频繁更替，令人遗憾地妨碍了 (这一意图) 的落实。”

[155] 夏普泰尔 (Chaptal) (1893, 86)。

[156] 杜马 (Dumas) (1904, 78)。

[157] 两段引文都转引自比滕瓦尔 (His de Butenval) (1869, 57, 70)。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沃勒西 (Weulersee) 称1786年的条约为重农派的“辉煌胜利” (1985, 33)。

[158] 科贝特 (Cobbett) (1816, 395)。

[159] 马尔切夫斯基 (Marczewski) (1965, XCV) 把这一高峰界定在1780~1786年。

[160] 埃尔曼 (Ehrman) (1962, 175)。卡马森的引文在第2页。

[161] 参见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44, 78~82)，巴特 (Slicher van Bath) (1963, 235~236)。1802年，当波尔多商务会议 (Conseil de Commerce de Bordeaux) 送交内阁大臣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Chaptal) 一份备忘录，为伊登条约 (Eden Treaty) 辩护时，葡萄园主人回溯往事，仍然十分强烈地拥护这一条约。参见比滕瓦尔 (His de Butenval) (1869, 107)。

[162] 科贝特 (Cobbett) (1816, 398)。这是真实的：反对党报纸《清晨使者》 (Morning

Herald) 认为法国制造业优于英国, 英国税收更高一些。参见比滕瓦尔 (His de Butenval) (1869, 134) 和杜马 (Dumas) (1904, 107)。但是, 正如杜马 (121页) 指出, 这无可怀疑是政治性宣传, 企图吓坏英国制造商——但事实上没有成功。埃尔曼 (Ehrman) (1962, 65) 认为, “可能正是这种 (经济) 论点的薄弱 (导致了反对派) 把精力集中在条约的外交含义。”达尔 (Dull) 给这找到了例证, 认为, 对韦尔热纳 (Vergennes) 来说, 这一条约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俄罗斯政策在18世纪的翻版” (1983, 11)。然而, 芒图 (Mantoux) 认为, 英国制造商中有分歧, 旧工业支持保护政策, 反对这一条约, 新工业则认识到, “他们的主要利益在于得到廉价的原材料和出售他们的商品的开放的市场” (1928, 400)。

[163] 参见布朗宁 (Browning) (1885, 354)。

[164] 参见杜马 (Dumas) (1904, 14~15)。

[165] “棉纺织、铁和陶器的利益重心强有力地转向了支持政府的政策……因为所有这些贸易大大得益于扩大进入法国市场, 没有人需要害怕来自法国制造业的激烈竞争” [阿什顿 (Ashton), 1924, 171]。曼彻斯特的两个棉布印花人, 史密斯 (Joseph Smith) 和皮尔 (Robert Peel), 认为英国棉纺织品贸易的优势在于节约成本的机器生产。“不可能说清外国将在怎样短的时间内得到这些机器, 但即使到那时, 我们在使用它们的过程中已累积起的经验将给我们如此的优势, 以至于我不必害怕竞争” [转引自爱德华兹 (Edwards), 1967, 51]。

[166] 参见鲍登 (Bowden) (1919, 25~26)。

[167] A.E.46, 1788, 239。

[168] 莫里诺 (Morineau) (1978, 411)。这还被叫做“可怕的竞争” (孚雷 (Furet) 和李希特 (Richet), 1973, 26)。

[169] 达代尔 (Dardel) (1963, 71)。

[170] 马尔科维奇 (Markovich) (1966c, 130)。施密特 (Schmidt) (1913, 270) 引用了一位机械师 (mécanicien) 的话, 此人在1788年谈及“我们遇到的商业革命”。

[171] 阿诺德 (Arnould) (1791, 181~183)。同时参见夏普泰尔 (Chaptal) (1819, I, 95~96)、杜马 (Dumas) (1904, 150~151)、施密特 (Schmidt) (1908, 91~92)、芒图 (Mantoux) (1928, 263)、塞伊 (Sée) (1930, 308)、拉布鲁斯 (Labrousse) (1933, II, 320)、埃克姆 (Acomb) (1939, 42)、盖兰 (Guérm) (1968, I, 64~65)、蒂利 (Tilly) (1968, 215~222) 和莫里诺 (Morineau) (1971, 331)。

[172] 有些学者主张, 法国工业在条约之前已陷入困境, 所以, 不应夸大条约的作用。参见加亚尔东 (Gaillardon) (1909, 151) 和墨非 (Murphy) (1966, 578)。在我看来, 像布尔瓦桑 (Bouloiseau) (1957, Liv) 的观点一样, 更恰当的说法是, 虽然工业遇到的困难最近在1780年以来就存在, 但正是条约“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广度”——揭示了其广度、加重了其程度并

有把它制度化的危险。

比如，卡汉（Cahen）（1939，275）谈到这一事实：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全部责任”在于“条约所导致的混乱”。亨德森（Henderson）（1957，110）贬低了条约带给英国的好处，认为1787年到1792年间英国对法国的出口翻了一番“可能只是代表着把从前商品的走私变成了合法的贸易渠道”。

[173] “当时的人们认为1786年条约起了很大作用” [勒费弗尔（Lefebvre），1939，118]。同时参见赫克谢尔（Heckscher）（1922，22）。1788年8月，巴黎流传着一幅漫画。一个名叫商业的人正在一个公共广场被处以绞刑。绞绳被叫做廉价商店。从他的裸脚上挂下一重物，叫做“出口关税”。他的手被一带子捆住，这条带子意思是“贸易条约”。参见施密特（Schmidt）（1908，78）。当时的这些知觉并非歇斯底里，而是以物质环境为依据。这一说法被塔雷德（Tarrade）证实。他指出，条约一签订，英国制造商由于期待着利润，在棉织品上进行了投机。这导致了“快速的”价格上涨，“在法国企业大胆面对英国竞争之时损害了它们”（1972，II，691）。

[174] 一个格拉斯哥（Glasgow）制造商在写于1786年或1787年的著作中，讲述了他如何在鲁昂（Rouen）碰见霍尔克（Holker），以及霍尔克如何赞同他的观点：在法国制造商降低工资的同时，他们的生产率也由于纪律涣散而下降了，因此，实际上，成本提高了。参见奥克兰（Auckland）（1861，I，516~517）。

[175] 毕舍（Jacques Peuchet）《分类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清理学》，第九卷，警察与市政当局，第U案，农业）（*Jurisprudence IX, Police et Municipalités, Vagriculture*），转引自布洛赫（Bloch）（1900，242，注1）。

[176] “（英国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甚至低于法国投机商——他们从英国买来货物——在不赔本的情况下的最低价格。这使我相信，他们得到了政府的秘密资助。我们知道，这是他们毁灭已允许他们出售商品的国家的工业的惯用伎俩”（A.E.46，236）。奇怪的是，后来的学者们无人探究这一问题，去搞清当时法国人的这一感觉是否能被事实所证明。

[177] 莱特（Letter）1788年的著作，转引自穆尔勒（Mourlot）（1911，106）。

[178] 参见皮卡德（Picard）（1910，156，161）。当然，“工业地区内的大法官辖区的陈情书（the cahiers of the bailliages）一致痛恨这一条约” [杜马（Durmas），1904，182]。可以相信，一些农业地区对这一条约则持相反的观点（186页）。

[179] 尚皮翁（Champion）（1897，164）和塞伊（Sée）（1931a，II，950，注1）观点一致，认为，首先，条约是“有害的”，香槟（Champagne）、皮卡底（Pi-cardy）和诺曼底（Normandy）这些省份受害最深；第二，“在法国，不满情绪一致反对这一条约，反对英国实施条约的方式”，这可以在陈情书（cahiers）中看出。这一敌对行为并没有在1789年中止。而是相反。“在1789~1793年的痛苦与骚乱中，该条约被视

为庇特（Pitt）蓄谋已久的以法国为代价来富强英国的阴谋的序幕……1786年在旧王朝下的不成熟的行动，以及它引起的共和国时期的反抗行动，大大有助于法国的民众政府采取禁止性的或严格保护主义的政策”[罗斯（Rose），1893，705]。

[180] 穆尔洛（Mourlot）（1911，105）。

[181] 布罗代尔（Braudel）（1984，381）。

[182] 埃尔曼（Ehrman）（1962，206）。

[183] 转引自卡安（Cain）和霍普金斯（Hopkins）（1980，472）。

[184] “英国人对酒的兴趣没有显著改变……；而英国的金属器具和亚麻布马上在法国找到了销路”[布朗宁（Browning），1885，363]。

[185] “酒是开放经济的产物，市场调控的产物……酒经济是国际性的”（拉布鲁斯（Labrousse），1944，207，211）。

[186] 参见拉布鲁斯（Labrousse）（1944，586～588）。

[187] 参见拉布鲁斯（Labrousse）（1944，579～588）。

[188] 达代尔（Dardel）（1948，62）。

[189] 关于经济状况，勒费弗尔（Lefebvre）（1947b，89）的权威性观点是：“因此，毋庸置疑，经济困境（危机）（crise）应当被列为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当然，关于经济危机，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贫穷”危机[尤其参见拉布鲁斯（Labrousse），1944，XLii]；“发展”危机[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6，29～30]；或“J曲线”危机，即一个好转的阶段紧随一个突然下降[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5，176～177]。

[190] 然而，我完全同意伊戈涅特（Higonnet）（1981）的令人信服的观点：这样一个“事件”并非不可避免，甚至不可能出现。

[191] 这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论点。正如哈特韦尔（Hartwell）和恩格曼（Engerman）所评论的（1975，193）：“历史学家们已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竞争的结果。历史学家们可以以这种方式，认为拿破仑战争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竞争的结果；但是，他们目前为止还没有。”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孚雷（Furet）不久以后大声疾呼（1978，92）：“当然，可以理解，人们可以怎样称（1792～1815年的战争）为传统的法——英商业竞争的顶峰。但是，如果想再往前迈一步，夸大冲突的这一方面，夸大这一漫长战争的主旨和‘客观’原因，就需要一个跳跃。而到目前为止，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家学还没有人——盖兰（Daniel Guérin）除外——愿意进行这一跳跃。”但这不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论点。没有人需要艰难的跳跃。所需的只是认识到这一点：德希奥（Dehio）（1962，139）关于军事冲突的观点——“大革命进入大规模冲突阶段

并不是由于对自己力量的认识，而是由于失望后的勇气”——在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后适合于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始终。

[192] 布洛赫（1966，149）。我已经纠正了翻译有严重错误的第二个句子。

[193] 参见赫希（Hirsch）（1978）。勒费弗尔（Lefebvre）（1972，407）认为，什物税的废除“是农业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休厄尔（Sewell）更为偏激。他视8月4日夜晚为“作为阶级斗争和作为思想转化的大革命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是特权的大灾难”（1985，69）。

[194] 参见布洛赫（Bloch）（1930，549）。关于公共牧场（vaine pâture）在19世纪的命运的详细叙述，参见克莱尔（Clère）（1982）。

[195] 虽然圈地被正式认可，但财产权的普遍巩固实际上减缓了圈地。其结果，正如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1973，263）特别指出的，“许多农民的收入（在革命时期）有一个陡然的上升。”无可怀疑，这解释了拉布鲁斯（Labrousse）（1966，62）观察到的政治后果：“大革命的土地改革和它建立起来的传统总是在乡村发现，虽然有保皇派运动（保皇派叛乱）（朱安党）（Les Chouanneries）和无数热情的保卫者。”但是，正如沙贝尔（Chabert）评论的：执政府（Consulate）和帝国时期的最终的农业繁荣更有利于大地主（1949，91）。它因此增加了，而非降低了乡村无产阶级化：“革命性事件超乎其他一切地增加了强大者的力量，同时掏空了小耕地者（Laboureurs）——他们正想方设法圈起其小块土地（园地）（Clos）——的钱袋。它空前地增大了后者与大地产的差距。大革命增强了每一个地方性空间的主导特征”[佩罗（Perrot），1975a，38~39]。布洛赫（Bloch）的残酷的结论（1930，544）好像得到了证明：“立法机关——不仅制宪议会……甚至还有国民议会——的农业政策还没有摧毁君主政体实行的改革，而是紧随它们的足迹……革命的所为的确有一些新特色。如果（革命的立法机关）恰恰像旧政体（Ancien Régime）那样故意牺牲无产劳工（非技术工人）（manoeuvres），而不必再讨特权阶层的欢心，它就可以更紧密地与中等所有者的利益连在一起。”这一结果在北部法国特别残酷，正如索布尔（Soboul）所指出（1976a，63），通过农民公社的分解：“贫穷农民迅速无产阶级化，为现代农业和大规模工业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革命期间给大贵族地产造成的这种有限的破坏在拿破仑时期不同程度地取消了，那时，“人们目睹了从前的贵族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财富的重新出现”[图拉德（Tulard），1970，643]。同时参见夏贝尔（Chabert）（1949，330）；迈耶（Meyer）（1966，II，1254）；洛朗（Laurent）（1976a，643）；索布尔（Soboul）（1976b，126，132）和戈蒂埃（Gauthier）（1977，第五章和第三部分全部）。

[196] 布洛赫（Bloch）特别提到（1930，544）革命时期农业政策的第二个新特色是：“由于不那么胆怯[比旧政体（Ancien Régime）]和本质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它着手采取了适用于整个民族区域的措施。”

[197] 布尔金（Bourgin）（1911，192）。“经济和法律的革新主要为了巩固从前的所有者的地位，或者巩固那些利用特别形势而进入新团体的行列的新人的地位”（185页）。麦克莱尔（Mackrell）甚至更尖刻（1973，176~177）：“一旦去掉这些名称，……封建和领主的权利就

变得可被尊重了。……隶属政府只是在加紧将以前的义务赋税吸收到财产权利上过于迫切了。封建权利在它们的新形式中不只是存在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鲁特（Root）在农业改革的失败中发现了软弱的法国国家的限制因素的持续存在：“革命政府被迫放弃它对农业改革的承诺是由于它首先考虑财政而非农民反抗的威胁……在大革命之前和大革命期间，法国国家由于为国家战争、财政混乱和管理软弱所困扰，没有能力促进农业发展”（1987，241）。

[198] 勒费弗尔（Lefebvre）（1963，355，366~367）。我们可以指出英国经济转型的另一个不人道的方面。英国向用煤做燃料的转化（如此经常地受赞美）直接导致了18世纪“苏格兰煤矿的生命契约”。煤矿主“发现招收劳工困难”，因而让国家强加了一种农奴身份 [达克汉（Duckham），1969，178]。

[199] 如果人们以这一方式看待它，西部法国的“反革命运动”这一棘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勒高夫（LeGoff）和苏德兰（Sutherland）（1974，101）指出，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下，布列塔尼受中央（Center）控制很弱，农村公社把它挡在了“一个适中的距离”之外。大革命带来了较为积极主义者的中央（Center）。革命的立法机关在其集权化措施中，没有考虑到那里的租佃制的特性。这一制度被叫做“可随时收回的地产”（domaine congéable），它能大大增加中等富裕的佃农的地位的不稳定性。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国的其他地方，正是这一阶层受惠于农业改革。勒高夫和苏德兰（1983，75）估计，在西部法国，改革的最后结果从零效果到农民的负担增加了40%。因此，他们指出（1974，109）：从布瓦（Bois）、福舍克斯（Faucheux）和蒂利（Tilly）的著作中抽出没有充分展开的共同的主题将是有意义的；“一般说来，定居在法国乡村的穷苦大众从大革命中得利极少——如果有所得的话；在反革命地区，正是这些人把绝望，有时是无穷的力量，转化成了不满和起义。”因此，可以把保皇派反叛朱安党（Chouanneries）解释成农民革命（以大众保皇主义为伪装），反抗“其出身与在1790年选举中掌权并在此后维持这权力的资产阶级地主有联系的人”的以城市为“基地的权威”（勒高夫和苏德兰，1983，86）。在这一解释中，反革命令人怀疑地成了革命者。面对这一观点，马佐里克（Mazauric）放弃了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ary）这一名词，而赞成把大众的反抗仅仅叫做“假革命（anti-revolutionary）”这一更给人以安慰的方式（1985，239）。

[200] 一个自由主义者主张，在整个19世纪，法国“在明显的机会面前所显出的怯懦”是农民担心“革命的土地政策”也许会被推翻的结果。关于他的观点，参见格兰瑟姆（Gramtham）（1980，529）。他痛惜（527页）法国资本家性格的不健全：“如果法国的土地所有者权利更集中一些，可以肯定，每个土地所有者都会加倍努力地巩固他们的财产。”

[201] 夏普泰尔（Chaptal）（1819，I，90）。其他六点解释类似于流行的当代学术著作中的解释：没有束缚性规章，机械化，煤和国内运河的丰富，劳动的技术分工，殖民地和海上霸权，政府有同情心地帮助寻找外部市场和阻止外国竞争（91~93页）。正如克鲁兹（Crouzet）所言：“现代观察家实际上没有提出什么因素来解释18世纪英国经济的发展，而这一时期的法国观察家和作家却不止一次地看到了这些因素”（1981，72）。

[202] 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1973，167）。有一份分析1786年条约的外交

部备忘录，写于1797年。作者塞里明（M.Therein）认为，英国人寻求“互惠”是由于他们在市场上有两个优势。第一，他们恰在那时是效率高的生产者；第二，他们实际上是在开放八百万人的英国市场，以换取三千万人的法国市场（A.E.46, 287）。几年后，又有一份阿诺德（M.Arnould）写的备忘录（A.E.46, 331页的副页）。它反对恢复1786年条约，理由是：“公众舆论好像非常满足于已经为国家利益得受的损失复了仇，而这一损失是由1786年条约所引起，该条约被认为已经是灾难性的，我们的制造商尤其这么认为。”

然而，克鲁兹（Crouzet）（1962, 217）告诫我们要警惕茹弗内尔（Jou-venel）的这一主观臆断：正是法国对英国的经济抵抗导致了波拿巴（Bona-parte）与1802年的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决裂。克鲁兹提到了一份1802年的英国备忘录，它建议英国人对恢复1786年条约保持沉默。然而，有许多原因证明英国本可以在1802年保持沉默，其中一些原因是：它可能带来错误的地理指向，法国经济的中断可能使恢复贸易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203] 参见科班（Cobban）（1963, 176）。

[204] 赫克谢尔（Heckscher）（1934, I, 456~459）。

[205] 索布尔（Soboul）（1976a, 14）。

[206] 至少庇特（Pitt）对法国国家的作用没有这种幻觉。后者的另一个进攻性行动是“开放”斯凯尔德河（the Scheldt），从16世纪尼德兰反叛（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以来它一直关闭着。参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 185~186; 1980, 53~54, 198）。这被视为“对英国贸易和军事安全的直接威胁。当法国战舰强占这条河时，它意味着安特卫普这一闻名于世的指向英国心脏的‘手枪’可以被用作对付英国的海上基地，甚至是进攻基地。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刺激不情愿的庇特脱离他的中立政策”[阿舍森（Aschersson），1975, 90]。

[207] 卢梭（Rousseau）[1947（1762）]，第二册，第三章。

[208] 水闸门好像朝每个方向敞开着。还不仅仅是伊登条约的经济后果这一直接的难题。这里特别提一下勒费弗尔（Lefebvre）所讲述的（1947b, 32~33）法国财政危机的间接外交后果：“由于缺少金钱，法国政府不得不让普鲁士人（Prussians）干涉荷兰（于1788年）；支持荷兰的省长（Stadholder）反对荷兰资产阶级；省长派撕毁了与法国的盟约，而与英国人结成联盟。”

[209] 吕提（Lüthy）（1961, 14~15）。

[210] “促成君主政治倒台的那一同样的条件却有助于使它的继任者免遭此难……因此，在一个最近刚刚贬低了君主政治的国家中，又出现了一个中央权威，其权力比以前的任何法国国王所行使的权力更广、更严格、更绝对……拿破仑倒台了，但他成就中更牢固的部分保留下来；他的政府完结了，但他的管理幸存下来；每当人们试图废除专制主义时，人们所能做得最多是把自由女神（Liberty）的头嫁接到一个奴隶的身躯上”[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5, 205, 209]。

[211] 转引自科班 (Cobban) (1963, 137)。

[212] “在18世纪，英国贵族政治上的优越和经济上的财富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引起了羡慕和嫉妒，这正像英国宪政本身的羡慕和嫉妒一样……这种印象虽然是建立在对英国政治生活的内部运行和习俗的有限了解之上，并被政治偏见所曲解，但也并非是完全错误的” [古德温 (Goodwin), 1965b, 368]。

可以相信，法国人对英国贵族的作用的这一羡慕，只是这一时期本质地统治着各个领域的法国不如英国这一更普遍的感觉的一部分。参见克鲁兹 (Crouzet) 对于论述这一问题的法国18世纪著作的综合评述 (1981)。对于英国 (土地) 贵族的作用的这一羡慕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取代。珀金 (Perkin) 认为，恰恰正是“妒忌国王的土地贵族控制政府和社会”，才使得英国能够“向工业社会制度迈出了决定性一步”。他认为，他们正创造着腾飞的政治前提条件 (1969, 63~64)。

[213] 马迪厄 (Mathiez) (1923~1924, 9)。

[214] 马迪厄 (Mathiez) (1923~1924, 47) 的确着手列举资产阶级所遭受的社会伤害。但是，把革命归因于为了弥补自尊还不是社会解释。不仅如此，他以这一有点让人吃惊的评语来结束他的公开讲演 (mise en scène)：“如果路易十六 (在1789年6月25日) 跨上马，如果他亲自指挥他的军队——像亨利四世本该做的那样，也许，他本可以成功地控制 (军队) 尽其职责，并因而使他的力量的炫耀有所成果。但是，路易十六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215]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47b, 175)。

[216] 沃弗尔 (Vovelle) 和罗奇 (Roche) (1965, 26)。

[217] 穆尔 (Moore) (1966, 105~106)。或者，还有一个更温和一点的说法：“无论谁赢得了大革命，贵族地主反正输了” [福斯特 (Forster), 1967, 86]。关于类似的表述，参见吕德 (Rudé) (1964, 288, 290)、夏皮罗 (Shapiro) (1967, 510)、蒂利 (Tilly) (1968, 161) 和赫希 (Hirsch) (1980, 330)。

[218]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1962, 212~213) 谈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巨大的自相矛盾”。那里的发展本应是最快的，因为法国拥有“典型地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然而，其发展“明显慢于”其他地方。他从法国革命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一自相矛盾。“法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是建立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219] 这里，我认为孚雷 (Furet) (1982, 74) 完全击中了要害：“正是这一革命中非资产阶级的东西、更激励人的东西——农民和城市大众——最为人所知。这也许证明，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并非如此这般地可以使用，因为它还没有为社会史研究开辟一个领域。”

[220] 马迪厄 (Mathiez) (1923~1924, 59)。

[221] 索布尔 (Soboul) (1976a, 17)。

[222] “一方是一种以逐渐‘重农主义化’的领主制本身并变得更以城市的基地，在另一方是受教育的农民少数派，他们拒绝将他们的希望牺牲在英国式资本主义革命的领主制祭坛上。他们之间在整个18世纪有着小冲突和前驱性的斗争。1789年，革命性事件把这些此前微不足道或被压制的冲突出人意料地推到了前台” [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4, 22]。

“农民对领主的痛恨不是昨天的事情……然而，如果说1789年他们处于普遍的反叛状态，一个原因应当到三级会议的召开中去找”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47b, 143]。

[223] 圣-雅各布 (Saint-Jacob) (1960, 572)。同时参见勒费弗尔 (Lefebvre): “资本主义在封建权利的外衣下闯入农业，这使得这些权利更难忍受。资本主义曲解了这些权利的性质，因为它们以前是用来支撑生活在他的农民之中的领主的，而现在又落入了资本家之手，这些资本家只想着从这些权利中获取利润” (1963, 352)。

[224] 蒂利 (Charles Tilly) 的这一短语用于他分析研究1500年到1900年之间的东盎格利亚 (East Anglia) 的时候，但他所描写的好像同样适合于法国：“生计农业这一农民经营方式——在这一经营中，控制土地的家庭把一部分产品拿到集市上出卖——在资本主义和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扩大了，而在这同一进程的后期阶段则衰落了” (9页)。在18和19世纪的法国，我们所发现的正是对这一后期阶段的抵抗，在这方面法国比英国更成功。

[225] “因饥饿而铤而走险的农民是贵族无法逃避的威胁。资产阶级本身也决非安全。他们所应得的税收份额也还没得到；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领地；他们给庄园领主提供法官和管理者；作为包税人，他们得到了征收封建捐税的权利。大土地所有者、富裕农场主和谷物商人都像什一税征收人和庄园主那样从国王的农业政策中获利甚多。这一政策限制对农民如此宝贵的‘集体权利’ (droitscollectifs)，并且，由于上述人的执意要求商业自由，这一政策提高了食物价格。由于人民不想死于饥饿，他们不理解富人——不管他是谁——为什么不掏出腰包为穷人做点什么。法官、放高利贷者 (rentiers)、商人、农场主，在阿尔萨斯 (Alsace) 还有高利贷者 (犹太人) (Jews) 像教士和贵族一样受到威胁。他们也有理由害怕”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73, 32~33]。

[226]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73, 40)。

[227] 斯考波尔 (Skocpol) (1979, 112~113)。

[228] “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结论仍然是：这一时期推动革命性民众的主要的、最持久的动机是要求得到便宜、充足的食物供应” [吕德 (Rudé), 1967, 208]。关于法国的面包骚动为什么传统地主要是大田耕作区 (grande culture) (从英吉利海峡到卢瓦尔河，布列塔尼除外) 和葡萄栽培区的现象，而不是小型耕作地带的现象，参见哈夫顿 (Hufton) (1983)。这与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地区有互相联系。

[229] 罗斯 (Rose) (1956, 171)。在批评那些相信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有相同的利益并“赞成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时，勒费弗尔 (Lefebvre) (1937, 324) 认为，与这些历史学家已承认的程度相比，“饥饿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230]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73, 46, 49)。

[231]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73, 101)。

[232]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73, 211)。同时参见奥拉尔 (Aulard) (1913, 200~201)。

[233] 参见扎普里 (Zapperi) (1972) 中的论述。同时参见索布尔 (Soboul) (1976d, 268): “封建主义在其制度和法律形式上被摧毁了; 它作为一个经济现实维持了下来。”但维持的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呢? 正如勒费弗尔 (Lefebvre) (1963, 356) 所写, 观察国民议会 (National Assembly) 和国民公会 (Convention) 从1789年到1793年的所为, 所取得的总成果好像是明显的: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的愿望, 大革命没有予以重视。”

[234] “当诺埃里子爵 (Viscount of Noailles) 在1789年8月4日晚, 求助于公众的要求, 提议向人民显示出‘我们不反对它, 在其中有我有兴趣保护的东西。’他确实不企图限制民众对‘特权’领域和封建制度的攻击, ‘和再花一些年来拯救财产特权。’人们必然感到要理解这种呼声的威胁!” [赫希 (Hirsch), 1980, 327~328]。不仅如此, 农民权利的“恢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在1789年到1792年间的直接行动, 后来只是通过1792年8月28日和1793年6月10日的法律而合法化了。参见戈蒂埃 (Gauthier) (1977, 149~150, 163~166); 同时参见亨特 (Hunt) (1983, 137)。

[235] “1789年到1793年, 在法国的广大地区, 农民的反叛也是剧烈的。它构成了——这一点时常不被认识到——大革命的生机勃勃的力量……即使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 这也不意味着它只是资产阶级的功劳” [索布尔 (Soboul), 1973, 86, 87]。阿多 (Ado) (1977, 127) 走得甚至更远, 他还因为大众走在资产阶级前面而斥责他们: “这篇短文开头提出的总问题是: 在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中, 这一农民平均主义设想的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从经济的视角来说, 这一设想是反资本主义的, 并因而 (原文如此!) 是倒退的, 保守的吗? ……在大多数例证中,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236] “在摧毁旧政体的同时, 农民也希望反抗这一进程: 它正把社会引向经济自由和竞争性个人主义, 引向资本主义社会。农民与工匠一起, 反对谷物自由贸易、要求控制价格 (规定价格) (la taration)。在各地, 农民夺回了已被剥夺的习惯权利” [勒费弗尔 (Lefebvre), 1978, 242]。

[237] “许多历史学家暗示, 当农民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之时, 农村问题就被认为得到了解决, 农民所需要的只是享受他们新近得到的在恢复的秩序下的好处。事实决非如此。封建的、教会的敌手的被消灭, 农业产品价格的上涨, 所有这些都刺激了地主的胃口。由于他们最为经常地控制着市政当局, 对他们来说, 把这些对农民的传统保护措施变成对付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武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阿伯德姆 (Aberdam), 1975, 73]。进一步指出了“资产阶级什一税”这一说法的出现 (88页), 并说 (89页): “大革命中的分成制佃农——三个世纪以来通过抵抗他们的主人而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人们的后代, 所保护的实际上是

一种虚假的工资。”

[238] 马佐里克 (Mazauc) (1965, 71)。他提出了关于这一点的许多详细证据,但是,他然后得出结论(75页):“总之,只要是在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寄生的地方,只要是在它与封建制度妥协而非引进分工和资本主义这一革命进程的地方,当它成为历史性‘失败’的例证之时,保皇派叛乱(朱安党)(chouannerie)就发展起来。”并且,他又一次因农民走在了时代前面而谴责他们(66页)。“(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设想法国大革命代表着进步,他就不能认为保皇派叛乱是‘合法的’,甚至如果他发现了发动它的民众基础,和丰富的悲惨动人和个人英勇行为的资料时也是如此。”在其他地方,马佐里克(1967, 364)提醒我们注意饶勒斯(Jaurès)的观点,“正是人民强加了他们的看法,挽救了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没有“人民”,资产阶级革命可能已经失败了。但是,当“人民”在法国西部反对革命政府时,他们又变成“非法”了。

[239] 布瓦(Bois)(1971, 347)。“正是在摆脱各种形式的统治这一最大愿望没能被满足的地方,人们对城镇资产阶级接管政权的不信任最为强烈”(344页)。参见苏德兰(Sutherland)(1982)关于乡村保皇派叛乱的阶级基础的论述(佃农与独立的自耕农相对)。虽然苏德兰说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他也只是详细修改了这一观点。米契尔(Mitchell)也视旺代保皇党叛乱(Vendée)为“公众不满的表现”(1974, 117)。

[240] “从大革命一开始,(农民)就抵抗并痛恨资产阶级企图控制公社的努力”[蒂利(Tilly), 1968, 281]。

[241] “事实上,经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在所谓的1789年西部(West)的农民反叛(Peasant Revolt)中,有相当多的小事件的参与者的核心成份是农村或半城市工人而不是农民.....在整个大革命期间的大众暴动中,有三个最为骚乱的系列——1789年曼恩(Main)和诺曼小树林(Norman Bocage)的‘农业’革命,1793年开始的曼恩、诺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tany)和北安茹(Anjou)的朱安(Chouan)游击队,还有旺代(Vandée)保皇党叛乱本身——爆发在西部的农村纺织业地区。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蒂利(Tilly), 1968, XI]。记住:如果伊登条约(Eden Treaty)复活并导致纺织生产下降的话,这些纺织工人中有许多会丧失工作。

福舍(Faucheux)主张,城市和农村造反者都“主要为物质考虑所推动”(1964, 384)。多年来,旺代保皇党比法国其他地方经历了更惨重的饥饿状态(191页)。本迪巴尔(Bendjebbar)特别指出,田地树木围隔的地区被转向了市场,“指券(assignat)破坏了屠宰业的肉类循环”(1987, 95)。

[242] 休厄尔(Sewell)(1980, 111)。用休厄尔的话说,这一用语“与无套裤汉对劳动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理解紧密相关.....对无套裤汉来说,有用的劳动.....只是通过用双手工作的人来进行的”。

[243] 费赫尔(Fehér)(1987, 40)在福克纳(Falkner)(1919)著作的基础上,十分令人信服地表明,指券(assignat)的历史并非一个偶然的悲剧,而是所选择的一项政策,在这一

政策中，“持续的贬值为政治的和暂时的上等人提供了预算上的需要，即使是以靠工资过的人为代价。”

[244] 索布尔 (Soboul) (1958a, 259)。“无套裤汉与商业资本的敌对主要表现在他们坚持不懈地反对用货币进行贸易”(475页)。正是由于他们不信任政府，他们从没“停息地要求让人民批准法律”(510页)。

无套裤汉感到这一敌对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心甘情愿地断绝甚至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大众暴力使无套裤汉运动失去了许多人的同情：“小资产阶级、房东、小店主、临街房屋的拥有者 (ayant pignon sur rue)，这些人虽然在相当程度上与无套裤汉的上层社会属于同一社会范畴，但他们惊呆了并且厌恶破坏财产……普通的雅各宾派不能不谴责一个看来不能给民间和平提供保障的运动；旧制度之所以已被推翻是由于它不能维持国内秩序，还没有公开指责法国领主的掠夺性暴力的巴黎店主……结果发现自己被处于半饥饿的妇女的盲目狂怒包围了”[科布 (Cobb)，1959，64]。

[245] 索布尔 (Soboul) (1958, II)。

[246] 索布尔 (Soboul) (1954, 55)。正如索布尔所说，这一“模糊性”说明了丹尼尔·盖兰 (Daniel Guérin) 的那种“看待问题的某些错误”。

[247] 费赫尔 (Fehér) (1987, 82~83)。当然，费赫尔强调这一点的反面作用，断言这一“反资本主义政治愿望……与恐怖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以此解释1793年是正确的，我也不能赞同认为它肯定不可避免地是这样的任何推论。滕内森 (Tonnesson) (1959, 347) 在评述共和三年 (1795年) 芽月和牧月 (Germinal and Prairial) 的暴动时，也提醒我们，正是“无套裤汉对富人的这种仇恨……使这些暴动具有了阶级冲突的性质”，他还说，“在防栅的另一边”，这一态度也“是同样有意识的”。关于无套裤汉不但是穷人，同时也是政治斗士的论述，参见伯斯坦 (Burstin) (1986, 45~46)。关于无套裤汉应主要被看作社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的争论，参见吕德 (Rudé) (1962, 370~372) 和察赫尔 (Zacker) (1962, 384)。

[248] 卡普兰 (Kaplan) (1979, 75)，他还说：“执政府 (Consulate) 的警察对工人骚动的诋毁与‘英国委员会’的所为是如此不同吗？它与使得杜尔哥 (Turgot) 能够否定小麦之战的民众性和自发性的一个阴谋的主旨十分不同吗？在旧制度下的违抗君命的罪名，经过一个几乎毫无意识的转化，变成了反革命的罪名。两者同样具有颠覆性，同样名声扫地。”不仅如此，可以这样说，大革命部分地是一个手段，通过它，资产阶级减弱了城市工人的阶级压力。加登 (Garden) (1970, 592) 描述了丝织业业主与他们的工人间的剧烈“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尤其剧烈，但“自相矛盾地，里昂 (Lyon) 的大革命历史的特征是工人的要求的倒退以及他们的地位的降低。需要花很多年时间，里昂工人才能恢复他们的凝聚性和力量，并努力再一次摆脱商人制造业主加在他们身上的依赖性枷锁。”

[249] 威廉斯 (Williams) (1968, 19)。

[250] 这是吕德 (Rudé) 的清单 (1967, 12)。

[251] 威廉斯 (Williams) (1968, 20)。但也参见松南斯舍 (Sonenscher), 他主张, 无套裤汉实际上更是帮工而非工匠, 并且, 如果政治语言同化了这两类人, “那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帮工提出的条件之上的合作” (1984, 325)。

[252] 滕内森 (Tonnesson) (1959, xviii)。同时参见肖辛南-诺加里 (Chaussinand-Nogaret) (1981, 548)。

[253] 索布尔 (Soboul) (1968, 192)。把这一观点与加登 (Gardon) 描写 (1970, 595) 的里昂相对照: “1789年以前, 在一个贵族兴起有限作用的城市, 它自然是一个在整个18世纪都在建设中的阶级社会——虽然有传统力量。以不止一种方式, 里昂社会预示着19世纪的社会: 资产阶级统治工业劳动大举已成为其本质特征。”同时参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关于用“前无产阶级”一词来称呼无套裤汉的争论 [吕德 (Rudé), 1962, 375~377; 洛泰 (Lotté), 1962, 387~390; 索布尔 (Soboul), 1962, 392~395]。

[254] 索布尔 (1981b, 356)。滕内森 (Tonnesson) 类似地谈到了正在变成“无套裤汉庇护人的政治被保护者”的穷人 (1959, XV)。

[255] 马迪厄 (Mathiez) (1923~1924, 262, 383, 405)。这就是“误入歧途的无套裤汉”最后转向反对罗伯斯庇尔为什么是一“有讽刺意味的悲剧”的原因 (577页)。

[256] “在大革命的历史上, 1793年6月2日还不具有1792年8月10日那样的重要性”, 即使它的确标志着一个“决裂”、“议会制政府的失败”并因而是“大革命的失败” [孚雷 (Furet) 和李希特 (Richet), 1973, 201~202]。

[257] 孚雷 (Furet) 和李希特 (Richet) (1973, 253)。

[258] 费赫尔 (Fehér) (1987, 131)。

[259] 费赫尔 (Fehér) (1987, 54~55) 坚持认为, 在相当程度上, 雅各宾主义是有意识地努力排除“英国式发展, 或者至少是雅各宾感觉中的这一发展”。他援引了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5月10日在国民公会 (Convention) 上的演说 [《著作集》 (Oeuvres), IX, 499]: “让我们亲眼看看英国吧! 在那里, 君主的黄金和权力不停地加向天平的同一侧……; 一个怪异的政府形式, 其公共品德只不过是厚颜无耻的体现: 自由的幻影扼杀了自由本身, 法律把专制奉为神圣, 人民的权利成为公开交易。在那里, 腐败没有受到廉耻心的束缚。”

[260] 参见费赫尔 (Fehér) (1987, 149~154) 关于“从雅各宾主义所学到的东西”, 认识到的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等同的论述。

[261]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1955, 20)。最近有一经验主义式研究坚定了这一主题, 这就是布吕日耶尔 (Brugière) 的研究 (1986)。他表明了法国财政从路易十六, 经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 到以后的连续性, 不仅在结构和政策方面, 甚至某种程度上在人事方面。

[262] 吕德 (Rudé) (1954, 247)。

[263] 盖兰 (Guérin) (1968, II, II)。

[264] 盖兰 (Guérin) (1968, I, 405)。像勒贝鲁 (Rebérioux) (1965, 197~198) 那样, 时常有人反对盖兰, 认为他没有考虑到“在1793~1794年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选择的不可能”。但即使这些反对是正确的, 它们也只是论证了城市大众的追求的明智, 而不是他们实际上到底追求了什么。

[265] 伊戈涅特 (Higonnet) (1981, 39, 91, 112, 131)。伊戈涅特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易如反掌地解释国民公会的某些行为的残酷性, 比如, 1793年3月13日, 它宣布对于“提出农业法”——(它意味着强有力地重新分配土地财富)——“的任何人”处决死刑。参见罗斯 (Rose) (1984, 113)。

[266] 参见韦斯顿 (Western) (1956, 603~605) 关于英国保守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的论述。

[267] 沙萨涅 (Chassagne) (1978, 164~165)。同时参见马尔科维奇 (Markovitch) (1976a, 484)。

[268] 借由比较两国冶金业发展得出的一项初步统计数字, 就可以得到说明。1720年到1790年间, 英国增长了100%, 而法国增长了468%。然而, 在1720年到1830年间, 英国增的是2608%, 而法国只是908%。参见莱昂 (Léon) (1960, 179); 参较莱维-勒布瓦耶 (Lévy-Leboyer) (1964, 326~332); 伯奇 (Birch) (1967, 47~56)。

[269] “革命的斗争……和英法之间的斗争是分离的。不列颠政府反对每一种革命的努力。……另一方面, 法国在波旁 (Bourbon) 和随之而起的共和政府两者之下, 实际上赞助所有革命的骚动。”帕玛 (Palmer), 1954, 9~10。

[270] 莫里诺 (Morineau) (1976b, 69)。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不管把英国的发展归结为什么原因, 它反正不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优势……(英国) 拥有足以能够从竞争者手中夺取市场的强大经济和进攻性国家。实际上, 1793~1815年的战争从根本上把所有竞争者驱逐出了非欧洲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除外”(1962, 47, 51)。

内夫 (Nef) (1957, 86) 走得甚至更远。他提出——违背事实地——如果没有大革命, 法国也许已经跑在大不列颠前面: “(在18世纪的) 技术发展中, 模仿英国已成为法国人的一个口号……到这一世纪末, 他们已开始在许多方面改善技术。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可以设想, 他们也许在这时超过了英国, 甚至是在以煤燃料为动力的技术发展中。”但是, 这当然是把政治发展当成了偶然事件, ——如果不是不相干的事件。另一方面, 哈特韦尔 (Hartwell) 则表示怀疑, 因为他宣称英国也遭到了损失。他主张, 如果没有战争, “形势也会是这样; 英国领先, 法国和德国的工业化稍后”(1972, 373)。另一方面, 麦克尼尔

(McNeill)嘲笑战争对英国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的观点。他指出,战争在增加国外需求的同时增加了政府开支,在增加国内需求的同时提高了补助金,更不用说在为出口铺平道路的同时增加了战争开支了。如果没有这些,“让人相信英国工业生产的增长会像事实上的速度那样看来是不可能的”(1982, 211)。

[271] 参见伯杰龙(Bergeron)(1970, 490),蒂拉德(Tulard)(1970, 645~646),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1973, 262~263)。作为一个明知不对而争论不休的人,克鲁兹(Crouzet)在与索布尔(Soboul)的争论中主张,封建课税的废除“不是发展所必需的因素”,因为它可能降低了需求。索布尔的答复是,农民在拿破仑时期的生活改善了。对此,克鲁兹反击:“我完全同意;但是,他们生活改善这一事实标志着生活消费的提高,此外,贮藏可能也增加了,以期购买土地。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说,这代表着发展的中断”(1971, 556~557)。

[272] 科尔(Cole)(1952, 42)说,在18世纪英国,农业的各种变化一直在进行。由于这一系列战争,其速度“惊人地加快了”。约翰(John)(1967, 30)特别提到,高昂的价格导致了“圈地行为的加快”,在1727年到1845年的所有圈地中,有一半是发生在1793~1815年这一时期。休克尔(Hueckel)(1976a, 343)特别提到,价格上涨给地主带来的好处具有非弹性土地上的“自然增值”的性质,与只提供劳动和资本的佃农相对。虽然这些佃农可以通过在新技术上投资来增加他们的绝对利润,但是,“超出平常水平的资本利润率是短命的”,因为农业是一个“竞争性事业”。

[273] 参见奥布莱恩(O'Brien)和凯德尔(Keyder)(1978, 136~138)。他们特别指出,“法国(在19世纪)的迟滞……(根源于)小型所有权和小型耕作生产可转化性剩余产品的能力有限”,他们又把这一形势归结到“大革命中断了大地产的复兴”这一事实。格兰瑟姆(Grantham)(1978, 311)把北部法国延迟采用精耕混合农业归因于“1840年以前肉类和奶产品需求的缓慢增长”,但肯定的,这至少部分地由于同样地缺乏农业经营的集中以及它所带来的生活品生产的更高的水平。然而,劳伦特(Laurent)断言,从1815年到1880年,法国小麦和裸麦产量不断提高(但没有与大不列颠的比较)(1976b, 683)。

[274] 克拉夫茨(Crafts)(1983, 186)。

[275] 哈利(Harley)(1982, 286)。惹人注目的是,“贬低”18世纪后期英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这种类似的修正——哈利和克拉夫茨(Crafts)(1983)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两个著名的经济史杂志上发表。

[276] 查普曼(Chapman)(1971, 75)。他得出结论:“实际上,在显微镜下观察早期棉纺织工业的时间越长,其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所显现出的革命性就越弱”(76页)。

[277] 参见查普曼(Chapman)(1972, 18~19)和克鲁兹(Crouzet)(1958, 74)。关于水力动力直到1840年的持续重要性(以之对抗不太经济的蒸汽动力),参见贝尔洛克(Bairoch)(1983)和昂德雷(Endrei)(1983)。同时参见吉勒(Gille)(1959, 28),罗

宾逊 (Robinson) (1974, 101), 马森 (Masson) (1976, 416~417) 和范滕泽尔曼 (Von Tunzelmann) (1978, 6)。

[278] 查普曼 (Chapman) (1972, 22)。

[279] 盖尔 (Gayer) 等人 (1975, 649)。参见戈德肖 (Godechot) (1972, 370, 表53) 的数字。

[280] 盖尔 (Gayer) 等人 (1975, 649)。

[281] 爱德华 (Edwards) (1967, 33)。他指出, 1790年代, 棉布在英国国内市场上的优势是由美男子布鲁梅尔 (Beau Brummel) 日益成为男性时装的仲裁人而煽动起来的。他强调经洗性和式样。“白布和平织细布正适合这些要求”(35页), 让人们也可以仿效他们。

[282] 弗林 (Fohlen) (1973, 69)。同时参见克鲁兹 (Crouzet) (1967a, 173) 和莱维-勒布瓦耶 (Lévy-Leboyer) (1968, 282)。戈德肖 (Godechot) 曾责备莱维-勒布瓦耶夸大了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工业的消极影响, 但甚至他也承认, “毋庸置疑”, 革命“不仅抑制了”大陆欧洲达到英国工业的水平, “甚至还拉大了差距”(1972, 370)。特别是就法国而言, 他认为大革命“严重干扰了工业化的演进”(戈德肖, 1972, 362)。除此之外, 还有对法国特定地区的影响。克鲁兹 (1959) 断言, 1793年是西南部法国的转折点, 此前, 那里的工业化程度不低于法国其他地方, 而此后, 它变成了一个非工业化地区, 并把这种状况延续到1815年以后。

[283] 马尔切夫斯基 (Marczewski) (1963, 127) 提到了1796年的最低潮, 1812年的第二个中断点。索布尔 (Soboul) (1976a, 4) 谴责指券 (assignat) 和通货膨胀造成了1790年到1797年的“断裂”, 这一断裂“暂时中断了发展, 导致了无法弥补的社会后果”。克鲁兹 (Crouzet) (1926, 214) 谈到了“督政府时期和执政府开始时的暴跌”, 他把此归因于“法国工业丧失了外国市场”。伯杰龙 (Bergeron) (1970, 504~505) 说, 1800~1810年的好年景“处于两个灾难性事件之间, 其一从大革命最初几年对旧政体 (Ancien Régime) 局面的破坏到战争开始, 其二从大陆封锁政策的相对失败到拿破仑垮台”。

[284] 沙萨涅 (Chassagne) (1979, 104)。虽然沙萨涅特别提到, 法国棉纺织业的这种农村化在旧政体 (Ancien Régime) 的最后几年已经开始了, 但是, “大革命加速了这一社会—经济‘革命’”。

[285] 参见施密特 (Schmidt) (1914, 51)。

[286] 沙萨涅 (Chassagne) (1979, 107)。

[287] 克拉夫茨 (Crafts) (1983, 199)。

[288] 马尔切夫斯基 (Marczewski) (1965, IX)。他主张, 直到1855年, 法国才再次达到了1787~1789年的对外贸易水平。

[289] 布罗代尔 (Braudel) 说, “革命法国的 (对外) 贸易的衰落——甚至在1792~1793年的引人注目的事件之前, 在其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1982, 219)。

[290] 在旧政体 (Ancien Régime) 的最后几年, 圣多明各本身就提供了法国对外贸易的1/3。“只要法国仍然拥有‘这一群岛’, 特别是拥有‘西印度的明珠’ (圣多明各), 旧政体法国的经济体系就会安然无恙。”但是, 这恰恰是旧政体下“崩溃”的“第一个部分” [吕提 (Lüthy), 1961, 596]。正如伯杰龙 (Bergeron) 继续指出的: “从那时起说, 在被切掉了那一最有活力的部分后, 法国经济发现自己屈从了农村化的诱惑, 或者至少是, 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下, 被迫面对向工业时代的转化” (1970, 476)。

[291] 迪恩 (Deane) 和科尔 (Cole) (1967, 30)。同时参见施洛特 (Schlote) (1952, 42, 表8), 克鲁兹 (Crouzet) (1958, 178~192), 迪恩和哈巴库克 (Habakkuk) (1963, 77) 和爱德华 (Edwards) (1967, 27~29)。戴维斯 (Davis) 强调是技术而非需求是解释是英国棉纺织生产扩张的因素, 但即使他这样的作者也特别提到, 在18世纪90年代, 出口迅速增加了, 它遭到了战争引起的贸易模式的“扭曲”——他如此称之。在我看来, “扭曲”一词扭曲了现实。哈巴库克和迪恩 (78页) 的观点更为正确: “对于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最初几年发生的市场的扩展, 英国海军力量的贡献至少像英国实业家的创造力的贡献那样多。”

[292] 弗林 (Fohlen) (1973, 13)。莱维-勒布瓦耶 (Lévy-Leboyer) (1964, 246~247) 特别提到, 在19世纪前半期, “争夺海洋的斗争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盎格鲁-萨克逊人间进行”, 这在早些时候是“始料不及的”, 特别是对法国来说。“1793年的切断和供给的新来源的出现, 将给 (法国和荷兰海上) 运输以致命一击。”同时参见克鲁兹 (Crouzet) (1962, 215): “在执政府之初, 法国所缺少的是外部市场, 而不是生产能力。虽然其生产能力在大革命期间遭受损失, 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没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克鲁兹的发现 (1962) ——这一时期缺乏市场 (与缺乏工业能力相对) 对他们的工业的生死攸关的影响, 埃利斯 (Ellis) (1981, 102) 以阿尔萨斯为例给以恰当的证实。

[293] 迪恩 (Deane) (1973a, 208)。同时参见奥布莱恩 (O'Brien) 和凯德尔 (Keyder) (1978, 76)。他们提醒我们注意梯也尔 (Adophe Thiers) 的解释: “我们没有在特拉法尔加 (Trafalgar) 战役中取胜。我们不是海洋的主人, 我们没有两亿消费者——像英国那样。这就是我们的劣势的所有秘密。”莫里诺 (Morineau) (1978, 416) 指出了这一连锁反应: 由于“法国的被迫让出”, 英国的传统销路又增加了在大陆得到的市场, 而向南美洲的扩张更增大了其范围。“在此之后, 一切转入正轨, 游击战结束了。”克鲁兹 (Crouzet) (1980, 72) 特别提到, 1783年到1812年, 英国“附加的出口”有60%到新大陆, 23%到欧洲大陆。

兰德斯 (Landes) 首要强调的是他所称的工业发展的地方性决定因素, 但甚至他也谈到 (1969, 145) 了大革命的动荡导致的大陆工业化延迟所造成的“次要结果”: “特别地, 大陆与英国之间工业装备的差距增大了。虽然这一扩展在理论上可能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更大的刺激, 但实际上却成为一个障碍。”他有两点解释。其一, 增加的生产额意味着晚近的装备“不大适应滑铁卢之后的大陆市场了” (146页), 但这当然是由于英国现在控制着进入非欧洲市场的通道。其二, 这是由于现在必须的“大量初始投资”的增加 (147页)。因此, 兰德斯说, 大陆工业

正陷于“自愿的萎缩”，并且承认，这“有助于维持英国在第三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是，在相当程度上由政治军事优势所创造的经济结构如何自愿呢？兰德斯实际上是在评述“霸权”的形势。在这方面，参见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1973，307~309）。

[294] A.E.46, f326。1847年，一个德国作者写到：“（1792~1815年的法国与英国间的）这一战争——后人会相信吗？——是作为讨伐糖和咖啡、高级密织薄纱和平纹细布的十字军而宣战的”〔施莱格尔（Schlegel），转引自林厄巴赫（Lingelbach），1914，257〕。

[295] 克鲁兹（Crouzet）（1958，I，86）。

[296] 参见伯杰龙（Bergeron）（1978e，358）和罗斯（1893，704）。至于英国的封锁，迈耶（Meyer）主张，“早在1778年，英国就给荷兰人施加压力，让他们背弃与法国的商业条约，这是大革命和帝国期间英国‘大陆’封锁的遥远的先例”（1979a，213，注脚）。

[297] 克鲁兹（Crouzet）（1958，I，86）。

[298] 参见布特尔（Butel）（1970）。他特别提到，1802年，随着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而出现的改观的形势在1803年夏天随着海上战争的重新开始又急转直下了。虽然如此，英国此时的封锁“仍然是相当宽容的”，这是因为，英国允许“经由中立的中介人、特别是美洲人的间接地与殖民地的贸易”（546页）。

[299] 克鲁兹（Crouzet）（1958，I，203）。

[300] 克鲁兹（Crouzet）（1958，I，57~63，91~97，102，122~123）。

[301] 克鲁兹（Crouzet）（1958，I，126~152）。

[302] 马汉（Mahan）（1893，II，279）。关于1806年，马汉谈到了“英国海军的霸主地位以及它的无所不在，这使得悬挂敌旗的船只不可能在海上维持”（308页）。马汉得出结论：“通过垄断海洋，通过摧毁法国的殖民体系和商业，（英国）把敌人赶到了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的战场，在那里，他的最后崩溃是无可怀疑的。”（400~401）。

[303] 参见富吉尔（Fugier）（1954，236）。

[304] 参见莱维-勒布瓦耶（Lévy-Leboyer）（1964，708）。布罗代尔（Braudel）谈到了革命法国的“资本的大规模外流”（1982，219）。

[305] 参见舍威格（Sherwig）（1969，12）。

[306] “借钱以支付战争的早期实践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有更多的好处，一方面是维持了就业水平，另一方面，它在英国经济发展的可能的关键时期维持了发展势头”〔安德森（Anderson），1974，618〕。

[307] 参见迪恩（Deane）（1979，52）和约翰（John）（1969，47）。

[308] 国家的扶植有三种主要形式：（1）把教会财产出租成低价售给制造商（这对工业的长期结构意味着什么我们前面已特别提到了）；（2）政府鼓励由英国模型演化而来的新机器；（3）给那些装配这种机器的人以适当的津贴（特别用于帮助那些否则就有破产危险的雇主）。参见伯杰龙（Bergeron）（1978b，213~214）。莱勒（Leleux）提起了拿破仑帝国的大实业家——多尔富斯（Dollfus）、奥伯康夫（Oberkampf）、理查-勒努瓦（Richard-Lenoir）、泰尔诺（Ternaux）、鲍温（Bauwens）——“他们感到被理解、被资助、被支持”（1969，122）。同时参见沙萨涅（Chassagne）（1980，336）。

[309] 英国人是他们的技术优势的积极保护者。他们制订了各种立法，并在1795年的一个综合法令中予以巩固。此法令禁止机器出口（包括器具、草图或机器模型），同时禁止熟练工人移居国外，违犯者予以严重处罚（丧失英国居民身份、剥夺财产）。固然，这种法律并非100%成功。然而，它们是有用的，只是到1824年才被取消——即使那时也只是部分地取消。直到1843年才完全废除。参见克拉夫（Clough）（1957，1346）。

[310] 参见科班（Cobban）（1965，52）和戈德肖（Godechot）（1967b，167~168）。布维尔（Bouvier）把法国1810~1811年的工业危机归咎于封锁（Blockade）造成的“获取原材料供应的困难”。同时参见富吉尔（1954，237~238）。

[311] 克鲁兹（Crouzet）（1958，II，855~860）。

[312] 参见戈德肖（Godechot）（1967a，180~200）关于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反抗运动的论述。克鲁兹（Crouzet）（1958，I，408）特别指出，封锁在西班牙的结果对法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法国现在最终眼睁睁看着英国人取代了西班牙市场。参见布罗德（Broder）（1976，310）。同时参见迪潘（Dupin）（1858，160）。他表明，1807年到1812年间，英国产品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销售量翻了5倍。民族主义反抗拿破仑不仅有政治基础，而且还有经济基础。参见波拉德（Pollard）讲述的拿破仑的打算：“（法国）边缘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将成为某些原材料的供应者和它的制造品的市场。欧洲其他地方——只要是稍微引人注目的地方，将成为属地，任凭被法国的保护性并精心培养的工业所淹没，而那里的制造品则完全被排除在宗主国市场之外。法国的视野就是排他性的民族主义”（1981，24）。

[313] “财政援助开始于1794年的普鲁士威胁，由于事态发展的压力”而日益慷慨。到1806~1807年冬，财政援助是“少量地……分发”[舍威格（Sherwig），1969，181]。到1812~1814年，这种财政援助占到了英国总课税收入的大约14%（354页）。1793~1816年的财政援助总量为“57,000,000镑以上”[克拉潘（Clapham），1917，495]。

[314] 参见茹弗内尔（Jouvenel）（1942，399~417）。埃利斯（Ellis）（1981，266）主张，拿破仑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相对欧洲大陆其他地方来说的“刻意的单向性”。拿破仑没有去促成大陆关税同盟（Continental Zollverein），而是创造“一个适合法国利益的庞大

的‘奇异市场’（Uncommon Market）。”

[315] 克鲁兹（Crouzet）（1964，579）。

[316] 参见克鲁兹（Crouzet）（1958，II，872）。

[317] 参见滕内森（Tonnesson）（1959），马尔科夫（Markov）（1960），索布尔（Soboul）（1963），罗斯（Rose）（1965，1972，1978），伊戈涅特（Higonnet）（1979）。

[318] 佛瑞斯特（Forrest）（1981，172）。

[319] 参见索布尔（Soboul）（1970a，335）。关于制宪会议的“社会成就”，他谈到了波拿巴。同时参见戈德肖（Godechot）（1970，795~796）。

[320] 勒费弗尔（Lefebvre）（1969，153）。

[321] 图拉德（Tulard）（1970，659~661）。

[322] 汤普森（Thompson）（1968，171~172）。关于工匠此时在英国劳动阶级激进主义中的领导作用，同时参见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1974，484），普罗瑟罗（Prothero）（1979），卡尔霍恩（Calhoun）（1982，7）。

[323] 古德温（Goodwin）（1979，26）。

[324] 汤普森（Thompson）（1971，129）。

[325] 埃姆斯利（Emsley）（1981，155）。除了对叛国者和煽风点火者的起诉外，还有大量的“私人迫害”（174页）。勒费弗尔（Lefebvre）特别提到（1968，616）了在法国被称作“断头台沙滩（guillotine sèche）”的广泛运用，即驱逐出境。

[326] 罗杰斯（Rogers）（1884，434）。

[327] 麦克尼尔（McNeill）（1982，209）。当然，它是通过消灭了对生产率的任何促进的制度来做到这一点的。用波拉尼（Polanyi）的话说（1957，79~80），这“就等于放弃了都铎王朝立法，不是由于家长作风淡漠了，而是由于它更浓了。”他说，从长远来看，“结局是可怕的”。

[328] 布劳格（Blaug）（1963，162，168，176）。

[329] 参见布劳格（Blaug）（1963，176~176）。

[330] 芒图（Mantoux）（1928，448）。

[331] 参见麦克尼尔（McNeill）的分析（1982，209）：“如果没有济贫法的帮助，在饥荒

之时，或在一年中土地上的劳动最松的季节，农村劳工就会别无选择地逃进城镇……1788～1789年，由于歉收，成群的这类人就曾涌进巴黎。”然而，1795年后，类似的事情不可能在英国发生了，波拉尼（Polanyi）（1957，93）引用了坎宁（Canning）的信条：“济贫法（Poor Law）使英国避免了一场革命”。

这让人完全赞同钱伯斯（Chambers）和明盖（Mingay）（1966，109～110）的结论：“从根本上说，正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政策帮助了膨胀的农村人口的维持——以农场主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为代价。”

[332] 波拉尼（Polanyi）（1957，81）。“1793年到1820年间，60个以上的以抑制劳动阶级的集体行为为目的的法令被议会通过。到1799年，从本质上说，各种形式的劳动阶级组织或集体行为都成为非法，或者都要得到治安法官的许可”[芒格（Munger）1981，93]。

[333] 普鲁姆（Plumb）（1950，158）。类似地，芒图（Mantoux）（1928，456）主张，这一法令是由“对革命，比如正在法国发生的那种革命的恐惧而激起的”。

[334] 芒图（Mantoux）（1928，436）认为这一下降的特点是其剧烈性。“名义上的工资提高……与战争引起的价格上涨根本不成比例。”同时参见福斯特（Foster）（1974，21），琼斯（Jones）（1975，38），图泽尔曼（Von Tunzelmann）（1979，48）。奥布莱恩（O’Brien）和恩格曼（Engerman）（1981，169，表9.1）表明，实际工资接近于一稳定水平，但在中间有一剧降。

[335] 关于食物骚乱，参见斯蒂文森（Stevenson）（1974）。关于1809～1811年的英国可以与1786～1789年的法国相类比，参见坎宁安（Cunningham）（1910，75～77）。关于卢德主义是工人极度穷困的反映，参见托米斯（Thomis）（1972，43～46）。

[336] 奈恩（Nairn）（1964，43）的总体印象有点不同：“英国劳动阶级的早期历史是……一种反抗史，延续半个多世纪，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1840年代的宪章运动（Chartism）的顶峰。”对此，我并非不同意。但我感到法国人的反抗更成功，这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他们作为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的早期成功。他们变得日益勇敢，而法国资产阶级有点不如他们的英国同行大胆。法国资产阶级增补工人日益困难，因为用于此项的剩余日益减少。

[337] 最完整的论证是由斯梅尔（Semmel）来做的。他收集论据，并从而主张（1973，7）：“卫理公会派（Methodism）可能帮助了阻止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的暴力响应——通过以先买权取得法国大革命的关键呼吁和目的。”同时参见基尔南（Kiernan）（1952，45）、汤普森（Thompson）（1968，419）。

[338] 参见安德森（Anderson）（1980，37～38）。“国家系统地组合起来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拿破仑时代很可能是一强大的现实力量，超出了前一个世纪的任何时候……（反革命的民族主义）普遍而持久，其组织重要性肯定大于更是地方和局部现象的卫理公会派……”但也参见科利（Colley）。他主张，英国国家是够强大，感觉不到有必要“鼓动和利用民族自觉性”（1986，106）。

[339] 参见格雷厄姆 (Graham) (1966, 5), 肖 (Shaw) (1970, 2), 达比 (Darby) 和富拉德 (Fullard) (1970, 12~13)。

[340] 参见格雷厄姆 (Graham) (1966, 7), 布罗代尔 (Braudel) (1982, 395)。

[341] 参见伊姆拉 (Imlah) (1958, 40~42)。

[342] 英国的工业保护主义只是到1842年才结束。参见伊姆拉 (Imlah) (1958, 16, 23)。英国的航海条例只是到1849年才废除。参见克拉潘 (Clapham) (1966, 169~170)。同时参见莱维-勒布瓦耶 (Lévy-Leboyer) (1964, 213~214) 和迪恩 (Deane) (1979, 203)。当然, 法国的保护主义延续时间更长。参见莱维-勒布瓦耶 (1964, 15), 布罗德 (Broder) (1976, 334~335), 多马尔 (Daumard) (1976, 155~159), 莱昂 (Léon) (1976a, 479), 沙萨涅 (Chassagne) (1981, 51); 关于欧洲的普遍情况, 参见吉尔 (Gille) (1973, 260)。

[343] 亨德森 (Henderson) (1972, 212)。

[344] 转引自吉尔 (Gille) (1959, 33)。参见斯特恩斯 (Stearns) (1965)。他分析了法国实业家在1820年到1848年感受到的“英国工业的压倒优势”(53页)。

[345] 夏普泰尔 (Chaptal) (1819, II, 31)。兰德斯 (Landes) (1969, 161~164) 同意。然而, 克鲁兹 (Crouzet) (1972e, 286) 列举“廉价而聪明的劳动大军”为1815年以后的时期法国与大不列颠相比的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

[346] 奥布莱恩 (O'Brien) 和凯德尔 (Keyder) (1978, 174; 同时参见表4.3, 91页)。作者的确特别提到, 这是一“非正统的发现”。

[347] 奥布莱恩 (O'Brien) 和凯德尔 (Keyder) (1978, 74)。

[348] 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1975, 378)。塞迪约 (Sédillot) 更为严肃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断言, 1789年到1815年间, 法国人口增长了9%, 而大不列颠是23%, “这有助于缩小人口规模的差距, 并为将来的鸿沟做了准备”(1987, 37)。

[349] 莱因哈德 (Reinhard) (1965, 451)。

[350] 麦克尼尔 (McNeill) (1982, 201)。迪帕克耶 (Dupâquier) (1970, 340~341) 好像赞同这一观点。

[351] 参见特兰特 (Tramter) (1981, 209~216) 的评论。他主张, 从1780年到1860年, 劳动力增长中的最大部分源自自然增长。同时参见莱因哈德 (Reinhard) (1965, 458)。关于爱尔兰在英国人口增长中的作用, 参见康奈尔 (Connell) (1969, 39)。

[352] 奥布莱恩 (O'Brien) 和凯德尔 (Keyder) (1978, 75)。

[353] 这一观点反映在吉尔（Gille）（1959，40），莱昂（Léon）（1976a，478），休厄尔（Sewell）（1980，153）。

[354] 奥布莱恩（O'Brien）和凯德尔（Keyder）（1978，75）。

[355] 阿什顿（Ashton）（1949，28），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57，52），哈特韦尔（Hartwell）（1961，412），霍布斯鲍姆（1963，126），泰勒（Taylor）（1960，25）。同时参见伊姆拉（Imlah）（1958），哈特韦尔（1963，1970a），威廉斯（Williams）（1966），尼尔（Neale）（1966），古维斯（Gourvish）（1972），弗林（Flinn）（1974），哈特韦尔和恩格曼（Engerman）（1975），许克尔（Hueckel）（1981），奥布莱恩（O'Brien）和恩格曼（1981），克拉夫茨（Crafts）（1983），林德特（Lindert）和威廉森（Williamson）（1983）。

读一下布里阿瓦尼（Briavoine）于1838年对这一论题的非难是很迷人的：“有物质上的得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一个结果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虽然这一点不再为许多杰出人物怀疑。这就是，要清楚新工业制度是否有助于激起劳动者更健全的自尊意识、更规律的工作习惯、更强烈的节约爱好、更纯洁的品行。节余贮存的现状已经列举了。但是，这一物质上的证据之外，人们可以易如反掌地提出其他相反的证据：反映家庭内部的混乱与不幸的出生登记档案和弃婴收容所的档案；证明轻罪和重罪行为稳步上升的犯罪统计资料。因此，这些问题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充足的资料以进行明确的分析”（1838，98）。人们怀疑，这一问题即使今天是否“成熟”了。

[356] 迪恩（Deane）（1979，208）说，1815年到1846年，谷物法是“富人与穷人冲突的一个标志”。

[357] 迪恩（Deane）（1979，99~100）。

[358] 莱维-勒布瓦耶（Lévy-Leboyer）（1964，144~145，169~171，342，411~414）。

[359] 原文短缺此注——编者按

[360] 参见克鲁兹（Crouzet）（1964，586）。从沿海地区向内的这一转化当然开始于战争期间，并涉及了整个前洛林吉亚（ex-Lotharingia）：法国东北部，根特（Ghent）、韦尔维耶（Verviers）、列日（Liege）、亚琛（Aachen）、阿尔萨斯（Alsace）。

[361] 莱维-勒布瓦耶（Lévy-Leboyer）（1964，186~191）。

[362] 蒙戈尔菲耶（Montgolfier）（1980，7）。

[363] 休厄尔（Sewell）（1980，281）。他也说：“在紧随1830年革命而来的民众骚动中，阶级意识第一次在法国出现。”但是，正如我在前面证明的，阶级意识已经在那里存在了。还没有做到的是把它理论化。这一点现在开始了。

[364] 参见汤普森（Thompson）（1968，911）。

[365] 汤普森（Thompson）（1978b，46~47）。他还加上了这一十分中肯的历史编纂学评论：“如果事态的发展不是如此，那么，这样假设是合理的：革命可能已经促成了一个十分快速的激进主义过程，走过并超越雅各宾的经历；并且，不论是采取了什么形式的反革命，也不管最终怎样稳定下来，18世纪的许多社会机关——上院、国教会、君主制——的幸存是不太可能了，法律上的和军事上的显贵可能已被肃清——至少暂时地。倘若事态照这样发展，至少那些喜欢建立模式的人们现在会感到满足了；1832年将成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1640年将被忽略，只不过被视为一个‘早熟的’爆发，一种胡格诺战争（Huguenot wars）与投石党运动（the Fronde）的混合物。暗示某种类型的‘封建’社会在英国一直存在到1832年前夜的倾向（以此作为解释法国大革命——“封建制度”于1788年在法国盛行——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隐约透出的古怪意向的参照）也会增强。”

[366] 汤普森（Thompson）（1978b，50）。

第三章 巨大的新地带并入世界经济：1750~1850年



第三章插图 “欧洲使节与大维齐在国会大厅的晚宴”

贝诺瓦斯特（可能是M.A.Bénoist）所作。（1785）

巴黎：国家图书馆，版画部。

这幅雕版画描绘的是在奥斯曼（Ottoman）宫廷接见一位欧洲使节所精心安排的过程之一部分。这是在使节将要觐见苏丹（sultan）之前，在国务会议厅（Divan）与大维齐（Grand Vizier，首相）交换国书后提供典礼用餐。这幅饰刻画是贝诺瓦斯特（M.A.Bénoist）在1785年制作的（也许是贝诺瓦斯特，他于1780~1810年在巴黎工作），并由德尔沃（Delvaux）完成，[也许是雷米（Rémi）·德尔沃，1750~1832]。它出现于第一本主要向欧洲公众介绍奥斯曼的风俗习惯和历史的书的插图中。这本名为《奥斯曼帝国的总图景》（*Tableau généralde l'Empire Ottoman*）的书，是道森（Ignatius Mouradgea d'Ohsson）所写，他曾是瑞典驻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的代办。它分成三卷在法国巴黎于1787年、1790年和1820年出版。

在1733年~1817年这个恢复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的时期（或长或短）的过程中，欧洲世界经济突破了它在漫长的16世纪创造的疆界，并开始将巨大的新地带并入它所包含的有效带动分工中。它开始于合并从16世纪以来已经是它的外部竞争场的地带——最特殊和最重要的是印度次大陆、奥斯曼（Ottoman）帝国、俄罗斯（Russian）帝国和西部非洲。

这些合并发生在18世纪下半期和19世纪上半期。其速度正如我们所知的，随之加快了，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终包括了全球，甚至那些从来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都不是的地区也被拉了进来。这种合并到现存的资本累积进程的过程的模式适合于这四个地带。虽然每个地带的合并过程在细节上有些不同。这四个进程或多或少是同时发生

的，并且在本质的特点上显示了实质上的类似。

合并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从来不是由于那些被合并者的主动。这个进程源自世界经济扩张其疆界的需要，一种由于这个世界经济内部压力的结果本身的需要。像合并这样主要的和大规模的社会过程再者说也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现象，它们产生于持续进行的活动的潮流中。若我们能够给出它们追溯性（和大致的）的时期的话，这些转折点也很少是明显的，而它们的影响是真实的，并最终它们的发生会被觉察到。

在这部著作的前面，我们已经探讨了系统地区分哪些（在漫长的16世纪）是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和那些在其外部竞争场的地区。我们认为在俄罗斯（在外部竞争场）和东欧（在边缘）与西欧的联系之间有三种在方式上的主要不同：“（a）在贸易性质上的不同，（b）在同家机器的力量和作用上的不同，和（c）作为前两点的结果，本地市镇资产阶级在力量和角色上的不同。”^[1]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在时间的一点上是这个世界经济外部竞争场的地带，在以后时间的一点上变成这同一个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的过程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转变是一个中间性的过渡时期，并且将它命名为“合并”（incorporation）时期。所以，我们使用的模式对一个“地带”（zone）而言，包括三个接续的阶段——处于外部竞争场，被合并和被边缘化。这些阶段没有一个是静止的，它们全都包含着一个过程。

合并基本上意味着至少在一个既定的地理场所有一些重要的生产过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构成进行着的劳动分工的种种商业链条的一部分。而我们怎样会知道是否一个特定的生产过程是这个劳动分工“整体中的一部分”？一个生产过程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是其整体的一部分，即如果它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个世界经济不断变化（不管这些变化的来源是什么）的“市场状况”的反应，这种反应以那些

控制着这些生产进程的人在这个“市场”内最大程度地进行资本累积的努力为方式——如果不是以非常短期行为的方式，至少是以有某种道理的中期行为。只要这不能说是整体上发生的，只要这些特有的生产进程的不可预测的变化，还能够解释为出于与使得在世界经济中达到最大程度的资本累积有所不同的考虑，那么这些特定进程所处的地带应当认为还留在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中，尽管存在着贸易联系，不管所进行的“贸易”看来是多么广泛或有利润也罢。

当然，尽管以这种方式尽多地对这种分别下定义，可能在理论上会澄清这个问题，它对将一个特定情况作正确描述的经验指标而言却几乎没有用处。要找到这样的指标，我们必须转向这种整体化的某些经验性结果。而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合并”阶段（不管有多么长）和随后的“边缘化”阶段之间作为区分。如果可以使用一个类比的话，合并意味着将这个地带“攫获”进世界经济圈内，以使其完全不能再逃脱这样的方式。而边缘化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小结构的继续转变，其方式有时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化。

也许我们如果要问自己这个简单的问题，为了使一个地方性的生产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世界经济的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作出反应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所需要的标准。看来清楚的是做出反应的能力部分取决于做出决定的单位的大小。一个较大的单位更易于有基于其自身的影响，和它自己的对资本累积的期望，并以其所认为一些市场的变化状况的看法来改变它的生产决定。随之而来的是，因为在一个地带的企业开始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时，它们就可能必须变得更大。这种做出决定的较大单位的创立，可能发生在直接生产的地点（例如创造一个“大农场”），或者在一个商品出产的聚集地点，提供给聚集者，也就是商人，有着某种控制机制，必然是控制着众多小生产者（例如债务人）的活动。其次，决定，最简单地就是那些扩张契约性生产的决定，必须依据获得（或免除其责任）进入生产进程的因素的能力——机

器、原料、资本，还有更重要的，人加人的劳动力必须是以某种方式“可强制性的”。第三，那些控制生产进程的人，如果与权力与权威有关的政治机构允许，鼓励和资助这样的反应，比起没有这种条件的情况更会做出反应。最后，反应需要有合理的担保和适当的流通安排这类制度化的基础设施。

由此而来的就是分析一个既定地带的生产进程是否是一个世界经济更大的劳动分工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探究作出经济决定的结构的性质，使劳动力各有不同地应用于这些生产进程的运行的方法，统治单位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上层结构的要求相适应的程度，最后还有所必须的制度化的基础设施的出现，或者说这些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基础设施扩张到包括了被合并的地带。这就是我们在这章中打算讲述的故事。

让我们从回顾在什么意义上这四个地带没有在1500~1750年这个时期被合并，并且在这个时期，所有这四个地带可以说作为外部竞争场的一部分，一直与欧洲世界经济有着持续的贸易关系开始。

首先是这种贸易的性质。两个地带之间贸易的独特性不是在一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之中，而是围绕着这种区分，用较早时代的语言说是在“富人贸易”和“劣等的”（coarse）或“粗制的”（gruff）货物贸易之间。今天我们作这种区分一方面是在“奢侈品”货物，另一方面是“大宗货物”或“必需品”之间。奢侈品当然是一个其所用定义是与规范估价相关的术语。我们今天知道甚至像生存的最低生活标准这样一个生理学概念也是由社会来定义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将人们度量生存的时间长度放进这个方程式。难于决定什么特定的产品——香料、茶叶、毛皮或确实的奴隶——在一个既定的情况下是还不是奢侈出口货品，更不用说金银这种特别例子了。我让奢侈品出口，是因为在经济意义上一种奢侈品进口的概念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一项物品被带

入市场，那是因为有些人主观上感到对这项物品有“需求”，分析观察家断言这种“需求”是不真实的就显得愚蠢。在托马斯（Thomases）的经典表述中说，“如果人们认定情况是真实的，它们在其影响上就是真实的。”^[2]确实，有些项目的物品每单位是昂贵的，有些则不昂贵，但是与商人有关系的是买卖数量中总售出量增长的回报率。

但是，奢侈品出口可以有一种更具分析性的定义。它应用于将社会上低价值的货物从它们的另外用途中以比它们能得到的要高得多的价格进行处理。这是一个只能够应用于人们讨论两个分离的历史体系之间的贸易，这就可以料到会有社会价值的不同度量标准。因而“奢侈品”和“外部竞争场”的概念是携手并行的。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文献，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们往往使用“奢侈品”贸易这种语言来描述印度和西部非洲。例如库尔什雷斯德拉（Kulshresthra）注意到：“吉朋（Gibbons）说东方贸易的目的是辉煌而又无关重要的。而这对于16和17世纪而言是格外真实的。”^[3]诺思拉普（Northrup）在谈到大西洋商业在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的发展时，观察到阿罗人（Aro）以“奢侈物品——奴隶、马匹、牛群等用于礼仪活动的东西和珠串”进行贸易，^[4]而这样的商业活动是不在本地市场上进行的。

但是是什么使得奢侈品成为奢侈品的？阿明（Amin）发现关键性的一个变数被忽视了。他将“长途贸易”中货物的“稀有”与这个事实联系起来，即这种贸易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因为每一方都不知道另一方的生产费用。”^[5]如果无知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在什么情况下这种奢侈品贸易将会自行消灭。随着贸易的扩张，这种无知的基础就会消失。这于是就带给我们第二个关键因素，即由波拉尼（Karl Polanyi）提出的，并特别应用于18世纪达荷美（Dahomey）的情况。这就是“贸易港”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重新下概念为“政治构想”，由此这种“无知”就被保全了。

如阿诺德（Rosemary Arnold）所详述的达荷美（Dahomey）的“贸易港”功能那样，如惠达（Whydah），关键在于达荷美王国的“贸易组织和军事组织的彻底在制度上分离”。^[6]在地域上和制度上的情况一样——因为战争位于“内陆”而贸易位于海岸，这意味着这个王国的军事目标，包括奴隶捕获，能够在“没有来自贸易者的干预，不管是欧洲人还是达荷美人”的情况下进行。^[7]但什么是干预呢？很清楚，阿诺德（Arnold）的意思不是军事的而是经济干预，而经济干预包括了对市场状况的了解。

为了维持对这种了解的垄断，“贸易港”的概念与统治者的贸易垄断相联系，商人们的作用只是作为统治者的雇员或代理人。^[8]除了自然上的分离和王家的垄断外，奥斯汀（Austen）加上了第三个因素。“一种将收集国际贸易商品与为内部非洲使用的货品生产保持分离的体制。”^[9]这种假定可能是不正确的，即收集的内部基础结构相对于“生产”而言是薄弱得多的，并且因为如此，收集活动数量扩张和收缩的费用就比卷入生产活动的情况要大为减少。

确实，这种波拉尼-阿诺德（Polani-Arnold）理论一直没有受到达荷美王国经验性描述的挑战。特别是王家对奴隶贸易的垄断似乎不总是完全性的。然而，阿盖尔（Argyle）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考察到国王的权力足以要求非洲的奴隶捕获者和欧洲的商人都在与其他人做交易之前首先与国王做买卖，以“规定价格”卖给国王，并用比“他们给予其他交易者”要高的价格从他那里买东西。^[10]曼宁（Manning）的批评形式也许更适当。他认为波拉尼-阿诺德模式由于将三个不同的世纪混同起来，因而是“扭曲的和反历史的。”^[11]因而这种描述只对最早的时期是真实的。并且，这种为了防止合并建立的贸易港，却可能导致相同于合并的其他依赖模式。因为贸易港需要一个较强有力的国家形式，一个西非洲人在卷入奴隶贸易时的特点，这点经常被提到，对此我们以后再论。而较强国家的真正生存就要越来越依赖于贸易联系。^[12]

在外部竞争场的国家机器的力量成为一个关键的变数，但是它对合并的影响要比我们一直愿承认的要更复杂。从与另一个世界体系作最初接触而言，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确保两个外部竞争场之间的贸易以平等交换的方式进行。这种贸易的实际进程可能会加强双方的某些国家机器，正如我们所知在这种历史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一些外部竞争场中的国家增强的力量因而激起了在欧洲世界经济中掌握权力的人以更大的努力在关系上投资，以求打垮这种对合并的垄断性壁垒。在某种意义上，在外部竞争场中的国家从强大变得更强大再到相对弱小。

诺尔蒂（Nolte）的论证反对我在以前所作的区分，即波兰在16和17世纪已被合并和边缘化，而我认为俄罗斯在那时仍在外部竞争场。他的论证的关键是俄罗斯与西欧贸易的扩展。他确实承认俄罗斯的“合并进程”开始得比波兰要晚。然而他恰好说：“这更多是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原因而不是经济上的。”^[13]但这恰恰是我的观点。^[14]

我们也不应被单纯的文化借用所欺骗。苏丹（Sultan）阿赫迈德三世（Ahmed III）统治奥斯曼（Ottoman）帝国时期（1718~1730年）以“郁金香时代”（Tulip Age）闻名，因为宫廷据说迷恋于从荷兰进口的郁金香。霍奇森（Hogdson）请求我们将这种奥斯曼帝国对西方文化的借用理解为“外国奢侈品的夸示”，（这符合我们所坚持的进口货物从不是奢侈品），而应是奥斯曼统治者“恢复绝对君主制”以反对一直发生的地区性权力分散的努力。而当这种绝对君主制的反对者求助于伊斯兰教（Islam）的价值观猛烈抨击“宫廷反信仰的（和商业竞争性的）奢侈品，”霍奇森认为他们明显“有意的”反对与西方（Occident）的那些贸易联手，“这会增加宫廷的权力。”^[15]

类似地，对印度洋时代近来的学术研究倾向于贬低而不要夸大我们对葡萄牙人在16世纪海洋上统治地位的理解。（从来没有人相信任何西方强国在18世纪的后半期之前在印度次大陆控制大规模地区的问题。）

迪格比（Digby）注意到，葡萄牙人在为所谓国家（也就是地区内）的贸易份额的竞争中“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以致使得他们必须“与其他掌权者”在这个地区达成“互惠调解”。^[16]

最后，这是个熟知的故事，即在奴隶贸易的进程中，从西非洲到中非洲海岸，沿着这个地带或在其内陆，出现了新的王国，旧的王国也变强了。结果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一种“非洲人发号施令的地方”的形势，^[17]特别在西非形成的贸易制度普遍实行的方式——就是说，这些非洲人统治着这些中介者王国，而不是那些被掠劫的地区。当然人们应当牢记，这些王国的力量是与本地商业阶级的力量联手并进的。^[18]

这些外部竞争场与欧洲的（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的贸易所具有的第四个特点是引人注目的——持续的长期贸易不平衡。^[19]在1750年前这个时期金银流向印度次大陆长期受到注意。乔杜里（Chaudhuri）称之为一个“悖论”（paradox），即甚至印度在1660～1760年这个时期对欧洲的进口需求增加时，也不足以克服“这种根本上结构的不平衡。”^[20]我们可以由两条途径去考虑这种现象。一是人们可以将其看作这些地带是在购买一种必需的商品金银，因而这就变成不是属于外部竞争场，且恰恰相反，被合并入欧洲世界经济的象征。这就是乔杜里采取的途径，将其说成是“本质上是由于美洲金银矿开采而造成的流通增加”，^[21]这造成了“一种在国际生产费用和价格上的相对差异。”^[22]波林（Perlin）进一步论证，认为这种金银的进口是“一种商品贸易，这用斯拉法（Sraffa）的观点来说就是进入了……所有商品的生产。”^[23]这和诺尔蒂（Nolte）对贵金属流入俄罗斯的看法是同一思路：“它们在本质上是为了使货币流通循环。”^[24]

但是为什么当时满是对贵金属流失的抱怨呢？如果事实上金银只是另一种商品，那么在一个世界体系之内的贸易，相对于两个世界体系之间（也就是分离的和可能不同的经济结构）的贸易之间就不可能有有意

义的区别。那为什么在印度这种情况下这种流失如此剧烈地改变了呢？“金银的进口.....在1757年之后停止了。”^[25]

另一种考虑这种流失的途径是以欧洲世界经济的观点看待其本质，无足轻重的余额的流出（因而是一种“奢侈品”“出口”）在17世纪欧洲世界经济长期收缩的时期（当时发生了大量的流失），是这样的，但在1730~1750年左右之后欧洲世界经济的重新扩张中，这种流失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由此从欧洲世界经济的观点看，这种与这些外部竞争场的联系必须改变或是切断。因为还有其他的动机也将合并作为解决办法，这个进程就开始了。

从这些对欧洲世界经济而言是外部地带——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的观点看，他们实际上坚持接受金银这个事实，显示出其他欧洲产品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可以解释为意味着它们还没有被包括到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商品链条中被合并的环节。欧洲人在出售上要比购买困难一直受到注意。例如，最初是葡萄牙人，后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必须在印度洋地区从事“地区间”（或“运输”）贸易来为他们得到购买的资金。^[26]这种情况首先是出现在奥斯曼帝国^[27]也出现在西非洲。^[28]

在1750年左右某个时期，所有这一切开始迅速改变，而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或至少是鲁米利亚（Rumelia）、安纳托利亚（Anatolia）、叙利亚和埃及〕、俄罗斯（或至少其欧洲部分），和西非（或者至少是其更靠海岸的地区）被合并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产程序（所谓的劳动分工）相联系的发展趋势中去。这种合并过程约在1850年完成（在西非可能晚一些）。在这种生产进程的方式中有三个主要变化，我们将陆续讨论：一种“出口”和“进口”的新模式；更大的经济“企业”的创立（或做出经济决定的实体）在这四个地带的创立；和对劳动力实行强制的大规模增加。

这种“出口”和“进口”创新模式将是重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构成了轴心劳动分工的核心-边缘两分法。这在实质上在那时意味着边缘地区的原料与中心地区的工业制成品的交换。为了使这四个地带集中力量于原料的出口，在它们的生产进程中必然会有两个方向改变；在创立或大规模扩张商品化农业（初级领域产品生产的类似形式），它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上的销售；还有减少或消灭当地的工业制造活动。在这两者中前者在时间上或许在重要性上是首要的，但是最终后者必然也会发生。必然这种商品在作物（和类似物品）出口的创立会带动进一步建立一系列土地集合，在上面种植一些特别作物，如棉花等。如果这些土地集合用来种棉花，这一般就意味着它们不再用于种用作食品的作物。随着越来越多比例的土地面积特别用于种植用于“出口”的特定作物，其他土地集合必然开始特别用于种植食品作物，以出售给在第一类土地集合上工作的工人。并且当经济合理化向创造劳动力等级制发展时，可能在财产所有者的权力之下，其他区域开始致力于输出人口，使之服务于商品化作物土地集合以及食品作物土地集合。这种在一个地带中三级空间分离的专门化——“出口”商品化农作物，“地方性市场”食品农作物，和移民工人“作物”——的出现，一直是一个过去的外部竞争场合并到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着的劳动分工中的明显信号。

在1750年之后，大不列颠和法国两者的贸易——这两个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要经济中心——大规模扩张到我们分析的这四个地带。对这两个国家，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使这种贸易降低，而在1815年之后法国的作用变得比大不列颠要小得多，但是仍没有完全消失（可能除了印度之外）。在每个地方，这四个地带对西欧的出口以更快的扩张拉开与进口的差距，但支付的平衡却不再通过从西欧出口金银作为弥补手段。一个迅速的扫描会证实这幅图景是如何具有一致性的。

无疑，最熟知的故事是在印度次大陆。在这之前那一个世纪，1650～1750年，大洋贸易的旧中心——马苏利帕特南（Masulipatnam）、苏

拉特（Surat）和胡格利（Hugli）——在重要性上衰落了，开始将地位转让给欧洲贸易联系的新中心，如加尔各答（Calcutta）、孟买（Bombay）和马德拉斯（Madras）。^[29]1750~1850年这个时期整齐地由两个对贸易模式有着直接影响的政治事件划出界线。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在印度无限制地将政治和经济控制相结合；从1757年经营到1813年。然而乔杜里（Chaudhuri）认为，在这个时期贸易“继续沿着传统的渠道流通”，并且其性质也是相同的。^[30]达塔（Datta）对此表示同意，虽然他将转折点定在1793年 [康沃利斯的《永久居留法》（Permanent Settlement of Cornwallis）]，这看来是一个更合理的年代。^[31]

即使这样，在1757~1793年这个时期和更早时期已有着一个重大区别——没有金银出口了。^[32]有两种途径不必从欧洲出口金银就可以弥补贸易差距达到平衡。一个是使用新获得的孟加拉总督府（Bengal Presidency）的国家财政来源，它看来在这个时期足够用于孟加拉的行政，不列颠在这个次大陆其他地方的征服和行政费用，还留下一些用来购买出口到不列颠的物品。^[33]

第二条途径是从1765年起被称为抵押的制度。东印度公司在伦敦以印度总督权的名义出售汇票，在印度以英格兰的名义购买汇票。印度货物通过公司向英国商号出口，是作为公司在英格兰的贷款保险抵押的“抵押品”，以此公司将不列颠的出口货物买到印度。公司在这其间预付钱给在印度的货物出售者，贷款以作为印度向不列颠出口的货物偿付。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金银流出了，而公司还收取了船运利润，加上因此比它在伦敦借款要高的向印度贷款的利息率得到的不等差额比。^[34]

当孟加拉总督权（Bengal Presidency）的掠夺能够提供一种转变的联系时，我们就可以说只是在1757年之后，通过“急剧的扩张”，沿着恒

河（Ganges）的贸易通过加尔各答（Calcutta）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35]而在南印度类似的扩张是在1800年之后。^[36]

到19世纪前半期，四种原料产品主宰了出口，占总量的约60%：靛青、生丝、鸦片和棉花。^[37]当前两项产品向西运到欧洲时，棉花和鸦片在那时主要运到中国。我们将讨论在这种现象下的原因，和这种印度—中国—不列颠（所谓的）三角贸易的重要性。

对于在1778年或1779年欧洲建立的第一批靛青工厂的直接推动力看来是美国革命，它切断了不列颠先前的北美洲供应来源。^[38]这种在世界经济中供应的短缺后来由于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因其革命停止了供应而更加严重。^[39]而在这世纪交替时，西属美洲实际上已放弃了种植靛青。^[40]而因靛青生产在莫卧儿（Mughal）印度时期已有商业上的重要性，在不列颠统治下在绝对产量上又扩张了3到4倍。^[41]

棉花也是印度的老产品，主要是在古吉拉特（Gujarat）。但是在1770年之前古吉拉特的棉花从未出口到信德（Sind）、马德拉斯（Madras）和孟加拉之外，^[42]并且生产已下降了一个世纪。^[43]到1775年，不列颠开始从印度到中国的棉花出口贸易。^[44]1793年之后，随着在欧洲的战争，在欧洲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市场，虽然比起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出口这是一件“小买卖”。^[45]增长的世界性需求似乎是在1800年合并苏拉特（Surat）的因素之一。^[46]丝生产的扩张也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有联系，这体系剥夺了不列颠市场来自意大利的供应。^[47]只有鸦片生产的扩张与世界经济其他地方生产上的变化没有直接联系，不过它也相当引起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需要的作用。^[48]从长远看，这四种商品没有一种会持续成为印度对世界经济劳动分工的主要贡献（虽然棉花在很长一段时期在印度出口生产中仍有着重要性），但是它们提供了一种模式，据此印度能够在1750～1850年这个时期被合并进来。

奥斯曼帝国的故事是类似的。贸易的规模在1750年左右突然增加。例如，法国贸易在整个18世纪控制着奥斯曼统治地区，在这个世纪后半期增长到4倍。^[49]在这同一个时期，在出口上有着从“制成品或部分加工货物（向）原料的稳步转变”——安哥拉羊毛线取代了呢布，生丝取代了丝网，棉花代替了棉纱线。^[50]

在巴尔干地区（Balkans），是当地物产的生产的扩张是最显著的，^[51]特别是1780年以后谷物的增长被称为“奇迹般的”；^[52]棉花当时在巴尔干的生产中也是非常重要的，^[53]在西部安纳托利亚（Anatolia）也是如此。在18世纪晚期，它是法国棉花工业原料的关键来源，对于这点马赛（Marseilles）的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在1782年可以说“地中海东部地区（Le-vent）的使命是养育……法国的工业。”^[54]一种“在安卡拉（Ankara）生产和在伊兹密尔（Izmir）向海外出口的联系”在那时“牢固地建立起来。”^[55]

不列颠人和奥地利人一道在19世纪取代了法国人成为主要的直接贸易伙伴。安纳托利亚棉花的作用面对美国的竞争衰退了（如在印度的情况），^[56]正如面对埃及竞争的情况那样。^[57]尽管如此，棉花出口还会在美国内战期间有一个重新暂时的扩兴。^[58]并且，安纳托利亚棉花向不列颠出口的衰落被这同一时期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地区小麦向不列颠和奥地利出口的稳步增长更多地补偿，巴尔干地区与俄罗斯南部作为一个出口地带而相竞争。^[59]

俄罗斯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与西欧的贸易在1750~1850年这个时期有着一个“显著的上扬”。^[60]在这个时期，它出口的构成同样有相当急剧的变化，初级产品达到95%。^[61]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大麻和亚麻，“对于不列颠制造工业极为重要的原料”，^[62]而最初对于法国人也同样如此。^[63]俄罗斯的大麻由于其质量，它的种植者“精心的对待”和“缓慢和细致”的制作过程，使它如此有用，克罗斯比（Crosby）

将其归因于俄罗斯“便宜的劳动力和生产费用”的特点。^[64]

在18世纪晚期，俄罗斯的铁（它在俄罗斯加工）仍是一种重要的出口产品，因为俄罗斯（还有瑞典）有着以木炭冶炼技术为基础的高质量产品的两个重要因素——大量的森林和丰富的铁矿^[65]——还加上我们将会提及的奴役劳动。当新的不列颠技术在19世纪早期导致了俄罗斯铁出口工业的垮台时，一种新的主要出口品小麦取代了铁。^[66]到1850年，小麦出口达到了平均收成量的20%。俄罗斯主要出口小麦的昂贵品种，“它们极少进入国内消费。”^[67]确实，俄罗斯对于至少直到1820年代的世界小麦价格的稳步上升做出了反应，^[68]在此后主要的出售者俄罗斯贵族，在小麦生产上投入如此之深，致使他们几乎再无选择。^[69]

值得提出的是，俄罗斯在那时的主要贸易伙伴不只是英格兰，（并且在18世纪晚期还有法国），还有两个半边缘地带，它们能够为俄罗斯的合并贡献力量。它们是苏格兰和美利坚合众国。苏格兰的情况是，在18世纪晚期“真正剧变性的”经济进步是以与俄罗斯贸易的增长为“特有”标志的，俄罗斯成为1790年代时向英格兰的“主要大陆出口者”。^[70]在合众国的情况是，它的经济“在一个可观的程度上……繁荣是因为它得到了俄罗斯农夫（muzhik）无尽的劳动力和粗重技术。”^[71]

至于西非洲，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合并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不是那些被合并者所寻求的事情。如罗德尼（Walter Rodney）所说，“从历史上看，发动者来自欧洲。”^[72]通常认为从奴隶贸易向所谓合法贸易的转变导致了这种合并。这是不正确的。最初的推动力是奴隶贸易本身的扩张。由于这种扩张，奴隶抓捕越过了从提供一种聚集“剩余价值”的奢侈出口品到成为一种真正的生产企业的界限，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着的劳动分工。^[73]这种转变可以认为是在18世纪随着奴隶价格的稳步上升发生的，^[74]这反映了奴隶需求的增长，欧洲奴隶贸易商之间竞争的加剧，和在同一空间内扩大供应奴隶的困难增多的结合效

应。^[75]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世界经济全面扩张时期的典型现象。奴隶贸易的高峰看来发生在1793年之前的十年间，^[76]法国—不列颠战争导致了它如同所有大洋贸易那样的衰落，后来，废止奴隶制和海地的（Haitian）革命的共同效应使得这个数量没有再度上升，虽然它们直到至少1840年代早期仍保持着重要性。^[77]

萦绕着对这个时期奴隶贸易的讨论，更为热衷而没有妥当定位的问题之一是有关奴隶贸易的所谓“有利可图”与否的讨论。人们会认为，任何兴旺了一个长时期的贸易必然对某些人有利可图。否则很难想象私人贸易商在没有法律强制赋予特惠的贸易中会继续进行这种贸易。这场辩论起源于文化非殖民化的一场运动。面对标准的和传统的以不列颠废奴主义者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图景，这可以在库普兰（Coupland）的经典著作（1964年，但第一版是1933年）中引人注目地看到。威廉斯（Eric Williams，1944年）企图揭穿这幅全然自负的图景；论证禁止奴隶贸易中潜伏的经济动机。他的论点是，大部分是由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和工业革命的结果，不列颠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的产粮殖民地变得“对于不列颠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无足轻重”。^[78]这导致不列颠的资本家们成功地推行了三方延续的改革——在1807年反对奴隶贸易，在1833年反对奴隶制，在1846年反对粮业种植义务制。“这三个事件是不可分的。”^[79]这些行动的原因是，由于不列颠属西印度群岛的“垄断”和竞争优势的丧失，主要问题是粮的“生产过剩”，而解决办法是在于这些立法行为。^[80]

从事实上看，这本书表面上的中心论点是属于一种技术上的攻击而并非毁灭性的，^[81]毕竟不能唤起热情。因为更根本的论点是，奴隶贸易加上奴隶劳动的蔗粮种植业是所谓的不列颠工业革命的资本累积的一个主要来源。这当然是这个附带论点的一种较早说法，是大胆的陈述而非充分的证实。安斯蒂（Anstey）的相反思考导致他得出结论，奴隶贸易对不列颠资本构成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82]托马斯（Thomas）和

比恩（Bean）作得更进一步，他们宣称，在理论上可以假定奴隶贸易有完善的竞争市场，奴隶贸易商是“捕人渔夫”。如同在捕鱼中那样，在奴隶贸易中利润必然是很低的，奴隶的价格很低，其结果是种植业商品的价格很低。这种在经济角度上明显是荒谬的企业的唯一受惠者是“烟草、粮、靛青、大米、棉花等的消费者。”^[83]

这种天真的论证只有三个毛病：奴隶贸易如我们将揭示的那样远非是竞争性的；原料的主要的“消费者”是欧洲的制造业主〔因而这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威廉斯（Williams）的例证〕；而奴隶贸易在18世纪后半期有足够的吸引力来把一些投资者从纺织业生产上吸引过来。^[84]

然而真正的回答是确切的百分比是不重要的。正如我们一直企图揭示的，18世纪晚期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球扩张的时期。某个地带的每种产品尽能占整体中一个小的百分比。这个整体明显是有利可图的，而事实上这确实导致了大量的资本累积，并最终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原因，更多地集中在不列颠而不是在法国或西欧的其他地方。不需要论证从奴隶贸易得到的利润是格外的大，^[85]来推断出它们是这幅图景的中心部分，并构成了西非洲在这种假定下对这个时期对全球性累积的贡献。^[86]

在不列颠人废除奴隶贸易有着经济动机这个问题上，考察一下丹麦人（Danish）和法国人的辩论可以更冷静地看待它。丹麦人事实上（深思熟虑地）抢先了不列颠人一步。当时的丹麦财政大臣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1791年为他作顾问。他们的主要发现导致他建议发布废除敕令，这是由于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人口在一个转变时期和引入了某些社会改良之后，能够不需要新的供给自行维持。^[87]法国的情况是奴隶贸易已在大革命中被废除，^[88]后来又恢复了，然后在1815年“维也纳条约”（Treaties of Vienna）中被宣布为非法。然而实际上抵抗却是很强大的。^[89]原因是简单的。法国人将这种强制解释为“英格兰的马基雅维利

式（Machiavellian）的发明，希望用剥夺对其繁荣不可缺少的奴隶人力来毁灭我们的殖民地。”^[90]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分析比威廉斯（Eric Williams）提早了125年。

尽管如此奴隶贸易的废除最终产生了它的效果。奴隶作为出口品衰落了，被原料出口所代替。这种转变大部分发生在1800~1850年这个时期。虽然这两种出口贸易不具有固有的互斥性。如罗德尼（Rodney）提醒我们的，“奴隶从来不是西非洲唯一的出口品。”^[91]在这个时期确实改变的是，出口品首次不再是“征掠来的”物品（例如象牙、黄金、宝石、颜料树，当然还有奴隶），而是变成了农业产品，它们是“普遍的、单位价值低”的物品，如棕榈油和花生。^[92]如果说这些出口品的总价值仍然偏低（1817年以后这个时期在世界经济中是通货紧缩的），其数量更是引人注目的；确实这种增长是“惊人的”增长了“6或7倍。”^[93]

基本上，从西非向欧洲世界经济的出口在这个合并时期的类型经过了三个阶段：（1）增加和继续集中于奴隶出口，在绝对数量和也许在相对比例上，从1750年左右（特别地）到1793年；（2）维持大量的奴隶出口，但同时，所谓的合法贸易量也稳步增长，从1790年代到1840年代；（3）大西洋奴隶贸易实际上消失，初级产品出口（特别是棕榈油和花生）的稳步扩张，从1840年代到1880年代全面殖民化时代的开始。

重要的是要牢记，虽然确实从长期观点看奴隶抓捕和商品作物生产实际上是不能共存的，因为两种趋向合并起来就会造成一种在使用劳动力上不可能的矛盾，从短期来看却不是这样。两种出口能够同时繁荣，并确实持续了约30到40年。确实如诺思拉普（Northrup）论证的，解释棕榈油生产迅速增长的真正因素之一——如所知的，当然是欧洲人不可缺少的（和新的）对脂肪和油类需求，用于工业润滑油、个人卫生和蜡烛照明——是先前奴隶贸易的大量增长刺激了非洲人对外来货物的需求，扩展了贸易团体网络，和（经常被忽视的）扩展了“市场、道路和

流通这些经济基本设施。”^[94]而且，奴隶能够直接用于生产“合法的”货物——首先作为向双方巨货的搬运工，^[95]再者，作为种植园的工人 [最著名的在达荷美（Dahomey），在1830到1860年代之间]。^[96]这两种用途都可以产生减少生产费用的作用。^[97]

但棕榈油终于开始取代奴隶抓捕成为主要的生产性企业。它的扩展早在1770年代在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地区就开始了。^[98]到1830年代，沿着海岸它成为一种稳步增长的贸易，“尽管物价是波动的。”^[99]当然，欧洲市场上价格的全面改善在1840年代之后给它以进一步的经济激动。^[100]

法国人不像不列颠人、德意志人和美国人，最初在文化上抵制棕榈油产品，但这在1852年随着发现一种化学方法将黄肥皂变白而结束。^[101]确实，花生贸易的起源正是基于法国消费对黄色肥皂的抵制。马赛（Marseilles）的肥皂制造者在19世纪上半期已经发现花生油加上橄榄油制造出一种蓝大理石花纹的肥皂。^[102]花生贸易始于1830年代，并坚定了法国人在奴隶贸易结束后仍留在塞内加尔（Senegal）的决心，这种“进一步卷入的经济基础”与法国国内各种要求一种“更积极的”的殖民政策的压力结合到了一起。^[103]

在商品作物生产和市场导向的食品生产之间的联系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特别是从我们一直称之为合并的进程的观点而言，尽管如此，看来在印度和西非洲仍然有一些证据可以观察到。哈比卜

（Habib）发现就农业生产而言，在莫卧儿（Mughal）和不列颠属印度之间关键区别，是在于“为遥远的市场而生产”方面不像后者在“在特定地域大规模在地理上集中生产特定作物”，使土壤用于它“最适宜”的目的。^[104]将地区的自给自足让位于世界经济的自给自足。高夫

（Gough）分析了在马德拉斯（Madras）于19世纪前半期，沿着商品作物地区（种植棉花、靛青、胡椒、烟草），其他地带开始专门为地区性

市场生产粮食，^[105]而还有其他地带开始派出契约劳工，最初只是到南印度，但最终派到锡兰（Ceylon）、缅甸（Burma）、马来亚（Malaya）、毛里求斯（Maruitius），直至西印度群岛。^[106]而贝利（Bayly）指出重要的一点，“薄弱的”城镇经济的一次新扩张在靛青和棉花商品作物地区出现，是“给以一小类商业作物依赖的中介环节”提供房屋的结果。^[107]

对于西非洲，罗德尼（Rodney）提请注意，运奴船的“食物供应”问题受到“不认真的对待。”^[108]但是很清楚，需要大量的食物，并且要部署许多奴隶从事当地食物生产来供给其他运往南北美洲的奴隶路上吃。例如，莱瑟姆（Latham）注意到，在1805年到1846年之间，在卡拉巴尔（Calabar）以东大规模安置了奴隶，但他们不是用于棕榈油生产的。他推测这可能是“为卡拉巴尔生产食品的”。^[109]最后，纽伯利（Newbury）注意到“大宗货物中心”与当地食物市场的成长的紧密联系，因为大量移民进入贸易网络的这些场所。^[110]

另一方面，即为合并而驱使的进出口模式的重物的背面是被合并地带制造业领域的衰落。这个论题长期以来与印度次大陆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致使在某种程度上启发我们认识到这绝非是印度所特有的情况。但还是让我们从印度的情况开始。很清楚在1800年之前，印度次大陆从世界的标准衡量，是纺织业生产的一个主要中心。确实乔杜里（Chaudhuri）认为，它“也许是世界上棉纺织业最大的生产者”。^[111]衰落是突然发生的。虽然拿破仑战争的早年确实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出口繁荣，柏林法令（Berlin decrees）加上英国人的竞争“意味着苏拉特（Surat）布匹向伦敦出口的结束。”^[112]而对于孟加拉（Bengal）的棉布匹而言，它们在1820年代左右从“东印度公司的出口货单上”实际消失了，在这之后不久也从私人贸易商货单上消失了。^[113]在一段时期内，仍有着（或开始了）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贸易，但这后来也消失了，这样在统计上就显示出一种持续的衰落，棉布匹的出口价值在1828年到

1840年之间在已经大量减少的基础上又减少了50%。^[114]此外，由于观察到19世纪在比哈尔（Bihar）生产的急剧衰落，而这是一个从未向欧洲出口的地区，我们看到了对“国内”市场同样的影响。^[115]

对此的一个解释只是由于不列颠的新技术和因此的竞争优势。斯梅尔瑟（Smelser）给予自动机器（或自动骡机）以不列颠的印度市场“最后征服者”的荣誉。^[116]人们就会要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列颠人还要依靠用政治手段来确保他们的市场霸主地位。在1830年，马奇班克斯（Charles Marjoribanks）在议会下院作证说：

我们用高额禁止性关税在英格兰排除了印度的制成品，并对将我们自己的制成品引入印度给予一切鼓励。用我们自私的（我用了这个招人恶感的词）政策，我们打垮了达卡（Dacca）和其他地方的当地制造业，在他们的国家充满了我们的货物。^[117]

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与中国的贸易进行得不那么好：“我们对中国人不能行使我们对印度帝国同样的权力。”晚至1848年，当议会委员会认为没“必要”从印度进口棉布，因而认为取消进口粮到不列颠的关税是正当的，在这些条件下：“如果你为了她的粮取得印度的市场，你就要以同样的比率或更大的比率破坏她的制成品货物在英格兰的市场。”^[118]无论如何，很难否认这个精心使印度非工业化的论点，当不列颠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的主席在当时所夸耀的。在1840年，兰伯特（George G.de H.Lampert）作证说：

公司已经用各种方法，在我们伟大的制造业的才能和技巧的鼓励和帮助下，成功地将印度从一个制造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出口原料产品的国家。^[119]

奥斯曼帝国在这个时期没有变成不列颠的殖民地，如印度次大陆那

样。但是，其经历明显地类似，时间上甚至更早。在18世纪前半期，奥斯曼帝国仍然出口丝绸和棉纱到欧洲。在1761年，法国人对从奥斯曼帝国进口的棉纱设置了高额保护性关税，而这种关税加上英国的机器纺纱关闭了西欧的市场。^[120]热斯（Genc）将工业部门的高峰期定于1780年代，并且说在这之后，到那时为止西欧和奥斯曼纺织业生产的类似进程分化了，奥斯曼的工业开始衰落，不只是在出口方面，甚至还在“它自身过去已达到的生产水准”方面也是如此。^[121]尽管从塞利姆三世（Selim III）在1793~1794年的法令开始，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试图采取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对策，^[122]到1856年一位英国作家谈到这个事实，在土耳其制造业已“大大衰落”，土耳其现在出口原料，此后再以制成品的形式返回。^[123]到1862年，另一位不列颠作家的评论的调门甚至更坚决：“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124]

如我们将国家先从安纳托里亚（Anatolian）的核心地带转到外国的埃及和叙利亚，事情也是相同的。尽管阿里（Mohammed Ali）试图在埃及“强行工业化”，^[125]他失败了。其原因中重要的有这个事实，英国—土耳其商务条约在1841年强制给他的条款规定，而这“使得他在尼日尔河上的工厂生锈和毁坏。”^[126]而在叙利亚，制造业的“灾难性衰落”开始于1820年代。^[127]而到1840年代，这个进程在阿勒颇（Aleppo）和大马士革（Damascus）完成了。^[128]

俄罗斯在遏止这个潮流方面有更好的措施吗？是好一些但也不多。18世纪前半期俄罗斯的工业处于一个高峰。乌拉尔（Ural）的金属工业从1716年起有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129]在女沙皇伊丽莎白（Tsaritsa Elisabeth）统治下，特别是从1745年到1762年，有着一次“工业化的第二次复兴”，在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统治下达到一个“黄金时代”，^[130]当时向英格兰的出口“迅速地”增长。^[131]无怪乎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塔尔列（Tarle），在他1910年的教科书中认为，在18世纪，“俄罗斯的落后状况放在当时欧洲的总背景中，显得不是很大。”^[132]而到1805

年之后，俄罗斯在铸铁生产上开始落后于不列颠，而一旦焦炭熔炼成为主导技术，俄罗斯的生产就处于劣势。^[133]加上在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统治下（1825~1855年），主要官员对工业增长变得“冷漠”甚至“怀有敌意”，害怕引起社会动乱。然而，尽管主要工业生铁的出口急剧衰落，俄罗斯人能够为他们的丝织业保持一个国内市场，在1830年代之后靠的是高额关税保护和一些进口技术的结合。他们也能创建一种甜菜炼粮工业。^[134]对于这种抵抗全面非工业化的有限能力，俄罗斯军队持续相对的强大是一个不小的有益因素，这部分解释了他们在20世纪开始时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与印度或土耳其不同作用的能力。

最后，我们通常不认为西非洲有过工业。而确实纺织品被进口到西非已经是在18世纪。^[135]但对此不应予以夸大。罗德尼（Rodney）注意到，直到1750年之前，在几内亚（Guinea）海岸当地的棉花“抵抗住了”英国制造品的“竞争”。^[136]而诺思拉普（Northrup）论及18世纪的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时，观察到如铁业这样的进口品仍需要大量加工“并由此对内部经济具有增值的作用”。^[137]只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和不列颠的船只在1807年后退出奴隶贸易时，“进口品的性质和质量改变了”。^[138]这不只对于纺织品而且对于铁制品都是确实的。西非的铁加工业和炼铁业被19世纪早期便宜的进口品“毁灭了”。^[139]

大规模的，出口导向的初级产品，如我们已经解释的，如果它是市场回应性的，就能够有效地运作。而这只能当有效的做出决定的实体足够大，以致在他们若改变生产和商贸决定就能真正影响到他们自己的财富时，情况才确实如此。不重要的参与者的自身利益对于市场的“调整”不是必要的，或者说无论如何比大规模的参与者要差得多。

有两种主要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创建做出决定的实体的大的中心。一个是可以将初级生产集聚在大的单位中——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种植园”解决办法。或者可以在商业环节的开端生产地带后面的一个

场所创建一个大的中心。例如，有些大的“商人”[法国人称之为“大宗买卖批发商”(négociants)相对于“个人贩子”(traitant)或“小商人”(commercants)]能够将他们自己安置在流通的瓶颈上。但是这还不足以创造一个商品交易的半垄断或买方市场。对于这个(让我们这样称呼他)大宗贸易商人(或商人—银行家)也很关键的是，在一群小生产者中建立大众对他的依赖。最简单并可能是最有效做到这点的的方法是债务奴役(debt bondage)。用这种方法，当大宗贸易商人希望对世界市场作“调整”时，他能够迅速以他发现有利可图的方法改变生产模式。^[140]这些大规模经济单位的创建——不管是种植园或是大宗贸易商人的瓶颈——是合并的一个首要特征。

在这个时期，印度的出口集中于四种主要作物周围——靛青、棉花、丝和鸦片。在这四者中，靛青是最具种植园导向的。在18世纪最后25年，由于西半球供应的不稳定性和迟缓，许多英国私人贸易创建了种植园。^[141]此外，他们给予小规模生产者以贷款，这种贷款很快在“衰退的最早迹象出现时”被收回，而这导致了土地的没收，进一步集中了土地。^[142]外加工制度，^[143]在这个进程中是关键，只是在这个时期才用于靛青生产中。^[144]在那种情况中——直接生产或是借贷给小生产者的制度——靛青种植者将基本的生产决定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使用“小规模压迫”或“债务奴役制”来实现他们的目的。^[145]

类似地在粗棉生产中，当它变得更加以出口为导向时，就出现了“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生产的加紧控制”使“租金和利息的实际负担变得.....更重了”。^[146]鸦片的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的商品垄断(通过东印度公司)，起了控制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确定价格水准的同样目的，并有效地监督了为中国市场的国际竞争。^[147]在1848年，普利多(Prideaux)在议会下院的指定委员会上作证说，“没有什么在印度种植的东西不会增值，粮、靛青，和各种种植作物都可以从这个国家出口。”^[148]还有，尽管缺少像在西印度群岛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欧洲“种植

园主”，然而确实如克拉芬（Clapham）所论证的，这些出口货物大多数有着“某种他称之为旧式的种植园或殖民地特征。”^[149]罗瑟蒙德

（Rothermund）正是从改变功能方面捕捉到了从外部竞争场向被合并的转变。正如他描述关于（贸易）代理商的情况，从在船上进行的买卖，到发出特定的订货单，到以借款资助这些订货单，到利用借款刺激生产，到通过外加工制度和管理工厂来组织生产。^[150]

在奥斯曼帝国种植园形式的契夫特里克（Ciftliks）是一个要花些时间讨论的问题。契夫特里克是特指一种土地租佃的法律名词。这个词的起源是指一个契夫特（Cift）（或一对）牛，由此指一对牛在一天内能够耕作的土地数量。^[151]因而引起了某些混乱，因为主要是这些契夫特里克（Ciftlik）要远比一个契夫特（Cift）要大，更接近于通常意义上的种植园，并看来一直直接与出口导向的商品作物生产相联系。

斯托亚诺维奇（Stoianovich）将契夫特里克的扩展〔特别是较大的哈萨-契夫特里克（hassa ciftlik）〕与“新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耕种的散布”从1720年代在巴尔干地区开始直接联系起来。^[152]甘德夫

（Gandev）类似地将它们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的增长看作是大规模商品作物土地单位的出现。它们是资本投资和资本累积的对象。^[153]休格

（Peter Sugar）也强调它们的市场导向，新作物的耕种，和村民的债务奴役。^[154]麦高文（Mcgowan）注意到它们位于靠近海的地区，它们在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几乎总是……与商品的对外贸易相联系。”^[155]

最后，伊纳尔契克（Inalcik）也将较大的契夫特里克与市场导向和“类似种植园的结构”联系起来，他说其分布特别与土地开垦和边缘荒地（miri）的改良联系在一起。^[156]

至于埃及，很清楚棉花生产的兴起直接与在19世纪过程中大地产的创建相联系。^[157]还在1840年，鲍林（John Bowring）在他给议会下议院的证词中解释了是为什么。他谈到埃及农夫（fellah）不愿意生产棉

花，因为害怕被欺骗，害怕税收，因为这使得一年中只有一种作物。解决办法呢？

后来许多大片土地被转让给同意代为支付拖欠税款的资本家们，他们由于雇佣这些埃及农夫（fellahs）作为计日劳工，而从他们那里接过交还土地税，和由官员巴夏（Pasha）规定价格造成生产量下降的负担。^[158]

在俄罗斯，当然已经有大量土地集中在贵族阶层手中。在合并期间发生的事情强化了 this 进程，并加强了它与商品作物生产的联系。如布卢姆（Blum）指出的，这些领主“显然是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例如，他们生产多达90%市场上的粮食。^[159]在这同一时期我们有了三种作物连续轮作的这项主要农业革新。^[160]

于是在18世纪晚期，“农村经济具有一种更加商业化的特点。”^[161]农奴制模式的变化，从交纳实物货币制（obrok）改变为劳务制（即强制劳役，barshchina）^[162]——这种改变我们将在以后从强制劳动的方面讨论，它也被视为土地集中的一种模式。它不是所有权的集中，因为它已经是如此了，但在生产中作决定的程序集中了，这对商品化农业而言是关键的。而在那些保留交纳实物货币制（obrok）的地产上，领主们通常鼓励和保护那些成为商业企业家的农民（尽管有法律上的限制），因为这不只使得那些农民交付更多的实物与货币，而且能让领主们利用他们作为“农村公社中不那么富裕的成员的担保人。”^[163]

西非洲的景象又一次带有比偶然更大的相似性。我们先谈奴隶市场，它绝不是鼓励无限制竞争的，这导致了商品化的瓶颈。我们发现在每个地方都存在着“限制性的贸易联合和活动，有时是官方的，有时是私人的，而有时包括这两者之间的结合。”^[164]而且，这种如棕榈油这类商品作物的转变伴随着创建种植园结构的努力。确实，废奴主义者自己直接支持这种作法，他们认为这作为一种手段可以给予合法贸易一个巩

固的经济基础。^[165]强大的君主，奴隶劳动，可能还有资本的结合，使种植园主要在达荷美（Dahomey）和约鲁巴兰（Yorubaland）获得成功，这意味着这些君主能够从相当遥远的内地出口棕榈油，否则就太昂贵了。^[166]但是，哪里转运不太成问题，棕榈油（和花生）的生产技术就可以为小规模农夫所利用。^[167]

然而正如劳（John Law）指出的，谈及在这个生产进程中对国王和军事首领统治地位的侵蚀，如同最终从奴隶贸易到橄榄油的转变那样，“然而这种改变的受益者，包括农夫也包括富有的商人。”^[168]换言之，集中化的场所只不过是从一个产品集散地转换到另一地，一个如果我们集中注意于榨炼棕榈油这种相对小的单位时就会错过的地点。确实，国家权力和商品集中之间的联系，在这个合并时期是特别大的。纽伯里（Newbury）清楚地介绍了这种现象。

达荷美（Dahomey）或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的商业国家……（提供了）非洲统治者从贸易收入中得到支持的（好）例子……如奥波博（Opobo）的扎扎（Ja Ja）或瓦里（Warri）的那那（Na Na）这样的统治者更好说是机敏的商人，而非榨取贸易商的非洲官僚。^[169]

若要理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必须注意到贸易商的多重结构的出现。在大西洋港口有商人或进出口商，他们代表欧洲商号，并且通常是欧洲人。这些商人与大规模的经纪人与中间商（法语称为négociants）做交易，他们再与身为行贩商（法语称为traitants）的中间商做交易，于是这些行贩商经常与直接生产者做交易。通常在经纪人的层面上我们注意到在哪里有着小规模的生产。当这个地带落入殖民统治之下时，正是这些经纪人被欧洲商号吸收或取代。^[170]

我们已经论证，合并的过程多少导致一种相对大规模的决策单位的建立，根据自身利益回应世界市场变化着的需求。这些单位的规模部分

起了促进需求变化的作用，因为它们造成的变化对于它们累积的可能性有重大影响，但是一部分也产生增加其反应能力的作用，因为它们控制着充足的资本和商品流通而影响世界市场。对这种反应能力而言，还有一个因素要讨论，就是在使产品具有竞争性价格的条件下获得充足劳动力的能力。

对一个工人，特别是农业工人而言，被陷于商品作物生产，特别（但不只是）在类似种植园的结构之内，是几乎提供不了什么内在的吸引力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为生存和甚至相对富裕保证的各种实质服务的时间和可用的体力。这不足为奇，至少在最初和此后一段长时间内，在经历着合并的地带，市场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必须是强制性的，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在适当的地方以适当的节奏工作。这种强制包括两个因素，应当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使工人工作得更辛苦（更有效率？）和更长时间（每天，每年，每人一生）的方法；和工人的合法权利或法律地位，和由此与其工作有关的选择范围。

莫卧儿（Mughal）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是很少的地区之一，我们有它合并到世界经济之前劳动阶层生活标准的一些资料。有四种比较。哈比卜（Habib）认为在1600年平均农业出产量不比在1900年同样地区的要少，也不少于1600年西欧的平均农业产出量。^[171]斯皮尔（Spear）认为在莫卧儿帝国的印度普通人吃得要比他的西欧的同类要好。^[172]而德赛（Desai）累积的统计资料支持这个论点，即在阿克巴（Akbar）的帝国比起在1960年代的印度“食物消费的平均标准……看来要高”^[173]而一旦我们看到1750年后合并刚开始时，就会听到（不列颠人）抱怨孟加拉农民的“懒惰”。^[174]对这种“懒惰”的解决办法不久就找到了，其中之一我们以前已经论及，就是“预支贷款”制度。我们发现这种现象作为强制的主要机制突然在所有商品作物地区出现。

在这时，两种土地持有制度，地主制（柴明达尔 zamindari）和佃农

制（罗特瓦尔ryotware）发展起来，两者都规定或不如说是重新定义附带行政权的所有权的意义。这种土地保有形式的发展方向是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证明，因为行政权对土地商业化是不可缺少的，它本身是解放所有使资本无限制累积的各个因素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地主制度是在孟加拉由1793年的永久安置法（Permanent Settlement）创立的。^[175]在这种制度中，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的佃农（或农民）就被地主（zamindars）认为是他的佃农，因而易于被提高租金或被驱逐。其结果是：“租金提高了，而且农民被驱逐是常事。”^[176]但同时也种植了新的作物和获得了新的劳动力。^[177]

佃农（ryotwari）制度则相反，经由将行政权直接给予佃农（ryot）本人，基本上去除了地主（zamindar）作为中介者的情况。这被鼓吹为一种“在理论上更周全，在实践上更方便和有益，与本地的制度、习惯和人民的风俗更协调”^[178]的制度。这种制度最初应用于马德拉斯（Madras），并通常认为是在南印度的制度，但是同样在北方甚至被孟加拉利用。在实际上，得到行政权的农民（ryots）在大多数情况中往往是较高种姓（caste）的村庄头领。这些农民当然是耕作者，但他们也是中介人〔尽管比地主（zamindars）的规模要小〕，因为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是较低种姓的直接劳动者的监督者。^[179]

我们应当注意的重要事情是，在这两种制度中，行政权的结合加上预付贷款的制度使苛刻的强制成为可能。如一个1861年的不列颠议会报告谈到靛青生产时提到的：

在哪里种植园主有地主的（zamindary）权利，佃农（ryot）也许就没有多少选择.....这种影响也许最好描述为一种道德习惯上的强制，和对具体的武力的恐惧。^[180]

但事实上，靛青在佃农（ryotwari）制度下更经常种植。然而这对直接生产者也并不更好些：

甚至在最好的季节，靛青的种植也很少按靛青种植园主给出的价格支付……（靛青种植园主）强加给佃农（ryots）预付贷款，而佃农不能供应种植靛青土地上的应交配额。……将这种靛青种植制度描述为靛青奴隶制是没错的。[\[181\]](#)

难怪这些靛青种植园主“因为苛征压迫而恶名昭彰”。[\[182\]](#)

棉织工比种植靛青的农民也好不了多少。在1787年7月于孟加拉颁布的“织工规章”，一旦织工从东印度公司接受了预支贷款，他就必须向公司交付棉布，将棉布卖给其他任何人就是非法的。公司被授予强制监管织工使其完成契约义务的权利。[\[183\]](#)其结果当然是“他们经济状况的显着恶化”，而这些织工最终“由于他们的职业而变得贫困”。[\[184\]](#)公司将其政策扩展到印度东南部。一旦东印度公司能够驱逐其荷兰和印度的竞争者，如在1770年代，公司就让他们商人“与织工缔结苛刻的合同”。[\[185\]](#)工人的实际收入从实际得到报酬角度下降了，加上因为他们在新的状况下不能“在耕种田地的同时”进行纺织。[\[186\]](#)至于棉花种植本身，我们有特纳（J.A.Turner）在1848年曼彻斯特（Manchester）商业协会上的讲话为证，他断言，“印度以其便宜的劳动力，将在任何时候能够与美利坚的奴隶劳动作竞争。”[\[187\]](#)

盐业生产提供给工人的状况甚至更恶劣。由于报酬可怜和工作状况恶劣，“明显地”若制盐业“没有强制性”则是不能进行的。利用预支贷款在这里采取了格外扭曲的方式。一旦一个人被雇用，甚至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他在将来就“有义务被扣押”；并且他的后代也“永久性地”被束缚。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可以想象到接受预付贷款是不情愿的。因此它经常是被扔在一个潜在的工人的门前。“只要看一眼这笔钱就会使他有被送进盐场（aurangs）的义务。”[\[188\]](#)一种类似的对工人的强迫预付贷款也有记载，是在1800年后的比哈尔（Bihar）用于硝石生产。[\[189\]](#)总而言之，这种预付贷款制度产生了长期的强制。如库马尔（Kumar）所

说，农奴制“是在实际中表现得如此持久”的原因之一，是这些预付贷款造成的“债务负担”。[\[190\]](#)

在俄罗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比农奴制更具压迫性的强制劳役制（barshchina）取代免役租制（obrok）发展起来，而不是相反（在过去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特别是在1780~1785年和1850~1860年之间这个时期。[\[191\]](#)康菲诺（Confino）对这种滑向强制劳役制

（barshchina）给予的解释，正是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信条的发展所致，尽管可以说代役租制（obrok）似乎表面上看来更与之相适合。他将关键的转折点定为1762年，在那时（而在1775年之后以更为迅速的方式）贵族们开始收回他们的土地，这是一个与世界市场上谷物价格上涨直接联系的现象。看来强制劳役制（barshchina）在大多数情况中，对于种植商品作物的地主而言比代役租制（obrok）“更为有利”。[\[192\]](#)卡汉（kahan）提到了有利于强制劳役制（barshchina）的第二个因素。乡绅的“西方化”导致进口物品的大量增加，贵族们的实际收入需要有“大量的增长”，因而导致他们对农奴压榨的增加。[\[193\]](#)强制劳役制

（barshchina）的增加使得大地产以吞没农民小块土地的方法扩张成为可能，大地产“更易于适应和更能够从变化的市场形势中获取短期收益”。[\[194\]](#)

并非强制劳役制（barshchina）成为农村劳动的唯一形式。康菲诺（Confino）在事实上认为一种混合强制劳役—代役租（barshchina-obrok）义务的形式有其优点，它提供领主大地产上劳动力供应的保证，加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中从代役租制（obrok）可得到某些立即的收入。这种结合的形式在这个时代中变得更为常见。[\[195\]](#)这是一个何者优先的问题。由于事实上这些领主自营地具有了一个“经济企业”的特点，代役租（obrok）制度的缺点看来大于优点。当地主们寻求提高代役租制（obrok）农奴的地租时，农奴经常在其他地方寻找雇佣工作以交足代役租（obrok）义务。于是，到18世纪末，代役租制农奴

（obrotchnik）被认为是不再耕种土地的某种人，而这个名称经常“在侮辱的意义上用作‘流浪汉’的代称。”^[196]因此若要生产仍然是他们基本收入来源的小麦，地主们需要强制劳役制（barshchina）。

并且，我们必须抛弃强制劳动必然是无效率的劳动这种迷思。^[197]事实上，在强制劳役制增长最大的地带，黑土地带，也有着最大的农艺上的革新（例如引进马铃薯作为一种园艺作物。）无论如何，可耕土地的扩展和产出量的提高主要发生在大地产上，而不是代役租制（obrok）农民的土地上。^[198]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强制劳动的强化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在1754年废除国内关税和在1766年使粮食出口合法化，便利了谷物生产的增长。获取南方大草原和黑海（Black Sea）的港口也促进了粮食的出口，并因此被并入世界经济。而1762年的宣言，解除了领主们的官僚服务义务，给予他们成为农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方便。^[199]

并且，增长着的土地集中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于1765年命令彻底测量土地的帮助，因为除非特别的抗议外承认所有现存疆界在法律上有效，国家就默认了以前夺取的国家土地和无主荒地，并“批准了对自由农民和小农奴所有者的掠夺”。^[200]勒多内（Le Donne）将凯瑟琳（Catherine）的行政大改革，即省（guberniya）的建立，看作创建了“一个能够便于最大程度上剥削农奴劳动的机构”。^[201]而也是在凯瑟琳（Catherine）统治下，农奴制的法律定位终于充分发展了，认可了事实上的情况，也排除了几乎所有农民所谓的个人法律地位。结果是事实上的自由农民成为“潜在的农奴，不管什么时候政府要使用他们，就能变为实际上的农奴”。^[202]

俄罗斯的合并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制铁业起了向更为常常强调的商品作物出口的过渡作用这种途径。这有些类似于在西非洲的奴隶贸易和在印度的棉布出口那种作用。乌拉尔（Urals）制铁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是在18世纪中期，由于欧洲1754~1762年间战争引起的需求增加而真正的起飞，这是俄罗斯政府和英国市场的购买成为主要销路的结果。^[203]这种制造品出口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不会持续下去，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

在乌拉尔（Urals）工厂中的工作是艰辛的，并且报酬不高。对于许多人而言，“状况和待遇常比那些农业农奴要坏得多”。^[204]这当然对于无技艺的学徒和“矿上的年轻人”，即从事辅助工作的非常年轻的儿童是特别真实的。^[205]有技艺的工人部分是外国人（人们认为是以有吸引力的条件招募的），部分是从俄罗斯中部招募的冶金专家，部分是当地的手工艺人。^[206]他们是工业中挣工资的人。技术工人不只有现金薪水，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小块土地，它带来的收入经常与从工厂领取的工资一样多。^[207]

然而，无技艺工人则“被归类为”农民，他们从事多种辅助性的工作——伐树，炼木炭，和运输原料和完成的产品。最初，这些“被归类的”农民只是本地的定居者，以作这种工作来支付他们应交的税。^[208]但光是这些本地定居者是不够的。1721年的一道法律允许工厂主人购买整个村庄的农奴，他们于是被称为专有的农奴，附属于工厂而不是工厂的主人。还有从国家领地来的逃亡者，他们自愿来到工厂，于是就成为专有农奴而重新组合到封建制度中。^[209]最后，在工厂中也有代役租制（Obrok）农奴，但是他们更多是被安置在纺织而不是冶金工厂中。他们从他们的村庄被“分离”出去，和其他农奴工人相比要自由些，与工厂主交涉待遇报酬时地位也较有利。^[210]这显示出这个制度从工厂厂主的观点而言提供了“有适应性和便宜的劳动力”，^[211]但从工人的观点而言是“可恶的”。^[212]

由于这种压迫性的状况，这些工厂主必须依赖大量的武力，他们保持了大地产的监狱来惩罚酒鬼、好争吵的人，甚至懒惰或不胜任的工

人。^[213]不用说，强制劳动，恶劣的状况，和维持纪律的惩罚合起来导致激发反叛的情势。早在18世纪中期，骚乱就在乌拉尔（Urals）开始了。^[214]当普加乔夫（Pugachev）在1773年发动大起义时，乌拉尔的工业农民像农业农奴一样支持他。^[215]我们会看到他们并非独有的一类人群。

在西非洲内部“奴隶制”的存在一直是一个争论很多的论题，在其中显示出时期和定义上的混乱，并由此带来在社会原因和意义上的混乱。奴隶制成为这样一个概念，它经验性的内容至少延展到像工资劳动者那样广泛的一个系列。如果我们将其最低限度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某种无限期延续的工作义务，而工人不能够单方面取消它（和直到奴隶由主人任意处置的程度），无疑地在西非洲就存在着奴隶制的各种形式，或者说至少在西非的部分地区存在了一段长时期。在许多地区确实有着所谓家庭奴隶制的某种形式，它可以看作是包括了将亲属作为伪亲属强迫结合进来充当相对低下地位的家庭角色。这看来是与向他人出售的奴隶化过程，或使用奴隶作为“田间”劳动力非常不同的现象，甚至在这后一种情况中，这个名词用来包括的不只是种植园奴隶，也有向其主人交纳实物租或服劳役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名词使用得很不严格，因为后一种人在欧洲背景下在历史上被称为农奴而不是奴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试图在这定义的迷宫中作归纳。而是应集中在看使西非洲先成为欧洲的外部竞争场，其后又被合并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趋势是什么。

似乎相当清楚的有一个序列，在每个地方或多或少不完全地遵循发展着。从一个某种形式的家庭奴隶制占支配地位（如果说不是真正唯一的存在形式）的时期（不是在所有地方均如此），到奴隶搜捕成为主要现象（这些奴隶通过商业网络出售）的时期，再到奴隶越来越多地用在西非内部本身的生产企业中的第三个时期。奴隶搜捕当西非洲在外部竞争的最初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并作为一种合并模式持续下来（甚至其重

要性有所增长），在合并时期让位于一种所谓合法贸易的形式，这种形式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在西非商品农作物生产中大量的奴隶劳动，这是一个只是缓慢消失的现象。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在西非洲内部还有着大量的奴隶，一个原因是由于那些出售俘虏的人“为他们自己的用途保留了一些俘虏”。^[216]如科皮托夫（Kopytoff）简单地说明的，“以非洲的情况而言，当从俘虏的人中使用劳动力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上升时，这种使用就增加了”。^[217]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不是非洲特有的现象。

那第一次转变，是当非洲人开始认识到“奴隶”不是某种由于犯罪或因为“极度贫困”而被奴役，和因而成为一个新家庭的伪亲属的人，而是作为一种“可出售的商品”。一个看来是起源于奴隶出口贸易的概念。^[218]并且，看来在一个出售奴隶的民族和一个使用奴隶的民族之间有着一种清楚的关系，一种随着时代出现的关系。其次序不是很确定的，但是更可能是出售是在使用之前，而不是相反。^[219]

当向更大的商品作物的过渡开始时，特别是在不列颠宣布废止奴隶贸易后的数十年间，出售奴隶的国家面临了经济困难，丧失了他们奴隶的一些销路，并且还失去了一些转售欧洲产品的贸易利润。在那里他们不能延缓这种影响，他们就立即做出“将他们不能出售的奴隶转入生产替代的作物中”的反应。因此，阿贾伊（Ajayi）主张，废除奴隶贸易事实上直接导致了“更大规模和集中地使用家庭奴隶。”^[220]

在西非内部更大规模和更集中地使用奴隶，是合并进入世界经济的标志。因此这比奴隶贸易本身更代表决定性的转变。^[221]再加上被出售给作为合并到世界经济的商品链条中的企业工人，奴隶还成为金融投资的目标——一种资本利益，一种财富储备，和一种投机的目标。^[222]

为商品生产而增长的强制在西非洲也采取了其他形式，如在其他地方那样——债务束缚。这始于欧洲人的船只给非洲经纪人以预付贷款；^[223]这种活动然后从经纪人转到行贩商人推向内陆。例如，在尼日

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一种秘密社团埃克帕（Ekpe）发展起来，它具有收取债务的作用，开始于18世纪奴隶贸易迅速扩展的时期。用莱瑟姆（Latham）的话说，埃克帕（Ekpe）是一个“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机构”。^[224]下一步是易于进行的；欧洲的进口品以赊账的方式预付，“而不是贸易商纺的季节性供应”，纽伯里（Newbury）将这看作是“从这种新的大宗产品贸易中产生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性革新”。^[225]

如果奥斯曼帝国的文献讨论这个时代劳动强制的增多较少，这可能只是在学术上忽视的结果。我们的确有依据这些线索得到的少量资料。斯托亚诺维奇（Stoianovich）在讨论奥斯曼的征税结构时，估计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的农民在18世纪最后一段时期必须提供比同时期的一个法国农民“至少要多50%的劳役”。^[226]麦高恩（McGowan）指出马其顿（Macedonia）受制于增加的劳役偿债制：因债务施加的压力；因小块园艺式土地而来的引诱。他也谈到罗马尼亚（Romania）和多瑙河（Danube）以南地区，政府以与当地领主合作的方式“将几乎整个农民阶级，即克拉卡西（Clacasi），陷入完全从属的地位，在法律上越来越多地规定了更有压榨性的劳役要求”。^[227]而伊萨维（Issawi）注意到，在叙利亚（Syria）农民土地所有者转化为佃农，并观察到商品作物生产导致地主们增加役使制劳动。^[228]佃农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也是常见的。

我们已力图证明，合并包括了将生产领域并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商业链条，而这种并入在这个合并时期，趋于需要既建立更大的经济决策单位（通常是指种植园，但不都是如此），又要增加劳动力的强制性。造成混乱的相反例子也提出来过，但不一定中肯。这是因为一个次要的现象出现时，它通常没有被充分地合并区别开来。

当一个既定地带被合并到世界经济中时，这经常会导致一个毗邻的更远地带被牵入外部竞争场。这好像是有一种扩张的向外冲击波。当印

度被合并时，中国成为外部竞争场的一部分。当巴尔干地区，安纳托利亚和埃及被合并时，富饶的新月形（Fertile Crescent）地区和马格里布（Maghreb）就变成了外部竞争场。当俄罗斯欧洲的部分被合并时，中亚细亚（甚至中国）进入了外部竞争场。当西非海岸地带被合并时，西非大草原地带变成一个外部竞争场。

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观点看来，一个外部竞争场是这样的一个地带，在那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需要得到货物，但是它却抵制（也许是在文化上）进口的成品货物作为补偿。并且在政治上强大得足以维护它的选择。欧洲从18世纪早期起一直购买中国的茶叶，但发现他们除了白银之外不接受其他东西作为支付方式。印度的合并为不列颠提供了某些其他选择，这对其更有利并还能为中国所接受。这就是所谓的印度—中国—不列颠三角贸易的起源。

三角贸易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发明。早在1757年，公司就开始用船运孟加拉的白银去购买中国的茶叶。^[229]在此后70多年间，公司在中国的购买量（其中90%是茶叶）增长到五倍。^[230]使用白银的费用是很高的。公司受到很大压力要求采取某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231]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同时安排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减少在印度的棉布制造业的进程在进行，印度棉布制造业在西欧曾找到市场，当然在印度次大陆各部分也是这样，它取代了不列颠棉布进口品。但是这个过程形成一个问题，即怎样处理印度的棉花产品，因为在那时用船将它运到欧洲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中国看来需要更多的原棉，并且不像印度棉加工业，中国的棉制品并不出口到欧洲，因此也不构成竞争的威胁。印度棉花出口到中国于是提供了一个适合的市场销路，^[232]从不列颠的观点而言是这样，这同时也不再需要以不列颠的白银出口到中国。^[233]

然而棉花出口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本身也生产棉花，从印

度的进口只是一种补充。印度棉花的价格随着中国每年作物的收成情况变动，造成了利润的不确定，导致东印度公司宁愿作为在中国的委托代理人而不是自身进行活动，将作物变化造成的经济负担用长期契约的手段转嫁给行（Hong）商。1820年当中国的需求降低时特别困难。^[234]

于是不列颠发现了棉花的替代品——鸦片，它生长于马尔瓦（Malwa）和孟加拉。虽然在理论上中国皇帝禁止进口它，但“腐败的官僚阶层（Mandarinate）和海军的弱小”结合在一起为鸦片贸易打开了中国的港口。^[235]当时进口数量变得如此之高，使得原来的形势逆转过来，中国开始出口白银来支付鸦片费用。当1836年，中国皇帝试图更严厉地执行对鸦片的禁令时，就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由于1842年的下关条约，中国开始走上她自身被合并之路。^[236]但这是另一桩事情了。

印度被合并进世界经济导致了在生产模式上的变化（棉布制造业的衰落），这给古吉拉特（Gujarat）的棉花生产者造成了问题，要靠在外部竞争场中找到销路（中国）来解决。同样地，将西非洲海岸地区合并到世界经济中，导致了它经济模式的变化（最终是奴隶贸易的结束），它给奴隶出售地带造成了问题。一些地方复原到出售商品作物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其他地方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那时及时地这样做。他们新的外部竞争场，西非洲大草原上为新产品发现了新销路。

撒哈拉（Saharan）的规模的商业——这是一个包括西非洲的大草原或撒哈拉（Sahelian）地带向北到马格里布（Maghreb）的贸易和向南（向西）到西非洲的森林和海岸地带的贸易的专门名词——在1820年到1875年之间有着一次“复兴”或“突然的增长”。^[237]阿散蒂，一个18世纪晚期在森林地带主要的出售奴隶国家，大规模扩张了它向北方豪萨（Hausa）地区的可拉（Kola）出口，作为“阿散蒂（Asante）政府对19世纪初早期大西洋奴隶贸易衰落的对策”。^[238]但是最显著的变化是在大草

原地带本身，它以两个主要现象为标志：主要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国家建设运动的特别扩展，最著名的有弗迪奥（Uthman dan Fodio）、乌玛尔（Al Hajj Umar）和萨摩里（Samory），还有奴隶制现象同样的特别扩展。

关于伊斯兰教运动的情况，这个事件主要是从18世纪晚期整个伊斯兰教世界苏菲（Sufi）教团的复兴开始的。这无疑与意识到（基督教）欧洲扩张构成的威胁，和当时三个伊斯兰教的主要政治实体——莫卧儿（Mughal）、沙法维（Safavid）和奥斯曼（Ottoman）帝国——的衰落有联系。^[239]在西非洲，由大西洋奴隶贸易引起的内部持续瓦解无疑为这一种忧患意识提供了更多的根据。^[240]主要的宗教运动不能贬低为只是为政治服务，如那么多的评论家所主张的那样。^[241]但是它也证明了这些宗教运动导致的政治改变，只能从社会与经济改变的更大背景中得到解释。我们将就这些政治改变本身作简短的讨论。让我们先集中讨论经济的变化。

为什么奴隶制在那时在大草原如此显著的扩张？在一个意义上这个回答是简单的。对奴隶的需求在其南方和北方的邻近地区，在大草原内部都增长了。^[242]我已经叙述了其南方需求的来源。大规模生产的增长创建了“依靠增长的奴隶数量的劳力密集型经济”。^[243]奴隶向北出口到的黎波里（Tripoli），再向外到埃及、塞浦路斯（Cyprus）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比起18世纪增长了一倍。这是因为19世纪经济上的“繁荣”性质所致。尽管这种贸易有一大部分是女性奴隶，因而还反映出一种家庭的奢华消费。^[244]

最后，大量的奴隶保留下来用于大草原地带，在新的种植园结构中用来为地区经济进行生产。^[245]在某种意义上，西非洲海岸地区合并的波浪性效应，在19世纪西非洲大草原地区，引起了在18世纪早期海岸地区仍处于外部竞争场时曾发生的同样现象；出售奴隶的国家的兴起，和

使用奴隶从事本地—地区性生产的扩大。

合并进入世界经济意味着必然要将政治结构嵌入国家间体系。这意味着已经在这些地区存在的“国家”必须或者将它们自己转变为“国家间体系内的国家”，或者被采取这种形式的新政治结构所取代，或者被其他已经在国家间体系的国家所吞没。一种整合的劳动分工的顺利运作，不能够在没有关于商品、货币和人员跨越边界有规律流通可能性的确实保证的情况下进行。这不是说这些流通必须是“自由的”。实际上，它们几乎从来不是自由的。但正是这些对这类流通加以限制，使其在某种规则的管制之中行动，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国家间体系中的以国家为其成员的集体推行的（但在实际上是由少数较强的国家）。

从现存国家间体系的观点看，在一个经历着合并的地地区的理想形势，是存在着一个既不太强又不太弱的国家结构。如果它们太强，它们就会在并非出于在世界经济中最大程度地累积资本的考虑的基础上，防止跨边界的必要流通。而如果它们太弱，它们就会不能防止它们领土内的其他人妨害这类流动。在合并进程结束时，人们应当期望发现的国家是在内部有足够强大的官僚机构，能以某些方式直接影响生产进程，并且在外部联系在国家间体系正规的外交和通货网络之中。

梅拉索（Meillasoux）在讨论19世纪西非洲国家与商人的关系时，精彩地总结了这种转变包含的内容：

（没有）任何清楚的方法可以证实，贸易在任何地方都受到既有的国家制度的鼓励。后者的赎武主义与商人的和平主义是相反的。……据19世纪的旅行者所说，旅行队应避免的最危险地区，是在这些国家最集中的领土上，这是由于它们之间进行的战争……当国家的行政手段（交通、通货、公共秩序）成为商业手段时，国家便开始在促进贸易上扮演积极角色。这种倾向导致商人作为国家的一个属民被结合进来，并去掉了他的

（外国人）地位。这种现象大部分发生在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那里盛行奴隶贸易。[\[246\]](#)

作为一个已被合并进世界经济的地带，它的跨边界贸易对于世界经济变为“内部的”，而不再是某种“外部的”东西。贸易从曾要冒很大的危险的事情变为得到国家间体系促进和保护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正是这种转变。

当然，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这四个地区以前的政治形势彼此之间是很不相同的。其他所需政治改变的详情因而也是非常不同的。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合并结束时，其结果变得比在起点的不同之处要少，虽然每个地区的特有之处绝不会被完全抹杀。

让我们这次从分析奥斯曼（Ottoman）帝国开始。从1683年对维也纳围攻失败后，帝国在它的所有边界都处于持续的压力之下。接连的战争，主要是与奥地利（Austria）和俄罗斯战争，在整个18世纪（还有19世纪），造成了缓慢但却持续的领土丧失，其最终结果是土耳其共和国，它现在的边界缩减到主要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奥斯曼帝国原来的核心。奥斯曼帝国有形的退却，在一个长时期内，与其用它在扩张时代建立的机构在政治上控制帝国的能力的衰退相称。特别是这个国家经历了它控制生产、流通、暴乱和行政管理各种手段的能力的严重衰退。[\[247\]](#)

帝国领土扩张的终结，是对它结构的基石提玛（timar）制度的一个严重打击。在这个制度中新近获取的土地分配给中级官员（Sipahis，塞帕希斯），他们是中央国家的地方代表，特别是作为收税官服务。在这同时中央国家也失去了用土地酬劳其臣属的能力，它维持财政水平的能力经历了长期的衰落过程——部分是因为物价上涨（成为世界经济外部竞争场和容纳从世界经济中流出的白银的影响），部分是因为曾是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的转移（因为欧洲世界经济在16和17世纪新的大西洋和

印度洋网络的出现）。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转向农业征税，这最终导致了帝国土地的半私人契约化。

在经由希萨（Hisha）规章严密控制商业活动方面也有类似的衰退情形。政府控制所有商业交易以便给予奥斯曼帝国中心地区优先供给地位的能力，让位给一种欧洲通货自由在帝国流通的体系，于是借钱给官僚阶层就变得流行了。

在军事领域，帝国在17世纪到来时发现自己开始落后欧洲人。为弥补这个问题，中央政府于是授权地方行政长官建立雇佣军团，[塞克班（sekban）军队]，并扩张它自己的雇佣军力量[近卫军（janissaries）]。由于增长的财政困难，雇佣军队的增加从长期来看，只能意味着既难于控制又骚动不安的仆从团体的增长。

最后，帝国看到地方官员和当地贵族（ayan）的权力，随着他们从向农业征税获取收入和从塞克班（sekban）军队获取军权而增长。^[248]在此时我们看到由于在战争中被俄罗斯打败，于1774年在凯纳尔贾（Küçük Kaynarca）缔结的“灾难性和约”^[249]的时代，贵族以“各地区事实上（de facto）的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并处于“争权”的有利位置。^[250]

地区性权力的兴起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每个地方——在鲁梅利亚（Rumelia）[巴尔干人（Balkans）]，在富饶新月地（Fertile Cresceht），在埃及和在北非洲。它在埃及采取了最具戏剧性的形式，阿里（Mohamed Ali）在实际上分离出来，他事实上的新国家起于拿破仑入侵后的局面。但是埃及的自治不只是奥斯曼帝国内部衰落的相关结果，这只是其先决条件。假若只是这样，阿里就会成功地创建一个新的强大的对抗帝国。在合并过程的背景下，在大不列颠和法国之间的世界战争最初允许了他的分离；但是后来，不列颠（在四十多年中）束缚了他巩固这样一个新帝国结构的能力。^[251]

在巴尔干地区（balkans）实际上“自治”的兴起是同样明显的。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省份的控制变为“纯粹是名义上的”。^[252]如塞尔维亚（Serbia）的奥斯曼帕夏（Pasvanoglu Osman Pasha）和亚尼纳（Janina）的阿里帕夏（AliPasha）这样的人物成为“半独立的”。他们的基础确实是大地主阶级，但是他们同样也受到当地商人阶级的支持，他们“的一切利益在于创立一个能够制止无政府状态的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对此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不再能有所作为”。^[253]这种正在出现的强有力的机构，却是在比帝国的省（sandjaks）要大的中等规模单位的架构中创建的。

苏丹（Sultan）马赫穆德二世（Mahmud II）改革的目标是结束这种中央权力的瓦解。而最终他能够废除贵族（ayans）和近卫军（janissaries）。^[254]他的成就在于他“建立了一种绝对君主制，由一个中央的官僚阶层和一支从平民中征募的国家军队支持，并由一种新的世俗化和进步的导向构成”。^[255]但是这种强化是有代价的。在某种意义上，从长期来看他的确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着国家内部体系的现代国家”，但只是在比以前的奥斯曼帝国要小的一个地带中。

马赫穆德二世（Mahmud II）在19世纪初期进行改革和重新中央集权化的努力，成为“希腊起义的直接原因”。^[256]第一次成功的真正分离。虽然希腊人的事业最终采取了一种经典的民族主义形式，建立在共同的语言和宗教的根据之上。^[257]作为对奥斯曼帝国重新中央集权化进行抵抗的较广大基础，可以由“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在希腊战争和罗马尼亚（Romania）的政治抵抗两者的早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来衡量。^[258]

正是在企图遏止中央集权的衰落和抵挡外来军事压力的背景之下，奥斯曼帝国成为“第一个加入欧洲国家体系的非基督教国家，并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外交模式”。^[259]如果说第一个西方“外交家”，一个名叫哈布

伦（William Harborne）的英格兰人，早在1583年就到达伊斯坦布尔（Istanbul），^[260]奥斯曼帝国的唯我独尊主义（unilateralism）和对欧洲国家的轻蔑在那时仍是毫无顾忌的，并且基本上到18世纪末还是如此。然而，1699年的卡尔罗维茨（Karlowitz）和约，是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地理上退却的第一步，标志着至少是一段时间内对谈判和承认规则予以默认为的开始，因此也标志着一种奥斯曼帝国的新外交观点。^[261]

一种类似的演进是开始于“领事”（consul）的作用。这种“治外法权”（capitulations）最初是一种属于一个非穆斯林宗教团体〔米列特，（millet）〕的外国民族被授予的特权，其代表是“领事”。迟至1634年，苏丹（Sultan）在没有等巴黎说什么的情况下就“任命”了法国大使。但是一旦在1683年之后地理上的退却开始，治外法权就成为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能够做交易以取得欧洲的“外交支持”反对其他欧洲强国的手段。^[262]在1740年，法国人正是因为因为在1739年于贝尔格莱德（Belgrade）与俄罗斯人的和平谈判中的帮助给予了这种酬报。这导致了法国人与奥斯曼帝国贸易的大量增加。^[263]

但是最重要地，在这种与法国人的新协议中，奥斯曼人（Ottomans）将“治外法权”的意义重新规定，将这种保护证书〔授权书（berats）〕从外国民族扩展到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臣民，他们被接受并置于处于外国领事的保护之下。^[264]这会造成商业阶级全部社会组成的深刻变化，从一种穆斯林一直是“多数或强有力的少数”处于大多数地区的形势，变为在金融中，在工业中，和在对外贸易中非穆斯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犹太人（Jews）、利凡特人（地中海东部）（Levantines）通过治外法权与外国领事的联系而拥有势力的形势。^[265]

当凯纳尔贾（Küçük Kaynarca）1774年的条约，强加给奥斯曼人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他们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不能够在军事上保卫自

己，他们就“得出明显的结论”，他们必须将自己并入欧洲国家间体系“复杂的机制”之中。^[266]在塞利姆三世（Selim III）统治期间（1789～1807年）奥斯曼帝国作了它第一次“互惠外交的实验”，^[267]并在同时寻求“减少”在治外法权行政管理上的“弊端”。后一项努力被欧洲的大使们成功地抵制了，领事们“将各种改革看作只是减少利润的新尝试”，这些利润是他们和由他们保护的商人通过这些“弊端”得到的。^[268]

这种新的氛围并没有阻止欧洲强国给予帝国内部反中央集权的努力以支持。波拿巴（Bonaparte）入侵埃及，这就最终结束了旧政体（Ancien Régime）谨慎的保守政策，这是由于害怕这种入侵只会有助于俄罗斯和不列颠占到便宜，^[269]而确实结果就是这种情况。^[270]不列颠事实上支持了希腊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拜伦勋爵（Lord Byron）唱出了它的抒情诗。^[271]

塞利姆（Selim）的改革是不够的，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外交缺乏以一个固定的专业官僚阶层为条件的有组织的基础。这是马赫穆德二世（Mahmud II）统治时期（1808～1839年）的另一项成就。^[272]一旦不列颠获得了它明确的霸权地位，它就取代了法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完整的保护者，它将这看作是遏制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的野心，并确保到印度的生命线，那时这已成为不列颠人首要关心的事情。^[273]但是最重要的是，大不列颠现在能够将它的条件强加给奥斯曼人，作为它保护帝国的代价。这些条件是颇高的。在马赫穆德二世（Mahmud II）统治的最末期1838年，不列颠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英国—土耳其商务条约（ATCC），[在巴尔塔利曼（Balta Limann）]。在八月签订的这个条约的直接前奏是阿里（Mohamed Ali）宣告埃及人（加上叙利亚人）独立。不列颠将帮助帝国使这个宣告无效。^[274]作为回报，英国—土耳其商务条约（ATCC）确认了所有以前的治外法权特权的“永久性”，和限制奥斯曼人对进口按价值（ad valorem）征收高于3%的关税（包括过境贸易）和对出口征收高于12%的关税的权利。并结束所有的垄断，给予

不列颠人最惠国地位。^[275]不列颠的进口商也同意付2%的税以代替其他国内税。这有支持奥斯曼帝国的中央反对像埃及这样潜在的分离主义者的效果。

如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的，这个条约表示奥斯曼人“实质上采纳了自由贸易”。^[276]这个条约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277]再加上它对产品构成的影响（奥斯曼的制造业的衰落），它也严重地削减了奥斯曼的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在1854年奥斯曼国家成为一个借债大国，最终于1878年的大崩溃达到顶点，并因而受到债务监护。^[278]在1838年之后，土耳其成为不列颠商品第四大购买者，到1846年，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能够告诉议会，“我们进行商业交易的外国中，没有一个像土耳其那样有如此之低的关税和如此自由。”^[279]

在新苏丹阿布杜麦吉德一世（Abdulmecid I）登位时，以1839年的《御园敕令》（*Gulhane Rescrup*）进行坦志麦特（Tanzimat）政治与行政改革，标志着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向西方的大门开得更宽了。”^[280]合并变得如此完全，以致到1872年，一位不列颠的臣民，法利（J.Lewis Farley），作为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驻布里斯托（Bristol）的领事（Consul），能够认为因为土耳其，“已经完全进入了国际社会”，并且因为她的行政制度已经“改造”，还因为她承认普世得救主义的至高地位在教派的主张之上，因而也许现在治外法权的某些方面可以修正。^[281]简而言之就是不再需要它们了。

在印度次大陆政治结构的重建与奥斯曼帝国相比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轨道。奥斯曼帝国的情况是，到1850年的结果是国家的内部比起1750年要强大，但是外部却更弱，并且在地理范围上缩小了。最终其领土还会进一步再划分，但是所有这些继承国家都充分参与了国家间体系并受其束缚。相反地，在1750年，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正处于比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瓦解进程中走得程度要远得多的尽头〔无疑莫卧儿人

（Mughals）从来没有像奥斯曼人那样的内部凝聚力和地理上的扩张]。合并的结果是到1857年莫卧儿帝国和曾存在于印度次大陆的其他较小政治结构被完全废除，它们全被一个单一的（但是复杂的）行政单位所取代，即印度，然而它没有主权。在20世纪正是这个实体向独立迈进，形成了两个（后来是三个）主权国家。然而这两个地带在1750年到1850年间的历史演化在重构国家结构方面显示出某种清楚的类似，就是既不太强也不太弱，正好完全安置到国家内部体系之中。

对17和18世纪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衰弱的解释，一直是印度历史编纂学中辩论很多的问题。哈比卜（Irvan Habib）和钱德拉（Satish Chandra）的解释是其中主要的两种。从根本上说，哈比卜（Habib）认为中央政府企图从农民那里征收足够的税收，以确保它的军事力量。但是没有多到使农民不能维持生活的程度。但是莫卧儿帝国像所有这样的机构那样，必须依赖一些中间干部来收集财税，在这个帝国称为札吉达尔（jagirdars）。中间人的利益与中央政府是很不同的。他们倾向于随着时间不断提高剩余产品榨取的水平，来为他们自己保留更多的东西。用哈比卜的话说，这是“不顾后果的”，因为这导致（应当加上在莫卧儿帝国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农民从土地上逃走，武装抵抗和农耕业的衰落，从长期而言损坏了帝国结构的经济基础。^[282]

钱德拉（Satish Chandra）解释的说法有些不同。他说这种制度在对付这个“根本问题”上，即可利用的剩余价值“不足以支付行政费用，支付这种或那种类型的战争，并给予统治阶级保持其所期望的生活水准”。^[283]阿里（Athar Ali）感到在钱德拉和哈比卜的论证之间有着矛盾，认为哈比卜认为曼萨巴达尔（mansabdar）制度执行得非常好，而钱德拉认为它执行得不够好。我自己不认为有矛盾。哈比卜描述的进程导致了钱德拉描述的形势。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过程是否是由于欧洲人出现在亚洲而在很大程度上突然走下坡路。阿里自己的回答是，由于生产没有扩展的条件，欧洲对亚洲货物的需求起了这些产品在亚洲市场上实

际价格上涨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它们经济中的“严重混乱，并加剧了统治阶级的财政困难”。^[284]这就部分地解释了哈比卜所说的榨取的增加，并且影响的不只是直接生产者，还有在这个结构中那些处于同一水准之上的人。古普塔（Gupta）说，这于是在实际上导致了当地资本的枯竭，不能够支付“过高的财政资金”给帝国，当地的土地管理者经常被诱导将他们收税的权利通过出售或抵押转让出去，尽管这是非法的。因此他认为，“在印度为一个土地市场运行的前提条件……在莫卧儿统治的最后日子里已经产生了。”^[285]

莫卧儿帝国军事上的崩溃，次大陆上大量的战争，和新的自治地带的兴起，无疑使欧洲的贸易公司认识到，到1740年代“促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机会到来了”，^[286]但是只是因为“机会”存在并不意味着抓住机会。因为这类“机会”有其要付出的代价。政治征服和直接的行政管理有许多优点，但它们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它们可以得到同样的利润，这些扮演着强大的经济角色的国家会企图避免这样的支出。很清楚地，不只是在1740年代，而且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后，在大不列颠有许多强权人物，认为避免这样的支出是谨慎的。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正是这么作了。

在七年战争期间，印度是法国—不列颠战争的一个重要场所，这场战争起了它的作用。正如斯皮尔（Spear）所说的，它给予欧洲人“一种新的信心，因为他们的武装力量在印度情况下是优势的，”^[287]克莱武（Clive）时期也许更加传播或夸大了印度作为一个“有着丰饶财富的土地”的神话。^[288]它掩盖了军事和行政花费代价的现实。在越来越卷入世界经济的生产网络，和由此带来的政治网络的重新构建之间的联系，那时的当地统治者对此的认识，可以由关于一位在1784年从马拉巴尔（Malabar）旅行到卡利卡特（Calicut）的商人的轶闻中描述出来。据说他看到：

在他经过的路上所有的白檀树和胡椒树都被砍倒。人们告诉他纳瓦布（Nawab）[即铁普苏丹（Tipu Sultan）] 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让他们如此毁坏，因为这些商品使欧洲人要与他们进行战争。[\[289\]](#)

正如马歇尔（Marshall）所主张的，也正如这段轶事所显示的，印度绝不是“一个无能力的牺牲品，正准备给任何欧洲国家去征服，被选来确认其不可抵抗的力量。并且在18世纪，不列颠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院（Court of Directors）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使用军事力量的强烈愿望”。[\[290\]](#)而“奇怪的是”，正如哈洛（Harlow）所说的，[\[291\]](#)获取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土地面积进行殖民化的实际成果，却是在这之前或是之后。

这种殖民化的一个原因，是在印度舞台上有着三个而不是两个主要角色。除了不列颠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院之外，还有私家贸易商。并且至少有两种私家贸易商，一种是本身为东印度公司的服务人员，另一种则不是。[\[292\]](#)显然那些是公司雇员的人有着利益上的矛盾；给予他们私人利益以余地的是有效的集中管理的遥远和极为困难这个现实。而且看来很清楚，对这些私人经济利益的追逐，经常导致公司的服务人员以政治方式使用他们的权威向印度的国家施加压力。如马歇尔

（Marshall）所说的，“他们属于运用（他们的军事优势）从印度的统治者那里逼迫各种让步，它们的最大效果是削弱和最终毁灭这些国家”。[\[293\]](#)

这种政治控制的驱动力并不是在公司的机构中没有大量争辩的情况下发生的。在1770和1780年代在所谓黑斯廷斯（Hastings）派和弗朗西斯（Francis）派之间不和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此。[\[294\]](#)但事实是甚至反对介入武力的态度也不是明确的。例如，这两派确实争论过应否合并处于内陆的奥德（Oudh），而威尔斯利（Wellesley）最终于1801年将其合

并。但是反对介入武力者有其经济打算，也并不比那些希望合并者不明确。如马歇尔（Marshall）所说：

自由贸易是一场需要不只一个参加者的游戏。如果欧洲人要放弃支持他们贸易的政治影响，他们就会感到〔奥德（Oudh）的〕瓦札尔（Wazir）必然要被迫使去弥补这种状况，从他们的观点而言，这就算是运用了必要的政治影响力。[\[295\]](#)

总之，在公司和贸易商之间有着一种授与受的关系。后者经常需要躲在“国家的保护”，和东印度公司的存在这个事实而支付的信贷利息之下。但是相反地，他们也利用了公司的商业基本设施。他们支付关税，他们促进贸易。从诸如汇寄财产的贴现、给付的批准费、规定的损失赔偿费、禁运货物的运费和罚金等这样一些“无形的收入”得到的优惠，所有这些都助于抵消时常发生的迫害行为，所有这些显示出一种“困难的”和“爱恨交织”的关系。[\[296\]](#)因此，这些私人贸易的利益能够逃避先是东印度公司，后来是不列颠政府的过分管束。

而人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某些关键时刻，没有严格地应用这种刹车。我想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在时间上分为两段，从1757年到1793年，和1793年之后。事实上，政治获取的孟加拉（Bengal）在我们要讨论的紧接其后的时期变得非常有利可图。金银停止从不列颠流出，而因为棉布匹和其他货品仍然运抵不列颠，很明显地就是有某些东西用来支付它们。国家财政必然有这些东西。确实如我们所知，孟加拉的白银开始流向其他省管区（Presidencies），并也资助了它们的征服和行政管理。[\[297\]](#)因为这发生在不列颠国家财政由于美国革命的后果大紧缩（对法国也是如此）的时刻，从印度次大陆流入的资金不会不受欢迎或不被注意。凯恩（Cain）和霍普金斯（Hopkins）将这种形势说得很好：“普拉西（Plassey）的劫掠者没有开启工业革命，但是它确实帮助了不列颠

从荷兰人（Dutch）那里赎回了国家债务”。^[298]简言之，对直接殖民统治的短期理由倾向于压倒了从中期来看的否定理由，不然后者就会控制着伦敦制定的政策。

与法国的竞争是关键性的。就部分而言，这无疑是人们通常会设想的那种直接竞争，即为了控制世界经济的新边缘地带所作的竞争。虽然在这里应该强调，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的观点而言，这对不列颠比法国更为真实，特别是在1763年之后。^[299]但是从更大的范围而言，可以说它在使得不列颠能够解决1780年代的国家财政危机上间接起了关键作用，而法国却恰恰不能够克服，这是一个我们已经从与法国大革命有联系的角度上讨论过的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英法竞争的第三轮的最终结果导致不列颠经济榜样最终被奉为神圣。

摆在董事院（Court of Directors）和不列颠政府面前的两难问题因而是清楚的。他们可能对他们被导入这场缓慢进行的政治统治感到不快，他们被迫不去使用这些刹车。他们开始感到不列颠政府确实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将这种工作更直接接收过来。这就是庇特（Pitt）的解决办法，它最终实施了。如哈洛（Harlow）所说的，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已经脱离控制，成为“对公司的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转变为准公仆”。^[300]不论喜欢与否，而董事院是不喜欢的，董事院事实上也不能单独这样做。不列颠国家不得不开始卷入。斯托蒙特勋爵（Lord Stormont）在当时明确提出的目标是“一个强有力的在印度的政府，隶属于国内更强有力的政府的约束与控制之下”。^[301]他们做到了这点。据1784年底特（Pitt）的《印度法案》^[302]及此后十年间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的改革，公司的服务人员作为独立的角色的局面就消失了。^[303]

当然，一如明智和谨慎的预想的那样，政府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变得比预期的要大。“收支平衡”情况又回到原状，白银重新外流又开始了。

并且，有持续的白银外流到东方的另一个大贸易地带——中国。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列颠现在能够将其正在形成的政治统治地位作良好地运用。斯皮尔（Spear）这样总结了18世纪末期的形势：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不再有利可图，因为它的利润，代之以孟加拉的财政增加，事实上却被行政花费吸收了。它的利润来自中国……对于在印度的霸权的一个强有力的经济理由就是保持对中国的贸易。^[304]

因为公司控制了印度，它能够创造出能在中国找到市场的出口作物，在中国它还不能以强力推行生产过程的再建构。

这个妥协包含在1793年重新制定的公司特许状的形式内，并良好地安排了这些利益。不列颠政府加强对公司的控制，而公司保持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还有在印度的某些垄断权。但是私家贸易商得到了进行某些一定数量的船运的法定权利。这种妥协结合着当不列颠在进入与法国的长期战争时所需的稳定，^[305]一种私家贸易商从中受惠的稳定^[306]又保证了东印度公司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的贸易。值此之际，1793年也是康沃利斯（Cornwallis）发布“永久安置法”（Permanent Settlement）的一年，这个法律与行政改革的高峰，其效果是除去了认为土地是“在市场上买卖的一种商品”的障碍。^[307]

随着拿破仑战争将尽，在1813年，不列颠政府能够进一步确立其直接控制，当时东印度公司再次提出修订特许状（Charter）。在这段时期内，私家贸易商成功地扩展了他们的贸易，并且被如通过公司汇款造成的损失这类束缚所激怒。兰开郡（Lancashire）的制造业者现在也卷入了冲突，渴望在印度扩展他们自己的市场。因此，新特许权结束了在印度的所有垄断权，但是将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延长20年。这个特许状也规定了领地与商业事务的完全分离，由此为一种完全正式的殖民政府管理准备好了途径。^[308]“到1837年，不列颠人不再只是在印度的一个政

权。他们就是统治印度的政权。”^[309]

俄罗斯的合并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俄罗斯在16和17世纪是否是欧洲一部分（因而属于欧洲的国家间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学术上的疑问。但是无论甚至在20世纪俄罗斯是否是“欧洲”的一部分对某些人还是一个问题，没有疑问地苏联（U.S.S.R.）今天完全是（现在是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而我要提出的论点是，俄罗斯只是到18世纪才成为（那时是欧洲的）国际体系完全组合进来的成员。

如德希奥（Dehio）提醒我们的，在一方面，“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不同，在种族上和心理上是西方各民族的远亲”，而在另一方面，“青年时代的莱布尼茨（Leibniz）仍然以同样的口气谈及俄罗斯、波斯（Persia）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310]无论怎样，如果人们使用互惠外交存在与否的标准来看，只有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统治时期（1689~1725年）我们才发现其开端。^[311]这是与对外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和“俄罗斯逐步摆脱欧洲其余部分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孤立状态”相协调一致的。^[312]

彼得（Peter）将他自己表现为一个伟大的“西方化者”（Westernizer），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化者”，在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在当时和现在，都接受这种描述。这同样的角色 [在细节略有不同（mutatis mutandis）]，埃及的阿里（Mohamed Ali），或是不那么鲜明（éclat）的苏丹马赫穆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也曾宣称过。彼得经由在1711~1712年间创建的治理参议院（Ruling Senate），无疑地开始了一个创造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官僚阶层的过程。^[313]他也借由使贵族们强制和永久服役改造了军队。^[314]一般来讲都认为，正是这支现代化的军队的作为“建立了俄罗斯作为欧洲政治体系中一个重要部分的地位。”^[315]

然而，近来的学术界更为怀疑彼得大帝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就，将其

和他所希望的或宣称达到的东西区分开来。克拉克拉夫特（Cracraft）认为彼得的（Petrine）神话可能比“彼得政权取得的任何成就有更大的历史重要性”。^[316]而托克（Torke）称彼得实行的行政变革被“大大估计过分”了，并认为在这方面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他说真正的“转折点”是1762年，即凯瑟琳二世（Catherine）登上王位的那年。^[317]

彼得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过渡性的工作。他将贵族在一种常备军的基础上编入军队，并将军队在同样的基础上纳入政府。他因而以占取贵族的时间和使他们相互对抗以确保更多的剩余价值国内收入，抑制了反中央集权化的倾向。要由凯瑟琳（1762~1796年）来结束贵族的强制终生军役，建立一个非军人机构来取代其地位，这还有使贵族有时间成为商品农作物企业家的效果。凯瑟琳取消了旧的省份，将俄罗斯划分为50多个“省”（guberniyas），[下面再划分为“县”（uezds）]，每个“省”有一个高等行政机构，部分由中央指派的官员，部分由地方上选举的代表组成。^[318]她这样就从根本上改造了俄罗斯政府，“从一个收集贡赋的等级制度，变成一个国家的行政机关，它的仆人如军队中的服役者那样，了解一般目的。”^[319]在1766年，凯瑟琳签署了《英俄商务条约》，对原材料出口给予低关税，对不列颠很有好处。^[32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评估凯瑟琳带有某种侵略性的军事政策，战胜奥斯曼帝国，参与瓜分波兰，给予“俄罗斯的活力……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印象”。^[321]但正是似乎看来这种对外政策是要补偿对外贸易政策，这使得凯瑟琳有可能热诚地接纳这种政策，通过她的行政改革，“（俄罗斯的）国内空间组织起来了”。^[322]

这种国内的重组当然还意味着其他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劳动力有效率的压榨增加了。^[323]这种压迫既导致了俄罗斯农民的“大规模逃亡”，向东越过伏尔加河（Volga），到达乌拉尔（Urals）甚至西伯利亚（Siberia），^[324]又导致了与“恶化的……经济状况”相联系的民众叛乱。^[325]当卷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增长时，这种“发展”越来越侵害到曾经

是遥远而自由的哥萨克（Cossack）边民。^[326]他们的不满，和新工业农奴与在商品作物大地产上加强的农奴制（这些我们已经解释过）的不满联系在一起，加上旧教信徒（Old Believers）的反对，^[327]造成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在普加乔夫（Pugachev）起义中到达了极点，而这正是在凯瑟琳的统治时期。潜在的意识形态主题是属于农民的记忆，“回归到当他们的祖先是自由人的时代”^[328]，或者至少是比合并入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状况要自由的人。

凯瑟琳却立场强硬。她镇压了农民，并保持了自由贸易。这种政策有足够的负面效果，导致她的继承者们采纳了如丘科夫（Chulkov）这样的“坦率的保护主义者”们的建议，他们在俄罗斯—不列颠的关系中要求更大的互惠。这些保护主义者对“长期受憎恨的不列颠商人”的猛烈攻击在沙皇保罗（Tsar Paul）于1800年与不列颠断交时达到了顶点，禁止不列颠的货物，并没收了不列颠的船只。^[329]

但是俄罗斯发现自己被国家间体系的束缚抓牢了，并发现她的行动自由非常有限。在1780年代，俄罗斯就已经企图增加她与不列颠的周旋余地，靠的是发展与法国的商业联系，由于两国在对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上利益相反而失败。^[330]俄罗斯凭借她在“东方”的扩张主义角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来确保她作为一个半边缘国家而不是作为一个边缘化地带被合并。而确实在凯纳尔贾（Küçük Kaynarca）条约中战胜奥斯曼人标志着“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的一次飞跃。”^[331]她做到这点的能力无疑是由于这个事实，在1783年，法国和大不列颠正专注于他们之间与美国独立战争有关的斗争，不能作什么来实行“他们所声称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Crimea）。”^[332]

但是这场游戏有一种代价。俄罗斯在中东（Middle East）需要至少有一个西欧大国的善意中立。因为法国在18世纪晚期在外交上支持奥斯曼人，俄罗斯感到她必须保持与不列颠的联系。因而保罗（Paul）在

1800~1801年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是鉴于拿破仑（Napoleon）的长期进逼，俄罗斯被迫回到不列颠的阵营。俄罗斯被两个方面所吸引和束缚，一方面她努力巩固她在东南欧、黑海（Black Sea）和高加索（Caucasus）地区的统治和影响，另一方面她面对西欧要创造一种更强的地位。^[333]为做到前一方面，她牺牲了后一方面，于是在被合并到世界经济中时的方式就确定和促成了后来的作者们写到的著名的“落后性”。但是俄罗斯仍享有一种比起其他被合并地带不那么弱的国家间地位，而这个事实最终使她有能力发动俄国革命。

西非洲与所有其他三个地带不同，在1750年，在这个地区没有在幅员和组织上可以与奥斯曼、莫卧儿或俄罗斯帝国相比的世界性帝国。有的是许多强大的，大部分是出售奴隶的国家，和大量在军事和政治上弱小的小实体。

我们已论证过，为合并到世界经济中，需要国家既不太强也不太弱，但是对国家间体系的“游戏规则”要能做出适当回应。通常认为，西欧国家在这些地带施加政治压力的原因之一，是要“恢复”这个地区的“秩序”，那里的“无政府状态”使和平的贸易不可能进行。我们已经指出，我们认为这对于印度次大陆而言是个有疑问的解释，在那里这种“秩序”中有许多被不列颠人在1750年后恢复，以弥补在这之前100年，因西方的闯入扮演主要角色而确实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重点在于资本主义需要的不是“秩序”而是可以称之为“有益的秩序”（favorable order）。促进“无政府状态”常常是为了摧毁“无益的秩序”，也就是有能力抵抗合并的秩序。

在西非的历史编纂学中，一个熟知的论题是所谓奴隶——枪支的循环。在获取火药武器和获取奴隶之间联系的证据大体看来是强有力的。“对于专业的奴隶捕捉者而言，火药武器代表着重要的收入”。^[334]理查兹（Richards）认为，这种“高度相关性”在1658~1730年这个时期

已经出现，并随之导致了西非洲政治图景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335] 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大的出售奴隶国家，如达荷美（Dahomey）和阿散蒂（Asante）成形了。无疑地这些国家如波拉尼（Polanyi）所论证的，认为它们创造了独立于世界市场影响的状况。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一旦被抓捕奴隶战争的恶性循环牵涉进去，这种依赖性只能增强”。^[336] 然而从世界经济的经济力量的观点来看，这些增长着的出售奴隶的结构正在其他地带创造“无政府状态”，因而摧毁了“无益的秩序”。这就是艾金乔格宾（Akinjogbin）称作奴隶贸易的“最大矛盾”的来源：

在18世纪初，阿贾（Aja）人的政治状况因为贸易的增长变得混乱。在这个世纪末，不稳定局面开始在达荷美王国出现，却是因为贸易在衰落。^[337]

然而，这种出售奴隶国家现有的“有益秩序”依赖的是非常有限的经济活动范围。当西非洲卷入世界经济的中心焦点从一个主要是奴隶出口贸易的时期转换到一个混合出口商品的时期，再到更后来完全没有奴隶出口的时期——一个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进程——在一个更大的、更具“无政府状态”的地带中，这种出售奴隶国家相当小的容积就变得不那么有用了。所需要的是新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比现存的国家大，但还是要既不太弱又不太强。

因此在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不列颠商人强有力地援助芳蒂（Fanti）人的国家抵抗阿散蒂（Asante）的扩张，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能够将阿散蒂的强权摧毁，一片广阔的商业领域就会向他们敞开”。^[338] 19世纪伊斯兰教（Islamic）的冲击，正如我们看到的，是朝着“几个小国和小公国的大规模组合”^[339]的一种运动。而那里没有国家形式存在，如在伊博（Ibo）人地区，一种“部分的国家结构”以阿罗丘库（Aro Chuku）的形式成长起来。^[340]

在其他事情中，人们可以将不列颠人反对奴隶贸易的驱动力解释为

一种摧毁较小的单位的“无益秩序”，以有利于重新建立较大单位的驱动力。当然其目的也是在于削弱法国人和其他经济竞争者的地位。^[341]如果在这个时期我们还不能谈到互惠外交，我们确实看到了更具结构性的政治实体的出现，它们开始确保新出现的商品作物生产流向世界经济。

我们主张将这个合并进程的时期大略定为1750~1850年。（或者西非洲的情况可能是1750~1880年）。这是唯一可能有的分期吗？明显地不是。对这个分期问题有着广泛的实证性辩论。不幸的是，这些参与者中许多人没有一个清楚的过程模式，或者至少他们没有运用我们一直在运用的同样模式：外部竞争场——合并——边缘（或半边缘）地带。依照这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有些作者将合并的时期推回到一个地带成为外部竞争场一部分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些作者却认为一个地带开始起到世界经济中一个边缘地带的作用时，才算得上被合并。这两类作者都没有理解到，我们所论证的方式中，是将“合并”当作一个特定的过程。

系统地说明这场辩论的一个标准方法，是论证“资本主义”开始的时期。一些作者认为，随着“外部竞争场”在较早时期长途贸易的广泛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或至少是原始资本主义。这经常伴随着一种资本主义“本地”根源的理论，或是欧洲人的闯入“打断”了这个过程。其他作者主张真正的最早“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的要晚得多。极端的例子是有些人认为它甚至在今天也几乎不存在。我们认为没有多种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至少要被组合进它的生产网络或商品链之中，并且位于构成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间体系的参与国之中。这样界定的合并正是指这种组合发生的时期。

^[1] 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 320）。

^[2] 托马斯夫妇（Thomas & Thomas, 1928, 572）。

[3] 库尔什雷斯德拉 (Kulshresthra, 1964, 220)。古普塔 (Das Gupta) 特别批判了勒尔 (Leur) 的理论, 即印度洋贸易在1750年之前是“奢侈品”贸易, 说这种论证是“难以站住脚的”, 因为虽然有些贸易是通过“奢侈品”, 贸易的这部分“比起大量的纺织商品是不足道的, 占压倒性的是各种普通的物品” (1974, 103)。但让我们在这里留心这种体系性的界限。古普塔谈到的是印度洋内部之间的贸易, 这不属于这个论题, 这里要谈的是印度洋地带和欧洲世界经济之间的贸易。

参见拉伊乔杜里 (Raychandhuri) 关于地区间贸易的类似论证。但是他所指的是印度次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 “尽管陆上运输花费很大……食品和种类广泛的纺织产品贸易, 其中一些确实不能说成是奢侈品, 而是 (1750年之前) 地区间贸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982b, 329)。然而当它成为拉伊乔杜里所说的纺织品“国际间贸易”时, 他指出, 欧洲人购买的“只占整个贸易很少一部分” (1972, 234)。

[4] 诺思罗普 (Northrup, 1972, 234)。

[5] 阿明 (Amin, 1972b, 508)。对诺思 (North, 1985) 而言, 这种无知是可以界定的增长了“交易费用”背离了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

张伯伦 (Chamberlin, 1979, 421) 比较了西非的“大宗出口贸易”, 他认为这是所谓合法贸易, 和“奢侈品出口贸易”, 他将后者定义为“每磅商品的高价值”。虽然在许多情况中可以使用每磅的价值比, 依我看来似乎不是本质性的。在世界的某些部分和在某些背景中, 出口用于宫廷典礼的大象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奢侈”产品——在花费上, 然而非本质上的, 它们是捕获而不是生产的, 稀少的但又是十分沉重的。

[6] 阿诺德 (Arnold, 1957a, 174)。

[7] 阿诺德 (Arnold, 1957a, 175)。

[8] 波拉尼 (Polanyi, 1966)。也见埃尔韦特 (Elwert, 1973, 74, 及各处)。

[9] 奥斯汀 (Austen, 1970, 268)。

[10] 阿盖尔 (Argyle, 1966, 103)。劳 (Law) 抓住了阿盖尔奴隶贸易是在国王和其他出售者之间分享的观点, 称王家商业垄断的概念“在本质上是神话” (1977, 556)。然而劳接着提到, “达荷美 (Dahomey) 的国王们看来不允许从内陆国家来的商人直接与在惠达 (whydah) 的欧洲商人打交道” (564页)。因此, 取代王家垄断地位概念的是它处于奴隶抓捕者和欧洲贸易商之间, 并在实际上将其分离开。劳以一种在国王和达荷美的 (Dahomean) 的私家贸易商间分享的垄断来取代它。从封锁信息来源的方面来看, 这似乎没有很大不同。见波伊克特

(Peukert), 他也强调达荷美私家贸易商的作用 (1978, xiii-xiv), 但是他企图用同样强烈地驳斥“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分析”来平衡他对波拉尼 (Polanyi) 将达荷美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的理论的批评倾向 (224页)。

[11] 曼宁 (Manning, 1982, 42)。在结尾曼宁本人为历史的无知还作了辩护: “人们还不

能说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乐于调节和保护奴隶贸易，和它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进行了收集和出售奴隶的工作。例如，如果大多数奴隶是在战争中俘虏的，必然存在着一种机制将奴隶从这个国家中转手出去，它也许宣称他们是俘虏，让商人们将他们出口。在这点上和关键的细节上，当代欧洲的观察家可以辩称无知”（143页）。

[12] 考虑一下在达荷美（Dahomey）王国的晚期发生了什么。在18世纪晚期，达荷美的当权者减少了奴隶贸易。这部分是要减少对被看作是一个衰落而不稳定的市场的依赖（似乎是起因于一种“贸易港”的刺激），部分是要安抚奥约（Oyo）王国，它在那时名义上是达荷美的宗主，也是她在供应奴隶方向的竞争者。然而，这种减少在王国的各个群体中造成了足够大的负面影响，以致在1818年发生了一场某种政变，使哥佐（Ghezo）登上国王王位。确实今天哥佐（Gezo）被视为达荷美历史上的伟大领袖之一。他作了什么呢？“哥佐复兴了停滞的奴隶贸易，开创了一个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时代……刺激促进他的王国经济的，是用俘虏来的劳动力强迫在达荷美的种植园工作，是通过在惠达（Whydah）的市场出售奴隶得到的资金，是通过建立在新征服领土上达荷美建立的贸易垄断”[约德（Yoder），1974，423~424]。这种卷入世界经济的特有模式，因为这就是当时所造成的情况，它看来会发展为用来阻止这种卷入的强大国家结构。它只是由于不列颠人到1843年对惠达的奴隶贸易进行积极封锁才告结束。约翰劳（John Law）怀疑达荷美的当权者曾经减少奴隶贸易。但是，他将强大的国家看作是“由于奴隶贸易造成的秩序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而创造出来的东西（1986~1266）。

[13] 诺尔蒂（Nolte，1982，47）。

[14] 此外，我完全同意诺尔蒂（Nolte）所总结的矛盾之处：“并且，延迟俄罗斯合并到世界体系之中从长远来看是优点还是缺点，是一个明摆着的问题。从经济上说，这种延迟导致了俄罗斯自己制造业的发展。从沙皇（Tsar）的角度看它也有政治上的优点，由于它反对瑞典的合法绝对君主制的斗争”（48页）。这又正是我的观点。最后这个论证要落实到俄罗斯是在1750年之后被“合并”[以在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统治下为标志]，还是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统治下已被合并，或是甚至更早。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个时期问题。例如，布兰克（Blanc）对彼得大帝的评价是：“彼得是信奉保护主义的……在彼得统治之后的政府有时比他更开放。1731年的关税，或甚至在1734年条约后授予英国人的优惠，标志着比起彼得大帝无可争辩的‘重商主义’来所显示的明确进步”（1974，29）。

[15] 霍奇森（Hodgson，1974，II，137~140），拉斯托（Rustow，1970，I，677）指出：“郁金香时期（Tulip Era）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田园诗已经被（回历1182~8年即1768~74年的）奥斯曼—俄罗斯战争粗暴地粉碎了，而并非在此之前。”“在屈奇克-凯纳尔贾（küçük Kaynarca）和约中，苏丹（Sultan）被迫割让克里米亚（Crimea）——第一块被奥斯曼人出让给基督教徒的穆斯林土地”。海德（Heyd）说，郁金香时期是“短命的”（1970，I，363）。这是足够真实的，但是我们应该将它看作为抵抗合并的压力而设的一道最后防线的一部分。

有时，作为早在1750~1850年之前奥斯曼帝国衰弱和被合并迹象的证据，引用了奥斯曼的臣民被葡萄牙人剥夺了在印度洋贸易中的角色的情况。海斯（Hess，1970，1917~1918）说这是一

个纯粹的以葡萄牙为中心的观点。“以（16）世纪的标准和根据构成他们社会的机构而言，奥斯曼人成功地在他们的边界上抵御外来海上的挑战——地中海（Mediterranean）的外部边缘和印度洋的非开放区域是16世纪奥斯曼海军的主要边界”。

[16] 迪格比（Digby, 1982, 150）。也见马歇尔（Marshall, 1980, 19）：“在印度洋西部，葡萄牙海军力量的大部分努力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越往东它就遇到更大的竞争”。日本有能力在1637年终结了所有的西方贸易，除了少量通过在长崎（Na-gasaki）的“贸易港”进行的之外，这在17世纪中期是引人注目的。“在锁国令实行之后，‘幕府’（Bakufu）或将军（Shogun）政府……发展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官僚阶层，在一个‘大老’（elders）会议的控制之下。于是通过恢复长期内战之后的和平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日本能够无畏地面对世界”[潘尼迦（Panikkar），1953, 87]。类似地，“取代衰微的明朝（Mings）的一个具有活力的新朝代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使中国强大起来”（77页）。

[17] 马丁（Martin, 1972, 14）。这种描述是关于卢安戈海岸（Loango Coast），但是这种同样的论述也能很容易地由其他地区得出。马丁指出两种主要的情况使这成为事实：“一个是强化了欧洲人竞争，另一个是没有欧洲人在沿岸得到永久的立足点”（115页）。当然在西非洲，第二种情况被堡垒的建立破坏了，而作这种努力是为了减少竞争。而这种情况要直到欧洲得到另一个转机的事件（比如说是1815年）时，这种竞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控制。

[18] 关于葡萄牙非洲混血人（Luso-Africans）的作用，特别是在16和17世纪，见布勒盖（Bouléque, 1972）。

[19] 关于白银流出到印度，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在17世纪的情况，见我以前的讨论[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80, 106~110]。

[20] 乔杜里（Chaudhuri, 1978, 159）。“东印度由西北欧洲航海国家进行的贸易的建立，大部分是基于用西方贵金属交换亚洲的制成品”（97页）。

[21] 乔杜里（Chandhuri, 1981, 239）。

[22] 乔杜里（Chaudhuri, 1978, 456）。乔杜里说，西欧人必须为印度货物支付金银，因为他们“不能够以他们大量需求的为西方产品的市场来衡量价格”。这几乎没什么说服力。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今天是怎样向印度出售计算机的呢？

[23] 波林（Perlin, 1983, 65）。

[24] 诺尔蒂（Nolte, 1982, 44）。

[25] 达塔（Datta, 1959, 318）。

[26] 晚至1730年代，“看来无疑，只有英格兰的国家船运增加了”。[弗伯（furber），1965, 450]。

[27] “巴尔干 (Balkan) 各民族 (在18世纪) 对欧洲货物的需求小于西方对巴尔干货物的需求 [斯托亚诺维奇 (Stoianovitch), 1960, 300]。欧洲人进行的贸易到19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一直顺利”。见伊萨维 (Issawi, 1966, 1980a)。

[28] “为获得他们国内市场所需的黄金和象牙 (如同胡椒), 葡萄牙人作为中间商必须花费大量精力, 沿着西部海岸运送货物” [诺思拉普 (Northrup), 1978, 22]。他得出结论: “葡萄牙人的到来……不需要在 [尼日尔河三角洲 (Niger Delta)] 地区的贸易生活中引起突然变化, 他们要的是被容纳到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商业组织模式之中” (129页)。

[29] 沃森 (Watson, 1980a, 42), 他指出, 正如英格兰的私家贸易商作为当地商人阶级的一个补充部分的程度那样。存在下来的那些人是否是那些与英国人合作的人, 如古普塔 (Das Gupta, 1970) 所说的那样, 沃森说: “仍需要一个答案”。

[30] 乔杜里 (Chandhuri, 1983a, 806)。

[31] 《永久居留法》 (*Permanent Settlement*) 起了去除使土地成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的障碍的效果 [科恩 (Cohn), 1961, 621]。

[32] 见达塔 (Datta, 1959, 317~318)。

[33] 见巴格奇 (Bagchi, 1976c, 248), 甘古利 (Ganguli, 1965), 阿拉萨拉特南 (Arasaratnam, 1979, 27)。辛哈 (N.K.Sinha) 说: “在1757年孟加拉的白银储备不但没有再加补充, 而且其中大部分由于各种途径而流失殆尽了。” (1956, 14)。

[34] 见辛哈 (Sinha, 1970, 28~29), 乔杜里 (Chandhuri, 1966, 345~346)。

[35] 基辛格 (Kessinger, 1983, 252)。“到18世纪末, 如甘蔗、鸦片, 和靛青这样的一些商品作物有着较高的价格和增长的需求” [科恩 (Cohn), 1961, 621]。

[36] 巴塔查尔雅 (Bhattacharya, 1983, 359)。

[37] 乔杜里 (Chandhuri, 1983a, 844), 他在 (1966, 348~349) 中叙述了进一步的详情。也见索万尼 (Sovani, 1954, 868~870)。

[38] 见马歇尔 (Marshall, 1976, 153)。

[39] 见达特 (Dutt, 1956, 280)。

[40] 辛哈 (Sinha, 1970, 1)。

[41] 见哈比卜 (Habib, 1963, 44)。

[42] 见古哈 (Guha, 1972, 2)。

[43] 见哈比卜 (Habib, 1963, 39~40)。

[44] 见奈廷格尔 (Nightingale, 1970, 128)。这原来只是指印度西部和中央北部。南印度开始向中国出口棉花要到1803年。见卢登 (Ladden, 1985, 137~138)。

[45] 哈洛 (Harlow, 1964, II, 292)。塞迪奇 (Siddiqi, 1973, 154)。联系到由于美利坚合众国在1820年后的竞争造成的生产衰落。到1850年代,“棉花在印度只是一种次要的作物,种植主要供国内消费” [特里帕蒂 (Tripathi), 1967, 256]。棉花在美国内战时期 (1861~1865年) 获得一个暂时的增产,但是甚至那时不列颠对棉花种植的政策仍是“半心半意的”(262页)。

[46] 见奈廷格尔 (Nightingale, 1970, 160)。

[47] 见辛哈 (Sinha, 1974, 2)。

[48] 见古哈 (Guha, 1976, 338~339)。关于当时印度商品作物的一个纵览和它们的地区分布,见达特 (Dutt, 1956, 272~285)。

[49] 见弗朗加基斯 (Frangakis, 1985, 152)。也见戴维斯 (Davis, 1970, 204)。

[50] 弗朗加基斯 (Frangakis, 1985, 241~242), 参见卡帕特 (Kavpat, 1972, 246)。关于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 (Syria/Palestine) 出口导向棉花出产的扩张,见欧文 (Owen, 1981, 7)。

[51] 见麦高文 (McGowan, 1981a, 32)。他指出这开始了一种奥斯曼帝国内部的贸易。

[52] 斯托亚诺维奇 (Stoianovitch, 1976, 189)。希钦斯 (Keith Hitchens) 怀疑这对于1830年代以前的瓦拉几亚 (Wallachia) 和摩尔达维亚 (Moldavia) 是否真实 (个人通讯)。

[53] 斯托亚诺维奇 (Stoianovitch, 1983, 349)。帕斯卡列娃 (Paskaleva) 谈到 (1968, 275), 巴尔干地区在棉花出口上的一次“大扩张”。

[54] 他们继续说:“我们从它那里取得的只是原材料,我们用王国制成品货物剥削它”。引自马森 (Masson, 1911, 431~432)。马森说地中海东部地区 (Levant) 在那时对法国起了芒图 (Mantoux) 所说的东印度群岛 (East Indies) 对英格兰所起的同样作用 (见434页)。

[55] 弗朗加基斯 (Frangakis, 1985, 248)。

[56] 见伊萨维 (Issawi, 1966, 67)。

[57] 见理查兹 (Richards, 1977, 17)。埃及人在那时用有许多优点的长纤维棉花迅速扩张。

[58] 在1862年,法利 (Farley) 写道:“在现时感到有很大的迫切性来关心这种重要物品

（棉花）的未来供给，如果我指出那里感兴趣的人注意到这种便利存在于在奥斯曼帝国种植的增长与改良，就不会失去供给地”（55页）。

[59] 见普里尔（Puryear, 1935, 也见132~139, 180~226）。普里尔指出，到这个时期的末尾，不列颠人由于政治原因越来越不依赖俄罗斯的小麦，结果就转向巴尔干的小麦（见215~217页, 227页）。

[60] 吉勒（Gille, 1949, 154）。关于英国—俄罗斯贸易在1750年后的迅速增长，见纽曼（Newman, 1982, 96）。

[61] 吉勒（Gille）显示出（1949, 156）从1778~1780年到1851~1853年，“初级产品”加上“食品”出口的百分比从71%上升到95%，而制造业出口从20%下降到2.5%。

[62] 卡汉（Kahan, 1979, 181），他继续说：“可以有把握地做出结论，俄罗斯的大规模原材料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扩张了不列颠的工业，有助于维持其增长与对劳动力的需求”（182页）。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那时从自我利益出发的观点。福斯特先生（Mr.Foster），俄罗斯公司的代理人（Agent），于1774年在议会作证说，没有俄罗斯的进口，“我们的海军、我们的商业、我们的农业都要完结”。引自杜克斯（Dukes, 1971, 374）。当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干扰了俄罗斯对大不列颠的出口时，不列颠人却发现，总的来说这些进口产品除了大麻之外，都是可以替代的或次要的。见安德森（Anderson, 1967, 73~74）。

[63] 见贝塞特（Besset, 1982, 207~208）。

[64] 克罗斯比（Crosby, 1965, 20~21）。

[65] 克罗斯比（Crosby, 1965, 16）。

[66] 俄罗斯政府对小麦出口的限制一直实行到18世纪后半期。当凯瑟琳二世（CatherineII）得到黑海（Black Sea）的港口时，“中央的出口开始增加”[布卢姆（Blum），1961, 287]。后来，在不列颠的谷物法（Corn Laws）在1846年取消后，有另一个主要的飞跃。

[67] 雷格莫特尔（Regemorter, 1971, 98）。

[68] 见康菲诺（Confino, 1963, 22, 注脚1）。

[69] 关于俄罗斯贵族依赖对外贸易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见克罗斯比（Crosby, 1965, 36）。

[70] 麦克米伦（Macmillan, 1979, 168~169）。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麦克米伦讨论了苏格兰人（Scottish）使用“给俄罗斯商人和生产者以长期借贷”来刺激这种贸易，并得出结论说这种贸易对苏格兰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1970, 431, 441）。

[71] 克罗斯比（Crosby, 1965, 24）。在1783年到1787年间，美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增长

为“一种重要性不小的交易”：美国人特别购买铁和大麻，并且“他们购买的价格在圣彼得堡（St.Peterburg）造成了效应”[拉施（Rasch），1965，64]。

[72] 罗德尼（Rodney，1970，199）。

[73] 例如，格麦里（Gemery）和霍根多恩（Hogendorrn）（1978，252~253）提到他们称之为商品化的技术变革：重新确定导向和调整长距离网络，建立移动营帐与仓库，新的船只，使用奴隶取代搬运工的任务。

[74] 柯廷（Curtin）谈到“奴隶的实际价格在18世纪超乎寻常的上升”（1975a，165）。19世纪早期奴隶贸易的废除，由于坚持进行贸易的费用增加，驱动价格甚至更高。见阿盖尔（Argyle）论哥佐（Ghezo）在1818年掌权之后的达荷美（Dahomey）：“大量运奴船仍然来往于惠达（Whydah），为奴隶支付很高的价钱，以致由此而来的财政收入没有减少很多，即使出口的奴隶减少了”（1966，42）。也见利文（Le Veen）：“（不列颠海军的作用）使得新进口到巴西和古巴的奴隶价格上升到没有这种干涉时的两倍”（1974，54）。当然最后当奴隶的需求停止时，“奴隶的价格实际下降了”（曼宁Manning，1981，501），但这也许是晚得多的事。

[75] 见马丁（Martin，1972，113）。确实由于主要是“战争的影响”每年有着波动。[拉姆（Lamb），1976，98]。

[76] 卢安戈海岸（Loango Coast）在1763年到1793年之间达到其高峰。见马丁（Martin，1972，86）。以欧洲来衡量，南特（Nantes）的奴隶贸易在1783~1792年这个时期是“特别重要的”，“超过了——并且是大大地——从1748年到1754年的繁荣的大进发”（迈耶Meyer，1960，122）。因为世界粮市场的扩张，法国政府在18世纪后半期为运奴船提供了奖金和额外的支付，如果这些船在法属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登陆的话。见霍普金斯（Hopkins，19773，91）。诺思拉普（Northrup）说：“奴隶贸易在比夫拉湾（Bight of Biafra）的商业中只是到了18世纪中期才达到了主导地位”（1978，50）。柯廷（Curtin，1969，266）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全面高峰定在1790年代。

[77] 见埃尔提斯（Eltis，1977），曼宁（Manning，1979）和诺思拉普（Northrup，1976）。确实，虽然也许在1790年代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弗林特（Flint）论证说，因为来自巴西、古巴和美利坚合众国的需求，“尽管不列颠人和法国人禁止，（在西非洲）从1807年到大约1830年，奴隶贸易实际上增长了”（1974，392）。

[78] 威廉斯（Williams，1944，132）。但是，见德雷舍尔（Drescher）的批评，他的论证思路是“废奴主义不是追随着反对奴隶制的潮流而来的，而是面对着有利的情况”（1976a，171）。阿希格布（Asiegbu）在另一方面，论证说是“相对于（不列颠的）的竞争者们的巨大劳动力优势的大好前景，使得对种植园主坚持实行了国际性废奴，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西印度群岛（West Indian）在1807年的行动，当时殖民者们参加了母国对废奴法令的起草”（1969，38）。

[79] 威廉斯 (Williams, 1944, 136)。

[80] 见威廉斯 (Williams, 1944, 154~168)。汉考克 (Hancock) 也将它们看作是联系的, 但却是错误的: “但是不列颠人的理想主义的左手几乎不知道它的右手在干什么。随着废除奴隶制取消了糖业的强制劳役, 起了使西印度的糖业暴露在古巴由奴隶种植的糖业的毁灭性攻击之下的效果。古巴对非洲劳力的需求抬高了非法奴隶贸易的利润 (又是这种利润!), 因此引起了西非洲的一次新的高水平出口。合法贸易的萎缩就不足为奇了” (1942, 160)。

[81] 安斯蒂 (Anstey) 对威廉斯 (Williams) 最直接的攻击, 得出的结论却比人们期待的更为谨慎: “而尽管从1833年的角度看经济上的证据似乎有说服力, 但从1807年的角度看则明显是薄弱的, 它仍有待于证实” (1968, 316)。

[82] 安斯蒂 (Anstey, 1974, 24)。见罗宾逊 (Robinson) 批评安斯蒂将他的利润分析局限在那些“十分严格意义上掌握奴隶的人…… (他似乎不) 理解利润可以从商品投机、货币流通、信贷扩张的增值、奴隶炫耀的影响力、任何数量的资本形式 (例如保险) 中获得” (1987, 134~135)。

[83] 托马斯和比恩 (Thomas & Bean, 1974, 912)。托马斯-比恩的文章导致了一系列抨击与辩护的回应: 英尼克里 (Inikori, 1981), 安德森和理查森 (Anderson & Richardson, 1983), 英尼克里 (1983), 安德森和理查森 (1985), 和英尼克里 (1985)。

[84] 见布勒 (Boullé): “也许鲁昂 (Rouen) 的纺织品生产在1763年到1783年间衰落了, 除了印花棉布 (indiennes) (它出口到西非洲以交换奴隶), 不是破产的结果, 而是精心将资本从一个衰落中的领域转移到另一个更有前途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 奴隶贸易可以说使得鲁昂和它的区域向工业革命的方向迈出更大的一步” (1975, 320~321)。维勒斯 (Viles) 指出, “奴隶贸易…… (在法国) 被认为是西印度贸易一个更有收益的变种” (1972, 534)。

[85] 布勒 (Boullé) 指出, 每次航行的高额利润必然为实现利润所花的时间长度的考虑所抑制。使得它们“最初看来与那些从非航海投资中的所得没有显著的差别” (1972, 83)。也见理查森 (Richardson) 所说的, 在经过所有适当的调整之后, 回报率“虽然不特别可观……但是……牢靠和明显合理的” (1975, 305)。

无论怎样, 如达里蒂 (Darity) 所说: “在威廉斯 (Williams) 的理论中, 从奴隶贸易中有利可图或是利润不是本质性的, 但是美洲殖民地没有奴隶制是不能发展的” (1985, 703)。

[86] 这种理论的用语一直清楚地出现在谢里登 (Sheridan) 和托马斯 (Thomas) 的对话中。谢里登认为“已非套在母国脖颈上的磨石, 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就此成为18世纪不列颠经济的一个关键部分…… (它们) 以不小的规模为母国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 (1965, 311) 托马斯回答说: “一个殖民地对整体经济的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是在于从它那里使用资源所获得的, 相对于它们若作另一种最好的选择的话所获得要不同 (正面或负面的) …… (这只能) 说是资源的一种巨大的错位配置处理” (1968b, 31)。谢里登的补充回答是, “托马斯实际上是在推测在事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 而这事件若在其他情况下是本不该发生的” (1968, 60)。对此托马斯

坚持说，除非谢里登“能够显示出，大不列颠的总收益超过了她的花费，并充分地包括了投资到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的资本以另一种最好选择所获得的回报，他就没能抓住他本来要问的问题作回答”（1968b, 47）。为什么使用“大不列颠的总收益”作为评估单位才有意义？企业家们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看来这是合理的。不列颠政府在实际上有比最大限度地扩大大不列颠的总收益更多的目标。最后，在所有这种反事实推论史中，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在事实上没有采用“另一种最好的选择”。

[87] 见格林-佩德森（Green-Pedersen, 1979, 418）。

[88] 关于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不愿意投票通过废奴决议，见昆内（Quinney, 1972）论原种植园主在殖民地委员会（Comité des Colonies）的作用，而雷斯尼克（Resnick, 1972, 561）显示出，甚至对于“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奴隶制仍是……一个非常附带关心的问题”。也见杜布瓦（Dubois）和特里耶（Terrier）（1902, 29）。在1789年，甚至“黑人之友协会”对废奴这种附带的关心，也导致他们被指控为“一个外来势力的工具”（是指英格兰），是要“摧毁”法兰西帝国的类似维持的东西。引自维诺尔斯（Vignols, 1928a, 6）。

[89] “法国殖民体系的崩溃没有结束法国的奴隶贸易，而是尽可能多地调整了它。在技术上，这种贸易在1814~1815年被宣告为非法，但它实际上，继续到19世纪后半期”[斯坦（Stein），1979, 198]。也见达格特（Daget, 1975, 131~132）。

[90] 德巴施（Debbasch, 1961, 315~316）。“废奴（被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达格特（Daget），1971, 57]。在1838年，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写到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Congress of Verona）时评论说：“所有这些30年来一直反对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的建议的托利党人（Tories），（却突然）变成黑人（Negroes）自由的热情拥护者了……这些矛盾的秘密在于私人利益和英格兰的商业精神”。引自埃斯科费尔（Escoffier, 1903, 53~54）。

[91] 罗德尼（Rodney, 1970, 152）。

[92] 蒙罗（Munro, 1976, 48）。也见考奎里-费德罗维奇和蒙涅特（Coquery-Vidrovitch & Moniot, 1974, 297~298）。

[93] 纽伯里（Newbury, 1971, 92）。见他进一步的评论：“19世纪早期西非洲贸易最显著的特点是大宗进口和出口从相当低的基准上的增长。不列颠和法国的贸易统计数字对1850年代之前与非洲的贸易所作的‘官方’评估应当作为过低的评估不予重视；制成品出口的数量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指南”（1972, 82）。

[94] 诺思拉普（Northrup, 1976, 361）。也见曼宁（Manning）：“奴隶商业因为战争和出口奴隶限制了商品交换体系，在另一方面又通过进口制成品和进口货币的流通扩展了商品交换体系”（1982, 12）。但是莱瑟姆（Latham）将他的论证建立在奴隶出口与棕榈油生产可以共生的基础上，其根据是后者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因此，“在闲暇的选择上只有小的变

化”（1978，218）。

[95] 见阿达姆（Adamu，1979，180）和马丁（Martin，1972，118）。

[96] 见曼宁（Manning，1982，13）。见雷诺兹（Reynolds，1973，311）论19世纪初在黄金海岸（Gold Coast）丹麦人（Danish）的种植园中奴隶劳动的使用。

[97] 曼宁（Manning）认为“（在种植园中）得到的经济效益可能更多地靠使奴隶长时间地工作，而不是任何技术上效率的增长”（1982，54）。没关系！经济效益就是经济效益。

[98] 见诺思拉普（Northrup，1978，182）。这当然恰恰是某些人所害的。在1752年贸易部（Board of Trade）拒绝批准非洲贸易商人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Africa）在非洲开始糖业种植，并说：“无法说这会在何处止步。现在靠战争为生的非洲人会变成种植园主”。引自罗利（Rawley，1981，424）。贸易部感到在西非洲比在西印度群岛对糖业种植会更难以控制，因为在西非洲，英国人“只是土地的租佃者，我们是靠当地人的好意持有这些土地的。”

[99] 梅特卡夫（Metcalf，1962，116）。他特别指的是开普海岸（Cape Coast）和周围地区。

[100] 见纽伯里（Newbury，1961，43）。英格兰已经在1817年降低了以前的高关税。

[101] 见施纳佩尔（Schnapper，1961，118~128）。关于法国殖民地部（Ministry of Colonies）在1820年代晚期较早的不成功努力以刺激商品作物的生产，见哈迪（Hardy，1971，215~216，231~249）。在这期间，法国人继续从树胶贸易中挣钱，使用奴隶收集树胶。见查理（Charles，1977，29）和哈迪（Hardy，1921，353~354）。

[102] 克莱因（Martin A.Klein，1968，36~37）。

[103] 克莱因（Klein，1972，424）。克莱因将开始花生生产的时期，在（不列颠属）冈比亚（Gambia）定于1833年，在（法国属）塞内加尔（Senegal）定于1841年。布鲁克斯（Brooks，1975，32）说花生首先于1829年或1830年在冈比亚商业化。

[104] 哈比卜（Habib，1963，56，75）。

[105] 高夫（Gough，1978，32）。

[106] 高夫（Gough，1978，35）。

[107] 贝利（Bayly，1975，499）。

[108] 罗德尼（Rodney，1968，282）。也见约翰逊（Johnson，1976，26）。诺思拉普（Northrup）说：“到19世纪早期，（食品）作物的种植据说在博尼（Bonny）完全停止

了”（1978，89）。这是因为他们完全卷入了奴隶贸易。明显地，他们就必须从某些地方购买食品。他本人指出了为棕榈油地区的以奴隶为基础的食品生产（220页）。

[109] 莱瑟姆（Latham, 1973, 92）。也见戴克（Dike, 1956, 156）进一步使食品作物专业化的是政治。莱瑟姆认为埃菲克（Efik）人的棕榈油商人，“将新（棕榈油）贸易得到的利润投资于奴隶，将他们安置在新发现的农业地区，作为在内部政治中对其主人安全很重要的自给的家仆”（146页）。

[110] 纽伯里（Newbury, 1971, 96）。

[111] 乔杜里（Chaudhuri, 1974, 127）。莫里斯（Morris）认为这不像看来那样：“有一个广为传播的概念，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前工业时期制造业国家。这非常像在18世纪的印度已达到了如晚期中世纪欧洲生产水平的技术。……虽然印度生产优良的纺织品和一些有杰出工艺技巧的例子，我们不要将手工艺的高超错当作生产率，也不要意想这种高超意味着复杂的工具和制造技术的体现，事实上相反而言倒是真实的”（1968，5~6）。

拉伊乔杜里（Ray Chaudhuri）对莫里斯的回答是：“这样一种观点对这个事实是不够公正的，印度是纺织品的主要供应者——不只是精制棉布，还有大众的日常穿着——对于整个东南亚、伊朗、阿拉伯国家和东部非洲等都是这样。……（并且），除了数量不大的奢侈品外……，印度在19世纪之前不进口金属制成产品”（1968，85）。然而，拉伊乔杜里确实承认：“与印度作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国的杰出地位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她的技术与这个时期的其他先进文明相比较显着落后，特别是欧洲和中国”（1982a，291）。他又说，“手工技艺的水平接近于难以置信地可以用来代替复杂的技术和工具的程度”（294页）。

[112] 奈廷格尔（Nightingale, 1970, 223）。

[113] 辛哈（Sinha, 1970, 4）。出口价值从1792~1793年的610万卢比（610 lakh rupees）下降到1819年的140万卢比，再到1823年的30万卢比（3页）。

[114] 乔杜里（Chaudhuri, 1968, 34）。在同时，棉纱进口增加了80%，棉花增长了55%。

[115] 见巴格奇（Bagchi, 1976a, 139~141）。

[116] 斯梅尔瑟（Smelser, 1959, 127, 注脚5）。无论如何，参见曼（Mann）：“这种自动机被宣称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机器，但它没有很快传布开来。到1839年它的利润还没有超过7000英镑”（1958，290）。

[117] 引自辛哈（Sinha, 1970, 11）。辛哈自己的观点是，出口到“欧洲的外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棉布匹的关税也一样地再加上内陆税“可能比便宜的不列颠布匹本身的竞争更迅速而有效地有助于扼杀印度的棉花工业”（7页）。

也应注意到关于丝制品的情况，当对印度向法国出口的禁令在1830年代短暂放开时，不列颠向法国的出口几乎消失了，而印度的出口特别上升了。见12页的图表。

[118] 不列颠议会文件（BPP），委员会的报告（1848b，10）。

[119] 不列颠议会文件（BPP），委员会的报告（1848b，24）。

[120] 伊萨维（Issawi，1966，41）。

[121] 热斯（Genc，1976，260~261）。伊萨维（Issawi，1966，49）将这个转折点定为1815~1820年，考伊曼（Köymen，1971，52）说危机开始于1825年。

[122] 克拉克（Clark，1974）对这些作了详细说明，他对到1850年代的最后崩溃没有较好的解释。他确实顺便提到，根据1838年巴尔塔-利曼（Balta-Limann）英国—土耳其商务协定，要求奥斯曼政府开放一切进出口控制。

[123] 乌比契尼（Ubicini）一本叫《土耳其通信》（*Letters on Turkey*）[伦敦London]，1856，III]的书。再印于伊萨维（Issawi，1966，43）。乌比契尼不只谈到棉花货品，并且谈到钢和武器，还有丝、金钱、鞣制皮革、陶器、马具和各种纺织品。

[124] 法利（Farley，1862，60）。

[125] 伊萨维（Issawi，1961，6）。

[126] 克拉克（Clark，1974，72）。

[127] 斯米连斯卡雅（Smilianskaya），见伊萨维（Issawi，1966，238）。也见谢瓦利埃（Chevalier，1968，209）。

[128] 波尔克（Polk，1963，215）。

[129] 见库塔索夫（Koutaissoff，1951，213）；也见戈德曼（Goldman，1956，20）。

[130] 科钦（Coquin，1978，43，48）。

[131] 波特尔（Portal，1950，307）。美国独立战争加上革命的拿破仑战争对此有某些帮助。波特尔指出：“俄罗斯的金属冶炼生产，在它1750年后的大扩张阶段，是……大部分导向出口的”（373页）。

[132] 引自杜克斯（Dukes，1971，375）。

[133] 见贝科夫（Baykov，1974，9~13）。

[134] 见福尔库斯（Folkus，1972，36~39）炼糖业的第一次繁荣开始于1820年代。

[135] 事实上，印度纺织品早在17世纪就通过欧洲贸易商到达那里。见弗伯（Furber，1965，12）。布勒（Boulle，1975，325）甚至认为西非洲市场是“有着很大重要性的”（de

taille, 极大的), 对于18世纪中期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出口而言。例如在1760年代, 在所有英国出口的布类中, 43%到非洲, 而只有39%到南北美洲。梅特卡夫 (Metcalf) 观察到, 纺织品是比火药武器更有吸引力的进口品, 而这些纺织品“是为大众消费而不是精英们的装饰品” (1987, 385)。

[136] 罗德尼 (Rodney, 1970, 182)。

[137] 诺思拉普 (Northrup, 1978, 149)。

[138] 诺思拉普 (Northrup, 1978, 175)。也见约翰逊 (Johnson, 1978, 263), 柯廷 (Curtin, 1975a, 326), 对塞内冈比亚 (Senegambia) 所定的时期略晚, 在1830年代。

[139] 弗林特 (Flint, 1974, 387)。

[140] “借贷契约”也缩小了直接生产者控制价格的能力, 并使大商人能够稳定其供应市场 [乔杜里 (Chaudhuri), 1978, 143]。

[141] 见弗伯 (Furber, 1951, 290~291)。

[142] 塞迪克 (Siddiqi, 1973, 151)。

[143] 乔杜里 (Chaudhuri) 这种“欧洲人的”概念“尽可能多地模糊了它所显示的东
西” (1974, 259)。也许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发现另一个术语。阿拉萨拉特南 (Arasaratham) 赞同地引用乔杜里的观点, 然而继续承认这种有关一个织工团体的制度的本质之处: “虽然有处理最终产品的自由, 进入市场的限制性质和购买货物近乎垄断的状况存在于许多遥远的织工村庄, 使这种自由不如说是一种空谈” (1980, 259)。

[144] 见拉伊乔杜里 (Raychaudhuri, 1965, 756; 也见1962, 180~181)。

[145] 费希尔 (Fisher, 1978, 115)。在118页, 费希尔衡量了每种制度的缺点: 直接耕作花费更大; 借贷制度更易于引起农民的不满。

[146] 古哈 (Guha, 1972, 18, 28)。

[147] 见理查兹 (Richards, 1981, 61)。国家垄断使用了私家大规模商人对其他产品用过的同样制度: “这全部过程, 从为 (鸦片) 种子准备土地, 到在加尔各答 (Calcutta) 的最后拍卖, 都是基于精密的借贷支付制度” [欧文 (Owen), 1934, 26]。

[148] 不列颠议会文件 (BPP), 委员会报告 (1848a, 21)。

[149] 克拉潘 (Clapham, 1940, 232)。

[150] 见罗瑟蒙德 (Rothermund, 1981, 76)。

[151] 见甘多夫 (Gendev, 1960, 209); 斯托亚诺维奇 (Stoianovitch, 1953, 401), 和布施-赞特纳 (Bursch-Zantner, 1938, 81)。

[152] 斯托亚诺维奇 (Stoianovitch, 1953, 401), “奥地利、萨克森 (Saxony)、普鲁士 (Prussia) 和瑞士新的纺织工厂需要马其顿 (Macedonia) 和塞萨利 (Thessaly) 的羊毛和棉花, 法国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上升的需求使得马其顿的棉花生产在1720年到1800年间增长到3倍” (斯托亚诺维奇, 1960, 263)。也见斯托亚诺维奇 (1976, 184)。

[153] 见甘多夫 (Gendev, 1960, 210~211)。

[154] 见休格 (Suger, 1977, 211~221)。

[155] 麦高恩 (McGowan, 1981a, 79)。麦高恩仍谨慎地说: “奥斯曼帝国农业中目标在于出口的部分……在 (17和18世纪) 这个时期必然只能缓慢地增长” (170页)。并且“一般的巴尔干的契夫特里克 (Chiftlik) 是一个租地经营单位, 在它的特点和规模上更为接近于地主庄园经济 (Grundherrschaft) 所曾见有的发展情况, 而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农场主经济 (Gutsherrshafte) 那种特点” (79页)。然而, 他在对外贸易导向的较大的契夫特里克, 和不那么有这种导向的普通规模者之间作了区分 (见1981b, 62)。

[156] 伊纳尔契克 (Inalcik, 1983, 116)。在西部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正是“高的生产率与高的土地价值……解释了契夫特里克 (Chiftlik) 的小规模” (117页)。由开垦获得土地的权利在奥斯曼帝国的古典时期已经是一个特点, 与被开垦的土地规模没有法律联系。然而这时它被用来创建大的契夫特里克。

[157] 见贝尔 (Baer, 1983, 266~267)。

[158] 重引自伊萨维 (Issawi, 1966, 387)。

[159] 布卢姆 (Blum, 1961, 391~392)。

[160] 见康非诺 (Confino, 1969, 39)。情况特别在北方和中央少黑土 (necernozem) 地带和黑土地北部是这样。

[161] 凯泽维特 (Kizevetter, 1932, 637)。

[162] 关于这种不同, 见康菲诺 (Confino, 1961b, 1066, 注脚2)。向强制劳务制 (barshchina) 转变已经在17世纪中期开始, 但是在18世纪中期扩张, 特别是在少黑土 (necernozem) 地带。这部分是为弥补私人地产上农民百分比的下降, 因为那些在国家或宫廷地产上的农民通常是支付实物货币租 (obrok) 的。

[163] 布卢姆 (Blum, 1961, 289)。这些企业家中有许多是从受迫害的旧教徒 (Old Believers) 中招募的。他们的神学可能完全不是“新教的” (Protestant), 但是迫害的驱使导致了阅读经文的需要, 用钱保卫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秘密写作的需要, 当然所有这些都与训练一个

商人阶级有关。见格申克龙（Gerschenkron, 1970, 35~37）。

[164] 洛夫乔伊和霍根多恩（Lovejoy & Hongendorn, 1979, 232）。霍根多恩进一步提到：“获取奴隶要用来对付知道如何保卫他们自己的民族是一项昂贵的事业。这就是如[托马斯和比恩（Thomas & Bean）所说的]这些鱼会反击”（1980, 480）。松德斯特罗姆（Sundstrom）强化了这同一主题：“非洲外部贸易最令人注意的方面之一，是中间商强有力的地位，经常近于垄断——商业垄断部分建立在河流交通的排他性控制上”（1974, 254~255）。也见但泽（van Dantzig, 1975, 264），他强调奴隶贸易的资本密集性，和由此而来的大规模经营倾向。

[165] 见阿贾伊和奥罗朗提姆辛（Ajayi & Oloruntimehim, 1976, 211）。关于丹麦人（Danish）企图废奴后的种植园，见诺里加德（Noregard, 1966, 172~185），米勒（Miüller）认为，至少在伊格博人（Igbo）人口稠密的地区，棕榈油出口生产开始于一个已经“生产油和其他物品由于交换”的地带（1985, 58）。

[166] 见曼宁（Manning, 1969, 287）。

[167] 见霍普金斯（Hopkins, 1973, 125），奥日（Angé, 1971, 161）。但描述的是南部象牙海岸（Ivory Coast）在19世纪后半期的棕榈油生产，提到了从家族中招募劳动力的困难，结果求助于俘虏劳动力。这当时大约是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较大规模的单位。

[168] 劳（Law, 1977, 572）。

[169] 纽伯里（Newbury, 1969, 74~75）。

[170] 关于这种多层性，见钱伯林（Chamberlin, 1979, 422~423）和纽伯里（Newbury, 1971, 100）。关于中间商（négoclant）与行贩商（traitants）的区别，见哈迪（Hardy, 1921）。一般而言在那时，这种旅行贸易在较低水平上是无规则的，竞争性的和充满斗争的。这三个地区那里不是这样——十字河（Cross River）盆地，[旧卡拉巴尔（Old Calabar）]，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奥波博（Opobo）和达荷美（Dahomey）——恰好是政治集中化和最大的出口生产地区。见钱伯林（Chamberlin, 1979, 434）。

[171] 见哈比卜（Habib, 1969, 434）。

[172] 见斯皮尔（Spear, 1965, II, 47）。他继续说：“将全莫卧儿帝国（Mughal）的所有人都算上，估计有上亿居民，将其一个半世纪的生活水准与当时的欧洲作大略的比较……农民可吃的东西要略多一点，商人花钱的机会要少一些。”

[173] 德赛（Desai, 1972, 61）。这为穆斯维（Moosvi）所支持（1973, 189）。赫斯顿（Heston, 1977）举证据予以反驳，他说他重新计算“确实削弱了（德赛的）论点，即实际工资从阿克巴（Akbar）时代下降了”（394页）。德赛反过来反驳赫斯顿，同样进行了重新计算并得出结论，阿克巴（Akbar）时代比起1960年代，有着“更高的作物产出量”和“依据城镇工资有更

高的购买粮食的能力”（1978，76，77）。

[174] 见辛哈（Sinha, 1962a, II, 217~218）的讨论，他指出有着肥沃的土壤，三个月艰苦的劳动，再加上几个星期的收割时期，足以生产一种稻谷作物来维持这种合理的生活水准。然而，这种劳动量不足以生产为世界市场的商品作物。

孟加拉（Bengal）的形势和由此而来的农民的“懒惰”的观点，确实因1770年“灾难性”的饥荒而强化了，它加剧了劳动力的缺乏，并无疑因此增加了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讨价还价的力量。见乔杜里（Chaudhuri, 1976, 290~292）。

[175] 当然，在莫卧儿（Mughal）统治下就有着地主（Zamindars）制度，但是他们没有行政（guiritary）权，在任何情况下，除了为“钱袋”；他们在农业剥削制度中的角色一直是“次要的”[穆斯维（Moosvi），1977，372]。

[176] 尼尔（Neale, 1962, 69）。

[177] 见巴塔查尔雅（Bhattacharya, 1983, 308），对孟加拉的地主（Zamindars）使用部落的劳动力的论述。乔杜里（Chaudhuri, 1976, 320~323）也描述了招募移民劳动力，包括部落成员和穆斯林。

[178] 古普塔（S.C.Gupta, 1963, 126）。

[179] 见穆克哈吉和弗里根堡（Mukherjee & Frykenberg, 1969, 220）。

[180] 不列颠议会文件（BPP），文件记录（1861，XV）。

[181] 辛哈（Sinha, 1970, 21~22）。

[182] 辛哈（Sinha, 1956, I, 199）。

[183] 见恩布里（Embree, 1962, 105~108）。

[184] 侯赛因（Hossain, 1979, 324, 330）。她说随着时间推移，存在着“生产组织的进一步压榨，和由此促进的等级结构的加强”（345页）。

[185] 阿拉萨拉特南（Arasaratnam, 1980, 271）。

[186] 阿拉萨拉特南（Arasaratnam, 1980, 262）。“这种由英国公司带来的变化倾向是使纺织者成为工资工人”（280页）。

[187] 不列颠议会文件（BPP），委员会报告（1848a, 83）。

[188] 赛拉米丁（Serajuddin, 1978, 320~321）。

[189] 辛格（Singh, 1974, 283）。

[190] 库马尔（1965，75~76）。确实，她说持久性的另一个解释因素是种姓（caste）制度。但这确实解释了奴役在那时增强，而没有解释在没有种姓制的其他地方类似奴役的发生。也许种姓制在这个时期采取了这种形式，后者是这种奴役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种原因。

[191] 见康菲诺（Confino，1963，197）。他谈及了俄罗斯欧洲部分的20个“省”（guberniya）。强制劳役制（Barshchina）从1790年代的50%上升到1850年代的70%。见雅内（Yaney，1973，151）和凯泽维特（Kizevetter，1932，636）。杜克斯（Dukes，1977）认为19世纪早期俄罗斯的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事实上可以与同时期美利坚合众国的奴隶制相比较——在道德上、政治上和经济上。

[192] 康菲诺（Confino，1963，229）。布卢姆（Blum）将这种变化的时间定得比1762年早一点。它开始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时“统治者加强了农奴制的束缚”（1961，277）。强迫劳役制（Barshchina）特别遍布于俄罗斯黑土地地区、白俄罗斯（White Russia）、乌克兰（Ukraine）、伏尔加河（Volga）地区和东部大草原。世纪末标志着“农奴经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那时，“它消耗了农奴劳动时间的主要部分（也就是一星期五到六天），留给他微不足道部分的时间供他维持自己的生存”〔（利亚什琴柯（Lyashchenko），1970，277，314）〕。

[193] 卡汉（Kahan，1966，46）。

[194] 卡汉（Kahan，1966，54）。关于农奴负担的下降，卡汉认为是从1730年代到1790年代。朗沃思（Longworth）认为，甚至在这个时期，只以免役租和人头税为根据来统计的这幅图景也是“不令人满意的”，“这没有算进去劳役、间接税、土地资源、盗用公款，也没有算上累积拖欠的人头税的影响”（1975b，68，注脚14）。即使如此，卡汉的论点仍然站得住脚。免役租和人头税是在下降。但正是这导致了一场反击：“到1760年代地主们感到他们是处于环境的困境之中：粮食的价格和生活的费用上涨了，而财产收入相对于购买力却保持停滞或下降。他们相信解决所处困境的办法在于有更多可利用的粮食，不管是低价购买，或是可以以更大利润可供在农业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他们相信增加收入的一条途径是迫使农民留在乡间，并比起从事其他职业来更宁愿耕作土地”〔里夫（Reaff）1971a，97〕。

[195] 见康菲诺（Confino，1961b，1079，1094~1095）。

[196] 拉兰（Laran，1966，120）。

[197] 见布卢姆（Blum，1961，343）中肯的批评。

[198] 见卡汉（Kahan，1966，50）。

[199] 见康菲诺（Confino，1963，21~22）。

[200] 雷夫（Raeff，1971b，168）。

[201] 勒东尼（Le Donne, 1982, 164）。

[202] 雅内（Yaney, 1973, 135）。

[203] 见波特尔（Portal, 1950, 131, 注脚1, 及各处, 131~174）。确实工业的起源是在1716年, 当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在遥远的乌拉尔（Urals）建立了工业企业, 因为北方战争切断了他以前的供应者瑞典, 他正与其进行战争。但是政府不久就丧失了兴趣, 存留下来的工业是由少数私人企业家经营的, 著名的有德米多夫（Nikita Demidov）, 见波特尔（Portal, 1950, 26, 34, 52~130）。

[204] 福尔库斯（Falkus, 1972, 25）。

[205] 有技术和无技术人员的比例大约为1 : 3, 或者说每12个专家和20个技术工人, 就有50个学徒和50个“矿中青年人”。见波特尔（Portal, 1950, 258~259）。

[206] 波特尔（Portal, 1950, 44）。

[207] 见波特尔（Portal, 1950, 251~252）。利亚什琴柯（Lyashchenko）指出, 许多制造商由分散的单位组成, 包括由手工业者（Kustars）（或小家庭）在家中以部分时间工作的可能性。

[208] 见库塔索夫（Koutaissoff, 1951, 254）。

[209] 如波特尔（Portal）所说, 这只是“对自由的暂时征服, 一旦逃跑, 一个人对国家的关系就迅速结束了”（1950, 233）。也见布卢姆（Blum, 1961, 311）。

[210] 见波特尔（Portal, 1950, 236~237）。

[211] 茨切尔卡索娃（Tscherkassowa, 1986, 26）。

[212] 这种制度正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即农奴可以用一个代替者取代自己。一种只有在南部乌拉尔（Urals）才能实现的可能性, 在那里自由的巴什基尔（Bushkir）人口中存在着潜在的代替者。见波特尔（Portal, 1950, 272~273）。“农民们同意支付高额的赔偿费以替换出他们, 是他们厌恶在工厂工作的强有力证据”。

[213] 见波特尔（Portal, 1950, 143）。

[214] 见波特尔（Portal, 1950, 143）。直接的因素是农民的状况由于领主权的重新确立（上升）而突然恶化, 由于派遣到工厂的农民的百分比的增长（并且在那里, 领有制的和其他属于农奴者的工资要比作相同任务的契约工人的工资低）; 由于监督管理的加强, 由于食品价格的上涨的合并作用。见波特尔（Portal, 1950, 278~279）和利亚什琴柯（Lyashchenko, 1970, 279~280）。

[215] 见布卢姆 (Blum, 1961, 313) 和波特尔 (Portal, 1950, 337~341)。

[216] 罗德尼 (Rodney, 1967, 18)。关于从家内奴隶制到奴隶贸易,再到商品作物奴隶制在西非洲内部的次序关联,见艾格塞 (Aguessy, 1970, 76) 和梅拉斯索 (Meillassoux, 1971a, 20~21, 63~64)。如艾格塞所主张的,这三个时期不是“完全分离的”(90页)。

[217] 科皮托夫 (Kopytoff, 1979, 65~66)。

[218] 约翰逊 [Johnson, 1976, 38, 注脚31; 参见马丁 (Martin), 1972, 104]。但是见费奇 (Fage), 他主张国内的奴隶制随着国家的发展进行,并“在15世纪欧洲人与西非洲的海上贸易开始之前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1969, 397)。但乌佐伊格维 (Vzoigwe) 主张,由奴隶贸易造成的大规模农奴阶级是新生的。对这类奴隶就所知的程度,在此之前“数量一直是微不足道的”(1973, 205)。洛夫乔伊 (Lovejoy) 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走得更远,他认为晚至17和18世纪,“尽管奴役,奴隶出口,和家内奴隶都在增长,奴隶对于经济和社会至关重要的地区仍是相对有限的……”(1979, 36)。也见曼宁 (Manning): “在19世纪奴隶制的巨大规模在几乎整个大陆是个新近的现象,它不能在时间上向以前推想”(1981, 525~526)。最后,罗德尼 (Rodney) 主张“在上几内亚海岸 (Upper Guinea Coast) 18世纪晚期的形势在数量上和本质上”与家内奴隶制不同 (1975a, 293~294)。

[219] 但泽 (Van Dantzig) 提醒我们,总的来说,人们既用奴隶来生产(这是奴隶抓捕的目的),抓捕奴隶,也出售奴隶。“一旦一个国家成为掠夺性的或从事出卖奴隶,它的未来就确定了”(1975, 267)。一个后果是它的人口增长了——靠繁荣,靠不失去人口作奴隶,也许靠“移民”到一个繁荣地区,并非常可能是靠奴役。出售奴隶并没有“减少过多的人口”(226页),如费奇 (Fage, 1975, 19) 所认为的,出售奴隶地带着作为奴隶贸易结果的稠密人口。也见罗德尼 (Rodney): “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上几内亚海岸 (Upper Guinea Coast), 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最大代理人,曼德人 (Mande) 和富拉人 (Fulas), 是真正后来继续掌握国内奴隶贸易的部落,而它们的社会变得包括了大量剥夺权利的人在强制下劳动”(1966, 434)。

[220] 阿贾伊 (Ajaye, 1965, 253)。但是我认为,“家庭内的”这个形容词是有一些误导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指的是树脂或棕榈油生产这类活动。见卡奇波尔和阿金约格宾 (Catchpole and Akinjogbin, 1984, 53), 他们指出在“出口商品”和这种“家内奴隶制”的高度协调一致性。类似地,在弗里敦 (Freetown) 和巴瑟斯特 (Bathurst), 那里早在成功的压力之下停止了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法伊夫 (Fyfe) 指出,“仍需要一种国内奴隶贸易,以为蔬菜生产的收获提供劳动力。不再跨过大西洋出口直接为欧洲人工作,奴隶们现在在西非洲海岸内出售,间接为欧洲市场工作”(1976, 186)。

克莱因 (Klein) 和洛夫乔伊 (Lovejoy), 在答复我1976年的文章时认为:“我们修正了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的论点,即注意到西非洲奴隶的密集使用。”这显示出“边缘化的过程比沃勒斯坦认为的在18和19世纪推进得更甚。”(1979, 211, 注脚103)。这很好地掌握了这篇文章的要点,除了我要说明,进行的是“合并”而不是“边缘化”。

[221] 见阿格西 (Aguessi, 1970, 89) 的类似观点。

[222] 见莱瑟姆 (Latham, 1971, 604)。

[223] 对于基督教徒而言，借款给非洲人尽管有危险（给予贷款超出了“文明的”政府的文化疆界并首先是其司法疆界），其优点不只是支付的利息，还在于这个事实，借款给予出借者以相对其他购买者的竞争优势。借款的活动是为了确保对债务者的经营进行准垄断，这早在1677年就由王家非洲公司 (Royal African Company) 的冈比亚 (Gambia) 商站所表明了。[柯廷 (Curtin), 1975a, 303]。也见马丁 (Martin, 1972, 103)。

[224] 莱瑟姆 (Latham, 1973, 29)。确实，德雷克 (Drake) 相信，尼日尔河三角洲 (Niger Delta) 有能力维持一个大的内部网络，在埃克帕 (Ekpe) 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它的信贷系统，“它虽然在起源上是传统的，却明显能够用于作为一个收集债务的代理者” (1976, 149)。

[225] 纽伯里 (Newbury, 1971, 97~98; 也见1972, 85)。

[226] 斯托亚诺维奇 (Stoianovitch, 1976, 177)。

[227] 麦高文 (McGowan, 1981a, 72~73)。

[228] 伊萨维 (Issawi, 1966, 236)。

[229] 辛哈 (Sinha, 1956, I, 222)。不列颠人也将开始深入西藏 (Tibet) (在1772~1774年) “以保持到中国的陆路畅通” [海厄姆 (Hyam), 1967, 124]。因为廓尔喀人 (Gwrkhas) 威胁要关闭它，这是必须的。见马歇尔 (Marshall, 1964a, 17)。

[230] 钟 (Chung, 1974, 412)。

[231] “这使 (不列颠的) 有野心的制造商们恼怒，他们看到印度和中国的货物大规模地进口到伦敦并有着相应的出口，谴责完全集中在东印度大厦 (East India House) 的门口” [哈洛 (Harlow), 1964, II, 489]。这是许多人所争论的问题，即公司的垄断性活动限制了私家贸易商扩大贸易网络。

[232] “到1789年任何数量的原棉都停止从古吉拉特 (Gujarat) 向孟加拉 (Bengal) 出口了，但它转而大宗出口到中国。这种贸易的大量增长大约从1784年开始，当时庇特 (Pitt) 的减免法案 (Commutation Act) (关于茶叶关税) 使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增加了在广州 (Canton) 购买茶叶” [奈廷格尔 (Nightingale), 1970, 23]。也见穆伊和穆伊 (Mui & Mui, 1963, 264)。

[233] 辛哈 (Sinha, 1956, II, 222) 将白银停止向中国出口定在1790年代的某个时候，而格林伯格 (Greenberg, 1951, 10) 将1804年作为结束时期。马歇尔 (Marshall) 说“到18世纪末，印度 (与不列颠的) 贸易的增长，不考虑到广州 (Canton) 创造的需求和机会， (就变得) 不可解释了” (1964a, 16)。

[234] 见格林伯格 (Greenberg, 1951, 80~81, 82)。

[235] 格林伯格 (Greenberg, 1951, 111)。既然棉花的利润是低而不可靠的,“没有其他商品能够像鸦片那样有利可图,它几乎不需要投资”[钟 (Chung), 1974, 422]。也见辛哈 (Sinha, 1970, 27)。到1821年,鸦片取代茶叶成为这种三角贸易的首要货品 (钟, 1974, 420)。而到1840年,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超过出口棉花的三倍 [费伊 (Fay), 1940, 400], 也见欧文 (Owen, 1934, 62, 及其后)。

[236] 见格林伯格 (Greenberg, 1951, 141, 198~200, 214)。

[237] 梅拉斯索 (Meillassoux, 1971a, 13, 57)。它在1870年代达到高峰,它的价值相等于西非洲海岸在1860年代的棕榈油贸易。见纽伯里 (Newbery, 1966, 245)。

[238] 威尔克斯 (Wilks, 1971, 130)。豪萨 (Hausa) 与海岸的联系可回溯到18世纪初 [科尔文 (Colvin), 1971, 123]。但是它们在19世纪大规模增长。

[239] 见马丁 (Martin, 1976, 2~3)。

[240] 例如,在描述凯约 (Kayor) 和博尔 (Boal) [位于现在的塞内加尔 (Sene-gal) /马里 (Mali)] 的形势时,贝克尔 (Becker) 和马丁 (Martin) 观察到:“资料有力地表述了奴隶贸易和内部的混乱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1975, 272)。他们继续说,“对这些农民反抗进行考察——显示出它主要不是国内政治问题,而是对首领参加大西洋贸易的后果的特有反应。叛乱的目标是结束‘掠夺’和奴隶抓捕”(291~292页,注脚31)。

[241] 沃尔德曼 (Waldman, 1965) 讨论了弗迪奥 (Uthman dan Fodio) 如何将许多动机结合到一起吸引支持,其中只有一个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这个因素霍金 (Hodgin, 1960, 80) 强调过。拉斯特 (Last, 1974, 10) 主张,农民们和商人们“很少卷入”圣战运动 (jihad)。但是,希斯凯特 (Hiskett) 详细解释 (1976, 136~139) 了圣战运动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包括“奴役的暴力进程”,和欧洲人用海岸上的贝壳的流入引起的子安贝 (cowrie) 货币的通货膨胀。

当乌玛尔 (Al Hajj Umar) 运动过去75年之后,奥罗朗提姆辛 (Olorun-timehin, 1974, 351~352) 批评苏里-卡纳尔 (Suret-Canal, 1961, 191~192) 认为阿尔“哈吉”乌玛尔是在反贵族的基础上动员他的追随者的看法,主张是在“宗教因素”的基础上。拉斯特 (Last) 说乌玛尔与法国人的斗争“不是他圣战运动的核心”(1974, 21)。希斯凯特 (Hiskett) 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接受社会论点,但只是在一点上。圣战运动“发生在法国殖民渗透到西非洲的高潮期间,结果它通常表现为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抵抗运动。这样一种解释,虽然不是完全无用的,也是过于简单的”(1976, 155)。

[242] 见洛夫乔伊 (Lovejoy, 1979, 42)。

[243] 坦博 (Tambo, 1976, 204)。他论述索科托 (Sokoto) 的哈里发国 (caliphate) 是那时贝宁和比夫拉海湾 (Bights of Benin and Biafra) 奴隶的主要来源。也见克莱因和洛夫乔伊

(Klein & Lovejoy)：“在森林地区，到19世纪大规模的生产也是常见的。在阿散蒂 (Asante) 的库马西 (Kumasi) 周围可以发现种植园，和成千的奴隶用于金矿……在达荷美 (Dahomey) 和约鲁巴 (Yoruba) 国家，政府同样卷入了在农业和贸易上依靠奴隶劳动的大规模生产……在伊格博土地 (Igboland) 东北部的新农业土地上，洋山芋种植园是常见的。在伊格博国家的中部种植棕榈树，北方边疆就成了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一种类似的模式出现在卡拉巴尔 (Calaber) 邻接的内陆中。” (1979, 197)。

[244] 奥斯汀 (Austen, 1979, 60~61, 图表2·7)，博亨 (Boahen, 1964, 128) 估计妇女奴隶占60%，10岁以下的儿童占10%，并说男人主要用作阉奴。也见姆博科罗 (M'Bokolo, 1980)。

[245] 见洛夫乔伊 (Lovejoy, 1979, 1267~1268, 也见1978)。梅拉斯索 (Meillas-soux) 报告说 (1971b, 184~186) 在大草原地带更西部有类似的现象。

[246] 梅拉斯索 (Meillassoux, 1971a, 74)。

[247] 在沃勒斯坦和卡萨巴 (Wallerstein & Kasaba, 1983, 338~345) 中，这个论题得到详细得多的论述。

[248] 关于贵族 (Ayans) 在提玛尔 (timar) 的作用衰落时的兴起，见苏切斯卡 (Sucéska, 1966)。

[249] 海德 (Heyd, 1970, 355)。

[250] 卡帕特 (Karpát, 1972, 355)。

[251] 见艾比尔 (Abir)：“奥斯曼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权力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迅速衰落……在企图以牺牲中央政府来巩固他们的自治的瓦利 (Valis, 地方总督) 中，埃及的阿里 (Mohamed Ali) 是格外突出的……阿里的扩张得益于奥斯曼帝国中普遍存在的衰弱和不稳定。对他来说不幸的是，这与不列颠人对这个地区兴趣的增长是同时存在的” (1977, 295, 309)。

[252] 斯基奥提斯 (Skotiis, 1971, 219)。贵族们 (Ayans) 现在形成了“对奥斯曼国家最危险的挑战” [耶拉维奇和耶拉维奇 (Jelavich & Jelavich), 1977, 16]。对于在富饶新月地 (Fertile Crescent) 同样的现象，见霍拉尼 (Hourani, 1957, 93~95)。

[253] 布达 (Buda, 1972, 102)。关于在大马士革 (Damascus)，阿勒颇 (Aleppo)，和圣城 (Holy Cities) 的地方政权的类似联合基础 (地主们和商人们)，见霍拉尼 (Hourani, 1968, 52~54)。

[254] 见卡帕特 (Karpát, 1972, 243~256)。

[255] 伯克斯 (Berkes, 1964, 92)。

[256] 布劳德和刘易斯 (Braude & Lewis, 1982, 19)。他们继续说：“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希腊的 (Greek) 的海员和商人团体大规模繁荣起来。奥斯曼的旗帜，在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一些关键年代中是中立标志，给了他们大量商业上的好处；奥斯曼帝国这个时期松弛和高度非集权化的行政管理，使他们有机会经营他们自己的行政，政治甚至军事机构。治理希腊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和豪门大部分是穆斯林。但是他们管理着大部分是希腊人的公国，由希腊人的大臣和代理人服务，甚至使用希腊人军队。马赫穆德二世 (Mahmud II) 恢复奥斯曼中央政府的直接权力的企图，于是就在实际上表现为严重地缩减了希腊人已经享有的自由。”

应当提到马赫穆德二世花了一段时间来推行他的改革计划。由于鲁斯屈克 (Rusccuk) 的贵族 (Ayan)，穆斯塔法帕夏 (Alemdar Mustafa Pasha) 在他1807年攫取权力上起了很大作用，马赫穆德二世事实上是在1808年发布《改革敕令》(Senedi Ittifak) 开始他的统治的，他授予贵族 (Ayans) 们在他们在鲁梅利亚 (Rumelia) 和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的领地以大量的自由，这被卡帕特 (Karpas) 认为是一个“屈辱的让步行动” (1974, 275)。

[257] 见达金 (Dakin, 1973, 56)。

[258] 见托多罗夫 (Todorov, 1965, 181)。

[259] 霍洛维茨 (Hurewitz, 455-456; 1961b, 141)。他说：“奥斯曼人认识到与欧洲建立完全的外交互惠关系是这个欧洲国家体系进入世界体系的过渡的重要步骤。”

[260] 见安德森 (Anderson) (1984, xv)。

[261] 在卡洛维兹 (Karlowitz)，一个威尼斯的参与者鲁西尼 (Carlo Ruzzini) 注意到在奥斯曼人谈判的方式作了特别的改变。他强调他们对“参与者的平等”的接受度，愿意认可方式上的差别，和他们对“沟通规则的考虑”。无论如何，这不是奥斯曼的自我图像。他们想要确定“没有一个同盟国 (Allies) 能够对‘古代’逐字口授的沟通过程提出改变”。

[262] 埃诺契克 (Inalcik, 1971, 1180, 1185)。

[263] 见巴黎斯 (Paris, 1957, 93~101)。但是在1768~1789期间，当法国不再能有效地援助反抗奥斯曼/俄罗斯的攻击，和法国的商业联系就缩减了，且英国也开始以贸易伙伴的身份兴起 (pp.104~106)。

[264] 见哈奇森 (Hodgson) (1974, III, 142)。

[265] 伊沙维 (Issawi) (1982, 262)。即使在农业上，虽然穆斯林人较有支配力 (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在西亚)，粟黍仍是重要的，特别是棉花，它已经变成“农业上最快速增长的区域 (p.263)。”

[266] 海德 (Heyd, 1970, I, 356)。吉卜 (Gibb) 和鲍文 (Bowen) 提出比这时期更早些时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的领导者就已没有低于欧洲的感觉。“只因为两场战争灾难似的经验，其一是由1767年到1774年，另一场由1788到1792年，这就会导出态度的转变 (1950, 19)。”

再加上对凯纳尔贾（Küçük Kaynarca）的军事措施，卡帕（Karpāt）提醒我们它的经济后果：“黑海到俄罗斯的开放，和借由凯纳尔贾和贾西（gassi）在1774和1792年的和平条约，伴随其同一海域的北海岸领地的损失，都剥夺了奥斯曼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黑海已经成为排除奥斯曼贸易的区域，这点弥补了法国和不列颠对地中海商业的支配权（1972，246）。”

[267] 霍洛维茨（Hurewitz，1961a，460）。在1792年，第一位永久大使要被派驻海外，法国是合理的选择。“无论如何，在考虑上，这个举动怕也可能冒犯到其他那些与法国开战并可能因而拒绝接受奥斯曼使者的欧洲国家”（Naff，1963，303）。在伦敦设立使馆之后代之而起的是1794年在维也纳设使馆，1795年在柏林，1796年在巴黎。参见肖（Shaw，1971，187~189，247~248）。外交的互惠措施也包含奥斯曼晚期在其大使出使苏丹时的错误条约。不列颠的大使在1794年报告说：“有别于之前已经传达给王室首领的公使苏丹人的愠怒和轻蔑的自尊表现，我从当朝王子那里受到宽大殷勤的接待，一如我从其他任何欧洲主权那里所能期待的那样。”[记录在贺拉尼（Hourani）的报告，1975，116]。在西欧和中国之间的外交互惠只用于1875年，而1870年与日本，1862年与波斯。“相对的，所有主要的欧洲强权和一些较小的国家，也在18世纪末之前在伊斯坦堡（Istanbal）保有外交任务。”（霍洛维茨，1961b，144~145）。

[268] 肖（Shaw，1971，178~179）。

[269] 在1784年，韦热纳（Verrgennes）指令法国大使舒瓦瑟尔-古菲埃（Comte de Choiseul-Gouffier），提供给土耳其人（Turks）军事使团，帮助他们“革新他们的武器”[罗什（Roche），1985，84~85]。

[270] “波拿巴（Bonaparte）远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奥斯曼帝国政府（the Porte）推向法国的敌人，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就这样波拿巴的轻率赌博以法国在中东的地位和价值为代价，而这是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肖（Shaw），1971，262~263]。

[271] 美利坚合众国也是如此，见厄尔（Earle，1927）。

[272] 见芬德利（Findley，1980，126~140）。芬德利（1972，399~400）却相信塞利姆（Selim）的“短命”革新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关于马赫穆德二世（MahmudII）的贡献，这“也应给予其公正的评价。”见伯克斯（Berkes，1964，92）。

[273] 见耶拉维奇和耶拉维奇（Jelavich & Jelavich，1977，22）。

[274] 通过这么做，他们也排除了奥斯曼人从俄罗斯寻求帮助的任何进一步需要。这样就破坏了1833年的洪克尔/伊斯凯莱西（Hünkâr-Iskelesi）条约，它准许了俄罗斯人的要求，在战争情况下关闭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见普里尔（Puryear，1935，第3章）。

[275] 见普里尔（Puryear，1935，123~125）。

[276] 芬德利（Findley，1980，341），伊那尔契克（Inaljik，1971，1187）谈到它将奥斯曼帝国变为完全开放的市场，这正当欧洲机械化工业为它们的产品寻求销路的时候。在随后十

年，地方工业垮台了。卡帕特（Karpát）谈到（1972，247），它给予不列颠“对于国内制造业无可争辩的竞争优势”，因而导致了奥斯曼国家经济的彻底崩溃。伊萨维（Issawi）提醒我们，建立这种“事实上的自由贸易区”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不列颠政府，特别是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迫切地要让阿里（Muhammed Ali）回到原来的地位。”并且应用于土耳其的这种经济政策接着在1841年用于伊朗（Iran），在1842年用于中国，在1856年用于摩洛哥（Morocco），这就是所谓“自由贸易帝国主义”（1980b，125）。

[277] 见康恰尔（Kancal，1983），但是见库尔姆斯（Kurmus，1983）的质疑。

[278] 见普里尔（Puryear，1935，104~105），他认为：“阿里（Muhammed Ali）是对的；从长期来看，英国——土耳其商务协定对土耳其的伤害比对埃及大。”

[279] 引自考伊曼（Köymen，1971，50）。

[280] 伯克斯（Berkes，1964，137）。也见芬德利（Findley）：“改革者们到1830年代末看来已经相当清楚地掌握了革新性改革所包含的向合理法制秩序运动的程度……（证据是）拉希德（Mastafa Resid）当时将欧洲支持帝国反对阿里（Muhammed Ali）理解为奥斯曼国家‘进入欧洲法权体系’（dans le droit européen）的事件。”（1980，163）。

[281] 法利（Farley，1872，161）。

[282] 见哈比卜（Habib，1963，319~338）。

[283] 钱德拉（Chandra，1972，XIIIV）。

[284] 阿里（Athar Ali，1975，388）。

[285] 古普塔（Gupta，1963，28）。

[286] 乔杜里（K.N.Chaudhuri，1982，395）。当然鲍林（Perlin）十分正确地强调了欧洲人对这些“机会”本身有所作为的程度。“这些在边疆和新近获得的领土上无政府和无秩序状况，激起了不列颠人如此之大的在道德上的愤慨，使最终的军事行动显得合乎正义，造成了他们参加这些侵略运动的结果，无论从长期和短期看都是如此。”（1974，181）。也见沃森（Watson，1978，63~64）。

[287] 斯皮尔（Spear，1965，79）。她继续说：“于是主要的印度武装力量被集中并恢复了平衡，如在古典时代那样，变为少量的高度有训练的步兵。”当然，欧洲的海军力量在印度洋贸易中长期占有优势。葡萄牙人在16世纪用他们优越的海军力量打破了穆斯林的垄断。见博克塞（Boxer，1969，46）和乔杜里（Chaudhuri，1981，230），后者认为“卢济塔尼亚人（Lusitanian）使用了暴力的方法。”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在17世纪解释莫卧儿人（Moghal）不能与英国人进行战争，因为英国人能够在那时“阻断他们与所有东方国家的贸易”，这就会给他们带来饥饿和死亡 [引自伍德德拉夫（Woodruff），1953，73]。普拉卡什

(Prakash) 指出, 荷兰人 (Dutch) 能够强加给印度商人一种“护照”“制度”, (允许在指定港口贸易和免受海岸攻击), 因为“莫卧儿印度几乎完全没有海军力量”(1964, 47)。但是所有这种海军力量都不足以改变印度次大陆的生产或政治结构。

[288] 布特尔 (Butel, 1978b, 102)。

[289] 古普塔 (Das Gupta, 1967, 113)。并且, 铁普 (Tipu) 是绝对正确的。当铁普在 1789 年攻击特拉凡哥尔 (Travencore) 时, 康沃利斯勋爵 (Lord Cornwallis) 曾一直寻求和平并解散了孟买省府 (Bombay Presidency), (也就是放弃了西部印度), 到 1790 年改变了他的立场。“(康沃利斯) 这些相当模糊的想法, 将西印度恢复到迈索尔 (Mysore) 兴起之前的状况, 产生了一种坚定而明确的合并政策”奈廷格尔 (Nightingale, 1970, 58)。

[290] “政治的或帝国主义的冒险在印度会使得在国内的东印度公司感到不快, 由于同样理由在早期开办新工厂也不受欢迎, 它们会使经常性的开支费用增加, 而带不来直接的财政回报”(乔杜里, 1978, 56)。并且, 如罗瑟蒙德 (Rothermond) 所说: “欧洲的工厂介入印度经济内部有着足够的效率, 不需要领土的统治”(1981, 88)。

[291] 哈洛 (Harlow, 1964, 1)。

[292] 这幅图景在事实上更为复杂。沃森 (Watson, 1980a, 81) 区分了五种类型的私家贸易商: 公司的服务人员, 印度—欧洲航船的指挥和海员, 居住在东方的自由商人, 私贩商, 和公司雇用的印度银行家和商人。

[293] 马歇尔 (Marshall, 1975b, 43)。

[294] 见恩布里 (Embree, 1962, 62)。当然, 黑斯廷斯 (Hastings) 派不只在印度, 并且在不列颠有着政治力量。见菲利普斯 (Philips, 1961, 23~24)。

[295] 马歇尔 (Marshall, 1975a, 470)。

[296] 沃森 (Watson, 1980a, 179, 189)。沃森进一步指出, 一种英国人的“国家利益总是体现在”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的商业中。“大量公众在 1708 年之后卷入东印度公司反映了在英格兰这种信念的力量”(361 页)。

[297] 见巴格奇 (Bagchi, 1976c, 248), 甘古利 (Ganguli, 1965) 和阿拉萨拉特南 (Arasaratnam, 1979, 27)。辛哈 (N.K.Sinha) 说: “在 1757 年孟加拉 (Bengal) 的白银储备不只没有得到补充, 而且大多数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了”(1956, 14)。

[298] 凯恩和霍普金斯 (Cain & Hopkins, 1980, 471)

[299] 吕提 (Lüthy) 在叙述印度公司 (Compagnie des Indes) 与法国政府的关系时, 掌握了这种不同: “对法国政治而言, 只代表一种, 当它没有成功或变得过于耗时就可轻易放弃……确实, 从奥地利王位继承 (Austrian Succession) 战争到拿破仑战役, 当这场竞争在很久以前对

法国而言已经失败时，每场新斗争都会见到法国的官方人员、军官和雇佣军首领（condottieri）与印度王公缔结联盟，在印度重新开战。正是这种持续出现的威胁，使英国人的征服不可逆转，使英国人不能听之任之，即使他们有这种希望……对于英格兰，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争才是牵制”（1960，860~861）。也见穆克哈吉（Mukherjee，1955，85）。

[300] 哈洛（Harlow，1964，18）。见博尔顿（Bolton）：“东印度公司的富人们（nabobs）证明像英裔爱尔兰人（Anglo-Irish）和美洲殖民者那样是隶属英国政府的一个大难题。他们希望不列颠纵容他们以一个海外社团掌握主权，他们只有当白厅（Whitehall）的权力在同他们一步步作斗争中扩张时才被控制。”（1966，196）。

[301] 引自哈洛（Harlow，1940，142）。

[302] 在关于《印度法案》的发言中，庇特（Pitt）最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目标：“首先和主要的目的是小心防止政府的野心和致力于征服……商业是我们的目的，并且要进一步予以扩展，和平的制度应当占有优势，并且还要有一种防卫和怀柔的制度。”因此，监督董事会（Board of Control）应当监督董事院（Court of Directors），“在法律能够允许的范围之内在印度进行掠夺的时代完结了”[引自奈廷格尔（Nightingale），1970，8]。

[303] 见辛哈（Sinha，1956，219）。

[304] 斯皮尔（Spear，1965，113）。斯皮尔还加上了两个动机推动进行统治：“更多希望的到来”和既得利益。正如钟（Chung）所说明的：“茶叶给印度的获利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手段，将不列颠在印度的钱转变为不列颠在国内的钱”（1974，416）。

[305] 特里帕塞（Tripathi）称这为“在1793年唯一可能的（态度）”，即是“在不列颠曾进行过的最大战争的前夕”。他又说，“一种新制度完全会使公司的存在濒于危境，而它到那时还有着虚幻的优势”（1956，32~33）。

[306] 见菲利普斯（Philips）：“在1793年与法国战争的爆发在商业世界造成了大动乱……在东方海洋中法国的私掠者从波旁（Bourbon）岛和毛里求斯岛（Mauritius）出发进行军事行动，虏获了更大量印度建造的私人船只，特别是在1803年到1809年间。无疑地，假如印度贸易在1793年对不列颠私人贸易商开放，他们就会遭受惨重的损失”（1961，99）。公司的贸易由护航加以保卫。

[307] 科恩（Cohn，1961，621）。关于居留法（Settlement）的条款，见赖特（Wright，1954，212），他引用会议记录（Minutes）：“为了简化土地持有者对农民（Ryots）或土地耕种者的要求，我们必须从确定政府对前者的要求开始。”古普塔（Gupta）说最重要的目的，除了确保财政收入外，是“促进耕作向巨大绵延的荒地上扩展，并由此促进这个省份的贸易”（1963，72）。

[308] 见特里帕塞（Tripathi，1956，132~136）。这当然被奈廷格尔（Nightingale）称为“私家贸易商的帝国主义”（1970，127）所加强。关于制造商的利益，见奈廷格尔

(Nightingale, 1970, 236~237)。

[309] 弗利肯堡 (Frykenberg, 1965, 24)。

[310] 德希奥 (Dehio, 1962, 94~95; 也见93~107, 各处)。

[311] 见萨姆纳 (Sumner, 1949, 59) 和安德森 (Anderson, 1978, 77~78)。

[312] 卡汉 (Kahan, 1974a, 222)。卡汉认为, 对外贸易扩张最突出的因素之一, (是) 需要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活跃的对外政策的支持, 这造成了几乎没有停顿的战争, 包括与瑞典的北方战争, 和与奥斯曼帝国及波斯的战争, (223页)。这样卡汉就暗示出一个序列: 战争的需要导致赋税增加, 再导致商品作物的增长。但是这些“战争需要”从哪里来呢? 确实北方战争的发动原因包括有某些瑞典人看到彼得企图组合进世界经济, 也许从长远看会牺牲瑞典的担心。见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80, 218~222)。而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战争的目标是确保俄罗斯在这个世界经济中更强大的作用。卡汉指出 (见224~225页), 对这种企图的束缚之一是俄罗斯商人不能在与西欧商人进行贸易时在信用方面与其竞争。后者更易于使用资本市场, 保险费和船运费率更低等等。然而, 在与奥斯曼帝国、波斯和中国进行贸易时, 俄罗斯商人发达起来。俄罗斯以一个典型的半边缘地位出现。见福斯特 (Foust, 1961)。

[313] 见雅尼 (Yaney, 1973, 7), 他详细阐述了在凯瑟琳二世 (Catherine II) 统治下和以后在19世纪继而进行的步骤。

[314] 见雷夫 (Raeff, 1966, 38~47)。这个步骤被认为改变的不只是军队。雷夫认为: “在一个现代化的合理化和官僚化的机构中服务, 教导给贵族这样的思想, 明确的指令环节、等级制的相隶属关系和绝对地服从是好的政府机构的本质性的东西” (49页)。雅尼 (Yaney) 也说: “在军队中俄罗斯的乡绅能够在一个制度化的组织的框架内与俄罗斯农民一道工作” (1973, 61)。

波特尔 (Portal) 总结出这种经验最重要的会议: “(贵族) 将这些军事和政策思想带到领地的管理之中。他强加给农民的是一种监护政策, 使理论上的象征是‘村杜’ (mir) 这种相对自由的机构变形。这种团体选出的领袖变成了领主的代理人” (1963, 10)。

[315] 安德森 (Anderson, 1978, 6)。塞顿-沃森 (Seton-Watson) 对此强调的甚至更为有力: “但是俄罗斯帝国 [彼得 (Peter) 发明的称号] 现在无疑是欧洲的大强国之一” (1967, 10); 也见费多罗夫 (Fedorov, 1979, 137)。

[316] 克拉克拉夫特 (Cracraft, 1980, 544)。

[317] 托克 (Torke, 1971, 457~458)。基普 (Keep, 1972) 批评了托克的观点, 托克作了回答 (1972)。苏联 (Soviet) 学者大多数认为, 在1760年代在俄罗斯“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德鲁泽尼娜 (Druzhinina), 1975, 21a]。也见巴伦 (Baron, 1972, 717) 论重要的1965年文件, 《在俄罗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Perekhod of feodo Lizma K Kapitalismu v Rossii*)。

[318] 见雅尼 (Yaney, 1973, 69)。格里菲思 (Griffiths) 主张, 凯瑟琳 (Catherine) 和她的顾问们理解到, 俄罗斯“在实质上落后于”西欧的先进国家, 并且通过明智的立法人们能够跨越这道鸿沟, 使得这种落后“成为短暂的” (1979, 471)。

[319] 雅尼 (Yaney, 1973, 59)。

[320] 见克伦德宁 (Clendenning, 1979, 145~148, 156)。

[321] 戴克 (Dyck, 1980, 455)。

[322] 马丁利 (Garrett Mattingly) 的这个用语为勒东尼 (Le Donne, 1983, 434) 应用于凯瑟琳 (Catherine) 的政策。公平地说, 凯瑟琳确实投入“大量精力于……鼓励国家的商业航运” [阿斯特罗姆 (Aström), 1983, 156]。

[323] 格申克龙 (Gerschenkron) 将这个时期定为从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开始, 因为其政策“以非常现实的意识增加了农奴制度的有效性” (1970, 91)。

[324] 波特尔 (Portal, 1966, 37)。

[325] 朗沃思 (Longworth, 1975b, 18)。

[326] 见朗沃思 (Longworth, 1969, 26~27, 28)。

[327] 见格申克龙 (Gerschenkron, 1970, 28~29)。

[328] 朗沃思 (Longworth, 1979, 269)。

[329] 麦克米伦 (Macmillan, 1979, 171, 176~177)。

[330] 见西罗特金 (Sirotkin, 1970, 71)。

[331] 戴维森 (Davison, 1976, 464)。

[332] 费希尔 (Fisher, 1970, 137)。

[333] 见多伊诺夫 (Dojnov, 1984, 62~63)。

[334] 英尼克里 (Inikori, 1977, 351)。他指出: “不只是博尼 (Bonny) 贸易地区进口 (在1750~1807年期间) 了比西非洲其他地区绝对要多的枪支, 而且也进口了远比每个奴隶出口所需的多要的枪支” (361页)。

[335] 理查兹 (Richards, 1980, 57)。

[336] 克莱因 (A.Norman Klein, 1968, 211)。

[337] 阿金约格宾 (Akinjogbin, 1967,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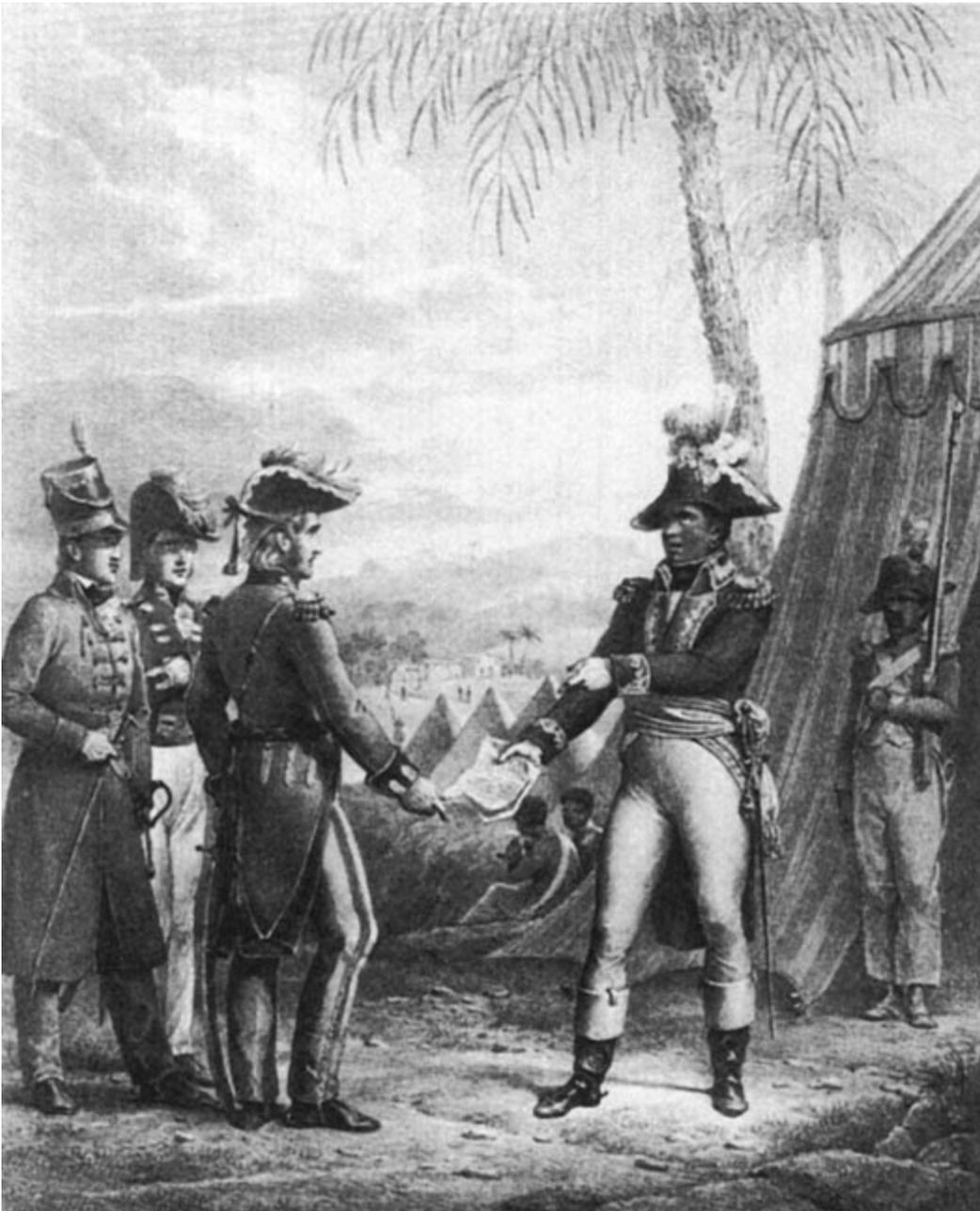
[338] 法因 (Fynn, 1971, 28)。1831年阿散蒂国 (Asantehene) 与麦克莱恩 (George MacLean) [代表开普海岸 (Cape Coast) 商人委员会] 的条约的主要成就, 是要求阿散蒂国“声明联合的 [芳蒂人 (Fanti)] 部落是脱离其控制而独立的” [麦特卡夫 (Metcalf), 1962, 140]。

[339] 奥罗朗提姆辛 (Oloruntimehin, 1971~1972, 34)。

[340] 史蒂文森 (Stevenson), 1968, 190; 参见戴克 (Dike), 1956, 38。但是诺思拉普 (Northrup, 1978, 141~142) 对这种名称有所保留。

[341] “一旦在18世纪曾掌握了这种贸易最大份额的不列颠人决定放弃它, 他们的利益就在于推动其他人同样放弃它” [阿贾伊和奥罗朗提姆辛 (Ajayi & Oloruntimehin, 1976, 207)]。戈雷 (Gorée) 曾经是法国在西非洲主要的贸易基地, 它在1815年之后的时期是如此衰落, 它只能靠将自身转变为一个自由贸易港才能存在下去。见朱卡莱里 (Zuccarelli, 1959)。总而言之, 这种独家经营 (Exclusif), 虽然在1817年虚张声势地恢复了, 但在1868年终被废弃。见施纳佩尔 (Schnapper, 1959, 150~151, 198)。

第四章 南北美洲定居者的非殖民化：1763～1833年



格伦尼尔（Francois Grenier）所画。（1821）

巴黎：国家图书馆，版画部。

法国艺术家和平版印工，大卫（David）的学生圣马丁的格伦尼尔（Francisque-Martin-François Grenier de Saint-Martin, 1793-1867）所画。他专门从事描述历史事件的绘画工作。这幅1821年完成的绘画表现了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将军在把两封信递给1798年在海地统率英国军队的一位将军。这些信指出法国政府特派员要求杜桑抓住英国将军，而杜桑拒绝执行命令，原因是他不能因食言而使自己蒙受耻辱。格伦尼尔说：“这是一个高尚的回绝，”在画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地的图画，铭文是“自由、平等！”（Liberté, Egalité）。

从法律上讲，18世纪中叶，南北美洲一半以上的地域都是由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构成的。这些殖民地主要是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剩下的地域则处于国与国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管辖之外。到19世纪中叶，（当在原有的管理实体中进行了某些组合和分裂之后）这些殖民地实质上已经变成了独立的主权国家。此外，当时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已经宣布在法律上拥有南北美大陆剩下的地域的权利。

很明显，这种对国家间经济体系面貌的重塑是卓越的。南北美洲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是发生在欧洲殖民者的庇护下的。这一举动不仅仅排斥美洲印第安人，而且排斥移居到美洲的非洲人，尽管事实上在很多这类新的主权国家中，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在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是大多数）。可以肯定，海地（Haiti）是个例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个例外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这次“非殖民化”运动与发生在20世纪的第二次伟大的“非殖民

化”运动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则恰恰体现在人口问题上。而人口问题必将决定那些最终成为主权国家的命运。

正确地说，或按传统的说法，非殖民化的故事是从1763年开始的，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a great turning point）。^[1]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的结果，使英国有效地把法国从西半球赶了出去。这一事实本身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完全没有可能试图趁机利用面目一新的扩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没有可能（重新）维护他们对美洲殖民地在经济上的真正控制。但是，英国的这一特别的胜利，实质上在南北美洲第一次提出了大国内部分赃不均的问题。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关于分赃的争论将导致殖民者，先是那些到达北美的英国移民，然后是那些在西班牙属美洲的（Hispanic America）和巴西（Brazil）的移民，寻求建立另外的国家的问题。

1763年英国面临这些问题，在一个重要的外交事件中很好地反映了出来，在导致签署《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英国是否会从法国那获得对加拿大或对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的领土控制权。从讨论一开始，英国不能同时获得两个地区，但是英国可以有所选择的观点就被采纳了。那些要求保留对瓜德罗普岛控制权的不列颠人指出，这个小小的出产糖的岛屿远比荒凉的加拿大富饶得多。得到它将使英国繁荣，而对法国来说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当然，这恰恰是当时生活在英国西印度领域的甘蔗种植者们的担心，因为他把瓜德罗普岛产的糖视为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观点最终很有说服力。^[2]

除了这个绝对的经济论争外，还有一场区域性的政治论争。提出保留瓜德罗普岛的人们指出，保卫加拿大对法国而言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耗费精力的负担，法国的海军在打这样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方面不够强大。但是加拿大对英国北美殖民地人士态度的潜在影响比加拿大对法国在战

略上的影响更重要。1761年5月9日贝德福公爵（Duke of Bedford）在写给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的信中就指出：

我不知道法国的邻居对我们独立于母国的北部殖民地来说，是不是最安全的，我担心当这些殖民地对法国的担心解除之时，它们会对自己的祖国表示怠慢的。^[3]

这一论断非常有远见性。此外，有一位英国殖民者发表了同样的见解：“（殖民地）似乎希望加拿大就是法国，这便使这些殖民地（对英国来讲）是举足轻重的。”^[4]

如果这场关于把加拿大留给法国的地缘政治性的论争没有展开的话，那是因为，除了西印度群岛（West Indians）的甘蔗糖业对伦敦的利益有足够的分量之外，还有英国在领土征服方面的傲慢以及英国对殖民者的漫不经心。这些殖民者的“双重嫉妒”被认为是不断独立于母国的一种保证。但是，毫无疑问，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国家财政的争论：

如果把最小的一块地留给在大陆的法国的话，英国便没必要保留一大批必须保持的常规部队，这将使英国节省一大笔开支。^[5]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英国比法国更具有良好地控制国家财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他们争夺霸权最后一场争斗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这一论断可能和其他论断一样也具有远见性。

长期以来英国面临的问题一直是如何在自己的边疆内以及在国际关系范畴内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至于产生公众财政负担过重的不良后果。七年战争使这个问题更加恶化。^[6]沃尔波尔（Walpole）根据对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广泛一致的意见”而提出了“膨胀的极权政府（Leviathan of government）”的论断。这个膨胀的极权政府

由于它腐败、善于讨好和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臃肿不堪而受到攻击。^[7]“巴黎条约”签署后在世界上表现的新的实力关系（*rapport de force*）更使英国在两方面获利：由于法国的逐步衰亡而降低了军费开支；有可能把他宗主国国土以外征收的部分税收转嫁给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

但是，这些英国殖民者认为，巴黎条约具有一种几乎相反的含义。他们现在从对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他们因而可以为“向西扩张……而带来的权利和财富的大幅度增长”这一前景贡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8]因此，在英国本土居民和在北美的移民“闭口不谈他们取得的胜利”^[9]的同时，他们从胜利中看到了相反的前景。英国人预见到一个帝国存在的“合理性”，因此试图“加强管制”。另一方面，移民们都期待着“放松强制”。^[10]建立“一个更加高度控制的……帝国组织”^[11]的那种需要对英国人来说仅仅是确保他们的成功的一个合理目标，而在殖民者们看来却是对帝国中现存的道德规范的根本性攻击。^[12]尽管他们不会脱离大英帝国，但是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

大量关于在英属北美发生的革命的历史书籍都着重于解释革命前长期的经济、社会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向——各类史学家们说——这些趋向在1765至1776年间发生的事件中达到高峰，这些趋向因而使我们能够描绘出“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的真正特征是什么。史学家们讲的大部分是正确的，正如他们解释的那样，对于美国革命的大部分论断是相对正确的。一切主要的政治事件都有长期的根源，尽管这些根源常常容易在回顾时（*ex post facto*）比当时更易辨明。但是这些长期的发展趋势不可能只能导致一种事实上真正发生了的特殊的（甚至被广泛地下了定义的）后果。但这并不是说那种后果在逻辑上看是来偶然的。当我们越来越强调特殊的后果时，我们宁可在计算过程中把越来越多的特殊因素包括在内，而这些因素很多无疑是关联性的^[13]而不是结构性的。

最重要的关联性的整体变化要算是18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重新扩张，以及英国有能力在与法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取胜。但是关联性趋势对英属北美的形势更为独特。1720年以来，英属北美总体的经济状况一开始时便逐渐有所改善，而在1745年以后，发展更为迅速。^[14]当然，扩张并不意味着均衡分配。一方面，这种扩张导致了在殖民地发生了“财富突然集中在部分人手中”，^[15]这对殖民地社会变得“不那么有凝聚力，与此同时变得更加僵化”^[16]的这一明显的矛盾进行了简单的解释。另一方面，这种经济扩张也使英国和殖民地私有贸易利益的敌对情绪尖锐化。英国资本扮演的角色甚至不断地伤害了殖民地比较富有的商人和种植园主。英国公司的“代理”取代了殖民地商人们的位置。在半个世纪过程中，“边际利润减少了，地区发展的可能性也没有了”。^[17]

在这一时期殖民地商人遇到的困难日益增长，这使我们考虑“长期困扰的严峻问题”^[18]的说法，即《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强加给北美殖民地人的负担有多重的问题。对后来研究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学家们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长期困扰的严峻问题，但对当时的殖民地人民来说是个长期困扰的严峻问题吗？格林（Greene）认为，“殖民地”依从英国为其颁布的商业条款的“程度”说明，殖民地人民要有对这一条款“高程度的适应力”才行。听上去这一论点似乎很合乎情理，前提是我们认为要有高度的适应力才行。他还说，谈到繁荣的程度，很多人在保持他们与英国的关系问题上具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这种关于保持高度繁荣的说法又是一个似乎很合乎情理的假设。^[19]自从哈伯（Lawrence Harper）第一个提供数据以来，如同很多这类辩论一样，假设的商业条款的“负担”一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关数量的辩论，这是一个关于计算什么以及多少数量就是太多了的问题。哈伯最初的结论是：即使商业法是由一个制衡平等的政府“非常公正地”发布的，但是这些决定是以遥远的英国作出的，而“殖民地却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20]除了后来围绕哈伯提供数据的价值量而展开的尖刻的辩论外，很大部分的讨论是集中在计算方面，也就是计算如果殖民地独立提前发生了的话，是否会有什么

不同的结果。这也就是所谓的反事实假设。

这种反事实的假设文字是由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于1965年提出的，而且直至今日仍在引用。托马斯认为，商业法带来的“最大负担可能仅仅是国家收入的1%强一点”^[21]因此并不重要。普莱斯（Price）认为，托马斯提供的低数据甚至也是夸大其辞，因为有意义的生活单位是一个公司，而不是一笔交易。公司考虑一笔单独的交易的销售价之外更多的成分。公司考虑普莱斯称之为“全面交易”的平衡（比如计算赊欠成本）这类事情。因此，即使在没有商业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为固守传统的贸易中心而寻找“合理的商业理由”。^[22]普赖斯的论点试图进一步削弱哈伯的论点，但事实上，他的论点却进一步证实了哈伯的论点。他提醒我们（特别是史诗式作家cliometricians），计算真正经济利润应放在更广泛的范围的地域和更长的时间之内。^[23]

兰塞姆（Ransom）继续指出，把北美经济聚集在一起计算很可能掩盖了《航海条例》给不同地区带来的不同后果，而且它对南美国家的出口带来的影响非常坏。^[24]托马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赞同这一观点，并且承认这种论断很可能证明以“经济方式解释”美国革命的起因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经济上的悬殊很可能导致产生一个“激昂的少数派”，这些人会对这种政治结局提出挑战。他甚至提出，当时很多事件，比如反对《货币条例》和《印花税条例》的人的举动都对这种解释提供了凭证。^[25]那么这很可能就是要害之处。正如布罗茨（Broeze）对这一辩论所作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在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可能提供计算真正经济增长的方法（布罗茨本人对这种做法根本不持敌意）的同时，它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如同人们感到的“负担”这类“主观意向”的问题。历史学家们对行为者情绪的假设“只能通过当事人所写的和所做的了解到并加以理解”。^[26]《航海条例》的真正代价这一主题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使人极烦恼”的东西，^[27]但是集体行为的动力这一主题却永远是个中心议题。

我们现在来讨论1760年代经济局势的问题以及美洲人是如何看待的。七年战争结束后带来的是一场战后经济衰退，^[28]这是紧随七年战争的“前所未有的繁荣”^[29]之后而发生的。这场经济衰退对几乎北美经济的各个方面——商人、种植园主、小农以及奴隶们，都带来了消极影响。

施莱辛格（Schlesinger）在他关于北美商人的经典研究中从这样一个前提入手进行分析，即《巴黎和约》签署之前的一个世纪，是北美商人的“黄金时代”。^[30]因此，当英国企图重新组织帝国和“使殖民地处于一个更为附属的地位”^[31]时，便在“实质上拖延了”战后正常的经济衰退和重整经济的发生。这样做便给予商人阶级“进行清醒思考的养料。”^[32]商人们比任何人对“1763年以后新的游戏规则”^[33]都感到奇怪和愤愤不平。在自我保护方面，他们转向以不进口英国货物来进行解脱。^[34]

与此同时，南部种植园主们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对苏格兰代理人（Scots）负有债务。1762年，信用贷款暴跌，这使得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受到冲击。^[35]殖民地政府一直以称为“现金信贷”制的方式为他们现金支出筹措资金，这种制度包括为预期要偿还的税款发行纸币。^[36]这一行动过程的扩大，使英国商人关心起债务证券的问题并导致在1764年《现金法案》（Currency Act）的通过。1767年的《现金法案》提出一种妥协的办法，即纸币对于公共债务来说将继续是合法货币，而对私人债务来说，再也没用了。殖民地种植园主是这方面蒙受损失的主要人物，他们因而“求助于政治”。^[37]继1762年危机后在1772年发生了更严重的一场危机。在普遍存在的种植园主与殖民地人民紧张关系的前提之下，《现金法案》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它“持续不断地暗示”，^[38]殖民地依附于帝国政府在经济上首先损害殖民地人民的做法。

当时总的形势使小农和有权势的种植园主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正

是在那个时期，较大的种植园主们正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英国政府挑战，而小农们却在本地地区采取行动。这些区域性行动的作用是向本地权势们控制的“州级行政机构的权力进行挑战并削弱它们。”^[39]在小农们参与政治煽动活动的同时，他们在一些地方使“爱国的行为”^[40]激进化，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又反对爱国行为。^[41]很明显，小农们至少如同关心反对英国的斗争一样关心反对种植园主的斗争。

城市的穷人们最终也骚动起来。1763年以后，在都市里，特别是在波士顿，“经济不平等迅速地增长”。^[42]1765至1775年间，波士顿“这个主要城市繁荣程度最低”。因此，在那些年代中，波士顿是“最激进的城市”这一点不是偶然的。^[43]纳什（Nash）认为，“大部分社会力量”正是由于这些不满“才认识到革命很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44]

但是，对于英国来讲，1763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比经济衰退更为重要。它标志着法国和英国争夺霸权的第二阶段的结束。但是，在英国于1763年原则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在1763至1815年间，在法国不再争夺这一问题之前，还要有一场最后的争夺。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试图把英国最后的胜利置于重新制订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环境中（逻辑上的A阶段）。我们估计这个阶段大约从1730年代到（传统的）1817年。

正如我们已经从17世纪（第二卷，第二章）荷兰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霸权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霸权国家并不惧怕来自其他核心国家经济方面的竞争。因此，它倾向于满足最大程度开放的世界经济。这一政策就是一些历史学家们称之为非正规帝国（也就是非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甚至是反对殖民的帝国主义）采取的政策。在英帝国机构的特殊形式下，这正是哈洛（V.Harlow）取名为建立“第二个”英帝国的结构的基础。哈洛认为，在1763年，《巴黎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在海上进行持续性地掠夺”，这些举动最初是出现在都铎（Tudor）统治时期。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一连串贸易港口和海军基地的基础上，创造一个贯

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商业交换网络”，但是这个网络不是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上的。印度在这一模式中是个例外，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头号”英帝国的“旧的”殖民地在何处符合这个架构呢？这些“旧的”殖民地主要是在南北美洲。正如哈洛讲的那样，在18世纪后半叶，由于同美国殖民者的争吵变得激烈了，“英格兰激进的经济学家们鼓吹一个令人吃惊的主张，就是希望政治分离是尽善尽美的。”^[45]但是这种观点在政治决策者中是否很普遍呢？我们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实如此，特别是在政治分离进程的开始。也许一个小小的事件可以证明这一观点是构成伯克（E.Burke）关于美国革命论断的基础。^[46]但是，总的来讲，政治家们很少是大胆、有远见卓识的发明家。大多数资本家也一样。当时的投资者们没有表现出“注意到”在大陆贸易帝国和西半球殖民地制度之间“进行选择的需要”。相反，他们在那些“有可能获得利润的地方”投资。^[47]

但是，问题不是在远见上。结构性变化，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将会缓慢的，但决定性地改变态度和政策。造成美洲殖民者们烦躁不安的原因很多。但是英国政府在做出反应时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下，即它在世界经济中势力的扩大迫使它考虑比以前更为广泛的利益。这就造成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歇尔（P.Marshall）所说的那样，“困境是灾难的前提”，^[48]或者那些在一开始看起来至少像是灾难的情况。

第一个困境是在政治上寻找解决办法方面陷入的困境。这种解决办法可以使在远方的白人殖民者当时开始提出的要求符合在英国本土保持内部政治平衡的需要。我们在前面讨论过1688至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是大英帝国的英格兰政治势力之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也是在1707年通过《联合法案》（Act of Union）后，政治势力间意见统一的基础。^[49]传统上只为贵族服务的上议会在宪法中的权力是至

高无上的，这就是，妥协在机构上的关键所在。上议会起的这种作用在而后的几世纪中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白人殖民者提出分散立法权力的任何要求不仅对英国对殖民地的集中控制是个威胁，而且对英国本土在宪法方面的妥协也是个威胁。“由于1707年增加了苏格兰和在沃尔波尔（Walpole）和乔治三世（George III）统治下议会的腐败”^[50]这种妥协已经受到了指责。用纳米尔（Namier）的话来说要求国王在英国议会外实行任何一种权利，看起来“是危险的并且对君权是不符合宪法的变异。”^[51]这个君权就是贵族的君权。

对于英国来说，考虑建立19世纪和20世纪那种英联邦体制为时过早，更接受不了。具体地讲就是因为英国的贵族在英国本土太强大了。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当时正在进入一个“利益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希望议会在行使权力方面对多种院外压力集团作出反应，而在北美的殖民者们比很多具有竞争力的势力的影响要小。“北美洲的政治影响是无法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相匹敌的。”^[52]

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者角度看，这确实是个问题。1763年以后英国政府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在1758年时与俄亥俄河谷（Ohio Valley）印第安人签订的一项条约。这个条约提出的条件是，如果印第安人叛离法国人，他们将会“安全地待在他们的土地上。”^[53]1763年10月7日，英国发布了一项声明，规定俄亥俄河谷将作为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而保存下来，因此不许往那里移民。但是在此前20年间，殖民人口数量的大量增加是基于“有不少便宜的土地”^[54]的前提下的。“禁止西移界线”（proclamation line）的确立，看起来关闭了移民的大门。

为什么英国要制造出一条禁止西移界线？是的，他们已同印第安人签订了条约，但条约本身很难对划定界线这一行为做出解释。英国战胜法国的结果是两批急于开辟这一领域的人们打开了通往“西北部”的大门。这两批人中首当其冲的是从前被法国人赶走的新英格兰皮货商。随

后而来的是具有潜力的定居者和土地投机商。新来的皮货商人给印第安人带来立即的“苛刻”待遇^[55]以及印第安人对《巴黎条约》^[56]的全面性的恐惧导致了一场大的起义。这就是庞蒂亚克阴谋（Conspiracy of Pontiac）。参与这一行动的有由各个印第安群体组成的一个重要军事组织。这场暴动被一场“灭绝性的战争”^[57]镇压下去了，但是英国人从中很快吸收了教训。

皇家敕令（Royal Proclamation）瓜分了新法兰西（New France）。它在北部成立了一个称为魁北克（Quebec）的新政府，但是把原隶属于魁北克的拉布拉多半岛（Labrado）和安蒂卡斯蒂（Anticosti）划归纽芬兰（New-foundland）了。但是，“皇家敕令”把阿勒根尼以西的所有地区都变成由一个印第安人行政机构（Indian Service）保护的保留地了。^[58]英国商人很快接替了法国人在蒙特利尔（Montreal）的角色，在十年内发展起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具有法国统治时期不少组织所具有的相同的特征。”^[59]的确，随着英国的实践不断发展，事实上皮货贸易已成为“一种需要给予贴补的工业。”^[60]因为印第安人当时从两个渠道得到日常用品：他们用皮货付款，从商人那购买东西；并由英国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一定的物品。

因此，这个敕令使英国和他们在北美的移民者之间“长期的利益分歧”更为突出。英国人企图“号召人们停止向西部扩张它的殖民地”，并且用跨阿帕拉契亚山脉这一地区作为通过同可靠的土著人进行和平贸易进行榨取的一种方式。这项政策是“出自贸易原因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而制订的。

与此同时，英国采取行动，迫使北美的殖民者们开始为帝国的开销付款，并且大大加强了对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的规定。这便导致了整整十年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殖民地的反对力量使英国政府事实上不断地改变以往的主张——比如：征税，然后废除“印花税条例”；征税，然后

废除汤生（Townsend）税法——这样做常常伴有英国企图推行新的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变得更有“原则性”或更有思想。1766年，当议会废除了“印花税条例”时，议员们同时通过了“宣告条例”，声明英国对殖民地征税的绝对权。在十年间，那些反对特别条例的殖民地人转为否定英国议会这一绝对权力——“没代表权就不付税。”

这犹如一种冲突的升级，或分贝的升高。“十年的论争根本没有解决一件单一的基本问题。”^[61]但是回想起来，这些问题本身看起来不都是难以驾驭的，也不全是新问题。诺伦伯格（Knollenberg）说：“这些问题是从1759年开始有的。^[62]格林^[63]（Greene）认为是从1748年就开始了。在没有明显的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整个论争原本可以化解为一场暂时的风波。”^[64]

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中贝林（B.Bailyn）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殖民地人民关心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问题。贝林把它称为权力与自由之间的一场斗争。^[65]这一观点认为，

不符合宪法原则的赋税，对职位的侵犯，司法部门的削弱，冗员杂多，威尔克斯党人（Wilks），常备军队——这些都是权力对自由任意践踏的主要证据。^[66]

他说，《茶叶条例》（*Tea Act*）对殖民地人们恰恰是个转折点。“在更根本的经济问题上”他们的愤怒不可能“仅仅像商店橱窗一样轻易地消失。”^[67]

但是当贝林转而在另一个方向进攻时，他逐渐地削弱了自己证明意识形态是主要的动力的事例。贝林在反对那些同意美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取得推翻一个“旧政体”的斗争胜利的观点的人们时，他希望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事实上这场伟大革命的目标是

争取“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而这一平等地位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早已开始实行了。他争辩说，在实际中如此。但他也承认，在理论上并不是这样。“很多人感到这些变化……代表了不正常；一言以蔽之，这些变化缺乏合法性。”这一方面代表了“在思维习性和信念之间的分歧”。他说，这种习性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贵族习性”，即认为殖民地人民“给予出身贵族家庭的人实行公共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的分歧是“经验和行为间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美国革命；而“这种提升到有意识和高道德目的的捐赠，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令人费解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变化……便是美国革命。”^[68]

但是贝林的观点是不能两全其美的。如果促使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的动力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其他方面的，他们不可能对这些动力毫无意识；他们不可能仅仅受到“处于萌芽状态的、令人费解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变化”的驱使。^[69]正如施莱辛格（A.Schlesinger）讲的，首先，那种认为革命是“一场就绝对的政府权力问题而展开的有争议的争论”的观点“是没有经过细致研究的”。那种观点认为，出于极简单的理由，意识形态方面的例子从来没有被经常不断地提出来过：

至多，考虑到反对议会党从一种战略地位退却到另一种战略地位，因而对其政治主张进行曝光。在放弃了他们的自由是建立在契约权利之上的观点之后，他们诉诸他们身为英国人的宪法权利；当得不到这种地位时，他们就援引人权原则。^[70]

当然，殖民地人民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从一个观点跳到另一个观点。在严肃的政治争论中，我们都企图使用现成的论点进行辩论，而且有时我们毫无疑问地开始热情地相信这些论点的效力。过后我们喜欢这样去思考，即我们平时的感受和最终的感受永远是一样的。但是对一位分析家而言，意识到意识形态地位的一种推论的（a posteriori）边际效益以外的事是值得商榷的。事实是，只要殖民地人们继续享有“帝国实质性

的好处”，他们是不会造反的。但是当“七年战争的结局彻底改变了形势，”^[71]他们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更耐心些呢？克里斯蒂（Christie）和拉巴雷伊（Labaree）认为，他们对“英帝国确立的惯例”的担心“似乎映出对当时人口发展趋势的应用的一种奇怪的盲目性。”他们主观地认为，如果他们再等上不到两代人的时间，殖民者们很可能“会处于物质上优势的地位同大英帝国进行斗争。”^[72]但是，“奇怪的盲目性”是一个分析家的傲慢看法。为什么不能寻求一个较简单的解释呢？反对1765年的《印花税条例》和1767年的汤生税法（Townsend duties）首先会与他们直接的财政影响有关，受到这种影响直接的就是税收，间接的就是对贸易平衡的动产的影响。殖民地人民和他们在英国的朋友们都担心这种反对作法是正在“杀死一只会孵金蛋的鹅。”^[73]正如处理绝大多数经济危机那样，消极的因素增加了。例如，自1764年起英国农业的连续歉收导致了从北美中部殖民地进口粮食的需求的增加。毫无疑问，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城里失业率高，贫困率高，英属北美殖民地随之而来的粮食价格的激增，引发了禁止粮食出口的要求。^[74]这种不满情绪的增长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一点火星就足以把双方推到动武的境地。我们已经回顾了为什么当英国殖民者越来越愤怒时，英国人却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灵活的原因所在。那些散布独立要求的“激进”人士看来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在这种气氛下，英国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但又是明智的政策，这就是《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这个条令于1774年6月22日生效成为一省的宪法。

《魁北克法案》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魁北克政府以什么方式组成的问题。这是一个牵扯到老的讲法语的（和天主教）移民与新的讲英语的基督教移民间的冲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魁北克边境延伸到包括俄亥俄谷在内的区域。这牵扯到从事皮毛货商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殖民地人民控制俄亥俄谷的问题。^[75]

自从大英帝国入侵后，在魁北克的讲英语的基督教殖民者试图建立一个自治的地方政府，而这个自治政府把讲法语的“罗马天主教徒”排除在外。在一个讲法语殖民者反对的压力下，英国政府，特别是在卡拉顿（Carleton）总督时期，一直拒绝英国殖民者的这些要求。辩论是从1764年开始的。英国政府的行政官员最后促使不情愿的乔治三世答应讲法语殖民者的基本要求：天主教徒可以有在宽松地解释为“至高无上的”英国教会领地内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重新制订法国的（罗马—荷兰的）民法；允许天主教会收什一税；解除公务服务人员进行反对天主教宣誓的要求。^[76]

与此同时，俄亥俄谷成为魁北克领土的一部分。这对于魁北克讲法语的农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益可言。但是对皮货贸易商来讲，却意义重大。当然，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为什么1763年建立的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没实现？尼特比（Neatby）说，皮货贸易的非常成功，皮货贸易扩大带来的“与印第安人的复杂关系”，造成了对某些直接性条款的需要。可以在蒙特利尔或阿尔巴尼两个皮毛贸易入口港中作选择。如果作出选择的话，“毫无疑问会选中魁北克”。但对于争夺土地的人们来说，当时的形势变得甚至更为“难以忍受”，^[77]更不用提及对住在阿尔巴尼的皮货商们的排斥了。^[78]

这一决定使沿海岸线的殖民地在很多方面极为恼火。首先，“七年战争的结果（看上去）造成很多损失，害怕被来自北部和西部的印第安人和法国殖民者包围的恐惧感很容易便复苏了。”^[79]其次，殖民者们“害怕在他们身边组成一个绝对主义的政府，以及他们认为是不可容忍的，与宗教法庭有关的天主教教会。”^[80]再次，他们感到特别沮丧，因为管理俄亥俄谷的法律条款是如此“非英国化的一种土地所有权形式。”^[81]最后，《魁北克法案》是与《不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一起通过的，因此，“受到这个伙伴契约的感染”。殖民地人民因此把《魁北克法案》看作是老的北部殖民地自然地，如果是非不分，对沿海殖民地人民

在制度方面重新设的一种威胁。这一次是英国达到目的了。^[82]

在费城（Philadelphia）出席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的代表们因此而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何为实现他们的目标把魁北克争取过去，同时又反对《魁北克法案》。决定是，大陆会议推动一个“微妙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强调税收问题，并且争辩说《魁北克法案》只是教士和庄园主组成的一个联盟取得的胜利。^[83]这在讲法语的普通农民中也有共鸣。^[84]

至于商人，尽管大陆会议“愿意为赢得加拿大的商人阶层而尽可能地让步，”^[85]但后者的反应非常谨慎。一方面，他们对剥夺了他们享有的英国民事法和贸易法 [以及可以由大陪审团提审和享有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 而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他们与新英格兰的商人们直接竞争。^[86]

1774年9月，大陆会议向“加拿大人民发出一个信息”，强调《魁北克法案》条款中没包括有关民主政府的内容，同时引证孟德斯鸠（Montesquieu）关于广泛自由的论述和赞美瑞士实行由基督新教和天主教联合管辖行政区的典范。他们甚至把这些信息印成法文，广泛散发了2000册。^[87]但是，他们同时发了一份《致大英帝国书》（*Address to Great Britain*），反对《魁北克法案》。在《致大英帝国书》中他们谈到天主教徒把血带到了英格兰。这些天主教徒是邪恶的和偏执的。卡拉顿总督（Governor Carleton）把这封《致大英帝国书》拿到不愿讲双语的魁北克散发。^[88]但是，当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在1775年夏侵占了魁北克省时，很多讲法语的农民不顾与英国结盟的商人们的威胁，不顾他们拒绝给不愿打击入侵者的人领圣体，甚至要开除教籍的威胁，^[89]而仍旧要称这个军队“的确是一个带来了解放的军队”。^[90]

这个军事行动一开始取胜了（蒙特利尔沦陷了），而后却失败了。造反的殖民地人民仍旧是优柔寡断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还没诞生。^[91]信仰基督新教的商人阶级坚决认为他们“最为需要的是与伦敦的密切关系和与在遥远西部的印第安人进行不受限制的贸易往来。”而这正是那些造反的殖民地人无法给予的。^[92]讲法语的居民认识到，他们被要求同意接受更为激进的结局；而美国殖民地人民却没被要求这样做。因为后者的目标是以“自由和基督新教为特征的。”这不仅使一个国家的首脑受到挑战，而且也是对“独立主义的基督教会秩序”的一种挑战。因此，居民们最初的同情转向更为巨大的对抗。^[93]正如德希奥（Dehio）讲的那样，英国最后“由于这一原因”使加拿大“没有英国殖民者”。当地的天主教徒认为，他们的清教徒邻居比伦敦这个“粗心大意、有容忍力的当局”更为狂热。^[94]

由于美国殖民地人民变得更为好战，支持这一运动的社会基础开始发生变化，正如在革命的情形下常常发生的那样。社会保守势力常被他们关心自身的反抗者们造成的势头所吓坏了。从整体上看，施莱辛格对北方殖民地商人们的评价可能更为正确：

1764至1776年之间的经验使商人们有理由相信另一种反映。为了证明自己做的事是对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请别人帮助解决人口中难以控制的那些人的问题，但是由于好高骛远而失败了……商人们模糊地开始察觉到一批觉醒了的、有自我意识的激进分子的危险。^[95]

正如詹森（Jenson）认识到的那样，尽管在1774或1775年以前革命运动“除了漫不经心之外”，还不是一个民主的或激进的运动。对大众广泛的动员使形势有些转变，并且使大众关心的目标提到了第一位。^[96]形势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即斗争不能不首先被称作是一场“人民战争”。^[97]在这场人民战争中，“革命党的力量大部分来自于普通百姓，有别于贵族”？^[98]

也许是这样的吧！看上去很清楚的是，“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怀疑伴

随着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的是一场在国内应由谁掌权的斗争。”^[99]但是对这种发展中的进化观点，有两种保守的反映。一种是根本撤回对革命的支持；有些人这样做了。^[100]但是第二种反映是抢先恢复斗争领导权，从而使阶级斗争目标转向纯民族性的斗争目标。^[101]出现了这两种反映，这就是在富有阶层人中间出现革命派和效忠派分歧的原因所在。从历史角度讲，那些试图通过参加独立运动而缓和独立运动的政治后果的人们比亲英分子更为重要。长远地看，他们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形势一直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实上……激进分子是殖民地人民中的少数派。”^[102]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已经准备好同英国政府诉苦的人们并没有在各方面取胜。1763年以后，英国在南北美洲有30个殖民地。所有殖民地都受到贸易和航海条令的管辖。正如哈伯讲的那样，对美国独立战争一个正确的解释“必须指出为什么13个殖民地造反；而17个殖民地却保持对英国的忠诚。”^[103]基于13个殖民地做了各种努力以保证其他殖民地也效仿他们这一点来看，这一观点尤为正确。

那种企图使魁北克也加入这场革命的作法是失败的。但魁北克是一个特殊的事例，因为大多数居民只在短时期内受到英国的统治，而且并没有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东佛罗里达也同样是个特殊的事例。^[104]但是在北美大陆还有一个由绝大多数新英格兰人（New Englanders）组成的英国殖民地，所以让他们加入这场革命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殖民地就是新斯科舍（New Scotia）。布雷布纳（Brebner）指出，如果在北美大陆殖民地有个地理中心的话，在1774年那里“即将爆发的革命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火势看上去越到边缘地区越小。佐治亚（Georgia）、佛蒙特（Vermont）、缅因（Maine）和新斯科舍都“处于危险之中”。^[105]但是只有新斯科舍最终没有加入独立革命。

在当时，新斯科舍和新英格兰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确确实实的家

族性的)关系。此外,像南部种植园主那样,新斯科舍在当时已经“负债累累”,而且很可能因为负债问题而造反。^[106]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对已经提出的团结一致的做法表现出“漠不关心”。^[107]相反,他们坚定地保持着一种“中立”的地位。^[108]一方面,他们不愿考虑加入造反行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军事方面的弱点,这就是他们是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居民住得非常分散的半岛。^[109]另一方面,新英格兰已经保存了“扩张实力”来对付魁北克,而且并没有认为新斯科舍重要到足以让它进行军事进攻的地步。^[110]

当然,新斯科舍人属边疆民族。“如果所有边疆民族一样,新斯科舍人是主张分裂的。”^[111]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政治上,也就是军事上,过于软弱而无法进行对抗。因此,或者说看上去他们发现自己发泄的方式是通过一场宗教运动,即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新斯科舍的殖民者中大部分是公理会教徒。他们害怕由伦敦和哈利法克斯(首府)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反复出现的“主教制度的威胁”。此外,当他们发现自己受到威胁并且无法在自己对新英格兰的亲密关系和对英王的(Crown)的忠诚之间做出选择时,宗教的复苏“立刻提供了一种解脱和一个证明。”^[112]

所谓的新光明(New Light)运动,如同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由于同样的社会的不安定和不满状况下发展起来的。^[113]但是,显而易见,在政治上使英国容易接受。此外,这便给予新斯科舍“一个新的身份”,以至于到1783年新斯科舍看上去好像成为“基督教世界极其重要的中心”。^[114]因此,新斯科舍也从正在建立的美国势力范围内退了出来。这对于未来的美国来讲,在经济上并不重要。但是在短时期内,可能对新斯科舍有利。^[115]如果新斯科舍成为北美第十四个殖民地的话,那么从长远观点来看,这在地域政治方面是举足轻重的。毫无疑问,英国将会感到很难抓住加拿大不放,英国也很有可能被“逐出”美洲。^[116]如果上述情况确实发生了的话,非殖民化的殖民定居的整个过

程将会大大改观。

在加勒比地区，各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却大不一样。与正在处于经济衰落阶段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不一样，西印度群岛由于主要出口蔗糖，而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117]此外，1766年《自由港条令》成功地使西印度群岛抵制了贸易衰落，这场贸易衰落源于1751年。西印度贸易中的走私成分已达100年之久了。这种走私活动只是大英帝国和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之间贸易的主要方式。大约在1751年，在这种贸易中出现了一个“激进的变化”。^[118]西班牙船队开始频繁地停靠英国港口，而不是英国船队在西班牙港口进行贸易往来。当然，这也是完全违反《航海条令》的。但是当地的英国当局认可了这种作法。1763至1764年间，又通过了一些新的条令，作为由格伦维尔（Grenville）提出的全面严厉实施的法令的一部分，这便使停靠在英国港口附近的外国船只很容易便被捉到。^[119]

1765年，当罗金汉（Rockingham）内阁上台时，为迎合北美殖民地居民而废除了《印花税条例》，通过了《自由港条例》，从而安抚了西印度地区的商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最初的动力是与法属岛屿（French Island）的糖业贸易有关。英国的殖民主义者以前反对占有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因为他们害怕竞争。但是英国岛屿的物产，在满足英国本土的供应之外，不能满足重新向北美大陆出口的需要。靠向法属岛屿的非法出口开放英国的西印度港口，就可以使法属岛屿的蔗糖可以通过英国运到北美大陆销售。英国事实上可以两者兼得，即在不让殖民地当局政治上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获得贸易和海运的利润。

作为已经通过的法令，《自由港条例》的目的不仅是要求法属岛屿的食粮，而且恢复与西属西印度（Spanish Indies）间的贸易，特别是与牙买加的贸易。如果恢复贸易往来的活动最初是缓慢的话，从长远来看将是非常成功的。在任何情况下，它促使西班牙马上作出反应。^[120]但

是，西班牙仅仅对《自由港条令》中指向西班牙的大的困境中一小部分作出反应。由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巴黎条约》从长远观点看对美国对英属殖民地一样重要。随着作为一个重要角色的法国从美洲舞台上的隐退，“西班牙却留下来独自面对未来20年的英国的威胁。”^[121]西班牙的根本问题如同它以往那样至少存在了100年。17世纪德国国际法专家普芬道夫（S.Pufendoof）嘲笑说，“西班牙养乳牛，而欧洲其他国家喝牛乳。”^[122]但是现在能否保住母牛，看来也成为问题了。

当然，这一问题在签署《巴黎条约》之前就出现了。在1740年代，英国的商人就已经在牙买加进行活动，力图完全回避在加的斯（Cádiz）的货物集散地。^[123]1762年英国占领了哈瓦那（Havana）（和马尼拉）（Manila），并且对维拉克鲁斯（Veracruz）施加威胁。尽管《巴黎和约》使哈瓦那回到西班牙手中，此外，尽管法国因为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支持过自己而把路易斯安那让给了西班牙，无论如何，英国的威胁仍旧是切实存在的。1765年西班牙的查理三世（Charles III）提出了与他的政权相关的重要改革，这就是使自由贸易（comercio libre）制度化。

自由贸易无疑是查理三世的“战略”，^[124]但是应该清楚地记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由贸易的内涵是有局限性的。西班牙的政策事实上“只是在帝国主义的框架内对贸易的一种自由主义化。”^[125]1765、1778和1789年连续几年颁布的法令基本上规定了三件事：给西班牙殖民地建立殖民地之间一定贸易关系的自由；解除西班牙半岛对塞维尔（Seville）和加的斯（Cádiz）的部分垄断；允许西班牙殖民地的人民从西班牙殖民地向西班牙港口自行运行货物。^[126]这种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对英国实行报复。”^[127]

报复是经由两个途径进行的。一个途径是通过殖民地人民与西班牙半岛进行贸易，从而使西班牙殖民地的人民更加受益，而同英国（和其

他国家)间的非法贸易会变得不太有吸引力。这可能恰恰削弱英国制订的《自由港口条令》(Free Port Act)试图达到的目的。但是,第二个途径是更直接的。帝国主义国家间贸易自由化的对手是宗主国真正地、更大地实行帝国的统治。哈布斯堡(Hapsburgs)领导下的西班牙殖民地的官僚精神据说是“我服从但我不执行命令”(Obedezco pero no cumplo)。从查理三世开始,波旁王朝决心改变这种状态。因此,从表面上看意味着更多自由的“自由化”(Liberalization),实际上意味着“事实上更少的自由……正如(美洲人)当时受到更有效的垄断资本的剥削,特别是被排除在给西班牙人的好处之外。”^[128]这种表面上的反论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出的结论。这个事实是,西班牙政府在削弱住在西班牙半岛的居民和在殖民地的居民的贸易权的区别的同时,却事实上同时扩大了在殖民地的西班牙半岛居民和在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Creoles)间权力上的区别。

观察到英国和西班牙在1763年在两方面面临的类似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首先,他们管理殖民地贸易的法律被他们自己的公民“几乎泰然地”破坏了。当他们没有泰然地去破坏这些法律时,更主要是由于“对他们有利和有好处,而不是由于害怕高压统治。”^[129]1763年以后,作为回报,英国和西班牙政府趋向于使用更多的高压统治。^[130]

两国政府面临的第二种类似的问题是国家机器承担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因此两国都在1763年以后企图增加殖民地税收。英属殖民地人民于1770年把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港口,1781年西班牙殖民地人民在索科罗(Socorro)把甘蔗酒(和烤过的烟草)倾倒入海。这种反弹并没有阻止英国/西班牙坚持把命令强加于殖民地人民的做法。而这种强制性做法,在两个殖民地地区中引起了类似的不满。英国和西班牙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做法,都是以继承以前权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的传统的名义搞的。正如费伦(Phelan)讲的那样,唯一的区别就是英国国王以前分散的行政权大部分是在司法方面,而西班牙国王以前分散的行政权大

部分是在官僚机构方面。[\[131\]](#)

七年战争也使葡萄牙受到挫折。1750年成为外交大臣的庞巴尔（Pombal）的侯爵（Marguis）曾提出创造一种形势使葡萄牙得到经济上更大的独立性。在这种形势下，在“美洲领土方面的获利会大大地增加”。如果不是把葡萄牙本土居民“排除在外的话。”[\[132\]](#)最先采取的一种机制是对殖民地经济加强“国家控制”。这在费伦看来的是他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础”。[\[133\]](#)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关于经济学概念的说法大部分是通过国家对极度增加的巴西金矿开采业的控制加以证实的。[\[134\]](#)的确，结果是葡萄牙那时比法国的人均税收要高。20世纪下半叶布罗代尔（Braudel）建议科威特（Kuwait）采取类似的做法。[\[135\]](#)

庞巴尔（Pombal）并没有试图对葡萄牙在历史上与英国的结盟提出疑问。他仅仅是试图利用提供给葡萄牙的新的世界经济形势这一“大的进行政策调试的机会。”但是，1762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的做法对于（庞巴尔的）基本论断却是“一个”破坏性的挑战。“而1763年以后西班牙在南北美洲持续不断的威胁，却根据葡萄牙的基本需要使英国保留了亲善友好的态度。”[\[136\]](#)英国付出的代价是为葡萄牙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庞巴尔的继承人会改变他的政策。当然，这种情况直到晚些时候才发生。[\[137\]](#)当时，庞巴尔的政策大大减少了葡萄牙（以及巴西）同英国的贸易，[\[138\]](#)并且引发了在巴西的商人们一系列的消极反映。[\[139\]](#)

因此，正是在1763年，不仅仅是英国而且还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对他们在南北美洲的移民日益增长的不满采取行动。事实上，人们可以说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某种成功的努力，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在世界体系中重新建立这种作法，激起了他们在美洲的殖民者的不满。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靠加强两个帝国的联合管理、靠加强军队以及靠把两个中央政府建立在更为坚实的财政基础之上来实现世界体系中势力的重建的。

查理三世从各方面出击来加强西班牙政府解决同宗主国（西班牙半岛）、同其在南北美洲殖民地以及同世界关系的能力。尽管得到西班牙式的启蒙运动（Ilustracion）思想的影响，而制定出的实际政策却是（重新）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削弱贵族统治的作用，削弱教会的势力，把他的政府建立在一种更专业的、有薪金的民事和军事的官僚政治基础之上。其目的就是通过改革贸易条款，鼓励殖民地出口贸易达到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扩张。然后，通过这个有效的官僚政治机构来“收获财政丰收”。起初，经济的（和财政的）成功是“惊人的”，^[140]但是西班牙势力的这种极大的增长结果是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均衡”^[141]之上的。这种脆弱的均衡是不可能保持的，因为世界经济力量是西班牙国家无法控制的。我们现在必须转题来讲讲这方面的事情。

由于七年战争是“变化的催化剂”，西班牙在战争中遭受了不愉快的军事挫折（最明显的是哈瓦那的陷落，但这不是唯一的例子），查理三世的改革中的第一步是军事改革，战士们想在政府的革命中扮演主要的角色。而这场政府的革命甚至被称为“重新征服南北美洲。”^[142]但是最激进的变化是在行政管理方面。这个变化牵扯总视察（visita general）机构的复苏，从马德里派遣一位拥有最高权力提出要求 and 采取行动的官员。在改革中出现的关键人物是加尔维斯（Don José de Gálvez），他最初是作为1765至1767年新西班牙（New Spain）第一位总视察官员（Visitors General）出现的。

但是，最重要的改革是采用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做法。地方行政长官是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柯尔伯主义者的（Colbertion）传统机制。地方行政长官是为了取代区域地方法官（alcaldes mayores）和地方长官（corregidores）（印第安贡品收集人、印第安劳动力的征募人和分配人）。这些人的官位已被出卖达100余年，而他们一直利用这些职位（和征税的权利）谋求私利。1768年，加尔维斯（Gálvez）和新西班牙的克拉瓦克斯总督（Viceroy Croi）提出全部废除这类在压迫印第安人

的同时获得主权的大部分财政税收的官员的职务。当加尔维斯于1776年成为西印度大臣（Minister of Indies）时，他开始使波旁王朝（Bourbon）政府的改革热情^[143]个人化，最后，于1786年，他推行了自己的改革。这可以被解释为对坚持不懈努力的一种回报；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证明了在“宗主国不变”^[144]的气候下进行改革是如何的不易。

加尔维斯最长远的影响就是他实现的在政治地理学方面的改变。这一改变对未来非殖民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影响。1776年，他作为西印度大臣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建立拉普拉塔的总督区（Viceroyalty of La Plata）。在16世纪，只有两个总督区，一个在新西班牙，一个在秘鲁。第三个在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于1739年被建立。为什么加尔维斯在1776年又创建了第四个总督区 [以及在总指挥区（Capitanerías Generales）和法官管区（Audiencias）那样一批较小的机构] 1776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已经开始了。这看上去是转而反对大英帝国及其盟友葡萄牙人的黄金时刻。葡萄牙人在干其他事的同时，当时正忙于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到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之间的航线上进行非法贸易来对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印第安人区域进行经济渗透。查理三世试图建立一个能够阻止这种渗透的一个强大的政府。这就是拉普拉塔。它包括今天的阿根廷（Argentina）、乌拉圭（Uruguay）、巴拉圭（Paraguay）和玻利维亚（Bolivia）。“在通常的情况下，英国是不会容忍这种企图的。”^[145]但是这些情况不是通常发生的。恢复了元气的军队实行了报复行动。1776年由8500人组成的远征军穿过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第三次并且是最后一次”^[146]占领了萨克拉门托。西班牙的这一胜利在1778年签署的圣伊尔德丰索条约（Treaty of San Ildefonso）中认可，而葡萄牙人对东岸地区（La Banda Oriental）（今天的乌拉圭）的渴望永远告一终结。

在北美大陆的斗争对拉丁美洲来说一直是一种不断的压力。它为改

革运动提供了“一种紧迫的特征”这一改革运动导致了1778年第二批自由贸易法令的颁布。即法国1777年加入对英战争之后，西班牙屈于高压，也于1779年加入了反对英国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国的决定是很明显的。他们自从1763年时起，就一直试图削弱大英帝国在南北美洲的势力。当1770年，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退位时，他留下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重申了这样一个政策中的五个必要原则：避免战争，与西班牙和荷兰结盟，削弱英国的财政信用，促进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以及减少英属殖民地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当韦尔热纳（Vergennes）于1774年上台时，他恢复了舒瓦瑟尔的政策。^[147]但是，美洲殖民地当时以开始了一场战争的方式迫使法国采取行动。

一开始，法国人限制自己对北美革命者们的秘密援助。法国内阁是分裂的，杜尔哥（Turgot）相信应该避免这场罪大恶极的战争。人们不能肯定北美的革命者们能够长时间地坚持下去。他们最终还是于1776年8月27日在长岛一战中战败。因此，1777年10月16日在萨拉托加（Saratoga）击败柏高英（Burgoyne）将军一事对于法国和西班牙都有极大的影响。^[148]法国突然开始担心比英国的一场胜利更为严峻的事情会发生。这场胜利是在法国没有援助起义势力的情况下取得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独立的和不友好的美国。^[149]1778年2月6日法国与美国签订条约，并且公开加入战争。

现在压力是指向西班牙了。而西班牙非常不情愿参战。西班牙犹豫于去作任何会使殖民地造反行动合法化的事情。再者，西班牙当时正与英国就割让直布罗陀（Gibraltar）和米诺卡岛（Minorca）的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西班牙持一种中立的态度，而英国认为没有进行交易的需要。法国更渴望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并在1779年签署的阿兰胡埃斯条约（Treaty of Aranjuez）中为西班牙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答应联合入侵英国。西班牙想把入侵英国看作是在它这个“过分扩张的和易于遭

到攻击的殖民帝国”受到攻击之前结束这场战争的一种途径。^[150]西班牙同法国签订了条约而不是同美国签约。^[151]当然，这样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重新获得米诺卡岛和直布罗陀，但是它的另一个目标是“把英国从加勒比（Caribbean）地区所占地驱逐出去，这些地区有路易斯安那（Louisiana）、蚊子海湾（Mosquito Coast）、牙买加（Jamaica）和小安德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152]

西班牙在“血和财富”^[153]方面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战争导致拉丁美洲同西班牙关系连续不断破裂中的事实上的第一次破裂。加拉加斯公司（Company of Caracas）破产了。国库并没从南北美洲人那获得收入。加泰隆（Catalan）的棉花工业遭受损失。^[154]而仍旧作为最重要的贸易组织成员的加的斯（Cádiz）商人们的贸易已陷入极大的困境，这必然有助于走私贸易。而走私活动当时正处于“繁荣发展时期。”^[155]

最大的灾难很可能就是当时开始的通货膨胀的周期。直到1774年康波曼内斯伯爵（Count of Campomanes）一直把西班牙没有纸币膨胀作为一个“国家大的宝贵的财产”的事例加以引证。但是，战争的开销和已经减少的收入使皇家的财政库存消耗殆尽。1793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由于开销是真的，西班牙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重新获得收入。事实上，“对美洲殖民地征税，为的是补偿”在乱发纸币上出现的纸币膨胀问题。^[156]当然，对西班牙本土的人民也要征税。最终，通货膨胀成为促成拿破仑（Napoleonic）入侵西班牙和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一个因素。

西班牙“半心半意地”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因而“在西班牙统治的南美洲产生反弹。”^[157]两个重要的暴动正是在这一时刻爆发的。这就是在秘鲁发生的阿马鲁（Túpac Amaru）和在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158]发生的暴动。阿马鲁暴动震撼了南北美洲，而这场暴动的真正目的仍是争议极大的课题。它是进行独立运动的最初的号角还是它几乎起了恰恰

相反的作用？

有些人把由阿马鲁在安的斯山（Andes）领导的印第安人起义看作是“没被征服的印第安人所做出的的最后的一次重大的努力。”^[159]但让我们记住阿马鲁领导的起义仅仅是长时期暴动的高潮和最有影响的一次暴动。^[160]上述那些人的观点很明显是当时很多统治者的观点，往坏的地方想，就是这些印第安人基本拒绝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往好的地方想，暴动犹如他们发出的一声“社会性的尖叫”，^[161]这种尖叫如果不能被接受或默认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阵营的人与另一批人的观点截然相反。那批人试图把在安的斯山爆发的印第安暴动的历史视为“独立运动的一个先兆”。一些晚期的秘鲁史学家们为这一暴动所作的解释被肖努（Chaunu）驳斥了。肖努认为，“这完全是一个误解”（Contresens）。他辩道，这些印第安人的暴动是一场印第安人反对“他们唯一的敌人，……克里奥尔人（Creole）压迫的暴动。”^[162]印第安人的暴动是与美洲反对欧洲的暴动绝对无关的。根据对于这些事件的这种解释，大大强调了阿马鲁（Tûpac Amaru）断言他的运动是“效忠”^[163]国王的，尽管不是效忠国王的奴仆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效忠主义有双重含义。阿马鲁的起义的一个结果便是使部分白种人感到殖民地制度是“对其霸权的最佳维护，也是反对立即灭绝更多的土著人及混血的种族的唯一保障。”^[164]

但是，还有第三种观点。这就是既不把阿马鲁看作是效忠主义者，他的争吵是与克里奥尔人进行的；也不把他看作是第一位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战士，而是把他当作一位社会革命家。只有当我们把这些起义置于世界经济的循环周期阶段（cyclical phase）[或衔接期（conjunction）]之中来看才有意义。这里有三点考虑。第一点，我们知道1763年以后经济的全面下滑。这种经济下滑到1776年造成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事件的发生以及1779年西班牙参与反对英国的战争。第二点，我们知道，由查理三世发动的改革以及改革在1778年达到了第二个

高潮。第三点，在安的斯地区，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带来了一些影响。事实是，1779至1780年的情景“恰恰反映出一百年间价格下跌中最急剧的一次。”物价位于自1725至1727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1779至1780年间是自1759年的物价下跌这一周期以来唯一最低的年头。[\[165\]](#)

远远不是出于原始的反抗，这些起义首先是由于印第安人参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而仅仅到了现代，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才进一步得到各式各样企图“加强中央集权”的验证。[\[166\]](#)秘鲁在腐败和滥用其市镇权利（conegidores）方面是臭名昭著的。当康多坎基（Jos'e Gabriel Condorcangui），又称作阿马鲁二世·印加（Túpac AmaruIIInca），于1780年起义时，他把用收取过高的税收来剥削印第安人和破坏经济的“坏政府”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这种试图解释阿马鲁个人行动的社会动机的说法确实没有打到重点上。最重要的是，他引起的社会回响。起义的中心可以在农村的印第安人中找到，但不是各地的印第安人的水准都一样。格特（Gotte）做了一些粗糙的，但有说服力的统计。他设计了一个各省平均总收入目录（这个收入在土地状况、出口量以及矿产业雇员工资收入机会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他从平均水准的税收中推论出合法和非法征收的实际税收。他发现，少纳税同参加起义的程度之间几乎非常相关。[\[167\]](#)皮尔（Piel）正确地指出，阿马鲁的起义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几乎同时发生的普加乔夫（Pugachev）起义（1773至1775年）两者间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自称是一个“沙皇”（tsar）或是一个“印加王”（Inca）；参加起义的农民占有大量土地；而且有一部分是靠奴役制运转的大的矿业工人来参加——简单地说，这些大量遭受强迫劳役的人参加了以市场活动为目的的劳动。[\[168\]](#)

阿马鲁得到了克里奥尔人的支持。的确，一开始，殖民地当局怀疑是对即将进行的改革表示愤怒的地方长官们（corregidores）唆使阿马鲁

进行起义的，在这方面很可能有证据可查。^[169]但是，这两批人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与印第安人、黑人、欧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人（mestizo）以及黑人与白人的混血人（mulatto）不同，克里奥尔人对于“血统的骄傲”（Pride of blood）不仅仅是因为从一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的美洲这样一个社会事实，而因为在18世纪这种对“血统的骄傲”实际上已经增长了。^[170]这种对于社会地位悬殊的感觉是相互的。^[171]

人口统计的数据是清楚的。1780年，秘鲁人口中的60%是印第安人，但是只有少数印第安人住在利马。只有12%是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或西班牙半岛人）。剩下的就是所谓的种族阶层的人——主要是黑人、欧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以及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172]对于印第安人来讲，他们最直接的敌人就是那些控制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人，“总体上讲，就是那些克里奥尔人”，而不是在西班牙半岛的西班牙人。^[173]此外，阿马鲁许诺要解放奴隶，并且提出对财产持“怀疑”的态度，例如，要摧毁克里奥尔人拥有的制造业（obrajes）。面对这种起义，“克里奥尔人不久便同西班牙人（Spaniards）联合起来了。”^[174]正如卢因（Lewin）讲的那样，总的来说，在拉丁美洲，当时有两场不同的革命运动，一场是克里奥尔人的，另一场是印第安人的。“有时他们的斗争是相交叉进行的，……有时他们又各自互不相干。”^[175]

阿马鲁的起义被对劳役摊派制的让步和军事力量两者的结合镇压了。但是这场起义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拉丁美洲带来的政治后果。印第安人“绝对地丧失了进行任何更重大起义的积极性。”^[176]原因是阿马鲁起义的程度、早期的成功以及其勇猛性把白种人吓坏了。1780年以后，不会有更多的白种人和近似白种人的人“支持”这种起义了。^[177]的确，克里奥尔人会从此开始承担革命的领导力。当然，作为一个通常的规律，甚至当克里奥尔人真的承担起领导力以后，赞成分离和独立的人“在占人口多数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中成反比”。^[178]在独立战争中，特别是在秘

鲁的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被迫受到两面夹击。“他们受到所有军队的掠夺。”^[179]

阿马鲁最初的胜利激起了在邻近的新格拉纳达总督区（Viceroyalty）爆发的一场称为公社派（Comuneros）的运动。^[180]它也是由波旁王朝改革过程衬托（但不是引起）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进程”的一个现象。^[181]马鲁起义的成功也使新格拉纳达的首都斯塔菲（Santa Fé）德·波哥大（Bogotá）的克里奥尔人以及在其他城市中心的克里奥尔人处于一种“持续的热情”的状态之中。^[182]

对新的钦差督察皮内德斯（Juan Francisco Gutiérrez de Pinedes）推行的新的苛刻的征税程序以及增加了的销售税（alcabela）表示的愤怒是引起1781年3月16日公社社员起义的直接原因。中心议题是“谁有权征收新的财政苛捐杂税”。^[183]因此，这一问题是个宪法问题，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新格拉纳达有众多的印第安人，他们不关心中央财政权力转移的问题，而更关心滥用这一权力的问题，比如过多的税收和对印第安人部落（Resguardos）土地的侵占。而这些土地被拍卖给克里奥尔人中大的土地拥有者（hacendados）以及小的土地购买者。这些购买者中大部分是混血种人。当地纺织工业衰落这一事实使情况更加恶化。而纺织工业衰落也是由于世界经济在总体上出现问题而造成的。^[184]

反之，在秘鲁这个社会引火箱内，一旦引燃之时，他们就落入了印第安领袖[尽管是印第安人酋长（caciques）而且是自称有老的印加人的贵族血统]之手。在新格拉纳达，起义从一开始就有一大批混血种人参加，而领导权是由克里奥尔人贝尔贝奥（J·F·Berbeo）掌握的。他是一个地主（hacendado）（尽管是个小的土地拥有者）。因此，在新格拉纳达，事实上有两个起义，差不多都在混血种人这一旗号下——以索科罗（Socorro）为中心的克里奥尔人的起义和在卡萨纳拉大草原（the

llanos of Casanare) 的印第安人的起义。

起义队伍朝着圣塔菲 (Santa Fé) 前进。在圣塔菲, 由于混乱, 权力曾一度落入大主教贡戈拉 (Archbishop, Antonio Caballeroy Góngora) 手中, 他的阵线是难以捉摸的, 并起到调解作用。贝尔贝奥“阻止了起义军队的行动”^[185]并与卡巴列罗 (Antonio Caballero) 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是一个妥协, 斯帕奇拉的投降 (1781年6月8日)。协议条款中规定降低税收, 使非西班牙大陆的人有更多担任政府职务的机会, 并且改善印第安人的状况。但是, 印第安人把这些协议条款基本上看作是一种“背叛”, ^[186]看作是抚慰起义者中的克里奥尔人和混血种人。印第安人试图继续独自进行斗争, 但是他们的斗争却在他们以前的盟友帮助下被击垮了。

最终, 由不喜欢西班牙的一部分贵族和没有继承权的“庶民”组成的临时同盟是一个不可能的联盟。^[187]贵族的参与是由于受到他们的对手, 在北美的殖民者起义的激励。^[188]庶民的参与是由于受到阿马鲁起义榜样的激励。结果, 克里奥尔土地所有者“不仅没有支持庶民的起义, 反而公开地挫败了他们并且与当局勾结在一起。”^[189]但是, 在新格拉纳达, 贵族们 (根据某种不同的人口统计证明) 很快便从阿马鲁的事情中接受了教训。借由承担起义的领导权和从起义运动内部渐渐削弱它的作法, 他们在维护自己对未来的选择权方面, 比与西班牙面对面地寻求自己的利益做得要好得多。玻利瓦尔 (Bolívar) 将在新格拉纳达出现并将在1820年代在秘鲁遭到了非常不同的待遇。

因此争取独立的克里奥尔人当时发现独立具有双重的刺激——克里奥尔人对西班牙本土的人不满, 以及两者都害怕具有非白人的低阶层的地位。正是因为前者, 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本土人间的敌对的问题实质上成为拉丁美洲殖民地末期史学理论关注的中心 (对巴西关注的程度要小些)。一个克里奥尔人的概念就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后裔。在拉丁美洲

的各个时期，正如在所有有移民的殖民地那样，白人中的一部分人是在殖民地出生的，另一部分人是从君主国移民来的。在后者中间，一些是新的移民，另一些人是临时移居殖民地的，为的是某种官职，然后再回到宗主国去。有些人达到了这一目的，而另一些人却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一个西班牙人回到了宗主国，他有在殖民地出生的孩子，而孩子选择留在殖民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讨论经历了两个阶段。传统的观点是，为了迎合西班牙人，在18世纪克里奥尔人是不许做官的，这便是他们不满的原因所在。^[190]从1950年代开始，这一观点遭到批判。比如，伊萨奎尔（Eyzaguirre）认为克里奥尔人“毫无疑问”仍旧保持“在贵族中的多数地位”。问题是克里奥尔人试图把他们的多数地位改变为对争取官位的一种“排外性”。^[191]修正学派认为，导致克里奥尔人不满意的波旁王朝（Bourbon）的改革事实上起了相反的效果。克里奥尔人的控制引起了对西班牙官僚作风的“警告”。^[192]波旁王朝的改革是克里奥尔人主张的结果，而不是“起因”。^[193]

无论这一事件发展的后果如何，无论在观念方面实际程度如何，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人心目中的“位置”变得“更加明确了”，也就是更公开化了，以及在争端中，殖民地当局“全力支持”西班牙人的问题，看上去是清楚的。^[194]这看来不是制订新的立法的问题，而是推行旧的立法的问题。^[195]一方面，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明确还因为克里奥尔人数有急剧的增长。^[196]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班牙努力“重新”征服南北美洲和进行经济扩张，所以会有大量新的移民。^[197]

毫无疑问，在克里奥尔人看来，形势的恶化是由于君主国当局的“专横”，^[198]在西班牙当局来看，形势的恶化毫无疑问是由于克里奥尔人的“无能和令人怀疑的不忠实”造成的。^[199]如同在英属北美洲一样，相互间的猜疑可能是慢慢地，但是稳定地发展起来的。但是还有更

复杂的情况——种族主义。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形势相对来说比较清楚。那里有白人，也有黑人。种族性的隔阂很严重。印第安人受到轻视，但是他们大部分位于经济制度之外。穆拉托（黑白混血）

（Mulattoes）算是黑人。在白人中的区别大部分是在阶级阵线方面，由于过多的种族划分使白人中的区别不太复杂。可以肯定，在殖民者中有些人的祖先不是来自英国，比如是来自德国。但是无论在这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对抗，种族在政治动乱中没起什么作用。那里有效忠派和爱国者，但是没有西班牙人，也没有克里奥尔人。

种族的界线在拉丁美洲（如同在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那样）更为复杂。那里有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白人—黑人（或非白人）的划分。三百多年来性习惯事实说明，西班牙人是“纯粹白人”，而克里奥尔人是“多少有点白”。正如林奇（Lynch）指出的那样，很多克里奥尔人事实上是有黑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粗糙的皮肤，“非常像玻利瓦尔本人。”^[200]

在一个看重“白”的社会结构中，事实上是混血 [根据肖努（Chaunu）的观点，三个克里奥尔人中有两个是混血] ^[201]这一事实毫无疑问使得很多克里奥尔人把他们作为西班牙人的“后裔”（尽管带有含混不清的种族色彩）的高等社会地位，转变为在阶层上高于新来的移民。这群克里奥尔人的祖先中大部分是在16和17世纪从安达卢西亚（Andalucia）、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和卡斯提尔（Castile）来的，他们把18世纪来的新移民视为分别从坎塔布连（Cantabrian Mountain）山脉和加利西亚（Galicia）地区来的为数不等的人群，而不是西班牙人。“反‘西班牙移民’（anti-gachupin） [（gachupin）是以嘲弄的口吻称呼西班牙半岛的人] 的民间风俗表现出对反坎塔布连人（anti-Cantabrian），甚至对塞维利亚的‘反加利西亚人’民间风俗十分的怀念。”^[202]克里奥尔人还称西班牙半岛人是哥特佬（godos），大概把他们暗中比喻成进入罗马帝国统治的西班牙的“野蛮的”哥特人的后裔的

同类。^[203]而西班牙半岛的人把克里奥尔人划分为“游手好闲的”人作为回报。^[204]作为殖民者的西班牙半岛人事实上常常是一些在社会地位方面上升的穷人。^[205]“克里奥尔人常常被困在一个经济地位下降的电梯中。”^[206]事实上，虽然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半岛人把等级问题看得很重，但只到一定程度。甘第亚（Gandia）提醒我们，当政治斗争的危难状况最终来临时，这些称号反映的常常不是家族史，而是当时个人作出的政治选择。“难以令人理解的事情是，这些应该是克里奥尔人的人，常常不是克里奥尔人，而是西班牙半岛人。而西班牙半岛人又不是西班牙半岛人，而是克里奥尔人。”^[207]人们进行决定性考虑的是经济问题。正如伊泽德（Izard）谈到委内瑞拉时讲的，“商人和地主间的冲突并没有出现在宗主国人和克里奥尔人之间，而是出现在生产者和买主之间。”^[208]他说，当西班牙半岛的商人在委内瑞拉独立之后全部消失时，冲突仍在继续，这便是一个例证。

波旁王朝的改革使这些问题明朗化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如果西班牙要限制即将来临的英国对于其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所做的最后的冲击——一种“孤注一掷的后卫行动”^[209]的话，它试图坚持中央控制权只是一个打不赢的战略。如果查理三世和他的代理人加尔维斯（Gálvez）输了的话，英国人便会取胜。但是，查理三世和加尔维斯并没有输。比如，他们在控制教会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清除耶稣会士的工作是十分轻而易举的，并且为西班牙国解决了各种财政和代理权问题。但是，在清除过程中，克里奥尔人的忠诚被严重地扭曲了。因为这1,000余位回到欧洲的美洲耶稣会士事实上“正是克里奥尔贵族中的精英。”^[210]为这一政策付出的代价是“疏远了”那些留下的克里奥尔人。^[211]由于耶稣会士，由于替换了地方行政长官，由于更有效地征收高利税，这种疏远便导致贵族走上独立之路，特别是考虑到当时世界制度的政治气候。到1781年，万莱恩苏拉（M.M.Vale-nzula）给查理三世写了一份备忘录，预见到上述事情将会发生。^[212]

因此，这就是在1763年签署《巴黎协议》之后，在不到20年间，美洲人——所有的美洲人看上去不可避免地要沿着建立一系列独立的殖民国家的道路走下去。此后的50年仅仅是把一个模式展开，这个模式的总线条如果没有细致地勾画出的话，但也是早就勾画好了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可能不太在于某些关于殖民者一方为“自由”而献身的史诗，或在于某些宗主国判断的错误——这是两种特别受人欢迎的观点——正如在新出现的英国的世界秩序中，（对各方）的开销和收益进行递增估计的积累那样。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完全是个预测。这一行动一旦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殖民者便会积蓄力量，它导致的结果常常是对集体利益进行的比较狭隘的估计所估计不到的。最终的结果同时对英国人和在南北美洲的殖民者来说在不同的方面都有利。当然，有利的程度和质量是不一样的。主要的输家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Iberian states）和南北美洲的非白人人口。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争夺，事后来 看，结果可能是明显的。事实上，那些得胜的人组成的长期的联盟是这样一种联盟，这个联盟为世界体系提供了最直接的政治稳定，因此也会对世界性的资本积累表示满意。

在1781年，美国军队在约克城（Yorktown）击败了英国人。这看上去对大英帝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挫折，毫无疑问，这也使英国清醒起来。但是直到1783年《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签署后，才真正实现了和平。这就是把真正的世界军事形势进行分析的原因所在。因为英国不仅仅在与它的殖民地交战。它与法国、西班牙以及荷兰交战，而且欧洲大部分国家事实上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在1781至1783年间，英国舰队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a）的圣各诸岛战役（Battle of the Saints）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国舰队。而法国与西班牙（Franco-Spanish）对直布罗陀（Gibraltar）的进攻证明是无效的。英国对其欧洲敌人的胜利在价值上超过了其在约克城的失败，并且意味着在1783年之后，不列颠人（Britania）将继续在海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失去了在北美大陆的13个“大陆殖民地（Continental colonies）。”^[213]

根据英国的观点，1783年并没有标出和平，而只是战争中的一个休战。这对它争取霸权的势力没有阻碍。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讨论过法国是如何试图接着以——《伊登条约》（*Eden Treaty*）、法国大革命（*the Revolution*）、革命战争、拿破仑扩张（*Napoleonic expansion*）以及在欧洲大陆进行封锁（*Continental Blockade*）——来对付英国。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殖民者是如何试图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件事上。1783年以后，有三个关键的“时刻”使殖民者的斗争力量失去平衡：海地（*Haidi*）的革命，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和1815年法国最终的崩溃。我们将根据美洲人的观点就这些事件一一做出解释。

1783年以后，新独立的美国（*United States*）试图使它成功的果实更为逼真。它变得比人们希望的更为强硬。特别是在它实现其经济的两个中心目标方面——实现对欧洲、对加勒比地区（*Caribbean*）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极大的出口扩张；获得通往北美大陆边疆地区的通道并控制这片土地——根本不是简单地靠终止英国的统治实现的。此外，革命战争（*Revolutionary War*）已经挑起了很多社会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威胁着这个新国家的稳定，因而也威胁着殖民者自己制定的经济目标的可能性。

在独立战争中，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当然切断了与英国的经济联系。在国际上，大陆会议早在1776年就采取了一个强硬的自由贸易立场，它在独立战争中一直坚持这一立场。^[214]中止从英国进口产品部分是靠增加殖民地的产品和增加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进口来加以补偿的。对于进口，小部分是靠出口进行偿还的，一大部分是靠补贴和贷款偿还的，以及法国的消费力量是靠其自身的支出支撑着生产部门这一事实偿还的。但是，总体来讲，战争并没有对经济，特别是对制造部门产生“革命性的作用”。^[215]

此外，在战后立即发生的贸易萧条方面，大英帝国（失败者）看上

去比美国和法国（胜利者）的处境要好。美国实际上保持着一种十分依赖大英帝国的状况，^[216]这件事对于美国和法国两国来说都是具有某种受挫感。根据我们现在理解，原因看上去是非常明显的。对于美国来说，英国的贸易是强大的并在出口方面价格便宜。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商人们“长期以来与英国的贸易中心建立了贸易往来”，这就意味着有长期的信誉。人们也不应忘记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价值。^[217]此外，1783年以后，英国的商人们“激励自己重新获得与美洲的贸易”。英国政府提出给这些商人们如同当年美国还是英属殖民地时他们享有的同样的退税、免税和补偿金来支持他们。^[218]相反地，对于法国商人们来说，由于港口商人们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与美国发展贸易需要开辟新的贸易渠道，而在1783年，他们无法“允许自己享有更多创新的奢侈。”^[219]

因此，美国发现其贸易又受到英国所控制，尽管总体的水准比较低，^[220]而且两国“所处的地位也不平等”。这是因为“无论美国的贸易对于英国是多有价值，英国的贸易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21]杨（Arthur Young）能在1789年与雷诺（Abbé Raynal）修道院长的一次谈话中反映出这一观点是不足为奇的。杨说，对于人民失去一个帝国“并且借由损失而获利”，这在“世界政治中”是“一个极特别的事件。”^[222]

美国可以希望扩张其贸易的最明显的地区就是加勒比地区，而它与该地区已经有长期的贸易了。但是，在这方面1780年代也是一个国难的时期。英属西印度群岛上上下下尽管全部都声明对美洲的独立战争表示同情，并且给予某种程度的转变性的支持，但是它们并没有加入这场战争。^[223]原因可能有两个：人口统计学表明，事实上黑人（大多数是奴隶）大约占人口的7/8；^[224]而这些小岛屿容易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军事进攻。^[225]

但是，恰恰是因为生产蔗糖的单一经营方式的不断增加导致了西印

度群岛必需要进口食品，所以在美国独立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十年间，北美大陆殖民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得很牢固了。战争的混乱使这一贸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短期的脱节”，因此蔗糖生产的开销也提高了，尽管西印度群岛的人对立即恢复贸易关系怀有极大的动力。但是，1783年以后，英国不许美国的船舰进入它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正如不让进入西班牙殖民地那样）。^[226]这对于蔗糖种植园主们来说也是一个坏消息。“从1783年开始，边远地区的蔗糖种植业开始衰退。”^[227]

如果对外贸易的前景在新的殖民国家看来只是一时间的黑暗的话，他们认为，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对“边疆”地区的殖民来扩大他们在北美大陆的经济发展。但是英国和西班牙都不会支持与他们的自身利益背道而驰的这种野心。人们可以把北美大陆的东半边想象为构成了一个长方形。在1783年，新生的美国在这个长方形中组成了一个盒中之盒。尽管这个小盒子东边的边界与较大的盒子的边界是一样的——即大西洋（Atlantic Ocean），它在北边被加拿大包围，而加拿大又不在其管辖范围内，在它的南边，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从路易斯安那到佛罗里达）都在西班牙管辖之下，在它的西边，在密西西比（Mississippi）和阿帕拉契山脉（Appalachians）之间一片大的区域，这块土地的管辖权还在争夺之中。

在凡尔赛进行和谈时，毫无疑问是讨论过美国能否获得加拿大这一问题。在战争中，美国人没能在军事上或政治上把加拿大弄到手。他们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得到法国在外交方面的支持。^[228]如果有区别的话，英国人比法国人在对待加拿大的问题上要更加小心。^[229]是否应该允许美国向西扩张是个比较大的问题。1783年的和约规定，大英帝国归还所谓的西部港口（Western ports），就是从密西根湖（Lake Michigan）到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之间在美国边界一方的8个边疆港口。英国人办事拖拖拉拉，借口便是美国拒绝归还效忠派被没收的财产。而美国

则反驳，英国已允许成千名黑奴移居加拿大（因此就不“归还财产”）。事实是，英国只不过想给加拿大皮毛商充足的时间来“重新组织他们的买卖并且撤回他们的财产。”^[230]这个问题直到1796年签署杰伊（Jay）条约时才解决。然而，正是因为英国期望把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卫星国来扶植，美国才最终平息了与英国的纷争。^[231]此外，英国很有可能怀疑美国新政府会粉碎边疆人民强烈的分裂主义愿望这一阻碍其向西扩张的真正障碍。^[232]

西北部的情况是复杂的。除了美国和大英帝国各自怀有不同想法之外，美国各个州都有不同利益可图，如皮毛商和土地投机商，又如白种边疆人和土著美洲人（所谓的印第安人）。

从一个新兴国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包含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在东海岸各种各样的13个殖民地中澄清所有权问题；其次，解决东海岸 [在有些地区称为“潮水”（Tidewater）] 和边疆（横断阿巴拉契亚山脉大部分但不是整个的地区）之间的争端。

第一个问题是围绕假定的古代权利而反复出现的。6个洲——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和康涅狄格（Connecticut）（在北部）和弗吉尼亚（Virginia）、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南卡罗莱纳（South Carolina）以及佐治亚（Georgia）（在南部）——声称他们的特许证是“从海洋到海洋”，因而允许他们无限期地向西部扩张。在中部的州——著名的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马里兰（Maryland）、特拉华（Delaware）和新泽西（New Jersey）——在成立州时制定的文件中没有这类条款，因而会被排除在土地投机的热潮之外。他们试图组成私人公司 [如：印第安纳公司（Indiana Company）和伊利诺-沃巴什公司（Illinois-Wabash Company）]，并请求新兴的美国帮助他们，如同他们以前求英国帮助他们那样。^[233]结局是个妥协，即1787年的西北土地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拥有“从海洋到海洋”特许证的那些州把

这些条文让给了美国，允许它出售土地（因此可以减少美国的债务），但是必须以每份640英亩的量出售，这样便可以使有“民主”风尚的大土地投机商们满意。

但是，土地法令还有另一个条款，即在这一地区建立新州的可能性。又一次同样把东海岸“帝国主义”排除在外条款，可能最终成为解决潮水涨落的边远地区的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办法。这种紧张关系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一直困扰着大陆会议。这便是北卡罗来纳的“管理者”（Regulators）的敌对情绪和佛蒙特（Vermont）人对革命事业的矛盾心理。^[234]总的来讲，“西部人”特别是居住在肯塔基（Kentucky）和田纳西（Tennessee）新领土的那些人把国会的控制视为是“在立法机构中沿海地区所发挥的作用。”^[235]边疆人认为，“他们在继续1776年的战斗。‘他们自己是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而东部沿海那些州的政府却扮演了‘以前是由乔治三世充当的暴君’的角色。”^[236]此外，经济地理的形势是这样的，他们利用内陆航运把产品向东北方运送到英国管辖的区域和向西南方运送到西班牙管辖的区域，比由陆地运到东部沿海各州要容易得多。^[237]

西北土地法令从创造出一种区分美国中央政府和东部各州的办法扭转了这一不满情绪。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便是触犯印第安人的反对把边疆地区分裂出去的做法。英国人正在做一个传统的游戏，即试图在美国境内创造出一个“中立的印第安屏障国”，^[238]而边疆人基本上渴望得到印第安人“没有放弃的”土地。美国可以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特别是在1789年正式成立了一个联邦政府之后，以及英国在同一时期由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而感到心烦意乱。“欧洲的不幸对美国是有利的。”^[239]那对于白人殖民者是有利的，对美洲土著（Native Americans）是不利的。对于后者来说，

美国总统是个让人生畏的人，是沙皇（czar）、皇帝和苏

丹（Sultan）直接的同类；对于克里克人（Creeks）和切罗基人（Cherokees），奇克索人（Chickasaws），肖尼人（Shawnees），温纳贝戈人（Winnebagos）以及很多其他的印第安人来说，华盛顿（Washington）这一新兴城市正如芬兰人（Finns）眼中的圣彼得堡（St.Petersburg），苗族人（Miao）眼中的北京（Peking）或塞尔维亚人（Serbs）眼中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种变幻莫测的、专制权力的席位。[\[240\]](#)

而大英帝国对于美国向边疆的扩张行动的态度犹如一个霸权国家解决一桩小的、基本性的问题，如果有麻烦的话。而西班牙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们正在保卫一个已经受到攻击并且不能为美国提供经济上的成功或推广美国政治榜样的机会的美洲帝国。英美和约和英国西班牙和约都是在1783年9月3日签署的。但是它们在影响整个密西西比河谷（Mississippi Valley）的一个关键问题上相互矛盾的。英国与美国的条约给予美国在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航行的自由权利，并且把南部边界固定在纬度30°的地方。英国与西班牙的条约没有谈到在密西西比河航行的问题。但是，它提供的条件是，根据英国1764年颁布的一项咨询枢密院后不经议会同意的敕令（order-in-council），西班牙可以保留包括密西西比河纳齐兹（Natchez）港和北至32°26'的一切领土在内的西佛罗里达（West Florida）。[\[241\]](#)

起初，西班牙人发现很难区别英格兰这个他传统的敌人和英格兰人的后裔，他们称为“盎格鲁—美洲人”（Anglo-Americans）[\[242\]](#)的美国（United States），但是，西班牙开始进行区分了，这种区别对美国是不利的。也许正如西班牙人色利奥尼（Jacques Accarias de Sérionne）在1776年作的精明的预测：

由于西班牙失去了它的殖民地，因而新英格兰（New

England) 可能比老英格兰更令人恐惧。盎格鲁——美洲人的
人口和自由看起来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发出的声明，要征服美洲
最富有的地区、建立一个英国人的新帝国和独立于欧洲。^[243]

西班牙人发现，在新占领的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莫比尔
(Mobile) 和彭萨科拉 (Pensacola) 港口的英国商人比与他们有“长期
积怨”的美国商人喜欢这些港口。但是，西班牙人付出的代价是由于他
们自己经济上的衰弱而造成的。“为了阻止 (美国的) 美洲人同他们的
邻居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往来，(西班牙) 不得不允许英国人通过西班牙
的港口同印第安人做买卖。”^[244]

作为在西南部对付美国土地投机商，保护皮货商的西班牙不能像英
国在西北部地区扮演的同一角色那样成功，特别是由于非西班牙人在路
易斯安那 (Louisiana) 和佛罗里达当地经济中发挥了大的作用。西班牙
永远无法把 (所有新近获得的) 这些地区融于它自己的殖民地制度之
中，这预兆着 (分别在1815和1819年) 使两个殖民地落入美国手
中。^[245]

新的美国在南北美洲不仅仅是一个要寻求经济利益的新的 大国。它
也是殖民者独立的一个象征。它信奉共和主义这一原则。但是共和国是
什么？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是包括自由贸易、自由人和平等的一种思
想体系。我们恰恰刚刚看到，美国在1780年代并没有鼓励自由贸易。正
如麦科伊 (McCoy) 观察的那样，1780年代的商业危机确实“对美国人
看待他们自己和他们社会的方式起了深远的、使人不安的影响。”^[246]对
外贸易方面的失败毫无疑问是造成1783至1791年间宪法危机的诸因素之
一，而当时新的州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存在下去还是个问
题。但是，长远地看，在美国展示自己并认为自己是殖民者争取独立的
一个榜样的范围内，对于世界体系最为重要的是它如何解决这一阶段内
自由人和平等的问题。

自由人的问题并没有围绕土著美洲人反复出现。他们位于这个领域之外（直到1924年在美国宪法上仍是这样规定的）。殖民者们想迫使印第安人离开他们的土地，并不想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把他们当作一种劳动力来进行合作。^[247]黑人，大都是奴隶的黑人，不在这个领域之外。他们是一个整体，确实是生产过程中的中坚。1774年，13个殖民地（Thirteen Colonies）（不包括印第安人）的人口是230万。当然，其中20%是黑奴，另外1%是自由的黑人。^[248]18世纪运到美洲的奴隶数量平稳地增加。^[249]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契约劳动力制度的严重崩溃和最终消除。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情况是，17世纪契约劳动力主要是英国人，但是在18世纪，契约劳动力中的种族成分有了变化，当时大部分是德国人（Germans）、瑞士人（Swiss）、苏格兰人（Scots）、苏格兰—爱尔兰人（Scotch-Irish）、爱尔兰人等等。^[250]殖民地时代的最后20年间，北部主要城市中“迅速地放弃了契约劳动力”。这样做当然部分是由于经济困难，并且甚至确实导致了手工业工人对“奴隶劳动力竞争作法的不满”以及对奴隶的进攻。^[251]但是，较长期的原因是，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提供奴隶比提供契约劳动力的弹性更大，因此，由于前者的需求量，后者的成本也大大提高。^[252]

当杰弗逊（Jefferson）想把谴责乔治三世不许在废除奴隶贸易方面做出努力的一段写入《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不仅受到来自拥有众多奴隶的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的代表的“激烈反对”，而且受到那些把奴隶贸易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意的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Rhode Island）的代表的“激烈反对”。^[253]甚至在北部各州中也有奴隶，如果那里的奴隶数目“相对的少”的话，但还是“常见的和能让人接受的。”^[254]当英国和殖民地人都考虑有可能把黑奴作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战士对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尽管这个想法甚至在英国也不太受欢迎，但是“战争展示了它遇到的现实情况。”一开始，英国人从黑奴中征兵，然后，尽管很不情愿，但大陆会议和北部各州也从黑奴中征兵，把给予他们自由作为“他们效忠行为的一种回报。”^[255]

黑人（自由人和奴隶），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周旋。那些成为效忠派的人“不太倾向于英国，而更倾向于黑人（proBlack）。”他们把自己视为“黑人解放的鼓吹者”。^[256]另一些人参加了革命事业，因而在根除奴隶制的过程中做出了贡献。在战争结束时，根除奴隶制的活动在除纽约州（New York）和新泽西州之外的所有北部各州中展开。^[257]很明显，关于各州根除奴隶制的信息至多是混杂的。而且战后奴隶制的模式在各州也不一样。1787年的西北土地法令确实禁止了这一地区的奴隶制。而且在大陆会议上，奴隶贸易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个著名的妥协案，也就是全面废除奴隶贸易的妥协案是在20年（1808年）前后才生效的。这一妥协案具有的一个重要的副作用就是把奴隶制“进一步地”赶到了“南方”。^[258]几年以后，即1857年，大法官（Chief Justice）塔尼（Roger Taney）曾在斯考特判决案（Dred Scott decision）中宣布，正如1787年时那样，黑人“不具有一个人应考虑的那些权利。”正如利特沃克（Litwack）讲得那样，“这不是在道德上麻木不仁的一个标志，而是一个重要的史实。”^[259]殖民地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中没有包括黑人的权利。

然而，当时至少所有的白人是否都享有平等权呢？并不十分如此。我们知道，在导致独立战争爆发的那个时期，不平等的状况日趋严重。问题在于是战争本身，还是战争随即带来的后果对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的程度和正在形成的政治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最初把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国王的效忠派和反叛者分裂开的是对待（被广泛认为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英国政治的态度，而不是对它的感性认识。辉格党人（Whigs）认为，他们造反是为了英国民族主义的理想；托利党人（Tories）认为，应保持对王权（Crown）的忠诚，尽管内阁是愚蠢的。同意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行动是后来才出现的。正是“革命事件的进展，才促使美洲人不可抗拒地构成建立一个国家的思想。”^[260]这是要记住的重要一点，因为正在形成的一种民族主义的原动力，对于社会上对不平等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

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看一看谁对革命是冷淡的。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在革命初期，只有一小部分人坚决地参加或不参加革命，如同在绝大多革命情况下那样。大多数人是“犹豫不决的、害怕的、动摇不定的和优柔寡断的。”^[261]看来托利主义（Toryism）（或至少是效忠主义）在3个地区有它最强大的立足点。一个是由中部殖民地的沿海区域构成的地区，这便是社会保守主义的托利主义。他们就是害怕新英格兰活动家是“激进的平等主义者”的那些人。^[262]他们就是把自己看作是与其它殖民地的人民就“美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宪法”而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战斗的那些人。如果一个人把托利党人与爱国者（Patriots）进行比较，他可以把这说成是一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爱国者是想变化的一方，他们反对保持现状的托利党一方。^[263]这就是作为一场社会革命的美国革命神话的基础，而这个神话看来在某一点上是有道理的。

但是，还有另外的托利党人。这第二类托利党人的主要成员是从佐治亚州（Georgia）到佛蒙特州的边疆人，他们在西部北卡罗来纳州的管理者运动（Regulator Movement）中最为著名。“无论在哪些海员、渔民、看矿山人和商人的人数多于农民和种植者人数的地方，那里的托利党人就会多于辉格党人。”^[264]有些效忠派指望英国政府对东海岸贪婪的土地投机商们进行控制。正如我们刚刚读到的那样，恐怖心理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明的，爱国的殖民地人使边疆人遭到厄运。也许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遭厄运的”，但是毫无疑问，美国革命加速了他们遭厄运的过程。对于这些效忠派来讲，爱国者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力量而不是激进的力量。

还有第三种反抗力量，即“文化少数民族”，他们中所有的人看上去都表现出一种较高级别的效忠主义。这批人与边疆人中的一些人是一样的，他们更多地受到贫困的困扰。从宾夕法尼亚到佐治亚，内陆的州“大部分居民”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内陆人和沿海居民血

统的不同最主要是表现在南、北卡罗来纳（Carolinas），在那事实上发生了最严重的冲突。^[265]宗教的少数派和少数民族（当然他们常常是相同的）也倾向效忠主义。北部殖民地的圣公会成员（Episcopolians），南部殖民地的长老会信徒（Presbyterians），各地的虔信派教徒（Pietists）和浸礼会教徒（Baptrists）并不倾向革命事业。^[266]所有这些人怀疑新的国家的和民族主义的主流派会考虑他们的利益。他们担心强调了个人利益会根除他们的群体利益。

因此，谈到保护社会特权，有这样的效忠派，他们是效忠派，因为他们害怕平等的趋向，而且还有另一种效忠派，他们因为完全相反的原因而成为效忠派。最后，帕尔默（Palmer）的评价看来是十分公正的：“爱国者是那些看到与英国决裂会带来更多机会的人；而效忠派多为那些从与英国的联系中得到好处的人，”或人们可以补充说，他们至少是那些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从与英国的决裂中得到好处的人。^[267]

最后一个考虑。为什么可能会被称为左派的托利主义不比它以前更不强大呢？这些人不是爱国者（Patriots），恰恰是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不享有平等权利的绝大多数人。因为它曾经在政治上强大过，很可能是这些殖民者永远不会打赢同英国的战争。摩根（Morgan）指出，在培根叛乱（Bacons Rebellion）^[268]的1676年和1776年的气氛之间，这种阶级冲突的强度有何等的不同。他说，在两次事件之间，“奴隶制的膨胀抑制了一个自由的、受压迫的较低阶级，相应地扩大了白人的社会和经济机遇。”^[269]

对于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社会影响的矛盾心理一直延续到1783年以后。两极分化的现实事实上增长了。比如，如果波士顿（Boston）这个推动革命的激进城市在革命之前就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的话，在革命之后，“会发展起一个更不平等的社会”。^[270]在1783年以后的时期，当新英格兰（New England）商人们发现英国人的报答是把他们排除在西印

度群岛之外时，他们靠“收债”来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在马萨诸塞西部的小农抱怨时，镇压性的立法使接着颁发了，它“促使很多农民直接采取行动，”这就是1786年称为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的暴动。^[271]它被镇压下去了。

这种矛盾心理便是1787年起草宪法（Constitution）的原因。比尔德学派（Beardian）的解释^[272]与美国在50和60年代的庆典中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正是比尔德学派时宪法的解释是有价值的。如果社会革命家在发动革命时发挥了大的作用的话，他们激进的行为随着革命的具体进程更强大了一些的话，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看上去显然是代表了试图阻止这一行为的一种企图。1776年引人注目的、受欢迎的领袖人物们没有出席1787年的制宪会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民主而痛惜并且同意建立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来除去由于邪恶势力而使国家受到困扰的恶行。”^[273]这一事件是如此有影响，以至于废除了认可程序，这便导致了1791年的会议，通过了宪法的头10个宪法修正案（Aments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即人权法案（the Bill of Rights）。^[274]

如果1783年的和平为美国开辟了一个大的变化不定的阶段，长远来看，这对于拉丁美洲是更为严峻的，因为西班牙恰恰不仅要解决她自己的人口问题，对付她以前的欧洲对手，而且现在还要对付美国。^[275]在一种程度上，这对于西班牙殖民地经济是一个黄金时代。1782至1796年（西班牙和大英帝国再次开战的一年，而且英国海军的一次封锁破坏了贸易）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年平均出口量是1778年（在西班牙与大英帝国开战前）出口量的四倍多。特别是在1784至1785年间，贸易有“巨大的发展”。^[276]这部分是由于西班牙严厉地减少了非法贸易的数量。这一能力在1761年以后一直平稳地增长。^[277]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放在世界经济全面增长的背景下来考虑，这一黄金时代只是“短暂的”，在1778年宣布贸易自由（comercio libre）和

1796年英国海上封锁之间，西班牙的贸易扩张看上去也是“不太引人注目的”。^[278]斯坦因派（the Steins）甚至谈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民族主义经济方面做出的努力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回报”。伊比利亚（Iberian）的殖民地贸易仅仅“支撑着‘野蛮人的大厦’，而这并不正好是准备对付大的危机的办法。”^[279]拉丁美洲的地方性手工业和制造业生产由于西班牙对贸易的解放而“受到了危害”。但是，这对于宗主国西班牙仅仅是暂时有利，因为西班牙作为一个物质生产国和资本输出国是不能与大英帝国相匹敌的。因此，正是在加拉加斯（Caracas）和拉普拉塔（La Plata）这些外国渗透最厉害的地方，一些殖民者开始考虑“如果他们只得摆脱西班牙的束缚的话”，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一黄金景象就要到来。”^[280]同时，由于英国商人可以立即从废除垄断权方面获利，^[281]因而在加的斯（Cádiz）和里斯本（Lisbon）的英国商人们“看起来特别幸运和幸福。”此外，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西班牙反对干涉他人事务的人的作法本身在政治上对西班牙是产生副作用的，因为以前这些干涉他人事务的英国人“依靠向西班牙统治的美洲（Spanish-American）殖民地提供所需的东西，使他们不至于尽早地起来反对西班牙的统治。”^[282]

当然，在1780年代这个短暂的间歇期间，在拉丁美洲，没有什么事件发生，而美国也正在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困难。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令人不安。但是，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圣多明各（St.Domingue）正在酝酿一个运动的进程，这便导致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的出现。通过暴力斗争而诞生的海地（Haiti），在南北美洲历史上，是比我们以往想象得要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应赞誉它为加速和澄清世界其他地方殖民地独立的模式所做的贡献。自治的思想，遭到某些希望把个人权利（以及因此可以共同分享对任何潜在的自主权的控制）给予所谓的“自由混血人”（一种合法的人种）并甚至想解放奴隶的人的反对。^[283]回应是迅速的。在1790年4月15日，法国国民议会（the general Assembly）驻圣多明各的地区代表

（Sector）在圣马克（Saint-Marc）聚会，拒绝接受殖民地这一头衔。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谢瓦拉利（B.de la Chavelerie）提出了下列问题：“人们根据什么精明的推理得出他们可以把自由的和独立的征服者置于最令人惊讶的专制控制之下的结论？”^[284]（1776年的阴影）。

区别就在于，在法国，革命宣称其目的是要终止在法律上的特权，而在圣多明各的白人殖民者却宣称要“在政治上不存在其他自由人和.....在政治上以及在民间没有奴隶”的基础上建立自治政权。简言之，他们想给“一个据有支配地位的特权阶级”永久的法律地位。^[285]但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失败了。

1790年，法国的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模棱两可地给予在圣多明各的有产黑白混血人投票权。当黑白混血人种的一位政治领袖回到圣多明各并准备组织起义从而实行这一权利时，他受到逮捕、遭到拷打并被处死。国民大会气愤了，通过了另一个不太模棱两可的法令。白人殖民者起来反对法国和黑白混血人。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黑奴的第一个暴动突然爆发了。如同在法国的其他殖民地，如法兰西岛（Isle-de-France）和波旁岛（Isle de Bourbon）发生的那样，种植园主和富有的黑白混血种人在没有组成政府的“阶级联盟”的情况下起来反对贫穷的白人、黑白混血种人和黑奴，一场“种族战争”开始了。^[286]

这场种族战争并不是当白人殖民者最初试图获得他们纯种族性自治时的那种战争。也不是在巴黎的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French Revolutionaries）想要进行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保护领土”的原则性是很强的。^[287]这也不是“自由有色人”——常常是那些富有的、拥有奴隶的黑白混血种人——在他们申明自己的平等权利时想干的。但是这场种族战争是黑奴们自己想发动的，这只能被看作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上最成功的奴隶暴动。当时在圣多明各开始了“三次内战”时期，这便是三个相继发生的起义——“重要的白人投石党，黑白混血种人的造反以

及黑人的革命。”^[288]

这一形势使在那个地区的四个国家——法国、大英帝国、美国和西班牙都感到惊恐、害怕和不满。法国国民议会和美国制宪会议对这一形势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疑惑不解的。但是总的来讲，制宪会议是支持黑白混血人种的，犹如一个文明的过渡期的保护者那样。正如塞泽尔（Césaire）讲的那样，在巴黎的著名的黑人友社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是“第一个和最重要的黑白混血种人社团（*Society of the mulattoes*）。”^[289]

对英国来讲，大英帝国和法国的战争在1793年2月一爆发，白人殖民者便要求英国给予支持，并秘密地与英国达成协议。^[290]英国把这看作是破坏法国贸易的一个好时机。英国派出了一个远征军，但是他们对圣多明各的占领遭到了严重的反击，成为“英国军事史上最大的灾难。”^[291]英国的干涉使法军、西班牙军和英军都争取奴隶的支持，这实际上“明显地扩大了当时软弱无力的（奴隶）暴动的规模，并且使它从可能快要濒临失败的边缘解救出来。”^[292]

但是，和英国一样害怕“自由的病毒可能会在奴隶暴动的过程中传染其他奴隶”的美国，对英国的干涉“根本不感到兴奋”。而英国的干涉威胁着美国的贸易伙伴圣多明各，要把它也置于“航海制度管辖之列。”^[293]因此美国尽力保持并扩大其为圣多明各粮食供应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不发生任何政治关系。^[294]

当然，西班牙人也对英国保持同样的警惕。岛的东半部是他们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殖民地。黑人革命除了被压制之外，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展开。那里的经济状况也不一样（从事家畜饲养和维持农业生产，而不是种植蔗糖）。人口统计学角度看也不一样——那里有白人、获得自由的奴隶（*libertos*）（大多是黑白混血种人，但也有一些黑人），还有相同比例的黑奴。最后，社会结构也不一样。不像黑白混血

种人在圣多明各那样，获得自由的奴隶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西班牙政府能够更严格地控制他们。[\[295\]](#)西班牙对圣多明各最初的干涉并不比英国的干涉更为成功。

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能够利用法—英战争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建立了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他使种植业继续发展，靠把种植业的产品1/4分给黑人工人来把他们限制在种植业行业内。但是随着欧洲人暂时停止了他们之间的战争，他们把对黑人共和国的担忧变为企图扼杀它这样一种新的念头。1802年拿破仑的军队逮捕了杜桑。西班牙、美国和大英帝国都在企图重新建立殖民地方面默然地与法国勾结在一起。尽管这个岛屿独立了并在一定时期内有两个政府存在，但四个大国在一段时间内根本“没有考虑”承认它的独立。[\[296\]](#)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也许可以说，尽管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和混血种人统治的海地南部的两个继任国之一的总督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有着友好却又存在分歧的联系，然而圣多明各的黑人革命减缓了拉丁美洲争取独立的速度。圣多明各的作用是不仅向欧洲大国灌输了大量谨慎行事的思想，而且也使在南北美洲的白人殖民者感到应谨慎行事。[\[297\]](#)

正是在这同一时期，一场爱尔兰革命（**Irish revolution**）结束了。这场革命的前景最初看上去是由横扫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同一股浪潮席卷的，但后来却形成了一种社会革命的框架。爱尔兰首先扮演了使英国陷入1760年代帝国危机的角色。从某些方面看，大英帝国在北美不断地重复地表现出来并使用它已为爱尔兰的革命形势制订的态度和政策。[\[298\]](#)爱尔兰本身在很多方面比英属北美的状况差得多。英国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殖民者对稠密的爱尔兰天主教（**Catholic**）农民人口强行进行统治，而不是对一批居住分散大量从事狩猎的部落进行统治。这种形式在结构上更类似于秘鲁或中墨西哥，而不同于13个殖民地。[\[299\]](#)

但是，信奉天主教的殖民者们（如同在1691年时那样）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一点说明，正是那些信奉基督新教的殖民者才感到“英国在贸易戒备状态方面所带来的全部压力。”因此，正是这个“受到信任的‘驻军’（被）当作贸易方面的一个威胁者。”^[300]信奉基督新教的殖民者甚至没被准许建立一个造船业 [在新英格兰的殖民者（the New England settlers）却有]，而爱尔兰也没被准许成为美洲和欧洲之间的一个货物集散地。的确，直率的北美殖民者当时的一个担心就是他们可能会被迫使处于“爱尔兰北部所处的那种悲惨的境地。”^[301]

因此，随着法国在七年战争中战败，一个“盎格鲁-爱尔兰（Anglo-Irish）民族主义的殖民思想”^[302]发展起来了，其发展的原因如同在北美一样。在爱尔兰议会中，出现了一个称为爱国者（Patriots）的改革派。就在同一时期，汤生（C.Townshend）正试图把印花税法案强加给英属北美殖民地，他派自己的长兄乔治作为副总督长官（Lord Lieutenant）到爱尔兰“加强了英国的直接控制，使爱尔兰也为帝国支付一大笔防务开支。”^[303]这明显地说明为什么北美和爱尔兰的殖民者感到他们都对宪法表示不满，并把宪法作为攻击的目标。因此，在1775年很多爱尔兰人“自然而然地”对北美洲人表示“同情”——就是很多信奉基督新教的爱尔兰人，因为信奉天主教的教徒趋向于支持英国在美洲的政策。^[304]

事实上，美国革命使爱尔兰的经济形势恶化了。英国的战败激起了对爱尔兰的需求。1782年英国愿意给予爱尔兰更大的政治自治权。庇特（Pitt）甚至提出了经济特许权的观点，但是这种特许权是在爱尔兰共同担负帝国的防务开支情况下才有的。^[305]1783年与法国签署和平条约之后，英国的方针立即进一步强硬了。^[306]爱尔兰的爱国者们仍旧没有为争取独立做好准备，因为他们没有为创造“一个包容一切的党”做好准备，他们也没有为组织“一个完全全国性的运动”做好准备。^[307]（当时如同在20世纪时一样）他们担心会发生国内社会革命，这一担心使他们裹足不前。

法国革命对爱尔兰影响极大，为它开辟了新的机会。天主教和信奉基督新教的持不同政见者（Dissenters）开始组织在一起以进行实现反叛性共和国计划。天主教徒要求解放（Emanicipation）。信奉天主教的佃户也开始起来反对地主（基督新教徒）的压迫。正是在1795年这一时刻，橙带协会（Orange Society）作为基督新教社会的一个秘密组织组成了，进而反对天主教徒的要求。1796年爱尔兰联合会（United Irishmen）这一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托恩（Wolfe Tone）从美国来到巴黎，帮助计划一项对爱尔兰的远征。他使执政府（Directory）相信爱尔兰“已经孕育着一场革命”^[308]他不仅指望天主教徒的支持，而且期待北爱尔兰厄尔斯特（Ulster）的基督新教徒的支持，因为他们具有长期的共和的传统，他们的领导人以1688年发生的先例证实他们要求法国人的支持是对的。^[309]

入侵失败，天气恶劣，航海技术不佳。法国人选择登陆地点班特里湾（Bantry Bay）也选得不好。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在这个地区只有很少人支持，但爱尔兰人差一点就获得了成功。英国在爱尔兰的领地此时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310]班特里湾是个转折点，它对世界体系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如汤普森（Thompson）所说：“法国失去欧洲，不是在莫斯科之后，而是在1797年，这是可以论证的。当时在叛乱前夕，只有叛变的海军站在法国人和爱尔兰之间。”^[311]

爱尔兰人联合会的谋反在1798年仍在进行。厄尔斯特长老会的教友（Ulster Presbyterians）此时对法国革命的信心已经冷却，而橙带秘密会社（Orange lodge）的力量却日益壮大。英国人对反叛者毫不留情，拿破仑决定不进行第二次入侵而将军队转向征服埃及，据说对此决定拿破仑甚为懊悔。革命者的失败也影响了爱尔兰议会中像格拉顿（Arthur Grattan）这样的温和改良派的地位。英国人决定强行废除1782年的改革。庇特（Pitt, William）在1800年努力通过了联合法案（Act of Union），爱尔兰议会已不复存在。新教徒移民事实上放弃了（被迫放

弃)关于自治的一切希望,因为他们害怕这是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自治,是一种过于民主的自治。[\[312\]](#)

至此,18世纪90年代经历了白人移民者的两次重大失败——在圣多明各(St.Domingue)和在爱尔兰。两者历史状况不同,最后的结局也不同——海地的黑人共和国被放弃,爱尔兰重新统一于殖民地母国。但是两者都是一个信号,警告美洲的白种人移民,走向建立移民共和国的道路十分艰难,布满危险。如果有人想取得期望的结果,那么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榜样是很难效法的。18世纪90年代的海地和爱尔兰就是步了80年代阿马鲁(Túpac Amaru)和公社派(Comuneros)的后尘。独立无疑是一桩冒险的事。

所以,那时像米兰达(Miranda)和玻利瓦尔(Bolivar)那样倡导移民革命的人在极大程度上只得到谨慎的信任就不足为奇了。然后,一个事件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形势:拿破仑在1808年入侵西班牙。但在我们讨论为什么这一事件能使美洲移民独立事业具体化并赋予事业新生命之前,我们必须来看看在此之前在那唯一存在的移民共和国内发生了些什么事。

对年青的美国来说,1793至1807年是“非常繁荣的年代”。在回顾起来似乎是美国经济历时甚久的增长模式中,这个时期是一个特别“增长”的时期,因为美国利用了它在英法战事时的“中立”场面获取了横越大西洋贸易的很大一部分。[\[313\]](#)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是由于美国在1794年作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决策,即把他们的“中立”,向他们的前殖民主子英国这可能的胜利者和霸权大国倾斜。实际上,1793年爆发的战争促成了1794年以杰伊条约(Jay's Treaty)形式出现的这个决策。英国曾拒绝承认美国要求战事时期同法属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全部权利,美国作为报答,心照不宣地在归还西部港口(它们自1783年起一直是美国的合法领土)和要求在英属

西印度群岛上有新贸易权的问题上给予让步。^[314]条款基本上不利于美国，但美国比英国更怕与对方开战。从根本上说，杰伊条约“延缓了英美之间的对抗”，直到形势对美国更为有利的1812年。^[315]在此期间，美国把这条约看作是为了英国工业的利益和美国自由贸易的保证。^[316]

在美国作出这个具有战略性选择的决策后面，看来有两方面巨大的经济压力。运输业的经济因素仍使美国处于从对外贸易中赚取大部分收入的状况，虽然后来在1820年后这情况有了变化。^[317]第二个因素是由于1793年发明了轧棉机，美国南方有机会复兴农业。革命战争对早期南方有相当大的破坏性，他们的主要物产靛青和大米似乎不可能有广大的市场。^[318]18世纪90年代的南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农作物”。^[319]棉花正是这样的新作物，棉花需要英国这个主顾。^[320]

的确，美国和英国达成的这笔政治地理和经济的交易，对力量软弱的伙伴有它不利的方面，它降低了美国制造厂的发展速度。纵然在1793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外贸能赚得高额利润”，^[321]但美国工厂作为投资场所是无法参加竞争的。1808年，有位美国作家奇塔姆（James Cheetham）曾吹嘘过这个事实，说美国“像施了魔法似的，成了世界上最大贸易国的一帆风顺的对手。”^[322]欧洲重新出现的敌对行为戳穿了这种天真的气泡，也许对美国来说是件幸事。1807年11月11日，英国全面禁止美国同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港口进行贸易。杰弗逊总统（Thomas Jefferson）企图对英法两国都实行禁运以便对他们施加压力。1808年的禁运法案只实施了一年，结果反而对美国有害，^[323]但它最终导致了1812年重燃和英国的冲突，我们以后还要来谈这个问题。它当时使美国在美洲非殖民化过程中重新充当了英国对手和合作者的角色。^[324]

关于美国人尤其是法国革命对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人们思想上所起的精神鼓舞作用已经写了很多。无疑这是事实，至少对某些阶层来说是如此。但是，在最后的政治结局使得革命思想传布的重要性似为可信的

情况下，事后很容易夸大革命思想传布的重要性。艾扎奎尔

（Eyzaguirre）对智利作的结论可能实际上更合乎事实：“不能证明法国革命是独立主义思想的催化剂；它甚至可能正好相反是西属美洲克里奥人重申他们对君主国忠心的适当时机。”^[325]

1793至1796年，西班牙与革命的法国交战。但是西班牙首相戈多伊（Manúel de Godoy）在1796年签订圣伊尔德丰索条约（Treaty of San Ildefonso）使西班牙和法国结成联盟。英国则以切断西班牙和美洲的海上联系作为报复。^[326]但英国此时不愿对蓬勃发展的移民独立运动给予任何重大支持。^[327]

无论如何，查理三世实行的使西班牙重新繁荣昌盛的新保护主义和帝国内部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经济改革，其全部经济影响在1797至1814年间“全化为乌有”。^[328]其改革对西属美洲的一些地区也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委内瑞拉在1797年陷入了经济困境。反应之一是走私的合法化。^[329]墨西哥物价猛涨加剧了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以及非特权阶层中的不满情绪。^[330]但这些困难周期性地一再出现，若是在另一种政治地理条件下，本不会产生多少重大的政治影响。

1806年，一支未经批准的英国远征军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当地居民证明忠于西班牙并成功地打退了远征军，事实证明居民“不愿再更换另一个帝国主子”。^[331]同年，米兰达解放委内瑞拉的一支小远征军遭到失败，从表面上看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海地人的援助。^[332]即使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不久就充当调停人），显然也缺乏独立的热情。

所有这一切突然起了变化。1807年，拿破仑劝诱西班牙同法国一起征服葡萄牙。若奥（Dom João）逃亡巴西。戈多伊允许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转道葡萄牙，导致了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行动和戈多伊的下台。查理四世（Charles IV）被其子费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废黜。费迪南被拿破仑召至巴荣纳（Bayonne）后将王位归还查理，但查理立

即让位于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费迪南也放弃了他的权利。西班牙王国突然没有了合法当权者。中央执政团（Júnta）在塞维利亚（Seville）僭取政权并和英国签订盟约。执政团宣称美洲属地不再是殖民地，并邀请他们参加议会（cortés）。但法国人强迫执政团逃至加的斯（Cádiz），后即解散。西属美洲一片混乱。“爱国主义者”组织的地方委员会在多处以费迪南名义取代西班牙当局接管政权。现在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人以效忠的名义事实上自己管理自己。^[333]1810年加拉加斯的地方会议更进一步，它们以效忠费迪南七世的名义，毫不隐讳地不承认新成立的西班牙摄政评议会（Spanish Council of Regency，加的斯顶替会议的机构）为权力机构。随后发生了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的叛乱，他们都宣称他们的港口允许自由贸易。玻利瓦尔于1810年赴伦敦，受到外交大臣韦尔斯利勋爵（Lord Wellesley）的接待，他劝告玻利瓦尔“继续效忠西班牙将是取得美国援助的最佳途径。”^[334]

墨西哥的革命已证明从社会意义上说是最激进的革命。1810年有一个教区的牧师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 y Castilia）在他所著《多洛雷斯呼声》（*Grito de Dolores*）一书（他是抄《陈情书》的书名吗？）中号召永远取消总督。他联合一切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组织反对总督以及西班牙当局。伊达尔戈领导的起义横扫墨西哥中部，“传播恐怖和惊骇”。“实际上没有武器的”印第安人便转移到首都，在途中吸收了20000人，并在估计总共有15000的居民中，处决了2000个西班牙人。伊达尔戈起义被新西班牙强大的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兵团所扑灭。伊达尔戈下面的一个中尉莫雷洛斯（José Maria Morelos）也是位牧师，他成了斗争的领导人。这次他创建了一支“组织精良和有战斗力的军队”，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激进社会改革在内的明确政治纲领。在起义的第二阶段，比起印第安人来说，得到了更多印欧混血的梅斯蒂索（Mestiso）人的支持。莫雷洛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可被压倒的，但在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代表大会一朝在1813年宣告独立抢先占用了他的政纲时，他的军事力量迅速减弱。^[335]

现在有三个因素决定了西属美洲移民独立最后阶段的范围和特点：那就是英美之间1812年的战事（实际上是1812年至1814年），1813年西班牙费迪南七世恢复王位以及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

1812年战事大概是美国移民非殖民化的最后一幕。自1783年起，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一直阴影重重，但还没有真正破裂。英国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市场而不是一个竞争者，而美国则企图改善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英法战争对美国说来既是一个机会，又令美国恼火。当英国的海上地位变得无可匹敌时，美国对英国对其贸易限制的愤怒也越益加深。所以战争在大陆再次爆发时，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或征服加拿大的机会来了。^[336]在某一方面来说，美国在战争中表现不好。于是无论在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中还是在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中，现在对与美国合并一事都无甚热情了。^[337]加拿大仍属英国，毛皮贸易的重要性减少了。^[338]英国在海运业航海法所作的种种限制方面并未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339]英国在根特条约中（Treaty of Ghent）所作出的全部让步只是模糊地认可美国有权向西和向南扩张，^[340]以及在美洲非殖民化过程中对未来发展有发言权（至少是一种后辈的发言权）。当然，这点极为重要。^[341]

英美战事于西班牙危急时刻爆发。由于拿破仑的失败，费迪南在1814年恢复王位。他废止了1812年的自由主义宪法并企图恢复包括西属美洲在内的旧况。西属美洲的大多数起义在一年之内均被费迪南的军队平靖。玻利瓦尔人曾这样写过1812年的战事，“委内瑞拉本可以单枪匹马地取胜，那样南美洲原可不受西班牙残酷统治的蹂躏和被革命无政府状态所摧毁。”^[342]

从很短时期来看，玻利瓦尔也许是对的。但是实际上西班牙的复辟保证了西属美洲稍稍迟到的独立。费迪南的复位使美国和英国放开手脚随其所好去支持移民运动。^[343]而且，根特条约也打消了美国和英国害怕这些独立会对对方有利的共同念头。

最后是维也纳会议，它在支持正统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基础上建立了和平，并与希望者意愿相反，削弱了西班牙对西属美洲的主权要求。主要的欧洲列强害怕西班牙的镇压措施“不大可能有效”，导致西属美洲独立的革命可能会“鼓励欧洲的自由派革命”。因而他们更情愿西班牙给予殖民地“让步”。^[344]这就更进一步使英国放手在拉丁美洲谋求她的商业利益，特别是拉丁美洲现在已经成为英国扩大棉织品销售的主要地区。^[345]

移民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楚现在已没有重大障碍的独立会真正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落入其他团体手里。斗争的第二回合开始了，不同殖民地斗争形式的许多差别，是西属美洲克里奥尔白种人、黑人、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mestizo）、帕多人（Parcilo）、黑白混血人关系的结果。确实，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特权阶层对立即独立问题的拥护、反对或又赞成又反对的程度，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对“包括群众实在的或潜在的反叛意识所需条件”^[346]的评价决定的。一旦西班牙王国开始解体，许多原先对独立心存怀疑的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都觉得有必要转向有胜利把握的一方，他们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从西班牙手里夺取政权，而“主要在防止梅斯蒂索人夺取政权。”^[347]我们不需用秘鲁和墨西哥的勉强的、太迟的和多少保守的独立运动来证明，在拉普拉塔和委内瑞拉激进先锋的独立运动中，就可以看出这点。

拉普拉塔是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占极大比例的一个殖民地，也许占人口的一半。这殖民地可以轻易地支持以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为基础的革命，因为在拉普拉塔，对印第安人、黑人、梅斯蒂索人和帕多人，都采取“开明”的态度。在拉普拉塔，就和以前在英属北美洲一样，殖民统治者和移民革命者“开始都犹豫不决”地想招募黑人和帕多人士兵入伍，答应最后给他们自由。^[348]就像在英属北美洲那样，黑人从中得到了少许好处，但是付出了重大死伤的代价。印第安人从土著居民村落（委托监护地）（enconciéuda）中获得了自由，但只被招募在甘蔗种植园作强

迫劳动的苦工，而梅斯蒂索和高乔（gaucho）人的混血儿被迫在牧场劳作。

委内瑞拉有许多大地主领地，奴隶制和苦工问题比拉普拉塔的还要严重。白种人只占人口的20%，其中许多人还是白种穷人，通常属加那利（Canary）血统。当玻利瓦尔在1816年重新发起斗争时，他从海地到达委内瑞拉时，他看到“有需要将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帕多人和奴隶的起义融合成一个巨大的运动。”^[349]玻利瓦尔允诺解放委内瑞拉和其他地方的奴隶。^[350]但是他未能强迫他的大农场主同胞实行废奴，因而黑奴对独立渐渐失去热情并转入中立。^[351]后来在1854年才实现全面废除黑奴。^[352]玻利瓦尔本人为了报复早期海地人的支持，后来拒绝承认海地，也拒绝邀请海地参加1826年的巴拿马会议。确实，“由于害怕建立另一个海地……不去侵犯古巴成了一个决策。”^[353]

现在西属美洲国家接二连三相继独立，经过了含糊不清的，或激烈的，或保守的革命。^[354]他们一个个地向前进，玻利瓦尔关于模仿十三个殖民地所创立的联邦公式的梦想失败了。当然，牵涉到的地域要分散得多，因此不可能把建立美国过程中军事斗争一个重要因素统一起来。玻利瓦尔于1826年6月召开的巴拿马会议也全盘失败。

1823年独立有了结果。英国国务大臣坎宁（George Canning）和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争先恐后想知道究竟谁能得到给予西属美洲独立确立恩赐的名望。^[355]与此同时，在西班牙1823年4月法国的入侵使费迪南七世得以不受“宪法拥护者”的约束而实行一种“未缓和的反动”政策。从1823到1833年的十年，被人称之为“不吉利的十年”。^[356]但是，费迪南在国内的胜利意味着西班牙在美洲的一切希望，现在注定要失败。^[357]

巴西的情况基本上和西属美洲不相上下。它是同时非殖民化（1789～1831）和英国渗入巴西经济（1810～1827）的一段历史。^[358]巴西在

后庞巴尔（post Pombaline）时期发生了两起“阴谋”，即所谓的1788至1789年吉拉斯（Minas Gerais）的小团体密谋（Inconfidencia mineira）和1798年的巴伊亚联合（Conjurācao Bahia）起义。^[359]它们都在早期企图独立。第一次是由克里奥尔人上层阶级领导的抗议税收的“先兆”。^[360]第二次在城市中发生，性质更为激进，“主旨在黑白混血（mulatto）人、自由黑人和奴隶举行武装起义”。^[361]它特别受到法国革命的鼓舞，企求“一个完全的革命”，以便建立一个“白种人、黑人和黑白混血人（mulatto）之间没有区别”的社会。^[362]

同样在巴西，拿破仑由于迫使摄政王子若奥（Dom João）出逃至巴西，使事态突然发生变化。当然，这形成了和西班牙废黜王位不同的情况。葡萄牙国王可以准备合法地转变到最终的独立。若奥在1815年没有回葡萄牙而是把巴西提高到地位平等的王国，并把双君主政体的中心设在巴西。结果葡萄牙实际上由里斯本一个摄政委员会统治〔后来它由一个英国元帅贝雷斯福德（Beresford）做主席，贝雷斯福德是葡萄牙军队的总司令，军队重新占领了葡萄牙直到后来〕。

1820至1821年，爆发了一次自由主义的叛乱并通过了新宪法。叛乱蔓延至巴西。代表克里奥尔人上层阶级的“巴西人民党”“赢得了最高权力”，而平民阶级不能“得到他们的要求。”^[363]葡萄牙人帮助巴西人实现独立的愿望。有个葡萄牙议员莫拉（Jose Joaquim Ferreirade Moura）曾为1821年派军队去巴伊亚（Bahia）辩解说，这是因为“由黑人、黑白混血人（mulatto）、克里奥尔人和各种各样欧洲人组成的”巴西人民正处于“沸腾热情”的冲动之中，需要帮助去恢复秩序。^[364]若奥返回葡萄牙，巴西人现在害怕他们不会有充分的平等。他们从效忠国王若奥六世转而效忠摄政王子佩德罗（Dom Pedro），人们劝说他留了下来。不久以后，佩德罗于1822年成了巴西皇帝，他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和保护。^[365]

就这样在五十多年中，白种人移民慢慢地在西半球建立起一个个国家，它们成了国际体系的成员。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法都受到新的霸权大国英国的保护，虽然美国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助手的角色，因而也是英国潜在的和最终的对手。

海地是个例外，海地是被排斥的。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有效地被排除担任任何角色，但是黑人和印第安人也毫无地位。莫雷洛斯有关他能以欧洲法治理论为榜样建立一个宣告“古阿兹特克（Aztec）人是本国之本”的共和国的梦想，仍是一个被粉碎的梦。^[366]新的民族主义“几乎全部没有了社会内容。”^[367]

在18世纪后期的伟大革命中——所谓的工业革命，法国革命，美洲的移民独立运动——没有一个能代表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挑战。他们只代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人民的力量受到压制，人民的潜在能力实际上受到政治变革的遏制。这些力量（与其说是他们的继承人）在19世纪将会反思他们的失败并构思出一个完全新的斗争策略，一个更为有组织的系统的和自觉的斗争策略。

[1] 安德鲁斯 (Andrews) (1924, 122)。

[2] 见尼古拉斯 (Nicolas) (1967)；也见惠特森 (Whitson) (1930, 74) 和哈克 (Hacker) (1935, 289~290)。

[3] 引自纳米尔 (Namier) (1930, 320)。当时在魁北克的穆瑞 (Murray) 将军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如果我们明智的话，我们不会要 (加拿大)。新英格兰需要继续不断地吞食一小块土地，我们将给她一小块土地使他忙碌，但却不保留这个国家。”引自赖尔森 (Ryerson) (1960, 197)。后来的学者们同意这一观点：“对加拿大的征服切断了连接在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在物质方面的主要结合物，使得这些殖民地的独立在政治上成为一种可能” (比尔, 1907, 172~173)。

1749年一位法国人科尔姆 (Pierre Kolm) 阐述了恰恰相同的观点：“没有相邻的法国人，美国人会很快切断他们自己与英格兰的关系。”引自维格诺斯 (Vignos, 1928b, 790)。到1758年，法国海军部中一位资深官员实质上已经鼓吹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国在加拿大所扮演的角色已经结束。见埃克尔斯 (Eccles) (1971, 21, 注解96)。众所周知，舒瓦瑟尔预见到这是《巴黎条约》的后果。

[4] 瓦茨 (John Watts) 1764年5月16日写给蒙克顿 (Monckton) 将军的信，引自纳米尔 (Namier) (1930, 327)。

[5] 1760年1月15日莫顿伯爵 (Earl of Morton) 写给哈德威克伯爵 (Earl of Hordwicke) 的信，引自纳米尔 (Mamier) (1930, 323)。

[6] “由于七年战争 (Seven Years' War) (英国) 的国债翻了一番，在美洲建殖民地的年开销是以前的5倍。” (布雷布纳) (Brebner) (1966, 44)。

[7] 贝林 (Bailyn) (1973, 8~9)。

[8] 吉普森 (Gipson) (1950, 102)。

[9] 布雷布纳 (Brebner) (1966, 32)。

[10] 迈尼格 (Meinig) (1986, 295)。

[11] 克里斯蒂和拉巴雷 (Christie & Labaree) (1976, 274)。

[12] 格林 (Greene) (1973a, 79)。

[13] 在这方面，布罗代尔 (Braudel) (1958) 用过这个名词，更广义地讲，用除英文外其他欧洲语言的经济史学家们也用这一名词。

安德鲁斯 (Charles M. Andrews) (1924, 28) 在他关于美国革命 (American Revolution) 的经典

讲座中对这个名词的起源作了我个人认为，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关联性的解释：“因此，英国历史最主要的特点可以用‘扩张’和‘中央集权’的过程这些词归结起来。而扩张和中央集权的过程是在贸易、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这些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实现的。英国关于其殖民地的政策是为了其商人们的贸易利益而确保一个更为严密的和有效的殖民地政府；而对于那些殖民地人民来说，尽管他们接受自己作为效忠王权的臣民的责任，但早就开始为行动上的更大自由而奋斗了，而不是实施在法律上严格规定的作为殖民者的责任。”但是内特尔斯（Nettels）坚持认为，在1763年以前，“殖民地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由于英国的统治而感到极为反感……，（但是）1763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1952，113~114）。给殖民地人民的奖赏减少了，英国的苛求（税收，实行限制等等）极大地增长。

[14] 见埃格纳尔（Egnal）和厄恩斯特（Ernst）（1972，11）。比如，克林格门（Klingaman）发现在1740和1770年间，在种植烟草的殖民地，由于出口烟草和麦子这两类产品，经济增长了35%（1969年，278）。谢泼德（Shepherd）和沃尔顿（Walton）坚持认为：由于造船业和其他贸易活动带来的收入的增加甚至比由“农产品”带来的收入更为重要（1972，158）。但是参阅安德森（T.L Anderson）的不同看法。安德森争辩说，从北美最初的殖民地时期到今天这一长期发展趋势看，“一个凄凉的时期……就是18世纪最初的80年”（1979，256）。

[15] 洛克里奇（Lockridge）（1973，416）。财富集中的另一面是贫困的增加。纳许（Nash）声称，在这一时期，在海港城市中20%的住户处于长期的贫困之中，（1976b，574）这便导致了“一股阶级对抗滚翻的兴起和政治觉悟的提高”（1976a，18）。琼斯（A.H.Jones）在她对美国革命前150年的财富不均状况的研究中指出，不平等确实增加了，“但是并没有急剧地增加”（1980，269）。对于财富极大的不平等的论述持更大怀疑态度的，见布朗（Brown）（1995b）和沃登（Warden）（1976）。另一方面，伯索夫（Berthoef）和穆林（Murrin）提到一种与在欧洲同时代的“封建复苏”情况类似的状况。“到1730年，老的殖民地已经人口稠密到足以使老牌的封建的要求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利的地步……旧的特权被恢复了，因为它们可以带来利润。在殖民地，如同在法国一样，这些要求引起了不满，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愿从更广义的社区福利中获利”（1973，265~267）。

[16] 格林（Greene）（1973b，10）。

[17] 埃格纳尔（Egnal）和厄恩斯特（Ernst）（1972~3）。

[18] 埃格纳尔（Egnal）（1975，192）。

[19] 格林（Greene）（1973a，47，50）。

[20] 哈伯（Harper）（1939，31）。也见哈伯（1942）书中关于计算的论述和明智的评估。迪克森（Dickerson）对于哈伯的攻击，极大地夸大了哈伯的谬误，暗示哈伯相信航海条令（Nanigation Acts）逐步迫使南北美洲沦为毫无希望的贫困的境地（1955，55）。

[21] 托马斯（Thomas）（1965，638）。

[22] 普莱斯 (Price) (1965, 659)。

[23] 在对托马斯的批评中：麦克莱兰讲得很正确 (1969, 376) “只要 (违反实际的假设) 只局限在13年 (1763~1775年) 间, 那么极力夸大…… (由于英国干预海外贸易而使殖民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 (蒙受损失) 的那种能动影响的可能性看上去是十分微小的。”

[24] 他争辩道, 南部种植园主的出口很可能是“不受限制的67%强”, 而南部的全部收入则是2.5%强, “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 [兰塞姆 (Ransom) 1968, 433~434]。记住, 对于托马斯来说, 10%是不重要的。

[25] 托马斯 (1968a, 438)。

[26] 布伦斯 (Broeze) (1973, 678)。

[27] 克鲁斯 (Krooss) (1969, 385)。

[28] 实际上布里登博 (Bridenbaugh) 把这个年代算作是1760年, 这是殖民地城镇商人阶级年景“最好”的一年 (1955年, 282)。也见罗森堡 (Rosenberg) 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价格索引 (1979, 981)。

[29] 哈克 (Hacker) (1935, 293) 指出, “在西印度群岛正在扩大的市场, 英国军需军官的大量开销, 与敌对势力进行的非法和走私贸易, 所有这些都为稳步地雇佣工人和获利地卖出小农的产品提供了条件。”战争的结束导致了失业, 小商人的破产以及缩小了的小农市场。“再者, 逃到边疆区域——这永远是这些被遗弃的人最后的避难处所——的通道已被关闭了” (293~294)。

[30] 施莱辛格 (Schlesinger) (1917, 15)。

[31] 布里登博 (Bridenbaugh) (1955, 251)。

[32] 施莱辛格 (Schlesinger) (1917, 91)。

[33] 沃尔顿和谢泼德 (1979, 175)。不知怎么地, 这些作者感到这表明, 这些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对“已经建立了一种自由”的威胁 (153)。但是关于自由的花言巧语常常是与经济利益的实际情况混淆在一起的。

[34] 埃格纳尔和厄恩斯特论证说, 这“仅仅是偶然地设计好来迫使议会 (Parliament) 废除令人反感的法规” (1972年, 第17页)。这也许是可能的, 但是对一个政治主张定形可能至少可以为他们的鼓励提供一个具体的, 可以实现的目标。

[35] 见埃格纳尔和厄恩斯特 (1972, 28)。

[36] 见厄恩斯特 (1973a, 22); 也见弗格森 (Ferguson) (1953)。

[37] 厄恩斯特（1973a, 360）。厄恩斯特谈到了“北美债务中的”一个“量的飞跃”（第356页），但是，沃尔顿和谢泼德（1979年，第108页）说，债务问题“在革命的前夕并不是很普通的。”安德鲁斯（Andrews）同意这个问题在1770年以前并不严重的观点。但是，正在这一时期，在殖民地“无节制地”买进，在英国以增加大约300万镑受惠数额卖出，并且在短时期内展示出奢侈和通货膨胀。价格的下跌是迅速的（1924, 109）。此后，这便导致了1772年严重的收支差额危机和一个严重的、富有爆炸性的“信贷短缺”时期。谢里登（Sheridan）（1960, 186）。

[38] 格林和杰利森（Jellison）（1961, 518）。厄恩斯特（1976）论证说，1772年的危机标志着从作为改革的反抗运动转变为作为一个独立运动的反抗运动。

[39] 康特里曼（Countryman）（1976a, 57）。巴克（Barker）谈及马里兰的领主制时说，这是“为革命所受的正规教育”（1940, 375）。

[40] “革命不再是（城市知识分子和具有激进分子头衔的商人们）唯一的财产，即便它曾经是的话。正由于它不是这些人的唯一财产，因此它更是一场革命了”（康特里曼）（1976a, 61）。

[41] 见在北卡罗来纳西部 [格林, 1943凯（Kay）, 1976] 的管理者（Regulators）和其他“不情愿的革命者” [霍夫曼（Hoffman）, 1976] 扮演的具有矛盾心理的角色。另一方面，施莱贝克（Schlebecker）申明，小农村于革命的支持表现在英国人必然在革命战争（Revolutionary War）把食品和弹药送给他们的军队（1976, 21）。

[42] 库利科夫（Kulikoff）（1971, 409）。也见纳什（1979年，第253页），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1763年开始的经济贫困导致了劳动阶级中“一个由完全贫困的群体组成的阶级的迅速的成长”。

[43] 普莱斯（1976, 708~709）。

[44] 纳什（1984, 250）。普莱斯的观点是更为可疑的。“具有从属地位的穷人是否……与革命活动有很大的关系还是（一个）问题”（1976, 709）。

[45] 哈洛（Harlow）（1952, 3~5）。

[46] 科恩（F.Cohen）在1949年英国殖民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为什么国内政治的反对力量 [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伯克（E.Burke）和赫斯特（Hearst）] 常常支持从属国人民的独立运动？我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承认这样的事实而得到，这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不必非要依赖政治帝国主义，而有时却甚至是受到政治帝国主义的阻挠的。这种障碍在什么地方出现，这便有利于经济帝国主义者来消除殖民主义的政治状态”（1949, 103）。另一方面，纳米尔（Namier）的观察（1930, 45）至少是值得考虑的。“如果伯克在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期间在任的话，我们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反革命的英国保守党主义的时间提前大约20年。”

[47] 马歇尔 (Marshall) (1964a, 213)。

[48] 马歇尔 (1964b, 145)。

[49] 见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80、第三、六章)。格林 (1968a, 168) 谈到“非常赞同”建立在1688~1714年神圣不可侵犯的殖民时期 (Settlement) 的18世纪英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原则”。由于七年战争刚刚达到詹姆士党 (Jacobitism) 的最终目的。“到1760年, 苏格兰杂志 (*Scots Magazine*) 所做出的统计是, 苏格兰人中每4个达到参军年龄中的一个人是在英国的陆军和海军中服役; 在战后, 这些从军者中不少人一直留在英格兰服役, 在回家前, 常常是讨了英格兰人为妻” [科利 (Colley), 1986, 100]。

[50] 英尼斯 (Innis) (1943, 321)。

[51] 纳米尔 (1930, 42)。

[52] 坎门 (Kammen) (1970, 95, 113)。“同时期的人把西印度群岛拥有的财产, 而不是大陆拥有的财产看作是帝国的宝石” [拉加茨 (Ragetz), 1935, 8]。也见帕尔默 (Palmer) (1959, 173): 必须承认, 英国政府要考虑很多利益, 而美洲人则把这些作为外国的而不加考虑——比如, 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者、法属加拿大人、美洲的印第安人, 以及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更不用说英国的付税人了。

正如博尔顿 (Bolton) 补充的那样, 当时在英帝国各地也出现了要求不纳税这一特权的事情。“从这方面看, 美国革命仅仅代表了调和这些问题的最不成功的意图” (1966, 200)。

[53] 吉普森 (Gipson) (1950, 94)。

[54] 迈尼格 (Meinig) (1986, 289)。

[55] 肖努 (Chaunu) (1964, 170)。

[56] “割让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的消息使印第安人大吃一惊” [詹宁斯 (Jennings), 1976, 334]。

[57] 里奇 (Rich) (1960, 第二章, 4) 说, 英国的总司令阿默斯特 (Amherst) 将军“正在考虑……甚至在不满意的印第安部落中传播天花, 像对待牲畜那样, 而不像对待人类那样对待印第安人。”

[58] 见赖尔森 (Ryerson) (1960, 201); 也见肖努 (1964, 171)。肖努认为, 英国“采取了一项保护印第安人的政策, 因而部分地毁坏了”他们通过七年战争“从西部获得的巨大的同情资本。”

[59] 英尼斯 (1956, 176) 与伦敦的商号有联系的蒙特利尔的商号与像米奇里—麦基诺岛 (Michili-Mackinac) 和底特律 (Detroit) 那些西部城镇中的小商人来往。这些小商人又转而同随着印第安人旅行的游动小贩打交道。这便是法国人称之为的 (深入加拿大印第安人地区的) 皮

货商（Coureurs de bois）。英国人仍继续使用法国商人，尽管当时各种各样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也加盟了。这批人基本上是从从事与印第安人的赊购交易，印第安人用打猎之后获得的利润再支付欠款。见史蒂芬（Stevens）（1926，122~124，145）。

[60] 史蒂芬（1926，161）。

[61] 史密斯（Smith）（1964，6）。

[62] 诺伦伯格（Knollenberg）（1960，1）谈到“1765~1766年间殖民地起义”是对印花税条令的反抗。1759至1764年间，“英国施行的一些颇具挑衅性的措施”把殖民地推到了反抗的边缘：1759年枢密院（Privy Council）否决了弗吉尼亚条令；1761年支持海关机构的总条文；1761年禁止总督颁布英王不能废除的委任状以及英格兰教会官员企图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

[63] 英国管理殖民地的当局在1763年并不是突然地……做出“放弃沃尔波尔（Walpole）关于调解的政策以及企图使殖民地置于更强硬的控制之下而决定的……而是从1748年开始的10年间逐步地做出这些决定的”（格林，1973a，65）。因此，对于格林来说，在诺伦伯格看来是新的措施的那些事情，“仅仅是早些时候的改革政策的补充和扩大”（74）。

[64] 巴克谈及马里兰的情况在我看来从广义上看更为真实：“如果没有烟草贸易持续不断的萧条，政治上的不满和各殖民地间的联系都不会如此突出。立宪方面的斗争是不可能仅仅因为英国的传统而不断扩大，也不会因具有法律思想而扩大；立宪斗争的巨大动力是经济上的需要”（1940，376）。

[65] 如果不是我，便是贝林（Bailyn）把这一问题拟人化了：“权力自身天生的掠夺性这一事实使在权力方面敢作敢为变成超常地重要。权力必然的牺牲品是自由，或法律或权利”（1967，57）。

[66] 贝林（1967，57）。

[67] 贝林赞同地引用了詹森（Merrill Jensen）的一句话（1967，118，注脚26）。

[68] 贝林（1962，348，350~351）。

[69] 对于贝林关于意识形态和它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的富有洞察力的一般性批评，见厄恩斯特（1973b）。奇怪的是，贝林坚持意识形态对美国革命有影响的观点却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阿普特克（Herbest Aptheker）那里引起了共鸣：“把大众的主权……作为政府权力唯一合理的基础……进行宣传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革命活动……革命代表了……对政府理论的——根本性的决裂”（1960，233~234）。

[70] 施莱辛格（1919，76）。

[71] 厄恩斯特（1976，172）。

[72] 克里斯蒂 (Christie) 和拉巴勒 (Labaree) (1976, 276)。很有意思的是, 他们提到的人口趋向基本上是白人殖民者。他们忽略了另一类人口趋向。从1670至1770年, 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中的黑人从4%增加到20%。1700至1775年间, 运进的非洲奴隶的人数与欧洲的移民人数相同。见沃尔顿和谢泼德 (1979, 56~57)。这也是一种“初期的、混乱的社会……变化……因素”, 这很可能构成了殖民地殖民者们的部分潜意识。

[73] 安德鲁斯 (1924, 139)。

[74] 见萨克斯 (Sachs) (1953, 284~290), 厄恩斯特 (1976年, 180~181), 和纳许 (1979, VIII)。

[75] 魁北克条令还归还给魁北克有拉布拉多半岛 (Labrador)、马德连群岛 (Iles de la Madeleine) 和安蒂科斯塔群岛 (Ile d'Anticosta)。

[76] 见兰可托特 (Lanctot) (1965, 21~38)。

[77] 尼特比 (Neatby) (1966, 134~135)。

[78] “魁北克条令……承认加拿大经济中皮毛的优势以及蒙特利尔对西部的控制……(它)为扩张而进行的一次新的努力打下了基础” [韦洛特 (Ouellet), 1971, 102]。他特别提到, 直到当时, 以蒙特利尔为基地的作海狸毛皮交易的商人仅仅进行了“缓慢的征服”, 但是现在一个富有的权势阶级可以出现了。与此同时, “1774至1775年标志着阿尔巴尼 (Arbany) 在皮毛出口和向西部重新分派贸易项目两方面都在衰落。”

[79] 阿尔斯丁 (Van Alstyne) (1960, 38)。英尼斯 (1956, 178), 观察到: “从一个非常大的范围来看, 美国革命和新法兰西 (New France) 的陷落是反对皮毛贸易而殖民的斗争时期。”他认为, 1754年法国占领俄亥俄河谷是1754至1763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 (French and Indian War) 中直接发生的事件, 这因与1776年革命有关的魁北克条令是类似的。

[80] 特鲁德尔 (Trudel) (1949b, 16)。

[81] 诺伦伯格 (1975, 124)。

[82] 布雷布纳 (Brebner) (1966b, 54)。

[83] 这并不是不正确的。正如韦洛特讲的那样: “1774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使教士和庄园主站在政府一边。由于资产阶级没有要求议会控制, 也没有为社会提出一个新的价值系统, 因此, 相信一个建立在神权基础上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1971, 118)。

[84] 兰可托特 (Lanctot, 1965, 87~88)。韦洛特 (Ouellet) 指出, 讲法语的农民的反应“比当时人们相信的那种反应更为复杂。”这种反应包括对他们安全的担忧, 因为英国当局的军事力量薄弱。但与此同时, 农民们反对自愿从军。因为他们相信, 自从1760年以来, “英国政

府希望最好是使（他们）签约以组织一个大规模的放逐”（1971，122）。

[85] 史蒂文斯（1926，49）。

[86] 韦洛特（1971，120）。此外，他们担心“皮毛贸易会转到（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手中”（兰可托特，1969，51）。作为一个推论，“毫无疑问，他们的兴趣使那些参与皮毛工业的人保持对英国的忠诚”（史蒂文斯，1926，49）。也见克拉克（Clark）（1959，118）：“正是由于蒙特利尔的商人们不愿放弃英国市场，这才使他们拒绝向大陆会议派代表的提议。”

[87] 赖尔森（1960，208~209）。

[88] 见特鲁德尔（1949b，25~31）。

[89] 克拉克（1959，101）。

[90] 见赖尔森（1960，208~210）。

[91] 赖尔森认为，区别在于：“加拿大人在同美国人结盟方很可能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整个国家独立于异国统治的问题。但是，美洲的殖民地还没有采取彻底独立的行动。他们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只是在入侵加拿大之后才正式通过的。亚当斯（Samuel Adams）……沮丧地评论说，如果独立宣言提前九个月制订出来的话，加拿大如今很可能会是我们的了”（1960，214）。

[92] 克莱顿（Creighton）（1937，64）。

[93] 克拉克（1959，117）。

[94] 德西奥（Dehio）（1962，122）。

[95] 施莱辛格（1917，91~92）。

[96] 詹森（Jensen）（1975，326）。詹森根据下面一段话做出了总结：“美国革命是一场民主运动，并非起因，而是结果。”（341）。

[97] 阿普特克（Aptheker）（1960，59）。

[98] 詹森（1926，25）。

[99] 林德（1961，33）继续指出：“对恰恰这样一场内部革命的担心，使得利文斯顿（Robert R.Livingston）在独立前夕犹豫了很长时间。”

[100] “很多商人……受到对阶级利益一种更广泛的理解的驱使，坦率地（在1775~1776年间）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施莱辛格，1977，604）。

[101] “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辉格党领袖们看来并没有把与英国作战视为独立的一种方式，而把它看作是革命的替代物，甚至是对革命的防御。这场战争……有意地使除托利党人以外的所有美洲人暂时团结起来，并给予他们直接针对英国可能会用来反对殖民地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能力” [内尔森 (Nelson), 1961, 117]。

也见赫尔德尔 (Hoerder)：“由于支持既成事实的自发暴动的某些作法，辉格党的杰出人物甚至在试图赶上大众的行动时仍以领导人的姿态出现……用一致的利益和对领导人大约屈尊的花言巧语把群众的要求扭曲了” (1976, 265~266)。

[102] 施莱辛格 (1919, 75)。

[103] 哈伯 (1942, 24)。哈伯的大约有30个殖民地的数字可能是较低的，不准确的。根据查阅《新剑桥现代历史地图集》，我计算出是39个殖民地。毫无疑问，这要看你如何估算在西印度群岛的各种各样的殖民地。

[104] 1763年从西班牙手中征得了东佛罗里达 (East Florida)。有一些英国殖民者想效仿南卡罗莱纳 (South Carolina) 的一种种植园经济结构，但是种植稻米的失败和能产生靛青的植物的缓慢生长是“抑制殖民的明显因素” (切斯纳特, 978, 14)。这些种植园雇佣从欧洲南部来的劳动力，大约1400个劳动力被招到新斯米尔纳 (New Smyrna)，其中大多数人来自米诺卡岛 (Minorcans)，有100名意大利人是从里窝那 (Leghorn) 来的，还有一些希腊人。“异族人群使殖民地微薄的资源赋税过重，在 (1768年) 到达后的两个月内，由意大利和希腊人领导的一场起义发生了。”尽管这场起义被镇压了，它的两位领导人被处死了，但是动乱仍旧在继续。“随着美国革命的暴发，米诺卡岛人，迄今为止是在殖民地的最温和的份子，被认为与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共同策划阴谋” (莫里斯, 1946, 178~180)。在效忠派的种植园主和倾向西班牙的米诺卡岛人两者之间，没有向美国革命补充新成员的余地。

[105] 布雷布纳 (1966b, 56~57)。纽芬兰的人口也少，经济上也薄弱，是不会被考虑会发生暴动的；它“迄今为止是不会独立地从事一项活动的。”

[106] 布雷布纳 (1937, 293)。

[107] 正是布雷布纳 (1937, 353) 讲的，这“可以归咎于与不同的殖民中出现的地形的屏障差不多的贫困问题…… [新斯科舍 (Nova Scotia)] 甚至不可能在她自己的议会中得到合适的代表席位。”也见克尔 (Kerr) (1932a, 101) 讲的：“新斯科舍的新英格兰人对他们在暴动中的关系持一种被动的同情心理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没有严肃地仔细考虑自己应采取的行动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108] 声明持有一个中立地位的做法，“提供了一种保护同与相邻的参与革命的殖民地关系的方式，与此同时，也避免了同英国的公开决裂。” (克拉克, 1959, 105)。

[109] “在1776年，只有英国的海军和陆军妨碍了新斯科舍成功地加入……暴发革命的殖民

地的行列……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英国在军事上在一个地区开战方面的优势，而在一个地区开战是会被海军包围或封锁的。”美国革命运动是一场大陆运动（克拉克，1959，102）。也见罗利克（Rawlyk）（1963，380）。“不管‘新斯科舍’普遍存在对革命原则的同情”，但仍不愿加入暴动，这一点被它没有海军这一事实解释得特别令人满意。

[110] 罗利克（1973，230）。他争辩说，“1776年马萨诸塞没能成功地强行进入新斯科舍是因为其自身的薄弱。”很难相信马萨诸塞怎么会在1776年不太在意新斯科舍（第240页）。

[111] 克拉克（1959，70）。

[112] 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46，54）。

[113] 克拉克（1959，111）。

[114] 罗利克（1973，250~251）。

[115] “随着与新英格兰贸易关系的中断……哈利法克斯（Halifax）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给予它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新的地位……由于老殖民地被排除在贸易往来之外，作为大英帝国一个成员的殖民地逐步享有经济上的优势证明了这一点”（克拉克，1959，110~111）。

[116] 韦弗（Weaver）（1904，52）。

[117] 佩尔斯（Pares）（1960，40）称巴黎协议和美国革命爆发之间的年代为“银色的蔗糖年代。”

[118] 阿米塔奇（Armytage）（1953，22）。

[119] 为在英国港口征用外国船舶而制定的第二十三条款中提出了蔗糖条令（the Sugar Act）。“牙买加商人正是把西班牙贸易的衰败……归咎于这些条文”[克里斯特洛（Christelow），1942，320]。关于把自由港口条令（the Free Port Act）作为恢复被扣押的西班牙船舶的作用一种努力的论述，见威廉斯（1972，378~379）。

[120] 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很可能对英国用来破除每个国家在其殖民帝国实行的垄断的方法而生气。就西班牙人来说，随着英国自由港口的开放之后，便出现了一些加强保护西班牙的垄断的企图（阿米塔奇，1953，48）。也见哈密特（Hammett）（1971，27）。西班牙的反映仅仅使英国更加努力使西印度群岛成为“与被禁止的区域进行贸易的一个贸易中心”[戈贝尔（Goebel，1938，289）]。

[121] 布朗（1928，187）。也见萨维尔（Saville）（1939，162）。

[122] 在克里斯特洛的书中引用（1947，3）。

[123] 见斯坦（Stein）和斯坦（1970，95~96）。

[124] 阿瓦利诺 (Avelino) (1978, 83)。

[125] 斯坦和斯坦 (1970, 100)。

[126] 见阿西拉 (Arcila) (1955, 94~95)。改革的这些方面的第二点当然对于西班牙半岛来说也是个内部问题，并且代表了西班牙的边界地区战胜了加的斯 (Cádiz) 的垄断的中央集权主义。“但是，正如伯拉达的凡兹奎斯 (Vázquez de Prada) 补充的那样 (1968, 220)，这一胜利更多的是英国经济对于西班牙经济的胜利。”

[127] 加西亚 (Navarro Garcia) (1975, 137)。

[128] 林奇 (1973, 13)。

[129] 克里斯蒂和拉巴里伊 (Christie and Labaree) (1976, 27) 谈到英国的这一问题，但是这对于拉丁美洲来讲，也是同样适用的。根据肖努所做的估计，在整个18世纪走私贸易数量超过了加的斯合法垄断的贸易量，尽管到18世纪来，由于自由主义，“垄断贸易比走私贸易发展得更为迅速” (1963, 409, 注脚14)。

[130] 但是，在他们使用合作的程度方面是有区别的。“英国提出的那部分是靠收缩贸易行为来实现的，西班牙提出的那部分是靠放松贸易行为来实现的” [汉弗莱 (Humphreys), 1952, 215]。

[131] 见费伦 (Phelan) (1978, 34)。

[132] 克里斯特洛 (1947, 9)。

[133] 赖斯 [1960, I (2), 327]。见诺瓦伊斯 (Novais) 关于为什么葡萄牙的内政改革是受文艺复兴思想的鼓舞和殖民地商业的增加影响，“在表面上仅仅”是“一个矛盾：它本身是使自己受到伤害的一种倒退”的论述 (1979, 223)。

[134] 见加西亚 (N.Garcia) (1975, 249)。

[135] 见布罗代尔 (Braudel) (1984, 304)。这是一个科威特，但是，它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来自殖民地。“正是由于巴西产品的出口起了作用，因而葡萄牙的贸易顺差 (在这一时期) 才成为可能 [诺瓦伊斯 (Novais, 1979, 293)]。”葡萄牙驻巴黎大使库尼亚 (Dom Luis de Cunha) 在1738年就已经写道：“为了保存葡萄牙，国王需要巴西的财富比需要葡萄牙本身的财富还要多。” [席尔瓦 (Silva) 在书中引用, 1984, 469]。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说法大大夸大了18世纪葡萄牙经济的关节断离，而且只适合于180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见伯伊拉 (Pereira), 1986。

[136] 麦斯威尔 (1973, 22, 33, 38)。见席尔瓦 (1984, 484~485) 关于1763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在南美洲击败后，庞巴尔 (Pombal) 要求英国援助的论述。

[137] (英国对葡萄牙贸易的) 盛衰加速了法国大革命。法国的战争, 正如那场老的战争一样, 把英国和葡萄牙驱赶到一块儿了 [曼彻斯特 (Manchest), 1933, 5329]。

[138] 英国与葡萄牙的贸易从其“在世界各地贸易中最有利的地位下降到从英国购物的外国国家中的第六位” (曼彻斯特, 1933, 46)。

[139] 殖民地人民最大的反弹是反对庞巴尔关于使葡萄牙 (Luso) — 巴西贸易国有化的政策。正是那些巴西商人们常常感到自己的利益因为王权的利益而作出牺牲, 就像在宗主国的商人们感到他们为庞巴尔的“巴西建立垄断的‘有特许证的殖民地’政策做出牺牲一样” [(拉塞尔-伍德) (Russel-Wood), 1975, 28~29]。

[140] 布雷丁 (Brading), (1984, 408)。从16世纪以来, 查理三世的统治就是“最少伤害国家尊严的”王朝 [惠特克 (Whitaker), 1962a, 2]。也见肖努 (1963, 417)。他称1770~1800这一阶段是“西班牙复苏”的阶段。最后, 加西阿-巴奎罗 (Garcia-Baquero) 称1778年以后的时期为加的斯贸易“惊人地发展的时期” (1972, 127)。但是这也适用于加泰隆尼亚 (Catalonia) 的状况; 也见德尔加多 (Delgado) (1979, 25~26)。最后, 费希尔 (Fisher) 称查理三世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 特别是它对拉丁美洲的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它对于半岛经济的影响从某种角度讲是比较有节制的” (1985, 62)。

[141] 布雷丁 (1984, 439)。也见汉弗莱 (1952, 213): “在查理三世统治下, 并且据回忆, 在查理四世当政的头几年, (西班牙) 看上去如同享有一个繁荣的小阳春。对于西班牙是如此, 对于她控制的地区也不例外。”

[142] 布雷丁 (1984, 339~400)。

[143] 加西亚 (Navarro Garcia) (1975, 160)。

[144] 斯坦 (1981, 28)。斯坦关于加尔维斯成功的看法是有点尖刻的: “在加尔维斯为在新西班牙的地方行政长官提出一个计划的18年之后, 在他被任命为西印度的主管大臣 (Minisrer of Indies) 的10年之后, 在阿马鲁在安的斯山中部地区掀起大的印第安人起义的6年之后, 在秘鲁收到了它的法令2年之后, 在1786年12月4日, 加尔维斯才终于能够推行他向新西班牙长期许诺的法令。在几个月后, 他去世了” (第13页)。几乎就在他死后不久。他原先制订的计划的合作者, 当时的秘鲁总督克鲁瓦 (Croix) 建议在秘鲁重新恢复对贸易的份额 (repartimiento de mercancias) 的承担, 旧的地方长官制度中最邪恶的部分。

[145] 加斯蒂罗的塞斯皮德斯 (Céspedes del Castiello) (1946, 865)。

[146] 布雷丁 (Brading) (1984, 401)。在军事上恢复元气的状况可以在几年后西班牙加入北美战争和入侵彭萨科拉 (Pensacola) 时继续显示出来。1783年, 英国把彭萨科拉和东佛罗里达都割让给了西班牙。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 西班牙最终把英国逐出了蚊子海岸 (Mosquito Coast) (现在在尼加拉瓜的东部)。

[147] 见萨维尔 (Savelle) (1939, 164~165)。

[148] “在1777年10月16日，柏高因 (Burgoyne) 将军在萨拉托加 (Saratoga) 向盖茨 (Gates) 将军投降。对于我们来讲，很难了解这一新闻在当时意味着什么。用1776年一位英国小册子的作者的话来讲，直到当时，这场战争在欧洲看来犹如昏头昏脑的殖民地人的领袖们的蛮横无理。这些人是野心勃勃的煽动者，他们把无知的群氓一步步地引到无法摆脱的困难境地，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突然，这批无知的群氓打败了旧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军事史上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 [马德里亚加 (Madariaga), 1948, 300]。

[149] “从1776年开始，韦尔热纳 (Vergennes) 一直被鬼怪缠绕着。这便是美国独立斗争的一个结果，法国和西班牙将会失去他们拥有的西印度群岛” [范梯尼 (Vay Tyne, 1919, 534)]。1776年，大陆会议在巴黎的代表迪恩 (Silas Deane) “警告法国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持，美国人会被迫与英国人重新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一个独立的美国会使法国在主宰世界贸易方面成为英国的一个继承人” (卡普兰, 1977, 138~139)。1777年7月23日，韦尔热纳给路易十六发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说：“如果英格兰不能迅速地镇压美国的暴动，她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在对秘鲁、墨西哥和法国的蔗糖岛屿的富人同时进行进攻时，她可以把没有继续作为臣民来对待的人当作盟友。” [引自科温 (Coriwin) 的著作, 1915, 34]。法国仍旧怀疑美国的真正用意，这在后来1782~1783年间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时是法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让英国保留加拿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早在1778年，大陆会议促成法国人同意殖民地人征服加拿大 (以及新斯科舍和佛罗里达)。但是，韦尔热纳于1778年3月在写给他在美国的外交官吉拉尔 (Conrad Alexandre Gérard) 的信中做出指示，英国“对这三个 (反抗的) 地区的占有，或至少是对加拿大的占有，会是对付美洲人不确定性的一种有用的原则和防范。这会使他们感到更加需要同英王的友谊和联盟，而且英王本身并不希望破坏这种友谊和联盟” [在弗利高特 (Frégault) 和特鲁戴尔 (Trudel) 的书中重新印出, 1963, 153]。1779年韦尔热纳在卢泽恩 (Luzerne) 宣称，法国没有兴趣“看到北美发挥一个强国的作用并且处于使它的邻国不安的状态。”当真正开始在巴黎进行谈判时，英国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比法国人希望他们所做出的让步还要多的准备 [比如，在圣劳伦斯 (St. Lawrence) 的捕鱼权]，甚至更重要的，比1775年殖民者们拥有的更广阔的边界。不用说，美国人并不赞赏法国人的态度。见特鲁迪尔 (Trudel) (1949b, 213~214)。

[150] 达尔 (Dull), (1985, 108)。

[151] “在盎格鲁—美国革命期间，西班牙 (是) 法国的盟国，但从来不是美国的盟国。她是在英国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之后才承认美国的” (比米斯, 1943, 16)。

[152] 加西亚 (Navarro Garcia) (1975, 141)。事实上，西班牙得到的一切便是美洲的佛罗里达和蚊子海岸 (Mosquito Coast)，他们为了得到这些地方，实际上是用伯利兹 (Belize) 作为交易。西班牙还得到米诺卡岛，但没有得到直布罗陀。

[153] 汉密尔顿 (Hamilton 1944, 40)。

[154] 见赫尔（Herr 1958，145~146）。

[155] 加西亚-巴奎罗（Garcia-Baquero）（1972，43）。最受人喜爱的走私方式是“hacerse el sueco”，也就是采用瑞典的中立国旗帜。

[156] 汉密尔顿（1944，41，48）。

[157] 利斯（Liss）（1983，137）。

[158] 正如马达里阿加（Madariaga）中肯地做出的评论那样：“暴动是易于传染的……照这种情景，与阿马鲁-康多坎奎（Tubac Amaru-Condorcanqui）暴动相关的革命运动一直持续到1783年，也就是一直持续到凡尔赛和约（Peace of Versailles）的签署”（1948，302~303）。

[159] 见博尼拉（Bonilla）（1972，17）。

[160] 哈洛（1964，636）。

[161] 瓦拉卡尔斯尔（Valcárcel）（1960，358）。瓦拉卡尔斯尔没想到的唯一另一种可能性便是，我们把它视为“一场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政治运动”，他说认为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162] 肖努（1964，194）。

[163] 瓦拉卡尔斯尔（1957，241）。

[164] 阿尔庇林-多基（Halperin-Donghi）（1972，118）。也见肖努的著作（1963，406），他把阿马鲁的暴动看作是造成“秘鲁效忠主义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165] 唐迪特和瓦赫特尔（Tandeter & Wachtel，1983，231~232）。他们指出，这类似于拉布鲁斯（Labrousse）“为法国革命描绘的场景。”

[166] 科恩布利特（Cornblit）（1970，131）。正如他争辩的那样，“现代化的决定性方案……是从冲突中概括出的结果（133）。”

[167] 见戈尔特（Golte）（1980，176~179）。

[168] 见皮尔（1975，205，注脚22）。

[169] 见费希尔（1971，409~410）。

[170] 科尼特茨科（Konetzke）（19462，232）。

[171] 西班牙人和欧洲人的白种后代克里奥尔人希望与印第安人毫无关系，而献身于自己种族和传统的印第安人与他无视或痛恨的克里奥尔人也无关系 [甘迪亚（Gandia），1970，

10] 。

[172] 见戈尔特（1980，42~43）。当然，这并不是南北美洲的唯一的人口统计的模式。百分比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是相似的。但是，在格拉纳达，混血儿的人数比印第安人的人数多得多。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区，黑人是占绝对优势的。在北美洲，白人居多。见在肖努（1964，196）书中复制的亨布尔特（Humboldt）在1820年制的图表。有关拉丁美洲种族制度的分类方法，见麦卡利斯特（McAlister）（1963）。

[173] 费希尔（1971，921）。

[174] 汉弗莱和林奇（1965a，28）。“通加苏阿（Tungasua）黑奴的解放，在暴动过程中对克里奥尔土著劳役的破坏，以及首要的在印第安人口中进行独立动员的潜在的危险是使朋友分开和尔后使克里奥尔人反对印第安人最充足的原因”（博尼拉，1972，19）。

[175] 卢因（Lewin）（1957，143~144）。

[176] 博尼拉（1972，16）。

[177] 坎贝尔（1981，693）。

[178] 肖努（1963，408）。在委内瑞拉和拉普拉塔这两个革命的中心白人的百分比最高，其次是在新格拉纳达，再次是在新西班牙和秘鲁（第408页，注脚13）。

[179] 林奇（1973，276）。

[180] 索可罗地区的人（Socorranos）[索可罗（Socorro）是暴动的所在地]被传说的阿马鲁的胜利所陶醉了（费伦，1978，68）。

[181] 阿奎勒（Liévano Aguirre）（1968，467），也注意到阿马鲁的暴动“对于公社派的革命（Revolution of the Comuneros）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共鸣”（第470页）。

[182] 阿科斯塔（Cárdenas Acosta）（1960，I，88）。

[183] 费伦（1978，XVIII）。

[184] 见洛伊（Loy）（1981，255）。

[185] 林奇（1985，34）。

[186] 林奇（1985，36）；也见阿西尼加斯（Arciniegas）（1973）的第十四章，题目是“背叛者。”

[187] 阿奎尔（1968，447）。

[188] 见阿科斯塔（1960，I，88）。

[189] 伊泽德（Izard）（1979，134）。还有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黑奴。阿马鲁声称要废除奴隶制的做法吓坏了克里奥尔人。虽然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在公社派起义过程中提出，但是它是背景。委内瑞拉（Venezuela）长期以来一直是逃跑的奴隶所谓的聚集的重要的居住区，那里已经繁荣起来了，很多的奴隶从事于“社会性的盗匪活动”并且与在种植园的奴隶们保持一种勾结的关系，这样可以使奴隶们以逃亡来报复的威胁作为同奴隶主讨价还价的武器。“委内瑞拉并不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和平的地方”[多明奎茨（Dominguez）1980，48]。一个延长了的印第安暴动很可能会引发由黑奴组织的起义。

[190] 这是19世纪自由派史学家的观点。这看法现在也得到了迪菲（Diffie）（1945，488）和哈林（1947，136，194）的赞同。科利尔（Collier）（1963，19）说，这是一个夸大了的，但却是真正的观点。博尼拉（1972，58）认为，在1776~1787年时事情确实如此。关于这一历史事件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讨论，见坎贝尔（1972a，7）和伯克霍尔德（Burkholder）（1972，392）。

[191] 伊萨奎尔（Eyzaguirre）（1957，54，57）。巴比尔（Barbier）也强调克里奥尔人在政府中的优势作用（1972，434）。

[192] 坎贝尔（1972a，20）。

[193] 马尔萨尔（Marzahl）（1974，637）。

[194] 阿尔庇林-多基（Halperin-Donghi，1972，127）。

[195] 见科尼特茨科（1950）。

[196] 见肖努书中的数据（1964，195）。

[197] “在寻找新世界时，官僚和商人们都纷纷涌入殖民地。这个新世界是适合于西班牙人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仍旧喜欢更高的统治政权，在那儿贸易自由（Comercio libre）已经为西班牙半岛的垄断者们建立了防护设施”（林奇，1973，16）。

[198] 阿奎勒（1968，439）。

[199] 坎贝尔（1976，55）。坎贝尔是特别指加尔瓦茨（Galvez）对克里奥尔人在阿马鲁起义中的作用的反映。

[200] 林奇（1973，19）。

[201] 肖努（1964，197）。

[202] 肖努（1963，412~413）。肖努认为，这些紧张关系存留在19世纪查理王子战争中

(Carlist Wars)。

[203] 见肖努 (1964, 197)。

[204] 布雷丁 (Brading) (1971, 213)。

[205] 见西班牙属美洲大会 (Congreso Hispánicoamericano) (1953, 273)。

[206] 布雷丁 (1973b, 397)。

[207] 甘迪亚 (Gandia) (1970, 27)。

[208] 伊泽德 (1979, 54)。

[209] 布雷丁 (1984, 438)。

[210] 布雷丁 (1984, 402)。也见鲍尔 (Bauer) (1971, 80~85)。驱逐耶稣会士的做法标志着从哈布斯堡 (Hapsburg) 的政策转向波旁王朝政策的另一个转折点。“在哈布斯堡使用牧师的地方，在波旁王朝雇用了士兵” (布雷丁, 1971, 27)。

[211] 布雷丁 (1984, 403)。

[212] 见欧拉 (Munñoz Oraá) (1960)。

[213] 戈特沙尔特 (Gottschalk) (1948, 7)。也见安德森 (1965, 267~268)。

[214] 见比米斯 (1935, 45~46) 和内特尔斯 (Nettels) (1962, 1~6)。

[215] 内特尔斯 (1962, 44)；也见沃尔顿和谢泼德 (1979, 181~182)。相反，美国独立战争看上去在这方面对苏格兰很适用。通过摧毁格拉斯哥 (Glasgow) 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作用，这一作法加快了重新建立一个经济优势的速度。“只要格拉斯哥保持与美国进行烟草贸易方面的垄断地位，制造业——甚至棉花加工——很可能会处于贸易的从属地位” [罗伯逊 (Robertson), 1956, 131]。

[216] “对于英国来说，从声誉方面看，(战争)的失败比物质利益方面的损失要大得多：美国经济的独立远远落后于赢得并运用国家主权” (马歇尔, 1964a, 23)。

[217] 克劳德 (Clauder) (1932, 16)。

[218] 内特尔斯 (1962, 47) 也认为“英国商人在放弃了资本之后，货物贷款的期限从12个月提高到18个月” (第231页)。

[219] 迈耶 (Meyer) (1976b, 181)。也见福伦 (Fohlen) (1979) 关于为什么法国商人错过了他们“把英国人从北美市场上逐出的唯一机会”的论述 (第98页)。

[220] “以整个1780年代对英国的出口为标准，对外贸易没能达到其革命前2/3的水准”（杰里米Jeremy, 1981, 14）。

[221] 本尼安斯（Benians）（1946, 16）。比米斯认为，当时英国—美国间的贸易“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1789年）美国进口的90%是来自大英帝国，而且美国的税收主要是来自进口税。突然打乱与大英帝国的贸易关系……将意味着破坏了美国3/4的对外贸易。用汉密尔顿后来讲的一句话来形容，这将从根本上断绝了贷款的来源”（1923, 35～36）。

此外，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在当时的优势。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rlild）反对放松航海法，他说：“我们也许确实可以对他们友好，而且善待他们，但是我们应该等待事件的发生而不应力图促使事件的发生……由于谨慎行事，（英国）将会得到她希望得到的符合她利益的（美国）贸易。”[引自斯托弗（Stover）的著作，1958, 405]。

[222] 杨（Young）带着一种20世纪老练的帝国主义非殖民者的情绪继续说，而且还表示了对殖民地的国家可能会自愿地摆脱殖民状况的疑虑，尽管“放弃殖民地会是明智的”。他叹息道：“法国紧抓着圣多明各不放；西班牙紧抱着秘鲁；而英国则紧抓着孟加拉（Bengal）。”[引自洛克（Lokke）（1932, 155）]。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前两个大国正处于快没有能力保住这些殖民地的状况。

[223] 见布拉斯韦特（Brathwaite）（1971, 68～71）和克尔（1936, 61）。

[224] 见在诺伦格伯书中的数据（1960, 298）。百慕大（Bermuda）和巴哈马（Ba-hamas）是两个最积极地支持13个殖民地的殖民地，是唯一两个白人殖民者居人口多数的殖民地。

[225] 见布朗（1974, 20）。当然，这是几个主要解释新斯科舍为什么没有支持独立战争的原因的说法中的一个。

[226] 见沃尔顿和谢泼德（1979, 183）。威廉姆斯解释了1783年12月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的原因所在。这一敕令是由于英国傲视美国无能力进行报复从而禁止美国船舰而发布的：“这是海运部门的利益……他们的观点已经很有说服力。他们坚持认为，英国无需害怕在美国市场上与其他国家或本国劳力就制造业产品而展开的竞争……”
“英国掌握了美国市场这一可靠的假设，看上去很快就被事实加以证明。”（1972, 220, 222）。他们还丧失了英国军舰对他们在地中海贸易的保护，这将导致他们同北非伊斯兰教国家（Barbary）海盗间的矛盾。至于同爱尔兰（Ireland）的贸易，“在殖民地时期”，直接贸易“是不足轻重的”，直到现在也没发展起来（纳许，1985, 337）。一个光明的前景，但仅仅从长远的观点看是重要的前景，便是开辟了对中国的贸易，“这是美国革命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斯蒂格（Ver Steeg），1957, 366]。

[227] 克拉顿（Cration）争辩道，即使“在1783至1805年间，（蔗糖生产）增加了70%并不是会带来大利润的先兆，而恰恰相反；由于通货膨胀它代表了通过已增加的产量来恢复利润这一企图”（245～246）。1780年至1786年间从未预见到的一系列飓风，使人们无法航行，这便造成

无法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局面。谢里登（Sheridan）（1976a, 615）说，结果是“一连串的危机。”

[228] 关于在这一问题上从舒瓦瑟尔（Choiseul）到韦尔热纳（Vergenes）执政期间法国政策的连续性（1949b, 131）。1778年舒瓦瑟尔在退位时给韦尔热纳写了一个备忘录，认为法国可以从美国争取独立的战争中获得好处，但却不能从尚在英国人控制下的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以及卡罗莱纳得到什么好处。韦尔热纳在给吉拉尔（Gérard）的回信中说，这种结局可以使一旦独立的殖民地为使法国获益，而能够“毫无疑问地延长他们同英国关系的破裂。”

[229] 在1782年春季期间，谢尔本（Shelbourne）勋爵和他的代理奥斯瓦德（Richard Oswald）看上去小心翼翼地准备把整个加拿大作为无偿的附加物送给一个独立的美国的做法，可以从（他们对于自由贸易的观点中）找到答案。他们的观点大体是，大英帝国比美国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处于如此领先的地位，因而以前的英属的美洲必须继续成为一个独立的、或不独立的丰富并日益扩大的市场。尽可能地把法国彻底排除在外便是真正的目标。布雷布纳（Brebner, 1966b, 62）。

[230] 琼斯（Jones）（1965, 508）。也见伯特（Burt）（1931）。里比（Rippy）指出，英国不愿放弃海港还有另一个动机，那就是害怕那样做会使美国“威胁加拿大”（1929, 23~24）。

法国对于英国故意拖拉的做法并没有感到不满意。见特鲁德尔（Trudel）（1949a, 195）。加拿大在这一问题上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势力。大商人感到，1783年条约（Treaty of 1783）已经摧毁了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的贸易帝国，并且直到1815年一直为修改边界施加压力，但是1783年也标志着效忠党（Loyalists）人从当时已经独立的殖民地来到加拿大。这些效忠党人以前是农民，并且把“出口产品”带到“最初是经营皮毛贸易的州的中心”[克莱顿（Creighton），1937, 89]。至于美国，它与西方接触的方式看上去只是一种“报偿”。这种做法允许它一方面承担公共债务，另一方面为大批人提供机会来“聚集财富”（亨德森Henderson）（1973, 187）。因此，英国的拖延看上去是肆无忌惮的。

[231] “在1783年之后的头两个十年当中，英格兰与美国的经济伙伴关系使（加拿大和纽芬兰）的作用降到不太重要的地位”[格雷厄姆（Graham），1941, 56]。也见布雷布纳（1366, 85）的著作。他观察到了“英国在沿海问题上不向（美国）妥协和在大陆问题上讨好美国的截然不同的做法。”

[232] 哈洛（Harlow）（1964, 603）当时在英国政府内压倒一切的意见是“看上去美国的西部边疆可能会保持在阿勒根尼（Allegheny）和阿帕拉契山脉。一个靠近大西洋海岸的联邦政府把它的政权扩大到山那边辽阔的荒野的做法看上去是行不通的。”

[233] 见詹森（Jensen）（1936, 28~30；也见1939）。扩张的计划被美国独立革命吸收了。就在革命爆发之前，为了收编印第安纳和俄亥俄公司（Indiana and Ohio Companies），成立了范代利亚公司（Vandalia Company）。1773年，这个公司从上议院贸易和均平专员委员会（the Lords Commissioners of Trade and Planations）得到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建议授予大约包括

当今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和被称为范代利亚（Vandalia）的东肯塔基的两块土地。尽管除要履行一小部分正式手续外，移交土地使用权的进程已在实施之中，美国革命的爆发使授予土地一事暂时告一段落 [特纳（Turner），1895，74]。

[234] 在美国的教科书中，伊桑·艾伦（Ethan Allen）是个革命英雄。事实上，他和他的兄弟在1777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并向英国讨价还价的，要求承认佛蒙特（Vermont）的独立。这一讨价工作一直持续到1789年李维·艾伦（Levi Allen）到伦敦与乔治三世（George III）进行磋商。在与（1790年放弃了一些土地要求的）纽约州进行了进一步的讨价还价之后，佛蒙特于1791年作为第14个州“加入”美国。见布雷布纳（1966b，66~67）。从马塞萨诸塞“独立”出来的缅因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见格林（1943，408~409）。

[235] 特纳（1896，268）。

[236] 惠特克（1962a，92）。

[237] 见比米斯（1916，547）。

[238] 比米斯（1923，109）史蒂文斯（Stevens）（1926，14~15）认为，英国战胜印第安人，使他们直到1812年战争（War of 1812）之后在西北地区仍在贸易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也见赖特（Wright）（1975，35）。

[239] 比米斯（1943，18）。

[240] 米尼格（Meinig）（1986，369~370）。肖努（Chaunu）（1964，183）把皮毛商和移民看作是征服印第安人的特殊作法。“设陷阱的捕兽者向前设置的陷阱超过了真正的边疆的界线，这个边疆的界线是（持火把和斧子）的农民把已经被威士忌酒、朗姆酒和肯定的是被火枪征服的印第安人向后驱赶形成的。”

[241] 见惠特克（1962a，11）。

[242] 惠特克（1962a，33~34）。

[243] 色隆尼（Accarias de Sérionne）（1766，I，73）。

[244] 惠特克（1962a，37，43）。也见威廉斯（Williams）（1972，57~59）。这是有前提的。当1769年欧雷利（O'Reilly）将军到达新奥尔良（New Orleans）时，西班牙已经从法国手中承担了对路易斯安那（Louisians）的有效控制。但是，当1770年欧雷利回到哈瓦那（Havana），禁止作为对古巴出口的构成威胁的劣质的路易斯安那烟草出口时，英国人事实上已作为秘密的贸易者又回来了。见克拉克（1970，170~180）。

[245] 见惠特克（1928，198）和克拉克（1970，220）。

[246] 见麦克伊（McCoy）（1980，105）。

[247] 关于对印第安人有限的意义的1924年公民法案（the Citizenship Act of 1924），见莱西（Lacy）（1985，91ff）。关于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中有关印第安人问题的争论是反复围绕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而展开。中央（the Center）的胜利事实上是在思想意识上把印第安人排除在国家之外。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概念加强了。不仅仅是处于边界线之外的，禁止殖民者和没有执照的商人进入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领域；而且这也是联邦政府施行统治的一块地域。联邦法律控制着印第安人，而印第安贸易只能在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内进行；在这个保留地之外，他们无权进行贸易。普鲁查（Prucha）（1970，31）。对于印第安人的这种排斥态度标志着对印第安人的看法从殖民地早期认为他们“可以（以欧洲的方式）融合于他们自身的生活之中”的看法的一个转变 [麦克尼科尔（McNickle），1957，87]。

[248] （A.H.Jones，1980，39，表2.4）。1760年梅因（Main）的数字表明，人口中23%是黑奴，其中4/5在南部各州（1965，271）。

[249] 见柯廷（Curtin）（1969，216，表6.5）关于这样一个估计，即在一个世纪之间，劳动力成倍地增长。

[250] 见莫里斯（Morris）（1946，315~316）。

[251] 纳什（1979，320~321）。

[252] 见盖伦森（Galenson）（1981b，175）。当时弗吉尼亚公开为奴隶制辩护的种种原因中有一点是“为奴隶提供的食品、服装及住所只需占用在养育白人侍者身上的开销的1/4”。此外，据说，黑奴比从白人社会渣滓中选出的、不习惯于干农活、厌恶艰苦的工作、受不了弗吉尼亚的“酷暑”和“严寒”的、可能会从他们的主人那里成功地潜逃的白人侍者干得更好。格雷（Groy）和伍德（Wood），1976，356。1774年法国正式废除了契约劳动力（engagés）制度。从此以后，便把依靠奴隶作为“解决殖民地劳动力问题的唯一办法” [维戈斯（Vigols）1928a，6]。

[253] 阿普特克（Aptheker）（1860，101）。奴隶贸易特别集中在罗德岛商人手中，这些商人在1725至1807年间控制了从60%增加到90%的奴隶贸易。见库格特里（Coughtry），1981，6，25。

[254] 齐佛斯米特（Ziversmit）（1967，7）。

[255] 夸尔斯（Quarles）（1961，100，198）。也见伯林（Berlin）（1976，352~353）。英国殖民主义者争夺黑人支持的斗争可能是由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爵士（Drd Dunmore）发起的。他于1775年11月允许给予那些与好人和持枪者为伍的黑奴以自由。“英国人不是正在试图发动一场革命，而是结束一个暴动。回复战前的状态（Status quo ante bellum）是他们的基本政策” [罗宾森（Robinson），1971，105]。当英国军队在战争结束后离开美国时，他们把“上千名”黑人带到英国、加拿大、西印度群岛甚至是非洲（伯林，1976，355）。正如我们在前面讲

述的那样，这实际上成为与美国政府进行竞争的一个缘由。

[256] 沃克 (Walker) (1975, 53, 66)。

[257] 见齐佛斯米特 (Zilversmit) (1967, 137, 146~152) 和利特瓦克 (Litwack) (1961, 3~4)。这一进程是缓慢的。只有两个州——佛蒙特于1777年以及马萨诸塞于1783年——废除了奴隶制。其他州只是部分地参与了废奴运动。这一运动在北部各州拖拖拉拉地进行，直到新泽西州 (New Jersey) 于1846年进行扫尾工作时，才最终全部废除了奴隶制。戴维斯 (Davis), 1983, 273。

[258] 弗里林 (Freehling) (1972, 89)。必须进一步认清，排斥印第安人的活动是与扩大使用黑奴的活动紧紧相连的。“美国革命使南部奴隶主摆脱了英帝国各种各样的限制，开辟了印第安人迁移和奴隶制向西部扩大的方式” (戴维斯, 1983, 273)。

[259] 利特瓦克 (1987, 316)。

[260] 萨维尔 (Saville) (1962, 916)。

[261] 夏伊 (Shy) (1973, 143)。

[262] 亨德森 (1973, 180)。

[263] 内尔森 (Nelson) (1961, 1)。

[264] 内尔森 (1961, 88)。

[265] 格林 (1943, 158)。

[266] 内尔森 (1961, 90)。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是“例外”。是不是他们感到“应该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服从看上去是大多数的意见”或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相信英国会保护他们？在爱尔兰 (Ireland) 的天主教徒们的举止却大不一样。

[267] 帕尔默 (Palmer) (1959, I, 201)。

[268] 见在米德尔考夫 (Middlekanff) 著作中的文件。

[269] 摩根 (1973, 296)。

[270] 库里科夫 (Kullikoff) (1971, 376)。

[271] 查特玛丽 (Szatmary) (1980, 92)。

[272] 见比尔德 (1913; 1915)。关于近期时对比尔德的说法的有理智的辩护，见麦圭尔 (McGuire) 和奥斯费尔特 (Ohsfeldt) (1984, 577)。他们认为制宪会议 (Constitutional

Covention) 的投票形式支持一个狭义的比尔德式的说法, 即: “能起作用的唯一经济利益便是一个重要的财政利益正处危险之中的那些利益。”但是, 制订宪法会议上的投票却支持一个“广义的比尔德理论”, 即“一切经济利益都是有关系的, 无论他们的影响有多大。”

[273] 詹森 (1974, 172)。

[274] 当时, 这一对抗“动摇”革命的努力的保守主义企图并没有完结。“老的、顽固的贵族”继续试图建立“堡垒……以确保既得的财产权并保持原有的地位” [布鲁切 (Bruchey), 1987, 309]。

[275] “如果真的不能实现一个和平的话, 那便是1783年的和平……因为没有一项条约定定了在美洲、西班牙和美国的最老的和最新的帝国的敌对关系, 或限制这种敌对” (惠特克, 1962a, 1)。

[276] 费希尔 (Fisher) (1981, 32)。加西亚 (Navarro Garcia) (1975, 173) 谈到新西班牙 (New Spain) 在这一时期“不知不觉地达到了兴盛的水平”。

[277] “看来在1792到1795年间, 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走私贸易已经占合法贸易量的1/3弱。同早些时候 (16世纪除外) 比较而言, 这已构成事态的全部扭转” [伯斯凯特 (Bousquet), 1974, 21]。

[278] 布雷丁 (Brading) (1984, I, 413, 418)。

[279] 斯坦和斯坦 (Stein & Stein) (1970, 104)。以及惠特克 (1962a, 16) 使用了“美洲的病人”这句话。

[280] 惠特克 (1928, 22)。

[281] 克里斯特罗 (Christelow) (1947, 8)。

[282] 潘塔里奥 (Pantoleão) (1946, 275)。这可能是指这一时期西班牙与西属美洲的贸易看上去不是希望之中的“达到惊人的程度” [维拉娄伯斯 (Villalobos), 1965, 10]。

[283] 1788年的政府人口调查表明, 白人人口是28, 000, “自由有色人口”为22, 000人而奴隶为405, 000人。1789年地方行政长官所作的估计是, 前两类人口的数目稍稍高一些, 这可能更准确, 但区别并不大。见斯托达德 (1914, 8~9)。

[284] 在德比因的著作中引用了 (1953, 215)。关于1786年以前白人殖民者中“美洲爱国主义” (American Patriotism) 这种情绪的背景, 见德比因 (1954)。关于1769年白人反叛咖啡种植园主斗争初期的情况, 见特鲁伊洛特 (Trouielot) (1981)。关于1789年以前法国对于“非殖民地”的概念和矛盾的心理, 见塞伊 (Sée) (1929) 和洛克 (Lokke) (1932)。

[285] 塞恩托扬特 (Saintoyant) (1930, I, 75~76, 423)。

[286] 见斯托达德（1914，97~99）。

[287] 塞恩托扬特（1930，I，376），也认为国民公会（Convention）只能把海地革命看作是比包括旺代（Vendée）暴动在内的法国本土各种各样的暴动更具威胁力。“这种威胁不仅对于新的政权的存在，而且对于法国自身的存在都更具威胁力”（I，233）。

[288] 塞泽尔（1961）。

[289] 塞泽尔（1961，85）。在标题为“法国革命的局限性”一章中，塞泽尔说：“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法国议会侈谈黑人，但为黑人的利益却没干什么事”（159页）。正如萨拉-莫令斯（Sala-Molins）指出的那样：“（在1794年2月4日），国民公会并没有因为黑人动人的眼睛而为他们废除奴隶制，而是由于暴动才迫使他们这样做的；是由于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在遥远的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推行破坏法国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的政策，才迫使他们这样做的”（1987，262）。

[290] 见德比因（1954，53~54）。

[291] 葛古斯（Geggus，1981，285）“还有一个政权的旗帜上写的是‘圣多明各’。没有一个总督或将军把占领的历史铭记在心。这是一个最易忘记的乐章，这也是19世纪无需记住的一个乐章”（葛古斯，1982，387）。

[292] 葛古斯（1982，389）。短时间内，这一切对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在圣多明各内战和1796年收复荷兰殖民地两件事发生之间的年代中，“英国突然几乎成为欧洲（蔗糖）的唯一提供者”[切克兰德（Checkland），1958，461]。这一繁荣景象的“最后一个阶段”仅持续到1789年。

英国在处理他们自己在西印度群岛对黑人的占有问题上吸取了在圣多明各的教训。他们从1795年起武装了西印度群岛军团（West India Regiments）的黑人。因此，他们赢得了对白人殖民者和黑奴的控制。因为当时英国拥有“会管辖在加勒比地区巨大奴隶帝国的”奴隶[巴克利（Buckley），1979，140]。

[293] 珀金斯（Perkins）（1955，106）。乔丹观察到，对于美国来说，“圣多明各呈现出一个吓人的充满暴力的火山的状态”威胁着要重新讨论奴隶制这一“已议决了的主题”。此外，海地的难民殖民者把奴隶带到了美国，这些奴隶是传播“暴动瘟疫的媒介”。他说，“从一开始”便考虑到这是“.....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威胁”（1968，380~386）。

但是，正如欧特讲的那样，这一理论被第二种理论抵消了。这第二种理论“有时”与为南部奴隶社会辩护的理论相佐。“对新英格兰商人的利益来说，第二种理论是使圣多明各持续成为一个贸易基地”这一理论“永远意味着支持当政的政府”（1973，53~54）。在1798至1800年间，当美国正与法国展开“一场半官方战争”时，亚当斯（John Adams）甚至与英国和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结成“半官方的联盟”，并给予卢维杜尔以“半官方的认可”[洛根（Logan），1941，68]。

[294] 见特伦德利 (Trendley) (1961)。

[295] 见弗朗哥 (Franco) (1968)。当然，西班牙当局是担心的。1791年佛罗里达布兰卡 (Floridablanca) 伯爵 (Conde) 指示墨西哥和圣菲 (Santa Fe) 的总督 (Viceroys)，哈瓦那、波多黎各、圣多明各、特立尼达和卡塔赫纳 (Cartagena) 的地方长官确信“暴动的蔓延不应传播到西班牙拥有地区，而且特别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圣多明各政府应在边疆建立一个军事防线 (cordon)。” [韦尔纳 (Verna)，1984，747]。关于在圣多明各发生的圣多明各革命，见阿方索 (Dilla Alfonso) (1982，83~90)。西班牙政府分别于镇压1795年在路易斯安那，1794年在马提尼克岛 (Martinique) 和瓜德罗普 (Guadelope)、1792年在铁拉菲尔梅 (Tierra Firma) 和1797年在危地马拉 (Guatemala) 发生的反对奴隶制的暴动。

[296] 洛根 (1941，152)。艾吉尔 (Liévano Aguirre) 谈到了“为孤立海地而设立的”一个“安全线” (1968，954)。法国已在1825年承认了海地，英国在1833年 (解放奴隶之年) 承认了海地，而美国则更晚，是在1862年承认海地的。见洛根 (1941，76~77) 和乔丹 (1968，378，注脚2)。甚至西属美洲的那些共和国也与海地保持一定的距离，1824年哥伦比亚率先把海地逐出巴拿马大会 (Congress of Panama)。见韦尔纳 (1969，477~495) 和博尔 (Baur) (1970，410)。直到1865年巴西承认海地之前，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愿意承认海地。墨西哥直到1934年才承认海地。

在杜桑逝世后，海地的“黑色”才得到更大的重视。他死之后的第一位继位人德萨林 (Dessalines) 禁止非黑色人种的人拥有财产，而只对那些支持过海地独立的法国人以及有助于海地事业的德国人和波兰人予以例外对待 (韦尔那，1969，64；尼科尔斯，1978，179)。关于其标准，见帕孔斯基 (Pachonski) 和威尔森 (Wilson) (1986)。只在德萨森遇刺之后，海地才被分割为北部由克里斯托弗 (Eenri Christophe) 统治的一个黑人当政的王国和在西部及南部由后来成为玻利瓦尔的朋友的佩蒂翁 (Alenandre Pétion) 统治的一个由黑白混血儿为主的共和国。这分开的两部分于1811年又结合在一起了。关于这一时期，特别是关于海地的土地改革，见拉萨尔特 (Lacerte，1975)；也见伦达尔 (Lundhal) (1984)。特鲁伊洛特 (1971) 认为，联合进程的终结正是他称为黑人克里奥尔人的胜利。相同观点见约钦 (Joachim) (1970)。

[297] 见马达里亚加 (Madariaga) (1948，324~325) 和谢里登 (1976b，237)。它对古巴有特殊的影响，古巴当时可以取代圣多明各成为一个蔗糖供应国。圣多明各的奴隶暴动对于古巴的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都是一个“可怕的警告” (汉弗莱和林奇，1965a，19)。托马斯补充说，这个警告的威力是极大的，“足以使古巴的种植园主们在近100年内从未向奴隶们做出过让步” (1971，77)。也见奈特 (Knight) (1970，25) 和科温 (A.F. Corwin) (1967，22)，科温也观察到：“当关于海地奴隶起义的消息在1791年传到古巴时，在古巴的蔗糖利益发言人阿伦格 [(Francisco de) Aranga (y Parrens)] 认为，对于奴隶人数相对少的古巴来说，这不是一个吓人的范例，而在法属海地受损害的情况下，对古巴却是一个黄金一般的机会” (13~14页)。

[298] 例如，1766年废除印花税条例 (the Repeal of the Stamp Act) 之后通过了罗金汉 (Rockingham) 的宣告令 (Declaratory Act)。这个法令“几乎是根据1720年爱尔兰法案 (the

Irish Act of 1720) 逐字逐句抄下来的，而爱尔兰法案则是英国首脑和殖民地的领导人都熟悉的”。宣告令使北美大陆的人极为恼火 [詹姆斯 (James)，1973，296]。

[299] 做一个特有的比较，见哈洛 (1952，503)。他认为在16世纪，爱尔兰和爱尔兰人被看作如同条顿骑士团 (Teutonic Knights) 看待住在奥德河 (The Oder) 和维斯杜拉河 (the Vistula) 之间的野蛮土著人那样的人。也见詹姆斯 (1973，289~290)。

[300] 哈洛 (1952，505~506)。

[301] 萨维尔 (Savelle) (1953，207)。

[302] 帕尔默 (Palmer) (1959，I，165)。

[303] 多伊尔 (Doyle) (1981，153)。

[304] 麦克道尔 (McDowell) (1979，241)。关于英国从天主教徒中招募送往北美洲的士兵，见克劳斯 (Kraus) (1939，343~344)。

[305] 见克劳斯 (1939，346) 和哈洛 (1952，495)。

[306] 见戈德肖 (Godechot) (1965，145)。

[307] 多伊尔 (1981，157)。因此，他们甚至不能从他们获得的有限的主权中获利。关于爱尔兰不能控制她自己的生活，如同在1770年和1790年间，与葡萄牙人谈判达成一项贸易协约的企图是无效的所说明的那样，见拉梅 (Lammey) (1986，40)。

基督新教徒们的确争取过天主教徒的支持。但是天主教徒不愿意让基督新教徒议会中的代表他们。“天主教徒们事实上是会被代表的。这就是为什么爱尔兰革命 (Irish Revolution) 没达到预期目的的原因所在” (哈洛，1952，511)。

[308] 莱基 (Lecky) (1972，309)。

[309] 莱基 (1972，388)。

[310] 莱基 (1972，313)。1797春年厄尔斯特的总司令莱克将军 (General Lake) 在给总督卡姆登 (Viceroy Lord Camden) 的报告中说：“下层民众和大多数中产阶级都是坚决的共和份子，他们接受法国的道德观念。如果不达到革命目的，是不会满意的” (第135页) 他推荐采用“最强烈的高压手段”。

[311] 汤普森 (Thompson) (1968，470)。

[312] “那时的爱尔兰新教教会受到欺骗、恐吓、诱惑和劝服—有的被收买—去毁灭1782年取得的成就。1800年联合法案决定爱尔兰和英国合并成一个王国，议会在伦敦。在1782年后的几年中，教会显示了它的无能，在某一方面来说，它未能了解教会本身胜利的意义：独立必须

成为政策”（多伊尔）（Doyle）1981年，第179页。

[313] 诺思（North）（1974，67，73）。参看内特尔斯（Nettles）（1962年）。戈尔丁（Goldin）和刘易斯（Lewis）在美国靠中立政策在航运和出口业方面所取得的“极大刺激”实际究竟增加了多少个人平均增长率方面，是有保留的（1980，22）。参看大卫（David）（1967，154，188~194）和亚当斯（Adams）（1980，714，734）相同的观点。但是，丘恩卡（Cuenca）很支持诺思的看法，他特别强调与西班牙世界贸易的重要性，说这是“在国际债务即将到欠债时刻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和极重要的补偿”（1984，540）。参看泰勒（George Rogers Taylor）（1964，431）。

[314] 参看内特尔斯（1962，324~325）。这是与法国一场“准战争”的结果。

[315] 比米斯（Bemis）（1923，270）。比尔德（Beard）提出，1794年与英国贸易关系的中断可看作“对美国商人不可弥补的损失”并损害了政府和个人的信用。和平在另一方面“至少”能使“南方的贷方暂时安心，对各处农民都不会造成困难”（1915年，第274~275页）。参看威廉斯（Willams）（1972，228）。

[316] 见格拉汉（Graham）（1941，91）。

[317] “在美国革命时，一吨货物可以从欧洲海运3000英里到美洲，其运费和在这新国家运输30英里一样便宜”（诺思）（1965，213）。美国国内的运输费用，由于1816年汽船投入使用和1825年后建设运河系统而大幅度降低。参看科克伦（Cochran）（1981，44~48）。

[318] 见比约克（Bjork）（1964，184）。

[319] 内特尔斯（1962，184）。

[320] 1787年，美国进口棉花的一半来自西印度群岛（属欧洲各列强），其他1/4则来自奥斯曼帝国。到1807年，在282，000包棉花中，美国供应171，000包。见诺思（1966，41）。

[321] 布鲁奇（Bruchey）（1965，90~91）。指在美国建立可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纺织工业的经济障碍。见杰瑞米（Jeremy）（1981，34~35）。由1786至1792年贸易萧条引起的制造商暴动，被1793年后商业兴起所压服。见内特尔斯（1962，125）。

[322] 奇塔姆（Cheetham）于《和平或战争》（*Peace or War*）一书中写的（第20页），载于克劳德尔（Clauder）（1932，134）。

[323] “禁运法案由于自身的苛刻而导致失败”[菲顿（Fitton）（1958，313）]。虽然这法案在经济上对英国的损害比对美国的损害要大，但它也导致美国国内政治严重分裂。见弗兰克尔（Frankel）（1982，309），他坚持说禁运“执行情况良好”和“有效”。

[324] 见利比（Rippy）（1929，VI—VII）。

[325] 伊萨奎尔 (Eyjaguirre) (1957, 79)。见布拉丁 (Brading) (1983) 关于西属美洲独立的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认为是大西洋革命的第三幕, 另一观点认为在1808年仓促完成。

[326] 见肖努 (Chaunu) (1964, 193, 205)。

[327] “正如英国人原来摇摆于掠夺西属美洲殖民地和同它们贸易之间那样, 现在 (1796~1808) 英国也在征服这些殖民地还是解放这些殖民地之间犹疑不决” [汉弗莱斯 (Humphreys) (1952, 225)]。其实, 两者皆不需要, 因为如肖努所说, 从1797年到1810年, “伊比利亚人的美洲已成为英国殖民地中最美丽的殖民地” (1964, 210)。确实, 有一些如波纳尔 (Thomas Pownall) 的英国知名人士鼓吹建立一个和英国联合在一个大西洋联盟里的美洲国家独立团体。见舒茨 (Schutz) (1946, 264)。1785年, 法国驻西班牙大使报告说, 西班牙外交部长佛罗里达布兰卡 (Floridablanca) 表示害怕英国企图以给西班牙同样的损失来补偿它丧失13个殖民地的损失。见塞居尔-德佩隆 (Ségur-Depeyron) (1873, 376)。但事实上英国行动十分谨慎。

[328] 布斯凯 (Bousquet) (1974, 14)。“1789年法国革命后加速了西班牙经济崩溃的趋势” [罗德里格斯 (Rodriguez) (1976, 23)]。这对西班牙国内的影响极大。西班牙首先是与法国, 然后是与英国的冲突, 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为了获得足以“避免破产”的国家收入, 西班牙于1801年对中立船舶开放港口 [巴比尔 (Barbier) (1980, 37)]。这涉及“放弃作为1778条例 (reglamento) 基础的民族主义原则” [费希尔 (Fisher) (1985, 63)]。“在这过程中。必须牺牲波旁王族一直企图建立的统一经济, 于是在王室保护下开始了会被认可独立的分裂” (巴比尔) (1980, 21~22)。

[329] 见伊泽德 (Izard) (1979, 27~41)。

[330] 见加纳 (Garner) (1942) 和弗罗勒斯卡诺 (Florescano) (1696, 188~194)。

[331] 林奇 (Lynch) (1985, 25)。

[332] 见卢宾 (Lubin) (1968, 304~305) 和林奇 (1985, 48~49)。

[333] 这些新的执政团声称爱好和平并以它们的合法性为基础, 霍尔珀林—唐伊 (Halperin-Donghi) 问: “革命者自我形象的真诚性怎样?” 他说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并不认为他们 (在1810年) 是反叛者, 而是一个也许永远衰落的权力的继承人。没有理由对他们现在认为是他们的并想利用它谋私利的政治继承物表示不同政见” (1972, 129)。

[334] 考夫曼 (Kaufmann) (1951, 50~51)。此时, 英国利用西班牙衰弱的这个时机来建立和西班牙几个主要港口的“牢固贸易关系” (丘恩卡) (1981, 419)。参见利比 (1959, 18~19)。

[335] 见安娜 (Anna) (1978a, 64, 76和第三章各处) 和安娜 (1985, 67~68), 肖努讲到墨西哥知道“阿马鲁的起义迟了30年” (1964, 207)。

[336] “如果英国和法国一直维持和平关系，看来就不大可能发生1812年的英美战争”（霍斯曼Horsman）（1962，264）。参见吉布斯（Gibbs）说的：“按照亚当斯（J.Q.Adams）的看法，1812至1814年战争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坚持有权搜查中立国船只，但是争端的根源也许是要征服加拿大”（1969，88~89）。

[337] 加拿大沿海诸省觉得在“抵制美国联邦政策的及英政府方面”，可与新英格兰联合一致（克拉克）（Clark，1959，240）。至于法国发言人，当他们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以及他们的“革命热情”冷却后，也没有被美法新联盟重新燃起革命热情（第244页）。关于后者，参见乌利特（Ouellet）（1971，230）。

[338] 见乌利特（1971，37）。

[339] 见格拉汉：“在美国革命以后英国政策的各种变化中，从未放弃过航海法的根本原则——垄断运输……当英国从漫长的与拿破仑的斗争中得胜时，殖民垄断的原则基本上未受损害”（1941，197，218）。

[340] 英国人实际上取消了在佛罗里达对西班牙的支持。直到18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不得转让决议，希望西佛罗里达并入（于1813年完成）并警告英国勿企图重新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东佛罗里达。见比米斯（1943，28~30）和内特尔斯（1962，322~324）。1819年，美国取得了巨大的“外交上的胜利”，使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如果不割得克萨斯）并承认“美国对直达大西洋之间的领土有无可争议的权利”（比米斯）（1943，37~38）。

[341] 见珀金斯（Perkins）（1964，137~138）书中有关根特条约中各国所得的分析。

[342] 转引自利斯（Liss）（1983，209）。

[343] 见霍尔珀林-唐伊：“英国政府直到西班牙恢复王位以前一直对独立运动保持谨慎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如她现在不打算公开支持革命事业，也不会对志愿者参加对西班牙军队太注意。至于美国方面，在这点上表示出了对爱国者更仁慈的面孔：最后购买武器和招募海盗船变得容易得多”（1972，144）。事实上，美国对西属美洲运动援助的最后一个因素，即补充海盗船变得容易这事损及了美国本身。在1810年到1823年间西印度群岛就广泛出现了海盗，他们成了美国和西印度群岛之间“主要的贸易妨碍”[钱德勒（Chandler）1924，482]。

[344] 沃德尔（Waddell）（1985，205）。

[345] 见布斯凯（Bousquet）（1978，57）。19世纪的头15年中，只有拉丁美洲和西欧极大地扩张了英国的纺织品出口。

[346] 安德鲁斯（Andrews）（1985，128）。见费希尔（Fisher）：“1814到1815年库斯科（Cuzco）起义是一次受到秘鲁南部的人和印第安人广泛支持的争取独立的革命。如果利马和沿海居民支持的话，这次革命几乎可以肯定会取得成功。他们之所以未能成功只能解释为他们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和他们害怕印第安人”（1979，257）。到1821年，“秘鲁就只有很少西属美洲

克里奥尔人独立动员民众的迹象了”[博尼拉和斯伯丁(Bonilla & Spalding) 1972, 108]。参见拉德(Ladd)对墨西哥的看法:“害怕群众是上层克制牢骚的至关重要的因素”(1976, 89)。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对于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上层对独立运动不同程度支持的经济因素的仔细分析(特定农业出口区,扩展能力,竞争性质),见布斯凯(1974)。

[347] 汉弗莱和林奇(Humphreys & Lynch) (1965a, 124)。

[348] 劳特(Rout) (1976, 165)。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领导人的态度远非受人欢迎。阿根廷第二次去北秘鲁(Upper Peru)远征军的司令官贝尔格拉诺将军(General Belgrarło)说:“黑人和黑白混血人(mulatto)是暴民,他们又胆小又残忍.....唯一的安慰是白人官员正在途中”(转引自林奇, 1973, 85)。

[349] 林奇(1973, 210)。

[350] 见比尔克(Bierck) (1953, 365)。西班牙人利用这个诺言来反对他。并夸大海地军事援助的程度。见韦尔纳(Verna) (1983, 146)。

[351] 1953年一位委内瑞拉历史学家门多萨(Cristobal Mendoza)贬低印欧混血人(mestizo)(和黑人)在独立中的作用,他提出是“上层阶级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发动了独立运动”。无疑,他是对的。但为什么?关于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见阿吉埃(Lievano Aguirre) (1968, 947~948)。关于大地主的作用,见伊泽德(Izard 1979年,第50~51页)。关于独立斗争是一场“内战”,见巴古(Bagú 1979年,第13页)。关于大地主的领地,见布里托(Brito) (1966, 第1卷, 219~220)和伊泽德(Izard) (1979, 163)。

[352] 隆巴迪(Lombardi) (1971, 46)。

[353] 奥特(Ott) (1973, 194)。美国非常担心古巴。卡尔霍恩(Calhoun)在1822年鼓吹合并。美国的两桩害怕的事是古巴可能“落入英国之手”或“被黑人革命化”(利比) (1929, 80~81)。

[354] 这些是林奇(1973年)分别用来形容秘鲁、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形容词。

[355] 见利比(1929年, 112~114)和坦珀利(Temperley 1925a, 53)。关于美国承认独立,见罗伯逊(Robertson) (1918b, 261)。

[356] 卡尔(Carr) (1969, 452)。

[357] “在失去美洲方面,费尔迪南体制起了重大的作用”(安娜) (1978b, 357)。霍尔珀林—唐伊阐明了西班牙事件和坎宁—门罗立场之间的关系:“由于1823年西班牙专制主义的恢复,英国人的中立更为肯定地倾向于西属美洲革命的一边.....与此同时,美国在1822年购买了佛罗里达(条约签订于1819年,但到了1822年西班牙才批准),已失去了注意勿去冒犯费迪南

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理由，使其政策和英国的保持合作”（1972，146）。参见沃德尔（Waddell）（1985，213~223）。

[358] 见莫塔（Mota）（1973，76）。关于英国在巴西的突出地位，见曼彻斯特（Manchester 1933，第九、十章）。

[359] 其他两次——1794年在里约热内卢和1801年在伯南布哥（Pernambuco）——均被立即粉碎。

[360] 卢兹（Luz）（1960，第一卷，第二部分，405）。在这次叛变中，奴隶问题被看作是一个“可能的障碍”，问题的解决办法可能是解放黑白混血人（mulatto）（原文如此！）（399）。诺瓦伊斯（Novais）也用了“先兆”（precursor）这个字（1979，170）。

[361] 贝瑟尔（Bethell）（1985，166）。参看莫塔（Mota）（1967，103~194）论两次起义的区别。麦斯威尔（Maxwell）指出克里奥尔人害怕种族动乱导致一种“和英国政府显然一致的观点”（1973，238）。

[362] 诺瓦伊斯用的字是“preta”和“parda”来分别代表黑人和黑白混血人。

[363] 普拉多（Prado）（1957，48）。

[364] 转引自塔瓦勒斯（Tavares）（1977，57）。

[365] 见莫塔（1972，71~72）。

[366] 费伦（Phelan）（1960，768）。参看格里芬（Griffin）（1962，20）。

[367] 林奇（1973，340）。

参考文献

Abel, Wilhelm. (1973) . *Crises agraires en Europe* (XIIIe- XVe siècle) . Paris: Flammarion.

Aberdam, Serge. (1975) . “La Révolution et la lutte des métayers, ” *Etudes rurales*, No. 59, 73-91.

Abir, M. (1977) . “Modernisation, Reaction and Muhammad Ali’s ‘Empire,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XIII, 3, 295-313.

Abou-el-Haj, Rifa’at Ali. (1967) . “Ottoman Diplomacy at Karlowitz,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XVII, 4, 498-512.

Abou-el-Haj, Rifa’at Ali. (1969) . “The Formal Closure of the Ottoman Frontier in Europe: 1699-1703,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XXIX, 3, 467-475.

Abou-el-Haj, Rifa’at Ali. (1974) . “Ottoman Attitudes toward Peace Making: The Karlowitz Case, ” *Der Islam*, LI, 1, 131-137.

Abney, Jane. (1975) . “Femin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X, 1, 43-62.

Accarias de Sérionne, Jacques. (1766) . *Intérêts des nations de l’Europe développés relativement au commerce*, I . Paris: Desain.

Acomb, Frances. (1939) . “Unemployment and Relief in Champagne, 178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I, 1, 41-48.

Adams, Donald R., Jr. (1970) . “Some Evidence on English and American Wage Rat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 3, 499-520.

Adams, Donald R., Jr. (1980) . “American Neutrality and Prosperity, 1793-1808: A Reconsidera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 4, 713-737.

Adamu, Mahdi. (1979) . “The Delivery of Slaves from the Central Sudan to the Bight of Beni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 in H. A. Gemery & J.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63-180.

Ado, A. (1977) . “Le mouvement paysan et le problème de l'égalité (1789-1794) , ” in A. Soboul, dir.,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paysann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Ed. Sociales, 119-138.

Aguessy, Honorat. (1970) . “Le Dan-Homê du XIXe siècle était-il une société esclavagiste? ” *Revue française d'études politiques africaines*, No. 50, 71-91.

Agulhon, Maurice. (1980) . “1830 dans l'histoire du XIXe siècle français, ” *Romantisme*, X, 28/29, 15-27.

Ahlström, G, (1983) . “Aspects of the Commercial Shipping between St. Petersburg and Western Europe, 1750-1790, ” in W. J. Weringa *et al.*, eds., *The Interactions of Amsterdam and Antwerp with the Baltic Region, 1400-1800*.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153-160.

Aiton, Arthur S. (1932) . “Spanish Colonial Reorganization under the Family Compact.”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I, 3, 269-280.

Ajayi, J. F. Ade. (1965) . “West African St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in J. F. Ade Ajayi & I. Espie, eds., *A Thousand Years of We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 Nelson, 248-261.

Ajayi, J. F. Ade & Oloruntimehin, B. O. (1976) . “West Africa in the Anti-Slave Trade Era,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 : John. E. Flint, ed., *From c. 1790 to c. 18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1.

Akinjogbin, I. A. (1967) . *Dahomey and Its Neighbours, 1708-1818*.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Albion, Robert Greenhalgh. (1926) . *Forest and Sea Power: The Timber Problem of The Royal Navy, 1652-1852*,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Vol. X X IX.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den, Dauril. (1961a) . “The Undeclared War of 1773-1777: Climax of Luso-Spanish Platine Rivalr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 I , 1, 55-74.

Alden, Dauril. (1961b) . “The Marquis of Pombal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The Americas*, X VII, 4, 369-382.

Alden, Dauril. (1976) . “The Significance of Cacao Production in the Amazon Region During the Late Colonial Period: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C X X , 2, 103-135.

Aldrich, Robert. (1987) . “Late-Comer or Early Starter? New Views o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X VI, 1, 89-100.

Alexander, John T. (1970) . “Recent Soviet Historiography on the Pugachev Revolt: A Review Article,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IV, 3, 602-617.

Almeida Wright, Antônia Fernanda P. de. (1973) . “Os Estados Unidos e a independência do Brasil (revisando a posição norte-americana, ” *Revista de Historia*, XLVI, 94, 369-382.

Almquist, Eric L. (1929) . “Pre-famine Ireland and the Theory of 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1841 Censu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X, 3, 699-718.

Ambrose, Gwilym. (1931) . “English Traders at Aleppo (1658-1756) ,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2, 246-266.

Amin, Samir. (1971) . “La politique coloniale française à l’égard de la bourgeoisie commerçante sénégalaise (1820-1960) , ” in C.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1-376.

Amin, Samir. (1972a) . “Préface” to B. Barry, *Le Royaume de Waalo*. Paris: Maspéro, 7-54.

Amin, Samir. (1972b) .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e in Black Africa-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Forms, ”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X, 4, 503-524.

Anderson, B. L. & Richardson, David. (1983) .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fits of the British African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II, 3, 713-721.

Anderson, B. L. & Richardson, David. (1985) .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Profits of the British Africa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Rejoinder Rebutted,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V, 3, 705-707.

Anderson, J. L. (1972) . "Aspects of the Effects on the British Economy of the War Against France, 1793-1815, "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 1-20.

Anderson, J. L. (1974) . "A Measure of the Effect of British Public Finance, 1793-181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VII, 4, 610-619.

Anderson, M. S. (1952) .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 1769-70, "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XI, No. 16, 148-163.

Anderson, M. S. (1954) .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 of 1768-74,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IX, No. 270, 39-58.

Anderson, M. S. (1965) . "Europe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763-1790,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I: A. Goodwin, ed.,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252-278.

Anderson, M. S. (1967) . "The Continental System and Russo-Brit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 in K. Bourne & D. C. Watt; ed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Longmans, 68-80.

Anderson, M. S., ed. (1970) .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Near East, 1774-1923*. London: Edward Arnold.

Anderson, M. S. (1978) . *Peter the Great*. London: Thames & Hudson.

Anderson, M. S. (1979) . *Historians and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1715-178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nderson, M. S. (1984) . "Preface" to A. I. Bağış, *Britai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Ottoman Empire*. Istanbul: Isis.

Anderson, Perry. (1964) .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 *New Left Review*, No. 23, 26-54.

Anderson, Perry. (1980) .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R. L. & Richardson, David. (1983) .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fits of the British African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II, 3, 713-721.

Anderson, Terry L. (1979) . "Economic Growth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Statistical Renaissanc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X, 1, 243-257.

Andrews, Charles M. (1924) . *The Colonial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our Essays in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drews, Charles M. (1926)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

Interpreta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XI, 2, 219-232.

Andrews, George Reid. (1985) . “Spanish American Independence: A Structural Analysis, ”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XII, 1, 105-132.

Anisson-Dupéron, Etienne-Alexandre-Jacques. (1847) . “Essai sur les traités de commerce de Methuen et de 1786 dans leur rapports avec la liberté commerciale, ”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6e année, X VII, 1-17.

Anna, Timothy E. (1974) . “Economic Causes of San Martin’s Failure at Lim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V, 4, 657-681.

Anna, Timothy E. (1975) . “The Peruvi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Freedom by Coercion, ”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II, 2, 221-248.

Anna, Timothy E. (1978a) . *The Fall of the Royal Government in Mexico City*.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Anna, Timothy E. (1978b) . “The Buenos Aires Expedition and Spain’s Secret Plan to Conquer Portugal, 1814-1820, ” *The Americas*, X X XIV, 3, 356-379.

Anna, Timothy E. (1983) . *Spain and the Loss of America*.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Anna, Timothy E. (1985) . “The Independence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II: L. Bethell, ed.,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1-94.

Anon. (1810) . “Cotton, ”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4th ed.,
Edinburgh.

Anstey, Roger. (1968) “Capitalism and Slavery: A Critiqu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I, 2, 307-320.

Anstey, Roger. (1974) . “The Volume and Profitability of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1761-1807, ” in S. L. Engerman & E. D. Genovese, eds.,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ntitative Stud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31.

Anstey, Roger. (1975) .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 London: Macmillan.

Anstey, Roger. (1976a) . “The Historical Debate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 in R. Anstey & P. E. H. Hair, eds., *Liverpool,
The Slave Trade, and Abolition*. Bristol, Eng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 157-166.

Anstey, Roger. (1976b) .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1751-1807: A
Comment,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VII, 4, 606-607.

Anstey, Roger. (1977) . “The Slave Trade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60-181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2,
259-268.

Appleby, Joyce. (1984) . *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Aptheker, Herbert. (1960)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

Arasaratnam, S. (1978) . “Indian Commercial Groups and European Traders, 1600-1800: Changing Relationships in Southeastern India, ” *South Asia*, n. s., I , 2, 42-53.

Arasaratnam, S. (1979) . “Trade and Political Dominion in South India, 1750-1790. Changing British-Indian Relationships, ” *Modern Asian Studies*, XIII, I , 19-40.

Arasaratnam, S. (1980) . “Weavers, Merchants and Company: The Handloom Industry in South-eastern India, 1750-1790,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VII, 3, 257-281.

Arbellot, Guy. (1973) . “La grande mutation des routes en France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XVIII, 2, 764-791.

Archer, Christon I. (1974) . “Pardos, Indians and the Army of the New Spain: Interrelationships and Conflicts, 1780-1810, ”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I, 2, 231-255.

Archer, Christon I. (1977) . *The Army in Bourbon Mexico, 1760-1810*.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Archer, Christon I. (1981) . “The Royalist Army in New Spa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s, 1810-1821, ”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XIII, 1, 57-82.

Archer, Christon I. (1982) . “The Officer Corps in New Spain: The Martial Career, 1759-1821, ”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von Staat*,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Lateinamerikas, X IX, 137-158.

Archives de la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France) . (1788-1789, 1797) .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ngleterre*, No. 46: *Mémoires sur le Commerce, le Finance, etc., 1713 à 1811* (Arch. A. E. 46) : 21. f°239-243 [ca. 1788-1789], 3e mémoire, Recherche sur ce qui est relatif aux étoffes de laines; 29. f°287-297, may 1797, Remarques sur le traité de commerce entre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de l'an 1786, par Theremin; 37. f°326-328, Brumaire an VIII, Moyens d'attaquer l'Angleterre dans la source de sa prospérité; 38. f°329-334, Paris, 29 nivose an 8, Arnould, membre du tribunal au 1er consul Bonaparte, sur la Paix: De la Paix avec l'Angleterre sous les rapports de la marine et du commerce de la France.

Arcila Farias, Eduardo. (1955) . *Elsiglo ilustrado en América. Reformas economicas del siglo XVIII en Nueva España*. Caracas: Ed.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Arciniegas, Germán. (1973) . *Los Comuneros*. Medellín: Ed. Bedout.

Ardant, Gabriel. (1975) .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4-242.

Argyle, W. J. (1966) . *The Fon of Dohomey: A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Old Kingd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rmengaud, André. (1973) . "Population in Europe, 1700-1914, " in C. M.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ollins/Fontana 22-76.

Armstrong, Maurice W. (1946) . “Neutrality and Religion in Revolutionary Nova Scotia, ” *New England Quarterly*, X IX, 1, 50-62.

Armytage, Frances. (1953) . *The Free Port System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A Study in Commercial Policy, 1766-1822*, Imperial Studies Series, Vol. X X. London: Longmans, Green.

Arnold, Rosemary. (1957a) . A Port of Trade: Whydah of the Guinea Coast, ” in K. Polanyi *et al.* ,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 154-176.

Arnold, Rosemary. (1957b) . “Separation of Trade and Market: Great Market of Whydah, ” in K. Polanyi *et al.*,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 177-187.

Arnould, Ambroise-Marie. (1791) . *De la balance du commerce et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xtérieures de la France dans toutes les parties du globe, particulièrement à la fin du règne de Louis X IV et au moment de la Révolution*, 2 vols. Paris: Buisson.

Artola, Miguel. (1952) . “Campillo y las reformas de Carlos III, ” *Revista de Indias*, XII, 50 685-714.

Ascherson, Neal, ed. (1975) . *The French Revolution: Extracts from The Times, 1789-1794*. London: Times Books.

Asdrubal Silva, Hernán. (1978)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ver Plate: Interrelationships and Influences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 in S. Tulchin, ed., *Hemispheric Prospectives on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2-36.

Ashton, T. S. (1924) .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Eng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Ashton, T. S. (1948)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shton, T. S. (1949) . “The Standard of Life of the Workers in England, 1790-183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uppl. IX, 19-38.

Ashton, T. S. (1959) .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England 170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siegbu, Johnson U. J. (1969) . *Slavery and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1787-1861*. London: Longmans.

Athar Ali, M. (1975) . “The Passing of Empire: The Mughal Case, ” *Modern Asian Studies*, IX, 3 385-396.

Auckland, William. (1861-1862) . *The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Lord Auckland*, 4 vol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Auffray, Danièle, Baudouin, Thierry, Collin, Michèle & Guillermin, Alain. (1980) . *Feux et lieux: Histoire d'une famille et d'un pays face à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Paris: Galilée.

Aufhauser, R. Keith. (1974) . “Profitability of Slavery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 1, 45-67.

Augé, Marc. (1971) . “L'organisation du commerce pré-colonial en Basse Côte d'Ivoire et ses effets sur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populations

côtières, ” in C.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3-167.

Aulard, A. (1913) . “La nuit du 4 août,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LIV, 200-215.

Austen, Ralph A. (1970) . “The Abolition of the Overseas Slave Trade: A Distorted Theme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V, 2, 257-274.

Austen, Ralph A. (1979) . “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A Tentative Census, ” in H. A. Gemery & J.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3-76.

Avelino, Ivone Días. (1978) . “Instituição do ‘comercio livre’ na mudança estrutural do sistema colonial espanhol, ” *Revista de historia do América*, No. 85, 59-83.

Avrich, Paul. (1973) . *Russian Rebels, 1600-1800*. London: Allen Lane.

Ayandele, E. A. (1967) . “Observations in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Slavery in Pre-colonial Northern Nigeria, ” *Niger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IX, 3, 329-338.

Azevedo, João Lucio d’. (1922) . *O Marque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2a ed. con emendas.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Bã, Amadou Hampaté & Daget, Jacques. (1962) . *L’empire peul de Macina, I : (1818-1853)* . Paris & La Haye: Mou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tudes Soudanaises*, III, 1955.)

Baer, Gabriel. (1983) . “Landlord, Peasant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Arab Provin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 in J. L. Bacqué-Grammont & P. Dumont, dirs., *Economie et sociétés dans l’Empire ottomane (fin du XVIIIe-début du XIXe siècle)* ,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601. Paris: Ed. du CNRS, 261-274.

Bagchi, Amiya Kumar. (1976a) . “De-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XII, 2, 135-164.

Bagchi, Amiya Kumar. (1976b) . “De-Industrialization in Gangetic Bihar, 1809-1901, ” in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Susobhan Chandra Sarkar*. New Delhi: People’s Publ. House, 499-522.

Bagchi, Amiya Kumar. (1976c) . “Reflections in Patterns of Regional Growth in India During the Period of British Rule, ” *Bengal Past and Present*, XCV, Part 1, No. 180, 247-289.

Bagchi, Amiya Kumar. (1979) . “A Reply,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VI, 2, 147-161.

Bağış, A. I. (1984) . *Britai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Ottoman Empire: Sir Robert Ainslie’s Embassy to Istanbul, 1776-1794*. Istanbul: Isis.

Bagú, Sergio. (1979) . “Prólogo, ” in M. Izard, *El miedo a la revolución*. Madrid: Ed. Tecnos, 13-17.

Bagwell, Philip S. (1974) . *The Transport Revolution from 1770*. London: B. T. Batsford.

Baillargeon, Georges E. (1968) . *La survivance du régime seigneurial à Montréal. Un régime qui ne veut pas mourir*. Ottawa: Le Cercle du Livre de France.

Bailyn, Bernard. (1962) .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VII, 2, 339-351.

Bailyn, Bernard. (1967) .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ilyn, Bernard. (1969) . “A Comment,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V, 2, 361-363.

Bailyn, Bernard. (1973) . “The Central Them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 Interpretation, ” in S. G. Kurtz & J.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3-31.

Bailyn, Bernard. (1986a) .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Knopf.

Bailyn, Bernard. (1986b) .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Bairoch, Paul. (1973a) .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 in C. M.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ollins/Fontana, 452-506.

Bairoch, Paul. (1973b) .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genèse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anglaise, ” *Annales E. S. C.*, X X VIII, 2, 545-553.

Bairoch, Paul. (1974) .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t sous-développement*, 4^e ed. Paris & La Haye: Mouton.

Bairoch, Paul. (1983) . “La place de l’énergie hydraulique dans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et au cours des X IX^e et X X^e siècles, ” paper delivered at X V Settimana di Studio, Ist. Int.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 Prato, 15-20 apr., mimeo.

Ballot, Charles. (1923) . *L’introduction du machinisme dans l’industrie française*. Paris: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section d’histoire moderne (depuis 1715) et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fasc. IX. Lille: O. Marquant.

Bamford, Paul Walden. (1952) . “France and the American Market in Naval Timber and Masts, 1776-1786,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1, 21-34.

Barber, Elinor. (1955) . *The Bourgeoisi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rbier, Jacques A. (1972) . “Elites and Cadres in Bourbon Chil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II, 3, 416-435.

Barbier, Jacques A. (1977) . “The Culmination of the Bourbon Reforms, 1787-1792,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VII, 1, 51-68.

Barbier, Jacques A. (1980) . “Peninsular France and Colonial Trade. The Dilemma of Charles IV’s Spain, ”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XII, 1, 21-37.

Barel, Yves. (1968) .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Russie tsariste*. Paris & La Haye: Mouton.

Barkan, Ömer Lütfi. (1954) . “La ‘Méditerranée’ de F. Braudel vue d’Istamboul, ” *Annales E. S. C.*, IX, 2, 189-200.

Barkan, Ömer Lütfi. (1956) . “Le Servage existait-t-il en Turquie? ” *Annales E. S. C.*, XI, 1, 54-60.

Barker, Charles Albro. (1940) .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volution in Marylan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arnave, Antoine. (1960) . *Introduction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ahiers des Annales*, No. 15. Texte établi sur la manuscrit original et présenté par Fernand Rude. Paris: Armand Colin.

Baron, Samuel H. (1972) .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in Russia: A Major Soviet Historical Controversy,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VII, 3, 715-729.

Baron, Samuel H. (1973) . “The Fate of the *gosti* in the Reign of Peter the Great,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 IV, 4, 488-512.

Baron, Samuel H. (1974) . “Who were the *Gosti*? ” *California Soviet Studies*, VII, 1-40.

Barr, Stringfellow. (1949) . *The Pilgrimage of Western M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Barrow, Thomas C. (1968)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Colonial War for Independence,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 X V , 3, 452-464.

Barry, Boubacar. (1972) . *Le royaume de Waalo: Le Sénégal avant la conquête*. Paris: Maspéro.

Barthélemy, Edouard. (1848) . *Notice historique sur les établissements des Cotes occidentales d'Afrique*. Paris: Arthus Bertrand.

Bartlett, Roger P. (1979) . *Human Capital: The Settlement of Foreigners in Russia, 1792-1804*.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thily, Abdoulaye. (1986) . "La traite atlantique des esclaves et ses effe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en Afrique: Le cas de Galam, royaume de l'hinterland sénégalais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X VII, 2, 269-293.

Bauer, Arnold J. (1971) . "The Church and Spanish American Agrarian Structure, 1765-1865, " *The Americas*, X X VIII, 1, 78-98.

Bauer, Arnold J. (1983) . "The Church in the Economy of Spanish America: *Censos* and *Depósito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III, 4, 707-734.

Bauer, John E. (1970) .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 *The Americas*, X X VI, 4, 394-418.

Baykov, Alexander. (1974)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 " in W. Blakewell, ed.,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Stali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5-2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VII, 1954.)

Bayly, C. A. (1975) . "Town Building in North India, 1740-1830, " *Modern Asian Studies*, IX, 4, 483-504.

Bayly, C. A. (1985) . "State and Economy in India Over Seven Hundred Year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VIII, 4, 583-596.

Bayly, C. A. (1986) .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during the Age of Revolutions, 1760-1830, " *Itinerario*, X, 2, 69-84.

Bazant, Jan. (1964) . "Evolución de la industria textil poblana (1544-1845) , " *Historia Mexicana*, XII, 4, 473-516.

Beales, H. S. (1929) . "Historical Revision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History*, n. s., X IV, No. 54, 125-129.

Bean, Richard. (1974) . "A Note 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Slaves and Gold in West African Exports,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V, 3, 351-356.

Beard, Charles A. (1913) .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Beard, Charles A. (1915) .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Macmillan.

Béaur, Gérard. (1984) . *Le marché fonder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Ed. de l'E. H. E. S. S.

Beck, Thomas. (1981) .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obility: A Reconsideration,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X V , 2, 219-233.

Becker, Charles & Martin, Victor. (1975) . “Kayor et Baol, royaumes sénégalais et traite des esclaves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XII, 226/227, 270-300.

Beckett, J. V. (1977) . “English Landownership in the Later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he Debate and the Problem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 4, 567-581.

Beer, George Louis. (1907) .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54-1765*. New York: Macmillan.

Behrens, Betty. (1965) . “‘Straight History’ and ‘History in Depth’: The Experience of Writers o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 *Historical Journal*, VIII, 1, 117-126.

Behrens, Betty (C. B. A.) . (1967) . *The Ancien Regim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ehrens-Abouseif, Doris. (1982) .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Copts, 1798-1923, ” in B. Braude & B. Lewis, ed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II : The Arabic-Speaking Land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85-205.

Belaunde, Victor Andrés. (1938) . *Bolivar an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ell, Herbert C. (1916) . “Britis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West

Indies, 1785-93,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 X XI, No. 123, 429-441.

Bemis, Samuel Flagg. (1916) . “Relations Between the Vermont Separatists and Great Britain, 1789-1791,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I, 3, 547-560.

Bemis, Samuel Flagg. (1923) . *Jay’s Treaty: A Study in Commerce and Diplomacy*. New York: Macmillan.

Bemis, Samuel Flagg. (1935) . *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Bemis, Samuel Flagg. (1943) . *The Lati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Bemis, Samuel Flagg. (1949) .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Knopf.

Bemis, Samuel Flagg. (1956) .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Union*. New York: Knopf.

Bendjebbar, André. (1987) . “Les problèmes des alliances politiques, sociales et économiques dans la Contre-Révolution angevine (1787-1799) , ” in F. Lebrun & R. Dupuy, eds., *Les résistances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Imago, 87-96.

Benians, E. A. (1940) . “The Beginnings of the New Empire, 1783-1793, ” in J. H. Rose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 The Growth of the New Empire, 1783-1870*.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35.

Ben-Shachar, Ari Y. (1984) . “Demand versus Suppl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Com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V, 3, 801-805.

Bent, J. Theodore. (1890) . “The English in the Levant,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 No. 20, 654-664.

Berend, Iván T. & Rañki, György. (1982) . *The European Periphery and Industrialization, 1780-1914*.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geron, Louis. (1970) .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de la France napoléonienn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VII, 3, 469-505 (“Discussion, ” 630-638) .

Bergeron, Louis. (1978a) . “Introduction,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7-9.

Bergeron, Louis. (1978b) . “Les réseaux de la finance internationale,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19-135.

Bergeron, Louis. (1978c) . “La révolution agricole en Angleterre,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226-232.

Bergeron, Louis. (1978d) .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anglaise,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317-345.

Bergeron, Louis. (1978e) . “L’économie française sous le feu de la révolu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347-369.

Bergeron, Louis. (1978f) . *Banquiers, négociants et manufacturiers parisiens du Directoire à l’Empire*. Paris & La Haye: Mouton.

Bergier, J. F. (1973) . “The Industrial Bourgeoisie and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1700-1914, ” in C. M.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ollins/Fontana, 397-451.

Berkes, Niyazi. (1964) .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Berlin, Ira. (1976) . “The Revolution in Black Life, ” in A. F. Young,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a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349-382.

Bernstein, Harry. (1945) . *Origins of Inter-American Interest, 1700-1812*.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erov, Ljuben. (1974) . “Changes in Price Conditions in Trade Between Turkey and Europe in the 16th-19th Centuries, ” *Etudes balkaniques*, II , 2/3, 168-178.

Berrill, K. E. (1960)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3, 351-359.

Bertaud, Jean-Paul. (1975) .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révoluti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X VII, No. 219, 66-94.

Berthoff, Rowland & Murrin, John M. (1973) . “Feudalism, Communalism, and the Yeoman Freehold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Accident, ” in S. G. Kurtz & J.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56-288.

Besset, Giliane. (1982) .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Bordeaux et la Russie au XVIIIe siècle,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 X III, 2, 197-219.

Bethell, Leslie. (1969) . “The Independence of Brazil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Brazilian Slave Trade: Anglo-Brazilian Relations, 1822-1826, ”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 , 2, 115-147.

Bethell, Leslie. (1985) . “The Independence of Brazil,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II: L. Bethell, ed.,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7-196.

Bezanson, Anna. (1922) . “The Early Use of the Term Industrial Revolution,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 X X VI, 2, 343-349.

Bhattacharya, Neeladri. (1986) . “Colonial State and Agrarian

Society, ” in S. Bhattacharya & R. Thapar, eds., *Situating Indian Histor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6-145.

Bhattacharya, Sabyasachi. (1983) . “Regional Economy: Eastern India, ” in D. Kumar, e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I : c. 1757-c. 19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0-332.

Bhattacharya, Sukumar. (1954) .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from 1704 to 1740*. London: Luzac.

Bien, David D. (1974) . “La réaction aristocratique avant 1789: l’exemple de l’armée, ” *Annales E. S. C.*, X X IX, 1. 23-48; X X IX, 2, 505-534.

Bierck, Harold C., Jr. (1953) . “The Struggle for Abolition in Gran Colombi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X III, 3, 365-386.

Bils, Mark. (1984) . “Tariff Protec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U. S.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 IV, 4, 1033-1045.

Birch, Alan. (1967)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1784-1879*. London: Frank Cass.

Birmingham, David. (1966) . *Trade and Conflict in Angola: The Mbundu and their Neighbou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rtugues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irmingham, David. (1970) . “Early African Trade in Angola and Its Hinterland, ” in R. Gray & D. Birmingham, eds., *Pre-Colonial African*

Trad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3-173.

Bjork, Gordon C. (1964) . “The Wean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Independence, Market Chang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V, 4, 541-560.

Blanc, Simone. (1964) . “Aux origines de la bourgeoisie russe,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 3, 294-301.

Blanc, Simone. (1969) . “Tatiščev et la pratique du mercantilisme,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 3/4, 353-370.

Blanc, Simone. (1974) . “The Economic Policy of Peter the Great, ” in W. Blakewell, ed.,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Stali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23-49. (Transl. from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III, 1962.)

Blaug, Mark. (1963) . “The Myth of the Old Poor Law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II, 2, 151-184.

Blaug, Mark. (1964) . “The Poor Law Report Reexamined,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V, 2, 229-245.

Bloch, Camille. (1900) . “Le traité de commerce de 1786 entre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 in *Etudes s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1760-89)* . Paris: Alphonse Picard et fils, 239-269.

Bloch, Camille. (1901) . *Memoire sur le Traité de Commerce de 1786 entre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d’après la correspondance du plenipotentiaire anglai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Extract from

Bulletin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900, 257-269.)

Bloch, Marc. (1930) . “La lutte pour l’individualisme agraire dans la France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I . 329-383; 511-556.

Bloch, Marc. (1952, 1956) .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A. Colin.

Bloch, Marc. (1966) . *French Rural History*.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och, Raymond (1970) . “Préface, ” in Albert Soboul, ed., *La civilisation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 : *Crise de l’Ancien Régime*. Paris: Arthaud, 11-13.

Blum, Jerome, (1960) . “Russian Agriculture in the Last 150 Years of Serfdom, ” *Agricultural History*, X X X IV, 1, 3-12.

Blum, Jerome. (1961) .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ahen, A. Adu. (1964) . *Britain, the Sahara, and the Western Sudan, 1788-186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ois, Paul. (1971) . *Paysans de l’Ouest*. Paris: Flammarion.

Bolton, G. C. (1966) .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X, 1, 195-200.

Bondois, Paul-M. (1933) . “L’organisation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Le *privilege* exclusif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I}, 2/3, 140-189.

Bonilla, Heraclio. (1972) . “Clases populares y Estado en el contexto de la crisis colonial, ” in *La Independencia en el Perú*, Perú Problema, No. 7. Lima: Institute de Estudios Peruanos, 13-69.

Bonilla, Heraclio & Spalding, Karen. (1972) . “La Independencia en el Perú: las palabras y los hechos, ” in *La Independencia en el Perú*, Peru Problema, No. 7.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70-114.

Bosher, J. F. (1965) . “French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ir European Setting,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I: A. Goodwin, ed.,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565-591.

Bosher, J. F. (1970) .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From Business to Bureaucracy*.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lègue, Jean. (1972) . *Les Luso-africains de Sénégal, X^{VI}-X^{IX}e siècles*. Dakar: Université de Dakar,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épartement d'Histoire.

Bouille, Pierre H. (1972) . “Slave Trad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in Eighteenth-Century Nantes,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IX}, 1^{er} trimestre, No. 214, 70-112.

Bouille, Pierre H. (1975) . “Marchandises de traite et développement industriel dans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du X^{VIII}e siècle,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XII}, 1^{er} et 2^e trimestres, Nos. 226/227, 309-330.

Bouloiseau, Marc. (1956) . “Aspects sociaux de la crise cotonnière dans les campagnes rouennaises en 1788-1789, ” in *Actes du 81^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Rouen-Caen: Section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403-428.

Bouloiseau, Marc. (1957) . *Cahiers de doléances du Tiers Etat du Baillage de Rouen pour les Etats généraux de 1789. I : La Vil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ouloiseau, Marc. (1960) . *Cahiers de doléances du Tiers Etats du Baillage de Rouen pour les Etats généraux de 1789. II : La baillage principal*. Rouen: Imprimerie administrative de la Seine-Maritime.

Bouloiseau, Marc. (1983) . *The Jacobin Republic, 1792-94*.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e, André J. (1953) . *The Influence of England on the French Agronomes, 1750-1789*.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Bourde, André J. (1967) . *Agronomie et agronome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3 vols. Paris: S. E. V. P. E. N.

Bourgin, Georges. (1908) . “Les communaux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Nouvel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3e sér., X X XII, 6, 690-751.

Bourgin, Georges. (1911) . “L’agriculture, la classe paysann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an IV) ,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IV, 155-228.

Bourgin, Hubert. (1904-1905) . “L’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e 1800 à 1830,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 22-37.

Bousquet, Nicole. (1974) . “La dissolution de l’empire espagnol au X IXe siècle et son contexte économique, ” unpublished M. A.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Bousquet, Nicole, (1978) . “La carrière hégémonique de l’Angleterre au sein de l’économimonde et le démantèlement des empires espagnol et portugais en Amérique au début du X IXe siècle, ”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Boutier, Jean. (1979) . “Jacquerie en pays croquant: les Révoltes paysannes en Aquitaine (décembre 1789-mars 1790) , ” *Annales E. S. C.*, X X X IV, 4, 760-786.

Bouvier, Jean. (1970) . “A propos de la crise dite de 1805. Les crises économiques sous l’Empir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VII, juil. -sept. 506-513.

Bowden, Witt. (1919) . “The English Manufacturers and the Commercial Treaty with Franc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V, 1, 18-35.

Boxer, C. R. (1969) .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Knopf.

Boyetet, M. (1789) . *Recueil de divers memoires relatifs au traité d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faits avant, pendant et après les négociations*. Versailles: Baudouin.

Brading, David A. (1970) . “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Revival of Zacateca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4, 665-681.

Brading, David A. (1971) . *Miners and Merchants in Bourbon Mexico, 1763-1810*.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Brading, David A. (1973a) . “La estructura de la producción agrícola en el Bajío de 1700 a 1850, ” *Historia Mexicana*, X X III, 2, 197-237.

Brading, David A. (1973b) . “Government and Elites in Late Colonial Mexico,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II, 3, 389-414.

Brading, David A. (1983) .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and Creole Patriotism: Simon Bolivar (1783-1830) and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Engl.: Centr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Brading, David A. (1984) . “Bourbon Spain and its American Empire,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 : Leslie Bethell, ed., *Colonial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89-439.

Brading, David A. & Wu, Celia. (1973) . “Population Growth and Crisis: León, 1720-1860, ”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 , 1, 1-36.

Brathwaite, Edward, (1971) . *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 1770-18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raude, Benjamin. (1979) .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Cloth in the Ottoman Empire, 1500-1650: A Study in Underdevelopment, ” *Review*, II, 3, 437-451.

Braude, Benjamin & Lewis, Bernard. (1982) . “Introduction, ” in B. Braude & B. Lewis, ed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I : *The Central Land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34.

Braudel, Fernand. (1958) .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 *Annales E. S. C.* , XIII, 4, 725-753.

Braudel, Fernand. (1979) .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 V e- X VIII e siècle*, I : *Les structures du quotidien*, II : *Les jeux de l’échange*, III: *Le temps du mond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Braudel, Fernand. (1980) . “L’empire turc est-il une économie-monde? , ” in *Memorial Ömer Lütü Barkan*,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tudes Anatoliennes d’Istanbul, Vol. X X VIII. Paris: Lib. d’Amérique et d’Orient A. Maisonneuve, 39-51.

Braudel, Fernand. (1982) .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II : *The Wheels of Commerce*. New York: Harper & Row.

Braudel, Fernand. (1984) .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III: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Brebner, John Bartlett. (1937) . *The Neutral Yankees of Nova Scotia: A Marginal Colon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ebner, John Bartlett. (1966a) . “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II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52-2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48.)

Brebner, John Bartlett. (1966) . *North Atlantic Triangle: The Interplay of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Briavoinne, Natalis. (1838) . "Sur les inventions et perfectionnemens dans l'industrie, depuis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jusqu'à nos jours, " Mémoire couronné le 8 mai 1837. *Mémoires couronnés par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Belles-Lettres de Bruxelles*, X III, 5-187.

Briavoinne, Natalis. (1839) . *De l'industrie en Belgique, causes de décadence et de prospérité, sa situation actuelle*, Vol. I . Bruxelles: Eugene Dubois.

Bridenbaugh, Carl. (1955) . *Cities in Revolt: Urban Life in America, 1743-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iggs, Asa. (1960) .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 in A. Briggs & J. Saville, eds.,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43-73.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 Reports from Committees. (1832) . X , Parts I & II.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I : Finance and Accounts-Trade*,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on August 16.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 Reports from Committees.

(1840a) . VII.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East India Produce*,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on July 21.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 Reports from Committees.
(1840b) . VII.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petitio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for Relief*,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on June 4.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 Reports from Committees.
(1848a) . IX.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Growth of Cotton in India*,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on July 17.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 Reports from Committees.
(1848b) . X X III, Part IV. *Supplement No. 1 to the Eighth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ugar and Coffee Planting*,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on May 29 (361—II—Suppl. No. 1)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 Accounts and Papers.
(1861) . XLIV. *Report of the Indigo Commission*,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on March 4.

Brito Figueroa, Federico. (1966) . *Historia económica y social de Venezuela*, 2 vols. Caracas: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Broder, Albert. (1976) . “Le commerce extérieur: L’échec de la conquête d’une position internationale,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305-346.

Broeze, Frank J. A. (1973) .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the

Navigation Acts, and the Continental Tobacco Market, 1770-9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 4, 668-678.

Brooks, George E. (1975) . “Peanuts and Colonialism: Consequences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eanuts in West Africa, 1830-70,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VI, 1, 29-54.

Brooks, Philip Coolidge. (1936) . “Spanish Roy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9-1821, ” in A. C. Wilgus, ed., *Colonial Hispanic America*.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559-572.

Brown, Jonathon C. (1979) . *A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Argentina, 1776-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Murray. (1965) . “Towards an Endogenous Explan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 *Social Research*, X X X III, 2, 295-313.

Brown, Robert E. (1955a) . “Economic Democracy Before the Constitution, ” *American Quarterly*, VII, 3, 257-274.

Brown, Robert E. (1955b) . *Middle-Class Democrac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assachusetts, 1691-178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rown, Vera Lee. (1922) . “Anglo-Spanish Relations in America in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Colonial Er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 3, 325-483.

Brown, Vera Lee. (1928) . “Contraband Trade: A Factor in the Decline of Spain’s Empire in Americ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III, 2, 178-189.

Brown, Vera Lee. (1929-1930)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pai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X V , 1/2, 3-92.

Brown, Wallace. (1974) . "The American Colonies and the West Indies, " *American History Illustrated*, IX, 2, 12-23.

Browning, Oscar. (1885) . "The Treaty of Commerce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in 1786,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 s. , II , 349-364.

Browning, Oscar, ed. (1909, 1910) . *Despatches from Paris, 1784-1790*, I : (1784-1787) , Camden Third Series, X VI, 1909; II : (1788-1790) , Camden Third Series, X IX, 1910. London: Office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Bruchey, Stuart. (1958) . "Success and Failure Factors: American Merchants in Foreign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 X X II , 3, 272-292.

Bruchey, Stuart. (1965) .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An Essay in Social Caus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Bruchey, Stuart. (1987) .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 Earlier America,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VII, 2, 299-319.

Brugière, Michel. (1986) . *Gestionnaires et profiteurs de la Révolution: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françaises de Louis X VI à Bonaparte*. Paris: Olivier Orban.

Brunet, Michel. (1959) . "The British Conquest: Canadian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Fate of the *Canadiens*,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XL, 2, 93-107.

Buckley, Roger Norman. (1979) . *Slaves in Red Coats: The British West India Regiments, 1795-1815*.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uda, Aleks. (1972) . "Problèmes de l'histoire de l'Albanie des VIIIe-X VIIIe siècles dans les recherches de la nouvelle historiographie albanaise, " in *Actes du II 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du Sud-Est Européen*, Athènes, 7-13 mai 1970, I : *Chronique du Congrès, Rapports*. Athènes: Comité Hellénique d'Organisation, 87-103.

Bullion, John L. (1983) . *A Great and Necessary Measure: George Greenvil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Stamp Act, 1763-1765*.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Burckhardt, Jacob. (1965) . *Fragments historiques*. Genève: Lib. Droz.

Burkholder, Mark A. (1972) . "From Creole to *Peninsula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udiencia de Lim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I, 3, 395-415.

Burkholder, Mark A. (1976) . "The Council of the Indies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New Perspectiv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VI, 3, 404-423.

Burstin, Haim. (1986) . "I sanculotti: un dossier da riaprire, " *Passato e presente*, No. 10, genn. -apr., 23-52.

Burt, A. L. (1931) . “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the Western Posts, ” *Report of Annual Meeting of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ttawa, May 26-27. Ottawa: Department of Public Archives, 61-75.

Busch-Zantner, R. (1938) . *Agrarverfassung, Gesellschaft und Siedlung in Südösteuropas in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ürkenzeit*. Leipzig: Otto Harrasowitz.

Bushneil, David. (1985) . “The Independence of Spanish South America,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II: L. Bethell, eds.,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5-156.

Butel, Paul. (1970) . “Crise et mutation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à Bordeaux sous le Consulat et l’Empir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VII, juil. -sept” 540-558.

Butel, Paul. (1978a) . “Les Amériques et l’Europe,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53-92.

Butel, Paul. (1978b) . “La richesse des Indes,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93-109.

Butel, Paul. (1978c) . “Marchés européens, traditions et renouvellements,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09-119.

Cadot, Michel & Van Regemorter, Jean-Louis. (1969) . “Le commerce extérieur de la Russie en 1784, d’après le journal de voyage de Baert du Hollant,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 , 3/4, 371-391.

Cahen, Léon. (1939) . “Une nouvelle interpretation du traité franco-anglais de 1786-1787, ” *Revue historique*, 64 année, CL X X X V , 2, 257-285.

Cain, P. J. & Hopkins, A. J. (1980)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III, 4, 463-491.

Cain, P. J. & Hopkins, A. G. (1986) .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 .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88-18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IX, 4, 501-525.

Calhoun, Craig. (1982) .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llahan, William J. (1968) . “A Note on the Real y General Junta de Comercio, 1679-1814,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I, 3, 519-528.

Callender, Guy S. (1902) . “The Early Transportation and Banking Enterprises of the States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 Corporation,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 VII, 1, 111-162.

Cameron, Rondo E. (1956) . “Some French Contributions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Germany, 1840-187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I, 3, 281-321.

Cameron, Rondo E. (1958) . “Economic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France, 1815-1914,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X X, 1, 1-13.

Cameron, Rondo. (1982)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Misnomer, ” *The History Teacher*, X V, 3, 377-384.

Cameron, Rondo. (1985) . “A New View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VIII, 1, 1-23.

Cameron, Rondo. (1986) . “Was England Really Superior to Franc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VI, 4, 1031-1039.

Cameron, Rondo & Freedeman, Charles E. (1983) . “French Economic Growth: A Radical Revision, ”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II, 1, 3-30.

Campbell, Leon G. (1972a) . “A Colonial Establishment: Creole Domination of the Audiencia of Lima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II, 1, 1-25.

Campbell, Leon G. (1972b) . “Black Power in Colonial Peru: The 1779 Tax Rebellion of Lambayeque, ” *Phylon*, X X X III, 2, 140-152.

Campbell, Leon G. (1976) . “The Army of Peru and the Túpac Amaru Revolt, 1780-1783,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VI, 1, 31-57.

Campbell, Leon G. (1979) . “Recent Research on Andean Peasant Revolts, 1750-1820, ”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X IV, 1, 3-49.

Campbell, Leon G. (1981) .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Túpac Amaru Army in 1780-81,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 4, 675-693.

Campbell, R. H. (1967)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Scotland: A Revision Article, ”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XLVI, 1, 141, 37-55.

Cannadine, David. (1984) .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0-1980, ” *Past and Present*, No. 103, May, 131-172.

Cárdenas Acosta, Pablo E. (1960) . *El movimiento comunal de 1781 en el Nuevo Reino de Granada (Reivindicaciones históricas)* , 2 vols. Bogotá: Ed. Kelly.

Carr, Raymond. (1969) . “Spain and Portugal, 1793 to c. 1840,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X: C. W. Crawley, ed., *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439-461.

Carrera Damas, Germán. (1963) . “A propósito de los hipótesis de Charles C. Griffin: Cuestiones económicos-sociales de la emancipación, ” *Crítica contemporanea*, No. 10, marzoabril, 13-21.

Carrière, Charles. (1973) . *Négociants marseillais au XVIIIe siècle*. Marseilles: Institut Historique de Provence.

Carus-Wilson, E. M. (1954) .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I . London: Edward Arnold, 41-6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1.)

Castaneda, C. E. (1929) . “The Corregidor in Span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X, 4, 446-470.

Catchpole, Brian & Akinjogbin, I. A. (1984) .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in Maps and Diagrams*. London: Collins Educational.

Cavanaugh, Gerald J. (1972) . “The Present State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Alfred Cobban and Beyond,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II, 4, 587-606.

Cazals, Rémy. (1983) . *Les révolutions industrielles à Mazamet, 1750-1900*. Paris & Toulouse: La Découverte-Maspéro, Privat.

Césaire, Aimé. (1961) . *Toussaint Louvertu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éspedes del Castillo, Guillermo. (1946) . “Lima y Buenos Aires: repercusiones económicas y políticas de la creación del Virreinato del Rio de la Plata, ” *Anuario de Estudios Americanos*, III, 667-874.

Chabert, Alexandre. (1945) . *Essai sur les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de 1798 à 1820*. Paris: Lib. de Médicis.

Chabert, Alexandre. (1949) . *Essai sur le mouvement des revenus et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France de 1798 à 1820*. Paris: Lib. de Médicis.

Chalmin, Pierre. (1968) . “La querelle des Bleus et des Rouges dans

l'Artiller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LVI, 4, 465-505.

Chaloner, W. H. (1957) . “The Agriculture Activities of John Wilkinson, Ironmaster, ” *Agriculture History Review*, V, 1, 48-51.

Chaloner, W. H. (1964) . “Hazards of Trade with France in Time of War, 1776-1783, ” *Business History*, VI, 2, 79-92.

Chamberlin, Christopher. (1979) . “Bulk Exports, Trade Tiers,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West Africa’s ‘Legitimate Trad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X, 2, 419-438.

Chambers, J. D. (1940) . “Enclosure and the Small Landowne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2, 118-127.

Chambers, J. D. (1953) . “Enclosure and Labour Suppl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 3, 319-343.

Chambers, J. D. (1957) . “The Vale of Trent, 1670-1800, a Regional Study of Economic Chang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 No. 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s, J. D. (1972) .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s, J. D. & Mingay, G. E. (1966) .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750-1880*. London: B. T. Batsford.

Chambre, Henri. (1964) . “Posoškov et le mercantilisme,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IV, 4, 335-365.

Champion, Edne. (1897) . *La France d’après les cahiers de 1789*. Paris: Armand Colin.

Chandler, Charles Lyon. (1924) . “United States Commerce with Latin America a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 X X VIII, 3, 466-486.

Chandra, Bipan. (1968) . “Reinterpretation of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V, 1, 35-75.

Chandra, Satish. (1966) . “Some Aspects of the Growth of a Money Economy in Ind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III, 4, 321-331.

Chandra, Satish. (1972) . *Parties and Politics at the Mughal Court, 1707-1740*, 2nd ed.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handra, Satish. (1974) . “Some Aspects of Indian Village Society in Northern India during the 18th Century—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Khud-kásht* and *páhi-kásht*, ” *Indian Historical Review*, I, 1, 51-64.

Chapman, Stanley D. (1965) . “The Transition to the Factory System in the Midlands Cotton-Spinning Indust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3, 526-543.

Chapman, Stanley D. (1970) .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1770-181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II, 2, 235-266.

Chapman, Stanley D. (1971) .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British Cott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in J. P. P. Higgins & S. Pollard, eds., *Aspects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 Great Britain, 1750-1850: A Preliminary Survey*. London: Methuen, 57-107.

Chapman, Stanley D. (1972) . *The Cotton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Chapman, Stanley D. (1979) . “Financial Restraints on the Growth of Firms in the Cotton Industry, 1790-18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II, 1, 50-69.

Chaptal, Jean-Antoine. (1819) . *De l’industrie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A. A. Renouard.

Chaptal, Jean-Antoine-Claude (1893) . “Un projet de traité d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sous le Consulat, ”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VII, 2, 83-98.

Charles, Eunice A. (1977) . *Precolonial Senegal: The Jolof Kingdom, 1800-1890*. Boston, MA: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Chassagne, Serge. (1978) . “L’industrie lainière en France à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mpériale (1790-1810) , ” in A. Soboul, dir.,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émoires et Documents, Vol. X X X V.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43-167.

Chassagne, Serge. (1979) . “La diffusion rurale de l’industrie cotonnière en France (1750-1850) , ” *Revue du Nord*, LXI, No. 240, 97-114.

Chassagne, Serge. (1980) . *Oberkampf: Un entrepreneur capitalist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Aubier Montaigne.

Chassagne, Serge. (1981) . “Aspects des phénomènes d’industrialisation et de désindustrialisation dans les campagnes françaises au X IXe siècle, ” *Revue du Nord*, LXIII, No. 248, 35-58.

Chaudhuri, Binoy Bhushan. (1976) . “Agricultural Growth in Bengal and Bihar, 1770-1860. Growth of Cultivation since the Famine of 1770, ” *Bengal Past and Present*, XCV, 1, No. 180, 290-340.

Chaudhuri, K. N. (1966) . “India’s Foreign Trade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ing Activities, 1828-184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2, 345-363.

Chaudhuri, K. N. (1968) . “India’s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ical Survey, ” *Modern Asian Studies*, II, 1, 31-50.

Chaudhuri, K. N. (1971) . “Introduction, ” in K. N. Chaudhuri, 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 under the East India Country, 1814-58. A Selection of Contemporary Writings*.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50.

Chaudhuri, K. N. (1974) . “The Structure of the Indian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I, 2/3, 127-182.

Chaudhuri, K. N. (1978) .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udhuri, K. N. (1979) . “Markets and Traders in Ind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in K. N. Chaudhuri & Clive J. Dewey,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Essays in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3-162.

Chaudhuri, K. N. (1981) . “The World-System East of Longitude 20°: The European Role in Asia, 1500-1750, ” *Review*, V , 2, 219-245.

Chaudhuri, K. N. (1982) . “Foreign Trade: European Trade in the India, ” in T. Raychaudhuri & I. Habib,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 . c. 1200-c. 170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82-407.

Chaudhuri, K. N. (1983a) . “Foreign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1757-1947) , ” in D. Kumar, e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I : c. 1757-c. 19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04-877.

Chaudhuri, K. N. (1983b) .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A Review of Reviews, ” *South Asia Research*, III, 1, 10-17.

Chaunu, Pierre. (1954) . “Pour une histoire sociale de l’Amérique espagnole coloniale, ” *Revue historique*. 78^e année, CCXI, 2, 309-316.

Chaunu, Pierre. (1963) . “Interprétation de l’indépendance de

l'Amérique latine, " *Bulletin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Strasbourg*,
LXI, 8, TILAS III, 403-421.

Chaunu, Pierre. (1964) .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Chaunu, Pierre. (1966) . *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classique*.
Paris: Arthaud.

Chaunu, Pierre. (1972a) . "Les enquêt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d'Histoire Quantitative de Caen: Réflexions sur l'échec industriel de la
Normandie, " in Pierre Léon *et al.*, dirs., *L'industrialisation en Europe au
XIXe siècle*,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540. Paris: Ed. du
CNRS, 285-299 (with "Discussion, " 300-304) .

Chaunu, Pierre. (1972b) . "Interpretación de la independencia de
América, " in *La Independencia en el Perú*, Perú Problema, No. 7.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67-194.

Chaussinand-Nogaret, Guy. (1970) . *Les financiers du Languedoc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S. E. V. P. E. N.

Chaussinand-Nogaret, Guy. (1975) . "Aux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noblesse et bourgeoisie, " *Annales E. S. C.*, X X X, 2/3,
265-278.

Chaussinand-Nogaret, Guy. (1981) . "La ville jacobine et
balzacienne, " in G. Duby,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III: E.
Le Roy Ladurie, dir., *La ville classique de la Renaissance aux Révolutions*.
Paris: Seuil, 537-621.

Chaussinand-Nogaret, Guy. (1985) . "L'identité nationale et le problème des élite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 *Commentaire*, No. 31, aut., 856-863.

Checkland, S. G. (1958) . "Finance for the West Indies, 1780-181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3, 461-469.

Chesnutt, David R. (1978) . "South Carolina's Impact Upon East Florida, 1763-1776, " in S. Proctor, ed., *Eighteenth-Century Florida and the Revolutionary South*.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5-14.

Chevallier, Dominique. (1968) .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Eastern Crisi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Syria Confronted with the European Economy, " in W. R. Polk & R. L. Chambers, eds.,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5-222.

Chicherov, A. I. (1971) .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6th-18th Centuries*. Moscow: Nauka.

Choulguine, Alexandre. (1922) . "L'organisation capitaliste de l'industrie existait-elle en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X, 2, 184-218.

Christelow, Allan. (1942) . "Contraband Trade Between Panama and the Spanish Main, and the Free Port Act of 1766,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II, 2, 309-343.

Christelow, Allan. (1947) . "Great Britain and the Trades from Cadiz and Lisbon to Spanish America and Brazil, 1759-1783,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VII, 1, 2-29.

Christie, Ian R. & Labaree, Benjamin W. (1976) . *Empire or Independence, 1760-1776*. New York: W. W. Norton.

Chung, Tan. (1974) . “The British-China-India Trade Triangle (1771-1840) ,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I, 4, 411-431.

Cipolla, Carlo. (1961) . “Sources d’énergie et histoire de la humanité, ” *Annales E. S. C.*, X VI, 3, 521-534.

Gipolla, Carlo M. (1973) . “Introduction, ” in C. M.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ollins/Fontana, 7-21.

Clapham, J. H. (1917) . “Loans and Subsidies in Time of War, 1793-1914, ” *Economic Journal*, X X VII, No. 108, 495-501.

Clapham, J. H. (1920) . “Europe After the Great Wars, 1816 and 1920, ” *Economic Journal*, X X X, No. 120, 423-435.

Clapham, J. H. (1923) . “The Growth of an Agrarian Proletariat, 1688-1832: A Statistical Note, ”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I , 1, 92-95.

Clapham, J. H. (1940) .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Colonies, 1783-1822, ” in J. Holland Rose, A. P. Newton & E. A. Benian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 The Growth of the New Empire, 1783-1870*.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217-240.

Clapham, J. H. (Sir John) . (1944) . *The Bank of England: A History*.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Clapham, J. H. (1966) . “The Last Year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II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44-17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10.)

Clark, Edward C. (1974) . “The Ottom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 , 1, 65-76.

Clark, G. N. (1953) . *The Idea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Glasgow: Jackson, Son & Co., 1953.

Clark, J. C. D. (1985) . *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Ideology,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 during the Ancien Regime*.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rk, J. C. D. (1986) .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rk, John G. (1970) . *New Orleans, 1718-1812: An Economic History*.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lark, John G. (1981) . *La Rochelle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lark, S. D. (1959) . *Movements of Political Protest in Canada, 1640-184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Clark, Victor S. (1916) .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00*.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Clarkson, Jesse Dunsmore. (1970) . “Some Notes on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in Russia, 1500-1800, ” in G. A. Ritter, hrsg., *Entstehung and Wandel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87-220.

Clauder, Anna C. (1932) . *American Commerce as Affected by the Wa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1793-1812*.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sis.

Clendenning, P. H. (1972) .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n Transla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Works,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 , 3, 745-753.

Clendenning, P. H. (1979) . “The Background and Negotiations for the Anglo-Russian Commercial Treaty of 1766, ” in A. G. Cross, ed.,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trasts and Comparisons*. Newton, M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45-163.

Clère, Jean-Jacques. (1982) . “La vaine pâture au X IXe siècle: un anachronism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IV année, No. 244, 113-128.

Clogg, Richard. (1973) . “Aspects of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 in R. Clogg, ed.,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Macmillan, 1-40.

Clough, Shepard B. (1957) . “The Diffusion of Industry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a Half, ” i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n*, Vol. II .

Milano: Istituto Ed. Cisalpino, 1341-1357.

Coale, A. J. & Hoover, E. M. (1969) .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opulation Growth, ” in Michael Drake, ed., *Popul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ethuen, 11-20. (Originally published 1958.)

Coats, A. W. (1958) . “Changing Attitudes of Labour in Mid-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1, 35-51.

Cobb, Richard. (1959) . “The Peopl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ast and Present*, No. 15, 60-72.

Cobb, Richard & Rudé, George. (1955) . “Le dernier 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Paris: Les journées de germinal et de prairial, an III, ” *Revue historique*, L X X IX, No. 219, 250-281.

Cobban, Alfred. (1954) . “British Secret Service in France, 1784-1792,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IX, No. 271, 226-261.

Cobban, Alfred. (1956) . “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History,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L X XI, 1, 1-17.

Cobban, Alfred. (1958) . *Historians and the Cau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amphlet No. 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obban, Alfred. (1963) . *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I : *Old Regime and Revolution, 1715-1799*, 3rd ed. Hammondswoth, Engl.: Penguin.

Cobban, Alfred. (1964) .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bban, Alfred. (1965) . *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II : From the First Empire to the Second Empire, 1799-1871*, 2nd ed. Hammondsworth, Engl.: Penguin.

Cobban, Albert. (1967) . “The French Revolution, Orthodox & Unorthodox: A Review of Reviews, ” *History*, L II , No. 175, 149-159.

Cobban, Alfred. (1968a) .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 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8-28. (Originally published 1965.)

Cobban, Alfred. (1968b) . “Historians and the Cau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29-67. (Originally published 1958.)

Cobban, Alfred. (1968c) . “The *Parlements* of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68-8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istory*, 1950.)

Cobban, Alfred. (1968d) . “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90-111. (Originally published 1955.)

Cobbett, William, ed. (1816) .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1803, X X VI: 15 May 1786 to 8 Feb. 1788*. London: T. C. Hansard.

Cochran, Thomas C. (1981) . *Frontiers of Change: Early*

Industri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elho, Philip R. P. (1973) . “The Profitability of Imperialism: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West Indies, 1768-1772,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 3, 253-280.

Cohen, Felix. (1949) . Appendix X IV to United Kingdom, Colonial Office, Gold Coast: *Report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by the 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lonial No. 250. London: HMSO, 100-104.

Cohen, Jon S. & Weitzman, Martin L. (1975) . “A Marxian Model of Enclosures,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 , 4, 287-336.

Cohn, Bernard S. (1961) . “From Indian Status to British Contrac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I, 4, 613-628.

Cole, Arthur H. (1959) . “The Tempo of Mercantile Life in Colonial America, ”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 X X III, 3, 277-299.

Cole, G. D. H. (1952) .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1750-1950*. London: Macmillan.

Cole, W. A. (1969) . “Tr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Smuggling, ” in W. E. Minchinton, ed.,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969, 121-14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8.)

Cole, W. A. (1973) . “Eighteenth-Century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 4, 327-348.

Cole, W. A. (1981) , “Factors in Demand, 1700-80,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65.

Cole, W. A. & Deane, Phyllis. (1966) . “The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s, ” in H. J. Habakkuk & M. Postan,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After: Incomes,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5.

Coleman, D. C. (1956) . “Industrial Growth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 *Economica*, n. s., X X III, No. 89, 1-22.

Coleman, D. C. (1964) .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Julius Gould & William L. Kolb, eds., *A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326-327.

Coleman, D. C. (1966) . “Industrial Growth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 in E. M. Carus-Wilson, eds.,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II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334-35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a*, 1956.)

Coleman, D. C. (1983) .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 Concept Too Man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VI, 3, 435-448.

Colley, Linda. (1984) . “The Apotheosis of George III: Loyalty, Royalty and the British Nation, 1760-1820, ” *Past and Present*, No. 102, 94-129.

Colley, Linda. (1986) . “Whose Nation? Cla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itain, 1750-1830, ” *Past and Present*, No. 113, 97-

117.

Collier, Simon. (1963) . *Ideas and Politics of Chilean Independence, 1808-1833*.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E. J. T. (1975) . “Dietary Change and Cereal Consumption in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 X III, Part II , 97-115.

Colvin, Lucie G. (1971) . “The Commerce of Hausaland, 1780-1833, ” in D. McCall & N. Bennett, eds., *Aspects of West African Islam*,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on Africa, Vol. V . Boston, MA: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101-135.

Comadrán Ruiz, Jorge. (1955) . “En torno al problema del indio en el Rio de la Plata, ” *Anuario de Estudios Americanos*, XII, 39-74.

Comninel, George C. (1985) .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Popular Movemen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in F. Krantz, ed., *History From Below: Studies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pular Ideology in Honour of George Rudé*. Montreal: Concordia University, 143-162.

Comninel, George C. (1987) . *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Confino, Michael. (1960a) . “Maîtres de forge et ouvriers dans les usines métallurgiques de l’Oural aux X VIIIe- X IXe siècles,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I , 2, 239-284.

Confino, Michael. (1960b) . “La politique de tutelle des seigneurs russes envers leurs paysans vers la fin du X VIIIe siècle, ” *Revue des études*

slaves, X X X VII, fasc. 1-4, 39-69.

Confino, Michael. (1961a) . “La comptabilité des domaines privés en Russi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18 de siècle (d’après les ‘Travaux de Société Libre d’Economie’ de St. Peters-bourg) ,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II, 1, 5-34.

Confino, Michael. (1961b) . “Problèmes agraires, le système des redevances mixtes: Dans les domaines privés en Russie (X VIIIe- X IX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 X VI, 6, 1066-1095.

Confino, Michael. (1963) . *Domaines et seigneurs en Russie vers la fin du X VIIIe siècle: Etude de structure agraires et de mentalités économiques*. Paris: Institut d’Etudes Slav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Confino, Michael. (1969) . *Systèmes agraires et progrès agricole: L’assolement triennal en Russie aux X VIIIe- X IXe siècles*. Paris & La Haye: Mouton.

Confino, Michael. (1986) . “The Limits of Autocracy: Russia’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 *Peasant Studies*, X III, 3, 149-170.

Congreso Hispánicoamericano de Historia. (1953) . *Causas y caracteres de la independencia hispanoamericano*. Madrid: Ed. Cult. Hispánica.

Connell, K. H. (1950) . “The Colonization of Waste Land in Ireland, 1780-184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I, 1, 44-71.

Connell, K. H. (1969) . “Some Unsettled Problems in English and Irish Population History, 1750-1845, ” in Michael Drake, ed., *Popul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ethuen, 30-3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1951.)

Conrotte, Manuel. (1920) . *La intervención de España en la Independenci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la América del Norte*. Madrid: Lib. General de Victoriano Suarez.

Cooper, Frederick. (1979) .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African Studies,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X , 1, 103-125.

Coquery-Vidrovitch, Catherine. (1971) . “De la traite des esclaves à l’exportation de l’huile de palme et des palmistes au Dahomey: X IXe siècle, ” in C.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7-123.

Coquery-Vidrovitch, Catherine & Moniot, Henri. (1974) . *L’Afrique noire de 1800 à nos jours*, Nouvelle Clio, No. 46.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quin, François-Xavier (1978) . “En Russie: l’initiative étatique et seigneuriale,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39-50.

Cornblit, Oscar. (1970) . “Levantamiento de masas en Perú y Bolivia durante el siglo dieciocho, ” *Revis 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ia*, VI, 1, 100-141.

Corwin, Arthur F. (1967) . *Spai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Cuba, 1817-1886.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Corwin, Edward S. (1915) . “The French Objectiv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I, 1, 33-61.

Corwin, Edward S. (1916) . *French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Alliance of 177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steloe, Michael P. (1981) . “Spain and the Latin American Wars of Independence: The Free Trade Controversy, 1810-1820,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 2, 209-234.

Cottret, Monique. (1986) . *La Bastille à prendre: Histoire et mythe de la forteresse roy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ughtry, Jay. (1981) . *The Notorious Triangle: Rhode Island and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1700-1807*.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ountryman, Edward. (1976a) . “‘Out of the Bounds of the Law’: Northern Land Riot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A. F. Young,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36-69.

Countryman, Edward. (1976b) . “Consolidating Power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The Case of New York, 1775-1783,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 4, 645-677.

Coupland, (Sir) Reginald. (1964) .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Movement*. London: Frank Cass. (Original edition 1933.)

Cracraft, James. (1980) . “More ‘Peter the Great,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X IV, 4, 535-544.

Craeybeckx, Jan. (1968) . “Les débuts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Belgique et les statistiques de la fin de l’Empire, ”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G. Jacquemyns*. Bruxelles: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Ed.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115-144.

Crafts, N. F. R. (1976) . “English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Re-Examination of Deane and Cole’s Estimat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X, 2, 226-235.

Crafts, N. F. R. (1977) .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nd France: Some Thoughts on the Question, ‘Why was England First?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3, 429-441.

Crafts, N. F. R. (1978) . “Entrepreneurship and a Probabilistic View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I, 4, 613-614.

Crafts, N. F. R. (1981) .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urvey,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6.

Crafts, N. F. R. (1983) .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700-1831: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VI, 2, 177-199.

Crafts, N. F. R. (1984) . “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1830-1910: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 I V , 1, 49-67.

Crafts, N. F. R. (1985) . “English Workers’ Real Wage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me Remaining Problem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 V , 1, 139-144.

Craton, Michael. (1974) . *Sinews of the Empi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Slavery*. New York: Anchor Press.

Creighton, Donald. (1937) . *The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St. Lawrence, 1760-1850*. Toronto: Ryerson Press.

Crosby, Alfred W. (1965) . *America, Russia, Hemp., and Napoleon: American Trade with Russia and the Baltic, 1783-1812*.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rouzet, François. (1958) . *L’économie britannique 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1806-1813)* ,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rouzet, François. (1959) . “Las origines du sous-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u Sud-Ouest, ” *Annales du Midi*, L X X I, No. 45, 71-79.

Crouzet, François. (1962) . “Les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de la Révolution: A propos d’un inédit de Sir Francis d’Ivernois,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X X I V , 2, 168, 182-217; No. 169, 336-362.

Crouzet, François. (1964) . “Wars, Blockad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urope, 1792-1815,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 V , 4, 567-590.

Crouzet, François. (1965) . “Bilan de l’économie britannique pendant l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 *Revue historique*, 92^e année, CC X X X IV, 1, No. 234, 71-110.

Crouzet, François. (1966) . “Le charbon anglais en France au X IXe siècle, ” in L. Trenard, dir., *Charbon et Sciences humaines, Actes du colloque*, Lille, mai 1963. Paris & La Haye: Mouton, 173-206.

Crouzet, François. (1967a) . “Agriculture et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quelques réflexions, ” *Cahiers d’histoire*, XII, 1/2, 67-85.

Crouzet, François. (1967b) .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Economic Growth, ” in R. M. Hartwell, ed.,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39-174. (Translated from *Annales E. S. C.*, 1966.)

Crouzet, François. (1970) . “Essai de construction d’un indice annuel de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française au X IX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 X V, 1, 56-99.

Crouzet, François. (1971) . “Discussion” of paper by Albert Soboul, in *L’abolition de la “feodaanté”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Colloque de Toulouse, 12-16 nov. 1968, 2 vols. Paris: Ed. du CNRS, II, 556-558.

Crouzet, François. (1972a) . “Introduction, ” in F. Crouzet, 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69.

Crouzet, François. (1972b) . “Capital Forma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F. Crouzet, 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62-22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II, 1965.)

Crouzet, François (1972c) . “Encor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française au X IXe siècle, ” *Revue du Nord*, L IV, No. 214, 271-288.

Crouzet, François. (1980) . “Toward an Export Economy: British Export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VII, 1, 48-93.

Crouzet, François. (1981) . “The Sources of England’s Wealth: Some French View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P. L. Cottrell & D. H. Aldcroft, eds., *Shipping, Trade and Commerce: Essays in memory of Ralph Davis*. Leicester, Engl.: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61-79.

Crouzet, François. (1. 985) . *De la supériorité de l’Angleterre sur la France—L’économique et l’imaginaire, X VIIIe- X X e siècles*. Paris: Lib. Académique Perrin.

Crummey, Robert O. (1977) . “Russian Absolutism and the Nobility,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LIX, 3, 456-468.

Cuenca Esteban, Javier. (1981) . “Statistics of Spain’s Colonial Trade, 1792-1820: Consular Duties, Cargo Inventories, and Balances of Trad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I, 3, 381-428.

Cuenca Esteban, Javier. (1984) . “Trends and Cycles in U. S. Trade with Spain and the Spanish Empir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IV, 2, 521-543.

Cunningham, Audrey. (1910) . *British Credit in the Last Napoleonic War*.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Cuno, Kenneth M. (1984) . “Egypt’s Wealthy Peasantry, 1740-1820: A Study of the Region of al-Mansūra, ” in T. Khalidi, ed., *Land Ten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303-332.

Currie, R. & Hartwell, R. M. (1965) . “The Making of an English Working Clas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3, 633-643.

Curtin, Philip D. (1950) .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in Saint-Domingue, 1788-1791,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 2, 157-175.

Curtin, Philip D. (1969) .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urtin, Philip D. (1974) . “Measuring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 in S. L. Engerman & E. D. Genovese, eds.,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ntitative Stud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4-128.

Curtin, Philip D. (1975a) . *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Senegambia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urtin, Philip D. (1975b) . *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Supplementary Evidence*.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urtin, Philip D. (1976) . “Measuring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nce Again: A Comment,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VII, 4, 595-605.

Curtin, Philip & Vansina, Jan. (1964) . “Source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Slave Trade,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 , 2, 185-208.

Cvetkova, Bistra A. (1960) . “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 turc de la fin du X VIe jusqu’au milieu du X VIIIe siècle, ” in *Etudes historiques*, à l’occasion du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Stockholm, août. Sofia: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ulgarie, 171-206.

Cvetkova, Bistra. (1969) . “Quelques problèmes du féodalisme ottomane à l’époque du X VIe- X VIIIe siècles, ” in *Actes du Premier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Balkaniques et Sud-est Européennes*, Sofia, 26 août-1 septembre 1966, III: *Histoire* (V e- X V e ss.; X V e- X VIIIe ss.) . Sofia: Ed. de l’Académie Bulgare des Sciences, 709-721.

Cvetkova, Bistra. (1970) . “Les *celep* et leur rôle dans la vie économique des Balkans à l’époque ottomane (X V e- X VIIIe siècles) , ” in M. 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2-192.

Daget, Serge. (1971) . “L’abolition de la traite des noirs en France de 1814 à 1831, ”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XI, 1, 14-58.

Daget, Serge. (1975) . “Long cours et négriers nantais du trafic illégal (1814-1833) ,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XII, 1^e et 2^e trimestres, Nos. 226/227, 90-134.

Daget, Serge. (1979) . “British Repression of the Illegal French

Slave Trade: Some Considerations, ” in H. A. Gemery & J.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9-442.

Dahlman, Carl J. (1980) . *The Open Field System and Beyond*.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kin, Douglas. (1973) .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ek State, 1821-33, ” in R. Clogg, ed.,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Macmillan, 156-181.

Daniel, Norman. (1966) . *Islam, Europe and Empi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aniels, George W. (1915-1916) . “The Cotton Trade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 *Transactions of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53-84.

Daniels, George W. (1917-1918) . “The Cotton Trade at the Close of the Napoleonic War, ” *Transactions of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1-29.

Danière, Andre. (1958a) . “Feudal Incomes and Demand Elasticity for Bread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II, 3, 317-331.

Danière, Andre. (1958b) . “Rejoinder,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II, 3, 339-341.

Darby, H. C. & Fullard, Harold. (1970)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X IV: *Atlas*.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Dardel, Pierre. (1948) . “Crises et faillites à Rouen et dans la Haute-Normandie de 1740 à l’an V ,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 X VII, 1, 53-71.

Dardel, Pierre. (1963) .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dans les ports de Rouen et du Havre au X VIIIe siècle*. Paris: S. E. V. P. E. N.

Darity, William, Jr. (1985) . “The Numbers Game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British Trade in Slav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 V, 3, 693-703.

Das Gupta, Ashin. (1967) . *Malabar in Asian Trade, 1740-1800*.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Das Gupta, Ashin. (1970) . “Trade and Politics in 18th-Century India, ” in D. S. Richard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A Colloquium*. Oxford, Engl.: Bruno Cassirer &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81-214.

Das Gupta, Ashin. (1974) .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Maritime Merchant, 1500-1800”) ,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Thirty-Fifth Session, Jadavpur (Calcutta)* , 99-111.

Das Gupta, Ashin. (1979) . *Indian Merch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rat c. 1700-1750*.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Datta, K. K. (1959) . “India’s Trade in the 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I , Part 3, 313-323.

Daumard, Adeline. (1976) . “L’état libéral et le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 in F. Braudel & E.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37-159.

Daumard, Adeline & Furet, François. (1961) . *Structures et relations sociales à Paris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Cahier des Annales, No. 18. Paris: Armand Colin.

Daumas, Maurice (1963) . “Le mythe de la révolution technique, ”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 X VI, 4, 291-302.

Daumas, Maurice. (1965) . “Introduction, ” in M. Daumas, dir”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II : *Les premières étapes du machin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v - x ix.

Daumas, Maurice & Garanger, André. (1965) . “Le machinisme industriel, ” in M. Daumas, dir.,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II : *Les premières étapes du machin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51-288.

David, Paul A. (1967) . “The Growth of Real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840: New Evidence, Controlled Conjectur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II, 2, 151-197.

Davidson, Basil. (1961) . *Black Mother: The Years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Davidson, Basil. (1971) . “Slaves or Captives? Some Notes on Fantasy and Fact, ” in D. I. Huggins *et al.*, eds., *Key Issues in the Afro-American Experience*, Vol. I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54-73.

Davies, Alan. (1958) . “The New Agriculture in Lower Normandy, 1750-1789,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VIII, 129-146.

Davies, K. G. (1957) .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London: Longmans, Green.

Davis, David Brion. (1975) .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vis, David Brion. (1983) . “American Slaver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in I. Berlin & R. Hoffman, eds., *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62-280.

Davis, Ralph. (1969) .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1774, ” in W. E. Minchinton, ed.,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99-12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2.)

Davis, Ralph. (1970) . “English Imports from the Middle East, 1580-1780, ” in M. 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06.

Davis, Ralph. (1973) .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en.

Davis, Ralph. (1979)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 Leicester, Engl.: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Davison, Roderic H. (1976) . “Russian Skill and Turkish

Imbecility': The Treaty of Kuchuk Kainardji. Reconsidered, " *Slavic Review*, X X X V , 3, 463-483.

De, Barun. (1964) . "Some Implications and Political and Social Trends in 18th Century India, " in O. P. Bhatnagar, ed.,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Modern India)* . Allahabad, India: St. Paul's Press Training School, 203-271.

Deane, Phyllis. (1957) . "The Output of the British Woolen Indust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II, 2, 207-223.

Deane, Phyllis. (1972) . "Capital Formation in Britain before the Railway Age, " in F. Crouzet, 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94-11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1.)

Deane, Phyllis. (1973a) . "Great Britain, " in Carlo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Collins/Fontana, Part One, 161-227.

Deane, Phyllis. (1973b) . "The Role of Capita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 3, 349-364.

Deane, Phyllis. (1979) .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2nd ed.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ane, Phyllis & Cole, W. A. (1967) .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2nd ed.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Deane, Phyllis & Hubakkuk, H. J. (1963) . "The Take-Off in

Britain, ” in W. W. Rostow, ed.,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London: Macmillan, 63-82.

Debbasch, Yvan. (1961) . “Poésie et traite, l’opinion française sur le commerce négrier au début du X IXe siècle,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XLVIII, Nos. 172/173, 3^e et 4^e trimestres, 311-352.

Debien, Gabriel. (1953) . *La Société coloniale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II : Les colons de Saint-Domingue et la Révolution. Essai sur le club Massia (Août 1789-Août 1792)* . Paris: Lib. Armand Colin.

Debien, Gabriel. (1954) . *Esprit colon et esprit d’autonomie à Saint-Domingue an X VIIIe siècle*, 2e éd., Notes d’histoire coloniale, X X V . Paris: Larose.

DeClercq, Jules. (1864) . *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a France, I : 1713-1802*. Paris: Aymot.

De Gregori, Thomas R. (1969) .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ropical African Frontier*. Cleveland, OH: Pres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Dehio, Ludwig. (1962) . *The Precarious Balance*. New York: Knopf.

Delcourt, André. (1952) . *La France et l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e au Sénégal entre 1713-1763: La compagnie des Indes et de Sénégal*. Dakar: 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

Delgado, José Maria. (1979) . “Comerç colonial i reformisme borbònic: els decrets de lliure comerç, ” *L’Avenç*, No. 15, 24-28.

Desai, Ashok V. (1972) . "Population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in Akbar's Time,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IX, 1, 42-62.

Desai, Ashok V. (1978) . "Population and Standards Living in Akbar's Time. A Second Look,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 V, 1, 53-79.

Devine, T. M. (1976) . "The Colonial Trades and Industrial Investment in Scotland, c. 1700-18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X, 1, 1-13.

Devlashouwer, Robert. (1970) . "Le Consulat et l'Empire, période de 'take off' pour l'économie belg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VII, 610-619.

Deyon, Pierre & Guignet, Phillippe. (1980) . "The Royal Manufactures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France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X, 3, 611-632.

Dhondt, Jean. (1955) . "L'industrie cotonnière gantoise à l'époque français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I, 4, 233-279.

Dhondt, Jean & Bruwier, Marinette. (1973)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700-1914, " in C.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Part 1. London: Collins, 329-366.

Dickerson, Oliver M. (1942) . "Discussion of Professor Harper's and Professor Root's Papers,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III, 1, 29-34.

Dickerson, Oliver M. (1951) . *The Navigation Ac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Diffie, Bailey W. (1945) . *Lat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Colonial Period*.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Sons.

Digby, Simon. (1982) .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 in T. Raychaudhuri & I. Habib,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 . c. 1200-c. 170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5-159.

Dike, K. Onwika. (1956) .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illa Alfonso, Haroldo. (1982) . "La evolución histórica dominicana y sus relaciones con Haiti, 1492-1844, " *Santiago*, No. 48, 65-119.

Dipper, Christof. (1971) . "Die Bauern in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Zu einer aktuellen Kontroverse, "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II, 1, 119-133.

Disney, Anthony. (1978) . "Commentary on the Papers by S. Arasaratnam and I. Bruce Watson, " *South Asia*, n. s., I , 2, 65-66.

Dmytryshyn, Basil. (1960) . "The Economic Content of the 1767 *Nakaz* of Catherine II , " *American Slavonic & East European Review*, XIX, 1, 1-9.

Dobb, Maurice, (1946) .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Dobb, Maurice. (1961) . “Alcune considerazioni sulla rivoluzione industriale, ” *Studi Storici*, II , 3/4, 457-464.

Dodgshon, Robert A. (1976) . “The Economics of Sheep Farming in the Southern Uplands during 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50-1833,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X, 4, 551-569.

Doerflinger, Thomas M. (1976) . “The Antilles Trade of the Old Regime: A Statistical Overview,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 3, 397-415.

Dojnov, Stefan. (1984) . “La Russie et le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Bulgare au X VIIIe siècle, ” in *Etudes historiques*, XII, à l’occasion du V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Balkaniques du Sud-Est Européennes-Belgrade. Sofia: Ed. de l’Académie Bulgare des Sciences, 37-67.

Dominguez, Jorge F. (1980) . *Insurrection or Loyalty, the Breakdown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niol, Henri. (1886-1899) . *Histoire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rance à l’établissement des Etats-Unis d’Amérique*, 6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Doubout, Jean-Jacques. (1974) . “Problèmes d’une période de transition. De Saint-Domingue à Haiti—1793-1806, ” *La Pensée*, No. 174, 67-80.

Dovring, Folke. (1966) .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 in H. J. Habakkuk & M. Postan,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After: Incomes,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604-672.

Dovring, Folke. (1969) . "Eighteenth-Century Changes in European Agriculture: A Comment, "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I, 1, 181-186.

Doyle, David Noel. (1981) . *Ireland, Irishmen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0-1820*. Dublin: Mercier Press.

Doyle, William. (1972) . "Was There an Aristocratic Reac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 " *Past and Present*, No. 57, 97-122.

Doyle, William. (1980) .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ake, B. K. (1976) . "The Liverpool-African Voyage c. 1790-1807: Commercial Problems, " in R. Anstey & P. E. H. Hair, eds., *Liverpool, The Slave Trade, and Abolition*. Bristol, Eng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 126-156.

Drake, Michael. (1963) . "Marriag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Ireland, 1750-184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2, 301-313.

Drake, Michael. (1969) . "Introduction, " in Michael Drake, ed., *Popul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ethuen, 1-10.

Drescher, Seymour D. (1976a) . "Capitalism and Abolition: Values and Forces in Britain, 1783-1814, " in R. Anstey & P. E. H. Hair, eds., *Liverpool, The Slave Trade, and Abolition*, Bristol, Eng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 167-195.

Drescher, Seymour. (1976b) . “Le ‘declin’ du système esclavagiste britannique et l’abolition de la traite, ” *Annales E. S. C.*, X X XI, 2, 414-435.

Drew, Ronald F. (1959) . “The Emergence of an Agricultural Policy for Siberia in the X VII and XVIII Centuries, ” *Agricultural History*, X X X III, 1, 29-39.

Dreyfus, François-G. (1978) . “Le nouveau démarrage industriel des Allemagnes, ” in Pierre Léon, dir.,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III: Louis Bergeron, dir.,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36-39.

Druzhinin (Druzinin) , Michail Nikolaevic. (1973) . “Besonderheiten der Genesis des Kapitalismus in Russland, ” in P. Hoffmann & H. Lemke, hrsg., *Genesis und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ssland*.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6-62.

Druzhinina (Droujinina) , E. I. (1975) . “Les rapports agraires en Russie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 in *Le Village en France et en URSS: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Colloque franco-soviétique organisé à Toulouse du 24 au 29 mai 1971. Toulouse: Université de Toulouse-Le Mirail, Service des Publications, 209-221.

Dubinovsky de Bueno, Adela. (1985) . “Los origenes de la República en Chile, ” *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 No. 418, 111-120.

Dubois, Marcel & Terrier, Auguste. (1902) . *Un siècle d’expansion coloniale, 1800-1900*, Collection, les Colonies français, Tome I. Paris:

Augustin Challamel.

Dubuc, Alfred. (1967) . "Les classes sociales au Canada, " *Annales E. S. C.*, XII, 4, 829-844.

Duckham, Baron F. (1969) . "Serfdom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 *History*, LIV, No. 181, 178-197.

Duignan, Peter & Clendennen, Clarence. (1963)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1619-1862*.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Dukes, Paul. (1967) .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the Russian Nobility*.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Dukes, Paul. (1971) .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 *History*, LVI, No. 188371-386.

Dukes, Paul. (1977) . "Catherine II 's Enlightened Absolutism and the Problem of Serfdom, " in W. E. Butler, ed., *Russian Law: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Leiden: A. W. Sijthoff, 93-115.

Dukes, Paul. (1984) .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1613-1800*, 2nd impr.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Dull, Jonathan R. (1983) . "Fran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en as Tragedy, " in N. L. Roelker & C. K. Warner, eds., *Two Hundred Years of Franco-American Relations*. Worcester, MA: Hefferman Press, 1-22.

Dull, Jonathan R. (1985)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umas, François. (1904) . *Etude sur le Traité de Commerce de 1786 entre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Toulouse: E. Privat.

Dumbell, Stanley. (1923) . “Early Liverpool Cotton Import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otton Marke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Journal*, X X X III, No. 131, 362-373.

Dunham, Arthur Louis. (1955)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ance, 1815-1848*.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Dupâquier, Jacques. (1970) . “Problèmes démographiques de la France napoléonienn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VII, 339-358.

Dupâquier, Jacques. (1972) . “La non-révolution agricole du X 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 X VII, 1, 80-84.

Dupin, Baron Charles. (1858, 1859, 1860) . *Force productive des nations, depuis 1800 jusqu'à 1851*, Introduction aux rapports de la commission française instituée par la jury international d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à Londres, en 1851. 4 vol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I : 1 : 1-2, 1858; I : 2, 1859; I : 3, 1860.

Dupont de Nemours. (1786) . “Observations sur la Note concernant la Base du Traité de Commerce, communiqué par Monsieur le Comte de Vergennes à Monsieur le contrôleur Général, ” in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ris) : Angleterre*, No. 65: 1786: *Mémoires sur le projet de traité de Commerce. Dix pièces*, 34-234.

Dupont de Nemours. (1788) . *Lettre à la Chambre de Commerce de Normandie sur le Mémoire qu'elle a publié relativement au traité d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Rouen & Paris: Moutard.

Dutt, Romesh Chunder. (1956)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under the Early British Rule*, 8th imp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riginally published 1901.)

Dyck, Harvey L. (1980) . "Pondering the Russian Fact: Kaunitz and the Catherinian Empire in the 1770s, "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X XII, 4, 451-469.

Eagly, Robert V. & Smith, V. Kerry. (1976) .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London Money Market, 1731-1789,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VI, 1, 198-212.

Earle, Edward Meade. (1927) . "American Interest in the Greek Cause, 1821-1827,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X III, 1, 44-63.

East, Robert A. (1946) . "The Business Entrepreneur in a Changing Colonial Economy, 1763-1795,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uppl. VI, 16-27.

Eça, Raul d'. (1936) . "Colonial Brazil as an Element in the Early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rtugal, 1776-1808, " in A. A. Wilgus, ed., *Colonial Hispanic America*.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551-558.

Eccles, W. J. (1971) .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New France,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L II, 1, 1-22.

Edwards, Michael M. (1967) .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Cotton Trade, 1780-1815*. Manchester, Eng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Eeckante, Denise. (1965) . “Les brigands en Russie du X VIIe au X IXe siècle: mythe et réalité,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II, 3, 161-202.

Egnal, Mark. (1975)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ntinental Colonies, 1720-1775,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X X XII, 2, 191-222.

Egnal, Mark & Ernest, Joseph A. (1972) .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X X IX, 1, 3-32.

Egret, Jean. (1962) .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Ehrman, John. (1962) .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Commercial Negotiations with Europe, 1783-1793*.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ein, Elizabeth L. (1965) . “Who Intervened in 1788? A Commentary on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I, 1, 77-103.

Eisenstein, Elizabeth L. (1967) . “A Reply,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II, 2, 514-522.

Ellis, Geoffrey. (1978) . “Review Article: The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 CIII, No. 367, 353-376.

Ellis, Geoffrey. (1981) . *Napoleon's Continental Blockade: The Case of Als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llison, Thomas. (1862, 1863) . "The Great Cris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tton Trade: A Retrospect of Prices and Supply, 1790 to 1862, " *Exchange, a home and colonial review of commerce, manufactures, and general politics* (London) , I , 306-315 (1862) ; II , 45-54 (1863) .

Eltis, David. (1977) . "The Export of Slaves from Africa, 1821-1843,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VII, 2, 409-433.

Elwert, Georg. (1973) . *Wirtschaft und Herrschaft von 'Dāxome' (Dahomey) im 18. Jahrhundert: Ökonomie des Sklavenraubs und Gesellschaftsstruktur, 1724 bis 1818*. München: Kommissionsverlag Klaus Renner.

Embree, Ainslee T. (1962) . *Charles Grant 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mbree, Ainslee T. (1964) . "Landholding in India and British Institutions, " in R. E. Frykenberg, ed., *Land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dian Histor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33-52.

Emsley, Clive. (1981) . "An Aspect of Pitt's 'Terror': Prosecutions for Sedition During the 1790s, " *Social History*, VI, 2, 155-184.

Endrei, Walter. (1983) . "Energie hydraulique et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 paper delivered at X V Settimana di Studio, Ist. Int.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 Prato, 15-20 apr., mimeo.

Engels, Frederick. (1971) . “The Position of Engl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Karl Marx & Frederick Engels, *Articles on Britai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9-31. (Originally published 1844.)

Engerman, Stanley L. (1972) . “The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ment on the Williams Thesis, ”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LVI, 4, 430-443.

Engerman, Stanley L. (1975) . “Comments on Richardson and Boulle and the ‘Williams Thesis, ’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XII, 1^e et 2^e trimestres, Nos. 226/227, 331-336.

Engerman, Stanley L. (1976) . “Some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omparisons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XIX, 2, 258-275.

Engerman, Stanley L. (1981) . “Notes on the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 in P. Bairoch & M. Lévy-Leboyer, eds.,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46-57.

Engerman, Stanley L. (1986) . “Slavery and Emancip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Look at Some Recent Debat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VI, 2, 317-339.

Ernst, Joseph Albert. (1973a) . *Money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755-1775: A Study in the Currency Act of 1764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Ernst, Joseph Albert. (1973b) .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volution, ”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IV , 2, 137-148.

Ernst, Joseph Albert. (1976) . “‘Ideology’ an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olution, ” in A. F. Young,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59-185.

Escoffier, Maurice. (1907) . “La Restauration, l’Angleterre et les colonies, ”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 X XI, 40-56.

Evans, Laurence. (1983) . “Gulliver Bound: Civil Logistics and the Destiny of France, ” *Historical Reflections*, X , 1, 19-44.

Eversley, D. E. C. (1967) . “The Hom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750-80, ” in E. L. Jones & G. E. Mingay, eds.,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206-259.

Eyzaguirre, Jaime. (1957) . *Ideario y ruta de la emancipación Chilena*. Santiago, Chile: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Fage, J. D. (1969) .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in the Context of West African Histor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 3, 393-404.

Fage, J. D. (1975) . “The Effect of the Export Slave Trade on African Populations, ” in R. P. Moss & J. A. R. Rathbone, eds., *The Population Factor in African Studies*, 15-23.

Fage, J. D. (1980) . "Slaves and Society in Western Africa, c. 1445-c. 1700,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XI, 3, 289-310.

Falkner, S. A. (1919) . *Bumazhnia djengi frantzuzkoj revoljucii (1789-1797)* . Moscow: Redakcionno-Izdatelskogo Otdjela V. S. N. H.

Falkus, M. E. (1972) .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Russia, 1700-1914*. London: Macmillan.

Fanfani, Amintore. (1963) . "Osservazione sul significato del '700 nella storia economica, " *Economia e storia*, X , 1, 9-20.

Farley, J. Lewis. (1862) . *The Resources of Turkey Considered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ofitable Investment of Capital in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Farley, J. Lewis. (1872) . *Modern Turkey*. London: Hurst & Blackett.

Faucheux, Marcel. (1964) . *L'insurrection vendéenne de 1793: Aspec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Mémoires et Documents, X VII.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Fay, C. R. (1940) . "The Movement Towards Free Trade, 1820-1853, " in J. Holland Rose, A. P. Newton, & E. A. Benian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 The Growth of the New Empire, 1783-18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88-414.

Feavearyear, A. E. (1931) . *The Pound Sterling: A History of English Mon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ebvre, Lucien. (1962) . “Civilisation: Evolution d’un mot et d’un groupe d’idées, ” in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Paris: S. E. V. P. E. N., 481-528. (Originally published 1930.)

Fedorov, A. S. (1979) . “Russia and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urvey of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Links, ” in A. G. Cross, ed.,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trasts and Comparison*. Newton, M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37-144.

Fehér, Ferenc. (1987) . *The Frozen Revolution: An Essay on Jacobinism*.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instein, C. H. (1981) .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8-142.

Felix, David. (1956) . “Profi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Historic Record and Contemporary Analogies,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 X X , 3, 441-463.

Ferguson, E. James. (1953) . “Currency. Fina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onial Monetary Practices,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 , 2, 153-180.

Ferguson, E. James. (1954) . “Specula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Debt: The Ownership of Public Securities in Maryland, 179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I V , 1, 35-45.

Fernandez de Avila, Rafael Camón. (1975) . “La emancipación y el comercio catalán con América, ” *Revista de Indias*, X X X V , Nos. 139/142, 229-260.

Ferro, Marc. (1981) . “Tentation et peur de l’histoire, ” *Le monde diplomatique*, 28e année, No. 323, 32.

Findley, Carter V. (1970) . “The Legacy of Tradition to Reform: Origins of the Ottoman Foreign Ministr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 , 4, 334-357.

Findley, Carter V. (1972) .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Foreign Ministry: The Beginnings of Bureaucratic Reform under Selîm III & Mahmûd II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II, 4, 388-416.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540, Lyon, 7-10 oct. 1970. Paris: Ed. du CNRS, 372-373.

Hartwell, R. M. & Engerman, S. (1975) . “Modes of Immiserati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essimism, ” in Arthur J. Taylor, e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89-213.

Hartwell, R. M. & Higgs, Robert. (1971) . “Good Old Economic History,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VI, 2, 467-474.

Haskett, Richard C. (1954) . “Prosecuting the Revolu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X, 3, 578-587.

Hasquin, Hervé. (1971) . *Une mutation: le “Pays de Charleroi”*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ux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Belgique. Bruxelles: Ed.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Hauser, Henri. (1923) . "Avant-propos" to Charles Ballot, *L'introduction du machinisme dans l'industrie française.* Lille: O. Marquant, v -ix.

Hawke, G. R. & Higgins, J. P. P. (1981) . "Social Overhead Capital,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7-252.

Heaton, Herbert. (1932) .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VIII. New York: Macmillan, 3-13.

Heaton, Herbert. (1941) . "Non-Importation, 1806-1812,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I , 2, 178-198.

Heaton, Herbert. (1972) . "Financ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F. Crouzet, 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84-9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ulletin of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1937.)

Heavner, Robert O. (1978) . "Indentured Servitude: The Philadelphia Market, 1771-1773,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VIII, 3, 701-713.

Heckscher, Eli P. (1922) . *The Continental System: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eckscher, Eli F. (1934) . *Mercantilism*, 2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Helleiner, Karl F. (1965) . “The Vit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in D. V. Glass & D. C. E.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79-8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7.)

Hellie, Richard. (1967) . “The Foundations of Russian Capitalism, ” *Slavic Review*, X X VI, 1, 148-154.

Hellie, Richard. (1971) . *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nderson, Archibald. (1914) . “The Creative Forces in Westward Expansion: Henderson and Boon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 1, 86-107.

Henderson, H. James. (1973) .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i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 in S. G. Kurtz & J.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57-196.

Henderson, W. O. (1957) . “The Anglo-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 1, 104-112.

Henderson, W. O. (1961)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Continent*. London: Frank Cass. (Also entitl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Henderson, W. O. (1972) . *Britain and Industrial Europe, 1750-1870*, 3rd ed. Leicester, Engl.: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Henderson, W. O. (1976) . "The Labour Force in the Textile Industries, "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X VI, No. 76, 283-324.

Herr, Richard. (1958) . *The Eigh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Sp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rtzberg, Arthur. (1968) .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the Jews. The Origins of Modern Anti-Semit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hiladelphia, PA: Jewish Publ. Society of America.

Hess, Andrew C. (1970) . "The Evolution of the Ottoman Seaborne Empire in the Age of the Oceanic Discoveries, 1453-1525,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V , 7, 1892-1919.

Heston, Alan W. (1977) .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Akbar's Time: A Comment,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 IV, 3, 391-396.

Heuvel, Gerd van den. (1982) . *Grundprobleme der französischen Bauernschaft, 1730-1794*. München & Wien: Oldenbourg.

Heyd, Uriel, (1961) . "The Ottoman'Ulemâ and Westernization in the Time of Selîm III and Mahmûd II , " *Scripta Hierosolymitana*, IX: U. Heyd, ed.,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63-96.

Heyd, Uriel. (1970) . "The Later Ottoman Empire in Rumelia and Anatolia, " in P. M. Holt *et a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I : *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354-373.

Heywood, Colin. (1981) . "The Launching of an'Infant Industry'?"

The Cotton Industry of Troyes Under Protectionism, 1793-1860,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X , 3, 553-581.

Higonnet, Patrice. (1979) . “Babeuf: Communist or Proto-Communist?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 I , 4, 773-781.

Higonnet, Patrice. (1980) . “The Politics of Linguistic Terrorism and Grammatical Hegemon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Social History*, V , 1, 41-69.

Higonnet, Patrice. (1981) . *Class, Ideology, and the Rights of Noble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igonnet, Patrice. (1986) . “Le sens de la Terreur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Commentaire*, No. 35, 436-445.

Hill, Christopher. (1967) .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Pe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Vol. II . London: Penguin.

Hill, Christopher. (1980) . “A Bourgeois Revolution? , ” in J. G. A. Pocock, ed., *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 1641, 1688, 17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9-139.

Hirsch, Jean-Pierre, ed., (1978) . *La nuit du 4 août*, Collection Archives. Paris: Gallimard-Juilliard.

Hirsch, Jean-Pierre. (1979) . “Un fil rompu? A propos du crédit à Lill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 *Revue du Nord*, LXI, No. 240, 181-192.

Hirsch, Jean-Pierre. (1980) . “Note critique: Penso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E. S. C.*, X X X V , 2, 320-333.

Hirschman, Albert. (1957) . “Investment Policies and ‘Dualism’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 L V I I , 5, 550-570.

His de Butenval, Charles Adrien (Comte) . (1869) . *Précis historique et économique du traité du commerce entre la France et la Grande-Bretagne signé à Versailles, le 26 septembre 1786*. Paris: Dentu.

Hiskett, Mervyn. (1962) . “An Islamic Tradition of Reform in the Western Suda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Bulletin of SOAS*, X X V , 3, 577-596.

Hiskett, Mervyn. (1976) . “The Nineteenth-Century Jihads in West Africa, ” in J. E. Flint,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 : *From c. 1790 to c. 18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5-169.

Hobsbawm, E. J. (1952) . “The Machine-Breakers, ” *Past and Present*, No. 1, Feb., 57-70.

Hobsbawm, E. J. (1957) . “The British Standard of Living, 1790-18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 1, 46-68.

Hobsbawm, E. J. (1962) .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Mentor.

Hobsbawm, E. J. (1963) .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 I , 1, 120-134.

Hobsbawm, E. J. (1968) . *Industry and Empire*, The Pelic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II. Harmondsworth, Engl.: Penguin.

Hobsbawm, E. J. (1975) . "Essays in Postscript: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ebate, " in Arthur J. Taylor, e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79-188.

Hodgkin, Thomas. (1960) . "Uthman dan Fodio, " *Nigeria Magazine*, A Special Independence Issue, Oct., 75-82.

Hodgson, Marshall. (1974) . *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3 vol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erder, Dirk. (1976) . "Boston Leaders and Boston Crowds, 1765-1776, " in A. F. Young,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33-271.

Hoffman, Ronald. (1976) . "The 'Disaffec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South, " in A. F. Young,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73-316.

Hoffmann, Peter. (1973) . "Zur Problematik der sogenannten ursprünglichen Akkumulation in Russland, " in P. Hoffman & H. Lemke, hrsg., *Genesis and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ssland*, Berlin: Akademie-Verlag, 154-177.

Hoffmann, Walther G. (1955) . *British Industry, 1700-195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offmann, Walther G. (1958) .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Manchester, Eng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ogendorn, Jan S. (1977) . “The Economics of Slave Use on Two ‘Plantations’ in the Zaria Emirate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X , 3, 369-383.

Hogendorn, Jan S. (1980) . “Slave Acquisition and Delivery in Precolonial Hausaland, ” in B. K. Schwartz, Jr. & R. Dumett, eds., *West African Culture Dynamics: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 Hague: Mouton, 477-494.

Holderness, B. A. (1971) . “Capital Formation in Agriculture, ” in J. P. P. Higgins & S. Pollard, eds., *Aspects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 Great Britain, 1750-1850: A Preliminary Survey*. London: Methuen, 159-183.

Holderness, B. A. (1974) . “The English Land Marke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Case of Lincolnshir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I, 4, 557-576.

Hone, J. Ann (1982) . *For the Cause of Truth: Radicalism in London 1796-182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opkins, A. G. (1973) .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s.

Hoppit, Julian. (1986) . “Financial Crise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IX, 1, 39-58.

Horsman, Reginald. (1962) . *The Cause of the War of 1812*.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orton, W. R. G. (1954) . “The Ohu System of Slavery in a Northern Ibo Village-Group, ” *Africa*, X X IV, 4, 311-336.

Hoselitz, Bert F. (1955a) . “Entrepreneurship and Capital Formation in France and Britain since 1700, ”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91-337.

Hoselitz, Bert F. (1955b) . “Reply”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85-393.

Hossain, Hameeda. (1979) . “The Alienation of Weavers: Impact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venue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50-1800,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 VI, 3, 323-345.

Hourani, Albert. (1957) .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in the XVIIIth Century, ” *Studia Islamica*, VIII, 89-122.

Hourani, Albert. (1968) . “Ottoma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Notables, ” in W. R. Polk & R. L. Chambers, eds.,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1-68.

Houtte, François-Xavier van. (1949) . *L'évolution de l'industrie textile en Belgique et dans le monde de 1800 à 1939*, Université de Louvain, Collection de l'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No.

141. Louvain: E. Nauwelaerts.

Hueckel, Glenn. (1973) . "War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793-1815: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4, 365-396.

Hueckel, Glenn. (1976a) . "English Farming Profits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1793-1815,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III, 3, 331-345.

Hueckel, Glenn. (1976b) . "Relative Prices and Supply Response in English Agriculture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X, 3, 401-414.

Hueckel, Glenn. (1981) . "Agriculture During Industrialisation,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2-203.

Hufton, Olwen. (1980) . *Europe: Privilege and Protest, 1730-1789*, Vol. X of Fontana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 Harvester.

Hufton, Olwen. (1983) .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Grain Suppl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IV, 2, 303-331.

Hughes, H. B. L. (1944) . "British Policy Towards Haiti, 1801-1805,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XXV, 4, 397-408.

Hughes, J. R. T. (1968) . "Industrialization: I. Economic Aspects,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VII. New

York: Macmillan & Free Press, 252-263.

Hughes, J. R. T. (1969) . "Discuss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X,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382-384.

Humboldt, Alexander von. (1972) .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the John Black translation (abridged) . New York: Knopf.

Humphreys, R. A. (1952) . "The Fall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Empire, " *History*, n. s., X X X VII, 213-227.

Humphreys, R. A. (1965) . *Tradition and Revolt in Latin America,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umphreys, R. A. & Lynch, John. (1965a) . *The Origins of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3-27.

Humphreys, R. A. & Lynch, John. (1965b) . "The Emancipation of Latin America, " in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II: Commissions*, Vienne, 29 août-5 sept., 1965. Wien: Ferdinand Berger & Sohne, 39-56.

Hunecke, Volker. (1978) . "Antikapitalistische Strömung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Neuere Kontroversen der Forschung, "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IV, 3, 291-323.

Hunt, David. (1979) . "The People and Pierre Dolivier: Popular Uprisings in the Seine-et-Oise Department (1791-1792)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XI, 2, 184-214.

Hunt, David, (1983) . “Theda Skocpol and the Peasant Route, ” *Socialist Review*, XIII, 4, 121-144.

Hunt, David. (1984) . “Peasant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Social History*, IX, 3, 277-299.

Hunt, E. W. & Bothan, E. W. (1987) . “Wages in Britai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L, 3, 380-399.

Hunt, H. G. (1959) . “Landownership and Enclosure, 1750-18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3, 497-505.

Hunt, Lynn. (1984) .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urewitz, J. C. (1956) .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I : A Documentary Record, 1535-1914*.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Hurewitz, J. C. (1961a) . “The Europeanization of Ottoman Diplomacy: The Conversion from Unilateralism to Recipro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Türk Tarih Kurumu Belleten*, XXV, No. 99, 455-466.

Hurewitz, J. C. (1961b) . “Ottoman Diplomacy and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 *Middle East Journal*, XV, 2, 141-152.

Huttenback, R. A. (1961) . “The French Threat to India and British Relations with Sind, 1799-1809,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VI, No. 301, 590-599.

Hyam, Ronald. (1967)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 *Historical Journal*, X , 1, 113-124.

Hyde, Charles K. (1973) .“The Adoption of Coke-Smelting by the British Iron Industry, 1709-1790,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 3, 397-418.

Hyde, Francis E., Parkinson, Bradbury B. & Marriner, Sheila. (1953) .“The Nature and Profitability of the Liverpool Slav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 , 3 368-377.

Hyslop, Beatrice Fry. (1934) .*French Nationalism in 1789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Cahi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mbart de la Tour, J., Dorvault, F., & Lecomte, H. (1900) . *Régime de la propriété; Régime de la main d’oeuvre; L’agriculture aux colonies*, Collection,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Tome V. Paris: Augustin Challamel.

Imlah, Albert H. (1958) . *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alçık, Halil. (1955) .“Land Problems in Turkish History, ” *The Muslim World*, XLV , 3221-228.

İnalçık, Halil. (1969)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X, 1, 97-140.

İnalçık, Halil. (1971) .“İmtiyāzāt, ii -The Ottoman Empire, ” in B. Lewis *et al.*,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 Vol. III. Leiden: E. J. Brill, 1179-1189.

İnalçık, Halil. (1980) . “Military and Fisc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600-1700, ” *Archivum Ottomanicum*, VI, 283-337.

İnalçık, Halil. (1983) . “The Emergence of Big Farms, *Çiftlik*s: State Landlords and Tenants, ” in J. L. Bacqué-Grammont & P. Dumont, ed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Empire ottoman*, Collection Turcica, Vol. III. Leuven: Ed. Peeters, 104-126.

Indova, E. I. (1964) . “Les activités commerciales de la paysannerie dans les villages de la région de Moscou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 2, 206-228.

Inikori, J. E. (1976a) . “Measuring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 Assessment of Curtin and Anste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VII, 2, 197-223.

Inikori, J. E. (1976b) . “Measuring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Rejoinder,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VII, 4, 607-627.

Inikori, J. E. (1977) . “The Import of Firearms into West Africa, 1750-1807: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VIII, 3, 339-368.

Inikori, J. E. (1981) . “Market Structures and the Profits of the British African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 4, 745-776.

Inikori, J. E. (1983) .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Profits of the British African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Rejoinder,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II, 3, 723-728.

Inikori, J. E. (1985) .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fits: A Further Rejoinder,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V, 3, 708-711.

Innis, Harold A. (1943) . “Decentralization and Democracy,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X, 3, 317-330.

Innis, Harold A. (1956) . *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rev.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ppolito, Richard A. (1975) . “The Effect of the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on Industrial Demand in England: 1730-1750, ” *Economica*, n. s., XLII, No. 167, 298-312.

Issawi, Charles. (1961) . “Egypt Since 1800: A Study in Lopsided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1, 1-25.

Issawi, Charles. (1966)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1914: A Book of Readings*,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sawi, Charles. (1980a)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 1800-1914*.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sawi, Charles. (1980b) . “Notes on the Negotiations Leading to the Anglo-Turkish Commercial Convention of 1828, ” In *Mémoires Ömer Lûtfi Barkan*,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Etudes Anatoliennes d’Istanbul, Vol. XXVIII. Paris: Lib d’Amérique et d’Orient A. Maisonneuve, 119-134.

Issawi, Charles. (1982)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Mille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in B. Braude & B. Lewis, ed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I : The Central Land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261-285.

Itzkowitz, Norman. (1962) . “Eighteenth Century Ottoman Realities, ” *Studia Islamica*, X VI, 73-94.

Izard, Miguel. (1979) . *El miedo a la revolución. La lucha para la libertad en Venezuela (1777-1830)* . Madrid: Ed. Tecnos.

James, C. L. R. (1963) .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James, Francis Goodwin. (1973) . *Ireland in the Empire, 1688-177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James Alton. (1917) . “Spanish Influence in the West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IV, 2, 193-208.

Jameson, J. Franklin. (1926)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Jeannin, Pierre. (1980) . “La protoindustrialisation: développement ou impasse? (Note critique) , ” *Annales E. S. C.*, X X X V, 1, 52-65.

Jelavich, Charles & Jelavich, Barbara. (1977)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lkan National States, 1804-1920*.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Jennings, Francis. (1975) . *The Invasions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zation,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Jennings, Francis. (1976) . “The Indians’ Revolution, ” in A. F. Young,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 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319-348.

Jensen, Merrill. (1936) . “The Cession of the Old Northwest, ”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 X III, 1, 27-48.

Jensen, Merrill. (1939) .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al Domain, 1781-1784, ”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 X VI, 3, 323-342.

Jensen, Merrill. (1957) . “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X X , 4, 321-341.

Jensen, Merrill. (1974)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thin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eremy, David J. (1977) . “Damming the Flood: British Efforts to Check the Outflow of Technicians and Machinery, 1780-1843, ”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L I , 1, 1-34.

Jeremy, David J. (1981) . *Transatlantic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iffusion of Textile Technologies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1790-1830s.* Cambridge, MA: M. I. T. Press.

Joachim, Bénéôit. (1970) . “La structure sociale en Haïti et le mouvement d’indépendance au dix-neuvième siècle, ”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XII, 3, 452-465.

Joachim, Benoît. (1971) . “Le néo-colonialisme à l’essai: La France et l’indépendance d’Haïti, ” *La Pensée*, No. 156, 35-51.

John, A. H. (1967) . “Farming in Wartime: 1793-1815, ” in E. L. Jones & G. E. Mingay, eds.,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28-47.

Johnson, Christopher H. (1983) . “Response to J. Rancière, ‘The Myth of the Artisan, ’”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24, 21-25.

Johnson, Marion. (1970) . “The Cowrie Currencies of West Africa,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 1, 17-49; XI, 3, 331-353.

Johnson, Marion. (1976) .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the Economy of West Africa, ” in R. Anstey & P. E. H. Hair, eds., *Liverpool, The Slave Trade, and Abolition*. Bristo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 14-38.

Johnson, Marion. (1978) .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African Crafts, ” in C. Dewey & A. G. Hopkins, eds., *The Imperial Impact: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frica and India*. London: Athlone, 259-270.

Johnson, Marion. (1980) . “Polanyi, Peuker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ahome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XI, 3, 395-398.

Jones, Alice Hanson. (1980) .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Th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ones, E. H. Stuart. (1950) . *The Invasion that Failed: The French Expedition to Ireland, 179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Jones, E. L. (1967) . “Industrial Capital and Landed Investment: The Arkwrights in Herefordshire, 1809-43, ” in E. L. Jones & G. E. Mingay, eds.,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48-71.

Jones, E. L. (1968a) .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griculture, 1815-1873*. London: Macmillan.

Jones, E. L. (1968b) . “Agricultural Origins of Industry, ” *Past and Present*, No. 40, 58-71.

Jones, E. L. (1970) . “English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650-1750, ” in R. M. Hartwell, 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42-76.

Jones, E. L. (1974a) .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60-1750: Agricultural Change, ” in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67-8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65.)

Jones, E. L. (1974b) .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750-1815, ” in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85-12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7.)

Jones, E. L. (1974c) . “The Agricultural Labour Market in England, 1793-1872, ” in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11-23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4.)

Jones, E. L. (1974d) . “The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ern England, 1650-1850,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 La Haye: Mouton, V , 423-430.

Jones, E. L. (1977) .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 ” *Agricultural History*, L I , 3, 491-502.

Jones, E. L. (1981) . “Agriculture, 1700-80,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6-86.

Jones, G. I. (1963) . *The Trading States of the Oil Rivers: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Ni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nes, Gareth Stedman. (1974) . “Working-Class Cultur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London, 1870-1890: Notes on the Remaking of a Working Class,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III, 4, 460-508.

Jones, Gareth Stedman. (1975) .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New Left Review*, No. 90, 35-69.

Jones, J. R. (1980) . *Britain and the World, 1649-1815*. Glasgow: Fontana.

Jones, M. A. (1965) . “American Independence in its Imperial, Strategic and Diplomatic Aspects, ” in A. Goodwin, ed.,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I: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480-508.

Jones, Robert Leslie. (1946) . "Agriculture in Lower Canada, 1792-1815,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VII, 1, 33-51.

Jones, Stuart. (1981) . "The First Currency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X, 3, 583-618.

Jordan, Winthrop D. (1968) .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NC: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Jouvenel, Bertrand de. (1942) . *Napoléon et l'économie dirigée. Le Blocus Continental*. Bruxelles & Paris: La Toison d'Or.

Juglar, Clément. (1891) . *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de leur retour périodique en France, en Angleterre, et aux Etats-Unis*. Paris: A. Picard.

Kahan, Arcadius. (1962) .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Iron Manufacturing in Russia,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X, 4, 395-422.

Kahan, Arcadius. (1966) . "The Costs of Westernization, in Russia: The Gentry and the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Slavic Review*, X X V, 1, 40-66.

Kahan, Arcadius. (1974a) . "Continuity in Economic Activity & Policy During the Post-Petrine Period in Russia, " in W. Blakewell, ed.,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Stali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53-70. (Originally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 1965.)

Kahan, Arcadius. (1974b) . "Observations on Petrine Foreign

Trade,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VIII, 2, 222-236.

Kahan, Arcadius. (1979) .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British Trade: Russia’s Contribu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 in A. G. Cross, ed.,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trasts and Comparisons*. Newton, M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81-189.

Kahan, Arcadius,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Richard Hellie. (1985) . *The Plow, the Hammer, and the Knout—An Economic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amendrowsky, Victor & Griffiths, David M. (1978) . “The Fall of the Trading Nobility Controversy in Russia: A Chapt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herine II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X X VI, 2, 198-221.

Kammen, Michael. (1970) . *Empire and Intere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and the Politics of Mercantilism*. Philadelphia, PA: J. P. Lippincott.

Kançal, Salgur. (1983) . “La conquête du **marché** interne ottoman par le capitalisme industriel concurrentiel (1838-1881) , in J. L. Bacqué-Grammont & P. Dumont, dirs., *Economie et Sociétés dans l’Empire Ottoman (fin du X VIIIe-Début du X Xe siècle)* ,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601. Paris: Ed. du CNRS, 355-409.

Kaplan, Lawrence S. (1972) . *Colonies into Nation: American Diplomacy, 1763-1801*. New York: Macmillan.

Kaplan, Lawrence S. (1977) . “Towards Isolationis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ranco-American Alliance, 1775-1801, ” in L. S. Kaplan,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 and “A Candid World.”*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34-160.

Kaplan, Steven L. (1976) .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 V* , 2 vo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Kaplan, Steven L. (1979) . “Réflexions sur la police du monde du travail, 1700-1815, ” *Revue historique*, **CCLXI**, 1, No. 529, 17-77.

Kaplan, Steven L. (1982) . “The Famine Plot Persuas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LX XII**, 3.

Kaplow, Jeffry. (1967) . “On ‘Who Intervened in 1788? ’,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 XII**, 2, 497-502.

Kaplow, Jeffry. (1972) . *The Names of Kings*. New York: Basic Books.

Karpat, Kemal H. (1972)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1789-1908,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II**, 3, 243-281.

Karpat, Kemal H. (1974) .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Istanbu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t I : Istanbul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tudes du Sud-Est Européen*, **XII**, 2, 269-308.

Kaufmann, William W. (1951) . *British Policy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4-1828*.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Kay, Marvin L. Michael. (1965) . "An Analysis of a British Colony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American Historiographical Controversy, "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XI, 2, 170-184.

Kay, Marvin L. Michael. (1976) . "The North Carolina Regulation, 1766-1776: A Class Conflict, " in A. F. Young,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71-123.

Keene, Charles A. (1978) . "American Shipping and Trade, 1798-1820: The Evidence from Leghor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VIII, 3, 681-700.

Keep, John. (1972) . "Light and Sha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Administration,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VI, 1, 1-9.

Kellenbenz, Hermann. (1970, 1971) . "Marchands en Russie aux X VIIe et X VIIIe siècles,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I, 4, 516-620 (1970) ; XII, 1/2, 76-109 (1971) .

Kellenbenz, Hermann. (1973) .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Archangel Route (from the late 16th to the late 18th Century) ,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 3, 541-581.

Kemp, Tom. (1962) .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Retardation of French Economic Growth, " *Kyklos*, X V, 2, 325-352.

Kennedy, Michael L. (1984) . "The Best and the Worst of Times:

The Jacobin Club Network from October 1791 to June 2, 1793,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VI, 4, 635-666.

Kenyon, Cecelia M. (1962) . “Republicanism and Radicalism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 Old-Fashioned Interpretation,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XIX, 2, 153-182.

Kenyon, Gordon. (1961) . “Mexican Influence in Central America, 1821-1823,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 I , 1, 175-205.

Kerr, Wilfred Brenton. (1932a) . “The Merchants of Nova Scoti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XIII, 1, 20-36.

Kerr, Wilfred Brenton. (1932b) . “Nova Scotia in the Critical Years, 1775-6, ” *Dalhousie Review*, XII, 97-107.

Kerr, Wilfred Brenton. (1936) . *Bermu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0-178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rridge, Eric. (1967) .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Kerridge, Eric. (1969) .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I, 4, 463-475.

Kessel, Patrick. (1969) . *La nuit du 4 août 1789*. Paris: Arthaud.

Kessinger, Tom G. (1983) . “Regional Economy: North India, ” in D. Kumar, e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I : c. 1757-c. 19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2-270.

Keyder, Çağlar. (1976) .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 *Economy and Society*, V , 2, 178-196.

Keyder, Çağlar & İslamoğlu, Huri. (1977) . “Agenda for Ottoman History, ” *Review*, I , 1, 31-55.

Kicza, John E. (1982) . “The Great Families of Mexico: Elite Maintenance and Business Practices in Late Colonial Mexico Cit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3, 429-457.

Kiernan, Victor. (1952) . “Evangelic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ast and Present*, No. 1, Feb., 44-56.

Kilson, Marion Dusser de Barenne. (1971) . “West African Society an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1-1865, ” in N. I. Huggins *et al.*, eds., *Key Issues in the Afro-American Experience*, Vol. I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39-53.

Kindleberger, Charles. (1975) . “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V , 3, 613-654.

Kirchner, Walther. (1966) .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 1400-1800: Collected Essay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isch, Herbert. (1959) . “The Textile Industries in Silesia and the Rhine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in Industrializa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4, 541-564.

Kisch, Herbert. (1962) .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he Lower Rhine Textile Districts—Some Commen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 2, 304-327.

Kizevetter, M. (1932) . “Paul Ier et l’état intérieur de la Russie à la fin du X VIIIe siècle, ” in Paul Milioukov, dir., *Histoire de la Russie*, II : *Les successeurs de Pierre le Grand: de l’autocratie appuyée sur la noblessa à l’autocratie bureaucratique*. Paris: E. Leroux, 629-655.

Klein, A. Norman. (1968) . “Karl Polanyi’s Dahomey: To Be or Not to Be a State? A Review Article, ”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II, 2, 210-223.

Klein, Herbert S. (1978) . “The English Slave Trade to Jamaica, 1782-1808,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I, 1, 25-45.

Klein, Martin A. (1968) . *Islam and Imperialism in Senegal: Sine-Saloum, 1847-191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lein, Martin A. (1972) .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Muslim Revolution in Senegambia,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III, 3, 419-441.

Klein, Martin & Lovejoy, Paul E. (1979) . “Slavery in West Africa, ” in H. A. Gemery & J.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81-212.

Klingaman, David. (1969) . “The Significance of Gra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bacco Coloni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X, 2, 268-278.

Knight, Franklin W. (1970) . *Slave Society in Cub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Knight, Franklin W. (1977) . “Origins of Wealth and the Sugar Revolution in Cuba, 1750-1850,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VII, 2, 231-253.

Knight, Franklin W. (1983)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Caribbean, ” in I. Berlin & R. Hoffman, eds., *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37-261.

Knollenberg, Bernhard. (1960) . *Origi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59-1766*. New York: Macmillan.

Knollenberg, Bernhard. (1975) .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6-1775*. New York: Free Press.

Kochanowicz, Jacek. (1980) . “Le paysan et la modernisation: Le Royaume de Pologn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 paper delivered at 1er Colloque Franco-Polonais, Antibes, 6-9 novembre.

Konetzke, Richard. (1946) . “El mestizaje y su importancia en el desarrollo de la población hispano-americana durante la época colonial, ” *Revista de Indias*, VII, No. 23, 7-44; VII, No. 24, 216-237.

Konetzke, Richard. (1950) . “La condición legal de los criollos y las causas de la Independencia, ” *Estudios americanos*, II, 5, 31-54.

Kopytoff, Igor. (1979) . “Commentary One [on Lovejoy], ” in M. Craton, ed., *Roots and Branch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Slave Studies*.

Toronto: Pergamon, 62-77.

Kopytoff, Igor & Miers, Suzanne. (1977) . "African 'Slavery' as an Institution of Marginality, " in S. Miers & I. Kopytoff, eds., *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3-81.

Koulischer, Joseph. (1931) . "La grande industri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France, Allemagne, Russi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II, No. 9, 11-46.

Koutaissoff, E. (1951) . "The Ural Metal Indust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V, 2, 252-255.

Köymen, Oya. (1971) . "The Advent and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 in the Ottoman Empire, " *Etudes balkaniques*, VII, 2, 47-55.

Kranzberg, Melvin. (1969) .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 XII. Chicago & Lond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10-215.

Kraus, Michael. (1939) . "America and the Irish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R. B. Morris, ed.,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32-348.

Krause, John T. (1958) . "Changes in English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1781-18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1, 52-70.

Krause, John T. (1967) . "Some Aspects of Population Change, 1690-1770, " in E. C. Jones & G. E. Mingay, eds.,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87-205.

Krause, John T. (1969) . “Some Neglected Factors in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Michael Drake, ed., *Popul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ethuen, 103-11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59.)

Kriedte, Peter. (1983) . *Peasants, 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00-180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iedte, Peter, Medick, Hans & Schlumbohm, Jürgen. (1977) . *Industrialisierung vo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Göttingen: Vanderhoeck & Ruprecht.

Kroeber, Clifton B. (1957) . *The Growth of the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Rio de la Plata Region, 1794-1860*.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Krooss, Herman E. (1969) . “Discuss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X,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384-385.

Kulikoff, Allan. (1971) . “The Progress of Neutrality in Revolutionary Boston,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 X VIII, 3, 375-412.

Kulshreshtha, S. S. (1964) .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under the Mughals (1526 to 1707 A. D.)* . Allahabad, India: Kitab Mahfal.

Kumar, Dharma. (1965) . *Law and Caste in South India*.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Kumar, Dharma. (1985) . “The Dangers of Manichaeism, ” *Modern Asian Studies*, X IX, 3, 383-386.

Kurmuş, Orhan. (1983) . “The 1838 Treaty of Commerce Reexamined, ” in J. -L. Bacqué-Grammont & P. Dumont, dirs., *Economie et Sociétés dans l’Empire Ottoman (fin du XVIIIe-Début du XXe siècle)* ,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601. Paris: Ed. du CNRS, 411-417.

Labrousse, C. -E. (1933) . *Esquisse de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2 vols. Paris: Lib. Dalloz.

Labrousse, C. -E. (1944) . *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Vol. I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abrousse, C. -E. (1945) . “Préface, ” in A. Chabert, *Essai sur les 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1798 à 1820*. Paris: Lib. des Médicis, i -ix.

Labrousse, C. -E. (1948) . “Comment naissent les revolutions, ” in *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29.

Labrousse, C. -E. [Ernest]. (1954) . “Préface” to Pierre Léon, *La naissance de la grande industrie en Dauphiné (fin du XVIIIe siècle-1869)*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v - x iv.

Labrousse, C. -E. [Ernest]. (1955) . “Voies nouvelles vers une

histoire de la bourgeoisie occidental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1700-1850) , ” in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Roma, 4-11 settembre, 1955. *Relazioni, IV: Storia moderna*. Firenze: G. C. Sansoni, 365-396.

Labrousse, C. -E. (1965) . “Eléments d’un bilan économique: La croissance dans la guerre, ” in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Vienne, 29 août-5 sept. *Rapports, I: Grands thèmes*. Horn/Wein: Ferdinand Berger & Sohne, 473-497.

Labrousse, C. -E. [Ernest]. (1966) . “The Evolution of Peasant Society in France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 in E. M. Acomb & M. L. Brown, Jr., eds.,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 Since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44-64.

Labrousse, C. -E. (1970) . “Dynamismes économiques, dynamismes sociaux, dynamismes mentaux,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 Des derniers temps de l’a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age industriel (1660-1789)*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691-740.

Lacerte, Robert K. (1975) . “The First L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The Reforms of Alexandre Pétion, 1809-1814, ” *Inter-American Economic Affairs, XXVIII, 4*, 77-85.

Lacy, Michael G. (1985) .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n Indians: Political Relations, ” in V. Deloria, Jr., ed.,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83-104.

Ladd, Doris M. (1976) . *The Mexican Nobility at Independence, 1780-1826*.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Lamb, D. P. (1976) . “Volume and Tonnage of the Liverpool Slave Trade, 1772-1807, ” in R. Anstey & P. E. H. Hair, eds., *Liverpool, The Slave Trade, and Abolition*. Bristol, Engl.: Western Printing Service, 91-112.

Lammey, David. (1986) . “The Irish-Portuguese Trade Dispute, 1770-90, ”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X X V , No. 97, 29-45.

Lanctot, Gustave. (1965) . *Le Canada et la Révolution américaine*. Montréal: Lib. Beauchemin.

Landes, David S. (1949) . “Frenc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 Grow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IX, 1, 45-61.

Landes, David S. (1950) .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French Cris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2, 195-211.

Landes, David S. (1958a) . “Reply to Mr. Danière an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bat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III, 3, 331-338.

Landes, David S. (1958b) . “Second Repl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VIII, 3, 342-344.

Landes, David S. (1969) .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Langer, W. L. (1975) . “American Foods and Europe’s Population Growth, 1750-1850,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III, 2, 51-66.

Lanning, John Tate. (1930) . “Great Britain and Spanish Recognition of the Hispanic American State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4, 429-456.

Laran, Michael. (1966) . “Nobles et paysans en Russie, de l’âge d’or’du servage à son abolition (1762-1861) , ” *Annales E. S. C.*, X XI, 1, 111-140.

Laslett, Peter. (1965) . *The World We Have Lost*. London: Methuen.

Last, Murray. (1974) . “Reform in West Africa: The Jihad Movem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in J. F. A. Ajayi &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 London: Longman, 1-29.

Latham, A. J. H. (1971) . “Currency, Credit and Capitalism on the Cross River in the Pre-Colonial Era,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I, 4, 599-605.

Latham, A. J. H. (1973) . *Old Calabar, 1600-1891: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Upon a Traditional Econom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atham, A. J. H. (1978) .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Early Palm Oil Trade,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IX, 2, 213-218.

Laufenberger, Henri. (1925) . “L’industrie cotonnière du Haut Rhin et la France, ”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C X X V , 387-415.

Laurent, Robert. (1976a) . “Les cadres de la production agricole: propriété et modes de production,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629-661.

Laurent, Robert. (1976b) . “L’utilisation du sol: La rénovation des methodes de culture,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663-684.

Law, Robin. (1977) . “Royal Monopoly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Atlantic Trade: The Case of Dahome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VIII, 4, 555-577.

Law, Robin. (1986) . “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Rise of Dahome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X VII, 2, 237-267.

Lazonick, William. (1974) . “Karl Marx and Enclosures in England, ”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I, 2, 1-59.

Lebrun, Pierre. (1948) . *L’industrie de la laine à Verviers pendant le X VIIIe et le début du X IXe siècle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Liège: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fasc. C X IV.

Lebrun, Pierre. (1960) . “Croissance et industrialisation: L’Expérience de l’industrie drapière verviétoise, 1750-1850, ”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Contribu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Stockholm, August. Paris & La Haye: Mouton, 531-568.

Lebrun, Pierre. (1961) . “La rivoluzione industriale in Belgio: Strutturazione e destrutturazione delle economie regionali, ” *Studi storici*, II , 3/4, 548-658.

Lecky, W. E. H. (1972) . *A History of Ire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Originally published 1892.)

Le Donne, John P. (1982, 1983) . “The Territorial Reform of the Russian Empire, 1775-1796. I : Central Russia, 1775-1784,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X X III, 2, 147-185 (1982) ; “ II : The Borderlands, 1777-1796, ” X X IV, 4, 411-457 (1983) .

Lee, R. D. & Schofield, R. S. (1981) . “British Popul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35.

Leet, Don R. & Shaw, John A. (1978) . “French Economic Stagnation, 1700-1960: Old Economic History Revisited,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II, 3, 531-544.

Lefebvre, Georges. (1929) . “La plac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histoire agraire de la Franc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 4, 506-523.

Lefebvre, Georges. (1932) . *La grande peur de 1789*. Paris: Lib. Armand Colin.

Lefebvre, Georges. (1937) . “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IV, No. 82, 288-329.

Lefebvre, Georges. (1939) . *Quatre-vingt-neuf*. Paris: Maison du Livre Français.

Lefebvre, Georges. (1947a) . “Review of Daniel Guérin, *La lutte de classes sous la première République*, ” i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IX, No. 106, 173-179.

Lefebvre, Georges. (1947b) .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febvre, Georges. (1956) . “Le myth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X VIII, No. 145, 337-345.

Lefebvre, Georges. (1963)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ysans, ” in *Etudes sur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2e ed. rev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338-36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ahie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33.)

Lefebvre, Georges. (1968)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ol. X III of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6th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efebvre, Georges. (1969) . *Napoleon from 18 Brumaire to Tilsit, 1799-180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febvre, Georges. (1972) .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uv. éd. Paris: Lib. Armand Colin.

Lefebvre, Georges. (1973) . *The Great Fear of 1789*. New York: Pantheon.

Lefebvre, Georges. (1978) . “Les historien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in *Réflexions sur l’histoire*. Paris: Maspéro, 223-243. (Originally in *Bulletin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Strasbourg*, 1929-1930.)

Lefebvre, Henri. (1975) . “What is the Historical Past? ” *New Left Review*, No. 90, 27-34.

Lefort, Claude. (1980) . “Penser la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E. S. C.*, X X X V , 2, 334-352.

Léger, Jacques. (1934) . “Le rôle de Toussaint Louverture dans la cession de la Louisiane aux Etats-Unis, ” *La Relève*, II , 16-18.

LeGoff, T. J. A. (1981) . *Vannes and its Region: A Study of Town and Countr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eGoff, T. J. A. & Sutherland, D. M. G. (1974) . “The Revolution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tany, ” *Past and Present*, No. 62, 96-119.

LeGoff, T. J. A. & Sutherland, D. M. G. (1983) . “The Social Origins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Western France, ” *Past and Present*, No. 99, 65-87.

Leleux, Fernand. (1969) . *A l'aube du capitalisme et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Liévin Bauwens, industriel Gaulois*, Paris: S. E. V. P. E. N.

Léon, Pierre. (1954) . *La naissance de la grande industrie en Dauphiné fin du X VII siècle-1869*,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éon, Pierre. (1960) . “L’industrialisation en France, en tant que facteur de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u début de X 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August. Paris & La Haye: Mouton, 163-205.

Léon, Pierre. (1966) .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Les structures rurales de la France du Sud-Est, problèmes et premières interprétations, ” in P. Léon, dir.,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problèmes sociaux du Sud-Est (fin du X^{VII}e siècle-1835)* . Paris: Soc. d’Ed. “Les Belles Lettres, ” 7-32.

Léon, Pierre. (1974) . “Structure du commerce extérieur et évolution industrielle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 in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structures sociales: Hommage à Ernest Labrousse*. Paris & La Haye: Mouton, 407-432.

Léon, Pierre. (1976a) . “L’impulsion technique,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475-501.

Léon, Pierre. (1976b) . “Les nouvelles repartitions,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543-580.

Léon, Pierre. (1976c) . “La dynamisme industriel,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581-616.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69) . “L’Aménorrhée de famine (X^{VII}e- X^Xe siècles) , ” *Annales E. S. C.*, X^{XIV}, 6, 1589-1601.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74) . “Révoltes et contestations

rurales en France de 1675 à 1788, ” *Annales E. S. C.*, X X IX, 1, 6-22.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75) . “De la crise ultime à la vraie croissance, 1660-1789, ” in Georges Duby,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II : E. LeRoy Ladurie, dir., *L’Age classique des paysans, 1340-1789*. Paris: Seuil, 355-599.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76) . “La crise et l’historien, ” *Communications*, No. 24, 19-33.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78) . “L’histoire immobile, ” in *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 Vol. II. Paris: Gallimard, 7-3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nnales E. S. C.*, 1974.)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83-1984) .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es ‘révisions’ d’Alfred Cobban, ” *Commentaire*, VI, No. 24, 834-837.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 Goy, Joseph. (1969a) . “Présentation” in J. Goy & E. Le Roy Ladurie, eds., *Les fluctuations du produit de la dîme*. Paris & La Haye: Mouton, 9-24.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with Goy, Joseph. (1969b) . “Première esquisse d’une conjoncture du produit décimal et domanial, fin du Moyen Age- X VIIIe siècle, ” in J. Goy & E. Le Roy Ladurie, eds., *Les fluctuations de la dîme*. Paris & La Haye: Mouton, 334-374.

Le Roy Ladurie & Goy, Joseph. (1982) . *Tithe and Agrarian History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is: Ed.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with Quilliet, Bernard. (1981) .
“Baroque et lumières, ” in G. Duby,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III: E. Le Roy Ladurie, dir., *La ville classique de la Renaissance aux
Révolutions*. Paris: Seuil, 287-535.

Letaconnoux, J. (1908, 1909) . “Les transports intérieur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I, 97-
114 (1908) ; 269-292 (1909) .

LeVeen, E. Phillip. (1974) .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British Suppression Policies on the Volum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lantic Slave Trade, ” in S. L. Engerman & E. D. Genovese, eds.,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ntitative Stud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1-81.

Levene, Ricardo, ed. (1941) . *Historia de la Nación Argentina*, 2a
ed., V : *La Revolución de Mayo hasta la Asamblea General
Constituyente*, 2 secciones. Buenos Aires: Lib. y Ed. “El Ateneo.”

Levy, Avigdor. (1971) . “The Officer Corp in Sultan Mahmud’s
New Army, 1826-39,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I, 1, 21-39.

Lévy-Bruhl, Henri. (1933) . “La Noblesse de France et le commerc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n. s., II, No.
8, 209-235.

Lévy-Leboyer, Maurice. (1964) . *Les banques européennes et
l’industrialisation international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évy-Leboyer, Maurice. (1968) . “Les processus d’industrialisation: Le cas de l’Angleterre et de la France, ” *Revue historique*, 92e année, CC X X X IX, 2, 281-298.

Lewin, Boleslao. (1957) . *La rebelion de Túpac Amaru y los origenes de la emancipación americana*. Buenos Aires: Lib. Hachette.

Lewis, Bernard. (1953) .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urkey: Some 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 ”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 , 1, 105-125.

Lewitter, L. R. (1973) . “Ivan Tikhonovich Pososhkov (1652-1726)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II , No. 125, 524-553.

Liévano Aguirre, Indalecio. (1968) . *Los grandes conflictos sociales y económicos de nuestra historia*, 3a ed. Bolivia: Ed. Tercer Mundo.

Lilley, Samuel. (1973)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 in C. M.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ollins/Fontana, 187-254.

Lindert, Peter H. & Williamson, Jeffrey G. (1983) . “English Workers’ Living Standard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New Look, ”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X X VI, 1, 1-25.

Lindert, Peter H. & Williamson, Jeffrey G. (1985) . “English Workers’ Real Wages: Reply to Craft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 V, 1, 145-153.

Lingelbach, W. E. (1914) .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Napoleonic Era,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IX, 2, 257-281.

Lipski, Alexander. (1959) . “Some Aspects of Russia’s Westerniza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Anna Ioannova, 1730-1740, ” *Americ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 VIII, 1, 1-11.

Lis, C. & Soly, H. (1977) . “Food Consumption in Antwerp between 1807 and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ebat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3, 460-486.

Liss, Peggy K. (1983) . *Atlantic Empires: The Network of Trade and Revolution, 1713-1826*.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ittle, Anthony. (1976) . *Deceleration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Economy*. London: Croom Helm.

Littlefield, Daniel C. (1981) . “Plantations, Paternalism, and Profitability: Factors Affecting African Demography in the Old British Empire, ”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X LVIII, 2, 167-182.

Litwack, Leon F. (1961) .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twack, Leon F. (1987) . “Trouble in Mind: The Bicentennial and the Afro-American Experience, ”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 X X IV, 2, 315-337.

Lloyd, Christopher. (1965) . “Armed Forces and the Art of War,

1: Navies,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I: A. Goodwin, ed.,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4-190.

Lloyd, Peter C. (1971) .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Yoruba Kingdom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Londo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Occasional Paper, No. 31.

Locke, Robert R. (1981) .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The Roehl Thesis Reconsidered,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VIII, 4, 415-433.

Lockridge, Kenneth A. (1973) . “Social Chang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I, 4, 403-449.

Logan, Rayford W. (1941) .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aiti, 1776-1891*.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Logan, Rayford W. (1968) . *Haiti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kke, Carl Ludwig. (1928) . “Jefferson and the Lederc Expedi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II, 2, 322-328.

Lokke, Carl Ludwig. (1930) . “French Dreams of Colonial Empire under Directory and Consulate,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II, 2, 237-250.

Lokke, Carl Ludwig. (1932) . *France and the Colonial Questio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French Opinion, 1763-180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mbardi, John V. (1971) . *The Decline and Abolition of Negro Slavery in Venezuela, 1820-1854*. Westport, CT: Greenwood.

Longworth, Philip. (1969) . *The Cossack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Longworth, Philip. (1973) . "The Last Great Cossack Peasant Rising, "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III, 1, 1-35.

Longworth, Philip. (1974) . "The Pugachev Revolt. The Last Great Cossack Peasant Rising, " in H. A. Landsberger, ed., *Rural Protest: Peasan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Macmillan, 194-256.

Longworth, Philip. (1975a) . "The Pretender Phenomenon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 *Past and Present*, No. 66, 61-83.

Longworth, Philip (1975b) . "Peasant Leadership and the Pugachev Revolt, "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II , 2, 183-205.

Longworth, Philip. (1979) . "Popular Protest in England and Russia: Some Comparisons and Suggestions, " in A. G. Cross, ed.,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trasts and Comparisons*. Newton, M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263-278.

Loschky, David J. (1973) . "Studie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New Economic Non-Histo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 4, 689-691.

Lotté, Sophie A. (1962) . “A propos de l’article de George Rudé, ” *Critica storica*, I , 4, 387-391.

Lough, John. (1987) . *France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British Travellers’ Observations, 1763-1788*. Chicago, IL: Dorsey Press.

Lovejoy, Paul E. (1978) . “Plantations in the Economy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IX, 3, 341-368.

Lovejoy, Paul E. (1979) . “Indigenous African Slavery, ” in M. Craton, ed., *Roots and Branch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Slave Studies*. Toronto: Pergamon, 19-61.

Lovejoy, Paul E. (1982) . “The Volume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Synthesis,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X III, 4, 473-501.

Lovejoy, Paul E. & Hogendorn, Jan S. (1979) . “Slave Marketing in West Africa, ” in H. A. Gemery & J.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13-235.

Lowenthal, David. (1952) . “Colonial Experiments in French Guiana, 1760-1800,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XII, 1, 22-43.

Loy, Jane M. (1981) . “Forgotten Comuneros: The 1781 Revolt in the Llanos of Casanar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I, 2, 235-257.

Lubin, Maurice A. (1968) . “Les premiers rapports de la nation haïtienne avec l’étranger, ”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X , 2, 277-305.

Lucas, Colin. (1973) .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ast and Present*, No. 60, Aug., 84-126.

Lucas, Colin. (1979) . “Violence thermidorienne et société traditionnelle, ” *Cahiers d’histoire*, X X X IV, 4, 3-43.

Ludden, David. (1985) . *Peasant History in South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undhal, Mats. (1984) . “Defense and Distribution: Agricultural Policy in Haiti During the Reign of Jean-Jacques Dessalines, 1804-1806,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X XII, 2, 77-103.

Lutfalla, Michel. (1966) . “Saint-Just, analyste de l’inflation révolutionnair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 L IV, 2, 242-255.

Lüthy, Herbert. (1960) . “Necker et la Compagnie des Indes, ” *Annales E. S. C.*, X V, 5, 852-881.

Lüthy, Herbert. (1961) .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II : *De la banque aux finances (1730-1794)* . Paris: S. E. V. P. E. N.

Luz, Nicia Vitela. (1960) . “Inquietações revolucionarias no sul: conjuração mineira, ” in S. Buarque de Holanda, dir., *Historia Geral da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Tomo I , 2º Vol. São Paulo: Difusão Européia do Livro, 394-405.

Lyashchenko, Peter I . (1970) .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New York: Octagon.

Lynch, John. (1969) . "British Policy and Spanish America, 1783-1808, "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 , 1, 1-30.

Lynch, John. (1973) .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New York: W. W. Norton.

Lynch, John. (1985) . "The Origins of Spanish American Independence,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II. L. Bethell, ed.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0.

Lynd, Staughton. (1961) . "Who Shall Rule at Home? Dutchess County, New York,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XVIII, 3, 330-359.

Lynd, Staughton. (1967) . *Class Conflict, Slave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en Essay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McAlister, L. N. (1963) .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New Spai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II, 3, 349-379.

McCallum, John. (1980) . *Unequal Beginnings: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Quebec and Ontario until 18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cCary, B. D. (1928) . *The Causes of the French Interventio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ulouse: Edward Privat.

McClelland, Peter D. (1969) . "The Cost to America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X, 2, Papers & Proceedings, 370-381.

McClelland, Peter D. (1970) . "On Navigating the Navigation Acts with Peter McClelland: Reply,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 X , 5, 956-958.

McClelland, Peter D. (1973) .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A Comment,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 4, 679-686.

McCloskey, Donald N. (1972) . "The Enclosure of Open Fields: Preface to a Study of Its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English Agri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II, 1, 15-35.

McCloskey, Donald N. (1981)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80-1860: A Survey,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3-127.

McCloy, Shelby T. (1952) . *French Invention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McCoy, Drew R. (1974) . "Republican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James Madis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ial Discrimination, 1789-1794."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 X XI, 4, 633-646.

McCoy, Drew R. (1980) .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cCulloch, J. R. (1827) . "Rise, Progress,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 *Edinburgh Review*, XLVI, No. 91, 1-39.

McDonald, Forrest. (1960) . “Rebuttal,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VII, 1, 102-110.

Macdonald, Stuart. (1980) . “Agricultural Response to a Changing Market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XIII, 1, 59-71.

McDowell, R. B. (1979) . *Ireland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1760-180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cedo, Jorge de. (1954) . Portugal e a economia ‘pombalina’: temas e hipóteses, ” *Revista de Historia*, IX, 81-99.

McEvedy, Colin. (1972) . *The Penguin Atlas of Modern History (to 1815)* . London: Penguin.

McGowan, Bruce. (1981a) . *Economic Life in Ottoman Europe*.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Gowan, Bruce. (1981b) . “The Study of Land and Agriculture in the Ottoman Provin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an Expanding World Econom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II, 1, 57-63.

McGuire, Robert A. & Ohsfeldt, Robert L. (1984) .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 Qualitative Rehabilitation of Charles A. Beard,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V, 2, 509-519.

Mackay, D. L. (1974) . "Direction and Purpose in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1793-1801, " *Historical Journal*, X VII, 3, 487-501.

McKeown, Thomas. (1976) .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McKeown, Thomas C. & Brown, R. G. (1969) . "Medical Evidence Related to English Population Chang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M. Drake, ed., *Popul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ethuen, 40-7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opulation Studies*, 1955.)

McKeown, T., Brown, R. G. & Record, R. G. (1972)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in Europe, " *Population Studies*, X X VI, Part 3, 345-382.

McKeown, T. & Record, R. G. (1962) .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Mort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Population Studies*, X VI, Part 2, 94-122.

Mackesy, Piers. (1964) . *The War for America, 1775-178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krell, J. Q. C. (1973) . *The Attack on 'Feud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cmillan, David S. (1970) . "The Scottish-Russian Trade: Its Development, Fluctuations, and Difficulties, 1750-1796,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IV, 3, 426-442.

Macmillan, David S. (1973) . "Paul's 'Retributive Measures' of 1800 Against Britain: The Final Turning-Point in British Commercial Attitudes

towards Russia,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VII, 1, 68-77.

Macmillan, David S. (1979) . “Problems in the Scottish Trade with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Mercantile Frustration, ” in A. G. Cross, ed.,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trasts and Comparisons*. Newton, M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64-180.

McNeill, William H. (1964) . *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Neill, William H. (1976) .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McNeill, William H. (1982) . *The Pursuit of Pow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Nickle, D’Arcy (1957) . “Indian and European: Indian-White Relations from Discovery to 1887, ” *Annals of the A. A. P. S. S.*, CCCXI, May, 1-11.

McPhee, Allan. (1926) .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in British West Africa*. London: Geo. Routledge & Sons.

Madariaga, Isabel de. (1962) . *Britain, 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dariaga, Isabel de. (1974) . “Catherine II and the Serfs: A Reconsideration of Some Problems, ”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LII, No. 126, 34-62.

Madariaga, Salvador de. (1948) . *The Fall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Macmillan.

Mahan, Capt. Alfred T. (1893) .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 2 vol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Maier, Pauline. (1971) .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tory,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II , 1, 119-136.

Maier, Pauline. (1972) .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Great Britain, 1765-1776*.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Main, Gloria L. (1983) .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olonial Massachusett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II, 1, 101-108.

Main, Jackson Turner. (1960) . "Charles A. Beard and the Constitu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Forrest McDonald's *We the People*,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VIII, 1, 86-102.

Main, Jackson Turner. (1961) . *The Antifederalists: Critics of the Constitution, 1781-1788*.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ain, Jackson Turner. (1965) .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Alan K. (1931) . "The Rise of the Brazilian Aristocrac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 2, 145-168.

Manchester, Alan K. (1933) . *British Preëminence in Brazil: Its Rise and Declin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anchester, Alan K. (1957) . “The Recognition of Brazilian Independenc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XI, 1, 80-96.

Manfred, Alfred Z. (1961) . *La Grande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u X VIIIe siècle*. Moscow: Ed.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Mann, Julia de Lacy. (1958) . “The Textile Industry: Machinery for Cotton, Flax, Wool, 1760-1850,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V: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750 to c. 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77-307.

Manning, Patrick. (1969) . “Slaves, Palm-Oil, and Political Power on the West African Coast, ”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II , 2, 279-288.

Manning, Patrick. (1979) . “The Slave Trade in the Bight of Benin, 1640-1890, ” in H. A. Gemery & J.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07-141.

Manning, Patrick. (1981) . “The Enslavement of Africans: A Demographic Model, ”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X V , 3, 499-526.

Manning, Patrick. (1982) . *Slavery, Coloni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ahomey, 1640-19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suy, Andie. (1974) . “L’impérialisme britannique et les relations

coloniales entre le Portugal et le Brésil: un rapport de l'Amiral Campbell au Foreign Office (14 août 1804), ” *Cahiers des Amériques Latines*, Nos. 9/10, 131-191.

Mantoux, P. (1928)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rev. ed. London: Jonathan Cape.

Mantran, Robert. (1959) . “L'évolution des relations entre la Tunisie et l'empire ottoman du X^{VI}e du X^{IX}e siècle, ” *Cahiers de Tunisie*, VII, 2^e-3^e trimestres, Nos. 26/27, 319-333.

Mantran, Robert. (1962) . *Istanbul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d'Istanbul. Paris: Lib. A. Maison-neuve.

Mantran, Robert. (1984) . *L'empire ottoman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Administration, économie, société*.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Manuel, Frank E. (1938) . “The Luddite Movement in France,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2, 180-211.

Marczewski, Jean. (1961a) . “Y a-t-il eu un “take off” en France? , ” *Cahiers de l'I. S. E. A.*, Suppl. au No. 111, (Série A-D, No. 1) , 69-94.

Marczewski, Jean. (1961b) . “Som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France, 1660-1958,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IX, 2, 369-386.

Marczewski, Jean. (1963) . “The Take-Off Hypothesis and French Experience, ” in W. W. Rostow, ed.,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London: Macmillan, 119-138.

Marczewski, Jean. (1965) . “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13 (comparaison avec l’Angleterre) , ” *Cahiers de l’I. S. E. A.*, AF (4) , No. 163, vii-cliv.

Mardin, Şerif. (1969) . “Power, Civil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Ottoman Empire,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I, 3, 258-281.

Margadant, Ted W. (1983) . “Local Elit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State, ” paper delivered at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ists, Washington, DC, Oct. 13-15, mimeo.

Markov, Walter. (1960) . “Les ‘Jacquesroutins’, ” *Annales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X XII, avr. -juin, 163-182.

Markovitch, Tihomir J. (1965, 1966a-c) .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64, ” *Cahiers de l’I. S. E. A.*, AF, 4, No. 163, juil. (1965) ; AF, 5, No. 171, mars (1966a) ; AF, 6, No. 174, juin (1966b) ; AF, 7, No. 179, nov. (1966c) .

Markovitch, Tihomir J. (1968) . “L’industrie française au X VIIIe siècle: L’industrie lainière à la fin du règne de Louis X IV et sous la Régence, ”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II , 8, 1517-1697.

Markovitch, Timohir J. (1974) .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le cas de la Franc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L II , 1, 115-125.

Markovitch, Timohir J. (1976a) . “La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sous l’Ancien Régime, ” *Annales E. S. C.*, X X XI, 3, 644-655.

Markovitch, Tihomir J. (1976b) . *Histoire des industries françaises, I : Les industries lainières de Colbert à la Révolution*, Travaux de Droit, d'Economie, de Sociologie et de Sciences Politiques, No. 104. Genève: Lib. Droz.

Marshall, J. D. (1968) . *The Old Poor Law, 1795-1834*. London: Macmillan.

Marshall, Peter J. (1962) . "Radicals, Conservativ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Past and Present*, No. 23, 44-56.

Marshall, Peter J. (1964a) . "The First and Second British Empires: A Question of Demarcation, " *History*, XLIX, No. 165, 13-23.

Marshall, Peter J. (1964b) .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XXVII, 2, 135-145.

Marshall, Peter, J., ed. (1968) . *Problems of Empire: Britain and India, 1757-1813*.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Marshall, Peter J. (1975a)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xpansion: The Case of Oudh, " *Modern Asian Studies*, IX, 4, 465-482.

Marshall, Peter J. (1975b) . "British Expansion in Ind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Historical Revision, " *History*, LX, No. 198, 28-43.

Marshall, Peter J. (1976) . *East Indian Failures: The British in Beng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shall, Peter J. (1980) . “Western Arms in Maritime Asia in the Early Phases of Expansion, ” *Modern Asian Studies*, X IV, 1, 13-28.

Martin, Bradford G. (1976) . *Muslim Brotherhoods in Nineteenth-Century Africa*.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Gaston. (1930) . “Capital et travail à Nantes au cours du X VIIIe siècles,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X VIII, 1, 52-85.

Martin, Gaston. (1931) . *Nantes au X VIIIe siècle: L’ère des négriers (1714-1774)* . Paris: Lib. Felix Alcan.

Martin, Gaston. (1948) . *Histoire de l’esclavage dans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Martin, Phyllis M. (1972) . *The External Trade of the Loango Coast, 1576-1870: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Commercial Relations on the Vili Kingdom of Loango*.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wick, W. H. (1924) . “The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Scotland, ”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X XI, 207-218.

Marx, Karl (1967) . *Capital*, 3 vo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1894) .

Marzahl, Peter. (1974) . “Creoles and Government: The Cabildo of Popayá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V, 4, 636-656.

Mason, Michael. (1969) .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lave Raiding’—The Case of the Middle Belt of Nigeria,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4, 551-564.

Mason, Michael. (1971) .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lave Raiding’—A Repl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I, 2, 324-327.

Masson, Paul. (1911) . *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e Levan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 Hachette.

Mathias, Peter. (1969) .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London: Methuen.

Mathias, Peter. (1973) . “Capital, Credit and Enterpris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 1, 121-143.

Mathias, Peter. (1979a) .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Unique or Not? , ”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London: Methuen, 3-2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nnales E. S. C.*, 1972.)

Mathias, Peter. (1979b) . “Skill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from 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London: Methuen, 21-4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75.)

Mathias, Peter. (1979c) . “Who Unbound Prometheus? Science and Technical Change, 1600-1800, ”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London: Methuen, 45-71. (Originally published 1972.)

Mathias, Peter. (1979d) .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alculation by Joseph Massie, ”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71-189. (Originally published 1957.)

Mathias, Peter. (1986) . “British Trade and Industry, 1786-1986, ”

in S. Foreman, ed., *Striking a Balance ... The Board of Trade, 1786-1986*, London: HMSO, 1-21.

Mathias, Peter & O'Brien, Patrick. (1976) . "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15-1810,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 3, 601-650.

Mathiez, Albert. (1923-1924)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Armand Colin.

Mathiez, Albert. (1931) . "Les corporations ont-elles été supprimés en principe dans la nuit du 4 août 1789?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III, No. 45, 252-257.

Matsui, Toru. (1968) .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Indian Economic History—A Review of a Reinterpretation,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I , 1, 17-33.

Matthewson, Timothy M. (1979) . "George Washington's Policy Toward the Haitian Revolution, " *Diplomatic History*, III, 3, 321-336.

Mattoso, Katia M. de Queiros. (1970) . "Conjoncture et société au Brésil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 *Cahiers des Amériques Latines*, Série "Sciences de l'Homme, " No. 5, janv. -juin, 33-53.

Mauro, Frédéric. (1972) . "A conjuntura atlântica e a Independência do Brasil, " in C. G. Mota, org., *1822: Dimensões*, São Paulo: Ed. Perspectiva, 38-47.

Maxwell, Kenneth R. (1968) . "Pombal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Luso-Brazilian Econom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III, 4, 608-631.

Maxwell, Kenneth R. (1973) . *Conflicts and Conspiracies: Brazil and Portugal, 1750-1808*.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Mayer, Margit & Fay, Margaret A. (1977) .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Nation-State, " *Kapitalistate*, No. 6, Fall, 39-90.

Mazauric, Claude. (1965) . "Vendée et chouannerie, " *La Pensée*, n. s., No. 124, 54-85.

Mazauric, Claude. (1967) . "Réflexions sur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XXIX, No. 189, 339-368.

Mazauric, Claude. (1969) . "Bilan et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es: L'histoire du XVIIIe siècle et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LI, 4, No. 198, 667-685.

Mazauric, Claude. (1970) .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ontributions à la révolution bourgeoise*. Paris: Ed. Sociales.

Mazauric, Claude. (1975) . "Quelques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LVII, No. 219, 134-173.

Mazauric, Claude. (1985) . "Autopsie d'un échec: La résistance à l'anti-Révolution et la défaite de la Contre-Révolution, " in F. Lebrun & R. Dupuy, eds., *Les résistances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Imago, 237-244.

M'Bokolo, Elikia. (1980) . *De l'abolition de la traite à la conquête*

continentale, 1800-1870. Paris: Centre d'études africaines, mimeo.

Meillassoux, Claude. (1971a) . "Introduction, "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86.

Meillassoux, Claude. (1971b) . "Le commerce pré-colonial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esclavage à Gũbu du Sahel (Mali) , " in C.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2-195.

Meinig, D. W. (1986) . *The Shaping of Americ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500 Years of History, I : Atlantic America, 1492-180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Mendels, Franklin. (1972) .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II, 1, 241-261.

Metcalf, George. (1987) . "A Microcosm of Why Africans Sold Slaves: Akan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the 1770s,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X VIII, 3, 377-394.

Metcalf, G. E. (1962) . *MacLean of the Gold Coast: The Life and Times of George MacLean, 1801-184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ttas, Jean. (1975) . "La traite portugaise en Haute Guinée, 1758-1797: Problèmes et méthodes,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VI, 3, 343-363.

Meuvret, Jean. (1971a) . "Les oscillations des prix des céréal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en Angleterre et dans les pays du bassin parisien, ” in *E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13-12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69.)

Meuvret, Jean. (1971b) . “L’agriculture en Europ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 in *E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63-18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1955.)

Meuvret, Jean. (1971c) . “Domaines ou ensembles territoriaux? ” in *E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83-19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remièr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60.)

Meuvret, Jean. (1971d) . “La vaine pâture et le progrès agronomique avant la Révolution, ” in *E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193-19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69.)

Meuvret, Jean. (1971e) . “Les crises de subsistance et la démographie de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 in *E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271-27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opulation*, 1946.)

Meyer, Jean. (1960) . “Le commerce négrier nantais (1774-1792) , ” *Annales E. S. C.*, X V , 1, 120-129.

Meyer, Jean. (1966) . *La noblesse bretonne au X^{VIII}e siècle*, 2 vols. Paris: S. E. V. P. E. N.

Meyer, Jean. (1969) . *L'armement nantais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S. E. V. P. E. N.

Meyer, Jean. (1979a) . “La guerre d’indépendance américaine et les problèmes navals européens. Rapports de force et influence sur le conflit, ” in *la Révolution américaine et l’Europe*,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577. Paris: Ed. du CNRS, 187-217.

Meyer, Jean. (1979b) . “Les difficultés de commerce franco-américain vues de Nantes (1776-1790) ,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XI, 2, 159-183.

Meyers, Allan. (1971) . “Slavery in the Hausa-Fulani Emirates, ” in D. McCall & W. Bennett, eds., *Aspects of West African Islam*,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on Africa, Vol. V. Boston, MA: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173-184.

Michalet, Charles-Albert. (1968) . “Economie et politique chez Saint-Just. L’exemple de l’inflation,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V, No. 191, 60-110.

Michoff, Nicolas V. (1970) .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commerce de la Turquie et de la Bulgarie*, VI: *Auteurs français, allemands et anglais*. Sofia: Bulg. Akad. na nauike.

Middlekauff, Robert, ed. (1964) . *Bacon’s Rebellion*, Berkeley Series in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Miller, Alexandre. (1926) . *Essai sur l’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agraires de la Russie central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s*. Paris: Marcel Giard.

Milward, Alan S. & Saul, S. B. (1973)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Minchinton, Walter, E. (1969) . "Introduction, " in Walter E. Minchinton, ed.,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1-63.

Minchinton, Walter, E. (1973) . "Patterns of Demand, 1750-1914, " in C. M.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ollins/Fontana, 77-186.

Minchinton, Walter, E. (1979) . "The Triangular Trade Revisited, " in H. A. Gemery & J.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31-352.

Mingay, G. E. (1956) . "The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1730-17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3, 323-338.

Mingay, G. E. (1960) . "The Large E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Paris & La Haye: Mouton, 367-383.

Mingay, G. E. (1963) .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ish History: A Reconsideration, " *Agricultural History* X X X VII, 3, 123-133.

Mingay, G. E. (1969) . "Dr. Kerridge's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 Comment, "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I, 4, 477-481.

Mingay, G. E., ed. (1977) .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Changes*

in Agriculture, 1650-1880.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Misra, B. B. (1959) .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at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73-1834*. Manchester, Eng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Harvey. (1968) . “The Vendée and Counter-Revolution: A Review Essay,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 , 4, 405-429.

Mitchell, Harvey. (1974) . “Resistance to the Revolution in Western France, ” *Past and Present*, No. 63, 94-131.

Mitchison, Rosalind. (1959) . “The Old Board of Agriculture (1793-1822) ,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IV , No. 290, 41-69.

Mokyr, Joel. (1974)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IV , 2, 365-391.

Mokyr, Joel. (1977) . “Demand vs. Suppl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VII , 4, 981-1008.

Mokyr, Joel. (1984) . “Demand versus Suppl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Repl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 IV , 3, 806-809.

Mokyr, Joel & Savin, N. Eugene. (1976) . “Stagf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Napoleonic Wars Revisited, ” in P. Uselding, 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I . Greenwich, CT: Greenwood Press, 198-259.

Montgolfier, Bernard de. (1980) . *Il y a cent cinquante ans ... Juillet 1830*. Paris: Musée Carnavalet.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Moosvi, Shireen. (1973) .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Population in Akbar's Time,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 , 2, 181-195.

Moosvi, Shireen. (1977) . "Note on Professor Alan Heston'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Akbar's Time: A Comment,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 IV , 3, 359-374.

Morgan, Edmund S. (1967) . "The Puritan Ethic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 X IV , 1, 3-43.

Morgan, Edmund S. (1973) . "Conflict and Consensu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in S. G. Kurtz & J.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89-309.

Morgan, Edmund S. (1977) .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1763-1789*, rev.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rgan, Edmund S. & Helen M. (1953) . *The Stamp Act Crisis: Prelude to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organ, Valerie. (1971) . "Agricultural Wage Rate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V, 2, 181-201.

Morin, Victor. (1949) . “La ‘république canadienne’ de 1838, ” *Revue d’histoire de l’Amérique française*, II, 4, 483-512.

Morineau, Michel. (1965) . “Le balance du commerce franco-néerlandais et le resserrement économique des Provinces-Unies au X VIIIe siècle, ”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X X X, 170-233.

Morineau, Michel. (1969a) . “Histoire sans frontière: Prix et ‘révolution agricole, ” *Annales E. S. C.*, X X IV, 2, 403-423.

Morineau, Michel. (1969b) . “Réflexions tardives et conclusions prospectives, ” in J. Goy & E. LeRoy Ladurie, eds., *Les fluctuations de la dîme*. Paris & La Haye: Mouton, 320-333.

Morineau, Michel. (1971) . *Les faux-semblants d’un démarrage économique: agriculture et démographie en France au X VIIIe siècl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Morineau, Michel. (1972a) . “L’ankylose de l’économie méditerranéenne au X VIIIe et au début de X IXe siècles: le rôle de l’agriculture, ” in *Cahiers de la Méditerranée*, sér. spéc., No. 1, journées d’études des 12 et 13 mai, Nice, 95-105.

Morineau, Michel. (1972b) . “Budgets populaires en France au X VIIIe siècle, ” *Revue de’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L, 2, 203-237; L, 4, 449-481.

Morineau, Michel. (1974a) . “A la Halle de Charleville: Fourniture et prix des grains ou les mécanismes du marché (1647-1821) , ” in *Actes*

du 95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Reims, 1970, Section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I, 159-222.

Morineau, Michel. (1974b) . “Révolution agricole, Révolution alimentaire, Révolution démographique, ”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335-371.

Morineau, Michel. (1976a) . “Le rose et le vert, ” *Annales E. S. C.*, X X XI, 2, 467-510.

Morineau, Michel. (1976b) . “Les problèmes de la modernisation des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ans une économie multisectorielle, ” in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Leningrad, 1970. The Hague: Mouton, VII, 42-72.

Morineau, Michel. (1978) . “Trois contributions au colloque de Göttingen, ” in E. Hinrichs *et al.*, eds., *Von Ancien Regime zu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374-419.

Morineau, Michel. (1980a) . “La dîme et l'enjeu,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 II, 2, No. 240, 161-180.

Morineau, Michel. (1980b) . “Budgets de l'Etat et gestion des finances royales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CCL X IV, 2, No. 536, 289-336.

Morineau, Michel. (1985) . “Raison,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 in F. Lebrun & R. Dupuy, eds., *Les résistances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Imago, 284-291.

Morris, Morris David. (1968) . “Toward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V., 1, 1-16.

Morris, Morris David & Stein, Burton. (1961)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A Bibliographic Essa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I, 2, 179-207.

Morris, Richard B. (1946) . *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R. J. (1979) .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80-1850*. London: Macmillan.

Mota, Carlos Guilherme. (1967) . *Idéia de revolução no Brasil no final do século XVIII*. 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Mota, Carlos Guilherme. (1972) . “Europeus no Brasil à Epoca da Independência: Um Estudo, ” in C. G. Mota, ed., *1822: Dimensões*. São Paulo: Ed. Perspectiva, 56-73.

Mota, Carlos Guilherme. (1973) . “Efectos dos movimentos sociais brasileiros no politica metropolitana: a ‘revolução’ nordestina de. 1817, ” *Luso-Brazilian Review*, X, 1, 76-85.

Moreaux, Philippe. (1968) . “Truck-System et revendications sociales dans la sidérurgie luxembourgeoise du XVIIIe siècle, ” *Mélanges offerts à G. Jacquemyns*. Bruxelles: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527-530.

Mourlot, F. (1911) . “La Crise de l’industrie drapière à Sedan, en

1788, ” *Revue historique ardennaise*, X VIII, mai-juin, 104-106.

Mouser, Bruce L. (1973) . “Trade, Coasters, and Conflict in the Rio Pongo from 1790-1808,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IV, 1, 45-64.

Mouyabi, Jean. (1976) . “La Piste des Esclaves et des Portages, ” Mémoire de D. E. A., Dép. d’Histoire, Université de Brazzaville.

Mouyabi, Jean. (1979) . “Essai sur le commerce précolonial et protocolonial au Congo méridional (X VIIe-début X X e siècle) , ” Thèse 3e cycle, E. H. E. S. S., Paris.

Mui & Mui, Lorna H. (1963) . “The Commutation Act and the Tea Trade in Britain, 1784-1793,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 2, 234-253.

Mui & Mui, Lorna H. (1975) . ““Trends in Eighteenth Century Smuggling’Reconsidere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II, 1, 28-43.

Mukherjee, Nolmani. (1962) . *The Ryotwari System in Madras, 1792-1827*.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Mukherjee, Nolmani & Frykenberg, Robert Eric. (1969) . “The Ryotwari Syste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Madras Presidency, ” in R. E. Frykenberg, ed., *Land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dian Histor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17-226.

Mukherjee Ramkrishna. (1955)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Mukherjee, Rudrangshu. (1982) . "Trade and Empire in Awadh, 1765-1804, " *Past and Present*, No. 94, 85-102.

Müller, Birgit. (1985) . "Commodities as Currencies: The Integration of Overseas Trade into the Internal Trading Structure of the Igbo of South-East Nigeria, "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X X V , 1, No. 97, 57-77.

Mullet, Ch. F. (1946) . "The Cattle Distemper in Mid-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 *Agricultural History*, X X , 3, 144-165.

Munger, Frank. (1981) . "Contentious Gatherings in Lancashire, England, 1750-1830, " in Louise A. Tilly & Charles Tilly, eds., *Class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Ac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73-109.

Muñoz Oraá, Carlos E. (1960) . "Pronóstico de la independencia de América, y un proyecto de Monarquias en 1781, " *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No. 50, 439-473.

Munro, J. Forbes. (1976) .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00-1960*. London: J. M. Dent & Sons.

Murphy, James & Higonnet, Patrice. (1973) . "Les députés de la noblesse aux Etats généraux de 1789,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X , 2, 230-247.

Murphy, Orville T. (1966) . "DuPont de Nemours and the Anglo-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 X , 3, 569-580.

Musson, A. E. (1972) . Introduction, " in A. E. Musson, e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68.

Musson, A. E. (1976) . “Industrial Motive Pow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00-7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X, 3, 415-439.

n. a. (1960) . “Conference Report: The Orig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Past and Present*, No. 17, 71-81.

Naff, Thomas. (1963) . “Reform and the Conduct of Ottoman Diplomacy in the Reign of Selim III, 1789-1807,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 X X X III, 3, 295-315.

Nairn, Tom. (1964) .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 *New Left Review*, No. 24, 43-57.

Namier, Lewis B. (1930) . *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Namier, Lewis B. (1957) .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Naqui, H. K. (1968) . *Urban Centres and Industries in Upper India, 1556-1803.* New York: Asia Publ. House.

Nash, Gary B. (1976a) . “Social Change and the Growth of Prerevolutionary Urban Radicalism, ” in A. F. Young,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3-36.

Nash, Gary B. (1976b) . “Urban Wealth and Poverty in Pre-Revolutionary America,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 4, 545-584.

Nash, Gary B. (1979) . *The Urban Crucible: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sh, Gary B. (1984) . “Social Development, ” in Jack P. Greene & J. R. Pole, eds.,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33-261.

Nash, Gary B. (1986) . *Race, Class, and Politics: Essays on American Colonial Revolutionary Society*.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Nash, R. C. (1985) . “Irish Atlantic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LII, 3, 329-356.

Nathan, James A., (1980) . “The Heyday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Old Regime, ”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XXXIII, 4, Seq. 280, 53-67.

Navarro García, Luis. (1975) . *Hispanoamérica en el siglo XVIII*. Sevilla: Publ. de 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Neale, R. S. (1966) . “The Standard of Living, 1780-1844: A Regional and Class Stud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3, 590-606.

Neale, Walter, C. (1962) . *Economic Change in Rural India: Land and Tenure and Reform, 1800-1955*.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atby, Hilda. (1966) . *Quebec: The Revolutionary Age, 1760-1791*.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Nef, John U. (1943)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III, 1, 1-31.

Nef, John U. (1954) .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40, ”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I . London: Edward Arnold, 88-10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4.)

Nef, John U. (1957) . “Coal Mining and Utilization, ” in C.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500-c. 17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72-88.

Nef, John U. (1968) . “Industrie: I. la civilisation industrielle, ”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Vol. VIII. Paris: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France, 966-972.

Nelson, William H. (1961) . *The American 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lson, William H. (1965) .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 4, 998-1014.

Nettels, Curtis P. (1952) . “British Mercantilism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2, 105-114.

Nettels, Curtis P. (1962) .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1775-1815*, Vol. 11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eumann, William L. (1947) . “United States Aid to the Chilean Wars of Independenc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VII, 2, 204-219.

Newbury, Colin W. (1961) . *The Western Slave Coast and Its Rulers: European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Among the Yoruba and Adja-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Western Nigeria, Southern Dahomey and Togo*.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bury, Colin, W. (1966) . “North African and Western Sudan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Re-evaluation,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II, 2, 233-246.

Newbury, Colin, W. (1969) . “Trade and Authority in West Africa From 1850 to 1880, ” in L. H. Gann &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I :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870-1914*.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66-99.

Newbury, Colin W. (1971) . “Price and Profitability in Early 19th Century West African Trade, in C.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1-106.

Newbury, Colin W. (1972) . “Credit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West African Trade,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III, 1, 81-95.

Newman, K. (1983) . “Anglo-Dutch Commercial Co-operation and the Russian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W. T. Wieringa *et al.*, *The Interactions of Amsterdam and Antwerp with the Baltic Region, 1400-1800*.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95-104.

Nicholls, David. (1978) . “Race, couleur et indépendance en Haïti (1804-1825) ,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X V, 2, 177-212.

Nicholas, Maurice. (1967) . “A propos du traité de Paris, 1763: Arpents de neige ou îles à sucre? ” *Revue Historique de l’Armée*, X X III, 3, 73-77.

Nightingale, Pamela. (1970) . *Trade and Empire in Western India, 1784-1806*.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Nolde, Boris. (1952-1953) . *La formation de l’empire Russe; études, notes et documents*, Collection historique de l’institut d’études slaves, X V, 2 vols. Paris: Institut d’Etudes Slaves.

Nolte, Hans-Heinrich. (1981) . *Der Aufstieg Russlands zur europäischen Grossmacht*. Stuttgart: Ernst Klett.

Nolte, Hans-Heinrich. (1982) . “The Position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Early Modern Times, ” *Review*, IV, 1, 25-84.

Norregård, Georg. (1966) . *Danish Settlements in West Africa, 1658-1850*. Boston, MA: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ouglass C. (1960) .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1790-1860, ”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X X IV of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73-627.

North, Douglass C. (1965) .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 in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 V e-X IX e siècles*. Paris: S. E. V. P. E. N., 209-246.

North, Douglass C. (1966) .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New York: W. W. Norton.

North, Douglass, C. (1968) .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s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 X X VI, 5, 953-970.

North, Douglass C. (1974) . *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A New Economic Histor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North, Douglass C. (1985) . “Transaction Costs in Histor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X IV, 3, 557-576.

Northrup, David. (1972) . “The Growth of Trade Among the Igbo Before 1800,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III, 2, 217-236.

Northrup, David. (1976) .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Slave and Palm Oil Trades in the Bight of Biafra,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VII, 3, 353-364.

Northrup, David. (1978) . *Trade Without Rulers: Pre-colon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ern Niger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ovais, Fernando A. (1979) . *Portugal e Brasil na Crise do Antigo Sistema Colonial (1777-1808)* . São Paulo: Ed. Hucitec.

Nussbaum, Frederick L. (1925) . “American Tobacco and French Politics, 1783-89,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XL, 4, 497-516.

Nussbaum, Frederick L. (1933) .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East India Company of Calonn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VII, 3, 475-497.

O’Brien, Bickford. (1955) . “Ivan Pososhkov: Russian Critic of Mercantilist Principles, ” *Americ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IV, 4, 503-511.

O’Brien, Patrick K. (1959) . “British Incomes and Property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2, 255-267.

O’Brien, Patrick K. (1977) .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X, 1, 166-181.

O’Brien, Patrick K. (1983) .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3-1815, on the Long Run Growth of the British Economy, ” Princeton University, Davis Center Seminar, mimeo.

O’Brien, Patrick K. (1988)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Taxation: 1660 to 181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LI, 1,

1, 1-32.

O'Brien, Patrick K. & Engerman, S. L. (1981) . "Changes in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4-181.

O'Brien, Patrick K. & Keyder, Caglar. (1978) .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O'Brien, Patrick K. & Keyder, Caglar. (1979) . "Les voies de passage vers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n Grande-Bretagne et en France (1780-1914) , " *Annales E. S. C.*, X X X IV, 6, 1284-1303.

Okoye, F. Nwabueze. (1980) . "Chattel Slavery as the Nightmar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X X X VII, 1, 3-28.

Okyar, Osman. (1987) . "A New Look at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ttoman Empire,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X VI, 1, 7-49.

Oliver, Roland & Atmore, Anthony. (1981) . *The African Middle Ages, 1400-180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ivier, Pierre. (1936) . *Les antécédents d'une révolution: Etud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1715 à 1789*. Paris: Lib. Marcel Rivière.

Oloruntimehin, B. Olatunji. (1971-1972) .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Movement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We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 *African Notes*, VII, 1, Third Term, 33-58.

Oloruntimehin, B. Olatunji. (1974) . “The Western Sudan and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1800-1893, ” in J. F. A. Ajayi &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 London, Longman, 344-379.

Osier, Pierre, dir. (1978) . *Dictionnaire de citations français*. Paris: Usuels de Robert.

Ospina Vasquez, Luis. (1955) . *Industria y protección en Colombia, 1810-1930*. Medellín: Bibl. Colombi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FAES.

Ott, Thomas O. (1973) . *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 Knoxville, T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Ouellet, Fernand. (1971) .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Québec, 1760-1850: Structures et conjoncture*, 2 vols. Montréal: Ed. Fides.

Ouellet, Fernand & Hamelin, Jean. (1962) . “La crise agricole dans le Bas-Canada (1802-1837) , ” *Etudes rurales*, No. 7, 36-57.

Owen, David Edward. (1934) .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Owen, Roger. (1981) .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Ozouf, Mona. (1984) . "War and Terror in Fren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1792-1794) ,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VI, 4, 579-597.

Pachoński, Jan & Wilson, Reuel K. (1986) . *Poland's Caribbean Tragedy: A Study of Polish Legions in the Haitian War of Independence, 1802-1803*.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Palmer, R. R. (1954) . "The World Revolution of the West, 1763-1801,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LXIX, 1, 1-14.

Palmer, R. R. (1959, 1964) .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R. R. (1967) . "Polémique américaine sur le rôle de la bourgeoisie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XXIX, No. 189, 369-380.

Palmer, R. R. (1971) . *The Worl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andey, Gyan. (1981) . *Economic Disloc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astern U. P.: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Decline of Artisanal Industry in Colonial India*, Occasional Paper No. 37. Calcutta: Centre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Panikkar, Kavalam Madhava. (1953) .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antaleão, Olga. (1946) . *A penetração commercial da Inglaterra na América Espanhola de 1773-1783*, Boletim LXII. Univ. de São Paulo, Faculdade de Filosofia, Ciências e Letras.

Pares, Richard. (1953) . Review of V. T. 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Vol. I ,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VIII, No. 266, 282-285.

Pares, Richard. (1960) . *Merchants and Plante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 4.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Paret, Peter. (1964) . “Colonial Experience and European Military Reform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X X X VII, No. 95, 47-59.

Paris, Robert. (1957) . *Le Levant de 1660 à 1789*, Vol. V of G. Rambert, dir.,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Paris: Plon.

Parker, Harold T. (1979) . *The Bureau of Commerce in 1781 and Its Policies with Respect to French Industry*.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Parker, R. A. C. (1955) . “Coke of Norfolk an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2, 156-166.

Parker, W. H. (1959) . “A New Look at Unrest in Lower Canada in the 1830’s,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XL, 3, 209-218.

Parkinson, C. Northcote. (1937) . *Trade in the Eastern Seas, 1793-1813*.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Paskaleva, Virginia. (1965) . “Einige Probleme auf der Geschichte der Orientfrage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 in *Etudes historiques*, à l’occasion du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Sciences Historiques—Vienne, août-septembre. Sofia: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ulgarie, II, 185-205.

Paskaleva, Virginia. (1968) . “Contribution aux relations commerciales des provinces balkaniques de l’Empire ottoman avec les états européens au cours du XVIIIe e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 ” in *Etudes historiques*, à l’occasion du V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Slaves—Prague. Sofia: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ulgarie, IV, 265-292.

Patch, Robert W. (1985) . “Agrarian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Yucata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V, 1, 21-49.

Patterson, R. (1957) . “Spinning and Weaving, ” in C. Singer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500-c. 17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51-180.

Payen, Jacques. (1969) . *Capital et machine à vapeur au XVIIIe siècle: Les frères Périer et l’introduction en France de la machine à vapeur de Watt*. Paris & La Haye: Mouton.

Pearson, M. N. (1972)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ughal India,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IX, 2, 113-131.

Pereira, Miriam Halpern. (1986) . “Portugal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Market in the XVIIIth & XIXth Centuries, ” in W. Fischer *et al.*, eds., *The Emergence of a World Economy, 1500-1914, Part I : 1500-*

1850.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279-300.

Pereira Sales, Eugenio. (1971) . *Los primeros contactos entre Chile y los Estados Unidos, 1778-1809*. Santiago: Ed. Andres Bello.

Pérez Rojas, Reyes Antonio. (1978) .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Independence of Guatemala, ” in J. S. Tulchin, ed., *Hemispheric Perspectives on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4-21.

Perkin, H. J. (1968) . “The Social Cause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X VIII, 123-143.

Perkin, H. J. (1969) .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erkins, Bradford. (1955) . *The First Rapprochement: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95-1805*.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erkins, Bradford. (1963) . *Prologue to War: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05-1812*.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rkins, Bradford. (1964) . *Castlereagh and Adams: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12-1823*.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rkins, Dexter. (1927) . *The Monroe Doctrine, 1823-18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lin, Frank. (1974) . “Society in Crisis: Early 19th Century Western India in Demographic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paper delivered at IV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 Sussex, England, 173-193.

Perlin, Frank. (1978) . “Of White Whale and Countrym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ratha Deccan: Extended Class Relations, Rights, and the Problem of Rural Autonomy Under the Old Regime, ”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 , 2, 172-237.

Perlin, Frank. (1979) . “To Identify Change in an Old Regime Polity: Agrarian Trans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Mutation in 17th to Early 19th Century Maharashtra, ” in *Asie du Sud: Traditions et changements*, Sèvres, 8-13 juillet 1978,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582. Paris: Ed. du CNRS, 197-204.

Perlin, Frank. (1980a) . “Precolonial South Asia and Western Penetr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A Problem of Epistemological Status, ” *Review*, IV , 2, 267-306.

Perlin, Frank. (1980b) . “A History of Money in Asian Perspective, ”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II, 2, 235-244.

Perlin, Frank. (1981) . “The Precolonial State in History and Epistemology: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al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Deccan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 in H. Claessen & P. Skonik, eds., *The Study of the State*. The Hague: Mouton, 275-302.

Perlin, Frank. (1983) .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nd Pre-colonial

South Asia, ” *Past and Present*, No. 98, 30-95.

Perlin, Frank. (1984) . “Growth of Money Economy and Some Questions of Transition in Late Pre-colonial India, ”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I, 3, 96-107.

Pérotin-Dumon, Anne. (1986) . “Ambiguous Revolution in the Caribbean: The White Jacobins, 1789-1800, ” *Historical Reflections*, X III, 2/3, 499-516.

Perrot, Jean-Claude. (1975a) .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Révolution,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LVII, No. 219, 30-65.

Perrot, Jean-Claude. (1975b) . *Genèse d’une ville moderne. Caen au X VIIIe siècle*, 2 vols. Paris & La Haye: Mouton.

Perrot, Jean-Claude. (1976) . “L’âge d’or de la statistique régionale (an IV-1804) ,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LVII, No. 224, 215-276.

Perrot, Jean-Claude. (1981) . “Le présent et la durée dans l’oeuvre de F. Braudel, ” *Annales E. S. C.*, X X X VI, 1, 3-15.

Petrosian, Juri. (1976) . “Die Ideen ‘Der Europäisierung’ in dem sozialpolitischen Leben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n der Neuzeit (ende des 18. Anfang des 20. Jh.) , ” in N. Todorov, *et al.*, réd.,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dans le sud-est Europe X IXe siècle*. Sofia: Institut d’Etudes Balkaniques, 61-75.

Peukert, Werner. (1978) . *Der atlantische Slavenhandel von*

Dahomey, 1740-1797.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Phelan, John Leddy. (1960). "Neo-Aztec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Genesis of Mexican Nationalism," in S. Diamond, ed., *Culture in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Paul Rad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760-770.

Phelan, John Leddy. (1978). *The People and, the King: The Comunero Revolution in Colombia, 1781*.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hilips, C. H. (1961).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4-1834*, 2nd ed., reprinted with minor corrections. Manchester, Eng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iault, Marc-Henri. (1975). "Captifs de pouvoir et pouvoir des captifs," in C. Meillassoux, ed., *L'esclavage en Afrique précoloniale*. Paris: Maspéro, 321-350.

Picard, Roger. (1910). *Les Cahiers de 1789 au point de vue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 Paris: Marcel Rivière.

Piel, Jean. (1970). "The Place of the Peasantry in the National Life of Peru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46, 108-133.

Piel, Jean. (1975). *Capitalisme agraire au Pérou, I : Originalité de la société agraire péruvienne au XIX siècle*. Paris: Ed. Anthropos.

Pietraszek, Bernardine. (1955). "British and Direct Spanish American Trade, 1815-1825," *Mid-America*, X X X VII (n. s. X X VI), 2, 67-100.

Pinchbeck, Ivy. (1930) . *Women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London: Routledge. (Reprinted Frank Cass, 1977) .

Pinkney, David. (1950) . "Paris, capitale du coton sous la Premier Empire, " *Annales E. S. C.*, V , 1, 56-60.

Pinter, Walter McKenzie. (1967) . *Russi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Nicholas I*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inter, Walter McKenzie. (1980) . "The Evolution of Civil Officialdom, 1755-1855, " in W. M. Pinter & D. K. Rowney, eds., *Russian Officialdom from the 17th to 20th Century: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0-226.

Pluchon, Pierre. (1979) . *Toussaint Louverture de l'esclavage au pouvoir*. Paris: Ed. de l'Ecole.

Plumb, J. H. (1950) .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 Vol. 7. Harmondsworth, Engl.: Penguin.

Plumb, J. H. (1956) . *The First Four Georges*. London: Fontana/Collins.

Plumb, J. H. (1982) . "Commercialization and Society, " in N. McKendrick, J. Brewer, &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td., 265-335.

Pocock, J. G. A. (1972) . "Virtue and Commer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III, 1, 119-134.

Polanyi, Karl. (1957) .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1944.)

Polanyi, Karl, in collaboration with Abraham Rotstein. (1966) . *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olk, William R. (1963) . *The Opening of South Lebanon, 1788-184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llard, Sidney. (1963) . "Factory Disciplin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 2, 254-271.

Pollard, Sidney. (1964) . "The Factory Villa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IX, No. 312, 513-531.

Pollard, Sidney. (1965) .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A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llard, Sidney. (1972a) . "Capital Accounting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F. Crouzet, 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19-14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Yorkshire Bulleti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1962.)

Pollard, Sidney. (1972b) . "Fixed Capita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 in F. Crouzet, 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45-16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64.)

Pollard, Sidney. (1973) .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 4, 636-648.

Pollard, Sidney. (1981) .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815*.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ortal, Roger. (1949) . “Manufactures et classes sociales en Russie au X VI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73^e année, CC I , avr. -juin, 161-185; CC II , juil. -sept., 1-23.

Portai, Roger. (1950) . *L'Oural au X VIII^e siècle: Etud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Collection historique de l'institut d'études slaves, Vol. X IV. Paris: Inst. d'Etudes Slaves.

Portal, Roger. (1961) . “Aux origines d'une bourgeoisie industrielle en Russi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II, 1, 35-60.

Portai, Roger. (1963) . “Préface, ” in M. Confino, *Domaines et seigneurs en Russie vers la fin du X VIII^e siècle*. Paris: Inst. d'Etudes Slaves, 9-13.

Portai, Roger. (1966) . *L'Empire russe de 1762 à 1855*. Paris: Centre du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Post, John D. (1976) . “Famines, Mortality,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X, 1, 14-37.

Postan, M. (1972) .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 in F. Crouzet, 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70-8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5.)

Postma, Johannes. (1972) . “The Dimension of the Dutch Slave Trade from Western Africa,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II, 2, 237-248.

Poulantzas, Nicos. (1971) . *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 2 vols. Paris: Maspéro (Petite Collection 77) .

Poulantzas, Nicos. (1973) .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ado, Caio, Jr. (1957) . *Evolução política do Brasil e outros estudos*, 2a ed. São Paulo: Ed. Brasiliense.

Prakash, Om. (1964) . “The European Trading Companies and Merchants of Bengal, 1650-1725,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I , 3, 37-63.

Pratt, E. J. (1931) . “Anglo-American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Rivalry on the Plata, 1820-1830,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 3, 302-335.

Pratt, Julius W. (1935) . “Fur Trade Strategy and the American Left Flank in the War of 1812,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 2, 246-273.

Pressnell, L. S. (1953) . “Public Mon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anking,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 , 3, 378-397.

Pressnell, L. S. (1960) . “The Rate of Inter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L. S. Pressnell, ed., *Studie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esented to T. S. Ashton*.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78-214.

Price, Jacob M. (1965) . "Discuss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 , 4, 655-659.

Price, Jacob M. (1973) . *France and the Chesapeake: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Tobacco Monopoly, 1674-1791, and of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Tobacco Trades*, 2 vol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rice, Jacob M. (1976) . "Quantifying Colonial America: A Comment on Nash and Warden,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 4, 701-709.

Priestly, Herbert Ingram. (1916) . *José de Galvez, Visitor-General of New Spain (1765-1771)*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riestley, Margaret. (1969) . *West African Trade and Coast Society: A Family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othero, I. J. (1979) .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John Gast and His Times*. Folkestone, Engl.: Dawson.

Prucha, Francis Paul. (1970) .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Formative Years: The Indian Trade and Intercourse Acts, 1790-1834*.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ugh, Wilma J. (1939) . "Calonne's 'New Deal,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I, 3, 289-312.

Puryear, Vernon J. (1935)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Near Ea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Quarles, Benjamin. (1961) . *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Quirby, Robert S. (1957) .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The Theory of Military Tac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olumbia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o. 5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Quinney, Valerie. (1972) . "The Problem of Civil Rights for Free Men of Color in the Early French Revolution,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II, 4, 544-557.

Rae, J. (1883) . "Why Have the Yeomanry Perished? " *Contemporary Review*, X X X IV, 2, 546-556.

Raeff, Marc. (1966) .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Raeff, Marc. (1971a) . *Imperial Russia, 1682-1825: The Coming of Age of Modern Russia*. New York: Knopf.

Raeff, Marc. (1971b) . "Pugachev's Rebellion, " in R. Forster & J. P. Greene, eds.,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61-202.

Raeff, Marc. (1975) . "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n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n Attempt a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X , 5, 1221-1244.

Raeff, Marc. (1979) .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a of Imperial Russia, 1700-1905,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X IV , 2, 399-411.

Ragatz, Lowell J. (1928) . *The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1763-1833*. New York: Century.

Ragatz, Lowell J. (1935) . “The West Indi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 ”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amphlet series. London: Arthur Thomas.

Ragsdale, Hugh. (1970) . “A Continental System in 1801: Paul I and Bonaparte,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L II , 1, 70-89.

Ram, N. (1972) . “Impact of Early Colonisation on Economy of South India, ” *Social Scientist*, I , 4, 47-65.

Ramsey, John Fraser. (1939) . *Anglo-French Relations, 1763-1770: A Study of Choiseul’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History, Vol. X VII, No. 3.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 - x & 143-264.

Rancière, Jacques. (1983) . “The Myth of the Artisa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 Category of Social History, ”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24, Fall, 1-16.

Ransom, Roger L. (1968) . “British Policy and Colonial Growth: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Burden from the Navigation Act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III, 3, 427-435.

Rao, G. N. (1977) . "Agrarian Relations in Coastal Andhra under Early British Rule, " *Social Scientist*, VI, I , No. 61, 19-29.

Rasch, Aage. (1965) . "American Trade in the Baltic, 1783-1807,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I, 1, 31-64.

Rawley, James A. (1980) . "The Port of London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lave Trade: Historians, Sources, and a Reappraisal, "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No. 9, 85-100.

Rawley, James A. (1981) .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A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Rawlyk, George A. (1963)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Nova Scotia Reconsidered, " *Dalhousie Review*, XLIII, 3, 379-394.

Rawlyk, George A. (1968) . *Revolution Rejected, 1774-1775*. Scarborough, Ont.: Prentice-Hall of Canada.

Rawlyk, George A. (1973) . *Nova Scotia's Massachusetts: A Study of Massachusetts-Nova Scotia Relations, 1630-1784*.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Ray, Indrani. (1980) . *The Multiple Faces of the Early 18th Century Indian Merchants*, Occasional Paper No. 29, Calcutta: Centre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Ray, Ratnalekha. (1979) . *Change in Bengal Agrarian Society, 1760-1850*. New Delhi: Manohar.

Raychaudhuri, Tapan. (1962) . *Jan Company in Coromandel*,

1605-1690, Verhandelingen van het 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 X X X VIII.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Raychaudhuri, Tapan. (1965) . "Some Patterns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ndia: A Comparative Study, " in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Aix-en-Provence, 1962, II :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Paris: Mouton, 751-760.

Raychaudhuri, Tapan. (1968) . "A Re-interpretation of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V, 1, 77-100*.

Raychaudhuri, Tapan. (1969) .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Operation: Bakarkanj District, East Bengal, " in R. E. Frykenberg, ed., *Land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dian Histor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63-174.

Raychaudhuri, Tapan. (1982a) .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ughal India, " in T. Raychaudhuri & I. Habib,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 : c. 1200-c. 170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1-307.

Raychaudhuri, Tapan. (1982b) . "Inland Trade, " in T. Raychaudhuri & I. Habib,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 c. 1200-c. 170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5-359.

Rayneval, Gérard de. (1784) . "Aperçu sur le Traité de Commerce à

conclûre avec la Cour de Londres, ” Envoyé copie à M. de Calonne le 29 avril 1784, in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ris) : Angleterre*, No. 46: *Mémoires sur le Commerce, le Finance, etc. 1713 à 1811*, 202-220.

Razzell, P. E. (1969) . “Population Chan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A Re-Appraisal, ” in M. Drake, ed., *Popul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ethuen, 128-15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5.)

Razzell, P. E. (1974)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in Europe—a Critique, ” *Population Studies*, X X VIII, Part I , 5-17.

Rebérioux, Madeline. (1965) . “Jaurès et Robespierre, ” in *Actes du Colloque Robespierre*, X II 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Vienne, 3 septembre. Paris: Société des Robespierristes, 191-204.

Recht, Pierre. (1950) . *Les biens communaux du Namurois et leur partage à la fin du X VIIIe siècle*. Bruxelles: E. Bruylant.

Regemorter, J. L. Van. (1963) . “Commerce et politique: préparation et négociation du traité franco-russe de 1787,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IV, 3, 230-257.

Regemorter, Jean-Louis Van. (1971) . *Le déclin du servage, 1796-1855*, Vol. I of R. Portai, dir., *Histoire de la Russie*. Paris: Hatier.

Reid, Joseph D., Jr. (1970) . “On Navigating the Navigation Acts with Peter D. McClelland: Com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X, 5, 949-955.

Reid, Marjorie G. (1925) . “The Quebec Fur Traders and Western Policy, 1763-1774,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VI, 1, 15-32.

Reinhard, Marcel. (1946)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de la population, ” *Population*, I, 3, 419-427.

Reinhard, Marcel. (1965) . “Bilan démographique de l’Europe: 1789-1815, ” in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Vienne, 29 août-5 sept., *Rapports*, I : *Grands thèmes*. Horn/Wein: Ferdinand Berger & Sohne, 451-471.

Rémond, André. (1957) . “Trois bilans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temps des théories physiocratiques,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 4, 416-456.

Reis, Arthur César Ferreira. (1960) . “O Comércio colonial e as companhias privilegiadas, ” in S. Buarque de Holanda, dir., *Historia Geral da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Tomo I, 2 vols. São Paulo: Difusão Européia do Livro, 311-339.

Resnick, Daniel P. (1972) . “The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II, 4, 558-569.

Reubens, E. P. (1955) . “Comment, ”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78-380.

Reynolds, Edward. (1973) . “Agricultural Adjustments on the Gold Coast after the End of the Slave Trade, 1807-1874, ” *Agricultural*

History, XLVII, 4, 308-318.

Rich, E. E. (1955) . “Russia and the Colonial Fur trad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3, 307-328.

Rich, E. E. (1960) . *Hudson’s Bay Company, 1670-1870*, 3 vols.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Richards, Alan. (1977) .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Egypt, 1798-1882, ” *Review*, I , 2, 3-49.

Richards, E. S. (1973) . “Structural Change in a Regional Economy: Sutherland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80-183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VI, 1, 63-76.

Richards, J. F. (1981) . “The Indian Empire and Peasant Production of Opiu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Modern Asian Studies*, XV , I , 59-82.

Richards, W. A. (1980) . “The Import of Firearms into West Afr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XI, 1, 43-59.

Richardson, David. (1975) . “Profitability in the Bristol-Liverpool Slave Trade, ”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XII, 1^e et 2^e trimestres, Nos. 226/227, 301-308.

Richardson, David. (1979) . “West African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lave Trade, ” in H. A. Gemery & J.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03-330.

Richardson, Thomas L. (1969) . Review of W. E. Tate, *The Enclosure Movement*,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I, 1, 187-188.

Richet, Denis. (1968) . “Croissance et blocages en France du XV^e au XVII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XXXIII, 4, 759-787.

Richet, Denis. (1969) . “Autour des origines idéologiques lointa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lites et despotisme, ” *Annales E. S. C.*, XXXIV, 1, 1-23.

Richet, Denis. (1973) . *La France moderne: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Paris: Flammarion.

Ridings, Eugene W. (1985) . “Foreign Predominance among Overseas Trad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 ”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XX, 2, 3-27.

Riley, James C. (1973) . “Dutch Investment in France, 1781-1787,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II, 4, 732-760.

Riley, James C. (1986) .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Old Regime in Franc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ol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iley, James C. (1987) . “French Finances, 1727-1768,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IX, 2, 209-243.

Rippy, J. Fred. (1929) .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over Latin America (1808-1830)* .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Rippy, J. Fred. (1959) . *British Investments in Latin America*,

1822-1949.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ippy, J. Fred & Debo, Angie. (1924) .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Policy of Isolation, "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IX, 3/4, 69-165.

Roberts, J. M. (1978) .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M. W. (1966) . "Indian Estate Labour in Ceylon during the Coffee Period (1830-1880) ,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III, 1, 1-52; III, 2, 101-136.

Roberts, P. E. (1968) .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State, 1772-86,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 : H. H. Dodwell, ed., *British India, 1497-1858*, third Indian reprint. Delhi: S. Chand, 181-204.

Roberts, Richard. (1980) . "Long Distance Trade and Production: Sinsani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XI, 2, 169-188.

Robertson, M. L. (1956) . "Scottish Commerce and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X, 1, 123-131.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1915) . "South America and the Monroe Doctrine, 1824-1828,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X X X, 1, 82-105.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1918a) .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panish Colonies by the Motherland,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 , 1, 70-91.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1918b) . “The Recognition of the Hispanic American Na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 , 3, 239-269.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1926) . “The Policy of Spain Toward Its Revolted Colonies, 1820-1823,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I, 1/3, 21-46.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1939) . *France and Latin-American Independ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1941) . “Russia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Spanish America, 1816-1826,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I, 2, 196-221.

Robin, Régine. (1970) .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n 1789: Semur-en-Auxois*. Paris: Plon.

Robin, Régine. (1971) . “Fief et seigneurie dans le droit et l'idéologie juridiqu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III, 4, No. 206, 554-602.

Robin, Régine. (1973) . “La nature de l'Etat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Formation sociale, Etat et Transition, ” *Dialectiques*, Nos. 1/2, 31-54.

Robinson, Cedric J. (1987) . “Capitalism, Slavery and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 ” *History Workshop*, No. 23, Spring, 122-140.

Robinson, Donald L. (1971) . *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cies, 1768-182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Robinson, Eric H. (1974) . “The Early Diffusion of Steam Power,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IV, 1, 91-107.

Roche, Max. (1985) . “La présence française en Turquie (1764-1866) , ” *Annales du Levant*, No. 1, 83-95.

Roche, Patrick A. (1975) . “Caste and the British Merchant Government in Madras, 1639-1748,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 III, 4, 381-407.

Rodney, Walter. (1966) . “African Slavery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Oppression on the Upper Guinea Coa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II, 3, 431-443.

Rodney, Walter. (1967) . *West Africa and the Atlantic Slave-Trade*, Historical Assn. of Tanzania, Paper No. 2.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 House.

Rodney, Walter. (1968) . “Jihad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Futa Djal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V, 2, 269-284.

Rodney, Walter. (1970) .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dney, Walter. (1975a) . “The Guinea Coast,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IV: Richard Gray, ed., *From c. 1600 to c. 179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3-324.

Rodney, Walter. (1975b) . “Africa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IV: Richard Gray, ed., *From c. 1600 to c. 179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8-622.

Rodrigues, José Honório. (1977) . “A revolução americana e a revolução brasileira da independência (1776-1822) , ” *Revista de história de America*, No. 83, enero-junio, 69-91.

Rodríguez, Mario. (1976) . *La revolución americana de 1776 y el mundo hispánico: Ensayos y documentos*. Madrid: Ed. Tecnos.

Roehl, Richard. (1976) .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A Reconsideration,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III, 3, 233-281.

Roehl, Richard. (1981) .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A Reply, ”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VIII, 4, 434-435.

Rogers, James E. Thorold. (1884) .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with a new preface by G. D. H. Cole in 1949.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Rogger, Hans. (1960) .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mano, Ruggiero. (1960) . “Movements des prix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L’Amérique du sud au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VIII, 1, 63-74.

Root, Hilton Lewis. (1985) . “Challenging the Seigneurie: Community and Contention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VII, 4, 652-681.

Root, Hilton Lewis. (1987) . *Peasants and King in Burgundy: Agrarian Foundations of French Absolut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ot, Winfred Trexler. (1942)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III, 1, 16-29.

Roover, Raymond de. (1968) . “Un contraste: La structure de la banque anglaise et celle de la banque continentale au X VIIIe siècle, ” in *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 La Haye: Mouton, V , 623-627.

Rose, J. Holland. (1893) . “Napoleon and English Commerce,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III, No. 32, 704-725.

Rose, J. Holland. (1908) . “The Franco-British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 X III, No. 92, 709-724.

Rose, J. Holland. (1929a) . “The Political Reactions of Bonaparte’s Eastern Expedition,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 L IV, No. 173, 48-58.

Rose, J. Holland. (1929b) . “British West India Commerce as a Factor in the Napoleonic War, ”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III, 1, 34-46.

Rose, M. E. (1981) .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3-275.

Rose, R. B. (1956) .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Grain Supply: Nationalization Pamphlets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X X X IX, 1, 171-187.

Rose, R. B. (1959) . "18th-century Price-riot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Jacobin Maximum,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IV, 3, 432-445.

Rose, R. B. (1961) . "Eighteenth Century Price Riots and Public Policy in England,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I, 2, 277-292.

Rose, R. B. (1965) . *The Enragés: Socialis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Rose, R. B. (1972) . "Babeu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 *Historical Studies*, X V, No. 58, 223-236.

Rose, R. B. (1978) .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 R. B. (1984) . "The 'Red Scare' of the 1790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Agrarian Law, " *Past and Present*, No. 103, 113-130.

Rosen, Howard. (1975) . "Le système Gribauval et la guerre moderne, " *Revue historique des armées*, II, 1/2, 29-36.

Rosenberg, Nathan. (1967) . "Anglo-American Wage Differences in the 1820'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VII, 2, 221-229.

Rostow, W. W. (1941) . "Business Cycles, Harvests, and

Politics, 1790-185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I , 2, 206-221.

Rostow, W. W. (1971) .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2nd ed.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Rostow, W. W. (1973) .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Growth in Europe: An Essay in Synthesi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III, 3, 547-580.

Rostow, W. W. (1978) . “No Random Walk: A Comment on ‘Why was England First?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I, 4, 610-612.

Rothenberg, Winifred B. (1979) . “A Price Index For Rural Massachusetts, 1750-1855,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IX, 4, 975-1001.

Rothenberg, Winifred B. (1981) . “The Market and Massachusetts Farmers, 1750-1855,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 I , 2, 283-314.

Rothenberg, Winifred B. (1985) . “The Emergence of a Capital Market in Rural Massachusetts, 1730-1838,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 V , 4, 781-808.

Rothermund, Dietmar. (1981) . *Asian Trade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New Delhi: Manohar.

Rousseau, Jean-Jacques. (1947) . *The Social Contract*. New York: Hafner. (Originally published 1762.)

Rousseaux, Paul. (1938) . *Les mouvements de fond de l'économie anglaise, 1800-1913*. Bruxelles: Ed. Universelle &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 Cie.

Rout, Leslie B., Jr. (1976) .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Spanish America: 1502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ux, René. (1951)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idée de lutte de classes,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 X IX, 3, 252-279.

Rozman, Gilbert. (1976) . *Urban Networks in Russia 1750-1800, and Pre-Modern Period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udé, George. (1954) . “The French Revolution, ” *Marxist Quarterly*, I , 1, 242-251.

Rudé, George. (1956) . “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X VIII, No. 143. 139-179.

Rudé, George. (1961a) .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Rudé, George. (1961b) . “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en Picardie, en Normandie, et dans le Beauvaisis, ” *Annales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 X X III, No. 165, 305-326.

Rudé, George. (1962) .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composition, le rôle, les idées et les formes d'action des sans-culottes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Critica storica*, I , 4, 369-383.

Rudé, George. (1964) .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3-1815*. New York: Harper & Row.

Rudé, George. (1967) .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ssell-Wood, A. J. R. (1974) . “Local Government in Portuguese America: A Study in Cultural Divergence,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 VI, 2, 187-231.

Russell-Wood, A. J. R. (1975) . “Preconditions and Precipitants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Portuguese America, ” in A. J. R. Russell-Wood, ed., *From Colony to Nation: Essay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Brazil*.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40.

Rustow, Dankwart A. (1970) .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West, ” in P. M. Holt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I : 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673-697.

Ruwet, Joseph. (1967) . *Avant les révolutions: Le XVIII^e siècle*, Etudes d’histoire wallonne, Vol. IX. Bruxelles: Fondation Charles Plisnier.

Ryan, A. N. (1959) . “The Defense of British Trade with the Baltic, 1808-1813,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 IV, No. 292, 443-466.

Ryan, A. N. (1958) . “Trade with the Economy in the Scandinavian and Baltic Ports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 For and Against,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XII, 123-140.

Rydjord, John. (1941) . "British Mediation Between Spain and Her Colonies: 1811-1813,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I, 1, 29-50.

Ryerson, Stanley B. (1960) . *The Founding of Canada: Beginnings to 1815*. Toronto: Progress Books.

Ryerson, Stanley B. (1973) . *Unequal Union: Roots of Crisis in the Canadas, 1815-1873*, 2nd ed. Toronto: Progress Books.

Sachs, William A. (1953) .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in the Northern Colonies before the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III, 3, 274-290.

Saint-Jacob, Pierre de. (1960) . *Les paysans de la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égime*. Paris: Les Belles-Lettres.

Saint Lu, André. (1970) . *Condition coloniale et conscience créole au Guatemala (1524-1821)*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Saintoyant, J. (1929) . "La représentation colonial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 *Revue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X VII, 4, 353-380.

Saintoyant, J. (1930) .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9)* , 2 vols.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Salaman, Redcliffe N. (1949) . *The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Sala-Molins, Louis. (1987) . *Le Code noir, ou le calvaire de*

Canaa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Salvucci, Richard J. (1981) .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Mexico: the Case of the Obraj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 I** , 1, 197-199.

Samuel, Raphael. (1977) . "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 *History Workshop*, No. 3, Spring, 6-72.

Savelle, Max. (1939) . "The American Balance of Power and European Diplomacy, 1713-78, " in R. B. Morris, ed.,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40-169.

Savelle, Max. (1953) . *United States: Colonial Period*. Instituto Panamericano de Geografía e Historia, Publ. No. 159. Mexico: Ed. Cultura S. A.

Savelle, Max. (1962) . "Nationalism and Other Loyalti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 VII**, 4, 901-923.

Savelle, Max. (1974) . *Empires to Nations: Expansionism in America, 1713-1824*.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aville, John. (1969) .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Britain, "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9. London: Merlin Press, 247-271.

Schellenberg, T. R. (1934) . "Jeffersonian Origin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IV** , 1, 1-32.

Schlebecker, John T. (1976) .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nd Markets in the North, 1774-1777, " *Agricultural History*, L, 1, 21-36.

Schlesinger, Arthur M., Sr. (1917) . *The 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chlesinger, Arthur M., Sr. (1919)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XXXIV, 1, 61-78.

Schlote, Werner. (1952) . *British Overseas Trade from 1700 to the 1930'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chmidt, Charles. (1908) . "La crise industrielle de 1788 en France, " *Revue historique*, 33e année, XCVII, 1, fasc. 192, 78-94.

Schmidt, Charles. (1913, 1914) . "Les debuts de l'industrie cotonnière en France, 1706-1806,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I, 3, 261-298; VII, 1, 26-55.

Schmidt, S. O. (1966) .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du tsarisme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XXI, 1, 95-110.

Schmitt, Eberhard. (1976) .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Schnapper, Bernard. (1959) . "La fin du régime de l'Exclusif: Le commerce étranger dans les possessions français d'Afrique tropicale (1817-1870) , " *Annales africaines*, VI, 149-200.

Schnapper, Bernard. (1961) . *La politique et le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e Golfe de Guinée de 1838 à 1871. Paris & La Haye: Mouton.

Schremmer, Eckart. (1981) .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 Step Towards Industrialization?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X , 3, 653-670.

Schumpeter, Elizabeth Brody. (1938) . “English Prices and Public Finance, 1660-1822, ”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X X , 1, 21-37.

Schumpeter, Joseph. (1939) . *Business Cycles*, 2 vols. New York: McGraw-Hill.

Schutz, John A. (1946) . “Thomas Pownall’s Proposed Atlantic Federation,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VI , 2, 263-268.

Schuyler, Robert L. (1945) . *The Fall of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A Study in British Free Trade, 1770-18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wartz, Stuart D. (1970) . “Magistracy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Brazil,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 , 4, 715-730.

Scott, James Brown. (1928) . “Introduction, ” in G. Chinard, ed., *The Treaties of 1778 and Allied Document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x - x x v .

Scott, Samuel F. (1970) .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L II , 3, 307-330.

Scott, Samuel F. (1978) .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rmy, 1787-9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ckinger, Ron L. (1976) . "South American Power Politics During the 1820's,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VI, 2, 241-267.

Sédillot, Rene. (1987) . *Le coût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Lib. Académique Perrin.

Sée, Henri. (1908) . "La portée du régime seigneurial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171-191.

Sée, Henri. (1913) . "Une enquête sur la vaine pâture et le droit de parcours à la fin du règne de Louis XV, " *Revue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I, 3, 265-278.

Sée, Henri. (1923a) . "Les origines de l'industrie capitaliste en Franc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 *Revue historique*, 48e année, CXLVIII, No. 287, 187-200.

Sée, Henri. (1923b) . "Le partage des biens communaux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 *Nouvelle revue historique du droit française et étranger*, 4e sér., II, 1, 47-81.

Sée, Henri. (1923c) . "La mise en valeur des terres inculte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I, 1, 62-81.

Sée, Henri. (1926) . "Commerce betwee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 1, 732-737.

Sée, Henri. (1929) . “Les économistes et la questions coloniale an X VIIIe siècle, ” *Revue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X VII, 4, 381-392.

Sée, Henri. (1930) . “The Normandy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 2, 308-313.

Sée, Henri. (1931a) . “Introduction et notes, ” in Arthur Young, *Voyages en 1787-1788-1789*, 3 vols. Paris: Armand Colin.

Sée, Henri. (1931b) .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 1-15.

Sée, Henri. (1933) . “Préface, ” to C. -E. Labrouss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 VIIIe siècle*. Paris: Lib. Dalloz, vii- x i .

Séguir-Dupeyron, P. de. (1873) . *Histoire des négociations commerciales et maritimes de la France aux X VIIIe et X VIIIe siècles*, III: *Fragments historiques: Negotiation du traité de commerce conclu en 1786 entre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Paris: Ernest Thorin.

Semmel, Bernard. (1973) . *The Method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Serajuddin, A. M. (1978) . “The Salt Monopoly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Government in Bengal, ”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X XI, Part 3, 304-322.

Seton-Watson, Hugh. (1967) .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well, William H., Jr. (1980) .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well, William H., Jr. (1983) . “Response to J. Rancière, ‘The Myth of the Artisan, ’”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24, Fall, 17-20.

Sewell, William H., Jr. (1985) .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VII, 1, 57-85.

Shalhope, Robert E. (1972) . “Toward a Republican Synthesis: The Emergenc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Republicanism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XXIX, 1, 49-50.

Shapiro, Gilbert. (1967) . “The Many Lives of Georges Lefebvr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2, 502-514.

Shapiro, Seymour. (1974) .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Banking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 La Haye: Mouton, V, 229-235.

Shaw, A. G. L. (1970) . “Introduction, ” in A. G. L. Shaw, ed.,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onies, 1815-1868*. London: Methuen, 1-26.

Shaw, Stanford J. (1962) . *The 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ttoman Egypt, 1517-179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aw, Stanford J. (1963) . "The Ottoman View of the Balkans, " in Charles Jelavich & Barbara Jelavich, eds., *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6-80.

Shaw, Stanford J. (1971) . *Between Old and New: The Ottoman Empire under Sultan Selim III, 1789-180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elton, Walter J. (1973) . *English Hunger and Industrial Disorde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hepherd, James F. & Walton, Gary M. (1969) . "Estimates of 'Invisible' Earnings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68-1772,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IX, 2, 230-263.

Shepherd, James F. & Walton, Gary M. (1972)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Sheridan, Richard B. (1958) .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British Slave Trade, 1750-1807,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2, 249-263.

Sheridan, Richard B. (1960) . "The British Credit Crisis of 1772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2, 155-186.

Sheridan, Richard B. (1965) . "The Wealth of Jama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VIII, 2, 292-311.

Sheridan, Richard B. (1968) . “The Wealth of Jama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Rejoinde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I, 1, 46-61.

Sheridan, Richard B. (1976a) . “The Crisis of Slave Subsistence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X X X III, 4, 615-664.

Sheridan, Richard B. (1976b) . “‘Sweet Malefactor’: The Social Costs of Slavery and Sugar in Jamaica and Cuba, 1807-54,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X, 2, 236-257.

Sherwig, John M. (1969) . *Guineas and Gunpowder: British Foreign Aid in the War with France, 1793-181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y, John. (1973)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Military Conflict Considered as a Revolutionary War, ” in S. G. Kurtz & J.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21-156.

Siddiqi, Asiya. (1973) . *Agrarian Change in a North Indian State: Uttar Pradesh, 1819-183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iddiqi, Asiya. (1981) . “Money and Prices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Europe: India and Britain, 1760-1840,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 VIII, 3/4, 231-262.

Silberling, Norman J. (1923) . “British Prices and Business Cycles, 1779-1850, ”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V , Suppl. 2, 219-261.

Silberling, Norman J. (1924) .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 X X VII, 2, 214-233; 3, 397-439.

Silva, Andrée Mansuy-Diniz. (1984) . “Portugal and Brazil: Imperial Re-organization, 1750-1808, ”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 : Leslie Bethell, ed., *Colonial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69-508.

Singh, N. P. (1974) . “The Deplorable Conditions of Saltpetre Manufacturers of Bihar (1773-1833) , ”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Thirty-Fifth Session, Jadavpur (Calcutta) , 280-285.

Sinha, Narendra Krishna. (1956, 1962a)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engal from Plassey to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2 vols.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Sinha, Narendra Krishna. (1962b) . “Foreword, ” in N. Mukerjee, *The Ryotwari System in Madras, 1792-1827*.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iii-iv.

Sinha, Narendra Krishna. (1970)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engal*, III: 1793-1848.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Sinzheimer, G. P. G. (1967) . “Les industries ‘kustar’ : un chapitre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Russie, ” *Cas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II, 2, 205-222.

Sirotkin, V. G. (1970) . “Le renouvellement en 1802 du traité de commerce franco-russe de 1787, ” in *La Russie et l’Europe, X VIe- X Xe siècles*. Paris: S. E. V. P. E. N., 69-101.

Sivakumar, S. S. (1978) .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in Tandaimandalam, 1760-1900, ” *Social Scientist*, VI, 10, No. 70, 18-39.

Six, G. (1929) . “Fallait-il quatre quartiers de noblesse pour être officier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IV, No. 19, 47-56.

Skempton, A. W. (1957) . “Canals and River Navigation Before 1750, ” in C. Singer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500-c. 17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38-470.

Skiotis, Dennis. (1971) . “From Bandit to Pasha: First Steps in the Rise to Power of Ali of Tepelen, 1750-1784,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I, 3, 219-244.

Skocpol, Theda. (1979) .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heda. (1985) . “Cultural Idiom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A Rejoinder to Sewell,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VII, 1, 86-96.

Slavin, Morris. (1984) .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Miniature: Section Droits-de-l’Homme, 1789-17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licher van Bath, B. H. (1963) .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 Europe, A. D. 500-1850*. London: Edward Arnold.

Slicher van Bath, B. H. (1969) . "Eighteenth-Century Agriculture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I, 1, 169-179.

Sloane, William M. (1904) . "The World Aspects of the Louisiana Purchas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X, 3, 507-521.

Smelser, Neil. (1959) .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ith, H. F. C. (1961) . "A Neglected Theme of West African History: The Islamic Revolutions of the 19th Century, "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I, 1, 169-185.

Smith, Paul H. (1964) . *Loyalists and Redcoats: A Study in British Revolutionary Polic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mith, Robert S. (1959) . "Indigo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Colonial Guatemal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2, 181-211.

Smith, Walter B. & Cole, Arthur. (1935) . *Fluctuations in American Business, 1790-18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oboul, Albert. (1954) . "Classes et luttes de classes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La Pensée*, No. 53, janv. -févr., 39-62.

Soboul, Albert. (1956) . “The French Rural Commu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 *Past and Present*, No. 10, 78-95.

Soboul, Albert. (1958a) .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 La Roche-sur-Yon, Fr.: Imp. Henri Potier.

Soboul, Albert. (1958b) . “Classi e lotte delle classi durante la Rivoluzione francese, ” in A. Saitta, a cura di, *Sanculotti e contadini nella Rivoluzione francese*. Bari: Laterz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Movimento Operaio*, 1953.)

Soboul, Albert. (1962) . “A propos des réflexions de George Rudé sur la sans-culotterie, ” *Critica storica*, I , 4, 391-395.

Soboul, Albert. (1963) . “Personnel sectionnaire et personnel babouviste, ” in *Babeuf et les problèmes de babouvis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tockholm. Paris: Ed. Sociales, 107-131.

Soboul, Albert. (1965) . “Esquisse d’un bilan social en 1815, ” in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Vienne, 29 août-5 sept., *Rapports*, I : *Grands thèmes*. Horn/Wien: Verlag Ferdinand Berger & Sohne, 517-545.

Soboul, Albert. (1968) . “Aux origine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industrielle française (fin XVIIIe-début XIXe siècle) ,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aris & La Haye: Mouton, 187-192.

Soboul, Albert. (1970a) . “Le héros et l’histoir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VII, 333-338.

Soboul, Albert. (1970b) . *La Civilisation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 : La crise de l'Ancien Régime*. Paris: Arthaud.

Soboul, Albert. (1973) . “Sur le mouvement paysan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LV**, 1, No. 211, 85-101.

Soboul, Albert. (1974) . “L’historiographie class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ur des controverses récentes, ” *La Pensée*, No. 177, oct., 40-58.

Soboul, Albert. (1976a) . “Le choc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7,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3-64.

Soboul, Albert. (1976b) . “La reprise économique et la stabilisation sociale, 1797-1815, ” in Fernand Braudel & Ernest Labrousse, dir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1789-années 1880)*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65-133.

Soboul, Albert. (1976c) . “Sur l’article de Michel Grenon et Robin, ” *La Pensée*, No. 187, juin, 31-35.

Soboul, Albert. (1976d) . *Problèmes paysans de la Révolution (1789-1848)* . *Etudes d’histoir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Maspéro.

Soboul, Albert. (1977a) . *A Shor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Berkeley &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 publication in French, 1965.)

Soboul, Albert. (1977b) . “Problèmes agrair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in A. Soboul, dir., *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 paysann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Ed. Sociales, 9-43.

Soboul, Albert. (1979) . “Alla luce della Rivoluzione: problema contadino e rivoluzione borghese, ” in A. Groppi *et al.*, *La Rivoluzione francese*. Milano: Franco Angeli Ed., 99-128.

Soboul, Albert. (1981a) . “Le maximum des salaires parisiens et le 9 thermidor, ” in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Paris: Maspéro, 127-14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54.)

Soboul, Albert. (1981b)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histoire du monde contemporain, ” in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Paris: Maspéro, 349-380. (Originally in *Studien über die Revolution*, 1969.)

Soboul, Albert. (1981c) . “Trois notes pour l’histoire de l’aristocratie (Ancien Régime-Révolution) , ” in B. Köpeczi & E. H. Balázs, eds., *Noblesse française, noblesse hongroise, X VIe- X IXe siècle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Paris: Ed. du C. N. R. S., 77-92.

Socolow, Susan Migden. (1978) . *The Merchants of Buenos Aires, 1778-1810: Family and Commerce*.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nenscher, Michael. (1984) . “The *sans-culottes* of the Year II :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of Labour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 *Social History*, IX, 3, 301-328.

Sorel, Albert. (1885-1904) .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8 vols. Paris: Plon.

Sovani, N. V. (1954) . "British Import in India before 1850-57, "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 , 4, 857-882.

Spear, Percival. (1965) . *History of India*, Vol. II . Harmondsworth, Engl.: Penguin.

Spodek, Howard. (1974) . "Rulers, Merchants, and Other Groups in the City-States of Saurashtra, India, around 1800,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 VI, 4, 448-470.

Stagg, J. C. A. (1981) . "James Madison and the Coercion of Great Britain: Canada, the West Indies, and the War of 1812,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X X X VIII, 1, 3-34.

Stanley, George F. G. (1968) . *New France: The Last Phase, 1744-1760*.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Stavrianos, L. S. (1952) . "Antecedents to the Balkan Revolu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X IX, 4, 335-348.

Stearns, Peter. (1965) . "British Industry Through the Eyes of French Industrialists (1820-1848) ,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 X X VII, 1, 50-61.

Stein, Robert Louis. (1978) . "Measuring the French Slave Trade, 1713-1792/3,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IX, 4, 515-521.

Stein, Robert Louis. (1979) . *The French Slave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 Old Regime Busines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ein, Robert Louis. (1983) . “The State of French Colonial Commerce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XII, 1, 105-117.

Stein, Stanley J. (1981) . “Bureaucracy and Business in the Spanish Empire, 1759-1804: Failure of a Bourbon Reform in Mexico and Peru,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 1, 2-28.

Stein, Stanley J. & Stein, Barbara H. (1970) .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Essays on Economic Dependence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rn, Walter M. (1964) . “The Bread Crisis in Britain, 1795-96, ” *Economica*, n. s., X X XI, No. 122, 168-187.

Stevens, Wayne Edson. (1926) . *The Northwest Fur Trade, 1763-180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X IV, No. 3.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evenson, John. (1971) “The London ‘Crimp’ Riots of 1794,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 VI, 40-58.

Stevenson, John. (1974) . “Food Riots in England, 1792-1818, ” in J. Stevenson & R. Quinault,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ublic Orde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33-74.

Stevenson, Robert F. (1968) . *Popula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Tropical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tewart, John Hall, ed. (1967) . *The French Revolution: Some Trends in Historical Writing, 1945-196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tewart, Watt. (1930) . "Argentina and the Monroe Doctrine, 1824-1828,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 1, 26-32.

Stoddard, T. Lothrop. (1914) .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an Domingo*. Boston, MA: Houghton-Mifflin.

Stoianovich, Traian. (1953) . "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 1600-180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III, 4, 398-411.

Stoianovich, Traian. (1960) . "The Con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 2, 234-313.

Stoianovich, Traian. (1962) .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Ottoman Society in the Balkans, " *Slavic Review*, X XI, 4, 623-632.

Stoianovich, Traian. (1963) .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Balkan Politics, 1750-1941, " in C. Jelavich & B. Jelavich, eds., *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97-345.

Stoianovich, Traian. (1976) . "Balkan Peasants and Landlords and the Ottoman State: Familial Economy, Market Economy and Modernization, " in N. Todorov *et al.*, eds.,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dans le Sud-Est Européen- X IXe siècle*. Sofia: Institut d'Etudes Balkaniques, Musée National Polytechnique, 164-204.

Stoianovich, Traian. (1983) . “Commerce et industrie ottomans et maghrébins: pôles de diffusion, aires d’expansion, ” in J. L. Bacqué-Grammont & P. Dumont, eds., *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Empire ottoman*, Collection Turcica, Vol. III. Leuven: Ed. Peeters, 329-352.

Stoianovich, Traian & Haupt, Georges C. (1962) . “Le maïs arrive dans les Balkans, ” *Annales E. S. C.*, X VII, 1, 84-93.

Stokes, Eric. (1975) . “Agrarian Society and the Pax Britannica in Northern Indi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 *Modern Asian Studies*, IX, 4, 505-528.

Stourm, Rene. (1885) . *Les Finances de l’ancien régime et de la Révolution*, Vol. II . Paris: Guillaumin.

Stover, John F. (1958) . “French-American Trade during the Confederation, 1781-1789, ”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X X X V, 4, 399-414.

Suceska, Avdo. (1966) . “Bedeutung und Entwicklung des Begriffes A’yân in Osmanischen Reich, ” *Südost-Forschungen*, X X V, 3-26.

Sugar, Peter F. (1977) .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umner, B. H. (1949) .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umner, B. H. (1951) .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Russia*.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Sundström, Lars. (1974) . *The Exchange Economy of Pre-Colonial Tropical Africa*. London: C. Hurst. (Previously published as *The Trade of Guinea*, 1965) .

Supple, Barry. (1973) . “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 in C. M.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ollins/Fontana, 301-357.

Suret-Canale, Jean. (1961) . *Afrique noire occidentale et centrale*, 2^e éd. revue et mise à jour, I : *Géographie, Civilisations, Histoire*. Paris: Ed. Sociales.

Suret-Canale, Jean. (1980a) . “Contexte et conséquences sociales de la traite africaine, ” in *Essais d’histoire africaine (de la traite des Noirs au néo-colonialisme)* . Paris: Ed. Sociales, 73-96. (Originally in *Présence africaine*, 1964) .

Suret-Canale Jean. (1980b) . “La Sénégambie à l’ère de la traite, ” in *Essais d’histoire africaine (de la traite des Noirs au néo-colonialisme)* . Paris: Ed. Sociales, 97-112. (Originally in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977) .

Sutherland, Donald. (1982) . *The Chouans: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Counter-Revolution in Upper Brittany, 1770-179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utton, Keith. (1977) . “Reclamations of Wasteland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 in H. D. Clout, ed., *Them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47-300.

Svoronos, Nicolas G. (1956) . *Le commerce de Saloniqu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Swai, Bonawenture. (1979) . “East India Company and Moplah Merchants of Tellichery: 1694-1800, ” *Social Scientist*, VIII, 1, No. 85, 58-70.

Sweezy, Paul M. (1938) .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in the English Coal Trade, 1550-1850*,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Vol. L X VI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zatmary, David P. (1980) . *Shay’s Rebellion: The Making of an Agrarian Insurrection*.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Szeftel, Mark. (1975) . “La monarchie absolue dans l’Etat Moscovite et l’Empire russe (fin X V e s. -1905) , ” in *Russian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up to Peter the Great*.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737-757. (Originally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X XII, 1969.)

Szeftel, Mark. (1980) . “Two Negative Appraisals of Russian Pre-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X IV, 1, 74-87.

Tambo, David C. (1976) . “The Sokoto Caliphate Slav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IX, 2, 187-217.

Tandeter, Enrique. (1901) . “Trabajo forzado y trabajo libre en el Potosí colonial tardío, ” *Desarrollo Económico*, X X, No. 80, 511-548.

Tandeter, Enrique & Watchel, Nathan. (1983) . “Precios y producción agraria. Potosí y Charcas en el siglo XVIII, ” *Desarrollo Económico*, X X III, No. 90, 197-232.

Tanguy de La Boissière, C. -C. (1796) . *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commerciale de la France avec les Etats-Unis d’Amérique depuis l’année 1775 jusques et y compris 1795. Suivi d’un sommaire d’observations sur les Etats-Unis de l’Amérique*. Paris.

Tann, Jennifer. (1978) . “Marketing Method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eam Engine Market: The Case of Boulton and Watt,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VIII, 2, 363-391.

Tansill, Charles Callan. (1938) .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nto Domingo, 1798-1873: A Chapter in Caribbean Diplom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Tarle, Eugne. (1926) . “Napoleon 1^{er} et l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 la France, ” *Napoléon: La revue du X IXe siècle*, 15^e année, X X VI, 1/2, 117-137.

Tarrade, J. (1972) . *Le commerce colonial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L’évolution du régime de “L’Exclusif” de 1763 à 1789*.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Tate, W. E. (1945) . “Opposition to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 *Agriculture History*, X IX, 3, 137-142.

Tavares, Luís Henrique Dias. (1973) . “A Independencia como decisão da Unidade do Brasil, ” *Revista brasileira de cultura*, V, No. 17, 89-96.

Tavares, Luís Henrique Dias. (1977) . *A Independência do Brasil na Bahia*. São Paul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Taylor, Arthur J. (1960) . “Progress and Poverty in Britain, 1780-1850: A Reappraisal, ” *History*, XLV, No. 153, 16-31.

Taylor, Arthur J. (1972) . *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Taylor, George Rogers. (1964) .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efore 1840: An Exploratory Essa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V, 4, 427-444.

Taylor, George V. (1961) . “The Paris Bourse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1781-1789,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VII, 4, 951-977.

Taylor, George V. (1963) . “Some Business Partnerships at Lyon, 1785-1793,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II, 1, 46-70.

Taylor, George V. (1964) . “Types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XIX, No. 312, 478-497.

Taylor, George V. (1967) .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2, 469-496.

Taylor, George V. (1972) . “Revolutionary and Nonrevolutionary Content in the *Cahiers* of 1789: An Interim Report,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II, 4, 479-502.

Temperley, Harold. (1925a) . “French Designs on Spanish America in 1820-5,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L, No. 157, 34-53.

Temperley, Harold. (1925b) .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 1822-1827*. London: G. Bell & Sons.

Thomas, Hugh. (1971) . *Cuba: The Pursuit of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 Row.

Thomas, Robert Paul. (1965) .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upon Colonial Welfar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V, 4, 615-638.

Thomas, Robert Paul. (1968a) .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VIII, 3, 436-440.

Thomas, Robert Paul. (1968b) . “The Sugar Colonies of the Old Empire: Profit or Loss for Great Britai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 1, 30-45.

Thomas, Robert Paul & Bean, Richard Nelson. (1974) . “The Fishers of Men: The Profits of the Slave Trad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XIV, 4, 885-914.

Thomas, Robert Paul & McCloskey, D. N. (1982) . “Overseas Trade and Empire, 1700-1860,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7-102.

Thomas, William I., & Thomas, Dorothy Swaine. (1928) . *The Child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Thomis, Malcolm I. (1972) . *The Luddites: Machine-Breaking in Regency England*. New York: Schocken.

Thompson, Edward P. (1968) .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rev. ed. Harmonds-worth, Engl.: Pelican.

Thompson, Edward P. (1971) .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Past and Present*, No. 50, 76-136.

Thompson, Edward P. (1978a) .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 *Social History*, III, 2, 133-165.

Thompson, Edward P. (1978b) .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35-9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Thuillier, Guy. (1967) . "Pour 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u X IXe siècle: la crise monétaire de l'automne 1810, " *Revue historique*, 91^e année, CC X X X VIII, juil. -sept., 51-84.

Tilly, Charles. (1968) . *The Vendée*, 2nd printing with pref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82) . "Proletarianiza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in East Anglia and Elsewhere, 1500-1900, " *Peasant Studies*, X , 1, 5-34.

Tilly, Charles. (1983) . "Flows of Capital and Forms of Industry in

Europe, 1500-1900, ” *Theory and Society*, XII, 2, 123-142.

Tilly, Charles & Tilly, Richard. (1971) . “Agenda for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1970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I, 1, 184-198.

Tilly, Louise A. (1971) . “The Food Riot as a Form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France,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II , 1, 23-57.

Timmer, C. Peter. (1969) . “The Turnip, the New Husbandry, and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 X X X III, 3, 375-395.

Tinker, Hugh. (1978) . *A New System of Slavery. The Export of Indian Labour Overseas, 1830-192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53) .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Fragments et notes inédites sur la Révolution*, texte établi et annoté par Andre Jardin. Paris: Gallimard.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55) .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Todorov, Nikolai. (1963) . “Sur quelques aspects du passage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dans les territoires balkaniques de l’Empire ottoman, ” *Revue des é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Nos. 1/2, 103-136.

Todorov, Nikolai. (1965) . “La coopération interbalkanique dans de mouvement grec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à la fin du X VIIIe et au début du X IXe siècle—Son idéologie et son action, ” *Etudes historiques*, à l’occasion du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Vienne,

août-sept. Sofia: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ulgarie, II 171-184.

Todorov, Nikolai. (1977) . *La ville balkanique sous les Ottomans* (IX-XIXe s.) .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Todorova, Maria. (1976) . “The Europeanization of the Ruling Eli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s, ” in N. Todorov *et al.*, réds.,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dans le sud-est Europe—XIXe siècle*, Sofia: Institut d’Etudes Balkaniques, 103-112.

Toiles, Frederick B. (1954)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Movement: A Re-Evalua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 1, 1-12.

Tønnesson, Kåre D. (1959) . *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 Mouvement populaire et réaction bourgeoise en l’an III*. Oslo: Presses Universitaires & Paris: Lib. R. Clavreuil.

Torke, Hans J. (1971) .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Bureaucracy and Society in Russia, 1613-1861, ” *Canadian Slavic Studies*, V, 4, 457-476.

Torke, Hans J. (1972) . “More Shade than Light,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VI, 1, 10-12.

Toutain, J. -C. (1961) . “Le produit de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de 1700 à 1958. I. Estimation du produit au XVIIIe siècle, ” *Cahiers de l’I. S. E. A.*, sér. AF, no. 1, No. 115, 1-216; “II. La Croissance, ” sér. AF, no. 2, Suppl. No. 115.

Toutain, J. -C. (1963) .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de 1700 à

1959, ” *Cahiers de l’I. S. E. A.* sér. AF, 3, no. Suppl. No. 133.

Toynbee, Arnold. (1956)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4.)

Tranter, N. L. (1981) . “The Labour Supply, 1780-1860,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4-226.

Trendley, Mary. (1916) .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nto Domingo, 1789-1866, ”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VII, 1, 83-145; 2, 220-274.

Tribe, Keith. (1981) . *Genealogies of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Tripathi, Amales. (1956) . *Trade and Finance in the Bengal Presidency, 1793-1833*. Calcutta: Orient Longmans.

Tripathi, Dwijendra. (1967) . “Opportunism of Free Trade: Lancashire Cotton Famine and Indian Cotton Cultivation,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IV, 3, 255-263.

Trouillot, Hénock, (1971) . “La guerre de l’indépendance d’Haïti: Les grandes prêtres du Vodou contre l’armée française, ” *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No. 72, julio-dic., 259-327.

Trouillot, Hénock. (1972) . “La guerre de l’indépendance d’Haïti: II. Les hommes des troupes coloniales contre les grands prêtres de Vodou, ” *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Nos. 73/74, enero-dic., 75-

130.

Trouillot, Michel-Rolph. (1981) . "Peripheral Vibrations: The Case of Saint-Domingue's Coffee Revolution, " in R. Robinson, ed., *Dynamics of World Development*,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System Annuals, Vol. 4. Beverly Hills, CA: Sage, 27-41.

Trouillot, Michel-Rolph. (1982) . "Motion in the System: Coffee, Color, and Slavery in Eighteenth-Century Saint-Domingue, " *Review*, V, 3, 331-388.

Trudel, Marcel. (1949a) . "Le traité de 1783 laisse le Canada à l'Angleterre, " *Revue d'histoire de l'Amérique française*, III, 2, 179-199.

Trudel, Marcel. (1949b) . *Louis XIV, le Congrès Américain et le Canada, 1774-1789*. Québec: Publ. de l'Université Laval.

Tscherkassowa, A. S. (1986) . "Quellen der Arbeitskräftebildung des Urals im XVIII. Jahrhundert. Grossmetallurgie, " paper delivered at XVIIIa Settimana di Studio, Ist. Int.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 Prato, mimeo.

Tucker, G. S. L. (1963) . "English Pre-Industrial Population Trend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2, 205-218.

Tucker, R. S. (1975) . "Real Wages of Artisans in London, 1729-1935, " in Arthur J. Taylor, e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21-3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36.)

Tulard, Jean. (1970) . "Problèmes sociaux de la France

napoléonienn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 VII, juil.-sept., 639-663.

Turgay, A. Üner. (1983) . “Ottoman-British Trade Through Southeastern Black Sea Port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in J. L. Bacqué-Grammont & P. Dumont, réds., *Economie et Sociétés dans l’Empire Ottomane (fin du XVIIIe-Début du XIXe siècle)* ,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No. 601. Paris: Ed. du C. N. R. S. 297-315.

Turner, Frederick J. (1895, 1896) . “Western State-Making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Era,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 , 1, 70-87 (1895) ; I , 2, 251-269 (1896) .

Turner, Michael. (1982) .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vidence from Crop Yield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 V , 4, 489-510.

Unwin, G. (1922) . “Transition to the Factory System,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 X X VI, No. 146, 206-218; X X X VI, No. 147, 383-397.

Uzoigwe, G. N. (1973) . “The Slave Trade and African Societies, ”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 X IV , 2, 187-212.

Valcárcel, Carlos Daniel. (1957) . “Túpac Amaru, fidelista y precursor, ” *Revista de Indias*, X VII, 68, 241-253.

Valcárcel, Carlos Daniel. (1960) . “Perú Borbónico y emancipación, ” *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No. 50, dic., 315-438.

Valensi, Lucette. (1969) . *Le Maghreb avant la prise*

d'Alger (1790-1830) . Paris: Flammarion.

Van Alstyne, Richard W. (1960) . *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Van Dantzig, Albert. (1975) . “Effects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n Some West African Societies, ” in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XII, 1^e et 2^e trimestres, Nos. 226/227, 252-269.

Vandenbroeke, C. & Vanderpijpen, W. (1978) . “The Problem of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Flanders and in Belgium: Myth or Reality? ” in H. van der Wee & E. van Cauwenberghe, eds., *Productivity of Land and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250-1800)* .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63-170.

Van Tyne, Claude H. (1916) . “Influences Which Determined the French Government to Make the Treaty with America, 1778,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I, 3, 528-541.

Van Tyne, Claude H. (1925) . “French Aid Before the Alliance of 1778,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X XI, 1, 20-40.

Vargas Ugarte, Rubén. (1971) . *Historia General del Perú*, 2a ed., V : *Postrimerías del poder español (1776-1815)* ; VI : *Emancipación (1816-1825)* . Lima: Ed. Carlos Milla Batrès.

Vazquez de Prada, Valentín. (1968) . “Las rutas comerciales entre España y América en el siglo XVIII, ” *Anuario de estudios americanos*, X X V, 197-241.

Venturi, Franco. (1979) . “From Scotland to Russia: An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 in Feudalism, ” in A. G. Cross, ed.,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ntrasts and Comparisons*. Newton, M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2-24.

Verhaegen, Paul. (1922-1929) . *La Belgique sous la domination française, 1792-1814*, 5 vols. Bruxelles: Goemaere & Paris: Plon.

Verna, Paul. (1969) . *Pétion y Bolívar*. Caracas: Oficina Central de Información.

Verna, Paul. (1983) . “Bolívar ‘El Haitiano’: Revolucionario integral y libertador social, ” *Revista nacional de cultura*, XLIV, No. 250, 145-159.

Verna, Paul. (1984) . “La revolución haitiana y sus manifestaciones socio-jurídicas en el Caribe y Venezuela, ” *Boletín de la Academia Nacional de la Historia*, LXVII, No. 268, 741-752.

Vernadsky, George. (1945) . “On Some Parallel Trends in Russian and Turkish History, ” *Transac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XXXVI, July, 25-36.

Ver Steeg, Clarence L. (1957)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n Economic Movement, ”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XX, 4, 361-372.

Vicziany, Marika. (1979) .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Ind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Amiya Kumar Bagchi, ”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XVI, 2, 105-146.

Vidalenc, Jean. (1969) . “La traite négrière en France, 1814-1830, ” *Actes du 91^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Rennes, 1966, Section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Tome I : *Histoire maritime et colonia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229.

Vidotto, Vittorio. (1979) . “Il recente dibattito storiografico sulla Rivoluzione francese, ” in A. Groppi *et al.*, *La Rivoluzione francese: problemi storici e metodologici*. Milano: Franco Angeli Ed., 11-68.

Viennet, Odette. (1947) . *Napoléon et l’industrie française; la crise de 1810-1811*. Paris: Plon.

Vignols, Léon. (1928a) . “Etudes négrières de 1774 à 1928. Introduction. Pourquoi la date de 1774,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 VI, 1, 5-11.

Vignols, Léon. (1928b) . “La mise en valeur du Canada à l’époque française, ”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 VI, 4, 720-795.

Vilar, Pierre. (1974) . “Réflexions sur la ‘crise de l’ancien type’: ‘inégalité des récoltes’ et ‘sous-développement, ’ ” in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structure sociales*. Paris & La Haye: Mouton, 37-58.

Viles, Perry. (1972) . “The Slaving Interest of the Atlantic Ports, 1763-1792, ”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II, 4, 529-543.

Villalobos R., Sergio. (1962) . “El comercio extranjero a fines de la dominación española, ”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IV, 4, 517-544.

Villalobos R., Sergio. (1965) . *Comercio y contrabando en el Rio de*

la Plata y Chile. Buenos Aires: Eudeba.

von Tunzelmann, G. N. (1978) . *Steam Power and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to 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von Tunzelmann, G. N. (1979) . “Trends in Real Wages, 1750-1850, Revisited,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II, 1, 33-49.

von Tunzelmann, G. N. (1981) . “Technical Progres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R. Floud & D. N.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I : 1700-186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3-163.

Vovelle, Michel. (1972) . *La chute de la monarchie, 1787-1792*. Paris: Seuil.

Vovelle, Michel. (1980) . *Ville et campagne au 18e siècle (Chartres et la Beauce)* . Paris: Ed. Sociales.

Vovelle, Michel. (1984) . *The Fall of the French Monarchy, 1787-1792*.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velle, Michel & Roche, David. (1965) . “Bourgeois, Rentiers, and Property Owners, ” in Jeffry Kaplan,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Wiley, 25-46. (Translated from *Actes du Quatre-Vingt-Quatrièm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1959.)

Waddell, D. A. G. (1985)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Latin American Independence, ” in L. Bethell,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II: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28.

Wadsworth, Alfred P. & Mann, Julia de Lacy. (1931) .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Eng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Waldman, Marilyn Robinson. (1965) . "The Fulani *Jihad*: A Reassessment,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I, 3, 333-355.

Walker, James W. St. G. (1975) . "Blacks as American Loyalists: The Slaves' War for Independence, " *Historical Reflections*, II , 1, 51-67.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0) .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 Kasaba, Reşat. (1983) . "Incorporation into the World-Economy: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750-1839, " in J. L. Bacqué-Grammont & P. Dumont, eds., *Economie et société dans l'empire ottoman*. Paris: Ed. du C. N. R. S., 335-354.

Walsh, Lorena S. (1983) . "Urban Amenities and Rural Sufficiency: Living Standards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the Colonial Chesapeake, 1643-1777,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II, 1, 109-117.

Walton, Gary M. (1967) .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American Colonial Shipping, 1675-177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 1, 67-78.

Walton, Gary M. (1971) .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IV , 4, 533-542.

Walton, Gary M. (1973) .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A Repl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 , 4, 687-688.

Walton, Gary M. & Shepherd, James F. (1979) .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rd, J. R. (1978) . "The Profitability of Sugar Planting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650-1834,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XI , 2, 197-213.

Ward, W. R. (1965) .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in Great Britain: Imperial Problems: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Growth,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I: A. Goodwin, ed.,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2-1793*.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537-564.

Warden, G. B. (1976) .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oston: A Reappraisal,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 4, 585-620.

Warner, Charles K. (1975) . "Soboul and the Peasants, " *Peasant Studies Newsletter*, IV, 1, 1-5.

Watson, Ian Bruce. (1978) .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Commercial Alternatives in India, 1707-1760, " *South Asia*, n. s., I , 2, 54-64.

Watson, Ian Bruce. (1980a) . *Foundation for Empire: English Private Trade in India, 1659-1760*. New Delhi: Vikas.

Watson, Ian Bruce. (1980b) . "Fortifications and the 'Idea' of Force in Early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Relations with India, " *Past and Present*, No. 88, 70-88.

Weaver, Emily P. (1904) . "Nova Scotia and New England during the Revolutio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 1, 52-71.

Webster, C. K. (1912) . "Castlereagh and the Spanish Colonies. I . 1815-1818,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 X VII, No. 105, 78-95.

Wee, Herman van der. (1980) . "La dette publique aux X VIIIe et X IXe siècles, " in *Actes du 9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pa, 12-16 Sept. 1978. Bruxelles: Credit Commercial de Belgique, 13-21.

Weiss, Roger W. (1970) . "The Issue of Paper Money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1720-1774,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X X, 4, 770-784.

Weiss, Roger W. (1974) . "The Colonial Monetary Standard of Massachusett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X VII, 4, 577-592.

Western, J. R. (1956) . "The Volunteer Movement as an Anti-Revolutionary Force, 1793-1801,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 X XI,

No. 281, 603-614.

Western, J. R. (1965) . “Armed Forces and the Art of War. 2: Armies, ”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III: A. Goodwin, ed.,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17.

Weulersse, Georges. (1985) . *La Physiocratie à l’aube de la Révolution, 1781-1792*. Paris: Ed. de l’E. H. E. S. S.

Whitaker, Arthur P. (1928) . “The Commerce of Louisiana and the Floridas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III, 2, 190-203.

Whitaker, Arthur P. (1941)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0-183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Whitaker, Arthur P. (1960) . “Causes of Spanish American Wars of Independence: Economic Factors, ”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II, 2, 132-139.

Whitaker, Arthur P. (1962a) . *The Spanish-American Frontier: 1783-1795. The Westward Movement and the Spanish Retreat in the Mississippi Valley*.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Originally published 1927.)

Whitaker, Arthur P. (1962b) . *The Mississippi Question, 1795-1803: A Study in Tra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Originally published 1932.)

Whitehead, Donald. (1964) . “History to Scale? The British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Business Archives and History*, IV, 1, 72-83.

Whitehead, Donald. (1970) .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an Example of Growth, ” in R. M. Hartwell, 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3-27.

Whitson, Agnes M. (1930) . “The Outlook of the Continental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760-1775,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XLV, 1, 56-86.

Wicker, Elmus. (1985) . “Colonial Monetary Standards Contrasted: Evidence from the Seven Years War,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V, 4, 869-884.

Wilks, Ivor. (1971) . “Asante Policy Towards the Hausa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in C.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4-141.

Wilks, Ivor. (1975) .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Eric. (1944) . *Capitalism and Slavery*.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66 reprint.)

Williams, Gwyn A. (1968) . *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 Popular Movements in France and Britai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Williams, J. E. (1966) . "The British Standard of Living, 1750-18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X, 3, 581-589.

Williams, Judith Blow. (1934) .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Commerce with Argentina,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 V, 1, 43-64.

Williams, Judith Blow. (1972) . *British Commercial Policy and Trade Expansion, 1750-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76) . *Key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1962) . "Fire in the Ashes of Scientific History,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X IX, 2, 274-287.

Williamson, Jeffrey G. (1984) . "Why Was British Growth So Slow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 L IV, 3, 687-712.

Wilson, Charles. (1977) . "The British Isles, " in C. Wilson & G. Parker, e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I : Western Europ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15-154.

Wilson, R. G. (1966) . "Transport Dues as Indices of Economic Growth, 1775-182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IX, 1, 110-123.

Winsor, Justin. (1896) . "Virginia and the Quebec Bill,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 , 3, 436-443.

Wood, A. C. (1925) . “The English Embassy at Constantinople, 1660-1762,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L, No. 160, 533-561.

Wood, Gordon S. (1966) .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XXXIII, 1, 3-32.

Woodruff, Philip. (1953) . *The Men Who Ruled India, I : The Founders*. London: Jonathan Cape.

Woodward, Margaret L. (1968) . “The Spanish Army and the Loss of America, 1810-1824,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III, 4, 586-607.

Woodward, Ralph Lee, Jr. (1968) . “The Merch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mericas, 1750-1850: A Preliminary Study, ”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X , 1, 134-153.

Woodward, Robert Lee, Jr. (1965) . “Economic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Guatemalan Political Parties (1773-1823) ,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 , 4, 544-566.

Wordie, J. R. (1974) . “Social Change on the Leveson-Gower Estates, 1714-1832,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VII, 4, 593-606.

Woronoff, Denis. (1984a) . *L'industrie sidérurgique en Franc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Paris: Ed. de l'E. H. E. S. S.

Woronoff, Denis. (1984b) . *The Thermidorean Regime and the*

Directory, 1794-1799. Cambridge, Eng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H. R. C. (1954) . “Some Aspects of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Bengal,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2, 204-215.

Wright, H. R. C. (1955) .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816-30: A Study of the First Benelux.*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H. R. C. (1959) . “The Abolition by Cornwallis of the Forced Cultivation of Opium in Bihar,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 112-119.

Wright, J. F. (1965) .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2, 397-412.

Wright, J. Leitch, Jr. (1975) . *Florida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Wrigley, C. C. (1971) . “Historicism in Africa: Slavery and State Formation, ” *African Affairs*, LXX, No. 279, 113-124.

Wrigley, E. A. (1967) . “The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in R. M. Hartwell, ed.,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London: Methuen, 97-12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2.)

Wrigley, E. A. (1969) . “Family Limitation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 in M. Drake, ed., *Popul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ethuen, 157-19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6.)

Wrigley, E. A. (1972) .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III, 2, 225-259.

Wrigley, E. A. & Schofield, R. S. (1981) .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yczanski, Andrzej & Topolski, Jerzy. (1974) . “Peasant Economy Before and During the First State of Industrialization: General Report, ” in *S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nomic History*, Copenhagen, 19-23 August, *Five Themes*. Copenhagen: Institute of Economic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11-31.

Yaney, George L. (1973) . *The Systematiz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 Social Evolution in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Russia, 1711-1905*.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Yanov, Alexander. (1978) . “The Drama of the Time of Troubles, 1725-30, ”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XII, 1, 1-59.
(Corrigenda: XII, 4, 593.)

Yaresh, Leo. (1956) . “The Problem of Periodization, ” in C. E. Black, ed., *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32-77.

Yelling, J. A. (1977) . *Common Field and Enclosure in England, 1450-1850*. London: Macmillan.

Yoder, John C. (1974) . "Fly and Elephant Parti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Dahomey, "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 V , 3, 417-432.

Youngson, A. J. (1966) . "The Opening Up of New Territories, " in H. J. Habakkuk & M. Postan,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After: Incomes,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Cambridge, Eng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39-211.

Zacker, Jacques. (1962) . "Quelques mots sur les sans-culott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à propos de l'article de George Rudé) , " *Critica storica*, I , 4, 384-387.

Zaozerskaja, E. I. (1965) . "Le salariat dans les manufactures textiles russes au XVIIIe siècle,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I, 2, 188-222.

Zapperi, Roberto. (1972) . "Siéyès et l'abolition de la féodalité en 1789,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XLIV, No. 209, 321-351.

Zapperi, Roberto. (1974) . *Per la critica del concetto di rivoluzione borghese*. Bari: De Donato.

Závala, Silvio. (1967) . *El mundo americano en la época colonial*, 2 vols. Mexico: Ed. Porrúa.

Zeller, Gaston. (1955) . *Les temps modernes*, II : *De Louis XIV à 1789*, Vol. III of Pierre Renouvin, di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Hachette.

Zilversmit, Arthur. (1967) . *The First Emancipati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Nort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immerman, A. F. (1931) . "Spain and its Colonies, 1808-1820,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I, 4, 439-463.

Zuccarelli, François. (1959) . "L'entrepôt fictif de Gorée entre 1822 et 1852: Une exception au régime de l'Exclusif, " *Annales africaines*, VI, 261-282.

索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系原著页码，检索时请查阅本书正文页边码)

A

Aachen, 亚琛125

Abdülmeçid I (Ottoman Empire), 阿布杜麦基德一世177

Abel, Wihelm, 艾贝尔30, 57, 62, 66

Aberdam, Serge, 阿伯德姆64, 105

Abir, M., 艾比尔173

Abou-el-Haj, Rifa'at Ali, 阿布哈吉174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184

Accarias de Sérionne, Jacques, 塞里奥尼的阿卡里亚斯71, 233

Acomb, Frances, 埃克姆91

Act of Union, 联合法案 see Great Britain

Adams, Donald R., Jr., 亚当斯247

Adams, John, 亚当斯242-243

Adams, John Quincy, 亚当斯251

Adams, Samuel, 亚当斯208

Adams, Mahdi, 亚当斯147

Adhemar, Jean Balthazar d', Count, 阿德马尔89

Ado, A., 阿多105

Africa, 非洲 6, 71, 79, 129, 133, 135, 156, 193, 205, 236

East, 东非149

North, 北非167-169, 172

West (and Central), 西非219, 132, 134-137, 142-148, 152, 156, 162, 164-171, 187-189

Savannah zones, 萨瓦南区168-170

Agrarian individualism, 农业个人主义15

Agriculture, 农业3, 8-9, 26, 28, 59, 61, 63-64, 66-68, 73, 89, 94, 113, 115, 118, 170, 247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农业革命6, 12, 14, 16-18, 62-63, 77, 95

arable production, 种植产品13-14, 66

cash-crop production, 商品作物生产 62, 138-140, 147-148, 152, 155-156, 158, 162, 164-166, 168, 183, 186, 240, 248, 253

commons, 一般农业48, 63, 65, 73-74

direct producers, 直接生产者62, 157, 159

droit de parcours, 共同放牧权65, 74-75, 95

droit de triage, 挑选权74

fallow, 休耕地13, 62, 75

fertilizers, 肥料13

fodder crops, 敞田14-15, 65-66, 73-75, 95

pasturage, 畜牧13, 62, 75

rotation, 轮作制13, 62, 155

waste lands, 荒地14, 74, 155, 183

yield, 出产13-15, 62-63, 113, 160 see also various occupational roles

Agronomy, 农艺学62, 73, 76, 161

Aguardiente, 甘蔗酒214

Aguessy, Honorat, 阿格西164, 166

Agulhon, Maurice, 艾格隆35

Ahlström, G., 阿斯特罗姆186

Ahmed III (Ottoman Empire), 阿赫迈德135

Aja, 阿贾188

Ajayi, J.F.Ade, 阿贾伊156, 165, 189

Akbar (Mughal Empire), 阿克巴158

Akinjogbin, I.A., 阿金约宾165, 188

Albany, 阿尔巴尼207

Alcaldes mayores, 区域地方法官216

Alemdar, Mustafa Pasha, 艾伦达174-174

Aleppo, 阿勒颇151, 173

Algiers, 阿尔及尔243

Ali, Athar, 阿里178

Ali Pasha, 阿里帕夏173

Alleghenies, 阿勒根尼203, 231

Allen, Ethan, 艾伦232

Allen, Levi, 艾伦232

Allowance system' see Speenhamland 补贴制度

Alsace, 阿尔萨斯103, 116, 125

Althusser, Louis, 阿尔都塞43

America, (British) North, see United States北美洲

America, Hispanic (Latin, South), 西属美洲116, 140, 193, 211-217, 219-222, 224-226, 234-235, 239-240, 243-244, 248-254

revolutions of independence, 独立革命38, 219, 222, 224, 227, 249-250, 252-256

Americas, 美国the, 79, 116-117, 136, 149, 152-153, 193, 198, 200-201, 210-212, 215, 218, 226-227, 240, 246-250, 255

trade to, see Trade, colonial对美贸易

Amerindians, see Native Americans美洲印第安人

Amherst, Jeffrey Amherst, Baron (General), 阿姆赫斯特202

Amin, Samir, 132阿明

Amsterdam, 84阿姆斯特丹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137, 141, 151, 155, 166-167, 171, 174-175

Ancien Régime, see France旧政体

Andalucia, 安达卢西亚225

Andaman Islands, 安达曼群岛122

Anderson, B.L., 安德森145

Anderson, J.L., 安德森117

Anderson, M.S., 安德森3, 71-72, 82, 142, 174, 184-185, 227

Anderson, Perry, 安德森43, 52, 122

Anderson, Terry L., 安德森196

Andes, 安第斯219-220

Andrews, Charles M., 安德鲁斯185, 193, 196, 199

Andrews, George Reid, 安德鲁斯206, 252

Anglo-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see Treaties, Eden英法商
约

Anisson-Dupéron, Etienne-Alexander Jacques, 阿尼松-杜普龙87

Anjou, 安茹106

Ankara, 安卡拉141

Anna, Timothy E., 安娜 250, 254

Anna Ivanova (of Russia), 安娜·伊凡诺娃163, 250

Anstey, Roger, 阿斯蒂144

Anti-Combination Laws, see Great Britain反合并法

Anticosta, Ile d', 安蒂柯斯塔203, 206

Antiquity, 古城35

Antwerp, 安特卫普98

Appalachians, 阿巴拉契亚山202-203, 230-231

Aptheker, Herbert, 阿普特克205, 209, 235

Arable production, 阿拉伯产品 see Agriculture

Arab countries, 阿拉伯国家149, 175

Arasaratnam, S., 阿拉萨拉特南139, 153, 159, 181

Arbellot, Guy, 阿尔贝洛69

Arcila Farias, Eduardo, 阿西拉213

Arciniegas, Germán, 阿西尼加斯223

Argentina, 阿根廷 217, 222, 239, 249-250, 253

Argyle, W.J.阿盖尔133, 143

Aristocracy, 贵族制35-39, 41-43, 45-47, 49-52, 63-64, 81, 100-101, 103-104, 106, 111, 120, 142, 155, 160-162, 185, 209, 215, see also Class (es), upper; Landlords aristocratic reaction, 贵族反弹 34-35, 40-41, 62-63, 76, 196

Arkwright, Sir Richard, 阿克莱特23

Armaments, 军备25

Armengaud, André, 阿曼高特10

Armenia, 亚美尼亚175

Armstrong, Maurice W., 阿姆斯特朗211

Army (military), 陆军13, 82, 133, 152, 156, 172-173, 178-179, 185-186, 201, 203-204, 207-208, 211, 216, 222, 225, 228, 235-236, 243, 249-250, 255

Armytage, Frances, 阿米塔奇212

Arnold, Rosemary, 阿诺德1 33

Arnould, Ambroise-Marie, 阿诺德87, 91, 98

Aro Chuku, 阿罗丘库132, 189

Artisans, 工匠6, 37-38, 78, 107-109, 119, 162, 235

Asante, 阿散蒂169-170, 188

Ascension Island, 亚松森122

Ascherson, Neal, 阿舍森98

Ashton, T.S., 阿什顿7, 19, 67, 83, 90, 124

Asia, 亚洲178, 201

Central, 中亚167

Southeast, 东南亚49, 149

West, see Levant 西亚

Asiegbu, Johnson, U.J., 阿希格布144

Assignats, 指券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Athar Ali, M., 阿特阿里178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56, 122, 132, 143, 165, 169, 172, 230-231

Atlantic thesis, 大西洋议题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Auckland, William Eden, 1st Baron, 奥克兰see Eden, William

Auckland Island, 奥克兰岛122

Augé, Marc, 奥格156

Aulard, A., 奥拉尔104

Austen, Ralph A., 奥斯汀133, 170

Australasia, 澳斯特拉西亚122

Austria, 奥地利 141, 154, 171, 175-176

Auvergne, 奥弗涅11, 15

Avelino, Ivone Dias, 艾弗利诺213

Ayan, 贵族see Ottoman Empire

Azov Sea, 亚速海174

Aztecs, 255, 阿兹特克人see also Mexico, Native Americans

B

Babeuf, François Noël, dit Gracchus, (Babo-uvism), 巴贝夫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Conspiracy of Equals

Bacon de la Chevalerie, Jean-Jacques, 谢瓦利埃的241

Baer, Gabriel, 贝尔155

Bagchi, Amiya Kumar, 巴格奇139, 150, 181

Bagú, Sergio, 巴古253

Bagwell, Philip S., 巴格韦尔69

Bahamas, 巴哈马229

Bahia, 巴伊亚254-255

Bailyn, Bernard, 贝林 195, 204-205

Bairoch, Paul, 贝尔洛克6-7, 10, 12, 26, 28, 78, 114

Balkans, see Rumelia巴尔干

Ballot, Charles, 巴洛特-加龙省4, 29, 79

Bamford, Paul Walden, 班福德83

Banda Oriental, La, 东岸地区 (乌拉圭) 217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see Great Britain

Bankers, 银行家8, 20, 153, 180

Bantry Bay, 班特利湾246

Baptists, 浸礼会教徒237

Barbary pirates, 海盜230

Barber, Elinor, 巴伯50

Barbier, Jacques A., 224, 249

Barcelona, 巴塞罗那78

Barker, Charles Albro, 巴克199, 204

Baron, Samuel H., 巴伦185

Barr, Stringfellow, 巴尔71

Barshchina, 强制劳役制 see Russia

Barthélémy, 巴塞勒米Francois
de, Marquis, 88

Basel, 巴塞尔78

Bathurst, 巴瑟斯特122, 165

Bauer, Arnold J., 鲍尔226

Baur, John E., 博尔243

Bauwens, Liévin, 鲍温118

Baykov, Alexander, 贝科夫152

Bayly, C.A., 贝利148

Bayonne, 巴荣249

Beales, H.S., 比尔斯31

Bean, Richard Nelson, 比恩144-145, 156

Beard, Charles A., 比尔德238, 247

Béarn, 贝亚恩15

Beau Brummel, 花花公子 114

Becker, Charles, 贝克169

Bedford, John Russell, 4th Duke of, 贝德福特第四任公爵, 拉塞尔
194

Beer, George Louis, 比尔194

Behrens, C.B.A., 贝伦斯81

Belgium, 比利时66, 89, 125

Belgrano, Manuel, General, 贝尔格拉诺253

Belize, 伯利兹219

Bemis, Samuel Flagg, 比米斯72, 219, 228-229, 232-233, 247,
251

Bendjebbar, André, 本迪巴尔106

Bengal, 孟加拉国 72, 139-140, 149, 158-159, 167-168, 181, 183, 229

Benin, Bight of, 贝宁海湾170

Bénoist, M.-A., 贝诺瓦斯特128

Berbeo, Juan Francisco, 伯比欧223

Beresford, William Carr Beresford, Viscount (Marshall), 贝瑞斯福德255

Bergeron, Louis, 伯格龙31, 72-73, 77, 113, 115-118

Bergier, J.F., 伯吉尔28

Berkes, Niyazi, 伯克173, 176-177

Berlin, 柏林175

Decrees of, 柏林法令 see Continental Blockade

Berlin, Ira, 伯林235-236

Bermuda, 百慕大229

Berrill, K.E., 贝利尔79

Berry, 贝里15

Besset, Giliane, 贝塞特142

Bethell, Leslie, 贝瑟尔255

Bezanson, Anna, 贝赞森3, 33

Bhattacharya, Sabyasachi, 巴塔查尔雅139, 158

Biafra, Bight of, 比亚夫拉湾143, 170

Bien, David D., 比恩40

Bierck, Harold C., Jr., 比尔克253

Bihar, 比哈尔149, 160

Birthrate, 出生率see Demography

Bjork, Gordon C., 比约克248

Black Sea, 黑海 142, 161, 175, 186

Blacks, 黑人146, 193, 205, 221-223, 225, 229, 231, 234-236, 240-244, 246, 252-255

Blanc, Simone, 布朗克135, 163

Blanqui, Adolphe, 布朗基3

Blaug, Mark, 布劳格120

Bloch, Camille, 布洛克92

Bloch, Marc, 布洛赫15, 41, 64-65, 74-75, 95-96

Blum, Jerome, 布鲁姆142, 155, 160-161, 163

Boahen, A.Adu, 鲍亨170

Bois, Paul, 布瓦97, 105

Bolívar, Simon, 玻利瓦尔224-225, 243-244, 246, 250, 252-254

Bolivia, see Peru, Upper玻利维亚

Bolton, G.C., 博尔顿182, 202

Bombay, 孟买138, 180

Bonaparrtte, Napoleon, 拿破仑 see Napoleon

Bonilla, Heraclio, 波尼拉219, 222, 224, 253

Bordeaux, 波尔多90

Bosher, J.F., 波舍69, 82

Boston, 波士顿200, 238

Boulègue, Jean, 布勒盖136

Boulle, Pierre H., 布尔6, 42, 72, 145, 152

Bouloiseau, Marc, 布尔瓦桑91

Boulton, Matthew, 布尔顿6

Bounties, 奖金see Protectionism

Bourbon, House of, 波旁王朝82, 112, 213, 216, 222, 224, 226, 249

Bourbon, Isle de, 波旁183, 241

Bourde, André J., 博尔德62, 65, 76-77

Bourgeoisie, 中产阶级2, 32, 34-43, 45, 47, 49, 52-53, 82, 84, 99-100, 104-105, 107, 109, 111, 125, 129

bourgeois revolution, 中产阶级革命3, 36-37, 39-41, 44-51, 53, 102, 105, 110

petty bourgeoisie, 小中产阶级37, 47, 102

Bourgin, Georges, 布尔金96

Bousquet, Nicole, 布斯奎特239, 249, 252-253

Bouvier, Jean, 鲍维尔118

Bowden, Witt, 鲍登91

Bowen, Harold, 鲍温175

Bowring, John, 波林155

Boxer, C.R., 博克塞179

Boyetet, M., 波以太88

Brading, David A., 布瑞丁216-217, 225-226, 239, 248

Bras nus, 无赖汉see Sans-culottes

Braude, Benjamin, 布劳德173

Braudel, Fernand, 布罗代尔24, 30-31, 51, 68, 71, 87, 92,

115, 117, 122, 196, 215

Brazil, 巴西 143, 193, 214-215, 221, 224, 243, 249, 254-255

Conjuração Bahia, 巴伊亚联合起义254

Inconfidência mineira, 小团体密谋254

Bread, 面包58, 93, 104, 106, 124

bread prices, control of, 面包价格see Grain liberalism bread riots,
面包暴动104, 121

Brebner, John Bartlett, 布瑞纳19, 195, 207, 210, 230-232

Bullion, 金银条块131, 136-139, 181, see also Gold, Silver

Briavoine, Natalis, 布里阿瓦尼23-24, 33, 87, 124

Bridenbaugh, Carl, 布莱登堡198

Bridgewater, 1st Duke of, John Egerton, 布里奇瓦特第一任公爵,
艾格顿26

Bristol, 布里斯托177

Britain, see Great Britain不列颠

Brito Figueroa, Federico, 布里托253

Brittany, 布列塔尼48, 63, 74, 77, 79, 97, 104, 106

Broder, Albert, 布洛德118, 122

Broeze, Frank J.A., 布洛斯198

Brooks, George E., 布鲁克斯148

Brown, Robert E., 布朗196

Brown, Vera Lee, 布朗213

Brown, Wallace, 布朗229

Browning, Oscar, 布朗宁86, 88, 90, 92-93

Bruchey, Stuart, 布鲁奇239, 248

Brugièe, Michel, 布鲁吉尔110

Brumaire (Eighteenth), 雾月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18日)

Buckley, Roger Norman, 巴克利242

Buda, Aleks, 布达173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217, 249

Building construction, 建筑物结构8

Bulgaria, 保加利亚154, 174

Bureaucracy, 官僚系统65, 73, 156, 162, 171-173, 185, 213, 215, 224

Burgoyne, John, Ceneral, 柏高英218

Burgundy, 勃艮第76

Burke, Edmund, 伯克 83, 111, 201

Burma, 缅甸148

Burstin, Haim, 伯斯坦107

Burt, A.L., 伯特231

Busch-Zantner, R.布许赞特纳154

Butel, Paul, 布特尔 67-68, 117, 179

Byron, George Gordon Noel, 6th Baron (Lord), 拜伦176

C

Caballero y Góngora, Antonio (Archbishop), 卡巴列罗223

Cádiz, 加的斯 213-214, 216, 219-220, 239, 250

Cahen, Léon, 卡汉87, 91

Cahiers de doléance, 三级会议的陈情书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Cain, P.J., 坎恩19, 41, 79, 93, 181

Calabar, 卡拉巴尔149, 157, 170

Calcutta, 加尔各答138-139, 153

Calhoun, Craig, 卡龙120

Calhoun, John, 卡龙254

Calonne, Charles-Alexandre de, 卡洛纳80-81, 86-87

Camden, 2nd Earl and 1st Marquess of, John Pratt, Viceroy, 卡姆登246

Cameron, Rondo E., 卡梅伦7, 29, 32, 79

Campbell, Leon G., 坎贝尔222, 224-225

Campbell Islands, 坎贝尔群岛122

Canada, 加拿大71-72, 193-194, 202, 207-208, 211, 218, 230-231, 236, 251

French Canadians, 法裔加拿大人see Quebec Maritime Provinces, 251

Canals, see Transport运河

Canary Islands, 加那利群岛253

Cannadine, David, 坎纳丁4

Canning, George, 坎宁 121, 254

Cantabrian Mountains, 坎塔布连山225

Canton, 广州168

Cape Coast, 海岸角147

Cape Colony, 殖民地角122

Cape Horn, 合恩角72

Capital (capitalists), 资本的(资本家) 6, 17, 22-23, 28, 31, 34, 36-37, 41-51, 59, 62-63, 65, 76-78, 82, 84, 100, 106, 111, 131, 155, 162

Capital资本的

accumulation of, 资本累积6, 8, 31, 59, 78, 82, 129-130, 144-145, 154, 157, 171, 227

fixed, 固定资本7-8

investment, 投资8, 21, 26, 36, 76, 85, 122, 166

supply of, 资本供给7

Capitalism, 资本主义5, 8, 40-41, 46, 48, 51, 84, 97, 101, 104-105, 110-111, 115, 125, 130, 144, 160, 166, 185, 189, 256, see also World-economy

Caracas, 加拉加斯239, 250

Cárdenas Acosta, Pablo E., 卡尔迪纳斯222-223

Caribbean, 加勒比海56, 68, 71, 154, 198, 202, 212, 218-219, 221, 227, 229, 242, 252 see also West Indies, v-arious

Carleton, Governor (Dorchester, Guy Carleton, 1st Baron), 卡拉顿(总督) 206, 208

Carmarthen, Marquess of, Francis Osborne, 卡马森侯爵85, 88-90

Carolinas, the, 230, see also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卡罗来纳

Carr, Raymond, 卡尔254

Cartagena, 喀塔基那243

Casanare, 卡萨内尔223

Cash crops, see Agriculture商业作物

Caste, 种性159

Castile, 卡斯提尔225

Castries, Charles Eugene Gabriel de la Croix, Marquis of, 卡斯特利86

Catalonia, 加泰隆尼亚216, 219

Catepole, Brian, 卡奇波尔165

Catherine II (of Russia), 凯瑟琳二世135, 142, 151, 162, 185-186

Catholics,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 天主教教堂84, 115, 118, 206-209, 215, 226, 237, 244-245, see also Clergy

Cattle, 家畜132, 154

Caucasus, 高加索山脉187

Cereals, 谷物 57, 61-62, 64-65, 67-68, 76, 93, 141, 148, 206

Césaire, Aimé, 凯塞里240-242

Céspedes del Castillo, Guillermo, 加斯蒂罗217

Ceylon, 锡兰122, 148

Chabert, Alexandre, 夏贝尔96

Chalmer, George, 查默3

Chamberlin, Christopher, 张伯伦132, 157

Chambers, J.D., 钱伯斯13, 15, 17, 60-61, 70, 121

Champagne, 香槟15, 92

Champion, Edne, 尚皮翁92

Champlain, Lake, 尚普兰湖230

Chandler, Charles Lyon, 钱德勒252

Chandra, Satish, 钱德拉178

Chapman, Stanley D., 查普曼7-8, 25, 114

Chaptal, Jean-Antoine-Claude, 夏普泰尔89-91, 97, 122-123

Charcoal, 木炭26, 142, 163

Charles III (of Spain), 查理三世213, 215-217, 220, 226, 249

Charles IV (of Spain), 查理四世216, 249-250

Charles, Eunice A., 查尔斯148

Chartism, 宪章运动see Great Britain

Chartres, 沙尔特尔16

Chassagne, Serge, 沙萨涅112, 115, 118, 122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de, Viscount, 夏托布里昂37, 100, 146

Chatham Island, 查塔姆岛122

Chaudhuri, Binoy Bhushan, 乔杜里158

Chaudhuri, K.N., 乔杜里136, 139, 149, 153, 179-180

Chaussinand-Nogaret, Guy, 乔森南-诺加里40, 52, 82, 108

Chaunu, Pierre, 肖努26, 61, 202-203, 214, 216, 220-222, 224-225, 233, 249

Checkland, S.G., 切克兰德242

Cheetham, James, 奇塔姆248

Chemicals (chemical industries), 化学物79

Cherokees, 切罗基人233

Chesnutt, David R., 切斯纳特210

Chevallier, Dominique, 谢瓦利尔151

Chickasaws, 奇克索人233

Child, Sir Josiah, 蔡尔德179

Chile, 智利248, 250

China, 中国 135, 139-140, 149-150, 153, 167-168, 175, 177, 183-184, 230

Chinese Revolution, 中国革命49

Choiseul, Etienne François de, Duke, 舒瓦瑟尔公爵71-72, 81, 83, 194, 217, 230

Choiseul-Gouffier, Marie Gabriel Florent Auguste de, Count, 舒瓦瑟尔176

Chouannerie,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counterrevolution”朱安党

Christelow, Allan, 克里斯特罗212-214, 240

Christianity, 基督教 34, 135, 166, 169, 211

Christie, Ian R., 克莉里斯195, 205, 214

Christophe, Henri, 克里斯多夫243

Chulkov, M.D., 丘尔科夫186

Chung, Tan, 钟167-168, 183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教会 see Episcop-aliands

Ciftlik, 154-155, see also Plantations契夫特里克

Cipolla, Carlo M., 奇波拉4

City, The, see Great Britain伦敦城

Clapham, J.H., 克拉潘17, 118, 122, 154

Clark, S.D., 克拉克 208, 211, 251

Clark, John G., 克拉克79, 234

Clark, Richard, 克拉克151

Class (es) (or strata), 阶级

Lower (poor, popular), 低层8, 17, 35, 47, 63, 69, 77, 97, 102, 106, 108-109, 111, 115, 122, 124-126, 196-197, 200, 224, 237, 249, 255, see also Peasants, Proletariat, Sans-cullottes

Middle, 中产阶级3, 8, 10, 32, 43, 69, see also Bourgeoisie

Upper, 上层阶级100, 100, 103, 122, see also Aristocracy, Landlords

Class struggle, 阶级斗争97, 107, 126

Clauder, Anna C., 克劳德228, 248

Clemenceau, Georges Benjamin, 克雷孟梭49

Clendenning, P.H., 克伦登宁186

Clère, Jean-Jacques, 克里尔95

Clergy, 教士 51, 95, 100, 106, 207-208, 250

Climate, 气候58

Clive, Robert (Baron Clive of Plassey), 克莱武179

Clough, Shepard B., 克劳118

Clover, 苜蓿13

Coal, 煤26-27, 97, 113

Cobb, Richard, 科布48, 107

Cobban, Albert, 科班38-40, 42-43, 48-49, 81, 84, 87, 98, 100, 110, 118

Cobbett, William, 科贝特89-90

Cochran, Thomas C., 科克伦247

Cod, 鳕鱼86

Coerced Labor, 强制劳工see Debt-bondage Indentured labor, Peonage, Serfs, Slavery

Coffee, 咖啡 241

Cohen, Felix, 柯亨201

Cohen, Jon S., 柯亨66

Cohn, Bernard S., 柯恩139, 183

Coke, 可乐26-27, 151

Colbert, Jean-Baptiste, 柯尔伯41, 98-99, 216

Cole, G.D.H., 柯尔113

Cole, W.A., 柯尔6, 8, 15, 24, 57, 61, 67-68, 70, 73, 78, 80, 83, 116

Coleman, D.C., 柯尔曼3, 32

Colley, Linda, 柯利122, 201

Collier, Simon, 柯利尔224

Colombia, 哥伦比亚217, 219, 221-224, 243

Colonists, see Settlers殖民者

Colvin, lucie G., 柯尔文169

Comercio libre, see Trade, free商业自由

Comercio neutral, 商业中立see Neutrality

Commerce, see Trade商业

Commodity chains, 商品链129, 137, 152, 165, 167, 189

Commoners, 平民63, 64, 76, 101, 173

Common of shack, 公地see Agriculture, open fields

Common rights, 一般权利 see Agriculture, open fields

Compagnie des Indes, 印度公司182

Company of Caracas, 加拉加斯公司219

Company of General Farms, 总包税公司82

Company of Merchants Trading to Africa, 非洲商业贸易公司147

Comuneros, 公社派219, 222-223, 246-247

Condorcanqui, José Gabriel, 康多基see Túpac Amaru

Confino, Michael, 康菲诺142, 155, 160-163

Congregationalists, 公理教徒211

Congreso Hispánicoamericano de Historia, 西属美洲史大会225, 253

Conjuncture (conjoncture), 机缘196, 220

Conjuração Bahia, 巴伊亚see Brazil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州231, 235

Connell, K.H., 康奈尔11, 123

Conscription, 征兵制109

Consolidation, land, 合并土地 see Enclo-sures

Conspiracy of Equals,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平等派密谋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see Istanbul

Constituent Assembly,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制宪会议

Continent, see Europe 欧洲大陆

Continental Blockade, 大陆封锁 117-118, 140, 142, 149, 227

Continental Congress, see United States 大陆会议

Contraband, 走私 see Trade

Convention,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国民议会

Coquin, François-Xavier, 科钦 151

Cornblit, Oscar, 科尔布利 220

Corn Laws, 谷物法 see Great Britain

Cornwallis, Charles Cornwallis, 1st Marqu-uess, 康沃利斯 180, 182-183

Corporations, 公司 see Guilds

Corregidores, 地方长官 216-217, 220-221

Corsica, 科西嘉 72

Cort, Henry, 科特 23

Corwin, Arthur F., 科温 244

Corwin, Edward S., 科温218

Cossacks, see Russia哥萨克

Cottage industry, see Industry, putting-out家庭工业

Cotton, 棉23, 25, 27-28, 91, 139-141, 145, 148, 150, 153-155, 159, 168, 173, 248, see also Textiles, cotton

Coughtry, Jay, 高特利 235

Countryman, Edward, 康特里曼199

Coupland, Sir Reginald, 库普兰144

Cowries, 玛瑙贝169

Cracraft, James, 克拉克拉夫特185

Crafts, N.F.R., 克拉夫茨30, 61, 70, 73, 78-79, 113-115, 124

Craftsmen, see Artisans

Cration, Michael, 克雷生230

Credit, 信贷8, 153-154, 158-159, 199, 247 see also Debt Bondage

Creeks, 克里克人233

Creighton, Donald, 克雷顿208, 231

Creoles, 克里奥尔人214, 220-226, 243-244, 248, 250-255

Crimea, 克里米亚135, 187

Crises d'Ancien Régime, 旧政体危机see Harvests

Croix, Carlos Francisco de, Marquis, 克拉克斯216-217

Crompton, Samuel, 克朗普顿23, 79

Crosby, Alfred W., 克劳斯比142

Cross River, 十字河 157

Crouzet, Francois, 克鲁兹6-8, 19, 28, 31, 42, 67-68, 73, 79, 85, 98, 100, 113-114, 116-119, 123, 125

Cuba, 古巴71, 143-144, 234, 244, 254

Cuenca Estebán, Javier, 丘恩卡247-250

Cunha, Dom Luis da, 库哈215

Cunningham, Audrey, 坎宁安121

Currencies (Money), 现金147, 172

Currency finance, 现金财政171, 199

Curtin, Philip D., 柯廷143, 152, 166, 235

Cuzco rebellion, 库斯科反叛252

Cyprus, 塞浦路斯170

D

Dacca, 达卡150

Daget, Serge, 达盖146

Dahlman, Carl J., 达尔曼66

Dahomey, 达荷美 132-134, 143, 147, 156-157, 170, 188

Dakin, Douglas, 达金174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174

Damascus, 大马士革151, 173

Danière, André, 丹尼耶58

Danube, 多瑙河166

Darby, Abraham, 达比23, 26-27

Darby, H.C., 达比122

Dardel, Pierre, 达代尔72, 91, 93

Darity, William, Jr., 戴若提145

Das Gupta, Ashin, 古普塔132, 138, 180

Datta, K.K., 达塔137-139

Daumard, Adeline, 道马尔122

Daumas, Maurice, 道马斯30

Dauphiné, 多菲内67

David, Jacques-Louis, 戴维192

David, Paul A., 戴维247

Davis, David Brian, 戴维斯236

Davis, Ralph, 戴维斯7, 25-26, 67-68, 73, 78-79, 85, 116,
140

Davison, Roderic H., 戴维森187

Deane, Phyllis, 迪恩3-4, 6, 8, 12, 15, 17, 19, 22, 24, 24,
26-27, 30-31, 57, 60-62, 66-71, 78, 80, 83, 116, 118, 122, 124

Deane, Silas, 迪恩218

Death rate, see Demography死亡率

Debbasch, Yvan, 迪巴许146

Debien, Gabriel, 德比因240-242

Debt bondage, 债券131, 153-154, 160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人权宣
言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化192-256

Dehio, Ludwig, 德希奥 57, 84, 94, 184, 208-209

Deindustrialization, 非工业化119, 125, 138, 149-152, 168

Delaware, 特拉华231

Delgado, José Maria, 德尔加多216

Delvaux, Rémi, 德尔伏128

Demidov, Nikita, 德米多夫162

Demography, 人口统计 6-8, 10-11, 14, 16-18, 22, 33, 60-63, 66, 70, 123, 138, 165, 193, 221

Demographic revolution, 人口学革命9, 12, 60

Denmark, 丹麦146-147, 156

Dérapiage, 偏离 37, 44, 47, 109

Desai, Ashok V., 德赛158

Dessalines, Jean-Jacques, 243

Detroit, 底特律203

Dickerson, Oliver M., 狄克森197

Diderot, Denis, 狄德罗ii

Diffie, Bailey W., 迪飞224

Digby, Simon, 迪格比135

Dike, K.Onwuka, 戴克149, 189

Dilla Alfonso, Haroldo, 阿芳索243

Diplomacy, 外交see Interstate system

Disease, see Hygiene瘟疫

Dobb, Maurice, 多布4, 16, 46

Dojnov, Stefan, 多伊诺夫187

Dollfus, Daniel, 多尔福斯118

Dominguez, Jorge F., 多明奎茨223

Dominica, 多米尼加72

Dovring, Folke, 多弗林15-16, 18, 22

Doyle, David Noel, 多伊尔245-246

Doyle, William, 多伊尔42

Drake, B.K., 德雷克166

Drake, Michael, 德雷克9, 11

Dred Scott decision, 斯考特判决236

Drescher, Seymour D., 德瑞舍144

Droit de parcours, see Agriculture放牧权

Droit de triage, see Agriculture挑选权

Dubois, Marcel, 杜布瓦146

Duckham, Baron F., 杜坎97

Dukes, Paul, 杜克142, 147, 151, 160

Dull, Jonathan R., 杜尔 90, 218

Dumas, François, 杜马斯87-92

Dunmore, 4th Earl of, John Murray, 邓莫尔第四任伯爵, 默里235-236

Dupâquier, Jacques, 杜帕基尔123

Dupin, Charles, Baron, 迪潘118

Dupont de Nemours, Pierre Samuel, 杜邦87-88

Dutt, Romesh Chunder, 达特140

Dyck, Harvey L., 戴克186

Dyewoods, 染料树146

E

Eagly, Robert V., 伊格利85

Earle, Edward Meade, 厄尔176

East Anglia, 东盎格利亚103

East India Company, English, 东印度公司139, 149, 153, 159, 167-168, 180-184, 202

Eccles, W.J., 埃格尔斯194

Eden, William, 1st Baron Auckland, 伊登88, 92, see also
Treaties, Eden

Eden Treaty, see Treaties伊登条约

Edinburgh, 爱丁堡3

Edwards, Michael M., 爱德华兹90, 114, 116

Egnal, Mark, 埃格纳尔196, 199

Egypt, 埃及 137, 141, 151, 155, 167, 170, 172-173, 172-
173, 175-176, 185, 246

Elisabeth (of Russia), 伊丽莎白151

Ellis, Geoffrey, 艾利斯116, 118

Eltis, David, 艾蒂斯143

Elwert, Georg, 艾沃特133

Embree, Ainslee T., 艾伯利159, 180

Emsley, Clive, 艾姆斯利120

Enclosures, 圈地14-17, 19, 48, 62, 65-66, 70, 73-75, 96, 113

consolidation, 强化14-15, 66

division of commons, 一般分工95

engrossment, 垄断15, 74

eviction, 逐出17

Endrei, Walter, 恩德雷114

Energy, 能源 4, 26-27, 114-115, see also Engines

Engagés, see Indentured Labor 契约劳动力制度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3-4

Engerman, Stanley L., 恩格曼94, 121, 124

Engines, 引擎

hydraulic, 水力引擎111

steam, 蒸气引擎24, 26, 114

England, see Great Britain 英格兰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ii, 43, 109-110, 214-215

Enragés,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忿激派

Entrepôts, 59, 197, 207, 212-213, 228, 244

Entrepreneurs, see Capital (capitalists) 企业家

Episcopalians, 圣公会派成员126, 204, 206, 237

Ernst, Joseph Albert, 厄恩斯特196, 199, 205-206

Escoffier, Maurice, 艾斯科佛146

Estates-General,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三级会议

Estates, large, see Landlords, large; Pla-ntations大地产

Europe (western Europe and Europeans), 欧洲(西欧和欧洲人) 5-8, 11, 13, 17-19, 24-26, 29-30, 34, 38-39, 52, 56-57, 60-62, 67-74, 78, 82, 87, 111, 114, 116-119, 122, 125, 128-129, 131-134, 136-141, 143, 145, 148-154, 157-158, 162, 164-169, 172, 174-182, 184-185, 187-189, 193-194, 205, 212-213, 218, 220-221, 226-227, 233-234, 239, 242-244, 246-248, 251-252, 255

Central, 中欧8, 119

Eastern, 东欧62, 129

Northern, 北欧67, 84

Sonthern, 南欧210

Eversley, D.E.C., 埃弗斯利6

Exports, 出口 see Trade, foreign

External arena, 外部竞争场129-132, 134, 136-137, 154, 164, 167-168, 171-172, 189

Extremadura, 埃斯特雷马杜拉225

Eyzaguirre, Jaime, 伊萨奎尔224, 248

F

Factors, 因素199

Factories, 工厂22, 27-28, 31, 66, 78, 115, 162, 123, 163

Fage, J.D., 法格165

Falkland Islands, 福克兰群岛72

Falkner, S.A., 福克纳106

Falkus, M.E., 福库斯152, 162-163

Fallow, 休耕地see Agriculture

Family Accord, see Treaties王族协定

Famines, see Harvests饥荒

Fanti, 芳蒂188

Farley, J.Lewis, 法利 141, 151, 177

Farmers, small, 小农see Peasants

Farming-out, 出租 see Fermiers

Fats, 脂肪147

Faueheux, Marcel, 福舍克斯97, 106

Fay, C.R., 费168

Febvre, Lucien, 费弗尔5

Fedorov, A.S., 费多洛夫185

Fehér, Ferenc, 费赫尔106-110

Felix, David, 菲利克斯7

FerdinandVII (of Spain), 费迪南七世249-252, 254

Ferguson, E.James, 弗格森199

Fermiers (-Généraux), 包税人64, 76-77, 82

Ferro, Mark, 费罗35

Fertile Crescent, 肥沃新月地带167, 172-173

Fertility, 肥沃see Demography

Fertilizers, 施肥 see Agriculture

Feudalism, 封建主义35, 40, 46-48, 63, 77, 104, 126, 163

feudal dues, 封建税40-41, 47, 63-64, 93, 95, 103-104

feudal privileges (rights), 封建特权40-41, 63-64, 74, 96, 103, 163

Findley, Carter V., 芬德利176-177

Finns, 芬兰人233

Fire arms, 武器枪炮152, 188, 233

Fisher, Alan W., 费希尔187

Fisher, Colin M., 费希尔153

Fisher, H.E.S., 费希尔73

Fisher, J.R., 费希尔221-222

Fisher, John, 费希尔216, 239, 249, 252-253

Fishing, 渔业218

Fitton, R.S., 费顿248

Flanders, 佛兰德77

Flax, 亚麻141

Fleury, André-Hercule de, 费勒里81

Flinn, M.W., 弗森60, 124

Flint, J.E., 弗林特143, 152

Florescano, Enrique, 佛罗勒斯卡诺249

Floridablanca, Don Francisco Antonio Moñ-ino de, Count of, 佛罗里达布兰卡243, 249

Floridas, the, 佛罗里达210, 217-219, 230, 233-234, 251, 254

Fodder crops, 粮草see Agriculture

Fohlen, Claude, 弗林67, 114, 116, 228

Food and foodstuffs, 食物和粮食60, 63, 66, 77, 103-104, 121,

138, 141, 148-149, 158, 199, 206, 229

Forbes, R.J., 福布斯26

Ford, Lacy K., 福特10

Forrest, Alan, 福雷斯特119

Forster, Robert, 福斯特40-41, 63, 65, 101

Foster, John, 福斯特121

Fourth Estate, 第四等级102, 104, see also Class (es), Lower

Foust, Clifford M., 福斯特184

Fox, Charles James, 福克斯90

France, 法国3, 5-7, 9, 14-21, 23-25, 27, 29-31, 33, 42, 49, 52-53, 55-126, 138, 140-143, 145-146, 148, 150, 152, 154, 157, 159, 166, 169, 173-176, 179, 181-183, 187, 189, 192-196, 200, 202-203, 206-207, 215, 217-218, 225, 227, 230, 234, 240-243, 245-251, 254-255

France, 法国

Ancien Régime, 旧政体29, 36, 40-43, 48-49, 51, 57, 59, 74, 89, 95-101, 105, 107-108, 110, 112, 115-117, 176

Atlantic (West), 大西洋72, 97, 105-106

Center-East, 中央东部97, 103

domaine congéable, 可收回地97

financiers, 50, 82, 84, 财政家see also Bureaucracy

Five Great Farms, 五大包税区68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3-4, 14-15, 23, 33-53, 74, 80-81, 84, 93-117, 119-121, 123, 125-156, 146, 182, 208, 212, 215, 217-220, 225, 227-231, 233-235, 240-242, 245-246, 248-249, 255-256, see also

Marat, Robespierre, Sans-culottes

abolition of feudal rights, 封建权废止38, 40, 95, 104

anti-capitalist, 反资本主义者36, 46, 48-50, 97, 103, 106-107, 109, 111, 120-121

assignats, 指券84, 106, 114

Atlantic thesis, 大西洋议题34, 38-39

Brumaire (Eighteenth), 雾月十八日37, 116

cahiers de doléance, 陈情书37, 92

Conspiracy of Equals, 平等密约37, 48, 115, 119

Constituent National Assembly, 国家制宪议会37, 43, 47, 82, 84, 95-96, 98, 104, 109, 119, 146, 240-242

Consulate, 领事馆114, 116

Convention, 会议84, 96, 98, 104, 110-111, 241-242

“counter-revolution”, 反革命96-97, 103, 105-106

crowds, 群众104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人权宣言34, 37, 101

Directory, 督政府114, 245

Enragés, 忿激派119

Estates-General, convening of, 三级会议49, 81, 103, 240

Girondins, 吉伦特派37, 44, 47, 106, 108-110

Great Fear, 大恐怖104

Hébertistes, 埃贝尔派38

inevitability, 不可避免性43, 45, 94, 112

Jacobins, 雅各宾党34, 37, 39, 47, 100, 107-111, 119, 126,
201

liberal (or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自由的诠释44, 45, 48-50

loi Le Chapelier, 霞不列尔法107

pre-revolution, 革命前的85, 121

social (or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anti-feudal), 社会诠释34,
36, 38-40, 42, 51, 101-102, 109-110, 126

Socié des Amis des Noirs, 黑人之友协会146, 242

terror, 恐怖44, 82, 107, 109-110

Thermidor, 热月37, 50-51, 55, 57

Third Estate, 第三等级41-42, 46, 51, 81

Fronde, 投石党126

Guerre des farines, 冲突107

Huguenot wars, 胡格诺战争126

July Monarchy, 七月王朝57

loi Ségur, 砂糖法案42, 51

northern (northeast), 北方17, 66, 77, 96, 103, 113, 125

Parlements, 最高法院81, 85

Regency, 摄政57

Restoration, 复辟48, 51

Revolution of 1830, 1830年革命125-126

south (eastern), 南法11, 64, 114

Franche-Comté, 弗朗什-孔泰15, 75

Francis, Sir Phillip, 弗朗西斯180

Franco, Franklin J., 弗朗哥243

Franco-British Wars of 1792-1815, 法英战争see Wars

Frankgakis, Helen, 弗朗加基思140-141

Frank, André Gunder, 弗兰克71, 73

Freedeman, Charles E., 弗里德曼79

Freehling, William W., 弗利林236

Freetown, 弗里敦165

Frégault, Guy, 弗利高特218

Freudenberg, Herman, 弗罗伊登贝格28

Frykenberg, Robert Eric, 弗莱根堡159, 184

Fugier, André, 富吉尔117-118

Fullard, Harold, 福拉尔122

Furber, Holden, 弗伯 137, 152-153

Furet, François, 孚雷38, 40, 42-45, 47-50, 91, 94, 102, 108-110

Furs, fur-trading, fur trappers, 毛皮、毛皮贸易131, 203, 206-207, 231, 233-234, 251

Fussell, G.E., 福塞尔15

Fyfe, Christopher, 法伊夫165

G

Gachupín, 西班牙移民 see Peninsulars

Gaillardon, Charles, 加亚尔登91

Galenson, David W., 盖伦森235

Galicia, 加利西亚225

Gálvez, Don José de, 加尔维斯216-217, 225-226

Gambia, 冈比亚148, 166

Gandev, Christo, 甘德夫154

Gandia, Enrique de, 甘第亚221, 226

Ganges, 恒河39

Ganguli, B.N., 甘古利139, 181

Garanger, André, 加伦格30

García-Baquero 加西亚巴科罗

González, Antonio, 冈萨雷斯216, 219

Garden, Maruice, 加登9, 29-31, 79, 107-108

Garner, Richard L., 加纳249

Gaski, John F., 加斯基7

Gates, Horatio, General, 盖茨218

Gauchos, 高乔人253

Gauthier, Florence, 戈蒂埃48, 74, 96, 105

Gayer, Arthur D., 盖尔26, 112, 114

Geary, Frank, 吉瑞7

Geggus, David, 葛古斯242

Gemery, Henry, 吉默里143

Gena, Mehmet, 热斯151

Geneva, 日内瓦78, 84

Genoa, 热那亚84

George II (of Great Britain), 乔治二世71

George III (of Great Britain), 乔治三世 83, 201, 206, 212, 232, 235

Georgia (U.S.A.), 佐治亚州210, 231, 235, 237

Gérard, Conrad-Alexandre, 吉拉尔69, 218, 230

Germany, 德国

western, 西德47, 67, 113, 116, 118, 125, 148, 154, 213,

225, 235, 237, 243

eastern, 东德95

Gersehenkron, Alexander, 格申克伦20, 156, 186

Ghent, 根特125

Ghezo (of Dahomey), 达荷美的哥佐134, 143

Gibb, H.A.R., 吉布175

Gibbons, Edward, 吉本135

Gibbs, N.H., 吉卜斯251

Gibraltar, 直布罗陀218-219, 227

Gilboy, Elizabeth Waterman, 吉尔博7, 70

Gille, Bertrand, 吉尔8, 79, 114, 122-123, 141

Gillespie, Charles C., 吉尔斯比23

Gillray, James, 吉尔雷56

Gipson, Lawrence Henry, 吉卜生195, 202

Girard, L. 吉拉德69

Girondins, 吉伦特党人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Glassware, 格拉斯瓦尔88

Glasgow, 格拉斯哥92, 228

Godechot, Jacques, 戈德肖38-39, 42, 83-84, 87, 114, 118-119, 245

Godoy, Manuel de, 戈德伊249

Goebel, Dorothy Burne, 戈贝尔212

Gold, 黄金136-137, 146, 151, 214

Gold Coast, 黄金海岸147, 188

Goldin, Claudia D., 戈尔丁247

Goldman, Marshall, 戈德曼151

Goldstone, J.A., 戈德斯通 11

Golte, Jürgen, 哥尔特221, 222

Goodwin, Albert, 古德温64, 100, 120

Gorée, 戈雷189

Goths, 哥特人225

Gottschalk, Louis, 戈特沙克227

Goubert, Pierre, 古伯特21, 41-42, 82

Gough, Kathleen, 戈夫148

Gough Island, 戈夫岛122

Gourvish, T.R., 戈尔维什124

Goy, Joseph, 戈伊62

Graham, Gerald S., 格拉汉122, 231, 247, 251

Grain liberalism, 谷物自由主义73-74, 76-77, 85, 105

Grains, see Cereals谷物

Grange, Henri, 格兰治82

Grantham, George W., 格兰瑟姆97, 113

Grattan, Arthur, 格拉顿246

Gray, Ralph, 格雷235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see Nova Scotia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3-36, 41-42, 46, 49, 53, 55-57, 59-75, 77-95, 97-101, 103, 110-126, 134-135, 137-146, 148-153, 158, 162, 165, 167-168, 173, 175-177, 179-184, 186-187, 189, 192-215, 217-220, 225-240, 242-255

Act of Settlement (1662), 住民法案120

Act of Union (1707), 1707年联合法案68, 201

Act of Union (1800), 1800年联合法案246

Anti-Combination Laws, 反合并法120-121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84

Board of Trade, 同业公会147

British North America, 英属北美 see United States, Canada

Chartism, 宪章运动12

City, The, 伦敦城71

Corn Laws, 谷物法124, 142

English Revolution, 英国革命36, 49, 125

Free Port Act, 自由港法案212-213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 光荣革命83, 125, 195, 201

India Act (1784), 印度法案182

Lords Commissioners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232

Luddism, 卢尔德主义12

Navigation Acts, 航海条例122, 197-198, 210, 212, 229

Parliament, 议会15, 19, 25, 27, 64-66, 74, 87, 89, 121, 126, 142, 150, 154-155, 159, 177, 199, 201-203

Poor Laws, 济贫法120-121

Privy Council, 枢密院204

Reform Act of 1832, 1832年改革法案126

Speenhamland system, 斯平汉姆兰系统120

Sugar Act, 糖法案212

West India Regiments, 西印度军团242

Great Fear,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大恐怖

Greece, 希腊173-176, 210

Greenberg, Michael, 格林伯格168

Greene, Jack P., 格林195-197, 199, 201, 203-204, 232, 237

Greenleaf, Richard E., 格林里夫239

Green-Pedersen, 格林彼德森 Svend E., 146

Grenon, Michel, 格伦农35

Grenville, George, 格伦维尔212

Griffin, Charles Carroll, 格里芬256

Griffiths, David M., 格里菲斯185

Gruder, Vivian R., 格鲁德42, 64

Guadeloupe, 瓜德罗普71, 193-194, 243

Guatemala, 危地马拉221, 243

Guérin, Daniel, 盖兰 46-48, 91, 94, 107-108, 110-111

Guerre des farines, see France面粉之战

Guéry, Alain, 盖瑞82

Guha, Amalendu, 古哈 140, 153

Guibert-Sledziewski, E., 古尔伯—斯莱齐斯基45-46

Guilds, 行会 19, 24-25, 40, 51, 98

Guillerm, Alain, 吉伦82

Guinea (Coast) (Gulf of), 几内亚152, 165, 171

Gujarat, 古吉拉特140, 168

Gum, 树胶146, 148

Gupta, Selek Chandra, 古普塔158, 178-179, 183

Gurkhas, 廓尔喀族167

H

Habakkuk, H.J., 哈巴库克8-9, 31, 60, 67, 73, 86-87, 116

Habib, Irfan, 哈比卜140, 148, 157, 178

Hacienda, 地主253

Hacker, Louis M., 海克194, 198

Hailes, Damel, 海尔85, 87

Haiti, 海地38, 115-116, 140, 193, 227, 229, 240-244, 246, 249, 253-255

Haitian Revolution, 海地革命115, 143, 227, 240-241, 244

Hajnal, J., 哈伊纳尔11

Halifax, 哈利法克斯211

Halperín-Donghi Tulio, 图利220, 224, 250, 252, 254

Hamilton, Alexander, 汉密尔顿229

Hamilton, Earl J., 汉密尔顿7, 219

Hammett, Brian R., 哈密特212

Hammond, L.L., 哈蒙17

Hancock, W.K., 汉考克144

Handicrafts, 手工业者31

Hapsburg, House of, 哈布斯堡213, 226

Harborne, William, 哈彭174

Hardware, 金属制品88, 93

Hardwicke, 2nd Earl of, Philip Yorke, 哈德维克194

Hardy, Georges, 哈迪 148, 157

Hargreaves, James, 哈格里夫斯23

Haring, Clarence H., 哈林224

Harley, C.Knick, 哈利114

Harlow, Vincent T., 哈洛140, 167, 180, 182, 200, 203, 219, 231, 244-245

Harper, Lawrence A., 哈伯197, 210

Harris, Robert D., 哈里斯84

Hartmann, Peter Claus, 哈特曼20

Hartwell, R.M., 哈特韦尔4-5, 7, 31, 67, 70, 94, 113, 124

Harvests (bad, good), 收获57-58, 61, 67, 161, 206

crises d'Ancien Régime, 旧政体危机57, 59

Hastings, Warren, 哈斯廷斯180

Hausa, 豪萨169

Hauser, Henri, 豪泽29

Havana, 哈瓦那 210, 213, 216, 234, 243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赫斯特201

Heaton, Herbert, 希顿3, 31, 78

Heckscher, Eli F., 赫克谢尔91, 98

Helleiner, Karl F., 海连那60

Hemp, 汉普141-142

Henderson, Archibald, 汉德森29

Henderson, H.James, 汉德森231, 237

Henderson, W.O., 汉德森29, 87, 91, 122

Henry IV (of France), 亨利四世21, 101

Herr, Richard, 海尔219

Hess, Andrew C., 海斯135

Heston, Alan W., 希斯顿158

Heyd, Uriel, 希德135, 172, 175

Higonnet, Patrice, 伊格涅特44, 47-48, 94, 108, 110-111, 119

Hill, Christopher, 希尔66

Hirsch, Jean-Pierre, 赫希95, 101, 104

Hirschman, Albert, 赫希曼28

His de Butenval, Charles-Adrien, Conut, 布腾瓦尔88-90

Hiskett, Mervyn, 希斯凯特169

Hitchens, Keith, 希钦斯141

Hobsbawm, Eric J., 霍布斯鲍姆3-7, 27, 32, 36-38, 70, 84, 101-102, 112, 124

Hodgkin, Thomas, 霍金169

Hodgson, Marshall, 哈德森135, 175

Hoerder, Dirk, 霍德209

Hoffman, Ronald, 霍夫曼199

Hoffmann, Walther G., 霍夫曼24-25, 79

Hogendorn, Jan S., 霍根多恩143, 156

Holker, John, 霍克88, 92

Holland, see Netherlands 荷兰

Hopkins, A.G., 霍普金斯19, 41, 79, 93, 143, 156, 181

Horses, 马匹132

Horsman, Reginald, 霍斯曼251

Hoselitz, Bert F., 霍斯利兹20

Hossain, Hameeda, 霍赛159

Hourani, Albert, 胡拉尼173, 175

Hueckel, Glenn, 胡克尔113, 124

Hufton, Olwen, 哈夫顿 17, 62, 64, 66, 76, 104

Hughes, Jonathon R.T., 休斯4

Hugli, 胡格利138

Humboldt, Alexander von, 亨伯特221

Humphrey, H., 汉弗莱56

Humphreys, Robert Arthur, 汉弗莱214, 216, 222, 244, 249,
253

Hunecke, Volker, 胡内克48

Hungary, 匈牙利174

Hunger, 饥饿 103, 104, 120 158

Hunt, David, 亨特48, 105

Hunt, Lynn, 亨特52

Hurewitz, J.C., 霍洛维茨174-175

Husbandry, 农民14

alternate, 自主农民13

mixed (new) , 混合农民14, 17, 62, 77, 113

Hyde, Charles K., 海德26-27

Hygiene, 卫生学10, 60, 147

Hypothecation, 抵押139

I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118, 227, 239, 249

Ibo, 伊博189

Igbo, 伊格博156, 170

Illinois-Wabash Compamy, 伊利诺伊—瓦巴希公司232

Ilustración, 启蒙215, see also Enlightenment

Imlah, Albert H., 伊姆拉122, 124

Imports, 进口 see Trade, foreign

Inalcik, Halil, 伊纳西克154-155, 174, 176

Indentured labor, 契约劳工235

India 印度 (Indian subcontinent) , 8, 24-25, 71, 78-79, 85, 119, 129, 132, 135-141, 148, 150, 152 154, 157-158, 162, 167-168, 172, 176-180, 182-184, 187, 200, see also Mughal Em-pire

Permanent Settlement, 永久安置139, 158, 183

private traders, 私人贸易商167, 180, 183-185

south, 南印 139-140, 148, 158-159

Indian Ocean, 印度洋 122, 132, 135, 137, 172, 179, 200

Indiana Company, 印第安纳公司231-232

Indians, American, 印第安人 see Native Americans

Indigo, 靛青 139-140, 145, 148, 153-154, 159, 210, 248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45, 105

Industrialists, 工业家 8, 24, 37, 42, 73, 122, 126, 145, 162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6, 11, 14, 20, 27, 29-31, 114, 115, 125, 151, see also Deindustrializatio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Industries), 工业 3, 8, 26, 41, 62, 66-67, 69, 73, 77, 87, 89, 91, 94, 97, 100-101, 113-114, 118, 123, 141-142, 152, 177, 228, 247-248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6-9, 12, 16, 18-19, 24, 28-33, 45-46, 53, 59, 61, 67, 70, 78, 144-145, 181, 256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第一次工业革命 3-5, 17, 19, 22, 27, 29, 33-34, 62

putting-out, 产品管销制度 27-28, 69, 78, 115, 154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膨胀和收缩 see World-economy

Inikori, J.E., 英尼克里 145, 188

Innis, Harold A., 英尼斯 201, 203

Innovation, 发明 6, 13-14, 16, 22-23, 62, 68, 79, 88, 201

Insurance, 保险 144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73-74

Intendants, 行政长官42, 103, 215, see also Bureaucracy

Interest, 官僚利益63, 139

Interlopers, 无许可贸易see Trade, contra-b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90

Interstate system, 国际系统57, 99, 170-171, 173, 175, 184, 186-187, 189, 193, 195

diplomacy, 外交128, 174-176

hegemony, 霸权87, 94, 111-112, 116, 122, 176, 178, 194, 196, 200, 227, 233, 255

Inventions, 开发23, 25, 31, 33, 67, 88, 248

Investment, see Capital

Ionian Islands, 爱奥尼亚群岛122

Ippolito, Richard A., 伊波利托61

Iran, see Persia伊朗

Ireland, 爱尔兰 11, 14, 25, 68, 123, 182, 203, 230, 235, 237, 244-246

Act of 1720, 1720法案244

Irish Revolution, 爱尔兰革命244-246

northern (Ulster), 北爱244-246

Orange Society, 奥兰治社245-246

Parliament, 议会245-246

Patriots, 爱国者245

United Irishmen, 联合派爱尔兰人245-246

Iron, 铁16, 23, 25-28, 67, 78-79

Iron products (industry), 铁生产12, 27, 89-90, 112, 142, 151-152, 163

Islam, 伊斯兰123, 135, 158, 169, 173, 175, 179, 188

Holy Cities of, 伊斯兰的圣城173

Issawi, Charles, 伊萨维137, 141, 151, 155, 166, 175, 177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135, 170, 174-175, 233

Italy, 意大利28, 56, 118, 140, 154, 210

Ivory, 象牙137, 146

Ivory Coast, 科特迪瓦156

Izard, Miguel, 伊泽德223, 226, 249, 253

Izmir, 伊兹密尔141

J

Jacobins, 雅各宾党人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Jacquesroutains, 扎克卢派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Enragés

Jagirdars, 扎吉达尔 178

Ja Ja (of Opobo), 扎札 156

Jamaica, 牙买加 212-213, 219

James, Francis Goodwin, 詹姆斯 244

Jameson, J. Franklin, 詹姆森 209

Janina, 亚尼纳 173

J anissaries, see Ottoman Empire 近卫军

Japan, 日本 135, 175

Jaurès, Jean, 饶勒斯 34, 105, 109

Jeannin, Pierre, 詹宁 31

Jefferson, Thomas, 杰弗逊 235, 243, 248

Jelavich, Barbara, 耶拉维奇 173, 176

Jelavich, Charles, 耶拉维奇 173, 176

Jellison, Richard M., 杰利森199

Jennings, Francis, 詹宁斯202

Jensen, Merrill, 詹森 204, 209, 232, 239

Jeremy, .David J., 杰瑞米80, 229, 248

Jesuits, 耶稣会士226

Jews, 犹太人103, 175, 237

Joachim, Benoît, 约阿希姆244

João VI (of Portugal), 若奥六世249, 255

John, A.H., 约翰61, 113, 118

Johnson, Marion, 约翰逊 148, 152, 165

Jones, Alice Hanson, 琼斯196, 235

Jones, E.L., 琼斯15, 41-42, 60-61, 66

Jones, Gareth Stedman, 琼斯120-121

Jones, J.R., 琼斯71

Jones, M.A., 琼斯231

Jordan, Winthrop D., 乔丹242-243

Jouvenel, Bertrand de, 乔凡尼尔98, 118

K

Kahan, Arcadius, 卡汉 142, 160-161, 184

Kammen, Michael, 卡曼202

Kancal, Salgur, 坎考177

Kaplan, Lawrence, 卡普兰218

Kaplan, Steven L., 卡普兰75-76, 107

Kaplow, Jeffrey, 卡普洛38, 47

Karpat, Kemal, 卡帕141, 172-175, 177

Kasaba, Reçat, 卡萨巴172

Kaufmann, William W., 考夫曼250

Kay, John, 凯23

Kay, Marvin L.Michael, 凯199

Keep, John, 基普185

Kemp, Tom, 坎普29

Kentucky, 肯塔基232

Kerr, Wilfred Brenton, 凯尔210, 229

Kerridge, Eric T., 柯立芝3, 18, 62, 65

Kessinger, Tom G., 汤姆·基辛格139

Keyder, çağlar, 凯德尔28, 30, 77, 78, 13, 116, 123

Kiernan, Victor, 基尔南121

King, Cregory, 金17

Kissinger, Henry, 基辛格90

Kizevetter, M., 凯泽维特155, 160

Klein, A.Norman, 克莱因188

Klein, Herbert S., 克莱因165, 170

Klein, Martin A., 克莱因148

Klingaman, David, 克林格曼196

Knight, Franklin W., 奈特229, 244

Knollenberg, Bernhard, 诺伦伯格203-204, 207, 229

Kola nuts, 可拉果169

Kolm, Pierre, 科姆194

Kondratieff cycles, 康德拉基耶夫周期32, 73, 94, 112

Konetzke, Richard, 柯内次克221, 224

Kopytoff, Igor, 科皮托夫164

Koutaissoff, E., 高泰索夫151, 163

Köymen, Oya, 柯曼151, 177

Kranzbents, Melvin, 克伦本茨29

Kraus, Michael, 克劳斯245

Krause, John T., 克劳斯8, 11

Kriedte, Peter, 克里特31

Krooss, Herman E., 克鲁斯

Küaük-Kaynarca, 库克-凯纳贾 see Treaties

Kulikoff, Allan, 库里科夫200, 238

Kulsreshtha, S.S., 库尔斯瑞莎132

Kumar, Dharma, 库马尔160

Kumasi, 库马西170

Kurmua, Orhan, 库穆斯177

Kuwait, 科威特215

L

Labaree, Benjamin W., 拉巴利195, 205, 214

Labor force, 劳动力8, 12, 61, 77, 123, 131, 137, 158, 161,

Laborers, agricultural (landless), 劳工17, 61, 69, 74, 76, 96, 103, 120, 124, 155, 159

Laboueurs, 小耕地者74, 96, 106, see also Peasants

Labrador, 拉布拉多203, 206

Labrousse, C.-E., 拉布鲁斯57-58-59, 64, 66-67, 70, 73, 76, 88, 90-91, 93, 96, 112, 220

Lacerte, Robert K., 拉萨尔特244

Laccadive Islands, 拉克代夫群岛122

Lacy, Michael G., 蕾西234

Ladd, Doris M., 拉德253

Laissez faire, 放任政策19, 48, 80, 85

Lake, Gerard Lake, 1st Viscount (General), 吉拉德湖246

Lamartine, Alphonse de, 拉马丁 3

Lamb, D.P., 兰伯143

Lammey, David, 拉米245

Lampert, George G.de H., 兰伯特150

Lancashire, 兰开夏184

Lanctot, Gustave, 兰克托特206-208

Land tenure patterns, see Agriculture佃农制

Landes, David S., 兰德斯3-4, 6-8, 22-29, 32, 35-36, 43, 58, 70, 79, 88, 116, 123

Landlords, large, 大地主8, 14, 21, 40-42, 45, 48-49, 58-59, 62-65, 69, 75-77, 82, 88, 95-97, 103, 105-106, 113, 155, 159, 161, 166, 173, 185, 196, 198-199, 202, 207, 210, 223, 226, 240-241, 244, 253

Languedoc, 朗格多克66, 69, 77

La Plata, Riode, 拉普拉塔河217

La Plata, Viceroyalty of, see Argentina拉普拉塔

Laran, Michael, 拉伦161

Last, Murray, 拉斯特169

Latham, A.J.H., 莱瑟姆147, 149, 166

Latifundistas, 大地主see Landlords, large

Laurent, Robin, 洛兰133-134, 156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消除回归法62

Lawyers, 律师103

Lazonick, William, 拉索尼克17

Leather, 毛皮, 皮货151

Lecky, W.E.H., 莱基245-246

Le Donne, John P., 勒多尼162, 186

Lee, R.D., 李60

Lefebvre, Georges, 勒费弗尔17, 34-35, 37, 39, 49, 77, 81, 88, 91, 94-97, 99-101, 103-105, 119-120

Léger, Jacques, 李格243

Leghorn, 米亨210

LeGoff, T.J.A., 勒高夫97

Leibniz, Wilhelm Gottfried, 莱布尼兹184

Leleux, Fernand, 李勒118

Lenin, Vladimir I., 列宁111

Léon, Pierre, 里昂29, 57, 64, 67, 78, 79, 112, 122-123

Le Rond d'Alembert, Jean, 达朗贝尔ii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拉杜里10-11, 14, 40-42, 48, 60-64, 68-70, 74, 76, 78, 82, 84, 86, 94, 103, 123

Lesser Antilles, 小安的列斯群岛219

Letacconnoux, J., 列塔康努69

Leur, J.C.van, 勒尔132

Levant, 利凡特141, 175-176, 187

LeVeen, E.Phillip, 勒文143

Lévy-Leboyer, Maurice, 勒维勒勃尔79-80, 112, 114, 116-117, 122, 125

Lewin, Boleslão, 勒温222

Lewis, Bernard, 刘易士173

Lewis, Frank D., 刘易士247

Ley-farming, 牧草种植 see Husbandry, con-vertible

Leys, 牧草14

Liège, 列日125

Liévano Aguirre, Indalecio, 李维诺阿奎尔222-223, 225, 243, 253

Lille, 里尔78

Lillley, Samuel, 利利 25-27, 30

Lima, 利马221, 252

Lindert, Peter H., 林德124

Lingelbach, W.E., 林盖巴哈116

Lisbon, 里斯本239, 255

Liss, Peggy K., 里斯219, 252

Little, Anthony, 里托61

Litwack, Leon, 利特瓦克236

Livingston, Robert R., 利文斯顿209

Loango Coast, 卢安戈海岸136, 143

Locke, Robert R., 罗伯特·洛克79

Lockridge, Kenneth A., 洛克利奇196

Logan, Rayford W., 格根242-243

Loi Le Chapelier, 霞不列法令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Loi Ségur, see France塞居尔法令

Lokke, Carl Ludwig, 洛克229, 241, 243

Lombardi, John V., 隆巴底254

London, 伦敦84-85, 89, 139, 149, 167, 175, 182, 194, 203, 208-211, 236, 246, 250

Long Island, Battle of, 长岛战役218

Longworth, Philip, 朗沃斯161, 186

Lord Howe Island, 豪伊勋爵岛122

Lorraine, 洛林15

Lotharingia, 洛泰林吉亚125

Lotté, Sophie A., 洛泰108

Louis XIV (of France), 路易十四21, 42, 57-58

Louis XV (of France), 路易十五42, 58, 62

Louis XVI (of France), 路易十六21, 42, 58, 62, 81, 86-87, 101, 110, 218, 240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213, 219, 230, 234, 243

Lourmarin, 洛尔马林14

Lovejoy, Paul E., 洛夫乔伊156, 165, 170

Loy, Jane M., 洛依223

Lubin, Maurice A., 卢宾249

Lucas, Colin, 卢卡斯43

Ludden, David, 鲁登140

Luddism, see Great Britain 卢尔德主义

Lunar Society, 月光学会2

Lundhal, Mats, 伦达尔244

Luso-Africans, 葡萄牙—非洲人136, 215

Lüthy, Herbert, 吕提8, 57, 73, 83, 99, 116, 182

Luxury goods, see Trade, luxury奢侈品

Luz, Nicia Vitela, 鲁兹254

Lyashchenko, Peter I., 莱雅什琴科160, 162-163

Lynch, John, 林奇 214, 222-223, 225, 243-244, 249, 253-254,
256

Lynd, Staughton, 林德209

Lyon, 里昂107-108

M

McAlister, L.N., 麦卡利斯特221

McLelland, peter D., 麦克莱伦197

McLoy, Shelby T., 麦克劳伊23

McCoy, Drew R., 麦考伊234

McDowell, R.B., 麦克多威尔245

Macedonia, 马其顿尼亚154, 166

McEvedy, Colin, 麦克伊文狄32

McGowan, Bruce, 麦高文141, 154, 166

McGuire, Robert A., 麦克奎尔238

Machiavelli, Nicolo, 马基雅维利146

Machinery, 机械化26, 88, 90, 118, 131

Machinism, 机械主义4, 29

McKeown, Thomas, 麦基翁9-11

Mackrell, J.Q.C., 麦克莱尔48, 96

Macmillan, David S., 麦克米伦142, 186

McNeill, William, 麦克尼尔72, 113, 120, 123

McNickle, D'Arcy, 麦克尼可234

Macquarie Islands, 麦夸里群岛122

Madariaga, Salvador de, 马德里亚加218-219, 244

Madeleine, Iles de la, 马德连群岛206

Madras, 马德拉斯138, 140, 148, 158

Madrid, 马德里216

Magellan, Straits of, 麦哲伦海峡72

Maghreb, see Africa, North 马格里布

Mahan, Alfred T., Captain, 马汉117

Mahmud II (Ottoman Empire), 马赫穆德二世173-174, 176, 185

Main, Jackson Turner, 曼235

Maine (France), 曼恩106

Maine (United States), 缅因州210, 232

Maistre, Joseph de, Count, 梅斯特111

Maize, 梅兹154

Malabar, 马拉巴尔179

Malaya, 马来亚148

Maldiv Islands, 马尔代夫群岛122

Mali, 马里169

Malouines, see Falkland Islands 马尔维纳斯群岛

Malta, 马耳他122

Malthus, Thomas, 马瑟斯8, 61, 63

Malwa, 马尔瓦168

Manchester, 曼彻斯特26, 88, 90

Manchester, Alan U., 曼彻斯特160, 215, 254

Mande, 曼德165

Manfred, Alfred Z., 曼弗雷德46

Manila, 马尼拉213

Mann, Julia de lacy, 曼24, 78-79, 150

Manning, Patrick, 曼宁133, 143, 147, 156, 165

Manoeuvriers, see laborers, agricultural 熟练工

Mantoux, Paul, 芒图3, 5, 15, 19, 26-27, 29, 80, 90-91, 120-121, 141

Marat, Jean-Paul, 马拉特109

Marczewski, Jean, 马尔切夫斯基6-7, 29-30, 67, 79, 89, 114-115

Marie-Antoinette, 玛丽-安东奈特104

Marjoribanks, Charles, 马札里班克斯150

Market, 市场

home (domestic, internal, national), 国内市场6-7, 19, 66, 68, 70, 80, 97, 114, 137, 152

local, 当地市场66, 132, 138, 149

regional, 区域148, 170

world, 世界市场19, 27, 62-63, 68, 116, 153, 157, 218

Markov, Walter, 马尔科夫119

Markovitch, Timohir J., 马尔科维奇7, 24, 29, 31, 91, 112

Marriage, see Demography 婚姻

Marseilles, 马赛 141, 148

Marshall, Peter J., 马歇尔 135, 140, 167-168, 180-181, 201, 228

Martin, Phyllis M., 马丁 136, 143, 147, 165-166, 169

Martinique, 马提尼克岛 (岛) 71, 243

Marx, Karl, 马克思 3, 32, 36, 46, 50-51

Marxists, 马克思主义者 8, 17, 35, 46-48, 50-51, 108, 126

Maryland, 马里兰 199, 204, 231

Marzahl, Peter, 马尔萨尔 224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211, 231-232, 235-236, 238

Massie, Joseph, 梅西 17

Masson, Paul, 梅森 141

Masulipatnam, 马苏利帕特南 138

Mathias, Peter, 马赛厄斯 3-4, 17, 19-21, 23, 78, 83, 85

Mathiez, Albert, 马迪厄 34-35, 39, 101-102, 109

Mattingly, Garrett, 马丁利 186

Mauritius, 毛里求斯 122, 148, 183

Maxwell, Kenneth R., 麦克斯威尔215, 255

Mazauric, Claude, 马佐里克39, 97, 105

M'Bokolo, Elikia, 麦博科罗170

Mechanization, 机械化 4-5, 12, 22, 25, 28, 60, 92, 97, 123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56, 72, 122, 135, 170, 175, 230

Meillassoux, Claude, 美拉索164, 169-171

Meinig, D.W., 迈尼格195, 202, 233

Mendels, Franklin, 门德尔斯31

Mendoza, Cristóbal, 曼多萨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197, 203

Merchants, 商人8, 36, 38, 46, 71, 78, 83, 86, 107, 130, 132-133, 136, 138, 152-153, 155-157, 171, 173, 176, 180, 196, 198, 203, 207-209, 212-213, 215, 219, 224, 226, 228, 231, 234-235, 238, 242, 247

Mestizos, 梅斯蒂索221, 223, 250, 252-253

Metallurgy, 冶金术59, see also Iron products

Metcalf, George, 麦特卡夫152

Metcalf, G.E., 麦特卡夫147, 188

Métayage, see Sharecropping分成制

Methodism, 卫理公会派121-122

Meuvret, Jean, 穆夫里特16, 61, 74-75

Mexico, 墨西哥216-218, 221-222, 239, 243-244, 249-250, 253-254

Gulf of, 墨西哥湾230

Meyer, jean, 梅耶63, 71, 83-84, 96, 117, 143, 228

Miao, 苗族233

Michelet, Jules, 米什莱109

Michigan, Lake, 密西根湖230

Middle classes, see Class (es), middle中产阶级

Middle East, see Levant中东

Midi, 法国南部14

Migration, 迁移see Demography

Milan, Decreesof, 米兰公告 see Contine-ntal Blockade

Mill, John Stuart, 密尔3

Milward, Alan S., 米尔沃德9, 19, 22, 27, 29-30, 48, 68, 77-79, 96, 97, 113, 116

Minas Gerais, 米纳斯吉瑞斯254

Minchinton, Walter E., 明钦顿70

Mines and mining, 矿藏及采矿业79, 142

Ming dynasty, 明朝135

Mingay, G.E., 明盖13, 15-18, 61, 65, 121

Minorca, 米诺卡72, 210, 218-219

Miranda, Francisco de, 米兰达246, 249

Miîri, 边缘荒地see Agriculture, waste lands

Mississippi Valley (and River), 密西西比河谷230, 233

Mitchell, Harvey, 米切尔106

Mobile, 车233

Mode of production, see Production生产形式

Modernization, 现代化220

Mokyr, Joel, 莫凯尔7

Mohammed Ali (of Egypt), 穆罕默德阿里151, 172-173, 176-177, 185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141

Monarchy, 君主政体81-82, 86, 91-92, 95, 99, 104, 110,

120, 126, 133, 156, 202, 204, 207, 211, 218, 236, 248, 255

Monckton, Robert, General, 蒙克顿194

Moniot, Henri, 莫涅146

Monroe, James, 门罗254

Montesquieu, Charles Secondat

de, Baron dela Brède, 孟德斯鸠208

Montgolfier, Bernard de, 蒙哥费尔125

Montreal, 蒙特利尔203, 207-208

Moore, Barrington, 摩尔41, 45, 48-49, 101

Moosvi, Shireen, 莫斯维158

Morea, 莫里亚174

Morelos, José Maria, 莫雷洛斯250, 255

Morgan, Edmund S., 摩根238

Moroeco, 摩洛哥177

Morineau, Michel, 莫里诺8-9, 13-14, 18, 20-21, 57-58, 60, 62, 69-70, 73, 77, 79, 82, 84-87, 91, 112, 116

Morris, Morris David, 莫里斯149

Morris, Richard B., 莫里斯210, 235

Morton, 14th Earl of, James Douglas, 莫顿194

Moscow, 莫斯科246

Moslems, see Islam穆斯林

Mosquito Coast, 蚊子海岸217, 219

Mota, Carlos Guilherme, 莫塔254-255

Mouchon, P., ii蒙松

Mountain, the, 法国山岳党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Jacobins革命

Moura, José Joaquim穆拉Ferreira de, 穆拉255

Mouradega d'Ohsson, Ignatius, 莫拉吉亚128

Mourlot, F., 穆尔洛92

Mughal Empire, 莫卧儿帝国140, 148, 157-158, 169, 177-179, 187, see also India

Mui, Hoh-cheung, 穆伊 68, 168

Mui, Lorna H., 穆伊68, 168

Mukherjee, Nolmani, 穆克吉159

Mukherjee, Ramkrishna, 穆克吉182

Mulattoes, 黑白混血人221, 225, 241-244, 252, 254-255

Müller, Birgit, 穆勒156

Munger, Frank, 孟格16, 121

Muñoz Oraá, Carlos E., 穆诺斯226

Munro, J.Forbes, 孟罗146

Murphy, Orville T., 墨菲91

Murray, James, General, 穆瑞194

Murrin, John M., 穆林196

Musson, A.E., 穆森23, 114

N

Naff, Thomas, 内夫175

Nagasaki, 长崎135

Nairn, Tom, 内伦121

Namier, L.B., 纳米尔64, 194, 201-202

Nana (of Warri), 那那156

Nantes, 南特42, 72, 143

Revocation of Edict of, 南特敕令92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51, 56, 89, 96, 98-99, 110-111, 113, 115-119, 121-123, 140, 142, 149, 173, 176, 187, 219,

227, 243, 246, 248-251, 255

Nash, Gary B., 纳什 196, 200, 206, 230, 235

Natchez, 纳齐兹233

Native Americans (Indians), 美洲土著193, 201-203, 207-208, 216-217, 219-223, 225, 231, 233-234, 236, 250, 252-253, 255, see also Aztecs, Incas

National Assembly, 国民议会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Navarro Garcia, Luis, 纳瓦罗加西亚213-214, 216, 219, 239

Navigation acts, see Great Britain航海条例

Navv, 海军83, 117, 135, 143, 168, 179, 194, 201, 211, 229, 246

Neale, Walter C., 尼尔 124, 158

Neatby, Hilda, 尼特比207

Necker, Jacques, 内克尔81-82, 85-86

Nef, John U., 内夫26, 30, 32-3, 78-79, 112

Negroes, 黑人see Blacks

Nelson, William h., 尼尔森209, 237

Netherlands, 尼德兰5, 34, 59, 71, 77, 84-85, 87, 89, 99, 116-117, 122, 135, 137, 159, 179, 181, 200, 217, 227-228

Austrian, 奥属尼德兰see Belgium Revolt of the, 98

Nettels, Curtis P., 内特尔斯196, 228, 247-248, 251

Neumann, William, L., 纽曼141

Neutrality (on the seas), 中立71, 84, 247-249

New Economic History, 新经济史198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194, 202, 208-211, 233, 237-238, 242, 244, 251

New France, see Quebec新法兰西

New Granada, see Colombia新格拉纳达

New Jersey, 新泽西231, 236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234

New Smyrna, 新斯米尔纳210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尔士122

New Spain, see Mexico新西班牙

New World, see Americas新世界

New York, 纽约200, 232, 236

New Zealand, 新西兰122

Newbury, Colin W., 纽伯利146, 148-150, 156-157, 166, 169

Newcastle, Thomas Pelham-Holles, 1st Duke of, 纽卡斯尔公爵194

Newfoundland, 纽芬兰 71, 203, 210, 231

Newman, K., 纽曼141

Nicaragua, 尼加拉瓜217

Nicholls, David, 尼科尔斯243

Nicholas I (of Russia), 尼古拉斯一世152

Nicolas, Maurice, 尼古拉斯194

Niger Delta, 尼日尔河三角洲132, 137, 147, 152, 156-157, 166

Nightingale, Pamela, 奈廷格尔140, 149, 168, 180, 182, 184

Nixon, Richard M., 尼克松90

Noailles, Louis Marie de, Viscount, 诺埃里104

Nobility, see Aristocracy 贵族

Nolte, Hans-Heinrich, 诺特134, 136

“Norfolk system”, see Husbandry, alternate 诺福克制

Normandy, 诺曼底61, 88, 92, 106

Norregard, Georg, 诺尔加德156

North (northern states), see United States 北方州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see United States北美殖民地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199, 230-232, 237

North, Douglass C., 诺思132, 247-248

North, Frederick, Lord, 诺思84

Northrup, David, 诺思拉普132, 137, 143, 147-148, 152, 189

Novais, Fernando A., 诺维斯214-215, 254-255

Nova Scotia, 新斯科舍210-211, 218, 229-230

Great Awakening (New Light), 大觉醒211

O

Oberkampf, Christomphe Philippe, 欧伯坎夫78, 118

Obrajes, 欧布拉耶斯221-222

O'Brien, Patrick K., 奥布莱恩12, 15-16, 18, 20-21, 28, 30, 57, 61-62, 77-78, 113, 116, 121, 123-124

Obrok, see Russia实物货币制

Oder River, 奥德河 244

Ohio Company, 俄亥俄公司232

Ohio Valley, 俄亥俄谷202, 206-207

Ohsfeldt, Robert L., 奥斯费尔特238

Old Believers, 旧教信徒155, 186

Olive oil, 橄榄油148

Oloruntimehin, B.Olatunji, 奥罗朗提姆辛156, 169, 189

Open fields, see Agriculture 敞田

Opium, 鸦片 139-140, 153, 168

Opobo, 奥波博157

Orchards, 果园14

O'Reilly, Alejandro, General, 欧莱里234

Osler, Pierre, 欧斯勒86

Oswald, Richard, 奥斯瓦尔德230

Ott, Thomas O., 奥特241-242, 254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89, 128-129, 135-137, 140-141, 150-152, 154-155, 166, 169, 171-177, 184, 186-187, 248

Anglo-Turkish Commercial Convention, 英国-土耳其商约see Treaties
ayan, 贵族172-174

capitulations, 人头税 174-176

consul, 领事174-175

janissaries, 土耳其近卫军172-173

millet, 异教徒174-175

sekban, 雇佣172

timar, 提玛172

Tanzimat, 坦兹马特177

Tulip Age, 郁金香时代135

Oudh, 奥德181

Ouellet, Fernand, 欧列特207-208, 252

Owen, Roger, 欧文141, 153, 168

P

Pachoński, Jan, 帕琼斯基243

Pacific Ocean, 太平洋200, 251

Palestine, 巴勒斯坦141

Palmoil, 棕榈油146-149, 146, 169-170

Palmer, R.R., 帕尔默21, 39, 43, 112, 202, 238, 245

Palmerston, 3rd Viscount (Lord), Henry John Temple, 帕麦斯顿
177

Panama, Congress of (1824), 巴拿马条约243, 254

Panikkar, Kavalam Madhava, 潘尼迦135

Pantaleão, Olga, 潘塔里奥240

Paraguay, 巴拉圭217

Pares, Richard, 佩雷斯212

Paris (France), 巴黎11, 76, 85, 91, 106, 109, 121, 128, 174-175, 215, 218, 240-241, 245

Paris, Robert, 派里斯175

Parker, R.A.C., 帕克65

Parliament, see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议会

Pasturage, see Agriculture畜牧业

Patriots爱国者

American, 美国的see Whigs Irish, 爱尔兰人see Ireland

Patterson, R., 帕特森25

Paul I (of Russia), 保罗一世163, 186-187

Peanuts, 花生146-148, 156

Peasants, 农民5, 16, 21, 36-38, 48-49, 51-52, 58, 61, 65, 74, 76, 94, 96-97, 100, 102-104, 106, 113, 119, 142, 155-156, 158, 161-162, 166, 148, 185-186, 198-199, 206-208, 233, 238, 244, 247

Peasant revolution (rebellions), 农民革命 (反叛) 36-37, 48,

97, 102, 105-106, 169, 186

Pedro I (of Brazil), 佩德罗一世255

Peel, Robert, 皮尔90

Peking, 北京233

Peloponnesus, 伯罗奔尼撒166

Penang, 槟榔屿122

Peninsulars, 西班牙半岛人214, 221, 224-226, 250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231, 237

Pensacola, 潘撒科拉217, 233

Peonage, 劳役偿债制度253

Pepper, 胡椒148, 180

Pereira, Miriam Halpern, 伯伊拉215

Perkin, H.J., 珀金79, 101

Perkins, Bradford, 伯金斯242, 251

Perlin, Frank, 帕林136, 179

Pernambuco, 帕南布哥254

Perrot, Jean-Claude, 佩罗96

Persia, 波斯 149, 175, 177, 184

Peru, 秘鲁217-224, 229, 244, 252-254

Upper, 上秘鲁 217, 221, 253

Peter the Great (of Russia), 彼得大帝135, 160, 162, 184-185

Pétion, Alexandre, 佩蒂翁243-244

Peuchet, Jacques, 波舍特92

Peukert, Werner, 波伊克特133

Phelan, John Leddy, 费伦214, 222, 256

Philadelphia, 费城 93, 200, 207

Philip II (of Spain), 菲利普二世57

Philippi, Friedrich, 菲利普30

Philips, C.H., 菲利普斯180, 183

Physiocrats, 重农主义者63, 76, 77, 89, 99

Picard, Roger, 92皮卡尔

Piel, Jean, 皮尔221

Pietists, 虔信派教徒237

Pitt, William, the Elder, 皮特71-72, 82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皮特56, 87-90, 92, 98, 168, 182, 245-246

Plantations, 大规模农场130, 144-145, 147, 152-154, 156-157, 164, 167, 170, 196, 210, 230, 253

Planters, 地主see Landlords, large

Plassey, 普拉西85, 181

Plows, 犁12

Plumb, J.H., 普卢姆3, 8, 71-72, 83-84, 121

Poland, 波兰134, 186, 243

Polanyi, Karl, 波拉尼 120-121, 132-133, 188

Polk, William R., 波克151

Pollard, Sidney, 波拉德7, 118

Pombal, Marquis of, 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e Mello, 庞巴尔 214-214, 254

Poni, Carlo, 波尼28

Pontiac, Conspiracy of, 庞蒂亚克密约201

Poor (poverty), see Class (es), lower 贫者

Population, see Demography 人口

Portal, Roger, 波托尔 151, 162-163, 185, 186

Portugal, 葡萄牙89-90, 135, 137, 179, 193, 214-215, 217, 225, 239, 245, 249, 255

Council of Regency, 摄政会议255

Post, John D., 波斯特10

Postan, M.M., 波斯坦8

Potatoes, 马铃薯11, 13, 161

Pottery, 陶器88, 90, 151

Poulantzas, Nicos, 波兰查斯3, 37

Pownall, Thomas, 波纳尔249

Prado, Caio, Junior, 普拉多255

Prakash, Om, 普拉卡希179

Precapitalism, 前资本主义46

Presbyterians, 长老会信徒237, 245-246

Pressnell, L.S., 普瑞斯奈尔20

Price, Jacob M., 普莱斯73, 82, 197, 200

Price controls, 价格控制105, 109

Prideaux, F., 普利多154

Private traders, 私人贸易者see India

Production, 生产

mode of, 生产形式6, 40, 45-46

relations of, 生产关系5, 19, 27, 46, 64

Productivity, 生产力

agricultural, 农业生产力see Agriculture, yields

industrial, 工业生产力22, 80

total, 总生产力114

Profit, 利润 7-8, 23, 40-42, 52, 58-59, 60, 64, 66, 76, 79-80, 82, 91, 103, 121, 143-144-145, 153, 161, 165, 176, 196-197, 230, 248, see also Capitalism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5, 17, 47-48, 69, 96-100, 106-108, 119, 124, 125, 162, 164, 198

Proletariat, see also Class (es), 下层阶级lower

proletarian revolution, 无产阶级革命46

Proletarianization, 无产阶级化5, 11, 74

Precapitalism, 前资本主义19, 67, 72, 80, 86, 88, 90, 97-98, 117, 118, 122, 150-152, 186, 189, 249

Protestant ethic, 新教伦理42, 155

Protestants, 新教徒206, 208-209, 244, 245-246

Prothero, R.M., 普罗塞罗120

Protoindustrialization, 原始工业化31, 69, 78

Prucha, Francis Paul, 普鲁夏234

Prussia, 普鲁士74, 89, 99, 118, 154

“prussian path”, se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普鲁士道路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243

Pufendorf, Samuel, 普芬道夫213

Pugachev, Yemelyan Ivanovich, 普加乔夫163, 186, 221

Pugh, Wilma J., 波尤80, 86

Puritans, 清教徒see Protestants

Puryear, Vernon J., 普里尔141, 176-177

Pyrenees, see France, 比利牛斯山 south

Q

Quarles, Benjamin, 夸尔斯235

Quebec, 魁北克194, 202-203, 206-208, 210-211, 251

Quebec Act, 魁北克法案206-208

Quilliet, Bernard, 奎里特78, 82, 84

Quinney, Valerie, 奎尼146

R

Raeff, marc, 拉夫161-162, 184-185

Ragatz, Lowell J., 雷加茨202

Railroads, see Transport铁路

Ramsey, John Fraser, 拉姆齐72

Ransom, Roger L., 兰森197-198

Rasch, Aage, 拉什142

Rawley, James A., 罗利147

Rawlyk, George A., 罗利克211

Raychaudhuri, Tapan, 拉伊乔杜里132, 149, 153

Raynal, Guillaume, Abbé, 雷诺229

Rayneval, Gérard de, 雷恩瓦尔87-89

Razzell, P.E., 拉塞尔10

Rebérioux, Madeleine, 李贝里欧110

Record, R.G., 李科德10

Redich, Fritz, 雷地奇28

Regemorter, Jean-Louis Van, 雷格莫特142

Regulators, 调节器199, 232, 237

Reinhard, marcel, 莱茵哈德123

Reis, Arthur C zar Ferreira, 李斯214

Rent, 租金58, 61-65, 70, 76, 82, 101, 121, 158, 161

rentes perpetuelles, 终身年金84

rentes viag res, 世袭年金84

Rentiers, 租地者103

Resid, 雷西德Mustafa, 177

Resguardos, 印第安人部落223

Resnick, Daniel P., 雷斯尼克146

Revolution, 革命

Reynolds, Edward, 雷诺147

Rhode Island, 罗得岛235

Rice, 米158, 210, 248

Rich, E.E., 里奇202

Richard-Lenoir, 理查-雷诺阿 François, 法兰斯瓦118

Richards, Alan, 理查兹141

Richards, J.F., 理查兹153

Richards, W.A., 188

Richardson, David, 理查森145

Richardson, Thomas L., 理查森17

Richet, Denis, 李希特40, 43-48, 91, 108-109

Riley, James C., 莱里20, 76, 84-85

Rippy, J.Fred, 利比 231, 248, 250, 254

Roads, 道路see Transport

Roberts, J.M., 罗伯茨40, 84

Roberts, Richard, 罗伯茨23

Robertson, M.L., 罗伯逊228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罗伯逊254

Robespierre, Maximilien, 罗伯斯庇尔36, 38, 44, 47-48, 100,
108-111

Robin, Régine, 罗宾35, 45, 47, 81

Robinson, Cedric J., 罗宾逊144

Robinson, Donald L., 罗宾逊236

Robinson, Eric H., 罗宾逊114

Roche, Max, 罗赫101, 176

Rockingham, Charles 罗金汉 Watson-Went-worth, 2nd Marquess of, 212, 244,

Rodney, Walter, 罗德尼143, 146, 148, 152, 164-165

Rodríguez, Mario, 罗德里格斯217, 249

Roehl, Richard, 罗尔79

Rogers, James E.Thorold, 罗杰斯120

Roman-Dutch civillaw, 罗马—荷兰民法206

Romania, 罗马尼亚166, 174

Root, Hilton Lewis, 鲁特65, 96

Rose, J.Holland, 罗斯 92, 117

Rose, R.B., 罗斯104, 111, 119

Rostow, W.W., 罗斯托4-7, 67, 78

Rotation (three-course), see Agriculture 轮耕制

Rothenberg, Winifred B., 罗森堡198

Rothermund, Dietmar, 罗瑟蒙德154, 180

Rouen, 鲁昂72, 78, 88, 92, 145

Rousseau, Jean-Jaeques, 鲁索47, 99

Rout, Leslie, B., Jr., 鲁特253

Royal African Company, 皇家非洲公司166

Rudé, George, 吕德34, 36, 48, 101, 104, 107-108, 110

Rumelia, 鲁梅利亚137, 141, 154, 167, 172-174

Russell-Wood, A.J.R., 鲁瑟-伍德215

Russia, 俄罗斯 56, 89-90, 108, 129, 134, 136-137, 141-142, 151-152, 155, 160, 162, 167, 171-172, 174-176, 184-187

barshchina, 强制劳役155, 160-161

Cossacks, 哥萨克人186

nechernozem, 少黑土地带155

obrok, 实物货币155, 160-161, 163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34, 39, 43, 45, 49-50, 187

Russia Company, 俄罗斯公司142

Rustow, Dankwart A., 拉斯托135

Ruwet, Joscph, 鲁伊特13

Ruzzini, Carlo, 鲁西尼174

Rye, 裸麦113

Ryegrass, 牧草13

Ryerson, Stanley B., 莱尔森194, 203, 208

Ryotwari system (ryots), 佃农制度 (佃农) 158-159

S

Sachs, William A., 沙赫206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217

Saddlery, 马具151

Safavid Empire, 萨非帝国169

Sainfoin, 红豆草13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233

St.-Domingue, see Haiti 圣多明各

St. Helena, 圣赫勒拿122

Saint-Jacob, Pierre de, 圣雅各布76, 103

St. Lawrence River, 圣劳伦斯河218, 231

St. Lucia, 圣卢西亚122

Saint-Marc, 圣马克241

Saint-Martin, Francisque-Martin-Franaois

Grenier, 圣马丁192

St.Petersburg, 圣彼得堡142, 233

Saint-Simon, Claude Henri de Rouvray, Duke of, 圣西蒙5

St.Vincent, 圣文森特 72

Saintoyant, J., 圣托杨特241

Saints, Battle of the, 圣各诸岛战役227

Sala-Molins, Louis, 色拉莫林斯242

Salt, 盐160

Saltpetre, 硝酸肥料160

Salvucci, Richard J., 萨尔福西239

Samory Touré, 萨摩里169

Samuel, Raphael, 塞缪尔17, 28

Sandal trees, 白檀木180

Sans-culottes, 无套裤汉37, 47-49, 52, 100, 102, 105110, 119

Santa Fé de Bogotá, 波哥大的圣菲222-223, 243

Santo Domingo (Spanish), 243, see also Haiti圣多明各

Saratoga, 萨拉托加218

Saul, S.B., 索尔9, 19, 22, 27, 29-30, 48, 68, 78, 79, 96, 98, 113, 116

Savannah (zones), 大草原see Africa, West

Savelle, max, 塞维尔213, 217, 236, 244

Saville, John, 塞维尔5

Saxony, 萨克森154

Scheldt River, 斯米德河98

Schlebecker, John T., 施莱贝克199

Schlegel, Friedrich von, 施莱格尔116

Schlesinger, Arthur M., Sr., 施莱辛格198, 205, 209-210

Schlote, Werner, 许洛特116

Schmidt, Charles, 施密特91, 115

Schmitt, Eberhard, 施密特34, 39

Schmoller, Gustav von, 施默勒30

Schnapper, Bernard, 施耐普148, 189

Schofield, R.S., 斯科菲尔德10-11, 60

Schumpeter, Joseph, 熊彼得4, 32, 51, 67

Schutz, John A., 舒兹249

Science, 科学2, 23, 78

Scotch-Irish, 苏格兰—爱尔兰人235

Scotland, 苏格兰25, 97, 142, 199, 201, 203, 228, 235, 237

Sédillot, René, 西德洛特123

Sée, Henri, 塞伊29, 63, 65, 74, 91-92, 241

Séguir-Dupeyron, P.de, 西格-杜普伦88, 249

Seigniors, 领主see Landlords, large

Seigniorial reaction, 领主反动 see Aristo-cracy, aristocratic reaction

Selim III (Ottoman), 塞利姆三世151, 175, 176

Semmel, Bernard, 塞梅尔121

Senegal, 塞内加尔 72, 148, 169

Senegambia, 塞内冈比亚 77, 152

Serajuddin, A.M., 塞拉尤丁160

Serbia, 塞尔维亚173, 233

Serfs, 农奴51, 97, 101, 142, 155, 160, 162, 164, 186

Seton-Watson, Hugh, 塞顿-沃森185

Settlers (Colonists), 定居者 (殖民者) 193-195, 197, 199-200, 202, 205, 208-209, 211, 215, 219, 222-224, 227-229, 231-234, 236, 238, 240-242, 244-247, 250, 256, see also Creoles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see Wars

Seville, 塞维尔 213, 225, 250

Sewell, William H., Jr., 休维尔 52, 95, 106, 123, 126

Seychelles, 塞舌尔群岛 122

Shapiro, Gilbert, 夏皮罗 101

Sharecroppers, 佃农 16, 96, 105, 166

Shaw, A.G.L., 萧 175-176

Sheffield, Lord, 谢菲尔德 229

Shelburne, 1st Marquess of, 2nd Earl of, William Petty Fitzmaurice Lansdowne, 谢尔博尼 230

Shepherd, James F., 谢泼德人 196, 198-199, 205, 228-229

Sheridan, Richard B., 谢里丹 145, 199, 230, 244

Sherwig, John M., 谢尔维 117, 118

Ships, shipping, 船、航运 143, 148, 183, 196, 212, 229, 244, 247, 249

Shopkeepers, 店员 37-38, 107

Shy, John T., 夏伊237

Siberia, 西伯利亚186

Siddiqi, Asiya, 西迪基140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122

Siéyès, Emmanuel Joseph, Abbé, 西哀耶斯教士46

Silk, 丝139-141, 151, 153

Silva, Andréa Mansuy-Diniz, 席尔瓦215

Silver, 白银 136, 167-168, 172, 181, 183

Sind, 信德140

Singh, N.P., 辛160

Sinha, narendra Krishna, 辛哈139-140, 149-150, 158-159, 167-168, 181-182

Sirotkin, V.G., 西罗特金187

Skempton, A.W., 斯坎普顿69

Skiotis, Dennis, 斯奇欧蒂斯173

Skocpol, Theda, 斯考波尔49, 82, 103

Slavery, 奴隶 131-132, 144-146, 149, 159-160, 164, 166, 170, 188, 205, 221-223, 229, 234-236, 240-244, 253-254

abolition of, 奴隶解放143-144, 146, 156, 165, 168, 253-254

domestic, 奴隶支配164-165

slave raiding, 奴隶搜捕133, 143, 147, 164-165, 188

slave trade, 贩奴6, 42, 72, 134, 144-148, 152, 156, 162, 165, 168, 169, 187, 236

Slicher van Bath, 斯里舍·范·巴特B.H., 12-13, 62, 77, 90

Sloane, William M., 斯隆243

Smallpox, 天花202

Smelser, Neil, 斯梅尔瑟150

Smilianskaya, 斯米里安斯卡娅151

Smith, Adam, 史密斯51, 75

Smith, Joseph, 史密斯90

Smith, Paul H., 史密斯203

Smith, V.Kerry, 史密斯85

Soap, 肥皂148

Soboul, Albert, 索布尔34-40, 44-48, 50, 57, 82, 96, 98, 102, 104-108, 113-114, 116, 119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法国大革命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Socorro, 索可罗24, 214, 222-223

Soils, 土地13, 77, 158

Sokoto, Caliphate of, 索科托170

Sonenscher, michael, 松南斯舍107

Sorel, Albert, 索雷尔49

South (southern states), see United States南方

South America, see America, Hispanic南美洲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210, 230-231, 235, 237

Sovani, N.V., 索万尼139

Sovereign states, see Interstate system 主权国家

Spain, 西班牙50, 56, 71, 79, 89-90, 118, 193, 195, 210, 212-221, 223-230, 232-234, 239-240, 242-244, 246-255

Carlist wars, 查理战争225

Council of Regency, 摄政会议250

Napoleonic invasion of, 拿破伦入侵218, 227, 246

Spalding, Karen, 斯伯丁253

Sperar, Percival, 斯皮尔157-158, 179, 183

Speenhamland system, 斯平汉姆兰系统see Great Britain

Spices, 香料131

Sraffa, Piero, 斯拉法136

Stamp Act, see United States印花税条例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标准12-13, 124-125

State, 国家

role in economy, 经济的国家角色7, 18-20, 65, 72, 80, 82, 98-90

state finances, 国家财政72, 81-82, 84-90, 93, 99, 181-182, 249

state-machinery, 国家机制15, 65, 80, 92, 94, 129, 134, 214,
see also Burea-ucracy

Steamboat, 汽船 247

Stearns, Peter, 斯特恩斯122

Stein, Barbara H., 斯坦213, 239

Stein, Robert Louis, 斯坦79, 146

Stein, Stanley J., 斯坦213, 215-216, 239

Stevens, Wayne Edson, 斯蒂芬203, 208, 232

Stevenson, John, 斯蒂文森121

Stevenson, Robert F., 斯蒂文森189

Stoddard, T.Lothrop, 斯托达尔240-241

Stoianovich, Traian, 斯托亚诺维奇137, 141, 154, 166

Stover, John F., 斯多佛229

Sublime Porte, 土耳其政府see Ottoman Empire

Sučeska, Avdo, 苏切斯卡172

Suffrage, 投票45

Sufi orders, see Islam苏菲教教规

Sugar, 糖139, 143, 152, 154, 193-194, 202, 212, 230, 240-243, 253

Sugar, Peter F., 休格 154, 174

Sumner, B.H., 苏姆纳184

Sundström, Lars, 桑德斯特罗姆156

Supple, Barry, 萨普勒19

Surat, 苏拉特138, 140, 149

Suret-Canale, Jean, 苏雷卡纳尔169

Surplus-value, 剩余价值64, 82

Sutherland, Donald, 萨瑟兰97, 105

Sutton, Keith, 萨顿74

Sweden, 瑞典56, 60, 89, 128, 134, 142, 162, 184, 219

Switzerland, 瑞士56, 66, 125, 154, 208, 235

Syria, 叙利亚137, 141, 151, 166, 176

Szatmary, David P., 查特玛丽238

T

Take-off, 起飞5-6, 11, 14, 29, 31, 67, 101

Talleyrand (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Duke, 塔列朗公爵84

Tambo, David C., 汤博170

Tandeter, Enrique, 坦狄特220

Taney, Roger, 坦尼236

Tanguy de la Boissière, C.C., 布瓦西埃的唐居伊83, 86-87

Tarle, Eugene, 塔尔列151

Tarrade, Jean, 塔雷德91

Tatars, 鞑靼174

Tate, W.E., 塔特17

Tavares, Luis Henrique Dias, 塔瓦勒斯255

Taxation, 税制 20, 63, 74, 82, 85-88, 120, 150, 155, 161, 163, 166, 202-204, 219, 254, see also State finances

Taylor, Arthur J., 泰勒124

Taylor, George Rogers, 泰勒247

Taylor, George V., 泰勒37, 41, 79, 84

Tea茶叶131, 167, 214

Tea Act, see United States茶叶条例

Technology, 技术 2, 23-25, 27, 31, 42, 59-60, 62, 66, 80, 142-143, 152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技术革命30-31, 118, see also Innovations, Inventions

Temperley, Harold, 坦普利254

Tennessee, 田纳西232

Ternaux, Louis Guillaume, Baron, 特努克斯118

Terrier, Auguste, 泰里耶146

Terror,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大恐怖

Teutonic Knights, 条顿骑士团244

Texas, 德克萨斯251

Textiles, textile production, 织品 6-8, 27, 58-59, 132, 145, 151-152, 163, 2238

cotton, 棉 7, 24, 27, 68, 72, 77-80, 88, 90-91, 93, 113-116, 124-125, 141, 145, 149, 162, 167-168, 181, 219, 228, 252

linen, 亚麻布24-25, 88, 93, 114

silk, 丝28, 88, 107, 141, 150

wool, 羊毛25, 67, 88, 112, 114

Theremin, M., 塞里明98

Thermidor, 热月政变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Thiers, Adolphe, 梯也尔116

Third Estate, see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第三等级

Third International, 第三国际108

Thirteen Colonies, 十三殖民地 see United States

Thomas, Dorothy Swaine, 托马斯131

Thomas, Hugh, 托马斯244

Thomas, Robert Paul, 托马斯144-145, 156, 197-198

Thomas, William I., 托马斯131

Thomas, Malcolm I., 托马斯121

Thompson, Edward P., 汤普森80, 120-121, 126, 246

Three Bishoprics, 三个主教区15

Tibet, 西藏167,

Tilly, Charles, 蒂利3, 40, 69, 78, 91, 97, 101, 103, 105-106

Tilly, Louise A., 蒂利68

Tilly, Richard, 蒂利 3

Timmer, C.Peter, 蒂默13, 77

Tipu Sultan, 提普苏丹180

Tithes, 什一税63-64, 93, 95, 103-104, 206

Tobacco, 烟草148, 196, 204, 214, 228, 234

Tobago, 多巴哥122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37, 40, 43-44, 52, 94, 99, 108, 110-111

Todorov, Nikolai, 托多洛夫174

Tone, Wolfe, 托恩245

Tonnesson, Kare D., 滕尼森107-108, 119

Topolski, Jerzy, 托波尔斯基12

Tories, 托利党146, 201, 209-210, 231, 236-238

Torke, HansJ., 托克185

Toulousain, 图卢兹15

Toutain, J.-C., 图坦60, 62

Toussaint L'Ouverture, 勒佛图尔242-243

Townshend, Charles, 汤森245

Townshend, George, 汤森245

Toynbee, Arnold, 汤因比3-5

Trade, 贸易66-68, 101, 129-130, 132, 139, 170, 181, 196, 201, 247

colonial, 殖民地的6, 68, 70, 79, 132

commercial revolution, 商业革命91

contraband, 走私68, 87, 91, 118, 198, 212, 214, 219, 234, 240, 249, 252“country, ”乡村贸易135, 137

foreign, 外贸6, 61, 69-71, 73, 77, 79-80, 83, 86, 91, 93, 98, 115-116, 123-124, 138-139, 141-142, 146-147, 149, 152, 154, 197, 228-230, 234, 247-248

free, 自由贸易48, 88, 176-177, 181, 186, 213, 217, 225,

228, 234, 239, 247

legitimate, 合法的贸易143-144, 147, 156, 164

long-distance, 长程贸易132-133, 135

luxury, 奢侈品贸易131, 132, 135, 137, 143, 170

port of, 贸易港132-133, 135

triangular, 72, 140, 167-168, 三角贸易see also Slavery, slave trade

Trafalgar, Battle of, 特拉法加战役116

Trans-Appalachia, see United States, West跨阿巴拉契亚山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

“really revolutionary path” (English path), 实际革命道路36, 45-46“Prussian path”, 普鲁士道路36, 45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174

Transport, 转运8, 11, 25, 58-59, 66, 69, 76, 82, 156, 171

canals, 运河26, 79, 97, 247

railroads, 运输铁路22, 26

roads (land), 运输道路132, 147, 163

transport revolution, 运输革命69

waterways, 运输水路156

Tranter, N.L., 特兰特123

Travancore, 特拉文科180

Treaties (and accords), 贸易条约

Anglo-Russian Commercial Treaty (1766), 英俄商约186

Anglo-Turkish Commercial Convention (1838), 英国—土耳其商业会议条约151, 176-177

Amiens (1802), 亚眠条约98, 117

Anglo-Chinese (1842), 中英条约168

Belgrade (1739), 贝尔格莱德174

Eden (Anglo-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1786), 伊登条约27, 80, 87-93, 98-99, 106, 227, 240

Family Accord, 王室协议条约90

Franco-American Convention of 1787, 法美和约240

Ghent (1814), 根特251-252

Jay Treaty (1796), 杰伊条约231, 247

Karlowitz (1699), 卡洛维茨条约174

Küçük-Kaynarca (1774), 库楚克-凯尔纳贾条约135, 172, 175, 187

Paris (1763), 巴黎57, 69-72, 82, 193-195, 198, 200, 202, 212, 213, 226

Pyrenees, the (1659), 比利牛斯条约57

San Ildefonso (1778), 圣伊尔德芳索217, 249

Utrecht (1716), 乌得勒支条约68, 87

Versailles (1783), 凡尔赛和约 84, 219, 227, 230-231, 233, 245 (1783)

Vienna (1815), 维也纳条约146, 251-252

Trendley, Mary, 特伦德里242

Trinidad, 特立尼达岛122, 243

Tripathi, Dwijendra, 特里帕西140, 183-184

Tripoli, 的黎波里170

Tristan da Cunha,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122

Trouillot, Hénock, 特鲁伊洛特-加龙省244

Trouillot, Michel-Rolph, 特鲁伊洛特241

Trudel, Marcel, 特鲁戴尔207, 208, 218, 230-231

Tscherkassowa, A.S., 彻卡索瓦163

Tucker, G.S.L., 塔克9, 60

Trcker, G.S., 塔克70

Tudor, House of, 都铎王朝120, 200

Trlard, Jean, 图拉德96, 113, 119

Tulip Age, see Ottoman Empire郁金香时期

Tull, Jethro, 塔尔13, 23

Tungasua, 坦加苏亚222

Tūpac Amaru, 图帕克阿马鲁217, 219-223, 225, 246, 250

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突哥76, 81-82, 86, 107, 218

Turkey, 土耳其see Ottoman Empire

Turner, Frederick J., 透纳232

Turner, J.A., 透纳160

Turner, Michael A., 透纳62-63

Turnips, 萝卜13, 17

Two Sicilies, 两西西里89

U

Ubicini, M.A., 乌比契尼151

Ukraine, 乌克兰160

Umar, Al Hajj, 乌玛尔169

United Kingdom, 大英国协see Great Britain

U.S.S.R., 苏联see Russia

United Provinces, 联合省see Netherlands

United States (美利坚) 合众国 (of America), 25, 34, 68, 70, 81, 83-87, 90, 93, 112, 114, 136, 140-143, 145, 148, 150, 160, 176, 182, 193-198, 200-208, 210-214, 217-219, 221-223, 225, 227-240, 242-244, 246-248, 250-255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38-39, 52, 68, 79, 81-84, 140, 144, 151, 160, 176, 181, 187, 195-196, 198-202, 204-205, 209-212, 217, 219-220, 227-230, 232, 235-239, 245, 247-248, 251, 286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联邦条例234

Bacon's Rebellion, 培根的反叛238

civil War, 美国内战140-141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238-239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制宪会议236, 238

Continental Congress, 大陆会议 207-208, 218, 228, 232, 235

Currency Act, 现金法案198-199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208, 235

Declaratory Act, 独立法案203, 244

Embargo Act of 1808, 1808年禁运法令248

Intolerable Acts, 不合作法案207

north, 北美125, 231, 235, 237

northwest, 西北美202, 231, 235, 234

Northwest Ordinance of 1787, 西北1787年法令232, 236

Pacific Coast, 太平洋海洋251

Shay's Rebellion, 夏依的反叛238

south, 南美198, 210, 231, 236-237, 242, 247-248

Stamp Act, 邮票条例198, 203, 206, 212, 244-245

Tea Act, 204茶叶条例

Townshend duties, 汤生税203, 206

west (or frontier areas), 美西202-203, 206, 208, 230-231, 234

Urals, 乌拉尔151, 162-163, 186

Uruguay, see Banda Oriental 乌拉圭

Uzoigwe, G.N., 乌索格维165

V

Vaine pâture, see Agriculture, open fields公共牧场

Valcárcel, Carlos Daniel, 维卡塞尔220

Vandalia, 范达利亚232

Vandalia Company, 范达利亚公司232

Van Dantzig, Albert, 范丹齐156, 165

Van Tyne, Claude H., 范泰因218

Vázquez de Prada, Valentin, 凡兹奎斯213

Vendée, 105-106, 241, see also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counter-revolution”

Venezuela, 委内瑞拉 222-223, 226, 243, 249, 252-254

Venice, 威尼斯174

Veracruz, 维拉克鲁213

Vergennes, Charles Gravier de, Count, 韦尔热纳81, 87-88, 90, 176, 217-218, 230

Vermont, 佛蒙特210, 232-233, 236-237

Verna, Paul, 维尔纳243, 253

Verona, Congress of, 维若纳会议146

Versailles, 凡尔赛86

Treaty of, 凡尔赛条约see Treaties

Ver Steeg, Clarence L., 维史提格230

Verviers, 维维尔125

Vidotto, Vittorio, 维多托50

Vienna, 维也纳171, 175

Congress of, 维也纳会议see Treaties

Vignols, Léon, 维格诺思146, 194, 235

Vilar, Pierre, 维拉59

Viles, Perry, 维尔斯145

Villalobos R., Sergio, 维拉娄伯斯240

Vineyards, 葡萄园14, 64

Virginia, 弗吉尼亚199, 231, 236

Virginia Act, 弗吉尼亚法案204

Vistula River, 维斯图拉河244

Vivre noblement, 贵族生活42-43

Volga River, 沃尔加河160, 186

von Tunzelmann, G.N., 图塞尔曼114, 121

Vovelle, Michel, 沃维勒16, 41, 101

W

Wachtel, nathan, 瓦奇泰尔220

Waddell, D.A.G., 沃德尔252, 254

Wadsworth, Alfred P., 华兹华斯78-79

Wage-laborers, see Proletariat受薪劳工

Wages, 薪资7, 71, 119, 121, 123, 221 real wages (real income), 实际薪资61, 70, 124, 159

Waldman, Marilyn Robinson, 沃德曼169

Walker, James W.St.G., 沃克236

Wallachia, 瓦拉西亚141

Wallerstein, Immanuel, 沃勒斯坦7, 25, 59, 69, 78, 85, 98, 129, 136, 165, 172, 184, 201

Walpole, Robert, 1st Earl of Oxford, 沃尔波尔 195, 201, 204

Walton, Gary M., 沃尔顿196, 198-199, 205, 228-229

Ward, J.R., 沃德85

Warden, G.B., 沃登196

Wars (interstate) 战争

First World War, 一次世界大战94-95

French and Indian War, see Wars, Seven Year'War法国和印第安战争

Northern Wars, 北方战争162, 184

Opium War (1842), 鸦片战争168

Ottoman-Russian, War of1768-1774, 奥斯曼-俄罗斯战争135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2-1815), 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60, 85, 94, 113, 115, 123, 125, 138, 143, 149, 151-152, 173, 182-183, 227, 243, 247, 251

Second World War, 二次世界大战34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69-73, 78, 85, 179, 193, 195, 198, 201, 203, 205, 207, 213-214, 216, 245

War of 1812, 1812年战争232, 250-252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奥地利继承战争182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西班牙继承战争62

Washington, D.C., 华盛顿D.C.233

Waste lands, 荒地see Agriculture

Water-power, see Energy水力

Watson, Ian Bruce, 华森138, 179-181

Watson, Richard, Bishop of Landoff, 沃森27

Watt, James, 瓦特6, 23, 26

Watts, John, 瓦特194

Weaver, Emily P., 韦佛211

Wedgwood, Josiah, 韦奇伍德83

Weitzman, Martin L., 魏茨曼66

Wellesley (of Norragh), Richard Colby Wellesley, Marquess, 韦尔斯利181, 250

West Asia, see Levant西亚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British, 不列颠68, 71, 144, 147-148, 154, 194, 202, 210, 212, 229, 236, 238, 242, 247-248

Danish, 丹麦146

Dutch, 荷兰242

French, 法国86, 116, 143, 212, 218, 247

Spanish, 西班牙212, 218 see also Car-ibbean, Lesser Antilles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232

Western, J.R., 韦斯特恩112

Western Hemisphere, see Americas西半球

Western world, see Europe西方世界

Wheat, 小麦13, 57, 62, 113, 141-142, 161, 196

Whigs, 辉格党人120, 209, 236-237-238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辉格的历史解释34

Whitaker, Arthur P., 惠特克216, 232-234, 239, 243

White Russia, 白俄罗斯160

Whitehead, Donald, 怀特海6, 67

Whites, 白人 201, 221-222, 225, 229, 231, 233, 235-236, 240-244, 246, 252-253, 255

Whitson, Agnes M., 惠特森194

Whydah, 惠达133-134, 143

Wilkes, John, 威尔克斯204

Wilks, Ivor, 威尔克斯169

Wilkinson, John, 威尔森26

Williams, Eric, 威廉斯 144-146

Williams, Gwyn A., 威廉斯107

Williams, J.E., 威廉斯124

Williams, Judith Blow, 威廉斯212, 229-230, 234, 247

Williamson, Jeffrey G., 威廉森30, 124

Wilson, Charles, 威尔逊29

Wilson, Reuel K., 威尔逊243

Windward Islands, 向风群岛242

Wine, 酒88, 90, 93

Winnebagos, 温纳贝戈人233

Wood, 木材

fuel, 26-27, 燃料142

naval masts, 军舰桅杆83

Wood, Betty, 伍德235

Woodruff, Philip, 伍德鲁夫179

Wool, 羊毛24-5, 75, 140, 154

Wordie, J.R., 沃迪16

World-economy, capitalist (European) , 世界经济4, 11-12, 22, 25, 27-28, 33, 52, 57, 59, 62, 67, 70, 72, 78-79, 81-82, 94, 97, 99, 111-112, 124-125, 129-132, 136-140, 143, 146-148, 158, 161, 168, 171-172, 179, 182, 186, 188, 193, 200-201, 215-216, 220, 223, 239, 251

competition, 竞争4, 25, 67, 72, 86-87, 90-92, 98, 112, 132, 140, 143-145, 150, 156, 160, 168, 177, 200, 230, 248, 251, 253

core, 中心59-60, 62, 138, 200

demand, 要求6, 26, 59-60, 62, 67, 69, 113, 140, 143, 170, 178, 235

division of labor, 劳动分工131, 137-138, 140, 143, 170

economic freedom, 经济自由4-5, 36, 45, 65, 105, 213

economic growth, 经济成长4, 6, 17, 29-31, 57, 59-60, 67, 79, 87, 89, 98, 113-115, 129, 134, 139, 196, 200, 224, 239, 247

incorporation into, 合并入世界经济127-189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膨胀和收缩146, 169, 172, 199, 219, 230

periphery, 边缘 12, 28, 125, 129-130, 134, 138, 165, 187, 189

prices, 价格57, 61-64, 66, 69, 71, 88, 91-92, 113, 124, 132, 136, 143, 145, 147, 153, 155, 161, 172, 197-198, 200, 206, 220

semiperiphery, 半边缘86, 89, 92, 142, 184, 189

supply, 剩余7, 62, 69, 140, 146, 153, 235

Worsley, 沃斯里26

Wright, H.R.C., 赖特183

Wright, J.Leitch, Jr., 赖特232

Wright, Joseph, of Derby, 赖特（德比的）2

Wrigley, E.A., 里格利5, 10-11, 26, 60, 61

Wyczański, Andrzej, 维赞斯基12

Y

Yams, 山芋170

Yaney, George L., 亚尼160, 162, 185-186

Yelling, J.A., 耶林15-16, 66

Yeomen, 约曼 74, see also Peasants

Yields, 生产物see Agriculture

Yoder, John C., 约德134

Yorktown, 约克敦227

Yorubaland, 约鲁巴兰 156, 170

Young, Arthur, 杨229

Z

Zacker, Jacques, 察克尔107

Zamindari system, zamindars, 地主制度, 地主158-159

Zapperi, Roberto, 札波里 46-47, 104

Zilversmit, Arthur, 齐佛斯米特235-236

Zuccarelli, Francois, 祖卡雷里189

Zurich, 苏黎世78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书目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 35.00元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饥饿与公共行为》 35.00元

阿玛蒂亚·森

《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 48.00元

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

《生活质量》 68.00元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59.00元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第二版） 59.00元

曼纽尔·卡斯特

《千年终结》 45.00元

孙伟平 选编

《罗蒂文选》 53.00元

涂纪亮 编

《皮尔斯文选》 49.00元

涂纪亮 编

《杜威文选》 49.00元

万俊人 陈亚军 编

《詹姆斯文选》 59.00元

李国山 编

《刘易斯文选》 45.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 49.00元

费尔南·布罗代尔

《地中海考古》 49.00元

山口重克

《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 35.00元

莱斯特·M.萨拉蒙等

-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59.00元
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
- 《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 49.00元
詹姆斯·M.布坎南/罗杰·D.康格尔顿
- 《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 39.00元
詹姆斯·S.科尔曼
-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 125.00元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
- 《发展经济学》（第三版） 59.00元
理安·艾斯勒
- 《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 39.00元
理安·艾斯勒
-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49.00元
理安·艾斯勒
- 《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
68.00元
安东尼·吉登斯
-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39.00元

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29.00元

涂纪亮 编

《莫里斯文选》 58.00元

杜丽燕 余灵灵 编

《布里奇曼文选》 49.00元

李真 编

《普特南文选》 69.00元

丁东红 编

《米德文选》 68.00元

约翰·H.杰克逊

《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 59.00

元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哲学家》 98.00元

H.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35.00元

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

《社会学之思》（第二版） 29.00元

汤姆·R.伯恩斯等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 59.00元

尤尔根·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 49.00元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
45.00元

克里斯托弗·戴尔

《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
49.00元

吉尔贝·李斯特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59.00元

佩里·安德森

《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59.00元

尤尔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59.00元

何伟亚

元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69.00

唐纳德·萨松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下册） 189.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98.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98.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98.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 9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美）沃勒斯坦（Wallerstein， I.）著；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97-4929-6

I.①现... II.①沃... ②郭... III.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
IV.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068号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1730～1840年代

著者/（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者/郭方 夏继果 顾宁

校者/郭方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赵怀英 段其刚

（010）59367004 责任校对/陈晓永 高利娟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岳阳

项目统筹/祝得彬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本卷印张/29.25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本卷字数/453千字

印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9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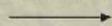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1282号

定价/489.00元（四卷本）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值20周年社庆之际，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其二是问题意识；其三是开放意识。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的基本理念。



《现代世界体系》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颇具影响力的多卷本著作，对全球史进行了重新阐释，将现代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确定为从16世纪到20世纪。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介绍了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分别论述了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第三轮中心国家争霸、南北美洲的独立运动和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西部非洲这几个被并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地区的边缘化和半边缘化。

“沃勒斯坦的研究是那种非常罕见的能够改变学术现状的研究。不参照沃勒斯坦提出的框架，就不可能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做出综合性的探讨，这无疑是他最伟大的成就所在。”

——威廉·罗斯贝里 (William Roseberry)

“从第一页起，我们就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和坚持不懈的研究者所吸引。沃勒斯坦既重视微观细节、又重视宏观综合。他对国际间的相互联系有着敏锐的把握（他在我们的时代对此有着领先性的认识）。……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本位主义相比，沃勒斯坦宽广的视野令人惊叹。”

——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

“这是一部延续伟人历史传统的著作。……许多读者会发现这是一部引发争议的和没有定论的著作。但正是因为它引发争议和没有定论，所以对经济史学的研究实践才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威廉·德瑞提 (William Darity)



ISBN 978-7-5097-4807-7

定价：98.00元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吴英 / 译
庞卓恒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四卷)

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
1789 ~ 191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 -1914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杰出教授，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等数十项学术职务。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和《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吴英 / 译
庞卓恒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四卷)

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

1789 ~ 191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 -1914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V

Centrist Libri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2011 © Immanuel Wallerste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沛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朱云汉 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汝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汪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春声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罗志田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

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生于纽约。1954年和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58~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1976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1976年起，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1993~1995年任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1994~1998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2000年起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沃勒斯坦著述颇丰，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30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2011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4卷本。其他著作有：《历史

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 1983）；《世界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1984）；《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9）；《知识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2004）等。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004）；《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2006）。



卷首插图“潘克赫斯特夫人被捕”

由安德伍德图片公司拍摄

（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图片与摄影部）

由安德伍德图片公司拍摄，“潘克赫斯特夫人被捕”。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一位领袖。尽管在当时由于采取激进策略，她受到过多的批评，但在今天，她被赞扬在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上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张照片拍摄于1914年6月2日，当时潘克赫斯特正在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途中。它发表于《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

- [序言 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的几点说明](#)
-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庸的自由主义](#)
- [第二章 建构自由主义国家：1815~1830年](#)
- [第三章 自由主义国家与阶级冲突：1830~1875年](#)
- [第四章 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
- [第五章 作为社会科学的自由主义](#)
- [第六章 对论点的重申](#)
- [参考文献](#)
- [索引](#)
- [译者的话](#)

序言 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的几点说明



序言插图“乡村政客”

大卫·威尔基/亚伯拉罕·莱姆巴赫（David Wilkie/Abraham Raimbach）

（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图片与摄影部）

大卫·威尔基/亚伯拉罕·莱姆巴赫（David Wilkie/Abraham Raim-

bach），“乡村政客”。这幅由苏格兰画派画家大卫·威尔基创作的油画在1806年于伦敦举行的皇家学院的展览中引起轰动，使他名声大噪。稍后，威尔基同莱姆巴赫合作将他的画作制作成版画以便更广泛地传播。它是第一幅这样制作的版画，制作于1813年。这幅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生动说明了政治讨论是如何在当地老百姓中进行的，而不再局限于上层阶级。

本书是一部多卷本著作的第四卷，它的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整部书是分卷对现代世界体系历史的和结构的发展做出分析。在内容设计上，每一卷都既独立成册，同时又作为这个大部头著作的组成部分。这样就给作者和读者都带来一些麻烦。我想说明我是如何应对这些麻烦的，这样做也许会对读者有益，特别是其中一些麻烦在开始时我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我的意图和方法。

每一卷，以及每一卷的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由此确立一种观点。整部书既是历史性的/历时性的，同时又是结构性的/分析性的/理论性的。这与我的认识论预设是一致的，即在认识论上过于夸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区分是过时的、错误的，不利于做出合理的分析。社会现实必然既是历史性的（在现实每时每刻都必然发生变化的意义上），又是结构性的（在社会行为受到各种制约因素支配的意义上，这些制约因素是源于所描述的行为在其中发生的历史性的社会体系）。

不过，当你试图描述一个长时段和大空间范围的现象时〔例如，现代世界体系开始于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年），它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明天〕，你就会遇到一个基本的困难，那就是你不可能同时描述每件事情。因此，我决定大致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只有当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首次出现或以显著方式表现出来时，我才予以介绍。所以，在主要用于讨论延长的16世纪的那卷书中去讨论只是在19世纪才变

得显著的结构问题，对我而言似乎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的，在主要用于讨论19世纪的那卷书中去讨论在第一卷书中已经讨论过的，并在其间几个世纪其主要特征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结构问题，似乎也是无益的。不过，既然我对诸如“工业化”等现象首次出现时间的认识不同于许多其他分析者的观点，故而读者可能在他们预期的章节中找不到对该问题的讨论。我将尽力说明我进行这种选择的逻辑。

首先，我想说明我是如何进行分期的。当我写作第一卷时，我在序言中指出，我将把整部著作分成四个时期，并且给出了每个时期的具体年代。第一卷覆盖延长的16世纪，即从1450年到1640年这段时间。不过，当开始写作第二卷时，我马上发现我希望讲述的这段历史并不是从1640年开始，而是从大约1600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大约1750年。我把这些年代列在副标题中。现在，我已经有意地接受各卷之间有很长一段重复时期的做法，这种做法延续到了第三和第四卷。当然，这意味着我不可能在仅仅四卷书中就能讲述到现在，像我在1974年写作第一卷时所设想的那样。

时间重叠的做法被证明对我的许多分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时间上的划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只能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来论证其合理性。荷兰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霸权的历史（第二卷第二章）可以认为开始于1600年（或甚至更早），但可以肯定并未在1640年结束，它确实不应作为延长的16世纪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被放在第二卷，该卷是专门记叙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在17世纪的进一步巩固。

进一步讲，这提出了人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引入结构性概念的问题。至少我认为，在16世纪并不存在霸权强国。因此，在第一卷就引入霸权概念是不合时宜的。荷兰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第一个霸权强国。同样真实的是，荷兰并非最后一个霸权强国。但我们不会在英国承担霸权角色的背景下讨论霸权概念，也不会在美国承担霸权角色的背景下讨论霸权

概念。概念本身一旦被讨论过，就被视为当然的，在需要使用它时就不会再去考察它的逻辑内涵。这样就发生了理论上的争论。

每一章年代的起始也是遵从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只要它所涉及的时间段大体在本卷书年代的断限范围之内。从第三卷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好例子。尽管该卷书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但其中的第三章却延伸到1850年（根据这一章的题目），而实际上超出的更多些。到第四章“美洲的非殖民化历程”却又是从1763年到1833年。

因为我无法推定本卷书的读者都读过前三卷书，所以我相信概述一下此前我已经讲述过的历史/理论内容是有益的。如果本卷书的读者感到我未能讨论一些他们认为应该讨论的内容，那么他们也许会发现我以前已对这些内容做过详尽的讨论。例如，绝大多数研究19世纪的书都将会讨论——确实会详尽地讨论——所谓的工业革命。对此，我已经在第三卷第一章中做过讨论，在第四卷中再重复论述就没有意义了，尤其是在我希望就19世纪讲述一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时就更是如此。

那就让我首先总结一下这部多卷本著作的每一卷的总体论点。第一卷书覆盖延长的16世纪，讲述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创立的历史。第二卷讲述从1600年到1750年时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巩固而不是分化割据的历史；它试图解释世界经济不同区域的资本家是如何对总体的缓慢增长现象做出反应的。第三卷覆盖从173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讲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经济上和在地理上——重新扩张的历史。第四卷我设想是覆盖从1789年到1873/1914年这段时期，专门用于探讨一种适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它只是在这个稍晚的时间点上最终形成的），该地缘文化大体是以我所称的中庸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塑造的，并由它所支配。

我已经指出过，在不同章节中我提出了具有连续性的理论观点。在

第一卷，第一章探讨了现代世界体系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中世纪开始萌生。后来我认为这一章对该论题的探讨是不充分的，为此，我在发表于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对该论点进行了更详尽的阐发。^[1]第一卷的重要章节是第二章，在这一章我提出了“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axial division of labor）概念。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导致世界经济中不同区域的形成——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 [其中最后一个概念是我在中心区/边缘区的区分之外增加的，它是由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出的]。我并说明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就是现代世界体系所采取的形式。这种资本主义最初是在农业区出现的，在世界经济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劳动控制模式。

（第一卷）第三章分析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的形成，以及16世纪绝对君主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第四章详细阐述世界经济和世界帝国之间的区别，以及查理五世创建世界帝国的尝试为什么会失败。第五章考察了新生的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并分析那里为什么会形成强政府结构，以及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六章考察边缘区，分析了它们的政府结构为什么是弱的。该章还进一步阐明世界经济的边缘区和外部竞争场之间的区分，后者则是指那些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间劳动分工之外的地区。

在第一卷我设定了整部著作的基本观点，并以理论反思作为本卷的结尾。理论反思一章总结了本卷书其余部分描述的具体历史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进行了理论概括。在延长的16世纪（确实也适用于此后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质上是由西欧和美洲的部分地区构成——只是作为全球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而全球的其他部分，到那时为止并不是这种历史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也不服从它的规则和约束。

如果第一卷的观点与流行的观点相抵牾，后者认为在18世纪晚期之

前并不存在我们能够称之为“现代的”或“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么，本卷书还将同持下述观点的那些人进行论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确实从16世纪开始，但在17世纪遭遇了一种大的逆转。有大量文献都论及“17世纪的危机”。我是在第二卷的序言和第一章中回应这种观点的。我要论证的是，所谓的危机根本不是一种逆转，而是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一个正常的B阶段（或下降阶段），它将推进而不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如上文提到的，（第二卷）第二章考察了荷兰的霸权，以及对一个国家为什么和如何成为——暂时性的——霸权国家做出解释的诸种模式。第三章探讨了当一个霸权国家开始衰落时所发生的情况。该章还从经验上考察了英国和法国力争成为后继霸权国家的努力。第四章探讨了各边缘区是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B阶段的，以及它们由融入世界体系向封闭自身的转变为什么不是反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以生存为目的的。第五章首次认真探讨了半边缘区的特征、半边缘区在现代世界体系运转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那些正在“崛起”的地区和那些正在“衰落”的地区之间的区别。第六章考察了在荷兰不再担当重要政治角色之后的时期，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持续对抗。该章叙述了英国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并说明这种优势的获得为什么不是更先进的经济结构（通常的论点），而是英国政府——由于诸方面的原因——比法国政府更强（与通常的论点相左）的结果。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被公认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经济和地理上实现扩张的时期，其标志性成就通常被归于所谓的“工业革命”——通常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它被假定是在英格兰发生的。就理论分析而言，我认为，这种观点由于两方面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一方面的理由在于，不同国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单独的“工业革命”。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现象的话，它也必然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理由在于，尽管这个时期所发生的现象确实表现出在机械化和世界生产产出价值方面的大幅上扬，但相比此前和此

后的几次上扬，它并不更为重要。这就是第三卷第一章所试图证明的。

（第三卷）第二章考察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著述目前分成社会（或传统）解释的拥护者和自由主义（或修正主义）解释的拥护者两大派，前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在20世纪的最后1/3时期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集中关注据说是法国国内的现象，关注在法国政府和经济结构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该章的论点在于，法国大革命是英法争夺霸权斗争——当然是英国最终取得胜利——最后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这种斗争的一个结果；作为革命的结果，法国发生的内部变化并不比通常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性。

英法这种争霸斗争的一个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次大的地理扩张，其中四个大的地区被纳入到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中来，即俄国、奥斯曼帝国、印度次大陆和西非。主要的争论是关于当一个地区被作为边缘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这个地区会发生什么变化。上述四个地区在被纳入世界经济之前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结构特征，但被纳入世界经济后，所发生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似乎使这四个地区都拥有大致相似的结构特征。

最后，（第三卷）第四章首次考察了形式上的非殖民化概念——它为什么会发生和它为什么会同一个新霸权国家的出现相联系。但我同时也论证了美洲的非殖民化是一次“殖民者”的非殖民化，而不是土著民族重新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其中的一个例外是海地，我试图阐明海地为什么和如何成为例外的，同时说明正是因为它不是由殖民者实现的非殖民化，所以它的经济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我撰写第四卷书，即意在讲述“延长”的19世纪的历史时，我面临两个问题。当我们按年代顺序推进时，世界体系的地理范围在拓宽，这也增加了要研究资料的数量。而且学术文献的数量——即使是有关一个

单一国家的——至少是按算术级数、甚至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这就造成没有充分时间阅读资料 and 进行更全面综合的实际困难。也许这是我花了如此长时间才写作出第四卷的理由吧，尽管它缺乏说服力。（其他理由是，我更多从事了许多其他的学术研究，它们占去了我很多本可以用来写作第四卷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这卷书的中心议题。从前面所做的分析看，中心议题不可能是工业革命——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因为我相信这些已经在较早时期发生了。它也不可能是伟大的民主革命——不管是法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因为我认为两种类型的革命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将中心议题确定为，法国大革命对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产生的文化影响。我将这种影响视为一种适用于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这种地缘文化是一揽子思想、价值观和规范，它被整个体系广泛接受，并由此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

正如读者将会看到的，我认为，法国大革命赋予政治变革是正常状态的观念以合法性，同时也赋予主权在民，而不是主权在君的思想以合法性。这两种信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种影响是作为对这些新近普遍流传的观念的反映，三种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形成。整卷书的论点是，在这个世纪，中庸的自由主义能够“驯服”其他两种意识形态，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它接着采取的形式是赋予创建自由主义国家以优先地位，首先是在那个时代两个最强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创建。它进一步采取的形式是刺激主要类型的反体系运动（这个新的概念将在此予以厘清）的形成，并限制它们的影响。这里，我考察了公民概念所允许实现的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幻象。最后，它采取的形式是鼓励历史社会的形成，同时也对它们做出某些限制。整段历史是从1789年到1914年，或许说是从1789年到1873/1914年更准确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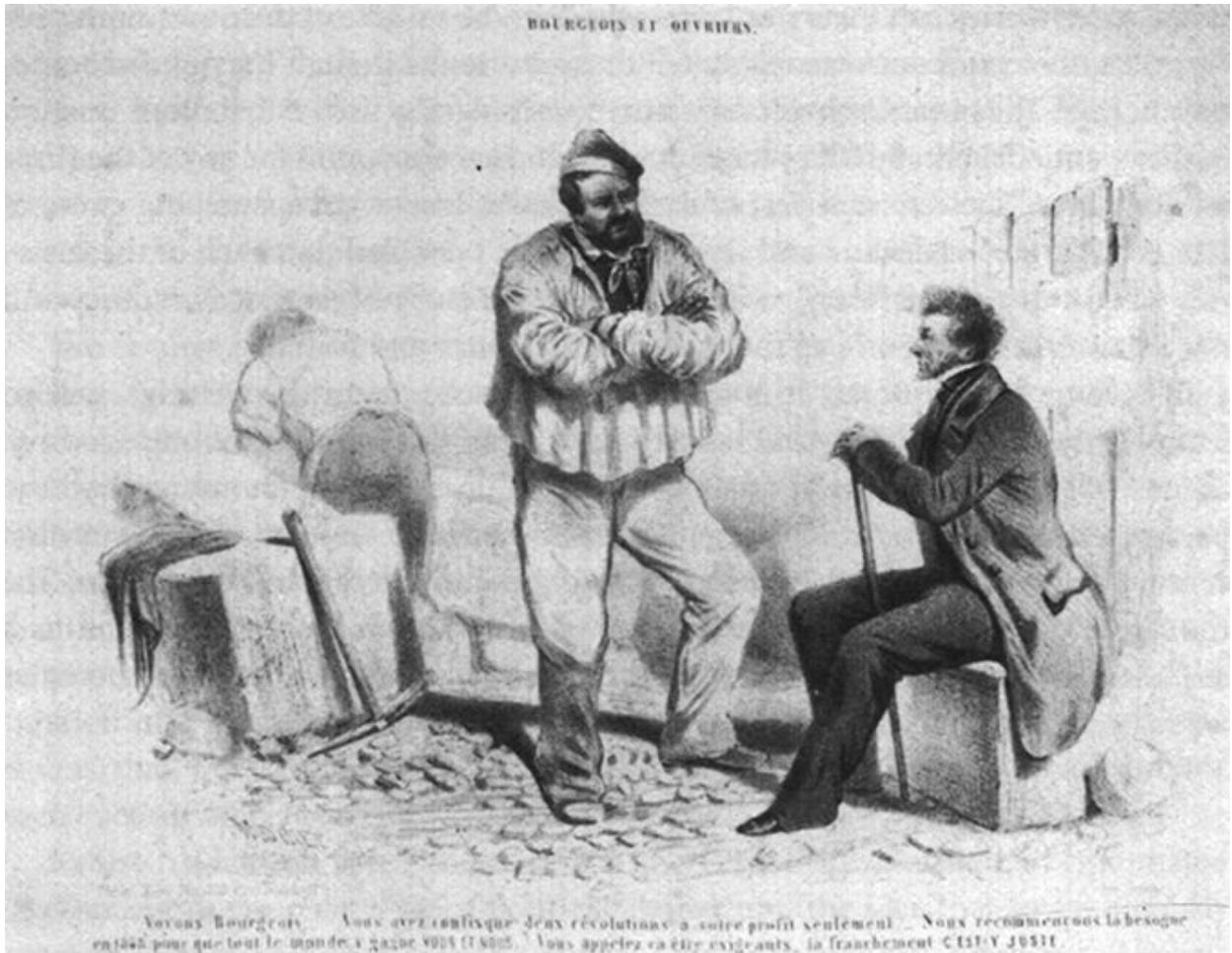
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以上述内容为重点意味着我原打算在这卷书中讲述的三段历史应该延后到第五卷来写。它们是瓜分非洲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了能够继英国之后成为霸权国家，美国和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美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东亚被纳入世界体系，它的边缘化，以及它在20世纪晚期的复兴。

所有这三段历史都始于19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但人们不可能讲述这些历史，仿佛它们能在1914年结束似的，这是不合理的。19世纪的历史不可分割地与它在20世纪的延续联系在一起。1914年并不是这三段历史中任何一段的转折点。每段历史的实质部分都位于一个上升和下降或下降和上升的长波之中。总之，我确定这三段历史中的每一段都是“延长”的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的历史是美国世纪，而不是英国世纪的历史。因此，我恳请读者能够宽容和保持耐心。

如果就如我现在筹划的那样（但这也许会在写作过程中发生变化），第五卷将讲述从1873年到1968/1989年的历史，那就肯定会有第六卷——如果我能活到那时的话。它的主题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危机，它的年代断限将从1945/1968年到21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例如2050年。我感觉，到那时我们将处于一种全新的情势中。现代世界体系将见证它自身最终的结束，让位于一个或多个迄今尚不为人知、也是不可能知的后继体系。其特征我们迄今还不可能予以勾勒。

[1] 《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评论》第4卷第15期（1992年秋），第561～619页；被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和格利高里·卜鲁（Gregory Blue）编辑的《中国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中国学的知识谱系》收录，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6页。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庸的自由主义



第一章插图“资产阶级和工人”

维克托·德莱弗（Vicesr Delaive）

（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

维克托·德莱弗（Victor Delaive），“资产阶级和工人”。这幅漫画发

表于1848年5月法国发生社会革命期间。工人告诉资产阶级，他们窃取了前两次革命（1789年和1830年）的果实，这次“我们工人要求获得我们应得的那一份。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

整个19世纪都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阴影之下

——乔治·沃特森（George Watson, 1973, 45）

1815年，对英国、法国和世界体系而言，新的最重要的政治现实是依据时代精神，政治变革已成为正常现象。“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议会改革已成为一种学说，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White, 1973, 73）。进一步而言，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头脑中，主权所在已经从君主或甚至立法机构转到更难以捉摸地存在于“人民”身上（Billington, 1980, 160-166；也见57-71）。这些，无疑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主要的地缘文化遗产。因此，在1815年及以后，英国、法国和世界体系必须面对的基本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做出调和，一方是那些坚持贯彻“主权在民”观念要求实施正常变革的人的愿望；另一方是显贵们维持其自身权力与确保他们拥有进行无限制资本积累的持续能力的愿望。

对那些试图调和基于相互间深刻的利益冲突，并可能根本无法调和的分歧的做法，我们赋予它们以“意识形态”的名称。意识形态并非简单地是观察世界的方法。它们也不仅仅是偏见或预设的定见。意识形态是政治方面的总体构想，它们只在视政治变革为正常，而不是视作异常的世界中才是需要的。正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所实现的文化大变革的影响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才变成为这样一种世界。正是这样的世界才孕育出各种意识形态，它们将在19和20世纪，既作为日常政治行为的指南，又作为赋予调和此类行为的做法以合法性的信条。

法国大革命是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激励的吗？抑或相反，它是对自

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吗？这是198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200周年期间，法国（和全世界）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也许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对它的政治文化的描述。^[1]不过，对改变地缘文化的法国大革命的第一种意识形态反应，事实上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保守主义。在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刻，伯克（Burke）和德·梅斯特勒（de Maistre）即时写作了有关大革命的著作，书中的某些内容直到今天还影响着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观念先于术语存在。很明显，“保守的”一词只是到1818年才首次出现，^[2]名词形式的“自由主义”首次使用也许是在1810年。^[3]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深刻地与一种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相联系。这种认识将其视为那种破坏了社会力量缓慢地“自然”演进的蓄意的政治变革的典型。对保守派而言，这种破坏作用产生了一种长期发挥影响的、令人心存疑虑的遗产：

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那种分化历史过程发展的顶点，该过程可以追溯到诸如唯名论、对宗教的质疑、科学理性主义等学说开始出现，以及那些作为中世纪基本组成部分的集团、制度和思想的确立地位出现动摇。（Nisbet, 1952, 168-169）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因而在下述简单意义上是“反动的”，即它是对我们视为现代性现象来临的一种反动，它把完全逆转这种情势（强硬形式的保守主义）或减少变革带来的破坏性并尽可能迟滞即将来临的变革（更为复杂形式的保守主义）作为自身的目标。保守主义者相信，通过将他们所谓“理性”的、由演绎推理而来的变革计划运用于政治过程，革命党人（或改革派，他们在保守主义者的信条中并不存在区别）会制造混乱、消解长时期积累的智慧，而由此危害社会。

像所有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保守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纲领。保守主

义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抓住权力不放或重新夺回权力，知道国家机构是实现他们目标所必需的主要工具。当保守派力量在1815年的法国重新掌握权力时，他们将这一事件命名为“复辟”。但正如我们下文将要看到的，事物绝非完全回复到原来的状态。路易十八（Louis XVIII）必须承认“宪章”对其权力的制约，当查理十世试图实施真正的复辟时，他被剥夺了权力，替代他的是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后者接受了一个更具现代性的头衔“法兰西国王”。^[4]

对保守主义而言，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所有反映自由主义倾向的运动都完全消失。首先是阻止那种运动出现——它在1815年并没有出现，只是在1848年以后才被承认为理想的社会状况；阻止不成，次优的解决方案是劝说议员在进行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变革时需要极其慎重。保守主义之所以会产生长期的政治影响就在于公众的谨慎态度，他们对反复灌输“主权在民”的改革所寄予的希望多次破灭。另一方面，保守主义最大的弱点一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学说。“[保守主义学说]是在反对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它因而生来就是反革命学说。”^[5]一般而言，相比革命，反革命在19世纪和20世纪并不很流行；它是一种意指保守主义者的标签，人们对这股力量表示担忧。

尽管如此，但保守主义者感到他们拥有无懈可击的论据。保守主义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最大的缺陷在于它的支持者和理论家所秉持的信念，即通过政治而实现一切，这既是可能的，又是合法的。取而代之，保守主义者支持一种有机的社会观念，“将人最终描述为政治的是非常不充分的”。^[6]就政府是权力的化身而言，保守主义者支持政府；就中央政府可能会制定法律而言，他们反对中央政府。结果就是对地方主义的偏好。这部分是因为显贵们在地方层面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部分是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不大可能制定法律。^[7]诚然，这种反对政治的偏见在那些“反对革命”的人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仅仅是占主导地位。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伯克式的保守主义（正是这里我们所描述

的那种保守主义)和梅特涅式(Metternich)的保守主义之间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区分:

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捍卫保守主义,否定革命问题的有效性,因为保守主义否认社会和社会契约的暂时性——这是伯克给出的答案。以理性的名义反对革命,因为革命与天地万物的结构相抵牾,基于这种认识论的理由否定革命问题的有效性——这是梅特涅给出的答案。两种立论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

正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观致使梅特涅制定的政策僵硬刻板.....

因此,到19世纪,它成为启蒙运动的最后支持者,它判断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它们的“真理性”,而不是根据它们是否成功。^[8]

成功。这是自由主义者响亮的口号。但是在什么上成功?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同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相对照,即作为一种针对人民主权要求而提出的总方针的自由主义,同作为一种对美好社会而提出的抽象理论的自由主义相对照——并不是由上帝理智地予以设计的。它是由多样的、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塑造的。直到今天,自由主义一词仍然会引起各种非常不同的反响。在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之间,传统上就存在“混淆”。同时还存在社会行为上的自由主义,有时被称为自由意志论。这种“混淆”很好地满足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使它能够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开始是政治派别中的左翼,或至少是中左翼。自由主义将自身界定为保守主义的对立面,立足于一种可以被称之

为“成为现代人的意识”（Minogue, 1963, 3）。自由主义宣称自身是普适论者。^[9]对他们自身和对现代性这种新世界观的真理性充满自信，自由主义者竭力传播他们的观点，将他们观点的逻辑强加给所有社会机构，由此将过去“非理性”的残余从这个世界上清除掉。为此，他们必须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做斗争。他们认为，这些人沉迷于对“自由人”^[10]的恐惧之中，而自由人就是从对传统的错误崇拜中解放出来。

不过，自由主义者相信，即使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人们不付出努力、不制定政治纲领，它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信，为了使历史能够按照其自然进程发展，有必要从事有意识的、连续的、明智的改良，而且应该充分意识到“时间是全人类的朋友，它将不可避免地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越来越多的幸福”（Schapiro, 1949, 13）。

1815年以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保守主义攻击的对象，^[11]被保守主义者视为是“激进主义的”。但随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获得不错的发展势头、广泛的支持、甚至权力，它作为左翼的声誉在下降；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获得右翼的支持。但它最终是宣称自己处于中间立场。贡斯当在18世纪以此方式对它进行了理论化概括。^[12]在19世纪，它作为一种中间立场成为人们所习惯的定式。施莱辛格（Schlesinger, 1962）在20世纪中期仍然称赞它是“至关重要的中间派”。

当然，中间派仅仅是一种抽象，一种修辞手段。人们可以简单地通过界定什么是极端，就能让自己置于中间立场。自由主义者正是那些决定将此作为他们基本政治策略的人。面对正常变革，自由主义者宣称自身处于保守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或称激进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或革命者）之间的立场上。前者是右翼，他们试图尽可能地迟滞正常变革的步伐；后者是左翼，他们试图尽可能加速变革的步伐。简言之，自由主义

者是那些希望控制变革的速度，以致它能够在其认为最优的速度上发生的人。但人们能够确切地知道什么是最优速度吗？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知道，而且他们的总方针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种总方针制定的过程中产生了两位代表人物：基佐（Guizot）和边沁（Bentham）。基佐是历史学家、作家、当然也是政治家。边沁是哲学家和一些具体立法的倡导者。最终，两个人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政府身上。基佐自己将现代性界定为“在管理上用思想方式替代物质方式、用谋略替代武力、用意大利的政治替代封建政治”（Guizot, 1846, 299）。他认为这种做法开始于路易十一，这也许是事实所在。但即使这是事实所在，它也只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才完全成为人们所习惯的定式，而这正是在基佐管理法国之时。

基佐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它既能缓和人民对主权的要求，又不会退回到王权神授的状态。通过宣称存在理性这只“无法抗拒之手”，它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处于不断进步的状态，他找到了这种方法。通过论证这种政治形式的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基佐能够将拥有“能力”确定为行使人民主权权利的先决条件，而这里的“能力”被界定为“依据理性行为的能力”。^[13]只有当将投票权限制在那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时，才有可能制定出“科学的政策”，以及拥有“理性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消除“回归独断专行的政府、民众情感的任意释放，以及社会解体”这三重威胁（Rosanvallon, 1985, 255-256；也见156-158）。依据科学做出决策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基本的行事原则。曼宁（1976, 16, 21, 23）发展了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牛顿式科学之间的联系。他表明，他试图论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个原则是从牛顿思想中推衍而来的：平衡原则、自然发生和循环原则，以及统一性原则。第一，世界的稳定“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保持一种平衡关系”。第二，“任何试图将自我运转的社会转化为具有发展方向的社会的做法，都必然会破坏合理社会秩序的和谐与平衡”。第三，“我们也许希望，只要人类社会达到适当

的发展水平时都会实行民主制度，就如根据物理现象发生的充分条件的原理，我们也许希望在条件具备时它们都会发生的那样”。

简而言之，基佐既不赞同路易十六（或查理十世），也不赞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因为两者都不是理性的选择。在两者中，基佐（和他的追随者）可能更担心罗伯斯庇尔和卢梭。“19世纪初通常仍然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派别试图建构反对卢梭的政治学。革命恐怖是政治上的唯意志论的产物；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分析。”（Rosanvallon, 1985, 44）^[14]

基佐的声誉在逐渐下降，他在七月王朝（the July Monarchy）中扮演的愈加保守的角色也损害了他的声誉，只是到今天，法国政界的新自由主义派才重新恢复了他的声誉。但作为英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边沁的声誉却一直得到人们的认可（和称赞）。^[15]基佐所面临的三重威胁对边沁主义者而言也是同样存在的，但他们也许更善于应对这些威胁。^[16]正是伟大的法国亲英派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埃利·阿勒维（Elie Halévy, 1900, iii-iv）指出了边沁研究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和卢梭相同的，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却不是革命，而是古典自由主义：

像法国一样，英格兰也经历了自由主义流行的世纪：英吉利海峡对岸实现工业革命的世纪和法国经历大革命的世纪具有相同的意义；将利益等同于法律权利的功利主义哲学相当于主张人权的唯心论哲学。所有个体的利益都是相同的。每个个体都能对他自身的利益做出最好的判断。因此，我们应该消除传统制度在个人之间设置的所有人为障碍、消除所有社会制约，它们是由于假称保护个人免受彼此侵害和免受自身侵害的需要而设置的。在灵感来源和原理方面，解放哲学非常不同于卢梭的情感哲学，但在许多实际应用方面，两者却是相近的。在欧洲大陆，主张人权的哲学在1848年革命中达到其高潮；在英格

兰，主张个人利益相同的哲学也在同一时期曼彻斯特人的自由贸易观念取得成功中达到高潮。

一方面，边沁主张，社会是“其个体成员意志的自发产物，因此在其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并未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社会又是“立法者的创造物，是成文法的产物”。这种观点对边沁和自由主义而言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所以，国家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只要国家是民主国家，表达了最大多数人的意愿”。^[17]

在支持科学政策和理性政府上，边沁和基佐是一致的。国家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完美而中立的工具。正是因为面临着三重威胁，所以国家必须成为实行改革，甚至是激进改革的工具：

边沁和边沁主义者……从未因英国的状况而自鸣得意。他们是“激进的改革者”，他们为了实现他们的改革而艰苦奋斗：通过制定详细的蓝图；通过宣传、鼓动、勾结、密谋；甚至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但又不超出这种程度——鼓励革命运动来达到目的，但诉诸武力是下策。^[18]

我们这里就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自由主义的总方针从来不是反对国家干预的，或者甚至不是主张所谓的守夜人式的国家的。但远非是同自由放任政策相对立，“自由主义国家本身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产物”（Polanyi, 1957, 3）。归根到底，自由主义一直是披着个人主义羊皮的强政府意识形态；或更确切地说，强政府意识形态只是作为个人主义唯一可靠的最后保证。当然，如果人们将个人主义界定为利己主义，将改革界定为利他主义，那么这两种目标确实是无法调和的。但如果我们将个人主义界定为个人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最大化，并将改革界定为创造一种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强者能够克制对弱者的不满，同时又能够利用现状，在这种现状下相比弱者，强者会发现他们更容易实现其愿望的话，那么这两种目标就不存在内在的不协调之处。而是恰恰相

反！

英国和法国正是这样的两个国家，它们相对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在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已经形成。但这些政府在民众中并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而且法国大革命已经破坏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合法性。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为自身设定的任务就是培植（重新培植，显著增加）这种合法性，由此增强这些政府在国内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力量。

三种意识形态中我们最后阐释的是社会主义。在1848年之前，人们很难认为它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理由主要是那些在1789年之后才开始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左派的人在各处都将自身视为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和拥护者，这在19世纪上半期确实无法将他们同那些开始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19]的人区分开来。在英国，法国大革命也遭到广泛的谴责，因此那里的“自由主义者”宣称他们的历史渊源并不是源于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者”（他们大约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者”）最初似乎只是某种程度上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

事实上，严格地将作为一种政治纲领、因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区别开来的是，前者坚信进步的取得不仅需要人为推动，而且需要全力推动，否则的话，进步的取得将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简而言之，他们纲领的核心是要加快历史进程。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一词相比“改革”而言对他们更具吸引力，而改革似乎仅仅暗示了耐心的——如果是有意识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主要表现为一种观望的态度。

简而言之，三种对待现代性和何谓“正常”变革的立场逐渐形成：保守主义是尽可能将危险减少到最小；自由主义是尽可能理性地在适当时间实现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激进主义是通过同那些强烈反对它的力量做激烈的斗争来加速进步的实现。正是在1815~1848年这段时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词汇被广泛用于指代这三种立场。

应该注意到，每种立场都将自身置于其他某种立场的对立面上。对保守主义者而言，法国大革命是攻击的目标。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攻击对象是保守主义（和旧制度，保守主义者被认为试图恢复旧的制度）。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正是自由主义是他们要予以摒弃的。正是在定义上述几种意识形态中的这种从本质上予以批判和否定的基调，解释了为什么每种意识形态都存在如此多的形式。可以肯定，作为一种明确阐述的学说体系，在每种意识形态阵营中都会提出许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主张，每种主张都断言自身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所在。每种意识形态阵营的统一性，只是在于它们共同反对的东西。这并不是不重要的细节问题，因为正是这种否定性成功地将每个阵营凝聚在一起长达150年左右（至少直到1968年）。

既然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应对现代性问题的政治纲领，所以每种纲领都需要一种实施它的“主体”或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用现代世界的术语来表达，这是指主权问题。法国大革命在这一问题上宣示了一种明确的立场：反对绝对君主制的主权，宣称“人民”拥有主权。

这种主权在民的新式用语是现代性的一个伟大成就。即使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一直存在着反对它的斗争，但是没有人能够破坏这个新偶像“人民”的地位。但这种胜利却是虚假的。就人民拥有主权而言，也许存在普遍的认同；但从一开始，就谁构成“人民”而言却并不存在认同。进一步而言，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三种意识形态并没有明确的立场，但这并不能使它们各自的支持者承认它们的立场具有模糊性。

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似乎是最明确的。对他们而言，“人民”就是全部“个体”的总和，每个个体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最终持有者。个体是现代性最典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主体”所在。人们之所以相信自由主义者，至少是因为他们已经就这种个体——即拥有主权的个体——到底指谁的问题展开过广泛的争论。

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大体上也应该一直在就此问题展开争论，因为他们各自都提出了非常不同于个体的“主体”，但他们的讨论远非是阵线分明的。如果“主体”不是个体，那么它到底是谁？要分辨出他们所设想的主体有点困难。例如，见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怀特，1950，28）：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的各种目标可能是最复杂的。因此，简单地安排或使用权力不可能符合人性的要求或适应人们的状况。

如果人们不知道这是一本攻击法国大革命的书，那么他们也许会认为它要谴责的是绝对君主制。如果我们看一下伯克在几乎20年前说的话，问题也许会变得更清楚些（1926 [1780]，357）：“个体就像影子一样随时会消失；但国家却是稳定不变的。”

博纳尔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坚持认为教会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他的观点和各种类型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拥有一个共同的内容：那就是他们都赋予诸如家庭、行会（行业协会）、教会、传统“等级”等社会团体以重要性。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些团体构成有权利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主体”。换句话说，保守主义者赋予所有那些也许可以被视为“传统的”（由此体现连续性）团体以优先性，但同时否认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拥有任何“总体性纲领”。事实上，保守主义思想从未清楚地指出如何才能确定哪些团体体现着连续性。毕竟，围绕正统地位属谁一直存在着争议。

博纳尔（1988 [1802]，87）认为，卢梭和孟德斯鸠所犯的重大错误就在于他们“想象……一种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纯自然状态”。恰恰相反，“社会的真正性质……就是社会——公共社会——当前所表现出的状态”。^[20]但这种界定对其作者而言是一个陷阱，因为它赋予当前以合法性，以致实际上禁止了“复辟”的发生。不过，准确阐述他们学说的逻

辑绝不是保守主义理论家所擅长的或主要的兴趣所在。相反，保守主义者关注于对一个由多数选民支持的多数党可能采取的行动发出警告。相比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具有历史意义的主体更为消极。在他们看来，好的决策是很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出，而这样的决策大体上都已经做出了。

如果保守主义者拒绝赋予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主体的个体以优先性，他们偏爱小规模、所谓的传统团体；那么，社会主义者则拒绝这样做。他们偏爱大规模的群体，那就是全体人民。对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研究，G.D.H.柯尔（Cole, 1953, 2）评论道：

与流行的强调个体要求的倾向相对立，“社会主义者”强调人类关系中的社会因素，并设法使社会问题在有关人权的大争论中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这场争论是由法国大革命和在经济领域随之而来的革命在全世界引发的。

但如果很难了解到底是哪些个体构成了人民，甚至更难了解人民是由什么样的团体构成的；那么，最难了解的是如何界定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人们如何能够了解这种共同意愿到底是指什么？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哪些人的观点，又如何考虑？

简言之，三种意识形态提供给我们的不是对谁构成适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主体问题的回答，而是简单地提供了三个出发点，以供人们探求谁是人民主权的体现者：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是自由个体；对保守主义者而言是所谓的传统团体；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是“社会”的全体成员。

作为“主体”的人民将国家作为主要作用的“对象”。人民是在国家中实现它的意愿，人民是主权所在。不过，从19世纪以来，我们还被告知，人民组成了“社会”。那又该如何协调国家与社会呢？这构成现代性思想中重大的自相矛盾之处。

最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考察三种意识形态在这方面的话语时，它们似乎都站在社会一方而反对国家。它们的论据也是相似的。对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关键是阻止国家介入经济生活，一般地讲是将国家的作用减少到最小：“自由放任是有关国家的守夜人学说”（Watson, 1973, 68）。对保守主义者而言，法国大革命令人恐惧的方面不仅是它的个人主义，而且尤其是它实行的国家主义。当国家开始质疑处于中间层面的团体——家庭、教会、行会等，它们赢得人民的主要忠诚——的作用时，它就变成极权式的国家。^[21]我们非常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976 [1848]，486）中做出的著名的概括：

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在现代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这些否定国家的观点并未阻止三种意识形态都抱怨这种国家——作为它们的批判对象——并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而据说是由它们的意识形态对手控制着。事实上，三种意识形态被证明都非常需要国家的帮助来推动它们自身纲领的实现。我们不要忘记，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者据说由于他们的言行不一致而受到攻击，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在言论上反对国家主义，但从短期看却一直在努力扩大政府的作用。

但保守主义者真的是在反对国家主义吗？他们一直在反对通过国家行为来实现改革吗？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必须应对“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保守主义者将它视为现代性所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为了逆转目前这种被广泛认识到的社会道德堕落的趋势，为了使社会回复到以前存在过的较为纯粹的状态，他们往往需要国家的帮助。据说19世纪40年代英国一位伟大的保守主义者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 曾说过,“他相信,对他生活的无政府时代而言,由强政府机构颁布一部宪法是必需的”(Grash, 1951, 52)。这种观点事实上更普遍地适用于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实践。

注意阿勒维(1949, 42-43)在解释19世纪初期英格兰的“托利党复古统治”时期保守主义针对国家立场变化的方式:

在1688年及其后的岁月,英王将自身视为主权所在,公众舆论也是这样认为的。人们一直担心他会使这种主权绝对化,但政府拥有的各种权力独立于他的权威而存在,这构成一种对王权的蓄意的限制,而且一套法律体系也保证了不会实施王权专制。在19世纪初,正是人民在美国、法国,甚至英格兰要求或准备要求拥有最高权力;因此,这三个政权目前要维持它们相对于人民而言的独立性。不再是辉格党,而是托利党支持那些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但形式仍然保持不变的制度。目前,英王主导着由这三个强国组成的联盟以维护它们政权的自主权,反对新力量对主权的的要求。

上述分析是简明透彻的。保守主义者一直准备强化国家结构,直到将力图推进改革的民众力量置于可控范围所必需的程度。这事实上就暗含在塞西尔爵士(1912, 192)的下述论断中:“只要国家行为没有不公正或压迫人民之处,那就能够说它不是保守主义原则所敌视的。”

既然如此,那么至少自由主义者——提倡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仍然保持对国家的敌视,难道不是这样吗?根本不是这样!从一开始,自由主义者就陷入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之中。作为个人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的卫护者,他们大力推进实施普选权——是对民主国家的唯一保障——的改革。但由此,国家变成所有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这些改革意在将个人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社会限制中解放出来。这又导致自由主义者接受通过制定法律来推进功利主义目标的思想。

再次的，阿勒维（1950：99-100）明确地指出了相应的结果：

“功利主义”哲学并不仅仅是、甚至也许从本质上看不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学说体系；它同时也是一种有关权力的学说，主张政府进行审慎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学的干预，以产生利益的和谐。伴随着思想的发展，边沁由年轻时倡导“开明专制主义”转为支持民主政体。但他却是通过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长跳转的过程才达成那种认识的，这个过程使他超越了许多政治学说——贵族制、混合宪制（mixed constitution）、分权制衡原则，以及有关政治家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削弱政府的权力和尽可能地分割它的权力而使个人获得自由的学说。人们本来也许认为他可能会接受其中的某个学说。在边沁看来，当国家权力由普选权或至少非常广泛的选举权——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予以制约时，就不应该再有理由对它持怀疑态度。它给人们带来的只有福祉。

由此，保守主义者目前变为真正自由主义传统的维护者：他们用贵族式自治的旧体制——其中官员没有报酬——反对官僚专制统治的新体制——由领取报酬的官员进行管理。

那么，是否有可能认为，边沁主义事实上背离了自由主义呢，对后者最令人满意的表达确切地说可以在古典经济学家、即主张“自由放任”的理论家那里找到？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当第一个“工厂法”在英国通过时，那时所有最重要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支持该立法——这个现象不是由别人，而是由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921, 763-764）予以了清楚说明（和赞同）。从那时起，实行官僚制的大政府从未停止过扩展，它的扩展一直受到信奉自由主义的各届政府的支持。作为对塞西尔勋爵有关保守主义著作的回应，当霍布豪斯（Hobhouse）写作有关自由主义的著作时，他以这种方

式论证了这种扩展的合理性：“政府实施强制的功能是克服由个人实施的强制和由任何个人联合实施的强制”（1911，146）。

无疑，每种意识形态在为解释多少令人尴尬的国家主义时所援引的理由是不同的。对社会主义者而言，国家是在执行人民的共同意愿。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国家是在保护传统权利免受共同意愿的侵害。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国家是在创造条件以使个人权利得到扩展。但在每种情况下，归根到底还是相比社会而言国家权力在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在宣传上却是恰恰相反的情况。

在国家和社会正确关系命题上产生的所有这些混乱和混淆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19世纪到底存在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三种？两种？还是只有一种？我刚才已经考察了认为存在三种意识形态的传统论点。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人们如何将三种减少为两种。

就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一时期的人而言，“唯一明显的分歧”在两部分人之间产生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进步是必然的和合意的，因此法国大革命得到“普遍的赞同”；另一部分人支持反革命，反对革命对社会价值观的破坏，将革命视为大错特错（Agulhon, 1992, 7）。因此，政治斗争是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进行的，而那些称自己为激进主义者、雅各宾派、共和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人被简单地视为自由主义中更激进的派别。在《乡村牧师》中，巴尔扎克（Balzac, 1897 [1839], 79）描述了主教的惊叹：

据称在工业人口中奇迹已经发生。这里煽动性言论广泛传播，并在各处生根；这里宗教和拥护君主政体的学说受到批判性质疑；这里源自新教的教义体系并不尊重任何事物，这种教义体系是由所谓的自由主义创立的，它今天采用这个名字，明天也许就用另一个名字。

蒂德斯克（1964，125-126）提醒我们，在1840年一份拥护正统王朝的报纸《奥尔良人报》（*l'Orléanais*）曾将另一份报纸《卢瓦莱报》（*Le Journal de Loiret*）谴责为是“自由主义的、新教的、圣西门主义的和拉梅内主义（Lamennaisian）的”。这并不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因为正如西蒙（Simon，1956，330）注意到的：“进步思想事实上构成了圣西门全部哲学思想的核心和主要灵感来源”（比较曼宁的说法，1976，83-84）。

进一步而言，这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联合植根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植根于反对绝对君主制的斗争（见Meyssonier，1989，137-156）。由于两种意识形态都对提高生产率越来越感兴趣，而且每种意识形态都将它视为是现代国家对社会政策的基本要求，所以这种结合在19世纪继续得到培植。“圣西门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都沿着我们今天称之为经济合理化的方向演进”（Mason，1931，681）。伴随着功利主义的兴起，这种结合似乎有可能变成一种更为密切的结合。柏莱柏诺（Brebner）以同情的态度提到了边沁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内容，并得出结论（1948，66）：“费边主义者难道不是现代的边沁主义者吗？”他还补充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30年就已经“可以被称为一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了”。

另一方面，在1830年以后，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开始出现明确的区分，到1848年以后，这种区分变得非常明显。与此同时，1848年标志着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和解的开始。霍布斯鲍姆（1962，117）认为，通过承认“温和的”自由主义在法国、英国、尤其是比利时（甚至部分在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取得的政治上的胜利，1830年的重要成果就是使群众政治成为可能，由此“使温和派同激进派相分离”。坎蒂莫里（Cantimori）从一位意大利人的视角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两者的分离问题直到1848年才提出。他注意到（1848，288），直到那时，“自由主义运动……并没有否认任何路线：既没有呼

吁起义，也没有主张采取改良主义的政治行动”。只是到1848年之后，这两种策略的分离才真正完成。

关键是要注意到，在1848年以后，社会主义者不再提到圣西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来进行组织。抗议的对象不再仅仅是贫困，它能够通过改良予以改善；而是由资本主义引起的人的异化，要克服这种异化需要完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Kolakowski, 1978, 222）。

正是在此时，保守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可以利用改良主义来实现保守主义的目标。紧接着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之后，罗伯特·皮尔爵士发表了一个竞选宣言，即塔姆沃斯宣言（the Tamworth Manifesto），该宣言被称赞为是一份纲领性声明。它被他那个时代的人视为“近乎革命性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宣布接受《改革法案》，将法案视为“对一个重大宪法问题所做的最终的和无法逆转的解决”；而且是因为这种立场是向人民、而不是向议会宣布的，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Halévy, 1950, 178）。^[22]

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主义者注意到他们在重视保护财产权问题上同自由主义者的趋同倾向，即使令他们对财产权感兴趣的主要是下述事实，即它代表了连续性，由此可以用作家庭生活、教会和其他社会团结的基础（Nisbet, 1966, 26）。但在这个事实上的趋同之外，还存在爆发真正革命的实际威胁——这是他们都感到恐惧的。正如塞西尔勋爵（1912, 64）注意到的：“既然有效抵制雅各宾主义是保守主义政纲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就应该遵从保守主义路线进行温和的改革。”

最后，我们不应该完全忽视将三种减少为两种的第三种可能性，即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起手来反对自由主义者，即使这从理论上可能性似乎是最小的。圣西门派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特征——它植根于博纳尔的思想——经常被学者们提及（Manuel, 1956, 320; Iggers,

1958a, 99)。这两大阵营可以围绕他们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汇合在一起。同样，像冯·哈耶克（von Hayek）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谴责保守主义者卡莱尔（Carlyle）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特征。这次，正是保守主义思想中的“社会”方面成为质疑的对象。事实上，塞西尔勋爵（1912, 169）毫不犹豫地公开指明了这种相似性：

人们经常假设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但这并不完全正确。现代保守主义继承了英国保守党的传统，支持国家发挥作用和扩大权力。确实，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先生曾攻击社会主义，认为它事实上是英国保守党的复兴。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结合的后果是出现了一种主张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最终产生了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可能性更小——最初只是权宜之计。但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能将20世纪各种类型的“极权主义”视为这种结合更持久的形式，在它们沿袭某种形式的传统——既有迎合平民的、也有迎合上流社会的——的意义上。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极权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保持中心地位的另一种方式，即作为摩尼教善恶对立中的一个方面。在这种强烈反对自由主义的表象背后，人们会发现所有这些政权都相信通过提高生产率实现进步是它们诉求的一个核心内容，而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信条。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甚至主张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或主张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它的邪恶形式。照此看来，得出如下结论难道不正确吗？即自1789年以来，只有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它在三种主要类型的意识形态上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当然，这样一种论断必须从历史的视角详细地予以说明。如果在1789~1848年这段时期，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意识

形态斗争，最终保守主义未能取得一种完成的形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那么在1848年之后，自由主义在世界体系中取得了文化霸权，并建构了一种地缘文化的基本核心内容。在延长的19世纪的其余时间，自由主义居于支配地位，未遭遇到强烈反抗。确实，马克思主义试图建构作为独立一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从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自由主义在19世纪取得胜利的历史正是本卷书要讲述的内容。

[1] 见卡普兰（Kaplan, 1993）对法国争论情况的详细介绍。这本书清楚地表明这场争论并无定论，大体是因为不能以这种方式来提出问题。或更确切地说，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是为了应对20世纪晚期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为了说明历史真相。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是不能理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的。在前一卷书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如何根据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来理解法国大革命。（沃勒斯坦，1989，第1和第2章）

[2] 贝内东（Bénéton, 1988, 6）将该术语追溯到了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出版的杂志《保守党人》（*Le Conservateur*），它在英国的使用则是作为对一篇由J.W.克洛克（Crocker）在1830年所写文章加上的党派标签。“反动”或“反动的”被收入辞典似乎更晚些。蒂德斯克（Tudesq, 1964, 2: 1028）论证，这些术语只是到1848年才被更普遍使用，但他的确没有谈及术语的首次使用问题。

[3] 作为具有政治内涵的形容词，该术语首次使用似乎是在法国督政府（the Directory）时期。克鲁兹·希奥安妮（Cruz Seoane, 1968, 157）认为也许是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首次使用了该术语，他在1796年提到“自由主义思想”。布吕诺（Brunot）和布鲁瑙（Bruneau, 1937, 2: 660-661）将它的首次使用确定为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第八年（Year VIII, 1797-1798年），它是作为一个与宗派主义和雅各宾派相对照的术语。但他还发现它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动词被使用是在1791年的《爱国者之友报》（*Ami des Patriotes*）。似乎所有人都同意，形容词变成名词是在1810~1811年的加的斯（Cadiz），那时它被用于指一群西班牙议员（Cortés）。一位议员托雷诺伯爵（Conde de Toreno）在大约60年后写书指出，公众将支持改革的人描述为自由主义者（los liberales）（转引自Marichal, 1955, 58）。比灵顿（1980, 554, n.33）指出，这导致自由主义政党（partido liberal）在1813年的形成（也见Cruz Seoane, 1968, 158）。马瑞考认为下述情况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即“西班牙这个西欧国家中最少‘资产阶级’特征的国家却在19世纪提出了欧洲资产阶级所关注的一揽子议题”（1955, 60）。但这并没有什么好讽刺的，因为1810年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正处在激烈的斗争中。对他们而言，对意识形态做明确的说明可以用作在政治上聚合力量的支点。曼宁（Manning, 1976, 9）宣称，“像帝国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者一词的最初内涵是指那部分最不受尊敬的人”。但从对西班牙议员的描述看，是否如此并不是完全清楚的。曼宁所想到的也许是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1816年2月15日在议会的演讲。勋爵提到，尽管在军事上是反对法国的，但西班牙

的政党“在政治上却是那种最坏类型的法国政党。他们宣称将不承认费迪南（Ferdinand）的王位继承权，除非他承认他们制定的原则，包括承认主权在民的原则。从所奉行的原则看，‘自由主义党’完全是雅各宾式的政党”（Parl. Deb., xxxvii, 602, 转引自Halévy, 1949a, 82, n.3）。费迪南明显同意勋爵这种说法，因为他在同年禁止使用该词（见Marichal, 1955, 60）。它在法国和英国作为政治术语使用是在1819年（见Bertier de Sauvigny, 1970, 155; Halévy, 1949a, 81, n.3），但又过了1/4世纪，辉格党才重新将自身命名为自由党。

[4] 路易十八承认宪章对他的约束在政治上对他实现“复辟”起了关键作用。在他于圣乌昂（St.-Ouen）发表的宣言中，这位未来的国王宣布，他决定“接受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他称之为“宪章”。巴斯蒂（Bastid, 1953, 163-164）评述道：“宪章一词的意义在以前是多样的，首先让人想起的是有关公社特许权利的记忆。”他补充说：“对那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而言，它会让他们非常自然地想起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巴斯蒂认为：“如果路易十八不能以某种方式满足人们对自由的渴望，那么他就绝不可能赢得公众的支持。”当1830年路易-菲利普同样宣布接受一部宪章时，它肯定是一部被公众赞同，而不是由国王认可的宪章。

[5] 贝内东（1988, 9）继续指出：“保守主义的本质是忠实于传统的信条，而对现代主义做出否定性批判，它的命运是无力阻止传统秩序被消灭的进步趋势……保守主义求助于历史，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却受到历史的蒙蔽”（p.10）。盖什（Gash）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保守主义]生来就是反动的；它作为学说体系的辩护机制部分可以追溯到开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1977, 21）。结果，它一直将其作用局限于主动提出一些建议，最终发现自身不得不变成某种主张改良类型的自由主义。

[6] 怀特（White, 1950, 4）。也见昆汀·霍格（Quintin Hogg）：“保守主义者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支持保守主义的理由》，1947，载怀特的书，1950, 31）类似地，克里克（Crick）将保守主义界定为“首先是否认变革的可能性，而赞成从法国大革命获得的教训或由对它的恐惧而产生的训诫”。最后，在20世纪初，塞西尔勋爵（Lord Cecil）将政治保守主义界定为源自“自然保守主义”，它包含“对未知事物的不信任”，而“偏爱我们已经习惯的事物，因为习惯实际上是使我们的天性服从于它”（1912, 14）。怀特（1950, 1-2）表明这种看待事物的立场是如何反对政治的，并由此反对理性的：“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认知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很明显，使这个范畴的人群团结在一起的与其说是一种在思想上得到充分阐释的原理体系，不如说是一揽子本能使然，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享乐本能……这种享乐本能——大体上是自私地沉湎于现时的生活，享受它的丰富和多样性——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将政治作为某种次要的或偶然的的东西置于其应当放置的位置。”

[7] 罗伯茨（Roberts, 1958, 334）描述了英国托利党人的态度：“‘中央集权’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词。托利党人对它抱有最深刻的成见，它触及了托利党人最神圣的利益……托利党人警惕地卫护着他们在地方上的特权，并以同样的关注度去卫护教士教育穷人的权利、城市设立监狱的权利和教区维修道路的权利……保守主义者对地方政府的偏爱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由于传统主义的影响，由于在地方权力和在地方保护上拥有既得利益，由于对教会的忠诚和对较高

税收的恐惧。最后提及的动机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8] 基辛格（1973，193，194，196）。从长期看，梅特涅在政治上的僵硬刻板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那些希望保护他们特权和权力的人的利益。它事实上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当中，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破坏性的“激进主义”当中，正如我们将在法国复辟时期博纳尔派（Bonaldian）保守党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梅特涅式的保守主义只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才重新流行。但再次地，它也许无法很好地服务于那些希望保护他们特权和权力的人的利益。

[9] “自由主义者关注整个人类的发展，不承认存在着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外”（Manning，1976，80）。

[10] 在司汤达（Stendhal）的《巴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中，革命党人费兰特·帕拉（Ferrante Palla）在做自我介绍时一直称自己是一位“自由人”。

[11] 雷蒙（Rémond，1982，16）将法国保守主义政治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之间产生分歧的起始点不是追溯到1789年，而是追溯到1815年，“从那时起，右翼和左翼的分歧就成为社会现实、成为集体心理已经习惯的定式”。

[12] 对贡斯当而言，“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在雅各宾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和君主政治（或“宗教狂热分子”）两种极端之间的一种“温和的”和“中间的”立场。

[13] 罗桑瓦隆（Rosanvallon，1985，91，95）进一步指出了这种立场是如何将基佐和其他空谈理论的人既同博纳尔（Bonald），又同卢梭（Rousseau）区别开来的：“[他们]试图将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引入政治思想中，由此将实现公民平等和对现代个人的完全承认作为一种不可逆转和积极的事实整合在一起。这就克服了在反动思想和自由—民主思想之间的对抗，有意识地使他们的哲学摆脱了困扰于两者之间对抗的恶性循环……”
“能力是才能，而不是品质，它既包括个人方面的，也包括非个人方面的。它使人们能够将那些拥有能力的人同人口中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如果没有后一部分人存在的话，人们就都能够将他们自身包括在有能力的一类人之中或都是拥有能力的人”。因此，能力原则使人们能够将稳定和社会流动性、将秩序和变革统一在一起。基佐写道：“我们必须将能力本身确定下来，这样人们就能够围绕它们找到自己的位置”（p.97）。

[14] 罗桑瓦隆在一个脚注（p.45，n.2）中补充说：“因此，必须将‘自由主义’同民主自由主义完全区别开来，后者是基于人权观念。”

[15]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62，228）称边沁式的哲学上的激进主义是“英国思想家中最具资产阶级意识的学派”。

[16] 罗伯茨对赋予边沁以过多的荣誉持谨慎态度。“就边沁而言，如此明显的事实在于他对许多人的影响并不是如此之大，但他在表达其他势力——在影响力上要远远强于他自己的思想——所贯彻的真理上却是有先见的、清晰的和合逻辑的。”（1959，207）这大体上适用于早期意识形态的各种论述。各种政治势力通常都不能清楚地表达他们主要的总方针，甚至不能确切

地表达他们正在执行的政策，但意识形态却能对反映这些总方针的各种观点做出令人信服的表达。因此，早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也许并不是某种总方针的实际创设者。只是到后来，这些意识形态论述才以一种使总方针为社会所接受和论证其合理性的方式被运用。

[17] 阿勒维（1950；3：332）。国家发挥适当的作用——既不多也不少——成为明显的关注点，但边沁主义者对此充满自信。“没有人比那些第二代主张自由放任的哲学家——即信奉边沁主义的功利主义者——更了解或认为他们更了解如何最有效地和最少浪费地进行管理。”（Evans, 1983, 289）

[18] 维纳（Viner, 1949, 361-362）。维纳辑录了在边沁死后与边沁主义者相关的许多改革：基本法改革、监狱改革、选举权（包括妇女选举权）、自由贸易、对殖民政府的改革、工会的合法化、由公共付费的普通教育、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无记名投票、根据业绩任用和晋升公务员、地方政府改革、废除有关高利贷的各种法律、财产权的普遍登记、商船运输的安全法则、卫生改革和由公共付费的预防药物、统计数据的系统收集，以及针对穷人的免费法律服务。边沁还在马尔萨斯之前就倡导生育控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包容广泛的辑录，包括同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保护民权、政府对工厂的干预，以及为个人提供社会权利相关的诸方面。所有这些改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需要采用立法形式、最终通过政府来实施这些改革。

帕金（Perkin, 1977, 107）强调了执行方面在边沁主义者改革中的重要性：“必须考虑关键的方面，即任命行政官员，他们将构成反复出现的反馈链条中的主要环节。”也见罗伯茨（1959, 207）：“相比同时代的人，[边沁]更全面地看到了扩大行政机构的必要性。”正是戴西（Dicey, 1914 [1989]）将边沁仅仅描述为自由放任政策的伟大倡导者。柏莱柏诺（Brebner, 1948, 59-60）指出这是一种神话。不过，甚至像派瑞斯（Parris, 1960, 34-35）那样的人也认为柏莱柏诺的反应过了头。他们论证，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一对论题中的任一个都同样是19世纪中期那段岁月的特征所在”，“没有必要假设它们是彼此相互矛盾的”。对帕里斯斯而言，理由很明显：“功利主义的主要原则就是它的支持者自身相信和坚持的原则——功利原则。应用这种原则会导致同时极大地扩展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两个方面。”拉吉罗（Ruggiero, 1959, 99）也指出了本质上相同的内容：“边沁的改革方案尽管要求极大地扩展政府的活动范围，但它并不意味着、也不打算同个人主义原则相抵触，只是给予它们一种必要的补充。”

[19] 普拉梅内兹（Plamenatz）指出，尽管在法国反对七月王朝的人分为四派，其中一派也许被认为处于“左派”的位置上，他们稍后成为1848年革命的支持者；但在那时，这个词所指的全体人员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共和主义者（1952, 47和其他一些地方）。

[20] 正如蒂德斯科克注意到的（1964, 235）：“正统王权拥护者对七月王朝的反对就是显贵对已经确立的权威的反对。”由此，正统王权拥护者难道不是与博纳尔的著名论断相矛盾了吗？

[21] 见奈斯比特（Nisbet, 1944, 318-319）对博纳尔观点的讨论。奈斯比特在“基于职业或专业的联合”的意义上使用协会（corporation）一词。

[22] 阿勒维引证了一篇发表在1835年4月《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vol.53, p265）

上的文章，题目为《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说》：“几时曾有哪位首相认为向人民开诚布公是适当的，不仅公开宣布接受公职，而且公开宣布他计划采用的执政原则，甚至是详细的措施，就迄今为止保留的国王特权向人民，而不是向议会征求意见，以向大臣们表明他的选择确实不是盲目自信的产物，而是一次合理的试验。”

第二章 建构自由主义国家：1815~1830年



第二章插图“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

（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摄影部）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这幅由照相制版的印刷画复制了一幅由英国画家所创作的肖像画“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亲王”。梅特涅是在1815~1848年时期存在的反动的神圣同盟的主要领导人。

[法国大革命] 推翻了君主统治或令君主惊恐万分，使哲学家感到困窘，并改变了问题的形式。

——埃利·阿勒维（1901A, 276）

继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半个世纪中，从攻陷巴士底狱到英国宪章运动的最终失败，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完全排除革命的危险。

——弗兰克·达瓦尔（Frank O.Darvall）

从1651年到1815年，为了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权，英国和法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只是到1815年，英国才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两国异常迅速地结成一种心照不宣，但却是影响深远的联盟关系，以努力使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作为制度而为位于中心区（或渴望加入中心区）的国家所接受。这种模式就是自由主义国家，它是在人民主权时代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关键性因素。

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能结成联盟，不仅是因为它们都面临着多少有点相似的内部压力，而且是因为它们在实现这种目标上是彼此需要的。确实，在建构政治模式上它们需要相互支持、相互借鉴。而且为了共同利

益，它们也需要相互合作以维持地缘政治上的平衡。^[2]但最重要的是，它们需要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一种统一的模式，以更有效地消除其他模式，使所有国家都效仿它们的模式。由此，它们的合谋关系开始，尽管通常并不是通过完全友好的默契来实现的。这个过程的关键时期是从1815年到1875年，在此之后，该模式被牢固地确立，至少在一个世纪中一直是如此，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即使遭遇到剧烈的动荡，也能够保持某种结构的稳定性。尽管如此，但在滑铁卢战役刚刚结束时，似乎没有人倡导用自由主义国家来取代强权，甚至在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确实，这个术语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现代国家——位于一种国家间体系之中，并受这种国家间体系的制约——的建构是现代世界体系自延长的16世纪开始形成以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的统治者都专注于以两种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实力：提高国家的权威，即它在国家边界内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即将其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减少相反情况发生可能性的能力。长期以来，就决策权在国家内部的适当分配一直存在争议：哪些权力应当集中在作为统治者的国家领导者手中，哪些权力应当与立法机构分享。不过，三个世纪过去了，争论仍然是围绕权力如何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分配展开的。诚然，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是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宣布的，但人们根本不清楚（甚至对这个宣言的签署者而言），人民主权这种观念是否得到认真地对待，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而言，正是“法国大革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1789年之后，不可能再将政治争论限制在有产者这个特权圈子之内”（Evans, 1983, 66）。法国大革命和作为其后果的拿破仑统治使人民主权观念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每个政府都必须接受的概念，两个争夺霸权国家的政府就更是如此了。在1815年，人们关注的问题在于，1789~1815年是否仅仅是某种短暂的革命插曲，很快就被“王政复辟”和“托利党的反动统治”所埋葬；还是人民主权观念将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令试图恢复世界秩序的人感到惊奇的是，相比他们的预想，这种观念已经更深地扎下

根来。他们已经不可能将它埋葬，不管他们是否希望如此。令显贵们^[3]感到困扰的梦魇是民主。用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的话来表述，在自由主义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区分是“19世纪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区分”。^[4]根据19世纪的用法，民主意指认真对待人民主权。显贵们并不准备、而且从未打算这样做。正是认识到这种新的现实，导致人们在19世纪做出一种非凡的创造——政治意识形态。

在1789年，没有人真正了解将主权从君主转移到人民手中实际意味着什么。人们也许认为它同限制政府任意行使权力有某些关系，而任意行使权力又是同绝对君主制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使确实将权力转移到人民手中，但那样做，仍然需要为各种各样的政治领导人暂时结合做出决策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对所有那些有效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人而言，认真对待人民主权的口号似乎暗示要服从由无知、任性的群众做出的反复无常的决定，这无疑令人不快的。因此，对显贵们而言，问题是如何确立一种框架，表面看似乎是人民拥有主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这样，但它还能获得相当数量“人民”的支持。这并非易事。自由主义国家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解决方案。

从1815年的视角，回顾从1789年到1815年这段长时间的历险，人们能够从法国和英国的内部社会冲突中看到什么呢？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 1993, 7）在他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将它命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有些狂妄自大，代之，他“更含蓄”地将它称之为“发现政治”。^[5]但这有区别吗？就国家而言，除了它的国民在其中进行政治活动被视为合法之外，我们还意指别的什么吗？在某种深层意义上，人民主权是一种体现政治合法性的观念。因此，有关这种观念如何实现的争论也就是有关政治范围的争论——不仅是有关谁可能会参与，以及他们如何参与的争论，而且是有关服从国家集体决策是否重要的争论。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国家，法国有一个不成熟的开始阶段。但欧洲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因为事实上，“入侵者”拿破仑“拥有解

放和社会解放的思想.....传播了国家观念”（Ponteil, 1968, vii），^[6]同时也用这种不成熟影响了其他国家。对法国也像对其他新兴的国家一样，问题在于，国家政治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这是相比他们以前的生活而言的。而那时并不存在政治，决策交由宫廷秘密决定。它也有意地在造成一种深刻的变化。尽管如此，但仍有一些人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主要是一种以建立秩序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一种以消除混乱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正如埃尔顿（Elton, 1923, 7）所认为的那样。那样的话，人们能够说拿破仑（不仅仅是他）“赋予了旧制度以生机’，或者他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Elton, 1923, 69）。

从1815年之后时期的政治方面看，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的两种主要政治遗产。一种是对恐怖的印象，直到今天它还影响着法国和世界的政治，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恐怖不可避免地同民主联系在一起。很长时间，恐怖事实上成为显贵们用于反对扩大选举权的主要论据。“根据这种经验，像路易·基佐或邦雅曼·贡斯当等人拒绝将政治权利赋予那些贫困的阶级”（Donzelot, 1984, 21-22）。第二种遗产同第一种遗产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不断地推动将较低阶层完全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排除出去。

这种状况其实在英国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认为，相比法国，英国取消绝对君主制要更早些。但事实上，只是在这时，国王任命和免去部长——即控制行政机构——的权力实际上才被取消。的确，法国大革命最初得到了所谓英国雅各宾派的有限支持，但他们是相对软弱的，主张“避免使用革命手段”（Thomis and Holt, 1979, 11）。^[7]更确切地，正如埃文斯（1983, 23）所指出的，“论证小皮特（Pitt the Younger）[1783年到1801年间担任首相]解除了王权，这似乎是很奇怪的说法，而且肯定是过于简单的，但这种认识包含了些许真理”。^[8]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在英国是镇压工人阶级时期。从1799~1800年颁布了一系列反结社法案（the Anti-Combination Acts）。当然，这些法案并不是全新的法案。早在1339年就颁布过此类法律，但它们大体上一直被人们所忽略。乔治（George）论证到，这些法案确实被人们所忽略。^[9]她指出（1936, 177），这些法案“作为实施镇压的工具实际上可以忽略不顾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们肯定会纳闷，皮特为什么还要劳心费神去这样做，答案当然是，之所以通过这些法案“主要是为了应对雅各宾派引发的骚乱”（Evans, 1983, 158），而这次骚乱我们已经提到被当时的政府夸大了。

与其说是对秩序的直接威胁，不如说是对更严重的威胁也许正在酝酿中的恐惧，导致这些法案的颁布。很明显，有一种意识形态讯息已经传达给了城市工人，他们开始认真对待人民主权的原则。伴随着1818年臭名昭著的彼得卢屠杀（the Peterloo Massacre）事件的发生，这种讯息变得更为具体。但从当局的观点看，导致彼得卢屠杀发生的各种事件，事实上只不过是源源不断的公民反抗行为发展的最高潮。这些反抗行为可以追溯到1789年，到1818年已经使曼彻斯特“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获得了容易发生骚乱的特殊名声”（Read, 1958, 93）。尤其令显贵们感到不安的是反抗运动的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事实。地方上由争抢粮食引发的骚乱到18世纪晚期仍然是主要的反抗形式，但此时已经不再是人们倾向于采取的形式。更确切地说，群众运动“在范围上正在变成全国性的，并且正在变得具有组织性…… [在1800年后] [它们] 越来越多地在新兴的工业地区爆发”（Thomis and Holt, 1977, 29）。尽管卢德分子（Luddite）的口号似乎是退步的，因为他们的纲领是反对工业发展的；但他们令显贵们感到惊恐并不是因为他们似乎是反对进步的，或支持暴力的，而是因为他们显示了“工人阶级进行组织的出众能力”。^[10]作为结果，卢德分子同托利党和辉格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主张雅各宾主义的工人阶级”（Thomis, 1970, 174）。

在这个时期，对人民主权、由此对民族主义的肯定，直接导致一些人试图证明不赋予工人阶级以参政权是合理的，理由是他们尚未为此做好准备，这并非偶然。上层阶级甚至愿意牺牲他们的享乐来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性。英国18世纪的贵族文化是“奢华的、田园风味的和喧闹的”，纵容贵族们享受奢侈的娱乐、纵欲和酗酒。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福音派新教会兴起的时期，他们宣扬“生活规律、自律和个人行为的节制”（Evans, 1983, 46）。显贵们开始改变他们自身的行为（稍后作为维多利亚式的生活方式而为人们所习惯），由此使得福音派新教会能够吸引工人阶级皈依，而这无疑成为后者重新融入社会的途径。这种转变在显贵们认为不可能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或降低社会门槛之前就已经完成。

无疑，这种要求是家长式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这仅仅是用一种代价较小的家长制形式代替一种代价更为高昂的形式。在同一时期，伊丽莎白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工资的管理、济贫法）也由于被视为“不合时宜和不切实际的”而被取消：

到英法战争结束时，由法律所认可的家长制管理已经失去其约束力；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由市场力量“客观地”予以维系着。在对关税发起正面攻击之前的10年间，它是新政治经济体制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和能为新时代带来好运的护身符。

（Evans, 1983, 44）

作为推迟赋予参政权——是同人民主权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的一种方式，这种先要重新融入社会的要求、即实现“道德规范”的转变，不仅在涉及英国工人阶级时作为要求被提出，而且在涉及我们今天称之为第三世界或南方国家的卑贱的、危险的阶级时也是这样要求的。同是新教的卫理公会在扩大国内影响上领先于福音派，它是第一个实施（在1787年）“定期海外传教制度”（Halévy, 1949a, 1: 446）的基督教教

派。^[11]这同时也是废奴运动兴起的时期。在英国要求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背后当然有许多经济的，以及人道主义的动机。^[12]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其中所传达的文化讯息。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在1789年提出了第一个议案。此时，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有大量“激进的追随者”，该运动从当时普遍的革命剧变中获益。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掌权“使[英国]废奴主义队伍发生分裂”，使“反革命力量得到动员”，迟滞了废奴运动的进展。10年之后，废奴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一种更多保守主义的氛围下复兴，正是因为它被视为“并不是最紧迫的，是能够进行的最少争议的改革”（Blackburn, 1988, 147, 295）。废奴运动的这种保守主义化可以在英国人对待“从属种族”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得到最好的理解，这种态度的变化正是在此时发生的。正如贝里（Bayly, 1989, 7）注意到的：

在1780年到1820年间，……[在殖民地]亚洲人、欧亚混血人、非洲人，甚至非英国和非清教徒的欧洲人都被广泛地排斥在政府权力之外，而与此同时，英政府采取步骤防止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受到当地腐败现象的侵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亚洲人、非洲人，甚至居于从属地位的欧洲人不断加剧和有意为之的蔑视，部分缘由竟是源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同样的动机推动废除奴隶贸易，并将它视为奴隶解放运动的开端。使奴隶摆脱不拥有社会权利的状态，并使他们融入市民社会，这在道德上是必需的。但如果这样做，那么，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划分就必须既通过制度，又借助于某种意识形态来严密地论证其合理性。这种意识形态源于下述思想，即文化是通过道德意识的觉醒和物质上的改善诸阶段来达到“文明”状态的。在英国，对城市贫困和犯罪阶层的“教化”是一种非常相似规划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由同样的世俗和宗教机构来实施的。^[13]

英国和法国恰恰是这样的两个国家，其相对强的国家机器已经在16

到18世纪之间被创建出来。但这些国家在民众眼中并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而且法国大革命还破坏了它们曾经拥有的合法性。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培植（重新培植、显著增加）这种合法性，由此增强这些国家在国内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

当然，英国和法国两国的经济状况在1815年时并不十分相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

英国一直未受到入侵的威胁，它在生产率、技术和财政实力上都得到了发展。不再是债务国，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债权国。与之相对，经历长期而且耗费巨大的战争，法国——那时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还有一些三心二意的盟友——已经无力再进行海外扩张，并且已经变得不再富有。（Condiffe, 1051, 203）^[14]

无疑，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也结束了英国“在农业、造船和转口贸易方面的不正常〔战时〕的大发展状态”，这些部门陷入了“严重的和长期的萧条之中”（Rostow, 1942, 18）。^[15]尽管如此，但英国却在1815年到1850年期间进一步加大了国内投资力度，实现了罗斯托（Rostow, 1942, 22）称之为“容易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调整。^[16]

英国和它的欧洲大陆诸邻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17]但其后，与法国（与比利时，也许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这种差距开始缩小，以致在1835年到185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它几乎完全消失。^[18]尽管如此，但至少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英国将继续保持它在世界贸易（即同西北欧国家以外地区的贸易）中的支配地位，^[19]它是通过向国外提供资本贷款来维持这种主导地位的。^[20]“海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对英国家庭消费水平所做出的贡献”（O'Brien and Keyder, 1978, 63）从根本上解释了英国在整个19世纪能够维持相比法国而言较高生活水平的原因，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人均国内商品产出量上

大致相同。

因此，将19世纪早期的英国视为“世界工厂”^[21]的传统观点正在遭到某些学者的抨击。早在1934年，达瓦尔（Darvall, 1934, 12）就已经论证：“在1811年，英格兰大体上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家”。^[22]塞缪尔（Samuel, 1977, 19）在大约40年后重新提出了这个命题：

机器取得最全面的胜利是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兰开斯特郡的棉纺织业。在其他地区，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进程是缓慢的，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直到19世纪70年代，蒸汽机几乎根本未产生什么影响……即使在纺织业，机械化的推进也是不平衡的。^[23]

假如相比我们的传统认识，机械化并不是如此的普遍和先进的话，那么英国是如何取得工业的显著增长的？最近的学术研究甚至质疑增长是否如此显著，或至少质疑增长是否如以前学者引导我们相信的那么快（诸如Walther Hoffmann, Phyllis Deane, and W.A.Cole）。通过对1844年人口普查中的职业统计数据重新计算，哈雷（Harley, 1982, 267；也见285）得出结论，这种增长要比他们就1770~1815年这一时期所主张的低了“三分之一”。贝洛赫（1962, 318, 323）坚持认为，英国（也包括法国和美国）在19世纪的年均增长率不到2%。贝洛赫称，我们有关这一时期经济增速较高的印象是“一种明显的夸大”，它缘起于这样一个时期，即在19世纪30年代有关成熟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理论非常有影响，由此导致后来的高估。^[24]

然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危险的，它会无视英国所具有的相对优势。修正主义学派的分析使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具有相对优势，但英国也存在着弱点，因此，即使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对优势的时期，政府也面临诸多政治上的难题。对1815~1873年这一时期的中心区国家而言，

基本的问题是增长导致价格下降，^[25]尤其是工业品价格相对原材料价格的下降（Markovitch, 1966, 228-229）。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生产商在控制成本方面的注意力集中于工资在总价格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他们用压低工资和采用机械化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减少工资成本，并取得成功。事实上，上述做法非常成功。因为这种做法产生了两方面的负面结果，既激起了政治动荡，又导致世界市场上工业品价格的相对下降。只是借助自由主义国家的创建才得以克服这种两难境地，中心区的资本主义生产商能够从国内秩序的恢复和有利贸易条件的出现中获益。自由主义国家运用的主要机制就是将控制成本的中心关注点从国内转向边缘区——该过程体现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殖民扩张上。

但在这种转变发生之前，西欧，尤其是英国还必须忍受通货紧缩带来的困难，从1815年到19世纪40年代末问题尤其严重。以工资为生的工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工资水平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上看都在下降。^[26]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因为“在19世纪前四分之三时期，英国的小麦价格一直在稳定地下降”（Fairlie, 1969, 105）。^[27]

英国的工业家做得更好吗？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们最初相对西欧而言的优势——就像在1815年所具有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优势——到1850年似乎已经逐渐丧失，更别提德国和美国在19世纪下半期的兴起了。英国工业的盈利能力是冒着只能短暂维持的风险取得的。需要其他手段来加以保障，它也确实找到了。如果英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有助于形成某种可以长期维系的经济优势，那么，英国对外投资的显著增长就使优势的长期维系成为可能。“这是英国19世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在国际事务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Imlah, 1952, 222）。

当然，法国——尤其是对工业家而言——似乎处于更艰难的境地。

诚然，法国确实拥有一些优势。它的技术教育——这要感谢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发展举措——享有盛名，被认为是19世纪上半期世界上最好的。它能够输出技术知识和商业秘诀（Cameron, 1957a, 245-246; 1961）。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工业基础确实在稳定地扩展。尽管如此，但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认为法国的工业化，以及它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受到人口增长缓慢、受到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占尤其大比重的阻滞。^[28]奈（Nye, 1987, 650, 668）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论证，企业的小规模事实上是“对当时经济状况的合理反应，绝没有阻碍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因为“根据任何标准来衡量，当时的规模收益都是非常低的”。基尔（Gille, 1959b, 163）论证，存在着一些比人们一直认为的规模更大的企业。他认为，法国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时间恰恰就是在1815~1848年这一时期。

不过，在有关世界经济中的自由贸易这个关键问题上，英国和法国难道不是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吗？答案并不像我们一直被引导相信的那样明显。首先，

1815年，英国仍然是一个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国，国家在管理对外贸易和实施海外扩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关税保护不仅涉及农业、而且涉及英国不断增长的制造业。对熟练劳动力移民海外和机器出口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第二，除了政府保护之外，英国的产业内部“充斥着价格操纵或类似的安排，这些操纵通常只是在地区层面上进行，但有时是在全国范围实施的”（Cain, 1980, 20）。第三，英国的工业家、包括那些在曼彻斯特的工业家，在赞同自由贸易上绝非是立场明确的。迟至19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仍被视为是〔同其他国家〕商战中的一种工具。当它似乎不能满足〔赢得这场贸易战的要求〕时，它是不会得到支持的”（Evans, 1983, 20）。^[29]

最后，伊姆拉（1949，307-309）评论说，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它存在的最后时期产生了“最坏的影响”：

相比以前英国工业化的初期，贸易保护主义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在前一时期它几乎建构了一个新的体系.....

考察实际的〔而不是“官方的”〕量值，英国的关税在18世纪末时是非常适中的.....紧迫的问题是增加收入〔这解释了关税在19世纪初的大幅提高〕。

伊姆拉论证道，这些关税产生了如此严重的不利影响，以致由于进口的明显减少，影响到潜在买主的购买力。因为，国际贸易对英国的经济健康而言已经具有了本质的重要性，所以她的“财政体制〔正在使〕她的国际经济失去平衡”。^[30]

也许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内容只是做做样子，确实并不是全都严格执行的。^[31]但是，它损害了自由贸易在英国政策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形象，至少在1850年之前是如此；尤其是当我们对照法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而不是从理论上来谈时。在1800~1840年的整个时期，法国的关税税率事实上要比英国“低得多”，尽管人们的印象与此相反。奈（1991，25；26，表1；42）从三方面解释了这种错误印象产生的原因：一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废除谷物法；二是一些分析家只考察了某些产业，而未考察作为整体的经济的发展模式；三是英国人喜欢谈论自由贸易，而法国人则喜欢谈论贸易保护主义，即使在拿破仑三世时期也是如此。奈指出，但事实上，“传统的有关自由贸易的历史记述将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同一个实行贸易保护的法国相对照，后者是被勉强拖入一个实行更进步商业政策的世界中的。但从目前看到，这肯定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伊姆拉本人就非常相信自由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正是根据自由贸易的相对缺乏，他解释了（1958，123）英国在这

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不顺利：

从许多方面看，19世纪上半期应该是英国贸易顺利发展的时期。她越来越多地实现机械化的产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她的煤炭和机械行业开发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这两个产业在1825年以后都可以更自由地出口产品，她的商船提供商业服务的潜力，以及对她所拥有资本的需求，所有这些创造出的发展机遇在整个经济史中都是无与伦比的。但在战后时期实行高度贸易保护政策的背景下，这个机遇最终并没有被抓住。^[32]

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做这种错误的对比^[33]构成我们评估另一种修正主义论点的背景，这种论点是有关法国工业化进程推进缓慢的假设，^[34]或者说有关法国“起飞较晚”的论断。^[35]奥布莱恩和凯德（O'Brien and Keyder, 1978）对1781~1913年这一时期的英国和法国做了一系列的比较，发现如下：人均国内商品产出大体相等。法国的工资水平明显更低些，但因为那里以工资为生的工人很少，所以就平均收入水平而言，这并不能向我们展示什么。英国的劳动生产率要更高些，但这由法国潜在劳动力的更大份额被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所抵消。^[36]英国的农业生产率同样更高些，但作者不是将之归结为更高的生产效率，而是归结为更优质的土地和更多的土地被用于集约化畜牧业生产。^[37]在工业方面，法国的劳动生产率要更高些，英国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赶上法国，尽管后者的工业生产规模较小。奥布莱恩和凯德（1978，198）批判了任何有关法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观点，认为它选择的经济道路无疑是不同的，但同样是理性的；事实上，他们更进一步指出，他们“倾向于将法国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视为是更人道的，而且也许是同样有效率的”。^[38]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即使那些希望坚持英国处于“优势地位”的学者（像克鲁泽）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只有“细微差别”，并坚称法国在19世纪

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可信的，但并不是更突出的”。^[39]克拉夫茨（Crafts, 1984, 59, 67）试图证明：“修正主义〔对法国在19世纪经济绩效〕的解释夸大了法国的成就。”尽管如此，但在表明了他的保留意见之后，他似乎被迫得出结论：“即使上述所有论点都被认可，但法国的经济绩效似乎比人们一度认为的要好得多，这是真实的。”^[40]

就像在1815年所做的那样，英国和法国都试图将全世界的资本积累集中于他们的边界之内，但他们能够这样做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他们各自工业企业的实力。同样也取决于他们抑制劳动力成本、确保稳定的外部供应和为他们的产品获得充足市场的能力。这与其说是提高他们各自的经济效率——在世界范围内两国的经济效率已经是非常高了——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任务。因此，国家发挥的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但国家权力的运用却是非常微妙的，因为它既能确保优势，也能产生破坏作用。所以，必须合理地控制、使用和指导国家的运作。下一个60年的政治，就是以促使国家的作用“合理化”这一努力为中心——也就是说，优化国家结构以使“国民财富”增加，尤其是在边界内积累资本的可能性最大化。

这个过程是从国家间层面开始的。从1814年9月18日到1815年6月9日，欧洲的君主和外长们齐聚维也纳，试图就他们怎样实现欧洲的和平——他们认为这将决定欧洲的命运——做出决定。它将被称为“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在这个漫长的秘密会议的中途，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并恢复王位“100天”，但接着在1815年6月8日的滑铁卢被最终彻底打败。相比战争而言，人们总是对和平更难达成一致。它的目标是更长期的，也涉及更多方面；因此，它们往往会造成决策者之间的分歧。只有英国一直同法国处于对抗状态（从拿破仑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已经开始）。而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立场在战争期间变化无常。因此，英国成为长达23年的一系列战争（也许最好被视为一场战争），以及长达150年的争夺世界体系霸权斗争的主要胜利者。她有充分的理

由镇定自若、使竞争对手保持均势、同时维持自身的强势地位。当然，她必须确定法国不可能再重新崛起以挑战她的地位。但在拿破仑百日复位失败后，这似乎已不再构成一个大的问题。也许更令卡斯尔雷勋爵挂怀的是如何阻止其他三个大国过度扩张他们的权力，尤其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英国的政治世界观——当然，同她的经济利益也不完全相同。

一方面，既然法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削弱，那么，英国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俄国的军事力量和可能的扩张野心。用20世纪的话语来表述，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尽管事实上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军事对抗的实际可能性。^[41]卡斯尔雷勋爵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在建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他遇到的一位真正对手是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后者熟稔外交之术，并且作为东方三巨头——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抗衡英国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共识的代表。亨利·基辛格（1973，5）的评价是，尽管是卡斯尔雷“通过谈判达成了国际和解”，但却是梅特涅“使它具有了合法性”：

为了确保英国作为岛国的安全，卡斯尔雷倾向于只反对公开的入侵。但作为一个地处欧洲中部大国的政治家，梅特涅则首先试图确保社会稳定。^[42]

我本人认为，梅特涅试图强加给国际社会某种形式的合法性，而它确实不对英国的口味，事实上最终还是英国占了上风。总之，很快就变得明显的是，梅特涅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43]

不过，很明显，恢复法国的某种地位有利于英国的直接利益（更别提她的长期战略了），它能够作为政治-外交斗争中的潜在盟友（即使法国偶尔也会抱怨作为小兄弟的角色）。确实，人们也许会论证法国才是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受益者，因为“后拿破仑时代和平解决方案最显著的特征无疑是对战败国的宽大处理”（Schenk，1947，45）。^[44]这通常

被归因于——有一些合理性——塔列朗（Talleyrand）的聪明才智。不过，绝不应低估英国认识能力所起的作用，她认识到应当采取措施来稳定法国在拿破仑之后的政权。一份〔由M.加拉斯（Gallars）〕写于1816年4月的秘密报告被呈送给在巴黎的英国大使〔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Sir Charles Stuart）〕，又依次呈送给卡斯雷尔，该报告确切地表明了英国人的忧虑所在：

由革命所引发的动荡仍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因为政权长期由卑鄙的人掌握，已经失去了它的威严，而这是信任与尊重的基础所在；……因为宗教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那个缺乏适当教育的阶级的控制，所以他们并不了解道德法则，也不可能由于担心下地狱和上绞架而受到震慑。（Cited by Schenk, 1947, 49）

正是出于这些担忧，英国人——甚至像威灵顿这样的激进托利党人——也赞同路易十八周围持更温和立场的顾问的建议，因为担心太过保守的药剂将会为“病人”所拒绝，由此他也许会“重新陷入过去进行左派革命的幻想中”（Schenk, 1947, 130-131）。^[45]英国所能做的与其说是进一步提高路易十八的权威，不如说是恢复法国的外交地位。

事实上，法国地位的恢复有助于提高英国行使其霸权的能力。卡斯尔雷尔有点过于简单化的法则——尼科尔森（Nicolson, 1946, 155）提及他梦想中的“理想平衡，几乎可以根据人口和军事力量而由数学计算得出”——最终由塔列朗的“更具现实可行性的观念”予以了改善，变得更为温和，使塔列朗（由此也使英国人）能够“理智、灵活和迅速地”应对这个世界。由此法国被允许进入核心集团。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打造的所谓的“四国同盟”被1818年在亚琛（Aix-la-Chapelle）打造的“五国同盟”（或五巨头政治）所取代。正如杜朴斯（Dupuis, 1909, 165）所表明的，这改变了一切：

法国进入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Directory）似乎增加了后者的实力和权威；但事实上，它削弱了它们的力量……伴随着法国威胁的逐渐消失而成为有关过去的模糊记忆；现在各国更容易表达不同的观点或追求相互矛盾的利益。^[46]

梅特涅的规划当然非常不同于英国的设计。1815年9月，三位“东方”^[47]君主签署了一份文件，即著名的神圣同盟，他们承诺共同努力以维持欧洲现状，如果必要的话，将对那些受到革命威胁的国家实施干预。^[48]英国并不在签约国之列。摄政王以下述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即根据宪法，他需要一位大臣与他共同签署。他本人对签署这样一份“神圣的文件”感到满意。卡斯尔雷拒绝该文件在他的政府通过所基于的理由是，它是“一份充满神秘色彩和无稽之谈的文件”（Weigall, 1987, 111; see also Ruggiero, 1959, 93）。但梅特涅绝非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只是真正相信旧制度的优越性，这能够从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看到，其中他讨论了发生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变革运动：

在所有这4个国家中，被煽动起来叛乱的阶级主要是由富人组成，真正的国际化眼光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个人利益，但这是以原有的各种秩序被打破为代价的，即以领薪国家官员、文人、律师和饱受公共教育的个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邪恶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傲慢。（Cited from 3: 465, 467, in Boyle, 1966, 832-833）

英国已经强大到可以不去理会这种傲慢。“当卡斯尔雷反对革命时，它不是像梅特涅认为的那样，因为它是‘不合自然规律的’，而是因为它是令人不安的”（Kissinger, 1973, 32, 35）。他继续指出：“革命尽管是不合意的，但[对他而言]却不构成一种实际的威胁”。英国认为，对它“唯一重要的扩张主义利益”——即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利益——而言，似乎尚不存在什么障碍（Hobsbawm, 1962, 134）。盖什

（Gash, 1979, 282）称英国为“一个已经得到满足的强国”。因此，它寻求——而且有充分的能力仅仅去寻求——“不纠缠其中的影响力”（Evans, 1983, 196-203）。^[49]借助于“颇为实用的和平主义政策”（Polanyi, 1957, 5），英国“知道如何从她所具有的优势中获得最大收益”（Renouvin, 1954, 131）。

达成这种目标的途径是不仅仅专注于发展世界商业，而且要成为其他国家公债的购买者。这种公债的买卖大体上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垄断的，长达一个世代，而且往往成为“支持革命、而不是正统性的贷款”——即对拉丁美洲、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贷款。因此，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债买卖“是政治理想主义和商业策略某种结合的产物，而这在当时的英国是公共舆论的基调所在”。依次地，这些公债买卖所获得的债券（在1815年到1830年之间达到大约750000镑）代表了一种“资产的积累，它们很容易在海外转让”，被证明是可以用于“为谷物贸易提供资金”的通货（Jenks, 1927, 44-45, 61-62）。^[50]

世界体系中的霸权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除非大后方是稳固的，就像1815年的英国处于困境中那样。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扩张的城市和工业区，以及战后的严重萧条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各种社会弊病的总爆发，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将它们控制住”（Gash, 1979, 2）。政府在预算上的主要选择是在下述两个方面之间做出的，要么是强调减少支出——包括社会支出——和最大限度地开放经济，要么是实行更为谨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后者是由执政的托利党的大多数支持者倡导的。“事实上，[政府]在两种对立的政策之间摇摆不定”（Halévy, 1949b, 46）。^[51]

尽管这是所谓的托利党反动时期，但英国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相对“开明的”，尽管它有时是不情愿的。可以肯定，托利主义强调“社会的和谐意识”（Brock, 1941, 35）。^[52]问题是就实际而言这

意味着什么。阿勒维（1949a, 199）认为，考虑到各个方面，托利党反动时期并无任何重要性可言。托利党领导人所利用的政治情感——以及经常挂在嘴边的流行语——在基本点上同60年前构成辉格党纲领的那些情感和口头禅并没有什么不同。^[53]布罗克（1941, 35, 76）将守旧的或极端的托利党人——他们抵制任何的改革——被边缘化的时间追溯到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组建内阁期间（1812~1827年，但尤其是在1822年之后它重组内阁期间）。他称这届内阁为“那些19世纪诸届政府中的第一个，如果不称其为进行‘改革’的话，那也肯定可以称其为进行‘改良’的政府”。^[54]与其说保守主义者认为改良应该是缓慢的，不如说他们认为改良不应该被有意识地计划或理性地构想；它应该简单地作为聪明人所达成的默契共识而发生。^[55]

这样一种策略面对的直接问题在于，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阶级的耐心有时被证明是有限度的。在社会动荡时期，很难实施作为默契共识的改良。因此，在英国能够启动这种改良之前，政府感到，他们需要将对动荡置于控制之下，他们选择的路径是镇压。战争年代也并不是没有对社会骚乱的镇压，从18世纪90年代对英国雅各宾派的镇压（see Thompson, 1997），到1811~1812年对卢德分子的镇压。1815年，和平导致谷物法被通过，但这引起了争议（1846年爆发的暴乱正是要废除那些法律）。这些法律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请愿运动”（Stevenson, 1979, 190）。^[56]1817年，由手工织机织工发起的所谓的彭特里奇起义（the Pentrich Rising）——不太像一次革命，但在那时对许多人而言它似乎是革命——导致人身保护法被暂停实施，起义领袖被绞死。^[57]1819年8月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大约6万名曼彻斯特人举行群众集会——接着在伯明翰、利兹和伦敦举行了类似集会——引发了慌乱的反应，后来被称为彼得卢大屠杀（the Peterloo Massacre）（这出遭遇惨败的讽刺剧已被无可挽回地记录在历史教科书中）。作为对自身混乱的反应，政府制造了“十一名烈士”和通过了6条法案，同时增加了军队编制的规模（1万人的陆军和2千人的海军）（see Read, 1958,

186-188)。[58]最后，1820年2月，阴谋杀害全部内阁成员的凯托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被政府密探揭露，5个人被绞死。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呢？布罗克（1941，1）主张，它“仍然处于19世纪的这样一个时期，即有可能爆发革命的时期”。[59]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相反，就“革命威胁”而言，托米斯和霍尔特（Thomis and Holt，1979，124）得出结论认为，它留给我们“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没有中间阶级参与的纯工人阶级运动”所具有的“软弱性”。[60]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人们都能够同意怀特（1973，192）的看法，作为结果，“伴随着彼得卢大屠杀和摄政制在英国的不得人心，议会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聪明人所达成的默契共识在于，镇压与之后的改革相结合（不是唯有如此而无其他选择）是对长期政治稳定的最好保证。

当人们记起这种社会动荡并非只是在英国发生时，它就会变得更清楚。在1819~1820年，动荡在整个欧洲发生。在1820年的特拉波会议上，梅特涅力促对那不勒斯和西班牙进行干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内阁正式拒绝了这个提议，尽管托利党的支持者对梅特涅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自身“在控制人民群众上”也有不安全感（Webster，1925，176-177）。更冷静的头脑会明白，那一天已经到来，是时候从镇压改为改革、或至少是改良了。

从许多方面看，战后萧条引发的群众不满，最初在法国要比英国轻一些。也许正是这一事实解释了法国人如此沉溺于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造的原因。也许是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遗产使然，尽管法国此时被假设正在经历一个复辟时期。也许正是要限制“极端保守派”集团发展的更大需要，加快了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发展的步伐。最重要的，也许正是“极端保守派”的过度傲慢，分散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甚至有人认为，拿破仑也许就是那个启动改革的人。在百日复位期间，他“改信自由主义”。面对宣称要制定一部自由主义宪法的路易十

八，他在滑铁卢战役之前的两个星期告诉上院：“我要开启立宪君主制的时代”（Suel, 1953, 180）。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返巴黎“像救世主式的重新君临法国”后实际所实施的，掩盖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形象，重新确立了他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他由此确保了一种遗产能够传承下来。“在19世纪早期主导革命传统的三个国家——法国、意大利和波兰——正是那些对拿破仑的崇拜获得最大发展的国家”（Billington, 1980, 129）。

1814年，国王路易十八对其王位的稳固性尚不放心，寻求中间派的支持。路易十八不希望在原则上做出让步承认人民统治的观念，作为替代，他发布宪章保障“人民”从革命中获得的大量权益：法律、税收和兵役面前人人平等；言论和宗教自由（尽管天主教再次被定为国教）；继续实行拿破仑的民法典；在旧体制下授予的爵位和地位继续保留；保障在革命过程中被没收和出售的财产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是，继续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当然，在这种妥协中的一个要素是基于如下事实，从政治上看，第一次复辟在拿破仑诸多主要支持者的默许下得以实现，他们以此换得自己继续保留原来的职位（see Zeldin, 1959, 41）。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尽管同样是在百日复位中同国王达成妥协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此后在第二次复辟的白色恐怖中却被清洗——有的还被绞死，然而宪章仍然保持不变。这明显反映出宪章的制定并不仅仅是一种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安排，而是一种政治选择。

令国王感到沮丧的是，第一次议会选举带来的是一次极端保皇分子——德·梅斯特勒、博纳尔（Bonald）和夏多布里昂的信徒们——的集会。一年之内，忠于国王意旨的“中间派”发现自身已经变成议会中的少数派。法国陷入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状况。其中极端保皇分子支持“将传统变为一种制度，并作为政策提出”。^[61]而君主制是该传统的一个支柱，这种传统同这种传统支柱的体现者之间出现了矛盾。国王解散了这届议会，试图组建一届更听他话的议会。但斗争一直持续到1824

年，伴随着路易十八的兄弟查理十世继位，极端保皇分子的势力得到了重大的提升。不过，这次明确的右转直接导致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

创建自由主义国家的决定性的和最后的斗争不是在英国——在那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到18世纪20年代，甚至在托利党统治时期就已经取得了胜利——而是在法国进行的。在法国，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在复辟时期进行了不间断的和不妥协的斗争，以实现他们认为驱逐拿破仑就应该已经表明的东西：恢复贵族的特权和教会的特权——即按照他们的观点，“消灭平等！”（Elton, 1923, 103）因此，当他们发现自身处于这样一位国王——他希望理性地和温和地进行统治，即处于中间派的立场，因为他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疏导民众的感情，这种情感已经不可能再作为不值得关注的东西而简单地予以忽视——的权威之下时，王权拥护者转而反对国王，由此而反对传统。1817年，博纳尔（cited in Mellon, 1958, 102-103）已经清楚地观察到正在发生的情况：

我们称自己为保皇党人，我们需要根据正统性确认的王权；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该像反法同盟者那样在某个地方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被宽恕——甚至赞扬。因为，正是由于我们认为王权正在反对正统性，所以我们反对王权本身是正确的。^[62]

正统王权拥护者自讨毁灭。一方面，他们逐渐支持一种独裁主义国家，这同支持一种专制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因为它暗示一种民粹主义的——或至少是反精英主义的——基调。^[63]与此同时，“他们对绝对君主制和神权〔他们努力反对王权〕的依恋使他们反对立宪君主制，变成为议会的坚决支持者”（Ruggiero, 1959, 174）。^[64]更糟的是，他们转而支持扩大投票权，认为中间派的选票能够被作为“传统拥护者”的农民的选票所抵消。这样做，他们进一步强调了议会的作用。路易·勃朗（Louis Blanc）在写于1841年的著作（1：73）中明确指出：

议会在1815年的作为对历史的意义何在？他们的作为确实成了他们的遗产。正是他们宣布了立法机构具有绝对主权的信条。因此，正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一个三段论打下了基础。从这个三段论中可以推断出，经过15年的斗争后，1830年代表了所得出的结论…… [路易十八解散议会的结果是] 那些称自己为极端保皇分子的人是沮丧的，而那些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却是鼓掌欢呼。但应该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

因此，正是这些同样的正统王权拥护者到1840年时正在组建法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对此不应感到奇怪。

正统王权拥护者给自由主义者开辟了道路，让他们能够使大革命（甚至拿破仑）适合于真正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使自身同大革命过于民主的基调分割开来。^[65]基佐^[66]和其他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孚雷使该论题在20世纪末重新流行）指出，大革命是合乎道德的，但由于偏离了它最初的自由主义初衷而误入歧途。然而“就已制定的宪章而言，有可能得出结论——大革命已经结束，而且已经取得胜利”。以那种方式，“自由主义者变成了真正的保皇分子，而极端保皇分子却成了真正的革命者”（Mellon, 1958, 47）。^[67]梅隆称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为“欧洲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此，自由主义者变得非激进化，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其他人的意识中，他们已经同“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自由主义变成了一个同温和立场相联系的词汇。^[68]“通过在语义上变为对1789年之后法国所取得的各项‘成就’的一般修饰语，该词汇失去了它的党派含义”（Marichal, 1956, 293）。由此，它能够从代表反对拿破仑专制统治的含义转变为保留从拿破仑那里获得经验的含义：

作为政府实践的自由主义源于同拿破仑政府相同的基质，在选举代表上有一种实际上受到限制的例外，以阻止专断统治

的出现。像拿破仑政府的官员一样，自由主义者确信他们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体现，有利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宣布将理性和功利主义原则作为一种优良和公平的政府的基础。在拿破仑政治实践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连续性突出地表现在，为前帝国行政官员辩护，而强烈反对某些复辟时期君主有关维护正统王权的要求；同时表现在，他们都承认统计方法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Woolf, 1991, 242）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一旦自由主义退去它激进的外衣，它就走上了专家治国的改良主义道路。对那时的英国政府而言，需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货币问题。事实上，库克·泰勒（W.Cooke Taylor）在1815年指出，英国在1815年之后有三个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现金、谷物和天主教”——但注意他将现金放在首位。1797年，因为源于战时支出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和孱弱的军事地位，皮特（Pitt）“暂时”中止了以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做“现金支付”，以此来保留它的黄金储备，^[69]同时，这“引发了持续长达3/4世纪还多的论战”（Fetter, 1965, 1）。更确切地说，是引发了两场论战。恢复硬币支付标志着所谓有关金本位的论战达到高潮，这依次又导致第二场论战，即在所谓的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之间的论战。^[70]主张实施金本位的人对1809~1810年通货膨胀的压力感到恐慌，他们将此归因于纸币的过度发行；他们鼓吹实施自由兑换政策。反对实施金本位的人论证，问题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来加以解决，因为它是战时各种极端困难导致的结果，将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双方达成的妥协是推迟恢复硬币支付，直到和平来临。不过，当和平到来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对任何紧缩信贷的做法都会招致强大的反对声音，而恢复硬币支付就等于紧缩信贷。^[71]正是主要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两者之间的争论，前者（诸如从事棉纺织业的主要企业家）强调实施金本位制将会提高英国外汇的地位，后者对能否维持农产品价格感到担忧，^[72]他们不仅包括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也包括平民（the little man）。^[73]

当彼得卢大屠杀表明政府的强硬支柱是哪个阶级时，应该赋予“平民”以什么样的地位就成为愈来愈多地吸引英国公众关注的问题。很清楚，民众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现有的救济制度明显不足以阻止工人阶级“诉诸骚乱手段”以达成自己的目的（Darvall, 1934, 199）。^[74]尽管有彼得卢大屠杀试图震慑、而且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震慑住了工人阶级的事实，但统治阶级仍然对他们增加了的社会力量感到担忧。

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比辉格党和托利党、或甚至激进派和保守派的说法要更确切）并非就是否存在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的，而是就如何能够最好地加以解决展开的。自由主义者指望将权力授予专家的立法，而保守主义者则期待被称为“利益集团”的模糊实体。^[75]尽管如此，但却是托利党政府在1817年开始运用立法方法——尽管是缩手缩脚地，那一年，政府颁布了穷人就业法案（the Poor Employment Act），提供修筑运河、道路和桥梁方面的工作。该法案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新起点”，因为它“含蓄地承认”政府有义务在萧条时期帮助“平民”（Flinn, 1961, 92）。^[76]对这种缩手缩脚的立法尝试，我们还必须补充像安抚卫理公会派、向外移民和帝国等因素。新教各教派在确保英国政治稳定中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77]威尔莫·霍顿（Wilmot Horton）建议通过鼓励移民来解决贫困问题，这被称为一种“将穷人逐出国门”的政策。^[78]对外移民依次又同帝国相联系。

在紧接着1815年之后的时期，英国政策的基调似乎是谨慎为之。他们对取消贸易保护主义持谨慎态度，对恢复硬币制度持谨慎态度，对殖民地和重商主义体制同样持谨慎态度。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原则上对帝国持反对态度，^[79]但对任何“突然推翻现存体制的做法”却持反对意见。这里像其他各处一样，自由主义者两面下注以避免损失。他们赞成自由市场，但不能以资本积累的损失为代价。变化终将发生，尽管“对自由贸易论者而言，它似乎是旧制度——像查理二世时的——由于不合

理而行将灭亡”（Schuyler, 1945, 103）。

自由主义者甚至在他们对殖民地的看法上也保持谨慎。一般而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利润下降感到非常担忧。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得出结论，殖民地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可获利投资机会不足的问题。尽管同意对李嘉图的批评，但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cited in Winch, 1963, 398）确实承认：“如果殖民地对英国而言在经济上是必需的话，那么它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80]韦克菲尔德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的帝国观”，为有效率的和自给自足的殖民地提供了一种真正功利主义式的辩护。^[81]因此，在摄政时期帝国的殖民地确实不同于较早期的殖民地，正如哈罗（Harlow, 1953）所论证的那样。它们变成了“社会变革向海外的一种扩展，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Bayly, 1989, 252-253）。^[82]

对英国而言，社会变革向海外的扩展实际意味着，当某地成为英国经济所必需的时候，它就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当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对英国有用时，它就被非殖民化。对岛国的人民——他们并没有拿破仑那种世界主义的自负——而言，世界突然变成了他们的俎上肉：“从1815年以来，英国人蜂拥至全球各地”——作为游客、作为移民、作为殖民者、作为浪漫主义的革命支持者（Halévy, 1949b, 126-127）。^[83]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对拉丁美洲殖民者的独立运动既鼓励、又犹豫不决之后，英国最终于1823年决定同西班牙——它派遣部队到那里镇压这些运动——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对抗；这被视为这场斗争中的决定性时刻。^[84]英国已经准备好在那里作战，不像它在1820年还没有做好准备为反对法国干预西班牙本土而战那样。^[85]当然，这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霸权，这样一种霸权如何才能加以维系——通过制造它预料将不会引起众怒的潜在威胁，而且知道把握这种威胁不足以引起别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的火候。^[86]由此，成功地迫使欧洲国家保持无所事事的状态，“坎宁最终在南美洲各国赢得了最多的赞誉”（Temperley, 1925b,

53)。与此同时，英国也获得了自由倡导者的地位，尽管很明显是经济私利在发挥作用。

在一定限度内，英国愿意在支持独立运动上发挥作用，这也包括巴尔干地区/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在希腊问题上。在英国，公众舆论在蔑视独裁政权——这种政权被视为非常不文明的——和谨慎地希望不过多地牵涉其中之间产生分歧。“施加影响，但又不牵涉其中”，这是埃文斯（1983，chap.21）描述这一时期英国在欧洲外交政策的目标。不过，另一种描述这些目标的方式是说，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神圣同盟陷入困境而慢慢地蚕食它，因为它所奉行的原则大多已经站不住脚。希腊问题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希腊革命继1820~1822年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而发生，实际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就其他国家的革命而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被动地”不赞成干预。不过，希腊的起义有其特殊性，它是基督教徒反对一个穆斯林帝国的起义，尤其是一次正统基督教徒的起义。梅特涅也许尚能保持镇定，但俄国的沙皇们却很难如此。尽管亚历山大对此犹豫不决，但1825年继位的尼古拉却已经准备同英国、接着同法国联合强行解决这一问题。^[87]不过，该问题只是到1830年才最终完全解决。

一方面，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希腊起义被认为是激进分子的事业：

希腊……已经成为激励国际自由主义和“支持希腊独立运动”采取行动的目标，包括有组织地支持希腊的运动，许多自愿到希腊参战的战士已经启程。希腊在19世纪20年代团结欧洲左翼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所起的作用（Hobsbawm，1962，145）。^[88]

但另一方面，希腊民族主义也被作为一种工具，英国政府能够利用它来破坏残存的神圣同盟。如果说在1822年仍然是“狰狞的怪物”的话，到1827年神圣同盟就已经变成一种“被人们所蔑视的东

西”（Temperley, 1925a, 474），这主要是因为希腊革命。“导致〔神圣同盟〕走向灭亡的主要设计者是乔治·坎宁”（Weill, 1931, 68）。^[89]

希腊革命所发挥作用的两面性——既作为造成稍后“民族国家全盛期”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原型，又作为英国强化它对世界经济霸权控制所做斗争的工具；由此，既是激进分子的神话，又作为托利党进行巧妙调度的借口——恰恰反映出浪漫主义的两面性。希腊已经成为启发欧洲浪漫主义灵感的主要来源，正如欧洲真正的古典主义者赞美古希腊的理性那样。浪漫主义“在1780年到1830年之间走向成熟”。它很自然地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因为浪漫主义必须同“创造一种不同于它的直接先行者所设想的新社会”相关联（Barzun, 1943, 52）。因此，它是个体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富于诗情画意的。它支持想象力的充分解放。正是因为它希望想象力的解放，所以否认现实的诸多限制。但与此同时，它“也赞美过去、依恋旧传统、对那些时代感到好奇，即人们创作了朴素自然诗歌——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这些诗歌尽管稍显幼稚，但却是真诚而自然的”（Weill, 1930, 215）。

所以，尽管浪漫主义包含着自然的一面，由此能够支持革命，但它强烈反对革命中的任何普适主义论调，尤其是当这表现为拿破仑将普适性方案强加给不情愿的民族时。^[90]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像布朗基（Blanqui）这样一位激进的理性主义者就将浪漫主义者视为敌人。当布朗基——19世纪伟大的实践革命家——结束了在1830年革命中的战斗后，他闯进了他所工作的报社的编辑部。站在门口，他挥舞着来复枪，以年轻人的热情对着坐在那里的老编辑们大喊道：“完蛋了，你们这些浪漫主义者！”——“革命消灭了浪漫主义”。对他而言，他刚刚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的大革命主要并不是共和国工人对压迫他们的人的胜利；他首先想到的是，夏多布里昂那种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做派、对中世纪的理想化、伪劣的哥特式风格和对封建制

度的追捧，现在都将消失，而让位于一种更纯粹的古典风格，它将比照罗马共和国的贵族传统在文学、戏剧和建筑方面重塑自身。（Postgate, 1974, 97）

尽管如此，但巴尔赞（1961, xxi）指出：“浪漫主义是民粹主义.....甚至当像司各特（Scott）或卡莱尔（Carlyle）这样的浪漫主义者鼓吹封建制度时也是如此”。也许霍布斯鲍姆（1962, 306）最好地把握住了它的总体基调：

尽管浪漫主义究竟代表什么绝非是清楚的，但它反对什么却是非常明显的：它反对中间立场。不管它的纲领为何，它都是一种极端主义信条。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被发现处于极左立场.....，极右立场.....，从左跳转到右.....，但很少有属于温和派、或辉格党-自由派的，即持理性主义中间派立场，后者确实是“古典主义”的根据地所在。^[91]

那么，根据这种非常具有弹性的概念，希腊将被置于何种地位上呢？这里，贝尔纳 [Bernal, 1987, 1991] 对欧洲起源的谱系进行概念化研究的著作是重要的。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已经将埃及——而不是将希腊——视为“最初的和富有创造力的来源”，埃及和中国“在 [他们的] 哲学和科学，但尤其是在 [他们的] 政治制度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Bernal, 1987, 16）。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这个时间点，由浪漫主义思想家引领，关注点才转向希腊：

到18世纪末，“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范式。人们更看重动力和变革，而不是稳定；世界开始被视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如此，但空间对浪漫主义者而言仍然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关注民族或“种族”的当地形态.....真正的沟通不再被视为是通过理性发生的，它能够传达到所有理性的人。目前它被视为是通过情感交

流的，只能传递到那些由于亲属或“血缘”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并拥有某种共同“传统”的人。（Bernal, 1987, 28）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将埃及从欧洲起源的谱系中去除。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而言，认为“希腊——不仅被视为欧洲的原型，而且被视为它的纯真童年——可能是土著欧洲人同在此殖民的非洲人和闪族人杂交的结果”，这是不能容忍的（Bernal, 1987, 28）。希腊代表着——被建构成象征着——欧洲和外部世界（东方世界、野蛮地区）之间的界线。在“欧洲影响的”地区（尤其是如果在对抗一个非基督教帝国时），民族主义是合意的，甚至是理想的。因此，在拉丁美洲的白人殖民者和希腊人在反对“独裁统治”时都可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但这与像印度那样遥远地区所发生的类似举动无关。

浪漫主义更具保守性和更具革命性的不同形式是和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相联系的。从时间方面看，为反对大革命—拿破仑时期的普适主义孕育而生的那种浪漫主义在较早期和中心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大约在1830年，它在意大利、德国和波兰——步希腊的后尘——让位于一种“主张进步的浪漫主义”，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种重要因素”（Renouvin, 1954, 19）。但在中心区、尤其是在英国，它仍然等同于“传统，等同于维系教会和国家的权威”，同它在大陆国家所具有的“革命或半革命性”相对立（Seton-Waston, 1937, 40）。

浪漫主义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霸权。它对神圣同盟起了破坏作用，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后者是非常理性主义的和主张普适价值的。它损害了大革命—拿破仑传统的声誉。它鼓励欧洲（和美洲）地缘政治空间的重组，以服务于英国的直接经济利益和它维持与加强霸权统治的能力。它在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具有正当性做了基本论证——这些对1789年以后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建构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它是一种不精密的学

说，不可能一直处于英国的掌控之下。因此，浪漫主义最终也在导致英国霸权统治解体中发挥了作用。但是直到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这种统治为经济和政治的转型所破坏时，它才发挥了上述作用。

法国国内的演进同这种宏大的发展模式相一致，这对英国非常有利。正如在英国那样——因此也像在法国那样，1815年以后的时期“既未给工人阶级带来繁荣发展、也未给他们带来富裕”，而是带来失业，这种状况又由于国内向大的中心城市的移民而变得更加恶化（Ponteil, 1968, 285）。^[92]从社会方面看，工人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悬殊巨大。^[93]工人的组织权利被严格地限定为只能组织互济会，而且是在警察的监视之下。^[94]1817年在里昂发生了工人骚乱，在骚乱中工人打出了三色旗（the tricolorcockard），罗讷省的省长将该事件归因于有关英格兰暴动（以及美洲的起义和里斯本的密谋）的新闻报道的不良影响。^[95]尽管如此，但像基佐这样一位自由主义者在1820年仍然能够说：“对获得群众支持，我并不感到绝望，尤其是就政治制度而言”。^[96]

不过，19世纪20年代中期是政治进程中一个严重动荡的时期。就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守主义在英国取得统治地位时，由于国王的意外早亡，查理十世于1824年登上法国王位，开始实施极端反动的政策。这导致同英国关系紧张，在国内甚至同享有选举权的集团（payslégal）的大部分人关系紧张，同工人阶级关系紧张。此外，查理十世继位时正赶上一个经济衰退期，这个衰退期开始于1825年，到1829年已变得非常严重。政治僵化同经济困难相结合倾向于产生爆炸性后果，直接为1830年革命创造了条件（see Bourgin, 1947, 203; and Gonnet, 1955, 250-280）。

查理十世不是设法缓和他实施的政策，安抚某些不满者，而是更加专横地行使他的权力。^[97]当221名下院议员鼓足勇气要求他发表一次公开讲话，请他尊重立法机构的权力时，他——正确地——将这种做法视

为是要维护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则，正像路易十八制定的宪章也要维护这种原则一样。但他驳回了恳请。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查理十世最后的机会。“如果说在1830年有一场革命要爆发的话，那它是一场被激起的革命”。查理十世于6月26日颁布了一部强制性的新闻出版法令。议员们妥协了；但一群工人行动起来。这群工人既不是由那些“感到绝望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也不是由“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人”组成的，而是“主要来自熟练的手工业工人组成，他们是经过训练多年积累经验才成为熟练工人的”（Suel, 1953, 188）。

那么，当邦纳罗蒂（Buonarroti）——“欧洲的第一位职业革命家”——“在1830年革命前夜为革命的胜利而祈祷时”，这是一场他所期望的革命吗（Eisenstein, 1959, 49）？[\[98\]](#)并非如此。它是一场持续3天的群众革命——7月27-29日，光荣的3天。但成果很快就被主张复辟的自由主义所攫取，导致7月王朝的诞生，由路易-菲利普担任国王，他更愿意称自己为法国人的国王、而不是法国国王。梯也尔（Thiers）指出：“如果没有奥尔良公爵（the Duke of Orléans）……我们不可能控制这群暴民”（cited by Dolléans, 1947, 42）。为了反对极端保守派——他们仍然希望真正复辟某种旧的政治体制，七月王朝赋予一种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释以合法性。“到1830年革命，对1789年大革命的攻击被最终挫败”（Elton, 1923, 88）。[\[99\]](#)

工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从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看，[1830年]革命并没有带来任何变化”（Bourgin, 1947, 205）。[\[100\]](#)如果说工人的幻想破灭的话，那么极端保守派也同样感到沮丧。1830年8月7日，夏多布里昂（cited in the Bénéton, 1988, 56-58, n.3）在贵族院发表演说拒绝支持路易-菲利普：“作为对改变现实无所助益的预言家，我的屡次警告均遭蔑视，我对国王和祖国已经感到厌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艘失事船只的残骸上，对船只的失事我已做出如此频繁的预警。”大商人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应该欢迎新政权，他们同时担心“正统王权拥护者

的反击，[和]群众的社会革命”（Price, 1975b, 6）。^[101]

最后，英国最初也对是否承认新政权感到犹豫。事实上，在紧接着革命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内，“战争威胁笼罩在法国上空”（Pinkney, 1972, 303）。三色旗、马赛曲、国民卫队的改组都令组成神圣同盟的各国感到不寒而栗；他们甚至开始担心法国会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但英国政府——恰恰是在威灵顿的领导之下，他是具有更保守倾向的托利党的代言人——很快就承认了新政府。到10月份，所有国家都承认了新政府。

英国为什么行动如此迅速？无疑，路易-菲利普既是英国议会制度“真诚的崇拜者”，又是同英国结盟的坚决支持者，这有助于促使英国尽快采取行动（see Guyot, 1901, 579）。无疑，路易-菲利普任命这两种观点的著名倡导者塔列朗（Talleyrand）担任驻英大使是聪明之举，表明争取英国的支持“是[路易-菲利普]最为看重的”（Guiden, 1917, 186）。^[102]无疑，英国有充分的理由对波利尼亚克（Polignac）为查理十世制定的外交政策感到恼火。尤其是，他们对法国在1830年初入侵阿尔及利亚感到非常不快，特别是当他们认识到查理十世实际上将此视为十字军远征的重演时就更是如此。^[103]在英国已经成功遏制神圣同盟之时，查理十世的举动似乎是在破坏英国的计划。^[104]英国避免直接同他对抗，因为法国得到了欧洲其他强国、尤其是俄国的强有力支持。^[105]不过，现在能够寄希望从路易-菲利普那里获得更好的结果，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106]

尽管有各种质疑，但事实是七月革命确实取得了成功。即自由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至少是在其原始形式上。100年后，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934, 101-102）能够回顾他称之为“七月荣耀”的革命，并称颂道：

伴随着[七月革命]欧洲所有的专制主义都在道德上被击

败：与之相反，欧洲的自由主义——正在低谷中挣扎和斗争——成为如何在极端状况下应对敌人的范例。证明以这种方式斗争，胜利必然来临。它有助于确立以下事实，即一个大国已经获得充分自由；并成为确信多场革命很快将来临的基础所在。

正如克罗齐所揭示的，1830年革命具有扩散性，立即就扩展到邻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后扩展到波兰。“欧洲人民从长期麻木状态中觉醒，神圣同盟的根基被动摇”（Rudé, 1940, 413）。^[107]在三国革命中，比利时革命是唯一获得成功的革命，这有其充分的理由。它是唯一适应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国家创建和巩固自由主义国家方案的革命。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起义受到法国更激进力量和拉法夷特领导的运动派（the Parti du mouvement）各支部的支持。他们在罗讷省组织志愿者到皮埃蒙特地区（顺便到附属于该地区的萨伏伊）帮助作战。不过，他们的行动部分为法国政府所挫败。^[108]因为新的法国政府只是想遏制奥地利；而皮埃蒙特地区的国王查尔斯-艾伯特（Charles-Albert）也想让奥地利人撤走，但自由主义者试图阻止他这样做。结果最后是自由主义者失败（see Renouvin, 1954, 73-75）。至于波兰，革命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在波兰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联系仅仅是精神上的。^[109]而且法国人离得太远，既无能为力、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比利时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比利时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尼德兰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长时期内，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治的行政单位，先是在西班牙人、后来是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之下。在这个时期，不仅它的农业获得繁荣发展，^[110]而且工业也同样获得兴旺发展，尤其是在查尔斯亲王（Prince Charles）统治下的“繁荣的32年”[1748~1780年]期间。亲王的代表科布伦茨伯爵（the Count of Coblenz）[1753~1770年]——被称为“低地国家的柯尔贝尔”——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Briavoine, 1839, 7, 86-90），这导致在1765年到1775

年之间取得“令人目眩”的增长，[\[111\]](#)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增长仍能继续稳定保持。[\[112\]](#)那时，奥属尼德兰相比联省共和国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将高人口增长、低工资和熟练劳动力结合在一起。[\[113\]](#)结果就是比利时能够几乎像英国那样快地采用工业机械。[\[114\]](#)

法国在1795年吞并比利时。在法国统治时期，主要的工业生产中心——根特的棉纺织业、维尔维耶和欧本的毛纺织业、列日和厄诺的重工业——都获得了进一步的“明显发展”（Mokyr, 1974, 366）。[\[115\]](#)似乎有两个主要原因在起作用：“同一个拥有3000万消费者的巨大的受保护的和统一的地区整合在一起”（Crouzet, 1964, 209），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消除了内部阻碍贸易发展的障碍（关税、过境费）、废除了行会、实行了公民平等、对制度和法庭实施了改革，以及废除了封建特权（see Wright, 1955, 90）。[\[116\]](#)两者结合在一起似乎发挥了非常大的功效，正如所有人似乎都同意的那样：“加速增长”、罗斯托式“起飞”时刻、“整体转型…… [以及] 决定性扩张的时刻”，是人们所使用的各种词汇（Lebrun, 1961, 555; Devleeshouwer, 1970, 618; Dhondt, 1969, 42, 44）。[\[117\]](#)这已经成为那个时期比利时分析家的共同观点，正如娜塔利·布瑞阿瓦伊尼（Natalis Briavoinne, 1839, 113）所指出的：

[法国统治时期发生的] 各种政治事件，统一的国内立法，更确切地说是对法庭的全面改组，改良的商业制度，这些都构成比利时明显发展势头的基础，就像在法国那样；但比利时是最早收获最大利益的国家。

法国在滑铁卢惨败之后，比利时被划入尼德兰王国。这并没有征求当地人的意见。这次重新合并（在分开250年之后）在比利时遭到各主要群体的敌视：民主主义者——在瓦隆尼亚势力强大，他们想实行议会制度；天主教徒——在佛兰德势力强大，他们对在一个新教君主的统治

之下生活保持警惕，除非预先签署一个协定来保护他们的宗教权利（see Ponteil, 1968, 17）。直接的经济影响是负面的，部分是因为世界经济普遍处于下降趋势，部分是因为他们产品的市场萎缩。^[118]从政策方面看，争论的中心是有关关税问题的，是在荷兰商人和比利时工业家之间展开的。前者依赖于开放的港口才能生存，更多地关注于汉堡、而不是曼彻斯特；^[119]后者要争取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以防止来自英国的竞争。^[120]

威廉国王（King William）主要关注将这个疆域扩大的王国凝聚在一起，并偿还巨额国债。^[121]事实上，有关关税的争执已得到平息。比利时人比荷兰人做得更好，所以他们相对较少地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这依次又成为问题所在，因为整个欧洲的经济在1825年以后都呈下降趋势，这在比利时造成了大量无产阶级的失业，他们变得“乐于接受革命情势”（Demoulin, 1938, 369）。

因此，巴黎的七月革命立即就在比利时引起反响。它使一直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可能同法国重新合并的想法流行起来。它也使天主教徒对荷兰新教统治的不满被表达出来。但革命需要一个导火索来引爆。正如一些人论证的，即使8月25日起义是“由来自巴黎的煽动者鼓噪的”，但他们还需要有“军队”，而军队只能在失业的工人中招募（Harsin, 1936, 277）。这是一次“民众的反抗”，它是由社会问题引发的，以卢德主义和一些暴力行动为标志。^[122]但这里也像七月革命的情况一样，起义很快被中间阶级的力量所控制，转变为一次民族的、自由主义的革命（see Demoulin, 1950, 152）。^[123]

不像法国那样，在比利时并不存在强大的极端党派，这是因为天主教并未掌握权力。这使得比利时的天主教徒更能接受自由主义形式的天主教，它在法国的倡导者是拉梅内（Lamennais），但他在那里实际上不可能将信众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124]诚然，罗马教廷本身是正

统王朝的拥护者，因此对比利时的自由民族主义持保留态度，但“罗马教廷的政策是一回事，比利时教士的表现是另一回事”（Demoulin, 1950, 143）。^[125]瓦隆地区反对教权的自由主义者愿意对（主要是讲佛兰德语的）天主教徒做出让步，以取得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支持。^[126]

争论很快就变得不是在维持现状与支持变革之间、而是在变革的形式上展开。存在三种可能性：尼德兰同比利时分离，但在一个来自奥兰治家族的国王的统治之下；同法国重新合并；或独立，由一个选自其他地方的国王统治。奥兰治亲王——威廉国王的儿子——的机会由于国王10月27日在安特卫普遭炮击事件而丧失，比利时人将此视为是帮助荷兰商人反对他们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主张重新合并的情绪从未如此强烈过，但它却在比利时之外遭到非常强烈的反对。主张由奥兰治家族统治和主张同法国重新合并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部敌人——教会——的反对，它将奥兰治家族视为新教徒，将法国视为强烈反对教权的国家。^[127]

但内部的社会妥协并不足以使比利时获得独立，如果这种独立无法满足英国和法国在更广泛层面的要求的话。神圣同盟希望英国不要急于承认新政权，就像它对待路易-菲利普那样。他们希望英国同荷兰的商业联系也许会促使前者采取强硬路线。他们还假设英国对法国扩张主义的复活感到担忧（see Guichen, 1917, 172 and passim）。^[128]但他们未能把握新兴的英法模式的机制所在，一个独立的比利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自由主义的——事实上将会巩固英法联盟。“有关建立‘自由主义联盟’的设想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就成为伦敦和巴黎两地自由主义报刊经常提及的话题”（Lichte im, 1969, 42）。法国人宣布“不干涉”原则以阻止普鲁士军队计划在8月末进行的干预，并促成英国人采取一致行动。^[129]“英国和法国在1830年10月初的互信关系在保持和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Demoulin, 1950, 127），^[130]由此使比利时国民会议能够在11月18日宣布独立。11月24日，国民会议宣布不再服从来自

奥兰治家族国王的统治。但就在这一刻，俄国宣布动员并派遣军队，11月29日波兰起义爆发。沙皇事实上力戒进行两次干涉。较早时，由于康斯坦丁大公和外交部长聂索洛得伯爵（Count Nesslerode）的反对，干涉行动被推迟。他们劝告沙皇谨慎行事，大公担心波兰——他的“私人领地”——军队会遭到屠戮。此时，波兰爆发起义，这无疑“使比利时免受干涉，也许使整个欧洲免于战争”（Guyot, 1926, 64）。诚然，沙皇进行动员本身是导致波兰起义的原因之一，因为波兰军官担心军队会遭到屠杀（see Morley, 1952, 412-414）。^[131]1831年1月15日，拉法夷特说道：“先生们，针对我们的战争已经准备完毕。波兰将成为先锋；但先锋已经转而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cited in Morley, 1952, 415）。

因此，波兰起义标志着俄国不可能再对比利时进行干预。当然，这对波兰并不会有任何好处。当英国首相格雷爵士（Lord Grey）在1831年初接见波兰特使莱昂·萨佩哈亲王（Prince Leon Sapieha）时，亲王提到格雷爵士曾代表波兰利益写过一本小册子。“格雷说他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有鉴于当前法国受舆论驱使有吞并比利时的危险，英国必须有一个盟友，以使它有能力对抗法国的这种举动。而这个盟友只可能是俄国”（Betley, 1960, 89）。

犬儒主义在礼节上是必要的。不过，它确实证明在比利时和波兰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比利时、而不是波兰有可能在巩固英法模式上发挥潜在作用。对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至少邦纳罗蒂是清楚的：比利时——在最终选定的利奥波德一世国王的统治下——已经同英国和法国联合构成“那种立宪君主制的堡垒所在，这种制度以议会制和中间阶级的广泛认同为基础”，邦纳罗蒂将它谴责为一种“利己主义的秩序”（Eisenstein, 1959, 86）。梅特涅同样清楚所发生的一切。在一封给聂索洛得伯爵的信中，他写道：“我最隐秘的想法是旧欧洲已经开始终结……另一方面，新欧洲尚未开始形成。在终结和开始之间，将会发生动荡”（cited by Silva, 1917, 44）。

埃文斯（1983，200）称这种阵线划分为“欧洲外交史上的自然分水岭”——在东部是独裁统治，在西部是自由宪政。^[132]它构成那种新的文化概念“西方”的物质基础，这个概念正是在1815年到1848年这一时期形成的，部分是由奥古斯特·孔德，部分是由一些俄国理论家提出并使用的，后者对这种“特定的文明形式”充满渴望，但对自身现实却充满失望（Weill，1930，547）。有关西方在军事上强大和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并声称要以个人自由的旗帜来对抗经济上落后的、“不自由的东方”的观念成为19世纪剩余时间和20世纪的思维定式。

比利时相比波兰的优势是它在西北欧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拥有一个已经成熟的工业基础。由此，它能够被纳入到已经得到扩展的中心区内；的确，作为已经得到扩展的高技术生产区的组成部分，比利时也是必要的，而这种生产区的扩大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所要求的。^[133]比利时将很快从它的暂时经济困难中恢复过来，这些困难是由一场政治革命的动荡所引发的。^[134]它将由一位贤能的国王进行统治，他为自身设定的目标是“致力于强固英法同盟关系”（Ponteil，1968，327）。

在稳定控制住法国和比利时之后，英国就能够更容易地进行自身的政治调整。事实上，改革并不是始于1830年格雷爵士领导辉格党政府期间，而是始于1829年威灵顿公爵主政的托利党政府，对极端政体进行改革是英国首先必须完成的工作。问题不是赋予城市中间阶级以公民权，而是“解放”天主教徒。解放天主教徒的问题自1778年以来就一直是议会讨论的对象，那一年一些涉及天主教徒的刑法被废黜。^[135]该问题最初是将公民权扩展到少数群体的问题——这是政治体制逐渐自由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1800年通过的联合法案使问题复杂化。一旦爱尔兰在法律上被并入联合王国，那么扩大天主教徒的权利能够被视为该法案“实施所必需的”。但该法案的实施也同样能够被视为有产生相反结果的可能，因为这样做有导致英帝国非殖民化的可能。

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另外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新教徒在18世纪的复兴，尽管新教徒对英国国教当局施加了压力，获得了强有力的话语权，但他们“总的来看反对[天主教徒]的解放”（Hexter, 1936, 313）。第二是法国大革命，它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反对大革命导致在英国对如何看待天主教徒的态度上发生变化：“天主教不再被视为一个灵魂被吞噬的妖魔，而是勇敢的阿特拉斯神，它支撑起摇摇欲坠的世界，对抗邪恶激进主义的冲击”（Hexter, 1936, 301）。[\[136\]](#)

尽管如此，但无疑正是爱尔兰的下层阶级迫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们的行动反映的不是迫切要求融入英国的政治体制，而是由大众进行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

正是在天主教徒的解放中，[爱尔兰的下层阶级]模糊地认为他们的许多愿望将得到满足，新教地主将被剥夺，土地将在他们中间分配——一句话，将曾经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归还给天主教徒。（Halévy, 1949a, 191）

到1829年，民族主义已经站稳脚跟，爱尔兰似乎在酝酿武装叛乱。“至少对威灵顿公爵而言，事实似乎就是如此”（Reynolds, 1954, 30）。[\[137\]](#)他认为，需要在解放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作为曾经强烈反对解放的铁腕公爵，威灵顿公爵“决定实施一次战略性让步。他强迫国王同意”（Reynolds, 1954, 30）[\[138\]](#)出台无条件解放措施。

对爱尔兰的下层阶级而言，解放对他们生活的改变比预期的要小得多。[\[139\]](#)没有关系！威灵顿所做让步产生的结果是“它使改革受到尊重”（Moore, 1961, 17），与此同时，它最终使英国的极端分子变成选举制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在面对路易十八采取半独裁的立场时，法国的极端分子在复辟时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威灵顿和皮尔被英国的极端派视为最终证明是不能信任的。既然已经得到有名无实选区代表的支持，这些极端派目前论证，“自相矛盾的，但却不是非理性的”，“一个理性

的和拥有广泛基础的选区只可能团结在‘非教皇’旗帜的周围”（Evans, 1983, 206）。^[140]威灵顿在天主教徒解放问题上的适时让步确保了英国将不会发生像法国七月革命那样的情形，但两者的结果被证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两个国家所发生的本质上相似的过程的最高潮。

尽管解放天主教徒平息了爱尔兰的不满情绪，但同一年发生在英格兰的歉收却使即将发生动荡的可能重新出现。1830年冬，农村地区的失业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接着是乡村银行倒闭，导致农村骚乱的发生（see Gash, 1935, 91）。正是在新的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七月革命爆发。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此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激进派是“得意洋洋”。他们将1830年7月视为是“重现1789年的壮举”。中庸的自由主义派（辉格党内的贵族们、城市中间阶级的显贵们）希望七月革命将被证明“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保守主义的，它事实上将不是1789年或1792年、而是1688年的重现，由此成为法国人对英格兰政治智慧的礼赞”（Halévy, 1950, 5-6）。

但不管怎样，威灵顿在选举中失利，阿勒维（1935, 53）将此视为“法国最后一任国王倒下的自然结果”。^[141]尽管七月革命也许伤害到、也许并没有伤害到威灵顿，但我们已经看到，威灵顿事实上并未对路易-菲利普持敌视态度。正如路易·勃朗（1842, 2: 4）那时所评论的，如果辉格党将七月革命作为“法国自由主义的胜利”来加以支持的话，那么托利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试图维系英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英格兰贵族——像所有贵族一样——在设法实现它的目标上都是非常见地的和严谨的。它知道，在查理十世的统治下，存在一种后果严重的可能性，即法国将接管莱茵河左岸，并将君士坦丁堡移交给俄国人。它知道，奥尔良公爵在风格和

偏好上都是倾向英格兰的。

很明显，七月革命的影响得到普遍传播。尽管如此，但如果没有民众的推动，改革也许永远不会到来，在英国同在法国或比利时一样。针对农村发生的持续骚乱，格雷爵士领导的新的辉格党政府以“最严厉地”执行法律来应对，成功地镇压了骚乱和纵火行为（Halévy, 1950, 15）。一旦控制住了骚乱，格雷爵士就开始推动他的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当改革法案只是勉强获得通过时，他解散了议会，新选出的多数议员都更强烈地支持改革。但当上议院于1831年10月否决了交其审议的改革议案时，城市开始爆发骚乱。中间阶级主张改革的领袖，像弗朗西斯·普赖斯（Francis Place），努力维持在改革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普赖斯提出了著名的口号“要阻止[威灵顿]公爵，就去买黄金”。这意味着从银行撤出私人资金。武装抵抗新一届托利党内阁的提议被传播，尽管“由弗朗西斯·普赖斯领导一场革命的说法肯定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Evans, 1983, 211）。尽管如此，但威胁还是发挥了作用。威灵顿放弃了他的反对意见，国王向格雷承诺，如果需要的话，他将册封新的贵族。“对这种承诺的检验从未发生”（Thomis and Holt, 1977, 91, 98）。^[142]

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同意，在那时，英国已经“处于骚乱爆发的边缘”（Fraser, 1969, 38）。吕德宣称，之所以没有1830年英国革命，是因为没有“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劳工们一时迸发的愤怒“没有得到中间阶级的有力支持”（Rudé, 1967, 102）。但这是对已发生的事件做出分析应该采用的方法吗？作为对那种吹嘘1832年改革是在“未引发暴乱”的前提下完成的反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写于1849年的文章（p.12）中反诘道：“但难道没有对发生暴乱的恐惧吗？如果没有发生暴乱的可能性，上议院会放弃投反对票、或者威灵顿公爵会在绝望中罢手吗？”^[143]答案几乎肯定是“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是假定要发生的暴乱使他们实现了目标。因为再次地，该过程被中庸的自由主义派所掌控。改革法案的“主要目标”是“将中间阶级团结起来以支持贵族制度”（Gash, 1979, 147）。^[144]辉格党人“确信——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表述——‘改良的时代’不会突然转变为‘动乱的时代’”。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或一些似乎能将中间阶级纳入到国家政治当中的法案。^[145]甚至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他想要更多的权力——也说：“如果该法案不是一个好法案的话，……那么它在通过时也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案”（Briggs, 1959, 259-260）。

改革对英国政治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影响。“赋予苏格兰和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以自治权利大大增强了辉格党-自由派在议会中的力量”（Gash, 1979, 154）。英国的非英格兰地区先是成为格莱斯顿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接着成为后来成立的工党的坚定支持者。与此同时，保守党也能从仅仅是“王室和贵族的政党”转变为“英格兰的政党”（Halévy, 1950, 182）。尽管如此，但仍然能够论证，正是既通过将英国的非英格兰地区整合在一起，又通过将中间阶级整合在一起，1829~1832年的一系列改革使英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

除此之外，通过清除有名无实的选区，法案削弱了政府各部相对于个体选民的权力，他们现在需要对选民负责。50年后，这种状况由于中央集权式政党的发展而被改变，这种政党将党员和他们的选民置于控制之下。但此时，这种对中央专权——如果是部长专权的话——的削弱实际上令许多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甚至辉格党员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新的改革立法经常是更难、而不是更容易通过。不再可能仅仅通过说服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人就能做出适时的和必要的改革。必须考虑一个更广大——但仍然是心胸非常狭隘的——人群的利益：

的确，功利主义者在1829年和1830年对威灵顿和皮尔有好

感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历史是沿着合理递进的路径演化的（它从未这样演化），也许可以论证，第一次改革法案更多的是延迟了诸如取消谷物法等举措，而不是加速了它们的实施。（Moore, 1961, 34）。

如果中间阶级获得的益处比他们预想的要少的话，那么他们确实得到了名誉，他们将变得不再吵吵闹闹。不过，工人阶级的全体——在英国像在法国一样——都感到“幻想破灭”（Briggs, 1956, 70），受到削弱的地位将使他们去继续下一轮的斗争。[\[146\]](#)

到1830/1832年，由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统治的自由主义国家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建成，它们是那个时期三个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三个国家共同构成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它们和其他那些渴望实现相似繁荣和稳定的国家都打算实施自由主义国家模式。神圣同盟和中心区极端派的力量受到遏制；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击败。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事实上都已经转变为某种类型的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如果已经有效地使极端分子的立场变得中立化，那么图谋发动起义的革命者很难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在这三个作为榜样的自由主义国家。

自由主义国家机器现在需要得到发展。选举权改革的推进仍然缩手缩脚。但已经启动，而且将不可阻挡地继续推进下去，直到在一个世纪内达到其顶峰，即获得普选权。伴随普选权实现的是将公民权扩展到全体公民——甚至是全体国民、甚至是全体居民。迄今尚未开始建构的是自由主义国家的第二大支柱，即驯服危险的阶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个过程将在下一个时期——即1830年到1875年之间自由主义国家的巩固时期——启动。

[\[1\]](#) 这段历史已经在第二卷第3和第6章，以及第三卷第2章予以了分析。

[\[2\]](#) “在1815年之后，多个和平条约有效地抑制了法国的扩张……俄国越来越多地 [被英

国] 视为新的威胁.....英国的政策通常是为了阻止俄国的侵略而设置障碍” (Evans, 1983, 196-197)。当然, 在19世纪后半期, 德国开始成为威胁。不过, 如我们所知, 英法联盟在整个19世纪和下个世纪一直非常稳固。

[3] 这个术语我借用自七月王朝, 它被用于指代统治阶层, 包括“贵族、冒牌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显贵通常是指有继承权的人” (Jardin and Tudesq, 1973, 1: 157)。

[4] 他指出这种区分“是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和其他一些人认识到的, 但被雅各宾派的追随者和功利主义者所忽略。对那些将这种区分视为理由, 以维系诸如七月王朝时期实行的狭隘的有产者拥有公民权等必不可少的阶级特权的人而言, 它构成理由; 但对那些认为它构成唯一理由的人而言, 它不构成这样的理由” (Beloff, 1974, 49) 类似地, 罗桑瓦隆 (1985, 75, 76, 80) 也注意到19世纪这种对民主的恐惧, 并含蓄地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斯塔尔夫夫人 (Mme.de Stael)、巴兰榭 (Ballanche)、夏多布里昂、拉梅内、罗耶·科拉尔 (Royer-Collard)、博纳尔、圣西门、邦雅曼·贡斯当或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都在言说着同样的话语, 尽管他们存在着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 区别.....他们共同关注的中心是希望避免实行人民主权模式, 他们认为这种模式要对前一时期 [大革命和拿破仑] 所发生的全部过激行为负责, 它既是推动革命发生、造成无秩序状态的策源地, 又是孕育拿破仑专制主义的温床。认识到人们对现代社会中民主现实的矛盾心理也就得出和说明了对民主脆弱性的认识。可以用下述说法来扼要地总结这种矛盾心理: 对教条主义者而言, 民主一方面是新社会的实在基础, 另一方面又有颠覆新社会的危险; 它既代表建设 (公民平等) 所基于的公正原则, 又代表可能造成破坏的潜在性 (在政治决策中由于参与者众多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

[5] 也见比灵顿 (1980, 57): “在法国大革命中.....‘国家’概念居于中心地位, 即使并没有新的国家被创造出来。‘国家’一词很快就取代较陈旧的和具有家长制意味的‘政党’一词流行起来。”

[6] 也见德芒戎和费弗尔 (Demangeon and Febvre, 1935, 111): “宗教改革运动是300年间对拿破仑之前的中世纪欧洲的古老结构进行反复冲击的第一波, 经拿破仑粗暴地一推, 它便轰然倒塌。”1815年之后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结成的意识形态联盟, 尽管双方并没有公开承认, 但在某种意义上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见比灵顿对激进主义在南欧传播的分析: “在反对拿破仑战争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国鼓励整个南欧地区——从希腊经意大利南部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左翼和右翼力量的联合。为英国做这些政治精英动员工作的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苏格兰共济会在各地的组织; 但英国人传达的主要讯息 (通过立宪限制王权) 在这些实施绝对君主制的地方却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观念” (1980, 119)。

[7] 他们继续指出: “当人民提出的要求被忽略时.....改革运动必然失败, 除非他们准备采用更直接的手段来使抗议不断升级。”但这里此类情况并没有发生。也见埃文斯 (Evans, 1983, 69): “人们经常提到, 在1794~1795年当局很容易就能够镇压改革运动; 但人们很少认识到, 英国的改革者在为进行更激烈斗争所做的准备上是多么的不充分, 当时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印刷小册子或分组讨论这些舒舒服服就能完成的范畴。”1794年政府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 并

在当年5月对伦敦12名激进分子领袖提起公诉，同样是在1794年还颁布了“两个法案”——叛逆集会法（任何超过50人的集会都需要治安法官批准）和叛逆行为法（禁止任何反对宪法的言论或文字）。“激进主义运动在1795年以后被迫转入地下”。（p.72）。

当局唯恐这次镇压被归咎于在18世纪的英国流行的传统的反法情绪，但应该注意到许多方面已经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反法是“激进分子”的专属特征，他们将反法视为反对上层阶级的一种方式。随着1789年革命的发生，“激进运动保卫英国的要求失去了其合法性，由此也失去了广泛的支持；代之，它不得不再次……以一种引起仇恨的邪教的形式出现，煽动对假想的反对英国的叛国者、对法国和法国道路同情者的仇恨”（Newman, 1987, 230）。

[8] 与此同时，埃文斯（1983, 60）继续指出，小皮特在1794年退出辉格党后重新组合的力量“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联盟，它从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提出的各种论点中获取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试图抵制法国的邪恶势力”。很明显，取消王权同民主没有什么关系。

[9] “如果这些法律没有被执行的话，原因当然是，雇主并未选择诉诸法律程序，这要么是因为雇员的组织对他们而言过于强大，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愿去冒诉诸法律带来的损失和不确定性，要么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引起公众的敌视”（George, 1927, 227）。

[10] “以及在保护违法者和保守秘密上惊人的团结一致”（Thomis and Holt, 1977, 33）。

[11] 欧洲较早期唯一的一个新教传教团体是德国的摩尔维亚兄弟会（Moravian Brethren）。

[12] 经济利益是复杂的和多样的，它使英国的“奴隶贸易外交”在1807年法案颁布之后的长时间内处于十分矛盾的境地，1807年法案废除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见布莱克伯恩（Blackburn, 1988, 316-326）。

[13] 贝利（1989, 12-13）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源于——至少部分源于——“被认为排除在统治权之外，未被……纳入其中”的程度非常感兴趣，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否还有其他根源，以及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再次地，当人民被赋予主权时，关键的问题是，谁是人民？

[14] 康德利夫认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处的地位”。如果考察一下商船数量，那么这种差别就能够更明显地看出。在1789年之前，法国大约有2千艘商船，但到1799年，“在公海没有一艘商船悬挂法国国旗”（Bruum, 1938, 86-87）。另一方面，即使在战争期间，英国的商船在数量上也从1500艘增加到1800艘。

列维-勒布瓦耶（Lévy-Leboyer, 1964, 246）指出，在19世纪上半期，争夺海洋权的斗争只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展开的，西欧国家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它们上百万吨级的商船队加起来也只有美国的一半、英国的三分之一。“这种力量的相对消长在18世纪末不大可能被认识到，尤其是就法国的情况而言”。他将这一转折点确定为1793年。

[15] 也见布尔（Buer, 1921, 169）对英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所处萧条状态的略带忧郁的描述：“不难解释这种长期的萧条为什么会发生。国家已经被一场大战消耗得精疲力竭。沉重的税负不可能有所减轻；偿还债务占去了一半的国民收入，军事和民用开支占去固定收入的一大半。因此，伴随价格的不断下降，国家支出并没有什么减少，而与此同时，加诸于纳税人身上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缴纳地方税的人也处于相似的困境之中。尽管价格在不断下降，但济贫仍然是一种灾难性负担”。

[16] 因此，罗斯托并不认为，英国从1815年到1847年期间的经济应该得到“经济史中的萧条期的坏名声”。诚然，在新兴工业城市中医疗和住房条件是恶劣的，也存在严重失业、农业歉收和食物价格高涨的不良状况。诚然，农民阶层也是不幸的，他们从事种植的利润非常非常少。但作为补偿，国内发展的势头强劲：“利率下降；实际工资增加；贸易条件也向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化”（罗斯托，1948，19）。

[17] “在1789年到1848年之间，英国的商品、蒸汽机、棉纺机和投资大量涌入欧洲和美洲”（霍布斯鲍姆，1962，51）见列维-勒布瓦耶的解释（1964，32，41）：事实上，纵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在取得技术领先的同时，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将处于积聚力量和培训专业劳动力队伍、建立工厂和迅速偿还建厂借贷资金的位置上，简言之，会对成本价格产生巨大影响，将潜在的竞争者逐出市场，成为需求预期增长的几乎唯一的受益者。此外，丰富的能源也成为有利于英国工业化顺利进行的一种因素。1817年，英国生产了1600万吨煤，而法国只生产了800万吨煤。这就为英国提供了非常大的进行产业地理布局的自由度，使他们能够从早先对设厂地址要求——沿河流分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纺织厂集中于产煤区附近，由此扩大了他们设厂的范围……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工厂的集中设置，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曼彻斯特工业集群在19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期变得愈加强大。但是，面对英国的主导地位，法国也并非完全失去了竞争力。见约翰逊（Johnson, 1975, 143-144）：列维-勒布瓦耶有关整个大革命—拿破仑时期“大滞后”的命题需要做某些修正。尽管如此，但在1815年——就像在1830年一样，在与海峡对岸的那个工业巨人的竞争中，法国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为了应对这种情势，法国首先是实施限制性关税政策……法国商人所采取的其他应对策略直到最近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英国工业生产的优势是在普通的大众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方面。实行资本密集型生产是它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上，法国历史上就有好的名声，更重要的是拥有进行竞争的可能性……就总体水平而言，法国工人的工资只是英国工人的不到2/3。这就是说，产品质量越高，劳动投入就越大，由此法国工业相对英国而言的地位就越强……所有这些意味着，相比英国，手工劳动、尤其是手工纺织劳动在法国保持其重要地位的时间要更长。而且，19世纪上半期的大部分时间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乍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即纺织业外包给农村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其中的原因当然不难发现。农村劳动力要更廉价。

[18] 见列维-勒布瓦耶（1964，115，326，409）的同一本书：“在1820年，人们也许会问，[法国]是否有可能摆脱它相对于英国而言的落后状态。到1840年，这项任务几乎已经完成……”到1835年，不管我们考察的是纺织业还是运输业，大陆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似乎是盈余的：在19世纪开始时的落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当自动织布机、铁路和汽船对整个经济的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时，落后的状态就将完全消失……不管我们考察的是工业生产——在1815年到1850年之间年均增长3%，还是得自对外投资的收入——年均增长稍高于4%，相比英国的数据，总体结果是十分有利的。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 1966, 122）断言，法国在1815~1848年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率要高于19世纪的任何其他时期。也见塞（Sée, 1927, 70），他将“在机械化方面的进步”视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它表现在纺织机的改良和蒸汽机使用范围的扩大上。类似地，德墨林（Demoulin, 1938, 298-299）也论证，在1800年到1830年之间，伴随着传统工业广泛采用机器生产，比利时的工业生产发生了转型，在1830年之后，它的工业增长加速。克鲁泽（Crouzet, 1978, 19）对英国和欧洲大陆（包括法国）之间存在差距持一种不同的观点。他相信，在19世纪上半期，这种差距从相对量上看“并没有缩小”，从绝对量上看是在拉大。他指出，在1860年，英国占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但占世界总产出的40~45%、占欧洲总产出的55%~60%。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克鲁泽（1972b, 115-116）解释了西欧在1815~1850年这一时期未能“赶上”英国的原因。因为，在英国“几乎完全垄断”对美国 and 拉丁美洲贸易的条件下，西欧国家国内市场狭小，在发展强有力出口贸易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因此，在经济霸权国家发挥强制性作用方面，他持一种非常接近列维-勒布瓦耶的观点：“似乎……一旦一个主要的‘现代’工业化经济体——英国——形成，整个国际贸易环境就会变得不利于其他国家，仅仅是新的工业巨人的存在就大大限制了它们以国外市场作为推动其工业获得重大发展的机会”。就英国持续保持工业领先地位而言，霍布斯鲍姆的观点类似于克鲁泽，但要相对更谨慎些：“[在1850~1870年]英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国……努力维系它的相对领先地位，尽管它在生产用蒸汽动力方面已经开始严重落后”（1975, 40）。卡梅伦（Cameron）的认识也是处于两种观点之间：一方面，他注意到“到1850年，法国拥有6800台蒸汽机，比所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接着他在一个脚注中强调：“另一方面，英国也许比欧洲大陆所有国家、包括法国的总和还要多”（1966, 66, and n.9）。

[19] “19世纪中期，进出英国港口的商品价值量几乎占到全部国际贸易总价值量的1/4”（Imlah, 1950, 194）。这是从1800年仅占3%发展而来的（p.191, n.24）。“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p.192, n.24）。

[20] “受英国对外提供贷款的影响，它的出口量显著增加。资本输出成功地转化为商品的形式，如果可能的话，绝大部分转化为英国商品的形式。在战争期间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出口，在1808~1810年和1820~1825年间对拉美国家的出口，在19世纪30年代对美国的出口，在40年代对印度和中国的出口都在急剧增长，这些增长都同这一时期的对外贷款联系在一起；当然，贸易额随后的下降也不可能离开这些贷款活动的终止来予以说明”（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1953, 2: 842）。在世界贸易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在这一时期是作为半边缘国家发挥作用的：“通过同时扩大在欧洲销售棉织品和在新兴国家销售制成品，英格兰能够减少风险，并为未来做好准备。因为，在欧洲大陆国家身上发生的注定会在海外国家发生。通过向那些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第三类国家提供奢侈品，法国能够直接获利；英格兰则通过向它们提供棉布、棉织品——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优质、偶尔是机器，以及一直提供技术人员来获益”（Lévy-Leboyer, 1964, 181）。尽管如此，到19世纪中期，正是作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的法国、而不是英国，通过输出技术和资本而在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化中发

挥着“主导作用”（Cameron, 1953, 461）。尽管贝洛赫（Bairoch, 1973, 592-593）认为，在整个19世纪，欧洲大陆国家同第三世界的贸易是“相对不重要的”，但这并不适用于英国。“早在19世纪中期，[英国]对第三世界的出口就占其出口总量的40%，而对欧洲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量的35%”。类似地，埃文斯（Evans, 1983, 340）也注意到，1815年，对欧洲的出口占英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对亚洲出口仅占出口总量的6%；而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对欧洲出口的比例下降到32%，对亚洲出口的比例上升到20%，对美洲出口的比例不低于37%。也见康德利夫（1951, 207）。施洛特（Schlote, 1952, 41）发现，相对人口规模而言，海外贸易最显著的增长是发生在1845年到1855年之间，这进一步突出了对欧洲以外地区贸易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但伊姆拉（Imlah, 1950, 176）同意盖耶（Gayer）、罗斯托和施瓦茨（Schwartz）的观点：出口并不能解释英国所取得的巨大优势。确实，纯易货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所得的指数）直到19世纪中期都一直是在稳定地下降的。指数变化并没有“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与其说是由新的进口价格更迅速地下降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出口价格更迅速地下降引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纯易货贸易条件到1839年所发生的不利变化”。也见切克兰德（Checkland, 1964, 62）。这些由进口导致的入超“在[19世纪40年代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实施]之前几十年间就已经存在”（Imlah, 1958, 6）。“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是]关税改革的结果”（Imlah, 1950, 189）。麦克洛斯基（McCloskey, 1964, 313）颠倒了进口增长同较低关税税率之间因果关系的顺序：“蓄意实施的国际贸易自由政策……只是部分地——确实只是一小部分——导致关税税率的下降。进口占国民收入的较高比例这种意外状况的出现——本身只能部分地归因于英国的财政改革——是导致关税税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所在，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胜利的作用微乎其微。”不管因果顺序到底是怎样的，我们都可以从中推断出：“英国新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创造出出口盈余……她在19世纪对海外贷款的显著增长不可能根据这种长期存在的臆说加以解释。”相反，正是无形资产（商船、商业佣金、汇回的个人储蓄，以及来自海外投资的收入）“弥补了她在有形贸易方面的赤字，并提供了进行海外投资所需要的新资本”（Imlah, 1948, 149）。

[21] 在威廉·坎安宁（William Cunningham）最重要著作的第四版中，他写作了下述内容：在辉格党统治时期，人们集中关注各类产业的升级换代，并没有努力使英国成为各生产领域的世界工厂，在这些领域，她的影响力和她所建立的友好关系能够使国外市场对我们的制造品开放。（p.494）我不大肯定这是否就是目前的经典说法——英格兰作为“世界工厂”（或这部分内容可以在较早的版本中找到，它最早的版本出版于1890年）——的缘起所在，但很有可能正是坎安宁最早提出了这种说法。

[22] 也见罗素（Rousseaux）：“直到1830年，英国经济仍然处于以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1938, 62）。该阶段几乎等同于亨利·塞（Henri Sée）描述的法国在1815~1848年所处的阶段。“在实行有限选举权的君主制时期，法国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1927, 11）。达沃尔（1984, 12-13）继续指出：“工业生产仍然主要在农村进行。甚至那些新兴的产业、像北部规模较大和不断扩展的棉纺织品制造厂仍然更多地设在农村、而不是城镇……在1811年，无论是在新兴的、工业高度发展的北部，还是在较落后的、更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南部和东部，工人的常态是在家里或在规模较小的农村工场中手工操作一台机器劳动。”

[23] 塞缪尔（1977，47）将这种“机械化进程的缓慢推进”归因于劳动力——既包括熟练、也包括非熟练——的相对充裕。

[24] 不过，可以比较一下贝洛赫的数据和霍夫曼（Hoffman，1949，165-6）的数据，后者认为，英国从1781年到1913年的增长率为2.8%。

[25] 盖耶、罗斯托和施瓦茨（1953，1：486）提及“[英国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最低点似乎出现在1850年”。也见马克兹夫斯基（Marczewski，1987，34-36）有关法国的论述。经济衰退时期仍然是通货膨胀，这与农业歉收的老问题相联系，它在使GNP下降的同时却抬高了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一旦全球运输系统的改善抵消了地方歉收产生这种影响的能力，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也许适用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但肯定适用于20世纪的情况。

[26] 罗素（1938，229）指的是1822~1848/50年这一时期。也见埃文斯（1938，141）：“对劳工而言，最糟糕的时期是在1815年之后的时期，那时由于军人复员而使市场供过于求，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也被压低。在这段时间，工资水平被压低，济贫支出达到其峰值……在从1811~1831年的20年间，最不幸的就是就业机会大大缩减，在南部和东部的各郡由于人口增加了31%而受害最严重”。

[27] 也见汤普森（Thompson，1963，232）。费尔利（1969，108）继续指出：“一旦我们承认整个欧洲直到1870年左右一直都处于短缺日益严重的状况，那么使这种说法能够同英国小麦价格明显一直在稳定下降的说法相协调的唯一方法就是坚持认为，以前受到保护的小麦价格是如此之高——这是相对于欧洲内部的潜在供应来源而言的，以致向英国和欧洲之间自由贸易的转化意味着英格兰小麦价格的实际下降，即使存在价格继续上扬的潜在趋势。”人们由此就会明白，为什么对取消谷物法存在如此大的阻力。

[28] 这是相关著作经常提及的命题（Markovitch，1966，316；Landes，1949；Kindleberger，1961a）。卡梅伦（1957a，441）部分根据供给方的相对稀缺做出解释，这种稀缺结果导致工业原材料的高价格。但由于我们前面提到英国的原材料价格也很高，所以这只能是一种通过比较得出的判断：原材料价格在法国要高于英国。

[29] 凯恩（Cain，1980，24）提醒我们，在导致迟迟不愿支持自由贸易的各种原因中尤其重要的是，“自由贸易还意味着在殖民地拥有的特权和对殖民地实施的严密控制的终结。当这些殖民地发展成熟时，似乎不再可能继续维持殖民统治”。也见穆森（Musson，1972b，18-19）：“历史学家倾向于太过一般地强调英国的竞争优势，而忽视英国制造商在保护性壁垒背后的发展，许多制造商仍然感到有必要继续这种保护……曼彻斯特的制造商尽管要求取消对原棉进口征收的关税和废除谷物法，但与此同时却仍然是顽固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反对取消对机器、尤其是制造棉织品机器出口的限制，因为这会提升其他国家的竞争力。”

[30] 关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1830年是38%，1840年是45%，几乎是战前这个比例的两倍。进一步而言，“对市场价值所征收的关税大幅度增加，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p.311）。

[31] 见杰里米 (Jeremy, 1977, 2): “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 法律规定, 熟练技工和工场主不能自由离开英国或爱尔兰, 到英王统治之外的任何国家继续从事他所擅长行业的生产。”但是, 许多人当然这样做了。杰里米估计, 从1783年到1812年, 有10万人从北爱尔兰移民到美国。对技工向外移民的限制在1824年解除。1825年, 完全禁止机器出口的禁令也被取消, 代之以一种审批制度。不过, 只是到1843年, 作为贸易委员会主席的格莱斯顿 (Gladstone) 才最终取消了限制条款。然而, 杰里米相信, 这些禁令“在早期工业化时期并没有明显阻止技术信息向国外的传播, 不管是通过人、还是通过机器” (p.34)。也见亨德森 (Henderson, 1954, 6), 他断言, 英国政府“让许多招募劳工到国外工作的经纪人和将机器与图纸走私到国外的人从他们的指尖下溜走”。

[32] 进一步而言, 伊拉姆 (1958, 23) 谴责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了社会动荡。他指出, 如果人们用实际价值 (而不是欺骗性的“官方数据”) 来衡量, 出口贸易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拿1842年同1816年做比较——两个年份都处于萧条时期, 出口贸易仅增长了14%, 而人口增长了40%, 进口增长了55%。“这表明动脉、而不是肌肉已经硬化 [正如俾斯麦 (Bismarck) 在描述这一时期英国的保护主义时所说的], 它也更充分地说明了社会压力不断上升这种症状产生的原因。[1842年之后] 接受自由贸易政策也许是为了避免陷入未老先衰的困境”。这种分析似乎太过简单, 我们稍后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33] 在整个这部著作中都会看到, 我们的历史学是多么频繁地向我们灌输这些不真实的对比。这种历史学的歪曲是19世纪社会科学遗产的组成部分, 那时的社会科学是作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

[34] 这次争论的背景已经在第三卷第1和第2章予以了考察 (沃勒斯坦, 1989)。

[35] 流行一时、目前几乎已经被人们忘却的“起飞”概念是W.W.罗斯托 (1971) 在1960年提出的。他认为, 法国的起飞是在1830~1860年之间发生的, 而英国的起飞则是在“1783年之后的20年间” (p.9) 发生的。有关法国的“起飞”存在一个确定时期的观点受到马克兹夫斯基的质疑, 或者更确切地说, 他指出, 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时期的话, 那么它最迟发生在19世纪初 (1961; 1963, 123); 也见布维耶 (Bouvier, 1965, 270), 马尔科维奇 (1966) 和列维-勒布瓦耶 (1968b, 801)。

[36] 因此, 法国的服务业部门规模较小, 寄生者也更少些。这导致奥布莱恩和凯德 (1978, 32) 评论道, 他们现在“明白尼采的话的力量, 即‘一个文明的实力’可以根据它所能供养的寄生者的数量来加以衡量”。

[37] “法国农业之所以‘落后’ [较低的人均产出] 是因为农村较高的劳动力密度, 这必然导致对劣质土壤的精耕细作, 以及生产的作物类型以基本食品为主。而且在法国, 无地农民仅占农村人口的一个较小比重 (事实上是少数)。几十年来,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表现出要从他们生活的‘劣质’土地上迁徙到城市的愿望……对法国经济发展绩效提出批评的人有时忘记了, 法国的农业制度由于大革命时期农民的激进表现而得到巩固” (O'Brien and Keyder, 1978, 190, 195)。

霍布斯鲍姆也提醒我们，回顾自1789年到19世纪中期的这段时间，并将他们同英国的农业工人相比较，法国农民“无疑处于更有利的地位”（1962，201）。接着，霍布斯鲍姆引述了一位英国学者科尔曼（H.Colman）在一本写于1848年的题名为《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农业和农村经济》著作中的评价。科尔曼写道（pp.25-26）：“经过对国内和国外农民和劳动阶级的考察，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讲，就人们所处的状况而言，我从未了解到有比法国农民更文明、更整洁、更节俭、头脑更清醒，以及穿着得更好。在这些方面，他们同绝大部分苏格兰农业劳动者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过分肮脏和低贱；同许多英格兰农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奴性的、意志消沉和严重缺乏生活资料的；同贫穷的爱尔兰农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衣不蔽体和处于野蛮状态的”（cited on p.201, n.a）。最后，霍恩伯格（Hohenberg, 1972, 238-239）论证道：“在整个19世纪，相比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法国农村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在社会结构、生育行为和土地使用制度方面]。矛盾的是，正是这些变化使维持——实际上是强化——一种建构在家庭经营、家庭所有的农场之上的基本平衡成为可能。”

[38] 对法国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的合理性，以及对法国工业在19世纪取得相对较好的发展绩效的重新评价，见列维-勒布瓦耶（1968b）、勒尔（Roehl, 1976）、卡梅伦和弗里德曼（1983）。尽管列维-勒布瓦耶在1968年称赞“法国经济具有灵活的适应性，以及它的工业充满活力发展”，并将它在整个19世纪的特征总结为“相对和谐的扩张”（p.801）；但在1985年同布吉尼翁（Bourguignon）合作出版的著作中，他却持一种不太乐观的观点。他们提到（pp.103-104）“法国问题”——食品消费比重过高、多样化需求太少、工业出口太少、投资太少，并责备法国农民：技术创新在农村未能实现的事实——某些创新在18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政治动荡、通货膨胀和战争中断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可以由两方面的因素来加以解释：（1）长期看，农村贫困——是从前工业时期继承下来的——的程度只是非常缓慢地减少[这不同于霍布斯鲍姆在前一个脚注中的看法]。这就解释了在一个加速增长时期人们所观察到的在工资结构和消费开支方面的不正常现象。素质较低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和农村移民的特点改变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数，……扩大了底层阶层的规模。在这个周期中，工资水平提高不够快和对工业品需求的不足被归因于阶层的变化，在计算适用于整个人口的资料时，我们必须将这些考虑在内。这等于说，在19世纪下半期，法国仍然有较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工业家在必要时可以予以吸纳，以压低城市工资水平。而这种劳动力后备军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吸纳完毕。（作者归因的另一种因素是19世纪70和80年代政府过度干预所起的不良作用。）

[39] 第一段引文出自克鲁泽（1970，86），第二段引文出自克鲁泽（1972a，278）。在出版于1985年的著作中，尽管假设英国处于相比法国而言的“优势地位”上，但克鲁泽提出了一个共同处于“领先地位”的长名单，并且非常苍白无力地得出结论：“在这两种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性和趋同性”（1985，454）。

[40] 他还将法国所取得的经济绩效总结为“可信的，但并不是更杰出的”（p.67），这比“可信的，但并不是更突出的”在语气上要稍强些。

[41] 见克雷厄（Kraehe, 1992, 693）。施罗德（Schroeder, 1992a, 684）甚至提及“英国

与俄国分享霸权”，这似乎是夸大其词的。也见杰维斯（Jervis, 1992）、格鲁纳（Gruner, 1992）和施罗德（1992b）。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它们“只是出于礼貌才被称为大国的”（霍布斯鲍姆, 1962, 129）。

阿勒维（1949a, 95）很好地把握住了英国人对1815年军事情势的评估：“从国家安全方面看，肯定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英国人减少他们在军队方面的支出。英国目前已经没有令其感到担忧的敌国。在长达1个多世纪的战争之后，法国的力量最终被削弱。迦太基征服了罗马”。

[42] 有关梅特涅，也见施罗德（1992a）。有关英国，韦伯斯特（1925, 48-49）类似地也强调她同欧洲大陆分离开来的意识，同时她继续赋予海上控制和帝国问题以优先地位。海军力量和制海权仍然被视为是权力的真正保障所在……“制海权”甚至被认为是不容讨论的。因此，“搜查权”和国际法的其他原则——尽管不为其他大国所承认——仍然保持了其效力……[然而]“制海权”[在1815年以后]就从未再实施过。的确，相比他的后继者，卡斯尔雷更多“孤立主义倾向”，但将托利党的傲慢自大同长期战略相混淆是错误的。从1815年这个时间点来看，在卡斯尔雷的岛国狭隘性与沙皇亚历山大的浪漫而充满活力之间，我们能够观察到威尔（Weill, 1930, 14）所称的“奇怪事实，即[在1815年]绝大多数国际法案的支持者是俄国贵族，而反对者却是英国外交官：托利党人傲慢地相信，只有他们的国家才能运转一个自由的体制，其中权力由贵族掌握”。非常妙！说得好，这是法国人有关权力领域尖刻评论的最好体现。但不管怎样，卡斯尔雷在维也纳获得了英国认为至关重要和非常想要的东西：“她保留了对海洋的控制权；她获得了在全球及区域层面上的安全保障；她占有了一些重要的殖民地”（Nicolson, 1946, 211）——即在全球海上航线上一系列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岛屿和港口在1783~1816年这一时期为英国所控制。名单可以在沃勒斯坦的书（1989, 122）中找到。

[43] 梅特涅事实上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30年谈及法国七月王朝时认为它“起到了冲垮防波堤的作用”（cited, without footnote, in Vidal, 1932, 34）。霍布斯鲍姆（1962, 132）同意这种说法：“1830年革命完全摧毁了[1815年所达成的和解]。”但更确切地说，它们摧毁了梅特涅所主张的和解形式，却更好地巩固了英国所主张的和解形式。威尔（1930, 4）称1815~1847年这一时期为神圣同盟走向破产的时期，它“既不能抵制民族观念的传播，也不能阻止自由主义政党充满激情的宣传”。

[44] 确实，克拉潘（Clapham, 1930, 317）认为与会国都太过宽容：“[在1815年之后的岁月里] 欧洲大陆人同意岛国居民的看法，即他们承担了可怕的债务负担，而且它的税收制度也是非常糟糕的。但人们很少注意到，负担过重债务负担的一个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卡斯尔雷和威灵顿具有绅士风度地拒绝考虑向法国索取任何重要的战争赔偿”。

[45] 申克（1947, 132）进一步指出，“威灵顿……以出众的洞察力预见到，波旁王朝将重蹈斯图亚特王朝的覆辙”。

[46] 尽管格罗斯（Gross, 1968, 45）指出，由欧洲和解所发起的就彼此利益展开协商的程序和会议“为维系和控制力量平衡提供了某种自封的管理机构，即大约100年间欧洲维系不稳定和平所依赖的那种力量平衡”。但对我而言，杜朴斯的观点似乎更为准确，他指出，这实际上根

本没有维持多久：“借助于诸大国就普遍关注问题进行经常协商的形式，维罗纳会议 [1822] 结束了一个欧洲共同政府的存在”。欧洲和解至多变成了一个“断断续续存在的利益集团”（p.503）。

勒努万（Renouvin, 1954, 57）确定的结束一致行动的时间甚至更早，他认为结束于1820年5月5日英国内阁的国务文件，涉及的内容是拟议的对西班牙的干涉。该文件声称，联盟“从来就不是设计作为世界政府的或者管理其他国家事务的联盟…… [英国] 不可能、也不会依据抽象的和纯理论性的预防原则行事”（cited in Crawley, 1969, 674-675）。

[47] 为了避免有人指责我在使用1945年以后的概念，见特默帕理（Temperley, 1925a, 23）对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发布的特拉波通告（1820年12月18日）的讨论，它是这三个国家在一次会议上发布的，当时英国和法国坚持只作为观察国参会：“由此宣布的原则是，革命性叛乱即使纯粹是国内事务，也绝不可能得到东欧三位实行军事独裁的君主的承认。”

[48] 就神圣同盟作为1815年之后和解的支柱，见希顿-沃森（Seton-Watson, 1937, 47-49）。申克（1947, 41）提醒我们，加入神圣同盟的邀请发给了除奥斯曼帝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盟约的基督教性质提供了一种同盟具有正当性的理由”。

[49] 也见康德利夫（1951, 203-209）。伊姆拉（1958, 2）有代表性地提出了对这种论断的最好注解：“英国统治下的和平 [不仅仅是军事力量] 中独具特色的……是她用她自己的自由和获得高度回报的政策对其他民族、由此对其他政府政策所施加的影响。”

[50] 詹克斯（Jenks, p.63）同时还提到，就拉丁美洲而言，这些贷款是“邪恶的”，因为它们主要被用于购买武器。“暴力、腐败、动荡和财政危机，这些总结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南美大多数共和国的特征，当然决不能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伦敦金融市场早期的宽松政策”。我们能够确定它是宽松的吗？

[51] 阿勒维继续指出：“当1819年，通过恢复硬币支付制度，李嘉图学派获得明显成功时，前一种主张明显获得了胜利，而且，也正是在此时，李嘉图为自己购买了一个下议院席位。”

[52] 布罗克继续指出：“国王、贵族、下议院议员和人民都不应该单独统治，但每类人都有它应该支配的固定领域，每类人也都能够通过越出那个专属领域而打破平衡。”

[53] 阿勒维辑录了（1949a, 200）两党采取一致政策的诸方面：党组建战时政府和全力保卫欧洲自由；政府努力获得社会的支持；禁止军队干预政府；实行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法律同各种权力的模糊分配相结合。

[54] 阿萨·勃里格斯（Asa Briggs, 1959）将英国从18世纪80年代到1867年之间的这段时期描述为“改良的时代”。

[55] 确实，在20世纪，保守主义学者将会论证，这就是实际发生的。哈特（1965, 39）分析了她称之为“托利党人对历史的解释”（指诸如大卫·罗伯茨 [David Roberts]、奥利弗·麦克唐纳 [Oliver MacDonagh]、基特森·克拉克 [G.Kitson Clark] 等历史学家），并将它同辉格党的

解释相对照，后者强调人和思想的作用：“在对19世纪英格兰进步的解释中，他们轻视人和思想的作用，尤其是轻视边沁主义者的作用；他们认为舆论——通常是由一种基督徒的良心所推动——一般都是人道主义导向的；当人们感到社会弊病无法容忍时，他们由此会起而抨击它们；许多变革并不是预先策划的或在某种意义上计划好的，而是‘历史过程’或‘盲目力量’的结果。言外之意就是，没有人类的努力，社会进步也将——在未来就像在过去那样——会发生；即使我们仅仅是随一条橡木做的小船（Oakeshottian boat）漂流，最后一切也都会变得最好。”

[56] 在伦敦，它“造成的场景再次唤起人们对1780年戈登暴乱的记忆”。就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而言，见霍兰德（Holland, 1913, chap.10）。政府公然实施谷物法以确保粮食供给。希尔顿（Hilton, 1977, 303）提出了这样做的理由：“当1814~1815年价格的下降有可能导致战时对农业投资的严重损失、大规模弃耕和资本从农地投资上逃离时，政府进行干预以阻止资本过多转移到工业部门，同时禁止外国剩余农产品的输入，这些剩余产品的数量大到足以使农民破产，但却不足以供养所有消费者”。这种论证似乎是有私利在其中的。

反对谷物法的各种论点很难说是具有更多利他主义成分。里德（Read, 1958, 11-12）概述了工业家的动机：“曼彻斯特反对1815年谷物法的工业家并不是根据社会正义来进行思考的，稍后的反谷物法联盟是利用它来获得合法性的。工业家的论据是赤裸裸地要求获得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论证，高食品价格将迫使雇主支付高工资，作为结果，他们的产品将在世界市场上变得不再重要。”见科尔曼（Coleman, 1988, 35, 39）对从逐渐兴起到在彼得卢达到高潮这一整个时期的评价：“政府的行为被归因于19世纪英国的统治阶级，当世纪初权威遭遇挑战时，它建立起威权体制。一些镇压手段是非正式的——像社会压力和骚扰、富人将关税转嫁给穷人、默许或纵容忠于政府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而其他的则是正式的和合法的，像强化有法可依的禁令和管制、不断提起诉讼、增加军队数量以震慑或压制心怀不满者……政府发现自己的力量得到强化。传诸后世的就是制造了彼得卢惨案，这是1819年的真正教训所在。”

[57] 见勃里格斯（1967, 43）；埃文斯（1983, 181-186）。怀特（White, 1973, 175）对实施绞刑评述道：“科尔切斯特勋爵（Lord Colchester）表达了他的满足感，该事件有助于消除一种有害的错觉，即‘叛逆罪是一种下等人将不会受到惩罚的罪过’。贵族的特权在即将来临的民主制中会继续存在。”纺织工人在这一时期的激进主义运动中所起到的中心作用，见克拉潘（1930, 1: 178-180）；普若瑟罗（Prothero, 1979）；和里德（1958）。

[58] 这6条法案是在1819年11月23日通过的，分别是禁止武装训练法（不得进行武器使用方面的培训）；没收武器法（查搜武器和逮捕的权力）；处置行为不端法（减少在司法程序中的延误）；煽动集会法（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他们只能在常驻的教区中集会，即使这样也能够命令他们解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携带武器、打出旗帜、敲锣打鼓或演奏音乐，或以军队队列行进）；亵渎和煽动诽谤法（限制激进出版物的作用）；对报纸征收印花税法〔将印花税的征收扩展到每26天至少出版一次的出版物上，税额是不高于6便士（不含税）〕。也见普若瑟罗（1979, 75）。

[59] 以一种轻蔑的语气，布洛克（pp.35-36）论证道：“发生于1816年到1819年的多次激进骚乱，迟滞、而不是推进了议会改革运动。相比过去改革者的恶行，托利党更加自信，而辉格

党则对他们过去曾如此支持的议会改革运动变得愈加冷淡”。

[60] 托米斯和霍尔特进一步驳斥了 (p.127) 对革命即将来临的担忧：“有鉴于革命一方存在如此明显的弱点，对革命不会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爆发的解释并不要求在政府统治能力和它所控制的军队的实力方面去寻找”。

[61] 这就是雷蒙 (Rémond, 1982, 22) 对于“极端保皇分子”的定义，他将这些保皇分子界定为法国的三种“右派”之一，其他两种是奥尔良派 (orléanist, 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和民族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

[62] 《档案》第1辑，1817年，第10页 (cited in Mellon, 1958, 102-103)。

[63] 勒屈耶 (Lecuyer, 1988, ii) 在他编辑的于19世纪80年代再版的博纳尔著作的序言中指出，博纳尔的《政治权力理论》……出版于1796年，它被法国政府 (督政府) 所禁止，因此在法国几乎没有人读到。但博纳尔确实有“一位著名的读者：波拿巴听说它后，似乎尤其为它所吸引”。博纳尔本人在接下来的时期强烈反对拿破仑，正是基于他是暴君的原因 (see Koyré, 1946, 57, n.6)，但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论点的逻辑使他赞同一种现代独裁主义，正如贝内东 (1988, 43) 所评价的：“既然真正的理性完全是社会性的，因此所有创新都必须被先验地认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最危险的就是新思想……书报审查制度因而是必要的……社会的首要性使求助于世俗权威具有了正当性。博纳尔激进的传统主义由此最终以一种独裁主义的统治方式而告终。”

[64] 这使得拉吉罗 (1959, 85) 这位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能够将正统王权拥护者作为革命者来加以攻击：“[在德斯特勒、博纳尔等人的思想中] ‘复辟’一词在其固有的意义上是不可能加以应用的。相反，它是同一场革命的延续，显现出它自身新的一面……现代君主实际上源于中世纪主张人类终将得救的宇宙神教的破灭……神圣同盟的宗教普济主义因此完全与传统无关；它的目的是反对《人权宣言》，但从本质上看它本身同样是革命性的。”

[65] 见梅隆 (Mellon, 1958, 3, 7)：“自由主义者面临的第一个政治任务……是宣传法国大革命。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存在依赖于他们证明大革命具有正当性、澄清认为它是犯罪的误解，以及为它的罪犯开脱的能力……不是对大革命的‘新气象’、对突然同几个世纪的黑暗和暴政分离感到荣耀，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把握住了它同这种过去的联系；但他们却反对保守主义者从法国历史中读出大革命的努力，这种解读暗示它归因于过去，暗示其中存在的连续性。”

[66] “革命是处于进步中的社会的神圣必然性的结果，它奠基于道德原则，并承诺代表公共利益。它是恐怖的，但却是法律反对特权或自由反对专断的合法斗争……通过自我约束，通过自我净化，通过建立立宪君主制，只有它能够使它开启的善达到完美，矫正它所犯的错误” (Guizot, 1820b, 28)。因此，正如罗桑瓦隆 (1985, 199) 所指出的：“从这种视角理解，1814年宪章远非是虚假的、根据当时情况达成的妥协。恰恰相反，它似乎是一段长期历史的终点”。

[67] 梅隆在写于1958年有关复辟时期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中给出的这种分析，应该结合卡普兰（Kaplan）在写于1993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的历史著作中给出的分析来加以解读。后者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

[68] 确实，正如拉吉罗（1959，89）在为自由主义辩护时所宣称的：“真正的复辟既未包括在有关领土的维也纳条约中，也未包括在神圣同盟实施的政策中，而是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逐渐发生的，其中在恢复平衡和实现新旧融合的共同事业中，传统与革命、反动派和激进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合作”。

[69] 有关1793年到1797年国库空虚的情况见克拉潘（1944，1：259-272）。克拉潘（p.172）提到“在1797年中止现金支付之前”，英格兰银行的“金条所具有的关键重要性”（1：172）。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在那时并不是法定货币。“只要公众接受银行纸币，而后者又不要求获得法定货币所带来的好处，那政府和银行就倾向于以此方式使用它”。人们避免使用法定货币说法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在公众意识中是同法国大革命时发行的纸币相联系的”（Fetter，1965，59）。纸币在1795年的暴跌事实上导致在法国使用硬币的增加，这依次又是导致英国国库如此空虚的一个原因。（see Fetter，1965，11-21）

[70] 有关这两次争论的复杂性见莱德勒（Laidler，1987）有关金本位论战和施瓦茨（1987）有关银行对货币学派论战的说明。有关两场论战的情况，也见菲特（Fetter，1965，95-103）。

[71] 有关恢复硬币支付争论的政治影响见詹克斯（Jenks，1927，25-31）和菲特（1965，95-103）。

[72] “农业生产者的不满由于硬币制的恢复而加重。契约已经签订、资本已经借贷、而且税额是在纸币体制下估定的；随着金本位制的恢复，货币价值将会提高，价格将会下降，契约规定的债务将必须以价值已经提高了的货币支付”（Brock，1914，186）。“在这一时期的抗议运动中，谷物和货币问题明显同时出现——确实，它们一度变成了同一个问题……沉重的负担被加诸在负债人身上……在负债人群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是农业生产者集团……货币操作的技术细节对谷物种植者而言至关重要，不管他们对此的认识是多么少。批评者很容易忘记这些细节，而攻击政治经济学家做了‘错误的推论’和提出了‘可憎的理论’，是‘见风使舵的人’，他们似乎要为极端政策的实施负责。‘确实如此！他们当时正在变成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赤裸裸地支持君主大会召开，李嘉图[正是他引入了恢复硬币的立法]管理着国内事务”（Briggs，1959，204-205）。

[73] “富人——他们能够筹得所需要的全部贷款——能够很好地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并对货币正统派对拿破仑战争之后经济的看法施加影响；正是平民遭受的损失最大，在整个19世纪的所有国家中他们都要求获得便宜的贷款和实施非正统的金融政策”（Hobsbawm，1962，58）。“1819年之后恢复实施金本位制被视为恢复了富裕阶级的垄断权力，他们控制着信贷的供给”（Cole，1953，1：110）。中间阶级的激进分子支持恢复硬币制，因为他们认为，它将使国家“回复到和平时期的正常税率”（Read，1958，64）。

[74] 这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那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当资产阶级变得愈益富有时，劳动阶级就会遭受损失。〔到1815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村地区无产阶级造反的条件已经成熟”（Halévy, 1949a, 249）。

[75] “托利党看待劳工阶级的主导性态度是‘既得利益’思想。一直对抗自由主义改革者的——他们试图基于明白易懂的理性路线来塑造公共管理——是18世纪的旧偏见，后者偏爱‘利益集团’、而不是作为政治单位的国家”（Hill, 1929, 92）。

[76] 弗林（Flinn, pp.84-85）注意到，在1793年到1811年之间，议会四次投票通过《财政部法案》，为处于困难中的商人、工厂厂主和殖民地的种植园主提供救助。此类法案中的第四个确实提到“由此带来的对就业的威胁”。但在1817年之前，这些法案仅仅是帮助增加企业家的流动性和推动举办特定的公共工程。1817年法案同时包含“提高就业水平的要求”。事实上，政府的社会立法在1817年法案之前就有。有1802年颁布的《学徒健康和道德法案》（the Health and Morals Apprentices Act），它将在棉纺织厂工作的穷学徒的劳动时间限制在每天12个小时。尽管也许这实际上与其说是对工人阶级这一新生社会力量反应的产物，不如说是伊丽莎白济贫法的衍生物（see Heywood, 1988, 218），但只有第二个法案是沿着这些路线制定的，它是在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促动下由皮尔在1815年颁布的（see Ward, 1973, 56）。很难在托利党的社会慈善（贵族不得不为之）和托利党明智地适应抑制社会动荡的要求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总之，“皮尔派的保守主义在劳工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在威灵顿和皮尔领导下的执政党将注意力放在了其他地方”（Hill, 1929, 181）。

[77] “它们提供了一种发泄渠道，使处于饥饿与贫穷之中绝望的无产阶级能够找到一丝慰藉，同利用和平手段阻止传播革命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并借助居于主导地位的公共舆论的影响来满足法律控制的需要”（Halévy, 1949b, vi）。“由于他们都渴望获得自由，〔不信国教的人〕统一于对秩序的忠诚，最终，这种忠诚占据了主导地位”（Halévy, 1949a, 424）。

[78] 对这种诋毁，约翰斯顿（Johnston, 1972, 64）为霍顿做了辩护，他指出，霍顿真正“相信殖民地的价值”。也许是这样，但向外移民的规模很大（大约1万1千人，或19个穷人中就有1个人移民），而且确实减轻了贫困问题。政府也确实在推动向外移民，正如约翰斯顿（pp.1-2）本人清楚地揭示的那样：“在1815年到1826年之间，利物浦勋爵执掌的政府在国家资助对外移民方面进行了6次不同的试验……像议会改革和取消谷物法一样，对外移民成为一个植根于下层阶级贫困的问题”。

另一个担忧是居住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人将会移民到“联合王国经济发达的地区”（Clapham, 1930, 63）。很明显，他们将会移民，而且明显已达到一定程度，这对企业家而言是非常有益的。但在超过一定程度后，它就会加剧城市的社会贫困问题，而同样是这些人移民到联合王国之外就不会产生这种不利影响。《1826~1827年移民研究》提及“自称为爱尔兰移民的巨大增长，……威胁到英国现有的生活水平”（cited in Clapham, 1930, 64）。

[79] “作为重商主义和它的各种观点不共戴天的敌人，经济学家〔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Mill）和麦克库洛赫（McCulloch）〕当然反对殖民制度，那时不实施某些商业限制的帝国似

乎是不正常的，他们的学说在基调上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Schuyler, 1945, 70）。在议会有关结束航海垄断的辩论中，哈斯基逊（Huskisson, 1825, 24）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强有力的陈述：“事实上，……[对殖民地的]垄断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有害的：当母国能够以相比其他国家相同的或更低的价格提供给殖民地商品的话，它是无用的；当她无力这样做时，垄断——通过强使她的部分资本进入她并没有特殊能力运用的领域——明显肯定是有害的”。他举了同独立后的美国继续保持活跃贸易的例子作为对这些论断真理性的证明。至于阻止国外竞争，他指出（p.258）：“西班牙过去实行的专断的规则和海上保护政策并没有阻止她的殖民地充斥着被禁止输入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商品”。

[80] 不过，哈斯基逊（1825, 287）持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事实在于，利润率根本不依赖于运用资本领域的大小，而是完全取决于当时工业的生产率。”

[81] “韦克菲尔德强调这种辩护的‘科学’性……能够比较韦克菲尔德领导的中央土地和移民委员会同另一个功利主义组织修订济贫法制度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相似性。两者都是某种类型的权力集中于中央的官僚机构，它们在当时既不常见、也未迎合英国人的心理。两者都需要一个由全职专家组成的机构，他们完全通晓支撑现存体制的各种原则，能够既经济又有效地进行管理，而且拥有一个下达命令和明确责任的明晰链条，能够直达他们的下属……殖民地不再仅仅是军事据点、或罪犯的流放地；它们之所以被保留并不是为了给贵族提供一份闲职、也不是为了给特殊利益集团提供贸易上的好处。新的社会共同体将被建立起来，它们将免受英国人生活中所受的那些政治和宗教上的限制，同时拥有旧文明的某些属性”（Winch, 1965, 149-150）。

[82] 贝里（Bayly）继续指出：“当然，在政治家的头脑中，并不存在如下的粗俗意识，即这里占领加勒比海的一个岛、那里占领印度的一个省，将有助于管教工人阶级，并为贫穷的苏格兰高地人或不满的爱尔兰农民提供向外移民的场所。它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使命感，即要消弭英国存在的冲突与不安，这种使命感尤其被一个新兴的军事化贵族阶层所传播，而且不断向海外扩散，重新唤醒了殖民地政府那几乎已被消磨殆尽的抱负。”

[83] 阿勒维继续指出：“贵族和中间阶级纷纷到巴黎或意大利享受更廉价的生活、较低的税收[注意这一点，所有人都认为英国是超级守夜人式的国度]、更宜人的气候和更多的快乐。失业的劳动者离开英国到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寻找工作；革命正在几乎全世界爆发，它为所有那些为冒险精神所激励和认为平静生活缺乏吸引力的人提供了一个以坚定的自由斗士出头的机会。在巴黎，罗伯特·威尔逊爵士（Sir Robert Wilson）帮助拉法夷特出逃；在拉文纳（Ravenna），拜伦（Byron）同奥地利警察发生了冲突。但南美洲为这些游侠提供了最荣耀的冒险机会。科克伦勋爵（Lord Cochrane）指挥的智利舰队，海军准将布朗（Commodore Browne）率领的拉普拉塔共和国舰队驻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外。在委内瑞拉，麦格雷戈将军（General MacGregor）经历了一场场战斗，英格利什将军走在由300人组成的英德军团的最前面。据估计，1819年有1万多人从爱尔兰港渡海‘到南美洲为反对专制统治而战’，其中有一个旅包括1500多名曾经在滑铁卢战斗过的士兵。”

[84] “坎宁（Canning）如何应对[欧洲各国威胁要进行的干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他及

时地发出警告，英国海军将被用于阻止法国军队和西班牙以外国家的军队离开欧洲……欧洲大陆各国政府在明确表态之前需要清醒地评估其中的风险”（Imlah, 1958, 9）。

[85] 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也是在1823年提出的，但它的作用不应夸大。帕金斯（Perkins, 1927, 256-58）提及它“给大多数欧洲国家带来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久的利益”，并补充说：“认为它使旧世界的外交官感到恐惧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正如希顿-沃森（1937, 88）所注意到的，“明显存在对英国的不同反应，但可以毫不夸大地断言，在‘创建新世界的’过程中，坎宁的态度、而不是门罗主义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美国被公认还没有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而坎宁对此非常确定，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各国明显也持类似的观点。”就拟议中的对西班牙本土的干预而言，卡斯尔雷和他那时的外长坎宁拒绝参与其中。的确，他们明确表示反对法国的干预，但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被动的，目的是防止法国染指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Seton-Watson, 1937, 84）。

[86] 见特默帕理（1925ab, 37）对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明显具有权威性的分析：“卡斯尔雷在亚琛（1818年）迫使亚历山大放弃了任何用武力干预拉丁美洲的计划……但神圣同盟在1818年屈从于卡斯尔雷的事实并不构成它[在1823年]也这样做的理由，假如法国已经为达成这一目标而做好准备去冒风险的话”。但法国准备去冒风险吗？法国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准备。路易十八试图恢复1815年签订的《家族盟约》（the Family Compact），由此向西班牙提供支持。接着，法国希望鼓励在拉丁美洲建立波旁王朝式的君主国。但到1823年末，法国已经确信：“西班牙不可能再恢复她以前据有的殖民地”（Robertson, 1939, 319）。因此，不值得为此而开罪英国，尽管有极端党派（包括很快将成为查理十世的现国王的弟弟）强烈支持干预的事实。

[87] 申克（1947, 41）提醒我们注意，当奥斯曼帝国在1815年被排除在神圣同盟之外时，它“倾向于认为在这种排除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毕竟，人们不可能太容易忘记，在如此近的1808年，俄国已经对君士坦丁堡提出领土要求”。

[88] 也见比灵顿（1980, 135）：“[1812年希腊革命]提高了宪政革命在这样一个时期整个欧洲的声誉，即在那项事业似乎正处于最难堪的时期。它对民族——不同于社会——革命赋予了富有想象力的助推，它在政治上激发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灵感”。事实是，民族主义需要这种助推。它是一种新兴的主义，从某些方面看诞生于拿破仑时期，但仍然被混淆于对任何占领军的抵抗。只是在1815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自觉的主义，它论证国家和民族应该一致。正如勒努万（1954, 12）所指出的：“在1815年……这种主义尚未完全成形”。

[89] 威尔（Weill, p.95）论证道：“神圣同盟的解体——开始于应对西班牙和西属美洲问题——完成于应对东方问题……正是这个欧洲集团的解体使自由主义在1830年的胜利成为可能”。见特默帕理（1925ab, 474-475），他类似地也将功劳归于坎宁：“由此开创的事业是永恒的。英国在1848年革命风暴中所享有的稳固地位更多归功于坎宁、而不是其他任何人……1830年和1848年革命证明，世界有可能‘由于立宪君主制而变得安全’。正是坎宁在20年代就已经预见到它有利于稳定的作用”。

[90] “对[浪漫主义者]而言，将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擅长的领域或艺术强加给另一个民族都是令人厌恶的。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试图犯的理性主义错误，也是浪漫主义者正在与之斗争的错误”（Barzun, 1943, 129）。威尔（1930, 216）认为：“在反革命政治学和新文学之间的联盟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而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91] 霍布斯鲍姆继续指出：“将它称为一种反资产阶级信条有些高估，因为在打算登堂入室的各新兴阶级中，革命者和征服者也令浪漫主义者着迷……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邪恶因素……令他们感到困扰……然而浪漫主义因素仍然居于从属地位，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霍布斯鲍姆（p.310）同时提醒我们注意：“这些浪漫主义批判中产生最持久性影响的是有关人的‘异化’概念，它将在马克思那里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也对未来的完美社会做了勾勒”。

[92] 也见勃吕阿（Bruhat, 1952, 186-187）：“工人的状况从1815年到1830年变得越来越糟。在工时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同时，工资却在下降……煤气灯开始普及，但主要用于在冬季使延长工作日成为可能”。

[93] “对工人而言，声称自己同资本家是平等，这是需要‘勇气’的”（Daumard, 1963, 517）。

[94] 勃吕阿（1952, 206-207）提到：“不过，即使他们的活动被限制在相互帮助方面，但这些互济会还是有助于赋予工人以组织意识的，哪怕只是定期收集会费、召集会议和指定会费收集人也是如此”（p.208）。

[95] 见吕德（1969, 61-62）有关省长德·夏布洛尔伯爵（the Comte de Chabrol）于1817年6月24日提到的报道的论述。吕德还提到一个由法维耶上校（Col.Fabvier）发行的小册子《1817年的里昂》（Lyon en 1817），类似地，它也暗示受到里斯本的运动和巴西的伯南布哥（Pernambuco）革命的不良影响。

[96] 给福列尔（Fauriel）的信，引自罗桑瓦隆（1985, 39）。

[97] 拉布鲁斯（Labrousse, 1949a, 19）论证道，这是1789年、1830年和1848年法国革命的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自发的；原因来自内部；在每次革命中都具有某种社会性质；之前都出现过经济困难。“如果经济困难和政治紧张这两种现象相结合会引发爆炸性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必然会遇到反抗……在英格兰，灵活的政策：适时的妥协，不会引发爆炸性反应。而在法国，抵制变革引发了爆炸性反应”。

[98] 邦纳罗蒂最担心的不是神圣同盟，而是“在这个改良时代由坎宁所领导的英格兰，它是更高明的对手”。（Eisenstein, 1959, 139）

[99] 这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称颂，纪念“光荣的三天”的纪念碑就矗立在巴士底广场。但对法国大革命的称颂主要体现在1814年路易十八的宪章中。巴黎资产阶级对极端保守派的反对“并不是进步性的；在显贵们的意识中，这部宪章是一个终点、而不是一个起点。为了同那些他们谴责为持反动观点的人做斗争，巴黎资产阶级的领袖自身也同样转向过去。他们的保守主

义态度既表现在社会层面，也表现在政治领域”（Daumard, 1963, 575）。

[100] 多莱昂（Dolléans, 1947, 44）同意这种说法：“对工人阶级而言并没有什么改变……[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敌视人民甚于敌视主张复辟的人”。杜马（Daumard, 1963, 576, 583）也持相同观点：“为大家所公认的观点是，七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窃取了这场由人民所发动革命的成果……到1831年底，资产阶级被组织起来。改良是有限的，但它们代表了那时中间阶级的希望，中间阶级的代表们都毫无例外地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在国家中的适当地位”。也见纽曼（Neuman, 1974, 58-59）：“[1830年革命]是主张立宪的自由主义者和平民之间结盟的产物，这种联盟的存在已经有几年了……[两个阶级]能够将自身视为一个单一政治体——人民——的组成部分，它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才联合在一起，敌人即以查理十世为首的、有大量神职人员充斥的贵族党……[只是稍后，平民才]在像路易·勃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下认识到，自由是不充分的，主张自由主义的中间阶级并不会、而且也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稍后”事实上几乎是“立即”。到8月中旬，巴黎爆发了许多次罢工。到10月，发生了“多次骚乱”。“工人阶级发现革命远没有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给他们带来命运的改善，却是使它更为恶化”（Pinkney, 1972, 313）。到1831年10月7日，罗讷省省长提到工人阶级的不满是“紧随着革命之后发生的，[他们]肯定认为革命是代表他们利益的”（cited in Tarlé, 1929, 151）。

[101] 首先，大商业发展得非常好，甚至在查理十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尽管革命“确实给公共机构带来新的人选”——的确，它“对政府的较高职位进行了彻底清洗”（Pinkney, 1972, 276-277），但它“并没有为大资产阶级带来新的体制”（Pinkney, 1964a, 71）。的确，他们担心动荡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1830年的春季代表了“在困难时期过后某种程度的高涨期”。但商业状况“在继革命之后的几个月中变得恶化”。继革命之后，发生了“群众骚乱”（Johnson, 1975, 150-151, 153）。

[102] 尽管对塔列朗的任命在英国和法国都引起了争议，但它得到英国民众的广泛欢迎。见马苏尔（Masure, 1893, 108-113）。

[103] “这次对阿尔及尔政权的远征，以及惩治柏柏尔海盗……令法国国王查理十世感到满意，因为他对宗教有着虔诚的信仰，他在此次远征的想象就像中世纪时期国王对十字军远征的想象一样”（Coulet, 1931, 2）。但这似乎必然构成对英国的危险挑衅。

[104] 路易十八在他的殖民政策上已经有所约束以安抚英国人。查理十世在这方面却较少受约束。的确，他首先同英国和俄国一道卷入希腊争端。但1829年的《亚得里亚堡条约》（the Treaty of Adrianople）保证希腊独立，对英国人而言，这有助于保证他们的霸权统治，而从争端中解脱出来的法国军队进行了多次不同的海外远征（see Schefer, 1928, 32-33）。

[105] 见基尚（Guichen, 1917, 65）：“欧洲的舆论将远征阿尔及尔视为一种权宜之计，意在通过一场令全欧洲印象深刻的大胜来分散人们对议会糟糕处境的注意力，强固政府和国王的政治地位”。结果，“欧洲强国几乎一致的支持大大限制了阿伯丁和威灵顿决策的主动性”（p.67）。尽管“英国不断地提出抗议，……但彼得堡和巴黎之间的同盟关系变得愈加友

好”（Schefer, 1907, 446）。

[106] 相比前任至少要好一些。尽管塔列朗建议路易-菲利普放弃阿尔及尔作为向英国示好的一种姿态，但路易-菲利普拒绝了（see Guichen, 1917, 187）。不过，英国人能够同赞成他们对欧洲规划的路易-菲利普打交道，而不可能同查理十世打交道。

[107] 但对马苏尔（1892, 696）而言，它在1830年之前就已经“摇摇欲坠”：“到1830年开始时，神圣同盟仅仅是一个虚名”。

[108] 见吕德（1940, 433），他指出，作为结果，“罗讷省志愿者的骨干是如何在里昂秘密组织起来的某些工人团体中生存下来的……在1831年11月21-22日，正是这些罗讷省的志愿者……在里昂领导工人投入战斗”。拉法夷特既是神圣同盟嘲讽、又是感到恐惧的对象。俄罗斯驻巴黎大使波索·德尔·博尔戈（Pozzo del Borgo）称他为“这支导致普遍动荡的远征军的保护人和煽动者”。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馆秘书阿波尼（Apponyi）认为，他是“人民的偶像和革命的榜样”（cited in Guichen, 1917, 180）。

[109] 见莱斯利（Leslie, 1952, 121）：“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波兰] 起义领袖发动起义是为了阻止军队被用于镇压1830年法国革命。这是在事件发生后为了博取法国同情而编造的理由，正像有人论证，对波兰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拯救了1789年法国革命一样。真相在于，[军队总司令俄国大公] 康斯坦丁（Constantine）发现威索基（Wysocki）在密谋起义，由于这种原因，密谋者必须迅速做出决策”。

[110] 斯里彻·范·巴斯（Slicher van Bath, 1963, 243）指出：“取得最大发展的是在1650～1750年这一时期”，因为“佛兰德农业的集约型耕作与其说以生产谷物为主、不如说以生产工业或饲料作物为主”。但在1750年之后，这种发展仍在继续。阿贝尔（Abel, 1973, 286）注意到：“1800年前后，欧洲旅行者再次一致认为[佛兰德人] 在欧洲[农业生产方面] 居于领先地位”。

[111] 哈斯奎恩（Hasquin, 1871, 299），他尤其指沙勒罗瓦地区（Charleroi）。也见加登（Garden, 1978b, 21），他指出：“即使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和不准确的，但1764年的数据仍然表明，奥属尼德兰大部分地区各种工业的发展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112] 指1770～1840年这一时期，勒伯汉（Lebrun, 1961, 654）提到“比利时工业革命极其迅速而密集的特征”。

[113] 莫基尔（Mokyr, 1974, 381）将高人口增长归因于马铃薯和农村家庭工业的结合，指出“在原工业化时期所支付的极低的报酬令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印象深刻”。他的结论在于：“较低的工资也许在决定比利时迅速实现工业化方面是重要的，而较高的工资在决定荷兰处于停滞方面也许是重要的”（p.385）。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and Saul, 1973, 452-453）对比利时较低的工资水平提出如下解释：“农村生产结构有助于……打破阻碍法国发展的那些僵化结构。农场的规模是如此之小，以

致同一劳动力通常需要在农业工作和工业工作之间分配劳动时间。工厂工人在完成一天工作之后要走相当距离回到他的小农场。这不是无产阶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而是比利时经济所具有的持久性特征。它似乎是从比利时境内劳动力移民的长期传统发展而来，是比利时的工业工资相对低于法国的一个原因所在，因为企业家不需要用高工资吸引劳动力永久离开土地”。就熟练工人而言，见卢维（Ruwet，1967，23）：“从[18]世纪初开始，莱茵-普法尔茨选帝侯、威尼斯共和国、巴伐利亚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普鲁士国王和稍后的俄国沙皇都定期设法吸引来自比利时维尔维耶的工人到他们国家工作，这充分证明了维尔维耶和它盛产技术工人的声誉”。

[114] 勒伯汉（1948，24）提到“只是稍微滞后”。

[115] 克鲁泽（1964，583）增加了克雷菲尔的丝织业。莫基尔（1974，368-369）提到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时期”，接着在1830年之后失去了“过去那种发展势头”。科雷拜科斯（Craeybeckx，1968，123-124）增添了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他指出，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刺激了某些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抑制了……其他部门、尤其是冶金业的技术进步”。不过，他确实提到，在法国人统治的后半期，消除“旧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最后障碍”的影响“尤其重要”。

[116] 德芒戎和费弗尔（1935，128）指出，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Emperor Joseph II）曾试图强制实施许多改革，却均遭失败，但拿破仑却获得了成功。“因此，拿破仑在比利时被假想为是约瑟夫二世意愿的执行人”。

[117] 米尔沃德和索尔（1973，292）基本上同意，但以更冷静的方式做出评价。他们指出，法国在比利时统治的影响是“复杂的，但总的来说是有益的”。东特和布吕维耶（Dhondt and Bruwier，1973，352）称这一时期为比利时工业革命的“巅峰期”。不过，勒伯汉（1961，574-576）提到一些“失去的机会”，它们是由允许大城市太过集中和对教育重视不够引发的。

[118] 东特和布吕维耶（1973，349）提到，政治调整加上英国产品的自由流动“导致根特棉纺织业的衰落。经济停滞一直持续到1823年”。但接着该产业在荷属东印度找到新的销路。里斯和索利（Lis and Soly，1977，480）记录了从食品消费来衡量，安特卫普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从质和量上看均是如此”。

[119] 见怀特（see Wright，1955，28，77）：“到18世纪末，荷兰的绝大部分贸易都是依赖于关税、而不是依赖于明显的经济优势。战时状况迫使外国商人寻求新的客户”。问题在于，贸易是否能够恢复？这又由于1815年之后斯凯尔特河（Scheldt）的开放——该河自1585年以来一直被关闭——和德国边境地区麻烦的减少而进一步复杂化。“到1816年，绝大多数荷兰商人都是本着15世纪威尼斯的、而不是19世纪汉堡的精神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的；他们想要一个免税出入的港口，它将受到各种可能限制的制约，但却有利于荷兰的商业利益和传统”。

[120] 见德墨林（1938，124）：“在失去了法国市场之后，比利时工业陷入混乱状态……尽管如此，但比利时人的要求被夸大；他们想要的是全面的贸易禁令……当然，那时全欧洲都是

保护主义者”。怀特（1955，100）提到“比利时的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都是保护主义者”。

[121] 尼德兰的债务自16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地积累，此时要求每年偿付的数额超过1400万弗罗林。而比利时却几乎没有债务负担（每年偿还的数额不超过30万弗罗林）。确实，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比利时每年缴纳7500~8000万弗罗林，但从财政体制方面看，比利时类似于奥地利统治时期的荷兰。他们尤其抱怨，1821~1822年的财政改革是“以牺牲比利时农业和工业区的利益为代价，而有利于荷兰商业城市的利益”（Terlinden，1922，16）。面对比利时人的抗议，国王改变了过去的做法，实行一些进一步加强保护的政策。政策修订之后，“1821年体制被证明令比利时人普遍感到满意。他们的铁制品、煤炭、棉纺织品和毛纺织品继续在荷兰市场上享有有效的保护，在荷属殖民地也是如此”（Wright，1955，208）。进一步而言，比利时银行家从继续实行两套金属货币——荷兰的弗罗林和比利时的法郎——中获得巨额利润，在汇率有利于法郎的情势下，导致北方资本流向南方（see Chlepner，1926，28-30）。

[122] 德墨林（1950，17-21）嘲讽了荷兰警察的证词，后者认为民众反抗的煽动者是来自布鲁塞尔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那似乎是一种事后的解释；因为资产阶级实际上害怕民众，他们非常精明，所以不可能充当煽动者的角色”（p.17）。就反对从来源上将革命解释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证据，见范·凯伦（vanKallen，1930）。

[123] 革命是民族的，不仅因为它为比利时反对尼德兰辩护，而且因为它将列日记在比利时名下。列日并不是奥属尼德兰的组成部分。法国将它同比利时一道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启动了将两者同化的过程。但就1815年而言，两者仍然被视为是各自独立的。不过，“到1830年，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一个比利时”（Stengers，1951，n.1）。

[124] 威廉国王甚至还触犯了保守的天主教徒的利益，他在1825年试图要求所有神学院的天主教学生都去上他开办的哲学学院，学习普通法和基督教会史（宣称这些课程并不是神学的组成部分）。到1829年，对天主教会而言，它已经进入“拉梅内和自由主义的时代”（Simon，1946，8）。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由于“共同的敌人”而联合在一起（p.10）。雅克敏（Jacquemyns，1934，433）还提及浪漫主义在同时激励对宗教的虔诚和民族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由此而有助于拉梅内社会改良主义的发展——这进一步证实了浪漫主义运动所产生的某些后果并不是阵线分明的，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拉梅内在法国所发挥的作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他最初是极端派中的最极端分子。按照他的逻辑，他是如此的信奉教皇至上主义，以致他最终将君主制——同主张限制教皇权利的运动相联系——视为真正的敌人。因此，他将“反对专制和追求自由也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一旦他想到这种令人震惊的联盟，他很快就被这种想法所吸引”，他开始论证两者在历史上的一致性，将法国16世纪的天主教联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旺代起义视为这种一致性的例证。事实上，正是比利时当时的情势使他能够发展他的思想，并预示他自己将进一步“左转”（Mellon，1958，189）。到1832年，当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在通谕中谴责自由主义、政教分离和将宗教同自由相联系时，拉梅内已经准备好“为了民主而牺牲教会”（Ponteil，1968，308）。

[125] 尽管在比利时革命之前和期间的确如此，但情况接着就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拉梅内和拉梅内分子的左转，教会施加了一些限制，天主教徒开始在民族主义革命中发挥一种缓冲作用（see Guichen, 1917, 255）。随着通谕的发布，教会成功地结束了同自由主义者的联盟关系。比利时教会开始论证，在拉梅内的自由主义形式的天主教和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派天主教之间存在着差别。即他们从根本上讲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天主教徒，如果他们承认政教分离的话，那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这就是著名的马利内学派的教义（the School of Malines, see Simon, 1959, 416）。然而，尽管这对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比利时未来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事实是，这种从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后退来得太迟。比利时已经被创建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在反教权的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自由派之间产生了分裂。而且，这种分裂贯穿整个19世纪。

[126] 这个妥协过程——主要是就教派问题达成的——在1828年就已经开始（see Renouvin, 1954, 62）。

[127] 对在三种选择之间的这种选择的详细说明，见斯唐热（Stengers, 1951）。

[128] 这并非是完全荒谬的。法国人对待比利时独立的态度是非常模糊的。此时，他们支持比利时的独立，但让-巴蒂斯特·诺东（Jean-Baptiste Nothomb）相信，除了路易-菲利普和基佐之外，绝大多数人将“它的存在视为是过渡性的”（Stengers, 1981, 29, n.1）。米什莱（Michelet）称比利时为“英国人的一项发明”（cited on p.7）。迟至1859年，法国驻比利时公使称比利时为一个“通过协议而组建的国家”（p.8）。

[129] 在呈送英国国王的国书中，塔列朗提出了不干涉原则，这是坎宁曾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提出的：“由此，从一种坎宁实施的暂时的政治权宜之计中 [它借鉴自门罗，同拉美独立运动有关]塔列朗自称为处理国家间关系找到了一条普遍和永久适用的规律”（Guyot, 1901, 585）。

[130] 也见贝特利（1960, 245）：“这些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支持为比利时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尽管英法两国政府在比利时独立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

[131] 的确，波兰起义接着也在俄国国内引起反响。波兰人支持俄国立宪民主党的密谋活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作为对立宪民主党表示友好的姿态。“在波兰议会投票否决尼古拉继续担任波兰国王的那一天（1831年1月25日），立宪民主联盟组织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抬棺示威游行，以对五位十二月党人表示纪念，他们是被绞死的。游行队伍打着的旗帜上写着‘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p.415）。

[132] 也见希顿-沃森（1937, 151）：“[1830年欧洲动荡] 的结果是非常明确地将欧洲划分为两大阵营——欧洲东部诸强国，拥护独裁统治，.....主张自由主义的西部欧洲，在国内推进宪政，并渴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支持宪政力量以对抗西班牙王室正统派和米格尔一世（Dom Miguel）的反动统治。”

[133] 波拉德（Pollard, 1973, 640）将比利时视为仍在发挥半边缘区作用的国家。在讨论比利时在1815~1865年这一时期的作用时，他指出：“[面对英国工业化的竞争] 那些最好的和最具韧劲的企业生存下来，它们的生存空间是在更先进的英国为一方和更落后的欧洲为另一方之间。由于最先和最成功地进入这样一种中间角色，比利时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只有在这种双重关系中才能充分理解比利时的工业发展史”。我认为，波拉德低估了比利时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在1834年以后。

[134] 亨德森（1954, 125）提到：“以严重的经济混乱为代价，比利时确保了她的政治独立”（1926, 57）。希兰普纳（Chlepnar, 1926, 57）也指出：“1830年革命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但到1834年，以修筑铁路为基础，比利时开始了一轮大的工业发展。安特卫普的复兴使她能够成为不断增长的英德贸易的中转站。进一步而言，比利时由此能够从作为后发国家的地位上获利。“法国和德国的铁厂老板有充分的理由继续使用较落后的技术，但在比利时却有充分的理由尽可能快地改用新的冶铁技术。铁轨在1834年以后成为比利时绝大多数新建的大型冶铁厂的基本产品”（Milward and Saul, 1977, 443）。

[135] 在与北美13块殖民地的战争中争取获得爱尔兰和魁北克支持的需要无疑起了作用（see Hexter, 1936, 297-298）。1778年法案是导致新教徒发动反对天主教的“戈登暴乱”（the Gordon Riots）的直接原因（see Stevenson, 1979, 76-90）。

[136] 一个直接后果是1791年颁布了对不信奉国教的天主教徒的救济法案。

[137] 威灵顿已经觉察到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政治不满情绪即将爆发的一些明显征兆。天主教协会的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在1828年克莱尔郡的议会选举中以2057票对982票战胜维奇·菲茨杰拉德（Vesey Fitzgerald），后者是贸易委员会新任命的主任。“解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在1829年颁布、而不是在5年或10年之后颁布，直接归因于爱尔兰的情势、尤其是[天主教协会]的行动”（p.164）。

[138] 他征求了助手罗伯特·皮尔的意见，皮尔后来成为废除谷物法的设计者。当然，他们还必须说服议会同意。托米斯和霍尔特（1977, 82）称之为“新型政治游说和组织的胜利”。可以将这些（开明的）托利党人同辉格党领袖做比较。阿勒维（1950, 255-256）评论道，在19世纪30年代，“在世界各地，在爱尔兰、比利时、波兰、加拿大和纽芬兰，不满者是天主教徒，他们是开明的自由主义派的保护对象”。然而，到1838年，这些辉格党人“出卖了波兰，将下加拿大置于军管法的高压之下，把卢森堡和林堡的天主教徒归还给加尔文教国家[尼德兰]”。类似地，霍兰德（1913, 77）也承认：“在[辉格党]执掌政权的十年间[1830~1841年，这事实上在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间被中断]，辉格党政府并未实质性地改变谷物法、殖民地特惠税率、航海条例和对制造商征收高额保护税等国家制度”。尽管假称自己为自由主义派，但辉格党几乎从来就不具有自由主义派的勇气。这实际上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辉格党的纲领一直都带有贵族政治的烙印……一位‘辉格派民主主义者’是一种玩笑说法，而不是真正指一类人”（Southgate, 1965, xv-xvi）。

[139] 见雷诺兹（Reynolds, 1954, 168）：“在爱尔兰，解放的直接影响似乎同人们在6年

动荡中所付出的精力和热情极不相称”。

[140] 第一个“彻底的改革议案”是由这些极端分子中的一位布兰福德侯爵（the Marquis of Blandford）在1830年提出的。它呼吁“将有名无实选区的席位转到各郡中去，取消非常驻选民的投票资格，将王室官员从议会中驱逐出去，向议员支付报酬和赋予一般纳税人以选举权”。当然，并非只有一种视角来看待下述事实，即一个充斥着有名无实选区产生的代表的议会会投票支持改革。阿勒维（1949a, 145, 147）对它提出了一种表示同情的评述：“因此，选区的腐败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制度的缺陷，它提供了一种途径，社会的新兴阶级能够由此获得议会的席位和在下院中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 [连续两次对改革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证明，不像上议院，未经改革的下议院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民众的意见”——或至少代表“银行家、商人和企业家的各种利益”，阿勒维提及的正是他们在下议院的议员资格问题。

[141] 盖什（1956）对阿勒维有关七月革命对英国选举产生直接影响的论点提出争议。他指出，到8月3日消息传到英国时，要换届的120名议员中的60人已经被选出。他承认，剩下的60人——占到席位的1/4——争议最大，但他认为，改革在7月之前就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说七月革命对英国民意产生了直接影响主要是激进派代言人的一种事后判断。不过，这是假设，七月革命是通过影响那些被选举的人、而不是影响那些事实上被选举人的地位来发挥作用的。

[142] “由此，现代议会改革者能够随心所欲，通过武装抵抗的威胁迫使对方让步，他们确立了一个先例，但这个先例后来将令他们极端窘迫，即当宪章派开始要求进一步的议会改革措施，并使用类似的策略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时”（Thomis and Holt, 1977, 99）。

[143] 沃德（Ward, 1973, 56）提出了非常不同的分析：“人们不必探查卫理公会或其他因素对革命的抑制作用。并不存在可能引发革命的情势。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的支持者在改革之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大部分被选为议员，因为威灵顿无力组建内阁，因为贵族们并不介意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新册封的损害，因为辉格党对法案条款细致入微的处理确保了资产阶级选民占绝对多数”。这些都是事实，但绝大多数都是中间变量，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而且它并没有否认穆勒所引证的因素：对暴乱的恐惧。

正如索斯盖特（Southgate, 1965, 21-22）很好地指出的那样：“实行广泛改革的唯一理由——也许是全部改革的唯一理由，像格雷内阁的所有大臣们都有意识地一致表明的那样——在于，它对统治阶级的安全、权势和声望而言是必需的。承认他们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保守、而且是要挽救显贵们和有产阶级的利益，辉格党希望，改革议案起草者们所发挥的作用能够像圣徒传记中那些英雄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他们努力将中间阶级同那些反对宪法的阶层区分开来，中间阶级是一个大的、新兴群体，可以根据财富、财产、所受教育和享有的‘声望’将他们同技工和工人区别开来，因此他们有资格享有选举权。对群众而言，改革法案并没有提供什么。它是一项不民主——和反民主——的举措”。

[144] 当然，它发挥了作用：“相比1831~1836年时期，辉格党要求将中间阶级同下层阶级的激进主义分离开来的合法性并未得到更清楚地证明……议会改革的实施直接导致伦敦民族政

治联盟（the London National Political Union）的成员人数和财政来源急剧萎缩”（Gash, 1979, 191）。

[145] 再次地，我们不应该言过其实。改革法案将选民人数从50万翻倍增加到100万（see Halévy, 1950, 27）。但正如克拉克（1962, 7）所论证的：“不管如何界定，中间阶级在1832年之后〔并没有〕统治这个国家。确实，在那个改革法案通过之时，他们被承认是在政治上重要的群体，那个法案的草拟和通过大体也是作为对他们重要性的承认；但在法案通过之后，最终掌控政权的无疑仍然是旧的统治阶级——贵族和乡绅”。

[146] 见索斯盖特（1965, 24）：“改革法案这一社会‘重大战略’的合理性在1848年宪章运动的惨败中得到证明，英国凭借对宪法的改革安然渡过了由法国新的一次革命所引发的风暴”。

第三章 自由主义国家与阶级冲突：1830～1875年



第三章插图 “里昂起义，1834年4月9～14日”

勒查德 [Lechard] (?)

(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

勒查德 [Lechard] (?)，“里昂起义，1834年4月9～14日”。里昂缫丝工人罢工演变为一场工人和政府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对工人

的大屠杀。工人所打的旗帜上写着：“不能工作而生，就要战斗而死。”

就像滚雪球一样，英国的国家干预在整个19世纪一直在不断地增强，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将这个世纪的特征总结为一个政府避免进行干预的时期。

——J.巴特利·柏莱柏诺（1948，108）

革命仅仅是发生了而已，它们既说不上成功，也说不上失败。

——约翰·普拉门内兹（1952，XII）

各阶层的斗争充斥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创造了整个这段历史……斗争之所以不会消失，并非仅仅是因为政府各部门和各政党需要它们或发现他们这样做是有益的。

——弗朗索瓦·基佐（1820，6）

在19世纪上半期，作为一种概念的社会主义仍然无法同作为一种概念的“资产阶级民主”区分开来，正如拉布鲁斯（1949b，7）所指出的，“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被人们混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状况也许仍然适用于此后的至少一个世纪，其间并未出现对这两个概念的完全区分。尽管如此，但在1830年以后，作为不同的政治道路选择，自由主义（对我而言似乎是比较“资产阶级民主”更好的表达方式）和社会主义开始分道扬镳。确实，正如霍布斯鲍姆（1962，284）所论证的：

务实的自由主义者……避免同政治民主挂上钩……拿破仑之后时代的社会不满情绪、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加剧了这种〔依赖多数人来执行理性的决策的〕困境，1830年革命使

矛盾更加尖锐。自由主义和民主似乎已成为对手而不是盟友。^[1]

阶级和阶级冲突概念并不是社会主义理论家、更谈不上是马克思的贡献。它是圣西门所使用的概念，由基佐作为自由主义方案的组成部分予以了发展。^[2]圣西门有关现代工业世界阶级结构的观点认为存在三个阶级：财产所有者、无产者和专家。他将“产业工人”（那些工作的人）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阶级冲突视为一个过渡时期，它将被一个由从事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组成的和谐社会所取代，其中产业工人阶级受到专家的指导。这种能人统治观认为，过去那种根据出身定贵族的方式将被根据能力定贵族的方式所取代（Manuel, 1956; Iggers, 1958b）。^[3]对基佐而言，阶级概念是他努力“论证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具有合法性”的一种根本性要素。^[4]

但在1830年，基佐和他的同道们——正如他们同时也在英国取得成功一样^[5]——成功地确立了某种形式的中间阶级的统治，“作为在革命和反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Starzinger, 1965, viii）。^[6]1830年8月7日下院删掉了1814年宪章的序言部分，“因为赋予法国人以在根本上属于他们的权利似乎损害了民族尊严”（Collins, 1970, 90）。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方面、大资产阶级在社会方面最终赢得了他们的公民权（*droit de cité*）。^[7]

此外，因为这是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变革的时期发生的，所以法国和英国目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新兴的无产阶级带来的社会问题，即由失去控制的、飞速发展的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Hobsbawm, 1962, 207）。因此，阶级冲突将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圣西门和基佐所关注的东西。1830年革命本身就是在在一个工人在经济上极为困难（高失业率、高小麦价格）的时刻爆发的。^[8]它提供了政治起义能够发挥作用的证据，有助于促进工人意识

的形成，这是一种“只有无产阶级”才拥有共同利益的意识，是一种“工人应该有尊严”的意识（Festy, 1908, 330）。^[9]自由主义者立刻就觉察到这种变化。梯也尔在一份给下院的报告中指出：“在七月革命后的日子里，我们认识到减轻其不良影响的职责。事实上，问题已不再是自由、而是秩序，它已经处于危险之中”（cited in Bezucha, 1974, 137）。^[10]

接下来的几年将见证一种在强度和类型上全新的工人运动在法国和英国的爆发。在有关罢工和工人运动的文献中，愈来愈多地提到这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工人”、而不是“一般工人”所为。尽管两者的界限并不总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清晰，但一般而言，相比其他类型的工人，那些被称为“技术工人”的人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和享有更多的工作自主权。这些“技术工人”中的许多人都是某些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在19世纪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而且一直发挥着作用，通过争取社会支持和互助来提高成员的福利。这些组织的内部结构是分等级的，而且是通过一些仪式建立起来的。

在工会组织被严格禁止的时期，^[11]这些组织是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因而也是在当局严密监管之下的组织。不过，在1830年之后变化的政治形势下，即使是互助会也开始承担新的职责，正如塞（1951, 2: 199）所指出的：“那些敌视雇主的、真正的反抗组织都打着此类协会的幌子；通过设立附属于它们的储备金，这些组织就能有资金来资助那些失业者和参加罢工的人”。^[12]因此，正如斯特恩斯（Stearns, 1965, 371-372）所论证的那样，在这个时候，这些“技术工人”相比“工厂工人”更有可能从事罢工活动，后者是处于一种更弱势的地位上，“几乎完全保持沉默”。^[13]

许多学者在技术工人和工厂工人之间所做的区分似乎主要是基于不同的工作场所。但事实上，技术工人通常是在“工场”（workshop）中工

作的，它们在结构、甚至在社会组织上并不是完全不同于这一时期存在的规模非常小的“工厂”（factory）的。我怀疑这两类工人的真正区分在于他们的社会出身。“技术工人”是男性，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工厂工人”大部分要么是妇女和儿童（Bezucha, 1974, 35），要么是“移民”，后者既包括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人、也包括说另一种语言的工人。^[14]

“技术工人”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抗议运动是由里昂的缫丝工人（Canut）^[15]发起的，先是在1831年，接着是在1834年。这些斗争开始于七月革命之后，包括破坏机器和驱逐“外来工人”。^[16]这种斗争发生的背景是18世纪短工所进行的斗争，即在1786年爆发的所谓的两个苏暴动（因丝织工人要求增加每月两个苏的工资而引发的暴动。——译者注）（*émeute de deux sous*），短工试图通过斗争要求当局确定成品布（finished cloth）的固定最低价格。断断续续的骚乱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和颁布谢普雷法（the *Loi Le Chapelier*）为止。伯祖查（1974, 11）得出结论：“法国大革命事实上中断了1789年之前已经形成的发展势头，也许是迟滞了里昂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过，在1789年到1830年之间这段时期，相对稳定的伙计制（*compagnon*）已经被一种“流动性更强的、实施计件工作的雇工制”所取代（Bezucha, 1974, 46）。

李瓦塞尔（1904, 2: 6）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发生在里昂？为什么发生在1831年？他给出的答案在于，里昂是以一种奢侈品产业——丝织业——为生的，这使它对“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更为敏感”。正像在1786年那样，它面对的直接问题是要求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省长已经同意实行，但随后被中央政府否决。第一次罢工相对而言是非政治性的。但不满在继续。1832年在巴黎爆发了一次罢工。罢工的基调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这部分是由工人阶级对七月王朝政策的不满所致，部分是（至少在里昂是如此）由意大利民族主义力量的煽动所致。马志尼（Mazzini）的副官罗马里诺将军（General Romorino）经常在里昂招募

士兵，力图解放萨伏伊和皮埃蒙特（Bezucha, 1974, 122）。激进分子呼吁在1834年2月14日进行一次总罢工。但没有成功。当地的共和党在对待总罢工的态度上产生分歧。^[17]一个镇压法令的颁布引起工人在4月份的进一步反击，在一次起义中有大约300人被屠杀。这次失败的起义后来被视为“欧洲工人阶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Bezucha, 1974, 124）。这次由当局进行的镇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1835年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审判活动”，要用它来“清除共和党人”。^[18]面对由城市工人阶级开始进行的危险的阶级斗争，自由主义国家最初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用镇压来作为反击。

情况在英国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从精神实质上看，同七月革命相对等的是1832年改革法案。英国并没有经历“光荣的三天”式的“革命”。取而代之，英国有议会斗争，其中革命被一次投票所“消解”，即在1831年关键的二读中的投票通过。尽管这样，但当法案在议员委员会的审议中被否决时，议会被解散，并选出了一个支持改革的议会。这时，人们对法国所发生的一切已有充分意识，并意识到在英国有可能发生“更糟”的情况。麦考利（Macaulay）在他于1831年3月2日发表的赞同改革的演说中明确表达了那些支持改革的人的理由：

我们将何去何从，倒退、还是向前？法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向我们昭示，改革，我们也许会生……重新恢复国家的青春。维护所有权，并消除它对国家的不利影响。继续获得群众的支持，它正受到其自身难以控制的情感的危害。保全贵族制，它正受到其自身不受欢迎的权力的危害。将我们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公正和最文明的国度从各种灾难中拯救出来吧，也许用不了几天它们就会将我们经过如此多代的智慧和荣誉才积累起来的丰富遗产吞噬殆尽。这种危险是可怕的。时间不等人。如果这个法案被否决的话，我会向上帝祈祷，但那些投否决票的人却不会在于事无补的自责中、在破坏法律中、在

混淆等级关系中、在掠夺财产中，以及在破坏社会秩序中记起这次投票。^[19]

麦考利的论证得到人们的认同。正像法国那样，一旦中间阶级赢得了公民权，他们的注意力就会立即转向遏制工人阶级的要求。宪章运动这一“最重要的工人运动”（Evans, 1983, 215）^[20]和旧的激进改革运动的延续都是在1837年到1843年这一工业大萧条时期发生的，而且在此期间表现得最为激烈。它招致了巨大的恶名，似乎在几年间就已经成为当局的真正威胁。参与宪章运动的各阶层大部分都是行业协会的成员。^[21]但它也得到中间阶级激进派的支持（Rowe, 1967, 85）。宪章运动同反谷物法联盟发起的自由贸易运动同时并存，而且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阿勒维（1947, 9）提及了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勃里格斯（1959, 312）指出，两种运动代表了“一个分裂的社会中两个部分之间的对立”。盖什（1965, 2）谈到“运动”（“借自欧洲大陆的一个用语”），认为它“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阶级斗争的外观”。^[22]

不过，宪章运动在突然爆发后迅速走向失败。从1843年开始，它走向衰落。部分原因在于，在英国，一种主要而且是公开的工人运动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部分原因在于，运动也不可能就暴力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合法武器达成一致。还有部分原因是所谓的“爱尔兰因素”：英国的工人阶级不再仅仅是英格兰的，而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这样，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就同阶级问题纠缠在一起。当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取得宪章运动的领导权后，两种问题的纠缠变得非常严重，运动受到“损害”。^[23]也许最重要的是，时代逐渐好转起来，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经济改革方案消除了一些不满。^[24]最终，这次阶级斗争在英国并没有比在法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英国和法国的国内问题还绝没有大到足以使这些强国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问题上。七月革命、比利时独立的反复和最

终完成，以及1832年改革法案，这些将对欧洲产生直接影响。尽管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在1815年到1830年之间是适当的，而且这两个国家也经常发现他们在国际问题上持相似立场，但两个世纪争夺霸权的影响足以导致双方的彼此猜疑，并保持一定距离。七月革命消除了这种距离，甚至影响到在改革法案制定之前威灵顿领导的托利党政府。欧洲目前进入了英法联盟的时代，这次联姻也许不是爱情的产物，但肯定是理性的产物，它经受住了此后发生的所有争执并至少维系到1945年。英法联盟这个用语本身也许就是由帕默斯顿（Palmerston）于1831年新创的，尽管它直到1842年才为官方所采用（Guyot, 1926, 220; Halévy, 1950, 3: 73, n.1）。联盟的地缘政治基础是明确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强国，法国〔在七月革命之后〕理所当然地是自由主义英国的盟友”（Halévy, 1950, 3: 73）。^[25]英国现在能够更轻松地实施它对欧洲专制主义的遏制政策，同时扩大自由主义国家的范围（Guyot, 1926, 88, 117）。^[26]

但两国结盟还有进一步的动机。英国和法国都面临相同的国内问题，即使法国尚未准备好实行英国推荐的自由贸易妙策，但在“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眼中”，英法同盟作为一种“资本联盟”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Guyot, 1926, 302）。这难道如此糟糕吗？的确，两方面的影响是无法分离的。在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使后者追随他们的发展模式上，英国和法国——凭借英法同盟——“阻遏了国际革命的传播，而这种传播依赖于强国之间的分裂”（Guichen, 1917, 424-425）。

进一步而言，1830年开启了一种模式，它甚至将进一步阻止这种传播。至少对法国而言，1830年有助于恢复法国的世界中心感和民族主义荣誉感。不是基佐、而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1844, 4: 143-144）写道：

七月革命……并不仅仅是反对教会和王权斗争的结束；它

是民族情感的表达，这种情感受到1815年各种条约的过分压抑。我们决心摆脱这些条约的束缚，恢复欧洲的平衡。^[27]

有关七月革命的一个有趣情况出现在阿尔及利亚。查理十世进行的征服冒险令英国大为不快，路易十八准备做出一些牺牲来安抚英国。不过，当法国人约束自己未直接干预比利时，他们感到已经为取悦英国做了应该做的，于是又继续进行征服行动，这次并没有遭到英国的抗议。^[28]很明显，一个原因是征服行动对法国国内工人骚乱产生的影响。巴黎的“流动”人口——潜在的革命者——被鼓励到阿尔及利亚定居。的确，在1838年，一位在阿尔及利亚的政府高官莱昂·布朗德尔（Léon Blondel）能够带有几分自信地说：“非洲是法国维持国内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cited in Tudesq, 1964, 2: 815）。^[29]

因此，自由主义国家将国内和国外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在国内是使中间阶级的政治角色合法化（由此依次又从他们那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和压制工人阶级的不满，在国外是利用英法同盟以确保他们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统治地位。最初，这种体制似乎发挥了效力。但它非常脆弱，正如1848年欧洲革命将证明的那样。在1789年之后的情势下，要确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尚有更多工作必须完成。

其脆弱性表现在如下事实上，即自由主义政府给予工人阶级的权利极度有限，如果不准备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的话，这使得他们很难支持自由主义政府去克服由定期发生的严重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这种状况在法国尤其明显。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愈益严重的社会不满，七月王朝和它的自由主义追随者基佐变得越来越保守。1847~1848年经济危机是迄今已知的“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危机，对法国打击严重。利润极大下降。在危机最严重时，巴黎75%的产业工人被解雇

（Markovitch, 1965, 256; Sée, 1951, 2: 143; Labrousse, 1976b, 3: 983-984）。

政府被证明缺乏灵活性。进一步而言，它未能注意到，由于疏远小商人集团——政府其实在1830年已经通过降低纳税额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它的主要政治机制——纳税投票权（*votecensitaire*）——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问题在于，伴随着政府提高投票权的纳税门槛，就将这些投票人从有投票权的名单中拿下，从而不仅损害了这个集团的政治权利，而且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30]由此，使他们易于受到实施选举权改革的煽动。与此同时，在工人阶级中间，艾蒂安·卡贝领导的伊加利亚派（*Icarians of tienne Cabet*）是温和派，也是19世纪40年代主要的社会主义派别——由基督徒、和平主义者、法学家和民族主义者组成，强调阶级调和，在经济危机中也被排挤出法国，由此将位置让给了更激进的集团。^[31]

法国政权的保守化同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1846年当选，这令梅特涅感到沮丧（*Bury*, 1948, 425）。如果说比利时在1848年仍能保持“平静”的话，那“正是因为它在1847年就已经和平地完成了革命”（*Dhondt*, 1949, 124）。类似地，在英国的外交支持下——但法国对是否支持一直犹豫不决，瑞士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也于1847年在国内赢得了对分离主义者联盟（*Sonderbund*）斗争的胜利。^[32]的确，这是英法同盟暂时破裂的一刻。^[33]在国内，在罗伯特·皮尔爵士不断推进废除谷物法^[34]进程的同时，政府成功地应对了宪章运动的挑战，以致他们同样能够不用为应对“共产主义的幽灵”而苦恼。^[35]1847年危机“并未引起革命动荡”（*Halévy*, 1947, 181），^[36]尽管爱尔兰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37]

尽管如此，但自由主义事业在法国——它是两大支柱国之一——的削弱为革命的火焰提供了充足的火种，它将在欧洲的所有非自由主义部分点燃。当然，梅特涅和奥地利人会谴责英国要为此次大起义负责，谴责它太过自由，^[38]但更应该谴责的是法国，她临阵畏缩，不够自由。在评价1848年2月的巴黎起义时——巴黎起义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开

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9，7）对路易-菲利普非常苛刻：

现在不可能期望哪个政府能长久地维持，除非它能确保进步和秩序；它也不可能真正确保秩序，除非它能推进进步。迄今为止，凭着仅有的一点改良精神，它还能够继续维持；与此同时，改革者对通过现存制度实现他们的目标也还抱有些微希望，他们一般愿意容忍它。但当根本就没有希望时，当制度本身似乎也反对改良方案时，进步的潮流就会不断积聚力量，直到将它们击败。^[39]

像所有此类重大事件一样，1848年欧洲革命的洪流是由各种运动和目标构成的。在法国，它基本上是哪两方面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欧洲第一次大的无产阶级起义”，^[40]（Tilly，1972，228）另一方面是左派自由主义者的严重不满，他们赞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有关七月王朝保守性的观点。在欧洲其他地方，在那些迄今尚未确立自由主义统治地位的国家，并没有无产阶级起义爆发；相反，那里是自由主义者的起义同民族主义者的起义相结合。两种情势需要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路易·拿破仑应对第一种情势；帕默斯顿应对另一种情势。

1848年2月起义使人们对一种“社会共和国”充满希望，这是一种模糊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它将给失业者提供工作，解放所有那些遭受屈辱和不平等的人。每个人都提出他们的要求：“手工业者”试图恢复他们的特权和他们的生产方式；^[41]农民试图重新确立传统的集体使用权；^[42]妇女试图扩大“普选权”以将她们包括在内；^[43]奴隶试图废除奴隶制。^[44]钟摆现在正开始摆得过远，6月份，卡芬雅克将军（General Cavaignac）命令军队镇压这些不守秩序的危险阶级。^[45]拉布鲁斯感叹道（1948，2），“可怜的临时政府！”“它惧怕社会革命，正像它也惧怕反革命一样”。^[46]

卡芬雅克能够镇压起义，但他不可能重新恢复国家的合法性。也不

可能重新恢复君主制，它已经声誉扫地。路易·拿破仑填补了这一空白，他试图重建一个自由主义的、有序的现代国家，正如泽尔丁（Zeldin, 1958, 6）很好地说明的那样，“他之所以当选，并不是因为他是〔秩序党（the Party of Order）的〕候选人，而是……他之所以是候选人，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肯定会赢”。^[47]但路易·拿破仑代表什么呢？首先，他代表拿破仑的传统，即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对科学和工业进步的信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在19世纪40年代，路易·拿破仑之所以对七月王朝做出尖锐批判，是因为他认为，由于使自身疏远进步的自由主义，它就是“建筑在沙粒之上，注定将倒塌”。但不像基佐，他意识到，“予以适当的保护，一个民主政体能够在不威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建立起来”。^[48]

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采取行动，正像他们在1830年所做的那样。对如此僵化、如此不自由的统治感到失望，他们发动起义，并很快取得成功。接着，又对下层阶级能够利用情势而将事业推进得过远的可能性感到沮丧，他们重新恢复了同那些他们刚刚赶下台的政治集团的联系，因为“现在的敌人是左派”（Palmade, 1961, 255）。^[49]当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时，他的主要目标是镇压左派。^[50]不过，次要的目标是约束保守派军队非经他允许而进行行动的能力。^[51]人们能够——如果他们想要这样做的话——强调政权中的帝政主义（Caesarist），即所谓的波拿巴主义因素。^[52]不过，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会冒着未能把握镇压的结果——既是真实的、也是有影响的^[53]——是建立了一种中间派统治的危险，这种统治以进行资本主义扩张、建构一种自由主义和解为导向，^[54]它不是由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而是由一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领导的。

在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同僵化的保守派力量相结合背景下，如果中庸的自由主义派想再次在法国立住脚的话，那它需要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形式。结果是在面对经济萧条时法国进行回旋的空间过于狭小，这同那

时的英国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在欧洲的其他地方，问题不是使中庸的自由主义派重新立住脚，而是使它能够形成。正是霸权国家英国的作用使这个过程——当然它支持该过程——能够避免受地缘政治平静被过多打破的干扰。

在法国以外，共产主义的幽灵并不具有相似的社会基础。尽管如此，对统治精英而言它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发现很难将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就在革命开始之前，一位法国作家在1848年1月的《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西班牙的文章中写道：

我再次说明，我相信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我们的政府犯了我认为它不可能犯的错误。但让我们至少不存幻想。让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持如此轻率态度的人了解我的观点，他们是如此的轻率以致对人民的愤怒感到兴奋，他们是如此野心勃勃以致要利用人民的愤怒进行投机活动！革命不会因为对一种观点有利就发生，但对共产主义有利除外。^[55]

类似地，坎蒂莫里（Cantimori, 1948, 1: 279）也论证，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只不过是对‘红色幽灵’、对农民暴动和对共产主义恐惧的反映，这种恐惧是全欧洲的反动派都有的”。革命在各处爆发，由于历史的不同，所以呈现不同的地方特色：在奥地利帝国 [“没有哪里比这里……更猛烈”（Vermeil, 1948b, 2: 246; cf. Endres, 1948）]，在德国和波兰，在北欧和南欧。^[56]在各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蓝”和更弱小的“红”很快就分道扬镳了（Fejtö, 1948c, 2: 441）。^[57]激进主义成分很容易被遏制，但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派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获利有限。^[58]当然，民族主义既能够被用于促进自由主义的发展、也能够被用于遏制它的发展，这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条件。^[59]

英国开始发挥作用，在这里支持自由主义者，在那里确保他们不会

走得太远，在各处都维持平衡状态，由此它能够控制国家间体系。在西班牙，政府在1848年之前就已经同路易-菲利普的法国有着紧密的联系，英国支持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3月替代纳瓦兹将军（General Narvaez）政府的努力。帕默斯顿实际上在3月16日给西班牙政府发了一封正式信函，在信中他大胆提出：“如果西班牙女王能够以扩大她的政府所依赖的基础为目标和听取一些得到自由党信任的人的忠告来对政府做出调整的话，那她就是在重大事务上明智地行事”（cited in Quero, 1948, 1: 328）。[\[60\]](#)

英国的干预即使不是直接成功的，但也限制了镇压的残酷程度。英国人在西西里岛做得更为成功，在那里他们支持反对那不勒斯王国的起义。那不勒斯王国决定，由于它的朋友奥地利离得太远，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会被占领，所以承认起义所要求的宪法；在这次沉重打击下，“意大利〔或至少那不勒斯〕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法国、英国和瑞士一边”（Cantimori, 1948, 1: 265）。帕默斯顿还要求奥地利在1849年“宽容”地对待匈牙利，他要求奥地利驻伦敦大使答复，在如何对待起义者问题上，奥地利将是“唯一的裁判者”（Fejtö, 1948b, 2: 202）。另一方面，帕默斯顿拒绝在波兰问题上同俄国交涉，担心这也许会鼓励爱尔兰的独立运动（Goriély, 1948a, 2: 227）。简言之，帕默斯顿的政策是非常简单的：“他的外交政策……除了使由革命事件所造成的情势有利于英格兰的利益外别无其他目标”（Fejtö, 1948a, 1: 35）。一般而言，这种政策是有效的，甚至当他所做外交干预被拒绝时也是如此。[\[61\]](#)

1848年欧洲革命开始是作为对世界自由主义体制的威胁而发生的，这种体制是由霸权国家英国在法国的重要帮助下确立的，但随后就变成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中的统治地位能否予以确保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波拉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57, 3）中勾勒出19世纪文明的4根支柱时，即权力体系的平衡、国际金本位制、自我管

理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他指出：“这种体制的源泉和基础是自我管理的市场”。如果确实存在某个时段，其中这种自我管理的市场的运行方式似乎最接近理论模式所规定的方式，那它是在1850~1873年。这种市场原则最优运行阶段的重要序曲是英国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其历史过程值得详细地考察。

所谓的饥饿的40年代（Hungry Forties）是继“真正贫困的19世纪20和30年代”之后发生的，它使得工人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利益能够联合在一起，前者关注于基本商品的价格，后者在为市场的优越性进行鼓吹。他们能够将那些垄断者作为共同的斗争对象，正是后者提高了生活成本：西印度公司在提高咖啡和蔗糖的价格上有其利益；东印度公司控制着海上贸易；尤其是英格兰的地主，他们的谷物生产受到谷物法的价格保护（Mellor, 1951, 14）^[62]

政治的天平开始向反对继续保护谷物价格的方向倾斜。1815年之后在欧洲出现了谷物供应过剩，这是由于此前扩大生产造成的——这依次又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和应对封锁的影响造成的，这种过剩被用于论证谷物法继续存在的合理性。^[63]但到19世纪30年代末，这种过剩不再存在。工业发展增加了城市人口，土地被转而用于生产经济作物和养殖牲畜（这在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衰退期是一种正常转化）。“做面包用的谷物目前在整个西北欧都变得不足”（Fairlie, 1965, 568）。^[64]争取取消谷物法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它的辩护者出于自身的原因不得不为一种保守主义立场做辩护。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把取消谷物法视为土地贵族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那么注意到反对取消谷物法的声音在小的租佃农场主那里比在大地主那里更强大是有趣的。^[65]

既然确实是小题大做，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激烈争吵呢？答案在于，对双方而言，“谷物法是一种象征”；对那些赞同取消谷物法的人而言，它象征着新的和进步的力量反对旧的和拥有特权的力量；对那些反对取

消谷物法的人而言，它象征着为土地乡绅辩护，“没有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在民主和专制之间起稳定作用的中间力量”。^[66]介入到这场争夺象征意义话语权的斗争中，罗伯特·皮尔爵士致力于唯一值得争取的目标不是中间阶级的胜利，而是自由主义国家的胜利，以及“地主阶级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地位的永久保持”（Moore, 1965, 651）。^[67]当皮尔在1846年3月15日通过三读成功地取消谷物法时，保守党2/3的党员都反对他。正是极少见的议会联盟使他获得成功。^[68]

皮尔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或两方面的考量才推动取消谷物法的议案在议会通过的。第一，坚持取消谷物法将强迫英国在农业中推广高产耕作技术，由此带来的好处会在财政上缓解转型的压力：即对牧草和草种征收的关税将减少；各种法律将使城市贫民更难重返他出生的农村地区，由此减少对当地征收税款的数量；“其中最重要的……建造排水系统的贷款”，该系统是设计用来在租佃农场主中推广高产耕作技术的，它是通过给予“长期租佃”以贷款，由此使租户能够终身从土地的改良中受益（Moore, 1965, 554）。^[69]第二方面的考量是纯政治方面的。皮尔试图确保，取消谷物法将被视为议会的一种明智决策，而不是对民众压力被动反应的产物。皮尔拒绝使取消谷物法成为1845年12月大选中的议题。（该议题也许会令他领导的政党产生深刻的分裂。）通过推动取消谷物法在议会通过和利用一次跨越政党界限的投票，他使它成为“一种战胜民主主义的煽动和[反谷物法]联盟的胜利，证明议会将全民福利置于党派利益之上”（Kemp, 1962, 204）。^[70]

取消谷物法实际上实现了什么样的目标？它确实实现了两方面的目标。一方面，它确保了在世界经济中中心-外围间劳动分工的重组，以使小麦生产再次变成一项在边缘区进行的活动。接下来的一些年将见证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与东欧的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兴起，它们是向西欧大量输出小麦的出口国，由此使工业生产集中在西欧地区。^[71]但这种转换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的，以致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能够将资本转移

到新的财富生产源上去。^[72]

另一方面，它确保了英国政治力量的重组，即重组为一个中间偏右的保守党和一个中间偏左的自由党（最终被一个中间偏左的工党所取代），两党基本上都接受中庸的自由主义的逻辑。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中间阶级的胜利，但它同样也容易得到贵族的承认，因为对后者而言，它“是从一个被证明危险的过于激进立场的适时后退”（Kitson Clark, 1951b, 12）。^[73]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概念——两者都是18世纪形成的联盟——不复存在。

最初的优势之所以会落在自由党一方，是因为在取消谷物法问题上保守派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74]但为了适应正常的变化，目前兴起了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它将通过“使自身……完全依赖于人民的支持和选票”而重新获得权力（Mosse, 1947, 142）。与此同时，那些试图将他们的党同工人阶级进行联合的自由党成员（激进派）则遭受失败，而让位于那些更多关注巩固国家结构的派别。正如勃里格斯（1956, 72）所说的：“改革法案所规定的，是谷物法案已经实现的”。

人们将会注意到，我并没有把奉行自由放任学说列为取消谷物法的一个伟大成果。这是因为在自由放任学说中虚构成分要多于真实情况。作为结果，这种学说不可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肯定也不是作为世界体系地缘文化的自由主义所传达的基本信息。当然，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如此精炼地总结的，公众的态度是：“除非有某种更大的利益诉求，否则所有对自由放任的偏离肯定都是有害的”。^[75]但这句话中的从句证明自由放任学说是带有很大欺骗性的。例如，在1846年取消谷物法那一年，在就十小时法案展开辩论时，麦考利宣称，尽管限制工时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他要求议会考虑妇女和儿童的社会需求，“她们没有能力同雇主建立一种正常的契约关系”（Taylor, 1972, 44）。^[76]取消谷物法运动的成功——反对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象

征的谷物法——同重大社会立法在英国（和在大陆国家）开始确立，二者同时发生是支持柏莱柏诺断言（1948，107）的强有力证据。柏莱柏诺断言，真正发生的并不是转向自由放任，而是“从由国家干预商业转向国家干预工业”。古典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一直对自由放任采取一种很微妙的立场，从亚当·斯密到边沁再到纳骚·西尼尔（Nassau Senior）都是如此，^[77]甚至像伟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也是如此。^[78]对所有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承认自由放任的“价值”和鼓吹它是一种“绝对教义”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Rogers，1963，535）。^[79]他们都意识到，“对一个人而言是自由放任，对另一个人而言则是干预”（Taylor，1972，12）。^[80]

尽管如此，但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仍然认为取消谷物法是一个伟大事件，它保证了经济进步的实现。^[81]正如许多这样的信念都是如此一样，紧随其后所发生的现象似乎提供了证据。由于世界经济目前正在进入另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上升期，所以19世纪50和60年代出现了“繁荣的黄金时期”，“许多那个时代的人将这归因于取消谷物法”，但坎普（Kemp，1962，195）认为这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神话”。这些年对当时世界体系的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尤其仁慈。

在英国，这一时期被称为“维多利亚大繁荣”、或稍微带点戏剧色彩的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盛时期”，它“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Kiston Clark，1962，31，57）。^[82]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做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主要是寻求“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Clapham，1932，2：145）。这是用那个时代的俚语来表述的。当然，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市场，销售她生产的几乎所有商品”。这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这时候，英国在各个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在商业、在金融业和在工业方面——即在制造“那些她主要需要的产品上”（Clapham，1932，2：2，

12)。[83]

19世纪50年代标志着英国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期。棉纺织品出口在1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实际增长速度甚至更高。正如霍布斯鲍姆论证的（1975，30-31），这“[为政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棉纺织业对英国财富生产而言仍然居于中心地位，但这一时期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逐渐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伴随着它们的发展，“规模更大的工业企业在各处”纷纷涌现（Clapham，1932，2：114）。很明显，英国正在通往建成一个工业国的道路上。而且其发展“路线是设定好的”（Clapham，1932，2：22）。对英国而言，这些年是“繁荣时期”，她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而新工业生产的发展“与其说像火山喷发，不如说像是聚宝盆”（Coleman，1973，7-8）。[84]英国舒服地享受着她的霸权地位，而且是如此的志得意满，并没有能够一直意识到她必须予以警觉的世界经济的每一次波动。[85]

然而，我们也不应夸大其辞。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过半”。农业“迄今为止仍然是[英国]最大的产业”（Clapham，1932，2：22）。[86]丘奇（Church，1975，76）相信，称这一时期为“维多利亚大繁荣的中期”肯定是要“严格加以限定的”。确实，存在价格的上涨、[87]商业扩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生产的增长率绝非那么高，1858年还见证了本世纪下降最严重的商业周期。像所有经济强国一样，英国正在为它自身的衰落做准备。它抵制创新。正是在1856年，贝塞麦（Bessemer）首次宣读了有关他研究成果的论文，他论证运用鼓风送气能够更廉价地制造出优质钢的方法，但他的方法并没有被广泛采用，直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下降期。[88]紧随其后的世界经济扩张带来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进一步工业化，使英国的竞争优势“越来越难以维系”，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表明——法国是一个重要例外——它们在是否接受自由贸易上“无意仿效英国的成例”（Schlote，1952，43）。[89]的确，英国自身最终也对自由贸易感到厌恶。[90]

在这个世纪的中期英国正光芒四射之时，因为1848年的动荡，法国似乎最初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再次地，革命似乎损害了她的经济发展。但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对动荡的政治解决方案——第二帝国是走平民路线的极权主义——有助于缓解一些政治紧张关系，而这又恰恰是因为这一政权使自身成为大大改进法国经济结构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由此巩固这个世界体系的自由主义中心国家的地位，而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91]

经济指标是清楚的：对外贸易增长了3倍（Palmade, 1961, 193）。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对消费品的生产增长得更快（Markovitch, 1966, 322）。^[92]不仅在国内投资上，而且在对外投资上都出现了迅速增长，以致到1867年，来自对外投资的净收入已经超过净资本输出。卡梅伦（1961, 79）认为，这意味着法国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债权国”。^[93]法国的公共财政也像英国那样变得“稳固”起来。公众认购政府债券“证明两国具有很强的储蓄能力和充足的资本”（Gille, 1867, 280）。^[94]简言之，这段时间对法国和对英国而言都是经济的鼎盛时期。这“对第二帝国而言是有益的，如果不是它的功劳的话”。但正如帕尔马德（1961, 127, 129）所坚持认为的，“外部有利条件只会落在一个坚定地致力于利用它的政府身上”。

进一步而言，正是这样一个政府认为，政府行为对经济扩张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它并不认为——用拿破仑三世的话来表述——政府行为是一种“必要的恶”，而认为其“对任何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而言都是仁慈的推动者”。不过，它的目标是由此推动私人企业的发展。尽管政府的“主要关注”是尽可能多地创造多样的〔经济〕机会，但政府希望“避免这种政府直接从事私人能够从事或由私人从事更好的活动的不良倾向”。^[95]进一步而言，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并不是仅仅援助工业，而且也支持农业部门。^[96]在这种实践的背后——“它是后来主张精英治国的戴高乐派领导的现代化的前身”——是同“政治不稳定和阶级冲突”做斗争的目标

（Magraw, 1985, 159），^[97]这对一个在1848年革命的严峻考验中诞生的政权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是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是“后圣西门主义者”，他们是从昂方坦（Enfantin）为代表的伪宗教阶段发展而来，仅仅保留了圣西门的“激进”精神。他们是严格的现代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改良主义者；他们归根结底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正如某些人已经指出的），而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者”，这在第二帝国表现得最为明显。^[98]圣西门主义之所以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它将自由主义的两个关键特征结合在一起：同社会改良相联系的经济发展。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两个特征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圣西门主义者断言“经济相对政治领域而言具有首要性”（Blanchard, 1956, 60）。他们还论证，在1831年伊萨克·贝列拉（Isaac Péréire）的方案中，经济进步将带来“对数量最大和最贫穷阶层命运的改善”（cited in Plessis, 1973, 86）。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和圣西门主义者“彼此相互支持”的原因所在（Weill, 1913, 391-392）。^[99]当然，圣西门主义者“大概是[拿破仑]唯一能够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Boon, 1936, 85）。而且反之亦然：资产阶级中的现代主义者成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需要拿破仑将他们从作为富裕阶层的怯懦中解放出来”（Agulhon, 1973, 234），^[100]他们控制着七月王朝时期的秩序党（the Party of Order）。这就是为什么杰拉尔（Guérard, 1943, chap.9）称拿破仑三世为“马背上的圣西门”。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银行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而为人们所认识。在这方面，荣誉也必须赋予后圣西门主义者（诸如贝列拉兄弟），他们是“首先认识到银行能够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刺激和协调作用的人”（Chlepner, 1926, 15）。但在贝列拉之前就有人认识到银行的作用。至少从1815年开始，最大的银行——尤其是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和巴林（Barings）——已经将它们的业务中心转向长期

贷款，首先是洽谈和推动向政府提供贷款，其次是支持大型私人企业。正如兰德斯（Landes，210-212）所注意到的，因为这些银行表现出“太过贪婪的欲望”，因为它们有可能被竞争者削弱，所以它们倾向于建立联盟关系。尤其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发现同神圣同盟建立默契联系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能够将它们的业务集中在几个主要的货币市场上，后者在那时是“比货币供应中心有着更大需求的市场”（Gille，1965，98）。^[101]进一步而言，罗斯柴尔德银行这“最满意的一招”——向处于困难中的政府提供短期紧急贷款——并不必然是对国家独立性的一种帮助。卡梅伦（1957b，556）论证道，这种政府“很少能够恢复[它们]的独立性”，并将这种做法比作一种“容易使人上瘾的毒品”。^[102]

当然，需要更多由当地控制的信贷来源。希兰普纳（1926，19）提醒我们，在贝列拉兄弟的动产信用银行（Crédit Mobilier）之前，在比利时就有许多“类似机构”存在——最著名的是通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它是由威廉国王于1822年创建的。不过，只是在1831年以利奥波德一世即位为标志的比利时独立之后，该银行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促动因素，主要是在铁路建设上。如果这个银行和竞争对手比利时银行（Banque de Belgique）——创建于1835年——在1838年金融危机之后都进入相对休眠状态，那么1846~1847年英法经济危机对它们的打击甚至更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1848年2月出现了对革命的恐惧、对失去独立的恐惧，以及一场“名副其实的金融恐慌”（Chlepner，1926，238；see also 1931），这迫使国家对银行进行援助，以结束这一动荡时期。因此，比利时能够避免出现革命浪潮，由此转向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体制，并在1851年取消通用公司的半官方资格。^[103]

在英国有关银行业的争论——以前讨论过——造成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银行不能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这些争论在1844年的银行法案中达到高潮，从皮尔的视角看，该法案的目标主要是“使

金本位的基础更为稳固”，其次是取消利用黄金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Fetter, 1965, 192）。^[104]也许相比其他国家，英国并未能更好地制定一种银行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卡梅伦（1961, 58-59）称这为“效率低下”，但他提到：“自相矛盾地，……在银行和货币体制合理发展道路上设置的障碍刺激了私营部门引入金融创新，而这些创新对实现工业中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全部利益而言是必需的”。

英国政府未能推动的——为本世纪中期的经济扩张提供充足的信贷——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政府却有意识地予以了推动。1852年2月的法令授权建立抵押贷款银行，埃米尔·贝列拉的土地信贷银行（the *Crédit Foncier of Émile Péreire*）是首批建立的银行之一，为奥斯曼（*Hausmann*）重建巴黎提供金融支持。“从落后国家，法国一跃成为抵押信贷方面的领先者和创新者”（Cameron, 1961, 129）。^[105]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此感到不快。詹姆斯·德·罗思柴尔德（*James de Rothschild*）论证，这种结构上的变革将把过多的权力集中在缺乏经验的人手中。他的说法似乎是五十步笑百步。^[106]但不管怎样，大的企业银行在第二帝国的兴起将垄断权从被称为“高特银行家集团”的手中夺走，后者是一个“由私人（非企业）银行家组成的强大集团”（Cameron, 1953, 462）。但“高特银行家集团”并未能为法国商业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贷款。^[107]

1867年，即第二帝国快要结束时，新建立的银行中最大的银行动产信用银行破产。不过，罗思柴尔德银行仍然存在，而且一直保持到今天。尽管如此，但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它的干预已经改变了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信贷结构：“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银行体制都打上了受法国影响的印记”（Cameron, 1961, 203）。^[108]创设大量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银行也许削弱了“高特银行家集团”的实力。在金融紧缩的情势下，这对较弱的政府结构并不必然十分有利。詹克斯（*Jenks*, 1927, 273）讨论了在对政府提供贷款的领域存在较大竞争的不良影响：

面对试图投机的银行家的压价做法，竞争只是加大了信贷市场的风险……不过，竞争确实鼓励的是将更多的货币强行贷给那些通常是“不知所措”的借贷者……简言之，信贷业务应该是垄断性的。[\[109\]](#)

动产信用银行的倒闭为这种分析提供了证据。它是导致对弱政府提供贷款来源枯竭的一系列事件的组成部分，由此加重了在1873年之后发生的大萧条。[\[110\]](#)

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中期取得了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和中心区政府——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各种行为确保了整个世界重新布局的稳定进行，直到至少20世纪末。我们可以称这种重新布局为“强市场”的确立，它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之一，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9和20世纪取得的伟大成就。但要确立一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尚需另外两根支柱：强政府和强国家间体制。现在我们就转向它们的稳固确立过程。

绝对君主制并不是强政府。君主专制仅仅是弱政府寻求变得更强大所借助的支架。只是在1789年之后，世界体系已经处在视变革为正常和主权在民的氛围之下时，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府，即拥有一个胜任其职的官僚机构和取得人民合理程度的支持（在战时能够转化为爱国主义热情）的政府。正是自由主义者、也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建立这样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增长在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的产物，至少是资产阶级目前所希望的和技术目前所能允许的经济增长水平的产物。

当然，建设一个强大的官僚制政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开始于15世纪晚期。抵制建设这样的政府是当我们提及“旧体制”时所真正意指的，旧体制当然在英国和法国都存在，正像它确实也在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存在一样。我们一般称为柯尔贝尔主义的就是试图通过将

实权从地方收回和集中在君主手中，以克服这种对建立官僚制政府的抵制。这种尝试至多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雅各宾主义只不过是共和主义面目出现的柯尔贝尔主义。它的最初形式在1815年就已经消失。在1815年之后，正是自由主义承担起了为创建一个强政府而斗争的重任。柯尔贝尔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对他们的意图都是直言不讳的，但自由主义者拒绝承认建设强政府是他们目标的事实——在许多方面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也许正是他们能够比柯尔贝尔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取得更大成功的原因所在。的确，自由主义者是如此的成功，以致开明的保守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的目标，大体上是为了在这一过程中掩盖在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的任何意识形态差别。

当然，有许多理由能够说明资产阶级为什么认为强政府是有用的。一个理由是能够帮助他们积累资本；^[111]另一个理由是为这种资本提供保障。^[112]如果资产阶级以前没有认识到的话，那么在1848年之后，他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强政府——即改良主义政府——才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工人不满的破坏性影响。贝列拉指出了症结所在：“强政府将在广大范围内变成资本主义的福利政府”（cited in Bouvier, 1967, 166）。当然，“福利政府”这里有双重含义：即既要确保工人阶级的福利，也要确保资产阶级的福利。

我们将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视为反对中央集权统制经济的高潮时期。在这个时期，“一般而言，[大多数英国人]都怀疑政府和中央集权”，这样说是千真万确的（Brun, 1964, 226）。^[113]但在两类人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争夺中，一类是那些（主要是自由主义者）要求政府不再扶持农业利益的人，另一类是那些（主要是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地方和更传统的权力、并将这种主张同呼吁社会关注穷人的花言巧语结合在一起的人。^[114]对后者而言，通过推动一些政府对产业实施干预方案的通过，很容易从自由贸易的每次成功中获得补偿。柏莱柏诺称它为“世纪中期的舞蹈……像小步舞”：1832年的议会改革，1833年的第一

个工厂法案；1841年皮尔的预算；1842年的矿山法；1846年取消谷物法；1847年的十小时法案。“[1825~1870年间实施的政治改革的] 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利益集团一贯乐于利用政府来推进集团的利益”（Brebner, 1948, 64, 70）。^[115]

在1848年之前，中间阶级支持政府社会改革的绝大多数论据都是基于“普遍的做慈善的热情和对贫困的场景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认为工人不适合在其中生活”（Halévy, 1947, 218）。尽管英国人暗自庆幸，正是由于开始了社会干预才避免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的爆发，但那些主张改良主义立法在政治上重要的人同时也感到内疚。^[116]因此，正是在英国自由主义古典时代的高峰时期，“中央政府的发展步履艰难”（Katznelson, 1985, 274）。^[117]正如埃文斯（1983, 285）所指出的，现代政府的这些基础也许“并不稳固”。^[118]但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迫不及待要进行改革的信条”（Southgate, 1965, 324），尽管甚至在表面上都没有任何对经济平等的承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格莱斯顿的改良主义起源于边沁主义。^[119]结果是所谓的管理革命，它将政府的职能沿着“一种新的和或多或少费边主义的方向”转变（MacDonagh, 1958, 60）。^[120]逐渐地，“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推动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导致了一个强大的、家长式政府的产生”（Robert, 1958, 335）。因此，在最终的形态上，以这种方式被重新界定的英格兰自由主义“在保守党那里也能够找到了一些类似的表现，后者.....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而在其他原则上.....双方也有被搞混的危险”（Ruggiero, 1959, 135）。

法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在那里，自由放任也已经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口号”。但“实践也是非常不同于理论”。“那些执政的人也意识到工业因素在全世界争夺优势地位的斗争中的重要性，开始时是用和平手段，接着倾向于采用战争手段”（Léon, 1960, 182）。^[121]在那里，19

世纪也是强政府被确立的世纪。当然，这种确立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黎塞留（Richelieu）到柯尔贝尔、雅各宾派、拿破仑、选举君主制、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一直到第五共和国。^[122]但在许多方面，第二帝国标志着前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或者，也许可以这样描述，即第二帝国标志着以取得民众支持为基础来巩固结构。路易·拿破仑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正如基佐所说的（cited in Pouthas, 1983, 144），是因为他能够同时将“民族荣耀、革命的保证和秩序原则集于一身”，当然听起来像是有嫉妒受赞美之人的意思。^[123]

拿破仑三世执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福利国家原则。第二共和国将“社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上，拿破仑三世论证，全体人民都拥有主权同“人民中的一些人处于悲惨的劣等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并证伪了前者。从这种论述中，似乎有可能得出两种结论：对人民主权的界定将导致“无限的政治权力”，或“绝对抵制政治权威”，这将冒着使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危险（Donzelot, 1984, 67, 70）。波拿巴主义代表了前一种界定，而且不要忘记必须使用权力来应对“社会问题”。

在执政的头十年，拿破仑三世通过镇压重新确立了秩序，利用政府兴建公共工程和使银行体系实现了现代化，并以1860年同英国签订自由贸易条约作为这十年的结束。在这一时期，拿破仑三世主要致力于营造一种“有利于工业资本家的氛围”，由此营造一种工人阶级在其中“将受到控制”的氛围（Kemp, 1971, 181）。^[124]一旦这一点得到保证，他随后转向将工人阶级纳入到政治进程中的工作。在1858年以后，他非常受工人的欢迎。这段时间是大繁荣的时期，是政治改革的时期，是法国支持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被压迫民族的时期。一个支持波拿巴主义的工人团体形成（Kulstein, 1962, 373-375; also 1964）。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争取工人的支持，在共和主义者、保皇党成员和拿破仑皇帝之间存在着一种愈益加剧的竞争。他们都鼓励发展合作社，所基于的理由是认为这种组织“同他们都相信的自由经济原则”并不矛盾（Plamenatz, 1952,

126)。[125]

以各种方式，拿破仑三世寻求“更接近新的社会左派”（Duverger, 1967, 156）。[126]1864年，他赋予工会和罢工以合法地位，用亨利·塞（1951, 2: 342）的话来表述，这构成“法国社会发展史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法令”。[127]的确，该政权将它“改善工人和贫苦人口状况”的努力作为宣传的中心主题，将这吹嘘为向贫困人口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帮助（Kulstein, 1969, 95, 99）。[128]拿破仑三世作为第一位“民主的波拿巴主义者”所寻求的是一种方案，它将“通过赋予群众一些甜头……而使他们保守化”（Zeldin, 1958, 50）。以这种方式，他使将法国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方案成为可能，该方案将在1875年的宪法中变为法律。[129]进一步而言，法国不仅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民族国家，正是法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并影响到19世纪的欧洲。[130]

英国/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的第三根支柱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间体系。梅特涅的神圣同盟并不被认为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一步，因为压迫性干预易于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与此同时又要努力保持使反抗不至于根本改变现存秩序——这是防止进一步发生革命的可靠措施，正如1848年所揭示的那样。或许，英国和法国都这样认为。作为此时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和最强大的经济体，英国想要的是尽可能多的自由贸易，它也想在政治方面实现同样的可能性，即用最小的军事支出来达到目的。英国想要为所欲为，但又不愿更多地诉诸武力以将他们的方式强加给别人。简言之，他们想要稳定和开放的程度是以服务于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目标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在本世纪中期，英国处于一种对此毫不隐讳的地位上，并在短期内能够从这样一种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确，正如坎安宁（1908, 869）所说的：

这样说也许带有几分真理性，即不受任何限制的交往体系对英格兰而言是合意的，因为作为工业国，她已经达到特定的

发展阶段；但对那些经济体系尚欠发达的国家而言并不会是同样有利的。

正如穆森（1972b，19）所论证的，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更多保护主义内涵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特定时间具有更大经济效率的国家能够享有保护主义带来的利益。^[131]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论证，自由贸易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或至少在欧洲的各强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但它至多是19世纪中期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上升时期，即1850~1873年的情况。“在欧洲，19世纪的开始和结束……都同对国际贸易的限制相联系”（Bairoch，1976a，11），^[132]而且是非常严厉的限制，一端是欧洲大陆的封锁，另一端是多重的保护性关税。

只是非常缓慢地，英国自身才为自由贸易的优点所吸引。贸易委员会的政治经济学家相信，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是刺激关税同盟建立的因素，他们对此非常担忧。保护主义促进了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在德意志诸邦国的发展，同时却倾向于阻止英国人利用这些国家作为向普鲁士、巴伐利亚、奥地利和俄国“进行走私的绝佳基地”，在此之前他们正是这样做的（Clapham，1930，1：480-481；Kindleberger，1975，33-34）。^[133]到19世纪30年代，对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发展的担忧不断增强。^[134]这些担忧加上以前讨论过的国内诸因素解释了皮尔在19世纪40年代采取行动的原因。让我们记住，皮尔并不是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他不是科布登。斯凯勒（1945，134）的界定是恰当的，他是“一位执行分期完成计划的改革者，并不愿意将理论推演到它的逻辑边界之外”。^[135]

在英国，自由贸易最强有力的主题——或者可以这样说，能够吸引最广泛舆论关注的主题——是也许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干预主义”的主题。自由贸易对英国而言是这样一种学说，它意在阻止其他政府做任

何有可能损害英国企业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人们也许会将反对奴隶制（和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视为自由主义的干预主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成功。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英国的废奴主义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考量的（Wallerstein, 1989, 143-146）。^[136]我们这里希望指明的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模式——这一点由布莱克伯恩（1988, 439-440）予以了强调：

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反对奴隶制有助于中间阶级的改革者突显他们的社会—经济理念…… [反对奴隶制] 提供了一种立法模式，它是由总体方针、而不是由特殊利益所支配的。它为政府干预同工人阶级合同的订立提供了正当理由，同时也赋予合同本身以不可侵犯性。奴隶解放的倡导者将它视为通过市场扩张提供了一种经济激励。自由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137]

相信由政府主导的改良主义具有合法性，这种自由主义信念也同样适用于自由贸易。对印度的强制性改造——从棉纺织品的出口国变为原棉的出口国——使英国的棉纺织品制造商毫无保留地支持自由贸易，只要英国政府“能够保障兰开夏在欧洲市场上免受任何来自印度竞争的威胁”（Farnie, 1979, 100）。^[138]帕默斯顿在1841年1月22日告诉奥克兰：“为商人开辟道路和保障他们的利益是政府的职责所在”（cited in Platt, 1968b, 85）。^[139]甚至将这种逻辑应用到欧洲国家，他在1846年的议会辩论中能够将自由贸易描述为一种慈善原则，由此“其他国家将变成对我们有价值的殖民地，而又不用强加给我们管理它们的责任”。^[140]这种将慈善强加于别人的观念（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可能导致一种“准宗教”信仰，即相信棉纺织品制造对文明的“社会改造”相比美术而言具有更重大的作用，后者是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所珍视的。正如一位叫R.H.哈顿（Hutton）的人在1870年所论证的：“如果我们必须在提香（Titian）和兰开夏的棉纺织厂之间做选择的话，那么以人性和道德的名义，我们选棉纺织厂”（Farnie, 1979, 87-88）。^[141]

用加拉格尔和罗宾逊（Gallagher and Robinson, 1953, 2-3, 11, 13）著名的说法来表述，自由贸易是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对此所做的重要限定：“如果可能的话，英国的政策遵循的是非正式控制原则；如果必要的话，遵循的是正式控制原则”。很明显，甚至在19世纪中期的自由贸易时代（要早于19世纪的最后1/3时期，即公认的争夺殖民地的高潮时期），也有必要占领或吞并一揽子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时期——远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时期——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英国海外扩张过程中的“决定性阶段”，它使商业渗透和殖民统治相结合，以致英国能够“要求那些经济体沿着最有利于她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变”。^[142]尽管干涉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令人厌恶的，但它很快就变得具有合法性，即每当通向印度的航线似乎产生危险时、或对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出现“令人恐慌的威胁”时，后者被认为是由敌对的贸易强国的“不公平”活动引起的，都需要政府出面干涉（Platt, 1968b, 32）。

尽管有英法同盟关系、尽管英国和法国在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强加给其他国家上有事实上的合作关系，但法国非常不愿意放弃一种公开的保护主义立场。法国曾在1786年短暂地这样做过，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Wallerstein, 1989, 87-93）。在1815年之后的时期，英国仍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像法国所做的那样，尽管稍微更强硬些。^[143]当英国转向实施自由贸易式的保护主义时，法国继续坚持保护主义，理由似乎非常令人信服，正如一位法国工业家在1815年对同行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清楚地揭示的那样：

先生们，不要去关注那些呼吁实行自由贸易的理论。英格兰宣称这种理论是商业世界的真正规律，这只是在经历很长时间的实施最绝对限制的政策之后，她已经将她的工业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致不存在任何其他大规模工业能够同她进行竞争时，她才这样说的。^[144]

的确，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法国试图——尽管并不成功——同邻国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以加强它相对英国而言的工业地位。^[145]

因此，似乎令人奇怪的是，在世纪中期英国自由贸易外交在欧洲的最大成功是签署了所谓的谢瓦利埃-科布登条约（the Chevalier-Cobden treaty）——即1860年英法商业条约（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该条约“代表了19世纪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最重要的协定”（O'Brien and Pigman, 1992, 98）。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该条约影响到了全部最重要的工业。法国取消了她按价格征收关税所实施的禁止和限制，而在6个月内代之以特种关税。英国同意让几乎所有法国产品免税进入，一个明显的例外是葡萄酒。两国出口的煤都将免税。但因为英国是出口国，而法国是进口国，所以这实际上是英国的一个让步——它在英国引起了很多反对。进一步而言，该条约包含了一个最惠国条款，它意味着，在法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缔结互惠关税协定的同时，英国将自动受益。每个新条约又依次包括同样的条款，这样就很快导致关税的普遍降低，以致“在大约十年间.....欧洲已接近实现自由贸易，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Cameron, 1989, 277）。^[146]

英国的自由贸易外交一直以法国为中心。法国当然是它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同法国的贸易差额上英国长期保持着最大的贸易赤字（Bairoch, 1976a, 46）。^[147]自1815年以来，英国同法国谈判签署条约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谈判事实上对双方而言都是三心二意的，因为所谈的条件一直都包括严格的互惠，无疑首先是因为法国政府“缺乏操纵主张保护主义的议会的能力”（Dunham, 1930, 101）。^[148]后来发生变化的是拿破仑三世巩固自由主义国家的愿望。正如在镇压革命的10年之后，拿破仑三世决定承认工会的合法性那样，在政府主导的强化法国经济的举措进行了10年之后，他决定推动1860年条约的签订。他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推动条约的签订，正是因为他

是借助他的极权力量秘密地完成的。某一天，在一封给财务大臣阿希尔·富尔德（Achille Fould）的信中，拿破仑三世简单地宣布了已经签订的条约。这立即被称为“由拿破仑三世发动的一次新的政变”（Bairoch, 1970, 6）。^[149]

在拿破仑三世就这个条约展开谈判中，重要的不是签订条约所带来的经济变化，而是它蕴涵的文化意义。签署条约代表法国完全信奉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用经济术语来表述，它是“法国经济开放的高潮，而不是开始”（Mokyr and Nye, 1990, 173）。它至多是从一种公开的保护主义体制向“一种温和的保护主义体制”的转变（Rist, 1956, 943; cf. Coussy, 1961, 3）。^[150]条约的签订在经济方面产生了什么后果呢？邓纳姆（1930, 1-2）宣称，它重振了“一些法国濒临灭亡的产业……外国竞争对这些产业施加了有益的压力”。^[151]但贝洛赫（1972, 221）并不认为它在经济上有利于法国。相反，他指出：“贸易自由化实质上降低了[法国]的经济增长”。^[152]

一般而言，自由贸易被认为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倾向于同意，从英国的视角看，它“从一开始[1846年]就是成功的”（Imlah, 1950, 156）。但就自由贸易是如何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存在着怀疑声音：怀疑它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利益。^[153]此外有学者不仅怀疑它在英国内部获得实际支持的程度，而且怀疑“自由贸易论者”所具有的影响力的程度。^[154]雷德福（Redford, 1956, 11）指出，因此，1860年的重大事件——英法条约和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许确实产生了——要比以前预想的小得多，但“两者为自由贸易的大厦贡献了一个壮观的盖顶石”。

尽管如此，但就英法商业条约到底对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带来多大程度的经济利益展开争论，会使我们忽视它在建构一种国际秩序中所付出的努力，这种秩序将赋予自由主义以欧洲的意识形态的神圣地位。我

们将1815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称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但事实上，这样来描述这段时期是不真实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爆发殖民战争的时期，“一些战争的规模是如此之小，以致[一些人]不习惯称[其为战争]”（Gough, 1990, 179-181）。^[155]因为创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同时也必然是创建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

无疑，1815年到19世纪70年代之间的世界状况有利于英国对边缘区国家采取“一种更为宽松的政策”。这段时间是英国贸易的“盛世”。“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的谦称是否定向“帝国控制区”强加过分要求的一种最好方式（Galbraith, 1961, 39-40）。^[156]进一步而言，伯恩（1949, 222-223）论证道，作为他称之为英国的“自由主义平衡”的组成部分，将群众的不满向外部疏导是至关重要的：“诉诸暴力的本能同样被向国外疏导……英格兰人绝非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通过反思他们应该如何做，或者反思他们对造反的印度士兵、暴动的黑人、俄国人或法国人，以及1861年的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应该已经知足了”。这种向外转嫁矛盾解决的不仅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而且是社会流动问题。在殖民地的工作机会消解了19世纪初期激进主义带来的“一些威胁”。^[157]

在理论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反对殖民主义，他们所基于的理由是它构成对人类自由的侵犯。^[158]但这是在理论层面的说法。在实践层面，就英国对“野蛮人”（该用语并不包括在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的帝国统治而言，英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评论家的认识有一个演变过程，而且越来越持赞同态度，尽管也有一些阶段（1780~1800, 1860~1880），他们持非常怀疑的态度。^[159]甚至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强烈支持民族自决的学者也强加了一种“是否适合”标准。^[160]印度当然是英国帝国计划的中心所在。但最初并不仅仅是——甚至也许主要不是——实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问题，而是税收问题，正如贝里（1989, 10）所正确坚持的那样。^[161]主张自由贸易的集

团能够成功地将东印度公司从人们的视线中完全转移出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加强英帝国同印度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长期延续下去”（Moore, 1964, 145）。

法国的自由主义也同样倾向于建立帝国政府。毕竟，对圣西门而言，就像对其他许多相信“人类进步具有必然性”的人一样，“东方”被认为仍然处于这种进步的“幼年期”（Cole, 1953, 1: 41）。^[162]路易·德·布甘维尔（Louis de Bougainville）很早就做过一次跨太平洋的游历，他于1766年12月15日从圣马洛港（St.-Malo）出发，旅途经过了图阿莫鲁岛（Tuamolu）、塔希提岛（Tahiti）、萨摩亚群岛（Samoa）、新赫布里底群岛（the New Hebrides）、所罗门群岛（the Solomon Islands）和摩鹿加群岛（the Moluccas）。不过，只是到1796年以后，传教士和商人才开始对太平洋地区表现出某种兴趣。始于查理十世对阿尔及利亚的入侵，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下继续扩张，法国“在不断地扩张它的海外领土”（Schefer, 1928, 430）。^[163]

对在太平洋海域维持秩序以防船只遇袭，七月王朝从经济方面考虑表示关注。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英法1843年在所谓的普里查德事件（the Pritchard affair）上的严重对立，英法同盟几乎走到战争边缘。1838年法国同塔希提签署条约。1840年，英国通过吞并新西兰而使法国的扩张计划失败（Jore, 1959, 1: 186, 213）。1842年法国“采取报复行动”，它接管了马克萨斯群岛（the Marquesas）、将塔希提变为它的保护国，并派传教士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就是在此时，英国通过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Faivre, 1954, 9, 338; Jore, 1959, 1: 200-207, 213, 224; 2: 81-106, 165-171, 181-353）。

英法对抗的高潮是由塔希提问题引发的。尽管英国“默许”法国吞并马克萨斯群岛，但对后者将塔希提变为其保护国深感不快。1842年，法国逮捕了英国驻塔希提领事，一个叫普里查德的人。1843年，舰长鲍里

特爵士（C.V.Lord Paulet）试图将夏威夷变为英国的保护国，法国也在暗中行动。双方都是群情激奋。但接着双方又都冷静下来。基佐和阿伯丁（Aberdeen）同意平息争端。法国决定赦免普里查德。普里查德和法国驻塔希提领事莫伦胡特（Moerenhout）都被撤换。法国不再把沃利斯群岛（the Wallis Islands）或新喀里多尼亚作为它的保护国，英国也放弃将冈比亚（Gambia，在西非）作为它的保护国。两个国家都同意承认夏威夷是一个独立国家（Faivre, 1954, 496-497; Jore, 1959, 2: 385-387）。

导致双方各自退让以避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爱尔兰的动荡不断加剧。美国登上历史舞台。就加拿大的沿太平洋边界地区，英国和美国展开积极的争夺。美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是“要么是北纬54度40分、要么是战争”。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Webster）将门罗宣言扩大到夏威夷。英国和法国都感到，它们从继续殖民扩张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并不比破坏它们之间联盟带来的损失要大，即联盟对它们彼此的目标而言更为重要。双方都决定不再让这种冲突事件发生，维持双方在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由此，英法双方决定共同提防危险出现（用船员的老话表述，提防风暴）（Jore, 1959, 2: 388）。[\[164\]](#)

重新加强英法同盟对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本质上看，这场战争是俄国长期试图向南、即向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区扩张其领土、权力和影响力的结果。既然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同样希望控制同这一地区的经济交往，而且英国事实上已经将奥斯曼帝国置于依附于它的地位，所以两个国家决定在军事上明确宣示，俄国人必须承认英国人具有优先地位。因此，用波拉尼（1957, 5）的话来表述，这场战争“或多或少是一个殖民方面的事件”。[\[165\]](#)由于英国的确是霸权国家，而且获得法国人（当然也获得奥斯曼人）的支持，所以“由帕默斯顿发起的战争”不可能不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俄国被迫接受一种“屈辱的和平”。但它确实能够

被称为“一场战争能够取得它最初想取得的结果的罕见的例子”吗（Vincent, 1981, 37-38）？^[166]

回顾起来，克里米亚战争被视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一个“不重要的”例外，包括“将作战区限制在地方层面上和……只是实现有限的目标”（Imlah, 1958, 1）。休·希顿-沃森（1937, 359）称之为“现代欧洲历史上最不必要的战争”。^[167]它肯定加强了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168]但它对英国也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负面影响。为了在克里米亚作战，英国政府必须从殖民地撤出一些军队。它甚至试图在美国招募军队，这过度使用了它的一些外交关系。^[169]而且将这些军队用于克里米亚战争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因为它证明英国能够削减一些“帝国的负担”，由此为保守党支持“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兴起”提供进一步的论据（Schuyler, 1945, 233）。

不过，甚至更重要的结论是必须诉诸战争。在许多方面，霸权依赖于下述事实，即潜在的优势从不会遭到挑战。尽管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它只是在遭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大多已被公之于众的失败和灾难之后”才取得的。作为结果的“悖论”是，英国现在必须为军事准备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表明“英国在欧洲影响力已经下降”（Gash, 1979, 310-311）。作为结果，俄国的失败事实上只是暂时性的。俄国发现，她“只是必须耐心地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即她能够摆脱在黑海对她施加的各种束缚”（Seton-Watson, 1937, 359）。在国内，克里米亚战争说服以前拒不服从的英国制造商承认将自由主义国家变为一个积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重要性。^[170]

19世纪60年代标志着英国主导下的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最后形成，当然是在同法国重要同盟关系的支持下。这一时期确实是它霸权的巅峰时期，但也标志着它衰落的开始。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帝国瓦解的趋势达到其最高潮”（Schuyler, 1921, 538），同时它也是“在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问题上最终证明英国无力干预和采取绥靖政策”的时期，由此动摇了“过去对英国道德影响力的信心”（Gash, 1979, 317-318）。[\[171\]](#)

同样的情况也在法国发生。除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和1862年征服科钦（Cochin）外，拿破仑三世试图通过在中美洲的冒险、由此限制美国的影响力以巩固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1852年，法国和英国向美国提议对古巴实行三国共管。美国“傲慢地予以拒绝”，这增加了法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172\]](#)1859年，在墨西哥存在两个政府争夺权力的情势下，即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的华雷斯（Juárez）政府和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的苏洛阿加（Zuloaga）政府，布坎南总统（Buchanan）提到美国在古巴和墨西哥的抱负，并支持华雷斯。苏洛阿加转向法国请求军事援助。当接下来美国由于1861年爆发的内战而无力顾及墨西哥事务时，法国和墨西哥拥护君主制度的势力联合起来支持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Archduke Maximilian）担任墨西哥国王。法国开始了他在美洲的“克里米亚冒险”。

当华雷斯暂停支付债务时，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联合要求在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Tampico）设立债务专员。这三个国家全都于1862年派驻军队，但只有法国人愿意支持马克西米利安。其他两个国家和马克西米利安本人都临阵退缩，只留下法国“被迫卷入一场真正的战争”。拿破仑三世派出了一支建制完整的远征军，但却被打败，第二帝国“声誉扫地”，失去了“[第二帝国]主要赖以维系”的大部分声誉，（Schefer, 1939, 11, 241）当然尤其是在欧洲。[\[173\]](#)

因此，英法试图创建一种将由他们进行统治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它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失败。一方面，它们对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使用已经达到极限，但却并不能够阻止德国和美国的稳步上升趋势。德国和美国在实力上都得到增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将开始

塑造1870年以后冲突愈益加剧的世界秩序。英国和法国目前都被迫改变他们进行殖民扩张的方式，即从一种只有它们起带头作用的方式转变为一种每个国家（或至少是许多国家）都随意进行“瓜分”的方式。但另一方面，英国和法国又成功地将一种自由主义的地缘文化强加给世界体系，每个国家都必须臣服于它，至少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俾斯麦并没有继续使用神圣同盟的话语，他对这样做也根本不感兴趣。相反，俾斯麦和狄斯雷利将从第二帝国那里汲取经验教训，倡导一种开明的保守主义，它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保守主义变种。

19世纪世界秩序的转折点是在1866~1873年这一时期——“19世纪晚期历史转向的一个巨大转折点”（Clapham, 1944, 2: 271）。美国已经实现统一，在1866年似乎很明显，德国也将这样做。由此，两个实力正在上升的强国处于增强他们地缘政治实力的地位上。与此同时，英国将同法国一道在实行男性普选权问题上实现一次大的飞跃。英国于1867年进行的议会改革被非常正确地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Burn, 1964, chap.6）。英国1867年的改革法案加上法国在1870~1871年的突然爆发共同代表了一个过程的最高潮，该过程开始于1815年，它试图通过将危险的阶级——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从政治上吸纳到体制中来从而驯服他们。但以这种方式，他们并没有破坏两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

在之前的50年中，扩大选举权在理论上是由自由主义者提倡的，但保守主义者予以了抵制。对此的可靠证据是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案。因此，其他大多数重大的进展都是在保守党政治家的主持下——或至少是领导下——取得的：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它先于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1846年取消谷物法；最重要的是1867年改革法案，它赋予成年男性以实际的普选权，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希梅尔法布

（Himmelfarb, 1966, 117）在她对1867年所做的分析中指出，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在政治上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将政治制度置于大量个人

的控制之下持如此谨慎的态度，以致他们将普选权视为既是“重要的、又是危险的”。她认为，保守主义者“相信人性和社会的永恒真理性”，反而对此并不太过担心，这就是为什么改革法案是一种“保守主义措施，由保守党政府提倡和通过”。^[174]在一定程度上，这无疑是对这两个政治集团成员推理过程的正确描述，但我不太确定这是否就是实际所发生的。

对我而言似乎是，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勇气去实现他们的信念，这是由于很简单的原因，即他们同保守主义者一样都对危险阶级感到担忧，保守主义贵族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没有任何自信可言。自由主义者一直害怕被谴责为是鲁莽不计后果的。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并不急于改革，但当他们看到改革不可避免时，他们又非常乐于给予决定性地推动，而不用担心被攻击为持有激进信念。^[175]此外，他们会施展小计谋，将扩大选举权转化为支持他们自己的、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投票。^[176]因此，这似乎并非完全是巧合：

在英国公共舆论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上，1869~1870年似乎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当面对帝国看似即将解体的威胁时，很明显，英国人民并不愿意遵从曼彻斯特学派那些教条主义信徒的观点，而这也许正是一些政治领导人所希望的。

（Schuyler, 1945, 276）

也许希望这种情况发生的政治领导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在使工人阶级变为公民而有某些权利可以予以维护之后，在向中间阶级保证他们将不会被剥夺财产之后，保守主义者现在能够使英国变成一个得到更广泛支持的自由主义帝国。不过，英国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由于她在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受到削弱，所以她试图通过重新强化她的帝国角色来获得慰藉。

第二帝国能够同样平稳地向成熟的自由主义帝国过渡吗？法国已经

实现了普选权。它缺少的是一个完全信奉自由主义的议会政治体制。拿破仑三世看到了这一点，在19世纪60年代明显试图沿着这个方向推进。正如普拉门内兹所说的（1952，162）：“通过使帝国变为自由主义的，拿破仑三世……真的希望安抚……共和党人”。的确，他的政权由于在显示威望的支出上过于挥霍和由于通过公共借款回避议会控制而受到攻击。^[177]尽管如此，但如果不是因为法德战争和法国战败，那么拿破仑三世实施的渐进自由化政策也许已经取得成功。

俾斯麦正确地认识到，第二帝国是英国霸权结构的薄弱环节，击败法国将导致英国在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结构中更迅速地衰落。俾斯麦未预见的是，击败拿破仑三世同时也意味着拆除由他精心构筑的对法国工人阶级，以及一般而言对法国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种种政治限制。因此有巴黎公社的诞生。正是对巴黎的包围和停战唤醒了巴黎的工人们：

他们抵抗普鲁士人已经4个多月，并且愿意继续抵抗。被击败的是外省人，正是这些以教徒和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外省人是第二帝国的支持者。他们是没有爱国心的反动分子。

（Plamenatz，1952，137）

在2月5日到8日举行的大选中，巴黎和其他大城市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外省投票支持保皇党人（和支持和平）。波拿巴主义者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共和党人成为主战派。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在公社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无疑是西欧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人起义，进一步而言也是第一次获得雇员重要支持的起义，即得到那些工作环境更干净、报酬更优厚，以及就那时而言有着更熟练技术的工人的支持：

首次地，那些还不是“白领工人”、仅仅是“办公室雇员”的人大量地加入到起义工人的队伍中。但在1848年6月，雇员们却一直站在统治者一方进行战斗。（Rougerie，1964，128）^[178]

中间阶级在1815年隐隐地和在1848年更明确地担忧的东西现在终于发生了。危险的阶级要求民主。他们要求管理他们的国家，他们不仅将国家理解为他们居住的国家、而且理解为是他们的国家。起义被设在凡尔赛的临时政府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后者享受德国军队不予以干预的恩赐。镇压遭到工人的激烈抵抗，在他们的抵抗被镇压后，被处死和判决流放的现象非常普遍。[\[179\]](#)

但一旦发生了，其后果是什么呢？我认为，普拉门内兹正确地把握住了它：

对共和党人而言，公社在19世纪70年代所做的就是在世纪中期的六月起义所做的。它令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名誉扫地。但这次它并没有增强保守主义者的力量.....

公社的失败并没有伤害到共和党人，但它确实使共和党人更加保守，这是相比假如不这样做的情况而言的。[\[180\]](#)

共和党人着手开始做的恰恰就是拿破仑三世未完成的工作。用自由主义帝国的话语来表述，共和党人准备镇压危险阶级，如果他们要求更多的话；但同时准备赋予他们以公民权，一个自由主义帝国的公民权。[\[181\]](#)阿道夫·梯也尔实现了这种转型。像他之前的塔列朗和基佐一样，作为一个经历许多政权的人，1834年梯也尔支持里昂的工人，但1848年他又支持秩序党镇压工人。他并不是由于加入第二帝国政府才做出妥协的，他对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同样友好，但他却是革命者凶残的敌人。他在1870年指出，尽管他并不想要共和国，但在他心目中它有一个优点：“在所有政府类型中，它是最少使我们产生分裂的政府”。

到1875年，人们能够说自由主义帝国现在已经在英国和法国稳固地确立，并表现出它遏制危险阶级的能力，由此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在该模式中，最恒久不变的肯定不是对自由市场的忠诚（这种忠诚

随着特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经济地位的不断变化和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而变化）。自由主义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也不是对个人权利最大化的忠诚（这种忠诚随着个人运用这些权利去挑战基本社会制度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将自由主义帝国同其他类型国家区别开来的是它对政府实施明智改革的承诺，这种改革将既推进经济增长（或更确切地说是推进资本积累）、又驯服危险阶级（通过将他们纳入公民范畴和让他们分享一部分——尽管是一小部分——帝国的经济财富）。

为实现这一目标，自由主义帝国必须奉行一种政治上的中庸路线，避免成为那种具有反动或革命倾向的政权。当然，为了能够这样做，国家必须对外没有重大的未解决的民族主义问题，对内没有强大的不满的少数群体。同时它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还必须足够强大，以致实现集体繁荣的前景是可能的。它还必须有充足的军事力量或足够强大的盟友，以致它能够避免做过多的对外干涉。当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时，自由主义帝国就能够自由地实行反映多数人意愿的集体保守主义，这些人现在都有某些权利需要加以维护。

因此，首先，自由主义帝国必须有一个强政府、一个作用已经被加强了政府。当然，从一开始，政府权力扩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那些危险阶级：

由边沁、尤其是埃德文·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所阐述的中央集权思想绝非是要触及居统治地位的中间阶级的利益。撇开理论不谈，中央集权是指授权提供那些会影响到劳动阶级的服务。毋庸置疑，哪怕是在最低程度上，中央集权也绝非意在减少更体面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它绝非要如此。

（Hill, 1929, 95-96）[\[182\]](#)

第二，自由主义帝国包含了对扩大选举权的承诺。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选举权的这种扩大是非常谨慎地推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认

为，只有能负责的成年人人才有权行使自由”（Crouch, 1967, 209）。当被用于扩大选举权时，能负责的概念既包括掌握扩大选举权的时机、又包括应用启蒙运动有关人性具有可塑性的信念。因此，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普选权是“非常模糊的”，正如罗桑瓦隆（1985, 136-137）所解释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倡导]只不过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仅仅表达了一种在国家内部推进文明和启蒙进步运动的预期性愿望。……在赞成普选权的自由派和共和派的圈子中，普选权继续被理解为对潜在能力的一种承认——而不仅仅是平等原则的结果，被理解为对人们同处一个社会中的象征性表现。……因此才有就引入普选权尚不成熟而产生的大争论。这种权利之所以被否决，通常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来得过早。正是赋予那些无知的和不成熟的群众以选举权才是他们所担心的。^[183]

据说，自由主义等同于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等同于经济进步，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和在这种意义上，到世纪中期，“几乎每一位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成了自由主义者，而不管他信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Hobsbawm, 1975, 105）。^[184]

有关这一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保守主义者的立场问题。如果在1834年继改革法案之后，罗伯特·皮尔爵士“重新命名他的党为‘保守党’的话，那么很快就清楚的是，在许多方面实施一种反动政策并非他的初衷所在”（Halévy, 1947, 57）。^[185]与此同时在法国，继1830年革命之后，保守主义在法国被精心地阐释为“管理一个后革命社会的方法”、一种“终结革命”的方法。如此一来，它就不再同自由主义相对立，正如罗桑瓦隆（1985, 277-278）很好地描述的那样：“相反，它将自身视为对自由主义的实现、视为它保持永久长存的手段”。

作为结果，保守主义者也开始支持强政府。对保守主义者而言，这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求助于传统和连续性具有内在的缺陷，伯克试图使之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186\]](#)正如贝内东（1988，116）所提到的，这种立场导致各种矛盾，正如在法国那样，一旦出现长期的中断，就会导致要创建其他的传统。那么人们能够怎么做呢？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思想就开始“在宿命论和激进改良主义之间、在一个有限政府进行统治和要求建立强政府之间”摇摆。因此，对许多保守主义者而言，强政府就变成恢复、或至少是部分恢复传统的手段。第二，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它将法律、秩序和稳定统治视为政府进行统治的第一原则”。像皮尔一样，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从原则上看，保留政府机构、并对它们进行稳定的改革是必然结果”（Gash, 1977, 59）。

但第三个理由是最具说服力的，正如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圭多·拉吉罗（1959，136-137）所认为的那样，他在对英国托利党人如何在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影响下，将他们为王权辩护转向为政府辩护的讨论中指出：

正是政府，它的重要性和威信必须予以维护。不应将政府视为在相互对立的私人利益之间所做的调和，而应视为——正如伯克称之为的——各种思想自然交流的结果。

出于这种原因，保守主义者承认拓宽政府基础的必要性，使它不是建筑在特权的狭隘基础之上、而是建筑在由全体人民的看法和利益组成的卑微然而却是牢固的基础之上。旧的托利党已经创建了一个实行寡头统治的政府；但难道自由党所创建的政府就不是实行寡头统治吗？他们之所以较少有资格进行统治，是因为他们唯一依赖的就是财富，而且是同出身和来自古老传统的特权相分离的财富。

保守主义者问，为什么自由主义希望削弱政府？答案很简

单。通过摧毁所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和能够发挥缓解矛盾与促进平等作用的权力，它想让最强势的力量在同最弱势的力量的竞争中不受任何限制地发挥他们的优势，它想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全部权力去剥削那些无助的民众，后者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而不是主角。[\[187\]](#)

当1960年基尔穆尔勋爵（Lord Kilmuir, 1960, 70-71）试图解释在“各种社会革命运动”（他如此称谓的包括1832年、1846年、1906年和1945年）遭遇大失败之后，保守党如何能在英国一直重新执掌权力时，他的回答是“沙夫茨伯里传统”（the Shaftesbury tradition）使然。他将之界定为将托利主义同“政府干预相结合，以多样形式保障最低标准，例如《工厂法》、《住房与公共健康法》，以及考虑工会的利益”——简言之，因为保守党利用政府来推进他们自己的社会改良主义。

这种“在〔保守〕党和人民之间结成的彼此互利的联盟”是狄斯雷利所谓的国家托利主义的核心所在。尽管有下述事实，即狄斯雷利最初在托利党内的崛起是他强烈反对皮尔取消谷物法的结果，但仔细观察狄斯雷利稍后的政治活动表明他“在精神实质上大体上是‘皮尔式的保守主义’”（Smith, 1967, 4, 15）。[\[188\]](#)从本质上看，狄斯雷利为“皮尔主义”注入了新的帝国主义内容。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被视为“一种手段、一种路径、一种原则，以服务于更高的目标，即帝国”（Ruggiero, 1959, 140）——由此将工人阶级更紧密地既同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同保守党联系在一起。

能够这样说，如果自由主义在1830~1875年间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是驯服危险阶级的话，那么它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意识形态成就是驯服保守主义——将它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由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以理性政府为导向的改良主义。它们的共同点是民族主义和强政府，这甚至影响到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巴尔赞（1943, 143-144）在讨论1850~1885

年这一时期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文化转向时，称它为从1848年的“挫折中重新振作起来”。他提到实力政治和唯物主义的兴起，其中每一种都由“物理科学那令人敬畏的权威”所支撑。他论证道：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由于他们对实实在在的、领土上的国家地位的共同要求而联合在一起；科学假设根据它们是否能运用于机械或同机械有着相似的内在机理来予以检验……；与此同时，力……作为对社会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伟大解决方案而被加以运用。^[189]

伴随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向着“他们共同的政府干预政策”方向的迈进，一些保守主义者〔诸如19世纪晚期的张伯伦（Chamberlain）〕试图坚持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认为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它是一种庇护行为，而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它是一种信念，即“应该帮助所有人管理好自己”。但正如拉吉罗（1959，151）所指出的：“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通常非常小”。它当然很小。到1875年，社会主义者仍然没有被完全驯服。这项工作只是到1875~1914年时期才完成。萨皮罗（1949，vii）在他有关自由主义的著作中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当19世纪从历史方面看终结于1914年时，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在欧洲已经被接受”。

[1] 霍布斯鲍姆继续指出（p.285）：“尽管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由此失去了它最初那种充满自信的诱惑力，……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重新阐释了18世纪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真理。它将理性、科学和进步作为自己牢固的根基”。科尔奈尔（Coornaert，1950，13）也认为，在无产阶级发展史上，1830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和“一个起点”。他还提到（p.26）对18世纪哲学的接受：“信仰理性、科学，以及对人类不断进步的简单化信仰”。

[2] 普列汉诺夫（Plechanow，1902~1903）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很早而且很明确地对此做了说明。这还不是全部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事实上直接取自圣西门的学说（1830，70）：“每个人应根据他的能力付出；每个人应根据他的工作获得报酬”（cited in Manuel，1956，227）。当然，马克思明确指出，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方案。在接下来的“共产主义”时期，它将是“按需分配”。

[3] 伊格尔斯最初指责圣西门是“极权主义者”（1958a, 3），但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改变了看法。在书中，他更倾向于论及圣西门思想的保守主义基础：“像德·梅斯特勒——[圣西门]非常敬仰他——那样，但不像进步理论的其他倡导者那样，他们确信，人都拥有‘不良倾向’，这些倾向使国家的存在成为必然，它将限制和调节个人自由”（1970, 689）。斯塔克（Stark, 1943, 55）称他为“资产阶级的先知”。也见布吕内（Brunet），他强调，圣西门在反对什么上是明确的，但在赞成什么上却是模糊的，并将他的特征总结为（1925, 9）“面对斯芬克斯的俄狄浦斯”，考察他所生活的19世纪，试图预测未来。也见哈耶克（Hayek, 1952, 156-188），他在三个方向上回溯了圣西门的影响：对青年黑格尔派和1848年以后社会主义的影响，对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影响，对孔德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G.D.H.柯尔（Cole, 1953, 1: 43）苛刻地指出：“在所有这些中，并不存在任何民主内容”。

[4] 福萨尔继续阐明了基佐的思想：“坚持自己的权利和渴望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并不惧怕采取革命手段；1830年就是对此的证明。它也不惧怕科学理论。它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正处在斗争中的阶级，并承认它将以这种方式来加以界定”。迟至1847年，那时基佐正奉行一条在政治上更为保守的路线，他由于支持阶级学说而遭到对手的诋毁。在下院，一位叫加尼埃-巴热斯（Garnier-Pagès）的人宣称：“在这个国家不存在阶级……而你、基佐先生，这就是你所支持的最可憎的理论，你认为存在不同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和穷人、资产阶级和人民……你想分裂我们，但你是不会成功的；……在法国，只有法兰西公民”。杜马（1963, xi）引述了这段演说，提到加尼埃-巴热斯——几乎紧接着上面那段话——这样继续他对下院的演说：“这里，我看到许多资产阶级”。至少下院一片大笑。

[5] 盖什（1977, 39）提到，利物浦勋爵所领导的由贵族组成的内阁事实上是由中间阶级的子孙们构成的。1835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伦敦商业中心区发表演说时曾提到下述事实，他的父亲是一位棉纺织品制造商。“无论如何，这令我感到耻辱了吗？……绝对没有，而且它不会令任何一个人、也不应该令你们——绅士们——感到耻辱，你们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同样的法律制度将同样的机会留给其他棉纺织工人的子孙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这个国家已经如此长久地保持了繁荣，而且要继续用同样诚实的方式实现同样的目标”（cited on p.71）。

[6] 基佐“既不否认、也不赞同大革命……社会的‘理性’和‘正义’是理论家在驳斥支持革命或旧政治制度的全部主张时所使用的的基本哲学概念”（Starzinger, 1965, 20-21）。

[7] 洛姆（Lhomme, 1960, 36）和普塔斯（Pouthas, 1962, 258）提到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成为统治力量。不过，蒂德斯克（1964, I, 335）提醒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否认大资产阶级在七月王朝君主制中的统治地位是没有问题的；但与其说它消灭了旧的贵族制度，不如说是更多地将它吸纳到新的制度中来”。尽管如此，但这种转变的社会后果却是真实的，正如巴黎省长在1830年革命后不久写给各区市长的信中所证实的那样，他在信中提及了要为可能在皇宫举办的庆典做必要的准备：“无疑，你们会发现这是适当的……即事先拟定一个每个区出席的名单，他们也许包括那些曾获得国王邀请殊荣的人。显赫功勋、以正当手段获得财富、响当当的名声、拥有大产业、诸如此类……是在生活正直之外应该指导你们做出选择的条件。因此，请将居住在你们区的市政官、大地产所有者、银行家、证券交易经纪人、公证人、

律师、制造商、军官、艺术家、作家列一个名单，包括上述各类人中5或6位最著名的人士”。这封信是由杜马（Daumard, 1963, 305）引用的，他评论道：“家世不再是问题所在，除了只是附带的和为了不将任何拥有‘响当当名声’的人排除在外，即使这样，也并不必然是那种世袭的头衔”。

[8] “在引发群众不满的过程中，在使群众习惯于骚乱的过程中，危机为革命创造了条件”（Gonnet, 1955, 291）。

[9] 也见莫斯（Moss, 1975a, 204）：“光荣的三天既激发了第一共和国平等主义理想的再度流行，也激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人阶级抗议浪潮”。

[10] 在1830年革命的一个月后，《辩论日报》（*the Journal des Débats*）警告中间阶级，无产阶级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兴起，并将他们比作罗马帝国的野蛮人（See Daumard, 1963, 515）。100年后，另一位自由主义者贝奈戴托·克罗齐（1934, 150）以相似的方式分析了1830年革命：“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斗争，民主包括从它的温和形式到它的极端的和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场斗争是19世纪真实存在的和进步性的斗争，它在那些享有自由的国家中……获得发展”。

[11] 见沃勒斯坦（1989, 107, 120-121）有关法国的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和英国的反结社法案（Anti-Combination Acts）的论述。

[12] 吕德（1969, 22）论证道，这些协会的斗争精神在1830年之前就已经清晰可见：“事实上，1831年10~11月发生的事件不能被视为是出人意料的。既然里昂缂丝工场协会的领袖称他们的组织为互助主义，那么‘工人发出要为解放而斗争的信号’就不是在1831年，而是3或4年之前，即他们的组织建立之时 [1828年]在整个复辟时期，工人运动将自身表现为‘联合斗争’和密谋活动，它们从未停止过展示它们那令人惊讶的斗争精神”。

[13] 蒂利（Tilly）一方面指出，1830年对法国北部工人的政治活动而言并没有什么改变。他谈及那里“几乎没有罢工”。但另一方面，他告诉我们：“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频度不断增加的工业冲突使罢工变得很正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1986, 262, 263, 265）。

[14] 见伯祖查（Bezucha, 1974, 23），他掌握有1833年里昂一个工人区的统计资料，资料显示，在3257名短工中，只有547人是在里昂出生的。其余的都是外国人或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是这一时期里昂增长的主要促动因素”（p.158）。阿盖（Aguet, 1954, 4）引述了1830年8月16日《立宪报》（*Constitutionnel*）的一篇报道《巴黎省治安的动向》，报道指出，当地工人要求应该勒令“外来”工人（这里的“外来”包括出身农村的法国工人）离开巴黎。省长予以拒绝，理由是“外来”工人的存在代表“一种竞争，有助于增强好胜心、有利于风气的改良、对增强法国工业的实力做出了巨大贡献”。阿盖（p.9）还提到了在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发生的类似事件。

因此像现在的法国一样，尽管“外来”工人获得的报酬要比当地工人低，但他们的报酬要比他们在出生地所能获得的高，他们也是因此才被吸引来的。塞（1924, 494, 498）引述了维尔梅尔

(Villermé)在1840年根据巴黎工人资料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这使他能够得出结论,农民被“制造业提供的相对高的工资”所吸引,尽管如此,但“工人的生活似乎是非常不稳定的”。

[15] 缫丝明显来自单股绢丝 (canette) 一词,意指“线轴” (spool),是在里昂自16世纪以来就有的牵线木偶表演中滑稽地模仿里昂缫丝工人所使用的名称。李瓦塞尔 (Levasseur, 1904, 2: 7) 坚持认为,它“并不是一个表达讥讽之意的用语”。

[16] “如果要把更多的工作机会留给法国人的话,那么这意味着雇主和国家将必须驱逐在法国的外国人……驱逐外来工人的问题是在七月革命之后的头几个月中工人和政府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点” (Newman, 1975, 23)。也见勃吕阿 (1952, 1: 223),他抱怨道:“工人并没有直接攻击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制度 (资本主义) 或者人 (资本家)”。

[17] 工人究竟得到共和党人多大程度的支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布祖查 (1974, 171) 对其重要性评价不高:“归根结底,共和党参加1834年里昂起义是这个地方性政党软弱、而不是强大的结果”。他还指出,这是一次工人起义,而不是像政府所断言的是一次政治起义。勃吕阿也希望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首要性 (1952, 1, 262)。李瓦塞尔 (1904, 2: 819) 论证了相反的观点:共和党人之所以支持1834年起义,是作为对他们在1830年所受欺骗的“报复”,而1831年起义事实上是非政治性的。多莱昂 (1947, 1: 97) 将问题颠倒过来,指出正是工人坚持将斗争目标限制在他们直接关注的问题上:“他们担心同共和党人合作会不利于他们要求的实现。他们想要更谨慎些”。

[18] 普拉门内兹 (1952, 55),他补充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他们赶入地下”。他指出,接下来是“一段沉寂时期”。也见多莱昂 (1974, 1: 107) 有关政府如何利用罢工作为借口镇压共和党人的论述。

[19] 《著作和演讲集》 (通俗版, p.492), 引自费伊 (Fay, 1920, 33-34)。

[20] 沃德 (1973, 7) 称宪章运动为“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

[21] 见普若瑟罗 (1971, 203, 209):“伦敦的宪章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它赢得了首都最重要的各行业部门的支持,诸如木匠、石匠、裁缝和制鞋匠”。尽管如此,但普若瑟罗同时论证,宪章运动还获得了来自那些“不太强大、但组织良好的行业”的更有力和更一贯的支持。只是当自身的利益受到诸如1844年《主仆法》 (the Masters and Servants Bill) 等立法的直接威胁时,贵族们才加入到反抗运动中来 (see Prothero, 1969, 84)。

[22] 对琼斯 (Jones, 1983, 57) 而言,这是继1832年之后幻想破灭的后果:“改革法案被视为是对一种事业的巨大背叛,即人们认为的 [中间阶级激进派和工人] 共同进行斗争的事业。辉格党政府随之而采取的措施——颁布了爱尔兰人强制转换法案、否决了十小时法案、颁布了市镇法案和新济贫法——被视为证实了中间阶级的叛卖行为。从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工人阶级必须为它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23] 见阿勒维 (1947, 208, 211):“公众的想象似乎将爱尔兰人同法国人相混淆。一位记

者写道，‘一个法国人是一个文明的凯尔特人，而一个爱尔兰人是一个野蛮的高卢人。在法国是共产主义，而在爱尔兰就是掠夺。很明显，这个国家同爱尔兰人领导的运动没有关系，后者在英国发起了一场效仿法国模式的革命’。

[24] 宪章运动的斗士也许并没有被愚弄。阿勒维（1947，149）指出：“就宪章派而言，十小时法案的颁布只不过是作为附带影响的部分结果”。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宪章运动斗士的、不如说是他们的潜在支持者的观点。

[25] 布罗伊公爵（Duc de Broglie）在他为《塔列朗回忆录》所写的序中称英法联盟为“两个自由主义君主制国家的联盟，双方都是基于他们的国家利益而结盟的”（cited in Weil, 1919, 4）。

[26] 亚丁和蒂德斯克（1973，1：179-180）论证，结盟的条件是“成熟的”：他们刚刚在强加给尼德兰的停战协定上进行了合作；奥斯曼签署的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the Treaty of Unkian-Skelessi）已经威胁到他们两国的地位；在1832年，他们都同情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

[27] 1830年，在一份工人办的杂志《初生的无产阶级》（*Étrennes d'un prolétaire*）中，有文章宣称：“我们之所以推翻波旁王朝，并不是因为它使我们感到不快，因为人民从来都没有比在1816年到1829年这段时期过得更快乐，而是因为它是由所谓的胜利者、由外国军队和国内的卖国贼强加给我们的”（cited by Levasseur, 1903, 1：667）。

[28] 谢弗（Schefer, 1928, 50-51）指出：“比利时人.....为我们第二次征服阿尔及尔提供了理由”。为什么七月王朝会继续前任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它的支持者仅仅是在他们掌权之前还如此毫无顾忌地批评过该政策，勒努万（1954，109）对此做出解释：“这根本不令人奇怪。同波利尼亚克做斗争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敌视这种冒险，是因为它也许会巩固他们所厌恶的政治统治。一旦这种统治被推翻，同样是这些人相信，放弃这些已经获得的利益会危及奥尔良派君主统治的声望”。他论证，英国人之所以不反对，部分是因为他们对七月王朝的意图并不明了，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慎重对待法国问题上有其利益，他们需要法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合作。奉行一种不表态政策是好的策略”（p.11）。

[29] 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政府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路易·勃朗曾热情支持针对阿卜杜·卡迪尔（Abd-el-Kader）的战争（1844，vol.5，chap.9），并为帝国主义政策在文明发展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合法性做出论证：“它是由于法国所拥有的真正天赋而产生.....她有义务进行扩张。就气质而言——甚至比地理位置更重要——法国是一个海上强国.....英国盟友宣布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陆地国家，如果我们哪怕是稍微安于这种角色的话，竞争就会将我们压垮”（pp.504-505）。

[30] 杜马（1963，57）注意到：“一个人有资格选举和被选，这种地位尤其为人们所看重，几乎等于一个人的世俗成就；例如，它会在记录25000个家庭住址的年鉴中被专门标出”。

[31] “就工人阶级而言，当势态要求为革命做准备、保持战斗警惕时，卡贝作为政府政策的背书人却要求人民保持冷静”（Johnson, 1974, 286）。在这个时候，卡贝本人也感到没有希望，移民去了得克萨斯州。

[32] 阿勒维（1947, 193-194）提到：“1847年，卢塞恩（Lucerne）的自由主义者〔对分离主义者联盟占据的各州发起进攻〕作为对他们1846年在克拉科夫所遭受失败的报复。这对梅特涅而言是一次严重的挫折，因此，基佐——他曾公开要与梅特涅合作〔但路易-菲利普‘谨慎地……阻止了他’〕——认为，对帕默斯顿、同时对西方自由主义而言，这是一场重要的胜利”。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对英国建立一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方案，基佐的抵制程度一直在增强。1844年3月16日，在写给法国驻奥地利大使弗拉奥伯爵（the Comte de Flahaut）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今天，不管大国间的分裂程度有多深，但并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也不存在争夺影响力的真正斗争……在欧洲唯一的关注——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是遏制无政府思潮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维持和平”。在看到基佐的这封信后，梅特涅亲王给他在巴黎大使馆的秘书阿波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引述了这段话，并承认：“这也是我的信念所在”。信件引自 Weill（1921, 6, 8, 13）。

[33] 英法同盟的破裂开始于1846年，即随着帕默斯顿重新执掌外交部。格瑞尔（Greer）将此归因于帕默斯顿对奥尔良家族的长期敌视，这可以追溯到下述事实，即他从1809年到1815年担任作战部部长。但这似乎有些牵强，尤其是基于下述事实，即正是帕默斯顿创造了英法联盟一词。但不管怎样，“英法的这种敌视也许是1848年初最引人注目的外交事实”（1925, 163）——人们也许会补充，也是最重要的外交事实之一。

[34] “从物质方面看，废除谷物法将在粮食短缺时保护贫穷阶级免受食品价格上涨的灾难性影响。从道德方面看，它给予他们以保证——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被赋予公民权——他们的福利将是贵族政府和议会关注的对象”（Gash, 1977, 97）。罗伯茨（1958, 336）提到皮尔，认为他“是新保守主义的缔造者，而且使它能够适应19世纪的需要，正如伯克所指出的，他努力将审慎的改革同旧的传统相融合”。

[35] “当马克思在1848年提到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时，他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至少对法国和德国而言是如此。在19世纪中期，确实存在着惧怕或希望群众起义爆发的情绪”（Hammen, 1958, 199）。

[36] 的确，它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了作用。4月10日的失败——一场“惨败”（fiasco）——不仅“标志着宪章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终结”，而且也为英国政府——受到巴黎、柏林和维也纳革命的惊吓——“彻底消灭宪章运动”创造了机会（Bury, 1948, 1: 145）。不过，詹克斯提请我们注意：“英格兰的财政状况同它成功地应对1847年和1848年革命风暴之间的紧密关系，她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此从未有充分的认识”（1927, 158）。詹克斯将英国之所以避免了革命，既未归因于她的政治智慧、也未归因于她对自由贸易的“迷信”，而是归因于加利福尼亚（1848）和维多利亚（1851年）金矿的适时发现，这导致“全球价格的上涨……由此刺激了实业的发展，其中对英国而言，铁路和自由贸易变成优势资产、而不再是负担”（p.162）。

[37] 就在对谷物法展开辩论之时，爱尔兰马铃薯歉收。“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准备在下次大选中——预计在1847年举行——展开决战，在英国纯农业区之外的中间和下层阶级的多数意见转而支持他们的见解。对皮尔和〔国务大臣詹姆斯〕格拉汉姆〔爵士〕而言，似乎很清楚，如果要求议会为100万英镑或更多纳税人的钱用于为爱尔兰提供粮食，而与此同时又继续保留谷物法的话，那无疑将引起巨大争议”（Gash, 1977, 95）。爱尔兰饥荒成为保守党内部进行政治博弈的一种手段，这从克拉克（1951b, 3）对取消谷物法的解释中可以明显看出：“传统应对饥荒的方法是搁置谷物法和开放港口。但皮尔告诉他的内阁，如果他确实这样做的话〔就此时的爱尔兰而言〕，那么他不可能承诺会重新实施谷物法，内阁的大多数成员感到他们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支持他的这项政策。他以此为由辞职，但辉格党不可能或不会去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因此，在女王的要求下，皮尔复职，并取消谷物法”。也见斯凯勒（Schuyler, 1945, 145），他说道：“1845年爱尔兰马铃薯的灾难性歉收大大增强了……取消谷物法运动的力量”。但他提到取消谷物法并没有解决爱尔兰的粮食问题，1846和1847年仍然是饥荒年（p.186）。政府也从未要求议会通过拨几百万英镑去帮助爱尔兰的议案。

[38] 梅特涅提到帕默斯顿所发挥的“恶魔似的作用”，认为后者要对革命负主要的责任，但帕默斯顿“坚定地相信，宪政改革是对革命最有效的阻滞”（Bury, 1948, 1: 420, 429）。奥地利驻比利时大使在1847年11月16日写道：“比利时的自由主义者是愚昧的；共产主义将会把他们全部吞噬”。这段话是由巴蒂尔（Bartier, 1948, 1: 358）引述的，他评论道：“我们知道，未来将会揭穿这些悲观预言的虚伪性。正是〔法国的〕路易-菲利普、而不是〔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失去了王位，正是梅特涅、而不是〔比利时激进派领袖〕夏尔·罗日耶（Charles Rogier）逃到布鲁塞尔避难，后者是到维也纳避难的”。

梅特涅的观点在100年后被弗托（Fejtő）所赞同，他在一本赞颂或至少部分赞颂1848年的书中指出：“〔英格兰〕存在的事实、它的社会结构演进的态势、它的内部斗争，是对改革计划的一种激励。因此，从这种视角看，英格兰能够被视为革命的一个主要推动者。但从另一种视角看，我们也能够评论说，正是因为英格兰的存在——它的强大使法国不敢与之作对——阻止了革命浪潮的蔓延”（1948c, 2: 456）。不管要谴责的是谁，但将1789年同1848年区别开来的正是“革命的国际性”（Beloff, 1974, 44; see also Hobsbawm, 1975, 10）。

[39] 路易-菲利普政府所犯的另一个错误——甚至是“更为致命的”——是“崇拜实利”和“崇拜现金和账户的盈余”，因而使它成为“一个腐败堕落的政府”（Mill, 1984, 7-8）。

[40] “它配得上这个称号”，因为工人第一次“以那种身份”“以集体暴力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41] 埃利斯（Ellis, 1974a, 41）略带严酷地指出：“1848年革命……代表了垂死的手工业者阶级的垂死一搏”。

[42] 这是“主要从事、但并非唯一从事生计生产的农业共同体保护他们谋生的多样方式的一种努力，以免受较富裕个体的侵害，后者试图通过圈地和放弃集体耕作来改良农业技术。政府试图保护森林使其免于退化，拥有森林私人所有权的人类似地也试图保护树木，因为这些是他

们的资本所在”（Price, 1975b, 16）。

[43] 男性普选权在3月6日投票通过。3月22日，一个妇女代表团将赋予妇女普选权的要求提交给作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的阿尔芒·马拉特斯（Armand Marrast）。他的答复是，既然妇女此前从未拥有过政治权利，那么如此重大的决策就不应由临时政府做出，而应等到选出国民公会后再由它决定。见托马斯（Thomas, 1948, 36-37）。当然，此前也从未有过男性的普选权。

[44] 维克托·舍尔歇（Victor Schoelcher）——他负责拟定立即废除奴隶制法令的委员会（*instituée pour préparer l'acte d'abolition immédiate de l'esclavage*）——论证，废除奴隶制是挽救殖民地的唯一出路。就妇女投票权而言，马拉特斯希望拖延问题的解决，但这次，他没有采取这种做法，1848年4月27日政府颁布法令直接废除了奴隶制。正当其时，塞泽尔（Césaire, 1948, 1）指出：“如果像马拉特斯那样，梅斯特罗（Mestro）[殖民地总监（Director of Colonies）]和其他许多人也认为，人们应该等待选举，然后把问题移交给国民公会去解决，那么废除奴隶制的主张会怎么样呢？”也见舍尔歇（1948, 175-184）。随着奴隶制的废除，殖民地还获得了投票权——包括以前的奴隶——和“决定他们选举方式的权利，以致他们的代表能够和那些来自宗主国的代表一道参与共和国宪法的制定”（Césaire, 1948, 23）。

[45] “中间阶级根本不准备答应工人的要求，后者要么要求恢复手工业生产方式、要么要求对新兴的工业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中间阶级不仅要阻止（原文如此！）社会主义者实现合作所有权的计划，而且他们甚至不愿意答应适度地增加工资。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资产阶级对待他们新赢得的权力的态度上。在受1848年起义影响的每座城市中都组建有某种类型的民兵组织来保护胜利者和他们的财产。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一旦最初的亢奋情绪已过，民兵就被用作镇压下层阶级的工具”（Ellis, 1974a, 39-40）。见布尔金（1948, I, 214-215）的类似评价：“在路易-菲利普统治之初，一位法国将军能够在镇压了波兰起义后说：‘华沙的秩序已经恢复’。在[1848年]七月起义被镇压后，巴黎恢复了秩序，尼古拉沙皇认为祝贺卡芬雅克的胜利是适当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在1848年所梦想建立的社会共和国在七月革命期间已经彻底无望，正如拉梅内如此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

[46] 拉布鲁斯（p.3）将临时政府的胆怯同立宪派的果敢做了比较，后者“并不惧怕其利益会受到他们授权制定的宪法的侵害”。拉布鲁斯是如何解释这种胆怯的呢？“1848年时的人们缺乏这种‘意愿’吗？让我们不要太苛求他们。即使他们有意愿，他们也不可能做得更多，而且不‘知道’如何做……1848年的法国与其说像第二帝国末期时的法国，不如说更像路易十五时期以农业为主的旧法国……1848年革命颇具戏剧性的方面也许是，在一个拥有18世纪结构的社会中，它提出许多对20世纪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

霍布斯鲍姆（1975, 20）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评价：“在1848~1849年，中庸的自由主义者在西欧做出了两项重大发现：革命是危险的；如果没有革命，他们的某些根本性要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就不可能得到满足。资产阶级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进一步而言，正如布永

（Bouillon, 1956, 71）所指出的，尽管当代人提到“山岳党”（Mountain）和“红色名录”（red list），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山岳‘党’：这个称号隐藏着一个复杂的现实”。它至多是一

个由各色派别组成的、有左翼倾向的联盟，甚至在那时，当他们将自身置于勒德律-罗兰（Ledru-Rollin）的领导之下参加1849年5月的选举时，他们仅赢得了1/3的选票。

[47] 泽尔丁指出，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梯也尔。当然他们终将会了解他——但必须等到20多年以后。

[48] 这些引述并不是路易·拿破仑自己的话，而是坎贝尔（Campbell，1978，3-4）对他思想的总结。坎贝尔进一步提醒我们，在19世纪40年代，“波拿巴主义是社会浪漫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路易·拿破仑确立了作为某种社会主义者的声誉”（p.5）。通过国家行为进行阶级利益调和的计划在他的著作《论消灭贫困》（*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中予以了勾勒。它类似于圣西门主义者所宣传的思想，是前圣西门主义者将在第二帝国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适当的序曲。

[49] “促成和解——事实上是一些贵族同商业资产阶级的和解——的原因是在1848年震荡之后，社会斗争已经改变了方向”。

[50] “政变之后的镇压比自大恐怖时期以来任何一届法国政府所做的都更凶残。超过26000人——他们中几乎全部都是共和主义者——被逮捕和受到一个特别委员会的审判……他们所做的不是进行公正的审判、而是进行政治清洗”（Plamenatz，1952，105-106）。被驱逐者不允许回国直到1859年。也见梅里曼（Merriman，1976，210）：“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是对激进的共和党人所进行的一系列镇压中的最高潮”。怀特（1975，2）提出了本质上相同的观点。“相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这次镇压的影响更广泛、也更骇人听闻”，他指出，因为我们还必须加上那些未记录在案的、非官方的镇压。不过，他还是加了些谨慎：“不管多么恐怖，这次镇压可能是非常恶劣的”（p.303）。布尔金（1948，1：246-247）得出结论，路易·拿破仑执政对1848年的革命者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它造成的是三方面的失败：社会方面的失败，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政治方面的失败，缩小了选举权的范围和作为政变后果实施的一些变革；国际方面的失败，远征罗马”。

[51] 在路易·拿破仑逮捕共和主义者的同时，他也逮捕保守主义的国会议员。普莱斯（Price，1975b，56）将这主要视为策略性的：“通过宣布恢复普选权，路易·拿破仑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左派反对力量的敌意；甚至通过解散由保守主义者、拥护君主制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既非穷人、也非民主主义者——主导的议会，他希望能够赢得更多的同情。但这并不是一场反对保王党的政变，他所采取的绝大多数措施是要对民主主义组织发动一次预防性攻击。最重要的，这是一个长期镇压过程中的高潮”。但难道这种策略不是路易·拿破仑基本战略的组成部分吗？不管怎样，普莱斯（p.63）提到，如果保守主义者“普遍地……欢迎政变”，那么他们也只是“带着疑虑”地欢迎。

[52] 见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在向法德有关波拿巴主义的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的观点：“1848/9年是第一次全欧洲的革命。由此就为帝政主义奠定了心理-逻辑基础，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莱茵河的这一边。自由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败、它对社会问题的漠视、继普选权之后新出现的一种群众性政治需求、吸引群众支持，以及以一个拥有非凡魅力的领袖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一致为基础确立一种新的合法性——所有这些自1848年以来都属于一个字母表，在其中

——在法国和德国——拼出的名字是恺撒。破除原来的合法性将由群众的支持和欢呼赋予其正当性。不过，如果这种支持一旦被拒绝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Stürmer, 1977, 110）。萨皮罗（Schapiro, 1949, 330）对路易·拿破仑持有类似冷漠的观点：“一种同社会革命做斗争的新的政治方法已经被设计出来，即将由工人阶级不满而导致的革命潮流转为一种由大众支持的和适应社会需要的独裁统治这种新的渠道之上”。

[53] 路易·拿破仑的策略是使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服务于镇压目标，最好是安全地实现自由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目标。第二次投票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自由主义者对维持在1848年实行的无记名投票制度的决定感到满意，将它视为对自由投票的保证。普拉门内兹（1952, 107-108）指出，路易·拿破仑的逻辑和他的顾问们的逻辑存在很大不同：“他们想要的是借助羞耻心而让畏惧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人民假设当局会了解他们将如何投票。“如果他们投票反对执政者的话，那么无记名投票将保护他们免受警察迫害，但这也许会使他们逃过惩罚，却使他们的朋友受过。投票既然是无记名地进行的，既然人们不用为自己的鲁莽之举而担心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不会因为胆怯而使自己的缺陷得到克服。……恐怖同无记名投票相结合……在1851年12月31日首次被证明是有效的”。

[54] 见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这同一个法德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它带来新思想了吗？没有。波拿巴主义源出于法国大革命……它是一种民主主义的、以三色旗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但对波拿巴主义者而言，革命并不是铁板一块。人们必须清理它提供的各种学说……[波拿巴主义提出的学说]是要保持一种完美的平衡、实行一种中间路线”（Girard, 1977, 23）。吉拉尔引述了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的话：“我们必须从大革命借鉴好的本能，同坏的本能做坚决的斗争……我认为，秩序就是维持所有那些由人民自由选择和赞同的一切；正是民族情感将会战胜派系分裂”。迪韦尔热（Duverger, 1967, 191）类似地也将波拿巴主义说成是“聪明的中间路线”。这种聪明的设计掌握了政权：“在这个不幸的、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中，它很快就变成了在那些赞同复辟王朝（要么是波旁王朝、要么是奥尔良王朝）的人和波拿巴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通过使自身以中间派的支持为基础和使用武力，路易·拿破仑获得了胜利。由此，他能够保持政权免于落到真正右派的手中”（p.141）。

也见泽尔丁（1958, 44-45）：“1852年选举揭示了第二帝国意味着什么。它……试图将贵族制同民主相结合……其中的动力是追名逐利，所有人都能获得的世俗荣誉是它给出的奖励。它使农民能够投左派的票——因为革命者蔑视宪法，反对旧的帮派和贵族，但同时也能投右派的票——支持秩序、支持所有权、支持家庭和宗教”。莫拉泽（Morazé, 1957, 2）提出了本质上相同的结论，但更为尖刻：“几个月中，资产阶级害怕失去任何东西：1848年，巴黎人民试图使自身成为进步的主宰者。但没有成功，社会主义的钟声并没有敲响。它是一种颇为自负的资本主义，由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掌控，试图赶上和超过英格兰，它们彼此竞争以图率先实现目标，将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转变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布兰查德（Blanchard, 1956, 211-212）强调了它的自由主义结果：“如果人们相信普选权是取得国家主权的必要手段，那么我们能够明白，尽管有官方候选人制度，但第二帝国同时既代表了普选权的实习阶段、又代表了法国农民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尤其是在法国农民政治形态的塑造上”。坎贝尔（1978, 24）同样给出了积极评价：“拿破仑的威权统治保障了秩序，并允诺提供在1848年回避的东西。通过制止混

乱，政府保留了普选权原则……到19世纪60年代，普选权已经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坎贝尔提醒我们注意圣佩韦的名言（Saint-Beuve'sbonmot）——拿破仑三世的伟大贡献是清除了法国的旧体制。但“结果比他认识到的要更为积极”（p.26）。霍布斯鲍姆（1975，26）同意这种说法，但给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解：“路易·拿破仑的当选意味着，即使是普选权式的民主制——被等同于革命的制度——也能够同维持社会秩序相协调”。

[55] 引自葛罗（Quero, 1948, 1: 323）。“观点”一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抱负。蒂德斯科（1964，1: 368）讨论了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政党”体制，他评论道：“七月王朝的新闻界过分使用‘政党’一词来表明舆论的各种倾向。其中只有极端的政治选择——它们敌视七月政权的原则——才会有一个组织（结构不是非常严密）和一个纲领（有时很有抱负），据说这个纲领能够将他们的追随者团结在一起”。

[56] 在波希米亚，民族问题同社会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绝大多数捷克人都支持革命运动，其中民族主义因素很快就占据主导地位。但因为大多数捷克人都是普通人，所以社会要求同民族主义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波希米亚的德国资产阶级很快就感到，捷克人希望同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德国”。（Klima, 1948, 2: 218）。

[57] 狄索（Tissot, 1948, 1: 390）提到“民族主义观念对改革思想的胜利”。

[58] 见卢扎托（Luzzato, 1948, 86）有关马志尼自由主义派对共产主义者和他们对城市工人的影响感到恐惧的描述：“对 [自由主义者] 就像对 [奥地利警察] 一样，共产主义的恐怖是实在的，导致至少要将下层阶级控制在远离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地方，害怕他们参与这些斗争。结果恰恰是 [自由主义者] 试图避免的：尽管力量受到削弱，但他们在继续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同时也使遏制群众热情的努力归于失败”。

[59] 一方面，在希腊已经有一部非常自由的宪法，通过挥舞“伟大思想的旗帜”——即古希腊文化的旗帜，“将群众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转移开来”——政府能够防范民主运动的威胁（Sakellariou, 1948, 2: 337）。但在瑞典，由于是一个长期保持独立的国家，所以自身并不存在“民族问题”，民族主义采取了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形式。这既暗示了外交政策从亲俄国转向亲“西方”（即亲英国），又暗示了要坚持斯堪的纳维亚的“自由主义”以反对“日耳曼主义，尤其是它的极权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Tissot, 1948, 1: 394-395）。在德国，反对派力量此时有统一的趋势，这“也代表了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对抗”（Vermeil, 1948b, 2: 30）。

[60] 帕默斯顿提及的是所谓的进步党，他们是政府中的温和派的左翼，但相比激进派，他们仍然是赞同君主制和较少激进性的。尽管如此，但英国的这种态度是在给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壮胆，“鼓励他们通过武力推翻纳瓦兹将军领导的政府”（Quero, 1948, 1: 329）。起义以失败告终，政府取消了公民自由，解散了议会。于是，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布尔法爵士（Lord Bulwer）写信给西班牙政府呼吁它重开议会，提醒他们伊莎贝拉女王（Queen Isabel）承诺要保护自由，并在结尾处写到：“今天，最稳固地保证君主王位的诀窍可以在国家自由和在它统治下实施的开明公正中找到”（cited on p.332）。新闻界获悉这封信后，将它发表。西班牙外长拒绝了这封信（fin de non recevoir），宣称它冒犯了一个独立国家，同时提出了爱尔兰问题。随之而

来的是外交关系破裂，一直持续到1850年。

[61] 总之，英国人有些自吹自擂，但这对于一个霸权强国而言是正常的。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指出：“当革命运动 [在1848年] 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改变了欧洲所有国家的政府时，只有英格兰表现出了诸如秩序、活力和繁荣等品质，这些要归因于一个稳定、自由和良好的政府”（cited in and retranslated from Bury, 1948, 1: 403）。法国共和党领袖勒德律-罗兰在他的著作《英格兰的衰落》（*Décaden ce de l'angleterre*, 1850, 1: 99）中提出了一种较少溢美之词的看法：“研究它的法律和习俗，英格兰揭示给我们的全是特权之人所犯的罪过和有智之人的堕落。它的征服史和战争史将使我们了解到它所执行的各种背信弃义政策，了解到它所犯罪行的数量和程度”。但正是勒德律-罗兰由于拿破仑在法国的解决方案而损失最大——从象征意义和从个人而言均是如此，这种解决方案非常对英国政策的口味。

[62] 见麦科德（McCord, 1958, 16）：“[反谷物法联盟] 在本质上是激进派的一个分支，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下述事实，即激进派在攻击谷物法上找到了一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释放能量的形式，而且此时激进党正需要这样一个能聚合各方力量的问题”。在1835年和塔姆沃思宣言（the Tamworth Manifesto）发表之后，保守派已经成为“激进派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从几个方面看，有更充分的理由去攻击谷物法、而不是选举权……很明显，在激进派的压力下取消谷物法将不仅是对地主利益集团在经济方面的、而且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优势地位的打击”（pp.20-21）。攻击谷物法是激进派进入政治斗争中心、而又不显得太过激进的一种路径，尤其是因为“经济思想的主流倾向是反对保护主义”（p.21）。

[63] “英国在1815年颁布谷物法时提出的一个理由是担心波兰小麦——由奴隶劳动生产的——输入也许会减少国内对小麦的种植”（Leslie, 1956, 51）。

[64] 这一时期，英国甚至出现了产出的增长以弥补从传统出口地区进口的下降，这些出口地区包括德国和波兰的沿海地区，在较少程度上是丹麦的临大西洋海岸、尼德兰和法国（Fairlie, 1965, 562）。这大大削弱了支持保护主义论据的说服力，尤其是因为即使英国产出增加也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时。“支持谷物法保护英国农场主免受大陆战后过剩威胁的情势让位于保留谷物法有使英国出现饥荒危险的情势”（pp.571-572）。

[65] “反谷物法联盟的领袖 [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并不是一位贵族，甚至不是一位乡绅。的确，贝克先生甚至不是一位土地所有者，.....而仅仅是一位租佃农场主.....正是租佃农场主领导着反谷物法联盟，而地主则是它不情愿的和胆小怕事的追随者”（Moss, 1947, 134）。首先，正如莫斯所指出的，所有此类社会骚乱对大地主而言都太过“民主主义”，他们表现出“不愿卷入日常政治活动的保守主义倾向”。（p.139）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是同较少有经济利益牵涉其中相联系的。正如克拉克（1951b, 10）所指出的，取消谷物法的理由对大贵族而言似乎是充分合理的，“他们租金的减少能够轻松地由来自煤矿、码头、或城市财产的收入予以弥补”，或者他们持有的大地产能够提供的大量剩余足以使他们渡过难关，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深层排水系统的新技术来增加产出。“他们是不会对农民表示同情的，他们认为农民也许会由于某一年的价格下降而破产，而且农民也许根本不拥有资

本和不懂得科学”。也见摩尔（Moore, 1965, 544）：“[到19世纪40年代] 谷物法对地主利益集团的经济价值已经变得不再如此明显”。

[66] 这是由一位托利党著名人士约翰·威尔逊·克罗科尔（John Wilson Croker）在1843年2月19日写给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的信中表述的观点（Jenning, 1884, 3: 13）。

[67] 也见基特森·克拉克（1967, 27）：“[皮尔] 不会取消谷物法，直到在做细致的研究之后，他确信农业不再需要谷物法的保护，而且没有它的保护农业会发展得更好时”。

[68] 艾德洛特（Aydelotte, 1972, 326）有关议会投票模式的分析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投票证据显示，在重大问题上，皮尔派保守党员[那些投票支持取消谷物法的保守党人]同辉格党或自由派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在对科布登有着特殊利益的大多数议题上，皮尔都联合党内其他成员一道反对自由派，唯一在自由贸易议题上例外”。

[69] 这是通过要求地主“在诸如[租佃农场主]退租[土地]时对他所做的改良予以补偿”而实现的（Moore, 1965, 558）。

[70] 麦科德（1958, 203）通过强调其重要性把握住了这层含义：“并未能更清楚地揭示[反谷物法]联盟根本无力施加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条件下比它在最终危机时的地位更是如此。8年来，联盟一直在反谷物法的鼓动中居于领导地位，但目前在它们被取消之时，联盟却对采取的程序或实施的确切条款无法施加任何控制”。尽管如此，但在取消谷物法后，“有关联盟的神话开始不断增加”（p.208）。埃文斯（1983, 263）做了类似的论证：“当皮尔推动取消谷物法获得通过时，联盟的影响力处于衰退中。并不能将取消谷物法的特征总结为在那种中间阶级的压力下注定会发生的结果，1830~1832年危机已经使贵族明白，它无力抵制谷物法的取消。至少可以论证，即使反谷物法联盟不存在，谷物法也将会被取消”。进一步而言，埃文斯指出：“皮尔.....在大选之前通过取消谷物法的议案，就是不给联盟以进行最后决战的机会.....这也许并非纯属偶然”。

[71] 这种转化发生的机制非常简单：“在谷物法的保护之下，商人能够从西北欧的港口和粮库的进口中有保障地获得利润，他们会对是否同黑海和美洲进行粮食贸易感到犹豫，甚至当国内饥荒使这种贸易成为一项重要责任时也是如此。首先，运回国内的航程是如此之长，以致在谷物价格下降之后才运回国的可能性和对运回的谷物再次征收关税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使他们难于应对。第二，即使在最好的时候，英国商船.....也很少进出黑海和其他粮食出口港，因为人们很少会预期到谷物价格会上涨，所以运费居高不下。但取消按比例增减税收法案（the Sliding Scale）[1846年]使远距离谷物贸易变得‘可做’，取消航海条例[1849年]使商人能够动员目前所能获得的船只开往谷物交易港”。（Fairlie, 1965, 571）

[72] “在取消谷物法之后的许多年中，许多大土地所有者开启了一个农业改良的全新时代”（Thompson, 1963, 247）。这包括改良农田排水、批量生产陶制排水管道、增加蔬菜（大头菜、万寿菊）的轮种，以及增加牛和羊的存栏数。“从本质上看，土地所有者将这一整套复杂的改良活动视为一次拯救他们自身的利益免遭损害的努力”（p.248）。相比圈地时代，回报

是“微薄的”（p.253）。然而，尽管“农业土地所有权正变成愈益昂贵的奢侈品，但〔这种运行模式的转变导致了〕大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巨大荣耀、威望和个人财富的一个长期衰落期的开始，他们的支配地位已经结束”（p.291）。汤普森甚至称1880~1914年为一个“小阳春”（第11章的题目），即在1914~1939年最终“衰落”（第12章的题目）之前的“小阳春”。

[73] “在这场斗争之后，权力仍然掌握在同样的人手中，即以前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手中”。下一个改革法案直到1867年才通过，而且不是由别人、正是由狄斯雷利（Disraeli）提议的，他在保守党内成功地领导了严厉批评皮尔努力推动取消谷物法在议会通过的运动。由此，明智的保守党人在执行一种自由主义纲领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74] 麦科德（1958，212）有些耸人听闻地指出，保守党被“谴责在近30年中无所作为”。尽管如此，但他确实提到，取消谷物法也损害了“自由派的团结”，使一些“温和的辉格党成员”转投保守党。

[75] 《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21ed., p.950），引自泰勒（Taylor, 1972, 13）。

[76] 麦考利的演讲是在1846年5月22日做的。当然，托利党的家长制作风是一种在1846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象。诸如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迈克尔·托马斯·赛德勒（Michael Thomas Sadler）和乔治·布尔（George Bull）等人几十年来一直在以这种方式进行游说。“他们对认为能够从自由竞争中获得益处的假设持怀疑态度，他们将国家视为自然的中介机构，由此能够对工业资本主义最野蛮的方面予以遏制”（Evans, 1983, 228）。当“托利党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艾希里勋爵（Lord Ashley）〔沙夫茨伯里七世伯爵（Seventhe arl of Shaftesbury）〕”试图促使十小时法案在1833年通过时，已经非常清楚的是，对工业进行管理的事业得到了来自许多力量的支持：“托利党的福音派信徒赋予它以动力、功利主义者界定了它的形式〔监察原则〕、辉格党和雇主达成妥协，由议会通过〔一个更温和的法案〕”（Roberts, 1958, 325-326）。类似地，当新济贫法在1834年通过时，一种“被夸大的对贫困的恐惧”导致议会接受了由皇家委员会推荐的制度，“尽管存在以下事实，即这与其说是在正常条件下接受的议案，不如说包含了更大程度的官僚中央集权的成分”（Rose, 1974, 9）。在法国的大约同一时期——1827~1841年，存在一种推动童工法通过的重大运动，当最终被通过时，它成为“首例在法国通过的社会立法：国家在此之前从未干预过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Heywood, 1988, 231）。

[77] “亚当·斯密并不是一位教条式地鼓吹自由放任的学者……他相信自由放任既不会一直是好的，也不会一直是坏的。它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Viner, 1927, 271-272）。进一步而言，“正是斯密本人推翻了通常被视为他支持自由放任学说的主要论据，他论证，当听其自然时，自然秩序会在许多方面不利于、而不是有利于全民福利”（p.218）。“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经济学家随时准备赋予国家以重要作用……道德和社会改良、而不是本身作为目标的自由放任……是古典经济学家独具特色的目标……在边沁自己的作品中，无疑是赋予国家以作为推进改革的工具的重要作用”（Gash, 1979, 45）。纳骚·西尼尔一般被视为最抵制社会立法的经济

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称自由放任为“所有错误中最致命的错误”的经济学家（*Social Economy*, 2: 302, cited in Sorenson, 1952, 262）。一些分析家则更为谨慎。瓦尔克（Walker, 1941, 173）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在观点上存在广泛分歧”。沃德读过柏莱柏诺、索伦森（Sorenson）和瓦尔克的著作，他指出（1962, 413）：“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般是修正、而不是否定传统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也许会怜悯儿童、但不会怜悯成年人”。

[78] 在生命的晚年，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于1920年出版第8版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这样总结了他对自由放任的认识：“我们这一代需要认识所有这些社会弊病的根源所在，它们源于[在工业革命期间]经济自由的这种突然增加……由此，我们逐渐实现社会生活的某种秩序，其中公共利益压倒了个人的任性妄为，甚至比在个人主义开始取得支配地位之前的岁月都有过之”（app.A, 750, 752, cited in Evans, 1978, 134）。

[79] 费伊（1920, 44）论证道：“对边沁的门徒而言，自由放任并不意味着……‘让事物顺其自然，不用担心’。它是一种战斗口号，要对阻碍自由发展的每一种法律或社会惯例发起攻击。它是一种打破长期存在的恶习的运动”。或正如泰勒（1972, 25）所指出的：自由放任逐渐变成“经济思想中的规范性、而不是分析性领域”。当然，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这种运动已经产生丰硕成果。马歇尔对此做了清楚的说明：“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在自由放任的原意上），加上将商品输送到任何地方和在任何地方销售的自由，使英格兰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即使如此，但马歇尔（1921, 84-85）也承认，这一事实最适合英国的情况，它是政治家为了混淆公众视听而设定的事实。“但长期看，如果[政治家]不得不突出强调这些为他们所忽略的限定的话，它也许对英格兰和对自由贸易都更为有利。因此，对其他国家要预先予以警告，取消保护性关税可能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会给他们最好的产业带来像给英格兰那样纯粹的利益”。确实，马歇尔甚至进一步指出：“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支撑如下观念，即当每个人都允许按他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他自己的事物时，工业将最繁荣、或生活将最幸福和最健康”（p.736）。

当然，就自由放任甚至对英国而言是否至关重要也存在一些怀疑：“如果我们将英格兰的国际贸易同其他国家相比较，尤其是[19世纪]英国的出口同西欧国家的出口相比较，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两种运动的相似性：例如，在实行保护主义的法国就像在实行自由贸易的英格兰那样……那么，我们将赋予哈斯基逊和皮尔的改革以什么样的荣誉呢？”（Labrousse, 1954, 1: 45）。

[80] 这种矛盾是自由主义所固有的，正如阿勒维如此准确地观察到的那样。在对作为中间派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进行讨论时，在阿勒维所称的威斯敏斯特哲学和曼彻斯特哲学之间发生了分裂，阿勒维（1904, 387）最后提到穆勒，当“面对极权主义民主时，他反对自由主义，但[当]面对竞争哲学时，他反对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在这两个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众人皆知。在英格兰的思想和法律史上，哲学上的激进主义已经耗尽了其能量”。

[81] “如果取消谷物法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左派’而言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那么它带来的是一种普遍的信念，即相信实现‘廉价食品’的目标需要完全的自由贸易，保守主义是对必需品征税——就像对生命征税一样——的同义词，这是科布登个人的胜利”（Biagini, 1991, 137）。

[82] 在1874年之后，“一系列灾难性打击使英国农业遭受严重挫折”（Kitson Clark, 1962, 57）。因此，皮尔设法给予大土地所有者以近30年的恢复时间。

[83] 克拉潘继续他的乐观评价（pp.20-21）：“在她选定的土地上，机器就会全力耕作，英格兰的控制事实上几乎是全方位的。美洲也在使用机器耕作；但就出口产品的生产而言很少使用机器，尤其是出口到英格兰的产品则几乎根本不使用机器。比利时生产大量精良的机械，但比利时国家非常小。就各方面而言，法国生产的机械数量相对不足、而且质量糟糕。荷兰很难被视为一个制造业国家……德国的机械……整体上看是劣质的和仿制的……就其他国家而言，英国也许会使用他们的产品、看重他们的市场、或尊重他们的艺术；但她并不会将他们置于同自己等量的经济类别中”。

[84] 她似乎也是以那种方式看待其他国家的。弗托（1948a, 1: 60）提醒我们，即使是“[欧洲各国的] 保护主义者也羡慕英格兰……正像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那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请求他们的同胞以英格兰为榜样，就像科布登的学生所做的那样”。当然，李斯特也许一直牢记着英格兰所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使它能够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这是相比自由贸易政策而言的，后者使它能够维系这种地位。

[85] 菲特（1965, 255）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下述观点开始流行，即国际经济出现的问题表明英国不再能够行使领导权，而美国又尚没有能力这样做，进一步而言，美国缺乏眼界和经验。“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我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帝国或英格兰人民在1845年之后的30年间感到要负任何此类的责任”。他论证道，英国不仅没有“管理”世界经济，而且没有充当“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菲特（p.271）本人引述了白芝浩（Bagehor）发表在《经济学家》（*Economist*, p.1009）杂志1861年9月14日上的文章《英格兰银行在安定时期的责任》（*the Dut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Times of Quietude*），在文章中白芝浩论证道：“它们发挥一种国家职能。在这个国家，它们是黄金储备的唯一保管者……我们相信，银行所有者的最终利益将由银行向国家最全面地放款而予以最好地满足”。菲特接着这样来解释这篇文章：“在白芝浩眼里，银行能够将政治家的才能和赢利动机适当地结合在一起，他对中央银行在下半个世纪发展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使他的同胞相信，这是一个由自由贸易法所保佑的、值得信赖的机构”。这对我而言听起来像是在“管理”经济，至少是管理英国经济，在1861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管理世界经济。

菲特承认，尽管“白芝浩的观点并没有被银行所正式承认……[尽管如此] 但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其原则不再被怀疑”（274-275）。在这一点上，正统派既将金本位制、又将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借款人：“作为一种政府决策，金本位制是不可违逆的。维持金本位制的任务委托给了英格兰银行，只要它履行这种职责，那政府就将操作细节交由它处理”（p.282）。进一步而言，英格兰银行的这种世界角色——作为“一种稳定的货币和积极的国际贸易”的保障者——已经由皮尔予以了很好的铺垫，他在1844年通过了《银行特许条例》（*the Bank Charter Act*），将所谓货币学派的成功经验确定为法案。“尽管中央银行的有效管理和技术需要许多年才能逐渐成形，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能够将一种充满自信的经济秩序的设计者追溯到皮尔那里”（Briggs, 1959, 339）。

[86] 这个事实突出了皮尔关注于为大土地所有者提供一个过渡期的重要性。它同时也凸显了社会动荡使英国政府必须继续面对难于应对的工人阶级问题。“不太容易夸大纺织品制造商在这个国家工业生活中的重要性。尽管棉纺织品的生产甚至还没有完全机械化……但它们确实是作为那个机械和动力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因为它们的机械化程度是如此之高，所以它们的产出是如此之大。但因为它们的生产尚未完全机械化，所以在它们的发展进程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通常还有可能半途而废，许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变成手工劳动者。这还不包括袜子和鞋带的生产，它们——难道我们不应该给这个行业起个名字吗？——是近110万人实现就业的行当”（p.38）。那时，这群手工工人占到工人的1/19；到1901年他们减少到1/37（seep.29）。

[87] 价格上涨必然有利于一个霸权国家的程度存在一些争议。伊姆拉（1950，191，n.28）对这一时期的价格上涨给出了三种主要解释：发生在克里米亚、美洲和普鲁士的战争；新的和更大的黄金供应源；资本产品的出口。罗斯托（1948，20-21）对这些解释项中的每一个是否发挥正向作用提出质疑。战争对经济而言是非生产性的。开采黄金是对资源的一种征税，“并不是对世界的贡献”。资本输出是“非生产性的冒险活动，或者……只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能产生回报”。至于铁路建设，它只是在1873年之后才产生收益（p.23）。人们也许会认为罗斯托倾向于将这段时间归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下降期，但它当然是不同类型的周期，是时间较短的周期，是在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下降期中的一个赢利期。

[88] 正像几乎一直发生的那样，一项发明只有在经济下降期才会成为一项重大的创新。“将巨大的资本和人力都投在旧的炼钢方法上，以及迄今为止英国钢铁业在世界市场上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这些都阻碍了迅速的变革。在1870~1880年的10年间，这种半垄断地位的丧失和在生产方面随之奉行的节约——部分是被迫实施的——是导致转型最终实现的决定性因素”（Clapham，1932，56-57）。英国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对《经济学家》1851年3月8日发表的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文章而言，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从[英国和美国]在过去60年的发展比较中，可以推断出，美国对英格兰的超越最终会像下一次月食来临一样确定无疑”（cited in Clapham，1932，10）。

[89] 相比英帝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国，“[从1850~1914年]在出口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例上，英国制造商表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但在进口占世界进口总值的比例上，英国制造商却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p.87）。至于帝国，它“在英国海外贸易中的份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p.88），但在那之后，它也呈下降趋势。在1847~1849年达到峰值之后，英国的海运也陷入“相对衰落”中（Clapham，1932，211）。

[90] 在1850年，“没有人会假设……英国是‘新兴的和处于上升期的’[这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允许实施保护政策的条件]。她是老成的、已经上升了一段时间、但仍然处于上升状态的。穆勒所说的条件并不适用于它。……在70年代初的衰退之后和在继之遭受令人困惑的商业和工业困难期间，普通人开始提出如下问题应该是最自然不过的，即对那些关闭它们市场的国家保持市场开放是‘公平的’吗？”（Clapham，1932，242，249）。公平贸易联盟（the Fair Trade League）在1881年建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在1885年首次被翻译成英文（p.251）。正如科尔曼（1973，10）所指出的：“到19世纪8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乐观主义已经不复存

在”。

[91] “第二帝国是法国第一个如此明确地赋予经济领域中的目标以优先性的政权”（Plessis, 1973, 85）。这发挥了作用。见马克兹夫斯基（1965, ix）：“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已经引起对外贸易的灾难性下降。伴随复辟王朝的建立，出口占物质产品的比率开始增长，但直到1855年才超过1787~1789年的水平。受到1860年英法条约的保障和新金矿的发现对世界贸易的刺激，自由主义政策肯定是导致法国在从1855~1864年10年间出口飞速发展的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妄称，第二帝国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奇迹。比利时分析家娜塔利·布瑞阿瓦伊尼在1839年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法国和英格兰？”对此他附加了一个脚注，在脚注中他提到，当然在意大利、德国和瑞典也存在一些工业发展。然而他宣称，尽管如此，但“存在着一种普遍认同，认为法国是化学技术革命的发生地，英格兰是力学革命的发生地”（1；191-192）。塞（1951, 2：226）类似地也提醒我们，“整体而言，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下，出现了重大的经济扩张，这已经被当代人注意到”。库西（Coussy, 1961）所做的详细分析对第二帝国同以前和之后法国经济政策具有不连续性的程度提出质疑，他特别论证，该政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非常相对的自由主义，在今天将被称为一种温和的保护主义”（p.2）。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政府政策的连续体中“温和的保护主义”往往处于自由主义一端。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长时间地超过这种开放水平。

[92] 马尔科维奇引用了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的数据。马尔科维奇将这视为结构发生根本变革的证据（see p.321）。

[93] 卡梅伦称这为“法国国际经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19世纪50年代的10年……在促进铁路发展上法国的领先地位也是明显的”（p.213）。也见塞（1951, 2：355）：“1871年，法国拥有超过120亿 [法郎] 的外国债券，从中必须扣除20亿来支付战争债务。但这种损失很快就变成利润：法国能够廉价地购得德国、意大利、甚至英格兰被迫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出售的债券，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从1873年发生的中欧危机中脱身”。

[94] 基尔指出，“人们称此时的 [这些公众认购] 为资本的普选权”（p.276）。

[95] 所有这些引自拿破仑三世的引文都来自帕尔马德的引述（1961, 129）。

[96] 在对波拿巴主义的评价中，维吉耶（Vigier, 1977, 18, 19, 21）强调了在七月王朝已有的基础上，第二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利用公共工程项目“使农民能够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中充分获利”。他接着问，波拿巴主义是否也能使农民将当地政治生活民主化，“逐步将自身从当地显贵的庇护中解放出来”。注意到历史学家在后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他指出他自己的观点“稍微有所不同”。普塔斯（1983, 459, 462）的评价更为积极：“农业是从该政权获益最大的部门。……被确保不受社会主义和反动力量的威胁，农民成为该政权最强大的支持者，在英格兰人和卡尔·马克思将第二帝国称为农民帝国的程度上”。但归根结底，路易·拿破仑对农民的关心和偏爱究竟同皮尔推行英国农业现代化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在两种情况下，政府都是在安抚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他们控制着国家的粮食供给，同时使该部门的作用和赢利性的长

期下降趋势能够温和地实现，这种下降在1873年之后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清楚的。见维尔莱（Verley, 1987, 166）：“在19世纪60年代，国内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无法同全球增加的需求保持同步”。莫基尔和奈（1990, 173）将政府政策描述为“将经济重心重新转向农业，即法国明显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很快会失去这种优势。我认为拿破仑主义的政策非常明显地是政治性的，目的在于抑制农民的不满。

[97] 根据麦格劳（Magraw）的观点，“波拿巴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资产负债表是不平衡的”（p.163）。

[98] 见卡莱尔（Carlisle, 1968, 444-445）：“圣西门主义者的激进主义就在于它决心在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从内部修正信奉自由主义有关资产阶级商业世界的观点、习惯和行为。进一步而言，圣西门主义者的激进主义就在于将一种对避免那种规律发生作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信念带给这个商业世界，后者目前由一种对僵化的、不可避免的经济规律的认识所支配……在法国商人中，圣西门主义者是一种创新、冒险、灵活和扩张主义观念的创造者”。柯尔（1953, 1: 52, 56）提到他们的全球视野和参与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的修建，指出：“他们事实上是杜鲁门总统‘四点计划’的前身。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目标是太大而无法实现的……他们是第一批理解（并赞同）现在称之为‘管理革命’的人”。

[99] 威尔继续指出：“圣西门主义者……赋予不断增长的生产以首要性……难道大的公共工程不是迅速援助穷人的最佳方式吗？……而兴办这些大的工程正是国家的责任……但如果国家忽视这种责任，圣西门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私人的创造性……帝国政府制定有同样的方案”。但这种方案绝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案。见布尔金（1913, 406）：“圣西门主义的社会主义奠基于不平等，这同以民主为基础的各种新学派无任何共同之处。支持强政府的人是不信任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人的主要来源”。

[100] 坎普（1971, 158-159）基于如下理由对圣西门主义者的重要性做了较低评价，即“正是第二帝国的客观地位……使国家应该承担刺激经济的职责。……[国家]提供给财富的全部所有者以继续增加财富的前景。正是这种隐含的对中间阶级和富裕农民贪欲的吸引力，构成该政权的真正优势所在；当然，仅仅是因为它确实使那些人获得了利益。正是在50和60年代，基佐‘发财致富吧’的口号对大多数法国人而言才真正实现”。因此，他的结论在于：“就19世纪第三个1/4世纪的有利经济情势而言，明显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和工业结构质的变化——似乎会在任何形式的能够维系国内和平的政府领导下发生”（p.200）。当然，这是真实的，但正是拿破仑三世政府能够维系国内和平，正是圣西门主义者团结在他的周围，并愿意进行一些必要的创新。

[101] 基尔继续指出：“他们也许乐于让人们将自身视为神圣同盟的银行家，尽管梅特涅……肯定不会接受。首先，他们从一个极端有利的发展阶段获利，此时他们能够把一些危险的竞争对手甩在一边。目前他们能够全力巩固、甚至进一步提高这种地位”。

[102] 他指出，它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恢复新的注资”。但这些政府能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呢？基尔（1965, 79-80）指出，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贷款的提供者，尤其是在伦

敦和巴黎的市场上。为此，它们需要一个承办机构，但并不仅仅是任意的一个机构，而是一个能够激发信心的机构。“[一个信誉优良机构]的名字就足以成为金融活动[担保贷款]的组成部分，它将所有能获得的资本都贷给它们。如果[这个机构]——通过代办——能够找到其他一些机构、即一定数量的对此感兴趣的客户贷到款，那么它的优势地位就能够得到保证”。

[103] 1838年金融困难在比利时特别严重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而非经济方面的。它是尼德兰的威廉国王最终接受1831年条约的结果，该条约承认比利时从王国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对比利时不利的条约，是在1831年被迫接受的，在1838年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比利时而言，它似乎变得不再合理（Chlepner, 1926, 154 and n.2）。

[104] 在涉及1832年改革法案的政治活动中，黄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因素。当改革法案在上议院未能通过时，威灵顿公爵试图组建一个政府——未能成功，弗朗西斯·普赖斯（正如我们以前提到的那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要阻止公爵，就去买黄金”。抢购黄金确实发生了，而且也确实影响到政治局势。但这依次产生的后果是“强化了纸币应该是法定货币的舆论”（135-136）。也许皮尔在1844年预计到这种武器可以在针对取消谷物法的斗争中被再次利用，但这次对他不利。菲特也提到（p.174）两种情况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自由贸易的呼声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愈益高涨，另一方面是“纸币发行不是一种商业活动、而是政府的一种职能，这种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地承认”。但他并未指出，根据自由放任学说，这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很明显，商品贸易越自由，支持商品自由贸易的人却想要货币交易越不自由。如果自由危及利润的话，那么它就是非常不值得追求的。

[105] 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成为第二帝国巨大财富的一个来源：“铁路建设和巴黎市重建债券或土地信贷银行债券都是定期发行的、而且利率较高，它们为储蓄提供了一种有保障的和高回报的投资渠道”（Girard, 1952, 399）。正如卡梅伦继续指出的：难怪“土地信贷银行观念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迅速传播，到1875年所有欧洲国家，以及欧洲之外的几个国家都设立了类似的机构”。

[106] 对詹姆斯·德·罗思柴尔德观点的详细讨论见基尔（1970, 132-134），也见普塔斯（1983, 457）。

[107] “在整个选举君主制（*monarchie censitaire*）[即拥有由有限选举权选出的立法机构的君主制]期间，对缺乏有组织的信贷——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直存在抱怨。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最后一年，对这方面的抱怨大大增加。在1848年革命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危机部分可以归因于缺乏发达的信贷体系”（Gille, 1959a, 370）。列维-勒布瓦耶（1964, 699）认为这些抱怨“并没有根据”。他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当铁路正在建设时，“金融市场给人的印象是它是西欧经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确实承认，这主要是在说巴黎和布鲁塞尔，以及其他一些中心，但也“存在重要的空白”（p.705）。这也许为我们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了线索。普莱西斯（Plessis, 1987, 207）指出，在七月王朝，法国银行开了许多地方分行，以排斥其他银行，但在第二帝国，它们关闭了许多地方分行，以对地方显贵表示抗议。地方显贵既想要法国银行、也想要新的银行，因为这能给它们提供多样的和相互竞争的贷款来源。

[108] 卡梅伦（1953，487）对此做出了审慎的评价：“在正确评价动产信用银行和同时代的其他银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时，人们必须考虑到其成绩可能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输出资本难道阻碍了法国自身的经济增长了吗？通过将它的活动限制在它自己的国家，动产信用银行就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吗？对这些问题的任何简单答案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将正统经济学说同法国那时的特定经济状况结合起来考察，表明它所采取的发展路线是在发挥最大社会效益的方向上”。

[109] 当然，将钱借给较穷的政府绝非难事。正如詹克斯所评论的那样（1927，263）：“政府之所以借钱，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在追求进步的热情和满足纳税人的愿望之间感到无法抉择”。

[110] 见纽博尔德（Newbold，1932，429）的分析：“在1866年英国金融危机和1870年法国政治崩溃之后存活下来的更为保守的银行并不想继续原来的投资去填补无底洞，而是将土耳其、埃及和拉美各‘自由主义’共和国作为新的资本借贷对象，以支付旧贷款的利息。……因此，土耳其皇帝、埃及总督和其他几个总统宣布他们完全无力偿还债务，将只是时间问题”。纽博尔德指出，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美国内战的后果，那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理解1869~1873年所进行的“无节制的投机”。

[111] 杜马（1976，3：150）引用了布尔多（Burdeau）的论述：“[资产阶级的]理论家重复着自由放任的口号，但商人们却要求拥有权力的立法者[能制定有利于他们利益的立法的权力]。对资产阶级而言，仅仅是允许他们自由行动绝非是充分的；他们想要政府更为主动地为他们谋利”。

[112] 1914年春，法国煤业协会（Comité des Houillères）的干事亨利·德·派里姆霍夫（Henry de Peyerimhoff）在发表的演说中谈到世界经济竞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能够指望什么呢？指望我们的资本，……它是一种力量，但当没有其他力量支持时，它是脆弱的。未受到保护的富人是诱人的猎物和理想的绑架对象。威尼斯发挥了这种作用，接着是联省共和国。在阿姆斯特丹的信贷机构（the House of Hope）对欧洲所有主权国家的债权要求并未能使人们对皮什格鲁领导的轻骑兵产生什么更深刻的印象，我担心这个最平和的共和国的国库——实际上一半是空的——对波拿巴的吸引力要超过它对它的威慑力。我们的帝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财富就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我们的帝国”（cited in Bouvier，1965，175）。

[113] 不过，他提到，同样是这些英国人，当他们“有某种特殊利益时，……他们也准备利用政府行为来推进这种利益”。

[114] 当然，斯品汉姆兰法案（Speenhamland，济贫法案）是这场斗争中的一种主要策略。它是在1795年实施的，结束于1834年。霍布斯鲍姆（1962，200）称它为“一种用济贫税来资助工资，以保障劳工最低工资的善意的、但却是错误的做法”——之所以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它实际上降低了工资水平。波拉尼（1957，81）指出，它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只是因为与此同时，反结社法案在1799~1800年通过。因此，保守主义者的目标是阻止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形

成，而这是工业家一直寻求建立的，但对工人阶级却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霍布斯鲍姆继续指出的，他们“通常是用快速的和无情的方式强迫[劳工]要么以一种社会规定的工资找工作、要么移民”。移民以两种形式发生：从乡村到城镇（see Cairncross, 1949, 70-71）和移民海外。后者由于取消对技术工人移民的限制而受到鼓励（see Clapham, 1930, 1: 489, 对谁移民到何地的分类记录）。对前者的讨论，见沃勒斯坦（1989, 120-121）。

[115] 见柏莱柏诺的附录（70-73），它记录了一长串19世纪颁布的干预主义立法。就古典经济学家并不反对像工厂法等社会立法而言，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921, 763-764）：“李嘉图和其他一些团结在他周围的大经济学家似乎不可能被援引来作为反对早期工厂法的根据”。他指出，图克（Tooke）、麦克库洛赫和纽马奇（Newmarch）都是这些立法的支持者，纳骚·西尼尔最初反对，但后来也支持它们。自由放任学说的代言人这种愿意赞成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一些干预的倾向，由另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于1882年以下述方式做了理论说明：“我们必须既不能将政府——它由一些准军事官员掌控着——的职能最大化，也不能根据一些最优秀的哲学家的理论将它们最小化。我们必须学会根据它的绩效来对每一次干预做出判定”[《政府同劳工的关系》（*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p.171, cited in Clapham, 1932, 2: 389]。杰文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伯恩（Burn, 1949, 221）称之为英国在世纪中期所实行的“自由主义平衡”的最好说明：“保持平衡，既在几个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保持平衡，又在‘个人’和政府之间保持平衡。它既有利于时代特征上的明显变化，也为这种变化所加强。这种变化也许可以描述为——被那个时代的人描述为——私利压倒了原则”。

[116] 这种内疚由于在英国残留的宗教偏见而被强化，正如阿勒维（1947, 326）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在想象中回到1850年，那一年‘罗马教皇入侵’在英格兰引起了如此大的骚动”。在整个拉丁欧洲国家、在奥地利和比利时，天主教战胜了自由主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在1851年结束之前，被整个主教团的祝福所包围的路易·拿破仑准备在法国废除宪法。罗马教皇入侵只不过是这种天主教反动势力跨越英吉利海峡同敌对力量进行斗争的延续，反动势力的这种攻势从1789年就开始，自1830年以来重新恢复了实力，在各地都产生威胁。因此，英国舆论对此产生警觉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的失败是天主教的胜利。但英格兰已经避免了革命发生；当天主教反动势力到达英格兰时，它遭遇到了在欧洲大陆并不存在的障碍，即1846年革命的胜利，也即自由主义的胜利。

卡希尔（Cahill, 1957, 75-76）从同样的事实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1848年通常被认为是英国自由主义取得胜利的一年，但面对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各种威胁，它实际上见证了那种意识形态的破产。英国民族主义的胜利正是在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取得的，它由反法和反天主教的情绪所支撑和强化……英国在1848年的成功是一种爱国主义宣传的成功，后者同爱尔兰反合并运动、法国的激进主义、一个自由主义的教皇、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和民主的宪章运动一道缓和了国内由社会骚乱造成的紧张”。

[117] 在1797年到1869年之间，中央官僚机构的规模扩大了15倍。“作为1834年《济贫法》；1848年、1866年、1872年和1875年《公共健康法》（*the Public Health Acts*）；1839年和1856年《警察法》（*the Police Acts*）；1860年和1872年《食品和药物法》（*the Food and Drug*

Acts) 通过的结果, 英国政府从整体上将公共分配政策置于中心地位”。

[118] 埃文斯 (p.289) 认为这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 但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正如他本人所说的: “没有人比、或认为他们比那些第二代主张自由放任的哲学家——边沁式的功利主义者——更了解如何最有效地和最少浪费地进行管理”。从此以后, 边沁式的功利主义者和他们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后继者将持续地发挥作用, 因为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加, “专家的权力也在不断增加” (Kitson Clark, 1967, 167)。

[119] 见科茨 (Coates, 1950, 358): “正是通过不加任何限制地利用政府的立法权力, 边沁努力推动实施他的改革方案”。也见切克兰德 (1964, 411): “边沁主义意味着确定最紧迫的社会工作, 并找出完成它们的途径: 它意味着特定的立法, 在立法领域有监察人员, 在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有行政官员。它意味着下院议员要根据‘议程’来思考问题, 就像边沁所做的那样”。在1852年到1867年之间, 下院议程包括警察、监狱、捐资助校、医生和兽医的培养——它们都由国家予以管理和促进。见伯恩 (1964, 167-22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他的著作《自由放任的终结》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1926, 45-46) 中对边沁主义和政府做了非常清楚的论述: “19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源于边沁、自由竞争等等, 它是一种同19世纪的个人主义相同的哲学, 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更清楚些, 在其他方面较模糊些。两者都强调自由, 一种是消极地避免对现存自由做任何限制, 另一种是积极地打破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它们是对同一种思想氛围的不同反应”。

[120] 这种转变是非常务实的: “这种伟大的转变是对日常具体问题的自然解决办法, 最终会纯粹由于问题的紧迫性而被迫产生” (p.65)。艾德洛特 (1967, 226) 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 [在英国] 19世纪中期并不是一个管理上的无政府主义时期, 而是相反, 是一个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获得迅速而显著发展的时期”。也见沃森 (1973, 70): “在维多利亚统治时期, 政府干预的水平提高了, 而且提高的幅度很大, 这是确定无疑的”。对这种观点的批判, 见哈特 (Harter, 1965) 和帕里斯 (Parris)。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学说上的变化。自由贸易学说在这一时期的整个欧洲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的确, 金德尔伯格 (Kindleberger, 1975, 51) 将1820年到1875年之间向自由贸易的普遍转变作为证据证明, 欧洲“作为一个单一实体由于意识形态的或也许是更具说服力的理论理由而向自由贸易转变”。但接着继大萧条之后, 欧洲就务实地取消了自由贸易政策。现实总是胜过理论。

[121] 在世纪中期,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 由于它们此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不同, 不像英国, 法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对商业领域的干预。

[122] “行政管理的合理化进程在 [1789年] 革命之前很早就已经开始, 而且从那以后就一直未停止过” (Théret, 1991, 141-142)。也见方特维雷 (Fontvielle, 1976, 2011) 有关自1815年以来行政机构稳定扩张的论述: “统计显示, 政府的扩张可以由它对经济结构干预的不断增长来加以解释”。

[123] 韦尔纳 (Werner, 1977, xi-xii) 进一步发挥了基佐的精妙概括: “尽管有某种不可否认的保守主义的、甚至反动的特征, 但波拿巴主义要求它的信徒信奉国家和1789年革命的观

念，即由拿破仑一世所认可的那种观念……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在选举中投票的人民，不再是君主的臣民、而是真正拥有主权的人，甚至能够通过全民投票迫使总统、甚至君主必须尽
职……普选权，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公民观念，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大革命保留下来的成就，在它的支持者的头脑中，它意味着需要一个强大的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制止未来的革命”。

[124] 布尔金（1913，224）也提到：“工人阶级感到它的手被束缚住……，极权的君主……在有关工资的争执中明显站在反对工人阶级的一方。尽管如此，但人们也不能否认……关注慈善也许是帝国特有的一个标志”。

[125] 拿破仑皇帝甚至安排了一个工人代表团参加1862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不过，一到那里，他们就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建工作，当他们返回时就同皇帝断绝了关系。

[126] 尽管如此，但正如布尔金坚持认为的（1913，232）：“在同工人的关系上，政府感到犹豫”。他补充说，他们的犹豫是有道理的：“就帝国所做出的妥协而言，这也损害了它的极权统治基础，工人开始感到他们的实力在不断增加，并力争使既欺压、又安抚他们的政府倒台”。

[127] 塞提到仍然存在各种限制因素，但他指出，尽管如此，但该法律代表了“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由于罢工工人仍然受到司法当局的起诉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直到它真正实现合法化的那一刻”。

[128] 特莱（Thèret，1989，1160）非常实际地评论道：“第二帝国的‘社会’形象并不成功……一旦人们仔细考察一下政府支出的统计数据就能认识到”。

[129] 杜马（1976，138）如此界定了该方案：“法国人逐步从臣民变为公民”。

[130] 见沃尔夫（Woolf，1992，101）：“人们能够论证，法国模式——也许甚至比英国模式更甚——之所以在这种建构现代欧洲政治观念的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正是在自由主义者手中，民族认同同赋予国家以领导地位结合在一起。拿破仑时期的这种遗产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自由主义和标准化的行政机构改革越来越多联系在一起，作为塑造一种统一的国家认同的方法……伴随着新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纷纷取得独立，他们的政府坚持用同样的方法来反对他们认为危险的反民族的地区或种族认同”。

[131] “像过去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样，[自由贸易]也是保护主义的：它的目标在于阻止或延迟不断增加的来自国外的工业竞争，它希望其他国家用它们的粮食和原材料交换英国的制造品，后者由于价格低廉将使外国的工业无法生存”。

注意英国赋予殖民地的特惠只是在1860年才完全取消（当然，在本世纪的最后1/3时期又重新恢复），斯凯勒（1945，246）指出：“对英国而言，不再有任何必要在全球驻军以为他们的商业开道；贸易已经变得可以自我保护”。埃文斯（1983，31）讨论了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较早期的“对签署商业条约的热情”，将此归因于试图克服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在欧洲被明显孤立的不利局面”。他评论道，只签署了一个条约，即1786年同法国签署的《伊顿条约》（*the Eden treaty*）。但他指出，这个条约“表现出了伴随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她将享有

垄断权的最初迹象，尽管她努力予以掩饰。贸易自由化注定将有利于最有效率的生产者”。
(On the Eden treaty, see Wallerstein, 1989, 87-93)。

[132] 贝洛赫 (Bairoch, 1973, 561-562) 将1860~1880/1890年列为“欧洲体验自由贸易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内部的贸易有更迅速的增长”。在稍晚的一篇文章中 (1989, 36)，他给出的年代是1860~1879年。波拉尼 (1957, 19) 是将1846~1879年定为“自由贸易阶段”。英国正式接受自由贸易原则是在1846年。

[133] 金德尔伯格的结论是：“作为对此的反应，取消谷物法由‘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予以了促进，以期在制造品上获得对世界贸易的垄断权。19世纪30年代的关税同盟仅仅是表明了需要加紧采取行动”。

[134] 见凯恩 (1980, 19)：“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做出种种努力以诱使欧洲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做出让步。这通常是基于如下观念，即在作为工业国的英国和作为农业国的欧洲各国之间应该形成一种‘自然的’劳动分工。这些谈判之所以破裂，主要是因为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决定在制造品上避免对英国形成依赖”。

[135] 正是这种中间派的调和立场使后来的评论者对他的行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詹克斯 (1927, 126) 指出，取消谷物法 (加上铁路修建热潮) “在英国对外贸易条件上，带来了一场全面的革命 [就像此前几代生产中的变革一样]”。在大约同时，沃克-史密斯 (Walker-Smith, 1933, 27-28) ——本人也是一位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论证道：“皮尔对关税的修正并不是沿着自由贸易方向发展的，而是科学的和渐进的保护主义……主张保护主义的议会已经就绪。对那时的一些人而言，似乎新制定的关税和已经修正过的按比例增减法已经站在自由贸易的边界上…… [但] 皮尔像他领导的政党一样，是保护主义制度坚定的支持者，这表现在由他们自身对那种制度所做的强化和修正上”。

[136] 德雷切 (Drescher, 1981, 18) 是反对下述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即反对奴隶制是“将一种单一的中间阶级世界观予以普适化的一种手段”，或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改革上转移开来的一种手段，而是将它视为“提供了一种人性标准，对照这种标准，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合理性能以非常具体的标准很好地予以论证”。尽管布莱克伯恩倾向于赋予经济因素以更大的作用，但他得出的结论 (1988, 520) 却认为，“奴隶制之所以被废除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是无法维持的”，这在本质上是指奴隶抵抗的程度和废奴支持者的社会动员程度。但我认为，这似乎是将经济和政治领域人为地分割开来。

[137] 布莱克伯恩 (p.430) 也提到：“在改革和废奴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绝非简单地是议会设计的产物。两种运动都对他们视为异常的所有权类型提出了质疑……反对奴隶制有助于动员中间阶级和群众的支持，而又不用担心他们会将它转化为革命的危险”。

[138] 不仅是印度、而且包括其他新近被纳入世界经济的地区所经历的非工业化过程由沃勒斯坦 (1989, 149-152) 予以了讨论。

[139] 普拉特 (Platt) 评论道：“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官员——都同意，让全世界都对贸易开放是他们可以期望英国政府去完成的目标。他们也许在所采用的手段上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对目标都有一种共同的信念；他们认为，可以期望物质和道德进步能够自动地从贸易的扩张中产生。例如，理查德·科布登强烈地反对中英战争，但却欢迎战争的结果，即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开放。他论证，在武力的威逼下开放市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能够进入这些市场事实上却是互惠的，最终将带来贸易的扩张，它将对世界和平的最好保障。大多数在伦敦的官员都赞同科布登的观点”。

[140] 议会辩论，3d ser., LXXXIII, 23February 1846, 1399-1400, 引自索美尔 (Semmel, 1970, 8)。当然，也有人认识到自由贸易优势的脆弱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暂时性，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它根本不应该尝试。狄斯雷利就持这样的观点。在1838年，他基于如下理由反对取消谷物法，即假设欧洲国家“将由于英格兰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而蒙受损失，那是一种‘妄想’”。当然，长期看他是正确的。在1840年做的一次演讲中，他提醒议会，荷兰人也是一度将全部欧洲都看作是“他们的农场” (Parliamentary Debates, 3d ser., XLI, 13 March 1838, 940; LIII, 1June 1840, 383-384; cited Semmel, 1970, 155)。

在1846年举行的一次针对取消谷物法的大的议会辩论中，狄斯雷利呼吁在抑制性保护和无限制竞争之间采取一种中间路线。他引西班牙和土耳其作为各自的例子，并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指出：“长期以来，那里一直全面实行着纯粹的竞争制度，它确实不是源于对这种政策的任何哲学信念、而是源于傲慢的毫不在乎，认为作为征服者的种族更应该考虑商业。在土耳其存在自由贸易，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它使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制造商破产” (cited in Holland, 1913, 265)。当然，这种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是貌似有理的，因为它没有提到1838年签署的实施自由贸易的英土商业协定 (Anglo-Turkish Commercial Convention) 在导致当地制造商失败中所起的作用 (see Wallerstein, 1989, 176-177)。

[141] 哈顿在一篇名为《罗斯金先生的艺术哲学》 (*Mr. Ruskin's Philosophy of Art*) 的文章中写的这句话，见《旁观者》 (*Spectator*) 1870年8月6日，第953页。

[142] 在这些年新占领的殖民地包括新西兰、黄金海岸、纳闽 (Labuan)、纳塔尔 (Natal)、旁遮普、信德、香港、贝拉尔 (Berar)、奥德 (Oudh)、下缅甸、九龙、拉各斯、塞拉利昂临近地区、巴苏陀兰 (Basutoland)、格利夸兰 (Griqualand)、德兰士瓦 (Transvaal)，以及在昆士兰和英属哥伦比亚的进一步扩张。索美尔 (1970, 203) 对此表示同意：“维多利亚中期据说实行的‘反帝国主义’政策是一种神话”。普拉特 (1973, 90) 恰当地指出：“在这一时期……1830~1860年，[英国] 向这些‘没有正式统治权’的地区进行迅速经济扩张的激励和机会简单而言并不存在，其中对拉美、地中海东部国家 (Levant) 和远东地区的贸易很难说得上重要”。

[143] 英国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才放弃工业上的保护主义，但将农业上的保护主义坚持到1846年，海运上的保护主义坚持到1849年。法国更不愿意放松限制。复辟时期的君主——以拿破仑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为依据——被要求做出明智的经济选择：“1814年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法国的政策是要将国内最大的经济自由同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保护主义相结合” (Démier,

1992, 97)。克鲁泽(1972b, 103)评论道：“不过，实行保护主义对[1815年之后时期]绝大多数大陆的工业而言是绝对必需的，这是更为合理的认识。法国的错误在于过于极端地实施了保护——完全禁止输入绝大多数外国制品”。

[144] 莱昂·塔尔博特(Léon Talabot)：《制造商大会：1845年全体会议》(*Conseil general des manufactures: Session de 1845* [1846, 4])，引自列维-勒布瓦耶(1964, 15)。

[145] 这样一个同盟几乎在1842年同比利时建立起来，而且已经谈及要将其扩大到尼德兰、瑞士和皮埃蒙特地区，但“法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那些对法国恢复影响力感到恐惧的其他大国的外交部联合起来有效地扼杀了法国的计划”(Cameron, 1961, 37)。

[146] 因此，“1860年条约就成为了一个不断增加的商业协定链条中的第一环”(Dunham, 1930, 142)。重要的是认识到，该条约“对双方而言都代表了实质性的让步”(Condliffe, 1951, 222)。这一自由贸易进程中的小插曲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对世界贸易地理格局的影响，它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在1790年，欧洲内部贸易占欧洲国际贸易总量的76%，从1800~1860年这一时期地理格局的多样化不断加强，接着在1860~1880/1890年这一时期出现了逆转趋势，此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多样化趋势。尽管如此，但不应夸大这种变动的规模。在整个19世纪，欧洲内部贸易占欧洲国际贸易总量的百分比从未低于过2/3。见贝洛赫(1974b, 561-563)。

[147] 英国对法国所处的情势，就像后来美国发现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和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期对中国所处的情势一样。

[148] 邓纳姆(Dunham)继续指出：“但即使在1840年或1852年签署了一个条约，它也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在上述的每种情况下，都不存在任何比就少数商品展开限制性议价更宏大的目标”。进一步而言，还没有尝试就最惠国条款的问题展开谈判。

[149] 弗朗(Fohlen, 1956, 418)论证，长期看，拿破仑三世为他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唯一一次重大的关税改革需要使用极权的方法来实现，而不顾资产阶级的意愿，拿破仑三世由此失去了王位。1860年1月23日签署的英法商业条约被视为一次‘工业政变，它是如此的违背经济传统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使它远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贸易……拿破仑三世背叛了资产阶级，他们将在1870年记起这次背叛”。

[150] 布罗德德尔(Broder, 1976, 335)更尖锐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对[1860年条约]存任何幻想。有关该条约的争论本质上看是一场错误的争论。在整个[19]世纪，法国是坚定的保护主义者。人们也许可以将法国实行的保护主义划分为连续的几个时期：一般的(1820~1852)、温和的(1852~1881)和选择性的(1882~)”。

[151] 也见瑞斯特(Rist, 1956)，他同意下述观点，即一般而言，结果对法国是有利的。至于英国，邓纳姆论证道：“它是否明显影响到英国工业的总体发展，这值得怀疑”。因此，根据英国这位为自由贸易唱赞歌的人的观点，该条约似乎就是英国人(他们几乎没有从中获利)

送给法国人（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需要被诱骗）的一份贵重礼物。如果是这样，人们会感到奇怪，英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签署条约。埃利阿苏（Iliasu, 1971）论证道，条约签署的动机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不如说是政治方面的。他指出，毕竟签署条约是“对下述原则的一种违背”（p.72），即在1846年以后决定的不签署任何商业条约的原则。他将该条约归因于两国之间在意大利问题上“悬而未决的外交争执”（p.87）。拿破仑在1861年吞并了尼斯，该条约被视为“无论对错……是要收买英国，使她同意这次吞并”（p.96）。

[152] 贝洛赫（1970，7）指出，不仅如此，而且“[1892年实施的梅利娜关税税则（the Méline tariff）] 重新引入保护主义导致增长率的加速增长”。进一步而言，这个实行较为自由贸易的时期在法国要比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在稍晚的一部著作（1976a，238）中，贝洛赫得出结论：“农产品的涌入……是解释法国自由主义遭受失败的最重要的因素”。

[153] 贝洛赫（1978a，75）指出，在1860~1910年这段时期，英国的出口扩张要慢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确，实施保护主义的国家做得最好。但从全球经济增长看，“自由主义时期对[诸如英国]较发达国家要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有利些”（p.163）。麦克洛斯基的结论（1980，318）更苛刻：“自由贸易导致英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减少了国民收入”。

[154] 见法尼（1979，39-41）有关自由贸易论者的影响力被“它的思想继承人予以夸大”的论述。他认为，它仍然只不过是一个“思想流派”，对自由党所产生的影响要小于对辉格党显贵或不信国教者的影响。他将曼彻斯特商人的支持视为是源自“作为权宜之计的动机、而不是源自对原则的坚守”。他提到在取消谷物法之后所发生的思想界反对自由主义的鼓噪：1848年的青年英格兰主义运动（Young Englandism）、1850年的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1851年的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ism），以及卡莱尔被广泛阅读的“辛辣的苛评”。“曼彻斯特成为令诗人、文学家和审美家感到愤怒的攻击对象”。它也许会获得一些长期的利益，但短期内，取消谷物法“迎来了一个激烈辩论的时期，它从1846年一直持续到1853年，只是伴随着最初的自由贸易信条被驳得体无完肤才告结束”。

[155] 她补充道：“在几乎每种情况下，支撑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的法律本身都是无效的。它必须由武力来支撑。这适用于最大的陆上自治领加拿大，就像它也适用于最小的岛屿殖民地或保护国皮特凯恩岛一样”。

[156] 对现有殖民地的政策，康德利夫（1951，254）甚至不愿意接受“宽松”这个形容词：“尽管有小英格兰人的各种看法，但在失去美洲的殖民地之后，行政管理并不是宽松的，对那些仍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的管理是非常严厉的……制造商也许会抗议战争和为战争做准备所带来的成本，但大多数英格兰人都顽固地坚持他们对海上强国的信念和他们对帝国的自豪感。而且，有大量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海运利益集团反对任何对航海条例的放宽。陆军和海军对维持这样的战争机构有着职业利益，对维持殖民地保护人的地位有着个人利益”。

[157] 尼尔（Neale，1972，97）指出，“至少对由一些有抱负的专业人员和小资产阶级成员组成的准集团而言这是真实的，而更强大的中间阶级也许就是来自这个集团”。提到1788年到

1856年之间澳大利亚的情况（p.108），他补充说：“总督和行政官员的社会形象……表明他们主要是一个居于中间地位群体的至少第二代成员，这个中间群体要么生活在母国、要么生活在苏格兰低地，是英国国教和长老会教的成员”。

[158] 就官方观点的经典阐述见科布登1847年给约翰·布赖特的这封信：“但你绝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邪恶就植根于那种清高的岛国个性——约翰牛——的好斗、精力旺盛、傲慢、鄙视外国人和同情心重。体会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对他乱挥棍棒的描述，即当他听说在世界某处有人打架时总是会这样做，而且对其他人竟敢不事先征求他同意或邀请他参与其中就打架，他会非常恼火”（cited in Condliffe, 1951, 255）。

[159] 见瓦格纳（Wagner, 1932, 74），他追溯了从亚当·斯密到G.D.H.柯尔对殖民地态度的演化。正如他所说的，“他们反对殖民政策，但不反对殖民地或殖民化”。他继续指出，不管怎样，“如果经济学家偶尔〔对帝国的价值〕持悲观态度，那么他们通常会恢复他们的信心，甚至当帝国主义变得声名狼藉时，帮助它恢复声誉”。

[160] 见穆勒写于1848年革命期间的著作（1849, 31）：“作为实现自由的手段，民族独立是合意的；这是同情意大利人重建意大利主张的充足理由所在，也是波兰人建立波兰的充足理由所在。的确，当一个民族不适合自治时，对他们而言，通常最好的是在外国人、而不是本地人的专制统治下，那些外国人在文明和文化上要比当地人更先进些。但当他们自由的时刻——用德·拉马丁（M.de Lamartine）的隐喻来表述——来临时，他们又没有完全被征服者的民族性所同化时，重新掌控他们自己的命运通常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即获得自由制度、或——如果他们获得了自由制度——以自由精神驾驭自由制度的条件”。

[161] “就印度的情况而言，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财政和军事上的发展势头是狂妄自大的自由贸易论者能够扩张势力的主要原因。印度各地区缴纳的税收、而不是同它的贸易仍然是英国在东方的主要经济收益。甚至在1834年之后，公司仍然保持了它进行商业垄断的许多特征。英荷在爪哇的统治和英国在锡兰的商业垄断一直到世纪中期都保持着相似的特征。英国制造商对印度和东方其他地区的销售直到19世纪40年代仍处于停滞状态。的确，从1790年到1830年之间，英国在世界贸易上的扩张不应过分夸大”。稍晚，甚至当贸易占据更突出的地位时，税收的作用也绝不应忽视。见詹克斯（1927, 223-224）：“将税收负担加诸在印度身上被认为是方便的，这听起来似乎是荒谬的。但制止兵变的成本、将公司权力移交给王室的代价、在中国和阿比西尼亚同时发动战争的支出，这每一项政府支出都同遥远的印度有关，甚至在印度事务处工作的女清洁工、那些出航但没有参与战斗的船只的成本、印度军队出航前在国内接受6个月培训的成本，所有这些都加诸于那些没有权利选出自己代表的印度农民的身上”。

[162] 就在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圣西门主义者在推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论述，见埃米利特（Emerit, 1941）。

[163] 除了在阿尔及利亚扩张领土外，它还在几内亚沿岸（the Guinea Coast）、印度洋海域和太平洋诸岛屿进行了征服活动。

[164] 根据费维尔（1954，497）的观点，英国在双方的交易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因为它目前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占据更强势的地位，这是相比西班牙曾经据有的地位而言的”。当然，在做这种评价时，他是将英国和美国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

[165] 在细节上做必要的修正后，对英国舆论而言，俄国扮演的角色就像在1945~1990年时期对美国的舆论而言苏联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见勃里格斯（1959，379-380）：“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从仔细考察英国政府成员动机的视角来加以理解。在整个英国，存在着很强的民众恐俄症……〔几位英格兰作家〕已经使大部分读者熟悉了下述观点，即只有渴望赢得自身解放的受奴役的人民才能够将处于半野蛮状态的俄国暴君们赶回亚洲大草原。……在1848年之后的世界，俄国的批评者们激起的不是有限读者的、而是大量民众的反俄情绪。前宪章分子……热衷于发动针对民众事业共同敌人的斗争；戴维·厄克特（David Urquhart）组建了‘工人外交事务委员会’来研究俄国人所犯下的‘罪行’，并对他们做出谴责……当〔激进派代表和一份报纸的合作经营者霍利约克（G.J.Holyoake）〕感到所签署的是一份不成熟的和约时，他拒绝提醒他设在弗里特街（报馆集中的街道——译者注）的办公室在报刊的显著位置发表它，而更愿意醒目地排印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 Browning）有关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持续处于困境的诗歌”。

[166] 他论证：“它的影响是持久的。当俄国下一次再进攻土耳其时，她必须在陆路用强硬的方式、而不是借助它在黑海地区的海军优势来应对这种侵略。土耳其再也没有沦为俄国卫星国的危险”。

[167] “这场战争的主要获益者是拿破仑三世，他稳定了他的统治……并同〔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建立了关系”。

[168] 见巴斯特（Baster，1934，82，86）：“战争的结果是激起了许多英国人对在获得新生的土耳其发展商业和金融业的兴趣，增加了英国人争夺银行经营特许权的竞争力……利用诸如奥斯曼帝国银行等机构作为向一个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渗透的武器为19世纪的外交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和可资借鉴的实例。西欧各大资本输出国对从中渔利绝不甘落后”。

[169] 作为结果，英国驻华盛顿公使被美国政府驱逐（Schuyler，1945，221）。这是因为美国已正式宣布中立，而且对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一城市——译者注）建立一个兵站招募美国志愿者并不看好，但事实上在萧条时期招募士兵并不困难（Brebner，1930，303-305，320）。不久之后，在美国内战期间，作为回报，美国招募加拿大人在联盟军队中服役（pp.326-327）。

[170] 见法尼（1979，44）：“开始于1846年的大争论结束于克里米亚战争，它加速了兰开夏经济精英世界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开始于帕默斯顿于1850年所做的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演讲。自由贸易时代的第一次国际冲突产生的是经济繁荣、而不是萧条，它打破了人们自1851年以来就一直抱有的有关持久和平的梦想。战争使尚武精神影响到了兰开夏的各个阶级，鼓励曼彻斯特人对英国国教的兴趣。它使曼彻斯特的公众舆论支持帕默斯顿，为在1857年战后大选中使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们遭受决定性失败铺平了道路，此时政府对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和拓展英帝国的势力范围的干预活动明显得到选民的认可。由于市场经济未能取得免于政府

干预的完全独立性，所以自由贸易伦理本身变成一种目标、而不是实现更高目标的手段，从一种改造社会的有效方法转化为一种纯粹的、机械的商品交换”。

[171] 到1864年，“作为现状的维护者之一，英国是孤立的和无能为力的。……很明显，英国今后要么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要么——例如——什么也不做……在扩大政府权力和自由主义之间旧的对抗已经演化为一种新的和危险的结合，即将1848年的民族主义同王朝统治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希顿-沃森引述了英国外长罗素勋爵（Lord Russell）的话：“我记得坎宁说过，‘我被告知我们或迟或早肯定会打仗。如果那是事实的话，那我会说迟点打’。我要对坎宁说，‘先别这样说’”。曼彻斯特学派的不干预主义同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后者更倾向于卷入到殖民地事务中、而不是欧洲大陆的事务中。结果对毛奇（Moltke）而言是非常明显的，他在1865年指出：“正像她自己认识到的那样，英格兰对欧洲大陆已经无能为力”。在国内，它意味着保守党重新执掌权力：“从19世纪70年代以降，反帝国主义情绪迅速减弱。……狄斯雷利熟练地利用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区分政党立场的问题，他的政治纲领中也许没有哪部分比他宣誓要维系帝国完整性的内容更能吸引英国选民了。保守党在1874年大选中的胜利将小英格兰主义完全从政治实践领域中驱逐出去”（Schuyler, 1921, 559-560）。

[172] 谢弗（1939, 7-11）：“简言之，对美国的恐惧主导着英国、西班牙和法国 [在加勒比地区] 的政策”。

[173] 见吉拉尔（1977, 25）：“在取得显著的成功之后，正是外交事务导致了政权的衰落。对欧洲大陆国家而言，法国不再是那种强大到足以在旧体制和革命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的国家。相反，正是俾斯麦在未来几十年间将这种解决方案强加给了大陆国家”。

[174] 希梅尔法布称该法案为“现代英国史上一个决定性的、也许是唯一决定性的事件。正是这个法案将英格兰转化为一个民主国家，使民主制度成为一种受尊重的政府形式（美国绝不是非常受尊重的），而且很快就为人们所公认，它是唯一自然的和恰当政府形式”。除了“民主”一词之外，这是非常正确的。普选权并不是民主。如果那是事实所在的话，那么可敬的保守主义者、或就此问题而言可敬的自由主义者将不会支持它。普选权是将完整的公民权授予全部成年人（或至少是全部成年男性），这远不是说他们在政治决策中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不过，这的确是事实所在，即在1867年改革法案之后，将民主界定为“男性普选权”在政治话语中确实成为普通的常识。至于自由主义者和他们所持的谨慎态度而言，见萨皮罗（1939, 131）有关他们在1832年的辉煌时刻所做的论述：“尽管鼓吹普选权，但功利主义者平静地接受1832年改革法案对普选权所做的狭隘限制。事实上，对他们而言，男性普选权是更合乎逻辑地从他们作为前提的‘最大快乐’原则中推导出的结论，这是相比它作为一个政治实践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言的。逻辑促使边沁提倡男性普选权，但调和精神——一直令功利主义者挥之不去——促使他宣布，他‘将高兴地做出妥协支持户主选举权’”。

[175] 这并不是说保守主义者是在没有任何刺激的条件下这样做的。辛顿（Hinton, 1983, 12-13）提醒我们，1867年的决定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做出的，此前一年是歉收、渡过了一个艰难的冬季、而且霍乱流行——所有这些“加重了不满”。左派在改革联盟中掌握了主动权，能够组

织一次15万人参加的在海德公园举行的游行示威，游行者挥舞着红旗。在接下来的两周内，狄斯雷利接受了一个激进的修正案，将被授予选举权的人数扩大了4倍。但这仍然不是普选权。不仅城市贫民（那些没有“登记在案”和“没有住宅”的人）没有被包括在内，而且最重要的，所有农业工人没有被包括在内，这就确保了保守党对这些选区的控制。狄斯雷利主要是试图避免由“阶级意识更明确的政治活动”带来的威胁。

即使有像示威游行这样的警示，但这仍然是一种大胆的举措，狄斯雷利的支持者确实了解恐惧带来的痛苦。勃里格斯（1959，513-514）提醒我们，德比勋爵（Lord Derby）坦然地承认，他有了“一次伟大的经历”，“在黑暗中迈出了一大步”。盖索尼·哈迪（Gathorne Hardy）是一位帮助狄斯雷利通过改革法案的人，他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未知世界。如果乡绅们能够发挥作用的话，那他们将作为领袖而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把我们交给蛊惑者处置的话，那只能请上帝保佑我们！”但正如勃里格斯同时指出的，回想起来，我们知道，1867年以后实际所发生的证明了托利党冒险行动的合理性：“在政治上没有突然发生的变革，……‘改良时代’并不是突然就结束的，……工人阶级也不是马上就能获得自己的正当权利，……乡绅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间阶级继续得到兴旺发展”。当然，那时有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狄斯雷利在1867年的鲁莽行为”（Goldman, 1986, 95）实在是愚不可及。1869年，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也许是由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克兰伯恩勋爵 [Lord Cranborne] 写作的 [see Southgate, 1977, 160]）抱怨说，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英国保守党的政策“一直是通过同极端反对派的联合来反对温和的反对派。这无疑肯定会有新奇的思想产生”。我们的作者将他的讽刺运用于对1867年改革法案的分析中：“两年前，赋予全家人以选举权是一项保守主义举措、还是一项激进主义举措，这是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一种模糊的观点认为，穷人更容易受富人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那些其职业是同中间阶级打交道和较量的人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必然倾向于支持乡绅；还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较原始的阶级意识对传统情感更敏感些，现在可能不再是这样；模糊地认为应该将拿破仑（那时假设的）在驯服革命方面的成功经验运用于英格兰的政治当中，他是通过实行普选权来制止革命的；——所有这些观点……使保守党成员具有了一种更清晰的信念，在一个比辉格党所主张的更激进的改革法案中，他们已经发现了取得一次有把握的明显胜利的秘密”（Anon., 1869, 284-285）。

[176] 就这种模式如何长期发挥作用的证据见麦肯齐和席尔瓦（McKenzie and Silver, 1968），他们提到，那时从卡尔·马克思到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绝大多数分析家（狄斯雷利是一个明显的例外）都相信，选举权的这种扩大将注定宣判保守党的灭亡。然而，在此后的100年间，保守党统治英国长达3/4世纪之久，正是通过“成功地获得大量工人阶级的支持”使这变成了可能（p.240）。就短期因素而言，见摩尔的分析（1967，54-55）：“1867年法案真正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的确应该这样说的话——不是选举权的扩大、而是选区的划界。……就有选举权的城市而言，在1860年的帕默斯顿法案和1867年的德比-狄斯雷利法案之间几乎并不存在什么差别，正如后者最终被修正的那样。……但在选区划界问题上，两个法案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1867年法案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于下述事实，即下院的大多数自由党议员不仅同意任命选区划界专员。他们还同意指示这些专员扩大有选举权城市的范围，‘将所有房屋都包括在选区的边界之内，出于议会选举的目的，房屋的居住者都应该被包括在其中，当然是在充分考虑到房屋的位置和其他当地情况的条件下。……’很明显，他们认识到，只有当这些专

员将他们的指示放在心上时，只有当一个选区划界法案是基于他们的报告才予以实行，以致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将大大地扩展它的范围以将郊区的大量人口纳入其中时，他们的目的才会达到。对保守主义者而言，他们权力的传统基础在农村，相比许多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更能接受一个实施等级制的社会，这种措施作为一种恢复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对许多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评估了它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认为它简单地就是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这里，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仅仅扩大选举权同实行民主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将一部分支持“托利党的工人”吸纳到选民队伍中来和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外，1867年改革法案还使保守党能够在以前支持自由党的选民中扩展力量。见史密斯（1967，319）：“自相矛盾的是，乍看起来，1867年选举权改革法案是狄斯雷利领导他的党为追求‘托利党式的民主’而发动的一场政变，但从长期看，它为创造必要的条件以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做出了最大贡献。尽管它赋予城市工人以一部分重要的政治权力，并使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对政治家而言变得至关重要的，但它同时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和制造了更大的恐惧，以使大部分中间阶级转而支持保守党，将它视为抵制激进主义的鼓吹者和劳工威胁的唯一可靠的力量”。

[177] 就这些批判的细节见吉拉尔（1952，400），他得出结论：“大部分资产阶级在〔第二帝国〕中不愿意承认除了‘临时进行统治的一班人’之外的任何东西，而是希望把在英格兰取得成功的方法应用于法国”。使幻想破灭的恰恰正是幻想：“帝国和圣西门主义者的财政学一直都是提前贴现未来的钱。1852年的未来就是1868年的现在……尽管有大胆的创新和如此多的公共工程以如此相对适中的成本完成，但那些已经获得住房、铁路和汽船便利的公众却并不感恩，他们对花费如此巨大感到惊讶。拿破仑三世、贝列拉兄弟和御用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常会说起，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因此，公众不再希望去体谅这些信誉令人失望的魔法师们，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江湖骗子。公众不再需要魔法师，而是一种得到他们信任的稳定的通货”。（p.371）

[178] 在鲁热里（Rougerie，1964，127 and 129）著作的列表中包含了对参加公社人员的分类。

[179] “凡尔赛的军队、尤其是他们的军官们残忍之极。……在血腥的最后一周，在巴黎的各街道上有近2万人被杀。当受到穷人的惊吓时，没有比富裕的和体面的阶级所进行的报复更丑陋的”（Plamenarz，1952，154）。类似地，鲁热里（1964，59）也提到“卑鄙的资产阶级恐怖，……1871年大恐怖，正如镇压的残酷程度所表明的。用了10年时间，他们才愿意给予那些被判有罪的起义者以大赦”。

[180] 比灵顿（1980，346）对公社所产生的政治后果给出了稍微不同的评价：“它导致右派在整个欧洲的胜利，同时也为革命左派开辟了新的天地”。也许确实如此，但直到1914年，中庸的自由主义派才能够更轻松地应对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压力。

[181] 见埃尔维特（Elwitt，1975，306-307）：“〔共和党人的激进言论〕在其政治性质上既是笼统的、又是有所限定的，将任何可能对现存制度之根本提出挑战的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内容统统无情地予以排除。……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接受了有关普选权的主张，而且欢迎它、运用

它、将它变为他们的政治利器。……至于法国工人，他们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存在被反复加以否定。当提到和解时，共和党人所意指的是，如果可能的话将工人纳入到现存体制当中，如果必需时，则予以镇压”。当然，第三共和国是在继续第二帝国所实行的政府进行积极干预的政策。正如吉拉尔所说的（1952，293）：“奉行机会主义的共和国最终是在执行〔由拿破仑三世〕在他写于1860年1月5日的信中所做的承诺”。

[182] 这种方案的成功受到达瓦尔的称赞（1934，307）：“一旦一揽子现代立法开始出台，激励革命爆发的因素和革命成功的机会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一方面，警察机构、地方政府的各种现代的和更有效的机构的创设减少了发生社会骚乱的可能性。即使有骚乱发生，也很少有机会发展成为革命。另一方面，反结社法案的取消、工厂法的通过、支持自由贸易的运动、议会改革方案，所有这些都缓解了民众的不满，消除了激励革命发生的诱因。也许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消除——逐渐地但却是有效地——民众的不满，这正在变得为人们所相信，就像它之前不为人们所相信那样”。达瓦尔的分析清楚地说明，这就是为什么“由治安管理所暗示的政府权力的扩大是宪章派最猛烈攻击的一个问题”（Evans，1983，257）。

[183] 教育和秩序之间的联系由约翰逊（1970，119）予以了很好的说明：“维多利亚早期对穷人教育的过多关注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对权力、对能力、对保持（或继续保持）控制的关注。这种关注表现为一种颇具抱负的尝试，即试图通过教育手段来决定工人阶级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由运动场的围墙所环绕，并在可信赖教师的管理下，学校将培养新一代的工人——有礼貌、开朗、勤劳、忠诚、爱国、虔诚”。

[184] 但在世纪中期这种自由主义被神圣化的背景下，同样真实的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成功的那一刻，正式接手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人在普鲁士是一位极端反动的容克贵族、在法国是一位冒牌皇帝、在英国是贵族地主的继承人”（p.3）。泽尔丁（1958，46）在其中并没有看到意外或自相矛盾之处：“对一个要从事改造国家工作的人而言，这个国家又是新旧势力直接对立无法调和的，〔拿破仑〕复杂的个性也许是必需的。……在许多方面，狄斯雷利就是在英格兰与之相似的人物，追求相似的事业，也像他那样怪异和神秘。在两个国家，他们的追随者同样产生分裂，但他们都必须应对来自从最激进的激进主义到最保守的托利主义各种极端力量的威胁”。

[185] 盖什（1963，163-164）详尽地说明了这种转型的长期影响：保守党在1841~1846年产生内部争执的实质问题正是就什么是原则问题和什么是“灵活的政治统治”问题展开的。皮尔能够公正地宣称，他从未制定过任何在本质上不是保守主义的政策。鼓励贸易和工业发展、用繁荣来削弱阶级和派系林立的宪章运动，以及通过适时的妥协来控制〔反谷物法〕联盟，在他看来，这些才是保留贵族领导权和传统权力结构的最可靠的手段。

[186] 盖什（1977，27）如此概述伯克的观点：“变革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正像所有有机体那样；时间本身是最大的变革者。……但社会结构的连续性必须得到尊重。变革应当以最小的渐进性发生；经由演进、而不是革命；通过适应、而不是破坏。……对教条主义的改革者而言，他在追求抽象正义的过程中就好像能够忽略人性和现存社会一样，他所拥有仅仅是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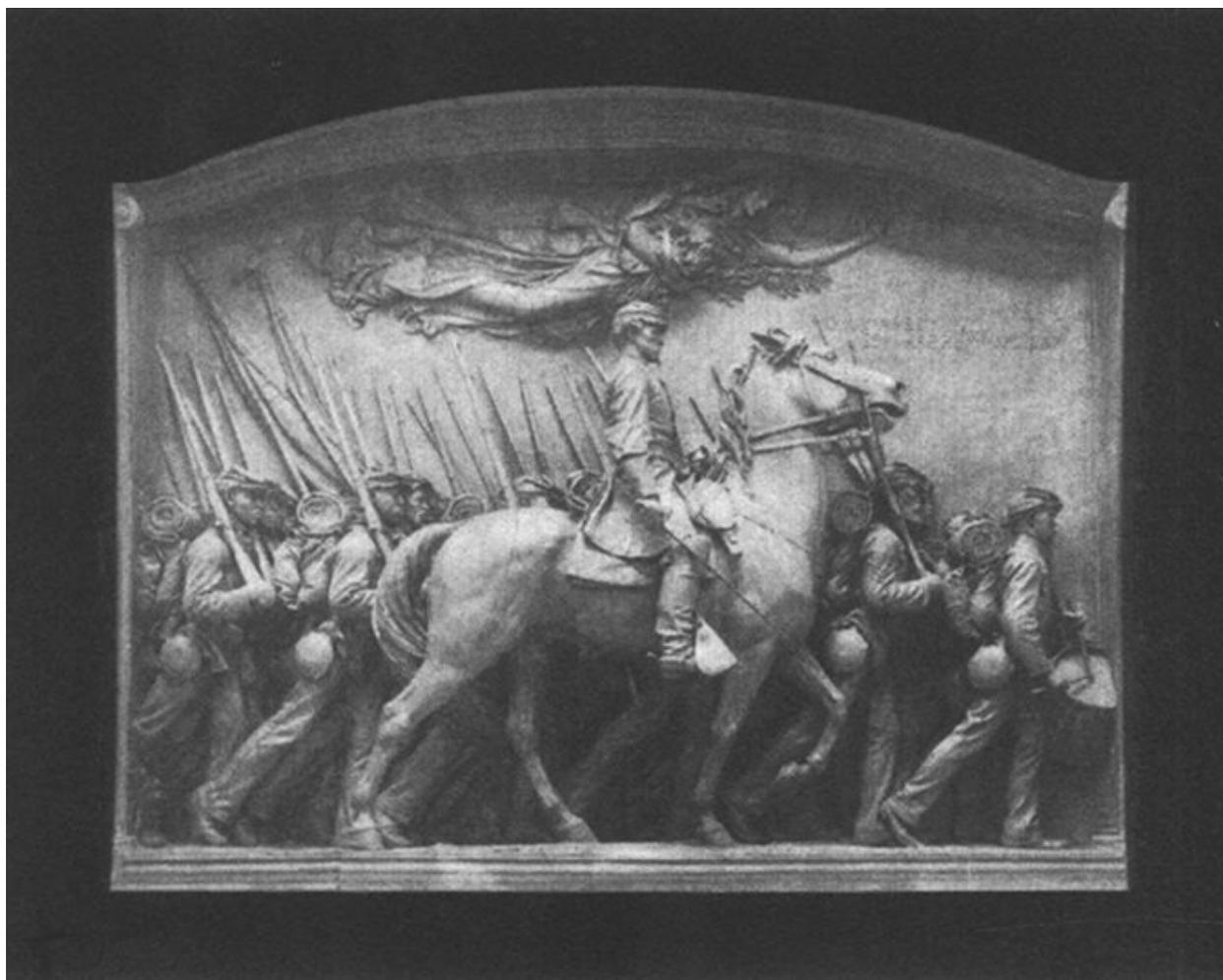
一切的态度”。

[187] 王权作为象征的作用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一个意外结果，这引发人们的兴趣，正如希尔（1929，100）提到的：“在同[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立法所表现出的中央集权倾向做斗争的过程中，托利党人和激进派同样是在另一种类型的政府干预的方向上发展的。狄斯雷利通过提高王权来抑制议会和内阁咄咄逼人的权力。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呼吁通情达理的年轻女王，利用她的王权来限制他称之为地方长官实施酷刑的权力，当奥斯特勒被旧时代所淹没时，他的呼声仍然能够听到。此时正是金斯利（Kingsley）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提高了女王的权力”。

[188] 20世纪80年代，当自威灵顿以来首次地，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能够宣布作为保守党政治信条和实践的改良主义为非法时，有一种尝试试图重新界定“狄斯雷利的遗产”，它表明狄斯雷利事实上一直受皮尔所制造的党内分裂的困扰。见科尔曼（1988，157，161-162）：“[狄斯雷利的]主要追求一直是维护他所在政党的利益和实现他的保守主义目标。……狄斯雷利内阁最显著的特征是连续性和传统主义、而不是对此的任何背离。……这种结论将令浪漫主义者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希望在狄斯雷利的领导能力中发现一种深刻的创造性。……[他]阻止[党]转向明显更进步的立场，也阻止它转向更僵化顽固的立场”。科尔曼同时还否定1866~1867年议会改革的激进主义意义（see pp.131-138）。

[189] 找出其中所隐含的意义的必要性能够在下述事实中看到，即正如现实主义被用作象征“实实在在的、领土上的国家地位”一样，较早时期的浪漫主义也被用作如此象征。见阿居隆（Agulhon，1973，13-14）：“[1848年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推动知识分子精英在人民中看到一种新的和有生命力的力量。正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在上个世纪末首次提出这样的论题，他们是中欧和东欧民族主义运动的激励者和领导者，在反对贵族的斗争和传播他们的世界主义文化中，他们称颂了民间传说、流行歌曲和故事，以及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群众所表现出的民族美德。当然，法国并没有面临同样的情势，在那里民族问题被视为已经予以了解决。但对正在进行反抗的人民和民族——从希腊到爱尔兰、从波兰到意大利，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抱有希望，由此那种支撑欧洲各国进行斗争的模糊的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确实影响到了他们的法国朋友”。

第四章 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



第四章插图“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和54团”

奥古斯都·圣高登（**Allguste Saint Gaudens**）

（感谢耶鲁大学的贝内克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耶鲁馆藏美国文献）

奥古斯都·圣高登（Auguste Saint-Gaudens），“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和54团”。在美国内战期间，北方有些不情愿地组织起了一个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志愿团，由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主张废除奴隶制家庭的白人军官指挥。54团由于在攻击华格纳堡（Fort Wagner）的战役中表现英勇而名声大噪。在大约30年之后，圣高登被任命在波士顿建造一座青铜制纪念碑。正如人们能够看到的，这座纪念碑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白人指挥官的。直到1982年，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64名非洲裔美国士兵的名字才被刻在纪念碑的基座上。

国家主权原则是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所在，这是我们几乎不需要去坚决主张的东西。该原则是通过将绝对主权从国王转移到国家手中而创设和付诸实践的，它是一个值得反复重申的真理。而且也值得对它做出检验。

——基思·迈克尔·巴克（Keith Michabel Baker），《主权》

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对19世纪的影响要比对当代人的影响大得多。

——厄内斯特·拉布鲁斯（1949B，29）

正像所有已知的历史上存在过的体系一样，不平等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同以前各种体系不同的和资本主义体系所特有的是，平等被宣布为是它的发展目标（确实也被宣布为是它的成就），即市场上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被赋予平等权利的全部个体在社会方面的基本平等。现代世界的最大政治问题——也是最大的文化问题——在于如何将下述两者相协调，一方面是在理论上支持平等，另一方面是在实际生活机会，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满足方面的持续的和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

长期以来——从16到18世纪的三个世纪中，这个问题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很少被提出。不平等仍然被视为自然的，甚至是由上帝规定的。然而，一旦18世纪晚期的革命高潮将有关平等的话语转变为一种文化的标志，一旦对权威的挑战在各地正变得不足为奇，那么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就不可能再予以忽视。遏制这种文化要求影响的扩大、由此驯服现存的“各种危险阶级”，就成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优先考虑的问题。自由主义国家的建构就是用来限制这种要求的主要组织。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精心阐释，依次又是建构自由主义国家的一种必要机制。

法国大革命和公民权概念

法国大革命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举措是坚持称呼人时不再使用头衔，甚至不再使用先生和夫人。所有人都被称为公民。这种举措意在表明要否定传统的等级制，在正在建构的新社会中逐渐形成社会平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头衔被恢复；但“公民”概念（如果不是仅仅作为称呼的话）保留了下来。它并不仅仅是保留下来，而且获得了大的发展。它为自由主义国家奠定了话语基石。它在各处都被法律所承认，以致到1918年，人们发现有必要创制一个“无公民权的”人的概念以描述一个相对小的人群，他们在其生活的地方尚不能要求获得公民权。

公民概念在创设时就是要具有包容性。它坚持一个国家的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一些人（君主、贵族）都有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权利——参与在政治领域的集体决策过程。从中可以推断出，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获得由国家分配的社会利益。到20世纪后半期，保障公民拥有权利成为构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最低标准，几乎每个国家目前都宣称如此。

但公民权的包容性的另一面是排斥性。根据定义，那些未被纳入国家公民这一新范畴的人将被纳入另一个新概念——“外国人”。一个国家的外国人也许是某个其他国家的公民、而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尽管如此，对任何特定的国家而言，即使在其边界内排斥外国人获得公民权，但这并不会限制在理论上被纳入公民范畴的人的数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超过90%的居民都是公民——合法公民，即公民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由法律予以界定的问题。

这恰恰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太多的人是公民。结果可能确实是危险的。^[1]19世纪的历史（确实也是20世纪的历史）是，一些人（那些拥有特权和优势地位的人）试图继续将公民权界

定在狭小的范围内，而所有其他人则试图通过使法律认可一个范围更大的公民权界定来作为回应。1789年之后几个世纪思想界的理论建构就是围绕这种斗争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也是围绕这种斗争形成的。

在实践中将公民权界定在狭小范围内、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又坚持扩大公民权原则的方法，是创制两个公民范畴。在攻陷巴士底狱仅仅6天之后，埃贝·西耶斯（Abbé Siéyès）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在1789年7月20~21日向国民大会的制宪会议宣读的报告中，西耶斯建议在消极的和积极的权利、消极的和积极的公民之间做出区分。他指出，自然的和公民的权利是“社会要形成就需要坚持和发展的”权利。这些是消极权利。此外还存在一些政治权利，“需要借助这些权利社会才能够形成”。这些是积极权利。从这种区分中，西耶斯得出如下结论：

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都应该享有消极的公民权利；所有人都有权保护他们的人身、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自由，等等。但在形成公共权力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积极公民。妇女（至少就目前而言）、儿童、外国人和那些对维系公共权力没有贡献的人，不应该被允许去积极地影响公共生活。所有人都有权享有社会利益，但只有那些对公共权力有贡献的人才是伟大的社会事业的真正股东。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积极的公民、联合体的真正成员。（Siéyès, 1789, 193-194）

没有感觉任何不妥，西耶斯接着补充道，政治权利的平等是一个基本原则（但假定只适用于积极公民），没有这种原则，特权就会被恢复。1789年10月29日，国民大会将这种理论观念转化为法令，即将积极公民界定为那些以直接税的形式缴纳三天工资的人，这是最低标准。财产成为享有积极公民权的前提条件。正如罗桑瓦隆（1985, 95）所指出的，“如果理性是健全的，就应该知道人们不可能发明规律。他们必须

发现它们。……能力概念在这种框架中发现了其逻辑所在”。^[2]

试图限制公民权范围的做法可以采取许多种形式，它们都必然包括创造某些对立，以此证明划分消极和积极公民的合理性。二元划分（等级、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教育等方面的）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社会现实。在19世纪所不同的是，人们试图确立一种理论框架，由此能够证明这种划分转化为法律范畴的合理性，以便使这些范畴能够被用于限制公开宣称的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权利的实现程度。

理由很简单。当不平等成为常态时，也就不需要做任何进一步的划分，即相比在那些不同等级之间——一般而言，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划分而言。但当平等成为官方规定时，了解谁事实上被包括在拥有平等权利——即谁是“积极”公民——的“全体人员”之内也就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平等越被宣布为一种道德原则，被用于阻止它实现的障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也就越多。在知识界和法律界，公民概念迫使人们做出一长串具体的和僵化的二元划分，它们由此构成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文化支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男人和妇女、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养家糊口的人和家庭主妇、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黑人和白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有教养的人和愚昧的人、有技术的人和没有技术的人、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科学家和外行、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异性恋和同性恋、正常人和变态、体格健全的人和残疾人。当然，最初的划分是文明人和野蛮人，所有这些其他的划分也都是在暗示这种划分。

在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试图排斥其他集团享有公民权利，而居于被统治地位的集团则试图被包括在享有公民权利的范围之内。斗争既发生在政治领域、也发生在思想领域。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必然居于上述每一种对立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方，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将这种划分在理论上阐发为自然的。

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方面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确保从个人角度看，他们能够在每种划分中都居于统治地位。面对统治者，那些居于被统治地位的集团开始进行组织，试图谴责、摧毁或重新界定这些划分，以使他们自身能被纳入积极公民的范畴、纳入文明人的范畴。

存在多元二分范畴的事实造成了一种困难。人们有可能在一些范畴中居于统治地位，而在其他范畴居于被统治地位。如果希望被视为享有完全公民权利的集团的组成部分，那么，那些并不能够在所有二分范畴中都取得统治地位的人就需要做出政治决策。很容易理解，他们通常会努力赋予那些他们居于统治地位的二分范畴以优先地位。结果可能是特权集团成员数量的某种扩大，但对那些仍然被排斥在外的人而言，却仅仅是增加了他们获得公民权的困难。正是这种就哪些二分范畴具有优先地位展开的斗争，构成了社会运动内部就其进行斗争的策略和希望结成联盟的性质展开持续争论的根源。

当然，公民权概念意味着获得解放，它确实将我们所有人都从公认的等级制度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这种等级制宣称等级是神圣的或自然的。但这种解放仅仅是部分地从无权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且新获得的权利会使继续（以及新的）被排斥在其他权利之外变得更明显和更难以忍受。作为结果，普遍权利在实践中就会最终变为一种语言上的口惠，即“说一套、做一套”的自相矛盾。创建一种由有德行的平等个体组成的共和国，被证明要求将那些由此被认为没有德行的人排除在享受权利之外。^[3]

自由主义将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它鼓吹德行能够通过教育获得，由此能够有序地逐渐扩大权利的范围，即有序地将消极公民提升到积极公民的地位——一种将野蛮人转化为文明人的路径。既然这种提升的法律程序被认为是不可逆的，所以必须仔细地、谨慎地、首先是渐进地掌控它的推进。另一方面，目标在于维护那些权利未得到全面

承认的人的利益的社会运动，一直在争论应该怎样做以尽可能快地结束这种未被承认的状态。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运动应该是反现存体制的，即他们应该努力摧毁现存的历史体制，正是后者使对平等的扭曲成为可能。还有一些人在本质上是融入现存体制者，他们相信，运动的作用仅仅在于加速已经存在的自由主义方案的实施，即有序地获得权利的方案。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历史开始于法国大革命本身。西耶斯在前面提到的报告中指出：“全部公共权力都无例外地是普遍民意的反映；全都来自于人民——即民族。这两个词应该被视为同义词”（1789，195）。这种观念的推行是简单和快速的。过去所有那些被标示为王室的，现在被重新标示为民族的。^[4]“对法国的革命者而言，民族并不是一种既定的东西；它必须是要加以创造的东西”（Cruz Seoane, 1968, 64）。民族概念迅速地向其他国家传播。^[5]同样也是法国的革命者首次使用民族概念来为民族自决权的概念辩护。当国民大会于1791年9月13日投票表决是否吞并阿维尼翁（Avignon）和罗讷河以东领土（Comtat Venaissin）时，它正是以“人民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名义这样做的（Godechot, 1965, 189）。

不过，一旦提出国家主权是在主权从王室转到民族手中那一刻形成的，诺拉（1988，893）切中要害地问道，“但是什么样的民族？……是什么样的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期间，普通人的热情也许赋予了民族概念以暂时的超平等主义的基调，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启蒙传统，它在“民族”与“人民”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民族概念被用于指那些受教育的阶层；人民是“尚未堕落、但易于受不良影响的，因此需要适合于他们状况的道德、技术（和身体）方面的教育，为他们过一种从事劳动的生活提供最好的准备”（Woolf, 1989, 106）。语言游戏在继续，但重点已经从祖国转到民族、再转到人民身上。^[6]

并没有用太长的时间，民族一词就已经变得过于温和，人民一词也变得如此流行，以致一些专制统治者甚至都在试图利用它。

到19世纪30年代，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革命者几乎经常会提到人民（le peuple、das Volk、il popolo、narod、or lud——这里作者分别用了不同国家用来指代“人民”的词语——译者注），将它视为人类历史中一种能够不断再生的生命力。在1830年革命之后执掌权力的新君主路易-菲利普和利奥波德一世试图使“人民”承认他们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国王、而不是法国或比利时的国王。甚至反动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镇压了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三年之后，也宣称他的权力是基于“民族性”（以及威权和正统性），他所使用的词语是民族（narodnost），也有“民族精神”的意思，仿造自波兰语的民族（narodowość）一词。（Billington, 1980, 160）

但它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有关谁构成真正公民的重要争论的组成部分。这场争论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争论。就公民权问题，国民大会和随后替代它的机构国民公会（the Convention）面临三个具体问题：妇女、黑人和工人。法国大革命是成就与缺陷共存，但在上述每个问题上，他们就排斥某一部分人享有权利方面所做的决策给这些人带来了痛苦。

就妇女而言，整件事情一开始就很糟。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公告明确指出，拥有领主封地的妇女必须选择男性代理人在选举团（the Electoral College）中代表她们投票——贵族代表世俗妇女、教士代表修女（Landes, 1988, 232, n.5）。尽管如此，但某些妇女群体（即信教的妇女群体、女商人协会）确实提交了《陈情表》。她们的一些抱怨预示了稍后出现的被排斥在公民权之外的群体的联合问题。来自塞纳河下游（Pays de Caux）的一位夫人写道：“已经涉及了黑人奴隶的解放问

题：……难道〔民族〕能够对我们保持缄默吗？”^[7]

众所周知，妇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各种群众示威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所谓的1789年10月的日子里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当时巴黎集市上的妇女（同国民卫队的男性成员一道）向凡尔赛宫进军，迫使国王夫妇回到首都居住。但这次示威活动涉及的是穷人的权利问题，而不是妇女自身的权利问题。^[8]在这些骚乱发生的两个月之后，即1789年12月22日，国民大会正式将妇女排斥在选举权之外。诚然，孔多塞（Condorcet）确实在1790年写作了一个著名的小册子为妇女吁请民权，但他并没有说服那些掌权的人。1791年宪法继续这种排斥，1793年7月24日国民大会选举中这一点被重申，指明妇女被排斥在全部政治权利之外，它实际上是指那些至少在旧制度下女贵族享有的权利。^[9]

在某些方面妇女的权利得到了提高，这是事实所在。结婚和离婚变成民事诉讼。长子继承制被废除，非婚生子女和他们的母亲获得经济支持的权利被法律承认。颁布法律承认妇女在与婚姻有关文件的签署上作为连署人的权利，尽管这个问题继续引发争议（Abray, 1975, 55）。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群情激昂的氛围下，妇女开始组织起来。她们开始在民间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她们站在国民公会的大门外，试图控制哪些人能进入议会。她们聚集在走廊上，大声呼喊她们的观点（Landes, 1988, 139-140）。

1793年5月5日，支持共和革命妇女协会（the Society of Republican-Revolutionary Women）成立。她们大力推进满足妇女对面包的要求。她们所使用的话语让人联想到女权运动所独有的话语。她们同激进派结盟，对左翼的雅各宾派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力量。^[10]但首先她们是妇女、而且是有组织的妇女，她们坚持她们的声音要被听到。当巴黎一个区的妇女进行请愿要求获得从军权利时，法布尔·戴格朗丁（Fabre d'Eglantine）在国民公会激动地争吵道：“继共和派在她们集会期间戴红

帽子之后，接着是子弹袋，再接着是枪”（cited in Abray 1975, 56）。公共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Safety）指派一个由安德烈·阿玛尔（André Amar）领导的委员会，考察妇女是否应该行使政治权利，是否应该允许她们加入政治社团。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委员会认为，妇女并不拥有行使政治权利所要求的“道德和身体素质”，进一步而言，正是贵族想要妇女拥有这些权利，目的是“为了使妇女同男性产生矛盾”（cited in George, 1976~1877, 434）。

就参与政治社团而言，阿玛尔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不应该允许妇女成为其成员的原因：

如果我们认为，对男性的政治教育尚处于开始阶段，……那么对所受道德教育几乎为零的妇女而言，认为她们在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开明程度较低，这难道不是非常合理的吗？因此，如果让她们进入政府，她们在民间社会的状态将会对那些更容易受错误和诱惑影响的人发挥不良作用。让我们强调，妇女由于她们的机体结构而倾向于过分激动，而这在公共事务中是致命的；由于情感上的狂热所产生的错误和混乱，将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Cited in Landes, 1988, 144）

正如班克斯（Banks, 1981, 28）所提到的，倡导“男性权利”并不必然导致也倡导“妇女权利”，因为“很有可能将妇女界定为拥有不同于男性的特征”。当然，将妇女排斥在权利之外通常是作为一种暂时规定提出的。一份由朗奇耐（Lanjuinais）在1793年4月提供的较早期报告主张将妇女排斥在政治权利之外，“因为需要花时间来克服妇女在教育方面的缺陷”。正如瑟拉蒂（Cerati, 1966, 170）尖刻地评论的那样：“[这些缺陷]肯定是非常顽固的，因为花了整整一个半世纪才将它们克服”。

为什么正是妇女的各种社团组织成为惩治嫌疑人法（the Law of

Suspects) ^[11]的第一批受害者，这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乔治（1976~1977，412）认为，“雅各宾派的神经过于紧张，他们对鼓吹参与民主制的人失去了耐心”，妇女很容易成为第一个攻击的对象。莱特尔（Lytle，1955，25）具体指出，“革命妇女对罗伯斯庇尔而言已经变成一种威胁，[因为后者]不能满足巴黎人对面包的要求”。赫夫顿（1971，102）将后一问题同无套裤汉（sans-culottes）的态度联系在一起：

索梅特（Chaumette）指出，当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10月解散妇女社团时，无套裤汉有权利期望他的妻子管理家务，而他去参加政治集会。……其他人对无套裤汉的自豪感到犹豫，后者在民间社会中、或作为收取佣金的职业革命者发现了他们的重要性所在。……当她的丈夫仍然在高谈阔论时，她在一些地区已经加入到领取食品的队伍，她这样做时，她的忠诚可能已经受到怀疑。

阿普怀特和列维（1984，76）将取缔妇女社团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对群众革命的胜利”。^[12]当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去。《妇女和公民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Citizen*）^[13]的作者奥兰普·德古兰（Olympe de Gouges）在1793年11月3日被送上断头台。不管对雅各宾派的态度做何解释，但在雅各宾派垮台之后，情况并没有改变。1795年，在牧月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之后，国民公会将妇女从它的大厅中全部驱逐出去，甚至作为旁听者也不行，除非有一位携带公民证的男性陪伴（Abrey，1975，58）。1796年，教育议事会（the Council of Five Hundred）将妇女排斥在高级教职之外。1804年拿破仑法典甚至倒退回旧的制度。以前，至少女贵族被允许处理财产和法律事务。但现在，以法国大革命更平等的方式，所有妇女都一视同仁——所有妇女都不再享有任何权利（Levy et al.，1979，310）。

就法国大革命对妇女地位的影响而言，我认为好坏参半的。人们能够强调它的负面性。阿布劳伊（1975，62）指出，它“是证明[大革命]在本质上具有社会保守性的明显证据”。克尼比勒（Knibiehler，1976，824）也坚持认为，它标志着“妇女地位的相对下降”。乔治（1976~1977，415）认为，这种下降“很明显是相比天主教、封建时代的过去更不如，因为它目前是由资产阶级的理性之神和自然规律予以界定、掩饰和证明其合理性的”。瑟拉蒂（1966，13）断言，妇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更大权利的要求遭到“那些[在其他方面]热情的[男性]平等支持者的冷遇”。不过，兰德斯（Landes，1988，148）认为，部分问题在于女权主义者自身“在对待女性公众人物上持有一种矛盾心理”。

但与此同时，人们也能够更多地从正面来评价这种经历。兰德斯同时还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以一种以前未受到重视的方式……性别变成一种具有社会适用性的范畴”。凯利（Kelly，1982，79）将1789年之后女权主义者面临的有利情势同那些参与了著名的女性问题论战（*querelle des femmes*）的人所面临的情势做了比较，后者是由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和其他一些人在15世纪发起的。她认为，较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缺乏“通过一种社会运动来改变社会进程的视野”，但在1789年之后，她们“受到一种进步观念和有意识地促进社会变革观念的激励”。摩西（Moses，1984，14）坚持认为，在1789年之前，女权运动只是一个对上层阶级而言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导致“女权运动的兴起，而且它的规模更大、追随者的范围更广”。负面评价强调实际取得的变化和证明那个时代的思想具有合理性。正面评价则强调女权运动的发展和它所做的动员。这种观点的对立仍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文化—政治对立的表现：统治者进行理论建构来论证现行秩序的合理性；被统治者进行组织谋求改变现行秩序。

黑人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当然，在大革命时期，法国的黑人

很少。但在殖民地、尤其是在圣多明各有大量黑人。我以前曾讲述过那里连续爆发起义，创建了美洲第一个黑人国家，接着是战争，最后是海地共和国在外交上被孤立的历史（Wallerstein, 1989, *passim*, esp.240-244, 253-256）。这里，我希望强调发生在巴黎的争论。

在大革命之前，圣多明各有着非常明确的社会分层体制。有一个数量较少的白人阶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种植园主。有一个自由的黑白混血阶层。但最大的群体是黑人，他们几乎全都是奴隶。这是一种按等级排列的社会分层。但这些阶层都不拥有政治权利。因此，法国大革命受到所有这三个阶层的热情欢迎，因为他们都希望它能给他们带来政治权利。不过，白人并不希望给予自由的混血阶层以同他们平等的社会地位，白人和自由的混血阶层也都不想给予奴隶以公民权。再次地，有关所有人都平等的规范提出了谁将被包括在享有权利的人群范围之内的问题。正如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 1981, 342）如此尖锐地指出的：

正如如果不在不同程度上压迫各个阶级，王权的统治就不可能压迫黑人一样，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不将殖民社会是否应存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那么从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就不可能答应殖民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对自由的要求。更具体而言，从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认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能只是给予白人种植园主以政治或经济权利，同时却将自由的混血阶层置于严苛的统治之下；同样也不可能承认自由的有色阶层是同他们平等的公民，同时却将黑人置于监禁状态。简言之，要解放殖民社会中的一个阶级，那就必须解放所有阶级，就必须解放圣多明各。而这似乎违背了法国的利益。

并不是说在国民大会和国民公会中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在就奴隶

问题展开的争论中，阿贝·格雷戈瓦（Abbé Grégoire）宣称：“仍然存在一种贵族制，即对有色人种的贵族制”（cited in Césaire, 1981, 187）。但正如塞泽尔所暗示的，反殖民主义已经超越了博爱、甚至超越了反种族主义，格雷戈瓦和罗伯斯庇尔都不准备走那么远。只有马拉（Marat）准备如此。马拉提到这一问题同积极公民原则的联系：“当我们不将那些无力交纳一埃居直接税的人视为公民时，我们怎么可能将拥有黑色皮肤的人视为自由人呢？”（cited in Césaire, 1981, 189-190）。

1793年解放奴隶并不是主张平等主义的法国革命者推动的结果。它是由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政权强迫法国承认的，卢维杜尔是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领袖，但这种解放仅仅是由国民公会以一个法令（1794年2月4日第2262号法令）的形式批准的，在杜桑·卢维杜尔被囚禁后，拿破仑在1802年废除了这项法令（直到1848年才重新予以颁布）。

不过，更具启示性的是此前有关是否给予自由的混血阶层以权利的争论。它由黑人之友（the Amis des Noirs）予以推动，但遭到马西亚克俱乐部（the Club Massiac）的反对，后者代表白人种植园主的利益，国民大会以“全体通过”的形式达成一种奇特的妥协。在通过了给予自由的有色人群以选举权的法令之后，杜邦·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代表白人提出了一个“宣言”，解释他们赞同法令通过的理由，即选举权仅仅是给予那些“符合其父母是自由人资格的混血群体”，而不是给予、也不可能给予“那些不自由的人、或被解放的人，因为这些人是一个外国’的成员”（cited in Blackburn, 1988, 187-188）。^[14]在圣多明各，贫穷白人反对对享有权利做任何财产限定，因为那样将会给予一些自由的黑白混血儿以选举权，而他们却不会得到。他们将白人种植园主的看法应用于所有自由的黑白混血人群，认为他们是“那种不应拥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外国人”（Blackburn, 1988, 177）。根据定义，甚至自由的黑白混血人群也不构成“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公民。

至于法国工人，我们已经提到，通过确立以财产为基础的对政治权利的界定，积极公民概念导致将他们排除在外，本意也是要将他们排除在外。不过，在群情激昂的革命氛围中，工人开始试图通过组织来改善他们的境遇。国民大会废除了行会。雇主和工人对此做了相反的解释。对前者而言，目前唯一支配生产的规律是供需规律。而工人则认为，它意味着他们不再可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自由地创建组织（Soreau, 1931, 295）。

价格的快速上涨加上纸币（assignat）迅速贬值点燃了工人的激情，在1791年春、即在国王逃走和颁布宪法之前达到高潮。罢工和骚乱似乎已经超出巴黎市政府的控制能力，导致后者呼吁国民大会采取行动。在维持不平等的选举权标准的同时，通过颁布“反结社”法令，国民大会试图利用平等的意识形态来消除工人进行组织活动的可能性。1791年6月14日颁布的、臭名昭著的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剥夺了工人进行联合的权利，7月20日，这项禁令被扩展到手工业行会（compagnonnages），后者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互助协会（Wallerstein, 1989, 107and n.248）。

斯蒂文·卡普兰（1979, 74-75）注意到，在使用新的平等语言的表象背后，革命者是如何继续采取王党政权的做法的：

从此以后，政权将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镇压以前政权以集体和共同体公共福利的名义所镇压的对象。……注意到革命者为了保护自由而利用的对劳工界进行社会控制的两种主要手段是令人震惊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和反结社法，前者由一种食品供应体系予以支撑，但在食品获得上施加了限制，后者是阻止工人进行组织的基础所在，是旧制度下的家长制统治。

正是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中，让·饶勒斯（Jean Jaurès, 1968, 912）谴责了这一“恐怖法令”，即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力量均衡的假象

下，该法令实际上只影响到工人，对他们施加重压长达75年之久。他援引马克思的话，后者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政变”，并认为罗伯斯庇尔用他的沉默来暗中支持该法令的颁布，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15]

法国大革命诉诸人性来论证其合理性，人性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它同时也诉诸德行，而这只是每个人的潜在特征（并不必然是实际拥有的）。从这些概念中，它推演出人权的存在。既然可能存在多样的“人性”和多样能力，那么这种话语就具有某种“模糊性”（Landes, 1981, 123）。斯科特（1981, 2）非常好地总结了“明显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同他们所体现的普遍性的关系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穷人、黑白混血儿、黑人或妇女如何能够体现他们作为人的权利？一般的回答是：很难”。

尽管如此，但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影响在于，“革命行动可能获得一种它希望获得的状况或危及那种状况，因而它马上就表现出相比反叛行动而言的本质不同，它在道德上类似于在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由伟大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有时尚未完全实现）变化”（Sonenscher, 1989, vi）。当然，既然革命行动既是有希望的、也是危险的，所以它正在产生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为未来一个半世纪的政治提供了基础”（Roberts, 1978, 73）。

具有伟大社会凝聚力的公民概念由此导致多样的截然对立的二元范畴的形成，导致政治生活中的二元对立，即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对立、主张维护秩序的政党和主张发动运动的政党之间的对立，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倾其全力来消弭这种对立。结果是公共生活剧烈的曲折变化，信仰进步的巨大力量在强力推动其前进，但在世界体系的现实生活中持续存在的和不断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却阻碍着它的前进。

在19世纪，所谓的中间阶级开始统治西方世界，欧洲开始统治世界。当取得统治地位时，问题就不再是如何获得这种地位、而是如何维

持这种地位。民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和世界中的欧洲都在试图维持他们的优势地位，他们打着人性和德行的幌子来论证他们拥有这种特权的合理性。他们称之为文明，这个概念是他们所做努力的关键因素。在西方世界，它被转化为教育，教育成为控制群众的一种方式。^[16]在全球层面，开始于拿破仑（但随后为所有其他的欧洲强国所接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明概念……变成一种厚颜无耻的文化帝国主义”（Woolf, 1989, 119）。

法国大革命在政治方面最后终止于1793/1799/1815年，此后它变成一种政治象征和文化记忆。不过，它给整个世界体系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主权现在是属于人民、属于民族。政治争论和政治变革是人民主权的正常结果。世界体系中的特权阶层必须同一种对他们而言是有害的遗产达成妥协。他们需要考察是否能将它融入现行体制内，以遏制它激进地破坏现存等级制度的潜能。

这种遏制过程采取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被称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它宣称自己是一种哲学建构，但实际上主要是政治策略。第二种是将各种概念范畴阐发为一种新的话语，用它来描述世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最初而且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工作，他们希望由此来框定争论的范围和证明限制公民权范围的合理性。最终，这种进行创造性概念建构的工作转化为和制度化为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第三种是确立一种组织系统，最初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工作，它们将被用作推动有益变革的力量，但同时也作为限制不利变革的机制。

1815~1848年是这样一个时期，其中各种力量在这种已经发生转型的政治领域中似乎都在发生不确定的变动。反革命者试图让时光倒转，消除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文化震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发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被统治（和被压迫）阶层一直在探寻适当而有效的组织方式。新兴的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尚不确定它应该如何、或如何能够

建构一种适当的政治基础以将动荡的秩序置于控制范围之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将精力集中于建构自由主义国家，首先而且最重要地是在最强大的国家中建构，即英国和法国。

1848年世界革命

正是1848年世界革命和它的直接后果要求终止上述这些具有不确定性的探索和尝试，以稳定世界体系和恢复某种程度的政治平衡。这场革命再次地开始于法国，在那里七月王朝已经失去了它的公信力和合法性。1848年2月25日爆发的起义获得了广泛支持，它得到了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得到了拿破仑主义者的支持、甚至得到了教会和正统王朝拥护者的支持，“他们都将路易-菲利普的垮台看作是对1830年的复仇”（Pierrard, 1984, 145）。它立即在欧洲其他国家引起反响，这肯定包括比利时，而且包括所有那些民族主义正在变得具有号召力的国家：德国、意大利、匈牙利。这就是为什么1848年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民族国家之春”。一个将不会爆发革命的国家是英格兰，这种状况立即在1848年2月26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中予以了解释，文章将它归因于下述事实，即：“人民感到在现行状况下，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已经有了发言权，而且能够有效地运用这种发言权”。^[17]

《泰晤士报》有关英格兰的论述也许是正确的，但法国爆发的革命则表现出一种更具社会性的、更多工人阶级参与的激进倾向。4个月后，即6月25日，爆发了第二次所谓的社会革命。^[18]在第一次革命中获得的广泛支持几乎是立即就消失了。到7月2日，《工业导报》（*Le Moniteur Industriel*）惊呼：“家庭、财产、民族都受到彻底的打击；19世纪的文明正受到这些新野蛮人打击的威胁”（cited in Scott, 1988, 117）。我们知道这第二次革命是如何结束的，它推翻了现行的社会制度，最终是路易·拿破仑的上台和第二帝国的建立。

但这已经道出了其中的秘密。社会主义运动过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尾巴、一个有活力的尾巴”（cited in Droz, 1972a, 16），^[19]但现在明显要将自身同中庸的自由主义分割开来。^[20]对阿勒

维而言（1947，204），“宪章运动已经取得胜利，但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英格兰”。^[21]诚然，这种新生的运动“在1848年之后遭受了一次非常大的挫折”（Cole，1953，1：157）。那个时代的一位经济学家路易·雷博（Louis Reybaud）是研究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他甚至在1854年宣称：“社会主义已死。人们只是在葬礼上宣读悼词时才会提及社会主义”（cited in Droz，1972a，16）。这并不是最不成熟的观点。

甚至在那时就提出民族主义已死确实是非常鲁莽的。洛维特（1982，92）将1848年革命视为地方性的和地区性的意大利民主运动转化为一种“民族性的民主运动网络”，但这种运动接着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产生困难。^[22]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运动面临着一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对科苏特（Kossuth）而言，“民族主义是同自由主义相一致的”（Fejtö，1948b，133），但对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些居住在匈牙利边界地区的人而言，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贵族的运动，是匈牙利贵族和在维也纳的统治者之间的家庭纠纷”（Fejtö，1948b，153）。^[23]尽管如此，但1848年确实“开启了欧洲的一波革命浪潮”（Djordjević and Fisher-Galati，1981，106），它将扩展到整个巴尔干地区。

1848年革命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次世界革命。这并不是说在世界体系的各个地区都爆发了革命，并非如此；也不是说革命者都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总体而言，革命在政治上都遭到失败；而是说，革命是围绕排斥问题展开的，即被排斥在享受公民权益的范围之外。正是在1848年，我们首次清楚地看到，存在两种反对现存体制的运动，两种不同的应对这种排斥的方式：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取得更多的权利（社会革命）和将一个种族集团同另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分割开来（民族革命）。

正是在1848年，长期发展战略问题被首次明确地提出。从1815年到1848年，意识形态的斗争被视为是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之间、在法国大革命精神（如果不是其全部精髓的话）的继承者和那些试图恢复秩序的人（这种秩序源于一种看待世界的较古老方式）之间展开的。在这场斗争中，“民主派”和“激进派”并没有太多发挥作用的空间。令保守主义者感到厌恶，令自由主义者感到尴尬，他们至多是在发挥一种促进作用，促使自由主义者更加勇敢（正如已经提到的，这种作用并不是非常成功）。1848年革命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这些民主派/激进派——有时称他们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但有时也称自己为“民族主义革命者”——将不仅仅是发挥促进作用，他们将以有别于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的独特方式组织群众采取行动。这正是宪章运动所预示的，也就是当阿勒维提到宪章运动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法国取得成功时，他所意指的。

不仅对保守主义者而言、而且对中庸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都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前景。他们各自都做出了反应。镇压激进派成为那时的常态，不仅在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诸地方政权如此，而且在法国和英格兰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是柯尔所提到的“大挫折”。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目前将经历困难的10到15年。女权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也是如此。

这场镇压是有效的，但却不是持久的，因为所有这些运动在10或20年后都重新兴起，而且是以更强大的形式。持久的是19世纪三种经典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倡导者们从1848年经验中所汲取的教训。自由主义者汲取了两方面的教训。一方面的教训在于，他们在许多方面相比他们所认为的更接近保守主义者，同激进力量的联合通常被证明将威胁到他们的利益。而另一方面的教训在于，他们决定必须对下述区分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做出更好的阐释，即他们希望继续在公民之间做出的区分，也即西耶斯对积极和消极公民所做的区分。

保守主义者汲取了不同的教训。梅特涅（确实也是德·梅斯特勒、博纳尔等人）的策略已经不再起作用。他们对只有英国没有爆发起义印象深刻，尽管它是激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他们注意到，英国是唯一一个其保守主义者更多采取一种中间路线的国家，他们准备去做一些妥协，这样至少可以将中间阶级的力量吸纳进政治决策领域。他们注意到这种政策是成功的，正如《泰晤士报》的社论所指出的。保守主义者目前已准备好采取某种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的策略，尽管带有更多保守主义色彩，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开明的保守主义”。

激进派（以前的民主派）得出一种更加不同的结论。那就是仅仅是自发行动是不够的。^[24]如果想要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话，那么，系统的和长期的组织就是先决条件。这将导致“运动”——一种带有暂时性内涵的概念——沿着官僚化组织的路径演化，有成员和官员、有资金和报纸、有纲领、最终还要参与议会活动。

西维尔（Sewell, 1985, 82）指出，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人们对革命的观念，从“某种针对政权发动的现象……转变为人民有意识地和有预谋地针对政权发动的现象”。1848年导致各种运动认识到，除非预先以组织形式联合在一起，否则“人民”不可能做任何对政权而言是重要的事情。^[25]这必然导致他们集中关注政权问题、即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它同时也最终和必然导致对下述论断提出质疑，即这些运动有可能继续保持它们真正的反现存体制的特性、而不简单地是中庸的自由主义的一种类型，尽管也存在某种在一种程度上缺乏耐心的运动。

19世纪其余时间、的确也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历史是：中庸的自由主义派进行理论建构活动，反现存体制运动（既包括社会主义类型的、也包括民族解放类型的）进行组织活动，开明的保守主义者进行立法活动。他们将达成一些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似乎也将同一些反现存体制运动达成和解。不过，正是自由主义者对公民权所做的理论建构

使这种和解成为可能。正是这段历史，我们现在将予以涉及。

劳工与社会运动

在自由主义国家——西欧和北美，以及后来的中欧，城市工人阶级最强烈地要求获得公民权。正是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在那时及其后得到了最多的关注，他们最经常地号召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从这部分历史讲起是恰当的。我将暂时地根据在作为思想的和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分来分别讲述，这种区分是由拉布鲁斯（1949b, 5）提出的：从1815~1851年是“思想影响很大、但实际运动相对弱小”的时期；1851~1871年是“运动兴起、但思想影响下降”的时期；1871年到19世纪末是“思想影响很大、实际运动也同样强大”的时期。

我们以前提到劳工运动开始于19世纪30和40年代。^[26]琼斯（1983, 59）很好地解释了他们各自为战的倾向：“在一种史无前例的情势下，工人阶级各种力量的政治活动必须凝聚在一起，他们分别受到启蒙运动、社会主义、反对国教和传统道德经济观念的影响”。^[27]但他们都共同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革命传统中更为激进的组成部分的继承人。^[28]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1830年在法国爆发了革命，但英格兰没有。取而代之，英格兰在1832年颁布了改革法案。这主要是因为英格兰并没有像查理十世那样的极端反动统治。^[29]但不管是否爆发“革命”，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开始在法国和英格兰扎下根来，不是在政党之内、而是在政党之外。^[30]为了能够获得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开辟出一定空间来满足各个团体的要求，而以前在法国大革命（和它所主张的一般公民）中所使用的革命言论对此是不予承认的。他们开始提及“合作”和“联合”——不是单一行业、而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全部“工人”。^[31]甚至在1830年之前，工人就已经认识到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他们主

张的逻辑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对行会的废除。生产的控制者不再是师傅，而是变成了雇主。尽管工人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他们也失去了要求师傅给予他们以慈父般关怀的可能性。作为补偿，他们接受了“某种对旧的制度予以修正的社团形式”，创立了工人行会，它的仪式和旧的组织形式是要“维系一种行业道德共同体的持续存在，对工场中劳动条件的变化保持警惕”（Sewell, 1979, 55）。正是这些熟练工人成为早期劳工运动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科卡（1986, 314-315）指出，他们主要来源于“城市手工业，具有很大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凝聚力，通常沿袭了行会传统，……具有相对强的讨价还价能力”。^[32]

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以匿名号召的方式发起，他们开始利用罢工作为武器，即使罢工是非法的。^[33]与此同时，工人们开始关注其他工人的“国籍”问题，即他们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者的非“公民”身份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里昂的缫丝工人使雇佣“外来工人”问题成为他们在1831年进行抗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手工业中存在的某些类似行会的组织在1830年之后逐渐消失，这尤其是因为“向巴黎移民的不断增加”（Judt, 1986, 57）。结果是“工人形成对民族的新的认同”（Derainne, 1993, 33）。随之产生了一场有关工人联合的基础的争论。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是一位强烈支持工人联合的人（也是一位重要的女权运动者），她在1843年就这一论题写作的小册子（1983, 53）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在工人运动史中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即通过支持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将整合成为“人民”：

如果我不断地援引爱尔兰的例子〔由奥康奈尔领导的天主教协会〕，那是因为爱尔兰仍然是唯一认识到下述事实的国家，即如果人民想结束奴隶制的话，那他们必须首先创建一个巨大的、团结的和牢固的联盟。要赋予联盟以力量，以争取它要求的权利和使这种对权利的要求引起公众关注，它首先必须

占据拥有充分权利的地位以表达它的意见。

也许特里斯坦之所以能够这样谈论爱尔兰是因为她是法国人。英格兰工人对这个论题明显持保留态度。他们唯一关注的中心是英格兰。正是宪章运动构成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英格兰历史的中心所在。众所周知，1838年通过的宪章提出了六点要求，不过它们一直都是英格兰激进派的要求：每年召开议会、普选权、选区平等、无记名投票、议员的豁免权，以及取消对选举资格的财产要求。就这是否至多仅仅是一揽子要求实施议会民主的问题而言，多莱昂（1947，127）回答说，这只是一种“表象”，宪章具有某种“明显的社会主义特性”，对宪章派而言，“真正的民主暗示了一场社会革命”。这是否是认识宪章运动的正确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一方是像埃文斯（1983，255）等人，他们将宪章运动视为“工人在19世纪组织的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主张它是“工人阶级接受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34]另一方是像盖什（1979，209）等人，他们相反地将宪章运动仅仅视为“在一个新的名称下延续旧的激进改革运动”。琼斯（1983，168，171）提出了一种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观点，他指出：“如果宪章运动是一场工人运动的话，那么，它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出于选择，而是不得不这样”。^[35]

尽管如此，但如我们所知，宪章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正如罗伊尔（Royle，1986，57-58）所论证的，也许是因为宪章派并没有“提供一种连贯的或有效的战略”，最终在“幼稚得无可救药”的道德教育者和“倡导使用武力、并沉迷于他们自身言论的人”之间产生了分裂。尽管如此，但正如罗伊尔（1986，93）自己所指出的，“宪章派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宪章运动，该运动给人们带来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宪章运动是使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存在的大的社会对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变得明确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立由于1848年的世界革命而变得明朗。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是永恒存在的。这两个概念都是社会的产物，无疑是对某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接着是被具体化。像所有这类概念一样，正是统治阶层、而不是被统治阶层开始这种具体化过程的，这与随后产生的信念正相反。我们已经讨论过基佐在系统阐发阶级概念上所起的作用，他甚至在七月王朝之前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他的阶级概念借鉴自圣西门。当然，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中所发挥的政治作用的合理性。但他这样做还是为了将资产阶级（他感到迟早会将贵族吸纳进来）置于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位置上，以将两者区分开来（Botrel and Le Bouil, 1973, 143）。如果他是在为资产阶级谋求公民权的话，那他特别反对将无产阶级包括在享受公民权的范围之内。公民权是专为积极公民——即拥有财产的公民——保留的。^[36]

伴随着“资产阶级”一词缓慢地演变为那种更为模糊的和更具包容性的“中间阶级”或“那个阶级”范畴，^[37]“无产阶级”一词也最终演变为那种更为模糊和更具包容性的“工人阶级”或“那个阶级”范畴。许多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非常抵制使用明确的阶级语言，因为使用这种语言将被等同于持一种特定的政治立场，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此，对许多人而言，使用它就代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政治主张。但倒退回使用更模糊的语言并不能消除这种对立。如果有任何不同的话，那就是通过使一些个体更容易跨越这种分界而强化了这种对立，与此同时又在牢固地维系着这种分界。对那些跨越这种分界的人而言，重要的是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分界，它也许保证了其他人无法去跨越这种分界，由此损害那些新近获得完全公民权的人的地位，他们试图跨越这种分界。^[38]

既然最终无产阶级概念——甚至在它有所淡化的工人阶级形式上——意在将一些人排斥在外，所以被如此称谓的人通常会努力重新界定该术语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例如，在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零售商店雇员的工作条件是非常差的，但他们拒绝别人称他们为工人（obers）或无产者（proletaris），坚持认为他们是蓝领

（treballadors）。这是因为相比工人，后一个词汇在19世纪较少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联系在一起（Lladonosa and Ferr, 1977, 284）。在德国，命名的政治学是非常清楚的。从19世纪30年代以后，工人（Arbeiter）一词的内涵从最初指代非熟练劳动者扩大将熟练工人包括在内，并被后者在政治激进时期所接受。不过，自主经营的工匠抵制这种分类，工人运动也就拒绝将他们包括在内（Kocka, 1986, 326-327）。^[39]

当然，这是一个双方都能够玩的游戏。斯科特（1988, 123-124）讲述了巴黎商会（the Paris Chamber of Commerce）在1851年提交的一份报告的有趣情况，它试图将社会结构重新分类，以使1848年社会革命失去合法性。其目标是通过将所有自主经营的人；将所有在制造产品时命令他所雇用的人，即使这些人是家庭成员并不用支付报酬；将所有为“资产阶级客户”提供产品的人（包括洗衣女工）；将所有为一个以上的制造商提供产品的人，都包括在企业家的范畴内以减少工人的数量。这样做，报告就消除了这些人对工人或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他们是1848年2月和6月革命的参与者。“写作于1848年之后不久，它意在驳斥革命提出的最激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重新确立他们理想的经济组织[等级制的与和谐的]，后者已经遭遇严重挑战、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挑战”。因此，当激进派在进行组织之时，自由派在进行理论建构。

从1848年革命失败到19世纪60年代末这一时期是工人运动发展非常困难的时期。那些掌握政权的人的最初反应是镇压任何似乎能让人回想起那些革命时期的东西。宪章运动和1848年革命的失败依次地又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一种“幻灭”感。琼斯（1983, 71）论证道，“工业资本主义的持久存在现在似乎是有保障的，除了那些最绝望的接活在家做的工人外，所有人都被迫‘适应’这一事实”。^[40]不过，仔细考察似乎表明“适应”也许是错误的表述。也许更像是在不露声色地等待更好时机的来

临。我认为，多莱昂（1947，1：225）的提法更恰当，他将1848～1862年这一时期称为“正在酝酿更大规模斗争的时期”。

许多学者强调，在19世纪40年代的模式和19世纪60年代的模式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就好像一旦镇压被稍微放松，工人的策略就会被简单地再次采用似的。“群众的激进主义不仅在1848年之后被保存下来，而且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Biagini and Reed, 1991, 5）。^[41]在各地，我们继续看到手工工匠在发挥主要作用，同非熟练的工厂工人形成鲜明对比。辛顿（1983，2）提到维多利亚中期的英格兰：“用那个时代社会评论的语言来表述，‘熟练的’和‘有组织的’通常被用作同义词”。^[42]

当然，人们应该重视科卡（1984，112）有关“不要夸大在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的告诫。^[43]然而，西维尔（1974，88-89）指出，我们也在这一时期的手工业者阶层中发现了某种“激进化倾向”，尤其是在那些“移民”中。^[44]辛顿（1983，5）的评论对弄清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是有益的。他区分出两类熟练工人：那些在手工业中的熟练工人，他们的“工会”是该行业非正式组织自然发展的产物；在其他部门的熟练工人，在这些部门“熟练身份更多的是工会组织的产物”、而不是先于它而存在的。第一类熟练工人有时是非常激进的，因为相比工厂工人而言，他们都“遭受了相对而言较大的损失”（Moss, 1975b, 7），但他们最终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后者正在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支柱。

确实正像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样，在整个这段时间，“害怕群众闹事，担心秩序受到破坏，一直是统治阶级行为隐含的动机”（Moorhouse, 1973, 346）。到底哪一种策略是最优的？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统治阶级、而且也适用于工人阶级。从统治阶级的视角看，镇压有其方便之处，但同时也会积蓄矛盾，最终导致反抗发生。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拿破仑三世和英国保守党都感到有必要实施宽松的统

治，使工人有可能进行组织，同时稍微扩大公民权的实际范围。在一篇写于1860年给英国全国社会科学协会大会（the Congres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报告中，作者赞成“工会作为一种自治尝试的合理性”，他宣称：“在没有正式组织的团体的地方，罢工的领袖有可能被证明更少理性和更多暴力，这是相比有正式组织的团体的地方而言的”（cited in Pelling, 1976, 51）。这个报告似乎具有一点基本的社会科学智慧，它标志着在公民权界定的问题上试图应对挑战的开始，这种挑战目前是由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发起的。一百年之后，另一位社会科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下层阶级在英格兰进行抗议的目标似乎是要确立工人的公民权”（Bendix, 1964, 67）。本迪克斯将这视为英格兰同欧洲大陆国家的区别所在。他也许是错上加错。欧洲大陆国家劳工运动的目标实际上同英格兰劳工运动的目标是相同的。而且，甚至在英格兰，说这是劳工运动的唯一目标也是不正确的。不过，这确实是他们将争取到的全部所在。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在他们的理论建构上和开明的保守派在他们的实践中都努力说服劳工接受这正是其所需要的或应该需要的全部所在。

这一时期是所谓的第一国际（the First International）、即国际工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 Association, IWMA）创立的阶段。这是一个规模很小、力量也很薄弱的组织，它的成员组织的力量也同样是弱小的，所追求的目标也完全不是国际性的。^[45]但从工人运动发展战略的演化上看，它是卡尔·马克思和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发生重大争论的阶段（Forman, 1998, chap.1）。这场争论涉及许多方面。但争论的核心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将国家视为死敌，不可能同它达成任何妥协；而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提出了一种两阶段社会改造理论：设法掌握国家权力，然后运用它来改造世界。当然，在如何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但首先他们必须驳倒颇具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情势在19世纪的最后1/3时期发生了变化。用拉布鲁斯的话来表述，社会主义变成了一种势力强大的运动和影响强大的思想。因此阶级冲突似乎有大大“激进化”的倾向，这开始于巴黎公社，继之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兴起，至少在世界体系的所有工业化程度较高、较富裕的部分均是如此。“在1880年，[社会主义政党]仅仅是存在而已。……到1906年它们的存在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Hobsbawm, 1987, 116-117）。^[46]但现在看来，在1890年之后，这些运动都普遍存在非激进化的倾向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47]这种倾向在1914年达到其顶点，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投票支持战争（布尔什维克党是明显的例外）。^[48]

大多数历史著述就这一论题提供给我们的画面是一幅战斗精神发生变化的曲线，开始是由于群众动员而上升，接着是由于改良主义的明智（或背叛，如果人们倾向于使用那种话语的话）而下降。就大致轮廓看这无疑是真的，尽管曲线的上升部分也许从未像一些人相信的那样明显。正如米歇尔·佩罗（Michèle Perrot, 1967, 702）就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中所谓的修正主义所说的，“为了有‘修正’，必须首先有要修正的东西”。^[49]

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激进政治运动的高潮的根源何在，这种高潮最终（到1914年）似乎不再能够威胁到现代世界体系的任何内在的社会结构。将这种高潮解释为有关公民权问题的争执似乎是合理的，即有关谁将被包括在享受特权的范围之内，由此获得拥有这些权利的（积极）公民应该获得的利益而产生的争执。当然，这既是一个追求实际利益的问题，也是一个获得认同和身份的问题。在1815~1848年期间，居主导地位的对实际公民权界定的狭隘性（由于下述前提而具有合理性，即工人未受过良好教育、也不拥有财产，因此没有理由去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激起了一场‘世界革命’，这吓坏了中间阶层（因为它威胁要走得更远），导致了镇压发生。当镇压给统治阶级带来的益处被消耗殆尽时，^[50]就有了更多对群众进行动员的政治空间。一方面，中庸的

自由主义派极力主张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则推进他们的自我“教育”。

这依次又导致一些重要组织的创设，它们试图推动至少将男性城市工人阶级包括在公民权的范围之内。这些组织必须大声呼吁它们的要求，以得到统治阶级和那些希望进行政治动员的人的认真对待。因此，我们听到一种“激进”言论。这种言论是有效的，统治阶级通过各种让步来作为回应：扩大选举权、扩大经济受益范围（包括初期阶段的福利国家制度）、通过排斥（源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将他们包括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当然，这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在其主要框架内维持体系的存在，以及工人言论的“非激进化”。人们不必把错误判断（错误认识）、处于领导地位的官僚阶层的自私（叛卖，寡头统治的铁律）、或报酬优厚的工人（工人贵族）的特殊利益等观念强加给我们，以解释一个回顾起来似乎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性和或多或少具有必然性的过程。它以非常相似的形式在整个世界发生（世界的工业化程度较高、较富裕的部分在1870~1914年这段时期发生），尽管就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所直接面临的条件而言，各个国家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最终被证明并不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看，相比1848年之前时期的“激进主义”，1870年以后时期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在精神上更少激进性。正如琼斯（1983，237-238）所指出的：

在1790年到1850年之间，社会运动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于，它们的国家观念都是明确而具体的。……它被视为一部有血有肉的机器，进行统治、剥削和发生腐败。……人民的胜利将用一种平均派或雅各宾派式的人民民主取而代之。

不过，具体纲领却是“共和主义、世俗主义、群众的自我教育、合作、土地改革和国际主义”，所有这些主题到目前为止都已经成为中庸

的自由主义派纲领的组成部分，至少是它更进步一翼纲领的组成部分。19世纪晚期的运动已经将其重心“从权力转向福利”，由此它们也就转向了一种“防御性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不管1870年以后的运动有多么激进，但相比1848年之前的运动，它们的火气要小得多。享受公民权回报带来的诱惑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见证了工人阶级第一次真正组织起政治运动（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和工会。因此，这是一个就战略问题展开重大争论的时期。所有那些要创建组织的人都会关注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尤其是他们应该同现行的政府和议会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场争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在所谓的革命者和所谓的改良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并不是阵线分明的。在一个层面上，这些争论是真正的争论，它们占用了组织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通常被证明并不是重要的争论，这是相比那时和以后人们通常所假设的而言的。

重要的是注意到最强大的和最有影响的运动主要是在那些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发生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较小程度上是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发生的。如果将俄国加进这个名单的话，那么在所有这些国家发生的全部争论随后将构成世界社会/劳工运动历史记忆的中心所在，成为在这些国家的几乎每个地方所发生的运动的话语参照。当人们回顾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争论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们不可思议地是如此相像，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势都具有重要的和经常被人们提及的历史特殊性，尽管通常用于描述它们的修辞性用语是如此的不同。

让我们首先记住，1870年之后的时期是一个男性选举权得到广泛扩大的时期。最著名的是1867年在英国由狄斯雷利和在德国由俾斯麦所推行的扩大选举权的改革。它们能够同此前在第二帝国和美国实行的改革

相比肩，而且很快将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发生相应的改革。当然，这些国家的选举权仍然说不上已经具有普遍性。^[51]本迪克斯（1964，63）将这些扩大选举权的改革称赞为将下层阶级的抗议疏导到“充分参与现存的政治共同体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在其中这种参与将成为可能”。他也许是对的。^[52]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种称赞的分寸。

在英国——它是1870年以前劳工运动的两个主要发生地之一，根据大多数观察家的看法，19世纪80年代末期所谓的新工联主义（the New Unionism）代表了一种新出现的（或重新出现的）斗争精神。当然，正如霍布斯鲍姆（1984c，152-153）所指出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英国看到一种“新的”工联主义，是因为不像在欧洲大陆，在那里，“我们发现一种已经确立的‘旧工联主义’……在进行斗争、转型和扩展力量”，而新工联主义将成为工党创建的基础。^[53]新工会意图在技术工人或那些有着稳定而连续工资收入的人之外扩展力量。它们将变成同时吸纳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非熟练工人的“一般”工会，这些工人不拥有稀缺资源，并缺乏组织性，这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使用技术工人工会所使用的斗争策略。但一般工会作为一种斗争工具也是他们希望利用的（Hobsbawm，1949，123-125）。

新工联主义强调发展战略和组织形式，同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将那些没有组织的工人组织在一起，由此创造了一种更强大的工会运动。尽管新工联主义通常被视为英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但事实上，在欧洲各国都有类似的发展（Hobsbawm，1984d，19；Pollard，1984，58）。在开始阶段，新工联主义导致工会在1889~1891年间有了惊人的发展，但工会发展的这种突然出现的高潮被证明是非常短暂的。从1891年到1914年，工会的数量确实在继续增加，但却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在增加（Hinton，1983，45-53，64）。^[54]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短暂的高潮时期”？海曼（Hyman，1984，331）认为，“各种制度上的改革〔消除和〕明显减少了发生骚乱的潜在可能性”。霍布斯鲍

姆（1964，189）认为，具有阶级斗争精神的一般工会之所以能够安然渡过低潮期，是因为它们为雇主“所容忍和接受”，这又是因为政府实施了“一种更为谨慎的安抚性政策”。类似地，霍维尔（Howell，1983，111）也认为，由于在将那些工作具有稀缺价值的工人（煤气行业的工人、金属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时，新工联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他们认识到需要放弃“创建大规模一般工会的希望”，并由此推断出“审慎是生存的条件”的结论。伯吉斯（Burgess，1975，309）强调了工会官僚阶层的发展，他们拥有一种不同于普通工人的“生活方式”，使得工会“不愿意”变得过于激进，因为同雇主发生纠纷也许会“危及”工会的资金来源、工会官员的地位，以及工会成员所能享受到的社会利益。

结果是英国的新工联主义确实促成了一些变化：它有助于使工会脱离自由党而转向工党。^[55]它将一些以前没有组织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而且在这些新的组织中，组织者并不必同现存的工会组织进行竞争（Hobsbawm，1984b，166-167）。它有助于“缩小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差别”（Hobsbawm，1984b，166-167）。但长期看，将证明旧工联主义和新工联主义之间“在主张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Duffy，1961，319）。^[56]

在这一时期，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这是一个引发过多争论、甚至某种对立的问题。相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在英国工会是新工党的主要组织基础，因此在党内发挥了更大的由制度赋予的作用。不过，英国的新工联主义也许是最后的一个实例，其中工人运动斗争精神的中心着力点是在工会本身的行动上。一般而言，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各政党都在试图控制工会，而不是相反。

第二国际积极地寻求使这种关系明确化。在1881年，瑞士工会就已经“愿意”使用男人和女人的隐喻来将政党和工会的关系表述为一种从属

关系（Haupt, 1981, 31）。第一国际经常就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的相对重要性展开争论，而第二国际则进一步在它们之间做出组织上的区分。^[57]在1891年，第二国际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号召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在党的组织机构内部设立一个工会事务处（Hansen, 1977, 202）。当各政党都试图更严密地控制工会时，后者予以了抵制，“工会应该具有自主权的思想逐渐占据优势”（Haupt, 1981, 43）。在工会和政党之间一直存在的“成问题”的关系导致两者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和“摩擦”（Hobsbawm, 1984b, 171），前者是要“利用现存的社会制度来渐进地实现它们的目标”，而后者则是在“规划着社会转型”（Hinton, 1983, viii）。

从政治方面看，工会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上。从此以后，有关斗争推进到什么程度和采取何种形式的战略性争论在党内居于中心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社会/劳工运动中的“模范政党”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the German SPD）。^[58]它是第二国际中最具影响力的政党，是唯一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的政党，也是产生最激烈理论争论的政党。在1877年，当社会民主党能够有6名代表被选进德国国会时，这导致愈加严厉的镇压（1878年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法）。它同时也导致无政府主义主张影响力的下降（Ragionieri, 1961, 57-62），^[59]这样在1891年召开的埃尔福特代表大会（the Erfurt Congress）上，正式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官方理论。^[60]

从此以后，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主要争论变成伯恩施坦（Bernstein）和考茨基（Kautsky）之间的大争论。伯恩施坦鼓吹一种“改良主义”，鼓吹政党的非党派化，他论证：利用普选权，政党能够通过投票实现它的目标。考茨基代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主张走“革命”道路的。

这种理论上争论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吉尔里（1976, 306）认

为，它涉及的“仅仅是一个小的知识分子群体”，工会会员之所以“通常都投党的正统派的票”，是因为这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所为，他们“不喜欢理论家，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甚至后来成为俄国革命支持者的李卜克内西也论证（为了反对第二国际的一位荷兰代表，后者在1893年反对参与选举）：“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涉及实际政治运动的问题”，既没有“革命”策略、也没有“改良主义”策略（cited in Longuet, 1913, 29）。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潮（Schorske, 1955, 28; Stern and Sauerzapf, 1954, xxxiv, xliii），但像1905年革命一样，它并不具有持久性。

人们能够将这段历史进程的特征总结为“理论上激进和实践中温和”（Roth, 1963, 163）。造成这种状况的基础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的和考茨基的）。^[61]罗斯（1963, 167）主张，由于劳工运动无力“打破其孤立性”，所以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某种社会民主党亚文化的意识形态”。诺兰（1986, 389）以一种更友好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强调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种不利于革命的情势下提供了革命的前景，在一个没有内在革命传统的国家提出了一种革命理论”。马赛厄斯（Mathias, 1971, 1: 178）论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接受对马克思主义做宿命论解释的前提”。

关键性的转变并不是在术语上的，而是在于下述事实，即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者开始要求保护性立法。在1871年以后，工人阶级“同民族-国家确立了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vanderLinden, 1988, 333）。诺兰（1986, 386）称这种转变为从“政治运动转向社会政策”。在德国，他们正在对“俾斯麦所设定的议题”做出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必然导致“工人阶级普遍地融入国家的现行体制中”（Mathias, 1971, 1: 181）。^[62]

就德国的情况而言，罗斯（1963，8，315）称这种融入为“消极的融入”，他做了如下界定：“一种充满敌意的群众运动在能够合法存在的同时，却又被阻止接近权力的中心”。^[63]不管怎样，德国皇帝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I）在1890年废除了反社会主义法，并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推动制定国际劳工立法（Ragionieri, 1961, 159）。由于做出各种小的“改良主义妥协”，他获得了工人皇帝的绰号，尽管他偶尔也“借助于一些镇压性立法”继续在镇压和安抚之间摇摆（Hall, 1974, 365）。罗斯倾向于认为德国的这种状况非常不同于英国和美国的情况。我同意在德国所使用的言辞更为激烈，但最终的结果有那么大的不同吗？

如果我们从两个“模范”国家的例子——英国和德国——转向其他社会主义/劳工运动获得发展的重要国家，我们发现尽管存在一些差别，但并没有重大的不同。在这些国家，一般都是由于国家采取镇压措施，组织活动遇到一些困难，这些组织所使用的言辞通常都是激进的，但他们的实践从整体上看却都是温和的，都是某种“消极地融入”民族共同体的模式。在法国，巴黎公社之后的严厉镇压在1875年之后有所缓和，政府承认实施一种“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政策”是明智之举（Schttler, 1985, 58）。

在法国，盖德派（Guesdists）于1882年创建了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 Francais, POF），并称自身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它是一种有着很大局限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仍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Willard, 1965, 30）。尤其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似乎指的是反对以阶级利益调和为基础的“调和主义”，而主张“在追求行业社会主义中采取革命战略”（Moss, 1976, 157）。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法国工人党似乎最偏爱的是圣西门传统的工业主义同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相结合。他们是“一种美好未来的宣传者”（Stuart, 1992, 126）。^[64]不像稍后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the Section Francaise de

l'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 SFIO), 法国工人党绝非是一个群众性政党 (Cottureau, 1986, 143)。斯图尔特 (1992, 54) 对法国工人党所下的结论是: 它的发展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降生, 前途无望的青年时期, 兴旺而且充满希望的壮年时期, 继之是处于明显危机的晚年时期和 [在1905年] 最终的转型”。可以肯定, 从寓意上看, 尽管发展程度不同, 但这难道不是在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吗?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正是亚历山大·米勒兰 (Alexandre Millerand) 在1896年首次新创了“改良主义”一词 (Procacci, 1972, 164), 他也是第一个进入联合政府的社会主义者, 该政府是在“共和主义者的集中”支持下由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 (Pierre Waldeck-Rousseau) 领导的 (Willard, 1965, 422)。[65] 随后于1906~1908年爆发的大罢工 (以及于1919~1920年爆发的第二次大罢工) 的失败“标志着 [上] 一个梦想的破灭: 即通过工人罢工发动革命” (Perrot, 1974, 1: 71)。

总之, 所有政党似乎都相继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 即融入 (即使是消极地) 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海伍德 (Heywood, 1990, chap.1) 称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为“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荷兰党和工会“明显是在向着一种改良主义的方向发展” (Hansen, 1977, 199)。意大利党完全追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Andreucci, 1982, 221), 它在1901~1902年的大发展是“在改良主义的旗号下”实现的 (Procacci, 1972, 163)。[66]

就美国 (和加拿大) 的情况而言, 李普塞特 (Lipset, 1983, 14) 坚持认为它不同于其他国家, 因为没有经历封建的历史“有助于减少明显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纲领和主张”, 但人们只需稍微改变一下说法就能看到美国同其他国家的相似性。赫伯格 (Herberg, cited in Dubofsky, 1974, 275) 揭示了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 (IWW, “强调无产

阶级采取直接行动”）和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手工业工会的关系同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关系之间的相似程度。拉斯莱特（Laslett, 1974, 115-116）就美国社会主义党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对一本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著作做出回应，方纳（Foner, 1984, 74）指出，这个问题实际应该这样来提，即“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什么没有在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美国（和加拿大）同西欧国家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民主党在美国能够一直保持作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主要工具的能力（Shefter, 1966, 270; Kealey, 1980, 273），这种状况也许可以更多地由各种城市组织在吸纳外籍工人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来加以解释。^[67]

归根到底，对所有社会/劳工运动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们融入民族国家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比利时工人党（the Parti Ouvrier Belge）的统一是在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的框架下实现的（Sztejnberg, 1963, 214）。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开始以满足物质需求为中心，这只能“借助于国家、或更确切地说借助于共和国”来予以满足（Schttler, 1985, 68）。美国的工会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变成全国性的，以“要求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即自下而上地对资本主义强加一些规定”（Montgomery, 1980, 90; see also Andrews, 1918, 2: 43-44）。在讨论法国工会联合会（the French trade-union federation, the CGT）于1906年通过的《亚眠宪章》（*the Charte d'Amiens*）时，布宏（Bron, 1970, 2: 132）描述了工会和社会主义党各自开展的“具有互补性的斗争”。工会强调工人在生产方面的作用；社会主义党强调工人争取“公民权的方面”。

工人将他们自身视为工人阶级。上层阶级倾向于将他们视为危险阶级。就工人而言，斗争目标的很大部分是以如何能够去掉“危险”的标签和获得公民的称号为中心的。在1871年之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谴责为“国家的敌人”和“没有祖国的人”（Groh, 1966, 17）。他们需要纠

正这种说法。谢瓦利尔（Chevalier, 1958, 461）很好地揭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它归根到底是一种政治问题：

将各种工人阶级同危险阶级区别开来.....由于下述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即这些范畴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在它们之间不确定的地带能够发现许多中间群体。就这些群体而言，很难说它们是属于这个还是那个范畴的。当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政治或生物条件而将人们结合在一起，并能够随着年度，季度，或革命、危机和流行病等的变化而使人们从一个范畴转到另一个范畴时，如何能够最终将它们区别开来呢？

被广泛使用的一种主要手段是根据种族或民族范畴来对工人做出区分。在国内是种族主义，在国外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它们能够起到将危险的标签转嫁给一部分工人的作用。在这种做法是有说服力的程度上，一些工人能够变成积极公民，而其他工人仍然是消极公民、或甚至不是公民。再次地，将一些人纳入公民范畴是通过将其他人排斥在外实现的。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在国内实施的排斥是最明显的。在19世纪，这是一个不断有移民移入的地区，其中移民往往在城市地区定居，开始是作为相对非熟练劳动力存在的，而本地出生的美国人构成技术工人阶层的主要成分，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原来的位置由移民（和第二代移民）工人填补。在本地出生的技术工人和主要由移民构成的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距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来，即一些反对移民的政党（反对移民、反对天主教）的出现，他们“强调他们作为技术工人的成员资格和他们所信奉的新教”（Bridges, 1986, 176）。在内战期间，被征召入伍的本地劳工通常被外籍劳工所代替，“种族对立增加了雇主与雇员之间自然产生的斗争的激烈程度”（Ely, 1890, 62）。在内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加入第一国际的兴趣

被新成立的全国行业总工会（the National Trades' Union）管理移民的企图所激发，它试图通过同第一国际（IWMA，又称国际工人协会）达成某种协定来实施对移民的管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英国工会同样对此感兴趣。由于工人的各种组织的鼓动，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在他的那部著名的美国工会运动史中，塞利格·珀尔曼（Selig Perlman, 1922, 62）竟然提出，这种鼓动“无疑是美国劳工史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没有它，整个国家也许就会被蒙古劳工所淹没，劳工运动也许就是用种族冲突代替阶级冲突”。

社会主义党大量地从移民工人中吸纳成员。一方面，这毋庸置疑地是因为19世纪晚期的美国工人阶级“主要是由在国外出生的或有着外国父母的男女组成的”，这在那时就已经被注意到（Ely, 1890, 286）。但这也能解释这个政党衰落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移民被严格地加以限制，以及第三代移民极力否认他们的移民身份。

当然，雇主也利用了这种种族对立，他们通常利用“黑人、东方人和妇女”作为破坏罢工的人（Shefter, 1986, 228）。下述说法肯定是真实的，即说英语的白人工人在种族等级中居于最高地位，这“在整个[美国]历史中都被暗中承认”（Soffer, 1960, 151），而引发社会骚乱的罪魁祸首经常被归咎于移民。但这并不足以解释种族/民族差别为什么一直是美国工人关注的中心所在。我认为，康芒斯（1935, 2: xvii）似乎很好地把握住了问题的本质，即美国工会同“美国主义”的关系：

[生产无烟煤的矿产公司同矿工达成了“可以自由雇佣非工会工人”的协议]。作为结果，由于工会的力量薄弱，这些公司在1912年发现，他们的煤矿受到主张无产阶级采取直接行动的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入侵。他们完全改变了对待工会的态度。人们发现，不管表面多么激进，美国的劳工运动是防止

革命发生的第一道防波堤，是立宪政府最强有力的保卫者。的确，使移民“美国化”的重担就落在了工会的肩上，50多年以来，它们一直在承担这样的工作。当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认识到需要将成分复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以应对世界大战时，他成为了第一位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讲的总统。当1924年，已经74岁高龄和担任劳联55年领导职务的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从同墨西哥劳工运动缔结联盟——此举意在阻止后者被共产党所掌控——的地点返回时，他在墨西哥边境的病床上处于弥留之际说出的最后的话是“上帝保佑我们美国的制度”。

纳入/排斥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在国外，即在其他国家或在一个宗主国的殖民地。一方面，对西欧的工人而言，很容易将他们对遥远地区人们争取解放的斗争的支持保持在某种激进/自由主义的传统之内。在1844年，1505名巴黎工人向下院代表提出请愿要求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他们提到“工人属于他自身”、“不管在法国目前的劳动组织是多么的差，但在某种意义上，工人是自由的”（cited in Césaire, 1948, 11）。英国工人将克里米亚战争视为“自由的英格兰人同俄国农奴的战争”（Foster, 1974, 242）。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支持加里波第（Garibaldi），在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方，并且支持波兰起义（Collins, 1964, 29-30）。[\[68\]](#)

但同样真实的是，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在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遭到工人阶级的敌视，因为“黑人奴隶已经比白人奴隶生活得更好；赋予黑人以自由将以进一步压迫白人奴隶为代价；一旦获得自由，黑人奴隶将变得和白人奴隶一样贫困”（Hollis, 1980, 309）。在20世纪初，英国劳工将他们对在南非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集中于反对输入中国劳工到兰德矿区工作，他们将这种情况视为“进一步证明了存在由政府支持的引入工贼以破坏罢工的行为”（Hinton, 1983, 73）。

在殖民地问题上，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深刻的分歧（Haupt and Rebérioux, 1976a, 77-283）。诸如英国的海德门（Hyndman）和列宁等人经常谴责帝国主义，但他们的影响力被诸如荷兰的亨利·范·柯尔（Henri van Kol）等人所抵消，后者曾提到“殖民地存在的必要性”，仅仅希望限制它在那里所犯的“罪行”；同时也被诸如伯恩施坦等人所抵消，对后者而言，“殖民问题 [是] 传播文明的问题”（Rebérioux and Haupt, 1963, 13, 18）。甚至那些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也在反对匈牙利的“分离主义”时义愤填膺，他们因对奥匈帝国境内多民族的不同要求持更宽容的态度而闻名。^[69]

归根到底，甚至对像盖德派那样对殖民地持反对立场的人而言，它也一直至多是一种“不重要的争论”（Willard, 1965, 63）。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肯定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表述的，即当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之时，它的“胜利将会导致一直在背后支持它的农民阶级的消亡，由此使社会主义的实现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也是可能的”（Haupt, 1986, 57）。这被认为是有关谁具有优先权的问题。但它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反响却是作为能否被纳入到“文明人”范畴之中的问题。^[70]在殖民地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就优先权问题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康纳利（Connolly）认为自己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位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当他观察到欧洲工人阶级在1914年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时，他在他所属政党的都柏林总部的外面悬挂了一幅标语：“我们既不为英王、也不为德国皇帝效力，而是为爱尔兰效力”（Bédarida, 1965, 20）。他在1916年领导了复活节起义。

妇女和女权运动

从许多方面看，女权/妇女运动在19世纪的情况类似于社会/劳工运动的情况。但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这两种运动似乎又处于普遍的分离状态，大体上就像两根平行的轨道，彼此几乎从未交汇过，也几乎没有合作过。的确，在许多方面，社会/劳工运动将女权/妇女运动视为竞争对手、令人厌恶、偏离正轨、甚至经常视为敌人。这无疑同纳入/排斥的思维模式有关。

当然，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这两种斗争不仅能够共存、而且能够结合在一起。在1848年之前的时期，弗洛拉·特里斯坦将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宣传这种思想。的确，她是如此专注于工人的事业，她在写于1843年的著作《工人联盟》（*the Workers' Union*）中表达下述观点：“工人阶级的所有不幸能够总结为两个词：贫困和愚昧。现在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认为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即首先教育妇女，因为妇女负责教育孩子们”。必须指出的是，她的主张并未产生什么影响，正如盖德的门徒阿莱恩·瓦莱塔（Aline Vallette）也默默无闻一样，他在写于1892年3月15日的《社会和谐》（*L'Harmonie sociale*）一文中指出：“要使社会焕然一新，社会的两个受压迫群体——妇女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cited in Zylberberg-Hocquard, 1978, 89）。

对城市的男性工人而言，问题似乎在于他们通过工作赚取工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女性工人获得的报酬相对较少——的确在1914年之前相比男性工人要少得“多”（Guilbert, 1966, 21），这一般而言会对工资水平造成威胁。^[71]这种所谓的威胁被反复地提出（Guilbert, 1966, 188）。尽管有某种夸大，但妇女在制造业劳动力队伍中所占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据估计，在19世纪中期的巴黎占40%（DeGroat, 1997, 33）。妇女之所以被归类到更具“无产阶级”特性的地位上（Judt,

1986, 44-46, 50-51), 无疑部分是因为熟练技术工人阻止她们进入他们的行业 (Hinton, 1983, 31), 但部分也是因为雇主认为相比男性工人, 她们的生产率更高、更容易遵守劳动纪律 (或听话), 以及在技术上更熟练 (Berg, 1993, 41)。

男性工人在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上都做出反应。亚历山大 (Alexander, 1984, 144) 将他们的反应主要视为“一种 (在法律上) 控制和 (在道德上) 命令异性的愿望”。绝不应该低估性别方面的动机, 无疑, 这种动机很好地适应了那时的文化习惯、尤其是中间阶级女性群体的习惯, 她们赞同“降低妇女的地位, 使她们在婚姻和家庭中从事无报酬的工作, 与此同时被完全排斥在……付酬的职业之外” (Kleinau, 1987, 199)。无疑下述的情况也是事实所在, 即在城市男性工人中, “无产阶级的反女权倾向居于支配地位” (Thnnessen, 1973, 19)。德国的男性工人将女性工人称为是“工厂工人” (Fabrikmenschen, 这是一个奇怪的用语, 因为从字面上它意指“工厂男工”, 但读音上又有“工厂女工”的意思), 往往将她们视为“在道德上堕落的人” (Quataert, 1979, 153)。霍布斯鲍姆 (1978, 8) 注意到, 工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以致到19世纪的最后1/3时期, 在世纪开始时“鼓舞人心的妇女”形象 [见德拉克洛瓦 (Delacroix) 的油画《光荣的三天》 (*Les Trois Glorieuses*)] 已经转变为妇女仅仅是“受苦和忍耐”的形象, 而裸体男性雕像目前已经变为工人具有活力和力量的形象化象征。

第一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186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拉萨尔 (Lassalle) 领导的全德工人协会 (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 的代表以“保护妇女”为理由建议禁止妇女就业 (Hervé, 1983, 23)。最终的决议是妥协的产物, 它一方面肯定妇女工作的积极意义, 同时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妇女工作的恶劣条件 (Frei, 1987, 39)。工人组织目前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工资平

等、支付家庭工资，以及改变工作场所的恶劣条件。

（同工）同酬明显是工会的一般性要求。但工会通常暗中希望，如果（对妇女、对少数民族和移民、对其他国家的工人）给予平等工资的话，那么在工人等级中居于优势地位的工人（具有优势地位的种族集团中拥有公民身份的男性工人）因而将被优先雇用，仅仅是出于文化-历史的理由也应如此。例如，注意法国工会联合会（CGT）1898年在雷恩（Rennes）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通过决议的用语：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在努力传播下述思想，即男人必须养活女人；如果妇女、寡妇或少女必须被迫自食其力的话，那么她们应该认识到同工同酬的原则也将适用于她们；

.....

禁止男人从事应由女人承担的工作，相应地，也禁止女人承担应由男人承担的工作，工作是男人的本分。（cited in Guilbert, 1966, 173）。^[72]

总的来看，妇女并不会加入或者被禁止加入工会。在1900~1914年这段时期，当工会变得相对强大时，据估计在法国，只有5%~10%的妇女是工会成员（Guilbert, 1966, 29, 34）。也有一些试图创建专门吸纳妇女参加的工会的努力，在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妇女工会的数量有了相对增加，但它们与其说是进行讨价还价的组织，不如说是“互助性的组织”，妇女工会很难同后者“区分”开来（Olcott, 1976, 34, 39）。

当然，工会经历的一个困难时期证明了将妇女排除在外的合理性，正如我们在法国图书工作者联合会（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du Livre, FFTL）勉强通过的决议中所能看到的那样，该组织由于多次发起以将妇女排斥在就业之外为目标的罢工而臭名昭著。但最终，读书会也承认，由于经济原因，甚至那些反对妇女在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中就

业的工人也经常会催促妻子到其他行业去工作，并提出如下的折中方案：

1. 我们将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那些地方性分会，它们希望反对对妇女的剥削，让妇女获得工会工人所能获得的最低报酬。

2. 在过渡期内.....目前就业的妇女将被承认有权以和男性相同的条件加入联合会。在过渡期结束之后，只有在工会工人所能获得的报酬水平上就业的妇女才被允许加入联合会。（cited in Guilbert, 1966, 62）。

第二个决议同时敦促“作为一家之长的工人贯彻妇女在家的原则，要求他们的配偶拒绝所有家庭之外的工作”。如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同其他决议相矛盾的话，那是因为它们的确是矛盾的。

一些社会科学家利用他们的专长来证明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在1890年，威廉·奥格尔博士（Dr. William Ogle）向皇家统计学会（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解释道：

对一些男性而言，他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工作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乐趣；对另一些男性而言，他们之所以将工作视为苦差事是因为他们将工作视为一种义务；但绝大多数男性都是被迫去工作的，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数量或性质上看都是令他们感到厌恶的，他们只是希望，首先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其次能够结婚和养活家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富裕就存在于成年人的富裕之中，因此当一个国家的最大部分人口都能够满足这两种自然愿望时，这个国家就是最繁荣的。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cited in Lewis, 1984, 45）。

获得“养活整个家庭的工资”就成为工会组织的主要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要求来源于一个实际问题。尽管在18世纪，妇女和儿童像男性一样为报酬而工作被认为是正常的，但许多生产活动转移到家庭以外进行意味着妇女和儿童所从事的家庭工作失去了收入。这也许是导致人们观察到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实际家庭收入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Pinchbeck, 1930, 4; Wallerstein, 1989, 124）。

“养活家庭的工资”是一种很简单的主张。一个成年男性为获得报酬而付出的劳动所获得的最低工资应该是足以供养他、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的。这种主张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它得到劳工运动的强烈支持（Lewis, 1984, 49）。它也引起了许多雇主的兴趣，因为它似乎保证了劳动力队伍的稳定（May, 1982, 418）。而且它也同19世纪的价值观相一致，即男性有“责任”照顾他们的家庭（Evans, 1983, 281）。因此，它不仅对第一国际和其他劳工运动有吸引力，而且也引起各种类型的中间派政治家的兴趣。只有主张女权的人反对这种主张（Offen, 1987a, 183）。

制定保护女性工人的专门立法的主张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Rowbotham, 1974, 114）。它似乎是一种合乎道德的主张，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关注的问题（Guilbert, 1966, 413）。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赞同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它包含着政府干预的因素。支持女权的中间阶级是以平等的名义来反对这样做的。女性工人自己则担心，它将会导致工资的减少。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例如，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论证道，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工业化已经消除了年龄和性别作为“特殊”变量的重要性。但她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是少数派（Quataert, 1979, 39）。在德国，天主教中央党（the Catholic Zentrum）支持养活家庭工资的主张，将它作为探索一种更注重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对绝大多数男性工人而言，它成为他们不愿

意看到妇女在工作场所、由此在政治社会中享有平等地位的借口。他们似乎认为，将男性工人纳入公民范畴就要求将妇女视为人口中更弱势、更脆弱、因而也是更消极的部分。

妇女权利问题在社会主义政党中获得了更多表示同情的关注，这是相比工会对它的态度而言的。社会主义者就妇女同政党的关系问题展开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争论的地方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奎塔特（1979）将该党描述为“不情愿的女权支持者”。妇女大会（the Women's Conference）和妇女部（the Women's Bureau）在社会民主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是非常罕见的。它们最初是作为德国政府颁布限制性法律的结果而出现的。1851年颁布的普鲁士结社法（the Prussian Vereinsgesetz）不仅禁止妇女参加政治组织，甚至禁止她们参加集会。在巴伐利亚（Bavaria）和萨克森（Saxony）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Evans, 1976, 10-11）。为了动员妇女力量，社会民主党被迫设立了一些独立机构，而且能够合法地宣称是它们非政治性的。这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它使社会民主党能够将妇女组织起来，尽管政府的法律禁止这样做。但它同时也使女性社会主义者能够在党内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派别发挥作用，“确保它能够代表妇女的特殊利益”。此外，它还意味着，正是因为她们有自己的组织，所以女性社会主义者极端敌视中间阶级发起的女权运动，“公开宣布”同它们决裂（Honeycutt, 1979, 32-33）。

结果就是在女权问题上持一种奇特的折中立场。一方面，奥古斯特·倍倍尔写作了一本论妇女问题的最重要的和被一些社会主义领袖广泛引用的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Frau und Sozialismus*），该书被认为对“妇女权利”持一种相对支持的立场。^[73]尽管女性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不像其他运动那样，并不存在诸如“妇女问题”这样一种东西——正如意大利、法国（盖德派）和俄国的运动所主张的那样，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强调了妇女的政治解放问题（Honeycutt, 1979, 37）。此外，尽管有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她从未参

与过社会民主党的妇女运动），但她们确实在寻求实行各种改革，目标在于“减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性别压迫”（Quataert, 1979, 12）。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妇女运动事实上“主要是一种已婚妇女的运动”，即家庭主妇、而不是女性工人参加的运动（Evans, 1977, 165）。而且，一旦德国政府通过新的《社团法》，结束对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的限制（1908年），社会民主党很快就取消了妇女大会（1910年），接着取消了妇女部（1912年）。霍尼库特（1981, 43）的评价是，妇女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克拉拉·蔡特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来实现妇女权利的理想，对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言是乌托邦”。

同德国的女性社会主义者一样，法国的女性社会主义者也对资产阶级的的女权运动持敌视态度。路易斯·索曼瑙（Louise Saumoneau）在1899年组织了第一个女性社会主义者团体（the Groupe des Femmes Socialistes），他完全拒绝同资产阶级的的女权主义者进行任何合作（Hause and Kenney, 1981, 793）。但不像德国的女性社会主义者，她们在1900~1913年占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几乎20%，在法国女性党员仅占2%~3%（Sowerwine, 1976, 4-5）。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女权运动在法国似乎也较少不和谐之处。首先，人们对妇女作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Rabaut, 1983, 6）。的确，民众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甚至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似乎也由于它的破坏风格而声誉受损。^[74]

第二，在法国有像于贝蒂娜·奥克莱尔（Hubertine Auclert）这样的人物，但在德国却没有与之相当的人。在1879年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第三次代表大会（the French Workers' Socialist Congress）上，奥克莱尔做了著名的演讲，她指出，她之所以来参加，“并不是因为我是一名工人，而是因为我是一名妇女——即一名受剥削的人，是作为900万奴隶的一名代表”。她呼吁在工人和妇女之间建立联盟，并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语：“啊，无产阶级，如果你们希望自由，那就停止你们不公正的

行为。依据现代科学，依据对现代科学不存在任何偏见的认识，我们说：所有男人都是平等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也是平等的”（Auclert, 1879, 1-2, 16）。她确实推动大会通过了一项强有力的决议，该决议支持“两种性别之间的绝对平等”和妇女的工作权利（当然，强调“同工同酬”），尽管与此同时仍然坚持妇女有看护孩子的义务（Guilbert, 1966, 156-157）。

但在法国也同样，暂时结成的联盟最终归于失败（Rebérioux, 1978a, xvi; Sowerwine, 1978, 233-234）。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882年的分裂一般被认为是在更具改良主义倾向的派别〔布拉斯派（Brassists）〕和更具革命倾向的派别（盖德派）之间的分裂，他们将在妇女问题上的分歧视为导致分裂的直接原因。一位布拉斯派分子莱昂尼·卢扎德（Léonie Rouzade）参加了1881年巴黎市议会（the Paris Municipal Council）的选举，盖德派明显对她的参选表示冷淡。这导致他们被开除出党。盖德派随之组建了法国工人党，并宣称布拉斯派是在鼓吹一种“性别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盖德派指出，倡导妇女的政治权利是“改良主义的”，因为它们能够“通过合法方式”、而不是革命方式获得。对此，布拉斯派的回答是，男性也通过合法方式获得他们的“权利”。但不管怎样，盖德派随后也将支持妇女权利的内容纳入他们自己的纲领中（Sowerwine, 1982, 28-45）。

最终，在法国，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放弃了建立联盟的想法。令社会主义者感到极大担忧的是，绝大多数妇女同时也受到教会的影响，她们有可能利用选举权来反对他们的党（Perrot, 1976, 113）。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妇女机构，它主要是用来限制女权运动的发展、而不是为妇女争取权利的（Sowerwine, 1978, 1）。

这种不和睦的关系似乎由于1913年“库里欧事件”（Couriau affair）的发生而达到激烈对抗的程度。在丈夫的支持下，艾玛·库里欧（Emma

Couriau) 一直是一位激进的工会主义者，并努力争取加入印刷工人工会。但工会拒绝吸收她入会，她的丈夫也由于允许她出外工作而被工会开除。这引发了一次大的抗议活动，库里欧不仅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支持，而且获得了某些工会团体的支持。该问题因而被提交给将于1915年召开的法国图书工作者联合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不过由于战争的爆发，这种讨论并未发生（Albis-tur and Armogathe, 1977, 361）。尽管许多作者都强调，这一事件证明劳工对妇女工作权利敌视的深刻程度，但索维温（1983, 441）更积极地看待这一事件：“如果库里欧事件‘表明了对待妇女的态度’，那么它表明的并不是针对妇女顽固而持久的厌恶，而是在趋向男女平等的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妇女选举权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党的领袖菲利普·屠拉蒂（Filippo Turati）和他的终身伴侣安娜·库里斯齐奥夫（Anna Kuliscioff）之间在《社会批判报》（*Critica sociale*）上展开的。在意大利，男性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希望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推后，以便更快地获得男性的普选权。在意大利，他们也同样是用“能力”来证明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例如妇女“一直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但正如库里斯齐奥夫所回应的，如果这构成理由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问：“有多少男性在实际参与政治活动？”她指出，当选举权被赋予男性文盲时，怎么样才能论证选举权之所以不应该给予妇女，那是因为她们是文盲呢？（Ravera, 1978, 77-79; see also Pieroni, 1963, 122-123; Pieroni, 1974, 9; Puccini, 1976, 30-31）。

这种矛盾心理在各处都能发现。在英格兰，工党勉强支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但工党的许多支持者都相信，“女权运动只不过是增加有产妇女特权的另一种称谓而已”（Liddington and Norris, 1985, 28）。而且担心给予那些持保守立场的妇女以选举权会使大多数支持工党的男性“不再对为全体妇女争取选举权感兴趣”（Fulford, 1957,

113)。只是到1912年，工党才决定不再支持不包括妇女在内的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Hinton, 1983, 79）。

在美国，在1868年召开的全国劳工代表大会上（the National Labor Congress）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事件，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参会资格受到质疑，理由是她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劳工组织。尽管最终承认了她的参会资格，但大会感到有必要声明，他们并不赞同她的“古怪观点”，而之所以同意她参会，只是因为她所在的组织正在寻求改善劳工的状况（Andrews, 1918, 2: 128）。

在比利时和奥地利（以及德国），社会主义政党都拒绝支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以使男性获得普选权不受影响（Evans, 1987, 86-88）。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地，社会主义政党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是勉强地）都转而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Evans, 1987, 76）。在革命后的俄国，被克拉拉·蔡特金称为“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并未得到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er Kollontai）和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的支持（Stites, 1957, 251）。^[75]

尽管如此，但肯尼迪和蒂利（1985, 36）坚持认为，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保持着距离”，至少从1890年到1920年是如此，而且实际上“已经逐渐变成一对死敌”。克莱曼和雷谢夫（Klejman and Rochefort, 1989, 231）指出，“从1889年到1914年，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之间从未停止过斗争”。对工人阶级的妇女而言，基本的选择似乎一直是：“要么做家庭主妇，要么做公民？”（Sowerwine, 1982, 1）。最终，那些在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级妇女并不被认为有拒绝做出选择的权利。

不过，绝不能主要通过社会/劳工运动的视角来考察女权/妇女运动。尽管两种运动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女权/妇女运动有它自身

发展的动力。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很好地解释了这种动力所在：

特权者对非特权者的妥协很少是由良好动机所致、而是由非特权者强迫他们这样做的能力使然。任何反对性别特权的观点都很少有可能被普遍关注，只要他们能够对自己说，妇女并不会抱怨这种特权就行。（Cited in Rossi, 1970, 214）。

尽管如此，但问题实际上并不是由妇女、而是由男性先提出的。正如奥尼尔（O'Neill, 1971, 6）在提到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但也普遍适用于整个19世纪的欧洲世界）时所说的，他们“教导妇女将自身视为一个特殊的阶级。…… [他们] 创造了妇女，在妇女尚未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之时”。

在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妇女组织主要是作为反对奴隶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稍后的女权运动组织也许很好地从中获益。正如班克斯（1981, 22）所指出的，她们积极地参与这种运动“赋予了她们以有价值的经验，即在诸如募捐和征集在请愿书上的签名等基本的日常政治活动方面的经验”。也许相比驻守街垒，它要逊色一些，但相比沙龙中的清谈，它确实要更重要一些。早期的宪章政治运动在斗争策略上要更激进些，它是一种群众政治运动，那时妇女也参与其中。但宪章派在妇女权利（尤其是选举权）问题上立场模糊，正像稍后的社会/劳工运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模糊一样。尽管在早期，宪章运动呼吁“特别将妇女包括在内的”普选权（Fulford, 1957, 38），但在绝大多数稍后发表的声明中，“立场变得非常模糊”（Thompson, 1976, 132）。它模糊地主张，主要的问题在于只有“一个阶级”。

正是欧文式的社会主义为新生的女权运动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条件。欧文主义“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致力于妇女的解放事业”（Taylor, 1983, xiii）。^[76]但伴随着建设“和谐新村”的实验在1845年遭遇失败，欧文主义也逐渐衰落，正如大约在同时，宪章运动也走向

衰落一样。欧文将妇女解放视为他所宣扬的更宏伟的“社会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随着这种运动的消失，“在女权运动和[英格兰]工人阶级激进主义之间的思想联系也随之消失”。在此之后，被视为“同一激进战略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斗争[变成了]相互分离的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是从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指导思想出发进行组织的”（Taylor, 1983, 264）。

18世纪的最后1/4时期和19世纪上半期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许多引人注目女性知识分子所做出的贡献，从英格兰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有关女权的论著，到法国的斯塔尔夫人（Mme.De Stal）和乔治·桑（Georges Sand）有关文化居于中心地位的论著，再到拉赫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亨丽埃特·赫兹（Henriette Herz）和多萝西娅·冯·库尔兰（Drothe a von Courland）开办的柏林沙龙（Hertz, 1988）。但主要是在法国，我们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女权运动，尽管它们都存在于各种——大多数是小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确，阿邦苏尔（Abensour, 1913, 222, 330）将1830年到1840年之间法国女权运动的要求（离婚、从事自由职业、政治权利）未能获得明显成功解释为是“它们同社会主义学说达成严格一致”的结果。

最明显地，女权主义者同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圣西门主义者非常强调通过爱、由此通过妇女来改造社会，首先要让妇女在他们的组织机构中发挥某种主要作用（Thibert, 1926, 78）。他们创办了许多女性杂志：《女性的自由》（*La Femme Libre*），由一位信仰圣西门主义的工人阶级妇女德西雷·瓦瑞尔（*Désirée Veril*）创办；^[77]1832年创刊的《妇女论坛》（*the Tribune des Femmes*），它只发表由女性创作的文章（Moss, 1982, 251-257）；1836年由珍妮·德滦（*Jeanne Deroin*）创办的《妇女报》（*La Gazette des Femmes*），它试图将圣西门主义的思想同一般的民主思潮相结合。^[78]

蒂贝尔（Thibert, 1926, iii-iv）赞美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女权主义“充满柔情和理想主义”的特性，他提到它的“大公无私和慷慨”。摩西（1982, 265）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了一种也许更为冷静的评价。她提到，正像妇女要维护自身的权利一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男性是如何削弱她们在组织中的影响力的。但摩西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却是解放性的”，因为作为结果，“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妇女将她们自身从男性的监护下解放出来”，产生了历史上第一次独立的妇女运动。

傅立叶将妇女解放同“道德解放”联系在一起，这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居于中心地位。但甚至更为重要的，他论证，妇女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自由是以妇女在经济方面的独立、由此以她们的“工作权利”为“基本条件”的（Thibert, 1926, 99, 140）。一般认为，正是傅立叶创造了“女权主义”一词（Perrot, 1988, 33），^[79]但对此存在争议。^[80]不管怎样，作为该词的创造者被记住要比作为“要么当主妇，要么当娼妓”说法的提出者好得多，后者是由蒲鲁东提出的，他是另一种早期重要的社会主义运动（该运动在整个19世纪一直都很强大）的领袖，他由于提出这种说法而立即遭到珍妮·德滦的谴责，从那以后他一直由此而受到谴责（Tixerant, 1908, 186）。^[81]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弗洛拉·特里斯坦做出了一种勇敢的努力，她坚持认为，妇女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一项共同的事业，因为妇女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中都处于“一种下等地位”（Puech, 1925, 337），因此这两种斗争是“无法分开的”（Albistur and Armogathe, 1977, 284）。的确，她曾经说过，“妇女是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cited in Rebérioux, 1978a, xix; see also Dijkstra, 1992, 178; Portal, 1983, 95）。

似乎正是在1848年的世界革命中，这种呼吁最终产生了结果。在1848年，女权主义重申自己作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社会革命组成部分的地

位。在法国，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波琳·罗兰（Pauline Roland）试图在巴黎市长选举中投票，但遭到拒绝。珍妮·德滦提出请愿要求获得作为1849年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权利。杂志《妇女的声音》（*Voix des Femmes*）所加的副标题是“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杂志，代表全体妇女利益的杂志”。它的编辑尤金妮亚·尼博耶（Eugénie Niboyet）甚至大胆地要求将国家图书馆（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阅览室对妇女读者开放（Thibert, 1926, 313, 317-318, 327）。但除了获得一些极小的共产主义团体支持外，这些要求被“一波清教运动的高潮”所淹没（Devance, 1976, 92）。在1850年，由于组建社会主义教师联合会（L'Association des Instituteurs, Institutrices et des Professeurs Socialistes），德滦、罗兰和其他人被逮捕入狱，理由是这是一个“有着政治目标的秘密社团”（Thibert, 1926, 332-334）。

在美国，1848年世界革命的唯一表现是塞尼卡福尔斯会议（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该会议一般被视为美国女权运动创始的时间。它在1848年7月19~20日发表了著名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该宣言深受《独立宣言》的影响，开篇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男女生而平等”。8月18日所记录的各种申诉都指向了下述事实，即妇女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选举权”，但这种权利却赋予了（这种申诉预示了未来的冲突）“那些无知和堕落的男性——本国的和外国的”（Rossi, 1973, 416）。

在欧洲，镇压是严厉的。在法国，对6月起义的镇压导致“即使是有限的社会改革要求也被拒绝”（Thompson, 1996, 399），破坏了七月王朝所营造的更为自由的氛围。支持女权主义的杂志被停刊（Adler, 1979, 175）。1848年7月26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将妇女纳入未成年人范畴，甚至禁止她们参加政治俱乐部的聚会（Tixerant, 1908, 63）。在意大利，临时政府（2月25日到5月4日）最初对妇女运动持同情态度，但被制宪会议（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5月4日到28日）采取的一些

歧视性措施所抵制，接着是一项立法，从其内容看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善妇女地位的幻想”（Anteghini, 1988, 57）。德国的女权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相联系，“成为继1848年革命之后所实施镇压的牺牲品”（Hackett, 1972, 362）。

因此，1848年革命的最终结果不仅是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而且也是对女权主义者的镇压。不过，这并没有使两种运动联合在一起。相反，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这两种“为社会所不容的运动”目前仍在继续它们各自独立的组织活动。19世纪上半期的情势被奥尼尔（1969, 17）总结如下：

在妇女权利范围不断缩小和男性权利范围不断扩大之间所形成的差距在这样一个时间达到其最大程度，即在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优势地位之时。在英格兰和美国，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这种排斥变得更为明显，但也更难于为其合理性辩护。

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大陆。正是因为很难为男女之间的这种差距辩护，^[82]所以从此以后，它将成为女权/妇女运动关注的焦点。

家庭主妇目前成为妇女所承担角色——即被假定在现代世界中所承担的角色——的主要文化形象。妇女已经丧失了在过去时代中作为“在经济领域中受尊重的合作者”的地位（Ortega, 1988, 13）。当然，应该强调“受尊重”一词，因为绝大多数妇女并没有停止她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正如霍尔（1992c, 688）所提到的，“资产阶级使他们的妻子变为一种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和意识形态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接着用下层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妇女为他们做家务和为他们生产纺织品”。^[83]

在19世纪，在生活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成为地缘文化的中心问题。它被欢呼为现代性的一种伟大进步，是对理性要求的一种

合乎逻辑的结果。根据理性，“好的社会组织”似乎要求“对空间、角色和任务做出严格的界定”（Perrot, 1988, 35）。这依次又“被用作证明将个人特性和社会角色赋予男性和女性是合理的”（Allen, 1991, 29）。^[84]这被称为是“公共领域的产生”，兰德斯（1988, 12）提到在19世纪的这种文化界定和旧体制的文化界定之间存在的区别，在旧体制下，“因为权利并不是普遍的，所以妇女被排斥在正式的权力系统之外并不被认为是特别不正常的”。^[85]但关键在于：权利目前被假设是普遍的，正如女权主义者一直坚持认为的那样。在1876年，一位德国女权主义者赫德维希·董恩（Hedwig Dohn）宣称：“人权并无性别之分”（cited in Clemens, 1988, 1）。

不过，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概念上的两难境地，而且这种两难境地是它们所特有的。一方面，她们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奉为神圣的普适价值和个人主义传统的继承人。但当她们要求获得作为积极公民的所有权利时，她们发现她们被拒绝的理由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男性。^[86]另一方面，当她们决定取而代之寻求一种“有差别的平等”时，这个概念是由19世纪中期法国的一位女权主义者欧内斯特·乐高弗（Ernest Legouvé）提出的，^[87]她们无疑是在寻求“一种方式以扩大自由主义的范围和同自由主义所承认的男权政治世界进行讨价还价”（Caine, 1992, 53）。她们同时也适应了“新科学对身体的说明”，新科学将男性和女性的身体视为“存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两者不能按照同一标准来衡量（Poovey, 1988, 6）。但这样做，她们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她们作为被动公民的角色，承认男性赋予他们自身的“仁慈家长”的角色（Offen, 1983, 257）。

在进退两难之间全身而退绝非易事，很少能够获得成功。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人们能够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伊冯·图林（Yvonne Turin, 1989, 359）认为，我们也许应该将修女视为在19世纪真正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人：

她们是最早研究医学、药学的学者，是企业最早的领导，是最早的罢工者，等等。……尽管完全为理论建构所忽视，但不管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她们都通过她们的日常实践而使人们感受到她们的存在，即不仅通过履行她们称为天职的工作，这推动她们去承担责任，而且获得了她们的为教会和市民社会所承认的动议权。教会是唯一为她们提供自由活动领域的组织，该领域对她们的活动而言是足够大的。……在行动之前，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应该扪心自问，男性是否也会做要求她去做的。如果答案是“是的”，那她将同意这样做。如果答案是“不是的”，那她将拒绝这样做。她知道模仿、重复、遵从是如何扼杀妇女的创造性的。19世纪的修女是最纯粹的女性，她们在各处进行着发明创造。

在文化分野的另一端，在一种互不相干的、但却不可思议地具有互补性的观点中，见罗宾（Rubin, 1975, 185）对心理分析的分析（和批判）：

[心理分析]是一种有关人类社会中性特征的理论。最重要地，心理分析提供了对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机制的描述，通过这些机制，人们对性别做出划分、并加以扭曲；心理分析还描述了兼具男女两性特征的幼儿是如何被转化为男孩和女孩的。心理分析是一种不彻底的女权主义理论。

但图林对如何从两难境地中全身而退的认识和罗宾对如何理解这种两难境地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危险的认识，都没有构成女权主义者在1848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晚期思考她们自身的组织方式的中心所在。在一个性别歧视不仅已经合法化、而且被公开地和积极地论证其合理性，由此会对任何潜在的同盟者产生影响的世界中，女权运动必须确定它自己的发展道路。勒贝留（1978b, 154）提到“19世纪的所有欧洲社会都存

在‘在文化上’反对女权主义的力量，它也为社会主义者所支持：[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反对政府、但不会反对社会”。

学者、政治评论家和政治领袖都不可能提供太多的帮助。在英格兰，由于受到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从早期支持女权运动（源自他的个人主义思想）转变为反对女权运动（Paxton, 1991）。米什莱的《女性》[*La Femme*, 1981 (1859), 49]一书中包括了一段两个男人就妇女局限性所展开的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带有性别歧视内容的对话，她们“被教导仇视和厌恶所有法国男人都热爱和信奉的东西”，即世俗价值观、科学和1789年革命。麦克米兰（1981a, 362-263）指出，米什莱、蒲鲁东和朱尔·西蒙（Jules Simon）都是坚定的反教权论者，但他们事实上都赞同教会有关妇女主要承担家庭角色的传统观点。至于右翼力量，他们认为女权运动是价值观堕落的又一个例证，并将他们的观点同民族主义的论题相联系。^[88]1893年在意大利，隆布罗索和费雷罗（Lombroso and Ferrero）出版了一本书《犯罪的妇女：妓女和普通妇女》（*La donna delinquente, la prostitute, la donna normale*），他们在书中论及妇女的智力低下、有天生的撒谎倾向和她们从遗传学看有做出越轨行为的潜在可能性。^[89]

伦德尔（Rendall, 1985, 321）注意到，“到1860年，在[美国、法国和英格兰]，讨论妇女政治权利问题所使用的共同话语仍然是共和主义的和公民权利的话语”，^[90]当然并不仅仅限于这三个国家。^[91]寻求在政治上融入国家体制几乎成为“由中间阶级构成其主要成分”的运动所面临的唯一政治问题（Evans, 1977, 34）。人们如何才能要求成为一个积极公民？答案似乎非常简单：组织起来，要求修改法律，为修改法律而做院外游说活动。这正是女权主义者所做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成为一个公民是重要的？答案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两阶段理论：首先是选举权，然后才是其他一切。^[92]

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选举权。它要求组织——妇女的组织。^[93]法国的女权主义者为了两种可能的替代性策略起了名称。她们称它们为“不合作策略”[同玛丽亚·德雷纳（Maria Desraines）相联系]和“攻击性策略”（同于贝蒂娜·奥克莱尔相联系）。问题在于，优先性应该赋予争取公民解放、还是争取政治解放（Bidelman, 1982, chaps.3, 4）。作为一场有关策略的争论，这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有关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一般而言，不合作策略占据主导地位。“几乎在所有地方，激进派（即首先是那些要求妇女选举权的人）都是少数，她们经常遭到‘女权主义者中温和的多数派’的强烈反对”（Evans, 1977, 37）。

通常对女权运动走向温和化的解释是将其归因于下述事实，即这些运动都是由持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中间阶级妇女所主导的。“资产阶级的心态使她们更倾向于选择渐进的、合法的解决方案”（Hause and Kenny, 1981, 783）。^[94]但一些女权主义者确实转向了更为激进的策略。埃文斯（1977, 189-190）称赞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例子和主张社会主义民主的妇女运动的出现，认为通过她们的“攻击性策略和密集的宣传方法激励了那些被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人群。……大规模示威游行、标语和招贴、口号和旗帜，以及对敌人给予狠狠打击的攻击性策略，这些都是由社会主义运动最早使用的策略”。

攻击性策略在英国和美国被特别多地使用。“正如她们砸碎了摄政街的厚玻璃窗一样，[英国]争取女性参政权的妇女颠覆了妇女作为消极的依附者的形象”（Rover, 1967, 20）。查菲兹和德沃金（Chafetz and Dworkin, 1986, 112）论证，正是这种激进性和“将问题局限在选举权上”使美国[和英国]的运动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摩西指出，如果这种情况并未在法国发生，那并不是因为法国的运动是“自行消亡的”，而是因为“政府的多次镇压消灭了激进的女权运动”。

领导争取选举权斗争的女权主义者面对着各种有组织的妇女团体，它们将其他目标放在比选举权更重要的位置上。争取女性参政权的妇女将这些运动视为在本质上较少激进性、更多社会保守性的运动。但也有人将这种认识颠倒过来：

远非是使妇女运动走向激进化，……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出现导致妇女运动目标的减少和更强调实用主义与温和的路线，大大缩小了妇女运动的范围。……争取妇女参政权的人居于支配地位导致妇女运动几乎仅仅是关注一个对某些中间阶级妇女具有直接重要性的问题，而不去关注那些所有妇女都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传染病引发的骚乱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也不去关注在某些较早期运动中所涉及的婚姻法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Caine, 1982b, 549-550）。[\[95\]](#)

这场争论并不简单地是有有关选举权和其他目标何者具有优先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当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时，她们之所以进入是为了要求获得无性别差异的个体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中的平等、在教育和其他任何文化领域中的平等）、还是为了确保承认妇女具有特殊的品德和才能（以及坚持认为不应将她们的活动限制在“私人”领域）。在女权/妇女运动内部的这场争论指导着19世纪的各种妇女运动，而且直到今天争论也未结束。[\[96\]](#)

重要的是认识到，关注社会权利的女权主义者关注政治问题（即法律方面的诸问题）事实上就像关注政治权利的女权主义者关注政治问题一样，后者将关注点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因为法律以非常多样的方式影响到妇女的权利和希望。堕胎的非法化（同社会的反对相对立）是19世纪早期颁布的措施（Rendall, 1985, 226）。从那时起，它的合法化就一直是妇女关注的问题（Mclaren, 1978a; Evans, 1977, 108）。生育控制也是如此。[\[97\]](#)戒酒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国，许多争取妇女参

政权的人都参与了戒酒运动。^[98]当德国的女权主义者论证幼儿园教育的合理性时，它是在追求她们的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家模式，“要求政府不仅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而且在积极鼓励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激励儿童早期自主活动的本能”，幼儿园教育被认为将促进这种目标的实现（Allen, 1991, 65）。

妇女力图使她们的各种女性特征不影响到她们享有政治权利的所有这些尝试都遭遇到一种障碍，它是在19世纪才新近变得重要起来的：医生作为居主导地位的专家的兴起，这是以医学新获得的科学地位为基础的。^[99]一般而言，这些医生“假设女性和男性的差异性大过相似性，性别之间的生理差异会‘自然地’转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the riot, 1993, 19）。在这个更为世俗化的世界中，医生已经继教士之后成为在性别领域中“保持正常状态的管理人”（Mosse, 1985, 10）。^[100]尤其是，“家庭医生”这种新概念变成一种在家庭内对行为是否良好进行“直接监督”的模式（Donzelot, 1977, 22, 46）。甚至保守派的妇女也试图进入公共领域，由此重新获得某种个人的自主权利，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当然，在从对行为的宗教控制向医学/科学控制的转变中，我们也从一种“自然”行为的观念、从有罪之人虽然偏离正轨但通过忏悔也许能够回归正途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从生理上看具有根本性的行为”的观念，它们能够由科学家来加以应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或“改进”、但却无法根本加以改变。福柯（Foucault, 1976, 59）揭示了这种转变是如何影响到人们对性行为的看法的：“[17世纪] 鸡奸是一种个人的堕落行为；[19世纪] 同性恋是一类人的行为”。他论证，它是在一种被禁止的行为（鸡奸）和一个人（一种个性）之间的区分，后者拥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成年期、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当然，一旦人们将这些行为具体到个人/个性，那他们就能够将一种不良行为同另一种不良行为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植根于生物学。那些能够最好地应对这种行为的不是生物学家（数量非常少）、而是医生：

医生在基本科学知识方面所受到的充分训练，确保他们作为在充满神秘色彩的诊所和日常生活所面临的令人苦恼的问题之间发挥沟通作用的科学中间人是值得信赖的。医生同样也是组织良好的、在世界观上是完全世俗化的和具有政治意识的，是他们职业和社会特权的狂热捍卫者。（Nye, 1984, xi）[\[101\]](#)

当然，就在公共领域应该强调哪些方面，女权主义者一直存在分歧。对一些人而言，它是“母性的隐喻”，意指“家庭和母亲的角色会对妇女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行为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Allen, 1991, 1, 244）。一些人感到，有关婚姻和家庭的话语最终会将妇女限制在女性的本分之内。无论使用何种方式，她们都意在将“父权制连根拔除”（Basch, 1986, 36）和为妇女创造更多的活动空间。

妇女寻求发挥女性所特有作用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是地缘政治领域。妇女组织和平运动，通常坚持认为，正是因为不像男人那样，妇女不具有好战特性，因为她们具有“母性”，所以她们不愿意看到她们的儿子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战死。爱好和平成为妇女的特色，而且有一个专门的国际组织“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WILPF），该组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创建的，目标是反对战争。[\[102\]](#)

妇女几乎没有能力施加影响的一种政府行为是人口普查的分类设置，因为它并不属于立法范畴。在19世纪晚期的澳大利亚，已婚妇女都被归类为家属，“这项政治措施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实施的，目的是在劳动市场上排斥妇女”（Deacon, 1985, 46）。这样一种分类已经被普遍接受：“到1900年，不承担在家庭之外有酬工作的已婚妇女是‘家属’的观念已经获得了一种作为科学事实的地位”（Folbre, 1991, 482）。当社会科学的各种观念变为立法时，它们就会产生某种影响和获得某种程度的合法性，而这会对社会体系的日常运转产生重大影响。

种族和民族运动

我们已经看到，就她们对积极公民权利的要求而言，在承认女权/妇女运动具有合法性上，社会/劳工运动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以类似的方式，在承认种族/民族运动对积极公民权利的要求具有合法性上，女权/妇女运动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就好像是船上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所有人一样。或者也许更好的隐喻是不愿意承认只有一种类型的船只的思想，即由全体平等的公民构成的类型。在19世纪，这第二种有组织的斗争主要是在美国发生的，在那里，对黑人的压迫在导致政治局势紧张上发挥了中心作用，由此导致黑人社会运动的出现。在英国，争取爱尔兰权利的斗争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只是它包括一种从政治上分离出去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在美国黑人运动中大体上是没有的。

从统治阶层的视角看，妇女权利问题和黑人（确实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的确，他们似乎通常将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察：

共和派的性别意识形态有助于形成一种依据种族标准赋予公民权的做法。性别意识形态使男性同女性相对立，将生产能力和独立性同男性联系在一起，而将奴性和依附地位同女性联系在一起。.....通过将女性特征赋予少数民族的男性，保守的美国人不仅阉割了所谓具有奴性和处于依附地位的男性，而且指明他们也是对共和国自由构成威胁的人。.....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的另一面是善良的母性；而处于依附地位的男性的另一面却构成了专制的根源所在。（Mink, 1990, 96）

在19世纪早期，妇女在废奴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妇女的权利在各地都在逐渐减少，就美国

而言，是“急剧”地减少（Berg, 1978, 11）。应该记住的是，在英国正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首次正式将妇女排除在选举权之外，该法案意在赋予一些之前不具有选举权的人以选举权。但在这样做时，法案明确使用了“男性”一词，这个词在之前的英格兰立法中从未使用过。它“成为了攻击的重点和引发不满的根源所在”，（Rover, 1967, 3），英国的女权运动由此而产生。[\[103\]](#)

妇女非常敏锐地求助于“自然权利”观念，它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由此而提出她们对自由的要求。废奴运动同样也是基于“自然权利”观念，它“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将潜在的追求女权的情绪转化为一种有组织的运动”（Hersh, 1978, 1）。当然，废奴运动包括结束奴隶制，由此使那些过去是奴隶的人获得正式的公民权利。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公民——积极的和消极的，所以直接的问题就是被解放的奴隶将被置于两种公民的哪个类别之中。

这是继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就美国宪法第13、14和15条修正案展开争论的核心所在。林肯（Lincoln）总统于1863年1月1日宣布奴隶获得解放（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奴隶、而是大多数奴隶）。1865年通过的第13条修正案规定奴隶制违反宪法。1868年通过的第14条修正案宣布，如果有哪个州拒绝给21岁以上作为该州“男性居民”的公民以选举权的话，那么这个州在国会中的代表名额将被减少。1870年通过的第15条修正案宣布，不应“由于种族、肤色或以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剥夺这些人的选举权。

女权主义者将第14条修正案视为一种“政治倒退”，因为它首次地将“男性”一词包括在内，由此首次地将妇女“明确地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Ryan, 1992, 20）。这非常类似于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所起的作用。选举权的范围被扩大，但在这个过程中妇女却被有意识地明确地排除在外。当然，妇女主张，选举权的扩大应该同时将所有那些被排除

选举权之外的人都包括进来。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是美国废奴运动的一位领袖，他在1865年5月指出，目前不应该支持妇女对选举权的要求，因为“现在是要争取黑人的权利得到满足”。这种著名的言论得到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非常强有力的、而且几乎是同样著名的回应，她在1865年12月26日写给《全国反蓄奴规范》（*the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的编者的信中指出：

在过去30年间，这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已经尽她们所能去确保黑人获得自由，只要他们还处于人类等级的最低等级，我们就愿意推动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但目前，当通往公民权利的天堂之门正在缓慢地向他们打开时，我们最好是袖手旁观，还是首先确保黑人进入天堂，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特权等级洋洋自得地向下俯视，然后告诉我们“现在是满足黑人要求的时刻；不要阻碍他们获得自由；不要提出任何新的问题而令共和党感到难堪；要豁达和大度一些；一旦黑人有了保障，接下来就轮到妇女了”。但现在，如果我们的要求包括一揽子新的举措或一系列新的思想，那么甚至一次用两个简单的问题来责问“男性白人公民”都被认为是残酷无情的：即所有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都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同样的逻辑和正义确保，如果赋予了一类人以选举权，那就应该赋予所有人以选举权。

过去30年的斗争并不是由于黑人本身的理由，而是由于更广泛的人性的理由。（Gordon, 1997, 504-505）[\[104\]](#)

争取女性参政权的妇女并没有保持沉默。压倒霍勒斯·格里利的反对意见，她们努力使纽约州的新宪法在1867年取消了“男性”以及“白人”这样的用词（O’Neill, 1971, 17）。1867年在堪萨斯州，斯坦顿和

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支持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 Francis Train）的竞选活动，后者是一位著名的种族主义者，不过倡导给予妇女选举权。^[105]在这场妇女同她们以前在反对奴隶制斗争中的长期盟友——在美国国会中居于多数地位的共和党和以前的奴隶——的斗争中，“在每次较量中妇女都是失败者”（Griffith, 1984, 118）。

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领袖都采取了斯坦顿-安东尼式的立场。露西·斯通（Lucy Stone）论证，“如果妇女无法赢得政治自由的话，那很清楚黑人能够赢得他们的自由”（Kraditor, 1967, 3）。结果是在女权运动中产生了深刻的分裂。1869年，安东尼和斯坦顿组建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NWSA），而且此后同民主党建立了更多联系。斯通和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组建了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the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AWSA），同共和党建立了更多联系。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提出了更具社会视野的分析，它论证，妇女之所以受压迫是由于婚姻和性别劳动分工。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则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选举权这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上（Buechler, 1990, 50）。^[106]

19世纪下半期，随着妇女运动在所有社会/劳工问题上变得愈加保守，它在国内的种族/民族问题（正如美国的情况那样）^[107]或者国外的殖民地问题上（正如英国的情况那样）也是如此。^[108]在这种转向保守的过程中，许多女权主义者放弃了“自然权利”的主张。在美国，她们开始论证，妇女被赋予选举权“将抵消在外国出生的移民的影响”（Berg, 1978, 269）。当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于1903年公开支持对选举权施加一种“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时 [只有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表达了明确的、但却是唯一的反对意见]，她们就从扩大选举权的运动转向建议“剥夺一些美国人的选举权，即南方的黑人和北方的归化公民”（Kraditor, 1965, 137; see Flexner, 1975, 316）。^[109]

就反对女权主义的优生学家而言，他们在英格兰和德国的势力强大，他们反对妇女选举权的理由在于，高生育率对一个优良种族而言具有根本重要性。但一些女权主义者却认为这样做出回应是适当的，即“除非妇女对一种新社会制度的要求得到承认，否则她们就拒绝生育孩子，而这将导致种族的衰落”（Rowbotham, 1974, 106）。^[110]1900年发生的所谓鲁芬事件（Ruffin incident）说明了当时的主基调。在全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的密尔沃基（Milwaukee）会议上，妇女时代俱乐部（the Women's Era Club）被接纳为新成员。当约瑟芬·圣皮埃尔·鲁芬（Josephine St.Pierre Ruffin）作为代表出席会议时，执委会认识到这是一个由黑人妇女组成的俱乐部，取消了接纳它入会的决定。鲁芬夫人被告知，她能够作为马萨诸塞州联合会（the Massachusetts State Federation）的代表参会，后者是一个“白人俱乐部”，她是它的成员，但不能作为一个“有色人种俱乐部”的代表参会。事件趋于恶化，达到了有人试图抢走她的徽章的程度，但未能成功，因为她做出了反抗，但她也因此而拒绝参加会议（Moses, 1978, 107-108）。^[111]

在这场冲突的高潮时期，一些争取妇女参政权的人诉诸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例如，她们张贴了一幅宣传画，画上一个“畜生模样的黑人勤杂工坐在一个穿着优雅的白人女性旁边”，画的题目是“他能够投票，我为什么不能？”当然，这得到了反对妇女参政权的男性的明确回答，他们指出，赋予白人妇女以选举权所能投出的明智选票将由同时被赋予选举权的黑人妇女的投票所抵消。1910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一位反对妇女参政权的人写道：“在贵族的统治下我们已经吃尽苦头；新世界也会有强有力的人进行统治。比将选举权赋予那些愚蠢但可爱的黑人文盲更严重的危险，是将选举权（如果是合逻辑的话）赋予那些更愚蠢的、更卑贱的妇女”（Kraditor, 1965, 31）。像布克·T.华盛顿夫人（Mrs.Booker T.Washington）这样的黑人请求获得选举权，理由是黑人在道德上要优越于移民。但请求并没有任何结果。^[112]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对女权运动而言是一个政治上的转折点。在许多国家，她们在那之前或在那时都已经获得了选举权。由此，女权/妇女运动似乎陷入了严重的衰落状态。当然，一个原因在于，为获得选举权而进行动员的过程已经使妇女争取参政权的 worldview 发生了转变，即从将选举权视为“向压迫妇女的传统发起挑战的手段的世界观，转变为接受那些传统的许多方面并在它们的基础上提出支持选举权论据的世界观”（Buechler, 1987, 78-79）。^[113]埃文斯（1977, 227）提到，在美国，禁酒和妇女选举权大体上是在同一时间被投票表决的，而且主要得到相同群体的支持：

两种运动都同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相联系。它们都代表了盎格鲁-撒克逊中间阶级新教徒控制黑人、移民和大城市的企图。它们是对一种不断增加的威胁的反应，即对美国价值观至上地位的威胁。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大战期间取得成功，尤其是因为同德国的战争，以及在更大程度上要同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战争结束时中欧国家的革命做斗争，中间阶级新教徒对他们的价值观被颠覆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恐慌的程度。

如果对工人和妇女而言，公民权——即积极的公民权——很难获得，那么对有色人种（或者其他群体，它们根据处于某种地位的特征加以界定并被视为在某些方面是劣等的）而言，甚至更难获得。自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形成以来，从理论上为这种状况做合理性论证的努力就一直在进行。^[114]但只是到19世纪，优等和劣等“种族”的主题才被经常地予以论及，并被白人视为几乎是不证自明的。首先，以前的种族理论都承认某种变化的可能性，例如通过“皈依”而实现的变化。^[115]“开始于19世纪，……或明确或含蓄地，人们认为在人性上存在着迥异的差别；一些群体的人性状况不再具有可变性”（Guillaumin, 1972, 25）。

从阶级意识形态演化的各种形式看，按种族做出分类从一开始就变

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16]当平民在英格兰和法国维护他们的公民权时，他们有时使用的一个论据在于，贵族是“外国人”、不是在本国出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诺曼枷锁（the Norman Yoke）理论，它在英格兰从17世纪就被提出；^[117]在法国，则是在高卢族（race gauloise）和法兰克族（race franque）之间做出区分的理论，它们不时地被传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重要的理论。^[118]类似的观点也在意大利出现，认为在伊拉斯坎人同库曼尼亚人（Etrus-comania）之间存在着对立（Poliakov, 1974, 65-66）。但如果贵族由于是在外国出生的理由就被排除在积极公民权之外，那么有色人种不就更应该被排除在外吗？同根据出生地标来赋予公民权相对应，根据血统标准来赋予公民权也是带有排斥性的和必然是种族主义的。但是如果存在着平民具有种族优越性的命题，那么当然也就存在着甚至更强有力的贵族具有“高贵血统”和他们拥有自然权利的命题。^[119]

如果种族在19世纪成为一种被进行理论建构的概念，种族主义成为一种被制度化的实践，那么它主要是公民权观念居于中心地位的结果。因为，作为一种观念的公民权根据逻辑推理会产生两种结果：它导致国家强调和坚持以同质性为唯一合理的基础，以此证明全体公民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具有合理性。它导致国家基于如下理由来证明他们对其他国家实施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即他们特殊的同质性表现为一种较高度度的文明，而这是相比被统治国家而言的；后者虽然也具有同质性，但是程度较低。

国家的有机特性是我们称之为雅各宾主义的主张所坚持的，雅各宾主义的核心观念认为，在国家和个人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中间机构。所有个人都是平等的，除了作为公民的特性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公共的（或同国家相关的）特性。不管是如何形成的，也不管它们的基础是什么，任何团体都不具有像国家那样的法律或道德地位。吉尔罗伊（Gilroy, 2000, 63）称作为结果的国家是“一种新型的暴力的和有机的

组织，它首先表现在政府的作用上”。这种有机的组织代表着进步。布尔盖（Bourguet, 1976, 812）分析了这一点是如何被共和9年的《省长统计报告》（*the Statistique des Préfets*）提到的：

进步由此被界定为向着社会更大同质性的方向发展，人对自然的胜利，统一性战胜多样性。……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塑造了这种有关理性社会的理想，异常、病态和差别将被从这种社会中消灭。

将有机特性的观念转化为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特性，或更一般而言在文明的国家（欧洲国家）作为一方和所有其他国家作为一方之间存在差异的观念，这并不困难、或甚至也不是不符合逻辑推理要求的。从人为制造的同质性转化为一种并不容易改变的文化-基因上的有机存在也并不困难。一个好的例子是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1886年论种族心理学的著作中，他将有机国家的最大威胁界定为同化政策，即将罪犯、妇女、种族集团、殖民地居民予以同化的政策（Nye, 1975, 49-50）。^[120]由此我们就从一种有机整体转向一种有机存在，前者赋予全体公民平等以合法性，后者赋予这些公民之间存在等级制以合理性。再次地，从全体公民转向了在积极/消极公民之间做出区分。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能够要求被包括在其中。但他们也可能采取一些对抗性措施，像愤怒的回击、修辞上的策略、或发起身份认同运动。^[121]

19世纪是欧洲称雄世界的时期。“欧洲血统的白人对[世界]的统治从未遭遇过太大的挑战”（Hobsbawm, 1975, 135）。^[122]无疑，这是基于他们军事力量的强大，但它却是由意识形态的建构予以保障的。“通过建构一个统一的文明形象，欧洲已经被‘欧洲化’，能够依据这种标准来对所有其他文化做出评估和分类”（Woolf, 1992, 89）。^[123]当这些国家试图创建由具有同质性的公民组成的民族时，他们同时也试

图在由圣西门倡导的“对世界落后地区的远征中”创造一个白人（欧洲）种族（Manuel, 1956, 195）。^[124]远征引发殖民：“将有色人种等同于没有人性……成为法国人由此将他们的角色界定为殖民者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Bouille, 1988, 245-246）。^[125]当然，这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内部。乔丹（Jordan, 1968, xiii）提到，在革命后的美国，知识分子“事实上确实宣称美国是白人的国家”。

一种种族存在等级结构的观念获得了科学赋予的合法性，这本身就是19世纪重要的文化标志。通过“将社会学事实同生物学事实相混淆”，科学完成了这种论证（Guillaumin, 1972, 24）。^[126]这对像戈宾诺那种公开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的人而言是以极端形式接受的，而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则是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形式接受的。^[127]在19世纪中期，“人类的多元起源说”在人类学家中间流行，尽管它甚至有违背圣经教义的事实。或者也许是正相反：多元起源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相比《创世纪》，它似乎更为“科学”。^[128]托多洛夫（Todorov, 1989, 3）将这种“科学主义”视为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战胜决定论”，他宣称这是“拒绝使‘应该是’服从于‘是’”。但我认为，科恩（1980, 210）似乎更为正确。他坚持认为，就“种族”之间的差别是起源于环境因素还是起源于生物学因素的争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并没有定论”。这个问题在公开讨论中直到1945年仍然没有定论，此后尽管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逐渐平息，但也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129]

对这种根据生物学来解释社会现实做出贡献的一种重要科学概念是雅利安人的概念。它最初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学概念，19世纪的语言学家发现在一系列语言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几乎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在欧洲、在波斯使用的，一些语言是在南亚使用的。人类学家称这种语系为印欧语系。1814年，巴朗什（Ballanche）建议用对梵语的研究替代对拉丁语的研究。这事实上是持语言是由人类所创造的立场，以反对语言是

由上帝启示而成的立场。像施莱格尔（Schlegel）和格林（Grimm）等语言学家发现过去被视为“原始”的语言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Schwab, 1950, 190-191）。在19世纪，有关雅利安人的理论成为“科学进步的主流”（Poliakov, 1974, 327-328）。

随着欧洲诸强国在19世纪晚期更积极地从事殖民扩张，以前支持奴隶制度的种族主义思想现在已经被“穿上一种新的伪科学的外衣，并对群众产生吸引力”（Davis, 1993, 73）。雅利安人的概念目前被用于证明欧洲人统治非欧洲世界的合理性。雅利安人的概念由此会遭遇到东方人的概念。

吉尔罗伊（2000, 72）提出，所有这种科学的和伪科学的理论建构加在一起构成他称之为的“人种学”。他将它界定为“[有关种族的]多样化的本质主义和简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它们认为种族在本质上既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又是文化因素决定的”。重要的是要强调，如果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认为种族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那它是有害的，正像它认为种族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是有害的一样。

种族主义理论建构引发反种族主义运动。但必须承认，这种运动事实上在19世纪非常弱小，要比社会/劳工运动和女权/妇女运动更弱小。相比其他类型的运动，它们最终获得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的支持甚至更少。部分原因在于，这也许反映出，相比资产阶级或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甚至更大的影响力。部分原因在于，它反映出那些在西方国家居于种族等级底层的人群的软弱性。这并不适用于美国，但美国也由此就成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最根深蒂的国家，因为它先是实行奴隶制、稍后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在面对种族主义时，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的困难在于他们从根本上接受了在积极和消极之间所做的区分，在种族问题上他们将这种区分建构为在内在潜质已经得到充分发挥的全部文明人（由此积极公民）和那些

目前的发展水平尚未能充分发挥他们潜质的人（由此消极公民）之间的区分。他们假设，那些拥有潜质的人将花“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来追赶，他们甚至能够得到来自仁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最细致的、家长制式的关照”（Bederman, 1995, 123）。^[130]这能够从美国戒酒运动的领袖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就在她的组织内实现种族平等问题所持的暧昧态度，以及她同黑人妇女领袖伊达·B·威尔斯（Ida B. Wells）——当两人都在英国做巡回演讲时——所展开的牵强的公开争论中观察到（Ware, 1992, 198-221）。这也能够从就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勇敢地成为反种族主义者而言，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所做的选择中观察到。^[131]

很少能够听到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尤金·V·德布斯（1903, 255, 259）所做的如下类型的声明：

全世界都对黑人心存愧疚，我们骑在黑人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就是对世界尚未达到文明状态的简单证明。美国的黑人史是一部史无前例的罪恶史。……我们必须简单地指出：“阶级斗争是无肤色区别的”。

更重要的是要记住，19世纪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如果马克思是将经济学同达尔文的生物学加以综合的话，那么正是戈宾诺将各种种族主义加以了综合，而且至少产生了同样的影响（Cohen, 1980, 217）。

对种族主义的二元划分所做的理论建构同对性别的二元划分交织在一起。正比比德曼（1995, 50）所指出的：“‘白人’将‘文明’说成是一种单一性的人类存在，可以同样地由他们的白色皮肤和他们的男子气概加以界定”。将种族差别和种族等级同性别差别联系在一起，似乎一直是重要的。就人们正在为等级结构所做的生物学方面的辩护而言，这是合乎逻辑的。摩斯（Mosse, 1985, 133-134）提到，一种种族主义的话语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将假设黑人男性无力控制他们的性冲动的内容包括

在对黑人男性的描述中的”。^[132]将劣等种族的男性视为无法控制他们的性冲动的人，也被用于强化在男性-女性之间的二元划法。它不仅为白人男性充当白人女性的保护者角色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而且它还纵容白人男性对待黑人男性就像他们对待女性一样。^[133]如果白人男性不知何故立场出现了动摇，那他由此将被谴责为“神经衰弱”，它被视为一种“身体上的疾病”，需要加以治疗。^[134]

性别依次地又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有关资产阶级“值得尊敬”的主流观念通过民族主义而为各阶级所接受，“这在它为资产阶级值得尊敬的辩护中很少会出现动摇”。但与此同时，要是“不正常的”就是不值得尊敬的。这样医生就成为“负责保持正常状态的人”（Mosse, 1985, 9-10）。由此，完整系列的强制二元划分就将阶级、性别、种族和性行为都包括在内，它们构成限制公民权扩大的全部机制所在。民族主义要求赋予那些将要或能够成为积极公民的人以优先地位。

不同社会来源的人——等级、阶级、性别、种族和教育——之间的差别和不平等并不是在19世纪才产生的。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就存在，并被视为自然的、必然的和确实也是合乎需要的。对19世纪而言，新增的东西是从理论上赋予平等和公民权概念以合法性，并使之成为集团统治的基础，成为中庸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导致对二元划分进行理论建构，并试图合乎逻辑地将这种二元划分长久地维持下去，使事实上的越界行为不仅是违背社会规则的、而且也是违反科学法则的。对19世纪而言，同样新增的东西是由所有那些被具体的二元划分排斥在外的人所创设的社会组织，以确保他们能够从各种法律限制中解放出来、或至少部分地解放出来。对要求解放的集团而言，上一个特定集团每次取得的成功似乎都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表明成功并不是那么困难，但在实践中却使成功变得更为困难。公民权一直将一些人排除在外，就像它将一些人包括在内一样。

19世纪见证了当代有关身份的一套概念体系的创制完成。一旦规则不再是由传统所保障的一套体系，原来体系的合法性——如果不是它的现实存在的话——已经由法国大革命彻底地加以了破坏，各种身份被要求划定谁拥有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权利，谁不拥有此类权利。确定强者的身份最为紧迫。不过，他们是关系型的，即他们不仅要确定他们是谁，而且要确定他们不是谁。在创设他们自己身份的同时，强者由此也创设了其他人的身份。

资产阶级的概念先于和引发了无产阶级/工人的概念。白人的概念先于和引发了黑人/东方人/非白人的概念。有男子气概的男性概念先于和引发了温柔的女性概念。公民权的概念先于和引发了外国人/移民的概念。专家的概念先于和引发了群众的概念。西方的概念先于和引发了“其他地方”的概念。

概念先于和引发了组织的存在。但组织使概念变成制度。正是组织/制度确保了对一些人而言是传统的东西，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承担反传统的角色。当然，所有这些范畴都是早就存在的，但它们以前并不是用来界定现代世界中某个人身份的概念。在19世纪之前，身份仍然是一种有关“等级”的问题，人们根据他们出身的家庭、根据他们所在的社区、根据他们所属的教派、根据他们在生活中的身份来加以界定。新的范畴是现代世界体系中新的地缘文化的标志，由中庸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予以指导和支配，在19世纪的进程中逐渐支配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组织的方式。

[1] “19世纪初，一个问题像幽灵一样困扰着绝大多数政治评论家：即社会解体问题。……处于这些共同关注中心的是希望回避人民主权模式。……正是公民的数量令他们感到担忧”（Rosanvallon, 1985, 75-76）。

[2] 从理论上看的正当理由在于，获得投票资格的标准是能够“做出独立判断”。从中可以推断出，“所有那些被视为在行使意愿方面依赖于其他人的人——诸如未成年人、妇女、或仆人——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Gueniffey, 1988, 616）。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纳税选举权制度

(régime censitaire) 的起源所在 (Théret, 1989, 519)。

做出判断的能力继续成为否定给某些人以选举权的主要理由。例如，那个时代英格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穆勒在1824年就反对赋予妇女和工人阶级选举权，“理由在于，他们的利益能够被其他人有效地代表，即那些能够更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就妇女而言是丈夫和父亲，就工人阶级而言是‘社会中最明智和最有德行的群体，即中间阶层’” (Taylor, 1983, 16)。

[3] 西耶斯的区分将在各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接受。“像他们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人一样，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也在公民和群众或民众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中，部分群众被赋予公民权，但只有公民能够被恰当地赋予政治权利，这个少数群体由于性别、财产所有权和所受的正式教育而适合待在负责任的位置上。……自由主义的这种立场……反映了一种担忧，即担忧政治民主也许会导致不稳定的政府和‘暴民统治’” (Lovett, 1982, 33)。

[4] 戈德肖 (Godechot, 1971, 495) 提到：“在1789年选举期间，民族突然得到革命者的支持，这使它在群众中间变得非常受欢迎。事实上，‘整合成为民族’、由此只有民族被假想为等级制度中处于国王地位的东西。因此，1789年9月喊出的口号是：‘民族、法律、国王’。民族决定、支配法律；国王只是执行法律。过去是‘王室的’所有东西现在变成民族的；国民大会、国民卫队、国民军队、国民教育、国民经济、国家疆域、国民福祉、国家债务，等等。继冒犯君主罪之后，现在有叛国罪”。

诺拉 (Nora, 1988, 801) 强调了下述事实，法国大革命将“民族”一词的三重意义结合在一起：“社会意义：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意义：相对被动接受法律而言的立法权；历史意义：通过连续性，一个人群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比灵顿 (1980, 57) 强调了这个概念在社会心理方面的重要性：“[民族是] 一种新的博爱，其中残存的对王室的忠诚以及对民族观念的些许敌意都被生而作为一个共同祖国的子民一扫而光”。他称之为一种“富于战斗性的理想”。

[5] 在加的斯的西班牙议员在1810年使“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变成新的基本政治原则，这里同样是，过去是“王室的”所有东西现在都变成“民族的” (Cruz Seoane, 1968, 53, 64)。就意大利而言，利特尔顿 (Lyttleton, 1993, 63) 论证道：“在1796年之前，意大利问题并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而存在的。意大利的雅各宾派是首次提出将创建联合的意大利作为一种具体政治方案的人，他们的民族概念源自于法国大革命。”

[6] 戈德肖 (1971, 495) 论证，对《陈情表》 (*cahiers de doléance*) 的一种解读揭示，正是受教育的阶级倾向于使用祖国 (*patrie*) 一词，他们似乎对在伏尔泰 (Voltaire) 和卢梭之间的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争论有充分的认识，伏尔泰将祖国界定为“人们在其中感到舒适的地方”，而卢梭则坚持认为它就是“人们在其中出生的地方”。“民族”一词被那些有着更多革命倾向的人使用。不过，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似乎为了革命事业想要拯救祖国。他指出：“在实行贵族制的国家中，‘祖国’一词毫无意义，除了对那些已经被剥夺了统治权的贵族家庭而言” (cited in Carrère d’Encausse, 1971, 222)。

[7] 迪埃 (Duhet, 1989, 33)。此后不久, 在一封给国民大会的吁请书中, 有人写道: “像犹太人和有色人种一样, 妇女肯定是有价值的” (cited in Rebérioux, 1989, x)。

[8] 赫夫顿 (Hufton, 1971, 95) 论证道: “旧制度下最重要的社会分化……是在下述两类人之间发生的, 一类人是能够自豪地宣称‘在我们的家里不用为面包担心’, 另一类人是不可能做这样宣称的。……在因面包而引起的骚乱中, 妇女将她们的过激行为归因于她们对下述必要性的认识, 即她们必须被视为贫困者, 而不是赤贫者。……赤贫者并不在抗议者和骚乱者之列。……他们已经放弃, 不抱任何希望”。

“因此, 法国大革命期间因面包而引起的骚乱, 不管是1789年10月5~6日向凡尔赛宫的进军、还是重要程度较低的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的那些斗争, 是典型的妇女的胜利。就面包而言, 这是她们的专属领域; 没有妇女参加的面包骚乱本来就是矛盾的”。阿普怀特和列维 (Applewhite and Levy, 1984, 64) 以稍微不同的方式看待妇女的作用: “就大革命而言, 最重要的、甚至最独特的特征是巴黎民众阶层中的妇女做出了主要贡献: 即它在18世纪的西方世界中实现了以最广泛民主为基础的人民主权。女权主义者对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要求源自于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 它从未成为革命者为权力而斗争的中心所在, 而且为拿破仑法典所否定, 但非精英阶层的妇女的政治活动是大革命政治的核心所在”。

[9] “当法王美男子菲利普 (Philip the Fair) 于1302年郑重其事地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时, 他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由男性和妇女共同选择的结果。在接下来的5个多世纪中, 各等级中拥有特权的妇女都拥有投票权, 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国家层面。接着在18世纪90年代, 宣称男性权利的大革命废除了妇女的政治权利” (Hause, 1984, 3)。

[10] 乔治 (George, 1976-1977, 420) 指出, 共和派的目的在于“将占‘人民’一半的妇女组织起来, 使她们热情地支持激进派的纲领”。

[11] 瑞茨 (Racz, 1952, 171) 提到这件事情的“讽刺性”, 因为共和派一直是这项法律的热情支持者。

[12] 拉古 (Lacour, 1900, 403) 也是这样认为的: “当米什莱指出: ‘[妇女政治权利] 这一大的社会问题被压制是出于偶然的原因’, 他是错误的。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在镇压妇女社团上有其逻辑必然性。他们要镇压的、或更确切地说已经镇压的是那个要求紧急执行宪法的政党, 即由勒克莱克 (Leclerc) 领导的人民之友 (the Ami du peuple) 和拥护共和的革命者论坛组成的政党。正是这个由男性和妇女组成的政党想要一场社会革命, ……他们将罗伯斯庇尔的社会主义承诺当真, 因而想要宪法赋予他们的选举权”。

[13] 这个宣言是非常大胆的: “醒来吧女性; 整个宇宙都能听到理性发出的警示; 发现你的权利” (reproduced in Levy et al., 1979, 92)。对奥拉普·德古兰的观点和作用有见地的分析见斯科特 (1981)。

[14] 在圣多明各, 白人并不理会这个法令。的确, 他们处决了自由的有色人群的领袖奥热 (Ogé), 当他试图推动法令执行时。这导致一场白人和黑白混血阶层之间的内战, 因而使黑

人奴隶反对上述两者的起义变得不合时宜。布莱克伯恩（1988，176）称倡导给予黑白混血阶层以权利的黑人之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是“不起作用的”，他还提到奴隶权益“不仅在国民大会、而且在革命社团中都遭到否决”。

[15] 尽管拒绝称这为阶级冲突，但科布（Cobb，1970，184）基本上同意，“在雅各宾派专政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冲突、在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和无套裤汉之间在道路上的分歧，却比人们以前所认为的更直接。纲领在这种分歧中并不起什么作用，从阶级视角看也不大可能发现这种冲突有任何‘必然性’可言。双方所代表的政权形式（无政府也许是描述激进民众所实行的自治的更为恰当的词语）不可能共存超过几个月”。就如何对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的无套裤汉给出最准确的分析，见霍布斯鲍姆（1977，88）、索布尔（Soboul，1962，394）和滕内森（Tnnesson，1978，xvii）。

[16] 见汤普森的总结（1997，23）：“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人们对待社会阶级、大众文化和教育的态度被‘确定’。在一个多世纪中，绝大多数中间阶级的教育者都不可能将教育工作同社会控制工作区分开来，这就必然要求他们要经常地压制或否定学生生活经验的正确性，认为那些是不文明的或传统文化形式的表现。因此，教育就被公认的经验产生矛盾。那些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融入所教授的文化中的工人们马上就会发现他们处于同样矛盾的地位上，其中教育带来的是排斥同伴和对对自己的经验产生怀疑的危险。当然，这种矛盾仍在继续”。

[17] 这篇社论发表于1848年2月26日，值得详细地予以引述：“在[自1830年以来的]这段引人注目的时期，英格兰的君主和政府一直在稳定改善这个国家的所有制度，并使它们为人民所接受。他们大大扩展了代议制的基础。他们明显和有意识地增加了平民的权利。他们将市政管理向平民开放。他们限制、甚至打破了公司和阶级的垄断权。他们将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从诸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我们真的需要纠缠于细节吗？总之，他们已经投入人民的怀抱。通过逐个满足人民的正当愿望，他们是在拆民主的台。让那些生活阅历尚不丰富的人将目前这种群众骚乱同最近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种群众骚乱做一比较。因此，英格兰不断受到要求进行组织变革的鼓噪的困扰。贵族的身份、教会、财产权、法律、君主制和秩序本身都将消失。注意那场动荡已经导致变革的发生。在这些日子里，群众骚乱具有一种纯理性的、以致可以说具有立法的特征。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代表了解他们针对紧迫问题的看法、一般而言是他们的明智看法，当然不涉及社会的根本问题或对国家的重构，而是一些较次要的和有争议的问题。这种讨论在其论题上是合法的，在其论调上是和谐的”（cited in Saville，1990，229）。

[18] “在法国爆发的各次革命中，1848年革命明显是最具社会性的革命，这是从该词的现代意义上讲的，……即在它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意义上讲的”（Labrousse，1952，183）。这方面并不为那时的其他国家所了解。德罗兹（Droz，1972b，462）援引了1848年5月14日发表的法兰克福工人协会宣言（the Arbeiterverein of Frankfurt）：“工人就是人民”。康策和格罗（Conze and Groh，1971，143）断言，在1848/1849年期间，“民主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几乎毫无例外地得到一个高素质少数群体的支持，即‘工人-技师’，他们的社会地位在那时只能被描述为是极其不稳定的”。

[19] 无疑，相比任何其他国家，它在1848年之前的法国有着更强的基础。勃吕阿（1979a, 331）称这一时期的法国“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

[20] 1848年是“独立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在欧洲出现的时间，它发源自民主革命”（Lichtheim, 1969, vii）。也见莱宁（1970, 171）。勃吕阿（1972, 505）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由理论指导的力量”是在1848年出现的。在德国，“在激进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明确区分在1848年之前并未出现”（Kocka, 1986, 333）。

[21] 不过，宪章运动并未在英格兰取得成功的事实是里希特海姆（1969, 5）重点考察的问题，因为它使“维多利亚社会得到巩固”成为可能。相反地，萨维尔（Saville, 1990, 227）将它视为“在所有那些在〔英国〕有财产利害关系的人中显贵时代的终结，不管那种利害关系有多么小”。

[22] “更重要的是，革命经历使许多民主激进分子相信，在不使用更严谨和更独特的术语——这是相比马志尼所做的而言的——来系统阐释革命的社会目标的前提下，他们同样有可能获得群众对文化和政治革命的支持。……就意大利革命的社会目标达成共识、甚至是一种模糊的共识，被证明要比就其文化和政治目标达成一致困难得多。的确，在统一之前和之后，社会正义问题是在民主阵营中引发分歧的主要原因所在”（Lovett, 1982, 50-51）。

[23] 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简单地是对所有那些拒绝承认他们有权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人充满仇恨的民族主义者”（Fejt, 1948b, 154-155）。

[24] 他们已经认识到密谋活动是不起作用的。布朗基在1839年领导起义的彻底失败是有说服力的。1846年，卡尔·肖伯尔（Karl Schopper）代表伦敦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the London 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写了一封信：“密谋活动对除我们的敌人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肯定已经确信，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不可能避免的，但认为通过密谋和愚蠢的宣告就能带来这样一场革命……是荒谬的”（cited in Ellis, 1947a, 42）。但目前已经超越了仅仅是怀疑密谋的价值，而是到了怀疑自发起义是否充分的阶段。

[25] 吉尔里（Geary, 1981, 26-28）试图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劳工抗议运动：前工业社会（“由粮食引发的骚乱是其典型”）、早期工业社会（卢德主义）和现代工业社会，后者以创建正式的和“长期稳定存在”的组织为标志。类似地，蒂利（1986, 389, 392）指出，在1848/1851年之后，在法国，群众抗议“转向全国层面”。他将此前的抗议描述为“地方性的和受到庇护的”，而此后的抗议则是“全国性的和自主的”。卡尔霍恩（Calhoun, 1980, 115）也指出：“在社会学层面，这种转型中的关键转变是转向‘阶级’行为，它是伴随着正式组织的发展而来的，这些组织能够动员工人采取全国性的行动”。他认为，这种行动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我认为，他确定的这个日期过早。我认为，这种行动在法国开始时阶级性是非常微弱的，在英格兰至多也是部分地以阶级为基础的。真正全国性的阶级组织是1848年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我相信霍布斯鲍姆（1975, 115）比卡尔霍恩更接近那个时间：“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到19世纪60年代取得的两个成就的影响是持久的。从此以后，将出现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性的和社会主义群众性的劳工运动。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左派的影响大体上已经被消除。作为结果，政治行动的结构

在持续地发生变化”。

[26] 这是一种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出的观点。布隆泰尔·奥布莱恩（Bronterre O'Brien）是一位激进分子和工会会员，他在1833年写道：“一种精神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形成，它在此前时期并无先例”（cited in Briggs, 1960, 68）。不过，福斯特（Foster, 1974, 47-72）坚持认为，“工人的非法联合”在英格兰的较早时期就已经存在，即在19世纪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之间，其后果是“对劳动人口的大规模文化重组”（p.72）。我认为，这取决于你如何界定“工会制度”。鲁尔（Rule, 1988, 10）发现了它在18世纪的英格兰存在的证据，他宣称，他发现亚当·斯密和1799年反结社法案都提到冲突使雇主们认识到“加强他们的力量以反对已经建立的工会”的必要性。也见佩林（Pelling, 1976, 14）对英国1825年之前工会的讨论，它“几乎都是由熟练工匠、而不是劳工组成的”。

[27] 英国工人“怀念洛克，正像他们也同样期待马克思一样。[他们的理论]不是一种有关生产过程中存在剥削理论，而是一种不平等交换的理论。资本家仍然被主要视为捐客或垄断者。……因此，利润是从劳动产品中扣除而来，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权强行获得的。……上述的这种情况最接近受剥削的工匠或外包工人的情况”（pp.57-58）。

[28] 吕德（1969, 52, 95, 112）提到里昂——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工人，在那里，绝大多数工人都“对复辟持非常消极的态度”，更别提他们“绝不可能热情地”欢迎查理十世即位，他断言“雅各宾传统影响了人们很长时间”。提到工会和工人政党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兴起，布里奇斯（Bridges, 163-164）指出：“这种有组织的生活表明杰克逊时代的工匠是[托马斯]潘恩和美国革命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信奉者，他们也以此为荣。……他们的理论认为自由人同奴隶相对立，贵族同共和主义相对立；……它的各种判断提出的基础是平等和自然权利”。莫姆森（Mommsen, 1979, 81）将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工人运动视为“继承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衣钵”。

不过，吉尔里（1981, 49）谨慎地指出，“相比稍后时期，激进思想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更顺利地得到英国工人阶级某些部分的欢迎，这表明，条件的变化（变得更富裕、自由主义国家的确立）、而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决定了工人的态度”。

[29] 吕德（1969, 243）强调了英格兰和法国在对待中间阶级政权态度上的不同：“简而言之，在1832年[英格兰]没有爆发革命，这与其说是因为托利党人或贵族屈从于辉格党或激进派的威胁，不如说是因为所有重要人物都不想革命爆发，因为那些使革命有可能爆发的政治和物质因素明显并不存在”。琼斯（1083, 57）认为1832年改革法案激励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就它被视为中间阶级所做的一次“大的叛卖”而言，过去工人阶级认为他们在同中间阶级一道“进行一场共同的斗争”。这种意义上的叛卖接着又由于辉格党政府后续的行动而加剧：爱尔兰人强制转换法案、否决十小时法案、对工会的攻击、市镇法案和新济贫法，所有这些法案都被视为“证实了中间阶级的叛卖行为”。从中得出的实际结论在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战斗。

[30] “在1830年到1836年之间，在法国和英国爆发的伟大运动并不需要政治家的指挥。恰恰

相反，它对他们持怀疑态度。各政党的领袖都仅仅对掌握权力和保持权力感兴趣”（Dolléans, 1947, 1: 30）。

[31] 因此，里希特海姆（1969, 7）认为英格兰和法国是新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发源地”，并将这种开端追溯到“大约1830年”。西维尔（1986, 61）集中关注法国，将其开端追溯至“在1831、1832和1833年期间”。他强调，“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真正大规模的发展……是利用、而不是抛弃革命政治传统的结果”（p.65）。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德国，“像‘共产主义者联盟等早期的激进组织主要是从手工业学徒（handwerksgeseller），即技师或年轻的熟练工人中吸纳成员的，他们是根据行会规则加以培训的和在依附于师傅的地位上工作的人”（Kocha, 1984, 95）。

莫斯（1967, 38）将合作社会主义视为“共和主义者对在七月革命之后出现的工人阶级抗议的反应”。当然，人权协会（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Homme）中的激进共和派是属于中间阶级的，但“将平等主义原则应用于工业社会导致他们超越了中间阶级的利益，而趋向于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因此，为了反对马克思的下述主张，即这一运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莫斯（p.47）坚持认为，它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和“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无产阶级对行业社会主义的渴望，即由熟练行业联合会拥有对工业资本的集体所有权”。普拉门内兹（1952, 177）同样也希望同马克思展开论战，但却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远非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来到法国是在那个阶级对它有关要求之前，该阶级在其中的利益是虚构的。……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然提出的问题，是在资产阶级头脑中产生的；工人之所以能够接受它（或就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而言）是因为他们最初接受了1789年的原则，因为他们认识到‘人权’不仅适用于其他人，而且也适用他们自身”。

[32] “这种类型的手工业者并不在雇主家中居住。在从传统技工向合格的工资劳动者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居于领先地位，但他们仍然保留了许多传统上将同行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并以此作为进行抗议和组织的基础”（Kocha, 1986, 315）。卡尔霍恩（1980, 421）正是援引这种类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凝聚力”来解释从事革命活动的可能性：“我认为，在特定‘运动’爆发之前存在的社会联系具有关键重要性，它们为长期的、危险的和协同进行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社会力量”。类似地，西维尔（1986, 53）借助于他们“对其劳动协作特性的认识”解释了“手工业者倾向于采取具有阶级意识的行动”的原因，这是相比此时“工厂工人保持相对沉默”而言的。对手工业者而言，它“主要是一种社会认知的产物……源于社团或行会制度”，而工厂工人“对生产关系的认识较少社会性、较多个体性”。也见莫斯（1976, 22-23）：“熟练工人并不会作为被动的牺牲品经历工业化过程，而是会为其带来一揽子价值观和导向：行业的自治、自豪和团结；组织经验；通过群众的共和经历而培育出的一种主张平等主义的倾向，这些激励了一种对转型的积极反应。……熟练工人将一种行业的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结合在一起”。

[33] “认为在工业化早期，罢工是由工厂工人非理性地发动的观念——他们是由于尚未学会适应他们的新环境才发动罢工的——同罢工者所表现出的高度理性和组织性相矛盾，同早期罢工主要是由手工业中的手工工匠发动的相矛盾，后者已经很好地整合到传统的行业共同体当中”（Aminzade, 1982, 63）。一般而言，在这个时候工人必须对联合行动保持谨慎，因为镇压是非常严厉的。例如，在西班牙，1839年颁布了针对互惠性协会的王室法令（a Real Orden）。

因此当巴塞罗那爆发冲突时，所涉及的协会被解散。在经历了各种动荡之后，到1845年所有联合行动都被镇压下去（Tuon de Lara, 1972, 41-48）。谈及英格兰，塞克斯（Sykes, 1988, 193）指出，“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时，似乎确实存在一段尤其强烈和令人感到痛苦的冲突。这段时期的全部经历……深刻地影响到各阶级的态度和关系”。

[34] 贝达里达（Bédarida, 1979, 319）同意这种看法：“从英国人的视角看，宪章运动代表了现代英格兰已知的最强有力的、最深刻的和内涵最丰富的群众解放运动。从欧洲人的视角看，它构成19世纪两次伟大的工人革命斗争中的一次，另一次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35] “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宪章运动是对社会进行激进批判的最近的、最著名的和最迫切的一种运动，尽管也许并不是最具革命性的。……在这种批判背后隐含的是对一种平等社会的设想，其居民只包括勤劳的人和只需要最小化的政府……”

“如果将激进派和宪章派的政治运动解释为一种对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反应的话，后者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和不可逆转的经济过程，那是毫无意义的。激进派所设想的更多的是一种武断的和人为的发展，其来源不可能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发现，而是来源于对经济掠夺过程加速和加剧的不满，此前50年政治运动的发展使它成为可能”。当然，宪章运动也包括其他一些成分。就“激进的基督教徒的感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见约（Yeo, 110-112）。就北方宪章运动所谓的托利党-激进派的性质——就它而言意指“传统的保守主义”——见沃德（1973, 156 and passim）。

[36] 在讨论这个概念在西班牙的出现时，罗利（Ralle, 1973, 124）援引了一份西班牙社会主义报刊《解放报》（La Emancipación）在1871年给出的对资产阶级的定义：“所有那些人属于不同的阶级和忠诚于不同的政党，生活在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努力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享有他们优势地位带来的果实，并对维系这种制度做出贡献”。

[37] 这稍后使社会科学家就中间阶级的确切定义问题展开争论，这场争论颇具中世纪教士激烈争论的色彩。就他们将其应用于法国而展开的有关定义问题的争论，按先后顺序见科本（Cobban, 1967）、欧波伊尔（O’Boyle, 1967）、斯特恩斯（1979a）、欧波伊尔（1979）和斯特恩斯（1979b）。

[38] 英格兰一直是这种厌恶使用阶级语言倾向的一个明显例外。琼斯（1983, 2）提到，在英格兰“普遍使用阶级词汇”的反常性，他提出了如下解释：“不像德国，阶级语言在英格兰从未面对来自以前存在的等级语言的严重竞争；不像法国和美国，共和语言和公民权概念的流行程度较低……；也不像南欧各国，阶级词汇并不是伴随社会民主党的产生才使用的——而是在它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而且也从来不是后者的专用词汇”。

[39] 对英格兰使用工人阶级术语的讨论可以在霍布斯鲍姆的著作（1979, 59-63）中找到。霍布斯鲍姆（1964, 116）还讨论了我们应该如何区分家庭手工业工人（cottage worker）和接活在家做的工人（outworker），这非常有用：“早期工业化时期并不是用工厂工人取代家庭工人。……恰恰相反，它大大增加了家庭工人的数量。……[后来]逐渐消失的使用手摇织布机的织工并不简单地是从中世纪残留下来的人，而是一个数量大大增加的阶级，它大体上是作为早期

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就像工厂工人一样。……忽略早期工业化时期那些不在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是不切实际的，就好像仅限于讨论引入打字机的社会影响——它们在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机械化工厂中被用于记录工人的工资和工作量，而忽略了打字员一样”。

[40] 库玛尔（Kumar, 1983, 16）对英格兰工人阶级的“非激进化”给出了类似的解释：“宪章运动的失败大大挫伤了工人的士气，加之雇主在几个产业中最终成功地打破了行业工会对工作组织和模式的控制这一事实，由此产生了大量不问政治的工厂劳动者，他们将对未来的最大希望寄托于行业工会为他们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上”。

[41] 提到英国，穆森（1976, 355）论证道：“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并不存在持续的、统一的和具有阶级意识的‘群众运动’，‘新的工人贵族’也不是在世纪中期突然出现的。在变化是连续和渐进发生的意义上，1850年左右也不存在大的中断，而是保持了某种连续性，”。谈及德国，康策和格罗（1971, 1: 159）提到，“从组成人员、意识形态和在较小程度上从组织形式看，工人阶级运动保持了连续性，由此民主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保持了连续性”。谈及美国，霍格兰德提到在19世纪50年代：“被剥夺了普遍的和激励人心的理想，甚至没有创办一份劳工的报纸来引起全国的注意，熟练工匠沉下心来，决定借助长期存在的和排他性的组织，继续从事冷漠的商业来为自己赚取更多的报酬”。

[42] 就法国而言，见莫斯（1976, 8）：“法国的劳工运动并不是在工厂工人中，……而是在熟练的手工匠人中兴起的，他们像工资劳动者一样从事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也见西维尔（1974, 81），他在对马赛的研究中指出：“各种手工业中几乎一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劳工组织，通常要么是手工业行会、要么是互助协会，直到19世纪60年代工会（chambressyndicates）被赋予合法地位时。……相反地，我并没有发现有证据证明在任何无产阶级从事的行业中存在着劳工组织”。就德国而言，见吉尔里（1976, 298）：“那些在19世纪60年代构成工人社团和协会成员的主要是熟练工人，它仅涉及一个相对小的范围，肯定不是从集中工作的非熟练劳动力中吸纳成员的”。也见科卡（1986, 314）：“熟练工人是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只是就美国而言，我们得到了稍微不同的说法：“到19世纪50年代，有更多的人在为工人阶级中的非熟练工人说话，有更多的人将自己等同于工资劳动者”（Bridge, 1986, 177）。但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并没有对自由的白人工人阶级进行特别的镇压。

[43] 他提醒我们（1984, 99），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德国“新兴的社会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明确抨击工匠和手工业者的传统，并怀疑技师和熟练工人的忠诚，因为他们正确认识到，这种传统和忠诚是严格地局限于行业范围的，是狭隘地忠诚于小团体，由此阻碍了他们试图推动的广泛的和全面的阶级团结”。

[44] 他提出的因果顺序（1974, 99-100）如下：在第二帝国镇压工人组织期间所取缔的组织都是由马赛的本地人、天主教徒和保皇党成员建立的社团，这导致沙龙文化的兴起，依次又为“手工业者中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他论证，“工人阶级”的兴起“既是文化变革、又是政治变革”（p.106）。

[45] 见克里格尔（Kriegel, 1979, 607）：“从本质上看，国际工人协会是由于不同利益的

暂时一致而产生的，…… [对英国的工会会员而言，它似乎] 对阻止破坏罢工者进入英格兰或外国工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工作而产生的竞争有用。法国工人正在寻求一种发展模式。他们对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并不确定：是同资产阶级的共和派联合进行反对帝国的政治斗争——帝国在实行独裁统治和寻求群众支持之间徘徊不定？还是进行反对雇主的经济斗争——雇主被英格兰人发起的新竞争惊呆了，未能很好地适应法国经济正在迅速发生的转型？……这样一种英法对话的伟大作用就在于为这种新的联合提供了具体目标”。范·德·林登（Van den Linden, 1989）指出了国际工人协会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组织所固有的问题，即它的成员主要由工会组成。例如，他指出英国各工会在1867年之后退出国际工人协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不再需要它的帮助去阻止在英格兰雇佣外国人以破坏罢工，以及在罢工期间给予它们以资金上的帮助，而这又是因为它们已经在全国层面上稳固地联合在一起。

[46] “几乎在所有地方，劳工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在以某种令人震惊的或令人惊奇的速度发展，至于是震惊还是惊奇取决于人们的视角。……无产阶级正在加入它自己的政党”。

[47] 见吉尔里（1981，109）：“欧洲工人阶级似乎确实放弃了为罢工而筑街垒和为争取和平组织权利而进行起义的做法”。

[48] 在即将宣战的时期进行的模糊争论见豪普特（Haupt, 1965）。基本的论点是几乎所有政党都承诺拒绝参与战争，但几乎每个人都投票支持战争。公众立场的转变是在几天之内发生的。克里格尔和贝克（1964，123）以如下方式解释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似乎只不过是现代形式的雅各宾主义，当国家处于危险中时，‘伟大先辈们’的声音压倒了社会主义理论，后者很难同当时直接面对的情势相协调”。肖斯克（Schorske, 1955，284）将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解释为“只不过是一种清晰的发展线索的合逻辑的结果，其中在党内对关键权力位置的掌握在之前的10年间就已经转移到修正主义者的手中”。实际上，在谴责战争上，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唯一的。在战争期间的1915年，巴尔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布加勒斯特开会，它们既谴责了战争，同时也谴责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支持战争的事实。它们提到“国际的耻辱”（Haupt, 1978，78）。

[49] 类似地，吉尔里（1976，306）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很明显，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早期的激进主义是被夸大的；这对通常主张的该党被资产阶级化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50] 尽管又一次镇压在巴黎公社之后发生。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公社之后不复存在，部分就是因为这次镇压。英格兰的成员组织之所以退出是为了将自身同总委员会（the General Council）出版《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脱开干系。法国政府发起了谴责国际工人协会要对公社负责的运动，后者的起因和行动几乎同协会无关。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Forman, 1998，61）。

[51] 辛顿（1983，77）估计，甚至在1884年英国进一步扩大选举权之后，也只有2/3的成年男性有资格投票（由于对户籍的要求和对靠救济生活的人的排斥）。穆尔豪斯（Moorhouse, 1973，346）断言，在1918年之前，只有一半的男性工人阶级有选举权。不过辛顿提到，尽管有

选举权的人所占的比率尚不理想，但在1884年之后，“扩大选举权从未成为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中心问题”。罗斯（Roth, 1973, 35）坚持认为，俾斯麦将扩大选举权视为是“为保守的群众提供投票权来反对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也许同样是狄斯雷利的考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格罗（1973, 27）将1867年德国扩大选举权视为某种可以由“德国宪政体制”的特殊性来加以解释的现象。

[52] 但也见布里奇斯（1986, 192）有关美国的论述：“在强调选举权具有重要性的同时，也应该做出一些具体的说明。正像莱因哈特·本迪克斯所做的那样，我这里并不是说，由于获得选举权的‘补偿’，美国工人相比其他地方的选民对工业化的抱怨较少。……我要论证的是，当工人拥有政治目标……、被赋予选举权和成为城市少数群体时，他们必然会被吸引参与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这些行为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意识和他们的文化”。

对文化的影响也是朗格维舍（Langewiesche）关注的对象：“如果人们将德意志帝国的社会和文化界定为‘资产阶级的’，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影响下的劳工运动就将成为一种使自身资产阶级化的工具。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将加强这些文化组织，信奉社会主义的专家将提出他们崇高的计划，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他们在促进文化发展上所做的努力。恰恰相反，他们相信，他们不是在为一种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而是在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努力，而德意志帝国的阶级制度阴谋阻止他们获得民族文化的遗产”。

[53] “之所以说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的‘新工联主义’是新出现的，主要是因为它将工会作为一种重要力量予以创建，它们在此之前一直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手工行业中发展的”。另一方面，G.D.H.柯尔（1937, 21-22）选择为英国旧工会所具有的“非常浓厚的斗争精神”辩护。“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工会的领袖绝非是社会主义者，我完全同意；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宪章运动。他们绝非是革命者，我也同意；但不持有革命主张是一回事，接受资本主义哲学是另一回事”。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其中一种加速新工联主义出现的因素，那就是由狄斯雷利在1875年通过的两个法令，它们事实上通过将工会从密谋法中排除出去从而赋予工会以合法地位，即允许设立监视破坏罢工者的纠察线和废除对违反合同者的监禁。相比自由党政府在1871年以前通过的立法，这些法令明显更能使工会得到发展（Hinton, 1983, 22; Pelling, 1976, 66, 69）。再次地，正是保守党所做出的妥协使自由主义的理论得以贯彻。

[54] 辛顿对这次发展高潮之所以昙花一现的解释在于，“新工联主义在1889~1890年的成功依赖于充分就业、警察乐于容忍工人的积极纠察行为，以及并没有遭到雇主的一致反对。所有这些条件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55] 但辛顿（1983, 60）指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的发展并不是代表了工人的斗争精神扩展到政治方面，而是一种对工人经济斗争遭遇失败的反应，即在经济斗争失败的地方寻求新的政治解决方案。在其背后隐含着工会组织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

[56] 或者正如霍布斯鲍姆（1949, 133）所指出的：“因此像一度曾与之斗争过的‘旧工联主义’一样，‘新工联主义’在1889年时也变得进退两难；其领袖的政见也相应地做出改变。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地为更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所取代”。

[57] 见加斯顿·马纳科达（Gaston Manacorda, 1981, 185）：“在德国，两者分离的时刻正是社会民主主义诞生的时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在这个问题上模糊的。见摩西（1990），就工会的作用和它们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可以从马克思的著述中得出相互矛盾的解释。

[58] “模范政党”一词是豪普特（1986）的著作第3章的题目，在这一章中他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东南欧各政党的影响。费伊（1981, 187）指出，俄国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甚至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梦想”都是“在俄国仿效德国的模式，在组织方面和在工会同政党的关系方面均是如此”。

[59] 同其他一些学者的“错误”主张相反，卡尔森（Carlson, 1972, 3）论证，在德国存在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不像拉吉奥涅里（Ragioneri），他在某种意义上根据它们自身的行为、尤其是1878年产生适得其反结果的刺杀企图来解释19世纪80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衰落的原因（chap.8）。此外，工业化消灭了“不满的手工业工人”阶层（p.395），他们构成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主要成员。拉吉奥涅里的观点能够同这些观点相结合。

[60] 罗斯（1963, 165）将这种情况的出现解释为主要是“对帝国僵化的权力和阶级结构，以及劳工运动的孤立和软弱的反应”。肖斯克（1955, 3）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对俾斯麦对它们实行“镇压”的反应。“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理论是19世纪90年代的产品，“正是在这一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倾向和派别之间开始就它的确切性质展开争论”（Hobsbawm, 1974, 242）。

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最终分裂是在这一时间发生的。1880年，在提及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时，一位社会民主党代表威廉·哈塞尔曼（Wilhelm Hasselman）——他是一位布朗基主义者——指出：“在议会中清谈的阶段已经过去，采取行动的阶段已经开始”（cited in Bock, 1976, 42）。在1891年埃尔福特代表大会之后，无政府主义派正式退出社会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已经落入“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后者想要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但他们组建的新组织独立社会主义者协会（the Verein der Unabhängiger Sozialisten）并没有获得发展，很快就解体了（pp.68-73）。1893年在苏黎世，第二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16票对2票通过决议将无政府主义者开除出国际，并决定只接纳那些“承认……采取政治行动必要性”的组织，正如倍倍尔（Bebel）在大会上所明确界定的那样。在1896年召开的下一次伦敦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成功地推动大会通过了一个进一步的规定。第二国际的成员组织必须承认“立法和议会活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手段”（Longuest, 1913, 27, 35）。

[61] 见倍倍尔在埃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资产阶级社会正在积极地促成它自身的灭亡；我们只需等待掌握权力的那一刻，它就会不知不觉地从他们的手中滑落！”（cited in Mathias, 1971, 1: 178）。正如霍布斯鲍姆（1987, 134）提醒我们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并不必然等同于“革命”学说：“在1905年到1914年之间，在西方，有代表性的革命者很可能是某种类

型的主张革命的工会主义者，他们——自相矛盾地——拒绝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些政党通常会利用它作为不努力去发动革命的借口。这对能够做多样理解的马克思而言是有些不公平的，因为就西方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在它们的旗杆上擎起马克思的大旗，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它们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又是那么的有限。它们的领袖和激进分子的基本信念通常无法同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激进派或雅各宾左派区分开来”。

[62] 马赛厄斯甚至更进一步。他指出，他们“最终承认帝国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一种无法撼动的现实”。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有意识“承认”这一点的，而且在这个时代他们肯定不是如此。但实际结果也许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63] 格罗（1973，36）喜欢这种说法（指“消极的融入”——译者注），指出它同一种“革命者等待革命来临的行为模式”存在相关关系。艾希里在1904年就已经观察到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基调（cited by Marks, 1939, 339），他将之归因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但马尔克斯（Marks）相信这种观点过于简单，他在“社会民主党依赖它在劳工官僚阶层中的同情者那里，以及在党员的组织成分中”找到了改良主义的根源所在（p.345）。梅尔（Maehl, 1952, 40）指出，结束迫害导致社会民主党集中于一些“实际工作”，由此导致该党“远远偏离激进的阶级斗争”。

[64]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坚持认为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首要性，“盖德派明确否定将革命理解为起义。……在法国工人党的政治纲领中，[新社会在旧社会的母体中发展和成熟]本身就构成革命性的社会转型”（p.260）。

[65] 盖德谴责了这种行径，但并未得到国际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在这个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盖德的立场前后是非常一致的。他一直在谴责“共和神话”，他用一种不同的“以资产阶级进行镇压的编年史为[基础]的历史来替代这种有关自由的编年史，前者是以血淋淋的历史纪录展现的，从1791年的广场惨案（the Champ de Mars massacre）一直到1891年的富尔米（Fourmies）杀戮。工人阶级在整整一个世纪长的时间里所做出的牺牲，对在此期间统治的共和政权提出了社会主义式的控诉”（Stuart, 1992, 228）。

[66] 普罗卡奇（1972，332-374）描述了在屠拉蒂（Turati）和拉布里奥拉（Labriola）之间展开的一场没有结果的争论，他们是就意大利社会主义党是否应该参加政府和是否应该寻求从意大利的发展中获得利益展开争论的。他指出，作为政治发展的“后来者”，意大利党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够利用复兴时代（Risorgimento）的大部分民主遗产。……它的后发性是它的优势所在”（pp.74-75）。但意大利的“后发性”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意大利的运动并不是唯一从较早期激进的、非社会主义的传统中汲取养分的运动。同样的情况明显也适用于英格兰，但它绝非是一个“后发”国家。我认为，布兰尼（Belloni, 1979, 44）更接近真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党（Partito Sozialista）而言，“革命在它的纲领中是一个确定的和毋庸置疑的组成部分，它规划了一种没有明确规定的、而且足够遥远的未来，以致事实上不会对中短期的政治运动和战略产生很大的影响”。

[67] 见康芒斯（Commins, 1918, 1: 13），他如此描述了劳工骑士团（the Knights of Labor）在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动荡中所起的作用：“该组织在此之前从未产生过如此广泛或深刻的影响。新的竞争领域、新的种族和民族、新的非熟练工人团体、新从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中招收的成员，都被暂时地吸纳到其中，它似乎已经形成一个组织，但更接近形成一支队伍，因为其成员数量的变化是如此之快。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它登记在册的成员人数达到75万人，有100万或更多的人参加它的集会，但很快就退出了”。谢夫特（Shefter, 1986, 272）提到城市的各种政治组织：“它们将存在分歧的种族和社区都组织进政治运动中，将加入工会的熟练工人、工会拒绝接纳的非熟练工人，以及中间和上层阶级的成员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这些组织在它们所发起的运动中表现出了某种斗争精神……类似于与它同时代的工会所表现出的斗争精神，尽管它们进行斗争所代表的集团和所针对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

[68] 的确，当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强迫加里波第突然中止对英格兰的访问时，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骚乱以致格莱斯顿“试图通过公开呼吁扩大工人阶级的选举权来重新获得支持”（Collins, 1964, 24）。

[69] 在1905年，“例如，卡尔·伦纳（Karl Renner）‘谴责了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怯懦，他们开始对马扎尔人（Magyars，指匈牙利人——译者注）的分离主义计划予以默认，尽管匈牙利市场对奥地利资本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摩洛哥市场对德国资本的重要性’”。他同“[匈牙利]城市的敲诈者、骗子和政治煽动者的叫嚣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认为他们反对奥地利工业、奥地利工人阶级和匈牙利农业人口的利益”（cited in Anderson, 1991, 107）。

[70] 琼斯（1983, 181-182）强调了不关心政治的因素。在讨论19世纪最后1/3时期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心态时，他指出：“如果工人阶级并没有积极支持侵略主义的话，那么能够毫无疑问地认为它会消极地予以默许。……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未能对伦敦的工人阶级产生任何深刻的影响，这是有更深层原因的，而不仅仅是主观努力不够的问题。……在庆祝布尔战争中的马弗京（Mafeking）大捷和庆祝其他帝国主义扩张行径中所表现出的，与其说是在伦敦工人群众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种错误的政治见解，不如说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诸如此类的政治活动。人们普遍认为，那时在政治上积极的工人要么是激进分子、要么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忠诚是漠不关心的产物”。但当然，漠不关心是被纳入到民族国家之中的结果，由此至少是被动地接受对其他人的排斥。

[71] 但也见哈特曼的评论（Hartmann, 1976, 155）：“男性工人将妇女就业视为对他们工作的威胁，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工人之间的竞争是现存经济体制的特征所在。妇女被支付较低的工资加剧了这种威胁。但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是试图排斥妇女、而不是将她们组织起来，这无法由资本主义、而可以由男性在男女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来加以解释”。

[72] “男人必须养活女人”的原则事实上隐含着另一层意思。的确如此，人们认为，男人必须赚钱，女人用这些钱来满足生活的需要。但辛顿（1983, 32）提醒我们，对19世纪的男性工人而言，妇女并不应该外出工作，以使她能够“将家庭营造为身体获得舒适和情感得到抚慰的场所”，这既是对男人，当然也是对孩子而言的。

原则是重要的。但年轻的未婚女性具有合法工作权利的观点在各处都被承认。不过，让我们考察一下它在19世纪晚期的日本是如何被证明具有合理性的：“相比任何其他群体，政府和资方对在纺织厂工作的年轻女性的看法是他们对女性工人的典型看法。她们不是工人、而是‘女儿’或‘学生’，她们在结婚之前要花几年的时间为家庭、为国家，以及为工厂工作。不签合同和缺乏技术使下面两种做法具有了合理性，一是向此类劳动力支付低工资，二是她们工作的特点是非全日制或零工性质的”（Sievers, 1983, 58）。

[73] 但也见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弗里茨·布鲁贝克尔（Fritz Brupbacher）在1935年所做的尖刻分析：“倍倍尔写了一本好书。……但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只是为礼拜日提供了一种方便的点缀，或如果某人必须在党的盛大节日上[3月18日（庆祝法兰克福议会在1848年的召开）和5月1日]发表演说时会提到的。但在工作日，人们会远远避开这种社会主义。工作日不会关注用于礼拜日的社会主义。那是一种适用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社会主义”（cited in Frei, 1987, 56）。

[74] “现在正如第三共和国新一代的温和政治家希望利用巴黎公社的暴力和骚乱——恐怖的6月——来消除人们对共和主义的记忆一样，女权主义者也同样渴望消除人们将女权运动同政治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记忆。……由于早期在这两种运动之间存在着联系，所以在法国，主流的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选择一种稳健的和温和的发展道路——甚至描述为怯懦的也许更贴切，但这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McMillan, 1981b, 84）。

[75] 但并不比克拉拉·蔡特金的观点更深刻。柯伦泰（1971, 59-60）非常明确地指出：“不管女权运动的要求是多么的激进，但人们决不能忽略下述事实，即由于她们阶级地位的局限，女权运动不可能是为了根本改造当代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斗争的，而没有这种根本改造，妇女的解放不可能是完全的”。

在意大利也同样，尽管安娜·孟佐尼（Anna Monzoni）坚持认为，必须在社会主义政党之外同时设立一个支持妇女解放的组织，如果社会主义者不理解这种做法，那是因为“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一种新形式的反女权主义”。但安娜·库里斯齐奥夫（和上面提到的同她的伴侣菲利普·屠拉蒂就妇女选举权是否重要的问题展开争论的是同一个人）却反对一种“跨阶级”的组织，她指出，即使有“争取妇女解放的明确目标”，这种组织也是无法接受的（Bortolotti, 1978, 105）。

[76] “他们论证，结束妇女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消灭所有权本身。相比沃斯通克拉夫特（Woolstonecraft）提出的方案，它肯定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案，但在某种意义上，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方案是她和其他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求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77] 第一期创刊评论的题目是《妇女的传道者》（*Apostolate of Women*）。开篇为，本刊旨在“引起妇女的关注”，“当所有人都在迫不及待地追求自由，当无产阶级正在要求选举权时，我们妇女难道就应该在这场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伟大的社会解放运动中消极无为吗？……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权利所在；我们的力量所在。我们拥有我们的吸引力、拥有我们的魅力，这是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让我们去认识如何运用它吧”（Adler, 1979, 41）。她将她的名字改为贞

德-德西雷 (Jeanne-Désirée)。

[78] 布格莱 (Bouglé, 1918, 106) 评论道：“在1848年的战火中，这种结合成为一种消弭各派冲突的结合”。他同时指出，“以不同形式，圣西门主义的这种先见之明甚至影响到和我们同时代 [1918年] 的主张妇女参政权的人” (p.110)。

[79] 不过，佩罗提到，这个词只是随着1892年法国女权主义协会联盟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Sociétés Féministes) 的创立才被人们习惯使用。

[80] 在他的著作《法国的女权主义》 (*Le féminisme français*) (1907, 1: 10; cited inAbray, 1975, 43) 中，图尔戎 (Turgéon) 宣称他在傅立叶的《四种运动的理论》 (*Théorie des Quatre Vents*, 1841) 中发现了这个词，但奥芬 (Offen, 1987b, 193, 193, n.4) 说她并没有在那里发现。奥芬只是同意，这个词“不为人知的”起源早于1872年。摩西 (1992, 80-81) 在傅立叶的所有著述中并没有找到这个词，指出它首次在重要场合使用是1885年在奥克莱尔创办的《女公民》 (*La Citoyenne*) 杂志中。

[81] 蒲鲁东说女权主义“有娼妓的味道”，称女权主义为“淫妇专政”。但他反过来也被称为“迷恋男权道德的农民” (Thibert, 1926, 171, 185, 190)。

[82] 针对这种巨大的差距，于贝蒂娜·奥克莱尔在1879年以她著名的宣告来作为回应：“男人利用法律来为他们谋利，而我们却在沉默中忍受屈辱。我们已经忍无可忍。社会的贱民们，站起来吧！” (cited in Bidelman, 1982, xiv)。

[83] 霍布斯鲍姆 (1984c, 93) 指出，“19世纪工业化的一大悖论就是它倾向于扩大和加深在 (无偿的) 家务劳动和 (有偿的) 家外劳动之间的性别劳动分工”。但这为什么构成一种悖论？

[84] 罗博特姆 (1977, 47) 论证了在性别领域和经济结构之间的联系：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原子化个体的模式要求情感上的支持来赋予它以凝聚力，当然这种情感支持要控制在适当的程度上。否则的话，资产阶级的个体就会被置于一种霍布斯式的世界中，这种世界将在它自身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分裂。维多利亚时期的中间阶级发现他们的情感能够在他们穿着裙装的女性伴侣那里得到抚慰。当然，并不仅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中间阶级能够由此而得到抚慰。佩罗 (1986, 99) 提到，“在20世纪初，男性意识在法国表现为一种阶级向度。……工联主义被资产阶级以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接管，后者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男性的专属空间”。我自己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比20世纪初早很多。

[85] 奈 (1993, 47) 主张，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这种性别划分是在1789年~1815年时期得到法律承认的，并将这种划分同科学理论建构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医学科学家对男性和女性的生物医学模式进行了建构，使性别‘自然地’适合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和家庭角色。由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根据性别区分的身体特征被如此地加以建构，以致它们既是‘相反的’、又是‘互补的’。因为资产阶级世界的公共和私人领域划分的是如此界限分明，所以只有完全不同的两类

人才能分别占据它们”。

[86] “个人主义为将各种自由主义运动（反对奴隶制的组织、民族主义协会、道德改良运动、社会改革协会、各种政党等等）同新兴的有组织的女权运动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这些联系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第一，似乎很可能……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早期女权运动的激进分子都是来自同上述的各种自由主义运动有着密切关系的家庭。……第二，这些和其他女性通常在自由主义的改革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妇女参与这些运动的共同经历使她们最初都拥有很高的斗争热情，但随后由于领导她们的男性对她们行动施加的各种限制，导致她们的幻想破灭”（Evans, 1977, 33）。

[87] “乐高弗‘有差别的平等’的口号为共和派组织的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设定了基调，他[在1848年]提出的改革方案，成为女权运动在第三共和国早期的纲领”（Offen, 1986, 454）。

[88] “由这种[法国]男子至上主义学派写作的著作和小册子论证，法国受到了可怕的外部势力的入侵、实际是传染（这些作者非常偏爱使用医学隐喻），外部势力包括犹太人、新教徒和共济会会员，他们都明显位列法国争取妇女权利运动的领袖之列。反对女权主义者论证，法国从本质上受到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威胁。以刺耳的语调，他们谴责了各种形式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帝国主义，其中女权主义是最应受到谴责的部分”（Offen, 1984, 662）。

[89] 卡萨利尼（Casalini, 1981, 17-18）论证，将妓女同男性犯罪相比较，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菲利普·屠拉蒂的立场归根结底同隆布罗索和费雷罗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同。更确切地说，它表明，至多只是存在“实证主义程度上的差别，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到更反动的达尔文主义”。

[90] 妇女运动对共和主义的忠诚并不必然是互惠性的。克莱曼和雷谢夫（1989, 57）将他们论法国女权主义的诸章节中的一章命名为“女权主义与共和主义：聋子的对话”。作为结果，于贝蒂娜·奥克莱尔在1889年写道，在庆祝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的场合：“妇女不应该歌颂男性的1789年，而应歌颂女性的1789年”（Auclert, 1982, 126）。她将创办杂志取名为《女公民》。也见德国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路易莎·奥托·彼得（Louis-Otto Peters）所使用的非常明确的语言：“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的斗争、而不是针对这种社会制度本身的斗争”（cited in Hervé, 1983, 19）。

[91] 例如，在俄国，直到1905年才出现有组织的女权运动，但当它确实出现后，它是一种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Stites, 1978, 191）。就印度的情况见福布斯（Forbes, 1982）。

[92] “传统的女权运动……最终将注意力集中在选举权上，将它视为妇女在西方获得解放的顶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选举权被视为女权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将政治平等视为一种手段，她们会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从事解放运动：女性投票人将投女性的票；妇女将实现她们所希望的改革，这不仅是为了她们自己的性别（法律、离婚、教育和其他方面），而且（通过论证妇女对各种问题反应灵敏，这有时同主流的女权主义者的言

论相矛盾)有助于民族的复兴,确保消灭诸如酗酒、卖淫和战争等罪恶”(Stites, 1978, xviii)。比德尔曼(Bidelman, 1982, 190)将法国女权主义者的主张总结如下:“如果对‘第一阶段’的政治问题不能一直给出自由主义的答案,那么就不可能有对‘第二阶段’的妇女问题的答案”。见杜博瓦(Dubois, 1978, 170)为这种战略所做的辩护:“得出如下结论是错误的,即就妇女为获得解放所做的斗争而言,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是一种无益的干扰,因为选举权并不能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但它是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首次发起的独立运动”。

[93] “自由主义的女权运动并非仅仅是附加在自由主义之上的女权运动。……女权运动要求——不管是多么含蓄和模糊——在性别类型上承认妇女是女性。……[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类型的成员被排斥在公民权之外。她被赋予的社会地位阻止她去追求由自由社会提供了可能性的个人成就”(Eisenstein, 1981, 6)。

[94] 尽管豪斯和肯尼(Hause and Kenney)宣称,这种影响在法国尤其强烈,因为女权运动并未“受到工人阶级经验的影响,像它在英国所受的影响那样”。但罗沃(1976, 61)将英国的情势描述如下:“早期的中间阶级的女权主义者从1866年以来就一直给予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以有组织的支持[争取妇女选举权全国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Women's Suffrage)]。相比同早期的改良协会或宪章运动的关系,它同反谷物法联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改良协会或宪章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工人阶级。作为反谷物法骚乱中心的曼彻斯特同时也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这并非完全是偶然”。佩罗(1988, 47)抗议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学将法国的女权运动视为明显不同于英国或美国的女权运动。至于德国,埃文斯(1976, 272)坚持认为,那里女权运动的两个主要特征在于,“它是自由主义的和中间阶级的运动”。

[95] 《传染病防治法》(*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是英国在19世纪20年代制定的一揽子法律的组成部分。就对这个问题和“在女权主义者与激进工人之间结成跨界联盟”的论述见沃克维茨(1982, esp.80-83)。

[96] 刘易斯(Lewis, 1984, 89)将后一种群体——即那些“承认妇女作为道德秩序自然卫护者的思想”的人——视为在使用福音派的语言(它以前是主张将妇女限制在家庭之中的),以“论证将母亲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家庭以外的合理性”。

[97] “很少有生育权的倡导者……仅仅是基于或甚至主要是基于妇女作为个体所应具有权利的理由,而不考虑社会、民族或新一代的福利就接受这种观点的。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女权运动——不仅仅是激进组织——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它的相对进步和勇敢、而不是因为它的保守性”(Allen, 1991, 204)。不过,问题在于,就这方面而言,“保守性”意指什么。麦克拉伦(Mclaren, 1978b, 107)指出了其中的模糊性:“早期有关生育控制的思想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它的‘进步’方面表现在它对妇女权利和医学上自救行为的兴趣;它的保守性表现在它坚持新马尔萨斯经济学”。接着,优生学家加入到争论中,这“将注意力从母亲的权利转向国家的利益;从劳动力的数量转向劳动力的质量”(p.154)。

[98] “争取妇女参政权的人之所以有可能参与[妇女戒酒]运动,是因为在这两种运动之间存在着具有一致性的地方。这两种运动不仅都是由妇女发起的和为了妇女的利益,而且它们都

维护妇女在公共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权利”（Blocker, 1985, 471）。

[99] 大体而言，在启蒙运动之前，内外科医生并不是非常受尊重的。尼比埃勒和福凯特（Kniehbiehler and Fouquet, 1983, 4）指出：“莫里哀证明了这一点”（1983, 4）。

[100] 当然，当这种转化没有发生时，情况也许更糟，因为在那时，“[女权主义者] 最顽固和最棘手的敌人是罗马天主教会”（Evans, 1977, 124）。

[101] 奈主要讨论了法国的情况。他指出，在那里，这种将社会不良行为归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的做法被用于解释1870年的战败，“根据这种方法来解释法国民族堕落后和人民软弱的根源有着完全是文化方面的目的”（p.xiii）。在论述英国和德国的第10章，他确实承认，“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其他地方”（p.320）。

[102] 但实际上，战争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在日本，1894~1895年同中国冲突的结果是“明显加剧了反女权主义的保守倾向”，促使政府鼓吹“妇女应该承担养育子女和支持政府政策的角色”（Siever, 1983, 10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的女权主义者“相对容易地从坚信和平主义转向在战争的组织 and 宣传上同政府合作”（Bigaran, 1982, 128）。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在法国发生（Klejman and Rochefort, 1989, 189）。韦拉科特（Vellacott, 1987, 95）指出，在英国，一旦战争结束，“三种‘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又重新披上令人炫目的光环。……就提出如下判断而言，和平主义者的确被证明是正确的，即一个军国主义的世界意味着妇女理想的破灭”。

[103] 富尔福德（Fulford, 1957, 33）提到个词：“就剥夺妇女的正当权利而言，并不存在什么难以理解的意图，因为在这些议员的脑子里从未有过存在这种权利的意识”。这突显了人们对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认识的根深蒂固性，女权运动正是试图消除这种认识。

[104] 稍后，斯坦顿在1868年1月15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革命》（*Revolution*）杂志上，题目为《谁是我们的朋友？》（*Who Are Our Friend?*）。在文章中，她指出：“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格里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和温德尔·菲利普斯异口同声地命令这个国家的妇女靠边站，旁观黑人获得拯救。温德尔·菲利普斯说：‘一代人实现一种理想’，并给出了它们在重要性上的排序。首先是黑人选举权、接着是戒酒运动、然后是8小时工作日运动、最后才是妇女选举权。按30年算一代的话，因此三代之后到1958年，菲利普斯和上帝才允许妇女选举权排上日程”（O’Neill, 1969, 117）。在美国，妇女选举权事实上是在1919年为法律所承认的。但正如卡特和舒勒（Catt and Shuler, 1923, 108）所指出的：“在通过赋予黑人公民权的第15条修正案（1870年3月30日）到1910年之间有40年，在此期间，白人妇女不间断地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等待机会、祈祷和共同努力，但终未获得成功”。当然，人们能够评论说，当美国的白人妇女在1919年获得选举权时，她们真的就获得了，而黑人男性（和妇女）直到1963年的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才真正获得选举权，而且甚至到那时，许多人实际上仍然继续被剥夺了这种权利。

[105] 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谴责了斯坦顿和安东尼同崔恩的

联合（Dubois, 1978, 187）。赫什（Hersh, 1978, 70）指出，这只是一种“短暂的联合”。但杜博瓦（Dubois, 1978, 95-96）论证，“由于求助于崔恩，[安东尼和斯坦顿]就赋予了反对女权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指控以实质内容，后者指控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只不过是民主党用于反对被解放的自由人的一种工具”。道格拉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支持者。他参加了1848年举行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到19世纪70年代他又重新支持妇女运动。“但在1866~1869年这一关键时期，他拒绝支持妇女运动”，认为将妇女选举权加入斗争目标会危及被解放的自由男性获得选举权，而后者才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Evans, 1977, 48）。

[106] 这种分裂状态最终在1890年结束，两个组织合并为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NAWSA）。不过，这些妇女领袖的政见并没有改变，这能够通过她们此后在劳工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予以证明。一般而言，对劳工运动持敌视立场，露西·斯通问道，为什么荷姆斯泰德的罢工者（Homestead striker）——在他们1892年同卡耐基钢铁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的斗争中——不“把他们的收入节省下来以创办他们自己的企业，如果他们对工作不满意的话”。另一方面，苏珊·B·安东尼则称自己为“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和劳工的朋友”，但像她对黑人选举权所持的立场一样，她宣称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前，她不会支持任何其他运动（Kraditor, 1965, 158-159）。

[107] 在美国，由于各移民群体对妇女选举权持敌视态度，所以妇女运动对它们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满。“在这个过程中……妇女的选举权一度曾是权利平等的表现，但现在却变成一种社会特权问题”。继就修正案产生冲突之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黑人的关系上。“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在南方，种族主义的言论被用于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这是很平常的事”（Banks, 1981, 141）。科恩（Cohen, 1996, 708-709）提到稍后一代女权主义者的主张，并评论道：“女权主义者通常假设，通过对妇女做出区分，白人妇女的种族主义破坏了她们自身的利益，而服务于白人男性的利益。然而，[美国]白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们通常是非常明确地反对非白人（或外国出生的）妇女和男性的要求的。她们的做法与其说是一种女权主义者在认识上的错误，不如说是一种反映和创造实际特权的政治策略”。

[108] “在英国，有组织的女权运动是在反对奴隶制情绪高涨的背景下诞生的，但它的发展得到巩固却是在群众狂热支持帝国主义的时期实现的”（Ware, 1992, 118）。“像帝国主义一样，女权运动是围绕承担道德责任的思想而加以组织的。用维多利亚时期的语言来表述，责任带有监管、阶级歧视、年龄歧视和等级的意思。……女权主义的言论并不输于帝国主义的狡辩，它主要关注于种族的延续、种族的纯洁性和种族的母性。这部分是因为它必须这样做。对妇女解放具有合理性的论证最具破坏性的一种攻击在于，它将使种族走向衰落”（Burton, 1990, 296, 299）。

[109] 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英国的女权运动也在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问题上发生分裂（Banks, 1981, 133-134）。在俄国，在1861年农奴获得解放之后，“妇女对她们地位的敏感性很快就使她们认识到5千万文盲农奴（两年之后在美国是4百万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同她们自身未能获得解放形成鲜明的对比”（Stites, 1978, 43）。尽管如此，但斯蒂茨强调，尽管俄国在1905~1917年之间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也许并不对普选权感兴趣，……但在各处都不可能听

到任何同像卡特、斯通和斯坦顿这样的美国人对劳工、黑人和‘下等人’所持的尖锐敌意相对应的抱怨”（p.228）。这种类型的女权主义观点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一位明显处于上层阶级地位的菲律宾女权主义者写道：“我的司机、厨子和男仆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但却拥有选举权；政府为什么不能允许我和一般的菲律宾妇女拥有投票的权利？”（cited in Jayawardena, 1986, 155）。

[110] 然而，更糟糕的是，德国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貌似更激进派别的一位领袖埃尔斯·林德斯（Else Linders）公开反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Evans, 1976, 167）。

[111] 在近50年之前，即1854年6月，发生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排斥事件，这次是由激进地反对奴隶制的（白人）男性对（白人）妇女采取行动。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反对奴隶制大会的第一天，大会花了一整天时间来讨论是否应该给予美国妇女以代表席位。最终，大会投票以压倒多数决定不能给予她们代表席位。“在会议的剩余时间，她们被迫坐在一个幕布后面，‘类似于那些被用来将唱诗班隔开以免公众注视的屏风’”（Ware, 1992, 82）。

[112] 在一封写于1896年11月23日给一位白人改革家埃德娜·D·切尼（Edna D.Cheney）的信中，华盛顿夫人写道：“我不可能告诉您我的感受如何，因为维拉德小姐已经提到亚美尼亚人的问题，不是说她不应该这样做，而是这些人对这个国家并没有提出特别要求却赢得了北方妇女的心，而有色人种妇女却被完全忽视，这都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布克·华盛顿在她为亚特兰大博览会（Atlanta Exposition）所做的演进中强调：“对那些白种人而言，他们将那些在外国出生、有着奇怪方言和习惯的人的到来视为南方繁荣的原因所在，如果允许我重复我对自己种族的同胞所说的：‘既来之，则安之’”。一份黑人刊物《妇女的时代》（*the Woman's Era*）的编辑甚至更进一步指出：“那些逃离他们的祖国，在这里寻求庇护的外国人是厚颜无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罪犯和叛国者，他们来到这里时间并不长就加入到反对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公民的叫嚣中，这是无法容忍的”（Moses, 1978, 112-113）。

[113] 林德霍尔姆（Lindholm, 1991, 121）论证，妇女获得的利益“从实际结构变迁看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由此他称瑞典的女权运动是“保守的革命”。奥尼尔称他的书（1971, viii）为“一种对女权运动为什么失败的研究”，指出争取选举权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p.48）。在她有关美国女权运动的书中，布尔论证（Buhle, 1981, 318），“女权运动一旦作为一种有活力的力量，就会被狭隘地归类为职业女性个人主义化的追求”。

[114] “如果做更仔细的考察，人们就能发现，从16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是各种思想汇集的一个巨大熔炉，从中产生了一些基本论点，它们被用作支持有色人种作为劣等民族命题的关键证据”（Poliakov et al., 1976, 52）。

[115] “从‘种族’一词在几种欧洲语言中的发展来看，它在现代早期是一个内涵非常不稳定的词语。……在这个时期的开始时，西班牙语的*raza*、葡萄牙语的*raca*、或法语或英语的‘*race*’都是从不同方面指代血统或世系概念，正如在高贵的（或《圣经》里的）‘种族和血统’的意义上所使用的那样，甚至在它在西班牙被用于指代摩尔人和犹太人或最终内涵被扩展意指在身体和外形上存在差别的意义之前就是这样使用的，这成为后来形成有关种族主义和种族存在差别的

话语的基础”（Hendricks and Parker, 1994, 1-2）。

[116] 见巴里巴尔（Balibar）和沃勒斯坦的争论，1988年，第10、11章。

[117] 诺曼枷锁理论是指1066年的诺曼征服剥夺了盎格鲁-撒克逊居民作为“自由和平等公民”的遗产，人民所做的斗争就是要重新恢复这些古老的权利。在1651年制作的共和国国玺上，镌刻着自由是“根据上帝的意志恢复的”。正如希尔（1958, 67）所提到的，这种理论“同时也激起了英格兰人的爱国主义和英格兰人的新教精神这些更为深刻的情感。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

[118]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高卢族被等同于资产阶级（由此等同于“人民”），而法兰克族被等同于“贵族”（Poliakov et al., 1976, 69）。他们引用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s）、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孟德劳席尔伯爵（Comte de Montlosier）较早期的论点。基佐后来明确使用这种区分作为他努力论证法国大革命具有合理性的组成部分，这种合理性是对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事业而言的。“如果七月革命标志着一种政治目标的实现的话，那是因为它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法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它同时也标志着高卢人的法国观念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Poliakov, 1974, 32）。在整个19世纪，这种高卢人的观念被用来论证对法兰克人（德国人）、拉丁人（意大利人）和闪族人（犹太人）持敌视态度的合理性所在。西蒙（1991）称这为一种“凯尔特文化”。

[119] “种族主义观念的根源实际上是存在于阶级意识形态中、而不是在民族意识形态中：它首先起源于宣称统治者具有神圣性，宣称存在‘高贵’血统或‘普通’血统，以及宣称贵族具有教养。因此，现代种族主义公认的祖先不应该是某个小资产阶级、而应是戈宾诺伯爵（comte de Gobineau）约瑟夫·亚瑟（Joseph Arthur）”（Anderson, 1991, 149），这丝毫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120] 像现代世界的所有极右翼思想家一样，勒庞 [1978 (1894), 9-10] 似乎相信，个体和种族平等的思想事实上将统治世界。“对群众非常有吸引力，这种思想最终将牢固地植根于他们的心理之中，而且很快就开始见成效。它撼动了旧社会的根基，引发了最可怕的革命，并将西方世界卷入到一系列的暴力动荡之中，其结果不可能加以预测”。

[121] “诸如‘无产阶级’、‘危险阶级’等词语和概念经常出现在19世纪上半期的话语和思想中。这些令人恐惧的、负面的、野蛮的印象迫使工人为自己做出定位，要么使这些负面形象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要么更常见地将自身同它们区别开来。工人有时会突出自己的一些负面特征，例如宣布他们自己会在星期一旷工、酗酒、打架、说脏话；在这方面，工人阶级的至上主义类似于非洲黑人传统的自豪感。换种说法，……他们希望证明自己同人们的印象是截然相反的。……有必要展示自己的一种正面形象，以反对那些否定它的人；认同本身是在这种冲突中、在这种同对手的关系中形成的”（Perrot, 1986, 95-96）。

[122] 霍布斯鲍姆将欧洲地位最高的时期确定为19世纪的第三个1/4时期。这种观点为20世纪的一部重要的论种族主义的著作《有色人种反对白人对世界统治的趋势不断增强》（*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Supremacy*）所赞同，它的作者劳斯罗普·斯托达德

(Lothrop Stoddard) 指出 (1924, 153): “1900年.....是白人对世界持续400年统治的最高峰。在这一刻, 白人站在了他权力与声望的顶点。短短4年之后, 日本的大炮就掠过旅顺港的上空, 这向被震惊的世界宣告白人统治衰落的开始”。

[123]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位学生指出: “他经常告诉我们, 牛津的神学家对英格兰所做的, 就像基佐、维叶门 (Villemain)、米什莱、库赞 (Cousin) 稍早对法国所做的, 他们提出、扩展和深化了欧洲历史的问题和意义; 他们提醒我们, 历史是欧洲的历史; 如果仅仅将它视为地方性的, 那就难以对它做出理解” (Morley cited in Hammond and Foot, 1952, 25)。德拉康帕涅 (Delacampagne, 1983, 200) 试图否认, 欧洲的种族主义能够由帝国扩张、阶级斗争或资本主义来加以解释, 而可以由“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特征, 即它完全不能容纳异说”来解释。他认为这种不能容纳异说源于欧洲有关普适价值的主张。但这种观点简单地是用本质论来反对欧洲对本质论的歪曲, 无益于对19世纪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做任何历史性的理解。

[124] 曼纽尔 (p.176) 援引圣西门的话: “对人民而言, 由欧洲种族——它要优越于所有其他种族——所统治的世界将全部开放供人们旅行, 使它成为像欧洲一样适合居住的地方, 通过这种事业, 欧洲议会应该继续参与欧洲的事务, 并一直保持其扩张的势头”。曼纽尔补充道, 就欧洲而言, 圣西门意指西欧, 尤其是英格兰、法国和德国。曼纽尔 (p.401, n.11) 将圣西门号召对野蛮而无序的种族进行远征视为类似于博纳尔的观点, 即现代国家的德行就在于它终结了封建诸侯的争斗。

[125] 当然, 英国人也是如此。“甚至粗略地浏览一下1890年之后 [英国的] 政治演说.....就能认识到, 在解释民族以及国际问题时, 人们愈来愈多地使用‘生物学’词汇; 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当然是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1898年] 所做的有关‘垂死的国家’的演说” (Mock, 1981, 191)。

[126] 她提到这种混淆是如何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种新现象的。在18世纪, “进化 [是] 一种社会机制的内部现象”, 导致差别的原因“要么是地理方面的、要么是心理方面的、要么是纯粹社会机制方面的, 但在所有情况下都同生物学无关” (pp.24-25)。类似地, 刘易斯 (1978, 74-75) 也论证: “当它的所有局限性都被提到时, 下述论断仍然是可信的, 即 [18世纪] 作为‘理性时代’的声誉并非浪得虚名。它以真正好奇的精神准备和渴望认识非欧洲的种族。而且它无疑往往对这些种族给出浪漫化的认识。.....它愿意倾听不同种族的声音, 承认非欧洲文明有着欧洲所缺乏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使这种状况发生转变的是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普适价值和公民权所面临的两难境地。

波里亚克夫和其他人共同撰写的书 (1976, 67) 也将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和博爱原则的对立面——他们指出, 那时很少被注意到——是“新的科学思想, 它倾向于强调生物学因素的决定作用。它用新的分类来取代过去用宗教和文化所做的分类, 而新的分类源于对身体特征的观察 (肤色等)。这些特征被视为无法改变的, 并被认为会影响到所涉及的个体的行为”。当然, 波里亚克夫 (1982, 53) 同时指出, 种族主义“在其现代形式上, 作为一种由科学予以支撑的价值判断, 可以追溯到18世纪”。乔丹 (1968, xiii) 提到在美国发生的同样的转变: “相比 [美国] 革命之前, 似乎使在革命之后有关黑人性质的争论变得尤其不同

的是，对人类差别进行解剖学研究的兴趣，以及根据手术刀和卡尺来解释这种差别的普遍兴趣在1775年之后的欧洲和美国都迅速增加”。

[127] “由科学支撑的种族主义产生影响的真实程度能够以下述方式予以最好地把握，即考察它对通常不被视为它的支持者——即对科学家中的自由派——的吸引程度来予以把握”（Barkan, 1992, 177）。他特别援引了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例子。波里亚克夫（1980, 55-56）提到伏尔泰、康德（Kant）和布封（Buffon）在为这种思想奠定基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公民自由的伟大象征，伏尔泰很明显是反对黑人和反对犹太人的。

[128] 科恩（1980, 233）认为：“到19世纪50年代，多元起源说已经席卷整个法国”。乔丹（1968, 509）指出，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方，“一个规模小、但声音大的人类学的‘美国学派’尖锐地反对人类起源的一元说，与此同时，反对他们的神职人员在为《创世纪》的辩护上却愈加僵化和教条”。就多元起源说在英国的情况见斯特潘（Stepan, 1982, 3）。

[129] “当面临明显无法改变的种族差别时，一种最适合世界主义意图的开明立场也可能受到损害。这种立场由于就人性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所持的模糊认识和争执而受到损害，而且也经常被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思想所击败，后者使最具启蒙运动色彩的理性观念同下述政治方案形成共谋关系，即依据‘种族’来对世界做出分类和运用种族主义的范畴来对历史运动做出解读的政治方案。同一种有关人类生活具有统一性的缺乏说服力的认识相似，这种结合也将为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半信半疑地加以继承。的确，我们能够说，只是随着纳粹和它的盟国在20世纪中期的战败，前一时期完全为人们所信赖的人种学才被暂时地予以唾弃。在此之前，甚至那些对帝国主义的胡作非为和殖民扩张主义持有异议的主张也必须同有关‘种族’、民族和文化的人类学思想——它称颂帝国主义的作用——进行论战，由此将它们导向一种更为公正的目标，而不是任由它们那些相互关联的逻辑发展”（Gilroy, 2000, 38）。

[130] 拉什（Lasch, 1958, 321）指出，在就美国占领菲律宾问题展开的争论中，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围绕对平等的不同观点而产生的；相反，分歧仅仅在于，反帝国主义者“拒绝相信，[盎格鲁-撒克逊的]天命要求美国人民如此竭尽全力地努力为之，尤其是当他们在这些努力中看到了军国主义和暴政的威胁时”。

[131] 见饶勒斯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者反犹问题上所持的极端模糊的立场。对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他们并不准备考虑除“逐渐同化”之外的任何政策，该政策也只是偶尔地予以表述，从未全力付诸实施过，“因为缺乏利害关系或因为它的教义令法国人感到为难”（Ageron, 1963, 6, 29）。也见对丹尼尔·奥康奈尔在19世纪上半期遇到的各种困难的值得关注的解释。作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告诉美国支持爱尔兰的人，他们必须持一种反对奴隶制的立场。他们坚决地予以拒绝，最终奥康奈尔软化了他的公开立场。“不是爱尔兰人对自由的热爱激励了美国，而是共和国的奴隶制之风又返回来影响到了爱尔兰。正如奥康奈尔所指出的，爱尔兰人正在从绿色退变为白色，这是受美国‘氛围’中的某些因素漂白的结果”（Ignatiev, 1995, 31）。

[132] 他继续指出：“所谓的劣等种族沉溺于色欲的陈词滥调是种族主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有关‘外来人’所具有特征的公认评价的进行歪曲的组成部分。外来人被视为威胁到社会的存在，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坚定了优等民族的行为标准”。

[133] 麦克唐纳（1981，339）揭示，这同样的关系是如何在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殖民统治中塑造的。他提到“爱尔兰人对兄弟岛屿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之所以说‘兄弟’是因为性别形象很明显被不断地用于表述统治者对两个岛屿之间关系的观念，稍后的土地法案（the Land Acts）被模糊地视为某种同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相对应的法案，这些政治法案的效力在潜意识上是由维护权利和不安全感的类似结合来证明其合法性的”。

[134] “所有健康的男性——不管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据信都拥有一种强烈的男性性冲动。…… [但] 原始人不能够运用文明的力量，因为他们的种族缺乏对性冲动进行自我控制的能力”（Bederman，1995，84-85）。

第五章 作为社会科学的自由主义



第五章插图“穆拉德总督（Murad Bey）”

安德烈·杜特尔特（André Dutertre）

（感谢耶鲁大学的贝内克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安德烈·杜特尔特（André Dutertre），“穆拉德总督（Murad Bey）”。收录在拿破仑的《埃及记述：现代国家》（*Description de l’Egypte/Etat Moderne*）（巴黎，1809~1828年）中。当拿破仑在18世纪末入侵埃及时，他随队带去了一个大的学者团队，他们完成了一部巨大篇幅的参考书，书名为《埃及记述》。它是东方学知识的一个基石所在。这幅画表明团队中的一位艺术家是如何描绘对拿破仑进行军事抵抗的一位主要领导人的。

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价值准则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
.....在被承认的地方，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是永恒的、无法改变的和普遍适用的。

——D.J.曼宁（1976，79）

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一个人变得如此保守——除了当前以外或者除了过去以外对其他一无所知。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6，16）

我们倾向于过度使用一种新的解释原则。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952，209，N.9）

从拿破仑战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世纪被称为蒸汽的时代、民族主义的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时代。尽管这些名称都具有合理性，但也许——同时——称之为劝告的时代更合适。

——彼得·盖伊（1993，491）

正如我们一直在论证的，法国大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导致对三种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建构，进而导致中庸的自由主义获得胜利，成为世界体系地缘文化的基础。它导致自由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心区的建成，进而导致反现存体制运动的出现，接着导致对这些运动的遏制。它导致一个全新知识部门的创设：即历史性的社会科学。哈耶克（Hayek, 1941, 14）将法国大革命对我们知识体系的影响总结如下：

首先，现存制度的崩溃要求我们立即运用所有知识来做出应对，即那些对我们而言似乎是理性的具体表现的知识，而理性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奉若神明。

在知识领域，中庸的自由主义同样是胜利者。正是19世纪世界体系这另一根支柱的历史（的确也是延续到20世纪前2/3时期的支柱），是我们现在要讲述的，以完成对自由主义在19世纪取得的胜利的全面论述。

现实的社会在19世纪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但我们理解、分析社会并对它做出分类的方法甚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后者，那么我们会夸大前者。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有两种学说被人们普遍接受，它们被法国大革命奉若神圣，即变化被视为正常的和人民拥有主权两种学说。对那些埋头于研究世界体系政治学的人而言，目前最紧迫的是去理解，究竟是什么产生了那些被视为正常的变化，由此能够限制群众偏好对社会体系结构的影响。这正是历史性的社会科学和它的一套新的概念话语需要做的工作。^[1]

当然，社会分析和社会理论建构都是一种古老的行为，尤其是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争论。如果我们研究这些争论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有益的。不过，传统的社会分析并不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现象。19世纪产生的社会科学是将有关

社会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现代世界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研究予以系统化、组织化和服务于官僚统治。这种“社会科学”被视为一种认知活动，它一方面区别于“人文学科”或“文学”，另一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而处于它们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Lepenies, 1989）。

对“两种文化”的建构

从新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新出现的知识体系的内容和结构两方面看，从1789年到1848年之间的时期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所使用的术语、所划定的界限，以及甚至所使用的基本范畴的数量（关键的问题是存在两个还是三个基本范畴）都尚未被明确地加以确定，肯定也尚未以任何方式被予以制度化。那时，就绝大部分而言，这些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斗争都发生在一个从地理上看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其次是在德国、意大利和美国。

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对世界体系产生政治影响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它同样也是在从17世纪开始的知识体系漫长转型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转型已经导致或正在导致一种概念被加以神圣化，即我们后来称之为“两种文化”的概念，该术语是在更晚时间由于C.P.斯诺（Snow）1959年在剑桥所做的著名的瑞德讲座（Rede Lecture）才流行起来的。

很久以前，在欧洲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只存在着一种知识文化，即追求真善美的知识文化。它并没有被分裂成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各种认识论。然而，对谁将控制这种单一的知识文化存在着持续的斗争。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宣称自己是知识的最终仲裁者。它宣称拥有接触只有上帝才掌握的真理的特权。在某种意义上，从教会的视角看，所有知识都是神学方面的。当主要通过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知识时，教会试图将它吸纳作为神学知识的组成部分，正像例如圣托马斯·阿奎纳（St.Thomas Aquinas）所做的那样。

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离不开非神学家付出的长期努力，他们称自己为哲学家，努力要将自身从教会的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能够自圆

其说地论证，人类能够通过直接运用他们的智慧来获得知识，而无须通过神启的方式获得知识，后者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被制度所承认的解释者集团——神学家。正如教会已经提出的那样，哲学家也论证存在有关真善美的自然规律。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能够像任何其他人（如果不是比这些人更好的话）一样洞察这些自然规律。逐渐地，在15到16世纪之间，哲学家能够让神学家靠边站，获得作为知识供应者的平等的、甚至是优先的地位。

对更多地从事实际建构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工作的人而言，哲学家是否能够提供比神学家更多的帮助，这一点并不是十分清楚。他们的研究似乎太过抽象，并不能产生太多直接的实际影响。最初作为神学家活动范围的大学的地位由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斗争而大大削弱，降格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场所。像法兰西学院（the Collège de France）和英国的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等其他机构作为替代性组织出现。

到1750年，就知识在哪里能够被建构，以及如何建构，存在着巨大的困惑和不确定性。就能够用什么名称来描述知识范畴存在着更大的困惑。有大量术语被用于描述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现象，它们被不加区别地和几乎是可以互换地使用。^[2]

此时，自然科学家开始坚持，对真理的探求不可能基于神学家或哲学家的论断，而必须植根于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他们论证，这种观察可能导致提出一些假设，这些假设能够被其他自然科学家所证实，或作为初步的规律，由此能够被应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3]尽管自然科学家直到1800年仍然声望不高，^[4]但他们的观点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特纳（Turner, 1974, 2: 524）论证道，到1820年，科学在德国已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5]

当然，对科学不断提高的声望也存在着抵制，博纳尔在1807年写作

的《科学、文学和艺术》（*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et des arts*）中就悲观地提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正如勒佩尼斯（1989, 9）所提到的，他“在科学和文学之间不断加大的隔阂中看到了现代性的预兆和走向堕落的迹象”。^[6]另一方面，卡莱尔在1829年《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似乎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他提到：

形而上学和道德科学正在走向衰落，而自然科学却正在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关注。……不能以物理学方式加以研究和理解的现象就是根本无法研究和理解的现象。（Cited in Ross, 1962, 69-70）

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科学家（该词在当时尚不存在）对知识进行重组的目标是要同所有那些模糊不清的知识相分离，为某些类型的知识确立一种有保障的地位，而其他类型的知识则不享有这种地位。自然科学家将自身视为唯一能够对真理探求做出保证的人。它们有别于文学或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中，这两种探求知识的活动非常不同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为了确保这种学术上“分离”的成功，自然科学家需要一种可靠的制度保障。开始时，他们是将自身安置于大学之中，在新成立的自然科学各系中从组织上为自身确立了一种地位。

一旦自然科学家沿着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人文学者”就必须做出防御性的反应，他们也试图从组织上为自身创造一种类似的地位（Lee and Wallerstein, 2004, esp.chaps.1-3）。以这种方式，大学开始恢复它作为知识体系生产和再生产场所的地位。但相比它假想的前身、即中世纪的大学，它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大学。到18世纪，大学已经降格为一种“学生打骂嬉闹”的场所，或许主要是这样一种场所（Ziolkowski, 1990, 220-236）。但到19世纪，它将转化为一种非常不同于中世纪大学的专业性的大学。学者们在大学中挣得他们的基本收入，并接受全职教师的

任命，他们在组织上开始隶属于不同的单位，我们称这些单位为系，它们大体上是依据各学科之间的划分而组建的。在这些系中，学生也变成全日制的，并进行认真的学习。^[7]

建构这样一种结构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做起来也并不容易。牛津大学在1800年和1817年正式通过新的章程，在人文学科（古典研究、历史学、语言学）、科学和数学都设立了荣誉教授职位（Engel, 1974, 1: 307）。在人文科系和科学系之间的区分，在法国可以追溯到1808年（Aulard, 1911）。尽管如此，但迟至1831年，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仍然相信有必要写一篇文章《英格兰的大学——牛津大学》（*Universities of England—Oxford*），它是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53, June, 384-427）。在文中，他呼吁大学应该认识到：“教育必须由专家来实施，由他们来讲授一门他们非常熟悉学科的课程；而不是由指导教师来实施，他们中的每个人过去都必须讲授所有学科的课程，尽管他们没有资格来深入地讲授任何一门具体学科的课程”（cited in Engel, 1974, 313）。学者们此时开始在大学中寻找适合于他们的位置。学者的经济来源当时来自两个方面的：大学教职的收入和撰写著作所获得的版税，相比自然科学家，后者对人文学者而言更为重要。^[8]

“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差别和争执正在被制度化。科学在方法上被界定为一种经验活动，目标是要探求一般规律，由此在研究类型上要尽可能地做到定量。而人文学科在方法上则被界定为悟释性的方法，它将一般规律视为简约主义式的幻象，由此在研究类型上是定性研究。稍后，我们将这种差别称为在探求普遍性的认识论和探求特殊性的认识论之间的区别。进一步而言，它并不单纯是认识论上的差别。每一方都倾向于将对方视为在从事学术上值得怀疑的认识活动，如果不是无用的或甚至是有害的认识活动的话。^[9]

1859年，作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会长，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宣称：

归纳科学的领域.....是研究事实的领域。我们由此找到了一种路径、一种阶梯，即使是孩子——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可以通过它攀登上真理的最高峰。（Cited in Benson, 1985, 299）

对此，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回答说，科学仅仅“带给我们现象。.....我们必须研究它确定的事实，赋予它们以意义”（cited in Benson, 1985, 300）。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进一步指出：“人文学者的任务就是将‘唯一的’知识同我们对行为的认识、对美的认识联系在一起”。（cited in Benson, 1985, 301）。

自然科学对所有那些人文学科和形而上学学科的蔑视程度在不断增加，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为对此的反制而出现的。正如戴尔（Dale, 1989, 5）所论证的：

19世纪学术史的基本特征也许可以合理地描述为〔人文学者〕寻求完全替代那种已经不复存在的基督教式的总体知识，努力在法国大革命的废墟上恢复一种拯救信念，正如卡莱尔所恰当地描述的那样。.....〔浪漫主义〕对基督教做了适应现代世界的改造，将它世俗化为一种有关社会的和个人的整体性的形而上学思想。^[1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社会现实、对日常变化的原因做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认识的需要导致社会科学、事实上导致新型学科的创立。^[11] 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宣称这一新兴的知识领域是他们自己的专属领域。科学家论证，能够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对人类活动的研究，就像将它

们应用于对物理现象或生物活动的研究一样，因为科学分析的方法是普适性的。与此针锋相对，人文学者论证，不像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对象那样，人是有意识的行为者，能够影响他们自身的命运，因此对他们行为的分析不可能通过机械地应用貌似规律的归纳来做出。

社会科学应该选择哪种发展路径呢？一般的答案在于，社会科学的实践者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一些社会科学家选择科学主义的路径，另有一些人选择人文学科的路径，但也有一些人则试图在两者之间摇摆。^[12]所有学科都将做出集体的选择，但除此之外，学者个人也将做出选择，他们是在每个学科的组织框架内做出的。为了对此做出评价，我们必须连续考察：（1）社会科学同社会改良运动存在明确联系的程度；（2）推动社会科学“专业化”的各种努力，它们是同有关客观性的性质和价值中立的重要性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评估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现象是如何和为什么变成制度性的存在的。

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科学

继法国大革命——连同它的承诺和它公认的缺陷——之后，科学一般而言——稍后尤其是社会科学——被视为改善人类状况的另一种路径。奈特 [1984, 3] 扼要地对这种观点做出了总结：

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科学发展带来了繁荣和减少了不幸。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既是由于将科学应用于指导以前由经验、由传统惯例指导的活动；又是由于普遍地接受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是科学的时代；一个单纯而又有信仰的时代。

正是在这种单纯而又有信仰的背景下，社会科学在19世纪开始了它的发展，不是作为大学的一揽子学科（甚至也不是作为某个单一学科），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用伯纳德夫妇（L.L. and Jessie Bernard, 1943, 33）的话来表述：

也许比它已经实现的任何特定目标都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从一种以神学为指导的社会向一种以科学为指导的社会的转型。[在19世纪前2/3时期] 社会科学.....并不是对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总称；它是正在经受工业化阵痛的社会中的宗教，正如神学是旧的封建世界中的宗教一样。

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运动，所以它最初并不是在大学、而是在被称为社会科学协会的机构中出现的，其中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协会首先是在英国和美国、稍后是在德国出现的。这些协会是“认识和纠正那个时代的社会弊病的迫切要求的产物.....，也是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产物”（Bernard and Bernard, 1943, 25-26）。当社会科学诸学科稍后在大

学中变成制度性的存在时，它们将失去这种作为中心的地位。^[13]

在英国，这些协会中最早成立的是统计协会。那些创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的人是“由于共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由于支持社会改革的信念而联合在一起的”（Elesh, 1972, 33）。他们主要围绕两个问题收集资料，即公共健康和教育。正是“城市化是统计学家进行统计研究最为关注的”（Cullen, 1975, 135）。在1832年的政治动荡中，那时贸易委员会的谷物收益审计员（Comptroller of Corn Returns for the Board of Trade）威廉·雅各（William Jacob）呼吁设立一个统计部门，他给出的理由如下：

在公共事务问题上打消不安和增加满意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明确而公开地说明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和如何予以妥善地应对。……就公共事务状况更普遍地公布准确信息往往会阻止引发聚众骚乱的情绪出现，后者通常是由歪曲或夸大实际情况所致，会引发对政府的不满，至少会在公众意识中引发暂时的不满。（Cited in Cullen, 1975, 20）。

雅各并不是唯一提出这种建议的人。艾布拉姆斯（Abrams, 1968, 38）表明：“在19世纪30年代，对贫困产生激进行为的担忧是推动社会研究的强大动力所在”。

1856年，专门成立了国家社会科学促进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也被称为社会科学协会（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SSA）——来促进立法工作的进行。^[14]罗杰斯（Rodgers, 1952）称这个由社会改革家、社会工作者、律师、教育家、经济学家、医生和商人组成的组织为“一个不成熟的团体”（p.283），但却是一个“对能够通过议会法令来实现一切目标充满信心的”团体（p.289）。戈德曼并不认为该协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团体，

因为：“在它中立的言辞、在它力争获得两党支持的背后，社会科学协会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论坛”（1986，101）。^[15]

在美国存在着类似的发展过程。随着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美国社会科学协会（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SSA）创立，它是“由新英格兰地区的上层知识分子发起的 [.....] 他们试图理解和改善他们置身其中的迅速变化的社会”（Haskell, 1977, vi）。但与此同时，除了这种支持改革的立场之外，哈斯克认为美国社会科学协会还涉及：

一种托克维尔式（Tocquevillean）的维护权威的冲动，即设立制度屏障以防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大众社会中由于在思想和道德价值观方面的无限争执带来的破坏性后果。（1977，63）

他称这为一种“保守的改革运动”，而我则称之为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的改革运动。

的确，1865年在美国创办了一份典型的自由主义左派杂志《民族》（*the Nation*）的埃德温·戈德金（Edwin Godkin）同时也是1869年成立的美国社会科学协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就成立大会，他写道，美国社会科学协会将：

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它真的有助于唤醒公众认识到下述事实的话，即没有比正确调整人们在社会中的关系更复杂和更重要的问题；像对所有其他问题一样，在该问题上，相比那些对此没有研究的人而言，更值得聆听那些对它有着特殊研究的人的意见。（*Nation*, November 4, 1869, p.381; cited in Goldman, 1998, 22）

社会科学的改革运动在英国和美国也许是最强大的，不过1862年在

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创建的国际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协会（th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 Progrès des Sciences Sociales）就有来自比利时、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瑞士和美国的代表参加（Villard, 1869），但它只存在到1866年（Goldman, 1987）。^[16]

只是在德国统一一段时间之后的1890年，类似的社会科学运动才在德国兴起。它被称为社会政策协会（the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德国人对协会的目标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它的名字并未提及社会科学、而是提到社会政策。像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它将学者、商人、政府官员和自由职业者聚集在一起（Lindenaub, 1967, 6）。正如克鲁格（Krüger, 1987, 71）所提到的：

协会表明在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范式和社会政治信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派在德国政治经济学界作为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出现。……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学者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中流行的看法，认为过时的制度体系应该予以修正，以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由此，学术知识和社会政治信念赋予彼此以合法性、并相互促进。……协会是一个“对社会改革进行争论的场所”，即支持社会改革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讨论问题的论坛。^[17]

问题是实施哪种类型的改革？一方面，“就他们被指责对工人阶级太过友好而言，企业家集团有时将社会政策协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置于同一范畴”（Plessen, 1975, 59）。的确，持有敌意的批评家指责协会的学者是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或教授社会主义者（Dorfman, 1955b, 18）。

但这正是关键所在。他们是讲坛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尽管社会改革运动在思想上是同1820-1850年时期被称为“柏林经济学家”的“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也可译成自由贸易主义——译

者注)的主张相对立的,后者强调自由贸易的价值(Lindenlaub, 1967, 2),但该运动同时也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对立。^[18]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种中间主义路线:

创建社会政策协会的那一代人相信,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团所持的反动的社会立场和社会主义者所持的社会革命立场都加剧了社会紧张,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和革命。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够稳定住摇摇欲坠的社会制度。

(Lindenlaub, 1967, 4)。^[19]

普莱森揭示了协会的社会政治纲领和俾斯麦的社会立法方案的一致之处。他进一步论证:“如果没有社会政策协会所做的工作,俾斯麦的开创性立法是不可能提出的”(1975, 127)。

社会科学中的专业化和价值中立

尽管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的社会科学也许被认为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该运动体现了中庸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但在学者和中间阶级的改革家组成的联合体中，学者们对他们所承担的角色愈来愈感到不满意。他们寻求在社会组织中承担一种更具自主性和更与众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打破社会学协会的束缚，创建一种专业性的、完全学术化的组织。

对业余爱好者自称能够提供学术知识的资格，学者们目前予以否定，但在17和18世纪这种资格得到非常广泛的承认（Torstendahl, 1993, 115），即使到19世纪在社会学协会的组织内部也仍然被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学者的专业化被鼓吹为：

一种如此牢固地确立权威的手段，以致真理和它的提出者甚至能够赢得广大公众的尊重，而公众曾威胁不给予任何人、任何传统、甚至最高尚的价值观以尊重。（Haskell, 1977, 65）

但是什么样的权威呢？戴尔提醒我们（1989, 14），所有早期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者（诸如孔德、穆勒和斯宾塞）都认为：“社会科学理论最终将导致对社会制度的革新。这无疑是一种政治目标”。人们不应该忽略反平等主义的力量作用，它构成这种新的趋势的基础所在。专业化的发展既是为了应对大众文化的肤浅、也是为了应对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人的狭隘。^[20]这种双重目标能够通过赋予哈斯克称之为“有能力的人组成的团体”以权力而实现。^[21]

根据专业能力赋予权力，要求一种新型的“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Wittrock, 1993, 318）。这就是研究型大学，一种使大学能够恢

复它在知识生产中——不仅仅是在知识再生产中——的中心地位的组织。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是“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结果，大学被赋予“相比之前更多的资源”（Wittrock, 1993, 305, 344）。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抛弃实施中间主义路线的社会改革的目标，而是要让它在专家的指导下更稳步地实施。^[22]这意味着，直接为某种改革目标做辩护不再可能保障它一定能获得人们的支持，因为学者缺乏那些政治人物的伪装。因此，有必要给改革的各项目标披上“客观”知识的外衣，这种知识只有科学专家才能够确定和呈现给公众。^[23]

这种伎俩是政治性的，但似乎又不是政治性的。弗尼斯（Furness）提到，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赫伯特·巴克特斯·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和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都相信，不受管理的工业资本主义会引发不公正。但他们发现，他们不可能直接谴责这些不公正之处。相反，“随着他们开始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两个人都开始将稳健的立场等同于客观性，并将客观性等同于学术价值”（Furness, 1975, 91）。普莱维特（Prewitt）指出：

探求能够论证由政治设定的目标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理论.....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对不谨慎的人而言布满了陷阱，甚至那些对其中的内在矛盾有着清醒认识的人也不容易驾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社会理论，它既是有用的、事实上又不被用于为党派利益做辩护呢？那些信奉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权威人物.....坚持认为，这是可能的。（2004, 782）

有关持辩护立场、还是持价值中立立场的最著名的争论是所谓的价值判断之争。1909年，马克斯·韦伯和其他一些人退出社会政策协会，组建了德国社会学协会（the German Sociological Society），它是主张价值中立的。不过，这种目标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简单；的确，从

那时起，它就受到目标不明确的困扰。但那些宣称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仍然相信：

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繁荣的保障。……科学——由于它自身的缘故而被人们所追求——将使人们能够消除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正像科学能够消除愚昧和疾病一样，它也能消除战争和社会冲突。科学是一种实现和谐的力量、一种实现统一的力量。（Proctor, 1991, 96）

在1871年到1918年威廉皇帝统治时期，德国的学者处于尤其困难的政治情势下，这对社会科学家造成了非常难于应对的压力。一方面，他们被谴责为隐蔽的社会主义者，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也对他们施加压力，敦促他们做自己公开的盟友。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来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压力，后者公开支持德国军队和帝国的扩张目标。^[24]价值中立是“身陷重围的科学”在意识形态上表现。^[25]价值中立含有在道德和知识之间摇摆的意义。

但它发挥作用了吗？稍后的两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都深受韦伯的影响，他们都强调了这些论证的难点所在和在道德上的不确定性，达伦多夫称它们具有“极易引起争论的模糊性”。如果韦伯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在科学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的区分是如此明晰的话，达伦多夫问，那么：

为什么韦伯本人发现他的这种区分是无法接受的？难道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是有说服力的，但在实践中却是不可能加以坚持的吗？它们是一种错误的方法论规定吗？（1987, 577-578）

阿隆的分析并不是那么苛刻，但归根到底同达伦多夫所持的保留意见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韦伯的创新和伟大之处首先源于下述事实，即他既是一位政治人物、又是一位学者，而且他想要如此；或更准确地说源于下述事实，即他既将政治和科学分离开来、又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说分离：科学必须独立于我们的偏好，不掺杂任何价值判断。说结合：科学是以一种对指导实践所必需的方式来加以建构的。……科学和实在都不会强加任何规律；科学——不会做出预测或有任何想象的成分——将人置于完全自由的状态；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人们必须在诸神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是有关诸神对抗、信仰和必然性斗争的叙事。（1950，97-98）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诺维克（Novick，1988，7）指出，客观性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争论一直是围绕就“公正无私”而言人们到底是在指什么展开的。正如鲁施迈耶和范·罗森（Rueschmayer and Van Rossen，1996，150）所指出的，社会政策协会宣称他们公正无私的证据在于“他们同资本和工人阶级都保持距离”，这暗示他们受到“利益相关双方”攻击的事实。但由于学者共同体内部不断加剧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所以韦伯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p.147），即社会科学必须远离道德和政治。[\[26\]](#)

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遭遇最明显挫折的领域似乎是优生学。当然，优生学同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即一直存在的种族主义，该现象明显同理论上提倡的平等主义的学说相冲突，后者是在由法国大革命所孕育的地缘文化结构中被赋予合法性的。

当林奈（Linnaeus）在18世纪系统阐述了一种形态学，运用这种形态学，生物学家能够对所有生物进行分类时，那就有必要解释，如果人类事实上是一种统一的属/种的话，那为什么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种族之

间存在着视觉上的巨大差别。当然，视觉上存在的巨大差别是一种涉及社会定义的问题。很少有人会根据人眼的颜色来创造或使用社会范畴，但许多人会根据人类皮肤明显可见的颜色来这样做。到18世纪晚期，种族一词被主要用来对肤色不同的族群做出分类。

在18世纪，就种族差别存在的起因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理论：一元发生说，同传统的基督教有关人类具有统一性的观念相一致（Heiniger, 1980, pt.3）；多元发生说，宣称在各种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由此“为非白种人在历史上明显屈从于白种人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合理性论证”（Lorimer, 1978, 132）。到19世纪后半期，尽管多元发生说已经声名狼藉，但有关在各种族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的社会生物学观点得到了系统的阐释，我们赋予了它一个“科学的种族主义”的标签。它假设在社会生物学方面不平等的族群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Guillaumin, 1992, 25）。“有人为了普及这种权威性的科学观点付出了重大努力”（Lorimer, 1990, 369）。[\[27\]](#)

优生学是一种起源于科学的种族主义的社会运动。它呼吁国家采取行动以保护种族的“纯洁性”，并以各种方式来增加被视为优等种族的人口数量，这是以其他种族人口的减少为代价的。尽管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称之为“极端的保守主义”，但它最初获得了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的强有力支持：

优生学运动是以“改革”的面目出现的，因为它 [在美国] 兴起的时间正赶上大多数美国人都喜欢将自身视为改革家。像各种改革运动一样，优生学接受了国家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原则，并且是根据族群的集体命运、而不是根据个体的成功来加以表述的。（Hofstadter, 1992, 167）

“种族思想在欧洲 [和欧洲人统治的世界] 是同民族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两种运动至少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Guillaumin,

1972, 37)。帕克(1981, 827, 846)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种族主义”的现象是寻求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 它“太容易导致对边界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敌视”。

当然,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 在德国由于纳粹的灭绝劣等种族的计划, 优生学被推导出了最令人恐怖的、但却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科学和政治建立互惠关系的情况”在德国表现得尤为强烈, 在那里:

一个小的种族卫生学家(正如优生学家在那里称呼自己的那样)群体寻求地位和承认, 他们同一些既保守、又激进的右翼政治家结成了联盟。(Weingart, 1989, 260) [\[28\]](#)

正是因为优生学在德国推导出了纳粹希望得出的结论, 所以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在1945年以后是如此坚决地反对“科学的种族主义”, 后者依次又被也许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反种族主义所取代, 它也是被作为价值中立的学说提出的。

对科学史的建构

在大学中，社会科学的专业化采取了设立各种不同的学科和成立针对这些不同学科的全局性的（最终是国际性的）专业/学术组织的形式。^[29]它这样做并不是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单一的学科、而是将它“分割为许多分支学科、新的组织和专业”（Goldman, 2002, 356）。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每个学科、每个专业都有“一套话语、一个组织、一本杂志和一个学会”（Maloney, 1985, 2）。

在新的大学组织中，第一门宣布其独立存在的学科是作为大学的一个部门存在时间最长的学科——历史学。当然，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术语。在今天提及古代那些值得关注的历史学家是很平常的。肯定一直有一些著作家在描述“过去”，他们会赞美一些重要的统治者。对这些历史学家而言，资料的主要来源从传统上看是较早期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如果他们写作的著作能够保留下来的话。

在19世纪所发生的是就适合于历史学家研究的资料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它有时被称为历史编纂学中的一场“科学革命”，而且明显是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兰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主张：我们要如实地书写历史。^[30]

在这个著名的口号中我们应该注意两点：相信有可能对过去做出一种真实的描述，假设以前以历史学的名义所做的每件事并非都坚持了这种原则。兰克宣称可能存在一种对过去的“客观”分析。对所有那些赞同这种观点的人而言，从那时起，问题就在于是什么能够使一种描述成为客观的，历史学家正在书写的是什麼。尼培代（Nipperdey）将兰克视为在历史学中倡导科学客观性思想“之父”，他坚持认为（1988, 218），兰克思想的核心是将历史学家严格地限制在“发掘原始资料和对

原始资料做批判性的研究”上，他称之为一种“在方法论上有着严格限定的客观性”。赫伯斯特（Herbst, 1965, 216）强调了兰克式的历史主义中的矛盾之处：“作为唯心主义者，他们宣称他们的学科和所有精神科学具有自主性；但作为经验主义者，他们又建议运用自然科学的工具”。

原始资料是一个带有很浓经验色彩的概念。最初（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它们被认为只是存在于书面文献中。稍后，这个概念被加以扩展，包括了诸如考古发现等实物，也需要对它们做仔细的研究。考古学主要被用作对某些区域和某些时期进行研究的方法，就这些区域和时期并不存在书面的原始资料或书面的原始资料非常稀少而言，而且这是一种次优的选择。

但为什么书面的原始资料能够成为获得客观知识的基础呢？主要的论据在于，它们并不是为了稍后的研究者的研究需要而创作的，而是某种对当时所发生的事实的记录，就像事件的参与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当然，也存在下述的可能性，即这种原始资料是伪造的，它们是在晚于原始资料所描述的那个时期创作的、或者就是打算用于欺骗它们被写作的那个时代的其他人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必须对原始资料做考证研究。尽管如此，但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在使用这种原始资料上并不存在替代品。兰克“探讨过去几乎就像是发现上帝的启示一样。……正如兰克自己所评述的，它就像是在做礼拜（Gottesdienst）”（McClelland, 1980, 173）。

只有当历史研究同经验证据相联系时，它才被视为合法的，也才被视为科学的。不过，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是非常不科学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反对理论，拒绝探求任何类似规律的一般性判断，但其实他们是能够从经验研究中推导出这类判断的。^[31]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从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反对启蒙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和它们的继承者，

后者希望改造旧的世界。^[32]诺维克相信（1988，27），兰克是在“回避做价值判断，而不是在展示公正无私的中立性，在这种背景下，他所做的政治判断是非常保守的”。^[33]

然而，这种将对政治的分析“缩减”为“对最狭隘意义上的事件的分析”（Burke，1988，197）很好地服务于了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的利益。因为当一般性概括被回避时，历史编纂在19世纪首次地变为一种“民族的宗教”（Barrett-Kriegel，1988，264）。原因非常简单。如果人们要建构自由主义国家的话，那么就必须存在这样的国家，在其中人民能够创造他们对一个“民族”的认同，他们能够将他们的首要忠诚奉献于它。创造作为自由主义国家基础的民族具有本质的重要性。而要创造一个民族，人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国家。^[34]

历史学家承担了发现/创造一个国家对历史过去的记忆的任务。这适用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早的自由主义国家，但它甚至更适用于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是在19世纪才被创造出来的。接着通过扩大影响也适用于其他地方。^[35]正如我们所知，1830年的法国革命在（俄国人统治下）波兰也产生了反响。

这依次又对德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激励他们关注民族统一问题。例如，兰克在1832年围绕以前由贝特霍尔德·尼布尔（Berthold Niebuhr）提出的论题写作了一系列的文章：“推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是这个民族的天才的职责所在”。兰克的结论是：“我们承载着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的责任：创建真正的德意志国家，它将反映我们民族天才的意旨”（Renouvin，1954，75-76）。^[36]这一时期较为年轻的历史学家则“对兰克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希望普鲁士在德国的统一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主张提出了质疑，他们转向洪堡（Humboldt）、费希特（Fichte）和黑格尔寻求灵感”。但1848年革命的失败也使他们相信“国家具有首要性，政治权力必须合乎道德正义”。到1871年，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

者、甚至是民主主义者（激进主义者）都赞同“历史学是他们共同的宗教”（Iggers, 1983, 11）。^[37]

德国历史学家参与了德意志民族的建构，这同英国历史学家所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我们将后者称之为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这时，英国是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它的历史学家欣然地相信，在英国发展到这种地位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既是必然的、又是进步的。曼宁

（Manning, 1976, 84）非常清晰地解释了这种立场的逻辑所在：

所有有助于建构为自由主义者所称道的市民社会的事件都必然是进步的，所有那些抵制这些变化的事件都必然是反动的。根据定义，市民社会是一种比封建社会更文明的社会。在自由主义的话语中，“市民”一词的含义部分是指某种开放和进步的事物，“封建”一词的含义部分是指某种封闭和反动的事物。^[38]

德国的历史主义和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事实上也是历史主义的一种类型）都将民族的进步置于他们分析和关注的中心。^[39]

像英国一样，法国也开始将历史学作为它正在进行的建构民族国家工作的中心。豪塞（1903, 119）将七月革命视为转折点：

正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王朝，所以七月王朝不可能忽略、而且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学。……在政治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历史学转向关注如何组织社会的问题。新建立的国家从拥有像基佐、梯也尔这样的历史学家中获益颇多，他们运用对中世纪法国的记忆和英格兰革命的教训，来为王朝建构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的合法性。

然而，尽管七月王朝赋予历史学以合法地位，以使历史学家赋予王

朝以合法地位，但正是1870~1871年那些给法国人民造成创伤的事件——法国被德国打败、巴黎公社——最终确立了历史学的地位，它将发挥把国家整合在一起的中心作用。新建立的第三共和国也求助于历史学家，通过改革中学的课程体系以重新将民族团结在一起实现复兴。罗格（Logue, 1983, 80）以这种方式描述了共和国教育系统的领导人的想法：

迄今为止，无知和迷信的群众在这些年（1875年以后）被视为共和国较容易对付的潜在敌人，这是相比那些中间和上层阶级的年轻人而言的，他们在教士、世俗修士、最恶劣地在耶稣会教士的指导下接受教育。正是精英集团内部的不团结、而不是在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最令19世纪晚期的自由主义者担忧。……一个真正信奉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英集团将成为信奉民主主义的人民的自然领袖。[\[40\]](#)

不过，霍布斯鲍姆（1983, 270）将这种对民族历史的强调视为更多地是由对激进倾向的恐惧所激发的，他论证，历史学家发明了“共和国的形象、象征和传统”来控制工人阶级。“中间派”（他正在谈论的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通过“伪装成极左派”来实现这个目标。

无疑，中庸的自由主义派试图既限制保守派的力量，他们被等同于教会势力；又限制激进派的力量，他们已经在巴黎公社期间展示了他们的面貌和活力。中庸的自由主义派能够利用新的科学的历史学来在公众头脑中灌输一种对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能够将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使民族认同成为爱国主义的基础，由此使国家处于稳定状态。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机制。年轻男子在军队中服役也能够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和适应社会的需要，就如公共教育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对那些来自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人而言，这种方法尤其有效。建造国家纪念碑和设立公共仪式（诸如法国的国庆日）也是这种有组织运动的组成部分

（Hobsbawm, 1983, 271）。[\[41\]](#)但这些同样也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产物。历史由此正在变成获得合法性的来源。但对现实的认识又怎么样呢？

创建探求普遍规律的诸学科

不管多么重要，但建构和强化一种民族认同仅仅是自由主义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有助于赋予国家以合法性，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其他的同它处于潜在对立状态的认同——对阶级、种族或语言共同体——的合法性。但为了能够平稳地运行、尤其是能够预先应对来自危险阶级的各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压力，自由主义国家需要理解现实的情况。三门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将发挥这方面的功能。

就这种三位一体性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是三门学科共同发挥一种功能。当写作有关过去的历史（历史学的任务）时，新兴的大学组织将所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结合为一门单一的“学科”。然而，一旦涉及对现实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坚持认为，这些是三个独立的领域，需要分别地加以研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学科划分呢？唯一的理由在于，自由主义思想家（既不是保守主义的、也不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家）坚持认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社会结构分化为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它们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必须在实践中将它们分割开来，必须对它们做性质截然不同的研究。这三个领域分别是市场、国家和市民社会。正是从对这三个领域做理论上的区分出发——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被假设为现代化的结果，大学获得了三门学科：研究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国家的政治学和研究市民社会的社会学。

中庸的自由主义派一直致力于对制度做谨慎而合理的改革。在19世纪中期，对新兴的研究现实的社会科学而言，这种目标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是要使自身成为社会活

动家、还是仅仅作为从事理论研究的人，社会改革家能够利用这些研究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当像米拉波（Mirabeau）和孔多塞这样的思想家首次使用社会科学一词时，他们是将它作为社会管理艺术的同义词使用的，“作为对公共政策和社会改革的合理指导，它带有实用的和改良主义的内涵”（Goldman, 1987, 141）。最初的结果是创立了社会科学协会，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但到19世纪晚期，舞台转向了大学，创设了按学科划分的各系，它们将生产社会所需的专业性人才。

1.经济学

在这些探求普遍规律的诸学科中，第一个被正式确立的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名称是后来才创造出来的。直到19世纪晚期，在英国和美国通常使用的术语是政治经济学。在法国，就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还是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多少还产生过一场争论。类似的分歧在德国也存在，在那里国民经济学（Nationalkonomie）一词同人民经济学（Volkswirtschaft）一词相竞争，但后者因为将Volk（文字上指“人民”，但有一种强烈的种族暗示）一词同Wirtschaft（通常翻译为“经济”，可以带或不带Volks的前缀）一词联系在一起而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为什么所有这些术语都被放弃，而最终较短的术语“经济学”却被采用了呢？

政治经济学一词暗示在生活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存在何种联系呢？最早的一种说法是由18世纪所谓的苏格兰历史学派提出的，该学派包括诸如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和约翰·米勒（John Millar）等各色人物。尽管也许观点各异，但他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理念，这些理念既是有关历史学的、也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他们的宏观历史认识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其中人类经过一系列不同的进步阶段。那时，最常见的阶段划分包括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四个阶段。这种

划分的基础是某种“技术—经济决定论”。^[42]

如果这些人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话，那正是因为他们对经济结构、尤其是商业的这些连续形式的分析是在一种政治组织——即国家——的框架内做出的。因此，他们都强调“生计方式”，该术语是由罗伯逊发明的（Meek, 1967, 37）。他们都相信，如果人们要了解财产权状况的话，那他需要了解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情况，因为“在财产权关系和政府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43]对像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这样一位近期坚定信奉市场首要性的人而言，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将被视为一些不可能决定他们是科学家、还是道德和社会哲学家的人（Hayek, 1952, 13）。他们和随后的几代人并没有接受过特殊的培训，即在那些同今天的经济学相联系的技能方面的培训。^[44]

当然，哈耶克是正确的。亚当·斯密事实上拥有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的职位。这种既关注道德哲学、又关注历史学的事实解释了在政治经济学家和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原因；就前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家（从斯密到马克思），而后者在19世纪晚期对他们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明确的划定。

古典经济学家希望解开历史之谜，找出推动（决定？）国家和帝国发展的伟大的中心力量。……他们从事确定“伟大动力”的研究。与之相对，由〔新古典经济学家〕瓦尔拉（Walras）和马歇尔（Marshall）所设定的研究任务却似乎是平庸和琐碎的，但正是他们在分析市场运行机制方面所做的努力产生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即现在的那种经济学。（Gordon, 1973, 255）

就对市场和政治之间的模糊关系的认识而言，在法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重农学派占据着中心舞台。重农主义一词意指“自然的统治”。对他们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然土地，土地是

从事生产性劳动、因而是产生净利润的唯一来源。他们强调将生产性的人或物同非生产性的人或物区别开来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即使就哪些集团确实构成生产性集团存在不同的观点也是如此。像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重农学派是唯物主义者、但却不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的经济决定论观点受到法国大革命领袖言行的强有力支持。^[45]

但他们并非仅仅是经济决定论者。在热月政变之后，他们的遗产由一个被称为意识形态家（*idéologues*）的集团所继承，不过，对他们而言：

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它只不过是一个社会获得幸福的一种手段而已，该社会是在承认人的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的。源于对经济学规律的认识而实现的富裕，使人们“更有德行”、更能够自由地从事管理。政治经济学同其他道德和政治科学一道取代了重农学派的地位。在意识形态家的鼓动下，[法兰西]科学院 [the French Institute, 包括一个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Academy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于1795年创立，意在推动建立 [这种好的政府]。（Le Van-Mesle, 1980, 272-273）

不过，这些观点先是被拿破仑视为危险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接着被路易十八和复辟王朝的领导人认为是更为严重的威胁。由此，政治经济学失宠。不过，政治经济学很快就在法国重新受到欢迎。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修正了它自己的学说。它抛弃了它的颠覆性形象，转而强调它所持的是一种“中间路线”的学说。当然，如此一来，它就同时遭到左右两派的攻击。尽管如此，但通过证明在它所界定的中间路线原则——即法国大革命所奉行的——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它试图由此确立它是对政治有益的学说。1845年，政治经济学家欧仁·戴尔（Eugène Daire）写道：

对法国大革命的赞美已经写进法律之中，在正常的基础上它将对自由、财产权和家庭方面的制度产生影响。……今天，接受这些原则的人的任务简单地就是使它们在现实中完全得到实现，并全力同任何倒行逆施的行径或者所谓的进步学说做斗争，后者倾向于破坏我们父辈的事业，剥夺子孙后代享受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流血牺牲换来的报偿。（Cited in Lutfalla, 1972, 495）

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变得如此强调中间路线，以致一些左派的天主教思想家试图用“社会经济学”来反对“政治经济学”。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的社会科学系在1835年发行的手册批评政治经济学仅仅关注财富是如何积累的，而未能讨论财富被如此不公正地分配的事实。

由此，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在穷人的抗议声中，社会已经从它的梦幻中觉醒，最终发现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曾经在富裕中获得的保障性。（De Caux, 1835, 35）

因此，从中可以推断出需要一门有关社会经济学的课程。

直到1848年革命，这些左派天主教徒的声音并不能为政治精英所听到，穷人的抗议声 [德科（De Caux）无疑是指里昂的缫丝工人起义] 也无法获得有影响的政治表达。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被视为同社会保守主义相联系，所以1848年临时政府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决策是在大学中废除了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尽管政治经济学协会（the Society of Political Economy）进行了徒劳的抗议。相反，道德科学学会（the Academy of Moral Science）对政府的呼吁做出回应，它宣称，“用武力恢复表面的秩序是不充分的，如果不能恢复道德秩序的话”（Le Van-Mesle, 1980, 286）。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而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没有得到恢复。也许是受大革命的影响，它被认为太过强调中间路线，不够保守。不过，到1864年，维克多·杜卢伊（Victor Duruy）说服皇帝在法学系设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他论证，英国之所以能够在1848年避免一场流血革命，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各阶层都被普遍地接受”（Weisz, 1979, 87）。法国正在回归中庸的自由主义的立场。

在德意志诸国，18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the Cameralism）——强调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在19世纪早期已经让位给“国民经济学”。在普鲁士，国家的管理艺术已经被国家的管理科学所取代，后者“在涉及对经济过程的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Tribe, 1988, 8）。再次地，在德国，简单地为市场原则做辩护的学派由被称为历史经济学的学派所取代，后者为政治经济学做了最后一次辩护，强调它既重视政治因素、又重视经济因素。事实上，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最终都准备好要放弃政治经济学、转而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之时，德国仍然继续支持各种政治经济学的学派。

大的转变随着名称的变化而发生。政治经济学变成经济学。具有广泛影响的W.S.杰文斯（W.S.Jevons）在1879年指出了这种变化。^[46]但正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使这种变化得到正式的承认，他在1884年成为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在1881年他就已经写作了一本名为《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他在1885年论证，统计学会应该将它的名称改为经济学与统计学会。接着他在1890年创建了英国经济学协会 [the British Economics Association, 即稍后的皇家经济学会（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该组织由他和他的追随者牢牢地加以控制（Kadish, 1982, 143-144, 152; Coats and Coats, 1970）。到1903年，马歇尔已经能够在剑桥大学使经济学成为本科课程的一门学位考试课程。

不过，马歇尔使什么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呢？一种描述这种变化的方式是将它视为经济研究关注中心的转变：

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同“古典”经济学的决裂，后者关注于资本和劳动在生产价值和分配国民财富中的作用。改名后的经济学则是一门研究交换和价格形成的科学。替代那种研究生产和分配的理论，即以租金、利润和工资，以及同它们相对应的生产主体——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为研究中心的理论，新的经济科学变成这样一种理论，其中稀缺资源的分配受到一种抽象的经济人的算计的影响。一种新的价值理论转而关注这些自私的经济人的相互作用，他们满足自身需求的冲动导致他们反过来要满足其他人的需求，由此创造出市场价格。

（Triber, 2005, 116-117）。

另一种描述这种变化的方式也许是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明确终止了经济学同历史学的联系。在马歇尔为剑桥制定的教学大纲中，经济史学家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的地位被边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似乎正是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坎宁安在1891年离开了剑桥。在两个人之间无疑存在着个性上的冲突。尽管如此，但杰弗里·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却不同意下述说法，即马歇尔对经济史学怀有敌意。霍奇逊指出，马歇尔对德国的历史学派给予了表示同情的称赞和支持。他还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有关方法论的争论（Methodenstreit）中，马歇尔并没有站在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一边，尽管门格尔像马歇尔一样也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之一。^[47]

也许正确解释马歇尔在组织上对经济学做出改造的方式是将它视为强化了经济学家更有效地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以使政策制定变得专业化、并阻止党派偏见直接发挥作用——简而言之，让经济学家接受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的主张。^[48]为了保障这种地位，马歇尔需要通过确立经

济学的正统地位来控制大学教学大纲的制定，这才是他同坎宁安争论的真正根源所在。^[49]丘奇（Church）由此解释了专业化过程是如何导致经济学家同历史主义倾向相分离的。^[50]但与此同时，这种专业化也使同样的经济学家能够拯救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经济学。^[51]

对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的强调同样影响到法国经济学家的实践，尽管在那里经济学往往被设置在法律系、而不是在艺术与科学系之内，像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52]在德国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经济学方面的培训以历史主义方法为中心，这是因为社会政策协会长期占据支配地位。^[53]

考虑到这一点，人们似乎不应该将美国经济学会（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早期的著名争论视为一场在经济学是承担辩护的角色、还是承担提供专业知识的角色之间展开的，这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而应视为就什么是对公共政策做适当改革的最有效的方法展开的争论。

在美国，19世纪晚期的关键人物是理查德·埃利（Richard T.Ely）。在海德堡大学，埃利在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的指导下学习。他对德国的历史学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回国后，他于1881年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早在1882年，他就极力主张采纳俾斯麦在德国实行的社会立法（Dorfman, 1955b, 24-25）。他制定了创建一个经济学家协会的计划，该协会就是要“批判作为一种科学学说而提出的自由放任理论”，正如他在一封写于1884年的信中所指出的（cited in Coats, 1960, 556）。

1885年，他和其他人共同创建了美国经济学会（AEA），他担任了该组织的第一干事。在美国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对其所奉行的原则的声明中，第一点是：“我们将国家视为这样一种机构，它的积极帮助对人类的进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声明的其他三点强调：“对实际状况做历史

的和统计的研究”；解决由劳工和资本冲突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必要性；尽管美国经济学会并不具有党派性，但它坚持认为，“渐进地改善经济条件……必须由立法政策的相应发展予以保障”（Dorfman, 1955, 27）。

埃利本人在25年后宣称（1910, 60），这一声明“是各种利益妥协的产物。……每次修正都代表了一种被称为‘变得温和’的过程”。这种妥协并不成功。1892年，埃利不再担任干事，尽管他稍后被推选担任了一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但他有关美国经济学会应该从事一些公共政策的建议工作的观点被否定，而赞成它应该具有一种更“专业化”的导向。^[5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放弃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转向，因为“上层和中间阶级”都将这种影响视为是在发挥一种积极的作用。^[55]它只是意味着，一种专业性的和中立的经济学的政治倾向——主要指中庸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变得更为隐秘、而不是去公开承认。

2.社会学

像经济学一样，社会学也经历了同样的专业化过程。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门对支持社会改革的义务直言不讳的学科。正如众所周知的，社会学一词是由奥古斯特·孔德发明的，他将对社会关系的研究视为最高等级的实证主义研究，是“诸科学中的皇后”。但我们能够将孔德的研究置于政治谱系的什么位置呢？对柯瓦雷（Koyré, 1946, 56）而言，孔德像博纳尔一样，持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想，但是却“乔装打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伪装着现代的外衣”。奈斯比特（Nisbet, 1952, 173）给出了类似的评价：

孔德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但由于他对科学的浪漫主义崇拜，所以家庭、社会、语言和宗教的社会结构不再需要神学的和反动的框架（在博纳尔的思想中，它们是需要这种框架

的），而且还被赋予了科学的框架和术语，如果实质并非如此的话。……孔德的研究是将各种保守主义的原则转化为一种更能为稍后几代的社会科学家所接受的观点。

然而我们同时也知道，孔德是作为圣西门的秘书开始他的事业的。也许很难从政治上总结圣西门的观点，但他肯定是公开敌视博纳尔式的社会观的。哈耶克（1941，9，11，18）认为，孔德从一种更左翼的立场转变为一种政治中间派的立场。对哈耶克而言，19世纪两种伟大的思潮是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他更愿意称之为科学主义）：

两种思潮……都直接来源于这个由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群体——他们是在巴黎成长起来的，更具体地说是来源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the Ecole polytechnique）……

在法国实证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种理性主义的因素——也许应归于笛卡尔的影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强调综合的思潮承认意义只存在于那些被有意加以建构的事物中……这种思潮是一种新的强有力的因素，它被添加到——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开始取代——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当中。

在19世纪中期，法国社会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他是冶金专业的学生，是著名的高等矿业学院（Ecole des Mines）的毕业生。他从这种教育中获得的教益是厌恶做抽象的理论建构，并相信社会科学并不像物理学、而是像“明显带有实践性的冶金[科学]”（Goldfrank, 1972, 134）。因此，他追求一种经验性的和强调观察的社会学，这同孔德式的社会学正好相反。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也同孔德正好相反。但他是一位也许可以被称为过着田园生活的天主教徒。从这种生活中，他形成了厌恶圣西门

主义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对勒普莱而言，1848年革命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在秩序党同工人阶级分裂的政治背景下，他试图推动实施“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Kalaora and Savoye, 1989, 100）。他于1855年创建了社会经济协会（the Société d'économie Sociale），协会特别关注经济发展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影响。他同英国的社会科学协会建立了联系，追求一种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但带有某种保守主义色彩：

勒普莱是一位谨慎的、但并非持价值中立立场的社会科学家。他坚持认为，“社会和平”只能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才能实现。而现实.....包括不平等的阶级等级制度，它是在工业劳动分工中不断产生的。他因此反对让市场决定社会关系，主张引入权威（seigneurie），由大资产阶级充当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权威”。（Elwitt, 1988, 212）

勒普莱的改良主义并不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主张“道德改革，重申社会组织的5个基础：宗教、家庭、财产权、工作和庇护”（Chapelle-Dulière, 1981, 745）。尽管他所持的是一种主张家长制的保守主义，但戈德弗兰克（Goldfrank, 1972, 148）将他视为“一位令人好奇的当代人物：地位处于上升中的保守的（自由的）专家治国论者希望科学地解决由统治集团所造成的问题，他愿意为该集团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末的英国，勒普莱被视为同新自由主义相联系，后者是新兴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支持者。他被视为代表了“在无序的资本主义的异化和社会主义的专制之外的第三种选择”（Abrams, 1968, 60）——简言之，他被视为一位中庸的自由主义者。

在大学社会学产生之前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赫伯特·斯宾塞。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语世界，斯宾塞是到那时为止拥有最广泛读者和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是一种决定论类型的社会学。他接受了达尔

文的“适者生存”的极端观点。这种恶劣的、无情的进化观宣称，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益的。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论证的（1968，73），从中可以推断出，“社会学更伟大的目标是使人们认识到，通过立法措施来加速改善他们状况的努力是愚蠢的”。^[56]毋庸置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同中庸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相违背的。因此，尽管他在英国和美国声名显赫，^[57]但斯宾塞的如日中天仅仅是昙花一现，在新兴的社会学学科中并未留下什么印迹。

学院式的专业社会学的三个发源地是法国、德国和美国。我们已经讨论了由德国新学院社会学的权威人物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类型的社会学所具有的模糊性。这些模糊性事实上类似于那些在法国和美国社会学制度化过程中出现的模糊性。

在法国，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从思想和组织方面看都是如此。像马歇尔一样，涂尔干是一位组织者。他所受的专业培训是在哲学方面的，但他发现哲学太晦涩，而且太不关注当时的道德和政治问题。1887年，他收到波尔多大学哲学专业的教职任命。但在政府负责高等教育的官员路易·理亚德（Louis Liard）的支持下，他被允许教授一门社会科学的课程。到1896年，他成为社会科学的正教授，在法国的大学体系中这种任命还是第一次。1898年，他创办了一本带有社会学名称的学术期刊《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它成为所有那些——包括法国和其他国家——以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为导向的人进行交流的一个主要平台。1902年他获得巴黎索邦大学的教职。1908年，他成为“教育社会学”专业的教授，该专业1913年由部长下令改名为“教育和社会学科学”。^[58]

在此期间，他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在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发生期间。在波尔多大学时，他是保卫人权联盟（the Ligu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一个主要由德雷福斯

的支持者组成的组织——的秘书长，而且“在波尔多地区的群众集会上他是最受欢迎的演讲人”（Clark, 1972, 161）。正如在讨论韦伯时所论述的，这里的问题是在涂尔干的专业研究和他的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么紧密。这里的答案同样是模糊的。

克拉克提供给我们一种答案（1972, 170）：

在系统阐述对社会学理论和对现实的道德与政治关注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涂尔干]有着非凡的能力。由于他的理论研究及时关注对一种世俗道德的界定、提出了一种社会团结理论、并试图厘清社会不良行为的原因，所以他在同行和普通民众中的声望有了很大的提高。涂尔干还赞成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再次地，它们由于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验而结合在一起。

但克拉克的回答本身就是模糊的。因为它回避了动机问题。如果涂尔干试图将社会学变成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话，^[59]那么正如里克特（Richter, 1960, 172）所论证的，下面的说明对涂尔干而言也同样是真实的：

社会学将为共和国创建一个坚实的基础。它将表明什么样的改革是需要的；它将提供政治方面的管理原则，以及将国家团结在一起的道德准则；因为，他相信，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表象背后存在着一种在价值观上的真正共识。这种信念激励他要努力揭示，是什么样的联系将一个社会的成员团结在一起，如何产生维系社会存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与和谐。

就涂尔干将自己视为、而且确实也是第三共和国坚定的支持者而言，存在着相当大的共识。问题是这会将他置于政治谱系的什么位置。学院的保守主义者通常认为他是社会主义者。有证据表明，从个人角度看，他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即使他从未加入过任何社会主义的政

党。^[60]另一方面，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 1960, 212）却论证他所持的是“坚定的保守主义”。^[61]

但大多数分析者都将他置于两者之间，是中庸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我相信，魏兹（Weisz, 1979, 111）确切地把握住了法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涂尔干在政治谱系中所处的位置：

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大学的各门社会科学同某种共和主义-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后者明显是反社会主义的。的确，在某些群体将他视为社会主义者的前提下，涂尔干的主张确实更为模糊。但通过强调他的思想是多么具有进化论、实用主义、反乌托邦主义、有时甚至是保守主义的倾向，涂尔干设法使大学的领导人对他放心。

对此，罗格补充道（1983, 151）：

因为涂尔干反对传统的保守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和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以，他的绝大部分研究关注于由新自由主义提出的主要问题：如何将社会团结同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62]

总体而言，涂尔干的自由主义中间路线也许更接近由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所阐发的立场，而不是韦伯的民族自由主义立场。但施穆勒、韦伯和涂尔干都强调国家作为集体价值体现的重要性，最终三个人都成为了民族主义者。正如梅尔（Maier, 1992, 134）所指出的：

事实上，从孔德到涂尔干的社会学代表了一种思想设计，它要鼓励市民社会这种组织的发展，后者也许可以使一个愈益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变得更加稳固。而且不仅仅是在法国。^[63]

美国事实上是学术社会学最早被正式承认的国家。这里的争论和解

决方案同法国和德国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中主要发挥组织作用的人物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他自身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的成长轨迹。作为一位浸礼会牧师的儿子，他在一个神学院学习，但并没有接受圣职任命。取而代之，他于1879年到德国学习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接着，他于1881年接受柯尔比大学的教职任命，教授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后来他决定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拿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博士学位。1889年，他回到柯尔比大学担任校长。在那里，他用一门社会学的课程取代了一门道德哲学的课程——这是第一批被如此命名的课程中的一门。

1892年，他被邀请到新创建的芝加哥大学去组建美国（确实也是世界）第一个正式的社会学系。1895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JS*）。1905年，他和其他人共同创建了美国社会学协会（*the American Sociology Society*）。同年，他出版了一本初级教材《普通社会学》（*General Sociology*）。布尔默（Bulmer, 1984, 34-35）对他的基本观点做了很好的界定：

斯莫尔相信，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它正在从一门松散的学科转变为一门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客观的学科，它是一门以研究普遍规律、重视理论为特征的、逐渐发展的学科.....

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一门伦理学科，社会学家在社会改良中发挥着一种独特的作用。他的专长和信仰使他能够参与社会改革，而又不会偏袒任何的阶级或利益集团。科学主义和道德准则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对奥伯肖尔（Oberschall）而言，这意味着斯莫尔“确实是在走钢丝”。^[64]当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的主任伯盖司（J.W.Burgess）于1891年聘用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教授社会学课程时，正是因为他认为，“许多像刑罚、慈善和济贫等特殊的问题不可能从纯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加以研究，许多社会伦理问题也不可能从个体伦理学的视角来加以研究”（Dorfman, 1955a, 176）。奥伯肖尔称这是要求开设有关三类人的课程：“有缺陷的、依附性的和犯罪的三类人”。

在美国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历史中，所有其他主要人物也都将他们的社会学以各种的方式同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用一种适应改革需要的积极的社会理论体系取代了过去那种消极的决定论式的体系”（Hofstadter, 1992, 68）。罗斯（E.A. Ross）希望“有智慧的社会学家”能够对“那些支配着社会道德资本的人”提出忠告，“以使他们自身成为所有好人的同道，以消灭所有坏人”（cited in Dorothy Ross, 1984, 163）。伊万·萨默尔（Evan Summer）一般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但他批判“[斯宾塞理论中的] 自由放任内容，[试图] 证明‘进步’是指由拥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从事管理”（Crick, 1959, 50）。

正如布尔默（1984, 39）和奥尔伯肖（1972, 188）都提到的，自由主义新教的潜在影响——对那个时代的进步主义运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渗透到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当中。尽管如此，他们也都认识到，人们有可能将社会学同社会主义相混淆。当阿尔比恩·斯莫尔试图说服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允许他创办《美国社会学杂志》时，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一本杂志“既需要对乌托邦式的社会努力施加限制、又需要鼓励和引导在社会合作方面的明智的尝试”（cited in Dibble, 1976, 301）。政府由专家掌控是中庸的自由主义的一种基本主张。

3. 政治学

在三门以探讨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学科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最后出现的。它早期发展的标志是创建了三个重要机构：在巴黎是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在哥伦比亚大学是政治科学系、在伦敦是伦敦经济学院（LSE）。有趣的是，这三个机构最初都不

是设计用来创建一个独立的政治科学学科的。的确，它们三个都是计划建成从事跨学科研究的机构，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如此。然而，这三个机构都对政治科学学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使在20世纪，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是在美国，稍后是（尤其是在1945年以后）在全世界——以它自身独特的方式获得发展也摆脱不了这种影响。

这三个机构并不是同时创建的。巴黎政治学院最早，是在1871年创建的。追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创建的年代要更困难些，因为它经历了多次组织形式的变化。最可能的年代也许是1880年。伦敦经济学院最晚，正式创建于1895年。它们的发展史是相互联系的，但需要依次地讲述。

巴黎政治学院是通俗的叫法，而不是它的正式名称。在由理查德·德库安（Richard Descoings）于2007年撰写的有关巴黎政治学院半官方的历史中，我们读到（p.27）：

埃弥尔·布特密（Émile Boutmy）于1871年创建了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巴黎政治学院最初的名称]。……埃弥尔·布特密是什么样人？为什么要在1871年建校？就“自由学校”而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政治科学”？这就是在巴黎政治学院人们称之为“打破沙锅问到底”（*baliser le sujet*）的方法。^[65]

布特密是一位持中左派立场的资产阶级，一位有教养的政治评论家，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关系和很大影响的人。一位企业家。所有这些同时集于他一身。

为什么是在1871年建校呢？这也许是一个开端。1870年到1871年对法国而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法国在军事上被普鲁士打败。拿破仑三世的帝国结束，第三共和国宣布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有点故意炫耀

地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加冕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也许最重要的，巴黎是爆发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巴黎公社——的地点，革命最终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作为结果，法国的知识界遭受一场“由德国人造成的思想危机”（Descoings, 2007, 32-33）。文森特（Vincent, 1987, 28）指出，“德国的胜利被视为知识战胜了愚昧”。但并非仅仅如此，军事失败的经历再加上巴黎公社改变了法国的政治生活：

[这两个事件的结合] 导致人们相信，另一次社会大反抗的爆发是可能的，另一次（军事）失败也是可能的。法国必须借鉴德国的经验，并运用它们来反对它。因此，到德国去朝圣成为法国大学生培养方案的组成部分。正是从德国的大学中，埃弥尔·布特密借鉴了新的教学体系，创建了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Vincent, 1987, 13）

巴黎公社不可能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相分离，这在法国仍然是一个引发巨大争议的论题，对此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文森特表明（1987, 13），这也是布特密的心中所想：

在6年中（1789~1794年），传统精英被.....消灭，被其他人所替代，总的来说，这些人都只能实施短暂的统治。1792年的领导人实际上在1788年还都是不知名的，这导致人们认为，“群众”拥有某种“可怕的”潜力，既是危险的、但又是可利用的和“可支配的”（为什么不利用和支配呢？），正如我们今天会说的。[\[66\]](#)

布特密的主要解决办法是培养精英。正如文森特所提到的（1987, 12）：

布特密毫不犹豫地使用 [精英] 一词。对他而言，这意味着为法国提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决策者，他们将从统治阶级的优秀阶层中吸纳——也会将一些来自“较低阶级”的才华出众的人吸纳进这个集团中（让他们站在你这边要好于让他们反对你）。^[67]

因此，布特密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集资金创办了一个私立学校。但头一年，他并没有招到太多的学生，因为那时只准备研究政治情势、只准备从事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学术政治学研究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很快就调整了策略，增加了传授知识的专业目标。在1872年给投资者的报告中，他提出，有必要“提供培训，以致能够对民族命运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两种最重要的职业——外交和高级行政管理——可以在本校获得第一流的培训，而这是迄今为止人们一直无法获得的”（cited in Descoings, 2007, 40）。用文森特的隐喻来表述，这是从一种传播知识的机构向一种权力机构的转变。“自由主义的、反对政府干预的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如今变成了报考财政监察署（the Inspection des Finances）、国家法院（the Conseil d'tat）、审计法院（the Cour des Comptes）和法国外交部（the Quai d'Orsay）公务员的人准备考试的中心所在”（Vincent, 1987, 61）。^[68]

这样，布特密就创建了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它并不从属于索邦大学，而且也不是培养圣职的。它是一个教授“各门政治科学”（注意复数）的学校。但政治和科学这两个词都有点模糊。在法语中，科学仍然被用于意指一般的知识，像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en）一样。政治科学也仍然是一个能够意指一般社会科学的术语。的确，布特密实际上提供的培训绝大部分是我们今天称为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在更狭义界定的政治科学方面的知识。^[69]

1876年，约翰·伯盖司被从阿默斯特学院请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法专业的教授（Hoxie, 1955, 6）。正如伯盖司后来所描述的，哥伦比亚大学管理机构的意图是“通过为私法专业的学生提供伦理学、历史学和公法课程的教学——这些都是完成法学专业学习的必修课程，以使法学院过于专业化的倾向得到缓和”（cited in Byrson, 1932, 322）。但伯盖司发现法学院“非常难于渗透”，于是转而创建了政治科学系。

在为庆祝哥伦比亚大学建校200周年撰写的政治科学系的官方历史中，霍克西（Hoxie）描述了它同巴黎政治学院的联系：

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的创建对约翰·伯盖司是一种激励。像其他许多研究我们政府的学者一样，他在1879年非常关注美国公务员制度的状况，对由海斯（Hayes）政府发起的改革持谨慎的支持态度。而且，他从斯塔佛德·诺斯考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那里获得的有关英国公务员制度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在1878年访问英格兰期间提到，公务员被视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人们为它所做的准备应该像为从事医学或法律工作所做的准备一样充分。难道不应该在我们国家设立一个研究生院——一个学院或至少是一个系——来培训公务员，就像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所做的那样吗？难道不可以对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学大纲明显难以改变的专业化倾向提供某种补充吗？（1955, 11）

这很好地适应了由独立共和党人——被称为“共和党独立派”（Mugwumps）——所发起的政治运动，这个集团来自社会精英阶层，专注于公务员改革。他们是典型的中庸的自由主义派。他们反对所谓的绿背纸币党人（Greenbacker）和工会，后者被认为想要没收财产。他们还反对所谓的激进共和党人，后者领导了支持被解放的黑人奴隶获

得政治权利的斗争。共和党独立派认为激进共和党人是一群疯子。另一方面，共和党独立派还猛烈攻击富人不履行社会责任，这是他们属于中间派的证据所在。他们将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集团身上。从中可以推断出，“提高社会科学在教学大纲中的地位是这种教育方面的改革的另一个组成部分”（Church, 1974, 577）。^[70]

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董们同意组建政治科学学院（稍后被称为系）时，他们提到，伯盖司“明确宣称它将是他为政府机构培训人员计划的组成部分；但没有必要公开宣称这一目标，这样做也许会引起嫉妒而不利于它的成功”（cited in Hoxie, 1955, 15）。校董们也许是担心其他系的反应，但无疑他们自己是认同这一目标的价值。在哥伦比亚大学1880年的大学手册中，新的政治科学学院的发展目标是这样说的：“首要目标是发展政治科学的各分支学科。次要目标是为公共服务机构培养年轻人”（cited in Crick, 1964, 28）。

正如埃弥尔·布特密是创建巴黎政治学院的主要推动者、约翰·伯盖司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政治科学系的主要推动者一样，韦伯夫妇（Sydney and Beatrice Webb）是创建伦敦经济学院的主要推动者，它的全名是伦敦经济科学与政治科学学院。韦伯夫妇长期以来一直想创建这样一个机构，当1894年一位叫亨利·亨特·哈奇森（Henry Hunt Hutchison）的人去世时，他留给费边社一笔2万英镑的遗产——这在当时是数量可观的。因此，在1895年8月4日由韦伯夫妇召集、由格雷厄姆·华莱斯（Graham Wallas）和乔治·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参加的早餐会上，决定（压倒肖伯纳的反对意见）创建伦敦经济学院。

正如其他两个机构的情况一样，伦敦经济学院最初的意图是改进对英国政治和商业精英的培养。韦伯夫妇用巴黎政治学院的教学大纲作为他们自己创建的机构制定教学大纲的基础。的确，尽管他们过于关注经济问题，但伦敦经济学院后来的一位院长拉尔夫·达伦多夫在他撰写的

学院百年历史（1995，196）中解释道，之所以在学院的名称中插入“与政治科学”的短语，是因为

韦伯夫妇不想让人们忘记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对他们创建学院的影响，因此政治科学必须在学院的名称中有一个位置。

进一步而言，达伦多夫提到（1995，21），开始时所有课程都是在夜晚教授的，作为实现它的职业教育目标的手段：

学生之所以接受培训并不是仅仅为了获得某种学位，而是因为培训将对参加公务员考试以及银行家学会、伦敦商会（the 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和其他机构的考试有益。

尽管作为一个——但并不唯一的——机构，巴黎政治学院继续发挥着培训要进入外交和高级行政机构工作的学生的作用，但这最终不再是伦敦经济学院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科学学院也变成了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生院，它的一个系是政治科学系（在哥伦比亚大学那时被称为公共法律与管理系）。

正如我们在大约1900年以后所知道的，政治科学首先在美国出现。^[71]它的出现是作为休斯（Hughes，1958，66-67）所称的19世纪90年代重大观念创新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一种观念是“要揭穿实际掌权者对他们的政治行为编造的谎话”。克里克（Crick，1959，37-38）表明了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有关进步具有必然性的理论和有关社会治疗学的理论都已经出现。它们将导致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一种新的分裂；偏爱心理学的解释，反对历史学的和哲学的解释。……它

们将为一种独特类型的哲学——实用主义——的出现，并为一种大体上尚未加以系统化的、但影响越来越大的实证主义的出现提供更多的条件。

美国政治学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它是在1903年创建的——的创建者们的实证主义和现时主义导向一方面代表了同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决裂、另一方面代表了同伯盖司所主张的公务员培训导向的决裂。正如冈内尔所论证的（2006, 481），不过，同历史学 and 经济学决裂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方法的不同造成的，而是出于对“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关注。

正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建者们对“社会科学有效地发挥对现实的影响作用感兴趣，但他们同时也抵制讲坛社会主义者的主张”（Gunnell, 2006, 481）。他们试图仿效韦伯和滕尼斯（Tnnies）在1909年创建德国社会学协会（th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时所做的。沿着这种路径，像德国社会学家一样，美国政治学家正在接近达伦多夫（1995, v）所称的在“试图了解事物发生的原因和试图改变事物之间”的西德尼·韦伯断层线。

中庸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跨越断层线的方法，洛维指出（Lowi, 1985, ix），这种选择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它在政治科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美国，沿自由主义路线建构的民族政府出现的既晚又慢。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也是如此。……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自由主义回避对行为或资本主义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做出判断。通过使自身关注于应对那些只是根据结果才被认为是有害的行为，自由主义政府能够证明它的合理性所在。通过使自身关注于有关行为和它的后果——或相关地关注于行为和它的原因——的各种假设，社会科学能够对这种制度做出分析，

同时也能够服务于这种制度。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治科学和新兴的民族政府都如此地偏爱科学。

非西方世界

历史学和三门探讨普遍规律的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19世纪最后1/3时期和20世纪上半期的正式确立采取了作为大学几个系的形式，在那里西方世界对自身做出研究、解释它自身的运转，以对所发生的事态进行更好的控制。我说的是西方世界，但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95%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仅仅5个国家中进行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而且它们也主要是研究这5个国家。剩下的5%大多是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低地国家、俄罗斯、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在很小程度上是研究拉丁美洲的。

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西方世界、尤其是这5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统治世界其他地方的时期，所以这应该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尽管如此，但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这些强权国家给予某种关注的对象，他们希望了解如何最好地控制那些他们拥有支配权的“其他地方”。应该说，他们必须了解如何实施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控制。因此，再次地，各种学术专业纷纷出现，它们生产人们希望得到的知识，这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不过，世界的其他地方从政治上被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这种划分通常是用不准确的术语来加以命名的。分析家们有时提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种区分是在那些由一个“欧洲”强国实施直接殖民统治的地区和那些尽管名义上独立、但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欧洲统治的地区之间做出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对特定地区进行分类的方式给分析划定了许多框框，如果人们要准确了解情势的话，必须超越这些框框。不过，我们能够首先关注一门被称为人类学的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它主要是研究殖民地的某个地区、或者宗主国国内的特定地区的。第二门学科被称为东方学，在这一时期主要（但并非专门）是研究半殖民地地区

的。

这两个“学科”是彼此完全独立的，而且很少有例外出现。的确，甚至在21世纪，也很少有社会科学家认为在这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哪怕是一点模糊的联系，更少有人认为两者是在一揽子共同主题的基础上建构的。尽管如此，但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两门学科都研究世界的“其他地方”，即那些在19世纪晚期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泛欧洲地区组成部分的地区。第二个主题是他们研究的民族都不被视为“现代性的”，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拥有被视为现代“进步”组成部分的技术和机器。^[72]因此，不可能相信，他们会拥有现代性的价值观，就像这些价值观在泛欧洲世界被构想和实践那样。第三个共同主题是断言，这些国家/地区/民族没有历史，这意味着他们没有随着历史时间而变化、发展和进步。

不过，在以这个或那个名称命名的学科所研究的民族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重要的差别。人类学家研究的族群相对较小，这既是从他们的人口数量、也是从他们所居住地区的面积两方面来衡量的。很少有例外，这些民族在他们遭受殖民统治时期并没有文字记录。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通常和相邻其他民族的语言并不相同。它们之间所信奉的神也不相同。从欧洲征服者的视角看，他们被命名为“原始”民族，在每个方面都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几乎不能为普通的欧洲人所理解。

东方学学者研究非常不同类型的民族。他们研究的民族或“文明”从人口数量看和从居住地区的面积看都是巨大的。他们确实拥有文字记录，尽管对欧洲人而言这些文字很难读懂。而且在很大一片地区似乎存在一种被共同使用的语言、或至少是使用通用语言。因此，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的数量巨大。除此之外，在这片广袤的地区，他们似乎信奉一种单一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宗教。在19世纪，这种宗教的信奉范围是如此之

大，以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他们明显拥有某种历史，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僵化的”，因此它没有进化到“现代阶段”。通过研究证明，所有这些范围巨大的、“僵化的”文明都是在过去某个时间存在的巨大的、官僚化的帝国的产物，我们一直称它们为“世界帝国”。正是这些官僚化的帝国导致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或通用语言、信奉一种共同的“世界性的宗教”和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许多这样的地区——但并不是全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仍然是非常统一的，有能力抵抗外部势力的直接殖民。

由于在两类非欧洲地区之间存在着这种重要的差别，所以两类不同的学术问题构成了两个不同学科研究的基础，并且实际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人类学家试图解释他们所研究的民族——他们开始时将这些民族几乎统一地视作“部落”——实际是如何生活的。即，他们试图深入到表象背后揭示行为的理性基础，而这些行为在大多数欧洲人眼里似乎是非理性的。在这种意义上，探求行为隐含的理性同其他社会科学家在研究“现代”民族时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它是一种源于启蒙运动有关社会科学应该发挥适当作用的设想的探索。

但他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初，没有什么资料可供人类学家阅读，他们甚至不能同这些民族的成员进行口头上的交流，至少在他们研究的开始时是这样。人类学家以一种被称为“参与性观察”（即通过亲自参加研究对象的活动进行现场观察研究——译者注）的实践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方法要求进行田野调查。人类学家通常会在一个特定的族群中生活一段时间。他们会努力找出一些被他们视为“语言家的人”，后者出于某种原因掌握了一门欧洲语言。这些人不仅是人类学家和他们所研究族群之间进行交流的中间人，而且也是解释者（既从文字上对语言做出解释，又从思想上对文化做出解释）。

就他们所研究的民族而言，人类学家试图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人

类学家将所研究的文化界定为一种单一的、整合在一起的整体，而且它是不发生变化的，由此最终能够写出一部有关这一民族的民族志。一旦完成这种研究，人类学家就变成向欧洲世界、尤其是更经常地向殖民政府从文化和政治方面解释他们所研究的民族的专家。当然，尽管这是一种对所发生的情况高度理想化的描述，但也是对当时情况的一种权威性的描述。

东方学学者有着一种非常不同的关注和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论，因为他们正在研究的是一种他们称之为“高级文明”的现象。但对他们而言，这种文明似乎又不是现代性的，即在欧洲文明将自身视为现代性的意义上。所以要回答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解释为什么这种“高级”文明从未能做出进化性的飞跃，像欧洲人被假设已经发展到现代阶段那样。当然，这是欧洲人自己提出的一个沾沾自喜的问题。它假设自身具有优越的地位，但相比解释它的原因，它很少试图证明它的真实性（因为它大体上是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而提出的）。

问题在于这种研究是如何做出的。由于确实存在书面文献，似乎很难说有从事田野调查的紧迫性，而后者是人类学家的骄傲所在。尽管如此，但这类文献是以一种非常不同于欧洲东方学学者的母语的语言写成的。学习语言需要长期的培训，尤其是这些文本绝大部分都是古代的，而且它们中的许多是宗教方面的文本。所需要的技能主要是文献学方面的，从事研究的地点主要是一些数量有限的重要图书馆。当然，像人类学家一样，东方学学者也遵从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前提。他们也希望说明一些表面上非理性的行为和哲学观点的理性基础。他们也希望将他们所研究的文明解释给欧洲世界、尤其是更经常地解释给欧洲世界的政治权威。

人类学家和东方学学者说明他们所研究的部落或文明具有潜在的理性的愿望，几乎必然导致他们暗中持有的意识形态是中庸的自由主义

的。他们试图改善强国同弱国关系粗暴的一面，同时帮助强国更明智地和更有效地管理他们负责管理的民族和（或）同其他的文明打交道。^[73]他们支持那些有助于限制冲突、尤其是限制激进地颠覆泛欧洲地缘政治权力现状的改革。

东方学是天主教会长期传统的继承者。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一些僧侣和其他的基督教学者在研究穆斯林世界和中国的语言和文本，作为他们向这些地区传播福音努力的组成部分。这种学术研究在18世纪晚期、尤其是在19世纪获得了一种新的推动力（通常更多是世俗方面的），此时欧洲的扩张已经开始涉及亚洲大陆的各个地区。

具体而言，对埃及文明的研究——埃及学（Egyptology）——开始于18世纪下半期。不过，两个政治事件对埃及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获得重大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是拿破仑在1798年入侵埃及的失败，另一个是希腊于1823年爆发的争取独立的战争。拿破仑的入侵最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流产（see Cole, 2008）。但他有一个计划，即随身带上一批各学科的学者去研究埃及。这方面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一部多卷本的、被称为《埃及记述》（*La Description de l’Egypt*）的著作的问世，它是有关埃及历史、建筑、植物和动物的多篇文章的汇编，再加上地图和版画。

相比将希腊建构为西方文明的源泉，这部创建埃及学的不朽著作的重要性似乎要略逊一筹。有关希腊是西方文明源泉的观念在今天是如何的普遍，以致人们很难再记起这甚至并非一直是西方历史观中的一种既定认识。在《黑非洲》（*Black Africa*）一书中，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论证了（西方）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该书的第一卷（1987年）被定名为《对古希腊的建构》（*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他提出的是一种对比论证。对浪漫主义运动而言，正是希腊、而不

是罗马和埃及代表了“自由的典范”（p.289）。对埃及的过分褒扬也许会威胁到“希腊文明的独特性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文明的独特性”（p.269）。当希腊于1823年奋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时，欧洲的浪漫主义者带头呼吁要团结，并宣扬它是一场“在欧洲的青春活力同亚洲和非洲的堕落、腐败和残酷之间的斗争”（p.291）。

这里重要的不是分析贝尔纳的书所引起的学术争论。^[74]不容否认的是，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对其他地方的一种研究，埃及学在19世纪获得了发展。对埃及文明的否定性描述主导着19世纪的文献（确实也主导着20世纪的文献），这是同该时期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相对应的。^[75]

似乎同样明显的是，古典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一个学科在英国（接着在美国）大学中的出现，反映了中庸的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方面的推进。由于强调对文献做仔细的研读，所以古典学一方面代表了同传统的牛津-剑桥教育所开设的那些呆板课程的决裂。而且与此同时，它还代表了同法国大革命所孕育那种激进主义的决裂。它是某种类型的“第三条道路”。^[76]

不过，在新兴的东方学学科中，相比印度，埃及的地位要略逊一筹。1818年，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出版了《英属印度史》（*A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的第一版。在书中，穆勒提出了东方专制主义命题，认为这种专制主义是非常不同于欧洲的开明专制统治的；他对英属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做了非常负面的描述，认为两者都是没有变化的民族（Bannerji, 1995, 60-61）。该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内容不断扩充的形式不断再版。这导致他被任命担任东印度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最终成为它的首席检察官。

尽管有穆勒，尽管有印度是英国殖民地的事实，但英国并未成为研究印度文明最重要的中心。相反，德国成为这样的中心。德特马尔·罗

德蒙德（Dietmar Rothe rmond）是20世纪晚期研究印度的德国历史学家，他将德国“探索印度”的浪漫主义追求的根源归因于德意志诗人和剧作家在18世纪晚期“反对之前在德意志存在的法国文体和古典文学居优势地位”的斗争。他提到乔治·费歇尔（Georg Fischer）在1791年翻译了印度史诗《沙恭达罗》（*Shakuntala*），这“在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轰动”，“比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英国将它译为英文受到更热烈的欢迎”（1986, vii-viii）。德国人用印度学来抵制英法所宣扬的普适性主张。^[77]

德国的印度学研究采取了一种过于重视语言的形式。发现我们今天称之为印欧语系的各大语族之间存在着联系，这能够追溯到18世纪晚期。尽管英格兰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和意大利的一位商人在16世纪、荷兰的一位语言学家在17世纪、法国的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在18世纪，都曾指出过这种语言上联系的存在，但这些发现一直未能产生影响，直到亚洲学会（the Asiatick Society）的创建者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在他于1786年就任会长的演说中提到这种联系时。现在使用的“印欧”一词是稍后由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在1813年新创的（Decharneux, 2000, 13）。

不过，在德国，印欧被称为印德（Shapiro, 1981）。德国人的研究强调探寻一种“最原始的语言”，它有时同探寻一种“最原始的故乡”相联系。这种探寻可能体现了强调语言纯洁性的浪漫主义观念，认为梵语是最原始的语言。而从结构上看，德语是最接近梵语的语言（Mawet, 2000, 62）。这正是罗德蒙德（1986, 53）认为德国的印度学研究具有“保守性”的一面，它“在最原始过去看到了语言和宗教最纯洁和最完美的表现”，它的目标就是要洞察“语言的退化和讹误，以达到它最初的本原形态”。

不过，德国19世纪最著名的印度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uller）同

时也受到进化学说的自由乐观主义的激励。他设想了印度教实现宗教进化的可能性，这将使它更接近基督教。就个人而言，他同梵志会（the Brahmo Samaj）的领袖们的关系密切，后者是一个实际追求这样一种进化过程的组织，就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亚洲其他宗教中类似的运动一样（Rothe rmond, 1986, 54）。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德国学者都是印度学的研究者。黑格尔就非常强调下述思想，即只有在古希腊，人类才开始在它真正的故乡生活，而这正同东方学家的观点相对立（Droit, 2000, 91）。正如埃及的情况一样，印度也是如此。这是欧洲的普适性主张同东方文明处于僵化状态的主张的正论与反论。东方文明也许会进化，但只有在西方的指导下才会如此。因此，德国（确实也是整个西方）19世纪有关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术研究对这些国家的当代史并不感兴趣，这绝非偶然。^[78]

在某些方面，中国是东方学研究产生激烈争论的最有趣的例子。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富裕的远方文明的形象，曾长期得到欧洲人的赞美。但在18世纪中期到晚期的某个时间，这种形象被颠倒过来：“中国人目前受到谴责，因为启蒙运动认为他们的稳定性是令人惊叹的”（Bernal, 1987, 240）。尤其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后，中国变成“一个通常被解释为……典型的‘停滞的’和‘传统的’文明”（Blue, 1999, 94-95）。^[79]

在这方面，德国似乎同样处于领先地位。但不像印度的例子，德国的思想家似乎在各个方面都缺乏宽容。赫尔德带头论证，中国“肯定是东方蒙古人陈旧的和眼界局限于地方的思维方式的产物，……仅仅是僵化地维系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种处于冬眠状态的土拨鼠……一种经过防腐处理的埃及的木乃伊”（Rose, 1951, 58）。

黑格尔稍微宽容一些。罗斯（1951, 59）总结了黑格尔的观点：

中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家长制统治，它拥有一种运行良好的官僚制度，但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无法容忍的专制统治。……黑格尔在中国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自由的精神、内在的虔诚、深厚的感情、或较高的道德水准。在那里，具有压倒性影响的抽象推理通过它令人窒息的全面控制束缚着所有生命。中国没有参与历史创造。“它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最后，尽管强烈地反对进步和现代性，但戈宾诺也找到了蔑视中国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几乎同其他西方思想家提出的理由完全相反。布鲁（1999，134）以这种方式总结了戈宾诺的观点：

对他而言，[平庸、专制和缺乏自由]是“群众”与“革命”的典型特征。因此，正如他所认为的，中国是民主式专制和“进步”的一个典型例证。他看到了源自这些特征的结果，即奴隶制、停滞、最后是灭亡。

因此，通过不同的、但有着相似逻辑的具体论证，作为一种解释“高级文明”——那些从历史上的世界帝国派生而来的或延续到现代的文明——的方法，东方学建构了一种将这些地区视为僵化文明的形象，它们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述，它们是那些只有通过欧洲世界的某种干预才能实现进步的地区。

从许多方面看，在证明他们的论点上，人类学家的工作要容易得多。他们研究的是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民族，这些民族的技术水平总体看要低于19世纪欧洲的水平。正如亨斯利（1981，29）在研究美国的土著人时所指出的：“居于中心地位的、令人困扰的政治和宗教上的两难问题是：这些民族在何种意义上是我们的同胞？根据什么样的权利，我们能够宣称他们的土地就是我们自己的？”

围绕所谓的多元发生说展开过一场争论，人类学早期的历史由此而

发生转向；这个概念我们以前讨论过，它是指欧洲人和其他民族并不是一个单一人种的组成部分。1910年，约翰·林顿·梅耶斯（John Lynton Myers, 1916, 69）发表了就任英国科学促进会人类学分会（the Anthropological Sectio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会长的演说。他试图解释，多元发生论——一种那时已经被完全抛弃的观念——为什么需要认真对待。他首先指出，在18世纪晚期之前，它从未被认真提出过。接着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在英国出现了强大的废奴运动：

仍然存在奴隶制的18世纪广泛认为，黑人和中国人与其说是黑猩猩，不如说是愚人。正像亚里士多德以前证明过的那样，他证明奴役具有合理性的理由在于它对奴隶是有益的。

首次在政治方面对白人拥有黑人所有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将这些质疑转化为实际运动和议会法令的那一代人，恰恰就是首次在理论方面提出质疑——即白人和黑人是否流着相同的血——的那一代人，这绝非偶然。只要奴隶制在道德上被视为正当的，那就没有人会劳神费力地去证明它在人类学上也是正当的。但一旦奴隶制的自然性受到废奴主义者的质疑……那奴隶主就会提出以前的问题：“假如我是我同胞的监护人，假如这意味着我也许并不是他的主人；但是这个人、这个黑人同胞在何种真正意义上是我的同胞呢？从他的外表看，他难道不就仅仅是一种例外地可以驯养的动物，拥有和我们不同的血统吗？”^[80]

多元发生说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甚至在英国，它也被用作反对赋予凯尔特人以选举权的依据（Rainger, 1978, 69）。但到19世纪晚期，在人类学家的群体中，它败给了另一种过去就已经存在的有关“原始人”的观念，即一种同进步的基本观念相联系的概念。^[81]

约翰·洛克（1965，383）在1690年指出：“起初，全世界都处于美国土著的发展阶段上”。在18世纪中期的法国和苏格兰，人类进化的多阶段观念被作为一种理论主张提出，尤其是被雅克·杜尔哥（Jacques Turgot）和亚当·斯密所提出。在他们的论述中，美国土著“为总结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或‘最早’阶段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研究对象”（Meek，1976，128）。

相比多元发生说，这种假说更好地适应了时代精神。它同时也更好地适应了“自然史”和“科学”之间新出现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更一般层次上的分离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两个术语以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同一样东西：即有关自然界的知识”（Merill，1989，12），但随着科学被细分为不同的学科，它们目前意指不同的研究。正如梅利尔（Merrill）所指出的，目前“博物学家可能仍然在研究自然的方方面面……；但科学家只研究它的一个部分。业余爱好者仍然可以从事自然史的研究，但（科学）已经成为专业人员的专属领域”。

很明显，在选择强调人种学的方法上，人类学成为某种类型的以人类群体为研究中心的自然史。当然，在20世纪早期最终变成一种专属于专业人员的研究领域之前，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对业余爱好者开放。在19世纪上半期，人类学仍然依赖于旅行者提供的资料：有时是科学家乘坐海军舰船的探险，有时是地理学会派出的探险家，有时是殖民地政府机构的成员，有时是传教士，有时是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

关键的转变发生在对什么构成“原始状态”的界定上。直到19世纪中期，它还被“视为一种社会或工艺的简单状态”（由此能够作为一种生物学现象加以研究），“现在被重新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状态”（Betts，1982，67）。一旦这种转变发生，那么人类学就能够变成一门有着明确研究对象的学科。

特鲁罗（1991，40）抓住了它的核心所在：“并不是人类学创造了野蛮人。相反，野蛮人是人类学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上述在1871年提出的两个著名论断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意大利人类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指出：“[我们已经用]一些铁一般的事实取代了神学家的幻想和形而上学家的思辨……但它们是事实”（cited in Zagatti, 1988, 24）。同年，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1920, 410）中提出了他的主张：“有关文化的科学在本质上是服务于改革者的科学”。

人类学专业的范式目前已经确定。它将是整体主义的和描述性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提供探讨独特性的人种学研究。它将对“原始”民族的理性提供解释。它将为使这些民族更好地整合进现代世界提供支持，这既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统治他们的欧洲政府的利益。它将会一直如此，直到1945年以后时期发生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为止。正是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破坏了基本的地缘政治结构、由此破坏了地缘文化结构，而人类学正是在这种结构的框架下从知识结构中分割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

[1] 见布吕诺和布鲁瑙（1937，617）对“革命”一词词义转换的讨论：“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当晚，路易十六不安地问道：‘那么这是一场骚乱吗？’，利昂古尔公爵（the Duke of Liancourt）回答说：‘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这个词语并不是新产生的，甚至在它指一场使帝国发生深刻转型的运动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尽管如此，……不管它多么古老，它都是指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2] “就社会科学而言，生理学、心理学、对思想和情感的分析、人类学、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政治算术、管理学、社会管理艺术、伦理、伦理学和有关人的科学等术语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就它们的内涵而言也不存在共识”（Manuel, 1956, 130-131; see also n.4 on p.391）。贝克（1964，215）指出，孔多塞在1792年将社会科学和社会管理艺术作为同义词加以使用，当被译成英文时，这些术语变成“伦理科学”（p.220）。

[3] 这由此会导致将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艺术”，尽管这并不必然是唯一的结论。坎宁安和贾丁（1990，14）提出另一种结果，它直到1800年仍然是一种有很强竞争力的观点：

[在1800年左右] 学科分类将工程学纳入艺术门类，它是一种有用的、而不是一种高雅的艺

术。与此同时，那时在大学中教授的几乎所有其他学科，诸如化学、历史学和神学都被认为是科学。真正的学科划分是在由理性支配的科学领域同实践领域或由经验支配的领域之间做出的，科学的提倡者希望在生活中用理性取代习惯。

[4] “在19世纪早期，科学并不享有文化和制度上的地位保障，这使得 [许多人] 将它地位的提升视为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它的声望要比与之竞争的各种学术活动形式低，后者诸如神学和古典学，即使它们并未尝试解释自然界，但它们仍然作为由文化赋予其知识体系地位的典型范例。……‘科学’一词并未完全失去它较早期的有关系统知识的含义，或对一些人而言，科学 (scientia)、逻辑、神学、语法仍然是‘科学’，该术语仍然被作为‘哲学’的同义词而使用” (Yeo, 1993, 32-33)。

[5] 尽管如此，但人们应该对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划分完成得如此之早持谨慎态度。普罗克特 (1991, 75) 论证：“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德国学者被认为是道德和学术文化的承载者。科学 (Wissen) 同样也是对神学、医学、法律和哲学的研究。……相比科学一词，学术或研究更好地反映了科学的内涵”。罗斯 (Ross, 1962, 69) 认为，到1820年科学和哲学这些术语仍然可以互换使用，而两者被明确加以区分是在1850年，哲学变成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而科学则成为知识的试验和自然科学分支。正如施韦伯提醒我们的 (1985, 2-3)，维多利亚早期的知识精英 (大约从 1830~1850年) 仍然持有“对博学者的崇拜，[坚持] 要掌握所有已知的和能知的知识”。他提到，伦敦大学的第一位数学教授奥古斯都·德·摩根 (Augustus de Morgan) 曾指出：“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最低标准是既要有一般常识、又要有专业知识”。

[6] 博纳尔是包胥埃较早时期 (Bossuet) 所持蔑视观点的继承人，他称社会科学“对知识的渴望是徒劳的”，不可能生产任何有用的东西。这种观点可以在他的《论情欲》 (*Traité de la concupiscence*) 中发现，豪塞 (Hauser, 1903, 387) 曾援引过他的观点，指出包胥埃将社会科学学者归入“古代遗留下来的金属制品和昆虫标本收集者的行列”。

[7] “现代二元制的 [教学和科研] 教授体制、尤其是在任命教授时主要依据的学科标准是在更大的学术圈中所具备的几个条件为前提的。特别地，它以被明确界定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其成员的声望至少大体能够由它的管理者予以评估，作为他们做出任命的依据” (Turner, 1974, 2: 510)。

“科学在德国大学中的兴起，加上对学生录取和教师录用上的严格限制和较高标准，都对学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他们] 必须更勤奋地学习，因为学术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大，而且专业资格考试也越来越严格” (McClelland, 1980, 202)。

[8] “我们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知识分子专业化 [在19世纪] 的重要性。在18世纪，哲学家受到权势人物的保护，并从后者那里获得津贴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到19世纪，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他们在经济上变得更具自主性：一方面是大学教职任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他们著作销售量的扩大，由此版税收入增加” (Rosanvallon, 1985, 169, n.2)。

[9] 到19世纪中期，勒南 (Renan) 预言，历史和批判性的研究将降到“应当被忽略的地位” (cited by Super, 1977, 231)。这正是使实证主义构成对宗教信仰的根本挑战的现象。

它“对人类就神学问题做任何有意义探讨的能力和没有比这种探讨更重要的问题的说法提出质疑”（Cashdollar, 1989, 6-7）。总之，正如彼得·盖伊（Peter Gay）所评论的：“[在维多利亚时期]甚至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为去宗教化的趋势所困扰，但他们也赞成下述说法，即他们所生活的是一个科学的世纪。这种信念是如此的普及和如此的平常，以致几乎不需要为它提供任何历史证明”。

[10] 约论证（1993, 65），科学和浪漫主义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辩证地看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共同寻求“为他们的认识活动吸引追随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将自身视为在为争抢同一群追随者而发生争执”。奈特（Knight, 1990, 8）对这种论证做了补充：“新‘科学家’对自身的认识主要是围绕浪漫主义的主题建构的，将科学发现视为天才努力的结果，将对知识的追求视为一种公正无私的和英雄式的追求，将科学家视为激动人心的历史剧中的演员，而且科学家精英集团拥有自主权”。

“科学家”一词早在1833年就由惠威尔（Whewell）创造出来，但直到19世纪结束时才在英国被普遍使用的一个原因在于：“一些重要的科学家，诸如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T.H.赫胥黎都倾向于将他们的研究视为更广泛的哲学、神学和伦理学研究的组成部分”（Yeo, 1993, 5）。

[11] 昂里·豪塞在1903年（p.5）写道：“继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充斥着社会混乱、阶级斗争、公开反思和公开批判。因此，没有理由对下述现象感到惊讶，即正是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才首次充分地为人们所了解”。豪塞还提到巴黎公社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影响：“在1871年5月的恐怖镇压之后，相比过去，似乎更有必要将社会问题从街垒斗争转向科学领域。进一步而言，像它在1848年较早期的前身一样，9月4日建立的共和国也需要公务员。如果它不想从帝国时代的干部中吸纳公务员的话，那它就必须通过适当的教育来培养”（134-135）。

[12] 争论是非常激烈的：“由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思想上的伟大革命在涉及社会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自从笛卡尔以来，所有知识都具有统一性的观念普遍流行起来。所有现象……最终都能够应用同样的方法来加以认识，即社会科学的数学方法。不过，由于法国大革命，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社会现象构成一种特殊类型，要求做特殊的研究和运用特殊的研究方法。永恒不变的规律也许适用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现象是永恒不变的，但人类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一直在经历着变化（进步）。因此，社会科学的特殊任务不是试图探求永恒规律，而是要发现变化本身的规律”（Grossman, 1943, 386）。但当然，如果确实存在一种有关变化的规律的话，那它将同样是一种永恒的规律，即不会赋予任何变化以永恒意义。不过，就人类社会而言，人们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人们能够说，对社会政策的传统指导——哲学、古典学和历史学——“如果确实能够提供指导的话，那是以惯例、原则或系统研究的形式对理想的政府形式提供指导。新的自然科学似乎提供了进行准确和适当推理的前景”（Checkland, 1951, 48）。切克兰德提醒我们，早在1783年，孔多塞就已经呼吁学者“将自然科学的哲学和方法引入伦理学”。

[13] “在新兴的社会科学和普遍的社会关注——即关注那些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而

创立的新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Wittrock, 1993, 303）。不过，也见一种对所发生的变化之稍微不同的认识：“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科学‘阻挠了’一种学术社会学的发展；而是‘社会学’起源于改革的失败”（Goldman, 1987, 171）。

[14] 该组织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在前自由党首相罗素勋爵的支持下，由法律修订协会（the Law Amendment Society）和国家改革联盟（the National Reformatory Union）召开联席会议的结果。它“被设计用来为那些缺乏社会改革意识和专业知识的立法工作提供专家指导”（Goldman, 2002, 58）。它很快就经历了两次名称变化。最初它被称为改进人民道德和社会全国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Moral and Social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接着被称为国家法律修订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Amendment），最后被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促进协会这个长期使用的名称。由于这个名称仍然有点长，所以它被简称为社会科学协会。戈德曼在第27~66页给出了该组织演变过程的历史。

这些名称反映了社会科学协会的“国家干预主义”导向：“它的自由主义是功利主义类型的，重视理性和体系性，大体上不关注为实现这些目标所要求实施的控制措施，也相对不关注以个体权利为前提的争论”（Goldman, 2002, 133）。“在什么条件下协会会自发地求助于国家行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干预是明显的，也许可以给出如下名称：‘解放型改革’；‘保护性立法’；和最重要的‘行政干预主义’”（Goldman, 2002, 206）。在它的下述信念中，即“社会科学将构成改进社会管理的基础”，它将由成功来证明其正确性：“当社会科学协会于1886年解散时，一直对它持敌对态度的《泰晤士报》也不吝溢美之词：‘在法律、治安、教育和国民健康等方面，没有一个法律修正案不是首先得到社会科学协会的指导才予以通过的’”（Goldman, 2002, 19, 21）。戈德曼（2002, 14）做出了有趣的评价，社会科学协会体现了“韦伯式的官僚制理想类型的特征，它依赖于专家和专业知识和不是依赖于有着非凡个人魅力的权威”。它是一个自发组成的协会，“我们也许可以说，它之所以被创立是为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弥补由于缺乏有能力的和资源充足的理想类型的官僚制而造成的缺憾”。

[15] “[在英国从事经验研究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动机是收集那些对推动社会改革有益的知识。……皇家统计学会和社会科学协会的成员对自身的定位是社会改革家。他们将社会科学视为有益于社会改革的工具”（Cole, 1972, 99）。这种动机由于克里米亚战争、1867年选举权的扩大和征兵制的需要而进一步得到强化：“当在帝国的中心存在贫困的弊害时，整个国家的信心和获得人民的支持如何能够得到保障？”（McGregor, 1957, 156）。柯尔视为松散和缺乏凝聚力的特征，戈德曼（1998, 5）却视为社会科学协会的力量所在：“它每年的代表大会……有助于将地方和大城市的自由主义精英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由各种社会利益群体——宗教上不信国教的人、商人、工人、大学教师、社会改革家、仁慈的辉格党贵族和地方上的新闻记者——组成的复杂的和矛盾的混合体，他们共同塑造了格莱斯顿式的自由主义，既传统、又激进”。

[16] 尽管如此，但戈德曼（1998, 5）坚持认为：“这是‘社会科学’和英国的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拥有类似主张的政治和专业支持者中产生反响的强有力证据，自由主义是指自由贸易、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戈德曼所称的“国际自由主义”包括“对科学方法和专业知识的共同信念；对社会问题能够在国家的和国际的论坛上予以讨论和解决共同信念；对达成社会共识、实行审慎的改革和明智的公共管理拥有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坚持政治自由、和平和自

由贸易”（17-18）。

[17] “在1848~1914年这段时期，德国社会研究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关注工人阶级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它从根本上看是由实行改革的需要所激发的”（Oberschall, 1965, 137）。

[18] “[改革运动的领袖] 想要同马克思主义无关的社会改革”（Ringer, 1969, 139）。1897年，作为社会政策协会的领袖和也许是权威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在协会的科隆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祝贺协会成立25周年。他强调了协会所持的中间主义路线的政治定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强调，正是他们的活动、而不是我们的活动在推动社会改革的进行。从某种视角看，的确是这样。他们的活动以他们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力量为基础。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了一个强大阶级的利益。而我们是一个小的由学者和人道主义实践者组成的团体。我们不可能、也不尝试去做社会民主主义能够和尝试去做的事情。但这难道意味着我们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吗？”

“企业家们一直谴责我们对工人阶级过分友好。我们一直对工人友好、而且希望继续如此。因为我们相信，在行为教养和收入方面差距过大是未来最大的危险所在，可以通过提高我们社会和我们国家较低阶级的生活水平来予以补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企业家的敌人，他们作为经济大军的领导人和指挥官的价值是我们一直承认的” [Schmoller, 1920 (1897), 26]。施穆勒的立场前后非常一致。在25年前的1872年协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他指出，协会的创建者们关注“会削弱我们社会的深刻分裂，会使企业家同工人、有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敌对状态的矛盾，以及可能会爆发一场社会革命的危险”（cited in Rueschmayer and Van Rossen, 1996, 45）。协会的另一位创建者和权威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布伦塔诺（Brentano）在一封给施穆勒的信中表达了他同样反对“社会主义专制或绝对君主制”（cited in Gay, 1993, 469）。也见普莱森（Plessen, 1975, 104），他称协会为“两大阶级之间的调解者”。协会所持的中间主义路线非常类似于英国社会科学协会的立场，后者“准备承认工会运动的进步性，但作为回报，它试图强加给工会一系列有利于产业和谐的举措，即用于限制它们的作用和支持者数量的举措。……在这种公开宣示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即在它公开表明要承担这种调和各阶级矛盾的角色基础上，社会科学协会获得了大的发展”（Goldman, 2002, 201, 205）。

[19] 中庸的自由主义的两个基本信念在各地似乎都为社会科学家所赞同。一个基本信念是：“将被赋予完全选举权的公民应该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和受过教育的。对大多数人而言，自由主义有关公民的理想只不过是未来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实现这种理想是每个人的任务所在”（Langewiesche, 1993, 49）。这就产生了一种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会“持续努力地推动这样一种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会努力对它加以指导和限制”（Langewiesche, 1993, 52）。第二个基本信念是拒绝“采取暴力形式的集体行动”和“支持宪政国家”（Langewiesche, 1993, 41-42）。

[20] 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由腐败所引发的义愤、由民主所孕育的实利主义，以及用‘文明’、‘文化’和‘做更好的’美国人等口号将人民团结在一起……在19世纪晚期发起了反击，以收复他们在之前几十年间失去的权威。一次又一次地，人们能够在19世纪较晚期的权威学者那里发现一种共同的理想主义的和精英主义的动机：做‘更高水平研究’的热情压倒了‘对金钱贪

婪的追求’。……很明显，他们正在使自身脱离杰克逊时期美国那种结构松散的、缺乏理论指导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文化。在新创立的专业协会中，地位得到巩固的专业化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手段”（Higham, 1979, 9）。

这在美国是同进步运动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它强调不受任何党派控制、提高政府效率、选举制度改革，以及政治和行政分离。……[它试图]将政治决策从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做出转为由任命的官员做出；由此向后者提供不受党派影响的、专业化的建议。它同时还是这样一种政治运动，其中被一些人假设为过度的人民民主——由工人阶级所鼓吹——能够由重提代议民主制原则予以缓和。通过使政府重新由‘更优秀的分子’执掌，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将能够得到维护。在这些时代，‘更优秀的分子’不是指富有的贵族、土地贵族或实行等级制的官僚；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阶层”（Prewitt, 2004, 782）。

[21] “由有能力的人组成的团体是……一种专业化类型的自愿组成的协会，它向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使他们免受公共舆论的控制，甚至能够迫使公共舆论服从专业见解。当个人加入这样一种协会时，他的地位就被提高到群众之上、并独立于后者；但与此同时，他又会有意识地更多依赖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因此较少能够抵制由有能力的人达成的共识”（Haskell, 1977, 75, n.29）。“由有能力的人组成的团体必须界定能力的内涵，培养这种能力，并根据普适性的标准——或更具体地讲，根据那些明显不专属于任何个人、党派或特殊人群的标准——赋予那些拥有能力的人以权力”（Haskell, 1977, 89）。

[22] “对非学者型的和学者型的社会科学家都一样，在改革和知识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推动专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Furner, 1975, 3）。无论如何，“社会科学家都要用他作为专家的能力来服务于社会。专业知识需要通过研究才能获得。……相信接受高等教育有用的人……重视研究，而且会做大量的研究；他并不会像人文学者经常做的那样对它持轻蔑态度。但他而言，这仍然是一种居于从属地位的目标。研究一直是为了某种隐含（和有用）的目标而从事的，而主要不是为了通过发现而获得内心的满足”（Veysey, 1965, 76）。

[23] “从支持改良主义者的社会价值观看，社会科学家正在涉足特别危险的领域。大学要依靠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和学生的支持，前者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大学既渴望证明它们所设各系的有用性、又渴望避免受到公众的批评。[在美国]大学校长鼓励学校所设的社会科学各系展示它们对民主制度的重大贡献。然而，支持充满争议的改革事业或在政治任命的前提下到政府任职都会引起不满，因为他们会被认为具有某种党派偏见。……为了不危及他们作为客观的科学家的地位——他们在大学和专业内的地位都依赖于这种地位，他们将他们的政治主张限制在自由主义中间路线上，在这里他们的价值观表现得并不明显”（Ross, 1979, 122-123）。罗斯称这为“妥协于中间路线”。

实际上，持改良主义立场的社会科学家面临着一种两难，正如亨斯利（Hinsley, 1981, 286）所表明的：“社会科学精英所起的作用包括两种倾向，但它们并不容易共存。科学家必须在民众中传播科学知识作为提高精神修养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手段——这种目标必须通过直接掌握知识、而不是通过道听途说才能实现。与此同时，对排他性的追求——这依赖于只有少数人是真正有能力的或倾向于将他们的生命贡献给科学的假设——又要求承认他们的特殊地位。后一种要求迫使相关组织必须严防欺诈和冒名顶替，并努力设立官方正式认证的资格”。

[24] “价值中立被用来否认对它的下述指责，即社会学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名称而已。但研究机构获得自主地位并不是价值中立原则所发挥的唯一社会功能。价值中立并不仅仅是一种防御手段，而且是一种进攻武器；价值中立被用于阻止女权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将社会理论变成政治实践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对抗这些运动，[德国的]社会学家才系统阐发了价值中立的思想”（Proctor, 1991, 120）。

[25] 普罗克特（1991, 68）继续指出：“价值中立是自由主义者针对各种压力做出的反应，即政府审查制度的压力、工业追求实际效果的压力，以及社会运动要发挥实质作用的压力。价值中立既是一种政治声明、也是一种本体论的命题，它是有关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一种更普遍的自由主义观点的组成部分”（p.70）。

[26] 冈内尔（Gunnell, 2006, 480-481）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立场：“韦伯有关事实和价值分离的声明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上的规则、不如说是对——[20]世纪之交——大学与政治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的承认。……他的观点不是认为社会科学家做出价值判断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认为对社会科学家而言这不是一种适合的角色。在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愈来愈多元化的社会中，学院并不适合发挥这种功能。如果社会科学家仍试图坚持他们进行道德说教的立场的话，那将会破坏他们在知识方面的权威地位，而后者事实上是他们目前唯一拥有的一种权威，也是他们产生潜在的实际影响的唯一源泉所在”。

[27] 这种生物学的观点并不必然是基于孟德尔（Mendel）的遗传定律而得出的。有一些人基于拉马克的观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国最后一位著名的拉马克派生物学家欧内斯特·麦克布赖德（Ernest Macbride）相信，下层阶级主要是由爱尔兰人组成的，他认为，他们“永远具有固定的[种族特征]，这些特征不可能通过让他们接触更好的条件而予以改善”（Bowler, 1984, 246）。麦克布赖德论证，种族进化有可能减少、但决不会消除这些被假设存在的种族之间的差别。

尽管如此，但孟德尔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在[19]世纪过去的一些年中，社会遗传学自它在世纪中期发端以来已经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这为它积极进取、主张排外主义和正式蜕变为优生学创造了条件。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流行只是使人们已经牢固确立的在学术和情感方面对它的关注变得更加明确，并推动了其影响的继续扩大。在19世纪的最后1/4时期，政论家、医生、具有社会关怀的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已经将遗传学解释运用于对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分析。对人类行为的遗传学解释具有表面上体现科学概念和声望的优点，但与此同时却又缺乏能够予以证实的内容”。（Rosenberg, 1976, 49）。

[28] 魏因加特（1989, 280）基于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即“科学在制度方面的惰性”——来谴责种族卫生学在德国的发展。他指出：“科学丝毫不会为它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堕落所干扰。但只有一些科学家……能够洞察在一种不关心政治应用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同它能够被用于和适合于为不道德的政治目标辩护之间的联系”。

[29] “每一门专业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正式宣布它是独立于所有其他学科的，每门学科……都在大学创设为人们所熟悉的杂志和协会等专业机构，设置一套或多或少统一的培训课

程。学术权威的认定目前依赖于在一个易于确认的同行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和地位，它的成员拥有相似的受教育经历、由此拥有一套本质上相似的评价标准”（Haskell, 1977, 24）。

[30] “‘真正的’历史学家将他们自身视为经验主义者——而不像过去时代的编年史学者和文学家，他们将在实验室中做研究的科学家所使用的观察和分析的工具应用于对过去事件的研究”（Herbst, 1965, 101）。

正像我们在对各种起源的研究中追溯到别的人和事一样，兰克并不是第一位提出这种要求的人。伯克（1988, 190, n.2）提到，这种要求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斯莱丹（Sleiden）要求历史学家“就像它们所发生的那样”记述，波普里尼（Popelinière）也认为历史学在本质上是“就像它们发生的那样”记述。但很少有人对这些较早期的要求做出反应，结果斯莱丹和波普里尼在今天都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在历史学家中也是如此。兰克的口号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那是因为它产生影响的时机已经成熟。

[31] 林格（1992, 262）认为，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是研究个别性的学问：“利奥波德·冯·兰克本人是用移情和个别性的话语来描述他的历史观的。……而且，他对‘个人’的创造性感兴趣、对普遍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他相信，[国家]是文化和道德具有活力的表现，这就赋予它们之间的斗争以更高的意义”。

[32] 这种反对理论的倾向可能采取不同的——几乎是相反的——形式。诺维克提到（1988, 43），在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的倾向重视“独特性……对抽象的体系不感兴趣”。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正是严酷的事实被称赞是从宏大体系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高温和潮湿中解脱出来的工具”。

[33] 贝内东持有类似的观点：“因为反革命所持的观点同革命的观点正相反，所以保守主义倾向于贬低哲学、而支持社会学和历史学”（1988, 49）。

[34] 国家存在的重要性反映在恩格斯的一种众所周知的观念中，即存在“没有历史的民族”。对他而言，这些民族包括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乌克兰人/罗塞尼亚人），他所依据的理由在于，这些民族从未创立过国家。他之所以将波兰人（Poles）排除在外，正是因为他们曾有过国家。见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 1964, 87-88）。

[35] 在20世纪晚期，历史学家开始撰写有关“传统的发明”方面的著作（Hobsbawm and Ranger, 1992）。他们最初是在那时“新”创建的后殖民国家中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30到40年间的欧洲也存在这种现象。

[36] 勒努万进一步指出（1954, 164），在19世纪40年代，研究法律制度的历史学家萨维尼（Savigny）和研究语言的历史学家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的著述“有着共同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能够在有关政治史的著述中发现：即找出一些前提以使人们能够揭示在日耳曼各族群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

[37] 伊格尔斯（1983，42-43）注意到了历史主义观念的演化。在歌德（Goethe）和洪堡的个体性观念（目前也被用于指作为集体的群体）和赫尔德（Herder）的历史乐观主义观念（一种隐含在历史变动中的意义）之外，稍后又增加了“国家在民族和社会中具有首要性的观念”。这三种观念共同“为19和20世纪德国的绝大部分历史编纂的理论预设提供了基础”。

[38] “对自由主义而言，时间是人类的朋友，它将必然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幸福”（Schapiro，1949，13）。斯金纳（Skinner，1965，15）指出，这种19世纪的观点是如何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经济学相一致的：“交换经济被视为从原始状态开始的发展的最终产物。……他们得出结论，个人较高级别的自由是同他们实际面临的条件相适应的”。

[39] 斯金纳（1965，21）称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惊人地预言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至少是预测到了“新制度的起源”、如果没有预测到它的“葬礼”的话。但这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19世纪、实际也是在20世纪存在共同基础的又一个方面而已。

[40] 布列尔·莫诺（Gabriel Monod）在1875年创办了《历史评论》杂志（*the Revue historique*）。莫诺相信，法国历史学的传统存在一种缺陷。“他深信发展这样一种专业化导向的前提条件在法国确实存在，但他不耐烦地抱怨道，专业化精神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他寻求对大学进行改革以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创建这样一种专业化历史学的过程中，他希望《历史评论》将有助于……鼓励那些打算从事历史研究的年轻人接受科学的研究方法”（Keylor，1975，52）。

莫诺认为，这样的科学也是会产生政治影响的。“莫诺相信，德国历史学家、尤其是《历史学报》（*the Historische Zeitung*）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希望《历史评论》也将对一种政治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即在1870年的灾难之后能够重振法国的民族精神”（Stieg，1986，6）。从本质上看，法国教育部长朱尔·费里（Jules Ferry）想到了类似的目标。在一篇发表于1883年《国际教育评论》（*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上的演讲中，他呼吁专业历史学家提出科学的思想，能够用它们来同“各种乌托邦和错误的思想做斗争，……后者当不受科学的控制和指导时，有可能造成混乱和无政府状态”（cited in Weisz，1979，83）。

[41] 特鲁罗（Trouillot，1995，124）提到，这种新的对传统的强调已经越出法国的范围：“19世纪后半期，在国家范围内统治阶级关注对公共话语的系统管理，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话语将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同广泛的选举权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的庆祝活动]教导新的民众群体知道他们是谁，这部分是通过告诉他们不是谁而实现的”。

[42] 米克指出（Meek，1976，242），“我们应该将[这种阶段划分理论]视为首次对一揽子更广泛的观念和主张——有关意料之外结果的规律、有关社会科学的思想、比较方法、技术-经济决定论观念和文化进化原理——所做的伟大的理论上的具体概括”。

[43] “他们论证，社会的发展并无目标可言”（Meek，1967，38）。不是“伟人”、而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现实塑造了国家。

[44] 菲特（Fetter，1943，60）指出，迟至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每一位所谓的政治经济学

家都在其他方面——“神学、道德哲学、文学、语言、法学、政治实践、新闻学、商业、或自然科学的某个分支学科——接受过培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就好像是碰巧在这个领域做暂时停留一样”。

[45] “理性主义遭受到致命的打击。[法国]大革命和它所产生的后果证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理性，在决定人口中每个集团的政治立场上，经济利益是更重要的因素”（Grossman, 1943, 387）。

[46]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二版的序言中——他在1879年对第一版做了修正和扩充，杰文斯写到（xiv）：“在所做的各种较小的改动中，我也许可以提到用方便的只有一个词的经济学替换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我禁不住认为，尽可能快地抛弃我们学科中这个令人困扰的由两个词组成的旧名称是很好的一件事。几位学者试图引入一些全新的名称，诸如财富学（Plutology）、理财学（Chrematistics）、交易经济学

（Catallactics）等。但我们难道需要比经济学更好的名称吗？”名称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在19世纪上半期，罗伯特·惠特利（Robert Whately）为政治经济学辩护，反对“那些将它视为对今天的社会制度做出攻击的人”。他使他们相信“政治经济学名称的前半部分确实是用词不当”。他本人建议使用交易经济学的名称，但未能流行。

（Checkland, 1951, 56）切克兰德称赞惠特利为“有关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中立科学观念的创始人之一”。

[47] 马歇尔似乎对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持同情态度。马歇尔本人曾在德累斯顿和柏林学习过，在那里同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有过接触。“更具体地讲，同门格尔不同，马歇尔并不排斥历史特殊性问题：不像门格尔，他认为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一个合法而又重要的问题”（Hodgson, 2005, 334）。

浏览一下在坎宁安和马歇尔之间展开的那场大争论就会认为霍奇逊的分析更为可信。坎宁安于1892年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对马歇尔[同时也对索罗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发起攻击。他文章的题目为《对经济史学的歪曲》（*the Perversion of Economic History*）。他的基本论点（494-495）是：“从经济理论的视角看，忽略对实际事实的耐心研究似乎是情有可原的；但从我的视角看，这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阻止经济学家去发现他自身存在的狭隘局限性。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他所做的理论概括只能是近似真实的”。马歇尔在同一本杂志做出回应，指出（1892, 507）：“坎宁安博士错误地假设，我的书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包括……同样的动机在所有时代都发挥作用，都会产生类似的结果……是同样的规律在发挥作用’。恰恰相反，我在论经济科学的发展一章中坚持认为，现代经济学家从生物学那里认识到，‘如果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适用于一个阶段的规律很少能够不加修正地就应用于其他的阶段’”。马歇尔至少承认经济规律的普适性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针对坎宁安指责他运用李嘉图的地租规律来解释中世纪英格兰的事实，马歇尔回应道

（p.510）：“但事实上，习惯法或多或少是有弹性的；地租理论通常只是给出了处于较高等级的土地所有者能够从实际耕作者那里榨取地租的上限，前者处于强势地位，并不受最高所有者、即这块土地统治者的有效控制”。

[48] 这就是马洛尼在他的分析（Maloney, 1985, 2）中如何看待马歇尔的三个主要目标的：“第一，他想让经济学家接受他所指定的理论体系的培训，而这种理论体系对常人而言是无法理解的，因此他们不必过分失落。第二，借助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他试图赋予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发言权。第三，通过同政治党派撇清关系，他试图提高他所在学科的权威地位”。

[49] 马洛尼解释了（1985, 4）经济学在1880年到1914年之间发生的变化：“在19世纪70和80年代，被各方指责为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和缺乏对社会的适用性，正统经济学不是通过成功地回应这些批评、而是通过夺取一种支配地位来化解这种不利局面。凭借这种地位，它大体能够不去理睬它的批评者”。

[50] “围绕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能够更容易地变得专业化；这是相比围绕强调历史学和归纳方法的学说而言的。历史学派的观点认为，经济概括具有相对性，每个经济问题都必须重新地加以研究。这破坏了学院经济学家下述判断的可信性，即他所接受的良好培训使他的见解要比那些未接受过这种培训的人更具有权威性。……如果没有下述观念的支撑，即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掌握了可以被广泛应用的原理和专业化方法，而这些是无法被普通公众所理解的；那么，经济学家就不可能要求获得权威地位”（Church, 1974, 2: 593）。

马洛尼赞同这种观点（1985, 215-216）：“经济学家……很少能够对他们选择的范式所内含的世界观做有效的反思。各种经济学范式——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的、凯恩斯的——首先在他们的哲学出发点上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既受他的哲学出发点的制约，又受其结论所涉及的重要事实的制约。在读者的印象中，对事物做出全面的研究非常困难，但揭示这种研究背后的方法论实际更加困难。后一种研究将会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受到削弱。……专业化……仅仅有利于下述类型的范式，即内含一种被特别加以选择的世界观的范式”。这样，经济学就摆脱了历史主义的倾向，但却没有放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如果人们浏览一下在剑桥大学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系2008年的网页，就会发现作为“系简史”的结论是这样陈述的：“由目前全系教师所坚持的另一个传统是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其中首先是积极参与货币政策委员会（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竞争委员会（the Competitive Commission）、低工资委员会（the Low Pay Commission）和会计标准委员会（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的政策制定。经济学和政治学系建系已近百年，它一直致力于保持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www.econ.cam.ac.uk/contacts/history.html）。

[51] 特雷伯（Tribe, 2005, 130）对这种目标做出解释：“杰文斯、马歇尔、庇古（Pigou）和凯恩斯都明确将19世纪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非常‘沉闷的科学’，他们试图创建一门新的能够改造世界的科学。以这种方式解读，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因而并不是这样一种转变，其中一种抽象的、形式化的‘硬’科学取代了一种研究范围更广泛、更多涉及道德方面的知识体系。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视角看，由李嘉图、麦克库洛赫（McCulloch）和他们的同道所创建的抽象的、形式化的科学被普遍认为存在一种缺陷。这门科学无法作为建构一门有关社会改革的实证科学的基础，正是这种认识促使教师和学生共同投入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建构工作。19世纪晚期新的教育体制也使对一门新的替代性科学的系统阐述成为可能”。

[52] 这种政治上的压力使法律系发生了转型，正如卡拉迪（Karady, 1976, 281）所解释

的：“事实上，这些新的教学课程：不管是经济学课程——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金融学、统计学，还是法学课程——国际法、公法、法律史、宪法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与其说是满足从业律师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行政官员和高级公务员、即全体政府人员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课程的引入代表了大学课程适应某种类型能力培养的需要，更具体地说是那些同改革家们赋予法律培训的新任务相联系的课程，由此要求培训能够提供有能力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人员；与此同时通过这种能力的培养赋予他们所支配的权力以合法性。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不考虑第三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解释法律系的转型，这种意识形态既主张民主、又主张精英统治，并且试图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

[53] “〔社会政策协会〕不仅打算鼓励对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学术性的和专业性的讨论，而且要对政府和公众舆论发挥指导性的影响”（Ringer, 1969, 146）。正如奥伯肖尔（Oberschall, 1965, 139）所强调的，因为在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科学家实际指的是政治经济学家”，所以这种影响公共政策的导向仍然居于中心地位。

[54] “埃利将美国经济学会视为一个由经验主义经济学家构成的组织，它要致力于为紧迫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和为这些解决办法寻求广泛的公共支持，但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的成员都抵制下述观念，即经济学家既能够担任研究者、又能够担任民众的教育者。……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越来越相信，公众对不同意见的表达将会阻止他们影响公共政策的努力。如果经济学家连自己都不可能就经济科学的结论达成一致的话，那怎么可能期望外行能倾听他们的建议呢？”（Church, 1974, 2: 588）。

[55] “将科学应用于对政府的管理之所以对美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尤其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承诺将减少冲突和恢复秩序。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社会冲突有可能是社会中存在着根本性的价值观分歧或结构性不平等的结果，更富裕的社会阶层将困扰他们社会的冲突归因于愚昧或感情用事，正是后者使相关各方对他们的真正利益视而不见；当能够明辨他们的真正利益时，他们肯定能够和谐共处。当然，社会科学的专家将帮助人们发现这种真理，这将使各种竞争的利益集团和谐共处，使他们的利益能够同社会的利益普遍地达成一致”（Church, 1974, 2: 598）。

[56] 艾布拉姆斯继续指出（p.78）：斯宾塞“已经从看不见的手转向了看不见的拳头。现在他请求他的同时代人静观它发挥邪恶的作用”。

[57] 霍夫施塔特（1992, 43）告诉了我们有关斯宾塞在1882年他最受追捧之时对美国所做的著名访问的情况。在一次接受新闻采访时，“斯宾塞表达了（稍微有点不和谐）他的担忧，即美国人的性格尚未充分发展到能够驾驭它的共和制度的程度”。但依据“生物学的真理”，他表达了希望：“雅利安种族各族群相互杂居的状况将产生‘比迄今存在的更优良类型的人种’”。

[58]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以这种方式，涂尔干在法国通常被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人。拉克鲁瓦（Lacroix, 1981, 30-31）将这视为“在今天学科划分的基础上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因此“是一种双重的——即在当时实际的学科划分和当事人所起的作用两个方面的——时代错置”。他指出，在整个19世纪，每个人都在使用许多不同的名称，它们并不完全一致。“这些名

称反映了在一个被全面重组的知识领域，人们在划界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在对象确定问题上的混乱，以及就方法问题产生的争论。在这种思想动荡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对科学的信仰”。

[59]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他受到了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 1989, 49）非常严厉的责备：“新索邦大学的特征与其说是过于关注科学、不如说过于关注方法问题；它是改革者最喜欢的流行语。……这方面最引人好奇的例子是……由涂尔干通过他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提供的，该书充满了抽象的理论论述；向哲学家介绍了一门以公理为基础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认为，‘社会事实’是某种非常不同于、而且完全独立于组成社会的个体的现象。这种观点既令人震惊、又令人反感”。

[60] 见克拉克的合理评价（1972, 171-172）：“涂尔干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这已经成为大量学术争论的主题。他最初的论文选题就是有关个人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尽管后来改成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但在他的《社会劳动分工》中，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隐藏得太深；在《自杀论》和其他几部著作中也是这样。他计划写作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尽管只完成了有关圣西门的部分。饶勒斯几次到涂尔干家用周日晚餐，他同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也有过密切的接触。……他由于显眼地拿着法共的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去上课和走出索邦大学而闻名，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不过，他从未加入过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从未参与过他的年轻合作者们发起的党派活动。尽管对大多数社会主义作家的感情用事和缺乏严谨感到厌恶，但他仍然深刻关注他们研究的许多现象。对许多较少关注这些细节的人而言，涂尔干无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克拉克进一步提到（182, n.72）：“迟至1925年，在奥托·洛伦兹（Otto Lorenz）编撰的《法国图书总目》（*Catalogue général de la librairie française*）中还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这样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题名，该目录是在法国出版的著作的主要目录文献”。

这种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边缘摇摆不定也是涂尔干学派的许多成员——莫斯（Mauss）、西米安（Simiand）、布格莱（Bouglé）、哈布瓦赫（Halbwachs）、赫兹（Hertz）——的特征所在。他们定期为《人道报》和《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撰写文章，“但却没有完全转向政坛发展”（Karady, 1976, 294）。

[61] 科塞将保守主义界定为“一种维持事物的现存秩序或强化一种似乎受到威胁的秩序的倾向”。他继续指出（p.214）：“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思想家将某种理想状态同现实状态进行对比。恰恰相反，涂尔干用在常态和非常态之间的区分来代替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分裂，由此引入了对保守主义的偏爱”。与之相对，奈耶（Neyer, 1960, 45）论证：“涂尔干将向着‘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视为对个人主义和进步伦理的必然反应，以及他称之为‘个人的兴起’现象的结果”。类似地，里克特（1960, 181）指出：“问题不是如何通过限制或反对个人主义来实现社会秩序，而是如何完善和发展它。……[涂尔干]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表述应该撇开他同斯宾塞和主张放任的经济学家所进行的著名论战来加以解读。他有关所有阻止个体发展的人为障碍都应该清除的主张……表明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它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理性”。

[62] 罗格继续指出（1983, 179）：“涂尔干的社会学向民主的自由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能

够被同时运用到几条战线上。它为反对那些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后者试图用人们相互依赖和受社会恩惠的论据来证明集体主义的合理性。它为反对那些保守主义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后者试图宣扬家庭的社会价值、而不是提倡个人的价值，而且坚持群众在已经超出他们的理性认知范围的方面需要加以指导”。

吉登斯（Giddens, 1971, 513）做出了同样的论证：“面对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来自反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主义的挑战，涂尔干的社会学试图重新解释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也见林格（1992, 210）有关社会团结（solidarism）的论述，“作为进步资产阶级的一种选择，它明显发挥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社会团结思想的政治价值在于，它使自由放任思想同为国家进行温和的社会改革做合理性论证相一致。……涂尔干的《社会劳动分工》……也许可以作为支持社会团结原则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一个例子”。

[63] 作为一位自己承认的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奈斯比特（Robert Nisbet, 1952, 167）宣称，事实上从起源和结果看，社会学的各种概念都是保守主义的：“诸如地位、凝聚力、调整、功能、规范、象征等概念都是保守主义的概念。这不仅是在表面意义上，即每个概念都指代社会的一个方面，明显关注于维系或保护秩序；而且是在重要意义上，即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欧洲保守主义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奈斯比特的观点尤其得到科塞（1960, 213）的赞同。

假设对秩序的关注是专属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目标，这是成问题的。因为将保守主义同中庸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的问题并不是秩序是否是合意的、而是如何才能建立秩序。中庸的自由主义相信，秩序只能由审慎、但显著的改革来予以保障，而这必然包括一定程度的经济再分配。

[64] “一方面，为了争取宗教人士的支持，他宣称：‘最高的社会学在本质上必然是基督教的’，‘最高社会科学的原理将是对基督教本质的重申’；另一方面，他在为《美国社会学杂志》撰写的纲领性声明中写道：‘对许多可能的读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将是有关它对基督教社会学所持的态度’。答案在于……对待基督教社会学，[本杂志将]持诚挚的尊重态度，但对待所谓的‘基督教社会学家’，将持严重的怀疑态度”（Oberschall, 1972, 203）。

像经济学家理查德·埃利一样，斯莫尔也是社会福音运动（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的积极支持者，他要努力“克服目前被假设在宗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的冲突”（Potts, 1965, 92）。

[65] “Baliser le sujet”很难翻译。幸运的是，德库安自己在另一本著作（2008）中解释了它的意义：“要厘清复杂性首先就要追根溯源。要同时和不断地就问题提出问题，绝不接受作为假设的判断。要确定‘人们是在哪里说的’，仔细分析人们所使用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思考在问题中没有说出的东西、评估作者的意图。简而言之，就是采用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众所周知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方法”。

[66] “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的全体教师……都关注利用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的方案来确保‘有序的进步’。他们都痴迷于法国大革命。他们都相信，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政治结构未能使自身适应在传统和心态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预防胜于惩罚”（Vincent, 1987, 211）。

[67] 在一封给他的朋友欧内斯特·维内（Ernest Vinet）的信中——发表于1871年，布特密明确提出了这些观点：“新的培养方案是为这些阶级设计的，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有保障的，而且拥有闲暇时间来培养他们的智慧。迄今为止，这些阶级一直主导着政治舞台。但他们的地位目前受到威胁。……在将权力移交给更多人的压力下，称他们自身为精英的各阶级不可能再维系他们的政治霸权，除非他们能够让最有能力的人分享权利。在他们享有特权和按惯例进行统治的根基瓦解之后，民主的洪流必然会遭遇到第二道障碍，即由于有出色的和值得称赞的优点、由于有明显的声望而具有的优势，这些构成他们进行统治的合理性所在，剥夺他们因为能力而享受权利的资格是愚蠢”[《关于设立高等教育学院（或系）的几点看法》，见E.布特密和E.维内的通信，Paris: Imp. de A. Lainé, 1871, 15-16, cited in Favre, 1981, 433]。

[68] 布特密很快就为这种向专业教育的转变找到了一种理论基础：“我们的政治科学完全是用法语或拉丁语表述的，它有意地忽略了现代欧洲和新世界。……”“在法国，有培养医生、律师、工程师和军官的教育机构。但却没有培养政治人才的学校。……如果法国每年努力培养两到三千名掌握政治知识的人才、并使他们拥有他们的专业性建议能够被倾听的社会地位，以及通过论证能够使群众认识到所有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和绝大多数解决方案都是复杂的话，那肯定是一场伟大的和令人愉悦的革命。与此同时，为培养政治家而设立的课程将为这个国家提供一个有教养的和审慎而明智的中间阶级，后者是民主社会的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中间阶级的特征是具有一种保守的本能、举止良好和富裕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阶级并没有凭借它在政治方面的能力而占据它应有的地位”（cited in Descoings, 2007, 34）。布特密试图为这种培养方案取个名称。在稍作犹豫后，他最终确定的名称是财政科学（sciencecamérales），它是由18世纪德国的财政科学（Camerawissenschaft）翻译而来（Vincent, 1987, 84）。

[69] 见德库安（2007, 39）对跨学科的讨论。也见文森特（1987, 47-48）有关布特密为学校选择名称的理由的讨论。

[70] 丘奇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共和党独立派有关社会科学的观点（1974, 577）：“他们计划教授未来的精英——由此大学教育将几乎完全局限于对精英的培养上——以正确的对政治和社会进行组织的原则、支配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规律，如果社会想要正常运行的话，这些都是必须加以遵守的。通过研究自大宪章以来（有时是自村社共同体在德意志的森林中出现以来）英格兰人的自由发展史与自由在美国的扩展和进一步获得的保障，研究宪法是如何保护个人自由、财产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的（在这里它们是指富人反对‘民众’愿望实现的权利），以及研究它是如何限制平民的权力的，社会科学就是要教授这些原则和规律；同时教授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原则和规律”。

[71] 在试图解释作为一门独立的、以探寻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的政治科学在英国为什么直到1945年以后才真正出现时，达伦多夫（1995, 227）将它归因于“传统政治哲学在老牌大学、尤其是在牛津大学所拥有的强大势力”。但接着他补充了另外一种因素：“当它被应用时，现代政治科学被证明相比现代经济科学的效用不是那么明显”。我不确定“不是那么明显”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我自己会说“影响不是那么大”。

[72] 见迈克尔·亚达斯（Michael Adas, 1989），他讨论了欧洲人将“机器视为文明标志”（211-236）的观念和将“熟练运用机器视为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194-198）的观念。

[73] 正如亚达斯（1989, 203）所评论的那样，这里居于支配地位的“假设是认为，欧洲人之所以是非洲和亚洲社会最好的统治者和改革者，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已知最进步和最先进的文明”。

在1903~1904年，作为一位研究佛教巴利语文献（Pali literature）的专家，李斯·戴维斯（T.W.Rhys Davies）鼓吹东方学研究对英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我们绝不应该忘记条件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在我们的海军预算、外交活动中所考虑的那样，我们也应该使我们的情报部门在东方问题的研究上至少同任何其他两个大国一样强大，这是实际可行的政策。但到目前为止，它还为我们政府的情报部门所忽视，我们正在冒很大的风险”（p.196）。

[74] 在努力驳斥贝尔纳有关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埃及的观点方面，玛丽·莱福克威兹（Mary Lefkowitz）是最著名的学者。在她同罗杰斯（G.R.Rogers）合编的、书名为《修正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Revisited*, 1996）的文集中，她论证：“埃及在某些方面对希腊文化产生影响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和不容否定的。……但这种证据不足以证明埃及是希腊文化的起源”（p.6）。她指责贝尔纳是非洲中心论者。的确，她在1997年写的书的题目为《并非源自非洲：非洲中心论是如何导致将神话作为历史来教授的》（*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

在对莱福克威兹和其他人（Moore, 2001, 27）所做批判的回应中，贝尔纳否认自己是一位非洲中心论者。相反，他宣称，他正在论证的是一种“同化理论，该理论主张非洲和欧洲文化具有一种共同的起源”。他称这种理论持一种“跨大陆杂交”的观点，并论证这种观点“更严重地威胁到有关希腊并未受埃及的任何重要影响的观点，这是相比有关大陆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和隔离的非洲中心论观点所造成的威胁而言的”。

[75] 正如贝尔纳（1987, 442）所指出的：“随着种族主义在19世纪20年代的兴起，埃及的地位在下降；随着反犹太种族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的兴起，腓尼基人的地位下降；随着反犹太种族主义在1917年到1939年之间达到最高潮，腓尼基人的地位跌至谷底”。

[76] 这种说法也是由贝尔纳提出的（1987, 282 and 317）。贝尔纳指出，这也同样适用于德国大学中古代学研究（*Altertumwissenschaft*）的状况。

[77] 正如罗德蒙德所评论的（1986, 13），就其关注的重点而言，印度学是非常强调独特性的：“[到1900年]德国所有第一流的大学都设有印度学教授职位，它是在该词的严格意义上意指梵文文献学。担任这些教职的教授们一般都鄙视那些通才、哲学家和其他沉迷于思辨理论的人”。

[78] “卡尔·马克思有关印度的文章例外，他是在伦敦为纽约的一份报纸写作这些文章的”，正如罗德蒙德（1986, 4）尖刻地提到的那样。

[79] 布鲁（Blue, 1999, 92）提到：“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随着‘进步’变成界定欧洲‘现代

性’特征的流行语——这是相比‘其他’文明而言的，广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存在着〔对中国的〕蔑视”。

[80] 注意到梅耶斯告诉我们（p.1），这种对他1910年就职演讲的修改——即我在这里引用的——是他191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古典文学萨瑟讲座教授（the Sather Professor）的结果，它进一步证明了人类学在历史上就同研究独特性的诸学科存在着联系，这是非常有趣的。

[81] 科学的进步有助于人们抛弃多元发生论，正如罗利默尔（Lorimer, 1978, 142）所指出的：“简单地通过宣布它们是不合时宜的，达尔文主义最终解决了一元发生论-多元发生论之间产生争论的问题。……〔它〕改变了人们有关人种的观念，由此从整体上削弱了多元发生论的基础。……达尔文不仅证明了欧洲人同黑人存在着联系，而且证明了所有人都同猿人存在着联系”。

第六章 对论点的重申



TO THE TEMPLE OF FAME.

MR. PUNCH (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 "AFTER YOU, MY LORD!"

第六章插图“进入名人堂（**To the Temple of Fame**）”

《笨拙》（**Punch**）

（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

《笨拙》（*Punch*），“进入名人堂（**To the Temple of Fame**）”。这幅著名的漫画发表于1858年10月23日的《笨拙》杂志上，画的是布鲁厄姆爵士（**Lord Brougham**）。他是一位自由派贵族，正是在他伦敦的家中社会科学协会于一年前创立。漫画家讽刺了这位自由派贵族进行改革的抱负和它同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科学的联系。

本书是有关现代世界体系在延长的19世纪的发展轨迹的，该时段按照惯例是从1789年到1914年。讨论这一时期基本特征的著作汗牛充栋。存在着一种我们也许可以称为传统观点的共识，它为持各种意识形态和/或学术观点的学者所赞同。

它被视为有多种类型的革命发生的世纪：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人民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通常的观点认为，所有这些革命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或被称为——现代性。开始于延长的19世纪，现代性将延续到20世纪。

正如在迄今为止已完成的全部四卷书中所表述的，本书的观点是不同的。先说“工业革命”的概念。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它首先是在英格兰或英国发生的，最公认的时间是在1760年到184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接着是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洲的许多国家被复制或仿效。我们在第三卷中已经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在那个时期的英格兰所发生的是工业生产机械化过程中的一个向上的周期性增长，这种增长在以前已经发生过多，而且未来仍将会多次发生。我们同时认为，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发展进

程的组成部分，英国之所以能够从中获得特殊的利益，那是因为它在一场争夺世界体系新霸权的斗争中击败了法国。

很长一段时间，对法国大革命的主流观点是所谓的社会解释。这种观点论证，大革命代表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势力，使法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50年间，这种解释受到了一种观点的挑战，根据后一种观点，法国大革命被视为探索一种自由主义的、议会式发展道路的尝试，这种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再次地，对上述两种观点我们都不能同意。在第三卷中，我们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不能被视为一场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我们认为，法国很久以前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反，部分而言，我们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击败英格兰的最后一次尝试；部分而言，我们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一次“反对现存体制”（即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它遭受了根本性的失败。

我们已经论证，现代世界体系有两种主要的周期性过程。一种是康德拉基耶夫周期，长度大约为50~60年，是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要经历的扩张和停滞周期。第二种主要的周期性过程发生的要更缓慢一些。它是在国家间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兴起和衰落。我们在第二卷中解释了联省共和国（今天的荷兰）是如何在17世纪中期取得霸权地位的。我们在第三卷中解释了英国如何能够在大革命—拿破仑时期——从1792到1815年——的“世界大战”中击败法国而成为霸权国家的。

最后，我们在第三卷中描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的边界是如何实现第二次大的地理扩张的。通过考察四个从本质上看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外的地区（俄国、奥斯曼帝国、印度次大陆和西非）是如何被纳入到体系之中的，以及作为这种纳入的结果又是如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被加以改造的，我们对这一过程做出了解释。

因此，当我们要讲述延长的19世纪的历史时，我们是将它奠基于前三卷书所做的分析的。自延长的16世纪以来，现代世界体系就已经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英国在19世纪中期成为霸权国家。现代世界体系的有效边界已经得到了扩张，尽管它们迄今为止尚未将整个世界包括在内。第三次和最后一次扩张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些历史我们无需在本卷书中予以重述。（在序言中，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要将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三次和最后一次扩张的历史推后到第五卷来写。）

取而代之，我们选择在本卷书中集中关注那种我们认为在延长的19世纪中新出现的现象。我们将这种新现象称为“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当然，我们并不是最早提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逐渐获得强势地位的。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稍微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特别要求对“自由主义”一词的术语演变史做出考察，而且要考察它的各种模糊用法给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造成的干扰，但这是难度很大的研究。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首先，我需要论证，存在某种迄今为止尚未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实现的东西：即我们称之为地缘文化的创建。就某种地缘文化而言，我们意指价值观，它在整个世界体系中被非常广泛地持有，这既包括明确宣布的、也包括暗中持有的。

我们已经论证，直到延长的19世纪，在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和它的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脱节。在本卷书中，我们已经论证，正是法国大革命对文化的影响使克服这种脱节变得势在必行，这是通过发展现代世界体系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来实现的。

我们已经试图解释自由主义是如何一直保持一种中间立场的，既不左也不右。我们已经论证，这三种意识形态实际上都不反对中央集权，尽管它们都假称反对。我们已经努力揭示中庸的自由主义是如何“驯

服”其他两种意识形态的，并使它们事实上持有某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的。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论证，到延长的19世纪结束时，自由主义中间路线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模式。

我们详细论述了中庸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将它的意识形态在三个关键领域强制推行的。第一个是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创建“自由主义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是最早的和主要的范例。第二个是尝试将公民权学说从一种说明将什么人包括在内的学说，转变为一种说明将什么人排斥在外的学说。通过说明三个被排斥在外的重要群体——妇女、工人阶级（无财产的、通常也是不识字的）和种族/民族方面的“少数群体”——的情况，我们对此做了阐释。第三个是历史性的社会科学的兴起，它们既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同时又为统治集团更好地控制被统治阶层提供服务。

依据我们所能收集到的各种经验证据和理论观点，我们提出了这种分析。这里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与其说是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延长的19世纪的方法，不如说提供的是一种更适合于对这个世界的社会现实的整体性做出解释的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窃蓝书房（ID:QLSF68）

参考文献

Abel, Wilhelm. 1973. *Crises agraires en Europe, XIIe-XXe siècle*. Paris: Flammarion.

Abensour, Léon. 1913. *Le Féminism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Philippe et en 1848*. Paris: Plon-Nourrit.

———. 1923. *La Femme et le féminisme av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E. Leroux.

Abrams, Philip. 1968.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ology, 1834-1914*.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Abray, Jane. 1975. "Femin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no. 1 (February) : 43-62.

Adas, Michael. 1989.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Ideologies of Domin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Adler, Laure. 1979. *A l'Aube du féminisme: Les premières journalistes (1830-1850)*. Paris: Payot.

Aelders, Etta Palm, d'. 1791. *Appel aux Françaises sur la régénération des mœurs et nécessité de l'influence des femmes dans un gouvernement libre*. Paris: L'Imprimerie du cercle social.

Ageron, Charles-Robert. 1963. "Jaurès et les socialistes français devant la question algérienne (de 1893 à 1914)." *Le mouvement social*, no. 42 (January-March) : 3-29.

Aguet, Jean-Pierre. 1954.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Les grèves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1830-1847)*. Geneva: Droz.

Agulhon, Maurice. 1970. *Une ville ouvrière au temps du socialisme utopique: Toulon de 1815 à 1851*.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 1973. *1848, ou l'apprentissage de la République, 1848-1852*. Vol. 8 of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aris: Éd. du Seuil.

———. 1979. *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 Réédition, augmentée d'une Préface. Paris: Éd. du Seuil.

———. 1998. "1848, l'année du suffrage universel." *Le Monde*, March 1-2, p. 12.

Albistur, Maïté, and Daniel Armogathe. 1977. *Histoire du féminisme français du Moyen Age à nos jours*. Paris: Éd. de Femmes.

Aldcroft, D. H. 1964. "The Entrepreneur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191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7, no. 1 (August) : 113-134.

———. 1968. "Introduction,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ed. D. H. Aldcroft, 11-36.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Alexander, Sally. 1984. "Women, 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s in the 1830s and 1840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a Feminist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17 (Spring) : 125-149.

Allen, Ann Taylor. 1991. *Feminism and Motherhood in Germany, 1800-1914*.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Allen, Judith. 1990. "Contextualising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eminism: Problems and Comparisons."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 s., 1: 17-36.

Allen, Robert. 1979.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Iron and Steel, 1850-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no. 4 (December) : 911-937.

Amin, Samir. 1979. *Classe et nation, dans l'histoire et la crise contemporaine*. Paris: Éd. du Minuit.

———. 1989. *Eurocentr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minzade, Ronald. 1982. "French Strike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 no. 1 (Winter) : 57-79.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Andreucci, Franco. 1971. "Engels, la questione coloniale e la rivoluzione in occidente." *Studi storici* 12, no. 3 (July-September) : 437-479.

———. 1979. "La Questione coloniale e l'imperialismo." In *Il marxismo*

dell'età della Secondo Internazionale (vol. 2 of *Storia del Marxismo*) , 865-893. Turin: Einaudi.

———. 1982. “The Diffusion of Marxism in Italy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ed. R. Samuel and G. S. Jones, 214-227.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Andrews, John R. 1918. “Nationalisation (1860-1877) .” In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J. R. Commons et al., 1-191. New York: Macmillan.

Angenot, Marc. 1993. *L'Utopie collectiviste: Le grand récit socialiste sous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Anon. 1869.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onservative Policy.” *London Quarterly Review* 127, no. 254 (October) : 283-295.

Anteghini, Alessandra. 1988. *Socialismo e femminismo nella Francia del XIX secolo*, Jenny D'Héricourt. Genoa: ECIG.

Applewhite, Harriet B., and Darline Gay Levy. 1984. “Women,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in Paris, 1789-1794.” In *French Women an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ed. Samia I . Spencer, 64-7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eds. 1990. *Women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Armstrong, Sinclair W. 1942. “The Internationalism of the Early Social Democrats of German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7, no.

2 (January) : 245-258.

Aron, Raymond. 1950. *La Sociologie allemande contemporaine*. 2nd ed.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Ashley, Percy. 1920. *Modern Tariff History, Germany-United States-France*. 3rd ed. New York: Dutton.

Auclert, Hubertine. 1879. *Égalité sociale et politique de la femme et de l'homme: Discours prononcé au Congrès ouvrier socialiste de Marseille*. Marseille: Imp. Commerciale A. Thomas.

———. 1976. "Rapport du troisième Congrès ouvrier, Marseille, 20-31 octobre 1879." *Romantisme*, nos. 13-14, 123-129.

———. 1982. *La Citoyenne: Articles de 1881 à 1891*. Préface et commentaire d'Edith Tareb. Paris: Syros.

Aulard, Alphonse. 1911. *Napoléon Ier et le monopole universitai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Aydelotte, William O. 1962. "The Business Interests of the Gentry in the Parliament of 1841-47." In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 by G. Kitson Clark, 290-305. London: Methuen.

———. 1963. "Voting Patterns in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in the 1840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 no. 2 (January) : 134-163.

———. 1966. “Parties and Issues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 no. 2 (May) : 95-101.

———. 1967. “Th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Victorian Social Legislation.” *Victorian Studies* 11, no. 2 (December) : 225-236.

———. 1972.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n the 1840s: A Study i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ed. W. O. Aydelotte et al., 319-34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Babel, Antony. 1934. “Jacques Necker et les origines de l’interventionnisme.” In *Mélange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sociale offerts à M. Edgard Milhaud*, 25-44.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airoch, Paul. 1962. “Le Mythe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rapide au XI^X e siècle.” *La Revue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35, no. 2, 307-331.

———. 1965. “Niveaux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1810 à 1910.” *Annales E. S. C.* 20, no. 6 (November-December) : 1091-1117.

———. 1970. “Commerce extérieur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quelques enseignements de l’expérience libre-échangiste en France.” *Revue économique* 21, no. 1 (January) : 1-23.

———. 1972. “Free Trade and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 211-245.

———. 1973. “European Foreign Trade in the XI^X 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 and Volume of Exports (Preliminary Results)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 no. 1, (Spring) : 5-36.

———. 1974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t sous-développement*. 4th ed. The Hague: Mouton; Paris: E. P. H. E., Vie Section.

———. 1974b. “Geographical Structure and Trade Balance of European Foreign Trade from 1800 to 197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3, no. 3 (Winter) : 557-608.

———. 1976a. *Commerce extérieur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IX^e siècle*. Paris: Mouton.

———. 1976b. “Reply to Mr. Gunder Frank’s Commentary.”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no. 2, (Fall) : 473-474.

———. 1976c. “Europe’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1800-1975.”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no. 2, (Fall) : 273-340.

———.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no. 2 (Fall) : 269-333.

———. 1989. “European Trade Policy, 1815-1914.” In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ed. P. Mathias and S. Pollard, 1-161.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97. *Victoires et déboire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du XVI^e siècle à nos jours*. Vol. 2, *Collection Folio/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 1999. *L’Agriculture des pays développés, 1800 à nos jours*:

Production, productivité, rendements. Paris: Economica.

Baker, Houston A., Jr. 1987. *Modernism and the Harlem Renaissanc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Baker, Keith Michael. 1964.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erm 'Social Science'" *Annals of Science* 20, no. 3 (September) : 211-226.

———. 1988. "Souveraineté." I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by F. Furet and M. Ozouf, 888-902. Paris: Flammarion.

Baker, Paula. 1984.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no. 3, (June) : 620-647.

Baldwin, Robert E. 1953. "Britain's Foreign Balance and Terms of Trade."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5, no. 4 (May 15) : 248-252.

Balibar, Étienne,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1988. *Race, nation, classe, Identités ambiguës.* Paris: La Découverte.

Ballot, Charles. 1923. *L'Introduction du machinisme dans l'industrie française.* Lille: O. Marquant.

Balzac, Honoré de. 1897. *The Country Parson and Albert Savaron.* Philadelphia: Gerrie Publishing.

Banks, Olive. 1981. *Faces of Feminism: A Study of Femin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Bannerji, Himani. 1995. "Beyond the Ruling Category to What Actually Happens: Notes on James Mill's Histori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In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Ruling Relations: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ed. M. Campbell and A. Manicom, 49-64.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Barbano, Filippo. 1985. “Sociologia e positivismo in Italia, 1850-1910: Un capitolo di sociologia storica.” In *Sociologia e scienze sociali in Italia, 1861-1890: Introduzione critiche e repertorio bibliografico*, ed. F. Barbano and G. Sola, 7-73. Milan: Franco Angeli.

Barkan, Elazar. 1992. *The Retreat of Scientific Racism: Changing Concepts of Ra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Barker-Benfield, G. J. 1989. “Mary Wollstonecraft,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wom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0, no. 1, (January-March) : 95-116.

Barnave, Antoine. 1988 [circa 1792-1793].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a Constitution*. Grenoble: Presses Univ. de Grenoble.

Barret-Ducrocq, Françoise. 1991. *Pauvreté, charité et morale à Londres au XIX^e siècle: Une sainte violenc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arret-Kriegel, Blandine. 1988. *Les historiens et la monarchie*. Vol. 3, *Les Académies et l’histoir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arrows, Susanna. 1981. *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Barry, Kathleen. 1988. *Susan B. Anthony: A Biography of a Singular*

Feminist. New York: New York Univ. Press.

Bartier, John. 1948. "1848 en Belgique."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1: 355-371. Paris: Éd. du Minuit.

Barzun, Jacques. 1943. *Romanticism and the Modern Ego*. Boston: Little, Brown.

———. 1961. *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2nd rev. ed. Boston: Little, Brown

Basch, Françoise. 1986. "Women's Rights and the Wrongs of Marriage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2 (Autumn) : 18-40.

Baster, Albert. 1934. "The Origins of British Banking Expansion in the Near Ea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 no. 1 (October) : 76-86.

Bastid, Paul. 1953. "La Théorie juridique des Chart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 n. s., 3, no. 11 (July-September) : 163-175.

———. 1970. *Siéyès et sa pensée*. Nouv. éd.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Hachette.

Baudis, Dieter, and Helga Nussbaum. 1978. *Wirtschaft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 von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1918/19*. Vaduz: Topos.

Bauman, Zygmunt. 1986-1987. "The Left as the Counterculture of Modernity." *Telos*, no. 70 (Winter) : 81-93.

Bayly, C. A. 1989.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don: Longman.

Beales, H. L. 1934.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Industry and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 no. 1 (October) : 65-75.

Bebel, August. 1988. *Woma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Zwan.

Bécarud, Jean. 1953. "La Noblesse dans les Chambres (1815-1848)."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 n. s., 3, no. 11 (July-September) : 189-205.

Bédarida, François. 1965. "Le Socialisme et la nation: James Connolly et l'Irlande." *Le Mouvement social*, no. 52 (July-September) : 3-31.

———. 1979. "Le Socialisme en Angleterre jusqu'en 1848." In *Des Origines à 1875*, ed. J. Droz, 257-330. Vol. 1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u soci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ederman, Gail. 1995.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Beiser, Frederick C. 1992.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 179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Belloni, Pier Paolo. 1979. "Lotte di classe, sindacalismo e riformismo a Torino 1898-1910." In *L'età giolittiana, la guerra e il dopoguerra*, ed. A.

Agosti and G. M. Bravo, 43-137. Vol. 2 of *Storia del movimento operaio, del socialismo e delle lotte sociali in Piemonte*. Bari: De Donato.

Beloff, Max. 1974. "1848-1948, A Retrospect." In *A Hundred Years of Revolution, 1848 and After*, ed. G. Woodcock, 41-59. New York: Haskell House.

Benaerts, Pierre, et al. 1968. *Nationalité et nationalisme, 1860-1878*.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17.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endix, Reinhard. 1964.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New York: Wiley.

Bénéton, Philippe. 1988. *La conservatisme*. Que sais-je? , 2410.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ennett, George, ed. 1953. *The Concept of Empire: Burke to Attlee, 1774-1947*.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Bennett, Jennifer. 1982. "The Democratic Association, 1837-41: A Study in London Radicalism."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1860*, ed. J. Epstein and D. Thompson, 87-119. London: Macmillan.

Benson, Donald R. 1985. "Facts and Constructs: Victorian Humanists and Scientific Theorists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Victorian Science and Victorian Values: Literary Perspectives*, ed. J. Paradis and T. Postlewait, 299-318.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Berend, Ivan T. 1996. "Instabilità, crisi economiche, rapporto centro-periferia." In *L'età contemporanea, Secolo XIX - XX*, ed. P.

Bairoch and E. J. Hobsbawm, 175-222. Vol. 5 of *Storia d'Europa*. Turin: Einaudi.

Berg, Barbara J. 1978. *The Remembered Gate: Origins of American Feminism: The Woman and the City, 180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Berg, Maxime. 1993. "What Difference Did Women's Work Mak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35 (Spring) : 22-44.

Bergounioux, Alain, and Bernard Maini. 1979. *La Social-démocratie ou le compromi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erlinerblau, Jacques. 1999. *Heresy in the University: The Black Athena Controversy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Bernal, J. D. 1953.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ernal, Martin. 1987.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Vol. 1 of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 1991.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Vol. 2 of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 2006.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Vol. 3 of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Bernard, L. L., and Jessie Bernard. 1943.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ology: The Social Sci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Bernstein, Samuel. 1948. "Saint-Simo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Science and Society*, 12, no. 1 (Winter) : 82-96.

———. 1952.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Great Powers." *Science and Society* 16, no. 3 (Summer) : 247-272.

Berry, Christopher J. 1981. "Nations and Norms." *Review of Politics* 43, no. 1 (January) : 75-87.

Bertier de Sauvigny, G. de. 1970. "Liberalism,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The Birth of Three Words." *Review of Politics* 32, no. 2 (April) : 147-166.

Besnard, Philippe. 1979. "La Formation de l'équipe de l'Année sociolog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 no. 1 (January-March) : 7-32.

Bessel, Richard. 1990. "Workers, Politics and Power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Some Recent Writing on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Historical Journal* 33, no. 1: 211-226.

Betley, Jan Andrzej. 1960. *Belgium and Polan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30-1831*. The Hague: Mouton.

Betts, Raymond F. 1982. "The French Colonial Empire and the French World-View." In *Racism and Colonialism: Essays on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ed. R. Ross, 65-77. The Hague: Nijhoff, for Leiden Univ. Press.

Bezucha, Robert J. 1974.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Early July Monarc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Biagini, Eugenio F. 1991. "Popular Liberals, Gladstonian Finance and the Debate on Taxation, 1860-1874." In *Currents of Radicalism, Popular Radicalism, Organised Labour and Party Politics in Britain, 1850-1914*, ed. E. F. Biagini and A. J. Reid, 134-1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Biagini, Eugenio F., and Alastair J. Reid. 1991. "Currents of Radicalism, 1800-1914." In *Currents of Radicalism: Popular Radicalism, Organised Labour and Party Politics in Britain, 1850-1914*, ed. E. F. Biagini and A. J. Reid, 1-1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Bidelman, Patrick K. 1982. *Pariahs Stand Up! The Founding of the Liberal Feminist Movement in France, 1858-1889*.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Bigaran, Maria Pia. 1982. "Mutamenti dell'emancipazionismo alla vigilia della grande guerra: I periodici femministe italiani del primo novecento." *Memoria, Rivista di storia delle donne*, no. 4 (June) : 125-132.

Billig, Michael. 1982, 1983. "The Origins of Race Psychology." Pts.

1 and 2. *Patterns of Prejudice* 16, no. 3 (July 1982) 3-16; 17, no. 1 (January 1983) : 25-31.

Billington, James H. 1980. *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Revolutionary Faith*. New York: Basic Books.

Birnbaum, Pierre. 1976. "La Conception durkheimienne de l'État: L'Apoliticisme des fonctionnaires."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7, no. 2 (April-June) : 247-258.

Black, Eugene. 1988. *The Social Politics of Anglo-Jewry, 1880-1920*. Oxford: Blackwell.

Black, R. D. Collison. 1953.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Irish Problem."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 s., 5, no. 1 (March) : 26-40.

———. 1960.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Irish Question, 1817-70*.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Blackbourn, David. 1977. "The *Mittelstand* in Germ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871-1914." *Social History*, no. 4 (January) : 409-433.

———. 1984. "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 Reappraising German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ed. D. Blackbourn and G. Eley, 157-292.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1986. "The Politics of Demagogy in Imperial Germany." *Past and Present*, no. 113 (November) : 152-184.

———. 1988. "Progress and Party: Liberalism, Catholicism and the

State in Imperial German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6 (Autumn) : 57-78.

Blackburn, Robin. 1988.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Verso.

Blanc, Louis. 1841-1844. *Révolution française: Histoire des 10 ans, 1830-1840*. 5 vols. (1, 1841; 2, 1842; 3, 1843; 4, 1844; 5, 1844) . Paris: Pagnerre.

Blanc, Olivier. 1981. *Olympe de Gouges*. Paris: Syros.

Blanchard, Marcel. 1956. *Le Second Empire*. 2d rev. ed. Paris: Lib. A. Colin.

Blanning, T. C. W. 1989.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2, no. 2, 109-129.

Blocker, Jack S., Jr. 1985. “Separate Paths, Suffragists and the Women’s Temperance Crusade.” *Signs* 10, no. 3 (Spring) : 460-476.

Bloom, Solomon F. 1941. *The World of Nations: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Implications in the Work of Karl Marx*.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Blue, Gregory. 1999. “Gobineau on China, Race Theory, the ‘Yellow Peril,’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0, no. 1 (Spring) : 93-139.

Bock, Hans Manfred. 1976. *Geschichte des linken 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Böhme, Helmut. 1967. "Big-Business Pressure Groups and Bismarck's Turn to Protectionism, 1873-79." *Historical Journal* 10, no. 2, 218-236.

Bolt, Christine. 2004. *Sisterhood Questioned? Race,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Women's Movements, c. 1880s-1970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onald, Louis de. 1988 [1802]. *Législation primitive considérée par la raison*. Paris: Éd. Jean-Michel Place.

Boon, H. N. 1936. *Rêve et réalité dans l'œuv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Napoléon II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Bortolotti, Franca Pieroni. 1978. "Anna Kuliscioff e la questione femminile." In *Anna Kuliscioff e l'età del riformismo: Atti del Convegno di Milano, dicembre 1976*, 104-139. Rome: Mondo Operaio-Ed. Avanti!

Botrel, J. -F., and J. Le Bouil. 1973. "Sur le concept de 'clase media' dans la pensée bourgeoise en Espagne au XIX e siècle." In *La Question de la "bourgeoisie" dans le monde hispanique au XIX e siècle*, 137-151.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Hispaniques, fasc. 45. Bordeaux: Éd. Bière.[Discussion, 152-160.]

Bougié, Célestin. 1918. "Le Féminisme saint-simonien." In *Chez les prophètes socialistes*, 57-110. Paris: Félix Alcan.

Bouillon, Jacques. 1956. "Les Démocrates-socialistes aux élections de 1849."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s politiques*, 6, no. 1 (January-March) : 70-95.

Boulle, Pierre H. 1988. "In Defense of Slavery: Eighteenth-Century Opposition to Abolition and the Origins of Racist Ideology of France." In *History from Below: Studies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pular Ideology*, ed. Frederick Krantz, 219-246. London: Basil Blackwell.

Bourgin, Georges. 1913. "La Législation ouvrière du Second Empire." *Revue des études napoléoniennes*, 2e année, IV, (September) : 220-236.

———. 1939. *La guerre de 1870-1871 et la Commune*. Paris: Éd. Nationales.

———. 1947. "La Crise ouvrière à Pari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e 1830." *Revue historique*, 71e année, No. CXCVIII (October-December) : 203-214.

———. 1948.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n France."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1: 165-253. Paris: Éd. du Minuit.

Bourguet, Marie-Noëlle. 1976. "Race et histoire: L'Image officielle de la France en 1800." *Annales E. S. C.* 31, no. 4 (July-August) : 802-823.

Bouvier, Jean. 1967. *Les Rothschild*.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Bouvier, Jean, François Furet, and Marcel Gillet. 1965. *Le Mouvement du profit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Bouvier, Jeanne. 1931. *Les Femm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Éd.

Eugène Figuière.

Bowler, Peter. 1984. "E. W. MacBride's Lamarckian Eugen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nals of Science* 41, no. 3, 245-260.

Bowles, Robert C. 1960. "The Reaction of Charles Fourier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 no. 3 (Spring) : 348-356.

Boxer, Marilyn. 1982. "'First Wave' Femin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Class, Family and Religio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5, no. 6, 551-559.

Boyle, John W. 1965. "Le Développement du mouvement ouvrier irlandais de 1880 à 1907." *Mouvement social*, no. 52 (July-September) : 33-53.

Bramson, Leon. 1974.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Brass, Paul R. 1991.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Theory and Comparison*. New Delhi: Sage Publ.

Brebner, J. Bartlett. 1930. "Joseph Howe and the Crimean War Enlistment Controvers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11, no. 4 (December) : 300-327.

———. 1948. "Halévy, Diagnostician of Modern Britain." *Thought* 13: 101-113.

Briavoine, Natalis. 1839. *De l'Industrie en Belgique: Causes de décadence et de prospérité: La Situation actuelle*. Vol. 1. Brussels: Eugène Dubois.

Bridges, Amy. 1986. "Becoming American: The Working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157-19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Briggs, Asa. 1956.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in English Politics, 1780-1846." *Past and Present*, no. 9 (April) : 65-74.

———. 1959. *The Age of Improvement* London: Longmans, Green.

———. 1960.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ed. A. Briggs and J. Saville, 1: 43-73. London: Macmillan.

———. 1967. *William Cobbett*.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Bristow, Edward. 1974. "Profit-Sharing, Socialism and Labour Unrest." In *Essays in Anti-Labour History*, ed. K. D. Brown, 262-289. London: Macmillan.

Brock, W. R. 1941. *Lord Liverpool and Liberal Toryism, 1820 to 1827*.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Broder, André. 1976. "Le commerce extérieur: L'échec de la conquête d'une position international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ed. F. Braudel and E. Labrousse, vol. 3,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1879-années 1880) , 1: 305-346.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ron, Jean. 1968. *Le Droit à l'existence, d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à 1884*. Vol. 1 of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Paris: Éd. Ouvrières.

———. 1970. *La Contestation du capitalisme par les travailleurs organisés (1884-1950) :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vol. 2. Paris: Éd. Ouvrières.

Brown, Kenneth D., ed. 1976. *Essays in Anti-Labour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Brown, Lucy. 1958.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Free-Trade Movement, 1830-4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ruhat, Jean. 1952.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te des canuts*. Vol. 1 of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Paris: Éd. Sociales.

———. 1972. "Le socialisme française de 1815 à 1848." In *Des Origines à 1875*, ed. J. Droz, 331-406. Vol. 1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u soci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Bruhat, Jean, J. Dantry, and E. Tersen. 1960. *La Commune de 1871*. Paris: Éd. Sociales.

Brunet, Georges. 1925. *Le Mysticisme social de Saint-Simon*. Paris: Les Presses Françaises.

Brunot, Ferdinand, and Charles Bruneau. 1937. *Précis de gramm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Rev. ed. Paris: Masson.

Bruun, Geoffrey. 1938. *Europe and the French Imperium*. New York: Harpers.

Bryson, Gladys. 1932.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cience from Moral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42, no. 3 (April) : 302-323.

———. 1945. *Man and Society: The Scottish Inqui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Buck, Paul. 1965.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s at Harvard, 1860-1920: The Inculcation of the Open Mind*, ed. P. Buck, 1-1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Bud, Robert, and K. Gerrypenn Roberts. 1984. *Science versus Practice: Chemistry in Victorian Britain*.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ess.

Buechler, Steven M. 1987. "Elizabeth Boynton Harbert and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1870-1896." *Signs* 13, no. 1 (Autumn) : 78-97.

———. 1990. *Women's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men's Suffrage, Equal Rights and Beyon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Buer, M. C. 1921. "The Trade Depression following the Napoleonic Wars." *Economica* 1, no. 2 (May) : 159-179.

Buhle, Mari Jo. 1981. *Women and American Socialism, 1870-1920*.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Buhle, Mari Jo, and Paul Buhle, eds. 1978. *The Concise History of Women Suffrage: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Work of Stanton, Anthony, Gage and Harper*.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Bulmer, Martin.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Burdeau, Georges. 1979. *Le Libéralisme*. Paris: Éd. du Seuil.

Burgess, Keith. 1975. *The Origins of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Nineteenth-Century Experience*. London: Croom Helm.

Burke, Edmund. 1926.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Burke, Peter. 1988. "Ranke als Gegenrevolutionär." In *Leopold von Ranke und die moder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d. W. J. Mommsen, 189-200. Stuttgart: Klett-Cotta.

Burn, Duncan L. 1928. "Canada and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2, no. 3, 252-272.

———. 1961.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Steelmaking, 1867-1939*. 2nd ed.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Burn, W. L. 1949. "The Age of Equipoise: England, 1848-1868."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146 (July-December) : 207-224.

———. 1964. *The Age of Equipoise: A Study of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Burnham, T. H., and G. O. Hoskins. 1943. *Iron and Steel in Britain, 1870-193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Burns, Gene. 1990. "The Politics of Ideology: The Papal Struggle with Liber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no. 5 (March) : 1123-1152.

Burton, Antoinette M. 1990. "The White Woman's Burden: British Feminists and the Indian Woman, 1865-1915."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3, no. 4, 295-308.

Burwick, Frederick. 1996. *The Damnation of Newton: Goethe's Color Theory and Romantic Percep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Bury, J. P. T. 1948. "La Grande-Bretagne et la Révolution de 1848."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1: 401-448. Paris: Éd. du Minuit.

Bussemer, Herrad-Ulrike. 1985. *Frauenemanzipation und Bildungsbürgertum: Sozialgeschichte der Frauenbewegung in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 Weinheim, Germany: Beltz Verlag.

Butterfield, Herbert. 1931.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G. Bell & Sons.

Cahill, Gilbert A. 1957. "Irish Catholicism and English Toryism." *Review of Politics* 19, no. 1 (January) : 62-76.

Cain, P. J. 1980.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British Overseas Expansion, 1815-1914*. London: Macmillan.

———. 1985. "J. A. Hobson: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Britai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3, no. 3 (May) : 1-27.

Cain, P. J., and A. G. Hopkins. 1987.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I, New Imperialism, 1850-194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40, no. 1 (February) : 1-26.

Caine, Barbara. 1978.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English Women's Movement." *Historical Studies* 18, no. 70 (April) : 52-67.

———. 1982a. "Beatrice Webb and the 'Woman Questio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14 (Autumn) : 23-43.

———. 1982b. "Feminism, Suffrage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Women's Movement."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5, no. 6, 537-550.

———. 1992. *Victorian Femi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airncross, A. K. 1949. "Internal Migration in Victorian England."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7, no. 1, 67-87.

Calhoun, Craig. 1980. "Transition in Social Founda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 no. 4 (November) : 419-456.

———. 1982.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Cameron, Rondo E. 1953. "The *Crédit Mobilier*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1, no. 6 (December) : 461-488.

———. 1957a. "Profit, croissance et stagnation en France au XI^e siècle." *Économie appliquée* 10, nos. 2-3 (April-September) : 409-444.

———. 1957b. "French Finance and Italian Unity: The Cavourian Decad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2, no. 3 (April) : 552-569.

———. 1957c.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du XI^e siècle, Le Rôle de la France." *Annales E. S. C.* 12, no. 2 (April-June) : 243-257.

———. 1958. "Economic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France, 1815-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0, no. 1 (March) : 1-13.

———. 1961. *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00-19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89.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ameron, Rondo E., et al. 1967. *Bankin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ameron, Rondo E., and Charles E. Freedeman. 1983. "French Economic Growth: A Radical Revis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7, no.

1 (Winter) : 3-30.

Camparini, Aurelia. 1978a. "La Questione femminile come problema de classe." In *Anna Kulischoff e l'età del riformismo: Atti del convegno di Milano, dicembre 1976*, 318-328. Rome: Mondo Operaio-Ed. Avanti!

———. 1978b. *Questione femminile e Terza Internazionele*. Bari: De Donato.

Campbell, Stuart L. 1978. *The Second Empire Revisited: A Study in French Historiograph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Cantimori, Delio. 1948. "1848 en Italie."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1: 255-318. Paris: Éd. du Minuit.

Carlisle, Robert B. 1968. "Saint Simonian Radicalism: A Definition and a Direc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5, no. 4 (Fall) : 430-445.

Carlson, Andrew R. 1972. *Anarchism in Germany*.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Carnot, Sadi. 1875. Preface to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t ses détracteurs*, by J. S. Mill, v - x x x. Paris: Lib. Germer Baillière.

Caron, François. 197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Carrère d'Encausse, Hélène. 1963. "La Révolution de 1905 au Turkestan." *Le Mouvement social* 45 (oct. -December) : 86-92.

———. 1971. "Unité prolétarienne et diversité nationale: Lénine et la

théorie de l'autodétermination.”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21, no. 2 (April) : 221-255.

Casalini, Maria. 1981. “Femminismo e socialismo in Anna Kuliscioff, 1890-1907.” *Italia contemporanea* 33, no. 143 (April-June) : 11-43.

Cashdollar, Charles D. 1989.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ology, 1830-1890: Positivism and Protestant Thought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Catt, Carrie Chapman, and Nettie Rogers Shuler. 1923.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The Inner Story of the Suffrage Movem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Cecil, Lord Hugh. 1912. *Conservatism*. London: Williams & Northgate.

Cerati, Marie. 1966. *Le Club des citoyennes républicaines révolutionnaires*. Paris: Éd. Sociales.

Césaire, Aimé. 1948. “Introduction, Victor Schoelcher et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In V. Schoelcher, *Esclavage et colonisation*, 1-28.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81. *Toussaint Louvertu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hafe, William. 1977. *Women and Equality: Changing Patterns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Chafetz, Janet Saltzman, and Anthony Gary Dworkin. 1986. *Female Revolt: Women's Movements in World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towa, NJ: Rowman & Allenheld.

Chandra, Bipan. 1979.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Modern India*.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Chapelle-Dulière, Jacqueline. 1981. "Le 'Socialisme' de Frédéric Le Play (1806-1882), membre de la Commission du Luxembourg en 1848." *Revue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4: 741-769.

Charlton, Donald Geoffrey. 1959. *Positivist Thought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1852-18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rvet, John. 1982. *Feminism*. London: Dent.

Chauvet, P. 1951. "Le Coup d'état vu par un ouvrier." 1848. *Revue des révolutions contemporaines*, no. 189 (December) : 148-152.

Checkland, S. G. 1951. "The Advent of Academic Economics in England."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cience*, n. s., 19, no. 5 (January) : 43-70.

———. 1964. *The Rise of Industrial Society in England, 1815-1885*. London: Longmans.

Checkland, S. G, and E. O. A. Checkland 1974. Introduction to *The Poor Law Report of 1834*, ed. S. G. and E. O. A. Checkland, 9-59.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Chevalier, Louis. 1958.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à*

Paris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Paris: Plon.

Chlepner, B. -S. 1926. *La banque en Belgique: Étude historique et économique.* Brussels: M. Lamertin.

———. 1931. “Les Débuts du crédit industriel modern.” *Revue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9, no. 2 (April-June) : 293-316.

Church, R. A. 1975. *The Great Victorian Boom, 1850-1873.* London: Macmillan.

Church, Robert L. 1974. “Economists as Experts, 1870-1920.” In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ed. L. Stone, 2: 571-60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Clapham, J. H. 1910. “The Last Year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Pts. 1 and 2.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5, no. 99 (July) : 480-501; no. 100 (October) : 687-707.

———. 1916. “The Spitalfield Acts, 1773-1824.” *Economic Journal* 26, no. 104 (December) : 459-471.

———. 1930.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1, The Early Railway Age, 1820-1850.*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3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2, Free Trade and Steel, 182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44. *The Bank of England. Vol. 1, 1694-17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lark, Terry N. 1972. "Emile Durkheim and the French Universit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olog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ical Sociology: Studies in Continuity, Discontinu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ed. A. Oberschall, 152-186.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73. *Prophets and Patrons: The French Univers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Clemens, Barbel. 1988. "Menschenrechte haben kein Geschlecht": *Zum Politikverständnis der Bürgerlichen Frauenbewegung*. Pfaffenweiler, Germany: Centaurus Verlagsgesellschaft.

Clements, R. V. 1955. "Trade Unions and Emigration, 1840-1880." *Population Studies* 9, no. 2 (November) : 167-180.

———. "British Trade Unions and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1850-187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4, no. 1 (August) : 93-104.

Coates, Willson H. 1950. "Benthamism, Laissez-faire, and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1, no. 3 (June) : 357-363.

Coats, A. W. 1960.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no. 4 (September) : 555-574.

Coats, A. W., and S. E. Coats. 1970.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British Economics' Profession, '1890-1915."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1, no. 1 (March) : 73-85.

Cobb, Richard. 1970.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French Popular*

Protest, 1789-18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bban, Alfred. 1950. Introduction to *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A. Cobban, 1-32. London: Nicholas Kaye.

———. 1967. “The ‘Middle Class’ in France, 1815-1848.”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5 (Spring) : 41-52.

Cobbe, Frances Power. 1881. *The Duties of Women*.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Cohen, Philip N. 1996. “Nationalism and Suffrage: Gender Struggle in Nation-Building America.” *Signs* 21, no. 3 (Spring) : 717-727.

Cohen, William B. 1980. *The French Encounter with Africans: White Response to Blacks, 1530-18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Cole, G. D. H. 1937. “British Trade Unionism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al History* 2: 1-22.

———. 1953. *Socialist Thought: The Forerunners, 1789-1850*. Vol. 1 of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ole, Juan. 2008. *Napoleon’s Egypt: Invad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Cole, Stephen. 1972. “Continu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Science: A Case Study of Failur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ical Sociology: Studies in Continuity, Discontinu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ed. A. Oberschall, 73-129. New York: Harper & Row.

Coleman, Bruce. 1973. *The Idea of the C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8. *Conservatism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Edward Arnold.

Collini, Stefan. 1978. "Sociology and Idealism in Britain, 1880-1920."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19, no. 1, 3-50.

———. 1979. *Liberalism and Sociology: L. T. Hobhouse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ngland, 188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ollini, Stefan, Donald Winch, and John Burrow, eds. 1983. *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ollins, Henry. 1964.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 Bulletin*, no. 9 (Autumn) : 24-39.

Collins, Irene, ed. 1970.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France, 1814-1848*. London: Edward Arnold.

Cominos, Peter T. 1963. "Late-Victorian Sexual Respectability and the So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8: 18-48, 216-250.

Commons, John R. 1918.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J. R. Commons et al., 13-21. New York: Macmillan.

———. 1935. "Introduction to Volumes III & IV." In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J. R. Commons et al., 3: ix- x x x. New York: Macmillan.

Condliffe, J. B. 1951. *The Commerce of N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Condorcet, Jean-Antoine Nicolas de Capitat Marquis de. 1778. *Réflexions d'un citoyen catholique sur les lois de France relatives aux protestants*. N. p., n. d.

———. 1788. *Ré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Rev. and corrected ed. Neuchâtel, Switzerland.

Conze, Werner, and Dieter Groh. 1966. *Die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vor, während und nach der Reichsgründung*. Stuttgart: Ernst Klett Verlag.

———. 1971. "Working-Class Movement and National Movement in Germany between 1830 and 1871." In *Mouvements nationaux et indépendance et classes populaires aux XI^e et X^e siècles en Occident et en Orient*, by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and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ed. E. Labrousse, 1: 134-174. Paris: Lib. Armand Colin.

Cookson, J. E. 1975. *Lord Liverpool's Administration: The Crucial Years, 1815-1822*.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Coole, Diana H. 1993.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 From Ancient Mysogyny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2nd ed. Hertfordshire, UK: Harvester Wheatsheaf.

Coornaert, Emile. 1950. "La pensée ouvrière et la conscience de classe en France de 1830 à 1848." In *Studi in Onore de Gino Luzzatto*, 3: 12-33. Milan: Dott. A. Giuffrè-Ed.

Copans, J., and J. Jaurin, eds. 1994. *Aux origines de l'anthropologie française: L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 en l'an VIII*. Paris: Jean Michel Place.

Coppock, D. J. 1964. "British Industrial Growth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1873-96) : A Pessimist's 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7, no. 2 (December) : 389-396.

Cordillot, Michel. 1990. *La Naissance du mouvement ouvrier à Besançon: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1869-1872*. Rev. ed. *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Université de Besançon, Cahiers D'Etudes Comtoises*, no. 45. Paris: Les Belles-Lettres.

Corry, B. A. 1958. "The Theory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English Classical Economy." *Economica*, n. s., 25, no. 97 (February) : 34-48.

Coser, Lewis, 1960. "Durkheim's Conservat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is Sociological Theory." In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ed. K. H. Wolff, 211-232.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Cosslett, Tess. 1982.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and Victorian Litera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ottureau, Alain. 1980. "Vie quotidienne et résistance ouvrière à Paris en 1870." Étude préalable to *Le Sublime*, by Denis Poulet. Paris: François Maspéro.

———. 1986. "The Distinctiveness of Working-Class Cultures in France, 1848-1900."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

Zolberg, 111-15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Coudert, Alison. 1989. "The Myth of the Improved Status of Protestant Women: The Case of the Witchcraze." In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J. R. Brink et al., 61-90. Sixteenth Century Essays & Studies 12. Kirksville, MO: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Publ.

Coussy, Jean. 1961. "La Politique commerciale du Second Empire et la continuité de l'évolution structurelle française." *Cahiers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 no. 120 [série P, no. 6] (December) : 1-47.

Craeybeckx, Jan. 1968. "Les débuts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Belgique et les statistiques de la fin de l'Empire."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G. Jacquemyns*, 115-144. Brussels: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Ed.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Crafts, N. F. R. 1984. "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1830-1910: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no. 1 (March) : 49-67.

Crick, Bernard R. 1955. "The Strange Quest for An American Conserv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17, no. 3 (July) : 359-376.

———. 1964. *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tics: Its Origins and Conditions*. 3rd printing.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Croce, Benedetto. 1934.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Cronin, James E. 1983. "Politics,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Enduring

Weakness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6, no. 3 (Spring) : 123-142.

Cross, Máire, and Tim Gray. 1992. *The Feminism of Flora Tristan*. Oxford: Berg.

Crouch, R. L. 1967. “Laissez-fair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Myth or Reality? ”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35, no. 3 (September) : 199-213.

Crouzet, François. 1964. “Wars, Blockad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urope, 1792-181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no. 4: 567-590.

———. 1967. “Agriculture et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Quelques réflexions.” *Cahiers d’histoire* 12, nos. 1-2, 67-85.

———. 1970. “Essai de construction d’un indice annuel de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française au XI X e siècle.” *Annales E. S. C.* 25, no. 1 (January-February) : 56-99.

———. 1972a. “Encor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française au XI X e siècle.” *Revue du nord* 54, no. 214 (July-September) : 271-288.

———. 1972b. “Western Europe and Great Britain: Catching Up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ed. A. J. Youngson, 98-125.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1975. “Trade and Empire: The British Experienc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Free Trade until the First World War.” In *Great Britain and Her World, 1750-1914*, ed. B. M. Ratcliffe, 209-235.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ess.

———. 1978. *L'économie de la Grande-Bretagne victorienne*. Paris: S. E. D. E. S.

———. 1985. *De la supériorité de l'Angleterre sur la France: L'économique et l'imaginaire, X^{VIII}e-X^{IX}e siècle*. Paris: Lib. Académique Perrin.

Cruz Seoane, María. 1968. *El Primer lenguaje constitucional español (Las Cortes de Cádiz)*. Madrid: Ed. Moneda y Crédito.

Cullen, L. M. 1980. "The Cultural Basis of Modern Irish Nationalism." In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ed. R. Mitchison, 91-106. Edinburgh: John Donald.

Cullen, Michael J. 1975. *The Statistical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Hassocks, Sussex, UK: Harvester Press.

Cunningham, Andrew, and Nicholas Jardine. 1990. "Introduction: The Age of Reflexion." In *Romanticism and the Sciences*, ed. A. Cunningham and N. Jardine, 1-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unningham, Hugh. 1981.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1750-1914."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2 (Autumn) : 8-33.

Cunningham, William. 1892. "The Perversion of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Journal* 2, no. 3 (September) : 491-508.

———. 1907.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 The Mercantile System*. 4th ed. London: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08.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ing the Parts Entitled Parliamentary Colbertism and Laissez Faire, Reprinted from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 by W. Cunning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urrie, R., and R. M. Hartwell. 1965.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8, no. 3, 633-643.

Curtin, Philip. 1990. "The Environment beyond Europe and the European Theory of Empir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 no. 2 (Fall) : 131-150.

Daget, Serge. 1973. "Le Mot esclave, nègre, Noir et les jugements de valeur sur la traite négrière dans la littérature abolitionniste française de 1770 à 1845."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LX, 4, no. 221, 511-548.

Dahrendorf, Ralf. 1987. "Max Weber and Modern Social Science." In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ed. W. J. Mommsen and J. Osterhammel, 574-581. London: Unwin Hyman.

———. 1995. *LSE: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85-1995*.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Dale, Peter Allan. 1989. *In Pursuit of a Scientific Culture: Science, Art and Society in the Victorian Age*.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Darvall, Frank O. 1934. *Popular Disturbance and Public Order in Regency England*.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Daston, Lorraine. 1988. *Classical Probability in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Daumard, Adeline. 1963. *La Bourgeoisie parisienne de 1815 à 1848*. Paris: S. E. V. P. E. N.

———. 1976. “L’Etat libéral et le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vol. 3, pt. 1 (MSP 419), ed. F. Braudel and E. Labrouss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Davies, Emily. 1988.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London: Hambledon.

Davis, David Brion. 1966.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 1984.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Davis, Horace B. 1941. “The Theory of Union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5 (August) : 611-637.

Davis, John A., ed. 1979. *Gramsci and Italy’s Passive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 1989. “Industrialization in Britain and Europe before 1850.” In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s*, ed. P. Mathias and J. A. Davis, 44-6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Davis, Mary. 1993. *Comrade or Brother?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789-1951*. London: Pluto Press.

Davis, T. W. Rhys. 1903-1904. “Oriental Studies in England and

Abroad.”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83-197.

Deacon, Desley. 1985. “Political Arithmetic: The Nineteenth-Century Australian Censu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pendent Woman.” *Signs* 11, no. 1 (Autumn) : 27-47.

Deane, Phyllis, and W. A. Cole. 1967.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s*. 2nd ed. London: Cambridge Univ. Press.

Debs, Eugene V. 1903. “The Negro in the Class Struggl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4, no. 5 (November) : 257-260.

DeCaux, Charles. 1835. “L’Université catholique. Premier semestre. Programme des Cours, Faculté des Sciences Sociales,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L’Université Catholique* 1 (July) : 53-54.

Decharneux, Baudouin. 2000. “Introduction philosophique: Les Indo-Européens, de l’étude aux fantasmes.” In *Modèles linguistiques et idéologies*, “Indo-Européen”, ed. S. Vanséveren, 13-29. Brussels: Éd. Ousia.

Degler, Carl N. 1956.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eminism.” *American Quarterly* 8, no. 1 (Spring) : 21-39.

DeGroat, Judith A. 1997. “The Public Nature of Women’s Work: Definitions and Debates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848.”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0, no. 1 (Winter) : 31-48.

Dehio, Ludwig. 1962.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Delacampagne, Christian. 1983. *L'Invention du racisme, Antiquité et Moyen Age*. Paris: Fayard.

Delaisi, Francis. 1905. *La Force allemande*. Paris: Pages libres.

Demangeon, Albert, and Lucien Febvre. 1935. *Le Rhin: Problèmes d'histoire et d'économi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DeMarchi, N. B. 1976. "On the Early Dangers of Being Too Political an Economist: Thorold Rogers and the 1868 Election to the Drummond Professorship."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 s., 28, no. 3 (November) : 364-380.

Démier, Francis. 1992. "Nation, marché et développement dans la France de la Restauration." *Bulletin du Centre d'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no. 13, 95-103.

Demoulin, Robert. 1938. *Guillaume 1er et la transformation économique des provinces belges*. Bibliothèque de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Liège 80. Paris: Lib. E. Droz.

———. 1950. *La Révolution de 1830*. Brussel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 1960. "L'Influence française sur la naissance de l'Etat belge." *Revue historique*, 84e année, CC X X III, 1 (January-March) : 13-28.

Derainne, Pierre-Jacques. 1993. "Naissance d'un protectionnisme national ouvrier au milieu du XI X e siècle." In *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Les difficiles chemins de l'internationalisme, 1848-1956*, ed. S. Wolikow and M. Cordillot, 27-34. Dijon: EUD.

Desanto, Dominique. 1980. *Flora Tristan: La femme révoltée*. New ed. Paris: Hachette.

Deschamps, Henry-Thierry. 1956. *La Belgique devant la France de Juillet: L'Opinion et l'attitude françaises de 1839 à 1848*.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Descoings, Richard. 2007. *Sciences Po: De La Courneuve à Shanghai*.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 2008. "... et assumer la complexité." 8 December. <http://www.richard-descoings.net/2009/10/04/et-assumer-la-complexite> (accessed August 18, 2010) .

Dessal, M. 1949. "Les incidents franco-belges en 1848." In *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107-113.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Devance, Louis. 1976. "Femme, famille, travail et monde sexuelle dans l'idéologie de 1848." *Romantisme*, nos. 13-14, 79-103.

Devleeshouwer, Robert. 1970. "Le Consultât et l'Empire: Période de 'take-off' pour l'économie beig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7: 610-619.

Devreese, Daisy Eveline. 1989.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s des Travailleurs, Bilan de l'historiographie et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é." *Cahiers d'histoire de L'IRM*, no. 37, 9-32.

Devulder, Catherine. 1987. "Histoire allemande et totalité, Leopold von Ranke, Johann Gustav Droysen, Karl Lamprecht." *Revue de*

synthèse, 4th ser., 108, no. 2 (April-June) : 177-197.

Dhondt, Jean. 1949. "La Belgique en 1848." In *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115-131.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55. "L'Industrie cotonnière gantoise à l'époque français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 (October-December) : 233-279.

———. 1969. "The Cotton Industry at Ghent during the French Régime." In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789-1914*, ed. François Crouzet et al., 15-52. London: Edward Arnold.

Dhondt, Jean, and Marinette Bruwier. 1973.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700-1914." In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ed. C. Cipolla, 1: 329-366.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4. London: Collins.

Dibble, Vernon. 1976. "'Review Essay' of Herman and Julia R. Schwendinger's *Sociologists of the Chair: A Radical Analysis of the Formative Years of North American Sociology*." *History and Theory* 15, no. 3, 293-321.

Dicey, Alfred Venn. 1914 [1965].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Dijkstra, Sandra. 1992. *Flora Tristan: Feminism in the Age of George Sand*. London: Pluto Press.

Djordjević, Dimitrije, and Stephen Fisher-Galati. 1981. *The Balkan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Dolléans, Édouard. 1947.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2 vols. Paris: Colin.

Dominick, Raymond H. III. 1982. *Wilhelm Liebknech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Donzelot, Jacques. 1977. *La Police des familles*. Paris: Éd. du Minuit.

———. 1984. *L'Invention du social: Essai sur le déclin des passions politiques*. Paris: Fayard.

Dorfman, Joseph. 1955a.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In *A History of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R. G. Hoxie et al., 161-206.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 1955b. "The Role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45, no. 2 (May) : 17-28.[Discussion, 29-39.]

Dorpalen, Andrew. 1969. "The German Struggle against Napoleon: The East German View."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1, no. 4 (December) : 485-516.

Drachkovitch, Milorad. 1953. *Les Socialismes français et allemand et le problème de la guerre, 1870-1914*. Geneva: Droz.

Drescher, Seymour. 1981. "Art Whip and Billy Roller; Or Anti-

slavery and Reform Symbolism in Industrializing Brita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5, no. 1 (Fall) : 3-24.

Dreyer, F. A. 1965. “The Whigs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848.”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0, no. 316 (July) : 514-537.

Droit, Roger-Pol. 2000. “L’Orient comme paradis ou comme enfer: Science des religions et mythes philosophiques à l’époque contemporaine.” In *Sciences, mythes et religions en Europe, Royaumont, 14-15 octobre 1997*, ed. D. Lecourt, 97-103. Luxembourg: European Communities.

Droixhe, Daniel, and Klaus Keifer, eds. 1987. *Images de l’africain de l’Antiquité au X X e siècle*.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Peter Lang.

Droz, Jacques. 1963. “L’Origine de la loi des trois classes en Prusse.” In *Réaction et suffrage universel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1848-1850)*, ed. J. Droz, 1-45. 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22. Paris: Lib. Marcel Rivière.

———. 1967. *Europe between Revolutions, 1815-1848: The Fontana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 Collins.

———. 1971. “Cisleithanie, Les Masses laborieuses et le problème national.” In *Mouvements nationaux d’indépendance et classes populaires aux XI X e et X X e siècles en Occident et en Orient*, by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and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ed. E. Labrousse, 1: 74-92. Paris: Lib. Armand Colin.

———. 1977a. Introduction to *Des origines à 1875*, ed. J. Droz, 9-24. Vol. 1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u Soci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77b. “Le Socialisme allemand du Vormärz.” In *Des Origines à 1875*, ed. J. Droz, 407-456. Vol. 1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u Soci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Dubofsky, Melvyn. 1974. “Socialism and Syndicalism.” In *Failure of a Drea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 ed. J. Laslett and S. M. Lipset, 252-285. Garden City, NY: Anchor.

DuBois, Ellen Carol. 1978. *Feminism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s Movement in America, 1848-1869*.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Duchet, Michèle. 1975. *Anthropologie et histoir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Albin Michel.

Duffy, A. E. P. 1961. “New Unionism in Britain, 1889-1890: A Reappraisal.”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4, no. 2 (December) : 306-319.

Duhet, Paule-Marie. 1971. *Les Femmes et la Révolution, 1789-1794*. Paris: Julliard.

———, ed. 1989. *1789,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s femmes et autres textes*. Nouv. éd. augm. Paris: Des Femmes.

Dunbabin, J. D. D. 1963. “The ‘Revolt of the Field’: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s’ Movement in the 1870s.” *Past and Present*, no. 26 (November) : 68-97.

Dunham, Arthur Louis. 1930. *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1861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ance*. 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Dupuis, Charles. 1909. *Le Principe d'équilibre et le concert européen, de la Paix de Westphalie à l'Acte d'Algéciras*. Paris: Perrin.

Durkheim, Emile. 1925. "Saint-Simon, fondateur du positivisme et de la sociologi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50e année, XCIX, nos. 5-6 (May-June) : 321-341.

Duroselle, Jean-Baptiste. 1951. *Les Débuts du catholicisme social en France (1822-1870)*.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Duverger, Maurice. 1967. *La Démocratie sans le peuple*. Paris: Éd. du Seuil.

Echard, William E. 1983. *Napoleon III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

Eichtal, Eugène d'. 1903. "Carlyle et le Saint-Simonisme: Lettres à Gustave d'Eichtal." *Revue historique*, 28e année, LXXII, 2 (July-August) : 292-306.

Einaudi, Mario. 1938. "Le Prime ferrovie piemontesi ed il conte di Cavour."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3: 1-38.

Eisenstein, Elizabeth L. 1959. *The First Professional Revolutionist, Filippo Michele Buonarroti (1761-18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Eisenstein, Zillah R. 1981. *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 Press.

Elbaum, B., and W. Lazowick. 1984.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no. 2 (June) : 567-583.

Elesh, David. 1972.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Discontinuity in the History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ical Sociology, Studies in Continuity, Discontinu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ed. A. Oberschall, 31-72. New York: Harper & Row.

Eley, Geoff. 1976. "Social Imperialism in Germany: Reformist Synthesis or Reactionary Sleight of Hand? ." In *Imperialismus im 20. Jahrhundert: Gedenkschrift für George W. F. Hallgarten*, ed. J. Radkau and I. Geiss, 71-86. Munich: C. H. Beck.

———.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 1984. "The British Model and the German Road: Rethinking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Before 1914." In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ed. D. Blackbourn and G. Eley, 37-155.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1996.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Boston: Unwin and Hyman.

Ellis, John. 1974a. "Patterns of Political Violence during the Second Republic, 1845-51." In *Revolt to Revolution: Studie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European Experience*, ed. M. Elliott Bateman et al., 59-112.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ess.

———. 1974b. “Revolutionary Trends in Europ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Revolt to Revolution: Studie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European Experience*, ed. M. Elliott Bateman et al., 31-57.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ess.

Elshtain, Jean Bethke. 1981.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Elton, Godfrey Lord. 1923. *The Revolutionary Idea in France (1789-1871)*. London: Edward Arnold.

Elvin, Mark. 1986. “A Working Definition of ‘Modernity’?” *Past and Present*, no. 113 (November) : 209-213.

Elwitt, Sanford. 1975.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Republic: Clas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68-1884*.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

———. 1988. “Debate, Social Science, Social Reform and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no. 121 (November) : 209-214.

Ely, Richard T. 1890. *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Rev. ed. New York: T. Y. Crowell.

———. 1910.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885-1909.”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Quarterly*, 3rd ser., 11, no. 1, 47-92.

Emerit, Marcel. 1941. *Les Saint-simoniens en Algérie*. Paris: Les Belles-Lettres.

———. 1943. “Les Saint-simoniens au Maroc.” *Bulletin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du Maroc*, 30e année, no. 176 (April-June) .

——, ed. 1949.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n Algérie*. Paris: Larose.

Emy, Hugh Vincent. 1973. *Liberals, Radicals and Social Politics, 1892-1914*.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Endres, Robert. 1948. "1848 en Autriche."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65-122. Paris: Éd. du Minuit.

Engel, Arthur. 1974. "Emerging Concepts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at Oxford: 1800-1854." In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ed. L. Stone, 1: 305-35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Erickson, Charlotte. 1949. "The Encouragement of Emigration by British Trade Unions, 1850-1900." *Population Studies* 3, no. 3 (December) : 248-273.

Evans, David Owen. 1951. *Social Romanticism in France, 1830-18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vans, Eric J., ed. 1978. *Social Policy, 1830-1914: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3. *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 1783-1870*. London: Longman.

Evans, Richard J. 1976.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1894-1933*.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1977. *The Feminists: Women's Emancipation Movements in*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asia, 1840-1920. London: Croom Helm.

———. 1986. “The Concept of Feminism: Notes for Practicing Historians.” In *German Wome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 Social and Literary History*, ed. R. -E. B. Joeres and J. M. Maynes, 247-26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1987. *Comrades and Sisters: Feminism, Socialism, and Pacifism in Europe, 1870-1945*. Brighton, Sussex, UK: Wheatsheaf Books.

Fairlie, Susan. 1965. “The Nineteenth-Century Corn Law Reconsider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8, no. 3 (December) : 562-575.

———. 1969. “The Corn Laws and British Wheat Production, 1829-76.”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22, no. 1 (April) : 88-116.

Faivre, Jean-Paul. 1954. *L'Expansion française dans le Pacifique, de 1800 à 1842*. Paris: Nouvelles Éd. Latines.

Fakkar, Rouchdi. 1968. *Sociologie, socialisme et internationalisme prémarxiste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influence internationale de Saint-Simon et de ses disciples. (Bilan en Europe et portée extraeuropéenne)* . Neuchâtel, Switzerland: Delachaux & Niestlé.

Farnie, D. A. 1979. *Th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Market, 1815-189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arr, James. 1988.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no. 4 (November) : 1175-1195.

Faure, Alain, and Jacques Rancière. 1976. *La Parole ouvrière, textes rassemblés et présentés, 1830/1851*. Paris: UGE.

Fauré, Christine. 1991. *Democracy without Women: Feminism and the Rise of Liberal Individualism in Fra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Favre, Pierre. 1981. "Les Sciences d'Etat entre déterminisme et libéralisme: Emile Boutmy et la création de l'Ecole libre de sciences politiques."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2, no. 3 (July-September) : 429-468.

Fay, C. R. 1920. *Life and Labou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 1926. "Price Control and the Corn Averages under the Corn Laws."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History)* 1, no. 1 (January) : 149-154.

———. 1932. *The Corn Laws and Social England*.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Fay, Victor. 1981. Remarks in *Jaurès et la classe ouvrière, 187-188*. Collection mouvement social. Paris: Ed. Ouvrières.

Feaveryear, A. E. 1931. *The Pound Sterling: A History of English Money*.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Fehér, Ferenc. 1987. *The Frozen Revolution: An Essay on Jacobi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Feis, Herbert. 1930.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Fejtö, François. 1948a. "Introduction: L'Europ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1: 25-125. Paris: Éd. du Minuit.

———. 1948b. "La Guerre de l'indépendance hongroise."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123-204. Paris: Éd. du Minuit.

———. 1948c. "Conclusion."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435-466. Paris: Éd. du Minuit.

———. 1948d. "Le Sens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n Hongrie et en Autriche." *Revue socialiste*, n. s., nos. 17-18 (January-February) : 107-116.

———. 1949. "Paris des années 40, capitale de la Révolution." In *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357-369.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Feldman, Gerald D. 1986.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9, no. 2 (June) : 174-185.

Feray, E. 1881. *Du Traité de commerce de 1860 avec l'Angleterre*. Paris: Plon.

Festy, Octave. 1908. *Le Mouvement ouvrier au début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1830-1834)*. Vol. 2, part 3, of *Bibliothèque d'Histoire Moderne*. Paris: Éd. Cornély.

———. 1913. “Le Mouvement ouvrier à Paris en 1840.” 3 pts. *Revue de l’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6 (July-August) : 67-79; (September-October) : 226-240; (November-December) : 333-361.

Fetter, Frank W. 1943. “The Earl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87, no. 1 (July) : 51-60.

———. 1959. “The Politics of the Bullion Report.” *Economica*, n. s., 26, no. 102 (May) : 99-120.

———. 1965.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onetary Orthodoxy, 1797-187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Fitchett, W. H. 1899-1900. *How England Saved Europe: The Story of the Great War (1798-1815)* . 4 vols. London: Smith, Elder & Co.

Fitzpatrick, David. 1984. *Irish Emigration, 1801-1921*. Vol. 1 of *Studies in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Dubl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Society of Ireland.

Flamant, Maurice. 1988. *Histoire du libéralisme*. Que sais-je? , no. 1797bi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Fletcher, Roger. 1984. *Revisionism and Empire: Socialist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97-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Flexner, Eleanor. 1975. *A Century of Struggle: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Flinn, M. W. 1961. “The Poor Employment Act of 1817.”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4, no. 1 (August) : 82-92.

Fohlen, Claude. 1956. "Bourgeoisie française, liberté économique et intervention de l'état." *Revue économique* 7, no. 3 (May) : 414-428.

———. 1961. "Sociétés anonymes et développement capitaliste sous le Second Empire." *Histoire des entreprises*, no. 6 (November) : 65-77.

Folbre, Nancy. 1991. "The Unproductive Housewife: Her 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conomic Thought." *Signs* 16, no. 3 (Spring) : 463-484.

Foner, Eric. 1983. *Nothing but Freedom: Emancipation and Its Legac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

———. 1984.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17 (Spring) : 57-80.

Foner, Philip S. 1977. *The Great Labor Uprising of 1877*. New York: Monad.

Fong, H. D. 1930. *Triumph of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 Tientsin, China: Chihli Press.

Fontvieille, Louis. 1976. "Evolution et croissance de l'Etat français de 1815 à 1969"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10 (September-December) : 9-12 [Cahiers de l'I. S. M. E. A., Série AF, no. 13].

Fontvieille, Louis, with Anita Bringent. 1982. "Evolution et croissance de l'administration départementale française, 1815-1974."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16 (January-February) : 1-2 [Cahiers de l'I. S. M.

E. A., Séries AF, no. 14].

Foote, George A. 1951.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the British Reform Movement, 1830-1850." *Isis* 42, pt. 3, no. 129 (October) : 192-208.

Forbes, Geraldine H. 1982. "Caged Tigers: 'First Wave' Feminists in Indi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5, no. 6, 525-536.

Forman, Michael. 1998.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 The Idea of Nation in Socialist Anarchist Theor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 Press.

Fossaert, Robert. 1955. "La Théorie des classes chez Guizot et Thierry." *La Pensée*, no. 59 (January-February) : 59-69.

Foster, John. 1974.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ree English Tow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76. "Some Comments on 'Class Struggle and the Labour Aristocracy, 1830-60.'" *Social History* 1, no. 3 (October) : 357-366.

Foucault, Michel. 1976. *La Volonté du savoir*. Vol. 1 of *L'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Paris: Gallimard.

Fox, Robert, and George Weisz, eds. 1980.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France, 180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France,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du Commerce et des Travaux Publics, 1860. *Enquête, Traité d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Frank, Andre Gunder. 1976a. "Multilateral Merchandise Trade Imbalances and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no. 2 (Fall) : 407-438.

———. 1976b. "Trade Balances and the Third World: A Commentary on Paul Bairoch."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no. 2 (Fall) : 469-472.

———. 1977. "Imbalance and Exploit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6, no. 3 (Winter) : 750-753.

Fraser, Derek. 1969. "The Agitation for Parliament Reform." In *Popular Movements, 1830-1850*, ed. J. T. Ward, 31-53. London: Macmillan.

Fredrickson, George M. 1971.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Harper & Row.

Freedeman, Charles E. 1965. "Joint Stock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 France, 1807-1867."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9, no. 2 (Summer) : 184-204.

Frei, Annette. 1987. *Rote Patriarchen: Arbeiterbewegung und Frauenemanzipation in der Schweiz um 1900*. Zurich: Chronos.

Fridieff, Michel. 1952. "L'Opinion publique française devant l'insurrection polonaise de 1830-1831." 3 pts.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 n. s., 2, no. 6 (April-June) : 111-121;

no. 7 (July-September) : 205-214; no. 8 (October-December) : 280-304.

Fulford, Roger. 1957. *Votes for Women: The Story of a Struggle*. London: Faber & Faber.

Fuller, Margaret. 1992.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Essential Margaret Fuller*, ed. Jeffrey Steele, 243-378.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Furet, François. 1963. "Pour une définition des classes inférieures à l'époque moderne." *Annales E. S. C.* 18, no. 3 (May-June) : 459-474.

———. 1988. Preface to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a constitution*, by A. Barnave, 9-29. Paris: Presses Univ. de Grenoble.

Furner, Mary O. 1975. *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 Lexington: Univ. Press of Kentucky for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 1990. "Knowing Capitalism: Public Investigation and the Labor Question in the Long Progressive Era." In *State and Economic Knowledge: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ed. M. O. Furner and B. Supple, 241-286.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Gabaccia, Donna. 1999. "The 'Yellow Peril' and the 'Chinese of Europe':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ace and Labor, 18: 15-1930." In *Migration, Migration History, History, Old Paradigms and New Perspectives*, ed. J. L. Lucassen, 177-196. Bern: Peter Lang.

Galbraith, John S. 1961. "Myths of the 'Little England'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7, no. 1 (October) : 34-48.

Gallagher, John, and Ronald Robinson. 1953.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6, no. 1 (August) : 1-15.

Gallisot, René. 1979. "Nazione e nazionalità nei dibattit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 *Il Marxismo dell'età della Secondo Internazionale*, 785-864. Vol. 2 of *Storia del Marxismo*. Turin: Einaudi.

Garden, Maurice. 1978. "Un exemple régionale: L'industrie textile des Pays-Bas autrichiens."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u monde*, ed. Pierre Léon, vol. 3, *Inerties et Révolutions, 1730-1840*, ed. Louis Bergeron, 20-27. Paris: Lib. Armand Colin.

Garnier, Joseph. 1852. "De l'Origine et de la filiation du mot économie politique et les divers autres noms donnés à la science économique." 2 pts.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II e année, X X XII, nos. 135-136 (July-August) : 300-316; X X X III, nos. 137-138 (September-October) : 11-23.

Gash, Norman. 1935. "Rural Unemployment, 1815-3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 no. 1 (October) : 90-93.

———. 1951. "Peel and the Party System, 1830-50."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1: 47-70.

———. 1956. "English Reform and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830." In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Lewis Namier*, ed. R. Pares and A. J. P. Taylor, 258-288. London: Macmillan.

———. 1965. *Re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English Politics, 1832-185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77. "From the Origins of Sir Robert Peel." In *The Conservatives*, ed. Lord Butler, 19-108.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1979. *Aristocracy and People: Britain 1815-186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Gates, Henry Louis, Jr. 1988. "The Trope of the New Negro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Black." *Representations*, no. 24 (Fall) : 129-155.

Gay, Peter. 1993.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Vol. 3 of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New York: W. W. Norton.

Gayer, Arthur D., W. W. Rostow,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 1953. *The Growth and Fluctua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790-1850*.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eanakoplos, Deno J. 1976. "The Diaspora Greeks: The Genesis of Greek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Hellenism and the First Greek War of Liberation (1821-1830) :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 N. P. Diamandouros, 59-77. Thessalonica: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Geary, Dick. 1976.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1848-1918."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6, no. 3 (July) : 297-330.

———. 1981. *European Labour Protest, 1848-1939*. London: Croom Helm.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Gemelli, Giuliana. 1987. "Communauté intellectuelle et stratégie institutionnelles: Henri Berr et la Fondation du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 *Revue de synthèse*, 4th ser., 8, no. 2 (April-June) : 225-259.

Genovese, Elizabeth Fox. 1987.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an Women." *Signs* 12, no. 3 (Spring) : 329-347.

George, M. Dorothy. 1927. "The Combination Laws Reconsidered."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History)* 1, no. 2 (May) : 214-228.

———. 1936. "The Combination Law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 no. 2 (April) : 172-178.

George, Margaret. 1976-1977. "The 'World Historical Defeat' of the *Républicaines-Révolutionnaires*." *Science and Society* 40, no. 4 (Winter) : 410-437.

Gerbod, Paul. 1965. *La Condition universitair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Gerhard, Ute. 1982. "A Hidden and Complex Heritag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s Women's Movement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5, no. 6, 561-567.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43.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71. "Durkheim's Polit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Review, n. s., 19, no. 4 (November) : 477-519.

Gignoux, C. -J. 1923. "L'Industrialisme de Saint-Simon à Walther Rathenau." *Revue d'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11, no. 2, 200-217.

Gille, Bertrand. 1959a. *La Banque et le crédit en France de 1815 à 1848*.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59b. *Recherches sur la formation de la grande entreprise capitaliste (1815-1848)*. Paris: S. E. V. P. E. N.

———. 1965.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Vol. 1, *Des origines à 1848*. Geneva: Droz.

———. 1967.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Vol. 2, *1848-1870*. Geneva: Droz.

———. 1970. *La Banqu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Geneva: Droz.

Gillis, John R. 1970. "Political Decay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789-1848." *World Politics* 22, no. 3 (April) : 344-370.

Gilroy, Paul. 2000. *Against Race: Imagining Political Culture beyond the Color Lin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 Press.

Girard, Louis. 1952. *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 1966. "Révolution ou conservatisme en Europe (1856) : Une Polémique de la presse parisienne après la guerre de Crimée." In *Mélanges Pierre Renouvin: Etudes d'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125-134.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77. “Caractères du Bonapartism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In *Le Bonapartisme, phénomène historique et mythe politique*, ed. K. Hammer and P. C. Hautmann, 22-28. Munich: Artemis Verlag.

Glaser, John F. 1958. “English Nonconformity and the Decline of Liber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no. 2 (January) : 352-363.

Glenn, Evelyn Nakano. 1992. “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Racial Division of Paid Reproductive Labor.” *Signs* 18, no. 1 (Autumn) : 1-43.

Godechot, Jacques. 1965. *Les Révolutions: 1770-1799*. 2nd ed.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71. “Nation, patrie, nationalisme et patriotism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3^e année, no. 206 (October-December) : 481-501.

Goldfrank, Walter L. 1972. “Reappraising Le Pla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ical Sociology: Studies in Continuity, Discontinu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ed. A. Oberschall, 130-151. New York: Harper & Row.

Goldman, Lawrence. 1986. “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1857-86: A Context for Mid-Victorian Liberalism.”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1, no. 398 (January) : 95-134.

———. 1987. “A Peculiarity of the English? 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Soci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Past and Present*, no. 114 (February) : 133-171.

———. 1998. “Excep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 no. 1 (March) : 1-36.

———. 2002. *Science, Refor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1857-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2005. “Victorian Social Science: From Singular to Plural.” In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Victorian Britain*, ed. M. Daunton, 87-114.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Goldstein, Jan. 1982. “The Hysteria Diagnosis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clericalism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4, no. 2 (June) : 209-239.

Goldstein, Leslie. 1980. “Mill, Marx, and Women’s Liber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 no. 3 (July) : 319-334.

———. 1982. “Early Feminist Themes in French Utopian Socialism: The St.-Simonians and Fouri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3, no. 1 (January-March) : 91-108.

Goliber, Sue Helder. 1982. “Marguerite Durand: A Study in French Femi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5, no. 5 (November-December) : 402-412.

Gonnet, Paul. 1955. “Esquisse de la crise économique en France de

1827 à 1832.”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33, no. 3, 249-292.

Gooch, Brison D. 1956. “A Century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2, no. 1 (October) : 33-58.

Goode, William J. 1960. “Encroachment, Charlatanism, and the Emerging Profession: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Medici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no. 6 (December) : 902-965.

Gordon, Ann D., ed. 1997. *Selected Papers of Elizabeth Cady Stanton and Susan B. Anthon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Gordon, Barry L. 1976. *Political Economy in Parliament, 1819-1823*. London: Macmillan.

———. 1979. *Economic Doctrine and Tory Liberalism, 1824-1830*. London: Macmillan.

Gordon, H. Scott. 1973. “Alfred Marsha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s a Science.” In *Foundations of Scientific Method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R. N. Giere and R. S. Westfall, 234-25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Gordon, Linda. 1991. “On ‘Difference,’ ” *Genders*, no. 10 (Spring) : 91-111.

Goriély, Benjamin. 1948a. “La Pologne en 1848.”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267-318. Paris: Éd. du Minuit.

———. 1948b. “La Russie de Nicolas 1er en 1848.”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355-393. Paris: Éd. du Minuit.

Gouges, Olympe de. N. d. *Les Droits de la Femme*. N. p.: A la Reine.

———. 1980.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In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795, Selected Documents*, ed. D. G. Levy et al., 87-113.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 1993. *Ecrits Politiques*. Paris: Côté Femmes.

Gough, Barry. 1990. “Pax Britannica, Peace, Force and World Power.” *Round Table*, no. 314, 167-188.

Gourevitch, Peter Alexis. 1977.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8, no. 2 (Autumn) : 281-313.

Granger, Gilles-Gaston. 1989. *La Mathématique sociale du Marquis de Condorcet*. Paris: Éd. Odile Jacob.

Gray, Robert Q. 1979. “The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Sociology* 9, no. 1 (January) : 101-104.

Greer, Donald M. 1925. *L'Angleterre, la France et la Révolution de 1848: La Troisième Ministère de Lord Palmerston au Foreign Office (1846-1851)*. Paris: F. Rieder.

Grew, Raymond. 1962. “How Success Spoiled the Risorgimento.”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4, no. 3 (September) : 239-253.

Griewank, Karl. 1954. *Der Wiener Kongress und die europäische Restauration, 1814/15*. 2nd rev. ed. Leipzig: Koehler & Amelany.

Griffith, Elisabeth. 1984. *In Her Own Right: The Life of Elizabeth Cady Stanto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Groh, Dieter. 1966. "The 'Unpatriotic' Socialists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 no. 4 (October) : 151-178.

———. 1973. *Negative Integration und Revolutionärer Attentismus: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am Vorabend der Ersten Weltkrieges*. Frankfurt am Main: Propyläen.

Gross, Leo. 1968.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648-1948."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ganization*, ed. R. A. Falk and W. F. Hanreider, 45-67.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Grossman, Henryk. 1943. "The Evolutionist Revolt against Classical Economics." 2 p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1, no. 5 (October) : 381-393; no. 6 (December) : 506-522.

Gruner, Wolf D. 1985. *Die Deutsche Frage: Ein Problem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seit 1800*. Munich: C. H. Beck.

———. 1992. "Was There a Reformed Balance of Power System or Cooperative Great Power Happening?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no. 3 (June) : 725-732.

Gueniffey, Patrice. 1988a. "Introduction au texte et notes." In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a Constitution*, by A. Barnave, 31-38 and notes passim. Grenoble: Presses Univ. de Grenoble.

———. 1988b. “Suffrage.” I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by F. Furet et al., 614-624. Paris: Flammarion.

Guérard, Albert. 1943. *Napoleon II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Guichen, Eugène, vicomte de. 1917. *La Révolution de juillet 1830 et l'Europe*. Paris: Émile-Paul Frères.

Guilbert, Madeleine. 1966. *Les Femmes et l'organisation syndicale avant 1914*. Paris: Éd. du CNRS.

Guillaumin, Colette. 1972. *L'Idéologie raciste: Genèse et langage actuel*. Paris: Mouton.

Guiral, Pierre, 1960. “Le libéralisme en France (1815-1970) : Thèmes, succès et lacunes.” In *Tendances politiques dans la vie française depuis 1789*, 17-40. Colloques,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Paris: Hachette.

Guizot, François. 1820a. *Du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du ministère actuel*. Paris: Chez Ladvocat.

———. 1820b. “Avant-propos de la troisième édition.” *Supplément aux deux premières éditions du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a Restauration et du Ministère actuel.”* Paris: Ladvocat.

———. 1846.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Didier.

Gunnell, John G. 2006.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Discipline, Professio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no. 4 (November) : 479-486.

Guyot, Raymond. 1901-1902. “La Dernière négociation de Talleyrand: L’Indépendance de la Belgique.” 2 pt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 (1901) : 573-594; 3 (1902) : 237-281.

———. 1926. *La Première entente cordiale*. Paris: F. Rieder.

Haag, Henri, 1960. “La Social-démocratie allemande e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n *Histoire contemporain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Stockholm, 21-28 Août 1960. Rapports* 5: 61-96.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

Hackett, Amy. 1972. “The German Women’s Movement and Suffrage, 1890-1914: A Study of National Feminism.” In *Modern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ed. R. J. Bezucha, 354-386. Lexington, MA: D. C. Heath.

Halévy, Elie. 1900. *La Révolution de la doctrine de l’utilité (1789-1815)* .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Paris: Félix Alcan.

———. 1901a. *La Jeunesse de Bentham*. Vol. 1 of *La Formation du radicalisme philosophique*. Paris: Félix Alcan.

———. 1901b. *L’Évolution de la doctrine utilitaire de 1789 à 1815*. Vol. 2 of *La Formation du radicalisme philosophique*. Paris: Félix Alcan.

———. 1904. *La formulation du radicalisme philosophique*, vol. 3. Paris: F. Alcan.

- . 1905. *L'Angleterre et son Empire*. Paris: Pages Libres.
- . 1930. *The World Crisis, 1914-1918: 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1935. "English Public Opin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Studies in Anglo-French History*, ed. A. Coville and H. Temperley, 51-60.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 . 1947. *The Age of Peel and Cobde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41-1852*. London: Ernest Benn.
- . 1948. *Histoire de socialisme européen*. Rédigée d'après des notes de cours par un groupe d'amis et d'élèves. Paris: Gallimard.
- . 1949. *England in 1815*. 2nd rev. ed. Vol. 1 of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Ernest Benn.
- . 1950. *The Triumph of Reform (1830-1841)*. 2nd rev. ed. Vol. 3 of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Ernest Benn.
- Hall, Alex. 1974. "By Other Means: The Legal Struggle against the SPD in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00." *Historical Journal* 17, no. 2 (June) : 365-386.
- Hall, Catherine. 1992a. "Competing Masculinities: Thomas Carlyle,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Case of the Governor Eyre." In *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 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255-295. New York: Routledge.

———. 1992b. “The Early Formation of Victorian Domestic Ideology.” In *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 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75-93. New York: Routledge.

———. 1992c.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wife.” In *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 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43-71. New York: Routledge.

Halpérin, Jean. 1848.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Suisse, prelude aux révolutions.”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1: 127-161. Paris: Éd. du Minuit.

Hammen, Oscar J. 1958. “1848 et le ‘Spectre du Communisme.’” *Le Contrat Social* 2, no. 4 (July) : 191-200.

Hammond, J. L. 1930.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Discont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 no. 2 (January) : 218-228.

Hammond, J. L., and M. R. D. Foot. 1952. *Gladstone and Liberalism*.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at Saint Paul’s House.

Hangland, Kjell. 1980. “An Outline of Norwegian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ed. R. Mitchison, 21-29. Edinburgh: John Donald.

Hansen, Alvin H. 1921. “Cycles of Strik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 no. 4 (December) : 616-621.

Hansen, Erik. 1977. “Workers and Socialists: Relations between the Dutch Trade-Union Movement and Social Democracy, 1894-1914.”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7, no. 2 (April) : 199-225.

Haraszti, Eva H. 1978. *Chartism*.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Hargreaves, E. L. 1930. *The National Debt*. London: Edward Arnold.

Harley, C. Knick. 1982.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1841: Evidence of Slower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no. 2 (June) : 267-289.

Harlow, Vincent T. 1953. *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1774-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rrison, Royden. 1960-1961.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and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868." 2 p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 no. 3 (1960) : 424-455; 6, no. 1 (1961) : 74-109.

Harsin, Paul. 1936. "La Révolution beige de 1830 et l'influence française." *Revu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53 (April-June) : 266-279.

Hart, Jennifer. 1965.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Reform: A Tory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31 (July) : 39-61.

———. 1974.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Reform: Tory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Essays in Social History*, ed. M. W. Flinn and T. C. Smout, 196-21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rtmann, Heidi. 1976.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Signs* 1, no. 3, pt. 2 (Spring) : 137-169.

Hartog, François. 1988. *Le XIX^e siècle et l'histoire: 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Hartwell, R. M. 1961. "The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in England, 1800-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3, no. 3 (April) : 397-416.

———. 1963.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6, no. 1 (August) : 135-146.

Hartz, Louis. 1948. *Economic Policy and Democratic Thought: Pennsylvania, 1774-18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Haskell, Thomas L. 1977.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of Authority*.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 1984. "Professionalism versus Capitalism: R. H. Tawney, Emile Durkheim, and C. S. Peirce on the Disinterestednes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Authority of Experts*, ed. T. L. Haskell, 180-22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Hasquin, Hervé. 1971. *Une mutation: Le "Pays de Charleroi"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ux origines de la Re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Belgique*. Brussels: Ed.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Haupt, Georges. 1965. *Le Congrès manqué: L'Internationale à la veill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François Maspéro.

———. 1972.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74. "Les Marxistes face à la question nationale: L'Histoire du

problème.” In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1848-1914*, by G. Haupt et al., 9-61. Paris: François Maspéro.

———. 1986.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871-1914: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Haupt, Georges, and Claudie Weill. 1974. “L’Eredità de Marx ed Engels e la questione nazionale.” *Studi Storici* 15, no. 2 (April-June) : 270-324.

Haupt, Georges, and Madeleine Rebérioux, dirs. 1967a.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et l’Orient*. Paris: Éd. Cujas.

———. 1967b. “L’International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In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et l’Orient*, ed. G. Haupt and M. Rebérioux, 17-48. Paris: Éd. Cujas.

Haupt, Georges, Michael Löwy, and Claudie Weill. 1974.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1848-1914*. Paris: François Maspéro.

Hause, Steven C., and Anne R. Kenney. 1981. “The Limits of Suffragist Behavior: Legalism and Militancy in France, 1876-192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 no. 4 (October) : 781-806.

———. 1984. *Women’s Suffrage and Social Politics in the French Third Republ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Hauser, Henri. 1901. “L’Entrée des Etats-Unis dans la politique ‘mondiale’ d’après un américain.”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6, 444-456.

———. 1903. *L'Enseignement des sciences sociales: Etat-actuel de cet enseignement dans les divers pays du monde*. Paris: Lib. Marescq Ainé.

———. 1905.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Paris: Pages Libres.

Hayek, Frederick A. von. 1941.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Economica*, n. s., 8 (February) : 9-36.

———. 1952.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Hazelkorn, Ellen. 1980. "Capital and the Irish Ques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44, no. 3 (Fall) : 326-356.

Heilbron, Johan. 1985. "Les Métamorphoses du durkheimisme, 1920-1940."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6, no. 2 (March-April) : 203-237.

Heinen, Jacqueline. 1978. "De la Ière à la IIIe Internationale, la question des femmes." *Critique communiste*, nos. 20/21, 109-179.

Heiniger, Ernstpeter. 1980. *Ideologie des Rassismus: Problemsicht und ethische Verurteilung in der kirchlichen Sozialverkündigung*.

Immensee, Switzerland: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Henderson, W. O. 1934. *The Lancashire Cotton Famine, 1861-1865*.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ess.

———. 1950. "Prince Smith and Free Trade in German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2, no. 3, 295-302.

———. 1954. *Britain and Industrial Europe, 1750-1870*. Liverpool: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 1976. *Studies in German Colonial History*. London: Frank Cass.

Hendricks, Margo, and Patricia Parker. 1994. Introduction to *Women, "Race," and Writing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d. M. Hendricks and P. Parker, 1-14. London: Routledge.

Henriques, Ursula. 1968. "How Cruel Was the Victorian Poor Law?" *Historical Journal* 11, no. 2, 365-371.

Hentschel, Volker. 1978.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und Interventionsstaat?* Stuttgart: Klein-Cotta.

——. 1981. "Produktion, Wachstum und Produktivität in England,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von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Statistische Grenzen und Nöte beim Internationaler wirtschaftshistorischen Vergleich."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68, no. 4, 457-510.

Herbst, Juergen. 1965.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Hericourt, Jenny P. d'. 1860. *La Femme affranchie: Réponse à MM. Michelet, Proudhon, E. de Girardin, A. Comte et aux autres novateurs modernes*. 2 vols. Brussels: A. LaCroix, van Meenen.

Hersh, Blanche Glassman. 1978. *The Slavery of Sex: Feminist-Abolitionists in America*.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Hertneck, Friedrich. 1927. *Die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in Zeitalter Bismarcks.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Hertz, Deborah. 1988. *Jewish High Society in Old Regime Berlin*.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Hervé, Florence. 1983. “‘Dem Reich der Freiheit werb’ich Bürgerinnen’: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Frauenbewegung, von den Anfängen bis 1889.” I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auenbewegung*, ed. F. Hervé, 12-40. Cologne: Pahl-Rugenstein.

Hexter, J. H. 1936. “The Protestant Revival and the Catholic Question in England, 1778-1829.”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 no. 3 (September) : 297-318.

Heywood, Colin. 1988. *Child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 Health and Education among the “Classes Popula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Heywood, Paul. 1990. *Marxism and the Failure of Organised Socialism in Spain, 1879-19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Higham, John. 1979. “The Matrix of Specializ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America, 1860-1920*, ed. A. Oleson and J. Voss, 3-18.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Higonnet, Patrick L. R., and Trevor B. Higonnet. 1967. “Class, Corrup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1846-1848.”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5, no. 2 (Autumn) : 204-224.

Hill, Christopher. 1958. “The Norman Yoke.” In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50-122. London: Secker & Warburg.

Hill, R. L. 1929. *Toryism and the People, 1832-1846*. London: Constable.

Hilton, Boyd. 1977. *Corn, Cash, Commerc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Tory Governments, 1815-1830*.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Hilts, Victor L. 1973. "Statistics and Social Science." In *Foundations of Scientific Metho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R. N. Giere and R. S. Westfall, 206-23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Himmelfarb, Gertrude. 1966. "The Politics of Democracy: The English Reform Act of 1867."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6, no. 1 (November) : 97-138.

Hinsley, Curtis M., Jr. 1981. *Savages and Scientists: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46-1910*.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Hinton, James. 1983. *Labour and Socialism: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867-1974*. Brighton, UK: Wheatsheaf Books.

Hoagland, Henry E. 1918. "Humanitarianism (1840-1860) ." In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J. R. Commons et al., 1: 485-623. New York: Macmillan.

Hoagwood, Terence Allen. 1996.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the Production of Romantic Texts*.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 Press.

Hobhouse, L. T. 1911. *Liberalism*.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Hobsbawm, Eric J. 1949. "General Labour Unions in Britain, 1889-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 nos. 2/3, 123-142.

———. 1952.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Some Social Movements since 18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5, no. 1, 1-25.

———. 1957. "The British Standard of Living, 1790-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0, no. 1 (August) : 46-68.

———. 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London: Abacus.

———. 1963.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6, no. 1 (August) : 119-134.

———. 1964.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1974. "La Diffusione del Marxismo (1890-1905) ." *Studi storici* 15, no. 2 (April-June) : 241-269.

———. 1975.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1978. "Sexe, symboles, vêtements et socialism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o. 23 (September) : 2-18.

———. 1979. "Soziale Ungleichheit und Klassenstrukturen in England: Die Arbeiterklasse." In *Klassen in der europäischen Sozialgeschichte*, ed. Hans-Ulrich Wehler, 53-65.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1983. “Mass 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 J. Hobsbawm and T. Ranger, 263-30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84a.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1870-1914.” In *Worlds of Labou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194-213.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1984b. “The ‘New Unionism’ in Perspective.” In *Worlds of Labou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152-175.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1984c. “Men and Women: Images on the Left.” In *Worlds of Labou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83-102.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1984d. “Der *New Unionism*: Eine comparative Betrachtung.” In *Auf dem Wege zur Massengewerkschaft*, ed. Wolfgang J. Mommsen and Hans-Gerhard Husung, 19-45. Stuttgart: Ernst Klett.

———. 1987.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 1988. “Working-Class Intern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Labour Movement, 1830-1940*, ed. F. van Holthoon and M. van den Linden, 1: 3-16. Leiden: E. J. Brill.

———.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Hobsbawm, Eric J., and Terence Ranger, eds. 1992.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Hodgson, Geoffrey M. 2005. "Alfred Marshall versus the Historical Schoo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32, no. 4, 331-348.

Hoffman, Ross J. S. 1933. *Great Britain and the German Trade Rivalry, 1875-1914*.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Hoffmann, Walther. 1949.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Great Britain: A Quantitative Stud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2, no. 2, 162-180.

Hofstadter, Richard. 1992.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

Hohenberg, Paul. 1972. "Change in Rural France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1830-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no. 1 (March) : 219-240.

Holland, Bernard. 1913. *Fall of Protection, 1840-1850*. London: Edward Arnold.

Hollinger, David A. 1984. "Inquiry and Uplift: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Academics and the Moral Efficac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In *The Authority of Expert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 T. L. Haskell, 142-15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Hollis, Patricia. 1980. "Anti-Slavery and British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in the Years of Reform." In *Anti-Slavery, Religion and Reform: Essays in Memory of Roger Anstey*, ed. C. Bolt and S. Drescher, 294-315. Folkestone, UK: Dawson; Hamden, CT: Archon.

Holmes, Stephen. 1984. *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Hone, J. Ann. 1982. *For the Cause of Truth: Radicalism in London, 1796-182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oneycutt, Karen. 1979. "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Imperial Germany." *Signs* 5, no. 1 (Autumn) : 30-41.

———. 1981. "Clara Zetkin: A Socialis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Women's Oppression." In *European Women on the Left: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Political Women, 1880 to the Present*, ed. Jane Slaughter and Robert Kern, 29-49.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hooks, bell. 1988.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Horn, Norbert, and Jürgen Kocka, eds. 1979. *Recht und Entwicklung der Grossunternehmen im 19. und früher 20. Jahrhundert: Wirtschafts-, sozial-und rechts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Industri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England und den US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Horsefield, J. K. 1949. "The Bankers and the Bullionists in 181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7, no. 5 (October) : 442-448.

Horvath-Peterson, Sandra. 1984. *Victor Duruy and French Education: Liberal Reform in the Second Empir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

Houssaye, Henri. 1901. "Allocution." In *Annal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vol. 1, *Histoire générale et diplomatique*, 5-8.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aris, 1900. Paris: Lib. Armand Colin.

Howkins, Alun. 1977. "Edwardian Liberalism and Industrial Unrest: A Class View of the Decline of Liberalism."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4 (Autumn) : 143-161.

Hoxie, R. Gordon. 1955. *A History of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Hroch, Miroslav. 1968. *Die Vorkämpfer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bei den kleinen Völkern Europas*. Prague: Univ. Karlova.

Hufton, Olwen. 1971. "Women in Revolution, 1789-1796." *Past and Present*, no. 53 (November) : 90-108.

Hughes, H. Stuart. 1958.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New York: Knopf.

Humphreys, R. A. 1965. "British Merchants and South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51: 151-174.

Humphries, Jane. 1977.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 no. 3 (September) : 241-258.

Huskisson, William. 1825. "Substance of Two Speeches Delivered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21st and 25th March, 1825...." *Edinburgh Review* 42, no. 84 (August) : 271-303.

Hyman, Richard. 1984. "Massenorganisation und Basismilitanz in

Großbritannien 1888-1914.” In *Auf dem Wege zur Massengewerkschaft*, ed. Wolfgang J. Mommsen and Hans-Gerhard Husung, 311-331. Stuttgart: Ernst Klett.

Iggers, Georg G. 1958a. *The Cult of Authorit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Saint-Simonians. A Chapter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talitarianis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58b. *The Doctrine of Saint-Simon, An Exposition, First Year, 1828-1829*. Trans.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Georg G. Iggers. Boston: Beacon Press.

———. 1962.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2, no. 1, 17-40.

———. 1970. “Le Saint-Simonisme et la pensée autoritaire.”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4, no. 4 (April) : 673-691.

———. 1983.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Rev. ed. Middleton, CT: Wesleyan Univ. Press.

Ignatiev, Noel. 1995.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New York: Routledge.

Iliasu, A. A. 1971. “The Cobden-Chevalier Commercial Treaty of 1860.” *Historical Journal* 14, no. 1 (March) : 67-98.

Imlah, Albert H. 1948. “Real Values in British Foreign Trade, 1798-185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 no. 2 (November) : 132-152.

———. 1949. “The Fall of Protection in Britain.” In *Essays i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onor of George Hubbard Blakeslee*, ed. Dwight Erwin Lee, 306-320. Worcester, MA: Clark Univ. Publications.

———. 1950. “The Terms of Trad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98-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0, no. 2 (November) : 170-194.

———. 1952. “British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Export of Capital, 1816-191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5, no. 2, 208-239.

———. 1958. *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 Studies in British Foreign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Ivray, Jehan d'. 1928. *L'Aventure saint-simonienne et les femmes*. Paris: Félix Alcan.

Jacobitti, Edmund K. E. 1981. *Revolutionary Humanism and Historicism in Modern Italy*.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Jacquemyns, Guillaume. 1934. “Les Réactions contre l'individualisme de 1789 à 1848.” *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39, no. 4 (May-July) : 421-437.

Jacquey, Marie-Clotilde. 1988. *Images de Noir dans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Vol. 1, *Du Moyen-Age à la conquête colonial*. Cultures Sud/Notre Librairi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Janes, R. M. 1978. “On the Reception of Mary Wollstonecraft's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9, no. 2 (April-June) : 293-302.

Janowitz, Morris. 1972.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ology." In *Varieties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Sociology*, ed. R. K. Merton, 105-135.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Jardin, André, and André-Jean Tudesq. 1973. *Le France des notables*. 2 vols.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6 and 7. Paris: Éd. du Seuil.

Jaures, Jean. 1903. "La Doctrine saint-simonienne et le socialisme." *Revue socialiste* 38 (July-December) : 129-149.

———. 1968. *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Éd. Sociales.

Jayawardena, Kumari. 1986.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Rev. ed. New Delhi: Kali for Women; London: Zed.

Jelarich, Barbara. 1976. "The Balkan Nations and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In *Hellenism and the First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 N. P. Diamandouros, 157-169. Thessalonica: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Jenks, Leland H. 1927. *The 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 New York: Knopf.

Jennings, Louis J., ed. 1884. *The Correspondence and Diaries of the Late Right Honorable John Wilson Croker, LL. D., F. R. S.* 3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Jeremy, David J. 1977. "Damming the Flood: British Government Efforts to Check Outflow of Technicians and Machinery, 1780-1843."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1, no. 1 (Spring) : 1-34.

Jervis, Robert. 1992. "A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Concer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no. 3 (June) : 716-724.

Johnson, Christopher H. 1966. "Etienne Cabet and the Problem of Class Antago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1, no. 3, 403-443.

———. 1971. "Commun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before Marx: The Icarian Exper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no. 3 (June) : 642-689.

———. 1974.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 Cabet and the Icarians, 1839-1851*.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 1975. "The Revolution of 1830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In *1830 in France*, ed. J. M. Merriman, 139-189.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 1983. "Response to J. Rancière, 'Le Mythe de l'Artisa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24 (Fall) : 21-25.

Johnson, Richard. 1970. "Educational Policy and Social Control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 49 (November) : 96-119.

Johnston, Hugh J. M. 1972. *British Emigration Policy, 1815-30: "Shovelling Out Paup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Joll, James, ed. 1950. *Britain and Europe: Pitt to Churchill, 1793-1940*. London: Nicholas Kaye.

Jones, Charles. 1980. "Business Imperialism and Argentina, 1875-1900: A Theoretical Not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2, no. 2 (November) : 437-444.

Jones, D. Caradog. 1941.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Survey in England since Boo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 no. 6 (May) : 818-825.

Jones, Gareth Stedman. 1971.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77. "Society and Poli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 no. 1 (March) : 77-92.

———. 1983.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84. "Some Notes on Karl Marx and the English Labour Movement."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18 (Autumn) : 124-137.

Jones, Kathleen, and Françoise Vergès. 1991. "Women of the Paris Commun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4, no. 5, 491-503.

Jones, Robert Alan, and Robert M. Anservitz. 1975. "Saint-Simon and Saint-Simonism: A Weberian 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 no. 5 (March) : 1095-1123.

Jordan, Constance. 1990. *Renaissance Feminism: Literary Texts and Political Models*.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Jordan, Winthrop D. 1968.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Jore, Léonce. 1959. *L'Océan pacifique au temps de la Restauration et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1815-1848*. 2 vols. Paris: Éd. Besson & Chantemerle.

Jorland, Gérard. 2000. "L'Orient et le mythe du peuple primitif." In *Sciences, mythes et religions en Europe, Royaumont, 14-15 octobre 1997*, ed. D. Lecourt, 67-90. Luxembourg: European Communities.

Judt, Tony. 1986. *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ur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98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Juglar, Clément. 1862. *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de leur retour périodique en France, en Angleterre et aux Etats-Unis*. Paris: Guillaumin.

Julien, Charles-André. 1981. Preface to *Toussaint Louvertu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by Aimé Césaire, 7-19.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Kadish, Alon. 1982. *The Oxford Economis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alaora, Bernard, and Antoine Savoye. 1989. *Les Inventeurs oubliés*. Seyssel, France: Champ Vallon.

Kaplan, Marion A. 1979. *The Jewish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The Campaigns of the Jüdischer Frauenbund, 1904-1938*.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Kaplan, Steven L. 1979. "Réflexions sur la police du monde du

travail, 1700-1818.” *Revue historique*, 103e année, CCLXI, 1, no. 529 (January-March) : 17-77.

———. 1993. *Adieu 89*. Paris: Fayard.

Karady, Victor. 1976. “Durkheim, les sciences sociales et l’Université, bilan d’un demi-échéec.”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7, no. 2 (April-June) : 267-312.

Karlsson, Gunnar. 1980. “Icelandic Nationalism and the Inspiration of History.” In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ed. R. Mitchison, 77-89. Edinburgh: John Donald.

Kasler, Dirk. 1984. *Die Frühe deutsche Sociologie 1909 bis 1934, und ihre Entstehungs-Milieus*. Opladen, Germany: Westdeutscher Verlag.

Katznelson, Ira. 1985. “Working-Class Formation and the State: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 P. B. Evans et al., 257-2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Kealey, Gregory S. 1980. *Toronto Workers Respond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1867-1892*.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Kedourie, Elie. 1985. *Nationalism*. 3rd ed. London: Hutchison.

Kehr, Eckart. 1965. “Englandhass und Weltpolitik.” In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preuss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s*, 149-17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Kelly, Gary. 1993. *Women, Writing, and Revolution, 1790-182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elly, Joan. 1982. "Early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Querelle des Femmes*, 1400-1789." *Signs* 8, no. 1 (Autumn) : 4-28.

———. 1984.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 In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 19-50.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Kemp, Betty. 1962. "Reflections on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Victorian Studies* 5, no. 3 (March) : 189-204.

Kemp, Tom. 1971. *Economic Forces in French History*. London: Dennis Dobson.

Kennedy, Marie, and Chris Tilly. 1985. "At Arm's Length: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Europe, 1890-1920." *Radical America* 19, no. 4, 35-51.

———. 1987.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Stillbirth of Socialist Feminism in Europe, 1890-1920." *Science and Society* 51, no. 1, 6-42.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Keylor, William R. 1975.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Keynes, John Maynard. 1926.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London:

Hogarth Press.

Kiernan, Victor. 1967. "Marx and India."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7, 159-189. London: Merlin Press.

Kilmuir, Lord. 1960. "The Shaftesbury Tradition in Conserva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October) : 70-74.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51. "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9, no. 1 (February) : 30-46.

———. 1961a. *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1851-19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 1961b.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Lessons from Britain and France, 1850 to 191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4, no. 2 (December) : 289-305.

———. 1975.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 1820-187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no. 1 (March) : 20-55.

———. 1984.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no. 2 (April) : 103-124.

Kintzler, Catherine. 1987. *Condorcet: 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la naissance du citoyen*. Paris: Gallimard.

Kissinger, Henry A. 1973. *A World Restored*.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Kitson Clark, G. 1951a. "The Electorate and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1: 109-126.

———. 1951b.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ort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4, no. 1, 1-13.

———. 1962.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 1967. *An Expanding Society: Britain, 1830-1900*.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Klein, Ira. 1971. “English Free Traders and Indian Tariffs, 1874-1896.” *Modern Asian Studies* 5, no. 3 (July) : 251-271.

———. 1980. “Prospero’s Magic: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Iran, 1909-1911.”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4, no. 1, 47-71.

Kleinau, Elke. 1987. *Die Freie Frau: Soziale Utopien des frühen 19. Jahrhunderts*. Düsseldorf: Schwan.

Klejman, Laurence, and Florence Rochefort. 1989. *Légalité en marche: Le Féminism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Klima, Arnost. 1948.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n Bohème.”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205-237. Paris: Éd. du Minuit.

Klinge, Matti. 1980. “‘Let Us Be Finns’: The Birth of Finland’s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ed. R. Mitchison, 67-75. Edinburgh: John Donald.

Knibiehler, Yvonne. 1976. “Les médecins et la ‘nature féminine’ au

temps du Code Civil.” *Annales E. S. C.* 31, no. 4 (July-August) : 824-845.

Knibiehler, Yvonne, and Catherine Fouquet. 1983. *La femme et les médecins*. Paris: Hachette.

Knight, David. 1984. *The Age of Science: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0. “Romanticism and the Sciences.” In *Romanticism and the Sciences*, ed. A. Cunningham and N. Jardine, 13-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Kocka, Jürgen. 1980. “Th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 mouvement social*, no. 111 (April-June) : 97-117.

———. 1984. “Craft Traditions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The Power of the Past: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ed. Pat Thane et al., 95-1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86. “Problems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The Early Years, 1800-1875.”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279-35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88.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3, no. 1 (January) : 3-16.

———. 1995. “The Middle Classes in Europ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7 (December) : 783-806.

Kocka, Jürgen, and Heinz-Gerhard Haupt. 1996. “Vecchie e nuove classi nell’Europa del XI X secolo.” In *L’Età contemporanea, Secoli XI X - X X*, ed. P. Bairoch and E. J. Hobsbawm, 675-751. Vol. 5 of *Storia d’Europa*. Turin: Einaudi.

Koerner, Konrad. 1982. “Observations on the Sources: Transmission and Meaning of ‘Indo-European’ and Related Ter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In *Papers from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J. P. Maher et al., 153-18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Kohlstedt, Sally Gregory. 1976.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848-1860*.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Kohlstedt, Sally Gregory, Michael M. Sokal, and Bruce V. Lewenstein. 1999.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ce in America: 150 Year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Kohn, Hans. 1946.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3d printing, with addi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 1956.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Macmillan.

———. 1965.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Grands Thèmes.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1: 191-240. Horn/Vienna: F. Berger & Söhne.

Kolakowski, Leszek. 1978.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ollontai, Alexandra. 1971.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Woman Question."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Alexandra Kollontai*, 58-73.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ies by Alix Holt. London: Allison & Busby.

Koonz, Claudia. 1987.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Koyré, Alexandre. 1946. "Louis de Bonal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7, no. 1 (January) : 56-73.

Kraditor, Aileen S. 1965.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 ed. 1968. *Up from the Pedestal: Selected Writing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eminism*.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

Kraehe, Enno E. 1992. "A Bipolar Balance of Pow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no. 3 (June) : 707-715.

Kriegel, Annie. 1979.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1864-1876)." In *Des Origines à 1875*, ed. J. Droz, 603-634. Vol. 1 of *Histoire générale du socialisme*. Paris: Univ. de France.

Kriegel, Annie, and Jean-Jacques Becker. 1964. 1914: *La guerre et le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Krug, Charles. 1899. *Le Féminisme et le droit civil français*. Nancy: Imp. Nancéienne.

Krüger, Dieter. 1987. "Max Weber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the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In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ed. W. J. Mommsen and J. Oberhammer, 71-87. London: Unwin Hyman.

Kuczynski, Jürgen. 1975. *Studi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Berlin: Akademie-Verlag.

Kuhn, Thomas. 1976. "Mathematical vs. Experimental Trad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Scie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7, no. 1 (Summer) : 1-31.

Kukiel, Marian. 1953. "La Révolution de 1830 et la Pologne."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 n. s., 3, no. 11 (July-September) : 235-248.

Kulstein, David I . 1962. "The Attitude of French Workers towards the Second Empir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 no. 3 (Spring) : 356-375.

———. 1964. "Bonapartist Workers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9: 226-234.

———. 1969. *Napoleon III and the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Government Propaganda under the Second Empire*. N. p.: A Publication of the California State Colleges.

Kumar, Krishan. 1983. "Class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4, no. 1, 3-43.

Labrousse, Ernest. 1948. "Les Deux révolutions de 1848." *Revue socialiste*, n. s., nos. 17-18 (January-February) : 1-6.

———. 1949a. "1848-1830-1789: Comment naissent les revolutions." In *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1-20.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49b. *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l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Les Cours de la Sorbonne.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 1952. *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théories social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Les Cours de la Sorbonne.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 1954. *Aspects de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et du Royaume-Uni de 1815 à 1880*. 3 vols.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 ed. 1956a. *Aspects de la crise et de la dépressio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1846-1851*. 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19. La Roche-sur-Yon: Impr. Centrale de l'Ouest.

———. 1956b. "Panoramas de la crise." In *Aspects de la crise et de la dépressio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1846-1851*, ed. E. Labrousse, iii- x x iv. 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vol. 19. La Roche-sur-Yon: Impr. Centrale de l'Ouest.

———. 1976. "A Livre ouvert sur les élans et les vicissitudes des

croissances.”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ome 3,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1789-années 1880)* , 2: 859-1024.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Lacour, Leopold. 1900. *Les Origines du féminisme contemporaine. Trois femmes et la Révolution: Olympe de Gouges, Théoigne de Mericourt, Rose Lacombe*. Paris: Plon-Nourrit.

Lacroix, Bernard. 1981. *Durkheim et la politiqu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Laidler, David. 1987. “Bullionist Controversy.”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 J. Eatwell et al. London: Macmillan.

Lambi, Ivo Nikolai. 1963.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Germany, 1868-1879*.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e no. 44. Wei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Landauer, Carl. 1961. “The Guesdists and the Small Farmer: Early Erosion of French Marx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6, pt. 2, 212-225.

Landes, David S. 1949. “Frenc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 Grow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9, no. 1 (May) : 45-61.

———. 1956. “Vieille banque et banque nouvelle: La révolution financière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 204-222.

Landes, Joan B. 1981. "Femi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s." *Telos*, no. 49 (Fall) : 117-126.

———. 1988.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Lange, David. 1977. "London in the Year of Revolutions, 1848." In *London in the Age of Reform*, ed. J. Stevenson, 177-211.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angewiesche, Dieter. 1987. "The Impact of the German Labor Movement on Workers' Cultu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9, no. 3 (September) : 506-523.

———. 1993. "Liberalism and the Middle Classes in Europe." In *Bourgeois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 J. Kocka and A. Mitchell, 40-69. Oxford: Berg.

Lasch, Christopher. 1958. "The Anti-Imperialist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Inequality of Ma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4, no. 3 (August) : 319-331.

Laslett, John H. M. 1964. "Reflection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ism in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50, no. 4 (March) : 634-651.

———. 1974. "Comment[on Daniel Bell]." In *Failure of a Drea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 ed. J. H. M. Laslett and S. M. Lipset, 112-123. Garden City, NY: Anchor/Doubleday.

Lasserre, Adrien. 1906. *La Participation collective des femmes à la*

Révolution: Les antécédents du féminisme. Paris: Félix Alcan.

Lazarsfeld, Paul F. 1961.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Quantification in Sociology: Trends, Sources, and Problems." *ISIS* 52, pt. 2, no. 168 (June) : 277-331.

Le Bon, Gustave. 1978[1894].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Paris: Les Amis de Gustave Le Bon.

Lebrun, Pierre. 1948. *L'industrie de la laine à Verviers pendant le XVIIIe et le début du XIXe siècle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fasc. 114. Liège.

———. 1961. "La rivoluzione industriale in Belgio: Strutturazione e destrutturazione delle economie regionali." *Studi storici* 2, nos. 3/4: 548-658.

Leclercq, Yves. 1991. "Les Débats d'orientation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1815-1850) ." *Cahiers de l'I. S. E. A., Series AF: Historie quantitativ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no. 4 (July) : 91-119.

Le Cour Grandmaison, Olivier. 1987. "La Citoyenneté à l'époque de la Constituant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s. 269-270 (July-December) : 248-265.

Lecuyer, Bernard-Pierre. 1983. "Les Statistiques démographiques et sociales et les statisticiens durant la Restauration." In *Sciences, médecines et technologies sous la Restauration.* Paris: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 1988. Preface to *Législation primitive considérée par la raison*, by L. de Bonald, i -vi. Paris: Jean-Michel Place.

Ledru-Rollin, A. -A. 1850. *De la décadence de l'Angleterre*. 2 vols. Paris: Escudier Frères.

Lee, Dwight E., and Robert N. Beck. 1954. "The Meaning of Historic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9, no. 3 (April) : 568-577.

Lee, Richard E.,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coord. 2004. *Overcoming the Two Cultures: Science versus the Humanities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Boulder, CO: Paradigm.

Lee, W. R., and Eve Rosenhaft, eds. 1997. *State,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94*. Updated and rev. 2nd ed. Oxford: Berg.

Lefkowitz, Mary R. 1996. "Ancient History, Modern Myths." In *Black Athena Revisited*, ed. M. R. Lefkowitz and G. M. Rogers, 5-23.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997. *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 Rev.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Lefrane, Georges. 1930. "The French Railroads, 1823-1842."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2, no. 2 (February) : 299-331.

Lehning, Arthur. 1938.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1855-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Prelimin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eiden: E. J. Brill.

———. 1970. *From Buonarroti to Bakuni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Leiden: E. J. Brill.

Lemoine, Robert J. 1932. "Les Étrangers et la formation du capitalisme en Belgiqu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20, no. 3, 252-336.

Lentini, Orlando, ed. 1981. *La Sociologia italiana nell'età del positivismo*. Bologna: Il Mulino.

Léon, Pierre. 1960. "L'industrialisation en France en tant que facteur de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u début du X^X 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In *Premièr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économique*, 165-204.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Leon, Pierre, François Crouzet, and Richard Gascon, eds. 1972. *L'Industrialisation en Europe au XI^X e siècle, Cartographie et typolog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u C. N. R. S., Lyon, 7-10 Octobre, 1970*. Paris: Éd. du C. N. R. S.

Leopold, Joan. 1970. "The Aryan Theory of Race in India, 1870-1920: Nationalist and Internationalist Visions."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7, no. 2 (June) : 271-297.

———. 1974. "British Applications of the Aryan Theory of Race to India, 1850-1870."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9, no. 352, 578-603.

Lepenies, Wolf. 1989.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The Rise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Originally published as *Die Drei Kulturen*.]

Lerner, Gerda. 1993. *The Creation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ighteen-sevent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Leslie, R. F. 1952. "Polish Political Divis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surrection of November 1830.” *Slavonic Review* 31, no. 76 (December) : 113-132.

———. 1956. *Polish Politics and the Revolution of November 1830*. London: Athlone Press.

Leuilliot, Paul. 1953. “Notes et remarques s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sous la Restauration.” *Revue de synthèse*, n. s., 33 (74, sér. gén.) (July-December) : 149-172.

Le Van-Mesle, Lucette. 1980. “La Promotion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France au XI^e siècle, jusqu’à son introduction dans les facultés (1815-1881)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7 (April-June) : 270-294.

Levasseur, Emile. 1903-1904.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 2nd ed. entièrement refondue. 3 vols. Paris: A. Rousseau.

Levy, Darline Gay, et al., eds. 1979.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795: Selected Documents*.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Lévy-Leboyer, Maurice. 1964. *Les Banques européennes et l’industrialisation international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68a.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n France au XI^e siècle: Résultats préliminaires.” *Annales E. S. C.* 23, no. 4 (July-August) : 788-807.

———. 1968b. “Le Processus d’industrialisation: Le Cas de l’Angleterre

et la France.” *Revue historique*, 92e année, CC X X XI X (April-June) : 281-298.

———. 1970. “L’Héritage de Simiand: Prix, profit et termes d’échange au XI X 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94e année, no. 243 (January—March) : 77-120.

———. 1971. “La Décélératio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 X 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49, no. 4, 485-507.

Lévy-Leboyer, Maurice, and François Bourguignon. 1985. *L’Economie française au XI X e siècle: Analyse macro-économique*. Paris: Economica.

Lewis, Gordon K. 1978. *Slavery, Imperialism, and Freedom: Studies in English Radical Though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83. *Main Currents in Caribbean Thought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aribbean Society in Its Ideological Aspects, 1492-19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Lewis, Jane. 1984. *Women in England 1870-1950: Sexual Divisions and Social Change*. Brighton, UK: Wheatsheaf Books.

———, ed. 1987. *Before the Vote Was Won: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Women’s Suffr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ewis, W. A. 1957.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Manufactur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7, no. 2, 578-587.

Lhomme, Jean. 1960. *La Grande bourgeoisie au pouvoir (1830-1880)*.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Lichtheim, George. 1969. *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iddington, Jill, and Jill Norris. 1984. *One Hand Tied Behind Us: The Rise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Reprinted and corrected ed. London: Virago.

Lidtke, Vernon. 1980.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3, no. 4 (December) : 393-400.

Lincoln, Andrew. 1980. "Through the Undergrowth: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Social Formation in 19th Century France." In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ed. R. Samuel, 255-267.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ndenlaub, Dieter. 1967. *Richtungskämpfe im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Vierteljahresscha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 no. 53.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Lindholm, Marika. 1991. "Swedish Feminism, 1835-1945: A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4, no. 2 (June) : 121-142.

Linebaugh, Peter, and Marcus Rediker. 1990. "The Many 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and the Atlantic Working Cla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 no. 3 (September) : 225-522.,

Lipset, S. M. 1983. "Radicalism or Reformism: The Source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no. 1 (March) : 1-18.

Lis, Catharine, and Hugo Soly. 1977. "Food Consumption in Antwerp between 1807 and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eba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ol. 30, no. 3: 460-486.

Lisanti, Nicola. 1979. "La Nascità del movimento operaio, 1815-1860." In *Dall'Età preindustriale alla fine dell'Ottocento*, ed. A. Agosti and G. M. Bravo, 219-267. Vol. 1 of *Storia del movimento operaio, del socialismo e delle lotte sociale in Piemonte*. Bari: De Donato.

Lissagaray, Prosper-Olivier. 1976.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Paris: La Découverte.

Lladonosa, Manuel, and Joaquím Ferrer. 1977. "Nacionalisme català i reformisme social en els treballadors mercantila a Barcelona entre 1903 i 1939. E l C. A. D. C. I." In *Teoría y práctica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España, 1900-1936*, ed. A. Balcells, 281-329. Valencia: Fernando Torres, Ed.

Locke, John. 1965[1689].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Mentor.

Logue, William. 1979. "Sociologie et politique: Le Libéralisme de Célestin Bouglé."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 no. 1 (January-March) : 141-161.

———. 1983. *From Philosophy to Sociology: The Evolution of French Liberalism, 1870-1914*.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 Press.

Longuet, Jean. 1913.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 Paris: A. Quillet.

Lora, Guillermo. 1990. *A History of the Bolivian Labour Movement, 1848-197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Lorimer, Douglas A. 1978. *Colour, Class, and the Victorians: English Attitudes to the Negro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Leicester, UK: Leicester Univ. Press.

———. 1990. "Nature, Racism, and Late Victorian Sci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25, no. 3 (December) : 369-385.

Lorwin, Val. 1958. "Working-Class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no. 2 (January) : 338-351.

Louis, Paul. 1905. *Le Colonialisme*. Bibliothèque Socialiste, no. 36. Paris: Société Nouvelle de Librairie et d'Édition.

Lovett, Clara M. 1982.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Italy, 1830-187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Lowi, Theodore J. 1985. Foreword to *Disenchanted Realists,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American Crisis, 1884-1984*, by R. Seidelman, vii- x vii. Albany: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Löwy, Michael. 1974. "Le Problème de l'histoire (remarques de théorie et de méthode)." In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1848-1914*, by G. Haupt et al., 370-391. Paris: Maspéro.

Lukes, Steven. 1973. *Individu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utfalla, Michel. 1972. "Aux Origines du libéralisme économique en France, Le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Analyse du contenu de la première série, 1841-1853."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50, no. 4, 494-517.

Luzzatto, Gino. 1948. "Aspects sociaux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n Italie." *Revue socialiste*, n. s., nos. 17-18 (January-February) : 80-86.

Lyon, Peyton V. 1961. "Saint-Simon and the Origins of Scientism and Historicism."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7, no. 1 (February) : 55-63.

Lytle, Scott H. 1955. "The Second Sex (September, 1793)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7, no. 1 (March) : 14-26.

Lyttleton, Adrian. 1993.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Italy." I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 ed. M. Teich and R. Porter, 63-1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MacCoby, S., ed. 1952. *The English Radical Tradition, 1763-1914*. London: Nicholas Kaye.

MacDonagh, Oliver. 1958.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 Reappraisal." *Historical Journal* 1, no. 1, 52-67.

———. 1962. "The Anti-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s., 14, no. 3 (April) : 489-501.

———. 1981. "Ambiguity in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Ireland."

Historical Studies 19, no. 76 (April) : 337-352.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ehl, William. 1952. "The Triumph of Nationalism in the German Socialist Party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4, no. 1 (March) : 15-41.

Magraw, Roger. 1985. *France, 1815-1914: The Bourgeois Century*. Fontan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Fontana Press/Collins.

Maier, Charles S. 1992. "Democracy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0 b. c. to a. d. 1993*, ed. John Dunn, 125-153.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Malefakis, Edward. 1977. "Un Análisis comparativo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España e Italia." In *Teoría y práctica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España, 1900-1936*, ed. A. Balcells, 95-111. Valencia: Fernando Torres, Éd.

Maloney, John. 1985. *Marshall, Orthodoxy and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Manacorda, Gaston. 1981. Remarks in *Jaurès et la classe ouvrière*, 184-186. Collection mouvement social. Paris: Ed. Ouvrières.

Mann, Michael. 1970.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no. 3 (June) : 423-431.

Manning, D. J. 1976. *Liberalism*. London: J. M. Dent & Sons.

Manuel, Frank E. 1956. *The New World of Henri Saint-Sim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74. "Marxism and Feminism." *Women's Studies*
2, no. 3, 279-288.

Marczewski, Jean. 1961. "Y a-t-il eu un 'take off' en France? "
Cahiers de l'I. S. E. A., Series AD: Évolution des techniques et progrès de
l'économie, no. 1 (February) : 69-94.

———. 1963. "The Take-Off Hypothesis and French Experience." In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ed. W. W. Rostow, 119-
138. London: Macmillan.

———. 1965. "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13 (comparaison avec la Grande-Bretagne) ." *Cahiers de l'I. S. E. A.*,
Series AF: Histoire quantitativ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no. 4 (July) :
vii-cliv.

———. 1987. "Préface" to "Le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1982, " by Jean-Claude Toutain. *Cahiers de l'I. S. M. E. A.*, Series AF:
Histoire quantitativ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no. 15 (May) : 3-48.

Marichal, Juan. 1955. "España y las raíces semánticas del liberalisme."
Cuadernos, no. 11 (March-April) : 53-60.

———. 1956. "The French Revolution Background in the Spanish
Semantic Change of 'Liberal.'"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Yearbook
1955*, 291-293.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Markovitch, Timohir J. 1965. "La crise de 1847-1848 dans les

industries parisiennes.”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43, no. 2, 256-260.

———. 1966.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64: Conclusions générales.” *Cahiers de l’I. S. E. A*, Series AF: Histoire quantitativ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no. 7 (November) .

———. 1967. “Le revenu industriel et artisanal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et le Second Empire.” *Cahiers de l’I. S. E. A*, Series AF: Histoire quantitativ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no. 8 (April) .

Marks, Harry J. 1939. “The Sources of Reformism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1890-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1, no. 3 (September) : 334-356.

Marriott, Sir J. A. R. 1918. *The Eastern Ques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in European Diplomacy*.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rus, Michael R. 1972. “French Jews, the Dreyfus Affair, and the Crisis of French Society.” In *Modern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ed. R. J. Bezucha, 335-353. Lexington, MA: D. C. Heath.

Marshall, Alfred. 1892. “Reply”[to “The Perversion of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Journal* 2, no. 3 (September) : 507-519.

———. 1921. *Industry and Trade*. London: Macmillan.

Marshall, Susan E. 1986. “In Defense of Separate Spheres: Class and Status Politics in the Antisuffrage Movement.” *Social Forces* 65, no. 2 (December) : 327-351.

Martin, Gaston. 1948.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27 avril 1848)* .
Collection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Martin, Kingsley. 1963.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Rev. ed.
London: Hutchison.

Martin, Wendy. 1972. *The American Sisterhood: Writings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6.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Marx and Engels, 1845-
1848*, 477-51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son, E. S. 1931. "Saint-Simonism and the Rationalisation of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5 (August) : 640-683.

Mastellone, Salvo. 1957. *La Politica estera del Guizot (1840-1847)* .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Masure, Auguste. 1892-1893. "La Reconnaissanc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2 pts. *Annales de l'École Libre de Sciences Politiques* 7 (October
1892) : 696-721; 8 (January 1893) : 72-117.

Mathias, Eric. 1971. "The Social Democratic Working-Class
Movement and the German National State Up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 In
*Mouvements nationaux d'indépendance et classes populaires aux XI^e et
X^e siècles en Occident et en Orient*, 1: 175-183. Paris: Lib. Armand
Colin.

Matoré, Georges. 1967. *Le Vocabulaire et la société sous Louis-Philippe*. 2nd ed. Geneva: Slatkine Reprints.

Matthew, H. C. G. 1973. *The Liberal Imperialists: The Ideas and Politics of a Post-Gladstonian Elite*.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 1979. “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Policy of Mid-Victorian Budgets.” *Historical Journal* 22, no. 3 (September) : 615-643.

Mawet, Francine. 2000. “Inde, réponses ou questions? ” In *Modèles linguistiques et idéologies, “Indo-Européen, ”* ed. S. Vanséveren, 61-84. Brussels: Éd. Ousia.

May, Arthur J. 1948. “L’Amérique et les révolutions du milieu du siècle dernier.”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395-434. Paris: Éd. du Minuit.7

May, Martha. 1982.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the Family Wage: The Ford Motor Company and the Five Dollar Day.” *Feminist Studies* 8, no. 2 (Summer) : 399-424.

Mayer, Arno J. 1969. “Internal Courses and Purposes of War, 1870-1956: A Research Assign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1, no. 3 (September) : 291-303.

———.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 New York: Pantheon.

McBride, Theresa M. 1976. *The Domestic Revolu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Household Science in England and France, 1820-1920*. London: Croom Helm.

McCalman, Iain. 1986. "Anti-slavery and Ultra Radicalis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Case of Robert Wedderburn." *Slavery and Abolition* 7, no. 2 (September) : 99-117.

McClelland, Charles E. 1980. *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McCloskey, Donald N. 1971.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Coal and Steel in America and Britain before World War I." In *Essays on a Mature Economy: Britain after 1840*, ed. D. N. McCloskey, 285-304. London: Methuen.

———. 1980. "Magnanimous Albion: Free Trade and British National Income, 1841-188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7, no. 3 (July) : 303—320.

McCloskey, Donald N., and Kars G. Sandberg. 1971. "From Damnation Entrepreneur."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9, no. 1 (Fall) : 89-108.

McCloskey, Donald N., and J. Richard Zesher. 1976. "How the Gold Standard Worked, 1880-1913." In *The Monetary Approach to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ed. J. A. Frenkel and H.G. Johnson, 357-385.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McCord, Norman. 1958.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1838-1846*.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McCormmach, Russell. 1974. "On Academic Scientists in Wilhelmian Germany." *Daedalus* 103, no. 3, 157-171.

McDougall, Mary Lynn. 1978.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ty: The Workers of Lyon, 1830-185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4, no. 1 (Fall) : 129-145.

McGregor, O. R. 1957. "Social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 no. 2 (June) : 146-157.

McGrew, William W. 1976. "The Land Issue in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In *Hellenism and the First Greek War of Liberation (1821-1830) :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 N. P. Diamandouros, 111-129. Thessaloniki: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McKenzie, Robert, and Allan Silver. 1968. *Angels in Marble: Working Class Conservatives in Urban England*. London: Heinemann.

McLaren, Angus. 1978a. "Abortion in France: Women and the Regulation of Family Size, 1800-1914."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0, no. 3 (Spring) : 461-485.

———. 1978b. *Birth Control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McMillan, James F. 1981a. "Clericals, Anticlericals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France under the Third Republic." *Historical Journal* 24, no. 2, 361-376.

———. 1981b. *Housewife or Harlot: The Place of Women in French Society, 1870-1940*. Brighton, Sussex, UK: Harvester Press.

Meek, Ronald L. 1967. "The Scottish Contribution to Marxist

Sociology.” In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34-50.
London: Chapman & Hall.

———. 1976.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Melder, Keith. 1977. *The Beginnings of Sisterhood: The American
Woman's Rights Movement, 1800-1850*.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Mellon, Stanley. 1958. *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 A Study of
Historians in the French Restor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Mellor, G. R. 1951. *British Imperial Trusteeship, 1783-1850*.
London: Faber & Faber.

Menager, Bernard. 1981. “Forces et limites du bonapartisme populaire
en milieu ouvrier sous le Second Empire.” *Revue historique*, 105e année,
CCL X V, 2, no. 538 (April-June) : 371-388.

Merle, Marcel, ed. 1969. *L'Anticolonialisme européen de Las Casas à
Marx*. Textes choisis et présentés. Collection U. Paris: Lib. Armand Colin.

Merrill, Lynn L. 1989. *The Romance of Victoria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Merriman, John M. 1975. “Radicalism and Repression: A Study of
the Demobilisation of the ‘Democ-Socs’ during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In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ed. R.
Price, 210-235. London: Croom Helm.

———. 1978. *Agony of the Republic: The Depression of the Left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848-1851.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Meyssonier, Simone. 1989. *La Balance et l'horloge: La Genèse de la pensée libératric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Montreuil: Éd. de la Passion.

Michaud, Stéphane, ed. 1984. *Un Fabuleux destin, Flora Tristan. Actes Du Premi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Flora Tristan, Dijon, 3 et 4 mai 1984*. Dijon: Éd. Univ. de Dijon.

Michelet, Jules, 1860. *La Femme*. 3rd ed. Paris: Hachette.

Michels, Roberto. 1908. *Il Proletariato e la borghesia nel movimento socialista italiana*. Turin: Fratelli Bocca, Ed.

Michie, Ranald. 1993. "The City of Lond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1850-1914." In *Decline and Recovery in Britain's Overseas Trade, 1873-1914*, ed. D. C. M. Platt et al., 21-63. London: Macmillan.

Middleton, Lucy, ed. 1977. *Women in the Labour Movement: The British Experience*. London: Croom Helm.

Mill, John Stuart. 1849.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and Its Assailants." *Westminster Review* LI, April-July, 1-47.[Published anonymously.]

———. 1970.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In *Essays on Sex Equality by 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 Mill* ed. A. Rossi, 123-242.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Miller, Sally M., ed. 1981. *Flawed Liberation: Socialism and Feminis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Milward, Alan S., and S. B. Saul.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850-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Mink, Gwendolyn. 1986. *Old Labor and New Immigrant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ion, Party, and State, 1875-1920*.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 1990. "The Lady and the Tramp: Gender, Ra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In *Wo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ed. L. Gordon, 92-122.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Minogue, K. R. 1963. *The Liberal Mind*. London: Methuen.

Mitchison, Rosalind. 1980. "Nineteenth Century Scottish Nationalism: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ed. R. Mitchison, 131-142. Edinburgh: John Donald.

Mock, Wolfgang. 1981. "The Function of 'Race' in Imperialist Ideologies: The Example of Joseph Chamberlain." In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ed. P. Kennedy and A. Nicholls, 190-203.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Mokyr, Joel. 1974.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no. 2: 365-391.

Mokyr, Joel, and John V. C. Nye. 1990. "La Grande quantification"[review of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by M. Lévy-Leboyer and F. Bourgnig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0, no.

1 (March) : 172-176.

Molnár, Miklós. 1971. "Mouvements d'indépendance en Europe: Rôle de la question agraire et du niveau de culture." In *Mouvements nationaux d'indépendance et classes populaires aux XI^e et X^e siècles en Occident et en Orient*, ed. E. Labrousse, 217-227.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aris: Lib. Armand Colin.

———. 1975. *Marx, Engels et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Paris: Gallimard.

Mommsen, Hans. 1979. *Arbeiterbewegung und nationale Frage; ausgew. Aufsätz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Mommsen, Wolfgang J.,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1985.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Montgomery, David. 1980. "Strik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 no. 1 (Winter) : 81-104.

Mooers, Colin. 1991. *The Making of Bourgeois Europe: Absolutism,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London: Verso.

Moore, David Chioni, ed. 2001.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Moore, David Cresap. 1961. "The Other Face of Reform." *Victorian Studies* 5, no. 1 (September) : 7-34.

———. 1965. “The Corn Laws and High Farming.”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8, no. 3 (December) : 544-561.

———. 1967. “Social Structur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ublic Opinion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I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of Victorian Britain*, ed. Robert Robson, 20-57. London: G. Bell & Sons.

Moore, R. J. 1964. “Imperialism and ‘Free Trade’ Policy in India, 1853-5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7, no. 1 (August) : 135-145.

Moorhouse, H. F. 1973. “The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An Interpretation.” *Sociology* 7, no. 3 (September) : 341-359.

———. 1975. “On the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Reply to Gray.” *Sociology* 9, no. 1 (January) : 105-110.

———. 1978.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Labour Aristocracy.” *Social History* 3, no. 1 (January) : 61-82.

Moravio, Sergio. 1980.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History of Science* 18, pt. 4, no. 142 (December) : 247-268.

Morazé, Charles. 1957. *Les Bourgeois conquérants, XI^e X^e siècle*. Paris: A. Colin.

Morgan, David. 1975. *Suffragists and Liberals: The Politics of Women Suffrage in England*. Oxford: Blackwell.

Morgan, E. Victor. 1965.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entral*

Banking, 1797-1913. London: Frank Cass.

Morley, Charles. 1952. "The European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mber Uprising."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11, no. 4 (January) : 407-416.

Morrell, Jack, and Arnold Thackray. 1981. *Gentlemen of Science: Early Years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Camden Fourth Series 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oses, Claire Goldberg. 1982. "Saint-Simonian Men/Saint-Simonian Wom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minist Thought in 1830s' Fra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4, no. 2 (June) : 240-267.

———. 1984. *French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bany: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 1992. "Debating the Present, Writing the Past: 'Feminism' in French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no. 52 (Winter) : 79-84.

Moses, John A. 1990. *Trade Union Theory from Marx to Walesa*. New York: Berg.

Moses, Wilson J. 1978. *The Golden Age of Black Nationalism, 1850-1925*. Hamden, CT: Archon.

Moss, Bernard H. 1975a. "Parisian Workers and the Origins of Republican Socialism, 1830-1833." In *1830 in France*, ed. J. M. Merriman, 203-221.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 1975b. “Parisian Producers’ Associations (1830-51) :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In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ed. R. Price, 73-86. London: Croom Helm.

———.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1830-1914: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Mosse, George L. 1947. “The Anti-League, 1844-1846.”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7, no. 2, 134-142.

———. 1985.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Respectability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 New York: Howard Fertig.

Mouralis, Bernard. 1987. “Le Concept du primitif: L’Europe, productrice d’une science des autres.” *Notre Librairie*, no. 90 (October-December) : 86-91.

Muret, Maurice. 1925. *La Crépuscule des nations blanches*. Paris: Payot.

Murphy, Marjorie. 1986. “The Aristocracy of Women’s Labor in Autum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2 (Autumn) : 56-69.

Musson, A. E 1959.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Britain, 1873-1896: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 no. 2 (June) : 199-228.

———. 1963. “British Growth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1873-96) : Some Commen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5, no. 3, 529-533.

———. 1964. “British Industrial Growth, 1873-96: A Balanced 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7, no. 2 (December) : 397-403.

———. 1972a. *British Trade Unions, 1800-1875*. London: Macmillan.

———. 1972b. “The ‘Manchester School’ and Exportation of Machinery.” *Business History* 14, no. 1 (January) : 17-50.

———. 1976. “Class Struggle and the Labour Aristocracy, 1830-60.” *Social History* 1, no. 3 (October) : 335-356.

Myers, John Lynton. 1916. “The Influence of Anthropology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History* 4, no. 1 (February 29) : 1-81.

Neale, R. S. 1972. *Class and Id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Neff, Emery. 1926. *Carlyle and Mill: Mystic and Utilitari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Neuman, R. P. 1974. “The Sexual Question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Imperial German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no. 7 (Spring) : 271-286.

Newbold, J. T. Walton. 1932. “The Beginnings of the World Crisis, 1873-96.”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History)* 2, no. 7 (January) : 425-441.

Newell, William H. 1973.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no. 4 (December) : 697-731.

Newman, Edgar Leon. 1974. “The Blouse and the Frock Coat: The

Alliance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Paris with the Liberal Leadership in the Middle Class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Bourbon Restora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6, no. 1 (March) : 26-59.

———. 1975. “What the Crowd Wante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30.” In *1830 in France*, ed. J. M. Merriman, 17-41.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Newman, Gerald. 1987.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al History, 1740-1830*. New York: St. Martin’s.

Newsinger, John. 1979. “Revolution and Catholicism in Ireland, 1848-1923.”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9, no. 4 (October) : 457-480.

Neyer, Joseph. 1960.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ism in Durkheim.” In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ed. K. H. Wolff, 32-76.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Nicolson, Harold. 1946.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 Study in Allied Unity, 1812-1822*.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Nipperdey, Thomas. 1988. “Zum Problem der Objektivität bei Ranke.” In *Leopold von Ranke und die moder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d. W. J. Mommsen, 215-222. Stuttgart: Klein-Cotta.

Nisbet, Robert A. 1944. “De Bonald and the Concept of the Social Group.”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 no. 3 (June) : 315-331.

———. 1952. “Conservatism and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no. 2 (September) : 167-175.

———. 1966.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Nolan, Mary. 1986. "Economic Crisis, State Policy,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1870-1900."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352-39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Nora, Pierre. 1988. "Nation." I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ed. F. Furet et al, 801-812. Paris: Flammarion.

Norrell, Robert J. 1990. "After Thirty Years of 'New' Labour History, There Is Still No Socialism in Reagan Country." *Historical Journal* 33, no. 1, 227-238.

Norton, Philip, and Arthur Aughay. 1981. *Conservatives and Conservatism*. London: Temple Smith.

Novick, Peter. 1988.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Noyes, P. H. 1966. *Organization and Revolution: German Worker Associations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and 18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Nye, John Vincent. 1987. "Firm Size and Economic Backwardness: A New Look at the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 no. 3 (September) : 649-669.

———. 1991. "The Myth of Free-Trade Britain and Fortress France:

Tariffs and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no. 1 (March) : 23-46.

Nye, Robert A. 1975. *The Origins of Crowd Psychology: Gustave Le Bon and the Crisis of Mass Democracy in the Third Republic*. London: Sage.

———. 1981. “Degeneration, Hygiene, and Sports in Fin-de-Siècle France.” 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ed. E. L. Newman, 404-412. Las Cruces: New Mexico State Univ. Press.

———. 1984. *Crime, Madnes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France: The Medical Concept of National Declin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93. *Masculinity and Male Codes of Honor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Obermann, Karl. 1965. “Der Wiener Kongress, 1814/1815.”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3, no. 3, 474-492.

Oberschall, Anthony. 1965.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in Germany, 1848-1914*.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 1972.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olog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ical Sociology: Continuities, Discontinuitie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ed. A. Oberschall, 187-251. New York: Harper & Row.

O’Boyle, Lenore. 1966. “The Middle Class in Western Europe, 1815-

18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 no. 3 (April) : 826-845.

———. 1967. “The ‘Middle Class’ Reconsidered: A Reply to Professor Cobba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5, no. 1 (Spring) : 53-56.

———. 1979. “The Classless Society: Comment on Stear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1, no. 3 (July) : 397-413.

O’Brien, Patrick. 1986. “Do We Have a Typology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XIXth Century?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 no. 2 (Fall) : 291-333.

O’Brien, Patrick, and Çağlar Keyder. 1978.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 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O’Brien, Patrick, and Geoffrey Allen Pigman. 1992. “Free Trade, British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8: 89-113.

Offen, Karen. 1983. “The Second Sex and the Baccalauréat in Republican France, 1880-1924.”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3, no. 2 (Fall) : 252-286.

———. 1984. “Depopulation, Nationalism, and Feminism in *Fin-de-Siècle* Fra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no. 3 (June) : 648-676.

———. 1986. “Ernest Legouve and the Doctrine of ‘Equality in Difference’ for Women: A Case Study of Male Femin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8, no. 2, 452-484.

———. 1987a. “Feminism, Antifeminism, and National Family Politics in Early Third Republic France.” In *Connecting Spheres: Women in the West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ed. M. J. Boxer and J. H. Quataert, 177-186.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1987b. “Sur l’origine des mots ‘féminisme’ et ‘féminist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4 (July-September) : 492-446.

———. 1988. “Defining Femin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Signs* 14, no. 1 (Autumn) : 119-157.

O’Gorman, F. 1967. *The Whig Par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Olcott, Teresa. 1976. “Dead Centre: The Women’s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London: 1874-1914.” *London Journal* 2, no. 1 (May) : 33-50.

O’Neill, William L. 1969. *The Woman Movement: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1971. *Everyone Was Brave: A History of Feminism in America*. With a new Afterword by the author. New York: Quadrangle.

Ortega López, Margarita. 1988. “‘La Defensa de las mujeres’ en la sociedad del Antiguo Régimen: Las Aportaciones del pensamiento ilustrado.” In *El Feminismo en España: Dos siglos de historia*, ed. P. Folguer, 3-28. Madrid: Ed. de la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Ortner, Sherry B. 1974.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 In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67-8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Ottaviano, Chiara. 1982. "Antonio Labriola e il problem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Luigi Einaudi* 16: 305-328.

Paish, George. 1909.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 in Other Land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72, no. 3 (September 30) : 465-480 (with discussion, 481-495) .

———. 1911.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 in Individual Colonial and Foreign Countries, Pt. 2."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74 (January) : 167-187 (with discussion, 187-200) .

Palencia-Roth, Michael. 2008.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Sir William Jones: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and the ISCSC." *Diogenes* 55, no. 2, 103-115.

Palmade, Guy P. 1961. *Capitalisme et capitalistes français au XIX^e siècle*. Paris: Lib. A. Colin.

Pancaldi, Giuliano. 1994. "The Technology of Nature: Marx's Thoughts on Darwin."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ome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 I. B. Cohen, 257-274.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50.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ankhurst, Richard K. P. 1957. *The Saint-Simonians: Mill and Carlyle*. London: Lalibela Books, Sidgwick & Jackson.

Pannekoek, A. 1912. "Révolution mondiale." *Le Socialisme*, no.

214, 6e année, no. 21 (January) : 4.

Paquot, Thierry. 1980. *Les faiseurs des nuages: Essai sur la genèse des marxismes français, 1880-1914*. Paris: Le Sycomore.

Parker, C. J. W. 1981. "The Failure of Liberal Racialism: The Racial Ideas of C. A. Freeman." *Historical Journal* 24, no. 4 (December) : 825-846.

Parris, Henry. 1960. "The Nine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 Reappraisal Reappraised." *Historical Journal* 3, no. 1, 17-37.

Paxton, Nancy L. 1991. *George Eliot and Herbert Spencer: Feminism, Evolution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Payne, Howard C. 1956. "Preparation of a Coup d'Etat: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and Police Powers in France, 1849-1851." In *Studie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in Honor of Franklin Charles Palm*, ed. F. J. Cox et al., 175-202.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Payne, Peter L. 1967. "The Emergence of the Large-Scale Company in Great Britain, 187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20, no. 3 (December) : 519-542.

———. 1968. "Iron and Steel Manufac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ed. D. H. Aldcroft, 71-99.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elling, Henry, ed. 1954. *The Challenge of Socialism*.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 1968.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1-18.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 1976.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London: Macmillan.

Perkin, Harold. 1969.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77.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A False Antithesi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7, no. 1 (Fall) : 105-118.

Perkins, Dexter. 1927. *The Monroe Doctrine, 1823-18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Perlman, Selig. 1918. “Upheaval and Reorganization (since 1876) .” In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J. R. Commons, et al., 193-537. New York: Macmillan.

———. 1922. *A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Perlman, Selig, and Philip Taft. 1935. *Labor Movements*. Vol. 4 of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6-1932*. New York: Macmillan.

Perrot, Jean-Claude, and Stuart J. Woolf. 1984. *State and Social Statistics in France*.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Perrot, Michelle. 1967. “Les Guesdistes: Controverses sur

l'introduction du marxisme en France." *Annales E. S. C.* 22, no. 3 (May-June) : 701-710.

———. 1974. *Les ouvriers en grève: France, 1871-1890*. 2 vols. Paris: Mouton.

———. 1976. "L'Éloge de la ménagère dans le discours des ouvriers français au XIX^e siècle." *Romantisme*, nos. 13-14, 105-121.

———. 1986.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Clas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71-11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88. "Naissance du féminisme." In *Le Féminisme et ses enjeux: Vingt-sept femmes parlent*, 29-60. Paris: FEN-Edilig.

Phillips, G. A. 1971. "The Triple Industrial Alliance in 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24, no. 1 (February) : 55-67.

Picavet, François. 1891. *Les idéologues*. Paris: Félix Alcan.

Pieroni Bortolotti, Franca. 1963. *Alle origini del movimento femminile in Italia, 1848-1892*. Rome: Einaudi.

———. 1974. *Socialismo e questione femminile in Italia, 1892-1922*. Milan: G. Mazzotta.

Pierrard, Pierre. 1984. *L'Eglise et les ouvriers en France, (1890-1940)*. Paris: Hachette.

Pinchbeck, Ivy. 1930. *Women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Pinkney, David H. 1958.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63. "Laissez-Faire or Intervention? Labor Policy of the First Months of the July Monarch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 no. 1 (Spring) : 123-128.

———. 1964a.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3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0, no. 1 (October) : 1-17.

———. 1964b. "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30." In *A Festschrift for Frederick B. Artz*, ed. D. H. Pinkney and T. Rapp, 52-71.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 1972.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3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Plamenatz, John. 1952.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France, 1815-1870*. London: Longman, Green.

Platt, D. C. M. 1968a.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Some Reservation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21 (August) : 296-306.

———. 1968b. *Finance, Trade, and Politic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73. "Further Objections to an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830-186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26, no.

1 (February) : 77-91.

———. 1993a. “Introduction: Britain’s Decline.” In *Decline and Recovery in Britain’s Overseas Trade, 1873-1914*, ed. D. C. M. Platt et al., 1-12. London: Macmillan.

———. 1993b. “Particular Points of Strength in Britain’s Overseas Trade.” In *Decline and Recovery in Britain’s Overseas Trade, 1873-1914*, ed. D. C. M. Platt et al., 65-76. London: Macmillan.

———. 1993c. “Trade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s of Recent Settlement.” In *Decline and Recovery in Britain’s Overseas Trade, 1873-1914*, ed. D. C. M. Platt et al., 91-138. London: Macmillan.

Plechanow, Georg. 1902-1903. “Über die Anfänge der Lehre vom Klassenkampf.” *Die Neue Zeit* 21, no. 1: 275-286, 292-305.

Pleck, Elizabeth. 1983. “Feminist Responses to ‘Crimes against Women, ’1868-1896.” *Signs* 8, no. 3 (Spring) : 451-470.

Plessen, Marie-Louise. 1975. *Die Wirksamkeit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von 1872-1890: Studien zum Katheder-und Staatssozialismus*. **Berlin: Duncker & Humboldt.**

Plessis, Alain. 1973. *De la Fête impériale au mur des fédérés, 1852-1871*. Paris: Éd. du Seuil.

———. 1987. “Le ‘Retard français, ’la faute de la banque? Banques locales, succursale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et financement de l’économie sous le second Empire.” In *Le capitalisme français, 19e-20e siècle: Blocages et dynamismes d’une croissance*, ed. P. Fridenson and A. Straus,

199-210. Paris: Fayard.

Poggi, Stefano, and Maurizio Bossi, eds. 1994. *Romanticism in Science: Science in Europe, 1790-1840*.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52.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

Pohl, Hans. 1989. *Aufbruch der Weltwirtschaft; Geschichte der Weltwirtschaft von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Poliakov, Léon. 1974. *The Aryan Myth: A History of Racist and Nationalist Ideas in Europe*. London: Sussex Univ. Press.

———. 1982. "Racism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Age of Imperialism." In *Racism and Colonialism: Essays on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ed. Robert Ross, 55-64.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oliakov, Léon, Christian Delacampagne, and Patrick Girard. 1976. *Le racisme: Collection Point de Départ* Paris: Éd. Seghers.

Pollard, Sidney. 1963. "Factory Disciplin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16, no. 2 (December) : 254-271.

———. 1964. "The Factory Villa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9, no. 312 (July) : 513-531.

———. 1973.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26, no. 4: 636-648.

———. 1977. “Merchandise Trade and Exploit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6, no. 3 (Winter) : 745-749.

———. 1983. “England, Der unrevolutionäre Pionier.” In *Europäische Arbeiterbewegungen im 19. Jahrhundert,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England und Frankreich im Vergleich*, ed. J. Kocka, 21-38.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1984. “Wirtschaftliche Hintergründe des *New Unionism*.” In *Auf dem Wege zur Massengewerkschaft*, ed. Wolfgang J. Mommsen and Hans-Gerhard Husung, 46-75. Stuttgart: Ernst Klett.

Ponteil, Félix. 1968. *L’Eveil des nationalités et le mouvement libéral (1815-1848)*. Nouv. éd. mise à jour.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15.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Poovey, Mary. 1988.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Poper, Barbara Corrado. 1987. “The Influence of Rousseau’s Ideology of Domesticity.” In *Connecting Spheres: Women in the West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ed. M. J. Boxer and J. H. Quataert, 136-145.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Portal, Magda. 1983. *Flora Tristán, precursora*. Lima: La Equidad.

Postel-Vinay, Gilles, and Jean-Marc Robin. 1992. “Eating, Working, and Saving in an Unstable World: Consum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45, no. 3 (August) :

494-513.

Postgate, Raymond. 1974. "The Principles of 1848." In *A Hundred Years of Revolution, 1848 and After*, ed. G. Woodcock, 93-119. New York: Haskell House.

Potter, J. 1955. "The British Timber Duties, 1815-60." *Economica*, n. s., 22 (May) : 122-136.

Potts, David B. 1965. "Social Ethics at Harvard, 1881-1931: A Study in Academic Activism." In *Social Sciences at Harvard, 1860-1920: From Inculcation to the Open Mind*, ed. Paul Buck, 91-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Pouthas, Charles H. 1962. "La réorganisation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et la reconstitution de l'administration préfectorale par Guizot en 183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9 (October-December) : 241-263.

Pouthas, Charles H., et al. 1983. *Démocratie, réaction, capitalisme, 1848-1860*. Peoples et Civilisations 16.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Prewitt, Kenneth. 2004. "Political Science and Its Audience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7, no. 4 (October) : 781-784.

Preyer, Robert O. 1985. "The Romantic Tide Reaches Trinity." In *Victorian Science and Victorian Values: Literary Perspectives*, ed. J. Paradis and T. Postlewait, 39-68.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Price, Richard. 1990. "Britain." In *The Formation of Labour Movements, 1870-1914: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 M. van der Linden and J. Rojahn, 3-24. Leiden: E. J. Brill.

Price, Roger. 1972. *The French Second Republic: A Social History*. London: B. T. Batsford.

———. 1975a.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France*. London: Croom Helm.

———. 1975b. Introduction to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ed. R. Price, 1-72. London: Croom Helm.

Prinz, Michael. 1989. "Wandel durch Beharrung: Sozialdemokratie und 'Neue Mittelschichten'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4: 35-73.

Procacci, Giuliano. 1972. *La lotta di classe in Italia agli inizi del secolo X X*. Rome: Ed. Riuniti.

Proctor, Robert N. 1991. *Value-Free Science?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Prothero, I. J. 1969. "Chartism in London." *Past and Present*, no. 44 (August) : 76-105.

———. 1971. "London Chartism and the Trad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24, no. 2 (May) : 202-219.

———. 1979.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John Gast and His Times*. Folkestone, Kent, UK: William

Dawson & Son.

Proudhon, Pierre-Joseph. 1912. *Les Femmelins: Les grandes figures romantiques*. Paris: 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

Przeworski, Adam. 1980. "Social Democracy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New Left Review*, no. 122 (July-August) : 27-58.

Przeworski, Adam, and Michael Wallerstein. 1982. "The Structure of Class Conflict in Dem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no. 2 (June) : 215-238.

Puccini, Sandra. 1976. "Condizione della donne e questione femminile (1892-1922)." *Problemi del Socialismo* 17, no. 4 (October-December) : 9-23.

Puech, Jules-L. 1925. *La Vie et l'oeuvre de Flora Tristan*. Paris: Marcel Rivière.

Pugh, Evelyn L. 1982. "Florence Nightingale and J. S. Mill Debate Women's Right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1, no. 2 (Spring) : 118-138.

Puryear, Vernon John. 1931. *England, Russia, and the Straits Question, 1844-1856*.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Quataert, Jean H. 1979. *Reluctant Feminists i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85-191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Quero Molaes, J. 1948. "L'Espagne en 1848."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1: 319-354. Paris: Éd. du

Minuit.

Rabaut, Jean. 1983. "1900, tournant du féminisme françai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 82e année, sér. 14, no. 17, 5-16.
[Supplement to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no. 1, 1983.]

Racz, Elizabeth. 1952.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16, no. 2 (Spring) : 151-174.

Ragionieri, Ernesto. 1961. *Socialdemocrazia tedesca e socialisti italiani, 1875-1895*. Milan: Feltrinelli.

Rainger, Ronald. 1978. "Race, Politics and Science: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in the 1860's." *Victorian Studies* 22, no. 1 (Autumn) : 51-70.

Ralle, M. 1973. "La notion de 'bourgeoisie' dans l'idéologie d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en Espagne." *La Question de la 'bourgeoisie' dans le monde hispanique au XIXe siècle*, 119-131. 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Hispaniques 45. Bordeaux: Éd. Bière. [Discussion, 131-135.]

Rancière, Jacques. 1981. *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 Paris: Fayard.

———. 1983. "The Myth of the Artisa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 Category of Soci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24 (Fall) : 1-16.

———. 1984. "A Reply."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25 (Spring) : 42-46.

Ravera, Camilla. 1978. *Breve storia del movimento femminile in Italia*. Rome: Ed. Riuniti.

Read, Donald. 1958. *Peterloo: The "Massacre" and Its Background*.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eardon, Bernard. 1976. *Liberalism and Tradition: Aspects of Catholic Thought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Rebérioux, Madeleine. 1978a. Preface to *Les femmes et le socialisme*, by C. Sowerwine, x i - x x iii. Paris: Presses de la FNSP.

———. 1978b. "La questione femminile nei dibattiti della II Internazionale." In *Anna Kuliscioff e l'età del riformismo: Atti del Convegno di Milano, dicembre 1974*, 140-154. Rome: Mondo Operaio—Ed. Avanti!

———. 1989. Preface to *1789: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s femmes et autres textes*, ed. Paule Duhet, i - x ii. Nouv. éd. augm. Paris: Des Femmes.

Rebérioux, Madeleine, Christiane Dufrancantel, and Béatrice Slema. 1976. "Hubertine Auclert et la question des femmes à l'immortel congrès' (1879)." *Romantisme*, nos. 13-14, 123-152.

Rebérioux, Madeline, and Georges Haupt. 1963. "L'attitude de l'Internationale." *Le Mouvement social*, no. 45 (October-December) : 7-37.

Reddy, William M. 1979. "Skeins, Scales, Discounts, Steam, and

Other Objects of Crowd Justice in Early French Textile Mill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1, no. 2 (April) : 204-213.

———. 1984. *The Rise of Market Culture: The Textile Trade and French Society, 175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Redford, Arthur. 1956. *Manchester Merchants and Foreign Trade*. Vol. 2, 1850-1939.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ess.

———. 1968. *Labour Migration in England, 1800-50*. 2nd ed., rev. W. H. Chaloner. New York: A. M. Kelley.

Reichand, Richard W. 1953.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13, no. 2 (July) : 136-153.

Reid, Alastair. 1978.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A Response to H. F. Moorhouse.” *Social History* 3, no. 3 (October) : 347-361.

———. 1983. “Intelligent Artisans and Aristocrats of Labour: The Essays of Thomas Wright.” In *The Working Class in Modern British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Henry Pilling*, ed. J. M. Winter, 171-186. London: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91. “Old Unionism Reconsidered: The Radicalism of Robert Knight, 1870-1900.” In *Currents of Radicalism: Popular Radicalism, Organised Labour and Party Politics in Britain, 1850-1914*, ed. E. F. Biagini and A. J. Reid, 214-24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Rémond, René. 1982. *Les Droites en France*. Paris: Aubier

Montaigne.

Rendall, Jane. 1985. *The Origins of Modern Feminism: Women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60*. London: Macmillan.

Renouvier, Charles. 1868. "De la philosophie du XIX^e siècle en France." *L'Année philosophique—Première Année (1867)*. Paris: Lib. Geemer Baillière.

Renouvin, Pierre. 1949. "L'idée d'Etats-Unis d'Europe pendant la crise de 1848." In *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31-45.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54. *Le XIX^e siècle*. Vol. 1, *De 1815 à 1871: L'Europe des nationalités et l'éveil de nouveaux mondes*.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5. Paris: Lib. Hachette.

Rerup, Lorenz. 1980.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n Denmark." In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ed. R. Mitchison, 47-59. Edinburgh: John Donald.

Reynolds, James A. 1954. *The Catholic Emancipation Crisis in Ireland, 1823-1829*.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Rhys Davies, T. W. 1903-1904. "Oriental Studies in England and Abroad."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03-1904*, 183-197.

Richard, Gaston. 1914. *La Question sociale et le mouvement philosophique au XIX^e siècle*. Paris: Lib. Armand Colin.

Richter, Melvin. 1960. "Durkheim'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ed. K. H. Wolff, 170-210.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 1964. *The Politics of Conscience: T. H. Green and His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Ringer, Fritz. K. 1969.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 1979.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1992. *Fields of Knowledge: French Academic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90-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Rist, Charles. 1897. “La Durée du travail dans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820 à 1870.”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11, no. 4 (May) : 371-393.

Rist, Marcel. 1956. “Une Expérience française de libération des échanges au dix-neuvième siècle, le traité de 1860.”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66e année (November-December) : 908-961.

Roberts, David. 1958. “Tory Patern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no. 2 (January) : 323-337.

———. 1959. “Jeremy Bentham and the Victorian Administrative State.” *Victorian Studies* 2, no. 3 (March) : 193-210.

———. 1963. “How Cruel Was the Victorian Poor Law? ” *Historical*

Journal 6, no. 1, 97-107.

Roberts, J. M. 1978.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1939. *France and Latin American In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Robinson, Ronald E. 1991. "Introduction: Railway Imperialism." In *Railway Imperialism*, ed. C. B. Davis Jr. and K. E. Wilburn, 1-6. New York: Greenwood.

Rodgers, Brian. 1952. "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1857-1886."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0, no. 3 (September) : 283-310.

Roehl, Richard. 1976.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A Reconsider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3, no. 3 (July) : 233-281.

Rogers, J. D. 1963. "Laissez-faire in England." *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 535-537. Reprint of rev. 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Roller, Michel. 1948. "Les Roumaines en 1848."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239-266. Paris: Éd. du Minuit.

Romalis, Coleman, and Shelly Romalis. 1983. "Sexism, Rac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Two Cases of Minority Prot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6, no. 3 (May/June) : 270-287.

Rosanvallon, Pierre. 1985. *Le moment Guizot* Paris: Gallimard.

Rosdolsky, Roman. 1964.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losen' Völk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in der Revolution 1848-1849 im Lichte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4: 87-282.

Rose, Ernst. 1951. "China as a Symbol of Reaction in Germany, 1830-188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no. 1 (Winter) : 57-76.

Rose, Michael E. 1974. *The Relief of Poverty, 1834-1914*. London: Macmillan.

Rose, R. B. 1984. "The 'Red Scare' of the 1790'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Agrarian Law,'" *Past and Present*, no. 103 (May) : 113-130.

Rose, Sonia O. 1986. "Gender and Work: Sex, Class,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1 (Spring) : 113-131.

Rosen, Andrew. 1974. *Rise Up Women! The Militant Campaign of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1903-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osenberg, Charles E. 1976. *No Other Gods: On Science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Rosenberg, Hans. 1943.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873-1896 in Central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3, nos. 1 and 2, 58-73.

Ross, Dorothy.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America, 1860-1940*, ed. A. Olesen and J. Voss, 107-138.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 1984.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The Authority of Expert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 T. L. Haskell, 157-17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1991.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Ross, Sydney. 1962. "Scientist: The Story of a Word." *Annals of Science* 18, no. 2 (June) : 65-85.

Rosselli, John. 1980. "The Self-Image of Effetenes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Bengal." *Past and Present*, no. 86 (February) : 121-148.

Rossi, Alice S., ed. 1970. *Essays on Sex Equality [by] 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 Mill*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 1973. *The Feminist Papers, from Adams to de Beauvoir*.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Rostow, W. W. 1938. "Invest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 no. 2 (May) : 136-158.

———. 1939. "Investment and Real Wages, 1877-86."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9, no. 1 (November) : 144-159.

———. 1942. "Adjustments and Maladjustments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2, no., part 2, suppl.,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Fifty-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rch) : 13-23.

———. 1948. *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48.

———. 1971.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2nd ed.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Roth, Guenther. 1963.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A Study in Working-Class Isol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Totowa, NJ: Bedminster Press.

Rothermund, Dietmar. 1986. *The German Intellectual Quest for India*. New Delhi: Manohar.

Rougerie, Jacques. 1964. *Procès des Communards, présenté par Jacques Rougerie. Collection ‘Archives.’* Paris: Juilliard.

———. 1965. “Sur l’histoire d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Le Mouvement social*, no. 51 (April-June) : 23-45.

———. 1968. “Remarques sur l’histoire des salaires à Paris au XI^e siècle.” *Le Mouvement social*, no. 63 (April-June) : 71-108.

———. 1972. “1871, jalons sur une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Livraison spéciale prépar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Jacques Rougeri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Tristan Haan, Georges Haupt et Miklós Molná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7, pts. 1 and 2, i -ix, 1-624.

Rousseaux, Paul. 1938. *Les Mouvements de force de l'économie anglaise, 1800-1913*. Brussels: L'Édition Universelle; Paris: De Brouwer & Cie.

Rover, Constance. 1967. *Women's Suffrage and Party Politics in Britain, 1866-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owbotham, Sheila. 1974.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 1977. *Hidden from History: 300 Years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It*. 3rd ed. London: Pluto Press.

Rowe, D. J. 1967. "The Londo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nd 'The Peoples' Charter.'" *Past and Present*, no. 36 (April) : 73-86.

Royle, Edward. 1986. *Chartism*. 2d ed. London: Longman.

Rubel, Maximilien. 1960. *Karl Marx devant le bonapartisme*.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Rubin, Gayle.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 R. Reiter, 157-21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Rudé, Fernand. 1940. "La première expédition de Savoie (février 1831)." *Revue historique*, CL X X VIII-CL X X XI X, 65e année (July-December) : 413-443.

———. 1969. *L'Insurrection lyonnaise de novembre 1831: Le*

mouvement ouvrier à Lyon de 1827-1832. 2nd ed. Paris: Éd. Anthropos.

Rudé, George. 1967. "English Rural and Urban Disturbances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Reform Bill, 1830-1831." *Past and Present*, no. 37 (July) : 87-102.

———. 1969. "Why Was There No Revolution in England in 1830 or 1848? " In *Studien über die Revolution*, ed. M. Kossok, 231-244. Berlin: Akademie-Verlag.

Rueschmayer, Dietrich, and Roman Van Rossen. 1996. "The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and the Fabian Society: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Policy-Relevant Knowledge." In *States, Social Knowledg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al Policies*, ed. D. Rueschmayer and T. Skocpol, 117-16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Ruggiero, Guido de. 1959.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 Boston: Beacon Press.

Rule, John. 1988. "The Formative Years of British Trade-Unionism: An Overview." In *British Trade-Unionism, 1750-1850*, ed. John Rule, 1-28. London: Longman.

Ruwet, Joseph. 1967. *Avant les révolutions: Le XVIII^e siècle*. Brussels: Fondation Charles Plisnier.

Ryan, Barbara. 1992.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Dynamics of Change in 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Activism*. New York: Routledge.

Sagnac, Philippe. 1901-1902. "Les Juifs et Napoléon (1806-1808)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 595-604.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5.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Race and Class* 27, no. 2 (Autumn) : 1-15.

Sakellariou, Michel. 1948. "L'Hellénisme et 1848."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319-354. Paris: Éd. du Minuit.

Salvadori, Massimo. 1977. *The Liberal Heresy: Origin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Samuel, Raphael. 1977. "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no. 3 (Spring) : 6-72.

Santarelli, Enzo. 1964. *La Revisione del marxismo in Italia*. Milan: Feltrinelli.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A. 1931. *Die Entstehung der Weltwirtschaft: Geschichte des zwischenstaatli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letzten Viertel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is 1914*. Jena: Gustav Fischer.

Saul, S. B. 1960. "The American Impact on British Industry, 1895-1914." *Business History* 3, no. 1 (December) : 19-38.

———. 1971. "Some Thoughts on the Papers and Discuss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ate Victorian Economy." In *Essays on a Mature Economy, Britain after 1840*, ed. D. N. McCloskey, 393-397. London:

Methuen.

Saville, John. 1990. *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ayers, R. S. 1932. "The Question of the Standard in the Eighteenth-Fifties." *Economic History* 2, no. 7 (January) : 575-601.

Schapiro, J. Salwyn. 1934. *Condorcet and the Rise of Liber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 1939. "Utilitarian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nglish Liberalism."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4, no. 2 (January) : 121-137.

———. 1949. *Liber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Fascism: Social Forces in England and France (1815-1870)*. New York: McGraw-Hill.

Schefer, Christian. 1907. *Les Traditions et les idées nouvelles, la ré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ve, la reprise de l'expansion (1815-1830)*. Vol. 1 of *La France modern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Paris: Félix Alcan.

———. 1928. *L'Algérie et l'évolution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Lib. Anc. Honoré Champion.

———. 1939. *Les Origines de l'expédition du Mexique (1838-1862)* : *La Grande Pensee de Napoleon III*. Paris: Marcel Rivière.

Schenk, H. G. 1947. *The Aftermath of the Napoleonic Wars: The Concert of Europe—An Experi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1962.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chlote, Werner. 1952. *British Overseas Trade from 1700 to the 1930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chmoller, Gustav von. 1920. "Zur 25jährigen Feier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In *Zwanzig Jahre Deutscher Politik (1897-1917)*,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23-34.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Schnerb, Robert. 1936. "Napoleon III and the Second French Empi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 no. 3 (September) : 338-355.

———. 1963. *Libre échange et protectionnisme*. Que sais-je? , no. 1032.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68. *Le XIX^e siècle: L'Apogée de l'expansion européenn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Schnetzler, Barbara V. 1971. *Die frühe amerikanische Frauenbewegung und ihre Kontakte mit Europa (1836-1869)*. Bern: Peter Lang.

Schoelcher, Victor. 1948. *Esclavage et colonisation*.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Schorske, Carl E. 1955.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Schöttler, Peter. 1985. *Naissance des Bourses de travail, un appareil idéologique d'état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Schroeder, Paul W. 1989.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ical Equilibriu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5:

135-153.

———. 1992a. “Did the Vienna Settlement Rest on a Balance of Power?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no. 2 (April) : 683-706.

———. 1992b. “A Mild Rejoind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no. 3 (June) : 733-735.

Schuman, Frederick L. 1958.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Schumpeter, Joseph. 1964. *Business Cycles*. 1st abr. ed. Philadelphia: McGraw-Hill.

Schuyler, Robert L. 1921. “The Climax of Anti-Imperialism in Englan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6, no. 4 (December) : 537-560.

———. 1922. “The Rise of Anti-Imperialism in Englan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7, no. 3 (September) : 440-471.

———. 1945. *The Fall of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A Study in British Free Trade, 1770-1870*.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Schwab, Raymond. 1950. *La Renaissance orientale*. Paris: Payot.

Schwartz, Anna Jacobson. 1987. *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Schweber, S. S. 1985. “Scientists as Intellectuals: The Early Victorians.” In *Victorian Science and Victorian Values: Literary Perspectives*, ed. J. Paradis and T. Postlewait, 1-37.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Schwendinger, Herman, and Julia R. Schwendinger. 1974. *Sociologists of the Chair: A Radical Analysis of the Formative Years of North American Sociology (1883-1922)*. New York: Basic Books.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Scott, Joan Wallach. 1974.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 1981.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Olympe de Gouge’s Declaratio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8 (Autumn) : 1-21.

———. 1988. “A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of Work: Le Statistique de l’Industrie à Paris, 1847-1848.”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13-138.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See, Henri. 1921.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en Europ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Paris: M. Giard.

———. 1923. “Esquisse de l’évolution industrielle de la France de 1815 à 1848: Les progrès du machinisme et de la concentration.”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11, no. 4, 473-497.

———. 1924. “Quelques aperçus sur la condition de la classe ouvrière et sur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France de 1815 à 1848.”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 12, no. 4, 493-521.

———. 1927. *La vi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censitaire (1815-1848)*. Paris: F. Alcan.

———. 1951.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2nd ed. 2 vols. Paris: A. Colin.

Seecombe, Wally. 1986. "Patriarchy Stabiliz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Wage N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Social History* 11, no. 1 (January) : 53-76.

Semidei, Manuela. 1966. "De l'Empire à la décolonisation à travers les manuels salaires français."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6, no. 1 (February) : 56-86.

Semmel, Bernard. 1970.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Sergent, Bernard. 1982. "Penser—et mal penser—les Indo-Européens (Note critique) ." *Annales E. S. C.* 27, no. 4 (July-August) : 669—681.

Seton-Watson, Hugh. 1977. *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London: Methuen.

Seton-Watson, R. W. 1937. *Britain in Europe, 1789 to 1914*.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Sewell, William H., Jr. 1974. "Soci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Working Class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Marseille." *Past and Present*, no. 65, 75-109.

———. 1979. "Property, Labor,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ism in France, 1789-1848."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 J. Merriman, 45-63.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1983. "Response to J. Rancière, 'The Myth of the Artisan, '"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24 (Fall) : 17-20.

———. 1985.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no. 1 (March) : 57-85.

———. 1986.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45-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88. "Le citoyen/la citoyenne: Activity, Passivity,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ncept of Citizenship."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d. C. Lucas, 2: 105-123. Oxford: Pergamon Press.

———. 1990.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Loyalties in France: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de a Differe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68, no. 4 (December) : 527-552.

Shapiro, Fred R. 1981. "On the Origin of the Term 'Indo-Germanic, '"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8, no. 1, 165-170.

Shefter, Martin. 1986.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ed.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197-27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Sherman, Dennis. 1974.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Liberalism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6, no. 2 (Summer) : 171-199.

Shine, Hill. 1941. *Carlyle and the Saint-Simonians: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Periodic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Sievers, Sharon. 1983. *Flowers in Salt: The Beginning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Jap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Siéyès, Emmanuel-Joseph. 1789. "Préliminaire de la Constitution, lu les 20 et 21 juillet 1789, au Comité de Constitution." In *Recueil des pièces authentiques approuvés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 France*, 178-200. Geneva: 1e éd.

———. 1985. *Ecrits politiques*. Paris: Éd.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Silbering, Norman J. 1923.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of Britain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8 (November) : 214-233.

Silva, Pietro. 1917. *La Monarchia di luglio e l'Italia*. Turin: Fratelli Bocca Ed.

Silver, Allan. 1967. "The Demand for Order in Civil Society: A Review of Some Theories in the History of Urban Crime, Police and Riots." In *The Police*, ed. D. J. Bordua, 1-24. New York: Wiley.

Simon, André. 1946. "Les Origines religieuses de l'indépendance belge." *Chantiers* 11, no 2 (15 November) : 1-28.

———. 1949. *L'Eglise catholique et les debuts de la Belgique indépendante*. Wetteren, Belgium: Éd. Scaldis.

———. 1959. "Lamennais en Belgique."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37: 408-417.

———. 1991. "Théoriciens français du racisme au 19c siècle." *Gavroche*, no. 55 (January-February) : 21-25.

Simon, Walter M. 1956. "History for Utopia: Saint-Simon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7, no. 3 (June) : 311-331.

Simoni, Pierre. 1980. "Science anthropologique et racisme à l'époque de l'expansion coloniale: Le cas du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 de Pierre Labrousse." *Historical Papers (Ottawa)* 15, no. 1, 167-184.

Singelmann, Joachim, and Peter Singelmann. 1986. "Lorenz von Stein and the Paradigmatic Function of Social The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no. 3 (September) : 431-452.

Sked, Alan, ed. 1979.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 London: Macmillan.

Skinner, Andrew S. 1965. "Economics and History: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February) : 1-22.

Skocpol, Theda. 1985. "Cultural Idiom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the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A Rejoinder to Sewell."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no. 1 (March) : 86-96.

Slaughter, Jane, and Robert Kern. 1981. *European Women on the Left: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Political Women, 1880 to the Presen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Slicher van Bath, B. H. 1963.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 d. 50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Smelser, Neil J. 1991. *Social Paralysis and Social Chang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Smith, Carol H. 1995. "Race-Class-Gender Ideology in Guatemala: Modern and Anti-Modern Form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 no. 4 (October) : 723-749.

Smith, Paul. 1967. *Disraelian Conservatism and Social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9. "Liberation as Authority and Discipline." *Historical Journal* 32, no. 2 (September) : 723-737.

Snyder, Carl. 1934. "Measures of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Economica*, n. s., 1 (November) : 421-435.

Soboul, Albert. 1948. "La Question paysanne en 1848." 3 pts. *La Pensée*, no. 18, 55-66; no. 19, 25-37; no. 20, 48-56.

———. 1962. "A propos des réflexions de Georges Rudé sur la sans-

culotterie.” *Crítica storica* 1, no. 4 (July 31) : 391-398.

Soffer, Benson. 1960. “A Theory of Trade Union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Autonomous’ Workman.” *Labor History* 1, no. 2 (Spring) : 141-163.

Soffer, Reba N. 1982. “Why Do Disciplines Fail? The Strange Case of British Sociolog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7, no. 385 (October) : 767-802.

Solle, Zdenek. 1969. “Die tschechische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Nationalismus und Internationalismu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9: 181-266.

Soloway, Richard A. 1990. *Demography and Degeneration: Eugenics and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omit, Albert, and Joseph Tanenhaus. 1982.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New York: Irvington Publ.

Sonenscher, Michael. 1989. “Editorial, 1789-1989.”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8 (Autumn) : v -vi.

Soreau, Edmond. 1931. “Le loi Le Chapelier.”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8e année, no. 46 (July-August) : 287-314.

Sorenson, Lloyd R. 1952. “Some Classical Economists, Laissez Faire, and the Factory 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2, no. 3 (Summer) : 247-262.

Southgate, Donald G. 1965. *The Passing of the Whigs, 1832-1886*. London: Macmillan.

———. 1977. "From Disraeli to Law." In *The Conservatives*, ed. Lord Butler, 109-27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Sowerwine, Charles. 1976. "The Organisation of French Socialist Women, 1880-1914: A European Perspective for Women's Movements." *Historical Reflections* 3, no. 2 (Winter) : 3-24.

———. 1978. *Les Femmes et le socialisme: Un siècle d'histoir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1982. *Sisters or Citizens? Women and Socialism in France since 18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83. "Workers and Women in France before 1914: The Debate over the Courian Affai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 no. 3 (September) : 411-441.

Spain, Jonathon. 1991. "Trade Unionists, Gladstonian Liberals and the Labour Law Reforms of 1875." In *Currents of Radicalism: Popular Radicalism, Organised Labour and Party Politics in Britain, 1850-1914*, ed. E. F. Biagini and A. J. Reid, 109-1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pengler, Oswald. 1926.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Form and Actuality*. New York: A. A. Knopf.

Spitzer, Alan B. 1962. "The Good Napoleon III."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 no. 3 (Spring) : 308-329.

Stanton, Elizabeth Cady, Susan B. Anthony, and Matilda Joslyn Gage, eds. 1881. *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 6 vols. Rochester, NY: Charles Mann.

Stark, W. 1943. "Saint-Simon as a Reali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 no. 1 (May) : 42-55.

———. 1945. "The Realism of Saint-Simon's Spiritual Progra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 no. 1 (May) : 24-42.

Starzinger, Vincent. 1965. *Middlingness: "Juste Milieu" Political Theory in France and England, 1815-48*. Charlottesville: Univ. Press of Virginia.

Stearns, Peter N. 1965. "Patterns of Industrial Strike Activity during the July Monarc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0, no. 2 (January) : 371-394.

———. 1974. *1848: The Revolutionary Tide in Europe*. New York: W. W. Norton.

———. 1979a. "The Middle Class: Toward a Precise Defini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no. 3 (July) : 377-396.

———. 1979b. "Repl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no. 3 (July) : 414-415.

Stengers, Jean. 1950-1951. "Sentiment national, sentiment orangiste et sentiment français à l'aube de notre indépendance." 2 pts. *Revue bei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28: 993-1029 (pt. 1) ; 29: 61-92 (pt. 2) .

Stepan, Nancy. 1982. *The Idea of Race in Science: Great Britain, 1800-1960*. Hamden, CT: Archon Books.

Stern, Fritz. 1971.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Knopf.

Stern, Leo, and Rudolf Sauerzapf. 1954. Introduction to *Die Auswirkungen der ersten russischen Revolution von 1905-1907 auf Deutschland*, ed. L. Stern, x i -l x x vi. Berlin: Rütten & Loening.

Stevenson, John. 1977. "The Queen Caroline Affair." In *London in the Age of Reform*, ed. J. Stevenson, 117-14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79.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England, 1700-1870*. London: Longman.

Stewart, Robert. 1971. *The Politics of Protection: Lord Derby and the Protectionist Party, 1841-1852*.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Stieg, Margaret F. 1986.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Historical Periodicals*. Tuscaloosa: Univ. of Alabama Press.

Stigler, George J. 1965. "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51-65.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Stites, Richard. 1957.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Women." In *Connecting Spheres: Women in the West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ed. M. Boxer and J. Quataert, 246-255.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1978.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Stocking, George W., Jr. 1971. "What's in a Name? The Origins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Man*, n. s., 6, no. 3 (September) : 369-390.

Stoddard, Lothrop. 1920.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Supremac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Stokes, Eric. 1959.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0. "Bureaucracy and Ideology: Britain and Ind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30: 131-156.

Stolcke, Verena. 1981. "Women's Labours: The Naturalis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Women's Subordination." In *Of Marriage and the Market: Women's Subordination Internationally and Its Lessons*, ed. K. Young et al., 159-177. London: CSE Books.

Storr, Marthe Severn. 1932. *Mary Wollstonecraft et le mouvement féministe dans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Strandmann, Hartmut Pogge von. 1969. "Domestic Origins of Germany's Colonial Expansion under Bismarck."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 140-159.

Struminger, Laura S. 1984. "The Legacy of Flora Tris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7, no. 2 (May/June) : 232-247.

Stuart, Robert. 1992. *Marxism at Work: Ideology, Class and French Socialism during the Third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türmer, Michael. 1977. "Krise, Konflikt, Entscheidung, die Sache nach dem neuen Cäsar als europäische Verfassungsproblem." In *Le Bonapartisme, phénomène historique et mythe politique*, ed. K. Hammer and P.C. Hartmann, 102-118. Munich: Artemis Verlag.

Suel, Marc. 1953. "L'Adresse et sa discussion de 1814 à 1830."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 n. s., 3, no. 11 (July-September) : 176-188.

Sugihara, Kaoru. 1986. "Patterns of Asi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1880-1913." In *The Emergence of a World Economy, 1500-1914: Papers of the IX.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nomic History*, by W. Fischer et al., 2: 709-746.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Super, R. H. 1977. "The Humanist at Bay: The Arnold-Huxley Debate." In *Nature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ed. U. C. Knoepfelmacher and G. B. Tennyson, 231-245.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Swingewood, Alan. 1970. "Origins of Sociology: The Case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1, no. 2 (June) : 164-180.

Sydie, Rosalind A. 1991. "From Liberal to Radical: The Work and Life of Mary Wollstonecraft." *Atlantis* 17, no. 1 (Fall-Winter) : 36-51.

Sykes, Robert. 1988. "Trade Unionism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of General Unionism, 1829-1834." In *British Trade-Unionism, 1750-1850*, ed. J. Rule, 178-199. London: Longmans.

Sztejnberg, Maxime. 1963. "La Fondation du Parti Ouvrier Beige et le ralliement de la classe ouvrière a l'action politiqu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8, pt. 2, 198-215.

Talmon, J. H. 1952.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Seeker & Warburg.

Taricone, Fiorenza. 1992. "Cronologia per una storia sociale femminile, dall'Unità al fascismo." *Il Politico*, no. 162 (April-June) : 341-364.

Tarlé, Eugène. 1929. "L'insurrection ouvrière de Lyon." 3 pts. *Revue marxiste*, no. 2 (March) : 132-153; no. 3 (April) : 265-294; no. 4 (May) : 412-428.

Taylor, Arthur J. 1960. "Progress and Poverty in Britain, 1780-1850: A Reappraisal." *History* 45, no. 153 (February) : 16-31.

———. 1972. *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Taylor, Barbara. 1983.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Pantheon.

———. 1992.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the Wild Wish of Early Feminism."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33 (Spring) : 197-219.

Taylor, Edward B. 1920.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J. P. Putnam.

Taylor, Keith. 1982.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Utopian Socialists*. London: Frank Cass.

Temperley, Harold. 1925a.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 1822-1827*. London: G. Bell & Sons.

———. 1925b. “French Designs on Spanish America in 1820-5.”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40, no. 158 (January) : 34-53.

Terlinden, Charles. 1922.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de Guillaume 1er, roi des Pays-Bas en Belgique (1814-1830) .” *Revue historique*, 47e année, C X X X I X (January-April) : 1-40.

Therborn, Göran. 1974. *Science, Class, and Society: On the Formation of Soci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öteborg: Tryck Revo Press.

Théret, Bruno. 1989. “Régimes économiques de l’ordre politique.” Doctorat d’Etat en Science Economique, Université Paris-I Panthéon-Sorbonne. 2 vols.

———. 1991. “Le Système fiscal français libéral du X I X e siècle, bureaucratie ou capitalisme? ” *Etudes et documents* 3: 137-224.

Theriot, Nancy M. 1993. “Women’s Voi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Discourse: A Step toward Deconstructing Science.” *Signs* 19, no. 1 (Autumn) : 1-31.

Thibert, Marguerite. 1926. *Le Féminisme dans le socialisme français de 1830 à 1850*. Paris: Marcel Giard.

Tholfsen, Trygve R. 1961.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Victorian Eng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6, pt. 2, 226-248.

———. 1976.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Thomas, Edith. 1948. *Les Femmes en 1848: Collection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Thomis, Malcolm I. 1970. *The Luddites: Machine-Breaking in Regency England*. Newton Abbot, Devon, UK: David & Charles.

Thomis, Malcolm I., and Peter Holt. 1977. *Threats of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89-1848*. London: Macmillan.

Thompson, Dorothy. 1976. "Women and Nineteenth-Century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Women*, ed. J. Mitchell and A. Oakley, 112-138. Baltimore: Penguin.

———. 1984. *The Chartists: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Temple Smith.

Thompson, E. P. 1997. *The Romantics: England in a Revolutionary Age*. New York: New Press.

Thompson, F. M. L. 1963.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Thompson, Victoria, 1996. "Creating Boundaries: Homosexuality and the Changing Social Order in France, 1830-1870."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ed. Joan Wallach Scott, 398-428.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Thompson, William. 1983. *Appeal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 Women, 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 Men, 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 and Hence in Civil and Domestic Slavery. London: Virago.

Thönnessen, Werner. 1973.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63-1933*. London: Pluto Press.

Thyssen, A. Pontoppidon. 1980.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Danish Monarchy 1800-1864,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In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ed. R. Mitchison, 31-45. Edinburgh: John Donald.

Tickner, Lisa. 1987. *The Spectacle of Women: Imagery of the Suffrage Campaign, 1907-1914*. London: Chatto & Windus.

Tilly, Charles. 1964.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s of Paris: An Essay on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 *Social Problems* 12, no. 1 (Summer) : 99-121.

———. 1972. "How Protest Modernized in France, 1845-1855." In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ed. W. O. Aydelotte et al., 192-25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Four Centuries of Popular Struggl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 Press.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Tilly, Charles, and Lynn Lees. 1974. "Le Peuple de juin 1848." *Annales, E. S. C.* 29, no. 5 (September-October) : 1061-1091.

Tilly, Richard H. 1990. *Vom Zollverein zum Industriestaat: Die wirtschaftlichsozial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1834 bis 1914*.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Tissot, Louis. 1948. "Les Événements de 1848 dans les pays du Nord."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1: 373-400. Paris: Éd. du Minuit.

Tixerant, Jules. 1908. *Le Féminisme à l'époque de 1848, dans l'ordre politique et dans l'ordre économique*. Paris: V. Giard & E. Brière.

Todorov, Tzvetan. 1989. *The Deflec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

Tomaszewski, Jerzy. 1993.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Po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 ed. M. Teich and R. Porter, 293-3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Tønnesson, Kåre D. 1978. *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 Mouvement populaire et réaction bourgeoise en l'an III*. Oslo: Presses Univ. d'Oslo.

Torstendahl, Rolf. 1993.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since 1800: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Essays*, ed. S. Rothblatt and B. Wittrock, 109-1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Toutain, Jean-Claude. 1987. "Le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1982."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Cahiers de l'I. S. M. E. A.*, ser. AF 15, 21, no. 5 (May) .

Treble, J. H. 1973. "O'Connor, O'Connell and the Attitudes of Irish Immigrants towards Chartism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1838-48." In *The Victorians and Social Protest: A Symposium*, ed. J. Butt and I. F. Clarke, 33-70. Newton Abbot, Devon, UK: David & Charles; Hamden, CT: Archon Books.

Tribe, Keith. 1988. *Governing Economy: The Reformation of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2005.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In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Victorian Britain*, ed. M. Daunt, 115-137.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Tristan, Flora. 1846. *L'Emancipation de la femme ou le testament de la paria*. Ouvrage posthume, complété d'après ses notes et publié par A. Constant Éd. Paris.

———. 1983. *The Workers' Union*.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Trouillot, Michel-Rolph. 1991. "Anthropology and the Savage Slot: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Otherness."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ed. T. G. Fox, 17-44.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1995. *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Tudesq, André-Jean. 1964. *Les Grands notables en France (1840-1849) : Etude historique d'une psychologie sociale*.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Tuñón de Lara, Manuel. 1972.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la historia de España*. Madrid: Taurus.

Turin, Yvonne. 1989. *Femmes et religieuses au XI^e siècle: Le Féminisme "en religion."* Paris: Éd. Nouvelle Cité.

Turner, R. Steven. 1974. "University Reformers and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Germany, 1760-1806." In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ed. L. Stone, 2: 495-53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80. "The Prussian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cept of Research." *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e* 5: 68-93.

Twelmann, Margrit. 1972. *Die deutsche Frauenbewegung: Ihre Anfänge und erste Entwicklung*. Vol. 2, *Quellen 1843-1889*. Marburger Abhandlungen zur Politischen Wissenschaft, vol. 17, no. 1-2. Meisenheim-am-Glan, Germany: Verlag Anton Hain.

Valensi, Lucette. 1977. "Nègre/Negro: Recherches dans les dictionnaires français et anglais du X^{VI}^e au XI^e siècles." In *L'Idée de race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ed. P. Guiral and E. Temine, 157-170. Paris: Éd. du CNRS.

———. 1993. *The Birth of the Despot: Venice and Sublime Por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van der Linden, Marcel.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Labour Movement, 1830-1940*, ed. F. Holthoon and M. van der Linden, 323—335. Leiden: E. J. Brill.

———. 1989. “Pourquoi le déclin d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était-il inéluctable? ” *Cahiers d’histoire de L’I. R. M.*, no. 37, 125-131.

van Kalken, Frans. 1930. “La révolution de 1830, fut-elle prolétarienne? .” *Le Flambeau* 13, nos. 1-2 (January) : 45-54.

Veblen, Thorstein. 1964a [1918].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 1964b [1915].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Vellacott, Jo. 1987.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3 (Spring) : 81-101.

———. 1987. “Lecteurs forts et secteurs faibles dans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s années 1860: Une simulation économétrique.” In *Le capitalisme français, 19e-20e siècle: Blocages et dynamismes d’une croissance*, ed. P. Fridenson and A. Straus, 151-173. Paris: Fayard.

Verley, Patrick. 1989. *L’Industrialisation, 1830-1914: Nouvell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Vol. 2. Paris: La Découverte.

Vermeil, Edmond. 1948a. “Pourquoi la tentative de 1848 a-t-elle échoué en Allemagne? ” *Revue socialiste*, n. s., nos. 17-18 (January-February) : 99-106.

———. 1948b. “Un Paradoxe historiqu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n Allemagne.” In *Le Printemps des peuples: 1848 dans le monde*, ed. F. Fejtö, 2: 9-63. Paris: Éd. du Minuit.

Veysey, Lawrence R. 1965.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 1979. “The Plural Organized World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America, 1860-1920*, ed. A. Oleson and J. Voss, 51-106.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Vidal, Cesar. 1931. *Louis-Philippe, Metternich et la crise italienne de 1831-1832*. Paris: E. de Boccard.

Vigier, Philippe. 1977. “Le Bonapartisme et le monde rural.” In *Le Bonapartisme, phénomène historique et mythe politique*, ed. K. Hammer and P. C. Hartmann, 11-21. Munich: Artemis Verlag.

Villieus, Marc de Baron. 1910. *Histoire des clubs de femmes et des Régions d'Auragones, 1793-1848-1871*. Paris: Plon.

Vincent, Gérard. 1987. *Sciences Po: Histoire d'une réussite*. Paris: Éd. Olivier Orban.

Vincent, J. R. 1981. “The Parliamentary Dimension of the Crimean War.”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31: 37-49.

Viner, Jacob. 1927.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5, no. 2 (April) : 198-232.

———. 1949. “Bentham and J. S. Mill: The Utilitarian Backgrou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9, no. 2 (March) : 360-382.

———. 1960.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October) : 45-69.

Vogel, Lise. 1983.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 Press.

von Laue, Theodore H. 1953. "The High Cost and the Gamble of the Witte System: A Chapter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3, no. 4 (Fall) : 425-448.

———. 1961. "Russian Peasants in the Factory, 1892-190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1, no. 1 (March) : 61-80.

———. 1964. "Russian Labor between Field and Factory, 1892-1903."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 3: 33-65.

Vovelle, Michel. 1993. *La Découverte de la politique: Géo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La Découverte.

Waelti-Walters, Jennifer. 1990. *Feminist Novelists of the Belle Epoque: Love as a Lifestyl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Wagner, Donald O. 1931-1932. "British Economists and the Empire." 2 p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6, no. 2 (June 1931) : 248-276; 47, no. 1 (March 1932) : 57-74.

Walker, Kenneth O. 1941.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 no. 2 (November) : 168-177.

Walker-Smith, Derek. 1933. *The Protectionist Case, 1840-184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Walkowitz, Judith R. 1982. "Male Vice and Feminist Virtue: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stit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13 (Spring) : 79-90.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9.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3,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1995. “Three Ideologies or One? The Pseudo-Battle of Modernity.” In *After Liberalism*, 72-92. New York: New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et al.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Walmsley, Robert. 1969. *Peterloo: The Case Reopened*.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 Press.

Ward, J. T. 1962. *The Factory Movement, 1830-1855*. London: Macmillan.

———. 1973. *Chartism*. London: B. T. Batsford.

Ward-Perkins, C. N. 1950. “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47.”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 s., 2, no. 1 (January) : 75-94.

Ware, Vron. 1992. *Beyond the Pale: White Women, Racism, and History*. London: Verso.

Washington, Joseph R., Jr., ed. 1984. *Jews in Black Perspectives: A Dialogue*. Rutherford,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 Press.

Watson, George. 1973. *The English Ideology: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Victorian Politics*. London: Allan Lane.

Webster, C. K. 1925.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1815-1822: Britain and the European Alliance*. London: G. Bell & Sons.

———. 1931.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1812-1815: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London: G. Bell & Sons.

Wehler, Hans-Ulrich. 1970.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1890." *Past and Present*, no. 48 (August) : 119-155.

———. 1971. *Sozialdemokratie und Nationalstaat: Nationalitätenfrage in Deutschland, 1840-1914*. 2nd ed., rev.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1985.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Leamington Spa, UK: Berg.

Weigall, David. 1987. *Britain and the World, 1815-1986*.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Weil, Cdt. Maurice-Henri. 1919. *Metternich et l'Entente Cordiale, une dépêche inédite, les manœuvres et les inquiétudes du Chancelier*. Paris: Auguste Picard.

———. 1921. *Guizot et l'Entente Cordiale*. Paris: Félix Alcan.

Weill, Georges. 1913. "Les Saint-Simoniens sous Napoleon III." *Revue des études napoléoniennes*, 2e année, III (May) : 391-406.

———. 1924. *Histoire du mouvement social en France (1852-1924)*. 3rd ed, rev. Paris: F. Alcan.

———. 1930. *L'Eveil des nationalités et le mouvement libéral (1815-*

1848) . Paris: Lib. Felix Alcan.

Weindling, Paul. 1989. "The 'Sonderweg' of German Eugenics: N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2, pt. 3, no. 74 (September) : 321-333.

Weingart, Pater. 1989. "German Eugenics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Science in Germany, The Intersection of Institutional Intellectual Issues*, ed. K. M. Olesko, 260-282. *Osiris*, 2nd ser., 6.

Weisz, George. 1979. "L'Idéologie républicaine et les sciences sociales: Les durkheimiens et la chaire d'histoire d'économie sociale à la Sorbonn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 no. 1 (January-March) : 83-112.

Wengenroth, Ulrich. 1994. *Enterprise and Technology: The German and British Steel Industries, 1865-18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Werner, Karl Ferdinand. 1977. Preface to *Le Bonapartisme, phénomène historique et mythe politique*, ed. K. Hammer and P. C. Hartmann, ix- x ii . Munich: Artemis Verlag.

White, R. J. 1950.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ed. R. J. White, 1-24. London: Nicholas Kaye.

———. 1973 [1957]. *Waterloo to Peterloo*.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Willard, Claude. 1965.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en France (1893-1905) : Les Guesdistes*. Paris: Éd. Sociales.

———. 1971. *Le Socialisme de la Renaissance à nos jours*.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 1978. *Socialisme et communisme français*. Rev. ed. Paris: Lib. Armand Colin.

Williams, Glamor. 1980. "Wales: The Cultural Bases of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Nationalism." In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ed. R. Mitchison, 119-129. Edinburgh: John Donald.

Williams, Gwyn A. 1982. "Druids and Democrats: Organic Intellectuals and the First Welsh Radicalism." In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ed. R. Samuel and G. S. Jones, 246-27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illiams, Judith Blow. 1972. *British Commercial Policy and Trade Expansion, 1750-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83.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With new prefa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Williamson, Jeffrey G. 1962. "The Long Swing: Comparis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Balance of Payments, 1820-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2, no. 1 (March) : 21-46.

Willson, A. Leslie. 1964. *A Mythical Image: The Ideal of India in German Romanticism*.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Wilson, Charles. 1965. "Economy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18, no. 1 (August) : 183-198.

Winterarl, Barry D., and Stanley N. Katz. 1987. "Foundations and Ruling Class Elites." *Daedalus*, no. 1 (Winter) : 1-39.

Winch, Donald. 1963.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Case for Colonization." *Economica*, n. s., 43rd year, vol. 30, no. 120 (November) : 387-399.

———. 1965.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lonies*. London: G. Bell & Sons.

———. 1990. "Economic Knowledge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Som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In *State and Economic Knowledge: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ed. M. O. Furner and B. Supple, 40-4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Wittrock, Björn. 1993.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since 1800: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Essays*, ed. S. Rothblatt and B. Wittrock, 303-3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Wolff, Richard J. 1986. "Christian Democracy and Christian Unionism in Italy, 1890-1926." *Italian Quarterly* 27, no. 103 (Winter) : 49-57.

Wood, George H. 1909. "Real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Comfort Since 1850."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72, pt. 1 (March 31) : 91-103.

Woolf, Stuart. 1989. "French Civilization and Ethnicity in the Napoleonic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no. 124 (August) : 96-120.

———. 1991. *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Chapman & Hill.

———. 1992. "The Construction of a European World-View in the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Years." *Past and Present*, no. 137 (November) : 72-101.

Wright, Gordon. 1938. "The Origins of Napoleon III's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9, no. 1 (November) : 64-67.

Wright, H. R. C. 1955.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816-30*.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Vincent. 1975. "The Coup d'Etat of December 1851: Repression and the Limits to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ed. R. Price, 303-333. London: Croom Helm.

Wurms, Renabe. 1983. "Kein einzig Volk von Schwestern: Frauenbewegung 1890-1914." I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auenbewegung*, ed. F. Hervé, 41-83. Cologne: Pahl-Rugenstein.

Yaari, Aryeh. 1978. *Le Défi national* Vol. 1, *Les Théories marxistes sur la question nationale à l'épreuve de l'histoire*. Paris: Éd. Anthropos.

———. 1979. *Le Défi national* Vol. 2, *Les Révolutions éclatées*. Paris: Éd. Anthropos.

Yeo, Eileen. 1981. "Christianity in Chartist Struggle, 1838-1842." *Past and Present*, no. 91 (May) : 109-139.

———.1982. “Some Practices and Problems of Chartist Democracy.”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1860*, ed. J. Epstein and D. Thompson, 345-380. London: Macmillan.

Yeo, Richard R. 1993. *Defining Science: William Whewell, Natural Knowledge and Public Debate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Yeo, Stephen. 1977. “A New Life: The Religion of Socialism in Britain, 1883-1896.” *History Workshop*, no. 4 (Autumn) : 5-56.

Zagatti, Paola. 1988. “Colonialismo e razzismo: Immagini dell’Africa nella pubblicistica postunitaria.” *Italia contemporanea*, no. 170 (March) : 21-37.

Zak, L. A. 1971. “Die Grossmächte und die deutschen Staaten am Ende der napoleonischen Krieg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 no. 11, 1536-1547.

Zeldin, Theodore. 1958.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on III*. London: Macmillan.

———. 1959. “English Ideals in French Politic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Journal* 2, no. 1, 40-58.

———. 1967. “Higher Education in France, 1848-194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 no. 3 (July) : 53-80.

———. 1979. *France, 1848-1945*. Vol. 1, *Politics and Ang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Zévaès, Alexandre. 1953. "La Fermentation sociale sous la Restauration et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 n. s., 3, no. 11 (July-September) : 206-234.

Ziolkoski, Theodore. 1990. *German Roman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Zolberg, Aristide R. 1972. "Moments of Mad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2, no. 2 (Winter) : 183-207.

———. 1999. "The Great Wall against China: Responses to the First Immigration Crisis, 1885-1925." In *Migration, Migration History, History: Old Paradigms and New Perspectives*, ed. J. L. Lucassen, 291-315. Bern: Peter Lang.

Zubrzycki, J. 1953. "Emigration from Polan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Population Studies* 6, no. 3 (March) : 248-272.

Zylberberg-Hocquard, Marie-Hélène. 1978. *Féminisme et syndicalisme en France*. Paris: Anthropos.

索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系原著页码，检索时请查阅本书正文页边码）

我是按照某些常规来编制这个索引的。在国家或大陆内部的地区；君主和总统的名字；仅仅是指一个特定国家的事件、集团或法律作为子范畴被辑录在较大的实体下。不过，海外殖民地和城市单独列出，正如除了君主或总统之外的其他人物那样。进一步而言，被用于在多个条目下讨论某种现象的一般性范畴将单独列出其条目，涉及多个国家的现象、诸如条约或战争将在它们最常见的名称下单独列出。

A

Abd-el-Kader, 阿卜杜·卡迪尔 86

Abel, Wilhelm, 威廉·阿贝尔 63

Abensour, Léon, 莱昂·阿邦苏尔 193

Aberdeen, 4th Earl of (George Hamilton-Gordon), 第四任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82, 127

Abrams, Philip, 菲利普·艾布拉姆斯 225, 252-53

Abrey, Jane, 珍妮·阿布蕾 150, 152, 193

Absolutism, xiv, 绝对君主制 7, 12, 16, 24, 62, 80, 85, 111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127

Adams, Herbert Baxter, 赫伯特·巴克特斯·亚当斯 233

Adas, Michael, 米歇尔·亚达斯 265, 267

Adler, Laure, 劳尔·阿德勒 193, 196

Adrianople, Treaty of, 《亚得里亚堡条约》 62

Africa, 非洲 86

Guinea Coast, 几内亚沿岸 121

Scramble for, 瓜分 xvi, 16, 121, 131

West Africa, xv, 西非 15, 128, 276

Ageron, Charles-Robert, 查尔斯-罗伯特·阿格荣 215

Aguet, Jean-Pierre, 让-皮埃尔·阿盖 81

Agulhon, Maurice, 莫里斯·阿居隆 16, 108, 141

Aix-la-Chapelle, 亚琛 55

Albistur, Maïté, 梅泰·阿尔比斯图尔 191, 194

Albert, Prince, 阿尔伯特亲王 225

Alexander, Sally, 萨利·亚历山大 185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61, 85-86, 127

Aliens, 外国人 82, 126, 144-45, 154, 171, 195, 209

Allen, Ann Taylor, 安·泰勒·艾伦 196, 201

Amar, André, 安德烈·阿玛尔 150-51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EA), 美国经济学会 250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劳工联合会 18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国社会学杂志 257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美国政治学会 263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SSA), 美国社会科学协会
228-29

American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 (AWSA), 美国妇女选举
权协会 206

America (the Americas), 美洲 31, 58, 99

Caribbean, 加勒比地区 130

Central, 中美洲 130

Latin, 拉丁美洲 30, 43, 54-55, 58, 68, 111, 121, 264

North, 北美洲 54, 70, 98, 162, 275

America (the Americas) (continued)

South, 南美洲 30, 54-55

Spanish, 西属美洲 54, 56

See also United States 也见美国条目

Aminzade, Ronald, 罗纳德·阿明扎德 164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112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11, 27, 42, 60, 64, 79, 112, 131, 149-50, 152, 155, 164, 196

Anderson, Benedict, 本尼迪克·安德森 184, 211

Andreucci, Franco, 弗兰科·安德鲁奇 180

Andrews, John R., 约翰·R.安德鲁斯 181-82, 190

Anglo-Chinese Wars, 中英战争 120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Chevalier-Cobden Treaty, 1860), 英法商业条约 (谢瓦利埃-科布登条约) 105, 116, 122-23, 125

Anglo-Saxons, 盎格鲁-撒克逊 128, 215

Anglo-Turkish Commercial Convention (1838), 英土商业协定 121

Année sociologique, L', 社会学年鉴 253

Anteghini, Alessandra, 亚力山德拉·安特基尼 195

Anthropology, 人类学 213-14, 222, 264-73

Antiracism. *See* Racism 反种族主义，也见种族主义条目

Anti-Semitism, 反犹太种族主义 58, 210, 268

Anti-statism. *See* Statism 反对中央集权统制经济，也见中央集权统制经济条目

Antisystemic movements, 反现存体制运动 xvi, 147, 159, 161, 229, 276

Antwerp, 安特卫普 65, 67, 70

Applewhite, Harriet B., 哈丽特·B.阿普怀特 150, 152

Apponyi, Comte Antoine, 安托万·阿波尼伯爵 63, 87

Aquinas, St. Thomas, 圣托马斯·阿奎纳 221

Archaeology, 考古学 238

Argentina, Republic of La Plata, 阿根廷，拉普拉塔共和国 54

Aristocracy, 贵族 15, 22, 26, 40, 45, 47, 53, 61, 71-72, 78-79, 83, 87, 91, 93, 97-98, 104, 144, 149, 151-52, 162, 168, 210-11, 229, 232, 274

Arnold, Matthew, 马修·阿诺德 225

Aron, Raymond, 雷蒙·阿隆 234-35

Arrighi, Giovanni, 吉奥瓦尼·阿瑞吉 v

Artisans. *See under* Classes 手工业者，也见下层阶级条目

Aryan, 雅利安人 214, 253

Ashley, Lord Anthony, 安东尼·艾希里勋爵 100

Ashley, William James, 威廉·詹姆斯·艾希里 179

Asia, 亚洲 31, 128

East, 东亚 xvi, 16

Far East, 远东 121

South, 南亚 214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 Progrès des Sciences Sociales, 国际
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协会 219

Atheism, 无神论 119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刊 208

Auclert, Hubertine, 于贝蒂娜·奥克莱尔 190, 195, 199-20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126, 203

Queensland, 昆士兰 121

Austria, 奥地利 39, 42, 63-64, 87, 95, 114, 119, 131, 159,
191

Austrian Netherlands, 奥属尼德兰 63, 66

Bohemia, 波希米亚 94

Joseph II, Emperor, 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 64

Suffrage, 选举权 191

Aydelotte, William O., 威廉·O.艾德洛特97, 115

B

Bagehot, Walter, 沃尔特·白芝浩 103, 133

Bairoch, Paul, 保罗·贝洛赫 31-32, 118, 122-24

Baker, Keith Michael, 基思·迈克尔·巴克 143, 222

Baker, Robert, 罗伯特·贝克 97

Bakunin, Mikhail, 米哈伊尔·巴枯宁 171

Balance of power, 制衡 15, 21, 39, 44, 95-96

Balibar, Étienne, 艾蒂安·巴里巴尔 210

Balkans. *See under* Europe 巴尔干, 也见南欧条目

Ballanche, Pierre-Simon, 皮埃尔-西蒙·巴兰榭 23

Banks, Olive, 奥利弗·班克斯 151, 192, 207

Bannerji, Himani, 西玛尼·班奈尔吉269

Banque de Belgique, 比利时银行 109

Banque de France, 法国银行 110

Barings Bank, 巴林银行 108

Barkan, Elazar, 埃拉扎尔·巴尔坎 213

Barre, Raymond, 雷蒙·巴尔 106

Bartier, John, 约翰·巴蒂尔 88

Barzun, Jacques, 雅克·巴尔赞 56-57, 131, 140

Basch, Françoise, 弗朗索瓦·巴什 203

Baster, Albert, 阿尔伯特·巴斯特 129

Bastid, Paul, 保罗·巴斯蒂 3

Basutoland, 巴苏陀兰 121

Bayly, C.A., C.A.贝里 27, 53, 126

Bebel, August, 奥古斯特·倍倍尔 177-78, 189

Bédarida, François, 弗朗索瓦·贝达里达 165, 184

Bederman, Gail, 盖尔·比德曼 215-16

Beecher, Henry Ward, 亨利·沃德·比彻 206

Belgium, 比利时 17, 29-30, 37, 62-71, 73, 75, 84-85, 87-88, 102, 105, 109, 114, 119, 122, 149, 157, 173, 264

Austrian Netherlands, 奥属尼德兰 63, 66

Flanders, 佛兰德 65

Leopold I, 利奥波德一世 69, 88, 109, 149

Liège, 列日 64, 66

Malines, School of, 马利内学派 67

Suffrage, 选举权 191

Wallonia, 瓦隆尼亚 65-67

Belloni, Pier Paolo, 皮尔·保罗·布兰尼 180

Beloff, Max, 马克斯·贝洛夫 22-23, 89

Bendix, Reinhard, 赖因哈德·本迪克斯 170, 174

Bénéton, Philippe, 菲利普·贝内东 2, 12, 48, 60, 139, 239

Benson, Donald R., 唐纳德·R.本森 225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6, 8-10, 15, 17, 100-101, 114-15, 132, 137

Benthamism, 边沁主义 15, 53, 114-15. *See also under* Great Britain
也见英国条目

Berg, Barbara J., 巴巴拉·J.伯格 204, 207

Berg, Maxime, 马克西米·博格 185

Berlin, 柏林 88, 193, 230, 248

Bernal, Martin, 马丁·贝尔纳 57-58, 268, 270

Bernard, Jessie, 杰西·伯纳德 227

Bernard, L. L., L.L.伯纳德 227

Bernstein, Eduard, 爱德华·伯恩斯坦 177-78, 180, 184

Bertier de Sauvigny, G. de, 贝蒂埃·德·苏维涅 2

Bessemer, Sir Henry, 亨利·贝塞麦爵士 104

Betley, Jan Andrzej, 让·安杰依·贝特利 65-69

Betts, Raymond F., 雷蒙德·F.贝茨 273

Bezucha, Robert J., 罗伯特·J.伯祖查 80-82

Biagini, Eugenio F., 欧金尼奥·F.比亚吉尼 102, 168

Bidelman, Patrick K., 帕特里克·K.比德尔曼 195, 199

Bigaran, Maria Pia, 玛丽亚·皮娅·比加兰 203

Billington, James H., 詹姆斯·H.比灵顿 1-2, 23-24, 47, 56,
136, 146-49

Binary categories. 二元范畴 See Civilization vs. barbarism 也见文明对野蛮条目

Birmingham, 伯明翰 45

Bismarck, Otto van, 奥托·冯·俾斯麦 36, 93, 131, 135, 174,
177-78, 231, 250

Blackburn, Robin, 罗宾·布莱克伯恩 27, 119-20, 154

Black Sea, 黑海 99, 129

Blacks, 153-54. 黑人 *See also* United States 也见美国条目

Blanc, Louis, 路易·勃朗 48, 61, 72, 85-86

Blanchard, Marcel, 马塞尔·布兰查德 93, 107

Blandford, Marquis of, 布兰福德侯爵 72

Blanqui, Louis Auguste,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 17, 57

Blocker, Jack S., Jr, 小杰克·S.布洛克 202

Blondel, Léon, 莱昂·布朗德尔 86

Blue, Gregory, xii, 格利高里·卜鲁 270

Bonald, Louis de, 路易·德·博纳尔 12-13, 18, 23, 47-48, 160, 212, 223, 251

Boon, H. N., H.N.布恩 108

Bortolotti, Franca Pieroni, 弗兰卡·皮尔罗尼·博尔托洛蒂 191

Botrel, J.-F., J.F.博特雷尔 166

Bougainville, Louis de, 路易·德·布甘维尔 127

Bouglé, Célestin, 谢莱斯廷·布格莱 193, 255

Bouillon, Jacques, 雅克·布永 90

Boulle, Pierre H., 皮埃尔·H.布尔 212

Bourgeoisie, xviii, 资产阶级 2, 8, 14, 23, 57, 59-61, 66, 75, 77-79, 90-94, 107-8, 123, 126, 146, 152-53, 155, 158, 162-64, 166-68, 170, 174, 177-78, 184, 189, 191, 196, 199-201, 211, 215-17, 219, 230, 252, 256, 259, 276

Bourgin, Georges, 乔治·布尔金 59-60, 90-91, 107, 116-17

Bourguet, Marie-Noëlle, 玛丽-尼勒·布尔盖 21

Bourguignon, François,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 37

Boutmy, Émile, 埃弥尔·布特密 258-62

Bouvier, Jean, 让·布维耶 36

Bouvier, Jeanne, 让娜·布维耶 112

Bowler, Peter, 彼得·鲍勒 236

Boyle, John W., 约翰·博伊尔 41, 167

Brassists, the, 布拉斯派 190

Brebner, J. Bartlett, 巴特利·J.柏莱柏诺 9, 17, 77, 100-101, 113, 129

Briavoine, Natalis, 娜塔利·布瑞阿瓦伊尼 63-64, 105

Bridges, Amy, 艾米·布里吉斯 162, 169, 178, 185

Briggs, Asa, 阿萨·勃里格斯 44-45, 51, 74-75, 83, 100, 103,

128, 133, 162

Bright, John, 约翰·布赖特 74, 88, 126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 225, 271

Brock, W. R., W.R.布罗克 43-46, 51

Broder, André, 安德列·布罗德 124

Brogie, Duc de, 布罗伊公爵 84

Bron, Jean, 让·布宏 181

Brook, Timothy, 蒂莫西·布鲁克 xiii

Broughan, Lord Henry, 亨利·布鲁厄姆勋爵 97, 274

Brown (e), Commodore William, 海军准将威廉·布朗 54

Browning, Elizabeth Barrett,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夫人 128

Bruhat, Jean, 让·勃吕阿 59, 81-82, 158

Bruneau, Charles, 查尔斯·布鲁瑙 2, 220

Brunet, Georges, 乔治·布吕内 78

Brunot, Ferdinand, 费迪南·布吕诺 2, 220

Brupbacker, Fritz, 弗里茨·布鲁贝克尔 189

Brussels, 布鲁塞尔 66, 88, 110, 229

Bruun, Geoffrey, 杰弗里·布鲁恩 18

Bruwier, Marinette, 马里内特·布吕维耶 64-65

Bryson, Gladys, 葛拉蒂斯·布瑞森 261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171

Buechler, Steven M., 史蒂文·M.伯克勒 206, 229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54

Buer, M. C., M.C.布尔 28

Buhle, Mari Jo, 玛丽·约·布尔 209

Bull, George, 乔治·布尔 100

Bulmer, Martin, 马丁·布尔默 257-58

Bulwer, Lord Henry, 亨利·布尔法爵士 95

Buonarroti, Filippo, 菲利普·邦纳罗蒂 60, 69

Burdeau, Georges, 乔治·布尔多 112

Burgess, John W., 约翰·W.伯盖司 257, 261-63

Burgess, Keith, 基斯·伯吉斯 175

Burke, Edmund, 埃德蒙·伯克 2, 5, 12, 25, 87, 139

Burke, Peter, 彼得·伯克 238-39

Burma, Lower, 下缅甸 121

Burn, Duncan L., 邓肯·L.伯恩 11

Burn, W. L., W.L.伯恩 113, 115, 125, 131

Burton, Antoinette M., 安托瓦内特·M.伯顿 207

Bury, J. P. T., J.P.T.伯里 87-88, 95

Byron, 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拜伦勋爵 (乔治·戈登·拜伦) 54

C

Cabet, Étienne, 艾蒂安·卡贝 86-87

Cahill, Gilbert A., 吉尔伯特·A.卡希尔 114

Cain, P.J., 34, P.J.凯恩 119

Caine, Barbara, 芭芭拉·凯尼 197, 201

Cairncross, A.K., A.K.凯恩克罗斯 113

Calhoun, Craig, 克雷格·卡尔霍恩 161, 164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加利福尼亚大学 272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221, 247, 249

Cameralism, 重商主义 246

Cameron, Rondo E., 龙多·E.卡梅伦 30-31, 34, 37, 106, 108-

11, 122-23

Campbell, Stuart L., 斯图尔特·L.坎贝尔91, 93

Canada, 加拿大 71, 98, 125, 129, 180

British Columbia, 英属哥伦比亚 121

Liberal Party, 自由党 180

Newfoundland, 纽芬兰 71

Quebec, 魁北克70

Victoria, 维多利亚 88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加拿大的沿太平洋铁路 128

Canning, George, 乔治·坎宁 54-56, 60, 68, 130

Cantimori, Delio, 德里奥·坎蒂莫里 17, 94-95

Canuts. 缫丝工人 *See under* France 也见法国条目

Capacity. 能力 *See under* Suffrage 也见选举权条目

Carlisle, Robert B., 罗伯特·B.卡莱尔 107

Carlson, Andrew R., 安德鲁·R.卡尔森 177

Carlyle, 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 18, 57, 125, 223, 225

Carrère d'Encausse, Hélène, 艾莱娜·卡莱尔-当戈斯 149

Casalini, Maria, 玛丽亚·卡萨利尼 199

Cashdollar, Charles D., 查尔斯·D.卡斯多拉 224

Castlereagh, Viscount Robert Stewart, 卡斯尔雷勋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子爵） 2, 39-42, 54-55

Catholicism, 天主教 4, 12-13, 18, 47, 50, 60-67, 70-72, 74, 85, 114, 132, 139, 152, 157-58, 169, 182, 190, 197-98, 202, 217, 221, 241-42, 246, 252, 267

Catholic University (Paris), 天主教大学（巴黎） 246

Catt, Carrie Chapman, 卡利·查普曼·卡特 206, 208

Cavaignac, Gen.Louis-Eugène,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将军 90-91

Cecil, Lord Hugh, 休·塞西尔勋爵 4, 15-16, 18

Cerati, Marie, 玛丽·瑟拉蒂 152

Césaire, Aimé, 艾梅·塞泽尔 90, 153-54, 183

Ceylon, 锡兰 126

Chabrol, Comte Christophe, 德·夏布洛尔伯爵 59

Chadwick, Edwin, 埃德文·查德威克 137

Chafetz, Janet Saltzman, 简娜特·萨尔兹曼·查菲兹 200

Chapelle-Dulière, Jacqueline, 杰奎琳·拉夏贝尔-迪利埃 250

Charte d'Amiens, 亚眠宪章 181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de,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
2, 23, 47, 57, 80

Chaumette, Pierre-Gaspard, 皮埃尔-加斯帕尔·索梅特 152

Checkland, E.O.A., E.O.A.切克兰德 114

Checkland, S.G., S.G.切克兰德 31, 114, 220, 247

Cheney, Edna B., 埃德娜·B.切尼 208

Chevalier, Louis, 路易·谢瓦利埃 161

Chevalier, Michel, 米歇尔·谢瓦利埃 112

Chicago, University of, 芝加哥大学 257

Chile, 智利 54

China, 中国 vii, 30, 57, 120, 123, 127, 130, 203, 267, 270-
71

Chlepner, B.-S., B-S.希兰普纳 66, 70, 108-9

Church, R.A., R.A.丘奇 104, 251

Church, Robert L., 罗伯特·L.丘奇 247-49, 261

Citizens, active-passive distinction, 公民, 对积极和消极公民的区
分 145-47, 160, 164, 182, 188, 193, 197, 200, 205, 211, 225

Civilization vs.barbarism, 文明对野蛮 80, 84, 126, 146-47, 156, 158, 197, 216-17

Clapham, J.H., J.H.克拉潘40, 45, 50, 52, 102-5, 113, 119, 131

Clark, G.Kitson.基特森·G.克拉克 See Kitson Clark, G.也见基特森·克拉克条目

Clark, John Bates, 约翰·贝茨·克拉克 233

Clark, Terry N., 特里·克拉克 254-55

Class conflict, 阶级冲突 77-141, 155, 171, 225

Classes 阶级

Dangerous, 危险阶级 90, 132, 135-37, 140-41, 181-82, 212, 243, 259

Dominant strata, 统治阶级 79, 146, 153, 157, 166, 170, 172, 204, 260, 277

Middle 中间阶级 (see Bourgeoisie) (也见资产阶级条目)

Working 工人阶级

Artisans, 手工业者 60, 80-81, 84, 90, 103, 113, 158, 162-64, 167, 169

Workers, 工人 xviii, 25, 32-33, 37, 57, 59-60, 63-64, 66, 70, 79-83, 85-86, 89-90, 94, 114, 116-17, 133-36, 149, 154-55,

158, 161-72, 174-77, 180-90, 209, 212, 215

Mutual aid societies, 互助会 80

Classics, 古典 212, 226, 268

Clemens, Barbel, 巴贝尔·克莱门斯 197

Coates, Willson H., 威尔逊·H.科茨 114

Coats, Alfred William, 阿尔弗雷德·威廉·考特斯 247, 290

Coats, S.E., S.E.考特斯 247

Cobb, Richard, 理查德·科布 155

Cobban, Alfred, 阿尔弗雷德·科本 167

Cobden, Richard, 理查德·科布登 88, 98, 103, 119-20, 122, 126

Cochran, Thomas, 10th Earl of Dundonald, 托马斯·科克伦勋爵,
第十代邓唐纳德伯爵 54

Cochin, 科钦 130

Cohen, William B., 威廉·B.科恩 207, 211, 214, 216

Colbert, Jean-Baptiste, 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 65, 115

Colbertism, 柯尔贝尔主义 112

Colby College, 柯尔比大学 256

Cole, G.D.H., G.D.H.柯尔 13, 32, 51, 78, 107, 126-27, 159-

60, 175

Cole, Juan, 胡安·科尔 267

Cole, Stephen, 史蒂芬·科尔 229

Coleman, Bruce, 布鲁斯·科尔曼 45, 103, 105

Collè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221

Collins, Henry, 亨利·科林斯 183

Collins, Irene, 艾琳·柯林斯 79

Colman, H., H.科尔曼 37

Cologne, 科隆 230

Colonial scramble.瓜分殖民地 *See under Africa*也见非洲条目

Coloureds, 有色人群 149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257-58, 261-62, 265

Commons, John R., 约翰·R.康芒斯 181, 183

Communism, 共产主义 76, 84, 87-88, 93-94, 161, 163, 183,
195

Competence, as criterion for decision-making, 作为决策标准的能力
228, 232, 243, 249

Comte, Auguste, 奥古斯特·孔德 23, 69, 78, 232, 251-52,

256, 259

Concert of Europe. *See* Vienna, Congress of/Treaty of 欧洲协调, 也见维也纳会议/维也纳条约条目

Condliffe, J.B., J.B.康德利夫 28, 31, 43, 123, 125-26

Condorcet, Jean-Antoine Nicolas de Capitat, Marquis de, 让-安托万·尼古拉·卡利坦·马奎斯·德·孔多塞 149, 221, 226, 241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 法国工会联合会 181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2-6, 11-18, 23-25, 27, 43-44, 47, 49, 51, 58, 60-61, 66, 72, 74-75, 78, 86, 88, 92-93, 97, 99, 107, 111-13, 115-19, 129, 131-36, 138-41, 160-61, 170, 174-76, 191, 201-3, 207, 209, 219, 229, 237, 239-40, 242-43, 246, 251-52, 254-56, 260, 269

Enlightened, 开明的 43, 71, 92, 95, 112, 131, 161, 170

Constant, Benjamin, 邦雅曼·贡斯当 2, 6, 23-24

Constantine, Grand Duke, 康斯坦丁大公 63, 68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55, 73

Continental Blockade, 对欧洲大陆的封锁 64, 96, 118, 122

Conze, Werner, 维尔纳·康策 158, 169

Coornaert, Emile, 埃米尔·科尔奈尔 78

Coser, Lewis, 刘易斯·科塞 255-56

Cottureau, Alain, 阿兰·考克托 179

Couriau, Emma, 艾玛·库里欧 190-91

Cousin, Victor, 维克多·库赞 212

Coussy, Jean, 让·库西 105, 124

Cracow, 克拉科夫 87

Crafts, N.F.R., N.F.R.克拉夫茨 38

Cranborne, Lord,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
爵克兰伯恩勋爵 133

Crédit Foncier, 土地信贷银行 110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银行 109-11

Crick, Bernard R., 伯纳德·R.克里克 4, 58, 262-63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104, 128-31, 183, 229

Croats, 克罗地亚人 159, 239

Croce, Benedetto, 贝奈戴托·克罗齐 61, 80

Croker (Crocker), John Wilson, 约翰·威尔逊·克罗科尔 2, 97

Crouch, R.L., R.L.克劳奇 138

Crouz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克鲁泽 30, 38, 64, 122

Cruz Seoane, María, 玛丽亚·克鲁兹-塞瓦内 2, 148

Cuba, 古巴 130-31

Cullen Michael J., 迈克尔·J.库伦 227-28

Cunningham, Andrew, 安德鲁·坎宁安 222

Cunningham, William, 威廉·坎宁安 31, 118, 247-48

Czechs, 捷克人 99, 239

D

Dahrendorf, Ralf, 拉尔夫·达伦多夫 234-35, 262-63

Dale, Peter Allan, 彼得·阿兰·戴尔 225, 232

Darvall, Frank O., 弗兰克·O.达瓦尔 21, 32, 51, 137

Daumard, Adeline, 艾德琳·杜马 59-60, 78-80, 86, 112, 117

Davies, Emily, 艾米丽·戴维斯 267

Davis, Mary, 玛丽·戴维丝 214

Deacon, Desley, 德斯利·迪肯 203

Deane, Phyllis, 菲利斯·迪恩 32

Debs, Eugene V., 尤金·V·德布兹 207, 216

Decharneux, Baudouin, 博杜安·德沙讷 269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化 xiii, xv, 32, 54, 70

- D'Eglantine, Fabre, 法布尔·戴格朗丁 150
- DeGroat, Judith Ann, 朱迪特·安·德格洛特 185
- Deindustrialization.非工业化 *See* Industrialization 也见工业化条目
- Delacampagne, Christian, 克里斯蒂昂·德拉康帕涅 209, 212
- Delacroix, Eugène, 欧仁·德拉克洛瓦 186
- Delaive, Victor, 维克托·德莱弗 xviii
- De Lamartine, Alphonse,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 127
- De Maistre, Joseph, 约瑟夫·德·梅斯特勒 2, 47-48, 78, 162
- Demangeon, Albert, 阿尔伯特·德芒戎 24, 64
- Démier, Francis, 弗朗西斯·德米耶 122
- De Morgan, Augustus, 奥古斯都·德·摩根 222
- Demoulin, Robert, 罗伯特·德墨林 30, 65-68
- Denmark, 丹麦 97
- De Pisan, Christine,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152
- Derainne, Pierre-Jacques, 皮埃尔-雅克·德莱内 165
- Derby, Lord (Frederick Stanley, 16th Earl of Derby), 德比勋爵
(弗雷德里克·斯坦利, 第16代德比伯爵) 133-34
- Deroin, Jeanne, 珍妮·德深 193-94

Descoings, Richard, 理查德·德库安 258-60

Despotism, 专制主义 14-15, 23, 49, 54, 67, 97, 120, 126, 251, 268-71

Enlightened, 开明的 15, 269. *See also under* Conservatism 也见保守主义条目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德国社会学协会 263

Devance, Louis, 路易·德旺斯 195

Devleeshouwer, Robert, 罗贝尔·德弗莱苏维尔 64

Dhondt, Jean, 让·东特 64-65, 87

Dibble, Vernon, 维农·蒂波 258

Dicey, Albert Venn, 阿尔伯特·维纳·戴西 9

Dijkstra, Sandra, 桑德拉·迪杰斯特拉 194

Disraeli, Benjamin, 本杰明·迪斯雷利 99, 120-21, 130-31, 133-34, 138, 140, 174-75

Divine right of kings. 王权神授 *See* Absolutism 也见绝对君主制条目

Djordjević, Dimitrije, 迪米特里耶·德约贾维奇 159

Dohn, Hedwig, 赫德维希·董恩 196

Dolléans, Edouard, 爱德华·多莱昂 60, 81, 165, 168

- Donzelot, Jacques, 雅克·唐斯勒 24, 116, 201
- Dorfman, Joseph, 约瑟夫·朵夫曼 230, 250, 257
- Douglass,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206
- Drescher, Seymour, 西摩·德雷切 119
- Droit, Roger-Pol, 罗热-保尔·德鲁瓦 163, 226
- Droit de cité, 公民权 79, 83, 166. *See also* Suffrage 也见选举权条目
- Droz, Jacques, 雅克·德罗兹 158-59
- Dubofsky, Melvyn, 梅尔文·杜波夫斯基 180
- DuBois, Ellen Carol, 艾伦·卡罗尔·杜博瓦 199, 206
- Duffy, A.E.P., A.E.P.达夫 176
- Dunham, Arthur Louis, 阿瑟·路易斯·邓纳姆 123-24
- Dupont de Nemours, Pierre Samuel, 皮埃尔·萨缪尔·杜邦·德·内穆尔
154
- Dupuis, Charles, 查理·杜朴斯 41
- Durkheim, Emile, 爱弥尔·涂尔干 253-56
- Duruy, Victor, 维克多·杜卢伊 246
- Dutch East Indies, 荷属东印度 65-66, 126

Duverger, Maurice, 莫里斯·迪韦尔热 93-117

Dworkin, Anthony Gary, 安东尼·加里·德沃金 200

E

Economics, 经济学 15-16, 51-53, 88, 100-101, 113, 119, 126, 159, 228, 230, 24-45, 248-52, 255, 257

Economist, the, 《经济学家》 104

Eden Treaty (1786), 《伊顿条约》 118

Egypt, 埃及 57-58, 111, 218, 267-68, 270

Eisenstein, Elizabeth L., 伊丽莎白·L.爱森斯坦 60, 69

Eisenstein, Zillah R., 齐拉·R.爱森斯坦 200

Elesh, David, 大卫·埃列士 227

Ellis, John, 约翰·埃利斯 89-90, 161

Elton, Godfrey Lord, 哥弗雷·埃尔顿爵士 24, 47, 60

Elvin, Mark, 伊懋可 60

Elwitt, Sanford, 桑福德·埃尔维特 136, 252

Ely, Richard T., 理查德·T.埃利 182, 250, 257

Emerit, Marcel, 马塞尔·埃米利特 127

Endres, Robert, 罗伯特·恩德雷斯 94

Enfantin, Barthélemy Prosper, 巴特米尔·普罗斯比尔·昂方坦 107

Engel, Arthur, 亚瑟·恩格尔224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4, 188, 239

England.英格兰 *See* Great Britain 也见英国条目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5, 138, 148, 162, 202, 204, 211, 214, 239, 241, 260, 266, 270

Entente cordiale, 英法同盟 22, 70, 84-87, 121, 127-28

Equality, 平等 7, 23, 47, 64, 107, 114, 116, 138, 143-48, 153, 155, 163, 165, 186, 188, 190, 197, 199, 201, 211, 213, 215, 217, 221

Erfurt, 埃尔福特 178

Eugenics, 优生学 235-37

Eupen, 欧本 64

Europe, 欧洲 xii-xiii, 2, 21, 24, 27, 29-31, 39, 41-42, 44, 46, 49, 54-58, 60, 62-63, 65-66, 69, 72, 82, 84-85, 87-89, 92-96, 102-3, 110, 112, 115, 117-25, 129, 131, 134, 136, 141, 146-47, 156-57, 159, 165, 171, 173-75, 184, 192, 195, 198, 209-14, 220-21, 237, 240, 256, 260, 264-73

Central, 中欧 106, 141, 161, 209

Concert of (*see* Vienna, Congress of) 欧洲协调 (也见维也纳会议)

条目)

Continental, 欧洲大陆 28, 30-31, 39, 110, 114, 131, 170, 174, 195

Eastern, 东欧 42, 69-70, 98, 141

Latin, 拉丁欧洲 114

Northern (Scandinavia), 北欧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94, 264

Northwestern, 西北欧 95, 99

Revolutions of 1848, 1848年革命 8, 56, 86-89, 91-92, 95-96, 114, 118, 126, 141, 157-62, 168, 189, 194-98, 206, 240, 246 (*see also under France*) (也见法国条目)

Southern, 南欧 94

Western, 西欧 33, 69, 90, 98, 100

Evans, David Owen, 大卫·欧文·埃文斯 188, 200, 208

Evans, Eric J., 艾瑞克·J.埃文斯 9, 21-22, 25-26, 33-34, 43, 55, 69, 72, 83, 98, 100-101, 114, 118

Evans, Richard J., 理查德·J.埃文斯 189, 191, 199-202, 206, 209

F

Fabvier, Col., 法维耶上校 59

Fairlie, Susan, 苏珊·菲尔利 33, 97, 99

Faivre, Jean-Paul, 让-保罗·费弗尔 127-28

Family wage, 家庭工资 186-88

Faraday, Michael, 迈克尔·法拉第 235

Farnie, D.A., D.A.法尼 120-21, 125, 130

Fauriel, Claude, 克劳德·福列尔 59

Favre, Pierre, 皮埃尔·法瓦 260

Fay, C.R., C.R.费伊 20, 26, 32, 83, 101

Fay, Victor, 维克托·费伊 81, 177

Febvre, Lucien, 吕西安·费弗尔 24, 64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du Livre (FFTL), 法国图书工
作者联合会 187, 191

Fejtö, François, 弗朗索瓦·弗托 89, 94, 96, 103, 159

Feminist and suffragist movements. 女权和妇女选举权运动 *See*
Women 也见妇女条目

Ferguson, Adam, 亚当·弗格森 244

Ferrero, Guglielmo, 古列尔摩·费雷罗 199

Ferry, Jules, 朱尔·费里 242

Festy, Octave, 奥克塔夫·法斯蒂 80

Fetter, Frank W., 法兰克·W.菲特 50, 103, 244

Fichte, Johann Gottlieb,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240

First World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 *See* World War I 也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条目

Fisher-Gelati, Stephen, 斯蒂芬·费希尔-戈莱蒂 159

Fitzgerald, Vesey, 维奇·菲茨杰拉德 71

Flahant, Comte de, 弗拉奥伯爵 87

Flexner, Eleanor,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 207

Flinn, M.W., M.W.弗林 52

Fohlen, Claude, 克劳德·弗朗 123

Folbre, Nancy, 南希·佛伯尔 203

Foner, Eric, 埃里克·方纳 84, 180

Fontvieille, Louis, 路易·方特维雷 115

Forbes, Geraldine H., 杰拉尔丁·H.福布斯 199

Foreigners.外国人 *See* Aliens 也见外国人条目

Forman, Michael, 迈克尔·福尔曼 171-72

Fossaert, Robert, 罗贝尔·福萨尔 78

Foster, John, 约翰·福斯特 162, 183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202

Fould, Achille, 阿希尔·富尔德 123

Fourier, François Marie Charles, 弗朗索瓦·马利·夏尔·傅立叶 59

France, *passim*. 法国, 见文中多处

Amis des Noirs, 黑人之友 154

Assignats, 纸币 154

Avignon, 阿维尼翁 148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国家图书馆 195

Bicentennial (1989), 200周年 2, 49

Bonapartism, 波拿巴主义 47, 91-93, 106-7, 116, 117, 135, 157

Bourbons, 波旁王朝 41, 55, 85, 93

Cahiers de doléance, 陈情表 148-49

Canuts, 缫丝工人 76, 81, 165, 146

Catholic League, 天主教联盟 67

Champ de Mars massacre (1791), 广场惨案 180

Charles X, 查理十世 3, 8, 47, 55, 59-62, 72, 85, 127, 162-63

Charter of 1814, 1814年宪章 3, 46-47, 49, 60, 79

Collapse, political (1870), 政治崩溃 111

Committee on Public Safety, 公共安全委员会 150

Commune of Paris, 巴黎公社 135-36, 165, 171-72, 179, 189, 225, 241-42, 259

Comtat Venaissin, 罗讷河以东领土 148

Constitution of 1875, 1875年宪法 117

Council of Five Hundred, 教育议事会 152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Women and the Citizen, 妇女和公民权宣言 152

Dreyfus affair, 德雷福斯事件 254

Elba, Napoleon's return from (Hundred Days), 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恢复王位 (100天) 39, 46-47 (*see also* Waterloo) 也见滑铁卢条目

Enragés, 激进派 150

Estates-General, 三级会议 149-50

Fifth Republic, 第五共和国 115

Fourmies killings (1891), 富尔米杀戮 180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xv-xvi, 1-4, 13, 16, 21-23, 28, 50, 56-57, 60, 79, 82, 91-92, 105, 213, 217, 219-21, 225-26, 235, 240, 245, 259, 268, 275-77

Convention, 国民公会 149-55, 153-55

National Assembly, 国民大会 149, 153-55

Idéologues, 意识形态家 245

Jacobins, 雅各宾派 115, 150-52, 155

July Monarchy, 七月王朝 8, 10, 12, 22-23, 32, 60, 79, 82, 85-86, 89, 91, 94, 106, 108, 110, 115, 127, 145, 157, 166, 195, 241

July Revolution (*Trois glorieuses*) (1830), 七月革命 40, 47, 60-62, 66, 70, 72, 77, 79-81, 84-85, 139, 163, 186, 210, 241

La Marseillaise, 马赛曲 61

Legitimists, 正统王朝拥护者 12, 16, 47-50, 60-61, 66-67, 71-72, 75, 157, 163

Loi Le Chapelier, 谢普雷法 80, 82, 155

Louis XI, 路易十一 7

Louis XV, 路易十五 90

Louis XVI, 路易十六 8, 220

Louis XVIII, 路易十八 3, 41, 46-48, 55, 60, 62, 71, 85, 249 (*see also* Restoration) 也见复辟条目

Louis Napoleon (Napoleon III), 路易·拿破仑 (拿破仑三世) 36, 89-93, 106-8, 110, 112, 114, 116-17, 123-24, 129-36, 170, 258-59

Louis-Philippe, 路易-菲利普 3, 61-62, 67-68, 72, 87-90, 94-95, 105, 110, 127, 149, 157 (*see also* July Monarchy) 也见七月王朝
条目

Maximum, the, 最大限度地满足 155

Méline tariff, 梅利娜关税税则 124

Millerand, Pres.Alexandre, 亚历山大·米勒兰总统 180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48, 64, 116, 122

Orleans, House of, 奥尔良家族 87, 93

Orleanist monarchy 奥尔良王朝 (*see* July Monarchy) 也见奥尔良王朝

Party of Movement, 主张发动运动的政党 156

Party of Order, 秩序党 91, 108, 136, 156, 252

Philip the Fair, 美男子菲利普 150

Prince Napoleon, 拿破仑皇帝 117

Race gauloise vs. race franque, 高卢族对法兰克族 210

Republicans, 共和主义者 10, 16, 82, 91-93, 95, 117, 134-36, 163, 206

Restoration, 复辟 3, 5, 12, 46-50, 60, 71, 80, 105, 122, 162, 245

Revolution of 1848, 1848年革命 10, 16, 59, 75, 88-90, 93-94, 105, 107, 109-10, 112-13, 252

Social revolution, xviii, 社会革命 89-90, 92, 135-36, 157-62, 168, 246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period, 革命—拿破仑时期 1, 23-25, 29, 58, 105, 276

Royalists, 保皇分子 47-49, 92, 117, 135-36, 155, 169

Saint-Simonians, 圣西门主义者 16-18, 27, 78, 91, 106-8, 127, 135, 179, 193-94

Second Empire, 第二帝国 90-91, 93, 105-8, 110, 115-17, 127, 131, 134-36, 158, 169, 174

Second Republic, 第二共和国 116

Slavery, abolition of, 废除奴隶制 90, 181

Society of Republican-Revolutionary Women, 支持共和革命妇女协会 150

Suffrage, 投票权 7, 24, 48, 86, 89-90, 92-93, 116, 131, 133-34, 190

Suffrage censitaire, 纳税投票权 31, 86, 107

Terror, the, 恐怖 8, 24, 91, 152, 189

Third Republic, 第三共和国 115, 136, 189, 197, 241, 250,

254, 259

Tuppenny riot (*émeute de deux sous*) , 两苏骚乱 81

Ultras 极端保守派 (*see Legitimists*) 也见正统王朝拥护者

Vendée, 旺代 67

Volontaires du Rhône, 罗讷省志愿者 62

White Terror, 白色恐怖 47

Franco-German War (1870-1871) , 法德战争 134-35

Fraser, Derek, 德里克·弗雷泽 73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See Laissez-faire* 也见自由放任条目

Freedeman, Charles E., 查尔斯·E.弗里德曼 37

Freemasons, 共济会会员 198

Frei, Annette, 安内特·弗雷 189

Fulford, Roger, 罗杰·富尔福德 191-92, 204

Fur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孚雷 49

Furner, Mary O., 马利·O.费纳 233

G

Galbraith, John S., 约翰·S.加尔布雷思 125

Gallagher, John, 约翰·加拉格尔 121

Gallars, M., M.加拉斯 41

Gambia, 冈比亚 128

Garibaldi, Giuseppe, 朱塞佩·加里波第 183-84

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路易-安托万·加尼埃-巴热斯 78

Gash, Norman, 诺曼·盖什 4, 14, 42-43, 71-72, 74, 79, 83, 87-88, 101, 129-30, 138-39, 166

Gay, Peter, 彼得·盖伊 219, 224, 231

Gayer, Arthur D., 阿瑟·D.盖耶 30-32

Geary, Dick, 迪克·吉尔里 161, 163, 169, 171-72, 178

Geisteswissenschaften, 精神科学 238

Geoculture, 地缘文化 xiii, xv, 2, 19, 58, 96, 100, 131, 196, 217, 219, 268, 277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 *See* Interstate system 也见国家间体系条目

George, M.Dorothy, 多洛西·M.乔治 25

George, Margaret, 玛格丽特·乔治 76-77, 150-52

Germany (Germanies), 德国 xvi, 21, 27, 31, 41, 53-54, 58, 65, 70-73, 85, 87, 92-94, 97, 102, 105-6, 119, 131, 135-39, 141, 157-58, 160, 163, 167, 169, 171-74, 177-79, 184-85, 188-

90, 195, 197, 199-203, 207-10, 212, 214, 217, 229-30, 234, 237, 240-43, 246, 248, 250, 253, 256, 259-64, 268-70

Bavaria, 巴伐利亚 64, 119, 188

Frankfurt Assembly, 法兰克福议会 189

Katheder-Sozialisten, 讲坛社会主义者 230-31, 256, 263

Nazis, 纳粹 214, 237

Palatinate, 普法尔茨 64

Prussia, 普鲁士 39, 42, 64, 65, 68, 104, 119, 135, 138, 188, 240, 246, 259

Suffrage, 选举权 174, 177, 191, 200, 207

Wilhelm I, Kaiser,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 179

Vaterlandlos, 没有祖国的人 181

Zollverein, 关税同盟 119

Ghent, 根特 64-65

Giddens, Anthony, 安东尼·吉登斯 256

Giddings, Franklin, 富兰克林·吉丁斯 257

Gille, Bertrand, 伯特兰·基尔 34, 106, 108, 110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 207

Gilroy, Paul, 保罗·吉尔罗伊 211, 214

Girard, Louis, 路易·吉拉尔 93, 110, 131, 135-36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35, 74, 125, 183

Glasgow University, 格拉斯哥大学 244

Gobineau, Joseph Arthur, Comte de, 约瑟夫·阿瑟·戈宾诺伯爵 211, 213, 270

Godechot, Jacques, 雅克·戈德肖 147-48

Godkin, Edwin, 埃德温·戈德金 229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121

Goldfrank, Walter L., 沃尔特·L.戈德弗兰克 252

Goldman, Lawrence, 劳伦斯·戈德曼 133, 227-29, 231, 237, 243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51, 96, 103, 109

Gompers, Samuel, 塞缪尔·龚帕斯 183

Gonnet, Paul, 保罗·高奈 59, 79

Gordon, Ann D., 安·D.戈登 206

Gordon, H.Scott, 斯科特·H.戈登 245

Goriély, Benjamin, 邦雅曼·格列里 95

Gottesdienst, 做礼拜 239

Gouges, Olympe de, 奥兰普·德古 152

Gough, Barry, 巴里·高夫 125

Graham, Sir James, 詹姆斯·格拉汉姆爵士 88

Great Britain, *passim*. 英国, 见文中多处

Abolitionist movement, 废奴运动 27, 119-20, 183, 192, 197, 205-8, 271

Act of Union (1800), 联合法案 70

Anglicans 英国国教徒 (*see Church of England*) 也见英国国教条目

Anti-Combination Acts, 反结社法案 25, 80, 113, 137, 162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50, 103

Bank Charter Act (1844), 银行特许条例 103, 109

Benthamites 边沁主义者 (*see Utilitarians*) 也见功利主义者条目

Board of Trade, 贸易委员会 35, 71, 119, 227

Catholic Dissenters Relief Bill (1791), 对不信奉国教的天主教徒的救济法案 70

Catholic Emancipation, 解放天主教徒 70-72, 132

Chartism, 宪章运动 21, 73, 75, 83-84, 87-88, 114, 128, 137-

38, 165-68, 175, 192-93, 200

Christian socialism, 基督教社会主义 125, 140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 58, 70, 126, 130

Colonial Preference, 殖民地特惠政策 71, 118

Contagious Diseases Act, 传染病防治法 201

Corn Laws (and Repeal of), 谷物法 (和取消谷物法) 33, 35, 44-45, 71, 75, 83, 87-88, 95-100, 102, 109, 113, 119-21, 125, 132, 139-40, 200

Conservatives (see Tories)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95-96, 126

“*Entrepôt of the world,*” 世界的贸易中心 101

Fabianism, 费边主义 57, 115, 261

Factory Acts, 工厂法 15, 113, 137, 142

Fair Trading League, 公平贸易联盟 105

Financial crisis of 1816, 1816年金融危机 111

Fleet Street, 弗里特街 128

Food and Drug Acts, 食品和药物法 114

Gordon Riots, 戈登暴乱 44, 70

Great Victorian Boom, 维多利亚大繁荣 101, 104

Home Counties, 母国 126

House of Commons, 下院 43, 72, 134, 158

Ireland, 爱尔兰 35, 70-72, 74, 84, 88, 95, 128, 141, 165, 184, 215

Catholic Association, 天主教协会 71, 165

Easter Rebellion, 复活节起义 184

Potato famine, 马铃薯歉收 88

Ulster, 北爱尔兰 35

Irish Coercion Bill, 爱尔兰人强制转换法案 83

Irish workers in England, 在英格兰的爱尔兰工人 84

John Bull, 约翰牛 126

Labo (u) r Party, 工党 99, 174, 176, 191

Lancashire, 兰开夏 120-21, 130

Liberals 自由主义者 (see Whigs) 也见辉格党人条目

Little Englandism, 小英格兰主义 125, 130

Luddites, 卢德分子 26, 44

Manchester School, 曼彻斯特学派 8, 29, 101, 130, 134, 230

Masters and Servants Bill (1844), 主仆法 83

Methodists, 卫理公会教徒 27, 73

Municipalities Act, 市镇法案 83

Navigation Acts, 航海条例 53, 71, 99, 125

Nonconformism, 不信国教的人 52, 125

Norman Yoke, 诺曼枷锁 210

Pax Britannica, 英国统治下的和平 43, 125, 129

Pentrich Rising, 彭特里奇起义 44

Peterloo Massacre, 彼得卢大屠杀 25-26, 45-46, 51

Police Acts, 警察法 114

Poor Laws, 济贫法 26, 52-53

New Poor Laws, 新济贫法 83-84, 100, 114, 163

Pre-Raphaelitism, 前拉斐尔派 125

Presbyterians, 长老会教徒 126

Public Health Acts, 公共健康法 114

Reform Act (1867), 1867年改革法案 99, 132-34, 140

Reform Bill (1832), 1832年改革法案 75, 82-84, 100, 109, 113, 132, 136, 163, 204-5

Reform League, 改革联盟 133

Repeal of the Sliding Scale (1846), 取消按比例增减税收法案 99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 221

Scotland, 苏格兰 x, 24, 27, 51, 74, 172, 241, 244-45

Lowlands, 苏格兰低地 126

Speenhamland, 斯品汉姆兰法案 113

Stuarts, 斯图亚特王朝 41

Suffrage, 选举权 2, 9, 131-34, 136, 145, 165, 174, 191-92, 195, 200, 207, 272

Tamworth Manifesto, 塔姆沃斯宣言 17, 96

Ten Hours' Bill, 十小时法案 83-84, 100, 113, 163

Tories, 托利党人 4, 14, 18, 22, 26, 40-41, 43-44, 46, 51, 56, 59, 66, 70-72, 84, 88, 95-97, 99, 113, 115, 129-34, 138-42, 165

National Toryism, 国家托利主义 140

Peelism, 皮尔主义 97, 140

Tory Evangelicals, 托利党的福音派信徒 100

Tory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托利党人对历史的解释 44

Tory Reaction, 托利党反动时期 114, 22, 43-44

Tory workers, 托利党的工人 134, 140

Utilitarians, 功利主义者 8-9, 17, 23, 44, 63, 75, 100, 114, 132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女王 95, 115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 240-41

Whigs, 辉格党人 2, 14, 25-26, 31, 44, 46, 51, 70-74, 83, 88, 97-100, 120, 125, 133-35, 138-40, 163, 175-76, 228-29, 274

White settler colonies/White Dominions, 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白人自治领 125, 173

“Workshop of the world, ” 世界工厂 31, 120

Young Englandism, 青年英格兰主义运动 125

See also under Hegemony 也见霸权统治下条目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111, 115

Greece, 希腊 24, 43, 55-58, 62, 94, 141, 267-70

Greeley, Horace, 霍勒斯·格里利 206

Greer, Donald M., 唐纳德·M.格瑞尔 87

Grégoire, Abbé Henri Jean-Baptiste, 阿贝·亨利·让-巴蒂斯特·格雷戈瓦 153-54

Grey, Lord, 格雷爵士 69-70, 73-74

Griffith, Elisabeth, 伊丽莎白·格里菲斯 206

Grimm, Jacob, 雅各布·格林 214, 240

Groh, Dieter, 迪特尔·格罗 158, 169, 174, 179, 181

Gross, Leo, 利奥·格罗斯 41

Grossman, Henryk, 亨利·格罗斯曼 226, 245

Gruner, Wolf D., 沃尔夫·D.格鲁纳 39

Gueniffey, Patrice, 帕特里斯·格尼费 145

Guérard, Albert, 阿尔伯特·杰拉尔 108

Guesdists, 盖德派 179-80, 184-85, 189-90

Guichen, Eugène, Vicomte de, 尤金·基尚子爵 61-63, 67-68, 85

Guilbert, Madeleine, 玛德琳·吉尔伯特 185-88, 190

Guillaumin, Colette, 柯里特·圭洛敏 210, 213, 236-37

Guizo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基佐 6-9, 48-49, 59, 68, 77-79, 85-87, 91, 108, 116, 127, 136, 210, 212, 241

Gunnell, John G., 约翰·G.冈内尔 235, 263

Guyot, Raymond, 雷蒙·居约 61, 68, 84-85

H

Hackett, Amy, 艾米·哈克特 195

Hainault, 厄诺 64

Halbwachs, Maurice, 莫里斯·哈布瓦赫 255

Halévy, Elie, 埃利·阿勒维 2, 9, 14-17, 21, 27, 38-39, 43-44, 51-52, 72-74, 83-84, 87-88, 101, 114, 138, 158, 160

Halifax, 哈利法克斯 129

Hall, Alex, 亚历克斯·霍尔 179

Hall, Catherine, 凯瑟琳·霍尔 196

Halpérin, Jean, 让·安贝翰 87

Hamburg, 汉堡 65

Hamilton, Sir William, 威廉·汉密尔顿爵士 224

Hammen, Oscar J., 奥斯卡·J.哈曼 87

Hammond, J.L., J.L.哈蒙德 112

Hansen, Erik, 埃里克·汉森 176, 180

Hardy, Gathorne, 盖索尼·哈迪 133

Harley, C.Knick, C.尼克·哈雷32

Harper, William Rainey, 威廉·雷尼·哈珀 258

Harsin, Paul, 保罗·哈尔辛 66

Hart, Jennifer, 詹妮弗·哈特 44, 115

Hartmann, Heidi, 海蒂·哈特曼 185

Haskell, Thomas L., 托马斯·L.哈斯克尔 229, 232, 237

Hasquin, Hervé, 埃尔韦·哈斯奎恩 63

Hasselman, Wilhelm, 威廉·哈赛尔曼 177

Haupt, Georges, 乔治·豪普特 171, 176-77, 184

Hause, Steven C., 斯蒂文·C.豪斯 150, 189, 200

Hauser, Henri, 昂里·豪塞 223, 225, 241

Hausmann, Georges-Eugène, 乔治·欧仁·奥斯曼 110

Haute banque, 高特银行家集团 110-11

Hayek, Frederick A.von, 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 18, 78, 219, 244, 251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240, 270-71

Hegelians, Young, 青年黑格尔派 78

Hegemony, 霸权 104

American, 美国霸权 xii, xvi

British, 英国霸权 xii, xv-xvi, 21, 30, 33, 39, 41, 43, 54,

84, 103, 118, 129, 135

Dutch, 荷兰霸权 xii, xiv

Heiniger, Ernstpeter, 恩斯特皮特·海尼格 236

Henderson, W.O., W.O.亨德森 35, 70

Hendricks, Margo, 玛格·亨德里克斯 210

Herberg, Will, 威尔·赫伯格 180

Herbst, Juergen, 尤根·赫伯斯特 238

Herr, Lucien, 吕西安·埃尔 255

Hersh, Blanche Glassman, 布兰奇·格拉斯曼·赫什 205-6

Hertz, Deborah, 黛博拉·赫兹 193

Hertz, Robert, 罗伯特·赫兹 225

Hervé, Florence, 弗洛伦斯·埃尔韦 186, 199

Herz, Henriette, 亨利埃特·赫兹 193

Hexter, J.H., J.H.赫克斯特 70

Heywood, Colin, 柯林·海伍德 52, 100, 180

Higham, John, 约翰·海厄姆 232

Hill,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希尔 210

Hill, R.L., R.L.希尔 51-52, 137, 140

Hilton, Boyd, 博伊德·希尔顿 45

Himmelfarb, Gertrude,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132

Hinsley, Curtis M.Jr., 小柯蒂斯·M.亨斯利 233, 272

Hinton, James, 詹姆斯·辛顿 133, 169, 174-75, 183, 185-86,
191

Historicism, 历史主义 238, 240-41, 249

Historische Zeitung, 历史学报 242

History, as science or humanism, 历史学, 是作为科学还是作为人文学科 222, 224-25, 228, 235, 237-44, 247-49, 261, 263-65, 267-68, 272

Hoagland, Henry E., 亨利·E.霍格兰德 169

Hobhouse, L.T., L.T.霍布豪斯 16

Hobsbawm, Eric J., 艾瑞克·J.霍布斯鲍姆 8, 17, 29-30, 37-39, 51, 56-57, 77, 79, 89-90, 102, 113, 155, 161, 167, 171, 174-78, 186, 212, 240-42

Hodgson, Geoffrey M., 杰弗里·M.霍奇逊 248

Hoffmann, Walther, 瓦尔特·霍夫曼 32

Hofstadter, Richard,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236-37, 251, 257

Hogg, Quintin, 昆汀·霍格 4

Hohenberg, Paul, 保罗·霍恩伯格 37

Holland.荷兰 *See* Netherlands 也见尼德兰条目

Holland, Bernard, 伯纳德·霍兰德 44, 71, 121

Hollis, Patricia, 帕特里西亚·霍利斯 183

Holt, Peter, 彼得·霍尔特 25-26, 46, 71, 73

Holy Alliance, 神圣同盟 20, 40, 42-44, 48-49, 55-56, 58, 60-62, 65, 67, 75, 108, 117, 131

Holyoake, George Jacob, 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 128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64

Honeycutt, Karen, 卡伦·哈尼库特 189

Hong Kong, Kowloon, 香港, 九龙 121

Hope, House of, 信贷机构 112

Horton, Wilmot, 威尔莫·霍顿 52

Hoxie, R.Gordon, R.戈登·霍克西 261-62

Hufton, Olwen, 奥尔文·赫夫顿 151

Hughes, H.Stuart, H.斯图尔特·休斯 263

Humanité, L', 人道报 255

Humbolt,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洪堡 240

Hungary, 匈牙利 95, 128, 157, 159-60, 184

Huskisson, William, 威廉·哈斯基逊 53, 101

Hutchison, Henry Hunt, 亨利·亨特·哈奇森 262

Hutton, R.H.R.H.哈顿 121

Huxley, Julian, 朱利安·赫胥黎 213

Hyndman, Henry Mayers, 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184

I

Ideologies, 意识形态 xvi, 1-19, 23-25, 27, 31, 36, 43, 77, 91, 112, 114-15, 119, 123, 125-26, 138-41, 144, 147, 155-60, 162-64, 169, 178, 193, 196-97, 201, 204, 210, 213, 215, 217, 219-21, 227, 234-35, 237, 245, 249, 252, 255-56, 267, 275-77

Iggers, Georg G.,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48, 72, 78, 140

Ignatiev, Noel, 诺埃尔·伊格纳蒂夫 215

Imlah, Albert H., 阿尔伯特·H.伊姆拉 30-31, 34-36, 49, 54, 104, 104, 124, 129

India, 印度 xv, 30, 53, 58, 111, 121, 126-27, 268-70

Berar, 贝拉尔 114

India Office, 印度事务处 127

Oudh, 奥德 121

Punjab, 旁遮普 121

Sepoy Mutiny, 造反的印度士兵 125, 127

Indian Ocean, 印度洋 127

Indo-European languages, 印欧语系 269-70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xiii, xv-xvi, 8, 38, 69, 85, 101, 105, 275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xii, 36, 104, 120, 164, 167, 171, 173-74, 188, 196, 227

“Take-off, ” 起飞 36, 64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 183

Inequality. 不平等 *See* Equality 也见平等条目

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IEP). 巴黎政治学院 *See* Sciences Po 也见巴黎政治学院条目

International Workingmans' Association (IWMA) (1st International), 国际工人协会 (第一国际) 117, 170, 172, 176, 182, 186, 188

Interstate system, 国家间体系 22, 39, 68, 95, 111, 117, 176, 203

Ireland. 爱尔兰 *See* Great Britain 也见英国条目

Irving, Washington, 华盛顿·欧文 126

Italy (Italies), 意大利 7, 17, 41, 47, 54, 58, 61-62, 81, 82, 85, 105, 116, 124, 126, 128, 141, 146-48, 157, 159, 175, 180, 187, 191-92, 195, 198, 202, 210, 219, 240, 264, 269, 273

Carbonari, 烧炭党人 62

Naples, 那不勒斯 46, 95

Northern and Central,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94

Piedmont, 皮埃蒙特地区 68, 82, 123

Risorgimento, 复兴时代 180

Savoy, 萨伏伊 63, 82

Sicily, 西西里岛 95

Southern, 意大利南部 24

Suffrage, 选举权 191-92

J

Jacob, William, 威廉·雅各 227

Jacobinism, 雅各宾主义 2, 18, 77, 112. *See also under* France 也见法国条目

Jacquemyns, Guillaume, 纪尧姆·雅克敏 86

Jacqueries, 农民暴动 94

Japan, 日本 123, 189, 203, 212

Jardin, André, 安德烈·雅尔丹 22, 85

Jardine, Nicholas, 尼古拉斯·贾丁 222

Jaurès, Jean, 让·饶勒斯 155, 215, 255

Java, 爪哇 126

Jayawardena, Kumari, 库马里·贾亚瓦迪那 208

Jenks, Leland H., 利兰·H.詹克斯 43, 50, 88, 111, 119, 127

Jennings, Louis J., 路易·J.詹宁斯 97

Jeremy, David J., 大卫·J.杰里米 35

Jervis, Robert, 罗伯特·杰维斯 39

Jevons, William Stanley,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113, 247, 249

Jews, 犹太人 198, 21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50, 256-57

Johnson, Christopher H., 克里斯托弗·H.约翰逊 29, 61, 87

Johnson, Richard, 理查德·约翰逊 138

Johnston, Hugh J.M., 休·J.M.约翰斯顿 52

Jones, Gareth Stedman, 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 83, 162-63, 166-68, 173, 184

Jones, Thomas, 托马斯·琼斯 269

Jones, William, 威廉·琼斯 269

Jordan, Winthrop D., 温斯罗普·D.乔丹 213

Jore, Léonce, 莱昂斯·若尔 127-28

Judt, Tony, 托尼·朱特 165, 185

Juárez, Benito, 贝尼托·华雷斯 131

K

Kadish, Alon, 阿隆·卡迪什 247

Kalaora, Bernard, 伯纳德·卡劳拉 252

Kaplan, Steven L., 史蒂文·L.卡普兰 2, 49, 155

Karady, Victor, 维克托·卡拉迪 249, 255

Katznelson, Ira, 伊拉·卡茨内尔森 114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177-78, 198

Kealey, Gregory S., 格雷戈里·S.基利 181

Kelly, Joan, 琼·凯利 252

Kemp, Betty, 贝蒂·坎普 98

Kemp, Tom, 汤姆·坎普 108, 116

Kennedy, Marie, 玛丽·肯尼迪 192

Keyder, Çağlar, 恰拉尔·凯德 31, 36-37

Keylor, William R., 威廉·R.科勒 242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15, 219, 249

Kilmuir, Lord (David Maxwell Fyfe, 1st Earl of Kilmuir), 基尔穆尔勋爵 (大卫·麦克斯韦尔·费夫, 第一代基尔穆尔伯爵) 140

Kindleberger, Charles P.,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34, 115, 119

Kingsley, Charles, 查尔斯·金斯利 140

Kissinger, Henry A., 亨利·基辛格 5, 40, 42

Kitson Clark, G., G.基特森·克拉克 44, 74, 88, 97, 99, 102, 114

Kleinau, Elke, 埃尔克·克莱瑙 185

Klejman, Laurence, 劳伦斯·克莱曼 192, 199, 203

Klima, Arnost, 阿尔诺什特·克里玛 94

Knibiehler, Yvonne, 伊冯娜·克尼比勒 152

Knies, Karl, 卡尔·克尼斯 250

Knight, David, 大卫·奈特 225, 227

Knights of Labor, 劳工骑士团 181

Kocka, Jürgen, 尤尔根·科卡 158, 163-64, 167, 169

Kolakowski, Leszek, 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 17

Kollontai, Alexandra,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191

Kondratieff cycles, 康德拉基耶夫周期 96, 102, 104, 118, 276

Koyré, Alexandre, 亚历山大·柯瓦雷 48, 251

Kraditor, Aileen, 艾琳·克雷迪特尔 206-8

Kraehe, Enno E., 恩诺·E.克雷厄 39

Krefeld, 克雷菲尔德 64

Kriegel, Annie, 安妮·克里格尔 170-71

Kruger, Dieter, 迪特尔·克鲁格 230

Krupskaya, Nadezhda,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 191

Kuliscioff, Anna, 安娜·库里斯齐奥夫 191

Kulstein, David I., 大卫·I·库夫斯坦 116-17

Kumar, Krishan, 克里珊·库玛尔 168

L

Labrida, Antonio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186

Labrousse, Ernest, 欧内斯特·拉布鲁斯 5-9, 77, 86, 90, 101, 141, 158, 162, 171

Lacroix, Bernard, 伯纳德·拉克鲁瓦 253

Lafayette, Marquis de, 拉法夷特侯爵 62-63, 68

Lagos, 拉各斯 121

Laidler, David, 戴维·莱德勒 50

Laissez-aller, 自由放任 101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 8-11, 15, 31, 34-36, 53, 83, 85, 88, 98, 100-103, 105, 109, 112, 114-26, 130, 137, 229-30, 250, 255-56, 258, 263

Lamennais, Hugues Félicité Robert de, 雨果·菲利希黛·罗贝尔·德·拉梅内 23, 66-67, 90

Landes, David S., 大卫·S.兰德斯 34, 108

Landes, Joan B., 琼·B.兰德斯 149-52, 155, 196

Lanjuinais, Jean-Denis, 让·丹尼斯·朗奇耐 151

La Plata.拉普拉塔 *See Argentina* 也见阿根廷条目

Lasch,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拉什 215

Lassalle, Ferdinand, 斐迪南·拉萨尔 186

La Vallet (t) e, Duchess of, 拉法夷特公爵夫人 54

Le Bon, Gustave, 古斯塔夫·勒庞 24

Lebrun, Pierre, 皮埃尔·勒伯汉 63-65

Lechard (engraver), 勒查德 (雕刻者) 76

Leclerc, Jean-Théophile, 让-西奥菲尔·勒克莱克 152

Lecuyer, Bernard-Pierre, 伯纳德-皮埃尔·勒屈耶 48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罗兰
91, 95-96

Lee, Richard L., 理查德·L.李 223

Leeds, 利兹 45

Lefkowitz, Mary R., 玛丽·R.莱福克威兹 268

Legouvé, Ernest, 欧内斯特·乐高弗 197

Lehning, Arthur, 亚瑟·莱宁 158

Lenin, Vladimir Ilyich,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84, 191

Léon, Pierre, 皮埃尔·莱昂 115

Lepenies, Wolf, 沃尔夫·勒佩尼斯 220, 223, 254

Leslie, R.F., R.F.莱斯利 63, 96

Le Van-Mesle, Lucette, 吕塞特·勒·范-梅斯勒 245-46

Levant, 地中海东部国家 121

Levasseur, Emile, 艾米尔·李瓦塞尔 81-82, 85

Levy, Darline Gay, 达琳·盖伊·列维 150-52

Lévy-Leboyer, Maurice, 莫里斯·列维-勒布瓦耶 28-31, 36-37, 110, 122

Lewis, Gordon K., 戈登·K.刘易斯 213

Lewis, Jane, 简·刘易斯 187-88, 201

Lhomme, Jean, 让·洛姆 79

Liard, Louis, 路易·理亚德 250

Lichtheim, George, 乔治·里希特海姆 68, 159, 163

Liebknecht, Karl, 卡尔·李卜克内西 177

Liège.列日 *See under Belgium* 也见比利时条目

Limburg, 林堡 71

Linders, Else, 埃尔斯·林德斯 208

Linnaeus, Carl (Carl von Linné), 卡尔·林奈 (卡尔·冯·林奈) 235

Lipset, Seymour Martin,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180

Lis, Catharine, 凯瑟琳·里斯 65

Lisbon, 里斯本 59

List,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103, 105

Liverpool, Lord (Robert Jenkinson), 利物浦勋爵 (罗伯特·詹金逊) 44, 52, 79

Lloyd George, David, 大卫·劳合·乔治 74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162, 272

Lombroso, Cesare, 切萨雷·隆布罗索 198-99, 273

London, 伦敦 10, 25, 41-42, 68, 74, 83, 95, 108, 117, 120, 127, 161, 177, 184, 208, 222, 258, 262, 270, 274

Hyde Park, 海德公园 133

London, University of, 伦敦大学 222

Longuet, Jean, 让·龙格 177-78

Lorenz, Otto, 奥托·洛伦兹 255

Lorimer, Douglas A., 道格拉斯·A.罗利默尔 236, 272

Lovett, Clara M., 克拉拉·洛维特 147

Lowi, Theodore J., 西奥多·J.洛维 264

Lucerne, 卢塞恩 87

Luddism, 卢德主义 66, 161. *See also under* Great Britain 也见英国
条目

Luxemburg, 卢森堡 71, 189

Luzzatto, Gino, 吉诺·卢扎托 94

Lyon, 里昂 59, 65, 76, 80-82, 136, 162, 165, 246

M

Macauley, Thomas Babington,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83, 100

MacBride, Ernest, 欧内斯特·麦克布赖德 236

MacDonagh, Oliver, 奥利弗·麦克唐纳 44, 115, 216

MacGregor, Brig.Gen.Gregor, 旅长格雷格尔·麦格雷戈将军 54

Maehl, William, 威廉·梅尔 179

Magraw, Roger, 罗杰·麦格劳 107

Maistre.梅斯特勒 *See De Maistre* 也见德·梅斯特勒条目

Maloney, John, 约翰·马洛尼 237, 248-49

Malthus, Thomas, 托马斯·马尔萨斯 9, 52, 201

Manacorda, Gaston, 加斯顿·马纳科达 176

Managerial revolution, 管理革命 107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26, 334, 335, 45, 65, 125, 130, 200.
See also under Great Britain 也见英国条目

Manchester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曼彻斯特统计学会 227

Manning, D.J., D.J.曼宁 2, 5, 7, 16, 219, 240

Manuel, Frank E., 弗兰克·E.曼纽尔 18, 78, 212, 222

Marat, Jean-Paul, 让-保罗·马拉 154

Marczewski, Jean, 让·马克兹夫斯基 32, 36, 105

Marichal, Juan, 胡安·马榭尔 2, 6, 49

Maries, Marcel, 马塞尔·玛丽 255

Market (s), 市场 10, 14-15, 26, 29-31, 34-35, 38, 43, 45, 53, 65-66, 92, 96, 102, 104-5, 108, 110-11, 113, 120, 122, 130, 137, 143, 149, 165, 184, 196, 201, 203, 241, 244-45, 247, 252

Markovitch, Timohir J., 蒂默尔·J.马尔科维奇 30, 33-34, 36, 81, 86, 106

Marks, Harry J., 哈利·J.马尔克斯 179

Marquesas Islands, 马克萨斯群岛 127

Marrast, Armand, 阿尔芒·马拉特斯 90

Marshall, Alfred,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15, 101, 113, 144, 251, 247-49

Martineau, Harriet, 哈丽雅特·马蒂诺 193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14, 57, 77, 87, 107, 133, 155, 162, 171, 176, 178, 188, 216, 241, 244, 270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7, 19, 78, 161, 167, 171-73, 176-80,

184, 199, 230, 241, 249

Mason, E.S., E.S.梅森 17

Masure, Auguste, 奥古斯特·马苏尔 61-62

Mathias, Eric, 埃里克·马赛厄斯 178

Mawet, Francine, 弗兰辛·马威特 269

Mazzini, Giuseppe, 朱塞佩·马志尼 82, 94, 159

McClelland, Charles E., 查尔斯·E.麦克莱兰 24, 239

McCloskey, Donald N., 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 124

McCord, Norman, 诺曼·麦科德 96, 98-99

McCulloch, J.R., J.R.麦克库洛赫 52, 113, 240

McGregor, O.R., 麦格雷戈 229

McKenzie, Robert, 罗伯特·麦肯齐 133

McLaren, Angus, 安格斯·麦克拉伦 201

McMillan, James F., 詹姆斯·F.麦克米兰 190, 194, 198

Meek, Ronald L., 罗纳德·L.米克 244, 272

Mellon, Stanley, 斯坦利·梅隆 48-49, 67

Mellor, G.R., G.R.梅勒 96

Mendel, Gregor, 格雷戈尔·孟德尔 236

Menger, Carl, 卡尔·门格尔 248

Merrill, Lynn L., 林恩·L.梅利尔 271

Merriman, John M., 约翰·梅里曼 91

Mestro (Director of Colonies), 梅斯特罗 (殖民地总监) 90

Methodenstreit, 有关方法论的争论 248

Metternich, Prince Klemens Wenzel von, 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亲王 50, 20, 39-40, 42, 46, 55, 69, 87-88, 108, 117, 160

Mexico, 墨西哥 131, 183, 185

Archduke Maximilien, King of, 墨西哥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大公 131

Zuloaga, Pres.Félix María, 费利克斯·马里亚·苏洛阿加总统 131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131

Meyssonier, Simone, 西蒙娜·梅索尼埃 17

Michelet, Jules, 儒勒·米什莱 152, 198, 211

Migration, 移民 34-35, 38, 52-54, 59, 64, 81, 113, 165, 181-83, 186, 207-9, 217

Miguel, Dom, 米格尔一世 69

Mill, James, 詹姆斯·穆勒 145, 268, 269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7, 52-53, 73, 89, 100, 105, 126, 126, 192, 212, 232

Millar, John, 约翰·米勒 244

Milward, Alan S., 阿兰·S.米尔沃德 64, 70

Mink, Gwendolyn, 格温德琳·明克 204

Minogue, K.R., K.R.米洛 5

Mock, Wolfgang, 沃尔夫冈·默克 213

Moerenhaut (French consul in Tahiti), 莫伦胡特 (法国驻塔希提领事) 128

Mokyr, Joel, 乔尔·莫基尔 64, 102, 124

Moltke, Helmuth Bernhard Graf von, 赫尔穆特·贝恩哈特·格拉夫·冯·毛奇 130

Moluccas, the, 摩鹿加群岛 127

Mommsen, Wolfgang J., 沃尔夫冈·J.莫姆森 163

Monod, Gabriel, 布列尔·莫诺 241

Montesquieu, Baron de (Charles-Louis Secondat), 孟德斯鸠男爵 (夏尔-路易·塞孔达) 12, 210

Montgomery, David, 大卫·蒙哥马利 181

Montlosier, Comte François Dominique de Reynaud de, 弗朗索瓦·多

米尼克·德·雷诺孟德劳席尔伯爵 210

Monzoni, Anna, 安娜·孟佐尼 192

Moore, David Chioni, 大卫·基奥尼·摩尔 268

Moore, David Cresap, 大卫·克雷萨普·摩尔 71, 97-98, 134

Moore, R.J., R.J.摩尔 127

Moorhouse, H.F., H.F.穆尔豪斯 170, 174

Moravian Brethren, 摩尔维亚兄弟会 27

Morley, Charles, 查尔斯·莫利 68

Morley, John, 约翰·莫利 212

Morocco, 摩洛哥 184

Mortgage banks, 抵押贷款银行 110

Moses, Claire Goldberg, 克莱尔·戈德堡·摩西 158, 193-94, 200

Moses, John A., 约翰·A.摩西 176

Moses, Wilson J., 威尔逊·J.摩西 208

Moss, Bernard H., 伯纳德·H.莫斯 80, 163-64, 169, 179

Mosse, George L., 乔治·L.摩斯 97, 99, 202, 216

Murad Bey, 穆拉德总督 218

Musson, A.E., 34, A.E.穆森 118, 168

Myers, John Lynton, 约翰·林顿·梅耶斯 271-72

N

Naples.那不勒斯 *See under Italy* 也见意大利条目

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波拿巴 *See under France* 也见法国条目

Narváez, Gen, Ramon María, 1st Duke of Valencia, 拉蒙·玛利亚·纳瓦兹将军, 第一代巴伦西亚公爵 95

Nation, 民族 xvi, 23-24, 26-27, 39-40, 47, 49, 53, 56-58, 61, 66-68, 71, 74, 79, 82, 84-87, 89-95, 103, 106, 108, 110, 115-18, 124-26, 129-30, 135, 137-38, 140-41, 143, 145, 147-50, 153-54, 156-61, 164-65, 171-74, 176-84, 187, 190-91, 197-99, 201, 205-6, 210-17, 229, 233, 237, 239-44, 246-47, 256, 260, 264

National American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 (NAWSA), 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 206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国家社会科学促进协会 *Se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SSA)* 也见社会科学协会条目

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 全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 208

National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

(NWSA) , 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 206

Nationalism.民族主义 *See* Nation 也见民族条目

Nationalist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

ents.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See* Nation 也见民族条目

Neale, R.S.R.S.尼尔 126

Negroes, 黑人 125, 207, 271. *See also* United States 也见美国条目

Nesselrode, Count, 聂索洛得伯爵 68

Netherlands, 尼德兰 64-68, 71, 85, 97, 112, 120, 122, 126,
148, 180, 269

Orange, House of, 奥兰治家族 67-68

William, King, 威廉国王 65-67, 109

Newbold, J.T.Walton, J.T.沃顿·纽博尔德 111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亚 127-28

New Hebrides, 新赫布里底群岛 127

Newman, Edgar Leon, 埃德加·列昂·纽曼 61, 81

Newman, Gerald, 杰拉德·纽曼 25

Newman, John Henry, 约翰·亨利·纽曼 225

Newmarch, William, 威廉·纽马奇 113

New Zealand, 新西兰 121, 127

Niboyet, Eugénie, 尤金妮亚·尼博耶 194

Nice, 尼斯 124

Nicolson, Harold, 哈罗德·尼科尔森 40-41

Niebuhr, Berthold, 贝特霍尔德·尼布尔 240

Nipperdey, Thomas, 托马斯·尼培代 238

Nisbet, Robert A., 罗伯特·A.奈斯比特 13, 18, 251, 268

Nolan, Mary, 玛丽·诺兰 178

Nora, Pierre, 皮埃尔·诺拉 148

Novick, Peter, 彼德·诺维克 235, 239

Nye, John Vincent (V.C.), 约翰·文森特·奈 34-36, 107, 124

Nye, Robert A., 罗伯特·A.奈 196, 203, 211

O

Oastler, Richard, 理查德·奥斯特勒 100, 140

O'Boyle, Lenore, 勒诺·欧波伊尔 167

O'Brien, Bronterre, 布隆泰尔·奥布莱恩 162

O'Brien, Patrick,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30, 36-37, 122

O'Connell, Daniel 丹尼尔·奥康奈尔 71, 165, 215

O'Connor, Feargus, 费格斯·奥康纳 84

O'Neill, William L., 威廉·L.奥尼尔 192, 195, 206, 209

Oberschall, Anthony, 安东尼·奥伯肖尔 230, 250, 257-58

Oceania, 大洋洲 54, 126-28

Offen, Karen, 卡伦·奥芬 188, 194, 197-98

Olcott, Teresa, 特里萨·奥尔科特 187

Orientalism, 东方学 218, 264-73

Egyptology, 埃及学 262-68

Indology, 印度学 268-70

Orientalists, 东方人 181, 214, 217

Orleans, Duke of, 奥尔良公爵 60, 73

Ortega López, Margarita, 玛格丽塔·奥尔特加·洛佩斯 196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xv, 42, 55, 110, 121, 128-29, 268, 276

Owenism, 欧文主义 52, 193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224

P

Pacific Ocean.太平洋 *See* Oceania 也见大洋洲

Paine, Tom, 托马斯·潘恩 161

Palmade, Guy P., 盖伊·P.帕尔梅德 91, 106

Palmerston, Viscount Henry John Temple,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子爵 84, 87-89, 95, 120, 129-30, 134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 107

Pankhurst, Emmeline,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ii

Pankhurst, Richard K.P., 理查德·K.P.潘克赫斯特 ii

Paris, 巴黎 41, 54, 60-63, 66, 68, 79, 81-82, 86-90, 93, 106, 108, 110, 135-36, 150, 153, 155, 165, 168, 171, 185, 190, 194, 218, 225, 241-42, 251, 253, 258-60, 262

Parker, C.J.W., C.J.W.帕克 210, 237

Parris, Henry, 亨利·帕里斯 9, 115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参与性观察 266

Parti Ouvrier Français (POF), 法国工人党 179

Paulet, Lord George, 乔治·鲍里特爵士 127

Paxton, Nancy L., 南希·L.帕克斯顿 198

Peasants, 农民 31, 45, 53, 81, 89, 93, 97-98, 101-3, 106-8

Peel, Sir Robert, 罗伯特·皮尔爵士 14, 17, 52, 71, 75, 79, 84, 87-88, 97-98, 101-3, 107, 109, 113, 119, 138-40

Pelling, Henry, 亨利·佩林 162, 171, 175

Péreire brothers, 贝列拉兄弟 108-9, 135

Péreire, Émile, 埃米尔·贝列拉 110, 112

Péreire, Isaac, 伊萨克·贝列拉 107

Perkin, Harold, 哈罗德·珀金 9

Perkins, Dexter, 德克斯特·帕金斯 54

Perlman, Selig, 塞利格·珀尔曼 182

Pernambuco, 伯南布哥 59

Perrot, Michelle, 米歇尔·佩罗 172, 180, 190, 194, 196, 200, 212

Peters, Louise-Otto, 路易莎-奥托·彼得 199

Peyrinhoff, Henri de, 亨利·德·派里姆霍夫 112

Phillips, Wendell, 温德尔·菲利普斯 205-6

Phoenicians, 腓尼基人 269

Physiocracy, 重农学派 245

Pieroni Bortolotti, Franca, 弗兰卡·皮埃罗尼·博尔托洛蒂 191

Pierrard, Pierre, 皮埃尔·彼拉德 157

Pigman, Geoffrey Allen, 杰弗里·艾伦·皮格曼 122

Pinchbeck, Ivy, 艾维·平奇贝克 188

Pinkney, David H., 大卫·H.平克尼 61

Pitcairn Islands, 皮特凯恩岛 125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小威廉·皮特 25, 50

Place, Francis, 弗朗西斯·普赖斯 73, 109

Plamenatz, John, 约翰·普拉梅内兹 10, 77, 82, 91-92, 117, 134-36, 163

Platt, D.C.M., D.C.M.普拉特 120-21

Plechanow (Plekhanov), Georgi,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 78

Plessen, Marie-Louise, 玛丽-路易斯·普莱森 230-31

Plessis, Alain, 阿兰·普莱西斯 105, 107, 110

Poland, 波兰 47, 58, 60, 62-63, 68-69, 71, 90, 94-97, 123, 126, 128, 141, 149, 183, 239-40

Posen, 波兰 126

Polanyi, Karl, 卡尔·波拉尼 10, 43, 96, 113, 118, 128

Poliakov, Léon, 莱昂·波里亚科夫 209-10, 213-14

Polignac, Prince Jules de, 朱尔·德·波利尼亚克亲王 61, 85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 *See Economics* 也见经济学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 237, 243, 245, 257-64

Politics,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群众参与政治学 x, 25-26

Pollard, Sidney, 西德尼·波拉德 69-70, 175

Ponteil, Félix, 费利克斯·彭泰尔 24, 59, 65, 67, 70

Poovey, Mary, 玛丽·普维 197

Popelinière, Lancelot Voisin de la, 兰斯洛特·弗瓦桑·德·拉·波普里尼 238

Portal, Magda, 马格达·波特尔 194

Portugal, 葡萄牙 17, 24, 43, 54, 69, 210, 264

Postgate, Raymond, 雷蒙德·波斯特盖特 57

Potts, David B., 大卫·B.波茨 257

Pouthas, Charles H., 夏尔·H.普塔斯 79, 106, 110, 116

Prebisch, Raúl, xiii 劳尔·普雷维什

Prewitt, Kenneth, 肯尼斯·普莱维特 232, 234

Price, Roger, 罗杰·普莱斯 61, 89, 92

Pritchard, George, 乔治·普里查德 127-28

Procacci, Giuliano, 朱利亚诺·伯加齐 180

Proctor, Robert N., 罗伯特·N.普罗克特 222, 234

Protestants, 新教徒 16, 27, 52, 65-67, 70-71, 180, 198, 209-10, 258

Prothero, I.J., I.J.普若瑟罗 45, 83

Proudhon, Pierre-Joseph,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 194, 198

Puech, Jules-L, 朱尔-L.普厄什 194

Q

Quadruple Alliance, 四国同盟 41

Quataert, Jean H., 让·H.奎塔特 186, 188-89

Quellenkritik, 考证研究 238-39

Querelle des femmes, 女性问题论战 152

Quero Molaes, J., J.葛罗·莫拉莱斯 94-95

Quintuple Alliance, 五国同盟 41

R

Rabaut, Jean, 让·拉博 189

Racism, 58, 153, 172, 种族主义 181-83, 204-17, 235-37, 268, 271, 277

Racz, Elizabeth, 伊丽莎白·瑞茨 151

Ragionieri, Ernesto, 埃尔内斯托·拉乔尼埃里 177, 179

Raimbach, Abraham, 亚伯拉罕·莱姆巴赫 x

Ralle, Michel, 迈克尔·罗利 166

Ranger, Terence, 特伦斯·兰格 240

Ranke, Leopold von, 利奥波德·冯·兰克 238-40

Ravenna, 拉文纳 54

Ravera, Camilla, 卡米拉·拉维拉 191

Read, Donald, 唐纳德·里德 26, 45, 51

Rebérioux, Madeleine, 马德琳·勒贝留 149, 184, 190, 194, 196

Redford, Arthur, 阿瑟·雷德福 125

Reformism, 改良主义 4, 6, 17, 50, 67, 107, 112, 114, 120, 139-40, 171, 173, 177-80, 190, 200, 226-27, 233, 243, 252, 274

Rémond, René, 勒内·雷蒙 6, 47

Renan, Ernest, 欧内斯特·勒南 224

Rendall, Jane, 简·伦德尔 199, 210

Renner, Karl, 卡尔·伦纳 184

Rennes, 雷恩 186

Renouvin, Pierre, 皮埃尔·勒努万 42-43, 56, 58, 63, 67, 85,
240

Revue historique, 历史评论 241

Reynolds, James A., 詹姆斯·A.雷诺兹 71

Rhys Davis, T.W., T.W.李斯·戴维斯 267

Ricardo, David, 大卫·李嘉图 43, 51-52, 113, 115, 248-49

Richelieu, Armand Jean du Plessis, Cardinal-Duc, 枢机主教阿尔芒·
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 115

Richter, Melvin, 梅尔文·里克特 254-55

Ringer, Fritz K., 弗里茨·K.林格 230, 239, 250, 256

Rist, Marcel, 马塞尔·瑞斯特 124

Roberts, David, 大卫·罗伯兹 4, 8-9, 44, 87, 100, 115, 124,
156

Robertson, William, 威廉·罗伯逊 244

Robertson, William Spence, 威廉·斯班瑟·罗伯逊 55

Robespierre, Maximilien de, 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 8, 148,
151-52, 154-55

Robinson, Ronald E., 罗纳德·E.罗宾逊 121

Rodgers, Brian, 布赖恩·罗杰斯 228

Roehl, Richard, 里夏尔·勒尔 37

Rogers, Guy Maclean, 盖伊·麦考莱恩·罗杰斯 268

Rogers, J.D., J.D.罗杰斯 101

Rogers, Thorold, 索罗德·罗杰斯 248

Rogier, Charles, 夏尔·罗日耶 88

Romania, 罗马尼亚 98, 159, 239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54, 56-58, 66-67, 91, 139-41, 149, 213, 215, 239, 251, 268-69

Romorino, Gen.Girolano, 吉罗拉莫·罗马里诺将军 82

Rosanvallon, Pierre, 皮埃尔·罗桑瓦隆 2, 7-8, 23, 49, 59, 138-39, 144-45, 224

Roscher, Wilhelm, 威廉·罗雪尔 248

Rosdolsky, Roman,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239

Rose, Ernst, 恩斯特·罗泽 170

Rose, Michael E., 迈克尔·E.罗斯 100

Rosenberg, Charles E., 查尔斯·E.罗森伯格 236

Ross, Dorothy, 多萝西·罗斯 222-23, 257

Ross, Edward Alsworth, 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 257

Rossi, Alice, 艾丽丝·罗西 192, 195

Rostow, W.W., W.W.罗斯托 28-31, 36, 64, 104

Roth, Guenther, 古恩瑟·罗斯 174, 177, 178-79

Rothermund, Dietmar, 德特马尔·罗德蒙德 269-70

Rothschilds, the, 罗斯柴尔德 43, 108, 110

Rougerie, Jacques, 雅克·鲁热里 135-36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7-8, 12, 32-33, 148, 160

Rouzade, Léonie, 莱昂尼·卢扎德 190

Rover, Constance, 康斯坦斯·罗沃 200-204

Rowbotham, Sheila, 希拉·罗博特姆 188, 196, 208

Rowe, D.J., D.J.罗 83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皇家统计学会 187

Royer-Collard, Pierre-Paul, 皮埃尔-保罗·罗耶-科拉尔 23

Royle, Edward, 爱德华·罗伊尔 166

Rubin, Gayle, 盖尔·罗宾 198

Rudé, Fernand, 费尔南·吕德 59, 62-63, 80, 162

Rudé, George, 乔治·吕德 73, 163

Rueschmayer, Dietrich,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 231, 235

Ruffin, Josephine St.Pierre, 约瑟芬·圣皮埃尔·鲁芬 208

Ruggiero, Guido de, 圭多·德·拉吉罗 10, 42, 48-49, 115, 239-41

Ruskin, John, 约翰·罗斯金 121

Russia, 俄国 xv, 21, 39, 41, 55, 62, 64, 68-69, 73, 98, 119, 125, 128-29, 173, 177, 191, 199, 207, 229, 264, 276

Cadet League, 立宪民主联盟 68

Decembrists, 十二月党人 68

Nicholas, Tsar, 沙皇尼古拉 149

Suffrage, 选举权 199, 297, 229

Russell, Lord John, 1st Earl Russell, 约翰·罗素勋爵, 第一代罗素伯爵 130, 218

Ruthenians, 罗塞尼亚人 239

Ruwet, Joseph, 约瑟夫·卢维 64

Ryan, Barbara, 巴巴拉·瑞安 205

S

Sadler, Michael Thomas, 迈克尔·托马斯·赛德勒 100

Saint-Gaudens, Auguste, 奥古斯都·圣高登 142

Saint-Simon, Comte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克劳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圣西门 16, 23, 76-79, 107, 127, 166, 212, 251, 252, 255

Sakellariou, Michel, 米歇尔·萨克雷吕欧 94

Samoa, 萨摩亚群岛 127

Samuel, Raphael, 拉斐尔·塞缪尔 32

Sapieha, Prince Léon, 莱昂·萨佩哈亲王 69

Saul, S.B., S.B.索尔 64, 70

Saumoneau, Louise, 路易斯·索曼瑙 189

Saville, John, 约翰·萨维尔 158-59

Savoie, Antoine, 安托内·萨伏依 252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See under Europe* 也见欧洲条目

Schapiro, J.Salwyn, 塞尔文·J.萨皮罗 6, 21, 132, 141

Schefer,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谢弗 62, 85, 127, 130-31

Scheldt, the, 斯凯尔特河 65

Schenk, H.G., H.G.申克 40-42, 55

Schlegel,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 214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小阿瑟·M.施莱辛格 6

Schleswig-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30

Schlote, Werner, 维尔纳·施洛特 31, 105

Schmoller, Gustav von,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230-31, 256

Schoelcher, Victor, 维克托·舍尔歇 90

Schopper, Carl, 卡尔·肖伯尔 161

Schorske, Carl E., 卡尔·E.肖斯克 171, 177-78

Schöttler, Peter, 彼得·舍特勒 179, 181

Schroeder, Paul W., 保罗·W.施罗德 39-40

Schuyler, Robert L., 罗伯特·L.斯凯勒 53, 88, 118-19, 129, 134

Schwab, Raymond, 雷蒙·施瓦布 214

Schwartz, Anna Jacobson, 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 30-32, 50

Schweber, S.S., S.S.施韦伯 222

Science, natural, 自然科学 7, 9, 15, 50, 53, 57, 77-78, 91, 97, 105, 114, 119, 138, 141, 190, 196-98, 201-3, 213-14, 217, 220, 222-27, 233-34, 236, 271-72, 275

Sciences Po, 巴黎政治学院 258-59, 261-63

Scientists.科学家 See Science, natural 也见自然科学

Scott, Joan Wallach, 琼·瓦莱赫·斯科特 152, 155, 158, 168

Scott, Walter, 沃尔特·司各脱 57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国际 176-77, 184

Second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 *See* World War II 也见二次世界大战

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FIO),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176

Sée, Henri, 亨利·塞 30, 32, 80-81, 86, 106, 117

Semites.犹太人 *See* Anti-Semitism 也见反犹太种族主义

Semmel, Bernard, 伯纳德·索美尔 120-21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1848), 塞尼卡福尔斯会议 195, 206

Senior, Nassau William, 纳骚·威廉·西尼尔 100-101, 113

Serbs, 塞尔维亚人 159, 239

Seton-Watson, Hugh, 休·希顿-沃森 69, 129-30

Seton-Watson, R.W., R.W.希顿-沃森 42, 54, 58, 129-30

Sewell, William H., Jr., 小威廉·H.西维尔 161, 163-64, 169

Shaftesbury, 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沙夫茨伯里勋爵 (安东尼·艾希里·库柏, 第三代伯爵) 100, 140

Shapiro, Fred R., 弗雷德·R.夏皮罗 6, 269

Shaw, Robert Gould, 罗伯特·古尔德·肖 142

Shefter, Martin, 马丁·谢夫特 181-82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121

Sievers, Sharon, 沙伦·西沃斯 187, 203

Siéyès, Emmanuel-Joseph, 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耶斯145, 147,
160

Silva, Pietro, 皮埃特罗·席尔瓦 69

Silver, Allan, 阿兰·席尔瓦 133

Simiand, François, 弗朗索瓦·西米安 255

Simon, André, 安德烈·西蒙 66-67

Simon, Jules, 朱尔·西蒙 198

Simon, Walter M., 沃尔特·M.西蒙 16, 210

Skinner, Andrew S., 安德鲁·S.斯金纳 241

Slave trade, Atlantic, 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27

Sleiden, John, 约翰·斯莱丹 238

Slicher van Bath, B.H., B.H.斯里彻·范·巴斯 63

Slovaks, 斯洛伐克人 230

Slovenes, 斯洛文尼亚人 239

Small, Albion, 阿尔比恩·斯莫尔 256-57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7, 100, 115, 126, 161, 344, 272

Smith, Gerrit, 格里特·史密斯 203

Smith, Paul, 保罗·史密斯 134, 140

Snow, Charles Percy, 查尔斯·佩尔西·斯诺 221

Soboul, Albert, 阿尔伯特·索布尔 155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199, 253

Social Gospel movement, 社会福音运动 257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0-19, 77-78, 80, 85-93, 102, 106-7, 114-15, 125-26, 135-36, 140-41, 152, 158-65, 168-81, 184, 188-95, 198-200, 203, 214-16, 231, 234, 251-58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 xvi, 36, 157, 167, 170, 187, 203, 219-73, 276-77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Value Neutrality, 专业化和价值中立 231-37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SSA), 社会科学协会 228-29, 231, 252

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Homme, 人权协会 163

Société d'Économie Sociale, 社会经济协会 252

Société Générale, 通用公司 109

Sociology, 社会学 234, 241, 251-58, 261, 263-64

Soffer, Benson, 本森·索弗 182

Solomon Islands, 所罗门群岛 127

Soly, Hugo, 雨果·索利 65

Soreau, Edmond, 埃德蒙·索罗 154

Sorenson, Lloyd R., 洛伊德·R.索伦森 101

South Africa, 南非 54, 183

Griqualand, 格里夸兰 121

Natal, 纳塔尔 121

Transvaal, 德兰士瓦 121

Southgate, Donald G., 唐纳德·G.索斯盖特 71, 74-75, 114, 133

Sovereignty, popular (of the people), 主权在民 xvi, 1-2, 5, 7, 11-13, 21-27, 111, 116, 143-44, 148, 150, 156, 220

Sowerwine, Charles, 查尔斯·索维温 189-92

Spain, 西班牙 2, 17, 24, 42-43, 46, 53-56, 69, 94-95, 121, 130-31, 148, 164, 166, 180, 210, 264

Carlists, 西班牙王室正统派 69

Cortés, 西班牙议员 2, 95, 148

Ferdinand, 费迪南 2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18, 198, 213, 231, 252-53, 255, 258

Staël, Mme.de (Anne-Louise Germaine Necker), 斯塔尔夫人 (安妮-露易斯·热尔曼娜·内克) 23, 193

Stanton, Elizabeth Cady, 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 191, 205-6, 208

Stark, Werner, 沃纳·斯塔克 78

Starzinger, Vincent, 文森特·斯达日戈 79

Statism, 国家干预主义 9-10, 13-16, 22, 27, 113, 137, 139-40

Stearns, Peter N., 彼得·N.斯特恩斯 80, 167

Stengers, Jean, 让·斯唐热 66-68

Stepan, Nancy, 南希·斯特潘 214

Stern, Leo, 利奥·斯特恩 178

Stevenson, John, 约翰·斯蒂文森 44, 70

Stieg, Margaret F., 玛格丽特·斯蒂格 242

Stites, Richard, 理查德·斯蒂茨 191, 199, 207

St.-Malo, 圣马洛港 127

Stocking, George W., Jr., 小乔治·W.斯托金 99

Stoddard, Lothrop, 劳斯洛普·斯托达德 212

Stone, Lucy, 露西·斯通 206

Stuart, Robert, 罗伯特·斯图尔特 179-80

Stuart, Sir Charles, 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 41

Stürmer, Michael,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 91

Suel, Marc, 马克·苏 46, 60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107

Suffrage, 选举权 15, 75, 132, 137-38, 174, 199, 200-201, 209

Capacity as basis for suffrage, 作为选举权基础的能力 7, 138, 145, 191, 233

See also under Austria;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Russia; United States 也见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俄国条目

Sumner, Charles, 查尔斯·萨姆纳 206, 257

Super, R.H., R.H.苏佩尔 224

Switzerland, 瑞士 17, 37, 87, 95, 122, 176, 189, 229

Sonderbund, 分离主义者联盟 87

Sykes, Robert, 罗伯特·塞克斯 165

Sztejnberg, Maxime, 马克西姆·斯特恩伯格 181

T

Tahiti, 塔希提岛 127-28

“Take-off.”起飞 *See under* Industrialization 也见工业化条目

Talabot, Leon, 莱昂·塔尔博特 122

Talleyrand, Charles Maurice de,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 41, 61-62, 68, 84, 136

Tampico, 坦皮科 131

Tarlé, Eugène, 叶甫根尼·塔尔列 61

Taylor, Arthur J., 阿瑟·J.泰勒 44, 101

Taylor, Barbara, 巴巴拉·泰勒 145, 193

Taylor, Edward B., 爱德华·泰勒 273

Taylor, W.Cooke, W.库克·泰勒 50

Temperley, Harold, 哈罗德·特默帕理 42, 55-56

Tenant farmers.租佃农场主 *See* Peasants 也见农民条目

Terlinden, Charles, 查尔斯·特林登 66

Thatcher, 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 140

Théret, Bruno, 布鲁诺·特莱 115, 117

Theriot, Nancy M., 南希·M.塞里奥特 201

Thibert, Marguerite, 玛格丽特·蒂贝尔 193-95

Thiers, Adolphe, 阿道夫·梯也尔 60, 80, 91, 136

Thomas, Edith, 伊迪丝·托马斯 90

Thomis, Malcolm I., 马尔科姆·I.托米斯 25-26, 46, 71, 73

Thompson, Dorothy, 多萝西·汤普森 192

Thompson, E.P., E.P.汤普森 44, 156

Thompson, F.M.L., F.M.L.汤普森 33, 99

Thompson, Victoria, 维多利亚·汤普森 195

Thönnessen, Werner, 维尔纳·腾尼森 185

Tilly, Charles, 查尔斯·蒂利 81, 89, 161

Tilly, Chris, 克里斯·蒂利 192

Tissot, Louis, 路易·狄索 94

Titian (Tiziano Vecelli), 提香 (提香·维切利) 121

Tixerant, Jules, 儒勒·迪克斯朗 194-95

Todorov, Tzvetan, 茨维坦·托多洛夫 213

Tønnesson, Kåre D., 凯尔·D.滕内森 155

Tönnies, Ferdinand, 斐迪南·滕尼斯 263

Tooke, Thomas, 托马斯·图克 113

Torstendahl, Rolf, 罗尔夫·托斯坦达尔 232

Toussaint L'Ouverture, 杜桑·卢维杜尔 154

Train, George Francis, 乔治·弗朗西斯·崔恩 206

Treaty of 1831 (Netherlands-Belgium), (尼德兰-比利时) 1831年
条约 109

Treaty of Nanking (China-Great Britain), (中国-英国) 南京条约
127

Tribe, Keith, 基思·特雷伯 246-47, 249

Tristan, Flora, 弗洛拉·特里斯坦 165, 185, 194

Troppau, Congress of, 特拉波会议 46

Trouillot, Michel-Rolph, 米歇尔-拉尔夫·特鲁罗 242, 273

Tuamolu, 图阿莫鲁岛 127

Tudesq, André-Jean, 安德烈-让·蒂德斯克 2, 12, 16, 22, 79,
85-86, 94

Tuñon de Lara, José Manuel, 何塞·曼努埃尔·图尼昂·德拉拉 165

Turati, Filippo, 菲利普·屠拉蒂 180, 191, 199

Turgeon, Charles Marie Joseph, 夏尔·马利·约瑟夫·图尔戎 194

Turgot, Jacques, 雅克·杜尔哥 272

Turin, Yvonne, 伊冯·图林 197-98

Turkey.土耳其 *See Ottoman Empire* 也见奥斯曼帝国条目

Turner, R.Steven, R.斯蒂文·特纳 222, 224

Two Cultures, 两种文化 220-26

U

Ukrainians 乌克兰人 239

United Kingdom.联合王国 *See Great Britain* 也见英国条目

United Provinces.联省共和国 *See Netherlands* 也见尼德兰条目

United States, 美国 xiii, xvi-xvii, 14, 22, 28-30, 32-33, 35, 53-54, 98-99, 104, 111, 118, 125, 128-31, 141, 162, 167, 169, 173-74, 179-83, 191, 195, 199-201, 204, 206-9, 213, 215-16, 221, 227-29, 231-33, 236, 243-44, 246, 250, 253, 256-58, 261, 263-64, 268, 271, 275

Buchanan, Pres.James, 詹姆斯·布坎南总统 131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88

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0), 排华法案 162

Civil Rights Act (1962), 民权法案 206

Civil War, 美国内战 111, 118, 129, 131, 142, 182, 205, 228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22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122, 128, 180, 206

Hawaii, 夏威夷 127-28

Lincoln, Pres.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 205

Monroe, Pres.James, 詹姆斯·门罗总统 68

Monroe Doctrine, 门罗宣言 54, 128

Mugwumps 共和党独立派 (see Republi-can Party) 也见共和党条目

Point Four, 四点计划 107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204-5, 261

Slavery and Jim Crow, 奴隶制和种族隔离 215

Suffrage, 选举权 174, 195, 200, 205-7, 209

Texas, 得克萨斯州 87

Thirteenth,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Amendments, 第13、14和15条修正案 205-6

Truman, Pres.Harry S., 哈里·杜鲁门总统 107

Wilson, Pres.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183

See also under America; 也见美国条目 Hegemony 也见霸权条目

Unkian-Skelessi, Treaty of, 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 85

Urquhart, David, 戴维·厄克特 128

V

Vallette, Aline 阿莱恩·瓦莱塔 185

Van der Linden, Marcel, 马塞尔·范·德·林登 179, 178

Van Kallen, Frans, 弗兰茨·范·凯伦 66

Van Kol, Henri, 亨利·范·柯尔 184

Van Rossen, Roman, 罗曼·范·罗森 231, 235

Varnhagen, Rachel, 拉赫尔·瓦恩哈根 193

Vatican, the, 罗马教廷 66

Gregory XVI, 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 67

Mirari vos, 通谕 67

Pius IX, 教皇庇护九世 87

Vellacott, Jo, 乔·韦拉科特 203

Venezuela, 委内瑞拉 54

Venice, 威尼斯 64-65, 112

Vénil, (Jeanne-) Désirée, (让娜-) 德西雷·瓦瑞尔 193

Veracruz, 韦拉克鲁斯 131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社会政策协会 230-31, 234-35, 250

Verley, Patrick, 帕特里克·维尔莱 107

Vermeil, Edmond, 埃德蒙·维梅尔 94

Versailles, 凡尔赛 136, 149-50, 259

Verviers, 维尔维耶 64

Veysey, Lawrence R., 劳伦斯·R.维赛 233

Vidal, César, 塞萨尔·维达尔 40

Vienna, 维也纳 88

Vienna, Congress of/Treaty of (Concert of Europe), 维也纳会议/
条约 (欧洲和解) 39-41, 49

Vigier, Philippe, 菲利普·维吉耶 106

Villemain, Abel-François, 阿贝尔-弗朗索瓦·维叶门 212

Villermé, Louis-René, 路易-勒内·维尔梅尔 81

Vincent, Gérard, 杰拉尔·文森特 259-61

Vinet, Ernest, 欧内斯特·维内 260

Viner, Jacob, 雅各布·维纳 9, 100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

148, 213

Von Courland, Dorothea, 多萝西娅·冯·库尔兰 193

Vovelle, Michel, 米歇尔·伏维尔 23

W

Wagner, Donald O., 唐纳德·O.瓦格纳 126

Wakefield, E.G., E.G.韦克菲尔德 53

Waldeck-Rousseau, Pierre, 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 180

Walker, Kenneth O., 肯尼斯·O.瓦尔克 101

Walker-Smith, Derek, 德里克·沃克-史密斯 119

Walkowitz, Judith R., 朱蒂斯·沃克维茨 201

Wallerstein, Immanuel,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2, 36, 40, 80, 113, 118-22, 153, 155, 188, 210

Wallis, 沃利斯群岛 128

Walras, Léon, 莱昂·瓦尔拉 244

Waterloo, 滑铁卢 22, 39, 45-46, 54, 65

Ward, J.T., J.T.沃德 52, 73, 83, 101, 166

Ward, Lester, 莱斯特·沃德 257

Ware, Vron, 弗伦·韦尔 207-8, 215

Warsaw, 华沙 90

Washington, Booker T. (Mr. & Mrs.), 布克·T.华盛顿夫妇 208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121

Watson, George, 乔治·沃特森 1, 13, 115

Webb, Sydney and Beatrice, 韦伯夫妇, 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 262-63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228, 234-35, 253-54, 256, 263

Webster, C.K., C.K.韦伯斯特 40, 46

Webster, Daniel, 丹尼尔·韦伯斯特 128

Wells, Ida B., 伊达·B.威尔斯 215

Weil, Cdt.Maurice-Henri, 莫里斯-亨利·威尔 87

Weill, Georges, 乔治·威尔 50, 56-57, 69, 84, 87, 107

Weingart, Pater, 彼得·魏因加特 237

Weisz, George, 乔治·魏兹 242-46, 255

Wellington, Duke of, 威灵顿公爵 41, 52, 61-62, 70-75, 84, 109, 140

Werner, Karl Ferdinand, 卡尔·费迪南德·韦尔纳 116

West Indies, 西印度 96

Whately, Robert, 罗伯特·惠特利 247

White, R.J., R.J.怀特 1, 4, 12, 45-46

White settlers, 白人殖民者 58, 126, 153-54, 173

Wilkie, David, 大卫·威尔基 x

Willard, Claude, 克劳德·威拉德 179-80, 184

Willard, Frances, 弗朗西斯·威拉德 208, 215

Wilson, Sir Robert, 罗伯特·威尔逊爵士 54

Winch, Donald, 唐纳德·温奇 53

Wittrock, Björn, 比约恩·维特洛克 227, 233

Wolff, Richard J., 理查德·J.沃尔夫 50, 117, 148, 156, 211

Women, 妇女 iv, 145, 149-52, 184-204, 206, 208, 216

Politics of breach vs, politics of assault, 不合作策略对攻击性策略
200

Temperance movements, 禁酒运动 202

Woolf, Stuart, 斯图尔特·沃尔夫 50, 117, 148, 156, 211

Wollstonecraft, Mary,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193

World religions, 世界性宗教 265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103, 105, 123, 128, 131, 173,

177, 183, 201, 209, 219, 250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123

Wright, H.R.C., H.R.C.怀特 64-66

Wright, Vincent, 文森特·怀特 91

Y

Yeo, Eileen, 艾琳·约 166

Yeo, Richard R., 理查德·R.约 222, 225

Z

Zeldin, Theodore, 西奥多·泽尔丁 47, 91, 93, 97, 117, 138

Ziolkoski, Theodore,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 223

Zurich, 苏黎世 165, 177

Zylberberg-Hocquard, Marie-Hélène, 玛丽-艾莱娜·西尔伯贝格-奥
卡尔 72

译者的话

翻译沃勒斯坦教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对自己的知识面和语言能力都是一次考验。《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涉及的时段是从1789/1815年到1914年，即我们习惯称之为世界近代史的下半时期。沃氏以他大师级学者深厚的知识积淀与敏捷的思考、辨析能力，实践着他所倡导的“人的科学”的尝试，就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等涉及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体系性的论述。而他所引用的材料除英文以外，还有法、德、西班牙等文。对于翻译这样一卷巨著，个人能力多有不逮之处。在专业知识方面，我向恩师庞卓恒先生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郭方先生请教颇多；在语言方面，我向景德祥先生（德语）、黄艳红先生（法语）、秦海波先生和王文仙女士（西班牙语）请教颇多，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应该说，在世界历史研究所这个通晓各国语言人才荟萃的单位工作，对我翻译此书帮助良多。

伴随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跨学科，甚至全学科的研究确应作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发展目标，就像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为我们所展示的那样。但就目前史学界的现状看，情况并不乐观。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宏大叙事正在被人们所摒弃，微观叙事则为人们津津乐道。尽管最近有宏大叙事的复兴，像大历史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但离沃勒斯坦提出的建构“人的学科”的理想尚有很远的距离。从大历史本身讲，它是要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集合在一起，书写囊括自然史和人类史在内的全面的历史。如何保障学者们的研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如何保障受众能够理解这种包容各学科的知识，都是困难的。从历史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历史学受社会科学影响，并趋

向社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提出了写作整体史的目标，但在高歌猛进一段时间后却最终走向碎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史学研究居主流地位的是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彻底走向整体史的反面。从社会科学看也不例外。尽管沃勒斯坦提出建构“人的科学”的宏伟蓝图，而且在撰写《现代世界体系》中也力争实现这一目标。但直到这第四卷，能够读到的只是集中于中心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历史，看不到半边缘区，更看不到对边缘区历史发展的记述。书中在涉及这两类地区时也只是作为中心区发展的背景存在。因此，若以建构“人的科学”为目标，从写作世界史的角度看，《现代世界体系》仍是存有缺陷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践行跨学科研究尽管是必要的，但它的难度却是极大的。需要像沃勒斯坦这样的大师级学者的开拓性探索，以使历史学的构建一步步走向“整体史”，真正实践“人的科学”的研究。

对这卷书的翻译，我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但毕竟个人的知识面和外语水平有限，问题一定不会少，敬请读者指正。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书目

-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 35.00
元
-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
《饥饿与公共行为》 35.00
元
- 阿玛蒂亚·森
《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 48.00元
- 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
《生活质量》 68.00
元
-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59.00
元
- 曼纽尔·卡斯特

元	《认同的力量》（第二版）	59.00
	曼纽尔·卡斯特	
元	《千年终结》	45.00
	孙伟平 选编	
元	《罗蒂文选》	53.00
	涂纪亮 编	
元	《皮尔斯文选》	49.00
	涂纪亮 编	
元	《杜威文选》	49.00
	万俊人 陈亚军 编	
元	《詹姆斯文选》	59.00
	李国山 编	
元	《刘易斯文选》	45.0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	49.00
元		
费尔南·布罗代尔		
	《地中海考古》	49.00
元		
山口重克		
	《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	35.00元
莱斯特·M.萨拉蒙等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59.00
元		
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		
	《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	49.00
元		
詹姆斯·M.布坎南/罗杰·D.康格尔顿		
	《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	39.00
元		
詹姆斯·S.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	125.00
元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	
元	《发展经济学》（第三版）	59.00
	理安·艾斯勒	
元	《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	39.00
	理安·艾斯勒	
元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49.00
	理安·艾斯勒	
元	《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	68.00
	安东尼·吉登斯	
元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39.00
	露丝·本尼迪克特	
元	《文化模式》	29.00
	涂纪亮 编	
	《莫里斯文选》	58.00

元

杜丽燕 余灵灵 编

《布里奇曼文选》

49.00

元

李真 编

《普特南文选》

69.00

元

丁东红 编

《米德文选》

68.00

元

约翰·H.杰克逊

《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

59.00

元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哲学家》

98.00

元

H.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35.00

元

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

元	《社会学之思》（第二版）	29.00
	汤姆·R.伯恩斯等	
元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	59.00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元	《理论与实践》	49.00
	马克斯·韦伯	
元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	45.00
	克里斯托弗·戴尔	
元	《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	49.00
	吉尔贝·李斯特	
元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59.00
	佩里·安德森	
元	《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59.00

	尤尔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59.00
元		
	何伟亚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69.00
元		
	唐纳德·萨松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	
	（上、下册）	
189.00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98.00
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98.00
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98.00
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元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

98.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美）沃勒斯坦（Wallerstein, I.）著；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97-4929-6

I.①现... II.①沃... ②郭... III.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
IV.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068号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

——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

著者/（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者/吴英

校者/庞卓恒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赵怀英 段其刚

（010）59367004 责任校对/陈晓永 高利娟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岳阳

项目统筹/祝得彬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本卷印张/30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本卷字数/475千字

印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929-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1282号

定价/489.00元（四卷本）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值20周年社庆之际，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其二是问题意识；其三是开放意识。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的基本理念。



《现代世界体系》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颇具影响力的多卷本著作，对全球史进行了重新阐释，将现代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确定为从16世纪到20世纪。

《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覆盖1789~1914年这段时期，专门用于探讨一种适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沃勒斯坦认为该地缘文化大体是以他所称的中庸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塑造的，并由它所支配。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和令人振奋的著作。它对自由主义中间路线是如何在全世界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做了重要的说明，对世界体系分析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是过去50年间社会科学的一次重大创新。在本卷书中，世界体系理论最重要的创新者继续推进他在1974年开启的事业，从编年史和从理论的视角看都是如此。它提出了‘全球地缘文化’的概念，深化了对世界体系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诸方面之间关系的理解。”

——克雷格·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

“由于对海量的资料进行了有条理的组织，由于对有说服力的细节做了精准的选择，所以沃勒斯坦的书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在延续前几卷书叙事风格的基础上，第四卷充满了睿智的和令人惊叹的解释转句，对19世纪的意识形态、政治和运动这些已经被过多讨论的论题做出了颇具创新性的解释。它显现出沃勒斯坦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优秀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历史社会科学的伟大理论家。本卷书对沃勒斯坦的整个研究计划做了最好的概括。”

——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ISBN 978-7-5097-4732-2

定价：98.00元

www.ssap.com.cn